# 王树增战争系列

## 全四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 总　目　录

长征

解放战争（上）（1945.8—1948.9）

解放战争（下）（1948.10—1950.5）

朝鲜战争

王树增战争系列

# 长征

王树增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征 / 王树增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 978- 7- 02- 005798- 6

I.长… II.王… III.纪实文学- 中国- 当代 IV.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90833号

责任编辑：脚 印 李羽壮

装帧设计：刘 静

责任校对：王鸿宝

责任印制：周小滨

长 征

王树增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670千字 开本680×1000毫米1/16 印张41 插页4

2006年9月北京第1版 2009年9月第10次印刷

印数 144001—154000

ISBN 978- 7- 02- 005798- 6

定价 53.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前言

当人类社会迈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人类一〇〇〇年》一书由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出版，该书公布了从公元一〇〇〇年至公元二〇〇〇年的千年间，人类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一百件重要事件。来自世界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们共同认为，在已经过去的整整一千年中，这一百件重要事件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这些事件包括：一〇八八年，世界上第一所大学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诞生——人类的真知有了得以“世代相传的智慧之地”；一五八二年，罗马教会颁布了历法——从此日历“见证着组成我们生活的每一分钟”；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人类第一次全社会性的革命将平等的法律制度传向了全世界；一八〇四年，海地获得自由——世界上有了“第一个独立的黑人共和国”；一八三〇年，第一列火车从英国的利物浦开出——人类只能通过脚力推进陆地运输的时代结束；一八九六年，法国人顾拜旦开创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它使人类实现了“把世界各国联合起来”的梦想；一九〇五年，爱因斯坦发表关于能量守恒定律的论文——人类的思维第一次“深入到了宇宙的两个基本构成：物质和能量的内在联系”中；一九五三年，DNA链的奥秘被解开——它使人类得以“弄清我们是怎样成为我们自己的”；一九六九年，“阿波罗”十一号宇宙飞船登月——全世界得以开始探索星球之谜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们是惟一的人类吗？尽管人类登上月球与人类进化过程相比，仅仅相当于生命从海洋刚刚来到陆地……

这些最具影响力的事件可以告诉今天的人类，世界“是如何变当时的沧海为今日的桑田”。历史淘汰了千百万匆匆过客，留下的是那些能够书写并见证人类已往生存面貌的人与事，是那些能够启发和塑造人类未来生存理想的人与事。而这些人与事无不使人类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并足以说明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震撼人心。

公元一〇〇〇年，中国北宋真宗咸平三年。

公元一〇〇〇年至公元二〇〇〇年间，中国的三个事件被世界认为具有巨大影响，并入选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百件重要事件。

第一个事件：一一〇〇年，火药武器的发明。

早在公元十世纪初的唐朝末年，中国人就开始将火药用于军事。至宋代出现了燃烧性火器、爆炸性火器和管形火器。一一三二年，即宋高宗绍兴二年，宋军在和入侵中原的金军的战争中，首次使用了靠火药燃烧喷火杀伤对方的火枪。由中国人发明并首先使用的火药武器，使人类战争从此进入了热兵器时代，剧烈地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形态——“以常备军队为后盾的中央集权国家取代了封建分封制。火枪使殖民者对于土著人有了更大的优势。但是，这种武器的广泛传播最终使大家又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从而使一个充满着革命、世界大战、游击战和恐怖主义爆炸的时代来临了。”整整一千年过去了，无论当代科技如何发展，只要子弹和炮弹还在世界上继续被使用，火药武器依旧是战争兵器的主角，并继续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或倒退。

第二个事件：一二一一年，成吉思汗的帝国。

自公元一二一九年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起，蒙古帝国凶悍的骑兵横扫中亚和欧洲腹地，铁戈所指，势如破竹。成吉思汗的军事占领使

“蒙古帝国成为历史上拥有土地最多的国家”——“西至波斯和阿拉伯［今伊拉克］，东南至朝鲜、缅甸和越南。几乎所有俄国的土地都在他们手中”。一二二七年成吉思汗去世后，“他的继承者窝阔台狂风暴雨般地征服了波兰和匈牙利，一直打到了多瑙河岸边”。然而，对于历史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军事征服，而是成吉思汗的西征“在客观上造成了东西方的交流”——欧洲人得以知道“亚洲人竟然用纸作钱币，一种被叫做煤的石头居然可以用作燃料”。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第一次，蒙古骑兵的铁蹄和尖矛打通了东西方文明的隔膜，促成了东西方政治、军事、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内文明成果的碰撞、交融和嫁接，由此产生出的奇异现象使人类生活陡然显得异彩纷呈，至今欧亚大陆上仍有众多的文明成果与这次东西方真正的交融有关。

第三个事件：一九三四年，长征。

可以肯定的是，来自世界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们，在评选一千年间影响了人类历史进程的一百件重要事件时，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共产党人并无共同之处，他们也不是从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国红色武装的军史角度来看待长征的。

长征是什么?

毫无疑问，在二十一世纪回首长征，我们应该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去探寻中国历史上的这一重要事件。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不畏艰难险阻的远征。长征跨越了中国十五个省份，转战地域面积的总和比许多欧洲国家的国土面积都大。长征翻越了二十多座巨大的山脉，其中的五座位于世界屋脊之上且终年积雪。长征渡过了三十多条河流，包括世界上最汹涌险峻的峡谷大

江。长征走过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广袤湿地，那片人迹罕至的湿地面积几乎和法国的国土面积相等。而更重要的是，在总里程远远超过两万五千里的长征途中，中国工农红军始终在数十倍于己的敌人的追击、堵截与合围中，遭遇的战斗在四百场以上，平均三天就发生一次激烈的大战。除了在少数地区短暂停留之外，在饥饿、寒冷、伤病和死亡的威胁下，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中不但要与重兵“围剿”的敌人作战，还需要平均每天急行军五十公里以上。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不畏牺牲的远征。一九三四年十月，红一方面军作战部队八万六千多人踏上长征之路，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全军仅为近八千人。一九三五年三月，红四方面军近十万大军开始西渡嘉陵江，自此踏上万般曲折艰险的长征之路，一九三六年十月到达甘肃会宁时全军三万三千多人。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红二方面军两万一千多人从国民党三十万大军的合围中冲出，踏上了长征之路，一九三六年十月到达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时，全军一万一千多人。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留下的一支红军武装——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踏上长征之路，经过数月的颠沛流离和艰苦转战，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部队，全军兵力最多时不足八千人，最少时兵力只有一千多人。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传播理想的远征。中国工农红军转战大半个中国，一路浴血奋战，舍生忘死，用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传播着中国共产党人改天换地的革命理想。长征唤醒了中国的千百万民众，给予了他们世代从未有过的向往和希望——自世界近代文明的潮流猛烈地冲击了这个东方大国之后，生活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赤贫的农民、手工业者、失业的产业工人从共产党人的宣传中懂得了人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世间可以有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于是，当那面

画着镰刀斧头的红旗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时候，他们第一次知道了共产党人所领导的革命和工农红军所进行的征战可以改变世间的一切不公。他们随手抓起身边的锄头、铁锤甚至仅仅只是一根木棍，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跟随着那面红旗一路远去，他们坚信这条道路的尽头就是劳苦大众千百年来所梦想的中国——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走向一个崭新的中国的启程。

长征属于人类历史上这样一种事件：即使经过了漫长的岁月，依旧被世人追寻不已。数十年来，不断有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年龄的人出现在中国工农红军曾经走过的这条漫长征途上。在人类物质与精神的文明高速发展的今天，世人何以要忍受疲惫、劳顿和生存条件的匮乏，行走在这条蜿蜒于崇山峻岭和急流险滩的路途上？在地球的另一端，曾出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于一九八一年秋天宣布，他要来中国进行一次“沿着长征路线”的跋涉。他来了，带着他的全家走上了一九三四年中国工农红军走过的路。当这位西方政治家走到大渡河渡口的悬崖边时，他被这条湍急的河流和两岸险峻的崖壁震惊了，他被三万多中国工农红军在十几万国民党军的追堵中渡过这条大河的壮举震惊了。布热津斯基后来说：“对崭露头角的新中国而言，长征的意义绝不只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史诗，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它是国家统一精神的提示，它也是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长征是突破了国度、阶级和政治界线的人类精神的丰碑。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人，无论持有何种意识形态，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给予人类的精神财富，是走向理想所必需的永不磨灭的信念。

长征是信念不朽的象征。

一位叫B.瓜格里尼的意大利诗人这样写道：

黑夜沉沉，朦胧的黎明前时分，

遥望辽阔而古老的亚细亚莽原上，

一条觉醒的金光四射的巨龙在跃动、跃动，

这就是那条威力与希望化身的神龙！

他们是些善良的，志气高、理想远大的人，

交不起租税走投无路的农家子弟，

逃自死亡线上的学徒、铁路工、烧瓷工，

飞出牢笼的鸟儿——丫环、童养媳，

有教养的将军，带枪的学者、诗人……

就这样汇成一支浩荡的中国铁流，

就这样一双草鞋一杆土枪，踏上梦想的征程！

世界上不曾有过像中国工农红军这样的军队：指挥员的平均年龄不足二十五岁，战斗员的年龄平均不足二十岁，十四岁至十八岁的战士至少占百分之四十。在长征征途上，武器简陋的红军所面对的往往是装备了飞机大炮且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年轻的红军官兵能在数天未见一粒粮食的情况下，不分昼夜地翻山越岭，然后投入激烈而残酷的战斗，其英勇顽强和不畏牺牲举世无双。在两万五千里的征途上，平均每三百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

世界上不曾有过像中国工农红军这样的军队，官兵军装是一样的，头上的红星是一样的，牺牲时的姿态也是一样的。在中国工农红

军中，无论是政治和军事精英，还是不识字的红军战士，官兵如同一人的根本是他们都坚信自己是一个伟大事业的奋斗者，他们都坚信中国革命的队伍“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他们激情万丈、前仆后继、视死如归，决心为每一个红军所认同的理想牺牲生命。

因为付出了太多的牺牲，因为在难以承载的牺牲中始终保有理想和信念，所以，一切艰难险阻皆成为一种锻造——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留下的是：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以及无与伦比的勇敢。这些都是可以创造人间奇迹的精神。物质和精神是认识生命的过程中两个互相依存但处于不同空间的要素。前者是须臾的，后者是永恒的；前者是脆弱的，后者是坚实的；前者是杂芜的，后者是纯净的。支撑生命最可靠的力量不是物质而是精神——小到决定一个人人格的优劣，大到决定一个民族和国家文明的兴衰。

一个没有精神的人，是心灵荒凉的人。

一个没有精神的民族，是前程暗淡的民族。

精神的质量可以改变个人与世界的命运。

经过了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成为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人类一〇〇〇年》对此评价道：“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带领着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进入了社会主义。毛泽东震撼了亚洲和拉丁美洲，他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看到了农民推翻了几百年来的帝国主义统治。”

长征永载人类史册。

长征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壮丽史诗。

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有理由读懂中国工农红军所进行的长征。读懂了长征，就会知道人类精神中的不屈与顽强是何等的伟大；就会知道生命为什么历经苦难与艰险依然能够拥有快乐和自信；就会知道当一个人把个体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时，天地将会多么广阔，生命将会何等光荣。

为此，我们有必要重新上路，走过那千山万水，感受那风霜雨雪，认识中国工农红军中杰出的共产党人和行进在这支队伍中的伟大的红军士兵。

- 第一章 突出重围
- 第二章 绚丽之梦
- 第三章 十送红军
- 第四章 路在何方
- 第五章 山河苍茫
- 第六章 橘子红了
- 第七章 血漫湘江
- 第八章 恭贺新年
- 第九章 夜郎之月
- 第十章 残阳如血
- 第十一章 巴山蜀水
- 第十二章 金沙水畔
- 第十三章 喜极之泪
- 第十四章 黑暗时刻
- 第十五章 北斗高悬
- 第十六章 天高云淡
- 第十七章 北上北上
- 第十八章 江山多娇

# 第一章 突出重围

1934年10月·贵州甘溪



货郎带来的消息使那个蒙蒙细雨中的偏僻小镇一度陷入混乱之中，人们纷纷收拾起可以携带的财物逃进深山密林，只留下一条横贯小镇的空荡荡的死街。那个消息说:“赤匪来了。”

湿润的天地间只有细雨落入红土的沙沙声，寂静令进入小镇的红军官兵感到了一丝不安，他们沿着街道两侧的土墙停下了脚步。二十二岁的前卫营营长周仁杰在把这个空旷的小镇探视了一遍之后，站在镇口下意识地朝通往县城方向的土路上看了一眼——就在这一瞬间，

他看见了从朦胧雨雾中突然闪现出的三个穿土黄色上衣和短裤的人，以及三个人身后跟着的那条同样是土黄色的狗。

接踵而来的巨大灾难令这位年轻的红军营长永生难忘，即使在十六年后他已成为新中国的海军将领时，回想起这个瞬间周仁杰说他依旧会不寒而栗。那三个土黄色的身影和那条土黄色的狗的突然出现所导致的后果影响深远：它不仅使红军的一支部队在艰难跋涉数月之后面临着一场恶战，而且对于整个中国工农红军来说它还是一个危险的预兆，预示着中国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军事转移将是充满艰辛与磨难的远征。

这一瞬间发生的时间是：一九三四年十月七日上午九时。

甘溪，贵州省东北部石阡县城西南二十公里处的一个南北走向的小镇，小镇被险峻的山岭环抱着。

叙述数十年前发生在中国的那次非同寻常的军事行动——长征，必须从远离中央苏区和主力红军数千里之外的甘溪小镇和一支红军部队开始，理由很简单：尽管当时中国的红色武装已经被分割成若干个孤立的区域，但红军始终是一个整体。所有的红军成员，无论是占少数的政治军事精英，还是占多数的赤贫的农民官兵，因为有着共同的理想和信仰，他们在精神上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是中国共产党人最早的政治追求。所以，没有理由把一个人或一支部队认定为中国革命史上的政治主角——自人类进入有政治纷争的时代以来，所有推进文明的力量从来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群体，而只能是某一种理想或某一种信仰。

周仁杰的前卫营所在的部队，在当时的中国工农红军中被称为第六军团。第六军团两个月前离开了赖以生存的根据地，那片根据地在山高林密的江西境内，有一个至今令无数中国人向往的名字——井冈山。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已经在根据地转战了近五年的第六军团接到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由于局势日益恶化，“六军团继续留在现地区，将有被敌人层层封锁和紧缩包围之危险”，因此必须撤出根据地，以“最大限度地保存六军团的有生力量”，并运用游击战争“破坏湘敌逐渐紧缩湘赣苏区的计划及辅助中央苏区之作战”。而一个特别之处是，命令要求第六军团把一切都带走。仓促的准备之后，第六军团在八月七日这个炎热的日子里动身了。他们不知道撤离根据地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有什么意义，他们不知道此刻的撤离对于他们几乎等于在走向虎口，他们甚至连最终要去哪里都不知道。他们知道的仅仅是：必须在敌人逐渐压缩的重重包围中冲出去，然后在偌大的国土上重新寻找一块可以生存之地。

突围行动开始了，整整四天之内，第六军团七千多人的队伍不停地在碉堡群中穿梭。碉堡群是国民党军为封锁红色根据地修建的，在交通干道上黑压压地连成一线。组成第六军团的绝大部分是湖南籍士兵，平均年龄不超过二十岁，其中还有十名女性，他们几乎携带着根据地的一切，包括兵工厂的老虎钳子，印刷厂的石印机，医院的医疗设备，甚至还有病床的床板，发电机、脱粒机和磨面机。负重累累的队伍突然出现在重重封锁线间，令认为他们很快就会被消灭的国民党军万分惊愕。就在敌人短暂的不知所措中，第六军团突破了地方民团的阻击到达了第一个集结地：寨前圩。

在寨前圩，突围的红军建立起正式的指挥系统，并宣布了第六军团领导成员，除了二十九岁的军团参谋长李达是陕西人外，其余的是

清一色的湖南人。他们是：军团长萧克，二十六岁；军团政治委员王震，二十六岁；军团政治部主任张子意，三十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三十岁。第六军团的战斗部队分为两个师：军团长萧克兼任十七师师长，十八师师长由三十岁的湖南人龙云担任。然后，年轻的军团领导和红军官兵召开了大会庆祝突围成功。可就在他们群情激昂地高呼"誓死保卫胜利果实"的时候，兵力数十倍于他们的敌军正迅速地从四面包围而来，这些部队除了国民党政府直接指挥的中央军外，还包括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省的军阀部队。

由于军情紧急，第六军团第二天就重新上路了，急切地奔向他们预定的第二个集结地：湘江。他们必须渡过这条自南向北贯穿湖南全境的大河。显然，第六军团的红军官兵过早地庆祝了胜利，因为接下来的突围在铺天盖地的"围剿"中几近出生入死。敌人在湘江沿线的防守极其严密，且已从各个方向开始实施大兵力夹击。八月二十三日，第六军团到达了位于湘江东岸的一个叫蔡家埠的渡口，他们这时才发现江对岸已经布满了严阵以待的敌人。猝不及防令他们在湘江东岸不停地徘徊，与夹击他们的敌人兜着圈子。最终，第六军团不得不放弃渡过湘江的计划，掉头往回走，进入了广东与湖南交界处的阳明山中。但是，进入山区便可以暂时立足的想法很快就被这片荒山的极度贫瘠粉碎了。为了部队能够生存，只有再次突围。第六军团先是向北，绕过敌人的侧翼，然后突然向南，几天之后又折向西，他们再一次接近了湘江。虽然连续的行军和不断的遭遇战严重消耗了第六军团有限的兵力，但是九月四日，一个夜色昏暗的晚上，红军官兵以一场恶战在重围中撕开了一道缝隙，他们终于渡过了湘江。这时候，中革军委的命令再次到达，命令要求第六军团在广西与湖南交界处的武冈山地区坚持到九月二十日，然后向北与红军第三军取得联系。

红军第三军转战在湖南西部，中国革命史中称那片开满高高的巴茅花的土地为湘西。

红三军的领导人名叫贺龙。

当第六军团按照命令开始折向北的时候，国民党军很快调整了部署重新包围上来。数次交战之后，第六军团在湖南、广西与贵州三省交界的荒蛮地区再次陷入严重危机。九月二十五日，湘军第三十二旅和第五十五旅的猛烈阻击使他们无法按照预定路线前进，而桂军和黔军也火速自南向北包抄而来，第六军团被迫绕行在广西边界的大山中。二十六日凌晨时分，他们发现自己绕到了敌人早已部署完毕的阻击阵地前。

桂军第二十四师的机枪子弹暴雨一般，第六军团必须打开通路，红军官兵只有迎着密集的子弹挺身而上。整整一天的激战令第六军团伤亡严重，他们只有再次进入荒山野岭之中，但是这一次敌人紧追而来。军团命令十八师五十二团和五十四团阻击，以掩护军团主力突围。阻击战斗进行得异常残酷，当放弃阻击阵地的命令传来时，两个团都没有了撤退的后路。这是挣脱罗网一般的突围：五十二团伤亡一百五十人；五十四团损失殆尽，团长赵雄阵亡，团政委身负重伤。

第六军团在撤出根据地后的一次次突围中损失严重，唯一的收获是他们发现在所有企图消灭红军的国民党军队中，黔军的战斗力是最弱的。于是，第六军团决定迎着黔军打开缺口冲出包围圈。这个判断果然正确，红军最终击溃了黔军的阻击一路进入贵州，占领了贵州东北部的一个小城——旧州。在旧州，第六军团不但获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而且还得到了急需的给养，随军的担子中又多了数万块银元和一部无线电发报机。更令军团长萧克惊喜的是，他得到了一张一平方

米大的地图。而在这之前，这位年轻的红军指挥员作战时所依靠的地图是从中学课本上撕下来的，那上面只有简单的城镇地名和山河的大致走向。只是，这张极其珍贵的地图上的文字是红军不认识的洋文，为此，萧克把旧州天主教堂里一个名叫薄复礼的英国传教士叫来询问。

三十六岁的薄复礼原名鲁道夫·阿尔弗雷德·勃沙特·比亚吉特，出生在瑞士德语区，后移居英国曼彻斯特。他在一个从中国回到曼彻斯特的英国传教士那里知道了中国，并开始向往去中国传播上帝的福音——“虽然我没有路费，但是在上帝那里什么也不缺，因为在我的脑海里，中国仿佛就在曼彻斯特的郊区。”一九二二年，比亚吉特传教士在一条日本船上漂泊了二十天才到达中国。他长途跋涉至贵州偏僻的山区，在那里一待便是十二年。他结了婚，给自己取了“复礼”这个极具中国色彩的名字，而之所以选择“薄”姓，是因为他认为“这个汉字有细、瘦、贫穷、刻薄、小气、吝啬、轻视、轻率等异常丰富的内涵”。

此刻，这位又细又瘦又贫穷的传教士极其紧张，因为红军要求他尽快筹集足够数量的银洋、枪支和药品，而薄复礼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在担心失去生命的巨大恐惧中，薄复礼就着一盏煤油灯的亮光，用了大半夜的时间，将那张地图上的法文全部翻译成了中文。这个举动一下就缓解了红军与传教士之间的敌对情绪。但最终薄复礼还是被要求留在红军队伍中，因为面对日益严重的伤亡红军认为他能搞到药。薄复礼就这样跟随着中国工农红军度过了他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年半的时光，并且在历尽艰难困苦之后活了下来。他于一九三六年四月在昆明附近被释放。当时军团长萧克主持了一个小小的欢送会，红军特地为他准备了一只鸡让他品尝。薄复礼离开中国回到英国后对全世

界说："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著，是前所未闻的。"

整整五十一年后，在英国曼彻斯特安度晚年的薄复礼与已经成为新中国高级将领的萧克彼此又获得了消息，萧克在致薄复礼的信中说："虽然我们已分别半个世纪，但五十年前你帮我们翻译地图的事久难忘怀……"

对旧州的占领并没有缓解第六军团所面临的危机，萧克在地图上找到了与红三军会合的准确位置，而去往那个方向必会陷入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中。第六军团决定暂时放弃直接向北，转向西，渡过横贯贵州境内的水流湍急的乌江，再以乌江为屏障寻找机会向北靠近红三军。但是，当第六军团到达乌江岸边准备冲破黔军防线的时候，中革军委的电报又到了，电报严令他们"无论如何不得再向西移动"。电报同时说，贺龙的部队已经占领贵州与湖南交界处的印江，做好了接应第六军团的准备；而追击的敌军正在向南移动，第六军团应该立即掉头向东北方向的石阡一带前进。从地图上看，这确实是一条与红三军会合的最近的路线。但是，随后发生的事实证明，敌军向南移动的情报是没有根据的推测，而这一推测几乎断送了整个第六军团。此刻，敌人已准确地判断出，第六军团如果急切地想与贺龙的部队会合，就只有通过石阡县城向东北延伸而去的那条土道。于是，当第六军团在乌江岸边研究如何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的时候，国民党中央军、黔军、桂军和湘军已经制定出了完整的大规模合围计划。第六军团就这样从乌江边折返，向着贵州东北方向，一步步走进了埋伏着巨大危险的包围圈中。

十月七日凌晨，第六军团从乌江边的走马坪出发了，行军序列是十七师、军团部和十八师。十七师五十一团为前卫团，三营为前卫团

的前卫营，营长周仁杰处在团侦察班与营尖刀排之间，他认为这个位置有利于处置随时发生的情况。往后，周仁杰可以看见跟随五十一团团部的军团参谋长李达和跟随三营营部的五十一团参谋长马赤。前卫营进入甘溪镇后，团侦察班和营尖刀排伸出镇外，向石阡方向观察警戒。此时，第六军团的大部已行至官庄至甘溪镇的十几公里的山路上。

尽管中革军委的电报说敌人已经向南移动了，也就是说，至少今天可以放心地按照预定路线前进，因为无论是前面还是后面都没有敌情了，但是军团指挥员们还是无法完全放心。队伍出发后不久，军团部特别询问了在路上遇到的邮差，并且仔细研读了从邮差那里获得的报纸，而无论邮差的话还是报纸的报道，都证明中革军委提供的情报是准确的——见多识广的邮差说他没有在石阡方向发现军队，报纸的报道中也没有国民党军在石阡地区活动的蛛丝马迹。这一切似乎很好，因为很久没有这样的情况了。数日来第六军团一直处在被围困和追击之中，每天传给部队的行军命令只能含糊地把宿营地点写成“相机宿营”，而今天关于宿营地点的命令中明确地写着：甘溪。尽管情况很好，却好得令人有点不那么放心。此刻，第六军团的士兵坐在湿漉漉的路边休息，女战士甚至开始梳理让雨水淋湿的头发。马上就要到达宿营地了，如果太阳能够出来，找到些干柴烧些热水把肿胀的脚泡一泡，幸运的话再找到些包谷山芋什么的塞到嘴里，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围着火堆边烤衣服边唱歌吧。但是，红军官兵所有美好的期望，都被那三个在雨雾中突然出现的穿着土黄色上衣和短裤的人以及跟在他们身后的那条土黄色的狗彻底地粉碎了。

周仁杰的手下意识地伸进衣服摸出驳壳枪，同时向穿着便衣的侦察班班长周来仔递了个极特殊的眼神。周来仔带领几个同样穿着便衣

的侦察员迅速迎了上去，然后突然扑倒了两个穿着土黄色上衣和短裤的人，另一个人连同那条土黄色的狗跑掉了。

狗在奔跑时狂吠不已，凄厉的叫声打破了山野的寂静。被红军侦察员抓获的人咿里哇啦，说的是周仁杰听不大懂的土话，这些发音奇怪的土话和疯狂不止的狗叫混杂在一起，使周仁杰愈加紧张起来。土话是广西方言，可以肯定，眼前的这两个人是桂军的侦察员。接着，俘虏的口供令周仁杰的脑袋像炸开了一样：桂军第十九师的先头部队已经接近甘溪镇北面的山脊了。

周仁杰立刻命令把这两个俘虏送到军团部去，同时命令两个连沿着镇边的土墙火速散开，机枪配置在侧翼，另一个连跑步上山占领前面的无名高地——这一切，都是周仁杰的本能反应，是在没有任何命令的情况下，瞬间作出的决定。

但是，俘虏送走了好一会儿，周仁杰仍没接到军团传来的行动命令，他看见的依旧是正常行军的景象：第六军团先头部队的一部已经陆续进入了甘溪镇，几个干部坐在一家店铺门口好像在开会；红军士兵已经开始做饭，炊烟正慢慢地向镇子上空飘散，而主力部队仍在镇外远处的土道旁休息——这一切令周仁杰恍惚觉得敌人并没有出现，刚才在镇口突然闪出的桂军仿佛只是一个幻觉。

时间一分一分地流逝过去。

接近中午十二时的时候，枪声响了。

枪声居然来自镇中！

镇子里传出的枪声令红军官兵惊异万分，他们顺势用桌子和凳子当掩体，一边没有目标地四处射击，一边急速地向镇外撤退。

查阅现在所能查到的所有史料，也无法查清一九三四年十月七日上午，在九时至十二时的三个小时内，第六军团先头部队的指挥员面对突发敌情为什么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唯一能够说得通的推测是，他们完全相信了中革军委的电报，把当前的重大敌情判断成了企图骚扰他们的小规模的地方武装。在这生死攸关的三个小时内，他们既没有下达任何展开部队以抢占有利地形的命令，也没有部署一旦遭到袭击部队如何行动的作战方案。而这就意味着，在接下来桂军突然发起攻击的时候，除了周仁杰的先头营之外，整个第六军团从军团指挥员到普通官兵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桂军在这三个小时里占领了甘溪镇北面和东面的制高点——群宝山和白虎山，追击炮阵地设置完毕，机枪扫清了射界。桂军那些穿着土黄色军装的步兵在布满山脊棱线的低矮树丛中时隐时现，令山脊两面的山岭如在风中起伏涌动。其中，一个营规模的桂军沿着一条干涸的河床，分两路向甘溪镇的左右两翼迂回，远远地看过去像是两道浑浊的泥水正沿河道蠕动而来。而另一股桂军——其领头的一定是个富有作战经验和冒险性格的老兵——钻进了一条用厚木板封住顶部的暗水沟，这条暗水沟自镇北的小河一直通到镇中。十二时响起的枪声就是他们突然掀开头顶上的木板射出的。

短暂的交火之后，大批桂军成散兵队形沿着干河道冲过来。

桂军设置在制高点上的机枪和迫击炮一齐开火，掩护步兵前进。

这支一直追击着第六军团的部队，属桂军第十九师周祖晃部。

当桂军快要冲过河道的时候，周仁杰突然站了起来，驳壳枪和呐喊声同时响了：“打！”

此时，周仁杰依然没有接到上级的战斗命令。

在桂军被子弹和手榴弹暂时压制的空隙里，周仁杰迅速调整了部署：留一个连和一挺重机枪在原地阻击，命另外两个连爬上附近的一个无名高地挖掘工事，以迅速扫清机枪的射界。周仁杰的部署刚刚被实施，桂军又开始了兵分两路的冲击：一路仍从正面，另一路从侧翼的白虎山向下冲。桂军的火力十分猛烈，步兵很快逼近了红军的阵地前沿，其中的一部甚至已从阵地的右翼突了进来。

周仁杰问身边的教导员：“团部有什么指示？”

锡教导员回答道：“没有。”

周仁杰，湖南茶陵县一个农民的儿子，十七岁参加游击队，十八岁加入工农红军，十九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自从他参加革命的那天起，他目睹过许多与他一样年轻的红军伤残或死亡，他早已不再考虑自己究竟能够活到哪一刻，尽管他和所有的红军一样曾无数次地梦想过美好的未来。

周仁杰沉默了一下，对他的教导员说：“必须把敌人顶住，准备牺牲吧。”

甘溪镇的枪声令第六军团先头部队的另一位营长刘转连顿时警觉起来。几乎在枪声响起的同时他开始迅速跑步前进，不一会儿，他看见了他的先头部队一连已经被猛烈的火力压制在一条山沟里。一连此时的处境几乎是绝境：山沟的一面是陡崖，官兵全部被压在沟底；而

崖上的敌人一边居高临下地扔手榴弹，一边逐渐向下挤压。一连的通信员冒死从沟里爬了出来，报告说：一连没有手榴弹了。不但崖上有敌人，在沟底，身后的敌人正在大量增援。

与周仁杰同龄的刘转连也来自湖南茶陵县，他十八岁时就有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县苏维埃政府秘密交通员的革命身份。参加红军后，曾在苏区瑞金的红军大学学习，在那里他知道了马克思是一个什么样的德国人，以及马克思的主张究竟是什么。四十九团一营营长刘转连与周仁杰一样是战争的幸存者，当他们为之浴血奋战的新中国诞生后，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北方的一个军区任中将副司令。

而在一九三四年的这个十月间，刘转连面对绝境的唯一念头是：不能让敌人冲下来，因为身后是毫无准备的军团机关。他命令一连坚持住，命令二连带机枪从侧翼迂回接敌，以减轻一连的压力。他还要求营部通信班和三连每人拿出一颗手榴弹支援一连。手榴弹是由人组成的插入前沿的一条传递线递过去的。得到手榴弹的一连立即在面前形成了一道火墙，往下挤压的桂军暂时被遏制了。

刘转连在这个短暂的瞬间向后看了一眼，他知道，必须在这里为大部队冲击出一条通道，无论为此将付出多大的代价。

然而，就在这时，桂军的枪声突然稀疏了。

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时刻。

尽管前面已经发生了战斗，但第六军团的指挥机关和主力部队依旧在通往甘溪镇的土道上缓慢向前。而桂军在正面进攻受到阻击之后，已开始分成两路向西运动，企图直接侧击第六军团。这就是说，此时此刻，红军与桂军双方的主力仍在迎面运动。于是，当第六军团

指挥机关突然发现敌人就在眼前时，已经来不及给部队下达明确的作战命令了。

在先头部队五十一团的阻击方向上，桂军大部已经冲进了甘溪镇，并在镇南一个叫青龙嘴的高地与红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桂军猛烈的火力冲击令红军很难守住这一地势上的要地，军团机关被迫作出了全面撤退的决定。军团参谋长李达带领一个机枪连与五十一团和四十九团的两个团部向东南方向撤退。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军团长萧克、军团政治委员王震与军团机关和部分官兵一起离开土道折进了没有道路的山谷密林中。而已被分割包围的四十九团、五十团和五十一团，为了给军团机关赢得宝贵的转移时间，拼死阻击着桂军洪水般的冲锋。桂军武器精良，每个班都配有机枪，数十挺机枪一齐扫射，谷底中岩石上火光四射，坡上的枯草被飓风般呼啸的子弹引燃，熊熊大火映红了整个甘溪镇上空。

一营营长刘转连在最后关头开始组织正面强攻，力图给被包围的红军杀开一条血路。副营长樊晓洲命令机枪火力掩护二连冲击。红军士兵手扒着陡峭的崖壁缝隙，头顶着如雨的枪弹向上爬。不断地有人掉下来，不断地又有红军接着拥上去。在一排排长的带领下，二连最终爬上了敌人的阵地。司号员蔡百海在爬上崖顶的那一瞬间，一手提着号一手提着马刀喊：“营长命令，冲呀！”二连的官兵终于用血肉之躯在敌人的冲击线上撕开了一条裂缝般的生路。四十九团与五十团的官兵混杂在一起，从这道裂缝间向南撤去。他们不知道，前面一个叫羊东坳的山涧会成为他们的死亡之地。

羊东坳山深涧狭，只有一条很窄的水槽从那里通过。退下来的红军官兵拥挤在一起走上水槽，很快，木制的水槽断了。红军在水槽断裂的那个瞬间听到了迎面两百米处桂军阵地上响起的机枪射击声。桂

军将数挺机枪聚集在一起，射出的子弹被狭窄的山涧挤压得异常迅疾而锋利，红军即刻出现大量伤亡，倒下的人重重叠叠地摞在了一起。到第二天战斗结束时，当地四百多位农民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才把这条山涧里的红军的尸体全部掩埋掉。

这一天傍晚，接近十七时的时候，周仁杰的前卫营接到了撤退的命令。他们把重伤员集中放在了镇东南尖峰山鞍部的草丛中，然后便在当地青年农民陈正财的带领下匆匆撤离了战场。三十九年后的一天，已经六十一岁的周仁杰再次来到了位于贵州东北部的这片草丛中，茂密的野草迎风而立，令山岭间萦绕着无边无际的低吟。身边的乡亲对周仁杰说，当年留在这里的红军伤员大部分被搜山的敌人发现后就地杀害了，少数还能动的自己爬到悬崖边滚了下去。

一九三四年十月七日，天快黑下来的时候，甘溪之战结束了。

受到国民党军凶猛追杀的红军第六军团，经过整整两个月异常顽强的突围之后，除了流尽鲜血永远倒下的官兵外，其余的红军相互间都失去了联系，他们分散消失在中国西南部山高谷深的茫茫密林之中。

第二天，贵州军阀首领王家烈派出黔军的一位团长，挑着茅台酒和猪肉来到甘溪镇慰问刚刚打扫完战场的桂军。双方聚集在镇中一个地主家的院子里吃饭喝酒，用各自的乡音开了些猥亵的军中玩笑，然后相继离开了甘溪镇。

又过了几天，国民党第二十五军镇远行营参谋长黄烈侯给被打散的红军官兵可能流动的各县发出了命令。命令要求立即集中民团武装，左臂上佩戴好易识别的标记，在各个要点进行严格搜捕；侦探更

是要不分昼夜地活动，随时把情报报告给政府军。命令要求尽快筹集粮食、草鞋、盐巴和大洋，以满足政府军的作战需要。同时还特别规定，无论政府军的长官到达哪里，县长和区长都要立即出面欢迎。命令最后警告县长和区长们小心自己的脑袋：“以上各条令县长、区长立即遵办，倘有迟延违误，查实即以军法枪决。须知本职法出令随，切勿以身试尝为要。”

又过了些天，内地一些报纸的角落里出现了一块篇幅不大的新闻，题目是：《流窜数月之萧匪近日覆灭于黔东》。

除此之外，在贵州东北部那个偏僻的山区小镇周围发生的一场惨烈的战斗，并没有给一九三四年的中国留下特别的痕迹。

一九三四年开春以后，全国气候异常。不停歇的暴雨导致面积广袤的国土上数条江河决口，大水肆意倾泻摧毁了无数房舍和苗田。而在被称做“人间天堂”的江浙一带，春来却一反常态地没降一滴雨，沟渠干涸，早稻枯萎。于是，全国一半以上地区的农田在夏收还没到来之前便已收成无望。在城镇里，工业原材料价格失控导致物价开始崩溃，抢购之风刚过，市面立即萧条，倒闭势头几乎席卷了所有的工厂，连橡胶大王陈嘉庚都宣布破产了，银行大门外昼夜挤满了等待兑现的市民。失业的产业工人、入不敷出的手工业者和衣食无着的农村难民混杂在一起，遍布在密如蛛网的乡村土道和水陆交汇的城镇街道上。随着炎热季节的到来，整个国家的疲惫消沉如同暑气蒸腾的热雾一般四处弥漫。

自民国开国以来，军阀们无休止的混战如同一出演了再演的旧戏，到了一九三四年已无丝毫新的情节。唯一给报刊市井留有谈资的是那个把慈禧太后和乾隆皇帝的陵墓炸开并盗走了无数珍宝的军阀孙

殿英。这一年的元旦刚过，国民党政府的委任状到了，孙殿英被任命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尽管他知道这个任命的真实用意是把他弄得越远越好，但他还是梦想着占领一块地盘养精蓄锐之后卷土重来。可是，他的部队还没吃上几顿真正的西北羊肉便遭到了追杀——西北的军阀决不容忍任何势力涉足自己的地盘。孙殿英的步兵和马步芳的骑兵在戈壁荒滩上厮杀的过程激烈而短促，除了造成士兵和百姓死伤无数之外，很快就因为孙殿英部内部的分崩离析而结束了。到了三月，国人已听不到任何战事的信息。

曾经不断地成为战争主角的冯玉祥此时正在泰山上隐居，各路军阀忙着派兵往山上挑大洋给他：宋哲元每月五千，韩复榘每月五千外加五百袋面粉，孙连仲三个月一次三千。而冯玉祥全家粗布衣服白菜豆腐，只在星期日兴许炒个鸡蛋，所以成千上万的大洋除养活随从外，大量地被用于救济穷人和办平民学校，同时还要付给那些不断地被滑竿抬上山来的中国最知名的教授们——冯玉祥决心利用这个枯燥的年份补课。从小没读过书的他此时学得五花八门：《资本论》、《西洋史》、《进化史》、《生物学》、《天文学》，而《政治学》和《政治概论》分别是许德珩和邓初民讲的，《通史》和《心理学》分别是李达和张孝如讲的。

冯玉祥的隐居验证了国民党最讳言的党内离心离德的传言，这个传言在年初召开的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上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一批国民党党员居然抛弃国民党名称，不提三民主义，不挂国民党党旗，甚至连中华民国的国号都改了。但他们并不是始终想与南京政府分庭抗礼的军阀，而是在一九二六年北伐前就已经入了党的老党员。忠实的党员都嫌弃本党了，可以想象这个党成了什么样。国民党元老胡汉民逗留香港没来，山东军阀韩复榘和泰山

上的冯玉祥冷眼旁观，阎锡山在山西的闭关自守更加严紧，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因密谋着扩充地盘只派来个代表，而广东军阀陈济棠眼下正在与江西共产党人的代表谈判，谈判的内容如果让蒋介石知道他定会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一九三四年，甚至连中国的文人也开始疑惑中国是不是个正经八百的“国家”。这种面对千头万绪的社会现状绞尽脑汁的思考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口水战。挑战的是清华大学著名教授蒋廷黻，应战的是北京大学著名教授胡适。论战的内容是：中国未来的政治制度应该是专制独裁还是民主立宪？然而这个问题不是被辛亥的革命者早在帝制倒台的时候就用鲜血阐明过了吗？蒋廷黻撰写了《革命与专制》一文，认为现在的中国“革命没有出路，不革命也没有出路”，只能持续内乱因而不能称其为“国家”。为了让中国看起来像个“国家”，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包括牺牲可爱的民主实行全面的“新式独裁”。以声明“少谈些主义”闻名的风流倜傥的胡适教授不同意，他撰写了《建国与专制》一文进行反击，反击的理由很有趣并且很有说服力：目前的中国“没有专制的政党、人和阶级”，因此没有人有资格做独裁统治者。“建国”当然要建立现代国家，现代国家的标志是民主政治，而“像我们这个缺乏人才的国家，最好的政治训练是一种可以逐渐推广政权的民主宪政”。论战持续了很久，结果是既没弄明白现在的中国、也没弄明白将来的中国到底是应该独裁还是应该民主。

二十三年前，这个国家经过长期的痛苦酝酿和短暂的暴力行动推翻了封建帝制统治，然而革命使巨大的国家骤然裸露于政治混乱中。随后出现的那个以中国国民党为轴心的政权，从来没有在真正意义上统一过中国，疆土、政治、经济、军事、民生的裂缝在这片国土上纵横交错。国家前景暗淡不明，军阀争斗无休无止，政治统治空前脆

弱，各种新锐思潮与各类陈旧陋习冲撞演绎出畸形世态，掌握绝大部分财富的少数集团导致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极端贫困——民国以来的中国，是一段无法叙述清晰的混乱时光，整个民族心灵麻木已久但睡梦浮浅极易惊醒。这种混乱在某种意义上讲对产生人类历史的惊人事件显得极其难得，因为当各种政治见解、政治主张和政治信仰不可避免地纷纷滋生之时，在思想的旗帜下聚集起一支张扬和捍卫思想的武装力量就不足为奇了。

在一九三四年开年后那段沉闷的日子里，没有被军阀和教授惊动的中国百姓却突然有一天被军警的闯入惊动了：军警不是来搜查有没有窝藏共产党人或者违禁宣传品的，而是来搜查各家各户有没有老鼠和虱子的。

为什么?

因为新生活来啦！

这是蒋委员长说的。

蒋介石，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时年四十七岁的他此刻正和夫人宋美龄住在江西省府南昌城里的一栋官邸内。他们于一九二七年结婚，一千五百名贵宾出席了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的盛大婚礼。基督教青年会的牧师宣布他们成为合法夫妻，一支俄国乐队演奏了《新娘来了》，然后一位美国歌手演唱了《请答应我》。南昌城里那座外墙结实的官邸内有一个美丽的花园，蒋介石和宋美龄常常在这个花园里散步。一个力图打破一九三四年沉闷时光的好主意，也许就是在这样的散步中产生的，而正是这个好主意使蒋夫人首次在中国频

频露面——“新生活运动”，这一名称多少带有女性温存、活泼和琐碎的色彩。

一九三四年无疑是蒋介石政治生涯的巅峰时期。有三个理由支撑着他的政治地位开始呈上升趋势。首先是日本对中国的武力侵略暂时停止了，这不是因为《塘沽协定》对日本人起了约束作用，而是日本人在占领了东北三省和热河之后需要巩固统治。其次是在与西北军和晋军于山东、安徽、河南、湖北展开的中原大战中，蒋介石最终迫使冯玉祥下野、阎锡山辞职，并随即收编了他们的部队。再者便是消灭共产党人的问题已经明朗：自从国共两党分裂之后，国民党军队对共产党武装的军事打击从未松懈过。目前，国民党军的前锋部队已经距离最大的苏区仅仅数十公里。在铁桶一般密不透风的包围中，蒋介石确信共产党的红色武装插翅难逃。

半年前来到南昌这个“剿共”前线城市后，各种战况消息并没有消除蒋夫人在一九三四年开年以后感到的极度枯燥，倒是南昌城的杂乱和破败引起了她的格外关注，而这种关注立即得到了蒋介石的强烈回应。在后来的回忆中，他们都谈到了对当时中国现状的共同感受：绝大多数人精神浑浑噩噩，社会生活毫无生气。民众不分是非，公私不辨；官员虚假伪善，贪婪腐败。人民斗志涣散，对国家漠不关心。有钱人纵欲放荡，花天酒地；穷人体弱污秽，萎靡潦倒——这幅悲观的图景，简直就是一个国家即将分崩离析的前兆。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日，蒋介石在南昌市中心广场上宣布：全国性的新生活运动开始了。之后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讲话中，着重列举了中国人举止不够文明的例子：随地吐痰、走路抽烟、头发很长、帽子歪戴、扣子不扣、穿拖鞋上街、厕所里的味道太臭、吃饭的样子太难看等等。蒋介石强调：不文明是国家不能进步的原

因，而且还是社会混乱的根源。那么，如何不让中国社会发生混乱呢？只有中国人成为文明的国民。而如何成为一个文明的国民呢？只有人人参加新生活运动。蒋介石阐明新生活运动的要义是“礼义廉耻”——礼，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清清白白的辨别；耻，切切实实的觉悟。蒋介石说，如果能够把“礼义廉耻”四个字和“衣食住行”四个字融合在一起，新生活便开始了，强大的现代化国家的基础便奠定了。蒋介石宣布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长由他本人亲自担任。

一时间，南昌的大街小巷到处弥漫着尘土——车夫们拉着陈年的垃圾向城外跑，然后把新鲜的黄土拉进来。人们纷纷佩戴起促进会制作的证章：一个盾形，表示自卫；中间一个指南针，表示准则；边缘红、黄、蓝、白四色——红色表示进取精神，黄色表示光明正大，而蓝白两色则代表青天白日。证章的图案被无限放大后悬挂在车站、码头、学校、娱乐场所、酒馆、茶楼、街区、浴室和理发室。童子军依据《新生活公约》在所有的公共场所监督人们的言行举止，甚至登堂入室检查居民是否一天洗了三次手，不够三次的必须立即就洗。然而，这个数千年以来便以贫困农民为主体的国家怎么可能一夜之间遍地都是翩翩君子呢?

文人们说：“什么是新生活运动？就是一切为了国民生活艺术化！”

蒋介石说：“什么是新生活运动？就是使全国国民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

冯玉祥说：“什么是新生活运动？政治腐败到极点，军事无能到极点，经济贪污到极点，文化摧残到极点！”

就在新生活运动自南昌沿着中国的铁路线走向各大城市的时候，一封电报惊扰了蒋介石在这片颓败的国土上创造新生活的兴致：红军的两支小规模部队已经从被国民党军包围的苏区内跑了出来。

根据情报，这两支红军部队都打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旗号。进入贵州的——即红军第六军团，蒋介石这时还不知道这是哪一支部队——行踪是西北方向，可以断定，这是企图与贺龙的武装会合。而另外一支却是向东北方向。可那个方向是大海呀？红军想要干什么呢？蒋介石百思不得其解。

突然，消息传来了，往东北方向去的红军对福州发动了进攻。

红军第七军团进攻福州的时间是：一九三四年八月七日。

这正是第六军团离开井冈山根据地的那一天。

福州南临闽江，城墙高大坚固。当时城内外驻有国民党军第八十七师的一个团和一个宪兵团，还有炮兵、工兵和海军陆战队。重兵沿城市周边交通干道驻扎，使整座城市的防御固若金汤。而进攻福州的这支红军部队只有四千多人，平均三个士兵才拥有一支老式步枪，至少一半以上的红军手里拿的是大刀或梭镖。第七军团对福州的突然攻击，无论如何都难以寻到合理理由，这也是让蒋介石感到困惑的原因。

第七军团是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内组建的一支部队。自组建之日起就一直在苏区内线与“围剿”苏区的国民党军作战。在保卫苏区的战斗险象环生的危急时刻，中革军委命令第七军团立即冲出包围，向北突击，因为在安徽南部有几个县发生了武装暴动。第七军团出发的时候，中革军委发表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因此这支红军

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由于连续战斗兵力严重不足，第七军团出发前紧急补充了两千新兵，使整个队伍号称六千人，但实际上非战斗人员就有两千，其中包括中革军委派驻的随军工作团和五百多名挑着担子的民夫。七月六日晚上，这支由半数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青年农民组成的、武器极其原始并且由于跟着长长的挑夫队而行动迟缓的队伍，从苏区瑞金出发了。几天之后，在另一支红军的掩护下，他们渡过了闽江的上游，并由此走出了根据地，进入了危机四伏的国民党统治区。

按照抵达安徽南部的计划，第七军团应该直接向北，首先进入浙江西部。但是中革军委的电报到了，命令他们改变方向，目标是东部的福州。第七军团并不明白此举的目的，只能忠实地执行命令。八月一日晚，他们冲破了国民党军四个营的阻击，占领了闽江边上的一个重要集镇：水口。这里距离福州城仅仅七十公里。在水口，第七军团召开了“八一纪念大会”，作了攻打福州的战斗动员。官兵们情绪高涨，这不仅因为福州是个物资丰富的大城市，可以使红军得到急需的补给；更令红军官兵摩拳擦掌的是，他们被告之，当攻打福州的战斗打响时，城内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将发动大规模的武装暴动，然后打开城门迎接他们。

第二天，第七军团开始从水口镇向福州接近。

由于没弄清楚向福州逼近的红军到底有多大规模，国民党军的一个整师奉命沿长江日夜兼程赶往福州。

双方几乎同时到达福州，战斗接着就打响了。

这场发生在炎热季节里的城市攻防战只持续了一个昼夜。

面对着高大的城墙，年轻的红军士兵举着大刀和梭镖开始冲锋，而在他们的前方，从坚固的工事里射出的机枪子弹密如蝗虫。红军保持着他们一贯令敌人感到胆战心惊的无所畏惧的精神，冒着枪林弹雨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冲锋，尽管伤亡巨大，他们仍一步步地顽强向城门接近，其中的一股小部队一度打到了城北关。但是，第七军团最终没能攻破福州城防。而就在他们不断地流血和牺牲的过程中，眼前这座巨大的城市里丝毫没有发生武装暴动的迹象，直到战斗结束，紧闭着的城门也没有打开一道缝隙。

第七军团迅速撤离了。

这场战斗导致的严重后果并不是官兵的伤亡，而是第七军团彻底暴露了军事实力。国民党军很快就反应过来了：这不过是一支力量单薄的“小股赤匪”。于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是：自第七军团从福州开始撤退起，敌人便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

第七军团艰难的转移由此开始了。

九月初，当第六军团辗转于广西与贵州交界处的荒山中时，第七军团到达了闽北苏区。一路上，数百名挑夫被丢弃，兵力损失近半数。闽北苏区虽然不大，但这里属于山深林密、物产富庶的武夷山区，其领导人是威望极高的老共产党党员黄道，因此成为藏身休整甚至是扎下根来开辟根据地的好地方。然而，第七军团的官兵们刚吃上几顿饱饭，中革军委的电报又到了。电报严厉地批评他们在闽北的停留“迎合了敌人的企图”，命令他们继续执行前往安徽南部的任务。后来被证实的史实令人震惊：命令第七军团前往安徽南部是因为那里有几个县爆发了武装暴动，中革军委计划第七军团到达后在暴动的基础

上建立新的根据地。但是，就在第七军团从瑞金出发后不久，中革军委就得到了暴动已经失败的消息。

第七军团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移动出闽北苏区，冲破两道封锁线后进入了闽浙赣苏区，与那里的另一支红色武装红十军会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军团长是著名的红军指挥员刘畴西，军政委员会主席是著名的共产党人方志敏。但是，两支红军武装的会合并没有使闽浙赣苏区被围困的危机得到缓解，由于数支一直尾追着第七军团的国民党军此时也到达了闽浙赣苏区的外围，所以刚刚成立的第十军团只能立即开始转移。

此时，在甘溪镇战斗中幸存下来的第六军团的红军官兵，正长久地徘徊在中国西南部的深山密林中。山中所有可以果腹的林木野草他们都尝过，每一处有可能突围的方向他们都试过。他们没有向导，没有食物，没有药品，没有弹药，许多红军战士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因为没有鞋而赤着脚。他们以日月星辰辨别方向，以冰冷的山泉缓解饥饿，在灌木与乱石之间开辟道路，在枯萎的草丛中躲避藏匿。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患上了疟疾，高烧不退，已经无法翻山越岭，四个战士用担架轮流抬着他。但是，抬担架的战士很快就因为负伤、疾病和死亡只剩下一个人了。这个年轻的红军士兵把任弼时背在了自己的背上，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在后面托着他的脚。从井冈山根据地出发的时候，这对革命夫妻刚刚有了一个孩子，部队要上路了，他们只有把孩子送给当地的老乡，从那时起他们再也没有得到过这个孩子的任何消息。在一个狭窄的山崖口，队伍通过得极其缓慢，尾随的敌人已经近在眼前。身体极度虚弱的任弼时站在崖口处指挥部队，而在他的身边，年仅二十岁的警卫连连长余秋里提着枪，用强迫的口气让他立即

随先头部队撤离。任弼时发火了：“一个人重要还是整个部队重要？”他索性坐了下来，一直坐到最后一名红军通过崖口。

湖南、广西和贵州的军阀决心将这些散落在深山中的红军斩尽杀绝。十月十七日，在第六军团遭遇重兵袭击后的第十天，他们发现自己居然又离那个噩梦之地——甘溪镇——不远了。第二天大雾，红军官兵进入了甘溪镇。他们知道国民党军绝不相信他们有勇气再次走入这个小镇，而对手的不备就是他们生存的希望。利用浓雾的掩护，红军官兵悄悄地穿过甘溪镇向东急行。当得知前面那个叫马厂坪的地方没有敌人阻击，是包围圈上一个罕见的缺口时，他们立即占领了有利地形，然后在一位猎户的带领下进入了一条人迹罕至的大峡谷。第二天天明时分，穿过峡谷的这部分红军再次把包围他们的敌人甩在了身后。

与此同时，在甘溪镇附近，第六军团十八师师长龙云所带领的师后卫部队和五十二团被包围了。激战中他们与军团指挥部失去了联系。在孤军作战数日后，这部分红军最终覆没。后来曾经给毛泽东当过译电员的五十二团的红军战士黄欣，是那场惨烈战斗的幸存者，他在数十年后回忆道：敌人的几十挺机枪向阵地上扫射，弹头打在岩石上叮当作响，火药呛得人喘不过气来。红军的子弹打光了，手榴弹也扔光了。团长田清海牺牲后，二营营长代理团长指挥战斗；但是二营营长很快也牺牲了，于是三营营长接替指挥战斗。团政委方明理负伤后，三营营长要求政委立即突围，方明理坚决不离开阵地。那一刻，三营营长对年仅十八岁的黄欣说：“立即把政委背下去，不然我枪毙你！”黄欣用绑腿带把奄奄一息的政委绑在自己背上，顺着一条水沟往山下爬，在黑暗中过了一条小河后，钻进了密林中。黄欣背着他的政委走了三天三夜，第四天黎明时分，他听见了他熟悉的军号声，看见

了他熟悉的红旗，那是五十团的队伍！九死一生的小红军黄欣没能高兴多久，因为他很快就听说龙云师长受伤被俘后被押往长沙，不久这位年轻的红军师长遭湖南军阀何键杀害。

第六军团那个叫张吉兰的女战士没有黄欣幸运。在一次战后掩埋战友尸体的时候，她在尸体堆里发现了一张熟悉的脸庞，那是她的丈夫。张吉兰把丈夫满是血污的脸擦干净，把他们夫妻平时最珍爱的一把牙刷放进丈夫的口袋里，然后把丈夫埋葬了。张吉兰因为悲伤和生病身体极度虚弱，五十团的政治部主任把自己的马让给了她，瘦弱得如同秋风中的一片落叶的张吉兰在马背上说："广西人都说猴子会骑马，我像不像呢？"几天后，她连趴在马背上的力气也没有了。她被留了下来。不久后，当张吉兰觉得又有力气走路的时候，她决定去追自己的队伍。但是队伍在哪里呢？张吉兰得出的结论是：追击红军的敌人到了哪里，自己的队伍肯定就在哪里。在一个山洞里，她把自己的头发剪光，装成男人报名参加了国民党军。她跟随敌人的队伍在大山中转来转去，终于有一天接近了红军，而且距离如此之近，她几乎可以看见隐约闪现在灌木丛中的那些虽然褪了色但依旧夺目的红色五角星。张吉兰立刻抱着枪向红军阵地跑去。她扑进一条河，拼命向对岸游，就在她感到可以回到久已未见的战友们温暖的怀抱时，身后的枪声响了。张吉兰想喊一句什么但没有喊出来，她挣扎了一下便在河面上消失了，消失在一个血红色的旋涡里。

从重重包围中冲出的红军第六军团和第七军团，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淹没在一九三四年纷杂混乱的历史中了。年轻的红军士兵的鲜血和生命没有使中国的社会生活呈现出特别的异样：使用着原始农具的农民依旧在日复一日地春种秋收。破败小镇上的烟馆和妓院依旧烟雾缭绕。手工业产品和农产品之间的贸易依旧保留着以物易物的方式。大

城市中的教授和学生还在讨论着到底该不该崇尚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鸳鸯蝴蝶派的缠绵小说正在畅销。政府的税收和国民党军的摊派年复一年地实施着。戏院的喝彩声依旧夜夜响起。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亲赴山东参加盛况空前的祭孔大典。上海江湾举行了前所未见的大规模集体婚礼。胡蝶主演的《姊妹花》和王人美主演的《渔光曲》观者如潮——听说南京政府已经与日本人开始了新的谈判，而“赤匪”不过是几个政治人物带领的一群人数不多的南方农民。一九三四年，对于这个国家的数亿人口来讲，普通百姓需要关注的事名目繁多：官场的升迁，生意的起落，维持日常生活的开支，庄稼收成的丰歉……那么，又有多少中国人会对政府声称即将“剿灭”的“赤匪”的现状和行踪给予特别关注呢？

转战在湖南西部的贺龙的部队陆续迎来了从绝境中走来的第六军团幸存的官兵。所有的食物和衣服都被拿出来送给这些骨瘦如柴的兄弟。两支部队的红军相拥而泣之后举行了联欢晚会。

深山静谧，篝火熊熊，因为拥有理想和信念而能够战胜一切苦难的红军士兵此时此刻享受着无比的快乐，他们跳着唱着：

共产党领导真正确，

人民拥护真多多。

红军打仗真勇敢，

粉碎了国民党的乌龟壳。

我们真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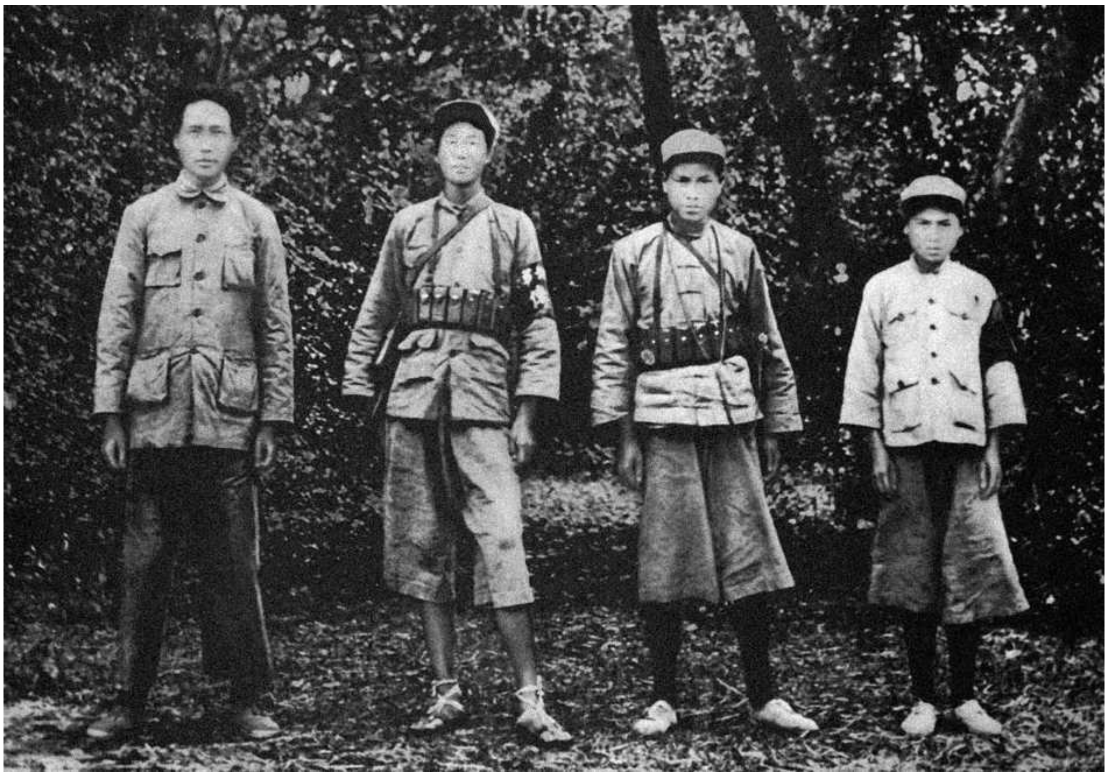
我们真快乐。

无论是对于一段历史还是一段人生来讲，快乐是什么？在偌大国土上的这偏僻一隅，烈烈燃烧的篝火向着夜空腾起璀璨的火焰。谁能透彻地解释，那些幸存下来的红军士兵在这个夜晚歌声为何嘹亮？快乐从何萌生？

逐渐明朗起来的历史表明，虽然相对整个中国版图来讲面积很小，但对于聚集在红色苏区里的那些头戴红星的政治精英和追随着他们的青年农民来讲，在一九三四年夏秋交替的季节里，一段新的历史——无论是快乐还是痛苦，是走向新生还是走向灭亡——的确就要开始了。只是那时候，没有人意识到红军第六军团和第七军团的遭遇，已经成为一个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事件即将发生的前兆。

# 第二章 绚丽之梦

1931年11月·江西瑞金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刚刚开始时候，飘荡在中国东南一角的绚丽的快乐之梦，曾经使那片狭窄的山川宛若天堂。

当时，世界并不快乐。美国失业人口达一千五百万，罗斯福将一美元的价值降至了六十美分。苏联开始推行集体农庄，斯大林认为资本家会选择战争来摆脱萧条。纳粹冲锋队在纽伦堡举行了大规模阅兵，阿道夫·希特勒预言德意志帝国将存在一千年。墨索里尼说“国家就是我”，意大利军队陈兵奥地利边境四十八万——而这一切对于中国

并没有特别的影响。真正令这个国家悲伤的是接踵而来的天灾人祸：长江流域的洪水使二十万人丧生，绥远、山西、陕西的地震又使七万人死亡，而挣扎在贫困线上的饥民多达五千七百万。当经济一败涂地的时候，统治集团内部因利益分配失衡突发分化：反对蒋介石的冯玉祥、阎锡山等军阀拥兵自重，建立了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对立的“第二政府”，由此引发了以抢夺地盘为目的的军阀混战。战火波及十多个省份，战场纵横绵延千里。为了维持浩大的战争开支，自称为“政府”的军阀不断向百姓摊派名目繁多的赋税。战争刚刚开始，在主战场之一的河南，农民所负担的军费数目是本来就已十分沉重的田赋的四十倍以上，而且各种税收已经提前征收到了一九三六年。战争进行到第五个月时，军费开支高达五亿多元，双方死伤人数在三十万以上。这时的中国犹如一个巨大的难民所——数千万为躲避战争而流离失所的平民、人数多达五十万的失业工人以及那些番号不同但心情同样绝望的伤兵混合在一起，徘徊于荒芜的田野与破败的城镇中。

然而，还是这个国家，在江西与福建的交界处，在那一小片被国民党当局宣布为“赤色匪区”的土地上，傍晚时分响起了快乐的铜锣声：“太阳落山后在澎湃广场开群众大会！”接着，在夕阳的余晖里，一个身穿灰色军装的小战士滴滴答答吹响了军号。正是晚稻收获的季节，金黄色的稻浪在这片土地上一直荡漾到山脚。赤卫队开始帮助各家收割，妇女们把晚饭和水挑到地里，然后再把沉甸甸的稻子挑回家，竹扁担在她们的肩上吱呀呀地唱歌一样响着。大路上，远远地开来了一支长长的队伍。“是总部警卫师，到瑞金去，准备开大会啦！”带领队伍的干部和老人们打着招呼。队伍前面的红旗在晚霞的映照下如同一团飘舞的火焰。村里的大会按时召开，村苏维埃干部轮番上台讲话：要选举啦，大家要把最革命的人选出来！不错，白军知道我们开大会的计划，那又怎么样？我们的队伍正在前线打败他们的进攻！

我们要创造一种新的制度，有了新的制度，我们就能争取自由进步的生活。同志们！苏维埃胜利万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尽管存在的历史十分短暂，但这个“国中之国”存在的时候却充满了勃勃生机。站在今天的角度，无论如何都无法准确地想象当时中国的瑞金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瑞金位于福建、江西与广东三省交界的偏僻之处，即使在大比例中国地图上也很难被一眼看见。但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这里空前密集地聚集着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现政权的反叛者——作家、诗人、哲学家、教育家、职业革命家、旧式军官、流亡学生、破产商人、逃离婚姻者以及被生活压榨得无路可走的赤贫的农民。瑞金是一座苏维埃京城，一座在当时的中国除南京之外的另一个首都。这个首都所管辖的“国土”，除了中央苏区以外，还有十几个面积和人口大小不一的苏区：江西赣江以西与湖南东南部交界处的湘赣苏区，湖南、江西与湖北交界处的湘鄂赣苏区，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与浙江、安徽交界处的闽浙赣苏区，湖北、河南与安徽交界处的鄂豫皖苏区，四川与陕西交界处的川陕苏区，湖南与湖北西部交界处的湘鄂西苏区，湖南、湖北与四川、贵州交界处的湘鄂川黔苏区，海南岛上的琼崖苏区，广西西部的右江苏区，福建东部的闽东苏区，陕西北部与甘肃东部交界处的西北苏区。这些属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土”，总面积一度达到四十多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到三千多万。

苏区祥和的生活景象，出乎当时所有中国人的意料。

鼎盛时期的中央苏区，面积达八万多平方公里，被划分为四个“省”和六十多个“县”，人口四百五十万之众。中央兵工厂和印刷厂都设立了分厂，烟草、制糖、织布、造纸、制药等工业和手工业的规模

不断扩大。苏区设有对外贸易局，鼓励商品输出和输入，各地的商贩不顾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甘愿冒坐牢和杀头的危险长途跋涉来这里进行贸易。瑞金城的南关外设有市场，农民和商贩们在这里摆摊设点，百姓与红军采购员穿梭其中，讨价还价之声不绝于耳。苏区还为红军官兵和他们的家属开办了供应生活必需品的专门商店，规定国家企业和合作社赢利的百分之十要拿出来服务于红军家属，红军家属一旦患病或遇到困难就会得到踊跃的募捐。苏区通行江西工农银行发行的钞票，由于有大量的黄金和白银作储备，这种钞票比国统区发行的钞票值钱。在苏区浓密的树荫下和宽阔的水田旁，学校、医院、合作社、俱乐部、政府机关散落其间。每一个清晨和黄昏，瑞金的天地间都会响起红军官兵的歌声：

当兵就要当红军，我为工农争生存。

官长士兵相亲近，没有人来压迫人。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闹革命。

会做工的有工做，会耕田的有田耕。

红军确信他们是这块土地的主人。苏区开展了彻底的土地革命，不但当地的贫苦农民得到了土地，来自外省的红军官兵也都分到了土地，这些土地以公田的形式由当地的农民替他们耕种。绝大多数红军官兵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立即对红色苏区产生了生死相依的感情——苏维埃共和国是给贫苦农民以土地的国家，而中国工农红军的主体正是贫苦的青年农民。于是，有足够的理由解释为什么红军官兵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充满了无法遏制的热情，为什么在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战斗中他们能够一次又一次地舍生忘死。

苏维埃，俄文COBET的音译，意思是“会议”或“代表会议”，是俄国一九〇五年——一九〇七年革命时创立的一种武装夺取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这个充满了激烈的反叛意味的名词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名称。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址选在了瑞金城北五公里处叶坪村的叶氏宗祠前。选择这里的理由是：敌机轰炸的时候会议代表们可以迅速向附近的密林中疏散；另外，叶氏宗祠前有一块面积很大的草坪。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一天，红军士兵在这片草坪上平整出了一个巨大的会场。他们还在会场附近搭起了一座宽敞的席棚，席棚下的饭桌呈五角星形排列开去，足够一千人坐在一起就餐。苏维埃大会的代表来自全国各省、苏区各县以及红军各个军团。代表中年龄最小的是一位年仅十五岁的红军战士，年龄最大的是一位裹着小脚的六十多岁的农民老太太，这位红色政权的热情拥护者一接到开会通知就从她居住的村庄出发，整整走了一个半月才到达叶坪村。苏区成立了交际委员会负责接待会议代表，委员会为每位代表准备了一套专门的装束：蓝色棉布做成的红军式的裤子；钉有纽扣的翻领上衣，衣袖左臂缝着用布剪出的一颗红星；胸前一条系着结的丝带，上面写有代表登记号码；一顶草绿色的帽子，上面嵌有一颗红星，同时缝有一条红带，红带上写有“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的字样。红军居然还在会场上安装了电灯！电线接在一台缴获来的发电机上。当地的农民从没见过这种亮晶晶的东西，他们围着电灯看就是不走，感叹说红军什么事都能办得到。红军在会场的大门两侧一边挂上了苏维埃旗，一边挂上了共产党党旗，还把大门用松树枝、柏树枝和菊花装饰起来，菊花的中间镶有两颗巨大的星星，由于苏区出产白银，那两颗星星是纯银制作的。

终于到了开会的那一天。天还没亮，工作人员就在会场一遍遍地检查电灯是否能够正常地亮起来；而女红军则对会场内悬挂的"勇敢、勇敢、再勇敢"和"学习、学习、再学习"两条标语的位置进行了反复调整，直到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表示了满意为止。早晨六点整，两队司号员一起吹响了军号，住在山坡上临时帐篷里的代表们排成队沿着山路走来。红军警卫师列队鸣枪致礼，然后由共青团和少先队组成的合唱队开始演唱瑞金最流行的《红军进行曲》：

同志们，你拖枪，我拉炮，

一齐向前扫！

阶级敌人真万恶，

努力去征讨！

同志们，争自由，向自由，

保我苏维埃！

帝国主义反革命，

打倒国民党！

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

向着光明走！

你看黑暗已过去，

曙光在前头！

红军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宣布大会开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项英等领导同志就政治、土地、劳动、红军等问题作了专题报告。下午民主选举大会主席团，被选举出的主席团成员有：一个铁路工人、一个印刷工人、一个矿工、一个造纸工、一个卷烟工、几名党和红军的领导人，还有一名纺织女工、一名女农民和一名女赤卫队队长。

整个会议期间，苏区如同过节。开幕的那个晚上，红军组织了浩大的提灯游行，一团一团橘红色的灯火闪烁在大地上像星河一般。会议进入到各地代表发言的阶段气氛严肃，代表们就土地分配、阶级政策、军事作战等问题发表了意见。各委员会紧张地起草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有关土地、婚姻、教育、经济、财政等方面的法规，这些重要的法律法规要经过代表们激烈的争论通过后才能正式公布。会议选举了国家和红军的领导机构。最后全体代表庄严宣誓：终生奋斗干革命，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时刻，都不背叛自己的理想。

夜幕再次降临，会议代表聚集在帐篷里听收音机。那台新奇的收音机是红军缴获的，每一次收听都有专门的人负责播放。开始总是嘶嘶的声音，播放人员不断地调整，于是，大家听见了上海电台的爵士乐、北平电台的京剧……终于，频率调到了苏联电台，是苏联红军远东司令部领导人纪念十月革命的讲话。现场的翻译语速很快，绝大多数代表无法完全明白，但是他们的表情始终专注，因为他们认为苏联红军讲述的必然有与中国革命相通的神圣的东西。接着，收音机里传出《国际歌》的旋律，这是每一个红军官兵所熟悉的，寂静的帐篷里出现了躁动，接着大家起立跟着收音机大声地唱起来：“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寄生虫。最可

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国际歌》，世界上最著名的无产者之歌，唱响的是一无所有者改天换地的梦想。因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人们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定会神思飞扬。

一八七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一个叫“工人的里拉”的合唱团在法国里尔的卖报工人集会上首次演唱了《国际歌》。那时的中国正值大清同治十年间，皇帝和他的军队刚刚把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农民暴动镇压下去。在接下来的岁月里，这个古老的国度并没有获得平静，一些“古怪”的东西和“古怪”的想法不可阻挡地进入了中国：计算器、照相机、X光机以及变法、维新、图强等等。无论这个巨大的东方国度如何闭关自守，世界性的社会进步与科学发展的潮流却一次次叩开中国的国门，撞击着中国仁人志士的认知世界。从那时起，这个古老的国度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梦想迭起的时代。

发生在戊戌年间企图引进西方君主立宪制度，从而使国家摆脱政治和军事双重危机的变革，随着其领袖人物或是流亡海外或是人头落地而迅速宣告结束。接着，义和团运动把对痛苦生活的怨恨全部指向了洋人，结果却是外国势力空前规模的入侵和大清皇室的悲惨流亡。发生于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统治，革命还在这片热血沸腾的国土上引发了不可遏制的集体梦想，维新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民权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纷至沓来，各种社会改造学说混乱无序地进入了中国的知识阶层中，往往是旧的梦想刚刚破灭新的梦想随即诞生，各种政治思潮令国人眼花缭乱也令国家不知所措。那时候，中国人谁也没有在意一种名为“马克思主义”的学说。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的北方酷热难耐，南方却是阴雨连绵。在上海法国租界内的一幢建筑里，十三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青年与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秘密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从一开始便受到租界内巡捕的监视，因此中途转移到一个湖中的小船上继续。尽管会议的细节至今回忆不一，但不争的史实是：会议明确创建一个名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参加了这次会议的湖南青年毛泽东那一年二十八岁。整整二十八年后，当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时候，毛泽东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意味着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和世界的最伟大的绚丽梦想与最壮阔的革命实践自此发端。

中国共产党宣布自己是无产阶级政党。

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讲，“无产阶级”是一个崭新的名词。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无产阶级指的是没有任何资产、只拥有劳动力供资产者压榨剩余价值的产业工人。然而，在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几乎都不是无产者：李大钊，毕业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入东京早稻田大学留学，后成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陈独秀，就学于杭州求是书院、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曾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毛泽东，毕业于湖南省立师范学校，后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蔡和森，毕业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留学法国后在上海共产党中央机关工作……这些中国的知识精英虽不是无产者出身，但他们的社会理想是属于无产者的，那就是：推翻一切形式的专制统治，谋求无产者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彻底解放，最终建立共产主义大同社会。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之所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他们经过对社会现实的深入分析和痛苦思考，发现只有根据马克思的学说才能挖掘出中国社会种种黑暗产生的根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体制，受到国家法律保护和

官僚阶层庇护的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导致的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及腐朽封建文化的根深蒂固等等。尽管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上障碍重重，但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旧梦想飞扬激情澎湃，因为他们看见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

在苏联共产党的协调下，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与当时中国一个规模更大的政党——中国国民党——有过短暂的合作时期。一九二四年，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具有国民党和共产党双重身份的李大钊入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同样具有双重身份的毛泽东入选候补委员。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国民党就不可能取得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间与旧军阀作战的胜利。在共产党人的策划下，组织起来的农民武装不断地配合北伐军袭击敌人的后方，城市中的秘密共产党小组甚至组织过小规模的城市暴动以配合北伐军战斗。北伐军每占领一座城市，共产党人便在那里成立工会组织；在北伐军占领的数个省中，共产党人还建立起农民协会，协会的骨干大多来自毛泽东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被美好的生活前景激发出革命热情的青年农民，迅速地成为共产党主张的拥护者。他们从减租减息发展到阶级对抗，没收土地和财产的风潮因而迅速蔓延，令拥有土地和雇工的地主和士绅们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恐惧。中国共产党按照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开展的革命运动，不可避免地触及了作为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国民党的利益，这种政党之间的冲突意味着一个无法调和的问题，即中国革命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是单纯地消灭军阀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重新统一中国？还是进行一场把劳苦大众从不公正的社会体制下解放出来的阶级革命？共产党和国民党因不同的政治信仰而代表着不同的社会阶层，因不同的阶级地位而追求着不同的社会利益——社会利益的不同是人类冲突的本质所在，本质的冲突是永远无

法调和的。因此，关于革命目的的不同主张不久之后便演变成为政党之间的政治对抗。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的决裂是从一九二七年开始的。那一年，国民党以解散上海工人武装为借口，开始了对共产党人的彻底“清剿”。上海警察厅公开通缉所有的共产党人，悬赏价为一个人头一千块大洋。在接下来的数周之内，有八千多共产党人被杀。随着国民党在上海的行动，其他城市也以“清党”为名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当国民党的每一把屠刀上都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时，全国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已近五万。这一年的四月六日，在北平的东交民巷，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创始人李大钊被捕了。《晨报》这样记述了狱中的李大钊：“受审时，态度极其从容，毫不惊慌”，“身穿灰布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入狱二十二天后，李大钊被处以绞刑。那台从德国进口的绞刑机笨拙而缓慢，绞杀整整进行了四十分钟。李大钊时年三十八岁，他是遗腹子，三岁丧母，既无兄弟也无姐妹，临刑前留下一张遗照：宽阔的额头很干净，浓黑的双眉下神情若然，方正的脸上一片平和。只是，在横着褶皱的灰布棉袍下，垂着又粗又黑的铁链……这位著名的共产党人曾经描述过他一生最渴望看到的情景：“不出十年，红旗将飘满北京……”

面对国民党的疯狂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只有一条出路：起义，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零时后爆发的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打响的反对国民党的第一枪。起义的主要策划者是：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起义的军事指挥者是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南昌起义在军事上迅速取得了胜利，天亮的时候，起义军已完全解除了敌

对部队的武装。八月三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起义军开始南下广东，一路上不断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作战。由于许多起义官兵并不了解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因此部队在艰难的征战中开始出现混乱。先是第二十军的参谋长带领一个团脱离了起义军，接着第十一军代理军长蔡廷锴带领除二十四师外的官兵也脱离了起义军。起义军还没到达抚州，就已减员六千以上，弹药也损失了一半。接着，起义军在江西瑞金和福建汀州的战斗中遭遇重创，数千伤员被安置在当地的一所教会医院里。教会医院的院长名叫傅连暲，这个当时信奉上帝的中国医生，此后将他个人的命运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紧密相连，一直到数十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严峻的形势使起义军被迫作出决定：向西，前往海陆丰地区，因为彭湃曾在那里组织过农民暴动，在已有群众基础的土地上可以发动更大规模的起义。但是，随着国民党军增援部队的不断到达，起义部队陷入了重重包围之中。为了保存干部，起义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决定解散组织，部队撤离。只是这个决定还没来得及传达，国民党军的猛烈进攻又开始了。贺龙的第二十军一师和二师均被打散，只有第十一军二十四师的千余人突围了出去。至此，参加南昌起义的所有部队由两万人只剩下不到两千人。第九军军长朱德这时站了出来，并讲出了他一生中那句著名的话："不愿意继续奋斗的，可以走；继续革命的留下，我是要继续革命的。"留下的人数大约是八百。在这些"愿意继续奋斗"的青年中，有七十三团二十六岁的政治指导员陈毅。

这时候，在中国国土的中部，田野上的稻子熟了，秋收的时刻到了——秋收是中国农村中各类矛盾一触即发的时刻，因为无论收成如何，甚至是无论有没有收成，农民们都要交租子了。熟悉中国农村生活状况的共产党人懂得，这是一个发动革命的大好时机。

一九二七年八月，中共湖南省委突然得知：准备参加南昌起义但是没能准时赶到南昌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此刻正滞留在江西西北部的修水、铜鼓一带，而平江、浏阳等地的工农义勇队和安源煤矿的一部分工人武装也恰好聚集在这一带。于是中共湖南省委立即决定：利用这些武装力量实施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岳阳、安源七个县镇的秋收起义。同时决定：起义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发动，任命毛泽东为前敌委员会书记。

八月底，毛泽东到达安源。他寻找到那些武装起来的矿工和已被共产党控制的矿警队，然后召集了包括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副团长余洒度在内的起义领导人开会，正式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任命余洒度为师长。但是，当这支刚刚成立的成分复杂的部队准备攻打长沙的时候，国民党长沙卫戍司令部已经获得了情报。国民党军火速调动部队，宣布长沙全城戒严，并且开始大规模地捕杀共产党人。

毛泽东在前往铜鼓时，也被地方民团抓住了，当时他装扮成了安源煤矿的采购员。可以肯定地说，民团的兵丁根本没能把面前这个手拿雨伞、穿着长衫的人的真实身份搞清楚，不然他们不会在毛泽东掏出身上仅有的几十块银元时，便那么迅速地把钱收下并且随即决定放了他。但是，民团队队长反对放了毛泽东，他认定这是一个危险的共产党，坚持要把毛泽东带到民团团部执行枪决。面临死亡的毛泽东决定逃跑。在距离民团团部仅剩两百米的地方，毛泽东终于找到逃跑的机会。他一直跑到一个水塘边的茅草丛中藏了起来。民团的兵丁来回搜查，几次从他藏身的地方走过，但直到天黑下来也没发现他。毛泽东在民团兵丁放弃搜捕之后开始赶路。雨伞早就丢了，脚上的鞋也不知去向，光脚赶路使毛泽东的脚肿痛得厉害，幸好他遇到了一位农

民。没人知道毛泽东对这位农民说了些什么，这位农民不但为毛泽东提供了食物和住处，第二天当毛泽东再次上路的时候，他身上居然已经有了钱。毛泽东花七元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干粮，最后安全到达了铜鼓起义军驻地。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与死神迎面相遇却又绝处逢生。自一九二七年九月从湖南的那片茅草丛中脱险之后，毛泽东再也没有遇到过任何危及生命的危险，哪怕是被子弹或弹片轻微擦伤或者被炮弹掀起的土块石头碰一下。他是所有身经百战的共产党高级将领中唯一一位身上没有留下任何战争痕迹的人。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就这样开始了，时间是一九二七年九月。

九月十一日，秋收起义部队驻修水的一团、驻铜鼓的三团和驻安源的二团分三路向平江、浏阳、萍乡推进，准备会攻长沙。为此，毛泽东异常兴奋地写下了《西江月·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

修铜一带不停留，

便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沉，

霹雳一声暴动。

但是，一团到达修水与平江交界处的龙门镇后，余洒度收编的土匪邱国轩部突然叛变，掉转枪口袭击了一团的后卫，正面的国民党军趁机发起攻击，致使一团遭遇重创。二团在攻击萍乡不成后转攻醴陵，刚刚夺取县城便因敌人增援部队到达而随即放弃。三团的进攻也屡屡受挫。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毛泽东命令起义部队撤出战斗，到浏阳以东的文家市镇集结。在文家市镇，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会上余洒度主张部队继续向长沙进攻，毛泽东则认为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攻打长沙这样的中心城市是不现实的，主张放弃原来的起义计划，转移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以保存革命力量，求得队伍的发展壮大。毛泽东提出的具体路线是：沿罗霄山脉南下。

横跨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南北绵延四百公里，其主峰位于山脉中段，名为井冈山。

秋收起义部队开始转移了，一路上不断地打遭遇战。九月二十九日，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一个叫三湾的山村时，起义军只剩下不足千人。毛泽东再次主持召开了前委会，和朱德一样，他允许不愿意留下的人离开。结果有两百多人选择了离开，剩下的七百多人中有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的一团特务连党代表罗荣桓。毛泽东把剩余的官兵缩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不久，他带领这支队伍到达了宁冈县城，与永新、宁冈两县的共产党组织接上了头，并通过他们与占据着井冈山的一支农民武装的领导人袁文才取得了联系。毛泽东送给袁文才一百支枪，袁文才安置了毛泽东部队里的伤员。

就在与袁文才会面的这一天，毛泽东认识了井冈山上的第一个女共产党员贺子珍。这位来自永新的革命者一身干净的土布裤褂，由于正患疟疾面色苍白，但究竟正值青春因而修长的身材显得格外亭亭玉立。毛泽东用他特有的幽默语言称赞道：“好哇，妹子十七八，军中一

枝花。”不久，年仅十八岁的贺子珍便与三十四岁的毛泽东一起生活战斗在井冈山上。他们相濡以沫地度过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历史上最艰苦的岁月，包括充满了艰难险阻的行程万里的长征，直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终于在西北获得了一方得以休养生息的根据地。

井冈山，方圆二百七十五平方公里，五大隘口雄踞峡谷，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里远离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毛泽东很快便在这里建立起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工农兵政府，二十五岁的谭震林被任命为政府主席。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武装割据计划自此开始实施。晚年的时候，毛泽东曾向外国友人谈到一九二七年的往事，他说："国民党如果不抓人杀人，我也不会去革命。""谁教我们打仗的呢？还是蒋介石。""没有军队，就闹不出什么名堂来。""中国的事，历来是有枪为大。"毛泽东正是因此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

这个时候，在湖南的南部，又一次农民起义爆发了，起义的领袖是在广东已经消失、现在又在湖南重现的朱德。

南昌起义军在海陆丰地区解散后，一九二八年一月的隆冬时节，朱德到达了湖南南部的宜章县。在这里朱德得知了一个消息：国民革命军第六军一个叫胡少海的营长，因为对国民党军不满离开部队回到了宜章老家，此刻正准备带领农民们闹点事情。朱德立即与胡少海取得了联系。于是，冒充国民党军副团长的胡少海以衣锦还乡的名义大摆宴席，当宜章县的各界名流都已入席的时候，朱德的官兵持枪举刀冲了进来——宜章县城即刻被共产党人占领了。朱德在宜章把部队编成三个营，他给这支部队命名的番号竟与毛泽东的一样：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朱德在湘南的行动引发了湖南境内新一轮的农民暴动。中共湘南特委的革命激情再次迸发，主张"焚烧整个城市和湘粤大道沿线五里的所有民房"，目

的是“要用一个赤色恐怖去刺激”中国农民，使他们“与豪绅资产阶级无妥协余地”。同时，中共湘南特委派人上井冈山去找毛泽东，命令毛泽东带领部队下山加入湘南的斗争。但此时中共湘南特委的“赤色恐怖”计划所引发的后果已使朱德的部队处境困难。因为知道了毛泽东在井冈山上，朱德决定带领部队向罗霄山脉进发。

两支红军武装就这样相向而行。一九二八年四月中旬，毛泽东和朱德各自带着他们人数不多的部队在宁冈县的砻市相见了，这就是后来中国革命史中所说的“井冈山会师”。从此，毛泽东和朱德，除了因为战争需要或为政治斗争所迫曾经短暂分离过之外，一直到他们携手创建了一个崭新的中国，在漫长的征战岁月里他们再也没有分开过。这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之间的政治友情，是世上绝无仅有的坚固无比的革命情谊的典范。直到他们都老了，然后又相继离世，相信在天国里他们依旧并肩站在一起——毛泽东曾经说过：“朱毛是一个人，一个人是不能分开的。”

朱德和毛泽东会合之后，按照中共湘南特委的决定，两支部队被统编成一个军，名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下辖三个师。“第四军”的称谓并不是虚张声势，按照刘伯承的说法，这是为了“继承北伐战争时期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的光荣传统”。工农革命军成立一个月后，根据中共中央“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的通告，一九二八年六月，“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正式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支红军。

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中国内地的《申报》、《字林西报》的版面上，充斥着共产党人号召穷苦农民暴动起义的消息：“著名赤匪

朱德手下兵马甚多，不少农民甚至国民党士兵投奔朱德，普通百姓喜欢他，只有富人碰到他要倒霉。”“赣东共产党头目，原国民党南昌市党部主席方志敏到处宣传抗租废债，赢得了无知农民的信赖，这对躲进县城的财主们来说情况不妙。”“数千共产党军包围县城，民团无力退兵，全城一片火海，县长下落不明。”“几个月不见踪影的贺龙出现在他的家乡湖南省边界一带，拉起一支队伍袭击富豪，势力正在扩大。”“赤祸由此村蔓延到彼村，从一村扩展到全县，如不奋起将其消灭，中国之未来必属赤匪无疑。”

在社会极端不公平的年代里，富人的噩梦就是赤贫者的梦中天堂。

红军来了！红军来了！消息惊动了偏僻的村落。向往红军的农民们开始秘密开会。地主的深宅大院门户紧闭，护院的民团兵丁拿起了枪。地主的儿子腰里别着匣子枪在祠堂四周转了一圈，他家的一个佃户正在祠堂里带领穷人开会。晚上，这个佃户在地主家的后院被斧头砍死，尸体挂在院墙上。可是天亮的时候，地主家门口乱成了一团，朱毛红军距离镇子东头不远了，地主全家开始向镇子西头逃跑。青年农民们很快就集中在镇边的土道上，手里的梭镖闪闪发亮。红军的队伍走来了。这是一支衣衫破旧但队列整齐的队伍，一个年龄很小的红军吹着一支小铜号走在前面，身后步伐稳健的红军官兵有的赤着脚，有的包着脚布，有的脚上的草鞋已经磨破。

红军占领镇子之后，在所有的墙上写上了标语：“饥民们！向土豪劣绅要粮！”“消灭一切不公平现象！”然后，红军召开群众大会，把地主家的财物一一分给最贫困的人。广场上挤满了穷人，少年们攀在树上，一个红军干部站在广场中央开始了演讲：“穷人过的是什么日子？地主老财、国民党军阀、资产阶级都压榨我们，可他们所有的东西都

是我们穷人创造的！不打败他们，把本来属于我们的东西夺过来，我们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农民协会万岁！暴动万岁！红军万岁！”最后，广场的土台子上走来一个留着胡子、面色很黑的人——朱德讲话的语调很慢，他对农民们讲了自己信仰共产党的经过，讲了南昌起义和红军的主张。他长者般的话语赢得了乡亲们的掌声。有人问：“我想当红军，听说当红军给发二十块钱？”朱德说：“当红军没有钱，官兵都没有钱，有一桌酒席大家一起吃，有一个南瓜大家也一起吃。”又有人问：“全世界无产阶级是什么东西？”站在朱德身边的红军干部说：“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都是阔佬，全世界的穷人都受他们的压迫。全世界的穷人和我们都是无产阶级。”当天晚上，红军从这里出发了，刚出镇子便发现队伍后面多了不少青年农民。农民们说他们要跟红军走，因为他们对红军很满意，如果能够发给他们一袋干粮和一支枪他们会更满意。

在不知道什么是梦想的时候，赤贫的农民只求能够活下去。他们常听富人们说“人生有命，富贵在天”，他们为此到神庙里祷告过哀求过，但是依旧活得一贫如洗牛马不如。红军掀起的革命风暴让农民们很快就明白了，他们也是人，也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只要不怕富人们说的那个“天”。各村各寨的贫苦农民开始向有红军的地方奔去，当一面画着他们所熟悉的镰刀和斧头的红旗突然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当举着那面红旗的人告诉他们穷人也有权利过好生活的时候，他们惊讶、欣喜、冲动，然后赤着脚板跟上那面红旗无论走到哪里。这样的情景几乎能够解释二十世纪初中国所有的革命发生的根由。

那时红军的生活艰苦异常，常常因为没有粮食，官兵们只能吃野菜和野果。在井冈山，新入伍的红军战士曾经抱怨说：“打倒资产阶级吃南瓜。”毛泽东则风趣地说：“这些新同志认为他们的敌人就是资产

阶级和南瓜。”在这样的一支队伍里，令红军官兵舍生忘死的动因是：只有在这里他们才拥有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人世间的平等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犹如梦幻中的珍宝。红军是这个世界上官兵之间从着装到待遇几乎没有任何差别的军队。毛泽东和战士们一起尝试各种不会令人中毒的野菜，朱德有一根和所有红军官兵一样刻着名字的扁担。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岁的红军士兵打仗、训练、学文化、唱歌、打球、种地，彼此之间没有歧视，不允许打骂。那些识字又快又多的战士，能得到一支铅笔之类的奖励，红军部队中所有的官兵都很在乎这样的荣誉。红军因为武器简陋打仗时格外勇敢凶猛，这使红军的作战伤亡率很高，在这支队伍里可以看见许多二十岁不到便少了一条胳臂的少年，但令人惊异的是，纵然如此，他们依旧个个精神饱满斗志高昂。毛泽东在著名的古田会议上重申了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对老百姓要和气，随时帮助他们；借东西要还，损害东西要赔；与农民买卖要公平；买东西要付钱；要讲卫生，盖厕所离住家要远……所有这些体现红军性质的纪律和原则，被毛泽东称为“民主的温和主义”——虽然绝大部分红军士兵并不明白“民主的温和主义”是什么，但究竟是红军使他们获得了人的尊严，使他们拥有了改天换地的梦想和勇气。

就在毛泽东和朱德各自经历了九死一生的武装起义，终于在中国中部一个偏僻的山区创建了革命根据地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地点在远离中国本土万里之遥的苏联首都莫斯科。

在莫斯科郊区一幢名为塞列布各耶的别墅里，会议代表们吃着面包喝着红茶然后一致认为：只要中国共产党人一声呐喊，一夜之间就会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革命高潮，资产阶级顷刻之间便会被无产阶级

的铁拳砸得稀烂，一个崭新的赤色中国用不了多久就会诞生于世界的东方。会议选举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是：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瞿秋白、张国焘、蔡和森。向忠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这个轮船工人出身的共产党人，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被正式命名的主席。

毛泽东不在中央的名单中，他拒绝到中央去工作，他称自己是一个典型的农民，他有一个关乎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命运的绚丽之梦：在偏僻的国土一隅建立一个苏维埃国家，实行土地改革，发展国家经济，从而可以不断壮大红色武装，与国民党政府武装割据下去。毛泽东的这个愿望与中共中央领导者的想法完全相反，中央一再要求红军去占领全国的大城市，理由很简单：列宁当年并没有在俄国的哪个角落先开辟出一个根据地，等把俄国的贫苦农民武装起来之后，才去夺取国家政权。俄国无产阶级发射出的第一发炮弹就落在了资产阶级的老巢——彼得堡皇宫那空旷的院子里，武装的工人和水手没等炮弹的硝烟散尽，就把皇宫的铁栅栏门砸开冲了进去，然后站在宫殿的台阶上向全世界大声宣布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此诞生。

毛泽东坚持在井冈山上过“守山的日子”。一九二八年八月三十日，国民党军开始进攻井冈山的五大哨口之一黄洋界，毛泽东率领三十一团一营的两个连阻击，在反复的拉锯战之后，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迫击炮把仅有的三发炮弹发射了出去。国民党兵从未领教过红军的炮弹，以为主力部队包围上来了，慌忙趁着夜色撤退了，这便是毛泽东在《西江月·井冈山》中所描绘的：“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那天晚上，红军开了联欢晚会，官兵们根据传统京剧《空城计》改编了一出新京剧叫《毛泽东空山计》，戏中的毛泽东像当年的诸葛

亮一样坐在空城上唱道："忽听得山下人马乱纷纷，一抬头举目来观看，原来是蒋贼发来的兵……"

国民党军这时需要调兵遣将的地方已不仅是江西了，因为与江西毗邻的湖南又发生了规模浩大的武装暴动，其领导者是国民党军独立第五师一团团长彭德怀。

独立第五师的前身是北伐时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师，当时任营长的彭德怀与师政治部秘书长、共产党人段德昌关系密切，在段德昌的介绍下彭德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彭德怀升任团长后，这支部队里又来了一位年轻的共产党人，名叫邓萍，彭德怀让邓萍在他的一团一营当文书。几乎和邓萍同时进入这支部队的，还有从黄埔军校毕业的共产党人黄公略。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共湖南省委派遣湘鄂赣边特委书记滕代远赴平江寻找党的组织。就在滕代远与邓萍接上关系的这一天，彭德怀截获了独立第五师师长周磐命令将黄公略"立即捕杀"的电报，他这才得知周磐已经发现了黄公略的共产党员身份。面对共产党秘密组织有可能全部暴露的危险，彭德怀、滕代远决定以闹饷为名举行起义。七月二十二日上午，彭德怀率领两个营袭击了师部和民团，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起义部队随即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接下来的战斗是残酷的，新成立的红军因为还没能形成稳固的战斗力，在与赶来"围剿"的国民党军的作战中伤亡巨大。彭德怀和滕代远被迫决定撤离。经过艰苦的行军，红五军于十二月一日到达江西宁冈县的砻市，与毛泽东和朱德的红四军会合在一起。彭德怀带领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标志着中国革命史上的中央红军的主体初步形成。

随着井冈山根据地武装力量的壮大，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相继成立，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

治委员，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滕代远任副总政治委员。这是当时中国工农红军中最强大的一支武装，并且成为日后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中的主力部队。

红一方面军成立后，制定的第一个作战计划依旧是攻打长沙城。

早期的共产党中央领导人受苏联革命模式的影响，始终坚持“首先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从而使红军屡次把革命的目标对准了湖南的省会长沙。湖南地处中国中部，江河纵横，土地肥沃，山岳险峻，南北通达，一旦为革命武装所占据，对于整个中国革命确有“中心开花”的效果。同时，湖南自古民风剽悍，是农民暴动频发之地，红一方面军中大多数官兵是湖南人，打回老家去也符合中国人传统的思维习惯。

一九三〇年九月一日，攻打长沙的总攻令下达。

翌日，大雨倾盆。红军在大雨中发起了进攻，湖南口音的呐喊声铺天盖地，但进攻很快受到了阻击。国民党长沙守军早有戒备，城防阵地前设置了多层防御体系，战壕与通电的铁丝网多达九层。没有重炮的红军只有用生命冲锋开路，在大雨中他们前仆后继地扑向电网。电网上摞满了死去的红军官兵，冲击仍然无法突破。为了把层层电网撕开，红军使用了古老的作战方式：集中起大量的耕牛，把牛尾巴一一点燃，然后驱赶着牛群向电网狂奔而去。可是，电网后密集的火力扫射开始了，牛群倒成了一片。红军的进攻失利后，国民党军发起了反击，红军激战一天才维持住对峙局面。第二天，大雨停了，红军在被鲜血染红的泥泞中再次发起进攻，攻击持续了一天一夜，仍旧未能取得突破。这时，多路国民党军已增援而至，再战将会陷入重重围困，红一方面军遂决定撤退。

红军对长沙的进攻导致了许多红军干部伤亡。这些二十岁上下的青年农民从红军的课堂里懂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理，即使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刻也从未动摇过理想和信念，他们在红军的每一次作战中都冲在士兵的前面，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是红军部队最基本的保障。红军对长沙的进攻导致的另一个后果是杨开慧遭遇不幸。一九一四年，长沙女子杨开慧在父亲的书房里与毛泽东相识。后来毛泽东对杨开慧说："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与汝。"那时，杨开慧并不知道有一天自己的生命将会为所爱恋的人而面对屠刀。一九二一年，杨开慧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也是在这一年，她与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二十二号的三间木板房内有了一个温暖的家。那是杨开慧短暂的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她为共产党区委秘密传送指示和文件，还为来到清水塘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做香喷喷的湖南辣子。一九二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为组织秋收起义起程去安源，他嘱咐杨开慧照顾好母亲和他们的三个孩子。毛泽东不知道此一去他将永远失去那个从十七岁就开始爱恋他的杨开慧。攻打长沙的红军撤离后，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悬赏千元大洋"捉拿毛泽东妻子杨氏"。十月里的一天，子夜时分，杨开慧被捕。在经受了种种酷刑之后，十一月十四日，年仅二十九岁的杨开慧被枪杀于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在杨开慧长眠九泉整整二十七个寒暑后的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写道：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红一方面军撤离长沙后，不顾中共中央“回攻长沙”的指示，向已被红军包围多日的吉安进发。红军攻打吉安的战斗大获成功，不但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还有八千多青年农民参加了红军。在这个基础上，以赣西南和闽西为主要地域的中央苏区建立了起来。

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决裂两年后，中国工农红军作为对国民党政权具有对抗能力的武装力量的存在，已经成为现实。

一九三〇年八月二十九日，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召集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的党政军高级官员召开了“绥靖会议”，会议制定了《湘鄂赣三省剿匪实施大纲案》，计划用三至六个月的时间彻底消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

至少从军事常识上讲，国民党政府军与工农红军之间无法构成军事对峙局面，因为双方的军事力量悬殊极大。当时的国民党军队连同各路坚决反共的军阀部队，总兵力至少在两百万以上，且掌握政权的国民党政府有充足的金钱来支撑强大的武装力量。国民党军配备有坦克、飞机和各式先进的火炮。而当时分散在全国的红军总数不超过二十万。二十万红军分散在各个根据地内，每一个根据地都处在国民党统治的包围之中，彼此之间联系十分困难，因此军事上的协同、配合、掩护等等根本无从谈起，这使每一个根据地内的红军都面临着巨大的军事危险。当国民党军对苏区和红军展开全面“围剿”的时候，红

军中最强大的一支武装——红一方面军的总兵力还不到三万，而国民党军最终调往江西一地的兵力就达到了一百多万。

国民党军对红军的军事“围剿”持续了近四年。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五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指挥七个师又一个旅向中央苏区发起进攻。红军采取了“诱敌深入，待机反击”的战术，令国民党近十万大军在苏区东奔西跑了一个多月，不但没能接触到红军的主力，而且还不断受到红军小队、农民赤卫队的袭击和骚扰。由于后方补给运输线一次次被切断，苏区内的百姓又早已坚壁清野，国民党军的供给发生了极大的困难。而此时，隐蔽起来等待战机的红军正在加紧学习《八个大胜利的条件》和《三十条作战注意》。这两本军事教材体现了从没有在任何一所军事学校读过书的毛泽东所创造的“另类”作战原则：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十二月三十日清晨，冷雨霏霏。国民党军前线总指挥兼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率部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地带前进。上午九时许，其先头部队突然遭到阻击，阻击异常猛烈，令国民党军无法突破。张辉瓒亲自指挥部队企图发起新一轮的进攻，但就在这时，四面密林中杀声顿起，林彪指挥的红四军、黄公略指挥的红三军和罗炳辉指挥的红十二军已经把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师部加两个旅包围在一个叫龙冈的山谷中了。红军发动了总攻，漫山遍野红旗招展刀枪如林，突围不成的国民党军到处逃窜。两个小时之后，龙冈战斗结束，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长、大个子红脸膛的张辉瓒被活捉。接着，红军乘胜追击逃跑的国民党军第五十师，并最终歼灭了这个师的一个旅。至此，红军在五天之

内两战两捷，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毛泽东为此写道：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不久，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兵力增加至十八个师又三个旅近二十万人马。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红军做了大量的准备，包括派出侦察人员，加强战术训练，建立野战医院，甚至在部队集中时为了节约粮食以减轻补给压力而把官兵的一日三餐改成了一日两餐。与此同时，大批赤卫队和少先队队员再次出动，对敌人后方和运输线进行不断的骚扰。这些穷人的孩子生在大山长在大山，翻山越岭如履平地，他们打冷枪、搞偷袭，神出鬼没来去无踪，闹得国民党军昼夜不宁。更让国民党军感到恐惧的是，种种迹象表明，自己的部队里已有共产党派进来的人，可能是士兵也可能是军官，但就是难以确凿辨别，于是部队的每一次调动都无法做到保密。而所有通往红军活动区域的山路，哪怕是一条难以行走的小道，也被赤卫队和少先队封锁得风雨不透，国民党军派出的化装侦察员大多再也没有回来。

红军再次使用了大规模的运动战战术，自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的半个月中，从赣江边一直打到了福建西北的山区里，一

路上找到机会就回身一战，不战则已，战就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力求围歼。这一次毛泽东写道:

白云山头云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发生在一个月以后。屡遭军事失利的蒋介石亲任“围剿”军总司令，并发表了《告全国将士书》，发誓要彻底“剿灭赤匪”，表示“幸而完此夙愿，决当解甲归田”，否则“舍命疆场”。这一次，国民党军调集了二十三个师又三个旅，总兵力达到三十万，对苏区发起了坚决的攻击。

中国南方的盛夏闷热难当，国民党军已深入到苏区内七十至一百公里处，所到之地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一律平毁，格杀勿论”。在逐渐向红军主力接近的过程中，双方发生了局部战斗。红军在莲塘偷袭了国民党军第四十七师第二旅的一个侦察营，将旅长谭子钧击毙。接着在良村歼灭了国民党军第五十四师大部，击毙副师长魏我威和参谋长刘家祺。红军官兵伤亡一千一百人。

随着不断与红军交战，国民党军八个师逐渐向根据地压缩，最后从三面将红军包围。八月十六日黄昏，红军主力两万人趁着暗夜开始突围，在国民党军第一军团与第二路军之间大约十公里的缝隙间悄悄地移出——能够令两万官兵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悄无声息地大规模移动，也许只有红军才有这样的胆量和能力。接着，突出包围的红军与紧追不舍的国民党军都开始在移动中寻找战机，一旦交战便苦战不休，每一次战斗都进行得十分残酷。在老营盘战斗中，国民党军死伤两千多人，红军伤亡也达两千，红四军十一师师长曾士峨、红三军团四师代理师长邹平阵亡。最后一战发生在方石岭，红军发现国民党军有退却的迹象后猛烈追击，先截住一个营将其歼灭，然后对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发起攻击，几乎将其全歼。但是，在红军撤出战场转移时，部队遭遇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红军第三军年仅三十三岁的军长黄公略在轰炸中牺牲。

红军连续三次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剿”，不但歼灭了敌人大量的有生力量，而且还使赣南、闽西两个苏区连成了一片，中央苏区自此成为全国面积最大的红色根据地。红军在三次反“围剿”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毛泽东说：“对于我们，当敌举行大规模‘围剿’时，一般的原则是诱敌深入，是退却到根据地作战，因为这是使我们最有把握打破敌人进攻的办法。”诱敌深入作战原则的确立，是中国工农红军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的重要标志。

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在远离苏区的上海秘密召开。一部分中央委员被剥夺了参加会议的权利，一些根本不是中央委员的人参加了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发表了啰嗦的演说，在涉及中央人选问题时，他首先表示对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决不能让他们滚蛋”，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由此松了一口气。接着米夫又提到

周恩来："应该打他的屁股，但是也不是要他滚蛋。"最后他开始吹捧王明为"天才的领导者"。在讨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候选人时，不同立场的代表提出了五花八门的名单，有的名单竟把原来政治局的人一个没剩地全部剔除了出去。候选人还没吵出结果，表决权问题又再次引发冲突。会场上互相指责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操着异国语言的米夫不停地拍着桌子咆哮，一遍又一遍地勒令声音最大的代表滚出会场。最后，在米夫的干预下，也就是说在共产国际这个不可抗拒的权威的干预下，会议终于"选举"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向忠发、周恩来、项英、张国焘、徐锡根、卢福坦、陈绍禹［王明］、陈郁、任弼时。候补委员是：罗登贤、关向应、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刘少奇、王克全。政治局常委是向忠发、周恩来和张国焘。

但是，没过多久，悲剧发生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特科重要领导人顾顺章和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先后叛变。

顾顺章，大革命前是上海烟厂的工人，一九三一年四月，他在护送张国焘等人前去鄂豫皖苏区的时候，在武汉街头被叛徒认出被捕。出乎国民党当局的预料，顾顺章立即声称自己有"对付共产党的大计划"，要求速"安排本人晋见总司令蒋公"。武汉的国民党当局一边打电报请示，一边将顾顺章押往南京。万幸的是，发往南京的电报被打入国民党内部的中共党员钱壮飞截获，钱壮飞立即破译了电文并连夜派人赶往上海密报李克农，许多共产党人得以平安转移。但是，顾顺章的叛变依旧导致了一些著名的共产党人遇害：恽代英，他刚刚被中共营救出来便再次被捕，随即被枪杀于南京雨花台；蔡和森，他在香港被捕，随后被引渡到广东，敌人将他的四肢钉在墙上，他坚贞不屈英勇就义。顾顺章的叛变还导致了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被捕。此前，

因得知向忠发不喜欢自己的农村妻子，顾顺章便给他介绍了一个女人，正是因为这一点，向忠发在顾顺章叛变后设计的一次幽会中被捕。向忠发没等敌人用刑就供出了中共中央机要处所在地，这令审讯他的人都有点怀疑这个共产党主席是不是个冒牌货。蒋介石得知向忠发叛变的消息立即电令上海警备司令部“暂缓处决”，但是电报到达时这个窝窝囊囊的老头已经被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下令枪决了。

白色恐怖之下，实际掌握着中央领导权的王明不得不到处躲藏，最后他想起能够救他于危险之中的还是苏联人。王明给米夫打电报要求去苏联，米夫立即回电邀请他到共产国际工作。临走，王明安排了中共中央的工作，这时张国焘已被派往鄂豫皖苏区建立中央分局，周恩来将被派往中央苏区任中央局书记，由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已经所剩无几，经共产国际的批准，成立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其成员是：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生，总负责人是年仅二十四岁的博古。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起了第四次进攻，红军开始了更为艰苦的反“围剿”作战。

“必须向外发展，必须占领一个两个顶大的城市，不要重复胜利后休息，致使敌人得以从容地退却。”——这是中共中央对红军的指示。但是中国的哪一座城市是“顶大”的？早在二月，红一方面军曾经攻击过赣州。赣州三面环水，往来通畅，是赣南政治、经济、军事要地。城内驻有国民党守军三千人，地方武装五千人。在其南北还驻有国民党军第十八军和第一军。毛泽东坚决反对红军攻打赣州，他认为红军还不具备攻坚作战的能力。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想占领赣州，拿毛泽东的话说，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四周农村群众发动起来”，把“游击战争普遍开展起来”，那时候赣州的城墙就会一块砖一块砖地被“搬掉”——毛

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著名战略思想那时还没有最后形成，但是他这个“搬砖头”的比喻已经十分形象有趣。但是中共中央不同意，要求红军必须占领苏区附近的大城市，“使革命发展更迫近夺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

从二月底至三月初，红军一再向赣州发起攻击。攻击西门的红三军团一师几次冲锋都未能突破。攻击南门的红三军团二师组成了突击队，把炸药秘密埋在了城墙下，但是炸药用量的计算失误导致爆破时城墙向外倒塌，突击队队员全部被埋在了废墟下。攻击东门的红七军爆破成功，一度冲进城墙内并占领了城楼，但在国民党军猛烈的反扑中，坚守城楼的红军官兵全部牺牲。国民党军开始大量增援赣州，当红军准备再次爆破时，城内的国民党军突然出击，城外的国民党援军也发起了进攻。在腹背两面受敌的时刻，一师政委黄克诚亲自组织部队用大刀与冲上阵地的敌人展开肉搏，掩护大部队撤退。赣州一役，红军伤亡三千多人，红四军十一师政委张赤男、红十三军三十七师政委欧阳健阵亡。接下来发生在水口的战斗，被称为“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战斗几乎全部在肉搏中进行，沟渠中双方官兵的尸体交错重叠，河水因为注入了浓浓的鲜血而流动迟缓。严峻的局面使红军领导人毅然放弃了城市攻坚战，避免与敌人主力决战，在战略转移中寻找有利的战机。红军先战黄陂，左翼部队全歼了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俘虏了师长李明；右翼部队全歼了国民党军第五十九师，活捉了师长陈时骥。再战草台岗时，红军歼灭了国民党军第十一师大部。红军连续两战两捷，迫使大规模“围剿”苏区的国民党军纷纷撤退。

这时，由于险象环生的局势，上海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迁往中央苏区。

一九三三年一月，经秘密交通站护送，博古、张闻天、陈云先后到达瑞金。自此，创建于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在繁华的大城市里存在了十二年后，搬到了中国的乡村，并且一直在这样的乡村间领导中国革命直至一九四九年赢得胜利。

博古到达中央苏区两个月后，一位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也到达了中央苏区。他是博古请来的，博古要求同志们一律称他为“李德”，取姓“李”的德国人之意。关于这个德国人如何带着几百美元和奥地利旅游护照乘英国商船到达中国广东汕头，如何在甲板上不断地响起国民党士兵皮靴声的船舱里躺了好几天，如何冒充考古专家通过了国民党军的严密封锁进入中央苏区等等惊险的情节，叙述与描绘的版本如何众多如何过分都可以理解，因为正是这个人的到来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进入了充满磨难的岁月：红军损失了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兵力，中国南方的红色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各个根据地的红军被迫进行大规模军事转移。

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几天后，在他所住的那座散发着新鲜石灰味道的“独立房子”里，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博古召集了会议。除了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周恩来之外，政治局书记处书记张闻天［洛甫］、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翻译伍修权，以及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等参加了会议。博古严肃地说：“今天，中央和军委，热烈欢迎我们盼望已久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李德同志是一位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又是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国际主义战士。他来到中国，体现了共产国际对我们党和红军以及中国革命的关怀和支持，更体现了这位革命家和军事家献身世界革命的崇高感情。”然后，这个穿着特大号红军军服，腰间扎着缴获来的国民党军官使用的带有铜圈

的宽大皮带，脚上穿着一双中国人很少见过的厚底运动球鞋的外国人开始了演说：“我，李德，遵照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其书记处的要求，来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的革命根据地，担任派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之职，负责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工农红军提供军事上的协助和指导，帮助建设正规的红军部队，建立强大的苏维埃军事体系，粉碎中国资产阶级政府和反动白军的军事进攻，保证苏维埃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让共产主义的革命红旗迅速插遍全中国、全亚洲、全世界！”

所有的领导人一时间都没有从眼前突然出现一个外国人的惊愕中反应过来，只有角落里的毛泽东在卷烟飘出的烟雾中漠然地看着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外国军事顾问。当李德主动走过去向毛泽东伸出手的时候，他发现这个中国人的身高竟然和他差不多。他看见毛泽东似乎嘟囔了一句什么，于是把头扭向站在他身后的博古，博古赶紧翻译说：“毛泽东同志说，见到你很荣幸。”此时正在生病的毛泽东极瘦，极高，颧骨凸出，头发长而蓬乱，神情漫不经心，视线飘忽不定——在李德和博古的眼里，这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重要缔造者是最不可忽视的，也是最难以琢磨的。

一九三三年夏，沿着中央苏区越来越缩小的边界，枪炮声再次隆隆作响，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了。

蒋介石认为这是与共产党人的最后一战。他设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坐镇南昌处理一切“剿共”事务。为了筹集战争经费和改善武器装备，国民党政府向美、德、法购买了八百五十架作战飞机和大量的其他军火物资。据《大公报》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二日统计，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捐税已经达到了一千七百五十六种之多。蒋介石这一次采取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战略方针：政治

上推行保甲制和“连坐法”，控制交通，实行禁运，以地主武装加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军事上则推行堡垒政策，“以守为攻，乘机进剿，主用合围之法，兼采机动之师，远探密垒，薄守厚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九月，五十万国民党军被调往江西前线。

面对国民党军的强大进攻，住在瑞金那座“独立房子”里的军事决策者不顾敌我力量对比的悬殊，仍然命令红军对敌人的坚固堡垒实行攻坚战。这使红军的反击从一开始就连续受挫，经黎川、硝石、资溪桥、浒湾、八角亭、大雄关等一系列战斗，红五军团十三师减员过半，红三军团四师政委彭雪枫负伤，红七军团十九、二十两个师因为伤亡过大合编为一个师，红一军团一师、二师师长都身负重伤，二师政委胡阿林负伤后不治牺牲。

就在红军陷于军事被动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有可能缓解甚至扭转危机的机会：驻扎在福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反叛，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表示与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决裂。蒋介石不得不立即调动部队前往镇压。面对国民党营垒中出现的大分裂，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建议：红军主力抓住机会立即离开中央苏区，深入到杭州、苏州、南昌，甚至是南京附近去开辟新的游击区，在没有堡垒的地区寻求作战机会，迫使“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回防，让红军的作战态势由防御变为进攻。同时，这样也可以分散国民党军对造反的第十九路军施加的军事压力。

这个建议后来被国民党高层人士获悉，仔细分析之后他们不寒而栗：如果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与第十九路军合为一股，兵力便会膨胀近一倍。这些军队如果活跃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心地带，不但云集于共产党苏区的军队要全数调回，而且一旦瑞金的红军与湖南、湖北等地

的红军会合，那么国民党军所要面对的局面将难以收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红军被迫开始军事大转移的前一年，毛泽东就已经提出可以暂时放弃苏区。这再次体现了毛泽东“不要固守一城一地，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军事思想。但是，一九三三年夏，在中央苏区，这样的军事思想不被接受。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红军被一再命令向敌人层层叠叠的坚固堡垒发起进攻。团村一战，虽歼灭国民党军千人，但红军也伤亡千人，红三军团四师师长张锡龙、红五军团十五师师长吴高群阵亡。面对红军遭遇的损失，朱德提出将红军主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转移。建议没被接受反而传来了继续反击的命令，结果红军再次出现大量伤亡。一九三四年一月，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起了最后孤注一掷的军事进攻。强大的攻击兵力在中央苏区的东、北两个方向上集结：东路军共十六个师又一个旅和两个团，由卫立煌指挥；北路军共二十五个师又两个旅、三个团和一个支队，由陈诚指挥。二十五日，国民党军首先向苏区北面建宁方向的红军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红军的阵地上瞬间腾起一片火海，国民党军一步步筑垒推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其前锋直指中央苏区的中心。

此时的毛泽东孤独地住在一座破旧的寺庙中，伴随他的只有妻子贺子珍以及他们三岁的儿子毛岸红，还有一位法号叫“乐能”的老和尚和两个小和尚。

不断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的国民党军已经距离瑞金不远了，瑞金开始遭到国民党军飞机的连续轰炸。苏区的党政军机关已经迁到了瑞金以西二十公里处的梅坑。领导人被分散安排住进各个村庄里，唯独毛泽东住在高围乡云石山山顶的这座寺庙里，无法得知在以防空为目的的隐蔽疏散中，为什么把毛泽东安排在目标明显的山顶上。青瓦黄

墙的寺庙寺门上有一副对联：“云山日永常如昼，古寺林深不老春。”横批取上下联的前两个字为“云山古寺”。寺中满院芳草，寺后一棵大樟树，树下两个青石凳，坐在石凳上可以静静地读书，或者远眺四周平展的稻田和袅袅炊烟。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无公可办。

此前，毛泽东刚刚受到党内的严厉批判。他的“四大错误”是：一、“狭隘经验论”和“游击主义”，与中央“夺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精神背道而驰；二、“富农路线”，主张在土地分配时“要给富农出路”，与中央“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精神背道而驰；三、“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战略是“单纯防御路线”，与中央“先发制人，积极进攻”的精神背道而驰；四、“以党治国”，建立中央苏区最高领导机关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赋予总前委书记对红军的指挥权，这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余毒”。因为这四大错误，毛泽东被撤销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

那一年的春节，毛泽东过得十分冷清。节后没多久，一个大雨倾盆的日子，警卫员报告说两匹马正往山上来，看不清楚马上是什么人。两匹马到了寺庙门口才知道是项英和他的警卫员。项英对毛泽东说：打赣州进行得很不顺利，恩来同志请你到前线去。项英并没有给毛泽东带来马匹，毛泽东抓起一把雨伞冲出庙门径直往瑞金走。到了瑞金，浑身湿透的毛泽东向前线发了一封电报，建议刚刚起义来到苏区的红五军团前去赣州解围。然后他乘上一条小船赶向赣州。两天三夜后，毛泽东到了赣县的江口圩。刚刚撤退下来的红军和中央局的领导项英、王稼祥、任弼时、彭德怀、林彪、陈毅等在这里召开了会议。会上又爆发了冲突，因为面对攻打赣州的失败，中央局依旧坚持攻打大城市，而毛泽东十分强硬地坚决反对。周恩来、朱德和王稼祥

鉴于当前严重的敌情，主张重新任命毛泽东为红军总政委。由于他们的一再坚持，毛泽东重新拥有了军事指挥权。但是，恢复了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的矛盾更加激烈了。在数次军事决策中，毛泽东的建议连续被否决，毛泽东不能眼看着红军一再失利只有擅自发布命令，结果招致了中央局的勃然大怒。

毛泽东后来一生都没忘记在江西宁都城郊的一个农家小院里召开的宁都会议。宁都会议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但是，现存的一份《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上有这样的表述："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毛泽东坚决不承认自己有错误。周恩来不得不站出来表态，他同意"毛泽东有某种倾向"的说法，但是建议让毛泽东随军行动。为此，他提出两个方案：一是让毛泽东在前线当红军总政委的助理；二是让毛泽东全面负责前线指挥，自己给毛泽东当助理。中央局同意了第一种方案。但是最后的决定却是：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请了病假的毛泽东从宁都走了两天回到了瑞金。贺子珍不在家，有人告诉他说贺子珍快要分娩了，去了汀州的福音医院。毛泽东心情烦躁，一连两天没出房间。第三天，他骑马直奔汀州。在汀州，他看见了他的老朋友、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傅院长连声恭贺，原来贺子珍生了个儿子。他们为这个孩子起名为"毛岸红"。儿子的诞生使毛泽东郁闷的心情缓解了一些，他在汀州住下边治病边读书。这是毛泽东政治生涯的最低潮，他的住处门可罗雀，因为可能被归入"小集团"之中，所以没有人敢与他来往。毛泽东也不愿意连累别人，他不再与别人接触、谈话，这位健谈的共产党领袖有时一连几天都不说一句话。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那个时候共产党中央领导人与毛泽东之间的冲突个中原因不难解释。首先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与中国

革命实践的认识差异不可调和：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感悟到革命的真理，他没有按照共产国际所奉行的革命模式行事，特别是在如何建立革命武装、依靠什么阶级成员以及武装斗争的样式上，他虽然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一生都竭力反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这使他从一开始就被那些在苏联受过系统政治训练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们认为是个“土包子”。特别是，这个农民出身的“土包子”从来就没有向“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们低头或妥协的任何迹象。其次是对中国革命领导权认识的差异不可调和：自从毛泽东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确定在农民中间，并在深山中建立了农民武装和革命根据地之后，当时共产党中央的主要领导者中，没有一个人在政治威望上能够超越毛泽东，其原因是红色政权根据地的主体和红色军事武装的主体就是广大的青年农民。当共产党中央在大城市里无法生存继而转移到乡村根据地时，享有很高威望的毛泽东从一开始就令他们感到了无法立足的威胁。在以后的数十年间，毛泽东一直清晰地记得那段难熬的日子：“我是政治局委员，但是他们却不要我参加中央全会，把我封锁得紧紧的，连鬼都没有一个上门来找我。”“那个时候，我的任务就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前线阵地不断后撤的战报雪片一样飞到红军总部，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毛泽东正在寻找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好使自己的装束与“国家主席”的身份更加吻合——就在国民党军队逐渐逼近瑞金的时候，中央苏区召开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开幕前举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阅兵式，红军官兵、农民赤卫队和少先队队员列队走过主席台。毛泽东已经没有了军事指挥权，他现在是一位行政领导，因此他所作的报告在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声中不免令人感到幻象丛生。毛泽东讲了苏区的民主选举工作，强调提高选民中妇女的成分；讲了八小时工作制，要求建立专门的机构监督；讲了农村的“查田运动”，指

出土地分配是否公平要由群众会议来检查；讲了苏区内学校和学生的详细数字，说目前至少有百分之六十九的妇女参加了扫盲运动。毛泽东的报告还涉及了植树问题、公债问题、卫生问题和调整各种农作物的种植比例问题。针对年轻人想早点娶媳妇的倾向，毛泽东细致地讲解了苏区的《婚姻法》，他说："等二十年有什么关系？早婚对人不好，安心点！长工们往往干活到四五十岁还没希望讨到老婆哩！"最后，毛泽东展开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徽和国旗的图样，他解释说国徽和国旗是这样规定的：

在地球形上交叉的镰刀与锤子，右为谷穗左为麦穗架于地球形之下和两旁，地球之上为五角星。上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再上书"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地球形为白色底子，轮廓经纬线为蓝色，五角星为黄色。

国旗为红色底子，横为五尺，直为三尺六寸，加国徽于其上。旗柄为白色。

就在代表们热烈讨论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旗样式的时候，距离会场并不遥远的前线，为保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而战的红军正经历着从未有过的巨大牺牲。坪寮战斗最后以红军撤退结束。鸡公山战斗中红军只有边打边退，红七军团三师七团一营营长岳忠山带领部队与敌人反复争夺阵地，最后时刻手拿一把大刀扑向敌群，连续砍杀十余名国民党军士兵后，流尽鲜血牺牲在阵地上。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在团长杨得志的率领下抵抗着国民党军三个师的进攻，弹药全部用光之后，红军战士用石头砸、用拳头打、用牙齿咬，阵地竟然数昼夜岿然不动。只是，无论红军官兵多么不惜生命，阵地往往在红军全部伤亡之后一一落入敌手。

一九三四年四月，国民党军逼近了中央苏区的北部门户——广昌。四月十日傍晚十八时，国民党军十一个师向广昌发起了大规模进攻。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中，红军的阻击阵地被连续突破。十四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联名致电中革军委，建议红军主力避免与敌人长时间对峙，应采取“运动防御”的战术“机动地消灭敌人”。但是李德和博古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红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布了《保卫广昌之政治命令》：“应毫不动摇地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有生兵力。”面对这用词蹩脚生涩的命令，一脸硝烟的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愤怒地说：“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万二千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广昌附近是开阔的平地，极不利于防守，而国民党军的坦克可以毫无阻拦地向前碾压。战至四月下旬，广昌已被国民党军三面包围，红军被迫撤离。惨烈的广昌保卫战历时十八天，红军伤亡五千多人，其中红三军团伤亡近三千——没有比大量的红军干部阵亡更令红军指挥员痛心的了，因为对于整个红军有生力量的保存和发展来说，丧失了红军干部比丧失苏区的土地更加不可挽回。

一九三四年六月，国民党军占领广昌之后，调集了三十一个师的兵力于七月初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发起了全面进攻。在李德、博古作出的“全线抵御”的战略部署下，已经连续苦战了近十个月的红军又开始了更加艰难的防御作战。高虎脑一战，国民党军倾泻在红军阵地上的炮弹达数千发，直至红军的阵地成为一片焦土。万年亭一战，红三军团五师政委和军团卫生部部长阵亡，全师团以下干部牺牲三百四十二人。驿前保卫战，红军官兵决心“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仅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十五师就有两千三百五十二名官兵伤亡。而在兴国方向的阻击战斗中，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陈毅身负重伤。一九三

四年十月六日，国民党军占领了石城地区，这里已经十分接近中央苏区的核心部位了——敌人拟于十月十四日对瑞金发起总攻。

危在旦夕的前夜，瑞金的四周十分寂静。

不久前，中央已决定第六、第七两个军团撤离根据地。

无法得知毛泽东获得这个消息时的反应，但毛泽东前往于都视察还是引起了诸多猜测。有相当多的史料认为，毛泽东在红军即将出发的时刻到远离瑞金的于都去，是博古想令毛泽东就此留下来。但也有史料证明，到赣南视察的要求是毛泽东自己提出的，他向中央书记处请示并且得到了同意。毛泽东到达于都的时候，他憔悴的模样令赣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龚楚吓了一跳，他问："主席身体不舒服吗？"毛泽东答："身体不好，精神更坏。"接着，周恩来的电话打来了，他要求毛泽东着重了解一下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毛泽东很快就判断出这个要求的真实含义，于是他对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作出了详尽的调查——二十天后，苏维埃共和国与中央红军正是从于都突围出去的。

调查电报发出之后，毛泽东突然发起高烧。警卫员吴吉清打电话向瑞金报告，张闻天派傅连暲院长赶到这里。毛泽东被确诊为恶性疟疾，他在床上昏沉沉地躺了整整八天。一个叫刘英的女红军此刻正在于都征兵，她后来成为共产党领导人张闻天的妻子。刘英来看望病中的毛泽东，毛泽东抱着被子斜在床上，他迷迷糊糊地给刘英背诵了一首明朝金陵人陈全作的曲子，以形容自己此时的痛苦：

冷来时冷的在冰凌上卧，

热来时热的在蒸笼里坐；

疼时节疼的天灵破，

颤时节颤的牙关挫。

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

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

真个是寒来暑往都难过。

病中的毛泽东挣扎着给博古写了一封信，建议中央红军转移到外线作战。具体路线是：从兴国方向突围，攻万安，渡赣江，经遂川北面的黄陂，沿井冈山南麓越过罗霄山脉的中段，迅速进入湖南境内，再攻攸县、茶陵，在衡山附近过粤汉铁路到达有农民运动基础的白果一带休整和补充，然后攻永丰、蓝田或宝庆。当调动敌人远离苏区之后，再返回中央苏区所在的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这封信的内容表明，毛泽东那时没有将中央红军大规模转移到中国西北地区的打算。只是他提出的这条作战线路简直就是返回他的故地的路线，而李德和博古无论如何也不会到毛泽东的老家去。由于信件涉及了极端的军事机密，毛泽东派警卫员送信的时候要求带上火柴和汽油，以便在发现敌情的时候立即将信烧掉。

毛泽东送出的信没有任何回音，但是一个秘密通知到达了于都，毛泽东被要求立即回到瑞金。

毛泽东知道，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来讲，一个极其重要的时刻到了。

瑞金的“独立房子”里正在召开小型会议，与会者除了李德和博古之外，还有张闻天、周恩来和朱德。这是一次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

的高度机密的会议，会议作出的重大决定和向共产国际发出的重要电报，如今没有任何可以核对和考证的文字线索。只是那个重大决定已经成为没有争议的史实：放弃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军事转移。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喜欢吃鸭子，因此，“独立房子”的周围养着大群的鸭子，鸭子们的嬉戏喧闹和领导们的经常云集已经成为这里的一景。突然，细心的红军官兵发现这一景象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领导们的会议多了，但是鸭子越来越少了。

红军的高级将领们也嗅出了苏区空气中的异样，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找到了毛泽东，小心地试探着问：“我们要到哪里去？”毛泽东面无表情地答：“去命令你们去的地方。”

除此之外，在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前，苏区的田野中依旧是一派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景象，红军干部们依旧三三两两地走村串户，写出“人”、“马”、“手”或“太阳”教农民们识字，然后给各乡的贫协干部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苏维埃共和国的百姓绝大多数搞不清楚“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底是什么，他们甚至无法准确地把大胡子的马克思和小胡子的列宁区分开来，他们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全部热情来源于对共产党和红军的信任，他们坚定地相信只要跟在共产党和红军的身后，他们梦想中的无产阶级的好日子就会天长地久。尽管此刻他们也听说了前线的情况有些不妙，但他们依旧相信苏维埃共和国不会消失，他们相信红军是不可战胜的。

正是秋天，稻子金黄。为了庆祝丰收，红军剧社的小演员们在广场上搭起了演出的席棚，演出的内容有自创的《丰收舞》和《红军舞》，有学习苏联的《水兵舞》和《高加索舞》，然后红军女战士嘹亮地唱道：“红缨一杆捅破天，贫苦的人们笑开颜！”台下的红军官兵

和四乡的百姓看到这儿时，的确是个个喜笑颜开。和他们一起席地而坐的还有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毛泽东已经习惯在快开演的时候走进人群找个空儿坐下来，有时为了坐着舒服些他的手里还提着两块砖头。天黑下来的时候，聚集在这里的人们点燃了火把，火光闪闪烁烁地连成一片。如果从空中看下去，四周残酷的战场在沉沉黑夜中一片死寂，唯有被死寂包围着的这一小片土地上闪耀着人间欢愉的光芒——这样的景象对于中国历史宛如罕见的绚丽之梦。

# 第三章 十送红军

1934年10月·江西瑞金



当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面展开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国红军总司令部——构成苏区指挥中枢的庞大机构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快速运转。

在历史的那个时刻，在整个中央苏区内，工作最繁忙、心情最紧张的当属共产党中央总负责人博古。

博古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奇特的人物之一。至少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几年间，作为共产党领导层中的重要一员，他的名字无论

从哪方面讲都该列入党史名册。但自一九三一年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后，仅仅过了三年，他便在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的途中从革命史册上消失了。中国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博古在中共中央组织部供职。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他被派往湖北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部长。一九四一年回到延安在《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工作。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作为与国民党谈判的共产党代表团成员之一，他乘坐的飞机在重庆飞往延安的途中，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坠毁，时年三十九岁的博古遇难。同机遇难的还有著名的共产党人叶挺和邓发。

随着那架“因为气候原因而迷失了方向”的小型飞机一头栽进中国西部的黄土沟壑中，博古曲折的人生经历也在刹那间被尘封为历史往事。而恰恰在博古全面掌握领导权的三年间，中国共产党人以及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中国革命史上最艰难的岁月。在这段岁月里，博古所面对的复杂的政治斗争和险恶的军事形势，无不在质疑和挑战着他十分有限的政治经验和军事才能。作为承担着中国革命命运的领导者，博古被他所肩负的巨大责任折磨得十分消瘦。

博古，原名秦邦宪。江苏无锡的秦家曾是一个书香传世的大家，这个家族的族谱上有中国文学史中赫赫有名的人物——北宋婉约派词人秦观。秦观那“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凄婉词句，在整整十个世纪过去了之后，依旧被中国人在各式各样的纸页中书过来写过去。只是到博古出生时，秦家的家境已经败落。博古对诗词毫无兴趣，天生的演说才能使他成为学生运动领袖。一九二五年，十八岁的博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和无数向往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国青年一样，他奔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此期间，他与同学王明共同组成了一个名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小团体；同时给自己起了个与苏联同志类似的名字：博古诺

夫。一九三〇回国后，他把“博古诺夫”省略成“博古”，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任干事。一九三一年，在向忠发叛变的非常时期，经王明鼎力举荐，博古年初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四月任共青团中央书记，九月任共产党临时中央常务委员，直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总负责人。一九三三年，博古连同临时中央政治局到达瑞金苏区。五月，被增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就这样，当一九三四年巨大的动荡将要来临时，博古的政治权力也达到了顶峰：在党内，他任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和中共中央书记；在政府中，他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府主席团委员；在红军中，他任红军前方野战司令部政治委员——这个拥有党政军大权的青年这时年仅二十七岁，除了读过马克思和列宁的书籍之外，没有过任何从事革命武装斗争的实践。

当中国工农红军以巨大的代价完成了长征之后，博古在延安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当时是‘三人团’处理一切。”——放弃中央根据地，数万红军大规模转移，整个苏维埃国家整体搬迁，如此重大的决策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如果博古的这个说法是真实的话，无论如何都令人难以置信。

一九三四年，中国共产党经过六届五中全会的改选，领导机构和组织程序已相对健全。中央政治局十一名正式委员中，除王明和康生在苏联、任弼时在湘赣苏区、张国焘在川陕苏区外，其他的委员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毛泽东、陈云、顾作霖均在瑞金；候补委员中除关向应在黔东苏区外，朱德、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也在瑞金。当时的书记处成员在党务、政府、工会等方面各有分工：党中央设有由李维汉任局长的组织局，中央大量的日常工作由组织局

处理。政府方面，虽身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已不能有效地行使权力，但是身为副主席的项英大权在握，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也有相当的权力。而在军事上，朱德是中央政府的军事部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周恩来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委，王稼祥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刘伯承任红军总参谋长。中革军委下属的总司令部、总供给部、总卫生部、总兵站部、总动员武装部等机构十分健全。由此可见，当大规模军事转移计划形成的时候，博古和李德应该无法完全取代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擅自决定一切。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革军委是红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在日后红军长征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重大决定都是以中革军委的名义作出的。在中革军委之前组建的中央军委，成立于大革命时期，全称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是隶属于共产党中央的军事指挥机构。一九三〇年，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之所以设立一个隶属于政府但在职能上与中央军委重叠的军事机构，是因为俄国十月革命时，负责指挥军队的军事机构就是隶属于政府的，名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共中央明确规定中央军委和中革军委是同一套班子，对外是中革军委，对内则是党的军委。同时指出：“在苏维埃政府中，军事指挥系统直属中央临时政府之下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则成为绝对的，有权指挥所属红军与一切武装力量。只有其上级政府与党的苏区中央局可以变更其决定”。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简称“中革军委”。在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前，中革军委主席为朱德，副主席为周恩来、王稼祥，代理副主席为项英，委员有十七人，包括彭德怀、林彪、叶剑英、谭震林、博古、张闻天、毛泽东等。军事顾问是李德。

依据李德的说法："军事转移"这个思想"是我一个人在一九三四年三月底首先提出来的"。但是，这个外国人的头脑毕竟还没有完全错乱，或者说是因为不愿为中国红军的巨大牺牲承担责任，于是他又补充说"军事转移在军事委员会讨论通过并形成了决议"：

五月初，我受中央委托草拟了一九三四年五月至七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三个月的季度计划。这个计划是以军事委员会决议的三个观点为基础的，这三个观点是：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独立部队深入敌后作战，部分放弃直接在前线的抵抗，以利于在苏区内开展更灵活的行动。这个草案在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又由周恩来在细节上作了加工。最后计划规定：储备粮食、冬服，以保障红军的物质需要；建造新兵工厂，以修理机枪、迫击炮和野战炮以及制造各种弹药，特别是迫击炮和手榴弹；政治上和组织上系统地加强志愿兵的动员工作；改编军队，配足各师的兵力，把这些师编入军团，每个军团至少两个师；贯彻符合运动战要求的训练原则，以及其他内容等等。最后还草拟了一个战略战术指示，这个指示在夏天传达给了军队的高级领导人。

决议草案是否如李德所说"在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至今依旧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但有一点应该是符合通常程序的，即军事转移计划被用电报的形式发往共产国际请示；同时，军事转移的决定应该是讨论之后作出的，尽管讨论的范围可能很小。

根据李德的翻译伍修权记述：一九三四年五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三人团"是中革军委中的一个决策班子，是军事意义上的决策中心。李德曾说："毛泽东……以他称之为'灾难'的毫无战绩的广昌战役为把柄，给博古、周恩来和我——即他所谓的军事上的'三套马'加上种种罪名。"李德的话表明，三人决策班子在广昌战役中就已经存在了。这个班子的工作方式是：在博古的支持下，李德排斥了朱德、王稼祥、刘伯承等红军领导参与

军事决策的权利，自己包揽起军委的一切工作。凡遇重大军事行动，均由博古和李德作出决策，再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以中革军委主席、副主席的名义签发电文并负责实施。在这种情况下，中革军委的集体领导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已名存实亡。而中共中央书记处之所以决定成立“三人团”，是因为大规模的军事转移在即，需要有一个精干的班子秘密筹备转移的准备工作。迄今为止，只能在史料中看到博古、李德和张闻天明确提到“三人团”，而朱德、王稼祥、刘伯承等其他红军领导人从来没有提及过。由此可见，成立“三人团”的决定，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讨论通过。而李德就这样在拱手相送般的礼遇中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命运的决策者。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一九〇〇年出生在德国慕尼黑郊区的马宁镇。除了奥托·布劳恩这个德国原名之外，还有“斯特洛夫”、“特利罗夫”、“巴格奈尔”以及“李德”、“华夫”等一系列化名。据说李德对“华夫”这个名字最满意，因为翻译告诉他这是“中国男人”的意思。

李德的身世扑朔迷离。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称自己一九三三年在北平见过他，并说这个“从来不提自己的身世和姓名”的德国人，曾在南美和西班牙当过“革命的代理人”——“代理人”这个用于商品交易中的词汇被用在革命事业里显得格外古怪。根据斯诺提供的履历，李德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二八年在德国被捕并被“判处死刑”，但是他逃了出来并且一直逃到了莫斯科，他在那里受到了苏联共产党的政治和军事训练。而美国另一位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却是这样说的：李德是奥地利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一名德军士兵被俄军俘获，继而被押往西伯利亚。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爆发后，几乎所有的战俘都站在了革命的对立面上，唯独这个叫布劳恩的战俘参加了苏联红军。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打了三年仗之后，布劳恩已成为苏联红军骑

兵师的参谋长。他被选送到莫斯科陆军大学进修，学成后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被派往中国。但是，李德死后，当时的东德报纸用讣告的形式描绘出的竟是另外一个李德：十三岁在初级师范学校读书，十八岁服役上一战前线，战后回来继续上学，十九岁成为德国共产党前身“斯巴达克联盟”成员，二十岁成为德国共产党汉堡组织成员，二十一岁在德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做情报工作，二十六岁被魏玛共和国司法部以叛逆罪关进柏林西区莫阿比特监狱，两年后以“曲折惊险的方式”越狱成功逃往苏联，继而以“巴格奈尔”的化名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九年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一九三二年离开莫斯科前往中国。

李德本人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往中国。我的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对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双重斗争中担任军事顾问。”前苏联远东研究所A·季托夫在《纪念奥托·布劳恩八十诞辰》一文中也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中国共产党人的请求，派遣他前往中国，担任中共中央红军总部的顾问。”那么，究竟是哪个中国共产党人向共产国际提出了派遣军事顾问的请求？或者，究竟是哪个中国共产党人指名道姓请奥托·布劳恩来指导中国革命？

一九三七年，在充满了艰难险阻的长征中幸存下来的王稼祥去苏联治病，他在那里见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王稼祥就李德一事向王明提出了质问：共产国际是怎样决定派李德去中国的？在李德去中国前你和他谈了什么？为什么博古要完全依赖李德指挥军事工作？王稼祥后来回忆说：“那一天王明的回答令我大吃一惊。”王明说，共产国际从来没有派李德到中国去，他本人也从没对那个德国人作过什么指示，他只知道李德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到中国去

的，至于派他去中国干什么不清楚。吃惊之后的王稼祥勃然大怒，他认为这是王明为推卸责任而在编造谎言。因为当时共产国际派往所有国家的代表和顾问，必须经过共产国际的东方部和西方部。当这两个机构撤销以后，就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直接决定和批准。王明是共产国际负责中国党的工作的执行委员，这么大的事怎么可能一无所知？而如果李德真如王明所说，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的，那么他凭什么去指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

早在李德没来中国之前就与之相识的老资格共产党人师哲曾在共产国际工作过，他不但坚持说李德是一个被俄军俘虏的普鲁士军队下级军官，而且对于李德的来历提供了一个新的说法：这个德国人本是苏联军队里的一名普通特工，他之所以来到中央苏区并且颐指气使，完全是“博古搞出来的事”——“李德到中国来，根本不是共产国际派的，东方部和中共代表团都没有派他去中央苏区当什么军事顾问。我听说他开始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往远东搞情报工作的，因为他是德国人，当时我国东北地区被日本占领着，他同日本人打交道会方便些，所以来到中国东北。后来不知怎么又到了上海，正好被博古他们在共产国际驻华办事处见到了，就被博古弄到了苏区，成了军事顾问。”

师哲提到的“搞情报工作”竟有相应的史料可以核对：一九三一年秋天，苏联著名的情报小组“佐格尔小组”中的一名成员在中国被国民党当局查获并被判处死刑。佐格尔通过各种关系与国民党当局的上层官员达成了协议：用两万美金把人赎出去。苏军总参谋部得到消息后，立即派出两个“德国同志”携带美金前往中国办理此事。于是，“党龄都已十年多的德国共产党老党员奥托·布劳恩和赫尔曼·西伯勒分别踏上了征途”——这一历史情节与王明对王稼祥所说的那番话有吻合之处：李德来到中国与共产国际无关，他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的。

完成了营救苏军间谍的任务后，“德国同志”布劳恩来到上海的中共中央，他的主要工作是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世界各地的情报翻译整理后用电报发给中央苏区，同时再把从中国搜集的情报翻译整理后用电报报告给共产国际。在上海工作期间，他遇到了正准备撤往瑞金的博古，在博古的请求下，布劳恩化名“李德”来到中央苏区，成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

博古此举的理由很简单：请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无疑会加强他这个从外面来的年轻的总负责人的威慑力量，因为他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一批创建了红色根据地和红军武装的共产党领导人。

历史本来简单，是千头万绪的思路将历史搞复杂了。

一切都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观念在作怪。在博古和李德这样的共产党人眼里，毛泽东和朱德都不在“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之列。博古真诚地认为，没有规范地学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的人，迟早会被革命的发展所淘汰。但是，面对中国红军即将开始的大规模军事转移，博古和李德无论如何都不敢擅自决策，他们必须请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大本营——那个远在异国他乡的共产国际。

关于军事大转移的计划，博古与共产国际往来多封电报。但是，令博古和李德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中央红军即将离开苏区的时候，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报联络突然中断了。中断的原因很久以后才知道，是因为共产党上海局连同秘密电台一起被国民党秘密警察查获了。李德说：“中央与外界完全隔绝，对以后事态的发展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影响确实是“无法估量”的。秘密电台的丧失，切断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而此时的中国工农红军即将转战于崇山

峻岭与急流险滩之间，恢复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一局面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共产国际的大员无法再对中国共产党人发号施令了，而那个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博古也失去了拥有“上方宝剑”的靠山。历史突然进入了这样一种时刻，对于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讲，犹如难以驯服的烈马突然甩掉了笼头，于是，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的转危为安已经指日可待。

一部电台的失去竟使历史突然间改变了走向，这是一九三四年九月间的博古、李德、毛泽东，以及在上海狭窄的里弄中忙于搜查的那些国民党秘密警察，谁都不曾想到的。

中国共产党人和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具有坚定无比的政治信仰和铁一样的组织纪律，因此他们能够身处巨大的危机之中仍然从容不迫地一一打点行装，虽然几乎所有的红军官兵都不知道自己要走多远，要走多久，要去哪里。

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准备工作首先是舆论上的准备。

在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疯狂“围剿”的时候，中共中央提出的口号是“决不放弃苏区的一寸土地”。现在，整个苏维埃共和国都要转移出苏区了，因此必须在舆论上对红军官兵和苏区百姓有所交代。

发表在中共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名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对此作出了说明。文章首先颂扬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取得的胜利，指出这一胜利“大大地兴奋了与革命化了全东方民族与全中国的民众”。接着，文章批判了“认为党的路线仅仅是进攻路线”的错误观点，批判了在苏区内部与敌人较量的“个人的拼命的英雄主义”：“他们看见某些战线上几次军事的胜利，就会发狂，就会使胜利

冲昏头脑，以为革命在明天就会胜利，明天我们就会占领南昌、上海。”文章最后阐述了主题：放弃苏区或者说转移战线，是可以在马克思和列宁那里找到依据的一种策略，因为“马克思主义和一切原始社会主义不同，就在于他不用一种固定的斗争方式束缚运动，他承认各种各样的斗争方式”。那么，为什么要进行大规模军事转移呢？文章说：“跟着群众自觉性的生长，跟着政治经济危机的剧烈化”，便产生了“新的越来越复杂的防卫和进攻的方法”，而“马克思主义无条件地不抛弃任何一种斗争的方式”——识字不多的红军官兵根本无法弄清这些蹩脚的翻译和生涩的行文，他们只能拐弯抹角地从中捕捉即将发生的事情：红军要离开苏区了。其实，所有这一切只需一句话就能向红军官兵讲清楚：“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只不过毛泽东的这句话实在太“土”了，在博古和李德看来，即使毛泽东的说法有正确的成分，“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也绝不会像草寇首领一样粗俗地说话。

舆论准备之后，更重要的是军事转移前的物质准备。

李德亲自试验了苏区兵工厂制造的三颗手榴弹。第一颗等了好一会儿也不见爆炸，在决定前去查看的时候，却见手榴弹“嘭”的一声裂成了两半。第二颗根本就没有爆炸，而且无论等多久连“嘭”的一声也没有。第三颗的爆炸声虽然清脆好听，但它爆炸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差点把李德当场炸死。李德说：“亲爱的同志们，今天，一颗炸成两半，一颗没炸，一颗全炸了，成功率应该算百分之五十。你们能够保持这个比例么？”兵工厂的红军干部表示：“能！”

苏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工业。最初的兵工厂仅是在一间屋子里简单地修理枪支。后来终于有了几台旧机床，那是许多共产党人历尽千难万险甚至是付出了生命才弄进苏区的。这些旧机床被连接在红军打漳州时缴获的那台发电机上，居然可以转动。有关部门在可能的

范围内广泛征召铜铁锡匠和烧焊工，大城市中的地下党也专门送来了真正的技术工人，红军还从国民党俘虏中鉴别出懂得军工知识的官兵，同时迅速在红军部队中培养政治可靠又懂技术的人才。所有这些人集合在一起，从利用废弹壳造出不保证全能打响的步枪子弹开始，直到造出雷管、炸药，修理好前线缴获来的机枪和迫击炮，甚至制造出了几发迫击炮弹。苏区兵工厂最重要的任务是制造手榴弹，兵工厂的工作人员到处收集废铜烂铁用以浇铸手榴弹弹体，因为在红军所擅长的近战中手榴弹用途最大。

在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前夕，李德匆忙的身影在苏区内到处可见，他来回地视察通讯厂、被服厂、织布厂。为了配合他的工作，红军总部一局汇总了有关武器装备和生活物资准备的各项资料：枪支三万三千二百四十四支（挺）、子弹一百七十三万二千一百三十发、迫击炮三十八门、炮弹两千四百七十三发、冬衣八万三千件、盐巴三万四千八百六十二斤、各类药品一百七十七担。红军还筹集了够所有官兵食用十天的粮食，以及至少可以维持两个月消耗的通讯材料。其中粮食是向民间征集的。中央发布了《关于在今年秋收中借谷六十万担的决定》——苏区内大量的政府工作人员和数万红军官兵每天都要吃饭，再度大量筹粮必会加大苏区百姓交纳公粮的份额，于是便“借”，只是“借”的数字格外巨大。七月正是稻谷收获的时节，百姓并不知道红军即将离开苏区，他们把粮食一担担地挑进了红军的粮库。

中华苏维埃有个国家银行，行长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一九三二年，中央政府认为随着红军的军事行动越来越多，在瑞金存放如此大量的财宝不安全，遂在位于石城地区的烂泥坑建立了秘密金库。这真是一大批财宝：从攻打县城和乡镇的战斗中缴获、没收的大量金条、金锭、银元、元宝、珠宝、金银首饰以及钻翠工艺品，国民党统

治区发行的纸币，苏区铸造的银元，甚至还有在金店作坊里才能看见的金扣子、金发卡等装饰品。这些财宝被苏维埃政府雇来的一百多名民工搬运到陡峭的山上，所有的民工都不知道沉重的担子里装的是什么。财宝搬运完毕后，毛泽民和两个红军战士封闭了山洞。除了他们三个人和极少数苏区高级领导人之外，再也没人知道苏维埃国家银行的金库在什么地方。

一九三四年，国民党军逐渐向中央苏区核心地带压缩，首先逼近的便是石城地区。毛泽民找到毛泽东，说他准备把金库搬到兴国附近去。毛泽东对毛泽民说："还是分散给各部队保管吧。"毛泽东这句话的意思也许是：搬到哪里都不安全了。于是，毛泽民重新开启了金库，再次雇民工把财宝往山下搬。这些财宝在大规模军事转移前被分给了各军团，各军团又把部分金锭、金条、银元以及钞票一一分给了红军官兵。

无法想象数万红军分到这些国家财宝时的情景，队伍中的欢愉和欣喜定是十分壮观。红军中绝大多数官兵从来没有手握沉甸甸银元的经历，他们小心地把这些令他们惊喜不已的东西揣在腰间，誓死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感觉油然而生。在后来的长征途中，这些财宝竟对红军官兵的生死起到了重要作用：红军用它们向遇到的百姓购买食物和用品；而一旦他们受伤无法跟随部队行军被留下来时，这些东西可以让他们活下去。

军事转移的另一个重要准备是大规模"扩红"。

于都距离瑞金九十公里。一九三四年夏天，"扩红"突击队队长刘英来到于都，她的任务是三个月内动员两千两百名青年农民参军。但是这个有着丰富政治鼓动经验的女红军努力了半个月，才说服了大约

五十名青年农民参军。正当刘英一筹莫展的时候，县苏维埃干部请她去审问“破坏扩大红军的反革命分子”。刘英和突击队副队长张振芳在县苏维埃主席的带领下还没走到审问地点，就听见远远地传来一声痛苦的惨叫。到了那里，才看见审问者手里的棍棒正打向被审问者的胸口。这是几个衣衫褴褛的农民，他们被认为“散布过不利于扩大红军的言论”。具体地说，就是他们不停地对红军干部诉说日子艰难不能没人干活。少女时代就参加了革命的刘英目睹过许多残酷的场面，包括她那同样是共产党员的新婚丈夫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但她还是对眼前的情景感到十分惊骇。她忍不住冲上去企图阻止，但是被张振芳拦住了，张振芳悄声提醒她小心成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当时，矛头直指毛泽东的政治运动在苏区如火如荼，副队长的提醒显然是善意而且及时的。审问在刘英的惊骇中继续进行。突然，一个红军战士骑马飞奔而来，他交给了刘英一封信，写信者是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信的内容是指示在“扩红”工作中“不能乱来”。刘英立即把张闻天的信向审问者朗读了，于是，那几个颤抖不止的农民当即被释放了。那一天，刘英对这封信连同写信者充满了感激，这也许是她在万里长征结束之后成为张闻天妻子的原因之一。

苏区开展的“扩红”运动十分猛烈，因为自广昌战役以来，红军由于伤亡巨大而出现了严重的兵员短缺。没人能够预料未来的军事形势将往哪个方向发展，而红军队伍的人数是这支红色武装战斗力的基本保证。博古在党的会议上指出：“现在红军的数量还是不够的，非常不够的。要准备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一百万以至几百万红军的创立是目前紧急的任务。”然后，博古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达指示，要求“全党全军甚至共和国全民，最大限度地扩大和巩固主力红军……动员一切力量、一切资源，发扬党和群众的积极性到最高限度来扩大和巩固红军，将一切其他任务围绕在这个任务的周围”——当时，整个中央苏

区总人口大约为三百万，不知博古创立“一百万以至几百万红军”的设想从何而来？如果博古是针对全国所有的苏区提出的这一宏伟蓝图，那么，在短时间内把红军的数量扩大到“一百万以至几百万”也是不现实的。纵观中国红军的历史，即使在鼎盛时期，全国苏区内的红军作战部队加在一起，总兵力也从来没有超过二十万。

一九三四年九月，扩大红军数量的运动达到了高潮，而这时苏区内可动员的人力资源已越来越少，因为自一九三三年以来，已有十七万青年参加了红军，这个数字意味着苏区内不分男女老幼，平均每十五个人中就有一人参加了红军。“扩红”干部找到正在于都忍受着疟疾折磨的毛泽东，请这位动员过无数贫苦农民加入红军的领导人帮助他们动员群众。毛泽东去了，在群众大会上，身体极度虚弱的他只讲了五分钟，五分钟内他只讲了一个意思：决心。“决心”这两个字几乎可以概括那时苏区军民所具有的勇气：敌人就要闯进来了，我们可以放弃眼前的一切，但是我们必须保留决心！决心可以使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决心可以使我们重新赢得一切。

为了鼓励青年参军，苏区给带头参军的家庭以丰厚的物质奖励，包括当时在苏区十分珍贵的大米、火柴和盐巴。干部们当场宣布有人参军的家庭免去税收，这个家庭还可以凭军属证享受无偿帮助春耕和秋收的待遇。在干部们的努力下，长冈乡四百零七名青年中有三百二十人参加了红军，而瑞金一县参加红军的青年就有五万之多。

大量的新兵组成了新的红军部队：以萧华为政委的“少年共产国际师”，官兵平均年龄只有十八岁；以周昆为军团长的第八军团，全部战士都是来自苏区的新兵。这些刚刚参军的青年农民很快就跟随中央红军离开了家乡，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日后残酷的战斗中牺牲了，仅瑞金参军的青年就有一万八千人牺牲在长征途中，兴国参军的五万青年

中两万三千人成为红军烈士。而那个全部由新兵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因为在战斗中兵力损失殆尽，它在红军的编制序列中仅仅存在了六十多天。

当红军主力部队全部转移出苏区后，国民党军队立即占领了瑞金，从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七年间，整个苏区被屠杀的红军家属竟达八十万人！那么，苏区的百姓为什么愿意并且能够承担如此巨大的牺牲呢？原因显而易见：在红军没有到来之前，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贫苦农民，仅仅拥有不到百分之二十的土地，几乎所有的贫苦农民都是地主的佃户，人人身上都背负着地主发放的高利贷，他们为了还贷而付出的劳作永无尽头。但是，红军来了，贫苦的农民不但拥有了土地，可以享受土地上的收获，他们甚至还知道了“人民代表大会”和“无产阶级革命”，这些新奇的名词让他们享受到了共产党人给予他们的政治尊严和社会权利，目不识丁的农民因此萌生了“为公家的事出力”的群体意识，而这种群体意识是数千年以来中国农民最为缺乏的，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首先把产业工人而不是农民视为革命生力军的主要原因。但是，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由于占有万分微薄从而导致付出时万分吝啬的农民，当他们眼见为实地认为值得而且必须付出的时候，其毫无保留和不计代价的程度竟是十分惊人的。

刚刚进入九月，位于前线的红军高级指挥员突然接到了与往常迥然不同的电报，电报要求他们不要和敌人硬拼，要特别注意“爱惜地使用自己的兵力”，以减少官兵的损失，特别是要减少干部的损失。电报指出：为了这个目的甚至可以从阵地上撤出。在敌人进攻最激烈的石城地区，彭德怀的第三军团接到了中革军委的电报：“最高度地节用有生兵力及物资器材”，“不要准备石城的防御战斗，要准备全部的撤退”。九月二十四日，朱德致电第一军团林彪和聂荣臻：“预先没有充

分的准备和侦察，并以密集队形冲锋，这是不适当的”，“以后抗击围敌行动中，第一等原则是爱护兵力，因此主要的行动方式是防御和局部的反突击”。第二天，朱德再次致电各军团：“坚决避免重大的损失，特别是干部”。“我们工事不十分巩固时，指挥员应适时放弃先头阵地”，“在失利时，应有有组织地退出战斗的计划”。接着，朱德在致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的电报中明确指出：“为爱惜兵力，应避免坚决的战斗。”——“避免坚决的战斗”，这样的措辞至少在一个月前是不可想象的。为了苏区的每一寸土地而战，无数的红军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面对死亡的。“第一等原则”突然从“坚决和敌人战斗到底”变成了“避免坚决的战斗”，红军高级指挥员们隐约意识到：要有大的军事变动了。

前线的阵地在逐一后撤，苏区内在紧张地筹备转移，大多数的人并不知道，此刻，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正在很小的范围内被万分机密地讨论着：苏维埃共和国要走了，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要走了，那么，现有的高级干部中哪些人一起走，哪些人必须留下呢？

最终制定的那份“走留”名单是一个永远的悲剧话题。其悲剧性在于，所有的人都清楚地知道，留下来便意味着九死一生。

虽然军事转移一开始就意味着举国搬迁，似乎并不存在有人留下的问题，但是军事决策中心认为必须留下干部和部队坚持战斗。理由是：军事上可以迟滞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占领，分散国民党军对红军主力的追击；政治上要坚决地避免造成红军完全放弃中央苏区的印象，留下的部队可利用苏区的群众基础与国民党军周旋作战。最后，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万一中央红军走不出去需要回来呢。

广昌战役后的一天，大约是七八月间，博古把三十八岁的中央组织局局长李维汉叫了去。博古指着地图对他说：中央红军要转移了，要到湘西洪江去建立新的根据地。现在，需要你到江西省委和粤赣省委去传达这个精神，并且让省委提出带走和留下的干部名单。红军还要带一批优秀的地方干部走，这个名单也让省委研究后提出。两个名单一起报中央组织局批准。这是李维汉第一次听说中央红军即将转移。

确如博古所说，干部的“走留”问题，属于省委的名单由省委报中央，属于中央机关、政府、部队、共青团、总工会等系统的，由各单位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后报中央。但党的高层干部的“走留”名单，则是由军事决策中心决定的。在迄今为止可以查阅的史料中，没有确切证据支持“走留”名单被用来进行了一次“清洗”。但是，最后确定的那份党的高层干部的“走留”名单依旧令人百感交集。

留下来坚持斗争的领导机关叫“中央分局”，因此，最先被确定的就是中央分局领导人的名单，他们是：项英、陈毅、贺昌、瞿秋白、陈潭秋。其他被留下的高级干部有：何叔衡、刘伯坚、毛泽覃、古柏……

当博古找到陈毅告诉他将被留下时，陈毅正忍受着剧烈的伤痛。博古说：“本来是想把你抬着走的，但考虑到你在江西闹革命已经七八年时间了，在江西有声望，党内军内都活动得开，最后还是决定把你留下来，负责军事工作。”陈毅不久前在兴国指挥作战时胯骨被子弹打碎，他是被抬到医院后看见医院里的医疗器械和药品都已装箱，才知道红军要转移的。周恩来让医生给陈毅照一张X光片，但X光机和发电机都已被拆成零件装在箱子里了，周恩来强行命令把箱子打开把机器重新装上。X光片显示陈毅伤势严重，如不手术有瘫痪的可能。周恩

来命令医生们立即为陈毅手术。术后的剧烈疼痛令陈毅很难忍受，但是被留下的消息令他更加难受。陈毅让人用担架把他抬到红军总司令部，到了那里他对朱德说："我请求和红军一起走，我的伤很快就会好，我还要继续指挥作战，请不要把我留下。"朱德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你的请求，我无法回答。但是我可以转告他们，我个人同意你的意见。"可是，陈毅的请求再也没有回音了。此时，这位三十三岁的共产党人考虑的并不是自己的生死，而是红军走了之后他能否与心存芥蒂的项英一起坚持战斗。果然，中央红军刚刚出发，陈毅与项英就时局的判断和斗争策略问题便争吵起来。当陈毅勉强可以拄着棍子走路的时候，他率领少数警卫人员突围成功。在以后的几年间，他在人烟罕见的荒山中过着野人般的生活，创伤复发的剧痛和极度的饥饿常常令他感到濒临死亡，他幻想过到另外一个世界里与他的同志们相聚，并继续实现他们的革命理想："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这位后来成为新中国外交部部长的红军将领能够生存下来，无论在革命者的意志上，还是在人类生存的极限上，都是一个奇迹。

瞿秋白半年前才来到中央苏区。这个曾经担任过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此时正患着严重的肺病。他面容清瘦，气韵谦和，曾用优美的文笔翻译了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鲁迅在念及他的人格和才华时深情地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瞿秋白曾经多次躲过了国民党当局的搜捕，但是却无法躲避王明和博古的政治攻击。中共临时中央局曾经作出《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中有这样的表述："根据狄康［瞿秋白］同志最近所发表的几篇文章，中央认为狄康同志犯了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错误。在客观上，他是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一九三三年冬天，淅淅沥沥的阴雨令上海格外寒冷，已开始咳血的瞿秋白接到了临时中央

局要求他前往战火中的中央苏区的电报。瞿秋白看了电报说："想去很久了。"一九三四年二月，在艰难辗转一个月后，他到达瑞金，被任命为苏维埃共和国教育部部长。他还是经常发烧，成为傅连暲医生的常客。但他主持制定了《苏维埃教育法规》，倡导创建了苏维埃大学。邓颖超不知道瞿秋白的病体里为什么会有燃烧不完的革命热情，她在供给十分紧张的条件下找来了面粉和糖，特意为瞿秋白烙了几张糖饼。整个苏区内，只有博古对瞿秋白的到来耿耿于怀，因为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瞿秋白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曾对王明和博古的小团体进行过严厉的呵斥。军事转移前夕，毛泽东召集苏维埃政府各部门领导开会，宣布政府各部门的"走留"名单，瞿秋白没有在转移名单中听到自己的名字。已经收拾好行装甚至打好了几双草鞋的瞿秋白当场要求跟随红军转移。毛泽东的回答是："会后再谈。"会后，毛泽东找到博古，结局拿毛泽东的话讲是："我的话不顶事。"之后，周恩来又找到博古，建议他就瞿秋白的问题"再郑重考虑一下"，而博古坚持说瞿秋白患有肺病不适宜长途行军。最后，瞿秋白自己找到了博古，但任凭他怎样请求，博古仍是无动于衷。从博古那里回来后，瞿秋白把自己的马送给了即将转移的徐特立老人。一九三五年初，瞿秋白被要求打入白区工作。二月二十四日，他在从苏区向福建转移途中于长汀被捕。瞿秋白在狱中受尽酷刑但坚贞不屈，他说："我不会出卖我的灵魂和信仰。"六月，蒋介石的电报到了："瞿匪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刑场位于县城西门外罗汉岭下的一块草坪上，瞿秋白到达那里后盘腿坐在青草上，然后对身后的持枪者说："就是这里了，开枪吧。"数粒子弹瞬间穿透了这位三十六岁的共产党人的胸膛。

已经五十八岁的何叔衡也被留下了，这也许与他和毛泽东的情谊有关。何叔衡曾与毛泽东一起发起新民学会，一起创立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又一起作为湖南省的代表参加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会议。一

九三一年何叔衡到达中央苏区后，出任苏维埃政府工农检查部部长、内务部部长和临时法庭主席。当毛泽东受到排斥的时候，他也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得知自己被留下后，何叔衡准备了水酒和花生，为他的老朋友林伯渠送行。那个晚上，他将女儿为他织的毛衣送给了林伯渠。林伯渠有诗记载道："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赠我绨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一九三五年初，何叔衡被要求与瞿秋白一起去白区工作。出发前因为脚上没有鞋子，他开始寻找一双结实一点的布鞋。二月二十四日，在地主武装的袭击中何叔衡中弹倒在一片稻田里。两个匪兵赶上来搜查他的衣袋，何叔衡突然间奋起反抗，匪兵立即朝这位老人的胸口连开两枪，何叔衡的血瞬间染红了那片开阔的稻田，同时也染红了他揣在怀里的那双仍没舍得穿的布鞋。

刘伯坚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国共合作时期他以秘密党员的身份在冯玉祥的部队中任总政治部部长，对争取西北军将领同情甚至投身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九三一年，他出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政治部主任。但在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前夕，他被要求离开红五军团，留在苏区，出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那个时节，苏区的桂花芳香馥郁，于都河边却是一片伤感。刘伯坚带领着赣南军区的官兵开始在于都河上架桥，以护送红军主力部队撤离苏区。好友叶剑英望着他忙碌的身影不禁心如刀绞，整整二十七年后，叶剑英想及此情此景时写道："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一九三五年三月，刘伯坚在率部突围中左腿中弹不幸被俘，三月二十一日在江西大庾被国民党军枪杀。刑前，国民党军警给他戴上沉重的镣铐，让他从大庾一条人口稠密的长街上走过。刘伯坚拖着带有枪伤的腿，沿着长街一步步地向前挪，这位时年四十岁的共产党人在哗哗作响的铁镣声中留下了那首《带镣行》：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

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

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

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在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后，留在苏区牺牲的革命者还有：贺昌，曾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率部突围时遭遇国民党军伏击牺牲。古柏，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师师长，一九三五年三月六日，他所率领的闽粤赣边游击队被国民党军包围，激战中身中数弹牺牲。毛泽覃，曾任中央苏区中央局秘书长，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在瑞金附近红林山区的战斗中牺牲……

有史料表明，毛泽东也曾经被列入留下的干部名单。时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道：“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被留下，结果就很难预料了。”另外一个历史细节也可以成为佐证：红军军事转移出发前，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人都去供给处领取行军用的布鞋、草鞋、绑腿带、背包、马袋子以及冬服等物资，就去领取毛泽东的那一份，但是负责物资发放的一位姓刘的干部在供给名单上就是找不到毛泽东的名字。

以当时博古与毛泽东的关系而言，他很可能更希望毛泽东留下。虽然军事决策中心在决定高层干部的“走留”问题时，因为高度机密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但可以肯定的是，周恩来坚持让毛泽东跟随红军转移的立场是显而易见的。

家庭出身与文化背景有着很大差别的周恩来和毛泽东，他们的关系是中国革命史上最意味深长的关系。长期的革命实践使周恩来对毛泽东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认识，那就是：无论把马克思和列宁的经典背得如何流畅，毕竟马克思和列宁从没有来过中国，他们所有的革命理论都产生于欧洲的人文历史中，而中国有现实的、具体的、独特的国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与欧洲迥然不同的中国搞无产阶级革命，公认的行家里手不是马克思和列宁而是毛泽东。因此，即使在毛泽东受到排斥和冷落的时候，周恩来也会把党内的重要文件送来请毛泽东过目，就重大的政治军事问题请教毛泽东。他甚至在生活上也尽可能地给予毛泽东细致的照顾，包括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警卫安全乃至食品和香烟的供应。如果仅从信任的角度讲，面对能够滔滔不绝地引用马克思列宁经典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周恩来更倾向于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熟读了《水浒传》的毛泽东。当周恩来认准了这一点之后，这个中国共产党内少有的温文尔雅的革命家，以他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气魄成为毛泽东的追随者。当博古提出把毛泽东留下后，周恩来的反对态度异常坚决，他的理由很简单：毛泽东是红军的创始人，是根据地的创始人，是苏维埃政府主席，在党内和红军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如果把他留下万一出了事，无法向全体干部和红军官兵交代。周恩来的最后一句话意义深远，他说：“中国革命需要毛泽东。”

博古突然感到自己把这个问题看简单了。

博古就毛泽东的问题与李德交换意见，李德给博古转述了斯大林常讲的一个希腊神话：每逢天神安泰与敌人作战失败，他就往母亲地神盖娅的身上一靠，这样他就能重新获得神奇的力量从而赢得作战的胜利。为此，敌人总是千方百计地隔断他与母亲的联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他回到大地上。虽然李德一向认为“口头上服从，行动上反对”的毛泽东是个“危险的人物”，但此刻他讲的这个欧洲故事竟使博古一下子改变了主意：如果毛泽东留下，当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撤离后，留在苏区的中央分局就会成为毛泽东的小天地。毛泽东当年在井冈山上仅仅只有几百人，不是后来也发展成了一个共和国吗？那么让毛泽东留下正是给了他重打锣鼓另开张的机会。要阻止这种后果的发生，就必须将毛泽东与他的“大地”的联系隔断。

就这样，毛泽东被批准跟随红军转移了。

没过多久，博古和李德几乎同时明白了用希腊神话解释中国革命是多么的幼稚。

一九三四年十月六日，从中央苏区北部前线传来的消息令人格外焦虑：国民党军已经全面突破了石城防线，其主力部队正向瑞金方向攻击而来，距瑞金的直线距离只有几十公里了。而使事态变得更为严峻的是：湘鄂赣军区司令员兼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突然叛变，导致湘鄂赣边区随即被国民党军占领。这一突发事件也许还会导致另一个更可怕的后果：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计划将被泄露。孔荷宠，时年三十八岁，湖南平江人，一九二六年在平江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游击队队长、湘赣边游击纵队司令员、红五军第一纵队纵队长、红十六军军长等职。一九三二年因“盲动主义”受到批评被撤销了职务，后调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工作，他借巡视工作的机会向国民党军投降。

孔荷宠叛变时，身上带有一张瑞金中央机关位置图，这张图使国民党军如获至宝，瑞金苏区内的重要目标立即遭到了猛烈轰炸。

形势危在旦夕。

一九三四年十月七日，这一天，萧克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在贵州甘溪镇遭遇国民党军重兵突袭；而在江西苏区前线，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高层指挥员——接到了令他们心情异样的命令：从现有的阵地上迅速撤出，把阵地移交给地方武装，清点所有的武器装备，立即到指定地点集结。

朱德致第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应在目前集中地进行补充和军政训练”电：

彭、杨：

甲、三军团到十二号止，应在目前第一个集中地域进行人员、干部、弹药等的补充，在这时期应完成部队的整理。

乙、在这时应加强军政训练，主要是演习进攻战术的动作，及步兵与机枪、迫击炮及工兵的协同动作。

丙、三军团全部约于十二号晚出动，并于十四日晨到达第二集中地域［即集结于雩都东北之水头圩、石溪坝、车头圩、禾田及仙露观地域］。十五日晚，三军团全部应准备备战前进。

丁、为保守军事秘密，应［在］整理训练中严密防空，严格克服逃亡现象及随便闲谈。

戊、整理的经过，每日电告我们。

朱

七日九时半

朱德致第九军团罗炳辉、蔡树藩“转移到古城、瑞金间地域的部署”电：

罗、蔡：

甲、李［李延年部］敌于到达河田后，主要是构筑碉堡和路。

乙、九军团［医院、兵站及轻伤员均在内］准备转移方向，并应于九日晨到达古城、瑞金之间的地域。其行动部署如下：

（A）今七日夜应秘密转移到汀州地域，八日即在该处隐蔽配置。

（B）八日夜向古、瑞间前进，九日即在该地隐蔽配置。

丙、罗、蔡应于九日晨赶到军委，部队即交参谋长指挥。

丁、二十四师主力仍留河田以北地域，并向河田、大田屋、南山坝进行积极的游击活动。河田以西汀州河的桥梁应拆毁之。在河田之东端及南端，应于夜间派得力便衣队埋设踏发的地雷。

戊、军团的移动应在二十四师的掩护下，保守绝对的秘密，除二十四师首长可知道外，不得使其部属知道。

己、九军团的移动必须在黄昏与夜间行之。如行军至早晨尚未到达目的地时，必须采取办法使敌人空军侦察不能知道九军团的移动。

庚、二十四师从今晚起，应令其直受军委指挥并电告其部署。

朱

七日十时

朱德致第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向集中地域秘密移动”电：

林、聂：

甲、一军团［欠十五师］及全部后方机关，应于今七号晚集中于兴国东南竹坝、黄门地区，于八号晚开始向集中地区移动。十一日晨应集结于以下分界的地区：在北面及西面则以宁都河为分界线，在东面则以下坝、宽田为分界线，［在］南面则以宽田、梓山市及向西到会昌、宁都河会合处为分界线，各分界线均不包含在一军团集中地域内。

乙、为保守军事秘密，应采取如下的办法：

A、对于部署只告以每天的行进路和宿营地。

B、为避免敌人的空军侦察，应于夜间移动，拂晓时则应隐蔽配置起来，并采取各种对空防御的手段。

C、要克服落伍及逃亡。

丙、十五师约于十二号到达你们集中地区内的东部。

丁、到达集中地域后，你们应于宽田、岭背间接上我们的长途电话。

戊、应给五军团首长战术上的指示，而兴国最少要于十五号以前保持于我们的手中。五军团从八号晚起即直接受军委指挥。

己、执行情形电告。

朱德

七日十一时

九日，朱德致第八军团周昆、黄甦“向集中地域移动”电：

周、黄：

甲、八军团于今九日由现地出动，并于十二日拂晓前到达杰村、澄龙、社富地域。

乙、移动的秩序如下：

（A）九日夜，八军团应到达古龙岗南岸之水南南路石桥地域，而后方机关则应到达黄沙、平安寨。

（B）十日夜，八军团司令部随二十一师应到达桥头地域，而二十三师及后方机关则应到达银坑地域。

（C）十一日夜，则全部隐蔽地到达指定集中地域。

丙、独二、独三团没有任何掩护的任务，独三团的任务则仍照你们昨日来电行之，而独二团则应于九日晚接替六十三团的任务。以后独二、三团的再行动，另有电告。你们则应转告独三团首长统一指挥行动。

丁、为守军事秘密，应注意如下事项：

（A）这一命令不得下达，而仅以单个的每日的命令实施之。

（B）严防落伍和逃亡。

（C）只应于夜间移动部队，日间休息配置时，则严密注意防空。

戊、执行情形，电告军委。

朱

九日九时

至此，除了董振堂任军团长、李卓然任政治委员的第五军团外，中央红军所有的主力部队都已从反“围剿”阵地上撤离，开始了大规模军事转移前的集结。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由在宁都起义的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改编而成，在此后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的途中，一直担当着艰辛危险的后卫任务。一九三四年十月初，当中央红军所有主力部队开始移交阵地的时候，他们依旧在阵地上阻击着国民党军的凶猛攻势，以掩护红军大部队撤离。

军情万分紧急，转移迫在眉睫。

朱德的电报格外引人注意之处不是移动的方向，而是被反复强调的“命令不得下达”和“克服落伍及逃亡”。

红一军团一师师长李聚奎仅在军团长林彪那里得到了“部队要转移”这句话以及几百名新兵和五百块大洋。他回忆说：“部队由一个区域作战转移到另一个区域作战，是常有的事。但是过去部队转移时，军团首长总是尽量争取时间采取各种办法面授任务，讲明情况；遇到情况紧急时，也要给师的主管干部直接打个电话。可是这次部队转移，军团司令部只是通知我们按行军路线图指定的方向前进。至于部队为什么要转移，转移到何处去，均不得而知。”师长都“不得而知”，团一级的干部就更无从得知了。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杨成武是在读了那篇名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时，才隐约感到会有异常情况的。他想从自己的师政委刘亚楼那里了解更确切的消息，但是当

他找到刘亚楼时，却见刘亚楼也正捧着那张报纸费力地琢磨着——从军事常识上讲，向有关指挥员，尤其是中高级指挥员隐瞒部队行动目的，是不符合军事惯例的，而且是具有一定潜在危险的。但是，重兵于危急时刻的大规模移动，最严格的保密显然是必须的：在当前的前沿阻击阵地上，只有少量的后卫掩护部队和地方自卫队武装了，如果红军主力的撤离和移动被国民党军得知，敌人也许会迅速形成全线规模的大攻击，这种局面一旦出现导致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自人类有战争以来，就有在艰险之中或危难时刻的落伍或逃亡。大规模的军事转移仓促提前，致使红军刚从阻击阵地下来就开始了集结行军，队伍中的大批新战士没有经过必要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一部分新兵甚至是在移动中被直接编进战斗连队的。况且，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难离故土，红军中的新兵绝大多数是本地人，因此，部队中出现了一些士兵落伍或逃亡的现象。红军总政治部为此要求各部队普遍成立“反逃跑斗争委员会”，同时要求“特别注意经过区域的战士的巩固工作，发动不请假不回家的斗争”。负责中革军委警卫工作的特务队队长杨世坤卸任后请假外出，两天之后仍不见回来，接任的队长潘开文立即向上级作了汇报。因为潘开文兼任朱德的警卫员，朱德的妻子康克清亲自前去检查，结果发现杨世坤外出时不但带走了两支驳壳枪和一些子弹，还带走了自己的全部衣物。这显然已经构成了一个严重的事件。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保卫局红军工作部部长李克农立即展开调查，不久就得到了杨世坤与苏区附近的一个女人相好的线索。康克清和李克农找到了那个“长得挺漂亮”的女人，女人坚决否认她与杨世坤有关系。后来在不说就要把她带走的威胁下，她才说出杨世坤正藏在小山上的一个亭子里。李克农立即派人包围了那座小山。当红军官兵冲上小山时，杨世坤开枪自杀了。

一九三四年十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红军主力突围转移，中央苏区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训令。这一训令被认为是长征最早的军事和政治命令：

> 在我们党面前摆着这样的问题，全部红军继续在苏区内部与敌人作战，或是突破敌人的封锁到敌人后面去进攻。很明显，如果红军主力的全部照旧在被缩小着的苏区内部作战，则将在战术上重新恢复到游击战争，同时因为地域上的狭窄，使红军行动与供给补充上感觉困难，而损失我们最宝贵的有生力量。并且这也不是保卫苏区的有效的方法。因此，正确的反对敌人的战斗与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必须使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封锁，深入敌人的后面去进攻敌人。

训令特别表明：“当着主力红军突围之后，敌人会更加深入苏区内部，占领许多城市与圩场，切断我们各个苏区的联系，更加凶恶地摧残苏区。但是我们不是惊慌与丧气，而应该坚强而有毅力地继续领导游击战争……”训令的最后一句话是：“中央向着在艰苦奋斗着的中央苏区全党同志致热烈的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奉命坚守苏区的部队除了二十四师外，全部是地方部队：二十四师七十、七十一、七十二团，独立第三、第七、第十一、第十五、第十六团，江西军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团，赣南军区独立第六、第十、第十三、第十四团，福建军区独立第八、第九、第十九、第二十团，闽赣军区独立第十二、第十七、第十八、第二十四团等，共计一万六千多人。

十月七日一天之内，在红军主力部队的移动集结中，十多个团的新兵、一百四十多万发子弹、七万六千多枚手榴弹以及大批其他物资被补充到了各个军团。

一天之后，国民党军各部队接到了蒋介石发来的电令：“所有川、黔、湘、赣边区各县及预防匪流窜之地方，均应赶速构筑碉堡。”——没有证据表明这时的蒋介石已经预感到了红军将从他筑起的层层堡垒中突围而出。在“围剿”作战期间，蒋介石发出过为数甚多的关于构筑碉堡的命令，因为他对他的德国军事顾问所主张的“碉堡战术”十分着迷，甚至对那种开有小窗口的类似中国农村谷仓的建筑欣赏到了玩味不已的程度。在他亲自签发的关于构筑碉堡的命令中，对碉堡建筑材料的选择、碉堡地点地形的确定、每座碉堡之间的合理距离、碉堡的火力配置等，都有不厌其烦的说明。然而历史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证明了蒋介石的碉堡无法阻挡住红军前行的脚步。中国不是中世纪时代的欧洲，不是一个土地狭窄的城堡式的大公国，中国国土之广袤足以让不在乎任何行军条件的年轻的红军官兵自由驰骋。

十月十日，对于国民党人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一九一一年的这一天，爆发了推翻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八年后的这一天，领导了辛亥革命的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为此，《民国日报》在这一天特别发表了社论，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但是“乱世中之大幸，江西的局势正迅速改观，共匪一年之内即可肃清”。社论最后号召全国人民为国分忧，具体的要求是“戒酒禁舞”和“崇尚仁义道德”，以便“为祖国与中华之生存而努力奋斗”！

这一天的上午，中央红军司令部所在地梅坑阳光灿烂。梅坑村口聚集着一支红军中的特殊队伍——休养连。休养连大约有一百多人，其中包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人民教育委员徐特立，时年五十七岁；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时年五十岁；中央政府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时年四十八岁。但是，董必武的妻子陈碧英却被留下了。军事转

移计划原本决定将所有的女同志都留下，直到最后一刻这一决定才有所松动。

有幸获得批准跟随红军主力部队转移的贺子珍，此刻正忙着把刚满三岁的儿子交给留下来的妹妹贺怡和妹夫毛泽覃。这个男孩子是贺子珍与毛泽东的第一个孩子夭折后使母亲重新欢愉起来的天使，但是军事转移计划规定孩子一律不准带走。贺子珍给妹妹留下一件褐色的夹衣和四块银元——夹衣可以在冬天来临时给孩子改成一件小棉袄，银元是一旦形势危急不得不把孩子托付给老乡时所需要的。从那一天起直到四十九年后贺子珍忧伤地离世，她再也没见过这个孩子。一九三四年十月，整个中央苏区共有三十一名女红军跟随主力部队开始长征，包括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博古的妻子刘群先、李德的妻子萧月华、李富春的妻子蔡畅、邓发的妻子陈慧清等等，她们以前所未有的意志和勇气成为中国革命史中空前绝后的一群。

还是十月十日这一天，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命令中央红军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组成“军委第一纵队”，代号“红安”，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叶剑英，博古、李德、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王稼祥等人都被编入了这支队伍。军委第一纵队下辖四个梯队：第一梯队负责人为彭雪枫，第二梯队负责人为罗彬，第三梯队负责人为武亭，第四梯队负责人为陈赓和宋任穷。军委第一纵队总人数四千六百九十三人，枪支一千九百八十八支，子弹七万零六百五十五发，手榴弹二千三百六十一颗，梭镖三十六杆，马刀二百一十六把，迫击炮十六门，炮弹八百八十枚。命令由中央党政机关、卫生部、后勤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军委第二纵队”，代号“红章”，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委第二纵队总人数九千八百五十三人，枪支二千二

百四十支，梭镖三千二百七十七杆，马刀六十七把，没有迫击炮。两个纵队共携带冬衣一万四千六百件，盐巴六千一百一十二斤，药品二十六担，各类金银货币折合银元三十八万三千元。

傍晚时分，彩霞满天，两路军委纵队在几声军号响过之后，从瑞金出发了，向着转移的最后集结地于都而去。

这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刻：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离开了他们创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不久之后，瑞金这个国中之国便在国民党军队的枪炮声中成为一个陷于一片火海的小城。只是，在这一天的这个时刻里，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人，不知有谁能够预料到，中国工农红军此一去竟是走向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天黑了下来，朦胧的月色里，在江西南部与福建西部交界处的丘陵中，聚集着除第五军团以外的中央红军所有的主力部队：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

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

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军团长周昆，政治委员黄甦。

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

李德后来回忆说，参加大规模军事转移的红军有十万人。然而红军参谋部制作的“野战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显示，中央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时的兵力与装备情况是：

第一军团：兵力一万九千八百八十人，枪支八千三百八十三支，子弹五十四万六千六百四十九发，手榴弹一万九千二百八十一颗，梭镖五百一十三杆，马刀二百一十九把，迫击炮八门，炮弹六百一十二枚，冬衣一万九千零五十件，盐巴八千七百斤，药品三百零五担，各类金银货币折合银元三十四万元。

第三军团：兵力一万七千八百零五人，枪支八千二百八十七支，子弹四十八万二千七百三十六发，手榴弹二万零五百一十八颗，无梭镖，马刀一百一十八把，迫击炮八门，炮弹六百八十枚，冬衣一万八千五百件，盐巴九千斤，药品三百零五担，各类金银货币折合银元三十四万元。

第八军团：兵力一万零九百二十二人，枪支三千四百七十六支，子弹十八万零三百四十一发，手榴弹一万零六颗，梭镖八百一十六杆，马刀五十把，迫击炮二门，炮弹一百零四枚，冬衣九千五百件，盐巴四千零五十斤，药品二十六担，各类金银货币折合银元十四万七千元。

第九军团：兵力一万一千五百三十八人，枪支三千九百四十五支，子弹二十万八千六百九十七发，手榴弹九千九百四十二颗，梭镖一千零二十三杆，马刀八十二把，迫击炮二门，炮弹一百零四枚，冬衣九千五百件，盐巴二千五百斤，药品二十六担，各类金银货币折合银元二十万一千元。

加上此时仍在阵地上的第五军团，中央红军转移部队的总人数应为八万六千八百五十九人。但是，如果再加上两个军委纵队和各个军团所雇的大量民夫，这支队伍的总人数应该能够达到十万。

数量庞大的民夫队令各军团都成立了后方部。其中东西最多的是军委第二纵队，不但担子达到了一千担以上，而且奇形怪状的东西堆积如山。由于物资太多，且有重要之物，经中央指示成立了由张经武任师长、何长工任政委的教导师，教导师的三千兵力负责帮助中央机关搬运各个部门的物资。当时，中央决定所有可以搬走的东西都要捆扎起来搬走，包括兵工厂、服装厂、印刷厂、医院等部门中的织布机、缝纫机、铅印机、石印机、印币机，还有红军总部储备的银元、大米、盐巴、药品、通讯器材等等。野战医院的同志认为转移仅仅是到苏区的边缘作战，因此把病号的尿盆都捆在一起带上了。更有机关办公用的桌椅和文件柜被捆扎好等待着教导师的战士们抬着行军。所有这些物品堆放在一起，就是教导师再派三千兵力也无法全部搬走。最后，中央同意把已经捆扎起来的物品重新拆开、整理、压缩，并要求每副担子不得超过五十斤，但结果还是整理出了一千多担。红军战士必须携带的干粮、枪支和弹药加起来已有四十多斤，再挑上五六十斤重的担子，如何长途行军？一旦遇到敌情又如何机动作战？——“整个国家走上了征途。”美国记者斯诺说得十分准确而形象。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四日，国民党《中央日报》报道：

中央社西安十三日电，蒋委员长日前由汉经洛于十二日莅陕，以绥署新城大楼为行辕，当晚接见本省各党局，咨询一切。十三日晨微雨，上午十时十五分，蒋委员长偕夫人宋美龄，由杨虎城夫妇陪同乘汽车赴碑林游览，旋即返行辕午餐。下午召见邵力子、杨虎城，对陕建设及治安情形垂询甚详。

在中国西北难得的细雨中悠闲漫步，欣赏历史上文人墨客留下的笔迹，此刻的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一直处心积虑要消灭干净的红军在他认为“插翅难飞”的重兵包围中已经开始突围了。

就在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的核心地带逐渐压缩的时候，认为“围剿”胜券在握的蒋委员长开始了全国性的周游，目的是向各个方面解释他那颇受争议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

近一年来，国人不断地指责蒋介石消极抗战，甚至已经有了他勾结日本人的舆论，这使他十分不安。蒋介石明白，如果让这样的舆论剧烈起来，等于给了共产党人一个求生的机会。他强调说：“现在国人关注外患，忽视了内乱”，“如果我们放下共产党不管，用全部的精力去抗日，共产党就会趁机扩大”——如果说蒋介石主张不抗日，甚至是与日本人勾结出卖国家，这至少是不够客观和不够准确的。在那样的时刻，蒋介石不敢公然主张不抗日，因为自甲午到“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与日本的积怨实在是太深了。在接见到南京请愿的学生时蒋介石说：“三日内不出兵，砍我蒋某人的头，以谢国人！”在南京的中央礼堂，他又说：“三个月内一定收复失地。如果收复不了，我亲自上前线堵炮眼。”虽然这句话当即受到台下一名军校学员的讥笑：“不要言过其实！”但蒋介石无论如何不敢拿“抗日”在国人面前儿戏。所以，那一天，他愤怒地冲下讲台，当众给了那个讥笑他的军校学员一记响亮的耳光，然后重新回到台上，朝着孙中山的遗像三鞠躬。蒋介石人生中最值得提及的历史便是继承孙中山的遗志，率领北伐军完成了中国的南北统一。所以，于公于私他都没有理由对蚕食自己国土的外国势力屈服，甚至与之勾结。但是蒋介石认为有两个现实严重地影响着他面对日本人的入侵立刻宣布全面抗日：一是中国缺少足以战胜日本军队的强大的武装力量，二是共产党武装的不断扩张对他的政权已构成直接威胁。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蒋介石只有把共产党武装放在敌对的第一线，因为对于至少在短期内不会直接威胁他的政权的日本方面，或许可以采取外交手段寻找解决争端的办法，或许可以在政治上和经

济上期待国际援助——国民党政府正式宣布全面抗战是在两年以后了。

蒋介石来到陕西，真正的目的是部署“围剿”川陕地区的红军。因为在四川与陕西交界处的共产党根据地不断扩大，令他有了从前面对江西红色根据地时的忧虑和恐惧。可是就在这时候，一封来自南昌的电报令他大吃一惊，电报说：“最近红军调动频繁，有向西南移动的模样。”——这是迄今所能见到的史料中蒋介石最早获悉中央红军开始转移的记载。蒋介石只有先放下川陕方面的事情匆匆赶往江西，等他到达南昌已经是十月十五日了。

十月十五日上午，于都县郊外，昏暗的谢家祠堂里，面容憔悴的毛泽东坐在长凳上，面对两百多名被留在根据地的干部沉闷地吸着烟。赣南省委在中央红军出发的最后时刻，召开了省、县、区三级干部会议，同志们希望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对他们说些什么。毛泽东的心情格外沉重，他知道必须向这些同志交代红军为什么要放弃中央苏区，为什么苏维埃共和国要举国上路。但是他又无法将所有事情的原委一一解释清楚。沉默了一会儿，毛泽东缓慢地开口了：“敌人已经打到我们的家门口了，蒋介石的目的是要全部消灭红军。我们的主力只有冲破包围，到敌人的后方去。你们不要怕，不要认为红军主力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要回来。”毛泽东把最后这句话说得很重，力图让同志们确信他说的是真话。而这句话确实代表了毛泽东当时的想法：在中央苏区周围转个圈，把敌人调开之后再回来。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七日，集结在一起的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出发了。

三天之内，他们将全部走出苏区，离开他们从前赖以生存、发展、壮大的根据地，开始后来被全世界称之为“长征”的悲壮的大规模军事转移。

江西南部的于都是个宁静富足的小县城，县城边有一条河，叫于都河也叫贡水。此刻，河上已经架起了数座木桥，开辟出了十个临时渡口，所有参加军事转移的人员都聚集在河岸边的于都城里，等着太阳落山。

黄昏时分，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治委员杨尚昆走进了县城的一家小酒馆。酒资是彭德怀付给店家的一块银元。两个人都不是善饮之人，但还是把一壶当地的老白酒喝光了。彭德怀的恶劣心情已经持续了几个月，根据地的逐渐缩小直至丧失令他这个前线指挥员无比愧疚。为此他与博古和李德大吵了一架，他指责李德根本不懂军事不懂打仗。李德还击说他是因为军委副主席的职务被撤销故意在找麻烦。彭德怀那一刻感到了极大的侮辱，他怒火万丈地指着李德高声喊道：“你下流无耻！”然后对翻译伍修权说：“把这句话翻译给他！翻译给他！”现在，一切都无法挽回了。彭德怀想到了那些依旧躺在医院里无法跟随转移的红军伤员，他们大多是在李德一再要求强攻的广昌战役中负伤的。

第三军团从阻击阵地上撤下来后，博古曾经到军团来讲了一次话，笼统地说中央红军要“转移阵地”。第三军团四师政委黄克诚当时就预感到中央红军也许要撤离苏区，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立即跑到医院动员伤员们出院。那时，第三军团有近万名伤员躺在医院里。但是，因为自己并不知道真实情况，还因为必须遵守组织纪律，黄克诚无论如何也说不出“红军就要走了”这样的话。结果，他只动员了少数伤员跟着他出院归队了，这些伤员包括甘渭汉、钟伟、张震，他们后来都

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著名指挥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著名将领。为了把更多的红军官兵带走，彭德怀在出发前夕下达了一个“死命令”：第三军团的伤员，凡是能走路的，全部要带上。要检查落实，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可能跟随转移的受伤战士——正是由于有了彭德怀的这个命令，更多的红军官兵活到了革命胜利的那一天。而那些被留下来的伤员，在红军主力出发后不久，就全部死在了国民党军的搜查捕杀中。

晚上七时左右，依旧在北线阻击敌人的军团长董振堂接到了命令，命令要求第五军团将阵地移交给独立第三团并开始撤离。董振堂立即将军团营以上干部集中在一座大庙里，听参谋长刘伯承讲话。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这时已被贬到了第五军团任参谋长，原因是他对李德的军事指挥持反对意见，而李德说中国红军总参谋长的“战术水平还不如一个参谋”。但是，在红军官兵的眼里，刘伯承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大家都知道他在一九一六年的护国战争中右眼被子弹打中，手术是在没有麻醉药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手术做完了，医生小心地问“是否很疼”时，刘伯承说：“才七十多刀，小意思！”刘伯承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不能因为中央红军转移就认为中国革命失败了，失利是军事指挥上的失误。第五军团担负的是殿后掩护的任务，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作出牺牲，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确保中央机关的安全。

天黑了下来，于都河边的十个渡口同时拥挤着渡河的队伍，当成千上万的涉水官兵同时踏进河水中时，于都河水顿时浑浊起来。

这是一个离别的时刻。从下午起，红军官兵就开始打扫借宿的老乡家的院子，把水缸里挑满水，甚至还上山割了些草把房东家的牛喂了。百姓们知道红军要走了，妇女们聚集在一起把她们做的鞋和缝补好的衣袜送给红军；年纪大些的妇女拿着针线站在路边，发现哪个红军衣服破了就匆忙上前缝几针；孩子们追着队伍往红军的口袋里塞上

一把炒熟的豆子；另一些百姓聚集在路边，努力想在队伍中认出自己的孩子或者兄弟。

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杨成武是闽西长汀县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因为在广昌战役中负伤，这个二十岁的团政委此时走路还有点不利索。不久前，他的一位同乡把他在红军部队的消息带回了老家，他的父母在与儿子失去联系六年后得知儿子还活着。家里为此派出了一个包括他父亲在内的“代表团”来部队看望他，“代表团”中还有他的堂嫂，因为他的堂哥也在这支部队里当连队的司务长。亲人们挑着装满炒米、草鞋、鸡蛋、红薯干、萝卜干、豆子、兔子和活鸡活鸭的担子，从百里之外出发，居然找到了他的部队。那时四团刚从阵地上撤下来休整，团长耿飚告诉他家里来人了，杨成武一出门就看见了摆了一院子的担子，还有站在角落里的父亲。父亲一认出他便蹲在地上哭了。杨成武十四岁背着父母参加了革命，母亲因为不知道儿子去了哪里把眼泪都哭干了。四团的红军用丰盛的饭菜招待着政委的亲人，但是那位当司务长的堂哥外出执行任务一直没能回来。三天过去了，部队要走了，亲人们也要走了，那位堂哥这时候回来了。一对夫妻仅仅见了一面便要分手，女人哭着就说了一句话：“胜利了，就回来。”此刻，杨成武在送行的人流中发现了他的房东。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把自己的三个儿子都送进了红军，其中有两个儿子已经牺牲，她这个时候来到于都河边，定是想再看一眼她唯一还活着的儿子。于都河边挤满了红军，天色越来越暗，杨成武走到了大娘的身边，大娘一把抱住了他，塞给他一个白布包，布包里面是两个还热着的红薯。杨成武把红薯收下，说了句“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然后带领部队上了于都河上的木桥。

四团团长耿飚在部队准备转移的时候开始打摆子发高烧，二师师长陈光决定让他留下来养病。万分焦急的耿飚把卫生队队长姜齐贤找来了，因为他的病是这个队长诊断并报告给师长的。耿飚的话很不客气：“姜胡子，你搞的什么鬼名堂？”姜队长只好一再解释疟疾病是很危险的。可耿飚还是一个劲儿地骂。出发前，师长陈光和政委刘亚楼一起来看望他，耿飚坚决要求跟随部队转移，并且表示他能够顶得住。陈光和刘亚楼都不愿失去这个能带兵打仗的团长，耿飚在最后的时刻被批准转移了。

回到部队，耿飚发现他的房东一家总是躲在窗后偷偷地看他，而且还向警卫员询问他的情况。直到政委杨成武来检查准备工作，被这一家人请到了屋子里，耿飚才知道原来房东家的儿子五年前参加了红军，临走的前三天结的婚，但是一走就没有了任何消息。耿飚住进房东家后，母亲觉得耿飚像那个失去消息的儿子，媳妇觉得耿飚像那个失去消息的丈夫。最后，在师政委刘亚楼的安排下，耿飚和这家人面对面地坐在了一起，结果耿飚一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令房东一家大失所望。部队出发了，耿飚看见在战斗中被炸伤了眼睛的特务连谭排长正站在大路边摸索着与战友们道别。耿飚停下了脚步，他不忍心走上去，但是谭排长已经摸了过来，当摸出是自己的团长时，谭排长哭了。耿飚说：“谭伢子，莫要这样！我们十天半个月就回来！”谭排长知道团长这是在宽慰自己，他哭着说：“团长！记住我是浏阳县的！”耿飚从口袋里掏出几块银元，送给了照顾谭排长的老乡。当他走了之后再次回过头来时，看见谭排长正拼命地撕扯着蒙在眼睛上的纱布。耿飚说这一幕他一辈子都没忘，数十年之后，那位眼睛蒙着纱布的红军排长还曾出现在他的梦境之中。

十月十七日黄昏，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渡过了于都河。临走的时候，他与项英单独谈了很长时间。根据李德的说法，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和前途是那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那么忧虑”。项英特别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认为“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回来”。事后，李德就项英的忧虑与博古交换意见，博古说：“党的政治总路线不存在任何分歧了，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随着红军已经转入了移动作战，这个问题也消除了。”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八日下午五时，毛泽东来到于都县城北门与军委的队伍会合。毛泽东的随身物品不多，只有一袋书、一把雨伞、两条毯子和一块旧油布。他甩着胳膊顺着于都河岸走着，已经有些凉意的秋风吹着他的长发。毛泽东很清楚，此一去，包括博古和李德在内，谁都无法预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国工农红军将要走向哪里。现在要紧的问题是，国民党军的飞机最好晚一些发现这支逶迤如长龙的队伍。那一天，走在于都河边的毛泽东并不知道，人类历史上一次惊心动魄的军事远征就要开始了，踏上征程的每一个红军都将成为一部前所未有的英雄史诗的主人公，不管他是新入伍的战士还是拥有军事指挥权的领导者。仿佛是为了证实这一点，在那个秋天的黄昏，毛泽东的身影很快就淹没在渡河的人流里了，他匆忙的脚步声和上万红军官兵的脚步声混杂在一起，瞬间便融入了夜色之中。

月亮升起来了，又大又圆。

红军主力部队和挑着各种担子的民夫队同时通过于都河上的木桥，拥挤着的长长的人流望不到头也望不到尾。一个肩上挂了个印花包袱的女红军因为人流的阻挡无法过河，焦急中她突然看见了四团团

长耿飚，于是像是看见了救星似的大声喊着：“耿猛子！我走不动呀！过不去河，怎么追上队伍呀？”耿飚刚刚接到中革军委作战局的一纸命令，命令他的部队不得延误立即过河，要求其他人必须等待主力部队过完后才能使用木桥。耿飚在人流里高声喊：“大姐！别着急！实在追不上，就等后卫部队吧！”

经过耿飚身边的一位红军战士这时问了一句：“团长，看这个阵势……咱们这是要到哪里去呀？”

耿飚说：“打敌人去！”

月亮被云彩遮住了，红军的队伍点起了火把。

伴随着于都河溅起的水花，数万红军身后的苏区响起了流传至今的歌声：

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了山，

秋风［里格］细雨，［介支个］缠绵绵。

山上［里格］野鹿，声声哀号叫，

树树［里格］梧桐，叶呀叶落光，

问一声亲人，红军呀，

几时［里格］人马，［介支个］再回山。

三送［里格］红军，［介支个］到拿山，

山上［里格］包谷，［介支个］金灿灿。

包谷种子［介支个］红军种，

包谷棒棒咱们穷人掰。

紧紧拉着红军手，红军呀，

撒下的种子，［介支个］红了天。

…………

# 第四章 路在何方

1934年10月·粤北与湘南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凌晨时分，在江西南部的赣州，驻新田的粤军第一军第一师二团团长廖颂尧、驻重石的三团团长彭霖生和驻版石的教导团团长陈克华几乎同时接到了防线前哨的电话：发现红军部队。

这里是国民党军包围中央苏区防线的最南端。此刻，国民党军主力部队正从防线的北端向中央苏区的核心地带压缩，蒋介石给驻扎在这里的粤军的任务是：筑起像铁桶一样密不透风的防线，不能让防线

内的任何一个东西活着出来。可是蒋委员长又不是粤军的首领，况且一个团挨着一个团的布防已经很密了，因此，这个电话对于粤军的三个团长来说也就是“注意观察”的级别，他们又一一接着睡了而且睡得还挺踏实。

南中国最著名的军阀是号称“南天王”的粤军首领陈济棠，这个地方军出身的军人不属于蒋介石的嫡系，他甚至一度联合广西军阀李宗仁和白崇禧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试图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一九三四年，陈济棠在广东办军事学校，组建海军和空军，改革民政机构，建立起一整套政府公务员考核任用制度，发展工业和农业，兴办教育，整理财政，整顿治安，一个广东省让他治理得大有兴旺发达之势。但是，比起中国其他省份的军阀，这个在广东说一不二的人物多了一个说不出的苦衷：除了要时刻防备蒋介石的吞并之外，他还有数百公里的“边防”要守，因为他的地盘与共产党红色苏区几近接壤。

当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时，陈济棠被任命为赣粤闽边区“剿匪”副总司令兼赣粤闽湘鄂南路军总司令。被授予如此重任本应喜出望外，但是陈济棠却格外忧虑。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令下，粤军出兵与红军作战，结果遭到红军伏击，一下子损失了两个营，这令陈济棠心都疼了。在这个时局日益动荡不安的年份，军阀陈济棠深陷于蒋介石与共产党政治对抗的夹缝中，他觉得必须为自己的生存安全寻找出一种最有利的策略。

拖延迟缓——这是陈济棠想出的上策。自江西出现红色根据地起，蒋介石年年要求他沿着共产党苏区的边界修筑碉堡封锁线，但是直到中央红军出走江西，他管辖的南部碉堡封锁线仍旧没有修筑完毕。而对蒋介石让他出兵参加“围剿”作战的命令，他口头上坚决执

行，至于具体怎么打，他给粤军下达的作战原则是：修碉堡，守阵地，决不主动进攻；即使发生了战斗，也不求有功，但求少受损失。部队每天的前进行程绝不能超过二十公里。陈济棠对他的部下说："这个原则，必须遵守。"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驻守福建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发动兵变，公开宣布在福州成立政府与蒋介石决裂。蒋介石急调十五个师分兵三路合围福建。两个月后兵变平息，蒋介石遂令其嫡系部队李玉堂部等自此陈兵闽西南。闽西南与广东交界，国民党中央军得以直接威慑陈济棠的广东了。在这种局势下，当蒋介石再次催促粤军向共产党苏区出兵时，陈济棠的生存危机感就更加强烈了。于是，他一方面派出部队向苏区进犯，对扼守苏区南大门的筠门岭作出进攻的态势；另一方面，却派出心腹参谋秘密去筠门岭，试图私下与红军达成"互不侵犯"协定。

陈济棠本没指望这种临阵谈判能有多大的效果，但是他发现，当粤军的部队开始进攻的时候，筠门岭一线的红军主动放弃了阵地。占领了筠门岭的粤军对自己的"战果"狠狠吹嘘了一阵，蒋介石在"通令嘉奖"的同时赏给粤军官兵五万大洋。但是，当陈济棠站在筠门岭上向北看去的时候，"南天王"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自己不是时刻担心蒋介石的中央军会开进广东吗？而中央军要想进入广东只能从北面来，那么，在自己与蒋介石之间存在着的共产党苏区，正好是目前蒋介石部署在江西的大军进入广东的屏障。筠门岭一战，红军并非没有战斗能力却主动放弃了阵地，这表明红军并不想和自己的粤军过不去，红军与陈兵闽西南时刻窥视着广东的蒋介石截然不同。陈济棠仔细一一想来，这么多年，蒋介石频繁调兵前来"围剿"共产党苏区，永远采取的是大军自北向南齐头并进的战术，这难道没有一点想把红军赶入广东

境内的意思吗？一旦真成这样，自己与红军不想拼也得拼，而蒋介石的中央军也就有了充足的理由进入自己的地盘。到那个时候，自己苦心经营了八年的广东算是完了。因此，如果红军能够在北面顶住蒋介石的进攻，对自己的粤军和自己的地盘百利而无一害。陈济棠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红军不能垮，最好永远在。自己无论如何要想法与红军达成个正式协议，如果红军承诺不侵占自己的地盘，自己就和红军一直和平共处，为此在物资上接济红军都可以——不就是盐巴和弹药吗？让红军去打那个心术不正的老蒋吧，以免老蒋有一天打了自己。

陈济棠开始颇费心思地派人打探与红军接上关系的可能，其中包括曲折地找到了一位红军指挥员在广州的亲属，让这个亲属无论如何联络上那位指挥员向周恩来传话。陈济棠还派人秘密地给红军送去弹药和药品以联络感情。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粤军与红军的秘密谈判通道逐渐打开，这使中央苏区的南线一度出现了相对平静的局面。

战事暂时平静后，陈济棠便鼓动广东的商人到共产党苏区做生意，通商贸易使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两个区域都得到了实惠：陈济棠卖了商品赚了钱讨了苏区的好，红军找到了突破国民党军严密经济封锁的缺口，得到了那些急需的和必需的物资。毛泽东对苏区南部的政治军事形势感到高兴，开始具体地指导红军如何进一步消除“赤白对立”。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总司令部发出了一份《告白军官兵书》，特别强调了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告白军官兵书》共印刷了五千份，被散发在苏区南线的粤军阵地前。毛泽东还指示部队可以适当地小规模出击，战斗的分寸是“不吃陈济棠的主力”，这样既可让陈济棠仍然保持对红军战斗力的认识，也可让粤军在蒋介石那里多少有个交代。当时，苏区的北部防线上战火纷飞，而南部防线上却出现了难得的宁静。面对宁静中南中国郁郁葱葱的山峦，

毛泽东诗曰："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不知毛泽东那时是否预料到了，不久之后当红军面临危难时，这里成了数万红军冲出重围的唯一突破口。

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夕，陈济棠派来的代表秘密进入了苏区，要求见一个叫何长工的人。何长工，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曾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军政治委员、红军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一九三四年春出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是中央苏区南线红军的负责人，陈济棠的代表之所以要见他，是因为在以往的接触中，粤军对这位红军将领有信任感。通过何长工，陈济棠的代表带走了一封朱德的亲笔信。朱德在给陈济棠的信中用毫不掩饰的措辞指出了红军与粤军应该协同作战以消灭蒋介石的军队：

> 红军粉碎五期进攻之决战，已决于十月间行之。届时我抗日先遣队已迫杭垣［杭州］，四川我部将越川边东下，威胁武汉，贺龙同志所部及在湘各部均将向湘敌协同动作，而我主力则乘其慌乱之际，找其嫡系主力决战而歼灭之。若贵部能于此时由杭、永［上杭、永定］出击，捣漳州、龙岩，击蒋鼎文之腹背，而直下福州；另以一部由湘南而直捣衡阳、长沙，则蒋贼将难免于覆亡也。

朱德在信的最后特别强调："为顺畅通讯联络起见，务望约定专门密码、无线电呼号波长，且可接通会昌、门岭之电话。"——处于被国民党大军"围剿"中的红军总司令与实施"围剿"的敌军南路军总司令就要互通"密码"与"波长"了，这是发誓要彻底"剿灭赤匪"否则就"舍命疆场"的蒋介石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当朱德写这封信的时候，中央苏区所面临的军事形势十分严峻，军事决策中心已作出了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决

定。在这种情况下，朱德宣称全国的红军正准备向蒋介石全面开战，中央红军必求与蒋介石的主力“决战而歼灭之”；同时建议粤军兵分两路倾巢出动，一路“直下福州”而另一路“直捣衡阳”，袭击蒋介石在福建与长沙的嫡系部队。最后认为如此一来，蒋介石就会“难免于覆亡”——这样的协同作战计划无论如何是不切实际的，最合理的解释是：红军试图利用这些说辞将粤军调开从而乘机冲出重围。

陈济棠身经百战，见多识广，老谋深算。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对于让蒋介石的中央军“覆亡”，他知道仅凭一己之力也就是有个念头而已，对于他最要紧的问题是如何保存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对于朱德的这封信，他看进去的只是“谈判”是完全有可能的；至于其余的，他和了解蒋介石一样也了解共产党人。此刻，关于陈济棠是否预感到中央红军即将突围，并且已经选择了他的防线作为突破口，不得而知。但是年初，当蒋介石的中央军正在苏区北部大举进攻的时候，陈济棠曾邀请他的老盟友白崇禧来广东“共商防共防蒋军事大事”。广西军阀白崇禧到达广东后，专门去陈济棠布防的“围剿”前线走了一趟，而且一直走到了筠门岭。从筠门岭回来，白崇禧关起门来告诉陈济棠：一、共产党红军定要突围。二、突围的方向很可能是广东。三、突围的时间应在秋冬之间，因为红军要等收获季节解决粮食问题——白崇禧说这番话的时间是一九三四年春，距离中央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还有半年的时间。无法得知陈济棠听了这个惊人的判断之后的表情，但从历史档案的记载中可以发现，白崇禧刚一离开广东，陈济棠就向粤北方向增派了兵力，特别是在粤汉铁路的两侧加强了防御部署。但是，半年之后，陈济棠却主动要与红军谈判了，并且不惜工夫万分诚恳。就在红军已经做好了突围的一切准备的时候，陈济棠依旧心存着红军在北面为他阻挡蒋介石的幻想。

一九三四年十月五日，中央红军开始军事转移的前夕，粤赣军区司令员何长工接到命令让他立即赶到瑞金。在瑞金，周恩来当面向何长工交代了任务：到陈济棠管辖的一个叫寻乌的地方去，与粤军第一军少将参谋杨幼敏、独立第七师师长黄质文和独立第一师师长黄任寰举行秘密谈判。与何长工一起执行这个任务的还有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潘汉年。时年二十八岁的潘汉年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一九三一年顾顺章叛变之后，他被周恩来调进了中央特科，出任特科二科科长。

何长工和潘汉年化装成江西老表，骑马到达了筠门岭附近一个叫羊角水的地方，看见粤军整整一个连的人马正在等待他们。这是陈济棠的粤军第一师第二旅的特务连，连长是早年毕业于日本军官学校的旅长严应鱼的心腹，名叫严直。严应鱼的第二旅长期驻扎在赣粤闽边区，即与共产党苏区交界的寻乌、平远、武平三县交界处。一个月前，蒋介石电令陈济棠向苏区展开攻势，第一师师长黄任寰命令第二旅进入江西寻乌前线掘壕设网。由于第二旅的官兵大多是本地人，不少士兵和苏区的百姓甚至是红军战士都有亲戚关系，再加上陈济棠有“决不主动进攻”的指示，因此这一带一直很平静。与红军谈判是一件万分机密的事，师长黄任寰从陈济棠那里领受了任务后，为了保证红军方面代表的安全，他责令第二旅负责迎接红军代表。为此旅长严应鱼派出了他最信任的人：特务连连长严直和旅参谋长兼军法处处长韩宗盛。严直布置了严密的警戒，同时还准备了两顶用来抬红军代表的轿子，四个轿夫都是严旅长的私人轿夫。严直见到何长工和潘汉年的时候悄悄地说他看过那份《告白军官兵书》。两个红军代表坐着轿子向第二旅旅部驻地罗塘镇而去，一路凡是遇到岗哨，在前面带路的严直便大声说：“这是旅长请来的贵客！”于是轿子被顺利地抬进了罗塘镇附近一个十分偏僻的小山村，在一座崭新的两层小洋楼前停下了。

出了轿子的何长工给了轿夫每人一块大洋，这让轿夫们感到十分惊喜，因为当时即使在大户人家现大洋也是极其珍贵的，大多被用于储藏而不是花销。这时候，谈判双方的代表都已经到齐，红军代表住在二楼，粤军代表住在一楼。

第二天，秘密谈判在楼上的会议室里正式开始。双方态度都很诚恳，因此气氛一直融洽。经过三天的密谈，红军与粤军达成了以下五项协议：

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

二、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

三、解除封锁；

四、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粤军的防区后方建立医院；

五、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粤军，粤军撤离二十公里。红军人员进入粤军防区用陈部护照。

可以肯定地说，双方商量第五项协议的时候，粤军代表并不知道红军方面的真实用意。谈判期间，何长工接到了周恩来用密语发来的电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在场的粤军代表极其敏感，问："你们是不是要远走高飞了？"何长工答："鸽子是和平的象征，这是说谈判成功了，和平鸽上天了。"——何长工和潘汉年心里明白，周恩来密语电报的意思是：中央红军就要出发了。因此，协议的其他条款对于红军来讲已经没有意义，红军此时不惜一切与粤军谈判的唯一目的是：借道。即在红军"有行动"时"事先告诉粤军"以便粤军撤出一条二十公里的通道。周恩来的电报显然是在提醒和催促。

粤军首领陈济棠私下与共产党红军谈判，事关重大。尽管蒋介石的特务网十分密集，但是，等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时，红军已经越过粤军的防线进入了湖南。怒火万丈的蒋介石发电谴责陈济棠“通共”，可中央红军的大规模突围令他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讨伐粤军了，他必须分秒必争地把江西的大军一一调往湖南。后来，一九三六年七月里的一天，蒋介石通过收买、兵谏、胁迫等各种手段分化瓦解了粤军的高层将领和广东的高层政客，最终让陈济棠尝到了众叛亲离的滋味，大势已去的陈济棠被要求二十四小时内离任，“南天王”只有“声言”下野从而彻底结束了他对广东的割据。

尽管并不清楚粤军与红军达成了什么协议，但是有一点被明确地写进了下传的命令中：粤军与红军互不侵犯。这就是处在中央苏区南部防线上的三个粤军团长在接到遭遇红军进攻的报告后依旧能够安心睡觉的原因。

秋高气爽，山林寂静，这几天前沿阵地附近除了有小股红军侦察部队时隐时现外，一切如常。粤军各个团都已经奉上司之命派人去红军那里交涉卖给他们紧俏货物的事，包括电线、煤油、盐巴、卷烟，而电池红军是有多少要多少，出的价钱也很高。交易时红军那边的人不赊不欠，付的全是响当当的现大洋——粤军已与红军达成默契的事士兵们并不知道，但他们知道在与红军的交易中他们的长官肯定捞足了油水。但是，今天红军怎么在凌晨突然出现了呢？防线上的粤军判断：这些人定不是正规的红军部队，而是些零散的地方“土共”。这样也好，小摩擦还是应该有的，双方都放上几枪，然后让参谋官写一份“我将士同仇敌忾，赤匪狼狈逃窜”的战报就没事了。

早晨的雾气刚刚散去，起床了的三个粤军团长正吃早饭，防线前哨阵地的电话又来了。这一次口气十分惊慌，说是红军攻击猛烈，前

沿阵地怕是要丢了。三个团长商量了一下，决定各派一个营上去把“土共”赶走。向前沿增援的粤军磨蹭了好一会儿才出发，一路上直埋怨那些“土共”逞什么能呀。结果还没到中午，增援的三个营长先后打来电话：向前沿阵地攻击的红军越来越多，绝对不是打个小摩擦的“土共”，绝对是红军的大部队来了！二团团长廖颂尧一听就蒙了，他一面命令自己派出的营坚持住，一面向正好在这里巡视的副师长莫希德报告。莫希德立即显出惊慌的神色，然后命令所有的部队向古陂方向撤退。三团和教导团没有马上执行莫希德的命令，因为三团团长彭霖生认为向前沿阵地攻击的绝不可能是红军主力，完全没有必要慌成那个样子，他想和“土共”打上一仗顺便捞点便宜。结果，三团的部队还没来得及部署，分兵两路的红军攻击部队瞬间便到了跟前。等彭霖生大喊“撤退”的时候，三团已经没有了后路，官兵们只有自顾自地四处逃散。

莫希德带领一、二团和师部一直退到安西才停下来构筑阻击阵地，他们在那里整整等了两天，才收容到逃回来的残余官兵。这一仗粤军不但伤亡严重，辎重行李也全部丢失。盛怒之下的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把三团团长彭霖生痛骂了一顿，然后把教导团团长陈克华撤了职。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三军团的先头部队沿着预定目标向粤军的封锁线开始了强行突击，并在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实施严密包围的防线南部撕开了一个口子。

从于都出发以来，连续几个晚上，由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组成的浩浩荡荡的队伍缓慢地移动着。按照这样的速度，他们至少要在苏区内走三个晚上才能到达苏区的边界。在最初的几天里，队伍的头顶上没有飞机，那些携带着炸弹的飞机依旧在瑞金城的上空盘旋轰炸，国

民党军根本不知道他们轰炸的瑞金已经是一座空城。那些没完没了地执行轰炸任务的飞行员哪怕将飞行半径稍微扩大一点，或者只是向南偏离预定航线十几分钟的航程，他们便会看见令他们目瞪口呆的情景：近十万人组成的三条长达十多公里的队伍正在齐头并进。如果太阳还没有落山的话，红旗在林木中若隐若现，土路上扬起的尘土遮天蔽日；而如果一旦天色暗了下来，地上便会出现数条逶迤的火龙。

这是一个“甬道”式的行进方式。

走在“甬道”中间的队伍，是包括共产党中央、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红军总司令部在内的军委纵队。这是一支近一万五千人的长长的队列：党政军首脑，老人和妇女，警卫部队和后勤人员；用锡铁皮、木板或竹片制成的各式箱子；用稻草绳子捆扎着的机器部件和行李物品；各种形状奇特颜色各异的包袱，所有这些都使得这支队伍行进的速度极其缓慢。翻山的时候，抬着大件的战士和民夫喊着号子一点点地往上挪，每挪上去一个巨大的箱子他们便欢呼一下。那些挑着银元、盐巴和大米的担子分量也不轻，民夫们时时需要停一小会儿喘口气。女人们边走边议论自己的丈夫此刻走到哪里了。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骑在马上，望着向天边延伸而去的队伍，一一回想着他所知道的人类行进史中的壮举，比如俄国著名将领苏沃洛夫，为援助在瑞士作战的俄军，一七九九年曾率领着他的无敌兵团跨越了高耸入云的阿尔卑斯山……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骑在一头高大强壮的骡子上，他后来回忆说，他一路默诵着苏联著名作家绥拉菲莫维奇在《铁流》中的描述：“人们拥挤着，步行的、负伤的都挤成了一堆，几十里长的大路，都被队伍塞满了……”傅连暲坐在一顶轿子里，轿子后面跟着八个装有医疗器械和各种药品的大箱子。这个如同嫁新娘的阵势引起了红军士兵的激烈议论。曾是教会医院院长的傅连暲将自己的全部家产和

整个医院捐献给了红军，一百七十个人整整搬了半个月才把那座红军急需的医院搬到瑞金。参加红军后，傅连暲救治了无数在战场上负伤的红军官兵，包括王稼祥、蔡树藩、伍修权、方强、伍中豪……他后来跟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艰苦的战争岁月，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其政治信仰的坚定和政治品格的高尚绝不亚于那些自称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人。懂得共产党规定的傅连暲不愿坐轿子，之前他特意练过骑马，但是屡次从马背上摔下来。傅连暲在轿子里不断地回头看，那些大箱子就是一座医院。有时他还能看见毛泽东。毛泽东的疟疾还没全好但并没有骑马。他走路一晃一晃的，以特有的姿势甩着胳膊，眼睛看着很远的地方。还有朱德，出发时要给他配担架，朱德却说他只要马，而且要两匹，一匹他骑，一匹驮他的文件。他是个永远乐观的人，腰带扎得很紧，一把小手枪别在腰间，他大步走着和旁边的人有说有笑，警卫员牵着那两匹马跟着他。

在两个军委纵队的前后左右，是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

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分别位于军委纵队前方的左右两边开路，第八军团和第九军团分别位于军委纵队的左右两侧护卫，第五军团在整个军委纵队的最后面担任后卫。拿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话讲，军事转移的出发队形像是红军主力抬着个“八抬大轿”，轿子里需要小心保护的是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新媳妇”，这个“新媳妇”就是庞大冗长的两个军委纵队——如果说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设计的这个行军阵形还有优点的话，那就是在以后漫长的征战路途中，无论红军主力部队遭遇多么残酷的战斗，走在“甬道”中间的这支上万人的队伍却少有战斗伤亡。

转移的队伍白天隐蔽休息，红军就在民宅或者树丛中睡觉。每天黄昏五时半开饭，然后大队人马启程出发。队伍走不了多久就需要点

燃火把了。红军的夜间照明用具基本有三种：点燃的竹片，以松脂或洋油为燃料的竹筒灯，以及军委纵队和各部队连部、营部、团部使用的马灯。灌上洋油的竹筒灯和使用洋油的马灯在红军中属于高级照明设备，因为携带的洋油不多，在以后的日子里这种东西很快就没有了。因此，红军大规模转移之初的行军，称得上是夜晚的大地上最明亮的行军。

绝大多数红军战士并不完全了解红军此时的处境。占兵员总数一半以上的新兵军装是新的，背包、绑腿带、皮带、帽子是新的，口袋里的步枪子弹和胸前挂着的几颗手榴弹也是新制造的。他们每人准备了三双草鞋和十天的粮食，队伍后面跟着的伙食担子和公文担子让他们走起来踏实而放心，于是他们在行军时唱起他们刚刚学会的《胜利反攻歌》：

战士们高举着鲜红的旗帜，

奋勇向前进，

配合那全国红军要实行总的反攻，

创造新的革命根据地，

大家要努力。

红军临近了苏区与白区的交界处，天开始不停地下雨，大队人马行军的速度更加缓慢了。半夜时分，队伍在大山中转来转去，不时地需要所有的人都停下来，因为前面遇到了山崖，要等把大行李大箱子弄过去，人才可以顺利通过。停下来的官兵开始打瞌睡，新兵们睡着了，老兵蹲在地上吸烟，烟锅子的光亮一闪一闪的。有时候，队伍一停下来便长时间不动了，着急的指挥员一直跑到最前面，才发现黑暗

中几个新兵睡得很死。于是赶快叫醒他们，整个队伍又接着蠕动起来。秋雨中的小路经过千万人踩踏，成了一道稀烂的泥沟，不断地有人滑倒。有挑担子的战士和民夫滑下山崖，跟着滚落的箱子破了，里面的东西撒了半山坡，细看一眼，有时撒出的竟都是钞票。挑担子的民夫的鞋很快就磨烂了，没有新鞋给他们，于是他们就用烂布裹脚，但是脚还是肿了起来。眼看着离家乡越来越远，并且就要进入白区了，一些胆大的民夫丢下担子跑了，胆子小的便向红军干部求情："再走远，回去被当成红军抓起来就没命了！"虽然进入白区之后，敌人已经被先头部队赶跑，但红军官兵还是意识到自己到底是走出苏区了，因为看不见"工农政府"的木牌子了，路边也没有招展的红旗了，更没有地方武装的同志站在路边给他们端上一碗热水。黑暗中的村落荒芜而寂静，红军干部反复对战士们说着：进入白区之后要提高战斗警惕，因为即使没有敌人正规部队的阻击，由地主豪绅自发组织的类似民团的反动武装，对待掉队的或是负伤的红军手段极端残忍。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八日，朱德签发了关于"野战军攻占古陂、新田地域的命令"。这是一个内容极其详尽的作战命令，其部署的周密程度在以后的日子里不曾再出现过。命令明确了各路部队的进攻出发地和进攻前必须的准备，然后规定红军主力部队发起总攻击的时间为二十日晚。但是，由于第三军团没有按规定时间到达攻击地域，于是总攻击的时间拖后到二十一日拂晓。其部署是：中央红军由王母渡、韩坊、金鸡、新田地段突破粤军封锁。第一军团为左路，攻击新田、金鸡，向安西、铁石口方向发展；第三军团为右路，攻击韩坊、古陂，向坪石、大塘埠方向发展；第九军团跟随第一军团前进，掩护左翼安全；第八军团跟随第三军团前进，掩护右翼安全。军委第一、第二两个纵队居中，第五军团担任后卫，掩护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前进。

粤军在与中央苏区交界的防守线上部署了东、西两个战斗群。东线战斗群为粤军第一军余汉谋部。其各部队部署是：第一师，师长李振球，主力位于安西；第二师，师长叶肇，主力位于信丰；第三师，师长张达，主力位于赣县和南康；独立第二旅，旅长陈章，部署在安远。各部队沿纵贯江西西南的桃江构筑起一道由碉堡组成的阻击阵地，这便是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所面对的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

虽然红军与粤军事先达成了那份“粤军撤退二十公里”的协议，虽然在总攻击发起前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都收到了中革军委“如粤军自愿撤退，应勿追击和俘其官兵”的电报，但是，红军与粤军的协议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粤军”——对于中央红军的大规模军事转移，事先在红军内部都实行了严格的保密，怎么可能“事先告诉粤军”呢？况且，即使红军方面执行了这个前提，由于政治上的对立，双方达成的协议也不可能向下级部属传达。事后得知关于协议之事，粤军方面对团一级都采取了保密措施。这导致了当战斗发生的时候，粤军多次在上级命令撤退时官兵因为打红了眼而坚决不撤——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两军刚一接触，枪声即刻响起，双方展开的竟是激烈的生死之战。

粤军的防御阵地虽没有最后修完，但毕竟修筑了多年，不但有坚固的碉堡，碉堡的前面还加设了两层由铁丝网、竹桩、地雷和深沟组成的工事。战斗打响的时候，粤军声称他们的阵地坚不可摧，“红军休想越雷池一步”。面对粤军坚固的防御工事，手中只有步枪和手榴弹的红军拼死冲击。担任主攻的红三军团四师、六师干部伤亡将近一半，战士伤亡近千人。四师是第三军团的先头部队，其先锋团是十一团，战斗僵持不下时，四师独臂师长洪超亲自指挥十一团冲击，最后以肉搏战击溃了当面阻击的粤军。接着，十一团的一个侦察排奔向最前沿

侦察敌情，在信丰木桥镇附近，他们遇到了一股退下来的粤军。红军战士大声询问这股粤军的番号和他们长官的姓名，惊慌的粤军士兵说："我们的师长跑远了！我们的师长跑远了！"就在粤军师长丢下他的士兵跑得无影无踪了的时候，红三军团四师师长洪超策马扬刀疾驰在他的队伍中。朦胧的月色下，一个粤军士兵抬起头来，看见一个一只袖子空荡荡地飘舞着的红军骑在马背上飞驰而来，另一只手里举着的马刀在月光中上下翻飞。战马越来越近了，惊恐万状的粤军士兵举起了枪。在子弹呼啸的战场上，十一团的红军官兵还是清晰地听见了"砰"的一声——子弹不偏不倚击中了洪超的胸口，洪超直挺挺地跌下了战马。年仅二十五岁的红军师长洪超在部队刚刚出征的时刻阵亡，令四师的红军官兵万分悲痛。军团长彭德怀闻讯大为悲伤，因为洪超已经是红三军团在短时间内失去的第二个师长了。

不久前，在反"围剿"作战的团村一战中，第三军团阻击着兵力一倍于己的敌人的冲击，双方士兵如同两股洪水撞击在一起，阵地上的肉搏战杀得天昏地暗。面对成百上千的红军不畏生死的拼杀，敌人最终支持不住了，数万人开始一起狂逃。彭德怀站在阵地后的指挥所内，虽已身经百战，但看着敌人从他面前汹涌而过，这位著名的红军将领仍是为之心惊。数十年后彭德怀回忆道："当时尘土漫天，只见敌军狼奔豕突，不见我军混杂其间，虽是猛虎突入群羊，可是羊多亦难捉住。我以一万二千人，击溃敌三万余，仗虽打胜了，俘虏不及千人，算是打了个击溃战。"第三军团四师师长张锡龙与政委黄克诚也在前沿阵地指挥战斗，当敌人开始疯狂溃退的时候，他们走上阵地的高处观察战场形势。他们没有料到在不远处的一个山包上，草丛中埋伏着一小股敌人。师长张锡龙刚刚走上阵地，枪声响了，狙击步枪的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并穿越而出，带着鲜血和脑浆继续朝前飞去，打在了政委黄克诚的眼镜上。猝然间不知到底怎么了的黄克诚弯腰去找眼

镜，却听见脚下有人发出痛苦的呻吟。待黄克诚重新戴上眼镜时，看见倒在阵地上的张锡龙已没有了气息。红三军团四师师长张锡龙生于巴蜀山区，二十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著名的南昌起义，后毕业于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曾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锡龙倒下的那一天，恰逢他二十七岁生日。

年轻的红军师长长眠在被战火烧焦的阵地上曾令军团长彭德怀悲伤不已。现在，四师的又一个师长牺牲了。洪超，湖北黄梅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十八岁加入国民革命军叶挺的部队，在南昌起义中又加入朱德的部队。一年前，在保卫苏区的反“围剿”战斗中他身负重伤，终于从死神那里挣脱时，他少了一条胳膊。张锡龙师长牺牲后，晃动着一只空袖筒的洪超担任了四师师长。他打起仗来凶猛无比。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苏区的时候，他率领四师血战在苏区北部阻击阵地的最前沿，誓死不退浴血而战，成为红军师一级指挥员中少有的获得过“红星”奖章的人。此刻，洪超无声无息地躺在江西与广东交界处的泥泞中，四师的红军官兵围着他的遗体，拉着他那只空袖筒哭成了一片。

第一军团前卫团是二师四团，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在第一军团的序列中，四团的前身是北伐战争时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这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部队在以后漫长的转战中总处在开路前锋的位置上。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红军的总攻击即将打响的时候，团长耿飚因疟疾发作浑身发软，警卫员不得不找了个门板抬着他。耿飚在迷迷糊糊的高烧中，听见杨成武正给部队下达战斗任务，然后就是来来回回的急促的脚步声。耿飚睁开眼，拉住一个人，一看是先锋营营长，就问：“部队要干什么？”杨成武没等营长回答就说：“要打一仗！”耿飚一下子从门板上下来，叫参谋长李英华拿地图来。

警卫员赶忙递过来一缸子热水，耿飚不停地喝着热水，然后用斗笠遮住马灯盯着地图看。李英华说：“我们的突击方向是古陂，离这里近十公里。”耿飚和杨成武商量了一下，决定派尖刀连迅速接敌。

四团的那场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粤军支持不住开始向后撤退时，尖刀连连长喊：“追！不能让他们回去报信！”于是红军战士猛追不舍，最终把这股逃跑的粤军追上了。粤军士兵穿着清一色的斜纹布军装，个个都戴着钢盔而且武器精良。部队刚出苏区的第一仗就抓了俘虏，红军战士很是兴奋，他们让耿飚继续躺在门板上，说保证让团长在古陂吃上早饭。因为是第一仗，耿飚不敢马虎，他把特务连连长王友才叫来细致交代了任务。因为王友才是广东人，所以耿飚说让他去“招待”一下他的老乡：“从右翼插进去，猛打猛冲，但是不要硬攻碉堡，只要把他们赶出来就行。”王友才边点头边用广东话说：“系［是］的啦！系［是］的啦！”特务连上去了，冲到距离碉堡十几米远的地方，王友才开始用广东话向粤军喊话，其他的战士在他身边“冲呀杀呀”地一通乱叫，结果果然把粤军的增援部队引来了。粤军一到，四团一营就冲了上去，与粤军增援的一个营扭打在一起。这时候，四团的其他部队向古陂发动了冲锋，并最终占领了这个小镇。

位于赣州西南的古陂虽是白区，可这里的群众并不怕红军，他们把愤怒全都发泄到了粤军的碉堡上，因为粤军在修筑碉堡时强行征用了他们的木材、家具，甚至是棺材。红军将粤军打跑后，小镇上的人们蜂拥钻进碉堡，把里面的东西抢了个精光。四团在粤军的一个营部里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还有几床丝绵被。这几床丝绵被经师政治部批准，耿飚和杨成武每人分到了一床。杨成武很珍惜这床被子，在后来艰苦的征战中，他一直小心地带着它走了万里之遥。数十年后，杨成武依旧将这床被子保存在身边，他说看见它便会想起“长征第一仗”的

那个夜晚——那个夜晚“有月亮，视野很好”，杨成武在“战斗间隙时不由得向后望了一眼，惜别的情绪依旧盘旋在心里”，因为“真的离开苏区了”。

二十一日，第一军团二师六团的一个连占领了金鸡，一师一团占领了新田；第三军团先头部队占领了百宝，六师十六团占领了韩坊。粤军开始全线撤退，红军开始全线追击。二十二日，第一军团击溃了从重石、版石向安西撤退的粤军的两个团；第三军团占领了桃江以东的坪石；第八军团在坪石以北的王母渡渡过桃江，向坳头背、大垅方向前进。二十三日，在第九军团监视粤军之时，第一军团在坪石以南绕过安西直奔桃江，第三军团顺利地占领了与桃江近在咫尺的大塘埠。二十四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已占领了桃江东岸，控制了岸边的渡口。晚上，各军团先头部队渡过桃江，抢占了河西岸各个要点。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在红军官兵用热血和生命开辟出的狭窄的“甬道”间，在两侧红军主力部队的严密掩护下，军委两个纵队的上万人马安全渡过了桃江。至此，中央红军以伤亡三千七百多人为代价，突破了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从被国民党军围困了四年之久的中央苏区突围而出。

就在中央红军开始全面突围的二十一日，位于江西的国民党军各部队收到了湖南军阀何键转发来的一封蒋介石的电报。蒋介石在电报中汇集了各部队关于中央红军动态的报告，因为消息互不验证甚至没有关联，所以看去如同大杂烩：十六、十八日有报告说，红军第一、第三军团正向宁都方向移动，携带了大量的粮食和弹药，初步判断红军准备攻击赣州。十七日有报告说，第五军团罗炳辉部两千人、机枪二十余挺已西去，长汀现仅由杂色部队维持秩序，“俱甚恐慌”。同时，一个情报参谋报告说，红军在兴国的医院也有移动的迹象。无线

电侦察的结果是：红色中华通讯社已经五天没有广播了。综合上述所有情况判断，“赤匪”有可能“西窜”。这封电报，是蒋介石对中央红军军事转移作出的最早判断，但是口气并不十分肯定。因为就在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与南部防线上的粤军发生了激烈战斗的时候，陈济棠依旧向蒋介石报告说：“毛泽东现在于都。”——这本不是一个“情报”，因为蒋介石早就知道毛泽东在于都，毛泽东在那里已经有一阵子了。但是陈济棠的电报如此简明，这等于在告诉蒋介石，至少在他防守的那个方向上红军还没有什么动作。

然而，就在陈济棠给蒋介石发出这封电报的时候，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关于前沿军情的电报到了：

赣匪主力伪一、三、五军团企图西窜。本日发现赣、信两县之东北地区，计有伪一军团一、二师及三、五军团全部，其先头部队现在信丰属安息等处，与我守备部队激战中。

二十二日，中央红军全面突破了当面粤军的封锁线。尽管陈济棠对中央红军没有“事先通知粤军”就开始全线攻击强烈不满，尽管已经明知中央红军开始了大规模的突围，但他还是没有把这一重要的军情报告给蒋介石，至少是没有及时报告。

二十五日，驻吉安的国民党空军第五中队飞行员报告说，他们在粤赣湘边界地带的大山中发现了“从来没有过的大部队红军”，“数量约数万人正向湖南方向行进”——这是国民党军的飞行员第一次发现共产党中央、苏维埃政府机关以及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行进的情景。而这时，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已经全部渡过桃江，离开中央苏区的边界已有上百公里了。

红军正迎着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走去。

航空照片和情报分析被立即送到蒋介石手里，蒋介石终于确信中央红军已经突围而出。蒋介石的困惑和恼怒几乎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虽然那支被围困中的部队突围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且毛泽东绝不会等到国民党大军兵临瑞金城下时才做打算，可他们竟然如此轻易地突破了重重叠叠的封锁线——五十多万的重兵，九千多个碉堡，成百上千的飞机大炮坦克，花费金钱无数，伤亡官兵数万，费时数年之久，可最终还是让毛泽东就这么走出来了。

红军的突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呢？关于这个问题，蒋介石和他的参谋们有过数种设想：从中央苏区所处的地理位置而言，如果红军往东突围，那么国民党军就要从三面向东压缩，把红军赶进福建，然后一直逼到海滩上歼灭。如果红军向南突围，肯定是要走南昌暴动后朱德和周恩来走的那条老路——南下广东。虽然陈济棠有“通共”的嫌疑，但只要红军真的进了他的地盘，他就得全力迎战以求自保。那时中央军就趁势进入广东，在把共产党武装消灭的同时，顺便把那个不听话的陈济棠也解决了。可是，现在红军正向湖南方向行进，也就是说，他们出了苏区就折向了西面，根本没有进入广东的迹象。事情如此一来便有点复杂了。因为位于川陕地带的红军已把“围剿”他们的四川军阀刘湘打得狼狈不堪，刘湘不得不提出引咎辞职；而且有确切的情报说，萧克的红军残部已和贺龙的部队在湘西会合了，如果毛泽东走萧克的那条路，朱毛红军将会与贺龙、萧克会合，那样的话局势可就严重了。

“生擒毛泽东朱德者，赏洋十万元。献其首级者，赏洋五万元。生擒或杀死彭德怀等以下者，各赏洋一万元。”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五日，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发布了把朱毛红军消灭在第二道封锁线的

作战命令。同时，以南昌行营的名义向全国发布了重新更改的“赏格”：“生擒毛泽东朱德者，赏洋二十五万元。”蒋介石的悬赏布告发布在中国的各大报纸上。有好奇的外国记者就此顺着世界历史的线索调查了一番，找寻了能够找到的所有有据可查的悬赏公告，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份悬赏是迄今为止以政府的名义针对某一个人的“最昂贵、最诱人的悬赏”。

虽然悬赏公告发布了，作战命令也发布了，但中央红军到底要干什么，到底要走向哪里，蒋介石仍在各式各样的猜测中。于是，南昌行营关于“围剿”中央红军的部署便以问号开了头：

查匪徒此次南窜系全力他窜？抑仍折回老巢？或在赣南另图挣扎？刻下尚难断定。惟歼匪于第一线以东地区已不可能，自应歼匪于第二纵线及万［万安］、遂［遂川］、汾［大汾镇］横线中间地区之目的，另为机动之部署。经详商拟定：

（1）先电芸樵［何键］迅就上述纵、横两线加强工事，严密布防。

（2）令李云杰集结遂川，援助罗霖，巩固赣州以北江防。

（3）周［周浑云］纵队抽调十六个团集结泰和，薛［薛岳］路抽集十二个团集结龙冈。

（4）匪如他窜，即以薛、周会两李［李云杰、李生达］进剿。如回窜，即以周纵队会罗、李，由赣州东进。薛路仍服原来任务。

（5）东路及辞修［陈诚］应加速向长汀、宁都分进。

渡过桃江的中央红军依旧分成三路，在广东东北部边界折向正西，沿着岭南山脉巨大的山谷向湖南方向行进。这里山深林密，溪流湍急，人迹罕至。在山谷两侧的密林中，偶尔会突然响起零星的枪

声。集结在广东边界各个要地的粤军，甚至能够从阻击阵地上看见红军的队伍蜿蜒而行。那些挑着担子的红军和民夫一路都在他们精良武器的射程之内，但是，他们没有接到实施攻击的命令。粤军官兵趴在草丛中，看着如此大规模的行进不禁目瞪口呆。

十月二十六日，中革军委发出了《关于我方正与广东谈判让出西进道路，如粤军自愿撤退我军应勿追击的指示》：

林、聂、彭、杨、董、李、罗、蔡、周、黄：［亲译］

现我方正与广东谈判，让出我军西进道路，敌方已有某种允诺。故当粤军自愿地撤退时，我军应勿追击及俘其官兵；但这仅限于当其自愿撤退时，并绝不能因此而削弱警觉性及经常的战斗准备。

军委

二十六日

粤军第一军警卫旅少将副旅长兼二团团长黄国梁，是叶剑英在云南讲武堂时的同学，毕业后与叶剑英一起在孙中山领导的粤军中工作。黄国梁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十四师师长，后因蒋介石怀疑他与广西的白崇禧暗通而被撤了职，黄国梁自此投奔了陈济棠。在接到命令率部开赴粤北的时候，他对军中的好友说：“最好不要和红军打碰头仗。”部队到达韶关，黄国梁见到了第一师参谋长李卓元。那天和黄国梁一起到达韶关的，还有二团少校政训员黄若天。黄若天后来回忆，当时李卓元说：“已经同共产党达成协议，互不侵犯。共产党借路西行，保证不入广东境内；我方保证不截击，在湘粤赣间划定通道让他们通过，并由我方赠送步枪子弹一千二百箱，由四师负责运送，到乌迳附近交接。拟定共产党西行通道是乌迳、百顺、长江圩以北，以

及城口和二塘。过了二塘，便脱离了广东境。”李卓元还强调说：“关于协议的事，不能向团长传达，但要明确要求。共产党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总之，保持不接触。说不接触容易，要各级做到，执行起来不容易。”这段当事人的口述，至少证明了即使在中央红军开始突围之后，红军依旧与粤军保持着极其机密的谈判状态。虽然在向南突围的时候双方发生过激烈的战斗，但当中央红军开始向湖南方向行进时，粤军证实了红军没有进入广东的意图后，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让开了一条通道。从军事上讲，如果粤军在红军进入岭南山谷时全力发动攻击，红军将面临空前惨烈的战斗和难以预料的结局。从地图上看，这条沿着广东北部边界延伸出的通道，宽度也许不足二十公里，东起广东与江西交界处的乌迳，西至广东与湖南交界处的城口，城口镇的北面就是湖南的三江口镇了。通道的路线虽然不长，但因行军速度缓慢，中央红军至少也要走三天以上。

黄国梁率领二团继续向北，沿着给红军留出的通道的南侧布防，以监视红军的行动，防止红军进入广东。二十七日，二团到达了指定地域并开始修筑工事。晚上，黄国梁接到了一团团长莫福来的电话，说红军正在渡锦江，队伍庞大，有乘骑有辎重，好像还有一个高级指挥机关。莫福来最后说：“一团请求出击。”黄国梁立即指示：“不准出击。”莫团长没有吭声便放下了电话。于是一夜无事。

二十七日晚，渡过锦江上游的红军正是军委纵队。

二十八日天还没亮，剧烈的枪声把黄国梁惊醒了，他赶紧打电话询问，原来是布防在城口南面仁化县厚坑方向的一个营与红军发生了枪战。这个营违反了“在厚坑以南布防”的作战命令，擅自把部队部署在了厚坑以北，而他们布防的阵地正好处在狭窄的通道内。黄国梁立即命令接电话的何营长“撤退到厚坑以南”。谁知何营长在电话里百般

强调，就是不愿意执行撤退命令，坚持要和红军打上一仗，以表现自己的勇敢无畏。黄国梁只好立即给仁化县县长打电话，让他亲自赶到何营长那里再次传达他的命令。天亮的时候，厚坑方向的枪声停止了。第二天，粤军第一军警卫旅召开了营以上军官会议，黄国梁在会上声称要把一再违犯军令的何营长枪毙了。这边黄国梁的火气未消，那边他自己便挨了一顿骂。一直尾随着中央红军来到这里的粤军第二师五团团长陈树英火冒三丈地对着黄国梁喊："眼看着共产党经过，不截击，真是饭桶！"陈树英之所以敢骂军阶比自己高的黄国梁，是因为他是陈济棠的亲侄子——这样看来，连陈济棠当团长的亲侄子都不清楚粤军与红军间的协议。

十月二十九日，中央红军接近了广东与湖南的交界处。

这时，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已经部署完毕。这是由粤军第一军主力部队组成的防线，阻击线沿大庾、南雄和沙田一线构成。如果不发生意外，红军通过粤军的阻击线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国民党中央军已经开始向这个方向紧急调动，特别是湘军第六十二师正迎面开来。蒋介石对"追剿"中央红军所作出的军事部署是以他对红军动向的判断开始的："由赣南西窜之匪，尚徘徊于大庾东北地区，有向西北逃窜之模样。判断匪将以全力经赣南西窜，或以一部北犯遂川……"蒋介石使用了"尚徘徊"这三个字，足以显见中央红军行军速度之缓慢。中央红军自二十一日开始突围以来，整整一个星期，队伍仍没走出粤赣交界处的大山。蒋介石是以战斗部队通常的移动速度判断的，如果不是"徘徊"的话，红军早已进入湖南境内了。中央红军"徘徊"式的行军给蒋介石带来了判断上的误导，使他始终无法断定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于是，他的军事部署只能是把"西窜"的红军歼灭在粤赣湘交界处的"纵横碉堡线之中间地区"。

国民党军的具体部署是：位于中央苏区北面和西面的部队迅速集中，然后分路进入湖南南部；粤军则需一面“努力堵截”，以迟滞红军的行进速度，同时还要派出主力“追击”。蒋介石唯恐粤军追击不力，特别强调由湖南军阀何键负责追击部队的给养：“先行饬知境内官吏、团队先事筹备，尽力协助。”并细嘱粤军官兵追击的时候“应轻装并携带炒米袋”——这时的粤军正缩在几个军事要点内，除了防止红军进入广东之外，他们绝不会主动追击红军；而湖南的何键正忙于本省内的“清剿”，因为贺龙的红军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所以他只派出一个师的湘军前来防守边界。除此之外的其他国民党军此刻都远在数百里甚至上千里之外，因此蒋介石的作战部署如同纸上谈兵。

不知实情的蒋介石雄心勃勃，但是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从四川打来的一封电报令他顿时气概全无。刘湘的电报内容为两项：其一，通报红军第二、第六军团会合后，正向他的地盘四川方向开进：“萧、贺合股已成事实，燎原之势既成，后患之忧更大。不特湘、鄂、川、黔边徼永无宁日，万一绕窜万［万县］东，以扰我五路剿匪后方，则将势成不至。”刘湘含蓄地警告蒋介石，别以为国家的祸害只有朱毛红军，会合之后的萧贺红军不但到处袭扰而且发展很快，闹不好就会成了扰乱后方的心腹大患。到红军抄了你中央军后路的时候，可别说我“剿匪”不力和没有事先提醒。其二，刘湘说：“近据各方情报，朱、毛西窜，先头彭部已达湖南汝城。是川、黔形势日趋紧张，川民引领，切盼中央速筹大计，早清搀枪，用固西陲。”——中央红军从江西突围而出并已接近湖南，这已经不是秘密，刘湘煞有介事的“近据各方情报”的说辞等于废话。这个四川军阀的真正用意在于“川民引领”和“早清搀枪”：不是总说我们地方军“剿匪”不力么？蒋委员长不是亲自坐镇南昌声称“不日歼灭赣南残匪”么？怎么最后却让朱毛红军跑出来了呢？这回倒要看中央军如何办理了。为此，四川人民都瞪大眼

睛伸长脖子盯着看呢。《史记·天官书》中曰："三月生天搀。"《尔雅·释天》中曰："彗星为搀枪。"彗星俗称"扫帚星"，汉民族普遍认为天上出现彗星是大祸临头的先兆。刘湘在此引经据典比喻因为蒋介石的无能致使中央红军突围而出，真的由此酿成大祸，蒋介石要承担主要责任。蒋介石阅后称，这是一封"火上浇油"同时又"居心叵测"的电报。

广东仁化县城口镇是个隘口，南面的粤军严阵以待，北面是无路的大山，这里是中央红军西进的唯一通道。

情报说，城口镇内没有粤军防守，只有几百人的民团。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中国工农红军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就是从袭击城口镇开始的。

担任袭击任务的是第一军团二师六团一营。年仅二十三岁的一营营长曾保堂，家乡就在部队刚刚经过的江西信丰。他一九二八年参加农民起义，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位机智勇敢的红军指挥员。此刻，曾保堂面临的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城口镇内的敌人虽并不强大，但要求他的营一昼夜间奔袭二百二十里，这无论如何都是难以做到的。团里要求他去军团部领受任务，曾保堂到达军团部时，看见军团长林彪神情有点忧郁，在铺盖上半靠着不说话，政委聂荣臻和参谋长左权正在分析地图。左权交代：一营必须按时到达城口镇，不然湘军先到就麻烦了。聂荣臻说："保堂，那是红军突出去的唯一的口子，要不惜一切代价占领它！几万红军战士的生命就托付给你们营了。回去一定要向战士们讲清楚！现在，把参谋长交代的任务给我重复一遍。"临走时，曾保堂向军团长林彪请示，林彪只说了一句话："按照命令执行吧。"

二师六团团长朱水秋和政委王集成把团侦察排加强给了一营，并且派来了曾在这个营代理过营长的团参谋唐振旁协助指挥作战，团俱乐部主任余勋光也被派来协助做政治工作。经过加强的一营官兵们吃了一顿很饱的晚饭，每人还携带了够一天食用的米饭团子，临时又补充了弹药，连排长作战动员会议也开过了。十一月一日黄昏时分，一营出发了，序列是侦察排、机枪排、一连、二连、三连。按照参谋长左权的指示，全营官兵都上了刺刀，排成四路，疾速跑步前进。一营沿着大路没跑出多远，就看见了碉堡。碉堡上传来严厉的询问声，战士们有点紧张，但是前面的侦察排已经回答了："老子是中央军！诈诈唬唬的小心把红军引来！"结果，就这样过去了。后来又不断地遇到碉堡，每一个碉堡都无声无息，可能是第一个碉堡里的敌人已经把"别惹中央军"的意思挨个通知了下去。天亮的时候，曾保堂看了看自己的队伍，掉队的不多，但干部们的肩上都多了好几支枪。趁着在树林里吃早饭的空隙，曾保堂在地图上一量，发现这一夜竟然跑了一百五十多里路。本打算让部队休息一下，但是怕一休息就睡着了，于是决定连续赶路。第二天黄昏来临时，曾保堂看见了前面的城口镇。

这是一个被几条河渠环抱着的小镇，镇前有一座木桥，要想占领镇子必须从桥上过去。曾保堂部署了两个连攻击两侧的碉堡，又选择了十几名水性好的战士分别从木桥的上、下游泅水过去，然后自己带领侦察排强行闯桥。桥头草棚子里的敌人正在灯下赌博，一个哨兵在草棚外来回晃荡。红军走近了，哨兵喊："什么人？"红军战士答："中央军！叫你们当官的出来说话！"红军说着话脚步却没停。哨兵慌了，回头喊："班长！中央军兄弟要过桥！让不让过？"棚子里说："是陈长官的队伍吧？先过来一个问问。"棚子里的话音还没落，棚外的哨兵已被红军扑倒，接着一颗手榴弹就在草棚子里爆炸了。侦察排在爆炸声中从木桥上一拥而过。这里的枪声一响，迂回的连队也开了枪，驻扎

在镇子里的民团团长吓坏了，当即决定逃跑，结果刚出镇子就被包抄过来的红军俘虏了。一营迅速控制了城口全镇，而国民党军的大部队此时还没有到达，城口这个隘口要道已经扫清了。曾保堂命令三连一排长和一个班的战士赶快吃点东西，然后往回跑，把战斗结果报到军团部去。一排长带着一个班走了之后，一营的官兵虽已万分疲惫，但还是不敢睡觉，因为敌人一旦压过来，守住这个通道必会是一场血战。

曾保堂没睡，但一夜无事。第二天上午十点，哨兵抓到了几个便衣侦察员，一审问，曾保堂吓出了一身冷汗：国民党军的一个师已于昨天晚上六时到达城口镇附近。这个师几乎是与一营同时到达的，当曾保堂强行闯桥的时候，他们距离城口镇仅仅还有十公里的路程。但是，从城口镇方向突然传来的枪声令这个师停下了脚步，他们截住了几个从镇子里逃出来的民团士兵，惊慌的民团士兵对他们说镇子已经被红军主力占领了。结果，这个师立即往回撤，一撤就撤出了四十多里。

曾保堂后怕的原因是，如果一营奔跑的速度慢了一点，或者在中途休息了一下，那么，当一营攻占城口镇的战斗打响时，也许就要面对国民党军的一个整师了，那将会是付出巨大牺牲的拼死夺路。

但是，究竟四十里之外有敌人一个师的兵力，曾保堂为此作了拼死也要守住城口镇的战斗动员。中午，参谋长左权带领一个连进了镇子。曾保堂正要上前报告，左权劈头就问："占领镇子为什么不及时报告？"曾保堂忙说昨天晚上就派一排长回去报告了。后来才知道，已经奔跑了一昼夜的一排长半路上实在跑不动了，钻进一个废弃的碉堡里准备休息片刻，谁知那一个班的红军士兵一坐下来就睡了个昏天黑地。

国民党军对中央红军布防的第二道封锁线由粤军和湘军共同构成。这是粤军和湘军的头一次“互相协同”，按照双方总司令的话讲，简直是“珠联璧合”。但是，只要红军一出现，粤军就往后缩，希望湘军快点上来；而湘军因为红军还在广东境内，希望以邻为壑，不肯耗费兵力冒险出击。结果，中央红军在敌人混乱而单薄的防守中通过了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只是红军先头部队开路的时候，粤军、湘军和地方民团的混乱敌情常常让红军指挥员们有点糊涂。

第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耿飚就糊涂了好几天。抓到了敌人的尖兵，交代说是湘军，于是冲上去打，结果发现打的不是湘军而是粤军。侦察员报告说前面的村子里有敌人，于是便紧急组织攻击，冲进去发现敌人已没了踪影。正要命令部队追击，又报告说后面发现了敌人，接着就见村后的道路上果然来了一支队伍，走近了原来是支由少数官兵押送的挑夫队，挑着满满的军需物品。不用打就缴获了这些担子，问他们是给哪支部队送的，连押送的军官都说不清楚，只要是“剿匪”的部队就行。红军官兵打开担子一看，个个眼睛一亮：清一色的带曳光的尖头子弹。红军官兵的子弹全是苏区自己生产的“再生弹”，于是他们见到这些崭新的子弹如同见到珍宝。耿飚命令给每个挑夫三块大洋全部放走，然后让官兵把那些子弹尽力往身上塞。耿飚自己塞了满满三条子弹袋。这些优质子弹太宝贵了，因为常常舍不得使用，所以直到翻过雪山，耿飚的这些子弹都没打完。后来在两河口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耿飚把其中一条仍是满满的子弹袋作为礼物送给了第三十军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五日，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按照朱德发布的命令，开始陆续在先头部队开辟出的通道间穿越封锁线，向湖南与广东交界处的宜章、乐昌方向前进。

随着中央红军即将全部进入湘南，十一月六日，蒋介石给何键发出了“关于消灭中央红军于湘、漓水以东地区”的电报。这封电报显示出蒋介石混乱的猜测终于有了一个清晰的结果：“判断该匪必沿五岭山脉，循萧匪故道，经兴［兴安］、全［全州］间窜，且其行动必速，不致北犯，既有亦不过以一部掩护其侧翼。”蒋介石的判断已经没有差错，他确信中央红军将要取广西全州西进。蒋介石按照这个判断作出了阻截中央红军的军事部署：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调集中央军薛岳部、周浑元部以及湘军和桂军共二十一个师组成第三、第四道封锁线。而此时粤军独立第三师李汉魂部、独立第一旅范德星部已从仁化前出至乐昌地区，粤军第一师李振球部和湘军的一部也已从郴县前出至宜章地区。

对于中央红军来讲，往北，并不是没有军事上的出路。蒋介石凭什么肯定地判断中央红军不会向北而是要沿着湘南边界继续向西？蒋介石的判断在军事和政治上的依据是什么呢？查阅现有的史料，无法得出结论。而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的原因是，就在这一天，自离开中央苏区以来一直沉默的毛泽东第一次开口说话了，毛泽东提出的建议是：立即停止向西的行军，中央红军要向北走。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跟随军委纵队到达城口镇。虽然他没有任何军事指挥权，但只要队伍停下来宿营或休息，他便要对着地图仔细研究，他常常因为警卫员忙着给他烧水弄饭而没有把地图及时展开而大发雷霆。红军不能再往西走的想法，产生在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以后。向北，在北面的大山后面有毛泽东熟悉的湘南和赣南，有红色武装的起源地井冈山。毛泽东没有想过要到中国的西部去，他认为在红军向西的道路上，必会有敌人的重兵阻截。如果继续往西走，就不仅仅是国民党中央军和湘军的堵截了，广西军阀的部队一旦加入

进来，将导致军事形势的更加恶化。毛泽东郑重地向中共中央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红军不要向文明司前进，不要在坪石过粤汉铁路，不要夺取宜章、临武，而应该向北越诸广山，沿耒水北上，在水口山一带休整，仍回到永丰、蓝田、宝庆等地摆开战场，消灭‘围剿’之敌。”——毛泽东的计划是：在城口直接折向正北方向，沿诸广山北麓和耒水两侧一直挺进到井冈山西麓。红军在那里休整之后，集中优势兵力，寻找最有利的战机，与尾随而来的湘军或中央军打个歼灭战。然后，或上井冈山，或者沿着当年自井冈山出兵开辟赣南和闽西中央苏区的路回到瑞金去——毛泽东最初并没有转战上万公里把红军带到中国偏僻的西部去的想法，他那时候仅把中央红军的大规模军事转移当作了一次战略性地调动敌人的机动作战。

毛泽东的建议没有被理会。

连日阴雨，山路泥泞而陡滑。

红军规定每天必须行军七十里，于是早上就出发，一直走到半夜也许才能到达指定的宿营地。阴雨中火把无法点燃，冰冷的雨点打在脸上，无法看清楚脚下的道路。前面的人滑倒了，连锁反应会引发一大串人倒下。身上的水和路上的泥沾在一起，站起身来都很困难。机器与行李担子在民夫和红军战士眼中几乎等同于灾难，由于负伤、掉队、牺牲等原因，负责搬运这些大箱子的人已经少了三分之一，这给剩下的人造成了更加沉重的负担。上山艰难，下山更险，一不小心就会连人带担子一起滚下去。为了寻找可以顺利通行的路，各部队都找当地的农民做向导，向导们对这支庞大的军队和其所携带的庞大的行装感到十分惊讶与不解。在缓慢的行军中，极度的疲劳和困倦折磨着每一个人，红军官兵吃辣椒、咬手指，生怕自己一迷糊掉了队或者滑进山涧。更严重的是饥饿，深山里没有人烟，携带的干粮早已吃光，

即使偶尔路过一个村镇，粮食也被先头部队买光了。于是就喝山涧里的水，但是很快就闹了肚子，收容队每天的收容量都在百人以上。大家在收容队里互相搀扶着走，那些根本走不动和已重病在身的人，只能在经过村镇时留给当地的百姓。在一个巨大的陡坡下，几个红军干部掉了眼泪，因为数十名红军战士用了整整一个晚上也无法将一个巨大的箱子搬上去。忽然，有人主张把箱子扔下，但是没有一个人肯下这个命令。天亮以后，干部动员战士们再做一次努力，他们弄来了绳子，前边十几个人拉，后面十几个人推，一寸寸地向上挪，终于把大箱子挪上了陡坡。但是，这时候他们已经掉队了，因此只有不吃不喝不睡觉，抬着大木箱子赶了两个昼夜才追上大部队。

十一月七日，中革军委发布了红军主力部队通过“第三道封锁线”的行动电令。从电报中看，前方的敌情并不严重：“九峰似有粤敌独三师一个团”，“乐昌似有独三师二个团”，“在汝城、宜章间没有正式部队”。湘军至少在预知的前进路线上“无大变动”。因此，电令要求“野战军于宜章北之良田及宜章东南之坪石［均含］之间通过”。但是，电报发出之后，军情却骤然紧急起来：自从红军突破中央苏区边界以后，粤军一部就一直跟在中央红军的后面，保持着约一两天的路程，始终没有攻击的意思。按照广东军阀陈济棠的说法，跟在红军后面的粤军是为了“监视红军不得南下进入广东”。现在，中央红军的大部已于城口镇进入了湖南南部，按理说后面的粤军应该回广东了。但是，不断有侦察情报报告，红军身后的粤军跟随速度越来越快，而且眼看着就要追上红军了。为此，中革军委决定：担任后卫任务的第五军团停下来阻击粤军，阻击地点是延寿。

追击红军的是粤军第二师和独立第二旅。其中，以第二师五团的追击最为积极，五团团长就是那个在仁化县城大骂黄国梁放走了“共

匪”的陈树英。陈树英眼看着红军就要走出广东了，急切地想与红军打上一仗。八日，他接到了在“延寿附近发现红军后卫”的报告，报告里居然有“看样子他们很疲劳”的揣测，于是陈树英立即命令全团跑步前进——现有的史料无法提供这个粤军团长非要和红军作战不可的充足理由，在阶级地位上、意识形态上、政治立场上，甚至在个人恩怨上，都有产生这种极度对立情绪的可能，但如果陈树英不是团长而是师长或者军长，这种情绪所导致的后果也许就可能改变历史了。陈树英的先头营营长李友庄执行团长的命令很坚决，他带领他的官兵跑步翻过一座山脊后，在一条小河的对岸发现了红军的部队。双方当即发生了战斗。这些红军确实是担任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的官兵。红军在高处，有小河作为屏障，加之他们的任务是后卫掩护，自然要据险死守。陈树英命令部队涉河发动强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举着望远镜的李营长的手腕被红军击中。他的副营长潘国吉带领部队继续向前冲锋，刚冲上一个山坡，突然发现山坳中至少有千人以上的红军正在集结。潘国吉急忙转身，发现跟上来的部队充其量只有一个排，他想撤退但已经来不及了，陈树英的先头营瞬间成了红军的俘虏。

红军没有留恋战斗，迅速脱离战场向西走了。

清理战场之后的陈树英不甘心，依旧主张迅速追击。果然，在继续追击的时候，他的部队再次与红军遭遇并立即展开攻击。这次攻击陈树英所在的粤军第二师全部上阵了。陈树英决心要打个大胜仗，他站在粤军的冲击队形后，一个劲儿地催促着粤军士兵向前冲。仗一直打到了后半夜，陈树英觉出了有点不对劲儿，第二师的官兵都说从猛烈的火力上判断，无论如何都不像是红军。于是进攻暂时停了下来，派出人去观察，这才发现打了大半夜，打的竟是从另一条路追击红军而来的粤军第三师。这场粤军自己和自己的战斗使两个师均损失惨

重，后来陈济棠把所有这些损失都作为与红军作战的消耗报给了蒋介石，要求委员长给予补充。

在红五军团与粤军交战的时候，红一军团受命抢占乐昌以北的制高点九峰山，以掩护军委纵队从九峰山山脚下通过。

九峰山，位于广东与湖南的边界，是从广东进入湖南的咽喉之地。接受任务之后，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与政委聂荣臻之间发生了短暂的摩擦。林彪认为，目前粤军并没有占领广东北部的乐昌，因此没有必要派出部队占领九峰山，只要催促军委纵队提高一下行军速度，完全可以顺利地通过乐昌一线。聂荣臻则认为万一粤军先于红军占领了乐昌，西进的通道就等于被堵死了，因此必须抢先占领九峰山制高点，以控制九峰山与五指峰之间的地带，保证军委纵队安全地通过。参谋长左权见军团长和政委意见不一，就建议先派出侦察部队到乐昌方向摸一下情况。但聂荣臻还是坚持派部队抢先攻占九峰山。

正在争执的时候，二师师长陈光到了。陈光报告说他的部队在向乐昌方向侦察的时候，看见了正在大道上快速行军的粤军。军团部里的争执立即被放下了。第一军团按照朱德的命令按时到达了一个叫麻坑圩的地方。林彪在那里发现了一条电话线，沿着电话线找到了一部电话机，一摇，居然通了。接电话的是前边一个民团自称是“师爷”的家伙。林彪装作国民党中央军军官在电话里骂了几句，口气蛮横的师爷立即缓和了态度。林彪让那位师爷把民团团长找来讲话。林彪问：“林彪的红军现在到哪里了？”民团团长说：“红军到哪里不清楚，粤军的三个团已经开到乐昌，其中的一个团去九峰山了。”林彪这才知道自己差点铸成大错，他放下电话立即命令道：“耿飚那个团能跑，让他们立即出发，不惜一切代价抢占九峰山！”

阴雨变成了大暴雨，天地间一片昏暗，山涧中唯一的一条小路已被红军挤满，数万人的长长的队伍在大雨中缓慢向前蠕动着。四团政委杨成武在拥挤的人流中看见了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高大的罗炳辉因为马丢了正艰难地走在前堵后拥的队伍中，杨成武立即把自己的马送给了罗炳辉。山涧小路上的情形让耿飚和杨成武都产生了巨大的担心：现在，几乎所有的红军部队都被压到一条狭窄的道路上了，如果前面的九峰山拿不下来，后果不堪设想。耿飚带着他的四团不顾一切地向前跑。巨大的雷声和粗大的雨鞭把马吓坏了，无论如何也不肯再向前一步。耿飚立即弃马和部队一起跑。跑着跑着，就觉得浑身颤抖不止，他知道自己的疟疾又犯了。他向身边的师长陈光嘟囔了句什么，陈光一个劲儿地点头："要得！要得！"实际上，在暴雨中奔跑的陈光什么都没听见。四团的官兵跑到九峰山下就开始在暴雨中往山上爬。他们不知道在山的另一面，粤军也正在往上爬，且粤军比红军离山顶更近一些。但是，狂风暴雨帮了红军的忙，粤军是顶风，红军是顺风，结果刚刚上了山的粤军还没来得及设置阻击阵地，就被爬上山的红军赶了下去。占领了山顶的红军立即开始挖工事，官兵中有人还穿着从苏区穿出来的短裤，因此在大雨中被冻得瑟瑟发抖。发着高烧的耿飚嘴上起了一串水泡，师长陈光给他卷了一支旱烟让他提提神。

大雨停了，粤军的反击开始了。

在四团与粤军交火的时候，九峰山相邻的山头上插满了红军的红旗，冲击的枪声此起彼伏。在两侧部队的全力掩护下，军委纵队及其他红军部队从山下狭窄的山路上滚滚而过。

万分危急的军情令红军明白了那些巨大的箱子可能导致的危险，中革军委终于下令将搬运不了的大行李就地销毁。于是，恨透了那些东西的红军官兵立即开始砸，最后只剩下了四百多件。摆脱了大行李

的红军官兵情绪明显好转，他们唱着歌喊着口号一路向前——在中国广东与湖南交界处的巨大的山峦褶皱中，数万人的队伍在不断的作战中汹涌流动，这肯定是人类历史中前所未有的奇观，尽管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和整个世界并没有注意到这一景象。

中央红军通过了乐昌一线，陈济棠终于松了一口气：红军完全走出了他的地盘，粤军的任务也完成了。红军说话算话，没有进入广东；而自己也遵守了协议，没有与红军为难。

九峰山阻击战是粤军与红军的最后一战。

完成了掩护任务之后，四团官兵抄小路赶到主力部队的前面，重新回到了整个红军的前卫位置。由于四团官兵中生病的人太多，耿飚在一个叫天堂圩的宿营地请来个老中医给大家看病。这位拥护共产党主张的老中医专门为四团官兵熬了一大锅中药，还给很多人做了针灸治疗。耿飚要求老中医马上治好他反复发作的疟疾。老中医沉吟了很久说：有一个祖传的秘方，但毒性很大，平时不敢轻易使用，因为病人服后会大把地掉头发。老人担心面前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如果变成个秃子，将来就可能找不到“堂客”了——江西、湖南一带的人管“老婆”叫“堂客”。耿飚大笑道：“不怕！只要能继续干革命，不要堂客也行！”耿飚要了老中医的秘方，走了好久之后，才在贵州境内的一个县城里配齐了药，一剂喝下去，头发掉了很多但没掉成秃子，手脚麻了些日子但无大碍，最重要的是疟疾治好了！耿飚把这个秘方一直带到了延安。

红军全部通过九峰山一线的消息传到了南昌，蒋介石这才明白那个陈济棠一直在和他耍把戏，其“通共”程度比想象的还要严重而恶劣。恼怒的蒋介石给陈济棠发去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声称要对陈济

棠动用刑法："……平时请饷请械备至，一旦有事，则拥兵自重……此次按兵不动，任由共匪西窜，贻我国民革命军千秋万世莫大之污点。着即集中兵力二十七个团，位于蓝山、嘉禾、临武之间阻截，以赎前愆。否则本委员长将执法以绳……"而陈济棠在蒋介石的电报上只草草地写下了几个字："本电报转发至团长为止。"

蒋介石匆匆回到了南昌大本营，两份重要的情报随即到了眼前：一是向瑞金前进的国民党军获得了中共的材料，其内容充分证明红军的大规模移动不是战术机动而是战略转移；二是粤军与红军的作战虽然规模并不大，但是，红军主力部队的番号都已一一显露，这再次证明江西的红军确实是"倾巢逃窜"了。蒋介石立即召开了军事会议，会议再次对中央红军的走向进行了讨论。在红军西行的问题上没有争论，但是，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秘书长杨永泰的一个猜测令人吃惊。这个"攘外必先安内"理论的主要策划者有蒋介石的"策士"之称，他认为"中央红军有渡长江上游金沙江入川西的可能性"——这时，中央红军刚刚进入湖南南部，杨永泰如此超前的判断，如果不是他直觉敏锐，便是他故意在蒋介石面前危言耸听。因为就当时的情报而言，判断中央红军将去湘西与贺龙和萧克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有充分的理由，但是预言中央红军将绕行遥远而艰难的路途前去四川西部，显然有点不合逻辑。因此，蒋介石当即反驳道："那是太平天国石达开走的死路。他们走死路干什么？"——后来的历史证明，杨永泰那个近乎胡思乱想的判断竟然是正确的。

会议作出了军事部署，心情急切的蒋介石要求立即把军事部署的电报发出去。他的急切既来自担心也来自兴奋。担心的是，按照目前朱毛红军的走向，与贺龙、萧克会合的趋势已经明朗，如果让他们如愿以偿地实现了会合，那么红军主力将在湘南和湘西重新建立根据

地，将来湘鄂川黔的红军连成一片，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而兴奋的是，朱毛红军已经“流徙千里，四面受制，虎落平阳，不难就擒”。且从军事上看，共产党红军已经走进了一个绝境。负责起草军事部署电文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正患头疼，但是每过十分钟就接到南昌大本营参谋长贺国光的一次催促电话，贺国光在电话里只有一句话：“校长等不及了。”于是，电报被迅速地草拟出来，其主要内容是：

一、以湘军刘建绪部率章亮基、李觉、陶广、陈光中四个师，立即开赴广西全州依湘江东岸布防，与驻守在灌阳的桂军第十五军切取联系，进行阻截。

二、以中央军薛岳部率吴奇伟的第七纵队及韩汉英、欧震、梁华盛、唐云山的四个师，沿湘桂公路进行侧击，保持机动，防止朱毛红军北上与贺龙、萧克的部队会合。

三、以中央军周浑元部率所辖谢溥福、萧致平、万耀煌、郭思演师尾追红军，取道宁远进占道县加以确保，防止红军南下进入桂北。

四、以湘军李云杰部率王东原师及其所兼之第二十三师，取道桂阳、嘉禾、宁远，沿着红军前进的道路尾追。

五、以湘军李韫珩部率所兼之第五十三师，取道临武、蓝山，沿红军前进的道路尾追。

五路大军协同作战的部署颇费了蒋介石的一番苦心。第十六军李韫珩部和第二十七军李云杰部，官兵多来自嘉禾、蓝山和宁远，部队十分熟悉即将展开作战的地域；周浑元部属中央军精锐部队，所以用其强占道县压迫红军西进；而吴奇伟部沿着永州西进，可阻止红军向北，令其非渡湘江不可。如此，五路大军便在湘江东岸的有利地形上

形成了决战局面，这势必会给朱毛红军以毁灭性的重创。即使红军能够挣脱“围剿”，也只能掉头进入广东，陈济棠总不至于欢迎红军进他的广东吧？他手下的几万部队对付红军余部应该没有问题。至于有人提醒蒋介石说，广西的桂军可能和粤军一样不听指挥，甚至也可能“通共”，蒋介石的回答是：“不必担心，广西北部有大量的民团，红军即使想进去也不那么容易。如果桂军真把红军放进了广西，中央军也会跟进，那时他们就知道利害了！”

下达命令时，担心部下不认真落实部署的蒋介石还在电文中引用了中国古代兵家尉缭子的四句话：“众已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徒归；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救溺人。”——中国战国时期的兵家著作真可谓亦兵亦文，只四句话就把求敌若渴的心境描绘得形象之极：既然大军集结了，官兵出击了，也就没有任何退路了！寻找敌人要像寻找自己丢失的儿子那样心急火燎，打击敌人要像去救一个快被淹死的人那样奋不顾身。

蒋介石任命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也是出于周密的考虑。在向国民党军各部队发出了任命何键的委任电之后，蒋介石专门派飞机给何键空投了一封亲笔信：

芸樵兄勋鉴：

今委任兄以大任，勿负党国之重托，党国命运在此一役，望全力督剿，并录古诗一首相勉：

昨夜秋风入汉关，

朔云边月满西山。

更催飞将追骄虏，

莫遣沙场匹马还。

中正 文西行战一印

面对委员长的恳切言辞，何键受宠若惊，他当即复电表示拼死决战不负重托。然后，他将蒋介石的信札大量复制，广为散发，以激励下属同时抬高自己。

在任命何键的同时，蒋介石却任命原国民党军第六路军总指挥薛岳为第二路“追剿军”司令。薛岳对此很不满意，作为蒋介石的嫡系和心腹，他不愿意把中央军的近六个师的兵力置于何键这个地方军阀的指挥下。薛岳向蒋介石发牢骚，他得到的是“越境追歼有利于国家大局”这句听上去意思很含糊的话。薛岳确实无法理解蒋介石的周密打算：首先，红军现在进入了湖南，那里是何键的地盘，无论任命谁当“追剿军”总司令，在何键的地盘上调动部队、筹集给养以及求得作战支援等等，只要湘军不想积极配合，所有的行动都将受到制约，所以不如直接任命何键统筹指挥。何键杀了许多共产党人，特别是他杀了毛泽东的妻子，挖了毛泽东的祖坟，毛泽东的军队一旦踏上湖南的土地，何键自知他将要面对的是血海深仇，那么让他率领湘军与朱毛红军杀个天昏地暗有什么不好？最终，湘军和红军拼光了，湖南自然就变成了中央军的地盘。其次，何键不会容忍朱毛红军在湖南立足，而如果他是“追剿军”总司令，湘军就会跟着朱毛红军一路追击下去，哪怕追出了湖南。湘军一旦被调出湖南，薛岳率领的六个师就可以趁机进入，成为中央军钉进湖南的一颗钉子。而在这之前，别说皇皇六个师的中央军，就是蒋介石的一兵一卒也休想进入湖南。最后，蒋介石向来与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猜疑很深，而中国各省的军阀们彼此又从来互相戒备，现在朱毛红军进入了湖南与广西的交界处，湘军也许不可避免地要进入广西境内，而何键与李宗仁和白崇

禧之间却有很深的私交，湘军的进入不会引起桂军的猜疑，两军必能协同合力封锁湘江——果然，如蒋介石所盘算，接到任命的何键立即给已经归他指挥的薛岳发出了电报，内容是：“欢迎中央军入湘作战，戮力同心，共矢有我无敌之决心。”

现在，中央红军的前面横着两条大河：潇水和湘江。

两条大河之间地域狭窄，河渠纵横，地势平坦。

从军事地理上看，大军一旦进入这样的地带，当前后都有河流阻隔的时候，如果陷入包围几乎等同置于绝境。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日，湘南宜章方向一直有炮声传来，无法得知那里的战况。侦察员报告说，前面的路上有数座难以逾越的大山，能供主力部队和军委纵队通过的只有两条不宽的土路，但两条路都要经过宜章县城。更严重的是，连日大雨不断，无论是潇水还是湘江定会洪水暴涨，如果不提早派出部队占领渡口、准备船只、架设渡桥，大队人马一旦拥挤停滞在大河岸边，国民党军几乎不用使用地面部队，仅凭飞机轰炸就会给红军造成巨大伤亡。为此，根据中革军委“突破第三道封锁线”的部署，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治委员杨尚昆提出了以第三军团为先遣军团抢占潇、湘两水主要渡口的建议。

至此，中央红军离开瑞金苏区已经一个月了。

一个月内红军没有遭遇重大敌情，已经通过了敌人的两道封锁线。之前，萧克的第六军团在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出发前撤离根据地时，走的也是这条路，而现在，第六军团已经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合了。第六军团仅有七千人，中央红军有数万人；第六军团走了两个月，那么中央红军再走一个月就能与贺龙和萧克会合了。博古和李德

为此心情一直很好。只有周恩来的心情一直不佳：转移的突然性使敌人没能来得及调整部署；通过封锁线的时候与粤军事先有协议；第六军团七千人中有五千的作战部队，依旧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现在中央红军近十万人的大搬家，作战部队的任务已不只是消灭阻截的敌人，还要打通并守护一个长长的“甬道”，以掩护两个庞大的军委纵队通过。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敌人调动完毕，谁也无法料到如此规模的转移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局面。

中央红军自军事转移开始，一直避免攻打县城，只要有可能都是绕着走。现在，湘南的宜章县城横在了红军向西行进的通道上。

既然宜章是必经之地，那么就必须占领宜章。

大雨中的一个夜晚，距宜章县城四十公里处的一个小村庄里，第三军团六师师长曹德清和政委徐策来到十六团团部，下达了明天黄昏前必须占领宜章县城的任务。为了加强十六团的力量，彭德怀还专门把军团的山炮营派来配合战斗。

宜章县城，南接广东，东接江西，全县丘陵地貌，植被葱茏茂盛。

根据情报，宜章由湘军的一个营防守，县城四周碉堡林立。由于通往县城的公路畅通，战斗打响之后，湘军的增援能够快速到达。接受了任务的十六团团长李寿轩和政委于端祥立即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会。团长李寿轩认为要对打碉堡有充分的准备，山炮够不到的碉堡，必须要上爆破组，与那些坚固的碉堡拼死一搏。政委于端祥发言时表情严肃，他说如果宜章县城拿不下来，军委纵队的行军道路就将被堵死。现在国民党军已从各个方向包围过来。大家掂量一下这个任务的

重要性吧。会议最后决定一营、二营担任主攻，三营为预备队。会议正开着，来了几个老百姓，原来是中共宜章县委派出县游击队副队长前来接洽。副队长显得很激动，说游击队的百十人都归红军指挥；还说现在宜章县城里的那个营是何键收编的一股土匪，大约有五百多人，头目名叫程绍川，是个无恶不作的家伙。

天亮的时候，十六团出发了。依旧是冷雨。游击队带着抄近路，走的全是泥泞的山路。直到中午的时候，红军才上了大路，疲惫不堪的官兵们刚把粘在鞋底上的沉甸甸的泥巴刮掉，前面就响起了枪声。敌人占领了大路两侧的有利地形开始了阻击。十六团的队伍短暂混乱了一下后迅速组织起反击。机枪压制，两路包抄，当红军官兵发起冲锋的时候，阻击的敌人撒腿就朝县城跑去。红军官兵在后面追，边追边喊话，逃跑的敌人还是拼命跑，有跑不动的就当了俘虏，一问，是程绍川的队伍，上司命令他们把红军阻击在距离县城二十公里之外，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下午三点，十六团指挥所设立在县城外的一个山包上，从这里可以俯瞰宜章县城全貌。军团的山炮营上来了，开设了射击阵地。各营根据各自的任务开始攻击县城外围的那些碉堡，结果山炮一响，还没派出爆破组，碉堡里就空无一人了。外围清扫得很快，下面就是攻城了。十六团开始做战斗准备，这时，他们发现当地的百姓在他们周围越聚越多。突然，不知哪个一声呼叫，百姓们蜂拥向红军跑来，加入了战斗准备的行列。他们为红军推炮、挖工事、搬运弹药，还有一群百姓弄来了木头为红军制作攀登城墙的云梯。最后来了一群手拿工具的民众，一问，原来是在这里修建粤汉铁路的工人，他们的到来引起正在忙乎的红军官兵的热烈欢呼。这个场面令走了上千里路的红军骤

然想起了苏区的日子，想起了苏区的兄弟姐妹和父老乡亲，他们的眼睛湿润了，一个劲儿地说“谢谢同志们”。

一个小时后，指挥部下达了攻击宜章县城的命令。红军官兵劝说百姓们躲远点，免得伤了，但是百姓们不但不走还要往前冲，这一幕使得宜章城门外竟不像是大战在即而像是即将联欢。攻城的第一枪打响了，十六团的队伍刚刚向城墙冲去，眼前的情景又令他们大吃一惊：宜章城门突然大开，百姓从城内汹涌而出，他们大声喊着：“红军进来吧！红军进来吧！他们已经跑啦！”

在百姓们的簇拥下，第三军团六师十六团的红军官兵凯旋一般走进了宜章县城——宜章，当年朱德和陈毅在南昌起义后曾转移到这里举行了湘南暴动。这里的百姓知道红军的主张是什么，知道红军官兵是什么样人。

然而，红军自上而下的快乐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占领了宜章的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提出了一个建议：不能再往西走了，尤其是不能向湘江走了：

以三军团向湘潭、宁乡、益阳前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我中央率领其他军团，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人的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

彭德怀的建议与毛泽东的建议有相似之处，即：以一支部队向北，直接威胁长沙，打乱敌人的部署，并牵制敌人的兵力；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直接深入湖南腹地，向湘西拓展，寻求创建新的根据地。应该说，这样的建议有相当的合理成分，因为这样一来便会搅乱蒋介

石的部署，数万红军主力完全能够与湘军周旋作战并且打几个胜仗。再者，在中央红军行动的同时，命令贺龙和萧克于湘西同时出击，在沅陵一带创建根据地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博古和李德“既未回信，也未采纳”。中革军委的思路是：沿着第六军团转移的路线，沿着湘桂边界向西再向北，与贺龙和萧克会合。这就是说，红军必须过湘江。

过粤汉铁路的时候，第一军团一师师长李聚奎见到了毛泽东，这是毛泽东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后，这位师长一年多以来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当时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都拥挤在一条小路上，正在粤汉铁路东侧的一师接到军团部的紧急命令，要求他们派出一个团立即赶到军委纵队的前面去：“动作要快，不得延误。”李聚奎亲自带领三团从掩护阵地上撤下来往前跑，行进途中，他看见了坐在路边休息的毛泽东。和毛泽东坐在一起的还有周恩来和朱德。出生于湖南涟源的李聚奎时年三十岁，是一名在保卫井冈山根据地和湘鄂赣根据地的战斗中成长起来的优秀红军指挥员。当他看见又瘦又高的毛泽东坐在潮湿的地上吸着烟时，心里一阵难过。没等他开口，周恩来就和他打了招呼：“来得好快呀！”接着，周恩来展开地图，向李聚奎具体指示哪里放一个连，哪里放一个排，目的是全力保卫军委纵队的安全。周恩来说：“别怕部队撒得太散，后续部队一上来，你们立即收拢，不影响你们执行左翼前卫任务！”这时，毛泽东说话了：“动作要迅速，不然后面的队伍就会堵塞住了。大方向是嘉禾、蓝山，你们如果相机占领一两个县城当然好，如果不能走大路就走小路，小路过不去就爬山，具体道路由你们在前边决定，不要等指示，我们在后面跟着！”毛泽东特有的语言风格和表情手势令李聚奎想起了井冈山上的日子。李聚奎向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分别敬了礼，然后朝他的部队跑去。跑出几步他又回头看了一眼，看见毛泽东正在细雨中凝望着他。

军委纵队和主力红军进入了宜章。

欢乐的宜章！欢乐的突然降临令红军官兵疲惫的身心猝不及防，他们恍惚觉得艰辛的征程到此为止了。红军砸开了监狱，释放了革命者和无辜群众。红军召开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把没收的豪绅地主的财物全部分给了贫苦百姓。宜章全城店铺营业，生意兴隆，因为红军要补充许多物品。红军的采购人员使用的是红军自己的钞票，店家收了之后到一个指定地点去换大洋；红军的信誉好，店家换来的大洋货真价实。晚上，红军宣传队在露天演出，军委卫生部的两百多名十四五岁的小红军都是看护，小看护们唱起的歌声清脆悦耳余音缭绕，百姓们对他们仰着头唱歌的模样十分喜欢。天黑了，县城里各家各户的灯都很亮，百姓们男女老少聚在一起，话题全是红军。第二天早晨，像是约好了似的，上百个青壮年来到红军驻地要求参加红军。因为当年朱德的部队来过这里，不少百姓打听自己当年参加红军的兄弟或者侄子现在在哪个部队。军委纵队的一个管理科长是当地人，他请假两个小时回家看看，结果等他回来的时候，不但带回了一大罐子家乡的甜米酒，还有十一个要求参加红军的老乡。最踊跃参加红军的，是在这里修筑粤汉铁路的四千多工人，他们多数是从湖南各地招募来的。红军专门给这些铁路工人开了大会，告诉他们受压迫受剥削的原因，然后给他们发大米和衣服，还给愿意回家的人发路费。这些贫苦人从没见过对穷人这么好的队伍，一个口号在铁路工地上流传开了：“兄弟们，跟着红军干事去！”

红军继续西进了。

百姓们不愿意红军走。

红军官兵唱着歌，向百姓们挥着手，脚步格外坚定地向着前方，脸上洋溢着走向胜利的欢欣的笑容。

对于刚刚踏上艰险征途的红军官兵来说，湖南南部那个叫宜章的县城给予他们的短暂欢乐，将永远留存在他们的记忆之中，尽管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在接下来最残酷的战斗中很快便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 第五章 山河苍茫

1934年11月·湘西、皖南与豫西



三十八岁的贺龙站在湖南西部一个长满香樟和苦竹的山顶上，目光越过山下的一大片平坝，在对面同样葱郁的山岭间游移，他想看见哪怕是瞬间闪现出来的那个熟悉的身影。

个子不太高但显得十分结实的贺龙，与个子同样不高但显得有些瘦小的萧克之间的不寻常的友情，在中国革命史中堪称佳话。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娶了一对亲姐妹为各自的妻子，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具有同样政治信仰的共产党人志同道合。

山下的那一大片平坝被当地人称为十万坪谷地，这个南北长约十五公里、东西宽约四公里的平展的坝子，面积之大在湖南西部连绵的群山中十分罕见。

一场为摆脱围困而进行的伏击战就要在十万坪谷地中打响了。

这是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的上午。在离这里大约四百多公里的湖南与广西的交界处，中央红军庞大的队伍正在连绵阴雨中向着凶险莫测的湘江上游移动。而此刻贺龙的眼前却是阳光灿烂，宁静的平坝在暖洋洋的冬日阳光的照耀下浮动着一层金黄色的尘雾。

贺龙的部队是一九三四年分散在中国的数支红军武装中的一支，在当时中国工农红军的序列中被称为第二军团。

湘西是贺龙的家乡。

原名贺文常的贺龙一八九六年出生在桑植县一个叫洪家关的村庄里。他的祖父是清末的一名武举人，其父虽然以农为业，但仍继承了家传的武艺。这个家族的从武传统对贺龙一生不改的强悍性格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少年贺龙为了谋生，曾经在这一带的崇山峻岭中赶过马帮，因此他对这里的每座山每条水都了如指掌。十八岁时，贺龙成为由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中的一员。这个以推翻袁世凯为政治目的的政党下达给贺龙的指令是拉起一支队伍并组织武装暴动，但是由于消息走漏暴动没有成功。一九一六年，二十岁的贺龙给云南护国军首领蔡锷写过一封信，他请蔡锷派军队进入湖南帮助他再次举行暴动，但是他的邀请被蔡锷拒绝了，于是贺龙决定自己干。那是初春的一个晚上，贺龙带领二十多个青年袭击了盐局税务所和团防分局。袭击时他们手中只有一支老式火枪、三把马刀和三把菜刀，而袭击的收获却

是缴获了枪支和财物。在把财物分给了当地的贫苦农民后，这个二十岁的山村青年成为湘西护国军左翼第一梯团二营营长。在混乱的年代里，无论各路军阀如何利诱，这个青年从未改变过他对孙中山的忠诚。到了一九二六年孙中山领导北伐战争的时候，贺龙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兼湘西镇守使。一年以后战争结束，他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同年，在共产党人策动的南昌起义中，贺龙的部队成为起义军主力——就在国民党开始残酷屠杀共产党人的时候，贺龙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自此确立了至死未曾改变的信仰。

南昌起义军转战广东失利后，贺龙在湖北南部的洪湖地区开始了他组织红军武装的革命生涯。一九二八年，他在家乡聚集起三千多人的队伍，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军长。在国民党军和地方军阀的疯狂“围剿”下，这支红军武装数次陷入危机之中，数千人的队伍曾一度仅剩下不足百人。但是，无论环境如何恶劣，贺龙率领的红军始终转战在湖南与湖北的边界地区。一九三〇年，第四军与另一支红军武装第六军会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一九三一年初，红二军团改称红三军。红三军先后开辟了湘鄂西和洪湖两个革命根据地，鼎盛时期部队发展到两万多人。然而，令这个在死亡面前都不会退缩的共产党人悲愤的是不断发生在红军内部的“肃反”运动。一九三一年，王明派来的那个叫夏曦的湘鄂西分局书记竟连贺龙也列入了审查名单，“肃反”运动不但令许多红军干部遭到错杀，最终还导致了两个革命根据地的丢失。贺龙的姐姐贺英在战斗中牺牲，妹妹贺绒姑被敌人追到一个山洞里残酷杀害。

一九三四年夏，当江西南部的中央红军开始准备军事转移的时候，贺龙率领的红三军经过艰苦转战，在一个更偏僻的地区——四川

与贵州交界处的苗族和土家族聚集地——开辟了一个狭窄的立足点，军指挥部就设立在四川境内酉阳县一个叫南腰界的小村庄里。

在南腰界，贺龙从当地小学校里弄来一张国民党当局的报纸，他在报上看到了这样一条消息：“江西萧克匪部第六军团窜入黔东，企图与贺龙匪部会合。”此时，由萧克和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已经从甘溪的围困中冲出，官兵正分成数股顽强地向红三军所在的方向艰难靠近。红六军团转战如此遥远的路程，遭遇如此严酷的战斗，突然之间距离红三军如此之近了，这让偶然获得了消息的贺龙悲喜交加，他立即命令七师和九师分两路前出贵州方向，他对红军官兵说：“咱们去撞六军团！”

两天之后，红三军九师到达了一个叫铅厂坝的小镇，当他们准备宿营的时候，与湘军周燮卿部遭遇。九师二十六团被湘军从行军序列中阻断分割出来。二十六团团长常德善、政委汤成功正纳闷湘军为什么会出现在如此偏僻的地区，却突然发现山下的小河边有一小股部队在慢慢移动。二十六团立即派出部队前去与那股小部队接触，在远远地开了几枪试探之后，二十六团的红军官兵在草丛中发现了一个令他们眼睛一亮的东西：一顶缀有红五星的军帽。他们放下枪，轻轻地喊，大声地喊，然后，他们奔跑了过去。躺在草丛中的人已经无力站起来了，红三军的红军官兵小心地走到跟前，把这些红六军团的士兵扶起来，然后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几乎与此同时，在贵州沿河县的水田坝村，由贺炳炎率领的红三军独立团的官兵把一支大约百人的队伍带到了贺龙面前。尽管百人中无一人不是衣衫褴褛，但贺龙还是一眼就认出了站在最前面的那个万分消瘦的人是红六军团的参谋长李达。

这一瞬间发生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下旬。第六军团以巨大的代价揭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序幕，尽管这一过程使这支红军武装经历了太多的艰险与苦难，但他们终于与红三军在贵州、湖南和四川三省交界处的荒僻群山中会合了。可以想象长着一张娃娃脸的萧克和留着胡子的贺龙自南昌起义之后再次相逢时的情景。

同样是湖南人的萧克十七岁便只身来到广州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和贺龙一样，萧克也是在南昌起义爆发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起义失利后，萧克在湖南宜章担任一支农民武装的指挥官，而后参加了朱德领导的湘南暴动，跟随朱德的部队上了井冈山。他先后在红一方面军中担任独立第五师师长、第二十二军军长、第八军军长，一九三二年出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军团长，那一年他刚满二十四岁。

十月二十六日，红三军和红六军团的官兵在南腰界举行了联欢会。

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

贺龙与萧克，两个性格坚强的共产党人从此生死相依。

第二、第六军团会合后，向中革军委提出了两个军团建立统一指挥的建议，但受到临时中央局的严厉指责，中央局要求两个军团各自“单独接受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并且单独地活动”。当时，红六军团归队的官兵只有三千多人，其中还有三百多名伤员，由于干部大量牺牲和部队曾被打散建制已不全；第二军团由于“肃反”扩大化，基层连队的党团员和政治干部也非常缺乏。“我们谁也离不开谁！”在没有得到临时中央局同意的情况下，红二、红六军团还是迫不及待地建立起统一的指挥机构。第二军团军团长贺龙曾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第六军团

的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于是，两个军团近八千名官兵热烈拥护贺龙和任弼时的统一指挥。“会师，会师，我们见到老师了。”在贺龙的眼里，红六军团是来自中央苏区的部队，是诞生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部队，他们具有丰富的建军和作战经验。为此，贺龙向红六军团要了数名优秀的干部担任红二军团的师团政委。

第二、第六军团所在地是一块纵横不过一百公里、仅有十万人口的荒凉地带，这里无法养活八千人的红军队伍。因此，两个军团统一指挥后作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离开这里，到湘西寻求发展。在红军官兵的大会上，贺龙说：“六军团的同志们来到我贺龙这里，想好好休息一下打双草鞋，这个要求不过分。但是，我们这块根据地是新开辟的，还不巩固。可靠的根据地在哪里呢？”贺龙抬起一只脚，用手里的竹烟袋杆敲了敲他的草鞋底，然后大声说：“根据地在我们的脚板上！”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八日，中央红军突破了瑞金苏区南端的粤军防线，正缓慢地行进在广东北部的大山中，而第二、第六军团这一天则从南腰界出发，开始向湖南西部的永顺、龙山和桑植地区开进。

这支八千人的红军队伍由熟悉地形的红二军团开路，红六军团跟随在后，他们沿着湖南、湖北和四川三省的边界一直向北，一度进入了湖北的来凤县境内。在确定敌人已经从各个方向开始向湖南北部集结时，他们突然将行军路线折向东，重新进入了湖南。之后袭击了湖南西部的龙山和永顺两座县城，县城里的团防根本没有招架之力，拿红军官兵的话讲：“打得他们连骨头渣渣都没了。”十一月七日，当中央红军到达广东与湖南交界处那个叫城口的小镇时，红二、红六军团的领导们已经住进了永顺县城一座华丽的老宅之中。这座老宅是国民

党永顺县党部的办公地。眼下，在大厅悬挂的那块“天下为公”的匾额下，谈笑风生的是一群无比坚强的共产党人。

第二、第六军团在风景秀丽的永顺县城开始了难得的休整。

军团领导在县城的天主教堂里召开了干部会议。红六军团政委王震传达了中央六届五中全会精神，虽然这一精神表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是“绝望的进攻”，红军很快就要取得“一省和数省”的苏维埃革命胜利，但博古的这些话显然与中央红军放弃根据地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的现实不相符了。会议对中央派来的湘鄂西分局书记夏曦的“肃反”扩大化问题进行了批评，在随后写给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报告中“建议中央撤销他中央分局书记及分革军委会主席”的职务。尽管如此，“左”倾的思想依旧影响着这支红军部队，会议作出的决议之一就是：“凡是受到批判的干部不能担任主官。”结果贺炳炎团长被撤了职，分配到管理科当管理员去了。会议批判的另一件事与贺龙有关：贺龙曾经利用他在湘西的一些社会关系，把不少红军伤病员安置在了政治上比较中立的团防那里。凭着贺龙的威名，团防不敢怠慢红军更不敢出卖红军，不少红军伤病员得以养好伤回到红军队伍来。可是会议说贺龙的这个做法违反了中央六届五中全会“要有明确的阶级路线”的指示。大部分红军干部对此心里充满困惑：红军要不断地机动作战，天天抬着伤病员肯定不行，如果没有可靠安全的安置办法，一旦负伤了不就是死路一条了吗?

会议仅仅开了两天就被突然发生的敌情中断了。

号称“湘西王”的陈渠珍已派出周燮卿、龚仁杰、杨其昌的三个旅又一个团共万余人向永顺扑来。

与此同时，第二、第六军团收到了中革军委的电报，电报说中央红军已经接近湘江，湖南的国民党军已被全部调来阻击，第二、第六军团应趁此时机深入湖南西北部扩大行动地域。

两个军团的领导经过紧张磋商，认为只有给予敌人重创，才能重新打开局面。于是制定了这样一个作战计划：撤离县城，先向敌人示弱，待把追击之敌人引到适当的地点时，打一个快速的伏击战。

红军从永顺县城撤离的时候发生了一些混乱。

永顺县城边有条河，河上那座古老的花桥是通往县城的交通要道。为了迟滞敌人的追击速度，红军决定把这座建造得格外精美的花桥烧掉。为了不引起当地民众对红军这个举动的反感，贺龙命令执行烧桥任务的五十一团团长郭鹏到军团供给部领取一千块大洋送到县商会会长家去。郭团长对这个数字之巨大感到十分惊讶，但他还是立即执行了。八十四岁的永顺商会会长也被这笔巨款吓住了，他让人挑着大洋找到贺龙，战战兢兢地说不要和他一个老头子开这么大的玩笑，自古以来还没听说过哪支军队自己掏钱打仗。贺龙说这不是玩笑，他找人测算过了，重新修一座更漂亮的桥，一千块大洋大致够了。贺龙麻烦老人家在事后建桥的时候组织工匠并负责监督。商会会长感动得战战兢兢地把钱收下了。接着，五十一团一营二连连长苏杰又来报告，说有一群百姓正在花桥边哭呢。原来这些百姓都是靠在桥上摆摊谋生的，烧了桥等于断了他们的生路。军团政委王震把五十一团批评了一顿，说他们考虑不周，完成任务不好，要求他们即使借钱也要给百姓赔偿损失。五十一团到供给部去要钱，回答说没有了。于是五十一团全团官兵人人掏口袋，官兵们把所有的积蓄都掏出来，凑够了两百块大洋分发给了桥边的百姓。但是当花桥着火的时候，又发生了混乱。县城里拥出了一批人，有的往燃烧的桥上冲，有的往河水里跳。

原来，县城里的不少富户人家把大量的金银细软甚至是烟土，偷偷地藏在了这座桥的木板缝隙里，火一起，这些财宝噼里啪啦地往下掉，争抢财宝的混乱直到追击红军的国民党军到达，乒乒乓乓放了一通枪之后才告结束。

到达河边的国民党军看见的花桥只剩了几座桥墩。

河对岸，负责引诱敌人追击的五十一团随便放了几枪，然后跑得没了踪影。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上午，站在山顶上向平坝瞭望的贺龙对这个伏击地点感到很满意：红二军团四师埋伏在坝子一侧的毛坝，红六军团的部队在萧克和王震的带领下分别埋伏在坝子另一侧的东山和北山；另有一个师负责守住“袋底”；负责引诱敌人追击的五十一团则负责最后封锁“袋口”。伏击敌人的“口袋”已经布置完毕，官兵们已经吃饱了，武器已经检查了好几遍，政委们正在各部队进行着最后的战斗动员。

从上午一直等到下午，天快黑了的时候，追击的敌人到了。先头部队龚仁杰和周燮卿的两个旅刚刚进入了伏击圈，平坝四周山上的军号声便骤然响起，埋伏在侧翼的红六军团官兵呐喊着顺着山坡直接向敌军拦腰冲去，红二军团的官兵则把攻击方向对准了敌人的前卫部队。湘军陈渠珍部的两个旅在没有任何先兆的突袭中顿时混乱起来，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由于部队在平坝中拥挤在一起，本来占据优势的火力也无法发挥。

宽阔的坝子一望无际，村庄间、田埂上、土路上，到处是红军的砍杀声，湘军官兵只有争相逃命。自从贺龙的部队被湘军赶到了四川

与贵州的交界处，湘军的长官就宣布“湘西的剿匪已经告一段落”。湘军士兵已经闲散很长时间了，已经不再做与红军打仗的噩梦了，于是，突然降临的伏击和砍杀声令他们顿时魂飞魄散。平坝里到处是湘军丢弃的武器，侥幸冲出红军伏击圈的敌人不顾一切地向县城跑去。红军开始了追击。这是红军官兵最擅长的。那些年轻的贫苦农民此刻心情畅快淋漓，追击起来便会脚步如飞。红军干部们边跑边喊：“县城的桥没有了，把他们堵在河边，把他们消灭呀！”

茫茫夜色中，红军官兵一口气追出了近二十里，这才发现没有进入伏击圈的杨其昌旅正在构筑工事企图阻击。萧克把追在最前面的第二军团十八团和第六军团五十一团的团长召集在一起，进行了战前部署和动员。萧克认识当面的对手杨其昌。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的时候，杨其昌是第二十六师师长，萧克所在的那个团归第二十六师指挥。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公开屠杀共产党人后，萧克与杨其昌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是两个人恐怕谁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们会以敌我的身份在这样一个偏僻之处相遇，并且双方都要决一死战。萧克布置好了战斗方案，命令部队立即攻击。红军的这两个团不属于一个军团，相互还十分陌生，是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把两支部队临时组合在了一起——“动作协调一致，配合很好，只有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才做得到。”事后萧克这样说。萧克的攻击令发出后，十八团在团长高力国的带领下从右侧顺着一条干涸的水沟迅速接近了敌人，之后红军官兵瞬间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五十一团则同时从正面直接向敌人冲击。战斗进行了两个小时，杨其昌旅的阵地接连失守，大部分官兵被红军歼灭，杨其昌自己带领残部趁着黑暗落荒而逃。

红军官兵一口气追到了永顺县城。由于其中的一支红军部队是抄小路上来的，因此他们比逃跑的敌人更早地占领了县城附近的有利地

形，并且把敌人在被红军烧毁的桥上临时架设的木板全拆了，致使逃到这里的国民党军因无法渡河而纷纷投降。此一战，红军俘虏湘军两千多人，缴获枪支两千多支，初步扭转了两个军团会合以来的困难局面。

为了寻找到能够立足的根据地，两个军团留下四十九团的三个连在永顺地区打游击，以保护伤员同时钳制敌人，主力部队则随即向南准备渡过酉水，争取在酉水以南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但是，部队到达酉水北岸的时候，发现敌人早已严阵以待，于是立即放弃了渡过酉水的计划折向东北方向，于十一月二十四日攻占了大庸县城，接着占领了贺龙的故乡桑植县城。第二天，中革军委的电报到了，电报要求第二、第六军团深入湖南的中部和西部，“力求占领沅陵”，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调动湖南境内的国民党军，以减轻中央红军方向的军事压力。此时的中央红军“已过潇水，正向全州上游急进中”。虽然情报显示沅陵县城及周边地带敌人戒备森严，但是第二、第六军团经过短暂休整之后依旧执行了中革军委的指示。

结果，攻击沅陵的行动没能成功。攻击未果的两个军团在顺沅江东下时发现了一个战机：国民党军独立第三十四旅奉蒋介石之命刚从湖北黄陂乘船赶至常德和桃源一带，目的是防止贺龙和萧克的红军攻击湖南省会长沙。自以为装备精良的旅长罗启疆把他的三个团部署得很分散，彼此相距都有数十里，于是红二、红六军团决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攻击其一部。红军选择的目标是驻扎在桃源北面浯溪河附近的敌七〇一团。

大雨滂沱，道路泥泞。红军官兵以夜行百里的速度迅速接敌。十二月十六日拂晓时分，先头部队十二团一举突入了敌人的阵地。短暂的混乱之后，敌人随即进行反冲击。这时，两个军团的主力到达了。

四师师长卢冬升指挥部队向敌人展开猛烈攻击，将七〇一团和赶来增援的七〇〇团两个营的敌军打得纷纷南逃。红军官兵紧追不舍，溃逃的敌人一直逃进了常德县城。常德是湖南西部的政治、经济和交通中心，县城内驻防有国民党军的一个保安团和独立第三十四旅的残部。红军的逼近引起国民党军的极大恐慌，正在策划对中央红军进行“围剿”的何键一日数次急电蒋介石：“共军围攻常德甚急，势难固守，请飞兵救援。”蒋介石遂令位于江西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六师乘火车驰援常德。同时，何键令在湖南南部的国民党中央军第十九、第十六和第六十二师迅速北进，向常德、桃源方向靠拢。而此时的红二、红六军团在占领了桃源后又掉头向北占领了慈利县城。

这是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以来的一段美好时光。战斗缴获丰富，没有险要敌情，因为贫苦农民踊跃参加红军，红军的队伍几乎扩大了一倍。后来成为萧克夫人的蹇先佛时年二十岁，她在红军占领慈利县城时参加了红军。蹇先佛的全家几乎都是红军：姐姐蹇先任一九二九年成为湘西的第一个女红军。当年贺龙先是托人说媒后又当面求婚，都被蹇先任拒绝了，贺龙只好在一次前敌委员会会议上向蹇先任再次求婚，然后动员所有参加会议的红军干部帮他做工作，蹇先任实在抵挡不住这样的攻势终于同意嫁给贺龙。而蹇先佛的哥哥蹇先为曾历任红军营长和游击队参谋长等职，一九三一年在战斗中牺牲。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在慈利与蹇先佛一起参加红军的，还有她年仅十六岁的小弟弟蹇先超，不幸的是，一年多以后小红军蹇先超在随部队过草地时牺牲。

红二、红六军团在湖南西部和中部的移动作战，最大限度地牵制了湖南境内的国民党军队。但是后来的史实证明，他们的战斗并没有真正解除中央红军所面对的越来越险要的军情。红二、红六军团在不

断的移动作战中，一直试图寻找到一块能够立足的地方。中国湖南西部的那片山水，数十年后被全中国乃至全世界视为山川奇秀宛如天堂。但是在一九三四年，对于转战中的红军官兵来讲，翠绿的山峦和清澈的河流无法令他们留恋，如果要他们描述自己心中的天堂，那就是一片可以自由歌唱的红色根据地。

如果试图在一九三四年末的中国地图上，标出共产党红色武装所占据的红色区域，应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些区域的位置和范围自年初开始就不再固定，如同溅落在一块平滑玻璃上的一些水珠，水珠在不断的流动中或缩小、或汇合、或扩大、或消失。在那段时光里，除了位于四川西部的川陕苏区与不断“围剿”的国民党军保持着抗衡状态之外，位于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的中央苏区由于中央红军的军事转移已不复存在，位于江西西部与湖南东南部的湘赣苏区也由于红六军团的撤离不复存在。这时候，共产党中央并不知道，在陕西北部的黄土沟壑中，共产党人刘志丹领导的一支红色武装正活动于陕北苏区内；而在中国的中部，在河南南部与湖北的交界处，在安徽与浙江的交界处，也同时存在着两支规模不大的红军武装，其领导人分别是徐海东和方志敏。

在安徽与浙江交界处的闽浙赣苏区，一九三四年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与第十军在这里会合了。第七军团自一九三四年七月六日以六千多人的规模从中央苏区出发，经历了三个多月的艰苦转战，终于在绕行了上千公里的崇山峻岭后，在江西东北部一个叫重溪的地方，看见了长满毛竹的山顶上高高飘扬着一面红军的战旗。这座飘着红旗的山峦名叫怀玉山。欣喜万分的第七军团官兵此刻无法知道，仅仅几个月之后，怀玉山将给这支红军武装留下永远的悲怆。

在江西东北部与安徽交界处坚持战斗的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在根据地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的率领下，这块小小的红色区域在敌人的重重围困中异常顽强地生存扩大着。一九三四年秋天，第七军团红军官兵的到来，给红十军带来了难得的欢乐，而第七军团也有一种游子回家般的亲切感。这里的红军称第七军团为“老十军”，因为第七军团是红十军的前身——一九三三年一月，红十军主力部队被调往中央苏区，并以此为骨干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当时留下的少部分红军组建了现在的红十军。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四日，正在广东北部穿越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的中革军委发来了命令，要求第七军团与红十军连同这里的地方红色武装，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原红七军团改编为第十九师，原红十军改编为第二十师，地方红色武装改编为第二十一师。原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刘畴西任军团长兼二十师师长，原第七军团政委乐少华任军团政治委员兼二十师政委，原第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任十九师师长，方志敏任闽浙赣省苏维埃主席兼闽浙赣军区司令员。中革军委特别强调，第十军团要接受留在中央苏区的项英的领导和指挥。

改编后的红十军团，兵力六千人左右。军团要决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何处去。这一问题的紧迫基于红十军团所面临的严重敌情：在距离这片狭小的红色区域中心仅仅几十公里的四周，成环状部署着兵力为红十军团十倍以上的国民党军。

军团领导决定：红十军团二十师、二十一师留在根据地坚持战斗，由十九师率先冲出国民党军的重围。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八日，离开了湖南南部宜章的中央红军继续向西开进，红十军团十九师在师长寻淮洲的率领下也出发了。他们先

向南，经过江西上饶附近，再向东进至赣浙边界处的玉山县，在那里迅速通过了国民党军布防在玉山至开化间的封锁线。十九师突然冲出包围令国民党军感到很意外，他们认为这股红军的举动有点孤注一掷的意思。负责防守浙江边界的浙江保安纵队副总指挥蒋志英亲自率领两个团一路尾追红军，但很快就被十九师的红军官兵杀了个回马枪，蒋志英负伤后带领部队溃退而去。十九师沿着浙江与安徽边界的浙江一侧向北疾行，经过上方镇，渡过了新安江，向昌化、临安附近逼近，这里距离浙江省会杭州已经不远了。就在杭州城里的国民党军如临大敌的时候，十九师突然转向西进入了安徽境内，通过歙县和绩溪，突袭并占领了旌德县城。旌德县里的富人们开始争相逃亡，红军却又突然离开继续向北开进。他们在泾县和宣城之间穿过，直逼长江南岸的重要城市芜湖。这短短的二十天，定是十九师的红军官兵心情十分畅快的日子，因为年轻的师长寻淮洲充分显示出他机动灵活的军事指挥才能，红军官兵也找到了与敌人周旋作战的胜利感。江浙地区是国民党政权的心腹地带，只有规模小且机动性好的武装，依靠没有规律的灵活作战，才有可能生存下来。

但是，就在十九师出发的那一天，坚持在闽浙赣苏区的第十军团主力部队收到了来自留守中央苏区的负责人项英的命令。命令的内容是：第十军团立即率领二十、二十一师离开根据地，“集结主力坚决地争取运动中消灭敌人以创造皖浙边苏区”。命令还指定以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等组成军政委员会，方志敏为军政委员会主席，随第十军团行动。同时任命粟裕为军团参谋长，刘英为军团政治部主任。

项英的这个命令意味着小小的闽浙赣苏区要被彻底放弃了。

这是后来始终受到史家质疑的一个命令。最普遍的认识是：这个命令的错误在于把长于打游击战的红十军团和地方红色武装集中起

来，放弃了红军浴血奋战开创并坚守的根据地，以大兵团的规模转移到外线去“打大仗”，从而导致了整个红十军团遭遇重创的结局。

十一月下旬，在方志敏和刘畴西的率领下，红十军团军团部和二十、二十一师离开了根据地，向着敌人的封锁线冲去。与十九师先向南兜个圈子再向北不同，红十军团的主力由重溪出发后直接向北，在江西的婺源和浙江的开化之间突破了国民党军的封锁，而后径直往北向安徽南部而去。十二月十日，当国民党军还没能搞清红十军团行动的意图时，他们已在黄山东南的汤口地区与寻淮洲率领的十九师会合了。

放弃根据地后的再次会合并没有给红军官兵带来多少欣喜，因为国民党军很快就得知了闽浙赣苏区内的红军已经全部出动，于是立即调集了怀玉山附近所能调动的所有兵力，对红十军团展开了最猛烈的追击与合围。十二月十日，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从婺源向北推进，第七师则从北向南压过来，而“追剿军”补充第一旅和浙江保安团的一个营，已经由歙县方向推进到了汤口附近，几乎要与红十军团迎面相撞了。

红十军团沿着安徽南部屯溪至青阳的公路向北转移，十二月十三日到达了黄山东麓的谭家桥。而在他们的身后，国民党军补充第一旅已经越追越近了。补充第一旅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共有三个团，兵力与红十军团的三个师相差无几，但武器装备异常精良。红十军团领导在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之后，认为乌泥关是一个隘口，从那里到谭家桥之间的公路东侧有一个制高点，是个可以伏击敌人的有利地形。

红十军团的作战部署是：由乌泥关起沿着公路两侧自南向北，十九、二十、二十一师相连设伏，再从战斗力最强的十九师抽出一个连

控制乌泥关以南的制高点，从二十一师抽出一个营在谭家桥正面构筑工事，以便向南封锁道路同时阻击北援之敌。

红十军团的伏击圈已经布好，只等着敌人走进来，红军力图把敌人彻底消灭在这段公路上。

十二月十四日上午九时，补充第一旅前卫部队二团和旅直属队进入了乌泥关伏击圈。红十军团二十师和二十一师同时发起了攻击，敌人突遇埋伏顿时乱作一团，但是，很快，补充第一旅就调整了部署稳住了阵脚，并且集中兵力开始了猛烈的反击。尽管红军官兵奋力作战，但是由于兵力单薄武器简陋，特别是由地方武装改编的二十一师士兵大多是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青年农民，因此红军的阵地很快就被冲垮了。在这个急需增援的时候，红十军团指挥部发现十九师主力并没有按照事先的部署配置在便于冲击的公路北侧，而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配置在了公路的南侧。南侧是高高的悬崖峭壁，兵力和火力都无法展开，同时也无法及时增援二十师和二十一师。这一错误最终导致了从乌泥关以北至谭家桥东端的红十军团的所有阵地全部被敌人占领，包括乌泥关以南那个至关重要的制高点。

激战中，第十军团政治委员乐少华和政治部主任刘英先后负伤。

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对制高点的丢失异常愤怒，亲自组织起一支突击队向制高点冲去，冲击的时候寻淮洲位于所有红军士兵的最前面。决一死战的精神令红军的冲击一时间势不可挡。当敌人被迫从高地上退下去的时候，红军官兵发现他们的师长已经倒在地上血流如注。

寻淮洲出生在湖南浏阳，十五岁参加了秋收起义，之后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十六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十八岁任红军团长，十九岁

任红军师长，二十岁任红军军长，二十一岁任红军第七军团军团长。因为指挥机智，作战英勇，一直深受红军官兵的爱戴和崇敬，牺牲时年仅二十二岁。

红十军团撤出乌泥关阵地开始向北转移。

红军官兵抬着他们不忍丢下的师长的遗体走了很远。

红十军团刚刚转移，国民党军便蜂拥而上，兵力达二十个团之多。

红十军团官兵在黄山周边十余个县的范围内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兜着圈子。安徽黄山，以姿态奇异的青松、鬼斧神工的岩石和苍茫无际的云海成为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上最美丽的山峰之一。如果把红十军团最后的撤退路线在地图上标出来，便会发现他们一直围绕着这座山峰转来转去。无法考证红十军团的官兵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条路线作为他们青春和理想的归宿，因为已经无法详尽地恢复出当年数万国民党军追杀几千红军时的具体攻击线路。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那段短暂的时光里，红十军团的官兵无论走到哪里，抬起头时便会看见黄山那缭绕着茫茫云雾的峰峦。干部和老兵告诉年轻的红军士兵，在那云雾深处住着容颜美丽的仙女、心地善良的菩萨和永远面带笑容的胖胖的佛，那里是诸神的家。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日，第十军团到达了安徽南部的柯村地区，那里曾经是一个小小的苏区，但此时已是一片断壁残垣。军团领导最后的决定是：回闽浙赣苏区去，回到他们一个月前离开的那个地方去。

可是，回家的路上已经布满了敌人。

怀着回家的梦想，红十军团官兵继续转战，甚至一度再次回到了令他们不堪回首的乌泥关。然后，沿着一条螺旋状的路线，在一场接一场的遭遇战中，他们逐渐向南移动，终于靠近了老家。就在红军官兵已经看见了他们所熟悉的怀玉山时，却发现自己被密不透风地包围在了一个很小的范围内。

包围红十军团的国民党军是一直追击他们的第四十九师、补充第一旅、第二十一旅和浙江保安第五团。国民党军先于红十军团到达了安徽南部的徽州地区，并派出部队抢占了附近各个有利阵地，敌人决心把红军第十军团彻底歼灭在这块原来的红色根据地内。

方志敏一直跟随着红十军团参谋长粟裕率领的先头部队行动。方志敏和粟裕商定，部队必须立即出发，一刻也不能在此停留，当晚要全部突破敌人的包围，进入闽浙赣苏区内，并决定粟裕率领先头部队先行出发，军团长刘畴西率领军团主力迅速跟上。此时红十军团的先头部队，主要由军团机关人员、伤病员、后勤人员以及早已没有了炮弹和子弹的迫击炮连和重机枪连组成，共八百多人。天近黄昏的时候，粟裕刚要出发，军团长刘畴西派人过来说，由于官兵已十分疲劳，建议休息一个晚上再走。粟裕坚决不同意，要求部队今晚必须通过封锁线。方志敏同意粟裕的意见，他让来人回去告诉刘畴西今晚必须行动，否则将会面临极大的危险。之后，方志敏担心刘畴西行动犹豫，于是决定留下来等待军团主力。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晚，粟裕带领着红十军团先头部队消失在皖南的茫茫夜色中。从敌人严密包围的缝隙中冲出来后，粟裕整整等待了七天，七天之后，他从截获的国民党军的电台里听到了这样一条消息：国军在怀玉山地区的“清剿”已基本结束。

粟裕痛苦的心情难以言表。

那个夜晚，粟裕率领的那八百多名红军官兵是幸运的。

粟裕出发以后，方志敏没能说服军团长刘畴西，第十军团主力开始原地休息。那一夜，天降大雪，山峦苍茫。等红军官兵早上睁开眼睛的时候，除了天地间一片洁白之外，敌人已经近在眼前了。层层包围的敌人呐喊着从四面冲上来，把第十军团的队伍切割成了碎块，然后开始了疯狂的捕杀。

方志敏和刘畴西带领一部分官兵奋力突围，但是遭到了国民党军的猛烈阻截。在迎着敌人的枪弹战斗了近五个小时后，红军官兵的背后又出现了另外一支国民党军。方志敏和刘畴西带领战士们向着山林最深处跑去。夜幕降临后，为了把散落的红军官兵集合起来，方志敏点燃了两堆大火，最后聚集在他身边的红军官兵还有八十多人。官兵们劝方志敏化装逃出去，他们说他们将拼死掩护苏维埃主席，但是方志敏不肯离开官兵们。天亮的时候，国民党军已把他们藏身的这座小山团团围住。方志敏在怀玉山东麓陇首村被俘。

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从此在中国革命史中消失了。

国民党军给方志敏钉上十斤重的铁镣，让他从怀玉山走到上饶，再从上饶示众到南昌。被沉重铁镣桎梏的方志敏在日复一日的折磨中给今天的中国写下了最优美的文字：

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悲叹，笑脸将代替苦脸，富裕将代替贫穷，健康将代替疾苦，智慧将代替愚昧，友爱将代替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凄凉的荒地！

一九三五年八月六日凌晨时分，方志敏被枪杀在南昌城外的一口小水井边。这位三十六岁的共产党人在牢房的墙壁上留下的遗言是：“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

就在红十军团的官兵围着安徽南部那座美丽的山峰寻求生路的时候，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在中国河南省的中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副军长徐海东带领着二二三团从阻击阵地上撤了下来。主力已经转移，二二三团在雨雪交加中开始向主力转移的方向疾行。在估计快要追上主力的时候，前面骤然响起剧烈的枪声，徐海东立即带领部队向前奔，狂风卷着雨雪打在脸上使他双眼迷蒙，在前面出现的混乱人影中，他看见军政委吴焕先提着一把大刀对他喊道：“情况不好！二二四团垮下来了！”

这里是位于河南方城县东南方向一个叫独树镇的地方，一条南阳通往许昌的公路自西南向东北横穿于此。

拂晓出发的时候，一直尾随的敌人再次发起了攻击。红二十五军留下一支阻击部队后，主力还是按时出发了。雨雪交加，气候寒冷，道路泥泞，衣衫单薄的红军官兵脚下的草鞋早已磨烂，大多数人赤脚走在冰冷的泥水之中。前几天行军时就有红军战士被冻死，这个早晨，依旧有人在夜晚的短暂宿营后再也没有醒来。走在主力最前边的是二二四团，他们将从独树镇附近的七里岗通过公路。在忍受着饥饿、寒冷和疲惫的行军中，红军官兵的心中仍旧充满着希望，经过了许多天的战斗和转移，他们知道只要能通过公路就相对安全了。这条公路的对面就是一片大山，大山的名字叫伏牛山。

雨雪之中天地一片混沌，二二四团已经可以隐约分辨出公路了，然而，密集的子弹突然向他们倾泻而来。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二二四

团官兵们匆忙举枪射击，但是已经冻僵的手根本拉不开枪栓。就在二二四团拥挤在一起向后撤去的时候，正面的敌人发起了冲击，并从两翼开始了包抄。

国民党军的第四十军第一一五、第一一六旅和一个骑兵团早在两个小时之前到达了这里，并且布置了伏击阵地。

从国民党军作战记录上可以看出，对于活动在河南中部的这支不足三千人的红军武装的行踪，他们一直了如指掌。当时国民党驻河南省特派绥靖主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每天都向部队报告红二十五军详细的行动路线和宿营地点。桐柏县县长文心在报告红军的行踪方面更是十分尽力，他派出侦察红军动向的人化装成普通农民直接与红军官兵接触，因此他提供的情报甚至包括红军今天是否吃了饭。根据情报，国民党军第四十军几乎每天都在调整追击部署，军部发出的战斗指令详尽到连一级，上万兵力始终围绕在移动中的红二十五军的四周，合围谨慎而严密地实施着，他们等待着最后决战的契机。

十一月二十五日，独树镇战斗发生的前一天，根据红二十五军的移动速度，第四十军命令其第一一五旅和骑兵团连夜赶往独树镇，命令骑兵第五师对红二十五军加紧尾追。

第四十军军部要求第一一五旅到达独树镇的时间是当晚十点，但是由于狂暴的雨雪和寒冷的天气，第一一五旅整整走了一个晚上，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时他们才到达独树镇。即使如此，他们到达独树镇的时间还是比红二十五军早了两个小时。

这是一场事先预谋好的伏击战。

二十六日，红二十五军向独树镇走来，尽管指挥员们知道敌人正在追击和合围，但是对正前方那个叫独树镇的地方竟然有敌人整整一个旅已经张开的火网他们却毫不知情。

此时的红二十五军与四周合围而来的国民党军力量对比极其悬殊，即使与在前面布防伏击的敌第一一五旅相比，红二十五军无论在兵力上还是在武器装备上也不占优势。敌第一一五旅出发时给军部报告的人数和武器清单是：两千四百六十六人，三百零五匹马，一千八百一十九支轻武器，二十二挺重机枪，三十多万发子弹，六门迫击炮。而在红二十五军不足三千人的队伍中还有很多伤员，官兵由于冻饿身体十分虚弱，弹药也已经十分缺乏。更重要的是——迄今为止有关这支红军武装生存经历的叙述几乎都没有认真地涉及他们的平均年龄——与面前的国民党军相比，这支红军部队几乎全部是由娃娃组成的。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是一支奇特的队伍。

一九三六年《共产国际》第七卷第三期刊登的一篇题为《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的远征》一文这样写道："最堪注意的，就是这支队伍差不多没有年逾十八岁以上的战斗员。从前的鄂豫皖苏区里，遭受异常残酷的白色恐怖。那些在战斗中牺牲者的孤儿，那些在一九三二年随红四方面军远征到四川的红军战斗员的子弟，便在这种恐怖条件下建立起游击队，从游击队变为现在以'儿童军'著名的红二十五军。"

红二十五军，这支红军武装"差不多没有年逾十八岁以上的战斗员"的表述，是真实的。除了军长程子华二十九岁、政委吴焕先二十七岁、副军长徐海东三十四岁以外，全军团营干部很少有超过二十岁的。最精干的作战单位要数军部交通队了，由精心挑选出来的最有战

斗力的战士组成，清一色都是十六七岁的少年。队伍里还有不少十二三岁的小红军，甚至还有八九岁的儿童。一个名叫匡书华的少年是河南光山县匡家湾人，他家被国民党军烧光了，于是他带领六七个和他年龄相仿的少年当了红军。一开始因为他个子太矮没有被批准入伍，但他的堂兄匡占华是红军连队的炊事班班长，于是他就跟着堂兄在炊事班里干活。后来堂兄在战斗中牺牲了，红二十五军所有的官兵都成了他的哥哥，匡书华加入红军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十八岁的安徽人明道和是一名“老红军”，两年前他在战斗中负伤掉队，后被一户人家收留。当他听说红军又回来的时候，带着十几个放牛娃找到了队伍。政委吴焕先怎么也记不起这个小红军了，明道和说：“我是七十三师的，还听过你的讲话呢！你说，我们红军队伍好比一把大扫把，要把敌人扫个落花流水！”吴焕先这才回忆起来了，他说：“好同志，你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红军战士。”明道和带来的十几个放牛娃刚好组成一个班，明道和也就当了班长。政委吴焕先说：“你这根孤零零的竹子不又扎成一把小扫把了么。”

在红二十五军这支年轻的队伍里，红军官兵常唱的歌曲是《红军青年战士之歌》：

红色的青年战士志气昂，

好比那东方升起的太阳。

不怕牺牲英勇杀敌如猛虎，

冲锋陷阵无坚不摧谁敢当。

可以想象这首乐观而自信的歌曲在被这群红军少年唱响的时候，该是多么动人。只是，这些红军少年在以后的生存经历中承担了他们

这个年龄几乎不可能承担的挫折与苦难。

一九三二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因国民党军的疯狂“围剿”撤离了鄂豫皖苏区，红二十五军就是第四方面军留下的部队。当时，留下的部队有军部特务营、七十五师的二二三团和二二四团、二十七师的三个团和由地方红色武装新组建的两个团，再加上各县的游击队和独立团，以及大批的红军伤病员，总人数约两万人。国民党军派出十万兵力追击撤离苏区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又以十五个师又两个旅的近二十万的大军对留在苏区的红军进行残酷的“清剿”。蒋介石下达的作战任务是：在两个月之内完全占领并彻底摧毁共产党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之后，鄂豫皖苏区的大部分地域逐渐丧失。最后，根据地被国民党军分割成鄂东北和皖西北两个互相隔绝的狭窄地域。主力红军的突然撤离使苏区的军事形势十分严峻，国民党军挨村挨户的“清剿”使得大批贫苦农民放弃家园跟随红军进了大别山，他们宁可吃树皮也要和红军在一起。百姓为红军探敌情、送消息，国民党军靠近了，他们就摇红旗，放鞭炮，为红军的战斗助威；国民党军烧山毁林，他们就到处贴标语：“树也砍不完，根也挖不尽，留得大山在，到处有红军。”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被打散的红军官兵聚集在一起，红二十五军再次重新组建。军长吴焕先，政委王平章，两个师长是姚家芳和徐海东，总人数约七千人。一九三三年，临时中央局所奉行的“夺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政策，也影响到了这样一支艰难生存的红军小部队。鄂豫皖省委要求红二十五军“向敌人实施大规模反攻夺回中心城市”。而在湖北与河南交界处的穷乡僻壤中，“中心城市”到底在哪里呢？鄂豫皖省委选定了包括黄安和七里坪等县城和集镇在内的几个目标。

七里坪，湖北东北部距离黄安县城大约二十公里处的一个集镇，攻打七里坪对于红二十五军来说如同一场灾难。

正是初春青黄不接的时节，红军官兵腹中无粮，弹药也十分缺乏，于是鄂豫皖省委领导在战斗动员时说：只要夺取了七里坪，根据地就会得到恢复和巩固，春耕秋收就有了保障，官兵们就不再饿肚子了，群众就能过上好生活了。为了好生活，年轻的红军官兵面对火力强大的国民党军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冲锋，但最后都因牺牲惨重而被迫放弃。

在战斗几乎无法进行的时候，徐海东等人建议撤退，但被指责为“右倾”。此后，红二十五军陷入艰苦的攻坚战长达四十一天，国民党军趁机深入到苏区的核心地带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在仅存的红色区域也完全丢失的情况下，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三日，鄂豫皖省委终于对红二十五军下达了撤出战斗的命令。

七里坪战斗之后，损失严重的红二十五军进行了整编，撤销了一个师的番号，所辖七十四、七十五师两个师仅剩下约六千人。十月二日，在通过一条公路的时候，已严重减员的红二十五军又一次遭到伏击，突围之中部队被分割成两截，军长吴焕先带领一部分官兵冲过公路向西而去，副军长徐海东率领的一部分官兵却被阻截于公路的东侧。各路合围的国民党军开始了大规模搜山，两部分红军损失都在一半以上。

更严重的是，当七十五师二二五团大部分官兵终于冲出合围到达乌鸡山之后，一直跟随这个团行动的七十五师师长周希远产生了到七里坪投降敌人的念头。周希远把营连干部集合起来之后，二营政委李世煌发觉了周希远的这个企图，他借口说去把自己的部队带过来而迅

速脱身。回到营里，李世煌立即进行了紧张的布置，然后带着营交通班和五连再次来到周希远处。周希远问他为什么这么久才来，李世煌回答说敌人在打枪绕了点路，话未说完就扑了上去把周希远拦腰抱住，跟随政委而来的红军官兵随即一拥而上，用绑腿带子把他们的师长绑了个结实。官兵们用一根粗木棍抬着周希远，往吴焕先军长那里送。当他们到达一个水塘边的时候，发现一股搜山的敌人距他们仅三十米远。这是个万分危险的时刻，仅仅犹豫了一瞬，在李世煌的示意下，红军战士迅速用刺刀把周希远捅死，然后他们掉头就跑，一直跑到了吴焕先所在的那个小村庄。二营官兵把事情的经过向军长作了汇报。吴焕先说："你们干得好。李世煌，你就当二二五团的政委吧。"

红二十五军在军长吴焕先的带领下进入了天台山。这里曾经是皖西北苏区的中心地带，但在国民党军毁灭性的"清剿"下几乎成了无人区。国民党军几乎天天都在搜山。在一个叫仰天窝的地方，红二十五军被三个团的敌人包围，红军官兵用大刀、梭镖和石头与敌人搏斗。为了掩护部队突围，军长吴焕先带领一个排冲出去吸引敌人，敌人在追赶中大喊："抓活的！抓活的！"当吴焕先的衣角几乎被敌人拉住的时候，他把随身携带的一袋银元撒了出去，在国民党军争抢之际得以逃脱。晚上，部队重新集合的时候，吴焕先发现除了牺牲的官兵外，没有一个人脱离队伍，年轻的红军军长对更年轻的红军士兵说："我们都是革命的坚定分子！"

红二十五军的少年们无疑具有极其坚定的革命意志，但是拥有幻想的年龄仍会使他们不时困惑地发问：明天我们到哪里去呢?

这个问题也同样困扰着鄂豫皖省委。经过研究，省委决定派人去寻找共产党中央，当面请示工作并要求中央支援一些军事干部。被派出寻找中央的人是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部长成仿吾。

成仿吾从天台山一个名叫高山岗的村庄出发，一支持有四十把盒子枪的红军便衣队负责护送。由于国民党军队封锁严密，省委特派员成仿吾跟着便衣队打了一个多月的游击，才在湖北北部的广水火车站上了火车。

到达上海后，成仿吾找了一个多月也没找到共产党中央。于是，他找到了与鲁迅有联系的内山书店，通过书店经理的安排，成仿吾在上海外滩的一间咖啡馆里见到了鲁迅。从鲁迅的口中成仿吾得知党中央已经去了中央苏区，目前留在上海的只有一个中央局。成仿吾通过鲁迅和中央局接上了关系，中央局安排他和几个去苏区参加五中全会的代表一起去瑞金。成仿吾到达瑞金的时候，正是中央苏区军事形势异常紧张的时刻。成仿吾向中央汇报了工作，中央决定派正在红军大学学习的独立第二十二师师长程子华到红二十五军去。程子华临行前，周恩来亲自向他交代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率领红二十五军到更有利于发展的地方去创建新的根据地。

到达鄂豫皖苏区的地域后，在一个叫卡房的地方，程子华见到了中共鄂东北地委书记兼游击总指挥郑位三。那时，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省委都在皖西北。关于红二十五军到底去哪里的问题，程子华建议要走就走得远一点，比如去河南西部的伏牛山地区。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四日，在皖西北的大山里与国民党军周旋的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省委，收到了郑位三的来信，信上只有一句话：“中央派来程子华同志送来了重要指示，已到我处，请你们接信后，火速率领红二十五军到鄂东来。”信是九月写的，并不漫长的路，送信的名叫陈锦绣的同志竟然走了两个多月，可见沿途国民党军队封锁之严。尽管如此，这封信的到来还是令鄂豫皖省委书记徐宝珊和红二十五军领导吴焕先、徐海东等人兴奋异常。红二十五军刚与国民党军上官云

相的第四十七师打了一仗，激战进行了两夜一天，撤出战斗后的军领导正在为下一步怎么办苦思冥想，现在党中央不但派人来了，还带来了重要的指示，顿时，大家都觉得革命的前景定会如同这位送信人的名字一样美好起来。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六日，红二十五军开始西进。

这时，张学良东北军的第一〇七、第一〇九、第一一〇、第一一七、第一二九师共五个整师已经在红二十五军西进的路上设置了数道封锁线。

红二十五军出发后的第二天，突袭了东北军第一〇九师的一个工兵营，然后又与企图阻截的第一〇七师的两个团发生了战斗。当晚，红二十五军强行军一百三十里，拂晓时分逼近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为了摆脱追击，避免陷入包围，体力消耗已到极限的红军官兵疾速地且战且行。八日上午，他们到达了河南南部光山县扶山寨地区。红军停下了突进的脚步准备稍事休息。然而，追击来的东北军第一〇七师和第一一七师各一部共四个团，以及国民党军刘镇华部的第六十四、第六十五师共六个团，从东西两面开始了夹击。

红二十五军再次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

国民党军从地面向红军发起猛烈冲击的时候，四架战机在空中盘旋轰炸红军的阵地。红二十五军指挥员认为，在如此强大的敌人面前，如果撤退，不但退不出去，很可能彻底覆灭，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坚决地打，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身处绝境的红军官兵爆发出的战斗勇气惊天动地，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冲锋，红军一次又一次地顽强阻击。战斗从上午一直打到黄昏，红军的阵地始终屹立不倒。就

在国民党军的攻击锐气被残酷的战斗逐渐消磨之时，一声军号在残阳的余晖中嘹亮地响起，红二十五军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击。年轻的红军官兵从各自的阵地上跃起，向当面的敌人猛扑过去。在红军官兵视死如归的气势面前，国民党军立即慌乱起来，接着就是兵败如山倒的大撤退，而且一旦撤退速度飞快，即刻就脱离了战场。

红军抓获近四千俘虏，打扫战场时仅捡回的机枪就有一百多挺。

俘虏无法处置，全部就地释放。红军对他们的要求很简单：不要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兵了，回家老老实实种地去吧。

被释放的国民党军士兵坐在地上直发愣，因为他们的长官多次对他们说，红军是一群土匪，只要被抓住就要被扒皮抽筋砍头活埋。

第二天，红二十五军到达了光山县西南的花山寨。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在花山寨举行的中共鄂豫皖省委第十四次常委会，在红二十五军的历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会议在讨论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后，作出了放弃已经不适合红军生存的地域，开始军事转移以寻找创建新的根据地的决定。关于转移方向：向北，有黄河，是平原，不行；向南有长江，不行；向东有津浦路，也不行；唯一可能的方向是穿越平汉铁路向西，因为在那个方向上不但敌人的封锁相对薄弱，而且还有红军生存所必需的两座大山：河南与湖北交界处的桐柏山和伏牛山。参加会议的人都说，还是省与省的交界处好，国民党的特点就是这个省不管那个省的事。

虽然中央的指示是程子华任红二十五军参谋长，但根据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的提议，会议决定程子华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任副军长，吴焕先为政治委员。

红二十五军开始了军事转移前紧张的准备和动员：安置好不能随军的伤员，部队准备三天的干粮和两双草鞋，动员官兵们有“打远游击”的准备。同时，红二十五军重新整编了部队，撤销了师一级建制，军部直接指挥二二三团、二二四团、二二五团和手枪团，共两千九百八十七人。

这是红二、红六军团烧毁了永顺县城边那座漂亮的花桥的时候，是在安徽与江西交界处的红十军团准备放弃闽浙赣苏区突围的时候，是中央红军已经移动到湖南西南部那条叫潇水的大河东岸的时候——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红二十五军，这支在鄂豫皖洒下了无数红军官兵鲜血的部队，离开了他们亲手创建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开始了长征。

获悉红二十五军开始转移的国民党军用飞机撒下了传单，传单上写着：击毙徐海东者，赏大洋十万。

徐海东，湖北黄陂徐家窑村人，时年三十四岁。他的祖辈都是窑工。一九二五年，二十五岁的徐海东挑着窑货在庙会上叫卖的时候，碰见了一个读私塾时的同学，同学是受共产党人陈潭秋的指派回到家乡来发展革命力量的。在这个同学的影响下，徐海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一九二六年他到广东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在第十二师三十四团任排长，并跟随这支部队参加了北伐战争。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时，徐海东回到家乡，建立起一支三百人的农民自卫队。一九三二年，这位参加了黄麻起义和鄂东暴动的革命者成为红四方面军独立第四师师长。同年秋，当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后成为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军长。这是一个生性豪放、秉性耿直的共产党人，对于敬重之人他披肝沥胆，对于轻看之人他横眉立目。他的腰间总是扎着一根宽皮带，发火的时候说不定

就会解开抡起来。在一次战斗中，一颗子弹卡在了他的腿骨里，没有任何麻醉药物，他硬是让人把子弹生生地拽了出来。黄麻起义失败后，他的家族共有六十六人惨遭国民党军杀害，如此的血海深仇令他率领红军作战时身先士卒，凶猛无比。国民党军只要听说阵地对面有“徐老虎”，仗还没打就会胆战心惊。

经过急促的行军，红二十五军很快进入了桐柏山。

红二十五军的突围行动令蒋介石颇感意外，因为根据他所能看到的《匪情通报》，中原地区的那一小股“赤匪”早已“覆灭”很多次了。蒋介石立即让鄂豫皖三省“剿共”副司令张学良命“追剿”纵队五个支队和东北军第一一五师跟踪追击，同时命驻扎在河南南阳、泌阳、方城、叶县一带的庞炳勋部第四十军和驻扎在湖北老河口一带的萧之楚部第四十四师迎头阻截。蒋介石决心以三十多个团的兵力趁红二十五军孤军远征之际一举将其包围歼灭。

进入了桐柏山的红二十五军不久就发现这里不是久留之地。首先因为这里距平汉路和汉水太近，国民党军调动起来十分便捷。同时，桐柏山令红军难以与敌人兜圈子打运动战。经过研究，红二十五军决定放弃在这里建立根据地的计划，部队迅速向北通过豫西平原，向河南西部的伏牛山转移。

从桐柏山重新出发的时候，由于所面临的军情险恶，军部决定再次精简部队。首先需要精简的就是军中的七名女红军。军部决定每人发一些银元作盘缠，让她们脱离红军返回老家。这七名女红军从根据地出发的时候就曾被命令留下，但是在她们的坚决请求下，军领导勉强同意她们跟随大部队转移了。当再次听到让她们离开红军的消息时，七名女红军并排坐在大路边放声大哭。她们边哭边喊：“红军走到

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军领导为此再次开会研究，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她们都是孤儿，离开了红军，等于死路一条。困难是很大，但不至于带不走几个女娃娃。军政委吴焕先让供给部给七个女红军每人准备了一匹小马，可以骑也可以驮行李，以免她们在情况危急的时候掉在后面让敌人捉去。

后来的战斗证明，红二十五军七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战士，不但没有成为部队的累赘，反而在最需要的时候成了最勇敢的战士。她们从没有骑过配给她们的马，马背上总是驮着她们救护的伤员。她们中间有的人曾经缠过足，在翻山越岭涉水过河的艰难行军中，她们抬着好几副担架却从没有一个人掉队。在枪弹横飞的战场上，她们无所畏惧奔跑如飞，在任何一个交战的空隙间寻找红军伤员并且把他们抢救下来。红二十五军每打下一座县城，她们都是最活跃的宣传员，动员群众参加红军，努力筹集粮食药品。这些被饥饿疲惫折磨得面容黑黄、身体清瘦的女孩子被红军官兵心疼地称为“七仙女”。

为了隐蔽向北行进的意图，红二十五军继续向西，并派出一支小分队佯攻了位于湖北北部的枣阳县城。当各路国民党军纷纷向枣阳一带集中之际，他们突然掉头向东，冲破了敌人包围圈上的薄弱之处，然后转向北。由于国民党军第四十军的两个旅已经堵住了红二十五军北上伏牛山的道路，他们在当地地下党员的带领下绕过泌阳县城，进入了平坦的豫西平原。

常年在山区里生存和作战的红军官兵对平原很陌生。

这里的平原上村落稠密围寨林立。所谓“围寨”，是用高墙围起来的大村庄，村庄外营垒重叠，形成了独立坚固的防御体系。围寨里的

武器很多，甚至有土炮。有的在外围还挖有深壕，在入口处设有吊桥。这些由地主豪绅把持的村庄连通一气，一寨有事，烽火四燃。

为了迅速安全地通过平原，红二十五军给围寨首领写了信，红军的信被一寨接一寨地传递下去。信中除了说明红军北上抗日的目的之外，还提出了你不打我我不打你的协议。红二十五军的宣传队每路过一座围寨便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并且高声喊话：

老乡老乡，不要惊慌，

红军所向，抗日北上。

借路通过，不进村庄，

奉劝乡亲，勿加阻挡。

红军的政策产生了效果。他们路过围寨的时候并没有受到激烈的阻击，在大多数情况下围寨的团丁们都架着枪观望，还有的围寨甚至在路边摆放了开水和饭食供红军取用。

此刻，在红二十五军即将通过的豫西平原上，还有最后一道屏障——南阳至许昌的公路。

国民党军第四十军已经在这条公路上一个叫独树镇的地方布防了阻击阵地。独树镇是红二十五军进入伏牛山区的必经之地。

袭击是突然间开始的，红二十五军二二四团在混乱中开始迎战，手枪团冲了上去向蜂拥而来的国民党军抡起大刀，其他两个团迅速展开应敌阵形。二二三团五连一排排长用几台大轱辘车挡住了通往镇子的路，敌人的一队骑兵被堵在了这里，红军官兵躲在车轱辘后面扔出

手榴弹，手榴弹硝烟散尽后，五连被敌人密集的子弹打倒了一片。这时，一个叫薛云阶的参谋惊慌地喊叫起来：“我们被包围了！我们被包围了！”他的喊叫令红军瞬间出现了撤退的迹象。在这个关键时刻，军政委吴焕先提着大刀冲了过来，他厉声喊道：“谁也不准撤退！撤退就等于自己找死！现在只有冲上去和敌人拼了！共产党员跟我上！”说完，吴焕先举起大刀率先向敌人扑了上去，红军官兵跟随着他，残酷的肉搏战开始了。

吴焕先，湖北黄安人，十九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枪会会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黄安县委组织部部长、鄂东暴动委员会委员等。当地的地主豪绅对他恨之入骨，勾结土匪把他的父亲、哥哥、嫂子和弟弟全部杀害，全家只有母亲一人幸免。母亲说：“只有打倒了军阀和地主，咱们才有活路，儿子从此就是革命的人了！”吴焕先在他的家门口支起了铁匠炉，昼夜不停地打制大刀和梭镖，然后组织起一支农民武装。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他参加领导了著名的黄麻起义，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吴焕先出任红二十五军军长，一九三四年四月任红二十五军政委。他和红军官兵有着深厚的情谊。在部队最困难的时候，他的妻子听说红军断了粮，就背着讨要来的一些米和鸡蛋千里迢迢送到部队，在亲眼看着丈夫把米和鸡蛋送到了伤员那里后，这个已经十分虚弱的女人离开了部队。从此，吴焕先再也没有了妻子的音信。后来战士们才知道，军长的妻子在那次离开部队后饿死在了山里的草丛中。他的母亲为了躲避国民党军的捕杀，一路讨饭找到了部队找到了儿子，艰难的日子里母子相见使红军官兵都为他们的军长高兴。官兵们不忍军长的母亲再到处乞讨，建议把母亲留在部队里，但是吴焕先坚决不同意。母亲理解儿子，走了。这一走，直到吴焕先牺牲，他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

战斗一直持续到天黑以后，由于国民党军固守在坚固的工事里，红军的反击始终无法突破，于是战场陷入僵持。

雨雪还在继续下着。红二十五军的领导认为，在目前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如果继续在平坦的平原上与敌人决战下去，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必须立即脱离战场，尽快进入预定的伏牛山区。

当夜，红二十五军绕过敌人的阵地，沿着弯曲的小路在寒冷的狂风中开始秘密突围。红军官兵不顾极度的饥饿和疲劳，伤病员们忍受着剧烈的伤痛，彼此相互鼓励着坚持前进。天亮之前，他们终于穿过了南阳至许昌的公路。

国民党军发觉红军已经脱离战场便立即展开了追击。

这时候，红二十五军面前出现了一条大河——澧河。

红军官兵知道，只要渡过澧河，就进入伏牛山了。

隔河望去，伏牛山莽莽苍苍。

澧河边有一个叫孤石山的渡口，当红二十五军到达这里准备渡河时，大量的敌军从南北两面压了过来。

向红二十五军进攻的是国民党军第四十军骑兵第五师和第一一五旅又一个骑兵团。其中的一部分骑兵已经越过红二十五军，占领了澧河对岸的高地，把红二十五军进入伏牛山的道路封锁了。

徐海东命令前卫二二三团无论付出多大牺牲也要坚决强渡澧河，并把对岸的国民党骑兵消灭，为全军开辟进山的道路。

河水冰冷，火网炽热。

红二十五军官兵拼出最后的气力一边抵抗敌人的阻击，一边跳入河水中奋力向对岸游去。连日的作战使国民党军万分疲惫，恶劣的天气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士气，更令他们心惊的是眼前这些还是孩子的红军战士面对子弹脸上显现出的慷慨赴死的神情。

红二十五军终于冲过了澧河，进入了伏牛山的大山之中。

刚刚进山，吴焕先就说：“同志们，咱们来了三个团的增援！”官兵们惊讶之余，顺着政委的手臂看去，他们看见了伏牛山三座高高的尖峰。

大山，永远是红军的家。

红二十五军的官兵向着大山一头扑了进去。

就在红二十五军于狂风怒号中强渡澧河的时候，在他们的南面仅仅数百公里之遥，中央红军的官兵正用生命和热血强渡另外一条大河——湘江。

此时，两支红军的面前是同样奔涌的河水和同样苍茫的山峦。

中央红军撤离苏区后的一九三四年十月，国民党军于二十六日占领宁都，十一月十日占领瑞金，十一月十七日占领于都，十一月二十三日占领会昌。至此，中央苏区全部沦陷并陷入一片血海之中。国民党军《剿匪报告》记述：“剿匪之地，百物荡尽，一望荒凉。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木，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里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已经没有了任何退路，这些具有坚定信仰和灿烂理想的人，他们只能奋不顾身地一再向前，无论遇到多么巨大的艰难险阻。

在湘江的附近，有一条窄小的水渠举世闻名。水渠名叫灵渠，是第一个统一了中国的秦始皇下令修建的。水渠奇异地通过湘江和漓江，连接起南中国最著名的两大水系，使长江中的舟楫能够在渠水上摇摇摆摆地进入珠江。当年设计这条渠道的智者和修建这条渠道的工匠绝不会想到，两千多年后，他们的智慧和劳动使得一群为了生存和理想而抗争的青年洒下的鲜血，同时染红了注入长江的湘江和注入珠江的漓江。

湘江之战，年轻的红军士兵前仆后继的壮烈牺牲令大半个中国山河苍茫。

# 第六章 橘子红了

1934年11月·湘南



暴雨骤停，道路泥泞。

刚刚走了四十公里的红一军团二师四团的官兵正准备宿营，却接到了要求他们继续前行二十公里的命令。官兵们纷纷向小山上跑，争着折树枝做手杖。连队干部们喊：“不要把群众的树弄死了！”但是“啪啪”的折枝声依然没有停。已经十分疲劳的红军官兵预感到，在漆黑的夜色中，那二十公里的泥泞之路并不好对付。

再次出发后不久，四团官兵发现情况比预想的还要糟糕。刚刚拐上一条泥泞的小路，就迎头碰上了其他部队的行军队伍，四团走着走着队伍就被冲乱了。小路上拥挤不堪，泥路被千百双脚踩踏后，变成了一条黏稠的泥河。不断有人接连摔倒，负重的骡马滑倒了很难站立起来，黑暗中充满着喘息声、咒骂声和相互联系的叫喊声。四团的连排干部着急地呼唤着战士们:“靠过来！靠过来！不要走散了！不要走散了！”

这是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北面的红二十五军在这一天撤离了鄂豫皖根据地——下弦月在下半夜的时候才露出了些许微弱的光亮，因此湖南南部嘉禾、蓝山和临武三县之间的田野上一片漆黑。

中革军委十一月十四日的部署是：迅速、秘密地脱离尾追之敌，向西前出到湖南南部的临武、嘉禾、蓝山地域。第三、第八军团为右纵队，由彭德怀、杨尚昆指挥，向嘉禾方向前进，并占领嘉禾县城。第一、第九军团为左纵队，由林彪、聂荣臻指挥，向临武、蓝山方向前进，并占领这两个县城。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和第五军团随后跟进。

十七日，由于两个团的国民党军增援部队已经到达嘉禾，因此第三军团放弃了强攻，部队绕到城南阻击城中的敌人南进，以掩护第一军团占领蓝山。第一军团二师五团此时已经顺利占领了临武。为了尽快打通红军西进的必经之地，周恩来亲自赶到前线，指挥第九军团消灭了国民党军的一个营，占领了临武以西的蓝山县城。红军打开县政府仓库，起获了大批的粮食、被服和军装，并从县政府的金库里用箩筐抬出来五千块大洋。同时被抬出来的还有一个沉甸甸的箱子，砸开一看，是黄澄澄的金子，“至少有十斤以上”——至少在这个时候，中央红军西进的路上还没有出现重大敌情。

午夜时分，走完了二十公里泥泞小路的四团官兵终于看见了前面的火把。那个村子叫雷家祠，四团的官兵进了村，才发现在这里宿营的部队不是红一军团的。经过交涉，四团官兵终于得到了一个干爽的住处，匆忙吃了点干粮便躺下睡觉。但是，没睡一会儿，官兵们又被叫醒了：“有命令！立即出发！”

带着睡意又急促地走了十五公里，到达一个叫祠堂圩的地方。四团在那里接到了由师长陈光和政委刘亚楼亲笔签署的命令：

薛敌率五师之众在我野战军后尾追，湘、桂两敌向道县、蒋家岭前进，企图配合薛敌截我于天堂圩、道县间。道县无大敌。我野战军为达到迅速先敌占领道县，渡过潇水，转入机动地域，打击敌人的目的，着你部立即由此地出发，经天堂圩，限明日［十八日］相机占领道县城，并拒止由零陵向道县前进之湘敌。

二师的战斗部署是：五团负责迂回，四团负责正面攻击。

从祠堂圩到道县，路程约两百里。四团只有一天一夜的时间。

道县，古称道州，紧临潇水西岸，是湖南西南部最大的县城，同时也是潇水河上的著名渡口。

敌情通报显示，何键已命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火速赶往道县截击红军。因此，红军必须赶在国民党军的前面占领道县才能确保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在道县渡口安全渡过潇水。

四团迅速集合交代任务，团长耿飚提出的要求包括：“加强先头部队的火力配备”、“行军中加强侦察和警戒”、“干部的位置一定要靠前”。政治动员完毕，部队立即出发。向前跑出几十里，爬过了一座小山，面前突然出现一群人。这些人长衫短衣，挑筐提篮，看样子是一

群赶集的群众。部队停了下来，杨成武和耿飚掏出香烟上前打招呼。在询问了前往道县的道路和地形之类的问题后，红军宣传员开始给他们分发红军的宣传品，群众这才知道这些人就是保长跟他们说的最近要来杀人的“赤匪”。群众抢着宣传品，七嘴八舌地说，现在在县城里把守的只有从广西来的一个连和几十个民团。当四团继续前进的时候，一个挑夫突然跑了回来，对耿飚悄悄地说：“长官，我还告诉你一个事，道州有座浮桥，进城要从桥上过。桥是船做成的，用铁链子串好。他们如果知道你们要进城，会把桥拉过去。你们就要夜晚游水过去，把桥放过来才行！”这个情报十分有用，耿飚立即掏出两块大洋递给挑夫，但是挑夫坚决不收，他用更低一些的声调对耿飚说：“我家老弟去年当的红军，在贺胡子那里。”

情报被立即通知了最前面的尖刀连。

中午，四团开进了一个小集镇。集镇里的群众蜂拥来看红军，端出的开水里面放了大把的茶叶。四团的官兵喝着茶水吃着东西，大声地问：“到道州还有多远？”群众也大声地答：“还有一百里！”一个红军战士因为草鞋烂了，脚上磨得全是血泡，坐在路边让卫生员给他上药。杨成武认识这个战士，是江西人，同志们都称他“小老表”。杨成武问：“是党员吗？”小老表回答：“是共青团员，正争取入党呢。”旁边一个十五六岁的小红军喊起来：“学习团员同志的模范行动！”他一喊，大家也跟着喊起来，弄得小老表看着周围看热闹的群众很不好意思。

在距道县还有三十多里路的一个树林旁，四团抓到了一个军人打扮的人。这个人把红军误认为是国民党中央军了，于是说自己是县长派出来到天堂圩去送紧急公文的。红军官兵在他身上搜出了一封信，是道县县长亲笔写的，信上说县城里现在只有团丁四十人枪三十支，

前天花一万元从广西请来的那个连，人是来了但连行李都没带，看来是靠不住的，急需天堂圩派人来帮助守城。

为了给敌人以突然袭击，四团加快了前进速度，官兵们终于在天黑下来的时候到达了道县城下。守城的敌人果然已经把桥拉到了对岸。红军官兵在做战斗准备的时候，大批的群众就站在河岸边等着看红军如何攻城。陈光师长的电话打过来了，原来二师师部一直在四团的后面以同样快的速度跟进，现在距离道县县城只有十里路了。陈光说，已命迂回的五团在河的上游过河，然后攻击道县的西北门，四团必须即刻开始攻击。耿飚首先派出工兵排排长带领三个战士向河对岸泅渡。工兵排排长在火力的掩护下，快速登上了泊在对岸的船，然后群众一拥而上，帮助红军拉船系绳子，很快将一座浮桥搭好了。四团主力迅速从桥上通过，向道县城里冲了过去。县城里的敌人乱放了一阵枪后，很快就开始了各自逃命，因为五团这时候也已经打进县城的西北门了。

二十二日，天亮的时候，红军主力部队开进了道县县城。队伍正走着，突然，红军的号声响了，原来天空出现了敌机。急忙隐蔽的红军官兵向天空看，竟看见一架飞机突然栽了下来。红军官兵愣了片刻，然后呼叫起来。原来，正在进城的红三军团五师十三团的官兵对空射击，机枪射出的子弹居然把一架飞机打中了。红军官兵端着刺刀向栽下来的飞机冲去，飞机里的飞行员看见红军一个劲儿地喊，后来才弄清楚他们喊的是“中央军饶命”，原来国民党军把中央红军也简称为“中央军”。两个飞行员一个是广东人，一个是江西人，他们是从广西柳州机场起飞的。红军把飞机上的机关炮和炮弹卸了下来。由于飞机无法带走，便由工兵排排长负责把它彻底烧毁。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在众目睽睽之下，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地看过飞机的工兵排排长

把一些破布等引燃物塞进了飞机的座舱，然后亲自点着了火。谁知，坠毁的飞机的油箱已经破裂，工兵排排长手里的火苗刚伸过去，四溢的燃油“轰”的一声腾起了一团巨大的火球，围观的群众在欢叫声中拼命逃开。尽管工兵排排长也跑得很快，但是他的头发瞬间就被火焰烧光了。

二十三日，就在何键命令周浑元部“务必占领道县”的这一天，中央红军和军委纵队进入了道县县城。

湖南南部盛产蜜橘，此时正是橘子红了的季节。在道县，几乎所有的红军官兵都尽情品尝了这块土地上出产的蜜橘。蜜橘甘甜的汁液令疲惫万分的红军官兵的心情如同连日阴雨之后突然放晴的天空一样，温暖而明亮起来。

在攻击道县时，县城内外的百姓自发地参加战斗，他们对红军的每一句赞扬和每一次笑容，都让红军官兵们激动不已。对于普通的红军官兵来讲，他们并不清楚红军此刻置身在何种局势中，他们也不知道转战路途的前方究竟是生还是死。至少从四团急促的行军和充满斗志的作战中，可以感受到红军官兵们对于未来不曾有过一丝担忧。一路上，他们心中对苏维埃共和国美好生活的记忆，只要被哪怕一个瞬间的类似情景所唤醒，他们便会格外地兴奋因而也就能够始终拥有信心。

早在十一月中旬，国民党军南昌行营就已制定了在湘江以东地区围歼红军的作战计划。这一计划包括两个作战意图：一是把中央红军合围在天堂圩和潇水之间地区；二是把中央红军歼灭在湘江东岸。蒋介石把在湖南南部的国民党军部队编为五路大军，并且制定了五路大军的作战任务：

第一路军：湘军刘建绪部第十六、第六十二、第六十三、第十九师共四个师，加上两个补充旅和十四个保安团，南下至黄沙河、全州一带，到达潇水和湘江之间，负责从北面攻击，以防止中央红军在湘江受阻后往北转向湖南腹地。

第二路军：中央军薛岳部第五十九、第九十、第九十二、第九十三师共四个师加两个旅，位于湘军刘建绪部的侧后，由茶陵、衡阳前进至零陵附近，任务是与第一路军一起防止中央红军前去湘西与贺龙、萧克的部队会合。薛岳的部队之所以跟在湘军的后面，还有一个只有蒋介石和薛岳才明白的意图：催促和监督湘军与红军作战。

第三路军：中央军周浑元部第五、第十三、第九十六、第九十九师共四个师，近距离地位于中央红军的右后方，直插道县，“而后与第一、第二路军及桂军联络截击”。

第四路军：湘军李云杰部第二十三、第十五师共两个师，“由嘉禾向宁远及其以南地区蹑匪尾追”。

第五路军：湘军李韫珩部第五十三师，位于中央红军的左侧后，“与第四路军及粤军联络，经由临武、蓝山、江华、永明蹑匪尾追，并与桂军适切联络”。

国民党军五路大军近二十五万兵力，从前后左右开始向中央红军合围。

十一月十四日，蒋介石致电何键：

现在匪已窜过一、二两线，今后倘再不幸窜过第三线，则扑灭更难，贻害国家不堪设想。希芸樵［何键］兄督饬两李［李云杰、李韫珩］各部及军队、民团，并

会同粤、桂两军，妥为部署，分别严密追堵，务歼灭窜匪于湘水以东；尤须注意勿使迂回粤、桂，剿办更难。并须粤、桂两军严密防堵南窜，且压迫于郴水以北地区聚而歼之，最为有利。又亟须设计迟滞匪之行动。

蒋介石的这封电报被红军截获了，中革军委经过研究作出的判断是：敌人在潇水、湘江地区的集结十一月二十二日才能部署完毕，而在此之前中央红军是可以安全渡过潇水和湘江的。

众多的史料都难以提供作出这一判断的依据。

因为尽管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前往湘江上游抢占渡口，并且红军主力的一小部分部队已经到达了湘江岸边，可此时两个军委纵队依旧停留在距离湘江一百六十公里之外的道县。

军委纵队刚到道县的时候，毛泽东再次对中央红军的军事转移计划提出了不同意见：中央红军自苏区的战略撤离，到此应该是向西的最后终点了。红军不要渡过潇水，应该沿着潇水的西岸向北，攻击板桥铺、渔涛湾、华江铺、双牌、富家桥，再向西攻击零陵，从那里渡过湘江向北攻击冷水滩，越过湘桂铁路，进军至宝庆诱敌决战，然后再回到中央苏区去——这时候，毛泽东仍然认为中央红军的军事转移，应该是受到严重的军事威胁时所作出的一次大规模的战略机动，在充分调动了敌人之后，红军主力部队应该再回到中央苏区去。

毛泽东的建议有相当合理的成分。但是博古和李德的意图是红军必须继续向西，沿着前几个月红六军团走过的那条路，将整个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带到湘西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那里重新建立一个如同赣南和闽西一样的红色根据地。

中央红军的这一行动意图连蒋介石都已十分清楚，况且第六军团在这条路上遭遇过重创，因此中央红军继续向西，几乎等于在往国民党军已经布置完毕的“口袋”里钻，这显然是万分危险的。

有史料显示，在中央红军军事转移的初期，军委纵队里一个小小的政治集体已经开始形成，其成员是：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

在通往道县的路上，毛泽东经常躺在担架上行军，他在军事转移前夕所患的疟疾使他的身体十分虚弱。始终和他在一起行军和宿营的是张闻天和王稼祥。张闻天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王稼祥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委员。这三位当时都处于被冷落地位的高级领导人，自军事转移以来一直形影不离。显然，这是毛泽东的有意为之，他需要政治上的支持者。即使在行军最艰苦的时候，即使毛泽东只能躺在担架上，他也没有间断与红军高级将领们的交谈。李德多次对此表示出不满，他说：“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待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待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们接受他的思想。”毛泽东坚决要求张闻天和王稼祥与他一起行军宿营，是要冒政治上的风险的，但是毛泽东认为形势已经到了需要为风险付出的时刻。博古同意他们同行的原因不明，可以猜测出来的原因是，他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充足的理由把这三个老资格共产党领导人分开。

二十八岁的王稼祥自军事转移以来一直躺在担架上。在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被国民党军飞机扔下的炸弹炸成重伤——数块弹片切进了他的腹部，他的肠子被打穿。虽然经过瑞金医院的紧急手术，但是限于医疗条件的简陋，直至红军撤离中央苏区的时候，王稼祥腹部的弹片

仍然没能全部取出，这导致了他的伤口不断地化脓。王稼祥是安徽泾县人，十九岁在上海大学中学部读书时加入共青团，后在苏联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政治经历上讲，他与毛泽东本没有达成共识的更直接的可能，因为他在苏联学习期间与王明、博古和张闻天同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所以在党内，他一直是坚定地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中坚力量。但是，王稼祥同时又是一个具有优秀政治品格的共产党人，当他逐渐发现博古和李德在政治路线和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时，就开始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他因此受到博古和李德的排斥和冷落。而王稼祥所主张的军事策略，与毛泽东的观点有许多共同之处。

三十四岁的张闻天是骑在马背上行军的。他是东海之滨一个农民家的孩子，在他家的东面有一大片大海的滩涂，传说是仙鹤鸣叫之地，于是村里的秀才给他取名应皋，字闻天，秀才解释说这是取《诗经·小雅·鹤鸣》中的“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之意。这个农家子弟果然聪慧，十五岁高中毕业后进入水产学校学习捕捞技术，不久转入南京全国水利局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由实业家张謇创办的这所学校并没有使张闻天成为一个水利工程师，却使他因为接受了开明思想而成为一名学潮领袖。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张闻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此他写了一篇抒情书信体小说，通过小说主人公之口他说：“我将认真地要开始做一个无私的光明的找求者了，把自己变作一片光明，照彻这黑暗如漆的世界。”这一年的十月，他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首批学员，他的俄文名字叫“伊凡·尼古拉耶维奇”，笔名叫“洛甫”。他的博学多才很快使他出类拔萃，二十八岁毕业时他已开授了《列宁主义》和《联共党史》两门课程，成为中山大学著名的青年教授。一九三一年，张闻天和杨尚昆结伴回国，到达上海后担任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与从来没有出过国、不会任何一门外语的毛泽东有

着诸多不同。在以往的岁月里，他可能与毛泽东相识的唯一机会，是十九岁那年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时候，因为比他大七岁的毛泽东也在那时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他们两人的名字同时刊登在一九二〇年出版的《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八期上。但是，他们确实互不相识。张闻天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是一九三三年他进入中央苏区之后。那时，他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是：一个老资格的和不守规矩的红军领袖。但是，自从担任了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与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来往越来越多。为了躲避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张闻天被安排了一个新的住所，这个住所正是毛泽东已经居住在里面的那座寺庙。毛泽东在生病，张闻天十分关注毛泽东的治疗，这两个身世和性格迥然不同的人终于得以在一种很闲散的状态下坐在了同一条石凳上。他们开始谈的是文学，毛泽东对文学闲云野鹤式的独特理解让张闻天吃惊不小。谈话逐渐深入到政治和军事，毛泽东对马列主义“本土”式的解释、在军事指挥上的丰富经验，以及对中国革命的未来充满豪迈情怀的描绘，使张闻天刮目相看。

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开始后，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有充分的时间一路畅谈。他们偶尔还会谈到文学，毛泽东低吟苏轼的“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张闻天背诵歌德的“小麦、黑麦之间，绿篱、荆棘之间，树林、草丛之间，恋人在哪里”？但是毫无疑问，他们更多的时间是在谈论红军的前途。这样的反复谈论确实像在谋划着重要的问题，但是他们的出发点却十分简单而明确，即如何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从目前的危机中解脱出来。

毛泽东要求中央红军不要过潇水的建议虽然被断然拒绝，但发生于此时此刻的另一件事却令人回味。时任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的李一氓回忆道：“有一天，中央把红军当中湘南籍贯的连排

级干部集合在一起，约两百多人，成立了一个湘南营，调一个湘南籍贯的团长当营长，把我调去当教导员。调来的干部以三军团的为多。他们包括衡阳以南宜章、郴州、临武、蓝山、嘉禾、桂阳、资兴、汝城等县籍贯的同志。我们的作战意图在于吸引围攻江西的国民党顾祝同、陈诚的部队尾追我们到湖南南部，我们相机在湘南同他作一次战役性决战，如果取胜，既能够解江西之围，又能够在湘南立脚下来。”——“作一次战役性的决战”不是一个营能够完成的，显然在这个举动的背后有更大的作战计划。在湖南南部与敌人周旋并相机建立立足点，这与博古西渡湘江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想法是矛盾的。如果李一氓的回忆可靠的话，那么这一举动唯一意味着：毛泽东的建议已在一定范围内达成了某种一致，这是中央红军西进万一受挫之后的预备打算，而将这一打算落实在行动上的只能是周恩来。“湘南营”的存在没有可以印证的历史记载，它很快就因为迅速降临的军事危机而解体了。但是李一氓的回忆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在中央红军即将扑进湘江这个巨大的陷阱之前，掌握着红军命运的高层决策者已经有了相当的不安。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军委纵队到达道县的那一天，朱德发布了“关于野战军二十五日晨前西渡潇水的部署”：

第一军团：于二十三日夜“移至道州地域”，以一个师的兵力控制河水东岸，“准备突击向西追我之敌”。二十四日黄昏，军团主力开始“向永安关方向移动，在河东之后卫师转移到道州地域，并破坏浮桥”。

第三军团：在可能的情况下，“应以一个师随先头渡过河西”。另一个师则须“准备明晨突击追我之敌”。二十四日夜，军团主力“应全部西渡完毕，而后卫则应破坏桥梁”。

第五军团："准备突击明日由东向我尾追之敌"，严防敌人从侧翼包抄而来。二十四日黄昏迅速脱敌渡河，"并破坏浮桥"。

第八军团：军团主力"可于二十四日拂晓前渡过河西"。如不可能，应改于二十四日黄昏时"全部渡过河西"，"并限三小时渡完"。

第九军团："袭取江华的任务不变"。

部署最后要求："二十三、二十四两夜渡河动作应迅速，绝对保证遵守时刻，严禁日间渡河。各兵团应派得力人督队收容落伍，限二十五拂晓前止全部渡完，并破坏完浮桥，将一切船只集中西岸。"

十一月二十四日，红军野战司令部向各军团通报了何键给国民党军各部队下达的作战任务。红军之所以能够迅速截获敌方详尽的作战命令，据说是"运用了某种侦察手段"。将红军野战司令部的这份通报与现存的国民党军有关档案资料比照，内容竟是惊人地准确。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所获得的及时而准确的情报为数不少，尽管至今也无法翔实地考证共产党方面获得情报的切实来源，但这些情报至少说明共产党人在情报搜集方面确实存在着相当机密而又可靠的渠道。在何键于二十三日下达的作战命令中，预测了中央红军必定要向西通过湘江地域，所以急令国民党军各部队即刻向湘江上游移动集结。这也就是说，二十四日，中央红军已经完整清晰地了解了国民党军准备在湘江和潇水之间与红军决战的意图和部署，那么，中央红军如果决定继续西进，就必须尽一切可能在国民党军调动完毕之前渡过湘江。

但是，二十四日，军委第一、第二纵队仍在道县。

即使从道县启程，两个纵队还需渡过湘江以东的另一条大河——潇水。而从潇水到湘江，还有近八十公里的路途。

在何键下达的作战命令中，有这样一句话值得注意：“匪一、九两军团在龙虎关与桂军激战，桂军主力已移向恭城方面。”——这就是说，在二十三日的时候，桂军并没有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向湘江上游地域开进，反而开始向南往广西境内的恭城方向撤退了——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中著名的“走廊”问题。所谓“走廊”，是指在中央红军试图西渡湘江时，国民党军决心在湘江东岸与中央红军最后决战，而桂军却在自己的防区内为即将西进的红军有意地让出了一条通道。

关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下旬在广西北部边境附近是否存在着一条“走廊”，翻阅所能查阅的史料，无论共产党方面还是国民党方面，都没有明确提及此事，也从没有“走廊”一词出现。因此，有史家认为这条“走廊”根本不存在，是后人对历史的误读；也有史家认为即使“走廊”存在，那也是广西军阀部队的“虚晃一枪”，意图是引诱中央红军更快地走进罗网，国民党军与中央红军在湘江东岸的惨烈战斗就是证明；还有史家认为，也许“走廊”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虚拟，因为当中央红军先头部队西进到湘江西岸地域时，所谓“走廊”的存在也就不成立了。但是，将大量的史料一一比照就可以发现，“走廊”不仅存在，而且确实是桂军为中央红军迅速通过而有意避开的。那是一条位于广西北部全州和灌阳之间的一条宽约四十多公里的山谷地带，它的东面与湖南交界，它的西面那条向东北方向流去的河流就是湘江的上游。“走廊”距离湖南道县约两百里。只是，在“走廊”已经被让出的那万分宝贵的几天内，庞大的军委纵队没能迅速地走出道县地区，以至丧失了利用“走廊”的宝贵机会。

在当时国民党军阀系统中，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众所周知。一九二八年，因与西北军将领冯玉祥的矛盾日益尖锐，蒋介石力邀李宗仁的桂军通力合作对付冯玉祥。李宗仁则表

示：如今冯玉祥统兵十万，他的作用就像一串钱上的线索子。有事索子一提钱串子即起；一旦索子断了，遍地散钱拾起来可就太麻烦了。蒋介石立即将对李宗仁的“近交远攻”的政策改为“远交近攻”，直至干脆先放下冯玉祥开始对付李宗仁。一九二九年三月，蒋桂战争爆发，国民党十万大军水陆并进合围广西。至五月，李宗仁前往香港，广西全境为蒋介石国民党南京政府暂时统一。一九三〇年，冯玉祥、阎锡山为反对蒋介石挑起中原大战，李宗仁即刻在广西遥相呼应，他成立了“护国救党军”，自任总司令，同时任命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桂军决定挥军入湘，企图北上攻打武汉，然后与冯玉祥、阎锡山的部队会师中原。但是，进入湖南的桂军在衡阳被粤军拦腰截断，最终因弹尽粮绝不得不退回广西。一九三〇年秋，国民党军开始“围剿”中央苏区，为了在蒋介石面前作出姿态，桂军派出一个师前去江西“围剿”前线，但很快就以广西防务紧张为由将部队撤了回来。

一九三四年十月，当得知中央红军突围而出的消息时，虽然白崇禧和李宗仁早有思想准备，但是对于中央红军的突围方向却十分恼火。李宗仁和白崇禧认为，既然已经把中央红军合围了多年，而且已经接近彻底消灭的时刻了，本应全力以赴与红军作最后决战，中央军却“网开一面”把朱毛红军放了出来。如果在军事上非要如此的话，也应该在包围圈的东面敞开口子，让中央红军进入福建、进入浙江、进入广东，让他们一直跑到大海里去。但是，蒋介石的中央军却把口子开在了湖南、广西方向，这不是居心叵测是什么？中央红军突围进入湖南之后，蒋介石完全可以利用粤汉铁路，把红军包围在湖南境内一举歼灭。但是，蒋介石却把中央军的主力远远地放在了湖南北部，眼看着中央红军缓慢从容地向西开去，直等到红军快到湖南与广西的边界了，中央军才大举南下，这不是想把红军赶进广西是什么？蒋介石

的心思谁都明白，让红军与桂军在广西境内厮杀，然后中央军借口追击红军进入广西，最终再次占据桂军的地盘。

就在中央红军向湖南道县方向前进的时候，白崇禧从上海请来了一位“高参”——刘斐。当年，白崇禧率部在湖南作战的时候，曾大病于刘斐的家乡湖南醴陵，后经刘斐父亲的精心医治才得以痊愈。于是，刘斐先被送到江西讲武学堂，毕业后跟随白崇禧，后被送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这个三十六岁的高材生足智多谋，深受白崇禧器重，成为白崇禧身边不可缺少的智囊人物。当时刘斐正在上海，因为蒋介石屡次电令桂军出兵阻截西进的红军，为了“防蒋、防共”，白崇禧让刘斐速回广西商讨军机大事。

刘斐到达广西的第二天就随白崇禧去了桂北前线。在前线阵地上，刘斐对白崇禧说：虽然中央红军现在处于被动，但是终究号称十万，而桂军有作战能力的部队只有十八个团，所以桂军不适宜与红军发生正面的剧烈冲突。与红军作战，桂军既不能败，也不能胜。败了红军进了广西，蒋介石的中央军也就跟进来了，广西就是老蒋的了；而要想胜，桂军定会损失巨大，那样蒋介石就会来“善后”，广西还是老蒋的。因此桂军的作战总方针应该是“拒客和送客”——对于蒋介石的中央军，只要他们有进入广西的态势，就要坚决阻击；而对于中央红军，则采取“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原则，赶快送走。具体作法是：重兵把守进入广西的隘口龙虎关，迫使红军不能进入广西，只能从龙虎关以北过境，这样一来也可防止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广西。刘斐为白崇禧制定的作战方案，与蒋介石命令桂军配合湘军和中央军与红军决战一事毫无关系，其要点既是为防止红军进入广西，也是为防止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广西。

由此也可看出，蒋介石对各省军阀存有巨大戒心不是没有理由的。在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的时候，蒋介石曾给愤愤不平的薛岳写了一封亲笔信。在信中，蒋介石让薛岳“顾全大局”，而所谓大局就是，暂时利用地方军阀，最终目的是消灭他们：“西南诸省久罹军阀鱼肉人民之苦。此次中央军西进，一面敉平匪患，一面结束军阀割据。中央军所至，即传播中央救民德意，同时也宣扬三民主义之精神。”蒋介石要求中央军要尽量避免与红军直接作战：“匪行即行，匪止即止，堵截另有布置。”然而，军阀们无一不把蒋介石的心思看得透透的。

刘斐对白崇禧提出的最重要的建议是：“开放一条让红军尽快西进的通道。”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中央红军到达道县的当天，桂军防守的隘口龙虎关遭到红军的攻击——实际上，那只是红九军团先头部队的一次小兵力佯攻。无论红军对龙虎关的攻击是否是为了调动桂军对湘江的封锁，可事实上这一行动确实令桂军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借口——桂军在全州只留了两个营，在兴安和灌阳分别留了一个团，而主力部队瞬间就从湘江边上的全州、兴安和灌阳撤回到上百公里之外的恭城去了。这时候，无论湘军还是国民党中央军，都不可能立即调动部队封堵桂军造成的缺口了，湘江防线终于向中央红军敞开了一条通道。

但是，直到十一月二十五日，军委纵队才从道县出发，而且是仓促之间的立即动身，因为国民党军已经从道县的东面压过来了。

在桂军的“走廊”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军委纵队为什么仍在道县停留了三天，史料中没有确切的解释。

事后证明，对于中央红军的全体官兵来讲，这三天的停留几乎是致命的。

从道县出发后，首先要渡过潇水。

依旧是庞大的队伍，依旧是浩浩荡荡的移动。两支军委纵队拥挤在潇水岸边等待着渡河。红一军团二师六团已在河上架设了浮桥，但浮桥狭窄，因此渡河的速度十分缓慢。潇水河上正混乱着，国民党军周浑元部冲过来了。红一军团一师师长李聚奎立即指挥部队进行阻击。

一师到达潇水之后，按照军团首长的命令，应该继续前进。当时一师的左边是红五军团的部队，右边是红三军团的部队，李聚奎师长和红五军团联系了一下，告诉他们一师奉命往前赶，结果电话里传来刘伯承的声音："同志呀，你们的队伍不能走，我们的队伍还没上来哩！"李聚奎又和红三军团联系上了，彭德怀在电话里说："刘伯承的意见对头，潇水西岸要有部队掩护军委纵队过河。你们不但不要走，三军团的六师也留下归你指挥。至于一军团给你的命令，我负责向你们司令部解释！"

李聚奎坚决执行了彭德怀的命令，除了让二团去追红一军团主力之外，他亲自率领一团和三团留了下来，并在潇水西岸开设了阻击阵地。

尽管如此，李聚奎也没想到敌人会来得这么快，攻击会这么猛。国民党军周浑元部的官兵叫喊着，一轮一轮地不断冲锋，除了从正面向军委纵队的浮桥冲击外，在侧翼也划着船冲来，企图往军委纵队的侧后迂回。红军的阻击部队不但要坚守阵地，而且还要不断地组织反

冲击，尽可能把敌人阻击得距离渡口越远越好。几乎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两支军委纵队才全部渡过了潇水。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局局长张云逸立即命令把浮桥炸掉。

红军工兵营把浮桥炸了，当浮桥变成碎片漂浮在潇水河面上时，河的东岸突然又出现了一支红军队伍，这是负责断后的红五军团的一个营。这个营的红军官兵与追击的敌人纠缠了很久，在最后一刻才摆脱追击奔向浮桥。跑到河边的红军看见“浮桥”已经消失了，他们脚步一刻未停纵身扑到了河水中。

军委纵队渡过潇水的第二天，道县即被国民党军占领。

这意味着渡过潇水的中央红军的退路已被完全封死。

被封堵在潇水和湘江之间的狭小区域里的红军，此刻只能向前，即使需要流血需要牺牲……

从潇水到湘江，横在路上的是南岭山脉中的都庞岭。

都庞岭山峰险峻，道路崎岖。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野战军进行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战役渡过湘江的政治命令”。

［致一、三、五、八、九军团，二纵队］

各兵团首长：

一、我野战军即将进行新的最复杂的战役，要在敌人优势兵力及其部分地完成其阻我西渡的部署条件下，来突破敌人之第四道封锁线并渡过湘江。此战役须经过

粮食较缺乏之两个大山脉［都庞岭和越城岭］，并要克服二条河道［灌江和湘江］与开阔地带，及部分的敌人堡垒。野战军应粉碎前进路上敌人之抵抗与击溃向我侧翼进攻及尾追之敌，任务是复杂与艰巨的。但由于敌我部队质量之悬殊，我工农红军之顽强坚决、忍苦耐劳，可断言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二、为着胜利地进行这次战役，要求野战军全部人员最英勇坚决而不顾一切地行动。进攻部队应最坚决果断地粉碎前进路上之一切抵抗，并征服一切天然的和敌人设置的障碍，掩护部队应不顾一切阻止及部分地扑灭尾追之敌。各兵团应不断地注意自己侧翼之安全，如敌人向我翼侧进攻时，应机断专行地坚决击溃之。同时，不应离开、放弃完成自己的前进道路。

三、对每一个指挥员要求明确地执行放在前面的战斗任务，与友军确实地协同动作，不间断地进行各种侦察、警戒，并应遵守一切战术规定，以避免不必要之损伤。指挥员应牢记争取战斗的胜利，不仅依靠个人的勇敢，而首先是在正确地指挥部队。

四、政治工作人员应不疲倦地政治宣传与鼓动及个人的模范，克服战斗员中的疲劳、落伍与各种动摇，应与指挥员一起征服为完成战斗任务上的一切客观困难，并最高限度地提高全体红色军人的战斗精神、顽强抗战及其坚定性。我野战军的基本口号应该是：不仅要安全地不受敌人损害地通过封锁线，且须击溃及消灭所遇之敌军。

五、当前战役的胜利完成，是将决定着我们突破敌人最后的封锁线，创造新的大块苏区，协同其他红军部队［二、六军团，四方面军］一致进行全线的总反攻，与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

六、本政治命令随军委二十五日十七时作战命令同时下达至团、至梯队首长为止。军团、师、团政治部［处］应据此进行加强的政治工作，但不应下达提出作战任务。

党中央及总政治部

二十五日

这一政治命令中使用了“最复杂”、“最英勇”、“最坚决”、“最高限度”、“最后的封锁”等极其严峻的词汇，显示出中央红军的领导层已经意识到西渡湘江的路上存在着极大的危险。

同一天，国民党军“剿匪军”总司令何键给第一路军刘建绪部和第二路军薛岳部发出了“向零陵、黄沙河、全州间推进的命令”：

命令：

一、据报，窜匪万余本日到王母渡，似为敌之右侧卫。讯俘匪供称，匪系伪三军团、伪中央机关、伪九军团、伪一军团之行军序列。推测任右侧卫者为伪五军团，任左侧卫者为伪八军团。

二、着第一路追剿司令刘建绪指挥所部担任黄沙河［不含］至全州之线，置重点于全州东北地区，便于桂军及第二路部队夹击。

三、着第二路追剿司令薛岳指挥所部担任零陵至黄沙河［含］之线，集结主力于安东附近，并策应第一路。

四、第一、第二路均限明晨开始行动。第一路所遗零陵至黄沙河之线防务，俟第二路接替完毕，逐渐移防。

上四项，仰即遵照为要。

中央红军要渡过湘江的渡口，位于广西东北部的全州至界首之间。

由于红一军团一师被刘伯承和彭德怀留在了潇水西岸，因此，当军团长林彪接到抢占湘江渡口的命令时，不得不把本来应由一师完成的任务全部交给了二师。

红一军团左翼的界首本是红三军团的防区，但是红三军团目前还没有赶到，林彪对二师师长陈光说：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等了，桂军正在向界首运动，再等下去界首就没了，你的四团必须立即往前冲！

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再次成为整个中央红军的尖刀。

为了抢时间，四团在地图上自东向西找到了一条通往界首的最短的路途。这条几乎是直线的路途上有大路，也有小路，或许根本就没有路。团长耿飚和政委杨成武率领全团官兵开始不顾一切地向界首奔去。幸运的是，沿途他们并没有遭遇大的敌情——这再次证明，由于桂军南撤所形成的“走廊”是存在的。

四团到达湘江之后，立即涉水过江上了湘桂公路。刚上公路，就听见附近有联络的军号声，仔细一听，竟是桂军发出的。同时前来抢占界首的桂军先头部队发现公路上出现了一支队伍，一时还弄不清楚究竟是哪一部分的。四团迅速隐蔽起来，却又听见一阵号声，这一次的号声很熟悉，四团的官兵听出是红三军团六师发出的。原来彭德怀已令六师迅速赶往界首，这阵号声是六师呼唤四团的，六师要知道四团目前的位置。但是，六师不知桂军也已经到达了界首，号声令双方都知道了相互的存在，于是情形骤然紧张起来。

四团刚隐蔽好，便见一队桂军排列成战斗队形，沿着通往界首的公路运动而来。桂军的武器十分精良，因此他们的行军是一副很轻松的样子。可是，等他们走进了四团的隐蔽区域后，团长耿飚一声令

下，四团开火了。桂军的先头部队胡乱放了一阵枪后，因为出现伤亡立即向后撤退，不久就与后面的大队人马撞在了一起，混乱的桂军队伍从公路上散至公路两侧的稻田边。这时，四团的军号吹响了，红军官兵端着刺刀开始了冲锋。桂军没能支持片刻就留下了尸体和伤员顺着公路向南跑得没了踪影。四团打扫战场时缴获不少，其中还有几大箱白金龙牌香烟，这让一直在吸自制“土烟”的耿飚异常高兴。

四团先敌占领了湘江上的重要渡口界首。在构筑阻击阵地的时候，红三军团六师的先头部队也赶到了。界首在军事部署上归红三军团防守，因此双方交接了阵地。四团还没离开，二师师长陈光的一个紧急命令到了，看了命令的杨成武脸色立刻阴沉起来，他悄声对耿飚说：“团长，问题严重了。”

就在四团向界首奔袭的同时，红一军团二师五团奉命向右翼的全州急促前进。但是，当五团接近全州的时候，发现全州已被湘军刘建绪部抢先占领。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如果全州不在中央红军的掌控之下，中革军委西渡湘江的计划将无法实施，整个军委纵队就有可能被封堵在湘江东岸。

军团长林彪顿时紧张起来，他在地图上急忙寻找可能构成阻击线的新地点。最后，林彪在距离全州十六公里处的觉山、脚山铺、鲁班桥一带画出了一条线。

红一军团二师师长陈光给四团的命令是：立即把界首阵地交给红三军团，连夜赶回与主力会合。四团没有时间吃晚饭了，官兵们一边啃干粮一边顺着公路往回跑。

从左翼的界首到右翼的脚山铺，距离约为三十公里。

这三十公里将是近十万人的中央红军西渡湘江的唯一通道。

因为十分狭窄，所以万分危险。

四团在横穿这条通道的时候，看见中央红军各部队正陆续抢占各个要点——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夜晚：右翼红一军团主力已经全部到达湘江渡河地点；左翼红三军团的前锋四师占领了界首以南的光华铺；红八、红九军团由于在西进的路上受到国民党军的疯狂阻击，已改道向这个方向靠拢。在界首到脚山铺的这条狭窄的通道间，联络的军号声、战马的嘶鸣声、嘈杂的喊人声充斥在茫茫黑夜之中。没有敌人的影子——无论是湘军、桂军还是中央军。至少这时候，在三十公里的渡江范围内没有敌情。湘江正值枯水期，有些地段的江面甚至可以涉水而过。奔跑中的四团官兵盼着军委纵队能够立即到达并且迅速渡江。但是，红军官兵并不知道此时那支庞大的队伍走到了哪里。

天蒙蒙亮的时候，奔跑了一夜的四团到达了觉山。

师长陈光命令四团立刻修筑阻击阵地，不少官兵修着修着就睡着了，嘴角上还黏着炒米。

这是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军委纵队翻越庞都岭进入广西境内，到达了一个叫文市的小城镇——这里距离预定的湘江渡口还有七十公里。

到达文市的军委纵队在仓促地安排了宿营地后，军事决策中心立即开会研究目前的敌情。

敌情比想象的严重。

二十七日，在中央红军的右翼，湘军的四个师已经到达全州。中央军薛岳的四个师也到达了全州以北的黄沙河一带。在中央红军的身后，中央军周浑元部和湘军李云杰部共六个师已经以拉网的阵形扑了上来，敌人距离文市也就是一两天的路程了。更为严重的是，南面的桂军重新把主力部队调了上来，其前锋已经和刚刚到达界首的红三军团遭遇。

敌人从南、北、东三面围了上来，而西面就是湘江。

自十一月二十二日桂军南撤形成的“走廊”存在了五天，现在，这条“走廊”已从中央红军的面前消失了。

桂军重新北上封堵中央红军，既是迫于压力，也是出自本能。桂军向全州、界首以南的恭城移动后，引起了何键和薛岳的极大愤慨。何键以激烈措辞致电蒋介石，暗示桂军有“通共”的嫌疑：

若灌［灌阳］、兴［兴安］、全［全州］间又准桂军移调，则不免门户洞开，任匪长扬而去；加之萧、贺两匪现复乘机窜扰桑［桑植］、永［永顺］，逼近辰［辰溪］、沅［沅陵］，湘西全部阢陧不定。似此情势迫切，忽予变更计划，兵力、时机两不许可。合围之局既撤，追剿之师徒劳。

最后，何键含蓄地表明桂军此举如导致严重后果自己将不负任何责任：

职受钧座付托之重，虽明知粉身碎骨，难免一篑功亏，亦唯有勉策驽骀，不稍回顾，继续追剿。用敢历陈利害，幸乞钧座睿察详筹，指示机宜，俾资尽力，无任惶悚待命之至。

虽然李宗仁和白崇禧可以忽略蒋介石对桂军南移的责备，但是他们也明白，与对“追剿”负有战场责任的何键和薛岳结下怨恨于巩固广西的地盘并不利。更何况一旦中央红军真的与贺龙、萧克会合之后成了气候，共产党红军也将是广西的一个巨大威胁。于是，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桂军十一月二十六日开始重新北进，并派出了战斗力最强的主力部队追近中央红军，企图在与红军的决战中捞取政治和军事上的资本——此时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已经预感到，即将爆发在湘江边的决战，很可能是与中央红军的最后一战。

在讨论作战方案的时候，毛泽东与李德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毛泽东再次重申自己的建议，主张中央红军不要从文市继续向西，不要从界首西渡湘江，而应该从文市直接向北，从黄沙河附近渡过湘江，经湘桂边界处的庙头，攻占湘南的白牙，沿着夫夷水的东岸北上，直取宝庆。接着，既可以向东北攻击两市镇和永丰镇，也可以继续北上攻击酿溪镇。之后穿过湖南中部的丘陵地带或在湖南中部建立革命根据地，或者返回到中央苏区去。

几乎从中央红军刚一进入湖南起，毛泽东就一直主张红军向北，深入到湖南的腹地去。毛泽东从来没有把中国革命的中心移到荒凉的西部去的念头，尽管后来中央红军的长征不得不一再向西、向西，直至头戴红军八角帽的毛泽东站在中国西部的黄土窑洞前成为中国革命的经典画面。

多年后李德回忆说：“我建议从南面绕过全州县，强渡湘江，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之后，立即向湘桂黔交界的三角地带前进……毛泽东粗暴地反对了这个建议。”李德使用了“粗暴”一词，可以想见在军事形

势万分危急的时刻，毛泽东对红军即将面临的危险焦虑到了何种程度。

文市狭窄的街道上由于数万红军的到达显得格外拥挤。大批的行李散乱地堆放着。大量伤病员的抬进抬出使临时野战医院内拥挤不堪。红军指挥部里的电话声不断响起，前方渡口的掩护部队已经和敌人打起来了，指挥员在电话里不断地问军委纵队什么时候能够到达渡口……

中央红军抢渡湘江的作战命令最后下达了：

第一军团，由林彪和聂荣臻指挥，在右翼距离全州十六公里处的鲁班桥、脚山铺一线构成第一道阻击阵地。其中二师重点部署在桂黄公路的两侧，准备阻击南下的湘军刘建绪部的进攻。

第三军团，由彭德怀和杨尚昆指挥，在左翼的灌阳、新圩一线构筑阻击阵地，准备阻击北上的桂军的进攻。

两个军团的作战目的是：确保军委纵队和中央红军安全地渡过湘江。

即使按照一般的行军速度，文市至湘江渡口七十公里的路程，一个昼夜也可以走完。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自道县向西直至渡过湘江，近一百多公里的路程，只用了两个白天和一个晚上。而此时，在敌人已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军委纵队依旧没有轻车简从，七十公里的路走了整整四天。这四天的每一分每一秒对数万阻击着国民党军进攻的红军官兵来说都是生死考验。

毛泽东在文市边缘的旷野中徘徊，蓬乱的长发无法掩饰他忧郁的神情。这里的西面就是那条名叫湘江的大河了。湘江在毛泽东心中留有挥之不去的情愫，那是一条孕育了他的生命的大河，是一条赋予了他浪漫情怀的大河：

独立寒秋，

湘江北去，

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

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

鱼翔浅底，

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毛泽东知道，整个中国工农红军，包括他自己，已经走到了一个不是走向灭亡就是走向新生的关口。

毫无疑问，毛泽东以其辉煌的人生成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中国人。他传奇般的革命史和异常丰富的心灵史交织在一起，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乃至世界政治史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尽管这是已经四十一岁的毛泽东在广西北部那个叫文市的小城中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

那一刻的毛泽东面色黑黄，消瘦憔悴，手指被劣质的烟草熏得乌黑——整整四十一年后，美国作家特里尔是这样描述他所见到的八十二岁的毛泽东的："黑头发下温和的面容，柔软的双手，炯炯逼人的目光，保持头部稳定的宽大的双耳，在没有皱纹、宽阔而苍白的脸上尤显突出的是下巴上的黑痣。""脸的上半部分显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宽阔的前额，探索的眼睛，长长的头发。下半部分则表明他是一个感觉论者：厚厚的嘴唇，高隆的鼻子，稚童般的圆圆的下巴。""在几十年的战争生涯中——这一战争摧毁了占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古老帝国，同时也使他家中四分之三的人以身许国——他却从未负过一次伤。""他活着。他以铲除所有的不平等让社会进入一个新时代为毕生使命，这位幸存下来的农家子弟看上去更像一位先祖而不是政治家。"——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无论是站在哪种政治立场上的人都无法否定这样一个事实：离开了这个身躯高大、行动缓慢、面容慈祥的中国人，叙述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史乃至世界政治风云变幻的脉络，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是一位性格和行为都十分独特的中国人。他欣赏由于消灭异己言论而受到非议的秦始皇，欣赏被称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曹操，欣赏转战半个中国与起义农民作战而成为"同治中兴"名将的曾国藩，欣赏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和至死也不宽容任何人的作家鲁迅。毛泽东常用"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句中国俗语来表明自己的个性，他说自己是一个"不会为戒律所困扰的人"。当和平的生活来临以

后，他让自己吃饭、睡觉和工作的时间与所有人的正常作息完全相反。“他善穷经据典，使来访者大惑不解，或以沉默静思使对方不知所措”。他写字不论铅笔、钢笔和毛笔，只看距离手边最近的是什么笔，写出的字自成一体，恣意纵横，妙趣横生，同一张纸上最大的字和最小的字甚至能够相差十倍。他不屈服，不谄媚，不信邪，对任何强加给他的意志绝不苟同，“对任何事从不持中立或消极态度”。“他说自己既有虎气又有猴气。他的性格中冷峻无情的一面和幻想狂热的一面不断交替出现”。

准确地了解毛泽东所说的“虎气”和“猴气”的含义不是容易的事情。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中，“虎气”意味着傲视群雄，独占一方，甚至是横扫一切如卷席。而“猴气”一说似乎只有在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可以找到来龙去脉。《西游记》里著名的猴子孙悟空，这个从石头缝中蹦出来的猴子居然能够成为标榜“中庸守礼”和“忠厚传家”的中国人的精神偶像，一直令西方学者大惑不解。这是一只以造反著称的猴子：我行我素，随心所欲；喜欢恶作剧，特别热衷于对权贵阶层和妖魔鬼怪嬉笑怒骂；对现实充满不平和怨恨，在自由理想的折磨下非常容易火冒三丈；不喜欢安宁和平静的日子，天下大乱乾坤颠倒才能使它纵横驰骋；它刀枪不入，筋骨结实，至死也不嘴软，即使磨难重重也永远毫发无损；他的寿命几乎接近永恒，因此尽管世间沧海桑田，天荒地老，而它一张年轻顽皮的猴脸却恒久不变——至少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这是一个不但不需要任何私人财产，而且可以随心所欲占有天下财产的快乐的无产者，是一个哪一条清规戒律都拿它没有办法的独行者，是一个脱离了现实生活的压力、能将所有关于物质和精神的幻想轻易实现的魔幻大师，是手拿一根锄头把似的棍子便可以把一切不顺眼的东西包括眼前的这个世界砸个稀巴烂的人生楷模。而毛泽东对孙猴子的评价是：“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毛泽东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出生于湖南中部一个叫韶山冲的村庄。这里之所以叫“韶山”，据说是因为上古时代一个皇帝曾经路过这里，并且在这里演奏了韶乐引来无数凤凰翩翩起舞。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十七岁当家理事的时候，毛家家境拮据，为了还债毛贻昌在湘军中当了几年兵。当兵的经历不但使他长了见识，还积累了一些钱财。毛贻昌回家之后买了点地，到毛泽东出生时，他不但已经拥有了二十二亩地，每年至少可以收获八十余担稻谷，同时还做着贩运稻米和猪牛的生意。日子过得兴旺发达之时长子出生了，这令毛贻昌兴奋不已。他摆了几桌酒席，邀请同宗长者为长子取名。长者没费什么心思脱口而出：名泽东，字咏之——后改为“润之”，改得极其恰当，因为“润”和“泽”的含义是相通的。无法猜测这位同宗长者的脑子里游荡的是什么，因为中国农民一向认为孩子的名字不能过于显赫，那样的话孩子容易受到各种鬼魅的嫉妒和攻击。“泽东”，“润泽东方”或者“恩泽东方”，这个气魄惊人的名字显然不是农家子弟所能承受得了的。于是，母亲把他抱到一个用石块垒起的观音庙里，代替孩子给庙里的一块石头磕了头，并决定让自己的孩子认这块石头为“干娘”，同时给孩子取了个小名叫石伢子。母亲希望以此向鬼魅们声明，她的这个孩子只不过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而已——没有人知道毛泽东的母亲是否读过《西游记》，因为神通广大的孙悟空出世前就是一块石头。

韶山冲里的那位农民兼小业主很快就领教了儿子的“猴气”：八岁就在学堂里和先生顶撞起来，原因是拒绝站着背书而要求和先生一样坐着。十岁干脆从学堂逃跑了，要独自到县城去，结果流浪了三天才被找回家。十三岁因为拒绝给父亲请来的朋友斟酒而与父亲发生冲突，父亲追打过来，他站在一个水塘边宣布，如果父亲再往前一步他就跳下去——那个水塘在韶山的山脚下，水面上漂满了碧绿的浮萍。十四岁时父亲给他娶了个十八岁的媳妇，他拒不接受并且从没看过这

个姑娘一眼。因为拒绝父亲让他到一家米店当学徒，父子又发生了激烈口角，毛泽东再次声明要离家出走，结果父亲同意他到邻县的一所新式学校去上学，并为他交纳了一千四百个铜板作为五个月的学费和住宿费。

从家里出发的时候，毛泽东写了一首诗夹在了父亲的账本里：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诗的后两句是一个日本人写的，曾经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显然毛泽东读过并且很受感动，于是才一字不差地放进了自己的诗中。而他自创的前两句诗稚气十足且情绪悲壮。无法想象对于一个十六岁的农家少年来说"成名"到底意味着什么。毛泽东挎着母亲为他准备的粗布包袱，顺着乡间小路大步向前走去——这个懵懵懂懂的少年至少知道"埋骨"需要慷慨以赴。

新式学校使又瘦又高的毛泽东眼界大开，他知道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两年前就死了，他对"华盛顿胜利了并且建立了他的国家"这句话印象深刻，他还喜欢听一个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老师讲述日本的事情。当年那位老师对毛泽东吟唱的一首日本歌曲，五十年之后，当他孤独地坐在中南海中的大书房里时，依旧可以哼出它的歌词：

麻雀歌唱，

夜莺跳舞，

春天的绿色田野多可爱。

石榴花红，

杨柳叶绿，

展现一幅新图画。

一九一一年，对于中国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年份。刚到长沙不久的毛泽东初次体会到了革命是怎样的激动人心：长沙城外炮火猛烈，城里革命者的呐喊响彻夜空，城门被暴动的人们打开了。当黎明来临时，革命军在城头竖起了一面白色的旗帜，旗帜上写着一个大大的“汉”字，这个字意味着大清被推翻了，千年的帝制被推翻了。毛泽东立刻成为湖南新军第二十五混成旅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列兵。但是半年之后他就不干了，他说他当不了兵。毛泽东也不清楚自己到底适合干什么，他先后投考过警察学校、商业学校、法律学校，甚至一度强烈地想成为一个制造肥皂的专家。最后，他参加了一所不收学费的师范学校的考试，在考场上连写三篇作文，其中两篇是替他的朋友写的，结果他和他的朋友都被录取了——“我没有觉得代替别人考试是不道德的。”毛泽东曾经这样评判自己。

师范学校里有一位名叫杨昌济的老师，曾获得过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成为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的第一人。这不仅是因为杨昌济把自己心爱的女儿许配给了这个农家子弟；更重要的是，崇尚宋明理学同时也崇尚康德的杨昌济在这个农家子弟身上发现了一种非凡的了解力和惊人的精神活力。这也许就是后来西方记者所说的：“在他个

人的身躯里含藏着中国革命的故事。”而杨昌济是第一个在毛泽东身上意识到这一点的人。

韶山冲的父亲按月给儿子寄钱，这些钱一半让毛泽东用来购买书籍了。他的阅读能力和刻苦精神来自他内心的矛盾：“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在杨昌济的教导下，毛泽东已经能够把以康德为代表的具有欧洲风格的理想主义，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具有中国风格的公民意识结合在一起了。毛泽东公开宣布要做个“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的“奇人”，因此，他的同学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毛奇”——他在冰冷的池塘中游泳，迎着风背诵唐诗，一天只吃一顿饭，长久地暴晒在日光之中，不在宿舍而在学校的院子里睡觉，身上不带一文钱就开始长途游历，站在长沙南门最嘈杂的街市中读书并说这种锻炼是“成为英雄的一条小径”。

一九一八年，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在俄国诞生的时候，幻想成为“奇人”的毛泽东从师范学校毕业了。他追随着去北京大学执教的杨昌济到了北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负责打扫卫生、整理书籍和登记借阅者的姓名。这个已经二十五岁的湖南青年孤独而寂寞，他穿着褪色的旧蓝布长衫和布鞋，一口湖南乡音在学术圣殿里显得十分不合时宜——“我的地位低下，人们都不愿意和我来往。”唯一能让毛泽东心境好转起来的是杨昌济年仅十八岁的女儿杨开慧温柔动人，当她走在毛泽东身边的时候，如梅花盛开在中国北方初春的阳光下。不久杨昌济因病去世，悲伤的杨开慧将自己的一生托付给了她面前的这个贫穷而高大的青年。

毛泽东站在北京大学光线昏暗的借阅室默默地观望着，他看见了很多令他崇敬不已的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他还认识了谭平山、张国焘、陈公博。李大钊对这个湖南青年的影响不可估量，直到

一九四九年毛泽东依旧说：“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毛泽东还热切地希望与陈独秀见面，以便阐述自己的思想。那时，陈独秀正在上海筹备创建中国共产党。于是毛泽东卖了过冬的大衣买了张去上海的车票。名满天下的陈独秀教授坦率地与湖南青年毛泽东交流了关于政治信仰的见解，这一幕令毛泽东终生难以忘怀，他后来说：“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一九二一年六月，毛泽东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他穿着一件蓝色的土布长衫但不穿袜子，吃饭的时候用袖子去擦桌上的饭粒，脖子和身上的泥可以“刮下斤把”。可是，当辩论问题的时候，毛泽东突然令所有的代表刮目相看，他“微笑着布下陷阱引诱辩论的对方上钩，使之无意中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结果常常惹得对方很恼火。”尽管当时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地位并不高，但这次会议使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

中共中央委派毛泽东回湖南去做发展国民党党员的工作。为了使这项工作名正言顺，当时在国民党中央担任总务部副部长的共产党人林伯渠给了毛泽东一个头衔：国民党中央党部筹备员。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没能继续当选中央局委员，张国焘用轻蔑的口吻说毛泽东正忙于“国民党的工作”，而李立三的话更具有讥讽性，他直接说毛泽东现在是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秘书”。如同验证张国焘的话一般，回到湖南后不久，毛泽东就接到了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的邀请信，汪精卫邀请他到广州代理自己因为“政府事繁，不能兼理”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职。此时，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暗杀，国民党内部政治斗争十分严酷，毛泽东不但喜欢这个职务，

更喜欢复杂动荡的局势的挑战。他先后把萧楚女、沈雁冰等共产党人调进宣传部，并且撰写了大量文章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本质，指出中国革命的步伐决不会因为分裂而停滞不前。毛泽东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发表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第四期上，文章在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之后，观点鲜明地指出：国民党右派是我们的敌人，国民党左派是我们的朋友，但这是个我们要时时提防的朋友——几十年后，毛泽东把这篇文章作为了《毛泽东选集》的开篇之作。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的湖南、湖北和江西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毛泽东认为，推动农民革命是中国革命的根本——各地的农民簇拥着黑脚板的农会主席，敲锣打鼓地把地主和劣绅牵上街头批斗。一个字都不认识的农民在斗争大会上质问那些压迫和剥削他们的人："你晓得三民主义么？"农民们砸了老爷们平时乘坐的轿子，闯进土豪家里在精致的牙床上打滚，然后拥进祠堂把族长老爷摆的酒席瞬间吃个精光。农会强迫地主减租减息，不准加押，不准退佃，不准欺负孤儿寡女，不准说农会的坏话。大地主和豪绅们都跑进了大城市，小地主们赶快给农会送上写有"革故鼎新"的匾额——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几乎可以解释数千年来发生在中国的所有农民暴动的根源。

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继续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时年三十九岁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蒋介石首次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当时没有人能够预料到这个操着浙江口音、身材细瘦的军人被选入国民党中央的严重的政治后果。这也许是毛泽东第一次见到蒋介石。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两

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人面对面只见过一次，那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即将打响解放全中国的战役的前夕。

国民党和共产党决裂之时，也是毛泽东与蒋介石形成政治对抗的开始——政治信仰最根本的出发点是代表社会生活中哪个阶层的利益。蒋介石很快就成为中国社会地主、官僚、资产所有者和军阀的代表，而毛泽东却愿意一生是中国最广大的贫苦民众的代表。

从一九二七年开始，蒋介石决心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一千，不得放走一个”。经过七年的调兵遣将，国民党军终于使毛泽东和他的军队撤离了红色根据地。占领了瑞金的国民党军给蒋介石送来了拍摄的影片，他很认真地观看了，他很想看看毛泽东住的地方是什么样子。但是，他只看见一间普通的农家房子，房内窗前有一张粗木桌，桌上有一盏农家油灯。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日，蒋介石从南昌飞到了南京。这一天，毛泽东和中央红军正走在通往湘南道县的路上。如果蒋介石的座机稍微向西偏一点，他就可以看见在已经收割完毕的稻田边走着怎样一支庞大的队伍。

六天之后，蒋介石收到了何键关于湘江布防的电报。电报显示出大战前夕战场上常常会出现的某些混乱，也显示出中央红军各主力部队在抢占湘江渡口时不顾一切的行动给国民党军造成的错觉：“匪众数在十万以上，故我一旅或一师动辄与匪二三万接触。谓非匪之主力，则其数实众；谓系匪之主力，则他窜或又发现大股，不综合各方面之情况，颇难为确实之判断。”——发现当面的红军有两三万人，说不是主力吧，人数实在很多；说是主力吧，瞬间就没了踪影，然后又在其他地方发现人数更庞大的一股。作为总指挥，何键到现在还没弄清楚

与他作战的中央红军到底有多少人。但是何键对中央红军的作战意图还是十分清楚的："匪之主力似在桂属文市及湘属寿佛圩以西地带。其先头已进至桂属石头圩、蒋家岭。匪左翼正在龙虎关、桃川地区与桂军持战中；右翼进至黄沙河东南之西头之线"。电报的最后，何键表示湘江防线作战调动和部署已经完毕，剩下的就是"各部奋勇夹击，期收聚歼之效"了。

按照蒋介石的想法，他与毛泽东的较量，很快就要在湘江边结束了。

就在蒋介石收到何键的电报的同时，何键收到了来自前线的最新军情报告："匪两万余本［二十七］日晨抵达文市。其最先头便衣散匪约二三千人，刻正分途通过茅埠、屏山渡、凤凰嘴之线，向我侦察。"

何键立刻给国民党各路大军发出了急促推进防线的电报：

第二路司令薛岳、第三路司令周浑元、第四路司令李云杰、第五路司令李韫珩：

匪循萧匪故道西窜企图甚明。彭匪德怀到达文市，有晚在江西渡架设浮桥，今晨续向古岭头、鲁荐、两合坊移动。其右侧卫经桥庄村、黄腊洞，宥［二十六日］日已到西头附近；左侧卫在永明附近地区构筑工事中。与第三、四两路保持接触之匪仅少数后卫。我桂军十五军全部感［二十七日］午可在灌［灌阳］属新圩、全［全州］属石塘圩、咸水以南之线展开完毕。我第一路章［章基亮］、陶［陶广］、陈［陈光中］各师，感日推进全州；第二路向东安、黄沙河推进；第五路仍遵前令迅经零陵、东安西进。着周司令浑元、李司令云杰速督所部觅匪猛攻，以收包围之效为要。

总司令 何键 感巳衡总参机

何键的电报发出不久，在中央红军的左翼，桂军第四十师师长王瓒斌的一个团到达了新圩，迎面与红三军团的部队撞上，双方立即展开了战斗。桂军处在一条隘路上，部队无法迅速布阵，因此拥挤在一起凭借火力优势与红军对峙。而在中央红军的右翼，刚刚筑好阻击阵地的红一军团听见了迎面而来的枪声——湘军刘建绪部开始了试探性进攻。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红军总司令朱德给中央红军各部队发出了“至三十日止全部渡过湘江”的战斗命令。命令要求中央红军各部队“自二十八日起至三十日止全部渡过湘水，并坚决击溃敌人各方的进攻”，“以最大的坚决性完成放在自己面前的战斗任务”。

十一月二十八日，天蒙蒙亮的时候，军委纵队从文市出发了。

刚刚走出文市，天空出现了敌机。军委纵队庞大的队伍混乱了一下，但敌机仅仅盘旋了几圈就飞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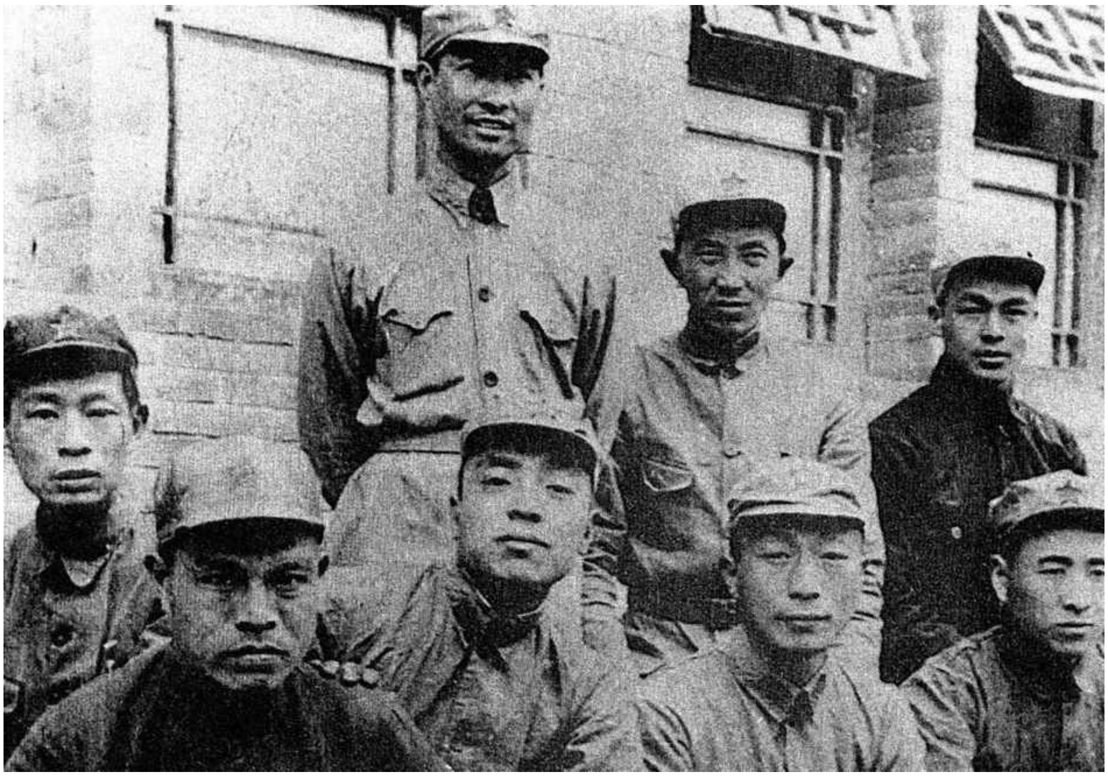
这架国民党侦察机上的飞行员所看见的情景，定是他此生从未见过的：从文市通往湘江渡口的路上，行进着数万身穿灰色军装的红军，多路并进的队伍令小路无法容纳，于是田埂上、山坡上、沟壑里布满了滚滚人流，宛如漫山遍野都已成为战场——一个大地上从未出现过的巨大的战场。而在这支队伍的周边，身穿土黄色军装的国民党军正从所有的公路和山路上像一张放射状的网在快速靠近，夹杂其间的汽车卷起了一团团翻滚的烟尘。

天空阴沉，灰云低垂，似乎要下雨了。

西边，连接地平线的地方，斜着一条弯弯曲曲的亮线，那就是湘江。

# 第七章 血漫湘江

1934年11月·湘江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一大早，一份空中侦察报告被送到了国民党“追剿军”第二路军指挥部，薛岳一看不禁万分惊愕：红军一部分部队已经渡过了湘江，并且占据了湘江西岸的滩头阵地。一支红军在湘江上架起了一座浮桥，浮桥上已陆续走过零散的队伍。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番号和位置已经明确，这些前几天还来去不定的红军，已经用南北两线构筑的阻击阵地形成了一个长廊式的通道。尤其是在南面，湘江上重要渡口界首的掩护阵地显然已被红军巩固；而在北面，全州附近的阻击线也清晰可见。在这条长廊式通道的东端，中央红军

的“大队伍”——国民党军飞行员几乎是惊叫着这么说——确定无疑是共产党武装的核心机关，正在向湘江靠近。

这是军事部署早已预料和防备的情形，但是真的发生了的时候还是令薛岳万分紧张。

作为蒋介石直接委派的中央军指挥官，薛岳不得不为可能出现的后果担心：眼下，南边的桂军虽然已经向界首靠拢，但是白崇禧是否真能与红军血战到底还很难说。而在北线，何键的湘军四个主力师中，到达全州防线的仅有陈光中的第六十三师和章亮基的第十六师，李觉的第十九师和陶广的第六十二师还在零陵通往黄沙河的公路上磨蹭呢。按照目前的形势，红军顺利地渡过湘江几乎没有问题——即使从文市算起，到达湘江渡口最多七十公里，行军速度再慢，一个昼夜也足够了，更何况红军向来一旦移动便快步如飞。如果真让红军渡过了湘江，即使有广西的白崇禧和湖南的何键在前边承担罪责，但是作为中央军的指挥官，自己也不可能完全逃脱干系。与共产党武装作战，目前是蒋介石的头等大事，贻误战机乃至纵敌逃窜，自己的仕途很可能到此为止了。可是，如果率领中央军向前冲击，不要说蒋介石亲自交代过中央军要尽量避免与红军正面作战，就是蒋介石真的下达了这样的命令，湘江上游的那个地段是白崇禧的地盘，中央军一旦进入了广西，哪怕仅仅是擦了个边，也可能会受到桂军的暗中袭击——这些可恶的地方军阀，没有中央军的监视，他们和红军一场像样的仗都不肯打；而如果打的是中央军，他们从来没有手软过。

薛岳左思右想得出的结论是：中央军绝不能直接冲到湘江岸边去，但至少可以派一支部队赶往广西境内的文市方向。在中央红军队伍的尾巴上打一下，这样总不会引起白崇禧的误会吧?

此时，“追剿军”第一路军司令刘建绪也有点慌了。红军大部队到达，渡江态势坚决，仅凭他那两个师恐怕根本不是红军的对手。如果把红军就这么放走了，自己在蒋介石那里一定罪责难逃；但如果让自己的两个师与红军作战，很可能要血本无归。刘建绪急忙给何键打电话请示，何键刚刚受到蒋介石的斥责，无奈之下，只有命令把湘军的另外两个师也调上去。于是，刘建绪立即命令李觉的第十九师和陶广的第六十二师火速赶往前线。接着，衡阳机场的电报也到达了第一路军指挥部，电报说已经接到何键的命令，立即出动十五架飞机为刘建绪部助战。到这个时候，刘建绪已经没有了任何退路，只能下决心在湘江岸边与中央红军决一死战。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刘建绪发布了第一道作战命令，命令全州防线上的湘军部队依托全州、桥头之线阵地夹击中央红军。第二天，刘建绪的又一个作战命令发布了：

1、据报，西窜之匪约五六万，其先头万余已在麻子渡、屏山渡等处渡过湘水，出没于路板铺、珠塘铺、沙子包、界首一带。我桂军主力在新圩、灌阳、龙虎关之线，其黄振国团在光华铺、卖猪岭一带。

2、我军以与桂军协歼股匪于兴［兴安］、全［全州］地区之目的，决乘匪主力未渡之前，先将渡河之匪歼灭之。

3、着陶广师为预备队，位置于五里牌、石角村中间之金家村附近，策应各方。

刘建绪决定在红军大部队尚未渡过湘江之前，先将已经渡江的那部分红军歼灭。就在刘建绪下达这道命令的同时，在国民党军湘江防线的南端，桂军第十五军军长夏威在距离界首西南二十公里的兴安接到了白崇禧的电报。白崇禧在电报中说，刚刚收到了委员长的电报，

委员长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认为是桂军把红军放走了。要求立即派出主力部队追击，“务使后续股匪不得渡河”。

在红军主力部队于南北两侧准备掩护军委纵队渡过湘江的时候，已经赶至湘江地区的国民党军均没作出相应的阻击。口口声声要“不负钧座厚望，与匪殊死一战”的湘军、桂军和中央军，这些吃着国民党南京政府调拨的军饷和物资的各路大军，出于什么意图和目的竟然使战场出现了这种情况？尽管在国民党军与红军的数年作战中，这样的情形曾经不断地出现——“各军相互掣肘，全无大局观念”——但是如今中央红军已置身在几近弹丸之地，为此蒋介石精心部署了把红军一举歼灭在湘江岸边的作战计划，可是至少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这一天的战场形势来看，国民党军的宏大军事部署等同了一张废纸。

蒋介石在给何键和白崇禧的电报中充满了怒不可遏的诘问：

迭电固守河流，阻匪窜渡，何以全州沿至咸水之线并无守兵，任匪从容渡河，殊为失策。窜渡以后，又不闻我追堵各队有何处置，仍谓集结部队，待机截剿。匪已渡河，尚不当机立断痛予夹击，不知所待何机？可为浩叹。为今之计，唯有一面对渡河之匪，速照恢先［刘建绪］、健生［白崇禧］所商夹击办法，痛予歼除；一面仍击匪半渡，务使后续股匪不得渡河，并照芸樵［何键］预定之计划，速以大军压迫。匪不可测，以迟滞匪之行动，使我追军得以追击及兜剿。总之，窜匪一部漏网，已为失策，亡羊补牢，仍期各军之努力，歼匪主力于漓水以东、四关以西地区也。前颁湘水以西地区剿匪计划，已有一部之匪西窜，并望即按计划次第实行，勿任长驱西或北窜为要。

在蒋介石的催促下，国民党军开始迅速向湘江渡口推进。但是，令蒋介石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二十八日，桂军第七军第二十四师覃连芳部到达了新圩以北地区，准备在中央红军“大队伍”的侧后发动攻击。在前出至攻击阵地的路上，桂军突然发现在他们的前面出现一支部队，紧张了一阵子之后，才辨明那是薛岳派出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的一个营。本是“友军”的两支部队乍一相逢就分外眼红，桂军长官白崇禧多次向桂军官兵灌输要坚决“拒中央军于广西之外”，于是，桂军根本就没想还要请示上司，毫不犹豫地就向中央军开火了。双方交战了一个小时，结果周浑元部的这个营全部被桂军缴了械。事后这个营的长官解释说，他们堂堂的中央军不是在向桂军投降，而是以为向他们开火的是红军主力部队。

战斗进行的时候，桂军第十五军军长夏威和参谋长蓝香山就在附近观战。

中央军的一个营被桂军缴械之后，周浑元部反倒派人来向桂军道歉，反复说明中央军是来寻找红军作战的，根本没有进入广西的意思。但是白崇禧还是不放心，他专门与湘军第十九师师长李觉通个电话，核实中央军的真实意图，李觉说“薛岳的部队已经沿着黄沙河向湖南方向去了”，于是这场“误会”最终以桂军把缴获的人和枪还给中央军方面了事。

全州，位于中央红军军委纵队即将渡江的通道的右翼，湘军刘建绪部的两个师先于红一军团到达了那里，这使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被迫建在了觉山的脚山铺一带。这里向北距离全州十六公里、向南距离界首三十公里，与湘江并行的一条公路从这里穿过，公路的两侧是起伏的丘陵。虽然地形并不适合展开阻击战，但此时红一军团只能选择这里了。

担任阻击任务的二师刚刚挖好工事，湘军就开始了试探性攻击。从湘军设在山上的炮兵阵地发射的炮弹暴雨一样落在红军的阵地上。从衡阳机场起飞的飞机也到达了脚山铺上空，开始俯冲投弹。如此猛烈的炮击和轰炸，即使是身经百战的红一军团的官兵也不多见，这种预示着一场大战即将来临的攻击，令挖了一夜工事还没来得及休息的红军官兵骤然紧张起来。接近中午的时候，湘军发起了地面攻击。红一军团指挥员从望远镜里看去，冲击上来的湘军黑压压一片——“像蚂蚁一样，把整个山坡都盖满了。”红一军团各团的阵地都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之中，因为红军官兵的弹药十分紧张，缴获来的子弹几乎都给了机枪手，普通官兵手中的步枪子弹全部是红军兵工厂制造的“土弹”。为了节省弹药，红军有这样一条规定：不到步枪的有效射击距离内，任何人都不准开枪。

湘军成群地往山坡上爬。红军阵地上的沉默让他们产生了误会，他们认为在猛烈的炮击和轰炸中，红军已经丧失了战斗勇气。但是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当他们就要接近红军的阻击阵地时，红军突然间开火了。

虽然二十八日攻击红一军团阻击阵地的湘军只有两个师，但在兵力、火力上与红军比还是占据了绝对优势。敌人的炮弹很快就把红军仓促修筑的工事炸塌了，巨大的爆炸声把阵地上的不少官兵震得耳鼻出血。虽然湘军的攻击被一次次击退，但是敌人依靠着兵力充沛，前面的撤下去后面的接着冲上来，一轮接着一轮，双方多次发生近距离的搏斗，厮打声在整整一个白天几乎没有间断。

在通道左翼的新圩方向，战斗几乎同时开始了。新圩距离湘江渡口七十公里，扼守着通向湘江的一条公路，是桂军向北攻击湘江渡口的必经之地。公路的两边是长满杂草的丘陵，丘陵的后面就是一片平

川。在这里设置阻击阵地，是没有退路的绝地。红三军团的前卫部队五师奉命在这里阻击桂军，军团长彭德怀给五师师长李天佑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在这里坚持四天。”

二十八日天刚亮，桂军第七军的攻击就开始了。武器精良的桂军从士兵到军官都没有把红军放在眼里，他们认为红军虽说打仗不要命，但是毕竟武器太简陋。而数架作战飞机和数十门大口径火炮的支援，也给桂军官兵长了胆量和信心，这使桂军一开始的攻击就显得十分凌厉凶猛。但是，当红军阵地上发射出炮弹的时候，桂军官兵一时间全都愣住了，因为他们从未听说红军有大炮。原来，彭德怀深知新圩阵地对于保障军委纵队安全渡过湘江的重要性，他把中革军委配属给红三军团唯一的一个炮兵营加强在了这里。

打了一整天，桂军虽然夺取了公路附近的几个小山包，但是付出的代价却是五百多名官兵的性命，这个结果使桂军感到了与红军主力部队作战的恐惧。红三军团五师的伤亡也在数百人。时任五师十五团政委的罗元发后来回忆道：“敌人离我们很近，炮火打得到处烟雾漫天，很快就分不清敌我战线了。一营在前面的战斗最激烈，当敌人一个营的兵力冲上来以后，被我们打了下去，随后整营整团的敌人就暴露在我军阵地前，向我前沿冲击，很快就冲到我前沿阵地几十米处。我炮兵营的大炮猛烈地向敌人发起轰击，炸弹声和我们的手榴弹声连成一片。经过激烈的战斗，敌伤亡惨重，惊慌溃退。第一天的战斗，我们打垮了敌人的多次进攻，阵前留下了遍地尸体，我团也伤亡一百三十多人。”

桂军出师作战不利的战报被迅速报给了白崇禧，白崇禧立即命令查一下在新圩与桂军作战的到底是中央红军的哪支部队。调查的结果让白崇禧的心情更加阴郁不安了：红三军团五师由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广西百色起义的部队发展而来，当时起义的参加者有桂军的警备大队和教导队，所以这支部队从师长李天佑到大多数官兵都是广西人。

十一月二十八日这一天，担任中央红军后卫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在文市的水车地区也开始了对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的阻击战斗。朱德给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和政委李卓然发了电报，电报命令第五军团无论如何也要在军委纵队的侧后方阻击敌人至二十九日晚。第五军团在掩护军委纵队的安全的同时，也要掩护第八、第九军团向湘江渡口方向移动。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的先头部队在与桂军发生了误会之后，桂军有意把部队向后撤了一段距离，这让周浑元部不得不面对中央红军后卫部队的阻击。周浑元的部队对红五军团的攻击凶狠而猛烈，因为他们知道这里是中央红军最薄弱的部位，只要冲过这道阻击线，就可以直接追击共产党武装的主力部队了。

这个早晨，军委纵队的大队人马从文市向西出发，根据他们的行军速度，走不了多远定会进入国民党中央军的合围中，而这也正是蒋介石所期待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的一〇〇团是全师阻击阵地的前沿部队，面对周浑元部整整四个师的攻击，这个团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和牺牲。战斗到最激烈的时候，阵地上所有的掩体全部被敌人的炮火摧毁，但是连同负伤的人在内，红军没有一个人退缩。一位福建籍的连长肠子被打了出来，鲜血把半个身子都染红了，他用手按着腹部，斜靠在指挥位置上边射击边不断地喊：“同志们！咱们没有退路，身后面就是党中央！”当又一次把敌人打下去的时候，红军官兵发现连长的呼喊声已经停止了。官兵们把自己的连长从落满炮灰和子弹的阵地上抱起来，没有了呼吸的年轻的红军连长眼睛瞪得滚圆，一只手已经被炸断，但食指依旧紧紧地按在驳壳枪的扳机上。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是军委纵队安全地渡过湘江的最后时机。此时，在军委纵队的左、右两翼，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对从南、北两面夹击而来的国民党军进行着顽强阻击，使界首至全州之间宽三十公里的通道依旧畅通无阻。湘江上的浮桥已经架设完毕，渡口四周除了天空的敌机之外，没有国民党军队到达。如果在二十八日夜晚来临的时候，或者是在二十九日天还未亮之前，军委纵队能够到达湘江并且迅速过江，整个中央红军的命运也许会是另外一种走向。但是，十一月二十八日，由朱德签署的红军行动部署向各军团表明：我军“至三十日止全部渡过湘水”。行动部署还表明：二十九日，军委纵队将到达“石塘圩以东之官山”——从地图上看，军委纵队二十八日晨从文市出发，二十九日到达位于文市西南方向的石塘圩，一天一夜之间仅仅前进了不到二十公里。

军委纵队缓慢的行军令红军官兵在湘江上构成的那条走廊式的通道静静地等了整整三天。在这三天里，通道的南北两线是日夜不断的密集的火网，而在通道的中间则是碧绿舒缓的寂静的江水。中国革命史中异常惨烈的战斗在这三天里发生了。

在通道的左翼，中央红军有两个阻击地点，一个是湘江边上的界首，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指挥部就设在那里；另一个是名叫新圩的小集镇，集镇位于文市西南方向中央红军的侧后，横跨在灌阳至湘江渡口的公路上。奉命在新圩阻击桂军进攻的是红三军团五师。因为十三团被军团部调去直接指挥了，五师这时候实际上只有十四、十五两个团。二十八日，红军官兵刚把阻击工事挖好，桂军的队伍就开过来了。红军与桂军刚一交战，战斗的残酷性立即让五师师长李天佑想到了高虎脑战斗。红三军团五师在保卫中央苏区的高虎脑战斗中，面对国民党军作战飞机倾泻下的数千发炮弹，面对国民党军六个师在大炮

掩护下的进攻，阵地上所有的红军官兵无不舍生忘死，每个人都准备为保卫苏区流尽最后一滴血。战斗进行到最后的时刻，五师阵亡的团以下干部达三百二十四名，阵地虽已经成为一片焦土，但是依旧在红军官兵的脚下。年仅二十岁的红军师长李天佑出生在广西临桂，十五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著名的百色起义，历任红军排长、连长、团长，因作战勇敢获得过“红星”奖章。一九三四年，在国民党军“围剿”中央苏区的最危急的时刻，他出任了红三军团五师师长。身经百战的李天佑预感到，新圩阻击战也许比高虎脑战斗还要残酷。

当时的国民党军对桂军的评价是：打仗狡猾且又固执，一旦打红了眼就分外凶狠。二十九日天刚亮，桂军对新圩的攻击又开始了。桂军的火力异常猛烈，飞机投下的炸弹把红军的阻击阵地几乎炸成平地。除了正面进攻之外，桂军还派出数支小部队不断地迂回，试图切割红军的防线。五师在战斗开始后不久，丢失了前沿的几个小山包，原因是坚守在阵地上的红军官兵全部牺牲了。战斗持续到中午，在漫天的硝烟中，李天佑师长站在指挥所的掩体上已经忘了头顶上盘旋的敌机，因为不断从他眼前抬下去的负伤和牺牲的官兵令他万分焦急：十四团政委负伤了；十五团团长白志文和政委罗元发都负伤了，两个营长也已经牺牲，全团伤亡已达五百多人。虽然阵地仍在，但李天佑还是盼望这样的阻击战早点结束。军团指挥部的电报不断到达，电报的内容全部是“继续坚持”。

没有了军政主官的十五团需要有人指挥，五师政委钟赤兵向十五团的阻击阵地冲了上去。由于阻击阵地被不断压缩，敌人的炮火已经打到了师指挥所。李天佑把十四团团长黄冕昌叫来了，准备当面向他布置反冲击任务。但是，当黄团长的身影刚从硝烟中冒出来的时候，一个不幸的消息又传来了：在前沿指挥战斗的师参谋长胡震中弹牺

牲。李天佑心头一阵撕裂般地剧痛，他和胡震相识于瑞金红军学校，这个和他年龄相仿的战友坚毅、勇敢、乐观，无论五师承担多么艰巨的战斗任务，只要有参谋长胡震在，李天佑的心里就能踏实许多。战斗开始的时候，胡震对团长们交代任务时大声地说："无论如何不能在阻击阵地上撤退一步，要把命豁出去在这里死顶！如果让敌人冲过这里，中央纵队就要被拦腰截断，绝不能让党中央和中央纵队受到任何损失！"说完他亲自带领团长们上了前沿。李天佑双眼湿润了，在向黄冕昌交代任务后，他强调说："记住胡参谋长的话，只要阵地上还有一个人，就不能让敌人过新圩！"黄团长敬了个礼，转身消失在炮火中。李天佑回到师指挥所不一会儿，电话响了，是十四团打来的，十四团的一个连长报告说："团长在和敌人的搏斗中牺牲了。"十四团团长，那个几分钟前在向师长敬礼的时候还微笑了一下黄冕昌！李天佑抓起电话大声地喊："我们是红军！我们是打不散的！"说完，他拿起自己的驳壳枪冲出了指挥所。

在新圩的西北方向，湘江岸边的界首距离军委纵队的渡河地点仅仅几里地。二十九日清晨，这里的战斗是在熊熊大火中开始的，敌机扔下的燃烧弹把红军的阻击阵地烧成了一片火海。红三军团四师的官兵顶着数倍于己的敌人的疯狂进攻，他们的顽强坚守使整个前沿阵地几乎成了一个巨大的肉搏场。

位于最前沿的是四师十团，这个团在无险可守的开阔地上与敌人拉锯般地来回争夺阻击阵地，交战的惨烈致使这片开阔地上布满了桂军和红军的尸体。十团团长沈述清身先士卒，当敌人再一次冲上来的时候，他一声呐喊从掩体中跃出，带领官兵开始了不畏生死的反冲击。但是，搏斗中沈述清的呐喊猝然停止，这个一九三〇年参加红军的湖南青年身中数弹，一头栽倒在被鲜血染红的泥浆里。彭德怀得到

沈述清牺牲的消息后，冲出指挥所奔上前沿。在前沿指挥战斗的四师政委黄克诚大喊：“你下去！太危险！”彭德怀不理会，当即任命红三军团四师参谋长杜中美为十团团长。时年三十五岁的杜中美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彭德怀站在前沿阵地上问四师师长张宗逊现在哪里，得到的回答是在前沿的最前边。彭德怀发火了：“把他给我拉下来！”彭德怀那一刻想到的定是张宗逊师长的前任洪超，他对那个骑在战马上冲锋的年轻而勇敢的身影难以忘怀，他不愿意听到四师又一个师长阵亡的消息。在黄克诚的竭力劝阻下，彭德怀回到了军团指挥所，然而身后跟进来的人报告说，十团团长杜中美刚刚牺牲了……

位于通道右翼的红一军团的正面是湘军。

二十九日清晨，经过了昨天一天的战斗，红一军团二师的官兵正在战壕里吃饭，湘军的炮火准备就开始了，与炮火同时袭来的还有天上十几架飞机的轰炸。与二十八日相比，湘军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了不惜代价的战斗决心。红一军团的脚山铺阵地位于一片小山岭上，这些山岭有着古怪的名字：尖峰岭、米花山、美女梳头岭和怀中抱子岭。湘军的炮火和炸弹几乎把所有的小山岭一一覆盖，山岭上被打断的树枝横飞乱舞，泥土被一次次地掀起来，把红军的工事全部压塌。湘军在这次战斗中使用了燃烧弹，燃烧弹接连爆炸，令脚山铺的每一个小山岭都如同火炬般熊熊燃烧。几次近距离的战斗后，红一军团的前沿阵地相继丢失。红军强行发动了反冲击，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红一军团二师赶到了。

二师自从被留在道县担任后卫阻击任务以来，一直在与紧追不舍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作战。当他们接到了立即向全州方向增援的命令后，即刻从整个红一军团序列的最后面不停歇地奔跑了一天一

夜，终于到达了军团最前面的阻击阵地。下午，红一军团一师扼守的米花山阵地的第一道阻击线被湘军突破，接着，美女梳头岭前沿阵地也被敌人占领，一师奉命在师长李聚奎和政委赖传珠的率领下向第二道阻击阵地转移。转移的时候，一师三团的两个营陷入了敌人的包围之中。其中的一个营从敌人的空隙中突围而出追上了主力，另外一个营因突围方向上的误差在密林中迷失了方向。当四周都响起了敌人的枪声时，部队出现了一时的混乱，营长对大家说："同志们不要急，我有把握！政委告诉过我，有紧急情况让我们向右面的大山靠拢，跟我走！"

此刻，在由二师扼守的尖峰岭阻击阵地上，只有五团政委易荡平率领的两个连了。面对号叫着冲上来的黑压压的湘军，两个连的红军官兵一直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子弹没有了，就和敌人抱在一起用拳头打、用牙齿咬。易政委负伤倒在了血泊里，敌人端着刺刀冲过来时，他命令自己的警卫员向他开枪。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政委易荡平，湖南浏阳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是一位优秀的红军政治干部。警卫员哭了，不忍心这么做，易荡平一把夺过警卫员手里的枪，同时高喊道："快走，赶快突围！"然后朝着自己的头部扣动了扳机。易荡平牺牲时年仅二十六岁。

在五团的阵地被敌人占领之后，四团的阵地也已被敌人三面包围。二师师长陈光送来命令，让四团撤到第二道阻击阵地去，但是为了迟滞敌人的攻击速度，为西进的军委纵队多争取哪怕一分钟的时间，四团边打边撤，始终和敌人纠缠在一起。湘军在公路上以宽大的正面展开了快速突击，公路左侧的一营已经和敌人厮杀成一团，本来是团指挥所的位置现在变成了肉搏战的前沿。团长耿飚被几个警卫员围着，警卫员不断地向敌人扔出手榴弹，但是敌人还是潮水般地拥了

上来。警卫员杨力说："团长，我们掩护，你赶快撤退！"耿飚却大喊一声："拿我的马刀来！"马刀一举，寒光凛冽，耿飚率领着四团的战士迎面向敌人冲击过去。混乱的砍杀中，耿飚浑身上下溅满了敌人的血浆。待敌人暂时退下去时，强烈的血腥气味让这位经历过无数恶仗的红军指挥员蹲在地上呕吐不止。四团政委杨成武看见一营有了支持不住的迹象，于是想穿过公路去一营指挥战斗。但是，他刚一跑上公路就被一连串的子弹打倒了。身后的战士想冲上来营救他，但是敌人的子弹密集如网。湘军也许看出这个被打倒的红军是个干部，于是叫喊着向这里冲来："抓活的！抓活的！"这时，五团五连指导员陈坊仁正好转移至此，一见这一情景立即奋不顾身地冲了上来组织火力掩护。四团二营副营长黄古文带着几名战士迎着敌人密集的扫射向他们的政委一点一点地爬过去。倒在地上的杨成武眼看着爬向他的战士一个个中弹心如刀绞，他躺在公路上大喊："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但是，战士们还在向前爬。黄古文终于爬到了杨成武的跟前，他抓住杨成武的一条胳膊就向公路边拖，拖到公路边之后，被敌人的疯狂射击激怒了的黄古文把杨成武交给了警卫员白玉林，自己端起一挺机枪转身向敌人冲去。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当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于北、南两线与湘军和桂军展开殊死战斗的时候，湘江上那条关乎红军命运的通道依旧敞开着。这一天，尽管各部队的指挥员都因部队出现的巨大伤亡而十分焦虑，但是，军委纵队距离湘江渡口仍有三十公里的路途。

三十公里仅仅是野战部队一个短促冲击的距离，但是中央红军各军团接到的电报显示："军委纵队要完全渡过湘江，至少要在十二月一日的晚上。"

十一月二十九日这一天，周恩来和朱德赶到了湘江边上的界首，并在湘江东岸开设了指挥部。此刻，他们已知道了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各个阻击阵地上的情况，他们也收到了各军团催促军委纵队尽快渡江的电报。但是，根据他们的计算，即使到十二月一日，军委纵队也不可能全部渡过湘江。为了确保军委纵队的安全，周恩来和朱德要求红一、红三军团无论如何要把敌人阻击住，以确保湘江上通道的完整和畅通。同时命令红五军团坚决堵住从后面追击上来的敌人，一直到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为止。

三十日，天气晴朗。

就在军委纵队开始从官山附近向湘江渡口接近的时候，红一、红三军团的阻击阵地在敌人的猛烈进攻下被严重压缩着。红一军团在退守到第二线阻击阵地后，湘军四个师的进攻在火炮和飞机的支援下更加猛烈。红军前沿阵地上的各团指挥所已经基本失陷，各团团长根据炮弹坠落时发出的声音判断出落点的远近，然后他们从一个弹坑跳到另一个弹坑继续指挥战斗。红军官兵们俯在被炸弹炸松的灰土中躲避着弹片，那些还没来得及转移下去的伤员不少被埋在了坍塌的工事里。红一军团二师师长陈光在向团长们通报要动用师预备队的时候，团长们突然问：“军委纵队渡江了吗？”陈光师长回答：“渡了一半！”

湘军冲击的兵力超过了阻击他们的红军十倍以上。

红一军团的预备队六团上来之后，并没有使情况好转，各师各团的建制都在激战中被打乱，红军战士只能从团长们身上背的装地图的袋子分辨出谁是指挥员，然后根据不管是哪个团的指挥员的命令，哪里出现危机就不顾一切地冲向哪里。在已经无法在现有的阵地上继续有效地阻击敌人的进攻的时候，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

臻联合署名，直接给朱德发了一封电报，要求军委纵队和仍在湘江东岸的红军部队无论如何要在三十日晚渡过湘江。

我军向城步前进，则必须经过大埠头，此去大埠头，经白沙铺或咸水圩。由脚山铺到白沙铺只有二十里，沿途为宽广起伏之树林，敌能展开大兵力，颇易接近我们，我火力难发扬，下面又太宽，如敌人明日以优势猛进，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状况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一、二师明天继续抗敌。

这封电报表明第一军团的作战能力已经消耗到了极限。

红一军团要求各部队坚守阵地的电话几乎没有停止过。左权的嗓子已经喊哑了，聂荣臻不断地与阵地指挥员保持着联络，军团部里只有林彪默不作声。年仅二十八岁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是个沉默寡言的青年，他被他的对手何键和薛岳称为“朱毛赤匪中最有计谋的干将”。出生于湖北黄冈的林彪十九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学员。毕业后他在国民革命军叶挺部当见习排长，随即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湘南暴动。凭借着与年龄并不相符的对作战的独特的感悟力和把握力，林彪从营长开始，团长、纵队司令员、军长一路升迁，二十五岁时，他已经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他可能是个索然无味的人，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爱好，唯一能够吸引他的就是作战地图和沙盘。林彪曾经写过一篇名为《论短促突击》的军事文章，受到李德的赞赏，李德说他是“最有头脑最有前途的红军指挥员”。尽管这篇文章后来成为林彪赞成李德错误军事路线的一个证据，但史实中难有更充分的实据说明他与李德有更深的交往。恰恰相反，林彪始终受到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老资格共产党人和红军领导人的信任。对于中央红军目前所面临的危机，林彪忧心忡

忡，因为红一军团已经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损失。但是，无论在多么混乱的场合，林彪总是能够在没完没了的踱步中把自己的思路调整到具体的作战方案上来。

凌晨一时半，中革军委的电报到了，其中对红一军团的指示是："一军团全部在原地域，有消灭全州之敌由朱塘铺沿公路向西南前进部队的任务。无论如何要将汽车路向西之前进诸道路保持在我们手中，在湘水东岸只留小的侦察部队。"

仅仅两个小时后，又一封电报到了，这次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名致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电报：

林、聂、彭、杨：

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退则我野战军将被敌层层切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的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中央局 军委 总政

十二月一日三时半

这是对红一、红三军团全体官兵的最后的战斗动员——"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这个夜晚，在红一、红三军团的阻击阵地上，

到处是红军干部宣读电报的声音："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根据电报的要求，已经在阻击阵地上浴血奋战了三天的红一、红三军团至少还要在阻击阵地上坚守整整两天。

此时的湘江渡口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人流旋涡。

从三十日上午开始，军委纵队的人马陆续到达了湘江渡口。远远地，由成群的驮着重物的马匹、被战士和民夫搬运着的大行李和一眼望不到边的挑夫组成的队伍黑压压地滚滚而来。军委第一纵队缓慢地走上了浮桥。炮弹在江水中爆炸，掀起了冲天的水柱，浮桥开始摇晃，受惊的马匹惊叫着不肯上桥，马夫和战士们咒骂着、抽打着，慌乱的马匹加剧了浮桥的动荡。大行李把浮桥堵塞了，战士们大声喊叫着，催促着前面的人赶快让路。后面又走上来一支队伍，是红军的剧团！小红军已经很疲惫了，抬着的大箱子摔裂开，花花绿绿的服装和道具撒了出来，小红军一边收拾一边哭。突然，一颗炸弹在距离浮桥很近的地方爆炸了，桥上的人马全被掀翻到江里，人在游水，马在挣扎，江面上漂浮着文件、传单、苏区的纸币和大大小小的书籍……从江水中重新爬上浮桥的小红军突然扯开嗓子唱起了红军编创的京剧《骂蒋介石》：

听罢言不由我怒火冲头

骂一声蒋介石细听从头

你那年在广东点兵北走

欺骗我工农兵去做马牛

出湖南打江西攻下汉口

哪一仗不是我工农战斗

旧军阀都被我英勇赶走

实指望工农兵得到自由

哪晓得到武汉你又反口

见着那革命人都要杀头

到一处烧一处残酷野兽

只杀得遍地里血似水流

你还说中国内没有对手

遇到了共产党是你对头

工罢工农抗租地主打倒

贪官们土豪辈也要赶走

白匪狗你胆敢与我决斗

我红军杀得你片甲不留

那一刻，湘江上所有的嘈杂之声突然沉寂了，天地间回响着小红军带着童音的唱腔。

十二月一日凌晨，中央红军于湘江南北两翼部署的阻击线都已被压缩到了通道即将被完全封闭的状态。从阻击阵地上送来的告急电报一封接着一封，已经数天没有吃饭睡觉的周恩来和朱德面容极度消瘦而又极其严峻。他们知道，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到了。

这个夜晚，中央红军第八军团的官兵没有听见“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的朗读声，他们在茫茫的夜色之中踏上了艰险的撤离之路。

自军委纵队从道县出发后，第八军团一直跟随着第九军团向道县西南方向的江华、永明方向前进，任务是保卫军委纵队侧后的安全。但是，渡过潇水之后，中革军委突然命令他们赶赴灌阳的水车地区，与在那里的红三军团六师取得联系。这一命令意味着第八军团必须返回道县，然后前往位于道县西南方向的灌阳。后面的敌人追击得很紧，第八军团没有动员就匆忙上路了。由于始终没能与红三军团六师联络上，部队走走停停，速度缓慢。不少官兵由于极度疲劳，倒在路边就睡着了，任凭干部们如何催促也醒不过来。为了让他们不至于掉队，干部们只好朝天开枪，用枪声警示这是危机四伏的战场。

十一月三十日夜，第八军团终于到达水车，但红三军团六师已经奉命前往新圩去增援阻击部队了。在水车，第八军团遇到了另一支红军部队，一打听，原来是红五军团三十四师。三十四师是整个中央红军的后卫，这就是说，跟在三十四师的后面，第八军团成了整个中央红军最后面的部队。

第八军团从水车出发的时间是三十日午夜。出发时他们依旧跟在第九军团的后面，而留在水车阻击敌人的是红五军团的三十四师。部队刚一上路，右翼就传来激烈的枪声和爆炸声，然后是左翼。接着传来一个更可怕的消息：两个师的敌人正从第八军团的后面潮水般地卷过来。而在第八军团的前面，也就是第九军团的方向，山腰丛林中突然响起了步枪声和机枪声。难道第九军团已经不在前面了？后来才知道，桂军已经插到了第九军团与第八军团之间。

桂军的突然插入令第八军团处在了前后受敌的境遇里。军团长周昆在万分危急中下达了命令：二十三师断后，其余人员向前冲击。但是这时候，前方的各个通路都已被桂军占领。很快，第八军团的队伍就被蜂拥而来的敌人切割成了若干部分。

天黑下来了，黑暗中的交战极其混乱也极其惨烈。

到第二天天亮的时候，战场上到处都是第八军团丢下的行李、伙食担子、马匹和担架。

军团宣传部部长莫文骅带领一部分官兵向湘江方向奔去，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一步步地向红军主力部队靠近。莫文骅一口气跑出二十多里地，红军官兵进入了一个漂亮的小镇子。莫文骅从镇上老乡的口中打听到，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已经渡过了湘江，这里距离湘江还有约四十多里路。于是他决定队伍不休息继续向前赶。一出小镇，莫文骅发现路边有一大堆书籍，这个场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后他依旧清晰地记得那天阳光微红，“马路旁边这一堆那一堆的军事、政治书籍，有的原本未动，有的扯烂了，有的一页一页地散了一地……里面有列宁主义概论，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土地问题，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有战略学，还有许多地图、书夹、外文书籍等……”这是莫文骅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所获得的极其难得的温暖感受。不久之后，他和他所带领的红军官兵就与追击而至的敌人展开了激战——“肉搏数次，剧战几个小时。”

直至十二月一日下午，由第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带领的一部分官兵才摆脱敌人的追击到达湘江岸边。湘江上的浮桥已被炸断，罗荣桓一脚迈进了江水里，江水的寒冷令他几乎无法站稳，但是他和官兵九死一生就是为了渡过这条大河，罗荣桓在刺骨的江水中坚定地朝

对岸走去。终于踏上了湘江的西岸，罗荣桓转过身来，发现自己的身后只剩了一个年龄很小的红军战士。戎马征战多年的罗荣桓顿时热泪盈眶——这位红军小战士的肩上居然还扛着架油印机，原来他是一名红军的小油印员。

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是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夕在苏区仓促组建的部队，部队几乎全部是由没有任何战斗经验的新兵组成。军团长周昆，政治委员黄甦，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一九三四年十月，第八军团从中央苏区出发的时候，其实力在中革军委的统计表格上显示为一万零九百二十二人。至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初，第八军团最后回到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人员不到一千人，其中战斗人员仅为六百人。

十二月一日清晨，湘江上雾气弥漫。军委纵队依旧在敌机的轰炸下渡江，由于行李和物资在江边越堆越多，因此渡江的速度更加缓慢。傍晚六时，中央红军野战军司令部向红一军团发出的战场通报是：灌阳敌人占领新圩，正向我追击。“三十四师及六师二团被切断”。八军团情况不明。“五军团无联络”，但估计主力已经渡江，正向麻子渡方向前进。“四师一部在光华铺被敌截击。五师及六师尚未完全抵达”。向红三军团发出的战场通报是：“六师十八团于陈家背被切断”。“桂敌已前出到古岭头地域，我八军团被打散，估计该敌将向麻子渡西进”。“全州之敌已进到朱塘铺，明二号将会向界首前进”。

红三军团新圩阻击阵地的丢失，使桂军从南面向中央红军的中后部直插过来，不但将担任后卫任务的红军部队通往湘江渡口的路完全封堵，同时桂军还得以从东面向即将到达渡口的军委纵队的后续人马压了过来。此时负责守卫通道左翼的红三军团只剩下界首一个阻击点了，红三军团使用了所有的部队在这个几乎位于渡口的阻击点上顽强

战斗。而在右翼红一军团的阵地上，激烈的混战场面一直延续着。在被聂荣臻称作“战斗最激烈的一天”里，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上到处响彻着红军干部“一切为了苏维埃”的呼喊。在密集的枪炮声中，前沿的三团阵地再次被敌人突破，三团的红军官兵以慷慨赴死的勇气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击。在一、二师的接合部，湘军终于撕开了一个口子，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被敌人三面包围，二师的指挥所已经处在了一片枪炮声中。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四团团长耿飚看见军团保卫局局长罗瑞卿提着张开机头的驳壳枪出现在阵地上。耿飚不由得紧张起来，因为他知道，自凌晨三时起，军团保卫局组织了一支由红色政工人员组成的战场执行小组，这个小组的唯一任务就是在战场上督战。在“左”的路线仍在影响着中央红军的时候，战场执行小组的权力很大，拿耿飚的话讲：“谁在作战时弯一下腰，也要被认为是‘动摇’而受到审查，轻则撤职，重则杀头。”在阻击战已经白热化的关头，保卫局局长的出现显然不妙。果然，罗瑞卿直奔耿飚而来，他用枪指着耿飚的脑袋吼道：“为什么丢了阵地？快说！”罗瑞卿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时负伤，至今腮上仍有一道伤疤，此刻这道伤疤令耿飚觉得格外异样。耿飚说：“全团伤亡大半，政委负伤，我这个团长都和敌人拼了刺刀。在敌人十倍于我的情况下，接合部是在阻击阵地上的官兵全部牺牲的情况下丢失的。”四团参谋长在一旁补充道：“我们正在组织突击队夺回阵地。”罗瑞卿仍是怒气未消：“四团不该出这样的事情。立即组织力量把阵地夺回来。”接下来他的话语才缓和了：“中央‘红星’纵队才渡了一半，阻击部队必须坚持住。”他掏出一支烟递给耿飚，“指挥战斗披着条毯子，像什么话嘛。”警卫员赶紧解释说：“我们团长一直在‘打摆子’发高烧！”耿飚并没有因为罗瑞卿语气缓和而轻松，他的脸色格外凝重了，耿飚说：“这里的每分钟都得用命来换！”罗瑞卿没再说什

么，转身下了阵地，走了几步回头对耿飚的警卫员说："过了江，给你们团长搞点药。"

耿飚事后才知道罗瑞卿怒火万丈冲上阵地的原因：从红一军团一师、二师失守的接合部冲进来的敌人，竟然一直冲到了红一军团指挥部的跟前。当时林彪、聂荣臻、左权正在看地图，警卫员冲进来报告的时候聂荣臻还不相信，出去一看竟吓出一身冷汗，国民党军端着刺刀已经从山坡下爬了上来。聂荣臻一面命令收拾电台撤离，一面指挥警卫部队反击，并且派人去告诉正在另外一个山窝里指挥作战的二师政委刘亚楼。派出的那个红军士兵在快速奔跑中草鞋被敌人的子弹打掉了，但是他的脚居然没有受伤——聂荣臻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奇特的场面。"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中午，李德和博古终于到达了湘江东岸。眼前的情景令他们十分震惊：天上数十架敌机轮番俯冲，即使浮桥已经断了，轰炸和扫射依然猛烈，江水不时地被激起数道水柱。那些还没被炸断的浮桥在爆炸声中剧烈地摇晃，桥下湍急的江水中红军工兵们正在冒死抢修。湘江江面上漂浮着竹竿、木板、各种杂物以及人和马的尸体。浮桥上拥挤着行进的队伍，人声马嘶鼎沸，不断又有人和马跌入江中。在江边的渡口处，除了等待渡江的人群外，还堆着没有炮弹的山炮、印刷机、缝纫机、机床零件、行李、炊具、担架、书籍……指挥渡江的周恩来在混乱的人群中发现了躺在担架上的邓颖超，这副担架被蔡畅等人抬着正跌跌撞撞地向江边靠近。然后，周恩来看见了毛泽东。头发长长的毛泽东向湘江岸边走了过来。在环视了这个极其混乱的渡口之后，他对周恩来说："恩来，我们到了。"周恩来说："安全到了就好，立即过江吧。"

这时，从界首方向冲来的桂军距渡口仅剩不足两公里了。

敌人的子弹已经打到了浮桥上。

毛泽东走上了浮桥。

傍晚的湘江上夕阳低垂。

军委纵队在缓慢地过桥。

至十二月一日十七时三十分，包括李德和博古在内的军委纵队全部渡过了湘江。

但是，湘江以东，还有尚未过江的红军部队。

萧华率领的少共国际师完成阻击任务后，发现通往湘江渡口的路上已经布满了敌人。师政治部立即决定开展“飞行政治工作”——所谓“飞行政治工作”，就是在战斗中进行的“紧急政治工作”。少共国际师的领导最后向这群饥渴疲惫的红色少年发出的战斗口号是：“生死存亡在此一战！”

为了突破敌人的包抄，少年红军不断发起殊死的攻击。十二月一日，少共国际师已经接近了湘江渡口，但是四面的敌人把他们围得很紧，他们只有不顾一切地拼死扑向渡口的方向。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少年红军终于闻到了江水的气息，看见了出现在眼前的那条大河，他们一齐扑进了让他们付出了巨大牺牲的河水中。江对岸，岸边的泥土潮湿而柔软，少年红军一一爬上岸的时候，在大山的巨大阴影里，他们看见了聚集在一起的红军主力部队，然后看见了胡子很长的周恩来，周恩来说：“小鬼们！大家都好吗？”

没能渡过湘江的还有担任整个中央红军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

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三年前还是一名国民党军的高级军官。他一八九五年生于河北新河，二十八岁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之后参加了冯玉祥的西北军，从连长一直升至师长。一九三〇年，西北军被改编为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董振堂出任第二十五师七十三旅旅长，不久被调往江西参加“围剿”中央红军的战斗。第二十六路军官兵皆为北方人，董振堂说：“我们部队的士兵有四怕：一怕跟红军打仗，二怕害病，三怕下雨，四怕吃大米。部队伤亡得这么多，士气很低落……”第二十六路军备受蒋介石歧视，为了让第二十六路军坚守“围剿”前线，蒋介石甚至将其在南昌的留守处抄了。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董振堂率部在“围剿”中央红军的前线宁都起义，起义部队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第二年董振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夏出任红五军团军团长。中央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后，董振堂率领红五军团位于整个红军队伍的最后，担负着万分危险的殿后掩护任务，董振堂知道自己必须随时准备付出生命。两年后的一九三六年，新年刚过，董振堂率红五军进至甘肃西北的高台县时，被八倍于己的马步芳的匪军包围。红军激战八天八夜之后，董振堂身边只剩了两个警卫员和一个司号员。黑压压的敌人冲了过来，董振堂因左腿中弹卧在地上用双枪轮番向敌人射击，直至给自己剩下最后一颗子弹……马步芳的匪兵将董振堂的尸体绑在大炮炮口上，然后将炮弹轰出了炮膛——四十一岁的红军军团长董振堂的生命如烟花一般向天空腾起，然后缓缓飘落在中国西部辽阔的土地上。

当红一军团抢占道县的时候，红五军团在远离军委纵队两百多公里的土地圩附近阻击着粤军和湘军两个师的追击。三十四师和六师的十七、十八团相互配合与敌人激战了两天两夜，保证了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顺利地渡过了潇水。

十一月二十五日，军委纵队离开道县，开始向湘江渡口方向行进，红五军团主力部队紧跟着到达道县以东地区，接替了红三军团四师的阻击阵地。这时，军团首长接到了中革军委的命令，命令要求红五军团三十四师留在原地“坚决阻止尾追之敌”，以掩护行动缓慢并且走了弯路的第八军团，同时担任整个中央红军的后卫。也许因为意识到三十四师将面临极其危险的处境，命令还特别指出：“万一被敌截断，返回湖南发展游击战争。”

中革军委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三十四师是有理由的。三十四师并不是由董振堂带来的国民党起义部队官兵组成，而是由闽西地方红色武装逐渐发展演变而来的。师长陈树湘一九二七年参加秋收起义，在井冈山上任红四军连长，一九三一年任红十二军团长，一九三三年任红十九军五十六师师长，中央红军军事转移前夕出任红五军团三十四师师长。政委程翠林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秋收起义，一九三三年任红十二军团政委，一九三四年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夕出任三十四师政委。三十四师全师干部大多是原红四军调来的骨干，政治立场坚定，作战经验丰富；而战士全部来自贫苦的青年农民，士气旺盛，作战能力很强。

但是，此时此刻，红五军团三十四师的命运已成定局：在整个湘江东岸的敌情日益严重的时刻，中央红军数万人的后卫掩护任务落在了一个师身上。

在红五军团主力部队离开道县阻击阵地的时候，军团首长和三十四师的干部们一一告别。那是一个悲壮而伤感的时刻，已经对三十四师的命运有了某种不祥预感的军团首长叮咛不止：“全军团期望着你们完成任务后迅速过江。要把干部组织好，把战士们安全带回来。”——

无论是军团长董振堂，还是陈树湘和程翠林，都双眼湿润，没有人知道他们彼此在那一刻是否意识到了这一别竟是永别。

主力部队西进以后，师长陈树湘命令一〇〇团先行一步，向灌阳方向急促行军，去接替红三军团六师在那里的阻击阵地，以便让六师去追赶红三军团主力部队。然后，陈树湘带领一〇一团加师部走中路，程翠林带领一〇二团跟随，在掩护第八军团西进之后，前往文市和水车一带建立阻击阵地。

十一月二十九日，三十四师在军委纵队后面的文市以东地区，与追击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展开了战斗，异常惨烈的阻击战一直持续到十二月一日。当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之后，三十四师接到的最后一个命令是：放弃阻击阵地，“立即向湘江渡口转移，并且迅速渡江”。但是，三十四师的阻击阵地距离湘江渡口至少还有七十五公里以上的路程，且通往湘江渡口的所有道路都已被敌人完全封锁。

三十四师处在了敌人的四面包围中。

中央红军的所有部队都离他们远去了。

国民党军很快就发现了这支孤立无援的红军部队，于是，各路大军立即从各个方向向三十四师合围而来。

经过连续不断的残酷的阻击战，三十四师的部队已经伤亡过半。因为总是处在后卫位置，沿途的粮食都已被前面经过的部队筹集一空，三十四师已断粮多日，但饥饿难耐的官兵们依旧要时刻处在战斗状态中。险恶的敌情令他们没有精力去寻找可以充饥的东西，也没有时间坐下来哪怕打片刻的盹。桂北秋雨连绵，寒冷的冬天就要来了，三十四师的红军官兵身上的单衣都已破烂不堪。

西渡湘江追赶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已经无望。

师长陈树湘命令把所有的文件烧掉，然后率领三十四师向东走去。这与中央红军远去的方向完全相反——红五军团三十四师准备突围，他们真的要去湖南南部打游击了。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夜幕降临的时候，三十四师的突围开始了。红军官兵与迎面扑来的国民党军激战整整三个小时，师长陈树湘在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硝烟中向全师宣布了两条决定：一、寻找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突围出去，到湘南发展游击战争；二、万一突围不成，誓为苏维埃共和国流尽最后一滴血！战斗持续到深夜，三十四师的部队已被敌人切割成数块。陈树湘命令一〇〇团团长韩伟带领部队掩护，自己和参谋长王光道带着师直、一〇一团和一〇二团继续向东突围。负责掩护的一〇〇团实际上已不足一个营的兵力，红军官兵边阻击边突围，在一个叫猫儿园的地方，一〇〇团再次被敌人重兵包围。红军官兵把仅存的弹药打光后开始了肉搏，战至最后全团只剩下三十多人。团长韩伟重申了红军宁死不屈的精神，然后宣布部队解散——“立即分散潜入群众中，而后设法找党组织找部队。”陈树湘带领的一百多名官兵，在向东突围的过程中始终无法摆脱敌人的重重围堵，红军官兵只有用身体去和敌人拼杀，包括政委程翠林和参谋长王光道在内，一百多名红军官兵全部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在昏迷中被俘。国民党道县保安司令命令将陈树湘放在担架上，由他本人亲自监督，押往湖南省会长沙。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抬着担架的国民党士兵突然脚下一滑，他们这才看见躺在担架上的陈树湘从腹部的伤口处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扯断了。

国民党军把陈树湘的头颅割下来，挂在了长沙小吴门城墙上。

整整二十九年前，陈树湘出生在长沙小吴门的瓦屋街。

站在小吴门的城墙上，可以看见他家那木板做的家门。木门后的家里有他卧病在床的老母，他的妻子名叫陈江英。

年轻的红军师长陈树湘的灵魂终于回到了他梦中的故乡。

湘江渡口已是一片死寂。

当地的百姓被驱赶来掩埋那些遗留在战场上的遗体。

距离渡口不远有一处水流突缓的江湾，红军官兵的遗体从上游漂下来密集地浮满江面，使在这里拐弯的湘江变成了令人惊骇的深灰色。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掩护着军委纵队向湘江西面那座叫老山界的大山匆忙而去。

红军官兵知道，只要进了苍苍茫茫的大山，危险就会相对减少。

老山界山口附近有一个村庄叫千家寺，这里成为红军进入大山前最后一个需要付出生命的地方。

为了“坚决防止红军南下进入广西和尽快把红军赶入贵州”，桂军对刚刚渡过湘江的中央红军进行了穷凶极恶的追击。十二月二日早八时，桂军第十五军军长夏威致电第四十三师一二九团团长梁津，说在千家寺附近有近五千的红军在休息，要求一二九团迅速绕小路向那里迂回。梁津找来了当地的一名瑶族人当向导，一二九团随即出发了。说是小路实际上无路可走，天快黑时，一二九团才接近目标。梁津在一个山脊上用望远镜看了看，他看见了军长夏威所说的那支红军队伍

——“田野间枪架成行，整齐地排列着。附近炊烟四起，红军战士有的围坐休息，有行动往来者，似将用晚膳的时候了。”梁津立刻命令部队分三路顺着山涧隐蔽向红军接近，在距离红军部队不到八百米的地方，桂军一二九团突然开始了攻击。

桂军的攻击达到了袭击的效果，从红军部队瞬间发生的混乱来看，他们对桂军如此顽强的追击并没有思想准备。红军官兵在混乱中本能地拿起枪还击，然后逐渐形成了阻击线。红军的阻击线一旦形成，桂军立刻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山涧突然燃起了千万只火把，这些火把聚集在一起，向着大山深处绵延数里地蜿蜒而去。

当桂军终于冲破红军的阻击线时，发现红军做好的饭还热着。

留下阻击桂军的，依旧是红五军团的数百名官兵。这些疲惫的红军在大部队迅速离开千家寺之后，顽强阻击着洪水一样汹涌而来的桂军，不久，他们就被桂军从四面包围了——桂军一二九团从正面袭来，一二七团从另一个方向包抄上来。这个团在包抄的时候，快靠近山口了却听见激烈的枪声，远远看去，崎岖的山路上红军部队正向大山腹地前进。为了不使自己的攻击变成被红军包围，一二七团竟在原地等了一阵，等红军大部队远去了之后，他们才突然从山脊上冲下来用火力封锁了山路。红五军团的官兵后路已绝，并且受到两支桂军的前后夹击。

经过大约一个小时的战斗，两支桂军把还活着的十几名红军挤压在了一个小山窝中。一阵猛烈的扫射之后，桂军在这个遍洒着红军鲜血的山窝里缴获了红军的一些政治书籍，其中一本名为《侦探须知》的书被上交给白崇禧，白崇禧命人稍微删改之后下发到部队，红军的《侦探须知》成了桂军的军事教材。

桂军接下来的搜山行动十分不顺。在一个岩洞里，他们发现了大约三十名红军官兵，桂军劝说他们投降，结果遭到了红军的激烈抵抗。趴在洞口劝说的一名桂军副连长被红军一枪打死了。桂军立即开始了报复性攻击，岩洞里的红军官兵最终全部战死。另一股桂军搜查到一处红军曾经宿营的地方，那里有一个用竹木临时搭起来的台子，上面贴着很多标语，看来是红军开大会用的。在台子下边，桂军发现了十几名红军官兵，看上去是因为负伤和重病已不能行动了。桂军军官们聚在一起紧急磋商，他们认为红军不可信任，弄不好这些人是伪装留下来的，等桂军对他们丧失警惕后他们就会突然发动袭击。磋商的最后决定是：全部枪决。

一阵乱枪之后，大山寂静了下来。

在确定红军已经到达贵州边界后，桂军停止了追击。

湘江一战，中央红军由从苏区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锐减到三万余人，其中仅牺牲和失踪的红军官兵就高达三万五千人。

在险峻崎岖的山路上行进的时候，挥之不去的压抑情绪一直笼罩着红军的队伍。中国工农红军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重创，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灵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苦痛。

李德掏出手枪企图自杀，被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制止了。李德的绝望不仅来自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国红军前途的未知，更来自政治上的极度恐惧：中国红军的遭遇令他无法向共产国际交代，无论他有多么理由充足的辩解，中国红军的巨大损失也会让他难以自圆其说。而博古自从过了湘江就进入了一种茫然状态，这个年轻的共产党领导人已经预感到自己将要承担什么样的政治后果；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到

了这样的时候，他仍然想不清楚红军到底要走向哪里？茫然无措令他曾经咄咄逼人的自信荡然无存。博古开始用目光寻找他一直不愿意看见的毛泽东，他希望在毛泽东的表情上发现某种证据，以证明这个非“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已经开始幸灾乐祸了，但是博古始终没能看见毛泽东走在哪里。即使红军主力部队已经损失大半，即使在黑夜的大山里行进，红军依旧保持着以军委纵队为核心的“甬道”式的行军序列，这让无论是李德还是博古，谁也无法看见红军军团指挥员们的表情。战争的残酷对于林彪和彭德怀这样的军事指挥员来讲已不会构成严重的影响，尽管在他们无声的内心世界里有一处深情的角落永远属于跟随他们出生入死的士兵，但是只要战斗的脚步还在前行，他们在沉闷中思索的只能是下一步的战斗将会发生在哪里?

老山界，是当地少数民族对越城岭的称呼，这是中央红军军事转移以来遇到的第一座真正的高山。

一条狭窄的小路在陡峭的山崖上呈“之”字形盘旋而上。队伍的一侧就是万丈悬崖。卫生队的一名担架员掉下去了，官兵们把火把聚拢来寻找他，见他卡在悬崖上的一道石缝里，红军官兵就垂下绳子拉他，拉上来了却发现这个眼睛被血浆覆盖的战士已是奄奄一息，大家就轮换着抬着他走。爬到半山的时候，火把因燃烬而一一熄灭。红一军团的官兵好容易在一个山坳里发现了一户瑶民，还在瑶民的木屋里发现了一锅煮在火塘上的稀粥，红军官兵人人喜出望外，但却在瑶族老人惊恐的神色面前停了下来。红军给钱老人不敢收，官兵们就把自己装米的袋子解下来和老人换，老人点了点头。红军官兵刚舀了一碗粥，就听见指导员在黑暗里发火，说有人把老人的篱笆拆了做了火把。于是他们赶紧端着粥出去，写了张“不准拆篱笆做火把”的标语，然后用稀粥当糨糊贴在了篱笆上。

红三军团五师终于走进了一块平地，军团命令官兵休息并且想办法弄点吃的。但是，小村寨里跑得一个人都没有了，于是部队派人上山去寻找。官兵找回来一部分村民并向他们求购大米，双方讨论的价格是六块大洋一百斤。条件讲妥了但是不少连队不愿意购买，说不但价钱太贵，而且卖的米是糯米，糯米是坐滑竿的财主们吃的，吃了这东西脚软走不动路。经过调查，不是卖大米的人故意和红军作对，而是这块平地里只出产糯米。于是红军只好买来吃，竟发现米很黏而且很好吃。继续上路的时候还是没有火把，大山伸手不见五指，只看见团部的那盏马灯在远处发出微弱的光亮。突然，队伍不动了，接着命令传下来让就地休息。狭窄陡峭的山路上根本躺不下来，只能坐着，但是立刻就响起了一片呼噜声。红军干部们不敢睡，他们用力吸着被当成烟草的树叶，直呛得剧烈地咳嗽。天蒙蒙亮的时候，队伍又开始向上蠕动。在阴冷潮湿的山雾中，红军官兵这才发现昨晚队伍居然停在了一处高高的悬崖上。

进入老山界后，红九军团二十二师师长周子昆的妻子曾玉经历了人生的一场苦痛。这位已经怀孕的女红军刚一进山就觉得肚子剧烈疼痛，于是休养连命令担架队用担架抬着她走。但是没走多远就遇到桂军的袭击，抬担架的民夫扔下担架跑了，红军官兵立即把曾玉扶上马迅速撤离战场。马背上的颠簸令曾玉无法支撑，血顺着双腿涌流而出。三名女红军将她从马背上架下来，一步一个血印地寻找安全僻静之处。没有任何接生设备，甚至连一张干净的纸都没有，一个孩子在一丛茅草中出生了。曾玉把浑身是血的孩子抱在怀里就是不肯松手，但是桂军的枪声已经越来越近。在大家的催促下，这个没有衣服的孩子被用几把茅草裹了裹在最后的时刻丢弃了。枪声和孩子尖厉的哭声交织在一起，曾玉一步一回头，前面是一条山涧的溪流，刚刚生完孩子的曾玉一脚下到冰冷的水里。直到上了岸，依旧能够隐约听见孩子

的哭声，曾玉眼前一黑栽倒在地上。战士们找来张破桌子当担架抬着她，并给她找来了唯一能找到的补养身体的东西——豌豆叶。昏迷中的曾玉始终把双臂抱在胸前，她就这样紧紧地抱着自己的“骨肉”直到红军走出老山界。

黑暗中，宣传队的小红军站在高处嘶哑地喊：“还有十几里就到山顶啦！爬上去国民党军就追不上啦！我们英勇的红军就要胜利啦！”

中央红军在黑暗中的大山里辗转前行，上千公里之外的蒋介石也是夜夜无眠。

湘江一战后，蒋介石的参谋人员不断地给他推算中央红军到底还剩多少人，推算的结果是四万人。这个并不准确的推算显然夸大了中央红军的实力，向来夸大国民党军战果的参谋们这次夸大红军实力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再一次证明白崇禧的桂军“通共”。果然，蒋介石勃然大怒。蒋介石认为，朱毛红军注定要被彻底消灭在湘江一战中，即使没有军事常识的人看一眼地图就能明白红军自己走入了绝境，可是绝境中的朱毛红军竟然从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夹击中走掉了，这不是内部出了问题还能是什么?

蒋介石给白崇禧发出一封电报，怒火万丈地让广西方面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

电报发出的第二天，白崇禧的“合理的解释”来了。

白崇禧在电报的开头说，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后“拜诵再三，惭悚交集”，但是随即就开始了冷嘲热讽：

赤匪盘踞赣闽，于兹七载，东南西北四路围剿，兵力达百余万，此次任匪从容脱围，已为惋惜，追其进入湖南，盘踞宜章，我追剿各军，坐令优游停止达十余日不加痛击，尤引为失策。及匪沿五岭山脉西窜而来，广西首当其冲，其向桂岭东南之富［富川县］、贺［贺县］，抑向东北之兴［兴安县］、全［全县］，无从判定。职军原遵委座电令，将兵力集中兴、全，后以共匪分扰富、贺，龙虎关之警报纷至沓来。复奉委座电令，谓追剿各军偏在西北，须防共匪避实就虚，南扰富、贺西窜，更难剿灭。

白崇禧的意思是：亲自坐镇南昌大本营指挥“围剿”中央红军的不是委座您吗？百万大军把红军压迫在江西南部的弹丸之地，这难道不正是消灭他们的最好时机么，可是红军怎么跑出来了呢，放走他们的到底是谁呢？中央红军进入了湖南，虽然广西的军队“十余日不加痛击，尤引为失策”，但难道不是中央军和湘军任红军一路从容西进直至进入广西的吗?

在让蒋介石明白中央军和湘军有错在先之后，白崇禧开始陈述桂军的委屈与功劳：

兹以湘、桂边境线长七百里，我军兵力总数不过十七团军，处处布防，处处薄弱，故只得以军一部，协同民团防堵，而以主力集中于龙虎、恭城一带，冀以机动作战，捕捉匪之主力而击破之；又虑匪众我寡，顾此失彼。迭经电请进入全州附近之友军，推进兴、全，并经与湘军协定，共匪主力侵入兴、全时之夹击方案。自匪以伪一、九两军团由江华、永明方面分扰富、贺边境及龙虎关，与我防军接触后，当指挥进击，经两日激战，将其击溃，并判明匪之主力窜入四关，即以十五军全部及第七军主力星夜兼程转移兴、灌［灌阳县］北方之线截击该匪。

白崇禧不但派出了桂军主力，而且主力还“星夜兼程”，持续激战常常不是一日而是两日，如今却受到委员长的指责，于是白崇禧说：

“委座点责各节，读之不胜惶恐骇异。”——惶恐之余，关键是“骇异”，“骇异”二字显现出白崇禧看似觉得莫名其妙，实则心中充满了愤怒。愤怒的白崇禧开始列举事实，以证明桂军的政治坚定以及作战勇敢：

无论职军在历史立场上，已与共匪誓不并存，而纵横湘、赣边境数年之萧匪主力，目前为我七军追至黔东将其击溃。即此次共匪入桂以来，所经五日苦战，又何尝非职军之独立担负，不畏螳臂挡车之讥，更无敌众我寡之惧。至于全、咸［咸水乡］之线，因守兵单薄，被匪众击破，则诚有之；谓无守兵，则殊非事实。以我国军百余万众尚被匪突破重围，一渡赣江，再渡耒河，三渡潇水，如职军寡少之兵，何能阻匪不渡湘江？况现届冬季，湘江上游处处可以徒涉乎。

白崇禧的反问直指蒋介石的痛处：“以我国军百余万众尚被匪突破重围”，那么凭什么要求桂军必须能够阻挡住红军？最后，白崇禧为蒋介石总结了国民党军宏大的湘江作战计划之所以失败的原因：

惟目前问题似不全在计划，而在实际认真攻剿，犹忌每日捷报浮文，自欺欺人，失信邻国，贻笑共匪。至若凭一纸捷电，即为功罪论断，则自赣、闽剿共以来，至共匪侵入桂北止，统计各军捷报所报，斩获匪众与枪械之数，早已超过共匪十有几倍，何至此次与本军激战尚不下五六万乎！

相信蒋介石看到这里定会汗颜。

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白崇禧“失信邻国”一句。湘江一战，国民党各军之间“失信”肯定是有的，但是“邻国”指的是哪个？难道白崇禧已把广西一省视为了一“国”不成？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五日，中央红军终于翻过了老山界主峰。

老山界主峰苗儿山的山顶是一小片平地，红军官兵们纷纷在这里坐下来喘息。这时，山顶上传来了一曲咿咿呀呀的京剧唱腔，是周信芳的《徐策跑城》：

湛湛青天不可欺，

未曾起事神先知。

善恶到头终有报，

且看来早与来迟。

……

红军宣传队的那台留声机响了。枣红色的盒子，绿呢子垫的转盘，一只黑色的大喇叭，这是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央红军入闽作战时在沙县缴获的，同时缴获的还有十几张唱片，除了电影《渔光曲》的插曲外，大部分是京剧唱片。宣传队的小红军们背着它，挑着它，让骡子驮着它。宣传鼓动的时候把它架上，一摇，它就嘶嘶啦啦地唱起来了，然后小红军们就开始了政治鼓动，没有它的伴奏，总觉得鼓动的气氛不够。这台留声机是这些贫苦孩子参加红军前从没见过的，他们像爱护武器一样爱护着这件稀罕之物，留声机跟随着这些年轻的红军战士走了上千里的路途，经过了无数次的血腥战斗，现在它在中国西南部的蛮荒大山中传出了响亮的唱腔。

到达山顶的毛泽东放眼望去，老山界的山岭直插云海。

山，

快马加鞭未下鞍。

惊回首，

离天三尺三。

山，

倒海翻江卷巨澜。

奔腾急，

万马战犹酣。

山，

刺破青天锷未残。

天欲堕，

赖以拄其间。

在毛泽东正式发表的所有诗词作品中，这是唯一一首跨年度写作的词，毛泽东标明的时间是“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五年”。而最值得注意的是词的最后一节，因为它的寓意竟与即将发生的历史事件惊人地吻合——在老山界崎岖险峻的山路上艰难行走的毛泽东，心中向往与呼唤的竟是中国古典传说所描绘的壮阔而绚丽的景象：天崩地裂，一根擎天柱撑起朗朗乾坤！

# 第八章 恭贺新年

1935年1月·乌江



如果一些历史回忆者所讲述的往事是准确的话，那么，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二日，那位家住湖南、广西与贵州三省交界处的通道县城旁正忙着娶亲的农家青年，应该是一个与中国革命历史有关的人物。

中央红军越过老山界之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共产党中央在通道就红军到底往哪里走这个问题进行过一次短暂的讨论。讨论是必需的，因为那天凌晨，中央红军野战军司令部获得了一份国民党军目前位置和部署的情报，情报标署为“火急”：

刘敌十一日令：1，判断我军主力似在通道、龙胜边境。2，薛敌先头已抵洪江。3、刘敌部署：A、陶广一路除以一部筑绥、靖封锁线，主力向临江口、通道方向觅我主力"截剿"。B、李云杰部进至绥宁策应。C、李抱冰部进至长铺子待命。D、刘建之旅除留团队守城步外，主力向木路口"进剿"。E、十五师十二日可到长铺子。Z、周敌谢、萧两师九日抵武冈，万、郭两师十日续到，其先头十一日到高沙，续向洪江前进。

本以为翻越老山界之后便暂时脱离了危险，但是国民党军追击的速度超出了预想。

通道会议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日后甚至在会议地点上也存在着多种说法。最普遍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参加讨论的六个人鱼贯走进了通道县城东面古老的恭城书院，他们参观了长满青苔的石阶、爬满紫藤的月牙门和阁楼层叠的藏书楼，然后穿过幽雅的院落直至安静的讲书堂，他们在那里坐了下来。另一种说法来自当事人的回忆：参加讨论的人挤在了县城边一户人家的偏房里，因为这户人家的正房里张灯结彩——一位农家青年这一天正在迎娶他的新娘。显然，后一个充满了世俗欢乐的地点更能显出世事沧桑和时光流逝——无论是新婚青年的幸福还是共产党人的焦灼，中国工农红军的未来命运正是自这一刻陡然开始了微妙的变化。

除了娶亲略显喧闹之外，农家院落的周围是安静的。红一军团二师占领通道县城时，因民团跑光了而没有发生任何战斗；军委纵队进城的时候，县城里的民众也没有异样的反应；各军团依旧按照两翼保护的状态到达了指定位置——至少现在敌人还没有出现，因此讨论开始的时候气氛平和。

李德照例先阐述了自己的意见：中央红军从通道向北，去与转战在湖南西部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是中革军委军事决策中心从转移一开始就确定了的路线，李德的阐述并没有任何新的内容。接着，毛泽东发言了，他坚持说中央红军不能向北，因为中央红军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越来越多的情报显示，在那个方向上国民党军的数道封锁线已经设置完毕。因此，中央红军必须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念头。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继续向西进入贵州，争取在贵州东北部地区寻找一个可以立足的区域，或者说是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

参加会议的人就毛泽东的建议进行了讨论。李德埋怨说“中国同志说话的速度太快”，常常使他根本弄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因此，正在“打摆子”的李德在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之后就退场了——后来的叙述往往说经过“激烈的争吵”之后李德“怒火中烧，愤然退场”，但无论是当事人的回忆还是当时的客观情景都不大可能出现这种局面，因为至少在那个时候，共产党领导层内部的冲突还没有激烈到这样的程度。剩下来的五名同志继续讨论，并很快达成了一致：中央红军继续向西，进入贵州。

中途退场的李德在讨论结束后向周恩来询问讨论的结果，让他感觉有点异样的是，平时一向稳重的周恩来对他说话时“有些激动”。周恩来说：“中央红军需要休整，很可能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

周恩来为什么“有些激动”？可以猜测的原因是：这是近两年来共产党中央第一次集体否决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意见。

李德这样叙述了当时的情形：

在谈到原来的计划时，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周浑元］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与萧克的部队，就可能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李德对于讨论的结果并不满意：

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他乘此机会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即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

尽管李德在多年后写的那本名为《中国纪事》的回忆录里，充满了为自己的辩解和对毛泽东的不满，但是从他的叙述中依然可以发现共产党高层在通道的讨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成千上万的红军献出了生命之后，毛泽东终于获得了表达自己主张的机会，这说明共产党高层正发生着一种微妙的变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参与重大决策的仅限于三个人，而现在参加讨论者却是六个人，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都被邀请参加了通道会议。特别是对于毛泽东来讲，这是自一九三二年宁都会议以后，他第一次参加高层军事会议。据说邀请来自周恩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偏僻的通道县城进行的这次紧急讨论，的确称得上是中国革命命运发生转折的开端，尽管当时所有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包括隔壁那个沉浸在幸福中的新郎——不了解红军的农家青年无法想到，对于历史来讲，在他的洞房旁边那个屋子里发生的事，远比他的新娘是否美丽要重要得多。

通道会议的当天，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发出了西进贵州的命令。目的是迅速脱离桂军，以便寻机机动转入北上——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意见之所以在讨论时得到一致同意，是因为博古也认为贵州是敌人兵力薄弱之处，如果从贵州境内北进湘西也许会更顺利些。

通道会议的另一个收获是对共产党机关和红军部队进行了改编，并对红军高级干部作出了调整：撤销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建制，第八军团人员并入红五军团；第八军团军团长周昆和政治委员黄甦回军委工作；红五军团参谋长刘伯承调回军委，任命红五军团十三师师长陈伯钧为红五军团参谋长；原第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出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的电令要求“五、八军团应利用行军中的间隙执行此电令中一切规定”。同时，取消军委纵队的第二纵队编制，决定“将一、二两纵队合编为一个纵队”。“军委纵队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叶剑英为副司令员，陈云为政委，钟伟剑为参谋长。”军委纵队下辖三个梯队，第一梯队司令员、政委和参谋长均由纵队首长兼任，“第二梯队以何长工为司令员兼政委，第三梯队以罗迈［李维汉］为司令员兼政委”。

刘伯承回到中革军委工作，意味着李德的权威在进一步削弱。

十二月十四日，在中央红军各军团和军委纵队向贵州前进的途中，中革军委以朱德的名义向转战在湘西的第二、第六军团发出了电报，电报表明中央红军“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与第二、第六军团会合。电报要求第二、第六军团“以发展湘西北苏区”并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为目的，“主力仍应继续向沅江上流行动，以便相当调动或钳制黔阳、芷江、洪江的敌人”。

无法理解在明知国民党军已在通往湘西的路上部署了大量兵力的情况下，李德和博古为什么固执地主张中央红军沿着红六军团遭遇重创的路线继续向北。蒋介石早已经预料到中央红军试图北上与贺龙、萧克会合，国民党军的十六个师正从三面紧紧跟随着中央红军，其先头部队始终紧贴着中央红军的后卫掩护部队。同时，在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必经之路上，国民党各路大军已部署了四道碉堡封锁线，用蒋介石的话讲叫做“请君入瓮”或者“守株待兔”。这是四条起于湘南与桂北交界处、止于湘西南腹地的防线，防线由南向西或西北方向延伸而去，因为布防过于密集，竟使四道防线的南北宽度仅有上百公里。

如果按照李德的建议，中央红军从通道直接北上，那么走不了多远，就会立即进入国民党军已经布防好的包围圈中。

红一军团工兵营的队伍里，走着一个穿着红军军装的麻子脸，凡是从他身边走过的红军官兵，都会好奇地看他一眼，往往就看得他很是不自在。这个人叫陈时骥，曾是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第五十九师的师长。红军官兵只要一看见他，自湘江以来的沉闷情绪就会一下子缓解不少。过去的时光令人怀念。那是在井冈山第四次反“围剿”时，红军在江西宜黄县一个叫磨罗嶂的地方与国民党军作战，红军官兵机动周旋布下一个迷魂阵，结果把国民党军的两个师全都围在了里面。杀声震撼山谷，漫山红旗飞舞——红军不但把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师长李明击成重伤，而且把国民党军第五十九师基本上全歼了。红军在俘虏中没有发现第五十九师那个脸上有麻子的师长，于是便开始搜山。红军官兵一边搜一边喊：“麻子！出来！我们看见你了！”最后军团电台队终于把装扮成伙夫的麻子脸师长抓住了。这个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的国民党军高级军官经过教育参加了红军。红军官兵们听说在湘江时他架起桥来还挺卖力。

队伍向敌情并不严重的贵州西进，没有必要的大行李已经统统扔掉，红军官兵们走起路来轻松了许多。小红军们休息的时候开始重新玩他们在中央苏区时经常玩的游戏：大家围成一圈传子弹袋，一边传一边鼓掌，掌声停止的时候子弹袋传到了谁的手里，谁就在事先准备好的盒子里抽签，然后回答抽到的军事的或是政治的问题。若是没回答对，就得出个洋相请别人回答；要是回答对了，就会得到奖励，奖品是几粒花生米。小红军们玩的另一种游戏是“打蒋介石”：把几根木棒竖起来，然后拿一根长棍子在十几米外的地方扔过去，看谁将竖着的木棒打倒得多。重新上路的时候，小红军们唱起了歌：“白军兄弟，我们是红军，彼此都是穷苦人。你不打我，我不打你，请你老哥下决心。”

听着歌声，走在路上的王稼祥对少共国际师师长萧华说：“还是年轻好啊，不知道忧愁。”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很快越过省界进入了贵州。

一九三四年的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贵州最贫苦的山民被称为“干人”，红军总司令朱德对这个称呼的解释是：“他们所有的一切完全被榨干了。”这些扶着原始的木犁在石缝中劳作的人衣不蔽体，目光呆滞，唯一的栖身之处是茅草搭盖的窝棚。贵州的财主和军阀以挥霍和奢侈著称全中国，他们囤积着大量金银、鸦片、盐巴和枪支的房屋高大华丽，如同一座座坚固的城堡，高耸的屋檐尖角弯刀一样翘向阴沉的天空。他们的军队由步枪和烟枪装备起来，对付省内的“干人”凶恶无比，对外作战的能力却十分低下——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除了盛产鸦片，贵州是中国西南部的贫穷省份之一。

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时年四十一岁。十九岁时，因为感到在富裕人家当家庭教师地位低下，王家烈加入了贵州陆军步兵第六团，成为一营三连的一名列兵。他参加过蔡锷领导的反对袁世凯的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从列兵的位置一直升迁为连长。当他成为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后，一九二七年奉命率部进入湖南进攻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军。但是，他的部队还没与起义的农民军接触上，就和湘军先交上了火。王家烈的黔军孤军深入，左右无援，屡屡失利，最后屈辱地返回了贵州。一九三〇年王家烈再次奉命率部进入湖南，配合中央军"围剿"湘鄂西根据地，结果因为"出兵积极，会剿有功"，被蒋介石任命为湘黔边"剿总"司令。他的部队不但驻守在湖南的地盘上，还每月从蒋介石那里领饷三万，湘军首领何键也不得不每月向他支付军饷两万。这一年的十一月，王家烈出席了国民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从此和蒋介石、何应钦、张群等国民党大员拉上了关系。依仗着这种关系，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一九三二年春，王家烈兴师动兵直取贵阳，打赢了争权夺利的省内战争。国民党中央立即任命他为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自此开始了他对贵州的全面统治。一九三四年八月，王家烈协同桂军与贺龙的红二军团和萧克的红六军团作战。十月，他接到了蒋介石的电报，电报说中央红军已经离开瑞金西进，有进入贵州的趋势，要求黔军"择要堵截"。

王家烈和蒋介石的关系十分微妙。在贵州地面上，王家烈看上去是绝对的统治者。但是，由于贵州各路军阀内部争斗剧烈，因此在贵州地面上实际形成了几股互相牵制的势力：犹国才部割据盘江地区；侯之担部割据赤水、仁怀、习水和绥阳等县；蒋在珍部割据正安、沿河等县；而王家烈真正能够实施统治的区域仅仅是贵州南部和东部的十几个县，他可以直接指挥的部队也仅仅只有两个师又五个旅。那些割据在贵州各方的军阀口头上都拥护王家烈主席，但是王家烈主席根

本无法调动他们的一兵一卒。蒋介石在支持王家烈统治贵州之后，又暗中支持各路军阀割据一方，以利用军阀的势力牵制、削弱王家烈，使他无法扩展自己的军事实力。蒋介石在等待着由中央军吞并贵州的最终机会。为了既防共产党又防蒋介石，同时在贵州的各路军阀中取得军事优势，王家烈一直做着倒卖鸦片的生意，即把贵州出产的鸦片大量运到两广地区，以换回黔军需要的武器。随着与两广军阀的往来深入，王家烈和与他有着同样心情的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订立了“三省互助联盟”，企图联合起来暗中与蒋介石抗衡。但是，粤桂黔的联盟关系很快就被蒋介石知道了，王家烈自此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心头恨。虽然表面上蒋介石依旧对王家烈褒奖有加，但是王家烈明白这只是时机未到，一旦时机成熟，蒋介石定会毫不犹豫地把他置于死地。

现在，蒋介石的机会来了。

王家烈十分清楚，如果中央红军真的进入了贵州，那么，共产党要占自己的地盘，自己势单力薄无以抗衡，而蒋介石的中央军必定会以追击红军为借口跟着进入贵州，自己流离失所的日子也就为期不远了。忧虑中的王家烈想到了“三省互助联盟”，于是他急忙与陈济棠和白崇禧联系。联系的结果是：白崇禧答应桂军派出两个师位于黔南都匀、榕江一带策应；陈济棠答应粤军派出一个军位于桂北柳州一带策应。陈济棠和白崇禧都说：“若再远离各自的省境，自己的后防就会空虚。”

王家烈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上旬，当中央红军已经到达湖南南部，正继续向西行进的时候，王家烈在贵阳召开了第二十五军和贵州省政府高级

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堵截可能进入贵州的中央红军。具体部署是：乌江以北防务由侯之担部负责，乌江以南防务由犹国才部负责。为了不得已时能够迅速向广西方向靠拢以得到支援，王家烈自己担任了防守贵州东南部的指挥。

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军，即黔军，总兵力为十二个旅。

就在共产党高层领导人在通道讨论红军行进方向的时候，王家烈率领第二十五军军部到达了贵阳与镇远之间的马场坪，那里的一户人家的厢房成了黔军的前线指挥部。王家烈在这间厢房里召开了军事会议，黔军所有的军、师两级长官都参加了会议。会议在划分防区、协调作战和补充供给等问题上进行了一番争吵，但是吵来吵去并没有令在贵阳制定的防务计划有多大改变。唯一不同的是会议气氛：在贵阳的时候，中央红军离贵州还远，黔军将领无不表示坚决执行委员长的命令，愿意肝脑涂地不惜一切与红军作战；可是，现在红军近在眼前了，各路军阀却纷纷表示绝不能与红军硬拼，应该或追而不堵，或堵而不打，或打了就跑，或让路通行。尤其是听说薛岳率领的八个师也要进入贵州境内时，所有的黔军将领都认为，无论如何还要对中央军留上个心眼儿……

散会之后，王家烈把几个心腹师长留下了。心腹们秘密分析的结果是：中央红军虽一路西进，但看上去似乎并没有占据贵州的意思。因为目前所有的情报均显示，红军前进的方向并不是省府贵阳，而是贵阳以北。难道红军有北渡长江进入四川的企图？如果真是那样，黔军有什么必要在贵州境内与红军打仗呢？让他们过去好了。最令人担心的倒是尾随着红军的薛岳的那八个师，听说他们已经接近贵州边界了。

王家烈当即决定回贵阳去，以待观望，再做图谋。

王家烈所不知道的是，共产党中央红军即将进入贵州，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军也正向贵州集结，由此将导致中央红军与薛岳的中央军和王家烈的黔军在贵州的穷山恶水之间发生一场血战。他更没想到的是，这正是希望中央红军离自己的地盘越远越好的粤军和桂军万分高兴的事。为了表达他们抑制不住的兴奋之情，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一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联名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类似“请战书”的电报，措辞与仅仅十天前白崇禧为湘江一战给蒋介石发出的那封充满狡辩与讥讽的电报判若两人。这封请命出兵的电报文辞华丽，慷慨激昂，读来颇有点为国为民视死如归的架势：

南京中央党部、五中全会、广州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会、国民政府林主席、行政院长汪、军委会蒋委员长钧鉴：

共匪朱、毛正突围西窜，号称十万，气焰紧张，天诱其衰，是我军最好歼灭之机会。途次信丰、安息、铅厂、城口、仁化、延寿、九峰、良田、临武、下灌、四眼桥、道县、洗砚圩、桃川、四关、文市、新圩、苏江、界首、寨圩、珠兰铺、宝洛冈、石塘等处，经我湘、粤、桂各军节节兜剿，计已歼灭过半。计凭隅匪众约五万人，转向湘、黔边境，所过之地，焚毁掳掠，庐舍为墟，非各路大军继续追剿，不能根本肃清，若任其转黔入川，会同萧、贺、徐匪，则共祸之烈，不堪设想。盖川、黔两省，卵谷西南，山深林密，形势险峻，远非赣、闽无险可恃之比，若不趁其喘息惶恐未定，加以猛力攻剿，则匪众一经休养整顿，组织训练，北进足以赤化西北，打通国际路线；南向足以扰乱黔、桂，影响闽、粤，破坏东亚和平，危害友邦安宁，而党国民族之危亡，更将无从挽救。济棠、宗仁、崇禧等，迭承各方同志奖勉有加，亦应当仁不让，继续努力，窃以为共匪不除，国难未已，一切救国计划，皆属空谈。粤、桂两省军旅，素以爱国为职志，拟即抽调劲旅，先组编追剿部队，由宗仁统率，会同各路友军，继续穷追，以竟全功。如蒙采纳，即请颁布明

令，用专责成，并请蒋委员长随时指示机宜，俾便遵循。除另派专员面陈一切机密外，谨此电闻。

陈济棠 李宗仁 白崇禧叩。真印。

这种把戏蒋介石见得多了。

十几天后，蒋介石回了封电报，说了几句“至深感佩”的客气话后，拒绝了粤军和桂军进入贵州的要求。

不知当时蒋介石是否留意到这封“请战书”中“北进足以赤化西北，打通国际路线”这句话。两广军阀的预感具有惊人的前瞻性——在未来的一年中，不断地向中国西北行进的中央红军，其军事意图之一就是“打通国际路线”。

黎平，黔东南紧靠湖南的一个边界小城，小城被云贵高原的翠绿山峦所环抱。

红一军团的三团和六团顺着简易公路急促前进，十二月十三日，在平茶附近击溃了黔军周芳仁旅一个营的阻击，很快接近了黎平县城并开始攻城。战斗进行得出奇的顺利，红军的攻击刚一开始，黎平的城门就打开了——从县城里面跑出来一群百姓，敲着锣鼓说欢迎红军长官进城。原来，黔军一个团的守城官兵昨天已经全跑光了，团长带着家眷更是跑到了数十公里之外的榕江。和黔军一起逃跑的还有县城里的豪绅地主们。因此，当红军进入黎平县城时，这座县城里实际上只剩下了穷苦的“干人”。红军官兵部署了警戒之后，打开县政府的仓库一看，顿时心花怒放：敌人没来得及销毁和转移的大量的粮食和盐巴完好地堆积着，不但可以分给县城里的穷苦人，还足够所有的红军官兵饱饱地吃上几天。

在黎平县城边的一个小村庄里，在湘江战役中身负重伤的红三军团五师十五团团长白志文终于苏醒了。半个月前，在湘江西岸新圩的阻击阵地上，桂军的一颗子弹从他的左肩射入，打断肩胛骨之后，横穿过他的肺部而出。一直昏迷的白志文在师长李天佑的安排下，被红军官兵抬过了弹雨横飞的湘江和山峰险峻的老山界。苏醒过来之后，白志文被送到军委纵队的休养连。担架刚一进小院，白团长一眼看见了他的老上级何长工，他喊了一声："何军长！"然后他又看见了在瑞金红军学校上学时的学员队政委董必武。白志文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声音来自小院东墙根下一溜排开的四副担架。白志文看见的全是红三军团负伤的干部：炸伤了一条腿的五师政委钟赤兵，胸口中弹的十六团团长李寿轩，脚被炸烂了的四师师长张宗逊和腰部中弹的十一团团长文年生。白志文的担架也被抬了过去，和墙根下的那四副担架排在了一起。

钟赤兵说："差不多凑齐了，够组建一个师的！"

军委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在中央红军过了湘江之后被重新整编。周恩来决定把分散在各军团的女红军、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与重伤员们集中在一起，以方便照顾和管理。自中央红军军事转移出发以来，被分散到各军团的女红军们和所在军团的官兵之间偶有摩擦，主要原因是在实行平均主义的红军队伍中，官兵们看不惯对女红军的特殊照顾。和红四方面军的妇女团不一样，中央红军中的女红军大都不是战斗员，矛盾的起因常常是为了吃。分给女红军们的粮食不够吃，而且她们还需要红军官兵替她们背米行军。

休养连整编后，周恩来决定让何长工担任休养连连长，这个奇怪的任命让何长工感到很突然也很为难。周恩来对他说："你的任务就是绝对保证他们的安全。转移结束的时候，他们在，你也在，两全其

美；他们在，你牺牲了，我追认你为烈士；如果他们中间有人丢了或者牺牲了而你还活着，我就要你的脑袋！”然而，何长工作战任务繁重，根本无法具体负责，于是周恩来又调来了原第八军团卫生部部长侯政当休养连专职连长。侯政内心紧张不想干，周恩来说：“工作光荣，责任重大，损失一个杀你的头。”侯政这下子就更紧张了。女红军李坚贞也被派来任休养连指导员。参加红军前当过童养媳的李坚贞性情泼辣，快言快语，办事能力很强，而且山歌唱得很好，只要一有空她就扯开嗓子唱，那首“新做的军鞋四方方，哥哥他穿着上战场”每每唱得红军官兵们心驰神往。

休养连三百多人，四十副担架，十多副担子和药箱，几十匹骡马。

休养连开会的时候，董必武说：“我们虽然是老弱伤病，但是我们是红军，要像战斗连一样生活战斗。”

红三军团的五名干部也躺在担架上开了个小会。钟赤兵说：“我们要把平时对战士讲的话，今天对自己讲，严格要求自己。”大家跟着钟赤兵都说了几句，说的意思很一致：我们是一个特殊的集体，特殊就特殊在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说着这些话的时候，几个躺在担架上的人都把手伸了出来，然后他们的手紧紧地拉在了一起——那么多的战友永远地留在了湘江两岸，二十九岁的红军团长白志文没想到自己还能如此安静地享受西斜的温暖阳光。在以后数十年的残酷战斗中，他征战南北并一直活着，直到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在黎平，还有一些人与红军团长白志文一样享受到了短暂的温暖。

中央发出了这样一个通知：是夫妻的，可以团聚几天。

贺子珍、邓颖超、萧月华等都洗了脸，将头发梳理整齐，然后被等在休养连外面的警卫员们接走了。

因为怀孕数月肚子已经明显隆起的贺子珍买了一只老母鸡，作为给丈夫毛泽东的见面礼物。尽管她对丈夫备受疟疾折磨有思想准备，但是见面的时候，贺子珍还是因为毛泽东的憔悴而十分伤感。虽然这个曾是一名英姿飒爽的游击队队长的女红军曾经抱怨过自己不断地怀孕，但是她对丈夫始终充满了温存的情感。她在炖鸡汤的时候没有忘记放一把辣椒，毛泽东对她炖的鸡汤很满意，关心地问到她的身体状况，这使贺子珍不由得想起了他们那个叫毛毛的孩子，这个话题让本来就心事重重的毛泽东心情更加阴郁了。

时年三十岁的邓颖超依旧在吐血。走进丈夫的办公房间后，她看见胡子很长的周恩来依然在伏案工作。他们相识于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中，那时周恩来二十一岁，邓颖超年仅十五岁。他们的爱情关系在周恩来留学欧洲的时候由相互的通信而确定，那时她已和周恩来一样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追求者。一九二五年周恩来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他们在广州结婚。此后，他们近十年的夫妻生活大都是在纷飞的战火中度过的。邓颖超望着油灯光影下周恩来表情严峻的脸，预感到党内将要有重大的事件发生。

但是，无论如何，夫妻相逢总是幸福的。

而接下来，在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所有的温暖感觉荡然无存。

政治局会议在黎平县城内一户最大的商人家里进行。这个被当事人回忆成姓徐或者姓胡的商人显然财源广进，他在红军到达之前就逃跑了。商人家雕梁画栋，明亮宽敞，从窗户看出去，隔壁那座德国式的路德教堂高高的尖顶在小城中显得十分怪异。

政治局委员们陆续到齐，大家没有看见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依旧在“打摆子”，这是他进入中央苏区以来，第一次缺席共产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决策性会议——有记述说，是周恩来以安心养病为由劝说李德不要参加会议。但是这种记述没有可靠的史实支持，因为当时李德确实病得不轻，数天的高烧已经把这个身材高大的德国人彻底击倒了。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照例是博古首先发言。博古重申了中央关于下一步行动的计划：从贵州向北，进入湖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然后在湘西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接着，红军几个军团的领导发言了。他们并没有在中央红军要到哪里去的问题上直接表态，他们说得最多的是中央红军为什么走到了如此被动的地步。他们回顾了第四次反“围剿”以来红军经历的那些不断失利的战斗，回顾了湘江一战红军遭遇的惨烈牺牲和巨大损失。红军军团领导们的话语中已经有了“该算算账”的味道，至少表情十分不自在的博古体会到了这种味道。

毛泽东开口了。他再次陈述了自己的建议：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想法，原因很简单，会合的路线已经被敌人严密封锁。毛泽东认为，即使再次付出巨大代价到达了湘西，红军发展的天地也不广阔。斯大林早在一九三〇年就建议中国红军向四川发展，现在看来这个建议很英明。四川是中国的内陆大省，盆地富饶且被高山环抱，在地理上是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毛泽东指出，目前国民党军在贵州的防

御力量薄弱，如果中央红军在贵州东北部的遵义地区能够站住脚，那么，向北偏西可以相机北进与力量更强大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向北偏东又可以与红二、红六军团相互策应，遵义地区应该是一个能让红军左右逢源的好地方。

张闻天和王稼祥都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建议。

在关系到中国红军命运的重大决策的讨论中，毛泽东突然把斯大林说过的话搬出来，显然经过了周密的思考和准备。对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毛泽东多年来一直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他在政治上遭受的所有挫折，几乎都和他的这个态度有关。毛泽东对苏联共产党的倔强的戒备贯穿着他的一生，直到晚年，他依旧对北方那个大国“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给予过温和的嘲讽。在黎平会议上，毛泽东把斯大林的话拿出来给予重申，目的就是对付李德和博古这些“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以使红军避免再次遭遇重大挫折。果然，博古没能对毛泽东的建议提出反对意见。于是，会议很快通过了一个决议。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发布：

## 中共政治局决定

一、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

二、根据于：甲、使我野战军于今后能取得与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团之密切的协同动作。乙、在政治的经济的及居民群众的各种条件上，求得有顺利的环境，便利于彻底地粉碎五次“围剿”及今后苏维埃运动及红军之发展。

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

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阻止敌驱迫我至前述地区之西南或更西。

三、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

四、政治局认为，为着保证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必须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这在目前成为主要危险倾向。

五、责成军委依据本决定按各阶段制定军事行动计划，而书记处应会同总政治部进行加强的政治工作，以保证本决定及军事作战部署之实现。

一九三四、十二、十八

当周恩来把这个“决定”的俄文翻译本送给李德之后，李德“勃然大怒”，继而向周恩来大吼起来。在李德的吼声中，周恩来用英语不断地解释，当双方的情绪都到达激烈的顶点时，一向稳重的周恩来突然一掌拍向桌面，桌子上的马灯被震落于地，李德的屋子里顿时一片漆黑——黎平会议作出的另一个决定也让李德感到了无奈与难堪：刘伯承重新当上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参谋长。

在中国红军中，李德最早认识的军事干部就是刘伯承，那是一九二九年在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里。当时，刘伯承具有传奇色彩的革命经历使比他小八岁的李德只有崇敬地仰望。刘伯承参加过推翻中国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和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护国战争。在一九一六年三月的一次战斗中，北洋军阀的一颗子弹自他的太阳穴射入，从右眼穿出，这次严重致残的负伤让这位年仅二十四岁的护国军将领声名

远扬。之后，刘伯承和朱德一起发动了武装暴动，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后改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军长。一九二七年，他与周恩来、朱德、贺龙等人一起领导了南昌起义。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回国后，刘伯承一九三二年一月进入中央苏区，任红军中央军政学校校长兼政委，同年十月出任红军总参谋长，在领导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的作战中显示出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

通道讨论之后，刘伯承回到军委纵队的时候，与李德迎面碰上了。在这一瞬间，万分不自在的是李德，当刘伯承用俄语和他打招呼的时候，他一句话没说，只是表情漠然地点了点头。

李德和他的中国妻子萧月华的结合是一件让红军官兵们愤愤不平的事情。原来在少共机关做内勤工作的女红军萧月华，是在组织的要求下与进入中央苏区的李德生活在一起的。她对组织说：“既然为革命都可以不要命，我服从党的决定。”她还对组织说：“我从小当童养媳，什么气、什么罪、什么苦都经受得住。”但是，自从与李德生活在一起，这对语言不通的异国男女就经常发生争吵。而无论为什么争吵争吵成什么样，红军官兵们都认为是那个德国人在欺负红军战士。

在黎平，被警卫员领去与丈夫团聚的萧月华突然哭着从屋子里跑了出来，她找到周恩来请求首长“救救她”。李德一直追到周恩来的屋里要把他的妻子拉走，这一情景被毛泽东看见了，毛泽东大声制止了李德。在听了萧月华的哭诉后，毛泽东说：“今天我要行使一下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权力，月华同志，跟我走。”

李德呆呆地看着毛泽东把萧月华领走了。

毛泽东的态度开始强硬了。

作为长征征途上的首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没有触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领导层问题，仅仅就红军的走向在军事层面上作出了决定，这使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等同了一次单纯的军事会议。

黎平会议的第二天，中革军委以朱德和周恩来的名义签发了“关于军委执行中央政治局决议之通电”：

为执行党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的决议，军委对红军部队于最近时期的行动，有如下的决议：

（一）野战军大致于二十三日可前出到剑河、台拱、革东地域，其区分为：

甲、一、九军团为右纵队，有占领剑河的任务，以后则沿清水江南岸向上游前进。

乙、三军团、军委纵队以及五军团为左纵队，应经岭松、革东到台拱及其以西的地域。在前进中如遇黔敌应消灭之，如遇尾追之敌应击退之，在不利条件下则应迟滞之。

（二）野战军到达上述指定地域后，于十二月底右纵队有占领施秉地域、左纵队有占领黄平地域的任务。为此，应坚决进攻和消灭在上述地域的黔军部队，并钳制黄平以南之黔军，及由东面可能来追之湘敌及其中央军。

（三）在前出到施秉、黄平地域以前，可用常行军前进，最后则应迅速地占领施秉、黄平两城。

（四）二、六军团目前应在常德地域积极活动，以便调动湘敌。当湘敌所抽调之部队已北援时，二、六军团应重向永顺西进，以后则向黔境行动，以便钳制在铜仁之薛敌部队及在印江、思南之黔敌部队。

（五）方面军应重新准备进攻，以便当野战军继续向西北前进时，四方面军能钳制四川全部的军队。

（六）未参加决定此问题的军委委员，应于二十日晚以前，将自己的意见及其是否同意，电告军委。

朱、周

十九号十八时

这一军事部署显示出黎平会议的另外一个重要成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重大决策必须经过政治局会议的集体讨论，并以会议决议的形式给予明确确定。

在黎平地区休整了六天之后，中央红军开始向遵义方向移动。

就在共产党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的那一天，王家烈给蒋介石发出了一份电报，电报先是描述了黔军“英勇作战”的“辉煌战果”：

赣匪一部约五六千人，删日［十五日］在黎平被我周旅长芳仁击退，折向老锦屏，图绕天柱、青溪北窜，被我五、六团迎头痛击，匪伤亡甚众。

可是，事实是红军已经强渡了黎平以北的清水河，王家烈无论如何都不能自欺欺人了，于是，他言辞一转，恳请南京政府“飞令”大军入黔：

查该匪号称十万，若今日久蔓延，不仅黔省被其赤化，恐川、湘及其他各省，亦同感危殆。除集中所部进剿堵截外，并恳中央飞令到湘各军，西移黔境；及桂省各部队越境会剿，以期聚歼该匪，挽救黔难，无任感祷。

一省军阀向国民党中央军发出这样的求救电报是不多见的。

当中央红军迅速进入贵州并且占领了黎平之后，王家烈对红军的作战能力以及黔军的脆弱本质有了切实的体会。在黎平方向布防的是黔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周芳仁旅。然而王家烈用精良武器装备起来的这支部队，几乎还没有与红军真正接触，便一退上百公里接着就散了伙。王家烈只好立即命令其他各旅向黎平增援，但是其他各旅要么行动缓慢，要么根本就没执行命令。十五日，万分焦急的王家烈发出了电报，要求黔军各部“不分畛域进剿”红军。王家烈警告贵州的各路军阀，如果不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然而他的严正警告收效甚微，黔军只要一旦面对红军依旧一触即溃。王家烈突然意识到，仗如果这样打下去，红军长驱直入贵州不说，如果让红军发现黔军如此不堪一击，红军很可能就会待在贵州不走了，然后再发展出一个面积广大的红色根据地，那样自己就永无宁日了。万般无奈的王家烈痛下决心，与其这样，还不如请中央军大军入黔“追剿”红军，两个后果相比肯定是红军留在贵州境内更可怕。

而实际上，蒋介石用不着王家烈的恳请，国民党中央军正以大兵力阵容向红军包抄而来，其前锋部队已经从正东和东北两个方向进入了贵州。

从黎平出发的中央红军，面临的敌情十分严重：南面，桂军廖磊部已经从广西推进到了贵州南部的榕江。北面，薛岳指挥的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已经从湖南进入贵州，正快速地向中央红军靠近，其前锋部队已经到达了距离黎平只有一百二十公里的镇远。东面，一直尾追着中央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不断地与红军的后卫部队发生摩擦，就在军委纵队离开黎平几个小时之后，周浑元部的侦察尖兵就进入了黎平县城；第二天一早，当军委纵队走出黎平仅仅五十公里时，黎平县城即刻被周浑元部完全占领。从中央红军三面包抄而来的

国民党军总兵力达十五个师。如果再加上贵州境内的黔军，国民党军的总兵力是中央红军的十倍以上。

从黎平出发后的第二天，一支国民党军突然冒出，向整个中央红军队伍的中间部位发起侧击，而那个位置正好是共产党中央和红军领导层的核心部位。

当时，军委纵队的担架队队长病了，临时队长由朱德的夫人康克清担任。枪声骤然响起之后，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向康克清喊："如果是敌人，赶快派部队去打！"子弹呼啸着从康克清的头顶掠过，康克清让担架队退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同时通知军委纵队停止前进，然后自己带领一个班去前面侦察。"我的眼力很好，没有望远镜，也能看见前面山头上正在射击的敌人。"看清了敌情并向红军野战司令部报告之后，康克清把特务排布置在最有利于射击的位置上，她对大家说："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就在我们身后，拼了性命也不能让敌人越过我们！"正说着，一股敌人从山坡上冲了下来。敌人利用乱石做掩护，很快就接近了红军的阻击阵地。康克清低声说："沉住气，沉住气……"直到敌人距离自己只剩下约五十米的距离时，康克清大喊了一声："射击！"跑在最前面的两个敌人即刻停下来，然后开始灵活地沿着曲线前进。康克清对身边的一个战士说："你打右边那个，我打左边那个，比比看谁打得准。"结果，两枪齐射，两个敌人应声倒地。这时，迂回到敌人后面的红军官兵开始了冲击，叶剑英派来的一个连也赶到了，这股国民党军即刻撤出了战场。

康克清是长征中唯一一个始终没有和丈夫分开过的女红军。她走在红军战斗序列里的原因很简单：她是一名勇敢的战士。康克清的腰间总是插着两把手枪，肩上还背着一支步枪，这个身体健壮的渔民的女儿，自十五岁起就以这样的英姿战斗在井冈山上。她骑马、攀山、

行军、打仗，和所有的红军战士一样无所畏惧。即使在很多红军官兵都支持不住的艰难时刻，她也是始终行走如飞——“就像每天出去散步一样。”多年以后，她对美国记者海伦·斯诺这样形容她的长征。

康克清与朱德的结合，被革命队伍中所有的革命者称为典范。一九二九年当朱德向康克清求婚的时候，她才是个不满十七岁的红军士兵，而朱德已经是四十三岁的红军军长了。井冈山根据地妇女组组长曾志有一天对康克清说：“朱军长十分喜欢你，组织上希望你能同他结合。你和他结合后，可以从生活上帮助他，给他最大的安慰。”康克清认为无论是年龄还是资历，她与朱德军长相差实在太远了，因此她只好向曾志推说自己“已经有了人”了。但是，朱德的求婚是固执的，他不断地把康克清找来，详细地介绍自己的身世和经历，希望这个年轻的女红军能够接受他。最后，朱德以“只要你不表示反对就是同意”结束了艰苦的求婚过程。举行婚礼的时候，红军将打长汀时缴获的几盒罐头拿来了，毛泽东、陈毅、谭震林、贺子珍、曾志等都到场助兴，只是康克清平时要好的那些小伙伴没有来。后来当康克清埋怨她们的时候，小伙伴们的回答是：“怪不好意思的。”结婚的当天晚上，康克清对新婚丈夫说：“我有自己的工作，还要抓紧时间学习，希望你在生活上不要指望我很多。”朱德听了不但很高兴而且很支持，红军军长对他的新婚妻子说：“干革命就不能当官太太，当官太太的人就不能革命……生活上的事不用你操心，你只管努力工作、学习吧。”

向遵义方向移动的中央红军各军团行进顺利。右纵队的红一军团二十日经过剑河，二十五日攻击施秉和镇远，二十八日一师一团攻击余庆、二师攻击老黄平。红九军团由老锦屏出发渡过清水江，一直跟随着红一军团前进并配合其行动。二十四日前后，左纵队的红三军团已经到达了台拱以南地域。军委纵队也到达了南哨附近。红五军团照

例跟随在军委纵队的后方，担任整个中央红军的后卫掩护任务。这时候，中央红军距离遵义仅剩不到一百四十公里的路途了。

一九三五年的新年就要来临了，红军官兵行军路过大集镇时，处处感受到节日的气氛。他们对贵州富裕人家筹备新年的奢华程度感到惊讶：猪肉和美酒陈列在厅堂，炭火上蒸着糍粑，白米饭在大碗里堆得很高，上面插着供奉祖先的香火。

红三军团四师是军团的先头部队，而十团是四师的先头团。走在十团最前面的二营在距离瓮安还有大约二十公里的时候，在一个叫坠丁关的山口遭到了一股黔军的阻击，二营一个冲锋就把这股黔军打散了。在坠丁关关口吃了几口携带的冷米饭，二营接到了占领瓮安县城的任务。

瓮安，位于遵义的东南方向，距离遵义只有不到一百公里。二营刚要出发，就发现沿着公路嘻嘻哈哈地走来了大约两百多名黔军。也许黔军没有料到红军会这么快到达这里，看见沿着公路两边运动而来的红军，黔军大喊：“我们是王司令官的，不要打呀！”但是红军官兵的机枪已经响了。措手不及的黔军立刻向后跑，边跑边喊：“红军来了！红军来了！”

防守瓮安县城的是王家烈的精锐部队五团和六团。

瓮安的城墙很高很厚。二十九日清晨，大雾弥漫。红三军团四师十团悄悄接近了瓮安城门。在把黔军的一个流动哨兵毫无声息地刺倒之后，十团的三个营从不同方向开始了攻城。攻击几乎是盲目的，因为雾很浓，几步之外就什么都看不见了。红军和黔军都在浓雾里晃来晃去，估摸着对手的方位，然后犹犹豫豫地举枪射击。大雾之中的搜

索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十团的红军官兵终于接近了城门，但他们在那里并没有发现黔军的影子。根据几个百姓的指点，红军朝黔军撤退的方向继续搜索，可还是没有寻找到黔军的踪影。后来才知道，就在红军官兵向前搜索的时候，黔军从他们百米之外向城外逃走了，逆向并行着的双方竟然都没有相互察觉。瓮安，这座被浓雾笼罩的县城几乎没有发生激烈的战斗就被黔军丢弃了。这时候，十团接到了师里的命令，让他们停止对县城的攻击，因为雾大容易遭遇埋伏，可是十团已经在县城里了。下午三点，浓雾散了，红三军团四师主力部队才开进了瓮安。然后，红军立刻准备在这里大吃一顿以庆贺新年。各团各连都杀了猪、羊和鸡，加上在县城里打土豪时获得的年货，每个连队都端出了五六盆美食，令整个瓮安县城到处飘散着浓郁的肉香。与以往自己吃年饭不同的是，红军官兵们邀请了县城里的“干人”一起吃。红军说：“吃吧吃吧！把土豪们好吃的东西全吃光！”

与此同时，红三军团的另一支部队从台拱向北前出，开始进占镇远县城。在县城防守的黔军柏辉章师只象征性地抵抗了一下，然后全师向马场坪方向撤去。红军打死了民团的一个大队长后，很快占领了县城。这时，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的先头部队第九十师五三五团也到达了镇远城下，他们远远地看见红军在县城里来来往往，搞不清红军究竟在忙什么，于是站在公路上不敢贸然行动。正当国民党军犹豫不决的时候，埋伏在附近的红军突然发起了攻击，于是国民党军慌忙撤退，并开始构筑迎战阵地，但是红军的攻击又戛然停止了。占领镇远的红三军团官兵也在准备过年，他们似乎对穿新衣服过年更感兴趣，由于从县政府仓库里缴获的布匹不够，他们把县城所有店铺里的布匹采购一空。第二天天一亮，国民党军五三五团官兵小心翼翼地向前移动，最后在没有经过战斗的情况下开进了镇远县城，他们这才发

现红军早已走远了。县城里的百姓对他们说，红军官兵走的时候个个全身簇新。

红一军团一师师长李聚奎在一个小镇子边休息的时候，看见了共产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所有的领导一起向他走来。一师师部刚杀了一头猪准备过年，李聚奎邀请首长们在一师吃饭，竟然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于是他赶快让师部炊事员把有的东西全做了。李聚奎发现毛泽东的精神状态好多了。毛泽东问李聚奎一师的伤员多不多，官兵的情绪如何，疲劳恢复了没有。然后，一师的过年饭开始了。炊事员端上来一大盆肉，红军首长们高兴得拍了手。大家正吃得畅快淋漓，李德来了。毛泽东对李德说："这里有饭，赶快吃吧。"于是李德抓起一块肉大口地吃起来。事后，毛泽东这句不经意间说的话，竟然在一师官兵的嘴里传来传去变成了"毛泽东说李德是饭桶"——"这样说不大好，但一下子纠正不过来。"李聚奎师长对红军的这个新年记忆深刻。

中央红军开始向西北方向的乌江行进，但是李德不走了，他希望中央红军不要过乌江，而是从这里向北，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显然，李德对黎平会议决定不满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至少他认为那是经过少数人的商议之后决定的。令人不解的是，无论当时党内存在着何种具有历史渊源的内部矛盾，仅就中央红军是否北上这个经过了多次讨论的问题来讲，李德的反复无常已经到了不合常理的地步。此刻，几个月前红六军团遭遇重创的地方——贵州甘溪镇——就在距离李德不远的地方。

中央红军自中央苏区出发以来，其征战路线丝毫没有超出国民党军的预料，中央红军一直走在红六军团曾经走过的路上。就连进入贵州之后，中央红军的行军路线也几乎与红六军团走过的路线相重叠。就在此时中央红军所处的位置上，萧克鉴于严重的敌情曾决定把队伍

拉过乌江以寻求机动，但是红六军团接到了博古严厉批评的电报，电报要求他们放弃向西立即向北，并且说北进的路上并没有重大的敌情，然而红六军团向北没有走出多远，就陷入了敌人的重兵包围之中。现在，红六军团牺牲的那些红军官兵的遗体，依旧散落在北边不远的大山中。

在博古正式宣布了红军总参谋长的任命后，刘伯承立刻向周恩来报到了。周恩来要求刘伯承迅速执行中央红军强渡乌江的军事计划。曾在川军任过高级将领的刘伯承在这一带打过仗，对这里的地理环境十分熟悉，因此他对中央红军是否能够成功地渡过水流湍急且各个渡口都有重兵防守的乌江有些顾虑。周恩来说："毛主席说了，刘伯承这条四川的独眼龙，定能想出渡过乌江的办法。"

一九三四年就要结束了。

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十二月三十一日，贵州中部大雪纷飞，漫天皆白。

中央红军到达了距离乌江南岸不远的瓮安县猴场。

猴场是一个商业繁荣的集镇，"场"即"集市"的意思，猴场号称贵州北部的"四大场"之一。

猴场的黔军、民团和豪绅都逃跑了，普通商贩对红军的到来很高兴。因为几个月前，他们见过路过这里的萧军长和他带领的那支红军部队——除了大地主大官人之外，谁会害怕为穷人说话的队伍呢？因此，当中央红军到达猴场的时候，这里的市场照旧一片火热，浓烈的新年氛围一下子把浑身落满雪花的红军官兵们包裹了起来。

红军宣传队很快就把整条街贴满了标语，广场上堆满了从大土豪家里没收的财物，红军正向蜂拥而至的“干人”们分发物品。领取了过节费的红军官兵兴高采烈地采购着自己喜欢的东西，他们个个说话和气出手大方，获利颇丰的商贩们喜笑颜开。红军警卫员是采购者中最繁忙的，他们今天都想给自己的首长弄点新奇好吃的东西。警卫员们提着肉和菜往回走的时候，路边就有青年人拉住他们问番号，原来是红六军团在这里打仗时留在老乡家养伤的红军战士，这些红军战士没说几句话就都眼泪汪汪的：“我们知道部队一定会来的！一定会来的！”

年饭张罗好了，但是首长们不知道上哪里去了，警卫员们都在等。

等的时候，小红军们对这样一个现象议论不停：自红军离开苏区以来，毛主席第一次住最好的房子。在红军部队长大的警卫员们懂得这肯定说明了什么。

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召开，中国革命史称为“猴场会议”。

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是毛泽东的建议。他不但直接向周恩来表示继续让中央红军置于李德和博古的独断指挥下是危险的，而且还建议会议必须再作出一个决议，以坚决遏止在政治局集体作出决议后随意修改的恶劣作风。毛泽东说，这种恶劣作风是违反组织原则的。

果然，会议一开始博古就提出了两条建议：一、不要渡乌江，也不要试图在遵义附近建立根据地；二、杀个回马枪，坚决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李德随即警告说，乌江很可能是另一条湘江，强渡很可能失败，或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毛泽东立即对博古和李德的建议给予了批评，并表达了坚持黎平会议决定的立场。接着，没有经过太激烈的辩论，博古和李德的建议就被会议否决了。大多数与会者认为，黎平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无条件地予以执行。之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事先提醒，引导会议作出了一个决议，即《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

午夜时分，毛泽东回到了住处。警卫员为他准备的年饭都是他喜欢吃的东西：油炒辣椒、炸豆腐、牛肉和醪糟。按照在中央苏区时的习惯，警卫员们还在门口堆了个雪人，准备了一些凳子，以迎接前来拜年的首长。毛泽东没有进屋吃饭，他长时间地在雪地中徘徊着——李德关于"乌江很可能是另一条湘江"的警告不是没有道理的。

乌江，发源于贵州西部威宁的草海，自西南向东北贯穿贵州，是贵州省内最大的一条河流。乌江两岸悬崖陡峭，难以攀登，江道曲折，水流湍急，自古就有"乌江天堑"之说。在乌江的主要渡口上，黔军修建了坚固的防御工事，配置了主力部队和强大的火力。更严重的是，向中央红军包抄而来的国民党中央军正全速向乌江方向推进，其中吴奇伟部的四个师和周浑元部的四个师已经距离乌江不到一百公里了。

中央红军必须在国民党军主力部队到达之前渡过乌江。

湘江一战的情景绝不能重演。

此时，林彪、聂荣臻的红一军团和彭德怀、杨尚昆的红三军团已经奉命赶往乌江，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也亲自带着工兵队上去了。根

据他们的报告，第一支试渡尖刀部队已经组成，中央红军即将开始抢渡乌江的行动。

一九三五年的第一天，雪后天晴。

在距猴场以南仅仅几十公里远的黔军指挥部马场坪，王家烈正在等待着一个人的到来，这是一个从前他最不愿见但如今又不得不见的人。

黔军各路高级军官已经到齐，丰盛的宴会已安排妥当，几大坛上等的茅台酒已经开封。等待的时候，王家烈依旧对如何应对目前的局面拿不定主意，其中最大的苦恼就是自己的部队很快就会在与红军的作战中耗损严重而无处补充。王家烈正没着没落的时候，薛岳的车队到了。

与薛岳一起到达马场坪的，还有国民党中央军第一纵队司令吴奇伟，第二纵队司令周浑元和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王家烈和薛岳相互寒暄，然后开始了谈话。出乎王家烈预料的是，关于黔军的补充，薛岳一口答应由中央军负责。军事问题谈完了，开始谈政治问题。薛岳悄悄对王家烈说：你政治上的敌人是何敬之［何应钦］，今后要对他采取远距离，应该走陈辞修［陈诚］的路线。军事和政治都谈完了，象征性地碰了一下杯，然后中央军和黔军各自上路了。

王家烈不知道，说是各自开拔，其实薛岳和他去的是同一个地方，那就是贵州首府贵阳。

在来马场坪之前，薛岳专门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说他即将与王家烈会晤，请委员长明示“会晤要点”。蒋介石回电只强调了中央军进入贵州的主要任务：“乘黔军新败之余，以急行军长驱进占贵阳。”

得到了这个“要点”之后，薛岳立即给王家烈和中央军各部队长官发出了电报。在给王家烈的电报中，薛岳“拟请贵军主力速向瓮安、紫江［开阳县］一带截剿”。而在给中央军各部队长官的电报中，薛岳命各军“迅速向西追剿，免匪窜犯贵阳，而保我中心城市”。在限定了各军急促赶赴贵阳的时间之后，薛岳特别强调：“本路军部署，不得向友军宣泄，希遵办。”自江西、湖南一直紧跟着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刚一进入贵州就要直冲贵州军阀的老窝而去——在蒋介石的心目中，把王家烈的贵阳占了，远比把朱毛红军消灭了更紧迫。

薛岳的电报生动地揭示出蒋介石的中央政府与中国各地地方军阀之间的奇怪关系。这种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形成的奇特政治关系，在世界政治史中极其罕见，弄清了这种现象的由来和内幕，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强大的国家军队就是无法制止一支并不强大的武装力量在偌大的国土上到处移动。

就在王家烈和薛岳在马场坪碰杯的时候，在乌江岸边，红一军团二师四团的红军官兵也在碰杯，红军官兵端着的杯子或碗里是开水，开水在冰天雪地里冒着腾腾热气，红军官兵高兴地喊道：“同志们！祝贺新年！”

四团团长耿飚到达猴场的时候，过年的兴致依旧很高，他亲手杀了一只鸡，还让警卫员去弄点红枣或桂圆什么的。他在连队转来转去，闻着饭锅里各种各样的香气，然后看看战士们正在准备什么节目。但是，香喷喷的饭还没有吃，警卫员就通知说让他到师部去。耿飚在师部一直等到半夜，中央的会散了，军团长林彪亲自到了二师师部，给四团下达了攻占乌江渡口的作战命令。林彪说：“要赶在敌人到达之前把渡口拿下来！”

耿飚回到团里，让警卫员把年饭撤了，然后铺开地图开始研究，等把作战计划想明白了，天已经亮了。

一九三五年的第一天，耿飚带领一支侦察分队出发了。他们化装成贩运私盐的商人，踩着积雪向乌江疾行。在爬上一道峭壁后，耿飚听见了江水冲击岩壁的轰鸣声，但是看不清乌江的全貌，视野里是一片飘荡的云雾。当地向导说：即使在晴天的时候，乌江也总是被大雾裹着。红军的侦察分队开了几枪，对面的大小火力即刻也开火了，四团的参谋们忙着记下敌人的火力点位置。这个叫江界河的渡口对岸只有黔军的一个连，由一个团长指挥着。重任在肩的耿飚立刻开始组织部队强攻，他命令官兵在渡口的正面大张旗鼓地砍竹子捆竹筏，然后一边大声喊叫一边扛着几根竹子来回奔跑。耿飚布下的阵势使对岸的黔军即刻乱作一团，大雾里传来的喊叫仿佛江对岸来了千军万马，而耿飚正躲在竹林里开始确定突击队队员的名单。

首先报名的是三连连长毛振华，这是个身材高大的湖南农民，因为不满地主的盘剥而参加了赤卫队，他曾给贺龙当过勤务兵，打起仗来勇猛而又机智。接下来报名的足有三十多个红军。耿飚最后确定由毛振华率领七个人首先强渡。都是会游水能打仗的老兵，八个人腰里插着驳壳枪，头上顶着一捆手榴弹，瞪着眼睛在耿飚面前站成了一排。小雪变成了蒙蒙细雨，江风阴冷刺骨。在离渡口上游几百米的隐蔽处，耿飚一一端起了酒碗，八个老兵大口地喝下了团长递过来的酒，然后纵身跳下乌江。四团所有的官兵都屏住呼吸看着他们，他们很快就消失在江雾中了，只能看见那条连接着他们的粗绳子被江水冲成了一条弯弓。对岸的黔军开始了射击，机枪、步枪和迫击炮一起朝着江面上打。突然，在一声剧烈的爆炸声响过之后，耿飚一下子感到粗绳子松了。观察哨兵喊：“绳子被炮弹炸断了，他们被水冲跑了！”

耿飚急了，一边让一营营长罗有保派人去下游组织营救，一边高喊："把竹筏抬过来！跟我上！"知道耿飚水性不好，警卫员一听团长的话，立刻把早已准备好的旧车胎掏了出来开始用嘴吹，小红军不停地鼓着腮帮子，直吹得满脸通红。换口气的时候小红军对耿飚说："团长，我跟你上！"官兵们正忙着给团长配备人力和火力，二师师长陈光赶到了，他拉了耿飚一把："耿猛子，冷静点，抽袋烟再想想办法！"

正抽烟的时候，罗有保营长回来了。跟在他身后的是毛振华和六个浑身湿漉漉的老兵，那名福建籍的尖刀战士没能从旋涡中游出来。

天黑了。

在陈光师长的组织下，四团制定了一个新方案：用竹筏子强渡。这一次侦察连连长要求上，但是由于他的任务是架设浮桥，耿飚没同意。突击队还是由毛振华带领。漆黑的夜色里，三只竹筏上坐满了突击队队员，陈光和耿飚与他们一一握手，然后突击队开始向对岸奋力划去。不一会儿，由于一只筏子被江中的礁石撞烂，筏子上的队员游了回来。再等了一阵，又一只筏子上的几个队员也回来了，他们的筏子在湍急的江水中因无法控制被冲到了下游。然后就没有了消息。一直等到下半夜，还是没有任何动静。对岸有火把不时地乱晃，不知道敌人在干什么。毛振华他们到哪里去了?

天亮的时候，在乌江的另一个渡口边，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团长杨得志极为焦灼不安。一团是中央红军中革命资历最老的部队之一，与二团、四团、五团一样，其红色历史可以追溯到秋收起义后建立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接受了突击乌江回龙场渡口的任务后，杨得志率领部队在雨雪交加中赶到了乌江边，但是刚一接近江岸黔军就开火了。杨得志和政委黎林忙在渡口找船，但是找遍了附近的村庄，别

说船，就连一根桨和一块像样的木板都已被黔军拿走。当地的老乡说：“渡乌江向来要具备三个条件：大木船、大晴天和好船夫。”可这三个条件红军现在一条也不具备。杨得志和黎林在冷雨中额头上竟然出了汗。在这个方向，担任强渡任务的只有四团和一团，完不成任务如何向上级交代？如果让后面的敌人追击上来，红军不就面临绝境了吗？杨得志突然发现江面上漂着根什么东西，仔细一看，是一根大毛竹。

在乌江边山崖上的茂密竹林里，一团官兵们用了整整三个小时，才扎成了一个宽一丈长两丈的巨大的竹排。和四团一样，杨得志挑选了八名官兵首先强渡，但这个巨大的竹排还没到江心就被湍急的江水冲翻了。竹排在急流中倾斜扣翻的那一刻，岸上的官兵们大声呼唤着八位战友的名字。红军的呼唤声和对岸敌人射来的枪声混合在一起，令杨得志热血贲张。再次强渡的时候，一营营长孙继先奉命挑选了一个突击队。突击队离岸的时候孙继先营长说：“同志们，就是剩一个人，也要过去，无论如何咱们要过去！”竹排消失在黑暗的江面上。经过了焦急的等待之后，一团官兵终于听见了来自对岸的两声枪响，两声之后又是两枪，这是孙营长的突击队已经到达对岸的信号。

红三军团五师担负了从乌江最险要的渡口茶山关强渡的任务。茶山关关口绝壁高耸，高出江面三百多米，关下的渡口为明崇祯年间设置，叫茶山渡，其险峻有诗句为证：“乌江无安渡，茶山尤险极。急流一线穿，绝壁千仞直。”在这里防守的是黔军侯之担部实力最强的第五团和一个机炮营，由团长罗振武坐镇指挥。五师集中了十三团、十四团和十五团三个团的侦察排，精兵强将在三个强渡地点同时跳入汹涌冰冷的江水中，红军准备用泅渡的方式强行攻击对岸黔军的阻击阵地。五师在江岸上集中了十几门迫击炮和所有的轻重机枪向敌人猛烈

射击，以掩护渡江突击队。在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后，红军强行登上了江岸，然后不顾一切地向黔军的阵地扑了过去。前沿阵地上的黔军被红军不畏生死的气势吓呆了，当泅渡上岸的红军在凛冽的寒风中湿淋淋地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心惊胆战的黔军士兵丢下枪掉头就跑。机炮营营长赵宪群从红军泅渡点的两侧拼命组织抵抗，但是，对岸已经又冲出数十只竹筏，乌江江面上一时间杀声震天。在激烈的交火中，赵宪群中弹而亡。与此同时，五师工兵营在枪弹中开始用木排搭建浮桥，从浮桥伸出的两条粗大的绳索已经连接了两岸。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日拂晓，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军委作战局局长张云逸率领工兵营，军委干部团团长陈赓和特科营营长韦国清率领干部团工兵连，两支队伍同时到达了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所在的江界河渡口。刘伯承说：国民党军的追击部队距离这里不远了，要加快渡江的速度。四团组织官兵捆扎了六十多个竹筏，然后在猛烈的火力掩护下实施强渡。

雪后初晴，当竹筏群接近江岸的时候，黔军的炮火异常猛烈，竹筏群眼看有被打散的危险。二连连长一声呐喊，带着一个机枪班跳入江中直扑江岸。这时，对岸山崖下突然有几个人猛然跃起，快速扑向黔军前沿的火力点。原来，昨天三连连长毛振华带领的竹筏被急流冲到了距离渡口下游五六公里处，他们在那里奋力靠岸，然后沿着江岸向黔军阵地方向摸索，一直摸到了敌人阻击阵地的下面。毛振华数了数，四个人，少了一个，是不久前从国民党军俘虏后教育过来的战士，毛振华正要恼火的时候，那个战士爬过来了，一问，他到旁边拉屎去了。五个红军忍受着寒冷和饥饿潜伏下来，整整一夜他们一动不动，一直等到部队打过来时才突然发起冲击。

在毛振华突击小组的配合下，四团眼看就要冲上黔军的阻击阵地了，这时候，黔军投入了一个营的预备队发起了反冲击。黔军顺着一条小路往下冲，红军官兵仰面射击十分不顺，被压制在一条狭窄陡峭的山路上。二师把已经过江的重机枪手全调来了，暂时封锁了黔军冲击的小路。但是终究火力有限，四团其他武器的射程也已经到了极限。耿飚在电话里一个劲儿地对师长陈光喊："我要炮！要炮！"于是，军团炮兵连连长赵章成被火速调了上来。赵章成是中央红军里的一个著名人物，他原来是国民党军炮兵连的副连长，一九三一年被俘后参加红军。他有不使用瞄准器就能百发百中的神奇本领，让红军官兵们又敬佩又好奇。官兵们问他诀窍，他说自己信佛。佛门弟子是不开杀戒的，于是每次开炮射击的时候，赵章成都要先抱着炮弹嘟嘟囔囔地说些"上头命令，执行公务，不打不行，死鬼莫怨"之类的话。话一说完，一条腿向前半步，另一条腿一跪，单眼瞄准，然后把炮弹送进炮膛，八二迫击炮一声脆响，每每在目标上准确地爆炸。被调上来的赵章成连发四弹，弹弹引起红军官兵的欢呼。趁黔军预备队被炸得乱了阵脚时，四团的又一批突击队队员上岸了。紧要关头，红军官兵发现山路旁边有一块岩石可以攀登，几个战士跃了上去，突击队队员跟着一拥而上，黔军的阻击开始动摇，接着就是混乱的大溃散。几个要跑的黔军去拉他们那个叫罗玉春的团长一起跑，罗玉春哭喊着："我不走，我要死在这里！"但是很快他就跑得没了踪影。

四团在江界河渡口大规模强渡的同时，军委工兵营和干部团工兵连已经开始架设浮桥。这在乌江的历史上应该是一件开天辟地的事，因为这里自古就没有成功地架设过任何一座桥梁。军委纵队即将渡江，浮桥必须牢固可靠。在刘伯承和张云逸的指挥下，三层竹排重叠在一起成为一个门桥，门桥一个一个地放入江水中，被用竹篾编成的粗绳连接起来，而装入重石的竹篓被坠入江中以固定每一节门桥。红

军工兵在纷飞的子弹中运送门桥，打桩固绳。黔军的炮弹密集地落下来，不断有官兵被击中掉入江水被冲走，但是前面的消失了，后面的红军立即替补上来。整整三十六个小时之后，一百多个巨大的门桥被准确地连接在一起，两条巨绳穿过所有的门桥横跨江面，整个浮桥在江水的冲击下弯成一个巨大的弧形，如同一条巨大的蜈蚣在翻卷的乌江水雾中摆来摆去。乌江两岸的百姓，连同在对岸阻击的黔军在内，都被这条巨大的蜈蚣般的浮桥惊呆了，致使数十年后，依旧有人以惊愕的神情描述着当年红军在枪林弹雨中创造的这个神话般的场面。浮桥架设完毕后，刘伯承在乌江边走了几个来回，他说：“好！红军里面有神仙！”

一九三五年一月三日，军委纵队在江界河渡口渡过了乌江。

至此，黔军乌江防线全线崩溃。虽然防线总指挥侯之担下达了一律撤退到遵义集中的命令，但是没有任何人执行，逃往遵义方向的黔军大部分绕过了遵义继续向北，一直逃到了桐梓才停了下来。带领卫兵和家眷也开始出逃的侯之担，逃亡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他的官兵，而且一逃便不可收拾，竟然一口气出了贵州逃到了四川重庆。

一月三日，王家烈在得知中央红军全面突破黔军乌江防线的同时，也得到了薛岳的国民党中央军主力已经到达贵阳郊区观音山的消息。两个消息奇怪地混合在一起，令王家烈顿时不知所措。他镇静了好一会儿，才决定先不管乌江如何，还是赶快去观音山迎接和慰问中央军为好。王家烈的慰问品是四卡车贵州特产茅台酒和另一种贵州特产麻草鞋。薛岳的中央军连以上军官每人茅台酒两瓶，营以上军官五瓶，而士兵则是每人一双麻草鞋。当天晚上，就要进入贵阳的国民党中央军几乎全喝醉了。

酒和鞋送出去之后，王家烈给正在溪口老家休养的蒋介石发出了电报，称黔军在乌江各个渡口正在与红军殊死作战，红军“抢渡两次，均未逞，刻尚隔岸相持中”。

同一天，薛岳也给蒋介石发出了电报。电报并没有对乌江防线被红军突破多说什么，因为中央军本来就没有与红军在乌江决战的计划，朱毛红军只不过是又过了一条江而已。薛岳在电报里强调的是：“黔本贫瘠之省区，年来遍地植烟，生产锐减，补给极为困难”。乌江一战再次证明黔军战斗力低下，“匪来则望风披靡”。最后，薛岳特别告诉蒋介石：王家烈“颇以中央军入贵阳为虑”。

一九三五年一月五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大规模渡过乌江后开始向黔北重镇遵义前进。薛岳的国民党中央军也在这一天占领了贵阳，并随即任命了一个新的城防司令。回到贵阳的王家烈在城门口被中央军士兵阻挡，中央军士兵要求他出示通行证并接受检查。王家烈万分沮丧地回到了他的官邸里。他统治的省府贵阳和他起家的老巢遵义，一个被老蒋占领一个将要被朱毛占领，王家烈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事情怎么眨眼之间变成了这样。这时候，黔西的一个县长给省主席送来了一份年礼：酒、肉、丝绸、烟土和现大洋，还附有一张写着“叩拜王主席大人”字样的大红帖子。王家烈有气无力地将帖子翻开来，里面是四个描金大字：恭祝新年！

# 第九章 夜郎之月

1935年1月·遵义



一九三五年一月五日晚，贵州北部大雨倾盆。

在距离遵义约四十五公里的一个叫团溪的小镇里，以卖戒鸦片药丸为生的土医生罗福元正和几个朋友在一间茶馆里紧张地商量着如何迎接红军的到来。罗福元经常到遵义城里去进货，结识了遵义的中共地下党员周司和。受周司和的委托，罗福元成立了一个“红军之友协会”，准备在红军到达遵义时安排住宿和筹集粮食。几个人的秘密商议一直持续到半夜，散伙后罗福元冒雨回家时，在空无一人的小街上没

走出多远便吓了一跳：狂暴的风雨中，小街两侧的屋檐下，静悄悄地站着很多荷枪实弹的士兵。黔军绝不会在大雨中站得这么整齐。罗福元小心翼翼地上前一问，是红军！

红一军团二师六团渡过乌江之后，奉命迅速向前突击。官兵们在大雨中一直前进到了这个小镇，然后休息等待下一步的命令。没过多久，浑身湿透的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也赶到了这里。罗福元赶快招呼人为红军服务，但是六团的官兵坚持不进百姓的家，镇子里的百姓一时间都很感动。因为前几天，从乌江退下来的“子弹兵”——当地百姓这么称呼黔军第二十五军副军长侯之担的兵，不只是因为这是“侯之担”三个字的谐音，百姓们还说那些兵就会一个劲儿地开枪。“子弹兵”跑过这里时不但乱放枪，还抢了几家店铺。在百姓们拿出食物和热水招待红军的时候，刘伯承被领进了镇上西医杨德甫的家里休息。第二天凌晨时分，刘伯承接到了中革军委“迅速占领遵义”的电报，他随即带领六团自团溪出发了。临走的时候，刘伯承送给杨德甫一本宣传土地革命的小册子，还给了这位医生一张签有他名字的字条，字条上写着：“此为开明人士，不得侵犯其利益。”

接近中午的时候，侦察员报告说，距离遵义还有大约十五公里，前面的村庄是敌人防守遵义的一个外围据点。刘伯承立即命令六团分两路发起攻击，要求全歼，不能让一个漏网的敌人跑回遵义县城去报告情况。

六团的攻击开始了。老天好像漏了一样，雷声滚滚，暴雨倾盆，水雾弥漫。驻守在这里的是黔军易少荃旅的一个营，恶劣的天气使这个营的警惕性很松，而且他们认为即使乌江防线垮了，红军也不会这么快到达这里。于是，当他们被包围的时候依旧全然不知。红军的枪声响过之后，黔军在大雨中左冲右突企图逃出去，但是没有成功，包

括营长在内的一部分黔军被打死，另一部分做了俘虏。为了了解遵义城内的情况，红军在俘虏中找出来一个连长、一个排长和几个出身贫寒的士兵询问，询问开始前红军给他们每人发了三块大洋。黔军官兵平时都听说红军个个青面獠牙，一旦落在红军手里就会被挖眼睛抽脚筋。可是现在，这些红军长官说话极其和气，放在他们每个人手上的光亮亮的大洋更令他们不知所措。在把遵义城内的情况全都如实地说出来后，俘虏们要求把自己的军服就地脱了。

刘伯承提出："仗要打好，又要避免大的伤亡，还要节省子弹。"红一军团二师六团团长朱水秋和政委王集成为此想出了一个办法：化装诈城。

六团穿上黔军军服的官兵足足有一个营，除了留下一个战斗连以免诈城不成强攻时使用外，侦察排和全团的三十名司号员，都被挑选出来担任化装诈城的任务——为什么集中挑选司号员不得而知，也许是因为这些小红军个个都是心眼儿多多的机灵鬼。

负责化装诈城任务的干部是一营营长曾保堂。

曾保堂要求带上几名俘虏。

晚上九点，这支"黔军"出发了。天黑路滑，没走多久，他们个个浑身泥浆，草鞋被泥巴粘掉了，人人几乎都赤了脚，看上去倒更像是撤退下来的一支队伍。两个多小时后，他们接近了遵义城门。刚走近城墙墙根，城墙上就传来了喊话："什么人？"俘虏兵用当地方言答道："外围营的，受了袭击，营长已经死了，我们跑回来了。"在准确地说出了营长的名字之后，曾保堂听见城墙上开始了紧张的商量。这时候雨停了，星星冒了出来，夜色也明亮了一些。城墙上的手电向下

照，在曾保堂的示意下，小司号员开始乱喊乱叫，说红军就要追来了，再不开门老子就开枪了。又过了一会儿，吱呀呀的一声响，遵义的城门向红军打开了。

曾保堂一声呼哨，红军官兵一拥而进，他们一口气冲上城墙，割断电话线，把缴了械的黔军关进了一间屋子里。然后，三十名司号员齐聚城头，一起吹响了军号。这是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的凌晨，可以想象贵州北部那座还在睡梦中的山城遵义，在如此声势浩大的军号声中骤然醒来的时候该是多么的惊讶。遵义城内的黔军守敌，除了被打死的和投降的之外，剩余的都从城北门仓皇逃走了。而在遵义正南面的大路上，刘伯承骑着快马飞驰而来，雨衣被风鼓荡得如同一面旗帜，跟随在他身后的六团官兵一片杀声蜂拥而至。

遵义城就这样被中央红军占领了。

城内的百姓纷纷走出家门，想看看进城的红军是什么样子——“没啥子特别，身上全是烂泥巴。”不过百姓们还是围着红军不走，因为自乌江那边打起来之后，逃到这里的黔军都说，渡乌江的红军个个身穿“盗甲”，骑着“水马”，在乌江江面上行走如履平地。六团的一名干部开玩笑地在曾保堂住的房门上贴了张纸，上写“第一水马司令部驻此”，结果百姓们把这里围了个水泄不通，要求看看红军的“水马”和“盗甲”是什么样子，他们还想看看“第一水马司令”长得是不是人的模样。曾保堂站了出来，他借机作了演讲，说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穷人的队伍，一不拉夫，二不派款，三不打人骂人，专打军阀恶霸土豪劣绅。“第一水马司令”的模样让百姓们很失望，但是曾保堂的演讲却受到了热烈欢迎。

六团在遵义全城布置了警戒之后，奉命先去打一个全城最坏的土豪。百姓们说最坏的应该算是“柏拐子”。“柏拐子”就是黔军师长柏辉章，他在遵义城里有一座巨宅，两层木楼，很漂亮的凉台，凉台下是一条小街。红军进去之后发现，柏辉章一家人全跑了，只剩下一个姨太太。红军把这个吓得面如土灰的女人关了起来，然后就开始搜查这座巨宅。柏辉章已经把大部分贵重财物转移了，金子和银子都没有找到，只搜出不少的衣服、布匹和大量的点心。从头天晚上就一直没有吃东西的红军官兵一边吃着点心，一边把柏师长家的衣服和布匹从凉台上往下扔。红军很快就发现，这里的百姓和有些地方害怕报复不敢要浮财的百姓不大一样，遵义城里的穷苦民众拥挤着，争先恐后地抢着军阀恶霸的财物。红军官兵专门往那些衣衫最破的老人和孩子身上扔。看见一位抱着孩子的大嫂挤不上来，就有官兵专门跑下去塞给她一大块布。很快，县城里的大街上又响起了军号声，红军官兵告诉百姓们：“要开大会哩！要演戏哩！”

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在完成突破乌江的战斗后，连续三天三夜没休息，紧跟在六团的身后开进了遵义城。进了城就派人上街去采购，说是要“补新年”。负责采购的给养员们在一起议论说，这里的盐巴太贵，猪要整头买才便宜。“补新年”的年货还没有买回来，刘伯承的命令就到了团部，要求四团立即出发，不但要追击逃跑的黔军，占领娄山关；还要马不停蹄地继续向北，占领黔西北的重镇桐梓和松坎。

在连续的急行军之后正躺在街边睡觉的四团官兵，被团长耿飚和伤愈归队不久的政委杨成武一一叫醒。军号在前面吹，队伍在后面出了遵义北门。出了遵义城的耿飚仍对没能过上新年耿耿于怀，说是连块“补新年”的蛋糕都没吃上一口。机灵的警卫员立即骑上骡子返回遵义。一会儿这位小红军气喘吁吁地回来了，还没到耿飚跟前就喊：“团

长，买来了，这回能过新年了。”耿飚打开一看，说：“真是个土包子，你买的这是米糕！”警卫员嘟嘟囔囔地不服气：“我们江西的鸡蛋糕就是这个样子的。”

从遵义到娄山关六十公里，一条弯曲险峻的山路穿过这里直通桐梓。吃了“蛋糕”的四团官兵在行进中做好了战斗准备，所有的干部都被要求走在战斗单位的最前面。在对一个叫板桥的小镇实施了攻击后，一个排的黔军被击溃。黔军刚一跑，小镇的家家户户立刻挂出了桐油灯。红军一问，百姓说这是这里迎客的风俗。四团立即召开了群众大会宣传红军的宗旨，然后根据百姓的指认抓了几个当地的大地主。红军分发财主浮财的时候，不少贫苦农民要求跟红军走。在板桥镇，四团官兵终于吃上了几天以来的第一顿饱饭，都是从地主家弄来的，有肥肉、腊肉和鸡鸭。几个老人为红军指点了一条通往娄山关的秘密小路，红军准备了大量攀登用的绳索、竹竿和铁钩子，然后部队向着娄山关出发了。

为了保证打下娄山关这道险要的关口，四团每个干部都指定了万一自己牺牲后的代理指挥员。逼近关口的时候，一营在营长季光顺的带领下，沿着弯曲陡峭的山路开始了正面主攻，二营为预备队。侦察队队长潘峰带领侦察队和工兵排由右侧迂回，试图在无路的悬崖上寻找可以攀登上去的地方。这时候，通信班把电话线接好了，耿飚拿起话筒刚要向师里报告情况，没想到话筒里传来了黔军通话的声音——王家烈的军部在与侯之担的师部通话。不知怎么搞的，红军和黔军的电话线串在一起了。为了利用这个难得的情报来源，耿飚让攻击的部队暂时停一下，自己则专心地听着黔军的电话内容。

十几分钟后，当耿飚听到电话里说“军座命令我们赶快撤退，不然就没后路了”的时候，他立即向四团下达了攻击的命令。黔军用猛烈的

火力封锁着狭窄的关口，正面攻击的一营艰难地一点点向上推进，就在快要接近关口的时候，迂回的侦察队突然从右侧的山上出现，高喊着“杀呀”一路冲了下来。黔军立刻放弃阻击阵地向北逃去。四团的官兵紧追不舍，黔军丢弃的枪支子弹、雨伞包袱，还有烟枪，甚至是脱下来的军装散落了一路。耿飚和杨成武大步上关，在黔军伤员的呻吟中，他们看见关口上立着一座石碑，上刻“娄山关”三字，关下云雾缭绕，山路如丝。

四团追击黔军一直追到遵义以北七十多公里处的桐梓，先击溃了黔军两个团的阻击，然后和黔军的一个重机枪连接了火，这个连抵抗了一阵子也撤退了。一个逃跑的黔军士兵在黑暗中喊了一句：“红军长官，机枪扔在草垛里啦。”最后，四团占领了贵州与四川交界处的松坎，这里距离遵义已有近一百公里。

桐梓是黔西北重镇，是王家烈的老家。这是一座风景奇特的小山城，城里漂亮的小洋楼特别多，都是贵州的军阀、官僚和大商人在这里修建的别墅。打下桐梓的耿飚和杨成武不但每人住洋楼一座，而且全团每个排也都住上了一栋洋楼。军阀和大商人在桐梓附近的秘密山洞里藏着的不少黄金和银元，统统被红军搜查了出来，红军用其中的一部分银元买了不少布匹给官兵们做了新军装。桐梓城外还有一个发电厂，红军官兵从没见过这东西，不少人还好奇地去参观了。发电厂的老板说，黔军逃跑的时候把他的汽车抢走了，现在无法运煤也就无法发电了。于是杨成武命令团机关派人帮助发电厂运煤，结果还没到晚上，桐梓县城洋楼里的电灯全亮了。对于红军官兵来讲，电灯是很新鲜的玩意儿，不少官兵从没见过，有些战士走的时候把灯泡拧下来带上了，说是用它照明和点烟都很方便。

在桐梓，耿飚接到了调任红一军团一师参谋长的命令，四团的新任团长名叫黄开湘。二十七岁的黄开湘过去在方志敏那里工作，曾担任过红一师政委和红一军团供给部政委，军政两方面都有丰富的工作经验。那时，耿飚正迷恋吹口琴，吹的都是中央苏区的诸如“一马打到抚州城”的革命山歌，他说吹着这些山歌就不会忘记苏维埃共和国的美好时光。离开四团的时候，耿飚叫警卫员把自己的骡子送给了腿伤刚好的杨成武，杨成武心里舍不得耿飚走，顺着口琴的声音找到了他。杨成武说：“等革命胜利了，咱们要是能够到苏联去一趟该多好啊！”耿飚说：“带上咱们的红四团一块儿去！”

红三军团的任务是封锁贵阳至遵义的通道，以阻击北上追击红军的国民党军。军团一部从茶山渡渡过乌江之后，进驻遵义以南四十五公里处的尚稽镇。这是一个处在交通要道上的镇子，因通达四方而客商云集。在这里跑生意的商人钟光福曾在榕江旁听过红军的大会，回到尚稽镇后，到处对百姓说红军是穷苦人自己的队伍。当中央红军还在乌江作战的时候，钟光福就召集尚稽镇的一些开明人士筹备“欢迎红军维持会”，并以这个组织的名义筹集了四千多斤大米。“欢迎红军维持会”的成员之一、经营纸店的掌柜梁德培无偿地拿出纸张，于是，尚稽镇一夜之间贴满了欢迎红军的标语和三角形的小红旗。

一九三五年一月五日下午，红三军团五师开进尚稽镇。那一天正是尚稽镇赶集的日子，在钟光福的带领下，百姓纷纷站立在街道两旁欢迎红军。五师师长李天佑住在一个叫周蕴桥的人家，师部设在了镇小学校里。五师的官兵自觉遵守群众纪律，在小吃摊上坚持先付钱后吃东西，而且从不讨价还价，弄得全镇的商贩们满心欢喜。红军部队采购大宗的食品和物品付的是苏维埃纸币，红军说拿着纸币可以到师部去兑换大洋。有些吃过黔军亏的商贩拿着纸币不敢去，于是采购的

红军战士亲自领着他们去，商贩们果然换来了大洋。这件事成了尚稽镇街头巷尾的美谈，百姓都说天下的军队就数红军说话算话。

住在尚稽镇附近村庄里的教导营专门召开了儿童会，红军把村里的苦孩子都叫来，一个一个地发糖果和米花，然后教他们唱红军歌曲。军团还特别要求官兵们如同在中央苏区时一样，为驻地的百姓干农活，因此只要有红军驻扎的村子总是很热闹。红军官兵也仿佛回到了中央苏区，唱歌、演讲、训练的时候口号声格外嘹亮，就连一直心情压抑的军团长彭德怀也开朗了许多。军团部设立在一个叫懒板凳的地方，彭德怀亲自参加群众大会。他是穷苦人出身，因此对穷苦人家充满同情。他的警卫员总是背着个大包袱跟着他，包袱里是打土豪时留下的一些银元、盐巴和布料，只要走在前面的军团长看见特别苦的人，小警卫员就会立刻打开包袱送出去一些东西。但是，彭德怀选择送东西的对象很苛刻，要是真正的穷苦人，还要是受到地主欺负的穷苦人，因此他的大包袱很长时间里都是满满的。警卫员不愿意背着大包袱行军作战，彭德怀为此严厉地批评了这个小红军。红三军团驻扎在懒板凳的最初几天里，因为没有敌情，彭德怀常常蹲在门口与老人孩子说笑谈天。军团指挥部向别的村子移动的那天，一大清早，百姓们看见这个红军里的“顶大的官”扛着块门板沿街喊：“这是谁家的？”——红三军团的军团长要把用来当床板的门板送还给老百姓。

至一月八日，中央红军各军团均已到达指定位置：红一军团在遵义北部；红三军团在遵义南部；红五军团进驻团溪镇，主力一部驻守羊岩河渡口，另一部驻守瓮安江界河，还有一部驻守草塘；红九军团进入湄潭和牛场地域，与红五军团共同构成了遵义东南方向的防线。至此，以遵义为核心，向北延伸一百多公里，向南延伸四十多公里，向东南延伸八十多公里，向东延伸四十多公里，中央红军基本控制了

黔西北地区南北长约两百公里、东西宽约一百公里的区域——新的共产党苏区根据地已经呈现雏形。

一九三五年一月九日，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

连日大雨中的行军让所有的人都一身泥泞，于是所有的人都在城外的小河边洗了脸。遵义城内的百姓拥挤在街道的两边看“朱毛”，他们一直把朱德和毛泽东当做是一个人。由于在进城之前就和保卫局局长邓发打过招呼，于是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一起住在了黔军旅长易怀之的公馆里。毛泽东显然对这个住所很满意，他站在易公馆气派的大门前说：“看起来很不错，这是个大人物住的地方。”周恩来、朱德和刘伯承住在黔军师长柏辉章的巨宅里，那里同时是红军总司令部和军委作战局的办公地点。国家保卫局住在福音堂，总政治部住在天主教堂，休养连住在省立第三中学，负责全城警备任务的干部团住在何家公馆。博古和李德没有被分配在红军领导们集中的地方居住，他俩被分别安排在了柏辉章公馆附近的两个小院子中。

中央红军迫不及待地在整个遵义地区开始了建立根据地的工作。

红军派出了大量的工作人员深入到每一个集镇村庄，打土豪，分浮财，动员贫苦群众，建立党组织和革命政权。短短几天之内，带有地方政权性质的十三个革命委员会在遵义附近各县相继成立，游击队、赤色工会、红色儿童团、革命先锋队、土地委员会、清算委员会、农民协会、斗争委员会、贫农团、红色妇女先锋队和抗捐委员会等名目繁多的革命组织也相继建立。而声势浩大的“扩红”运动在数天之内就吸收了至少四千多青年农民加入了红军。

共产党人从来就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把革命的声势造得天翻地覆。红军官兵们张贴和书写标语的积极性无与伦比。从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一直到刚刚入伍的新战士，红军中几乎人人都有书写标语的热情。在长征途中，无论处境如何艰险，红军官兵都要在他们所经过的墙上、树上和岩石上留下表达他们思想感情的标语和口号。当时的《红星报》刊登过指导红军官兵如何写标语的文章，文章说：要多写关于群众斗争的标语，要照底稿写，不要敷衍了事。部队所到之处，墙上和房子外面都要写满。写的时候不仅可以用粉笔，还要用各种颜料，要写得清楚漂亮，并且不容易被擦掉。为此，红军总政治部专门表扬了一批写标语成绩显著的单位：一个直属连队两天内写了六百多条标语；一个机枪连宿营的时候天黑了，但是官兵们点着火把写了一百多条标语；还有一个连队的宣传小组平均每天写标语十条以上。

中央红军到达遵义后，整个遵义城立即成了各种标语口号的海洋。

“红军为土地革命而战！”

“红军不拿群众一点东西！”

“欢迎白军弟兄拖枪过来当红军！”

“打倒蒋介石，工农坐江山！”

在遵义的玉皇庙前写标语的是一个年仅十七岁的女红军，她手提墨桶站在板凳上，在山门两侧分别写了“白军兄弟不打红军，北上抗日去”和“只有苏维埃才可以救中国”两条标语。年轻的女红军字写得好，写字的样子也好，百姓们一路跟着她观看啧啧称奇，因为他们从没见过世上有这样好看的女兵。更能吸引百姓的是红军宣传队的文艺演

出。红军总政治部和各军团的宣传队轮番上阵，为演出搭起的台子上夜夜汽灯明亮。红军演出了活报剧《打倒军阀王家烈》。剧中的王家烈抓兵派款无恶不作，后来红军来了，带领“干人”们把他活捉了。女红军王泉媛被要求扮演王家烈，因为大家认为她模样长得狠。王泉媛很不愿意，但是为了革命还是执行了命令，并且竟然演得很生动，惹得台下响起一片“打倒王家烈”的口号声。青年学生们最喜欢的还是女红军教他们唱的革命歌曲，在那几天里，遵义满城都是“轰、轰、轰，我们是开路先锋”的歌声。

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了！成立的过程几乎和在瑞金建立苏维埃国家时一样。大会召开的消息早几天就在民众中传开了，有谣言说到时候会场四周会架起机关枪，要把参加会的人全都打死。但是，到了开会的那一天，会场四周到处是红旗和标语，红军官兵们穿得很干净坐在会场上歌声震天。博古、毛泽东、朱德、陈云等共产党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央红军的领导人在主席台上坐成一排。大会由博古主持，毛泽东和朱德都讲了话。毛泽东问会场上的群众：你们中间有没有“苗子”？毛泽东的意思是有没有苗族同胞，但是被群众听成了有没有“庙”，于是会场上的人齐声回答：“有！”接着，中央红军中一个遵义籍的战士和省立第三中学一个叫李小侠的女学生分别代表红军和群众发了言。最后，博古宣布遵义工农兵临时政府正式成立。包括当年发言的那位女学生李小侠在内，几位参加过这次大会的人多年后都异口同声地回忆说：在大会上，我们听见红军领导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定在遵义。

这就是说，中央红军进入遵义地区还不到十天，贵州的遵义就取代了江西的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

这是一个奇特的时刻。

大会之后，红军篮球队和省立第三中学篮球队进行了一场友谊赛，红军总司令朱德是红军篮球队的队员之一。

年已半百的朱德笑眯眯地在球场上奔跑着，这个场景令把球场围得水泄不通的遵义百姓恍如隔世。如果说大量的标语、化装演出，甚至是买卖公平仍不足以让民众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红军产生由衷的信任的话，那么，朱德在一片欢笑声中与战士和百姓一起玩篮球的这个瞬间给予他们心灵的触动，足以令他们终生难忘。这里的普通百姓自古以来见过各色各样的武装，无论是“绿林”还是“山匪”，无论是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军还是王家烈的黔军，可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像红军这样的军队——士兵不欺负百姓，长官不聚敛钱财，官与兵皆纪律严明，精神振奋，人人对未来满怀热切的向往。难道真和红军宣传员们说的那样，人间果真有这样天堂般的世道不成?

红军就是这样一支由政治精英和普通战士平等地组合在一起的军队，是过去的中国从未有过的为了所有官兵的共同理想出生入死的军队。

遵义，一个让红军官兵充满梦想的小城。

对于红军官兵来讲，关于国家的红色革命信仰和拥有一块土地的梦想和谐地混合在一起，使他们能够把种子和信仰一起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播种下去，然后渴望着收获人间平等与自由的硕果，这是他们在战斗中鲜血即将流尽的最后时刻也不愿意放弃的梦想。

而今梦想又一次要实现了，尽管是在他们还很陌生的这个叫遵义的地方。

对于个体生命的流程来讲，即使感受到瞬间幸福也弥足珍贵，因为有幸感受到这种瞬间的人并不多。遵义城中的红军官兵是一群幸运的人——尽管被后来的历史称为“长征”的军事大转移最终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而遵义只不过是中央红军万里征途上的一个最初的落脚点。

就在军委纵队开进遵义城的第二天，那个先失乌江又失遵义的黔军将领侯之担给他的一连串的“上级”发去了一封特急电报。特急电报毕恭毕敬地请一连串的“上级”“钧鉴”，包括：“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主席林［林森］、行政院长汪［汪精卫］、军事委员长蒋［蒋介石］、各部长、北平何部长［何应钦］、汉口张副司令［张学良］、何主任［何成浚］、宝庆何主席［何键］、南宁李总司令［李宗仁］、柳州白副司令［白崇禧］、广州陈总司令［陈济棠］、巴县［重庆］刘督办［刘湘］、云南龙主席［龙云］、贵阳王主席［王家烈］、犹［犹国才］总指挥”：

共匪朱、毛西窜，自上月中旬由湘入黔，此剿彼窜，狼奔豕突，直趋乌江。担奉命总领后备军，率教导师全部沿乌江三百余里扼防，构筑堰固截工事，严阵以待。匪于一日抵江来犯，担部沉着应战，防制该匪于南岸，俾追剿各部易于成功，该匪竟猛攻三昼夜，片刻未断，各渡均以机炮集中轰击，强渡数十次，均经击退，毙匪、溺匪约三四千名，浮溺满江。冬［二日］午，匪忽增加至二三万之众，拼命强渡。担抑体钧座埋头苦干之训诲，督各部死力抵抗，务祈追剿各军一致奋击。无如众寡不敌，我林旅守老渡口、岩门之一五团，被该匪机炮灭净。匪于冬日午后五时，突过乌江，不得已收集各部退守湄潭龙岩一带，死守待援，以图反攻。该匪渡江后，节节进攻，连日激战肉搏，担部虽伤亡过重，仍以孤军固守遵义。至虞晚，匪以大部攻城，卒以寡不敌众，弹尽援绝，不得不暂率所部背进于娄山关及长岗山之线待援。现匪之主力在遵、湄等处。担部正整顿补充中。查共匪为全国公敌，此

间军民等早已具杀敌决心，山河可残，壮志不磨。谨电告明，伏乞睿察，并请中央早颁围剿明令，期于一致进行，以达早日歼灭之效。

二十五军副军长兼剿匪后备总指挥 侯之担叩。

侯之担所有的“上级”都知道，担部既没有“沉着应战”，也不曾“死力抵抗”，更不曾“激战肉搏”；特别是，正在“整顿补充”中的担部早已经没有了一兵一卒。带着全家竟然一口气逃出了贵州的侯之担，看上去先是被红军的进攻吓蒙了，后来又被国军的严斥吓蒙了，于是，无论天南地北把国民党党政军有头有脸的人全拜到了，以解释令他自已和他的担部无论如何都难以自圆其说的一路溃逃。病急乱投医，结局是——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八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电：“查侯之担迭失要隘，竟敢潜来渝城［重庆］，已将其先行看管，听候核办。”

就在中央红军军委纵队进入遵义的那一天，薛岳在贵阳表示一定要“救黔军于水火”。薛岳挽救黔军的使命包含着蒋介石的两个企图：一、消灭朱毛红军；二、使贵州中央化。而国民党中央军“追剿”计划的明确目的是：将红军歼灭于乌江西北地区。针对中央红军在遵义地区停留，向北可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向东可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趋势，薛岳沿遵义地区南面的息烽、东南面的瓮安、东面的湄潭制定了一条前出追击线，这条环状的追击线意味着国民党军将从三面向遵义合围。一月十二日，蒋介石复电，命令四川刘湘的川军、湖南何键的湘军、广东陈济棠的粤军和广西白崇禧的桂军“渡过乌江，联络各友军，跟踪追剿，以收聚歼之效”。这时候，国民党军对中央红军的“追剿”，内线作战区域在川黔地域，目标是“限匪之流窜或合股”；外线作战区域已扩至湘、滇、鄂、陕，目标是“利用关隘、江河封锁，造成会剿态势”。

一月中旬，国民党军近四十万大军一齐向遵义地区压了过来：

国民党中央军薛岳的八个师已经推进到遵义南部的清镇、贵阳一线，其前锋到达了距离遵义约七十公里的息烽。湘军刘建绪的四个师已经推进到遵义以东的乌江东岸，与红五军团隔江对峙。粤军和桂军的八个师已经从南向北进入贵州，并且迅速推进到了遵义东南部的都匀、马场坪一带。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组成了总指挥行营，统一指挥滇军以防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并派出了第二、第五和第七旅从西面进入了贵州境内，并继续向东逐步推进。而在遵义的北面，为了防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川军将领刘湘专门成立了川南"剿匪"总指挥部，任命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教导师师长潘文华为总指挥。川军三路主力部队严密封锁了从贵州进入四川的所有要地。其中第一路军的四个团已经渡过长江，抵达了川黔边界地带的古蔺和叙永地区，与原来驻守在那里的川军一个旅共同对赤水地区进行防守；第二路军则直接从川南进入贵州，到达了贵州西北边界上的赤水县。一月十四日，王家烈对黔军进行了重新部署，命蒋在珍部经瓮安、余庆向湄潭、绥阳方向前进，命柏辉章师和何知重师经息烽直接向遵义和桐梓方向进攻。同日，黔军的后备部队已经控制了赤水河的上游。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追剿军"总指挥何键向国民党军各路大军发出了向遵义地域发动全面进攻的作战命令。

正是这一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黔军师长柏辉章公馆二楼的一个房间面积不大，有一个带镜子的橱柜，两面镶嵌着彩色玻璃的窗户可以向外打开，天花板上吊着一盏煤油灯。房间的中间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些茶杯茶

碗和一些当地产的粗糙的糖块。桌子周围有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子。因为天气寒冷，房间里还生了一盆炭火。

十五日晚上七点多，与会者陆续到来，房间顿时显得有些拥挤，尤其是王稼祥被担架抬进来的时候，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大家都移动椅子以便让担架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上。

参加遵义会议的共有二十个人，与会者伍修权的回忆是："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和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和凯丰，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会议扩大到军团一级干部，有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五军团的政委李卓然因为战事迟到，在会议开始后才赶到；邓小平同志先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会议，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李德只是列席了会议，我作为翻译也列席了会议。"

关于遵义会议的酝酿过程，后来的各种叙述充满太多的臆想，臆想大多源于在老山界崎岖的山路上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的秘密交谈。建议召开这样一次会无疑是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共同商议的结果。有史料显示，他们甚至就谁在会议上首先发言讨论了很久。因为自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之后，作为共产国际的五十七个支部之一，中国共产党一直处在共产国际的绝对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任何重要的会议决议，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才算生效。尽管毛泽东对此十分反感，但是此前的客观形势没有改变这一现状的机会。

三个人讨论的最后结果是由张闻天首先发言。原因是，政治局常委的名单顺序是博古、张闻天、周恩来和项英。张闻天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人民委员会委员，那么即使将来共产国际过问，他

的资历也完全可以抵挡可能出现的质疑——自从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以来，共产党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报联络已经完全中断，毛泽东一直等待的那个有利的契机终于出现了。因为是否得到处在异国他乡的共产国际的认可，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来讲，已经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了，红军的生存问题迫在眉睫，为此必须调整现行的政治和军事策略。

遵义会议的两个议题是：一、就中央红军下一步的行动作出决策；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和教训。第一个议题在没有争论的情况下很快达成了决议：根据目前严重的敌情，遵义已不适合建立根据地，中央红军应该迅速北上，于川南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第二个议题引发了争论，这一次的争论是真正的政治交锋。

关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和教训，首先由博古和周恩来分别作"主报告"和"副报告"。两个报告都是在总结自一九三三年博古和李德进入中央苏区以后，红军在军事上逐渐陷于被动的原因和教训。但是，两个报告的观点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前者强调的是"敌人的过分强大"，虽然涉及了自己"在军事路线上所犯的错误"，但是开脱和辩解的成分很大，最后的结论是："战略上是正确的，错误是执行中的错误。"而周恩来的报告强调的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自我批评的态度十分坦率。从中国共产党复杂曲折的政治历史上看，应该说这时候的博古在做人上还是十分坦荡的——这个年仅二十八岁的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青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负责人，自然要对中央红军所遭受的重大损失承担首要责任。但是，不能因此否认这个年轻的革命者一直在为他所追求的理想作着最大的努力。现在，他之所以不愿意承认在军事策略上存在错误，一方面是因为他对共产国际的盲目尊重，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幼稚。

没有史料显示，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与周恩来私下里有过更密切的接触。但是当周恩来作完报告之后，通过翻译，李德终于确定了一个他不愿意接受的现实：周恩来已经不再维护他和博古的领导权威了。

周恩来发言之后，毛泽东说："洛甫同志有材料，要念一念。"

张闻天从评价博古的"主报告"基本不正确开始说起，尖锐地批评了五次反"围剿"中的战略战术、不利用福建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兵变的时机、不顾敌情机械地坚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等错误。同时，张闻天还引用了大量的斯大林语录，详细批驳了把红军的损失归结于敌人过于强大的说法，认为如果这样就会不可避免地得出"敌人的'围剿'根本就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结论"。张闻天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特别是博古的震惊，因为对博古的批评就是对李德的批评，而之前从没有人尝试过如此激烈地批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尤其是批评出自于曾和博古同属于"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阵营的张闻天。

会议休息的时候，博古和李德心情抑郁。

毛泽东对刚刚赶到的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说："怨声载道啰……你明天在会议上讲一讲。"

下午会议再开始后，毛泽东一反总是到最后才开口的惯例，开始了长达近两个小时的发言。毛泽东的讲话没有原始记录，根据陈云的说法，毛泽东讲的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那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此文发表时，标注的时间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那时，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已经结束，毛泽东胸有成竹地住在中国西北黄土沟壑中的一间窑洞里，他在那里写下了大量充满中国

智慧与伟人韬略的文字——毛泽东的发言有意而巧妙地回避了政治路线问题，因为他知道解决政治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如果现在就陷入是否纠正共产国际政治路线的纷争中，日益紧迫的军事危机很可能会使红军面临致命的危险。毛泽东讲的实际上是一堂军事启蒙课。他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从国情到军情；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到中国内战的政治策略和军事策略；从《水浒传》里洪教头和林冲的一场打架，到共产党红色武装的游击战术；从“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的急性病”，到“保守主义”、“逃跑主义”、“拼命主义”等等，毛泽东出口成章，侃侃而谈。他的讲话让与会者，尤其是那些军团指挥员们听了很顺耳，他们在毛泽东的诙谐幽默中不断愉快地开怀大笑。

伍修权无法将毛泽东的那些中国式的幽默翻译给李德，但李德从与会者的表情和笑声中认定毛泽东的发言十分受欢迎——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不断吸烟的李德此刻被严重地冷落了。毛泽东天马行空般的发言最后落在了李德的军事指挥上：“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

王稼祥在毛泽东之后发言。他的伤口在化脓，体温很高，周恩来让他躺着说，他还是挣扎着坐了起来。王稼祥的发言很简短，但是很有分量：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建议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他投了我关键的一票。”数十年之后，毛泽东依旧这样说。

会议一共举行了三次，都是在晚饭之后。从第二个晚上开始，与会者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朱德的发言很简单：“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然后是聂荣臻、彭德怀、刘伯承、李卓然，红军军事

指挥员们先后发言，全都赞同毛泽东的观点，对李德的盲目指挥怨声载道：部队损失严重；官兵思想混乱；保密工作要做，但是仗都打不赢，保密还有什么意义？连前沿哨位放在哪里都需要请示，这样一来怎么打仗？指挥错了还不能批评，批评就是机会主义，甚至是反革命。刘伯承说："这顶帽子吓死人。"

伍修权回忆说："当时会议的气氛虽然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如果说有争吵的话，那就是时任共青团书记的凯丰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不满——当王稼祥明确提出让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的时候，凯丰忍不住插话说，博古的报告是正确的，毛泽东的指责是偏激的，工作上的缺点不涉及马列主义的原则，批评不允许夸大。在说到军事指挥时，他说毕竟李德在莫斯科接受过系统的军事训练，而毛泽东"只会看看《孙子兵法》翻翻《三国演义》"。

凯丰的话严重地刺痛了毛泽东，他一生都没有忘记凯丰对他的讥讽，以至三十年后他再次提起这件事："党内有同志说我打仗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能照书本？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船……"——当时，毛泽东反驳说："你读过《孙子兵法》吗？几章几篇？为什么我们不能学学我们的老祖宗？"

李德问伍修权："他们在吵什么？"

伍修权说："他们在说中国的一个古人。"

毛泽东所说的"逼使我翻了船"，指的是日后让博古交出领导权。

会议最后补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以补上因留在中央苏区生死不明而一直空缺的项英的位置。这已经是一个很惊人的“翻了船”的事件了，因为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党的最高决策层。会议解除了博古的中央总负责人和李德的军事顾问职务，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同时中断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在接下来的政治局常委分工中，会议明确了毛泽东的地位：“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尽管当时毛泽东还处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的位置，但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政治伙伴关系自此开始确是事实。虽然不久之后两个人的地位便发生了颠倒，但是，这一对中国和世界当代历史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关系一旦确立便惊人地稳固——从一九三五年初一直延续到一九七六年两个人先后走到生命的终点。

对于被驱除出中央红军的军事决策层，李德最大的忧虑是中国共产党脱离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将会失去“正确方向”。他在回忆录中说：

> 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党的领导完全同外界隔绝，此事造成的后果尤其严重，他们从国际共产工人运动那里，具体地说就是从共产国际方面，既不能得到忠告，也不能得到帮助。所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农民的、地方性的和民族主义的情绪，就能够不顾马列主义干部的反对而畅行无阻，甚至这些干部本身也部分和暂时地为这种情绪所左右。

虽然李德跟随中央红军最后走完了漫长的长征之路，但是他在中国的使命自遵义会议后基本上已经完结。一九三九年李德离开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回苏联，在延安机场登机前他看见了毛泽东，那一瞬间他甚至有了一些感动，他以为毛泽东是来为他送行的，而且会对他为中国革命做过的一切说些什么。但是他很快就明白了，毛泽东是为送毛泽民等人去苏联而来的。毛泽东见到李德客气地和他握了手——

“毛泽东也祝我一路平安，他在向我握手告别的时候，流露出一种有节制的礼貌，但没有一句感谢和认可的话。”回到苏联之后，李德经过了共产国际的严格审查，最后的结论是“虽然有错误但免予处分”。他被分配到莫斯科一家外文出版社工作，负责把德文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翻译成俄文，再把俄文版的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翻译成德文。斯大林去世之后，李德终于回到自己的祖国，一九七四年他在德国去世。

遵义会议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次会议。它在革命的危急时刻使党对红军的“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更重要的是，它使毛泽东从此开始了他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

遵义会议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成果。如果站在当代中国的角度回首历史，这一成果便会更加凸显其重要意义，这就是邓小平的命运变化。邓小平是一个命运坎坷的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艰难曲折的历史中，每当政治生活发生变动，他往往就会因遭到批评而经历磨难。这个小个子四川人性格坚忍不拔，十六岁那年他漂洋过海到法国，加入了周恩来创建的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一九二七年回国后先在冯玉祥的部队中工作，后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一九二九年被派往广西，组织了著名的百色起义，随即担任红七军政治委员。邓小平于一九三一年到达中央苏区，不久后他的坏日子来了，因为被列在“毛派”阵营里，他被撤销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职务。一九三五年初，邓小平能够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说明他已开始重返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这一变化足以令数十年之后的中国人感到庆幸，尽管当时在柏公馆二楼的那间房间里，邓小平一直默默无闻地坐在一个角落里。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仅仅参加了一天的会议就匆匆赶回部队了，因为负责遵义南面防线的红三军团已经与推进到那里

的黔军开始了战斗。

这一次，黔军推进的速度如此之快，作战的积极性如此之高，原因很简单：率领部队作战的是黔军师长柏辉章，而共产党领导人此刻正住在他在遵义城中的巨宅里。

一月十六日，柏辉章部的三个团向驻守在刀靶水的红三军团五师的阵地开始了进攻。战斗从早晨一直打到晚上，由于黔军的攻击异常猛烈，五师开始放弃一线的阻击阵地向北撤退。十七日下午，黔军继续推进，傍晚时分再次与红三军团发生战斗，双方的拉锯战持续了五个小时。天完全黑下来之后，五师在一个叫赵士杰的儿童团团员的带领下开始向北转移。十八日，黔军占领了遵义正南方向四十公里处的刀靶水，同时占领了遵义正东方向六十公里处的湄潭。

十九日，朱德发布命令将“军委纵队改为中央纵队”。同一天，红军总部和中央纵队撤离了遵义。

心急如焚的柏辉章带领黔军疯狂地向遵义冲来。一路上，他不断担心着自己的巨宅会被“赤匪”弄成一片平地。柏辉章几乎是跟着中央红军的后卫部队一头冲进了遵义，冲进了自己的那座巨宅，他在院墙上看见了这样一条标语：“不发军饷就不打仗，拖枪过来当红军！”柏辉章从一楼看到二楼，在二楼的那个房间里，他闻到了浓烈的烟草味，看见了一地的烟头。黔军师长柏辉章，据说遵义城里“所有赢利的产业都有他的份额”，这个遵义城里最大的财主没有特别的伤心，因为究竟自己的巨宅还在。柏辉章唯一没有想到的是，在他花了大价钱修建的这座中西合璧的公馆里，不但刚刚发生了一件即将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事，而且数十年之后，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遵义会议在此举行，这座巨宅成了纪念中国革命胜利的标志性建筑。

虽然不能在遵义建立根据地了，但红军官兵的心情并没有黯然，相反他们的斗志更加高昂了。经过在遵义的十天休整，官兵们吃得好，睡得好，连衣服和鞋子都换成了新的。由于缴获很多而红军的人数少了，武器弹药也得到了补充。对于红军官兵来讲，只要能吃饱又有枪弹，还有什么可怕的？再说，以前连干部们都不知道下一步要去哪里，现在大家知道得很清楚了，到四川去，与红四方面军实现会师，建立一个比遵义地盘更大的根据地，四川定会出现一个最伟大的苏维埃共和国！

于是，瞬间出现的敌情出乎了红军官兵的预料。

一月十九日，中央纵队刚走出遵义没多久，迎面的山坡上突然出现大约一个连的黔军，黔军居高临下地开始了火力射击，整个中央纵队都在敌人的射程之内。周恩来赶快招呼队伍匍匐在一条土沟里隐蔽，然后组织警卫部队抵抗。但是警卫连的火力不够，眼看黔军就要冲到跟前的时候，叶剑英带领通信连赶到了，红军战士立即迎着黔军冲了上去。毛泽东站起来拍打着身上的土说："这个房东硬是客气，要送送客哩。"

柏辉章一直紧跟在撤离遵义的中央红军的后面，虽不敢猛追，但跟得很紧。中央纵队突然遇险之后，红军后卫部队奉命停在遵义城北的一座小桥边不走了，迫使追击的黔军也停了下来，两军仅仅相距两百多米对峙着。对峙的过程中，一个立功心切的黔军营长忍不住想指挥部队冲一下，但是他刚一站起来就被红军一枪打倒了。

一月二十日，中央纵队到达了黔北重镇桐梓，在那里"中革军委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正式下达。这一作战计划内容极其完备，部署十分细致，再次明确了中央红军将冲出贵州进入四川，在川南的泸州和宜

宾之间北渡长江，然后跨越整个四川东部，与位于川陕甘边界的红四方面军实现最终会合。

作战计划明确了中央红军的作战方针和作战任务：

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

……为实行上述基本方针，我野战军目前初步任务应是：

1、由松坎、桐梓、遵义地域迅速转移到赤水、土城及其附近地域，渡过赤水，夺取蓝田坝、大渡、江安之线的各渡河点，以便迅速渡江。

2、消灭和驱逐阻我前进之黔敌与川敌，尽力迟滞和脱离尾追与侧击之敌。

3、在尾追之敌紧追我后，而我渡赤水与渡长江发生极大困难，不能迅速渡河时，则应集结兵力突击尾追之敌，消灭其一部或多部。

4、在沿长江为川敌所阻，不得渡江时，我野战军应暂留于上川南地域进行战斗，并准备渡过金沙江，从叙州上游渡河。

在详细部署了各军团的行动时间、地点和目的后，作战计划提出了实施军事行动的战术要点：

1、渡江要夺取先机，各纵队均应以迅速秘密的行动，达到目的地域。每日行程约六十里左右，必要时则以急行军赶到目的地。

2、须有充分的战斗准备，以迅速和包围的手段，坚决消灭阻我之敌。当其溃退时，应乘胜急追，夺取前进的要隘及渡河点。

3、对尾追之敌应使用少数得力部队［约一团兵力左右］进行运动防御，并向敌前出游击，以阻止敌人前进，而主力则应迅速脱离敌人，对侧击之敌，应以少数部队掩护，而主力应迅速脱离敌人，勿为敌人所抑留。

4、当我必要与尾追或侧击之敌进行战斗时，应集结主力进行消灭敌人的进攻战斗，不应以防御战斗等待敌人来攻。

5、夺取和控制长江各渡河点，为实施此计划之最后关键。我先遣兵团应以秘密迅速勇敢坚决的行动，实行最大机动，首先要派遣得力便衣队，夺取沿河船只，以便能以得力部队迅速渡河，占领和控制两岸各渡河点，掩护船渡。当取得某一渡河点，并已开始船渡时，应即扩张船渡范围，可能时野战军应改在同一地域内进行渡河。在某一部队先到渡河点而不能渡河时，应机动地转到另一渡河点，一般地应向泸州上游延伸。

作战计划还对位于湘黔边界的红二、红六军团和位于川陕甘边界的红四方面军提出了策应中央红军的要求：

为配合这一计划的实施，我二、六军团应及时转移和依托酉［酉阳］、秀［秀山］、黔［黔江］、彭［彭水］、松桃、印江、沿河地域发展，并以一部发展咸丰、来凤、宣恩、恩施地域的游击运动，以便造成深入川东行动，威胁敌人长江下游水路交通的有利条件，钳制和分散蒋敌新的围攻兵力，而配合我野战军及四方面军来争取四川赤化。四方面军在我野战军渡河之先，应向重庆方向积极行动，吸引重庆川敌之主力于自己方面，以便野战军顺利渡江。在我野战军渡江后，则转向苍溪至南部之嘉陵江西岸反攻，密切配合我野战军与川敌实行决战，以打通横贯川西北的联系。

前一天，一月十九日，蒋介石也发布了“关于在长江南岸‘围剿’中央红军的计划”：

一、我军以追剿军蹑匪急追，压迫该匪于川江南岸地区，与扼守川南行动部队及各要点之防堵部队，合剿而聚歼之。

二、追剿军除第一兵团以一部围剿萧、贺，并派一部开赴西、秀，固守乌江东岸，即与徐［徐源泉］部联络外，其大部及第二兵团全部，并联合黔军，应于二月十五日以前渡过乌江，先行扫除湄潭、遵义之匪，而占领德江、凤江冈、湄潭、遵义、黔西之线，而后追击行动愈速愈妙，使匪无喘息余地，尤须控置重兵于兵团左翼，俾得压迫该匪于川江南岸地区。

三、堵剿部队由川、滇军任之。川军对匪主力如犯重庆，则由南川与龙门场部队夹击之；如犯泸州，则由龙门场与泸州、纳溪部队夹击之；如向西窜，则第一步防堵于泸、叙、毕线，并于横江、老鸦滩及安边、叙府间金沙江下段，叙、泸大江一带，构成第二道防线。滇军应分任叙永、毕节线及老鸦滩、横江，衔接川军防堵。各该部队，应于本月三十日以前，完成各地区碉堡工事及通信设备，严阵固守，以待追剿军赶到，联络川军机动部队夹击之。如被匪窜过其防地时，则立即蹑匪追剿。

四、徐清泉部，以一部协同湘军剿办萧、贺，一部如限速接彭［彭水］、黔［黔阳］之线，联络友军防堵，上官云相部到达夔［奉节］、万［万县］、涪陵，扼要布防，并备切应。

五、追剿军第一兵团，占领德江、凤江冈、湄潭线后，以一部扼守原防，其主力须两师以上兵力，向绥阳、桐梓、松坎方向；第二兵团会同黔军，占领遵义、黔西，向古蔺、叙永方向兼程追剿。两兵团应切取联络，互相策应。其行进路线，由薛总指挥负责，相机处理。

六、川军南岸总指挥潘文华，正安穆［穆肃中］旅，松坎廖［廖泽］旅，南川陈万仞两旅，每旅计三团。合江徐［徐国暄］团，叙府四团，赤水、古蔺侯［侯汉

佑］部，另以各县团防分任以西防堵，须依情况，联络第一、第二两兵团夹击聚歼之。

七、滇军应以十团以上之兵力，扼守叙永、毕节之线，并限于二月十五日部署完妥。如匪窜过该线，即联合第二兵团及川军，堵追围剿。另以三团防守安边、横江、老鸦滩及其上游。

八、徐清泉及上官云相二部主力为预备军，在指定地区待命。

至此，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已经不是军事秘密。

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两军都清楚对方的行动，因此注定要狭路相逢。

根据中革军委的部署，位于黔北的红一军团开始向赤水方向移动。二十二日，在击溃了一个营的黔军和四个中队的民团的阻击后，进占了温水和良场。二十四日，红一军团从东皇场出发，经过三元场抵达赤水河中游的土城。黔军教导师的一个旅先于红一军团到达，已经在河上架设了浮桥，但是远远地看见红军风尘滚滚地开来，黔军立即丢弃阵地和浮桥逃向了赤水县城。二十五日，红一军团军团部到达土城以北的猿猴镇后，立即部署了占领赤水县城的作战计划：一师于北向葫市和旺隆方向，二师于南渡过赤水河向丙滩、复兴方向，两师共同对赤水县城形成包围态势。

赤水县城位于贵州的西北角，坐落在贵州与四川的边界上，只有打下这里中央红军才能走出黔北进入川南。

二十六日，红一军团一师师长李聚奎和政委赖传珠了解到，赤水县的县长正命令各乡向县城里运送稻草，以备在川军到来时宿营用，

于是他们立即作出了化装占领县城的计划。早晨，一师两个排的红军官兵化装成送稻草的老百姓，把枪藏在稻草里，远远地走在了主力部队的前面。但是，当他们距离赤水县城还有十多公里的时候，突然遇到了向这个方向疾行而来的川军的一个团。在川军的盘问中，化了装的红军官兵的江西口音很快就被川军看出了破绽，双方立即开始了短距离的战斗。川军占领了右侧的高地，尽管一师三团拼死向高地进行火力压制，但是川军凭借精良的武器还是把一师的主力部队压制在了狭窄的路边。为了夺取高地，摆脱被动，一师反复向川军阵地发起冲击，但是始终无法在不断增援而来的川军的火力封锁下冲出狭窄的山口。战斗进行了数小时后形成了对峙局面。就在一个营的红军官兵准备向川军实施包抄以打破对峙僵局的时候，川军的又一批增援部队——一个旅和一个机炮营——到达了战场，接着就向一师展开了更加猛烈的进攻。战后，川军在其作战报告中把此战描绘得极其惨烈："彼众我寡，往复冲突数次，匪我伤亡均大……我前卫继续仰攻，伤亡甚重，几不能支，乃增加机、炮各二门，前进助战……匪我炮弹，势如雨下，我炮弹迭中匪密集部队，毙匪甚多……"

从另一路向赤水县城迂回的是红一军团二师。二师在抵达距赤水县城九公里的复兴附近时，与已经占领这里的川军的两个团遭遇。复兴三面是山，一面临河，一度冲进去的二师无法迅速摆开战场，在增援川军的凶狠攻击下，红军官兵伤亡极大，被迫撤出战斗。

至此，红一军团占领赤水县城的作战目标没有完成。

首次与川军发生战斗，作战的失利令红军官兵第一次体会到川军攻击性的作战风格和极其强悍的战斗力。

红九军团奉命配合红一军团对赤水县城的攻击，他们在占领了由民团防守的习水县城之后继续向北，在前至黔西北边界集镇箭滩时，与川军徐国暄部遭遇，双方在狭长的河谷里开始了战斗。战斗进行了整整一个白天，红军击退了川军十余次的猛攻，但是川军的增援部队不断到达，并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攻击。红九军团因无法支撑，撤离战场向西南方向而去，试图向左侧的红一军团靠拢。

二十四日，为了掩护中央纵队的行军安全，红五军团在军团长董振堂的率领下，在梅溪河边构筑工事，准备应付突然发生的意外。事后证明他们的准备是完全必要的，因为此时梅溪河对面的山上已经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川军。川军郭勋祺部分三路包抄过来，企图冲过河上的石桥，直接威胁红军中央纵队。红五军团的官兵拼死阻击，双方在石桥附近的河滩上展开了激烈的近战。当川军抽调正面部队向红五军团阻击阵地的侧翼迂回的时候，董振堂乘机发动了冲锋，川军被红军官兵不顾一切的气势所震慑，开始向后撤退。当日，中央纵队通过梅溪。

连日阴雨，山路泥泞，小雨又变成了小雪，路面上结了一层湿滑的薄冰，这给红军的行军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因为不断有人滑倒，因此红军的队伍里都是满身泥浆的人。

一月二十六日，中央纵队到达土城。

从这里向西北，距离赤水县城还有四十五公里。

毛泽东住在土城街上一家绸缎铺后院的一个天然岩洞里。

由于中央红军各部队相继遭遇川军的猛烈阻击，没能按照中革军委的作战计划完成任务，使对实施北渡长江的计划持乐观态度的周恩

来、朱德和毛泽东心情沉重起来。到达土城后，毛泽东和朱德一起开始研究这个赤水河边的渡口小城周边的地形，试图寻找能够击溃川军主力的战场。

在随即发布的中革军委致中央红军各军团的电令中有这样的话："迅速向赤水及其附近地域集中，以便争取渡过赤水的先机，在必要时在赤水以东地区与追击和截击的敌人的一路进行决战。""决战"一词说明此战带有决定胜负的意义。土城一战如若胜利，除了可以鼓舞士气，突破川军的严密阻截外，还有政治上的特殊意义，因为这是毛泽东恢复军事指挥权后的第一仗。况且，对于被压迫在一个狭小地域里的中央红军来说，面前只有一条路，必须像突破乌江，甚至像突破湘江一样从这里冲出去，成功地北渡长江，实现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合。但是，红四方面军现在哪里，他们那里情况如何，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红军中没有一个人十分清楚。只是听闻红四方面军地处富庶地区，拥有十万人以上的红军部队。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七日，中革军委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在土城附近的枫树坝、青岗坡一带与川军进行决战，为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开辟道路。此时，中革军委对敌情的判断是："川敌潘文华二十六日令郭勋祺指挥官、廖泽指挥官、穆［穆肃中］旅、潘［潘佐］旅各部速向东皇场猛追。依此判断，今日进占枫村坝、青岗坡地域之敌约四团，或有后续四个团左右兵力于明后日赶到的可能。"应该说，如果这个敌情判断是准确的话，虽然中央红军在兵力上不占明显优势，但是至少交战双方势均力敌，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已占据有利地形，并可采取突然伏击的手段，那么击溃或歼灭这股川军的大部是有把握的。而且，如果不迅速消灭追击而来的川军，红军很有可能会陷入川军数旅的三面包围中。因此，中革军委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以红一、红九军

团继续阻击向土城方向而来的川军，以红三、红五军团在土城消灭川军郭勋祺旅的建议。遗憾的是，事后证明，中革军委的敌情判断与到达战场的川军的实际兵力有相当大的差距。

土城，位于赤水河中游的一座小城，古称滋州，从前是川盐进入贵州的集散地。这里是黔北的大道要冲，城北三公里处是青岗坡，一个由主峰白马山和莲花山对峙而成的险要关隘，一条弯曲的山道沿着关口而去。如果北出贵州进入四川的话，土城是必经之地。

二十八日凌晨，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分兵两路，对青岗坡的川军阵地发起了进攻。两路红军在抢占了前沿的几个要点后，直接向青岗坡北端的营盘顶冲去。川军拼死抵抗，两路红军进行了数次冲锋，在这个方圆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山顶上，阵地在反复争夺中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在双方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之后，红军官兵终于占据了这个阵地。前面的村庄叫永安寺，是山脚下的一小块平地，平地中央的一座小寺庙就是川军的指挥所，指挥所四周修筑了坚固的环形阵地。围绕着这个阻击阵地，红军官兵遇到了川军的顽强抵抗。战斗进行了三个小时，红军依旧没能突破，而川军潘佐旅的到达使红军的战斗进行得更加艰苦。为了摆脱困境，中革军委命令正沿着赤水河向北开进的红一军团二师迅速返回参加战斗，但是二师最快也需要三个小时才能到达青岗坡。这三个小时，成为这场战斗最残酷的时刻。川军采取正面、多梯次连续冲锋的战术，很快就转守为攻，红三军团出现了大量的牺牲，官兵们在子弹打完的情况下，与川军进行了长时间的肉搏。十团政委杨勇在战斗中负伤，子弹从他的右腮打进，从嘴唇穿出，他掉了六颗牙，血流将整个前胸都染红了。

突破了红军阻击阵地的川军开始向土城迅速攻击，瞬间便打到了中革军委指挥部的前沿。这是战斗最危急的瞬间，如果不能迅速扭转

局面，一旦土城被川军彻底突破，小城的后面就是赤水河，中央红军将陷入背水一战的绝境。

朱德提出要去前沿亲自指挥战斗，他对毛泽东说：“老伙计，不要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能够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

朱德的话让毛泽东动了感情，他一个劲地吸烟，不知该说什么好。

听说朱德要上前沿，指挥部里所有的人都出了指挥部站成了两排。

朱德说：“不必兴师动众，礼重了，礼重了。”

朱德和刘伯承上去了。

毛泽东问：“附近有部队吗？”

身边的陈赓回答：“有，有我们干部团。”

毛泽东说：“上去，跟着总司令把敌人压下去。”

陈赓大喊：“干部团集合！”

中央红军干部团是一支奇特的队伍，它组建于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前夕。那时，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央苏区的四所红军学校，即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红军第二步兵学校以及红军特科学校合编组成干部团，由原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校长陈赓为干部团团长，红五军团十三师政委宋任穷为干部团政委。干部团下设三个步兵营和一个特科营，以及一个“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上干队”

队长是红军大学教员萧劲光，政委是红军大学的另一位教员余泽洪。全团共一千多人。

干部团团长陈赓是中央红军里的传奇人物。一九二四年他和后来成为国民党军陆军中将的宋希濂一起报考黄埔军校，军校只招收年满十八岁以上的青年，二十一岁的陈赓对十七岁的宋希濂说："我可以借给你两岁。"一九二七年陈赓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在起义军撤退途中，他的左腿被国民党军的机关枪射中。危急中陈赓将腿上流出的血抹在脸上和身上，装成死尸躲过了敌人的搜捕。辗转到达福建长汀医院后，傅连暲医生告诉他，他的左腿已经皮肉腐烂，要想保住性命只有截肢。高烧中的陈赓叫了起来："没有腿，我拿什么走路？我怎么带兵打仗？"傅连暲说：一刀一刀剜掉烂肉"那个滋味不比截肢好受"。陈赓恳求傅连暲："打惠州的时候，是我自己把子弹从腿上抠出来的。你大胆做吧，我要是叫一声就不是人！死我都挺过来了，还怕疼？只要能保住这条腿，我陈赓年年给你做寿！"手术做完了，因忍受了剧痛而面色惨白的陈赓对傅连暲说："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好医生。到我们革命队伍里来吧。"从那以后，陈赓一生都没有忘记傅连暲医生的生日是中秋节，直到一九六一年，陈赓在去世前依旧叮嘱家人："每到中秋节，不要忘了向傅连暲同志祝寿。"

一九三五年初，在黔西北的土城战场上，红军真的要感谢傅连暲医生救下了陈赓，使他依然是一名生龙活虎的红军指挥员。

端着步枪冲向敌人的干部团果然是一支英勇无比的队伍，他们迎着川军猛烈的火力，呐喊声和冲锋的脚步不曾有过瞬间的犹豫和停顿，而朱德亲临前沿更使他们勇气倍增。川军被这群头戴钢盔的红军前仆后继的冲击吓住了，之前国民党军还从没见过头戴钢盔打仗的红军队伍。干部团四营营长韦国清指挥特科营的迫击炮把仅有的几发炮

弹轰向了川军指挥所。下午两点，增援的红一军团二师赶到了，与干部团一起发起了新的冲击。这一次，红军一直打到了川军指挥所的跟前。

毛泽东一直在望远镜里看着干部团的冲锋。虽然事后他说干部团的学员是红军的宝贵财富，以后千万不能再这么用了，但是看见川军凶猛的进攻终于被压了下去，毛泽东还是兴奋地说："这个陈赓，可以当军长！"

为了取得战斗的主动，二十八日下午，中革军委调整了战斗部署：红一军团二师从正面，红三军团从左翼，红五军团从右翼，向川军发动总攻。

但是，红一军团的攻击很不顺利，川军占据着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把红一军团二师压迫在一个葫芦形的隘口里。由于地形所限，红军只能仰攻。尽管红军官兵来回冲杀，但是部队始终无法展开，二师只好把部队调向川军的两翼，然后在正面部队佯功的同时，两翼部队突然发动猛攻，川军不得不掉转火力保护侧翼，红军抓住这一时机直扑川军在永安寺的指挥所。永安寺被占领令川军的整个防线发生了动摇，川军被迫退守，与红军形成对峙局面。

川军的拼死作战，与川东南的社会动荡关系密切。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后，因为惧怕红军北渡长江，川东南的富裕乡绅们开始举家迁徙，一时间人心惶惶。尤其是在川东南的中心城市重庆，军阀富豪们更是纷纷转移财产，致使四川汇往上海的金钱数额比平时骤增了百分之七十以上。为此，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给川东南各县县长发去了电报，电报表明"围剿"形势一片大好，各县大可放下心来不必惊慌：

赣匪西窜，经中央军，粤、桂、湘、鄂各军追击，奔逃数千里而入黔中者，仅残部三数万人，枪支不过万余，其已渡乌江者，仅一部分。现在参谋团业已率兵抵渝，中央追击部队已达五万人，正向遵义追剿。滇军五个旅集中毕节，与泸、叙方面切取联络，桂、黔军亦向遵义前进，与本军出击部队相犄角……综计各省及本军在黔边兵力数在二十万以上，军事部署极为周密，决于最短期内在黔边将该匪歼灭。

刘湘要求川东南各县“应抱有匪无我之决心”，“众志成城，精诚团结”，“全民动员，一致防御”，“开导绅民，不得闻风惊惶”，“倘或遇事张皇，或擅离职守，定按军法从事”。最后，刘湘向川东南各县县长保证说：红军已经“奔驰数千里，所谓‘强弩之末不穿鲁缟’，械弹既极缺乏，粮食尤感困难，以十倍于匪之兵力歼三数万疲极之残匪，本总司令确有把握”。

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五时，在中革军委位于土城后山的指挥部里，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紧急会议。这是自中央红军踏上长征征途以来，唯一的一次在战斗还在进行时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中革军委决定在土城附近与川军进行决战时，对敌情的判断有严重的失误，中央红军不是在与川军的三个团打，而是在与六个团的川军共一万多人打，而且川军另外两个旅的增援部队很快就会到达，土城战斗再打下去凶多吉少。与会者认为：由赤水北上进入四川，从泸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无法实现。为了保存中央红军的实力，必须立即轻装脱离战场，西渡赤水河，向川南古蔺方向前进。会议决定毛泽东、朱德和刘伯承仍在指挥所指挥战斗，周恩来负责天亮前在赤水河上架好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那些不符合轻装原则的物资。

土城战斗让红军官兵牢牢记住了一个川军旅长的名字——郭勋祺。

郭勋祺，四川华阳县一农家子弟。早年从军，投效川军潘文华部。一九二一年，潘文华率部投效川军总司令刘湘，潘文华任四师师长，郭勋祺升至第七旅旅长。他与共产党人刘伯承、陈毅曾是好友，与另一位共产党人吴玉章更是来往密切。一九三五年，蒋介石命川军入黔阻击中央红军，刘湘思虑再三派出了郭勋祺的部队。因为刘湘知道，郭勋祺既能打硬仗，又同情共产党。这样一来，当红军一旦入川北渡长江的时候，郭勋祺的部队就会不惜一切地阻击；而如果红军并没有占领四川的意思，那么郭勋祺一定会“相机行事”。土城一战，领受了决战任务的红军显示出必入四川的态势，忠于刘湘的郭勋祺只有率部拼死抗击。川军的猛烈火力造成了红军的严重伤亡，并迫使红军暂时放弃了北渡长江的计划。

土城战斗结束后，郭勋祺被蒋介石晋升为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模范师中将师长。而眼看着战友一一中弹牺牲的红军官兵也记住了郭勋祺，他们表示在日后的战斗中一旦面对这个川军将领的部队绝不手软。整整十二年后，郭勋祺在蒋介石的胁迫下出任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副司令，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襄阳发动进攻时，为了避免与共产党人作战，郭勋祺要求部队撤离战场，但是蒋介石三次电令要求死守待援。最后，郭勋祺在襄阳战役中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俘虏。刘伯承闻讯后特电前线，要求将郭勋祺送至河南宝丰中原军区政治部。正在山东战场上的陈毅闻讯也特意赶到了宝丰。想必郭勋祺见到刘伯承的那个瞬间想起的定是惨烈的土城一战，他对刘伯承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过去在战场上对抗，我很惭愧。”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把手一挥，说：“明打不算，不必介意！”陈毅在一旁大声说道：“你呀你，大炮是没长眼睛的，你怎么跑到襄阳去了？”郭勋祺被刘伯承释放后，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四川前夕，他成功

地策反了五个师的国民党军起义，为成都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凌晨三时，朱德发布了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的命令——史称中国工农红军“一渡赤水”的行动开始了。

中革军委的渡河部署是：红一、红九军团，中央纵队第二、第三梯队，干部团的上干队为右纵队，由林彪指挥，从猿猴场渡河；中央纵队第一梯队、干部团、红三军团五师为中央纵队，从土城下游渡河；红三、红五军团直属队和红三军团四师为左纵队，由彭德怀指挥，从土城上游渡河。为了轻装，中革军委命令把打完了炮弹的炮统统扔进河里。

红一军团二师五团二营奉命抢占右纵队的渡河地点：猿猴渡口。营长刘新金准备挑选三十名水性好的战士组成突击队，在一个机枪小组的掩护下泅水过去打开突破口。第一个报名参加突击队的是共产党员温长。突击队组成后，在机枪排排长陈国辉的率领下出发了。他们向老乡借来个杀猪用的大木盆，让机枪连同射手坐在里面，然后其他人下水推着木盆前进。木盆被推到河道中间的时候，对岸防守的黔军发现了。黔军的枪一响，木盆里的红军机枪手立刻开始了还击。在激烈的对射中，突击队迅速登岸，并攻占了两个碉堡。渡口这边的营主力也乘势开始了强攻，二营最终控制了猿猴渡口。在占领渡口的战斗中，二营伤亡十人，其中包括第一个报名参加突击队的温长。

能否迅速地在土城附近把供中央纵队渡河的浮桥架设起来，是最让周恩来担心的。在土城战斗还在进行的时候，周恩来就迅速召集各部队的工兵，命令他们想法收集船只，同时向土城居民购买各种架桥物资。这是一个万分紧张的夜晚，土城方向枪声依旧激烈，周恩来在

架设现场亲自指挥，工兵们也立下了军令状，他们把收集到的贩盐用的十几只木船在河中沉锚固定，然后用竹竿将船连接起来，再在船上铺上木板。天亮起来的时候，赤水河上的浮桥架设完毕。

红军撤离土城的那个夜晚是混乱的。在战斗打响的时候，城内所有的人都等着前边的部队把敌人赶跑，之后他们还要继续赶路，准备晚上在赤水县城里休息。但是，接近傍晚的时候，战斗失利的消息传来了，跟着就接到了立即向西转移的命令。在一条狭窄湿滑的山路上，休养连的序列很快就被撤退下来的红军作战部队冲乱了，撤退下来的部队的身后就是追击的川军。子弹在队伍的上空呼啸，康克清在最后沉着地阻击着敌人。这个勇敢的女红军在敌人冲到眼前的时候依旧镇静地发射着子弹。一个川军士兵竟然抓住了她身上的背包，康克清一转身，把背包留给了那个川军士兵，自己迅速消失在黑暗里。

摆脱了川军的追击后，休养连的牲口损失了大半。由于民夫的逃亡，很多伤员被迫放在了老乡家，其中一个伤员是军委机要科的干部，周恩来听说后大发雷霆，命令休养连立即把这个干部找回来，无论怎样都得带上他走。

二十九日中午十二时，中央红军从三个渡口全部渡过了赤水河。

红军工兵在向船主们付了钱之后，把浮桥全部炸毁了。

一支川军追到了河边，看见赤水河河面上漂满了木板的碎片。

向西撤退的中央红军分三路进入了川南叙永县境内。

叙永是川南重镇，处在从贵州西进四川和云南的交通要道上。一条小河穿城而过，河上有两座石桥。县城的城墙十分坚固，早在中央

红军刚刚到达黔北的时候，叙永县县长就强行把城外的一千多幢民房全部拆除了，然后沿着城墙挖了壕沟修了碉堡。在中央红军向叙永靠近的时候，在这里防守的是川军教导师第一旅的一个团和第二旅的两个连，还有县民团的五个“义勇”大队。

如果从古蔺北渡长江，就必须占领叙永。

二月一日，红一军团二师奉命向叙永县城攻击。

攻击叙永的战斗进行得极其艰苦。红军官兵分成多个小组，在火力的掩护下架设云梯强行登城，守城的川军和民团用猛烈的火力和马刀、刺刀、镰钩枪、石灰罐拼死抵抗，红军的多次强攻都没有成功。夜晚，一队红军潜入了城墙东北角大碉堡的地道里，与地道里的川军扭打在一起。负责在这里指挥战斗的是川军营长刘光耀，他勒令县城里的大盐商交纳八百块大洋，然后以每人二十块的价格招募了一支敢死队。但是这支敢死队的十二人战死后，就再也无人应征了。川军无法指望别人只好自己死拼，在将红军击退后，他们用乱石封闭了地道口。

叙永县城依旧没有被攻破。

这时，川南“剿匪”总指挥潘文华已经判断出中央红军的目的依旧是从叙永北渡长江，于是立即改变部署，命令川军的八个旅和一个警卫大队直扑叙永。同时，蒋介石也调整了战斗序列，以黔军、滇军各部队和中央军薛岳部共同组成“剿匪军”第二路军，共十三个师加四个旅，分为四路纵队，急促向川南地区推进。

二月三日，中央纵队在红五军团的掩护下到达古蔺的石厢子。石厢子是古蔺县城边上的一个偏僻的山村，中央纵队到达这里时正值春

节的大年初一。二月四日，在叙永县城久攻不下和川军增援部队不断到达的情况下，中革军委作出了新的决定：放弃在叙永一带北进的计划，向云南东北部的威信和扎西转移。

土城战斗的失利和北渡长江的夭折，令红军官兵再度迷茫起来。

首先，中央红军长途征战的目标再次模糊了。从中央苏区出来的时候，目标是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路线，去湖南西部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合，但是由于路线被国民党军严密封锁而没有实现。经过湘江突围和渡过乌江之后，尤其是对黔北地域的顺利占领，令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可能性突然显现，这给全体红军官兵带来了极大的振奋。可是，红军每一次试图向长江靠近的战斗都未能取得突破，现在中央红军又重新回到了“到底要走向哪里”的起点。

其次，接连失利的战斗令中央红军损失严重，尤其是主力军团损失更为巨大。红三军团四师十团在掩护师指挥所的战斗中，一营和二营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兵力，其中七连最后使用了预备队，到战斗结束时，全连活下来的只有连长一人，太多的牺牲令这个五尺高的汉子大哭不止。为了保持作战能力，彭德怀对部队进行了整编。九连解散了，九连连长黄荣贤被降到班里任班长。到了班里，黄连长才发现，这个班的九名战士竟然全是各连的连长。十名连长彼此相互看着心里直发酸，最后他们把手拉在一起说：“咱们早晚要重新拉起一个团来！”

中央红军从突破乌江直到土城一战，在黔北的遵义地区留下了不少伤员，他们被红军托付给当地的贫苦百姓收留看护。红军撤离遵义地区后，土豪劣绅在国民党军阀的支持和怂恿下，对拥护红军的百姓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他们封山封路，到处搜查，以“杀一个红军伤员或

掉队者给一块大洋”的悬赏，大肆捕杀掉队和受伤的红军和曾经帮助过红军的人。黔军师长柏辉章在遵义城内连续屠杀三天，城内有六百多人遇害。在红三军团驻扎过的懒板凳，一名红军伤员被搜查出来，腿被打断了也宁死不跪，牺牲的时候趴在地上面向红军主力转移的方向。遵义城里的大地主罗徽五，不但在回到遵义后大肆抢掠，说要把他家“被赤匪分的东西全部找回来”，而且还提着马刀到处寻找红军伤员。他在遵义附近的新街把生病倒在路边的一名红军战士砍死，然后抓了一名在老乡家养伤的十四岁的小红军，在把那家乡亲全家杀尽之后，罗徽五对小红军进行了残酷的折磨。新街的老人至今还记得当时整条街都听得见小红军的叫骂声，老人们说那叫骂声最后变成了一丝一缕的气息。国民党区长刘焕章把抓到的二十多名红军伤员全部用大刀砍死，然后对最后一个小红军说：“只要你愿意当长工就可以不死。”小红军用清脆的江西话破口大骂：“我给你们当爷爷！”这位至死带着八角帽的小红军被砍倒在水沟里时依旧怒目圆瞪。在一个叫蒲家洞的地方，刘焕章的手下从老乡家搜出了十名红军伤员，红军官兵像在战场上一样拖着负伤的身躯与敌人进行搏斗，最后全部被害。其中一个大个子红军，头被砍了一刀后依旧扑向刽子手。当地的百姓数十年之后依旧说，红军把脑袋抱在怀里和土豪们拼命。在遵义东南有个叫桑木垭的地方，红军驻扎在那里的时候，红军小卫生员经常给百姓看病。在红军撤离遵义的前一个晚上，红军小卫生员被一个孩子叫走了，因为这个孩子的母亲生病就要死了。红军小卫生员看完病回到桑木垭时，部队已经撤离了。小卫生员一个人上路去追赶队伍，没走出多远就被国民党保长拦住杀害了。当地的百姓们把红军小卫生员的遗体洗干净，埋在了路边，那里从此被百姓们叫做“红军坟”。一些百姓生病了，就到“红军坟”边去祷告，回家后果然会觉得好了些。于是一传十十传百，那里的百姓都说红军小卫生员死后变成了“包治百病”的

菩萨。后来，国民党军队来了把坟平了，但是第二天，“红军坟”就被百姓重新堆了起来。

从叙永往西，中央红军在四川、云南和贵州交界处的荒凉的山区中整整徘徊了十二天。

这是中央红军面临的又一个危急时刻。

毛泽东走在茫茫的风雪里。他知道，土城战斗的失利必会引起部队官兵的议论和不满。这是他恢复军事指挥权后的第一场战斗，战斗指挥确实存在着问题：北渡长江的企图没有隐蔽性，打的是红军不擅长的阵地攻坚战。而目前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央红军始终没有摆脱被国民党军“追剿”的局面。从战略战术上讲，在过去的日子里，红军能够取得战斗胜利的原因是什么？是机动灵活，是行踪不定，是动作突然，是出其不意，是在运动中打击敌人。

雪后初晴，朗月高天悬挂。

中央红军刚进遵义的时候，毛泽东曾说：“走呀，咱们进夜郎国！”所谓的夜郎国，并不只存在于传说中，它在中国的历史上确实存在，虽然位置不断游移，但至少从战国到汉朝，此刻毛泽东脚下行走的地方就是那个叫“夜郎”的小国的领地。

一九三五年二月六日，大年初四，中央红军在天寒地冻中到达云南东北部的扎西镇。扎西镇孤悬于云南的东北角上，全镇仅三百户人家。毛泽东宿营的那个村庄叫做鸡鸣三省。

中央红军在这里停下了一直向西的脚步。

因为是春节，中央纵队和红军各军团负责民运和筹粮的干部们四处奔走，试图尽一切可能让官兵们能够吃上一顿饱饭。

蒋介石的春节是和宋美龄一起在庐山上过的。在那里的一幢西式别墅里，他们夫妇和张学良夫妇度过了一个愉快的除夕之夜。刚上庐山的时候，蒋介石发表了一个讲话，讲话里没有提到“赤匪”，因为他认为这个话题已经不值得一提了，那些特意赶上山的记者们也没多问。几天前，蒋介石看到了一个材料，材料里有这样的话：“共军内部在遵义井冈山派与苏俄派斗争非常厉害，井冈山派只谈主动硬干，坚决反击国民党军，苏俄派则空谈理论避重就轻，斗争结果毛泽东的井冈山派胜利。”对于蒋介石来讲，这没有什么意外，因为他一直只把毛泽东当作真正的对手，而现在这个对手已经跑进没有人烟的山里去了。蒋介石目前讲的最多的是社会舆论的焦点问题——中日关系，他特别强调了“中日亲善”的观点：“日本广田外相在议会所发表的对我国之演说，吾人认为亦具有诚意，吾国朝野对此有深切之谅解，我全国同胞亦当以堂堂正正之态度与理智道义之指示，制裁一时冲动及反日行为，以示信谊。”

一九三五年中国的春节没有什么特殊的事件可以记述。《申报月刊》所描述的当时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的有闲日子也显得平淡无聊。北平人照旧喜欢听京剧，“他们对拍子、转板和神态都有很精致的考究”。他们照旧在茶馆里喝茶，“喝了一会儿茶，躺了一下子，看看报，也许谈谈天，有的干脆就在那里睡了一觉”。他们还爱玩鸟，“他们永远不会寂寞，因为小鸟是他们的良伴”。当时“标准的天津人是大胖子”，“你如果看见一个面部像一只肥硕的鸭梨，上面窄小向下阔大臃肿起来，由胸以下到大腿根凸起一个地球仪式的大肚子，那便是天津人的标准”。天津人胖的原因是“喝茶有惊人的海量”，他们在茶馆里

喝，在戏院里喝，在澡堂里喝，而且吃得很饱。至于首都南京人，“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说是乡下人，却没有乡下人的敦厚；说是城里人，又没有城里人的气魄”。南京城里遍地是“长”，任何人一旦荣任了什么“长”，就像坐在了金銮殿上，“头是八角的，两眼朝天”。夫子庙那块地方就是他们的俱乐部，“他们笑、谈、吃、喝，津津有味，乐而忘返”。南京的板鸭实际上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好吃。女人“多穿旗袍，臃臃肿肿的，好像里面塞了许多草，她们说话的声音比男人还粗重，女孩子如果学了南京腔调，就只能嫁给南京人了”。

读报纸的中国人也许还可以看见蒋委员长最近签署的最新“赏格”：

（一）朱德、毛泽东、徐向前，生擒者各奖十万元，献首级者各奖八万元。

（二）林彪、彭德怀、董振堂、罗炳辉，生擒者各奖八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五万元。

（三）周恩来、张国焘、项英、王稼祥、陈昌浩，生擒者各奖五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三万元。

（四）王宏坤、王树声、何畏、孙玉清、余天云、王维舟、刘伯承、叶剑英、倪志亮暨伪中央政委、伪军团政委、伪军长等，生擒者各奖三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二万元。

在中国西南部的荒山野岭中，共产党中央的领导人围着火盆，吃着烤山芋，又一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

扎西会议实际上是遵义会议的延续。

这次会议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是：博古彻底交出了共产党总负责人的权力。关于这一事件，所有的史料都记述简单，即使当事人的回忆，也存在着很大差异。但是，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博古自此没有了决策权。应该特别说明的是，博古将党中央的领导权交给了张闻天。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当时对他讲："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权力的交接形式很简单，让那几副一直跟随博古行军的装有党内文件、中央档案和印信公文的担子，从此跟随着张闻天行军。新上任的张闻天是中国共产党第五任总负责人。前四任是：一九二七年以前，陈独秀；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瞿秋白；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向忠发；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空缺；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博古。

扎西会议讨论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并且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将中央红军的征战目标改为："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会议还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除干部团外，中央红军共编为十六个团，其中红一军团两个师六个团，其他各军团取消师，红三军团四个团，红五、红九军团各三个团。同时，抽调一百多名干部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并组建川南游击纵队。

周恩来亲自向那些被留下的干部作了动员。

上干队政委余泽洪被留了下来，任中共川南特委宣传部部长兼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政委。这一年年底，他在四川江安的战斗中牺牲，年仅三十二岁。

女红军李桂英也被留了下来。

二十五岁的李桂英是江西寻乌的一个贫苦家庭的女儿，她在家乡听了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演讲之后跟着红军的队伍走了。之后成为红军中著名的“扩红”突击队队长。中央红军军事转移开始时，她在中央工作团当战士，后被调到总卫生部担架连任指导员。这是一个工作繁重的职务，每天要组织两百多名挑夫行军。担架连的红军每人每天发一茶缸米饭，李桂英从来舍不得吃，因为怕挑夫丢下红军伤员，所以每天她都把自己的那一茶缸米饭给了挑夫，她一直在靠吃野菜行军打仗。担架连还有一个庞然大物——X光机。X光机被装在一个大箱子里，足有七八百斤，需要八个战士才能抬起来，李桂英每一天都为了它前呼后喊，当男同志实在抬不动了时，她就对担架队里的姐妹们说：“男同志不干了，我们女同志抬。”担架队在枪林弹雨中把X光机从江西南部的中央苏区，一直抬到了贵州北部的遵义县城。在遵义，毛泽东看见了这个令人惊奇的大箱子，他问李桂英：“那个像棺材一样的东西是什么？”李桂英告诉毛泽东：“照肺用的镜子，宁都暴动时带来的。”毛泽东吃惊地看着瘦弱的李桂英，问：“你们就一直抬着它？”李桂英点了点头。毛泽东毫不迟疑地说：“扔掉它，轻装前进。”坚强无比的女红军李桂英被留下来不到一个月，她的丈夫、川南特委组织部部长戴元怀就在掩护战友突围的战斗中牺牲了。不久，川南游击纵队被打散，她在数百名敌人的包围下被俘，遭受了比死亡更残酷的折磨。直到第二年的秋天，李桂英才被组织设法保释出狱。一九三八年元旦，在中共中央长江局招待新四军领导的宴会上，周恩来看见了留着齐耳短发的李桂英，周恩来对站在他身边的项英说：“她叫李桂英，长征中没有到达延安，但她走得比我们还要艰难。”

扎西会议急于解决的问题是：被围困的中央红军要到哪里去？哪个方向才是敌人最预料不到的方向？

毛泽东建议：向东，再渡赤水，回到遵义去。

# 第十章 残阳如血

1935年2月·娄山关



一九三五年春，中央红军离开云南东北部荒僻的扎西镇重新进入贵州北部，为摆脱纠缠已久的国民党军的追击而连续进行的游动作战，即使从最苛刻的角度评价，也可以称得上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

所谓“奇观”，并不是指战争的规模。一九三五年发生在中国的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的武装对抗，如果仅从兵力规模上看，于人类战争史中似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就其在以追逐与摆脱为主要内容的作战过

程来讲，双方军队的任何一位优秀的军事参谋，都无法在地图上清晰、准确而又完整地标出其密如蛛网的游动路线和瞬息万变的战场态势。这一作战过程险象迭出而又绝处逢生，山穷水尽而又柳暗花明，悲痛欲绝而又欢喜若狂，极其生动地把残酷的战场作战演绎成了一部战术对抗的精彩大戏——严格地说，中央红军第一次渡过贵州北部的赤水河，是战斗失利后的被迫转移。而在其后两个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连续在那条大河的两岸来回穿越。且不论中央红军第一次渡过赤水河是否神奇，但是之后的每一次渡河，无不令中央红军一次又一次地化险为夷——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一日，毛泽东人生经历中一个重要的时刻就从那个晴朗而又寒冷的早晨开始了。

这一天，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中央红军各军团和中央纵队开始从扎西镇向东进发。这是一个让红军官兵心绪复杂的早晨，脚下的路几乎就是十几天前走过的路。为什么一路打过来现在又要回去？红军官兵心中有了挥之不去的困惑，因为无法清楚地了解往回走的理由，也就不能预测未来的前景是什么。

那个早晨，毛泽东对中央红军的未来并没有更远的预测，因为眼下中央红军被敌人合围的态势已经越来越严重了。

土城一战后，红军的撤离令川军一鼓作气，一路紧追中央红军而来，始终在北面与中央红军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随时准备与试图再次北渡长江的红军决战。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后，四川省内的川军开始全部向北移动，不但在川南和滇北形成了一道严密的封锁线，而且还调来水面舰艇封锁了长江江面。在川军布防兵力不断得到加强的情况下，谁也无法预料他们是否会主动发起攻击。

二月十四日，川南“剿匪”总指挥潘文华发布命令，要求各路川军继续向停留在扎西附近的中央红军进逼，与滇军、中央军“协同截堵”，“务必拒匪于叙、蔺大道以南”——叙永、古蔺的南边，就是滇北的扎西。此时，国民党军第二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孙渡已命滇军各部队死守滇界，无论如何不能让中央红军进入云南腹地。孙渡所担心的与广西的白崇禧和贵州的王家烈一样：中央红军一旦进入云南，蒋介石的中央军跟着就会进来——

如果共军进入云南，则中央军必跟踪而来，那就会使云南政局有发生变化的可能。因此我们防堵共军，还是以出兵贵州为上策。在共军未进入云南以前，应尽最大努力去防堵，总以不使共军进入云南为最好。但我们兵力不敷分配，处处设防则处处薄弱，集中一点则两侧空虚，防堵任务殊不易达成。因此，不能不有共军入境时的打算。若共军已进入云南，为免除以后一切麻烦起见，只有追而不堵，将共军尽快赶走出境为最好。

孙渡的观点深得云南军阀龙云的认同。

土城一战，龙云对滇军没有战绩甚为不满意，觉得与川军相比，滇军令他在委员长那里很没面子。龙云认为，中央红军即使是铁打的，这一次也无法逃脱覆灭的结局了：“共匪在江西时，本属凶悍，各长官印象太深。此次西窜，路经数省，迭被截击，损失已在十之八九，昼夜兼行，为克喘息，纵为铁铸之身，至今亦难久持。”而在这种情况下，滇军依旧“行动迟缓，近于畏匪，每到一地，必拥挤一处，延挨多日”。与川军“以旅或以团独立作战者，已成天渊之别矣”！因此，龙云要求滇军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勇气和决心“奏非常之奇勋”。否则，“若再迟疑犹豫，不特共匪难灭，且将贻笑大方。吾滇人士，不免失望”。受到龙云的严厉指责后，滇军各部队开始向扎西急速推进。

此时，陈兵贵州乌江南岸的薛岳也接到了蒋介石的电令，电令要求中央军和川军密切协同，“将西窜之匪完全消灭”。为此，薛岳命令国民党中央军各部队“兼程向古蔺前进”。因为红军已经进入了四川和云南，疲于奔命的黔军终于松了一口气。驻扎在桐梓的黔军师长何知重提醒王家烈说，既然红军已经离开了贵州，现在要紧的是赶快恢复地盘，加强对黔境的防守，绝不能让红军再回来。王家烈立即将黔军主力全部调往了黔北——就在中央红军从扎西开始向东移动的时候，川军、滇军和国民党中央军正从不同的方向快速向扎西开进。中央红军是否会与国民党军迎面相撞？或者再次被国民党军重兵合围？而要想从合围敌军的缝隙中穿越出去该是怎样的一种险境？

毛泽东还有另一件令他焦灼不安的事：贺子珍临产了。

走在长征队伍中的女红军生产，是一个悲伤的历史话题。

红九军团二十二师师长周子昆的妻子曾玉在红军翻越老山界时临产，孩子在战火中出生后被丢弃在草丛里。共青团书记凯丰的妻子廖似光也经历了相似的苦难。由于严重的营养不良和长时间的奔波作战，只有七个月身孕的廖似光在红军翻越一座大山时早产了。警卫部队冲上来阻击追击的敌人，廖似光在激烈的枪声中把孩子生下来后，用一件衣服裹上孩子抱起来就跑。她在上海工作的时候曾经生过一个女儿，因无法带着孩子通过封锁线去中央苏区，她把孩子送给了上海的一家红十字医院。此刻，廖似光不愿意再一次丢弃自己的骨肉，可是，究竟无法抱着孩子长途转战。当部队遇到第一户人家时，廖似光还是把自己的孩子留给了老乡。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的妻子陈慧清的生产更是险象环生，那时中央纵队正以急行军的速度通过贵州境内的一个山口，二十六岁的陈慧清却要分娩了。她被抬到了路边的一个草棚里，董必武和休养连连长侯政焦急地守候在一边。陈慧清因为

难产在剧烈的疼痛中打着滚。枪声越来越近了，董必武对警卫员说："去，告诉董振堂，这里在生孩子，让他把敌人顶住。"董振堂把三十九团团长吴克华叫来了："生孩子需要多长时间，就给我顶多长时间！"三十九团的红军官兵在距离陈慧清不到一公里的地方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战斗。拼杀中，不断有官兵问："生了没有？生了没有？"整整两个小时后，孩子出生了。董必武立即命令把已经昏迷的陈慧清抬走，然后他抱着孩子掏出了一张纸——年近五十的老红军董必武在这张纸上用最恳切的话语写道：收留这个孩子的人是世上最善良的人。写完了，他把字条放进包裹着孩子的衣服里，把孩子轻轻放在了弥漫着硝烟的路边。担负后卫任务的三十九团随即撤离了阻击阵地。当董振堂听到有官兵埋怨说为了一个孩子让一个团打阻击不值得时，这位红军军团长火了，董振堂说："我们今天革命打仗，不就是为了他们的明天吗？"

从扎西出发的第四天，是贺子珍与毛泽东结合后的第四次分娩。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一个女孩儿，一九二九年出生在红军第二次攻打福建龙岩的时候。因为部队要撤离，出生仅仅二十天的孩子被托付给了当地的一户老乡。三年之后贺子珍回到那里去找女儿，老乡说孩子早已经不在人世了。一九三二年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毛毛在苏区出生，红军军事转移前夕被留给了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现在已是音讯全无。在毛毛一岁的时候，他们还有过一个男孩，但是由于早产而夭折。此刻，在路边残破的空房子里，贺子珍在呻吟中不断地念叨着："第四个……第四个……"天下着雨，格外寒冷，女红军们撑着雨衣为她遮挡寒风和冷雨。贺子珍的生产依旧不顺，在极度的疼痛中，她透过残破的屋顶看见了阴云密布的天空。两个小时后，孩子生下来了，是个女儿。警卫员给孩子擦了身子后，用一块土布把孩子包了起来，

然后大家都愣在那里，不知该怎么办。沉寂了好一会，贺子珍说：“中央有规定，行军不能带孩子，你们想办法送人吧。她长大了如果参加了革命，会来找我们的……”董必武立即把孩子连同三十块银元一起交给了警卫员和毛泽民的妻子钱希钧。两个人抱着孩子转身就跑，跑出去了好远，才在一座山坡上发现了一户人家。进去一看，里面只有一个年迈的瞎眼老婆婆。四周荒无人烟，只能留在这里了。钱希钧回来小声地对贺子珍说：“是个阿婆，人还面善。”一直没掉眼泪的贺子珍突然号啕大哭。

数十年后，经当地部门的详尽调查，确定当时收留孩子的老人是家住白沙河边的张二婆，老人还给孩子取过一个名字叫王秀珍，孩子在三个月时因身上长毒疮死了。

虽然妻子生孩子的消息会在第一时间被飞报给毛泽东，但是史料中没有毛泽东在得知他的又一个女儿被丢弃在深山里时的记述。

在连续四天的阴雨中，中央红军到达了川黔边界的古蔺县境内。

此时蒋介石的判断是：中央红军依旧在扎西附近徘徊，而且还在寻找北渡长江的可能。

这是中央红军突然东进的行动尚未暴露之前的微妙时刻：此刻北面的川军依旧在向扎西逐渐靠近；西面的滇军由于已经接近了扎西，更加小心翼翼地在试探前行；南面的国民党中央军正不分昼夜向北开进；而在中央红军行军方向的东面，黔军已经在自己地盘里的各个要点驻扎了主力。

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文件一开始就说明当初

之所以放弃遵义决定北渡长江，是为了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但是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进行阻挡，“党与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文件没有掩饰形势的严峻：“或者是我们消灭敌人，创造新苏区，求得休息扩大的机会；或者是我们不能消灭敌人，长期地为敌人追击堵击与截击，而东奔西走，逐渐消耗我们自己的力量”。文件提醒全体红军官兵，无论哪一种结局“完全决定于我们自己”。那么，怎样实现消灭敌人的目的呢？怎么获得创建新苏区的结果呢？文件接下来的文字可谓关于中国革命的经典阐述：

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从井冈山起就一直跟随毛泽东作战的红军官兵，对这样的话语再熟悉不过了。即使是在十年之后，壮大起来的共产党武装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最后的大兵团决战时，毛泽东关于战争艺术的阐述依旧是这样的语式：“不预先存着一定要打开某城，一定要歼灭多少敌人的想法，能歼多少算多少。军队疲劳就休息，休息好了就打仗……增援到了看形势，好了就打，不好了就机动。”

二月十六日这天，距离中央红军最近的川军发现情况似乎有点异样，刘湘赶紧给薛岳打了个电报，电报说：“南窜之匪，经我滇军压迫，有回窜蔺叙之模样。电请薛总指挥，饬驻古蔺部队出击。”虽然川军的情报已经晚了，但是薛岳的回电竟然是：“古蔺附近阵地，职已配备完全，俟其到达，彼劳我逸，可操胜算。”——此时，中央红军从古

蔺南侧悄悄越过了薛岳“配备完全”的阻击阵地，已经再一次到达了川黔交界处的赤水河边。

事后证明，在中央红军离开扎西向东移动的七天之内，除了川军发现了红军移动的一丝迹象外，国民党军并没有弄清楚中央红军的行动意图，其各路大军依旧在向扎西方向急速推进。于是，在中央红军第二次渡过赤水河之前，其东进的举动已经具备了出其不意的前提。

中央红军近三万官兵经过七天不停顿的行军，终于在国民党军重重包围的一个缝隙间穿过，走到了包围圈的边缘。现在，红军官兵直接面对的只有让红军打怕了的黔军了。而此时的黔军仍然以为红军远在滇东北而毫无戒备，他们的总司令王家烈正在桐梓忙着家事，因为他母亲的寿辰日眼看就要到了，戏班子的戏码和寿宴的菜谱令他和他的副官们忙得不可开交。

二月十八日，中革军委发布了“为东渡赤水对我军十九日行动部署致各军团”电，要求中央红军各部队“须在明［十九］后两天以最迅速坚决行动确实取得并控制渡河点，架好浮桥，最迟要二十夜及二十一上午全部渡河完毕”。

二渡赤水河的作战行动依旧是两个主力军团担任开路前锋：红一军团为左路，占领太平渡附近渡口；红三军团为右路，占领二郎滩附近渡口；中央纵队在后卫红五军团的掩护下从中间通过。

红一军团先头部队二师迅速到达了太平渡，控制了渡口和河岸边的船只，并以一个团抢先渡过赤水河，占领了河东岸贵州境内的高地。接着又派出另一支部队，在土城附近渡过了赤水河，对土城、猿猴的黔军进行侧击，以掩护主力部队渡河。在两支红军部队的攻击

下，黔军只是朝天放了几枪就跑得无影无踪了，致使红军的工兵部队在相距十公里的太平渡和九溪口两个渡口同时架起了浮桥。

右纵队红三军团的先头部队是十三团。十八日晚十三团抵达了二郎滩渡口。这是一个坐落在川黔两省交界处的繁华小镇，集镇沿着赤水河西岸延伸开来。就在红三军团到达二郎滩渡口的时候，黔军犹国才部的一个团也正向这里急速推进，并占领了河东岸的一个制高点，其一部已经开始向赤水河西岸赶来。对于十三团的红军官兵来讲，争取到先机就是胜利。虽然只找到了三只木船，但红军还是开始了强渡。每只木船最多可容三十人，由于河水水流湍急，船只一个来回很费时间，这让团长彭雪枫万分焦急。好容易渡过去一个营，彭雪枫立即命令占领滩头阵地。突然，不远处传来了枪声，原来向这里开进的黔军和一支闻讯前来助战的游击队顶上了。黔军这才知道二郎滩渡口已经来了红军主力，于是赶紧停下脚步，在山腰上开设了阻击阵地。十三团渡过两个营后，立即对黔军发动了攻击。彭雪枫说：“这是背水一战，又是向上仰攻，不进则败，要勇猛冲锋，坚决把敌人打垮。”两个营的红军官兵鼓足了勇气，迅速展开了攻击队形，以决死的态势向山上的黔军阵地扑了上去。红军的呐喊声刚一响起，黔军没有抵抗丢下阵地就跑了。敌人一跑，红军官兵马上意识到这是黔军，于是大胆地开始追击。黔军为了逃命纷纷从河谷悬崖上往下跳，因摔伤不能动的在一个小山窝里就挤了三四十人。红军官兵不能往下跳，只能绕着山路追下去，弯曲的山路上到处都是黔军丢弃的背包、手榴弹、子弹和枪支。黔军逃跑的时候有脱下军装再跑的习惯，于是黔军的军装也被扔得到处都是。

当晚，二郎滩渡口的浮桥架设完毕，红三军团的后续部队陆续渡河。十九日早晨，渡过河的红三军团主力部队向当面的黔军阵地发起

了攻击。防守这个阵地的是昨晚增援而来的黔军的一个团，由副师长魏金荣率领，阵地修建在通往遵义的一个叫把狮坳的山口上。红三军团分兵几路，正面进攻，左右迂回，一支小部队甚至翻越大山，跑到了黔军阵地的后面。魏金荣发现后路已被截断时，立即带着几名卫兵率先逃离了阵地，结果引发了黔军不可收拾的大溃逃。

左纵队的红一军团一部在土城附近渡过赤水河后，立即向土城和猿猴发动了进攻。驻守这两个据点的黔军象征性地抵抗了一阵后，就向北撤退到葫市等待增援。驻扎在土城附近的黔军教导师第三旅五团借口没有防守土城的任务，也即刻撤离了。五团二连的书记官许俊陶刚回家过完元宵节，回到部队就赶上了疯狂的溃逃。他混在溃逃的队伍里一离开驻地，就发现自己已经被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红军包围了。营长徐定远从中弹的马上摔下来，在许书记官的搀扶下拼命奔跑，好不容易才逃出红军的火网——“我团损失很大。”许书记官回忆说，“被打死打伤的士兵遍地都是。死的无人掩埋，伤的无人救护，伤亡者的枪弹全被红军缴获了。”

攻打土城的红一军团官兵心情是复杂的。因为十几天前，就是在这里，他们的许多战友付出了生命。占领土城后，他们站在依然能够闻到血腥味的战场上，不禁百感交集。

红一军团扫清了黔军的阻击后，向桐梓的北面直插过去。

同时，红三军团也开始向桐梓的南面疾进。

就在中央红军大规模渡过赤水河的这一天，蒋介石下达了“在赤水河以西地区消灭红军的部署”。部署称：“查朱、毛残部不及万人，粮弹两缺，状极疲敝，毫无战斗能力，经川、滇军压迫……似有回窜入

黔模样。我军以集歼该匪于叙、蔺以南，赤水河西，仁怀、毕节以北地区之目的，拟联合各军向匪围剿。”但是，仅仅过了两天，中央红军就快速突破了黔军的防守，从赤水河以西打到了赤水河的东岸。于是，蒋介石的军事部署随即变成了一纸空文。蒋介石在地图前来回巡视，最后勉强得出这样一个推想：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不成，现按原路返回，定是又要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这时蒋介石收到了一份情报，情报称：一、红一军团正向东疾进，各军团也在跟进；二、红军总兵力不详，新兵没有装备且多数逃亡，八军团的番号已经撤销，大约总数在两万多；三、红军不继续向西而向东的原因不详，可能与国军的前堵后追有关；四、红军现在提出的作战要求是“打倒王家烈、打倒周浑元”——这样的情报简直就是一堆废话！

二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到达汉口。此时他已不得不为日益严峻的中日关系而焦虑。他和汪精卫商定了联名向全国发布严禁排日运动的命令，又商量了禁止各报纸、通讯社刊发抵制日货消息的通告。之后，他调整了对中央红军的作战部署：

命川军郭勋祺部三个旅向土城方向追击，“蹑匪尾追，穷匪所至，不灭不止”；

命滇军孙渡部三个旅由扎西向赤水河以西地区推进，“协同川军，觅匪进击”；

命中央军周浑元部沿赤水河两岸，“协同川、滇军寻匪兜剿”；

命川军潘文华部速赴赤水、习水一线，协同黔军“堵匪北窜”。

之前，蒋介石还做了两件他认为比与红军作战更为重要的事。首先是以和共产党武装作战为由，命令四川各路军阀交出地方权力，将四川的一切统治权归属省政府主席刘湘。这是蒋介石和刘湘私下达成的一项协议，即任命刘湘出任省政府主席，刘湘允许中央军进入四川。蒋介石向四川派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军事机构，名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参谋团”，颇有一点接管或监管四川的架势。在任命刘湘出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典礼上，参谋团主任贺国光说：长期脱离中央管制的四川是个一塌糊涂的地方，目前积弊有六：一私、二贪、三穷、四毒、五乱、六伪。最后一个“伪”，指的是红四方面军在四川境内建立的一块红色根据地就是屡“剿”不灭。蒋介石做的第二件事是：任命云南军阀龙云为“追剿军”第二路军总司令，任命薛岳为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兼贵阳绥署主任。这个任命使一直受地方军阀指挥的薛岳终于释怀，在掌握了贵州的军政大权后，他立即着手搜集王家烈在贵州的种种“恶行”，特别是反蒋的“恶行”。

二十一日，在汉口的蒋介石给王家烈发了一封电报，通知他接受薛岳的指挥，同时命令他立即开赴前线。

这一天是王家烈给母亲正式做寿的日子。应该说，在中央红军西去云南扎西的十几天里，王家烈的心情是十分愉快的。给他带来巨大灾难的红军终于离开了贵州，现在该轮到四川的刘湘和云南的龙云倒霉了。王家烈很想借给母亲做寿的机会庆祝一番，同时也联络一下贵州各界，准备在地盘分配上再与犹国才他们较量一番。宴会觥筹交错，人声鼎沸。突然，有人一路小跑进来，一直跑到了王家烈的跟前报告说：红军已经回到了贵州！红军打回贵州的消息令来客一哄而散。王家烈独自一人呆坐了很久，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红军要干什么，朱毛红军为什么如此和他过不去。王家烈匆忙回到遵义召集了军

事会议，几近绝望的他在会上对何知重、柏辉章两个师长说：在贵阳，薛岳的中央军掌握了一切，没有咱们的地位了。黔北是咱们起家的地方，保住了这块地盘，才有东山再起的可能。你们两个如果愿意和红军拼死一战，我提供军饷和伙食。王家烈这一次真的动了感情，两个师长忙说：“愿意和总司令共存亡”。

二月二十三日，红一军团到达了习水县新罗坝，红三军团到达了桐梓以西的花秋，红五军团到达了习水附近的良村，红九军团到达了习水附近的碗水，中央纵队到达了吼滩。

当晚，中革军委命令红一、红三军团对桐梓县城发起攻击。

此时的桐梓基本上是一座空城。黔军在慌乱中调度出了问题，原来驻扎在这里的部队被调往了北面的松坎，城里只留了两个连，说是等待黔军杜德铭旅前来接防。结果杜旅长的部队没有等来，却等来了红军的猛烈进攻。

黔北重镇桐梓就这样再一次被红军占领了。

顷刻间，桐梓县城内写满了红军的标语，路上还立着不少路牌，上面写着：“前面打了土豪！快去分谷子！”

占领桐梓后，红三军团开始向桐梓以南的遵义方向疾行。十三团团长彭雪枫回忆说：红军官兵对第一次占领遵义时的印象太深了，“繁华的街市，热情的群众，鲜红的橘子，柔软的蛋糕”，所有这些记忆无不令官兵们一路上兴致高涨。沿途贫苦的百姓都出来看红军的队伍，每天都有近百名贫苦农民加入红军。

红三军团到达回龙场的时候，毛泽东来了，他号召红军官兵一鼓作气，消灭王家烈和周浑元的主力，打一个漂亮的大胜仗。毛泽东说：敌人就像五个手指，咱们要一个一个把他们割掉。怎么割这些指头呢？现在的关键是一面“牵牛”一面“宰猪”。“牵牛”就是派一支规模不大的部队往北，装成红军的主力，用打了就跑的办法去与川军兜圈子，给敌人造成中央红军主力还要北渡长江的错觉，至少要在桐梓以北把川军牵制三天以上。同时，红军主力大军南下去打遵义，大刀阔斧地去“宰”黔军这头“肥猪”。红军官兵们都被毛泽东的话逗乐了。

毛泽东这个奇异的作战设想，基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中央红军突然向东二渡赤水，虽然出乎敌人的预料，把敌人甩下了至少四天的路程，但是目前的处境依旧不能乐观：南面，黔军正向桐梓和娄山关方向增援，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第五十九、第九十三师正从贵阳地区向遵义开进；北面，国民党中央军上官云相部已从重庆南下，进至綦江、松坎一带，再加上驻守在那里的川军，中央红军很可能会处于敌人的南北夹击中。此时的中央红军必须毫不犹豫地朝着一面的敌人冲上去。但是，往哪一面冲呢？蒋介石的判断有一定的道理：中央红军经过突然机动后，必然会在撕开的缝隙之中，再次尝试向西北方向北渡长江去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或者向东北方向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两条路红军必选其一。但是，中革军委发布的命令却是：向南，冲过娄山关，再占遵义。

敌我双方的作战命令几乎是同时发布的。

林、聂、彭、杨：

甲、敌情如你们所知。估计守娄山关、黑神庙的柏［柏辉章］、杜［杜肇华］两部可能为黔军第一、第四、第五、第八、十五、十六共六个团或仅一部共三个

团，有凭娄山关相机出击，阻我南下，掩护遵义，以待薛敌来援的模样。

乙、我野战军决以一部阻滞四川追敌，主力坚决消灭娄山关黔敌，乘胜夺取遵义城，以开展战局。我五、九军团主力明二十六日均移官店，其两个后卫团分在温水与新罗坝两处阻滞川敌，并令其在二十九日以前不得使该敌逼近桐梓。

丙、我一、三两军团及干部团统归彭、杨指挥，应于明二十六日迂回攻击娄山关、黑神庙之敌，坚决消灭之，并乘胜直取遵义，以开赤化黔北的关键。该两军团及干部团明日进攻部署，除照彭、杨二十五日十四时来电外，兹补充指示如次:

A、右翼队第三军团从正面进攻的十三团及预备队干部团，应预计我迂回部队尚未到指定地点攻击时，该敌可能向我出击，反攻桐梓。因此，须预筑工事，准备顽强扼制之，及迂回部队攻击时，则行猛攻。

B、两翼迂回部队所取道路不宜过远，以免延长时间，并须注意到达与攻击时间的配合。

C、两军团在运动及战斗间，三军团向遵义及仁怀方面，一军团向遵义及绥阳方面侦察、警戒。

D、进攻成功后，应乘胜直下遵义，而以清扫战场任务交给干部团，万一今夜或明晨敌退，应行猛追。

E、两军团后方暂在桐梓城，应随战斗之进展转移于遵、桐马路以西适当地点。

F、第一军团教导营应留桐梓城北端，向石牛栏方向游击警戒，向正安方向警戒。军委警备营将于明二十六日十四时到桐梓城任城防。

丁、战斗前政治工作，应使指战员认识此战役为立足赤化黔北之关键，鼓动其拼命争取胜利。

戊、我拟明日十三时前到桐梓城，与你们用无线电联络，娄山关正面部队则用原有电线。

己、彭、杨攻击命令，望告军委。

朱德

二十三时

薛岳关于“向松坎、桐梓‘追剿’中央红军给周浑元、吴奇伟”电：

一、据确报，窜东皇殿之匪约万余，养［二十二］、漾［二十三］两日节节向图书坝、良村、温水方面急窜，有与萧、贺合股模样。

二、我裴［裴昌元］师现配置綦江、松坎之线，严密堵截。

三、周［周浑元］司令官所部谢［谢溥福］、萧［萧致平］两师应速取捷径，兼程向松坎、桐梓线追剿。万［万耀煌］师及何知重部，应速由东皇殿、温水向松坎进剿。万、何两部行进路线，由万副司令官区处之。王［王家烈］司令在遵、桐、绥之部队，应兼程移至桐梓至松坎之线死守，堵匪东窜。吴［吴奇伟］司令所率韩［韩汉英］、唐［唐云山］两师到达遵义后，即配置遵义、桐梓之线策应，均不得任匪漏窜，至干法纪。

两个命令，国民党军是向北推进，红军是向南进攻，两军尘土飞扬相对而来，相遇之处是遵义北面的雄关天堑——娄山关。

二十四日凌晨，红三军团攻打娄山关的突击部队十三团和十二团冒雨从桐梓出发了。三连连长邹方迪带着一个排在一个叫南溪口的地方遇到了几个背煤的人，因为行色可疑邹连长把他们扣留了。红军官兵把煤筐里的煤一倒，倒出了驳壳枪，原来是黔军的侦察兵。经过审

问得知，黔军主力到达了板桥，其中两个团已经上了娄山关，杜肇华旅的指挥所在黑神庙，黔军在娄山关关口至黑神庙一线设置了阻击阵地。

晚上，十三团团长彭雪枫给侦察连连长韦杰下达了抢占娄山关山口的任务。侦察连立即开始急行军，一个晚上换了三个向导，二十五日早晨到达了距娄山关约两公里的红花园。在这里，红军官兵看见娄山关左右夹峙的山峰云雾缭绕，一条公路自关口盘旋而下，山下的一个小客店冒出了缕缕炊烟。尖刀班向韦杰连长报告说前面发现几个敌人，韦杰立即命令手枪排化装成国民党军上去把敌人围住。被围住的黔军里有个少校军官，手枪排缴获了他的枪和公文包。一看公文才知道，黔军柏辉章、杜肇华部的四个团已先于中央红军到达了娄山关。韦杰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命令全连火速前进。侦察连很快就和黔军的前卫部队遭遇了，在黔军措手不及地向后退去时，侦察连马上开设了阻击阵地。而这时候，在红军阻击阵地南面的公路上，黔军的大部队密密麻麻地开来了。

突破娄山关的先机已失，只有趁敌未稳强行夺关了。

红三军团的官兵在冷雨中草草吃过午饭，军团长彭德怀下达了夺取娄山关的作战命令。这是一个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作战命令，是一个令红军官兵没有任何退路的作战命令。彭德怀一反作战常规，令红三军团仅有的四个团全部参加进攻，不留任何一支预备队——扎西整编的时候，红三军团由于连日作战损失严重，取消了师一级的建制，部队缩编成四个团，原来的师长和师政委都当了团长和团政委——现在，以彭雪枫为团长、李干辉为政委的十三团和以谢嵩为团长、钟赤兵为政委的十二团担任正面进攻，以张宗逊为团长、黄克诚为政委的十团和以邓国清为团长、张爱萍为政委的十一团左右迂回。下午四

时，彭德怀亲临十三团的阵地，命令在天黑之前务必要拿下娄山关关口。

娄山关，海拔一千四百四十米，向北距桐梓县城十五公里，南接遵义县境，一孔之道，险峻异常。川黔公路盘旋其中，两侧群峰并立，绝壁千仞。关口西侧是主峰，陡峭不可攀登；东侧山峰俨如巨锥，名叫点金山，是控制关口的制高点。

彭雪枫和李干辉一声令下，十三团在细雨中瞬间消失在了关口下的沉沉雾气中。

彭德怀的心一下子绷紧了。

十三团决定由三营先把左侧的一个高地拿下来，然后由一营主攻制高点点金山。三营刚开始攻击，就遭到了黔军第六团杨国舟营的火力拦截。黔军居高临下，用机枪封锁了通向关口的公路，给进攻的红军造成严重杀伤。三营派出了一个连，迂回到黔军阵地的侧翼，突然发起了攻击。黔军两面遭袭，最终无法支持，开始向点金山撤退。三营占领了左侧高地，为攻击点金山建立了一个有利的出击点。随后，一营的进攻开始了。在点金山上阻击的是黔军第十团，他们凭借着险峻的地形和构筑好的坚固工事拼命抵抗，同时也得到了身后黔军火炮的火力支援。一营分为两个梯队向山顶轮番冲击，但是都以失败告终，最终与黔军形成了僵持局面。眼看天就要黑了，团长彭雪枫焦急万分，他对连长们说，如果最重要的制高点点金山拿不下来，中央红军全面突破娄山关就等于一句空话，咱们十三团决不能给第三军团、给军团长丢脸。

彭雪枫命令一营组织突击队，不惜一切攻下娄山关。一营要求三连承担突击任务，三连连长血脉贲张，大吼一声：“跟我上”！红军官兵跟着一声吼，发起了最后的攻击。他们冒着黔军的弹雨在陡峭的山崖上往上攀登，不断有战士中弹坠落，但是三连的吼声一直没有停止，直到吼声沙哑。一排的三名战士充当了开路前锋，他们叼着匕首，背着手榴弹，沿着绝壁的缝隙一点点地向山顶靠近，在他们翻上山顶的那个瞬间，黔军向他们蜂拥而来，三个红军战士背对绝壁投出了一排手榴弹。手榴弹的硝烟还没散尽，三把尖刀寒光凛冽地向敌人刺了过去，随着黔军发出的惨叫，三连向山顶的最后冲锋开始了。前沿的黔军被迫向后压缩，但是整整一个营的黔军又反击上来。三连连长大喊：“咱们没有退路！往前冲击啊！”为冲击山顶付出了巨大牺牲的三连再次迎着增援的黔军冲过去。这时候，一营一连、二连和重机枪连也翻上了山顶，四个连的火力向黔军开始了猛烈射击，黔军最终被赶下了山顶。但是，红军立足未稳，黔军第十团在团长宋华轩的督战下，再次向山顶反扑过来。天已经逐渐黑下来，双方在山顶上展开了残酷的搏斗。最后的时刻，红三军团炮兵营把仅有的几发炮弹用在了这个方向，排长张量来不及架设炮架，凭借着娴熟的射击技巧在斜坡上杵击发射，炮弹在黔军中准确地爆炸，黔军出现了撤退的迹象。十三团的官兵乘势发起冲击，点金山主峰被红军占领了。

点金山的后面就是娄山关关口。

身上血迹未干的一营、三营和重机枪连的干部们组成了临时指挥部，紧张地商量着夺取关口的作战方案。最后决定由一营巩固点金山阵地，阻击黔军的反击；三营在重机枪连的掩护下抢关，九连在前，七连、八连跟随。六挺重机枪开始了掩护射击，九连在连长廖九凤的率领下，向退守关口的黔军发动了冲击。他们很快占领了关口一侧的

制高点小尖山，接着三个连队分为三个方向一齐向关口冲锋。冲锋中，替代负伤的三营营长指挥战斗的营教导员冲在最前面，黔军的子弹暴雨一样密集，红军官兵看见他们的教导员身体晃了一下，然后栽倒了。

从关口阻击阵地撤退到南部山腰的黔军连续发动了四次反击。红军官兵发现黔军的冲击队伍中有个手提马刀的军官，凡是后退的士兵都会被他砍倒。于是红军官兵挑选了四名射手，寻找时机一齐向这个黔军军官开了火。最后，黔军在发现侧翼出现了迂回的红军之后，从关口阵地全部撤退到了南面的阻击阵地上。

娄山关关口的夜晚冷雨霏霏。

团长彭雪枫率领二营上来了，他们带来了晚饭。

在查看了一营、三营的损失情况后，彭雪枫派出了一支小分队，小分队的任务是点燃火把满山移动，以震慑黔军；同时在公路两侧的悬崖上堆积大量的石头，准备应付黔军的反扑。

彭雪枫对干部们说："明天定有恶战。"

十三团的红军官兵神情严峻。

晚二十三时，彭德怀决定由十二团代替刚刚结束苦战的十三团担任正面主攻，张宗逊和黄克诚率十团由左侧迂回攻击黑神庙，邓国清和张爱萍率十一团迂回板桥断敌退路，十三团休整后从点金山出发侧击黔军右翼。

当晚，十二团前进到娄山关关口接替十三团，并命令三营把守关口阵地，一营为第二梯队，二营在山腰作为预备队。

二十六日拂晓八时，大雾，黔军向娄山关关口的反击开始了。十二团政委钟赤兵和参谋长孔权都在即将迎接苦战的三营。三营营长杨威一直到敌人距自己的枪口只有五米远的地方才下令开火，黔军的第一次冲击很快就被压下去了。这时，带领小部队在西侧准备攀登悬崖给敌人以侧击的参谋长孔权回来了，因为悬崖上林木太密，根本无法锁定目标在哪里。上午十时，黔军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进攻，军官全部在后用手枪督战，前面的士兵黑压压一片向娄山关关口蜂拥而来。

钟赤兵想起了彭德怀的话："现在，王家烈到了遵义，薛岳、周浑元和吴奇伟已北渡乌江，必须迅速夺取娄山关，不然中央红军就被合围了。"

三营官兵在黔军冲击最猛烈的时候，迎面而上发动了反冲击。

两股力量瞬间便撞击在了一起。

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战史上惊心动魄的一幕：军号声在瞬间嘹亮地响起，令整个娄山关群峰间缭绕着不绝于耳的号音，红军士兵跟在向前冲去的干部们的身后，端着刺刀或举着马刀呐喊着冲出了掩体，英勇无畏的身躯向着黔军潮水般地推了过去！黔军的冲锋队形霎时间混乱起来，然后就开始顺着公路向深谷中撤退。这时，作为预备队的干部团在上干队队长萧劲光的率领下，也冲到了关口的南面，在连续占领了几个山包后，协同三营把黔军压在了山谷中。

沿着公路追击黔军的三营速度太快了，他们冲在了红三军团所有部队的最前面。黑神庙，黔军指挥部所在地，当三营追击到这里的时候，黔军蒋德铭旅第四团突然从山坳里冲了出来，三营瞬间被压回了几十米，官兵出现了大量的伤亡。十二团团长谢嵩立即命令二营火速

增援三营，二营在营长邓克明和教导员谢振华的率领下向黑神庙扑了上去。在冲到黑神庙半山坡的时候，前卫四连指导员丁盛报告说，跟随三营冲击的钟政委负伤了。谢振华说，四连给我冲上去，无论如何要把钟政委抢下来！谢振华一边说一边跟着四连冲上了山坡。在路边的草丛中，他看见了负伤的钟赤兵。一名警卫员和一名参谋正在给他包扎，鲜血从他的左腿往外涌，染红了身下的草丛。警卫员说，包了十层血还是冒。悲痛一下袭击了谢振华。谢振华还记得在中央苏区万年亭战斗中，他在五师十四团任政委，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五师政委陈阿金牺牲，接替陈阿金的新政委就是钟赤兵。钟赤兵深受官兵们的爱戴，他作战时身先士卒，总是冲在最前面，不管什么样的恶仗，战士们跟着他就会生死不顾。谢振华命令六连指导员陈福太立即组织人把钟赤兵抬下战场，然后他举起了驳壳枪："同志们，跟着我，冲啊！"

黔军在战斗中的表现出乎了红军官兵的预料，以至他们有点怀疑眼前的对手是不是曾经不堪一击的贵州"双枪兵"。

二营越过三营继续向黑神庙冲锋，在接近一个山弯的时候，遇到了黔军严密的火力封锁。营长邓克明和教导员谢振华召集三个连长开会，决定由五连担任突击队。团参谋长孔权挺身而出决定亲自带队。

十二团团长谢嵩率领一营开始了火力掩护，二营五连在弯道中分成三个梯队迎着黔军的射击前行。在突破了几道障碍后，距离黑神庙只剩不到一百米了，可是黔军的又一批增援部队赶到了战场，并且迅速向红军反扑过来。被压在公路两侧的五连利用黔军修筑的掩体顽强抗击。在黔军的连续冲锋中，排长宋福朵、班长王益桥和战士殷福希先后牺牲。五连连长高书官带领机枪班死守前沿，增援上来的四连和六连占领了公路左侧的制高点，以阻击增援的黔军。两军在狭窄的山路上展开了殊死的对抗。五连的伤亡越来越大，副指导员和二排长先

后牺牲，团参谋长孔权的子弹打光了，就在他试图在阵地上找子弹的时候，黔军的一颗子弹击中了他，他的胯骨被打碎了。

二十六日下午四时，红三军团各路迂回部队均已到达指定位置，彭德怀随即下达了总攻的命令。正面，十三团、十二团和干部团向被压在黑神庙谷地里的黔军发动了最后的进攻。而这一刻，黔军的背后也响起了枪声，迂回的十团和十一团的攻击也同时开始了。

黔军开始溃散，沿着山间小路向遵义方向逃去。

彭德怀和杨尚昆站在板桥附近的公路上，在他们的身边，蹲着一片被截住并被俘虏的黔军官兵。

娄山关一战，红三军团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十二团政委钟赤兵因身负重伤被锯掉了一条腿。十二团参谋长孔权负伤后被留在了当地的老乡家，从此没有了任何音信。十几年之后，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黄克诚有一天接到了一封来自遵义的信，信里写道："老师长，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孔权，打娄山关的那个孔权……"孔权活了下来！在黄克诚的过问下，孔权成为遵义纪念馆的馆长。从此，他年复一年地向来这里参观的人们讲述娄山关战斗，讲述那些至今还游荡在险峻大山中的年轻而勇敢的英魂。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娄山关，硝烟将散，血迹未干，寒风凛冽，林涛怒号。

二十八日傍晚时分，毛泽东随着中央纵队通过了云海苍茫的娄山关。

二十六日晚二十时，中革军委以朱德的名义发出了“关于我军乘胜夺取遵义致红一、三军团”电。电报表明：黔军的约六个团已被红军击溃，目前遵义城内空虚，薛岳的国民党中央军二十七日前无法到达遵义。因此中央红军各军团须“乘溃敌喘息未定跟踪直下遵义”。

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第三军团于二十七日凌晨发布了攻打遵义的作战命令：十团、十一团向遵义新城、老城攻击；十三团阻击懒板凳方向的来敌。同时，第一军团也发布了作战命令：如第三军团在前面追击，则跟随前进；如第三军团停止追击，则要超过他们继续追击。两个军团作战区域的划分是：以遵义城北的公路为界，路东为第一军团作战区域，路西［含公路］为第三军团作战区域。

第三军团的先头部队是十一团，军团参谋长邓萍跟随先头团前进。中午时分，当他们追击到遵义城北公路边的董公寺、飞来石的时

候，与赶来阻击的黔军遭遇，战斗随即爆发。

从娄山关败退下来的黔军第四、第六、第十五团在连夜逃到高坪附近的时候，遇到了军长王家烈和师长柏辉章，他们率领着第一、第五、第八三个团正准备去增援娄山关和黑神庙。当听说娄山关已经失守，红军就要追过来的时候，王家烈和柏辉章甚至都没商量一句，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立即往回跑。沮丧的王家烈心情极其复杂。他知道遵义守不住了，因为薛岳已经掌握了贵州的财权，不但不给黔军发军饷，同时也不让他集中指挥黔军。现在，他能够指挥的部队只有四个团。在遵义的时候，他就对那些恳求他坚守城池的豪绅们说，你们还是各自逃命去吧。但是，当他收到薛岳关于中央军的两个师正在疾驰北进，顷刻就可以到达遵义解围的电报之后，他的心里又重新燃起了一丝希望，于是他决定固守遵义等待中央军的到来。可是，增援需要时间，至少还要两天。

王家烈和柏辉章跑到距遵义城北约七公里处的十字铺一带停了下来，在公路两侧大约五十米高的山头上仓促建立起防御阵地。

十一团政委张爱萍认为在这里阻击的黔军是一支掩护部队，于是立即率领先头营向阻击的黔军发起了攻击。可是很快，攻击的红军就被黔军强大的火力所阻挡。十一团又投入了两个营再次发动进攻，黔军不但没有动摇，阻击的火力反而更加猛烈了。由于后续部队还没有赶到，十一团的两个营开始边打边撤。冲锋时政委张爱萍在最前面，撤退时他走在最后面。张爱萍的身边有个小红军，刚才冲锋的时候，他和他的哥哥并肩向前，但是哥哥中弹倒下了，小红军没有停下来继续向前跑。现在他也走在了十一团的最后，和政委张爱萍在一起。黔军越追越近，喊着：“小赤匪不要跑！你被捉住啦！”小红军提着一支短马枪，回头喊：“你来呀！你捉我呀！”

十一团刚撤出不远，军团主力就到了，十一团立即把攻击改为围歼，两支队伍分别向黔军阵地的两侧迂回，然后发动了进攻。在进攻中，黔军旅长杜肇华和副旅长江荣华负伤。柏辉章发现黔军已经腹背受敌，急忙下令全师撤回遵义城内。

十一团紧追不舍，一直追到遵义城下的一片开阔地前。

这时，黔军第五团已经从鸭溪赶到遵义，黔军在湄潭的部队也在向这里疾进，薛岳的国民党中央军第九十三、第五十九师距离遵义只有两三天的路程了。因此，中革军委认为占领遵义的时机稍纵即逝，要求第一、第三军团务必当日拿下遵义城。

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七日下午，久雨初晴，烈日当空。位于前沿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心急如焚。在安排部队休息之后，他带着十一团政委张爱萍、参谋长兰国清前出到遵义城墙下的一个隐蔽处观察敌情。邓萍建议先派一个营向前接近城墙，提前隐蔽起来，等主力到达发起总攻时，这个营可以首先冲上去。张爱萍随即向三营下达了潜伏命令，同时派出一个侦察排秘密向前控制要点。在继续观察的时候，三个人突然发现有人在爬城墙，仔细看去，似乎是派上去隐蔽的三营。“哪个叫他们爬城墙，乱搞。”邓萍说，“看看带头的是哪个？”张爱萍在望远镜里看了好一会儿，说：“那个带头爬的好像是七连指导员蔡爱卿。这个家伙，胆子大得很。”三个人正说着，又看见那些人从城墙里爬了出来。不一会儿，三营派来的通信员到了，报告说：“一个连爬进城又爬了出来，都看清楚了，是两层城墙。”邓萍说：“告诉营长，不要回来，也不要爬墙了，就在那里隐蔽，等到天黑，攻击的命令一下，再往前冲。”

城墙上的黔军似乎发现了这里的动静，团参谋长兰国清建议换个地方，但邓萍认为这里视野开阔不肯移动。兰国清的话音刚落没一会儿，城墙那边突然响起了枪声，邓萍身子一歪，倒在了张爱萍的肩膀上。

黔军的子弹射进了邓萍的头颅。

几名战士用担架抬着他急促地向后跑。

他的脸上盖着一块洇满了鲜血的白布。

红军官兵们不肯相信这个事实：参谋长牺牲了。

邓萍，四川富顺人，十八岁加入共青团，十九岁转为共产党党员。同年受党组织的委派，到国民党军湖南独立第五师一团开展兵运工作，结识了具有强烈正义感的爱国军人彭德怀，成为彭德怀秘密加入共产党的入党仪式主持人。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邓萍和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一起举行了震惊中国的平江起义，起义部队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邓萍任参谋长。一九三二年，二十四岁的邓萍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参谋长。红三军团无数次奔袭，无数次血战，邓萍与彭德怀年复一年荣辱与共，生死与共。

邓萍的遗体被放在一块背风的洼地里。

彭德怀亲自为邓萍洗了脸，给他换上了一身新军衣。

彭德怀凝视着邓萍苍白的面容，这位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红军将领不禁热泪长流。

这天夜里，红三军团向遵义发起了进攻。

彭德怀的命令是：“拿下遵义城，为参谋长报仇！”

十二团、十三团的突击队成立了。几个突击队各带轻机枪一挺和云梯两架，突击队队员每人一支驳壳枪、一把马刀和五枚手榴弹。晚上九时三十分，突击队队员开始向遵义城墙靠近。二十八日零时三十分，突击队队员悄悄地爬上了城墙，杀死了哨兵后，他们在城墙上吹响了军号。山城遵义又一次在梦中被惊醒。红军官兵们高喊着“为参谋长报仇”冲了进去。黔军没能组织起任何抵抗就丢弃了一切从城南夺门而出，开始了一路狂逃。

遵义城重新被红军占领了。

彭德怀给邓萍买了一口棺材，将他安葬在城外山坡上的一棵沙棠树下，年仅二十七岁的红军参谋长邓萍从此长眠在了遵义城下。

天刚刚亮起来，遵义就再次被各色标语铺满了。大批的红军宣传队队员和民运干部跟着作战部队拥进了城。由于红军曾经在这座县城里住过十几天，因此干部们很快就占据了他们认为应该占据的地方。天主教堂里挤满了伤员，采购人员大规模地采购药品和食品，警卫员们忙着在土豪豪华的住宅里进行安全检查，地方游击队的领导也进城了，他们要求得到武器特别是干部的补充。

王家烈出城的确切时间是二十七日下午三时，那时红军还没有攻城，他的部队还在董公寺一带阻击红军，但是，他已经带着他的手枪队顺着遵义至贵阳的公路往南跑去。二十八日上午九时左右，跑到忠庄铺的王家烈见到了国民党中央军第一纵队司令吴奇伟。这个从江西一路“追剿”红军到达黔北的中央军将领给王家烈的第一印象是胸有成

竹。当王家烈向吴奇伟说他身边现在只有一个团的时候，吴奇伟说：“我带的两个师大约还有一两个小时就到了，任务是反攻遵义。两个师加一个团的兵力对付朱毛足够了。你看仗怎么个打法？”王家烈说中央军应该立即进攻遵义。但是吴奇伟说，既然红军已经占领了遵义，中央军就不用再向北推进了，应该在遵义以南找个地方与他们决战。在王家烈的指点下，吴奇伟和第五十九师师长韩汉英共同认为：必须先占领老鸦山和红花岗。于是中央军开始了排兵布阵。吴奇伟让王家烈的那个团守住川黔公路以东的几个高地，说是公路以西全归中央军了。

两个人见面后不到两个小时，中央红军的攻击部队就到了。

这是二十八日上午十一时，毛泽东一直期盼的打一场胜仗的时刻出现了。

中央红军自二渡赤水重新进入贵州以来，从黔北的桐梓地区突然南下，突破娄山关继而占领遵义城，打垮了黔军的主力，现在最凶险的敌人就是国民党中央军了。如果按照中革军委的设想，红军要在遵义地区暂时落脚，以拥有一块获得休整喘息之地，那么就必须如同毛泽东说的那样，将国民党各路大军中的一部甚至是几部给予重创——目前是打击吴奇伟的国民党中央军的绝好时机：川军和滇军虽然依旧在向遵义地区压来，但是贵州终究不是他们的地盘，他们并没有强烈的作战积极性，且红五、红九军团正在桐梓以北死死地阻击着川军和滇军。而受到严重打击的黔军目前分散在各地，由于受到薛岳的制约，王家烈已成了没有指挥权的空头司令，黔军部队要恢复战斗力需要相当的时间。那么，在贵州境内，只有国民党中央军是红军的最大威胁了。现在，吴奇伟部的两个师已经孤军深入到红军的眼前，这个战机万分宝贵且稍纵即逝，如果能够在国民党中央军其他各路大军到

达之前，彻底把眼前这两个师的敌人吃掉，那么就可以在遵义南部创造一个军事上相对宽松的环境，使中央红军始终被追击的被动局面在一段时间内得到缓解，还可以避免北上的国民党中央军与南下的川军和滇军再次对中央红军形成大军合围的态势。

二十八日零时，中革军委发出了作战命令："第一、三军团应不顾一切疲劳，马上乘胜南下，坚决猛追该敌。并部署在新站地域与敌决战……这一追击的决战关系全局胜负，无论如何要扩张战果到灭其全部，不得丝毫动摇。"

彭德怀和杨尚昆立即作出了作战部署：十团、十三团在遵义西南的红花岗、老鸦山一线构筑防御工事，十二团担任迂回包抄的任务。

林彪和聂荣臻也命令第一军团各部队在遵义东南修筑工事，等战斗打响之后，一师包抄敌人的后路，二师准备追歼。

同时，第三军团的十一团和第一军团的三团分别南下接敌，采取边打边撤的战术，将吴奇伟的国民党中央军逐渐向北引诱。

接近中午时分，两军相峙于遵义城南的红花岗和老鸦山。

在江西中央苏区反"围剿"战场上，红军多次与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交手，现在两军骤然在贵州的偏僻一角相逢，战场气氛格外异样。

向红三军团十一团红花岗防御阵地进攻的，是国民党中央军第五十九师韩汉英部。红花岗，主峰九百九十一米，地形险要，是扼守遵义的南大门。十一团首先抢占了红花岗主峰，他们的任务就是死死地阻击，把敌人拖在这里。第五十九师的进攻从一开始就是猛烈的，军

官们给每个士兵都发了两块银元，并且在散兵线的后面布满了持枪督战的战场督察队。和黔军不一样的是，国民党中央军的炮火十分密集，并且有飞机的支持。第五十九师的两个营在炮火的掩护下，反复向十一团的阻击阵地冲锋，双方都出现很大的伤亡，尤其是进攻的国民党中央军，担任主攻的两个营“官长伤亡殆尽”。十一团很快就发现敌人出现了动摇，在团长邓国清和政委张爱萍的带领下，红军官兵高举着马刀喊：“不要跑！缴枪就活命！”但是敌人撤退的趋势已经不可遏制。敌一营三连连长宋少华肩膀负伤，他一边组织几个老兵掩护撤退，一边向后奔跑，奔跑中他听见一声大喝：“站住！缴枪不杀！”向他怒吼的是一名腿部中弹正坐在草丛中包扎的红军战士。宋连长愣了一下，随即被追击而来的几个红军扑倒在地。

对红花岗主峰的进攻受阻之后，吴奇伟调整了作战方案，集中兵力向由十团防守的老鸦山阵地发动了进攻。参加进攻的不但有第五十九师，第九十三师唐云山部也投入了战斗。在炮火的轰击和飞机的轰炸下，老鸦山山头上的树木和野草都燃烧了起来，一个整师的国民党兵黑压压地向红军的阵地前沿蠕动而来。十团的官兵连续几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但是敌人的进攻规模越来越大，一部分敌人已经冲到了主峰上。急了眼的团长张宗逊决定立即发动反击，他让政委黄克诚留在主阵地上，自己和参谋长钟伟剑率领官兵开始了反冲锋。红军官兵反冲锋的主要武器是刺刀，在小小的山头上，双方展开了空前残酷的肉搏战。一次次的肉搏战一直持续到下午三时，团长张宗逊负伤倒下，参谋长钟伟剑牺牲，老鸦山阵地遂被国民党中央军占领。

这是一个危险的时刻。如果中央红军在遵义以南的阻击线被突破，不但红一军团向敌人两侧的迂回包围失去了依据，而且中央红军

将面临两面受到夹击的处境。更为严重的是，中央红军自突破娄山关以来的所有努力都将毁于一旦。

彭德怀上了最前沿，组织部队夺回失去的老鸦山。十一团三营的两次进攻都失败了。十团的进攻同样受挫，九连在连长黄思沛和指导员丁三的率领下曾经冲上了主峰，但是遭遇到敌人猛烈的反击，九连在伤亡过半的情况下退了下来。

朱德也上来了。他在电话里对十一团政治处主任王平说："这是背水一战，如果失败，我们就得到乌江去喝水。"十一团再次组织部队强攻，甚至在加强了一个连的兵力后，进攻依旧没有效果。

双方都知道失败意味着什么，于是无论进攻还是阻击都是决一死战的态势，投入了最后可以使用的最大兵力——重兵对垒，冲突的顶端在一个小小的山包上。战斗进行到这个时候，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哪怕出现一丝一毫的动摇或者放弃的迹象，都会如同岌岌可危的大堤出现一个小小的裂缝一样，瞬间就会兵败如山倒。

中革军委命令：干部团上。

土城战斗之后，干部团再次出现在战斗最危急的时刻。

干部团由北向南正面进攻，十一团从左侧助攻。这次进攻，红军所有的机枪都开了火，官兵们不顾一切地蜂拥向前。这时，迂回的红一军团在敌人的后面已经打到了吴奇伟指挥部所在地忠庄铺，而向另一侧迂回的红军也已经突破了黔军的阻击阵地正向纵深发展——王家烈在红军的再次打击下一跑就无影无踪，致使中央红军对吴奇伟部的合围趋势已经形成。

最后时刻，吴奇伟的信心首先动摇了。

红军的枪声离忠庄铺越来越近，突然，吴奇伟命令第九十三师掩护，指挥部立即向南转移。于是，几乎是一瞬间，在前面与红军血拼的第五十九师终于垮了，洪水般地溃退了下去。

战局的突变令彭德怀和林彪几乎同时下达了一个命令：追！

这是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第一次大规模地追击敌人。

在五里堡第一军团指挥所里，林彪把各师师长、政委和参谋长都找来了。干部们一进到林彪的那间大木板房里，就发现满墙都是地图，于是立即预感到部队要有大行动了。林彪开会的目的就是命令各部队不惜一切地追击：一师沿着公路东侧，向白蜡坎方向追击；二师在公路上追击，最后以乌江为界聚歼。聂荣臻对干部们说："我们没吃饭，敌人也没吃饭；我们疲劳，敌人比我们更疲劳。追击的成功关系全局，要不顾一切追下去，力求全歼敌人，这个决心不能有丝毫动摇。"有干部请示追击的范围，林彪说："给我追出一百里。"

一师参谋长耿飚率领二团沿着公路追击。开始的时候部队还比较集中，但是跑着跑着部队就散开了，因为吴奇伟的部队跑得到处都是。二团的一个班追到了一个小镇上，发现跑到这里的敌人正在百姓家抢食物。红军班长当街吹响了哨子，喊："集合！集合！"敌人果然乖乖地集合了，然后稀里糊涂地被缴了械。二团沿路抓的俘虏太多，其中不少是黔军官兵，不断有战士被留下来看管俘虏。师部特务排的一名小战士追得高兴，竟然一头跑进了敌人的队伍里，细看才知道这是敌人的一个团部。他只好装作系鞋带落在后面，直到把耿飚等来了

作了汇报。耿飚说别的先不管，把那个团长抓了再说。结果这个小战士又追了上去，一把把那个团长拉住了，说：“别跑啦，到家啦！”

晚上，二团追上了黔军的一个师部，师部的官兵挤在一座大庙里，横七竖八地睡了一地。红军官兵先把哨兵抓了，哨兵说这伙人里最大的官是一个副师长，于是红军让他带着去找。哨兵在庙里的大供桌上捅了捅一个蒙着大衣睡觉的人，说：“副师长，他们来啦。”副师长翻个身说：“叫他们到树林子里去睡！”红军的一个侦察参谋一把把副师长揪了起来，说：“我们是红军！”谁知这个副师长抡起胳膊给了红军参谋一耳光：“开什么玩笑？这是闹着玩的吗？”红军参谋被打得火星直冒，他抽出马刀架在这个副师长的脖子上，然后举起一盏桐油灯说：“你小子好好看清楚老子是谁！”

跑在二师最前面的是五团。五团追到一个叫螺蛳堰的小镇时，把吴奇伟的中央军追上了。当时，吴奇伟的第九十三师一〇七团正在挖工事准备阻击。五团侦察排报告说，封锁公路的是十几挺重机枪，工事也修得十分坚固，挖了好几道壕沟，每条壕沟里都配备了很强的火力，还设置了大量带刺的竹桩。五团决定团长带一营正面攻击，政委指挥二营、三营左右迂回。一营三连在一连、二连的火力掩护下分成三个梯队，第一梯队砍倒竹桩，第二梯队疏通道路，第三梯队掩护。一个多小时后，道路基本疏通了，迂回的部队也已经到位，最后的战斗打响了。一个团对一个团，在这场势均力敌的战斗中，五团勇猛地向敌人冲上去。在一条壕沟里，红军和三十多名国民党兵展开了肉搏，七连的一个班长连续刺死了两个敌人，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扑向敌人最密集的地方拉响了手榴弹。战斗结束后，除了少数逃脱的国民党兵之外，国民党中央军第九十三师一〇七团几乎被全歼。

五团迅速打扫战场，然后进入了螺蛳堰，发现一〇七团做好的饭菜还热着。官兵匆忙吃了饭，然后继续追。在追击的路上，一个当地的农民来给红军报信说，一伙国民党军正住在旁边的村子里。于是五团的两个侦察排全部换上国民党中央军的军装，在那个农民的带领下摸进了村庄。他们先解决了哨兵，然后在一个寺院里把正在睡觉的敌人全部俘虏了。在清点俘虏的时候，报信的农民说，那个穿呢子大衣的长官不在。于是，全村的贫苦青年都出来了，农民们高举着火把，带领红军官兵开始搜查，最后在一户地主家把那个穿呢子大衣的长官捉着了。一问，竟然是被红军歼灭的那个一〇七团的团长。

漆黑的夜色中，吴奇伟的汽车被挤在溃兵之中无法通行，无论卫兵们如何开枪恐吓，就是没有人给他的汽车让路。吴奇伟焦急万分，不断地嘟囔着："这真是老天安排好了让我死在这里。"最后，他只好放弃汽车，在卫兵的搀扶下，和混乱的部队拥挤在一起，向乌江边逃去。

天蒙蒙亮，终于跑到了乌江边的吴奇伟接到了薛岳的电话，薛岳说增援的第九十师已经开到了乌江南岸。吴奇伟立即命令第九十师渡江阻击，但是他的命令被第九十师师长欧震拒绝了。欧震在电话里对吴奇伟说："北岸现在兵败如山倒，过江增援十分不利，在南岸稳住阵地才是上策。"吴奇伟一听，一屁股坐在地上痛哭不止，一边哭一边说："我不过江了，就在这里死了算了。"红军追击部队的杀声已经越来越近，军参谋长吴德泽厉声命令卫兵把吴奇伟拖过乌江。

吴奇伟一过乌江，在南岸还未立稳，即刻命令道："把浮桥砍断！"

有人提醒他说："还有不少弟兄在桥上呢。"

吴奇伟说：“砍！”

浮桥被砍断了。

桥上的国民党军随着浮桥的断裂跌入了滚滚乌江。

乌江北岸，在红军的追击下终于跑到了江边的一千八百多名国民党军发现，他们已经跑到了溃逃的尽头。

红一军团二师最先追到乌江边的官兵大约有九百多人，师长陈光和政委刘亚楼跑在这九百多名官兵的最前面。

两个年轻的红军将领在乌江岸边蹲了下来，掬起了一捧清凉的江水，洗了一把汗津津的脸。

遵义成了一座欢乐之城。

军委纵队进入遵义之后，电令第五、第九军团扼守娄山关，第一、第三军团开始休整。

在遵义的天主教堂里，中央红军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红军干部们穿上了干净的军衣早早地来到了会场，频繁的行军作战使他们相互难得见面，于是相聚时便显得格外亲切。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同志来了，大家突然静了下来，目光集中在个子瘦高头发很长的毛泽东身上——至少有一两年了，毛泽东这是第一次出现在中央红军团以上干部会上。张闻天首先传达了在扎西会议上通过的遵义会议决议。而后宣布毛泽东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宣布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同志组成军事指挥小组。

会后，全体干部就地会餐。为了筹备这次会餐，朱德专门派人买了一头两百多斤的肥猪，采购了大量的蔬菜和大量的茅台酒。由于人多，就用脸盆盛菜，酒杯是当地的大泥碗。各军团的干部自由组合，席地而坐，围成圈子，伙食兵们把酒在大泥碗里斟满，然后把大盆的肉和菜端了上来。中央和军委的领导们也开始到处敬酒。周恩来海量，端着一只大茶杯到处碰杯而面不改色。朱德拿的是个拇指大的酒杯，碰杯的时候憨厚地微笑着。张闻天书生意气，几杯下来已略显飘逸的醉态。毛泽东不善饮却端了只大泥碗，不喝光碰："各位劳苦功高！各位劳苦功高！"刚开始的时候，大家有礼貌地互相让着，吃一口菜喝一口酒，但是很快就听见有人喊了一嗓子："同志们！干呀！喝个痛快！"于是大家激动地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大声说笑。突然，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黄开湘哭了，他想起了在残酷的战斗中牺牲的战友。黄开湘的哭声感染了在场的所有的人，各军团的干部们互相拥抱在一起——能在一次又一次的激战中幸存下来，能在那么多的生命离去之后喝上一口庆祝胜利的酒，年轻的红军指挥员们不禁把手里的铁饭盒和大泥碗碰得当当响："为了战友！为了胜利！"

三月一日，就在吴奇伟在乌江边上哭着说自己不想活了的时候，蒋介石正在武汉为张学良举行宴会。此前，他刚刚任命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武昌行营主任，要求武昌行营以"剿匪"、"禁烟"和"推行新生活运动"为三大要务。这时候，有人悄悄走进宴会大厅告诉蒋介石：薛岳部在遵义遭到朱毛红军的重创。紧接着，薛岳"听候处理，自请处分，以求宽恕"的电报到了。蒋介石的心情骤然烦躁起来。

此前，蒋介石已被中日关系出现的危机搞得焦头烂额。日本侵吞中国东北地区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平津各界要求抗日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而日本方面更是对国民政府派往北平的最高长官何应钦出言不

逊，吓得何应钦无论如何不敢去北平办公了。蒋介石大骂何应钦：“怕死就不要穿军装！”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建议“作出处置”以“稳定华北局势”。蒋介石大发脾气：“拿什么处置？抽部队去？你看抽什么部队到华北去和日本顶？共军把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消耗了，拿什么打日本？”

武汉的公务一完，蒋介石就在陈诚和晏道刚的陪同下飞到了重庆。

在川军师长范绍增的公馆里，蒋介石仔细阅读了关于遵义一战的诸多报告。首先是王家烈关于遵义丢失经过的报告，报告不但说“烈亲赴前线”指挥黔军与中央红军进行了“激战”，而且指出遵义失守的根本原因是中央军无能：

重庆委员长蒋钧鉴：

匪有日［二十五日］乘我驻桐蒋［蒋德铭］旅部队奉令推进松坎，及由遵所派接防部队尚未到达之际，攻陷桐城后，复向遵义南进，与杜肇华旅及十五团激战于娄山关、黑神庙一带，达两昼夜。我方伤亡官兵千余员名。感日［二十七日］迫近遵城，复与我第一、第八两团激战于校场坝一带。烈亲赴前线指挥，战斗甚烈。我杜旅长及江副旅长，均负重伤；营、连、排长一时尚难确查；士兵伤亡过半。匪徒伤亡倍我。适吴司令官奇伟率部于感日傍晚至忠庄铺，烈即赴忠庄铺商洽附近剿匪机宜。夜过半，匪攻城益急，城内官兵殉城者极众，至伤亡过半之第一、第六团突围退至附城之马坎，布防于附城之丰乐桥一带。俭［二十八日］晨，吴司令由左翼进剿；烈收集兵力，仅约两营，由右翼进剿。殊匪以大部向我压迫，烈身边护卫士兵使用殆尽，而左翼亦无进展，我宋团长亦负重伤，万团长失踪，连长连副伤亡又复过半，士兵已亡伤殆尽，是以无功。烈冬日［二日］移驻新场附近，收容散部，速加整顿，待命反攻。刻匪一部已到后坝场及新站附近。自遵义至老蒲场及中坪大

小道上，均有匪踪。我何［何知重］副总指挥率魏［魏金荣］、李［李成章］等部到大坝场；蒋旅在松坎附近，除令向桐梓、遵义西南地区猛进截击，并令正安蒋［蒋在珍］指挥严密警备，详侦匪情外，烈正集结各部，力行整理，以图报称。至于唐云山师等，冬日始达息烽一带，欧［欧震］、郭［郭思演］、梁［梁华盛］三师驻贵阳，周代总指挥浑元三师在仁怀附近。特闻。

职王家烈叩。冬二于鸭溪本部。

而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第九十三师师长唐云山关于在遵义以南忠庄铺与红军作战的报告，是一个文过饰非的典型。战前部署极其啰嗦，战斗经过却简单扼要，除了描述自己的部队在“赤匪冲击甚烈”的情况下如何“阻匪追击”和“毙匪枕藉”外，还把部队的狼狈溃逃写成了“由于众寡悬殊”而作出的“相机处理”。至于战斗失利的原因，则被列在了“经验”一栏里：

一、以寡敌众，预备队使用无余，无法挽回战果。

二、友军久战饥疲，同置一线，以致波动全局。

三、在外线作战，未行稳扎稳打，又未与各纵队切取联络，遭匪各个击破。

四、我军进取心太急，在敌况不明，远来未定之际，遽行攻击，遭匪主力倾力冲击。

五、各部大行李跟进太近，仓促之际，混乱拥挤，以致影响前线士气。

广西的李宗仁就遵义一战给广东的陈济棠打的电报似乎有点幸灾乐祸：“遵城二十七日夜已失，黔军五、六两团伤亡殆尽。”川军潘文

华的电报却说："匪大部在遵义附近，被我中央军围攻之中。"滇军孙渡对中央军的溃败明知故问，他给周浑元打了一封电报，居然关切地问道："不知二纵队各师现达何地？"

从黄埔军校延续下来的国民党军的军法是严厉的："一班同退，只杀班长；一排同退，只杀排长；一连同退，只杀连长；一营同退，只杀营长；一团同退，只杀团长；一师同退，只杀师长。"遵义一战，大军溃败，王家烈、吴奇伟直至薛岳，统统难逃惩治。但是，吴奇伟是薛岳的人，薛岳是陈诚的人，陈诚将尽全力保护这些家伙；而那个家底已经丧失殆尽的王家烈根本不值得大张旗鼓地惩罚了。眼下，蒋介石急于考虑的是中央红军下一步要往哪里走。

中央红军大规模的移动作战，令蒋介石东南西北难以理清头绪。三天之内，蒋介石连续发出了一系列命令：

三月二日，致电中央军周浑元和吴奇伟，命令他们沿乌江南岸"疾进"，"相机再渡乌江北岸"，以堵截中央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三月三日，致电何键，要求湘军李韫珩部急调第五十三师"兼程向石阡及其以西疾进"，然后"沿乌江扼要布防"。

三月三日，致电入黔各路部队，命令黔军、湘军和中央军在乌江以西、黔巴大道及其以西"数线布防"，"严密守备，坚固防堵"，"阻匪窜渡"。

三月三日，致电中央军薛岳、吴奇伟，命令以凤江冈、湄潭为目标"寻匪迹所向而击之"。

三月四日，致电重庆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要求上官云相的“第四十七师应全部向桐梓推进，并限本月八日前到达”。

因为对红军的作战风格感触颇多，蒋介石不禁对国民党军痛心疾首，他先是致电川军各将领，明确指出了与红军相比国军的致命陋习：

查赤匪行动，飘忽不定，我军剿匪作战，处置贵在神速。各带兵长官，必须身临行间，方能应付机宜。近人常谓剿匪战略，前方反指挥后方，确系洞见症结之论。乃查川中各将领，每每安处后方，前方责任，委诸部属，而所谓将校亦相习成风，层层委托。以致平时则废弛军纪，有事则坐失戎机。

三月六日，蒋介石在致川军将领刘湘和潘文华的电报中，干脆明确要求川军以“朱毛红军”为借鉴：

重庆刘总司令、刘主席、宜宾潘总指挥：

庭密。据报，前朱、毛匪部窜川南时，对人民毫无骚扰，有因饿取食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置铜元一枚于土中，又到叙永时，捉获团总四名，仅就内中贪污者一人杀毙，余均释放，借此煽惑民众，等情。希严饬所属军队、团队，切实遵照上月养巳行［二月二十二日］参战电令，爱护民众，勿为匪所利用，为要。

蒋中正。鱼午行参战印。

四面八方部署完毕，谆谆教诲也传达完毕，蒋介石给刘湘和薛岳发出了收复遵义的电令：命川军郭勋祺部并指挥现位于桐梓的黔军，限六日集结完毕，即向遵义东北地区进攻；命中央军周浑元部六日集结在枫香园、鸭溪一带，即向遵义西南地区进攻；命中央军吴奇伟部

仍在茶山渡至乌江一带防御，另派一部向鸭溪、枫香园与周浑元部联络，准备无论红军向何方移动，“不失时机取直径堵剿”。

蒋介石收复遵义的军事部署立即被中央红军截获了。

正是因为这封电报的截获，引发了后来的一连串事件。

三月五日凌晨三时，中革军委发出的军事命令是：第九军团在桐梓至遵义一线钳制敌人，中央红军主力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和干部团即日集中于鸭溪附近地域。

当日，毛泽东和朱德到达鸭溪，并以前敌司令员和前敌政治委员的名义发布了“关于消灭萧［萧致平］、谢［谢溥福］两师的作战部署”。

这是自一九三二年宁都会议以来，毛泽东第一次签署中央红军的作战命令。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离开了遵义，向着与蒋介石预测完全相反的方向开进。拿毛泽东在中革军委会议上的话讲，这叫“声东击西”。毛泽东认为，既然蒋介石依旧判断中央红军要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并且决心在遵义地区与中央红军决战，那么，根据“把五个手指一个一个地割掉”的原则，下一步最重要的战略目的就是寻找合适的战场和合适的时机，继续歼灭国民党中央军的一部或几部，使中央红军能够在遵义地区最后落住脚。现在，红军的作战目标已经出现了，这就是顶替受到重创的吴奇伟部从南向北开来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和万耀煌部。

中革军委判断向遵义方向扑来的敌军共有周浑元部两个师七个团、万耀煌部一个师六个团以及黔军何知重部一个师三个团。前敌司令部要求中央红军首先消灭周浑元部的萧致平、谢溥福两个师。具体部署为：第一军团及干部团为右路攻击纵队，由北向南突击，其一师需绕到敌人的后方突击，二师迂回侧击，干部团随二师前进。前敌司令部随第一军团司令部前进。第三军团为左路攻击纵队，由南向北进攻，并以一团吸引敌人东进，还应派出小部队迷惑并钳制何知重的黔军。第五军团为总预备队。部署要求各兵团必须于六日“以猛烈动作解决敌萧、谢两师，以便七日继续对万师作战”。

发自鸭溪前敌司令部的作战计划，其制定依据就是红军截获的蒋介石关于收复遵义的作战部署的第二条，即周浑元部六日集中枫香园、鸭溪一带，即向遵义城西南地区进攻。

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出动了，设伏在周浑元进攻的必经之路上。

毛泽东在这个详细的作战部署中把该想到的都想到了，但是，就在这一作战部署被以电报的形式发至中央红军各军团的时候，蒋介石用专用的电报密码给薛岳和周浑元又发出了一封加急电报——在贵州遵义西南方向那个叫鸭溪的小镇里的毛泽东，与在四川重庆豪华的范公馆里的蒋介石，两个人给各自部队发出电报的时间居然都是三月五日晚二十三时——蒋介石在这封加急密电中突然全盘否定了他三日作出的收复遵义的计划，决定贵州境内的所有国民党军“暂取攻势防御”。蒋介石不但要求吴奇伟部不要急于渡过乌江，而且自此要“秘其行动”，待敌情明确后再有动作：“如匪果向西窜，则吴纵队主力用最快行动，星夜兼程，即向黔西西南地区挺进，不得延误片刻；若匪果与我周纵队在枫香园附近接触或对峙时，我吴纵队亦用最速方法，渡江北岸猛进，寻匪侧背围剿之。”蒋介石还要求周浑元部放弃向遵义方

向进攻的计划，在鸭溪以南的长干山附近集结并构筑坚固工事："如匪不敢向我进攻，仍在枫香园附近停止，则我军可逐步前进，先诱其来攻，然后双方夹击之。否则，匪如向黔西窜去，则周纵队亦应取最速行动，向黔西之西北地区兜剿"。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在密电的开头阐述了他对中央红军未来动向的分析："察其企图，不外以下两种：甲、放弃遵义，仍向西窜，求达其原来目的；乙、先求与我周纵队决战，然后再向南对贵阳压迫。"——事后中央红军的行动表明，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蒋介石的判断已经有了相当的准确性。

三月六日清早，当预定的战场上始终没有出现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的部队时，在鸭溪指挥部里的毛泽东立刻意识到问题复杂了。

这个时候，双方都在观察对方的行动，都在等待对方的主动进攻，然后试图在对方的调动中寻找到打击的破绽。

毛泽东和朱德命令第一、第三军团在遵义、鸭溪至白蜡坎一带徘徊诱敌，希望能够调动起国民党军周浑元部的急躁情绪，诱使他们离开坚固的据点前出到红军眼前。但是，周浑元部在蒋介石和薛岳的一再密令下，不但始终不为红军频繁的调动所迷惑，而且还制定了完整的作战方案：如果红军有向另外任何一个方向大规模运动的迹象，就以迅速的行动追击围歼；如果中央红军主动前来决战，就把红军拖在战场上，等待国民党军各路大军包抄而来。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中央红军反复诱敌没有效果，遵义四周的敌情却已越来越严重了。

蒋介石决心不再和红军比机动，他不允许任何一支部队贸然出击，而是打算在根本不交战的情况下，将红军包围在狭窄的地域内，

然后逐渐缩小合围的范围。蒋介石认为，在贫瘠的贵州西北山地里，不但粮食困难，而且陡峭的山势也不利于大部队机动，因此只要稳稳地步步合围，中央红军插翅难逃。

就在中央红军不断徘徊的时候，川军的三个旅和国民党中央军上官云相部的两个师已从桐梓向遵义方向推进；周浑元部则以缓慢移动并层层筑垒的方式，逐渐占领了遵义以西的战略要点仁怀和鲁班场；滇军孙渡部已经进入贵州西部并在逐渐向东压缩；而黔军一部在打鼓新场配合周浑元部拖住红军主力，另一部则驻守在黔北的土城以防红军突然北渡长江；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的四个师也已从贵阳动身向遵义方向开进；湘军、桂军和粤军联合在遵义地域的东面和南部设置了防线。

一九三五年三月七日，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主力向西移动。

由于遵义四周敌人的威胁越来越严重，中央纵队也撤出了遵义县城。

中央红军的徘徊引发了红军官兵的急躁。三月十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进攻黔军占据的打鼓新场，以打开战场上的僵持局面。

已经到达鸭溪与前敌司令部会合的中共中央立即召开了会议，会上除毛泽东之外所有的人都赞同打这一仗。毛泽东反对的理由是：如果按照目前敌军的前进速度，很可能在战斗还没结束的时候，红军就会受到各路敌军的多方侧击，那样就会使红军陷入极其被动的境地——站在众人的对立面，对于毛泽东来讲，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时刻，周恩来后来回忆说：

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着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可以想象那个夜晚毛泽东的心绪是何等的焦虑。但是，他之所以坚决反对在打鼓新场作战，除了作战结果可能不利之外，必是在策划着另外一场战斗——此时，打上一仗是生存的需要，必须从敌人合围的某个方向冲出去，再不动作，就等于等待覆灭。

三月十四日，天亮的时候，前敌司令部发出了战斗命令，要求全体红军官兵“以全部力量和毫不动摇的决心”开始战斗，而战斗攻击的目标却是比黔军防守的打鼓新场更坚固的一个据点——由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八个团坚守的鲁班场。

鲁班场，贵州仁怀县内的一个小集镇，三面环山，只有南面是一片山间开阔地，地形险要，易守难攻。

周浑元部按照蒋介石的指令，在鲁班场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等待着红军主动进攻。

十五日下午，红军的进攻开始了。

对于中央红军来讲，攻击坚固阵地的战斗是极其艰难和危险的。

在突破碉堡前面的深壕的战斗中，担任主攻的红一军团三团和六团的官兵迎着敌人密集的子弹前仆后继，虽然攻击在局部地段显出了

成效，但是整个战局始终无法突破。红军官兵伤亡多达一千五百人，最后不得不放弃攻占，与周浑元部形成对峙局面。

这种对峙是蒋介石最希望看到的结局，因为此战不但暴露了中央红军主力的位置，造成了红军兵力的严重损失，而且一旦对峙形成，国民党各路大军将飞速合围而来。

危险已经临近。

十六日黄昏，中革军委下达命令：放弃鲁班场，立即向北，“于今十六日晚和明十七日十二时以前”在茅台镇附近全部渡过赤水河。命令详尽安排了中央红军各军团渡过赤水河的次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各军团渡河具体计划的后面都附加着这样一句话：渡河后向西或西北走出二十至三十里“隐蔽休息”。

迅速撤离鲁班场战场的中央红军主力突然掉头向西北方向，于十六日当天便占领了茅台镇。

这个赤水河边的小集镇以出产优质的白酒闻名中外。占领了茅台镇的红军官兵没有侵犯酒厂的酒窖，但还是在当地大土豪的家里搬出了数百坛的茅台酒，然后和全镇的贫苦百姓一起享用，几乎所有官兵的水壶都灌满了茅台酒。红军的野战医院更是忙碌，他们储存了大量的酒以便当作消毒的酒精用，红军小卫生员们忙着用酒给伤员擦伤口，把脏的绷带在酒里浸泡后赶紧晒出去。干部们建议脚肿了的战士用酒洗脚，头上生虱子的用酒洗头。霎时间，茅台镇里酒香四溢。

在茅台渡口渡河的时候，毛泽东不但没有强调部队隐蔽，还问红军官兵们：“看见敌人的飞机了没有？”小红军抢着说：“看见了，狗日的飞得很低，就不怕被咱们打下来！”

这时，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将沿着旧路向北进入川南，然后再次试图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于是，他严厉催促国民党军各部队迅速向黔北和川南地域推进。

吴奇伟部因心有余悸而推进缓慢。十四日十七时，他致电蒋介石说“先遣队到达枫香坝附近，有匪阻我，前进即止”。蒋介石不禁大发雷霆，将薛岳、周浑元、吴奇伟一并斥责道：

梧生［吴奇伟］部到枫香坝后，其主力不得停留片刻，应即向太平场、井坝道路转进。如遇匪后卫拦阻，更应猛力冲击，并设法绕至其后卫两侧，竭力抄袭。若照梧生寒［十四日］酉［十七时］电称，“梁［梁华盛］师先遣队到达枫香坝附近，有匪阻我，前进即止”，此乃为我军之大耻。当此釜底游魂之匪，若再不乘机聚歼，运其智勇，各尽职责，则何颜再立于斯世？希严令遵行！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日，已经渡过赤水河并在西岸附近隐蔽休息的红军各部队接到了立即疾行的命令：“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向东，限二十日夜由二郎滩至林滩地段渡过赤水河东岸。”中革军委指出，再渡赤水是“野战军此后行动的严重紧急关头”，“渡河迟缓或阻碍渡河的困难不能克服，都会给野战军最大危险”。最后，中革军委命令第一军团派出一个团，继续向西“逼近古蔺方向之敌”，“伪装我主力西进”，但“遂行此任务后”，“限于明晚渡过太平渡”。

中国革命史上最绝妙的一刻到了：刚刚西渡赤水的红军官兵，现在又掉头重新东渡赤水，并且迎着包抄而来的国民党大军，从他们三天前走过的原路又折回去了。这是国民党军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因此他们依旧在向北昼夜行军，然后几乎与突然返回的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擦肩而过——没有确凿史料表明这个惊人的举动是毛泽东策划已久的，也没有确凿史料证明毛泽东这个异常冒险的想法产生于哪一时

刻。也许在发布鲁班场战场命令的时候，毛泽东就已经把红军三渡、四渡赤水的路线想清楚了——在撤离鲁班场战场开始西渡赤水的时候，毛泽东曾问刘伯承：“咱们第二次渡赤水河时，在太平渡和二郎滩的浮桥还在不在？”刘伯承立刻明白了毛泽东话里的玄机，他马上派人去赤水河边查看，并且安排部队把河上的浮桥看管起来。

红一军团伪装成主力继续西进的那个团行动极其成功。他们在快要到达古蔺县城的时候，遇到了前来阻击的川军的一个团，红军官兵毫不犹豫地扑了上去，把川军打得疯狂逃窜，其士气之凶猛颇有主力部队横扫一切的样子。消息传到蒋介石那里，他更加确信中央红军一定会北渡长江。于是，就在中央红军开始再渡赤水的时候，国民党各路大军依旧在昼夜兼程向川南前进。蒋介石不断地发出催促电报，措辞中流露出无法掩饰的兴奋：“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勉之勉之。”

至三月二十二日上午，中央红军各主力部队，连同中央纵队在内，全部秘密而迅速地渡过了赤水河，再次进入贵州境内。这是自一月二十九日因土城战斗失利中央红军第一次西渡赤水河之后，红军官兵第四次跨越这条纵贯黔北的大河。

两天后中革军委命令红九军团伪装成红军主力，一部分在长干山，一部分向枫香坝，沿途张贴标语，放火烧山，制造红军大军北上的假象，以吸引敌人继续北进。然后，中革军委向中央红军各军团发出了迅速南下的命令。

蒋介石偕同夫人宋美龄和一支庞大的随行队伍到达了贵阳。一下飞机，他就发表了一个热情的讲话。基于他对中央红军北渡长江的判断，蒋介石说：“浩浩长江俨如天堑，已经成强弩之末的共军，现在正为寻找渡江的地点而彷徨。”蒋介石亲赴贵阳，是来指挥与中央红军的

最后一战的。当他听说黔北重镇桐梓现已经没有了驻防部队时，立即写了一封怒火万丈的信，让飞机空投给位于桐梓以北松坎的上官云相：

据飞侦报告：“本日桐梓已无我军，亦无匪踪，而只见土人向遵义逃跑。”此种不遵命令，放弃县城，只图自保生命，殊为军人最大之耻辱。如果以兵单不能两守，则盍不放弃松坎而守县城？不应弃重就轻，乃竟放弃桐梓，此非怕死而何？中［蒋介石］自治兵以来，未有见如此之奇耻，痛心盍极！限令裴［裴昌会］师速于明日恢复桐梓城，并希松坎亦派部队前往桐梓。否则照“连坐法”处治不贷！

蒋介石严令收复黔北重镇桐梓，他哪里知道，此时的中央红军正大举南下，已经抵达了乌江岸边。

在暴风骤雨中首先到达乌江北岸的，是黄永胜为团长、林龙发为政委的红一军团先遣三团。

当地的百姓把这段乌江称为“乌龙江”。两岸绝壁，江水湍急，绝壁上只有一条小路通往一座浮桥，浮桥上的木板已经被抽掉，并且桥头有哨兵巡逻。三团决定强行突击，偷渡不成就强攻。被聂荣臻临时派到三团加强政治工作的萧华作了战前动员，然后三团突击队登上竹筏子开始强渡。竹筏子未到江心就被敌人发现了，突击行动很快失败。接着，三团的第二次强渡又开始了。四只竹筏子，三十名突击队队员，在大雨中勇敢地向对岸冲去。红军官兵冲上了南岸，他们把米袋子系成绳子，抠着悬崖上的石壁缝隙，在风雨中爬上了敌人的阻击阵地，然后迅速控制了浮桥。三团的主力沿着浮桥一边前进一边发起了冲锋，把江对岸国民党军守军和援军的各一个营几乎全歼了。

大雨倾盆，惊雷滚滚。

中央红军和中央纵队前进至乌江边，然后分别从乌江的大塘、江口和梯子岩渡口急促地渡过了乌江。

在大雨中的一棵大树下，毛泽东来到了红一军团二师。干部们撑起雨衣，毛泽东向师长陈光和政委刘亚楼询问了部队的情况，然后拿出一张地图，二师的指挥员们惊讶地看见了毛泽东在地图上画出的那条巨大的弧线：从乌江边向南，穿越贵阳和龙里之间狭窄的缝隙，然后慢慢地弯向西，最后径直向西，从贵州的西南角进入了云南。毛泽东向大雨中的远方望了望，然后对陈光和刘亚楼说："把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

年轻的红军指挥员还不能完全理解这条巨大的弧线意味着什么，但是他们对毛泽东最后说的那句话印象深刻："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敦厚的朱德发火了。原来，走在最后面的干部团一直守卫着浮桥等待第五军团渡江，当他们得知第五军团已从另外一个渡口渡过了乌江之后，立即把浮桥拆了，开始追赶主力。一追就追出二十多公里。追上了之后把拆桥的事情一报告，朱德听了大怒："岂有此理！罗炳辉的九军团还没过江，谁让你们擅自把桥拆了？回去把桥给我架起来！"陈赓立刻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带着干部团和工兵连就往回跑，二十多公里的路跑完了天已经黑了，谁也没有提出吃饭和休息，所有的人立即开始砍竹架桥，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把浮桥架好。但是，红九军团最终没能赶到乌江。在完成了佯装红军主力的任务之后，罗炳辉所率领的第九军团由于不断遭遇敌人，激烈的周旋令他们始终无法向指定的渡江地点靠近。军情急迫，中革军委只有命令第九军团暂时留在贵州，作为一支特殊的游击部队，另寻机会与主力会合。于是，罗炳辉只好率领部队掉头往回走，红九军团一头扑进了黔北的大山之中。

三月三十一日，蒋介石收到了中央红军已经南渡乌江的报告。报告令蒋介石真的不知所措了。他发出了一个照例充满怒火的电报，斥责防守乌江的吴奇伟部第五十九师三五四团团长黄道南“无耻之极”：

查现在大部股匪，任意窜渡大河巨川。而我防守部队，不能于匪窜渡之际及时制止，或于匪渡河之际击其半渡。甚至匪之主力已经渡过，而我军迄无察觉。军队如此腐败，实所罕见。推其缘故，乃由各级主管官事先不亲身巡查沿河地形，详询渡口，而配置防守部队。及至部队配置后，又不时时察其部下是否尽职，并不将特须注意之守则而授予防守官兵。是上下相率懒慢怠忽，敷衍塞责。股匪强渡，乃至一筹莫展，诚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军人至此，可谓无耻之极。此次匪由后山附近渡河，在一昼夜以上。而我驻息烽部队之主管官尚无察觉，如此昏昧，何以革命。着将该主管官黄团长道南革职严办，以为昏惰失职者戒，并通令各部知照。此令！

蒋介石企图整理出一个头绪来，但是无论如何还是一头雾水，因为他发现如果按照现在的情报，中央红军至少分成了三股：一股还在黔北，因为桐梓方向说他们正和红军主力作战。一股在东面的清水江上架桥，这个情报是空军提供的，相信不会有错，难道朱毛要往东走，重新去湖南西部与萧、贺会合？另外的一股更令人担心，竟然直接朝着贵阳来了！情报显示的情况太不合乎常理了。毛泽东向来是讲究集中兵力作战的，不到万不得已他绝不可能把主力分散，况且在兵力紧张形势危急的时候，分兵作战乃是兵家大忌。或许，朱毛红军真的走投无路开始分散逃亡了？但是，新的报告到了：在贵阳附近发现了红军！这股红军正向贵阳机场靠拢！

蒋介石立刻在地图前查看他所能指挥的部队目前的位置。他这才发现所有的部队都已被他昼夜兼程调到了黔北，而那个黔北重镇桐梓距离贵阳起码有两百公里。

蒋介石立即召开了军事会议，命令贵阳城防司令王天锡指挥一个宪兵营、两个消防连和四百名警察负责贵阳的城防，责成三天之内要把贵阳周围的碉堡修好，并且组织一个别动队严密警卫要害部门，同时严查城内户口。蒋介石说："我的性命是小事，贵阳不是遵义，让朱毛占领有碍国际视听。"会后，蒋介石把王天锡留下了。在亲热地谈了几句家常话之后，蒋介石问起了贵阳机场的防卫情况。当王天锡报告说已经在机场附近发现了红军的便衣队时，蒋介石的脸色即刻阴沉起来，问："有去机场的小路吗？"王天锡答有一条。蒋介石说："你去准备一下，挑选二十名忠实可靠的向导，预备十二匹好马和两顶轿子，越快越好。"

王天锡走了之后，蒋介石立即给滇军将领孙渡发出了一封特急电报：

孙司令官志舟［龙云］兄：

胜密。

甲、自本日起，匪约六百人，由后山搭浮桥两座，窜渡乌江以南地区，正午匪渡江者已有千数，尚有陆续部队。

乙、望兄部星夜兼程，经黔西限明日到达镇西卫待命。

盼立复。

中正。世申贵参印。

靠近贵阳机场的是红一军团二师四团，那个地方叫霓儿关，红军官兵可以看见贵阳市区的烟囱了。四团官兵在路边的墙上写的标语是："攻打贵阳城！活捉蒋介石！"

四月五日，从黔西一路向东疾行的孙渡终于到达了贵阳。一路上疲惫至极的滇军抱怨脚都走肿了，中途向国民党中央军第五十九师借了三辆卡车，装了两个连直接赶往贵阳机场，才算按时完成了蒋介石的命令。孙渡到达贵阳城下的时候，受到了薛岳中央军的阻拦，直到薛岳出面说这是蒋委员长亲自调来的救驾部队，中央军的守城卫兵才让滇军开进城去。

这时，国民党当局的报纸对中央红军的行动展开了各种各样的预测。其中有一条消息说：中央红军现有两万人，平均每天伤亡一千人。还有一条消息说，“匪首”朱德已经被中央军打死了，现在他的士兵正抬着他的尸体行军呢。

朱德说：“这是国民党第十次宣布我死了。”

中央红军并没有进攻贵阳，而是迅速从贵阳郊区穿了过去。

飞到昆明的蒋介石又回到了贵阳，因为贵阳已经没有危险了。于是，他立刻命令孙渡的滇军去追击红军，结果孙渡与中央红军的后卫部队真的交了火，但立即被打得丢盔卸甲。当孙渡把战斗情况向龙云报告之后，龙云立即命令孙渡：“我军若再超过贵阳前进，经费立将断绝。无论何人令赴黔东，均须考虑，不能轻进也。切要！”其实，前几天，龙云已经给孙渡发过密电：“若匪窜过贵阳后，我军应即暂行告一段落，停止前进……若委座有令，饬我军前进时，可将上述各种困难情形迳电婉呈。倘有滞碍，可借后方推托耳。”但是，已经觉得靠上了蒋介石的孙渡对龙云的警告不再复电，龙云只有再三去电要求孙渡停止前进。结果，龙云在贵阳的情报人员向他密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如果在湘军和桂军的压迫下，中央红军依旧不再往东的话，很可能会

向西进入云南。这一判断令龙云十分不安：难道在贵州无法立足的中央红军决心要占云南不可？

回到贵阳的蒋介石判断红军已经西去，于是，他在贵阳召开了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大会，发表了“剿灭黔匪之要领”的训词，训词对红军的战略战术大加赞赏，令与会者惊愕地感到他们的委员长犹如在进行红军战斗总结：

我看现在土匪唯一的长处，就是惯于运用掩护战术，他只要找到十里或四五里正面的空隙，就可以安全窜过去。他的掩护部队配置得非常之好，例如此次由息烽的西南石洞向东南窜去，而他的掩护部队并不配置在东南方面，却在西南方面离开息烽十五里的底坝，一方面掩护他的主力过去，一方面又对息烽逼近，使我们在息烽的主力五十三师竟被他牵制，以全力来进攻包围他主力所窜反方向的掩护部队，结果他的主力安全向东逃走了。他当时配置在底坝的掩护部队，据我判断，最多不过一二百人，你看他以如此少数的部队，便牵制了我们在息烽的一师多兵力，何等巧妙！

在提出了多达七点的“剿匪”战术，以及多达四点的补充战术之后，蒋介石长篇训词最后的结束语可谓循循善诱：

我历次所下的手令，都是根据我几十年指挥作战所体察研究出来的学问，所写出来的东西，你们不好看过就算了，一定要向部下一般官兵讲解明白，说委员长是怎样告诉我们的。同时，一般长官也一定要将手令带在身边，随时阅读，才能得其精义所在，而有所启发；如到了危难的时候，能拿出来研究，甚可以解救危难或转败为胜。到那时，你且可以问你部下，委员长平时与我们所说的那一句话，你们还记得不记得？这时他们的精神，就可以更加提起来，胆子也可以更加大起来，就更能够勇敢杀敌了。

如有能够“解救危难”的神奇话语，还需众多的战术要点做何？国民党军从江西打到广东，从广东打到湖南，从湖南打到广西，从广西打到贵州，从贵州打到四川，从四川打到云南，从云南再打回贵州，定是没有任何一支部队的官兵将委员长的手令“带在身边”，否则何以一路不见“转败为胜”？

中央红军继续以每天六十公里的速度向西疾进。

没有强大的敌人，没有危急的战事，于是，在红军总政治部的号召下，为了充实损失严重的部队，各军团不断派出工作组努力招收贫苦农民参加红军。红军宣传员只要看见村庄，就跑进去宣传和动员：“我们是红军，是穷人的队伍，谁愿意参加红军？去跟我们打地主土豪！”第一军团在黔西北盘江渡口边的紫云镇，发现了一个裁缝给国民党军制作的两百套军服，四团全部买下了，并且穿在身上，竟然在后来的路上受到了当地民团的欢迎。红三军团的先头部队是张爱萍的十一团，在江边的白层渡口，张爱萍和当地的民团达成了一个协议：让红军安全通过，红军只渡河不打仗。结果民团甚至给红军提供了渡船。

毛泽东在白层渡口渡过了北盘江。

四月二十五日，中央红军进入了一个叫黄泥河的小集镇。至此中央红军从黔北奔袭南下，现在已经从黔西进入了云南境内。

又进云南了。但这里已不是那个荒无人烟的扎西，这里是云南富裕的中部，如果再向西一步就是云南的腹地昆明了。

红军缴获了优质云腿。官兵不知道怎么吃这种据说很有名的东西，于是就用大铁锅煮。在火腿奇特浓烈的香气中，毛泽东向身后的

贵州看了一眼，从中央红军第一次突破乌江算起，红军在贵州整整徘徊了两个月，历尽千难万险之后现在终于走出来了。

至今依旧有人说，如果将中央红军在贵州的转战路线一一画出将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因为那些路线像是拆乱了的线团难以理出头绪。只是无论如何对于进入云南境内的中央红军来讲，生死仅在一瞬间的时刻已经成为历史了。

初春的云贵高原，树木葱茏，野杜鹃漫山怒放。

正是黄昏，残阳如血。

# 第十一章 巴山蜀水

1935年3月，川北、湘西与陕南



前景未卜的大战即将爆发，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有些焦灼不安。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央红军在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后，突然南下向乌江急促前进。那一天，贵州中部和北部风狂雨暴，而在数百公里以外，四川北部与陕西、甘肃交界处却是天清月朗——没有证据表明徐向前对中央红军此刻的行动和位置有确切的了解，他仅仅依据几天前的一封电报得知中央红军在黔北的土城受阻，已经被迫放弃

了进入川南北渡长江的计划，现正在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追堵中频繁移动——“他们的情况很不好。”多年后徐向前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们从鄂豫皖向川陕边转战途中尝过那种苦头。部队连续行军，吃不上饭，睡不好觉，疲劳得要死，仗怎么能打好？不是亲身经历过的人，很难懂得这一点。”

春月朦胧，夜风拂面。

这个晚上，嘉陵江东岸葱茏的大山中，正在进行着一个惊人的举动：距离江边三十公里的一个山坳里，天刚黑下来，突然涌进来数十支人流。这些由红军官兵和当地百姓组成的人流，抬着上百条刚造好的大木船和数十只大小不一的竹筏，以及数十个体积巨大的浮桥构件，沿着弯曲陡峭的山路，向那座叫凉风垭的大山主峰缓慢移动。不许点火把，不许喊号子，只有红军干部们小声的督促声，还有很快便回响起来的如同闷雷般的粗重喘息声。沉重的浮桥构件在一寸寸地蠕动，粗大的绳索把百姓和战士的肩膀都磨出了血。在山路险峻的地方，由于无法转弯，上百条巨大的木船被直立了起来，使夜色中的陡峭山崖犹如长出了无数的尖峰。不断地有人在移动和保护木船的时候从山崖上跌落下去。船体撞击在岩石上，发出惊心动魄的闷响，惊飞了一群又一群夜宿的鸟儿。

这些船全是崭新的，船底的木板还没有完全干燥。听说红军要在山里造船，当地的老人们很惊讶，他们从没听说过不在水边而在山里造船的。但在红军民运干部的动员下，百姓们很快就忙碌了起来，老船工、木匠和铁匠都带着工具背着干粮来了。没有手艺的青年农民砍大树、搬运木材，妇女和孩子们收集废铜烂铁，铁匠昼夜拉着风箱打造铁钉和铁件。船造好了，工匠们还在船帮上写上了“革命成功”的标语，像打扮女儿出嫁的花船一样把船装扮了一番。体积巨大的船在山

里造好了，必须把它们抬出山去。老人们这下更惊愕了：“哪个见过船走旱路的？红军这是要干啥子事？”

作为当时中国红军中最具实力的红四方面军的军事将领，三十四岁的徐向前从相貌上看与国民党报纸刊登的和国民党官兵议论的模样相去甚远，以至于曾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和他近距离相遇过的一位国民党军官多年后回忆说：“当有人告诉我，那个身材单薄得如同一个文弱的乡村教师的人就是徐向前时，我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因为在那场战斗中，他手下的红军个个赤膊袒胸，抡着大刀凶猛异常。”这位著名的共产党人和红色武装的将领，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影响，他沉稳甚至有些寡言的性格、朴实正直的道德风范、强悍威猛的军事指挥艺术，以及在经历了无数残酷的战争之后成为共和国元帅的经历，共同组成了他不同寻常的传奇人生。

徐向前的书生模样至少和他人生经历中的某一阶段相吻合，这个出生在中国山西北部五台山附近的农村青年曾经是一名教师。徐向前出生时，徐家家道已严重衰落，几亩薄田勉强维持全家温饱。他的父亲二十岁中了秀才之后，放弃仕途到遥远的内蒙古做教师。受家庭传统的影响，徐向前从十岁起开始读书，但很快就因家境贫寒而辍学。他没有按照母亲的心愿去当木匠，而是去了河北的一家书店当了学徒。两年后，他考入山西省府太原的一所师范学校。这所由阎锡山创办的师范学校俨然是一所军校，课程除了数学、历史、地理、心理学、教育学、音乐和美术外，还有严格的军事课程。在这所学校里，农家子弟徐向前第一次穿上了军装。军事课的教员都是阎锡山部队中的营级军官，其中一个叫张荫梧的教员后来官至国民党军上将。张荫梧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在他的学生中，那个无论从相貌上还是从性格

上最不可能成为职业军人的青年，日后竟然成了他在战场上最可怕的对手之一。

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徐向前当了小学教师。他还结了婚，妻子的名字很有书卷气，叫朱香蝉，第二年出生的女儿名字也充满书卷气，叫松枝。女儿松枝刚满周岁的时候，乡村教师徐向前作出了一个改变他人生轨迹的决定：报考黄埔军校。那一年他二十三岁。徐向前被录取了，后来他始终记得开学的那天孙中山讲过这样的话："作为革命党人，一生一世都不要存在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救国救民的事业。革命党的精神没有别的秘诀，秘诀就是不怕死。"黄埔军校校长是国民党主席蒋介石，政治部主任是共产党人周恩来，军事总教官是国民党人何应钦，教授部主任是共产党人叶剑英。徐向前加入了国民党，继而参加了北伐战争，成为孙中山卫队中的一员。孙中山逝世后，他被调到了冯玉祥的部队任团副，但是没过多久，在与军阀张作霖的作战中他所在的部队被打散。徐向前回到了家乡，妻子朱香蝉已经病逝。这是徐向前人生中的苦闷时期。国民党人对共产党人的屠杀令他开始思考严肃的政治信仰问题：是三民主义好？还是共产主义好？思考的结果是，他再次离开了家乡和女儿，在充满白色恐怖的上海找到共产党组织。那是一九二七年，二十六岁的徐向前从此走上了一条万般艰险但却终生无悔的革命道路。

一九二七年年底，徐向前被派往广州，参加了由共产党人张太雷、苏兆征、叶剑英等领导的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起义部队决定将仅存的一千四百多人整编成一支红军队伍。当时起义军所知道的红军，有由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改编的红一师，由海陆丰地区红色武装改编的红二师，以及由琼崖游击队改编的红三师，于是他们决定叫"红四师"，徐向前先后出任红四师参谋长、师长。这支红色武装在

东江地区坚持了两年之久，直至在国民党军队的残酷捕杀中伤亡殆尽。一九二九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徐向前和红四师仅存的几名干部被转移到香港。不久之后，徐向前再次转道到达上海，他化名余立人接受了一位商人打扮的共产党干部的指示：“鄂东有块根据地，基础不错，那里需要军事干部。”徐向前后来才知道，与他谈话的人就是当时的中央军委书记杨殷。谈话之后不久，杨殷就因叛徒的出卖而被国民党当局杀害。而杨殷所说的“鄂东有块根据地”，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鄂豫皖根据地。

鄂豫皖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发源地。

鄂豫皖根据地是在发生于湖北的黄麻起义、河南的商南起义和安徽的六霍起义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九三〇年，根据中共中央给鄂豫皖边特委的指示，转战在鄂豫皖根据地的三十一师、三十二师和三十三师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其领导人是：军长许继慎、政委曹大骏、副军长徐向前、政治部主任熊受暄，全军两千一百余人。同时，鄂豫皖边特区苏维埃政府也随之成立，主席是甘元景。至此，鄂豫皖根据地正式形成——那时，正是国民党军向刚刚形成不久的中央苏区开始第一次“围剿”的时候。

第一军成立后，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很快就使部队发展到六千多人，根据地也得到了扩大和巩固。一九三一年初，红一军和转战在鄂皖边界的另一支红军武装红十五军合并为红四军，徐向前出任参谋长，继而出任军长。红四军成立后，连续三次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围剿”。这时候，中央向全国各个根据地派遣了大批领导干部，被派到鄂豫皖苏区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中央候补委员沈泽民和陈昌浩。于是，以张国焘为书记的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成立了。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于湖北黄安七里坪正式成立。第四方面军辖第四军和第二十五军，兵力三万人。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刘士奇任政治部主任。红四军军部改为方面军总部，下辖第十师，师长倪志亮、政委甘元景；十一师，师长王树声、政委甘济时；十二师，师长陈赓、政委刘杞。

红四方面军成立后，在成千上万贫苦百姓的支持下，对国民党军占领的黄安县城发起了猛攻。方面军还出动了取名为“列宁号”的飞机向敌人投掷宣传品和迫击炮弹。黄安县城很快就被红军攻破，国民党军第六十九师师长化装逃跑，在红军的围歼中被活捉。此战，红军一共歼敌一万五千多人，其中仅俘虏就捉了近一万，缴获枪支七千支、迫击炮十余门。战后，红军将黄安县改名为红安县。两个月后，红军在黄安以东的苏家埠，将国民党军一部紧密包围。在双方最后的决战中，红军官兵和拼死突围的敌人展开了近距离战斗，并最终迫使敌人投降。苏家埠一战历时四十八天，红四方面军歼敌三万余人，俘敌竟达两万，其中包括国民党军第七师代师长厉式鼎、第五十七师代师长梁鸿恩、第一三六旅旅长王藩庆和第一三七旅旅长刘玉林，缴获枪支一万五千多支、手枪一千多把、机枪二百五十挺、山炮四门、电台五部以及大量的军用品。这是中国工农红军在对国民党军作战中取得的从未有过的巨大胜利。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迅速发展为四万五千多人，根据地人口也由原来的百余万人发展到三百万人以上。鄂豫皖红色根据地由此进入了鼎盛时期。

红军连续取得的胜利，使鄂豫皖苏区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张国焘有点兴奋了，他对敌我双方力量的判断也因此越来越离奇：“估计国民党军主力只剩下七个师，其余的都是杂色部队”，“红军有目前的力量，

已经无论多少敌人都不怕了”。“摆在各苏区尤其是鄂豫皖苏区面前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我们快要和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了”。

张国焘，一个身材高大、头方脸阔的老资格共产党人，他的讲话完全符合他的一贯性格。这个曾经出现在中国革命史中的重要人物，以暴躁蛮横的性格、反复无常的政治立场和寂寥冷落的人生结局而著称。他出生于江西萍乡的一个地主家庭，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一九一九年参加五四运动，一九二〇年参加李大钊创办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局成员。一九二三年，参与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大罢工。国共合作时期，他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在一九二七年爆发的南昌起义中，他是起义军中的中央代表。一九二八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六大上，他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一九三一年，张国焘从苏联回国后，被中共中央派往鄂豫皖苏区，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在以后的日子里，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完全出乎了这个措辞强硬的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想象。在接下来更为残酷的反“围剿”战斗中，张国焘在红军连战八个月未得喘息的情况下，要求红军与敌人强大的主力部队展开决战，致使红四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失利，被迫从兴旺发达的鄂豫皖根据地撤离。红四方面军主力在撤离鄂豫皖苏区后一直向西而去，那里是中国国土的腹地，那里山更高水更深——事实上，红四方面军比中央红军更早地开始了大规模军事转移，他们一九三二年九月从鄂豫皖根据地撤离之后的军事转移路程有两千公里之遥，在这条同样危机四伏的漫漫征途上，他们在国民党军近乎疯狂的追杀中历尽千般苦难万般艰险——这就是徐向前所说的：“不是亲身经历过的人，很难懂得这一点。”一九三三年一月，红

四方面军到达四川北部与甘肃和陕西的交界处。大巴山的群山让这支红色武装深刻地体会了蜀道之难，但也让红军在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之后终于获得了相对的安全。

四川，一个由极度丰饶和极度贫困组合为一体的奇特的内陆省份，是军阀和地主勾结在一起压榨贫苦百姓最残酷的地域，因此也是中国国土上发生动乱最频繁的地区之一。一九三二年正是四川军阀开始大混战的年代，军阀的部队纷纷聚往富庶的成都盆地，川北贫瘠的连绵大山因此无人防守，于是抗议苛捐杂税的暴动连续发生。民众手持大刀长矛拥入县城，搜捕团总，在衙门的公堂上张贴“官逼民反”的标语，这种类似打土豪的举动一旦发生便一呼百应——所有这一切，都是红军建立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因此，经过数次战斗，红四方面军很快就建立起包括二十三个县、五百万人口在内的川陕革命根据地，中共川陕省委和川陕苏维埃也相继成立，红四方面军历史上又一个革命高峰期来临了。

一九三三年九月，四川军阀在蒋介石的连续电示下，停止了混乱的内战，开始调动集结兵力，准备大举北进“围剿”川陕根据地。蒋介石以两百万军费、一万条枪支和数百万发子弹支援川军对红军发动的进攻。川军几乎动员了省内的所有兵力，在四川北部西起广元、东至城口的长达上千公里的弧形线上，集中了一百一十多个团，总兵力达二十多万，并配备了十八架作战飞机。当时，在川陕根据地内，红四方面军的兵力连同游击军在内为八万余人，无论是总兵力还是武器装备，红军与川军相比都处于绝对的劣势。于是，保卫川陕苏区的战斗，注定是一场空前惨烈的战斗。

沿着巨大的弧形包围圈，川军的进攻分为六路。

四川军阀刘湘称：三个月之内全部肃清入川的红军。

面对川军的攻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通江召开了军事会议。会议分析：除刘湘的嫡系部队之外，四川的各路军阀都受到过红军的重创，目前又在远离自己的地盘作战，因此必不会有很高的作战力，红军主要的作战对手应该是位于东路的刘湘嫡系部队的进攻。所以，红四方面军决定采取“收紧阵地”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节节抗击的过程中争取大量地消耗敌人，以创造最后反攻粉碎敌人“围剿”的战机。会议制定的作战部署是：集中第四军、第九军、第三十军的各两个师和第三十三军共二十多个团为东路军，由徐向前指挥，自北向南在万源、宣汉和达县一线阻击川军第五、第六路军的进攻；第九军二十七师、第三十军九十师、第三十一军主力共十多个团为西路军，由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指挥，自广元沿嘉陵江一线钳制川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路军的进攻。另以第三十一军二七六团和二七八团在北面监视陕南的敌人。

十二月上旬，六路川军先后自南向北、自东向西推进，红四方面军开始全面接敌。

十二月十六日，东线的川军在飞机的掩护下首先发起了进攻。但是，川军刚一渡过前河和州河，就遭到了红军的猛烈还击。川军第二十一军第三师和第二十三军第一师被歼灭三千多人。接着，红军第三十军的两个师乘胜发展战果，在达县东南的雷音铺给川军第二十一军第四师以沉重打击。战斗中，第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汪烈山牺牲。那是傍晚时分，川军的一发炮弹落在了汪烈山的身边。时任二六三团政委的陈锡联后来回忆说：“我急忙跑过去，汪师长已经倒在地上，血顺着他的额头还在流，他对我们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战斗，直到胜利。’”根据预先的战斗方案，红军的东线部队开始压缩阵地，并在已

经构筑好坚固防御工事的二线阵地再次与川军发生激烈的战斗。大巴山的丛林沟壑中，处处是红军的阻击阵地，红军的迂回部队弄得川军始终无法判断出红军主力究竟在哪里。等到川军消耗严重和疲惫不堪的时候，红军主力突然发动大规模的反击，然后趁川军发生混乱之际，近距离地用手榴弹和大刀大量地杀伤敌人。与此同时，在西线，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阻击着川军第一路军的进攻。西线总指挥王树声还组织了一次反击，在游击队和当地群众的配合下，把川军的一部一口气追出去数十里。方面军西线部队在取得初步胜利之后，也主动向后收缩了阵地。

红军收缩阵地的行动引起了川军将领的错觉，他们认为红军马上就要“全线崩溃”了，于是开始了更猛烈的进攻，但是进攻还是不断遭遇红军坚决而顽强的反击。春节临近，一再失利的川军开始厌战，各部队相继进入休整状态。二月十日夜，雨雪交加，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五团先是突然袭击了川军阵地的后方，然后全师向冒进之敌发动了大规模反击，在歼灭了川军的一个前锋团后，一直打到了川军第三路军指挥部，全歼了驻守在这里的两个团，击毙了川军第三路军副司令郝耀庭。川军立即调动正在休整的部队对抗红军的反击，双方在战场上形成了僵持局面。

一九三四年三月四日川军发动了第二阶段进攻。进攻首先从西线开始，红军官兵面对川军的猛烈攻击节节抗击，致使川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伤亡。根据地的百姓组织起担架队和救护队，冒着生命危险奔走在战场上救护红军伤员。而在战场的后方，红军的兵工厂日夜炉火熊熊，大量的弹药被挥汗如雨地制造出来供给前线。由红军派出的得力干部率领的游击队不断壮大，他们活跃在川军进攻的每个方向上配合红军作战。东线的川军企图在红军东、西两线的接合部打开

缺口，并在进攻中投入了敢死队，但是红军顽强的阻击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过丝毫减弱，最终致使进攻的川军因难以支撑而退却。

此时，一支特殊的部队在川陕根据地成立了，这就是给中国革命史带来无数悲壮往事的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

在当时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和哪支军队拥有如此众多的女战士，鼎盛时期红四方面军的女战士超过了三千人，曾经一度扩编为一个妇女独立师。这些在最残酷的战争中加入红军的女儿家，大多来自川北大巴山中的贫苦农民家庭。她们许多人不满十岁就被当作商品一样贩卖，十二三岁就要担负起养家糊口的担子，成为受尽剥削和欺凌的童养媳。红军到达大巴山区后，男女平等的政策在苏区的实施燃起了这些贫苦女孩子摆脱苦难的渴望，于是她们成为最向往革命的群体之一。越是川军向苏区进攻得猛烈的时候，报名参加红军的贫苦女孩子越多。这些女儿家把自己生活的全部希望都寄托给了红色苏区和工农红军，她们无法想象一旦没有了红军和苏区，她们是否还能像人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

随着女战士的增多，红四方面军民运、粮食、被服、运输等等部门，到处可以看见年轻的女红军忙碌的身影。红四方面军总医院里的工作人员几乎全是女兵，而新成立的妇女独立团从团长到司号员更是清一色的女孩子。她们在红军中接受了让她们惊奇不已的事物：官兵一致、妇女运动、民主选举、共产国际……这些从小就饱受磨难的红军女战士，一旦把革命当成了活着的唯一目的，她们的吃苦耐劳和不畏生死堪与红军中任何一支作战部队相比。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她们组成战场运输队，或者背着四支枪和一箱子弹，或者背着上百斤的粮食和盐巴，在陡峭的山林中翻山涉水

从不停歇。她们穿梭于战火硝烟之中抢救伤员。在冰冷的山涧溪流里，她们昼夜不停地洗带血的绷带和伤员的军衣，她们总也洗不干净，因为她们的双手由于冻裂而血流不断。她们还是出色的演员，不打仗的时候，她们的演出最受红军官兵的喜爱，她们演活报剧，甚至还会跳苏联红军的《水兵舞》，尽管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那个叫苏联的国家在什么地方。当需要她们冲上战场与敌人搏斗的时候，她们奋勇杀敌，宁死不屈，以致原来蔑视她们的川军只要在丛林中看见一片红色就胆战心惊，因为她们的枪上、刀柄上全都系着红布穗子。她们爱美，她们的军装大多是打土豪时缴获的地主富人的长衫，她们把长衫从中间剪断，上半截改成军装，下半截改成裤子，因此她们的军装五彩缤纷什么颜色都有，只有像男战士一样的绑腿是统一的，那是她们把缴获来的白土布染成灰色制成的。她们最喜欢打扮自己的草鞋，无论是草编的还是布条编的，都要在鞋的前头缀上个红绒球。队伍集合的时候，头上的大斗笠上画着五颗鲜红耀眼的星星，脚下的红绒球娇艳夺目，无论是红军官兵还是穷苦百姓都会看得出神。

根据地的女红军们最羡慕的还是她们的团长张琴秋：双排扣的列宁装，一顶洁净的八角军帽，绑腿很整齐地打成人字形，腰间扎着一条宽皮带，挎着一把精巧的小手枪。“那是一个老革命。”在年轻的女红军们看来，张秋琴团长很神奇，因为她在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学习过。

一九三四年六月，刘湘为了尽快达到消灭川陕根据地的目的，调集了二十万大军向万源发动了进攻。这时，红四方面军已经退出了百分之九十的根据地。徐向前说：“现在是我们的紧急关头，是消灭刘湘的决战关头，我们已经退到根据地的后部，不宜再退，也不能再退

了。”因此，万源保卫战成为关系到川陕红军生死存亡的最后一战。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共五个军参加了战斗，而指挥这场空前惨烈的战斗的都是中国工农红军战史上著名的指挥员：许世友、王建安、孙玉清、陈海松、程世才、李先念、詹才芳、王维舟、陈再道、陈锡联、郑维山……

七月十一日，万源大雨如注，保卫战在方圆一百公里的战场上开始了。川军的八个旅在飞机的掩护下，向红军阵地发动了猛烈的进攻，红军的火力居高临下，官兵们从山上推下去的石头碾过树丛草叶和冲击的川军。当敌人被迫退下去的时候，山坡上就只剩了被雨水冲刷流淌的泥浆。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川军投入了整团整旅的兵力，但是红军的阻击异常凶狠。焦急的刘湘发布了奖惩条例，宣布谁拿下万源奖励三万银元，谁放弃阵地立即处死，师长和旅长不亲临前线格杀勿论。这一仗一直打到八月，在万源的东面、南面和西面，川军分为六路协同作战，向红军发起了全线攻击。坚守在万源南面大面山阵地的是许世友的第四军。工事被炸平了，红军官兵就把敌人的尸体头对脚脚对头地摞起来当掩体。打起仗来一向凶猛无比的许世友后来回忆说：

后面的敌人还是往上拥，有的已经冲进了我军的堑壕。我们的战士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勇敢地跳出工事和敌人混战成一片。大刀在阳光下闪着白光，两军刀枪相接之处红花花的，也分不清是刀布，还是鲜血。敌人招架不住，纷纷向后溃退，但过不多久，又增兵压了过来。就这样你冲过来，我杀过去，一直持续不断……一个敌军指挥官正挥舞着手枪大喊大叫，我飞身过去，劈头就是一刀，也不知道是刀太快，还是砍得太猛，那家伙的头向山坡下滚出去好远，身子还踉踉跄跄地向前走了好几步。一场拼杀结束了，漫山遍野都是敌人的尸体……

红四方面军的总反攻开始了。红军采取猛烈攻击和长距离迂回的战术，最终使川军对川陕苏区形成的弧形包围圈全线崩溃。

八月二十三日，刘湘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川军“围剿”红军耗资一千九百万元，官损五千，兵折八万，“难以为继”。而国民党中央政府驻四川代表程泽明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

万源决战仅过月余，赤匪便收复全部失地，嘉陵江东岸均被占领，东北之城口、西北之广元延伸数百里。四川各军均遭惨重失败：田颂尧的二十九军几乎全军覆没，罗泽洲、李家钰部大部被歼，二十三军溃不成军，邓锡侯元气大伤，刘湘、杨森之精锐损失殆尽……四川的剿匪军事已到不得不由中央军统筹指挥的地步。

十月，远在江西的中央红军开始了军事转移。

紧接着，红四方面军留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也被迫放弃根据地开始了军事转移。

此时，对于红四方面军来讲，无论是党的总负责人张国焘，还是军事总指挥徐向前，他们在庆祝胜利的欢呼声中都感到了一种无法言表的茫然。

尽管在与川军的作战中取得了胜利，但是，川陕根据地所遭受的损失也是无法估量的。部队因为伤亡严重，从原来的八万余人锐减到了六万，于是不得不把十五个师缩编为十一个师。更严重的是根据地内良田荒芜，十室九毁，满目新冢，一片废墟。土地都没有播种，因为一来没有种子，二来百姓担心即使种子撒下去战事一来也是收成难保，可是根据地内的百姓如果放弃耕种，就等于断绝了红军的生活来源。战争使当地的许多青壮年牺牲了，根据地内的劳动力和兵源都已枯竭。战后，川军对根据地的封锁更为严密，红军必需的各种物资，

如食盐、粮食、衣被和药品等都出现了补给困难，兵工厂所能供应部队的弹药数量也开始急剧减少。随着根据地内饥饿现象的发生，伤寒和疟疾等传染病开始流行。

徐向前预感到，红四方面军最艰难的时刻就要来临了。

红军官兵依旧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一九三四年底，万源保卫战结束后的红四方面军官兵，无疑是这个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因为他们曾经为他们认定的生活理想迎着敌人的子弹前进，并且在枪林弹雨中英勇无畏地活了下来。

在红四方面军数万名官兵中，有一位普通的红军战士从根据地给他的家人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历经岁月沧桑被一直保留到今天，成为一封能够解释历史细节的十分珍贵的家信。在这封家信里，那位红军战士列举了无论生死他都要当红军的理由，理由朴实而深刻：

一、士兵的错误，除了士兵相互批评纠正以外，都由士兵委员会来负责，很少要长官或者军纪管束。

二、军需的来源和支出，完全公开，并经士兵委员会审查。

三、官长士兵间，生活一律平等。

四、军中有网球、足球、琴、棋、音乐等活动设备。

五、尤其特别的，红军到处帮助群众分配土地，肃清反动势力，帮助群众的武装组织和训练，所以每到一处便有成千上万的群众举行欢迎会和慰劳会。红军士兵家里的田，无人耕种的时候，大家争着帮忙。在每一次大会上，农民都亲热地叫出“我们的红军”。红军士兵也说：“这一支枪不是我的，也不是上级官长的，是谁的呢？是工农阶级的，也是全世界工农阶级的。”

六、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对红军都表示好感，每次打仗都留给红军许多子弹，并且告诉红军他们军中的情形和消息。有些简直举行哗变，投到红军里。所以国民党大小军阀都怕红军的标语和传单，每次进攻和退却的时候，总要派几个不识字的士兵，先把红军的标语和传单撕尽，然后通过。有一次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士兵，拿着一张红军的传单，反动军官立刻把他枪毙了，说他是私通共匪。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接到中革军委的电报，电报要求红四方面军派出一个师南下，接应中央红军从贵州进入四川北渡长江。

关于中央红军离开中央根据地之后的命运，徐向前和陈昌浩只能通过电台得到十分有限的消息。接到这封电报后，红四方面军感到了为难。因为仅仅以一个师的兵力自北向南横穿整个四川，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举动，部队恐怕走不到半路就会被川军包围吃掉；但是如果派出足以与川军抗衡的兵力，那就势必意味着要将川陕根据地放弃。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八日，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第一师独立旅进入四川，接替了川北广元、昭化地区川军的防务。于是，红四方面军决定先向川甘方向的广元、昭化出击，把相对孤立的胡宗南的部队吃掉，寻机向甘肃南部拓展根据地，同时牵制住敌人的大部兵力，以配合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

一月二十二日，就在中央红军攻打土城的战斗即将打响的时候，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发起了广昭战役。战斗进行得相当艰苦，徐向前亲自指挥红四方面军主力第九军和第三十军渡过嘉陵江，向据守广元以西羊模坝的敌人发动攻击。在持续两天的激战中，八十八师副师长丁纪才和二十五师副师长潘幼卿先后阵亡。在付出巨大的代价之后，红军占领了敌人的主阵地，切断了广元与昭化之间敌军的联络。在接下

来攻打广元县城和昭化县城的战斗中，红军遇到了敌人在坚固防御工事里的顽强抵抗。红军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冲击，始终没能突破敌人的防御阵地，在川军增援部队到达的情况下，红军被迫撤离了战场。

广昭战役开始后，中革军委的电报再次到达。这是一封因对红四方面军的命运有着重要影响所以极具史料价值的电报：

致四方面军电：

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的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为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地协同作战，先击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因我军入川，刘湘已无对你们进攻可能，你们若进攻刘敌，亦少胜利把握，与我军配合作战距离较远，苏区发展方向亦较不利。西线则田［田颂尧］部内讧，邓［邓锡侯］部将南调，杨［杨森］、李［李家钰］、罗［罗泽洲］兵单力杂，胜利把握较多，与我军配合较近，苏区发展亦是有利的。故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至兵力部署及攻击目标，宜以一部向营山之线为辅助方向，而以苍溪、阆中、南部之线为主要方向。在主要方向上宜集中主力，从敌之堡垒间隙部及薄弱部突入敌后，在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敌人，于运动战中包围消灭。若你们依战况发展，能进入西充、南充、蓬溪地带，则与我军之配合最为有利。同时我们要估计到敌人可能以较少兵力利用堡垒钳制四方面军，而趁野战军立足未稳之际，转移主力实行突击，以收各个击破之效。因此你们作战方针从速决定电复。

政治局及军委

一月二十二日

电报命令红四方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而中央红军也将“转入川西”。这无疑是一个惊人的设想——中国工农红军的两支主力方面军如果真在四川腹地胜利会合，中国革命的历史必将是另一种叙述。

由于中央红军渡江在即，关于这一指示是否能够执行和如何执行已经没有时间充分讨论。红四方面军决定马上开始造船，做好西渡嘉陵江的各项准备；同时收缩东部兵力，派出部队出击陕南调动敌人北上，以减轻中央红军的军事压力，并为红四方面军西进创造有利时机。

出击陕南的部队先后向宁羌、沔县和阳平关发动攻击，致使胡宗南的一个旅和川军的四个师开始向陕南移动。红四方面军的战役目的已经达到，作战部队随即返回了川北准备西渡嘉陵江。但是，就在这时，中革军委的电报再次到达，电报的内容令红四方面军十分意外：

……

我野战军原定渡过长江直接与红四方面军配合作战，赤化四川，及我野战军进入川、黔边区继向西北前进时，川敌以十二个旅向我追击并沿江布防，曾于一月二十八日在土城与川敌郭［郭勋祺］、潘［潘佐］两旅作战未得手，滇敌集中主力亦在川、滇边境防堵，使我野战军渡长江计划不能实现。因此，军委决定我野战军改在川滇黔边区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这一广大地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以与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呼应作战。

……

中央红军因北渡长江受阻而改变了原定计划。但是，红四方面军根据中革军委的电报所制定的西渡嘉陵江的计划已经开始实施：川陕根据地东线部队向西压缩之后，川军刘湘的主力部队占领了万源，此

刻正向通江、巴中方向推进。西线，苍溪、阆中、仪陇各县在红军部队移动后，也相继被川军田颂尧和罗乃琼部占领。目前的川陕根据地已经被压缩得很小，对于红四方面军来讲，西渡嘉陵江的作战计划已经无法停止。

徐向前说："箭在弦上，非进不可。"

红四方面军最后的决定是：继续执行西渡嘉陵江的计划，实现向陕甘方向扩展生存空间的目标；同时在战役进行中密切注意中央红军的动向，随时准备给予配合和策应。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夜，发生在四川北部的一场规模巨大的战役就要打响了。

嘉陵江，江面宽阔，水流湍急，两岸山峦耸立，乃巴蜀大地上的巨川，源于陕西省凤县的嘉陵谷，由北向南在广元与白龙江汇合后，奔腾直入长江。

在嘉陵江西岸防守的，是川军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和第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的部队，总兵力共计五十二个团，由邓锡侯统一指挥，集中在北起广元、南至南部的沿江一带。这是一道布防分散、后方虚弱的防线。总指挥邓锡侯与田颂尧、刘文辉和刘湘并称为川军四大军阀，彼此常年处在相互戒备甚至是攻击的状态中。在此前四川军阀的混战中，邓锡侯和田颂尧被刘湘拉拢，致使刘湘大败刘文辉的部队。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停止之后，刘湘被蒋介石任命为四川"剿匪军"总司令，田颂尧被委任为川陕边防"剿匪"督办，其部队成为在四川境内与红四方面军作战的川军主力。

川军在嘉陵江沿线的部署是：邓锡侯部的十七个团，防守北自广元以北的陈家坝、南至广元南面的江口镇一线，其中十个团守备江防，七个团为预备队。田颂尧部的三十五个团，防守江口镇以南至南部县境内一线，其中三十三个团守备约两百公里的江防，两个团为预备队。

针对川军布防正面宽大的特点，为了选择一个合适的突破口，徐向前亲自带着参谋走了一百五十多公里，详细勘察了嘉陵江沿江的地形、水文和对岸川军的防守情况。在对各部队提出的渡江地点进行了反复论证后，苍溪至阆中之间约五十公里的地段，被最后确定为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的突破口。其中主要突击点是苍溪东南的塔子山，突击点右侧的渡江点是鸯溪口，突击点左侧的渡江点是涧溪口。

红四方面军的作战部署是：第三十军实施主要突击，从苍溪东南的塔子山附近突破，消灭田颂尧部的江防部队，并协调第三十一军消灭剑门关守敌；第三十一军从苍溪以北的鸯溪口突破，消灭剑门关守敌后，迅速向广元、昭化方向发展，阻截胡宗南的部队南下，保障方面军右翼的安全；第九军向阆中以北的涧溪口突破，而后以一部协助第三十军进攻，另一部负责消灭南部县城的守敌，保障方面军左翼的安全；第四军为方面军第二梯队，在第一梯队渡江成功后，从苍溪渡江，以一部向南迂回，协同第九军作战，主力则向南部县城西北方向的梓潼发展；方面军的炮兵配置在塔子山上，掩护担负主要突击任务的第三十军强渡嘉陵江。此外，第三十三军、第三十军九十师和地方游击队，负责在东线牵制敌人。

大战即将爆发，方面军第三十军军长程世才和政委李先念深感责任重大。他们带领着自己的师长们按照当地农民的打扮，换上了蓝布裤褂，头上缠着白布头巾，拿着镰刀背着箩筐，一次又一次地在塔子

山附近的江边观察，并派出了大量侦察人员偷渡到对岸侦察敌人的火力配备和兵力部署。为了隐蔽渡江意图，第三十军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部队进入指定区域后，水路和旱路全部实行了警戒，部队不断地变化着番号，所有通往江边的道路都进行了伪装，炮兵的射击诸元被反复校对，参加强渡的每一条船上的战斗分工都进行了详细分解，甚至连船一旦中弹谁负责堵漏都作出了规定。

嘉陵江在陡峭的山崖之间奔腾咆哮。塔子山脚下的江面宽约八百至一千五百米，红四方面军选择这里作为主要突破口的理由是：江道弯曲，水流突缓，如果敌岸开火，便于部队强渡攻击。且塔子山高耸于江东岸，居高临下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掩护火力的作用。一旦部队强渡成功，对岸纵深是丘陵地带，有利于突破后的发展。

渡船秘密隐蔽在江边的山林中，渡江战斗将在天黑的时刻打响。

第三十军确定的主攻部队是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政委郑维山。八十八师是由参加过黄麻起义的红军骨干组成的部队，其三个团各有特点：二六八团擅长进攻，二六五团长于夜战，二六三团攻守兼备。最后，二六三团被确定为主攻团。白天，李先念和程世才到达二六三团时，发现不少官兵并没有按规定睡觉。一问，官兵们如实回答道："就是把眼睛闭得紧紧的，还是睡不着。"

二十八日晚二十一时，嘉陵江东岸，数万红军从黑暗的山林中出发，开始慢慢向江边移动。跟随八十八师行动的军长程世才和红军官兵们一起抬着船。两个小时之后，上百条木船一只只地下了水，每条船都由一名战士拉着船绳固定在江岸。

午夜一时，在嘉陵江东岸的三个突击点上，突击队队员们上了船。

黑暗中的嘉陵江，除了水声风声外，万籁俱静。

年轻的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在那个夜晚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他将成为诞生在这片广袤国土上的新中国的国家主席。这位面容清秀的军政委已经有了近十年的革命经历。他十八岁就从一名乡村木匠成为著名的黄麻起义的领导者之一。在经过无数残酷的战斗和苦难的生活考验之后，二十六岁的李先念已经成为一名外表安静温和、内心刚强如铁的优秀的红军指挥员。

李先念不时地看一眼自己的手表。

午夜一时三十分，李先念看见徐向前猛吸了一口旱烟，然后向身边的参谋点了点头。

突击命令发出了。

嘉陵江突击点上的所有船只都离了岸。

红军突击队队员奋力划桨，不顾一切地向对岸靠近。

距离对面江岸大约还有几十米，川军的游动哨兵发现了动静，喊：“哪里来的？要干什么？”

突击队队员没人吭声。

“不回答我就开枪啦！”川军哨兵拉动了枪栓。

这时，二六三团的第一条船猛地撞到了江岸，突击队队员纵身跳了上去。

双方几乎同时开了枪。

就在枪声响起的那一瞬间，嘉陵江东岸的塔子山上，数十门火炮一齐发射，炮弹在川军的江防工事中密集地爆炸，爆炸引起的巨大的火球顿时映红了嘉陵江江面。

即使在以往的数次战斗中受到严重损失，红四方面军依旧拥有可观的火力规模。和中央红军作战时仅仅有一门炮几发炮弹不一样，红四方面军的炮兵在王维舟的指挥下有整整一个团！至少在这个重要的夜晚，红军的炮兵炮弹充足，可以在主要突击点上组织起令敌人恐惧的强大火力网。

在塔子山对岸防御的是川军陈继善旅的一个营。八十八师突击队开始渡江的时候，值班的川军官兵正在哨棚里聚赌，对红军的强渡行动毫无察觉。等巡逻的哨兵开枪的时候，营长陈择仁慌忙跑出营部，结果一出门就被红军乱枪击毙。红军突击队迅速攻占了川军设立在滩头的碉堡。第二天拂晓时分，第三十军后续部队大批渡江，塔子山对岸川军的防御阵地全部被红军占领。

由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率领的第三十一军位于鸯溪口的突击也是同时开始的。但是鸯溪口江面水流湍急，在这里防守的川军邓锡侯部的四个团已经和北面胡宗南的中央军部队联合部署了江防，准备一旦红军渡江便实施南北夹击。川军还把东岸所有能找到的船只全部毁坏了，因此他们根本没有想到红军会选择这里渡江。这天深夜，当塔子山那边传来枪炮声的时候，鸯溪口江面上也出现了红军的渡船。第

三十一军的突击队队员手上是驳壳枪，背上插着大刀，腰间挂满了手榴弹。强渡出乎川军的预料，川军还没弄清大祸是怎样临头的，滩头阵地就已经被红军占领了。

在涧溪口渡口指挥部队强渡的是第九军二十五师师长韩东山。这个师竟然没用一枪一弹就渡过了嘉陵江。在准备渡江的时候，由于沿岸的船只都已被川军破坏，而为了加强塔子山主要突破点的渡江行动，师里把所有的渡江器材全部给了第三十军，因此，韩东山面对“渡江器材自行筹集”的命令有一点发愁。这时，一个四川籍的红军小战士提出了用打谷子的木拌桶渡江的建议。这种巴蜀农家使用的木拌桶又大又结实，里面可以容纳五六个人。二十五师各团很快就从百姓那里购买了几十个木拌桶，韩东山和师政委陈海松亲自试了一下，结果发现木拌桶在水里不稳，很容易翻。这时候，一名湖北籍的红军战士说，在他们家乡打鱼用的也是这种木拌桶，但不是一个，而是用木杠子把四个木拌桶连在一起。韩东山和陈海松用这种办法又试了一次，果真又稳又灵活。

二十八日夜，二十五师七十四团的红军突击队队员就是坐在这种木拌桶里开始强渡嘉陵江的。虽然上游塔子山方向的枪炮声已经响成了一片，但是涧溪口的川军却没有任何动静。七十四团渡过江的官兵在对岸找到了两条大木船划了回来，报告韩东山师长说没有发现川军。韩东山立即命令其余的部队迅速渡江控制对岸区域。等二十五师全部渡过了嘉陵江才知道，对岸的川军奉命向塔子山方向增援去了。

二十九日拂晓，第三十军八十八师从塔子山突破嘉陵江后，占领了江对岸飞虎山、高城山、万年山等制高点，击溃了川军田颂尧部一个旅的阻击。在鸯溪口方向突破的第三十一军占领了川军的阻击阵地

火烧寺。在涧溪口方向突破的第九军已经开始向阆中进攻。同时，方面军的第二梯队红四军也从苍溪迅速渡过了嘉陵江。

全部渡过嘉陵江的红四方面军开始了对敌人的追歼。

韩东山的二十五师在第四军一部的配合下，经阆中地区南下，按照原定作战部署对南部发动了攻击。南部是四川盆地东北边缘的一个县城，位于嘉陵江的西岸。在南部县周围有川军的七个团，其中一个团驻扎在县城里。二十五师以七十五团为前锋向南部的南面穿插，以断川军退路并阻击增援；以七十三团和七十四团急促向县城推进。三十日晚七时，扫清南部县城外围的战斗打响了。二十五师占领了大部分的制高点，但在攻打最后一个小山头时，遇到了川军一个加强连的顽强抵抗。七十五团二营多次组织进攻都未能突破，营长和副营长在进攻中先后阵亡。韩东山命令二营六连连长万德坤再次组织强攻。万德坤年仅十九岁，是方面军中有名的“夜老虎”，正是因为他善于组织夜战，第九军才把他从李先念的第三十军要了来。年轻的红军连长果然出手不凡，在他的指挥下，数路小股红军从不同的方向摸了上去，在漆黑的夜色中全歼了川军的加强连。

南部县城的城墙高两丈。四月一日晚，红四方面军进攻南部县城的战斗正式打响。川军利用城墙居高临下拼死阻击，红军发动了数次进攻都没能成功。七十三团团长田文龙仔细研究了川军的防守情况，决定组织敢死队从靠江边一侧城墙的一个薄弱部位突进去。七十三团副团长手提大刀对韩东山说：“敢死队组织好了，这次再拿不下来，师长你把我当尿泡踩！”多年后，韩东山已经无法回忆出这位副团长的名字，只记得大家都叫他“余娃子”。敢死队每人持大刀一柄列队完毕，余娃子作了战斗动员：“咱七十三团没有孬种，拿过方面军‘攻如猛虎’的大旗，好名头别让咱砸了！”话音一落，带着敢死队冲了上去。

没过多久，敢死队终于攀上了城墙，在川军的城防上撕开了一个缺口。随着敢死队队员的奋力拼杀，越来越多的红军拥入了县城。当天边露出了第一缕晨光的时候，南部县城里的川军已被全部歼灭。韩东山在进城的那一刻听到了余娃子在拼杀中牺牲的消息。他快步登上高高的南部城墙，在那个被红军用生命撕开的城防缺口处，看见余娃子的遗体已经血肉模糊，一柄大刀依旧紧攥手中，刀刃已经卷曲——《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烈士名录》：“余元。河南罗山人。一九一四年生。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红四方面军九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副团长。一九三五年，于四川作战中牺牲。”

第三十军渡过嘉陵江后一直追击着溃逃的川军。在追出了大约四十公里的时候，军长程世才跟随二六八团到达了一个小村庄，红军官兵发现村头的一个院子周围布满了电话线，于是立刻包围了这里。程世才进了院子，看见里面有个白白胖胖的川军中校，程世才问：“你是什么人？在这里干什么？”中校回答说：“我是刚从庐山军官学校毕业的团长，负责阆中、苍溪、剑阁及其周边部队的联络。你们是哪部分的？”程世才说：“我们是中央军的。你介绍一下情况。”中校说：“情况我不清楚，只知道红军渡江之后我军的一个旅正向剑阁增援。西北方向五公里处的野战医院由一个连负责警卫。”程世才等中校说完了，让身后的战士缴了他的枪。程世才军长说：“我们就是红军！”白白胖胖的中校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一个劲儿地说：“你们中央军不能这样对待川军！”

迅速解决了川军中校所说的那个野战医院后，四月二日拂晓，第三十军八十八师抵达剑阁。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也于这一天中午时分到达了剑阁城。部队推进速度很快，渡过嘉陵江后的急促行军使徐向前和他的战马都已

大汗淋漓，一路上到处可见逃难的百姓和被战火摧毁的村庄，这让徐向前的心情很沉重。这个时候，徐向前还不知道，此次渡过嘉陵江，红四方面军将永远地离开川陕根据地。他放眼望去，剑阁城里大火升腾，撤退的川军把县城里的粮仓点燃了。徐向前立即命令红军官兵连同川军俘虏一起先去抢救粮食。然后，徐向前来到了川军旅长覃世科的指挥部，里面的电话还能用，一个红军战士正抱着电话筒与川军对骂。徐向前拿过电话，听见里面有人叫喊着需要增援，叫喊的是防守剑门关的川军第二十八军宪兵司令刁文俊。

剑门关是横跨剑阁与昭化之间的著名隘口，两旁峭壁耸立，关口仅一狭窄古道。这个由川入陕、由陕进川的交通要道，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所谓“一关失，半川没”之说足以显现其战略价值。在四川军阀的长期经营下，剑门关关口碉堡林立，堑壕交错。眼下，川军邓锡侯部宪兵司令刁文俊指挥的三个团在此据守，其中一个团据守关东，一个团据守关南，而在关口主峰上防御的是杨倬云团。为了确保不失剑门关，刁文俊专门用十几匹骡子驮来了四万块银元囤积在关口阻击阵地上，制定了“勇者赏退者杀”的奖惩规定。

四月二日拂晓，第三十一军的四个团和第三十军的八十八师从三个方向朝关口守敌包抄而来。上午十一时，红军攻打剑门关的战斗开始了。

蒙蒙细雨中，红军向剑门关主峰发起了一次又一次冲锋，川军凭借险峻的地势居高临下地阻击，火力异常猛烈，担任前锋的二七四团伤亡不断增加，战斗却没有进展，这使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十分焦急。这个威震川北的著名红军将领这一年年仅三十岁，他参加革命前是一个小学校长，十九岁时已成为湖北麻城农民协会组织部部长，曾率领上万农民自卫军抗击过地主武装的进攻。他是黄麻起义的领导者

和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第三十一军是他亲手带出来的老部队，他和官兵彼此拥有的信任使这支部队经受了无数战斗的考验。

红军的攻击部队又一次退了下来。二七四团二营营长陈康来到了王树声面前，年轻的营长只有一句话："该我们上去了。"

二营是王树声从几十人的游击队带出来的部队。自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战役开始以后，他们作为军预备队一直跟随在王树声的身后，他们知道关键的时刻副总指挥会用得上他们。

王树声举起望远镜看了看，然后对陈康说："去准备吧。"

在炮火的掩护下，二营的攻击开始了。四连因为在渡江时损失大而被当做了营预备队，陈康拔出手枪对五连和六连的官兵说："跟我上！"

在险峻的剑门关主峰上，川军的火力十分凶猛，二营刚一开始攻击，陈康的左臂就中弹了。卫生员给他包扎的时候，他看见冲在前面的几个战士相继倒下。

王树声急了，跑到炮兵阵地上把炮连连长大骂了一顿。王树声命令他把炮打得准一点，把敌人的火力压制住。炮连的炮声再次响起来，炮弹准确地落在川军的射击阵地上。王树声大叫："好！好！给我接着打！"

陈康一挥手，二营各连的军号依次吹响，红军官兵从土坎后面犹如掀起的巨浪一般猛然站立起来，杀声随即响彻了剑门关山谷。

在王树声的命令下，二七四团所有的火力都射向了二营冲击的方向，川军盘踞的主峰上顿时硝烟漫天。这一刻，大雨突降，雨柱在万

仞插天的群峰之间形成一团团雨雾，血腥的战场上一片迷蒙。

二营教导员刚从土坎上跃起便倒下了，栽倒的那一刻手中的手榴弹朝前扔了出去。这个年仅十七岁的红军指挥员个子不高，平时总是笑眯眯的，打仗的时候永远冲在最前面。他姓鲍，红军战士们都亲热地叫他“包谷米”。攻击前战斗动员的时候他说：“在二营面前，没有什么关不关的，跟我冲上去就是了。”

冲上剑门关主峰的官兵都端起了刺刀。在陡峭的阵地上，红军的拼杀声和川军的咒骂声混合在一起，双方扭打着的士兵不断地从悬崖上跌落下去。当川军被压缩在阵地后面的一条石沟里时，拼杀中的陈康忽然发现川军越打越多，原来石沟里藏着川军的预备队，数百名拥上来的川军一下子把石沟填满了。此刻，二营的官兵都已经冲上了主峰，手榴弹下雨一般向石沟砸下来，一时间这条石沟里血肉横飞。

王树声向主峰疾步攀登。在二营攻击的路上，他看见了那些倒在川军尸体中的红军战士的遗体。一个已经牺牲了的战士依旧靠在石崖上，王树声轻轻地把他放倒，然后把他腰间的手榴弹取下握在了自己手里。

据守剑门关的川军团长杨倬云意识到最后的时刻到了。他让他的营长廖玉章把那四万块银元抬了出来，然后一面用手枪向撤退的川军士兵射击，一面把箩筐里的银元往外扔。但是他即刻看见营长廖玉章被手榴弹炸倒了，几个士兵想把廖营长拉起来，但是连同这几个士兵在内，一群人在一声炮弹的爆炸声中向天空飞去，然后碎片一样地落在淌着雨水的草丛中。

杨倬云在几个卫兵的护卫下顺着崖壁往上爬，当他们终于爬上崖顶的时候，却看见关口前面的山路上杀声四起，红旗飞舞。几天前，军长邓锡侯视察这里的时候曾经问过杨倬云："这道绝壁有多高？"当时他的回答是："一块石头丢下去要一袋烟的工夫才能落地。"——前面是冲来的红军，身后是万丈绝壁，无路可走的杨倬云一转身，从悬崖上跳了下去。

剑门关被红军占领了。

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在剑门关战斗报告中说："匪跟踪以大部来攻，先以火力激战，继以短兵相接，循回肉搏，情势极为激烈……刁司令以预备队力争无效，杨团与刁司令即先隔绝……杨团退路四塞，除少数官兵突围外，几全部覆灭于血泊中……是役杨团长倬云、江营长孝思及陈团廖营长均战死于剑门阵地。刘团李营长在沙溪坝附近阵亡，陈团何营长在天雄关任收容时阵亡。共计官兵伤亡失踪约一千三百余名。"川军在清理战场的时候，仅凭一双刺花的袜子和一条丝织的裤带才得以辨认出那具已经摔烂的尸体是他们的团长杨倬云。

一九三五年四月，在那个下了一场大雨的春天里，所有牺牲在剑门关的红军官兵，自此在这里守望着美丽的巴山蜀水。

四月二日，川陕边防"剿匪"督办、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被蒋介石撤销了职务：

查嘉陵江向称险要，苍、阆、南部一带，原属二十九军防地。一年以来，迭次通令构筑碉堡，加强工事，严密布防，以遏残余徐匪之窜扰，不啻三令五申。该军负责守备经年，糜饷实钜。律以救国救乡之大义，应如何激励军心，力图报称。乃

连日据报：该军防守不严，徐匪一部遂于俭［二十八日］晚突渡嘉陵江；继复作战不力，苍溪、阆中、南部亦竟相继撤退。弃藩篱而不守，陷人民于涂炭！实属玩忽命令，贻害地方，断难再予宽容。兼川陕边防剿匪督办第十二路总指挥、四川剿匪军第二路总指挥、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着即撤职查办；其副军长孙震辅助不力，记大过一次。着令孙震督率二十九军，戴罪图功。此次该军失败，负责诸将领，由孙震查明呈报，以凭分别惩处。该军现在收容若干，着孙震速即整理改编，禀承刘总司令——湘——办理具报，仰即转令，一体遵照。

剑门关战斗后，为了取得战役的全面胜利，红四方面军决定集中主力歼灭位于梓潼、江油的川军邓锡侯部，力求向川甘边界地区发展。

第九军和第三十军主力部队，一昼夜奔袭近一百公里抵达了涪江岸边，并于四月十日突破了涪江的川军防线，然后向南推进包围了江油县城，其前锋直逼江油南面的重要城市绵阳和成都。

江油位于四川盆地的西北边缘，古时就有“成都的北门”之称。防守江油的邓锡侯在四川军阀中素有“能战”之名。红四方面军突然向西突破川陕根据地的边界嘉陵江，邓锡侯与刘湘的看法是一致的：红军很可能要放弃根据地，沿着川陕公路南下川西平原。因此，他对红军挺进涪江上游并不以为然，认为那不过是红军的“转山”行动，于是把兵力全部放在了防守川西平原上，因为平原的中心就是省府成都了。邓锡侯在分析了局势和权衡了得失后，尽管连他自己都有一点胆怯，但还是决定亲自出马与红军一战，他已经不得不这样做了。红军到达江油附近的消息令成都城里一片慌乱，大地主、大资本家和高官大员们纷纷逃往上海，有的还逃到了香港，飞机票和汽车票成了这座城市里最抢手的东西。那些不是特别富有的人只有逃往重庆，从成都到重庆的汽车票价因此上涨了一百倍。刘湘急忙把川军潘文华部调到了成

都，在成都城垣的四周大修碉堡，表示要死守成都。结果，报纸上把刘湘说成了“大救星”。邓锡侯对此一笑置之：潘文华有多少部队？说穿了就一个教导旅而已，听说他把自己的家眷都送到上海去了——“本帅率兵十团，亲出一阵，你看如何！”

红军扫清了江油城外围之后，江油成了一座被红军包围的孤城。这座县城有三座城门，在红军到达之前关上了两座，只留下北门与城外联络。但是，当防守外围的任建勋团被红军击溃之后，江油城的北门也关上了。此刻，川军杨晒轩旅的旅部、一个手枪连和九个步兵连全部被困在了城里。邓锡侯打电话问杨晒轩能坚持多久，杨晒轩回答说最多十天。

四月十六日，邓锡侯率川军第二十八军第二师的龚渭清旅和第五师陶凯旅自绵阳出发，到达青莲镇，会合了孙礼和卢济清的两个旅后，继续向江油前进。在前进到中坝的时候，发现中坝城里并没有红军。当晚，邓锡侯进驻中坝，部署了第二天向江油的塔子山、鲁家梁子进攻的计划：孙礼和卢济清两旅为右翼，进攻塔子山；龚渭清和陶凯两旅为左翼，进攻鲁家梁子；李勋伯的警卫团为预备队。

红四方面军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以第九军二十七师继续围困江油县城，而将第四军十、十一师，第九军二十五师，第三十军八十八师主力部署在邓锡侯部的必经之路上。四月十七日拂晓，川军开始了进攻，进攻似乎发展顺利，红军节节抵抗，但抵抗一阵就稍退一段，川军虽然每推进一步都要付出代价，但终究是在向前推进。这种缓慢的推进一直持续到下午，川军左翼部队已经攻到了鲁家梁子的半山腰，右翼部队也占领了一个高地，并开始向红军占领的塔子山主阵地发起了攻击。天黑之前一定要拿下战斗，如果能够发起一次猛烈的冲

锋，红军也许瞬间就会垮掉，这次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赶回涪江以北去——邓锡侯觉得胜利在握。

此时，徐向前正在江油城南的一间民房里阅读《史记》，这本缴获来的竖版史书令他一有空就想读一段。徐向前与四川军阀交手多次，他的体会是：论兵力，刘湘兵强马壮；论打仗，邓锡侯精明过人。因此，他给部队的命令是：以小部队边打边撤，把敌人引诱进来；同时以一部向敌人的后面包抄迂回。

接近下午四点的时候，徐向前下达了作战命令。

第四军军长许世友不是个好脾气。迎着川军密集的子弹，他硬要站在阵地的前沿，大个子警卫员无论如何也拉不动他。许世友八岁入少林寺习武，后到吴佩孚的部队当兵，二十岁加入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岁成为共产党党员。一九二七年参加黄麻起义后，在红军中历任排长、连长、团长、师长、军长，在出生入死的战斗中虽七次负伤但勇气未减。没人知道这个从小习武的红军将领到底有多大力气，据说他能把一头大黄牛举起来然后重重地摔死。他那把又宽又厚的纯钢锻造的鬼头刀极重，红军战士往往需要双手抬着才能试试这把大刀的分量，但是许世友单臂抡刀却犹如一阵旋风，无数敌人的脑壳在他刀起刀落的风声中滚落在地。这天下午，许世友虽然接到了反击命令，但他不准部队射击，说谁在五十步以外射击就枪毙谁。川军快到跟前的时候，许世友突然大吼一声，红军官兵们一齐开火，阵地上随即便杀声四起。战斗进行到关键的时刻，许世友果断起用了预备队二十八团。二十八团团长王近山是方面军中有名的打仗能手，这个团坚守在第四军和第三十军的接合部，阵地始终坚如磐石。

二十五师和八十八师的红军官兵从早上六点就开始阻击川军的进攻，已经连续十个小时没有休息了，川军在红军突然发动的反击中被截成了几截。八十八师二六五团团长邹丰明一手拿着驳壳枪、一手握着一柄大刀冲在队伍的最前面。战斗进行到胶着状态时，川军集中了一个整旅的兵力在中路开始了突击。二六八团二营在机枪的掩护下，一个连冒着弹雨在正面阻击，另外两个连开始向敌人的两侧迂回。黄昏时刻，川军各部队开始出现动摇。右翼孙礼旅由于伤亡巨大，率先向中坝方向溃退。孙礼旅的溃退导致卢济清旅三面受攻，卢济清不敢恋战只有赶紧撤退。红军对鲁家梁子的包抄最后形成合围态势，龚渭清旅和陶凯旅的退路已被截断，被围困的川军只有进行最后的搏杀。龚渭清亲自指挥他的驳壳枪营进行反击，但是已经无法阻挡红军凶猛的攻势。龚渭清身负重伤，他的团长赵云霖、张南芳以及营长龚应全也先后负伤，全旅士兵伤亡过半。陶凯旅在投入了预备队后虽然勉强稳住了阵地，但是伤亡也已经超过了五百。各路川军的溃逃令在嘴头岩指挥部督战的邓锡侯心惊胆战。在命令预备队原地阻击红军的追击后，他自己也卷入了溃逃的川军队伍中，直到逃进中坝县城把城门死死地关上。

邓锡侯心乱如麻。仗如果继续打下去，重新整顿溃散的部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如果就此退回绵阳，面子上实在过不去。他想到了负责相邻地域防御的孙震。邓锡侯急忙打电话请求增援，孙震说增援不可能，如果想靠拢的话可以派部队去接应。邓锡侯的心情一下子恶劣到了极点，他想起了作战前曾经要求刘湘的第二师师长王瓒绪协助，但是王瓒绪以没有刘湘的命令为借口拒绝了。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他还曾数次给重庆的中央军参谋团打电报请求飞机增援，参谋团每一次都答应了，但是直到现在也没见中央军飞机的影子。犹豫再三之后，邓锡侯决定部队撤回绵阳，毕竟命和实力比面子重要得多。

江油一战，红四方面军歼灭川军四个团。邓锡侯的部队撤退之后，红四方面军于十八日攻克中坝，十九日攻克彰明，二十一日攻克北川。至此，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战役历时二十四天，歼敌十二个团约一万人，攻克南部、阆中、剑阁、昭化、梓潼、平武、彰明、北川八座县城，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北川、南起梓潼、北至平武的纵横约三百里的广大区域。

川北真是个好地方！粮食充足，物产丰富，占领了川北地区的红四方面军官兵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是丰衣足食。在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和川陕省苏维埃政治保卫局局长余洪远的率领下，机关干部和妇女独立团近万人进驻了中坝，仅在那里筹集到的粮食就有九百多万斤，还有大量的盐巴、腊肉、豆瓣酱和辣椒面。扩充红军的工作也进展顺利，仅江油地区参加红军的贫苦农民就达六千多人，数支游击队也改编成了红军的正规部队，红四方面军不但使在嘉陵江战役中受到损失的各师团都得到了补充，而且还重新组建了一个补充师——第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四团年仅二十一岁的团长被任命为补充师师长，他的名字叫秦基伟。

红军官兵在这片富庶的土地上享受着大米和腊肉，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却是心急如焚。他不断地给位于作战部队后方的张国焘打电报，反复请示这样一个问题：是否把南边的部队收缩回来，集中力量向北进攻甘南？如果这样不妥，下一步该怎么办？

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张国焘没有确切的答复。

徐向前向北发展根据地的计划，很快就因为战机的失去而无法实现。

张国焘作出的是一个后来在中国革命史中引发了剧烈争议的决定：采取大搬家的形式，彻底放弃川陕根据地。

当嘉陵江战役还在进行的时候，由陈昌浩率领的东线部队已经开始向西移动，并且采取的是坛坛罐罐统统带走的方式。至嘉陵江战役结束，红四方面军位于嘉陵江以东所有的机关和部队都已撤到了嘉陵江以西。四月二十一日川北腹地苍溪被川军占领，川陕根据地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

此时，在嘉陵江以西狭长的区域内，集中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全部人马，共五个军十一个师三十六个团。即：第四军辖十、十一师共七个团；第九军辖二十五、二十七师共六个团；第三十军辖八十八、八十九、九十师共九个团；第三十一军辖九十一、九十三师共六个团；第三十三军辖九十八、九十九师共四个团，再加上一个补充师、炮兵团、特务团、两个妇女团，共八万余人。连同地方武装和机关、学校、医院等，总计十万人以上。

作为川陕根据地党的最高决策者，不论张国焘放弃根据地的决定是否正确，至少促使他作出这一重大决定的客观原因是明显的。首先，与江西的中央苏区一样，自一九三三年开始，川陕根据地始终面临着严峻的军事形势和严重的生存危机。四川军阀结束了混战之后，服从了蒋介石的统一指挥，开始对川陕根据地进行全力合围。红军原来背靠大巴山对付的只是川军，而现在国民党军发起的是六路“围剿”，红军不得不“收缩战线”——应该说，这一战略是正确的，因为在有限的空间里死打硬拼是兵家大忌。再者，在敌人的反复“围剿”下，根据地内支持战争需要的各种条件已不具备。从建立川陕根据地到发动西渡嘉陵江战役，在两年多的时期内，根据地处于战争状态的时间长达十六个月，这期间敌人在根据地两进两出，烧杀掳掠，致使根据

地遭到极大的破坏。最后，如果一旦需要以军事行动策应中央红军，就必定会影响红四方面军对根据地的守卫和经营。尽管中央红军不断地改变行动计划，但是红四方面军不顾一切策应其行动的决心是坚定的——如果没有这一行动目标，红四方面军即使要向北发展，也没有强渡嘉陵江的必要，因为从根据地直接进入陕南会顺利得多。

但是，川陕根据地的丧失，带来的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那就是：当这块红色根据地不复存在之后，对于在中国国土上转战的工农红军来说，所有建立起苏维埃政权的大块根据地都已丧失，分散在各个地域的红军武装自一九三五年春夏之际开始，就全部处在没有根基的危险的移动之中了。

一九三五年二月，为了保障追击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侧后的安全，阻止中央红军与贺龙和萧克的部队会合，蒋介石对红二、红六军团尚未巩固的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围剿”。为此，湖南和湖北的国民党军达成了联合作战协议，集结起十一个师加四个旅共计十一万的兵力。“围剿”作战分为进攻和防堵两个部分。其中进攻部队是：

陈耀汉纵队的第五十八师和暂编第四旅由新安、石门向桑植进攻；

郭汝栋纵队的第二十六师和独立第三十四旅由慈利沿澧水北岸向大庸进攻；

李觉纵队的第十九师和四个保安团由龙潭河沿澧水南岸向大庸进攻；

陶广纵队的第十六师、第六十二师和新编第三十四师从南面向大庸和永顺进攻；

徐清泉纵队的第四十八师、新编第三旅和张振汉纵队的第四十一师、独立第三十八旅联合向桑植与永顺之间的塔卧镇推进。

进攻部队的攻击中心是大庸。大庸，今天名为“张家界”。

防堵部队是：

湘军陶广纵队一部加四个保安团驻守沅陵及沅江沿岸，防止红二、红六军团南下进入湖南腹地；

鄂军第三十四师封锁通往长江的主要道路；

湘军李云杰和李韫珩的两个纵队，以及第九十二师和新编第八师，共同部署在湘黔边界上的铜仁、秀山、酉阳地区和乌江沿岸，以防中央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此时，红二军团兵力为六个团约六千五百人，红六军团兵力为五个团约五千二百人，两个军团总计兵力约一万一千七百余人。

国民党军大军压境，兵力超出红二、红六军团十倍以上。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一日，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致电朱德，报告作战部署并请示可能转移的适宜地区。此时，中共中央已经召开了遵义会议，所以中革军委给第二、第六军团的回电颇显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

（甲）关于目前湘鄂的敌人向你们进行的“围剿”，是用了何键的全部兵力及徐清泉、郭汝栋等部。情形是很严重的。但在你们正确与灵活的领导下，是能够打破的。目前，南京政府的统治正进一步崩溃，全国革命斗争是增长不是低落。一些苏区及红军虽然遭到暂时的部分的损失，但主力红军存在，游击战争是发展着，四方

面军正在向川敌进攻，我野战军正在云贵川广大地区活动与你们相呼应。新的胜利正摆在你们与全国红军面前。

（乙）你们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时，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的力量是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的活动。对敌人需要采取疲惫、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

（丙）当目前敌人尚未疾进时，你们可以向陈渠珍进攻，但须集结五至六个团行动，对陈部作战亦不可轻敌。

（丁）你们主要活动地区，是湘西及鄂西，次是川黔一带。当必要时，主力红军可以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甚至渡过乌江。但须在斗争确实不利时，方才采取此种步骤。

（戊）为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应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分会，以贺、任、关、夏、萧、王为委员，贺为主席，讨论战略战术的原则问题及红军行动方针。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就在中央红军开始第四次渡赤水河的那一天，在赤水河以东五百公里处的后坪，红二、红六军团对湘军李觉部打响了一场伏击战。后坪位于大庸至永顺间的咽喉要道上，红二、红六军团计划趁李觉部渡过澧水立足未稳之际，打他个措手不及。红军的伏击圈已经设置完毕，但李觉部却因为天降大雨而停止了渡河。军团领导担心敌人察觉红军的意图，便让部队后撤一段距离，只留下一个团在伏击战场警戒。第二天拂晓，负责警戒的五十三团突然和渡过澧水的李觉部接触了。军团当即命令主力部队迅速向敌人靠近并发起攻击。十七师的攻击受阻后，四师接替了他们继续进攻。六师的一部迂回到敌人的侧后，破坏了澧水上的浮桥。但是，直到黄

昏，敌人的主阵地始终没有攻下来。在新的增援部队到达之后，李觉投入了预备队开始向红军的侧后迂回，红二、红六军团为避免被敌人合围撤出了战斗。后坪一仗，红军毙伤敌军约五百，却付出了伤亡七百的代价。战斗最直接的后果是导致了国民党军兵分五路向根据地中心区域开始了急速推进：陈耀汉部占领了桑植县城，并前出到桑植西北的陈家河镇；郭汝栋部占领了大庸以西的罗塔坪；李觉部一部推进到石堤溪，一部在向永顺推进；陶广部一部推进至永顺西北的农车地区；张振汉部则直接向红军医院、学校、兵工厂和被服厂所在地塔卧镇地区逼近——国民党军各路大军距离根据地中心最近仅剩二十五公里的路程，最远也只有六十公里了。

严重的敌情使红二、红六军团意识到已不可能在狭小的根据地内与强大的敌人进行决战，因此决定暂时放弃以塔卧镇、龙家寨为中心的根据地，突破敌人的封锁，北渡长江，进入神农架大山的南部寻找新的立足点。

三月二十二日，红二军团政委任弼时致电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

目前我们与西方军活动是呼吸相关的，西方军放弃桐梓、遵义，是否将转移于贵州以西地带？万一二、六军团被迫转移，就目前情况只有渡长江到漳［南漳］、兴［兴山］、远［远安］边为便利。因为乌江、酉水、沅江均无渡过条件。施［恩施］、鹤［鹤峰］逼近鄂主力，不能立足。这种预定的方向，是否适宜？对此动作，请给予指示。

四月五日，中共中央复电红二、红六军团：

如果渡江对于你们不成一个困难问题时，我们同意你们渡江的意图；但这只是你们认为在原有地区不利于作战，且红军主力非转移地区不足以保持有生力量时，

才可实行。

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二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第六军团在整编了部队并安置好伤员后，最终放弃了刚刚开辟的根据地，开始了北渡长江的战略转移。

两个军团初步确定的转移方向是：向北进入湖北境内，然后转向东北，于湖北秭归西北方向的香溪镇渡过长江，到神农架大山南麓的南漳、兴山和远安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

部队出发的当天，就在桑植以北的陈家河镇与深入到湖南境内阻击红军的鄂军部队接了火。红军抓了鄂军的一个俘虏，一审问，得知前面只有鄂军的一个旅，于是贺龙不走了，他说："要走，也要打完这一仗再走！"——红二、红六军团太需要一个胜仗了。况且这里的地形非常适合打歼灭战，鄂军又是不善于山区作战的部队。

陈家河镇位于澧水东岸，四周山峦环抱。十三日早上，在鄂军正面的五十一团首先开火了。战斗一再失利，被迫离开根据地，红军官兵的心头已经积压了太多的仇恨，所以一个凶狠的冲锋就把鄂军的先头部队打散了，接着又一口气连续占领了三个山头，把这股鄂军的大部歼灭在了山下的谷地里。与此同时，红二、红六军团主力急速渡过澧水，向鄂军第一七二旅发动了攻击。四师担任突击敌人主阵地的任务，五十一团三营则直插陈家河镇中，捣毁了鄂军的指挥部，然后一路追击，将鄂军旅长李延龄打死在澧水岸边。战斗持续到黄昏，鄂军第五十八师一七二旅全部被歼。这时，鄂军第五十八师师长陈耀汉正率部前来增援，在得知一七二旅已经覆灭后，第五十八师立即掉头回撤，但还是被萧克率领的红六军团追上了。激战后，第五十八师师部外加一个旅，还有这个师的山炮营全部被红军歼灭。此前，第二、第

六军团从来没有缴获过山炮，这次一下子缴获了两门山炮，红军官兵们大为振奋，他们扛着这两门山炮一路转战。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其中的一门山炮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

陈家河战斗结束后，红二、红六军团改变了北渡长江的计划，决定留下来坚持战斗。因为军团领导意识到：一旦红军运动起来，就可以充分调动敌人，就可以产生作战时机，就可以使红军打胜仗。

六月，红二、红六军团突然前出至湖北境内，包围了宣恩县城，并制定了围点打援的作战计划。果然，得知宣恩被围后，鄂军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急忙率部前来增援。红二、红六军团留下一个团继续围城，主力则趁黑夜离开宣恩，连续奔袭六十五公里到达预定战场。红二军团参谋长李达在奔袭的路上给四师下达了作战命令，命令四师加快行军速度，一定要抢在敌人的前面占领有利地形，以便在战斗打响时切断敌人的退路，待主力赶到后将增援的敌人全部包围。六月十四日清晨，红二、红六军团集中了所有的主力，从四面向增援宣恩的鄂军张振汉部发动了猛烈冲击。张振汉的鄂军被压缩在一个山洼里，两千多人挤成一团拼死抵抗。战斗进行得异常残酷，红二军团四师政委方理明、六师十八团团长高利国和政委朱邵田相继负伤。当时，贺龙正在发高烧，任弼时当即任命廖汉生代理四师政委，贺炳炎任十八团团长。

贺炳炎在“肃反”中被撤销了团长职务，目前正在管理科打杂，心里一直觉得十分冤枉。此时他对任弼时说：“我是改组派分子，不能当团长。”任弼时说：“你是共产党员。在共产党处在困难的时候，你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贺炳炎一愣，接着把大腿一拍：“好！我去！打完仗再说！”说完就带领十八团冲了上去。双方殊死的搏杀一直持续到下午，最后鄂军被全歼，师长张振汉被活捉。红军没有杀张振汉，把他

留在了红军队伍中当了战术教员。在以后的日子里，张振汉跟随红二、红六军团一直转战到陕北延安，在那里他被红军释放了。十年后，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长沙的时候，已经深刻地了解了共产党人的张振汉为长沙的解放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新中国的长沙市副市长。

脾气火暴的贺炳炎不久还是犯了个大错误。在接下来的战斗中，红军俘虏了鄂军第八十五师师长谢彬，这个凶狠的国民党军军官，战斗中带领师警卫营死守一个土围子，致使攻击的红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四师师长卢冬生和刚刚伤愈归队的政委方理明负伤，贺炳炎的十八团牺牲了两个营长，全团伤亡一半。战斗结束后，浑身是血的谢彬被红军战士用担架抬到了贺炳炎面前，怒火万丈的贺炳炎二话没说，拔出大刀就把谢彬的脑袋砍了下来。

虽然第二、第六军团暂时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但是根据地一直没能巩固下来，红军活动的区域人口稀少，物资缺乏，部队需要的粮食、兵员甚至冬衣都无法解决。因此，必须转移。但是，北有鄂军死守的长江天堑；南有湘军布防严密的沅江、澧水；西面是不具备任何生存条件的荒凉大山；东面虽人口密集，物产丰富，但却是湘军和鄂军联合防御的地区——那么，哪里才是安全的生存之地呢?

就在第二、第六军团在湖南与湖北交界的荒僻山岭间徘徊不定的时候，已经开始长征的红二十五军正行走在极其险恶的路途上。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五日，在接近陕南边界的时候，红二十五军发现一支国民党军队已经先于他们到达，并控制了从河南进入陕西的道路，这使红二十五军骤然陷入了前有阻截后有追兵的危境。为了迅速地突围出去，手枪团找到了一个愿意做向导的货郎，在这个货郎的带

领下，红军沿着一条在当地的民谣中被称为“七十二道文峪河，二十五里脚不干”的深山峡谷，迅速穿过了卢氏县城与洛河之间的一个隘口。红军通过的时候，卢氏县城的民团紧闭城门，在城墙上挂满了灯笼和火把，眼看着红军急促而过。十二月八日，红二十五军官兵在豫陕边界的铁锁关击溃了守关的陕西民团，但刚一进入陕西境内就遭到了陕军冯钦哉部两个团的阻击，红二十五军二二五团负责正面攻击，其他部队迂回。二二五团三营八连在营长李学先和连长萧邦与的率领下，首先攻上了陕军的阻击阵地。在消灭了这支陕军的先头部队后，红军官兵迅速脱离战场，连夜翻越蟒岭大山，第二天到达了豫陕边界上的商南县境内，在一个叫庾家河的村庄宿营。

十二月十日上午，由红二十五军主要领导组成的中共鄂豫皖省委第十八次常委会召开了。本来没有准备在这里开会，因为“敌人总是跟在屁股后面追”，危急的军情不允许红军指挥员们坐下来开会，但是部队非常疲劳需要休息，指挥员们聚集在一起说着说着就等于在开会了。

军长程子华随即派手枪团出去警戒。

会议没开一会儿，外面枪声骤响。

手枪团的战士跑进来喊：“敌人上来了！”——国民党军第六十师已经追了上来。

设立在庾家河东山坳口的红军哨兵睡着了，直到敌人到了跟前他才猛然惊醒。

国民党军占据了有利地形，对红二十五军形成了包围。

会议即刻中断。

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都向山上奔去。

徐海东率领二二三团向敌人占领的东山坳口发动了猛烈进攻，夺回了这个制高点。二二四和二二五团也相继建立起阻击阵地。

敌人的全面进攻也开始了。

这是一场遭遇突袭时的仓促应战，红二十五军再次面临生死考验。

国民党军第六十师，师长陈沛，归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指挥。这一次，由蒋介石亲自下令，第六十师十一月二十二日从开封登上火车，二十四日全师到达河南灵宝车站，然后直接向转移中的红二十五军靠拢，于十二月一日到达了商南地域。根据派出的侦察队和当地县长们的报告，第六十师一直跟在红二十五军的身后寻找作战时机。第六十师的先头部队是三五五团，这个团在追击了两天之后，在距离红二十五军仅有十里路程的时候不敢追了，原因是他们发现这里的群众大多同情红军，特别是以前红四方面军曾在这里活动过，当地的不少青年是当年红军的宣传员，他们总是给红军通报各种各样的消息。于是，陈沛把先头部队换成了三六〇团。八日，当红二十五军把陕军第四十二师击溃之后，黄埔一期出身的师长陈沛对陕军的无能表示出极大的蔑视："昨［八］日晚如友军堵截确实，稍能支持，今午职师赶到，即收夹攻之效，匪难逃脱。不料反壮匪之气，资匪以械，诚属可悲！但影响追击莫此为甚！"第六十师确定了在庾家河伏击红二十五军的计划，作战计划中有这样的描述："据土民报称，匪沿途怨声载道，脚多肿烂，且均无棉衣，形态精神，均异常疲惫云云。基以上情形分

析，匪疲惫必倍于我，毫无疑义，尽一日猛追之力，必可追及残匪而歼灭之。”九日晚，第六十师先头部队三六〇团接到的命令是：今晚必须到达庾家河——这个命令几乎与红二十五军下达的命令一样——两军在庾家河的一场恶战已不可避免。

只是，红二十五军对此时的敌情并不十分清楚。

由于仓促应战和地形不利，红二十五军在与国民党军第六十师的先头部队三六〇团的激战中出现了很大伤亡。当战斗进入近乎僵持的时刻，第六十师将另外两个团投入了战斗，猝然使红军所面临的战场形势更加恶化。

天降大雪，山风呼啸。

红军和国民党军在一条山沟里开始了短兵相接。军长程子华在观察战局时，举着望远镜的手被敌人的子弹打穿。军部司号员程玉林一直跟随在副军长徐海东的身边，从战斗一开始他的军号声就没停止过，在把嘴唇吹出了血的时候，一颗手榴弹在程玉林身边爆炸，程玉林的下巴被炸飞，整个脑袋成了个血球。小司号员从腰间抓出两颗手榴弹，凭着声音向敌人的方向爬去，直到把手榴弹扔出去才停止了呼吸。副军长徐海东怒目圆睁，他跃出掩体率领官兵出击，但是没冲几步便一头扑倒在地。一颗子弹从他的左眼下面射进去，再从颈后穿出。这是徐海东自参加红军以来第九次负伤了，每一次他都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说：“只要革命还没有胜利，敌人就打不死我。”

军政委吴焕先冲上来接替徐海东。在吴焕先的指挥下，红军官兵抱着决死的念头不断地冲击敌人的阵地——在迷茫的风雪中，红二十

五军发起的冲击达到二十次之多。黄昏时刻，雪更大了，国民党军终于无法支撑，留下了三百具尸体退了下去。

战斗结束了，风雪中的陕南天寒地冻。红二十五军一位叫周东屏的女战士一直守护在昏迷的徐海东身边。没有药品，只能用盐水不断地擦洗伤口。女战士整整守了四个昼夜，第五天天亮的时候，在一缕温暖的晨光的照耀下，徐海东缓慢地睁开了眼睛，一直沉默不语的周东屏抱着她的副军长号啕大哭。

徐海东对这位个子矮矮的、脸圆圆的女战士并不熟悉，仅仅知道她很会唱歌。

徐海东说:“敌人退了吗? 部队该转移了吧? ”

周东屏还是哭，哭得说不出话来。

这之后，周东屏跟随在身体虚弱的徐海东身边，细心地为徐海东护理伤口，尽可能地找到些食物看着徐海东吃下去。渐渐地，女红军周东屏终于使打起仗来凶猛无比的“徐老虎”心中滋生了一种温情。一年多以后，徐海东和周东屏结婚了。当红军到了延安，生活安定了以后，有人和徐海东开玩笑说:“这里来了不少漂亮的女大学生，你是否也要‘改组’一下？ ”徐海东脸色一沉说：“东屏是受苦人，我是泥巴人，我们两个是生死的交情！”

虽然红二十五军在庾家河的会议只开了一半，但还是作出了一个《关于创建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寻找到一块立足之地以休养生息、发展壮大，然后拥有一个人人平等的苏维埃共和国，这是二十世纪初在中国大地上出生入死的那些红色青年永远的梦想。红二十五军决定把建立根据地的梦想实现在河南、陕西与湖北交

界处的群山之中。这里重峦叠嶂，地势险要，人民生活困苦，敌人统治薄弱，是中国中西部著名的秦岭山脉的延续地段。

庾家河战斗的第二天，红二十五军把三个团缩编成两个团，又一次上路了。

如果在地图上标出红二十五军一九三五年在陕西南部的移动路线，将比中央红军在贵州的转战路线更为曲折复杂。他们在陕南那片狭窄的区域内，毫无规律地来回穿梭移动，令回首那一段历史的人足以想见他们所面对的险象环生的环境。这是一支仅仅只有两千多人、平均年龄不超过二十岁的红军部队，他们不像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样有浩浩荡荡的队伍，他们行军的时候也没有漫天飞舞的红旗，他们甚至没有像样的军装，头顶上的红星也因为生存的困苦而不那么耀眼夺目了。他们从不奢望能够有一个安稳睡觉的夜晚和一餐足以果腹的食物。但是，这一群衣衫破烂、面容憔悴的红军少年对理想和信念的执著坚守却是无与伦比的，这种坚守给予了他们超出常人想象的坚强与勇敢，从而使他们历经一切艰难困苦依然能够迎着敌人的子弹发起冲击。这就是我们在追忆红二十五军的往事的时候为什么怦然心动的原因。

红二十五军开始向河南、陕西与湖北交界处的群山之中移动，一路大张旗鼓地镇压盘剥农民的土豪和地主，没收他们的财产分给当地的百姓。一九三五年一月，就在中央红军第一次占领遵义的时候，红二十五军攻占了秦岭山脉以南的镇安县城。在镇安，红军缴获了大批的棉布和棉花，初步解决了部队的过冬御寒问题。红二十五军占领镇安县城的消息令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大为吃惊，因为他一直认为这股红军经过反复的“围剿”人数不过四五百，已经没有什么可顾虑的了，可是四五百人是绝对打不下镇安县城的，杨虎城这才明白自己的

判断严重失误。于是，他立即命令已经调往陕北的冯钦哉的第四十二师回防陕南，并且致电蒋介石要求河南、湖北的国民党军急速支援陕西。

国民党军第四十军一一五旅两个团，第四十四师一三〇旅三个团，以及第四十二师一二六旅等部队即刻从四面合围而来。这时候，红二十五军突然出现在西安南部的柞水县，大有攻占柞水县城的态势。陕军一二六旅只好急促向柞水增援，红二十五军趁其先头部队二五二团单独冒进之机，发动猛烈的突然袭击，歼灭了该团的一个营。然后，红军掉头就走，连夜翻越了九华山，又出现在离西安更近的蓝田县境内，并占领了距秦岭边缘仅十公里的交通要冲葛牌镇。天降大雪，红军在风雪的掩护下开辟了伏击阵地。陕军一二六旅的二四八团和二五一团刚一接近，红军正面与左翼的冲击枪声同时响了。二四八团副团长王泽民在战后给旅长柳彦彪的报告中说：

……时因天晚昏黑，匪攻甚猛，左翼尚未取得联络，匪忽由岭口突进，分三路向我猛扑，我阵地第四连尽被包围。职遂率连长张瑞符、连副白树德、士兵约一排、团部号长傅珍、随从勤务兵、传令兵等戮力冲杀突围而出，则仅余士兵十余名。第四连连长张瑞符、连副白树德阵亡，号长傅珍、勤务兵秦海林等被俘。职率冲出士兵仍移右翼山岭负险固守，迄晚十时。是役伤亡官兵及失踪一百余名。

受到胜利鼓舞的红二十五军乘势扩大红军。同时，他们释放了几名为国民党军队当密探的当地百姓，因为经过审问得知这几个人都是穷人。红二十五军为此还专门发布了《穷人不替国民党当侦探，捕杀坚决替国民党当侦探的重犯》的布告：

本军很诚恳地告知白色士兵、下级军官以及地方穷苦兄弟，你们都是受国民党豪绅地主压迫剥削的，红军是你们自己的军队，要为红军做事，不要替国民党当侦

探。如果是国民党压迫你们当侦探，你们见了红军就把实情告知红军，那也是为红军做事，红军应该重赏。自此布告之后，再发现忠实为国民党军队、区长、团总当侦探的，红军还是按照阶级纪律严办，倘若是地主、富农分子替国民党当侦探，定处死刑，决不姑宽。

红二十五军还释放了陕军俘虏。为此，国民党政府蓝田县县长郝兆先在给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的信中，不但描述了红军释放俘虏的事，还建议国民党军队在与红军作战时小心为妙：

主席钧鉴：

谨禀者，此次柳［柳彦彪］旅奋勇剿赤，死伤实有三百以上，而被俘亦如此数。连日回来徒手兵已达两百名，匪给每名洋二元，烟土二两，并在葛牌镇开欢迎十七路官兵大会，演新剧，宴会聚餐。对郑效仁之团丁且发三元，并给皮袍。其宣传工作无微不至……至匪之实力，有匣枪、自动步枪手提式者确为两三千以上，而翻山越岭、耐寒忍饥为其特长。今度匪之损失不及我方十分之一，而其所得枪弹增加实力不少，职与冯军长、张参谋长计议，注重切取联络，围困堵剿，过于猛攻，大部队深入山坳不能展开，徒损失耳。想钧座必与杨主任熟议及之矣。谨禀，恭叩崇安。

职郝兆先谨上

二月十三日夜一时

在得知红四方面军发动了陕南战役后，红二十五军立即向西靠拢，连续攻克了宁陕、佛坪两座县城。接着，又挥师向东，再一次回到葛牌镇，还是采用伏击的办法打垮了陕军警备第三旅的两个团，俘虏了旅长张汉民和一千多名陕军官兵。参加过这次战斗的陕军士兵后来回忆说：我们“全部进入陷阱而不自知，突然遭到袭击，大山小丘伏

兵齐起，弹如骤雨，声震山谷，官兵慌恐，措手不及；加之骡马相惊，到处奔跑，把自己的队伍乱冲乱踏，于是阵势大乱，无法指挥，全部队伍陷于层层包围之中，左冲右突，不能得脱，只在两三个钟点内全军覆没。张汉民旅长被俘。张旅长危急的时候，手里提着个斧头，在空中抡绕，像是表示投降的样子”。——陕军旅长张汉民是中共地下党员，被共产党秘密派往陕军中工作。长期与中央失去联系的红二十五军无法知道这一点，即使他们在战斗中发现这个旅长的行为有些异样，即使张汉民在被俘后极力说明自己的经历，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使处于危机之中的红二十五军的领导相信——被红二十五军错杀的张汉民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不久，红二十五军回到了曾经令他们遭受损失的庾家河地区，一举攻占了陕西、湖北、河南三省交界处的重要关口荆紫关。然后部队立即掉头往回走，到达了陕南山阳县袁家沟口一带。红二十五军长距离地来回移动，把追击的国民党军拖得十分疲惫，同时也使敌人无法判断这支红军部队到底在哪里。在袁家沟口，红二十五军预先设置好了伏击阵地，当陕军警备第一旅到达的时候，红军于前后两面发动袭击，完全没有防备的陕军警备第一旅除了被打死打伤近三百人外，包括旅长唐嗣桐在内的一千三百名官兵被俘。

再次打了胜仗的红二十五军接着作出的举动令敌人大为惊慌，因为红二十五军直接向西安开来，其前锋部队距离西安城仅仅还有十余里。西安城内的巨富商贾纷纷开始出逃，国民党军各路部队急忙调动准备保卫西安——而红二十五军此举只是因为听说终南山外很富裕，想乘胜出击缴获一些作战必需品。

在一个叫引驾回的集镇，红军官兵抓了专门管税收的厘金局局长宋柏鲁的儿子、当地人称四少爷的宋运生，大地主姬福堂和张学谦等五六个人。红军官兵把这些人和那个陕军旅长唐嗣桐一起游街示众。这一天正是引驾回赶集的日子，集镇上的百姓蜂拥观看，红军开了公审大会，宣布了处决唐嗣桐的决定——唐嗣桐率领部队出发的时候，就是在引驾回召开的誓师大会，会上他曾宣布说："三个月内消灭徐海东残匪。"这时，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在偶然获得的一份《大公报》上看到了中央红军到达川西的消息，虽然消息无法确定，但还是令红二十五军的官兵兴奋不已。于是他们决定往西走，向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所在的那个方向靠近。

红二十五军在恶劣的环境中，与二十倍于己的追击之敌反复周旋，不但没有被敌人消灭，而且还在不断地壮大。他们在陕南山区的移动作战，不仅消耗了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更重要的是，随着他们的辗转穿越，红军向中国社会最底层的贫苦民众宣传了革命，让人们知道在这个不公平的世界上有一支叫"工农红军"的红色武装在抗争，抗争的红军最终是扑不灭杀不绝的，红军的存在是为了创建一个新的共和国。

当红二十五军试图向红四方面军靠拢时，红四方面军却撤离了川陕根据地。为了防止红军在嘉陵江和涪江之间的区域建立新的根据地，蒋介石重新部署兵力对集结在江油、中坝地区的红四方面军发动了围攻。蒋介石的作战计划是:

刘湘的主力王瓒绪部十三个旅为右纵队，由罗江地区沿涪江东岸向彰明、两河口方向进攻;

川军邓锡侯和孙震两军各一部为左纵队，由绵阳出发，沿着涪江西岸向江油、中坝方向进攻；

中央军胡宗南部则由北面的碧口、文县南下，配合川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同时，邓锡侯的另一部从广元南下剑阁；唐式遵的一部防御昭化至阆中的嘉陵江一线，以防红四方面军返回川陕根据地；李家钰部在阆中以西布防，防止红军南下四川腹地。

至此，从川陕根据地撤离的红四方面军主力连同庞大的后方机关被围困在了江油和中坝附近的狭窄区域内。

东去、南下、北上的方向都已有敌人重兵防守。那么，对于红四方面军来讲，只有向西这一条路了。

在江油，张国焘主持了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对于放弃根据地的原因，张国焘解释说，是为了迎接中央红军北上，在与中央红军会合后，一起开辟川西北新苏区。他建议红四方面军西出，占领北川、茂县、理县和松潘，背靠西康地区作为立足点。对于张国焘的建议，与会者没有提出异议；或者说，严峻的形势已使红四方面军没有第二种可以选择的余地了。

从江油向西，走不了多远，就会一头进入川西常年积雪的高山峻岭之中。而在雪山冰峰的那一边，是中国西部荒凉的沼泽地带。

红四方面军上路了。

关于中央红军，他们只知道那支受伤严重的队伍快要到达金沙江边了。

# 第十二章 金沙水畔

1935年5月·金沙江



红三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罗明没能跟随中央红军走出贵州。

部队接近云南边境的时候，他接到这样一个通知：留下来坚持地方工作。

那时，中央红军正以急促的行军速度接近纵贯黔西的北盘江。接到这个通知后，罗明意识到，他不能跟随中央和红军到达长征的目的地了。

任何人都知道离开红军大部队意味着什么。

妻子谢小梅急切地问他：“为什么不让我们跟随队伍？为什么不让我们北上抗日？”

罗明简单地回答：“这是组织的需要。”

罗明，广东大埔人，原名罗善培。一九二五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六年任中共汕头地委书记。一九二八年任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书记，领导了闽西农民暴动。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五岁的罗明出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

在一九三三年博古到达中央苏区之前，罗明的名声与职务并不显赫。而他之所以迅速成为人人皆知的人物，是因为他的一个报告，或者说是因为这个报告中的一种表述。这种表述与毛泽东密切相关，并随即导致了中央苏区内部的一场政治风波。

那时，毛泽东正处在政治生涯的低落时期，宁都会议后他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心情和身体都欠佳的他在老朋友傅连暲的邀请下，来到福建长汀医院休养。在长汀医院后山散步的时候，毛泽东碰见了也在散步的罗明，罗明正在这里养腰伤。高大的毛泽东消瘦得让罗明很是惊讶，他们走到了一起。在常常一起散步的十几天里，罗明从毛泽东那里得到了什么教诲无从考证，但是随后发生的事情足以说明，至少在如何抵制“左”倾路线的影响，如何避免死打硬拼的军事指挥原则，如何争取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等问题上，毛泽东说服了走在他身边的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干部。

罗明结束休养后召开了福建省委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并决定立即去福建的上杭、永定和龙岩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以配

合中央红军的反“围剿”作战。几个月后，经过了游击战实践的罗明写出了《关于杭、永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报告针对博古和李德现行的战略战术提出了不同意见：“积极行动，向外游击，打击敌人的进攻”；灵活机动，“用最大的力量迅速的方法与最短的时间”，攻击敌人的薄弱之处；把猛烈地扩大红军的运动与发展地方武装结合起来，以巩固根据地的边缘地带……报告的行文显示出这位二十九岁的共产党省委书记锋芒毕露的性格：

> 如果只注意局部某一地方的转变，不注意很好地配合起来，发展武装斗争，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英、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者请列宁同志复活，一齐到下溪南或者其他已受摧残的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讲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斗争的情绪！

可以想见博古读到这样的文字会多么愤怒。罗明不但反对他的军事指挥原则，还把毛泽东列入了“最好的领袖”，博古当即质问罗明：党的文件和党的提法什么时候把毛泽东说成是“最好的领袖”了？毛泽东怎么能和斯大林、列宁相提并论呢？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五日，苏区中央局作出了《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决定表明福建省委之所以不执行积极的进攻路线，显然是因为“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而“这一路线对于目前革命形势的估计是悲观失望的，对于敌人的大举进攻表示了张皇失措”。博古发动的“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声势浩大。先是罗明被撤职，毛泽东也因此更加孤立。福建省军区司令员谭震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省委常委郭滴人、组织部部长刘晓、团委书记陈荣等都受到批判甚至是撤职。接着，运动扩大到江西的苏区，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都被撤了职，而他

们毫无例外都是毛泽东的支持者。运动还波及中央红军，罗荣桓、萧劲光、滕代远、李井泉等人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评。

如果不是苏区的军事形势不断恶化，这个运动很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博古后来在党的七大上对此作出了这样的自我批评：

苏区中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这时的情形可以说“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右倾遍于国中……”更沉痛的是由于路线的“左”倾错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再加一个错误的“肃反”政策，而使得许多同志，在这个时期中，在这个“肃反”下面被冤枉了，诬害了，牺牲了。这是无可补救的损失。

对于罗明来讲，他从没想到自己会卷入如此巨大的政治旋涡。他本来的出发点十分简单，那就是在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面前，红军必须纠正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军事指挥原则，尽一切可能保住中央苏区。而对于毛泽东，罗明并没有“吹捧”的初衷，因为当时毛泽东已经失去了领导地位。罗明经历过创立中国红军的艰苦岁月，他接受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发自内心的。

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前夕，罗明正在瑞金中央党校担任教务长的工作。因为中央要求他挑选一百名优秀学员送到主力部队去，他才预感到中央红军可能要有重大的行动了。后来，他和妻子一起接到了跟随中央红军出发的通知。妻子谢小梅刚生完孩子十几天，他们把孩子匆忙送给了当地的一位老乡，然后踏上了长征的征途。

罗明最后被批准跟随转移的原因不明。

罗明被派到后勤司令部政治部当宣传联络员，负责收容掉队的伤员和病号。遵义会议后，他出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他的秘书是红三军团十三团俱乐部主任兼团总支书记胡耀邦。

罗明刚被重新起用就负了重伤。那是在红军再次攻打遵义的时候，他和胡耀邦一起在战场上救护伤员，一颗炮弹在他们的身边爆炸，胡耀邦的伤势不重，而罗明右臂的大动脉被弹片击中，他在那一刻血流如注。

负伤后的罗明被送到休养连，他和妻子谢小梅相聚了。

妻子精心地照料着他，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

当中央红军经过艰苦的奔袭转战，即将从贵州进入云南的时候，罗明对中央让他留下来在贵州“坚持地方工作”颇感意外。

北盘江边，罗明和谢小梅与红军战友们一一告别。

中央红军远去了。

罗明和谢小梅开始往回走。

无法知道这个决定是如何作出的。虽然身负重伤的罗明继续跟随部队转战比较困难，但当时因负伤而被担架抬着的红军团以上干部不止罗明一人。

组织上给他们留了一笔钱和一枚可以充当货币使用的金戒指。钱放在了组织指定与他们同行并领导他们的朱祺手上，红军军事转移前朱祺是中央苏区总工会的委员长。而那枚金戒指藏在了谢小梅的身上。

他们乔装打扮成到贵州做生意的广西人。但是，仅仅两天之后，他们就被黔军犹国才部的士兵抓了起来。那时他们刚走到距离黄果树瀑布不远的关岭县城城门口，罗明浓重的闽粤口音与他装扮的广西商人的身份严重不符。

第一个受审的是朱祺，当晚他就被释放了。关于释放的原因，有史料说他用组织留下的那些经费贿赂了黔军，也有史料说朱祺供出了罗明的真实身份。在接下来的审问中，罗明和谢小梅一口咬定自己是做生意的商人，无论黔军怎样威逼就是不改口。最后，在审问者把谢小梅身上的那枚金戒指据为己有后，罗明和谢小梅被释放了。

从此，罗明和谢小梅不仅与组织失去了联系，而且成了生活毫无着落的流浪者。他们一直流浪到贵阳，希望能在贵阳找到党组织，但当时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贵阳城里戒备森严，找到党组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为了活下去，谢小梅在一个保长家当了女佣，没有工钱只管饭；而罗明在贵阳当了一名清洁工，他终于有了一件像样的衣服，虽然背上写有“清道夫”三个字。可是，没过多久，枪伤还没有痊愈的罗明开始吐血，他很快就被解雇了。他们感到在贵阳寻找党组织无望，便决定离开贵阳另寻他路。谁知在出城时，罗明再次被黔军扣留，在被吊打了一夜之后，经谢小梅为其做女佣的那个保长的具保，罗明才被释放，但是他的身体情况更加恶化了。这时候，贵阳城里开始流传追查一对共产党夫妇的消息。他们决定去上海寻找党组织。两个年轻的共产党人自此开始了他们孤独而艰难的“长征”：从贵阳至广西，经广州至香港，从香港辗转到达上海，漫长的流浪之路让他们尝尽人间辛酸。罗明刚一到达上海，立刻就被出卖了。出卖他们的是罗明的堂弟，这个鸦片吸食者为了得到赏钱，向警察局告了密，罗明和谢小梅立即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逮捕。无论审问者使用什么手段，罗明

和谢小梅一口咬定自己是流浪者，急得罗明的那个堂弟在一旁不断地对审问者说："他就是'罗明路线'的那个罗明！"

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罗明在同乡的多方周旋下，最终得以保释出狱就医。

一九三六年春，谢小梅陪同丈夫回到了罗明的故乡广东大埔。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罗明和谢小梅秘密前往闽西抗日根据地寻找党组织，但是由于他们离开组织的时间太长了，党组织只能建议他们用党外爱国人士的身份回乡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他们又一次往回走，回到大埔后，分别以罗亦平和谢章萍的名字一边在学校当教员，一边宣传抗日主张。

罗明和谢小梅，两个历尽苦难的共产党人，虽然没能走在革命队伍中，但是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始终没有停止找寻革命队伍的脚步。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八日，罗明在广州逝世。谢小梅曾经担任过小学教员、图书管理员、百货公司采购员，一九七三年退休时工资仅四十五元五角。让她感动得泪流满面的是，一九八一年，广州市委恢复了她的中国共产党党籍，那时距离她和罗明在北盘江边目送中央红军远去，已经过去了整整四十六年。

渡过了北盘江的中央红军一路向西。

左翼红一军团由贵州猪场进入云南，右翼红三军团由贵州盘县进入云南，中央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担任后卫。至一九三五年四月下旬，中央红军已全部由黔西进入了云南。

云南真是个好地方！

春日的阳光照射在高高的梧桐树上，洒下一片又一片斑驳的影子。远方山坡上的梯田层层叠叠，菜花金黄。此时，滇军主力仍在贵州，留守云南的刘正富旅也接到了命令，准备立即去贵州的兴仁防堵。云南境内龙云能够派出的部队，只有李嵩的独立团了。因此，中央红军所面临的严重军情暂时得到了缓解。云南境内教堂很多，红军尚未到达的时候，外国传教士就跑了，红军在教堂里发现了火腿、罐头、奶粉和果酱，这些西式食品令官兵们惊奇不已。

四月二十四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一师二团在滇东边界的富源县境内与李嵩独立团遭遇。二团抢先夺取了滇军侧翼的一个高地，然后采取两侧迂回的方式将滇军包围。滇军不顾一切地突围后，向沾益、曲靖方向退去。二十五日，中革军委在富源发出了《关于消灭沾益、曲靖、白水之敌的指示》：“最近时期，将是我野战军同敌人决战争取胜利的转变战局的紧急关头，首先要在沾益、曲靖、白水地区消灭滇军安旅，以我们全部的精力和体力去消灭万恶的敌人，一切牺牲都是为了目前决战的胜利。”

滇军安旅，即滇军第三纵队第二旅，纵队司令孙渡，旅长安恩溥。这个旅可谓是中央红军的死对头，因为在贵州的时候，这个旅就一直跟在中央红军的后面或者侧翼，始终威胁着中央红军。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滇军第二旅的官兵脚都跑肿了。旅长安恩溥后来回忆说：“我们毫无按照实际情况处理军务的一点自由，很多时间在毕节、瓢儿井、大定这一带旋磨打圈。有时候早晨得令兼程往东，夜间复奉命兼程往西，司令部仅往返瓢儿井就有三次之多。接到向打鼓新场前进的命令，刚出发一小时，又接到命令到大定集结。这一阶段连红军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滇军旅长安恩溥来回奔波没能追击到红军的部队，却在黔西遇到了一路溃逃的王家烈的部队。安恩溥去拜访王家烈，王家烈一个劲儿地夸奖滇军能打仗——滇军的一个团曾经把黔军的三个团打得满山跑——王家烈继而对安恩溥说：只要红军还在，“黔军和滇军就是一家人”。“不要听蒋介石的指挥，咱们自己干自己的事”。但是，在那些日子里，连龙云和孙渡都无法指挥安恩溥旅，因为蒋介石甚至把电报打给了深入贵州境内的这支滇军的团长们。中央红军逼近贵阳机场的时候，安恩溥旅被蒋介石紧急调往贵阳。这让龙云十分不满，他立即命令安恩溥旅返回云南。因为，中央红军已经接近云南边界了。

中央军和滇军一起从贵阳出发向云南推进。安恩溥旅一直跟在薛岳的中央军的后面，而薛岳的部队则一直跟在中央红军的后面。

四月二十四日，中央红军越过了滇黔边界，国民党军的追击部队紧跟着逼近了边界上的黄泥河镇。刚刚能看见镇子上空飘着的炊烟，安恩溥就听见前边传来了枪声。可是，薛岳的第九十师并没有发生战斗，官兵们统统坐在了公路边上。师长欧震走过来对安恩溥说：“进入云南的地盘了，你们熟悉情况，你们走在前面吧，我们支援你们。”确实进入自己的地盘了，安恩溥无话可说，于是命令第三团团长郭建臣率部向黄泥河镇发动攻击。第三团在攻击中发现，前面的红军似乎并不想真正作战，而是一边打一边退，第三团摸不清红军的真实意图，虽不能退但也不敢贸然推进。此时，只有蒋介石派来的飞机在这个小镇的上空不断盘旋。卫兵给安恩溥送来了一张字条，说是飞机上投下来的。字条上写着：“右前方小羊场有一千多红军干部正在集合讲话，盼速派部队围剿歼灭。”签字：航空队队长张有谷。安恩溥立即派四团团长万保邦率部攻击小羊场。但是滇军冲到了那个地方，却并没有发现红军大部队的影子，依旧只有零散的红军阻击部队。

阻击滇军的，是中央红军的后卫部队第五军团。

早晨的时候，万保邦团被告知，在一个叫沙寨的村庄里发现了红军的踪迹。万保邦当即命令部队进攻。滇军刚冲到村口，就发现大树下坐着一些负伤的红军，双方的枪几乎同时响了。在这个村庄里，红军与滇军的战斗是一场不明情况的战斗。云南特有的浓雾使滇军无法准确地辨认出红军的方位，因此发生的都是近距离的搏斗。混战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红军撤退了。晨雾散去后，安恩溥进了村，看见地上有很多大桶，里面是温热的米饭和刚煮熟的豆子稀饭，周围还有一些散落的碗筷。那几个坐在大树下的红军伤员，因重伤无法走动，依旧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看着饿急了眼的滇军士兵围在红军留下的那些大桶周围抢饭吃。

中央红军一进入云南，部队出现伤亡的原因，不是滇军的追击，而是飞机的轰炸。

轰炸突然来临，红军休养连根本没有躲避的时间。一阵猛烈的爆炸声响过之后，硝烟中是一片悲惨的景象：到处是被炸死的马匹和散落的担架。董必武、徐特立和谢觉哉三位老人被土埋了半个身子，躺在担架上的重伤员张宗礼被气浪推出去很远，负责抬钟赤兵的担架员和警卫员都负伤了，而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军衣已经被鲜血浸透。

奄奄一息的伤员对休养连指导员李坚贞说：“不要管我们了，快去追队伍吧。如果我们能活下来，就去找部队；如果活不下来，就当是牺牲了。”一个负伤的理发员要求李坚贞把他打死：“给我补上一枪吧，我死也不当俘虏！”李坚贞哭了，她说：“你们都是为革命负伤的，我们怎么能丢下你们不管呢？”

红军卫生员不得不就地抢救贺子珍，她身上一共嵌进了大小不一的十七块弹片，其中的一块弹片从她的后背一直划到右臂，形成了一条又长又深的血口子。紧急手术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开始了，这位坚强的女红军在难以想象的剧痛中没有呻吟一声。

为了不拖累部队，贺子珍要求把自己留下，她觉得自己这一回活不了了。她把警卫员叫到面前说："我不能和你们一起走了。等革命胜利了，如果我还活着，我们会见面的。如果我不在了，有一件事托给你。有消息说毛泽覃已被杀害，我的毛毛不知道在哪里，你要想办法把这个孩子找到。找到了，就告诉他，他妈妈是为革命牺牲的。"

这里是少数民族地区，敌人又追击得很紧，一旦暴露身份必定十分危险。休养连把贺子珍的伤势和要求报告给了毛泽东。当天晚上，毛泽东带着傅连暲医生和三个警卫员赶到了贺子珍的身边。毛泽东对依然要求留下来的贺子珍说："我和同志们绝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在千般苦痛万般磨难面前始终不曾掉泪的贺子珍，在突然降临的难得的温存中双眼含满泪花。

安恩溥不知道，中央红军的主力正在前面等着他呢。

红军决心把这支滇军彻底消灭掉。

四月二十六日，中央红军主力集结于沾益、白水和曲靖一线。下午，红三军团一部包围了沾益县城。晚上，红一军团先头部队包围了曲靖县城，把滇军的一支别动队、一个机炮连、李嵩独立团的残余官兵以及城防民团共两千多人全都困在了县城里。中央红军的主力则部署在通向县城的交通要道上，一场伏击战已经准备好了。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安恩溥按照蒋介石的命令继续追击红军的话，覆灭就会近在

眼前。但是，在昆明的龙云似乎更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个结局，他突然给所有追击中央红军的滇军部队，包括距离中央红军最近的安恩溥旅发去了电报，命令他们立即脱离红军，掉头向南，火速返回昆明。至于蒋介石命令滇军追击中央红军的任务，龙云仅留下一小部分滇军走在薛岳的前面做做样子——龙云的这个决定使他的安恩溥旅侥幸躲过了一劫。

滇军的调离使中央红军突然发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国民党军追击部队的前锋没有了，其他国民党军距离中央红军还有好几天的路程，而龙云的调动使滇北金沙江沿岸一带出现了兵力空白，中央红军自南向北迅速穿越云南东部抵达金沙江边的条件已经成熟。

虽然没有等来安恩溥旅，但是为了中央纵队顺利通过沾益和曲靖，红三军团一部向被围困的沾益县城发动了攻击；同时，红一军团二师一部和红五军团三十七团也作出了攻击曲靖的态势。二十七日，中央纵队安全通过了沾益与曲靖之间的公路。

中央纵队刚一通过，周恩来就发现从公路上远远地开来三辆卡车，车上还插着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周恩来亲自指挥警卫部队伏击了这三辆卡车。押车的是国民党中央军的一个副官。周恩来对这个还没反应过来的副官进行了简单的问讯，这才知道卡车上装的是龙云送给国民党中央军的礼物。上车一清点，让周恩来十分惊喜：除了十箱名贵的云南白药、大量的普洱名茶和宣威火腿之外，还有十张精确到十万分之一的云南省作战地图——对于中央红军来讲，缴获地图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原来，这个副官是薛岳派去昆明面见龙云的，因为他的中央军需要云南的作战地图。龙云本来准备用飞机送去，但是飞行员生病了，于是临时改用汽车。也许是因为这些地图太珍贵了，红军对这位国民党军副官给予了宽大处理。多年后，这位副官对自己

的这次遭遇依旧心有余悸：“在昆明没有得到红军已经沿着黔滇公路西进的消息，听到向汽车射击的枪声后，才知道进入了伏击圈里。幸运的是，汽车驾驶室前的玻璃虽被子弹击碎，但鄙人没有中弹负伤，而且蒙官兵积德，免除一死，盖红军宽大恩情也。”

四月二十七日，中央纵队到达寻甸，在一个叫哨口的村子里宿营。

中央红军走到这里，似乎来到了一个岔路口，因为这里南距昆明和北距金沙江的距离几乎相等。

之前，中革军委接到了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的电报，电报建议“野战军应立即改变原定战略，迅速脱离不利形势，先敌占领东川，应经东川渡过金沙江入川，向川西北前进，准备与四方面军会合”。林彪和聂荣臻的建议意味着中央红军立即北渡。而所谓“原定战略”，是指中央红军不能实现北渡长江时，暂在川滇黔边区活动。是日晚，中央红军在哨口村召开了紧急会议。

会议一开始，由作战参谋孔石泉和王辉报告了今晚中央红军各部队的宿营地点，然后由军委总参谋部二局局长曾希圣汇报了对敌情的估计和判断，之后会议开始对中央红军如何抢渡金沙江发表意见。毛泽东不同意经东川渡过金沙江，理由是：一、虽然敌人已经放弃了在宣威、威宁一带围歼红军的计划，但是十多万滇军依旧在回援昆明的路上，而且回援的速度很快。宣威距离东川不远，或者说，东川距离正在回援昆明的滇军不远，一旦敌人发现了红军北渡金沙江的意图，会对红军造成巨大的威胁。二、原定的我军一部南下佯攻昆明、大部北出金沙江的计划是主动行为，滇北多山，民情封闭，滇北的元谋距离金沙江很近，对我军安全渡江十分有利。毛泽东让参谋吕黎平在刚

刚缴获的云南省地图上标出了各军团和中央纵队从现驻地到达金沙江边的龙街、皎平和洪门三个渡口的行进路线和距离。然后毛泽东作了说明：自攻打遵义以后，红军大胆穿插，机动作战，已经把蒋介石的追击部队甩在了侧后。但是，蒋介石正调集近七十个团的兵力向我尾追而来。其前锋万耀煌的第十三师离红军后卫部队第五军团只有两三天的路程。现在，金沙江两岸没有敌人正规部队防守，这使我们北进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有了实现的可能。对于中央红军来说，应趁金沙江沿江敌人布防空虚、尾追之敌尚有一段路程的时机，迅速抢渡金沙江。

接着，毛泽东详尽阐述了红军抢渡金沙江的具体部署和作战原则：第一军团为左纵队，从现驻地出发，西进至元谋，然后迅速向北，抢占龙街渡口；第三军团为右纵队，从现驻地出发，经寻甸北进，抢占洪门渡口；军委直属单位和中央纵队由刘伯承率领，干部团为其前锋，直插皎平渡口。以上三路，从明天拂晓起，均应日夜兼程前进，一路不要费时强攻县城，务必在五月三日前抢占上述各渡口，收集船只，准备渡江。红军先头部队北渡之后，要不惜一切巩固与坚守阵地，为后续部队渡江创造有利条件。中央红军若能在五月三日前抢占龙街、洪门、皎平三个渡口最为有利。万一敌人发现红军的意图追击而来，能占领三个渡口中的一个或两个仍会不失时机。最忌的是，滇军得到消息，先我到达江边，下令把各渡口船只烧毁或撤到北岸。因此，各部队要不怕疲劳，务必在四天之内，赶到金沙江边抢占渡口。这是关系全军胜败的关键一步。第五军团为后卫，可派一个加强营进至寻甸以南的嵩明附近徉动，以迷惑敌人，使之以为我军准备攻占昆明，其主力随后向西北方向跟进中央纵队渡过金沙江。

与会同志均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九日早上，中革军委正式发布了《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指示要求“全军指战员均能够以最高度紧张性与最坚强意志赴之”。

毛泽东的判断是基于对敌情的分析。

有证据显示，当时中央红军的情报部门有破译蒋介石电报密码的能力，还有通过其他渠道及时获取国民党军调动部署的能力。这种能力对在敌军重重围困中艰苦转战的中央红军来讲，是能够绝境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贵州转战于赤水河边的那些日子里，如果没有及时准确的情报来源，红军就不可能在敌人密如蛛网的“围剿”缝隙中成功地来回穿越移动。

当时中央红军中有两个通信局，其中的二局专门负责截获和破译敌台。二局的红军干部大多是在情报工作方面经验丰富的共产党人，其中有后来担任外贸部部长的李强、邮电部部长的王子纲、总工会副主席的宋侃夫，还有担任过安徽省委书记的曾希圣，以及后来成为新中国著名外交家的李克农，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苏联接受过情报工作的专业训练。中央负责这项工作的领导人是周恩来。

在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围剿”作战的初期，由于国民党军的电报密码很原始，因此几乎国民党军的每一封作战电报，都能出现在中央红军的指挥部里。甚至有时国民党军队还没有接到电报，中央红军的领导人就已经先看到了。随着国民党军对保密工作的加强，红军也在不懈地改进自己的破译水平。至少自中央红军离开苏区踏上长征的征途以来，国民党军方的电报依旧频繁地被中央红军的情报部门所获取。

获。

蒋介石对红军破译国民党军作战电报的能力已经有所察觉。尤其是在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后，红军的一名参谋不慎被俘，滇军在他身上搜出了已经被破译的国民党军的电文。电文被送到昆明，龙云大吃一惊，立即给蒋介石发去了一封紧急电报：

急。

贵阳蒋委员长钧鉴，曲靖薛总指挥、宣威李军长勋鉴：

竭密。顷在羊街拿获共匪参谋陈仲山一名，瑞金人，现解省审讯。于其身上搜出情报一束，系我军各方往来密电，皆翻译成文。无怪其视我军行动甚为明了，如所趋避。现正研究其译电，系有我方电码本，抑以他种技术译出，并此后宜用何法通信，方免泄漏。特先报闻，详情续达。

龙云。冬未机印。

蒋介石立即回电：

特急。

云南龙总司令：

冬未机电悉。良密。我军电文被匪窃译，实属严重问题。此事只有将另行编印之密码多备，每日调换。凡每一密码，在一星期中至多只用一次，按日换用。密码每部各发十种密本，每日换一种，每十日再另发十种密码。一面如气候良佳，用飞机通信以补之。请兄就近编发密本，照此办理。盼复。

中正。江巳贵参一印。

不知道龙云和蒋介石的这两封往来电报是否依然被中央红军所截获。

四月二十九日，从贵阳飞抵重庆的蒋介石发出了两封重要电报。类似电报以前蒋介石发过多次，只是这一次抬头更加复杂。复杂的抬头足以说明因为全国的红军都已处在了移动之中，蒋介石索性决心把他所推崇的堡垒政策推广到全中国，他要求各地的国民党军对修筑式样统一的碉堡要“忍痛奉行”：

武昌行营张［张学良］主任、省府张主席，汉口绥署何［何成浚］主任，长沙何［何键］总司令、省府何主席，巴县刘［刘湘］总司令、省府刘主席，贵阳薛［薛岳］主任、省府吴［吴忠信］主席，昆明龙［龙云］总司令、省府龙主席，长安杨［杨虎城］主任、邵［邵力子］主席，兰州朱［朱邵良］主任、省府朱主席，西宁马［马麟］主席：

贻密。查江西剿匪胜利，得力于封锁者居多。从前徐匪窜川，南昌行营曾制有川、鄂、陕、甘封锁匪区办法颁布，惟各省多未切实遵行。本委员长此次入川，详察匪情，认为朱、毛流窜川、黔各省，既无固定地点可资封锁，即徐匪近来放弃通［通江］、南［南江］、巴［巴中］老巢，西向窜扰，原颁封锁办法今已不合实用。兹规定在详细封锁办法尚未改正颁布以前，各该省军政长官应速督促邻近各县，并村筑寨，辅以碉堡，一面遵照前鄂豫皖总部所发之民团整理条例，组织铲共义勇队或壮丁队，充实自卫力量。匪至则将人畜资粮完全集中于碉寨内，死守待援，实行坚壁清野，与匪断绝交通，使匪无可掠夺之物财，无可裹胁之民众，行之日久乃自消灭。此其前清曾文正、李文忠剿灭捻匪之良法。南昌行营师其用意办理封锁亦著大效。仰该军政长官务须督促奉谕各该县忍痛奉行。各省政府应速将该省应筑碉寨之县份查明电复，以凭察夺。一面令各该县将应筑碉寨之地点，需用之经费、材料，迅速筹办，依法赶筑。碉寨图样另行颁发，仰并知照。

蒋中正。艳末川行参战印。

蒋介石的第二封电报是发给龙云的，他授权龙云直接指挥入滇各部队，尤其是指挥国民党中央军的时候“不必客气”：

限即到。

云南总司令龙：

俭戌机电悉。良密。匪窜元［元谋］、武［武定］渡江，殊为可虑。刘文辉在金沙江北岸之部队，兵单防广，恐难独任防堵。中［蒋介石］前令川军郭勋祺部开赴鲁甸、巧家，乃为就近协助文辉会理部队，以防堵金沙江北岸也。已饬该部整饬军纪，兄可无虑。至入滇之湘军及各纵队，仍请兄就近直接指挥，以免往返误时，不必客气。并已电令伯陵［薛岳］前进，一切遵兄命而行矣。如需严定任务或限期，可以中之名义发布之。此间已加电各部遵照。

中正。艳戌侍参筑印。

龙云在收到蒋介石的电报的同时，还收到了一封署名“香港有影响的人士”发来的电报，电报说：“我同湘黔人士晤谈后得出印象，他们只希望红军早早离开这一地区，而红军是想借道进入四川，因此最好让他们过去，不要动武。”龙云在此电报上的批示是：“此文符合西南利益。”

龙云，字志舟，原名登云。彝族，彝名纳吉乌梯。一八八四年出生于云南昭通炎山。他的父亲纳吉瓦蒂在四川凉山拥有奴隶主身份，但龙云出生后因为父亲病逝家境开始衰落。少年龙云长期流浪于云南的昭通与四川的凉山之间，金沙江两岸的险山峻川令他有了圆滑强悍的性格。辛亥革命爆发后，龙云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堂，与后来成为共产党红色武装领导人的朱德成为同班同学。一九一四年彝族青年龙云从讲武堂毕业，担任了滇军护国军都督唐继尧的侍从副官，并开始一

路青云直上，直至一九二八年被蒋介石任命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十路军总指挥。

对于中央红军的动向，“云南王”龙云并不关心，直到中央红军进入了贵州之后，他才开始警觉起来，但是他仍认为红军不会进入云南。当中央红军还在贵州转战的时候，他曾就红军的走向与部下商讨，部下们有两种猜测：一是红军要到富裕的四川去；二是红军在四川过不去长江，很可能要绕道云南，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龙云宁可相信前一种猜测，他害怕红军进入云南，更害怕蒋介石借机插手云南的事务，以威胁到他在云南的统治地位。龙云的这种担心和害怕，是他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出兵贵州的主要原因。他给滇军下达的命令并不是歼灭红军，而是阻止红军进入云南。

为了阻止红军进入自己的地盘，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龙云在云南边界地带修筑起了两千多座碉堡，加上原来沿着进入云南的主要道路修好的碉堡，龙云修筑起的碉堡已达五千多座，使整个云南俨然成了一个被碉堡围起来的山寨。

但是，龙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他派出的部队和他修筑的碉堡没能阻止中央红军长驱直入。这一下，他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与红军打硬仗，不要说滇军没有这个实力，即使有实力，这种想法也是愚蠢的；但是如果不打怎么应付蒋介石呢？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中，龙云盼望那位“香港有影响的人士”所说的话是确切的。如果红军仅仅是路过云南，那就让他们过好了，而且过得越快越好，云南用不着和红军动武。

龙云正在左思右想，消息传来了：红军有攻击昆明的迹象。一时间，龙云不禁又悲又喜。悲的是，如果红军真要攻占昆明，那只有拼

个你死我活了；喜的是，如果红军仅仅是虚晃一枪，那么正好有了把所有的滇军都调回来的借口。

龙云毫不犹豫地按着令自己窃喜的思路行事了，他在最短的时间内下达了将滇军主力全部调回的命令。但是，接着传来的消息说，红军已经到达昆明郊区，贴出的标语是：拿下昆明，活捉龙云。

最先接近昆明的红军部队，是红一军团二师。

按照中革军委发布的抢渡金沙江的作战计划，红一军团首先要掉过头来，背对金沙江攻击嵩明县城，然后继续南下逼近昆明。一师为右翼，二师为左翼。二师政委刘亚楼在给干部们交代任务时说："看看你们谁最先进城。"二师的先头部队是五团二营。在向嵩明急行军的过程中，二营的官兵不断变换从被俘的民团身上扒下来的军装，在接近嵩明县城的时候，他们已经全部成了"国民党中央军"。二营的装扮引起了当地豪绅的误会。云南地处西南一隅，当地人只听说过红军都没见过。于是，豪绅们不但酒肉招待，而且还把奉命筹集的军款和军粮都拿了出来，直到吃饱了的红军官兵高喊了一声："同志们！"豪绅们这才恍然大悟，因为国民党军中从没有这样的称呼。之前，豪绅们甚至还主动强征了挑夫队，于是红军不得不向挑夫们说明身份，同时宣布：愿意留下为红军服务的每天给五角钱，先付半个月的工钱；不愿意的，每人发给一块大洋回家。结果十有八九的挑夫愿意留下跟着红军走。

占领了嵩明之后，红一军团立即派出部队配合红五军团一部逼近昆明。其先头连依旧装扮成国民党中央军，在连续夺取了沿途的几个小镇后，一直到达了距昆明仅五十公里的杨林。杨林是个大集镇，在这里防守的滇军早已没了踪影。红军打开了龙云设在这里的兵站仓

库，把大量的布匹、粮食和盐巴分发给贫苦百姓，同时到处张贴“打倒军阀龙云”和“占领昆明”的标语。同时，红军官兵还装扮成当地百姓，在群众中散布“昆明马上就要落入红军之手”的消息。红一军团侦察科科长刘忠率领的侦察连和军团便衣队，通过了距离昆明仅十五公里的大板桥，接近了昆明的城墙，并在那里发动群众制造攻城用的云梯。

“一个散发着淡淡的法国风情的城市。”曾有外国记者这样描述昆明。这座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省城，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成为法国人的势力范围，因此，无论是建筑风格还是生活情调，都弥漫着宁静的欧洲小镇的气息。红军将要攻打昆明的消息，引起了这座城市的恐慌。滇军主力依旧在回援昆明的路上，城里仅有五百多人的民团。龙云急忙动员了所有的警察和宪兵实行戒严，同时不断地催促回援的滇军加快行军速度，而他自己已经做好了一旦昆明陷落即刻逃往缅甸的准备。

四月三十日，就在滇军主力火速回援昆明的时候，中央红军分为三路纵队突然北返，开始了对金沙江渡口的偷袭。

红一军团的预定渡口是龙街；红三军团的预定渡口是洪门；红五军团掩护中央纵队，在嵩明和寻甸之间越过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抢夺皎平渡口。在中央红军确定的三个渡口中，皎平渡口被寄予了最大的希望，因为这个渡口的两岸是悬崖峭壁，在这里渡江会出乎国民党军的预料。为了确保抢渡成功，中革军委在皎平渡口方向上投入了最精锐的部队：干部团。

在劝禄县城北面的一个小山村里，周恩来在刘伯承的陪同下来到了干部团。充满了旱烟味道的小屋里挤满了人，周恩来和刘伯承对抢占皎平渡口的作战计划进行了详尽研究，最后决定：以干部团三营为

先头部队，由刘伯承和干部团政委宋任穷率领，以当天一百六十里的急行速度赶到渡口，消灭渡口敌人继而强渡金沙江并巩固北岸阵地；南岸部队迅速收集船只并组织架桥，为主力部队渡江做好一切准备。干部团团长陈赓率领其余的两个步兵营、一个特科营和上干队为后梯队跟进，以当天一百里的速度急行军，然后宿营休息，随后在先头部队抢占的渡口渡过金沙江，占领江北二十公里处的通安，阻击和消灭向渡口增援的川军。最后，周恩来交代了一旦发生最坏情况的处置方式：如果干部团渡了江，但是渡口没有保住，主力部队无法渡江，干部团要准备在江北单独打游击。

干部团的先头营和后梯队同时出发了。

先头营的前锋是政治八连。政治八连全部由中央红军中年轻可靠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组成，并且全部是干部，有连队指导员、副指导员和政治干事，年龄最小的十六岁，最大的二十岁。他们换上了国民党军的军装，不顾一切地向皎平渡口急速奔袭。山路崎岖，走了一个晚上，仅仅休息了十分钟，吃了几口干粮，然后又急促地行军。带路的向导是当地常走山路的脚夫，但即使是脚夫也被这种强度极大的行军累垮了，于是不得不走一段路更换一个向导。最后找到的向导是一个熟悉山路的四十多岁的山民，但这个山民吸食鸦片，烟瘾一上来就无法走路了，由于没有时间让山民停下来吸烟，红军官兵只好两个人架着他疾行。

在距离渡口六十里的一个叫沙老树的地方，先头营停下来休息了一会儿。先头排带来个胖胖的民团，胖民团挤出一脸笑容向刘伯承报告说："民团正在奉命烧船。"刘伯承立刻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并且要求他为红军提供船只。胖民团说："报告红军长官，皎平渡口的江边还停着两只船。"刘伯承立即命令先遣连火速赶到渡口。先遣连在三营政

委罗贵波、副营长霍海元和连长萧应棠的率领下，在已经暗下来的天色中开始奔跑。午夜，他们终于听见了江水拍打崖壁的声音。

金沙江，长江的上游。江水沿着川藏边界奔腾而下，在云南的石鼓突然北流，形成了一百一十度的急转弯，在高山峻岭中切出了三千多米深的大峡谷。

就在中央红军开始北返渡江的时候，蒋介石急电龙云把沿江所有的渡船全部销毁——“竹木片亦应严密收集或烧毁”。龙云当即下达了封锁金沙江沿江渡口的命令。

皎平渡是金沙江边一个重要的渡口，四川和云南两省往来的盐巴、粮食、皮革、金银、药材都要从这个渡口通过。从皎平镇到江边的渡口一路下山，两边全是峭壁，一不小心就会从山路上滚下悬崖。

干部团先遣连到达江边的时候，皎平渡口已经处于封锁状态，但是确实有两只渡船靠在江南岸。红军询问了船工之后才知道，这是北岸川军的船。控制了这两条渡船后，干部团的宣传员把在江边开小客栈的张姓兄弟说服了，红军宣传员们说：“红军是专门打土豪劣绅的，现在你们帮助红军，以后红军胜利了给天下的穷苦人分土地。”在张氏兄弟的帮助下，先遣连又找到了三条船。

和当地船工讲好了价钱之后，先遣连的两个排在连长萧应棠的带领下上船了。渡江的时候没有发生危险情况。船顺利靠岸后，萧应棠立即燃起了一堆火，这是顺利登岸的信号。同时，两个排的红军官兵在船工的带领下扑向了川军保安队的一个据点。这个据点是厘金局设在这里专门收来往百姓渡船税的。百姓对这个据点痛恨之极，因此带路的积极性很高。红军敲门的时候，里面正在打麻将，话喊出来很不

耐烦，说交税等天亮再说。里面的话音未落，门就被红军官兵踢开了。

萧应棠报告控制渡口的第二堆火也点燃了。

正在往渡口赶的刘伯承悬着的心放下了，他说：“告诉先遣连，往北岸的纵深发展，把川军顶住。命令后梯队赶上去，抓紧时间渡江。”

先遣连奉命继续向北。大家的肚子实在是饿了，路边一个小铺子的主人已经跑了，红军官兵在里面放了十几块银元，敛了大约三十斤点心，然后每人分了几块边吃边赶路。走了大约十几里，萧应棠连长决定休息。安排了警戒哨兵后，红军官兵倒在地上就睡着了。但是，刚睡一会儿，萧连长就被推醒了，副营长说前边的路边有座山，如果让川军占领了，可能对主力渡江有威胁。萧应棠立即把官兵们一一叫醒。天亮的时候，先遣连到达山顶，开辟了阻击阵地。

增援的是川军刘文辉部。

刘文辉是一个倒霉的军阀。在争夺对四川控制权的军阀混战中，刘文辉因战败被迫退到了川南的偏僻地区。部队编制缩小，士气低落，缺乏战斗力。他的侄子刘元瑭原来是川军的师长，现在不得不勉强混个旅长，手下有四个步兵团、一个手枪营和一个工兵营，驻守在川南会理和西昌一带。刘元瑭得知红军抢渡金沙江的消息后，就一直处在惶恐不安中，因为他和他的官兵被告知，如果当了红军的俘虏一律会被砍头。刘元瑭的官兵也不知如何是好：红军真的来到这里，打吧，不是战死就是当俘虏；不打，避战也会被军法从事。而他们的“上级”刘文辉说：“红军找我这个穷光蛋，拼也完，不拼也完！”进入四月下旬，刘元瑭接到了刘文辉的命令：一、红军已向金沙江逼近，有渡

江向西康前行的意图；二、红军长途跋涉，疲惫不堪，西康地区地瘠民贫，给养困难，后面又有追兵，必然不能久支，只要我据险阻击，等到中央军到达再转守为攻，定能胜利；三、西康崇山峻岭，悬崖峭壁，山路崎岖，人烟稀少，不利于大军周旋运动，红军必会被消灭在这里。但是，在分析了自己的实力之后，刘元瑭的军官们普遍认为：一旦金沙江江防被红军突破，川军就会即刻全线崩溃。虽然兵马未动就已心虚异常，刘元瑭还是强打精神布置了阻击任务。现在，他唯一祈求的是：红军将从云南的巧家和会泽附近渡江，然后直接攻击西昌。因为自己这里是渡江的正道，而红军一向擅长避重就虚。因此，刘元瑭在这个方向上仅仅部署了一个营的兵力，同时命令江防大队大队长汪保卿协助防守。

汪保卿已经被红军干部团的先遣队俘虏了。

汪保卿是当地人，厘金局的头目，他的手下都是江两岸的农民或船夫。他从没有见过红军，不知道红军有多厉害，因此，他不但没把江防当回事，而且认为发财的时机到了。刘文辉命令必须把南岸所有的船只拉到北岸，可他偷偷留了两条船做起了生意：单客渡江每人收洋一元，挑担子的加收半元；空马一匹收一元，马背上驮货物的收两元。汪保卿的命令是："无论谁要渡江都得收钱，连邮差也不例外。"干部团先遣连最先控制的那两条船，就是汪保卿为了自己发财留在南岸的。

干部团先遣连攻击厘金局的时候，听见枪声的汪保卿从睡梦中惊醒，他带着几个心腹刚一跑到江边，就看见江面上的船正在运送红军。这是他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红军。当他听说据点里的人已经都被红军俘虏时，立刻顺着通往通安的山路向北逃去。逃着逃着，汪保卿实在害怕对渡口的丧失承担负责，于是又重新组织队伍开始反扑。

萧应棠的先遣连占领了路边的高地之后，遇到的川军就是江防大队长汪保卿的队伍。

红军仅打了个把小时的战斗，汪保卿的队伍就逃得没了踪影。

小小的阻击战结束后不久，陈赓率领的后梯队就跟上来了。为了夺取通安县城，干部团在陡峭狭窄的山路上快速行军。山路的一面是万丈绝壁，川军不断从山上向下射击，不少干部倒在了山路上，但是队伍并没有停止前行。接近通安的时候，川军的阻击更加猛烈，刘元瑭几乎投入了他所有的部队，数团的川军阻击着一个团的红军，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肉搏战中，刘元瑭手枪团二连连长被红军的刺刀刺死。红军的冲击部队最后冲到了指挥战斗的刘元瑭的身边，刘元瑭立刻下达了撤退的命令，率领残部仅四百多人向会理县城逃去。

至此，金沙江皎平渡口的南北两岸，都已在红军的控制之下。

刘伯承在江边仔细查看了水情，发现这里根本不能架桥。这时，红军官兵报告又找到了两条船，刘伯承大喜过望。在江边的一个山洞里开辟了指挥所后，刘伯承给中革军委发去了电报："皎平渡已在我手中。有船七只，一日夜可渡万人。军委纵队五日可渡完。"电报发完，极度疲惫的刘伯承不禁心生万般感慨，他对身边的人说："干部团的同志一天走近两百里的路程，是黑夜，又是难走的山路，还有敌人。一个人怎么能一天走这么远的路？他们走到了，而且还打了胜仗。靠什么？靠觉悟，靠党。没有这些，根本做不到。"

红一军团官兵在完成了佯攻昆明的任务后，奉命火速返回赶往金沙江边，于是官兵们开始了超出常人极限的急行军，四十八小时内跑出了整整三百里路。有些官兵因极度疲劳而掉队，遭遇国民党军和民

团的追杀。红一军团一师好容易赶到龙街渡口，却发现这里的渡船已全被敌人烧毁。师长李聚奎为了把浮桥架起来，能想到的办法都试了。多年后，李聚奎回忆说：“我们用绳拴住门板，然后从上游一块挨着一块往水里放，可是由于水流太急，只架了江面的三分之一，就无法再架了。这时虽刚入五月，但金沙江夹在两岸高山之中，在炎热的太阳暴晒下，汗流浃背。我们整整架了两天桥，毫无进展。”同样心急如焚的军团长林彪在电话里不让李聚奎讲情况，只要求他干脆地回答“队伍什么时候能过江”。李聚奎被逼得一下子火了，在电话里和林彪顶了起来：“要是干脆回答的话，那桥架不起来，什么时候也过不了江。”林彪一听，比李聚奎火更大地骂了起来，骂完了问：“为什么桥架不起来？”李聚奎就把龙街渡口的江宽、流速、没有渡船、没有架桥器材等一口气全说了。

林彪必须让第一军团尽快渡过金沙江，因为龙街渡口的情况已被国民党军的飞机侦察到，部队如果再拥挤在没有任何遮蔽的渡口，定会在敌人猛烈的轰炸中遭遇重创。但是没有船又架不起浮桥怎么办？中革军委决定红一军团紧急向皎平渡口转移。于是，已经奔走了数百里的红军官兵仅仅吃了一顿饭，又接着开始了向东的急行军。

后来才知道，红一军团在龙街渡口的行动，令蒋介石一直判断中央红军的主力集中在龙街，这在无意间掩护了中央纵队在皎平渡口的渡江。

红三军团占领了洪门渡口后，只找到了一条船，仅仅把十三团渡了过去。这里的江水同样湍急，红三军团的架桥也失败了，于是中革军委命令红三军团向西往皎平渡口转移。

五月三日晚，毛泽东赶到了皎平渡口，并从那里渡过了金沙江。

从五月四日开始，金沙江的皎平渡口喧闹异常。数万红军聚集在这个峡谷中，从容而有序地乘船摆渡。摆渡全部靠七条木船完成。大船每次渡三十人，小船每次渡十几人，昼夜不停。木船都是旧的，即使用买来的布匹做了防漏处理，但是每次渡江的时候依旧漏水严重。白天还可以边渡江边观察，晚上便险象环生。为了保证渡江安全，皎平渡口两岸燃起了大火，大火将金沙江照得满江通明。中革军委制定了十分严格的渡江纪律，官兵还没到达江边就会拿到这个纪律。因此，仅靠七条渡船将数万人渡过了水流湍急的金沙江，而且是在前有阻截后有追兵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此大规模的成功摆渡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帮助红军渡江的船工报酬极其优厚，每昼夜五块大洋和六顿饭，尽管红军官兵每天只吃青豆，但是他们每顿饭都为船工们杀猪。

红三军团十一团的官兵在皎平渡口过了江，奉命沿江北岸西行阻击增援而来的川军。他们行军的时候，看见江南岸也有一连串的火把，经过联络才知道那是红一军团一师的部队。于是十一团的官兵一齐喊，让一师的战友们迅速到皎平渡口去渡江——年轻的红军官兵在深夜的峡谷里喊叫自己的战友，这让荒凉的西南山川间有了从未有过的生命震荡。自从进入云南就没有停下过脚步的红军官兵，隔江看见了同样是红军队伍的火把，既紧张又兴奋，所有经历过的疲劳、伤病和牺牲在这一刻都可以被忘掉。红军官兵坚信，无论还要奔袭多么远的路途，终会有那么一天，他们能够到达让他们尽情欢笑与歌唱的红色根据地。

蒋介石终于发现了中央红军大规模的渡江行动。他命令国民党军追击部队全力向金沙江南岸推进，要求“不顾任何牺牲，追堵兜截，限歼匪于金沙江以南地区，否则以纵匪论罪”。

作为中央红军的后卫部队，红五军团奉命在一个叫石板桥的地方阻击国民党军的追击。阻击先是被要求必须坚持三天三夜，然后改成六天六夜；最后，中央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亲自来到红五军团，传达了中革军委的最新命令，要求红五军团在这里阻击九天九夜。李富春召集了军团团以上干部会议，解释了红一、红三军团在龙街、洪门渡口遇到的困难。李富春说：现在千军万马都要从一个渡口渡江，严峻的情况要求红五军团用鲜血和生命保证中央和全军的安全。会后，军团长董振堂陪同李富春来到三十七团的前沿阵地。在阵地上，李富春听到红军战士们正在唱歌：

金沙江流水响叮当，

常胜的红军来渡江。

不怕水深河流急，

不怕山高路又长。

……

追击而来的是国民党中央军万耀煌部第十三师。阻击的红五军团三十七团原来的番号也是十三师。虽然两个十三师在数天之内进行了数次战斗，但是国民党军始终没能突破红五军团的阻击线。

五月四日，中央红军各军团开始从皎平渡口大规模渡江。蒋介石对追击行动进行得十分迟缓的国民党军火冒三丈，他接连发出电报，告知国民党军各部队将领：“须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绝非革命军人应有之心理。”同时，蒋介石根据一份避重就轻的情报，给国民党军第三十八团代理团长袁镛发出了一封“严禁士兵声言与红军无仇”的电报。小小团长承蒙委员长亲自电示，不敢怠慢，袁镛立即把电报内容

向各部队作了详细传达：“……据报各军多有兵声言我等与匪无仇，如匪反攻不战而退，至后有好处，有白米饭吃等语。希即立饬注意严禁，并设法训诫……”

龙云接受了贵州的王家烈被蒋介石搞掉的教训，在薛岳率领国民党中央军到达昆明城下的时候，他虽与薛岳拜了把兄弟，但却用蒋介石刚刚赋予他的“直接指挥”入滇各部队的权力，下令中央军不得进驻昆明——蒋介石要龙云对中央军“不必客气”，龙云这次果然没有客气。于是，薛岳给蒋介石发电报，密告龙云与朱德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学，而且怕是与罗炳辉之间也有往来。

最终完成了阻击任务的红五军团于九日晚顺利渡过了金沙江。

最后一个过江的三十七团官兵到达江边的时候，看见刘伯承浑身汗透正站在闷热的江边渡口边等着他们，红军官兵们顿时心生敬佩。

中央红军的后卫部队渡过金沙江后，在北岸烧毁了所有的船只。坚持到底的船工每人得到了三十块大洋的奖励。七条船中有一条船被确定是船工自己的，于是红军给了这个船工八十块大洋作为补偿。

中央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两天以后，第一支国民党军追击部队才到达金沙江边，除了从江北岸的悬崖上不断向他们打来的冷枪之外，他们连红军的影子都没看到。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开始抢渡金沙江的时候，自四渡赤水后便离开了红军主力的第九军团也在抢渡金沙江。这支红军部队的渡江地点是皎平渡口以东约三百里处的巧家。

被红军官兵们称为“掉队掉大了”的第九军团，在中央红军中是一支新部队。一九三三年，第九军团以红三师和红十四师为基础组建起来。遵义会议后，部队由两个师缩编为三个团，实际兵力仅相当于一个师。因为队伍小，机动方便，因此他们自乌江边重返黔北的大山中后，蒋介石始终无从判断从中央红军主力部队中脱离出来的这支红军到底要干什么和到底要去哪里。

还在三月下旬的时候，由于佯装红军主力在黔北与敌人周旋的时间太久，当第九军团赶到乌江边的时候，那里的浮桥已被拆掉。

眼看着红军主力远去，第九军团在瓢泼大雨中陷入了困境：追赶主力已经不可能，而身后五倍于己的敌人正向乌江岸边压来。中革军委的电报很简单：第九军团暂时留在贵州，作为一支特殊的游击部队，另寻机会与主力会合。可是眼下的问题是：往哪个方向走才相对安全？军团长罗炳辉和政委何长工经过紧急磋商，最后决定往回走出约二十里，然后转向西北方向迅速脱离敌人。

沿着乌江边崎岖的山路，第九军团整整走了一昼夜。四月三日下午的时候，他们到达了中央红军曾经痛苦徘徊的打鼓新场附近。那里有一个叫老木孔的地方，被泥泞和暴雨弄得万分疲惫的红军官兵刚想在老木孔休息一下，侦察员的报告使气氛立刻紧张起来：附近发现黔军。部队只好接着走，在老木孔以南二十里的地方又停了下来，然而侦察员又报告说：黔军犹国才部的三个团正向这里追击。打还是不打？如果打，部队疲惫，打不赢就更无法摆脱敌人了；不打，总是处在被追击的状态中，以后的日子就会处处被动。军团领导最后决定：打！把敌人打垮了，才能行动自如，才有可能追上主力。

寻找好伏击点，红军官兵埋伏在山路两侧的竹林中。九团在正面，七团在右翼，八团在左翼。战斗的原则是：集中力量打击敌人的指挥机关，把这股黔军打跑就是胜利。战斗开始的时间定在中午，因为这是黔军普遍犯鸦片烟瘾的时候。伏击圈布置好了，除了警戒人员外，其他的官兵正好休息，他们实在是太累了。

军团长罗炳辉和政委何长工却因高度紧张而无法休息。

三十八岁的罗炳辉是云南彝良人，十八岁那年从家乡步行十七天走到昆明参加了滇军，一九二六年北伐战争时他已经是滇军中的一名营长。一九二九年，时任江西吉安国民靖卫大队长的罗炳辉率部起义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在红军中，他历任团长、旅长、军长，一九三三年第九军团组建时出任军团长。他的枪法是军中传奇，百发百中，绝无失手，常常听到子弹的呼啸，就可分辨出是盲目射击还是瞄准射击，以及射击的距离有多近多远。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他的一颗子弹竟从两个鬼子的胸膛穿过，钻入第三个鬼子的脑袋，最后嵌进第四个鬼子的胳膊里。罗炳辉身材魁梧，胆力过人，立如一座山，坐似一尊塔，是个能打硬仗的优秀红军将领。他的妻子杨厚珍一直跟随着他，是中央红军中唯一的缠足女性，这位令人钦佩的女性用一双小脚走完了红军的长征。

中午的时候，黔军来了。

红军官兵按照作战部署看着黔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去，走了一会儿仍没发现黔军的指挥部在哪里，于是才明白情报有误：追击的黔军远不止三个团。但是红军不打也得打了。

下午一时，黔军的行军队伍越来越杂乱，骑马的、乘滑竿的、挑担子的和抬担架的，在山路上拉得很长。终于，黔军指挥部开来了。红军的伏击突然间开始了。

没有准备的黔军顿时大乱，指挥部被冲击后瞬间散开。红军官兵跃出阵地追击，但是没追出多远，黔军就开始了反击。反击的方向是左翼的八团。由于兵力不足，八团边打边退，几乎退到了军团指挥部的跟前。危急时刻，罗炳辉把战斗力最强的军团侦察连用上了。一百八十人的侦察连呐喊着向黔军冲去，八团也跟着冲了回去。打扫战场时一清点，俘虏黔军一千八百多名。第九军团无心恋战，把缴获的枪支都毁了，俘虏每人发了三块大洋释放了，即使有俘虏愿意当红军，第九军团也没要，因为黔军普遍有吸食鸦片的习惯。

四月五日，军团侦察连在长岩镇化装成国民党军队，拿着在老木孔战斗中缴获的黔军团长的名片，未费一枪一弹把一个民团收拾了。第二天在到达瓢儿井的时候，依旧用老办法，但是被敌人识破，于是伪装变成了强攻。

瓢儿井是大集镇，物产丰富，市面繁华，第九军团自离开遵义北上以来从来没有休息过，打下瓢儿井之后，部队在这里休整了三天。三天中，红军官兵打土豪，开粮仓，分浮财，宣传红军主张，招收了三百多名青年农民参加红军，还在镇上做了八百多套军装。休整之后，他们四天之内走了两百多里，于四月十三日下午到达了黔西织金县的猫场镇。

这里也是个大集镇。与瓢儿井不同的是，猫场镇嵌在深深的峡谷里，镇子的出口是一条名叫梯子岩的小路。小路在一座岩石峭壁上凿出，一百多级台阶，狭窄的地方仅容一人通过。

从军事上讲，这里不适合驻扎。但是，连续的胜利使军团领导产生了麻痹思想，认为仅驻一夜不会有大问题。于是布置了警戒，通知部队凌晨四点半起床出发。可是，凌晨时分还是出事了。

跟踪而来的是王家烈的一个师。这个师在距离这里不远的一个村庄里宿营。半夜的时候，红军的警戒哨兵看见那个村庄里有手电筒的闪光，立即把情况向自己的团长作了汇报。但是，这个红军团长麻痹了，认为敌人半夜不敢来，也没向军团首长报告就继续睡觉了。

凌晨四点，距第九军团动身出发还有半个小时，枪声骤响，敌人已经冲进了猫场镇。

混乱中，军团侦察连首先冲上去堵截敌人，军团机关开始沿着那道悬崖上的陡峭台阶转移。部队仓促集合之后，三个团想先于敌人抢占有利地形，各团都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黔军已经判断出这支红军不是主力部队，因此攻击十分凶狠，迫使第九军团各部队不断地压缩阻击阵地，直至退到那道陡峭的台阶跟前。军团机关直属队仍在通过，大行李和驮着大洋的几十匹马拥挤在悬崖下。如果部队全部撤离，必须把敌人顶住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军团可以指挥的只剩下一个三百多人的教导队了。教导队奉命向最危急的右翼堵了上去。

军团参谋长郭天民显示出惊人的冷静。他带人先把身体尚未恢复的何长工转移到了安全地带，又和警卫人员用肩膀把军团长罗炳辉一步一步地顶上了悬崖。然后返回指挥战斗。这个被罗炳辉称为“大管家”的红军指挥员毕业于黄埔军校，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红军队伍中担任过各级军事指挥员，战斗经验十分丰富。猫场镇战斗从凌晨四点一直持续到下午三点才结束。战斗使第九军团损失严重，除了大量的弹药物资被丢弃外，军团一共伤亡了四百多人。

从猫场镇撤离之后的第九军团在滇黔边界反复迂回，试图摆脱敌人的追击。中革军委曾给他们发来电报，命令他们迅速渡过北盘江进入云南。但是，北盘江上所有的渡口都已被敌人封锁。第九军团又开始在北盘江以北不断地徘徊。

最困难的时刻，一位当地的老人给他们带来了希望。这个被当地人称为王三爷的老人主动找到红军，说他赞成红军帮助穷人的主张，又说他曾在私运鸦片的时候用过一个秘密渡口。在老人的带领下，第九军团到达了北盘江边的一处荒无人烟的地段，没有船，也没有桥，但是这段江面上耸立着无数块巨大的岩石，形成了一排天然的桥墩。红军官兵把木板搭在岩石上，终于渡过了北盘江。

一进入云南境内，军团长罗炳辉利用他在滇军中的影响，率领部队顺利占领了宣威和会泽两座县城。尤其是攻击会泽的时候，城里的绅士和百姓听说“滇人罗炳辉”回来了，坚决要求县长把城门打开，大部分团丁也不愿抵抗，他们把坚持要与红军作对的县长抓起来枪毙了，然后打开城门迎接红军。红九军团不但获得了大量的物资，还发展了数量可观的新战士。罗炳辉后来很有感慨地说：“这一带群众对共产党红军很有认识，欢迎拥护我们，这种情况很难得。”

占领会泽县城后，军团侦察连立即着手准备渡过金沙江。渡口附近虽没有可以造成威胁的敌人，但是没有足够的船只。当地的贫苦百姓听说后，自发地组织起来为红军找船，竟然很快找到了大小船只四十多条。

就在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在皎平渡口渡江的时候，第九军团在金沙江下游一个叫盐井坪的小渡口也安全地渡过了金沙江——一九三五年

五月十日云南《民国日报》:“罗炳辉匪部，已于五日午后在会泽西方之树节［距会泽约一百七十里］附近，利用多数盐船，渡过长江。”

经过艰苦的奔波转战，终于渡过了金沙江的第九军团不但兵力没有减少，而且还壮大了。他们携带着一路缴获的多达九万的大洋——这一数目惊人的货币在数月之后给红一、红四方面军采购物资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是大洋实在是太重了，虽雇用了不少骡子，第九军团行军的速度还是缓慢。但是，红军官兵一路上心情很好，因为他们知道与主力部队越来越近了。

第九军团径直向西北方向进入了莽莽苍苍的大凉山中。

就在毛泽东渡过金沙江的那一天，红四方面军脱离嘉陵江狭窄地域向西突击的战斗开始了。

在红四方面军战史上，这次惨烈的战斗被称为土门战役。

从川北的江油西去，便会进入川西北山河交错的地带。这里的山势由东向西逐渐高耸，最初的北川河谷还可以蜿蜒通过，再向西便是绵亘南北、横断东西的一道道巨大山脉，大军根本无法通过。红四方面军一出江油，便进入了干沟、土门和土地岭一线，红军官兵试图通过这里仅有的一条狭长的隘路。这条隘路两边山势陡峭，断岩矗立，一路处处是险关：伏泉山、大垭口、千佛山、老君山、观音梁子等，每一处关口海拔都在两千米以上，其中千佛山海拔高达两千两百五十米。红四方面军十万大军一旦决定西进，就必须从这条隘路上通过。

一九三五年四月下旬，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军方高层，依旧对放弃了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到底要去哪里猜疑不定。有人认为红四

方面军将北出陕南，也有人认为红四方面军将南下威逼成都，唯独没有人想到这支十万人的大军会西进高山草滩。

由于川西北一直是川军将领邓锡侯的地盘，于是当红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开始西进后，邓锡侯多次召集军事会议研究红军的动向。军官们普遍认为，从土门向西便是藏族高寒地区了，语言和风俗不同，少衣缺食，红军断不会向西进入绝路。但是，在茂县代理邓锡侯行使督办权力的第二十八军参谋长刘铭吾却三番五次地来电，要求军长尽快派出部队封锁土门隘路——这个刘铭吾如果不是对红军的行动有所察觉，就是害怕红军打到自己的头上来。

最后，邓锡侯决定封锁土门隘路。

茂县地区有森林和黄金资源，封锁了这条隘路，既可以阻截红军进入茂县地区，还可以防止红军经过这里迂回成都平原。邓锡侯任命了第五师副师长兼第十三旅旅长陶凯为松、理、茂、懋、汶屯区“剿共”总指挥，第五旅旅长黄绍猷为副总指挥，临时拼凑起八个旅的兵力负责土门隘路的封锁。这支部队确实是一个大杂烩，八个旅来自哪个师的都有：其中一支由第二旅三团、第十旅十九团、第十三旅二十六团和二十五团三营、第十五旅的三十团组成，由总指挥陶凯率领，经观音梁子到土门；另一支由第四旅七团、第五旅十团、第八旅十五团、第二师警卫团的四个步兵连和一个炮兵连组成，由副总指挥黄绍猷率领，经灌县到土门。同时，邓锡侯命令在广汉担任城防的第二十五团也向土门前进，另外还征集了藏族马队约六百人归陶凯指挥。

五月一日，川军全部到达土门阻击阵地：一个团在墩上，五个团加两个营在观音梁子一线，两个团在土地岭一线，马队被部署在干沟。如果加上地方武装，川军在这条狭窄险要的隘路上共部署了约一

万五千人的兵力。且不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仅这一万多人的兵马就快把这条隘路塞满了。

红四方面军的作战计划是：夺取伏泉山、千佛山、观音梁子等要点，控制北川河谷，然后全军突破土门要隘。

正是初夏，天热多雨，山路泥泞而崎岖。

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八十八师、八十九师和第四军、第九军的一部同时向川军发动了进攻。

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和政委郑维山接到攻击伏泉山的任务后，在山脚下对这处险峻的高地进行了近距离观察。这是卡在山路边的一连串的悬崖，山头呈锯齿形，彼此距离很近，可以形成相互的火力支援。川军从山脚到山顶，修筑了一层层的阻击工事，并配备了炮兵支援。八十八师刚发起进攻，正面的攻击部队就被压了下来，这使两个师指挥员几乎同时想到了二六五团。这个团以打硬仗闻名，特长是搭人梯、登悬崖、攀绝壁、钻草丛和潜深谷，凡是敌人认为根本进不去、攻不进的地方，都是他们的突击方向。这个团的官兵个个不怕死，守纪律，就是在偷袭的时候被敌人发现，也是宁可牺牲也不暴露目标。团长邹丰明和政委黄英祥都是身先士卒的硬汉子，只要这两个人的大刀一挥，驳壳枪一举，全团的官兵就会前仆后继。熊厚发和郑维山决定，让二六五团从川军阻击阵地侧后的一道绝壁攀登上去，进行偷袭。

政委黄英祥带领一营在前，团长邹丰明带领二营和三营跟进，师政委郑维山跟随这个团一起行动。

天黑下来了。二六五团顺着川军阻击阵地之间的一条峡谷摸了进去。没有道路，悬崖峭壁上长满了带刺的灌木，尖利的岩石像一把把尖刀。不能点火把，更不能出声响，在攀登的时候有红军战士滚落下去，但他们即使在滚落的那一瞬间也没有呼喊。从黄昏开始一直到凌晨三点，一营终于摸上了主峰。红军登上伏泉山的时候，防守的川军依旧在睡梦中，即使是哨兵也没有发现身后的动静。待后续营上来之后，红军突然一声呼哨，手榴弹便在川军构筑的工事中爆炸了。川军在漆黑的夜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眼前隐约看见的全是胳膊上缠着的白布条和闪着寒光的大刀。川军在狭窄的峰顶上无处可逃，除了被杀和被俘的之外，不少人跌下了悬崖。天色渐亮，占领了伏泉山主峰的二六五团开始向山下冲击，山下的二六三团和二六八团也开始向山上冲锋。曙光中，红军的号声震撼山谷，两面受到夹击的川军争相逃命，伏泉山落在了红军的手中。

九日，红四方面军主力逼近了千佛山。

山势极险的千佛山是土门隘路的中心支撑点。一条山路通向主峰，山路的左右都是万丈悬崖。半山有一天然石洞，可用来藏兵，叫天门洞。第三十军八十八师和第九军二十五师多次向千佛山发起正面攻击，但都因遇到凌厉的阻击而被迫后撤。黄昏后，八十八师用了与攻击伏泉山一样的办法，派出一支精悍的小分队，趁夜晚从天门洞侧后方的悬崖摸了上去。天亮的时候，红军小分队突然袭击了防守天门洞的敌人。埋伏在山路上的红军后续部队一拥而上，通过天门洞向千佛山主峰发动了强攻，一举攻占了峰顶上的制高点佛祖庙。

邓锡侯这时才意识到，这条固若金汤的隘路很可能就此被红军占据，于是他开始大量地派出增援部队，对所有失去的阵地进行猛烈的反击。连续几个昼夜，土门隘路上各要点的搏斗没有停止过一刻。在

川军的作战记录中，到处可见“往复肉搏”、“血战冲锋”和“尸骸狼藉”等字样，川军称此一战“为剿匪以来最惨壮之一幕”。

红四方面军的攻击部队准备对隘路上最后一个要点土门实施攻击。

川军总指挥陶凯此刻坐镇在土门。

这里之所以叫土门是因为地形确如一道坚固的城门。险峻的山岭在茂县、安县和北川交界处形成了一道狭窄的山门，山门两侧“把守”着几座险要的高地。为了把土门封死，陶凯设置了三道阻击阵地，每道阻击阵地都配备了机枪和迫击炮，以构成猛烈的火网，主阵地是观音梁子。

徐向前到达了最前沿。

攻击时间定在十五日。

攻击的部署依旧是先由二六五团的一个营夜袭观音梁子主峰，然后二十五师的两个团担任正面主攻，二十七师一部和八十八师的两个团负责侧翼迂回。

红军夜袭成功，接着就发动了总攻。

两个小时之后，防守土门的川军前沿阵地被突破。二六三团奉命扼守占领的阵地，其他部队继续向主峰攻击。这里是土门隘路的最后防线了，因此川军表现得十分凶狠，在飞机和炮火的掩护下，川军和红军混战在一起。悬崖上的山路上长满了灌木，双方搏斗的官兵被淹没在灌木丛中，只能听见呐喊声和厮杀声，却无法分辨交战的界限。

川军的飞机为了给予地面准确的支援，不得不超低空飞行，这令其中的一架飞机由于飞得过低而撞在了山崖上。

午后，观音梁子主阵地的顶端出现了红军的旗帜，但是战斗却更加激烈了。川军反复地进行反扑，两小时之后，观音梁子上的枪声似乎减弱了一些，原来红军已经分成两路越过了观音梁子，包抄了防守土门的川军的侧后，后续的红军部队也开始不断向这里增援。川军营长古友君指挥的部队已被完全打散，古营长自己逃进了深山中，川军的作战记录中说此人“从此失踪”。在红军攻击川军的二线阵地时，副总指挥黄绍猷率领的五个营被击溃，他自己和坐镇土门的陶凯一样在卫兵的掩护下逃走了。

防守土门各阻击阵地的川军分成若干小股在深谷老林中乱窜，给红军的追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土门附近密林中的枪声一直延续了一个昼夜，十六日清晨时分才暂时停歇下来。

川军的作战记录对土门战况的描述是:

我陶副师长凯率龚［龚渭清］、黄［黄锡煊］等旅计龚［龚西平］、赵［赵云霖］、陈［陈永昌］、梁［梁冈］四团守土门附近。但各团均系作战残余部队，合计实力只有两团。该副师长奉令后，即以梁、陈、赵三团固守右自观音梁经赤土坡、黑山包之线；以龚团位置于土门为预备队。各团并须派出警戒部队。元日二十一军韩［韩任民］团接守观音梁阵线。我乃改为关口、土门、黑山包至赤土坡之线，固守半月之久，虽经匪几次袭击，均被我击退。删日［十五日］午前一时，匪约四千余，向赤土坡我赵团阵地猛扑，并占领我黑山包高地。我当饬郭营率五、七两连飞援。我官兵奋勇挺进，激战约两小时半，毙匪数十名。我官兵伤亡二十余名，乃得恢复黑山包阵地。同时我陈团阵地亦被猛攻。该团在七星堡高地之苟连被匪包围。当时观音梁之韩团早已撤去，我梁团右翼甚形暴露，但仍努力撑持，以求

挽回战势，并令古营竭力在右翼支撑。匪势愈炽，此时该副师长见战势已无挽回可能，乃向土地岭撤退，并令龚团在干沟收容。我古营与匪鏖战，无法脱离。匪复由人冲梁子直抄干沟，我古营被匪截断，完全覆没。各团退至土地岭时，匪部已直趋茂城［茂县］。我恐被匪截断，乃节节掩护向茂城撤退，但茂城城工颓废，且无粮食，人民逃避一空，兼退下时部队混乱，不易整理，匪复乘势跟进，不得已再向后撤退，以图固守雁门及过街楼一线。屯殖军之三营皆作战残余，在茂县附近被匪截断，向松潘引退后，经懋功回灌整顿。是役伤亡失踪官兵共二千二百余名。

土门战役是红四方面军在西渡嘉陵江之后发起的一次大规模山地争夺战。从当时中国工农红军各方面军的战斗力来看，只有红四方面军可以与国民党军进行如此规模的阵地攻坚战。土门战役不仅为红四方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开出了一条血路，同时还大量地吸引了国民党军作战部队，从而给中央红军在云南方向的北进减轻了压力。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军先后投入到土门战场的兵力多达二十个旅共计十五万人。红四方面军对国民党大军的牵制一直持续到他们与中央红军会合。

红四方面军突破土门后，各部队在隘路上的每一个要点都与反击的川军进行了艰苦的作战。这一阻击过程漫长而残酷，川军从成都、绵阳方向大量地增援而来，猛烈向红军阵地反攻，企图将土门隘路截断，而红军作战部队必须不顾一切地保证隘路的安全，因为此时红四方面军的后方机关，包括从根据地撤出来的兵工厂、被服厂、造船队、医院等等正从这条险峻的山路上通过。红军和挑夫抬着机器、粮食和各类物资从隘路上走了数十天才全部通过——在记录中国工农红军的战史中，这支红军部队此时的行动被称为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开始”。

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根据地，突破土门进入川西阿坝地域；中央红军从贵州进入云南后急促北上，突破金沙江进入了川西北。此时，包括蒋介石在内，没有人怀疑这样一个事实即将发生：中国工农红军中两支最重要的部队，在各自经历了太多的艰难险阻后，终于同处于中国的一个省内并且就要会合了。

土门战役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中央红军逼近了金沙江北岸的会理县城。

那时，从金沙江防线上溃败的川军刘元瑭部四百多人已经逃到会理，但是川军官兵都知道自己根本无法守住这座县城。这是刘元瑭万分痛苦的时刻：如果抵抗，凭着有限的兵力很难与红军较量；但是如果丢下县城继续逃跑，仍在一线防御的毛国懋和胡槐堂的两个团就会难逃覆没的命运，到那时自己的家当就算是全部丢光了。几天前，他已经派人把自己的太太严容华和姨太太伍碧容送走了，临走的时候他各自给了她们一包毒药，嘱咐她们只要被红军捉住就自杀。刘元瑭在无人可以商量的情况下徘徊犹豫，最终他给卫兵下了命令：把太太们追回来，与会理县城共存亡！——反正都是死，那就置于死地而后生。守金沙江是守一条线，守会理是守一个点。只要拼命守住这个点，反正有中央军在后面追呢，守到中央军来了，红军自然就会退去。

刘元瑭立即把防线上的部队全都调回了会理县城，并且打电报给位于西昌的川康边防军司令刘元璋请求增援。同时，派出部队到县城外用武力征集百姓的粮食。然后，他开始清除县城周边的民宅，为城防火力打开射界——刘元瑭清除的办法是放火，于是连续几天会理城外大火熊熊。

川康边防军司令刘元璋下辖三个旅，除了驻守德昌的许剑霜旅外，其余两个旅的旅长分别是他的兄弟刘元瑭和刘元琮。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不愿与红军硬拼的刘元璋为了保存实力，把所有的部队都集中在了各个县城里。但是，既然亲兄弟要求增援，他便派出了一个团前去会理，团长叫聂秋涵。增援部队刚派出去，刘元璋又有点后悔了，他打电话给刘元瑭，建议把根本无望守住的会理放弃算了，免得自己的队伍遭受损失。可是，局势已经容不得刘元瑭再考虑了，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向会理包围而来，县城附近已经响起了隐隐约约的枪声，刘元瑭即使想撤也撤不出去了。

刘元瑭怕增援的聂秋涵团半路听到枪声返回，于是亲自率领两个连冲出县城去迎接聂秋涵团。此时，聂秋涵的部队已经受到红军的袭击，聂团长本人大腿上中了一弹。在刘元瑭的掩护下，他仓皇跑进了会理县城。刚进城，又有士兵向刘元瑭报告说，从金沙江边往回撤的胡槐堂团被红军截住了。刘元瑭把上衣脱了，只穿一条短裤，腰上绑上了一条红缎钱囊，手提马刀，命令聂秋涵的两个步兵连全部上刺刀，他的一个手枪连也全部子弹上膛，然后带着部队冲出了县城北门。经过一场血战，他把胡槐堂团的大部分官兵接进了县城，然后命令立即关闭城门，再在城门上压上几条大石条。胡槐堂团落在后面的散兵到了会理城下，无论怎样叫喊城门也不开了。也有部分逃兵在城门关闭的最后时刻逃进了县城，胡槐堂团特务连二排排长庞云就是其中的一个。庞排长和他带着的十多名士兵全部负伤。会理县城里的川军围着他们问县城外的情况。庞排长说，这几个弟兄全被红军捉了，但是红军不但不杀俘虏，还给他们包扎治疗。红军长官和士兵穿一样的衣服，在一起吃饭，对他们说话很和气。

不久，会理县城的川军中间开始流传一副对联，没人能说清楚这副联是从谁身上发现的：

红军中，官、兵、夫，起居饮食一样

白军内，将、校、尉，阶级薪饷不同

刘元瑭很快就知道了。他先把包括庞云在内的十几个被红军俘虏过的官兵捆到了旅部，不由分说全用马刀砍了。然后在追查对联的来历时又杀了十几个人，最后追究到一个十二岁的小道士身上，于是连同小道士的师傅在内也砍了头。

五月八日夜，中央红军包围了会理。

已经显得有些神经质的刘元瑭提了把大刀，疯了一样地满城乱窜，开始了他噩梦般的守城日子。

除了留一个手枪营和一个步兵营为预备队外，刘元瑭将所有的部队都派上了城墙，每一座垛口两个兵。为了防止红军偷袭，川军把松枝蘸上煤油，然后用弓射出去。燃烧的松枝把城墙四周照得如同白昼。川军还在垛口上摆了装满石灰的瓦罐，以对付搭云梯上来的红军突击队。为了进一步扫清射界，川军把接近城门的两条街道也点燃了，木结构的民居顿时火焰冲天，百姓扶老携幼匆忙逃离。大火一旦点燃就无法扑灭，两条街整整燃烧了两天，大火熄灭之后，半个县城成为一片废墟。

五月九日，中央红军野战司令部发出了攻占会理的作战命令：第九军团在金沙江边阻击渡江的敌人；第三军团和干部团负责攻击县城；第一、第五军团负责消灭川军的增援部队。

红军攻击的重点是会理县城的西北角。有人报告刘元瑭说红军在挖城墙，刘元瑭立即命令各部队在墙根挖大坑，把空坛子放进去，用以查听红军挖墙的位置。果然，川军士兵听见了咚咚的声音，于是就往发出声音的地方灌水。也许红军真的挖城墙了，也许因为水灌得太多了，十日凌晨，会理城墙的西北角发出一声巨响，那里的城墙塌了一大片。红军官兵异常欣喜，趁势往上爬。防守这段城墙的川军连长吴鸣恩顿时慌了手脚，刚要准备撤退，就见刘元瑭提着马刀上来了。子弹横飞，手榴弹的爆炸声震耳欲聋，刘元瑭带领着手枪团和便衣队开始与红军肉搏。负了伤的刘元瑭满脸是血，大喊大叫地督战。由于塌陷的城墙被水弄得十分泥泞，红军的后续部队无法及时增援，再加上吴鸣恩的士兵不断地往城墙缺口处投手榴弹和石灰罐，最后，冲击进来的红军官兵全部牺牲。

上午，蒋介石派来的飞机飞临了会理县城，向包围县城的红军阵地和所有怀疑有红军驻扎的城外民房开始了狂轰滥炸。在轰炸的掩护下，刘元瑭组织起大量的民夫抢修塌陷的城墙。城里的关帝庙里挤满了地主士绅们的家眷，都说是关公保佑县城没让红军攻破，因此那里的香火被烧得浓烟滚滚。中午，一架飞机投下一封信，竟然是蒋介石亲笔写的，内容是：奖励守城官兵赏金一万，刘元瑭晋升为陆军中将。

没有参加攻城的红军部队普遍会了餐，红军官兵还得到了用以购买物品的银元。但是，官兵都把刚分给自己的银元塞在了伤员们的担架上。在红军中，从高级指挥员到年仅十五六岁的小战士，人人都没有个人财产的观念。红军官兵普遍认为，自己只要不掉队不负伤，留着银元没什么用处；而那些担架上的伤员万一被留下，这些银元可以救他们的命。红军宣传队还编了一出名为《一双草鞋》的活报剧给官

兵们演出，内容是中央红军突破了金沙江，追到江边的薛岳只捡到了红军的一双草鞋，气得蒋介石直骂娘。剧里的蒋介石依旧由曾经扮演过王家烈的女红军王泉媛扮演。红军官兵很喜欢这个剧，边看边鼓掌。

此时的薛岳正在金沙江边发脾气。使他气恼的不是一双草鞋，而是当国民党中央军全部到达了金沙江边的时候，由于气候闷热，船只很少，各部队根本不听从渡江指挥官的调度，部队之间、官兵之间都发生了打架斗殴的现象，局面混乱得几乎令他无法控制。而且无论是南岸还是北岸，滇军早已经没有了踪影。看来，只要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了四川，龙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龙云确实很高兴，但他还是给蒋介石发了一封请求处分的电报：

限即刻到。

贵阳委员长蒋钧鉴：

吭密。今晚十一时接伯灵［薛岳］自富民电话称：我第三纵队本日已到达江边白马口，未与匪接触，江南岸似已无匪。但万［万耀煌］师与周［周浑元］纵队明晨方能到达指定之洪门、鲁车两渡，有无匪踪，明晨始能明了。等语。据此情形，现虽未接前敌确报，而匪已过江无疑。闻讯之后，五中如焚。初意满拟匪到江边，纵不能完全解决，亦必予痛惩，使溃不成军，借以除国家之钜害，而报钧座之殊恩于万一。讵料得此结果，愧对袍泽。不问北岸之有无防堵，实职之调度无方，各部队追剿不力，尚何能尤人。惟有请钧座将职严行议处，以谢党国。谨此鞠诚上闻，伏祈鉴核。

职 龙云。佳亥机印。

龙云说，听说红军渡过了金沙江，自己痛苦得“五中如焚”，没能报委员长“殊恩于万一”，因此无论如何请求“严行议处”。龙云的电报措辞实在虚假，于是让人读来确实能够感到他对红军进入了四川定在暗暗窃喜。

按照常理，中央红军不该滞留在金沙江北岸，因为身后依旧有国民党军的追击部队。但是，中央红军还是停了下来，因为必须停下来开会。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二日，中央红军各军团将领在一天之内接连收到了朱德签署的两封电报。其一:

林、聂、彭、杨、董、李、罗、何、邓、蔡:

甲、我军渡过金沙江，取得战略上胜利和进入川西的有利条件。现追敌企图渡江跟追，但架桥不易，至少须四五天，西昌来援之敌前进甚缓，并企图从两翼迂回。同时，爆炸会［会理］城亦须十四号始能完成坑道作业。

乙、因此，我野战军以扼阻追敌、打击援敌并爆炸会城之目的和部署，决在会理及其附近停留五天［十五日止］，争取在长期行军后的必要休息与补充，如情况变化，当缩短此停留时间继续北进。

丙、依上述决定，我各兵团应以备战姿势进行部队中尤其新战士的战术教育、队列整理，开干部及连队会议传达战斗任务，检阅工作，加紧扩红、筹款及地方工作等。但牵制部队须加强沿江警戒，攻城部队须加强坑道作业与收买硝药，其他兵团则须以消灭援敌为一切部署中心，不得丝毫懈怠，以实现全部战斗胜利，以便继续夺取西昌而北上。

朱德

十二日

其二：

林、聂、彭、杨：

A、党中央决于今十二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望彭、杨、少奇三人及林、聂赶于今午十四时到铁场。

B、彭、杨不在时，由叶［叶剑英］、袁［袁国平］代理指挥。

C、林、聂不在时，由左［左权］、朱［朱瑞］代理。

朱德

十二号

铁厂是会理城郊的一个小居民点，从地名上看似乎和铁匠铺有关。

五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一个草棚子下召开了。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地点，为的是容易对空观察，避免遭到轰炸——想必会理会议召开的时候，从这里可以看见县城方向冒出的滚滚硝烟。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之后，敌情暂时得到了缓解，但是红军内部的不同意见却产生了。

导火索是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写给党中央的一封信。信的原始内容无从查找，但众多史料都引述了其核心内容：这段时间以来，部队在云贵川边东奔西拐，行军太多，走了许多不必要的弓背路。难道非走弓背不能走弓弦吗？部队已精疲力竭，再这样下去会被拖垮。建议

更换前线指挥，以改变目前的困境。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应主持军事大计，前线指挥最好叫彭德怀负责。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的行军路线确实极其复杂曲折。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理解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在敌人重兵追堵的情况下，在生存成为唯一目的的时刻，不可能有时间就每一次行动都对红军部队作出更多的解释，因此极度的疲惫令一些红军官兵产生牢骚可以理解。回首历史，至少不能断言林彪的这封信是在搞阴谋，因为他在信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而且他在信中直白地提出了彭德怀的名字。

会理会议上，还是张闻天首先发言。他在发言中严厉批评了林彪对毛泽东军事指挥战略的怀疑。接着，毛泽东在发言中详尽阐述了自四渡赤水开始，中央红军成功地运用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摆脱了国民党军队合围和追击的过程。朱德和周恩来在随后的发言中支持了毛泽东的观点。但是，当彭德怀表示他也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时，毛泽东的语气一下子变得严厉起来。他批评红军中有人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在困难中产生了动摇情绪。更为严重的是，彭德怀感到毛泽东的批评是针对他的，因为毛泽东的话表明他认为林彪是受人鼓动才写了这样一封信。果然，当毛泽东面对林彪时，竟是一番语重心长，他对林彪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对的，这一点不容置疑。渡过金沙江后，我们不是摆脱了国民党的追兵吗？不是实现了北渡长江的计划吗？下一步，要研究同四方面军会合。为了实现我们的战略目的，我们多跑一些路，走了一些弓背，又有什么关系呢？打仗就是这样，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这不值得发牢骚讲怪话。天下的事，有时并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你想这样，却偏偏一下子办不到；等你转了一圈回来，事情又办成了。遵义会议后，军事领导是正确的，要相信这一点，不要有怀疑和动

摇。一直沉默不语的林彪想替自己辩解一下，毛泽东却说："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

在中国革命漫长的征战岁月里，毛泽东与林彪之间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信任关系。林彪是中国工农红军中最年轻的军团将领，他所带领的第一军团是最能打仗的红军部队之一，与彭德怀率领的第三军团往往是中央红军的前锋部队。林彪给中央写信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已经不止一次了。早在井冈山时期，他就给毛泽东写信对红军的前途表示担忧，毛泽东用了整整五天的时间给林彪写了一封长达六千多字的回信，这就是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那篇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文章。在那封信的开头，毛泽东写道："新年已经到来几天了，你的信我还没有回答。一则有些事忙着，二则也因为我到底写点什么给你呢？有什么好一点的东西贡献给你呢？"在这封信的最后，毛泽东充满深情地告诫林彪的话语后来传遍了整个中国："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眺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中央红军进入云南扎西地区时，总结此前战斗失利的原因，大家认为林彪的红一军团没能打下土城和没有顶住川军的攻击，是导致中央红军被迫放弃北渡长江计划的主要原因。林彪作为中央红军主力军团的指挥员，连蒋介石都从来不敢小看他，部队的战斗失利和遭遇同志们的批评令他很是郁闷。接下来，中央红军连续在贵州境内声东击西，红一军团一直处在没日没夜的奔波转战中，甚至曾经一个昼夜奔袭两百里路，林彪的不满情绪更加严重了。中央红军进入云南抢渡金

沙江，红一军团奉命背离金沙江佯攻昆明，然后又奉命限时返回金沙江边，不少官兵在强度极大的行军中掉队。部队渡过金沙江后，林彪萌生了更换红军前线指挥员的念头。他把自己的想法对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说了，遭到了聂荣臻的反对。多年后，聂荣臻依旧记得他当时对林彪说过的话：

> 革命到了这样紧急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了遵义会议，你现在又来反对遵义会议，你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先不讲别的，仅就这一点，你也是违反纪律的。况且你跟毛主席最久。过去在中央根据地，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敌人几次“围剿”都粉碎了，打了很多胜仗。你过去保存了一个小本子又一个小本子，总是一说就把本子上的统计数字翻出来，说你缴的枪最多。现在，你应该相信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

彭德怀，这个耿直倔强从来不肯低头的硬汉，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只要一回忆起会理会议上发生的事，便会心情沉闷：“当时也未介意，以为这就是战场指挥呗，一、三军团在战斗中早就形成了这种关系：有时一军团指挥三军团，有时三军团指挥一军团，有时就自动配合。”尽管彭德怀并不知道林彪给中央写信的事，但在会上，面对毛泽东的批评他没有辩解——“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但大敌当前，追敌又迫近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误会总是有的……我就没有申明，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

彭德怀与毛泽东首次见面是一九二八年平江起义之后。那时，彭德怀率领起义部队到达了井冈山宁冈县，在一间农舍中，他见到了早已听说的那个高个子的红军领袖。毛泽东用彭德怀熟悉的湘潭乡音对他说：“你也走到我们这条路上来了，以后我们要在一起战斗了。”从那时起直至红军转战到会理，他们之间从未有过严重的分歧。然而会理会议以后，毛泽东用一句“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原谅了林彪，但

认为是彭德怀鼓动了林彪的阴影始终在毛泽东的心里。彭德怀说:“主席大概讲过四次，我没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同志谈过此事。”直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召开时，毛泽东又一次提到会理会议，在场的林彪才表明:“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三十五年后，为了新中国浴血奋战了一生的彭德怀身陷囹圄，他在一份又一份的自述材料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从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当谈清楚好。”

会理会议进行了两天。

在重大军事决策上，没有出现任何争论。

会议确定了中央红军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向北前进，穿过彝区，抢渡大渡河，实现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合。

会理会议召开的时候，红三军团和干部团对会理县城的攻击始终没有停止。五月十五日，随着一声巨响，会理城墙终于被红军利用挖地道的办法炸开了一个缺口。但是，由于守城的川军还在大量灌水，爆炸的威力受到了严重减损，城墙坍塌处的缺口不大，虽然红军官兵拼死突击，但是最终仍被川军的火力所封堵。这个夜晚，会理成了一个癫狂之地，枪炮的闪光横贯县城上空，川军点燃的大火将四野照得一片通亮，城墙上的川军大喊大叫如同开了锅一样，刘元瑭甚至把县城里的小学生都动员起来上了城墙跟着喊叫，似乎喊叫得越凶会理县城就越安全。结果，成百上千人的叫喊此起彼伏，连绵不断，震荡夜空。

但是，喊叫了一个晚上，清晨时分，刘元瑭却发现红军没了踪影。

五月十五日，中央红军从会理出发了。

这支经历了重重艰难险阻的红军此刻已经有了十分明确的前进目标：北上，与强大的红四方面军会合。

就在中央红军从会理出发的第二天，红四方面军在茂县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还在江油的时候，红四方面军破译了蒋介石与川军的通电。从敌人的电报中，张国焘得到了一个令他吃惊的消息：中央红军仅剩不足三万人了。茂县会议的议题之一就是如何尽快占领有利地区，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会议决定由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八十八师、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各一部西进小金川地区，扫清敌人，并派出联络部队去寻找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会上引发争论的是关于欢迎中央红军的口号。徐向前不赞同陈昌浩提出的“欢迎三十万中央红军”的口号，尽管当时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都认为中央红军有三十万之众，但至少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们已经知道中央红军遭受了巨大损失。最后，会议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

一九三五年五月三十日，张国焘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成立宣言》。宣言指出：“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的成立，树立了西北革命斗争的中心，统一了西北各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从此南取成都、重庆，北定陕、甘，西通青、新，进一步与中央红军西征大军打成一片。中华苏维埃革命不仅在东南各省更加巩固发展，从此在西北也打下了强固的基础，这便是给帝国主义国民党蒋介石一个致命的打击，同时也是赤化全西北具体的开始。”宣言表明：“只有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西北联邦政府，才是中国和西北民众自己的政府，唯一救中国救西北救穷人的政府。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坚决实行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全部政纲！”宣言最后号召：“全中国工农群众们！各民族穷苦弟兄们！快快

起来为中国和本民族的独立自由，为了民众自己的生路，快快武装参加作战，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誓率红四方面军三十万健儿和你们拼最后的一滴血！”

西北联邦政府的成立，日后成为张国焘架空中央的证据之一。

另一个证明张国焘的野心的证据，是他随后以主席名义发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临时政府布告》：

西北革命的总指挥部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临时政府，遵奉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命令，于苏共五年五月三十日在红四方面军伟大胜利，西北一万万五千万汉、回、番、蒙、藏、苗、夷劳苦群众热烈斗争和拥护之下正式宣告成立。

本政府自成立日起，坚决率领红四方面军三十万健儿，陕甘红二十六军、陕南红二十五军、川南红九十三军，并团结和领导西北一万万五千万民众配合中央红军六十万西征大军，以钢铁力量贯彻下列主张：

一、联合一切反蒋反帝的力量，工农劳苦民众武装打倒出卖康、藏和西北，出卖中国的卖国汉奸蒋介石、刘湘、胡宗南、邓锡侯和一切卖国的国民党军阀，驱逐帝国主义出四川出中国，收复康、藏，收复东北、华北，保卫西北领土，为救中国救西北血战到底；

二、实行各种保护劳苦群众利益的政策，取消国民党军阀的苛捐杂税，没收地主阶级的财产、土地、粮食、衣物、茶叶、布疋、牛、羊，分给穷人和回、番、蒙、藏、苗、夷民众，工人八小时工作，增加工资，保护劳动妇女和劳动青年的利益，穷人有吃有穿；

三、实行民族自决权，回、番、蒙、藏、苗、夷各民族得组织自己苏维埃或人民革命政府，各民族一律平等，得各以自己的意志，各族联合起来加入本西北联邦政府，政教分离，信教自由；

四、给广大工农劳苦民众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欢迎革命学生和脱离反动统治的知识分子和专门家到苏维埃政府下边工作，欢迎白色官兵投诚，参加红军分土地，和红军一路去打帝国主义国民党。

本政府号召各地工农和弱小民族的劳苦民众一致武装起来参加作战，为实现这些主张而斗争，实现赤化全川、赤化西北的完全胜利。

本政府是西北一万万五千万工农和回、番、蒙、藏、苗、夷劳苦群众的政府，一切对穷人和弱小民族有好处的事情，本政府誓以全力实行，一切危害和侵犯穷人和弱小民族利益的匪类，本政府坚决消灭之。

特此布告周知。

主席 张国焘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年五月

尽管张国焘自任主席的这个“联邦政府”打着“遵奉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命令”的旗帜，但是，苏维埃中央政府从来没有批准成立这样一个“联邦政府”——和彻底放弃川陕根据地一样，这是张国焘擅自作出的决定。在中国工农红军两支重要的主力军即将会合之际，张国焘成了政府主席的确令人疑窦丛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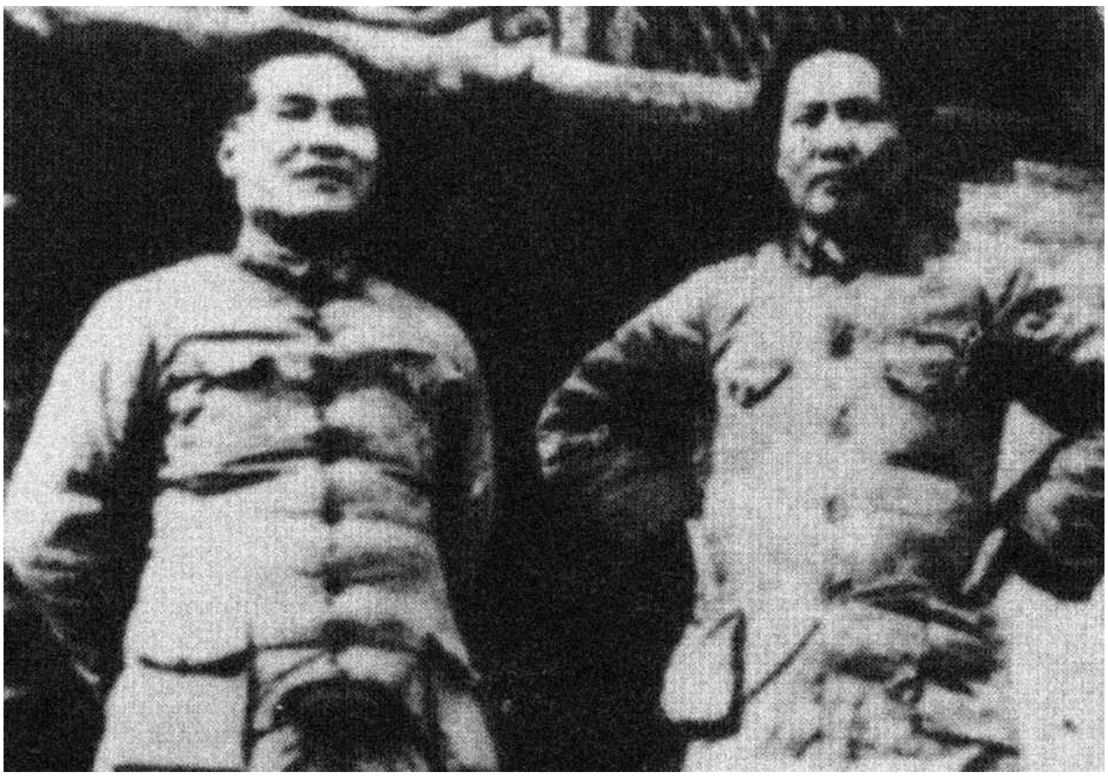
尽管在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的中间还横着一条比金沙江更危险的大河，但是，对于经历了太多苦难与艰辛的红军官兵来说，两军会合无异于一个盛大的节日。

红四方面军为迎接中央红军开始大量地筹集物资，并且号召全体官兵每人都要准备一个礼物送给中央红军的官兵。

张国焘给毛泽东准备的礼物是一个“联邦政府”。

# 第十三章 喜极之泪

1935年6月·四川达维



川军旅长许剑霜驻守德昌。红军将领刘伯承在川军中任第一路前敌指挥时，他曾是刘伯承手下的一个团长，一九二六年参加了朱德、刘伯承领导的泸州起义和安顺起义。起义失败后，他投靠了在四川陆军讲武堂时的同学刘元璋。德昌原来的守军只有许剑霜旅的一个营。当得知中央红军从会理继续北上并很快就要达到德昌时，川康边防军司令刘元璋本来准备把德昌也放弃，以便集中兵力守卫川南重镇西昌。但是，德昌是一个富裕的县城，县城里的不少豪绅又是他的相

识，在这些豪绅的一再恳求下，刘元璋觉得这个时候无论如何不能抛弃朋友，于是命令许剑霜带一个团前往德昌加强防守力量。

许剑霜到达德昌的时候，刘伯承写给他的信也到了。刘伯承在信中除了重叙旧谊之外，还奉劝许剑霜不要与红军为敌，让开一条道路给红军通过。许剑霜反复权衡了利害之后，让亲信把这封信火速送交了刘元璋，并恳切地建议刘元璋接受刘伯承的要求。

信送走之后，许剑霜没有得到刘元璋的回音。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六日黄昏，中央红军先遣部队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到达德昌外围的隘口丰站营和八斗冲，川军仅仅打了几枪就撤退了，而且一退便退得无影无踪，中央红军顺利地进入了德昌县城。

德昌果然物资丰富。中央红军的后续部队在这里休整了两天，想必刘元璋的那些豪绅朋友们损失巨大。

丢了德昌的许剑霜退回了西昌，立刻遭到了刘元琮和那个被蒋介石擢升为陆军中将的刘元瑭两兄弟的辱骂。刘元琮早有兼并许剑霜旅之意，因此两兄弟坚决要求把“通敌”的许剑霜杀了。刘元璋平时就很难驾驭这两兄弟，他也明白他们杀许剑霜的真正意图；而如果真把自己昔日的这个同学杀了，恐怕连自己的地位也很难保住。于是，刘元璋说：“哪有通敌的人会把敌人的信送给我的？”

天很蓝，风很猛，从会理北上，中央红军的队伍一直沿着安宁河谷前进，河谷东为大凉山，西为雅砻江流域山脉。这里是四川西南部最荒凉的地区，但却草木葱郁，山花怒放，整个河谷犹如一条景色秀丽的走廊。沿途集镇和村庄里的百姓大部分跑了，因此，红军的队伍穿行时寂静无声。最穷苦的人照例对红军的到来很感兴趣，红军官兵

和他们搭话，送给他们食物。胆子大些的小贩在路边卖面饼和汤圆，冲着红军的过路队伍大声吆喝。

过了德昌，再往北就是西昌了。

刘元璋坐镇西昌，决定死守，并调集自己指挥的所有部队向西昌靠拢。

在西昌，比刘元璋的国民党正规军更霸道的部队，是地方武装邓秀廷的队伍。邓秀廷在西昌一带是著名人物。邓家世代居住在这里，家族上溯几代就已形成了强大的地方势力，其祖父被称为“九蛮王”，在这里的彝民中有相当的号召力。邓秀廷接了其祖父的班，当上了地方团总。他照搬祖父“以夷治夷”的办法，挑拨彝民不同分支族系之间的冲突，自己从中操纵控制，并动用武力屠杀反对他的彝民。几年前，他“征剿”西昌附近的马家彝人，竟一口气烧毁了三十多个彝寨，杀了一千多人，灭了彝族中的五个分支族系，结果“远近支彝望风投降”。这样一个土匪式的人物，却被国民党正式任命为“彝务指挥官”。邓秀廷的部队虽然仅有两个团，但是他有随时调集上万彝兵的能力。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的时候，邓秀廷奉命防守距西昌上百公里的宁南一带。他率领一个团和五千彝兵赶赴宁南，中途遇到了从金沙江前线溃逃回来的刘元璋的部队。国民党正规军的狼狈溃逃令邓秀廷平生第一次感到了恐惧。因此，在接到增援西昌的命令后，他的部队一路行动迟缓。走到一个叫黄水塘的地方时，邓秀廷接到了刘伯承的信。信的内容有两点：一是红军不以彝民为敌，即使彝兵向红军开枪红军也不会还击；二是红军北上的目的是去抗日，因此路是一定要过的，如何对待红军请邓秀廷自己考虑。这个著名的红军将领曾经是著名的川军将领，刘伯承的信让邓秀廷很是犹豫不决。打吧，刘伯承的厉害人人皆知，恐怕打不过红军；不打吧，在刘氏兄弟那里怕说不过去。邓

秀廷召集手下人反复商量对策，最后决定看情况再说，能打就打一下，不能打就赶快跑，当然要是能趁机捡回点枪支弹药什么的更好。邓秀廷把部队布置在安宁河谷两边的山上，然后对彝兵军官们说：“今天的事，不比往常，要当心些，非有我的命令，不能开枪。”

在德昌通向西昌的河谷中，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走进了邓秀廷的防区。趴在草丛中观察的邓秀廷在看见红军的那一瞬间就决定绝不能开枪，因为“红军的部队来得很密”。眼看着红军陆陆续续地过了河谷，突然，枪声响了，是一个不听约束的彝兵开的枪。这一枪响过之后，不少彝兵跟着开了枪。邓秀廷怒火万丈地用彝话大声制止，而河谷里的红军不但没有还击，而且还大声地喊叫起来。懂得汉话的邓秀廷听见红军在喊“汉彝一家，汉彝是兄弟”。混乱很快地平息了。但是，红军刚过去，国民党军的飞机来了。彝兵绝大多数没见过飞机，于是他们像打鸟一样开始朝飞机射击。邓秀廷马上命令他的副官把事先发下来的对空识别标志拿出来铺在地上。但是，副官仅仅记得对空识别标志似乎是在哪个马驮子里，于是开始一个挨一个地找。正找着，炸弹就朝他们扔下来了。一阵猛烈的轰炸之后，邓秀廷的部队二十多人被炸死，其中包括一个叫邓华钦的连长。

收拾了混乱不堪的部队，邓秀廷一撤就撤到了西昌以北六十公里处的冕宁。他的撤退使西昌外围没有了任何防守部队，川西南这座重镇被彻底暴露在了中央红军的面前。

西昌城坐落在富饶的西昌坝子中。这里是川军刘元璋部的最后防线，如果西昌失守，刘元璋的部队将无处可去。因此，为了守住西昌，刘元璋构筑了三道阻击线：第一道是城外的旧城城墙；第二道是依安宁河构筑的工事；第三道是拆除南门外西街商业街的所有房子，只留下那面沿街的墙壁作为阻击掩体。对于这道阻击线的修筑，刘元

璋很是动了脑筋，因为约两里长的西街是西昌城最繁华的地段，店铺林立，商贾云集，如果要彻底烧毁，定会激起民愤。但是，刘元琮坚决主张烧，说如果不烧，红军的攻城部队就会利用这些房屋接近城墙。西昌一旦失守，命都保不住，还管什么民愤不民愤。刘元璋还是犹豫，说烧也要等红军接近时再烧，那时候可以说是红军放的火。两人之间关于烧与不烧争吵不休，最后用电报请示了位于雅安的军部，军部回电说等红军接近的时候再烧不迟。但是，刘元璋还是放心不下，那些靠近城墙的民房确实是大患。想了一夜，第二天刘元璋召集商会代表和士绅代表开会。会上，刘元璋极力渲染红军的厉害，说要守住西昌城必要烧西街，但是烧街又会使民众损失很大。说到这里的时候，他真是一副痛苦为难的样子。结果士绅们纷纷表示，为了保全西昌愿意承担烧街的损失。刘元璋趁势赶紧暗示士绅，让他们联名写一个请求烧街的请愿书。拿到了“请愿书”的刘元璋胆子一下子大了起来，在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距离西昌至少还有三十里的时候，刘元琮就下达了放火的命令——先是把城门用石条顶死，然后从城墙上往下泼洒煤油。火一点燃，不但繁华的商业街被烧毁，比邻的两条街也被焚毁了。

刘元璋和他的官兵紧张地等着红军的攻击。

但是，等了一夜，未见动静。

天亮的时候，有人报告说，红军的队伍在西南十五里的地方整整走了一夜，现在往泸沽方向去了。

消息在西昌城内传开，刘元璋立即受到了猛烈抨击，士绅们纷纷要求他赔偿损失。

中央红军绕过西昌，到达了泸沽县城。从这里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是大路，偏向东北，从越西到大树堡渡河，河对岸是富林，直通成都。另一条是小路，偏向西北，经冕宁，通过彝区，到达安顺场，渡过大渡河后是雅安地区。自古以来，从川西南北渡大渡河，来往行旅客商只知大路，因为那条小路不但崎岖难行，而且彝区从不准汉人通过。

在大渡河布防的是川军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其中，第四旅守泸定桥一带，第五旅守安顺场和富林一带。同时，刘湘派出的增援部队正沿着大路向富林开进——国民党军判断中央红军要走大路。

五月二十日，中央红军先遣队到达泸沽城。刘伯承认为，如果川军死守横在大路上的富林，中央红军要从大树堡渡口渡过大渡河将十分困难，因此建议中革军委改变行军路线，选择小路从安顺场方向渡过大渡河。关于必经彝区的问题，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说：彝族分黑彝和白彝，黑彝是纯粹的彝族血统，是彝族的上层；白彝是彝汉混血，属彝族的下层。他们之间有矛盾，矛盾的主要起因是彝人对汉人的猜疑和敌对，这是国民党当局长期奉行民族歧视政策的后果。但是，只要红军工作得当，是有通过的可能的。聂荣臻对刘伯承说："不管黑彝白彝，总比刘文辉好说话吧？"两个人统一了意见之后，立即给中革军委起草电报，电报的具体建议是：从泸沽兵分两路，主力部队和中央纵队秘密改走小路，从安顺场附近渡过大渡河。同时，派刘亚楼和左权带领红一军团二师五团佯装主力，继续顺着大路前进以迷惑敌人。但是，由于中革军委正在行军的路上，电报无论如何也联系不上，时间不能耽误，刘伯承命令继续呼叫军委电台，同时先遣队向冕宁前进。出发前，刘伯承专门给先遣队作了动员：红军就要通过彝区

了，彝人对汉人猜疑很深，语言又不通，他们可能会向我们开枪射箭，没有命令绝对不能还击。

晚上，在中共冕宁地下党员廖志高和陈野萍的带领下，刘伯承率领中央红军先遣队到达了冕宁县城。这座县城里竟然没有任何一支川军防守。为了不打扰居民，先遣队司令部设在了城内的一座天主教堂里。红军进驻的时候，刘伯承把教堂里的神职人员集合起来，向他们宣传了红军的宗教政策。教堂里的几个法国修女对面前这个被传说为“土匪首领”的红军将领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感到万分惊讶。

五月二十一日，中革军委在接到刘伯承、聂荣臻的电报的当天，向中央红军各军团下达了向安顺场前进的命令:

林、刘、聂、彭、杨、董、李、罗、何、邓、蔡:

……

各兵团今二十一晚至明二十二日晚行动部署如下:

1、刘、聂率我先遣第一团续向拖乌、筲箕湾前进，日行一百二十里，准备至迟二十四号午前赶到渡口。左［左权］、刘［刘亚楼］率我第五团，如查明越西无敌或少敌应迅速进占越西，并侦察前至大树坪、富林及由越西至海棠之线中间向西去的道路、里程；如小相岭或越西有敌扼守，则五团应伪装主力先头在登相营或小相岭扼制该敌。一军团主力今晚二十一时起开往冕宁，以便随一团前进并策应其战斗。

2、军委纵队今夜进至石龙桥［冕宁］。

3、五军团今晚二十一时起经泸沽开至石龙地域，准备二十三日超过军委纵队，仍归林、聂指挥。

4、三军团除留必要部队带电台监视西昌之敌，以掩护和接应九军团今夜或明日通过西昌外，其主力今夜应进至起龙、礼州地域。

5、九军团通过西昌城外进至锅盖梁及其西北地域后，应即布置掩护阵地，筑野战工事，以便扼阻西昌及由南来之追敌。

C、为绝对保持改道秘密，必须：

1、泸沽至冕宁道上严禁被敌机发现目标，不准挂露天标语，上午七时半至十时半，下午三时半至五时半，严禁部队运动。

2、一军团部队对去路，三、九军团对来路，要断绝行人出去。

3、严密搜捕敌探。

D、冕宁至渡口有两站缺粮，各兵团应在礼州、冕宁之线补充粮食，离冕宁时带足三天。

E、关于搜集架桥材料，经冕宁起应严格执行昨日电令。

朱德

二十一号十八时

对于中央红军来讲，在遭遇巨大损失的湘江战役之后，一次近乎赴汤蹈火的行动就此开始了。

毛泽东和蒋介石此时都在读同一本书：清末北洋幕僚薛福成所著的《庸庵文续编》，书中记述了一八六三年一支农民起义军在大渡河边全军覆没的悲惨遭遇。

大渡河，长江的支流之一。河不甚宽阔，但是水流汹涌，河床上乱石丛生，河面上旋涡处处，自古无法泅渡，一旦失足落水，无论水性多高超也必死无疑。大渡河两岸悬崖陡立，一条在悬崖上凿出的小路沿河而去。要想渡过大渡河，只能靠木船摆渡，由于河水流速极快，必须把渡船拉到渡口上游几里之外，然后放船，船工奋力闯渡，才能将船斜冲到对岸。

七十二年前，太平天国石达开的部队在大渡河边被清军包围，结果是伏尸遍地，血流成河，四万农民起义军最终全军覆灭。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命运起伏，几乎是太平天国起义兴衰史的写照。一八五四年，石达开受命主持军务，这个聪慧勇猛的农民领袖很快以痛歼湘军水师、收复武昌、进军江西而声名大振。在接连占领了五十余座县城后，石达开的农民起义军把湘军将领曾国藩困在了南昌城的大营里。接着，农民起义军占领区连接了皖赣鄂三省的广大区域，开创了太平天国的鼎盛时期。一八五六年，太平天国内部的互相残杀开始，石达开受到了洪秀全的猜疑，这迫使他于一八五七年率二十万起义军离开了南京城，开始了长达六年之久的辗转作战。这是一支没有后方基地的部队，先后进入浙江、福建、湖南、广西、湖北、云南、贵州和四川，不断地在清政府军的围剿下遭受重创。一八六三年的春天，石达开率残部四万人从云南渡过金沙江北上，到达川西南西昌附近。石达开的计划是：渡过大渡河，然后夺取四川平原。

石达开离开西昌之后的北上路线，正是现在中央红军要走的那条通往大渡河的小路：经冕宁到达大渡河边，渡河后至雅安地区。在这条崎岖的小路上，石达开买通了彝族土司，于五月十四日到达安顺场。安顺场渡口三面临山，一面临河，没有任何回旋余地。被收买的土司突然改变立场，配合清军将四万农民起义军紧紧包围。石达开在

大渡河南岸整整徘徊了一个多月，多次企图渡河都因水流湍急和清军的阻击而失败。其间，在一次强渡时，大军已经渡过了一万人马，但是天黑了，石达开认为渡过河的前锋将背水作战，没渡过河的部队将与前锋被截为两段，于是，一向用兵谨慎的他下令已经渡过河的那一万人撤回来："我生平行军谨慎，今师渡未及半，倘官军卒至，此危通也，不如俟明日毕渡。"——既然有时间又有能力把已经渡过河的一万人撤回来，为什么不连夜再抢渡过去一万人巩固对岸渡口？——当农民起义军再一次准备强渡的时候，石达开的一个妻子在大渡河边生了个儿子，被围困的大军立刻停止了渡河，决定在这个绝地"庆贺三天"。三天过去了，大渡河水由于山洪暴发"陡高数丈"，石达开四万人的大军因此被困岸边。清军趁机连日发动猛攻，起义军苦战之后粮弹断绝，大渡河上漂满了起义农民的尸体——"浮尸蔽流而下者以万计余。"最后时刻，石达开决定率领起义军决死一战："吾起兵以来十四年矣，越险岭，济江湖，如履平地，虽遭难，亦常嚏而复奋，转退为攻，若有天佑。今不幸陷入绝境，重烦诸君血战出险，毋徒束手受缚，为天下笑，则诸君之赐厚矣！"但是，清军已经逼近了起义军的大本营。面对即将全军覆没的悲惨结局，石达开决定"舍命以全三军"。他写信给清廷四川总督骆秉章，求自己一死而赦免他的部下。骆秉章假意受降。六月十三日，石达开命令士兵把他的五个妻妾全部扔进大渡河，然后自己一人走向了清军的营帐。被俘后的石达开在成都经过严刑审讯，最终被清政府以最残酷的"凌迟"处死。而他的部下两千多人并没有被赦免，在放下武器后全部被杀。

现在，进入了大渡河地区的中央红军依然没有退路：后面，有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和周浑元的追击部队；西面，有滇军孙渡部沿着雅砻江的布防；东面，有川军杨森的第二十军和郭勋祺、陈万仞等部的联合阻截；前面，大渡河上的主要渡口已经布满了川军刘文辉的部队

——中央红军进入了一个狭窄封闭的地域里，如果一旦被大渡河所阻挡，挣脱被围歼的命运就等于是一场血战死拼。

蒋介石再读《庸庵文续编》时感受复杂。当中央红军渡过了金沙江后，他曾经部署在金沙江和大渡河之间彻底消灭中央红军。但是，计划还没有执行，他就被中央红军在渡过金沙江后停留会理所困扰了。蒋介石并不知道红军在会理停滞不前是在开会解决问题，而是认为红军在会理停留多天必有蹊跷——在与共产党人的多年对立中，毛泽东给了蒋介石太多的意外，以致现在无论红军作出什么举动，蒋介石都会首先感到其中有诈。但是，等了几天之后，蒋介石发现毛泽东并没有什么惊人之举，而是沿着当年石达开走的路线北上了。这时，他想起了中央红军刚刚离开江西苏区的时候，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秘书长杨永泰说过：红军很可能渡过金沙江进入川西。当时蒋介石认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毛泽东是懂得历史的，中国版图如此之大，毛泽东为什么非要走石达开的死路？疑惑重重的蒋介石在忐忑不安中度过了几天，当情报最终证实中央红军向着大渡河边的安顺场走去时，蒋介石这才感到毛泽东成为“石达开第二”的结局已经注定了。

之前，中央红军曾在无线电中收听到了《四川日报》的一条新闻，题为《蒋介石委任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指挥并以骆秉章诱杀石达开相勖勉》：

六日本报载杨森将衔新命，现此种新命已经发表。十五日蒋委员长自昆明来电，任命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指挥，并拨二十一军、川康军一部约四旅，归其指挥调遣，借以巩固雷［雷波］、马［马边］、峨［峨边］、屏［屏山］防务，保障川南。蒋委员长原电中，并以清代活捉石达开之川督骆秉章相勖勉。现杨森氏已遵命就职，亲赴大渡河积极设防，准备予匪以迎头痛击。

雷波、马边、峨边、屏山四县，全都位于通往大渡河的大路以东方向，蒋介石把防守的重点并没有放在从冕宁向北的安顺场，这说明他依旧不相信精通历史的毛泽东会选择与石达开完全一样的旧路。

对于川军杨森，毛泽东并不熟悉，和杨森熟悉的朱德说，蒋介石的这个任命是“一石两鸟”，既考验了杨森对他的忠诚，也可借此机会拉拢杨森，促使杨森率川军与红军血拼一场。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一定会避免走石达开的旧路，毛泽东对这样一种心理十分清楚；但是毛泽东认为，石达开之所以被围困在安顺场而不能渡河，根本的原因是他收买的那个彝族土司背叛和出卖了他，不然清军也无法顺利地通过彝区来到大渡河边。毛泽东说：“顺利渡过大渡河的关键是和彝人关系的处理。”在给刘伯承率领的先遣队送行的时候，毛泽东特别嘱咐，先遣队的任务与其说是打仗开路，不如说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如果红军模范地执行民族纪律，取得彝人的信任，抢渡大渡河的行动就能取得胜利。为此，毛泽东特别命令十九岁的萧华带领一支红军宣传队跟随先遣队一起行动。

如果不是严峻的军事形势所迫，中央红军也不会走到这条路上来。

既然走到了这里，就要坚决地走下去。

虽然走的是同一条路，但是中国工农红军绝不是石达开的太平军。

读过了《庸庵文续编》的毛泽东深刻地知道这一点。

但是，读过了《庸庵文续编》的蒋介石绝不会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

这就是历史得以丰富的原因。

最先受到彝人袭击的，是走在先遣队后面的工兵连。工兵连奉命跟随红一军团一师一团赶往大渡河架设浮桥。临出发时，团长杨得志和政委黎林亲自到连里进行了政治动员，强调说必须以实际行动取得彝人的信任，无论如何都不准向彝人开枪，谁开枪就是违反了红军的军纪。

工兵连跟在先遣队的后面。在古木参天的崎岖山路中行进的时候，他们越走越觉得不对劲儿，因为很多架设在山涧上的独木桥被拆毁了，这令红军官兵不得不边走边砍树架桥。刚一走进俄瓦拉山口，他们发现掉队了。这时候，隐藏在山林中的彝人开始向他们开枪射箭。紧接着，前面有一队男男女女向他们跑来，而且无论男女一律赤身裸体，这使工兵连的红军官兵既紧张又惊讶。这些自称来自外省的过路客商说他们遇到了彝人，不但东西全被抢光，连衣服也被扒光了。在进一步的询问中，红军官兵终于弄明白了，这些遭到彝人袭击的汉人根本不是什么客商，而是为了躲避红军从县城里逃出来的国民党官员和他们的家眷。工兵连的红军官兵有些担心起来。大家议论说，我们一不是压迫彝人的官员，二不是剥削穷人的财主土匪，彝人会把我们怎么样？正说着，呼哨声四起，工兵连被一群手拿土枪长矛的彝人包围了。尽管在队伍最前面的三排排长反复解释，但是根本没有用，随着号角的吹响，围上来的彝人越来越多，并开始动手抢夺官兵们的武器和架桥器材，最后开始扒他们身上的衣服。官兵们实在忍无可忍，拉了枪栓准备反抗。指导员罗荣大声地喊：“总部命令，不准开枪！”

光着身子的工兵连只好往回走，没走出多远，就看见侦察连的几个同志带领着一个彝人也在往回走。侦察连的同志说：他是这一带沽

基家族彝人的头目，叫小叶丹，我们要带他去见咱们的总部首长。工兵连还看见了坐在路边休息的六团一营的官兵。红军战士看见工兵连竟然赤身裸体，禁不住开玩笑说："工兵连很凉快呀！这是到哪里洗澡去了？"营长曾保堂命令大家赶快凑衣服。衣服不够，又从供应处弄来了不少麻袋，让工兵连的官兵暂时围在身上。

这件事弄得工兵连官兵情绪很大。事情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表扬了工兵连执行纪律坚决。同时，毛泽东还跟工兵连的官兵打趣说："到了人家倮倮国，你们也算是入乡随俗嘛。"

毛泽东让部队准备了一些酒、绸缎和枪支，然后请来了当地那位名叫小叶丹的彝族头人。彝族头人对红军将领能够平等对待他们很感动，因为平时国民党军队和国民党官员很看不起他们。从彝族头人那里，毛泽东了解了这一带彝人族系的情况，并且指示刘伯承尽快和彝人首领达成协议，以免红军主力和中央纵队通过的时候遇到不必要的麻烦。

红军总司令部以朱德的名义发布了布告，布告是一段顺口溜：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

一切彝汉平等，都是兄弟骨肉。

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

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

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

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

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

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

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

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

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

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

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

见到刘伯承，小叶丹首先解释说，刚才抢红军东西的不是他的家族，而是与他们对立的罗洪家族。在这个地区，彝人基本上分成三个族系，即沽基、罗洪和洛伍。经过三方代表的交谈，罗洪家族由于抢了红军，人都已经跑了，其头人不肯再露面；洛伍家族表示出中立的立场，而沽基家族的小叶丹愿意和红军继续谈判。刘伯承从解释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到红军北上抗日的道理，一直到满足彝人的各项要求和红军过路的种种细节，耐心地与小叶丹商谈，最后以结为兄弟为条件结盟。这是共产党人少有的举动，仪式按照彝族沽基家族的传统进行：两碗清水，杀一只雄鸡滴血入内，然后双方宣誓。刘伯承说："上有天，下有地。刘伯承愿与小叶丹结为兄弟。"双方把血水一饮而尽。结盟仪式后，刘伯承邀请小叶丹和他的小头人们一起吃饭。红军把附近一个小集镇上的酒全部买了下来。酒席中，小叶丹表示，如果明天罗洪家族的人再袭击红军，他就带人把罗洪家族的村寨烧了。刘伯承劝解道："彝人之间要团结一致，共同对付欺压彝人的国民党军阀。"这个观点让小叶丹很是折服。最后，刘伯承送给了小叶丹十几支步

枪。按照彝人的最高礼节，小叶丹把自己骑的大黑骡子和两名漂亮的彝族女子一起送给了刘伯承。

黑骡子正好可以驮物资和伤员。

彝族姑娘就算是参加红军了。

刘伯承把结盟的消息报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非常高兴地问一向严肃的刘伯承："听说结盟的时候要跪下，你先跪的哪一条腿？"

红军将领和沽基家族的结盟，对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彝区至关重要。在以后的行军中，不但袭击红军队伍的事件很少发生，粮食的筹集也相对顺利了一些。小叶丹还专门派出彝人武装护送红军先遣队赶往大渡河渡口。

与沽基家族对立的罗洪家族也曾经派人来试探红军，他们派来的探子是一个赤裸着身体的十四岁的彝族女孩儿。这个女孩儿径直走进了中央纵队的队伍中，她立即受到了朱德的妻子康克清的欢迎。女红军们不知道这个女孩子的身份和任务，对她表示出了极大的友善和关爱。康克清给她穿上了干净的衣服，招待她吃东西，还送给她很多女孩子喜欢的小礼物。女探子高兴得连蹦带跳地离开了。从此，罗洪家族的彝人再也没有攻击红军的举动。

为了加深共产党人在彝人中的影响，红军专门留下了一名负伤的红军团政委，以帮助小叶丹组织起与国民党军对抗的武装力量。这支力量后来联合了包括罗洪、洛伍家族在内的一千多人，几乎相当于一支红色游击队。当薛岳的国民党中央军追击到这里的时候，虽然也按照蒋介石的命令给彝人准备了大量的礼物，但是薛岳发现共产党在这里的影响已经很深，于是他立即命令给每一个彝人紧急"消毒"。国民

党任命的那个“彝务指挥官”邓秀廷把红军留下的那位团政委逮捕了，小叶丹家族倾家荡产，用一千五百块大洋把人赎了出来。但是小叶丹最终还是被邓秀廷以“通共有据”的名义杀害于大桥镇。被害之前，小叶丹对弟弟沽基尼尔说：“红军把咱们彝人当人看。刘伯承这样的大人物是守信用的。我死了之后，你要告诉刘司令，咱们彝人相信的是共产党和红军。”

五月二十四日，刚刚走出彝区的先遣队到达了距安顺场渡口三十公里处的擦罗小镇。小镇上只有二十户人家，但却有一座刘文辉供给西昌守军的粮库。当穿着国民党军服的一团到达这里的时候，粮库守备官还以为来的是中央军，立即上酒端肉热情款待。一团团长杨得志带领官兵们故技重演，不但在宴席上大吃大喝了一顿，而且还接收了粮库守备官如数交出的军粮。这笔数目巨大的粮食让先遣队喜出望外但又不知如何处理：白花花的大米总计二十四万斤，用六十斤装的大麻袋一共装了四千包。在把川军守备官兵俘虏了之后，这批粮食被红军总部分配给了各军团，剩余的全都分给了镇子周围的穷苦百姓，不论男女老幼一人一麻袋，百姓们个个兴高采烈，直说：“红军好！红军来了把刘家的米给我们吃！”

当晚八时，在翻越了最后一座山头后，刘伯承看见了从山峡间汹涌而出的大渡河，看见了令石达开四万农民军伏尸遍野的安顺场渡口。

与此同时，在大渡河下游的大路上，由红一军团二师五团、侦察连和军团便衣侦察队组成的佯装主力的第二先遣队，由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和二师政委刘亚楼率领，也接近了大渡河。

这支部队顺着通往大渡河的大路，经泸沽，向越西县城方向前进。大路上没有彝人的阻拦，却有川军的阻击。在小相岭隘口，川军挖断了道路，架上了吊桥。军团侦察科科长刘忠和便衣队副队长范昌标带领一个侦察班，在当地一位采药老人的引导下，绕到了川军阻击阵地的后面，突然向守卫吊桥的川军发动了袭击，一举占领了小相岭隘口。越西县城的川军向这里打来电话，但是电话始终没人接听，县城里的川军立即意识到隘口丢失了，他们作出的决定竟然是放弃县城，向大渡河渡口方向撤退。川军的撤退导致了包括越西县长在内的所有国民党地方官员的大逃亡。因此，通过了小相岭隘口的红军第二先遣队没有经过战斗便占领了越西。

县城显然刚刚受到破坏，到处是残砖破瓦。原来三月的时候，四千彝民不满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在越西附近的三个县同时举行了暴动，并且围困了越西县城。正当县城几乎被彝民攻破的时候，由于中央红军的接近，大批川军的增援部队到达了这里，暴动的彝民被迫跑到了附近的山上。现在，他们听说越西城里的国民党军都跑了，彝民断定能够吓跑国民党军的红军必定是自己的朋友，于是纷纷下山进入县城来欢迎红军。进入越西的红军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监狱打开。在彝族和汉族群众的注视下，红军战士用大木杠反复撞击监狱的大铁门，随着监狱大门的訇然倒塌，三百多名因参加暴动被俘的彝人一拥而出。红军给每个彝人发了布匹、食物和银元，给全城的穷人分了粮食。结果，整个越西城内要求参加红军的青年就有近千人，其中彝族青年达四百人。当第二先遣队从越西出发继续北进的时候，欢送他们的彝、汉群众抬着猪肉和酒站满了街道两旁。一些没被批准参加红军的彝、汉青年跟随着红军的队伍，一直跟出去很远。

五月二十三日，第二先遣队到达了大树堡附近。红军接近大渡河渡口的消息引起了川军的恐慌，川军王泽浚旅派出一个连从大渡河的北岸渡了过来。这个连到达南岸后，在大树堡渡口以南的鱼塘要隘上放了一个排，在渡口上放了一个排，其余的兵力驻扎在大树堡镇的街里。他们命令这里的群众在街上堆放木柴和稻草，准备红军一到就放火烧街。

到达了鱼塘要隘的红军第二先遣队决定分三路进攻大树堡：一路占领要隘，一路攻击大树堡镇，一路直接占领渡口。战斗短促，大树堡镇里的川军还没来得及放火，红军就冲了进来，俘虏了川军的连长。防守渡口的川军一听响起了枪声，争相上船逃往北岸。赶到渡口的红军没有向他们射击，故意放他们回去报信。

就在刘伯承看见了安顺场的灯火的时候，左权和刘亚楼也到达了大树堡渡口。与刘伯承率领的这一路红军秘密接近渡口不一样，左权和刘亚楼率领红军官兵们开始了大规模的“渡河”准备。他们公开征集造船和搭浮桥的材料，动员群众砍毛竹、拆房屋，甚至声势浩大地组织群众把国民党政府的区公所拆了。在把拆下来的木料运往河边的时候，红军官兵组织群众使劲儿地喊着号子。为了震慑川军和扩大声势，红军还把从越西逃到这里的县长彭灿拉到河边，先召开了公审大会，然后当着对岸川军的面，把彭灿的脑袋砍了下来。

川军急忙调兵加强大树堡渡口北岸的防守，一共调来了五个团，再加上富林的地主武装羊仁安的部队。结果杨森部署在大渡河下游的近两万川军，在中央红军抢渡大渡河的过程中，除了一个连曾一度与红军的一支小部队发生了接触之外，竟然连红军的影子都没有看到。红军第二先遣队冒充主力的佯渡行动收到了效果，至少在五月二十五日以前，蒋介石依旧没有确定中央红军抢渡大渡河的确切位置。

五月二十四日夜，大雨。

到达安顺场附近的刘伯承从一团团长杨得志那里得到了基本敌情：在安顺场防守的是川军第二十四军第五旅余味儒团的韩阶槐营。

韩营长原来是这一带有名的哥老会头目，他的部队基本上是上下都拜了“把子”的袍哥兄弟。团长余味儒让他在这里防守的原因，也是认为他能利用在安顺场的势力联合这里的地方武装。韩阶槐到达安顺场后，为了确保渡口的安全，命令把南岸所有的船只和粮食全部弄到北岸，然后强迫安顺场的百姓们搬家，在街上堆起柴草，准备放火烧街以扫清射界。不知道是巧合还是韩营长有某种预感，他预定的放火时间是五月二十四日。这一天，中央红军先遣队赶到了安顺场。但是在中央红军先遣队之前，还有一支队伍也赶到了安顺场，这就是从西昌逃到这里的邓秀廷部的残兵，带领这些残兵的是邓秀廷的营长赖执中。

要说在安顺场，赖执中的势力比韩阶槐还大，因为赖执中是安顺场最大的财主，安顺场大半条街的房屋都是赖执中的财产。五月二十四日，赖执中刚到，正好碰见韩阶槐的一个连长准备放火烧街，结果烧街的举动被赖执中毫不迟疑地阻止了。赖执中和那个连长争执起来，两个人一直扭打到河北岸，打到了团长余味儒那里。舍不得自己的家产的赖执中陈述了他的理由。他说自己刚从西昌那边跑回来，确切地知道红军已经顺着大路去了大树堡渡口，根本没有走安顺场这条小路。余味儒听了半信半疑，但赖执中一再保证说，只要红军到达安顺场，他立刻带头放火烧街，于是余团长默许了。回到了南岸的赖执中还不放心，私下里违反军令，偷偷在南岸留下了一条船，准备万一红军打来时自己逃到北岸去。

赖执中偷偷藏下的这条船，成全了即将渡河的中央红军。

二十四日夜晚，朝着安顺场方向，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冒雨奔袭。

刘伯承知道，用不了一个昼夜，大渡河的南岸就会聚集起千军万马。眼下，大雨中的刘伯承只想着一件事：能否找到船?

刘伯承命令把一团一营营长孙继先找来。看见孙继先，刘伯承说的第一句话是："知道石达开吗？就在这里，他的四万人没了。"这位二十二年后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导弹基地司令员的红军营长说："我不管他十达开还是九达开，参谋长下命令吧！"刘伯承说："二营去下游牵制和吸引敌人，三营是先遣队的预备队，占领渡口的任务交给你们一营。你马上去完成三件事。第一是拿下安顺场，占领后放上一堆火作为信号；第二是迅速找到船，找到了再放一堆火；第三，把一切渡河工具准备好以后，再放一堆火。三堆火都点起来，后续部队就上去。"

晚二十二时，在团长杨得志的率领下，一营分三路：一连攻正面，二连和营重机枪排从东面，三连从西面，在大雨中向安顺场扑了过去。

韩阶槐和赖执中都侥幸地认为红军走大路去了大树堡。当一营的红军官兵悄悄地摸进了安顺场的时候，川军还在哨所里高声唱着川剧。枪声骤起，川军顿时混乱成一团，不是被打死打伤就是被俘。赖执中慌忙翻墙逃跑，翻墙的时候脚扭伤了，他的卫兵背起他跑到山上的彝民家里藏了起来。

一营二连的另一个任务是寻找船只。他们顺着河到处找，不见任何船，正着急，看见河边有个黑乎乎的东西，细一看，是赖执中的家

丁正准备划船往北岸跑。红军官兵们决不能让这条船跑了，他们在漆黑的雨夜里大叫起来，奋不顾身地扑了上去，硬是把这条船给拉了回来。营长孙继先一看有了船，立即命令把船拉到上游去做渡河准备。但是，这条木船很大，红军官兵又没有拉船的经验，船在湍急的河水中不停地原地转圈，折腾了近一个小时才把船拉走。

刘伯承和聂荣臻在大雨中盯着安顺场方向，希望能看见孙继先点起的三堆火，但是一直等到了凌晨三点，一堆火也没看见。侦察员回来报告说，渡口已经被占领。于是刘伯承跑到了河边，边跑边喊孙继先的名字。孙继先跑过来，刘伯承大怒："你跑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点火？"孙继先这才发现自己只顾作战和弄船，把点火的事忘了。刘伯承听了孙继先的汇报，尤其是听到已经搞到了一条船，火气顿时消了。本来准备立即渡河，但是百姓说无论如何晚上不能渡河，实在是太危险。刘伯承想了想说："一营睡觉！天亮了，街里能够搞到什么好吃的全给你们吃，吃完了准备抢渡！"

这个夜晚，刘伯承没有睡觉，他找来有经验的船工，不但询问了渡河的种种问题，连操船的优厚报酬以及万一遇险的后事安排都谈妥了。看来红军准备在大渡河上架设浮桥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当地的船工们说，连在河中插一跟木桩都是不可能的，游水过去更是不可能。只有靠唯一的一条船，先把对岸渡口占领了再说。

五月二十五日拂晓，大雨停了。

早晨七点，一营在大渡河边集合完毕，官兵们都要求第一个抢渡。

聂荣臻说："谁也别争，由你们营长下命令，叫谁去谁就去。"

营长孙继先想起几个月前，在乌江边的回龙场渡口，也是他挑选的渡江突击队队员。

一营的三个连争起来。

杨得志团长决定，突击队队员在二连中挑选。

连长熊尚林点名。包括他自己在内，一共十七人。

每人一支驳壳枪，一支冲锋枪，一把马刀和八颗手榴弹。

天色逐渐亮了。被大雨洗刷过的悬崖高高矗立，悬崖脚下大渡河水奔流咆哮。红军官兵看得很清楚：对岸一个小村的四周修筑着工事和碉堡。

连长熊尚林下达了命令，突击队队员开始上船。

刘伯承突然问："赵章成来了没有？"

参谋回答说："迫击炮和重机枪已设置完毕。"

刘伯承说："告诉赵章成，咱们的炮弹没有几发，瞄准那几座碉堡，要打准！"

赵章成，那个红军中十分著名的神炮手，尽管他每次打炮前都要祈祷一番，但是关键的时候，他总能让红军宝贵的炮弹显示出惊人的威力。

木船离岸了。

八名船工奋力划桨。

对岸的川军很快就发现了红军的这条船，射出的子弹和炮弹把木船四周的河水打开了锅。南岸红军的掩护火力也异常猛烈。木船在急流和弹雨中艰难地向北岸靠近的过程显得十分漫长，站在岸边的红军官兵眼看着船上的突击队队员中弹，眼看着船一头撞向河中的礁石上。刘伯承万分紧张，如果唯一的一条船抢渡失败，南岸也就没有船了，其后果不堪设想。在红军官兵焦急的呐喊声中，操船的四个船工跳下了水，脚踏礁石背靠船帮用力将船再次推进水里。船在极大的旋涡中随时有翻覆的危险，船上剩下的四名船工奋力掌握着船的平衡。岸上的红军官兵的嗓子都喊哑了："机枪打呀！快撑船呀！"

红军的机枪手已经打红了眼，大渡河北岸硝烟弥漫。

船终于从礁石边的旋涡中挣脱了出来，在距离北岸还剩下五六米远的时候，船上的红军突击队队员突然站了起来。川军也从北岸那座小村庄周围的阻击工事中冲出来了。对于已经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的红军来说，这一刻只要稍有迟疑就会在瞬间内被消灭。

杨得志急促地命令重机枪压制川军的反击。

赵章成这一次没有事先祷告就开火了。这个有着丰富战斗经验的炮兵连连长早已把射击参数算准了。两发炮弹出去，不偏不倚地在川军冲击队伍的正中爆炸了。

重机枪手李得才的火力跟着赵章成的炮弹，死死地封锁住了川军的反击路线。

突然，从抢渡一开始就吹响的军号声停了。

刘伯承和聂荣臻几乎同时喊道："怎么不响了？怎么不响了？"

原来，小司号员发现首长们都聚到了前沿，怕号声引来敌人的子弹就停止了吹号。

刘伯承说:“赶紧吹！”

小司号员再次举起军号时，不知是已把力气吹尽，还是因为首长在身边太紧张，竟然一时吹不出声了。当过号兵的萧华一把拿过号用力吹了起来。

木船“轰”的一声撞上了河岸。

川军的手榴弹雨点一样滚下来，岸边的悬崖石壁上响起了一连串的爆炸声。红军突击队队员从硝烟中穿过，沿着石壁上的台阶冲上了川军的阻击阵地。

大渡河安顺场渡口北岸被红军的突击队占领了。

在中国工农红军战史上，这些名字将永远熠熠生辉:

二连连长熊尚林。二连二排排长罗会明。二连二排三班班长刘长发。二连二排三班副班长张表克。二连二排三班战士张桂成、萧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二连三排四班班长郭世苍。二连三排四班副班长张成球。二连三排四班战士萧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民、陈万清。

将突击队送过河的那条木船掉头返回，运送第二批突击队队员到了北岸。

然后是第三船、第四船、第五船……

刘伯承对参谋说：给军委发电报，大渡河渡口已经被我军突破。

二十六日，大雨倾盆。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和中央纵队在大雨中向安顺场急促前进。

中革军委命令每个官兵都要扛两根毛竹，毛泽东自己扛了四根。在路上休息的时候，毛泽东遇到一位当地的老秀才，他向老秀才问起当年石达开的事，老秀才看看毛泽东身前身后的队伍，半天才说出一句话："大军切勿在此停留。"

部队必须迅速渡河，一刻也不能耽搁。

但是，当毛泽东到达大渡河边的时候，他的担心终于成了现实。

目前，红军一共找到四条船。而且只有一条是好的，其余三条都需要修。刘伯承计算了一下：一条船的最大容量是三十个人，往返一次最少要一个小时。从占领了北岸之后到现在，一天一夜仅仅渡过去了一个团。如果按照这个速度，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需要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可是，薛岳的国民党中央军已经越过了德昌正向大渡河急促挺进，川军杨森的部队距离安顺场也只有三四天的路程了。中央红军根本没有一个月的渡河时间。

一个新的渡河方案形成了：在此兵分两路。红一军团一师和干部团继续从这里渡河，渡河后组成右纵队，由刘伯承和聂荣臻指挥，沿大渡河北岸向上游的泸定方向前进，以接应从那里夺桥渡河的红军大部队；红一军团二师和红五军团为左纵队，由林彪指挥，沿大渡河南岸奔袭至上游的泸定桥，在那里夺桥渡过大渡河。其他部队和中央纵队随后，一律立即改变行军路线向泸定桥前进。

这是一个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作出的冒险决定。

首先，此刻红军无法确定位于大渡河上游的泸定桥现在是否还在，即使那座桥还没有被川军破坏，红军也无法确定那里现在有多少守桥部队。其二，命令所有的部队改路前进，从安顺场到达泸定桥有一百六十公里的路途，沿途的情况未知。其三，红一军团一师和干部团继续在安顺场渡河，其他部队改由泸定桥渡河，这就意味着中央红军将被大渡河分隔成两部分。一旦从泸定桥渡河失败，中央红军将成为分散的两支部队，而会合将会使红军再次付出代价。最后，中革军委决定：从最坏的情况打算，如果泸定夺桥渡河失败，两支红军不能会合，将由刘伯承和聂荣臻单独率领部队"到四川去搞个局面"。

五月二十六日，对于大渡河边的中央红军来讲，一个破釜沉舟的决定以命令的形式向各军团发布了：

林、刘、聂、彭、杨、董、李［抄送邓、蔡］、左、刘：

A、安顺场及其下游之小水、龙场三处共有渡船四只，因水流急，每天只能渡团余，架桥不可能。同时由安顺场至泸定桥之铁索桥仅三站路，由泸定桥可直趋天全、雅安或芦山。我第一团现在龙场对岸之老铺子，扼阻并监视其东北山地之刘敌第七团，一师明午可全部渡完。

B、我野战军为迂回雅安，首先取得天全、芦山乃至懋功，以树立依托，并配合红四方面军向茂县行动，决改向西北，争取并控制泸定桥渡河点，以取得战略胜利。其部署：我第一师及干部团为右纵队，归聂、刘指挥，循大渡河左岸；林率一军团军团部、二师主力及五军团为左纵队，循大渡河右岸，均向泸定桥急进，协同袭取该桥。军委纵队及三军团、第五团、九军团循一军团部及二师主力行进路线跟进。

C、一军团之第一师应于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两日由安靖坝先后经瓦狗坝、龙八布，以两天半行程达到泸定桥急进。经瓦狗坝、龙八布时，应向清溪方向各派出警戒部队，待干部团赶到后撤收。干部团主力明二十七日开安顺场渡河，接替老铺子第一团任务，以一部留龙场、小水警戒并监护渡船。

D、一军团部及二师主力，于明拂晓起亦以两天半行程由安顺场经田湾、楂维到建沙坝、泸定桥急进。五军团明晨由现地经新场、安顺场进至海罗瓦、草罗沟之线。

E、三军团明晨应由海棠或海棠以南西转至洗马姑、岔罗之线，并须到岔罗补充足五天粮米。

F、第五团仍留大树堡及万公堰、大冲南岸，续行佯渡，惑敌一天，并准备二十八号向海棠、洗马姑转移。

G、各兵团均须在岔罗、安顺场补足五天粮食。

H、军委纵队明日集中安顺场。

朱

五、二十六

中央红军各军团再次面临极大的困难：沿着大渡河南北两岸向上游泸定桥前进的部队，必须在两天半的时间里奔袭万分崎岖而又敌情未知的山路。仅就路程而言，一百六十公里的路途意味着必须以每天五十公里以上的速度急行军。同时，位于安顺场下游的红三军团必须立即向西靠拢，不然就无法追上突然转向的主力。尤其是由左权和刘亚楼率领的红一军团二师五团，他们顺着大路到达大树堡佯装主力后，必须不顾一切地追上在小路上的主力；但是现在主力部队改变了

行动路线，从大树堡到泸定桥比到安顺场远了整整一倍，且他们被命令坚持到二十八日才能动身，其追赶路途的遥远和艰辛可想而知。

五月二十六日，中央红军兵分两路夺取泸定桥的决定，当天就被国民党军的情报部门所截获。

蒋介石紧急由重庆飞往成都，重新部署了对中央红军的“围剿”计划。川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不敢怠慢，立即命令第四旅袁国瑞部火速向泸定方向增援。袁国瑞命令其第三十八团团长李全山沿大渡河南岸阻击向泸定桥前进的红军，第十一团团长杨开诚沿大渡河北岸阻击向泸定桥方向接应的红军，第十团团长谢洪康率领部队为总预备队，第四旅旅部进驻龙八部。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一百六十公里的路途都是沿大渡河两岸崖壁凿出来的山路。

这是敌对两军的赛跑，目标是泸定县城西面那座在十三根铁索上搭成的摇摇晃晃的吊桥。

南岸，中央红军的前锋是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

二十七日清晨，四团出发了。刚刚沿着河边小路走出十五公里，就遭到了河对岸川军的射击。两岸距离很近，甚至可以相互喊话，川军的射击对急行军的红军干扰很大，于是四团决定不与对岸的川军纠缠，离开小路上山。他们在大山中绕来绕去，大约又走了十几公里，遇到了一个连的川军正在这一带搜集粮食往北岸运。四团的先头连一个冲锋，把川军的这个连打跑了。追击的时候，由于一座小桥被川军炸断，水流湍急不能徒涉，红军官兵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架桥，因此耽

误了追击的时机。继续前进不久，真正的敌情出现了，一个营的川军把守着一个叫菩萨岗的隘口。黄开湘和杨成武为打还是不打商量了好一会儿，因为如果绕路时间损失太大，最后决定还是打上一仗在时间上更划算。隘口实在险要，左边的山陡峭之极，往上看帽子都要掉下来；右边是无法通过的一条河。敌人在隘口上修筑了碉堡。如果强攻，只能从左边的悬崖上绕到敌人的后面。三营担任了攻击任务。营长曾庆林亲自率领一个连从左翼迂回，其他两个连负责正面进攻。迂回的战术起到了效果，川军没想到红军能从悬崖上爬到自己的身后，当他们还在和正面进攻的红军抵抗时，身后响起了一片杀声。川军的营长骑马逃跑，马腿被红军打断，这个营长被活捉了。此仗用的时间很短，但是战果很大。川军的三个连全部被歼，红军俘虏一百多人，缴获枪支一百多支，其中机枪就有十多挺。

战斗结束后，四团接着赶路，午夜时分，他们在距安顺场四十公里的地方停下来休息，决定明天清晨五点继续前进。

第二天四团按时出发，没走出几公里，军团指挥部的通信员骑了匹大黑马旋风一样地追了上来，交给了黄开湘和杨成武一张纸条。军团长林彪写来的这张条子让两位年轻的红军指挥员倒吸了一口冷气：

黄、杨：军委来电限左路军于明天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高速度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你们要在此次战斗中突破过去夺取道州和第五团夺鸭溪一天跑一百六十里的记录。你们是火线上的英雄，红军中的模范，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此一任务。我们准备祝贺你们的胜利！

这就是说，四团必须在一天之内走完一百二十公里的路程，于明天早晨六点之前到达泸定桥。

如果要完成这一任务，即使按照急行军的速度，也得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奔跑才行。没有时间进行动员。四团立即跑步前进。团政治处的同志跑在了最前面，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们在跑，敌人也在跑。如果让敌人跑在了前面，整个红军就危险了。”官兵们就说：“咱们四团一直是红军的尖刀，这把刀什么时候都不能卷了刃。”

前面又出现了一个川军把守的隘口。没有时间观察敌情，组织了一个先头营就往上摸。仅仅用了十分钟，先头营摸了上去，一个冲锋就把川军冲垮了。顺着山路，四团官兵在这股川军的屁股后面猛追，一直追出去十几公里，追到了一个叫摩西面的大山前，溃逃到这里的川军和在这里防守的川军会合在一起，起码有两个营以上，但是四团犹如开了闸的洪水，根本停不住，没等命令就冲了上去。川军被冲得没了命一样开始逃跑，跑的时候把小路上的一座桥给破坏了。重新架桥用了四团两个小时的时间。过了桥的四团继续奔跑，一口气又跑了二十多公里，傍晚七点，部队到达一个紧靠大渡河的小村庄时，杨成武计算了一下，距离泸定桥还有六十公里。

仅仅喘了一口气，四团继续奔跑。

夜深了，一道闪电划过山谷，暴雨瓢泼而下。

这是一个万分艰难的夜晚。大雨中四周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因为有敌情，不能点火照明；但山路湿滑崎岖，一脚踏空就会跌下深渊。在这样的路上，红军官兵不能缓慢地移动，而是要竭力奔跑。更严重的是，官兵们已经整整一天没有停下来吃口饭了，每个人的体力透支几乎都到了极限，如果一旦倒下就很可能再也起不来了。这时候，红军各连队党支部的同志被分散到战士们中间，所有的党团员都配上了帮助对象，他们用绳子把体力不支的战士绑在自己的身

上，用最后一点体力拉着他们，显示出与每一个战士同生共死的决心。他们在黑暗的大雨中把身上背着的米拿出来，让战士仰起脸喝一口雨水，然后边跑边嚼湿漉漉的生大米。

四团在不顾一切地奔跑，但还是来不及了。黄开湘和杨成武算了一下，按照现在的速度，天亮时无法到达泸定桥。这时，大雨停了，突然间，他们看见大渡河对岸出现了一串火把，经过辨认，认出是川军的行军队伍。川军能够打着火把走，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如果对岸向这边联络，就让队伍里的川军俘虏用四川话骗他们。于是，四团官兵也点起了火把，而且比对岸川军的火把还要亮。点着了火把之后，黄开湘和杨成武命令把所有的牲口、行李和重武器统统留下，由一个排在后面看管，其余的官兵必须以每小时奔跑十里以上的速度前进。黄开湘要求给腿上有伤的杨成武留下一匹马，杨成武说：“咱们要走就一起走，看谁先到泸定桥。”

暗夜中的大渡河两岸，红军在南岸，川军在北岸，敌对双方的两条火龙在齐头并进。

与四团齐头并进的是川军第三十八团的一个营，营长叫周桂。周桂正奉命率部火速前往泸定桥。他挑选出全营最精壮的官兵组成了一个突击排，远远地跑在了全营的前面。这个排的任务是把这支部队的军旗插到泸定县城的城墙上，同时负责把泸定铁索桥上的木板拆卸下来。

周桂营果然向南岸的四团发出了询问信号，红军司号员根据川军俘虏的指点，用号声回答说是“自己的队伍”，并且说出了刚才被击溃的川军部队的番号。并行跑出了几十里后，北岸川军的火龙突然不见

了，司号员赶紧吹号询问，对岸的川军用号声回答说：“我们宿营了。”

大雨又下起来了。

四团官兵被对岸川军宿营的消息所鼓舞，以更快的速度向前跑去。大雨中的大渡河山洪暴发，河水冲击着黑暗中的岩石，发出震耳欲聋的怒吼。山路上不断有官兵跌倒。为了防止有人跌入河中，极度疲惫的官兵用绑腿带子把自己和队伍连接在一起，这样即使在奔走中睡着了也会不断地被拉醒。

天色逐渐亮了起来。

前面，就是泸定桥了。

在大渡河北岸，由刘伯承率领的红一军团一师和干部团也在向泸定桥奔跑。

队伍出发不久，就遇到了川军的一个团，这支部队是奉命前往安顺场阻击红军的。二团政委邓华指挥部队与川军的前哨刚一接触，川军就边打边撤，二团的红军官兵紧追不舍，一直将川军追到瓦坝附近，川军急忙向富林方向退去了。第三天，部队快要接近泸定桥了，一个叫铁丝沟的险要隘口却横在了路上。隘口的一面是大渡河，另一面是高耸的海子山，这里是川军袁国瑞旅第十一团杨开诚部的防区。因为没有时间与川军周旋作战，刘伯承命令对川军的阻击阵地发动强攻。担任先头部队的二团分成两路：政委邓华率领二营向川军主阵地的侧后迂回包抄，攻击海子山主峰；另一路由萧华率领二团主力，向海子山下的川军阵地发起正面进攻。铁丝沟果然名不虚传，一道参天的石壁之中裂开一道狭窄的缝隙，隘口的通道正好从缝隙中穿过。川

军用猛烈的火力封锁了这条缝隙，红军的几次正面攻击都未能得手。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萧华与突击连连长商量了一下，决定在火力的掩护下冲击到石壁下面，用搭人梯的办法登上敌人的阵地。掩护火力很快组织了起来，十九岁的红军指挥员萧华大喊：“共产党员们！跟我上！”对于红军来讲，这里的战斗是不进则退的背水一战。官兵们冒着巨大的牺牲，冲到了石壁下一个川军射击的死角里，然后搭成人梯翻了上去，在石壁顶上与川军展开了搏斗。支持不住的川军开始向龙八部方向撤退，一直退到了第四旅谢洪康团的阵地上。但是红军的追击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更加凶猛。在红军的连续攻击中，川军团长谢洪康自己开枪打伤了自己，并借此早早地逃出了阻击阵地。旅长袁国瑞派出了增援部队，试图继续与红军作战，但是随着伤亡的逐渐增大，川军最终开始了全线撤退。撤退之前，旅长袁国瑞接到了第三十八团团长李全山从泸定打来的电话，李团长语气慌张，说泸定桥遭到了红军的攻击，请求袁旅长赶紧派部队增援。袁国瑞一听显得很不耐烦，只说了句“我这里也很紧张”，便把电话挂断了。

铁丝沟距离泸定桥仅剩二十五公里。

二十九日清晨，沿着大渡河南岸一路奔袭而来的红一军团四团，已经向泸定桥守军川军李全山部发起了进攻。

大渡河经泸定的这段河段古称“泸水”。海拔七千多米的贡嘎雪山和海拔三千多米的二郎山隔河对峙，大渡河在奇峰险山切出的深谷中冲出，犹如脱缰的野马奔腾咆哮。这里是川康要道上的天堑。康熙四十四年，为了打通京城、成都至拉萨的通道，清廷下令在这个巨大的峡谷上架桥。这是一座由铁索支撑起来的空中吊桥，十三根碗口粗的铁索连接两岸，其中九根为桥面，四根为扶手。铁索分别固定在两岸的两根铁桩上，铁桩上刻有“康熙四十四年岁次乙酉九月造汉中府金火

匠马之常铸椿重一千八百斤”字样。桥的两端各建有亭式桥楼。北端紧邻泸定县城。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大渡河两岸间的河谷上铁索空悬。

泸定桥桥长一百零一点六七米。此刻，桥面铁索上铺的木板已被拆去，北岸桥头的桥楼已被沙袋紧围，形成了一个坚固的桥头堡垒，从堡垒的射击孔中伸出的机枪正对铁索。泸定城一半在山腰，一半紧贴河边，城墙高约两丈，上面的堡垒所配置的火力在桥面上形成了一张火网。

在北岸防守的是川军李全山的第三十八团。这个团的先头部队三营，就是与红军隔河举着火把齐头并进的那支川军。三营的先头连比红一军团四团早两个小时到达泸定桥，连长饶杰命令士兵立即拆桥板，但是由于士兵们实在太累，又有不少人犯了鸦片烟瘾，因此桥板拆得极其缓慢。三营营长周桂到达之后，增派了士兵去拆桥板，同时开始构筑阻击工事。天亮的时候，团长李全山率李昭营到达北岸桥头堡，南岸红军的四团也到了，双方没有犹豫就开始了射击。团长李全山命令周桂的三营负责守卫桥头堡，李昭营配置在两翼火力掩护。在持续了一个上午的相互射击中，李全山团竟然有五十多人受伤。

万丈深渊之间，仅凭几根铁索就想突击到河这边来，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至少川军是这么想的。因此，他们一边向河对岸射击，一边不断地向红军高喊:“有种的你们飞过来！”

下午，四团夺桥的作战方案定了：二营和三营火力掩护，特别注意用火力阻击两侧的增援之敌；一营分三个梯队正面强攻。

首先发动进攻的是一营二连连长廖大珠带领的二十二人突击队，他们必须强行攀索到达北岸；三连在他们的身后，任务是跟在后面铺桥板；三连的后面是一连，任务是在铺好的桥板上发起最后的冲锋。

下午四时，中国工农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战斗打响了。

没有任何别的可以选择的出路，只有迎着枪林弹雨强行冲过十三根寒光凛冽的铁索。

四团政委杨成武后来回忆说：

当事先准备的全团数十名司号员组成的司号队同时吹响冲锋号时，我方所有的武器一齐向对岸开火，枪弹像旋风般刮向敌人阵地，一片喊杀之声犹如惊涛裂岸，山摇地动。这时，二十二名经过精选的突击队队员，包括从三连抽调来的支部书记刘金山、刘梓华……他们手持冲锋枪，背插马刀，腰缠十来颗手榴弹，在队长廖大珠同志的率领下，如飞箭离弦，冒着对岸射来的枪弹，扶着桥边的栏索……向敌人冲去。

激越嘹亮的军号声震荡着千年峡谷。

二十二个年轻的红军勇士向铁索冲去。

铁索剧烈地摇晃起来。

川军开始了疯狂的射击，红军的掩护火力也开始了猛烈的压制。炮弹呼啸，大河两岸皆成一片火海。川军的子弹打在铁索上，火星迸溅。红军勇士一手持枪，一手抓索，毫无畏惧地一点点向北岸靠近。

三连连长王友才带领的官兵紧紧地跟在后面，他们人人抱着木板，只要前面的突击队队员前进一步，他们就在铁索上铺上一寸。

川军无法想象红军竟然这样向他们靠近了！看着在铁索上越来越近的红军，他们惊骇地瞪大了眼睛，他们不知道世间除了红军，还有什么人能够空悬在万丈深渊上顺着那些摇晃的铁索发起冲击。

南岸的军号声连续不断地怒号着。

红军所有的掩护火力愤怒地喷射着。

二十二名红军突击队队员没有一人中弹掉下深渊，勇士们在川军轻重机枪和炮火的阻击下已经靠近了泸定桥北岸的桥头堡。

这与其说是一场战斗，不如说是意志和勇气的较量。看着攀着光溜溜的铁索冲过来的红军勇士，川军目瞪口呆，惊恐万分。他们平生从未见过这样舍生忘死的场面。他们曾经听说过红军是打不死灭不尽的，今天终于亲眼看见了，他们射击的手开始忍不住地发抖。

就在红军勇士即将接近北岸的时候，北岸桥头突然燃起了大火——川军把拆下来的桥板堆在桥头，泼上煤油点燃了。

大火封住了桥头。

火势凶猛，映红了渐渐暗下来的黄昏天色。

南岸的杨成武大声喊:“同志们！这是最后的关头！莫怕火！冲过去！冲呀！敌人垮了！冲呀！”

南岸所有的红军官兵都呐喊起来:“冲呀！莫怕火！冲过去就是胜利！”

攀在最前面的廖大珠连长喊了一声：“同志们，跟我前进！”然后他站起身，第一个冲进了火海。

第二个迎着火海冲进去的，是一个苗族小战士。

接着，突击队队员一个跟着一个冲进了大火之中。

头发、眉毛和衣服都被烧焦的红军勇士冲过了火焰，冲上了泸定桥桥头堡阵地。

后续梯队踩着桥板，不顾一切地过了桥，蜂拥进泸定县城。

泸定县城里的巷战进行了两个小时。

最后的时刻，川军团长李全山得知自己的身后也出现了红军，他立即命令周桂的三营掩护团主力撤退。而周桂则把掩护的任务交给了饶杰连长。但是，饶杰连长没等红军到跟前就先跑了。周桂营长一边撤退一边收容自己的官兵，最后发现他的三营只剩下十几个人了。

傍晚时分，刘伯承率领的红一军团一师和干部团沿大渡河北岸到达了泸定桥边。

两军在桥头会合了。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晚十时，大渡河谷夜风强劲，刘伯承和聂荣臻提着马灯，在四团团长黄开湘和政委杨成武的引导下，走上了泸定铁索桥。刘伯承从桥的这头走到那一头，然后又从那头走回来。在桥中心，他停下了，用脚跺了几下桥板，铁索桥剧烈地晃动起来。刘伯承自语道：“泸定桥，泸定桥，我们胜利了，胜利了！”

第二天，由林彪率领的红一军团主力和由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团主力，以及中央纵队先后到达泸定桥。

一九三五年五月的最后一天，毛泽东走上了泸定铁索桥。走到桥中央，毛泽东扶着冰冷的铁索说：“应该在这里立一块碑。”

多年后，聂荣臻这样评述了中国工农红军何以能够突破大渡河：“这是全体红军集体作战的结果。没有红四团英勇无畏，川军不会如此就放弃了抵抗。没有红五团去大树堡吸引敌人，红一团在安顺场能否抢渡成功还是个疑问。如果不是红一师从安顺场渡了河，威胁了泸定守敌的背后，泸定桥能否顺利得手也很难预料。如果我们不能夺取泸定桥，我军将是个什么处境？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的牺牲精神，是任何敌人不能比的。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就能够绝处逢生，再开得胜之旗，重结必胜之果。”

二十二名抢渡大渡河的红军勇士每人得到了一套列宁服、一支钢笔、一个笔记本、一只搪瓷水杯和一双筷子——这是当时中央红军官兵所能得到的最高的物质奖励。二十二名勇士的大部分姓名已无从查考，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战史》中留有姓名的仅五人：

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二连连长廖大珠。

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二连政治指导员王海云。

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二连党支部书记李友林。

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三连党支部书记刘金山。

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三连副班长刘梓华。

今天，泸定桥畔矗立着一个红军士兵的巨型雕像，雕像年复一年地面对着汹涌澎湃的大渡河水。每当晚霞满天，喧闹的生活沉寂下来，如果你靠近这个红军士兵，也许会听见他依然在重复那位著名的红军将领说过的话："我们胜利了！"

刚刚摆脱了危机的中共中央在泸定县城作出了一个微妙的决定：派政治局委员陈云离开中央红军经上海去莫斯科。

陈云在天全县一个叫灵关殿的地方离开了中央红军。

中共中央派陈云去上海白区恢复党的组织，同时设法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这一决定的作出是基于这样一个现实：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组织上必须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于长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这次会议事先没有向共产国际请示，事后也没有汇报，这在中国共产党以往的历史上是破天荒的。遵义会议不但更换了中共中央的领导，还剥夺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权力，这样重大的事件如果不能取得共产国际的认可，将关系到目前的中共中央是否"合法"的问题。特别是在当时的中共中央内部，一些干部已经习惯了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指挥，他们对没有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遵义会议决议始终抱有怀疑的态度。

当时，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是王明和康生。

中央红军在贵州二渡赤水以后，因为没有大功率的电台，只能派人去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当时派出的人是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潘汉年。潘汉年化名杨涛到达上海，发现党的组

织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连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敦也被捕了。没有办法完成任务的潘汉年只能先辗转到香港以寻找新的时机。

潘汉年没有参加遵义会议，因此派一个参加过遵义会议的人去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一直是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一个愿望。

陈云是一个合适的人选。

陈云在一个小学教员的带领下，利用当地哥老会的关系，通过了川军的检查线进入天全县城，然后经雅安到达成都，又通过刘伯承的关系安全抵达重庆，在那里他乘轮船到达了上海。在上海，陈云与在香港的潘汉年取得了联系，他们决定分别起程去苏联。

就在中共中央千方百计地试图恢复与共产国际联络的同时，共产国际也在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试图恢复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一个叫史蒂夫·纳尔逊的美国青年曾受王明的委托带着五万美金来到上海，但是这个美国青年除了把美金交给了在上海的一个德国人和一个俄国人之外，再也没有了任何消息。后来，共产国际又派了一个叫张浩的同志去上海，张浩是中国共产党老资格党员，原名林育英，是中央红军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的堂兄。林育英是带着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回中国的，在共产国际的“七大”上，对中国共产党现状毫不知情的共产国际依旧选举了王明、毛泽东、朱德和张国焘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

当陈云一行到达莫斯科的时候，林育英已经在去上海的路上了。

到达莫斯科的陈云和潘汉年向共产国际汇报了遵义会议决议，以及中共中央和中国红军领导人的变动，还有目前正在进行的军事转移的情况。

共产国际肯定了遵义会议决议，肯定了张闻天和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共产国际的肯定，是毛泽东政治上的胜利。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采取了政治上的灵活机动战术，巧妙地回避了王明路线这一敏感话题，而且还违心地表明党的“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同时，毛泽东坚持让共产国际认可的张闻天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也依旧被留在了政治局里，这些都使遵义会议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少了许多阻力。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对于毛泽东的政治生涯来讲至关重要。

在泸定县城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还讨论了中央红军下一步的行军路线。踏着那些摇摇晃晃的铁索走到了大渡河北岸的红军将领们，此时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强烈的念头：尽快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结束没有尽头的移动。

从泸定向北有三条路可以选择：走西面，要从大雪山的西麓绕过去，是一条马帮走的小路，通往川北的阿坝地区，由于绕路，这条路的路程较长。走东面，是一条大路，沿途都是人口稠密的城镇，可以直通成都，但是这条路上肯定会有敌人重兵把守。还有一条路，在东西两条路的中间，由于需要翻越险峻的雪山，连马帮都很少通过。

会议决定中央红军走中间这条路。

当时，中央红军并不知道红四方面军的确切位置。但事后证明，这条中间的路恰恰是两军会合距离最近的一条路——此时此刻，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中间，仅仅隔着一座雪山。

向雪山前进首先要翻过大渡河北岸的二郎山，翻越二郎山必须经过一个叫林化坪的集镇。从大渡河沿岸溃败下来的川军袁国瑞旅堵在了红军的这条必经之路上。

红一军团一师向被土围子围起来的林化坪发起了攻击，镇子很快就被红军占领。阻击的川军逃到了镇北的一个险要的山垭口凭险据守，一师的攻击持续了一个晚上，山垭口依旧没有被攻破。

清晨时分，红一军团二师师长陈光和政委刘亚楼把黄开湘和杨成武叫来了，说：这里距离大渡河仅仅几十公里，中央红军的大队人马即将到达。如果不赶快开辟出前进的道路，调动完毕的敌人一旦发动反击，情况就会非常危险。因此，要不惜一切代价迅速拿下这个山垭口。

细雨霏霏，莽莽丛林和层层山峦都被遮盖在浓重的雨雾中。只有一条很窄的小路顺着山势蜿蜒向上，小路的一边是悬崖，另一边是峭壁，阻击主阵地就在峭壁的顶端，川军在小路上和路的两旁都埋了地雷。

攻击任务交给了四团六连。

刘亚楼问六连连长黄霖有什么困难，黄霖说：“连队一天多没吃饭了。”

部队本指望打下林化坪镇的时候得到粮食补充，但是占领了这个镇子之后才发现，川军已经把镇子里的粮食全都转移走了。

刘亚楼说：“告诉师机关和直属队，把干粮全给六连！”

吃了干粮的六连很快消失在被雾气笼罩的山林里了。

红军官兵刚开始向崖壁攀爬，川军的冷枪就飞了过来，其中一颗流弹把指导员的脸擦伤了。连长黄霖说：“好兆头，好兆头，这叫见面红！”

六连攀上了山腰，山风渐渐强劲，吹散了云雾。黄霖观察了川军的阻击阵地，发现左边的崖壁没有设防，于是决定从左边爬上去，打他个措手不及。

崖壁上野藤和乱石交错。遇到笔直的峭壁，六连就搭人梯，有官兵被苔藓滑倒坠落了下去，人梯接着就被后面的战士连接起来。在接近崖顶的一道石壁前，一个战士爬上了一棵古树，利用树梢的柔韧，居然荡到了悬崖顶的边沿。他在那里落下站稳后，从上面放下了系在一起的绑腿带子。下面的官兵一个跟一个拉着绑腿带子往上爬。爬上崖顶，每一个人都大汗淋漓。黄霖督促官兵检查枪支准备战斗。这时，一个战士看见一股白雾飘上了崖顶，再一细看就看出了蹊跷：这不是雾而是烟，冒烟的地方就是敌人的主阵地。

黄霖一声令下，六连的官兵抱着枪从陡坡上开始往下滑。

不管下面是什么，只管直接向敌人滑下去！

果然是川军的阵地。川军受不住湿冷的天气，正在烤火。他们无论如何不会想到红军会从头顶伸出的崖壁上落下来。

六连没有任何犹豫，管他是一个团还是一个旅，机枪朝着阵地来回扫射。

川军借助兵力优势试图将六连压下去，但是身后是绝壁的六连如同大树一样死死地扎在山崖上。黄霖下达了上刺刀的命令，在敌人近

得可以听见喘息声时，六连的决死拼搏开始了。在六连牵制敌人的同时，四团主力从正面冲上了阻击阵地。团长黄开湘和政委杨成武看见了令他们震惊的情景：山崖上到处是川军丢弃的武器和尸体，数十名红军官兵躺在血泊中，和敌人的尸体摞在一起。三排长的身后是一条长长的血迹，他一直爬到敌人的机枪前，与这个川军射手紧紧地抱在了一起。黄开湘团长看见牺牲的三排长时，忍不住落了泪，年轻的红军排长身上布满了还在冒血的弹孔。二排长也已经奄奄一息，手里还握着刺刀，刺刀的刀刃深深地插在一个川军的肩胛骨里。一排长没负重伤，但也是浑身是血，黄开湘和杨成武上来的时候，他正抱着一挺"花机关"向川军逃跑的方向扫射，他一边打一边说："我早就想缴获一挺这玩意了。好使！真好使！"看见主力来了，他扔掉手中的机枪，蹲在牺牲了的三排长跟前哭了。

杨成武万分悲痛。他们都是他生死与共的战友。在以往艰苦征战的日子里，他和他们每个人都拉过家常，他知道他们每个人梦想着什么。梦想还没有实现，他们就死在了这个细雨中的山崖上，年轻得还都没有结婚成家。不知道以后革命胜利了是否还会有人记得他们，自己是否能有机会再来这个荒僻的山崖看望他们。杨成武走到一排长身边，替他擦着脸上的血，将他抱了很久。这位一直想得到一挺"花机关"的红军排长在不久后的战斗中也牺牲了。

中央红军开始通过林化坪。整整一夜，周恩来站在没过脚脖子的烂泥中指挥部队。毛泽东也在徒步行军，他把担架让给了身边一位正生着病的工作人员。突然，国民党军的飞机来了。毛泽东仰起头去看，一颗炸弹朝着他落了下来，警卫员们飞身扑了过去……巨大的爆炸声响过之后，警卫员陈昌奉被爆炸的气浪推出去很远，警卫员胡昌保被严重炸伤。毛泽东和医生们赶快给他包扎，但是这个小红军已经

呼吸微弱。毛泽东抱着胡昌保轻声说："会好起来的，会好起来的，我们抬着你走。"小红军胡昌保说："主席，我感觉血都流进我的肚子里了。我不行了。我没什么牵挂，主席多多保重！"胡昌保死在了毛泽东的怀中。毛泽东把胡昌保平放在地上，当他站起身的时候，他掉了泪。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黄有凤说，这是他第一次看见毛泽东掉泪。战士们挖了个简单的土坑，毛泽东把一条毛毯盖在胡昌保的身上，安葬了这个小红军。队伍继续前进，走出很远后，毛泽东又迈着大步折了回来，在胡昌保的坟上又添了一把土，然后才离去。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翻过二郎山后，迅速突破川军在天全、芦山的阻击线，接近了大雪山夹金山。

中革军委收到了红四方面军的电报，电报称已派出部队去懋功方向迎接中央红军。一九三五年六月八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出了《为达到红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任务给各军团的指示》，首次以命令的形式明确了中央红军要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目的。会合的地点被确定为懋功。

林、聂、董、李、罗、何，并各分送彭、杨：

（甲）今后我军战略任务，是以主力乘虚迅取懋功、理番，以支队掠邛崃山脉以东，迷惑敌人，然后归入主力，达到与四方面军会合，开展新局面之目的。现敌杨森取守势，薛岳、邓锡侯到达需时。我军必须以迅雷之势突破芦山、宝兴线之守敌，夺取懋功，控制小金川流域于我手中，以为前进之枢纽。懋功南至天全约三百里，东至灌县六百五十里，东北至理番五百五十里，西北到崇化、绥靖约三百里。

（乙）一、三两军团统归林、聂指挥，经宝兴向懋功前进，军委纵队率五军团继进；九军团为右翼支队，经芦山东北迂回大邑、懋功之间，然后到达懋功。因洋

油缺乏，无线电指挥有中断之虞，届时各军团首长除随时用徒步与军委联络外，应本此战略意图机断专行，完成总的任务，并将此任务传达到每一中下级首长。

（丙）我军基本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四方面军直接会合。但在遇特殊情况使我们暂时无法直达岷江上游时，则以大、小金川流域为临时立足之地，争取在以后与四方面军直接会合。

（丁）取得懋功及小金川流域是关系全局的枢纽。各兵团首长必须向全体指战员指出其意义，鼓动全军以最大的勇猛果敢，机动迅速，完成战斗任务，以顽强意志克服粮食与地形的困难。此时，政治工作须特别努力。

中央及军委

六月八日

夹金山主峰海拔四千二百六十米。当地的一位老者说：这座雪山是一座神山，如果事先不向神祷告，贸然上山是会受到惩罚的。红军官兵们说：红军就是神仙。

年轻的红军官兵坚定而乐观地确信，在雪山前面不远的地方，他们一定能见到红四方面军的战友。两支红军部队一旦会合，革命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中央红军离开天全、芦山的那一天，中革军委命令红九军团再次脱离队伍独自向东佯装主力行军。而蒋介石接着就认定这支行进的部队就是中央红军的主力，他无法想象中央红军会选择翻越大雪山——蒋介石知道毛泽东急于与徐向前的部队会合，但是他没有想到毛泽东的心情竟是如此急迫。

蒋介石飞抵成都，召开了川军高级将领会议。

之前，薛岳向蒋介石建议，中央军不要急于进川，因为四川境内此时已有十万红军，刘湘想保四川肯定是保不住了，四川早晚是中央军的，让刘湘去与十万红军作战，正好可以彻底削弱川军的实力。薛岳甚至还建议把黔军也调到四川来，这样不但可以减少中央军对贵州的守备，还可以让川、贵两省的军队在与红军的作战中互相制约。薛岳告诉蒋介石，川军中目前普遍奉行刘文辉的“十六字方针”，即“只守不攻，尚稳不追，保存实力，避开野战”。蒋介石不禁怒火中烧。当时，四川军阀的部队已达到了六个军、二十七个师、一百一十九个旅、三百四十个团，这一兵力已占当时全中国国民党军队总数的三分之一。四川全省一年财政收入约六千七百万元，而军费支出竟然就占了六千万元，军费支出占整个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从这一比例上看，四川全省可谓“全民皆兵”，所有的经济活动只为养活军队。但是，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后，连续突破了川军的金沙江、大渡河防线，致使国民党各军都对川军的战斗能力和政治忠诚产生了巨大怀疑。尽管川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对薛岳说：“虽然朱德当年曾在我手下干过，但我反共的立场是坚定的。”但是，他的部队却在天全、宝兴、芦山一线阻截中央红军的战斗中节节败退，致使蒋介石一再慨叹“剿匪前途良堪浩叹”！

但是，蒋介石在成都会议上还是表现出了克制。他对川军高级将领们讲了很长的一段话，依旧是军事教官循循善诱的口吻——他喜欢国民党军的军官们永远称呼他为“校长”。蒋介石认为目前四川的情形，“若与三年以前江西比较，实在是要好得多了”。只是官兵们“对于作战最要紧的协同动作实在差一点”。现在，最重要的是必须“踞匪紧围”：“我们一定要有得力的部队穷其所住，加紧追剿，使匪军不得稍舒喘息，亦不使他有一刻工夫得以停止下来，做他补充整理和诱胁民众的工作。如此，则残余的匪众久在疲困饥饿疾苦之中，便自然要一

天一天减少下来，很容易被我们消灭”。蒋介石提醒川军将领一定要注意红军的战术：“避重就轻，避实就虚，声东击西，以迂为直，专用一些诡谲飘忽的计术来欺骗我们”。而我们“总是因为疏忽大意，中了他的诡计而受了损失”。因此对付红军必须要“研究透彻，观察明确，就运用他的战术，来剿灭他”。蒋介石还要求川军仿照红军的训练方法，因为这种方法能够提高战斗力：“他们最注意训练连排长，对于一般的匪兵，他们也都能因其所长而编为特种队伍，例如专门的观察手、射击手、冲锋队、侦探队等等，施以专门的训练，用以担负各种特殊的任务。最近还选出长于游泳的官兵编为抢船队。诸如此类，总是按照实际的需要，使每个士兵都能发挥个人的特长，以增加整个的战斗力。”接下来，蒋介石讲的话就更不像是国军的“校长”了：

他们每次经过大小战争之后，无论胜败，必定集合一般干部，详细讲论战役经过的情形，探求种种的缺点，讨论改进的办法，都一一记录下来，好叫大家改正。其实这本是行军作战必不可少的要务，我们以后要剿灭土匪，一定也要如此……土匪和我们打仗，每次伤亡之数，总是几百或者几千，为什么到现在还是打不完？他们为什么无论死伤怎么多，仍旧可以作战，甚至还敢来进攻我们呢？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一点不放松时间，每次作战以后，立即住下来即刻整顿缩编，赶紧补充，惟其整顿补充来得快而且得法，所以每个单位的实力不减，士气不馁，兵心不动，战斗力始终能够维持……

国民党军中军官吃空饷已成惯例。不仅仅是川军，各部队往往“只摆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单位虽多而力量不够，甚至两团人还不能真正当一团的力量使用”，结果是部队虽多，但“战斗力却一天一天地减少”。

蒋介石这番苦口婆心不久之后就显出了他的真正目的。六月下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下达了缩编川军的命令。

命令表明：“竭全川之财，不克养全川之兵，且以兵越多饷越绌；饷越绌，则质越不良。不唯剿匪作战难期有效之进展，即军风纪，亦复不易维持。地方人民，既深感剥削骚扰之痛苦；恐各军长官，因多兵为累，亦将有不戢自焚之忧；一切地方善后，及省政财政之改革，更因此而无法实行。故为救国救川及各部队长官之自救计，舍立即厉行缩编，极力裁减军费外，实无其他善法。”因此，“现据刘总司令——湘——陈报，以各军缩减半数，非一蹴即能达到，拟请暂行缩裁三分之一；而由其所兼领之二十一军，率先奉行，身为之倡。各军长官，亦应彻底觉悟，切实办理，各以缩编三分之一为最低限度”。

由于要翻越雪山，红军必须把一些伤员和病号留下来。在政治工作人员和这些伤员和病号谈话的时候，他们都流了泪。

对于大部分官兵都是南方人的中央红军来讲，即将翻越雪山比面临一场战斗更令他们心情紧张。从福建参军的小红军问十九岁的少共国际师师长萧华：“师长，雪是什么样子？”萧华说：“和面粉差不多，但是比面粉还白。”从江西参军的小红军接着问：“雪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云吗？”萧华愣了一下，认真地看看这个江西小老表，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文化。”在和当地老乡们的交谈中，红军官兵对有关雪山的一切譬如雪崩、寒冷、缺氧有了初步的了解。年长的老乡说：“如果你们一定要过的话，早晨和黄昏是一定不行的。要过，必须在上午九时以后、下午三时以前，而且要多穿衣服，带上烈酒、辣椒，好御寒、壮气，最好手里再拄根拐棍。”

部队开始着手准备粮食、御寒的衣服和辣椒。但是，大雪山下人烟稀少，烈酒和辣椒无法买到，御寒的衣服更是无从找寻。之前抢渡金沙江时闷热难挨，红军官兵大多是单衣单裤，有的还穿着短裤；后

来为了快速向泸定桥奔袭，官兵们把多余的衣物全丢掉了。因此，杨成武政委说：“看来，我们也只能穿着单衣去翻那座雪山了。”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二日一早，前卫部队红一军团四团将仅有的两串辣椒煮成了两大锅辣椒水，每个官兵一人一碗。喝完，上午九时部队向着夹金山大雪山出发了。

四团的前卫是二营六连。在陡峭的雪路上，穿着单衣的红军官兵用刺刀在坚硬的冰面上挖出脚窝，后面的队伍踩着这些脚窝前进。由于行进极其缓慢，没过多久，队伍便拉得很长很长。头顶上有人，脚底下也有人，山势越来越陡，空气逐渐稀薄，官兵们开始剧烈地喘息，雪面上反射的强光令他们睁不开眼睛。黄开湘团长建议鼓动一下，杨成武政委就站在一个雪坎上喊：“同志们，老乡都说雪山是神仙山，只有神仙能过，如今我们上来了，岂不成了神仙！”阳光刹那间就不见了，狂风骤起，卷起了漫天雪雾。冰雪在官兵们的脚步下发出了令人心惊胆战的“嘎嘎”声，雪流撞击在冰岩上激起巨大的雪浪。接近山顶的时候，天空又下起了冰雹。跟随先头部队四团前进的萧华走着走着，发现一个雪窝里好像缩着一个人，仔细一看，是少共国际师一名十五岁的小战士。萧华摇摇晃晃地走过去，试图把小战士拉起来，但是小战士说他再也走不动了。萧华在剧烈的喘息中命令他立即站起来，小战士依旧一动不动。萧华知道，如果在这里坐着，就等于是等着冻死。于是他掏出了手枪：“从江西出来，咱们走了一万多里，那么多苦都过来了，你想死在这里吗？这里除了你没有别人，只有这座大雪山。站起来，不然我枪毙你！”小战士哭了起来。萧华叫来了自己的马夫老刘，让他扶起小战士拉着马尾巴走。小战士站起来了，萧华说：“记住，红军战士，不能掉队。”冰雹瞬间就停了，头顶又变成万里晴空。六连爬到了山顶上，跟着上来的萧华看见战士们正堆雪堆，

雪堆埋着牺牲了的战友。其中一个战士刚喝了雪窝里的一口水就倒下了，还有一个战士抬头看太阳的时候一头栽倒在雪地上。萧华立即对他带领的宣传队作出三项规定：上山后不准四下张望，防止晕眩；山上雪窝里的积水不能喝，渴了可以吃雪；要低头走路，视线不能超过三米。下山的时候，萧华发现老刘的情绪不对，原来他负责照看的马滑进雪谷中不见了。萧华急忙问："那个拉马尾巴的战士呢？"老刘说："被三个战士扶着走了。"萧华于是安慰老刘说："那就好，只要过了雪山，山那边马多得很！"老刘还是痛苦："不光是马，还有吃的，打土豪时留下的罐头，咱们带了那么远都没舍得吃呢。"

对于经过了漫长征途的红军官兵来说，翻越夹金山大雪山是比任何残酷的战斗更为艰难的过程。远远地看，雪山并不是那么高，但是来自平原的他们对高海拔的威胁显然没有准备。他们预先想到了路滑、寒冷、疲惫和剧烈的喘息，但是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过死亡。

中央纵队中的女红军们也是一身单衣。贺子珍和刘群先一起拉着马尾巴爬山。无论刘群先如何劝说，贺子珍都不肯骑在马上。她认为红军要走的路还很远，如果把马累死了，困难就更大了。一向身强力壮的担架队队员刘彩香实在太累了，她一头栽倒在雪地上后，无论如何也爬不起来了。挣扎的时候她听见有人对她说话："小同志，快起来，这里是停不得的。"刘彩香抬头一看，是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她一鼓劲儿，居然一下子站了起来。彭德怀连声说："好，好，你很坚强。"

死亡最多的是担架员和炊事员。担架员的负重太大，他们因为不愿丢下那些在作战中负了伤的红军战友而直至自己累死。炊事员们死亡的原因大多是因为违反了轻装的规定，他们在登山时的负重甚至超

过了担架员。他们总是想多带些食物，以便日后别让官兵们饿着。他们无从估计雪山对自己有限体能的巨大消耗。

毛泽东在山脚下也喝了一碗辣椒汤，然后他拄着根木棍向大雪山出发了。毛泽东没有严重的不适。在喘得太剧烈的时候，他会停下来站片刻。毛泽东看着皑皑雪峰，对身边的人说："蒋介石认为红军不能从雪山上爬过去，咱们今天就是要创造出个奇迹来。"——毛泽东真正盼望的奇迹不只是翻越大雪山，而是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合。

四团已经开始下山了。下到山脚的时候，一条深沟挡在了路上，红军官兵沿沟寻找继续北进的路。就在这时，沟口方向传来了一声枪响。

前卫二营营长曾庆林报告说：弄不清是什么队伍，喊话也听不清楚。二营立即展开了战斗队形，四连做好了出击准备。团长黄开湘和政委杨成武在望远镜里观察，发现前面竟然出现了一个小村庄，村庄的四周影影绰绰地有不少人在走动，这些人都背着枪，头上戴着大檐帽。

这样的装扮黄开湘和杨成武以前从未见过。

司号员用号声联络，对方用号声回答了，但是双方都没听懂是什么意思。

四团派出三个侦察员摸了上去。然后主力部队以战斗队形缓慢前进，一点点地向对方靠近。

一阵风把对方的喊声又送了过来，但是声音微弱得还是听不清楚。

四团官兵沉默着，继续向前摸索。

对面的声音越来越清晰了：“我们是红军……”

四团是整个中央红军的前卫，前卫的前边怎么会有红军?

没有人跟四团的红军官兵说过红四方面军会出现在夹金山的北麓。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派出的三个侦察员飞奔而来，一边奔跑一边高声叫喊：“是红四方面军！是红四方面军！”

黄开湘和杨成武终于听清了来自前面那个雪山脚下的小村庄的叫喊：“我们是红四方面军！我们是红四方面军！”

这一刻，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官兵永生难忘。

只愣了片刻，两支队伍的红军官兵开始奔向对方，然后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这是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二日中午时分，地点是夹金山北麓达维小镇以南一个叫木城沟的藏族村庄。

那一刻，阳光下的雪山一片金黄，木城沟里的高山杜鹃迎风怒放。

与中央红军第一军团二师四团会合的是红四方面军的哪一支部队？《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对此作了如下表述：“六月十二

日，方面军第二十七师第八十团（一说第二十五师第七十四团）和红一方面军第二师第四团在夹金山北麓胜利会师。”这一表述的依据是：中央红军第一军团二师师长陈光在致中革军委的电报中称：“我四团于本［月］十二日十二时，在夹金山、大卫［达维］之间与四方面军八十团取得联络。”而时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二十五师师长的韩东山回忆说，六月十二日中午，他在达维接到了被派往夹金山的第七十四团三营的报告，说他们已经与中央红军的官兵会合了。李先念的回忆证实了韩东山的说法。

还在中央红军通过彝区向大渡河靠近的时候，红四方面军命令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和第九军军长何畏，率第三十军八十八师和第九军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各一部，由岷江地区日夜兼程西进，开往懋功地区去接应中央红军。由于双方的电台联络并不通畅，红四方面军接应中央红军的路线只能保证大方向正确。接受任务后，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和政治部主任李天焕立即与二十五师师长韩东山一起研究了行动计划。李先念还赶到理番向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和政委郑维山传达了方面军的命令和部署，决定熊厚发率领二六三团留在原地作战，郑维山率领二六五团、二六八团与接应中央红军的大部队一起行动。接应部队分两路出发：一路是第九军二十七师的一部，从汶川向西南的卧龙方向前进，阻击由巴郎山方向西进的敌人；一路是第九军二十五师和第三十军八十八师，分别从汶川、理番出发直取懋功。

从理番到懋功一百五十多公里，必须翻越一座海拔四千多米的雪山，红四方面官兵与翻越夹金山的中央红军一样为此历尽艰辛。直取懋功的先头部队是韩东山率领的二十五师。出发前徐向前找韩东山谈了近两个小时，谈话的中心意思是：要不惜一切代价迅速接应中央红军。两军的会合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徐向前说：“你韩东山是四方

面军派去迎接毛主席的代表，说不定将来你的名字还能进入史册呢。”徐向前的一番鼓励令韩东山十分兴奋。回来向师里的官兵一传达，官兵们也很激动，有的连队甚至加了餐喝了酒。在向懋功前进的路上，二十五师不断地遇到川军的阻击，大小战斗打了二十多场，但是为了完成接应中央红军的任务，全师官兵无心恋战，每一次都是把伤员匆忙留下之后继续赶路。在两河口附近，二十五师拼尽全力击溃了川军邓锡侯部两个营的阻击，然后一路直取懋功。根据行动计划，韩东山命令两个营据守懋功，其余部队向达维方向疾进。二十五师准备翻越夹金山，到宝兴、芦山和天全一带去寻找中央红军。但是，到达达维之后，寒风呼啸大雪漫天，韩东山决定大部队暂时休息，命令七十四团团长杨树华带领三营向夹金山接近。三营在到达巴郎地区时与川军遭遇。由于红军兵力少，遭遇战进行得十分残酷。三营官兵抱着一定要尽快找到中央红军的决心，奋不顾身地向数倍于己的敌人冲了上去。阻击的川军在被消灭了大半后溃逃，三营营长陈玉清却由于伤势过重停止了呼吸，全营牺牲的官兵多达六十四人！

从夹金山上下来的中央红军第一军团二师四团，在大雪山北麓遇到的那支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应该就是红四方面军第九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三营。

三营为迎接中央红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两军官兵终于会合的那一瞬间，他们仍没从众多战友牺牲的悲痛中解脱出来。这个营的红军官兵在很短的时间里经历了真正的悲喜交加。

四团团长黄开湘和政委杨成武所率领的中央红军官兵，在红四方面军七十四团官兵的簇拥下进入了达维小镇。衣衫褴褛的他们受到了极其热情的款待。徐向前要求红四方面军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大盘的牦牛肉、羊肉、土豆和青稞饭端到了中

央红军官兵的面前。晚上的时候，两支红军部队开了联欢会，联欢会的主要内容是唱四川民歌和兴国山歌，最后中央红军的官兵一齐高唱了宣传队刚刚谱写的《两大主力会合歌》：

两大主力军邛崍山脉胜利会合了，

欢迎四方面军百战百胜英勇兄弟！

团结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力量，嗳！

团结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力量！

坚决赤化全四川！

万里长征经历八省险阻与山河，

铁的意志血的牺牲换得伟大的会合！

为着奠定赤化全国巩固的基础，嗳！

为着奠定赤化全国巩固的基础，

高举红旗往前进！

联欢会的篝火熄灭后，黄开湘和杨成武住进了他们自离开遵义以来再也没住过的温暖的房间。但是整整一夜，两个人谁都没有睡觉，他们围着炭火，一一回忆了自离开中央苏区之后所有的战斗，他们还谈到了革命的未来，一直谈到天亮。

六月十四日下午，韩东山的二十五师在达维列队欢迎了从雪山上下来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领导：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王稼祥……这些领导人韩东山都听说过，可他一个也不

认识。在逐个握手敬礼之后，他突然看见了一张熟悉的面孔，是陈赓！韩东山在鄂豫皖根据地任十二师三十六团副团长时，陈赓是十二师师长。后来听说陈赓去上海养伤时被捕了，韩东山还以为自己的师长会遇害，没想到在大雪山下又见面了，韩东山一下子泪如泉涌。

作为红四方面军的第一个代表，韩东山忙前忙后地招呼着去搞炖牦牛肉，然后他被毛泽东等领导人叫去了。毛泽东细心询问了红四方面军的所有情况，包括建制、干部成分、思想状况以及部队的生活、训练和学习。问得韩东山有了一点紧张。在一旁的周恩来递给他一杯水，说："师长同志，讲得不错嘛。别慌！别慌！"韩东山在汇报的最后说："我们部队的指战员都是来自鄂豫皖和四川的贫苦农民，打仗都非常勇敢，一上战场没有一个怕死的，都是拼死往上冲的！"

清晨时分，韩东山的二十五师再次列队，送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出发去懋功。毛泽东向韩东山交代了他们在这里掩护后续部队通过的任务，然后向韩东山道了一声"再见"。数十年后，韩东山依旧难忘在中国工农红军艰苦征战的岁月里，因为两支红军终于会合而出现的欢乐时光。这位时年二十九岁的红军师长一直记得毛泽东说的那句话："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是一家！"

在离开达维北去懋功的路上，毛泽东接到了红四方面军发来的贺电：

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政委，中央红军全体指战员同志们！

懋功会合的捷电传来，全军欢跃，你们胜利地转战千余里，横扫西南，为反帝的苏维埃运动与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历尽艰苦卓绝的长期奋斗。造成了今日主力

红军的会合，定下了赤化西北的最有利的基础的条件。我们与你们今后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指挥之下，共同去争取西北革命的胜利，直至苏维埃新中国胜利。

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

及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启

六月十五日

之前，六月十二日，张国焘致电中央红军，要求："立发整个战略，便致作战，今后两军行动大计，请即告知。如有必要，请指示会面地点。"同一天，张国焘再次致电中央红军，详细介绍了川西北的敌情和红四方面军的兵力部署与当前任务，同时特别表明"以后关于党政军任务如何组织，行动总方针应如何决定，兄等抽人来懋或我们抽人前来，请立即告知"。十三日，张国焘仍是一天之内两封电报，电报告知中央红军主力可来懋功："疲劳之部队可在懋功、绥靖、崇化一带休息"。但"懋功一带粮食困难，不能养大兵，须用一切力量解决经济问题"。

十五日这天，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二师向朱德转发了红四方面军目前总兵力的电报："主力约四十个团，分编为四军八团，九军七团，三十军九团，三十一军八团，三十三军五团，三十四军三团，有五个独立师两个团，其余四个师每师平均约三千七百人。"尽管这一数字不甚准确，但是，红四方面军近乎十万人马的兵力，还是让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所有领导都感到了万分惊讶。此时此刻，中央红军的全部人马加在一起也不过三万。

六月十六日，中央红军给红四方面军发出了回复贺电：

张主席、徐总指挥、陈政委并转红四方面军全体红色指战员亲爱的弟兄们：

来电欣悉。中国苏维埃运动二大主力的会合，创造中国革命史上的新纪录，展开中国革命新的阶段，使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国民党惊慌战栗。我们久已耳闻你们的光荣战绩，每次得到你们的捷电，就非常欣喜。此次会合，使我们更加兴奋。今后，我们将与你们手携着手，打大胜仗，消灭蒋介石、刘湘、胡宗南、邓锡侯等军阀，赤化川西北。我们八个月的长途行军，是为苏维埃而奋斗。我们誓与你们一起，为苏维埃奋斗到底。特此电复。

朱、毛、周、张及中央野战军全体指战员

十六日

同一天的第二封电报，是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和张闻天的名义向红四方面军“张、徐、陈各同志”发出的，这封重要的电报第一次向红四方面军首长明确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关于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总方针，即“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懋功，一座偏僻荒凉的雪域小城，一时间拥满了兴高采烈的红军。

在派出李先念率领的先头部队去夹金山方向接应中央红军的同时，红四方面军还专门组织了一支五千人的筹粮工作队，由妇女团的两个营、省委工农医院、革命法庭、戒烟局等七个单位组成，在一个工兵营、一个战斗团和政府警卫营的掩护下，带着盐巴、豆豉、辣椒面、酱菜、豆瓣酱等出发前去懋功。这支队伍翻越了红桥雪山到达懋功后，开始了紧张的准备物资工作。他们磨糌粑、做干粮、腌腊肉、编草鞋，利用当地的一种盐矿石昼夜熬制盐巴。当得知先头部队遇到

中央红军的消息后，他们立即布置警戒，准备给养，腾房子，打扫卫生。十八日，中央红军大部队到达了懋功，红四方面军官兵列队欢迎，口号震天，他们与另一支部队的红军战友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在见到中央红军大队伍的时候，红四方面军官兵的情绪是复杂的，因为他们看见的不是很早以前干部们向他们描述的“伟大的铁军”。长时间的转战奔袭令中央红军的官兵疲惫不堪，他们武器简陋，军装不整，官兵的头上如果还有军帽的话，也不是红四方面军的那种大檐帽，而是一种小八角帽。从那时起，双方的官兵们私下里叫中央红军为“小脑袋”，叫红四方面军为“大脑袋”。

红四方面军为中央红军的官兵们准备了大量的礼物。这些礼物包括毯子、皮衣、衣服、毛巾、草鞋、袜子、袜底等等。

第三十一军的慰问品是：毯子，一百床；衣服，一百九十五套又十九件下装；汗巾，一百五十二条；草鞋，一千三百六十八双；鞋子，一百六十九双；袜子，四百一十九双；布袜子，十二双；袜底，一百九十一双；红匾，两挂。

第九军的慰问品是：毯子，四床；皮衣，四十七件；单衣，十一件；汗巾，两百零三条；鞋，二十双；草鞋，二百九十三双；袜子，三百五十七双；袜套，两双；袜底，三十七双；牙粉，三瓶；香皂，两块；旗子，两面。

第四军的慰问品是：棉大衣，一百七十九件；单衣，一百九十一件；草鞋，一千二百三十六双；汗巾，一百三十五条；袜子，六百九十双；袜底，三十八双；匾，四挂；对子，四副。

同时，中央红军也在各部队中发动了与红四方面军联欢与慰问的盛大运动，号召每个战士“准备娱乐，准备礼物，去会亲爱的弟兄”。中央红军的官兵们没有物品，只有一路打土豪分得的大洋，于是纷纷捐款。“‘坦克’（干部团代号）看见了红四方面军，立即发起慰劳运动，在一声号召之下，马上募了七百九十余元，没有一个不参加的，表现异常热烈！”“‘太阳纵队’（中央纵队代号），在政治处的号召之下，募了七百多元来慰劳百战百胜的红四方面军，也是没有一个不捐的，特别是三科的野战医院为最多，刘光甫同志一个人捐了二十元。”

住在懋功一座天主教堂里的中央红军领导人接见了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和韩东山一样，这是年仅二十六岁的李先念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领导人。毛泽东摊开地图问李先念：岷江和嘉陵江地区的气候和地形如何？老百姓的生活怎样？红军能不能打回去？李先念回答说：岷江和嘉陵江流域平坝很多，物产丰富，部队的给养和兵源都不成问题。从战略位置上看，东边连接川陕老根据地，北边靠近陕甘，南边靠近成都平原，可攻可守，可进可退，回旋的余地很大。如果红军在这一带立足，可以很快得到补充，再图进一步的发展。现在川北的茂县和北川都在我军手里，可以打回去，否则回去就很难了。李先念还说：大小金川一带山高地荒，大部队不宜久留，向东北方向打回去也是红四方面军官兵的愿望。李先念不知道，他的一番话与毛泽东的判断和设想十分吻合——这个年轻的军政委自此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印象后来对李先念的一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六月十七日，中革军委收到了张国焘、陈昌浩的电报。电报对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总方针表示了疑义，不但不同意红军向东或向北发展，反而提出了向西南更荒凉之地发展的设想。电报档案原文错漏极

多，读来大致的内容是：向东进入四川腹地，北川一带水深流急，敌人已有准备，不容易通过。而沿着岷江北打松潘，地形和粮食等条件也不具备。如果向北发展，那么就要集中主力打青海和新疆。

第二天，由张闻天、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联合签署的回电发出。电报坚持红军主力必须先控制向北转移的枢纽地带，占领从川北进入甘南的必经之地松潘，“否则兄我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因此，需要“即下决心”，“立攻平武，松潘”。

两天后，张闻天、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联名致电张国焘，重申“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实施向陕甘方向的突破，哪怕“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因此请张国焘“再过细考虑”。“如尚有可能，则须力争此着”。但是如果“认为绝无办法”，那么对向川西南发展的方案可以商量执行。电报最后希望张国焘前来懋功：“兄亦宜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此时在毛泽东和张国焘之间已经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对立。张国焘与中央和军委之间的分歧仅局限于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上：毛泽东主张向东，重新打回川陕根据地；或者向北，开辟川、陕、甘三省新的苏区；而张国焘则认为应该向西，首先占领青海和新疆。但是，无论从当时的角度还是现在的角度看，张国焘的主张都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从懋功往西，是中国最荒僻的雪域高原，大军进入那里前途将是什么?

事后，张国焘在行动时，也没有选择这条几乎等于自杀的道路。

一九三五年六月，经历了两军会合的喜悦和兴奋之后，在还没有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会面的时候，张国焘提出这样一个让人无法接受的主张，其原因和目的都是一个历史谜团。

如果非要找出理由的话，那一定不属于单纯的军事问题。

已经动身向懋功而来的张国焘回电了，首先还是表明不可北进，因为在平武、松潘一线有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的二十七个团，而在江油、北川、安县一线有川军的三十七个团。但是同意先打松潘：鉴于“任何通松潘道路都容不下十团兵力”，因此建议必须采取“分路合击、多方游击的战术”。同时，对中革军委主张北上不再坚决反对，但是主张首先向西去青海，然后再从青海东进陕西。最后告知：“焘已到东门外。”

东门，今名东门口，位于四川汶县，离红四方面军此时的大本营茂县已有三十多公里，距中央红军的所在地懋功还有一百三十公里。

六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一行离开懋功继续北行，到达两河口附近。

六月二十五日，在一个叫抚边的村庄里，红军官兵搭起了一个会场。

这是这个偏僻的小村庄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景：土墙上用石灰水书写了“欢迎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中国共产党万岁！”和“中国工农红军万岁！”等标语，房屋上挂上了红旗，红旗上也写有标语。草地上搭起的讲台四周用松枝镶起了一道绿色的边缘，这道绿色令这个荒凉的小村庄顿时有了生气。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从会场步行了三里路，到达一条小路的路口。几千名红军官兵在他们的身后列队完毕。

骤然下起了大雨，所有的人都站在大雨中没有动。

就这么过了许久，有人喊了一声：“来了！”

泥泞的小路上，一匹快马在大雨中飞驰而至。

锣鼓声立刻响了起来。

紧接着，三十多匹高头大马飞奔而来。马背上是全副武装的英武的卫兵，卫兵脚下的马蹄踏出一排排银色的水花。

张国焘骑在一匹白色大马上，高大而微胖，在卫兵们的簇拥下从雨雾中出现。

这是中国革命史上难以形容的重要时刻。

在漫长而艰辛的跋涉作战中被反复设想、不断期待的时刻就这样出现了。

红军官兵用力敲打着锣鼓，努力地高喊口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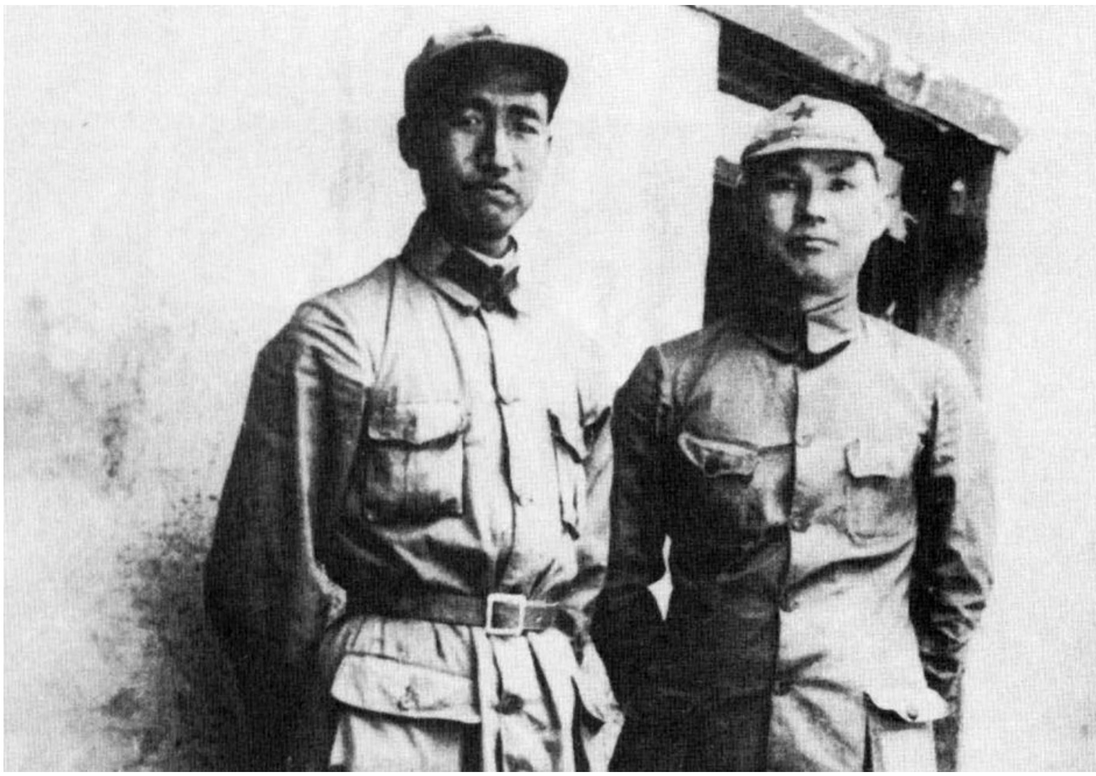
他们经历了太多的艰险、太多的苦难、太多残酷的战斗以及太多的伤痛和牺牲，此时此刻，他们备感胜利所带来的欢乐。红军官兵们哭了，他们的泪水被裹在大雨里令山川青翠。

流下了喜极之泪的红军官兵无法知道，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来讲，一个更加危险的时刻已经来临了。

在大雨中久候的毛泽东异常憔悴，他抻了抻已经湿透了的灰色军衣，向着那匹白色的高头大马缓慢地迎了上去。

# 第十四章 黑暗时刻

1935年8月·松潘草地



毛泽东此生第一次见到张国焘的确切时间无从考证。但是，根据他们各自的生平推测，应该是一九一八年在北京大学。当时，二十五岁的毛泽东是这所大学图书馆的一名普通管理员，而二十一岁的张国焘不但是这所大学的注册学生，还是小有名气的学生领袖。尽管当时他们之间地位不同，但相信他们应该有过来往，因为他们都同时与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李大钊关系密切。三年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张国焘后来这样记述了那时他眼中的毛泽东:

是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烬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在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的主张；可是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的时候常爱设计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坠入其中，发生了自我矛盾的窘境，他便得意地笑起来。

从现有史料中看，中国工农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应该是在一九二七年。那时中共中央暂时移到武汉，毛泽东和张国焘共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张国焘的回忆，在那次大会上，毛泽东在对中国农民现状进行了调查之后，提出了开展土地革命、扩大农民武装、建立农村民主政权的主张。毛泽东甚至说："矫枉必须过正。"张国焘认为这句话有些"左"倾，说如果按照你的"有土皆豪"的观点，你也是湖南一个有土地的自耕农，难道你也是土豪不成？当时毛泽东大笑。但是，张国焘还是对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运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毛泽东所做的努力"对中共有极大的贡献"，他这样评价了毛泽东要求回湖南举行农民暴动的要求："表现了他的奋斗精神，自动选择回湖南去，担负领导农民武装的任务……他这个湖南籍的'共产要犯'却要冒险到湖南去，不甘心让他所领导起来的农民运动就此完蛋，我们当时很高兴地接受了他这个到湖南去的要求。"

毛泽东和张国焘彼此失去信息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在一片白色恐怖中，毛泽东去了中国农民中间，张国焘则去了遥远的莫斯科。两年后，张国焘回国即被中央派往鄂豫皖根据地，那时毛泽东正率领着一支红色武装转战于井冈山的密林之中。眼下，在中国西部一条荒凉的小路上，尽管大雨中张国焘的高头大马踏起的泥水几乎溅了毛泽东一身，但是当张国焘看见毛泽东的时候，他立即飞身下马，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在红军官兵的欢呼声中，两个人登上了临时搭起的讲台，讲台是从藏族群众那里借来的一张桌子。毛泽东向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官兵发表了欢迎词，张国焘发表了答谢词。其间口号声始终不断，而"热烈欢迎张主席"这句口号，让中央红军的官兵们喊起来有些不习惯，因为他们只知道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是毛泽东，他们暂时还弄不清楚张国焘是什么主席。

欢迎会开完之后，领导们说笑着一起往村子里走——"我和毛泽东旋即并肩步向抚边，沿途说说笑笑，互诉离别之情。"张国焘后来这样回忆。在他们并肩前行的路上，毛泽东告诉张国焘，他们到达这一带已经四天了，专门等待张国焘来商量今后的军事方针。张国焘则告诉毛泽东，说他从茂县到这里骑了三天的马，一路多经藏族聚居区，山高林密，河流湍急。他还向毛泽东描述了他沿途看见的一所石建的教堂，说这座教堂拥有一个很大的养蜂场和一座精致的小磨房，而常年住在那里的一个西方传教士居然运进来了"整箱的金山橙苹果洋酒"以供享用。

毛泽东和张国焘并肩走在一起的瞬间，被红军官兵深刻地记忆在了脑海中。那个温暖的时刻给予他们的希望与信心，让他们觉得之前所经历的所有牺牲都是值得的。

毛泽东和张国焘分别住在了村庄的南北两端：分配给张国焘的，是这个仅有三十多户人家的村庄里最好的房屋——位于村庄最北端的一间店铺，柜台里面是他休息和办公的地方，柜台外面是他的随行人员的住处。而毛泽东和他的妻子贺子珍住在村庄最南端的喇嘛庙边上。

傍晚，在喇嘛庙里举行了欢迎酒宴。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博古和刘伯承等都出席了宴会。炖得很烂的鸡肉和牛肉，大量的米面食物，还有用大罐子装的酒。依旧先是相互的敬酒辞，然后是随意的闲聊说笑，都有意回避着之前在来往电报中针对今后军事方针的不同意见。当然，不免要提到的双方现有的兵力，周恩来说中央红军有三万人，而张国焘说红四方面军有十万部队——“周的夸张程度比张的要大得多。”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说，“双方都保守秘密，都不坦率和公开。”——其时，中央红军的实际兵力约在两万人左右，而红四方面军约有八万人。

有意回避着敏感的话题，反而使喧闹的宴会显得有些空洞。毛泽东照例拿“是否吃辣椒是革命与不革命的标志”开着玩笑。

毛泽东这个吃辣椒的湖南人，将吃辣椒的问题，当作谈笑的资料，大发其吃辣椒者即是革命者的妙论。秦邦宪［博古］这个不吃辣椒的江苏人则予以反驳。这样的谈笑，固然显得轻松，也有人讥为诡辩，我在悠闲谈笑中则颇感沉闷。

张国焘已经感到了无形中的隔阂。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时，在昨晚举行酒宴的那座喇嘛寺庙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了，史称“两河口会议”。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首先由周恩来根据两军都已经离开自己从前的根据地，现在红军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的现实，阐述了选择新的根据地的必要条件和今后红军行动的战略原则。周恩来强调，新的根据地的选择方向和地域要有利于红军的作战和生存，而目前红军所处的地域显然不符合这样的原则。关于战略方向问题，向南、向

东和向西都不利，应该选择向北，向川、陕、甘方向发展。周恩来的发言实际上代表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意见。

毛泽东在发言中针对红军为什么要选择北进作了阐述。他首先说共产国际曾经有电报指示，要求红军靠近外蒙古地区。张国焘问：“共产国际什么时候有这个指示？”张闻天回答说：“大约在十个月之前，中央红军还没有离开瑞金的时候。电报说，中国红军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靠近外蒙古。”然后，毛泽东继续说，宁夏是富裕地区，敌人在那里的防守比较薄弱。虽然共产国际的指示“已时隔多时”，但应该相信他们“仍会从外蒙古方向来策应我们”。根据张国焘的回忆，毛泽东接下来的发言“富于风趣但又非常沉痛”。风趣是因为毛泽东说：“为什么我们要到宁夏去？主要是蒋介石的飞机大炮厉害……他耀武扬威地找我们打，我们不中他的诡计，偏不和他打。我们不动声色地跑到宁夏去，背靠着外蒙古，看他还有什么办法？我们有的同志不肯老老实实地承认飞机大炮的厉害，现在我们只有变个戏法，也到外蒙古去弄点飞机大炮，来回敬蒋介石。”而沉痛是因为毛泽东说：“打开窗子说亮话，我们是有被消灭的危险的。”如果在宁夏不能立足，那么就得通过沙漠到外蒙古去，以留下革命的火种以图再起。

毛泽东所说的“到外蒙古去弄点飞机大炮”，指的是在中国红军遭遇严重困难的时候，要争取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这在当时是个合乎逻辑的想法。由此也可以解释中央红军自离开中央苏区以来，为什么始终坚持向西北方向转移。

张国焘的发言，是两军会合后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第一次发言，因此大家听得很认真。出乎与会者预料的是，张国焘并没有坚持反对北进。他在详尽介绍了西北地区和红四方面军的情况后，提出了他的三点设想：一是以西康为后方，向川北甘南发展，即“川甘康

计划”。优点是便于执行，但是没有可靠的后路；二是到陕甘北部，夺取宁夏为后方，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北进计划”，优点是机动余地大，但是后路也不好；三是到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带发展，以新疆为后方，即“西进计划”，优点是可以利用新疆当局亲苏的立场，缺点是距离中国内地太远。张国焘最后的表态是：最好执行第一个计划，先在川康地区立下脚来；如果不行再考虑西进，因为到新疆去得到苏联援助的可能性大，蒋介石的军队也不容易进入那里。

会议一直开到中午。绝大多数与会者都赞同周恩来代表中央和军委所作的报告，讨论基本在北进计划的框架内进行着。最后，会议形成了一个决议，即《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

一、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二、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

三、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于甘青新宁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地向东发展。

四、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均不利于大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

五、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六月二十八日

当时，终于会合的两支红军中没有人确切地知道陕北那片由共产党人刘志丹创建的红色根据地的情况。

留在茂县的徐向前没有参加两河口会议，此刻他焦急万分。部队一部分被派去接应中央红军，一部分被派去筹集粮食和物资，由于剩下的兵力有限，面对国民党军的步步进逼，位于前线的红四方面军所有部队不得不“处于守势”。蒋介石判断两支红军会合后“不外横窜康、青，北向甘、陕两途”，因此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北面，中央军胡宗南的二十七个团部署于松潘至平武一线；东面，川军刘湘、孙震、李家钰等部的九十多个团固守在江油、汶川和灌县一线；南面，川军杨森、邓锡侯部的五十多个团布防在芦山、雅安、荥经一线。而川军刘文辉部，中央军薛岳部正自南向北逐步推进，甘肃和青海的马家军屯兵两省边界也在准备出击。红军分散在这四个方向上的部队几乎每天都在作战，而且打的都是阵地战，消耗和伤亡极大。六月十二日，徐向前起草了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报告，催促中央尽快决定两军会合后的军事部署：

……

目前我军之主要敌人为胡宗南及刘湘残敌，我军之当前任务，必先消灭其一个，战局才能顺利开展。因之或先打胡，或先打刘，须亟待决定者，弟等意见。西征军万里长征，屡克名城，迭摧强敌，然长途跋涉不无疲劳，休息补充亦属必要。最好西征军暂位后方固阵休息补充，把四方面军放在前面消灭敌人。究以先打胡，先打刘，何者为好？请兄方按各方实况商决示知。为盼。

……

六月十九日，在各路国民党军的猛烈攻击下，红四方面军大本营茂县东北方向的战略要地北川丢失，红军被迫退至笔架山至神仙场一

线据险防守。

同一天，在南面阻击川军的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也被迫撤出了宝兴。在川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的严令下，一个旅的川军绕路翻过雪山，迂回到了第五军团阻击阵地的后面发起了攻击。红军由于两面受敌最终放弃了阵地。自渡过大渡河以来，担任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没有一天不处在战斗中。中央红军开始翻越夹金山时，红五军团三十七团奉命在夹金山南麓阻击川军的追击，他们在一个叫盐井坪的地方整整坚守了五天，才接到撤退翻越大雪山的命令。在雪山上，三十七团的官兵看见了一个个隆起的雪堆，雪堆下都是前面的部队翻越雪山时牺牲的官兵。当三十七团终于从雪山上下来到达宿营地时，军团通信员拿着军团首长的信已经在等他们了。团长谢良以为是命令三十七团整理军容，以便让中央红军这支最后的部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但是谢良打开信一看，内容却是为了保证两河口会议顺利召开，以及已经会合的一、四方面军的休整，命令三十七团迅速按照原路返回，至盐井坪一线继续阻击敌人。三十七团的官兵没说二话，掉头重新翻过夹金山，迎着已经开始翻山的川军扑了过去，硬是把川军压回到了盐井坪。两河口会议结束后，为了实施北进松潘的作战计划，红五军团给三十七团的电报是："接此电后，立即翻过夹金山，经达维到懋功待命。"在不到十五天的时间里，三十七团开始第三次翻越夹金山大雪山。部队到达山顶的时候，一连炊事班班长不行了，他对指导员说："我……不行了，过不去了……"说完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在他的身边，是一副他从江西苏区一直挑到了雪山顶上的油盐担子。

张国焘回到了抚边村北端的那个店铺里。吃午饭的时候，他的秘书长黄超拿来了一份中共中央的《布尔什维克报》。黄超说，这份报纸是三天前在懋功油印出来的。听一方面军的同志说，这份报纸"只给

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不给四方面军的干部看”。张国焘很是奇怪。可他拿过报纸只看了一眼，就知道为什么“只给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了。报上的文章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凯丰写的，标题是《列宁论联邦》。文章借用当年列宁反对建立“欧洲联邦”之意，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张国焘刚刚成立的西北联邦政府，说西北联邦政府在理论上是违背列宁主义的，在组织上是背离中华苏维埃政府的。

凯丰，曾在遵义会议上讥讽毛泽东“只会看看《孙子兵法》翻翻《三国演义》”，现在他又讽刺从莫斯科回来的张国焘说：“列宁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联邦是不正确的。”可以想象，因为在苏联学习了大量革命理论，布尔什维克青年凯丰写出的文章必会气贯如虹。凯丰这样一篇重磅炸弹式的文章被登在中共中央的报纸上，足以说明中央领导层意识到张国焘的那个“联邦政府”即使没有政治野心在其中，名称也是十分奇异的：既然标榜建立的是一个苏维埃政权，那么，按照通行的惯例，叫“川康苏维埃政府”也就可以了，弄出个说不明白的“联邦政府”是什么目的呢?

其实，比《列宁论联邦》更值得张国焘注意的应该是另外一篇文章。这篇署名张闻天的文章发表于两河口会议的前两天，即六月二十四日中央红军的《前进报》上，文章的题目是《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文章可以视为两河口会议的舆论准备。其中心意思是：红军决不能在此久留，要集中全部力量北进，“克服一切道路、粮食、山地、河流的困难”，“用最大的努力和自我牺牲精神”消灭敌人，争取在陕、甘建立根据地。而“仍旧以到达一定地区为我们行动的中心，实际上就是要避免战争，放弃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任务，而变为无止境的逃跑”：

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上是由于对于敌人力量的过分估计，与对于自己力量的估计不足而产生的。克服在创立苏区根据地中的一切困难，同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作斗争，是目前整个党与工农红军的严重任务。但同时必须同“左”的空谈作斗争。这种空谈表现在对于敌人力量过低估计，与过分地夸大自己的力量。这些空谈实际上也不是在紧张地动员我们的全部力量，去克服我们面前的一切困难，拼着性命去战胜当前的敌人，而是在拿一些好听的词句，催眠我们，使我们在美丽的幻梦中间寻求自己的满足。

毛泽东意识到张国焘也许自恃兵强马壮，会为保存实力而按兵不动。

但是，张国焘并没有特别注意这篇文章。

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基层官兵也开始有了小摩擦。除了“大脑袋”和“小脑袋”的议论外，一些小事在双方之间变得十分敏感。比如，博古的警卫员提着一块牛肉找到张国焘的警卫员，希望换一些子弹。未果，双方竟然吵了起来，最后扩大到恶语相向。再比如，红四方面军官兵看见红一方面军的战士开枪杀牛，不但觉得这件事浪费了子弹，而且提出不能确定他们杀的是不是土豪的牛。

张国焘对张闻天提出了一个比杀牛敏感得多的问题：中华苏维埃和中央红军受到的挫折，并不是像毛泽东说的那样，是因为蒋介石的飞机大炮厉害，而是中央的路线出了问题。于是，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张国焘分别找了他认为重要的人进行了谈话。在张国焘的眼里，博古说话直率但是“历练不足”。但博古却很认真地批评了红四方面军中存在的某种“军阀作风”，同时也对张国焘在谈话中称兄道弟的作风表示了反感。张国焘又请聂荣臻和彭德怀吃饭。吃饭的时候张国焘显得十分热情，而且表示要从红四方面军中拨出两个团给红一方面军。

饭吃完了，聂荣臻问彭德怀：“为什么请我们吃饭？”彭德怀说：“拨兵给你你还不要？”接着，张国焘就派黄超给彭德怀送去了几斤牛肉干和一些大米，这让彭德怀顿时警惕起来。多年后，彭德怀写道：

黄住下就问会理会议情形。我说，仗没打好，有点右倾情绪，这也没什么。他们为什么知道会理会议？是不是中央同他们谈的呢？如果是中央谈的，又问我干什么？他又说，张主席很知道你。我说，以前没有见过面。他又说到当前的战略方针，什么“欲北伐必先南征”。我说，那是孔明巩固蜀国的后方。他又说，西北马家骑兵如何厉害。把上面这些综合起来，知来意非善，黄是来当说客的。

后来，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又专门找到聂荣臻谈话，问到关于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时，聂荣臻毫不犹豫地表示：“遵义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都拥护。”不知道为什么，自陈昌浩谈话之后，聂荣臻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他最担心年轻的军团长林彪，于是就与红四方面军的关系问题和林彪谈了一次，结果是两个人吵了起来，吵一句拍一下桌子，直到把桌子上的盘子都拍翻了。聂荣臻回忆道：

我告诫林彪说，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因为我当时已经获悉张国焘还有一个方案，要把我调到三十一军去当政治委员，把林彪调到另一个军去当军长。总之要把我们调离原部队，只不过是命令还没有发出。当时林彪已经有他自己的立场。他说，你这是宗派主义。我说，怎么是宗派主义呢？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警惕，因为张国焘的思想和中央的思想不一致，我们应该想一想，我说这是路线问题。林彪反驳我说，既然是路线问题，你说他们路线不对吗？那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我们才几个人哪？这时，我一方面军的确只剩下两万多人。我驳斥他说，蒋介石的人更多，难道能说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

林彪和聂荣臻是出生入死的搭档，即使吵了架也不会影响工作配合。聂荣臻的一番话最终使林彪受到了震动，这个年轻的军事将领在不久后严峻的政治斗争中因此有了正确的选择。

张国焘在抚边停留三天，忙着与各种人谈话；毛泽东则忙着部署即将开始的松潘战役。

六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会议宣布了组织人员的调整：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为中革军委委员。会议通过了《中革军委关于松潘战役的计划》，并以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的名义发布，要求迅速、机动、坚决地消灭松潘附近胡宗南的部队，打开红军北进陕、甘建立新的根据地的道路。

红军两个方面军被分成三路军一并北进。三路军基本上保持了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原有建制：

右路军包括红四方面军的十师、十一师、九十师共八个团，由陈昌浩率领；中路军包括红四方面军的二十五师、八十八师、九十三师共十个团，由徐向前率领；左路军包括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第五、第九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八十九师共十六个团，由林彪、彭德怀、聂荣臻、杨尚昆率领。同时，在东面掩护侧翼的红四方面军八个团为岷江支队，由王树声率领；在南面掩护的红四方面军二十七师共四个团，由何畏率领；红四方面军散布在各要点的部队由周纯全率领为后方警备部队。

两个方面军会合之后的十万兵马，在夹金山北麓耽搁了太久之后，终于从不同的方向和地点开始向北移动了。

毛泽东一行跟随左路军行军。

离开抚边向北一百二十里是卓克基，中间需要翻越的雪山是梦笔山。

给翻越梦笔山的红军先头部队带路的是一位藏族喇嘛。这个和蔼的老人听说红军要翻雪山，组织僧众举行了祈祷平安的仪式，还给了红军一些酥油。红一军团四团刚一翻过雪山，眼前就出现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建筑。官兵们疑为是自己的幻觉，跑过去才知道一切都是真实的，因为从这座建筑里向他们射来了子弹。已是黄昏，为了避免武装冲突，四团想出了打照明弹的办法。昏暗的天空突然出现的照明弹十分耀眼，躲在建筑里阻击的土司武装大惊失色，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般令人恐惧的东西在脑袋顶上炸开，于是慌忙逃走了。

卓克基，一个土司的官寨。

经过两天的艰苦行军，毛泽东一行到达了这里。

土司的宫殿上下四层，全部由石块堆砌成，可以容纳数千人。

据说这个土司在成都的一所大学读过书，所以他的书柜里有《三国演义》和《水浒传》。

毛泽东在这座巨大的土司宫殿里作了短暂的休息。

相信他很有兴趣地参观了宫殿，特别是三层土司住房里的那个巨大的书柜。

前线的电报不断到达卓克基，一再希望大部队火速前进，因为原定发起松潘战役的时间急迫，各路红军必须按时到达预定位置。同

时，红军北上沿途粮食困难，土司武装袭击不断，在路上多走一天危险就增加一分。

从卓克基继续向北，行军队伍总是在雪山谷地之中的河流边绕来绕去。雨或雪交替不断，有森林的地方经常会打出冷枪。红军路过马尔康的时候，看见了同样规模的寺院，寺院里的喇嘛跑光了。附近没有村庄，找不到食物，夜晚宿营的时候，大部分官兵不得不露宿。雨雪纷飞，饥饿难耐，官兵们无法入睡，仅仅是挤在一起闭一下眼睛而已。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于是第二天用了一上午的时间把衣服烤干，然后继续翻越雪山。

左路红军到达马河坝的时候，由于粮食极度缺乏，决定休整两天以解决粮食问题。

藏民种植的青稞已经显出淡黄色，尽管距离收割还有一段时间，但至少现在是可以勉强充饥的。于是部队号召官兵们收割。这些青稞的主人全跑了，红军一边派人去寻找，一边给官兵下达收割的指标：不但要收割供自己单位十天食用的青稞，而且还要支援那些仍在雪山中行军的部队。早上八点，部队集合下地，都是农民子弟，收割庄稼的工作并不陌生。朱德从井冈山起就与战士们一起下地劳动，现在，他不但自己收割，而且还自己把收割的青稞挑回来。中央纵队中年龄最大的徐特立老人负责用手搓青稞粒。部队组织起一个粮食运输队，把搓好的青稞给发生粮食危机的部队送去。

青稞粒用清水煮了就能吃。

但这种颗粒非常不好消化，往往整粒吃进去再整粒排出来。

在马河坝，红军官兵让青稞粒弄得肚子很难受，而毛泽东则让李富春发来的一封电报弄得心情很难受。李富春在电报中向中央报告：张国焘提出了解决组织问题的要求。

两河口会议后，为了加强一、四两个方面军的了解和友情，中共中央向红四方面军派出了一个中央慰问团，团长是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

慰问团去的地方叫杂谷脑，是四川省苏维埃所在地。

慰问团出发的时候，张国焘也离开了抚边，他本想回茂县的方面军总部，但听说了慰问团的行动后，就直接赶往了杂谷脑。

张国焘对这个慰问团有点不放心。或者说，他对目前的中央有点不放心。

此时，张国焘的心境与两支红军主力会合前完全不同了。并且，他很难否认变化的动因应该就是“权力”二字。这种变化很可能从红四方面军突破土门要隘到达茂县之后，就已经开始了。之前，张国焘对中央红军的状况并不十分清楚，但是随着两支红军终于共处于中国的一个省内，会合的可能性已经日趋明显，因此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开始了频繁的电报联络，而这些电报最终使张国焘了解到中央红军遭受了巨大损失，部队从长征出发时的近十万人只剩下了不足三万。这个判断一旦清晰，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作为党内一个老资格共产党人，在两支红军主力部队即将会合之时，张国焘也许意识到，中共中央领导层的重新“洗牌”已成可能：苏维埃事业受到严重挫折，红军的兵力受到严重损失，这说明中央的政治路线出了问题；政治路线出了问题，制定路线的中央就要有人承担责任；有人承担责任

就会引起高层领导的分化，高层领导一旦出现分化就要有人站出来重新主持局面；有人站出来主持局面，就会有新的领导人产生。在眼前这种形势下，谁将是中共中央乃至中国红军的最高领导者呢?

张国焘之所以对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格外关注，是因为这两个会议都涉及了党的最高领导人和红军的最高指挥权问题。

张国焘认为，遵义会议只局部地解决了军事指挥问题，而没有解决根本的政治路线问题。这很可能是因为严重的军事危机迫使毛泽东不得不暂时回避可能导致矛盾激化的政治危机。但是，毛泽东对最高领导权的渴望是明显的，结果有人对他的领导权提出了质疑，从而导致了中共中央在遵义会议之后接着召开了会理会议。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期间曾对张闻天说过这样的话:

党内政治歧见早已存在，遵义会议没有能够作适当的解决，目前中央又只注意军事行动，不谈政治问题，这是极可忧虑的现象。值得忧虑的是我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将遭受惨败，不易翻身，并将引起一、四两方面军的隔阂和党内纠纷。如果我们能够根据实际情况，摆脱既定公式的束缚，放弃成见，大胆从政治上作一番研究，也许为时还不算太晚。

张国焘所说的“根据实际情况”可以理解为两个内涵：一是应该承认中央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中央，到了该清理其错误的时候了；二是中央红军已经损失过半，应该承认拥有近十万兵力的红四方面军的领导权，或者直接说就是承认他张国焘的领导地位。其实，这也正是毛泽东对张国焘会因兵强马壮而产生政治野心的巨大担心。

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开始在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中广泛散布自己的观点，即“中央的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责任在中

央”等等。同时，他试图利用一、四方面军官兵之间发生的摩擦来扩大对立情绪。张国焘首先需要统一思想的是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和军事总指挥徐向前。与徐向前的谈话令张国焘大失所望。徐向前晚年回忆说他那时因不满已久正在“闹调动”：

> 自从在鄂豫皖和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以来，我的心情一直不舒畅。张国焘对我用而不信，陈昌浩拥有“政治委员决定一切”的权力，锋芒毕露，喜欢自作主张。许多重大问题，如内部“肃反”问题、军队干部的升迁任免问题，等等，他们说了算，极少征求我的意见。特别是在川陕根据地，取消了原来的中央分局，由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实行家长制的领导，搞得很不正常。我处在孤掌难鸣的地位，委曲求全，凭党性坚持工作。既然两军已经会合，我就想趁此机会，离开四方面军。我在下东门见到陈昌浩时说过：“我的能力不行，在四方面军工作感到吃力，想到中央去做点具体工作。听说刘伯承同志在军事上很内行，又在苏联学习过，可否由他来代替我。”

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不敢把话直接向徐向前说白了，只能用“中央的北进决定是否明智”来试探虚实。徐向前虽然并不清楚张国焘的真实意图，也不清楚两河口会议中党内已经显露的矛盾，但他客观地分析了南下和北进都存在的困难：“平武那边地形不好，硬攻不是办法；松潘地区不利于大部队展开……南下固然能够解决目前供应上的困难，但一则兵力有限，二要翻越雪山，且不是长久立足之地，万一拿不下来，北出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徐向前的态度是张国焘没有对中央北进决定提出反对意见的重要原因。

张国焘和陈昌浩的谈话很投机。陈昌浩在政治上的立场是显而易见的。他曾经留学苏联，是王明的同学和助手。与张国焘一样，他一九三〇年回国，一九三一年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由于离开中央的时间很长，他对毛泽东等人并不熟悉，他所受到的革命理论影响全部来

自张国焘，因此，这位年仅二十九岁的红四方面军政委自然不容任何人向张国焘的权力和威望提出挑战。

中共中央慰问团到达杂谷脑，在张国焘和陈昌浩的安排下，慰问团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但是行动也受到了“热情”的限制。中央慰问团成员之一李维汉后来回忆说，慰问团出发前张闻天找他谈话，要求他就不要回来了，留在那里当苏区四川省委书记。但张闻天显然已经感到了张国焘与中央的矛盾，因此又嘱咐李维汉说：“如果做不成，就到白区当四川省委书记。”李维汉一到杂谷脑就看出来了，这里的人根本不愿意他当苏区的省委书记——张国焘的办法是“陪着”，中央慰问团吃饭、散步都有专人陪同，他们被尽量减少与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接触。

中央慰问团找张国焘谈话，张国焘的话令李富春大吃一惊。张国焘说：“两军会合，摊子大了，为了便于统一指挥，总司令部须充实改组，必须加强总司令部。”

七月六日凌晨一时，李富春给中共中央发去了电报：

朱、周、王、毛、张：

国焘来此见徐、陈，大家意见均以总指挥迅速行动坚决打胡为急图，尤关心统一组织问题。商说明白具体意见，则为建议充实总司令部，徐、陈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委；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我以此事重大，先望考虑。立复。

富春

六日一时

张国焘提出的要求是：徐向前和陈昌浩不能仅按两河口会议的决定当军委委员，而要出任具有决策权和指挥权的副总司令和总政委。另外，需要扩大军委常委的数量，以便让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更多地进入军委工作。

周恩来说，这是自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权。

北进的红军一直艰难地走在没有人烟的山路上。不断有马匹因在雪山上滑倒而跌落雪谷。因为要翻越的雪山一座连着一座，所以已经没有了特别的动员和准备，队伍就这么低着头往上走。山上的风很猛烈，有的战士被风刮倒了，就再也没有力气站起来，有的被风刮下了雪谷。

突然有人说，前面就要进入芦花地区了！

进入芦花地区的特殊意义在于，红军自此从中国的长江流域进入了黄河流域。

七月九日，一封署名为“中共川陕省委”的电报到了，电报建议加强总司令部同时增设军委常委：

党中央：

依据目前情况，省委有下列建议：为统一指挥、迅速行动进攻敌人起见，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向前同志任副总司令，昌浩同志任总政委，恩来同志任参谋长。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并希立复。

布礼

中共川陕省委：纯全、瑞龙、

黄超、琴秋、维海、富治、永康

九号

署名的川陕省委领导人是：周纯全、刘瑞龙、黄超、张琴秋、李维海、谢富治和吴永康。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级省委要求中央改组领导层，并提出具体人选且要求“立复”，此封电报可谓空前绝后。

对于还在北上的红军部队来说，最严重的实际问题仍是粮食的短缺。一些连队已经三天没有一粒青稞了。红军总政治部甚至发布了这样的命令：“……在发现有粮的地方和家屋，不论没收或购买，均应派武装看管……”红军官兵自觉地执行纪律，对所经藏区藏民的财物给予了妥善保护，包括粮食，尤其是寺院里的粮食。一支红军部队在山里发现了一群牦牛没有人看管，官兵们把牛牵了回来，尽管无米下炊，但依旧不敢杀牛，而且还得割草喂养着。几天之后，牛的主人小心地来到红军驻地，官兵们把牛全还给了他。这支部队还发现过一片玉米地，玉米已经接近成熟，官兵们喜出望外，但是得到的命令是：不准吃地里的玉米。经过再次请示，官兵们被允许摘一点玉米叶子，于是饿急了的官兵便在地边支上锅开始煮玉米叶。正煮着，在玉米地里藏了很久的主人来了，是一位藏族老阿妈。她揭开红军的锅，看见锅里煮的玉米叶子后，回家端来了一大盆煮熟的玉米送给红军。连队司务长给了老人三块大洋之后，官兵们才开始狼吞虎咽地吃起来，看得老阿妈在一旁直抹眼泪。

红一军团二师政委刘亚楼此时调到一师任师长去了，萧华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刻接任了二师政委职务。为了欢迎他，二师师长陈光好容易找来了一块大约四两重的牛肉干，让警卫员放在野菜里煮，然后两个人举行了“私人宴会”。风干的牛肉干根本煮不烂，味道也十分古怪，但两个人还是觉得已经很奢侈了，于是把一大锅野菜汤全喝了。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得到了筹粮队再次受到袭击的消息。

自红军进入这一地区以来，派出筹粮的部队不断受到土司武装的袭击，被袭击的官兵死得十分惨，有的被砍断了四肢，有的被挖了眼睛。这次派出的筹粮队不但受到了袭击，七名战士被杀，还有一名干部被抓走了，被抓走的干部是二师青年干事周书良。萧华一听，立即组织部队前去营救。在和土司代表谈判的时候，土司答应不再袭击红军，但条件是一定要留下那个红军干部。萧华就是为了营救周书良来的，但又不能立即拒绝土司，只有再接着谈判。谈判进行得十分艰难，被扣的周书良大吵大闹，决不答应留在土司这里。谈判如果破裂，就有可能发生武装冲突，周书良就有可能被杀。最终，土司不但保证不再袭击红军，并答应卖给红军粮食，但坚持条件依然是把人留下。土司解释说，留下这个红军干部是为了请他“帮助土司办事”。在请示了上级之后，萧华见到了被扣留的周书良。他动员周书良留下，希望通过他的工作，为后面的部队筹集粮食。年仅十九岁的萧华说着说着就掉了泪，而周书良哭成了泪人。最后，为了红军的生存，他还是答应留下了。周书良被土司的人领走的时候，萧华送他送出去了很远，一直送到了大草甸子的边上。在那里，萧华对周书良说：“我们走了以后，你的困难一定很多。无论什么时候，无论遇到什么情况，记住你是一名共产党员，是一颗红色的种子，要在这里扎根开花。等革命胜利了，我们来接你。”周书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向萧华敬了最后一个军礼，在土司的人的簇拥下渐渐消失了。

后来，不知是这个土司没有食言，还是周书良做了工作，土司果然主动卖给了二师一批粮食。

没有人知道土司固执地要把那位年轻的红军干部留下的真实原因。

自那时起，再也没有了周书良的消息。

直到晚年的时候，红军干事周书良依旧留在萧华的记忆之中。

二师的先头部队六团在向松潘前进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土司骑兵的袭击。红军没有与骑兵作战的经验，撤退到了山中的一个小村旁。这时候，六团全团已经断粮两天。团里不得不冒着巨大危险派出一个筹粮队。结果，筹粮队走出山谷没多远就被土司武装包围了。土司武装说只要把枪扔出来就放他们过去。红军官兵照着做了，结果土司武装却突然发动了猛攻，筹粮队除跑出了一名十三岁的小红军外全部牺牲。

没有了食物的六团被迫滞留。

必须刻不容缓地给六团送去粮食。紧急任务被交给了二师宣传科科长舒同。经过动员之后，二师其他部队纷纷把自己好不容易筹集来的青稞全都捐献了出来，然后舒同领着送粮小分队出发了。按照路程，至少要走三天，小分队不分昼夜地跋山涉水，仅用了两天的时间就找到了被困的六团。当舒同和六团派出的尖兵相遇的时候，他立即命令战士们朝天开枪，为的是让枪声告诉六团的官兵们：再坚持一下，救命的粮食送来了！时年三十岁的红军宣传科科长舒同，数十年之后成为新中国一位著名的书法家，他的书法被评价为“古拙苍劲，有禅气”。

尽管面对着饥饿的威胁，红军各部队还在顽强地向北前进。

七月六日，有消息说徐向前率领部队已经接近黑水河地区了，彭德怀立即去电告之第三军团目前的位置，并且带领两名警卫员和特务连的一个排顺着黑水河前去寻找。黑水河由高山积雪融化而成，河床中的乱石间翻着白色的浪花。河上架设着不少溜索，是当地藏民过河的工具。在一条溜索前，彭德怀停下了脚步，他发现溜索已被人为破坏。这时，河对岸出现了一支队伍。“是大脑袋！”彭德怀对身边的人说。但是，溜索已坏无法过河，相互喊话也因为河水冲击岩石的巨大声响无法听清。于是，彭德怀写了张“我是彭德怀，第三军团一部在此迎接”的字条，包上一块石头使劲儿扔了过去。过了一会儿，对面也扔过来一张字条：“我是徐向前，很想见到您。”电话兵受到启发，用同样的办法把电线连接起来。在电话里，彭德怀和徐向前约定次日到上游一个有桥的地点见面。

第二天，彭德怀再次带人出发，中午的时候到达约定地点。几乎与此同时，对岸也出现了队伍。可是，这里的铁索桥也被破坏了。双方还是不断地喊话，不断地扔石头。警卫员在附近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根溜索，溜索上悬挂的用竹条编织的筐还没有被破坏。

对岸的那个身材修长的干部爬进筐里，顺着溜索溜过来了。

彭德怀大步跑了过去，把从筐里跳出来的徐向前紧紧地抱住。

中国工农红军中两位著名的军事将领，一个湖南人，一个山西人，此前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此后他们终生都对对方充满了敬重之情。

彭德怀和徐向前立即交换军情，两个人共同的感觉是：部队行动的速度很不理想。

中革军委已经感到张国焘似乎在有意拖延部队北进的速度。但是七月十日张国焘的电报先到了。电报表明："现毛儿盖开始战斗，胡敌测明我们企图，将集结兵力于松潘及其东北地区抗战"。因此，"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反对右倾。要能以坚决的意志，迅出主力于毛儿盖东北地带，消灭胡敌；特别要不参差零乱地调动部队，而给敌以先机之利，及各个击破或横截的可能"。——这是张国焘首次明确向中央提出应该"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

接到张国焘电报后，中革军委发出的电报是：

张：

甲、分路迅速北上的原则早经确定，后勿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切盼如来电所指，各部真能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

乙、目前四方面军主力未到马河坝东北，沿途番民捣乱，三军团须使用于配置警戒及打通石碉楼方面。一军团及八十八、八十九两师三团，在毛儿盖未攻下前，不便突入。

丙、弟等今抵上芦花，急盼兄及徐、陈速来集中指挥。

朱、毛、周

十号

这一天，毛泽东到达了芦花附近。

到达芦花的中央领导人开始讨论一个必须作出的决定：给张国焘什么“官”才好——松潘战役的准备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不给一再要权的张国焘一个“官”，北进的计划也许会出现挫折，那样红军将面临更大的危机。毛泽东认为：“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泽东看出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但“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可只当副主席，同周恩来、王稼祥平起平坐，他又不甘心”。张闻天就说可以将自己的“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毛泽东断然否定了，他说张国焘“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了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经过反复权衡，毛泽东对张闻天说：“让他当总政委吧。”这样做既考虑了张国焘的要求，又没让他把军权完全抓到手，是唯一两全其美的办法。在同现任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商量时，周恩来正发着高烧。那时和张闻天谈着恋爱的女红军刘英后来回忆说，周恩来“一点都不计较个人职位，完全同意这么安排”。

七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芦花召开。

当天，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的电报到了，电报明确建议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集中军事指挥：

焘、向并转朱总：

第七团蔡电报称：坝尾、内客一带之敌均退走，大概是撤去克龙或集小堡寺，备与我战。已令其大部仍固现阵，一部佯攻以制所部，向左方克龙、克辰方面认真游击，河东尽力制敌。树［王树声］到沙，电台时所坏。四台已修好，今晚到马坝河工作。弟即在该地逗留，或可赶到德怀同志处。全局应速决，勿待职到。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仍请焘任军委主席，朱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示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坚决提高纪律、

士气，肃反、反右，所出总的政治文件，示写作干部写出，使战士明白形势、任务及前途。对一、四方面军行动决议公布，统一全党与全军意志。浩连日不得指示，现在决亲来面报。

弟礼

巧卯［十八日五时至七时］

芦花会议只有一项内容：解决组织问题。

主持会议的张闻天首先提出了中央对于解决组织问题的意见：军委设总司令，由朱德担任；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常委，过去是四人，现在增加陈昌浩。周恩来调至中央工作。但在张国焘尚未熟悉工作前，周恩来暂时帮助其工作。

宣布之后让大家讨论——实际上是听张国焘的反应。

想当军委主席的张国焘当然明白，在这个会议上他是绝对的少数，他不可能提出自己当军委主席的意见。他别无选择，只有同意。于是，张国焘表示“基本赞同”。但是，他提出了增补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建议。毛泽东的回答是：提拔干部是需要的，可是在目前形势下，中央不需要集中很多干部，因为部队更需要干部。于是，张闻天总结说：“大家意见一致，很好。”

会议结束后，中革军委以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的名义下达了对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的任命：

各兵团首长：

奉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特电全体知照。

军委主席朱、周、张、王

十八

两天后，中革军委以机密电文下达了一、四方面军各部队番号的变更和干部的任命：

组成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

第一军团改为一军：军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

第三军团改为三军：军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参谋长萧劲光；

第五军团改为五军：军长董振堂，代政委曾日三，参谋长曹里怀代；

第九军团改为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

原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三五个军番号不变。

第四军：军长许世友，政委王建安，参谋长张宗逊；

第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陈伯钧；

第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参谋长李天佑；

第三十一军：军长余天云，政委詹才芳，参谋长李聚奎；

第三十三军：军长罗南辉，政委张广才，参谋长李荣。

组织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在部队建制上，只要中央红军的基本建制和骨干将领仍在，不被张国焘"混编"，毛泽东根本不在意如何改变番号。特别是，从上述任命中可以看出，中央红军中的优秀指挥员李聚奎、张宗逊、李天佑、陈伯钧等已被加强到了红四方面军的队伍里。

中央红军在历尽千难万险的转战中，始终不遗余力地保存干部。朱德说："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尽管在中央红军的每一次战斗中，红军干部总是冲在最前面，但是他们一旦负伤，就会被抬着跟随部队行军。中央红军"甚至抽调战斗兵来抬着他们"。无论路途有多么遥远而艰险，无论敌人的围追堵截有多么紧迫，即使不得不把伤员留给当地的老乡，也是将战士留下而决不放弃干部。因此，中央红军这个曾经的巨人虽然几乎血肉耗尽，可是这支部队依然拥有着极其结实的骨架，骨架未倒血肉再度丰满只是时间的问题。那些政治上和军事上皆可信赖的红军干部，对于整个共产党红色武装的发展壮大来说，"是极可珍贵"的。

组织任命下达后，红军并没有立即北上松潘，尽管因为前线阵地不断失守再这样耽搁十分危险，但毛泽东认为接下来要开的会才是更重要的，这就是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形式讨论红四方面军的历史问题。

这是张国焘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

张国焘声称“中央的政治路线有问题”，现在，中央要首先深究他的路线是否有问题。

政治局会议的议题让张国焘没有任何反对的借口：两军会合之后，中央有责任听取红四方面军关于放弃根据地的情况汇报，并且有权力提出意见和作出评判。

七月二十日，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各部队军事指挥员陆续到达芦花。

会议开始前，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授予徐向前一枚金质“五星”奖章。

这是徐向前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因此他既兴奋又拘谨——此时此刻，向徐向前授予金质“五星”奖章，具有令人遐想的含义。其中至少有一个信息是明确的，即中央对徐向前的信任与肯定。

中央没有理会陈昌浩让张国焘任军委主席的建议，更没有采纳张国焘让陈昌浩当红军总政委的建议。陈昌浩和徐向前一起赶到芦花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但是中央只授予了徐向前奖章，这不能不使陈昌浩感到了一种难以言表的失落和尴尬。

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两天的政治局会议实际上是在讨论或者说是在争论一个问题：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根据地是不是一个错误的行动?

从向中央汇报工作的角度上讲，红四方面军在放弃苏区等问题上对中央有所交代，是必要的；从纠正张国焘与中央离心离德的思想苗

头出发，对他进行政治上的规劝和警告，也是必要的；从理论上解决思想问题，从而达到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合作，更是当前的必要。但是，这时候，整个红军的生存正受到极大的威胁：部队一直在严重缺粮的地域徘徊，国民党军不断地从四面压缩而来，特别是在红军准备突击而出的川北松潘地区，胡宗南部正利用红军在时间上的耽搁推进阻击防线。因此，在这个不毛之地的短暂争论，本应在时间更从容的时候再耐心讨论——事后证明，会议并没有达成中央希望的团结，张国焘与中央的背道而驰反而加剧了。

张国焘首先发言，他讲述了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的前后经过。接着是徐向前发言，他汇报了红四方面军的部队状况：“对党忠诚；服从命令听指挥；纪律较好；作战勇敢；打起仗来各级干部层层下放，指挥靠前；兵力运动迅速敏捷，长于夜战”；“平时注意军事训练”，“战后注意总结经验”。缺点是“文化程度低，军事理论水平和战略战术的素养不够”。最后陈昌浩简要介绍了红四方面军的政治工作情况。

由于徐向前和陈昌浩要立即率前敌指挥部去毛儿盖，他们发言之后就走了。

毛泽东的发言从红四方面军创建鄂豫皖根据地开始讲起，说到根据地在国民党军发动第四次“围剿”后被放弃时，毛泽东认为面对敌人的大兵压境，红四方面军既没有做充分准备仗也没有打好。说到川陕根据地，毛泽东认为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嘉陵江，在取得歼敌十二个团的胜利后放弃根据地，是一个严重错误。红四方面军领导没能了解建立政权与建立红军的密不可分的政治关系。

放弃川陕根据地，这是张国焘的痛处，因此他反驳说：“川北苏区固应保卫，松潘亦应当控制，但这决定于四方面军的力量，而非决定于主观愿望”。红四方面军“当时的主要努力是策应一方面军，而我们的兵力有限，不能过分分散使用。如果中央并不以为四方面军策应一方面军的行动是多余的或错误的，就不应苛责四方面军不能完成力不胜任的其他军事任务”。张国焘认为，“川北苏区即使当时留置了较多的兵力，事实上也不能达到保卫的目的”。“而一方面军当时能否渡过大渡河顺利到达懋功，尚成疑问，四方面军果真全力北向夺取松潘”，也许中央又会批评红四方面军“隔岸观火，看轻休戚相关的大义”。

徐向前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是：

整个说来，红四方面军退出川陕根据地，有复杂的原因。优势敌人的压迫，常年战争和“左”的政策造成的困难，策应中央红军的紧迫战略需要，都凑到了一起。从这个意义说，是历史的必然。问题在于：主力红军撤出根据地后，没有留下足够的兵力坚持游击战争，只留下刘子才、赵明恩等千把人枪，如果把三十三军留下，要好得多；强渡嘉陵江后，犹豫徘徊，丧失了进击甘南的战机，使“川陕甘计划”流产。川陕甘计划未能实现，非常失策，是关系整个革命命运的问题。如果当时实现了这个计划，我军将能得到更大的补充，中央红军北上就有了立脚点，形势会不一样的。

徐向前所说的“关系整个革命命运的问题”，显然是指由于红四方面军放弃了根据地，且没有在西渡嘉陵江后向北发展，造成了中央红军到达之后没有落脚点，从而导致红一、红四方面军全部拥挤在了西康这片不毛之地中。

由于发起松潘战役的时间被一拖再拖，红军先遣部队逐渐与后续部队“相隔过远”，中革军委被迫对原来松潘战役的计划进行了修改。

此刻，追击而来的川军已经距离红军越来越近了。

川军第二十军第二混成旅向廷瑞部为左翼，经两河口进攻懋功；第三混成旅为中路，其前锋翻越夹金山后直指懋功；第四混成旅从右翼翻越夹金山进攻达维；第二十军军部和第一、第五、第六混成旅为预备队。川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亲自带领军手枪团，跟在第四混成旅的后面翻越夹金山。手枪团快要爬到山顶的时候，一个士兵开枪射击逃跑的民夫，枪声响过之后，天空突降暴风雪，手枪团所有的人都趴在地上不敢动。一个民夫说，翻雪山不能大声喧哗，更不能开枪，否则天神一发怒就别想活着下山。听了这话，杨森先发怒了，他命令士兵把山顶小庙里的王母娘娘塑像推倒扔到山涧里，然后强令官兵顶着风雪快速前进。结果，第四混成旅仅九团就有一百多名官兵死在了夹金山上。七月二十五日午后，第二混成旅首先到达懋功。红军后卫阻击部队在把一条河上的桥板拆了后，撤退了。杨森在懋功的天主教堂里召集了第二十军各部队军官会议，说本军占领懋功，受到蒋委员长的通令嘉奖，这是很光荣的事情。目前红军已经向青海方向去了，咱们川军追到这里，任务就算是完成了。杨森的话音刚落，蒋介石的电报到了。蒋介石认为要巩固懋功，必须占领抚边，因此命令第二十军各部队继续向北进攻抚边。

进攻抚边的战斗经过并不像占领懋功那样顺利，第二十军三路进攻部队都受到了红军后卫部队的顽强阻击。六团二营在进攻中遭到红军的突然反击，十八名士兵全部被红军用大刀砍死。在左翼实施掩护的五团二营奉命向红军的阻击阵地发起冲击。眼看就要冲上红军的阻击阵地时，红军从没有任何动静的阵地后面一下子冒了出来，二营营长李显宗即刻死在了红军的乱刀之下。六团团长李介立连夜派出一营向红军阻击阵地的侧后迂回，并在第二天拂晓再次发动了进攻，两面

受攻的红军阻击部队撤退了。六团和五团相继开进了抚边。在这里，川军发现了几十名由于负伤已不能行动的红军伤员，伤员们的身边还有一挺打光了子弹的重机枪，而他们背后的墙上写着“热烈欢迎张主席”的标语。

杨森命令把红军伤员拍摄成影片，影片的名字叫《灵关大捷》。

灵关，抚边以南的一个小镇，距抚边尚有一百多公里的路程。杨森将影片命名为《灵关大捷》，也许是想用几个红军伤员表现他的第二十军从抚边到灵关一路“大捷”。

川军第二十八军邓锡侯部李树华旅奉命配合第二十军的行动。李树华的三个团一直跟在杨森部队的后面与红军后卫部队作战。中央红军翻过夹金山大雪山后，李树华旅接到了军里转来的一封密信，信中转述了红军总司令朱德写给邓锡侯军长的密信内容：国难当头，应停止内战。红军北上抗日，如兄部愿来，我们欢迎；如暂时不能，希望互不干扰。随后，邓锡侯给他的第二十八军各部队长官下达了密令：追击部队要与红军保持一天的路程。既不失红军的行踪，但也不要和红军发生战斗。每天派人向当地藏人打听红军的去向，然后逐级上报足以应付即可。结果，李树华旅一路与红军即使有过短暂的接触，也是一触即退，自己和红军双方都没有伤亡。邓锡侯的官兵由于得不到杨森的接济，到十月大雪封山时，部队粮米断绝。邓锡侯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第二十八军“奋勇追击斩获甚丰”，但是“饥无食，寒无衣，病无药”。

此时，位于川西北的北川、茂县、汶川等战略要地已先后被川军占领。

陷于荒无人烟的西康地区令红军面临着不战即毙的境遇。

松潘，四川西北部川甘大道上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四周山高林密，塌方不断，通行极其困难。

红四方面军向松潘实施的战斗攻击均未成功，红军想抢在胡宗南前占领松潘的愿望没有达成。

命令胡宗南部不顾一切地抢占松潘，是蒋介石军事指挥生涯中少有的精明之举。一个月前，蒋介石亲自调动了他的国民党中央军嫡系部队：胡宗南的第一师、陈沛的第六十师、伍诚仁的第四十九师和王耀武的第一补充旅、钟松的第二补充旅。大队人马奉命急促赶往川北松潘地区。

蒋介石最初的目的是阻止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然而这一军事调动的结果却显示出他对红军未来走向的一种预感。

急。

胡师长宗南：

松潘部队既占归化，应速向叠溪节节进展。但一面进展须一面逐段筑碉，对于两侧尤应注意。故横线亦应扼要筑碉据守，勿受匪迂回抄袭。对于向松潘增加后续部队，最好陆续移增，决再增三团，共加六团为妥。如弟能前往亲自督剿更好。决自鱼日［六日］起派空军每日掩护我军向叠溪进展。希告进攻部队协同动作，俾奏速效。

中正手令。

而这一天，中央红军刚刚到达夹金山大雪山脚下。

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向松潘集结的过程中吃尽了苦头。第二补充旅是从北平调来的，这个旅从旅长到团长全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于是与蒋介石皆成为师生关系。早在一九三五年二月的时候，他们就奉命向川陕开拔归胡宗南指挥。第二补充旅从北平坐火车到郑州，再从郑州转车到西安。虽然受到了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的招待，但是官兵们明显感到陕军并不欢迎他们到来。四月，第二补充旅开始向松潘地区靠拢，但他们接到的命令却不是顺着大路走，而是要走秦岭中陡峭的古栈道。国民党军第一师师长胡宗南对此解释道：陕军第七军军长冯钦哉的部队正在大路上转运物资，物资中有从汉中银行提出来的大量现款，如果在路上两军相遇可能要发生冲突——为什么会发生冲突？为了两军路上相遇，还是为了大量现款？第二补充旅被迫在没有人烟的荒山中行军，第一天就摔死了好几匹马，原来驮在马背上的弹药和给养只好由士兵来背。秦岭的春季阴雨连绵，栈道单人勉强可过，山中没有任何可以宿营的地方，由于开小差的士兵很多，被丢弃的弹药和整袋的面粉在栈道上随处可见。第二补充旅从陕西进入四川，翻越了海拔五千多米的雪宝顶大雪山后到达松潘，驻扎在松潘县城第一中学里。

胡宗南亲自率领着丁德隆的独立旅、李铁军的第一旅、袁朴的第二旅、廖昂的西北补充旅、伍诚仁的第四十九师、王耀武的第一补充旅在甘南和川北交界处的文县附近集结，当红四方面军从川北西去之后，胡宗南的大军才开始沿着涪江上游北岸的小路向松潘前进。庞大的部队把沿路百姓的粮食和稻草全都征用了，但仍然无法满足需要。而胡宗南的命令是：不顾一切迅速到达松潘。胡宗南认为如果红军赶在他前边占领了松潘，在川西北那个荒僻的地域里，他想撤退都不知道该撤往什么地方。

六月下旬，胡宗南的部队占领了松潘一线。

国民党军二十七个团挡在了红军北上陕甘的路上。

这就是毛泽东在芦花会议上对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后没能控制松潘地区提出质问的原因。

胡宗南大军驻守松潘，各旅搭起的帐篷遍布在附近的山谷中，红军没有飞机大炮，因此他们不怕暴露目标。山地多变的气候时风时雨，官兵们还都穿着单衣，虽然雇佣了大量的民夫，但由于需要昼夜不断地挑运粮食，因此根本没有力量运送棉衣。民夫从江油县城挑米来松潘，壮夫每人百斤，弱者每人七十斤，近三百里的艰险山路上，倒在路边的民夫不计其数。即使到了松潘，担子里的米也已让民夫在路上吃去了一半。给养成了严重的问题，胡宗南为此下了一道命令："国难当头，一切要节约，上至司令官下至士兵，每天只吃一餐，放午炮吃饭。"所谓"放午炮"，就是中午的时候，一声炮响各部队统一开饭，每天一炮一顿饭。胡宗南也在炮响之后吃饭，但他携带有大量的饼干罐头，而且当地的土豪经常请客，所以他自己并没有饿着。

西北补充旅的哨兵查获了一名红军便衣，从这名红军便衣身上搜出一张地图，地图是用毛笔画的，川、甘、青三省边界一带的山脉、河流、道路、村庄均在图上。这样一张地图绝非短时间能够画出，胡宗南这才知道这名红军便衣早在他的部队入川之前就已经扮作货郎潜入松潘。胡宗南看着这张甚至比他的作战地图还要详细的地形地貌图，终于明白红军肯定要在这里和他打上一仗了。

胡宗南不想与红军作战，因为他的兵力没有红军多，同时他知道红军能吃苦肯拼命，真的打起来他的部队凶多吉少。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在成都发出了给川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记大过处分的电报。电报以刘文辉各部失守大渡河为由，指出之前一再电示川军沿大渡河北岸“逐段切实筑碉”，而刘文辉也“先后电复一一遵办”，但当中央红军一举渡过大渡河后，蒋介石才发现刘文辉对他的每一次电示“实际全未遵行”。对于这一点，蒋介石说，红军“在两天内能行三百里，还要作战，可为铁证。否则碉堡阻滞，行动决不能如此神速”！所以，必须“着记大过一次，以为督饬不力者戒”。蒋介石终于敢收拾川军了，这是因为中央军薛岳率领的周浑元部和吴奇伟部已经到达成都附近，四川成为中央军的天下已经势在必得。蒋介石在成都认真研究了川西北地形，认为红军现在徘徊在西康地区，东有岷江，西有大小金川，南有夹金山终年不化的积雪，北有无法通行的草地，几万红军根本无法处处布防，加之粮食缺乏，气候恶劣，因此只要北堵南追，红军在劫难逃。

七月十八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发布了《川甘边区“歼匪”的计划大纲》，蒋介石对红军未来行动路线的判断已经准确：

现朱、徐两匪各派一部窜至毛儿盖、哈龙冈、羊角塘、班佑一带，企图袭取松潘。原据北川、墩上各处股匪，已向茂县撤退。威州［汶县］、茂县间之村庄，全被匪焚毁。依据匪之过去行动，均系避实攻虚，且青海南部多属软地，类皆不毛。是可判断该两匪，先各以一部分向毛儿盖、阿坝探进，其余必跟续分途北进，并以大部经毛儿盖进窜岷县，一部经阿坝进窜夏河，期达越过洮、黄两河，接通“国际路线”，或由陇中窜向陕北、宁夏，与陕匪合股。如其不逞，仍回窜川北。

而这确实是毛泽东设想的红军北进陕甘的路线。

于是，蒋介石在这条路线上层层设防，调集的总兵力达三十万之众。

胡宗南知道毛儿盖的重要性。虽然这个小地方在地图上难以发现，但是它处在红军北进的道路上，而且是松潘草地的南沿。如果红军要进攻松潘，必须先占领毛儿盖。因此，胡宗南在到达松潘的第二天，就命令西北补充旅一营营长李日基率部前去毛儿盖。胡宗南给李日基的任务是：“搜索、警戒和打游击。”至于“能不能打游击”，胡宗南的指示是：“自己做主，不要向我请示。”李日基营在两个藏族向导的带领下走了两天才到达毛儿盖，部队住在了寺院供喇嘛住的空房子里。

毛儿盖是河谷中的一块狭长平地。一条不宽的小河自北向南流过，把两座大山隔在平地的边缘。沿河是青稞地，山坡上长满低矮的乱草。由于这里海拔高，从北方来的官兵们很不适应。李日基判断红军只能从南边来，因此他向那里的一个藏族小村庄派出了一个前哨班，并在村庄两侧的山头布置了警戒排。除此之外，一营官兵没有修筑任何工事，因为李日基营长认为此地没有固守的必要。

但是，几天之后，胡宗南来电，说红军有向毛儿盖进攻的迹象，命令一营固守。李日基立即回电说，要固守这里至少需要一个团。胡宗南果然派了个副团长率领一个营来增援了。但是，这个副团长连同他率领的那个营仅仅在毛儿盖待了几天，就又被胡宗南调回去了。李日基后来才知道，这个副团长为了不留在毛儿盖与红军作战，买通了胡宗南的一个参谋，结果这个参谋对胡宗南说毛儿盖的防守一个营足够了。愤怒的李日基只有赶快修筑阻击阵地，以便迅速展开兵力。全营正忙着，电台报务员报告说：附近发现了一个大电台，肯定是红军大部队来了！

攻击毛儿盖的红军部队是黄开湘和杨成武率领的红一军团二师四团。

四团一直是整个红军的先头部队，他们到达毛儿盖的时间是一九三五年七月十日。

先是南边那个藏族小村庄里的前哨班跑了回来，然后整个毛儿盖被红军包围了。红军从南面的山地冲过来，警戒排很快就溃败了，负伤的排长被士兵背回了营部。晚上，李日基亲临阻击阵地指挥战斗，企图以此鼓舞士气。李日基发现红军的装备很差，火力根本无法和自己相比。由于李日基离开了营部，副营长吴剑平负责给胡宗南去电报告战斗情况。这一下弄得胡宗南不断地问“李日基如何”。天亮之后，李日基回到营部，发现一营请求增援的电报再也没有了任何回音，不禁怒火万丈。后来他才知道，自从副营长署名的电报一再发出后，胡宗南先是以为李日基已经死了，后来又怀疑他投降了红军，因此无论如何不敢派出增援部队，怕中了红军的计谋。

第四天，红军已经占领了毛儿盖的大部分地区。李日基营营部和各高地之间的联络被切断了，全营大部分人马被围困在那座叫索花寺的寺院里。一连几天，红军的攻击并不猛烈，李日基怀疑红军在挖地道，忙派人前去侦察。果然，红军的地道快要挖到寺院里了。此时，在寺院大门防守的副营长吴剑平和一连连长郭全喜相继阵亡，全营粮弹全无，增援无望，军心崩溃。李日基连续发电大骂胡宗南无情无义。胡宗南的电报终于来了，在确信李日基还活着后，他命令一营撤退：“电到后该营即可撤回并将电台砸毁，回来士兵一人赏洋十元，带回武器一支赏洋二十元。”已经魂飞魄散的李日基立即命令部队砸了电台开始突围。一营能够突围的官兵仅剩了约五百人，其余一百多个伤员和体弱者全部被红军俘虏。天降大雨，李日基营的官兵饥寒交迫，

看见红军冲上来，坐在地上马上缴枪投降。李日基顺着一条山沟拼命跑，跑了一夜之后发现身后的官兵不足一百人了。毛儿盖四周的小路上到处都有红军的警戒哨兵，李日基不敢走出树林，在流浪了几天之后才回到松潘。胡宗南没有斥责狼狈不堪的李日基，而是让他去领赏。由于根本没把胡宗南的那封电报听完就跑了，所以李日基一头雾水，不知道让他去领什么赏。

胡宗南丢失了毛儿盖，但是他的收获是：确定了红军现在的具体位置，同时明确了红军定要进攻松潘。因为红军如果不走松潘，就只能进入没有人烟的大草地。胡宗南认为，数万红军无论如何也不会走进那条绝路。

占领了毛儿盖的四团缴获甚丰。除了粮食和酥油外，竟然还有前门牌香烟！黄开湘和杨成武立即派出一个骑兵班把这些香烟送到了师部，因为他们知道聂荣臻政委和陈光师长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抽到真正的香烟了。

占领了毛儿盖的红军先头部队在那里停留了很长时间。

四团曾向松潘方向发起进攻，但是由于敌人兵力多火力强，在付出了很大牺牲之后不得不撤回——红军的后续部队没有及时跟进。

红军各部队虽都在执行北进计划，但是行动的速度极其缓慢。

八月初，毛泽东到达一个叫沙窝的地方。

由于内部的矛盾再次激化，张闻天发出了开会的通知：时间是八月四日。

北上毛儿盖的行军被再次耽搁。

粮食的匮乏更加严重，疾病开始流行。疾病流行的原因是饥饿的官兵吃了死亡后风干或腐烂的牛羊尸体，还有有毒的野菜或者有毒的蘑菇。

在沙窝附近负责收容伤病员的女红军李伯钊把刘少奇的烟叶子吃了。这些像萝卜叶子一样的绿色野草被刘少奇采集来当烟草，因为整齐地摊在地上晒着，饥饿难耐的李伯钊看见后就拿来煮着吃了。刚吃到一半，李伯钊就开始趴在一座牲口圈里不停地呕吐。不久，女红军们发现了一个可以找到粮食的办法，那就是在牲口粪里寻找没有被消化的青稞粒。这个发现居然使她们一粒一粒地从牲口粪里挑出来好几斤青稞。

沙窝会议在一座喇嘛寺院里召开。

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博古、邓发、凯丰等人。

矛盾爆发的导火线还是一篇文章。由于张国焘一直延误着红军的北进，仍试图促使红军实施他的西进川康计划，由此引发了一、四方面军之间的种种猜测。张闻天出于对党和红军的团结的担忧，写了一篇名为《北上南下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文章，送到红军总政治部内部刊物《干部必读》编委会要求发表。编委会由张闻天、陈昌浩、凯丰、博古、杨尚昆组成。陈昌浩发了脾气，说希望红军一致北上没错，但“何必又端出个南下来批判”？将北上与南下之争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其真实意图只能是“整”红四方面军。张闻天没想到自己的文章会惹来陈昌浩这么大的火气，他跑到毛泽东那儿从头到尾学了一遍，说他无非是想让红军北上的战略方针顺利实施。毛泽东听后笑了。他告诉张闻天，现在写这样的文章没有用，张国焘仗着人多枪多

不会听进去的。张闻天忧心地问：如果张国焘坚持南下怎么办呢？毛泽东的回答是："忍耐、斗争、等待，不可操之过急，最好一起北上。"

沙窝会议进行了两天。第一天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特别指出："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地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唯一的绝对的领导之下生长与发展起来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决议告诫全体红军："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部分，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领导的"。"一、四方面军兄弟的团结，是完成创造川陕甘苏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决议号召"全体党员与红色指战员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

第二天，会议开始解决组织问题。会议拒绝了张国焘提出的增补红四方面军九名干部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意见。当时中央政治局一共才八个人。会议决定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两人为政治局委员，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并任命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副主任。虽然中央在人事安排上对张国焘作了一些让步，但毛泽东坚持政治局不能人太多，因为"还有二方面军和全国白区的秘密党的组织"。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作出了"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的决定。周恩来被任命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个决定在未来巨大突变发生时，几乎起到了拯救危亡的作用。

沙窝会议结束了，张国焘说："深夜三时左右散会之后，我步出沙窝山口，与陈昌浩会晤，并告以会议经过。陈昌浩非常难过……"

沙窝会议召开的前一天，鉴于攻打松潘的战机已经失去，中革军委制定了一个新的作战计划，即《夏洮战役计划》。计划的中心意图是：红军继续北上，穿越松潘草地，经阿坝进入甘南，在洮河与夏河的广大地域形成发展趋势。

集中优势兵力突击一点，是红军一贯的作战原则。但是，张国焘坚持兵分两路——张国焘不愿意没有相对独立的军队。《夏洮战役计划》将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两路红军由两个方面军部队混编而成：左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第五、第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组成，共二十个团，由朱德和张国焘率领北上，向阿坝方向开进；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组成，共十二个团，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北上，向班佑方向开进；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等共七个团为钳制部队，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为总预备队并担任后方掩护，归右路军指挥。

张国焘离开了沙窝，毛泽东目送着他的身影渐渐消失。

与毛泽东告别的，还有朱德。

根据夏洮战役作战计划，朱德将和张国焘一起指挥左路军。

朱德与毛泽东的分开，对于依然处于危机中的中国工农红军来讲是十分危险的。

高大而消瘦的毛泽东站立在风中，他的心情恶劣到了极点。

在与朱德分别的那一刻，毛泽东无论如何都没想到，他们两个人再次相见竟然是一年以后了。

周恩来的病情在这个时候到了危在旦夕的地步。

自中央红军踏上长征征途以来，周恩来的精力和体力消耗已经达到了极限。他终于倒下了，高烧不退。医生开始以疟疾病来治疗，但是没有任何效果。当周恩来因腹部剧烈疼痛而陷入昏迷状态时，医生终于诊断出他得的是肝脓肿。

周恩来的肝脏已经严重化脓，疼痛使这位性格坚韧的共产党人彻夜呻吟。邓颖超被从休养连叫来了。看着随时会有生命危险的丈夫，邓颖超没有任何办法减轻周恩来的痛苦，只有不断地为他擦去脸上疼出的汗珠。性急的陈赓命令官兵到雪山上弄来冰块，为周恩来做腹部冷敷，以期减轻他的痛苦，但是周恩来的病情日益恶化，没有人能想出什么办法救他。

毛泽东来看望周恩来了，红军中不能没有周恩来。

昏迷三天之后，周恩来排出一大盆绿色的脓血，而后他的疼痛竟然减轻了。周恩来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近四十年后，周恩来被诊断出患了癌症。那时，毛泽东也同样被重病折磨着，他无法再看望周恩来了，周恩来在最后一次手术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四十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后得的肝脓疡病在那里穿肠成便治好的位置……"

毛泽东体质之好是惊人的。在中国红军的艰苦征战中，他除了被蚊虫叮咬患过疟疾之外，再也没有患过其他任何疾病。但是，从沙窝开始一路北上毛儿盖，毛泽东觉得自己十分难受，这种难受来自内心的巨大忧虑。

张国焘回到了卓克基。徐向前的意见是，部队必须马上离开这块不毛之地："这里没有吃的，得赶紧走，我们在前面打仗，找一块有粮

食吃的地方……部队天天吃野菜和黄麻，把嘴都吃肿了……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要命第一！”但是张国焘就是按兵不动。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催促左路军部队“专力北上”，口气急促而恳切：

朱、张二同志：

（一）不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时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疾进。右路军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出动，万不宜再事迁延，致误大计。

（二）新麦虽收，总数不多，除备行军十五天干粮外，所余无几。此事甚迫切，再不出动，难乎为继。

（三）目前洮、夏敌备尚薄，迟则堡垒线成，攻取困难。气候日寒，非速到甘南夏河不能解决被服。

（四）毛儿盖到班佑仅五天，到夏河十二天，班佑以北，粮、房不缺，因此，一、四两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支队，掩护后方前进。5K、32K［部队代号］即速开毛。

（五）目前应专力北上，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

（六）望立复。

中央

八月十五日十四时

八月十五日，朱德和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先头部队从卓克基出发前往阿坝。

同一天，右路红军的先头部队在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的率领下也从毛儿盖向北出发了。

但是，左路军的行进方向不是在向右路军靠拢，而是越走离右路军越远。此时的张国焘仍在试图自阿坝向西，进入甘肃和青海交界的边远地区。

张国焘表现出的动摇严重威胁着红军的整体行动计划。

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举行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博古、陈昌浩、凯丰、邓发，列席会议的有徐向前、李富春、林彪、聂荣臻、李先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因在左路军没有到会。叶剑英因在右路军先头部队，彭德怀因跟随担任后卫的第三军团也没有到会。周恩来因病缺席。会议再次强调了迅速占领甘南洮河流域的战役计划，特别指出“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那里是少数民族聚居地，物资匮乏，难以保障大军长期驻守。同时，一旦敌人在黄河东岸布防起拦截线，红军将被困于其中，前后左右都将难于伸展。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决定明确了一个重要原则：以右路军为北进主力，左路军作为战略预备队迅速东出跟进。会议要求“全体党员与红色指战员，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定，以工农红军特有的英勇，团结在中央的路线之下歼灭敌人，实现赤化川陕甘，而为苏维埃中国确立巩固不拔之基础”。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右路红军离开毛儿盖，陆续进入了无边无际的松潘大草地。

松潘大草地，位于今天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北部，南北绵延约两百公里，东西最宽处约一百公里，是一片平均海拔三千多米的高

原湿地。

如果之前能够按时发动计划中的松潘战役，近十万红军本可以避免进入这片犹如巨大陷阱的草地。

无论是红一方面军还是红四方面军，自离开苏区开始长征以来，所遇到的艰难险阻不计其数，但就自然环境之恶劣而言，以松潘大草地为最。

四团再次成为整个红军的先遣部队。

四团出发前，杨成武被毛泽东叫到了毛儿盖。

毛泽东对杨成武说：“这一次你们红四团还是先头团。必须从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毛泽东详细询问了四团的各项准备工作：粮食、衣服、向导……毛泽东告诉杨成武，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把可能遇到的一切困难向官兵们讲清楚，把为什么要过草地北上也向官兵们讲清楚。“只要同志们明确这些，我相信没有什么困难能挡得住红军”。杨成武走的时候，毛泽东让警卫人员把自己的晚饭——六个鸡蛋大小的青稞馒头——端出来送给了杨成武。毛泽东最后嘱咐杨成武：“必须多做一些‘由此前进’并附有箭头的路标，每逢岔路，插上一个，要插得牢些，好让后面的部队跟着路标顺利穿过草地。”

四团找到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藏族老人作向导，专门安排了八个战士轮流用担架抬着他。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一日早晨，在穿过一条无名山谷后，红一军团二师四团进入了松潘大草地。

在大草地的边缘，杨成武举起望远镜看去，心情骤然紧张起来：大草地野草丛生，水流交错，水草上雾气缭绕，天地间苍茫无边，人一旦置身其中根本无法分辨方向。没有树木，没有石头，几乎没有干燥坚硬的地面，只有长在沼泽上的一丛丛几尺高的乱草。黑色的积水散发着腐味，草丛下是无法预测的泥潭，脚踩在上面软软的，若是一不小心下脚过猛，就会陷下去直至被淹没。

六十多岁的藏族向导用生硬的汉语说："往北，只能从这里走。"

看着杨成武一脸的难以置信，藏族向导详细地解释说："要拣最密的草根走，一个跟着一个。我就这样走过，走了几天几夜才出了草地。草地里的水是淤黑的，有毒，喝了肚子发胀，还会死。如果脚被划破了，伤口被水一泡就会溃烂。"杨成武和黄开湘立即制定了一条纪律，要求部队一个一个地传下去：除了河水和雨水，不准喝也不准用草窝里的水。

四团进入松潘大草地的第一天，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发出的电报是：

聂抄转周、徐、陈：

一、二师于十七时到达腊子塘露营。

二、由毛到腊约八十里，路平好走，途中无人烟，须过五次河，有三次无桥。因天雨，水深及流速均正在增加，此刻水深约七十生的［厘米］。

三、编入四团之二九四团共三百余人全无雨具，通身湿透。

四、腊子塘从前有牧牛及架帐篷遗迹。今晚各部均在雨中拥坐，此地树林甚少，不能全部搭棚子及烧火。

林

二十一日十八时

二九四团，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在红军进入松潘草地前，被编入四团。

草地天气多变。早上乌云滚滚，冷雨霏霏，中午的时候突然晴朗起来，但顷刻之间又是大雨滂沱。大雨使草地里的河水骤然暴涨，四团无法徒涉，只能停下来等待。四团走了两天之后，藏族向导指着前面突然出现在草地中的一座山丘说：“那就是分水岭。我们从毛儿盖来，一路所有的河都往南流，流入岷江，接着又流进长江。过了那个山丘，所有的河都往北流，流入玛曲江，最后流到黄河里去了。”

红军官兵们登上那座山丘一看，眼前绿茵茵的草地铺展到天边，无数条水流在草地上蜿蜒如同玉带，草地里的野花色彩斑斓，在阳光下令人昏眩地摇曳着。

这里是中国的大河之源。

在这里，十七岁的小红军郑金煜死了。

进入草地的第二天，四团就有官兵倒下了，他们都是在消耗了身体里的最后一点热量后一头栽倒在泥水中的。有的人夜晚还在大雨中与战友们站在一起露营，天亮时分却没有了踪影，他们站立的地方只剩了一个泛着黑水的水涡。即使那些仍在行走的官兵，也因为饥寒而脸色黑黄。一些官兵只要倒下就再也站不起来了。郑金煜从江西石城加入红军，成为一名小宣传员，他虽然个子不高人又长得秀气，但打起仗来毫不含糊，因为作战勇敢十六岁就入了党。四团进入草地后，

小红军郑金煜背着武器、背包，还背着部队生火用的柴火。他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宣传鼓动的时候笑眯眯的，会讲故事还会唱歌。后来，杨成武发现有两天没见着这个活泼的小红军了，一问，才知道郑金煜因为呼吸困难已被送到卫生队去了。红军官兵都表示无论如何也要把他带出草地。杨成武把自己的马给了这个小红军，但是郑金煜已经无法在马背上坐住了，卫生队把他绑在杨成武的马上，让人跟着马看护着他。第四天中午，被绳子绑在马背上的小红军郑金煜突然说："让政治委员等我一下，我有话要对他说。"走在前面的杨成武立即赶了过来，郑金煜断断续续地说："政治委员，我在政治上是块钢铁，但是我的腿不管用了，我要掉队了，我舍不得红军，我看不到胜利了。"周围的人都哭起来。杨成武说："你一定能够走出草地，我们一定会帮助你走出草地。"——四团走出草地的前一天，十七岁的小红军郑金煜死在了马背上。

四团给后续部队留下了路标，但是不断的大雨和泥潭令路标很快就模糊了。

与冰冷的大雨、稀薄的空气和近似陷阱的泥潭相比，最大的威胁还是缺粮。一旦进入松潘大草地，几乎所有的死亡和消耗都与无法得到补充有关。尽管事先用强制的方式要求官兵筹集和携带至少可以支持一周左右的粮食，但能够筹集到的粮食十分有限。于是，不少官兵在行军的前两天就吃光了携带的干粮。

红三军团的一个连队有九名炊事员。班长姓钱，矮个子，不大爱说话。他带领的这个炊事班，每个人挑的担子都超过了规定的重量。钱班长说草地里弄不到粮食，多挑一点有好处。虽然受到了上级的批评，但是在向草地出发的那一刻，钱班长还是带上了连队的那个大铜锅。这个大铜锅从江西一直跟随着他们到了松潘草地。大铜锅有几十

斤重，上级命令把锅扔了，钱班长说："锅扔了，炊事班干什么？"虽然钱班长很严厉，但是大家还是很喜欢他，因为他对革命无比忠诚。在贵州打土城的时候，官兵们眼看着他在给阵地送饭时倒下了，大家都以为他牺牲了，难过了很久，可是半夜时分他又一个人爬回来了，敌人的子弹打在了他的腿上。炊事班行军负重大，别人休息的时候他们还要忙。钱班长发现官兵们的脚被黑水泡肿了，于是每天都要用大铜锅烧热水让官兵们烫脚。进入草地的第二天，大铜锅就没有粮食可煮了。炊事班给那些没有了干粮的官兵不断地补充着事先炒好的小麦和青稞。但是大铜锅还照常被挑着行军。一天早上，一个炊事员刚挑起大铜锅，身子一歪就一声不响地倒下了。另外一个炊事员挑起大铜锅继续赶路。中午的时候狂风大雨，部队被迫停止前进。炊事班在雨布下忙着用大铜锅烧姜水给大家喝，好容易把水烧开了，那个挑大铜锅的炊事员端着一碗姜水想给病号送过去，没走几步就连人带碗摔在了泥水里，官兵们赶忙上前想扶起他来，却发现他已经死了。这时候官兵们才知道，炊事班的同志自从进入草地以后谁都没舍得吃一粒粮食。第四天的时候，半夜里，钱班长突然想喝水，他走到篝火前坐了下来。大铜锅里一滴水也没有，钱班长就这样守着空锅一直坐到天亮。篝火已经熄灭，部队又要上路了，官兵们发现钱班长还在那里坐着，走过去一看，他就这个样子死了。官兵们叫着他，轮流把他抱住，试图让他活过来，但是钱班长的身体已经凉了。和钱班长一起转战了这么远的路途，大家竟然谁都不知道他的家乡在哪里，也不知道他在世上还有什么亲人，只知道在江西的时候他跟在红军的队伍后面走了很远才被批准参加红军。

钱班长和他的炊事班的战士全都牺牲在了草地里。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也断粮了。开始的时候还可以用野菜充饥，但是很快连这些东西都找不到了。彭德怀命令他的老饲养员把连同他的坐骑在内六头牲口全部杀掉。老饲养员急得直落泪，因为他知道彭德怀对他那头大黑骡子感情很深，平时无论他心情多么不好，只要看见大黑骡子脸上就有了笑容。为了这个，老饲养员经常和大黑骡子一起分享自己的干粮。大黑骡子在彭德怀面前十分温顺，但是打仗的时候却毫无畏惧。部队过湘江的时候，不少不会游泳的战士都是拉着它的尾巴才死里逃生的，它在那条被敌机狂轰滥炸的大江中游了好几个来回。平时行军的时候，它不是驮器材就是驮伤员。部队翻越夹金山大雪山，它的背上不但有沉重的行李，还有几个走不动的战士，尾巴上还拖着两个小红军。当时，老饲养员万分心疼，生怕大黑骡子会累死。彭德怀的命令下达之后，老饲养员和警卫员们谁都不愿意执行。彭德怀命令军团部的一名干部去。干部带上了一个叫印荣辉的战士。印荣辉后来回忆说：六头牲口被集中在一起，二十多分钟过去了，谁也不开枪。彭德怀叉着腰站在远处喊："开枪！立即开枪！"最后，那位干部开枪了，用机枪扫。五头牲口倒下了，可那头大黑骡子依然安静地站着。它是个老兵了，根本不害怕枪声。老饲养员扑了上去，抱着大黑骡子的脖子喊："把它留下！把它留下！"彭德怀走了过来，低声说："同志，人比牲口重要。"然后看了那个干部一眼，干部又开了一枪，大黑骡子很慢地倒了下去，老饲养员趴在它身上失声痛哭，就是不让人对它动刀。彭德怀转身走了，看得出来，他不忍心回头。彭德怀自己不吃，也不允许军团部的人吃。包括大黑骡子在内的六头牲口的肉全部给部队送去了。彭德怀特别嘱咐，好肉要分给战士，特别是伤员和病号。干部们要分，就分一点下水和杂碎。老红军印荣辉说："这些肉不知救了多少红军的命。"

红军官兵每人身上都有一个干粮袋，这个袋子是他们最重要的东西，走路时带着，露营时抱着，如果能够有块相对干燥的地方，可以躺下来睡一会儿的话，他们就枕着这个袋子。不少官兵在袋子上用线缝上了自己的名字。红一军团的小红军谢益先也不例外。由于不识字，他把他那个笔画很多的“谢”字用白线缝得很大，歪歪扭扭的。谢益先入伍前是一个赤贫的农民，红军到达他家乡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帮助红军带路，结果红军走后他的父母被地主打死了。谢益先把自己的小弟弟送给了乡亲，然后徒步走了十几天追上了红军。参加红军的那一年他才十六岁。红军大部队刚一进入草地，小红军谢益先就遇到了迷失在草地里的一对母女，她们是从已经被国民党军占领的川陕根据地逃出来的。看见她们，谢益先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在以后的行军中，只要部队停下开始吃干粮，谢益先就躲在一边，别人问他他说自己已经吃饱了。两天后，他走路开始摇晃，副班长就扶着他走；第四天，谢益先一头栽倒再也没能站起来。当这支红军部队到达草地边缘的时候，官兵们才发现队伍的最后面走着那一对母女，她们到处打听一个姓谢的小红军，手里捧着的那个干粮袋上缝着歪歪扭扭的一个“谢”字。副班长顿时声音哽咽，他告诉那对母女小红军谢益先已经死了。那位母亲一下子跌坐在地上。直到部队走远了，官兵们还能听得见她的哭声。

先头部队出发后的第三天，毛泽东走进了松潘大草地。他的警卫员吴吉清后来回忆道:

天空像锅底黑刷过的一般，没有太阳；眼前是一望无际的茫茫草原，看不见一棵树木，更没有一间房屋……如果一不小心，踏破了草皮，就会陷入如胶如漆的烂泥里。只要一陷进去，任你有天大的本事，也别想一个人拔出腿来。我因为性子急，走进草地不久就碰上了这种倒霉的事，幸好主席那宽大有力的手一拉，我才摆

脱了危险。一上来，主席就对大家打趣地说：“别看他外表像个泥人，那泥里包着的可是钢铁。”

和毛泽东走在一起的，是红军中的老同志和女红军。这是一支衣衫奇特的队伍。为了避寒，羊皮、狗皮被用来缝成衣服和鞋子。由于缺少雨具，每人手里都拿着块草编的垫子，下雨的时候遮挡在头上，休息的时候放在屁股下面。因为草地中几乎没有一块干燥的地方，露营时大家都忙着试图点起一堆火。极度的潮湿令火很难点着，无论谁好不容易点着了火，大家便都会凑过来围在一起。携带的青稞面粉经雨水浸泡，结成了一团黏稠的东西，女红军们小心地弄下一点放在嘴里。头发斑白的徐特立已经年近六十，他在红军大学任政治教授，但是生活却如同一名普通士兵。他穿着自己找来的一块旧红布缝成的裤子，披着一件破旧的皮袍子，手里拄着一根拐杖，肩上还背着他的干粮袋子，身后跟着分配给他的那头小毛驴。毛泽东问徐特立为什么不骑驴，他回答说驴背上驮着三个学生的行李，还有他的书籍。遇到掉队的官兵，徐特立总是停下来用湖南方言笑着说：“同志，快宿营了，努力呀！”

红军断粮以后，警卫员们开始四处寻找野菜。谢觉哉老人跟着他们一起找，居然找到了一张烂马皮，这让他很是兴奋。他用小刀刮去马皮上的毛，将马皮切成小块块，然后在瓦盆里煮。煮的时候，女红军们围着盆子看，但是煮着煮着，瓦盆突然炸裂了，马皮掉进了火堆里。谢觉哉赶快扑灭火，把零碎的马皮小心地捡起来，找了个铁锅继续煮。煮了很久也煮不烂，于是干脆就这样吃。包括林伯渠在内的几个老红军根本嚼不动，只好生硬地往肚子里吞。林伯渠老人边吞边说：“留得生命在，革命就开花。”毛泽东知道了，由于没有吃到马皮，总是问林伯渠：“那东西如何？”

晚上终于到了露营地，大家还是挤在一起坐着。开始的时候，他们交流着可以在湿地上睡觉的经验：挖一个洞，把油布铺在洞底，然后躺进去盖上毯子，最后把雨布蒙上。说这样不怕下雨，也不怕敌人骑兵的袭击，因为这等于是个掩体。松潘大草地的夜晚阴风萧瑟，无论怎样交流关于睡觉的经验，实际上既没有可以睡觉的地方，寒冷和饥饿也令人无法入睡。大家只能互相用体温温暖着，然后听那些曾经去苏联学习过的红军指挥员用俄语轻轻哼唱着：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

是我们劳动群众。

一切归劳动者所有，

哪能容得寄生虫。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

吃尽了我们的血肉。

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

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歌声在漆黑的松潘大草地上低低地飞翔……

红军左路军先头部队占领了阿坝，但其大部队依旧滞留在卓克基一带。

八月二十四日，中央致电左路军，再次阐述北进战略，催促左路军全力开进，断不可“坐失先机之利”：

朱、张二同志：

政治局对于目前战略方针有如下补充决定：

（甲）我军到达甘南后，应迅以主力出洮河东岸，占领岷州、天水间地区，打破敌人兰州、松潘线封锁计划，并依据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区域，有计划地大胆地向东进攻，以便取得甘、陕二省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有力根据地，另遣支队向黄河以西发展。这一计划是估计到政治、军事、经济、民众各种条件而决定的，是目前我们主观力量能够执行的。

（乙）若不如此，而以主力向洮河以西或失先机，敌沿洮河封锁，致我被迫向黄河以西，然后敌沿黄河东岸向我封锁，则我将处于地形上、经济上、居民条件上比较的大不利之地位。因这一区域，合甘青宁三十余县，计人口共不过三百万，汉人不及一半，较之黄河以东，大相悬殊。而新疆之不宜以主力前往经营，尤为彰明较著。

（丙）依上计划，目前应举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岷州间地段，并相权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出洮河左岸，然后并力东进，断不宜以右路先出黑错、旧城，坐失先机之利。

中央 八月二十四日

为了说服张国焘，跟随右路军行动的徐向前、陈昌浩也在同一天致电，表示北进计划“箭已在弦，非进不可”，且“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消灭已备之敌，必须左路马上向右路靠近，或速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

认为红军绝不会走进绝路的胡宗南终于知道红军已经穿过了松潘大草地，他立即命令第四十九师二九四团于八月二十七日火速赶往包

座，与驻守包座地区的另一个团会合，在包座至阿西茸一线阻截红军。

包座，位于松潘大草地的东北方向，卡在川北前往甘南的必经之路上。包座分为上包座和下包座，两个村镇相距数十里，包座河贯穿其间。这里山高林密，敌人利用山关隘路修筑起碉堡构成了坚固的阻击阵地。

红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意识到：如果红军不能打下包座，那就只有被迫退回松潘草地。

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和政委陈昌浩在听取了叶剑英的汇报后，决定必须要把包座拿下。鉴于红三军团还没有走出草地，红一军团在过草地时伤亡太大，徐向前和陈昌浩建议把进攻包座的任务交给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军和第四军。

徐向前拟定的作战计划是：以第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四团攻击包座南部的大戒寺；八十八师和八十九师各两个团位于包座西北方向，相机打援；以第四军一部攻击包座以北的求吉寺。红一军团为预备队，集结于包座西边的巴西、班佑地域待机。作战指挥部设在上包座和下包座之间的一座山头上。

这是红军走出松潘草地后的第一仗，是能否脱离绝境进入甘南的生死之战。

参战部队在倾盆大雨中出发了。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和第四军官兵刚刚走出草地，身体十分虚弱，一些官兵仍处在极度的饥饿中，大雨中的急行军使不少官兵掉了队。在行军的路上，军长程世才和政委李先念制定了战斗部署：由于胡宗南的第四十九师是一支战斗力很强

的部队，遂决定八十九师首先攻击包座南部大戒寺的守敌，然后至少集中五个团以上的兵力打击其增援部队。

八月二十九日下午，八十九师前卫部队二六四团抵达大戒寺，并立即开始了攻击。大戒寺北面是一座大山，寺前有一条水流湍急的小河，东面则是那条包座河。几天前，国民党军二九四团奉胡宗南的命令自樟腊向包座疾行，在约两百公里的急行军中，因为道路崎岖、气候恶劣、给养缺乏，虽然在红军之前抢占了包座，但对即将到来的战斗信心全无："官兵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患病倒毙者所在皆是，精神至为疲软。"到达包座后，二九四团奉命驻守大戒寺。他们围绕着寺院紧急修筑了各种工事，且在寺院内储藏了大量的粮食，准备据险坚守。红军二六四团的攻击并不顺利，官兵们在体力尚未恢复的情况下对敌人展开了一轮接一轮的进攻，每推进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由于敌人的火力十分猛烈，红军没有攻坚的火炮，加上大雨如注，河水暴涨，进攻从下午三点一直打到晚上九点，二六四团的红军官兵仅仅攻占了大戒寺外围的几个碉堡。从一个俘虏的口中，程世才和李先念得到了一个重要情报：敌第四十九师主力正向这里紧急增援，将于明天到达包座。根据这个情报，程世才和李先念决定，停止对大戒寺的强攻，改为严密包围，相机调动主力全力打援。

伍诚仁的第四十九师，是国民党中央军的主力部队，装备精良。红三十军虽然是一个军，但是经过缩编实际上只有两个师，且装备很差。为了取得战斗的胜利，程世才和李先念最后决定，将仅有的两个师的大部分主力部署在增援之敌的必经之路上打伏击。

第二天上午，伏击部队进入隐蔽地点。整整等了一个昼夜，官兵们不能睡觉不能吃饭，在饥饿和困倦中一分一秒地坚持着。当终于看

见了增援敌人的先头部队时，红军官兵几乎喊了起来：“敌人来了！敌人来了！”

八月三十一日中午时分，伏击战打响了。为了把敌人全部引进伏击圈，红军派出了一支小部队节节抗击，同时对大戒寺的守敌再次发动了猛烈进攻，令大戒寺的守敌不断要求主力部队迅速增援。伍诚仁师长终于火了，命令所有的部队，包括后卫，向大戒寺全速前进。

下午三点，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进入了红军的伏击圈。

这是一场装备悬殊的生死之战。当隐蔽在山林高地上的红军在骤然响起的军号声中潮水般地冲过来时，伍诚仁立即意识到他率部从西安辗转至此迎来的竟是最可怕的结局。沿着包座河东岸，几十里的山路上，到处是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和拼刺刀的厮杀声。枪弹横飞，硝烟弥漫，伍诚仁拿着望远镜却什么也看不清。红军铺天盖地的号声和喊声令伍诚仁身边的参谋大惊失色，他向师长保证说红军的兵力至少有几万人。红军官兵在向敌人出击的那一瞬间完全忘记了饥饿与疲惫，他们奋不顾身地把第四十九师的增援部队截成了互不联系的三截。

被分成了数股的国民党军利用树林、岩石和河岸边的土坎作为掩护拼命阻击。敌人的大炮和机枪火力很猛烈，而红军官兵的手榴弹大多是自制的马尾弹，杀伤力不够，于是他们挥着大刀直接向敌群冲去。最后的时刻，红三十军军、师、团的预备队，军部的通信连、警卫连和机关干部、宣传队队员，甚至炊事员和饲养员全部投入了搏斗，军长程世才和政委李先念也到达了最前沿。

混乱中，伍诚仁的指挥部遭到了攻击，他不得不带领警卫队进行反击。结果这一次他的胳膊被打断了。他的一个团长和一个副团长被红军包围后，无论如何不肯向红军投降，当红军官兵举着大刀冲到眼前的时候，这个团长竟和副团长抱在一起跳进汹涌的包座河自杀了。第四十九师投降的士兵跪成了一片，受伤的师长伍诚仁也终于被红军按倒在地。红军官兵把他押到了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面前。郑维山立即命令把他押到军部去。押解的路上大雨狂暴，伍诚仁拖着自己断成了两截的胳膊趁机跳进了包座河——他最后竟得以活着逃脱。

与红三十军同时打响战斗的还有第四军。第四军负责攻击包座河下游的求吉寺。在这里防守的是胡宗南的补充第一旅第一团。负责主攻的十师官兵在攻占了外围要点之后，突入了寺院。补充第一旅第一团团长康庄亲自督战，指挥机枪向冲过来的红军扫射。一批红军官兵伤亡了，又一批再次冲进去，数进数出，求吉寺院门口和院子里血流成河。最后，康庄亲自率领敢死队趁红军喘息之时发动了反击。

仗打到这个程度，第四军军长许世友沉不住气了，他看了看身边的十师师长王友钧，年轻的红军师长立刻明白了军长的意思。王友钧从一名战士手中夺过一挺机枪，冲上战场，机枪横着扫射了过去。在敌人出现退却迹象的时候，他从身后拔出了那柄寒光凛冽的大刀，吼了一声："交通队，跟我上！"交通队是王友钧师长的一张王牌，官兵个个配备一支德国造的二十响驳壳枪，外加一柄锋利的大刀。驳壳枪一响，敌人倒了一片，然后大刀如林朝着敌人挥了过去。

许世友大叫："还是大刀片厉害！"

交通队的李德生班长跟随着王友钧，一边砍杀敌人，一面保护着师长的安全。冲进寺院后，他们沿着寺院的台阶一层层地往上打，打

到最高一层的时候，敌人的一个机枪火力点封锁了红军的冲击路线。王友钧把机枪架在一名战士的肩膀上射击，硬是把敌人的火力压了下去，然后交通队的官兵向最后残余的敌人发动了猛攻。

李德生刚想往上冲，突然发现身边的王友钧杀声顿止。扭头一看，师长已经倒在了寺院的台阶上。

李德生抱起他的师长，王友钧的脸已被鲜血染红：一粒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

王友钧，湖北广济人，十九岁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在鄂豫皖根据地参加了四次反“围剿”作战，后随红四方面军转战至川陕根据地，牺牲时年仅二十四岁。

十师的红军官兵怒吼着向敌人冲去。

国民党军在逃跑前点燃了寺院里的粮库。

红军官兵一部追杀敌人，一部扑打着火焰。在大火中，他们抓起被烧焦的麦粒大把地往嘴里塞。

许世友跪在王友钧的遗体前，仰天长叹。

有参谋来请示缴获的物资如何处理。许世友大吼：“滚！多少东西也换不来一个师长！”

年轻的红军师长王友钧被安葬在求吉寺寺院东侧的山上。

红军不惜一切拿下包座，打开了北进甘南的通道。

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立即致电张国焘，通报了包座战斗的情况，再次要求左路军立即向东靠拢，以便红军迅速北进。

在中央的一再催促下，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张国焘终于下达了东进的命令。但是，左路红军部队东移的第三天，张国焘突然发来了电报，说由于嘎曲河水上涨无法渡河，不但已经命令部队返回阿坝，而且还要求右路军掉头重新向南进攻松潘：

徐、陈并转呈中央：

（甲）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两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

（乙）如此，已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

（丙）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

朱、张

三日

这封在中国革命史上极其重要的电报导致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电报意味着自毛儿盖会议以来，中央所有关于红军前途的决定瞬间全被推翻了；还意味着数万红军官兵付出巨大代价穿越草地的努力，以及之后攻占包座所付出的巨大牺牲瞬间全无用了。更严重的是，张国焘依仗着他所掌握的兵力和实力，在决定中国红军生死命运

的最关键时刻，利用红军总政委的权力突然向中央发难，在红军已经被兵分两路的局面下，这很可能会导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大分裂。

嘎曲河，今名白河，黄河的一个小支流，位于松潘草地的西沿。

从阿坝至松潘草地东面的班佑，走到嘎曲河边，红军官兵已跋涉了一半的路程。

在嘎曲河边，张国焘下了最后的决心：决不能再前进了。

他终于想明白了一旦与中央会合自己将面临什么样的政治前途。

关于张国焘选择嘎曲河水上涨无法过河的借口，一直跟随朱德行军的康克清后来是这样回忆的："董振堂带着红五军正准备涉水渡河，张国焘却说河水看涨，谁也不准过河。老总问带路的藏民，藏民说：这河虽宽，但是不深，只要不涨大水，可以徒步过去。河面有近百米宽，水流不急，不像涨水的样子。但张国焘一口咬定河水正在上涨，不能过。老总说：'空谈无益，还是派人下去试试。'张国焘不肯派人，潘开文［朱德的警卫员］站出来说：'我去！'老总叫他骑上自己的马。他问明了藏民过河的路线，拿了一根棍子，同红五军的一个战士一起骑马下到河里。不大工夫，到了河中心，用棍子试了试河水的深度。到了对岸，听见他高声地说：'水不深，最深的地方才到马肚子。大家快过来吧！'部队立即准备下水，张国焘吼：'谁也不准过！叫他们两人给我回来。'然后又对老总说：'河水分明在上涨，我不能拿几万人的生命当儿戏。'老总说河水并没有涨，即使涨，也涨得很慢，现在正是大队人马过河的好时机。刘伯承也过来说：两个人都过去了，证明河水不深，应当抓紧时机赶快过河。董振堂过来请示：'总

司令，我们前卫部队先过去吧。’张国焘竟然不等老总说话，大声吼道：‘不行！现在谁也不准过河，要等河水不涨了，才能决定。’他的蛮横，使左路军只好在嘎曲河边宿营。第二天早晨，天空密云不雨，河水明显地退下许多。朱老总正在组织部队过河，作战局向他报告说，四方面军的部队已经按照张国焘的命令返回阿坝去了。这时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来见朱老总，气愤地说，他因为坚持要过河，不等总司令的命令决不后撤，遭到张国焘的训斥，还被张国焘打了一耳光。他说：‘我当兵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侮辱。若不是为了团结，我会当场给他好看。现在他已带四方面军部队回阿坝，我决定带红五军北上同右路军会合。’……老总却摇摇头，说：‘要顾全大局，向远看，不能凭一时感情用事。你如果带走红五军，就要承担分裂左路军的责任。我们还应当对张国焘做团结争取的工作。’”

接到张国焘的电报后，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前敌指挥部立即召开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张国焘说嘎曲河涨水不能渡，完全是一个借口。四方面军连嘉陵江都过来了，哪有一条小河过不来的道理？至于说缺粮，在他们出发的阿坝地区筹粮，要比我们出发的毛儿盖地区容易得多。我们进入草地时带的粮食绝不比他们多，右路军的官兵都走过来了，他们为什么不能？

如何对待张国焘，来自红四方面军的徐向前和陈昌浩的态度最为引人注目。徐向前态度十分明确，而陈昌浩在考虑再三后也认为中央的北进计划是正确的。于是，两人联名给张国焘发出了一封电报，电报表示：“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目前是红军进入甘南的最佳时机。至于“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徐向前和陈昌浩请求张国焘“飞示”，因为“再延实令人痛心”。

当天，张国焘回电，没有解释，没有答复，只有命令：

［发总指挥部］

徐、陈：

一、三军暂停留向罗达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

朱、张

八日二十二时

同时，张国焘严令左路军第三十一军政委詹才芳：“飞令军委纵队蔡树藩将所率人员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

徐向前和陈昌浩感到事情严重了。

徐向前让陈昌浩带着张国焘的电报去向中央汇报。晚上，陈昌浩来电话叫徐向前去中央开会。

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聚集在周恩来的病床前进行了紧张的讨论。讨论的结果是以七人联名的名义再次致电张国焘：

朱、张、刘三同志：

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仔细考虑结果，认为：

（一）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

（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康定］、泸［泸定］、天［天全］、芦［芦山］、雅［雅安］、名［名山］、邛［邛崃］、大［大邑］，直至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

（乙）经济条件，绝对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求如毛儿盖者，仅一磨西面而已，绥［绥靖］、崇［崇化］人口八千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食之虞。

（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端严重，决难继续下去。

（丁）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

（二）因此务望兄等熟思审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亦远胜西康地区。

（三）目前胡敌不敢动，周［周浑元］、王［王钧］两部到达需时，北面敌仍空虚，弟等并拟于右路军中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二十五、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南，开展新局。

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

恩来、洛甫、博古、向前、昌浩、泽东、稼祥

九月八日二十时

张国焘焦急地等待着右路军开始南下的消息，结果等来的却是中央北上的决心毫不动摇的电报。

张国焘已经不可能回头了。

一九三五年九月九日，他对左路红军部队下达了南下的命令。同一天深夜零时，他给中央和前敌指挥部七人回了电报，电报要求就他提出的问题“熟思明告”：

（甲）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有续增可能。

（乙）左路二十五、九十三两师，每团不到千人，每师至多千五百战斗员，内中病脚者占三分之二。再北进，右路经过继续十天行军，左路二十天，减员将在半数以上。

（丙）那时可能有下列情况：

1、向东突出岷、西封锁线，是否将成为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不停留地行军，前途如何？

2、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稳脚跟？

3、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

接着，张国焘分析了南下沿途人口多、筹粮便、敌人弱、红军回旋余地大等种种优势，最后他告诉中央和前敌指挥部：“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打。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事态急转直下。

紧跟着，陈昌浩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同意张国焘的意见主张南下。

而就在这时候，一个更严重的事件发生了。

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了张国焘发来的一封电报，电报依旧表示北进的时机不成熟，坚持右路军掉头南下。叶剑英立即赶往毛泽东的驻地作了汇报。一九三七年三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讲到，张国焘在电报中说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张国焘的这封电报是一个危险信号。

因为党内斗争已经超出了军事争论的范畴。

当时，红一军团已经北上到达了甘南的俄界，毛泽东身边只有红三军团。彭德怀对张国焘的野心已有洞察，当张国焘收缴了各军团相互联络的电报密码时，他命令军团机要人员另外编制了一套新的密码，以便与红一军团保持联系。当听说陈昌浩改变了主张时，彭德怀找到了毛泽东，说如果强制红三军团南下，红一军团也就不能北进了，两个军团一同南下，“张国焘就可能仗着优势军力，采用阴谋手段将中央搞掉”。彭德怀认为红军已处在“危急的时刻”。

毛泽东先是亲自找到了陈昌浩，就南下还是北上这个问题，再次征求他的意见。陈昌浩说，既然张总政委命令南下，就南下，这个问题不必要再争论了。毛泽东听罢说：“既然要南进，中央书记处总要开个会。周恩来和王稼祥同志因为生病在三军团，我们去三军团叫他们来开个会吧。”陈昌浩点点头。

晚上十一点，毛泽东又特地去看望了徐向前。他站在徐向前住处的院子里，问他对北上或是南下的意见。徐向前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听后，让徐向前早点休息，然后告辞了。

凌晨，毛泽东一行出发去红三军团。

毛泽东此一去，再也没有回来。

到达了红三军团的驻地巴西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五位政治局委员立即召开了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巴西会议"。

这是千钧一发的关头。

如有不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前赴后继所赢得的一切都将毁于一旦。

巴西会议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由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支队，迅速向红一军团靠拢，之后与红一军团一起向甘南前进。

躺在担架上的周恩来想到一旦中央红军离开后，徐向前和陈昌浩也许只有掉头南下了，红四方面军的数万官兵将再次经受草地之苦，于是他向毛泽东建议再给徐向前和陈昌浩发一封电报。

是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

国焘同志并致徐、陈：

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如何速复。

中央

九月九日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日，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上，这是一个因危机四伏而紧张混乱的日子。

凌晨刮起了大风。

叶剑英携带着从机要组组长吕黎平那里要来的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地图，牵着他的黑骡子，率领军委二局等直属单位以“打粮”为名向红三军团驻地巴西出发了。在以后数十年里，毛泽东多次提到叶剑英的贡献，他曾摸着自己的脑袋说：“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

李维汉是中央组织部部长，张闻天交给他的任务是，天亮之前把中央机关的同志全部从班佑带到巴西。李维汉分别通知了凯丰、林伯渠和杨尚昆，让他们分别负责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和红军总政治部的行动。半夜里通知立即出发的时候，很多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凯丰低声说：“不要问，不要打火把，不要出声，都跟我走。”李维汉一直站在路口，一一清点着从他面前走过的各单位的队伍，结果发现没有政府机关的人，于是赶紧跑到政府机关的驻地，发现他们还有大量

的辎重需要捆扎。李维汉急了，要求把大东西统统丢掉，必须带走的全部放在马背上。

一直跟随红军大学行军的李德在这个时刻表示：我虽然同中央一直存在分歧，但在张国焘这个问题上，我拥护中央的主张。他对红军大学党总支书记莫文骅说："中央决定北上，把你身边的人组织好，要密切注意李特，不要让他把队伍带走了！"红军大学是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由红四方面军的军事学校和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团联合组成的，政委何畏和教育长李特都是张国焘的追随者。红一方面军干部团在红军大学中叫特科团，团长韦国清，政委宋任穷。干部团中的干部大多是红一方面军的，学员大多是红四方面军的。听说中央要强行北上，宋任穷对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刘少奇表示："中央要走一定要把特科团带走，否则我们就开小差去追中央。到时候可不要因为我们开小差开除我们的党籍。"

红军大学是凌晨三点接到出发命令的，命令由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签发。宋任穷立即集合队伍，阐明了南下和北上的两条路线，说愿意北上的跟我们走，不愿意的就留下，结果红军大学全体人员都表示愿意北上。学员们出发的时候，政委何畏还是跑到了陈昌浩那里，报告了中央红军已经单独出发的消息。陈昌浩十分震惊。他不停地说："我们没有下命令，他们怎么走了？赶紧把他们叫回来！"陈昌浩派李特率领一队骑兵去追。李特很快就追上了红三军团。毛泽东走在红三军团十团的队伍里。李特质问毛泽东："总司令没有命令，你们为什么要走？"毛泽东说：这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中央认为北上是正确的，希望张国焘认清形势，率领左、右两路军跟进。一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想通了再北进也可以，中央欢迎。希望以革命大局为重，有什么意见，可以随时电商。李特再次转达了陈昌浩的命令，要求部队立即

回去。毛泽东说：“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边敌人的力量很强大。再过一次草地，在天全、芦山建立根据地是很困难的。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我们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面跟上来。”

几乎所有的当事人在后来的回忆中都记述了毛泽东的这段话。

如果这些话确是毛泽东当时所说，那么毛泽东的话具有惊人的预见性——红四方面军北上恰好是在一年以后。

九月十日凌晨过后，得到消息的张国焘发来了电报：

林、聂、彭、李［李富春］并转恩、洛、博、泽、稼：

甲、闻中央有率一、三军单独东进之意，我们真不以为然。

乙、一、四方面军已会合，□□忽又分离，党内无论有何争论，决不应如是。只要能团结一致，我们准备牺牲一切。一、三军刻已前开，如遇障碍仍请开回。不论北进南打，我们总要在一块，单独东进恐被敌击破。急不择言，幸诸领导干部三思而后行之。候复示！

朱、张

九月十日四时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日夜晚，乌云密布，星月无光。从巴西到阿西仅仅二十里的路途，由于不允许点火把，在泥潭沼泽和灌木荆棘中，毛泽东和他率领的部队竟然走了六个小时。天亮时，国民党军的飞机来了，部队只好走进了一座大山中。好容易遇到了一个小村庄，红军弄到了很少的一点粮食，毛泽东和官兵们用水调了一点青稞面喝了下

去。第二天继续前进。这里距离俄界还有六十里的路程。红军走到了包座河边，沿着包座河向东北方向疾进，道路十分泥泞，一边是翻滚着浪花的河水，另一边是高耸的悬崖。走着走着，包座河水突然猛涨，淹没了河边的山路。红军中会游泳的奋力游着，不会的便往悬崖上爬去。

毛泽东带头跳进了冰冷的河水中。

当他游到了水浅的地方，湿淋淋地站起来时，问身边的警卫员有没有可以充饥的东西。见警卫员没有吭声，毛泽东笑了一下。

毛泽东与张国焘北上和南下之争，与其说是军事争论不如说是意志的对抗。

此刻，即使与红一军团会合，中央红军的这支部队也只有不足八千人。

第五军团［第五军］、第九军团［第三十二军］，还有朱德、刘伯承，都还在张国焘那里。

毛泽东在以后的岁月里提及这段历史时，称之为他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

在黑暗中行走的毛泽东强烈地意识到：一切需要从头开始。

但是，毛泽东坚信“我们一定要胜利，我们一定能够胜利”——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对他的革命理想和政治信仰的执著与坚守无人可比。

漫长的夜晚过去了。

东方的云翳裂开一道巨大的缝隙，血色的云霞从缝隙中喷涌而出。

# 第十五章 北斗高悬

1935年9月·陕南与甘南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凌晨，在陕西南部户县一个叫南乡的村庄里，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正在一盏油灯下给中共中央写报告。

油灯火苗跳跃，吴焕先心情激动。报告详尽汇报了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一年来的政治与军事行动，总结了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同时，对没有经过中央批准就决定西进陕南作出了解释。在这份名为《红二十五军的行动、个别策略及省委工作情况向中央的报告》的最

后，吴焕先写道：“自离开老苏区后到现在没有上级的指示，也没有当地党的帮助，不知我们的行动是否错误”。而目前“群众工作、党的组织十分的薄弱”，红军的力量也没能扩大到足以“有力地迅速地消灭整批敌人”。因此，是否“可以同二十六军、二十八军会合起来，集中一个大的力量，有力地消灭敌人，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迅速创造西北新的伟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请求中央给予指示。同时，鉴于红二十五军“军事干部异常缺乏”，希望中央派来得力的“团长、师长、参谋长、政委”，派来得力的省委书记、县委书记、区委书记、无线电电报员——“我们现监用一个所俘的电生［监视用一个俘虏的电报员］，只用呼叫中央台名两次，未见回答，未能发报，不知为何。请确定以后永久保持来往方法。”

“六月十三，红军出山。”

一九三五年，陕西长安县一带开始流传这样一句民谣。

民谣指的是红二十五军于七月中旬西出秦岭逼近了陕西省府西安。

在终南山外一个叫引驾回的地方，红军官兵捉住了当地的一个国民党区长。副军长徐海东和政委吴焕先都觉得在军事上有文章可做，就让这个区长给西安打电话，想把敌人调出来一股，然后打个伏击战。吴焕先把要说的话写在纸上，让那个区长照着在电话里说一遍，大致的意思是：共匪有出山的模样，请赶快派兵来增援。电话的那一头说：“毛炳文军长已经顺着西兰公路往西去了，于学忠的部队也从凤翔往西调呢。现在无兵可派。”徐海东在这个区长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张《大公报》，随手拿起来一看，映入眼帘的一条消息令他十分兴

奋。消息说，红军的两支主力部队已经在毛儿盖附近会合，其前锋正在通过松潘。

吴焕先和徐海东拿着报纸跑到了躺在担架上的军长程子华那里，程子华看完报纸后想了想说：“很有可能。”

红二十五军领导决定部队立即出发。一口气向西走了三十公里才停下来，停下来的地方叫沣峪口。这时，原中共鄂豫皖省委秘密交通员石建民从上海经过西安回到了军部，他带来了中共中央数月前发出的几份文件，并证实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继续向北行动的消息。

中共鄂豫陕省委在沣峪口召开了会议。会议作出的一个重要决定是：红二十五军西去陕甘苏区，与那里的红军会合。同时一路争取有力地消灭敌人，“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会议向全体红军官兵提出了“我们这三千多人就是全牺牲了，也要牵制住敌人，让红一、红四方面军顺利北进”的口号。

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是一个十分正确的决定，是鄂豫陕省委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战略性决策。这一决定使红二十五军成为从绝境中脱险的中央红军的开路前锋，并为中国红军乃至中国革命最终能够在陕北立足，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沣峪口会议的第二天，红二十五军上路了。

他们本来设想不再进入深山，而是笔直地向西走，直接进入陕南。但是，杨虎城的一支骑兵一直尾随着他们，而且距离始终仅在十公里之内，这迫使红二十五军不断地回头与这股骑兵作战。在与这股骑兵打了几仗之后，红二十五军突然发现国民党东北军第五十一军的

一个师也追了上来，其先头部队距离红二十五军仅有十五公里。为了彻底摆脱敌人的追击，红二十五军决定改变行军路线，掉头往南进入了秦岭山脉，经青岗树、宽台子、厚珍子、二郎坝等地，一路佯装要去攻打汉中，试图把敌人的注意力往南调动。

七月二十七日，红二十五军到达秦岭腹地留坝县的江口镇。在击溃了镇子里的民团武装后，决定在这里休整两天，并进行西征北上的思想动员和物资准备。

红二十五军的突然西进，引起了在成都的蒋介石的关注。他不可避免地把红二十五军向西靠拢的行动与朱、毛红军的未来走向联系在了一起，于是他向杨虎城的西安绥靖公署发出了电报：

区区之匪，至今尚不能歼灭，可知进剿不力，奉命不诚。兹再限期八月十五日以前肃清，如再不能遵令肃清，则唯该主管长官纵匪论罪。

红二十五军在江口镇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将跟随主力部队行动的第四路游击师二百八十余人分别编入了各团；原来在华阳地区坚持武装斗争的游击队仅剩的二十多人此时也追上了部队，连同他们沿途收容的伤病员一起，都补充进了连队。整编后，红二十五军下辖二二三团、二二五团和手枪团，加上军机关和直属分队，全军共四千余人。

七月三十日，红二十五军从江口镇出发了。

红军官兵的目标已经十分明确，因为他们又弄到一份七月十六日的《大公报》，上面的报道是：“松潘西南连日有激战。”——对于一路转战历尽艰辛的红二十五军官兵来说，前进的目标令人鼓舞：向西，向党中央和主力红军靠拢！

红二十五军重新出发的第三天，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给所属陕军各部队发出了一封密电，密电对红二十五军向西北方向开进的目的作出了准确判断：

综合最近情报，徐海东股匪主力已窜至留坝、佛坪间之江口镇、黄柏楼、二郎坝附近，有进犯汉中附近或向凤县、天水一带窜扰，以牵制我军，策应朱、毛及徐向前各股之势。

对此，杨虎城制定的战略是：

本部为预防朱、毛、徐等股侵入陇南或汉中方面时，得以全力迎击起见，决于朱、毛、徐股匪未侵入陕、甘地境之前，以最大努力与最短时间，先将徐海东股粉碎而歼灭之，以除后患。倘匪万一向东回窜或北窜时，则派队穷追，不灭不止。并派有力部队于陕、甘边境及汉水流域各地严防固守。对于商、雒一带，则划区搜剿，以清散匪。

密电刚刚发出不久，杨虎城就接到了前线的战报：在川陕公路上，胡宗南的一支别动队突然遭到徐海东部的袭击，四个连全部被消灭，一个兵也没能跑出来。更严重的是，一名姓何的少将参议落在了红军手里。

袭击胡宗南的别动队的是二二三团的一营，袭击地点在陕甘交界处的双石铺。双石铺，今天的凤县，位于川陕公路重要交通要道上。红军发起袭击的时候，四个连的国民党兵正押着大批民夫抢修西安至汉中的公路。他们根本没有应战准备，除了被打死的之外全部被俘。红军发现这四个连的国民党军军衔都高一级，士兵是中士，排长是上尉，连长是少校，营长居然是个中校，而且大部分官兵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红军发起袭击之前，一营三连奉命向双石铺东北三公里处派出一个排的警戒哨，警戒哨刚布置完毕，红军官兵就看见从凤县县城

方向过来了一副滑竿，滑竿上坐着一位国民党大官，红军官兵立即扑了上去。

吴焕先对这个少将参议进行了审问。审问的问题单刀直入：红一、红四方面军现在在哪里？少将参议回答说："贵军两部在懋功附近会合，现在毛儿盖一带休整，有北进的企图。"

再问的问题依然单刀直入：国民党军在这一带是怎么部署的？少将参议回答说：胡宗南的第一师、鲁大昌的新编第十四师、王钧的第三军、邓宝珊的新编第一军以及马鸿宾的第三十五师，分别部署在川西北、甘南一线，渭河沿线和西安至兰州的公路一线。

红军在滑竿上又发现了一张七月二十二日的《大公报》，上面的报道是："红军已越过六千公尺的巴郎山，向北行进……似有窥甘青交界之洮州、岷县、西固等处迹象。"

红二十五军领导拿着那张报纸立即开会，会议决定：部队进入甘肃南部，威胁天水等城市，在敌人防线的后方大造声势，无论付出多大的牺牲，也要把陕甘的国民党军队拖住，以减轻主力红军的压力，不惜一切配合主力红军北进。

八月三日，红二十五军自陕西凤县越过省界，手枪团和军部交通队一部化装潜入了甘肃两当县，策应随后开来的先头部队迅速攻占了县城。两当县县长朱志和声称自己率县保安队"奋勇抵御七小时之久"，而实际上红军杀声一起，他已逃出县城十里远了。红军俘虏了县城保安队数十人，处决了保安队副队长乔玉亮和第三分队队长朱玉川，把县政府里的文件档案搜集了之后，迅速穿城而过。红军的队伍出县城北门径直向北，翻越了麦积山，直逼天水城下。

攻击天水的行动是佯动。这座县城一共有五座城门，要打下来并不容易，红军攻击的目的是要把西面的敌人调回来，然后乘虚西进。九日晚，红军主力沿着天水城南边的一条小河悄然向西，而副军长徐海东亲自率领二二三团二营猛攻天水城的北关，在占领了北关之后，他们放火点燃了一座造币厂，大火熊熊燃烧之后，二营的红军官兵迅速撤离。天亮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县城西北二十五里的地方吃早饭了。红军攻击天水的行动令国民党军大为吃惊，国民党军第三军第十二师的一个旅奉命紧急回援，结果被红军袭击了后卫部队。

绕过天水向北，就是那条横贯陕甘的渭河了。此时，国民党军第五十一军第一一四师滞留在天水东北面的清水县附近，始终踌躇不前，与红二十五军隔河对峙。红二十五军遂决定从天水西面的新阳镇附近渡过渭河，以避免与牟中珩的第一一四师交火，同时还可以把身后追击的敌人甩开。

在渭河边，军部一面派人去筹集粮食，一面向当地百姓打听过河的事。当地的一位老人告诉徐海东，这里就是当年诸葛亮收姜维的天水关。徐海东看了地形后，决定先派一个连渡河，占领对岸的一座小庙，以掩护主力的渡河行动。由于只找到了一条小船，红军官兵们就弄来了一根又粗又长的绳子，待小船到达河对岸后，再利用河两岸的大树把绳子固定好，然后官兵们头顶着枪支弹药沿着绳子溜过去。但筹集粮食的工作却没这么顺利。河边的镇子四周都有围寨，镇子里的地主武装不敢出击，但是民团也不让红军进去，筹粮干部无论怎么做工作，寨门就是不开。红军官兵想出个办法，他们把连队的水压机枪弄来了，用布包上，伪装成一门大炮，声言如果再不开寨门就用炮轰。结果，镇子里的地主武装吓坏了，乖乖地把寨门打开。等筹粮的红军背着粮食返回渡口时，大部分官兵已经渡过河了，他们看见那条

唯一的小船上坐着红二十五军的七名女红军和几名重伤员，船上的女红军们直朝他们喊：“你们也上来吧！”

红二十五军“七仙女”渡过渭河时的情形，恰巧被两当县城里的一位照相师傅拍了下来，这张珍贵的照片至今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

红军渡过了渭河，蒋介石焦急万分，他不断地发出电报，命河南、河北等地的国民党军向天水方向增援。八月十日，蒋介石在电报中说：“查徐海东匪西窜原因在策应朱、毛。我军应采取内线作战要领，先以优势兵力迅速解决徐匪，再行以全力回击朱匪。”蒋介石的这番话，足以证明红二十五军牵制国民党军队以减轻主力红军军事压力的意图已经初显成效。

渡过了渭河的徐海东心里有点不踏实。

应该说，部队没有遇到国民党军队的阻击，顺利地渡过了渭河，这是有很大侥幸成分的。可是，一旦过了河发展不顺，想走回头路，在军事上就十分危险了。吃了晚饭，徐海东找到吴焕先说：“我们能接到中央更好，接不到，这条水是个大害。往回走准带尾巴，就是背水作战，搞不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吴焕先说：“我对渭水也有考虑。假如遇到敌人，怎么过好？不打死些，也要淹死些。”

渡过渭河之后的行动让吴焕先和徐海东思量了一夜。

第二天，八月十一日，红二十五军攻击并占领了秦安县城。

得知红军攻击两当县城后一路西进，接着又渡过了渭河开始北上，秦安县县长杨天柱已经有好几天寝食不宁了。他向上级请求派部

队前来守城，但是请求没有任何回音。他知道红军一旦攻城定会凶多吉少，于是命令全城三千多家商户百姓将财物粮食设法藏匿，男女老幼一律出城躲避。藏匿财物和争相出城的举动持续了好几天，秦安县城终于成了一座空城。上午十点，红军到了，攻击县城的第一枪跟着就打响了。此刻，防守秦安县城的只有县保安队，一共五十四个保安员，除了放哨和担任其他任务的之外，实际守城的只有三十一人。秦安是一个大县城，由一座老城和三座边城组成，仅城门就有十二座。每座城门的防守兵力还不足三人。红军的枪声一响，保安队队员立即跑了。红军分三路攀城而上，打死了几个保安队队员后，秦安县城落在了红军手中。杨天柱看见红军来了才跑的，由于过度惊恐，他在事后写给“上级”的报告中居然说他看见红军官兵“额前系以红花”：

> 先至城下者，约八九百人，均持短枪，并有少数自动步枪、手提机关枪，马数十匹，行动敏捷，剽悍无比，身着蓝衣，两袖围以约五分宽之红布，头戴八角帽，额前系以红花，口音混杂，各省人均有，似南方人最多。陆续至者，有两千人，枪支不全，服装褴褛。

秦安县县长也许此前从没见过红军，他虽不敢与红军作战，却将红军个个看得十分仔细，只是将红军八角帽上的红星看走了眼。至于县城的丢失，他是这样向“上级”报告的：“职本与城共存亡之决心，引枪自殉，奈被左右拦阻，不得已率队分头冲出。”

红军进入了秦安县城，县政府确实转移了物资，整个金库里只剩了零钱，红军数了数一共八百三十五元。

红二十五军穿过秦安县城继续向北。一支不知番号的国民党军在后面紧追不舍。徐海东被吴焕先叫了去，吴焕先说：“还不作出决定的话，我又得一夜不睡。现在不需要省委开会，咱们两个下决心就行。

眼前的问题是，如果接不到中央怎么办？”徐海东说：“能接到最好。接不到咱们就进陕北，去找刘志丹。我们不是不要陕南了，是敌人的封锁和渭河让我们回不去了，天上的牛郎织女也不愿意隔开嘛，咱们在哪里都是革命。”吴焕先说：“这个渭水很讨厌，越往下游水越大，根本不能徒涉。我同意你的意见，继续向北，接到中央更好；万一接不到，咱们就朝着陕北走！”

八月十四日，红二十五军逼近了秦安以北七十公里处的静宁县城。部队从县城的西面穿过了西兰公路，很快就越过甘肃省界进入宁夏，到达了一个叫兴隆的小镇。

这里是回民区。许多红军都听说过回民的强悍，历史上远到左宗棠近到冯玉祥都曾兵败于回民。红二十五军领导一致认为，绝不能与回民发生任何冲突。吴焕先集合部队讲了话，要求全体官兵严格遵守回民的风俗习惯。红二十五军为此作出了很多规定：绝对不准食用猪油，禁止部队驻扎清真寺，禁止毁坏回民的经典，回避回族妇女，买卖要公平，甚至还规定即使从井里打水也不准使用自己的水桶。部队在进入回民区之前，以手枪团为先导，先把红军的民族政策向回民解释清楚，再把标语和口号张贴起来。

这是一个仅有数百户人家的小镇，小镇里有一条小街，街南有一座很大的清真寺。

部队开进的时候，镇子里的回民百姓都躲在屋子里，这是他们第一次看见红军。

红二十五军在这里休整了三天，由于和回民的关系处理得很好，官兵们不但没有受到排斥，反而受到了优厚的款待。吴焕先亲自召集

当地的知名人士座谈，讲明红军是北上抗日去，不对回民群众征集粮款，也不拉夫派夫。军领导还吹打着洋鼓洋号去清真寺拜访了当地的阿訇，十二张桌子抬着四块银子、六只肥羊和一块写有“德高望重”的额匾。清真寺的阿訇按照民族礼节宴请了军领导，还赶着一群染成红色的羊送到军部作为回拜。他们也给红军送了一块匾，上面写着“劳苦功高”。红军官兵把镇子里的那条小街打扫得干干净净。

红二十五军离开的时候，镇子里的百姓都出来欢送红军，小街的两边摆满了香案和点心，并有向导在红军队伍的前边带路。这些向导都是回民自己安排的，而且一站接一站地传递，红军的队伍每走出数十里，前边的向导一声呼哨，立即就出现了新的向导接着给红军带路。

在兴隆镇，中共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领导召开会议。与会者综合了从各种渠道得到的情报和消息，认真分析了主力红军可能的走向，最后一致认为：主力红军如果北进一定会从这里经过，而且必然要跨越西安至兰州的公路。于是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在西兰公路附近牵制敌人，并尽一切可能控制公路，等待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到来。

红二十五军的官兵认为，他们盼望已久的时刻就要到来了。

他们预期的等待时间是半个月。

八月十七日，红二十五军从兴隆镇向东，沿着西兰公路，向卡在公路上的隆德县城扑了过去。

隆德县城不但有县保安队防守，而且还驻扎着国民党军新编第十一旅二团一营。红军发起的进攻十分猛烈。红军从北面攻城，县城里

的土豪们从南城墙上往外爬，县长林培霖和公安局局长温葆鑫混杂其间。林培霖事后对他此番举动的解释是：民众的“扶掖推挽”——“约下午二钟，匪共已用迫炮机枪攻至北山。北山碉楼驻军稍抗即退。山上弹如雨落，旋由北山一带包围而下，势甚猛烈。驻军、团队复稍抵抗，攻愈急。驻军慌乱退却。时已到下午三钟，民众因手无利器，亦各纷纷爬城而下。职与公安局长温葆鑫极力约束无效，只拼一命，与城俱尽，以尽守土之责。经左右民众扶掖推挽，缒下南城，藏身山谷禾苗深处得以脱。城遂陷。”占领了隆德县城的红军照例搜缴了县政府的文件，处决了几个被抓获的民团、甲长，张贴了宣传标语和布告，然后迅速撤离了县城。这时，沿着西兰公路，国民党军第六师第十七旅的七十多辆汽车正从兰州方向增援而来，车上的国民党兵胡乱向天上发射信号弹用以壮胆。红军官兵中不少人第一次见到信号弹，都很惊奇地朝天上看着。

第二天，丢失了隆德县城的国民党军新编第十一旅给军长邓宝珊写了战斗报告：

一、于八月十七日，有前窜踞静宁县属单家集徐海东股匪三千余人，由该集向东窜，于下午二时窜至隆德县南、北两山，以高临下，用机枪猛射扑城。我南、北两山守御部队，以寡众悬殊，故被击溃，伤亡极重。

二、查隆德城墙经久未修，墙垣倾颓，几如平地，不能掩蔽，且居民稀少，县城面积甚大，仅驻职旅一营，兵力薄弱，布防为艰。

三、职遵照前令，依着依险固守待援。

四、第六师丁［丁友松］旅奉令乘汽车七十余辆驰援，中途被匪所阻，迨至下午五时未至。该营与匪激战四小时，每兵所带子弹不过十粒，且该匪攻击甚烈，城

墙高不过三尺，行不并肩，无险可守。我兵子弹已尽，匪蜂拥而至。于下午五时三十分，我官兵奋勇白刃肉搏，终以寡众悬殊，援兵绝望，向庄浪县方向撤退。

五、此役我消耗七九步弹四千余粒，自来得［驳壳枪］弹一千二百余粒、手掷弹五百余颗，辎重、被服均被匪分给贫民，公文均被焚烧无遗。

六、此役职旅第二团第一营官兵重伤二十二名，阵亡二十五名，被俘二十一名，损失七九步枪四十五支。

七、据探报，第六师丁旅于下午九时克复隆德，匪向东窜。职饬第二团第一营仍回隆德原防整理，听候丁旅长指挥，待令追剿。

从隆德县城撤离的红二十五军，连夜翻越六盘山，接近了平凉县城。

红二十五军始终沿着西兰公路不断袭击县城的行动是危险的。

他们故意暴露自己的位置和实力，每到一处便大量地张贴标语和布告，几乎是在故意告诉敌人他们在哪里和将要干什么。红二十五军希望向他们围过来的敌人越多越好，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多地牵制敌人。但是，他们也意识到了这种一反常规的举动是危险的，特别是他们的兵力和火力十分有限，随着时间的推移，危险的因素在逐渐积累，如果他们还不迅速离开西兰公路，待敌人大批增援部队一旦到位，残酷的战斗就会来临。

接近平凉的红二十五军进入了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的防区。

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师长马鸿宾。这支部队是以凶悍著称的“马家军”中的一支。

两年前，红二十五军与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交过手，但是当时的第三十五师并不是现在的这支部队。第三十五师原隶属于马鸿逵的第十五路军，一九三二年六月奉蒋介石之命进入鄂豫皖苏区“围剿”红军，当时的师长是马腾蛟。一九三三年三月，这个师乘火车被调往河南与湖北的交界处，寻找刚刚组建的红二十五军作战。三月六日拂晓，在一个叫郭家集的地方，第三十五师遭到了红二十五军的突然袭击。当时郭家集四周的山顶上，游击队和民众摇旗呐喊，战场气氛令该师官兵胆战心惊。最终，该师的两个团被红军压缩在一片狭窄的洼地里，一百多名官兵被打死，两千多名官兵被俘，逃亡的官兵大部分被游击队和手持镰刀扁担的群众打死或俘获。遭遇重创的第三十五师残余人马撤到了河南开封，随即被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吞并。第三十五师名存实亡。后来，蒋介石为了拉拢回民将领马鸿宾，把这个师的番号送给了他，马鸿宾把自己的暂编第七师改成了第三十五师，下辖三个步兵旅、一个骑兵团，师部直属炮兵、工兵、辎重和特务各一个营，全师共有官兵近九千人。

一九三四年冬，马鸿宾的第三十五师奉命从甘肃移防陇东。

八月十八日，马鸿宾在他设在平凉城内的师指挥部，得知了红二十五军已经接近的消息，当时平凉城里的守军仅仅有第一〇四旅二〇八团的一个营。为了平凉的安全，他立即命令驻扎在平凉以北固原的第一〇五旅副旅长马应图率该旅的两个步兵营和两个迫击炮连增援，同时抽调二〇五团的一个营也归马应图指挥。之后，马鸿宾又命令驻扎在西峰镇的骑兵团一营副营长卡得云率部向平凉靠近。

马应图率领三个步兵营到达瓦亭的时候，与红二十五军遭遇。红军迅速占领了几个山头，马应图部逐渐处于不利地位。这时，卡得云的骑兵营赶到了，战斗骤然激烈起来。红军官兵顽强防守着几个重要

的高地，战斗虽然短暂，但是双方损失都很大，红二十五军二二五团团长阵亡，而马应图部也伤亡十余人，卡得云的骑兵营两人负伤、五人被俘。被俘的五名士兵很快就被红军释放了，释放回来的士兵都说红军好，因为红军说话和气，还给他们鸡肉吃。

红二十五军继续向平凉逼近。在占领了西兰公路上一个叫三关口的要点后，红军切断了公路，使平凉城的对外联络中断。

为了打通去平凉的通道，马应图决定强行闯过三关口，当两个步兵营营长王凤云和白效禹显出惧怕情绪的时候，骑兵一营副营长卡得云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冒险闯关。凌晨，在步兵的掩护下，卡得云率领骑兵一营向红二十五军防守的三关口猛烈冲击，已经决定放弃威胁平凉的红军仅仅留下了一个排边阻击边撤退，因此卡得云的骑兵营得以顺利地冲过了三关口。

平凉城里的马鸿宾一见卡得云，总算松了一口气。他向卡得云询问红军的情况。卡得云说，红军身体都很瘦小，而且很多是小孩子，并不可怕。卡得云的描述加上他顺利闯关的事实，使马鸿宾的胆子突然大了起来。他认为瓦亭遭遇战的损失完全是马应图怯战的缘故，第三十五师只要主动扑上去就能把红军吃掉。马鸿宾当即命令骑兵团和第一〇四旅的二〇八团迅速向泾川县城集中，准备竭尽全力把红二十五军逐出他的陇东防区。同时，根据红二十五军绕过平凉东去白水镇的动向，马鸿宾命令马应图率领三个步兵营迅速追击，命令炮兵集中火力向移动中的红军轰击。

八月二十日，红二十五军到达了白水镇附近。马鸿宾得知消息后，命令卡得云率领骑兵一营、马钟选率领辎重营东出平凉城追击。部队出发后，决心彻底消灭红二十五军的马鸿宾在第一〇四旅旅长马

献文的陪同下，带领二十多名警卫员和传令兵也跟随出击到达了四十里铺。在这里，马鸿宾见到了马应图，他立即拉下脸来质问他在瓦亭为什么怯战，马鸿宾身后的马献文也帮腔说怎么连娃娃兵都不敢打。马应图回敬马献文道：“你站在后头好说话。你们敢打你就上去吧！”说完掉头走了。

这时，乘坐卡车前进的辎重营到了，车上坐着该营的一百多名枪手。马鸿宾让枪手们下来步行，然后自己和马献文、警卫员、传令兵一起爬上了汽车。马鸿宾命令汽车往东追击。马献文提醒马鸿宾，卡得云的骑兵营还在后面，是不是再等一等。胆子大了的马鸿宾没有搭理马献文，一个劲儿地催促汽车快开。

下大雨了。

陇东地区很少下雨，即使下雨也没大雨，而这天下的却是罕见的暴雨，这场暴雨竟然持续了两天。

红二十五军即将遭遇的巨大创伤与这场罕见的暴雨密切相关。

下午六时，马鸿宾乘坐的汽车顺着西兰公路到达了马莲铺，汽车在村西口停了下来。

山野在大雨中一片迷蒙。

突然，前方传来了剧烈的枪声。

马应图一听就知道这是红军的枪声。他再不能在马鸿宾面前怯战了，于是打马向前奔去。

在马莲铺东面的打虎沟，红二十五军占领了公路两侧的有利位置，机枪阵地设在山顶上的一座小庙里。急需洗刷怯战罪名的马应图严令他的三个步兵营立即向红军的阻击阵地发起猛攻。在正面反复攻击始终没有得手后，他又派出两个连迂回到打虎沟的西面往山上爬。国民党兵快要爬到山顶小庙时，红军的机枪子弹穿过雨雾射来，马应图的两个连即刻伤亡惨重。瓢泼大雨中，红军官兵趁势冲出了阻击阵地。军号声、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和喊杀声与大雨倾泻的声音混杂在一起，马应图的三个步兵营顿时陷入了混乱，官兵们开始疯狂溃逃。红军很快冲上了公路，马应图身边的卫队瞬间跑了个精光。马应图不敢骑马，跌跌撞撞地在泥水中跑进了公路边的一间民居藏了起来。

在马莲铺村西口的马鸿宾不知道前面的战斗进行得如何，只听见枪声越来越激烈。已经认定红军是群娃娃的马鸿宾让马献文留在原地，自己则带着他的六儿子马定国和几个警卫员拍马向战场方向冲了过去。刚冲到村东口，迎面就遭到了手榴弹的袭击，马鸿宾还以为是自己的部队发生了误会，但是他很快就明白了冲过来的是红军。马鸿宾已经没有了退路，只能命令身边的卫兵抵抗。在警卫人员抵抗的时候，他带着儿子跳下马，爬进了公路边的一个院子。红军隔着院墙往里面扔手榴弹，并且把院子团团围住了。

就在这时，卡得云的骑兵一营和辎重营的一百多枪手赶到了战场。卡得云率领骑兵拼死向包围院子的红军冲击，同时命令士兵用刺刀在院墙上挖洞。经过反复的冲杀，红军撤退了。险些成了俘虏的马鸿宾被卡得云的骑兵连拖带拉才逃出了那座破败的院子。

接近午夜的时候，第三十五师的炮兵营赶到了战场。

红二十五军的攻击停止了。

大雨依旧在下。

受到惊吓的马鸿宾甚至都不敢回马莲铺了，师部就在村外一片黑乎乎的树林里休息。大雨把所有人的衣服全浇透了，马鸿宾浑身发抖，一个劲儿地说：“太厉害！太厉害！”

平静之后，马鸿宾首先想起来的是：在战场上怎么还是没见着那个该死的马应图？于是命令去找马应图。卡得云在黑暗的大雨中四处叫喊，就是没有人答应。其实马应图听见了，但是他怕卡得云被红军捉住，喊话引诱他出来，所以一直不敢应声。卡得云喊了很久，马应图才从他躲藏的那间民房悄悄爬出来。大雨倾盆，他竟然不知道红军已经撤了。见到马鸿宾，马应图连哭带闹地说：“我当团长当得好好的，让我当副旅长，什么副旅长，只有三个营，还指挥不动，身边连个护身的卫兵连都没有！你说红军尽是些娃娃，还让我活捉他们，你现在干脆杀了我吧！”

马鸿宾说：“你把三个营都丢了，我不问你罪，你倒倒打一耙！”

第二天，马鸿宾回到平凉城里，立即给马应图记了一大过。

经历了激烈战斗的红二十五军决定继续沿着西兰公路向东。

连日的暴雨使公路北侧的泾河河水猛涨，部队要渡过泾河几乎是不可能了；而公路的南面是一道数十里宽的高塬台地，回旋的余地很小。于是，红二十五军决定暂时离开公路，南渡泾河的支流汭河，佯攻灵台县城，摆出进入陕西的态势，而实际部队回击崇信县城，坚持切断西兰公路，顺着公路再往回走，继续探听主力红军的消息。

大雨仍未停止。

红二十五军离开白水镇向东，在王村附近翻越王母宫塬，然后徒涉汭河。

部队渡到一半的时候，这条平时并不湍急的河流河水迅速上涨。

山洪暴发了！

正在渡河的红军官兵立即被突然而至的洪水卷走。

先头部队二二五团基本渡河完毕。一营营长韩先楚和政委刘震已经在汭河南岸了，他们在大雨中开辟了阵地，准备掩护二二三团、军部机关和军直属队渡河。

突然暴涨的洪水令两岸的红军顿时焦急起来。

韩先楚和刘震，这对红二十五军营级军政搭档，作为红军中的中层指挥员，他们能够活下来看到革命胜利无疑是一个奇迹，因为绝大多数红军中层指挥员都在残酷的转战中牺牲了。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在陇东罕见的大雨中，浑身湿透的韩先楚和刘震非常紧张。军事常识是，一支部队在渡江河时，被天然的河流截成两半，这正是这支部队最脆弱和最危险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遭遇敌人袭击，就是中国兵法上所说的“半渡而击”了——半渡而击的后果将是毁灭性的。

跟随先头部队渡过了汭河的吴焕先已经强烈地意识到部队处在危险中了。

而被隔在汭河北岸的徐海东在大雨中来回走着，他始终没有离开河边，希望看见疯狂上涨的河水在某个时刻会突然平静下来。

没能过河的二二三团在塬上展开了警戒，军部机关、大量驮着物资的骡马、行李担子、医疗药品、军械修理器材以及跟随医院行军的伤病员，此刻都混乱地拥挤在大雨中的北岸。

军衣湿淋淋地裹在吴焕先细瘦的身体上。

二二三团必须赶快渡河！尽管事先得到的情报是泾河一带无大敌，但是，万一呢……

下午，枪声响了。

枪声是从徐海东身后的雨雾中传出来的。

在大雨中向红二十五军冲来的是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第一〇四旅。

先头部队是骑兵，后面紧跟着步兵。

对于红二十五军来讲，最坏的事情发生了。

八月二十日，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骑兵团奉命到达了泾川县城。骑兵团团长马培清不愿意继续追击了，因为一方面骑兵团在大雨中行军十分辛苦，另一方面他已经得知了在马莲铺战斗中马应图旅的不幸遭遇。但是，师长马鸿宾的命令到了，命令他立即出发追击红军，并说红军都是些娃娃和女兵，如果让红军跑了唯骑兵团是问。同时，调步兵二〇八团和二一〇团三营归骑兵团指挥。下午，马培清把二〇八团团长马开基请来商量，开口就说红军不是那么好打的，这次一定要稳扎稳打，不可轻易出击。谁知，马开基团长当场就顶了马培清一句：“怕死别打仗！”原来，泾川是马开基的防区，马培清的骑兵团是奉命到他的防区来增援的，理应接受他的指挥，可是马鸿宾师长竟然

命令他接受骑兵团的指挥，这让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商量没能进行下去，因此也就没有战斗部署。马开基命令他的副团长张海禄留下来坚守泾川县城，自己带着步兵一营、二营各两个连和团直属队，还向马培清要了一个排的骑兵，冒着大雨出发了。马开基出发的时候，根本就没通知奉马鸿宾之命前来参加追击的二一〇团三营。在他出发后，三营营长马维麟自动担负起了县城的防守任务。而马培清不愿意跟着马开基走，又不能不出击，于是率领着他的骑兵团向南出发了，说是去迂回红军的侧翼。

二十一日下午六时，马开基的部队到达王母宫塬，发现塬上已经被红军占领，但是汭河边正聚集着大量的红军。马开基意识到这是突然出击的大好时机。身边的军官说，红军人多，也没有攻击咱们的意思，天色已晚，又下着大雨，不利于战斗，不如先建立阵地再说。马开基还是那句话："怕死别打仗！"然后命令部队立即向汭河北岸的红军发动攻击。

红二十五军自从在报纸上获得了主力红军的消息，就以正常的行军速度计算着主力红军的行进路程。按照他们的预想，主力红军应该能够进入陇东地区了，所以他们一直冒险徘徊在西兰公路的两侧，以期迎接主力红军。但是，他们不知道主力红军在北进的路途中被迫一次又一次地停留，一次又一次地开会解决尖锐对立的政治与军事问题。此时此刻，张国焘率领的左路红军仍滞留在川北马尔康附近的卓克基，而毛泽东率领的红军右路军刚刚进入松潘大草地。

红二十五军最危险的时刻来临了。

首先接敌的是二二三团三营。三营利用塬上一个小村庄的房屋、土墙和窑洞，与最先冲击来的敌人的骑兵展开了激烈的对抗。敌人分

散成班和排，一波接一波地轮流向前顶，那些被红军砍断了腿的战马在大雨中嘶鸣着。二二三团机枪连连长戴德归率领几个战士抬着一挺重机枪上了一孔窑洞的顶部，用猛烈的扫射压住了敌人冲击的势头。这时，渡过河去的二二五团无法回援，战斗力较弱的军机关和后勤人员被迫开始在上涨的河水中拼命渡河，形势危在旦夕……

军政委吴焕先在枪声响起的那个瞬间，纵身扑进了水流湍急的汭河中，奋力往敌人发起冲击的北岸游来。汹涌的河水将他冲出了很远，他上岸后拼命朝渡口的方向猛跑，一边跑一边大喊“把敌人顶住”。徐海东也迎着吴焕先跑去，两人紧急商量了一下，就一起向三营所在的塬上跑，那里现在是整个北岸战斗的最前沿。徐海东的腿受过四次伤，跑起来跟不上吴焕先，吴焕先在剧烈的喘息中回头对徐海东说了句：“来呀，咱俩比赛。”

吴焕先冲到了塬上，立即组织军部交通队和学员连直接插向敌人的侧后。他跑在这支队伍的最前边，边冲边喊：“同志们，压住敌人就是胜利，决不能让敌人逼近河边，要坚决地打！”

二二三团一营、二营冒着横飞的子弹，迅速占领了塬上的制高点，从侧翼向敌人发动了进攻。

敌人的冲击受到两翼的压力，力度和速度缓慢下来。

在双方接触的前沿，仍听得见肉搏战的厮杀声。

大雨如注。

红二十五军绝不能让敌人拖在这里直至消耗殆尽。

吴焕先一声呐喊，红军官兵开始了反击，他们必须把这股敌人打跑。

跟随着吴焕先冲击的交通队的战士看见他们的军政委在大雨中直起了细瘦的身体，回过头来对他们喊了一句“冲啊”，然后就直挺挺地栽倒在大雨中了。

敌人的数粒子弹射中了二十八岁的红军军政委吴焕先的胸口。

战场上突然没有了他那军号般的呐喊声。

吴焕先，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后，他留下来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组建了红二十五军，先任军长，后任政委。对于红二十五军的官兵来说，无论进行的是多么残酷的战斗，只要吴焕先在前面大刀一挥，他们就会拼死争相跟随。在红二十五军官兵的心中，身先士卒的吴焕先永远是一面大旗，他们在这面大旗上懂得了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光荣，什么是中国工农红军。

红军官兵的怒火喷发了。

他们向敌人迎面扑去。

他们愿意跟随他们的军政委去死。

国民党军二〇八团官兵几乎无一漏网全部被红军压在一条烂泥沟里。

这条烂泥沟最终成了国民党军二〇八团的坟墓。

红军官兵往沟里扔手榴弹，开枪射击，最后扑进去，用大刀砍，用拳头打。敌人已经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红军干部在一边喊：红军优待俘虏！把他们押出来！但是，红军官兵仍继续射击、砍杀、撕咬。

二二三团二营通信班班长周世宗看见一个似乎是敌人指挥官的人要骑马逃跑，于是他开枪了。他连续开了四枪，把那个军官的马打伤了。他跑上前去，命令马背上的那个军官下马投降，但那个军官不肯。于是，周世宗朝着他再次连续开枪，直到他重重地跌下马来。

团长张绍东跑过来说："立功了！奖励大洋三块！"

被红军通信班班长周世宗打死的军官，就是声称"怕死别打仗"的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第一〇四旅二〇八团团长马开基。

但是，无论消灭了多少敌人，都不能让红二十五军官兵感受到胜利的滋味。

副军长徐海东说："一定要想办法，给政委买一口好棺材。"

天黑下来的时候，先是大雨停了，接着汭河河水开始回落。

徐海东亲自牵着骡子，把吴焕先的遗体运过汭河。宣传队队员们到处寻找棺材，最后把当地大地主郑庭顺家的一口还没上漆的柏木棺材抬来了。吴焕先穿上了他一直舍不得穿的那件旧呢子大衣，被安葬在汭河北岸宝盒山的山脚下。

第二天，红二十五军离开了泾川地区，沿着西兰公路继续向南，逼近了崇信县城。

惨烈的王母宫塬之战使国民党军暂时不敢靠近红二十五军了。为了继续钳制敌人，红二十五军开始在崇信、灵台地域长久地徘徊转战。他们每天都派出大量的侦察员四处打探主力红军的消息，但是一直都没有结果。这时，由兰州方向增援而来的国民党军第六师第十七旅已经到达泾川县城，马鸿宾的第三十五师也开始向崇信方向靠近，从陕甘方向调来的国民党军第五十一军第一一三师也已经向北推进到陇县，而国民党军第三军第十二师逼近了距离崇信只有二十多公里的华亭。红二十五军已经处在被四面包围的境地。

连日行军作战，伤员无法安置，官兵极度疲惫，这种没有后方的移动作战，会使部队的战斗力逐渐消耗。

红二十五军领导人终于下了决心，不再等待主力红军了，离开西兰公路，直接往北去寻找陕北红军。

从八月十四日到三十一日，红二十五军在西安通往兰州的公路两侧，以接连不断的战斗整整等待了十八天。无论多么艰难，多么危险，他们都不愿意离开这条他们认为党中央和主力红军必定要过的公路。他们希望在党中央和主力红军通过这条公路的时候，这一军事要地处在被红二十五军占领的安全状态中。他们奋不顾身的移动与作战，钳制了陕甘境内的国民党军，配合了即将北上的主力红军的行动。现在，即使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们还是无法在危机四伏的西兰公路上继续等待下去了。而他们此刻作出的北上决定，事后证明是极其正确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对此评价为：“胸怀全局和远见卓识。”

一九三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晚，红二十五军自平凉县城以东的四十里铺渡过泾河，离开了西兰公路，向东北方向而去。

红军官兵跨过西兰公路以后，不少人纷纷回头张望了一下。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知道，此时，毛泽东刚刚到达松潘大草地北沿的班佑，前锋红军正在包座与国民党军血战，试图打开北进陕甘的通道；而张国焘借口嘎曲河水上涨已经不再继续向北前进了。

渡过了泾河，昼夜兼程前进的红二十五军依旧被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追击着。九月三日，红军渡过马莲河到达了合水县的板桥镇。马鸿宾的第三十五师紧随着红军也到了。为了使部队能够顺利通过，徐海东率二二三团前去包围合水县城，命二二五团为后卫掩护军部机关。二二五团在板桥镇内短暂休息后，凌晨四时部队准备出发。这时，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的骑兵来了，立即与二二五团的后卫部队三营交了火。

二二五团三营的七、八两个连是由游击队改编的，官兵们的战斗经验不多。

突然攻击三营的又是马培清的骑兵团。这个团在王母宫塬战斗后一直尾随着红二十五军。追到泾川与合水之间的西峰镇时，团长马培清接到了师长马鸿宾的电话。马鸿宾在电话里命令骑兵团要与红军“好好打上一仗”，并把二一〇团也调来归马培清指挥了。马培清知道马开基的二〇八团是怎么覆没的，为了避免与红军硬拼，又不承担任何责任，他对马鸿宾说自己一个人怕是指挥不了六个营，要求派第一〇四旅旅长马献文来西峰镇。马鸿宾说：“红军现在很容易捉，你就不要推辞了。”

马培清对骑兵团下达的作战原则是：采取守势，谨慎出击。在西峰镇到合水县的路上，骑兵团两次和红军接触，都采取了这个策略，因此部队没有什么损失。但是，马鸿宾的电话又打来了，说他看出来

马培清在消极作战，如果贻误大局，军法从事。这一下，过了马莲河后，骑兵团的追击速度加快了。

九月四日凌晨，黎明前天色漆黑，马培清的先头部队一头进入了红二十五军后卫部队的阻击阵地中。

红军二二五团三营和多达六个营的敌人展开了激战。对于红军官兵来讲，马鸿宾的骑兵是很强硬的对手。当这些骑着高头大马的国民党兵呐喊着冲过来的时候，红军的阻击阵地上显出了将要顶不住的迹象。前去包围合水县城的徐海东听见板桥镇方向响起了枪声，立即返回来，发现二二五团参谋长戴季英还在军部机关的队列面前讲话，据说他已经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了。徐海东立即率二二五团二营投入了战斗，以掩护三营突围。但是敌人的兵力过于强大，连同徐海东在内，二二五团陷入了敌人的包围之中。

马培清似乎看出了红军阻击阵地的脆弱，他立即命令骑兵团一、三两个营从正面冲击，两个步兵营从右翼包抄，自己则率领一个骑兵营向左翼插了过去。骑兵的冲击给红军的阻击阵地带来很大的混乱。危急时刻，二二五团一营营长韩先楚和政委刘震率领部队迅速占领了左翼的一座山头，用猛烈的火力阻击敌人，掩护徐海东率部冲出了重围。

刘震在枪林弹雨中寻找着徐海东。

吴焕先政委刚刚牺牲，红二十五军绝不能再失去徐海东。在望远镜里，刘震发现了徐海东的身影，他骑在一匹白马上，白马正沿着一道土梁奔跑，敌人的骑兵已经距离他只有几十米了。刘震立刻命令所有的机枪向敌人的骑兵扫射。

已经认出白马上的人就是徐海东，骑兵团长马培清顿时兴奋起来，因为蒋委员长悬赏“徐匪”的价格是十万大洋。马培清的副官马长清却极端懊悔，因为徐海东是从他的眼皮底下跑过去的。那一刻，他看见一匹白马跑到了他的跟前，马上的人一身蓝衣没有拿枪，马长清以为是位师爷，慌忙中还敬了个礼。白马跑远的时候，马长清才回过神来，他惊叫了一声，立即命令骑兵去追。跑得最快的两名骑兵追上了在徐海东后面掩护的警卫员，他们把这个小红军拉下了马，接着，两个国民党兵为了谁占有小红军身上的驳壳枪争执起来。徐海东继续纵马飞奔，白马绕过了一片高粱地，等马培清的骑兵追上来时，高粱地里突然飞出了一片密集的子弹。

这是红二十五军离开根据地后移动作战的最后一战。

二二五团刚刚接任团长的方炳仁在突围中阵亡。

红二十五军军医院院长钱信忠突围时还带着十几名伤员。这位十几年后成为新中国卫生部部长的老红军，一九三五年九月四日在陇东的板桥镇经历了他人生中最危难的时刻。三年前，钱信忠还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名军医。一九三二年六月在湖北黄安的一次战斗中，他所在的国民党军第十师中了红军的埋伏。当国民党兵开始溃退的时候，他藏在稻田里没有走。看见红军的部队上来了，他从稻田中走了出来。红军战士看见的是一个穿戴整齐的军官：黄斜纹布军衣，皮鞋很亮，全副武装，胖胖的身体，看样子官一定不小。红军战士把他围起来，你一拳他一脚要把他绑起来。钱信忠连忙说：“不要打，也不要捆，我是医官，没有逃跑就是因为想当红军。你们把我送到你们的司令部去吧。”参加了红军之后，红军官兵问他为什么主动过来，他说在上海宝隆医院学习的时候读了几本马列的书。在红军队伍里，钱信忠经受了艰苦生活和残酷战斗的考验，他把他的全部医术都献给了红

军，成长为一名坚强的红军干部。过去他穿的是皮鞋，参加红军后，官兵们要他穿草鞋，但是他不会打草鞋，他说："我打赤脚也要革命！"

在板桥镇，当二二五团遭遇突袭的时候，钱信忠首先想到的是救护红军伤员。他跟在徐海东的身后冲上了战斗前沿。部队被敌人的骑兵冲散了，他带领他抢救下来的伤员形成了一个小集体，他说："现在，我们能否安全归队成了问题。我们要接过牺牲同志的枪，准备打游击，追部队去！"钱信忠带领伤员晚上走路，摸着地上草的倒伏方向来判断部队转移的路线，最终他们真的追上了红二十五军的大部队。那个时刻，红军伤员包括钱信忠都哭了，他们为重新回到生死相依的红军队伍中感到万分庆幸。

板桥战斗结束后，红二十五军进入了甘肃与陕西交界处的群山之中。这里人烟稀少，沿途没有可以获得粮食的村落，部队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但是他们依然没有间断行军，因为前面就要进入陕甘苏区了。

九月七日，红二十五军到达合水县东北方向的豹子川。在这里部队做了短暂的休整，中共鄂豫陕省委召开会议，决定由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接替吴焕先代理鄂豫陕省委书记兼红二十五军政委，徐海东任红二十五军军长。

红二十五军终于走出了陕甘边界的子午岭山区。在接近洛河的时候，部队遇到了几百头羊迎面而来。饥饿的红军把羊群拦了下来，后面赶羊的人急忙走上前来，拿出了国民党的护照，说他们是做生意的，于是红军官兵说必须要没收这些羊。赶羊的人赶紧问："你们是红军吧？"当听到确实是红军的部队时，他们又拿出了苏维埃政府的证

明，说这些羊都是苏区的，准备赶到白区卖了之后买布。红二十五军的供给干部问这些羊要卖多少钱，赶羊人说最少要四百二十块，供给干部给了他们五百块大洋，赶羊人丢下羊兴高采烈地走了。几百只羊，让红二十五军所有官兵都扎扎实实地吃饱了。

九月十五日，红二十五军终于到达了他们长征的终点——陕西省延川县永坪镇，与刘志丹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会合了。

此刻，红二十五军全军人数为三千四百多人。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八日，在永坪镇，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第二十六军和第二十七军合编成为第十五军团，下辖三个师，兵力七千余人。红军第十五军团组建的重要意义在于：为毛泽东率领的红军到达陕北奠定了军事基础——《共产国际》第七卷第三期《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的远征》："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的荣誉犹如一颗新出现的明星，灿烂闪耀，光波四表！就好像做毛泽东部队的先锋一样，帮助毛泽东部队打开往陕北的途径。"

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之后留下的一支红军武装，几乎与位于江西瑞金的中央红军同时开始了军事转移，经过了数月的颠沛流离和艰苦转战，成为所有红色武装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部队。红二十五军从河南进入湖北，从湖北又入河南，从河南进入陕西，从陕西进入甘肃，从甘肃进入宁夏，从宁夏再入甘肃，从甘肃又入陕西，红军官兵一路浴血奋战，前仆后继，舍生忘死，全军兵力最多时不足八千人，最少时兵力只有一千多人。然而，这支小小的红军武装最终摆脱了生存危机，寻找到了可以发展壮大的立足点。更为重要的是，红二十五军用坚定的信仰和不屈的精神，在中国的腹地

传播了创建新中国的革命理想。在他们经过的每一座城镇和村庄中，百姓因为他们知道了共产党人的革命和中国工农红军。

那些牺牲在征途上的红二十五军的官兵，他们的鲜血日复一日地润泽着中国辽阔的腹地，使那里的高山得以葱茏，河水得以奔流，使那里的每一块田野得以丰饶。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将永远分享着人类最壮丽的史诗——长征——的光荣。

红二十五军已经走在陕甘苏区的境内了，官兵们享受着欢迎的口号、金黄色的小米和肥美的羊肉。而在同一时刻，毛泽东率领的红军正冒着雨雪交加的严寒和不断袭来的饥饿行进于中国西南部蛮荒的原始密林中。

距离从草地边缘分出去的那部分红军越来越远了，被冷雨淋湿的毛泽东万分痛苦，他并不知道此刻红二十五军已经到达了陕北，中央红军前景不明的北进之路实际上已经敞开了。

所有的一切都在无形中支持着这个信仰坚定的红军领袖。

九月十一日，从万分危险的情况下脱身而出的红军陆续到达了甘南与川北交界处的俄界。俄界，今迭部县境内的高吉村。毛泽东在这里与一直等候着他们的红一军团会合了。

俄界是由一位杨姓藏族土司统治的小小村落，由于国民党军队无法在这里立足，到达这里的红军相对安全了。据说这个杨姓土司自清至今已经是第十九代，他们每年向国民党当局纳税之后便平安无事了。他们对红军也没有什么敌意，土司甚至把粮食仓库向红军敞开，让红军用一些枪支换取他的粮食。杨姓土司知道，这支军队只不过是过路客而已。

与红一军团会合的时候，红军官兵悲喜交加。悲的是，红军居然分成了两部分，而且大部分在很远的地方，这使红军的前途和命运陡增了令人不安的因素；喜的是，自那个充满危险的夜晚匆忙北进之后，至今除了行军的艰辛之外，一路没有发生大的险情，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第一、第三军团终于会合在一起了。

当天，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口气严峻了许多：

国焘同志：

（一）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即命令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二）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周副主席恩来同志指挥，并已令一、三军在罗达、俄界集中。

（三）立即答复左路军北上具体部署。

中央

九月十一日二十二时

第二天，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史称“俄界会议”。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领导以及红一、红三军团的主要指挥员都出席了这个重要的会议：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刘少奇、凯丰、邓发、叶剑英、蔡树藩、林伯渠、李维汉、杨尚昆、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清等。周恩来由于病情再次恶化没有出席。

会议首先听取了毛泽东关于与张国焘的争论和今后红军的战略方针的报告。虽然在现存的档案史料中，毛泽东的发言记录已有残缺，但是这一发言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史料。毛泽东在其中提出的战略方针将对未来中国革命的进程产生重要影响，是解释中国革命史中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起始缘由的重要依据:

……

我们在两河口一、四方面军会合，中央六月十八日决议，现在中央坚持这个方针。有同志反对这个方针，有他机会主义的方针，这方针的代表是张国焘、陈昌浩……四方面军起初是按兵不动，七月十七日要集中第一地点未实现。张到芦花，政治局决定他为总政委，张才把四方面军调动，但未到毛儿盖即动摇，一到毛又完全推翻这一决定，而把主力去阿坝、右路去班佑。张到阿坝后，便不愿意北上，要右路军南下，政治局七个同志在周副主席处开了一个非正式会议，决定给电张国焘北上，徐、陈当时表示，要他走路回草地是不好，但北上有王钧、毛炳文，走草地没有王钧、毛炳文，这是他根据的机会主义观点。所以，张国焘坚决要他回去，他便主张回去。

政治局说四方面军的领导一般是正确的，是说他在鄂豫皖、通南巴时期，从通南巴出来便不正确了，他退出通南巴，是在中央区红军退出中央区之后，那时他觉得通南巴孤立，决定到宁夏，又觉得宁夏有敌人骑兵，所以决定到西藏。四方面军退出通南巴，是不正确的，打了胜仗为什么要退出？有什么理由呢？……我们现在背靠一个可靠的地区是对的，但不应靠前面无出路，背后无战略退路，没有粮食，没有群众的地方……所以我们应到甘肃才对，张国焘抵抗中央的决议是不对的。

……

中央坚持过去的方针，继续向北的基本方针，补充决议上说的向黄河以东……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应该在陕、甘、川创造苏区。但现在不同了，现在只有一方

面军主力一、三军，所以应该明确地指出这个问题，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示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

这个方针是否可能？可能的，在地形上、敌情上，加上正确领导，加上克服困难的精神，无疑是可能的……我们由现地到苏联边境只有五千里……我们估计到运动战的可能还是有，但相应受限制，所以我们应该准备这些阵地战、堡垒战的工具——飞机、大炮，使运动战与阵地战配合，这一问题，很尖锐地提到我们的面前……我们总是可以求人的，我们不是独立的党，我们是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首先在苏联边境创造出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不然，我们就永远打游击战争……中央不能打到箭庐去，中央要到能够指挥全国革命的地区去，即使不能到达目的地，我们也不致做瓮中之鳖，我们可以到各处去打游击，即使给敌人打散，我们也可以做白区工作，我们可以去领导义勇军，而且我们估计，经过游击战争，我们可以打通国际关系，可以得到帮助，而克服敌人的堡垒主义。

……

目前与四方面军的关系，是党内斗争，但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在今天说来，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将来或者是拥护中央，或者是反对中央，最后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是否马上作组织结论……不应该的，我们现在还有两个军，还有很多干部在那里，我们还要尽可能工作，争取他们，将来是不可避免重作组织结论的。我们还要打电报，要他们来，用党中央名义打电报，要他们来，因为我估计，他还有来的可能，自然也有不来的可能。

……

毛泽东的一个观点值得注意：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现在已无法实现，因为“现在只有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了，所以出路是继续

向北“打通国际联系”，“在苏联边境创造出一个根据地”，途径是“经过游击战争”——此时，毛泽东没有关于陕北苏区的任何消息。他在客观地衡量了目前红一方面军的实力之后，提出了打游击这样一个低调的军事策略；而“打通国际联系”的方针将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成为红军在陕北和甘肃一带继续移动作战的主要指导原则，并由此可以解释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这一时期作出的所有决策的内在原因。

俄界会议进行当中，张国焘的回电到了。

张国焘连续发出了两封电报，一封是给中央的，竟然说中央有人“通敌”：

林、聂、彭、李并转恩、洛、博、泽、稼：

一、据徐、陈报告：三军撤去脚杖寺、班佑警戒，乘夜秘密开走，次日胡敌有番反占班佑。三十团开班佑，在途与敌遭遇，团长负伤，伤亡百余。贯彻战略方针岂应如此。

二、红大已分裂，剑英、尚昆等均须［？］逃，兄等未留一人在徐、陈处，用意安在。

三、兄等走后，次晨胡敌即知彭德怀部北窜，请注意反动趁机告密。党中央无论有何争执，决不可将军事行动泄之于敌。

四、诸兄不图领导全部红军，竟率一部秘密出走，其何以对国际和诸先烈。

五、弟自信能以革命利益为前提，虽至最严重关头，只需事实上能团结对敌，无不乐从。诸兄其何以至此，反［？］造分裂重反团结，敬候明教。

国焘亲笔

九月十二日十时

张国焘的另一封电报是给红一、红三军团指挥员的，预言北进“不拖死也会冻死”：

林、聂、彭、李：

（甲）一、三军团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会悔之无及。

（乙）望速归来受徐、陈指挥，南下首先赤化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

（丙）诸兄不看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不图以战胜敌人为先决条件，只想转移较好地区。自欺欺人论真会断送一、三军的。请诸兄其细思吾言。

并报徐、陈

国焘亲笔

十二日二十二时

可以肯定，毛泽东两封电报都看到了。

会上有人提出要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泽东表示反对。毛泽东说：“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

彭德怀后来回忆说：“如果当时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以后争取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就不会有后来二、四方面军在甘孜的会合，更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了。”

俄界会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这个文件只发到中央委员一级。

从俄界出发向东北方向，至腊子口三百八十里。

红军出发的第一天就进入了原始森林中的白龙江河谷。白龙江是嘉陵江的一条支流，发源于岷山的主峰，流经甘肃和四川交界处的河段是其最险要的地段，江水在乱石中奔涌，两岸绝壁如削，一条古老的栈道高悬于绝壁之上。栈道是在绝壁上打孔架设而成的，上面铺有木板，高悬于距江面一二十丈的半空，仅容单人通过。

为了阻止红军进入甘南，当地的反动武装对栈道进行了破坏，有的地方木板被拆下来扔到了白龙江里，有的地方横插在悬崖上的木桩被拔掉了。红军官兵一路走过来，还没见过如此危险的栈道，队伍小心地贴着悬崖向前蠕动。走到栈道被破坏的地方，红军停止了前进。悬崖对面的森林中不断地打来冷枪，栈道上没有地方可以隐蔽，想还击，满眼林木寻不到目标，队伍中不断有人负伤和牺牲，被子弹打中的官兵摇晃着跌下河谷，在湍急的江水中瞬间没了踪影。必须寻找木材修栈道！于是，从栈道被破坏的地方开始，口令被一个人一个人地传递下去："可以砍树的地方赶快砍树，能够买到木板的地方用现洋购买。"就这样，口令一直被传到还没有走上栈道的红军那里。等了大半天，木材和木板被一个人一个人地传递过来了。队伍在栈道上停留的时间太久，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官兵们只能往干渴的嘴里塞点炒麦子。

红一军团一师参谋长耿飚的马在栈道上嘶鸣不已，因为害怕，马不但不走还乱蹦乱跳，这样一来随时可能掉下深渊。马夫老谢想尽了办法哄着这匹马，抚摩它，跟它说话，给它麦子吃，但是哄着哄着，他身子一歪，从栈道上掉了下去，前后的战友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老谢已经不见了。老谢是福建建宁人，却有一脸北方人的络腮胡子，憨厚的性格深得红军官兵的喜爱和尊敬。从苏区出发的时候，

他负责的是一头大黑骡子，一路上无论多么危急的关头，他始终拉着大黑骡子，无论骡子还是物资没有一点损失。部队到两河口的时候，大黑骡子突然丢了，难过得老谢好多天不吃饭，只是闷着头吸旱烟。上级重新给了他一匹马后，老谢对马的照顾更加精心了。红军队伍过草地时，他把身上的干粮全给马吃了，自己一个劲儿地掏棉衣里的棉絮往嘴里塞。一师走出草地的时候，老谢身上的棉衣里面都掏空了。

直到晚上十一点，红军的队伍才陆续从栈道中走出。

摩牙寺是一座有四百多名喇嘛的洁净寺院，红军路过的时候，开阔的寺院院子里鹅黄色的菊花正在盛开。

红军沿着白龙江继续向东北方向走，队伍里有干部说："前面有一道险要的关口，一军团正在那里抢关呢。"

九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并特意要求"此电必须转达"朱德与刘伯承"，电报的口气愈加严厉了：

国焘、向前、昌浩三同志：

（一）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且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总政委对于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只有总政委放弃自己的错误立场，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时，才说得上内部的团结与一致。一切外交的词句，决不能掩饰这一真理，更欺骗不了全党与共产国际。

（二）中央率领一、三军北上，只是为了实现中央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之四军、三十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

上。一、三军的首长与全体指战员不顾一切困难，坚决负担起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的先锋队的严重任务，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模范。

（三）张总政委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是使红军陷于日益削弱，而没有战略出路的罪恶行动。

（四）中央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利益，再一次地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之继续北进。

（五）此电必须转达朱、刘。立复。

中央

九月十四日

中央的电报发出的时候，红一军团正向腊子口全速前进。

国民党军飞行员的侦察报告被送到了成都。报告说，在腊子口附近发现“赤匪不足万人，没有后续部队”。

情报让蒋介石火冒三丈。看来把红军围困在草地里的计划算是落空了。但是，出了草地的红军为什么又分开了呢？蒋介石左思右想就是理不出头绪。情报说即将到达腊子口的那股红军是林彪的部队。这是一支极具大规模运动能力的红军，他们一进入甘南就径直向东北方向而去，蒋介石在地图前站立了很久，他把目光沿着甘南朝东北方向一路看去，最后看见的是中国西北那片被黄土覆盖的土地，那里是陕北。

蒋介石立即给兰州绥靖主任朱绍良发出了一个“赏格令”，朱绍良随即把这个最新的“赏格令”转发给了他认为红军可能路过的各县：

特急。

岷县、临洮、陇西刘县长并转渭源赵县长，天水、武都孔县长：

奉委员长蒋阳［七日］亥［九至十一时］蓉行参战电开：据报，北窜之匪毛、彭、林等均在内，饥疲不堪，不难消灭。兹再申擒斩匪首赏格如下：

1、毛匪泽东生擒者奖十万元，献首级者奖八万元；

2、林匪彪、彭匪德怀生擒者各奖六万元，献首级者各奖四万元；

3、博古、周恩来二匪生擒者各奖五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三万元；

4、凡伪中央委员、伪军团政委、伪军团长及伪一、三军团之伪师长等各匪首生擒者各奖三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二万元；

5、其他各著名匪首，凡能生擒或献首级者，仍照前颁赏格各给0172［原件电码，未译］。希通饬各县及地方军民人等，一体知照。等因。

特电遵照。

朱绍良。覃［十三日］午总参池。

刚刚还是晴天，突然就下起了暴雨。晚上，大雨中向导迷失了方向，红军的行军被迫停下来。毛泽东和官兵们一起在大雨中坐到了天明。

九月十日那个夜晚，毛泽东率领一部分红军果断北上，这一举动对那些没能跟随北进的红军官兵的影响是巨大的。从红一方面军交流

到红四方面军出任第九军参谋长的陈伯钧在日记中写道：“是夜静思，痛彻肺腑，以至暗泣。有生以来，伤心事，莫过于斯。”

九月十一日早晨，徐向前在前敌指挥部听说叶剑英走了，军用地图也被带走了，他一下子想起了头天晚上毛泽东来到院子里问他的那些话，想起了毛泽东告辞后渐渐远去的高大而消瘦的背影，徐向前这才明白一切都不可挽回了。他愣在乱哄哄的前敌指挥部里，任凭陈昌浩来来往往地叫喊，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

晚年，徐向前忆及此夜，依然痛心不已：

……那两天我想来想去，彻夜难眠……我的内心很矛盾。一方面，几年来自己同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一直不痛快，想早点离开他们。两军会合后，我对陈昌浩说，想去中央做点具体工作，的确是心里话。我是左思右想，盘算了很久，才说出来的。另一方面，右路军如果单独北上，等于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自己也舍不得。四方面军是我眼看着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大家操了不少心，流了不少血汗，才形成这么支队伍，真不容易啊！分成两半，各走一方，无论从理智上或感情上说，我都难以接受。这也许是我的弱点所在吧。

阿坝额尔登寺院的大殿里光线很暗。出席川康省委扩大会的省委委员，红军总部、工会、青年团、妇女部、儿童团的干部约一百多人。

张国焘开始了他几乎持续了一整天的长篇讲话。

他从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理论开始讲起，一直讲到目前中国红军所面临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之后，他全面阐述了南下的正确和北上的错误。张国焘深知现在他迫切需要得到广大红军干部的认同，为此他不断地挑拨红四方面军反对中央的情绪，说中央利用红四方面军用牺牲

打开的北进通道自己溜了；说他们的秘密出走让蒋介石以为红军的中心仍然在毛儿盖，因此不会去追击进攻他们的队伍；说毛泽东走的时候把缴获的粮食等重要物资都烧毁了，为的是给红四方面军官兵造成更大的困难等等。张国焘煽动性的讲话获得了强烈的会场效果，红四方面军有的干部竟然伤心得哭出了声——从警卫员开始就一直跟随张国焘直至成为内卫排排长的何福圣回忆说："在四方面军里，只知道有张国焘，不知有毛泽东，我们根本不可能起来反对张国焘，既没那个勇气，也缺乏那样的觉悟。"

红四方面军官兵大多是四川人，因此对于自己坚持的南下计划，张国焘给他们描绘出一幅光明美丽的前景："明知道北上是一条死路，还逼着我们四方面军跟着他们走，其用心不是想断送四方面军吗？他们已经把十万红军拖垮了，难道还要把四方面军葬送吗？他们走了也是好事，迟跑不如早跑，他们走他们的独木桥，我们走我们的阳关道，南下英勇作战，咱们打到成都吃大米去！到成都过新年去！"

会场上一片欢呼。

张国焘请朱德讲话，被朱德当场拒绝。朱德的态度激起了会场上的愤怒情绪。朱德很沉着，任你怎么说，怎么喊，就是一言不发，等所有的人都不吭声了，他才不慌不忙地说："中央的北进战略是正确的。在川陕建立革命根据地是经过反复研究决定的。对中央的决定，我举过手表示拥护，现在依然是这个态度。至于要我和毛泽东划清界限，我和毛泽东从井冈山就在一起，国内外都知朱毛，朱毛是不可分的。你们可以把我朱德劈成两半，但是不能把朱毛分开，更不可能要朱来反毛。"

张国焘说："你说北上好，你就一个人走吧，我们决不留你。"

朱德说："我是红军总司令，党中央和军委派我带领左路军北上。现在你们不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硬要南下，我只能跟着你们。你们到哪里，我也到哪里，我一定要执行党中央、军委交给我的任务，带领左路军北上。"

会后，朱德伤感地对康克清说："会议开得一团糟，糟透了。"

阿坝会议发布了《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计划声称："大举向南进攻，消灭川军残部，在广大地区内建立根据地，首先赤化四川。"

这之后，红四方面军中开始流传一首歌，歌名叫《红军南下歌》："亲爱的工农同志们啦，亲爱哎哎哟；红军的南下胜利大得很，我唱你来听，亲爱哎哎哟；伟大的胜利，我们打垮刘湘兵，亲爱哎哎哟；一、二、三、四消灭尽，占领懋功城，亲爱哎哎哟；红旗插遍了宝兴，亲爱哎哎哟；天全打垮了刘文辉，芦山来占领，亲爱哎哎哟；乘胜追下雅安去，亲爱哎哎哟；机关枪扫得满天钻，敌人吓破胆，亲爱哎哎哟。"

红军情报部门很快就获得了蒋介石最新公布的"赏格令"，毛泽东身边的红军干部们一看不禁回想起在中央苏区时候，红军剧团上演的一出官兵们百看不厌的活报剧。活报剧是时任苏区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参谋长张爱萍编的，内容是罗瑞卿给蒋介石打电话要"赏钱"。在张爱萍的要求下，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罗瑞卿扮演他自己，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耿飚扮演蒋介石。其中的一段台词红军官兵们现在还能背出来：

罗瑞卿：［拿着电话］老蒋吗？我是老罗呀！

蒋介石：哪个老罗？

罗瑞卿：老子就是罗瑞卿！

蒋介石：［对宋美龄］快！拿钢盔来。［对电话］我不怕你！我有百万大军，还有美国的钢盔。娘希匹，怎么把痰盂给我戴上了！

罗瑞卿：你们的报纸宣布我被击毙几次了，可赏钱一分也没发，我至今还保留着脑壳，等钱用哩！

每次看到这里，台下的红军官兵都笑得前仰后合，纷纷喊道："老蒋彻底交代！钱都上哪里去了？"

台上扮演蒋介石的耿飚就临时编词说："钱都让我抽大烟啦。"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六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四团政委杨成武面对眼前将要攻打的一道天堑惊讶不已：

我们来到前沿，用望远镜抬头一看，果然这里地形险峻极了。沿沟两边的山头，仿佛是一座大山被一把巨型的大刀劈开了似的，既高又陡。周围全是崇山峻岭，无路可通。从下往上斜视山口只有三十来米宽，又像是一道由厚厚的石壁构成的长廊。两边绝壁峭立，腊子河从沟底流出，水流湍急，浪花激荡，汇成飞速转动的漩涡，水深虽不没顶，但不能徒涉。在腊子口前沿，两山之间横架一座东西走向的木桥，把两边绝壁连接起来，要经过腊子口，除了通过这个小桥别无他路。桥东头顶端丈把高悬崖上筑着好几个碉堡。据俘虏称，这个工事里有一个机枪排防守，四挺机枪对着我们进攻必须经过的三四十米宽、百十米长的一小片开阔地，因为视距很近，可以清楚地看到射口里的枪管。这个重兵把守的碉堡，成了我们前进的拦路虎。石堡下面，还筑有工事，与石堡互为依托。透过两山之间三十米的空间，可以看到口子后面是一个三角形的谷地，山坡上筑有不少的工事。就在这两处方圆不过几百米的复杂地形上，敌人有两营之众，此外还有白天被我们击溃逃到这里的敌人。口子后面的腊子山，横空出世，山顶积着一层白雪，山脉纵横。据确切的情

报，鲁大昌以一个旅部率三个团的重兵，扼守着口子至后面高山之间的峡谷，组成交叉火力网，严密封锁着我们的去路。

腊子口，从川西进入甘肃唯一一条通道上的险要隘口。

九月十七日凌晨两点，四团的官兵被从睡梦中叫醒。他们是两天前在摩牙寺接到攻击腊子口的作战任务的，军团规定占领腊子口的限期是三天。从摩牙寺到腊子口至少有一百公里的路程。四团连夜出发了。十六日，他们穿过了白龙河谷，上山时大雪纷飞，下山却变成了倾盆大雨。到达距离腊子口不远的山脚下，官兵们休息了一下，炊事员连夜做饭，吃饭后四团继续赶路。在大雨中沿着泥泞的山路走了半夜，天亮的时候部队停了下来，给他们带路的六十多岁的向导说，他上次来这里是十多年前了，现在前边没有路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走。团长黄开湘和政委杨成武立即决定用指北针开路，刻不容缓地继续向腊子口前进。没走多一会儿，先头一营就遇到了敌人。

对手是国民党军鲁大昌的新编第十四师第一旅六团，团长朱显荣。

腊子口是这个团的防区，六团不但齐额满员，而且还得到了五团一个营的加强。朱显荣团长认为，在这样一个天然隘口配备六个营的兵力显得有点过于谨慎了，但是师长鲁大昌还是不放心。兰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和驻扎在天水的第三军军长王钧都警告过他，如果让红军从腊子口突进甘肃腹地，其罪责不可饶恕。特别是蒋介石在电报中格外强调，如有重要防地失守，“唯各该防地军民主官是问，照失地纵匪论罪”！尽管鲁大昌也认为腊子口天堑“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但当得知红军已经向腊子口方向开进时，他立即命令一旅旅长梁应奎率一团的两个营，再加上旅直属部队，向腊子口方向紧急增援。梁应奎的

增援部队也是沿着白龙江向腊子口行进的，沿途大雨不断，道路狭窄，给养困难，机枪、迫击炮和驮弹药物资的骡子均无法顺利前行。尽管鲁大昌数次来电催促，但是他们的行军速度依然十分缓慢。当他们终于接近腊子口的时候，不但听见了枪声，而且看到一群士兵正从山上溃败下来。一问，说是一支红军正向腊子口方向攻击前进。听到这个消息后，梁应奎带领官兵们沿着小路慌张地奔跑起来，到达腊子口时已是九月十六日晚。

梁应奎立即部署阻击阵地：一团的赵国华营在小桥的东侧修筑工事，在桥头堡上配备四挺重机枪，原来在这里防守的五团王世惠营负责封锁小开阔地。正在部署的时候，朱显荣带着几名卫兵跑来了，说红军到了腊子口附近，六团团部和预备队已经被红军打散，电台也丢了。梁应奎顿时大骂起来："你指挥着六个营，还没打仗就成了这个样子，如何向鲁师长交代？赶快命令你的士兵上阵地！"朱显荣走了，谁知他这一走便不知去向，六团除了被红军打死和俘虏的之外，也全散了伙。后来才知道，领受了防御任务的朱显荣一直跑进渭源县城藏了起来。

四团先头部队一营没费什么力气就把攻击腊子口的道路打开了。但是，在一鼓作气向腊子口攻击的时候却严重受挫。

腊子口的守敌决心利用天堑和红军决一死战。

一营的几次攻击都被猛烈的火力压了回来，不但没有任何进展，部队还出现了很大伤亡。

团长黄开湘和政委杨成武趴在前沿对腊子口的地形反复观察，他们终于发现了敌人防守的两个弱点：一是敌人的碉堡没有顶盖；二是

敌人所有的火力全部集中在正面，试图凭借隘口天然险要的地形进行封锁。

敌人防守的这两个弱点恰是由于地形造成的。这里是一个狭窄的山口，两边全是高耸的绝壁。绝壁几乎是笔直的，陡峭得根本无法攀登，因此敌人在绝壁的顶端没有设防，碉堡也用不着要顶盖。

黄开湘和杨成武同时意识到，如果能够从绝壁上攀上去，就可以直接往碉堡中扔手榴弹，还可以向东攻击那片从正面无法冲过去的小开阔地。但是，绝壁连看一眼都让人昏眩，如何上得去?

四团的营连指挥员们集中在距离口子两百米远的一片树林里开会研究。会议开得很艰难，谁都没有好办法。

下午四时，四团指挥所里挤满了人。军团和二师的领导都到了：林彪、聂荣臻、陈光、萧华，他们轮流用望远镜向腊子口方向观察，都对那里的险要惊叹不已：绝壁间仅仅三十米宽的一道口子，口子中还有一条水深流急的河，别说有几个营防守，正面只要架起一挺机枪，谁也别想过去。

毛泽东不断来电询问攻击情况。

红一军团的指战员明白，严格地说，红军现在已经处在绝路中了。别说不能南下，即使南下路也被堵死了。

必须冲过腊子口，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

经过反复研究，决定还是派人攀登绝壁，迂回到敌人的侧后去。

四团召开了士兵大会，让大家出主意想办法。这时，一个从贵州入伍的苗族小战士站了起来，他说：“我能从绝壁爬上去。只要我一个人爬上去了，就能扔下绳子，别说一个连，一个营也能上去。”

所有的红军官兵都吃惊地望着他。

史料没有留下这个苗族小战士的名字，只知道大家都叫他“云贵川”，因为他自参加红军之后已经走过了云贵川三省。

这个年仅十七岁的苗族小战士大眼睛，高颧骨，皮肤黝黑，汉话说得不够好。他从小就过苦日子，受过不少欺辱，脾气很倔，但参加红军后作战异常勇敢。

“云贵川”对黄开湘和杨成武说：“我在家经常爬绝壁采药。只要给我一根长竿子，竿头绑上个铁钩子，能钩住绝壁上的树根、崖缝、石嘴什么的，我就能上去。”

黄开湘和杨成武看着他，不知说什么才好，两个人一个劲儿地点头。

四团立即确定了作战计划：由团长黄开湘带领一连、二连以及侦察组和信号组，攀登绝壁迂回，凌晨三时之前到达迂回地点，然后发出一红一绿两颗信号弹。之后政委杨成武率领二营正面强攻，六连担任主攻连，总攻击的信号是三颗信号弹。

杨成武还是对攀登绝壁不放心，他亲自带人用一匹高头大马把“云贵川”送到了绝壁下一个敌人看不见的死角。现在，红军突破腊子口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个身子单薄的小战士身上了。杨成武低声对“云贵川”说：“你爬爬看。一定要小心。”“云贵川”赤着脚，腰上缠着一条用

战士们的绑腿带连接起来的长绳，拿着长竿，先钩住了一棵小树的树根，往下拽了一下，似乎很结实，于是猛地向上一蹿，像只猴子一样登了上去。杨成武后来回忆说：“我和黄开湘同志、李英华同志，还有营、连干部，都屏住气仰视山顶，生怕惊动了‘云贵川’，好像是谁要咳嗽一声，他就会掉下来似的。”“云贵川”的身影越来越小，一会就不见了。绝壁下的每一个人都不敢出声，但都很焦急。“云贵川”能否攀上去，决定着整个腊子口战斗的胜负，甚至是决定着红军的生死。不一会儿，杨成武听见有人小声说：“他上去了！在上面招手呢！”又过了一会儿，“云贵川”居然从原路下来了。小战士站在杨成武面前说：“我说过，能上去嘛。”

天黑下来的时候，“云贵川”一个人先登上绝壁，在上面把绳子顺下来，上百名红军战士开始抓着绳子攀登绝壁。

为了麻痹敌人，二营的正面攻击也开始了。

二营六连，一个月前还是红四方面军的部队，由红四方面军二九四团的一个营缩编而成，是一支能打硬仗的连队。两个方面军会合后，红一方面军给了红四方面军一些干部，红四方面军为红一方面军补充了一些官兵，六连就是那时被补充到红一方面军的四团二营的。在二营里，六连和其他两个连的关系十分融洽，官兵之间相互亲密无间。六连连长杨信义和指导员胡炳云都是政治坚强的基层指挥员。在连队的战前动员会上，全连官兵的求战情绪十分高涨，大家争先恐后地报名参加突击队，最后决定由连长和指导员亲自带领十二个人打前锋。

这是北上红军最急迫的求生之战。

在密集火力的掩护下，杨信义和胡炳云率领突击队队员手拿大刀和手榴弹悄悄地向隘口上的木桥移动。在隘口阻击阵地上的国民党兵并不着急射击，他们一直等到红军突击队队员接近了，才突然投出大量的手榴弹。突击队伤亡过半，退了下来。

六连如此反复多次，依旧无法接近隘口。

四团组织宣传队队员向隘口上的守敌喊话："红军是北上抗日，你们不要受长官欺骗，让路吧，红军发大洋给你们回家！"

隘口碉堡里的国民党兵气焰嚣张，也喊过话来："你们就是打到明年，也休想从鲁师长的防区过去！"

毛泽东派人来到前沿，问要不要增援。

午夜时分，正面攻击已经进行了四个小时。

杨成武对二营营长说，万不可在这里打成持久战。鲁大昌的主力部队在岷县县城，距离这里很近，只隔着一座大山，如果增援，几个小时之内就能到达。如果敌人增援了，打起来就会更困难。攀登绝壁的部队至今没有任何动静，他们定是遇到了事先没有想到的困难。我们不能消极地等，还要加强正面的攻击力量。

六连再次组织突击队发动冲锋，但是无论如何都接近不了桥头。敌人扔过来的手榴弹雨点一般，弹片铺满了桥头几十米的岩石路。

黑暗中，可以看见牺牲的红军官兵的遗体躺在那里，六连连把他们拖出战场的机会都没有。

炊事班送来了热腾腾的面饼和炖猪肉，心情不佳的六连官兵谁也不吃。

杨成武和连干部经过研究，为了在迂回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前尽量消耗敌人，决定改变攻击方式，由正面大规模进攻改为小组多点攻击。

六连决定组织三支敢死队。

当场有数十名党团员报名。

敢死队被分成两路突击：一路沿腊子河前进，接近木桥后顺着桥墩摸过河去；另一路直接向木桥运动，然后两组配合一起冲锋，夺取木桥。

敢死队队员很快就消失在黑暗里。

已经接近凌晨两点，全团都已进入总攻的位置，但是还是没有看见绝壁上发出的信号。杨成武盯着表，又过去了一个小时，还是没有任何动静。正在着急，有人报告说："敢死队冲到木桥下面了！"

杨成武立即跑上去观察，果然，几名敢死队的战士竟然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涉水过河，到了对岸。

已经是下半夜，腊子口守敌实在是困倦了，红军也似乎停止了攻击，于是他们都缩在工事和碉堡里打起了瞌睡。

六连的敢死队队员顺着绝壁边缘一点点地靠近，其中四名战士已经到达了碉堡下面一块岩石的死角处。

一不小心，一名队员踩断了一棵小树。

敌人惊醒了，又开始了疯狂的扫射。

指导员胡炳云在枪声响起的那一瞬间，带着一个排立即扑了上去。在敌人只注意桥下的时候，他们扔出了一排手榴弹，接着就冲进了桥头敌人的工事里。桥下的敢死队队员一听枪声响了，一齐呐喊着翻上桥面。狭窄的木桥上，双方官兵在黑暗中扭打在一起，红军的几十把大刀上下飞舞，木桥上血肉横飞。一个战士赤手抓住了正在射击的敌人的机枪，一使劲就连人带枪扯了过来。一排排长在砍杀中被子弹击中，他身体摇晃了一下，然后扶住桥栏喊:“同志们！敌人已经支持不住了，向前冲啊！”

杨成武急得手心都在冒汗。敢死队在木桥上已经短兵相接，急需后续部队冲上去增援。但是，迂回的部队依旧没有信号，如果破坏原定的总攻计划，很可能和迂回部队的作战脱节。可不命令部队发起冲锋，六连的官兵只能独自与敌人血拼，一旦让敌人反扑回来，攻击的努力将前功尽弃。

腊子口！

山风呼啸，河水怒号。

黎明前的黑暗中，峡谷里的肉搏声惊天动地。

突然，两颗信号弹从山后升起来了，一红一绿。

接着，三颗信号弹升空了！

这是总攻的信号。

在腊子口前沿阵地上，红军所有的武器，包括军团支援来的迫击炮，一起开火了。参加总攻的官兵从隐蔽处蜂拥而出，向腊子口隘口冲了过去，杀声在峡谷中回荡。

国民党军的碉堡上面突然出现了红军，扔下来的手榴弹如同暴雨。

腊子口上的木桥迅速被红军控制，红军官兵们从桥上冲过，向敌人的防御纵深席卷而去。

这是最后的时刻。

也许久攻不下聚集了太多的仇恨，四团的先头部队打疯了一样。突破了隘口的前沿以后，他们在敌人装满弹药和补给的仓库里或是抱起一堆手榴弹，或是抓起一挺机枪，一路猛追下去。在那片小开阔地上，红军没有遇到抵抗，一路冲到了敌人第二道阻击阵地前。迂回部队从一侧压下来，一个小时之后，敌人放弃了抵抗，在黑暗中溃退而去。

四团的三个营继续向岷县方向追击。山路上到处是敌人的尸体和各种枪支物资。突然，敌人不知道从哪里向这里开炮了，炮弹没有任何目标地乱落。在隆隆炮声中，红军宣传队已经跟随着追击部队一路写满了红红的标语："追到岷州去，活捉鲁大昌！"

毛泽东很快就得到了报告：腊子口已在我军手中。

一夜没合眼的毛泽东高兴地笑了起来，对警卫员喊："搞点吃的，吃饱了咱们上路！"

红军大部队通过腊子口向北翻越岷山。下了岷山就是大草滩，走到这里就走出了藏民聚居区。先头部队在占领了大草滩后，缴获了大量的粮食和盐巴，部队再也不饿肚子了。毛泽东很高兴，立即给担任后卫的彭德怀发去了电报：

彭及彭［彭雪枫］、李［李富春］：

一、岷敌守城，哈达铺无敌。第一纵队驻地回、汉民众已大发动，我军纪律尚好，没收敌粮数十万斤，盐二千斤。过大拉山［岷山］后已无高山隘路。现一纵队驻占扎路、麻子川，纵队部驻鹿原里。

二、明［十九］日你们全部开来此间。中央队一科、二科驻鹿原里，二纵队驻漩涡、大草滩，三纵队驻红土坡。

三、部队严整纪律，没收限于地主及反动派，违者严处。请在明日行军休息时宣布。

四、缴获手提迫击炮三门、炮弹百余发，尚在大拉。请动员战士带来，可抛弃粮食拿炮弹。

毛

十八日二十时

走下岷山的红军官兵被眼前的景色惊呆了：九月和煦的阳光照耀着甘南辽阔的田野，将要成熟的庄稼散发着谷物特有的醇香，五彩缤纷的野花在田埂上蓬勃盛开。好客的百姓对红军没有丝毫敌意，他们很快就围了上来，好奇地向官兵们问这问那。官兵们就在原地坐下来，和百姓聊起了天。红军政治工作人员忙乱起来，一方面不断地向部队官兵强调遵守群众纪律，一方面向当地群众耐心地解释红军的性

质，同时也试探着问一句部队是否可以进村宿营。百姓竟没有人反对部队进村，于是各部队很快把宿营的房子确定下来，官兵们的和气态度马上就得到了房东的信任。大草滩四周的小贩们消息灵通，他们很快就聚集在了红军部队的驻地，贩卖的东西让红军官兵们惊奇不已，有糖、当地一种很大很厚的面饼、油炸的点心、瓜果和卷烟。红军部队派出专门的人统一买来，然后官兵们围坐在一起享用。红军派出采购的人全部使用现洋，而且从不和百姓讲价，这让这里的百姓很快就感到这支军队与他们以前见到的所有军队都不一样。民众对女红军们极其好奇，当地的妇女和老婆婆们把女红军拉进屋子，经过仔细"验身"确定她们真的是女人后，女红军们就被请到了土炕上吃饭，妇女和老婆婆们的热情令刚从死亡阴影中走出来的女红军眼泪不断。

毛泽东以彭德怀、李富春、林彪和聂荣臻的名义，给张国焘发去了一封电报：

朱、张、徐、陈及各首长：

一、我们执行中央正确路线，连日击溃鲁大昌师，缴获甚多，于昨十七日占领距岷州哈达铺各三十里之大草滩、占扎路、高楼庄一带，前锋迫击岷州城，敌人恐慌之甚。

二、此地物质丰富，民众汉回各半，十分热烈地拥护红军，三个半月来脱离群众的痛苦现在改变了。

三、请你们立即继续北进，大举消灭敌人，争取千百万群众，创造陕甘宁苏区，实现中央战略方针。

彭、李、林、聂

九月十八日

毛泽东知道电报对张国焘不起作用，他只是想告诉张国焘，中央率领的红军并没有被“拖死”、“冻死”，不但赢得了突破天险腊子口的胜利，而且还拥有了大量的物资。同时，毛泽东发出电报的另一个重要意图是，必须让朱德、刘伯承知道这支红军现在到了哪里。

无法知道这封电报到达的时候，红四方面军官兵是什么样的感受，或者他们根本不知道有过这样一封电报。正如重病中的周恩来所担忧的，此刻，徐向前和陈昌浩正率领着第四军、第三十军和红军大学的部分学员走在去阿坝集结的路上，这条路使他们必须重新回头走进恐怖的松潘大草地。

徐向前后来回忆说：

浩渺沉寂的大草原，黄草漫漫，寒气凛冽，弥漫着深秋的肃杀气氛。红军第一次过草地时留下的行军、宿营痕迹，还很清楚。有些用树枝搭成的“人”字棚里，堆着那些无法掩埋的红军尸体。衣衫单薄的我军指战员，顶风雨，履泥沼，熬饥寒，再次同恶劣的自然条件搏斗，又有一批同志献出了宝贵生命。回顾几个月来一、四方面军合而后分的情景，展望未来的前途，令人百感交集，心事重重，抑郁不已。

在草地行军中，依旧遇有土司武装的袭击。第四军十师师长陈锡联不幸被冷枪打中了腹部，伤势很重。军长许世友命令三十四团团长找几个身体强壮的战士不惜一切代价抬着陈师长走。三十四团团长为难了，因为他根本找不出有力气抬担架的战士了。十师前任师长王友钧在打包座的时候牺牲了，许世友不能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再失去一个师长，他向陈锡联保证说：“就是我死了，也让你活着！”许世友又找到了三十五团团长，让他把一匹驮重机枪的马腾出来，把机枪拆成零件让战士分散携带，然后把陈锡联扶上了马。由于伤势太重，陈锡联在马上坐不住，许世友就用绳子把他绑在了马背上。之后，他把

自己仅剩的一点大米留给了陈锡联，嘱咐战士每天一定要给陈师长喝一点米汤。第四军走出草地的那一天，许世友站在大草地的边沿等着，一直看见驮着陈锡联的马从雾气弥漫的草地深处走出来。他赶紧上前叫了一声，马背上的陈锡联答应了，许世友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此时的松潘大草地已进入秋季，寒风像刀子一样掠过野草深潭，沿途牺牲的红军“有的一个趴在地上，背上还背着一个同志”；有的“死亡前仍保持着爬行的姿势，两手攥着泥土和青草”；“还有两个女红军抬着一名伤员一起牺牲”，死的时候“担架仍压在她们的肩上”……红四方面军的这支部队九月中旬进入松潘大草地，直到九月下旬才走出草地的南沿到达毛儿盖。部队损失了近四分之一的兵力，其中程世才和李先念率领的第三十军走出草地后，不得不由原来的八个团缩编为六个团。

此刻的毛泽东在思索一个问题：下一步红军往哪里走?

毛泽东叫来了红一军团侦察连连长梁兴初和指导员曹德连。毛泽东说，现在红军已经不再挨饿了，必须出去找点“精神食粮”来。梁兴初明白毛泽东的意思，过去在红军转战的路上，毛泽东经常对他这样说。毛泽东对精神食粮的解释是：无论是杂志还是报纸，只要是近期的和比较近期的，都要搞些来。

梁兴初，江西吉安人，二十二岁，是个胆大心细、作战勇敢的红军基层干部。在经历了无数残酷的战斗之后，他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著名将领，这个外号“梁大牙”的军事指挥员，率领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无论是在解放战争中还是朝鲜战争中，所向披靡，战功卓著。

红一军团侦察连官兵装扮成一队国民党军，直接进入了还没有被红军占领的哈达铺。连长梁兴初穿的是国民党军中校的军服，指导员曹德连穿的是少校军服。哈达铺县城里的国民党党部书记、保安队队长和当地的士绅们赶忙出来接待。梁兴初正和这些人聊着天，想了解些情况，突然来了个真的国民党军官，是鲁大昌新编第十四师的一个少校副官，从兰州来路过这里。梁兴初自然也和这位少校聊得火热，并在少校下榻的地方收集了不少报纸杂志。最后，梁兴初亮明了自己身份，然后把这个国民党军少校绑了起来，连同收集的报纸杂志一起给毛泽东送了过来。

毛泽东一页一页翻看着这些报纸杂志，终于看见了令他眼睛一亮的消息：徐海东率领的红军到达了陕北，与刘志丹的陕北红军会合了。毛泽东希望能得到更进一步的消息。果然，一份杂志上刊登了一幅国民党当局绘制的陕北根据地略图。

这个晚上，毛泽东说他睡了一个好觉。

第二天，红军先头部队占领了哈达铺。这是一个富足的小镇，以盛产中药当归闻名。国民党县保安队被打跑了，百姓对红军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毛泽东在哈达铺提出一个口号：“大家吃好！和百姓一块吃！”

洗澡、理发，红军官兵们近一年来第一次洗热水澡，人人洗得很彻底，个个红扑扑的像只胡萝卜。供给部给每人发了一块大洋，让官兵们上街买零食吃。当地的物价十分便宜，一头大肥猪才五块钱，一只大肥羊两块钱，一块钱至少可以买五只鸡，五毛钱可以买一担子蔬菜，一毛钱可以买十几个鸡蛋。鲁大昌的部队在这里留下了大量的大

米、白面和盐，尤其是大米，让大部分来自南方的红军官兵吃起来格外香甜。为了落实毛泽东提出的“大家吃好”的指示，每个连队都忙着杀猪宰羊，杀鸡杀鸭，每天三顿，顿顿五个菜以上，而且保证三个菜都是荤的。经历了千辛万苦的红军官兵个个吃得肚子胀胀的，互相一见面就笑容满面地说：“真跟过年一样啊！”在河边洗衣服的时候，官兵交谈的都是自己的连队今天吃的是什么，都说在家过年的时候也吃不到这么多的肉。每个连队每天还特地摆上几桌酒席，邀请当地的百姓来做客，被邀请的有老人和孩子，还有妇女和婆婆们。四团在招待百姓的时候，一位老大爷把自己珍藏了多年的一坛老酒抱来了，说他要提前过七十岁的生日。哈达铺的百姓边吃边说：“鲁大昌在这里这么多年，不但不请我们吃，还要吃我们呢！”

在哈达铺，梁兴初又给毛泽东收集到了大量的《大公报》。其中一张《大公报》被贴在耿飚住的那家房东的墙上，耿飚在付给房东一块大洋之后，小心地将报纸揭了下来。国民党当局在报纸上刊登的军情分析，等同于在给红军传递情报，他们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一张报纸透露出的消息，能对中国历史的走向起到决定性的影响——毛泽东终于确切地知道：在陕北，红军活动之剧烈犹如当年的江西苏区；而且，在陕北，存在着一块几乎与江西的中央苏区面积一样大的红色根据地！

七月二十三日《大公报》报道：

山西军阀阎锡山于七月二十二日在绥靖公署省府纪念周报告上说：“陕北匪共甚为猖獗，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者有八县，半赤化者十余县，现在共党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扩大区域威势”。“全陕北赤化人民七十余万，编为赤卫队者二十余万，赤军者二万。”

七月二十九日《大公报》社论《论陕乱》：

徐向前朱毛之趋向，尚不尽明，今姑暂不论甘，而专就陕事一言。第一，国人应注意者，现在不独陕北有匪，陕南亦然。徐海东一股，猖獗已久，迄未扑灭，故论陕乱，不能专看北部。第二，过去所谓陕北，系旧榆林、绥德、延安属，近则韩城一带亦睹匪踪，是由陕北而关中矣。第三，就陕北言，兵队确不为多，就全陕论，则目下集中之军队，殆不下十师以上；而匪方总数，通南北计之，有械者当不过万余。由第一、二点，可知陕乱严重之轮廓；由第三点，可知迄今为止，军事效率之不良，证明此后应努力之点，不仅军事上的问题而已也。

八月一日《大公报》报道:

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则说:“盘踞陕北省为红军二十六军，其确实人数究有若干，现无从统计，但知其枪有万余。匪军军长刘志丹辖三师，为匪主力部队，其下尚有十四个游击支队。此外各种小组及赤卫队等则甚多。匪军现完全占领者有五县城，为延川、延长、保安、安塞、安定等。靖边一度陷落，顷已收复。本人自去岁开到陕北接防担任剿匪后，与匪大小战不下百余次。其后因扰乱绥远之杨小猴匪部窜至陕境，本人抽兵前往堵剿，同时冯钦哉部又调至陕南震慑，以防范徐海东匪部，官兵之力量薄弱，匪军之防地乃愈扩大。当时曾被占有十县之地，防线延长，交通不便，如是剿匪更为不易。现在陕北状况，正与民国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仿佛。”

毛泽东明确了红军的前进目的地：陕北苏区。

在哈达铺的关帝庙里，红军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红军基层指挥员看见了重病之后逐渐好起来的周恩来。

毛泽东开始了他的风趣幽默的讲话：什么叫胜利？咱们走了那么多路，打了那么多仗，现在能安稳地在这个关帝庙里开会，就是胜

利。以前有同志总是问，咱们到底要走到哪里去？现在我们有答案了，我们要走到陕北，因为那里有刘志丹和徐海东的红军。张国焘说我们是机会主义，现在看，哪一个是机会主义？咱们只有八千多人，少了点，可是目标也小了。咱们别张扬，也别悲观，一九二九年红四军下山的时候，人更少。咱们人少，但都是在政治上、经验上和体力上经过锻炼的，可以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七八百里了！

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中央纵队和红一方面军主力正式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林彪为副司令员，叶剑英为总参谋长，张云逸为副总参谋长，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政治部副主任。陕甘支队下辖三个纵队：一纵队以第一军团为主，辖六个大队；二纵队以第三军团为主，辖四个大队；中央纵队为三纵队。每个大队基本保持原来团的建制，但取消了营，直接辖五个步兵连和一个机枪连。

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在离开第三军团的时候向军团所有红军干部讲了几句话。讲话的时候，这位历经千难万险的红军将领掉了泪。彭德怀说：红三军团从第一次反“围剿”的几万人，到今天长途奔袭至甘南只剩下两千多人，被错误路线快折腾光了。今天剩下的这些人，都是精华，是中国革命的骨干和希望。大家要再接再厉，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我的脾气不好，骂过许多人，请同志们批评和谅解。我过去对你们这些干部要求很严格，有时甚至苛刻，这都是对你们的爱护，否则有的同志可能就活不到今天了。

到达哈达铺的红军约八千人，如果按作战部队计算，大约为六千人。六千人的红军，大部分是政治坚定作战英勇的红军干部。这些中

国红色武装的骨干，在未来赢得中国革命胜利的战争中成为创造历史的精英。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向北出发了。

向北，再向北，红军官兵看见明亮的北斗七星在头顶的正上方闪烁——尽管现在他们还不知道陕北是什么样子，但是他们每一个人在向北走的时候心中都充满了希望。

# 第十六章 天高云淡

1935年10月·陕北与川西



秋天到了，蒋介石心情郁闷地下了峨眉山。

几十万国民党军追击了大半个中国，终于把红军逼进了必死无疑的蛮荒之地；但是，毛泽东走出了那片绝境，红军眼看离陕北苏区越来越近了。

在峨眉山下，蒋介石抬头看了看被云雾缠绕的山巅，对身边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说："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

蒋介石给在武汉的张学良发电报，让他到成都来见他。

蒋介石和张学良，中国两个最著名的军阀巨头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涉及旧中国太多跌宕起伏的重大历史事件。

自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中国北方的最高统治者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在皇姑屯后，刚满二十七岁的张学良就成了奉系军队的最高统帅。与他的父亲“张大帅”的称呼相对应，直到他百岁之时国人依旧称他为“少帅”。这个如此年轻便支配着庞大军队和数省财富的青年可谓生不逢时。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军队发动了旨在侵吞中国东北地区的军事行动，坐镇北平的张学良因其麾下的东北军丧失家园而成为全国民众泄愤的目标。及至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东北军驻防的热河失守，张学良在一片同仇敌忾的谴责声中被迫辞职“以示惩儆”。

无论舆论对张学良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那个夜晚的“花边新闻”渲染得多么强烈，而历史的真实是，张学良的东北军是奉蒋介石之命为回避与日本军队对抗而撤离东北的。张学良说：“日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这次挑衅的举动，来势很大，可能要兴起大的战争。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它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我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现在我们既然已听命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的问题，我们只应速报中央，听候指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辞职后的张学良在蒋介石的一再提示下准备出游欧洲。出国前，国仇家恨以及代人受过令张学良悲愤难耐，他在上海发誓戒除鸦片烟瘾。他让卫兵把他捆在床上，枕头边放着一把子弹上膛的手枪，然后让一位德国医生每日给他注射戒毒药物。他对身边的人说：“无论我怎么叫唤，谁也不准解开绳子，除了这个德国医生。谁靠近我，我就一枪崩了他！”如

此长达半个月，张学良终于戒掉了鸦片烟瘾——如此性格的人在以后的历史中作出什么惊人之事都不为奇怪。

一九三四年一月，张学良回国。蒋介石没有让他率领军队打回东北，而是让他远离抗日前线，在武昌当了个行营主任的闲职。而这时候，张学良的东北军大多已被蒋介石调往了偏僻的西北地区，其中主力散布在陕西和甘肃一带。尽管东北军中的大多官兵有与张学良一样“打回老家去”的愿望，但是他们距离自己的家乡实在是太遥远了。

此时，红军从川北进入甘肃，并继续向陕西北进，蒋介石叫来了张学良，他赋予张学良的重任是“剿共”——让东北军与红军作战，这是蒋介石自认为“一箭双雕”的得意一笔。对于这一点，张学良十分清楚。

随着红军移动路线的变化，蒋介石将原来设立的行营进行了整顿，只留下三个指挥机关以对付红军：一、重庆行营，行营主任顾祝同，负责与徐向前的红四方面军作战；二、宜昌行辕，行辕主任陈诚，负责与贺龙和萧克的红二、红六军团作战；而设立在西安的西北“剿共总司令部”，是负责与毛泽东率领的红军作战的，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代理总司令之职。蒋介石对张学良说：“等把毛泽东这股红军彻底消灭了，我和你一起去打日本。”

无论如何，可以和自己的东北军在一起了，这是张学良答应蒋介石出任西北“剿共”副总司令的重要原因。一年多以后，蒋介石对张学良的这一任命，不但使他险些死于乱枪之中，而且给中国历史带来了一个彻底改变政治格局的惊人事变，这是蒋介石无论如何都没想到的。

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西北“剿共”副总司令张学良向全国发布了他的上任通电，电文简单枯燥如同他的心绪：

案奉国民政府令开：

特派蒋中正兼西北剿匪总司令，特派张学良兼西北剿匪副总司令。此令。各等因。

奉此。遵于本月东日［一日］在西安成立总部开始办公，并即日启用关防，先行视事。除电呈备查暨分行外，特电知照，并饬属一体知照。

除了东北军的主力之外，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的军阀部队，加之山西军阀的部分部队，张学良可以指挥的国民党军多达十万之众。

从哈达铺出发的红军连续行军两百余里，到达了渭河南岸。

红军离开哈达铺的时候，派出了小部队向天水方向佯动，于是国民党军纷纷聚集天水准备堵截红军。但是红军一天行军九十里，迅速从武山和漳县之间穿过。中央所在的三纵队当晚宿营在一个碉堡式的村庄里。这个村庄由几个巨大的围屋组成，红军到达的时候，民众站在围屋的墙上警惕地守卫着，经过红军政治工作人员的解释，他们才把大门打开。次日清晨，部队继续出发，目的地是一百三十多里外一个叫新寺的地方。一天的急行军中仅仅休息了三十分钟。天空中不断出现国民党军的飞机，飞机一出现红军部队就要隐蔽，因此天黑的时候才走了一半的路。红军官兵都已疲惫不堪，但司令部传来了命令：今天必须赶到新寺。官兵们喝了口井水、吃了点干粮继续走。大地一片漆黑，不准点火把，走着走着前后就失去了联络，掉队的人员不断增加，队伍到达新寺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但是大量的掉队人员和后面

的收容队还没有上来。炊事员开始烧热水，想让走了一天一夜的官兵们烫烫脚，可是水还没有烧开，命令又到了：立即前进，目标是渭河南岸的鸳鸯嘴，行程四十里。

如此急切的行军，是为了安全地渡过渭河。

万幸的是，出现在眼前的渭河，河岸没有敌人的阻击，正值枯水期的河水深仅过膝。

过了渭河，前面响起了枪声。官兵们看见彭德怀站在一座小山包上，示意让队伍休息一会儿再走。毛泽东赶了上来，官兵们问是不是前面有封锁线，毛泽东说："休息片刻，让他们打一下，把敌人吓跑就是了。"

前面的战斗果然很短暂。部队继续前进的时候，官兵们突然发现路边光秃秃的，没有一棵树，连草也没有，无法做防空伪装。向导说，前面的路全是这个样子。红军各部队的对空警戒员一下子紧张起来，把军号攥在手里，一刻不停地向天空瞭望，只要看见有飞机飞来，或者听见有飞机的声音，就赶快吹号，部队立即分散隐蔽。由于四周开阔便于观察，国民党军的飞机来了两次都没有发现红军的行军队伍。新的宿营地是榜罗镇。

在榜罗镇，部队休息了一天。毛泽东又获得了一些近期的报纸，也许是离陕西更近了的缘故，报纸上对陕北的情况有了更详尽的描述。于是，中共中央在榜罗镇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再次确定了陕甘支队前进的目标是陕北苏区。毛泽东后来说：榜罗镇会议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因为那时中央得到了新的消息，知道了陕北有大的苏区与红军，所以才改变决定，要在陕北保卫与扩大苏区。在俄界会议

上，只想会合后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的想法还没有。现在我们在榜罗镇会议上改变了，要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

会议决定召开陕甘支队连以上干部会议。

因为国民党军飞机频繁出动，因此会议的时间定在清晨五点。

会场是个露天的打麦场，四周有一圈低矮的土围墙，在一面围墙下放了一张桌子就是主席台，红军干部们全部坐在打成捆的麦草上。中央机关所在的三纵队和由第一军团组成的一纵队按时进了会场，由于行军和战斗的原因很长时间没见面的战友互相问候着。天空下起了小雨，有一点冷，会场出现了骚动，红军干部们纷纷披上了携带的雨布。直到六点钟的时候，由第三军团组成的二纵队才到达会场。他们是后卫部队，宿营地距离这里四十里，半夜两点就起床出发了，下雨路滑，走得很慢。二纵队进场的时候受到大家的议论，不仅因为他们迟到了，还因为他们的装束有点寒酸。二纵队的干部们解释说，第三军团总是担任后卫，你们走在前边把好东西都用光了。第三军团的很多红军还穿着过草地时的衣服——一种用藏民的“氆氇”做的军装或大衣。“氆氇”是羊毛粗编的，有白色的、黄色的和灰色的，纽扣是用布包着的铜元做的。还有的人穿着羊皮缝的上衣，脚下是牛皮做的“草鞋”。“这东西挡雨呢！”二纵队的干部们回击着嘲笑。

毛泽东在会上讲了五个问题：日本侵略中国的问题，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的状况，陕北可以成为新的根据地的理由和条件，尽量避免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以求迅速到达陕北，还有整顿部队纪律的问题。毛泽东最后强调说：我们马上就要面临新的任务了，部队要有新的精神。从前“我们在藏人区域，因为没有油吃，每个同志都是成天觉得饥饿，

成天在吃东西，坐了吃，睡了也吃，走路吃，甚至连上茅厕还在吃。脸上不是因为吃炒面弄得满嘴白胡子，就是因为吃炒青稞弄得满脸乌黑。现在环境不同了，要把纪律大大地整顿。要教育，要不怕麻烦，讲了一遍又一遍，干部自己先做出模范来”。

会议结束时已是中午，中央机关和红一军团的干部都争着请红三军团的人吃饭。

部队继续北上。向通渭县前进的时候，毛泽东、林彪和彭德怀三人破例走在了红军队伍的前面。沿途围观的百姓们不断地问：“又是徐老虎的队伍？”——一个月前红二十五军曾经路过这里。

通渭县城是一座古老的小城，城墙已经倒塌了，城内几乎看不见一座砖瓦房，全是土房。除了主要街道上有几家店铺外，居民不多，大多是农户。这里的守敌早在红军到达前就弃城跑了。红军顺利入城，百姓见怪不怪，县城内生活如常。在通渭县城，来自中国南方的红军官兵第一次住进了黄土窑洞，人人都感到十分新奇，因为睡在里面就不怕飞机轰炸了，而且很暖和，因此红军官兵们都很喜欢这种“房子”。

先头部队被派往西兰公路侦察，大部队在通渭县城里休息了两天。

这次，政治部又提出了“大家吃好”的要求，于是各伙食单位的后勤人员再次忙乱起来。部队的大会餐被安排在县城边的河滩上。为了布置这个巨大的会场，工兵营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搭起了一个临时舞台，河滩上摆上了无数张桌子，四周张贴了五颜六色的标语，会场中央还竖起了一根很高的旗杆，上面挂上了一面大红旗，沿着旗杆放射

状地拉了绳索，绳索上面系着一面面小红旗。晚上六点以后，国民党军的飞机不会来了，各部队开始向会场聚集。各单位的后勤人员把各种菜肴挑来了，沿着河滩的桌子上摆满了鸡、羊肉、猪肉、牛肉、鸡蛋和各种新鲜的蔬菜。宣布开会后，全体唱《国际歌》，然后杨尚昆、邓发和叶剑英先后发表讲话。他们分别讲了北上抗日问题、陕北根据地问题和打国民党军骑兵的战术问题。最后宣布会餐开始。各单位的官兵不断邀请兄弟单位的同志尝自己单位的菜，红军各级指挥员拿着筷子游行似的到处走，这里夹一下，那里吃一口，河滩上到处是红军官兵欢乐的笑声。

吃饱了，红军官兵们一起唱歌：

我们本是工农政府有力的柱石，

完成中国革命就是我们的天职；

为红区发展巩固大家努力吧，

英勇红色战士！

我们永远站在最前头，

流着最后一滴鲜血；

为着保卫我们根据地，

拼最后一滴血！

通渭县的百姓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支队伍，也从没听过这么多人一起在夜空下放声唱歌。他们远远地站在那里，听红军快乐的笑声，

又听红军唱流尽“最后一滴血”。百姓们都不吭声，感觉天地骤然间变得十分异样。

第二天，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等人一起来到了第一纵队一大队。大队长杨得志看来了这么多首长，对参谋长耿飚说：“首长都来了，咱们要好好招待一下。”耿飚说：“汇报工作你负责，招待首长我负责！”

耿飚在通渭县城里找到一家西北风味的小饭馆，让饭馆老板立即按照每桌五块大洋的标准置办两桌酒席。表情惊讶的老板说：在这里无论如何也做不出这么多钱的菜。耿飚把大洋拍在桌子上说：“尽管把好东西都弄来！菜量要大！盘子要干净！酒要足！多放辣子！”

这是自红军长征以来，中央和军委的领导们第一次在饭馆聚餐。他们在通渭的这间简陋的饭馆里一坐下，都没客气就开始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吃了没多一会儿，毛泽东觉得分成两张桌子不热闹，就喊：“合兵！合兵！”——当时红军内把两支部队的会合叫做“合兵”。于是大家七手八脚地把两张桌子合起来，然后再次举起了酒碗：“为胜利到达陕北苏区干杯！”

不喜喝酒的毛泽东有些醉意了。他把辣子、酱油和醋抹在一块西瓜上，说这是“五味俱全”，然后大口地吃起来，还热情地邀请大家也这么吃。

毛泽东一再邀请，张闻天便尝了一口，连说：“太辣，太辣。”

毛泽东说：“吃辣子的人最革命嘛。”

晚上，领导人都睡在了一大队的驻地，参谋长耿飚在屋子外面亲自担任警戒。半夜时分，毛泽东出了屋子，仰头看天上的星星。他看见了耿飚之后，说：“有一个大队在这里，敌人不敢来。”耿飚说：“说是一个大队，实际上只有四个连。”毛泽东甩着胳膊画了个大圆圈，说：“不要嫌少，等咱们站稳了脚，会猛烈地扩大，然后，再打出去！”

十月四日，分成三路行军的陕甘支队先后占领了西兰公路，控制了公路上十几公里的路段——一个月前，红二十五军在这里整整等待了他们十八天。

在控制西兰公路的过程中，红军各部队都与敌人发生了规模不大的战斗。战斗最激烈的是一纵队的一个先头连。这个连在占领了公路后没有发现敌情，于是在公路边生火做饭，做的是红烧猪肉。猪肉刚烧熟，不知从哪里冲出一股国民党兵，红军仓促阻击之后撤退了。已经烧好的香喷喷的猪肉留在了公路边。撤下来的红军官兵吃着干粮很是丧气，在身后跟着红军跑过来的百姓告诉他们，公路上的那些国民党兵不敢吃红军烧好的猪肉，怕里面下了毒，他们正在那里煮粥喝呢。

陕甘支队几乎沿着红二十五军走过的路，穿越西兰公路进入了回族区。红军的队伍在这里受到了回族民众的欢迎。经过红二十五军曾经驻扎过的兴隆镇附近时，路边摆满了茶水和面饼，红二十五军送给老阿訇的匾额还挂在大清真寺里。回民百姓对红二十五军的赞誉让毛泽东对从未见过面的徐海东有了难以磨灭的好印象，对北上陕北与那里的红军会合更是充满了强烈的渴望和坚定的信心。

陕甘支队翻越六盘山主峰后，遇到了张学良东北军的骑兵。

部队停止了前进。

四大队的杨成武和黄开湘被叫到了最前边，他们看见一大队的杨得志和萧华也在那里，纵队政委聂荣臻和参谋长左权正在山头上用望远镜向山下观察，他们的身后站着拿着根木杖的毛泽东。

毛泽东对杨成武和黄开湘说："山下隘口上的村庄叫青石嘴，那里有东北军的一个骑兵团。要消灭他们，不然咱们过不去。"说着，毛泽东把警卫员递来的两张面饼掰成碎块，给山头上的每个人都分了一些："大家都没吃午饭，咱们分而食之。打完了这一仗，下山再吃肉。"

一大队和五大队负责两翼迂回，四大队负责正面出击。

驻扎在六盘山下青石嘴村的骑兵，是东北军骑兵第七师十九团。

东北军骑兵第七师兵力四千三百多人，师长是两个月前刚在河南就任的中将门炳岳。新官上任，门师长热情高涨，军事训练抓得紧，政治洗脑也频繁，骑兵师每个星期都要集合官兵进行一次"总理纪念周"活动。第七师从河南陕县坐火车到西安，然后经过六天的骑马行军到达甘肃平凉，队伍补充休整后进至六盘山地域，任务是阻击毛泽东的红军进入陕西。第七师师部和二十一团驻扎瓦亭，二十团驻扎牛营子，十九团驻扎在六盘山下的要道上，其中的一连和三连驻扎在青石嘴。

一连和三连到达青石嘴仅两个小时，人和马身上的汗还未落，不但没有向四周派出警戒，而且把马鞍都卸了下来，马在村边的草地上悠闲地四处溜达吃草，官兵们则在村子里休息吃饭，一部分官兵因为

行军疲倦就地裹着毛毯睡着了——他们没有得到任何红军已经翻过六盘山的消息。

天刚黑下来，红军的攻击突然开始了。

一大队迅速从北面迂回，斜着插进了村庄。五大队在南面截断了公路，向村庄的后面包抄过去。四大队从正面直接向村庄扑了上去。正在吃晚饭的东北军还没反应过来，红军已经冲到了他们的饭碗边。战马都被拴在村边的树干上了，因此东北军仅仅抵抗了片刻，就开始四处逃散。三连连长陈钟岳在官兵的掩护下骑马跑了；一连连长杨士荣不敢去牵马，钻进打麦场里的一个草垛藏了起来；而一连和三连的其余官兵全部被红军俘虏了。

战斗仅仅进行了半个小时，缴获的物资让红军极其兴奋：十多辆马车上全是大箱子，里面全是簇新的子弹、军装和布匹，这是西北“剿总”送来的，都还没有开箱。子弹被分给了红军各部队，军装也让不少官兵换上了新衣服，布匹全都给了伤员，让他们做衣服和包扎伤口。而两个骑兵连的上百匹战马，匹匹壮硕，这使红军不但有了足够的马匹驮物资，而且各级指挥员和伤员们也都有了坐骑。就这样，还剩下不少马呢，毛泽东建议就此成立红军的骑兵部队。于是，赶快动员俘虏中的马夫、马掌兵和兽医等“技术人员”参加红军。中央红军中的第一支骑兵部队在青石嘴诞生了，骑兵连第一任连长是那个不断给毛泽东送去“精神食粮”的梁兴初。

青石嘴战斗打消了红军对国民党军骑兵特别是对强悍的东北军骑兵的惧怕。其实，在青石嘴附近，还驻扎着国民党军第三十七军毛炳文部的一个师，这个师距离红军之近甚至可以听见青石嘴方向的枪声，但是他们借口与东北军联络不上，竟在明知道前面不远的地方发

生了战斗的时候，下达了全师就地宿营的命令。而骑兵第七师的二十团和二十一团也采取了旁观态度，直到枪声平息很久才派人前去探听消息。探听消息的人小心翼翼地向青石嘴接近，路上遇到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头，老头对他们说：不用吓成这样，红军早就走了，把马都牵走了，队伍呼啦啦地过了很长时间，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人。兄弟部队之间如此无情无义，这让遭到重创的十九团团长胡竞先火冒三丈，他先是大骂那些天天在红军头顶上飞来飞去的飞行员定是在天上梦游呢，然后又大骂逃回来的三连连长陈钟岳，说仗打成这样还不如自杀死掉。

翻越了六盘山，意味着中央红军越过了长征路上的最后一座大山。

高天空旷，西风长啸的陕北已经遥遥可见。

红军的旗帜在西风中漫卷，毛泽东的眼前天高云淡，大雁南飞。

而此时，在川西一个叫卓木碉的地方，红军另一支部队的领导者张国焘宣布成立另一个“中共中央”。

卓木碉，位于马尔康县西北方向，今名为“脚木足”。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七日，红四方面军部队分别从松潘草地东西两边的阿坝和包座开始南下，向马塘、松岗、党坝一带集结。九月底，徐向前和陈昌浩率领的红军在大金川北面的党坝与朱德、张国焘率领的红军左路军会合。徐向前回忆那一刻他见到的朱德“面色黧黑，目光炯炯，步履稳健”。朱德的样子让一直郁闷不安的徐向前心里踏实了许多。徐向前后来一生都对朱德满怀敬重，晚年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他希望一、四方面军指战员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团结一心，渡

过眼前的困难，争取更大的发展。他的这些话，完全是顾全大局的肺腑之言，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朱总司令作风朴实，宽厚大度，平易近人，为接近过他的干部战士共同称道。”

十月五日晚，张国焘在卓木碉召集了高级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王树声、周纯全、李卓然、罗炳辉、何长工、余天云等军以上干部五十余人，会址设在一座喇嘛庙里。

张国焘作了长篇发言。他从中共中央撤离中央苏区开始讲起，说中央红军之所以没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被迫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转移，不是军事路线而是政治路线出了问题。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是红四方面军终止了中央红军的一再退却。但是，中央不但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指责红四方面军犯了路线错误。红四方面军的南下是战略进攻，中央的北上是被敌人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是对革命前途完全丧失了信心，只有坚持南下才能最后终止中央的退却。中央竟然发展到“私自率领一、三军团秘密出走”，这样的中央已经是一个“威信扫地”的中央，一个失去“领导全党资格”的中央。最后，张国焘说出了他这番长篇蛊惑的最终目的：组成新的“临时中央”。

张国焘当众宣布了一个他自己拟出来的“临时中央”名单——张国焘承认这个名单事先没有和任何人商量过，也没有和被列入名单的任何一个人交谈过。张国焘的理由是：“以免他们尴尬。”“临时中央”名单从来没有以组织的名义正式宣布过，它仅仅是封存在浩瀚档案史料中的一张纸。但是，这个名单确实在卓木碉的会议上宣读过，与会的五十多名红军军以上指挥员都听到了：

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二、以任弼时、陈铁铮、陈绍禹、项英、陈云、曾洪易、朱阿根、关向应、李立三、夏曦、朱德、张国焘、周纯全、陈昌浩、徐向前、陈毅、李先念、何畏、傅钟、何长工、李维汉、曾传六、王树声、周光坦、黄甦、彭德怀、徐彦刚、吴志明、萧克、王震、李卓然、罗炳辉、吴焕先、高敬亭、曾山、刘英、郑义斋、林彪组织中央委员会。

三、以任弼时、陈绍禹、项英、陈云、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周纯全、徐向前、李维汉、曾传六组织中央政治局，以何长工、傅钟为候补委员。

四、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周纯全、徐向前组织中央书记处。

五、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周纯全、倪志亮、王树声、董振堂组织军事委员会，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常务委员。

除了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张闻天］、杨尚昆、叶剑英六人外，张国焘的名单保留了当时中国工农红军的大部分领导人，甚至还包括了远在莫斯科的王明［陈绍禹］。由于消息闭塞，红七军团的原中央代表、已于四个月前叛变的曾洪易，红二十五军政委、已于两个月前牺牲的吴焕先，五年前就离开中国去了苏联、目前在莫斯科的一家出版社当中文编辑的李立三，中央红军转移后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战、一个月前被俘遇害的徐彦刚等，也被列在了名单之中。

至于“临时中央”的主席，自然是张国焘自己。

对于所有的与会者来讲，“临时中央”是突然而至的事件。参加会议的徐向前后来回忆说：“人们都傻了眼，就连南下以来，一路上尽说

中央如何如何的陈昌浩，似乎也无思想准备，没有立即表态支持张国焘。会场上的气氛既紧张又沉闷……”

张国焘让朱德表态，朱德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是一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了，全中国和全世界都知道。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无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不能让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陈昌浩对张国焘另立“临时中央”的举动不知所措。尽管一直对张国焘十分崇敬，但陈昌浩至少清醒地知道，党中央是由全国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并且要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确认。在这样一个荒僻之地，在这样一个混乱的会议上，仅凭一个人的意志就企图推翻中央，这显然关乎一个是否合法的问题——也许从这一刻开始，陈昌浩心中的政治天平出现了某些变化。而徐向前在会上既不发言也不举手表决。因为徐向前是红四方面军最重要的军事将领，张国焘不得不在会后找到他，小心地探询他的意见。徐向前对张国焘说：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现在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亲者痛仇者快。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果被敌人知道了有什么好处?

在以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无论内部的争执对立多么激烈，从来没有人试图另立一个中央。作为共产党内一个老资格的领导人，张国焘不可能不知道他这一行为的严重性。因此，在他宣布成立“临时中央”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敢对外公开。直到两个月以后，在他认为已经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时，才把这件事用电报的形式正式“通知”中央，而且完全删除了开除并通缉毛泽东等人并重新制定组织名单的事。张国焘说他成立“临时中央”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伸张正义”，并没

有强化“临时中央”的组织机构和政治作用，“临时中央”的存在“似只是一个名义”而已。但是，无论张国焘如何狡辩，他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另立“临时中央”的行为，永远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分裂事件。

朱德的警卫被撤掉了，康克清找到方面军的保卫部门，保卫干部说：只要总司令跟着张总政委一起活动，就不会有危险。康克清只好去找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董振堂派来的几个同志从此跟随在朱德身边，一直到到达陕北延安。后来，朱德和他的公务员连饭都吃不上了，伙房开饭的时候不通知他们。康克清生气了，说“革命革得连饭都没得吃了”。朱德说：“我们一顿半顿吃不上饭，还不是常事嘛。饿一顿怕什么？”但他还是亲自给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写了一封信。罗炳辉赶快派人送了一袋面来。从此，朱德和他身边的人的吃饭问题，就由第九军团负责了。再后来，又有传言说康克清是朱德的情报员，必须把他们分开。康克清被调到了方面军妇女运动委员会，那里离朱德所在的红军总司令部有二十里远。康克清对朱德说：“我打算一个人北上。”朱德摇了摇头：“你若单独一人行动，正好给他们借口，把分裂的罪名加在你头上。这一点你没有想到吧？”于是，康克清去妇女委员会报到了。工作中，康克清的身边总有一位叫萧朝英的女红军。后来两个人亲如姐妹时，萧朝英才告诉康克清，她是组织上派来专门监视康克清的，上级还要求她在适当的时候把康克清的手枪缴了，但她听说康克清带过兵打过仗，所以一直没敢这么做。萧朝英问康克清：“如果我真要缴你的枪，你怎么办？”康克清把腰间的手枪一拍，说：“那这支枪可就不客气了！”萧朝英吐了吐舌头：“多亏我多了个心眼儿，要是傻里傻气地听他们的话，说不定会挨你一枪哩！”

刘伯承因为反对张国焘的“临时中央”，被撤销了红军总参谋长职务。当时他手里有一套与共产国际联络的电报密码。张国焘的“临时中央”如想取得承认，必须首先和共产国际联系，而一旦让张国焘联系上，定会给中共中央造成很大的麻烦。那时刘伯承正在恋爱，他喜欢上了红四方面军中十九岁的女红军汪荣华。在安徽六安参加红军的汪荣华在总参谋部四局工作，她与刘伯承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认识了。两个人一起散步的时候，汪荣华说：我是普通农家的女儿，十四岁就参加了红军，只上过一年的私塾和两年的学堂，无论在资历和学识方面都和总参谋长差得太远。刘伯承说：我家也是穷苦农民，因为祖父当过吹鼓手，当年我考秀才的时候还被县官赶出了考场。正因为我们穷苦，活不下去，才起来革命，才走到一起来了。文化水平低不怕，我帮助你！卓木碉会议后，痛苦万分的刘伯承找到了汪荣华。他说：张国焘软的硬的手段都使了，现在他不叫我率领部队了，叫我到红军大学当校长。我是带兵打仗的，敌人的千军万马都不怕，还怕排斥打击和撤职吗？年轻的女红军汪荣华当即表示，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与刘伯承生死相依。刘伯承把与共产国际联络的电报密码烧了。许多年后他才说：“我告诉了总部秘书长刘少文，把密码烧了。这套密码藏在一本英文版的《鲁宾逊漂流记》里。这件事除了我二人外，谁也不知道。当时如果张国焘知道了，那我们也就完蛋了。”

世上谁人能想到，移动中的中国红军会把电报密码藏在一个举世闻名的漂流故事的字里行间？

十月七日，张国焘发布了《绥丹崇懋战役计划》。

所谓绥、丹、崇、懋，指的是绥靖、丹巴、崇化和懋功。作战计划要求红四方面军采取“秘密迅雷的手段”，“沿大金川两岸夹河并进，

配合夺取绥靖、崇化。随即分取丹巴、懋功”，以此作为方面军南下夺取成都附近富庶地区的策源地。

具体的作战部署是：部队分成左、右两支纵队，分别由观音桥和党坝沿着大金川两岸南下。右纵队由第九军二十五师、第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和第五军共八个团组成，王树声为纵队司令员，詹才芳为政治委员，八日自观音桥出发，沿大金川右岸南下，于十二日占领绥靖，十六日占领丹巴。左纵队由第四军、第三十军、第三十二军和第九军二十七师共十六个团组成，由徐向前和陈昌浩指挥，十日自党坝出发，沿大金川左岸南下，十三日占领崇化，十六日占领懋功。其中，右纵队的另一部向抚边前进，截断并消灭懋功和两河口之间的敌人，并控制达维一带的道路。同时，以第三十三军的两个团和第九军的一个团组成一个支队，罗炳辉为司令员，张广才为政委，驻守在梦笔山和马塘一带，保护位于卓木碉的红军总部的安全。第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师部、二七七团以及红军大学留在阿坝，负责掩护后方。

原来红四方面军有五个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后，由于红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九两个军团被编到了左路军中，现在这里的部队比会合前还多了两个军团。

红四方面军突然掉头南下，完全出乎了川军的预料。

刘湘判断红军一定会在山区建立根据地，于是他开始在大小金川一线部署对红四方面军的防堵。其中，刘文辉第二十四军的两个旅位于绥靖、丹巴和崇化一线，杨森第二十军的四个旅另一个团部署在懋功、抚边和达维一线，邓锡侯第二十八军的一个团扼守抚边以东的日隆关。

大小金川地域山高谷深，水流湍急，易守难攻，不利于大部队运动作战。

十月八日，右纵队的二十五师七十四团首先从观音桥乘船强渡大金川的支流卓斯甲河，但是强渡刚一开始就遇到了对岸川军的猛烈阻击。九日晚，七十四团变换了渡河地点，选择了对岸都是悬崖峭壁的地段偷渡，一举成功。然后红军官兵沿着河岸迅速袭击了位于卓斯甲河下游川军的据点。

由于右纵队出师不利，徐向前立即命令左纵队的第四军从党坝出发强渡大金川。同时，第三十军攻击崇化和懋功，二十七师攻击两河口和达维。第四军在军长许世友的指挥下迅速向南疾进，位于绥靖的刘文辉部的两个团没作抵抗就向南撤退了，第四军于十二日占领绥靖，十六日占领了丹巴。第三十军在李先念和程世才的率领下，于十一日渡过党坝河，十五日占领了崇化。第九军二十七师的推进尤其迅速，他们十五日攻击了驻守在两河口的川军第一混成旅，经过数小时战斗，将这个旅的敌人击溃。敌人逃跑后，二十七师紧追不舍，一直追到第二天，追到了抚边附近，歼灭了川军的两个营。抚边城内的川军第三混成旅拆毁了抚边河上的铁索桥，然后全旅望风而逃。二十七师官兵紧急架设浮桥，渡过抚边河后连夜袭击了达维县城。袭击开始的时候，由于红军动作神速，队伍摸进了街道时，守敌还在睡觉。川军第四混成旅旅长高德周从梦中惊醒，顾不得穿上衣服，仅仅穿了一条内裤就开始仓皇逃窜。二十七师穿过达维，继续向东南方向发展，攻克了日隆关、巴郎关等地。二十七师的红军官兵数日内连续奔袭了近五百里，一路出峡谷，渡急流，抢通路，攻县城，不畏强敌，英勇作战，在川军面前造就了红军“急风暴雨般的攻势”。

在川北地区驻防的川军主力部队是杨森的第二十军，下辖六个混成旅及其直属部队，共计二十二个团三万余兵力。而现在，他的第一、第三、第四三个混成旅都处在溃逃中。

二十日，红四方面军包围了懋功并发起了进攻。

懋功附近的制高点全部被红军控制住之后，从北面溃败下来的川军才到达这里。第二混成旅奉命占领后山高地准备收容，但是他们发现后山也被红军占领了。懋功城内的川军守敌一看大势已去，无心恋战，很快就和溃败下来的川军杂乱地混合在一起，逃往周围的大山里寻找可以躲藏的地方。第二天天黑下来以后，躲藏在大山里的川军听说懋功已经完全失守，于是急忙下山继续逃亡。川军下山的时候，用绑腿带连接起来从藏身的悬崖上往下溜，但是没溜下多少人绑腿就断了。第二混成旅六团副团长胡显荣从悬崖上摔了下来，迷迷糊糊地爬起来接着跑，结果跑错了方向，竟又一次看见了懋功县城。胡副团长不敢停下来喘口气，连夜开始往回跑，结果又跑进了大山，从此迷了路，流浪了半年之久才逃回成都。

第二混成旅六团进驻川北的时候，军长杨森亲自接见了团长李介立。在长时间的谈话中，杨军长特别嘱咐李团长：一、要筑起委员长特别看重的碉堡封锁线，以防红军趁夜间从侧后袭击；二、要严防民间妇孺装扮成小商小贩侦察我军情报，然后报告给红军。结果，红军进攻懋功的战斗打响不久，驻守在天全的李介立就看到了从北面垮下来的部队。第二天夜里，懋功四周已经没有了枪声。逃进山里的李团长从悬崖上下来后，跑了一夜，天亮时才看见路边到处躺着跑不动的川军士兵。他追上了旅部，问旅长李君实：“咱们该怎么办？”李旅长说：“红军突袭攻进了懋功，所有的部队都被打得七零八落。红军肯定还会追来，我看咱们还是赶快往后方跑吧。”旅长和团长一起继续往后

跑，直到追上了也在逃跑的第三混成旅旅长杨汉域，才一同停下来喘了口气。两个旅收容了自己的队伍之后，接着开始翻越他们撤退的必经之地——夹金山。李团长对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有以下回忆：

到了夹金山上时，荒无人烟，又值冬季严寒，天上大雪纷飞，地上积雪甚厚，官兵又冻又饿，疲惫不堪。特别是夜间，在雪山上集体露营，大雪仍不断地飞落，士兵们都未穿棉衣，通宵达旦只听着“妈呀，妈呀”的呻吟之声。第三天继续在雪山上行军，有的掉队被冻死，有的滚在路旁雪坑里湮没而死。在这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忽有旅部传来通报说：“接到后方军部来电，红军有一部由夹金山本道追来，要赶快通过山顶，才能脱离危险。”这才又鼓起逃命的勇气，加快速度往后跑。被打得惨败溃逃的第二十军已成惊弓之鸟。

至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日，红四方面军击溃川军六个旅，重创两个旅，毙俘川敌三千有余，“绥丹崇懋战役”胜利结束。

红四方面军南下的第一个战役目的已经实现，即顺利冲出滞留了数月之久的荒凉贫瘠的西康地区，占领了发动更大规模战役的出击地。接下来，只要翻过白雪皑皑的夹金山大雪山，把战斗的目标转向东，就可以直接攻击成都盆地的边缘，然后奋不顾身地冲进那块富饶的盆地——那里翠竹滴雨，菜花繁盛，田畦如画，米香鱼肥；那里乡音亲切，风调雨顺，丰衣足食。红军官兵决心在那里建立起一个新的苏维埃共和国。

红四方面军沿大金川开始分兵南下的时候，北上的陕甘支队就要走进梦想中的天堂了。红军官兵已经看见了一望无际的黄土沟壑，干燥的西风卷着漫天的沙尘灌满了他们的衣袖。夜晚，官兵们听见归圈的羊群在呼啸的风中咩咩叫着；偶尔，一阵苍凉的唢呐声从很远的地方飘荡而来。所有这些都让来自中国南方的红军官兵们不由得神思凝

重——毛泽东站在甘肃与陕西交界处的分水岭上，指着省界的界碑对红军官兵们说：“我们走了十个省，前边是第十一个，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

过了青石嘴，陕甘支队的行军速度明显加快了。尽管各部队都被通知尽量避免与敌人作战，但是，红军的先头部队还是和国民党军碰上了。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师长马鸿宾最怕的是红军进入宁夏，因为那里有他的一家老小和他积攒的全部财产，于是他命令他的骑兵团昼夜兼程赶往固原集中，马鸿宾试图把红军北进宁夏的通路堵死。同时，国民党军新编第一军军长邓宝珊奉命抽调两个团，自庆阳出发去加强东北军骑兵师的作战。就是这两个团，走到一半的时候，迎头与红军的先头部队撞上了。

红军的先头部队还是四大队。接到敌情报告后，黄开湘和杨成武立即登上一座小山观察，发现两山之间的一道川里，敌人拖着很长的队伍正在行进，看样子他们并不知道自己马上就要和红军碰头了。黄开湘和杨成武很快制定了作战方案：机枪连和一个步兵连占领右边阵地，另一个步兵连占领左边阵地，然后用两个步兵连和一个侦察连直接向敌人的队伍进行冲击。下达作战任务的时候，杨成武对身边的侦察连连长王友才说：“带着侦察连给我冲上去！”

王友才咧开嘴笑了，答道：“是！”

侦察连连长王友才前几天刚被撤了职。这个二十四岁的广东人，黑黝黝的小个子，入伍前当过海员，经历十分丰富，后来不堪船主的压迫参加了红军。在四大队，王友才是个小“名人”，优点和缺点都十分明显。他作战勇敢，尤其是战斗经验丰富，只要他在阵地前一看，就八九不离十地知道敌人的薄弱点在哪儿，准确程度简直神了。在中

央红军长征路上，他曾率领特务连、三连、侦察连在突破乌江、智取遵义、飞夺泸定和攻打腊子口的战斗中一马当先，立下了赫赫战功。但是，王友才脾气暴躁，最大的缺点是发火的时候不但开口骂人，还常动手打人，因此战士们都很怕他。前几天，部队过回民区的时候，上级下达了“不准吃猪肉”的书面命令，王友才因为识字不多，就让连队的文书念给他听。文书是南方人，浓重的乡音加上一时马虎，把“不准吃”念成“准吃”了。王友才一听可以吃肉了，高兴得跳了起来，马上弄来了一头猪让全连改善了一下伙食。结果侦察连受到了团长黄开湘的严厉批评。团长一走，文书来了，向连长承认是他念错了上级的命令，王友才竟劈头给了文书一巴掌。在红军队伍里，干部打战士是一件很严重的事。王友才因此被撤了职，下放到团部通信排。在通信排里行军的时候他一路念叨着：“只要有仗打，我还是连长！”

杨成武政委听说了这件事，在部队翻越六盘山后，专门找王友才谈了一晚上。直谈得王友才一个劲儿地承认打人不对，以后一定改正，请政委看他的行动表现。

现在，政委又让他带领连队冲锋了，王友才的美好感觉又回来了。

发起攻击的枪声一响，王友才就大叫一声，第一个冲了上去。侦察连的官兵跟着他个个热血沸腾，顺着川道向敌人压了过去。王友才见一个打倒一个，见两个打倒一双，红军密集的枪声再加上铺天盖地的喊声，令敌人顿时团团乱转。四面都是冲下来的红军，一条狭窄的川道，敌人跑都没有地方跑。战斗仅仅持续了半个小时就结束了，王友才红着眼睛在尘土中四处打转，好像仗还没打过瘾似的。

四大队继续前进的时候，恢复了连长职务的王友才走在侦察连的最前面，军帽都推到天灵盖上去了。

杨成武政委看见后对他说：“王友才，打了胜仗，可不准翘尾巴。”

队伍走到一个叫白杨城的地方，看见了几家店铺卖香烟、杂货和馒头。刚接到原地休息的命令，跟踪红军的国民党军飞机又来了。空旷的黄土高原上没有可以隐蔽的地方，敌人的十几颗炸弹丢下来，一些红军官兵负了伤。本来计划要在这里宿营的，但是因为敌机的轰炸，上级的命令改为连夜行军。

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连续不断的黄土沟壑，红军官兵要顺着很陡峭的沟壁溜下去，然后再爬上来。本以为过了这道沟就可以走平路了，谁知道紧接着又是一道巨大的沟壑。红军官兵都说“这比过河还费力气”。

直到又出现了一个村庄，队伍才停了下来休息。这里叫杨家园子，红军官兵发现这里没有水喝。以前都是没有粮食，自从离开江西苏区，这还是头一回没有水喝。红军在当地老乡的带领下去很远的沟壑中弄水，半天才弄回来一桶黄水。村庄里没有粮食，只有土豆可以卖给红军。来自南方的红军官兵没有吃过蒸土豆，土豆蒸之前也没有水洗，因此个个都吃得满嘴是泥。毛泽东也在吃蒸土豆。土豆盛在一只大茶缸里，毛泽东用手抓着吃，边吃边对身边的人说：“吃不饱没关系，供给部已经出发到前面办粮食去了，走到孟家园就有饭吃了。”

杨家园子到孟家园三十里，第二天中午的时候，各部队相继到达，散布在这个村庄的四周宿营。孟家园附近有条小河，村子较大，

村里还有一座教堂。先头部队没收了当地一家地主的一百多只羊，又筹集了一部分小米和面粉，于是各部队开始做饭。热情的百姓帮助红军杀羊，官兵们吃了一顿羊肉和小米饭，人人都吃得很饱。面粉被做成馍馍带上作为干粮。上级决定在这里多休息一天，为的是让各单位分批去河里洗澡和洗衣服。但是，红军官兵洗着洗着，敌人就来了。

枪声从环县曲子镇方向传来——国民党军大约一个师已经从那个方向悄悄迂回了过来。红军两个连的警戒部队顽强阻击，把敌人死死顶住，身后各部队宿营地紧急集合的号声此起彼伏。巨大的黄土沟壑起了作用，红军部队都下到了沟里，然后绕道向河连湾方向转移。为了摆脱敌人，部队连续行军，不能吃饭更不能休息，一个昼夜之后，在接近河连湾的时候，行军突然停止了。前面传来消息说，先头部队遇到了一座堡垒式的村庄，有地方民团守着，正在攻打。

疲惫不堪的红军官兵纷纷坐在路边开始吃干粮。

不久，消息又传来了：一连连长毛振华牺牲了。

所有在吃干粮的红军都停了下来。

毛振华，中央红军中著名的战斗英雄。

四大队的先头连攻打的是一个土围子，相当于一个营兵力的一股民团和地主武装藏在里面向过路的红军打冷枪。

等杨成武到达那里的时候，毛振华一动不动地躺在一间土屋的门口，脸上全是血——子弹是从他的额骨打进去的。

杨成武把手伸进他的军衣里，毛振华的身体还是暖的，但是他已经停止了呼吸。

杨成武对指导员喊：“怎么搞的？怎么搞的？”

指导员哽咽着说：“战斗一打响，他就要上去……”

杨成武说：“他要上你就让他上？这个仗完全可以不打，把敌人围起来用火力一压制，部队就可以过去了！”

毛振华，红军强渡乌江的时候，他是突击队队长，带领突击队率先偷渡过去，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潜伏了一夜；红军攻打腊子口的时候，他率领一连官兵攀上绝壁，迂回到敌人的背后发起了攻击。他是上了红军《红星报》的战斗英雄，中央红军中没有人不知道他。他原是红一军团四团一营三连连长，红军突破乌江后，他成为四团一营一连连长，由于四团总是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因此四团一营一连连长毛振华可以说是整个红军队伍的最前锋。

卫生队军医范英武和李智广小心地为毛振华擦去了脸上的血，把他被鲜血染红了的军衣脱了下来，换上了一套干净的军衣。这套军衣是从毛振华还挎着的小包袱里拿出来的，军衣在小包袱里叠得很整齐。官兵们知道打腊子口的时候毛连长穿的就是这套军衣，因为那上面还有攀绝壁时磨出的窟窿，几天前毛振华刚刚把这套军衣洗干净收起来——走过了千山万水的红军连长毛振华，倒在了距离革命根据地仅仅还有几天路程的地方。这一年，他刚刚二十岁。

风沙漫卷，月光黯淡。一连的官兵全来了，其他连队的官兵也来了。毛振华被安葬在这里最高处的黄土坡上。黄开湘说：“我们谁也不要忘了毛连长，胜利的时候我们都来给他上坟！”

黄开湘和杨成武共同在那堆隆起的黄土前立了个木牌，木牌上写着：毛振华同志之墓。

拂晓时分，部队继续上路。

所有路过这里的红军官兵都会朝那块木牌望一眼。

国民党军骑兵部队始终是红军的一个威胁。

连续行军的红军没有力量与装备精良的东北军骑兵不断作战。毛泽东说：“没有作战要求，避免和敌人发生战斗。”——这是这支接近了最后目的地的万分疲惫的队伍最明智的选择。

红军官兵们不断地问：“陕北到了吗？陕北苏区在哪里？”

红军队伍前进，东北军的骑兵也前进；红军的队伍停下来，他们也停下来。在经过一个叫铁脚城的村庄后，红军的队伍上了山，竟然看见东北军的骑兵与他们只相隔一个山头并行着走。两军互相戒备，但谁也不开枪。彭德怀和叶剑英站在山头上用望远镜观察敌人的动静，红军部队就从他们的身边走过去。观察了好一会儿，彭德怀对红军官兵说：“快走吧，天快黑了。骑兵不会靠近我们。他们的马没水喝，走不动了。”彭德怀的话很快被传给了每一个担心敌人骑兵的红军，官兵们一下放心了，因为这是彭老总说的。

果然，东北军的骑兵没有靠近，也没有跟上来。

部队上了山。

这座山就是甘肃与陕西交界处的分水岭，当地人叫老爷山。

这里也是白区和苏区的分界。

这时，一直走在队伍最前面的红军便衣侦察员遇到了几个可疑的人。狭路相逢，那几个人首先拦住了红军侦察员，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侦察员回答的时候江西口音很重："做买卖的。""听口音你们是从南方过来的。""是的，那又怎么样？"双方小心地互相打量着，拐弯抹角地问些无关紧要的话，最后，红军侦察员突然说："你们是陕北红军？"对方脱口而出："你们是中央红军？"

这是徐海东派出来寻找中央红军的手枪团的官兵。

后来双方都说，一看就知道对方已经走了很长的路，面黄肌瘦的。

双方握了一下手，交换了些情况后，匆忙分开，各自返回了。

老爷山的山顶上有一座古老的庙宇，里面有三个和尚。这座庙在甘肃、陕西和宁夏很有名，春天的时候，三省的善男信女都爬上山来烧香。现在，老爷山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的官兵，供三个和尚吃水的一个小小的储存雨水的水池显然不够用，于是红军在水池边加了岗哨，每个连队只给两担水，每个战士只分到一茶杯水。因为长途行军，口干舌燥的官兵一下子就把水喝光了，结果做饭没水了，只好派人到很远的山沟里去做饭，因为那里有水，饭做好了再挑上山来。官兵们吃完饭已经半夜了，全部露营在庙宇外面。司令部和电台人员住在殿内，叶剑英和蔡树藩等人就睡在佛像的脚下。

第二天，下了老爷山就进入了陕西境内。

五匹快马带来了令红军官兵万分喜悦的消息。马上的青年个个身强体壮，挎着驳壳枪，头缠白毛巾，下马便问毛泽东在哪里。毛泽东

的警卫员陈昌奉问他们从哪里来，他们回答：“老刘派我们来给毛主席一封信。”

“老刘”就是刘志丹！

看了信的毛泽东对红军官兵们说：“二十五军和二十六军的代表同志来迎接我们了。”

接下来的行军情绪激昂。各路纵队靠得很近，最后就都走到一条路上来了，因此队伍拉得很长，黄土大道上烟尘飞扬。

由于队伍拉得太长，前边还在唱歌，后面却出了事：一队东北军骑兵突然横着冲过来，把走在最后面的干部团的两个连和收容队截断了。干部团里多是有丰富战斗经验的连排长，团长陈赓和政委宋任穷命令他们打上一仗，把这条讨厌的尾巴彻底割掉。他们利用骑兵不能下沟的弱点与敌人周旋，双方的射击都很猛烈，骑兵在沟上，干部团在沟里，红军在纵横的沟壑中转来转去，射出的子弹每每出其不意。天黑了下来，干部团终于把东北军的骑兵队打跑了，战斗中一位排长和十几名战士牺牲。等到干部团归队之后，三纵队因为宿营地距离敌人的骑兵太近而临时作了移动，全体红军官兵露营在山坡上。半夜里下起了雨，山坡上的红军官兵在雨里坐了一夜——这是他们万里长征到达目的地前的最后一夜。

行军命令：宿营地吴起镇。

吴起镇，注定要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名字的一个陕北小城。

天亮的时候开始行军，在晴朗的天气中走了大半天，红军在一个小村庄稍事休息，然后命令来了：继续前进，吴起镇距此二十里。

那二十里路令所有历尽千难万险活下来的红军官兵永生难忘。

成仿吾回忆道:“我们高兴极了，像小孩子一样向吴起镇跑去。”

尘土飞扬中，那个小镇在红军官兵的视线里越来越近了。

杨成武回忆道:“我们在蓝盈盈的天空下，列队进入了这个镇子。”

斜阳把远处的树林染成了橘红色，野鸟惊讶地在土崖顶上来回盘旋，路边的一道土墙上一条标语隐约可见：中国共产党万岁！

红军走进了吴起镇。

官兵们站在街道上四处张望，小镇里空无一人，街边的砖窑洞大多已经坍塌，但是残垣上依旧可以看见画着的镰刀斧头。

这是陕北根据地吗?

“同志！同志！”官兵们在寂静的街道上高声地喊。

几个头缠白毛巾的人来了，是这里的乡党支部书记，还有苏维埃乡政府主席。

苏维埃！

红军官兵们一拥而上，把这几个人举了起来，热泪久久地挂在脸上。

这是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

离红一方面军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已经过去了一年零九天。

“原来是自己人！原来是自己人！”

百姓们纷纷返回了家，忙着给远道而来的红军做饭。

毛泽东与乡党支部书记和苏维埃乡政府主席等几个地方干部谈话谈得很晚，得知现在陕北苏区正在进行反“围剿”作战，因此刘志丹和徐海东都不在这里。

夜里，情报到了，东北军的骑兵和马鸿宾的骑兵一共四个团已经追上来，就要到达吴起镇了。

毛泽东说：“看来非要打一仗了，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

彭德怀在吴起镇的四周查看了地形，然后拟定了作战方案：用两个纵队先打马鸿宾的骑兵，然后回击东北军的骑兵。

无论是马鸿宾的部队还是张学良的部队，都在不久前受到过陕北红军沉重的打击。马鸿宾的第三十五师在与红二十五军的作战中损失很大，而东北军在刚刚结束不久的劳山和榆林战斗中被红十五军团打得狼狈不堪。当时，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部及刘翰东的第一〇七师进驻洛川，何立中的第一一〇师和周福成的第一二九师沿着洛川至延安的公路向陕甘根据地的腹地推进。为了阻止敌人的进攻，会合仅十三天的红十五军团在徐海东和刘志丹的率领下，在劳山附近设置了伏击战场。十月一日，何立中的第一一〇师从延安出发，沿着公路南下，向甘泉县方向搜索前进。中午，当其先头部队到达劳山附近时，八十一师二四一团的红军官兵突然开了火。同时，七十八师的红军骑兵团迅速出击，截断了敌人的退路。然后，在两侧设伏的七十五师和七十

八师向公路猛冲过来，把何立中全师分割成了数股。经过五个小时的战斗，第一一〇师的六二八、六二九团以及师直属队全部被歼，何立中师长身负重伤，被抬到甘泉县城后死亡。同时被红军打死的还有包括师参谋长范驭洲在内的一千多名官兵。

在毛泽东到达吴起镇的那天，张学良带着大批随从到达了西安。对于武器精良和战斗力旺盛的东北军在陕北一连受挫，张学良感到有点不可思议。他不相信红军有这么强的战斗力。从红军的攻击中得以逃生的何立中的参谋提醒他不要冒进，免得进入红军的伏击圈。张学良说："咱们四路并进，谁能有这么大的胆子和这么大的胃口？"

因此，当接近吴起镇的马鸿宾的骑兵团遭到了红军的伏击，溃逃下来的官兵都说看见大批红军正在吴起镇附近调动的时候，东北军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对马鸿宾的骑兵表示出了极大的蔑视。马鸿宾的第三十五师骑兵团团长马培清对骄傲的白师长讲述了他们的遭遇：部队接近吴起镇的时候，发现镇子里的百姓都跑光了。我们对那里的道路根本不熟悉。这时来了个穿蓝布大褂的先生，说他是种牛痘的"花儿先生"，说前面不远有一小队红军正拉着驮满枪的马往山上走。我立即率领部队催马直追，谁知没追出几里就遭到了红军的伏击。幸亏有二营上来接应，我们才逃了出来——什么"花儿先生"，纯粹是红军的伪装！从这一手上看，定是毛泽东的红军。

马鸿宾的骑兵和东北军的骑兵会合在一起，商量着打还是不打。

马鸿宾的骑兵战战兢兢。

东北军骑兵师师长白凤翔举起手枪说："不是我想打，是这玩意儿要打。"

第二天早上八点，两股骑兵同时向吴起镇攻击前进，战斗断断续续进行了一天，红军边打边撤，东北军骑兵追得很紧，步步向吴起镇逼近，马鸿宾的骑兵在后面跟着。天黑的时候一看地图，竟然前进了好几公里，白师长认为红军肯定是害怕与他的骑兵交战，想拖延时间或者想趁机逃跑，因此决定明天继续进攻。

晚上，马培清团长命令他的骑兵向后退十里再宿营。

十月二十一日，在把敌人引进了预设战场之后，彭德怀下达了战斗命令。

这是红军进入陕北根据地以后的第一场战斗。

自认为退出十里就可以安全宿营的马培清犯了常识错误：他的骑兵团和东北军的骑兵师分开了。

马培清的骑兵团一营营长卡得云回忆道：

就在我们宿营的时候，红军趁着天黑从远距离迂回，对我们实施了大包围，发动突然袭击。在红军强大的火力下，马部大乱，有的骑马逃跑，有的因马卸了鞍子，只有撒腿奔逃，卸了鞍子的马也被惊跑。好在马向枪声响处的反面跑，大部分在以后仍收容了回来。

部队遭到了红军的突袭，马培清想都没想撒腿就撤，然后远远地站在土崖上，看见白师长的部队是如何落入红军的伏击圈的：

骑兵第六师和第三师浩浩荡荡，沿着头道川直奔而来。白部当时自以为人多势众，装备精良，所以气焰嚣张，根本没有料到红军在这组织伏击。我见此情况，立即与白部联络，但联络人员还没有跑下山坡，白部的先头部队已经和红军接触了。一时枪声炮声，回荡山谷，震耳欲聋……白部完全陷入了红军的重围。我原想趁机

撤退，但又顾虑到将来会以坐视友军被歼，不予救援，干犯军法，于是命令部队向前面一座山头上的红军阻击阵地攻击。红军并未坚守，我部随即占领了一座山头。该山头接近沟口，可以清楚地看见坐落在前面川道里不远处的吴起镇。紧靠这座山头的前面，有一片尚未收割的荞麦地，我命令部队在这块荞麦地里构筑工事，准备在此扼守，不再前进。这时根据我部左翼报告，白部的第十七团已经被歼，第十八团正在与红军激战。即与白部联系，始知当时该部伤亡已近四五百人。

天黑下来的时候，红军竟然回过头来再次向马培清的骑兵团发起了攻击。马培清立即命令部队全速撤退，但是他的骑兵团的两边都出现了红军。部队跟着他开始狂跑，没跑多远退路就被红军截断了。红军的杀声漫山遍野而来，马培清觉得自己这一次是死定了。然而，红军的追击突然间停止了。马培清跑着跑着才发现身边已经没有了红军。他回过身朝战场方向看去，那里再次响起了红军的杀声，原来红军掉头朝着混乱中的东北军骑兵冲去了，再次把白凤翔的一个团截住，包围起来，全部缴了械。

吴起镇战斗，红军歼灭了敌人的一个团，击溃了三个团，缴获战马两百多匹。红军胜利回师的时候，吴起镇的百姓敲打着锣鼓，红军官兵们第一次看见中国北方的一种长长的红布被系在百姓们的腰间，然后又从他们的腰间向着天空高高地舞动。

吴起镇战斗的重要意义在于：红军不但表明了他们走到这里便不再迁徙的决心，并且证明他们有守住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心和力量。

毛泽东挥笔写道：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彭德怀把最后一句改成“唯我英勇红军”，然后将诗稿还给了毛泽东。

第二天，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宣布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结束。

红军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标志着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但是从当时整个中国红军所面临的局势来讲，红军依旧没有摆脱移动作战的状态：红四方面军数万官兵前途未卜，红二、红六军团依旧在极其艰难地转移，中国工农红军尚未拥有一块稳固的红色根据地。一九三四年以前那种在中国版图上武装割据出数块革命根据地，尤其是在江西和福建地区存在着一个相对稳固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局面，还远没有形成。无论是政治环境还是军事环境，中国工农红军依旧处在极其艰难的生存危机之中。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最后胜利还没有到来——后来的历史证明，数万红军还将经历数百次残酷的战斗和数千里艰险的跋涉，一年以后，中国工农红军才真正会合在一起。而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来说，那一天才是“中国革命的新的历史阶段”的真正开始。

陕甘苏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九二七年。当时，中共陕西省委先后组织了清涧、渭华和旬邑起义。一九三二年二月，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同年十二月，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将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并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苏区。一九三三年春天，只有一个团兵力的红二十六军南下，国民党军对其进行了

大规模“围剿”，部队被打散后，部分官兵在刘志丹的带领下冲出重围，转移到甘肃庆阳一带坚持斗争，直到这一年的十月，他们才带着几支驳壳枪返回到照金根据地。十一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将所辖部队改编为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治委员。不久，刘志丹和杨森分别接任师长和政委职务。到一九三四年夏天，四十二师创建了纵横大约七十多公里的一个小小的苏区，并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政府主席习仲勋，军委主席刘志丹。

在与“围剿”的敌人反复作战的同时，陕甘苏区周边的游击队逐渐壮大，一九三四年十二月，陕北各游击队正式被改编为红二十七军。一九三五年二月，蒋介石命令驻守河南的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进入陕北，会同陕西、山西、甘肃和宁夏四省的军阀部队对陕北苏区进行“围剿”。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打击深入到陕北的敌人，红军成功地通过机动作战使陕甘和陕北的根据地连成了一片。一九三五年秋，蒋介石再次调集十万大军对陕北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就在这时候，红二十五军到达了陕北。九月，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红二十五军的到来使陕北根据地的军事力量得到了加强。陕北的《信天游》因为红二十五军的到来被乡亲们唱为：

一杆杆红旗空中飘，

红二十五军上来了；

长枪短枪马拐枪，

一对对喇叭一对号；

头号盒子红绳绳，

军号吹起嘀嘀嗒。

十月二日，红十五军团南下，歼灭了国民党军第一一〇师的两个团，取得了劳山和榆林两次战役的胜利。但是，在这块面积不大的红色根据地的外围，数十万国民党军正从四面包围而来。一九三五年十月，红一方面军进入陕西后，蒋介石力图趁红军远征疲惫、立足未稳之时，调集大军向苏区腹地强行推进，以彻底“剿灭”陕北红色根据地：

查陕北匪区东、西两面业经职团制定封锁办法，已通知各部队及地方政府切实实施在案。为顾虑周密起见，必须四面实施方能奏效。拟恳通饬西、南两路及宁夏接壤之三边、盐池同时施行，严密封锁，期收实效。当否，乞核夺实施，等情。除电复外，仰即饬所属切实封锁匪区，断绝其物质资源，期收聚歼之效为要。

更加令人忧虑的是，在陕北苏区内部，尖锐的政治斗争也危及着红军的生存。一九三五年七月，当会合后的红一、红四方面军徘徊于川西芦花地域的时候，极力推行“左”倾路线的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到红二十六军。面对敌人大规模的“围剿”，杜衡认为革命的力量与反革命的力量对比，革命的力量已经“占了绝对的优势”，因此要求陕北红军主动迎着敌人出击，一个一个地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城市，“把陕西、四川、甘肃、青海和新疆连接起来”。同时，杜衡在苏区内部掀起了“肃反运动”，目的是清查刘志丹等红军领导人“不实行土地革命”、“秘密勾结军阀”的罪行。于是，陕北苏区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前方的红军官兵在与“围剿”苏区的敌人进行残酷的战斗，后方的苏区里却在策划着如何逮捕审问红军干部。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和陕甘边区县以上干部，几乎无一幸免，不少红军干部因拒不承认刘志丹“秘密

勾结军阀”而遭杀害。刘志丹是在劳山战役结束后去安塞的路上，得到自己将要被逮捕的消息的。当时他遇到了一个从瓦窑堡赶来的通信员，通信员并不知道信件的内容，既然信是要送到第十五军团的，通信员就把信交给了军团参谋长刘志丹。刘志丹打开一看，是一连串的逮捕名单，第一个就是他的名字。刘志丹把信件还给了通信员，说：“你把信送到军团部去吧，告诉他们我自己去瓦窑堡了。”在瓦窑堡，和刘志丹关押在一起的还有陕甘边区苏维埃主席习仲勋。刘志丹被污蔑为“为消灭红军而创造红军根据地的反革命”——在瓦窑堡的城门外，砍刘志丹脑袋的大坑已经挖好了。

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另一个重要决定是：派王首道、贾拓夫两同志立即赶赴瓦窑堡，迅速将中央的情况告诉他们，同时勒令陕北苏区立即停止“肃反运动”。中央还决定成立由博古负责的党务委员会，任务是迅速纠正陕北苏区错误的“肃反运动”。刘志丹在中央“刀下留人”的命令下走出了关押室，他见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后来周恩来说：刘志丹“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共产党员”。

在吴起镇，年轻的红军团长黄开湘死了。

红军到达吴起镇后，黄开湘患上了严重的伤寒病，高烧四十多摄氏度，天天昏迷着。医生想尽了一切办法救治他，就是没想到他枕头下面有一把手枪。昏迷状态下的黄开湘，不知什么时候摸到了枕下的那把手枪，他朝着自己的头扣动了扳机。

这把“六轮子”手枪是黄开湘的心爱之物。手枪跟着他走过了千山万水，总是被擦得一尘不染。红军渡过赤水河后，黄开湘成为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和政委杨成武一起，指挥着中央红军中最勇敢的前

锋部队，经历了无数次残酷的战斗。部队过松潘大草地时，黄开湘对杨成武说：“老杨，我们一定要熬过去，熬过去就好办了。”年轻的红军团长走出了草地，突破了腊子口，翻过了岷山和六盘山，他曾经幻想过：“将来革命胜利了，是什么样呢？”他没能等到革命胜利就离开了人世。黄开湘的搭档杨成武那时也患着伤寒。听到消息后，杨成武在高烧中骑马赶来。那一天天降鹅毛大雪，杨成武赶到的时候，看见的是一座新坟，坟上的积雪已经落了厚厚的一层……

十月三十日，陕甘支队红军离开吴起镇，经过保安东进，准备在下寺湾一带与红十五军团主力会合。

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徐海东得到了毛泽东即将到达下寺湾的消息，立即骑马从前线赶往下寺湾。一百三十里路，徐海东打马狂奔了三个小时，到达下寺湾的时候人和马都已是大汗淋漓。徐海东进了军团司令部，四个人看见了他，一齐朝他走来。徐海东谁都不认识，军团政委程子华赶快介绍。毛泽东向大名鼎鼎的“徐老虎”伸出手来：“海东同志，你辛苦了。”

徐海东握着毛泽东的手，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他对那一瞬间的记忆是：“终于看见毛主席了。”

和毛泽东一起向徐海东走过来的人是彭德怀、贾拓夫和李一氓。

毛泽东拿出一份三十万分之一的陕西地图，从根据地的范围、红军的兵力和装备、干部情况和战士们的吃穿，一直问到目前的敌情。当他听说红十五军团此刻正在打民团的土围子时，毛泽东说：“好，按你们的部署打，等打完了咱们再仔细商量下一步。”

临走，毛泽东握着徐海东的手说：一定要在陕北建立一个巩固的根据地，这就好比“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没人知道毛泽东为什么用这样一句略带伤感的古老诗句来描绘陕北未来的景象。

十一月二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政委聂荣臻，第二纵队司令员彭雪枫、政委李富春，陕甘支队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

林、聂、彭、李、叶并转杨：

（甲）第一、二两纵队及支队直属队明三日即现地休息一天，四号继续南进。各走六七十里宿营。

（乙）打草鞋、洗衣、洗澡、补充粮食。

（丙）沿途群众热烈欢迎须准备回答其口号，并注意与十五军团见面时应说的话。

（丁）力求部队清洁、整齐、礼节。

（戊）后方究到何处，如果无钱买柴菜时，须发给陕北苏票二百元，每人每日发六分。

彭、毛

二日二十时于下寺湾

陕甘支队和红十五军团召开了胜利会师大会。

陕甘支队向红十五军团输送了大批干部，包括周士弟、王首道、宋时轮、黄镇、伍修权和毕士悌等人。红十五军团则在物资上给予了陕甘支队很大的帮助。毛泽东亲自代表陕甘支队向徐海东借钱，当时红十五军团一共仅有七千多块钱，徐海东一下子给了陕甘支队五千块。除了钱，红十五军团还从各连队抽出了大量的枪支弹药、衣物布匹以及医疗药品送到了陕甘支队驻地。

“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毛泽东这样评价徐海东。

毛泽东的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合了。国民党第三十七军军长毛炳文给蒋介石写出了报告，就国民党军对毛泽东的红军围堵失利进行了“愧愤莫名”的总结：

查此次毛、彭股匪长途逃窜，实力减耗。而我以数倍之众，沿途堵截穷追，未克聚歼，愧愤莫名。虽曰天未厌乱，要亦人谋不藏。兹将所得教训，概述于左：

（1）最初因各方面情报不确实，对匪实力估计过大，本军第八师达到定西，匪突陷通渭。当时据各方面情况判断，仅系匪之先头部队。深恐匪以一部截断西兰路，主力威胁皋兰。本军主力应集结定西、通安驿、马营等处，准备经内官营、榆中县截击渭源向皋兰北犯之匪，以固省垣根本。静宁、会宁间故控置兵力较少，匪得乘机向北兔脱。

（2）指挥不统一。本军初次入陇，人地生疏，追击与堵截部队无统一之指挥，难期协同一致，良机坐失，极为可惜。

（3）联络不确实。各部携带之无线电，波长不一，呼号不明，各友军又无通用密本，无法联络。即同隶一军者，亦因波长各异，不能畅达，消息阻滞，遗误颇多。

（4）匪情不明了。匪窜经路，人民逃避一空，无可派之侦探。匪之内容实力及溃窜路线不易明白。纵有所得，多从俘匪传出。匪素狡猾，对俘匪供词，又恐系匪派间谍，惑我耳目，消息极难确实。实由我地方无组织，民众如散沙，且无知识。部队不能得他方之协助，不无遗憾。

（5）给养困难。此次追击路线，地形险阻，人民稀少，纵偶有村落，经匪洗劫之后，十室九空，不仅给养无法采办，甚至饮料亦不可得，各官兵有终日仅得一食者，或终日仅得菜叶、蕃芋以充饥者，或于匪方残余未熟牛羊肉以度日者。因此，坐失机宜。至民众畏匪烧杀逃避，且因为过去军队纪律不良，对军队怀疑误会。地瘠民贫，供不应求，亦系实情。

（6）无统一收容机关。长途追剿，官兵因病落伍者，道路相望，一经剧战，死者伤者，无法传送，迟滞部队行动，关系甚大。如卫生机关健全，减少部队顾累，动作当较敏捷。

（7）各级指挥官缺乏独断力。匪情变幻，惟前线指挥官观察最为明确。此次追剿各战役，与匪接触，大部为其侧后掩护队，势虽顽强，力量究属有限。各级战斗指挥官，每为匪势所眩惑，不能窥破弱点，乘机腰截，或埋伏阻截，致匪主力逃窜。虽逐日穷追，见匪打匪，似非战之善者也。

（8）部队行军力不强。追剿部队困难不免，但匪能往，我亦能往。胜负之争，即在能争持最后五分钟以为断。我追击部队虽能忍饥耐苦，日行百里或百数十里以行追击，然始终仅能尾匪跟追，不能过度要求迂回截击。各匪首均得漏网，未收最后之胜利，不能不认为行军力之薄弱。

他如民众之无组织训练，对国军时生疑惧，侦探部队之不完备，地图方向之差错，往往均有遗误。尤不能不加注意。

嗣后进剿陕北股匪，利钝在军食之盈虚与转运之迟速。似应核实各军支食之人马，计算转运之时日。兵站与交通、卫生种种设备，更不可忽视。

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在下寺湾召开了会议。会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林彪、聂洪钧、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后又增补叶剑英、聂荣臻、刘志丹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宣布，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第十五军团编入第一方面军序列。彭德怀任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原第一、第三军团合编为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辖第二、第四师和第一、第十三团。第十五军团辖第七十五、第七十八、第八十一师和一个骑兵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参谋长周士弟，政治部主任郭述申。

第一方面军全军总兵力约一万六千多人。

一年前，红一方面军从中央苏区出发的时候，兵力为八万六千多人。

在中国革命史上，除了刚成立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外，还曾经存在过两个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在川陕苏区成立的以张国焘为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及一九三五年二月在陕甘苏区成立的先后以谢子长、刘志丹和聂洪钧为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应该说，在下寺湾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实际上就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自己也始终认为，下寺湾会议之后，他所担任的职务是中央军委主席。他在一九四五年四月

填写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登记表》时，在职务一栏里写道：一九三五年担任中央军委主席。

此时毛泽东还不知道，或者还不明确知道，张国焘已经成立了一个“临时中央”，并且已经任命自己为“军委主席”了。张国焘还没用任何正式方式把他的这一决定通知中共中央。他没有立即这么做的原因很简单也很实际：他在等待一个最佳的时机，这一最佳时机将是他的南下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也就是他所说的那个富饶巩固的新苏区建立起来的时候——张国焘把一切希望全部寄托在南下战役上了。

这是一个巨大的政治赌注。

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四日，红四方面军南下战役的第二阶段战斗打响了。战役目标是：迅速翻越夹金山，南下并东出，占领川西平原边缘的天全、芦山、宝兴、名山、雅安、邛崃和大邑地区。

红四方面军面对的敌人，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庞大的军阀部队。

中央红军抢渡金沙江进入川西北地区以来，四川军阀内部相互争斗的矛盾，让位于蒋介石与四川军阀之间的矛盾。当时，中国各省军阀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所隐藏着的“一箭双雕”的玄机看得十分透彻：消灭红军的同时，削弱和收编地方势力，最后让中国成为统一的蒋家天下。诸葛亮说四川是个“沃野千里，天府之土”的好地方，彻底地控制四川的梦想在蒋介石心中积存已久。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之后，蒋介石认为他控制四川的时机已经成熟。他一面调派大量的中央军进入四川，控制四川重要的军事要点；同时在峨眉山上开办“军官训练团”，对川军军官进行分化收买；然后，他派遣大批国民党

军政要员以“建设四川”的名义进入四川。到一九三五年秋天，蒋介石已经把川军整编完毕。

川军被缩减了三分之一的部队。虽然其总司令部叫“善后督办公署”，有一点临时机构的意思，但川军依旧是一个庞大的军事体系，总兵力仍达二百多个团。川军的督办兼总司令是上将刘湘。

整编后川军主力部队的编制是：

第二十军，军长杨森，辖第一三三、第一三四、第一三五师，共十五个团；

第二十一军，军长唐式遵，辖第一、暂编第二、第四师，共十六个团、十二个独立营；

第二十三军，军长潘文华，辖教导师、第五师、边防第二路，共十四个团、六个独立营；

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辖第一三六、第一三七、第一三八师，加上一系列的宪兵、手枪、飞机、舰炮等大队和警备区、直属旅等，共二十二个团；

第四十一军，军长孙震，辖第一二二、第一二三、第一二四师，加上特务团，共十九个团；

第四十四军，军长王瓒绪，辖第一、第二师和暂编第一师，共十六个团、十一个独立营；

第四十五军，军长邓锡侯，辖第一二五、第一二六、第一二七、第一二八、第一三一师，共二十四个团；

第一〇四师，师长李家钰，辖第一、第二、第三旅，加上一个补充团和一个特务大队，共十个团。

刘湘的总司令部，即“善后督办公署”还有直属部队：暂编第三、第四师，暂编模范师，暂编独立第三、第五、第六、第七旅，警备第一路等，共三十八个团、十个营、五个大队。

整编后，蒋介石将川军各路将领一一任命为各地的绥靖司令，因而得以将川军主力部队全部调到了四川的边缘地区。大功告成后，蒋介石由衷地说：“四川不愧我们中国的首省，天然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蒋介石当然知道，红军也认为这里是一块“最好的根据地”。

刘湘敢怒不敢言。

面对红四方面军的突然南下，刘湘对川军军官们说了他的原则：只要红军不侵犯川西平原，就和他们对峙相处，别让老蒋坐收渔翁之利；但是，如果红军非要进攻川西平原，那就等于掏咱们的老窝了，那就要和红军决一死战。

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二日，红四方面军发布了《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战役部署是：以第四、第三十二军为右纵队，由丹巴经金汤进攻天全，并以一部向汉源、荥经活动；以第三十军全部、第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和九十一师的两个团、第九军二十五师组成中纵队，进攻芦山和宝兴，得手后向名山、雅安及其东北地区进攻；以第九军二十七师为左纵队，除一部巩固抚边、懋功、达维外，其主力向东前出威胁大邑和灌县。另外，以第五军为右支队，巩固丹巴地区；以第三十三军为左支队，留守马塘、两河口，并威胁理县和威州；以第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师部率领二七七团驻守懋功和达维。

战役的主要方向是天全、芦山、宝兴、名山、雅安、邛崃和大邑，而对康定、汉源、荥经和灌县等各方向采取的行动都是佯动，为的是配合主攻方向的行动。

即使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这一战役设想要求达成的目的也是惊人的。

自川西的夹金山大雪山往东，下山之后便自北向南排列着相距不远的几座地理位置极其重要的县城。这些县城拱卫着富饶的川西平原的西沿，大邑、邛崃、宝兴、芦山、名山、天全、雅安如同一个屏障，呈弧形围绕在成都西南方向不出三百公里的山脚之下。占领了这一条线，便可俯瞰整个川西平原；而自此进入成都，无险可守，可谓一马平川，只要有持续的攻击能力，整个成都平原将尽收手中。

当初中央红军自南向北经过这里的时候，知道这几座县城对于四川军阀的敏感与重要，因此尽量避开了这一线，向西上了夹金山大雪山。

现在，红四方面军把主攻方向选择在这一线，其战略目的十分鲜明：红军要占领的是整个川西平原。

朱德虽然同意这一战役计划，但是出于对战役难度的担忧，他就战术问题向红军指挥员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讲解。朱德认为，部队一旦打出山区，战斗就从山地战和隘路战，变成了平地战和城市战；由运动战，变成了阵地战和堡垒战，而后者恰恰是红军所不擅长的。因此，要想取得战役的胜利，就要充分注意集中使用兵力，采取重点突破和袭取堡垒的战术原则。侦察要详细，计划要周密，多运用红军擅长的机动、穿插、夜袭等方法。既不能把敌人飞机大炮的威力神化，

消除官兵们的畏惧心理；同时也要学会对付敌人的飞机大炮，避免部队无谓的伤亡。

红四方面军掉头南下占领了懋功、丹巴一线后，刘湘立即意识到红军下一步的企图只能是川西平原，于是他急令第二十三军军长潘文华以四川南路“剿共”总指挥的名义进驻名山县城，统一指挥布防在天全和芦山一线的川军。同时，命令刘文辉、杨森、邓锡侯的部队全速赶赴芦山和天全一线增援。刘湘专门召见了第二十三军教导师师长杨国桢和“善后督办公署”直属模范师师长郭勋祺，对两位师长重申了他的作战目的和原则：川军的主要任务就是把红军堵住，只要把南下的红军堵在西北的山岳地带，保卫住川西平原的屏障，就是胜利。因此，仗如果打得顺利，只要把红军赶上山，部队就不要追了；如果打得不顺利，可以转移阵地保存实力，但是要尽可能与红军周旋，最大限度地迟滞红军于天全、名山以西地区，等待增援。最后，刘湘说：“川西平原决不可丢失，两位仁兄应该知道攸关利害所在。”

届时，防守金汤、泸定至汉源、雅安一线的是刘文辉部；防守宝兴至夹金山一线的是杨森部；防守宝兴以东一线的是邓锡侯部；杨国桢的教导师去的是芦山，而郭勋祺的模范师去的是天全。

十月二十四日，红四方面军各部队开始翻越几个月前中央红军翻越的夹金山大雪山，唯一的区别是方向相反。翻越雪山的时候，作战部队没有太多的损失，但是跟随部队出征的妇女团、总医院和运输队出现了严重伤亡。总医院年龄最小的女战士是十三岁的孙文莲，她由于身体太弱倒下了，在雪地里像是昏迷了又像是睡着了。不久前，在攻打懋功的战斗中，孙文莲在抢救伤员时意外发现了很久没有消息的大哥。大哥负了重伤，抬下来的时候已经晚了，伤口里长了蛆。大哥看了孙文莲一眼就死在了她的怀里，孙文莲都不知道大哥在那一刻是

否认出了她。又过了两天，她竟然又遇到了负了伤的二哥，她本想好好照顾二哥，让他早一点康复。但是，攻打芦山、天全的战斗命令下达了，二哥被要求留在老乡家养伤。分别的时候，二哥的话让孙文莲很是悲伤，二哥说："留下来就等于死了，我想往家的方向走，但很可能死在半路。你好好地跟着红军干，就当二哥已经死了。"自从他们兄妹三人参加了红军，因为不断地行军打仗，几乎没有见过面。现在，孙文莲见到了她的两个哥哥，同时也失去了她的两个哥哥。孙文莲实在坚持不住了，在雪山上闭上了眼睛。十三岁的孙文莲被后续部队的一个战士踩着了，战士把她从雪里拉了出来，然后大家轮流抱着这个瘦弱的小红军，最终让她在红军官兵的怀里活了过来。

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八十八师在师长熊厚发的率领下首先翻过了夹金山，向在山下防御的川军第二十军发动了猛烈的袭击。处在和红军接触第一线的杨森已经在懋功被红军打怕了，他一听说红军又开始翻越夹金山了，仅仅留下一个团担任后卫掩护，全师人马立即自夹金山脚下撤退了。留下的团长杨干才本来还准备利用有利地形抵抗一阵，但是，当红军官兵一路叫喊着冲过来的时候，他的战斗信心瞬间就丧失了。熊厚发一手举着驳壳枪，一手举着大刀，率领官兵猛冲猛砍，凶悍无比。川军开始溃逃，红军狂追不舍，追击的路全是险要的隘口峡谷，川军在狭窄的山路上拥挤着溃逃，不少官兵被挤下悬崖摔死。杨干才的这个团一直逃到了盐井坪，被李先念率领的第三十军的一支迂回部队截住了，全团遭到了红军的重创。熊厚发在和王树声率领的部队会合后，直扑宝兴县城。杨森见自己的部队已经无法控制并且伤亡巨大，干脆放弃了宝兴，向灵关镇方向撤退。在放弃宝兴县城的时候，由于这里的兵站储存着大量的大米和盐巴，杨森强迫官兵每人必须背上一袋大米或者盐巴，但是人手还是不够，最后只得下令纵火焚烧。宝兴县城大火熊熊，火焰很快殃及民众的房屋，整个县城最

终成了一片废墟。红军穿过县城继续追击，一路向南追到了灵关镇，俘敌一千余人，缴获步枪两千支，轻重机枪五十余挺，其前锋直逼芦山县城。

红四方面军左纵队翻过夹金山后，向东进攻，占领了大川场，歼灭了川军第四十五军的一部，直接威胁着邛崃。

右纵队自丹巴出发，首先攻占了夹金山西侧的金汤镇，击溃了刘文辉部的一个旅，然后迅速翻过大雪山，突然出现在雪山脚下的险要隘口紫石关的守敌面前。驻守在这里的是川军第二十四军第一三六师的袁国瑞旅，这个旅在泸定桥与中央红军的战斗中严重受创，整编后全旅只有两个团，每团只有两个营。奉命调防夹金山后，官兵们怨声载道，因为天气寒冷却没有棉衣，武器也只有一半可以使用。负责防守紫石关的是这个旅的李全山团的两个营。从大雪山上下来的红军进入天全一线，必须要从这个险要的隘口通过。隘口的两面都是悬崖，川军在布置了对隘口的火力封锁后，认为红军本事再大也很难从这里通过。红军右纵队司令员倪志亮和红四军军长许世友仔细研究了紫石关的地形。在当地一名采药人的带领下，红军官兵沿着一条绝险的小路登上悬崖，绕到了紫石关守敌的侧后，突然发动了袭击。李全山团长还没弄明白红军是如何从悬崖绝壁上过来的，他的部队就已经顺着山路往天全县城撤退了。川军在沿途的几个险要阵地试图组织起阻击，但都是还没有进入阵地红军就追到了眼前。跑着跑着，李全山发现身边的官兵已经不多了，而后面的红军依旧喊着口号在追。在距离天全县城还有十几里的时候，川军和红军都跑不动了，气喘吁吁的红军官兵大声劝说川军官兵不要跑了，只要说出营长和团长在哪里，红军就优待俘虏，结果所有的川军士兵都就地躺下不跑了。只有团长李全山继续跑，跑到已经能看见天全县城的时候，旅长袁国瑞前来接应

了，红军这才放慢了追击的势头。天黑下来，红军又一次发起了攻击，袁国瑞旅在黑暗中一片混乱。到天亮的时候，全旅已经退到了天全县城城门外。但是，驻守在县城里的模范师师长郭勋祺不但下令不准开城门，而且还命令机枪向袁国瑞旅的残兵扫射。郭师长说：“把这些杂牌部队清除掉，我们好去打红军。”袁国瑞旅一个叫雷树清的连长对模范师的无情无义万分愤怒，竟然率领官兵向郭勋祺部的一个机枪阵地发动了奋不顾身的进攻，结果把这个机枪阵地给冲垮了，这个被打开的缺口让袁国瑞旅的幸存者逃进了天全县城。

天全县城分新、旧两城，新城在西，旧城在东。全城三面是悬崖绝壁，城南架有浮桥，城西北有大岗山俯视。川军师长郭勋祺认为这里地形险要，对抗红军不需要那么多兵力，于是把第一旅派在远离县城的宝兴方向，命令第二旅防御大岗山，第三旅为预备队，师直属队防守新城，师部在旧城——对于如此分散的兵力部署，郭勋祺说：“纵有红军数万，也难飞越天全。”雄心勃勃的郭勋祺刚刚从旅长升任师长，无论对红军还是对川军的其他部队他一律蔑视。在无法阻止袁国瑞旅的溃败后，决心死守天全的郭勋祺一面命令第二旅旅长唐明昭加强大岗山阵地的防御，一面命令廖泽的第三旅派一个团到县城增防。

攻击天全外围阵地大岗山的红军部队是第四军的十二师。川军的这个阻击阵地利用天全河作为屏障，修筑了大量的碉堡，因此当红军发动进攻后，川军得以藏身在碉堡里与红军顽固抗衡。红军的多次攻击受阻，军长许世友命令部队暂停攻击，决定组织突击队趁夜绕路攀崖进行偷袭。在当地百姓的带领下，红军突击队沿着大岗山西南面的绝壁攀了上去，在微弱的星光下登上了大岗山的山顶。果然，红军再次出其不意，山顶上的川军营长周曼生正在屋子里烤火，手还没离开火盆就被红军活捉了。突击队偷袭成功后，正面部队即刻开始攻击，

在大岗山阻击阵地上的川军徐元勋团被消灭大半，剩余的官兵纷纷放弃抵抗逃往天全县城。另一路红军在十师副师长王近山的带领下，先尾随袁国瑞的溃兵接近了县城，然后在当地百姓的带领下，涉水渡河，占领了天全县城南面的浮桥，继而向防守新城的郭勋祺的手枪营发动了攻击。接着，各路红军协同攻击旧城。当红军官兵举着大刀冲进郭勋祺的师部时，郭勋祺在警卫的掩护下边打边撤，撤到了县城东面的一座高地上。

十一月十日清晨，天全县城被红军攻克。

天全战斗进行的时候，红四方面军对芦山县城的攻击也开始了。

杨森的第二十军一路溃逃进芦山县城，让在这里防守的杨国桢的教导师官兵大惊失色。杨国桢虽然没有像郭勋祺那样轻视红军，但也对自己在芦山外围设置的口袋形防御火网抱有希望。为了把红军进攻的注意力吸引到他已经布置好的火网中，他特地派出了一个营当诱饵。十一月四日上午，红军的攻击开始时，似乎确实有一支红军部队对这个“诱饵”展开了攻击。但是，当杨国桢感觉红军已经进入了他的火网的时候，芦山岗阻击阵地四周突然出现了大量的红军，高地上的第一团陈康营受到了红军的迎头猛击。杨国桢立即派部队增援该营，但是，包括增援上去的那个营在内，两个营在越来越多的红军的打击下不得不放弃了芦山岗阵地。直到这个时候，杨国桢才明白，红军早就看出了他设置的口袋，红军以一支小部队佯装上钩，主力则集中进攻芦山岗。芦山岗的丢失给川军防线带来了崩溃的迹象。在第二天的战斗中，芦山县城外围川军的阵地被迫逐渐压缩，教导师第二团在最后时刻投入了预备队也没能挡住红军的进攻。中午的时候，红军推进到芦山县城城墙下，杨国桢在城墙上观察，几次命令第一团团长张竭诚出击，张团长的表情确实很激动，他不断地喊着：“老子和他们拼

了！”但是就是不动身，最后竟然在城墙上的行军床上躺了下来。红军对县城的攻击持续了两天，在芦山城处在红军四面包围的情况下，杨国桢最后率部弃城逃跑。

防守天全和芦山的郭勋祺部和杨国桢部在逃跑的时候，都受到了红军的快速追击。郭勋祺师长逃到半路，得知芦山也丢失了，立即命令部队离开公路进入大山，而他自己则带着一个排的警卫和几个幕僚逃往了洪雅县城。而杨国桢部更是一逃就溃不成军，虽然事先制定过撤退路线，但所有的计划都在红军的杀声中被川军官兵忘得一干二净。教导师第二团团长李长烈身边只剩了两个机枪排，天降大雨，他们在惊恐中找不到通往名山县城的路了，转来转去转进了红军的伏击圈。红军的呐喊声一起，李团长身边的官兵扔掉枪支，扯去军装上的番号，丢下他们的团长四处逃窜。那些逃进了名山县城的残兵，因为惊魂未定不敢在城内停留，便继续沿着公路往百丈关方向退去。

经过十几天的战斗，红四方面军夺取了宝兴、芦山和天全三座县城，占领了青衣江以北、懋功以南的广大地区。

红军官兵为了胜利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仅在攻占芦山的战斗中，就有近两个营的红军官兵阵亡，第三十军九十师政委何立池，二七九团团长周绍成、政委韩文吉、副团长丁子高都牺牲在了阵地上。但是，川军的损失更是惊人：在天全和芦山前线的川军的七个旅中，独立第二旅伤亡和被俘官兵达五千七百多人，教导师第一旅伤亡两千八百多人，模范师第二旅伤亡和被俘一千八百多人——川军在短短十几天的战斗中，伤亡和被俘官兵总数达到了万人以上。

红四方面军已经造成了直取成都的强硬态势。

红四方面军占领了天全和芦山之后，张国焘给中央发去了电报，虽然依旧没有正式通报他成立“临时中央”的事，但是口气上已经流露出“中央”的味道：

林、聂、彭、李、徐、刘并转毛、周、张、王、博：

（甲）我军于占领天全后，又于本月十二日攻占芦山，是役击刘湘之教导师、模范师、新编二师之第四旅、刘文辉之第五旅，并将刘湘独二旅全部缴械。敌仓皇溃退，我军正跟踪追击，乘胜夺取名、雅，俘获已在五千以上。

（乙）这一胜利打开了川西门户，奠定了建立川康苏区胜利的基础，证明了向南不利的胡说，达到了配合长江一带苏区红军发展的战略任务，这是进攻路线的胜利。甚望你们在现地区坚决灭敌，立即巩固扩大苏区和红军。并将详情电告。

朱、张

十二日

张国焘的电报是发给红一、红三军团的，而“徐、刘”指的是徐海东和刘志丹，这就是说电报同时也是发给红十五军团的，然后再转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博古。

张国焘“证明了向南不利的胡说”这句话，说得太急切了——欠缺军事常识的张国焘并不知道，总兵力仅几万人的红四方面军，就其目前所处的位置来讲，正面临着极其危险的境遇。

同日，中共中央给张国焘回电，旨在提醒他谁才是党中央：

朱、张、徐、陈诸同志：

（甲）我一、三军已同二十五、六、七军在陕北会合，现缩编进行粉碎敌人围攻的战斗。

（乙）中央及中［央］政府、红军陕北间工作磋商［正］与白区党及国际取联系。

（丙）对时局中央已发表宣言，检查政府及中革军委工作，将来再发宣言号召抗日反蒋战争，重申诸协定。

（丁）你们以总司令及四方面军名义，在中央历次对蒙古的范围内发表主张外，不得用此名义作［任］何表示。

（戊）关于方针你们目前应坚决向天全、芦山、邛崃、大邑、雅安发展，消灭刘、邓、杨部队，求得四方面军的壮大，牵制川敌主力残部，川、陕、甘、晋、绥、宁西北五省局面的大发展。

（己）你们战况及工作情形，应随时电告党中央。

十一月十二日

十一月十三日，红四方面军集中了中纵队的全部力量：第三十军、第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和九十一师的两个团、第九军二十五师，再加上右纵队的第四军，一共十五个团的兵力，向天全、芦山的东北方展开了进攻，在朱家场、太和场一线击溃川军两个团的阻击。接着，红军向位于观音场、百丈关的川军阵地发动了攻击。战斗持续了一整天，川军第一〇四师师长李家钰下令放弃百丈关。

百丈关，卡在名山北上邛崃的交通要道上的战略重镇。

百丈关的失守不但令红军直接威胁了四川“剿共”军总司令部所在地邛崃，而且已经有了从北面直袭成都盆地的可能。于是，刘湘严令

南路军总指挥潘文华无论如何要把红军的攻击遏制住。潘文华亲自率领特务营，举着手枪，站在公路上制止川军的溃逃，并指挥第四师逆败兵前行，阻击一路追击而来的红军。增援的川军模范师廖敬安旅到达了邛崃，刘湘立即说："到南桥去领子弹，到军需处去拿钱，然后赶快给我上去！"接着，第四师师长范绍增率领着师部也到达了前线。大量的川军堵截了红军追击的路线，双方终于在黑竹关、治安场、王店子一线形成了对峙。

红四方面军如果再继续追击，就可以进入富饶的川西平原了。

而对于川军来讲，百丈关是川西平原的最后屏障；一旦失去川西平原，失去成都盆地，川军还何以为川军？绝不能让红军进入川西，进而威胁成都，最后"赤化"整个四川。在这个性命攸关的前提下，庞大复杂的川军将所有内部的矛盾与恩怨都让位给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紧急调动所有的兵力，在进入川西平原的通道上，与红军决一死战。

邛崃至名山的公路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公路以北不出几里就是川西山区，公路以南则是丘陵间的旱田耕地，而扼守在公路上的百丈关四周地势平坦，有利于重武器和大部队的展开。

川军各部队开始向百丈关一带集结，规模之大在川军历史上不曾有过：第二十一军唐式遵部的两个师、第四十一军孙震部的三个旅、模范师郭勋祺部的三个旅、第一〇四师李家钰部的四个旅同时向战场上急驰。至十一月十八日，在百丈关附近狭小的地域内，川军集中了八十个团约二十万的兵力。

同时，蒋介石命令正在围困红二、红六军团的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立即北上，火速向百丈关开进。

鉴于之前川军的不战即溃，总指挥刘湘发布了《告剿共官兵书》：凡有临阵退缩，畏敌不前，或谎报军情，作战不力者，一律军前正法。其余各级官兵，倘有违令者，排长以下得由连长枪决，连长得由营长枪决，营长得由团长枪决，团长得由师长枪决，师长得由总指挥枪决，总指挥倘有瞻徇隐匿者，由总司令查照依法严办。

百丈关，距离成都不足一百公里的一个普通小镇，很快就会成为令川军和红军都难以忘却的血流成河之地。

十一月十六日拂晓，川军第四师第十旅向治安场的红军阻击阵地发起了进攻，目标是百丈关。第十旅顺着公路以三路队形在机枪和火炮的掩护下不断冲锋，一线和二线部队轮流交替进行，红军阻击部队付出了巨大伤亡的代价，依旧无法遏制川军的攻击，被迫开始向黑竹关方向撤退。川军投入了预备队追击进攻，红军放弃了黑竹关撤退到挖断山。川军在百丈关战斗一开始便显示出的决死势头让红军官兵始料不及。在增援部队陆续到达后，红军开始了猛烈的反击。在黑竹关至挖断山一线，双方展开了残酷的拉锯战。川军投入的重武器火力十分猛烈，第四师和模范师的部队在阵地上前后一字排开，无论红军的反击如何坚决，他们退下去又接着冲上来。第十旅投入了全部兵力，仅在挖断山附近的战斗中就付出了伤亡五百人的代价，而红军的伤亡也达几百人，双方官兵的尸体在战场上堆叠在一起，残肢在剧烈的爆炸中连同潮湿的泥土一起四处飞溅。模范师第三旅的旅部就设在公路边，其八团在公路南，九团在公路北，督战的宪兵横枪站在公路上。红军的反击沿着公路直接向川军的碉堡展开，但是碉堡里射出的重机枪子弹令红军无法推进。红军立即改变了攻击方式，沿着公路两边的田埂前进，川军马上将迫击炮的炮口对准了没有任何遮蔽的田野。在剧烈的爆炸声中，红军官兵倒下一批又有一批紧跟上来，川军面对红

军决死的态势惊骇不已。第三旅旅长廖泽看出了川军阵地上的动摇，他带着手枪队和预备队赶到了前沿，大喊：“我们必须死守，后面就是总指挥部！谁要是后退，就地枪决！”不敢撤退的川军只有拼命射击，把成束的手榴弹投向进攻中的红军。廖泽知道，机枪手是战场监督的重点，于是他两眼发红地站在机枪手的身后，机枪手一看干脆站起身来射击，冲在最前面的红军纷纷倒下。在剧烈的对抗之后，红军的攻势逐渐减弱，廖泽不顾一切地命令手枪队和预备队全线出击。两军开始了混战，双方官兵厮打在一起。廖泽的预备队队长和手枪队队长都在肉搏中被打死。在付出了几近伤亡一半的代价后，红军的攻势暂时停止了。此时，攻击公路南侧川军阵地的红军部队也出现了巨大伤亡。红军被迫撤出了百丈关战场。

川军的决死坚守和强行推进取得了初步进展。

这是自天全、芦山战斗以来，川军首次没有撤退反而推进了。

川军连夜补充兵力和弹药，并且给官兵分发了大洋。

十七日，红军再次发动了攻击，攻击的重点集中在百丈镇。程世才和李先念把第三十军的指挥所就设在了镇子附近的一个小山包上。由于连日血战未见成效，徐向前亲自去了前沿指挥所。一路上，天上是敌人的飞机，四周是猛烈的炮火，徐向前在枪弹纷飞中绕来绕去，才到达第三十军指挥部。徐向前和李先念的共同判断是：刘湘已经孤注一掷了，但是红军只要顶住敌人的攻势，寻找时机灭其一部，就有可能转入反攻。而目前最大的威胁是敌机对红军阵地持续不断的轮番轰炸，部队处在开阔地带无法隐蔽，又没有对付敌机的有效武器，冲击部队的头顶上炸弹像下雨一样。

川军新一轮的进攻又开始了。

就是否还能拥有富足的川西平原而言，百丈关之战是川军没有任何退路的战斗。

身经百战的徐向前意识到：对于红四方面军来讲，此战凶多吉少。

东、北、南三个方向，整团整团的川军黑压压地上来了。

天上的敌机一次又一次地俯冲投弹。

红军的阻击阵地上一片火海。

川军采取了集团冲锋的方式。在红军数十挺机枪的扫射下，公路和田地里躺满了川军官兵的尸体，但是川军的攻势依然没有减弱的趋势。在百丈镇东侧的桥头，红军临时修筑了堡垒，川军在攻击这些堡垒的时候，数次冲锋都没有取得效果。督战的川军军官把成筐的大洋抬到了前沿，现场招募敢死队，结果一百多人争相报名。川军把机枪和火炮都集中过来，一齐向红军的堡垒轰击，敢死队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也开始了冲锋。红军的堡垒被一一炸塌，川军的敢死队冲到了桥头。但是，在那一瞬间，红军官兵突然从坍塌的堡垒废墟中冲出来，与川军的敢死队展开肉搏。大刀和刺刀尖厉的碰撞声、官兵们的咒骂和厮打声混合在一起，鲜血在地面流淌，倒下的伤员在血泊中呻吟。红军和川军的后续部队不断拥挤上来，小桥上堆积的人已经无法分别敌我，红军和川军血淋淋地厮打在一起。一支红军部队绕过桥头，到了川军攻击部队的后面，但是他们发现川军的预备队兵力十分充足，红军试图袭击的部队立即与川军的预备队发生了搏斗。在川军逐渐感到不支的时候，国民党军的飞机开始了不分敌我的猛烈轰炸，轰炸从

桥头一直延续到百丈镇，百丈镇刹那间砖石横飞，大火冲天。红军被迫撤离了战场，川军终于突破桥头进入了百丈镇。

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命令王维舟负责向百丈镇运送弹药、转运伤员。作战部队的弹药快要接济不上了，大量的伤员根本无法转运出去。王维舟只好打电话给第三十一军参谋长李聚奎求援：“你来帮帮忙吧，伤员太多，我一个人搞不赢啦！”李聚奎正带领第三十一军直属队在镇后待命，他放下电话骑上骡子赶到了百丈镇。王维舟的指挥所设立在街道上的一家店铺里，他一看见李聚奎就说：“后面又发现了敌人！”话音未落，通信员就喊起来了：“敌人冲进来了！”李聚奎出了店铺一看，川军已经蜂拥而来。他赶快跑到隔壁的红四军十师政治部，通知他们赶快撤离，然后他和王维舟急忙往镇外跑。川军在后面紧追不舍，第三十一军教导队及时冲了上来，才把追击的川军廖泽旅三十一团一连顶了回去。三十一团团长谢浚冲进百丈镇的时候，抬头看见了一面红旗，上面写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一军政治部”。谢浚觉得自己立大功得大洋的机会到了，他立即把这个好消息报告了旅长廖泽，但是他的一连没等他的命令就追了出去。这个连的连长是土匪出身的王廷章。一连追了没多远，就遭到红三十一军教导队的阻击，亡命连长王廷章即刻就被红军打死了，全连逃回镇子里的官兵只剩下二十多人。

红军又开始了反击。由于撤离百丈镇时太仓促，大量的枪支弹药和伤员全部丢在了镇子里，因此必须反击回去。许世友的第四军的一个团在陈锡联师长的带领下跑了上来，接受了任务之后，陈锡联把袖子一捋对官兵们说：“冲进去，打！”红军官兵如同一股洪水向镇子里的川军席卷而去，刚刚占领了镇子立足未稳的川军瞬间就被打了出去。李聚奎带着教导队跟在陈锡联的后面进了镇子，令他们没有想到

的是，镇子里的第三十一军指挥部已经遭到了川军的洗劫，枪支弹药都丢失了，王树声的两个文件包也被翻了个底朝天。经过清查，文件居然一份也没少！红军这才知道川军只要财物。清查文件的时候，有一份文件让第三十一军参谋长李聚奎感到十分意外，这竟是一份张国焘制定的再次北上穿过松潘草地的计划！

尽管后来红四方面军确实再次北上，并且第三次穿过了松潘大草地，但是在张国焘一心一意实施他的南下战役的时候，出于什么原因和目的如此超前地制定了这样一份回头北上的计划，无法解释。

被红军反击出百丈镇的川军逃到了东面的桥头，被督战的手枪队截住了。川军官兵看见他们的团长谢浚也拿着把大刀站在那里。有川军士兵说：“他捡了一把红军的大刀！”官兵们正犹豫，谢浚团长竟然横躺在地上，将手里的大刀来回舞着：“要与百丈镇共存亡！谁后退我就砍了谁！”川军的增援部队很快就到了。天黑了下来，川军在镇子的东面，红军在镇子的西面，两军对峙入夜。

第二天的战斗更加激烈。为了争夺百丈镇，红军和川军几进几出，镇里镇外布满了双方官兵的尸体，相持不下的战斗持续了整整三天。徐向前后来回忆道：

> 二十一日，我黑竹关一带的前锋部队被迫后撤，敌跟踪前进。二十二日，百丈被敌突入，我军与敌展开激烈巷战。我到百丈的街上看了下，有些房屋已经着火，部队冒着浓烟烈火与敌拼搏，打得十分英勇。百丈附近的水田、山丘、深沟，都成了敌我相搏的战场，杀声震野，尸骨错列，血流满地。指战员子弹打光，就同敌人反复白刃格斗；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拉响手榴弹，与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百丈战斗，是一场空前剧烈的恶战，打了七天七夜，我军共毙伤敌一万五千余人，自身伤亡亦近万人。敌我双方，都打到了精疲力尽的地步。

在百丈关这个狭窄的战场上，短短七天之内，双方伤亡官兵竟然达到了两万多人，战斗之惨烈难以尽述。

此时，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的六个师到达了洪雅、雅安一线。

十一月二十二日，红四方面军决定放弃预定计划，撤离百丈关地区。

此时，川军的重兵集结在芦山、天全的东面，国民党中央军集结在芦山、天全的南面，红四方面军南下和东出的计划都已无实现的可能。

百丈关一战，成为红四方面军从战略进攻到战略防御的转折点。

张国焘坚持的南下计划最终被百丈关阻断了。

已是冬天，四川西部风雪弥漫，天寒地冻。

就在红四方面军与川军进行着“尸骨错列，血流满地”的战斗的时候，在川西遥远的东北方向，红一方面军与张学良的东北军在一个叫直罗镇的地方也进行了一场血战。

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引起了国民党军的极大恐慌。十月二十八日，国民党军西北“剿共”总司令部重新调整了部署，企图以五个师的兵力沿着陕西西部的葫芦河对红一方面军形成封锁线。具体部署是：东北军第一〇六、第一〇八、第一〇九和第一一一师，由甘肃庆阳、合水地区沿葫芦河东进；第一一七师由洛川北进，然后沿葫芦河西折。

从甘肃东进陕西的东北军四个师在行军路线上有南、北两条线可以选择：南路经甘肃、陕西交界处的太白镇向东南方向，经过上畛子直接前往洛川。这条路平坦，相对安全，不久前第一一七师就是走这条路到达洛川的，但是走这条路要比走北路多出两百多里。而北路不但道路狭窄，且要通过苏区边缘地带的黑水寺、直罗镇、张村驿等地段，容易受到红军的袭击。当时，四个师的绝大多数军官都认为应该走南路，唯独第一〇九师师长牛元峰说："我主张走北路。我们晚走早住，怕什么？胆小还打什么仗！我一个师都不怕，咱们一共有四个师怕什么？"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东北军四个师开始沿北路东进。先头部队就是牛元峰的第一〇九师，然后是第一一一、第一〇六和第一〇八师，总兵力三万人。

东北军的作战部署对于红军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东北军装备精良，战斗力强，如果他们的封锁线一旦构成，红军就会被困在一个狭窄的地域里，冲破"围剿"将是十分艰难的，红军的生存也将面临严重危机。

红一方面军能不能在陕北站住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战的胜负。

对于红军来讲，此仗不但要打，而且必须打胜。

如果让东北军突进根据地，红军就只能再度转战。

直罗镇战役是红军没有任何退路的战斗。

直罗镇，一个不足百户的小镇，三面环山，一条从西而来的大道穿过小镇。镇东面有座破旧的石头围墙的小寨子，小寨里的房屋因无人居住已经坍塌。北面是那条平缓的葫芦河。红军将领们仔细地查看了战场上的每一棵树、每一道坡，都认为这里的地形如同一个大口袋，是伏击敌人的绝好地点。查看完战场地形，战斗计划也制定完毕，大家都对镇东头的那个破旧的小寨子不放心，于是专门派第十五军团的一个营把那座寨子拆了，以免战斗打响后被敌人利用。

十一月十九日，红一方面军指挥部进入了张村驿镇。

同一天，一支红军部队奉命前去引诱敌人的先头部队进入伏击圈。

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是个行事谨慎的人。走到离直罗镇不远的黑水寺时，他召集了师长会议，特别提醒部队要提高戒备，加强相互间的联络，并制定了各部队相互掩护的具体计划。

第二天，先头部队第一〇九师在师长牛元峰的率领下从黑水寺向直罗镇行进。下午四点左右，在红军那支边打边退的小部队的引诱下，第一〇九师渐渐开进了直罗镇。六二六团和六二七团占领了镇子两侧的高地，并展开了警戒。师长牛元峰一边往镇子里走，一边让副官给董英斌发电，说他已经占领了直罗镇。

牛元峰，山东沂水人，毕业于东北讲武学堂，曾经出任东北军辎重司令多年，因为跟张学良的关系十分密切，所以除了轻视红军之外，连军长董英斌也不在他的眼里。但是，终究是辎重部队出身，刚任野战师师长，别说是作战经验，他根本就没指挥部队打过仗。

天黑了，各路红军悄悄地将直罗镇包围了。

十一月二十一日拂晓，红军的冲锋号突然响起。红一军团二师、四师、十三团从三面向牛元峰的部队发起了猛攻。第一〇九师各团的联络瞬间就被红军切断了。还在睡梦中的东北军官兵不是被打死就是被俘。六二六团团长在最后一刻开枪自杀，六二七团团长身负重伤后死亡，两个团的剩余官兵在红军的追杀下四处逃散。红军主力部队直扑镇子中央，第一〇九师师部的大部分人员、物资和马匹全部落在了红军的手里。

红军的袭击如此突然，东北军事先没有得到任何情报，各师也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这让师长牛元峰茫然不知所措。他认为头天下午他走进镇子的时候，如果有如此数量的红军埋伏在附近，他的四个团向四面放出的警戒哨怎么可能什么都没发现呢？而且红军向来惯于夜袭，可是一个晚上都睡得好好的，为什么天一亮就成了这个样子？红军冲进镇子的时候，牛师长带着警卫人员和一部分士兵跑到了镇南面的小山上，但是红军的追击部队紧跟着就上来了。他又往东跑，钻进了镇子东头那个有石头围墙的寨子里。

寨子立即被红军包围了。

这个事先让红军拆了的小寨子，昨天晚上竟然被东北军修复了。也许东北军军官比他们的师长更懂得一些军事常识。

周恩来上来了，在望远镜里观察了一会儿，对带领部队冲到这里的徐海东说：“围住了就行，里面没有吃的没有水，他们总是要出来的。”

牛元峰躲在寨子里不断地发电报，要求董英斌派部队解救。董英斌派出的第一一一师六三一团还没看见直罗镇就遭到了红军的伏击，

六三一团即刻逃回黑水寺去了。万般无奈的牛元峰把被围的情况报告给了张学良。

晚上十点，西北“剿共”总司令部决定，在直罗镇地域与红军决战。

总司令部直辖第一〇六师、第五十七军第一一一师奉命立即向直罗镇增援，第六十七军第一一七师奉命向红军指挥部所在地张村驿发动进攻，西北军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奉命配合第一一七师作战。

二十二日上午，第一〇六、第一一一两个师起程向直罗镇增援，而第六十七军的第一一七师和西北军的第十七师竟然都原地未动。

国民党军各部队之间的芥蒂再次成全了红军。

红军抓住时机先打击第一一一师，然后集中兵力攻击黑水寺的第五十七军军部。董英斌唯恐自己的部队被红军歼灭，在第一〇六师的掩护下向太白镇方向撤退。红一军团二师和红十五军团七十五师分三路迅猛追击，终于追上了第一〇六师的后卫六一七团，并把这个团歼灭在羊角台至张家湾的途中。

被包围在小寨子里的牛元峰此刻已经是饥渴难耐。当直罗镇的西边响起了枪声的时候，他认为这一定是增援部队来了，于是决定率领身边仅剩的五百多人突围。突围前，牛师长还到各连作了最后的嘱咐：“到了紧要关头，除了死里求生，没有别的办法。”半夜十二点，突围的队伍刚一出寨子，就被一直包围着寨子的红十五军团冲得七零八落。牛元峰在卫兵的掩护下一路狂逃，连着翻过了十几个山头，身边只剩下参谋处处长和一个副官了。天已经亮了，追击的红军越来越近，已经可以清楚地看见跑在前面高喊着“缴械”的红军官兵的模样

了。牛师长彻底绝望了，他把自己的勃郎宁手枪递给副官说：“把我打死吧。”副官接过手枪照着牛元峰的后脑开了一枪，子弹从牛元峰的前额穿出，在面颊的上半部炸出了个大窟窿。

红军全力攻击第五十七军退守的太白镇，未克。

红军掉头去找第六十七军的第一一七师，而这个师早已经逃得没了踪影。

红军就此收兵。

是役，红军共歼敌一个师加一个团，毙伤敌一千余人，俘敌五千三百六十七人，缴获长枪三千四百支、短枪一百二十支、轻机枪一百七十六挺、刺刀一千三百五十九把、子弹二十二多万粒，电台两部。

红军伤亡八百四十八人。

直罗镇战斗对于红一方面军是一个转折点：经过一年的长途跋涉，红一方面军终于有了一个可靠的立脚点和谋求新的发展的出发点。

而对于中国历史来讲，一个真正的转折点就要来临了。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高呼着“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口号的六千北平学生走上了街头。

对于那些已经走完了漫长的征途，还要继续在征途上前行以及正准备踏上艰苦征程的红军官兵来说，此刻，他们并不知道在遥远的北平那个寒风凛冽的冬日里发生的事件，将对他们的命运和前程产生多

么巨大的影响。而毛泽东已经敏锐地意识到，经历了重重磨难的中国工农红军将要与一个能够改变历史的巨大机遇迎面相逢了。

# 第十七章 北上北上

1936年7月·四川甘孜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已经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失去联系数月之久的红二、红六军团突然接到了来自中革军委电台的信号，信号传来的是一封明码电报：

弼兄，我们密留老四处。弟豪。

第二军团政委任弼时喜出望外。

“豪”即“伍豪”，就是周恩来。

但是，“我们密留老四处”是什么意思呢？周恩来为什么不使用事先约定的密码，而使用明码发电报呢？

出于警惕，任弼时当日用密码回发了一封询问电报：

恩：

（一）我们八月二十七日占领澧州、津市、石门、临澧，现已退出。

（二）我们将敌原“围剿”计划冲破，准备粉碎敌对我们新的大举“围剿”。

（三）你们现在何处？久失联系，请来电对此间省委委员姓名说明，以证明我们的关系。

弼时

九月二十九日

第二天，任弼时收到的回电使用的是事先约定的密码：

一、二十九日来电收到。

二、你们省委弼时书记，贺龙、夏曦、关向应、萧克、王震等委员。

三、一、四方面军六月中在懋功会合行动，中央任国焘为总政委。

四、广播蒋敌×十月在宜昌建立川×湘黔剿×行营，刘湘已调许绍宗师九个团进攻你们。

五、望你们以冲破敌之原“剿”部署的英勇和经验来冲破新的“围剿”。

六、我们今后应互相密切联络。

朱、张

三十日

“朱”自然是朱德总司令，电文中说中央已经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电报是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联名签署的，使用的又是红二、红六军团与中央约定的联络密码，那么此电确实是“中革军委”发来的。

突然恢复了与“中央”的联系，使正值困境中的红二、红六军团领导人万分高兴。他们不知道，他们收到的电报并不是他们认为的中革军委发来的，实际上只能说是红军总部发来的——红二、六军团对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又分路北上、南下一无所知。

事情的原委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北上之后，周恩来很想与红二、红六军团恢复联络，但是联络的电报密码保存在红军总司令部，于是周恩来不得不用明码电报与任弼时联系。明码电报中“我们密留老四处”，就是“电报密码在四方面军”的意思——周恩来强调密码在哪里，一方面是想告诉任弼时已经无法用密码联络；另一方面也许还想告诉红二、红六军团：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已经分离。但是，当时的任弼时无法理解这一点，包括他在内，红二、红六军团的官兵可以设想一切，但是无法设想红军内部会产生分裂。

任弼时给周恩来发出的询问电报使用的是密码，没有密码的周恩来自然无法收到，即使收到了也无法读出。而掌握着联络密码的红军总部电台收到了任弼时的电报，并且随即译了出来。于是，张国焘回电了。回电隐瞒了红一、红四方面军已经分路行动的事实，仅仅告知两军已经“会合行动”了。

从此，红二、红六军团一直和他们认为的“中革军委”保持着密切联系。而实际上，关于他们行动的所有指示都是来自红军总部而不是中革军委。直到数月之后，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时候，他们才明白这一点。

但是，无论如何，与上级恢复了联络，这对红二、红六军团的未来命运来讲，万分重要。

当时，红二、红六军团总人数已达两万一千多人。他们创建并坚守的湘鄂川黔根据地，北临武汉南接长沙，对长江中游一带的国民党军威胁很大。因此，当红一、红四方面军以及红二十五军进入了中国西部最荒凉的地区之后，蒋介石调集了一百四十一个团的兵力，对红二、红六军团开始实施大规模“围剿”，企图彻底消灭这支仍扎根在国民党统治区腹地的红色武装。

蒋介石认为：此前湘军、鄂军对红二、红六军团的“围剿”是失败的，失败的原因在于各省军阀间的隔阂使作战指挥无法统一。但是目前中国国内的抗日呼声日益高涨，如仍不能迅速解决“剿共”问题，自己的政治前途将充满危险因素。一九三五年九月，针对红二、红六军团，蒋介石采取了两项措施：一、让国民党中央军加入“围剿”作战；二、步步为营地构筑碉堡，层层严密设防以待寻机实施攻击。

此时，在湘鄂川黔苏区的北、西、南三面，湘军和鄂军部署的兵力已达八十六个团，其主要任务是巩固和加强对红军根据地的封锁；而在东面，国民党中央军第二十六路军的三个师加一个独立旅，樊嵩甫纵队的四个师，共四十二个团，已经推进到五峰、澧县、石门和慈利一线，准备自东向西进击湘鄂川黔苏区；国民党中央军的另一支部队汤恩伯纵队的两个师防守长沙和岳阳；黔军第一〇二、第一〇三师被

配置在北面的利川和宜昌一线，作为总预备队。至一九三五年秋，部署在湘鄂川黔苏区周边的国民党军已达三十万，是红二、红六军团总兵力的十五倍。为了协调作战，一九三五年十月十日，蒋介石设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宜昌行辕，任命陈诚为行辕主任，统一指挥在湘、鄂、黔境内与红军作战的国民党军队。

这一次，国民党军放弃了长驱直入和疾进猛追的战术，采取了逐段筑堡、交替前进的方式，甚至规定部队每天只准行进三到五里，以便一边推进一边修筑碉堡："各防区未成碉堡，赶紧增筑，以班碉为主，依实地形势，构成纵深配备梅花式之碉线网，并注意与邻区碉线双方衔接，勿留空隙。至于交通道路，亦应计划修筑，以利运输。"

面对国民党军的"围剿"，红二、红六军团最初决定依靠根据地和东部的游击区，抓住时机突破东面的进攻之敌，在运动战中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为此，红军先后主动放弃了位于湘北的津市和澧县，集结在石门西北部地域等待战机。但是，由于国民党军步步为营地推进，封锁线不但横向连接严密，纵向也达成了前后掩护，所以红军的出击战机始终没有出现，根据地反而在国民党军的逐步推进中越来越小。根据地的缩小使红军失去了机动作战的余地，同时也使红军的补给发生了严重困难。湘鄂川黔苏区北有长江，南有酉水、沅江，东有浩瀚的湘北湖区，西有长满巴茅的崇山峻岭，对于根据地内的红军来说，国民党军的层层封锁一旦形成，生存危机即刻就会使他们陷入困境。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和军委分会对红二、红六军团的未来行动进行了反复讨论，一致认为根据地内部的"狭小地区"已不利于红军与强大的敌人持久战斗，红军必须迅速从敌人的封锁中

突围出去，转移到根据地以外“无广大堡垒地带”，创造有利的条件对“围剿”之敌进行反击。

十月十五日，朱德、张国焘致电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同意红二、红六军团开始转移：

贺、任、关：

来电悉。

（甲）一切请按实际情况由你们自行决定，必须秘密、坚决、迅速、机动，出敌不意。

（乙）在狭小地区内固守为失策，决战防御亦不可轻于尝试，远征，减员太大。可否在敌包围线外原有苏区附近诱敌出堡垒，用进攻路线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之。上述意见供兄参考。

（丙）我方主力仍在川西北活动，当尽量与你方配合。

朱、张

删［十五日］午

红军总部的电报虽支持红二、红六军团转移，但鉴于红一、红四方面军在转移途中的巨大损失，建议两个军团的转移作战不要走得太远。

三天以后，红军总部再次来电，电报仍没有提及中共中央已经北上，但是通报了红四方面军目前的战斗方位：

贺、任、关：

（甲）删午电收到否？你们行动方针由兄等按实况决定，我们只作一些建议。取守势是最失策，远征损失大，可否在赤区外围和附近地区诱敌，各个击破之。

（乙）我军向川敌回击，刘文辉、杨森均被打垮，现已占领绥靖、崇化、丹巴、抚边、懋功。俘获甚多正追击中。

朱、张

皓［十九日］申［十五至十七时］

自红一方面军北上之后，红军总部发出和接收的电报，朱德并不是每一封都能看见。康克清回忆说："一连十来天不看电报，老总是无法忍受的。他天一亮就到张国焘那里要电报看，而机要员就要去请示张国焘。"

十一月四日，红二、红六军团部队陆续集结到湘西桑植附近。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和军委分会在桑植以北的刘家坪召开了会议，决定部队转移到贵州石阡、镇远和黄平一带创建新的根据地。

决心已下，立即准备。

首先整编部队，将地方武装独立团改编为红二军团五师和红六军团十六师。同时，两个军团都裁减了机关人员充实到作战部队中。红六军团十八师奉命留下，掩护主力突围，开展游击战争，危急时可以追赶主力。

从哪个方向突出去？

红军官兵们说：听贺胡子的。

贺龙和萧克已经决定：根据地东面的国民党军最强大，敌人一定以为我们绝不会迎敌东进，那么我们就先往东走，然后出其不意突然南下。贺龙说：湘中富裕得很哩，只要红军能出去，往哪里打都不吃亏，打下个县城就能得到物资补充。红军的突围计划制定得很周密，重点之一是圈子不能兜得太远，尽量避免靠近广东和广西的边界，以免把陈济棠和白崇禧的部队引过来。

整编后两个军团兵力约两万人。其主要领导是：红二军团，军团长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副政治委员关向应；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政治委员王震。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精英人物。

关于为什么要转移？道理是可以向红军官兵们讲清楚的，过去部队经常“跳到外线”去打仗，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才能够使红军出奇制胜。但是，红军的政治工作者还是遇到了一个特殊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红二军团中显得格外突出：红二军团官兵大部分都是本地人。虽然红军干部没说一旦突围就不回来了，但是什么时候回来也没人说过。家在刘家坪的一个老太太，儿子在红二军团六师当兵，红军干部找到老人讲了红军离开的道理，老太太就去了六师师部，说：“我把儿子交给你们了。”六师政委廖汉生对老人说：“放心！我们会照顾好你儿子的。有我们在，就有你的儿子在。”老太太又说：“打赢了你们就回来。”说着就流了泪。廖汉生对老人说：“不管红军走到哪里，一定会回来的。”——许多年后，廖汉生对那片山清水秀的土地依旧满怀愧疚：“他们的儿子和丈夫许多人都在长征中牺牲了，有些连牺牲在什么地方我都很难说清楚。这笔沉重的感情债在我心头压了几十年。全国解放后的三十年间，我迟迟没有回去看望故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那一年，红军师政委廖汉生二十四岁，他就是桑植人。部队要

离开的事他一直对家里瞒着。出发前夕，母亲得到了消息，走了近三个小时的路来到部队，想再看一眼自己的儿子。廖汉生安慰母亲说他一定很快就回来——廖汉生知道，所有的乡亲都怕自己的亲人一去不还，而包括他在内的一万多湘西子弟却是自此踏上了万里征途，所有活下来的红军官兵与自己的家乡都是一别数年。

陷于痛苦抉择中的还有贺龙的妻子蹇先任，因为十八天前她刚刚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孩儿——要么把小小的孩子留下来，将来再回来寻找；要么她和孩子一起留下来，等红军有了稳定的根据地，自己再去投奔。蹇先任，湘西的第一个女红军，当年在贺龙猛烈的追求下嫁给了她心目中的红军英雄。他们的第一个女儿生于一九三〇年。那时贺龙领导的红四军开始东征，蹇先任因为怀孕只能留下来。在国民党军和地主武装的搜捕下，她在湘西的大山中颠沛流离直至女儿降生。第二年，部队又要离开根据地，贺龙安排她到一个秘密联络点去休养。但是，国民党军来了，蹇先任只得再次带着女儿躲进大山中。湘西的冬季天阴地冷，女儿出了麻疹，蹇先任把女儿紧紧地抱在怀里，直到孩子的气息一点一点地消失。现在，蹇先任无论如何不能把刚刚出生的第二个女儿丢弃，任凭谁来劝说，这位刚强的女红军就是不答应。蹇先任就这样带着她小小的女儿踏上了万分艰苦的转移之路。红军官兵找来了一个湘西农家常用的竹背篓，把那个柔嫩的小女孩儿放在了里边。红六军团政委王震听说了，特意跑过来，他给蹇先任的第二个女儿起名叫贺捷生。王胡子说："希望这个红军的后代能给革命带来好运，让红军永远捷报频传。"贺捷生随红二、红六军团一起上路了，这个出生仅仅十八天的小女孩儿活了下来，在竹背篓中跟随红军从湖南一直转战到陕北，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队伍中最小的成员——数十年后，这个有着传奇色彩的红军的女儿，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位将军。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晚，红二、红六军团两万官兵开始了战略转移。

先头部队是第六军团十七师四十九团，曾在惨烈的甘溪战斗中九死一生的营长刘转连现在是十七师的参谋长。刘转连匍匐在澧水河边，向水中扔了一根木棍，棍子瞬间就被湍急的河水冲得没了踪影。刘转连和四十九团团长王烈不但对水流的汹涌感到吃惊，也对江对岸敌人防御的森严感到了巨大的压力。澧水对面的高地上布满了敌人修筑的堡垒，堡垒露出的射击孔密集得像蜂窝一样。没有船，也不可能搭起浮桥，红军必须从毫无遮拦的澧水上迎着敌人的火网冲过去。

突破国民党军在澧水和沅江一线构筑的封锁线，是红二、红六军团突出重围的第一步。

刘转连和王烈商量了一下，决定组织一个突击队，在夜色掩护下偷渡澧水。王烈亲自带一个营跟在突击队的后面，偷渡不成功就强渡。三十名水性好的红军官兵被挑选出来，每人八颗手榴弹。天黑下来的时候，突击队开始向澧水靠近，后面王烈率领的突击营紧跟着。但是，红军刚一摸近澧水岸边，对岸的敌人就开火了。国民党军没有丝毫的松懈，他们发现了红军的偷渡行动。王烈团长不得已率领部队开始强渡。

事先预备好的竹筏刚一推下水，就被迅猛的水流冲散了架。对岸敌人的子弹在黑暗中风一样地呼啸而来，没有时间回头重新弄筏子了，红军官兵不顾一切地扑下了水，很多人就抱着一根竹竿，向敌人的枪口发出火光的地方游去。如果从单纯的军事角度看，红军的强渡行动几近自杀，因为在他们的身后，掩护的火力十分微弱；而在他们的面前，敌人的机枪已把河面打得水花四溅。堡垒后面的炮弹打过

来，在澧水上打出了一个又一个巨大的浪涌。火光中的红军几乎没有还击能力，但是他们只要还活着，就默默地向对岸奋力游去。留在北岸的刘转连焦急万分，他希望能够回来一个人报告突击情况，哪怕游回来一个伤员呢。但是，被子弹击中的沉到江底，被江水卷走的消失在黑暗的下游，红军官兵没有一个人回头。突然，澧水对岸离滩头最近的一个堡垒燃起了大火，幸存的红军官兵在火光中爬上了岸。堡垒中的敌人在这一刻也冲了出来，双方官兵在泥泞的滩头展开了肉搏。

过了澧水的红军突击部队已经没有了指挥员。

四十九团团长王烈一上岸就扑倒在了泥泞中，身边的战士喊他没有回应，战士们用手一摸，团长的身上黏糊糊的，把手伸向亮处一看，全是血。

那些还没有上岸的红军官兵依旧在水中游着，他们看见了滩头上的肉搏情景，他们知道自己的战友急需支援，他们用最大的力气高喊着：“杀呀！杀那些个狗娘养的！”

刘转连知道，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抱着竹竿游过去。

到澧水上游侦察的侦察员回来了，报告说距离这里几里的地方，有个地方可以徒涉。

刘转连立即带领部队火速奔过去。徒涉点对岸的敌人已全部被强渡的红军吸引过去了。十七师的红军官兵手拉着手迅速地过了澧水，然后扑向了敌人的堡垒。砖石砌的堡垒顶盖却是稻草的，里面也铺满了稻草，只要一颗手榴弹扔过去，堡垒就燃烧起来。这个烧起来再打下一个，红军连续点着了十几个，沿着澧水南岸，国民党军的堡垒烧成了一条火龙。刘转连一直向突击队强渡的方向打，终于打到了那个

渡口，滩头的肉搏战已经结束，淤泥中到处都是尸体，红军突击队和跟随突击队前进的那个营已经牺牲过半。在黑暗的滩头上，刘转连找到了王烈团长的遗体。红军战士说：抱着竹竿强渡的时候，团长就中弹了，但他还是坚持到了滩头，上了滩头再次中弹，团长倒下去就再没站起来。

占领了渡口的四十九团官兵搭起了浮桥之后，刚坐在滩头的泥泞中想休息一会儿，一个声音在黑暗中传了过来："睡不得！睡不得！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候！再坚持一下！"是军团政委王震。王震对刘转连说："再走两百里路，必须抢在敌人前面，把沅江的大宴溪渡口拿下来！"

红军强渡澧水是突然发起的行动，现在红军的行动目标已经暴露，敌人必定会加强第二道封锁线的防守，所以红军必须赶在敌人调动完毕之前渡过沅江。四十九团的红军官兵立即出发了。一路不停顿地走，一直走到了第二天晚上八点，前面的侦察员报告说，渡口对岸的村子里只有十六名民团。红军很快就解决了沅江两岸的敌人，开始架设浮桥。王震也赶上来了，正研究大部队渡江计划，江面上突然传来划船的声音，还有手电筒的光束在晃动，刘转连立即命令把机枪架起来。船慢慢接近了江岸，船上的人先发问："哪个部分的？"红军回答："李司令的！"船上显然也是国民党军李觉纵队的官兵，因为他们马上说："自己人！"三只大船靠了岸，立即连船带人被红军扣押了——是李觉纵队的一个营，一共三百多人，奉命前来防御沅江大宴溪渡口。这个营的营长在王震面前一个劲儿地抓头皮："不对不对，昨晚还接到大庸的电话，说你们在澧水的潭口，怎么一夜就到了这里了？"

红军全部渡过沅江后，由于已经位于国民党军包围圈的后面，于是立即抓住有利时机出击，攻占了沅江以南的几个县城。从二十三日

至二十八日，短短的五天内，红二军团四师占领了辰溪，五师占领了浦市镇，六师占领了溆浦；红六军团十六师占领了新化，十七师占领了涟源和锡矿山——这是湖南中西部面积广大的一片区域，从地图上看，这个区域处在整个湖南省的腰部，四面通达，物产丰富。一九三五年的时节已进深秋，谷草垛堆得像山一样，收割过的稻田里放了冬水，明亮的水面照映着橘园里橙黄色的蜜橘——这里无疑是红军建立根据地的好地方，如果红军能够在这里站住脚的话。

可以想见长期受物资匮乏困扰的红军是何等的兴奋。从数个县城缴获的物资堆积如山，粮食和盐巴足够和穷苦百姓们一起分享，数万大洋再次充实了各部队供给部门的担子。红二军团在辰溪截住了国民党军的一支运输船队，仅布匹就缴获了两万匹，足以使全军每个官兵都穿上新衣服。锡矿山，今名为矿山，这里有当时湖南省最大的锑矿，有几十家矿产公司和冶炼厂。在大革命时期，这里的工人就有过革命斗争经历，因此红二、红六军团突入湖南腹地后，这里便成红军筹款和扩军的一个理想之地。

从军事上看，红军占领锡矿山的行动过于向东了，从而使得两个军团的主力部队过于分散，从最西边的浦市镇到最东边的涟源县城，红军的战线仅直线距离已达两百公里。后来的事实说明，这在军事上确实会造成不利。

占领锡矿山的行动，是红六军团十六师完成的。十六师四十七团为先头部队，他们穿过新化县城向东直接突击了锡矿山。当时这片矿区里只有两百多名矿警守卫，保安团保护着矿主和豪绅在红军到达之前就跑了。红军占领了矿区之后，迅速分散到矿厂、街道和附近的农村，大规模地开展群众工作。十六师政委晏福生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是中国红军动员百姓的一个经典范本：“矿山老板不劳动，却养得

肥头大耳，整天吃喝玩乐；你们工人天天在矿厂劳动，晒得墨黑，饿得皮包骨头。这是为什么？是因为矿山老板残酷地压迫和剥削你们，是你们的血汗养活了他们。我们只有团结起来，打倒他们，才能翻身过上好日子！”矿山工人成为红军打击矿主和豪绅的助手。宝大兴北矿老板杨笃吾和南矿开源公司老板段楚贤是红军和工人斗争的重点。工人们说，杨笃吾有矿地几千亩，在冷水江和安化等地开有六家公司，每天收的大洋有几箩筐，还建有豪华的庄园；段楚贤是个暴发户，在锡矿山有采矿厂和冶炼厂十多家，雇佣的工人有六千多，每天收入大洋上万。在工人们的带领下，红军抄了这两个矿主的家。他们早就把财产转移了，金银细软和大洋被装进煤油桶埋了起来。工人们带领红军到处寻找藏宝地点。他们担着水，在怀疑藏有财宝的地方把水泼上去，哪里渗水就说明那里一定藏有东西。工人们的这个办法很灵，仅在杨笃吾家的院子里，红军就挖出了几煤油桶的大洋。所有没收的粮食和衣物，红军一律向矿工低价出售：只要一块大洋，就可以担回去一担稻谷；如果实在没有钱，说明情况后尽管来担；家里没有劳动力的孤儿寡女，红军战士们给担上门去。一时间，贫苦群众蜂拥而至，担粮食的人彻夜不绝。由于敌情日益紧迫，红军在锡矿山仅停留了四天。但这四天无疑是赤贫工人的盛大节日。尽管到锡矿山“打富户”的重要目的是为红军筹集现款，但是，在贫富差别巨大的社会中，突然而至的红军所讲解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反抗的道理，无疑将给中国社会最底层的民众留下深刻的印记。

红二、红六军团突破国民党军的合围，突然出现在湖南的中西部，蒋介石不得不把“围剿军”迅速改编成“追剿军”，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负责向红二、红六军团发起追击：樊嵩甫纵队的四个师和李觉纵队的三个师兵分两路，一部由慈利渡过沅江向新化、溆浦发展，另一部由沅陵、泸溪南下向辰溪、溆浦发展，最后东

西两路实施合击。同时，陶广纵队的三个师和郭汝栋纵队的八个团前进到沅江西岸堵截。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由徐清泉的第四十八师继续“围剿”留在那里的红十八师，并防止红二、红六军团一旦出师受挫返回根据地。

在国民党军的各路追击部队中，李觉纵队的前进速度最快。这是湘军中的一支主力，李觉辅佐何键治湘多年，深得何键信任。红军从湘鄂川黔根据地突围后，蒋介石派来的宜昌行辕主任陈诚宣布：红军从谁的防区正面突破，就撤该防区指挥官的职。李觉知道国民党中央军此举是为了找各种机会、各种借口达到兼并湘军的目的。而李觉的部队不仅防线最长，且由于位置靠前最容易被红军突破。李觉想出的办法是将他手下的第十六师布防在靠近陈诚指挥部的位置，因为第十六师师长章亮基与陈诚是保定陆军学校的同学，彼此之间私交甚密。有交情就会走动频繁，走动频繁就能及时获悉各种情报和动态。果然，李觉的防线至今还没让陈诚找到下手的借口。

十一月三十日，李觉的第十六、第十九和第六十三师的先头部队已经推进到浦市镇和辰溪附近，如果这时红二、红六军团兵力集中的话，李觉纵队的单独冒进正好给了红军歼灭他们的机会。但是红二、红六军团各部队依旧处在分散状态中，无法形成打击敌人大部队的合力。而等到红军开始收拢部队时，国民党中央军樊嵩甫的四个师到了——红二军团六师在距溆浦县城约十公里处与突击而来的李觉的部队遭遇，六师参谋长常德善指挥十七团奋战一天，始终没能将敌人击溃。李觉部因此得以推进到被红军占领的溆浦城下。樊嵩甫的部队就是这时候到达战场的。

贺龙和任弼时骑马来到溆浦县城的时候，整个县城已处在一片混乱中，城内的百姓因惧怕战事蜂拥向城外奔逃，城门已经被人群堵

塞。贺龙认为面对强敌不可硬拼，于是命令六师撤出战斗，把掩护城内军团后方机关撤离的任务交给了红军学校。

贺龙的这一决定把红军学校校长谭家述急出了一身汗。红军学校只有四个营的兵力，兵临溆浦城下的国民党军有好几个师，敌人对县城的冲击一旦开始，后果不堪设想。谭家述赶紧给王震发了电报，请求派部队支援。谭家述的电报发出的时候，李觉的第六十三师已经开始攻城了。

王震向四十七团团长覃国翰交代："立即从锡矿山出发，务必在明天下午五点之前到达溆浦。"

此刻的溆浦县城已处在国民党军的炮击之中，民房集中的城北大火熊熊。红军学校的四个营顽强阻击着国民党军的进攻。由于敌我兵力过于悬殊，红军的城防阵地一个接一个地丢失，谭家述不得不命令官兵撤到城的西北一角拼死抵抗。

下午四点，四十七团到了。谭家述在电台里喊："覃团长！赶快把敌人压下去！让城里的机关撤出来！"四十七团在十六个小时里跑了一百多里路，没有吃饭没喝水，红军官兵一声呐喊冲进了浓烟滚滚的溆浦县城。萧克率领的教导团和警卫营也赶到了。溆浦城外，红军展开了一场拼死冲击。县城门口，红军机关的车马队、医院和家属连首先出来了，他们必须通过双方交战的地段才能转移到安全地区。谭家述对女同志们喊："谁也不许乱！听指挥！伤员都要带走，不许丢下一个！"阻击战从下午打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当溆浦县城里的后勤机关全部撤离之后，萧克才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贺龙把六师撤出溆浦县城而造成如此险境的目的是：让六师从溆浦径直南下洞口方向，给敌人一个错觉，以为红军依旧会滞留湘中，

有东进衡阳的发展态势，从而隐蔽全军即将西进贵州东部的企图。

但是，国民党军已经知道了红军主力所在，而且前所未有地与红军主力相距如此之近。于是，除了位于溆浦战场的李觉和樊嵩甫的七个师以外，西面陶广纵队的三个师和郭汝栋纵队的八个团也开始自沅江向南压缩，连防守长沙的汤恩伯的两个师也开始出动向西扑来。

为了不让敌人明了红军西进的目的，红二、红六军团继续向东南方向移动。十二月十一日，红军急促南下，造成了即将东渡资水的态势。资水纵贯安化与新化之间，渡过这条大河再向东，自北向南排列着长沙、湘潭、株洲、衡阳，皆为湘东重地。于是，国民党大军快速追击而来。当天，红军到达了湖南西南部的洞口地域。此地已经接近桂北了，广西的桂军已经闻风准备北上迎战——红军必须西进了。

贺龙的想法是：突然折向西，沿着雪峰山山脚直奔瓦屋塘，从瓦屋塘翻越雪峰山西进贵州。

但是，国民党军已经洞悉了一切。

自此，红二、红六军团开始了异常艰苦的作战——冲出国民党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封锁后，转战在湖南中西部的美好时光竟是那么短暂，红二、红六军团的长征就从他们西进的这一刻开始了。

红军的先头部队是第二军团五师，师长贺炳炎；五师的先头部队是十五团，团长李文清。

前面就是瓦屋塘了，出现在红军官兵眼前的大山高而陡峭。

就在红军先头部队快要接近东山山顶的时候，枪声响了。

从猛烈的火力上判断，是国民党军正规部队。

李觉和樊嵩甫的部队都在后面，前面怎么会突然出现了敌人?

师长贺炳炎上来质问:“怎么不走了? ”

李文清团长说:“前面有敌人。”

贺炳炎说:“你去向老总报告，这里归我指挥。”

横在红军前面的，是早就迂回过来的陶广的部队。

贺炳炎大吼一声:“机枪掩护！都跟我冲！”

东山山势太陡，机枪无法架设，掩护火力无法实施。

贺炳炎一甩手，继续往上冲。

敌人的机枪子弹如暴风骤雨。

贺炳炎愤怒的吼声在猛烈的射击声中炸响。他在山上杂乱的灌木丛中时隐时现。当他再次直起身子高喊着“跟我冲！”的时候，官兵们发现他们的师长用左手举着驳壳枪，右手臂整个衣袖血淋淋的。冲到他身边的战士喊:“快来抬师长！快来抬师长！”贺炳炎叫道:“喊什么? 快给我冲！”卫生员冲上来给他包扎，他挣扎着就是不从:“别按着我！前面正在死人！”

东山山头被红军占领了。

贺炳炎躺在敌人丢弃的阵地上昏迷不醒。

贺龙赶来问卫生员:“胳膊保得住保不住? ”

卫生员摇摇头，说：“只有锯掉胳膊才能保住性命。”

贺龙对参谋说：“去弄只老母鸡来。”然后问卫生员：“几时开始锯？”他得到的回答是：“午饭后就干！”

给贺炳炎锯胳膊的时候，他疼醒了。

没有麻药。一条大锯在开水中煮了一个小时。几个红军战士负责按住他的双腿和身体。他们还准备了一条毛巾，把师长的眼睛蒙上了。贺炳炎清醒后把毛巾扯下来，看了看说：“都靠边！锯吧！”说完把毛巾咬在嘴里，眼睛一闭。

卫生连的几个战士心一横，用脚踩住他的右胳膊，锋利的锯齿对准枪伤的伤口“嗞啦”一声锯了下去……

贺炳炎，湖北松滋人，十六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贺龙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他性格豪爽，作战勇猛，先后当过班长、排长、连长、团长、师长。他终生失去一条胳膊的这一年，年仅二十二岁。这位年轻的红军指挥员在日后转战的日子里，即使只有一条胳膊，依旧勇敢顽强地作战。在经历了中国革命赢得胜利的艰苦历程之后，飘荡着一只空袖筒的贺炳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

直到锯完了，贺龙才走到跟前，锯下的胳膊扔在了一边，贺炳炎大汗淋漓。贺龙俯下身子，对着那张因剧痛而苍白如纸的面孔仔细端详了很久。然后，贺龙在地上的那摊血里捡起些什么，攥在了手里。从此，红军每次进行战斗动员的时候，贺龙就会打开他随身携带的手帕，然后肃然地说：“都看看，这是红军师长贺炳炎的骨头渣！”

瓦屋塘战斗结束后，红军绕过陶广部的阻击阵地，从位于瓦屋塘西南方向的竹舟江西渡巫水，然后转向西北急促前行上百公里，在托口镇附近再次强渡沅江。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那天，红二、红六军团到达了芷江以西的冷水铺附近，这里已经临近贵州边界了。

国民党军队大多没有在崎岖的山路间急促行军的能力。此时，郭汝栋部在四天的路程之外；而汤恩伯的部队干脆回去了，原因是“要防止广西军队进入湖南”；只有李觉和陶广的部队追得很紧，其中李觉纵队的第十六师距离红军最近，其前锋已经接近芷江。

但是，年总是要过的。

这里的土豪很多，土豪的肥猪也很多，因此红军官兵很高兴。新年的晚上，炊事员们很忙，官兵们都来帮忙，把猪肉和鸭子炖得很香。第二天中午，红军官兵聚集在一起，刚要享用，枪声响了，敌人的先头部队到了。炊事员们急忙把肉捞起来放在筐里担着就跑。

既然李觉的第十六师已经过了沅江，红军决定抓住这个机会，一方面把李觉纵队还没有过江的第十九、第六十三师阻击在沅江以东；另一方面集中兵力打一个伏击，把独自冒进的这个第十六师吃掉。战斗目的一是阻止敌人的追击，二是如果仗打好了就可以回湖南去，因为在黔东建立根据地的设想已经难以实现。

便水，位于冷水铺西侧，战斗在这里打响了。

一月五日，红军由晃县龙溪口地区掉头，迎着敌人的第十六师而去。下午两点半，红六军团与敌人先头部队的一个旅突然遭遇了。此刻，红军还没有到达预定的伏击地点，他们没想到敌人的推进速度如此之快。双方的战斗很快就进入白热化的程度，国民党军依仗着优势

火力沿着公路猛烈突击，战斗一开始就显示出对红军不利的情势。这时，红二军团四师赶到了战场，没有停歇就加入了战斗。红军试图按照原来的部署，迂回到便水截断敌人后续部队的渡河点。但是，没想到的情况又发生了，敌人的另一个旅已经渡过了沅江，到达了新店坪，与赶去截断敌人后续部队的红军迎头撞上。迂回敌人后路的红军反被敌人阻击了。战斗进行得异常艰苦，红军的推进十分缓慢，战场上的来回拉锯使战斗成了一场消耗战。而这种战斗状态正是国民党军所希望的，因为只要把红军牵制在战场上，增援部队一旦到达就可以迅速形成总攻态势。

如果在这个时候，红二、红六军团果断地撤出战斗，所遭受的损失也许不至巨大，但是撤离战场的命令始终没有下达。战斗一直打到一月六日的下午，国民党军李觉纵队的第十九、第六十三师相继到达。红军原来计划集中力量打敌人的一个师，现在已经变成了要打三个师，战斗的性质即刻从伏击战变成了决一死战。第六军团十七师五十一团从敌人的左翼插了进去，位于敌人右翼的十六师也横插着打过来，给敌人造成了一时的被动。但是，两个师都没有后续力量补充，因此没有能力巩固和扩大战果，在增援敌人的猛烈反击下，先后被迫开始撤退。

便水一战，红军不但没有达到预定的作战目的，而且官兵伤亡一千多人。红二军团四师参谋长金承忠、四师十一团团长覃耀楚，红二军团六师十六团参谋长常海柏在战斗中阵亡。

二十六岁的红军参谋长金承忠在率领部队赶往战场的时候，正好从红二军团六师的阵地前经过。六师政委廖汉生曾在四师代理过政委，因此两个人很熟。当时廖汉生看着四师的队伍开过去，就对金承

忠喊:“喂！打了胜仗以后请你喝酒！注意呀，你老兄可不要被打死哟！”

金承忠参谋长还大声答应了一句:“好哇！”

但是仅仅过了十几分钟，廖汉生就听到了金承忠阵亡的消息——廖汉生说:“打这以后，我再也不开这样的玩笑了。”

便水一战成为红二、红六军团领导心中一个无法消除的痛。“只准备打一个师，背水战，头天布置好，两个军还搞不倒一个师? ”贺龙数十年后回忆说，“要脱了裤子谈！”——“脱了裤子谈”就是要实事求是地总结教训。

便水战斗失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对敌情的估计不足外，两个军团的相互协调也不够，进入战斗和撤出战斗时都出现了配合脱节。同时，部署上没有对保护侧翼的安全给予足够的重视，敌军陶广纵队在红军侧后的出现几乎是致命的。

红二、红六军团不但没能如愿地往回走，而且只有离开湖南继续深入贵州腹地。

红军急速地越过湘黔边界，先后占领了贵州东部的江口和石阡地区。

在江口镇，奉命留在老根据地的十八师追上了军团主力。

全师仅剩六百余人的十八师被缩编为五十三团。

石阡地区，最先开始军事转移的红六军团遭遇重创的地方，这里那个名叫甘溪的小镇令红六军团的官兵难以忘却。一年多之后又回到

了这里，军团长萧克和政委王震都心情异样。因为尽管眼前群山叠翠，但他们知道红六军团曾有太多的官兵牺牲在这里。

红二、红六军团领导在石阡县城内的一座天主教堂里召开了会议，会议认为应该放弃原来在这一带建立新苏区的计划，因为这里“居民稀少，经济落后，粮食十分困难，不利于大部队久留”；同时，这里“山河纵横，机动不便”，也不适于红军展开运动作战。会议最后决定：继续向西，争取在贵州西部建立根据地。

一九三六年一月七日，朱德和张国焘致电红二、红六军团，同意他们继续向西转移的计划：

贺、任、关：

（甲）蒋现组织清一色的亲日政府，现反蒋军阀企图以两广为基干拥胡［胡汉民］反蒋。

（乙）南京公开出卖华北，抗日反蒋运动在继续发展。

（丙）二、六军可在黔滇湘一带广大地区活动，在敌力较弱之处活动，寻求各个消灭敌人之机。

（丁）根据历次长征经验，不宜常采取直径行进，在未给敌严重打击时不宜久停一处，有时急行军夺取要点，有时行军勿过快，离敌策源处较远的地方活动，但勿入太荒野地。敌力虽多，我能进退自如，主动在我。

（戊）敌横的封锁线易袭破或穿过，勿硬攻纵深碉堡线。

（己）乌江下游障碍大，上游障碍较小。黔南、黔西均少大河障碍，给养也不困难。

（庚）桂军只有十七团，能作山地战，不敢远出；滇军只有二十一团，战斗力亦不甚强。滇东有广大地区亦可行动，但不可接近滇越铁路。川南只有达凤岗和穆肃中两旅兵力。

（辛）通过苗人地区必须设法争取苗人，严紧政治纪律。

（壬）经常进行政治工作，广大宣传自觉的艰苦战斗，必能最终获得胜利。

军委 七日

张国焘依旧坚持着他的“军委”。

但电报在军事上为红二、红六军团考虑周到，提醒细致，这完全是朱德的风格，也只有朱德而不是张国焘，才能对桂军、滇军、黔军的作战特点都有所知。

至于在贵州的什么地方可以建立根据地，朱德和张国焘在后来的电报中建议：“应以佯攻贵阳姿势，速转黔西、大定、毕节地区，群众、地形均可作暂时根据地。”

如果把红二、红六军团预定的转移路线画在地图上，加上一年前中央红军自湖南进入贵州后的转移路线，贵州地图上定会出现比蛛网更加密集更加复杂的路线图。在中国，没有哪一个省像贵州一样被中国红军在一年内所编织的巨大而纷繁的移动线路所覆盖。如果试图把中国红军为什么对这个以贫困和偏远著称的省份如此感兴趣解释明白，将是一个超越军事领域的内涵极其复杂的社会政治学课题。贵州省内数座险峻的山峰与数条奔涌的大河，注定要被移动求生的红军和追击他们的国民党军的脚步踏遍，使得中国的这个高原省份自此承载起了太多沉重的历史往事。

红二、红六军团开始重走一年前中央红军的长征之路。

朱德和张国焘的建议是正确的。如果红二、红六军团继续向西直行，必会到达乌江岸边，那样就只有渡过乌江直指遵义了，而已经被中央红军两次占领过的遵义，现在已是国民党军重点防御的地方。

红二、红六军团以六师十八团为先头部队，十八团团长成本新、政委余秋里。他们首先在龙溪附近消灭了国民党军的一个营，在敌人的堡垒线上撕开了一个缺口，然后红军大部队穿过敌人的封锁线，掉头往南直逼贵州的省府贵阳。

贵阳城内即刻一片慌乱。

国民党政府贵州绥靖公署得到的报告和贵阳城里富豪之间流传的小道消息没什么两样，都说是到处流窜的贺胡子的十万大军进了贵州。国民党军第九十九师第二九五旅五九〇团副团长邱行湘回忆道："听到传说，第二十三师各旅团遇到红军一触即溃，全部被红军打散了，大部分携带武器躲进深山了，无法收容。到一月九日，江口、石阡均被红军占领，贵阳震动。"

红军兵临城下，惊恐万分的国民党军立即调兵遣将：贵阳警备司令兼第九十九师师长郭思演奉命率部出击堵截红军，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奉命扼守乌江，甘丽初的第九十三师奉命守卫贵阳。第九十九师师长郭思演和他的军官们一致认为，抢占贵阳以东约八十五公里处的马场坪至关重要，因为扼守在那里前可阻截红军入黔，后可保障贵阳的安全。于是，郭思演立即向马场坪派出了先遣部队第二九五旅五九〇团。郭师长的嘱咐是："由马场坪到贵阳之间，任何一个要点，决不能落入红军之手。"副团长邱行湘率领先遣部队到达马场坪后，虽然官兵们对疲惫不堪的急行军牢骚满腹，但是又怕遭到红军的突然攻击，

于是先是到处放火以壮胆子，然后就守在二十多个碉堡里不出来了。前出侦察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在距离马场坪咫尺之遥的平越县城城郊，发现了大量的红军部队在运动。邱行湘赶快给平越县专员兼县长聂洸打电话核实情况，但是聂专员在电话里说红军根本没有进入平越县境，因为瓮安至平越的公路早已被保安队封锁了，保安队的张副司令一直与县城保持着联系。聂专员的话与侦察员的报告大相径庭，邱行湘放下电话后脑子里一片混乱。

事后邱行湘才知道，和他通话的“聂专员”根本不是聂洸，而是红军。

红二、红六军团迅速占领瓮安后，直指平越县城。平越县专员兼县长聂洸急忙纠集保安队和民团抵抗。红军还没攻城的时候，保安队和民团气壮如牛；真的看见了红军的影子，便立即作鸟兽散。当邱行湘的电话打过来的时候，聂专员早已被红军枪毙了。

马场坪的守军似乎不那么紧张了，但是多疑的邱团副还是不放心，他再次给“聂专员”打电话，说要立即派两个连去平越以加强前沿的力量。“聂专员”说不必费心，现在这里很平静，部队明天再来不迟。满腹狐疑的邱团副又给师部打电话，师部也说和“聂专员”联系了，平越现在平安无事，增援部队正在距那里十公里处休息，准备明天再向县城增援。第二天清早，邱团副接到了“聂专员”的电话，语气万分焦急：“赶快派部队来！红军开始攻城啦！”邱团副感到电话里的口音不大像聂洸，但又不能不信，于是带领两个连前往平越增援。快要到达的时候，邱团副看见大批从县城里逃出来的土豪富商和他们的家眷，这些惊慌失措的人对他说：红军早就进城了，现在正在打土豪呢。接着，大批的红军就攻到了邱团副的眼前。在短促的阻击抵抗

后，邱行湘带领官兵往回跑，竟然跑过了马场坪，一直跑到贵阳附近才住脚。

此时，从湖南一直尾随着红二、红六军团的国民党军已被甩在了黔东北地区，而贵州境内的黔军各主力部队纷纷忙于回防贵阳，因此黔西空虚了。红军在贵阳附近仅仅虚晃了一枪，突然折向西北方向，绕过贵阳，袭击了位于贵阳东北方向的扎佐和修文。在扎佐，红军先头部队六师避开敌人的堡垒，来到一道深达数十丈的崖涧。这道崖涧两边的绝壁上，凌空悬挂着一条绳子，绳子上仅仅挂着一个木斗，里面一次只能坐一个人。六师的红军官兵一个一个地坐在木斗里溜过崖涧，通过了敌人认为不可能通过的封锁线，一举打下了扎佐西面的修文县城。占领了修文的红二、红六军团作出了北袭遵义的态势，国民党军又急忙调动部队回防遵义，而红军穿过了贵阳至遵义的公路后，突然折向西，以昼夜疾进的速度直取乌江渡口鸭池河。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蒋介石再一次飞到贵阳直接指挥作战。一时间，湘军、桂军、川军和国民党中央军都进入了贵州。

红二、红六军团经过两个月的转战，伤亡人数已达两千，因负伤留在老乡家和掉队的也已有一千四百人，特别是有作战经验的老战士、红军干部伤亡很大，这严重影响了部队的作战能力。为此，一月二十五日，红二、红六军团致电朱德和张国焘，请求“一、四方面军此时应以较大的行动吸引川敌及蒋敌之一部，以配合我们行动”。

三天之后的二十八日，朱德和张国焘回电：

贺、任、关：

（甲）湘敌入黔、川、滇中是部分的不积极的，远进事实上亦甚疲劳。在湘蒋军一部可能跟追。桂敌与蒋矛盾较大不能离桂，但蒋企图逼你们入桂，一举两得镇压桂、粤，因此桂敌边防极严。滇敌实力不大，分散全省外，又恐我处入滇，事实上不能派多兵远出。黔军多系蒋军，较积极，指挥亦较统一，但无主力，又多系客军，战斗力远不及在湘敌人，有利于你们各个击破之。川敌陈万仞部达［达凤岗］、穆［穆肃中］两旅约四团，分布南六县。杨森新开川南，尚在沿途，数量是称八九团，质量极差，大败之后士兵极不振，是你们入川开辟道路的最好目标。许绍宗师有可能由酉阳调入渝［重庆］、泸［泸州］，其他川军暂时不能抽调，但川军极不善守，有充分的可能争取运动战消灭拦阻之敌的好机会。

（乙）建议你们的行动有二：（1）在黔、滇、川境广大区域与敌人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之一部，争取根据地，与我们配合作战。（2）入川，一经滇渡金沙江入上川南，一经毕节入下川南，在泸州上、下游渡大江深入川中，与敌作较大的运动战，均与我们直接会合作战，一、三军也可出陕南配合。

（丙）以上两建议，均须由你们的力量与渡河技术，当前的敌情和你们的机动战术来决定。依据目前政治新形势，抗日反蒋高潮急速到来时，我军不宜与敌决战，应努力争取时间之延长和本身巩固与扩大。目前你们战略当以第一项为宜，第二项是带有决战性质，只是在极有利条件下采用。

朱、张

二十八日

这是朱德和张国焘首次建议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从各师抽调来的一百二十多名红军组成了侦察队，侦察队化装成国民党正规军，成为红二、红六军团突破乌江的尖刀部队，紧跟在他们身后的是六师。红军冒着寒冷的冬雨连续奔袭，到达乌江渡口上的

黔军阵地时，一个连的黔军在睡梦中成了俘虏。接着，红军迅速夺取船只并开始架设浮桥。天亮的时候，主力到了，大部队立即开始渡江。顺序是红二军团在前，红六军团在后。红六军团后卫部队渡江的时候，追击的国民党军先头部队已经接近，最后一批渡江的红军纷纷跳进乌江奋力泅渡。就这样，红军近两万人的部队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全部渡过了乌江。等国民党军第二十三、第九十九师赶到时，浮桥已被炸掉，船只已被焚毁，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占领了黔西县城。

黔西民众对红军很友好，因为中央红军曾在这一带活动过。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地方武装和黔军的残部多与中共地下党员有联系。这为红二、红六军团的立足提供了可能。基于建立根据地的设想，红军迅速在这一带展开部队：十八师驻守黔西，四师、六师、十七师集中兵力向东北方向迎击国民党军万耀煌纵队，五师、十六师向西进攻大定和毕节。

红二、红六军团长征途中短暂的黄金时光来临了。

在贵州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红军展开了在黔西建立根据地的工作。

这个工作对于红军各级干部来讲驾轻就熟。派遣工作组，建立县、区、乡各级苏维埃政权，实行共产党的土地政策，“以最严厉之手段”镇压一切反动分子和敢于反抗的豪绅地主。一九三六年二月八日，“中共川滇黔省委”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在黔西县成立了。红军的政治主张和施政纲领，特别是红军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受到了民众的普遍拥护，尤其是得到了当地开明人士的支持。红军占领大定县城的时候，带领当地群众迎接红军的是一位叫彭新民的士绅。彭新民虽然当过国民党政府的县长，但是他

拥护孙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张。当大定县县长带着细软和随从逃跑的时候，他正召集县城里的工匠、教师和学生连夜赶制欢迎红军的标语。进城的红军打土豪共没收了粮食五十万斤、大洋五十多万块，各种物资堆积如山。大定县城里如同过年，许多贫苦青年第一次穿上新衣服，第一次把粮食担回家，县城里到处都是“红军万岁”的口号声。红军进攻毕节的时候，一个叫席大名的彝族人士帮助了红军。席大名曾是黔军的一个团长，由于对蒋介石遣散黔军不满，和当地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拉起了一支反蒋的队伍。红军兵临毕节，毕节城里的国民党官员以十箱子弹和一千块大洋的价钱让他阻击红军。席大名把这些东西收下后，却在红军攻城的时候带领自己的队伍打开城门迎接红军，而且表示要与红军“合股”。毕节城里最知名的名流，是一个叫周素园的老人。早在辛亥年间，他就是贵州省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之一，曾出任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红军占领毕节前夕，其他的名流纷纷劝他躲避一下，他说：“我没有多少家当，不必走。”红军进城后，官兵们进了他的家，要打他的“土豪”，但是却在他的书房里发现了大量的马列书籍。红军问他：“你这个地主为什么读马列的书？”周素园说：“我研究马克思主义十几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讲得对。你们共产党和红军，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用不着走。”周素园很快得到了红军高级将领的尊敬。当王震请他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时，这位已经年近六十的老人欣然答应，并以他的声望组建起一支下辖三个支队的武装。此事很快就传到了坐镇贵阳的蒋介石那里，为了掩饰尴尬，蒋介石指示国民党军令部部长何应钦发出通电，称周素园“不幸被赤匪掳去”，责令贵州省绥靖主任吴忠信“设法营救”。

蒋介石不能容忍的不仅是辛亥革命元老的政治背叛，更重要的是红军要在贵州“安家落户”了。就在红二、红六军团筹建根据地的时候，国民党军万耀煌、樊嵩甫、郝梦龄、李觉和郭汝栋的五路纵队从

四面开始向黔西推进。其中，以万耀煌部推进的速度最快，其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了毕节以东的军事要地三重堰，郝梦龄纵队紧随其后，而郭思演的第九十九师、李必蕃的第二十三师也已经靠近了乌江的鸭池河渡口。

为了稳定红军刚刚打开的局面，贺龙和萧克亲率三个师东出毕节向三重堰迎敌。为了调动敌人，红军先以一个师深入敌后，袭击了三重堰南边的打鼓新场，然后军团主力绕到万耀煌纵队的后面，准备将之围歼。但是，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军军长万耀煌作战经验极其丰富，他不但没有理会红军对打鼓新场的袭击，反而趁红二、红六军团正面兵力薄弱的时候，突然袭击了黔西县城，把被红军阻截在乌江东岸的第二十三、第九十九师接应了过来。二月十八日，万耀煌和郝梦龄的部队会合后，向位于大定的红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敌人的火力和兵力都远优于红军，大定县城当日失守，红军在这里仅仅停留了十六天。

黔西、大定相继失守后，为了阻击国民党军向毕节的攻击，从打鼓新场撤下来的红六军团十七师赶到了将军山。将军山是从大定通往毕节的门户，由十几座卡在公路两边的山峰组成。红军刚一到达，国民党军的先头部队也到了。在萧克的指挥下，五十团和五十一团从公路的东侧、四十九团从公路的西侧两面夹击，在红二军团四师、五师一部的增援下，红军仅仅用了一个多小时就把由六个连组成的万耀煌的先头部队消灭了。红军在这里修筑了阻击阵地后，等来了国民党军万耀煌纵队的大部队。国民党军反复向红军的阵地冲锋，红军在敌人强大的火力面前伤亡巨大。二十六日，红军开始向毕节方向撤退。

此时，对于红二、红六军团来说，东面的防线已经洞开，国民党军的四个纵队正齐头并进向毕节地区推进。

二十七日，中共川滇黔省委决定：放弃在这一地区建立根据地的计划。

红军官兵创建的黔大毕根据地仅仅存在了二十天。

红军撤退的时候，贺龙派人去对周素园老人说，给他一批黄金和大洋，请他到香港去寓居，以免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老人当即拒绝了，他说："我在黑暗的社会里摸索将近六十年，到处碰壁，现在参加了红军，才算找到了光明。我周素园就是死也要死在红军里！"贺龙听后一拍大腿，说："我贺龙就佩服这样的人！我就是拿出十八个人来，也要抬着他走！"周素园老人果然跟随着红军的队伍一直走到了陕北。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任八路军高级参议。一九三八年返回原籍。全国解放后曾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和贵州省副省长。毛泽东称他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

红四方面军也开始从天全、芦山和宝兴一线向西撤退了。

此时，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张国焘都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百丈战役后，红军逐步西撤，但是川军与国民党中央军紧追不舍。在把红军向西推出整个川西平原的边缘，直至推到夹金山以北的山区后，两军形成了对峙线。

天降大雪，在对峙线上，补给充足的国民党军采取了严密防御和坚决对峙的部署：川军主力位于夹金山以东的名山和邛崃一线，中央军薛岳部位于雅安和天全一线，第十六军李韫珩部位于夹金山以西的康定和泸定一线。国民党军大军横陈，森严壁垒，并有随时向红四方面军发起攻击的态势。

大雪和严寒给红四方面军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这里是高寒地区，物产不丰，经济落后，人口十分稀少，红军无法解决兵源、粮食、被服等必须解决的问题。大量的伤员由于缺少药品而死去，在恶劣的气候中生病的官兵急剧增加。位于前线的部队由于后方的全力支援，还能够吃上土豆，而分散在夹金山南北的红四方面军的后方人员，此时只能靠野草和树皮充饥。政府机关、后勤各部门、野战医院以及数千名伤员，加起来近两万人，自阿坝南下到大金川地域后，就已经感到了生存的艰难。大部队东出作战，国民党军趁机骚扰或攻击红军的后方，大肆捕杀红军和支持红军的群众，并且焚毁一切可能被红军利用的物资——敌人企图在这个寒冷的冬季把红军困死在川西北的不毛之地里。

所有这一切都令声言要"打到成都吃大米"的张国焘处在极其被动的境况里。但是，对于张国焘来讲，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令他越发焦急不安，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已经到达了陕北的瓦窑堡。

张国焘一不做二不休，以"党团中央"的名义给陕北发去了电报，命令在陕北的中共中央"不得再冒用党中央的名义"：

彭、毛等同志：

甲、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

乙、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

丙、一、四两方面军名义已取消。

丁、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

党团中央

五日

张国焘不能不在乎共产国际的态度，因为在莫斯科待过的他始终对共产国际心存敬畏。如果把他和中央之间的冲突比作一场“官司”的话，那么，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在他眼里就是一个“法官”——张国焘之所以迫不及待地发出了这样一封荒唐绝顶的电报，是因为现在“法官”并不在川西北雪山脚下他那间即使昼夜烧着牛粪依旧寒气逼人的土屋里，而是在毛泽东那孔炭火融融的温暖的窑洞里。

林育英，化名张浩，生于湖北黄冈林家染铺湾一个染工家庭，是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的堂兄。他在著名共产党人恽代英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武汉、汉阳、长沙、安源、上海、抚顺等地从事工人运动。一九三三年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一九三四年中央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后，由于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联络中断，共产国际决定派林育英取道蒙古回国。

林育英在中国革命的重要时刻出现在陕北，确实起到了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历史作用。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中国革命史称之为“瓦窑堡会议”。

从莫斯科回来的林育英参加了会议。

瓦窑堡会议讨论的两个重大问题是：中国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化和陕北苏区面临的生存困难。

首先，随着日本军队对华北的占领，中华民族面临着民族危亡，中国国内国共双方的矛盾已经退居于次，民族矛盾骤然上升为主要矛盾。而蒋介石依旧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日本政府明显的侵略野心面前不断退让，这迫使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变化的标志是：除了广大民众，包括爱国军人、知识阶层和劳动阶层日益高涨的抗日救国呼声外，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也已经显示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倾向。即使是中国的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各利益集团之间，也在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形势下出现了分化的趋向。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修正政治策略，以符合民族整体利益——这不仅是民族生存的需要，也是共产党人生存的需要。

瓦窑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历史证明，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作出的十分明智和正确的政治抉择。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虽然随着历史的发展其具体内容不断地改变，但自诞生之日起便成为共产党人赢得革命胜利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法宝”——走完了为生存而战的万里征程的中国共产党人，当他们聚集在陕北的窑洞里，在浓烈的旱烟味道中思维和眼界豁然开阔的时刻，是这个只有二十四年历史的年轻的无产阶级政党政治成熟之时。

瓦窑堡会议讨论的第二个重大问题是红军的军事战略问题。当时，红四方面军在川西的风雪之中处境困难；红二、红六军团依旧在

国民党军的追击中移动作战。即使已经与陕北红军会合，并且有了一块红色根据地，红一方面军同样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根据地面积狭小，土地贫瘠，经济落后，部队的供给十分困难；红一方面军兵力仅万余人，但陕北人口稀少，红军没有扩大兵员的更多余地。目前，陕北苏区北面有国民党军第八十四、第八十六师和阎锡山的五个旅，那里临近长城，长城外就是沙漠地带；西面的宁夏、甘肃地区虽然敌人的兵力较少，但同样地贫民穷；南面的关中和渭北地区物产丰富，人口稠密，但是临近西安，是国民党军重兵防御的地带。为了扩大根据地和求得发展壮大，红军只剩下东面可以考虑了。陕北根据地的东面是黄河，黄河那边的山西是阎锡山的地盘。阎锡山的晋军虽然号称十万，但分散在晋绥两地，并且没有与红军作战的经验；且阎锡山与日本方面订立了“共同防共”密约，这无疑是一种卖国行为，红军打他有政治上的合理成分。再就是，山西人口稠密，物产丰富，是扩大根据地和发展红军的好地方。瓦窑堡会议最终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红军东征的主张。

毛泽东请林育英以他特殊的身份，做与红四方面军的团结工作。林育英专门致电张国焘，特别表示：“党内争论，目前不应弄得太尖锐，因为目前的问题是一致反对敌人，党可有争论，对外则应一致。”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朱德致电林育英，提出了“应取密切联系”的请求：

毛、彭、李、林、聂并转林育英同志：

A．育英同志电悉，我处与一、三军团应取密切联系，实万分需要，尤其是对敌与互相情报即时建立。

B．薛纵队调川，胡宗南部到青，亦向川中开进，钟林松旅开徐州。

C．你处敌情近况望告。

朱德

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陕北大雪。毛泽东在给朱德的回电中指出："本应交换情报，但对反党而接受敌人宣传之分子实不放心，今接来电，当就所知随时电告……我处不但对北方局、上海局已发生联系，对国际亦有发生联系，这是大胜利。兄处发展方针须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对党内过去争论可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不可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

五天之后，张国焘给林育英发来电报，在"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的前提下，以怒不可遏的口气开列出中央的"机会主义"表现："将五次'围剿'估计为决定胜负的战争，在受一挫折的条件下，必然成为失败主义的严重右倾……机械地了解巩固根据地，因此不能学习四次'围剿'在鄂豫皖红军在强大敌力压迫下退出苏区的教训……'忽视川陕苏区和整个川、陕、甘的革命局势'……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放弃向南发展，惧怕反攻敌人"……张国焘表示这些"一贯机会主义路线，若不揭发，就不能成为列宁主义的党"。

一月十三日，中央负责人张闻天致电张国焘：

我们间的政治原则上争论，可待将来作最后的解决，但别立中央妨碍统一，徒为敌人所快，决非革命之利。此间对兄错误，未作任何组织结论，诚以兄是党与中国革命领导者之一，党应以慎重态度处之。但对兄之政治上错误，不能缄默。不日有电致兄，根本用意是望兄改正，使四方面军进入正轨。兄之临时中央，望自动取消。否则长此下去，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必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幸。

张国焘认为，无论从历史渊源上还是从个人感情上，他和林育英的关系都不一般，他们曾在汉阳钢铁厂一起从事过工人运动，他们还都属于从莫斯科回来的共产党人，而毛泽东和林育英过去从不认识。因此，张国焘甚至怀疑林育英在陕北受到了某种“胁迫”，他打电报询问林育英：“是否允许你来电自由？”并要求林育英：“望告陕北同志，自动取消中央名义。”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四日，这一天是中国农历春节大年初一，张国焘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国焘、朱德二同志：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林育英

二十四日

林育英的这封电报明确告知张国焘，共产国际的“裁定”是：张国焘不能自称“中央”，而只能是“西南局”。但是，共产国际给张国焘留下的“台阶”是：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代表团。

接到林育英的电报，张国焘仍不甘心，三天后致电林育英、张闻天，主张以共产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共中央，而将中共中央改为西北局，与他的西南局“平级”，共同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因为愤怒和无

奈，张国焘提出了一系列的质问：“究竟在六次大会后为何发生这许多重大事变？布尔什维克化的进程能否得着更顺利的经历？为何使过去中央和鄂豫皖领导发生隔阂？反五次‘围剿’为何应是这样的经历？我们会合后为何发生争执？究竟目下有些什么政治内容？”张国焘似乎并没有期望有谁来回答他这些偏执的问题，因为第二天他的电报虽然是发给“林育英和国际代表团”的，但内容已全是关于红四方面军的军事问题了。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四日，林育英和张闻天在联名发给张国焘的电报中明确表明：“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说这一战略方针“曾得［到］斯大林同志同意”。

张国焘终于决定红四方面军准备北上。

乌蒙山，中国云贵高原上山高谷深的荒僻地区。

从毕节西撤的红二、红六军团，从安全角度讲，只能进入人烟稀少、气候恶劣、道路崎岖的乌蒙山。

当时的敌情是：滇军孙渡部取保守态势，只守在云南边境地区，想把红军逼近四川；川军也不愿意进入贵州追击红军，只在川南和长江沿线布防。因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四川行营主任顾祝同利用滇军和川军布防的空隙，集中了万耀煌、樊嵩甫、郝梦龄、李觉、郭汝栋各路纵队，从东、南两个方向向红军压过来。

红军到达了位于毕节西南方向的野马川，发现继续南进已不可能，因为国民党军李觉纵队已经堵在了红军南下的路上。于是红军掉头折向西北，开始向四川境内的金沙江方向行进，计划与追击的国民党军兜一个巨大的圆弧，然后再寻找机会南下进入贵州安顺地区。

一九三六年三月八日，鉴于国民党军樊嵩甫纵队的第二十八师追击的速度极快，已走到川黔边界的红军决定回头打个伏击。具体部署是：第二军团四师和第六军团的十六、十七师在以则河附近伏击敌第二十八师，五师至恒底钳制樊嵩甫的第七十九师。

接到战斗命令，部队立即做饭，并且是吃一顿再带一顿，然后星夜出发往回走，奔赴五十里外的伏击地点。十七师师长吴正卿二月十日牺牲在打鼓新场的战斗中，师参谋长刘转连刚刚接任了师长。十七师一夜急行军，天亮时分到达了以则河伏击地点。红军在阴冷的风中潜伏下来，竟然等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早晨，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的先头部队出现了。但是进入红军伏击圈的敌人很少，刘转连正想着大部队究竟还有多远，别这边一开枪，等于给了后面的敌人部署的时间。这时候，敌人的搜索哨兵已经和红军的警戒哨兵遭遇了。打起来才知道，第二十八师只开来了一个步兵连和一个侦察连。三个师的红军没费什么力气就把敌人全部解决了。战斗结束后，红二、红六军团掉头继续北上，他们计划越过川黔边界，在滇北的镇雄附近摆脱敌人的包围，然后再回身南下进入贵州。

以则河一战的战果没有达到预先的设想，却暴露了红二、红六军团主力的位置。在顾祝同的严令下，各路国民党军纷纷向镇雄方向扑来，将红军合围在了一个方圆不到五十公里的包围圈内。樊嵩甫部的四个师在红军的后面紧追不舍，而万耀煌和郝梦龄的部队已经到达了镇雄。至十一日早晨，四面的敌人相继进入了战场，负责掩护的红军后卫部队十七师已经和敌人交火了。红军军团指挥部里充满了焦虑不安的气氛，如果不能迅速寻找到缝隙冲出去，就有在镇雄全军覆没的可能。十二日天亮的时候，十一团送来了国民党军的两名逃兵，逃兵说万耀煌正率领第十三师经得章坝向镇雄前进。贺龙认为这可能是一

个令红军摆脱重围的战机，于是立即率领四师、六师向得章坝方向奔袭。上午十一时到达预定位置，六师马上开辟设伏阵地，阵地还没完全掩饰好，万耀煌部的第三十七旅到了。红军官兵没等命令，所有的武器一齐开始了猛烈的射击。同时，四师在大丫口把万耀煌的指挥机关和担任后卫的第三十八旅拦腰截断了。这一瞬间，突然发动攻击的红军占据着兵力上的多数，左翼，十一团突进了敌人的警戒阵地；右翼，十二团打进了万耀煌的指挥所。正在行进中的国民党军完全失去了控制，万耀煌在一片混乱中只身逃走了。

在得章坝战斗中，红二军团六师十八团政委余秋里身负重伤。当时，十八团负责打万耀煌的后卫部队。团长成本新率领战士一路冲锋，当迎面敌人的机枪横扫过来时，冲在他身边的团政委余秋里下意识地拉了他一把，两颗子弹纵贯了余秋里的左臂，血顺着衣袖把他的左手都染红了。剧烈的疼痛令余秋里面色苍白，但他对站在一旁懊悔不已的成本新说：“也就是流几滴血。还好是左边，要是右边就不能打枪了。”

余秋里，江西吉安人，十五岁成为农民赤卫队队长，十七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湘赣根据地历次反“围剿”作战。这个性格沉稳的红军团政委身经百战，但是在得章坝战斗中负伤，却令他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痛苦。部队不断在高山峻岭中跋涉，他的枪伤始终无法得到医治，只能一路用冰不断地敷着以减轻疼痛，疼得实在不可忍受时他就把伤臂浸泡在冷水里。这一年他年仅二十二岁。直到红二、红六军团走到四川的西部，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之后，医生解开他手臂的包扎布，发现伤口已经完全溃烂，五个手指头也已完全坏死。那时的余秋里高烧不止，如果再不采取断然措施，就可能危及生命。红四方面军的小卫生员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找到一把能锯硬东西的小锯条，并给余

秋里注射了一针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镇痛剂，然后先用刀刮掉伤口处的腐肉，再用小锯条锯掉已经碎了的骨头。当时，红军卫生员不知道镇痛剂的合理使用剂量，一针下去，余秋里就完全昏迷了。手术之后很久他侥幸苏醒，醒来的第一句话是："这是我负伤十个月来睡得最安稳的一觉。"

成本新，湖北石首人，三年后在张云逸的建议下他改名"成钧"，取"雷霆万钧"的含义。他十九岁参加红军，作战英勇无畏，在短短的几年内多次负伤：一九三一年跟随贺龙在洪湖打游击的时候，他就负伤四次，两条腿先后中弹；一九三二年，在与敌人的一次遭遇战中他的腰部嵌进了弹片；一九三五年，在湖南招头寨战斗中他一天之内两次负伤，一处在腿上，一处在左臂。他对子弹和弹片多次进入他年轻的身体并没有特别在意，倒是向别人描述中弹后的感觉时格外出神入化："伤处豁地一亮，然后感到疼痛。"好像打仗负伤在他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但是在那次腰部负伤之后，他不得不扑到冰冷的河水中，因为他感到了彻骨的疼痛——"就像一柄大砍刀斜劈在身上。"数十年后，在一次生病需要照X光时，医生惊讶地发现这位勇敢的军事指挥员的身体里仍残留着那些历史的弹片。

得章坝一战并没有消灭敌人的主力，国民党军的五个纵队在四周构筑了防御工事，随时可能向红军发动最后的攻击。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区与如此众多的敌人进行决战，对因连续作战而非常疲劳的红军来讲十分不利。

贺龙和萧克告诉红军官兵们：我们疲劳，敌人也疲劳，现在是比意志的时候了，红军最大的优点就是意志无比坚强。我们目前只能用机动的方式在荒山中与敌人来回兜圈子，把敌人彻底拖垮，把他们拖得晕头转向。为了轻装突围，红军官兵把一切不必要的行李和装备全

扔掉了。在选择突围方向的时候，红军采取了迎敌而上的非常手段。趁着黑夜，红军的先头部队在郭汝栋和樊嵩甫两部之间的狭窄缝隙中穿了过去。

国民党军各部队似乎感觉到最后的大战已在眼前，他们全都突然沉寂下来，谁也不愿意首先出动与红军交火，以免成为红军决死一战的第一个战斗目标。他们唯一做的事就是派出侦察队，严密监视包围圈里的红军。而他们的侦察队回来报告说：红军正密密麻麻地守在山头上——红军在突围的时候，使用了中国最古老的迷惑敌人的办法，这个办法是中国农民在保护自己的庄稼时常使用的：在前沿阵地上竖起大量用树枝茅草捆扎的假人。同时，还把一部分红旗故意插在密林深处，让它们在风中时隐时现，这给敌人造成了红军在准备打埋伏的假象。

到十四日的上午，红二、红六军团全部悄悄移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红军官兵的体力已经达到透支的极限，但是依旧要在大山中急促地行走。

贺龙的脚底裂开了一条几寸长的口子，鲜血淋淋，把警卫员看得直害怕。贺龙说："帮个忙，划根火柴烧一烧。"警卫员以为贺龙要烤火，赶忙要去弄柴火。贺龙说："哪里去？用火柴烧我的脚！"警卫员知道军团长的脾气，他命令的事必须坚决执行。但是，连续划了几根火柴，都因为手抖而没划着。贺龙板着脸："怕什么？烧！"一根接一根的火柴不断地点燃，皮肉在火苗上被烧得嗞嗞作响。除了在火苗刚一接触到那条伤口的时候，贺龙的脚动了一下，直到把那条裂口两边翻起来的肉统统烧焦他再也没动一下。烧完了，满身大汗的贺龙站起

来，把脚放在地上，试了试，然后满意地对警卫员说：“这下好了，我还要用这双脚板把敌人拖垮呢。”

三月十五日，红二、红六军团到达妈姑附近，部队终于休息了半天。十六日清晨继续出发。红军官兵们都惊讶乌蒙山之大，因为他们已经转了几天了，依然看不见出山的路。当疲惫再次袭来的时候，红军官兵们看见了小路边压在石头下的字条，上面写着：到了宿营地都要用热水洗脚。大家一下子高兴起来，因为这表示晚上可以住上房子了。晚上真到了一个有房子的地方。官兵们都问自己住在哪里，黑暗中传来管理员的声音：“原来住在哪里还住在哪里。”官兵们先是一愣，细看才明白过来，原以为快要走到天边去了，没想又走回到了那个叫奎香的地方——十几天的行军作战中，他们曾三次经过这里。

三月二十二日，红军一路南下，穿过了贵州的西北角，到达了云南东北部的来宾铺一带。红二、红六军团决定从这里进入川黔交界处的南盘江、北盘江地区建立根据地。

来宾铺距离滇东要地宣威只有不到二十公里，为了给创建根据地打开局面，也为了得到兵员和物资的补充，红军决定攻打宣威县城。阵地选择在一条小河的两岸，红军埋伏好以后，等来了走出宣威县城的滇军孙渡纵队的预备旅。红六军团首先打响了战斗，红二军团负责策应掩护——“激战五小时，枪声之密，胜过除夕爆竹，血肉满地，尸横枕藉。”最后的时刻，红军的两个军团全部投入在正面阻击上，但是滇军孙渡纵队的第五、第七旅到达了战场。二十三日晚，红军撤出了战斗。

滇军第三纵队司令孙渡终于在与红军的作战中获得了一些认识，他对自蒋介石“围剿”红军以来已经转了大半个中国的国民党中央军将

领薛岳说：我军专事进攻，则共军必磨旋打圈，徙移无常，以走我疲，伺机反击；我军专事封锁，则我又因构筑碉堡，旷日持久，徒使共军从容坐大，安然休整，不难一举而突出于封锁线之外。现在我军应利用装备上、数量上的优势，趁共军无根据地可供依托之际，实行外锁内攻同时并举，围堵跟追密切配合，庶使共军处处时时受攻，寝食不遑，动则处处被阻，障碍难行，以免共军随时居于主动，我则常陷于被动地位。

离开宣威后，红军继续向南，于二十八日转移到了川黔交界处的南盘江、北盘江地区。应该说，到达这里的红二、红六军团暂时脱离了危险。因为在乌蒙山里一个月的周旋已把追击的国民党军拖得疲惫不堪，现在当面的敌人只有滇军距离最近，由于宣威一战过于惨烈，兵力单薄的滇军已不敢轻易出击。

但是，红二、红六军团的领导仍是心事重重。

几天前，红军总部发来电报，希望红二、红六军团在金沙江涨水之前过江，进入云南，经丽江、中甸地区，到四川的西康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是否向北踏上漫漫征途，关系到两个军团的未来命运，因此红二、红六军团在回电中详细报告了他们的近况，请求“军委”决定他们下一步的行动：

朱、张

电悉。

一、我军自离开毕节后，在彝良、镇雄地区直至进滇境之先的不长时期内，因粮困难，气候奇寒，居民房屋稀少，急行军和多半时间露营，故部队有相当疲劳，

减员亦颇大。以则河、得章坝及宣威城北战斗，共伤亡千人左右，落伍、开小差总共在二千人左右。唯近日又在恢复疲劳中。

二、在目前敌我力量下［即包括敌之樊、万、郝、郭、李、孙等纵队］于滇黔川广大地区内，求得运动战中战胜敌人创立根据地的可能，我们认为还是有的。

三、我们渡河技术是很幼稚，但如在第三渡河点［元谋龙街渡口］或最后路线［丽江、中甸一线］通过，在春水未涨之前或不致感受大的困难。

四、最近国际和国内事变新发展的情况，我们不能甚明了。及在整个战略上，我军是否应即北进，及一、四方面军将来大举北进后，我军在长江南岸活动是否孤立和困难，均难明确估计。因此，我军究应以此时北进与主力会合，或应留在滇黔川边活动之问题，请军委决定。并上望在一、二天内电告。

五、我军于昨日进战盘县，现集结在盘［县］、亦资孔之线。

贺、任、关

三、二十九

第二天，朱德和张国焘回电表示：“最好你军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处北进，与我们会合，一同北进。亦可先以到达滇西为目的，我们当尽力策应。”

贺龙和萧克明白了，朱德和张国焘还是希望红二、红六军团北上。两个军团的领导经过慎重讨论，决定放弃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北进去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红二、红六军团在盘县地区休整了三天，筹备了物资，扩大了几百名新战士，同时进行了政治动员——从这里出发，史称红二、红六

军团“长征的第二阶段”。而实际上，从中国工农红军三军会合的角度上讲，红二、红六军团从这里起程，才是开始了真正的长征。因为在这之前，两个军团转战湘黔只有一个目的：在滇黔川边地区建立一个新的红色根据地。

红二、红六军团选择渡过金沙江的渡口，与去年中央红军过江的地点相同，即在滇北元谋县城北面的龙街。由于中央红军已经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了，因而红二、红六军团的路线和意图也就没有了任何隐蔽性。龙云立即命令滇军张冲的混成旅从昆明出发，一路向北，赶往普渡河铁索桥两岸防堵。同时，命令仍位于滇东的孙渡纵队加快追击速度，配合张冲的混成旅把红军歼灭在普渡河以东地区。

普渡河，红军到达金沙江龙街渡口前必须要渡过的一条大河。

一九三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红二、红六军团离开位于黔西与滇东边界上的盘县，在平彝附近冲破滇军的防线，红二军团经沾益、寻甸，红六军团经曲靖、马龙，分为北南两路向普渡河渡口急促前进。

但是，张冲的混成旅已经先于红军到达了普渡河，而孙渡纵队的前锋也已向西推进到款庄地区，两支滇军对即将到达的红军形成了夹击之势。

滇军在普渡河边摆好了决战的架势。

普渡河一战，决定着红二、红六军团是否能够北渡金沙江。

四月八日，第二军团先头部队四师到达普渡河铁索桥时，桥上的桥板已经被滇军拆除。四师的红军官兵趁天未亮，从铁索桥下游不远处涉水过了河，然后向滇军混成旅的阻击阵地音翁山发动了攻击。战

斗激烈进行的时候，红六军团正在赶赴四师原拟的渡河地点，但是走到款庄附近的时候，遭到了孙渡纵队第一、第三两个旅的阻击。由于滇军抢先占领了有利地形，被阻的红六军团处境逐渐不利，只有边战边撤。下午五时，由于红六军团渡河受阻，已经渡过河的四师面临着独自被截断在普渡河西岸的危险，因此四师不得不从河西重新渡回东岸，追随着红六军团后撤。

红军从元谋北渡金沙江的路线已被国民党军完全封堵。

两个军团的领导人经过紧急磋商，决定放弃沿着中央红军从元谋北渡金沙江的路线，改从滇西在金沙江的上游渡江。这是一个极其大胆的计划，因为要到达金沙江的上游，就意味着红二、红六军团要横穿整个云南中部地区，一直前行到云南西北部的迪庆。而眼下的危机还不是长途跋涉，而是要把包围过来的滇军顶住，给部队改变行进路线争取到足够的调整时间。

四月九日凌晨，贺龙和任弼时命令红二军团六师从可郎返回到六甲阻击敌人，以掩护整个部队安全脱离普渡河地区。

接到命令的时候，六师刚刚到达可郎。贺龙对六师的红军官兵说：“原路回去阻击敌人，要和敌人抢时间抢地形，什么都不要怕！”

没有战斗动员的时间了，六师立即由军团的后卫变成了一支独立前行的前锋，而十八团由原来的师后卫成了全师的前锋。

十八团在当地的一个十来岁的孩子的带领下，奔跑了十几公里的路，到达了石腊坨垭口。这是一个天然的山口，山口两边是林木茂密的山峰。十八团刚到，就看见穿着灰色军装的滇军正从垭口下面的河沟里往上爬。十八团马上展开了部队，枪声同时响了起来。

十八团注定要不断地打恶仗。

成本新团长的新搭档是四师原副师长杨秀山。

滇军龚顺壁旅是一支擅长山地作战的部队。官兵打仗凶悍，火力配备充足，特别是火炮和重机枪的火力十分猛烈。龙云下定决心，要把红二、红六军团彻底歼灭在这里。龙云的决心来自于部下给他提供的一份战场报告，报告说经过宣威来宾铺一战，滇军已经把萧克的军团消灭了，现在与滇军作战的只有贺龙的部队了。“一担桶已经打烂了一只，剩下的一只就好打了。”——龙云之所以相信显然有夸大之嫌的战场报告，是因为在滇军与红军发生战斗时，他曾陪同蒋委员长乘飞机在战场上空盘旋，他说亲眼看见了滇军勇猛冲锋和红军“狼狈逃窜”。而且，战后他还看见了滇军打扫战场时拍回来的照片，不少红军尸体的照片上都标注有“师长”、“团长”的字样。即使按照照片上的数字计算，萧克部队的营以上军官也应该死光了。龙云的督练处处长说：“现在贺龙残部只剩下万余人，和我们集结起来的滇军兵力相比，相差二十倍，只要我们把硬干、蛮干和沉着三者结合起来，消灭红军指日可待。”由此，龙云产生了再打上一仗，把这股红军全部消灭在云南境内的想法。龙云仅仅在昆明留下了少量的部队，把滇军主力全部调到了滇北，并给部队下达了严厉的战场奖惩令。滇军军官们都跃跃欲试，只有长期与红军作战的孙渡态度消极，他说：“共军真想过去就能够过去。他不在你堵的地方过，折头一转，堵的人不小心反而要吃亏的。即使堵好了又怎么样？他一转起来问题就又多了。不如压迫他们赶快走好了。”滇军上下都说孙渡被红军打怕了，讥讽他胆子小得和老鼠一样。

滇军龚顺壁旅向红军的阵地反复冲锋，曾经一度突入了十八团的前沿，双方在前沿展开了近距离的搏斗，红军面临着极其危难的考

验。身经百战的十八团政委杨秀山战后回忆道：“敌人好像吃了迷魂药，显得异常顽强和凶狠。在密集的炮火支援下，他们开始了猛烈、持续的进攻。前面的刚被打下去，后面的又冒死往前冲，像大海的波浪，一波接一波地往上翻卷。几个回合之后，终于攻占了六连的部分阵地。”

红军的阵地被撕开了口子，滇军不断地往上增援。杨秀山命令二营营长带两个连包抄到敌人的侧后去发起突袭，把失去的阵地夺回来。但是，这两个连在滇军猛烈的火力阻击下伤亡巨大，不得不撤回来。

战斗中，杨秀山驳壳枪里的子弹打光了，他大喊一声叫警卫员拿子弹来，却猛然发现身边没人应声。杨秀山回头一看，警卫员倒在了血泊里。杨秀山刚想蹲下来给警卫员包扎一下，一颗子弹打过来，把他的左眼眶划开了一个大口子。杨秀山的眼睛立即被涌出的鲜血蒙住了。他抹了一把血，想继续指挥战斗，但是血还是不断地冒出来。

十八团的战斗打响后，后面的六师拼命地跑，终于在傍晚时分赶到了战场。十六团在左翼占领了新的阻击阵地，十七团在侧后建起了第二道阻击防线。战斗在更大的范围内更猛烈地进行着。红军官兵们的子弹打光了，便一边捡拾敌人丢弃的弹药，一边在阵地前堆起石头和滚木，准备和敌人死拼到底。当滇军再次发起大规模冲锋的时候，贺龙派来增援的五师一部突然从滇军的左翼插了进去，滇军的冲击顿时被打乱了。

六甲阻击战红二军团六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六师师长郭鹏、十八团政委杨秀山和参谋长陈刚负伤，十八团三个营长中一人负伤一人阵亡，九个连长中伤亡了八个。红军撤出战场的时候，团长成本新命

令："烈士的武器一件也不准丢！"结果，包括成本新在内，十八团幸存的官兵每人身上都背满了枪支。

第二天，杨秀山找来卫生队队长，指着自己的左眼说："把这里面的弹片给我取出来。"手术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进行，卫生队队长用一把小刀割开了杨秀山的伤口，取出了一块很大的弹片。整个手术下来，杨秀山把塞在自己嘴里的一条毛巾都咬烂了。

四月十日凌晨，红军分成两路突然南下，穿过了滇军孙渡部和张冲旅之间的缝隙。第二军团依旧是六师为先头部队，十八团依旧是六师的前锋。为了把滇军从红军的周围调向昆明，贺龙采取了与中央红军一样的策略：佯攻龙云必救不可的昆明。六师派出的小部队当日就抵达了昆明附近，夺取了距昆明仅二十公里的富民县城。当晚，红二、红六军团主力快速南下，全部到达了富民县境内。这时候，昆明城内只有滇军的四个团。龙云一面急令张冲和孙渡火速返回昆明，一面把军校学生部署在了昆明城墙上。当北面的滇军开始回救昆明的时候，红二、红六军团突然向西去了。

四月十七日，红二、红六军团逼近滇西，贺龙、任弼时和关向应致电朱德、张国焘，请求红四方面军前出接应：

朱、张：

（一）我们决采鹤庆、丽江、中甸路线前进。现我们已抵镇南、姚安之线，估计快则十天，迟则两星期可赶到金沙江边。

（二）查丽江附近之金江多系岩河，仅有一座铁索桥，船只少，敌必守桥、封船。我们造船无把握［因行进中无时间试造］，敌人［特别是滇敌］尾后跟进，靠我们渡河技术将感重大困难。

（三）据此，我们要求军委令罗炳辉军迳开金沙江之渡河点，占领铁索桥北岸，掩护我军安全北渡，且随带具有造船技术和其他架桥器材之工兵，并请计算时日，罗部能于同一时间开抵金沙江边接应。是否可以，望即电告。

贺、任、关

十七日二十四时

四月二十三日，红二、红六军团到达了云南大理地区与丽江地区交界处的鹤庆县城。部队在这里休整了三天。休整同时也有迷惑敌人的意思：因为鹤庆东面的梓里渡口有一座铁索桥。位于滇西的滇军部队正被紧急调往梓里渡口的对岸。而实际上，红军的先头部队早已从鹤庆出发了——红军选择的渡口是北面的石鼓。

蒋介石和龙云从昆明起飞，飞机向着西北方向一直飞到了金沙江边，两个人各怀心思看着舷窗外都不说话。龙云接到跟随蒋介石同乘飞机视察前线的邀请时，心里惴惴不安，他不知道蒋介石此举隐藏着什么动机。飞机在险峻的雪山上飞，龙云往下看，突然觉得飞机好像飞出了云南省界，于是愈加慌乱了。他害怕蒋介石像对付贵州的王家烈一样，把他弄到远离云南的某个地方，然后宣布南京政府接管了云南。但是，还好——当看见蒋介石让飞行员把他的亲笔信给地面的滇军投下去时，龙云这才放心了——至少飞机还在云南的上空。飞机盘旋了几圈之后，龙云打起了哈欠，他的鸦片烟瘾犯了。不吸鸦片的蒋介石弄不清龙云为什么不舒服，以为他乘飞机难受，于是热情地用一只吹风机给龙云吹脑袋，说这样一吹就不晕了，龙云虽不敢说什么却更加烦躁了。

四月二十五日，红军先头部队迅速而秘密地抵达了金沙江边的石鼓渡口。这是金沙江上游的重要渡口之一，是通往康藏地区的重要门

户，位于长江上游的大拐弯处。石鼓小镇坐落在玉龙雪山西麓的半山上，土木结构的民居顺着山势层叠。这里的敌情是：民团头目汪家鼎已经把所有船只撤到了北岸，民团就散布在北岸的山坡上。赶到石鼓的红军只找到一条船，于是动员船工和民工赶扎竹筏和木排。同时，一部分官兵用唯一的这条船先渡到了江北。上了金沙江北岸，红军官兵立即开始沿江搜索，那些民团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

第二天，红军大部队到达石鼓，控制了从石鼓到上游巨甸百余里的两岸滩头。红军聚集在金沙江南岸，为了征集船只，贺龙给丽江石鼓区鲁桥乡的开明绅士王赞贤先生写了一封信。这封措辞文雅而又古旧的信件被王先生的子孙们保存了很长时间：

赞贤先生大鉴：

此次大军道经贵地，因事先未遣派员拜谒左右，以致有惊台端。兹为冰释，万希请勿疑惧。闻贵地渡河船筏，一律隐藏东岸，此诚不幸之至，字到请阁下将渡河船筏并派人驶来，以便大军北渡。事竣当给重重劳金，决不至误。

第三路军总司令 贺龙

阴历三月初五

自四月二十五日开始，红二军团先后在石鼓附近开设了五个渡口，依靠征集来的六只木船和一批竹筏、木排，动员了当地的二十八位船工，往返于金沙江两岸；红六军团在上游的巨甸征集了七条木船，数十名船工不分昼夜来回运送红军。船只小坐不了多少人，就有红军官兵在船后用绳子拖上一根巨大的木头，然后他们抱着木头漂过去。至四月二十八日，红二、红六军团一万七千多人马全部渡过了金沙江。

龙云无言以对蒋介石。

蒋介石对龙云甩下的一句话是："兵无常守！"

此时国民党军虽已十分清楚红二、红六军团马上就要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了，但无奈各路部队都已被长时间的追击弄得疲惫不堪，加之实在无法忍受藏区的高原气候和物资匮乏，于是无论是滇军还是国民党中央军都在金沙江边停了下来。

渡过了金沙江的红军继续向北，迎面是连绵的大雪山。

哈巴雪山海拔五千多米。来自湖南、湖北、贵州等地的红军第一次感受到翻越雪山的艰难。从山脚到山顶，哈巴雪山在金沙江边直入云霄，从闷热的峡谷底端到寒冷的雪线以上，红军官兵还都穿着单衣，干部们急忙喊："把背包打开！把被子披上！"巨大的"之"字行队伍在雪山上显得格外渺小，随着海拔的升高，红军长长的攀登队伍明显地缓慢下来。接近山顶的时候，风狂雪暴，贺龙不断地说："不准停下来！不准坐下！赶快走！"因为绝不能在雪山上过夜，红军那一天走了十几个小时。萧克说："上下山一百五十多里。"

红二、红六军团对翻越哈巴雪山写有行军总结报告：

> 我们渡过金沙江向中甸前进，中部经过一个很大的雪山，这是事先不很清楚的，因此未曾有充分的政治动员和准备工作，结果有的在雪山上停止休息和吃雪水以致死亡近百。自百松到茨乌，走错了路，过了一雪山死亡亦数十，由东南又多过一雪山，四师当时因前面被番民破坏道路阻碍我军部队走不动，后面部队仍在山上，突然天变下大雪，冻死四十人，十三团亦因前面队伍走不动停止被冻死者近三十人，六师亦死亡数十……

五月三日，红二、红六军团到达了云南中甸。

中甸——香格里拉。

到达中甸地区的红二、红六军团最大的愿望是尽快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四月，张国焘在军事和政治的双重压力下决定北上。红四方面军在川军连续不断的攻击下，数万人的队伍第三次翻越大雪山，陆续撤退到了甘孜一带，并在这片更偏远更荒凉的地方停留下来。

红四方面军之前没想在这里停留，但是红二、红六军团已经北上，他们必须停下来等待接应。

红四方面军进行了整编。整编后的建制是:

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周纯全，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

第四军军长陈再道，政治委员王建安，参谋长陈伯钧，政治部主任刘志坚，下辖十师、十一师、十二师、独立师;

第九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三，下辖二十五师、二十六师、二十七师、教导师;

第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下辖八十八师、八十九师;

第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政治委员詹才芳，参谋长李聚奎，政治部主任朱良才，下辖九十一师、九十三师;

第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委员黄超，副军长罗南辉，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下辖十三师［原第五军团部队］、十五师；

第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李干辉，下辖九十四师、九十六师。

方面军直辖：

妇女独立团，团长张秋琴；

骑兵师，师长许世友；

四川抗日义勇军，总指挥王维舟；

金川省军区，司令员倪志亮，政治委员邵式平，下辖独立师、独立二师。

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政治委员何畏，参谋长张宗逊，政治部主任王新亭。

方面军共计六个军四万余人。

红四方面军派出了第三十二军和第四军的一部，一直南下到大雪山以西的雅江地区，与驻守在那里的国民党第十六军李韫珩的部队对峙，以保证正在北进的红二、红六军团右翼的安全。

随着两军逐渐接近，电报往来开始频繁。

五月八日，已从云南中甸进入四川西康地区的红二、红六军团致电朱德、张国焘：

朱、张：

甲、至中甸两军团人员武器统计如下：

1、二军团九九九五人，长短枪共四八六七支。

2、六军团五九九八人，长短枪二九八五支。

乙、合计人一五九九三、枪七八五二，另山炮两门、迫击炮四门。

贺、任、关

五、八

红四方面军的回电尽显红军之情：

贺、任、关：

甲、蒋贼令刘文辉、唐式遵、邓［邓锡侯］部推进大金川东岸筑碉封锁我。薛岳部在炉［炉霍］、康［康定］、雅［雅江］线。樊［樊嵩甫］、郭［郭汝栋］、孙［孙渡］等纵在金沙江、雅砻江封锁。刘湘以一部驻大渡河。杨森、李家钰驻西昌、会理。敌企图封锁我于现地区，待我出而击我。

乙、你们依沿路粮食情形可缓进，多休息，深入卫生运动，免减员。部队被服补充情形盼告，沿路须搜集羊皮、羊毛、木子布，速补充棉衣。因北来天较寒，伏天需要冬衣，同时须节省经济物质，有作长期艰苦斗争之准备。

丙、炳辉军前占理化南之摩拉［木拉］，约今可占理化。

丁、六军在定乡［乡城］如粮食足，可休息十天以上，并查明乡城通义敦和理化两路线、粮房电告。

戊、此间存有盐待补充你们，已动员全体指战员准备物质拥护你们，现已集中一部，但你们须注意沿路补充，随时均需带冬衣。

朱、张

五、十七

甘孜是中国西部最荒僻的地区之一。

这里的藏人被称为“康巴人”，由于历史上备受清兵的袭扰、镇压，因此普遍存在着敌视汉人的心理。红军到达这里后，不进喇嘛寺庙，尊重藏民的风俗习惯，严格执行群众纪律，为贫苦藏民送粮治病，结果甘孜的藏民都管红军叫“新汉人”。对那些袭击红军的藏族土司武装，红军往往是出兵将他们三面围住，攻而不打，留出一面让他们逃走。这是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的主意。红军还去甘孜县城北面的绒坝岔举行了一个阅兵式，为的是让那些土司看看红军的威风和力量。从绒坝岔回甘孜的路上，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遇到一位藏民骑着一匹黄马跑得飞快。李先念赶上去问藏民他这匹黄马换不换。藏民说：换呀，两匹小母马，换我这一匹。李先念就让他在警卫班的马里挑，藏民挑了两匹马，乐呵呵地走了。李先念也笑了，他把这匹黄马给了军司号长，因为这个十八岁的小红军行军总是掉在后面。李先念原来以为他不会骑马，谁知小红军说：“我会骑！可我的马不跑只走。”

红军的举动感动了甘孜白利寺的格达活佛，他不但把白利寺的一百三十四石青稞和二十二石豌豆送给了红军，还动员白利乡的藏民帮助红军筹集羊毛、帐篷等北上物资。为了让藏民更加了解红军，格达活佛写下了可以传唱的诗歌：

云雨出现在天空，

红旗布满了大地。

未见如此细雨，

最后降遍大地。

啊！红军，红军！

今朝离去，何日再回?

幸福的太阳，

从高山上升起来了！

像乌云一样的痛苦，

被丢到山那边去了！

你不要以为山高，

有翻山的一匹骏马。

你不要以为没有人同情我们，

有搭救我们的恩人来了！

后来红军离开甘孜的时候，朱德亲自来到白利寺向格达活佛告别。朱德说：“红军至多十年、十五年一定会回来的！”格达活佛在红军走后救治掩护了两百多名被留在甘孜的红军伤员。

尽管滞留在自然环境极其恶劣的地方，官兵们也不曾有过任何灰心与绝望，因为他们始终相信红军胜利的明天定会到来。红军忙着将羊毛捻成毛绳，再用毛绳织成衣服，“不久，全军服装都是各种颜色的

毛织品，其中以白色最多”。红军组织了“野菜委员会”，在朱德的带领下漫山遍野地寻找可以吃的野草。红军官兵还在甘孜举办了体育比赛和文艺比赛。体育比赛的内容有：两百米赛跑，通过障碍，跳高、跳远等。文艺比赛的内容有：出墙报，团体唱歌，政治演讲——无论如何，一九三六年春天来临的时候，缭绕在中国西部那片广袤而荒凉的土地上的歌声，是人间难以想象的充满希望的天籁之声。

五月五日，红二、红六军团分成两路继续向北前进：红二军团偏西，沿着川藏边界，走得荣、巴塘和白玉一线，然后从白玉东进，进入甘孜；红六军团走定乡、稻城、理化和瞻化一线，自南向北穿过甘孜地区的中部，到达甘孜县城。从这两条路线上看，红二军团的路途更远更苦。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二日，红六军团与前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到达了甘孜附近的普玉隆。红军总司令朱德特意从炉霍赶到了普玉隆迎接红六军团的官兵。

八天之后，六月三十日，红二军团到达甘孜北面的绒坝岔，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会合。朱德又从普玉隆赶往绒坝岔迎接红二军团的官兵。

然后，朱德骑马十几里去甘孜附近的干海子迎接贺龙。

远远地看见贺龙的时候，朱德勒马停住了，泪光闪闪。

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第六军团全部到达了甘孜县。

同一天，陕北发来了贺电，“以无限的热忱”庆祝红四方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胜利会师。并欢迎两军“继续英勇北进，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这是一封由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彭德怀、王稼祥、林彪等六十八人署名，并代表红一方面军、陕甘宁人民、苏维埃陕甘宁三省政府等十多个单位“联名致意”的贺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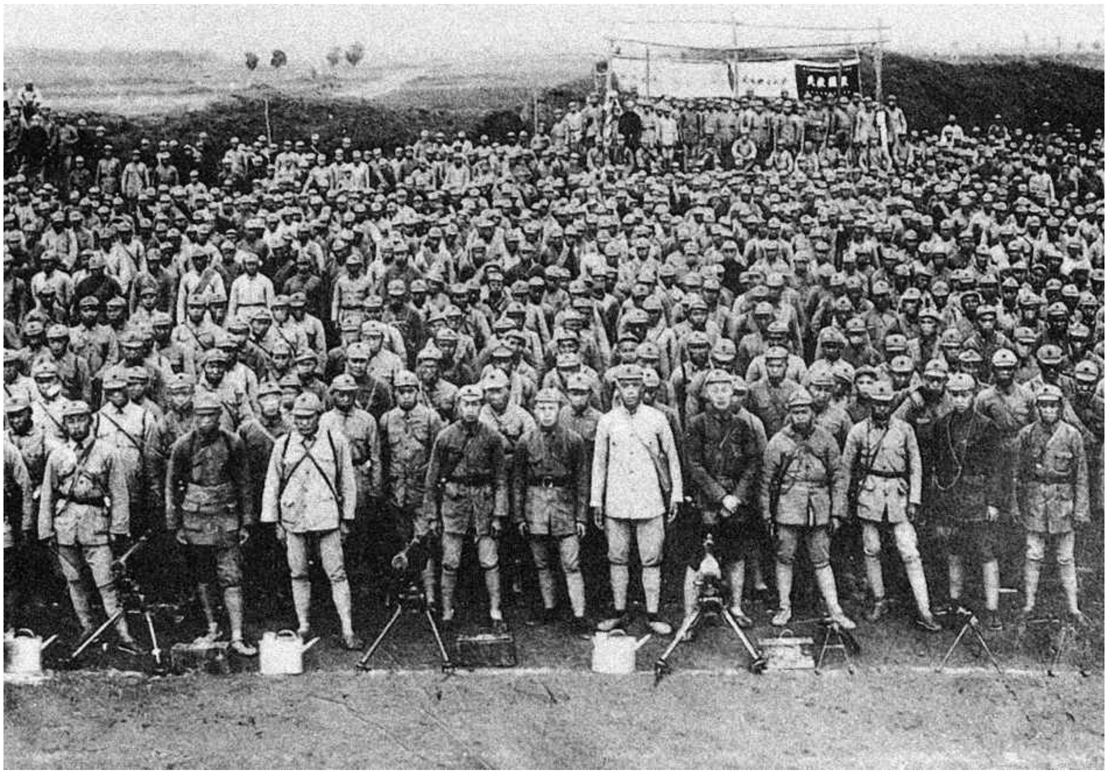
七月二日，在甘孜县举行了庆祝红军两大主力胜利会师的联欢大会。

参加大会的部队“服装整齐，按高矮站，成四路纵队进入会场”。当年红六军团十七师战士谭尚维回忆道：“两支从未见过面的兄弟部队，经过了千难万险，穿过枪林弹雨，在最困难的时刻会师了。”朱德在会上讲了话。他虽然不像红二、红六军团官兵想象的那样高大，但是这位红军将领“挂着慈祥的微笑，衣着很朴素，上身穿着一件土制褐色毛布上衣，脚上是一双草鞋，十分平易近人，一切都和士兵一样”。朱德说：“我们祝贺你们战胜了雪山，也欢迎你们来与四方面军会合。但是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联欢会上，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剧团演出了歌曲《迎亲人》和舞蹈《红军舞》，这让刚刚历尽艰辛与牺牲的红二、红六军团官兵惊奇不已、兴奋不已。贺龙当即说：“咱们也要搞一个剧团！”

但是，无论文艺演出多么美好，也无论会合后的心情多么喜悦，红军官兵明白，他们充满未知艰险的行军还远远没有结束。他们无法想象红军总司令朱德说的那个北方是什么样子——红四方面军官兵告诉红二、红六军团的兄弟，他们曾经走过的那条北上之路山险水急，还有一片处处隐藏着死亡陷阱的茫茫大草地。

# 第十八章 江山多娇

1936年10月·甘肃会宁



张国焘是这样描述红二、红六军团领导人的:

二方面军的领导人物以任弼时为重心，他留俄回国后，任少共中央书记，一九二七年以拥护共产国际反对陈独秀著称。中共第六次大会时，被选为中央委员，后来升任为政治局委员。他原富有青年气味，经过许多磨炼，已显得相当老成。当时他已蓄起几根胡子，我往常叫他做小弟弟，现在也要笑着叫他做“任胡子”了。贺龙当时亦已经看不出任何土匪气味，简直是一位循规蹈矩的共产军人，一切听由任弼

时指挥。萧克将军倒很像个文人，爱发发牢骚，但也不坚持己见。关向应原也是少共的小伙子，这时仍富有青年气味，不遇着大问题，例不轻易发言。

而任弼时、贺龙、萧克和关向应看见张国焘时，都有些吃惊：红四方面军全军只有他一人又白又胖。

张国焘在第三十军八十八师驻地炉霍招待了红二、红六军团领导。饭桌上的食物十分丰富，最令人惊奇的是有海味。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解释说，两个月前消灭了敌人的一个保安团，这些东西是缴获物资的一部分。连同郑维山在内，红军官兵不知道这些干货是什么东西，只是听说价钱十分昂贵，于是就向上级报告了。陈昌浩说："把好东西都保存好，等和二、六军团会合了，要好好招待他们！"

这一瞬间，贺龙和任弼时都很感动。

就在红四方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前夕，张国焘被迫宣布取消了他的"中央"。张国焘对红四方面军干部的解释是："我们双方都同时取消中央的名义，中央的职权由驻国际的代表团暂行行使。如大家所知一样，国际的代表团中，负总责的有陈绍禹［王明］同志，还有别的同志，代表代表团而回国的则有林育英同志等。在陕北方面，现在有八个中央委员七个候补委员，我们这边有七个中央委员，三个候补委员，国际代表团大约有二十多个同志，这样陕北方面设中央的北方局，指挥陕北方面的党和红军的工作，此外当然还有白区的上海局、东北局，我们则成立西北局，统统受国际代表团的指挥。"张国焘慷慨激昂地说："中国的党，因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幼稚，斗争环境的复杂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解比较少，所以党内引起争论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一件事。共产党的党内争论与国民党完全不同，国民党可以暗杀自己的人，可以用到卑鄙无耻阴谋的手段，但我们决不会如此。在

共产党内有时会发生争论，可是我们可以找到团结的方法去共同对付敌人，冷笑的敌人让他们去笑吧，最后会笑的才是真正会笑的！”——原始讲话记录此处有个括弧，括弧里面的三个字是：大鼓掌。

受到“大鼓掌”的张国焘夜深之时仍然惴惴不安。他不断地给林育英发电报，表示“赞成此间对一方面军取协商关系，对北方局取横的关系”。

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回电中的劝告异常恳切：

弟等与国焘同志之间，现在已经没有政治上和战略上的分歧，过去的分歧不必谈。唯一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与蒋介石。弟等对于兄等及二、四两方面军全体同志之艰苦奋斗表示无限敬意，对于采取北上方针一致欢迎，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国焘兄之意暂时采用协商方式。总之为求革命胜利，应改变过去一切不适合的观点与关系，抛弃任何成见，而以和谐团结、努力奋斗为目标，希兄等共鉴之。

张国焘认为，此时对于陕北来说，最重要的是要让占中国红军兵力绝大多数的红四方面军北上，与在陕北的红一方面军会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后，总兵力已达到六万，而陕北只有一万多红军，陕北无论如何不能把这支庞大的红色武装丢下。而此刻红四方面军必须动身北上了，这让张国焘感到自己的政治前途充满危机。

朱德与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和王震分别谈了话，详细地介绍了张国焘与中央对立的来龙去脉，还拿出了两河口会议和毛儿盖会议的决议请他们一一过目。朱德认为张国焘另立中央“是大错误”，但必须注意“争取、团结，促使他一起北上”。朱德特别叮嘱道：“不要冒火，冒火要分裂。中央在前面，不在这里。”

为了影响红二、红六军团领导人的政治倾向，张国焘提出“开一个党内会议，把有些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谈谈”。但这一建议遭到了任弼时的反对。留着胡子叼着烟斗的任弼时话说得极其威严：“我们认为目前召开党的会议的条件不成熟。会上谁作报告都不合适，如果有不同意见，结论怎么作？现在应集中精力投入北上行动。”

私下里，老资格共产党人任弼时与张国焘、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傅钟、李卓然一一进行了交谈，“期望了解过去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党内争论，并努力促成我党的完全团结一致”。徐向前对任弼时说：“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自己当时没有跟中央走，是不想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大敌当前，团结为重，张国焘另立中央，很不应该，党内有分歧可以慢慢谈”。“现在取消了‘中央’对团结有利。北进期间，最好不谈往事，免得引起新争端”。晚年的时候，徐向前回忆起此刻的任弼时时说：“他给我的印象冷静、诚恳，对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充满信心。”

一九三六年七月五日，中革军委颁布了关于组织红二方面军及其领导人任职的命令：

军委命令：

七月五日决以二军、六军、三十二军组织二方面军，并任令贺龙为总指挥兼二军军长，任弼时为政委兼二军政委，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陈伯钧为六军军长，王震为政委，即分别就职。此令。

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王稼祥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出现了。

命令到达的时候，红二、红四方面军已经离开甘孜开始北上了。

之前的六月二十五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发布了北上部署：

徐：［密译］

A、我军拟以松潘、包座之线为出动目标，分三纵队进。

1、董、黄指挥五军、九十一师在丹［丹巴］两团及留绥［绥靖］各部为右纵队，由绥经梭磨、马河坝、侧格、杂窝、哈龙进，但到侧格须抽检并与中、左纵队行程调节。

2、你指挥九军、三十一军四个团，四军两个团，红大、总供、总卫两部由炉［炉霍］、色［色科］，四科经诺科、让倘［壤塘］、三湾、按坝、查理寺、上壤口、毛儿盖进。

3、我们指挥三十军、四军两个团、三十二军、二方面军及总直各部为左纵队，由甘孜、东谷经日庆、西倾寺、让倘进，其先头须查报西倾寺或让倘到阿坝路状，再定前进路线。

A、中、左纵队准备在让倘地带补充粮并整理建制及指挥。

B、已令玉清［孙玉清］两师明寝［二十六］日由炉向色科进；洪儒［柴洪儒］两团则于建安［王建安］抵益时，即组织转色科归还建制续进。红大、总供、卫部则随建安后进，二七七团则断后，望据此指挥中纵先头速占让倘粮食地带为要。

C、我们拟在二方面军先头进。

朱、张

二十五日

按照这一部署，红四方面军由朱德和张国焘指挥一路为左纵队，徐向前指挥一路为中纵队，董振堂、黄超指挥一路为右纵队，分别从甘孜、炉霍、绥靖出发。红二方面军跟随红四方面军左纵队，由甘孜东谷出发。

根据朱德的建议，任弼时跟随红军总部行动，刘伯承跟随红二方面军行动。

这是一支人数多达六万的巨大人流。一年多前，这种规模惊人的移动在中国国土的腹地曾经出现过，那是在中央红军渡过湘江之前，滚滚人流穿行在江西与广东的翠绿山谷间。而这一次，规模巨大的移动发生在中国最荒凉的高原上，那里空气稀薄，人迹罕至，雪山间纵横着纷乱的冰河。

从甘孜到包座，要翻越大雪山，穿越大草地，没有任何物资补充的必经之地至少有七百公里以上。红军出发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一张羊皮或者一双结实的鞋子是十分必要的，更重要的是干粮。红二方面军官兵对将要走上的路一无所知，而红四方面军中许多官兵已是第三次走这条路了。

红军出发了，出发的队伍平静而有序。

红四方面军新成立的骑兵师，是中国工农红军中第一支正规的骑兵部队，师长许世友为此觉得甚是风光。三千多人马，浩浩荡荡，风尘滚滚，担负在最前面侦察道路和筹集粮食的任务。许世友已经走过两次草地，他知道筹集粮食的重要。骑兵师出发后不久，快到色曲河时，许世友策马登上一块高地，扑面而来的景色让他眼睛一亮：弯曲

的河水两岸，草地像毛毯一样，藏民的帐篷散落在河边，一群群牦牛和数不清的白羊如同初夏的繁花。

“好一座大粮仓！”许世友一声令下，三千匹战马朝着色曲河奔驰而去。

通过藏族向导的解释，牧民们知道了停在河边的红军没有任何恶意，只是对他们的粮食和牛羊特别感兴趣。红军出的价钱绝对公平，付钱时不欠分文。牛羊、青稞、豌豆、酥油、奶渣、土豆，凡是可以吃的东西红军都接受。骑兵师用白花花的大洋购买了四百多头牦牛，一千多只羊，还有一些粮食。

尽管对于长途行军的数万红军来说，这些食物可谓杯水车薪，但是终究能给后续部队的官兵带来极大的希望。

半个月之后，红二、红四方面军各路纵队相继到达了阿坝地区。

这里是九个月前红四方面军南下川西平原的出发地，想必包括张国焘在内的红四方面军所有官兵重见这片土地时，定会心情复杂。

红军再一次进入了松潘大草地。

九十一师十六岁的小红军谭清林是打旗兵。打旗兵要举着红旗走在连队的最前面，因此谭清林特别留心先头部队留在草地上的毛绒绳，顺着这条弯弯曲曲延伸到草地深处的绳子就不会迷路，也不会掉到泥潭里去。但是，沼泽中的草墩子往往踩上去就会沉下去一截，接着黑水就泛上来了，谭清林脚下的毛绒绳几次都差点没在黑水里。进入大草地的第四天，一场冰雹过后天降大雪，官兵们只有躲在用手撑起的被单下。雪停了，打旗兵伸出头来先看绳子，却发现毛绒绳不见

了。连长命令全连排成一路横队，一个草墩一个草墩地找。谭清林急得掉了眼泪，四野茫茫，他的红旗不知道该往哪里打了。没能找到毛绒绳，只好原地等待后续部队。一天又一天过去了，全连只有谭清林还剩最后一碗炒面，他把这碗炒面倒进炊事班的大锅里，用水搅得稀稀的，让全连官兵每个人都喝了一口。后续部队仍不见踪影，这支掉了队的连队必须走了，因为再等只能全都死在这里。有人从泥泞中挖出一种像萝卜一样的东西，咬上去有甜味，于是大家疯狂地吃起来，吃着吃着就有人开始呕吐。另一种长满刺的灌木上结着豆粒大的红果实，红军官兵尝了，没中毒，于是每当发现这种灌木，大家就不顾一切地跑过去。谭清林又饿又累，走着走着，眼前的草墩一晃，人跟着就栽进了泥潭里。那一瞬间，他仍用一只手举着红旗，他想挣扎着爬出来，但是越挣扎陷得越深。卫生员赶快用一根木棍拉他，可是没把他拉出来，自己差点陷进去。后面的官兵看见前面的红旗没了，赶了上来。一个大个子战士把自己的被子铺在草地上，再取下身上的两支步枪，十字交叉地横在被子上，然后几个人趴在被子上一起拉，终于把小红军谭清林拉了出来。队伍继续向前走，来到了一条河边，暴雨使河水涨得很高，先头部队在河上拉了一根铁丝。谭清林下了河，拉着铁丝往前游，游到河中央的时候，铁丝断了，他抱着红旗被河水冲向了下游。连长骑上一匹马，跟着河里的红旗追，然后连人带马冲进河里，让谭清林抓住马尾巴。连长拼命打马朝河岸冲。“别松手！坚持住！”官兵们都在岸边喊。喝了一肚子水的谭清林上岸后，呕吐了一会儿，接着，红旗又湿淋淋地竖在队伍前面了。晚上的时候，官兵们围着一堆火，用茶缸煮水喝。一个战士从衣服里像摸宝一样摸出一小块干姜，抠下一些姜末放在了谭清林的茶缸里：“喝吧，喝了姜水打旗有力气。”喝了热姜水，疲惫的打旗兵和卫生员挤在一起睡了。第二天天亮时谭清林怎么也起不来，身子与地面冻在一起了。连长使劲地摇晃，把他拉了起来。他回过身去拉卫生员，卫生员一动不动，仔细

看，和谭清林年龄差不多的卫生员已经死了，身体和结着薄冰的大草地一样冰冷。连队继续出发，连长和指导员都落在了后面，他们还在宿营地一遍又一遍地推推这个喊喊那个，他们总觉得那些官兵没有死，只是太累了，睡得很深。这个连队一百多人，走出草地的时候，只剩下不足二十人。

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前两次过草地的时候是指挥员，而这一次他却躺在了担架上。王树声高烧不退，烧得不断地说胡话："老子枪毙你！老子枪毙你！"谁也不知道他要毙的是哪一个。北上出发前，张国焘找他谈了一次话，原因是"有人反映王树声对张主席有意见"。张国焘开口就问："我刚到鄂豫皖的时候，你是什么职务？"——一九三一年五月，张国焘到达鄂豫皖根据地任中央分局书记，王树声那时任根据地红四军十一师副师长兼三十二团团长。张国焘话中有话地对王树声说："你眼光要放远一点，不能把自己降到一个普通士兵的水平。"当王树声从昏迷中醒来时，发现抬自己的两名战士不见了，一问，警卫员没说话眼圈先红了。王树声说："把我的马牵来！"他坚持不让战士抬他，可是这位骁勇善战的红军指挥员已经在马背上坐不住了。于是只能他昏迷的时候抬着他，他清醒的时候把他捆在马背上。红四方面军快出草地的时候，王树声不再说"枪毙你"之类的胡话了。他知道，红军所遭受的所有磨难就要到头了。

小文书邓仕俊因枪伤伤口化脓高烧不止。部队进入大草地后，二十六师政委杨朝礼安排四名战士抬着他。小文书躺在担架上昏迷了好几天，醒来的时候发现四个抬他的战士只剩下三个了。又走了几天，好不容易爬上一座地势稍高一点的山坡，能有块地方坐下来喘口气了。一个战士刚坐下来，身子往后一仰说："我不行啦。"然后就死了。剩下的两个战士对邓仕俊说："我们两个人一定会把你抬出草

地！”邓仕俊的伤口实在痛得厉害，打开一看，皮肉已经完全溃烂了。两个战士建议烧点热水把伤口洗一洗，于是就去捡柴。邓仕俊躺在担架上远远地看着他们。看着看着，其中一个战士在往回走的时候突然栽倒了，倒下的那个地方瞬间就泛起了一圈圈翻着沫的黑水。只剩下最后一个战士了，他烧了热水，给邓仕俊洗伤口。邓仕俊问："同志，把你的名字告诉我吧。"那个战士说："我叫刘宏，四川巴中人。"又说："别担心，我结实得很哩！"小文书邓仕俊说："刘宏同志，趁着还结实，你先走吧！"刘宏说："丢下伤病员自己走，算什么红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刘宏背着邓仕俊走。因为负重他越走越慢，直到落在了全师的最后。没有任何吃的，连皮带都已经煮了，刘宏实在背不动了，邓仕俊一定要他先去赶部队，他对刘宏说："你赶上了，吃点东西，再回来接我。"刘宏知道已经快出草地了，就把邓仕俊放在了一个草坡上，说："就在这里，别动，我去找人来抬你。"小文书邓仕俊没有在那个草坡上等，他一个人一点一点地爬，当他终于遇到了另一支红军队伍时，已经瘦得让所有看见他的官兵都落了泪。邓仕俊被送到了二十六师师部，杨朝礼政委说："这不是咱们的小文书嘛。"一年以后，杨朝礼政委在战斗中牺牲，邓仕俊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大哭了一场。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总是说："我的生命不是属于自己的。"

七月七日，红二方面军从甘孜出发。

关向应在日记中记录道：

七月七日，六军行军约百里，沿途均无房屋，到大吉岭附近露营。

七月十三日，六军经点头寺进沟，顺沟而上，翻了两个山，最后一个较高，下山坡很滑，行军约一百二十里到绒玉。

七月十六日，六军上午出发，沿河而上，下午到玉楼。各部队还是没有找到粮食，全吃野菜。指挥部及二军四师到打盆、大古岭。六师在东谷。因河水涨，需架设浮桥，明日才能续进。

七月十九日，六军到作木沟露营，大风大雨，接着下大雪雹，部队人员一夜满身通湿，寒冷似湖南三九天气。

七月二十一日，六军到离阿坝四十里的地方露营，通宵大雨，帐篷大漏，地下很湿，睡不成。

七月二十二日，六军过一个上下约四十里的横排山。过山时，大雨倾注，狂风折树，非常寒冷。

红二方面军第一次过草地。为了获得过草地的经验，在甘孜时他们曾不断向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取经，让他们介绍过草地的注意事项以及应对困难的方法措施，甚至把草地里可以吃的野菜形状都一一记了下来。但是，由于红四方面军已经在甘孜驻扎了数月，红二方面军能够筹集到的粮食十分有限。

为了帮助红二方面军，朱德命令红四方面军直属队把所有驮帐篷和行李的牦牛全都留给红二方面军，从牦牛上卸下来的东西一律由人背着。临出发的时候，朱德还嘱咐贺龙："牦牛的皮、肠子、蹄子，千万不要扔掉，那些东西都是可以吃的。"后来，当红四方面军渡过了嘎曲河的时候，朱德又亲自安排在那里设立兵站，留下一批牛羊，以接济后面的红二方面军——嘎曲河，红四方面军第一次北上折返的地方。

红二方面军最后筹到的粮食仅够维持七八天。可是根据红四方面军的介绍，通过松潘大草地即使一切顺利也需要十二天。

贺龙把所有可能遇到的困难都想到了，但是部队出发不久遇到的危机还是令他吃惊不小。由于奉命跟随红四方面军前进，他们严格地走在红四方面军的行军路线上，这样一来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宿营地可以筹集到的粮食已经全部被前面的大部队筹走了。更令人担忧的是，前面大部队的伤病员和掉队人员全部被收容到了红二方面军的队伍中，人员的增多使粮食危机更加紧迫，部队很快就出现了因冻饿而减员的现象。贺龙给各师都下了命令："不管多么难，都不许丢掉伤病员。活着的人只要有一口气，就要抬着他们走。"贺龙把自己剩的一点炒面给了身负重伤的警卫连连长朱声达。他命令成立一个由党员组成的"试吃组"，尝试着吃各种野草，然后把不会引起中毒的野草挑选出来，仅这个工作就牺牲了不少党员。胡子已经长得像乱草的贺龙心急如焚，因为这些红军还是孩子的时候就与他一起出生入死。贺龙把一个倒在路边的战士扶上了自己的马，然后对警卫员说："把他送到军医院去，不许半路让他死了，让军医院给我打个收条回来。"松潘大草地上，那些倒下的红军官兵为了不拖累其他同志，索性拒绝收容。他们用草把自己的脸盖上一动不动，希望走过他们身边的同志以为他们已经死了。收容队很快知道了这个情况，于是他们扒开每个人脸上的草，只要发现还有一口气，就要抬到担架上。可是他们看见的更多的是已经冰冷的尸体。

由于是后卫部队，红二方面军不断遭到土司武装的袭击。开始的时候，没有与骑兵作战经验的红军伤亡很大，他们没有力气抵挡旋风一样冲过来的马和从马上劈下来的锋利的刀。但是，后来红军还是摸索出了办法，比如坐在地上背靠背围成一个大圆圈，然后射击。

最猛烈的袭击发生在方面军总部宿营地。七百多敌人的骑兵从一座小山丘的背后突然冲了出来，担任警卫的特务连人少力单，附近的

二八八团听到枪声立即赶来增援。这时候，贺龙正在一个小水洼旁钓鱼。红军过了嘎曲河以后，草地里的小水洼很多，贺龙号召大家钓鱼以补充食物。这里是藏区，藏民不吃鱼，因此鱼很多。敌人的子弹从贺龙的头顶上飞过，警卫员跑过来让他隐蔽，贺龙一动不动，直到把一条大鱼拉上岸才站起来说："我去看看。"贺龙赶回来，看见二八八团一营营长正命令战士们坐下来围拢成一个圆阵，这给土司的骑兵造成了红军投降的假象，当他们毫不迟疑地再次冲过来时，红军的枪一齐响了。贺龙对一营营长说："打得很好！把这个办法通报给全军！"

进入草地后，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萧克却被另一个突如其来的问题苦恼着：他的夫人蹇先佛就要生孩子了。

蹇先佛是一个刚满二十岁的活泼开朗的女红军。部队到达甘孜的时候，姐姐蹇先任发现妹妹的肚子大了起来。部队北上出发后，蹇先任因为担心一直跟随着妹妹行军，她要帮助妹妹渡过女人生产的这道"鬼门关"。可是，蹇先任没想到，妹妹会在最艰苦的草地生产。草地无边无际无遮无拦，妹妹仰在马背上，血顺着双腿往下流。蹇先任赶快让马停下来，很快萧克拍马赶到了。

那个夜晚风雨交加，茫茫草地中支起了一顶小帐篷，但是由于漏雨，蹇先任和正在忍受阵痛的妹妹浑身都湿透了。蹇先佛在极度的痛苦中呻吟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孩子终于生了下来。

蹇先佛抱着孩子躺在担架上。

看见抬担架的战士艰难行进的样子，萧克和蹇先任都把自己的那份干粮省下来，给了抬担架的战士。

为了让更多的官兵活着走出大草地，十八师师长张振坤提出了“交公粮”的建议。所谓“交公粮”，就是大家把携带的干粮或者其他可以吃的东西都拿出来，然后所有的人平均分配。张振坤向红军官兵强调的理由是：“革命不是一个人能干成功的。”这是草地中最艰苦的时刻，一粒粮食比金子都宝贵。张振坤在地上铺了块雨布，首先把自己的干粮全倒在上面，红军官兵都跟着他这样做了。然后，张振坤拿着个小碗叫名字，全师每个官兵都分到了一份。分配的时候，张振坤听见有战士说：“要是能抽上口烟，就不会感到那么饿啦。”张振坤放下小碗骑马走了，一会儿他带回来一小袋子烟叶，说：“这是贺老总交的‘公粮’，他的烟我要来了一大半。”三十八岁的红军师长张振坤后来在“皖南事变”中被俘，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于上饶集中营。

六师是红二方面军的后卫，或者可以说，他们是中国工农红军穿越松潘大草地的最后一支队伍——当六师走出草地的时候，他们从这片苍茫荒凉的土地上带走了最后一个关于生命的不朽故事。

六师在甘孜筹粮的时间只有一个星期，于是每人只带了仅够两天的干粮。进入松潘大草地后，六师的队伍越来越庞大，因为他们必须收容前面所有的掉队人员和伤病员。每到部队宿营的时候，师长贺炳炎都要带着马匹返回去接应再次掉队的官兵。他把躺在地上的战士拉起来，扶上自己的马，然后用他仅有的一只胳膊拉着马缰绳在前边引路。贺炳炎边走边说：“小鬼，坚持一下，出了草地，就有村子了，咱们搞饭吃，吃它个够。”

晚上，天气突变，暴雨夹杂着冰雹。六师的后卫十六团那一个晚上竟然冻死了一百七十多人。

第二天早晨天空明朗起来。休息的时候，跟随红二方面军行军的廖承志坐下来开始画画。廖承志原是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在“肃反”扩大化中被撤职“关押”。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任弼时把他要了过来。因为有了任弼时的关照，廖承志不但获得了充分的自由，而且担负起大量的宣传工作。红军开大会张贴的马克思和列宁的像都是他画的。他给刘伯承画了一张像，酬劳是一捧青稞。他还给傅钟画了一张，这张画像傅钟一直保存着，画上写着：“11·7，1936，绒玉。”傅钟后来始终记忆着松潘大草地那个晴朗的早晨：

霎时乌云散了，久违的太阳露出火红的圆脸，把灿烂的光洒满草地。走在队伍中的刘伯承总参谋长情不自禁地高呼了一声：“太阳万岁！”……于是长长的行列上空，像有万顷波涛喧嚣一样，连连响起“太阳万岁！”“太阳万岁！”的喊声。

尽管许多人倒下了，但是在松潘大草地上，红军的队伍逶迤不断，一直向北。

国民党新编第十四师师长鲁大昌最近格外心神不定。几天前他派出去几十名通晓藏语的侦探，至今一个也没回来。前面的部队送来的情报说，红军在这一带派遣了许多侦探，专门侦察岷县附近的驻军兵力，还培训了六十多名当地人作向导。而新编第一军军长邓宝珊的来电更让鲁大昌迷惑不解了：“据战俘供称，共军之口号，要爬到最高高原地方，建成一所根据地，请注意。”——“最高高原”是什么地方？目前向腊子口和岷县靠近的这股红军，是要通过，还是要占领这里？

看来红军是非来岷县不可了，鲁大昌向全师官兵发布了公告：

查岷县扼洮河之上游，为由川入甘要冲，共军倾巢北窜，以其所经之路线判断，必先争取洮岷作根据地，再图进犯；如果岷县不守，则西北将受动摇，影响国

家大局，诚非浅显。彼等此种企图，早经委员长艳［三十日］电指出：消灭共军之计划，第一项须凭借天然险要及原有碉堡，采用攻势防御；第二项应参照过去教训，利用碉堡处处设防，原期封锁严密，但因兵力分散，反使处处薄弱，仍难堵其突围。今后除严密封锁，坚壁清野外，尚须集中兵力于重点；第三项从黄河、洮河经岷县西至临潭，南至旺藏为第一线，以兰州、临洮、岷县为重点。是本师驻防岷县，在防务上所负之责任至重且巨，自应坚定意志，抱与城共存之决心，固守岷县；况本师官兵，半系黄洮之间健儿，对于家山，尤应努力保卫，如有疏虞，不但无以对国家，更何以对地方父老子弟？今共军已入我堂奥，唯有抱定“有我无敌”之决心，与其作殊死战以尽军人之天职。且非如此，难立足以图生存。务期我官兵共坚信念，则众志成城，必固若金汤矣！

鲁大昌发布这个布告的时候，朱德、张国焘和任弼时接到了中革军委的电报：

朱、张、任同志：

岷州一带仅鲁大昌部。毛炳文军部及三十四师部在秦安、天水者，须待八月份款到才能西移，先派员赴岷与鲁师联络侦察情况，估计该部到岷当需七天以外。兄处以一部迅占腊子口天险，则进出便利。

毛、周、彭

八月二日

八月五日，到达了草地东部包座一线的红二、红四方面军领导在求吉寺召开了中共西北局会议。

求吉寺里的每一级台阶上都洒下过红军官兵的热血。一年前的八月，红四方面军年轻的师长王友钧就牺牲在这里的大殿前。开会之

前，徐向前专门去寺院东侧的山上看望了长眠于此的王友钧。那个低矮的坟已被乱草遮盖，徐向前一个人在这片乱草前站了许久，一年以来所经历的一切令他觉得恍如隔世。

求吉寺会议制定了《岷洮西战役计划》，决定集中两个方面军的主力，采取钳形攻势和东西夹击的战术，先机攻占岷县、洮州［临潭］、西固地区，为红军继续北上打开通路。战役部署是：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九军、第五军为第一纵队，其主力由包座、俄界、旺藏直出哈达铺，攻击岷县，另一部取道白骨寺、爪咱坝相机夺取岷县以南的西固，并向西固以南的武都方向佯动。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为第二纵队，首先夺取临潭旧城，得手后向位于临潭东北方向的临洮前进，另一部向临潭西北方向的夏河、临夏发展，以确保方面军左翼的安全。红二方面军为第三纵队，北出哈达铺，策应第一、第二纵队的行动。

一九三六年八月五日，红四方面军各部队从包座一线开始北进。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刻。

去年的这个时候，红一、红四方面军就是在这里分开的。经过一年的艰苦辗转之后，红四方面军掉头南下的部队重新回来了，并且决定沿着北上红军的路线继续前进。红二、红四方面军如果能够迅速冲破当面国民党军的阻截，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的最终会合，数天之内就可以实现。为此，八月一日，朱德、任弼时、张国焘曾致电中央：“我二、四两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对三个方面军大会合和配合行动，一致兴奋，并准备好了一切，谋西北首先胜利奋斗到底。”

八月三日，中央回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

朱、张、任同志：

（甲）接八月一号电，为之欣慰。团结一致，牺牲一切，实现西北抗日新局面的伟大任务，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完全一致的。

（乙）我们已将你们的来电通知全苏区红军，并号召他们以热烈的同志精神，准备一切条件欢迎你们，达到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

（丙）军事情况，由此间军委随时电告你们。

（丁）国际来电除前次一电已照转外，尚未继续对二、四方面军单独指示的电报，以后接到当照转你们。昨日来电我们已原文转告国际。

英、洛、恩、泽、博

八月三日

八月九日，红四方面军第一纵队先头部队第三十军八十八师接近了天堑腊子口。

在腊子口防守的是鲁大昌部的一个营。从防御兵力上看，去年鲁大昌将两个旅放在了这里，而攻击的红军仅仅是一个团；现在，鲁大昌仅仅放了一个营，而攻击的红军却是整整一个师。战斗并不激烈，八十八师一个冲击就把鲁大昌的这个营赶回了岷县县城——鲁大昌轻易放弃腊子口的举动，引起了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警觉。

红四方面军妇女团一营一连负责护送方面军五百多名伤病员通过隘口。

袭击红军伤病员的不是鲁大昌的部队，而是土司的骑兵。

骑兵突然出现，马蹄如风，一路砍杀过来。

那时，红军伤病员正在通过腊子口中的那座小木桥。

连长向翠华带领一个排在前边开路，指导员刘桂兰带领一个排在伤病员的两侧掩护，副连长谭怀明带领剩余的战士迎击土司的骑兵。

谭怀明是个面容清秀的姑娘。她背着钢刀，举着步枪，面对即将冲到跟前的敌人，脸色由于紧张和冲动而涨得通红。她对战士们说："现在伤病员们正在过桥，咱们就是死在这里，也不能让一个敌人接近。"

土司的骑兵也看清楚了，阻挡在他们面前的是一群女子，狂暴的马队一下子就冲乱了妇女连的阻击线。

枪声、砍杀声和咒骂声顿时混杂在一起。由于敌人骑在马上，年轻的女红军都站立着射击。那些被击中的骑兵纷纷落马，女红军的大刀接着就砍了下去。受伤的马匹恐惧地嘶鸣着，在狭窄的山谷中狂奔，而剽悍的土司骑兵和身体单薄的红军女战士扭打成一团。双方都使用了大刀，土司骑兵的马刀刀面窄而长，砍得女红军血肉飞溅；女红军的刀宽而厚重，砍得敌人血肉模糊。谭怀明光洁的额头被砍出了一道口子，伤口即刻翻卷起来，血汹涌而出。那把马刀在她眼前寒光一闪之后，她的大刀也砍了下去，土司的骑兵栽倒了。混战进行到最残酷时，连长和指导员都赶过来了。连长向翠华很快就牺牲了，敌人从她的身后袭来，马刀砍在了她的头上，向翠花的黑发混在鲜红的血沫里飞扬起来，然后飘落在布满尸体的战场上。指导员刘桂兰也倒在了血泊中。最后的时刻，满脸鲜血的谭怀明喊着："同志们！敌人已经支持不住了！杀死他们呀！"谭怀明即刻成了土司骑兵攻击的主要目

标，她被几名骑兵死死围住，前胸、肩膀都已被砍伤，最后，敌人的两把马刀斜着劈下来，她的左肋骨被砍断了。生在江南的女红军谭怀明倒在了中国西北苍凉的大山里，两眼直直地望向腊子口上那一线淡青色的天空。

红四方面军妇女团一营一连，全连近百名官兵，七十多人阵亡于腊子口。

红四方面军大部队通过腊子口后，相继占领了大草滩和哈达铺，击溃了鲁大昌部三个团的阻击，扫清了岷县外围据点，包围了岷县县城。

红四方面军领导的警觉得到了证实：鲁大昌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岷县县城。

就在红军在求吉寺开会研究攻打岷县的那一天，鲁大昌也主持了一个军事会议研究岷县防御。除了加强岷县最重要的屏障二郎山的阻击工事外，鲁大昌还特别强调了县城里的粮食储备。会后，鲁大昌清点了防守城池必需的炸弹和炮弹的数量：炸弹十万发，迫击炮弹一万多发。鲁大昌还要求岷县县长和各乡乡长配合城防司令部清查户口，“以防共探潜伏”。会后没几天，鲁大昌就接到了自哈达铺一线往北各要点被红军占领的战报。最后，当在岷县外围阻击红军的伤员被抬进县城的时候，引起了县城里守军的巨大恐慌。

八月十四日晚六时，风狂雨暴，红军对岷县县城以及外围要地二郎山同时发动了攻击。

整整一个晚上，红军以一个团的兵力反复攻击二郎山阵地。防守山顶大碉堡的王咸一的一个团几乎伤亡殆尽。天蒙蒙亮的时候，碉堡

里只剩下一个排的官兵在苦撑着，他们已经没有弹药了。红军利用云梯攀上大碉堡，在碉堡的顶上与敌人展开白刃战，眼看着碉堡即将陷落，鲁大昌派来的蒋汉城旅到了。冲在最前面的是杨伯达营，全营每人手持两把驳壳枪，左右射击，火力猛烈，从山脚一直冲到碉堡下面。最后红军退去，而杨伯达营包括营长和连长在内全部负伤，排长伤亡一半，士兵伤亡了三分之一。

鲁大昌分析了战场形势，感到问题严重了：二郎山需要继续增加兵力，但是他的新编十四师已经无兵可调。他立即给兰州绥靖公署打电报请求增援："敌众我寡，防阔兵单，数日以来，后续共军越来越多。职部以寡敌众，颇多伤亡，总不惜孤注一掷，究无裨国家之寸土，恳请速令就近部队，来岷协防，借固吾圉。"鲁大昌的电报发出后不久，蒋介石亲自回电了："已派队应援并补给，希督励所部杀贼，勇建殊勋。"跟着，张学良的电报也到了："攻岷县与陇西之共军，系敌三十军之第八十八、八十九两师，九军之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三师。敌五军现围攻岷县，其口号为消灭在甘之中央军。现毛［毛炳文］军增援，虽被敌牵制，而周［周浑元］师北开援军，计日可达，万望沉着应战，以竟全功。"——两个大人物亲自打来电报，鲁大昌有点受宠若惊，立即上街去巡查城防。

但是到了傍晚，还是昨天的那个时辰，狂风又起，红军以主力攻击二郎山，以另一部攻击岷县县城，致使鲁大昌的部队终"不能彼此兼顾"。午夜十二时，二郎山阵地被红军突破。鲁大昌焦急万分，命令梁应奎和蒋汉城的两个旅立即组织敢死队，由两个旅长亲自率领，由县城的小南门冲出去，直奔距离城门一公里的二郎山阻击阵地，同时命令迫击炮和机枪集中火力掩护。凌晨四点，消息传来，二郎山阵地保

住了，但是官兵伤亡巨大，九个步兵连中七个连长生死不明，一个团的兵力只剩下了四百人。

而在二郎山阵地前的战壕里，红军官兵的尸体已有千余。

十六日，国民党军的飞机往岷县县城内空投了大量的子弹、炮弹和粮食。但是在晚上的战斗中，红军的攻势更加凶猛，整整一夜轮番进攻，不曾有过一刻停止。鲁大昌的二郎山阵地虽没丢失，但是与县城的联络中断了。十七日清晨，红军的一部开始攻进县城南关，鲁大昌命令城墙上的两个团用机枪掩护，动用预备队进行反击，双方在南关的街巷中用大刀、刺刀和手榴弹战斗。两个小时后，红军撤走了。为了防止红军再度攻城，鲁大昌下令把南关一带的民房全部拆除，限居民五个小时内一律搬走。同时还决定，放弃岷县外的一切阵地，死守二郎山和县城。最后，鲁大昌把开战以来唯一允许军民通行的北门也彻底封闭了，“以示全城军民破釜沉舟之决心”。这一天，鲁大昌还发放了赏金：“以团为单位，凡能固守二郎山三天三夜者，各赏现洋四千元。”

但是，到了十八日凌晨的时候，县城的东、西城门都出现了危机，红军的攻击部队逐步逼近。鲁大昌严令部队不准撤退，而且要立即组织反击。反击的敌人与红军警戒哨接触的时候，占领了县城边缘的红军大部队正在做饭，饭锅里煮着黄米粥、炖着牛肉。双方即刻在锅前开始了肉搏战。红军撤离之后，有报告送到了鲁大昌面前，报告说：进攻岷县县城的红军部队“全系第九军之教导营和工兵营，官兵年龄，半系十三至二十一岁之间”。

蒋介石再一次亲自致电鲁大昌：“该师应鼓励士气，凭城固守。中正已派飞机三架，增援接济，望勿顾虑。”

鲁大昌接到侦察情报，说红军正在城外广泛征集木头、柴草、木板，制造攻城的云梯，扬言“不把县城攻破决不罢休”。果然，二十二日晚上，红军动用了一百多架云梯，开始了前仆后继的攻城。红军的攻击持续了整整三天，双方在城墙两侧形成了残酷持久的拉锯战。

《陆军新编第十四师战斗详报》：

一、上午九时，梁［梁应奎］旅长报告：昨夜十二时十分，匪在后所利用故城墙隐蔽演说：中国现在国家存亡关头，全国统一抗日救国，非红军不能引导。我守兵向之射击，而演说者如故，且数人更换；约二时余，大呼赤军万岁而罢。早间在城壕内拾来印刷品多件，皆告将士书及标语数十条。

二、上午九时，王［王咸一］团长报告：昨夜十二时，匪在阵地附近隐蔽处演说或唱歌或射击或吹号，至三时始止。

红四方面军攻击岷县的战斗持续了五十天。

最后，红军前沿部队指挥员不断给鲁大昌写信“商洽停止战事”。鲁大昌派人和红军方面接洽，提出“只要不再攻城，不占岷县地盘，愿意走哪条路就走哪条路”。红军给鲁大昌写了封回信，提出了停止战斗和交换战俘等建议，但是对“不占岷县地盘”一事只字未提。

事实是，红军确有占据甘南的意图，不然决不会付出如此代价来攻击一个县城。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红一方面军东渡黄河，发起东征战役，攻占了山西西南部的广大地区。国民党中央军的八个师又两个旅以及阎锡山晋军的四路纵队于三月下旬开始了对东征红军的大规模“进剿”。

五月五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出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通电指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本意集中全力消灭蒋氏拦阻抗日去路的部队，以达到对日直接作战之目的，但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再考虑，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且在蒋介石阎锡山两氏的部队中，不少愿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军人目前接受两氏的命令拦阻红军抗日去路，实系违反自己良心的举动。因此，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执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屡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发布的那一天，红一方面军东征部队全部西渡黄河返回了陕北苏区——一九三六年初，中国国情的变化，使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需要极大智慧的政治抉择。

四月九日，在延安城边降落下一架飞机，从飞机上走下来的是身穿飞行服的张学良。

张学良驾机在延安降落，是中国当代史上一个重大事件。

迎接张学良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

之前，在红十五军团发起的劳山战斗中，红军俘虏了东北军一个名叫高福源的团长。高福源是北京大学毕业生，抗日情绪十分强烈，并与张学良有着密切的私人关系。被俘期间，他受到了红军方面非同

寻常的礼遇，在与红军高级将领的接触中，他感受到了共产党人抗日的决心。高福源对彭德怀说，东北军普遍希望打回东北去，关键是张学良的态度，如果让张学良了解红军的政治立场，他就有可能与红军合作。彭德怀当即建议高福源回去做张学良的工作。

回到洛川的高福源与张学良谈了一个晚上。天亮的时候，张学良说："你谈得很好，我基本上同意。你休息一下就回去，请红军方面派个代表来，我们正式谈一谈。"

高福源立即回到瓦窑堡，当面向毛泽东和周恩来作了汇报。中共中央立即指派李克农前去洛川会见张学良。从此，红军与东北军的谈判通道打开了。在与李克农的交谈中，张学良表示愿意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力，并赞成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建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主张。张学良说："内战不停止，很难造成抗日之局势，从前我认为非先统一则不能抗日，现在我认为非抗日不能统一。"

四月九日，周恩来和张学良在延安城里的交谈进行了一个晚上。张学良承认红军的抗日是真诚的，承认"剿共"与抗日不能并存。他对蒋介石的民族情绪和领导能力表示了认同，但又对蒋介石身边有许多的亲日派感到担忧。张学良坦率地表示，现在中国的武装力量几乎全部掌握在蒋介石手里，蒋介石是有抗日的可能的，因此要实现中国全国的抗日必须联蒋。而如果蒋介石真对日本投降，他就辞职另起炉灶单独抗日。最后，张学良建议：他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促使蒋介石走上抗日的道路。

周恩来还对陕西实力派军阀杨虎城进行了耐心的工作。杨虎城时任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和国民政府西安绥靖主任，他十分赞同共产党人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和张学良秘密取得一致的

看法后，他的陕军也与红军方面达成了取消经济封锁和互不侵犯的协定。

从一九三六年五月开始，陕北苏区的周边呈现出一种奇特的现象：红军与国民党东北军和西北军之间默契地形成了相对平和的关系。虽然张学良必须执行蒋介石的“围剿”作战命令，但是双方的战斗已经逐渐减少；即使前面偶尔发生了摩擦性的战斗，后方集市上双方的采购人员仍互相打着招呼。红军剧团还可以去白区演出，台下坐着的国民党军无比惊奇，当红军剧团演出话剧《亡国恨》的时候，台下的东北军官兵哭声一片。

陕北苏区获得了相对的安全。

八月十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蒋介石在国内外的压力下，开始倾向全国统一的抗日战线了。我们愿意和南京谈判，应该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我们可以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但是国民党一定要停止“剿共”，一定要实行真正的抗日。会议决定以公开宣言的方式表明共产党人的抗日立场。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发表，中国共产党声明愿意与中国国民党“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以“实行大规模的抗日战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之际政治态度的巨大转变，这一转变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即捍卫民族的生存与国土的完整。

八月九日，中共中央向张学良提出，与东北军联合占领以兰州为中心的战略枢纽地带，从西、北两个方向打通苏联，然后出兵绥远抵御日军的进攻，首先在西北造成抗日的局面。这一建议得到了张学良的赞同。因此，当红四方面军开始攻打岷县的时候，中共中央电告朱德、张国焘和任弼时，提出红军有配合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

出兵绥远的任务。要求红四方面军迅速夺取岷县，以甘肃南部为临时根据地，以求得补充和休整。之后红四方面军以一部出陇西威胁兰州，另一部出夏河威胁青海，以利于红军的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北部会合——红四方面军之所以在巨大的牺牲下持续攻击岷县，实际上是为了实现在岷县地区建立临时根据地的军事计划。

在红四方面军第一纵队攻击岷县的同时，第二纵队在第四军军长陈再道的带领下开始向甘南东部的临潭进军。十一师沿着洮河西行，十师、十二师和妇女团在占领了临潭新城后，沿着大道向临潭旧城急促行进。八月二十日拂晓，红军逼近了临潭旧城。这座四面环山的古城有四座城门，其中东、西、南三门有瓮城，瓮城上都筑有碉堡。鲁大昌的新编第十四师在这里驻有一个团的兵力。十师在师长余家寿的指挥下开始了攻击。红军冲过五米深的城壕，搭起云梯攀爬城墙，很快就把守城的敌人打垮了——原来，驻守在这里的一个团的敌人在红军到来之前只剩下了一个营。

两天之后，敌人反击了。奉命夺回古城的是马步芳的警备第一旅的一个加强营。二十四日，十师在城外设伏，将这个骑兵营包围，随即展开了歼灭战。受到打击的警备旅旅长马彪集中了全旅的兵力，向红军的阻击阵地发起反复冲击。在城外的西峰山阵地，马步芳凶悍的骑兵旋风一样砍杀过来，混战中红军的子弹用光了，官兵们只有与敌人拼刺刀。敌人的骑兵一度冲进了县城，巷战在每一条街道展开。骑兵闯入狭窄的小巷里显得十分被动，守城的红军在巷内设置了绊马索，挖了陷马坑，然后爬到房顶上向下扔手榴弹。马彪旅长是个亡命徒，骑兵的攻击受挫后，他把银元和烟土统统抬到了前沿，亲自提刀督战。红军的阻击阵地在被敌人连续突破数道后，红军抱着成捆的手

榴弹，前仆后继地与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直至把敌人的进攻压下去。

至九月七日，在徐向前的指挥下，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一部占领了漳县，十二师占领了洮州，八十九师占领了渭源，九十三师占领了通渭——至此，红四方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在四川与甘肃边界设置的封锁线，控制了甘南的一部分地域，岷洮西战役结束——红四方面军终于在甘肃南部开辟出了一小块可以暂时立足的区域。

在红四方面军之后，红二方面军也相继到达了甘南哈达铺一带。

至此，中国工农红军的三个方面军，全部集中在了中国西部的甘肃、陕西和宁夏三省的交界处。世上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部队的最终会合了。

红四方面军占领通渭县城后，负责警戒的红军哨兵给第三十一军参谋长李聚奎带来了一个骑毛驴的老头。见到李聚奎之后，老头摘下了胡子，竟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少年说他是红一方面军先遣支队派来送信的。信是九月一日写的，藏在少年的鞋底里，信上写着：我部已到界石铺，离你们还有两天的路程。

李聚奎万分激动，当即写了回信：

驻界石铺红一方面军先遣支队负责同志：

你们九月一号来信收到，我们早已闻你们到界石铺并闻有来通渭讯，故悬望数日，至今始接来信，不胜欢迎！

亲爱的同志们，主力红军大集西北地区，这无疑的是领导和推动全国革命的中心。

目前甘南敌情，王钧在天水札县西和一带。最近我军一部占领了威县续向徽县推进。鲁大昌被我军围困于岷城一月有余，毛炳文在陇西城及其附近。我军也有一部监视中。其余如你们所知。

致以

胜利的敬礼。

二十日夜于通渭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李聚奎才知道，写信人是红一军团一师政委杨勇——为了接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的率领下，一支以一师为主的特别支队此时已经从陕北南下到甘肃的静宁与会宁之间了。

尽管红军各部队都已开始书写“为即将实现的伟大会合欢呼雀跃”的标语，但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危难时刻并没有最后结束。

自一九三四年以来，全国的工农红军分成数支，选择最荒僻的路径，转战了上万里的路途，就是为了在这片国土上寻找到一块可以立足的地方。但是，当中国红军各支部队相继到达了中国的西部之后，一个巨大的难题始终缠绕着红军的领导者们：在广袤而荒凉的中国西部，究竟哪里才是会合之后数万红军可以休养生息的家园？究竟哪里才能让共产党人建起一个符合他们信仰的苏维埃共和国？——这一难题的出现基于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面积不大、土地贫瘠、经济落后的陕北苏区很难支撑数万红军的未来。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和毛泽东联名致电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王明，探讨了中国红军的

生存与发展问题。这是一封极具史料价值的电报——

王明同志：绝对保密

二、四方面军已经全部集中甘南，整个红军的行动方针，必须早日确定。为着避免与南京冲突，便利同国民党成立反日，为着靠近苏联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为着保全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我们这一企图除在九月以下三个月中加紧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求得在一般基础上要求他承认划出红军所希望的防地外，还须解决一个具体的作战问题，因为我们所希望的地区，为青海、甘西宁夏至绥远一带，这一带的特殊地形条件是为黄河沙漠草地所束缚着的一个狭长地带，而且其中满布着为红军目前技术条件所不能克服的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即使蒋介石承认红军占领这个地带［这个可能是极大的］，但不见得能使这一地带的土著统治者自动地让出其防地［这个可能是很少的］。依红军现时条件如果不取得这一地带，则不可避免地要向现时位置之东南方面发展，但要取得这一地带没有新的技术之及时的援助是很困难的。在时机上进取这一地带仅能利用冬季黄河结冰之时，红军虽能奋勇抵抗最冷的天候，因地冻，也不利于用坑道方法攻城，在坚城面前即使平时坑道法也是不能必克的。但如果苏联方面能答应并且能做到及时地确实地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则无论如何困难我们决乘结冰时节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与外蒙。其部署拟略变前电计划大致可定为：

（甲）以一方面军约一万五千人攻宁夏，其余担任保卫苏区。十二月开始渡河，因宁夏地形狭小不利回旋，城寨甚多守备坚固，估计红军本身只能占领其一部分，主要的多数的城寨非借助从外蒙来之飞机与炮兵没有攻克之把握。如机炮能在十二月下旬或明年一月确实到达宁夏附近则可及时占领宁夏，宁夏占领则陕北与甘北苏区均有保障，如不能及时占领则红军须乘河冰未解之际退回甘北，以后发展方面亦不得不往甘南与陕南。因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非多兵久驻之地，且北不出宁夏，东不出山西，亦无红军活动之余地，故势必向甘南陕南一带发

展。然主力向南之后，苏区必被汤恩伯马鸿逵高桂滋高双成等用堡垒主义逐步侵占而化为游击区。目前陕北苏区，即已大为缩小，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只有占领宁夏才能改变这一情况。

（乙）以四方面军十二月从兰州以南渡河，首先占领青海之若干地方作为根据地，待明年春暖逐步向甘凉肃三州前进，约于夏季达到肃州附近，沿途坚城置之不攻，待从外蒙或新疆到来之技术兵种配合攻取。

（丙）以二方面军位于甘南，成为苏区南陕甘苏区联系。

以上是基于从今冬至明年以占领黄河以西为基本方针之作战计划。如此方针为苏联方面所赞同，则请兄代表红军直接向苏联关系方面谈判许多具体准备之问题，主要的是援助中国之技术兵种组成输送与按时到达，以及到达后使用的问题，因为我们即使得到技术在开始阶段也不善于使用。此方针与准备问题希望早些解决。如果苏联不赞成目前直接援助之方针，而我们与南京之谈判不能及时成立协定，或协定中不能达到使宁夏甘土著统治者自动让防之程度，红军攻取不克，结冰渡河时机又已过去，则我们只好决心作黄河以东之计划，把三个方面军之发展方向放到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待明年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的计划。但这种做法我们认为有下列的损失：甲、将被迫放弃现有陕甘宁苏区，这是非常不利的。乙、红军发展方向不是与日本进攻方向迎头，而是在相反方向，即不是抗日方向而是内战方向。丙、因此也就无法避免与南京在军事行动上发生冲突。丁、日本帝国主义有利用此时机截断中苏关系的可能。戊、宁夏、青海、甘肃等反革命也将利用明年大大加强其堡垒主义，将更加投靠日本，使得而后红军西进发生困难。邓发同志为此使命赴苏，但时机迫促，拟请兄全权代表红军进行交涉并以结果见告。我们希望同南京谈判红军驻地问题的结果，能够与向苏联提出的问题在大体上不相抵触，使国际与苏联对中国的方针不致因红军局部要求而破坏其统一性，我们是想两方面同时进行交涉以期不失时机地解决此问题。

洛甫、恩来、博古、泽东

在等待共产国际回电的时候，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鉴于蒋介石已令胡宗南部迅速北上，并且有分化东北军的企图，认为目前首要任务是必须把胡宗南的部队遏制在甘肃东部，将甘南变成红军的战略根据地之一，以保持陕北根据地与甘南根据地的呼应，从而在冬季到来的时候执行占领宁夏打通苏联的计划。因此命令红一方面军继续南下策应红四方面军，命令红四方面军进一步控制甘南地区，命令红二方面军东出哈达铺控制陕甘南部的交界地带。中央的电报特别表明："三个方面军的行动中，以二方面军向东行动为最重要。不但是冬季红军向西北行动的必要步骤，而且在目前我们与蒋介石之间不久就将举行的双方负责人谈判上也属必要。"

九月十一日，红二方面军开始行动。左纵队的红六军团向东，沿着礼县北面的崖城、娘娘坝一线，向位于陕甘边界的两当前进。红军选择的路线是国民党军两军之间的接合部，因此东进的速度相当快。十八日，十六师和十七师已经到达了两当城下。在当地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配合下，红军一枪未发便开进了县城。同时，十八师占领了两当南面的徽县。

中纵队的红二军团四师以及第三十二军在左纵队的南侧一路向东奔袭成县，于十七日向县城发起了攻击。成县守敌为一个营和一个保安团，火力配备猛烈。红军的先头部队十团首先突破了敌人在东门和南门的阻击阵地。进入县城的红军发现敌人隐蔽在街道两边的墙壁后面，射出的子弹打不到他们。十二团政委杨秀山观察了一会儿，想起在一次战斗中，一颗子弹打在他跟前的石头上，飞溅起来的石片使他的两腿七处受伤。杨秀山随即命令机枪向街道上的石板路上打。顿时，石板上飞溅起无数的小石片，躲在死角里的敌人果然出现了伤

亡，他们只有从那些墙壁后面出来试图跑向另外的地方，红军的机枪一下子就扫了过去——杨秀山，余秋里负伤后出任十八团政委，十二团政委负伤后他又来到了十二团。

右纵队红二军团六师十九日攻克了位于甘肃最南边的康县，之后继续东进威胁着陕西的略阳。

至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日，红二方面军十天之内连续作战，相继占领了甘南的礼县、两当、徽县、成县、康县，以及陕西南部的略阳、凤县等部分地区，使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南至陕南地区的控制范围得到了扩大。之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红二方面军在这一带开展了建立根据地的工作。

红四方面军到达甘南之后，朱德和陈昌浩都认为大军不能久留这里，必须迅速通过西兰公路去和红一方面军会合。但是张国焘反对，他说红军最好的出路是往西而不是往北。为此他给中共中央打电报，提出了他主张的两个方案：一是往西进入青海、新疆，接通苏联获得武器后再回来；一是往东南，向川陕豫发展，也就是回到红四方面军原来的老根据地去。中共中央回电表示：向西的行动中央已经向共产国际请示；至于往东南，是背向抗日指向，是向南京进攻的方向，这只能在与南京方面谈判彻底破裂之后才能考虑。

千方百计不愿意北上的张国焘开始盘算在甘南落脚的问题。

张国焘开始制定在这一带建立根据地的计划，组织大量的工作组去建立地方各级苏维埃政权，连夜起草建立根据地需要的各种文件。但是，中共中央要求红四方面军迅速北进的电报到了。电报要求红四方面军迅速“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之隆德、静宁、会宁、定西

之间的西兰公路及其附近地区，决不能让胡宗南部“占领该线”。并表示“我们已派一个师向静隆线出动，如此可滞阻胡宗南之行进，而便于四方面军之出至隆定大道”。

第二天，张国焘得到的消息令他的心情更加暗淡：由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率领的近三个团的人马，于九月九日开始南下，其先头部队已于十六日占领了西兰公路上的要地——界石铺。

红四方面军必须北上了。

中共中央试图占领宁夏为巩固的根据地，是为了从地理上更加靠近苏联，以期得到苏联的帮助，特别是重武器的援助。从当时中国红军面临的严峻局面和开辟抗日战场的意图上看，这也许是最稳妥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计划——中国工农红军即将结束万里长征，只有打通与苏联的往来通道，才能解决战役后方和战略依托问题。无论是红军的生存还是抗日的需要，没有优良的武器和物资保障将是很困难的。同时，张学良对红军打通苏联的计划也抱有极大的热情，他积极建议红军占领宁夏，甚至建议与新疆的盛世才达成政治联盟。从某种意义上说，张学良之所以冒着与蒋介石发生政治对立的风险愿意与红军联合，正是基于存在于国民党内部的“联俄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这种呼声的目的也是为了东北军的抗日能够得到苏联的支持。而打通中国与苏联的通道，其实也符合斯大林的需要。斯大林明白，中国的对日作战将牵制日本从东方进攻苏联的力量。这就是共产国际同意中国红军“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并答应“占领宁夏地域后”给予帮助的重要原因。

但是，随着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斯大林答应给予中国红军的帮助并没有实施，国共两党抗日联合统一战线最终形成之后，苏联

的飞机大炮全部给了国民党军队，这使最终还是在陕北扎下根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白了一个道理，这就是毛泽东直至晚年依旧坚忍不拔地保持着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九月十六日，中共西北局在岷县三十里铺召开了会议。会议制定了《静会战役纲领》，决定：四方面军在胡敌未集中静宁、会宁以前，先机占领静、会及定西通道”，争取尽快与红一方面军会合。

北上，与中央的会合近在眼前，张国焘对其政治前途的担忧也达到了他所能忍受的极限。当得知红一方面军为了确保陕北根据地，只有一个师南下配合红四方面军作战时，张国焘突然觉得转机出现了：原定计划是红一方面军南下，红四方面军北上，共同对胡宗南进行夹击，而现在红四方面军几乎是要单独与胡宗南作战了。于是，张国焘决定将北上静宁、会宁的计划改为西渡黄河。

静宁、会宁均位于甘肃北部，从那里再向北就进入宁夏了。

而西渡黄河将进入人烟稀少的青海，再往西就是与苏联接壤的新疆了。

红四方面军再一次面临着严峻抉择。

九月二十一日深夜一时，位于漳县前线指挥部的张国焘给朱德发来电报：“请你负责本夜令军委纵队［红军总司令部及直属队］电告停止待命。”

朱德接电后，立即致电陕北：“西北局决议通过之静、会战役计划正在执行，现又发现少数同志不同意见，拟根本推翻这一原案。”

二十二日凌晨三点，朱德给张国焘回电："国焘同志电悉，不胜惊诧。为打通国际线路与全国红军大会合，似宜经静、会北进。忽闻兄等不加同意，深为可虑。昌浩今早可到漳，带有陕北来新译长电，表示国际态度，望详加研究……静、会战役各方面均表赞同，陕北与二方面军也在用全力策应，希勿失良机，党国幸甚。"

然而，二十二日晚八点，张国焘已将红四方面军即将西渡黄河的计划致电告知了陕北的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以及仍停留在甘肃东南部的贺龙与任弼时。

天一亮，朱德骑马赶了一百二十里路到达了漳县前敌指挥部。

九月二十三日，西北局在漳县再次召开了会议。张国焘在会上侃侃而谈，他说北上作战会断送红四方面军，方面军自穿越草地之后连续作战，部队从未得到过休整，且十个炸弹有五个打不响，可胡宗南的部队武器精良，两下一比不得不作万一之想。宁夏地域狭小，红军集结在那里，前有敌人的封锁，后有黄河与沙漠，一旦出师不利必将陷于困境。而陕北很穷，根本不能解决大军吃饭问题。共产国际的电报同意我们靠近苏联，所以我们应该立即西渡黄河，占领兰州以北地带。这样既避免了与强敌决战，也不违中央夺取宁夏的意图，同时还可以解决方面军的粮食供应问题。朱德表示：有红一、红二方面军的配合，北上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如果再不北进，三军的会合不知要等到哪一天，这样将延误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且会使红一、红二方面军的侧翼暴露。但是，会议最终还是采纳了张国焘的西进计划。朱德仍坚持自己的意见，他对张国焘说："若强我们赞同是不可能的。"

张国焘的西进计划再次打乱了中央和红军的整个战略部署。毛泽东二十四日急电彭德怀：

彭并告聂：

甲、接朱电国焘又动摇了北上方针，我们正设法挽救中［对外守密］。

乙、为使胡敌不占去先机，请加派有力部队南下，交一军团指挥，增加界石铺分兵至隆静道游击至要。

毛

二十四日十六时

红四方面军官兵对突然改变的军事命令感到不解。绝大部分红军官兵不愿意再往西走了。第四军十二师先奉命到渭源接防，之后又突然命令他们撤离渭源；刚从渭源撤下来还没走出二十里路，又命令他们再度夺取渭源。师长张贤约和政委胡奇才让部队在洮河边上停下来，两个人在河边徘徊，内心充满着莫名的疑惑。军长陈再道亲自赶到洮河边，催促他们赶快执行命令。十二师的官兵打了整整一夜，才把刚刚放弃的渭源县城重新占领了。第三十一军距离红一方面军控制的界石铺最近，他们满心希望能够成为第一支与红一方面军会合的部队，但是接到的命令却是让他们立即返回岷县，而他们几天前才离开岷县到达这里。返回的路上大雨瓢泼，道路泥泞，红军官兵们对部队前途的猜测五花八门。

红四方面军一旦西渡黄河，对于已经东出甘南的红二方面军来说，他们将即刻失去侧翼与身后的策应。二十五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甘泗淇、王震、陈伯钧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表示关于目前的行动“比过去任何时期迫切要求能协同一致。否则，只有利于敌人各个击破，于革命与红军发展前途有损。我们已向陕北建议，根据目前情况和三个方面军实际情况作出三个方

面军行动的最后决定”。红二方面军请求红四方面军暂时不要立即西渡黄河：“我们请求你们暂以四方面军停止在现地区，以待陕北之决定。陕北与国际有联络，对国内情况较明了，而且与各方面行动、统一战线工作有相当基础，必能根据各种条件定出有利整个革命发展的计划。”

第二天，中共中央的电报到了：

朱、张：

确息：胡宗南部在咸阳未动，其后续尚未到齐。四方面军有充分把握控制隆、静、会、定大道，不会有严重战斗。一方面军可以主力南下策应，二方面军亦可向北移动钳制之。北上后粮食不成问题，若西进到甘西则将被限制于青海一角，而后行动困难。

英、洛、恩、博、稼、泽

二十六日十二时

而这时候，红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已经从漳县向西移动到了临潭附近。

九月二十六日，张国焘一天内给中央发出了四封电报，不但放弃了同中央保持“取横的关系”的立场，表示对于中央的指示愿意“遵照执行”，并且自红一、红四方面军分路北上、南下以来，第一次在电报中使用了“党中央”这一称呼。张国焘的心绪复杂而矛盾——

电报一：“关于统一领导万分重要。在一致执行国际路线和艰苦斗争的今日，不应再有分歧。因此我们提议，请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西北局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军事应如何领导，军委主席

团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均请决定指示，我们当遵照执行。”——这是张国焘第一次放弃“对一方面军取协商关系，对北方局取横的关系”的立场，表示愿意接受中央的领导。

电报二：“此次西渡计划决定，绝非从延误党和军事上统一集中领导观点出发，而是在一、二、四方面军整个利益上着想。先机占领中卫，既可更有利实现一、二、四方面军西渡打通远方，又能在宽广地区达到任务。此心此志千祈鉴察。关于统一领导问题已有具体提议，因恐同志对西渡计划可发生延误统一领导之误会，故决然如此，从此领导完全统一可期，当可谅解西渡计划确系站在整个红军利益的有伟大意义的正确计划，现我们仍照西渡计划行进，望以此实情多方原谅。如兄等仍以北进万分必要，请中央明令停止，并告今后行动方针，弟等当即服从。”

电报三：“如兄等认为西渡计划万分不妥时，希即明令停止西渡并告今后方针，时机紧迫，万祈鉴察。”

最后一封电报发自这一天的二十二时：“四方面军已照西渡计划行动，通渭已无我军。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计划实施，免西渡、北进两失时机。我提议一方面军主力，不必延伸到西兰公路，防敌从黑城镇、同心城截断我一方面军。我们一月内能在靖远附近会合，请善解释，决不可使全党全军对会合失望。”

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回电，告知政治局“仔细慎重”地谈论了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的问题，现在“特将结果奉告如下”：

中央认为：我一、四两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一、四两方面军合力北进，则二方面军可在外翼制敌；一、四两方面军分开，二方面军北上，则外翼无力，将使三个方面军均处偏狭地区，敌凭黄河封锁，将来发展困难。且胡敌因西兰路断，怕我夹击，又怕东北军不可靠，不敢向隆德、静宁，拟向天水靠王钧。如四方面军西渡，彼将以毛［毛炳文］军先行，胡军随后，先堵击青兰线，次堵击凉兰线，而后敌处中心，我处僻地，会合将不可能，有一着不慎全局皆非之虑。

这时候，红一方面军已有四个团以上的兵力即将通过隆德、静宁一线，以监视胡宗南的部队，确保红四方面军安全地北上。因此，中央要求红四方面军“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

同一日，党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

朱总司令、张总政委并告一、二、四方面军首长：

四方面军应即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从宁夏、兰州间渡河夺取宁夏、甘西，二方面军应暂在外翼钳制敌人，以利我主力之行动。一、二、四方面军首长应领导全体指战员发扬民族与阶级的英勇精神，一致团结于国际与中央路线之下，为完成伟大的政治任务而斗争。

党中央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张国焘终于知道大势已去。

紧接着，向西探路的先头部队派人回来报告说：黄河对岸大雪封山，气候寒冷，道路难行，西渡黄河怕是异常艰险。

九月二十九日，朱德下达了北进的命令。

自一九三六年九月三十日起，红四方面军分为五路纵队，由甘南向北面的通渭、庄浪、会宁和静宁前进。第一纵队的第四军是先头部队，他们刚刚到达通渭县城，胡宗南的部队就追了上来，鲁大昌和毛炳文的两个师也从兰州方向压来。为了避免与敌人纠缠，尽快地与红一方面军接应部队会合，第四军一个昼夜急行军二百三十里。北上沿途全是黄土山坡，村庄极其罕见。在连续的行军中，官兵在忍受极度疲惫的同时，还要忍受严重的缺水。出发的第三天，红军官兵终于看见了一个小茅屋，只有一个老婆婆住在里面。经过官兵们的解释，老婆婆把她积攒下的半桶浑浊的雨水和一小罐蜂蜜送给了红军。官兵们每人喝了一小口，然后把蜂蜜和剩下的水混在一起全部给了伤员。

与此同时，为了迎接红四方面军，红十五军团奉命从同心城出发突袭会宁县城。徐海东对骑兵团团长韦杰和政委夏云飞说：敌人企图阻截我们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合，我们要抢在敌人的前面占领会宁。骑兵团连续奔袭二百多里，于十月二日凌晨对会宁发起了攻击。由于红军奔袭的速度太快，敌人还没来得及加强对会宁的防御，会宁县城就被红十五军团攻占了。

十月八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四军十师在会宁附近的青江驿、界石铺与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一师会合了。在那个秋日晴朗的天空下，最先相向走来的是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陈再道和红一军团一师师长陈赓。

随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占领通渭，使红军总司令部顺利地通过了西兰公路。十月九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人到达了会宁。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中国西北部偏僻的会宁小城一下子成了红军之城。满城的红军无不兴高采烈，来来往往的任何一个红军，无论过去认识还是不认识，都如久别重逢的兄弟。晚上红四方面军十师和红一方面军一师聚集在县城文庙前的广场上，举行了庆祝会师大会。毫无疑问，这是所有的红军官兵万分激动的时刻。尽管官兵们并不清楚中国红军的会合经历了多少曲折与艰难，但是他们知道红军主力一旦会合在一起未来就会无比光明。

会后举行了大会餐。红一方面军官兵把准备好的礼物——毛衣、毛袜、粮食、蔬菜纷纷送给红四方面军各部队，这让两个方面军的官兵都想起了一年多以前，在夹金山北麓那个叫木城沟的藏族村庄里他们各自经历了千难万险会合在一起时的情景。那时雪域高原一片金黄，木城沟里杜鹃怒放，红四方面军官兵为红一方面军送来的也是毛衣和毛袜。此刻，中国的西北天高地阔，长风浩荡，红军官兵们吃着新鲜的羊肉，喝着当地产的一种叫呢呢的土酒，直喝得所有的人无不热泪滚滚。

当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于会宁城的时候，红二方面军正在北渡渭河。

九月下旬的时候，红四方面军停留在甘南，就是否北上的问题一再争论，宝贵的时间因此被严重地耽搁，胡宗南部十多个团趁机进至甘肃东部的清水、秦安一带，向驻扎在天水的国民党军第三纵队司令毛炳文部逐渐靠拢。这不但给红四方面军的北上带来了危险，更严重的是，由于红四方面军从甘南移动而出，位于甘东南的红二方面军的侧翼暴露了。红四方面军开始北上之后，胡宗南的十多个团迅速自北向南推进；而在红二方面军的南面，国民党中央军第一纵队司令王钧

的第三十五旅和补充团也已经靠近成县，第十二纵队司令孙震部也由武都推进到康县一带。红二方面军开始腹背受敌。

在向中央请示并得到同意后，红二方面军开始单独突围北进。

这一行动，被贺龙视为“长征中最危险的一次”。

敌人大军夹击而来，残酷的战斗不可避免。第三十二军在成县阻击王钧部。敌军火力强劲，阻击阵地很快告急。四师十二团和六师十八团奉命增援，两个团到达战场即投入了战斗。十八团在团长成本新的带领下向敌人发起了反冲击，但是敌人的炮火十分密集，在十八团的冲击道路上打出了一片火海。十八团新任政委周盛宏被爆炸的气浪抛出去一丈多远而阵亡，团长成本新再次负伤。敌人越打越多，从红军的阵地上看下去密密麻麻，而十八团的伤亡越来越大。最后时刻是已经分不清敌我的肉搏战。十二团的阵地上战斗同样惨烈，政委杨秀山又一次负伤，敌人的子弹打中了他的臀部。二营营长蔡久背起他就跑，跑下阵地后，杨秀山发现身上挎着的挎包又被子弹打了个洞，里面的两本书也被打穿了，这两本书是他最喜欢的，一本是《苏联红军步兵战斗条令》，另一本是《列宁主义概论》。前一本是一九三六年一月牺牲在湖南便水战斗中的师参谋长金承忠留下的遗物，后一本是已经身负重伤的师政委方理明送给他的新年礼物。

十月五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红四方面军，要求他们出兵策应单独北上的红二方面军：

朱、张、徐、陈：

甲、为彻底消灭迫近会宁城西南门之敌人，请你们令向会、静前进之部队即速截断会、静、定西间道路，以便我第一师及守城陈［陈漫远］支队明日将敌击溃后

全部俘虏之。该敌大约是邓宝珊部一团至二团。

乙、胡宗南先头才到清水、秦安，大部尚在咸阳、清水道上，判断该敌再需十天左右才能全部集中并开始展开。二方面军从六号起以四天行程经天水以西到达通渭。千万请你们派有力一部立即占领庄浪，在通渭、庄浪两地部队均向秦安迫近游击。以确实掩护二方面军之到达。

毛、周

五号十五时

并告贺、任、关、刘

红二方面军担任突围后卫的是由师长张辉和政委晏福生率领的十六师。部队出发没多久师长张辉就牺牲了。到达盐关镇时，十六师再次与胡宗南的部队遭遇。为了掩护主力北进，十六师在兵力和火力都占绝对优势的敌人面前誓死不退，因为在他们的背后，模范师师长刘转连正指挥着军团直属机关和后勤部门转移。战斗最终变成了残酷的拉锯战，十六师参谋长杨旻和政治部主任刘礼年先后负伤。师政委晏福生一个人指挥部队开始突围，一颗炮弹呼啸而至，落在晏福生的身边爆炸了，断了一条胳膊的晏福生倒在地上。他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电报密码本，对警卫员说："你负责把这个带出去。"然后他把自己的驳壳枪给了另外一个战士："这枪很好使，你带上。"晏福生严厉命令他身边的官兵赶快突围。警卫员和战士们不肯走，晏福生喊道："你们好胳膊好腿，革命需要！把我的枪给我，谁不走我就枪毙了谁！"官兵们把昏迷的晏福生藏在灌木丛中，走了。

前边就是渭河。

连日的大雨使渭河河水猛涨。红二方面军两翼没有掩护，前面也没有接应，岸边找到的船只根本不够，官兵们就往汹涌的河水中跳，不少人瞬间就被河水卷走了。更严重的是，两个旅的敌人已经包围上来。过了河的红军官兵上了岸就开始阻击，仍没过河的一边向河边撤一边回击追击的敌人。红二方面军整个部队被牵制在渭河两岸，掩护、抢渡、阻击同时进行着，部队出现巨大的伤亡。

渡过了渭河的王震得知十六师政委晏福生负伤的事，立即派刘转连带领一支精干的小分队返回去寻找。战斗已经结束了，战场上遍地都是尸体，刘转连没有找到晏福生。回来报告了王震，王震说："让我们为晏福生同志默哀三分钟。"这已经是红军官兵第二次为晏福生"默哀三分钟"了。在去年四月的一次战斗中，晏福生因为追击敌人追得太远了，没能及时归队。大家都以为他牺牲了，师长提议为他默哀三分钟，红军官兵们刚把头低下来，晏福生回来了，身上挂着好几支枪。一个多月后，驻扎在黄河边的萧克接到了一个报告，说是有个流浪汉被老乡用门板抬着送到了红军这里，因为门板上的人自称是十六师政委晏福生。萧克说："立即抬到军部来！"门板从望不到边的黄土高坡上起起伏伏地抬了过来，还没走到跟前，萧克一眼就认出了已经脱了相的晏福生，他大步上前，一把握住晏福生的手说："你受苦了！"

红二方面军单独北进令贺龙每每想起便心疼不已：

我们把四县打下，张国焘不打，向西一跑，所有的敌人都加到我们头上……我们损失了十七团……十七团一个团收不赢，很紧急，我们过河也很仓促。在盐关镇六军团被侧击，晏福生负伤。行军受到敌人的侧击，二军团甩了个团，到海原又吃了点亏，我差点被炸弹炸死……过渭河，狼狈极了，遭敌侧击。渭河上游下暴雨，徒涉，水越来越大……这是长征中最危险的一次。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一日，贺龙在平峰镇［宁夏西吉县］见到了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

第二天，红二方面军到达会宁东北方向的将台堡，与红一军团一师会合了。两军的红军官兵彼此见到的那一刻，双方都向对方跑过去，红一军团官兵的手里还捧着热乎乎的土豆。

此时，中国工农红军的三个方面军已全部集中在了甘肃和宁夏交界处。

而国民党军正加紧准备“通渭会战”。

蒋介石明白红军占领宁夏的意图在于打通苏联，但他认为红军长途跋涉，人马疲惫，伤亡累累，粮弹奇缺，目前处在一个狭小的地域内，基本上再也无路可走。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急促变化，国民党军的对日作战日益紧迫，这也许是消灭红军的最后的机会了。蒋介石调集了国民党军近二十个师，分兵四路，北堵南攻，企图把红军一举歼灭于黄河以东的甘、宁边界地区。

十月十五日，毛泽东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通过苏维埃通讯社发表了讲话：

苏维埃中央政府与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现已发布命令：

（一）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革命军之任何攻击行动；

（二）仅在被攻击时，允许采取必需之自卫手段；

（三）凡属国民革命军，因其向我进攻而被我缴获之人员武器，在该军抗日时，一律送还，其愿当红军者听；

（四）如国民革命军向抗日阵地转移时，制止任何妨碍举动，并须给以一切可能之援助。

吾人已决定再行恳切申请一切国民革命军部队与南京政府，与吾人停战携手抗日。该项申请书，已在草拟中。目前察晋绥三省形势，已属危急万状。吾人极愿与南京政府合作，以达援绥抗日救亡图存之目的。如南京政府诚能顾念国难停止内战出兵抗日，苏维埃愿以全力援助，并愿以全国之红军主力为先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五日

因为徐向前与胡宗南是黄埔军校的同学，所以中央又让徐向前致信胡宗南停止内战："黄埔学别，忽又十年，回念旧情，宛然如昨。目前日寇大举进攻，西北垂危，山河震动，兄我双方宜弃嫌修好，走上抗日战线，为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而努力。敝部已奉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军事委员会命令，对于贵军及其他国民党军队停止攻击，仅在贵军攻击时取自卫手段，一切问题均函商洽，总以和平方法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目的。非畏贵军也，国难当前，不欲自相残杀，伤国家力，长寇焰也；若不见谅，必欲一战而后已，则敝方部队已有相当之准备，逼不得已，当立于自卫地位，予必要之还击。敝部我军仅为抗日之目的而斗争，靡愿与贵军缔结同盟，携手前进。蒋校长现已大觉悟，实为佩服，吾辈师生同学之间倘能尽弃前嫌，恢复国共两党之统一战线，共向中华民族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决一死战，卫国卫民，复仇雪耻在今日。吾兄高瞻远瞩，素为弟所钦敬，虽多年敌对，不难一旦言欢。特专驰函，征求盏兄高见，倘蒙惠予采纳，停止军事行动，静候敝党中央与蒋校长及贵中央之谈判。如承派员驾临，敝部自

当竭诚欢迎。时危事急，率而进言，叨在同门，知不以为唐突也。专此顺叩戎绥！”

胡宗南没有回音。但是他对心腹说的一句话还是被共产党人得知了，胡宗南说：“剿共是无期徒刑。”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蒋介石飞抵西安。

蒋介石的部署是：毛炳文第三十七军的两个师、王钧第三军的两个师和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经会宁向靖远攻击前进；胡宗南的第一军四个师经静宁向打拉池方向突击；以王以哲、何柱国指挥东北军的三个步兵师及五个骑兵师，加上马鸿宾的第三十五师，经隆德、固原北进。同时，在西线和北线，以东北军第一一四师由兰州进抵一条城，以邓宝珊的新编第一军固守靖远城，以马鸿逵新编第七师担任中卫、中宁及其以东黄河沿岸的防守，阻击红军西渡或北渡黄河。

蒋介石把他制定的战役计划称为与共产党红军的“最后五分钟的决战”。他甚至打电报给兰州绥靖主任朱绍良说，在彻底消灭了红军之后“收编者不得超过五千”，其余的“一律铲除”。

鉴于国民党军队四面合围而来，会宁前线的局势越来越严峻，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发起宁夏战役，实现“占领宁夏，打通苏联”的计划，使红军能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域里得到急需的休整。

当时，中国红军主力的实力为，红一方面军两万一千人，红二方面军一万两千人，红四方面军三万三千人，总计约六万六千人。

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时候，红四方面军担负了作战主力。

但是，即使是红军中兵力与武器最强的红四方面军，面对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的猛烈进攻，还是感到了巨大的作战压力，特别是由于长途行军没有时间和机会得到补充，部队的弹药严重缺乏。胡宗南深知这一点，因此他的部队的攻击势头越来越凶猛。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师长徐深吉率部在渭河附近阻击胡宗南北进——

常常当我们一个连或一个营占领阵地阻击，敌人就从我阵地附近以密集队形前进，不顾我掩护部队而超前追击我主力部队。我批评团的干部，掩护部队为什么让敌人追到主力部队？团的干部批评营的干部，为什么敌人追来不打？营的干部说："没子弹，怎么打？"二七六团团长陈康不相信，自己带一个营担任掩护任务。胡宗南的部队就在我们占领的高地下一二百米处通过，陈团长命令举枪，枪举起来了，陈团长喊："放！""叭！"只有一支枪放了，其余的枪都没有响。陈团长问："为什么不开枪？"战士们手拍拍胸前的子弹袋伸出两个指头，示意只有两发子弹了。

国民党军很快到达了会宁城下。

十月二十日，会宁县城遭到了国民党军飞机的疯狂轰炸。朱德和张国焘要离开这里去打拉池与彭德怀会合，因为林育英已从保安出发赶往打拉池。临走时，朱德对徐向前说："渡河要抓紧，南面吃紧啦。"——中革军委已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西渡黄河，迅速控制黄河西岸，以保障红军主力顺利地进入河西走廊地带。

十月二十二日，徐向前和陈昌浩率方面军总部撤离了会宁。国民党军的飞机不断地飞临会宁上空，在这片已经没有一座完整房屋的小城四周投下了密集的炸弹，没有任何防空武器的红军被完全暴露在轰炸之下。这天黄昏，国民党军逼近会宁。第五军在军长董振堂的率领下，开始了极其惨烈的会宁保卫战。战至二十三日凌晨，红军三千多

人的部队伤亡人数已达八百多人。在南北两面城防都被国民党军突破之后，第五军被迫放弃了会宁。

会宁的失守给正在西渡黄河的部队带来了巨大威胁。如果让敌人从会宁继续向西推进，一旦占领了红军渡河的渡口，宁夏战役计划将会被迫终止。在陈昌浩的严厉命令下，第五军在会宁城北再次建立起阻击阵地，徐向前迅速从两翼调动了两个团增援会宁。

黄水滔天，浊浪翻卷。

在身后万分紧急的敌情压迫下，二十四日晚，已经西出靖远附近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不顾一切开始强渡黄河。至二十五日晚，第三十军从虎豹口渡口全部渡过了黄河。接着，第九军、第五军也开始了渡河。

国民党军立即调集飞机，对黄河渡口开始狂轰滥炸，同时从东、西、南三面快速调动兵力向黄河两岸压来。第四军奉命在会宁至靖远的大道上阻击向渡口扑来的国民党军。大道上没有利于阻击的地形，进攻的敌人兵力多于红军八倍！第四军军长陈再道和政委王宏坤分了工：陈再道指挥十二师和十一师的两个营以及骑兵大队，在大道以西面向兰州方向阻击敌人；王宏坤指挥十师、独立师和十一师的另一个营，在大道以东阻击从会宁来的胡宗南部。红军的阻击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残酷的拉锯战从早上一直打到黄昏，然后又从黄昏打到天亮，如此进行了三天三夜。第四天，国民党军已经逼近了黄河渡口，红军被分割在黄河两岸，敌机开始向河面上的渡船轰炸，合围而来的国民党军分成三路，正面突击左右迂回，开始了最后的攻击。第四军边打边撤，已经撤退到了距黄河渡口仅十公里的地方，与准备渡河的第三十一军挤在了一起。王宏坤跑到第三十一军军部见到了军长

萧克和政委周纯全。王宏坤说：“后面快守不住了，再往前就没有可以建立阻击阵地的地方了。敌人一突破，就没有办法了，你们赶快准备走吧！”正说着，炸弹落了下来。王宏坤在硝烟中回身又往阻击前沿跑，迎面与撤退下来的十师师长余家寿碰了头。王宏坤说：“三十一军没有准备，我们得回去坚持！不能撤！谁撤我枪毙谁！坚决执行纪律！”第四军依然艰难地坚持着阻击线。国民党军的飞机飞得很低，机枪子弹暴雨一样地倾泻下来。为了给身后的第三十一军赢得渡河的时间，第四军与敌人拼杀了近四个小时，最后部队被冲击上来的敌人分割成了若干小部队。王宏坤不断地把身边的警卫人员派出去寻找联络，直到身边的人都派光了，指挥所里只剩了他一个人。最危险的时刻，独立师副师长李定灼带着一个营出现了，于是王宏坤指挥这个营继续阻击。

晚上，国民党军占领了黄河渡口。

原来准备跟随第九军渡河的第三十一军没能西渡。

至三十日，红四方面军被分隔在黄河东西两岸。渡过黄河的部队有第五军、第九军、第三十军，以及包括徐向前在内的方面军指挥部，共两万一千八百多人。

没有渡过黄河的部队是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十一月八日，已经渡过黄河的部队奉中革军委命令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从此，两万多红军官兵开始了万分艰苦的河西战斗。四个月之后，这支部队在国民党军的重兵包围之中弹尽粮绝，红军官兵在突围中英勇不屈，大多牺牲在连绵起伏的祁连山下。第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第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均不幸牺牲。

至十一月初，国民党军各路部队已经完全打通了增援宁夏的道路，并将红一、红二方面军与已经渡到黄河西岸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完全隔断。

宁夏战役计划“暂时已无执行之可能”。

红军必须回到陕北苏区去。

十一月十五日，甘肃东部，红一方面军已经移至豫旺堡以东地区，红二方面军到达环县西南地区，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三十一军到达豫旺堡以东的萌城地区。而国民党军毛炳文部准备西渡黄河追击红军，王钧部因军长病逝到达同心城后便停止了推进，东北军王以哲部在胡宗南部的右翼向豫旺堡缓慢推进，只有胡宗南部兵分三路，孤军深入，在向豫旺堡方向展开。

打击胡宗南的时机出现了。

十一月十五日，中革军委向红军总部下达指示，要求红军主力“应即在豫旺县城以东，向山城堡迅速靠近”，集结全部兵力，打破敌人的进攻——中国工农红军必须遏制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这样才能彻底结束移动的状态，才能获得一个相对稳固的陕北根据地，才能赢得长征的最后胜利。

十七日，胡宗南为了控制战略要点，命令部队急促前进。第二天，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一军在萌城以西地区设伏，击溃胡宗南中路部队的第二旅，毙伤其团以下官兵六百多人。受到伏击后的胡宗南立即命令中路撤退休整，由第四十三师接替继续前进。十八日，胡宗南右路部队的第七十八师丁德隆部向山城堡方向突进，红军等待的战机终于出现了。

该日，毛泽东、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朱德、周恩来、贺龙联名发布了《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动员令》：

一、二、四方面军各兵团军事政治首长钧鉴：

从明日起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各首长务须以最坚决的决心、最负责的忠实与最吃苦耐心的意志去执行。而且要谆谆告诉下级首长转告于全体战斗员，每人都照着你们的决心、忠忱与意志，服从命令，英勇作战，克服任何的困难，并准备连续的战斗，因为当前的这一个战争，关系于苏维埃，关系于中国，都是非常之大的，而敌人的弱点我们的优点又都是很多的。我们一定要不怕疲劳，要勇敢冲锋，多捉俘虏，多缴枪炮，粉碎这一次进攻，开展新的局面，以作三个方面军会合于西北苏区的第一个赠献给胜利的全苏区的人民的礼物。

红军胜利万岁！

苏维埃胜利万岁！

抗日民族战争万岁！

毛泽东、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朱德、周恩来、贺龙

十八日

十九日晚，彭德怀下达了作战命令：红一军团隐蔽于山城堡以南；红十五军团以小部诱敌，主力隐蔽于山城堡以东和东北山地；第三十一军主力隐蔽于山城堡以北；第四军隐蔽于山城堡的东南，红二方面军为预备队。另外，以第二十八军、第二十九军和第三十一军一部分别钳制胡宗南部的左路和中路，八十一师以及红一方面军特务团、教导营协调红六军团在环县、洪德城以西分别阻止东北军王以哲各部的推进。

这是除了西路军之外中国工农红军的全部力量。

这是中国工农红军与一直追击堵截他们的国民党军的决死一搏。

二十一日，山城堡总攻开始了。红一军团一师和红十五军团一部迂回到敌人的侧后断其退路，红一军团一师、四师由山城堡以南向北实施突击，红十五军团主力由山城堡东北向西南突击，第三十一军由北向南突击。黄昏时分，在各路红军的猛烈攻击下，单独冒进的胡宗南部第七十八师被迫急切转移，红军占领了山城堡并开始了追击。由于退路已断，敌军除小部分突围之外，大部分被压缩在山城堡西北方向的山谷之中。至二十二日上午，胡宗南部第七十八师基本被全歼。

聂荣臻回忆道：

战斗从当天黄昏打起，一直打到第二天上午结束。先截断了敌人西逃的退路，然后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向敌人展开猛烈攻击。战斗开始，五团政委陈雄同志亲自带领一排人一下子就冲入敌人阵地。他们用手榴弹将敌人的临时堡垒一个一个地炸毁，一连占领十个堡垒，随后又把敌人几处主要阵地都拿下来了，敌人就溃败下去了。部队一追就和敌人混战在一起。这时天已经很黑，伸手不见五指，也分不清敌我，枪也不能打，手榴弹也不能投，上去就摸帽子，摸着是国民党军戴的那种帽子就用手榴弹砸头。夜晚打乱了敌人的部署，白天的仗就比较好打了。经过一夜多的激烈战斗，将敌七十八师二三二旅及二三四旅的两团全部歼灭。与此同时，胡宗南派向盐池方向进攻的另外几个师也被我二十八军击溃。

山城堡战役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最后一战。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在山城堡集会，这是中国工农红军三个方面军的官兵经过了万里转战第一次相聚在一起。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说：“三大红军西北

大会师，到山城堡战斗结束了长征。长征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终。我们要在陕甘苏区站稳脚跟，迎接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山城堡战斗结束后，红军炊事员朱家胜挑着担子跟着部队往陕北走，因为战友牺牲了，他一个人担着的东西太多，渐渐地落在了队伍的最后。夜色沉寂，雪落无声。朱家胜踩着战友们在雪地上留下的脚印一直向前。天边出现了一抹淡红色的光亮，朱家胜看见了向他跑来的红军。红军接过他肩上的担子，扑打着他身上的雪花，往他手里塞了个热乎乎的洋芋。一位红军干部从背包里翻出一个蓝布小包，拿出里面的针线对他说：“同志，到家了，补补吧。”红军干部一针一线地缝补朱家胜那件破得很难再补的衣服，那是他自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离开根据地就一直穿在身上的一件单衣。天边那片朦胧的亮色逐渐扩大，苍茫的河山骤然映入红军战士朱家胜流着泪的双眼——雪后初晴的黄土高原晨光满天，积雪覆盖下的万千沟壑从遥远的天边绵延起伏蜿蜒而来……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

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

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

2001年10月—2006年8月 北京

原驰蜡象，

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

看红装素裹，

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

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

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

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2001年10月—2006年8月 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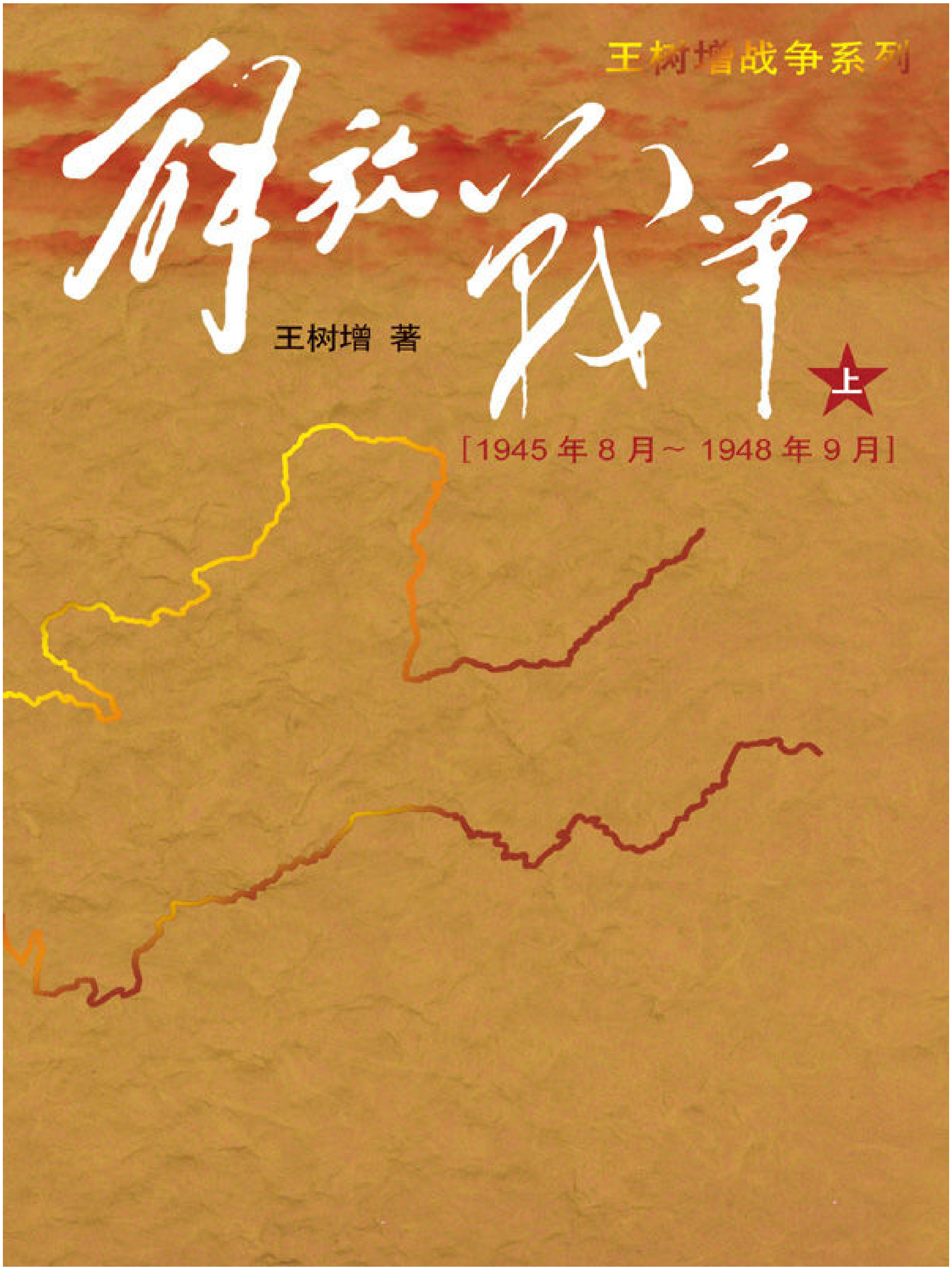
策　　划：王　瑛
责任编辑：脚　印
　　　　：李羽壮
设计：刘　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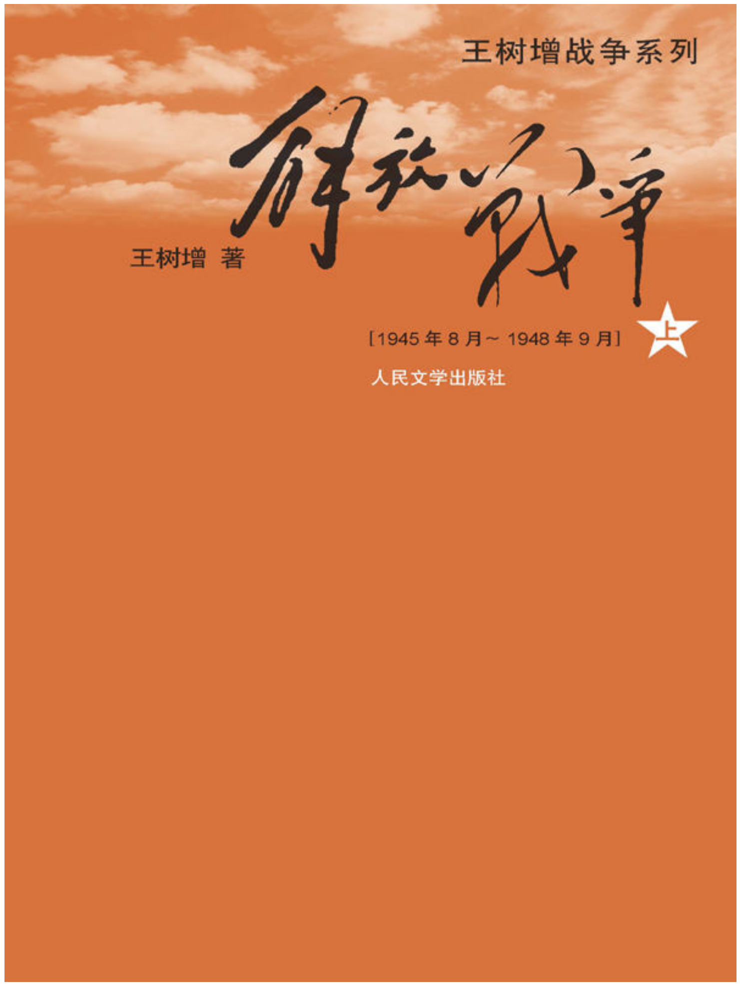


ISBN 978-7-02-005798-6
9 787020 057986 >

ISBN 978-7-02-005798-6

定价 53.00 元


王树增战争系列
解放战争
王树增 著
上
[1945 年 8 月～ 1948 年 9 月]


王树增战争系列
解放战争
王树增 著
[1945年8月～1948年9月]
上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解放战争（1945.8—1948.9）/王树增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ISBN 978-7-02-007358-0

I.解…II.王…III.纪实文学—中国—当代IV.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200102号

责任编辑：脚印 李羽壮 装帧设计：刘静

责任校对：刘光然 常虹 责任印制：王景林

解放战争（上）（1945.8—1948.9）

王树增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686千字 开本 680×1000毫米 1/16 印张 45.75 插页 4

2009年8月北京第1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0

ISBN 978-7-02-007358-0

定价 6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 第一章 青春作伴好还乡
  - “年纪愈大愈不愿意洗脸”
  - 青春作伴好还乡
  - 闯关东
  -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
  - “活着的最伟大的美国人”
  - 狭隘的关门主义
- 第二章 最大多数万岁
  - 四平之战
  - 中原突围
  - “蒋若攻李，粟必攻蒋”
  - 古老的中国战术和漂亮的美国帽子
  - 最大多数万岁
  - 和平已经死了
- 第三章 哀莫大于心死
  - 奇寒中的呐喊
  - 哀莫大于心死
  - 农民厌恶马师长
  - 姑嫂二人忙点灯
  - 囊形地带和中枢安全
- 第四章 战场的腰部
  - 胡宗南：为人民服务处
  - 孟良崮
  - 黄土沟壑
  - 战场的腰部
  - 夏季攻势
- 第五章 破釜沉舟
  - 共产党是否失败了？
  - 战略进攻
  - 破釜沉舟

    - “领导爬起来”
    - “共军北渡黄河公算最大”
- 第六章 朗照边区胜利花
    - “打他三个钟头再走不迟”
    - 半岛之争
    - 朗照边区胜利花
    - 打倒蒋介石才有饭吃
    - 瑟瑟秋风中的反腐与作战
    - “他们也未必愿意永久打仗”
- 第七章 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 黑发美少年
    - 卫立煌：“我参加共产党好吗？”
    - 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 沉重的门板
    - 麦子是个好东西
- 第八章 把汉江变成内河
    - 烽烟起洛阳
    - 只准活着打下去，不准活着退下来
    - 泾渭河谷
    - 打龙亭
    - 把汉江变成内河
- 第九章 决战的序幕
    - 群众的集体意识
    - 黄土黄
    - 济南战役：一次严重作战
    - 济南战役：不停顿地攻击
    - 济南战役：决战的序幕

# 第一章 青春作伴好还乡

## “年纪愈大愈不愿意洗脸”

一架带有美军标志的飞机在中国黄土沟壑的上空盘旋。

这是一九四四年七月里的一天。

在此之前，因为很少有飞机在延安降落，这个共产党中央所驻扎的偏僻小城内还没有称得上机场的设施。现在，那个被称为“机场”的地方只是一片较为平坦的空地。

正是盟军实施诺曼底登陆的那段日子，大半个欧洲都被战场上空的阴霾所笼罩。但是，在亚洲战场的中国战区，进入夏季以来却十分干燥。由于手中有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事先亲自起草的一封关于这块空地的规模、走向以及各种可以利用的地面标记的电报，驾驶飞机的美军飞行员很快就发现了那个“机场”，并且迅速地俯冲下去——他们有充分的理由享受此刻奇异的感觉：当盟军飞行员在湿气浓重的欧洲云层中躲避德军密集的对空炮火时，他们身边的天空却出奇的湛蓝宁静。更重要的是，在机翼下这片充满神秘色彩的土地上等待他们的，是无论意识形态还是生活方式都被蒋介石政府描绘得千奇百怪的共产党人以及追随着他们的士兵与百姓。这一切，都使得美军飞行员此刻的行动如同一次氛围奇特的飞行表演——但是，还是出事了。飞机的轮子刚刚接触地面，左轮猛地撞上一个看似松软实际上异常坚硬的黄土堆，机身立即向左倾斜，瞬间变成一团带着尖厉呼啸的巨大的黄色烟尘，烟尘在接近那片空地尽头的时候戛然而止，机头戳在地上使整个飞机几乎竖立起来，机舱的左侧裂开一个大窟窿。驾驶和乘坐这架飞机的数名美国军人惊魂未定地从机舱里爬了出来，他们显然没有受

到严重的伤害，他们立即感受到延安炙热耀眼的阳光和浓烈醇厚的黄土气味。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发生在中国的规模巨大的战争——战争的一方称之为“解放战争”，另一方称之为“戡乱战争”——毫无疑问是一场典型的内战。但是，自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来，发生在世界任何区域的所谓“内战”，仅仅是对交战对象和战场地理的界定而已，其影响毫无例外会超出战争发生国的国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国际社会的各个方面——叙述二十世纪中叶发生在中国的那场规模巨大的战争，必须从战争爆发前一年一架倒霉的美国飞机开始。因为，当那架飞机在跑道尽头变成一团跌跌撞撞的烟尘的时候，站在那片空地边的延安军民惊骇的叫声以及爬出飞机的美军观察组成员迷茫的神色，无疑是中国即将进入的那段动荡岁月和即将爆发的那场战争的极具意味的开端。

那个夏天，美国人急于飞往延安的原因是：首先，中国国民党军队在对日作战中一再失利，而蒋介石需求的对华援助越来越多，引起美国朝野的一片不满。其二，美军已经开始轰炸敌后日军目标，迫切需要共产党抗日武装提供有关情报和营救降落在敌后的美军飞行员。其三，或许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即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已经发展到令人无法忽视的程度，与中国共产党人接触并了解他们，是战后美国政府制定符合美国利益的对华政策所必需的。正是这一切，使得一九四四年夏季仍处在数十万国民党军封锁中的延安，突然间热闹起来。

延安，中国当代史上一个奇特的地方。延安的历史，已使它从一个普通的地名，变成一个含义复杂的政治词汇。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片土地贫瘠、植被稀疏、被国民党政府称为“匪区”的地方，却被全中国的热血青年视为寻求民族解放和国家新生的神圣之地。在延安散

落着泥屋和窑洞的数条干涸的河川之中，聚集着当时中国最富社会理想与政治抱负的精英，聚集着经过万里长征幸存下来的共产党官兵，聚集着因为向往一个崭新的国家远道而来的学者、作家、画家、作曲家。延安指挥的武装力量遍布整个中国，人数已达六十三万之众——在某种程度上讲，这里就是一个“国家”，尽管蒋介石从来没有正式承认过其合法性。

在美军观察组到来之前，无论蒋介石怎样阻挠，一个渴望踏上这块神秘土地的中外记者团，还是在盟军开始诺曼底登陆作战的第三天来到延安。中外记者们发现，共产党人在这片黄土地上所创造的一切，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意外和新奇纷至沓来。共产党军队总司令朱德宴请了他们，并和他们一起欣赏了艺术家们演唱的《同盟国进行曲》和《黄河大合唱》。被国民党报刊描绘成“匪首”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性情温和，除了不断地吸烟之外，这个高个子长头发的南方人举止从容不迫、神态安然自得。在回答记者们提出的“国共两党是选择战争还是和解”这个问题的时候，毛泽东说，共产党人和人民的选择不是内战，而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制度。中外记者们从日常生活的层面上认识了毛泽东——“在延安，毛是可以接近的，并且是很简朴的。他会在遍地黄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谈，他不带警卫。当和我们在内的一群人拍照时，他不站在中间，也没有人引他站在中间，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时在边上，有时站在别人身后。”

美军观察组虽然被延安的一个黄土堆弄得心惊肉跳，但是《解放日报》刊发的题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社论，还是让美国人十分高兴。社论不但说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而且据说社论标题中的“战友们”三个字，是毛泽东亲自加上的。共产党军队的高级将领一一向美军观察组介绍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介绍是极其详细的，仅彭德怀关于八路军在华北的抗战就整整讲了三天。毛泽东对随行的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表

示，中国问题的关键是国共两党的关系，共产党人深知内战对于国家经济和远东稳定的破坏。在目前情况下，因为国民党政府依靠美国的大量援助，所以在中国防止内战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美国的影响。由于担心一旦抗战结束，美军撤离后，国民党军会立即发动内战，毛泽东甚至向美军观察组提出："美国是否有可能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

受到友好接待的美军观察组吃上了延安生产的面包，而毛泽东和延安军民则兴致勃勃地观看了美军观察组带来的电影——汽油发电机轰轰作响，银幕上是一个永远走着鸭子步的落魄的美国流浪汉，在流浪汉的身后，是那个距离延安十分遥远的国度闪闪烁烁的摩登时代。

接着，美国总统特使帕特里克·J·赫尔利到达延安。

赫尔利曾经是胡佛总统时期的陆军部长，出任罗斯福总统特使之后不久，他便成为美国驻华大使。由于深陷中国内战开始时复杂的政治漩涡中，这个美国人很快就被共产党人视为一个出尔反尔的政客。但是，他第一次来延安的时候，受到了真诚的欢迎。毛泽东特别交代，要专门为赫尔利"开个欢迎会"，"再搞点音乐晚会"。延安方面期待的心境，源于重庆传来的情报。不久前，在重庆的共产党代表已与赫尔利见过面，赫尔利对林伯渠和董必武说：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态度已经缓和，并且同意他必要时与共产党人接触。蒋介石虽然是中国战区的抗日领袖，但是按照美国人的看法，他的国民政府不是一个民主的政府而是一个专制的政府。中国共产党应该得到合法的政治地位。他代表罗斯福总统来到中国，就是要促成中国一切军事力量的统一，以最终战胜同盟国共同的敌人。虽然美国支持由蒋介石来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但美国同时知道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很强大，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要因素。因此，他准备在国共两党之间进行"撮合"以求得双方的合作。

在此之前，包括毛泽东在内，共产党主要领导人都没有见过赫尔利。于是，与前些日子那架运载美军观察组的飞机出现意外一样，这位美国特使也令延安的共产党人感到了颇多的意外。赫尔利乘坐的飞机在延安降落时，周恩来正好在那片空地上，当他得知走下飞机的那个外国人是赫尔利时，立即招来一个步兵连作为临时仪仗队。六十一岁的赫尔利“伸直身子，挺起胸膛”接受步兵连的检阅，“像一个得意洋洋的小伙子那样高叫印第安人的战争口号”。这一情景令急忙赶来欢迎他的共产党领导人不禁“瞠目结舌”。

第一次会谈，面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基本上是赫尔利一个人在滔滔不绝。他再次强调自己到延安来是得到国民政府批准的，蒋委员长不但愿意承认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并且愿意承认中国其他一切政党的合法地位，同时正在考虑以某种形式吸收共产党人参加军事委员会——虽然这是美国人所期望的战后中国的政体样式，美国人正从各方面影响蒋介石迫使他接受这样的政体，虽然美国人或多或少地预感到如果国共无法合作这个国家将面临什么样的危险，但是，美国人既不了解国民党，也不了解共产党，更不了解中国。赫尔利拿出一份名为《为着协定的基础》的文件，亲自为共产党领导人朗读起来：

一、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工作，来统一在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

三、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拥护为了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孙中山的原则。双方将遵行为了提倡进步与政府民主程序的发展的政策。

四、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与一切士兵，当被中央政府改组时，将依照他们在全国军队中的职位，得到一样的薪俸与津贴，共产党军队的一切组成部分，将在军器与装备的分配中得到平等待遇。

五、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地位，并将承认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中国一切政党，将获得合法地位。

毛泽东问赫尔利，这份文件究竟是什么人的意见？赫尔利解释说，这是两党谈判的基础，不带有任何强迫性。参加会谈的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对赫尔利说，毛泽东想知道的是，您刚才说的是蒋介石的意见还是您自己的意见。赫尔利犹豫了一下说，原来是我自己的意见，后来蒋先生作了若干修改。

午饭之后，接着会谈。

毛泽东不再给赫尔利滔滔不绝的机会。在警告赫尔利“中国的事情很难办”之后，毛泽东着重谈了两个问题，即联合政府问题和改组军队问题——这两个问题，是解放战争爆发前，国共两党始终无法妥协的最主要的问题。毛泽东说，中国人民，包括我们共产党人，首先希望“国民政府的政策和组织”有所改变，建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政府，这是解决问题的起点。“直到现在国民党还是一个大政党，拥有庞大的军队，这个军队在抗战头两年打仗打得比较好，现在总算还在打日本，国民党当局还没有最后破裂民族团结，这是蒋先生所领导的党和政府好的一方面”。但是这个政府必须改组，因为国民党政府危机四伏，危机的来源“在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与腐败机构”，而不是共产党的存在。毛泽东说，抗战以来，“我们从不妨碍国民党，而国民党却来妨碍我们”，一共一百九十五万军队，“有七十七万五千人来包围我们”。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拥护国民党，以打击日本侵略者。我们战斗在敌后的六十三万军队和九千万人民，拖住了日寇的尾巴，如果没有这个力量拖住日寇的尾巴，国民党军队早就被打垮了。军队是需要改组，中国人民的公意是：哪个军队腐败，就改组哪个，“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尽管感受到共产党人对蒋介石政府持有强硬的批评立场，但是赫尔利依旧认为，关于他带来的那份文件是有沟通的可能的，他请毛泽东亲自修改文件上的条款。毛泽东表示，赞成第一条，把第三条放在

第二条之前，建议加上联合政府的条款："现在的国民党政府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及无党无派政治人士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同时，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军队代表的联合统帅部"。毛泽东强调增加的这一条款意味着：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国民党只是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中与其他党派平等的一员。

赫尔利以他对中国极其有限的了解，显然无法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在第二天的会谈中，赫尔利表示："我将尽一切力量使蒋先生接受，我想这个方案是对的。"他甚至表示如果蒋介石愿意，他可以陪同毛泽东去见蒋介石，并以"美国的国格"担保毛泽东在与蒋介石见面后能"安全地回到延安"。毛泽东的回答是："我很愿意和蒋先生见面，过去有困难，没有机会，今天有赫尔利将军帮助，在适当时机我愿意和蒋先生见面。"可以肯定地说，毛泽东对经过修改的方案是否能在蒋介石那里获得认可，持严重的怀疑态度。他问赫尔利："今天把文件准备好，明天签字"，不知蒋先生是否会同意？包瑞德上校在一旁说，有赫尔利将军见证，如果蒋先生拒不签字，将军就可以明确地告诉罗斯福总统，我们认为很公平的协议，"毛同意了，蒋不同意"。这时，赫尔利提出一个看似十分尖锐的问题："我要再证实一下，您是否愿意和蒋先生合作，由他当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回答是："他当政府主席。"赫尔利变得十分乐观了。他问毛泽东，与蒋先生见面的地点如果不在重庆，那么应该选在别的什么地方？毛泽东说："当然在重庆。"

毋庸讳言，美国政府的主动接近姿态，确实给中国共产党人带来了某种希望，即希望美国可以成为中国对立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之间的调解人。无论如何，至少在那个时候，美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和地位，使其在中国人的心中分量很重，尽管毛泽东终生都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强国抱有极大的警惕。

赫尔利带着美国式的天真回重庆去了。

毛泽东没有想到，给共产党人造成困难局面的，不是美国而是苏联。

一九四五年初春时节，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到达位于苏联克里米亚半岛南端的雅尔塔。当时，盟军对日作战的大势是：在由蒋介石指挥的中国战区，战局始终没有好转的迹象，罗斯福甚至接到过蒋介石表示中国可能不得不退出联盟战争的信函——而一旦日本从中国战场脱身，将上百万军队投入英美对日战场，那么，在美军以巨大代价征战的太平洋战区和仍让英军处在噩梦中的印缅战区，战局将会出现难以想象的困难。罗斯福和丘吉尔来到雅尔塔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劝说斯大林出兵，直接打击中国本土上的日军，以减轻盟军在亚洲其他战场上的压力，推进整个战争的迅速结束。为此，罗斯福和丘吉尔决定在战后利益分配上向斯大林作出让步。

果然，斯大林对苏联红军承担对日作战"开价"很高。除了从日本那里恢复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中苏联损失的各种权益之外，大部分的条件涉及中国。包括保证苏联在中国大连的权益，恢复租用旅顺港为苏联海军基地，苏联和中国共同经营中东（满洲里至绥芬河）铁路和南满（哈尔滨经长春至旅顺）铁路。另外还有：维持外蒙古现状，库页岛南部及附近一切岛屿交还苏联，千岛群岛交与苏联。斯大林的理由是：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得到满足，就很难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什么他们必须去同日本作战"；而"如果能满足必要的政治条件"，那便不难向苏联人民解释"他们与远东战争的攸关利益是什么"。

为了促使苏联尽快对日作战，以牺牲中国主权为前提的《雅尔塔协定》签字了——当时的白宫顾问舍伍德后来说："在雅尔塔考虑远东的所有问题时，罗斯福最关心的根本问题是美国对日作战计划。"

当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如此则我民族之大，凭借之厚，今日虽不能由余手而收复，深信将来后世之子孙亦必有完成其领土、行政、主权之一日。"

而在政治信仰上与苏联有着亲缘关系的中国共产党人心情更为复杂。

一九四五年春天，延安的山坡染上了一层斑驳的绿色，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

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报告的题目是《论联合政府》。

这个在解放战争爆发前公开发表的文件，明确表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即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用和平的而不是战争的手段，建设一个新的中国：

……中国人民在其对于日本侵略者作了将近八年的坚决的英勇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和自我牺牲之后，出现了这样的新局面——整个世界上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神圣的正义的战争，已经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中国人民配合同盟国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时机，已经迫近了。但是中国现在仍然不团结，中国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做呢？毫无疑义，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机，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国配合作战，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然后，需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

《论联合政府》的小册子在重庆印发了三万册。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看完这本书只说了两个字：内战。陈布雷的意思是，共产党的政治攻势有颠覆政府的巨大力量，国民党根本没有招架之功，对付共产党只剩下战争这一种手段了。

毛泽东担心的是：一旦日本战败，内战全面爆发。

就在共产党人对未来提出设想的时候，一个巨大的事件突然降临，发生于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骤然拉开了序幕。

一九四五年八月初，美国人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八月九日，苏军的重炮打破了中国东北边境的寂静。由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指挥的后贝加尔方面军六十个师的机械化作战部队，沿着四千多公里的边境线向中国境内大规模突进。同时，苏军轰炸机群对伪满洲国首都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长春开始了猛烈的轰炸。

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没有证据表明，无论是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之前预料到日本军队垮台在即。虽然五月初苏军攻克了柏林，德国在法国的兰斯向盟军无条件投降，美军也在太平洋诸岛经过一系列血腥战斗于七月在菲律宾登陆，但是，胜利的曙光还没有照耀到中国战区的上空。那时，在中国的北方，东北地区的日本移民在日本关东军的保护下，依旧犹如在自己的故乡一样享受着黑土地的肥沃；在弥漫着麦香的华北平原和飘荡着稻香的苏北河网地带，日本占领军虽然不断受到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游击队的攻击和袭扰，但并没有显露出明显的崩溃迹象。而在中国的南方，日军最精锐的部队，正向位居中国西南的国民党军发动代号为“一号攻势”的大规模攻击，其作战重点是：“占领并确保湘桂（衡阳至友谊关）铁路、粤汉（株洲至广州）及平汉（北平至武汉）铁路南部沿线的要地”，以实现贯通中国东北到越南的大陆运输线，同时摧毁设立在广西和湖南的盟军空军基地。

中国共产党的七大结束之后，举行了七届一中全会，各解放区的党政军负责人依旧集中在延安。毛泽东的预想是：“日本也许在明年就要倒下去。”于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那天，延安的杨家岭礼堂里还在召开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要发表一个声明，

即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以表明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准备“广泛发展进攻”配合苏军对日作战。

毛泽东和延安军民一样，是在广播中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的。

同样，设在重庆的盟军总部，也是在广播中听到这个消息的，只不过比延安早了一天。

突然到来的胜利，给中国人带来巨大的惊喜和无比的自豪。抗战八年，重庆政府承担着政治和军事的双重压力。日本政府、汪精卫伪政府、盟军各国、中国自身的民族危亡和国家权益，种种的冲突与对抗、危机与艰难令重庆政府饱受折磨。同时，在对日作战的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以空前惨烈的血战抵御着日军对中国一个又一个城市的进攻，并以一百三十二万官兵的阵亡在战争中付出了沉重代价。因此，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当日，蒋介石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以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发表了广播演说：“我们的抗战，在今天获得了胜利。正义战胜强权，终于得到了它最后的证明，这也就是表示了我们国民革命历史使命的成功。我们中国在黑暗和绝望的时期中，八年奋斗的信念，今天才得到了实现。我们对于显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和平，要感谢我们全国抗战以来的军民先烈，要感谢我们为正义和平而共同作战的盟友……”

延安的毛泽东自然也十分兴奋，他把胜利归结于“我国全体军民共同努力的结果”：“由于日本的投降，我全民族八年来所坚持的神圣的抗日战争，已经胜利地结束了！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地结束了！在全中国与全世界，一个新的时期，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来临了！中国共产党认为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并协同英美苏及一切盟邦巩固国际间的持久和平。”

这是一个举国欣喜的时刻。

这个时刻令中华民族喜泪纵横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近代以来，发生在中国的屈辱事件几乎麻木了这个民族欢乐的本能，此前这片国土上还未有过强大的入侵者缴械投降的记载。于是，陡然到来的巨大胜利，让国人来不及去想欢乐结束以后将是什么样的日子。

对于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政治家和军事家们充满焦虑。

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中国这片土地上最主要的政治和军事争端，都来自于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这两个从联合走向分裂的政治派别，由于政治信仰的巨大差异，多年来始终处在严酷的敌对之中。国民党无论政治上还是军事上，一直处于强势地位，这就使得共产党的发展历经坎坷与磨难。十年前，中国共产党人和他们数量有限、装备简陋的武装，在国民党军的大举围攻下几乎面临绝境，不得不放弃一个又一个根据地，转战在这个国家的急流险山之间。最终，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落脚于中国西北的黄土高原上。而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就是当日本入侵中国后，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国共两党必须联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无论是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都清楚这种联合与这种统一是暂时的，一旦共同对日这个大前提消失，两支力量在政治上与军事上的对立就会重新显现，那么随之而来的也许就是冲突或交战的再次爆发。

此刻，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同盟国对中国可能爆发大规模内战的焦虑，绝不是出自于对中国社会与民生的担忧。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冲突，这一冲突的性质决定其结局必然影响到世界主要强国的在华利益，影响到世界主要强国在国际事务中政治联盟的格局。另外，如果中国爆发内战，很可能演变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英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间的直接冲突，谁也无法预料到这一冲突是否会

演变成新的世界大战，而已被旷日持久、代价巨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弄得精疲力竭的苏、美、英等国，谁也不希望在战争刚刚结束后不久再次卷入新的战争。

来自蒋介石政府和军队、国内各地军阀和地方势力、国际战胜国和战败国的各色情报，杂乱地集中在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毛泽东格外关注国民党军队日渐紧迫的大规模调动：新六军被运到南京，第九十四军被运到上海，第九十二军被运到北平……这种规模甚至超出了抗战时期的军事调动，显然是针对共产党人的。毛泽东担忧的是，五万美军准备在华北沿海港口城市登陆，名义上是配合中国政府对日本占领军受降，实际上既是等着蒋介石的军队前去接收，同时也不排除打算与苏联争夺控制中国的势力范围。而更让共产党人吃惊和困惑的消息，来自苏联。

苏军对日作战开始后，朱德命令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准备接受日军投降，但是蒋介石宣布日军只能向国民党军投降。就在日本正式宣布投降数小时之前，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与国民政府保持着外交关系，签署外交文件当属正常，不正常的是这一“条约”签署的时机涉及中国共产党人未来的生存环境。条约的要点是，落实苏联在《雅尔塔协定》中取得的在华利益。国民政府以此换取了斯大林的承诺：上百万苏军已经开进中国东北，虽然此刻那里没有国民党军的一兵一卒，但是苏军只接受国民政府对东北的接管；并且，“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

有外国记者评论说：“一切都已昭然若揭，如果内战爆发，中共将独立作战。”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起草了发至各战略区的电报：《关于日本宣布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电报表明，日本投降后，面对国民党军准备向解放区"收复失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任务为分两个阶段：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和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决定。一部分地区如江南、豫、鄂、晋、绥等地，第一阶段之时间可能甚短，对此应有充分估计"。

同一天，蒋介石发布了三道命令：

一、命令国民党军前线各部队"对敌放弃要点，应即派部队进驻"，"距敌较远之部队，应察状况可能向前推进"，"对于敌人遗留之武器弹药材料财物，必须派兵严为看管"，而共产党武装"如有争夺城镇，妨害我之行动，应断然剿办为要"；

二、命令各沦陷区伪军"应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人民。各伪军尤应乘机赎罪，努力自新，非本蒋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移动驻地，并不得受未经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

三、命令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其在各地区作战地境内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秩序之恢复，政权之行使等事项，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为维护国家命令之尊严，恪守盟邦协议之规定，各部勿再擅自行动为要"。

蒋介石的第三条命令，涉及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冲突的核心，即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是否“合法”的问题——蒋介石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接管日军和伪军投降的行动称为“唐突和非法之行为”。

八月十三日，朱德、彭德怀回电蒋介石，电文充满了毛泽东的文风：

重庆蒋委员长勋鉴：我们从重庆广播电台收到中央社两个消息，一个是你给我们的命令，一个是你给各战区将士的命令。在你给我们的命令上说：“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此外还有不许向敌人收缴枪械一类的话。你给各战区将士的命令，据中央社重庆十三日电是这样说的：“最高统帅部今日电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我们认为这两个命令是互相矛盾的。照前一个命令，“驻防待命”，不进攻了，不打仗了。现在日本侵略者尚未实行投降，而且每时每刻都在杀中国人，都在同中国军队作战，都在同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作战，苏美英的军队也在每时每刻同日本侵略者作战，为什么你叫我们不要打了呢？照后一个命令，我们认为是很好的，“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这才像个样子。可惜你只把这个命令发给你的嫡系军队，不是发给我们，而发给我们的另是一套。朱德在本月十日下了一个命令给中国各解放区的一切抗日军队，正是“加紧作战”的意思。再有一点，叫他们“加紧作战”时，必须命令日本侵略者投降过来，将敌伪军的武装等件收缴过来，难道这样不是很好的吗？无疑这是很好的，无疑这是符合于中华民族的利益的。可是“驻防待命”一说，确与民族利益不符合。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 朱德 副总司令 彭德怀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

紧接着，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评论指出，蒋介石对八路军下的命令无异于“敌我倒置”，要求八路军“就原地驻防待命”，其目的是为了“他的大军能够从峨嵋山源源东下，及时地赶到目的地，然后协同伪军，向解放区人民及其军队举行一致的进攻”。

十四日，蒋介石的回电到了，电文竟是这样的：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这样的邀请出乎毛泽东的预料，尽管赫尔利曾与他谈到过与蒋介石见面的问题。

应该说，延安对于赫尔利的政治调解最初充满期待，期待的核心是：共产党人准备与国民党人在政治上再次合作。合作希望达到的最终目的不存在任何杂质，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来看，共产党人的要求甚至有些“简陋”：“如果蒋介石签字承认，即是最大的让步，因为我们得到了合法地位，这是前所未有的。”但是，赫尔利从延安带回重庆的那份由毛泽东修改过的协议，还是被蒋介石断然拒绝了。国民党方面的答复是：只有共产党军队接受改编，并且全部移交给国民政府统辖，国民政府才有可能承认共产党的合法性。蒋介石提出了三点“反建议”：一、国民政府允将中共军队加以改编，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二、中共应将其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委会统辖，国民政府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委会；三、国民政府之目标为实现三民主义之国家。

于是，赫尔利又开始劝说延安接受国民党提出的条件。毛泽东明确表示：“蒋介石提出的三点建议等于要我们完全投降，交换的条件是他给我们一个军事委员会的席位，而这个席位是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赫尔利则说，如果共产党人接受这个席位，就是“一只脚跨进大门”了。毛泽东的回答是：如果双手被反绑着，即使一只脚跨进大门，

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

不久，赫尔利当上了美国驻华大使。

美国人的记述是：“从这天以后，他同共产党人谈判时就日益倾向于袒护国民政府了。”

八月十六日，毛泽东给蒋介石回电：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

未（八月）铣（十六日）

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发出的电报，向蒋介石提出的要求包括：“你及你的政府与其统帅部在接受日伪投降与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时，我要求你事先和我们商量，取得一致意见。因为你及你的政府为人民所不满，不能代表中国解放区及沦陷区的广大人民及一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及其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有权根据波茨坦宣言条款及同盟国规定之受降办法，接受我们所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收缴其武器资财，并负责实施同盟国在受降后之一切规定……”；“请求你制止内战。其办法：就是凡被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由解放区军队接受其投降，你的军队则接受被你的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的投降，这不但为一切战争的通例，尤其是为了避免内战……”

八月二十日，蒋介石发来第二封电报，除了陈述接受日本投降的办法是盟军总部规定的，要求共产党军队“严守纪律，恪遵军令”外，邀请共产党人“共定大计”的口吻更加热烈：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犹小，今于盟军所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肯惠诺为感。

蒋中正哿（二十日）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

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说：现在的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共产党人如何进入这个阶段？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是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我们曾力争进入若干大城市，现在没有成功，原因有二：一是苏联为了国际和平和受中苏条约的限制，不可能帮助我们；二是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使日本完全投降他。我们只能承认这个事实，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对我们有利的是：在人民中的地位，广大解放区的存在；不利的是：没有大城市，没有机械化军队，没有合法地位。会议接着讨论毛泽东是否去重庆的问题。朱德同意，说要解决问题，去是有利的，对将来的选举也是有利的，“让蒋介石当总统，我们当副总统吧”。彭

德怀也同意，但是建议暂时先不去，等和老蒋打一下，把他的气焰打下来一点再去。

就在政治局开会的时候，蒋介石的第三封邀请电到了：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蒋中正梗（二十三日）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八月二十六日，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毛泽东明确表示：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他随后提出，在不损害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共产党武装可以让步的地域是：第一步广东至河南的根据地，第二步江南的根据地，第三步江北的根据地。但是，“陇海路以北以迄外蒙古一定要我们占优势。东北我们也要占优势”。毛泽东的分析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虽然蒋介石打内战的决心已定，但是他面临的困难很多，国内反对内战的呼声他也无法忽视。更重要的是，此刻国民党军的精锐部队都集中在中国的西南和西北地区，运送这些部队进入华南、华东、华北乃至东北需要时间。正如美国总统杜鲁门所说：“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本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事实上，蒋介石甚至连再占领华南都有极大的困难。要拿到华北，他就必须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如果他不同共产党人及俄国人达成协议，他就休想进入东北。”

毛泽东起草了一封很长的电报，发至各中央局和各大战略区，电报将共产党人力争国内和平的态度表述得十分清晰：

……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国民党在取得沪宁等地、接通海洋和收缴敌械、收编伪军之后，较过去加强了它的地位，但是仍然百孔千疮，内部矛盾甚多，困难甚大。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假如此种局面出现之后，我党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加紧国民党区域城市、农村、军队三大工作［均是我之弱点］。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解放军的数量，并不许发行纸币，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

经过八年的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共产党人认为自己已经具备了与国民党进行政治斗争的能力和资本——“现在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估计到我们。”

……现在唯一挽救时局的办法，就是要求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由现在的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的代表，开紧急国是会议，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并由这个政府宣布并实行关于彻底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新政策。只有这样的新政府，但绝不是请客式的、不变更一党专政实质的、不改变政策的所谓新政府，才能一新天下之耳目，才能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才能保障人民有充分民主自由的权利，才能发出积极抗战的军令与民主主义的政令，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而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增强抗战力量，停止敌人的进攻与实行我们的反攻，也才能实行真正由人民选举的国民大会与实现民主选举的政府。有了这样的新政府，国家统一也就可能实现了。

蒋介石的评述是：“组织联合政府无异于推翻政府。”

尽管在蒋介石看来组成联合政府是不可想象的事，但是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人仍决心“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人民来制止内战”。

毛泽东决定去重庆与蒋介石见面。他说：“我们还要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中国有“洗心革面”的成语，意为通过改过面目一新。毛泽东接着又说：“年纪愈大愈不愿意洗脸。”

那一年，毛泽东五十二岁，蒋介石五十八岁。

## 青春作伴好还乡

“这个在九年前经过四川的人，今天踏上了抗战首都的土地。”《大公报》记者这样描述道，“毛泽东先生，五十二岁了。灰色通草帽，灰蓝色的中山装，蓄发，似乎与惯常见过的肖像相似。身材中上，衣服宽大得很。”专车把毛泽东从重庆机场接到桂园，那里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张治中的公馆。毛泽东在公馆里“宽了外衣，又露出里面簇新的白绸衬衫。他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广漆地板客厅里的一切，显然对他很生疏。”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日本宣布投降十三天后，重庆街头庆祝日本投降的狂欢痕迹犹在，遍地的彩色纸屑还未被风吹尽——“毛泽东先生来了！中国人听了高兴，世界人听了高兴，无疑问的，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件大喜事”。

中国最广大的知识和平民阶层，在刚刚过去的残酷的战争中，从精神到肉体都被折磨得支离破碎。尽管此时大地仍是满目疮痍，但如果这块土地上没有战争了，归乡之路再远总是可以走到的。那个妻儿老母倚门而立、泪眼望穿的地方，就是这个国家和平的梦境：都市午夜时分寂寞的街灯下传来的慵懒亲切的电车铃声，小镇酒馆里伙计在浓郁的酒香中露出的憨厚笑容；教室里乡音浓重的教授令人神思迷离的诗词吟唱，农家树荫下清凉的茶汤和纺线车的嗡嗡声，所有这一切不都随着日本的投降和毛泽东的到来有了实现的可能了吗?

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当天晚上，蒋介石举办了一个小型欢迎宴会。

毛泽东与蒋介石见面了。

他们至少有十几年没有见过面了。上一次见面可能是在广州，那时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的统帅，毛泽东则以国民党员的身份代理国民

党中央宣传部长。一年后，随着国共两党的决裂，两个人从此成为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对手，他们率领各自的武装力量所进行的较量，每一刻都关乎各自的生死存亡。因此，即使毛泽东来到蒋介石面前，国共双方的高级官员们还是感到他们握手的那一瞬间有点不可思议。

此时，两个人的威望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作为二战中国战区的军事统帅，历经八年的抗日战争，蒋介石在国际社会已成为率领国民抵抗外国侵略的意志坚强的领袖。现在，他更有理由充满自信：他拥有四百万以上装备精良的正规军，苏、美援助中国抗日的所有武器都在国民党军队手中。而以他为核心的由联姻关系构成的四大家族，掌握并支配着大半个中国的财富和资源。他和他领导的政府在国际事务中得到广泛的承认，没有人怀疑他作为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土广袤的国家的首脑地位。尽管他向毛泽东发出邀请时有一种“恩赐”的感觉，也慷慨地公开表示他将对毛泽东“以诚挚待之”，但是，在与毛泽东见面的那一瞬间，他还是感到了一种强烈的羞辱：“今日，我国最大的敌国——日本已经在横滨港口向我们联合国无条件地投降。五十年来最大之国耻与余个人历年所受逼迫与污辱，至此自可湔雪净尽。但旧耻虽雪，而新耻重重，不知此耻何日可以复雪？勉乎哉！”——近二十年来，他不断地表示一定要把“祸匪”共产党斩尽杀绝，甚至数次宣布毛泽东已被他的军队“击毙”。——恍如昨日的一切如何能与今天这个举杯问候的场面对应？眼前这个长期与他对抗的“匪首”如不受到惩罚谁人还能服从政府？他领导的国家还能称得上是有尊严的国家吗？

此刻，在长征途中面容憔悴、身体消瘦的毛泽东已经容光焕发、体态丰满，这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革命者已经顺利地完成了创造伟业的一切准备。抗战后期在延安开展的整风运动，使中国共产党无论在组织上还是在思想上，都得到空前的统一，他在党内的威望和地位

已是无可置疑。此时，他宽大的上衣口袋里揣着延安发来的“解放区实力政权”统计电报，这封电报犹如一份共产党人的“财产”清单：“全军已扩大到一百二十七万人［东北发展的三万在内］，民兵发展到二百六十八万余人，地区扩大到一百零四万八千余平方公里，人口扩大到一万［亿］二千五百五十万，行署二十三个，专署九十个，县［市］政权五百九十个，县城二百八十五座［内反攻前八十九座］……”

由于蒋介石没有料到毛泽东真的会来，因此，在毛泽东抵达重庆的当天，他才匆忙召集会议讨论对策，会议临时确定了三条谈判方针：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蒋介石的核心意思是：“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

共产党方面提出关于谈判的十一点意见。这份极具务实精神的历史文件，显示出共产党人的胸怀与眼界，今天依旧值得细细品读：

（1）在和平、民主、团结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现三民主义。

（2）拥护蒋先生，承认蒋先生在全国的领导地位。

（3）承认国共两党及抗日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确立长期合作，和平建国之方针。

（4）承认解放区部队及地方政权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和合法地位。

（5）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6）重划受降地区，解放区部队参加受降工作。

（7）停止一切武装冲突，各部队暂留原地待命。

（8）在结束党治过程中，迅速采取必要办法，达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的地步。

（9）政治民主化的必要办法：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政治会议，协商国事，讨论团结建国大计，民主的施政纲领，各党派参加政府，重选国民大会，由中共推荐陕甘宁边区以及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山西五省省府主席，绥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浙江、广东及东北十省副主席，北平、天津、开封、上海四特别市副市长；推行地方自治，实行普选。

（10）军队国家化的必要办法：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解放区正规军逐步编成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驻地集中于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中共及地方军事人员，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其各部的工作；设立北平行营及北方政治委员会，任中共人员为主任。

（11）党派平等合法的必须办法：释放政治犯，取消一切不合理的禁令，取消特务等。

与毛泽东之前提出的政治主张相比，共产党人再次作出重大让步：不但承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承认国民党政权，而且舍弃了“联合政府”的提法，只要求“参加政府”。当然，这份意见中包含着两个核心的政治问题，即军队国家化和结束党治。

看到共产党人的意见后，蒋介石的感受是：“脑筋深受刺激。”

蒋介石与毛泽东进行了单独谈话——陪同毛泽东前往重庆的胡乔木回忆，在重庆，蒋介石与毛泽东会面有十一次之多，大多是在公开场合，但两人的几次重要会谈都是秘密的，“有时甚至没有任何其他人在场”。蒋介石开出了价码：承认解放区事实上是绝对行不通的，在中共真正做到军令政令统一之后，各县的行政人员经中央考核后酌情留任，省一级人员乃至省主席可以考虑邀请中共人士担任。关于政治问题，国民政府正考虑把战时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政治会议，各党派代表都可以参加，但是中央政府的组织和人事暂不变动。如果中共方面现在就想参加政府，可以考虑。也可以增加中共在国民大会的代表名额，但是现在的国民代表不能重选。关于军队问题，国民政府能够允许的最高限度是：中共军队整编为十二个师。

坐在蒋介石对面的毛泽东不置可否。共产党方面已经得到关于蒋介石谈判底线的情报，这份由中共南方局提供的情报相当准确：蒋介石在军队问题上最后可能让步到十六个师，国民大会的代表名额可以让步到百分之七。至于蒋介石说的省主席一职可以考虑邀请中共人士担任，情报援引国民党内部人士的说法是：到非让步不可的时候，蒋介石准备让毛泽东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无法得知，当毛泽东听说蒋介石准备让他出任中国一个偏远省份的“主席”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除了对共产党提出的“承认蒋先生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这一条表示“不胜赞佩”之外，国民党方面对其他问题没有任何让步的迹象：共产党要求以“和平、民主、团结为统一的基础”，国民党则要求“民主与统一必须并重”；共产党要求其领导的军队分期整编为四十八个师，国民党则要求只能编为十二个师，而且要“立即缩编至此数”；共产党要求承认解放区的合法地位，国民党甚至拒绝讨论这一问题；共产党提出重选国民大会代表，国民党则认为已选代表资格仍然有效。就在国共两党艰难地讨价还价的时候，参与谈判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态度突然强硬起来，原因是他必须带着国共谈判的某种成果回国述职。于是，赫尔利不耐烦地宣称：要么承认国民党统一，要么宣布谈判破裂。毛泽东对赫尔利说，我们的态度是：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

赫尔利空手回美国去了。

蒋介石焦躁不安。在他看来，毛泽东和共产党人依旧是“匪”——“余以极诚对彼，而彼竟利用余精诚之言，反要求华北五省主席与北平行营主任皆要委任其人，并要编组其共军四十八万人，以为余所提之十二师之三倍，最后将欲二十四师为其基准数乎？共匪诚不可理喻也……”而之所以还要与毛泽东周旋，其目的，蒋介石在给各战区司令

长官的密令中表述得明白无误："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毛泽东也十分疲惫，但是只要和谈的期待还有，他就必须坚持下去。毛泽东出席了由孙中山之子孙科举行的盛大酒会，与宋庆龄、冯玉祥、邵力子、张治中、沈钧儒、郭沫若、傅斯年等一一举酒碰杯。他把《沁园春·雪》赠给了辛亥前辈柳亚子——这首一九三六年冬天写于共产党人艰苦转战中的诗作，以傲视群雄的气概再次令蒋介石"深受刺激"。他还出席了包括白崇禧在内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举行的欢迎宴会或茶话会。他主动宴请各界朋友，从政界、军界、文化界到产业界。他甚至看望了一向反共的陈立夫和戴季陶。毛泽东的观点是：共产党人来到重庆，就是为了与反共势力的代表蒋介石谈判。那么我们光找国民党左派不行，左派赞成与我们合作但是他们不掌权，要解决问题就不能放弃与国民党右派的接触。他接受了英国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的采访：

问：是否可能不用武力而用协定的方式避免内战?

答：可能，因为这符合于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于中国当权政党的利益。目前中国只需要和平建国一项方针，不需要其他方针，因此中国内战必须坚决避免。

问：中共准备作何种让步，以求得协定?

答：在实现全国和平、民主、团结的条件下，中共准备作重要的让步，包括缩减解放区的军队在内。

问：假如谈判破裂，国共问题可能不用流血方法而得到解决吗?

答：我不相信谈判会破裂，在无论什么情形之下，中共都将坚持避免内战的方针。困难会有的，但是可能克服的。

问：日本投降后，你们所占领的地区，是否打算继续占领下去?

答：中共要求中央政府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与人民军队，它的意义只是要求政府实行国民党所早已允诺的地方自治，借以保障人民在战争中所作的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与教育上的地方性的民主改革，这些改革是完全符合国民党创造者孙中山先生的理想的。

问：如果联合政府成立了，你们准备和蒋介石合作到什么程度呢？

答：如果联合政府成立了，中共将尽心尽力和蒋主席合作，以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问：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

答：“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问：在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中，中共的建设方针及恢复方针如何？

答：除了军事与政治的民主改革外，中共将向政府提议实行一个经济及文化建设纲领，这纲领的目的主要是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土地改革与工业化，奖励私人企业［除了那些带有垄断性质的部门应由民主政府国营外］，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欢迎外人投资与发展国际贸易，推广群众教育，消灭文盲等。这一切也都是与孙中山先生的遗教相符的。

问：你赞成军队国家化，废止私人拥有军队吗？

答：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国家民主化。通常所说的“共产党军队”，按其实际乃是中国人民在战争中自愿组织起来而仅仅服务于保卫祖国的军队，这是一种新型的军队，与过去中国一切属于个人的旧式军队完全不同。它的民主性质为中国军队之真正国家化提供了可贵的经验，足为中国其他军队改进的参考。

毛泽东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阐述，令所有关注中国前途的人满怀希望。

但是，令人担忧的事情还是出现了。

此时，美军不但占领了从广州湾到秦皇岛的沿海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还动用飞机和军舰日夜兼程帮国民党军运送兵力。美国总统杜鲁门的解释是：“由于共产党人占领了铁路中间的地方，蒋介石要想占领东北和中南就不可能。事情很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假如我们让日

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更严重的是，国民党中统局拟定了以“蒋总统要经常咨询国事”为借口扣留毛泽东于重庆的计划。延安给毛泽东发来电报，建议毛泽东回来。毛泽东的态度是：继续留在重庆。同时，在有把握的情况下，反击胡宗南、阎锡山、傅作义向解放区发动的进攻，打几个大胜仗支援重庆谈判。

局部的军事冲突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在华美军在那个时刻所充当的角色充满戏剧性。他们在帮助蒋介石日夜运送兵力的同时，竟然也为共产党人做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那就是用飞机把共产党的将领们送到了前线。就在滞留延安的共产党将领急需返回各解放区的时候，恰巧有一架美军观察组的运输机从西安飞到延安，于是共产党人便对美军飞行员说，能否帮助我们运送几个人去太行山？美军飞行员在没有询问究竟是什么人的情况下痛快地答应了。飞机离开延安的那天，中央外事联络科长黄华去机场给美军飞行员送行，看见机翼下准备登机的一群人时，吓了一跳，这些人是：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薄一波、林彪、滕代远、张际春、陈赓、陈再道、陈锡联、萧劲光、宋时轮、杨得志、李天佑、邓华、王近山、傅秋涛、邓克明、江华和聂鹤亭。黄华当即向军委秘书长杨尚昆请求陪同飞行，因为一旦出了问题，他可以充当翻译。在小小的道格拉斯运输机的货舱里，二十一位共产党高级将领挤在一起——如果这架运输机真的出了事故，中国解放战争的历史也许会是另一种样子。

四个小时之后，飞机降落在太行山深处的一个简易机场。

共产党将领们立即奔赴各解放区。

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等人赶往涉县赤岸村的军区司令部所在地。

十五天之后，一场战役打响了，战场位于山西省东南部的上党。

上党是以山西长治为中心的长子、屯留、襄垣、潞城、壶关等十余个县的总称。这里是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建立的七个较大的解放区之一——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腹地。这个被毛泽东称为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中间的“一个脚盆”的地区，向东可以钳制华北平原，向南可以控制黄河，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阎锡山部配合沿同蒲线（大同至风陵渡）北上的胡宗南部，占领了这里的六座县城，犹如在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中心地带插入了一把刀子。如果不收复上党地区，不但晋冀鲁豫解放区不保，还可能导致国民党军向华北平原长驱直入。这就是刘伯承所说的“大门洞开”：“平汉线、同蒲线（敌人）都来了，我们打哪一个呢？上党不打打平汉线，背上有把刀子，子弹也没有，不好办。打上党，把冀南部队调去了，大门（平汉线）洞开，真是拼命，要命！那时国民党正向北，我们这里是足球门。打，不行也要打！”

所谓“不行也要打”，指的是当时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还没有做好打大仗的准备。晋冀鲁豫解放区在抗日战争中多次受到日军“扫荡”式的进攻，部队一直处在分散打游击的状态，而且编制很不充实，武器也十分简陋。大多数的团在千人以下，仅有一半的团有迫击炮两三门，重机枪三四挺，而且炮弹奇缺，步枪子弹更是缺乏。上党战役开始后，刘伯承曾问太行纵队副司令员陈锡联：为什么枪声这么少？陈锡联回答道：没有子弹，不敢多放枪。连国民党军都感到有点怪异：冲锋而来的共产党官兵，大多数人穿着老百姓的衣裤，衣裤的颜色五花八门，不少人脑袋上和山西的放羊倌一样系着一条白布巾。当时，占领上党地区的国民党军，是阎锡山部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十九军

军长史泽波率领的第十九、第六十一军的四个主力步兵师和一个相当于师的挺进纵队，兵力一万六千人。

毛泽东说："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别的法子是没有的。"

于是，不但必须作战，而且必须打胜。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日，上党战役正式打响。李达、陈锡联指挥太行纵队主力攻击屯留以吸引长治之敌来援，陈赓、陈再道分别指挥太岳、冀南纵队主力埋伏在长治至屯留的公路边准备打援。

由于缺乏攻坚战的经验和能力，太行纵队对屯留的攻击十分艰难，最后把李德生的第四支队七六九团加强上去才冲进城池。国民党军城防司令、暂编三十八师副师长徐其昌弃城逃亡，被埋伏在城北的解放区的民兵俘获。国民党军战史对屯留一战的叙述是："匪赓续向屯留围攻，以一部进出漳河西岸，截断我后方交通；经两昼夜鏖战，我军退守城垣。迄八日拂晓，匪集中五千以上兵力，先后爬城三十余次未逞，我乘机遴选奋勇官兵五百员，由第二团李团长文山率领出击，追至漳河左岸归还，毙敌千余。十日匪军再度来犯，战斗益烈，我官兵伤亡惨重，乃于十二日突围，翌日屯留遂陷。"

太行纵队占领屯留之后，太岳纵队开始攻击长子县城。担任主攻的三八六旅经过一整天的战斗，攻占了县城的西关和北关，国民党守军收缩入城。三八六旅旅长刘忠遂命令部队挖坑道，官兵们用了整整五天的时间把坑道挖到了城墙下，还专门买来一口棺材装炸药。九月十八日，长子县城墙西北角下那口装满炸药的棺材被引爆，一声巨响之后坍塌的城墙裂出一个大豁口，首先攻入城内的是三八六旅二十团。二十团以作战勇猛著称，团长楚大明。与二十团交过手的国民党

兵都害怕他们，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楚团戳一下”。长子城内的巷战异常惨烈，各攻击部队都伤亡很大，战斗一直持续到国民党守军的枪声停止。

接下来，太行、太岳、冀南纵队一起，从南、北、东三面向长治发起攻击。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严令部队死守。长治城墙坚固，天降大雨，攀爬困难，加之国民党守军火力猛烈，三个纵队的攻击屡屡受挫，攻守双方进入艰难的战场僵持状态。在史泽波的急切催促下，阎锡山派出由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领的第二十三、第八十三军以及省防军共八个师、两个重炮团从祁县出发来援。大雨阻断交通，援军只有步行。山岳相连，道路泥泞，在徒步行军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国民党军自带的弹药很多，还给长治守军带着增援的弹药，单兵负荷十分沉重，加上不断受到游击队的袭扰，一日仅可前进二三十里。但是，阎锡山严令增援部队不停顿地前进，同时给史泽波发电告之：“长治必守，援军必到。”

对于刘伯承来讲，战局到了严峻的时刻：援军不断逼近，长治守军很可能在援军到达时倾尽全力出击，两面夹击的局面一旦出现，对于晋冀鲁豫部队凶多吉少。九月二十八日，刘伯承和邓小平最后决定：由陈再道指挥冀南纵队继续围困长治；以陈锡联率太行纵队为右翼，陈赓率太岳纵队为左翼，立即北上迎击彭毓斌的援军。刘伯承在电话里对陈再道说：“长治这块骨头先不啃它，咱们先吃掉眼前这块肥肉。”

浑身泥泞的两军在屯留西北遭遇。

原来的情报说敌人兵力七千人，但是接敌后才发现援军竟有两万多人。晋冀鲁豫部队的一部不断后退，引诱敌军前进，主力则迂回至两侧发起进攻。在残酷的拉锯战后，彭毓斌部被包围。当得知粮食将尽，特别是水源被切断后，彭毓斌下令突围。但是，退路已被奔袭而

来的楚大明的二十团截断。楚大明对他的官兵们说：我们这里是口袋底，就是打到只剩一个人，也不许让敌人突出去！楚团长话音未落，敌人的先头部队就顺着公路冲来了，双方顿时在夜色中厮杀在一起。到天亮时分，战死者的尸体堆积在漳河北岸，河水变成了猩红色。阎锡山的部队全部装备着日式步枪和山炮，弹药充足，火力猛烈，虽然机关和后勤人员惊慌地到处乱跑，但作战部队在严厉的督战下反复冲锋。楚大明在最后时刻命令团机关、卫生队和直属连队全部投入战斗，他亲自带领二营向敌人发动反冲击，三营则从另一侧扑向敌阵。十月五日傍晚，晋冀鲁豫各部队开始了最后的总攻。战斗于六日上午九时结束，阎锡山的八个师两万余人全军覆灭。彭毓斌中弹负伤后自杀，被俘的高级军官包括炮兵司令胡三余、暂编四十六师师长郭溶、暂编四十九师师长张宏、六十六师师长李佩膺等。

长治守军得知彭毓斌两万人的增援部队被歼后，绝望中弃城突围。刘伯承、邓小平命令围城部队紧追不舍，同时命令其他部队急速前往合围。已连续作战月余的部队日夜兼程，终于在四天后将敌人包围在沁河以东歼灭。史泽波的部队除三千余人逃脱外，剩下的六千余人连同他本人以及暂编三十七师师长杨文彩、暂编六十八师师长郭天辛被俘。史泽波没有效法彭毓斌自杀，被俘后受到优待，并于一九四六年被释放。回到太原后不久，他重新加入阎锡山的部队，三年后在太原战役中再次被俘，并于一九四九年被再次释放。

上党战役是日本投降后国共的第一战。战役的结果完全出乎蒋介石的预料，他根本不相信手持简陋武器的共产党军队敢于发动如此规模的战役，这使他在重庆面对毛泽东的时候神情有些恍惚。更痛心疾首的是阎锡山，他苦心经营数年的精锐部队，总数也就九万有余，此役竟然一下子损失三万。而对上党一战失利之害，国民党军战史的总结是：

按上党区为晋、冀边区之锁钥，东屏太行，西障太岳，出东阳以瞰制冀南，扼天井以攫取豫北，形势险要，利于攻守。尤以交通上之影响，东控平汉，西扼同蒲，北制太正，南临黄河，战略之价值甚大。故是役我军败绩，即予匪回窜平汉之机，使华北、华中陷于分离，国军之北上受降，大受阻挠；而黄河以北晋、冀、豫地区之匪，自此连成一片，获得兵力运用之自由，使我豫东、鲁西时受威胁，晋南、豫北无法展开，影响而后之作战，实至深巨。

在国民党军失败的各种原因中，他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关键点，那就是他们已经深入到解放区内部作战了。国民党军无法知道，与他们交战的三万多官兵的身后还有九万多的百姓。解放区的青壮年帮助共产党军队挖战壕、修工事、送弹药、押俘虏，就在国民党军官兵因为老百姓的坚壁清野而缺粮短水的时候，晋冀鲁豫各部队得到了老百姓送来的三百多万斤小米和面粉、三十五万斤马料和四万斤食盐。解放区的妇女、老人和孩子们把支援共产党军队作战，视为打理自家庄稼一样天经地义的事情，他们守护村口、封锁消息、照顾伤员、缝制军衣，仅军鞋就做了一百五十多万双。部队攻打长治的时候，城关村的妇女们冒着枪弹送上来白面馒头，她们的到来让官兵们很是吃惊，官兵们一个劲地喊：“快下去！枪子不长眼！”经历过残酷战争的百姓知道打仗要死人，他们的丈夫或是孩子就在共产党的部队里，曾在他们村里给他们挑过水磨过粮的官兵也让他们格外惦记，于是，在战役进行的时候，他们把牺牲在战场上的官兵抬回来，擦净血污，给他们穿上新棉衣、裹上新棉被，然后哭喊着把他们葬在自家的坟地里。

就在上党战役将要结束的时候，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共产党代表与国民党代表在重庆桂园的客厅里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这就是中国当代史上著名的《双十协定》：

中国国民政府蒋主席于抗战胜利后，邀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先生，商讨国家大计。毛先生于八月二十八日应邀来渝，进见蒋主席，曾作多次会谈；同时双方各派出代表，政府方面为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四先生，中共方面为周恩来、王若飞两先生，迭在友好和谐的空气中，进行商谈，已获得左列（文件为自右往左竖写）之结果，并仍将在互信互让之基础上，继续商谈，求得圆满之解决。兹特发表会谈纪要如下：

一、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一致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业已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双方又同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

二、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现双方正与各方洽商政治协商会议名额、组织及其职权等项问题，双方同意一俟洽商完毕，政治协商会议即应迅速召开。

三、关于国民大会问题，中共方面提出：重选国民大会代表，延缓国民大会召开日期及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和五五宪法草案等三项主张。政府方面表示：国民大会已选出之代表，应为有效，其名额可使之合理的增加和合法的解决，五五宪法草案原曾发动各界研讨，贡献修改意见。因此，双方未能成立协议。但中共方面声明：中共不愿见因此项问题之争论而破裂团结。同时双方均同意将此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

四、关于人民自由问题，一致认为政府应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

五、关于党派合法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承认国民党、共产党及一切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示：各党派在法律之前平等，本为宪政常轨，今可即行承认。

六、关于特务机关问题，双方同意政府应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之权。

七、关于释放政治犯问题，中共方面提出：除汉奸之外之政治犯，政府应一律释放。政府方面表示：政府准备自动办理，中共可将应释放之人提出名单。

八、关于地方自治问题，双方同意各地应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唯政府希望不以此影响国民大会之召开。

九、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并重划军区，确定征补制度，以谋军令之统一。在此计划下，中共愿将其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由现有数目缩编至二十四个师至少二十个师的数目，并表示可迅速将其所领导而散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八个地区的抗日军队着手复员，并从上述地区逐步撤退应整编的部队至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解放区集中。政府方面表示：全国整编计划正在进行，此次提出商谈之各项问题，果能全盘解决，则中共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缩编至二十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关于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方面提出方案，讨论决定。中共方面提出：中共及地方军事人员应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其各部的工

作，政府应保障人事制度，任用原部队人员为整编后的部队的各级官佐，编余官佐，应实行分区训练，设立公平合理的补给制度，并确定政治教育计划。政府方面表示：所提各项，均无问题，亦愿商谈详细办法。中共方面提出：解放区民兵应一律编为地方自卫队。政府方面表示：只能视地方情势有必要与可能时，酌量编置。为具体计划本项所述各问题起见，双方同意组织三人小组［军令部、军政部及第十八集团军各派一人］进行之。

十、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承认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示：解放区名词在日本投降以后，应成为过去，全国政令必须统一。中共方面开始提出的方案为：依照现有十八个解放区的情形，重划省区和行政区，并即以原由民选之各级地方政府名单呈请中央加委，以谋政令之统一。政府方面表示：依据蒋主席曾向毛先生表示：在全国军政令统一以后，中央可考虑中共所荐之行政人选。收复区内原任抗战行政工作人员，政府可依其工作能力与成绩，酌量使其继续为地方服务，不因党派关系而有所差别。于是中共方面提出第二种解决方案，请中央于陕甘宁边区及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山西五省委任中共推选之人员为省府主席及委员，于绥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广东六省委任中共推选之人为省府主席及委员［因以上十一省或有广大解放区或有部分解放区］，于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特别市委任中共推选之人为副市长，于东北各省容许中共推选之人参加行政。此事讨论多次，后中共方面对上述提议，有所修改，请委任省府主席及委员者改为陕甘宁边区及热、察、冀、鲁四省，请委省府副主席及委员者，改为晋、绥两省，请委副市长者改为平、津、青岛三特别市。政府方面对此表示：中共对于其抗战卓著勤劳，且在政治上具有能力之同志，可提请政府决定任用，倘要由中共推荐某某省主席及委员，某某省副主席等，则即非真诚做到军令政令之统一。于是中共方面表示可放弃第二种主张，改提第三种解决方案：由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重新举行人民普选，在政治协商会议派员监督之下，欢迎各党派、各界人士还乡参加选举。凡一县有过半数区乡已实行民选者，即举行县级民选。凡一省或一行政区有过半数县已实行民选者，即举行省级或行政区民选。选出之省区县级政府，一律呈请中央加委，以谋政令之统一。政府方面表示：此种省区加委方式，乃非谋政令之统一，惟县级民选可以考虑，省级民选须待宪法颁布，省的地位确定以后方可实施。目前只能由中央任命之省政府前往各地接管行政，俾即恢复常态。至此，中共方面提出第四种解决方案：各解放区暂维持现状不变，留待宪法规定民选省级政府实施后再行解决，而目前则规定临时办法，以保证和平秩序之恢复。同时，中共方面认为：可将此项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政府方面则以政令统一必须提前实现，此项问题久悬不决，虑为和平建设之障碍，仍亟盼能商得具体解决方案。中共方面亦同意继续商谈。

十一、关于奸伪问题，中共方面提出：严惩汉奸，解散伪军。政府方面表示：此在原则上自无问题，惟惩治汉奸要依法律行之，解散伪军亦须妥慎办理，以免影响当地安宁。

十二、关于受降问题，中共方面提出：重划受降地区，参加受降工作。政府方面表示：参加受降工作，在已接受中央命令之后，自可考虑。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国庆纪念日于重庆

王世杰 张群 张治中

邵力子 周恩来 王若飞

毛泽东要离开重庆了。蒋介石与毛泽东又见了一面，并进行了长谈。蒋介石说，国共两党，不可缺一，党都有缺点，也都有专长。我们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十年之内总要搞出个名堂，否则对不起人民。毛泽东向蒋介石谈起土地革命。蒋介石听后说，很好，将来这些事都给你们来办。最后，蒋介石再次劝告毛泽东，不要搞军队，如果专门在政治上竞争，可以被接受。毛泽东则表示，赞成军队只为国防不为党派。于是，蒋介石对毛泽东说，我们二人能合作，世界就好办了。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毛泽东与蒋介石握手道别。

他们谁都没有想到，此一别便是他们的永别。

《双十协定》的签字令中国民众看到了和平的曙光。

在战时陪都重庆，因战争漂泊至此的人们都在收拾行装准备返回故乡，连国民党大员们也开始议论首都的回迁，因为对于国民党政客们来讲南京才是真正的国都。中国古代诗人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出现在重庆的报纸上——公元七百六十三年春季里的一天，得知引发巨大动荡的安史之乱突然以幽州守将投降而结束，杜甫写下了这首七律：

剑外忽传收蓟北，

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

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

便下襄阳向洛阳。

历尽苦难的中国就这样满怀希冀上路了。

尽管梦境萦绕，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人，都难免焦虑犹存。

这个民族百姓的心灵已经流离太久，故园静谧的模样已是模糊不清。

## 闯关东

狭窄的公路淹没在中国北方八月末的秋色之中，两支武装相距三百米在公路上对峙着。武装的一方是一群外国人，汽车上架着重机枪，一门八十二毫米无后坐力炮和一门三十七毫米平射炮已做好射击准备，武装人员手中的轻机枪、手枪和转盘式冲锋枪均已子弹上膛。武装的另一方是中国人，灰色粗布军装上没有任何军衔标记，每人手中是清一色的日式步枪。

红了的高粱和黄了的豆荚将大地染得斑斑驳驳。

这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的上午，毛泽东在重庆湿热的暑气中正前去拜访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一大批中外记者蜂拥跟随。而在距重庆数千公里的渤海西岸，在一个名叫“前所”的小火车站附近，具有历史意义的场面出现了。

苏联对日宣战后的第三天，朱德总司令发布了“第二号命令”：

延安总部命令第二号

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敌伪军投降，我命令：

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

二、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

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

四、现驻河北、辽宁边境之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总司令 朱德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五时

这个重要的军事命令中隐含着一个重要的地域名称：中国东北。

命令中提到的“现驻河北、辽宁边境之李运昌部”，是此时共产党武装距离东北最近的一支部队。尽管对这一命令的政治和军事背景了解不多，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运昌还是率领着这个小小根据地的全部人马——一万三千名官兵以及五个地委书记和两千五百多名地方干部，分三路开始向热河、辽宁和吉林进发。这是抗战结束后向东北开进的第一支共产党武装。其中由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和副政委唐凯率领的东路军的行进目标是：沿辽西走廊向北，进入锦州和沈阳。曾克林和唐凯骑着属于冀东部队典型装备的毛驴，日夜兼程，尽管他们对此次开进的目的以及可能遇到的情况满头雾水。

四天之后，他们越过长城。侦察参谋董占林率领侦察班仅用几支手枪，就迫使山海关附近前所车站的四百多名伪军投降了。然而，在这个小车站，曾克林和唐凯焦虑起来：上级命令他们与进入东北的苏军会合以配合作战。但是，苏军现在哪里？在哪里能与他们会合？正在费尽思量的时候，十二团副参谋长罗文率领的另一路侦察小组带来了消息：一支看上去好像是苏军的侦察分队，从赤峰方向急速开来，

距离这里已经很近了。果然，不一会，远处烟尘滚滚，五辆汽车冲进前所车站后戛然而止，苏军官兵随即展开了战斗队形。

这是进入中国境内作战的苏军首次遇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尽管曾克林和唐凯判断对方就是苏军，但是苏军无法弄清眼前这些手拿武器的人是干什么的。侦察科长找来的一位曾在海参崴做过工的老汉前去交涉，但是，苏军的翻译竟然是个蒙古人，俄语和汉语的水平还不如“海参崴老汉”，双方无论如何都难以沟通。更糟糕的是，曾克林携带的唯一一部电台此刻与关内的联系中断了。

双方的持枪对峙持续了两个小时。

突然，曾克林对唐凯说：让他们看看你的胳膊！

唐凯恍然大悟，他把衣袖卷起来，露出右臂上一个醒目的印记：镰刀和斧头。

苏军军官看清楚这个图案后，愣住了。

唐凯，湖北黄陂一个苦命的孩子。父亲死后，在和母亲一起乞讨的日子里，他突然发现富人们开始惊慌起来，拉着装满财宝的车到处躲藏。乡亲们传言，孙中山正在追这些富人呢。可是，大总统孙中山不是已经死了吗？开到他家乡的国民革命军说：大总统永远不会死！他不懂革命是什么，街边的挑夫这样回答了他：“革命就是杀他个龟崽子！抢他个龟崽子！让穷人吃饱饭！”一位领导穷人暴动的少共书记进入了他的生活，使他成为少年先锋队大队长和少共团支部书记。但是，没过多久，这个让他心中明亮起来的少共书记被地主民团用最残忍的方式杀害了。十三岁的唐凯在茅屋的油灯下，用钢针沾着草木灰，在自己的右臂上一针一针地刺出一个完整的镰刀和斧头图案。他说这是为了不忘少共书记说过的一句话：共产党指到哪里，我们就打

到哪里！死也不反悔！自此，这个图案一直印刻在唐凯的身体和心灵上，直到后来成为共和国将军的他于八十三岁那年终老之时。

唐凯把手臂袒露出来，充满血性光泽的皮肤上，镰刀和斧头的图案熠熠生辉。

苏军军官大叫："格米尼斯特（共产党）！"

一个苏军士兵举着电报跑来，后贝加尔方面军发来的电报说，莫斯科已经联系上了延安，延安方面向他们解释了"冀热辽"是怎么一回事。

名叫伊万诺夫的苏军营长向唐凯伸出了双臂。

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极具象征意义。从军事角度看，这是出兵中国打击日军的苏军与共产党军队的首次会合；从政治角度看，这次会合在第一时间确定了共产党军队与苏军的同盟关系。

接着，两支武装开始了首次合作：攻击山海关。在与日军方面谈判无效后，苏军的大炮在后面轰击，曾克林和唐凯的部队在前面冲锋，战斗以共产党官兵牺牲百人和苏军牺牲两名士兵的代价胜利结束。

山海关，这个被中国人称为"天下第一关"的关隘，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生死攸关的战略地位，它是中国北方一个重要地域分界处的门户，大门的外面就是面积广袤的黑土地。在这个星球上，有三块著名的黑土地：一块位于北美洲的密西西比河流域，一块位于欧洲的第聂伯河流域，另外一块就是位于亚洲东北部中国东北地区的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流域。这块黑土地以土壤肥沃、资源丰富而名传天下，曾令无数中国人抛家舍子满怀着憧憬去"闯关东"；这块黑土地的

东、北、西三面分别与朝鲜、苏联、蒙古接壤，南面的陆地与华北平原衔接，海上隔渤海湾与山东半岛遥望，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一九四五年，伴随着日本投降，中国东北突然出现了政权真空。

国共双方都知道东北的重要性。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考虑必须从日本占领军手中收复东北，他把东北地区称为中国革命胜利的"巩固的基础"："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这就可以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现在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得相当分散，各个山头、根据地都是不巩固的，也没有工业，有灭亡的危险。所以，我们要争城市，要争那么一个整块的地方。如果我们有了一大块整个的根据地，包括东北在内，就全国范围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基础，有了巩固的基础。"

而蒋介石之所以在日本投降前夕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由国民党军从苏联人手中接管整个东北。代表国民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上签字的外交部长王世杰说："当我们的政府决定签署条约时，我们在东北没有一兵一卒，而成千上万的苏联军队已经开进那个地区。如果我们拒绝缔结那个条约，我们仍不能收复东北，除非我们用军队去驱逐苏军并阻止苏军和共产党军队联合起来。"八月三十日，蒋介石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辕主任，公布将东北三省重划为辽宁、辽北、安东、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九省及哈尔滨、大连两市，任命了九省省长和两市市长。蒋介石将中国东北地区称为"革命的归宿地"："东北不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而是中国革命的归宿地。经过本党这三十年来不断的奋斗，我们中国革命已经快得到归宿地了。"

国共双方收复东北的命令几乎同时下达。

但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差别立刻显现：国民党军主力集结在西南地区，那里与东北是中国版图的两极。此时，通往北方的铁路因为战争大多处在瘫痪状态，修复进度十分缓慢。即使请求驻华美军援助，仅仅依靠飞机和军舰，在短时间内也不可能运送过多的兵力。而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中建立的敌后根据地，最近的距离东北南部边缘仅百公里。共产党武装兵力不多，但官兵执行命令坚决。这些穷苦人家的子弟，自他们投身共产党军队的那天起，就未奢望过搭乘任何一种交通工具，他们的奔袭转战只能依靠自己的双脚。他们没有辎重，除了一支步枪、少量的子弹和几颗土造的手榴弹外，最重的就是干粮袋，因为他们出发的时候，根据地的百姓往干粮袋里塞了不少可供路上充饥的食物。

九月五日，曾克林和唐凯的队伍到达沈阳。由于在山海关战斗中缴获颇丰，这支部队看上去还算威风：不但有机枪和崭新的日本步枪，而且官兵每人身上都挂着牛皮子弹盒。唐凯还骑着他的那头毛驴，曾克林却骑上了一匹黄色的高头大马。沈阳的百姓第一次看见八路军，欢迎与围观的人蜂拥而至，手里举的旗帜更是五花八门：镰刀斧头红旗、青天白日旗、美国的星条旗、英国的米字旗，甚至还有伪满洲国的龙旗和日本的太阳旗。——这就是那时候的中国东北，怪异的民众心理与混乱的社会秩序斑驳相交。

此刻，对于苏联，彻底打败日本关东军已不是问题，难题是如何处理国共两党在中国东北的利益。从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上讲，苏军与共产党武装应该更亲近一些。但是，由于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缺乏了解，更由于牵涉到未来的在华利益，苏联必须遵守《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将日本投降后的东北政权交给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就在冀热辽军区一支规模不大的队伍突然出现在沈阳的时候，苏联方面得知了美国为蒋介石政府向中国北方运兵的庞大计划，特别是美国军舰已经进入渤海湾的情报，苏联方面感到了严重的不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再微弱，终究是制约国民党政府与美国联姻的一种力量，苏联有必要在国共两党之间寻找一种有利于与美国抗衡的政治筹码。显然，用一种暧昧的态度容许共产党军队在东北地区存在，对于苏联来说或许有益而无害。

九月十四日上午，在延安没有得到任何通报的情况下，一架苏军飞机降落在那块已经成为机场的空地上。曾克林从机舱里一钻出来，就朝跑过来的警卫战士高喊：“快去报告！我从东北来！我把苏军代表请来了！”

驻扎在长春的苏军最高司令官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全权代表贝鲁罗索夫上校和翻译谢德明中校到达延安。

可以想象延安的惊讶与兴奋，朱德立即接见了苏军代表。

贝鲁罗索夫上校声明他的军阶不高且权力有限，此行仅为传达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四点声明：

一、按照苏军统帅部的指示，蒋军和八路军进入东北，应按照特别规定的时间。

二、苏军退出满洲之前，蒋军和八路军不得进入东北。

三、因八路军单独部队已进至沈阳、平泉、长春、大连等地，苏军统帅请朱总司令命令各部队退出苏军占领之地区。

四、未经苏军允许进入东北之蒋军部队，已被苏军缴械。苏军统帅部转告朱总司令，苏军不久将撤退，届时中国军队如何进入东北，应由中国自行解决，我们不干涉中国内政。

最后，出自同属共产党阵营的原因，贝鲁罗索夫上校礼貌地补充道："我的上级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不论对总司令个人还是对八路军，均抱深厚之同情。"

午饭后，曾克林向中央汇报了他们进入东北的经过，随后详细描绘了当前东北的情景：社会秩序混乱，依旧由伪警察维持治安。苏军占领了东北的所有大城市，正忙着把重要的机器设备装上火车运往苏联。日本军队遗留下大量的军用物资，特别是大量的武器，没有人接收——曾克林汇报的具体内容，可以从第二天中共中央发给各中央局的通报中得知详细：

各中央局：

我冀东军区十六分区司令曾克林奉令率一千五百人于日寇投降后，向东北前进，曾配合红军打下山海关、兴城、绥中、锦州、北镇等城，于九月六日进入沈阳城，并被红军委曾为沈阳卫戍司令，昨日随红军代表由沈阳飞抵延安。据曾报告东北情况如下：（一）曾克林部队现已发展到二万余人，全为新式装备，从山海关到沈阳各城均驻有曾部。曾率四个连到沈阳一星期，即发展成四千人。并收编保安队万余人。（二）原在东北作（做）苦工我八路军之俘虏一二万人，已组织八路军游击队若干股，并进入长春。（三）国民党员从监狱释出后，甚为活跃，到处成立国民党部。（四）在沈阳及各地堆积之各种轻重武器及资财甚多，无人看管，随便可以拿到。曾克林已看守沈阳各重要工厂及仓库，据说有枪数十万支、大炮数千门及弹药、布匹、粮食无数。武器、资财落于民间者甚多。（五）扩兵极容易，每一号召即有数百人，并有大批伪组织武装均待改编。（六）红军只驻大城市及要道，各小城市及乡村无人管理，秩序很乱，伪组织等待交代或畏罪潜逃，土匪兴起并占领若干小城市。（七）红军不准许八路军及中央军进入满洲，但我们个别同志及我们部队不用八路番号者，都可帮助并委为卫戍司令、市长及其他重要职务。因而得以控制资财及发展武装。但凡打八路军旗子及公开用共产党员名义者，红军概不接洽，亦不给任何帮助。曾克林部因在沈阳挂上八路军臂章，即引起红军干涉，并派代表到延安要求八路军撤退。（八）现在满洲最自由，一切人只要不带武器，不用八路共党番号，即可自由进入满洲，乘火车不要买票。（九）我党在各大城市甚活跃，各地应设法抽调大批干部到东北工作。

中央

申（九月）删（十五日）

事后证明，曾克林关于“轻重武器及资财甚多，无人看管，随便可以拿到”的说法是夸张的，这给后来进入东北的部队造成不小的困难。但曾克林当时的心情可以理解：作为首批到达东北地区的指挥员，他深知此刻任何犹豫都将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他急切地盼望中央速下决心，立即派遣大批干部和部队去东北，使共产党人成为那片黑土地的主人。

晚上，中央政治局彻夜开会，最终形成一个重要决策：舍弃南方所有的根据地，全力抢占东北。这个“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思想，对后来解放战争的战略形态、战役样式和战争进程，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对解读解放战争的历史——自北向南的战役走向——犹如一个重要的索引。会议决定：抽调四分之一以上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分别率领两万干部和十万部队开赴东北。同时，派遣彭真、陈云、伍修权、叶季壮以及报务员段子俊和译电员莫春和，立即跟随苏军飞机飞赴东北，在沈阳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党在东北的一切工作。

会后，刘少奇对贝鲁罗索夫说，我们想派几个人去沈阳与苏军建立联系，希望能搭乘你们的飞机一起走。

贝鲁罗索夫答应了。

九月十六日，苏军的飞机从延安起飞。在山海关落地加油时，飞机冲出了跑道，机头插进一块稻田里，机尾高高地翘起，机舱里的人和物全部倒进前舱。伍修权、莫春和与段子俊受了轻伤，彭真的头部受到撞击，叶季壮受伤最重被抬出飞机，只有陈云奇迹般地毫发无损——他在那一瞬间被撞进最前面的驾驶室，从而使冲击力得到了缓解。在当地八路军部队的协助下，一行人改乘火车继续赶路。九月十八日，他们到达沈阳，随即成立了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局的办公地点选在了张作霖的大帅府。

此刻，关内各解放区部队开始了向东北的急行军。

黄克诚率领的新四军第三师是当时进入东北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早在九月十四日，黄克诚就以个人名义给中共中央发去电报，建议立即派部队去东北“创造根据地”——“我党若没有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就不会有大的胜利。”九月二十三日，第三师接到中央的命令后，四个作战旅和三个特务团共三万五千人立即从苏北淮阴出发北上。黄克诚没有轻信东北到处是武器和物资的说法，不但坚持让官兵把武器都带上，而且还带上了过冬的棉衣。事后证明，他的这个命令具有惊人的预见性。

八路军山东军区部队分别从陆路、海路进入辽东半岛。中央的电令异常坚决：“向东北和冀东进兵和运送干部是目前关系全国大局的战略行动，对我党和中国人民今后的行动，有决定的作用。在目前是时间决定一切，迟延一天即有一天的损失。”毛泽东更是心情急迫：“……务使每日不断，源源北运。山东应出之兵，请分别陆行、海运，下月必须出完，并全部到达辽宁省，那边需用至急，愈快愈好。”山东军区的所有部队昼夜兼程，六万多兵力先后到达东北：滨海支队支队长万毅率领的三千五百人，师长梁兴初率领的第一师七千五百人，师长罗华生率领的第二师七千五百人，鲁中军区政委罗舜初率领的第三师和警备三旅九千人，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五师师长吴克华率领的第五、第六师八千人，渤海军区司令员兼第七师师长杨国夫率领的第七师八千人，渤海军区副政治委员刘其人率领的三个团五千人，以及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萧华分别率领的军区机关与直属部队等约四千人。

从陆路进发的部队，在粮食短缺的情况下，连续徒步急行军，导致不少官兵因伤病而掉队。从海路进发的部队，乘的是临时征来的帆船，在没有任何气象预报和导航设备的情况下，有的船只不幸失踪。

这些来自解放区的官兵大多没有想到，此一去他们将面临异常残酷的战斗；尤其是那些已经有了妻儿的官兵，别离时面对涟涟泪水谁也不曾想到一别竟是数年；而对于那些日后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官兵来讲，此一去便是他们与故土和亲人的永别。这些乡音不同、建制杂乱的共产党官兵，是后来被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最初基础。第四野战军以其巨大的规模、充实的装备、官兵们头顶上的各色狗皮帽子和勇敢强悍的战斗作风以及指挥他们的那个精于战术计算的著名军事将领而闻名于世。

林彪，中国当代史中奇特的人物。仅从单薄的外表上看，他不像一位军事指挥员，更接近一个书生。红军时期，年仅二十五的林彪就已成为共产党红色武装的主力作战部队——红一军团的军团长，与率领红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一起，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承担着冲锋陷阵的角色。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林彪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让他的名字进入中国抗战史的平型关一战，也让他的身体因中弹受到损伤。一九四五年九月，处于休养状态的林彪被任命为山东军区司令员。他在延安登上一架美军飞机，飞机降落在河北的一个简易机场，林彪接着骑马向山东前行。九月二十三日，当他到达河南濮阳的时候，接到了中央让他北上的命令。林彪只好掉头，先骑马到了河北南宫，再换乘汽车到达河北固安，从那里徒步穿越封锁线，于十月中旬到达冀热辽军区司令部。此刻，他的身边没有任何一支部队，他也不知道自己将指挥哪些部队。就在这时，中央命令他迅速前往沈阳的电报到了，这位三十八岁的共产党将领在少数官兵的护送下继续北上。而几乎与此同时，将要成为他的军事对手的另一位将领——国民党军派往东北地区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美国第七舰队代理司令巴贝中将的陪同下，站在美国军舰上的甲板上瞭望渤海岸边的一个登陆点。

杜聿明和林彪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但是这个时年四十一岁的国民党军将领已经先于林彪到达了其军事生涯的顶峰。他指挥的国民

党第五军，在抗日战争中是对日作战最强硬的部队之一，于著名的昆仑关一战中重挫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第十二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被第五军郑洞国指挥的荣誉师第三团击毙。他曾是中国远征军的副司令长官，在缅北的热带丛林中与日军作战并率领部队九死一生的突围经历中国妇幼皆知。一九四五年十月十八日，杜聿明被任命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后，蒋介石当面交代：“你到长春去与苏军接洽，要他们根据中苏条约，掩护我军在东北各港口［旅大、营口、葫芦岛等］登陆，接收领土主权。”几天后，杜聿明与他的随从到达上海，他需要与美军联系自海路运送他的部队去东北。老部下郑洞国在上海机场迎接了他。军装笔挺、马靴闪亮的杜聿明热情地邀请郑洞国一起去东北。而正是因为杜聿明的这个邀请，也正是因为郑洞国没有拒绝，三年后他们都在战争中成为战俘。

接收东北政权的国民政府人员于十月上旬到达东北，其中有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身份是外交特派员。国民党官员到达东北，同样引发了东北民众的爱国热情，各色旗子同样打了出来。蒋经国看见两个东北孩子互相用日语说话，便问：“你是哪国人？”孩子用汉语回答：“我是中国人！”孩子回答时的表情让蒋经国心生感动。但是，接下来，在与苏军接洽时却遇到了麻烦。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对国民党非军职人员不感兴趣，对蒋经国更是态度冷淡。然而，当杜聿明于十月二十八日飞抵长春后，他对这位赫赫有名的中国将领却极其友好。苏军不但表示“欢迎杜将军带领中国军队接收东北的领土主权”，还同意杜聿明的军队在苏军管辖的营口港登陆。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特别向杜聿明强调了中苏之间的友好关系：“我们苏联始终要和中国人民友好的……因为我们早就有了杰出的孙中山和列宁他们两人的友谊。”——对中国国民党人大谈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从这一点便可以看出，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苏联政府官员和军事将领们，对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信仰分歧的了解是多么的含糊不清。

蒋介石在重庆听到这个消息后很兴奋。在接收日本占领区的问题上，作为国民政府首脑他受尽了大国的要挟。美国为了钳制苏联，以达到包办中国各地的受降权、用美械装备控制中国军队的目的，一而再地对国民政府提出各种条件，包括必须由美械装备的部队占领中国北方的大城市，否则美国就不提供运输上的帮助。为了迫使蒋介石答应，美国人甚至把原来允诺交给国民党军的三百多辆坦克，交给了驻扎在印度的英军；而对于战后停在中国云南境内的上千架军用飞机，美国人宁可将其破坏也不让蒋介石染指。蒋介石向美国妥协之后，美国才开始帮助国民党军大规模地运送兵械——这是一幅令所有中国人备受伤害的情景：在国民党军向中国北方开进的时候，毫无例外地处在美军的指挥和监督之下——这哪里是在自己的国土上"光复失地"?

杜聿明乘坐美国军舰到达辽河河口，在巴贝中将的陪同下，换乘小船前往苏军欢迎国民党军登陆的营口港，身后跟随着大批的记者。此时，即使数万共产党军队已经进入东北，但在官方记者的眼里，那支军队并不具备"收复主权"的价值，只有眼前这位将军的上岸才具有一雪国耻的意义。在记者们身后的海面上，二十多艘美国军舰满载着国民党军官兵，他们军装簇新，钢盔闪亮，全部的美式武器装备，嘴里嚼着美国口味的战地口粮。杜聿明的联络官已经上岸，杜聿明和巴贝在摇摇晃晃的小船中等待，记者们也在向营口港张望着。"远远的辽河入口处有一个大炮台，西岸出现了一群人，其中有两个着军装的，也用望远镜向我们看。营口这边有一幢未完成的大建筑，那时有一个中国军人指挥着一群人拆去木料，在搭一个工事。"等待了几个小时之后，联络官终于回来了，带来的消息是："苏军卫戍司令不在，国军无法登陆。"

苏军已经撤走，现在占领这里的是来自山东解放军的吴克华部。

这些远道而来、人数不多、武器简陋的官兵，面对海面上庞大的美国舰队，依旧能从容地拆房子修工事，这让杜聿明和巴贝感到困惑不解和不明底细。于是，巴贝下令军舰掉头。在试图从葫芦岛登陆时，才知那里也被共产党军队占领了。经过侦察，发现秦皇岛只有五百日军和少量伪军——共产党军队曾经攻打过这里，但是没能占领——杜聿明和巴贝决定在秦皇岛登陆。

巴贝对杜聿明说："美国才是中国真正的朋友，你相信了吧？"

蒋介石命令杜聿明的部队立即从山海关进入东北。

杜聿明要求给他十个军。

蒋介石说调动不出十个军，目前可供指挥的只有第十三军和第五十二军。

毛泽东已经从重庆返回延安，他把守住山海关的希望寄托在最早进入东北的李运昌的部队上。但是，李运昌的部队新兵多，武器严重缺乏，平均两名战士才有一支步枪，几门迫击炮仅有几发炮弹，且部队分散在辽西的各个地区，山海关那里只有不到三个团的兵力。李运昌请求增援。在增援部队日夜疾进的时候，国民党军的试探性攻击开始了。

国民党军对共产党军队的数量估计过高，因此攻击颇显迟疑，导致几次攻击都未见成效。就在僵持的时候，李运昌部的防御力量得到了加强：渤海军区司令员杨国夫率领的三个团步行一个月从山东赶到山海关。杨国夫部刚刚达到，立即主动出击，两个营在夜色中冲进国民党军八十九师的阵地。这些从山东解放区来的官兵，十分擅长打游击战，他们在敌人的阵地上四处打枪、投掷手榴弹，然后趁乱抢了一门炮和十几挺机枪。国民党军不知来了多少共军，猛烈地还击，天亮

时才发现，整整一夜八十九师实际上在与国民党军的另一个师混战，混战导致一个团损失惨重，一个连几乎全部伤亡。侥幸逃出战火的连长惊恐地报告说，八路军火力非常强大，他们集中优势炮火把我们的工事在十分钟之内全部摧毁，阵地因此失守。杜聿明听了这个报告有些惊讶，因为他事先得到的情报是："山海关共军武器破烂，没有炮火。"第二天，他亲自率领第十三军军官连同那个连长去了战斗发生地。那个连长一会儿说共军炮击的是这个村庄，一会儿又说是那个村庄。连续走了几个村庄，并没有发现遭受猛烈炮击的痕迹，只有几处手榴弹的弹痕。最后，一个躲在自家墙根下看热闹的老汉，向杜聿明描绘了他所看到的战斗情景：早听说八路打仗刁得狠，日本鬼子的大炮机关枪都打不过他们，这回看见了真八路！不知啥时候摸了过来，把村子围住，你们老总们跑出去，被手榴弹炸死不少，其余的缴了枪。然后一转眼的工夫，八路就没影儿了！杜聿明认定共军根本没有炮，是那个连长在谎报军情，这使他对第十三军的战斗力产生了质疑。第十三军是汤恩伯的部队，抗战时期汤恩伯为保存实力，一向惯用与日军接触听见炮声就撤退的伎俩。第十三军的这种作风不改，东北是谁的还说不定呢。

杜聿明亲自制定了攻击山海关的作战计划。

除了士气之外，共产党军队与当时的国民党军相比，没有别的优势。天气冷了，从山东长途行军而来的杨国夫师的官兵依旧穿着单衣，出发时听说的到处都是可以随便拿的新枪大炮根本没见到影子。而且，这里不是山东解放区，没有百姓往阵地上送食物，伤员也没有人往下抬。十一月十五日凌晨，国民党军两个师开始猛烈攻击，战斗持续到十六日清晨，杨国夫部官兵边打边撤，山海关外围防御阵地相继失守。天亮时分，国民党军的攻击又开始了，打前锋的是四师。美式重炮整整轰击了一个小时，也没看见四师发起冲锋。杜聿明来到前沿督战，四师师长石觉报告说，共军的阻击异常坚决，兄弟们打了半

天都没打下来。杜聿明观察了一会儿，既没发现曾经激战的迹象，也没发现阵地上有什么动静，便严令四师攻击前进。国民党兵冲上去一看，杨国夫部早就撤没影了。十六日下午十六时，担任主攻的第十三军与负责迂回的第五十二军在山海关以东十公里处会合。

杜聿明占领了山海关。

对于国民党军来说，进入东北的大门已经敞开。

毛泽东在延安得知山海关失守的消息后，直接发电报给李运昌，命令他的部队必须在山海关至绥中一线坚守“至少三星期，多则两个月”。李运昌回电如实报告说，他的有限兵力分散，缺少武器弹药，怕是难以完成任务。毛泽东在命令他们不要轻易放弃阵地的同时，命令黄克诚、梁兴初部火速在锦西地区集结，准备阻击北进的国民党军。

但是，杜聿明没有给共产党军队集结的时间。

第十三军和第五十二军连续攻击前进，十八日占领绥中并接近了锦州。

锦州是辽西第一军事重镇，是东北与关内联系的交通枢纽。

这时候，林彪已经达到锦州。

林彪的身边依旧没有可供指挥的部队。十一月十五日他收到毛泽东的电报，毛泽东设想待黄克诚和梁兴初的部队到达后，由林彪或者罗荣桓亲自指挥，对进入东北的国民党军进行反击作战。可是，黄克诚和梁兴初的部队现在哪里？林彪离开锦州前往兴城和锦西，准备事先察看一下战场地形，等待黄克诚和梁兴初的到来。在兴城，林彪遇见撤到这里的杨国夫，部队的情况令他吃惊不小：伤亡很大，极度疲惫，没有棉衣，甚至没有鞋，官兵们得光着脚作战。二十一日，林彪

终于等来了梁兴初率领的山东军区第一师七千多人的部队，他们从山东走到兴城足足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艰苦的长途跋涉令官兵们根本没有立即投入战斗的可能。林彪遂致电延安，告之目前部队不具备作战条件，要有放弃锦州的准备：

……我部队已参加作战者皆极疲惫涣散，战斗力甚弱，武器弹药不足，而未得补充。自总部起，各级缺乏地图，对地理形势常不了解。通讯联络至今混乱未能通畅。地方群众则未发动，土匪甚多，故迂回包围时，无从知道。敌人利用我以上弱点，向我推进。我有一个根本意见，即：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促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及以北二三百公里，让敌人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

林彪发出电报的第二天，兴城、葫芦岛和锦西相继失守。

三天后，杜聿明的部队占领锦州。

从这时起，共产党军队再也没有占领过这一军事要地，直到三年后林彪指挥东北野战军的七十万大军再次对这里实施攻击。——那次攻击成为国共两军大决战的开端。

几天以后，进入东北的黄克诚与林彪见面了。他们商讨的结果是：就目前部队的状况而言，唯一能做的就是避战。寒冬已至，进入东北地区的官兵面临着极大的生存困难。苏军坚持不准共产党军队进入大城市，不准共产党军队接收日军留下的军用物资。没有地方党组织和地方政权的支持，东北民众又对共产党军队缺乏了解，近十万官兵的吃与穿面临着极其严峻的考验。黄克诚直接给毛泽东发电报，把当时部队的处境归结为“七无”：“……部队五十多天行军，极疲劳。自华中及沿途动员，均说坐火车汽车、到东北背好武器等乐观心理。现在处于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之困难情况，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锦州、山海关以西地区土匪极多，少数人不能通行，战场极坏。而敌人已占领锦州，将直达长春。

我提议我军应暂不作战，进行短期休整，恢复疲劳，并以一部主力占中小城市，建立乡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之准备……”

尽管一个月后毛泽东发来了关于在东北建立根据地的电报，但是当时共产党人还没有形成一个能够在东北地区站住脚的切实可行的思路。面对看似唾手可得实际难以占领的大中城市，中央依旧指示“准备坚决消灭蒋顽在沈、长、哈三处的着陆部队，夺取三大城市，其中最有决定意义的是沈阳城。”——共产党人希望将国民党军阻击于东北地区之外。然而，面对国民党军不断地向北推进的强大攻势，无力阻挡的共产党军队只能一退再退。

死上梁山，活闯关东。

在中国人的心中，闯关东是情势逼迫下的铤而走险。

许多年之后，那些在解放战争中幸存下来的老战士，依旧对他们初到东北的那段日子刻骨铭心：那年冬天，冷得真邪乎啊！

##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

《戡乱战史》：

……当日本宣布投降之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即于延安擅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名义，于十二小时内，发布七道作战命令，指示各地匪军，全面暴动。当时奸匪所部奉命后之实际叛乱行动，概要如左：

一、匪林彪、吕正操、张学诗［思］、李运昌、万毅等率匪众约八万人，并纠集韩共军，分由山西、绥远、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等地，齐向东北急窜，以配合俄寇进入中国境内之行动。

二、匪萧克纠集所部约六万人，由晋西北强行接收绥包，窜扰平绥路（北平至归绥）西段。

三、匪聂荣臻纠集所部约八万人，由察哈尔、热河现地出发，强行接收察哈尔，窜据张家口，向平、津进攻；进而配合外蒙军进入内蒙及绥、察、热等地区作战。

四、匪贺龙纠集所部约六万人，由晋西向太原攻击，企图接收山西全境，控制正太（正定至太原）、同蒲（大同至风陵渡）沿线，及汾河流域；进而配合外蒙军，进入内蒙及绥、察、热等地区作战。

五、匪刘伯承纠集所部约十万人，由太行山区强行接收平汉路（北平至汉口）及豫北地区。

六、匪陈毅纠集所部约二十万人，由山东、河北现地出发，强行接收胶济路（胶州至青岛）、津浦路（天津至蒲口），及陇海路（连云港至天水）东段两淮区，与江南苏、浙、皖边区，伺机袭取京、沪重要城市。

七、匪李先念纠集所部约六万人，由大别山挺进豫、鄂、皖，控制江汉地区，袭取津浦、平汉南段间之广大地域。

八、匪王震纠集所部约五万人，由九岭山地挺进湘、赣，强行接收两湖及赣北地区。

九、所有沿北宁路（北平至沈阳）、平绥路、平汉路、同蒲路、沧石路（沧州至石家庄）、正太路（正定至太原）、白晋路（白圭至晋城）、道清路（道口至清化）、津浦路、陇海路、粤汉路（武昌至广州）、沪宁路（上海至南京）、京芜路（南京至芜湖）、沪杭路（上海至杭州）、广九路（广州至九龙）、潮汕路（潮州至汕头）等铁路，及其他交通要道两侧之匪军或匪谍，积极进攻，或破坏、阻挠国军之运输。

十、匪另由苏北、山东、华北及晋绥一带抽调大批各级徒手匪干，从各方面偷运东北，准备利用东北人力，及俄寇所缴日本关东军武器，扩编新军。

在这段国民党军战史里，最频繁使用的一个词是“匪”。

日本投降后，中国境内共有一百三十万日军和六十八万伪军等待受降。问题是：谁是有权接受投降的“中方”？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草拟了一份中方受降人员名单，由蒋介石侍从室一处主任林蔚和二处主任陈布雷呈送审阅。蒋介石看到名单上有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字时，用红笔划去了。林蔚和陈布雷小心地解释说，如果这份名单上一个中共代表也没有，恐怕无法向国内外舆论交代。蒋介石坚持说：“让朱德待命好了。”陈布雷事后忧虑道：“先生连这点气量都没有，结果必然会弄巧成拙……”

蒋介石公布了他的中国战区受降代表名单：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接收洛阳；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接收山西；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接收嘉兴、金华、杭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接收郑州、开封、新乡、南阳、襄阳、樊城；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接收武汉、沙市、宜昌地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接收曲江、潮汕；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接收南昌、九江；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接收徐州、安庆、蚌埠、海州；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接收天津、北平、保定、石家庄；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接收青岛、济南、德州；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接收察哈尔、热河、绥远；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接收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接收广州、香港、雷州半岛、海南岛；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接收南京、上海；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接收长沙、衡阳；台湾受降长官为陈仪。

不允许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接受日军投降，但是那些在战争中投靠日军的伪政府人员和伪军将领，倒被蒋介石列入了受降的中方人员名单：伪行政院副院长周佛海被委任为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伪海军部部长任援道被委任为南京先遣军司令，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门致中被委任为北平绥靖司令。同时，蒋介石还把几十万伪军收编为国军，那些昨天还跟随日军与中国军队作战的伪军“军长”们，一夜之间便换了军服成为国军军长。更奇怪的是，华北和华东地区的日军，除被共产党武装缴械者外，二十六万日军反而开始“收复失地”——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命令是：“如果各地为股匪占领，日军应负责任，并由日军将其收回。”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解释是：“中国的对日抗战是结束了，但今后难题尚多，主要的就是剿共问题。这是中国的心腹之患。我既受到天皇的命令投降了中国，我就应该忠实地找机会为中国政府效劳。现在我们驻在中国的完整部队还有一百几十万人，装备都是齐全的，趁现在尚未实行遣散，用来打共产党当能发挥一定的力量。这是替中国着想。”

美国总统杜鲁门说：“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美国政府动用了六亿美元，将位于中国西南和西北的国民党军运送到华北、华中以及东北地区，其运送总兵力达到十四个军三十多万人。美国还直接派遣武装力量，抢先占领了中国北方的重要交通要地。后来出任美国总统特使来到中国的马歇尔将军说：“美国政府作为它和中国政府的战争合作的继续，并本着《波茨坦宣言》的精神，正在并将继续协助中国政府解除在华日军的武装和把他们遣返，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华的目的正在于此。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下达驻华美军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指令规定，美国武装部队在华占领的各地只许移交给中国之国民政府，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使命是和这项指令相关联的。”——一个来到中国承担运兵任务的美军士兵道出了历史的真相：“我们应该有勇气说真话，我们正帮助国民党军队进行其反对共产党的战争。”

国共军事冲突已经不可避免。

国民党军大军向北，主要依靠平绥、同蒲、平汉和津浦四条铁路。

位于中国中东部的津浦线，是一条从天津到与南京一江之隔的浦口的铁路，由于铁路穿越山东和华中解放区，而且能够直接威胁南京，因此成为蒋介石的心腹之患。为了打通津浦路，分割解放区，国民党军在这个方向上投入了强大的兵力。驻守浙赣边的顾祝同部、驻守皖北的李品仙部、驻守豫皖边的李延年部、驻守鄂北的冯治安部等，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分别向宁、沪、杭地域和津浦线上的浦口、徐州段推进，以期占领徐州，并以徐州为基地控制整个津浦铁路。其先头部队李延年部的第十二军、第九十六军和由伪军收编来的吴化文的第五路军进占临城（今薛城）、藤县、兖州后，直趋济南。

此时，共产党将领陈毅已经来到微山湖东岸。

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将陈毅派往华中，因为他曾在那里当过新四军军长。陈毅从延安飞赴晋东南的黎城，然后一路跋涉到达河南濮阳。在这里，他接到中央九月二十三日发出的命令："取捷径直到山东"，接替即将开赴东北的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的工作。陈毅时而步行时而骑骡，于十月初在临城与沙沟之间穿越了津浦铁路。这条贯穿南北的铁路线运输繁忙，向北开去的全是运兵的军列。陈毅对鲁南军区的干部说：不惜一切代价，把铁路彻底拆了！

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破坏交通阻止国民党军向解放区伸进给华中等分局并各区党委的指示》：

……敌人不肯向我军投降，顽军利用敌人和伪军反我，很快向我解放区伸进。各解放区除开集结部队在适当位置，准备打击前进之顽军外，必须切实破坏交通。凡被我包围之铁路及重要公路、电线等，必须彻底破坏。铁轨、枕木搬走，毁坏或掩藏，桥梁炸毁。应组织一切部队和民兵很有准备的去进行，并可联系铁路工人去进行，以便阻止敌、伪、顽军的行动，便利我军的行动……

陈毅到达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

此时，北进的国民党军已经进入解放区，随着山东军区的部队开赴东北，陈毅能够指挥的兵力严重不足——"截至今晚止（十月二十三日），我们手中只集中山东八师三个团，新四军九旅三个团，湖西一个地方团［六百人］，新四军五旅两个团要有日（二十五日）才能赶到。山东二师本日开到我们附近，又奉罗（罗荣桓）令东开。三师因开东北而东撤。新四军二旅王必成部及十九旅谭希林部，本日从淮南、苏中动身，最快也得十一月十日左右才能赶到。顽敌利用我军来去未能接替的空隙，正陆续取道徐州北上。"

尽管兵力不足，也必须直接攻击津浦铁路沿线的要点，以阻止国民党军北进。第一个目标就是邹县。上万军民先把县城南北两边的铁路拆了四十多公里，然后开始攻击邹县县城。县城里驻扎着日军的一

个中队和伪军的一个团，担任主攻的山东军区八师二十二团一营经过四次爆破，首先攻入东门。伪军没做过多的抵抗跑了，但是据守在碉堡里的日军十分顽固，以至于这座碉堡最终被炸的时候，三十多名日军全部葬身火海。与此同时，鲁中军区部队也对大汶口的伪四师展开了攻击。攻击中，三师七团一连七班副班长李安仁第一个冲进突破口，这个杀气腾腾的战士在昏暗的夜色中用刺刀连续刺倒了十五个阻挡他的对手，这使伪军的士气受到重挫。天亮时，大汶口被攻破，鲁中军区三师控制了一小段津浦铁路。

但是，对于国民党正规军的攻击艰难而残酷。

山东军区八师奉命阻击由徐州进抵临城的国民党军。在临城与夏镇之间一个叫柏山的据点，攻击持续了整整一个夜晚，虽然连续组织爆破，但由于敌人的碉堡十分坚固、火力异常凶猛而未能攻破。天快亮的时候，一个曾经当过和尚的名叫陈金合的班长站了出来。陈金合五岁跟着母亲乞讨度日，十岁给地主放牛和干杂活，终因不堪压榨跑进一座寺庙。他认为庙门里应该是一个公平的世界，可不久就因无法忍受方丈的凌辱而逃离。十八岁那年，提着个铁锤到处流浪打铁的他遇到了八路军，昔日的小和尚很快成为作战凶猛的战士，曾因身陷重围照样大量歼敌而立过战功，也曾因勇敢地近敌爆破而成为山东军区的英模代表。在部队攻击受阻时，陈金合知道该是他这个党员站出来的时候了。他提着四颗手榴弹摸上去，但围着碉堡转了一圈，也没找到安放手榴弹的合适位置。回来后，他向营长要了全营剩下的最后一颗手雷，在机枪的掩护下再次上去了。他把手榴弹和手雷捆在一起，放在碉堡唯一的一个小铁门下面，然后跑回来拉动了引爆的绳索。过了好一会儿，也没见有动静，原来绳索被敌人的机枪打断了。天大亮了，敌人碉堡里的火力越来越猛，团部的命令传了过来："敌人的增援部队正在靠近，五分钟之内不能攻占柏山，就得立即撤出战场！"陈金合要求再上去一次。由于天色已明，碉堡里的火力都射向了他，他在

弹雨中滚来滚去，战友们不知他是否中弹，只看见他终于再次接近了碉堡。上次安放的手榴弹和手雷还在那里，陈金合爬过去，但没有连接引爆的绳索，他觉得如果绳索再被敌人打断，一切就都来不及了。他朝天色明亮起来的远处看了一眼，然后低下头，用肩膀把捆在一起的手榴弹和手雷顶在小铁门上，直接拉响了引爆的拉弦。

这是解放战争爆发前夕第一位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士兵。

陈金合粉身碎骨的场面让他的战友们悲愤难忍。

陈毅同样是难耐悲情，他在参战部队团以上干部动员会上高声喊道:“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谁敢来摘果，把枪缴下来！”

到十一月下旬，山东军区部队控制了津浦线一百四十公里的地段以及临枣线二十公里的地段。

自津浦路上的临城沿着运河向南，便是共产党领导的华中军区的作战区域。这一区域紧邻国民党统治区的腹地，因此在重庆谈判中，共产党方面主动提出将华中解放区内的新四军北撤。当然，新四军北撤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补充山东军区部队开往东北后留下的空白。一九四五年九月至十月间，新四军各部队开始北撤的时候，遭到国民党军队的猛烈阻截。蒋介石深知共产党武装一旦在北方集结，将给国民党统一全国带来严重的后果。由苏浙军区副司令员叶飞率领的新四军一部的北移历尽艰辛，部队从金华地区出发后，于杭州湾陷于国民党军的包围，突出重围令这支部队付出伤亡二百一十三人的代价。接着，部队于深夜北渡长江时，租用的商轮不幸沉没，包括新四军第四纵队政委韦一平在内的八百多名官兵沉入江底。

此时，苏浙军区司令员粟裕正赶往淮安。

淮安和淮阴两城相隔十五公里，合称“两淮”。这里“阻淮凭海，控制山东”，为“南北咽喉，江浙要冲”，是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在淮安，粟裕以对未来战争走向的惊人预见，依据“进行大兵团作战”的需要，按照中央“必须首先在华中组织一个强大的野战军”的指示，把编制凌乱的部队组建为指挥统一的华中野战军。华中野战军下辖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共四个纵队，司令员粟裕，政治委员谭震林。但是，华中野战军的兵力状况令粟裕寝食不安：能够机动作战的部队只有近四万人，骨干只有第六纵队司令员王必成和第八纵队司令员陶勇率领的六个团，加上地方部队也不过六万人。而这时国民党军已经基本完成调动，于南线对华中解放区形成了分割之势，于北线阻隔着山东解放区与华中解放区的协同。

大战在即。

粟裕认为必须攻克并控制高邮、邵伯、泰州一线，以打破国民党军“沿运河北进分割华中解放区的企图”。这是一个军情混乱的时刻，陈毅的部队正在北面的津浦路作战，粟裕接到的指令多次变更：先是命令他率部悉数北进以配合陈毅部；当部队开始移动时，中央又命令他不要在重要的交通线上采取军事行动，因为重庆那边已经准备签署《双十协定》；待高邮邵伯战役就要发起时，命令他们返回津浦路方向的电报又到了。粟裕焦急万分，因为高邮之战，势在必打，“速战而胜，既利当前，又利长远，若失战机，后患无穷”。粟裕给中央发去一封长达千字的电报，力陈目前国民党军重兵集结于徐州、蚌埠地区，除警戒封锁此间的铁路线外，必会“利用淮北平原发挥其优势兵器”向两淮推进。如此一来，“不仅华中将被分割与孤立”，“华中对山东之配合亦将大减其效能”。而一旦夺取高邮、邵伯，就可解除国民党军“分割华中之威胁”。同时，淮北平原若在我军手中，将便于“大兵团机动”，迫使国民党军在华中与山东两个解放区之间的“起伏地及半河川地区作战”，令我军能够在运动战中大量歼敌。最后时刻，高邮邵伯战

役计划被批准了。但是，新四军军部还是要求第六纵队待机协同津浦路作战。粟裕可以指挥的只有第七、第八两个纵队。

时年三十八岁的粟裕是个性格独特的共产党将领。这个参加过著名的南昌起义的湖南人，自跟随朱德和毛泽东开始其革命生涯后，以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留名于中国革命战争史册。在决定国共两党命运的战争中，粟裕曾数次直言要求中央改变对他的军事指令，并且对自己的见解执意坚持。令人惊讶的是，历史也数次证明，不但他的分析是正确的，而且他所坚持的战略意图对共产党人赢得战场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曾这样问粟裕：“你是少数民族吧？是不是苗族人？”不知毛泽东的疑惑是否与粟裕倔强的性格有关。粟裕告诉毛泽东自己是汉族人。一九八六年，粟裕去世九年之后，经过有关部门深入调查，最终确定粟裕为侗族——生活在湖南会同县的粟姓是那片荒凉山地间的一族贫寒山民。

邵伯位于高邮至扬州之间，是运河走廊上的一个军事要点。粟裕把指挥部设在距邵伯几里路的一个小村庄里，指挥第七纵队对驻守邵伯的日伪军发起进攻。部队从三面包围，留出一面缺口，诱使日军突围，突围的日军竟然从粟裕指挥部的门口混乱地夺路而逃。当他们逃窜到一片开阔地的时候，围歼的命令下达了，这股日伪军两千多人很快被全歼。几天之后，粟裕下令对高邮发起攻击。

高邮是封锁运河通道的要地，由于地理位置具有战略意义，当年占领这里的日军把城防工事修筑得十分坚固，高九米、厚七米的城墙上分布着几十个碉堡火力点。城里的日军是独立第九十混成旅团六二六大队和一个炮兵中队，伪军是已经被收编为国民党军的孙良诚部的两个师。华中野战军官兵一边挖接近城墙的交通壕，修筑几乎和城墙一样高的机枪阵地，一边向城内喊话展开政治攻势，官兵们用弓箭把劝降信射进城去，甚至还制作了一个巨大的风筝向城内撒传单。但是

守敌依旧顽固，因为他们接到了上级“固守待援”的命令——从扬州方向增援而来的国民党军和一个团的日军已经出发。高邮城内的日军拒绝向共产党军队投降；而伪军更是嚣张，他们把被共产党军队释放回去劝降的军官的脑袋砍下来，挂在了城墙上。粟裕的攻击命令下达后，各个方向的部队开始奋力攻城，官兵们冒着弹雨登着吱呀作响的云梯往上爬。经过混乱的城墙搏斗之后，城南和城西都出现了突破口。登上城墙的突击队员誓死不退，与日军进行着反复的肉搏战；攻入城内的部队逐街逐屋地与顽敌激战。当惨烈的巷战接近尾声的时候，高邮城内日军最高指挥官岩奇大佐终于表示愿意向共产党军队投降。这位年近五十的大佐在与第八纵队政治部主任韩念龙见面时说他只能把重武器和所有的军需物资交给共产党军队，而他本人则必须率领全体官兵携带轻武器去南京投降。韩念龙回答岩奇大佐：“你们只有无条件投降一条路，全体日本官兵将按照俘虏处理。不然，再接着打！”

就在陈毅和粟裕在津浦路北南两面阻击国民党军北进的时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晋绥野战军司令员贺龙接到了阻击沿平绥路进攻的国民党军的命令：

……必须立即组织察绥战役，消灭傅作义部，解放绥远，收复归绥，夺取雁北十三县。为完成这一战役计划，晋察冀军区须立即集结二万五千以上兵力，除一部巩固张家口守备外，余须集结休整，充分动员。如傅作义向张家口前进，应坚决消灭该顽于张家口附近；如傅顽军暂不立即向张垣进攻，亦须准备于十天后协同晋绥军区转向傅顽进攻，夺取绥远、雁北全部……

日本投降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先于国民党军到达张家口，并从日伪军手中接管了这一地区。国民政府随即给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发出“备忘录”，指出因为日方的“失职”才导致张家口被“不明番号之股匪占领”。在蒋介石的责问和严令下，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傅作义的部队自归绥（呼和浩特）大举东进，接连占领武川、卓资山、清水河、集宁、兴和、尚义以及绥东、绥南的广大地区。傅作义的进攻意

图是：夺取张家口，控制平绥路，配合国民党中央军占领华北，进而夺取东北。

十月十一日，中央再次电令：“时机紧迫，绥远战役准备须迅速完成，最好在二十号以前开始行动。”此时，晋察冀部队急缺武器与棉衣，如留下一部分部队保卫张家口，能够机动作战的兵力十分有限，故认为十月下旬才能发动战役。但是，国民党军第一战区胡宗南的部队正沿同蒲路北进平津；第十一战区孙连仲的部队已经到达新乡，开始沿平汉路北进；第九十二、第九十四军已分别被空运至北平和天津。因此，中央要求尽快发动旨在“占领绥远全省”的战役，同时还要速战速决，以腾出兵力阻击胡宗南与孙连仲正在北进的十个军。毛泽东亲自致电聂荣臻：“平绥战役关系大局，望坚决执行。”

十八日，战斗在张家口的东面打响。傅作义兵力分散，为避免被各个击破，边打边退回归绥大本营。当傅作义的部队西撤时，留守集宁的一〇一师成为孤军，聂荣臻决心尽晋察冀部队全力歼灭该敌。尽管采取了迂回包围的战术，但敌我兵力火力极度悬殊，加之后续部队动作缓慢，一〇一师还是脱离了战场。此时，在归绥以东的卓资山，贺龙指挥的晋绥野战军对国民党军第六十七军军部和新编二十六师形成了包围之势。卓资山是平绥路上的军事要点，归绥以东的天然屏障。晋绥野战军三五八旅负责主攻，旅长黄新廷和政委余秋里亲自动员，官兵作战勇猛坚决，战斗从头一天黄昏一直打到第二天上午，第六十七军军长何文鼎还是率部突围而出撤离了战场。

聂荣臻和贺龙都感到，虽然完成了对归绥的包围，但傅作义大军避战必有名堂。果然，傅作义没有固守归绥，在修筑坚固防御工事的同时，不断主动出兵攻击晋察冀围城部队。十一月中旬，一个重炮团被空运至归绥，加上傅作义原有的六个师，归绥守军兵力已达两万四千多人。据此，聂荣臻致电中央，提出晋绥野战军全力进攻包头，晋

察冀部队继续围困归绥。待包头被攻下后，晋绥野战军东移，与晋察冀部队继续合围归绥。这样，归绥守敌将“更陷孤立”。但也须预见到，不到万不得已，傅作义必坚守归绥，“围攻归绥之战役，将转为持久”。中央复电表示：晋绥野战军既攻包头，就不能打援，而围归绥“短期内不会获得结果”，长期僵持“似非上策”，因此希望晋察冀和晋绥部队主力“一同西进”，这样既可有较大把握打下包头，又能有力地打击增援之敌。然而，在对包头的攻击中，缺乏攻坚作战能力的晋绥部队遭遇顽强阻击。四个营曾一度冲入包头城内，但终因敌我悬殊、弹药耗尽而撤出，部队伤亡数百人。十二月二日夜，晋绥部队再次以持续的冲锋猛攻包头，依旧没能打下这座防守坚固的城池。严冬已至，塞外极度寒冷，弹药、棉衣和粮食等各种供给十分困难，大量的伤员得不到及时救治，晋绥野战军司令员贺龙和副政治委员李井泉被迫决定撤离战场。至十四日，参加绥远战役的晋察冀和晋绥各部队先后撤离了包头与归绥。

北平至汉口——平汉路是贯穿中国南北的大动脉。

沿平汉路北进的，是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所属的第三十、第四十军和新编第八军，其中由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兼第四十军军长）和高树勋（兼新八军军长）率领的先头部队，已经越过河南新乡，计划用十天左右的时间到达石家庄，与已经占领那里的胡宗南部的第三军和第十六军会合，然后直趋北平和天津。来自国民党军国防部的命令是：“接受冀省，击破奸匪囊括华北企图之目的，使三十军及新八军等部，自丰乐镇强渡漳河，沿平汉路向北推进，击溃当面之逃匪后，迅速进出于保定、石家庄附近地区。”

在平汉路上阻击国民党军的共产党将领是刘伯承和邓小平。

还在刘伯承和邓小平指挥上党战役的时候，中央就要求晋冀鲁豫部队“必须以一切办法，阻碍孙连仲部在两个月以内不能进入平津”。

由于抽不出机动部队，只有命令当地的部队先行作战。在太行军区司令员秦基伟的指挥下，兵力单薄的部队攻击了平汉路上的邢台。向守志指挥的主攻部队十团勇猛作战，三营九连九班的十二名战士头顶湿棉袄，在猛烈火力的掩护下，将一百多公斤炸药送到了城墙下。由于他们第一次使用这种TNT炸药，不了解其爆炸威力，结果在引爆的时候没能撤到安全距离之外，十二名战士连同邢台北面的城楼一起被炸成了碎片。攻下邢台县城后，戏院为官兵免费演出三天，澡堂也优待官兵洗热水澡，付出巨大牺牲的官兵们初尝进城的快乐。接着，他们又攻占了邯郸，缴获大批物资。就在这时候，刚刚打完上党战役的晋冀鲁豫主力部队到达了战场。

沿着平汉路北进的国民党军先头部队的三个军矛盾严重。第三十军是战区长官孙连仲的基本部队，因孙连仲投靠蒋介石已基本嫡系化，而属于老西北军派系的第四十军和新八军仍属杂牌部队。其中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因长期受中央军和孙连仲的排挤，对蒋介石严重不满，部队还没从新乡北进，就派人与共产党方面联系，表示了不愿意打内战的态度。然而，老西北军部队普遍作战能力较强，火力也充足。相比而言，晋冀鲁豫部队无论兵力还是武器都处于劣势。

战场被选在了滏阳河以南、漳河以北多沙的河套里。

十月十四日，国民党军沿着平汉铁路向石家庄推进。由于没有遇到有力的阻击，其推进速度很快，先头部队于二十日渡过漳河并开始架桥。战区长官司令部的指示是：“两天到安阳，五天下邯郸，十天打到石家庄。”此时，晋冀鲁豫主力部队只有一纵到达了战场。刘伯承和邓小平立即命令一纵坚决阻击敌人，以保障其他主力部队顺利集结。当面的国民党军不但装备精良，且兵力是一纵的三倍以上。一纵奋力节节阻击，最后退守到崔曲一线。这一带村庄稠密，到处是杨树、枣树和桃树，距平汉路上的重镇邯郸仅十几里。退到这里，一纵就没退

路了。二十五日，国民党军第四十军一〇六师向一纵的防御阵地发动了更加猛烈的攻击。一〇六师装备精良，作战凶悍，师长李振清外号“李铁头”，打起仗来亲自带着两挺机枪督战。不间断的攻击持续了一整天，一纵各团阵地相继出现危机。傍晚六时，一纵四团与七团的接合部被撕开，导致七团的主阵地崔曲村失守。

二十七日，晋冀鲁豫主力部队相继赶到，并随即发起了反击，最终迫使敌人转攻为守，并对其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二十八日，刘伯承下达总攻命令：第一、第二纵队和冀南、冀鲁豫军区部队以及太行军区的两个支队为北集团，由陈再道、宋任穷、王宏坤指挥，重点攻击国民党军第四十军，特别要打击突出的一〇六师；第三纵队和十七师以及太行军区的另两个支队为南集团，由陈锡联指挥，钳制国民党军第三十军，隔断其与新八军的联系，协助北集团歼灭第四十军；对高树勋的新八军则围而不打，静观其变。

攻击一〇六师的任务还是给了一纵，地点还是在一纵丢失的崔曲村。这个有着两百多户人家的村庄，四周已被两米多高的土围子围起，一〇六师不但修筑了交错的交通壕、地堡和射击掩体，而且还开辟了火箭筒等重火器射击阵地。由于交过手，一〇六师认为武器破旧的八路军不敢再强行攻击，但是，夜幕刚刚降临一纵的攻击就开始了。这是国民党军从没有见过的攻坚战法：第一波是身上挂满手榴弹的两百多人的投弹队，边冲击边投掷，战场上一时间弹如雨下。投弹队的后面紧跟着梯子队，冲到围墙下前仆后继冒死攀登。三个小时后，一纵攻进崔曲村，与国民党守军展开了残酷的白刃战。刺刀、枪托的格斗声持续一整夜，双方的伤亡都十分惨重。最后在一〇六师师部里双方开始了肉搏战，师长李振清在卫兵的掩护下夺路而逃。天亮的时候，赶来增援的第四十军三十九师到达崔曲村附近。一纵三旅二十团奉命阻击。团长王大顺、政委胡华居带领官兵与增援之敌展开了

拉锯战。战斗中一营一连的阵地上除一名负伤的副排长外，全连其余官兵全部阵亡。团长王大顺和参谋长慕斌也相继牺牲。

崔曲村一战，一纵官兵以巨大的代价在国民党军的防御阵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就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一个突发事件令战局陡然逆转：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起义。

新八军的起义，动摇了平汉线上国民党军的军心，令国民党军的整体防线敞开了缺口，马法五遂决定渡漳河南撤。第三十、第四十军受命交替掩护逐次撤退。然而，就在他们开始移动的时候，晋冀鲁豫一纵和三纵多路出击实施侧翼包围，二纵和冀南军区部队则在后面紧紧追击，太行军区与冀鲁豫军区部队前出漳河以北进行阻截。马法五知道他的部队已处于绝境之中，更让他心惊胆战的是漫山遍野的民兵，这些跟随共产党军队作战的庄稼汉端着土造的火枪，或是从自家场院里抄起的一把锄头，成群结队地聚集在他们熟悉的乡村要道上，不断地袭击惊慌失措逃跑的国民党军队。最后，马法五率领的两万余人被分散包围在几个村落里。

刘伯承、邓小平命令一纵、二纵、三纵集中攻击马法五长官部所在的前旗杆樟村，攻击第三十军军部和三十师、六十七师主力所在的东、西玉槽村。西玉槽村守敌为六十七师师部和一九九、二〇〇团。六十七师撤退到该村后，砍伐树木设置鹿砦和障碍，同时在每一个街口都修筑了地堡，村里所有的民房全被相互挖通，每一座房顶上都布置了射击掩体。三纵八旅从村西发动进攻，占领村西沙丘高地之后，守敌退至村内。三连连长靳小瑞率部拼死冲击，控制了村西的一部分围墙，但守敌随即发动了坚决的反击。八旅二十二团在二十三团的掩护下，在村边沙丘上与守敌展开了殊死的搏斗。一营和三营营长相继负伤，九连连续换了三次连长，最后九连和七连的排干部全部阵亡。

战斗进行到这时候，对前旗杆樟村的攻击成为关键。一纵三旅十六团的四个连突入村内，虽然没有后续部队跟上，但是官兵们浴血搏战，誓死不退。国民党守军用炮把他们占据的房屋炸飞，然后用火箭炮平射，最后再用大量兵力进行突击，但幸存的共产党官兵依旧在抗击。村庄的四面都发生着激烈的战斗，七团三营在付出巨大伤亡后，冲到马法五长官部所在的一座小庙前。已经打红了眼的官兵组成了敢死队。七连指导员石玉昌冲在最前面，国民党守军用机枪、手榴弹抵抗，用木棍、铁锨、砖头和瓦块向下砸，小庙的围墙上一时间血肉横飞。石玉昌被砸伤，从梯子上掉下来，挣扎着再次爬上去。此时，十团从另一个方向突了进来。小庙被突破后，唯独不见马法五。各部队官兵、民兵以及众多的百姓在方圆十里内展开了严密搜查，最后，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被一纵三旅二团警卫连俘获。

此役，共产党方面称为“邯郸战役”，国民党战史称为“漳河战斗”。

战后，国民党方面公布的损失数字是：伤亡七千六百二十一人，失踪一万三千九百六十八人，被俘九百二十三人，其中二十七师七十九团“全团殉职”。

在总结惨痛教训的时候，国民党军把此役失败归结于三：一是战斗在“匪化区域”进行，百姓不但严密封锁消息，还不断把国军的动向向共军报告。二是战场村落“星罗棋布”，在“匪情不明”的情况下，又“无坚固工事可资凭借”。三是“兵团指挥官高逆树勋叛变”，从而“使战局急转直下，陷全军于危境”。而蒋介石本人感触更深，这次失败一是由于“高级将领指挥的错误和注意的疏忽”，没有记住“土匪的惯伎，在于抄袭侧后”；二是由于高级将领与中下级干部“精神意志不能贯通，以致临时一部哗变”，“整个军心就为之瓦解”。

这是国共两党签订《双十协定》后混乱而微妙的时期。

毛泽东认为，军事冲突不可避免，因为蒋介石要消灭我们的“主意老早定了”，只是他发动全面内战的条件还不成熟，所以“不能把目前这种大规模的军事斗争误认为内战阶段已经到来”，而只要我们“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到团结之目的”的方针，和平是可以实现的。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和平建设过渡阶段的形势和任务”的电文，对与国民党达成妥协从而赢得和平的前景充满信心：“只要战胜于大量歼灭向华北、东北进攻的顽军，争取我党我军在华北、东北的有利地位，迫使顽方不得不承认此种地位，然后两党妥协下来，转到和平发展时期，这是完全必要与完全可能的。”

与此同时，国民党召开了军事委员会会议，制定出向解放区全面进攻的计划。蒋介石特别要求对共产党人“必须除恶务尽”：“我们革命军依照主义的领导，前进一步，奸匪的破坏，也必跟着凶狠一步，奸匪是要从四面八方想尽种种的办法，来威胁我们，困扰我们的！……我们回想这二十年来，奸匪始终是本党唯一的敌人。从民国十四年到现在，他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和本党纠缠鏖战，诚然是很凶顽的，很健斗；但他一切行动的结果，竟无意之间帮助了我革命彻底的成功……革命是必须经过痛苦的，革命的过程愈痛苦，则其成功愈彻底，愈伟大！希望大家认识这个道理，以抗战时代的决心，来完成剿匪的任务……”

所有的事实都表明，尽管《双十协定》墨迹犹新，毛泽东所说的“两党妥协下来，转到和平发展时期”显然是过于乐观了。随着国民党军精锐部队对中国北方各解放区的逐渐蚕食，被共产党人称为“解放战争过渡时期”的万分艰苦的日子来临了。

## “活着的最伟大的美国人”

在军乐队演奏的《星条旗之歌》和《向总司令致敬》的旋律中，他接受了杜鲁门总统颁发的一枚特殊功勋橡叶勋章——服役四十二年的美国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退役了。

杜鲁门总统由衷地表示：“将军，您已经为国家做了这么多的事，我绝不打扰您的退休生活。”

第二天，退役的五星上将回到弗吉尼亚州的里斯堡老家，他在那里有一处名叫多多纳的宁静的庄园。“终于回家了。”夫人凯瑟琳的感叹声未落，电话铃响了。

电话是杜鲁门总统打来的：“将军，您愿意代表我去一趟中国吗？”

一九四五年末，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在《双十协定》签订后，依旧爆发了相当规模的军事冲突，这让美国人深感不安。不安的加剧来自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报告称如果美国需要国民党统一中国，就要在现有基础上大大加强驻华美军的数量，因为国民党军队远远不能控制华北和东北地区。赫尔利的报告在美国政界引起轩然大波。美国军方认为：必须显示出对国民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如果美军撤出，中国的华北和东北都将被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占领，这不仅直接损害了国民政府的利益，也将损害美国未来的在华利益。况且，遣返日军战俘仅靠中国自身的力量无法完成。但是，美国国务院认为：国民政府在这个国家已经失去民心，共产党武装虽然装备简陋但深得民心，美国应该避免卷入中国可能发生的内战。在通往中国北方的各条铁路线附近相继爆发军事冲突以后，赫尔利终于意识到，美国在国共两党之间的调解失败，源于他对国民党的一味袒护，白宫很可能要就对华政策和人事安排作出调整，与其被撤职不如自己辞职。当赫尔利向杜鲁门总统流露此意时，杜鲁门表示政府依旧支持他，希望他尽快回到中国去。总统的保证让赫尔利终于放心了。

但是国会议员们却对他提出了严厉指责，认为正是他全盘支持蒋介石的立场，把中国的战后形势搞糟了——帮助国民党在尽可能广大的地区确立政权，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给予国民党大规模援助，这一切都助长了国民党以武力消灭共产党的气焰。即使美国人的本意，是想让共产党向国民党屈服，以达成政治协商，但实际上国民党重兵在握内战已经无法避免。赫尔利突然想到：关于美国的对华政策，包括他给总统的报告，都是极端机密的文件，现在闹得满城风雨，如果不是国务院有人出卖了他还能是什么？恼怒之下，赫尔利发表了一个措辞强硬的演说，说他别无选择只能立即辞职，理由是美国的对华政策被国务院里的一帮亲共家伙左右着。消息传来，杜鲁门对赫尔利的出尔反尔难以置信，他感到是重新考虑一个更适合的人选的时候了。

此时，杜鲁门的对华政策仍然处为难之中：

中国的共产主义问题和其他地方的政治问题有很大的区别。蒋介石面临的不是一个分散在全国人民中的富有斗争性的政治上的少数派，而是面临着一个控制了一部分土地和大约四分之一人口的敌对的政府。我们在中国的处境很少有选择的余地。我们不能对这种局势简单地不加过问。在中国还有近三百万的日本人，其中约有一百万以上是军队。除非我们确知这股力量是被消灭了，否则，即使日本人被打败了，他们仍可以靠他们在争夺统治权中举足轻重的力量而控制住中国。另一个办法也是同样行不通的。这个办法就是，为了击败共产党人，把日本人从大陆上驱逐出去，并用实力迫使俄国人从东北撤退，美国人民是永不会赞成这样一种计划的。因此，我们断然认为，摆在我们面前唯一的行动途径，就是用一切办法在中国帮助维护和平，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一定限度内在军事上支持蒋委员长。但是我们不能卷入中国的这场阋墙之争。

国务卿贝尔纳斯的看法很简单：国民政府必须容纳目前已具备完善组织的其他政党，在这一点上必须迫使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相互妥协。要让蒋介石知道，他要是不这样做，美国就会停止对国民政府的一切援助。同时也要让毛泽东知道，如果共产党不肯作出让步，美国就将全力支持国民党，包括按照国民党的需要把大量的军队运往中国北方，这对共产党显然没有任何好处。而能够得到美国朝野一致认同的对华政策是：美国不希望中国内战，也不希望卷入中国内战，

应该努力把中国纳入民主政体的建国轨道，建立一个由国民党主政的、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这在战略上还可以“节制或遏制苏联在远东的影响”。其实，“美国的决策人……根本不愿意正视中国的实际情况。”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写道，“他们一味以为，只要整天念叨‘自由’和‘民主’之类的词句［再加上投入大量金钱］，就可以像变戏法那样变出一个像俄亥俄州或者像新英格兰那样的政权。”内阁会议的讨论是：派去中国的人，要能够代表美国的地位，要能够得到英国和苏联的认可，要具备调解复杂问题的勇气和能力。还有，他不应该毫无保留地只支持蒋介石。最后，所有的人都认为，刚刚退役的马歇尔上将是出使中国的最合适的人选。

马歇尔重回华盛顿。

在与杜鲁门、贝尔纳斯谈话的时候，他问到一个关键性问题：“假如蒋介石不肯让步，美国真的要抛弃他吗？”

杜鲁门明确回答：美国出于战略目的也要支持蒋介石。但是，如果因为蒋不肯让步导致内战爆发，从而让共产党占据大半个中国，苏联人又能够控制满洲，美国由此失去太平洋战争的主要目的，这也是美国的失败或损失。

马歇尔又问：“那么，如果共产党不肯让步呢？”

国务卿贝尔纳斯的回答是：“那就全力支持国民政府。”

C-54专机在太平洋上朝着中国飞行。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下午，马歇尔的专机在中国上海江湾机场降落。

马歇尔一到中国，就与驻华美军司令官魏德迈发生了冲突。魏德迈曾经是马歇尔的下级，其军阶提升一直受到马歇尔的关照，连他的出任中国战区司令官都是马歇尔推荐的，而正是这一职务使他成为美国陆军中最年轻的中将。此刻，魏德迈坚持认为，马歇尔的使命是不可能完成的。他说他十分了解国民党，国民政府是一个典型的一党专制政府，执掌全部权力的蒋介石绝对不肯作出让步；同时，他也和许多共产党人交谈过，出于政治信仰的缘故，他们也不会作出真正的让步。一个要掌权，一个要夺权，把中国这两个政治和军事上的对手撮合在一起，犹如天方夜谭。被长途旅程折磨得十分疲劳的马歇尔告诉魏德迈：我们在二战中克服的困难比这难以想象得多！我们必须完成总统赋予的中国使命！——魏德迈卸职回国后写过一个《魏德迈报告》，里面有这样一句话：马歇尔将军抵达中国的第一个夜晚就走错了关键的一步。

对于美国人，蒋介石爱恨交加。

抗战时期，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不得不依赖美国的大规模援助，但同时他与美国总统派来的驻华美军司令官、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矛盾重重。从维护美国和盟军的根本利益出发，史迪威坚持认为，只要是抗日的中国军队，不管是国民党军队、地方武装还是共产党军队，都应该得到美国的物资支援，以便让所有的抗日力量发挥更大的作用。他甚至提出应该把封锁解放区的国民党军调往抗日前线，因为那条封锁线“吸住了大约二十万最好的政府军队和五万共产党人的部队”。在国民党军队开始向中国偏远的大西南撤退的时候，史迪威建议罗斯福总统委任他全权指挥中国军队作战，以“阻遏日军的深入”。这个建议让蒋介石认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侮辱，他直接给罗斯福总统去电，要求明确史迪威在中国的职称、职责、权力以及他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为了不影响中国的抗日战局，罗斯福最终撤换了史迪威。

回到美国的史迪威对中国的局势依旧关切，一九四四年七月他的判断是：“中国在日本人离开后会马上爆发内战。”

毫无疑问，赫尔利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因为当罗斯福总统对是否让史迪威离开中国而犹豫不决时，赫尔利的如果“支持史迪威将军，则将失去蒋委员长，甚至还可能失去中国”的判断对罗斯福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赫尔利来到中国没多久，就因为明显地偏袒国民党而受到美国朝野的激烈批评，这令蒋介石再次担心美国的对华政策有所变化。得知杜鲁门总统派遣马歇尔来华的时候，国民党内不少人持强硬的反对态度。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长陈立夫认为，美国派任何人来都比马歇尔合适。他对蒋介石说：“国共间问题，宜直接商诸苏联，反易解决，若由美国出任居间，使苏面子过不去，徒生阻碍，此其一。照我观察，共方利于拖延，俾有时间整军以待我。美方对于共党问题，见解不深，易受其欺，此其二。国共问题，据我推测，调解之机会极少，马歇尔将军英雄人物，为世所称，此番出任调人，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一旦失败，如何下场？其咎若诿之我方，我又将何以自处？此其三。”蒋介石听后最终选择了沉默。陈立夫说：“将来得不偿失，悔之晚矣。”

十二月二十一日，马歇尔飞抵南京与蒋介石见面。他开门见山地表示：除非看到目前致力于和平的努力是有效的，否则美国就不能保证对中国继续给予经济和军事援助。蒋介石提醒马歇尔，中国统一的最大障碍是共产党不肯交出自己的军队，而苏联也有在中国扶持中共政权的意图。但是，马歇尔的看法是：国共冲突越激烈，越有利于苏联支持中共。

第二天，马歇尔飞往重庆。

毛泽东对马歇尔的到来寄予了极大希望。

重庆谈判期间严重的精力透支，使毛泽东一回延安就病倒了，这是他一生中极少出现的严重的身体不适。时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回忆说：“十一月，毛主席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令人担忧。我每天都要看他几次。他有时躺在床上，全身发抖，手脚痉挛，冷汗不止，不能成眠。”为此，斯大林专门派来了两名医生。经过检查，苏联医生认为是“负担过重，精神过于紧张”所致。可是，马歇尔来华的消息让毛泽东一下振奋起来。他从休养的医院中搬出来，没有回距离延安城较远的枣园，而是住进了八路军总部王家坪。

无疑，共产党人希望避免内战。因为一旦内战爆发，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还不具备抵抗强大的国民党军的能力。要想生存下去，最切实可行的方针就是与国民党合作。可是，即使《双十协定》已经签订，军事冲突还是频繁发生。共产党人知道，蒋介石根本没有和平的诚意。而要化解这种紧张局势，目前只能依靠美国人的调解。一个被误读的历史真实是，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依靠苏联的意图。原因很简单：苏联靠不住。就在几天前举行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上，苏联外长莫洛托夫重申：苏军之所以还留在中国东北，是为了“蒋介石的军队争取时间进驻沈阳和长春”。斯大林在接见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时，也对马歇尔使华作出了积极回应：“如果有什么人能解决（中国）这个形势的话，那就是马歇尔将军，他是仅有的几个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人的人。”而在蒋经国应斯大林之邀、以蒋介石私人代表身份访问苏联时，斯大林再次明确表示“支持国民政府”，并拒绝充当中国问题的调解人，因为他“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会接受他的意见”——三年后，当中国的解放战争进行到最后阶段，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已成定局时，斯大林承认了他的错误：“（当时）我们认为中国没有发展起义的前景，中国同志应该寻求同蒋介石的妥协，他们应当参加蒋介石的政府，解散他们的军队……在中国问题上，现在我们承认我们是做错了。”

在重庆，马歇尔会晤了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周恩来首先代表毛泽东对马歇尔来华表示欢迎，然后他直截了当地表示，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不能有内战，主张立即停止一切冲突，组成联合政府，民主地解决国内的一切问题。马歇尔问及"如何解决中国政府民主化"的问题时，周恩来表示，共产党人可以保证蒋介石在联合政府中的领袖地位以及国民党在政府中的第一大党地位。马歇尔注意到国共之间的一个重要分歧：国民党要求共产党军队统编应在成立联合政府之前，而共产党认为"一个他们在其中有真正发言权的联合政府"是统编军队的"先决条件"。

整整三十年后，马歇尔使华期间为美国国务院撰写的报告公之于世，在这份报告中他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一方面，国民政府畏惧和不信任苏联，并确信中共是苏联的傀儡。国民政府不相信中共的诚意和真挚。另一方面，中共也同样不信任国民政府。在后者表示愿意放弃一党统治并建立一个联合政府时，中共并不相信他们的诚意和真挚。他们担心政府的特务机构。除非他们在政府里得到一种发言权，足以充分保证他们作为一个政党继续存在和他们的党派活动自由，他们就不愿交出他们的军队……这种由两个对抗的政党间的担心、不信任和怀疑所造成的障碍，已成为中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最大障碍，这种障碍是国共两党之间经过多年的斗争逐渐形成的。"

十二月二十七日，中断一个多月的国共谈判终于恢复。

马歇尔希望，在来年一月十日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双方达成停战协议。但他一旦卷入中国的政治旋涡中，便立即感受到巨大的压力。谈判一开始，共产党方面提出"无条件停战"，而国民党方面坚持"有条件停战"，这个条件的核心就是"恢复交通"，也就是共产党人在北方的解放区内给国民党军北进让出通路。

新年之夜，马歇尔彻夜未眠，同时给蒋介石和毛泽东写备忘录，他特别要求蒋介石作出妥协，但最终还是在自己一直坚持的“无条件停战”原则上做了艰难的折中，这种颇费脑力的思索并不是美国人所擅长的：

一、停止一切军事冲突；

二、停止一切军事调动，国民党军为接收东北及在东北境内的调动例外；

三、停止一切破坏交通的行为；

四、一切军队维持现时位置。

最后，马歇尔建议成立由国、共、美三方组成的谈判小组。

蒋介石在马歇尔的劝说下表示愿意停战。

毛泽东权衡了东北问题有苏联参与的特殊性后，也对马歇尔的备忘录给予了支持。

谈判小组成立了，成员是：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国民党政府代表张群（四川省府主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

当谈判小组坐下来的时候，张群突然提出华北的赤峰和多伦也属于东北范畴，这两处地方也必须由国民党军队接收。蒋介石的意图十分明显：赤峰和多伦是进入东北的陆路通道，占领了那里，就可以彻底切断华北解放区与东北的联系，使进入东北的共产党部队陷于孤立，也便于对华北解放区形成包围。这个要求传到延安，毛泽东作出了严厉的回应：共产党不反对部分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但国民党始

终拒绝协商军队进入东北的办法。如果国民党方面坚持自己的主张，一旦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共产党方面概不负责。

此时已经是一九四六年一月九日，距离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仅仅还有一天的时间，心情恶劣的马歇尔在没有事先通报的情况下直接去了蒋介石在重庆的官邸。蒋介石态度强硬，说这一要求实际上是防止苏联染指华北的举措。马歇尔提醒蒋介石他是代表美国政府来华的，他目前的职责和权力是苏、美、英三国认可和赋予的，如果今天晚上达不成协议，对他的使命以及对蒋介石的切身利益都是不利的。尽管宋美龄将马歇尔严厉的语气尽可能翻译得柔和了一些，但蒋介石还是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在得到蒋介石暂且不提赤峰和多伦之事的许诺后，马歇尔回到寓所用电话通知了周恩来和张群。谈判双方的工作人员立即开始起草，停战协定文件终于在一月十日凌晨完成。

鉴于停战令传达到双方分散在不同地域的部队需要时间，协定规定一月十三日午夜十二时起停战协定生效，届时双方停止一切军事冲突。

蒋介石发布命令：

政府代表与中共代表对于停止冲突及恢复交通业经商定办法，并予公布，同时公布下开之命令：

一、一切战斗行动立即停止。

二、除下列五项附注另有规定者外。所有中国境内军事调动一律停止，惟对于复员、换防、给养、行政及地方安全必要军事调动，乃属例外。

三、破坏和阻碍一切交通线之行动必须停止，所有阻碍交通线之行动必须停止，所有阻碍该项交通线之障碍物，应即拆除。

四、为实行停战协定，应即在北平设一军事调处执行部。该执行部由委员三人组成之，一人代表中国国民政府，一人代表中国共产党，一人代表美国，所有必要训令及命令应由三委员一致同意，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名义，经军事调处执行部发布之。

五、附注。

甲、本命令第二节，对国民政府在长江以南整军计划之继续实施，并不影响。

乙、本命令第二节，对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九省或在东北九省内调动，并不影响。

丙、本命令第三节所云之交通线包括邮政在内。

丁、国民政府军队在上项规定之下行动，应每日通知军调处执行部。

六、上开命令应自即日起开始实行，迟至本年一月十三日下午十二时止，务必在各地安全实施，仰各遵行，不得违误为要。

国民政府主席 蒋介石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一月十日

毛泽东也同时发布了命令:

中国共产党各级委员会、中国解放区各部队首长、各级政府同志们:

本党代表与国民党代表对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之办法、命令和声明，业已成立协议，并于本日公布在案。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包括正规军、民兵、非正规军及游击队，以及解放区各级政府，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均须切实严格遵行，不得有误。

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做之努力，今已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望我全党同志与全国人民密切合作，继续努力，为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革，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

虽然久盼的和平似乎即将到来，但是，双方作战部队都接到了于协定生效前迅速占领有利军事要点的命令。

晋冀鲁豫军区陈赓部已经攻进山西曲沃城，激烈的巷战正在进行，但是协定规定的停战时间到了，陈赓只好命令部队撤离战场。而

晋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正在攻击山东聊城，战斗自一月四日开始后，外围作战十分顺利，土工作业已经完成，总攻时间定在十三日。结果，十二日接到刘少奇发自延安的电报，要求战斗必须在十三日二十四时前停止。接着，刘伯承和邓小平的电报也到了，说若十三日二十四时不能攻克，部队就必须撤出战斗。司令员陈再道急了，命令五旅和六旅提前攻城。虽然炮兵把城墙轰开了一个缺口，但是战斗进行到天黑，双方依旧在突破口上进行着拉锯战。午夜十二时，二纵不得不撤出战场。十三日上午，距离停战协定生效还有十几个小时，冀晋军区政委王平和副司令员陈正湘突然接到各部队阵地相继受到国民党军进攻的消息。在向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汇报之后，聂荣臻命令他们守住阵地，寸土不让。国共两军在大同以东二十公里处的遇驾山相遇。抢占这里的是阎锡山的骑兵第四师，师长田尚志已经向部队下达了悬赏令：打死一个赏三百元，活捉一个赏五百元，缴一支步枪赏三千元、机枪赏一万元。但是，当冀晋军区各团开始进攻并对敌形成包围之后，国民党兵开始溃逃。这里的百姓都出来帮助共产党军队作战，大批青壮年堵在通往大同的铁路和公路上抓俘虏，最后除了师长田尚志带领数百名官兵逃回大同外，冀晋军区官兵和老百姓打死打伤和俘虏千余人，缴获步枪数百支、机枪二十多挺。此时已经是十四日凌晨四时。

停战协定生效前，对津浦路的争夺更加激烈。在蒋介石星夜前进"抢占要点"的命令下，驻守徐州地区的国民党军分三路向解放区发动大举进攻。为了保卫解放区，山东野战军决定先打其先头部队——第五十一军一一三师。第二纵队四旅十二团负责攻击孤军深入到山东临城塘湖车站附近的国民党军三三九团。十二团的官兵正憋着一口气，因为自组建以来打了不少仗，却始终没有获得过荣誉称号，总觉得在兄弟部队面前很没面子。团长文盛森的战斗动员是：如果这一仗打不胜，我愿一降到底当战士。战斗开始后，十二团的官兵们果然进攻凶狠，阵地前沿的国民党兵刚挨了第一波密集的子弹和手榴弹，立即高

喊着“我们也是穷人”纷纷投降了。二排长提着从一户人家里弄来的一把大煤油壶，把敌三三九团一营营部所在的房屋点燃了。在最后向三三九团团部攻击的时候，十几颗手榴弹一起向院子里投掷，然后官兵们拼死往里冲击。在冲天的大火中，国民党守军跑得漫山遍野。文盛森团长集中起十五把军号一起吹，田野里顿时喊杀声四起。在全歼三三九团之后，第二纵队司令员罗炳辉对文盛森团长说：“看来你不用降职当战士了！”十二团当场被授予了“钢铁团”的荣誉称号。

停战了！

北平的东单北大街上有座赫赫有名的协和医院，这座宫殿式的建筑，是在美国石油大亨洛克菲勒以十二万五千美金买下的一个破落王府的基础上修建的，由于有美国人的背景，这里被选为停战协定中规定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办公地点。

此时，协和医院俨然成了一座军营，大门口有两个士兵站岗，一边是穿着美式皮鞋、挎着美式冲锋枪的国民党军宪兵，另一边是穿着黑色布鞋、打着绑腿、挎着缴获的日式步枪的八路军战士。双方都佩戴着写有“军事调处执行部”的胸章。出出进进的国民党军人、共产党军人和美国军人从军装上很好分辨，但细心的北平百姓还是发现，八路军军官还佩戴着一枚圆形胸章，上面有两支麦穗，刻有“中共代表团”的字样。

军调部委员是：美国委员：美国驻华代办罗伯逊，国民党委员：国民政府国防部二厅厅长郑介民，共产党委员：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马歇尔说：“军调执行部是世界历史上最奥妙的组织。”这个以调解中国军事冲突为目的的机构，其主席由美国委员罗伯逊担任。有外国记者对此评论道：“一个国家如此信赖外国的代表，这在历史上是少见的。”

就在停战协定签字的那天，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中达成共识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了。这个标志着中国国内政治和解的会议，从今天的角度看犹如一场梦幻。参加会议的三十八名代表成分复杂：国民党代表八人、共产党代表七人、民主同盟代表九人、青年党代表五人、无党派代表九人。蒋介石在开幕词中再次许下了“人民之自由”、“政党之合法地位”、“实行地方自治和普选”以及“释放政治犯”四项诺言。中共代表周恩来也致辞说，共产党人“欢迎这个公布，并愿为实现这四条权利而奋斗”。接着，拥有不同政治信仰和政治目的代表们就停战问题、军队国家化问题和政治民主化问题，展开了激烈而混乱的争论。最终，一月三十一日会议闭幕时，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和《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协议》。

仅就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来讲，达成如上的政治协议已经是一个奇迹。此前，这个国家政治民主化打破封建专制的坚冰，也许只在一九一一年帝制被推翻的那一瞬间出现过。现在，突然出现的这个奇迹是在国共两党处于尖锐军事冲突的前提下发生的，这不由得令人心存忧虑。但是，此刻共产党人已把执政的国民党推向了一个被动的位置。“政治民主化”对于共产党人而言，实际上就是取得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这个目的是关乎中国共产党生存与发展的第一要义。现在，这一目的至少在纸面上和舆论上已经实现，如此不但打破了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为“割据”之说，争取到将解放区问题纳入地方自治问题的范畴，而且还争取到了改组政府和实行“三三制”的承诺，即中共和民盟共占组成政府的三分之一名额，这已经达到了实施否决权的法定数字。为此，共产党人作出的最大让步就是“军队国家化”。

《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所确立的“军党分立”原则，并不符合共产党人的基本建军原则。因为共产党人始终认为：“无产阶级的军队，

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始终不渝地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特别是在随后由国、共、美三方达成的《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中，规定国共两军的比例为五比一，规定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要逐渐与国民党军队混编，还规定了中国军队（包括十个师的解放区部队）需使用美国装备，这无疑对共产党军队的生存已构成明显威胁——“装备虽好，但可把你集中起来，不给你汽油弹药，那你就没有办法。”而共产党人之所以作出如此重大的让步，其核心还是“合法化”问题，即共产党不但在政治上同时在军事上取得了与国民党平等的地位，这个地位与抗战期间国民党只承认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完全不同。周恩来说：“抗战八年，蒋以他的统帅地位来压我们，但在谈判过程中，马歇尔来后，为了套我们，在地位上也不得不承认我们与蒋军的平等地位，结果蒋成了一方面的统帅，而不是两方面的统帅。”

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式之前，因为所有的协议必须通过延安批准，马歇尔专门为周恩来派了一架美军C-47飞机。大病初愈的毛泽东执意冒着严寒亲自去机场迎接周恩来，显示出共产党方面对于协议充满期待。

当晚，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大家都为“中国即将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而感到高兴。共产党领导人的乐观心境，突出表现在他们初步商定了参加未来联合政府的人选：毛泽东、朱德、林伯渠、吴玉章、刘少奇、张闻天和周恩来。会议甚至还讨论了中共中央搬迁的问题，也就是说准备从偏僻的延安搬到富庶的江南去——这件犹如天方夜谭的事情，当时确实真切地发生过——共产党中央选定的搬迁地点是江苏淮阴。《周恩来年谱》：“当时的中央会议还研究了新四军第五师撤到华中、恢复交通、东北问题、在行政院力取得三分之一名额、中央要考虑搬迁的问题。”《毛泽东年谱》： 二月二

日，“中共中央致电陈毅，指出必须巩固华中现有地区，因中央机关将来可能迁淮阴办公”。

从延安回到重庆，周恩来拜会了马歇尔，明确表示共产党人并不打算现在就将社会主义理想付诸实践，因为中国还不具备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在目前阶段应该学习美国的技术、工业化、自由经济和个性发展。周恩来带给马歇尔一封中共中央的信，信中表明共产党人赞赏他为贯彻停止协定所表现出的公正与合理，而如果美国在处理中国问题上能一直秉持完全公正的立场，共产党人准备与美国进行局部性的乃至全面性的合作。

政治协商会议闭幕的第二天，是中国农历的除夕夜。尽管周恩来给蒋介石拜年时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并说毛泽东准备参加联合政府，蒋介石对此也表示了欢迎，但是，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心境之痛苦，不堪言状”。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一系列协议，招致了党内反对派的强烈不满，国民党组织部长陈果夫致信蒋介石：“共产党已得到好处，本党已受害。中国如行多党政治，照现在党政、军政未健全之际，颇有蹈覆辙之可能。请悬崖勒马，另行途径。”另外一种巨大的压力还是来自马歇尔。马歇尔刚到重庆的时候，与蒋介石一起住在林园里，当时蒋介石住一号楼，宋美龄住二号楼，马歇尔被安排在三号楼。但是，随着对马歇尔不满的加剧，蒋介石搬到曾家岩去了，原因是他不愿意在散步的时候碰上马歇尔。但是，蒋介石还是无法摆脱马歇尔的说服与胁迫。出于对美国式的民主政治的极端热爱，马歇尔给蒋介石起草了一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宪章》，这个雄心勃勃的美国将军要亲自设计中国未来的政治样式了。当从宋美龄的口译中听到“非经国务委员会同意，政府不得发布影响各县各行政区纯地方事务的法令”时，蒋介石实在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了：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发布政策和法令，难道还要经过有共产党参加的国务委员会的同意吗?蒋介石认为马歇尔说出了连共产党都不敢说的话，这个美国人难道已

经被共产党收买了不成？蒋介石的愤怒从他的侍从室秘书唐纵的描述中可见一斑："美国舆论对我最坏，压迫最甚；去年底杜鲁门声明，莫斯科公报，与马歇尔来华，对政府施用之压力，无殊前年。"

无论如何，马歇尔来华仅仅月余，就达到了他在中国声誉的顶点。他的言论和照片不断出现在中国各大报纸的版面上。从大洋那一边传来的一句话更是令中国人对和平充满期待，美国总统杜鲁门说：马歇尔将军是"活着的最伟大的美国人"。——自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证明，任何一个外国人或任何一种外国势力，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从不曾给中国带来任何真正的福音。

马歇尔乘着那架美国陆军航空兵部专门为他改装的C-54专机，在他认为已经迎来和平的中国上空，开始了堪称中国军事史上独一无二的大巡游。这个自我感觉良好的美国人无法知道，就在他的机翼之下，在这片古老的东方国土上，欢乐与悲伤、幻想与失望、对峙与较量正与严寒中流淌的热血剧烈地扭结在一起——纷争与争战在这个国度已经上演了数千年，无数想成为这片土地的救世主的英雄豪杰均已成为历史烟尘。

## 狭隘的关门主义

政治和解的气氛暖融融地弥漫在延安的窑洞里。

与此同时，在东北漫天的风雪中，东北民主联军的数万官兵正在混乱的局面中苦苦煎熬。

这是一块失去控制的土地。从贫寒的农民、城市平民、知识阶层，到乡村富农、地方军阀、山林匪霸，谁也不清楚这块土地最终会由谁来管理。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时刻，人人都可以认为自己是主人。于是，各种名目的"军队"蜂拥而起，各种"接收"的机关到处林立，所

有的人都怀着发财的念头把行动目标直指日伪统治时期留下的一切。呼啸山林的各色土匪以抗日者的面目开始劫掠，一些伪军在国民党的策动下不断发动武装暴乱。

最剧烈的暴乱发生在吉林南部的通化县城。这个边境小城在日本人看来十分特殊，它坐落在山间盆地里，易守难攻，且战略资源十分丰富。日本人拟定了将通化开发成大城市的计划，不但运来了大量的机械设备，甚至还准备当日本本土危机时把天皇藏在这里。一九四五年八月，苏军出兵东北之后，逃到这里的日本关东军总部、伪满洲国的皇帝以及皇妃大臣们、关东军第一二五师团和第一三四混成旅主力、从沈阳和长春逃难来的日本侨民，一下子使这个边境小城成为拥挤混乱之地。长驱直入的苏军把能够占有的一切掠去之后走了，自关内开来的共产党部队进驻通化县城。尽管共产党尽一切努力维持社会秩序，但在国民党辽宁省党部的策动下，通化县城内开始了驱逐共产党的活动。武装暴动在农历大年初一凌晨发生，叛乱的日本官兵向电报局、专员公署和共产党军队驻地发起猛烈攻击。被关押的伪满王妃们目睹了异常惨烈的战斗：一群日本军人冲进看守所把她们抢出去，刚出门就遭遇剧烈的枪战，共产党官兵强行向里面冲击，双方都出现大量的伤亡。溥仪的弟媳嵯峨浩在混乱中跑回关押她的房间蒙上棉被，直到枪声平息她才伸出头来。那时，天色已亮，到处是日本人的尸体，她“从窗口向外望，能看见那座可以俯瞰全城的山。八路军漫山遍野，正在向山上冲”。

苏军运走了当时东北大量的电力设备以及鞍山、本溪等地的钢铁工业设备和绝大多数的矿山挖掘设备。马歇尔来到中国后曾问：“苏联人是否将中国东北的财产当成他们的战利品了？”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的回答是：“他们运走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马歇尔说：“是这样！他们在德国就是这样做的。”苏军还把伪满洲国中央银行和多家私人银行的全部纸币、抵押品以及金银、外汇席卷一空，并强制东北地

区流通苏军自己印制的“红军票”。个别苏军士兵军纪松弛，所作所为无人控制。东北民主联军松江军区司令员卢冬生深夜带警卫员外出办事，遇到几名苏军士兵拦路抢劫中国人，他立即上前制止，竟被苏军士兵开枪打死。这位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著名将领，长征后被送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苏军出兵东北时跟随苏军回国，死时身上还携带着苏军军官证。

苏军和国共两军在这块土地上混杂在一起。

苏军对国民政府接收东北始终冷淡，尤其是美国人插手东北问题以后，苏军对国民党方面更是十分警觉。但是，苏军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也不明朗，他们坚持“不向八路军移交”的原则，不允许共产党军队进入东北地区的任何一座城市。

错综复杂的关系导致军事冲突频频发生。

此时，杜聿明因患肾结核到北平治疗，他一再致电蒋介石，要求任命第三方面军副司令长官郑洞国为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并暂代司令长官之职。郑洞国来到北平他的病床前，杜聿明劝说他到东北协助自己指挥作战，并在万一他因病不能返回东北时接替他的位置。杜聿明对郑洞国说，东北的共产党力量，比原来预料的强得多，作战亦相当艰难。但是，除了国民党大员们在东北趁机发横财，一时间贪污舞弊成风使他头疼之外，整个东北的局势还是乐观的，因为共产党军队兵力少装备差，且在东北立足未稳，还没形成群众基础。所以，只要持续果断地对他们展开攻势，是有把握收复全东北的。

国共停战协定签字后，东北的国民党军并没有停止进攻。由于连续的退却，东北民主联军中的悲观情绪开始蔓延。林彪对国民党的和平诚意始终持严重的怀疑态度：“如我在这方面停战，而让敌人自由攻击东北，则对我党的后果是不利的，华北之暂安局面也决不会长久

的。因此我们对现在所谓和平的实际收获，须清醒的（地）考虑之。”林彪认为，停战协定签字之后，共产党在东北面临的局面反而更加恶劣，进入东北的各部队都已被迫处于四处游走的状态中。“我入东北的部队目前完全处于无根据地的状态，与我军脱离中央苏区后到陕北以前的状况大体相同。”停战协定生效后的第三天，林彪致电中央，要求允许他向杜聿明部发动攻势：“我意最好利用国民党对东北问题拒绝谈判以前，我们开始攻击。”中央第二天回电，强调停战协定公布之后，如我军主动发起攻击，“将受到国内外舆论的严重责备”，而国民党也会将“发动内战的责任将推到我们的肩上”。因此，即使“目前可能取得局部的军事胜利”，也只有暂时放弃，“以服从目前全局的政治形势”。

当时，林彪的东北民主联军指挥部已经退到辽宁北部的法库，山东军区第一师和新四军第三师七旅两支部队也已撤到法库以西的秀水河子村。这些从关内解放区来的部队，为了让当地的百姓接受他们，使出了密切群众的所有办法，在终于得到当地百姓认可的时候，国民党军的追击部队来了。在严峻敌情的压迫下，部队只好撤出秀水河子村，同时向国民党军发出信函，要求他们遵守停战协定。但是，国民党军不但开始在秀水河修筑工事，而且还向东北民主联军指挥部所在地法库发动了进攻。林彪不再退让了，决定在这里打一仗——这就是第四野战军战史上著名的“秀水河子战斗”。当时的敌情是：国民党军第十三军八十九师二六六团与二六五团各一部，兵力共有四个营加师属山炮连和输送连。敌人兵力不大且远离主力，林彪集中了多达六个团的兵力，合力攻击国民党军的四个营。

但是，战斗一开始，却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战场僵持局面。

天黑之后，天寒地冻，等待出击的官兵个个手脚僵硬。二十二时，总攻的信号终于升起来了，梁兴初的一师和彭明治的七旅同时开始炮火压制，然后一师首先发起冲锋。二团三营为第一梯队，在八连

连长张文祥和指导员张作民的率领下，官兵们从村北往里打。刚冲进去，就遭到守军的迎面反击，部队被压了回来。张作民喊：“共产党员们！生死关头！不能后退！”连队掉头再冲。冲在最前面的连长张文祥硬是从敌人手中夺下一挺机枪，他扭头向跟着他的战士们喊：“好东西！加拿大的机关枪！”话音未落，他一头栽倒在地。这位山东军区著名的战斗英雄的牺牲，令每一次都跟在他身后冲击的战士们怒火万丈，他们呐喊着迎着国民党军密集的子弹往前冲。营教导员赵从让带领七连增援来了，重机枪排占领有利位置后，进行了猛烈的火力压制，终于把守敌压到村庄的北墙边。当七旅也开始发动攻击的时候，守敌在调动防御火力配置时出现混乱，一师和七旅趁机突进村庄，开始了逐屋逐院的肉搏战。守敌集中起所有的轻重机枪和美式六十毫米火炮抵进射击。战场出现僵持的时候，前来增援的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军一部推进到距秀水河子村仅十余里的太平庄。秀水河子村内的守军因为增援部队的靠近而更加顽固。一师二团指挥所在混战中被炮弹击中，团长江拥辉腰部和眼睛受伤，浑身是血。

一直在附近的一间民房中静观战局的林彪终于向攻击部队下达了命令：拂晓前如果不能解决战斗，迅速撤离战场。

七旅旅长彭明治很不舒服。仗打到这个份上，苦也吃了，血也流了，怎么能说撤就撤了？增援的敌人是从我七旅的屁股后面来的，一师只要坚持打，我七旅就没说的！此时，一师也决心孤注一掷。二团把预备队全部都拉了上来。一营营长刘海清经过仔细侦察，发现村东有一条沟可以利用，于是他建议改变突击方向，顺着沟插进村去。刘海清的这个建议成为化解僵持局面的关键。在他的指挥下，二连和三连连续冲击，最终突进守敌防御的核心。二营营长孙洪道也率领士兵冲了进来，在一个大院里与守敌扭打成一团。通信员向指挥所报告说：“孙营长和狗日的国民党摔起跤来啦！”秀水河子村被突破以后，增援之敌缩了回去，战斗于清晨六时三十分结束。

此战，东北民主联军共歼灭守敌一千五百多人，俘虏国民党军副团长以下官兵九百多人，缴获各种火炮三十八门，机枪近百挺，步枪七百余支，汽车三十二辆。一师和七旅共伤亡七百七十一人。

规模不大的秀水河子战斗，在解放战争史中具有重要地位。

这是共产党军队进入东北后，在不断的退却中首次主动作战，而且也是首次歼灭成建制的国民党军。

但是，局部的艰难取胜并不足以扭转全局的被动。

接下来发生的以东北民主联军遭遇重创为结局的沙岭战斗，再次显示出交战双方在武器装备和作战能力上的巨大差距。

沙岭位于辽河南岸，东北民主联军辽东部队所面对的是国民党新六军二十二师六十六团和师教导营。辽东部队集中了所有的主力共七个团，战场兵力已是敌人的五倍。指挥员动员时提出的口号是：这是和平前的最后一仗！这样的情绪无疑会导致官兵的急躁乃至轻敌。新六军是全副美式装备的部队，抗战期间曾是著名的中国远征军，在印度和缅甸与日军进行过残酷的血战，官兵中多是有七八年以上作战经验的老兵，不但善于在强大火力掩护下的攻击战，还善于依托坚固工事进行阵地防御战。接敌以后，辽东部队曾用三个营围攻该军的一个营，新六军的一个副营长被俘后依旧态度强硬，声称他们打过日军打过法军，这次到东北来连拉炮的骡子坐的都是飞机，论战斗力一个国军顶得上十个民主联军。

二月十六日黄昏，辽东部队开始向驻守沙岭的国民党军发动进攻。由于炮兵的发射技术差，两个小时的炮击效果不大，部队冲上去之后，遭到密集的火力扫射和炮火反击，轮番攻击的两个营营干部全部阵亡。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官兵们前仆后继，但始终无法冲破国民

党军严密的火力网，每一刻出现的伤亡都触目惊心。十八日，辽东部队的两个连在炮火掩护下终于冲进村子，但国民党守军以强大的火力拼死阻击，冲击部队因伤亡过大被迫撤出。十九日清晨，当得知国民党军增援部队即将到达时，辽东部队撤出了战场。

沙岭一战，国民党新六军二十二师伤亡约六百人，而辽东部队伤亡高达两千一百五十九人。

东北严酷的冬季即将过去的时刻，正是关内桃李含苞、柳烟渐浓的时候。

马歇尔认为连“和平前的最后一战”都没有必要，他现在要做的事就是飞遍这块国土，收获他所创造的“和平”之果，然后回到大洋另一边的农场去，享受不再有任何打扰的宁静生活。

有人称，五星上将的这次专机巡游，是一次典型的“马歇尔风格的飞行”，因为这与他在柏林战役前从美国本土前往欧洲战场的那次飞行有类似之处。那次飞行，他乘坐的是罗斯福总统的专机，专机从华盛顿起飞，飞越浩瀚的大西洋后，几天之内分别在法国、荷兰、比利时、德国等地着陆。上将旋风般接连会见了艾森豪威尔、布莱德雷、巴顿、蒙哥马利和法国前线司令官等二战高级将领，检查和落实了盟军将要执行的旨在结束战争的作战计划。而这一次，飞行时间表也是马歇尔亲自制定的，他要在短短的五天之内飞行近万公里，中途在华北、西北、华中、中原、华东的近十个地方降落逗留。马歇尔说，上次的欧洲之行是为了战争，这次是为了中国的和平。

二月二十八日下午，马歇尔抵达北平，先到军调部听取汇报，然后出席鸡尾酒会，会见北平军政要员和文化界人士，晚上八点在京城著名的淮扬菜馆萃华楼出席军调部举行的宴会。第二天一早，他飞往由共产党人驻守的大城市张家口，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在那里迎

接了他。听完汇报后，他享用了一桌为他精心准备的由二十多道菜组成的中国筵席。接着，专机向北，飞往归绥以北国共两军反复争夺的集宁。在那里，马歇尔见到了叼着烟斗的共产党将领贺龙。因为寒风刺骨，马歇尔在专机上听了汇报，听到的依然是国共双方严格遵守停战协定的话，他很高兴。他不知道的是，眼前的这座小城于停战协定生效后被傅作义的部队攻占，而在他到来之前，晋绥野战军刚刚经过一场血战从国民党军手中夺回。因为不久前国民党中央社曾郑重报道贺龙“中弹死于绥远，尸骨已运回延安”，于是随行的记者们对贺龙很感兴趣，而贺龙面对记者们谈笑风生，以证明自己不但活着而且还很健康。

从集宁再次起飞，在北平过夜后，第二天上午专机飞往济南。在这之前，身边的人曾对马歇尔提起，中国的山东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家叫孔子，还有一个强悍的共产党将领叫陈毅，再有就是山东解放区的物价很便宜，同样一条抽纱围巾，在解放区首府临沂只要两元钱，而在上海要付五百元。令马歇尔惊讶的是，前来迎接他的竟然有两个山东司令和两个山东省长：共产党省长是黎玉，国民党省长叫何思源；共产党领导的山东军区司令员是陈毅，而驻守济南的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是王耀武。听取了国共双方的汇报后，两个司令和省长在宴请马歇尔的时候又是碰杯又是握手，马歇尔不禁感叹道：“这是山东具有伟大历史性的和平会餐。”但是，当马歇尔到达徐州的时候，双方的气氛又开始恶化，因为国民党军虽然控制了徐州和津浦路的部分铁路线，但还有长达二百六十公里的铁路在陈毅部队的控制之下，而且铁路两边的乡村全部属于解放区。国民党方面要求即使为运输民生所需物资考虑，也要尽快恢复交通，但共产党指出国民党沿着铁路线建起了比抗日时期还多的碉堡和工事，这对于恢复交通后的和平是最大的障碍和威胁。马歇尔离开后，陈毅问驻守徐州的国民党军将领顾祝同：“和平民主是否有希望？”顾祝同答：“这完全取决于美国。”陈毅

说："老头子（蒋介石）不是闹着要打吗？"顾祝同的回答令陈毅十分吃惊："老头子能顶什么事！"

三月三日，马歇尔抵达河南新乡，在那里他受到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驻守新乡的国民党军第三十一集团军司令官王仲廉的欢迎。会谈的时候，国共双方发生剧烈的争吵，因为孟县是晋冀鲁豫部队接收的，而国民党军在停战协定生效后攻占了那里。但是，在这一天，记者们却觉得另外一件事更有新闻价值，那就是国民党方面在重庆释放了新四军前军长叶挺，共产党方面在新乡释放了在邯郸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马法五对记者们说，在解放区里，他吃饭是特殊伙食，刘伯承将军常来看望他，在他之后担任第四十军军长的李振清将军也被允许派人来看望他。当马歇尔离开新乡的时候，他收到的礼物是一只大银鼎，他对这个奇特的东西充满好奇。有人对他解释说，鼎是中国古代的烹煮用具，在汉语中"鼎"有稳固和强盛的意思。

在山西太原与国民党军将领阎锡山和共产党将领陈赓以及在绥远与国民党军将领傅作义见面会谈之后，马歇尔最期待的时刻到了——一九四六年三月四日下午四时二十五分，他的专机在延安降落了。

延安这样呈现在这位美国五星上将的眼前：

在三个小时的飞行中，只见山丘越来越陡，山谷越来越窄，最后看到一片片光秃秃的山坡，就像月球上的山脉一样。从空中看不见人家，因为人们都住在山崖的窑洞里。许多山顶都削平了，后来才知道这些削平的山顶就是耕地……

这里既没有自来水，也没有下水道。饮水从井里打，所以要烧开。照明用蜡烛或小煤油灯，少数房子由美国发电机供电。中国农民发现蜡烛和煤油太费钱，他们把自制的菜油倒在小碟子里，再放上一根棉捻子点着当灯使。这种油灯已有三千年的历史，它发出的光在房间里可使人不致摔倒……

在延安，党的干部工作时间很长，吃的又很差，冬天还减为一日两餐，吃的主要是小米和青菜。他们在窑洞里，坐在木椅或木凳上，在小油灯的暗淡灯光下进行工作。然而看起来

他们并不感到疲劳，甚至在敌人即将大举侵犯时也如此。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过着接近大自然的宁静而简朴的生活，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里的社会中充满同志式的友爱。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他们已经检验了他们的全部理论并使之适用于原始的中国农村以及农民的日常生活，他们感到在人民家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无忧无虑……

每逢交际场合，没有人梳妆打扮，也没有人换什么衣服。不管男女，都是一套公家发的粗蓝布服……冬天跳舞的时候窗户也是敞开的，因为跳舞的人都穿着棉衣……周恩来擅长跳华尔兹不过有时有点过于拘谨……刘少奇跳起舞来带着一种科学的精确性……朱德总司令跳舞好像进行举世闻名的长征一样……毛泽东大部分时间坐着不跳，许多人都想跟他聊天，他跳起舞来安然笃定，好像给乐队带来了“党的路线”一样……

在延安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人民”……中国人民如何，世界人民如何。“到人民中去”，“向人民学习”，这些都是口号，但又包含着比口号更深的含义，代表着一种极深的感情，一种最终的信念……

显然，延安方面的准备十分隆重。搭建起欢迎的牌楼，训练了八路军仪仗队，毛泽东还破例做了一身呢子中山装，破例同意买一双黑色的皮鞋。尽管毛泽东新缝制的中山装“好似从一大堆衣服里捡来的”，但马歇尔还是对这位有着非凡气质的共产党领袖产生了好感。马歇尔与毛泽东的会谈气氛融洽和谐，他们谈到停战协定和整军协议的履行问题、东北问题和解放区的地位问题，没有产生严重的分歧。和谐的气氛在中共中央举行的欢迎晚宴上达到高潮，毛泽东的祝酒词中包括了“中美合作万岁”、“国共合作万岁”和“全国人民团结万岁”，以及“祝杜鲁门总统健康”、“祝蒋主席健康”和“祝马歇尔将军健康”。马歇尔对筵席上可口的新鲜牛奶十分满意，问这些牛奶是从哪里弄来的，坐在他身边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告诉他：“我养了一群奶牛。”宴会之后，在杨家岭礼堂举行了欢迎歌咏晚会，晚会二十一点开始，礼堂里气温很低，虽然搭着毛毯，马歇尔还是被冻感冒了，但台上乐队演奏的美国国歌以及延安军民震耳欲聋的腰鼓表演依旧令他既兴奋又吃惊。

马歇尔的延安之行产生的最大效应，就是给予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共产党人以极大的乐观情绪。虽然这种乐观情绪很快便给他们的处境

带来极大的危险，但在当时这种情绪的产生似乎是难以避免，也是难以克制的。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将军在晚宴上对毛泽东表示，一旦政府改组之后，中共中央应该搬到南京去。毛泽东说："我们将来当然要搬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淮阴，开会就到南京。"

第二天，马歇尔一行离开延安。毛泽东前去机场送行。记者们围住毛泽东问："您准备什么时候去南京？"毛泽东的回答是："蒋主席什么时候要我去，我就什么时候去。"马歇尔临上飞机前，毛泽东对他强调说："再说一句，一切协定，一定保证彻底实行。"美联社记者约翰·罗德里克对毛泽东流露的乐观情绪记忆深刻，因为毛泽东对他盛赞杜鲁门总统的"主动精神对中美关系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罗德里克又惊讶于毛泽东身上"流露出的一种王者风范"，因为他总能够使自己保持一种"自信与权威而又不露骄矜的态度"。

那时的共产党领导人认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而党内一部分同志还不能适应这一新的形势，对"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提出疑义，这无疑是"狭隘的关门主义"：

> ……党内党外均有许多人不相信内战真能停止，和平真能实现，不相信蒋介石国民党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实行民主改革，并能继续与我党合作建国，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因而采取怀疑态度，对于许多工作不愿实行认真的转变，不愿用心学习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形式，因此，各地党委应详细解释目前的新形势与新任务，很好地克服这些倾向。

后来的历史是：一年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实搬出了延安，但不是被蒋介石请到南京去参政，而是在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下撤到了比延安更加荒凉的北部山区。

共产党人期望与国民党人一起和平民主建国的诚意，突出体现在《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签署后的积极行动中。一九四六年二月下旬，共产党人开始了裁减军队和官兵复员行动，行动之迅速，规模之庞大，与国民党方面日益加剧的运兵备战相比，令那一刻的历史显出了一些荒诞。中共中央给各解放区下达的缩编复员指标是：在三个月之内至少将官兵数量减少三分之一。根据这一指示，共产党军队三个月之内复员和转业官兵多达二十四万。这一行动给部队带来了思想上的混乱。从干部到战士都感到无法在“战”与“和”之间作出准确的政治判断。晋察冀解放区的复员工作最为彻底，军区从原来的九个纵队一下减少为四个，总计复员官兵近十万。有人报告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说在北平看到国民党军到处征兵扩编军队，而为什么共产党军队成群的复员人员在往家走？聂荣臻说：“我也有矛盾，一面担心内战再起，一面又看到中央的决心很大……国民党军无法打下去，美国也不支持他打下去。那就按中央的决心办吧。”

而关于“整军”，蒋介石在国民党整军会议上说得十分明确：

> 我与共产党斗争了二十多年，是最了解共产党的。现在只有把我们的部队整编好了，才有力量，才能打胜他。否则，不仅你们抗战功劳没有，连你们的历史都完了。甚至你们会死无葬身之地。

在共产党采取整军复员行动的同时，国民党军也制定了“复员计划”。遵照蒋介石的“机密甲9269号手令”，国民党军整军采取的是称谓缩小、人马照旧的办法，即将全部的国民党军队军改称为师，师改称为团。更有甚者，国民党军各军在整编中都要求扩充人员：第三军，扩充九千零三十六人；第十六军，扩充六千九百五十八人；第三十军，扩充六千八百七十五人；第四十军，扩充四千九百三十二人；第九十二军，扩充七千三百零五人；第九十四军，扩充六千九百二十二人。国民党方面宣布将对五万五千名军官和一百五十万士兵实行“集团转业”，但是，这些官兵几乎全部被改编为实际上依旧是作战部队的

“兵工建设总队”，其中三分之二的力量被安置在了共产党各解放区的四周。即使这样，到内战爆发的时候，国民党军依旧还有三十个军连虚假的整编都没有进行。

事后，当国共两党代表就整军中复员数量进行核对继而发生争吵时，穷极名目保存军事实力的国民党方面竟然说，他们有五十七万官兵不应算在整编之列，因为这五十七万是准备今后十二个月内“逃亡消耗”的人数。“逃亡消耗”这一名称，连同“五十七万”这一庞大的数目，皆令人惊愕。

随即爆发的战争证明，共产党军队的大规模复员，严重影响了其作战能力。

# 第二章 最大多数万岁

## 四平之战

一九四六年春暖花开之后，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敦城发表了有关“铁幕”的演说，要求英联邦帝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建立特殊关系，以应对全球范围内日益增强的社会主义革命。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由此升级。接着，美国在太平洋中一个名叫比基尼的热带珊瑚礁堡上，进行了水下原子弹试爆，巨大的“花冠似的水以子弹的速度射向空中”。而这时候的中国，正处在剧烈事变前的沉寂时刻。

在“战”与“和”两种模糊不清的前景中，这个国家民众的生活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乡村的春播正忙，都市里美国电影的放映海报多了起来，大学开始争论“苏联是否是个新帝国主义”国家。此时，国人并没有人注意到，在这片国土上有两个地区已经成为引发战争的火药库：一个是冰河开始解冻的东北地区，一个是麦苗已经返青的长江北岸。

尽管苏军一再拖延撤军时间，但是终究要大规模撤离了。

于是，一个始终没有解决的问题面临着最后的较量与抉择。

苏军撤离沈阳时，没有通知国民党军。驻扎在沈阳郊区的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军二十五师师长彭璧生发现苏军开始移交监狱和工厂时，才感到苏军可能要走。他派出大量的便衣混杂在看热闹的百姓中，直到苏军全部撤离之后，他迅速指挥部队占领了沈阳市区。此时的沈阳城市破烂，物价飞涨，市场萧条，但是当街市上挂起青天白日旗后，饭馆的生意顿时火暴起来，国民政府的接收大员夜夜请客，几乎所有饭馆的门口都悬挂着“某某机关包席”的牌子。苏军一路向北撤离，国民党军乘火车一路向北推进，但是火车运载的兵力毕竟有限，顺着公

路的徒步行军更是速度缓慢。这时候，国共两方代表正就东北问题进行谈判，虽然争吵激烈但尚未撕破脸皮。因此，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指示是："苏军退出沈阳后，我军不要去进攻沈阳城。我军进去在军事上必会陷于被动，在政治上亦将处于极不利。不仅沈阳不必去占，即沈阳到哈尔滨沿线在苏军才撤退时我们都不要去占领，让国军去接收。"就在这封电报从延安发出的当天，苏军从沈阳至长春间的四平撤离后，黄克诚立即指挥部队攻占了那里，官兵们把四平城内的国民党地方官员赶上一辆大卡车轰出了城。

中共东北局在抚顺召开了会议。这个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的会议，只能从当事人的回忆中复原原貌。会上，主张攻击大城市和离开大城市建立农村根据地的两种意见展开了直接交锋，而这两种意见关乎东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未来命运。在和平来临的乐观情绪的影响下，东北部队很多干部因留恋城市而不愿到农村去。后来，中共东北局书记彭真指出："大家的注意力切不要被占领长齐哈等大城市的斗争所吸引，而忽略中小城市广大乡村的剿匪与发动群众工作。不把中小城市广大农村的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以建立之巩固后方根据地，我们便不能持久作战，已占大城市亦难于占稳。"迫于对形势判断的局限，抚顺会议没有形成任何明确决议，东北民主联军依旧试图在东北地区沿铁路线与国民党军争夺大城市的控制权。

国民党方面坚持认为，东北不存在共产党驻军问题，只有国民政府从苏军手中接收主权的问题。国共两党代表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因而分歧严重。随着国民党军源源不断地到达东北，蒋介石的立场越来越强硬。没能取得任何斡旋效果的马歇尔回国述职去了。延安方面的态度也强硬起来：进入东北的国民党军，只能接收沈阳至长春沿铁路两侧三十里的地带。如想进入其他地区，必须得到共产党方面的同意——显然，共产党方面是不会同意的。

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阐明了他对东北问题的真实立场：

……我们可以说，东北九省在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没有什么内政问题可言。如果有人在东北主权没有收回，外交问题没有解决期间，提出内政问题，作对中央交涉的条件，在这时候必要妨碍我们主权的接收，加重外交的困难，那就不知道他们的用意如何了……在日本占领东北的时期，共产党并没有什么武装力量，自日本投降以后，东北才有中共部队的发现，从热河方面开进东北的中共军队，乃持有少数武器，而从烟台渡海的中共军队，那都是徒手过去的，这几种部队合起来，就是他们所谓“民主联军”，现在他们唯一的工作，就是妨害政府军队接收主权，要求特殊化的政治局面。要知道，阻碍国家主权的接收，就是妨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实行，也就是威胁远东和平和世界安全……政府对于东北九省只有接收主权，推行国家的行政权力，军事冲突的调处只有在不影响政府接收主权，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前提之下进行……

东北民主联军抢在国民党军之前，占领了从沈阳北进长春和哈尔滨的战略要冲四平。蒋介石立即命令国民党军自沈阳兵分四路攻占四平。于是，数天前还强调不要与国民党军在接收问题上发生军事冲突的中共中央连续致电东北局，要求部队坚决作战。

三月二十四日：

……我党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而以南满、西满为辅助方向……黄（黄克诚）李（李富春）部动员全力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顽军北进时彻底歼灭之，决不让其向长春前进……

三月二十五日：

……你们至少还须经一二个星期也许更长时间的恶战才能实际达到停战。在此时间内顽方会拼命进攻，企图控制更多的战略资源要地，而你们应尽一切可能不惜重大牺牲，保卫战略要地……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你们必须在苏军撤退后一二日内控制之……

连日大雨，河水暴涨，已经化冻的黑土地一片泥泞。在沈阳向北的各条道路上，国民党军的坦克和汽车与徒步行军的东北民主联军官兵在泥泞中迎头而进，战斗相继发生。国民党军的北进一开始便显示出强劲的突击能力。三月二十一日，第五十二军突破东北民主联军万毅部的阻击，占领抚顺；新六军主力和第七十一军八十八师、第九十

四军五师占领辽阳之后，突破东北民主联军吴克华部的阻击，于四月一日占领东北钢铁工业中心鞍山，第二天占领位于辽东湾的重要出海口营口；新一军于三月二十七日攻占开原后，向四平推进；而第七十一军主力则于四月四日占领法库，并拟从那里前出攻占四平以西的八面城。

四月四日，林彪到达四平街，在察看了战场地形之后，他向中央表达了“坚决与敌决死一战”的决心。毛泽东立即回电，表达的也是不惜一切的决心：

……集中六个旅在四平地区歼灭敌人，非常正确。党内如有动摇情绪，那（哪）怕是微小的，均须坚决克服。希望你们在四平方面，能以多日反复肉搏战斗，歼敌北进部队的全部或大部，我军即有数千伤亡，亦所不惜……本溪方面，亦望能集中兵力，歼灭进攻之敌一个师……如我能在三个月至半年内，组织多次得力战斗，歼灭进攻之敌六个至九个师，即可锻炼自己，挫折敌人，开辟光明前途。为达此目的，必须准备数万人伤亡，要有决心付出此项代价，才能打得出新局面……

一场为争夺铁路线上的重要城市而进行的血战已经不可避免。

这就是后来颇受争议的“四平之战”。

八日傍晚，四平外围战斗开始。交战双方是：东北民主联军山东军区第一、第二师，第七纵队新四军第三师八旅和十旅、东满挺进纵队等，共十二个团；国民党军是新一军新编三十八师。新一军是国民党军主力部队之一，抗日战争时远征缅甸，为解救被日军包围的英军，新一军在当时新编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的率领下奋勇杀敌，最终为远征军冲出一条血路，其顽强的战斗作风为盟军赞叹也为国人崇敬。战后，新编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升任新一军军长。此时，孙立人正在伦敦接受英国国王的授勋，该军暂由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梁华盛指挥。两军激战一夜，虽然东北民主联军的两个营在包抄中因迷路没有完成断敌退路的任务，但是新编三十八师的三个连还是在共产党军队不顾一切的攻击中受到重创。共产党官兵爬上院墙，一边开枪一面

高喊“缴枪不杀”。新编三十八师师长李鸿曾出征缅甸，作战经验丰富，在指挥部队发动逆袭之后，新编三十八师终于稳住了阵脚。此战，新一军兵力损失不大，但是士气受到打击，梁华盛甚至向刚到东北代替杜聿明指挥作战的郑洞国表示：按照作战命令限定的时间攻下四平是不可能的。

在接近四平的国民党军各路部队中，第七十一军八十七师占领法库后，企图迂回四平的侧后，他们面对东北民主联军的节节阻击边打边推进，突然间，发现自己被引到一个早已布置好的大口袋中：先头团看到前面有个熙熙攘攘的集市，便向路上的老百姓打探情况，百姓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八路早就走了，于是先头团解散休息。就在国民党军开始又吃又喝时，枪声骤起，原来集市上的不少百姓都是化装的八路军。伏击八十七师的部队，是从阻击新一军的战场上迅速移动而来的。林彪部署了“一点两面”的战术，即用主要兵力攻击敌人最薄弱的一点，其他方向以少量兵力助攻。同时，突击部队用在敌人的两侧，牵制部队则用在攻击正面。四月十五日，在东北民主联军的合力围攻下，八十七师被分割压缩在十几个村庄里。从各村跑出来的老百姓来到共产党军队的阵地上，详细报告了国民党军在各村的兵力分布情况。天黑之后，东北民主联军的围歼战开始了。至清晨时分，八十七师大部被歼，副师长和参谋长被俘，只有师长黄炎带领少数卫兵逃离。

就在国共两军在四平作战的时候，共产党东北局与苏军就东北民主联军接管长春达成默契。四月十四日，苏军撤离的最后一列火车驶出长春。一个小时后，东北民主联军第七师杨国夫部、三五九旅贺庆积部、东满二十二旅罗华生部和吉北军分区曹里怀部共十三个团，在联军副司令员周保中的指挥下向长春发动了攻击。官兵们拉来日军留下的大炮，轰击长春城内被空运来的国民党守军。战斗持续到十八日，包括长春城防司令陈家珍和市长赵君迈在内的八千多人被俘，长

春被东北民主联军占领。中共东北局立即致电中央："对于长春，我们决定采取巩固和确保的方针，争取成为我们的首都……"

同日，中央回电：

……（一）长春占领，对东北及全国大局有极大影响，望对有功将士，传令嘉奖。（二）杨师立即或休息数日南下参战，必须增加四平方向兵力，歼灭新一军主力，并准备继续打几个大胜仗，方能保卫长春。（三）用全力夺取哈、齐二市。（四）用全力发动长、哈、齐三市及长、哈、齐线东西两侧各二百里左右地区的数百万群众，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与武装起来，作为控制全满之中心区域，迅速准备一切，为保卫长春而战……

长春被东北民主联军占领的那天，马歇尔回到中国。美国人担心东北的战火会成为苏军继续滞留中国的借口。马歇尔听取了前往东北地区监督停战的三人小组的汇报，在与蒋介石和周恩来分别进行了多次交谈之后，得出了关于目前中国时局的结论，这一结论令蒋介石与马歇尔的矛盾公开化了。

目前的许多困难，国民政府早些时候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局势现在是逆转了；国共双方都完全缺乏诚意而且互不信任，每一方在对方所有建议的后面都看到邪恶的动机；国民政府阻碍了派遣执行小组进入满洲，而执行小组或许是能够控制局势的；共产党说停战令适用于全中国，而国民政府却反对停战令适用于满洲；当国民政府的军队开进满洲时，他们采取了鲁莽的行动，企图消灭在内地的共产党军队。我不得不作出结论：蒋委员长的军事顾问们所表现的判断力是低劣的。在许多事例中，国民政府当局给共产党提供了指责他们缺乏诚意的机会……自一九四五年开始谈判以来，政府曾有过几次满意地解决问题的机会，但是现在共产党却能够向政府提出过分的要求了。根据我听到的情况来看，国民政府所犯的大错包括对较小的事情采取强硬的态度，这种态度达不到有益的目的，却引起了严重的僵局。

同时，马歇尔也意识到，共产党人对长春的占领，"对于国民政府的影响甚至更是灾难性的"，因为国民政府中"极端反动集团的势力"现在可以说，共产党"从来没打算坚持履行达成的协议"。而"确实地解释共产党进攻长春的原因是困难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共产党力图迫使国民政府结束在满洲的冲突，停止把他的军队向沈阳以北调动，并且从事谈判以求得一项解决办法"。

四平没有攻下，长春也失去了。

四月十六日，从北平回到东北的杜聿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四平。

四平血战开始了。

四平位于辽宁与吉林的交界处，当时是通往南满、西满和北满的交通枢纽，四洮（四平至洮南）、四梅（四平至梅河口）、中长（满洲里至绥芬河的中东铁路与哈尔滨至旅顺的南满铁路）三条铁路穿城而过。铁路把小城分为东西两区，东区是中国人居住的矮小平房，西区是日本人建造的坚固的楼房，这里还有一个小型飞机场。四平城北面山峦起伏，其余三面地势平坦，从地形上看无险可守。

在林彪的急令下，东北民主联军所有的主力部队昼夜奔袭，前后到达四平的总兵力近八万人。虽然没有大规模阵地防御作战的经验，官兵们还是开始紧急抢修防御工事。他们沿着小城外围挖掘了大量的交通壕，甚至把小城西南的河道全部堵塞，从而让河水漫出形成大面积的沼泽，以阻止敌人坦克的冲击。同时，四平城内囤积了大量的粮食、弹药和医疗用品。林彪的命令是：要使每一个前线指战员有战斗到最后一人的决心，要有与最后一个阵地共存亡的决心。

十八日，国民党新一军在郑洞国的指挥下发动了攻势，其新编三十师沿铁路由南向北，新编三十八师由西向东，五十师直指四平东南，三路大军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对四平正面展开轮番攻击。交战双方都表现出决死的斗志。在国民党军强大的火力轰击下，东北民主联军的防线多次出现危机，前沿官兵数次与进攻的敌人进入肉搏状态。双方不断派出突击队向对方阵地渗透，两军犬牙交错地混战在一起。国民党军的每一次进攻，都用优势火炮进行长达三个小时以上的火力准备，致使四平外围的阻击阵地上硝烟弥漫、弹坑累累，东北民

主联军所有的防御工事很快就被夷平，官兵们只有利用钢板构成的堡垒做掩护，躲避炮弹的杀伤，然后待敌人冲锋到三十米处时，跳出工事用手榴弹和刺刀展开拼杀。经过反复的拉锯作战，新一军终于在东北民主联军的正面防御线上撕开一个缺口，进攻部队在坦克的引导下从缺口进入，并急速向纵深发展，占领了四平市区西南角的一座楼房。东北民主联军多次组织反击，但是在伤亡百人之后依旧没有夺回。在新一军五十师的进攻阵地上，百门以上的火炮以每分钟二十五发炮弹的火力向东北民主联军的防御阵地进行狂轰，但随后步兵的冲击依旧要面对共产党官兵的顽强坚守和寸土不让。战至二十二日，新一军重新协同火炮，前后配置，开始了毁灭性的轰击，致使东北民主联军的交通联络全部中断，各部队阵地都处在各自为战的情形中。这时候，战斗的焦点转向四平城西北一个叫三道林子的高地。仅二十二日一天之内，双方在高地上展开的拉锯战就有四次之多，而坚守在这里的东北民主联军的一个营伤亡达百人以上。二十三日，新编三十八师集中炮火轰击三道林子的北山阵地，东北民主联军阵地上平均每分钟落弹四百余发。新一军虽然武器优良、火力猛烈、战术精到，但是当白刃战和肉搏战来临时，国民党军官兵面对共产党官兵不惜生命的勇气不禁心惊胆战。四月二十六日，新一军在四平城东的一次攻击被打退，东北民主联军在城北的反击未能奏效，战场出现了暂时对峙。

郑洞国要求杜聿明增援。

二十七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到达：“（一）四平守军甚为英勇，望传令奖励。（二）请考虑增加一部分守军［例如一至二个团］，化四平街为马德里。”——“马德里”，指的是一九三九年西班牙内战中国际纵队与西班牙人民一起为保卫马德里而战斗。

毛泽东的态度是“化四平街为马德里”，林彪的态度则是“尽量化四平街为马德里”。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宣传部长陈沂后来回忆说：“就

是林彪本人，当时也没有说过要在四平进行一个大战役，我们全军上下都觉得这样‘且战且退’的打法是合算的。”四平八天的战斗，林彪已清醒地认识到目前我军作战的弱点：没有城市防御作战的基本经验，官兵们只知道向前方射击，缺乏与友邻部队策应的意识；火力配备的层次和纵深都不理想，无法形成有效的阻击火力；战场上没有统一的射击命令与信号，有的部队开火太早，致使敌人临近时弹药不足；部队交接阵地时没有顾及工事的交接，造成接手阵地的部队在工事已全部失效的情况下出现大量伤亡。而国民党新一军却在步炮协同、营连进攻和交替掩护方面都显示出老练的攻坚经验。如果他们在近战时顽强，而不是一拼刺刀就跑的话，此战打下去凶多吉少。

但是，毛泽东要求坚决保卫四平：

林：

感（二十七日）电悉。（一）前线一切军事政治指挥，统属于你，不应分散。如因工作繁忙需人帮助，则可考虑高岗等同志来助你，如前线机关以精简为便利，则照现状为好。（二）东北战争中外瞩目，蒋介石已拒绝马歇尔、民盟和我党三方面同意之停战方案，坚持要打到长春。因此我们必须在四平本溪两处坚持奋战，将两处顽军打得精疲力竭，消耗其兵力，挫折其锐气，使其以六个月时间调集的兵力、武器、弹药受到最大消耗，来不及补充，而我则因取得长、哈，兵力资财可以源源补充，那时，便可能求得有利于我之和平。（三）力戒轻敌，每战必须集结全力，打敌一点，以期必胜。此点你已充分注意，望深入教育，一体遵行。

毛泽东

辰（五月）东（一日）

毛泽东的真实意图，不仅是以四平之战赢得谈判桌上的有利地位，而且还要在四平一线将国民党军的攻势彻底遏止，以期达到国民党占领沈阳以南，共产党占领长春、哈尔滨以北的平分东北的目的——既然独占东北已无可能，争取到一半也是胜利。

但是，本溪失守的消息传来了。防守本溪的东北民主联军各部队，主力调到了四平方向，本溪城内只剩下萧华指挥的三个团。国民党军新六军、第五十二军、第七十一军的五个师，于四月二十八日向本溪发动全面攻击，萧华指挥各团拼死阻击，战至最后每团每连只剩下十余人，东北民主联军的防线被全线突破。五月三日，萧华命令放弃本溪。

本溪失守后，解除了后顾之忧的国民党军迅速北上，向四平包抄而来。其中廖耀湘的新六军在右，陈明仁的第七十一军在左，已经回国的孙立人指挥新一军居中。东北民主联军本来就装备简陋，兵力不足，现在为防御国民党军的两翼包抄，防线又被拉长至五十多公里，兵力更见稀疏，火力更见单薄。而国民党军将领很清楚，这种攻防战拖得越久，对防御一方越是不利。由于防御的正面过于宽大，东北民主联军各部队主力都被置于阵地一线，惨烈的战斗导致的重大伤亡令各部队的兵力捉襟见肘。

此时，指挥部队负责四平左翼防御的黄克诚提出了“适可而止，不能与敌硬拼”的建议。黄克诚先给林彪发电，提出目前敌人倾巢出动，“与我决战，而我军尚不具备进行决战的一切条件”。因此，可以“把四平及其他部分大城市让出来”，尽快到中小城市及广大农村建立根据地。等敌人“背上的包袱沉重得走不动了的时候”，我军再回过头“逐个消灭他”。黄克诚没有等来林彪的回音，更没有等来林彪撤退的命令。五月十二日，他直接致电中央，不但建议放弃四平，甚至建议放弃长春。黄克诚的这封电报，是后来对四平之战得失争论中最著名的电报（电文有删节）：

（一）由关内进入东北之部队，经几次大战斗，战斗部队人员消耗已达一半，连、排、班干部消耗则达一半以上，目前虽尚能补充一部新兵，但战斗力已减弱。

（二）顽九十三军到达，如将大量炮兵及部分坦克用上来，四平坚持有极大困难。四平不守，长春亦难确保。

（三）如停战短期可以实现，则消耗主力保持四平、长春亦绝对必要。如长期打下去，则四平、长春固会丧失，主力亦将消耗到精疲力竭，不能继续战斗。故如停战不能在现状下取得，让出长春可以达到停战时，我意即让出长春，以求得一时间的停战也是好的。以求争取时间，休整主力，肃清土匪，巩固北满根据地，来应付将来决战。

（四）东北已不可能停战，应在全国打起来，以牵制国民党军向东北调动。东北则需逐步消灭国民党兵力，来达到控制全东北的目的。

（五）我对整个情况不了解。但目前关内不打，关外单独坚持消耗的局面感觉绝对不利。故提上面意见，请考虑。

黄克诚还是没有接到任何回音。他不知道，在远离四平战场的地方，国共正在谈判桌上就东北问题激烈地讨价还价，而四平无异是一个重要的筹码，共产党人在这样的时刻绝不能轻易放弃四平。十五日，毛泽东给东北局发来电报称：“四平街作战支持的时间愈长愈有利。”整整十三年后，黄克诚才明白当年在战场上林彪为什么没有回音。

然而，就在毛泽东发出这封电报的时候，东北民主联军保卫四平的最后时刻来临了。

廖耀湘指挥的新六军新编二十二师的一个团，在付出一个连的伤亡后，突破了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的防线。新六军由此乘胜推进。在泥泞的乡间小路上，国民党军用钢板铺路，六百多辆汽车、坦克和火炮强行通过，其推进速度之快，进攻强度之大，令负责阻援的第三纵队连连退守，新六军主力很快逼近四平地区。同时，东北民主联军在其他方向上的防御阵地也被相继突破，国民党军最后对四平防线的制高点塔子山形成三面包围。

塔子山距四平城仅十余公里，这里的阵地原由万毅部的五十八团防守，由于伤亡过大，阵地后来被移交给第三师七旅。为了加强防御，林彪命令第三师十旅前往增援。七旅在之前的战斗中已严重减员，塔子山阵地上只有十九团一个团。五月十八日，新六军在向塔子

山进行了空前猛烈的炮击之后，步兵在飞机的助战下发动了强攻。十九团五连的阵地前突，八名机枪手全部伤亡，副班长杨甫南一个人轮流使用九挺机枪射击。防守核心阵地的三连和十连，面对敌人的集团冲锋，无一人后退。连续的激战令官兵们无法垒就工事和掩体，他们在犹如暴雨般倾泻的炮弹中血肉横飞。弹药全部用完之后，阵地上幸存的官兵们使用了石头和牙齿。最后，在这个不足百余平方米的小山头上，交战双方官兵的尸体达上千具。

林彪不断给塔子山方向打电报，先是命令“尽可能再坚持一天”，然后命令“最少明天要顶半天”。但是，在塔子山防御阵地上，官兵几乎伤亡殆尽。而奉命增援的部队轻信了以为辽河水深难以徒涉，以至于没能及时赶到战场。林彪给毛泽东去电：“四平以东阵地失守数处，此刻敌正猛攻，情况危急。”电报发出几个小时后，十八日下午，传来塔子山阵地全部失守的消息。这时候，林彪想的已经不是坚守四平的问题了，而是一旦撤退的后路被封死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他没等中央回电，下达了全线撤退的命令。

十九日，毛泽东致电林彪：“如果你觉得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地放弃四平……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

历时一个月的四平之战结束。

四平之战，以东北民主联军的重大损失成为一次失败的战例。不少人认为，四平之战是在对时局的错误估计下发动的，是在不宜进行大规模防御作战时进行的一次得不偿失的消耗战。在诸多要素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与优势交战对手争夺一城一地的得失，不但导致了八千多官兵的伤亡，而且在战略上也陷入了被动。

四平失守之后，东北民主联军继续向北撤退。毛泽东来电要求他们坚守长春，罗荣桓、林彪、彭真等东北局领导讨论后，还是作出了

放弃长春的决定。罗荣桓说："长春、吉林都是大城市，不利于防守，防线又宽，现在部队打得很疲劳，如果守长春，敌人从梅河口沿奉吉线插到吉林，就会把我们的后方打个稀烂，不但长春守不住，非退到西满蒙古大沙漠不可。"于是，林彪负责组织部队撤退，罗荣桓和彭真组织东北局机关撤往松花江以北。五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再次来电，还是要求坚守长春，原因是："我们正在南京谈判让出长春，交换别的有利条件，但必须守住长春，方利谈判，否则不利。"可是，由于撤退已经实施，毛泽东的命令已无法执行。彭真致电中央："长春方面幅员广大，周围地势平坦，我兵力不足，不可能固守。为避免被迫作战，我们决定撤出长春。我们昨夜退出，现已抵哈尔滨，林仍率主力在前线指挥。"

实际上，国民党军占领四平之后，并没有立即攻占长春的打算，原因是蒋介石担心杜聿明兵力不足，如果战线拉得太长，容易出现意外。同时，由于苏军还没有完全撤出东北，蒋介石还担心攻占长春会引起苏军的干涉。他派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去沈阳，指示杜聿明固守沈阳、锦州，确保东北与平、津之间的联络，不要轻易发兵北进。白崇禧在与杜聿明交换意见后，两人都认为蒋介石的顾虑没有道理：现在一旦放过林彪的部队，让他得以休整，等他坐大"倒真值得顾虑了"。况且，国民党军不惜一切打下四平，就是为了占领长春。杜聿明保证只用新一、新六两个军就能拿下长春，白崇禧随即表示只要"一周之内下长春，老蒋看打了胜仗，没有不高兴的"。五月二十一日，在杜聿明的命令下，国民党军多路纵队乘坐汽车和坦克，向撤退中的东北民主联军进行猛烈追击。林彪虽下令"各部队如遇敌时，向敌进路的侧面转移，避免单独决战"。但撤退中的部队在敌人凶猛的进击下建制均被打乱，已经无法形成有效的反击作战能力。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令林彪十分痛苦的事：掌握大量机密的东北民主联军作战科长王继芳背叛投敌了。王继芳少年时参加红军，走完漫长的长征路之后，毕业于延安抗大。部队从四平撤退的时候，这个作战科长突然失踪。国民党军有

关资料说，王继芳之所以投诚，是“他在四平街爱上了一个女人”。王继芳所提供的东北民主联军队目前军力的机密情报，是导致杜聿明穷追不舍的重要原因。

五月二十三日，国民党军占领长春。

蒋介石对国民党军的凌厉攻势感到万分惊喜，他在致东北军事三人小组和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的电报中说：“甚望共产党军队能幡然悔悟，切念萁豆相煎之痛，同懔骨肉相残之耻，为国家多留一分元气，为人民保存一线之生机，从速履行停止冲突之协议，遵守整编方案，化干戈为玉帛，化戾气为祥和，团结合作，完成革命建国之使命。”

原想一鼓作气打到哈尔滨的国民党军，在松花江南岸突然停滞不前了。

这让原准备继续北撤的林彪都感到了意外。

蒋介石到东北来了，他的到来打乱了杜聿明的作战部署。

就在各部队停在松花江南岸，等待下一步作战命令的时候，蒋介石在杜聿明的陪同下出席了沈阳市民的欢迎大会。由于进入东北的国民党军各级将领都前来拜望，前线的战事自然也就被搁下了。紧接着，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为牵制国民党军北上，突然向位于鞍山和海城的国民党军第六十军一八四师发动了攻击。鞍山若失，沈阳等于门户洞开。杜聿明限令孙立人的新一军“于二十六日前集结辽阳，迅速解海城之围，并收复鞍山”。但是，命令下达的第二天，蒋介石告诉杜聿明，说他已准许新一军休整三天，要求一八四师死守待援。三天之后，当新一军终于南下时，鞍山已被东北民主联军部队占领。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曾竭力阻击，甚至处决了作战不力的军官，但无论如何就是等不来援军，他终于意识到，再这样下去无异于置自己于死地。

三十日，潘朔端在海城宣布起义。潘朔端是黄埔四期毕业生，蒋介石历来最看重的是黄埔一期和四期，国共两军中不少著名将领皆出于这两期学员：一期有胡宗南、宋希濂、范汉杰、陈赓、陈明仁、李仙洲；四期除林彪之外，还有张灵甫、胡琏、李弥、文强。但同是四期学员，张灵甫、胡琏和李弥等人早在抗战期间就是中将军长了，而潘朔端至今仍然是个师长。

蒋介石到了长春。在这里他告诉郑洞国和廖耀湘："政府经与中共方面谈判，决定在东北战场实施短期停战，倘无情况变化，停战令可能在近日下达，你们务必做好充分准备。"所谓准备，即"整补军队，调整部署"，"提高警惕，严防中共"。

可是，令蒋介石吃惊的消息传来了：共产党将领陈毅集中山东野战军的全部主力，向山东战场上的国民党军发动了作战，先后解放了胶县、泰安、德州、枣庄、高密等城镇，不但扩大了山东解放区的地盘，而且威胁着国民党军控制的津浦和胶济铁路的畅通。蒋介石被迫把准备调往东北的两个军紧急调往了山东。林彪后来说："一九四六年五月四平、长春撤退后，主力失去战斗力。如果敌人继续增加两个军，我们的军事情况是很危险的，因为主力来不及休息补充和装备。山东大打起来救了我们一手，使得我们能够缓过气来。"

随着各地战事频发，马歇尔对蒋介石的压力开始升级，他通过宋子文转给蒋介石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国民政府在满洲继续前进，你并未采取任何行动以停止冲突，使我作为一个可能的调解人的工作陷于十分困难，也许不久实际上陷于不可能了。"马歇尔的火气来自魏德迈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说国民政府的舆论工具正大肆散布马歇尔中了共产党人的奸计，一家报纸上甚至登出一幅马歇尔穿着八路军军装、打着八路军绑腿的漫画。马歇尔郑重地告诉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如果不停止进攻，美国就立即中断对华援助。

国民党军对林彪部的追击就这样停止了。

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国共双方再次就东北暂时休战问题达成协议。从此，东北民主联军与国民党军隔松花江对峙。东北的大城市之一哈尔滨始终由共产党人占据着，松花江以北地区因此成为共产党人在东北的坚固后方基地。

多年之后，国民党军将领只要一提起内战，依旧慨叹当年没有乘胜追击将林彪的部队彻底消灭，以致最终使国民党政权自东北开始倾覆。

就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战火暂时平息，已经撤到东北最北边的林彪部终于得以喘息的时候，剧烈的枪声在中国国土的腹地再次响起——位于中原地区的共产党军队不但被迫放弃了自己赖以为生的解放区，而且，一场令所有幸存者刻骨铭心的生死大突围被迫开始了。

## 中原突围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国当代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

这一天，驻扎在湖北、安徽、河南三省交界处的中原军区李先念部，突然从国民党三十万大军的合围中突围而出。这一事件，被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认定为解放战争爆发的标志。

任何关于究竟是国民党一方还是共产党一方制造事端将中国带入了漫天战火之中的争论，都严重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无论当时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多么的旷日持久，也无论国共两军无时无刻不发生着危险的军事冲突，但李先念部被围，确凿无误地来自国民党方面早已计划完毕的一个政治与军事的双重阴谋。有史料显示，对李先念部的围歼计划至少产生于五月十日之前，虽然那一天国民政府代表军令部

部长徐永昌、共产党代表中共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以及美方代表军调部执行处处长白鲁德在汉口签署了停止中原内战的《汉口协议》。

命令是蒋介石向武汉行营下达的。

国民党武汉行营参谋处第二科情报参谋袁桓楚记录了那天在他办公室发生的事：

……

就在那天下午三点左右，卢济时（国民党武汉行营参谋处副处长）匆匆回到参谋处，向我和刘当阳［参谋］详细地了解共军的活动和态势。他并叫主管作战的第一科熊彭年［参谋］马上用电话告诉花园的第六绥靖区周嵒密令各部队"迅速占领有利地形，严密封锁共区，随时的待命行动"。同时告诉武昌的整编第五师、咸宁的整编二十六师待命行动。这时刘当阳笑眯眯地问卢济时："副处长，已经签了字，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卢济时冷笑了一声，马上沉下脸说："你们晓得什么？"

大约在六月十四五的一个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卢济时夹了一个皮包，匆匆来到第二科办公室内，对刘当阳和我说："从现在起你们要值夜班，密切注意共军动态，随时将情况告诉我，我在德明饭店，如果找不到我，可以告诉王振旅［也是二科的参谋］。"又跑到第一科去密谈了一个多钟点走了。不久，熊彭年走来开玩笑地对我说："好了，你们忙，我们失业了。"我鼓着两只眼睛望着他，并打着京腔"此话怎讲？"他悄悄地对我说"南京的电报来了"，接着就谈起，那天蒋介石给武汉行营的电令的主要内容是（一）出动鄂豫皖边区外围所有军队，对共军严密封锁，分进合击，彻底消灭中原地区的共军。（二）为避免共方的责难与美方的为难，着令武汉行营所辖部队，均归郑州绥署［刘峙］指挥出击。这就可以使武汉行营推诿签字的责任。

第二天下午，我们就看到郑州绥署请武汉行营转达各师的所谓作战部署，并请武汉行营随时将共军动态通报郑州，其作战部署的主要内容如下：

"整三师进出于界首、周家店以南之线，阻击北窜之敌。整六十六师进出于五里店、礼山以东之线，重点置于左，进击宣化店以北之敌。整十一师主力进出于卫家店以东姚家集以北至黄安之线，进击宣化店以南之敌。整七十二师主力指向白雀园以东以北地区，进击新县以东以北之敌。整四十六师指向叶家集、金家寨之线，阻击东窜之敌。整七十五师主力进出于皂市以北桑树店之线，围击大洪山以南江溪地区之敌；一部开京山聊屋山之线阻敌西窜。整二十师枣阳之一个旅，向大洪山北麓攻击前进。阻击大洪山北窜之敌，主力集结于樊城待命。整五师集结于横店黄陂之线待命。整二十六师集结武昌待命。"

宣化店，共产党中原军区司令部所在地。

那天黄昏，晚霞灿烂，军调处驻宣化店执行小组成员美方代表哈斯克上校和国民党代表陈谦上校，在宣化店狭窄的街道上遇到了身穿灰布军装的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和鄂东独立旅政委张体学。尽管四个人的表情在那一瞬间都显露出一种难以察觉的不自然，但他们很快就谈笑风生地攀谈起来。他们走上一座小桥，桥下的那条叫竹竿河的小河边有几个共产党官兵在洗衣服。

哈斯克与陈谦已经在不大的宣化店内外转了好几圈。他们的心情有些紧张，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国民党军对这个小镇及其附近地域的合围已经完毕。他们特别担心的是，在汉口举行的武汉行营记者招待会上，国民党发言人竟然当众宣布“未来二十四小时之内，湖北将有惊人的奇迹发生”。但是，眼下他们在这个小镇上假装闲逛的时候，并没有发现共产党官兵有什么异常举动：中原军区司令部的牌匾依旧悬挂在大门上，大门内外人进人出，里面传来寻常的电报键敲击声；佩戴着臂章的巡逻队如同往常一样在街上巡视；操场上的操练口号依旧响亮。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接到了晚上在中原军区礼堂观看文艺演出的邀请。只是各部队的伙房里都显得格外忙碌，炒米的香气四处弥漫——共产党方面不是通报说近日要举行小规模军事演习吗？为演习部队准备些干粮也许是正常的吧？

中原解放区是由抗战时期的鄂豫皖解放区演变而来。

鄂豫皖解放区的前身，是原新四军第五师创建的抗日根据地。一九三九年，李先念等人带领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从河南南下，到达湖北与河南交界处的四望山，与在那里活动的游击队会合，组成新四军豫鄂挺进大队。一九四一年初，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挺进大队与其他活动在河南、湖北两省的游击队共同组成新四军第五师。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五年十月，王震率领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王树声率

领河南军区部队先后到达鄂豫皖边区与第五师会合。十一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原中央局和中原军区，任命郑位三为中原局书记兼中原军区政委，李先念为中原军区司令员，王树声为中原军区副司令员，王震为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原军区成立后，中原解放区逐步发展为跨越鄂、豫、皖、湘、赣五省交界处的广阔地区，人口一千五百万，正规军五万余人，民兵三十余万。

抗战结束后，中原解放区面临极大的生存困难，原因很简单：这里是国土的心脏地带，又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地，交通的便捷使国民党军在日本投降后迅速到达这里，很快就对中原解放区形成了包围之势。而当时解放区内的武装依旧处在的分散游击状态中，因为来不及收拢部队形成大规模作战能力，所以难以在国民党军发起攻击时有效地巩固解放区。到一九四六年一月，中原解放区的面积已缩小到抗战胜利时的十分之一。当国共两党艰难地在重庆讨价还价的时候，中共中央根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提出让出包括鄂豫皖解放区在内的八个解放区，以换取在北方部分省份建立民主政权的建议。但是，由于中原解放区的地理位置万分重要，如能坚持下去便可牵制国民党军相当的兵力，遏制国民党军沿平汉、津浦两路大规模北进和东进，因此，毛泽东回到延安后指示中原解放区还是坚持下去为妥：“中原迟早是要放弃的，因为你在蒋介石家门口走动，他是睡不着觉。但现在还不能走，要把他那几十万大军拖住，要有力地配合华北和东北的行动。”

在国民党军重兵包围中坚持下去，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

此时，以宣化店为中心的解放区方圆不足五十公里，却聚集着中原军区数万人的部队和家属，还有四十万的百姓。国民党军的严密封锁令这里的给养“有朝不保夕之苦”。王恩茂在当时的日记里写道：“困难，就是搞粮的次数太多……百姓感到粮食负担不知要负担到哪一

天；负担的分量也重，百姓感到负担不了……我们说过再也不借了，现在又借，则失信誉。”国民党军不但控制了所有可能运输粮食的道路，而且在边缘地区故意抬高粮价，以吸引解放区内百姓的粮食外流。虽然国民党方面在谈判桌上反复表示，对共产党的粮食采购人员“绝不加以阻拦”，但是从解放区内派出去的粮食采购人员还是屡屡失踪。迫不得已，中原局书记郑位三以个人名义致电延安：“连日检查，三月一日全军无粮，即使有钱买，也要在五十里外至一百里以外运输。”可是，中原解放区根本无法运输任何给养。此刻，在解放区的北面是国民党军第四十七军，西北面是第六十六军，而在第四十七军和第六十六军的北面还有第四十一军，东面是第四十八军，南面是第七十二军，西面是第七十五军。国民党军将这个狭窄的区域围得铁桶一般密不透风，仅环绕解放区的碉堡就修建了六千多座，致使李先念部的数万官兵犹如在汪洋大海中困守于一叶孤舟。到《汉口协议》签订时，对中原解放区形成包围之势的国民党军已是中原军区兵力的五倍以上。

中原军区想尽一切办法生存下去。

八千多名编余干部和战士被要求复员——中央的指示是：“如果你处只能养活五千人，那就只留五千人，其余不愿走者可令其隐蔽或遣散。”同时，富有作战经验的基层干部被秘密向外转移。王震说，他们是革命的宝贵财产，无论环境多么险恶，保存这些干部是第一位的。当时，由于黄河决口而流离长江沿岸的难民需要返乡，国民政府为这些难民专门开辟出一条北返的通道，很多共产党干部化装成难民通过了国民党军的封锁线。联合国救济总署在宣化店设有办事处，共产党人通过大量的工作，用救济署的名义和证件也转移出不少干部。中原军区还制造了大量惟妙惟肖的假证件，包括外国通讯社的记者证、国统区百姓的身份证，甚至还有国民党军队的军官证，这些假证件居然有效地掩护了一些转移干部的身份。为了化装转移，中原军区组织部

专门设立了一个化装转移站，召集有敌后工作经验的同志传授化装技巧，并根据需要转移干部的年龄、口音、长相和气质，精心设计其化装后的身份与经历。仅这个化装站，就成功转移出四百多名干部。

中原军区还疏散了一些伤病员。尽管疏散是根据《汉口协议》的有关条款进行的，并且有美方的监督，但依旧险象环生。在湖北广水车站集合的时候，国民党军警林立，特务们跟随美方医务人员一起对上车人员进行严格审查，尽管不少化装成伤病员的女干部与担架上的伤员“结成”了掩护身份的临时夫妻，但依旧有近四百余人被要求不许上车。这是一列伤员呻吟、孩子哭泣的悲伤的列车，在拉货物的车厢里还有不少孕妇，其中一个女干部在接到转移通知时正要临产，为了转移她服用了大量的奎宁，硬是把已经足月的孩子打了下来。列车到达信阳的时候，站台上依旧军警林立，机枪对着车厢门口，不准任何人下车买食物。经过三天三夜的煎熬，列车终于到达华北一个叫观台的小车站。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方军队的岗哨几乎挨在一起。在共产党岗哨的后面，站着当地的老百姓。当列车缓慢停下的时候，民兵们抬着担架，老人们赶着大车，孩子们举着食物，妇女们抱着棉被，列车被热情的人们围了起来。在吃了热饭又睡了一个好觉之后，列车继续北进一直驶入邯郸，那里是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首府。刘伯承和邓小平专门招待了这些中原军区的伤病员，还请他们观看了文艺晚会，一部名叫《逼上梁山》的京剧看得大家泪水涟涟。

转移出去的人究竟是少数，中央要求中原军区要与国民党方面进行“合法斗争”。所谓“合法斗争”，就是国共两党旷日持久的谈判。

一九四六年初，军调部负责调处中原战事的第九执行小组与国共双方军队代表在靠近豫鄂交界处的罗山县开始谈判。参加罗山谈判的国民党军方代表是驻守罗山的第四十七军军长陈鼎勋和驻守信阳的第六十六军军长宋瑞珂，共产党军方代表是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王震。王震指出：陈鼎勋部抢占光山县，“是全国最早破坏停战令的行动”；宋瑞珂部在停战令下达之后，还来“抢占宣化店附近的村镇”，难道不知宣化店是我中原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吗？国民党军的两位军长连连说：“误会，纯属误会。”由于美方的努力斡旋，艰苦的谈判之后，最终签署了《罗山协议》。协议规定：“共产党能够领导之军队，得在其所驻地区之间运输给养，国民党军队不得阻挠干涉”，“双方军队在国共问题整个解决之前，均停于现在地区，不得向对方前进，唯无武器的运输部队除外”。同时“本协议应用于正规军、非正规军与民兵”。但是，协议依旧是一纸空文。王震离开罗山三天以后，他看到了中原军区的电报：“给养已到无米为炊的程度。”

三月，马歇尔一行到达汉口，李先念提出中原共产党军队“被政府军围困，粮食断绝，十分困难，请求移防就食”。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反对，认为一旦移动部队，必将“惹起误会”，已经达成的协议“必须遵守”，移防之事可留待“执行整军计划时再行解决”。周恩来反驳说：“总不能坐以待毙嘛。”马歇尔主张为共产党军队供给粮食，国民党武汉行营参谋长郭忏说：“已允代为购粮，但共军必须说明购粮总数、价格及购运方法，可是共产党方面至今尚未答复。”为了解决中原军区官兵的生存问题，周恩来甚至争取与国民党方面做成一笔买卖：由晋察冀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拿出两万吨粮食，卖给国民党军位于北平、太原、新乡和济南等处的部队，换取现金，然后拿这些现金在武汉购买粮食再转运到宣化店。买卖还没做成，周恩来却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国民党军将在五月到九月间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

中原局致电中央：

……

（一）中原局开了一次高干会，一致认为我们的处境是极其危险的，当地购粮之多只能坚持一月［前电说能坚持数月，事实上无可能］；另一方面则敌人日益压缩，时时围困，企

图严密封锁，以俟有机可乘时，向我包围袭击，达其歼灭我之目的。其次是身上已笨重［如干部家属千余之多］，处理时极其棘手。

（二）中原局认为，当前无合法转移之势，尽可能熬一个月，以后仍无合法转移时，只有图为作大的转移，如此达其保存主力之生存，但其顾虑者：敌人在一月当中就集中兵力向我猛袭，若如此局面就不可设想的难以收拾，但我们决心作熬一个月之打算，而后非法转移之。

……

中共中央特发表声明：

中共中央发言人声明：根据可靠情报，国民党军事当局即将对被围已久的我中原军区李先念将军所部六万余人实行凶恶的“围歼”计划。现中原形势非常紧急。国民党方面各种进攻的军事准备业已完成，如不即谋制止，势将演成绝大惨剧。中国共产党认为这是一个极端严重足以牵动大局的问题，特郑重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负责采取一切有效办法，制止这一重大流血阴谋的实现，并迅速允许李部安全转移与复员。反之，如果国民党当局竟纵容国民党内挑战分子掀起中原的血战，则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认为中国全国范围内的内战，已由国民党方面再一次发动，其一切后果均须由国民党当局负其全责。

在周恩来的坚持下，马歇尔派出军调部三人小组前往宣化店。

周恩来到达宣化店对于中原军区的命运具有决定性意义。其重要性不在于在宣化店进行的国共和平调解，也不在于就对峙前沿阵地上谁进攻谁理论清楚，而在于周恩来到达宣化店的当夜即与中原军区领导人详细商讨了一个秘密突围计划。此时，跟随三人小组到达宣化店的美国记者李敦白，将他所掌握的关于国民党军即将发动军事进攻的情报，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李先念。之前，李先念与李敦白在汉口相识，两人一见如故，李先念说他这个美国人挑选了和自己一样的姓氏，证明两人有缘；李敦白说自己还会木匠活，而他知道李先念从前也是个木匠，证明两人更有缘。李先念说他参加革命后，有人开玩笑说他是做棺材出身，他的回答是：“我是给旧社会做棺材的。”——几十年之后，担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李先念接到了老朋友李敦白来自美国的问候，李先念对往事记忆犹新，他说李敦白当年透露的情报令他“骤然清醒”。

六月十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原局书记郑位三：“目前时局虽还有由谈判获致协议，推迟全国内战爆发之可能，但全面内战亦有很快爆发之可能。我们方针是力争和平，但必须立即准备与国民党全面大打时能坚决粉碎之。”——全国内战不可避免，这是一九四六年六月中旬以后共产党人的判断。

蒋介石确实决心已下。

六月十日，他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上讲话时说：“今天以前我是主张政治解决的，可现在我必须放弃政治解决了，已经给他们（共产党）十五天的反省期限。我在北伐时决定三年解决统一问题，结果不到三年便告统一。请同志们再次相信，我决于一年内完成军事，两年内恢复经济。”六月十四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向国会提交了《拟予中华民国以军事顾问与军事援助法案》，依据这一法案，美国政府与国民政府签订了旨在充分提供军火装备的《中美处置租借法案物资协定》。三天后，蒋介石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最后通牒式的要求：退出华北的热河、察哈尔两省；山东的烟台、威海卫两地，以及六月七日以后中共军队在山东境内从日伪军手中解放的所有大小城镇；退出哈尔滨、安东、通化、牡丹江和白城子；退出山东胶济路沿线、苏北以及中共军队在山西、河北两省境内从日伪军手中解放的所有大小城镇。此时，国民党军在美军的帮助下基本完成调动和部署，位于内战第一线地域的总兵力已经达到一百九十三个旅，总兵力约一百六十万。

内战已呈一触即发之势。

毛泽东陷入两难的痛苦选择中。

胡乔木后来回忆道：“从一九四六年五月底开始，国内形势日趋紧张。我们不仅面临着与国民党破裂的问题，而且也面临着与美国破裂

的问题……那个时候，我们党要下决心立即面对两个破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九五〇年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毛主席思考了三天三夜，最后才下了决心。这个情况传播很广，大家都知道。人们不大知道的是一九四六年年中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破裂，毛主席也反复思考了很长时间才下了决心。”——抉择的艰难在于：如果内战爆发，与国民党军作战实力相差悬殊，将令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面临巨大的危险，至少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艰苦时期；而如果继续坚持和平政策，也许有可能遏制内战的爆发，但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其他方面的力量对蒋介石的制约。

毛泽东很重视美国人的态度。

但是，美国政府与国民政府签订的援助法案，以及蒋介石咄咄逼人的最后通牒，还是激怒了毛泽东。六月十九日，毛泽东致电晋察冀军区、晋绥军区、晋冀鲁豫军区、山东军区：“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接着，毛泽东指示《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美国政府的军事援华法案“对中国的和平安定与独立民主有极为不利的影响”，“中国人民痛感美国运来中国的军火已经太多，美国在中国的军队已经驻得太久，它们已经构成中国的和平和安定与中国人民的生存和自由之严重巨大威胁”。——这是自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政协会议以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谴责美国的对华政策。胡乔木后来说：“毛主席在形势转折的关键时刻作出坚决斗争的决策，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了通往最后胜利的道路。”

六月二十二日，面对中原军区请示立即突围的电报，毛泽东彻夜不眠。中原局认为“局势确已发展到必须迅速主动突围的地步”，因为截获的密电显示国民党军将于近日对中原解放区动手——“担任攻击部

队统于巳月（六月）养日（二十二日）前秘密完成包围形势及攻击准备，待令实施攻击。各部应于攻击开始之日起，对敌一举包围歼灭之。”如果中原军区部队不能及时突围，“皖南事变”的结局也许将会重演。深夜，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这封具有历史意义的电报：

中原局：

（一）二十一日电悉。所见甚是，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二）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免延误时机，并保机密。（三）望团结奋斗，预祝你们胜利。

中央

六月二十三日

六月二十六日晚，驻宣化店的军调执行小组成员观看文艺演出的时候，中原军区部队秘密集结后开始突围了。

演出结束，国民党代表提交了一份“据了解共军正在集结突围”的备忘录，但遭到共产党代表的当即否认。接着，美方代表提出要见李先念，此时李先念已经离开宣化店十五公里了。共产党代表说李将军身体欠佳已经休息。而李先念接到报告后立即策马连夜赶回。二十七日一早，美方代表看见中原军区司令部里一切如常，操场上仍然还有士兵在操练——他看见的是根据突围计划秘密进入宣化店接防的鄂东独立旅的两个连和警卫排。而李先念躺在床上，美方代表问候了几句，放心地走了。他的身影刚一消失，李先念再次上马飞驰而去。二十八日，鄂东独立旅政委张体学继续与军调执行小组成员打了麻将，唱了豫剧，还上山打了猎。二十九日傍晚时分，中原军区主力部队已经突围至平汉路附近，张体学则在宣化店设宴，代表李先念将军宴请军调执行小组。宴会进行到高潮的时候，张体学站了起来，他告诉军调执行小组：鉴于国民党军屡屡践踏停战协议，甚至准备对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我中原军区主力部队已经被迫撤离宣化店。宴会立即就

散了。张体学率领鄂东独立旅迅速离开宣化店，而军调执行小组也在中原军区一位营长的护送下乘汽车驶往汉口。

共产党方面称，中原军区被迫突围；美蒋方面称，共产党方面破坏了停战协议中双方军队“停于现在地区”的条款——无论如何，引发重大历史转折的事件就这样戏剧性地开始了。

中原军区的突围，选择了分散进行的方式，因为大部队突围即无法达到隐蔽性，也不利于最大限度地生存。李先念和王震率领人数最多的一支从宣化店向西，那是国民党军认为最不可能突围的方向，因为那个方向山高林密河流纵横。在国民党军调动部队企图围追的几天里，突围官兵以昼夜不停的急促行军冲过平汉铁路，在几乎筋疲力尽的时候到达了丹江岸边。头上虽然有国民党军飞机在盘旋轰炸，但是地面的拦截追击部队还不多，可湍急的江水让他们付出了代价。没有船，也没有时间和能力架浮桥，只能向江水中扑下去。伤员和跟随突围的家属孩子抓着骡子的尾巴，在战士们的护卫下在水流中挣扎前行，不断地有人被江水冲走。一个叫“小广东”的报社记者突然不见了，他是抗战胜利后参加革命的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平时戴着度数很深的眼镜，说着口音浓重的广东话，官兵们在漆黑的江面上焦急地喊着“小广东”，但是这个年轻的学生兵永远地消失了。

从宣化店南面突围的王树声部由于绕了路，追击他们的国民党军走到了他们的前面。在突破封锁线的时候，先头部队连续攻下国民党军的几个堡垒。但是增援的国民党军乘坐铁甲列车沿着铁路线迅速围上来。王树声率领的是一批经历过抗战的老战士，尽管出现大量的伤亡，部队还是突了出去。他们转战到襄河岸边，八团抓到一个俘虏，一问是国民党军整编六十六师四十六团的参谋长。王树声听了一愣，整编六十六师在湖北应城，怎么跑到襄河这里了？俘虏说他们都是美式装备，这点路程只用抽袋烟的工夫，整编六十六师的三个旅离这里

只有三公里了。没有退路，王树声立即命令部队强渡襄河，突围部队刚刚开始渡河，再次陷入国民党军的攻击之中。经过整整一天的血战，这支部队幸存的官兵被襄河分隔为两支。没有过河的部队由三旅旅长闵学胜带领向北突围，进入伏牛山区；已经过河的部队由王树声带领，最终进入了武当山的密林中。

向东突围的皮定钧部一开始的任务是掩护主力部队通过平汉路。三十二岁的皮定钧率领的是一支由太行山子弟组成的部队，这支部队作战勇猛顽强，老根据地的百姓都叫他们“皮司令的部队”，而共产党军队内部称他们为“皮旅”。突围的时候，包括皮定钧在内，所有官兵都准备为掩护主力突围而牺牲。为了吸引敌人，他们向国民党军重兵防御的方向突围而出。三天之后，当掩护任务完成时，“皮旅”已经深陷重围。但是，最终“皮旅”却是整个中原军区最先成功突围、保存最完整的部队。他们的战法是：全线猛烈出击，然后突然收缩藏起来，等国民党军开始追击时，从眼皮底下把他让过去，再接着往外插。“皮旅”独立作战，左突右冲，国民党军布置的一道又一道的阻击没能让他们退却半步。进入位于鄂豫皖交界处的金寨时，因为一直无法与中原军区取得联系，皮定钧只好要求电台呼叫延安，延安的回电只有两个字：快走！“皮旅”官兵丢掉了所有的背包，甚至忍痛将伤员留在了当地，然后一边作战一边以惊人的速度强行军，五天五夜后穿过皖中平原，最终到达华中解放区的时候，全旅无大损失，只是数千官兵头发长如蓬草，身上衣衫褴褛，脚上是沾满污泥和血渍的破布，只有黑瘦的脸上一双眼睛依旧明亮。从此，英勇的“皮旅”成为华中野战军的一支劲旅，在皮定钧的率领下屡立殊勋。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九五五年，人民解放军授衔的时候，在最初拟定的名单上，皮定钧的军衔是少将，毛泽东看后在名单上批了六个字：“皮有功，少晋中。”

李先念、王震率领的突围部队在国民党军的围追阻截下，被迫分成了两股。王震部在强渡丹江之后陷入重围，部队在一个叫鲍峪岭的

隘口再次被截成两半。在冲出包围圈的战斗中，七一九团团长吴刚、政委蒋洪钧和参谋长朱佐夫相继阵亡。身材魁梧的副团长颜龙斌接替了指挥位置，颜龙斌在率部冲击时右臂受重伤，王震当即命令旅卫生部长一定要保住他的性命。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颜龙斌的右臂硬是被锯了下来。战士们含着眼泪要用担架抬着他转移，但他死也不肯给已疲劳至极的战士增加负担。颜龙斌以惊人的毅力跟随部队继续作战。突围部队到达陕西西南部时，因伤口被雨水浸透而严重感染的颜龙斌摇摇晃晃地倒下了。安葬颜团长的时候，王震说："他这样的人，天不怕，地不怕，敌人见他就发抖！"

就在王震部在鲍峪岭与国民党军激战的时候，李先念部遭遇了胡宗南部队的阻击。蒋介石担心李先念的部队"占据陕南，控制关中，影响陕北"，于是连续三次电示胡宗南："务于荆紫关以南将李部包围歼灭。"胡宗南的整编第一师一旅横在了李先念部进入陕南的路上，而在中原军区官兵的身后，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师和整编十五师正在逼近。李先念说："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拿下对面的这道山梁。"在向陡峭的山梁发起拼死冲击的时候，三十七团官兵在炽热的火网前一批又一批地倒下。一营教导员薛国斌腹部迸裂，肠子流了出来，倒在地上依旧呐喊不止。陡峭的山梁上没有树，官兵们把刺刀插进岩缝一寸寸地向上攀爬，在距离敌人阵地只有十米远的时候，官兵们投出了成捆的手榴弹。这个让中原军区官兵血流成河的地方叫南化塘，位于湖北与陕西的交界处。整整四十一年后，这里竖起一座"南化塘革命烈士纪念碑"。李先念重回此地，想及牺牲在这片土地上的年轻官兵，他说："经南化塘激战，中原突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国民党军飞机沿着中原军区部队的突围路线撒下这样的传单：

中共中原军区李司令鉴：

第九执行小组及三十二执行小组业于七月二十三日到达西安，决做和平最后之努力，务请将军接到此信后，即刻发电与九小组贵方代表取得联络，同时派能全权负责之高级官一员

于七月二十八日前来龙驹寨或者西安谈判停战及驻地给养等问题。如贵司令亲自来此，则更觉光荣，除请政府代表通知第一线，允许通过及保护外，盼先电复。专祝平安！

第三十二执行小组

七月二十四日，李先念看到这一传单。鉴于中原军区突围部队已十分疲惫，加之不断的战斗导致伤亡过重，还有就是那些与大部队失散的小股部队生死不明，李先念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利用这一机会促成暂时停战，以利部队恢复战斗力。尽管对国民党方面的谈判诚意心存巨大的怀疑和警惕，但是为了生存，中央还是同意了李先念部提出的恢复谈判的请求。延安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处长周子健前去联络，以表明共产党方面愿意谈判，“唯须国民党停止追击中原军”。但是，胡宗南的十几万大军已经做好了进攻延安的准备，国民党方面根本不想再与共产党方面商谈停战，周子健到达军调部第三十二执行小组时，国民党方面根本没让他进入会场。由于联络不畅，中原军区的领导并不知道周子健遭遇的情况。八月初，李先念部派出了谈判小组成员，他们是：中原军区干部旅旅长张文津、干部旅政治部主任吴祖贻和毛泽东的侄子毛楚雄。

毛楚雄是毛泽覃烈士的遗子。一九三四年中央红军离开苏区长征后，毛泽东的小弟毛泽覃被留下，六个月后，他在瑞金附近的红林山战斗中牺牲。毛楚雄从小由年迈的外婆抚养。一九四五年七月，王震率三五九旅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毛泽东特别相托王震路过湖南时把毛楚雄带到队伍上。现在，部队在转移中生死未卜，谁也无法预料前面还有什么样的险境，王震担心毛楚雄的安全，建议他以谈判代表的身份从敌人的重围中转移出去。但是，十九岁的毛楚雄和张文津、吴祖贻离开部队后，在前去西安的路上，被胡宗南部在宁陕县东江口镇附近扣留。李先念和王震闻讯，立即请求中共中央设法营救。尽管周恩来、叶剑英等人想尽一切办法，包括向国民党方面提出抗议，并发动舆论界广泛呼吁，但胡宗南部始终矢口否认。从此，张文津、吴祖

贻和毛楚雄三人再也没有了任何消息。三十多年后，经过坚持不懈的调查，真相才得以弄清：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深夜，国民党军六十一师一八一团少校团长韩清雅奉胡宗南之命，将张文津、吴祖贻和毛楚雄三人活埋于东江口镇城隍庙背后石坎下的水渠边——成都军事法庭一九五三年的历史案卷中，存有韩清雅的供词以及他被处决的记载。

中原军区的官兵转战在深山中，粮食断绝，李先念因犯胃病口吐黄水，只好将一根绳子捆在腰上，让骡子拉着他往前走。王震部的官兵也是断粮数日。在一条山沟里休息的时候，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乡前来哭诉，说有官兵把他没有长熟的洋芋挖出来吃了。身体虚弱的王震猛地抓起身边的步枪朝天连续射击。警卫员李树森正好拿着一把准备打草鞋的草从王震身边走过，盛怒中的王震抄起一根棍子朝他的屁股打去，边打边喊："你也犯群众纪律！"警卫员争辩说："我没犯群众纪律，你看这是草啊！"王震说："草也不行！"官兵们一边把李树森拉开，一边给那个老乡赔钱。王震亲自给老乡写了张字条："一九四六年七月，三五九旅路过此地，把这家老乡的东西吃光了，革命胜利后加倍偿还。"写完了他觉得还不放心，又写了张布告贴在树干上："本纵队全体同志，务必遵守群众纪律，真正做到秋毫无犯，违者枪毙。"部队继续前行的时候，王震站在路边的一块岩石上，对着衣服破烂、鞋不裹脚的官兵们说：

> 我们革命战士今天为什么这样苦？这是因为中国人民身受的一切苦难，都集中表现在我们身上来了。为了解救苦难的中国人民，我们要咬紧牙关，奋勇作战，杀出一条血路，让中国人民永远摆脱苦难！

中原突围"拉开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序幕"。

为了民族摆脱苦难而先承受苦难，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面对的规模巨大的战争由此开始了。

## “蒋若攻李，粟必攻蒋”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李先念部开始中原突围的那一天，四十二岁的李默庵赴无锡接任国民党军第一绥靖区司令官一职。

这个在国民党军内颇具声望的将领心里十分清楚，在这种敏感的时刻，他所到任的战区将面临一场怎样的作战。

黄埔军校一期学员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又文又武李默庵。”李默庵出生于湖南长沙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虽求学艰苦但学业优异，十九岁那年考进黄埔军校一期，他的同学有徐向前、陈赓、关麟征、胡宗南、宋希濂、贺衷寒、左权等人，这似乎预示着他未来的军人生涯将与共产党人有扯不断的关联。在黄埔期间，他和共产党人关系密切，甚至一度加入过共产党组织。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东征时，他在第一军六十团当过党代表，该团团长是共产党人叶剑英。一年后，国共决裂，他奉命率部攻击红军鄂豫皖根据地，对手是昔日的黄埔同窗徐向前。抗日战争中，他在卫立煌的麾下作战，在山西战场又与他的同窗共产党将领左权重逢，并一起参加了惨烈的忻口作战。

此刻，国防部向他下达的作战任务是：攻击并占领苏中和苏北解放区。

刚刚把首都从重庆迁回南京，蒋介石忙得连回家的时间都没有，况且他还没有“家”，夫人宋美龄正在军政官员的陪同下，在南京城里到处物色安家的房子。除了出席包括孙中山陵墓祭奠仪式在内的各种社会活动之外，蒋介石还要处理复杂的外交事宜以及更加复杂的国共关系，接见来自各战区的军队将领和南京的各界人物，这些人物中包括抗战时期“敌后工作的杰出人士”——收编汪伪政府遗留下来的数量巨大的军队，必须依靠和收买伪政府中的实力派。蒋介石有些体力不

支，但依旧兴致很高。当他应夫人的请求终于回家的时候，心情一下子恶劣起来：宋美龄选中的房子，竟然是汪精卫的别墅。虽然在政治上对伪政府大员采取灵活策略是为了国家的前途大业，但一国首脑堂而皇之地住进伪政府主席的房子里成何体统？最终，蒋介石还是向夫人让步了。他住进这座舒适的别墅里，开始思考对共产党军队的作战问题。此刻，在这片国土上已经形成多条进攻战线，而距离南京最近的战场尤其重要，如果不能把盘踞在身边的共产党军队消灭，无论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都无法安然入睡。

与南京一江之隔，是共产党人的苏中和苏北解放区。

这片南靠长江的富庶的河网地带，是抗战时期新四军的根据地。这一地区含苏中、苏北、淮北、淮南，面积近十一万平方公里，人口两千多万，拥有城镇二十三座。新四军军部设在淮阴。这里盛产粮食、棉花、食油和海盐等重要物资，纺织业和商业都很发达，生存环境十分优越。抗战胜利之后，特别是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国共双方签署停战协定后，这里度过了一段和平的时光。但是，即使暂时没有军事冲突，这片解放区不论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对国民党统治中心区域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就在中原枪声骤起的时候，这里的军民立即意识到，他们已经处在与国民党军对峙的前哨位置了。

当时，国民党军已经越过长江，占领了南通、江都、扬州等城市，但黄桥、如皋、海安等地依旧在共产党人手中。在两军隔江对峙的地段，往来于长江上的船只，国民党军方面的只能靠南边行驶，航道北边的江面由共产党人控制，双方仅为行船问题就摩擦频起，这让“南京政府感到极不安全，面子上也很不好看，所以，下决心要攻占苏中、苏北”。

李默庵一上任，就着手准备作战。他认为进攻还是有胜算把握的，因为对手只有两个师和两个纵队，共计十九个团，兵力三万多

人，而他可以指挥的部队有五个师、两个旅，外加两个交通警察总队，兵力已达十二万人以上。而且他的部队装备优良，完全可以不把武器简陋的华中野战军放在眼里。在无锡召开的作战会议上，整编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更是信心百倍：“我的部队没有问题，一个团就可以和共军干一下！”李默庵突然想到，自己的部队存在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谁也没跟共产党军队真枪实弹地干过。而他自己有过与红军作战的经历，知道对共产党军队绝不可低估。所以，他告诫部下，共产党军队作战灵活，而且善于发动百姓，各部队之间要密切合作，力求稳扎稳打获得全胜。李默庵唯一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回，国民党军要深入到解放区内作战，而正是这一点将使他们面临在劫难逃的厄运。李默庵要求他的师长旅长们好好研究一个人——抗战时期，日军在南京设有专门研究这个人作战特点和规律的小组，但是直到战争结束也没有研究出任何眉目来——这个人就是第一绥靖区部队将要面对的作战对手：粟裕。

李默庵从陆军总司令顾祝同那里听到过对于粟裕描绘：个子不高，文质彬彬，寡言少语，面带杀气。抗日战争期间，顾祝同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粟裕部曾在他管辖的战区发动著名的黄桥决战。一九四六年三月，国共停战调处期间，时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的顾祝同曾与粟裕吃过一次饭。粟裕灰色军装，中将军衔，席间既不举杯，也不碰那些山珍海味。顾祝同陪着笑脸劝了半天，粟裕才说他要一盘炒辣椒。一碗米饭就着一盘炒辣椒吃完，粟裕又恢复了正襟危坐。顾祝同说：“粟将军，你很会打仗！”粟裕说：“这是讹传。我打的每一个胜仗都是毛主席的英明指挥和战士们英勇战斗的结果，我只是一名承上启下的执行者而已。”

一九四六年六月中旬，得知中原即将爆发军事冲突的时候，粟裕公开对新闻界表示：“蒋不攻李，粟不攻蒋；蒋若攻李，粟必攻蒋。”——几乎是话音刚落，中原李先念部突围的消息传来了。

敌人进攻在即。

粟裕与毛泽东在如何应对国民党军进攻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毛泽东的来电显示，中央的战略设想是：如果国民党军发动大举进攻，山东、太行两解放区主力部队即刻“实行外线出击”，从解放区内向南打出去。太行部队的主要作战方向是豫东，攻取陇海线开封至徐州段的重要县城，相机占领开封；山东部队的主要作战方向是徐州，攻取津浦路上徐蚌（蚌埠）间以及陇海路上黄（黄口）徐间的各要点，相机占领徐州；而苏中部队攻取蚌浦（浦口）之间的铁路线，“策应北面作战”。然后，“以太行、山东两区主力渡淮河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之线前进”。将战线放置在外线的意图是：在交战之初就把战火引向国民党统治区，这样不但可以避免解放区遭受损害，还可以作战的胜利开辟出新的解放区。同时，我军着重向南，国民党军着重向北，相反的作战方向“可将很大一部蒋军抛在北面”，令其在南北两面都“处于被动地位”。根据这一战略设想，在李先念部开始突围的六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给华中局的指示是：粟裕率主力兵出淮南，配合山东野战军主力，攻取蚌埠至浦口间铁路，“歼灭由浦口北进之敌”。

中央的外线作战设想，充满了迎敌而上与之决战的气势。如果仅从这个角度审视，在保证后方的前提下，大规模出击攻敌要害，战略上无疑是正确的。但问题是，苏中部队如此倾巢出动，一旦作战陷入僵持，甚至是战场失利的话——从当时双方作战实力对比上看，这种可能性极大，而后的战争进程也证明了这一点——不但作战力量会受到巨大损失，而且身后的解放区也将不保，共产党人将陷于极大的被动。

粟裕也许没有想到中央的战略设想可能给全局带来的不利后果，但是他至少意识到华中野战军主力转往外线作战凶多吉少。因为如果按照中央的设想，主力部队开赴淮南作战，不仅每天需要的十万斤粮

草需要苏中解放区供应，就连支前的民工也需要由苏中解放区供给。主力部队走后，面对国民党军的重兵攻击，留守部队很难确保解放区不被攻占。地富人稠的苏中解放区一旦沦入敌手，不但立即可为敌人利用，淮南的作战也将失去后方保障。而"淮南战局万一不能速胜"，苏中部队将处于进退两难之中。且苏中大部分地区为河网地带，一旦被敌人占领夺回将会异常困难。更何况，驻守淮南地区的是国民党军最精锐的"五大主力"之第五军和第七十四军（国民党军整编后，第五军和第七十四军皆对外称"整编师"）。强敌在前，又有后院失火之危，胜算有几?

六月二十九日，经过慎重考虑，华中局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和粟裕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和新四军总部，提出华中野战军主力不出淮南外线，坚持苏中内线作战以牵制敌人，待山东与太行部队完成第一阶段作战后，华中野战军主力再前至蚌浦铁路线间，配合山东部队作战，最终完成中央的战略设想。毛泽东接到电报后，经过认真考虑，回电同意苏中部队暂缓调动，待与陈毅商酌后再作决定。

此时，国民党军已在山东、徐州、河南同时发动了攻势，蒋介石要与共产党人全面开战已不容置疑。七月四日，毛泽东改变了原来的战略设想，致电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及华中局："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这是解放战争初期共产党人重要的决策转变，它将影响和决定未来的战争走势。当强大的战争对手开始猛烈进攻的时候，在军力对比中还处于劣势的共产党人，不惜承担解放区遭受巨大损失的风险，毅然决然地将战争引入解放区内部进行，这不但在政治上是主动的，而且从军事上讲解放区也是一个理想的战场。粟裕晚年回忆道："我们部队营以下干部、战士基本上都是土生土长的；即使是团以上干部，虽然大都是外地干部，但是由于长期在苏中地区坚持，坚持了八年抗战，与人民结成了血肉关系，与地方党政关系也是很融洽，很密切的……大家曾经是生死与共，艰难困苦

都是一道的，这是我们一个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部队对于当时的地形、地理、道路、人情、风俗习惯都很熟悉，这对我军作战也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同时，我军的补给无所谓什么交通线很长的问题，到处都是我们的后方，到处都可以安置我们的伤病员，到处都可以得到补给，所以我们没有后顾之忧。”

七月九日，李默庵在常州又一次召开作战会议，会上确定七月十三日向苏中解放区发动进攻。但是，七月十二日，李默庵突然接到蒋介石暂时停止进攻的命令。原因是第一绥靖区的绝密作战计划不知什么缘故竟然到了马歇尔的办公桌上，马歇尔直接质问蒋介石这个向共产党军队进攻的计划是否属实？更严重的是，这份作战计划同时也到了粟裕的手上——在粟裕晚年撰写的回忆文章中，清楚地记载着他得知李默庵作战计划的时间是一九四六年七月十日——居然比马歇尔还早了一天。在那个万分敏感的时刻，绝密作战计划是如何泄露的？又是什么人泄露出去的？李默庵说“事后我始终也没有查清楚”。

绝密作战计划的泄露，导致国民党军没能按时发动攻击，而粟裕却因此先发制人了。十三日黄昏时分，让李默庵吃惊的消息传来了：粟裕部主力已经完成向宣家堡、泰兴方向的集结，准备对李天霞的整编八十三师进行攻击。

在解放战争初期有着重要影响的“苏中战役”开始了。

粟裕之所以选择宣家堡和泰兴为首攻目标，是有政治考虑的。宣家堡是停战协定生效后国民党军侵占的，泰兴则是停战协定即将签署时国民党军抢占的。而从军事上讲，驻扎在宣家堡的十九旅五十六团和驻扎在泰兴的十九旅五十七团，孤单地突出于整编八十三师的整个战线上，而且都因轻敌而工事不坚，苏中部队一旦拿下，便可以扩大泰州与南通两路国民党军的间距，有利于下一步作战。

粟裕在攻击正面投入了六个团的兵力。华中野战军第一师的一个团迅速扫清宣家堡的外围，第六师的三个团同时对泰兴发动围攻。战斗一开始，李默庵打电话给李天霞询问情况，李天霞报告说："这两个团战斗力都不错，两个团长打仗有办法，请司令官放心！"但是，没过多久，他就接到"共军已经攻入城内，正在展开激烈巷战"的战报。李默庵立即命令李天霞派部队前往增援，但增援部队受到猛烈阻击而无法前进。十四日，持续攻击宣家堡的华中野战军第一师将攻击兵力增加到三个团，经过巷战歼敌大部，少量外逃者被外围的打援部队截击。同时，攻入泰兴的第六师在增强了一个团的攻击兵力之后，将守军大部歼灭，残余守敌退守核心阵地抵抗待援。此时，增援的国民党军整编六十五师已经逼近，粟裕遂命令部队结束战斗向东撤离。

国民党军整编八十三师，是整编前的国民党军第一〇〇军，抗战期间参加过长沙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以及湘西会战。全副的美式装备，是战斗力很强的中央军嫡系部队。李默庵百思不得其解：粟裕首战为什么要选择战斗力最强的这支部队？粟裕说："首战打这个强敌是否没有根据？不，这个部队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骄傲，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我军敢于主动向他们进攻，并且到他们的进攻出发地去打。我们定将收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奇效。"

果然。听说粟裕打的是整编八十三师，毛泽东直接打电报给粟裕："是否即八十三师？该师消灭多少？尚存多少？"粟裕回电："歼敌整编八十三师敌十九旅的两个团和旅属山炮营及六十三旅的一个营，共计三千余人。"

李默庵也在急切地询问战斗结果，但李天霞师长的描述有点轻描淡写，只是说他的两个团吃了一点亏，但建制还在并没有大碍。此时，李天霞还不知道，跟随他多年的十九旅五十七团团长钟雄飞已经被俘。四十多岁的钟团长是个又高又胖的湖南人，身为小小团长佩戴

的却是少将军衔，这在国民党军中实属罕见。日本投降后，他因率部偷袭泰兴成功，被委任为泰兴县县长。这个声称崇拜“闪电战”的团长兼县长被俘后一直不服，不断地唠叨说，打仗应该是一个团对一个团，人海战术算不得本事。看管他的共产党干部始终不吭声，他唠叨一句，那个干部就用手指一下贴在大门上的三个字：战俘营。

既然已经打起来了，李默庵立即重新部署作战。他判断集中在宣家堡、泰兴一带的粟裕部主力损失不小，不经休整无力再战。于是急令整编四十九师为主攻部队，由师长王铁汉率二十六旅和七十九旅星夜兼程奔袭如皋；整编六十九师九十九旅于泰兴方向助攻，整编六十五师师长李振率部在其右后跟进；李天霞的整编八十三师则向海安方向进攻策应。李默庵的作战目标是：拿下如皋，三路夹击，合围粟裕部主力。

但是，当王铁汉的整编四十九师两路迂回，对如皋形成两面夹击之势时，侧后突然枪声大作，有报告说攻击整编四十九师的是粟裕部主力。李默庵一时间不知所措。从地图上看，宣家堡到如皋，直线距离至少一百五十里，在宣家堡刚刚打完仗的粟裕部主力，怎么能如此迅速地移动到如皋并开始新的攻击呢？但是，情报是准确的。粟裕以多敌四倍的兵力将整编四十九师包围了。

宣家堡、泰兴的战斗还在进行的时候，粟裕就盘算下一步如何动作了：如果转身打增援而来的九十九旅和整编六十五师，优点是时间充裕，打的又是远道而来的疲惫之敌；缺点是来敌警惕性高，打不好在战场形成僵持，如皋也可能丢失。而如果迅速移兵，插到向如皋奔袭的整编四十九师的身后，优点是具备突然性，缺点是官兵在已经疲惫的状态下还要长途奔跑。粟裕的最后决定是：打整编四十九师。命令一下，官兵们立即开拔。皓月当空，夜风习习，路边传来水车灌田的声音。天亮的时候，华中野战军第一师截断了整编四十九师的退

路，并开始攻击二十六旅的侧后。第六师从另一个方向攻击七十九旅，第七纵队则从如皋东南方向包抄而来。

李默庵不断地收到请求增援的报告，在命令各部队坚持下去的同时，他亲自与空军方面联系请求助战，但是王铁汉率领的整编四十九师直属队和二十六旅还是崩溃了。这个地方的地名叫鬼头街，王铁汉觉得自己确实碰上鬼了。他在报话机里往哪个方向调动部队，共产党官兵就往哪里打，原来他的报话机的通话频率被粟裕的指挥部寻找到并且对接上了。最后时刻，他带着少数官兵突出重围。王铁汉，辽宁人，时年四十一岁，东北讲武堂毕业，在东北军中当过连长、营长、团长，抗战中他因率部在上高战役中重创日军得以晋升。从苏中战场逃脱后，他再也没有卷入内战，回乡当了一段辽宁省主席，然后去了台湾，以潜心撰写东北军史料为晚年寄托。

遭到围攻的七十九旅依托有利地形支撑着，旅长乔文礼不断打电话要求增援。自二十一日起，增援部队整编四十九师一〇五旅、整编八十三师和整编六十五师相继到达战场。

二十三日拂晓，粟裕下令放弃攻击，向如皋以北撤退。

据粟裕部统计，此战“歼敌整编第四十九师的一个半旅，连同阻击中消灭的敌人，共歼敌一万余人”。华中野战军伤亡也达五千以上。

李默庵的说法是，此战虽然受了点损失，但已达到作战目的，即占领了如皋。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亲临南通祝捷，并与李默庵一起策划了向海安攻击的计划。

如皋以北的海安东临黄海，西达扬州，南望长江，北通淮中，是苏中重要的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大敌当前，是守是弃，粟裕不能单独决定，必须与华中局和华中军区的领导一起商讨。但是，从海安到

华中局及军区机关所在的淮安，直线距离就有一百八十多公里。粟裕带着一名警卫员即刻上路，他使用了一切可能利用的交通工具：先骑摩托车经盐城到湖垛镇，然后在水网纵横的乡间小路上跑步前进，半途弄了一辆自行车，但不久自行车就散了架，又雇了一辆黄包车，黄包车跑到一条河边，河上的桥断了，又被迫改乘小船，船无法行进的时候，上岸继续跑，一天一夜后居然到达了淮安。经过商量，华中局和军区领导认可了粟裕的意见：即使决心固守海安，面对敌人强大的进攻力量以及充足的后备力量，最后还是要被迫撤出。但这样一来，部队将付出巨大的伤亡。因此，在适当的时机撤出海安是必要的。粟裕说："战争的胜败，决定于双方人力、财力、物力消长的对比，特别是人民站在哪一边，那一边最后是要胜利的，而不在于一城一地一交通线的暂时得失。"会议最后决定：在海安"实施运动防御，而后主动撤离，创造新的战机"。具体计划是：第七纵队负责海安防御，主力部队乘机休整。

第二天，粟裕返回海安前线。

海安外围防御战从七月三十日打到八月三日。粟裕后来回忆道："第七纵队从苏中地方武装上升主力不久，补充了大量的解放战士，所属四个团只有一个团打过大仗。但是四天多的战斗，他们只用了三千多兵力，英勇抗击了五万多敌人的轮番猛攻。敌人兵力集中，炮火浓密，但第七纵队作风顽强，指挥灵活，奋战四天多，伤亡仅二百余人，杀伤敌军三千余人，创造了敌我伤亡十五比一的新纪录。仅七月三十一日夜对敌人的巧妙袭扰，就使敌军消耗了炮弹万余发。八月三日，海安运动防御战胜利完成任务，第七纵队主动撤出海安。"

李默庵说："我部似乎没花费什么力气。经过两天时间，打了一下，整编第六十五师便占了海安，第一〇五旅占了李堡。从作战计划上来说，我部达到了目的。"李默庵不知道，他的部队在海安打得昏天

黑地的时候，华中野战军三万多官兵正在距海安不到十公里的地方休整待命。

粟裕在等待出击的时机。

占领如皋、海安之后，李默庵认为粟裕部大势已去，开始调整部队建立防御线。驻守海安的新编第七旅十九团附属炮兵部队奉命前去李堡，接替原本驻守在那里的一○五旅的防务。十九团一出发，粟裕立即意识到："歼敌良机已到。"十九团到达李堡，警戒还没布置，就遭到粟裕部的分路围攻。两个小时之后，十九团仓促构成的防御阵地被突破，团长介景和带领残部突围未果。拂晓时分，十九团被全歼，介景和只身逃脱。而奉命向李堡增援的第七旅二十一团在一条两边都是玉米地的路上遭到伏击，正是玉米成熟的季节，道路两边的玉米秆高叶密，国民党军看不清四周的任何地形，伏击战打响后不到一个小时，二十一团便溃败了，旅长黄伯光在卫兵的掩护下逃回海安。

此战，新编第七旅损失九千多人。李默庵很是心疼，更让他恼火的是，尽管自己派出大量的便衣侦探四处搜集军情，但根本无法在当地百姓那里得到真实情报，致使自己对粟裕的三万人马在眼皮底下休整一无所知。新编第七旅副旅长田从云被俘后，向第一师副师长陶勇抱怨说："老百姓躲开倒也罢了，遍地是民兵，分不清哪个是兵，那个是民，到处打冷枪，到处抓我们的谍报人员，捉得一干二净，去一个捉一个，去两个捉一双。我们都成了睁眼瞎，哪能不打败仗。"

由于兵力受损，李默庵放弃了建立防线的计划，决定固守已经占领区域。但是，八月二十一日，占领区腹地内的交通警察部队突然受到攻击，攻击他们的还是粟裕部主力。仗打成这样，李默庵简直是摸不着头脑了。三万多人的队伍在自己的防区里行军，怎么会如此无声无息？大部队半夜穿越村庄，怎么连狗都没有叫一声？真是让人匪夷所思。攻击开始的时候，李默庵打电话询问战况，指挥官的回答都是

没什么要紧的，打上一两个小时就没事了，但是很快电话就不通了。这场袭击战被粟裕称为“钻到敌人肚子里去”。由于打的是由抗战期间的“忠义救国军”改编的警察部队，因此战斗干净利索，一天一夜的激战之后，歼敌三千多人，缴获大量的美式卡宾枪和机枪。

接着，李默庵在苏中受到的最大的打击来临了。

“苏中战役”的最后一战不仅让李默庵晕头转向，而且让他真正尝到了与粟裕作战的苦果。战斗是由国民党军第五军进逼苏中解放区首府淮阴引发的。当时第五军已占领睢宁，那里距淮阴仅一百多公里，“为策应第五军作战”，驻守扬州的整编二十五师奉命“沿运河北上”，攻击江都县的邵伯镇。本来以为粟裕必救邵伯，但在调动部队的时候，驻守黄桥的整编六十九师九十九旅正准备东进如皋，华中野战军却突然从公路两侧冲了出来。战场情报显示，还是粟裕部的主力。粟裕不去增援受到攻击的邵伯，为什么突然出现在黄桥附近？九十九旅旅长朱志席是黄埔第三期毕业生，北伐期间李默庵任团长时曾是他手下的一名排长。李默庵万分焦急，命令驻守海安的整编六十五师火速增援。但是，增援的六十五师一八七旅和七十九旅的一个团在距离九十九旅仅仅几公里的地方不但受到猛烈阻击，而且部队因被分割而联络中断。李默庵又急令二十五师派出部队乘汽车前往黄桥附近解救九十九旅。救援部队还没到达，九十九旅已全军覆灭，旅长朱志席被俘。增援的一八七旅和七十九旅的一个团也大部被歼，仅有部分官兵逃回如皋。攻击邵伯的整编二十五师从二十三日战至二十六日，依旧没能取得突破。邵伯地区河网纵横，攻击部队很难展开，九十九旅被歼的消息传来后，“二十五师深受震动”，战斗已是难以取胜，被迫撤出战场返回扬州。到这个时候，李默庵才发现自己上了粟裕“围魏救赵”的圈套。此战，不但邵伯没有占领，而且损失官兵五千余人，被俘一万两千有余。

“苏中战役”结束了。

李默庵后来说：“双方作战目的不一样，各自评价也不一样。我当时奉命作战目的主要在于收复地盘，以占领城市，驱走解放军，维护占领区的安全。所以，尽管损失了一些部队，但最终收复了盐城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保障了浦口至南京的铁路以及长江下游的交通，解除了解放军对南京政府的威胁。”同时，李默庵不得不承认粟裕也是胜利者：“从解放军方面看，他们作战的目的，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以歼灭我有生力量为主。经过几次战斗，粟裕部以较少的代价歼灭我较多的部队，从这一点上看，粟裕部也是胜利的。特别是他在指挥作战中的卓越的指挥艺术很值得总结。”

李默庵没有想到或是难以言表的是，国民党军队闯入解放区作战，必然会面临举步维艰的处境。苏中战役中，解放区民众提出了“保田保家”，甚至“毁家纾难”的口号。在三万多人的华中野战军主力部队身后，直接参与战斗的解放区百姓达到十四万人，支前民工人数更是高达五十多万。整个苏中战役期间，始终有一万多条转运粮食、弹药、兵员和伤员的民船跟随华中野战军穿梭于稠密的河网中。解放区的百姓在战火中不惧生死，不少人和官兵们一起倒在泥泞之中，倒在枪弹炮火之中。侥幸从战场逃脱的国民党军新编第七旅旅长黄伯光在给上级的报告中说：“地方民众不问男女老幼皆为匪之军民，到处袭杀国军”，“我国军处处受袭，人人被俘，除少数外，无一漏网”。

苏中战役无疑是粟裕军事指挥生涯中的杰作之一。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史上，这场战役被称为“七战七捷”。战后，毛泽东亲自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发至各战略区首长；

……我粟（粟裕）谭（谭震林）从午（七月）元（十三日）至未（八月）感（二十七日）一个半月内，作战六次（当时延安还没收到第七次作战报告），歼敌六个半旅及交通总队五千，造成辉煌战果。而我军主力只有十五个团，但这十五个团是很充实与很有战斗力的，没有采取平均主义的补充方式。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故战无不胜，士气

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优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并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

只是，苏中战役并没有缓解解放区面临的严峻局面，苏中解放区的重要城镇不断丢失，面积也在不断缩小。共产党人的重要战争原则是：以消灭对手的有生力量为目标，而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但在内战爆发初期，在国民党军的猛烈进攻下，解放区的大片丢失给共产党人带来了巨大危机，因为解放区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

就在苏中战役进行期间，集结于山东胶济铁路沿线的国民党军五个军十五个师共十五万人，在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的指挥下，向山东解放区展开了大规模进攻。虽然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叶飞部、胶东军区许世友部等进行了顽强阻击，但国民党军队最终打通了胶济铁路，山东解放区的军事要点相继丢失。山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计划大军南下淮北，在徐州附近寻找战机打几个胜仗，以迟缓国民党军对山东的全面攻击。此时，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正在胶济线上阻击王耀武部的攻击，能够南下淮北的部队只有韦国清的第二纵队、谭希林的第七师以及何以祥的第八师，会同已经位于淮北的华中野战军张震的第九纵队，总兵力五万余人——从内战初起的那一刻起，位于华东和华中地区的陈毅部和粟裕部，实际上分别在苏中、山东和淮北三个方向上抗击着国民党军的进攻，这种违背共产党人集中优势兵力的现象，虽是因为保卫解放区的形势所迫，但面对强大的作战对手，分兵堵口的局面使危机从一开始便不可避免——大雨滂沱，淮北的河网地带一片汪洋，山东野战军在朝阳集地区与国民党军接战。陈毅部以绝对优势兵力包围的是国民党军整编六十九师九十二旅。九十二旅以抗日战争中参加台儿庄会战和长沙血战而闻名，但他们同样受到连日大雨的困扰，防御工事因遍地泥水无法修筑，结果，大雨中的交战只持续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清晨。九十二旅丢弃全部辎重开始突围，散乱的部

队在泥泞的田野上被陈毅部的三个团追歼，最终仅旅长艾瑗带着少数卫兵逃离战场。

但是，接下来的泗县战斗却以陈毅部的严重失利而告终。

按照原定计划，山东野战军准备攻击陇海线上的国民党军，但是这一线的国民党军四个师紧紧靠在一起，令山东野战军无从下手，于是改打驻守泗县、灵璧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第七军一七二师的两个团。作战命令即将下达的时候，华中分局来电提醒：一七二师是战斗力很强的桂军，与桂军交手需慎之又慎。陈毅认为，集中十九个团打两个团，哪有不能取胜的道理？况且担任主攻的第八师有攻坚作战的经验，如果拿下泗县，就可以继续向徐州方向攻击。接着，毛泽东也来电，嘱咐雨季作战要小心谨慎。只是，攻击泗县的命令已经下达。

山东野战军的十九个团在没膝的雨水中急行军，在病员和掉队者甚多的情况下逐渐向泗县靠近。连日的大雨使环绕泗县的五条河流全部暴涨，河水四溢令又深又宽的城壕变成危险的阻碍，山东野战军的火炮因大水阻隔无法运到战场。第二纵队主力为截断泗县与外界的联系，迅速控制了灵璧公路上的一个要点——这个要点是一座古墓，据说里面埋葬着西楚霸王的那个名叫虞姬的美丽女人。泗县成为孤城之后，第二纵队的一部与第八师、第九纵队一起开始了攻击。尽管主攻部队有攻坚的经验，但是却没在大水中冲锋的经历，官兵们冒着城墙上射来的密集的弹雨，跳进深不可测的城壕游向城门，他们无法携带攀登城墙用的梯子，身上的炸药和手榴弹也都被浸湿。在各个方向的攻击部队相继靠近城门的时候，桂军的反击开始了。桂军先用炮火割断山东野战军攻城部队间的联系，然后以连排规模分成若干突击方向猛烈冲锋。浑身湿透、立足未稳的攻城官兵无法形成有效的反击。第八师二十二团二营向城外突围时，因退路被火力封锁出现很大伤亡；

九纵七十七团一营的军事干部全部伤亡，七连只剩下一个班长在指挥作战；七十三团的干部在战斗前全都写了绝死书，但他们还是无法想象战斗进行得如此惨烈：携带的机枪泅水时已丢失，能拉响的手榴弹也用光了，后续部队被大水阻隔上不来，官兵们只有与敌人进行肉搏战。陈毅曾对桂军有过如下描述：“两广军队是很顽强的，是蒋军中战斗力最强的，硬不缴枪，真是蛮子蛮打，非打死不缴枪。伤兵还拿枪打你，伙夫挑起担子逃跑还骂‘丢他妈’。你捉他，他放下担子就用扁担打。他们不做工事，一到村子排长就用刺刀在围墙上画几个圆圈，以重机枪架起来打，通通通就成了枪眼儿。十多分钟就把阵地摆好，射击很准确的。他们都是老兵，有的营、连长还是大时代的黄埔学生。他们封建团结很厉害，他们说：‘广西人打败仗就没饭吃，打胜了老蒋还要我们。’他们战术好，可是纪律很坏，打开每个碉堡都关着三四个老百姓姑娘。我们消灭他一个班，打垮一个碉堡，要伤亡二三十人；消灭他一个营要伤亡四五百人，消灭他一个团要伤亡近千人，非常吃劲，要付相当代价。”

战斗进行到第三天，泗县仍无法攻克，陈毅遂命令部队撤离。

对泗县的攻击令山东野战军主力遭受很大损失。

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军集中重兵，在苏中、山东和淮北三个方向上同时并进。由于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受到威胁，山东野战军一纵前去守卫，兵力单薄的鲁中解放区很快就被国民党军攻占。而在苏中地区，尽管粟裕部的成功歼敌迟滞了国民党军的进攻，但是解放区内部已消耗很大，兵源补充逐渐困难，在国民党军的持续进攻下，粟裕部难以再守。身在淮北地区的陈毅对去苏中还是回山东难以抉择，就在他与粟裕电报商讨未果之时，坏消息再次传来：国民党军向苏皖解放区首府淮阴开始了大规模进攻。淮阴无论如何不能失守，陈毅和粟裕立即部署保卫淮阴的作战。但是，陈毅部主力的正面有国民党军的

阻拦，部队被缠在战场无法迅速脱身；粟裕部主力远在海安，距离淮阴至少有两百公里的路程，且一路上全是河网地带，雨季里道路泥泞不利行军，临时又无法调集大量船只。因此，无论是陈毅部还是粟裕部，都无法迅速集结形成作战能力。

向淮阴进攻的是国民党军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虽在整军后对外称师，但整编七十四师实力堪称为军，乃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这支全副美式装备、攻击意志强盛的部队，注定要在解放战争中与共产党军队有决死之战。此时，整编七十四师攻势迅猛凌厉，华中野战军的“皮旅”和九纵奉命阻击，尽管官兵不惜生命，英勇作战，依旧无法阻挡整编七十四师对淮阴的一再逼近。“皮旅”甚至把淮阴城边大运河的堤岸扒开，将敌人的攻击路线淹成一片汪洋，但是整编七十四师的进攻还是没有停止。九月十九日拂晓，整编七十四师以两个连的兵力轻装突进，捉到一个解放军士兵并获取了口令后，国民党军冒充共产党军骗过淮阴城的岗哨潜入城内。紧接着，整编七十四师的大规模攻击再次开始。内外夹击、里应外合的作战使淮阴城内瞬间陷入混乱的巷战。粟裕于下午十六时到达淮阴前线，他在那里电告陈毅和中央，敌人突入淮阴城内的部队已达一个团以上，其后援部队还在继续跟进，而我军激战一周已十分疲劳，“且主力尚未到达，故决定撤离淮阴”。

整编七十四师攻占淮阴后，继续南进，于二十二日占领淮安。

两淮相继失守，使共产党人在整个苏中和苏北地区失去了立足之地，大片的解放区由此变成了敌后游击区。严峻的形势考验着共产党人的意志，残酷的战争考验着共产党官兵的意志。事实证明，面对强敌的进攻，分散迎敌是不行的，必须勇于舍弃一些地盘，集中兵力击敌弱处，才有可能扭转被动局面。一九四六年九月间，粟裕与陈毅经

过多次的商榷与争论，先后分别致电中央，建议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联合作战，共同坚持淮北地区以寻机歼敌。

十月十五日，中央电报：

……决心在淮北打仗，甚慰。南京息，蒋方计划，引我去山东，我久不去，乃决心与我在淮北决战。此种情况于我有利。望你们集中山野、华野全力［决不可分散］歼灭东进之敌，然后全军西渡收复运西，于二至三个月内务歼薛岳七至十个旅，就一定能转变局势，收复两淮，并准备将来向中原出动。为执行此神圣任务，陈（陈毅）、张（张鼎丞）、邓（邓子恢）、曾（曾山）、粟（粟裕）、谭（谭震林）团结协和极为必要。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你们六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返电商贻误戎机］，战役指挥交粟负责……

这就是促成解放战争中著名的“陈粟大军”，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形成的历史文献。

毛泽东的电报到达三天之后，整编七十四师从刚刚占领的淮阴出发向涟水发动攻击。此时，连续的作战失利让华中野战军官兵憋了一肚子的火，于是，他们在迎敌的时刻表现出鱼死网破的决绝态势。守卫涟水城的部队顽强阻击，粟裕调集主力星夜增援。涟水城背靠黄河，交战双方在黄河大堤上展开了反复的争夺战，最终华中野战军以六千官兵伤亡的巨大代价迫使整编七十四师放弃攻击退回淮阴。战后，张灵甫致电黄埔同窗、整编十一师师长胡琏：“匪军无论战略战役战斗皆优于国军。数月来，匪军向东则东，往西则西。本军北调援鲁，南调援两淮，伤亡过半，决战不能。再过年余，死无葬身之地。吾公以为如何？”

就在涟水战斗进行的时候，除粟裕因指挥战斗未到之外，山东野战军和华中局领导人连续召开会议总结教训。陈毅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干部的责备，他们因解放区的连连丢失而十分痛苦。陈毅诚恳地承担了责任，表示愿意接受批评。但他同时指出，和平民主是难产的胎儿，现在是胎动的关头，胎儿是命定要出来的，这时是忍痛的时候。陈毅说：

……因为我们的仗还要继续打下去，许多地方还要放弃，地区可能更紧缩……现在只有一个目的，一个方向，一个意志，一个行动。这就要求同志们服从组织，约束自己，牺牲个人的一切，直至牺牲生命。在此伟大战争中，牺牲是无上光荣的。古语说：“皮之不存，毛将附焉？”又说：“一夫拼命，万夫莫当。”现在正是拼命的时候了，是用斗争来考验我们干部的时候了。战争首先靠勇气，就是拼，其次才是战术。所以我们要提倡自我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敌进我进，挺进到敌人后方去，准备杀个七进七出。我出来时就准备三条路：胜利回去开欢迎会，打败仗开斗争会，死了开追悼会！

但是，国民党军的大规模进攻重新开始了，华东和华中地区的战局前景更加扑朔迷离，陈毅与粟裕部的命运依旧无法预料——这个地区的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军队进入了生存最困难的时期。

## 古老的中国战术和漂亮的美国帽子

自一九三八年一月，时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的邓小平就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之后，他便和著名将领刘伯承共同指挥着一支部队，直至中国共产党人夺取全国政权。这种长达十三年的牢固合作关系，在中外战争史上十分罕见。在这十三年中，“刘邓”这两个字始终并列在一起，与“朱毛”一样成为中国人叙述历史的惯常使用词汇。他们共同指挥的部队在战争中被广泛地称为“刘邓大军”，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

日本投降后，在国民党军尚未向北方调动的时候，刘邓指挥部队迅速打通了太岳、太行、冀南和冀鲁豫四个解放区之间的联系。这四个解放区地盘虽略显松散，但基本上连缀成片，共产党人称之为晋冀鲁豫解放区。位于中国国土腹地的晋冀鲁豫解放区，是当时共产党人控制的面积最大、兵力最多的区域，它东起津浦铁路，西至同蒲铁路，南至黄河南岸，北至正太铁路和德石铁路，面积达到十六万多平方公里，区域内人口两千多万，县城百余座，首府设立在河北邯郸。

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总兵力二十七万，这些兵力包括在各解放区普遍采取的军区和野战军并列的体制之

中。晋冀鲁豫军区下属四个二级军区：以王秉璋为司令员的冀鲁豫军区、以杜义德为司令员的冀南军区、以秦基伟为司令员的太行军区和以王新亭为司令员的太岳军区。晋冀鲁豫野战军下辖五个纵队：第二纵队辖四、五、六旅，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宋任穷；第三纵队辖七、八、九旅，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彭涛；第四纵队辖十、十一、十三旅，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富治；第六纵队辖十六、十七、十八旅，司令员王宏坤，政治委员段君毅；第七纵队辖十九、二十、二十一旅，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张霖芝。

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内，交会着两条重要的交通动脉：平汉铁路和陇海铁路。因此，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军在铁路沿线的重要城市和军事要点上集结了十一个整编师共三十万兵力。国民党军的作战计划是：整编五十五、六十八师守备陇海铁路开封至徐州段，并待命攻击鲁西南；整编三十、三十二、三十八、四十、八十五师于平汉铁路新乡及其以南地段，待命袭击豫北；第一战区胡宗南部的六个旅，在第二战区阎锡山部四个师的配合下，待命攻击晋南——国民党军的所谓“待命”，是指待李先念部被歼灭后再发动攻势，因为不少部队此时已经被调往中原。在国民党军部署的这条攻击线上，最薄弱的部位是陇海铁路的开封至徐州段，那里的守备部队只有整编五十五、六十八师的六个旅和一些地方保安团。

在一九四六年那个多雨的夏季里，为了牵制国民党军对突围中的李先念部的追击，为了反击国民党军对各解放区发起的大举进攻，当粟裕已经在苏中的河网地带开始主动出击，陈毅也在山东与江苏交界处的遍地泥泞中寻找战机的时候，晋冀鲁豫野战军也开始了两个方向的出击：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第二、第三、第六、第七纵队和冀鲁豫军区部队共五万人，向国民党军守备相对薄弱的陇海路开封至徐州段出击；陈赓和谢富治率领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共两万人，攻击胡宗南部已经占领的同蒲路南线的各要点。

共产党军队还不具备与国民党军进行大规模正面作战的能力，迟滞敌人进攻并打乱其军事部署的有效的手段，就是直接攻击其兵力和军火调动必须依赖的铁路线。

八月十日深夜，对陇海路开封至徐州段各要点的袭击开始。晋冀鲁豫野战军的攻击正面宽达一百五十公里，陇海铁路沿线的兰封（兰考）、民权、砀山等县城同时告急，几乎所有存储和运输军火物资的车站和列车都成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的攻击目标。杨勇的第七纵队二十旅负责攻击砀山。在旅长匡斌和政委石新安的指挥下，五十八团直接攻击东门，五十九团在炮兵的配合下将南门的城墙轰开一个缺口，突击营瞬间攻入城内。两个团分路夹击，砀山城里的两千多守军大部分被俘，砀山车站上三十多节车皮里的物资全部落入七纵之手，这些物资包括大量的弹药，四十多挺机枪，两百多辆自行车和一车皮的苹果、鸭梨和瓜子。

王宏坤的第六纵队趁夜晚雷雨交加之时潜入兰封城郊。然后，十六旅于城东和城北，十七旅于城西和城南，突然间对县城发起了猛烈攻击。担任南门攻击任务的十七旅四十九、五十团在副旅长尤太忠和参谋长赖光勋的率领下正向南门接近，迎面看见一列军车沿着铁路开来，于是三营被留下来负责解决这列军车。三营在列车经过一座铁桥的时候，拉响了设置在那里的炸药包，铁桥被炸断的那一瞬间，列车一头栽了下去，“车厢一节接一节地翻出轨外”。此时，十七旅主力已经在南门打响。兰封火车站就在南门外，车站上静静地停着两列军车。五十团二营五连长霍文炳带领士兵摸过去，发现车上有十几辆坦克和几百名国民党军官兵；再往前摸去，居然还有一列弹药车，列车的车头不断喷出蒸汽，看来随时可能开动。二营立即派人把车站外的一座小桥炸断了，然后官兵们在营长张孝烈的带领下发起攻击。国民党军立刻组织反击，坦克从列车上开下来就到处开炮，二营在猛烈的火力面前无法前进，于是双方在车站上形成僵持。十七旅炸开城门从

西南方向冲进县城。十六旅在县城专署附近与国民党军展开巷战。突然，官兵们看见专署院子里跑出一群红男绿女，个个脸上都画着戏剧的脸谱，原来战斗开始前这里正在演戏。天亮的时候，兰封城内的战斗基本结束，但是一百多匹受惊的战马满街狂奔，六纵官兵在后面紧追不舍，枪声已经停息的兰封县城依旧骚动不安。此时，只剩下南门外的车站上交战双方还在僵持。就在六纵准备集中兵力解决车站的时候，那列弹药车被流弹引爆，爆炸声惊天动地，车站内外弹片横飞，土块四溅，断断续续的爆炸竟然持续了三个小时。爆炸停息后，十七旅重新发动攻击，躲得到处都是的国民党军已无心抵抗，四百多名官兵被追赶到城郊的一个大水塘里，人人站在齐腰深的水里不知所措。

配合六纵作战的三纵八旅攻击罗王车站后缴获颇丰，令官兵们觉得在战斗中所付出的一切都很值得：一车皮美式军装，让八旅人人都穿上了布料结实的衬衣和军裤，不少干部还分到了漂亮的大衣；炊事员用美国进口的面粉就地蒸馒头，官兵们都说美国的馒头有味道；八旅还缴获了六辆美式吉普车，由于没有人会开，用骡子拉着送给了纵队首长。

但是，三纵的七旅和九旅却打得有些被动。他们的任务是攻占民权县城。情报显示，县城里只有国民党军整编五十五师七十四旅二二〇团的一个营，加上地方保安队，守军兵力不过千把人。暴雨如注，七旅和九旅经过几天几夜的急行军到达民权外围。七旅负责攻击车站，九旅主攻县城。九旅官兵发起数次攻击，都被国民党军反击回来。防御民权县城的这支国民党军，前身是西北军韩复榘的部队，抗战中参加过台儿庄会战、武汉会战、常德会战、长沙会战，但始终不是国民党军的精锐部队。可是一九四六年八月间，驻扎在民权城内的几百名国民党军却出奇的顽强。在反复的攻击中，九旅伤亡官兵已达六百多人。小小的县城久攻不下，国民党援军已经靠近，三纵不得不分出兵力前去阻击，这使得攻城的力量更显不足。在持续数日的战斗

中，九旅政委秦传厚负伤，七旅副旅长兼十九团团长刘文勇、二十三团三营营长徐仁远、二十五团一营营长苟楼德、二十六团一营教导员李义才、二十二团一营副营长苟再权等相继阵亡。在一次战斗中伤亡如此多的团营干部，第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说“这是纵队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

在武器简陋、弹药不足和战术落后的情况下，直接攻击国民党正规军导致伤亡是预料之中的。尽管解放区十万支前民工支持着战斗，两万辆大车和两万副担架始终随军作战，每天运往前线的白面就达百万斤以上，但是，这场持续了十二天的陇海路袭击战还是令刘邓部付出了伤亡五千多人的代价。

二十二日，鉴于各路增援之敌都已接近，刘邓下令部队撤离战场。

陇海路袭击战，是内战爆发后晋冀鲁豫野战军的首次出击。陇海铁路线上的危机直接迟滞了国民党军兵力和物资的调动，并迫使蒋介石从追击李先念的部队中调回三个整编师，从攻击粟裕和陈毅的部队中抽回五个整编师，从而缓解了中原、华中和山东方向的军事压力。

但是，主动出击将刘邓主力的位置和实力暴露了。

因此，撤离战场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即刻处在了国民党军的重兵合围之中。

八月二十九日，蒋介石发布的作战命令是：“刘伯承部经各部反击，伤亡惨重，开始向北溃退。徐、郑两绥署各部必须予以彻底歼灭，续向三日指定之线推进，以绝匪患而利今后作战，限七日内完成。”

虽然严峻的形势在预料之中，但敌人于东西两面的大兵力夹击，还是令刘邓一时间进退两难：无论从实力对比上，还是战略态势上，都应该避敌退却，转移休整部队，以利寻机再战；但是，一旦撤到黄河以北，豫东和鲁西南这片战略要地就将迅速丢失，这对晋冀鲁豫野战军未来的作战发展不利。而且，苏北、山东和晋冀鲁豫解放区也将因此被割裂。可是如果迎敌而上，部队疲惫，弹药紧缺，无疑是凶多吉少，一旦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就只剩下撤往太行山这一条路了——刘邓别无选择，只有坚决作战，力求在避免重大损失的前提下取得局部胜利，以扭转危险的局势。

国民党军从两面合围而来，必须首先力挫其一路，使战场上的钳形攻势随之瓦解。刘邓选择的作战目标是：从郑州开来的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师。这一选择是颇费思量的：虽然与晋冀鲁豫野战军作战的国民党军有三十万之众，但向豫东和鲁西南方向攻击的只有二十三个旅，二十三个旅中一线部队仅为十五个旅约十万人。十万人的部队兵出郑州和徐州两个攻击方向，每个方向又兵分三路，因此每一路的兵力仅为一至两个整编师。徐州和郑州的部队分属两个系统，指挥不一，嫡系与杂牌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徐州方向的部队基本属于蒋介石的嫡系，其中的第五军和整编十一师是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中的两支，全副美式装备，攻击力量强大，需要设法避开。而郑州方向的部队，除了整编第三师，基本上都是杂牌，其攻击阵形是：左路为整编四十一师，攻击方向东明，但该师因有防御任务不可能过分深入；右路为整编五十五师，攻击方向曹县，这个师曾在民权与共产党军队作战，因此存在着避战的可能性；中路兵力最强，整编第三师和整编四十七师齐头并进，攻击目标定陶。但是，这两个师之间相隔近十公里，在战场上留下了易被分割的裂缝。况且，整编第三师是从围困中原解放区的部队中抽调来的，战痕隐隐作痛，远道奔波劳顿，只要将其分割出来猛烈攻击，因为他是嫡系部队，包括整编四十七师在内的其他杂牌部队一般不会拼死救援。

这是一个大胆的作战设想。实现这一设想要具备两个前提：首先是整编第三师确实与其他杂牌部队存在着派系矛盾，足以导致他在面临危境时其他部队见死不救；其次就是不但要将整编第三师从他与整编四十七师构成的协同战线中割裂出来，而且还要引诱其大胆冒进成为孤军。

整编第三师与整编四十七师共同隶属于第五绥靖区司令官孙震指挥。该师师长赵锡田一向不把孙震放在眼里，彼此之间隔阂很深。赵锡田的地位确实有点特殊，他不仅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与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有师生关系，而且还是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的外甥。赵锡田率部路过郑州时拜见刘峙，刘峙不但给他补充了大量的弹药，还专门为他配备了一个野炮营和一个坦克连。一直想取悦顾祝同的刘峙的设想是：如果赵锡田能够在这次战斗中作为主力拔得头功，就为顾祝同提升赵锡田提供了最直接的理由，赵锡田取代孙震成为战区长官的梦想他们彼此心里都很清楚。在与刘峙密商之后，赵锡田认为胜券在握，他没有向孙震报告就率部队直奔定陶，大有独享战功之意。孙震得知后十分恼怒，刘峙、赵锡田与孙震之间的裂痕瞬间扩大，这种裂痕不久就让赵锡田尝到了难以下咽的苦果。

为了确保足够的攻击兵力，刘邓从冀南急调陈再道的第二纵队到达战场，加上已经结集的第三、第六、第七纵队，兵力是整编第三师的四倍。毛泽东对作战设想和兵力比例均感到满意，中央军委致电刘伯承、邓小平：“望令我主力在一星期内休整完毕，俟第三师两个旅进至适当位置时，集中全力歼灭其一个旅，尔后相机再歼其一个旅。该师系中央军，如能歼灭影响必大。望按实情处理。”

六纵派出两个团负责引诱赵锡田，纵队主力则在前面布置了个大口袋。整编第三师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连续进攻，攻到哪里都会发现刘邓部刚刚撤离的痕迹。战斗进展令赵锡田十分得意。他的参谋人

员提醒说，刘伯承是打仗的好手，如此顺利有些异样，小心中了共军的埋伏。而赵锡田的反驳听起来很有道理：你们这些年轻人与共产党打交道的年头不多。看看防御阵地上丢弃的这些东西就知道了，除了军装和背包之外，还有扔掉的枪支，如果是从容撤离的话，他们绝不会丢弃哪怕是一块擦枪布和一根烤火的柴火棍儿。况且，共产党军队一向离开村庄的时候，都会打扫院子挑满水缸，现在他们住过的村子里又脏又乱，不是仓皇逃窜还能是什么？

每占领一个村庄，赵锡田都向刘峙报一次捷，蒋介石的嘉奖电报不断地发来，赵锡田很有些飘飘然了。他给刘峙去电说："飞机不需要了，凭我现有的装备，不把共军赶下黄河，就让他们回太行山去！"刘峙显然也被胜利的前景冲昏了头，他竟然临时改变作战部署，放弃原定的整编第三师和整编四十七师共同攻击定陶的计划，改为由整编四十七师单独攻击定陶，整编第三师前去攻击菏泽——情报显示，刘邓的司令部设在菏泽，刘峙认为这个头功只能属于赵锡田，别人绝对不可染指——但是，这个改变却加大了整编第三师与整编四十七师之间的间隔。

九月二日，刘邓命令部队继续放弃前沿阵地，引诱整编第三师继续往大口袋里走；同时命令一部迅速楔入整编第三师与整编四十七师之间的宽大的缝隙，从而对整编第三师形成包围之势。刘邓的作战命令发布之后，解放区内八千多名民兵拿着土枪、大刀开始在田野的庄稼地里集结，近两万民工携带着一万多副担架、五千多辆装满粮食弹药的大车，浩浩荡荡地向这个狭小的战场蜂拥而来。

此时，整编第三师已经彻底进入刘邓布置的大口袋里。国民党军官兵一路看见集市上熙熙攘攘，百姓们忙着做生意，根本没有共产党军队的影子，于是他们变得无所顾忌了。整编第三师不知道，这里是解放区，刘邓的部队即使埋伏在附近，老百姓也不会告诉他们。此

时，从郑州方向进攻的左路整编四十一师被冀南军区部队阻击于东明以西地区；右路整编五十五师被第三纵队一部阻击于曹县以南地区；原来与整编第三师齐头并进的整编四十七师已经被调动到四十里开外；而从徐州方向进攻的国民党军行军速度更为迟缓，距离战场尚有百里之遥。

五日，刘邓决定全力攻击，速战速决。

整编第三师的大难降临了。

午夜二十三点三十分，赵锡田的师部和三旅、二十旅所在地同时受到猛烈攻击，赵锡田急令炮火和坦克进行阻击，可是，外围二十旅五十九团的阵地已被突破，团长吴耀东被俘，全团只有少数官兵逃了出来。接着，旅部与五十八团也失去了联系。赵锡田赶紧向刘峙求援，刘峙急令整编四十七师向整编第三师靠拢。但是，由于受到陈锡联的第三纵队的拼死阻击，整编四十七师师长陈鼎勋不愿意再前进一步。赵锡田在师部和三旅的防御阵地被严重压缩后，命令二十旅旅长谭乃大放弃原阵地突围，尽一切可能向师部和三旅阵地靠拢。谭乃大旅长表示：自己的部队正与共军混战突围无望。迫不得已，赵锡田开始向孙震求援，要求速派援军和空投粮弹。孙震的参谋人员建议，让东明方向的整编四十一师出击刘邓的侧翼，这样即使不能最终解围，也可以给刘邓的部署制造混乱。孙震不置可否。孙震的盘算是：刘邓很可能有围点打援的准备，不能为了赵锡田损失自己的部队。另外，让总想取代自己的赵锡田吃吃苦头很有必要。但是为了应付刘峙，孙震命令一个团前往增援，而这个团没走出多远又退了回来。

绝望的赵锡田决定自己突围，向谭乃大的二十旅靠拢。他再次向孙震请求救援，说只要派一个团到天爷庙附近接应一下就可以。孙震说派出的部队受到共军阻击无法前进，第三师要突围就必须自己想办法。天爷庙，整编第三师师部所在地，被陈锡联的三纵和杨勇的七纵

最后攻破了。赵锡田跑到一排汽车下面，正准备继续抵抗的时候，发现身前身后全是指向他的枪口。有史料记载，活捉赵锡田的是三纵七旅二十一团七连文书张敬孝，他把赵锡田从汽车下面拽出来的时候，这位国民党军师长正忙着换士兵的军装。也有史料记载，七旅一个连队的指导员给了他一枪，然后上去一面给他包扎一面问其职务，赵锡田说自己是军械主任，指导员拉来个俘虏把这位国民党军师长指认了出来。

刘伯承在电话里说："派一个班把他送到我这里来。"

来到刘伯承面前，赵锡田问："你们从一开始就撤退，辎重丢得遍地都是，难道是在骗我吗？"

刘伯承说："你应该读过兵书，难道不知孙膑减灶赚庞涓的故事？"

公元前三五三年，魏、赵攻韩，韩向齐告急，齐出兵攻魏郡大梁，魏将庞涓弃韩回师。孙膑的计谋是：齐军入魏设灶十万，第二天五万，第三天三万。庞涓见齐军逐日减灶，认为齐军入已损兵一半，遂开始追击，结果全军遭遇埋伏。兵败之际庞涓自刎。

定陶一战，刘邓部伤亡三千五百人，国民党整编第三师死伤近五千，被俘者高达一万两千人。由于被俘的人太多一时不好看管，在国民党军飞机盘旋轰炸的时候跑了四千多。

消息传来，蒋介石震怒。

九月十五日，蒋介石下令撤销刘峙的郑州绥靖公署主任职务，同时被撤销职务的还有第五绥靖区参谋长赵子立。

但是，整编第三师未能占领的菏泽，很快就被从徐州开来的国民党军第五军和整编十一师攻占。

整编十一师在国民党军的序列中不是一般的部队。其前身是北伐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师，是国民党军现任参谋总长陈诚起家的部队。抗战期间，参加过著名的淞沪会战、武汉会战、枣宜会战、常德会战、湘西会战，其勇猛顽强在八年抗战中威震日军。该部有史以来的指挥官几乎全是黄埔军校的高材生，国民党军中的著名将领多有在该部任职的经历。现任师长胡琏，出生于陕西华县一贫寒农家，时年三十九岁，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从当连长开始就服役于这支部队。国民党军内部对他的评价是：兼有张灵甫之凶悍和黄百韬之愚诚，狡如狐而猛如虎。胡琏带兵经验丰富，特别是在用人上，少国民党军唯亲的习气，对待下属也和气公平，在部队中威信很高。他指挥作战警惕性和企图性强；重视战前侦察和研究对手；面对强敌据险固守，顽强防御；若遇弱敌，则集中兵力猛冲猛打一气到底。此时，经过整编，十一师兵员充实，火力强劲，作战能力在国民党军中堪为精锐，成为解放战争中共产党军队必须面对的强硬对手之一。

定陶战役结束后，第五军和整编十一师从菏泽出发，向巨野方向攻击前进，企图打通菏泽至济宁的公路，与其他部队一起对刘邓部形成合围。九月二十八日，第五军到达龙固集附近，整编十一师突出于巨野以南的张凤集地区。刘邓下定的作战决心是：以第二纵队阻击第五军，集中第三、第六、第七纵队，吃掉整编十一师的十一旅。

夜幕降临，刘伯承和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滕代远一起，坐着一辆胶皮轱辘的大车来到二纵指挥部作战前动员。刘伯承说：“现在我们要打的是第三仗。第一仗出击陇海路歼敌一万六，第二仗打整编第三师等部歼敌一万七，现在要打的是第三仗。这一仗不会歼灭那么多敌人，主要是打打敌人威风，摸摸老虎屁股。”刘伯承讲到这里的时候，

二纵的指挥员们都笑了，刘伯承认真地说：“不要笑，是真的，前面来了两只老虎，就是国民党军主力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师。”刘伯承告诉二纵指挥员，他们的任务非常艰巨，因为只有阻击住第五军，其他三个纵队才有可能吃掉整编十一师的一部。但是阻击第五军并非易事，绝不能死守，只能在运动防御中消耗敌人。

但是，这个“摸摸老虎屁股”的作战，令刘邓部付出了巨大代价。

胡琏很快察觉到刘邓主力合围他的企图，立即命令停止行军，各旅占领有利阵地，修筑坚固防御工事。

十月一日深夜，刘邓部的作战开始了。

六纵的任务是穿插侧后，负责割裂位于张凤集的十一旅与其他部队间的联系。穿插接敌的时候，六纵发现整编十一师已经事先收缩了部队，胡琏的谨慎致使六纵连续扑空。天亮的时候，六纵在一个叫王家垓的村庄发现了敌人——胡琏的师部和一一八旅驻扎在这里。这是一个不利于攻击的村庄，村庄地势高于附近的田野，由于刚刚下过大雨，田野里满是积水。虽然如此，六纵的攻击还是开始了。胡琏十分惊骇，一是共产党军队白天发起进攻的情况很少见，二是他摸不清刘邓是如何知道他的底细的——一一八旅是整编十一师中最弱的部队。但是，即使战斗力最弱的一一八旅，也让六纵的攻击出现极大的困难。一一八旅在短短的一天之内，在王家垓修筑起坚固的工事，其抗击强度足见其工兵的作业水准：第一道警戒是哨兵；然后是一圈照明设备；而后依次是绊发手榴弹区、地雷区、鹿砦和铁丝网地带；几道障碍之后，才是由壕沟和围墙共同构成的防御主阵地。即使是主阵地，也与村内的核心阵地相互隔绝，而核心阵地的前面还有更加坚固的围墙。六纵数次攻击无效后，一一八旅开始组织猛烈反击，六纵短时间内伤亡严重，仅攻击王家垓的主攻团伤亡近四百人。

与此同时，陈锡联的三纵和杨勇的七纵围歼十一旅的战斗进行得更为残酷。张凤集的守敌实际上仅有十一旅的三十二团。总攻开始之后，三纵和七纵两度突进村庄，但是，国民党守军依靠强大的火力迅速把突破口封锁了，导致突进去的部队与村外进攻的部队被分割。在激烈的肉搏战之后，突进去的官兵一部分突围而出，但还有一部分被困在村内。刘邓增强了攻击力量，力图再次突进去营救被困官兵，但是打了一夜，只打开村庄的一角。占领了村庄一角之后，三纵和七纵的攻击依然难以突破，而此时胡琏派出的增援部队突破二纵两个团的阻击，攻进了张凤集，与村内的守军会合了。然后，在飞机和大量火炮的掩护下，张凤集守军和增援部队一起撤出了战场。

这个叫张凤集的村庄终于寂静下来，村内所有的房屋都已被夷为平地，交战双方官兵的尸体交叠在一起，血水和雨水在残砖乱瓦中到处流淌。

此战双方损失近似。晋冀鲁豫野战军三纵、六纵、七纵共伤亡四千一百余人，被俘二百七十人，总计近四千四百人。国民党军整编十一师伤亡约五千人左右，其中防御张凤集的三十二团伤亡最为严重，战前兵力为三千余人的一个团跟随增援部队突围出去的仅有五百人。

这一结果是刘邓事先没有预料到的。

刘伯承后来说：“与敌陷于牛犄角僵持的笨拙状态”，是因为未能大踏步进退调动迷惑敌人使其暴露弱点，“结果反陷于被动”，这种‘牛犄角’式的打法甚为不智”。

就在刘邓与胡琏作战的时候，在战场的西面，国民党军另一位悍将也在与共产党军队作战。

中国的山西是一个地理位置十分特殊的省份。东面的太行山将它与河北隔断，西面与共产党人的陕甘宁边区仅隔一条黄河。山西省军阀阎锡山也是个十分特殊的人物，在中华民国的国土上，他的山西省犹如一个独立王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诸多方面，他从来就没和蒋介石同心过，以至于他在山西省内修建的铁轨，都与相临的省份尺寸不一，阎锡山以为这样一来就没人能随便进入他的山西。而正因为如此，山西虽然在战区划分上属于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作战范围，但在整个解放战争的进程中，这里的军事行动却始终与西北战场密切关联。

西北战场最为广阔，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在内，面积占中国版图的三分之一。在这片地域里，国民党军除了常驻各省的部队之外，还有青海的马步芳和宁夏的马鸿逵两个军事集团以及胡宗南的中央军嫡系部队。而共产党军队在这片区域里兵力始终没有超过五万人。军事力量对比如此悬殊，加之自然环境极其恶劣，致使西北地区的战争注定进行得格外残酷。

内战初起时，蒋介石没有力量顾及西北，陕甘宁解放区的晋绥联防军乘机向北扩张，占领了陕北无定河以南约五千平方公里的地区，并在这一地区建立起共产党地方政权——当时的共产党人不曾想到，就是这个小小的战果，在未来的战争进程中起到了预想不到的历史作用——当胡宗南的二十万大军进攻延安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正是在这片干旱贫瘠的小小区域内得以回旋。

攻占延安，是胡宗南的梦想。

为此，他必须首先打通山西境内的交通命脉同蒲铁路，以便在晋南和陕南拥有一个稳固的后方基地——同蒲铁路位于陕甘宁边区的侧后。

胡宗南在战场上遇到的是他的黄埔同学陈赓。

胡宗南是浙江镇海一个办事员的儿子，中学毕业后当了几年国文和历史教员，由于父亲拆散了他与初恋情人，并强迫他与另一个陌生女子结婚，二十八岁的胡宗南离家出走。报考黄埔军校时，由于身高不足一米六未被录取，得到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的帮助才得以入学。在黄埔军校的日子里，他逐渐成为蒋介石的心腹。毕业后，从排长、副连长、营长，团长、副师长，直至三十一岁那年成为国民党军第一师中将师长。而后，他历任国民党军第一军军长、第十七集团军军团长、第三十四集团军军团长、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一九四七年六月，他升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直接指挥国民党军第一、第十六、第二十七、第三十、第三十六、第三十八、第四十、第七十六、第九十军，拥兵共计十一个军，兵力五十万之众，人称“西北王”。

湖南人陈赓比胡宗南小七岁。他的祖父是当年湘军中赫赫有名的将军陈翼琼。毛泽东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的时候，曾与其父陈邵纯有过交往，对这个声称把儿子陈赓“打发出去革命”的开明士绅印象深刻。一九二三年底，陈赓考入黄埔军校，与他一起报考的同伴，是后来成为国民党军著名将领的宋希濂。陈赓以作战勇敢闻名。国共决裂后，他参加了南昌起义，一九三一年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十二师师长。第二年的秋天，他在作战中负伤，在上海养伤期间被捕。黄埔校长蒋介石面见陈赓，并许以第三军参谋长和南京卫戍司令的高位，但是陈赓却越狱逃跑了。辗转到达中央苏区瑞金后，工农红军长征前他成为干部团团长。一九三七年，陈赓出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他的部队被美国驻华参赞卡尔逊誉为“中国最好的一个旅”。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结束后，陈赓被任命为晋冀鲁豫军区太岳纵队司令员。太岳纵队编入野战军后，陈赓成为第四纵队司令员。

胡宗南的作战方针是：“以肃清同蒲南段沿线共军，恢复铁路交通的目的，决由第一战区派兵入晋，与第二战区分由铁路沿线南北夹击，一举而破共军主力。”七月三日，胡宗南部整编第一师和整编二十七、九十师的五个旅，从运城出兵沿着同蒲路向北攻击。十三日夜，陈赓的第四纵队突然间连续袭击了整编二十七师一部和整编第一师一部，国民党军立即收缩，退守闻喜和安邑。此时，位于山西北部的晋绥野战军贺龙部也发动了攻击，向南进攻的阎锡山部被迫北撤防御。陈赓抓住时机再次发动攻击，连续攻克赵城、洪洞等五座县城。就在陈赓部向北追击阎锡山部的时候，胡宗南紧急调集整编第一师一旅和整编三十师前出晋南，并亲自飞到运城坐镇指挥，重新开始了大规模北进。北撤的阎锡山部也停了下来，将第三十四军集结在介休附近，准备与胡宗南部一起对共产党军队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陈赓处于南北两敌之间，遂决定使用少量兵力阻击北面的阎锡山，在南面则动员地方武装和民兵迟滞胡宗南的北进速度，而将第四纵队主力集结隐蔽等待战机。

九月中旬，胡宗南的部队“陆续到达临汾地区”，接着，整编第一师一旅二团沿着临汾至浮山的公路继续前进，位置逐渐突出。

战机已至，陈赓立即命令第四纵队一部佯攻浮山，主力合力围歼二团。

胡宗南的整编第一师一旅，号称“天下第一旅”。它是国民党军组建最早的部队，北伐时由黄埔教官刘峙为师长。胡宗南自己在这支部队中从连长一直当到师长。这支部队的士兵多为有战斗经验的老兵，军官也都是清一色的黄埔毕业生。抗战后经过整编，一旅依旧保持着师的规模，旅长为中将，团长为少将。旅长黄正诚不但出身黄埔，而且留学德国，学习过德军正规的军事操典。

陈赓很快就破解了胡宗南部的通讯密语，知道其部队代号组成方式是：取上一级长官的名或字的第一个字，与本部队长官的名或字的第二个字连起来。整编第一师因此被称为“介梅部”，因为第一军军长董钊字介生，而整编第一师师长罗列字冷梅。其军事行动则用柴米油盐酱醋茶来代表，比如说去买酱，意思就是前去警戒。兵力规模的代号是：一个连称“三人组”，一个营称“四人组”，一个团称“五人组”。

九月二十日，陈赓在报话机中听到了董钊和罗列的对话：“下一步行动要注意南边那个高地方。”陈赓判断：“一旅要出动了，任务是策应攻占浮山县城。所谓南边那个‘高地方’，指的是塔儿山，是怕我们在那里设伏。”接着，电话线里传来第一军军部话务员的聊天：“你们过中秋什么都有，我们这里只有窑洞。”第二天，罗列对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说：“你们明天到浮山去买柴，临汾的人和你姐夫也去。”接着，一六七旅旅长和代号为“姐夫”的二十七旅通了话：“你们去几个四人组？”对方回答：“四个。”而这就意味着，胡宗南不但要攻占浮山，还要守住临汾至浮山的公路，以便以此为出击线北上打通同蒲铁路。

对于陈赓而言，胡宗南编制的密语如同儿戏。

此时，整编第一师一旅二团团长王亚武率部进至官雀村。

陈赓认为攻击时间已到。

四纵十一旅首先发起攻击。共产党官兵拼死冲击，国民党军凶猛阻击，两支作战能力都很强的部队撞在了一起。胡宗南和陈赓都明白，官雀村一战是两人相搏的关键，陈赓如果把二团歼灭了，会极大地增强自己的士气，同时极大地打击胡宗南的威风；而胡宗南也想把二团成功地救出来，以此创造一个坚守待援的范例，让陈赓充分认识到他的作战实力。但是，胡宗南派出的两路增援部队受到了顽强阻击，孤立的二团很快就垮了，少将团长王亚武死于乱枪之下。更严重

的是，陈赓接着又把一旅旅部和一团包围在了陈堰村。尽管增援部队拼死前突，还是难以靠近陈堰村。一旅旅长黄正诚的告急电话一个接着一个。正是闷热的初秋，田野里高粱旺盛玉米茂密，围攻一旅的共产党官兵从四面八方的青纱帐里汗流浃背地向陈堰村接近，干部们不断地向队伍里传话："不能让第一旅跑掉一个人！"攻击陈堰村的战斗从白天打到深夜，双方在村子里一个院落一个院落地争夺，到处是手榴弹的爆炸声、拼刺刀的喊叫声以及伤员的呻吟声。一团团长刘玉树被逼得上了房顶，他在房顶上跑来跑去指挥的时候摔了下来，被房下的共产党士兵捉住。刘玉树躺在地上大喊："快把我枪毙了吧！我是国民党，你们是共产党，我们不共戴天！你们抓住我就算我倒霉！想消灭'天下第一旅'，凭你们这几条烂杆子枪，梦想！"仗打到昏天黑地的时候，陈堰村里的百姓纷纷把自家的棉被拿出来浇上水，给共产党官兵当抵挡子弹的"土坦克"。陈赓在步话机里听见黄正诚向上级报告说："正与共匪激战，蒋先生安然无恙。"陈赓立即告诉正在村内指挥战斗的十旅旅长周希汉，无论如何也要活捉黄正诚和那个"蒋先生"。黎明时分，陈堰村里的战斗基本结束，整编第一师一旅的副旅长和参谋长被俘，但唯独不见旅长黄正诚和"蒋先生"。有报告说黄正诚被炸死了，陈赓不相信，因为他刚才还听见黄正诚在步话机里向军长董钊求救。天大亮了，一旅的俘虏被全部集中在一起，其中一个自称"书记官"的俘虏样子很可疑：上身穿的是士兵衣服，裤子却是呢子将军裤，脚上是一双皮靴，而且鼻梁上有副眼镜，手也很白。士兵们立即认出他就是黄正诚。

四纵官兵告诉黄正诚："我们的司令员马上就来。"黄正诚赶忙问："是徐向前吗？"——直到此刻，黄正诚仍然不知自己在与谁作战。

陈赓来到黄正诚面前。黄正诚称陈赓为"黄埔老大哥"。陈赓首先问"蒋先生"是谁，现在哪里？黄正诚的回答令陈赓很是失望，所谓"蒋

先生”原来指的是旅部院子里摆放的那几门山炮。陈赓问为什么这几门炮没有使用？黄正诚回答说院子太小无法使用。陈赓指着站在自己身边的第四纵队十旅旅长周希汉说：“这是我们的一位农民出身的旅长，没有进过洋学堂，是个‘土包子’，是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旅长。你是留过洋、受过西方军事学校教育的‘洋包子’旅长，可是被我们的这位‘土包子’旅长打败了。”接着陈赓说：“你要明白，仗不是我们要打，是蒋介石坚持独裁，主动挑起来的。”黄正诚听罢一脸疑惑：“老大哥这话我就不明白了，他那么大年纪了，还要搞独裁干什么？”

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这样记述临浮战役的：

共产党正规军“潜伏在胡的指挥部附近，对胡的每一个行动都了如指掌。第一师（整编第一师一旅）在第一天晚上刚扎营，就被地方民兵扩编成的共产党主力部队以压倒优势包围了。第一师师长黄将军（黄正诚）是蒋介石的亲信，他急电胡的指挥部求援，但不见援兵到来，因为所有可以派遣的军队都受到地方人民武装的袭击而被牵制住了……在考虑包围敌人哪一个师时，人民解放军总是挑选装备最精良的师来打，他们不喜欢打山西的老军阀阎锡山，因为他的军队装备很差，抓到他们没什么油水……一个前国民党军官在香港的报纸上透露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山东他的驻地附近俘虏了两个美式装备的师以后，给他的师送去了新年祝词：“不要担心，你们不是我们的目标，因为你们没有美国武器！”在人民解放军缴获了更多更好的武器后，他们就改变了作战方式……陈赓在山西俘获了蒋军五个旅以后，他就能炮轰城墙，攻打五座城市了。

“天下第一旅”在四纵官兵的押解下离开战场，他们的脚下是共产党人的解放区的土地：

五千七百名俘虏穿着美制军服，戴着漂亮而无用的美军帽子，在尘土飞扬的路上，向北方行进。他们一路上受到中国农民的嘲弄：“看美国造的帽子，看美国养的兵，来杀中国人的！”到天黑时，这些俘虏都扔掉了他们的美式军帽，请求发给人民解放军的实用而不显眼的帽子。可以完全有把握说，在下一周内会有五分之四的人将成为共产党军队的新兵。

自己的“天下第一旅”就这样被陈赓歼灭了，胡宗南痛苦难言。但是他仍有足够的兵力继续北进，不断地占领县城和铁路线上的要地——共产党军队虽然能够给予进攻中的国民党军以局部的打击，可是

解放区内的城镇和地盘依然在逐渐丢失和缩小——战事初起，谁是胜者?

## 最大多数万岁

就在中国内战爆发的那一刻，一个美国老人骤然卷入了中国政局。

没有哪一个美国人像他一样，在中国当代史上留下如此丰富的人生轨迹。他的大半生与中国的当代教育史密不可分，晚年的生活更与纷扰的中国政局密切关联。无论历史给予他什么样的评价，他那在中国北方一所著名大学里的雕像，至今依旧是一道令人心绪复杂的风景。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是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七十岁生日。

蒋介石拟出了“陶铸群伦”的生日贺词，同时签发了一份国民政府褒奖令:

> 司徒雷登博士致力我国教育垂五十年，其所创办之燕京大学，为我国著名学府之一，历年以来，成材甚众。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文化教育机关，尽陷敌手，司徒博士独任艰危，力维弦咏，不使中辍，直至太平洋军兴，身系囹圄而后已，临危不惧，守白不缁，其行谊殊难多觏等情，据此，查司徒博士热心教育，忠贞不贰，高节亮风，足资楷式，应予明令褒奖，用彰有德。

一八七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清光绪二年——司徒雷登出生于中国浙江省杭州市。司徒家族对教育和传教的热爱与执著在近代美国史上颇具盛名，家族成员先后独立创办或参与创办过五所学校，先后出了五位大学校长、学院院长和女子学校校长；同时，从司徒雷登的曾祖父开始，家族中曾有十三位男性成员成为传教士。一八六八年，约翰·林顿·司徒来到中国传教，几年后，他把一个名叫玛丽的美国私立女校校长也带到中国，他们在中国杭州城北的贫民聚集区盖起了一座教

堂和一所学校，这就是日后在中国生活了整整五十年的司徒雷登的故乡。

有着与父亲一样惊人的耐心，但更具社会干预欲望的司徒雷登，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所有的动荡岁月。他在南京的一所神学院里当教师的时候，辛亥革命爆发，他因为对革命十分向往而结识了孙中山。在孙中山宣布辞去大总统的演说会上，他是在场的唯一一位外国人。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夕，他受教会委托来到北平筹建燕京大学，筹款、选址、确定校名都是他一手操办，他决心把这所风景如画的私立大学办成世界一流学府。他的努力成功了。燕京大学聚集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学者，而学生多数成为开创中国新时代的先锋。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为了能使中国军队齐心抗战，他甚至以南京国民政府特使的身份去东北劝说张学良"易帜"。他与很多国民党官员、国民党军将领私交很好。因为真心认为蒋介石是孙中山革命的唯一继承人，所以他对蒋介石的倾慕几乎到了崇拜的地步：

> 他深知在与他最亲近的人相处的时候，也沉默寡言，时刻以公务为念，而不善于做应酬性闲谈。他具有中国上流人物必不可少的文雅与礼貌，但其处事的认真、率直和坦白，又非常合美国人的胃口……与各种各样人周旋的非凡才能，受过高度训练的智慧，当机立断的魄力与勇气，永不疲倦的精神，都是使他成为一个伟大军人和政府首脑的基本素质。这也是他之所以能够在国民党中始终处于群雄之首的原因所在。

他已是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特殊符号。

美国对日宣战后的第三天，日军将司徒雷登逮捕。日方试图用他作为与美国和蒋介石讨价还价的人质，同时也是对燕京大学不接受"奴化教育"的一种威胁。但是，日方没能让司徒雷登低头，他宣布已把生命交给了他信仰的上帝和他热爱的中国。日本投降后第三天，被囚禁三年零八个月的司徒雷登出狱了，他立即被飞机送往重庆，流亡在那里的燕京大学的师生们看见面容憔悴的老校长，与他相拥而泣。

就在马歇尔为国共两党的难以调解感到万分苦恼的时候，司徒雷登在蒋介石夫妇的建议和安排下会见了马歇尔——他坦率地承认，在这之前，他只是听说过马歇尔的名字，之所以前去拜会，完全是因为他对这个承担着特殊使命的人有点好奇。司徒雷登并不知道，这种老年人的好奇心会给他的晚年生活带来巨大的麻烦。初次会见，他只是耐心地听马歇尔详细介绍了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和分歧。然而，两个月之后，他在北平接到了来自马歇尔的邀请，请他出任美国驻华大使。

他和蒋介石都感到吃惊。司徒雷登已经准备退休了，为此他已提出辞去燕京大学校长一职；同时，他根本没有任何从事外交工作的经验。而令蒋介石吃惊的是，虽然他与司徒雷登私人关系很好，但在中国政局万分敏感的时刻，司徒雷登并不是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合适人选，坚决支持国民政府的驻华美军司令官魏德迈已经做好了就任的准备。更让蒋介石愤怒的是，马歇尔事前没有征求自己的意见，却征求了共产党方面的意见，周恩来鼎立推荐的人就是司徒雷登。而马歇尔选择司徒雷登的理由也让蒋介石有口难言："我之所以要求他出任，是根据所有在中国的知情人士，无论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的反应，他是一位具有独一无二地位的、受到普遍尊重的外国人。他完美无缺的人格标准以及五十年来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乃西方世界最后的榜样，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同样信任和仰慕他。"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日，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了对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的任命——消息传到大洋这边，司徒雷登说："马歇尔将军随便要什么，都会得到美国人民的同意。"

四天以后，司徒雷登告别燕京到南京上任。他的首要工作就是和马歇尔一起制止中国的内战蔓延。

但是，在河南、湖北、山东、山西、河北以及东北地区，国共两军的军事冲突不断发生，而且已有愈演愈烈之势。司徒雷登立即感到自己几乎无能为力，他和马歇尔共同预感到，他们的调解面临着最后破裂的危险。马歇尔直接对蒋介石表示：“华北的冲突不久就会完全无法控制，一旦它蔓延到热河省，就会波及满洲，然后会扩展到全国各地。我的目标是促成一个统一的新生的中国，不是与蒋委员长的某些顾问所想象的那样——使共产党就范，而是完全相反……我从多方面所获得的情报表明，国民党的威信严重下降，对国民党政府所采取的措施的批评也与日俱增。”而司徒雷登对蒋介石的劝告是：唯一的办法是重新赢得民心——使用汉语比使用母语还熟练的司徒雷登深知，当内战即将来临的时候，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民心”决定着一切：

> 一切比我从美国报纸上所了解的还要糟糕……应该拿出当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国民党时的勇气和热忱，发动一场内政改革运动。这样一来，就能再度把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团结起来，因为他们虽对现状不满，但却迫切希望有一位值得信赖的领袖。有了这些人做自愿的宣传者，就能重新赢回日见消沉的民心，再度成为民族意志的象征。

司徒雷登的劝告不是空穴来风。

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发生巨大社会动荡之时，也是隐藏在官僚体制下的污浊泛滥之际。究其原因大体有二：一是官僚体制本身固有的诟病积重多时，二是动荡时刻约束机制骤然缺失。这是中国历史中的一种奇特的现象：如果说从和平状态进入战争状态，必然会引发社会混乱的话；而从战争状态转变到和平状态，混乱发生的几率竟会更高——官僚阶层的贪污腐败是一剂关乎政权倾覆的致命的毒药。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大员只关心两个字：接收。“接收”二字至少包括军事和经济两方面的含义：军事上，要与共产党军队拼速度，十万火急地开赴战争中的沦陷区和共产党人开辟的解放区，这就是“为国收复失地”的概念。而在经济上，所有的政府和军队大员甚至比蒋介石还心急火燎，因为小到汽车房产，大到金库银行，敌伪

留下的巨额财产已经失去了主人，谁先贴上封条或者抢到手里财产就是谁的，这就是“个人发财致富”的概念。

几乎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同时，国民党军陆军部成立了“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也就是以国民党的名义成立的接收机构。可能觉得以一个政党的名义这样做有点不合适，很快，“行政院派驻陆军总司令部收复区全国性事业临时接收委员会”成立了。各省市纷纷效仿，争先恐后地成立“敌伪物资产业处理局”，国民政府的各级行政大员和驻扎在各地军队的高级将领混杂在一起，开始了空前的资财侵占。

从重庆返回南京的政府高级官员和军队各级将领，到处收集各种各样的高级小汽车，为给各种各样的别墅贴上封条而忙成一团。南京城内的公馆别墅集中在莫干山路、山西路、中央路和斗鸡闸一带，按照规模和档次，每一处建筑物上都直接挂上了从蒋介石到各级官员和将领的名字。处长、科长和科员们抢不到别墅，就抢民房、高级家具和名牌汽车，甚至连日伪办公楼里的地毯都扛走了。房产、财物到手之后，最有油水的查封“逆产”行动随即开始。“逆产”二字几乎无所不包，从银行、矿山、工厂，直到某户人家厅堂里的一件古董。南京原来的“伪中央政府”官员和重庆来的国民党大员互换名片之后，成为阶层一致、利益一致的朋友，像亲兄弟分家一样商量着如何把“敌产”变成“私产”、把“逆产”变成“民产”——本属于国家财产的巨大财富就这样流失了，究竟流失多少永远无法统计清楚。

为了不被追究自己在日伪统治时期的所作所为，各地的官员想出一个可以让重庆来的“同志”一夜暴富的好点子：以行政命令或者军事命令，将原来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纸币储备票，一律兑换成重庆国民政府发行的新法币。按照正常的兑换率，两种纸币价值大致相等，也就是说兑换率应是一比一，可是公布出来的兑换率竟然是两百比一——用两百面值的储备票，才能兑换一面值的新法币。结果，拥有大

量重庆钞票的国民党大员和将领瞬间成为巨富，就连薪金很低的来自重庆的公务员也发现自己像中了彩票一样，手里的那点新法币的价值突然间膨胀了整整两百倍。有资料说，仅南京一地，国民政府大员在兑换中获得的暴利价值三十万两黄金。

由于“接收”已经成为致富热点，来自中央系统、行政系统、军事系统、地方系统，再加上行业系统的“接收”机构相继冒出，最后连国民政府也搞不清全国到底有多少个“接收”机构。根据官方有限的统计：天津二十六个，杭州二十八个，北平三十二个，上海八十九个……那些价值较高的“接收”目标，往往被地方机构抢先接收，但是随后又被开到这里的军队将领派兵抢走。于是，国民政府的接收大员到达后，不得不与军方展开讨价还价的谈判。最终，所有财产和物资殊途同归，统统进了军阀和大官僚的私囊。

野蛮的原始掠夺造成了社会生活的迅速崩溃。

一九四六年，国民党政府财政赤字高达三万五千八百八十一亿元，为财政总收入的一倍。而通货膨胀更是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一九四六年一月，上海米价为每担六万元，六月上涨到每担五十万元，十二月涨到每担一百一十万元，物价比抗战结束时上涨了六万倍。

官富民穷的畸形统治终于面临着统治根基的倾覆。

两年以后，当蒋介石都已确信国民党政权垮台在即时，面对国民党军上百位高级将领，他有过这样直言不讳的检讨：

> 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匪”数十倍，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时还要有利。但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

为饥饿所迫，全国四十多个城镇，包括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接连发生了抢米风潮，国民党无一例外地宣称这是共产党的煽动和组织，这些城镇的城门上因此挂着“共党首要分子”血淋淋的头颅。紧接着，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面对血腥镇压。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一个没有任何凶兆的平常日子，民主同盟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李公朴和夫人走在昆明的街道上。突然，李公朴跌倒在地。夫人以为他不小心摔了，企图把他搀扶起来，李公朴呻吟道：我中枪了。——一粒子弹由腰部射入至腹部穿出。他立即被送往医院，不久就停止了呼吸。气绝的那一刻，将“在中国办一份民主报纸”视为人生理想的李公朴连声说：“我为民主而死！我为民主而死！”李公朴被暗杀的第四天，在中国西南部的蒙蒙细雨中，数千民众为他举办了追悼大会。清华大学教授闻一多在追悼会上痛斥道：“公朴先生只不过是说了一些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他不过是为了和平民主，他不过是写写文章，说说真话。大家都有笔，都有嘴，都可以说，都可以写，为什么不许人民说话？为什么用卑鄙的暗杀手段来杀害公朴先生？……想要以暗杀手段来镇压、扑灭和平民主运动，这说明统治者的末日就要到了！……我们都会像公朴先生那样，跨出门去，就不准备回来，民主是杀不死的！”当天傍晚，出门办事的闻一多真的没能回来。他在西南联大教员宿舍门前訇然倒地，那一瞬间出现在这位中国著名诗人和学者面前的，不是一个鬼祟的暗影和一声枪响，而是国民党特务光天化日下数支冲锋枪的猛烈扫射——“天真、任性、诚恳、勇敢、爱人民甚于爱他自己。”一介文人的鲜血涓涓而出。

马歇尔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说：“中国最近的局势已引起美国的许多议论，即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正遭到禁止，知识分子，特别是在国外大学受过教育的那些知识分子受到蓄意的迫害，并且肯定地处于镇压措施之下，想要威胁他们并防止他们发表不利于国民政府的观点。这种情况所引起的最严重的后果，是对蒋委员长威望的极大损

害。”而刚刚就任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听闻这一“残忍的消息”后说：“怎么能向长袍里裹着的那颗心开枪？”

无法理解国民党政府频繁使用暴力手段来挽救信誉危机是出于怎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在人类政治文明已经进步到二十世纪中叶的那段日子里，这种思维方式不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顽固地存在着，而且被国民党统治者当成巩固政权的一种强有力的途径，这无论如何让人匪夷所思，也让这个以出产温文尔雅的哲学经典而自豪的国度至少在那段日子里，显得极其虚伪和丑陋。

中国的民主人士高喊：“经过几百年的考验，民主是不怕暗杀的！”

中国的热血青年高喊：杀了李公朴、闻一多，杀不完全国的人民！人民是多数的，是最大多数的，最大多数万岁！

对于苦难的中国来讲，最大多数的人是谁?

中国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是农民。

这个生存能力最脆弱，生存条件最恶劣，政治和经济地位最卑微的群体，是这个苦难国家的基石。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经济模式决定了这个国家几乎没有出现过市民阶层，这也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最终没有达到目的的深层原因之一。占中国社会总人口绝对少数的统治集团、地方官僚、职业军人、买办商人和知识分子阶层，几乎无一例外都有纯粹的农民家庭背景，任何人都无法摆脱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给予他们的文化烙印，这种烙印与生俱来。尤其是中国的知识阶层，即使接受过西方的教育，他们身上的中式长袍依旧裁剪得中规中矩。他们所呼喊的“最大多数”，除了包括他们身边的思想前锐的知识集团外，也隐约

包含着依然在家乡的那片山水间劳作的父老乡亲——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无法设想，他们一直梦想着将其从愚昧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农民，会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主体。

农民出身的毛泽东对旧世界的“离经叛道”，是对谁是中国变革中“最大多数”力量的最好说明。毛泽东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判断的正确性，即中国农民是实现共产党人社会理想的中坚力量。一九四六年，当外国记者来到延安，问及与国民党军队的战争是否能够取胜时，毛泽东在回答中甚至连“军队”这两个字都没有提到，他只是说：“那就要看我们的土地改革工作完成得好不好。蒋介石肯定要失败，因为他反对农民的土地要求，如果我们能够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一定会胜利。”中国共产党人认为，“耕者有其田”是民主政治、自由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基础。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赢得“最大多数”的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土地改革——对于生活在旧中国的“千百万庄稼人来说”，“这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他们起来闹革命不是为了改善生活，而是为了能活下去”。

中国共产党人在以往二十多年的革命实践中，创造了三种不同的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在红军时期，没收地主和富农的全部土地分给农民。在抗战期间，放弃全部没收土地的做法，改为较温和的减租减息。抗战结束后，解放区内的农民要求土地改革的热情无比高涨，他们没收被官僚地主垄断的大量土地分配给赤贫的农户。共产党人随即制定了新的土地改革政策，即结合赎买、捐献、处罚、强制出售、没收等多种途径，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同时承认地主和富农们的土地拥有权，分给他们与一般农民一样的土地。让农民们感到惊讶的是，共产党人开始强调“保证并保护农民有权批评和控告政府和农会的工作人员侵犯民主权利的行为”。他们甚至还看到了共产党人颁布的这样的条款：家居乡村的国民党军队官兵、国民党政府官员、国民党党员及敌

方其他人员，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土地的所有权完全由农民自己支配。

一个叫维克·斯尼尔逊的外国记者这时候正在中国的山东，陪同他的是一位名叫孔东平的解放区记者。孔记者对斯尼尔逊说："土地改革是我们胜利的主要原因"，因为"人民是世界的主人，是土地的主人"，"没有任何东西比武装起来的人民更有力量"。孔记者还告诉他解放区军民都是"一手拿枪一手耕地"。于是，斯尼尔逊认真地观察了那些正在耕田的农民："古老的木犁翻过来潮润的土地，背上的那支旧步枪带子上镀铬的扣子，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美国女记者贝蒂·格兰姆在山东解放区向五十位农民提出过同样一个问题："你难道不怕万一国民党夺回这个地区，你会因为刚得到土地而受惩罚吗？"中国的农民们是这样回答美国记者的："我不相信国民党还能回到这儿来，因为我们得到自己军队的保护。即使他们真的回来了，我们也不怕。我们会尽量战斗下去。即使打不下去了，我们也会像日本人到达时那样跑掉。"

一九四六年的七月七日，撤退到松花江以北的中共东北局召开了一次具有历史性的会议，会议的中心内容是共产党人如何在东北站住脚并且壮大力量。会议最终形成的决议中有这样的表述：

……我们的方法，就是从战争，从群众工作，从解决土地问题改善人民生活，从其他一切努力，去增强革命力量，减少反动力量，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于我们有利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充分发动群众，使我党与人民密切结合起来，只要广大人民的力量增加到我们方面，就会使敌我力量发生于我有利的变化，从而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使敌人无法战胜我们……无论目前或今后一个时期内，创造根据地是我们工作的第一位……创造根据地的主要内容是发动农民群众……使乡村的政权确实掌握在农民手里……使东北自卫战争成为广大人民参加的战争……必须吸收在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加入我党，并在农村中建立党的堡垒——支部。只要广大的农民发动起来了，并积极参加自卫战争，我们就能建立不可战胜的阵地……目前应在干部中反复说明东北斗争形势，使干部认识到东北斗争的尖锐性和长期性，认识能否发动农民是东北斗争成败的关键，农民不起来，我们在东北有失败的可能……

就在国民党政府大员和军队将领忙着进城“接收”财富的时候，共产党人提出的口号是：“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的衣服”，“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中去”，并确定以能否深入农民群众为考察共产党员品格的尺度——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在东北凛冽的寒风和狂暴的大雪中，共产党的干部们敲开了一户户赤贫农民的家门。他们用恳切的语调描绘出人人平等的美好生活景象，去打动那些对他们心存疑惑的庄稼人；他们用最坚决的手段将垄断土地的大地主和大恶霸从深宅大院中拉出来，让他们面对世代遭受压迫的赤贫农民的控诉，这些残酷的利益盘剥、人身损害以及生活中的种种悲伤往事，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与土地的占有和归属相关。因此，当东北平原肥沃的黑土地上插上了张三李四的名牌，土地的新主人们兴奋得深更半夜蹲在地头上发呆，直至想及世道何以天翻地覆时，农民们终于明白了只有共产党人能让他们过上拥有土地的好日子，他们支持共产党建立农村民主政权的热情无法遏止地迸发了——中国革命史形容那时发生在中国北方农村的革命行动为“暴风骤雨”。

历史证明，共产党人在东北地区开展的大规模土地改革，对东北地区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最大多数”一词出现在毛泽东笔下，是在解放战争进行到最困难的时刻。那时，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想把位于陕北与晋北交界处的佳县打下来，以缓解胡宗南大军进犯陕甘边区的压力，但临战却发现胡宗南部已将这一带抢掠一空，部队由于极度缺粮根本无法打仗。毛泽东计算了一下，如果仗打三天，部队就需要十二万斤粮食。他请来佳县县长张俊贤，让他想想办法。张县长说：“把全县坚壁的粮食挖出来，够部队吃一天；把全县地里的青玉米和谷子收割了，还可以吃一天；剩下的一天，就把全县的羊和驴都杀了！”战役打响了，佳县百姓的支前队伍扛着拉着从各家各户凑来的粮食、驴和羊，共产党官兵打到哪里他们就一步不离地跟到哪里；而在战场的后方，佳县的百姓吃的是

树叶和树皮，这些都吃光了就吃观音土。战后很长时间内，这个县都看不到羊和驴。毛泽东十分感动，他给佳县县委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面。

毛泽东说："所谓人民大众主要的就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革命，忘记了农民，就是你做一百万件事情，也没有用处，因为没有力量。"

中国幅员辽阔的土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人由此获得了创建一个新中国的强大力量。

这一年的八月十日，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延安见到毛泽东。在一处幽静的窑洞前，在一棵苹果树下的石桌旁，毛泽东对斯特朗十分肯定地说："如果蒋介石维护人民的利益，那么他就是铁老虎；如果他背弃人民，发动反人民的战争，就像他现在做的那样，那么他就是纸老虎，会被雨水冲跑……共产党有力量，因为它能够启发人民的觉悟。在我们中国这里，共产党只有小米加步枪。但是我们的小米加步枪最后证明比蒋介石的飞机大炮还要厉害。"斯特朗后来回忆道：毛泽东说这番话的时候，他的小女儿"穿着一身花布衣服围着他玩耍"，当她把头伏到毛泽东的怀里时她便"受到父亲的爱抚"。

一九四六年底，在国民党军的步步进逼下，解放区危机不断，困难重重，但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并没有惊慌失措，他们坚信自己置身于让他们充满信心的"最大多数"之中，他们有决心最终赢得战争。

## 和平已经死了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一日，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被国民党军攻占。

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特意致电延安：“击败聂荣臻、贺龙两部十万之众是人民意志的胜利。”

晋察冀解放区位于长城南侧，是一片东西走向的狭长地带。东自热河承德附近，西至山西北部的五台山，沿山西、察哈尔、河北和热河的边缘延伸，将国民党军占领的北平、天津、保定、大同等城市包裹其中。内战爆发时，晋察冀解放区的面积约五十五万平方公里，人口两千六百多万，拥有大小城镇九十六座，首府设在张家口。

晋察冀军区司令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副政治委员刘澜涛、罗瑞卿。下辖四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苏振华；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郭天民；第三纵队，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李志民；第四纵队，司令员陈正湘，政治委员胡耀邦。同时下辖四个二级军区：冀晋军区，司令员赵尔陆，政治委员王平；冀察军区，司令员郭天民，政治委员刘道生；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政治委员林铁；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程子华。总兵力二十四万。

在晋察冀解放区的西面，是共产党人创建的晋绥解放区。晋绥解放区包含吕梁、雁门和绥蒙地区，东与晋察冀解放区相连，西隔黄河与陕甘边区相望，面积仅有十六万平方公里，人口三百九十万，大小城镇十九座，首府设在兴县。

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李井泉，副司令员续范亭、周士第，下辖晋绥野战军，司令员贺龙、副司令员张宗逊、副政治委员李井泉，以及吕梁、绥蒙、雁门三个二级军区，总兵力五万五千人。

晋察冀和晋绥解放区面对的国民党军是：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的五个军分布在北平、天津、唐山、保定和石家庄地区；第十二战区傅作义部的两个军以及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分布在归绥、包头、大同地

区；第二战区阎锡山部的三个军分布在太原和大同地区。另外，东北保安司令部指挥的两个军分布在热河地区。总兵力三十个师三十三万人。

一九四六年六月，内战初起的时候，国民党军在这个方向的作战意图是：占领承德和冀东地区，分割晋察冀解放区、晋绥解放区与东北解放区，集中兵力夺取共产党占领的张家口市。而中共中央给晋察冀和晋绥解放区部队下达的任务，恰与国民党军的部署针锋相对：夺取平绥路、同蒲路和平汉路，占领大同、太原、石家庄和保定。

夺占“三路四城”，这是一个以占领交通线上的主要城市为目标的庞大作战计划。这一计划至少在那个历史瞬间严重脱离了对敌我力量的正确判断。

一九四六年六月发动的晋北战役，其作战目的就是：切断同蒲路北段的交通，割断大同与太原间的联系，并“相机夺取大同”。

当时，无论是中央军委还是贺龙本人，都不想与作战力很强的傅作义部直接作战，甚至力图与傅作义保持自抗战以来建立的温和关系——“不要调动北线主力，不要惊动傅作义。”晋北战役的作战目标是阎锡山，如果能够达成战役意图，共产党人至少可以占领晋北地区。为此，晋绥军区组成了晋北野战军，周士第任司令员，廖汉生任政治委员。

晋北野战军首先攻击的是朔县。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攻城部队在侦察地形、爆破训练和扎制攀城云梯的时候，阎锡山部竟然没有察觉。六月十六日深夜，共产党官兵顺着云梯爬上朔县城头，攻击北门的部队把城墙炸开了两个豁口。一夜混战之后，朔县一千三百名守军被歼，县长也被活捉了。接着，部队南下攻打宁武县城。大雨之夜，枪声从四面骤起，宁武守军没有抵抗便弃城突围，七月一日，晋北野

战军占领了这座县城。在开作战总结会的时候，听说部队出现了擅自没收粮店、面铺和商铺解决给养的问题，野战军司令员周士第立即查处，并甚为忧虑地提醒官兵们：以后还要夺取更多更大的城市，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十一日夜，晋绥部队与晋察冀部队合兵攻击崞县。攻城时把每个团唯一拥有的一门山炮集中起来，与迫击炮和机枪一起抵进到前沿，以猛烈的火力掩护部队爆破。然后，攻击从县城的西面、北面同时发起，各路官兵从炸塌了城墙豁口处蜂拥入城，崞县守军在混乱中向城外逃跑。四个小时之后，晋北野战军占领了崞县。

阎锡山痛心疾首：

中共无论妥协与否，打山西是不成问题的。于此我们不能不痛心我们从今天以前的白过。明白地说不能不痛心我们工事筑的不圆满，军队补充训练的不圆满，以及兵器制造的不圆满。到今日已非痛心不痛心的问题了，而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我们的同志一向在工作上是醉生梦死，在认识上是书生官僚。今后太原城下将是最残酷的战争，我们不努力无以存在。

阎锡山被迫决定放弃部分县城，立即收缩兵力开始重点防御。遂命令原平、忻口、定襄、五台等地的守军全部撤到铁路线上的重要据点忻州。阎锡山的意图很明确：以有限的兵力，沿着铁路线上的各据点分兵对抗，必是凶多吉少。忻州是太原的北大门，守住忻州就能确保太原的安全，便可以和共军继续周旋下去。为了表示死守忻州的决心，阎锡山下令枪毙丢失朔县的城防司令张文龙，同时关押了连失宁武、崞县的暂编四十师师长王乾元，然后命六十八师的两个团火速增援忻州。在向忻州方向增援的部队中，竟然还有五百多名日军——日本投降后，阎锡山不但收留了大批日军官兵，而且还给这些日本军人很高的待遇，成建制的侵华日军由此公开地成为阎锡山的地方军阀部队之一。无法猜度在其他地区的日本人急切地希望早日被遣返日本的时候，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些身在山西的日本军人拼命为一个中国军阀效忠。增援的日本军人和六十八师很快就被晋北野战军的火力阻挡，在往回溃逃的时候又一路遭遇共产党地方武装的伏击，结果只有两百多名官兵逃了回去。

但是，即使忻州已成孤城，晋北野战军对这座县城的攻击，仍以失利告终。

大雨倾盆，河水暴涨，道路泥泞。为了攻击顺利，贺龙增派了两个团以强兵力。此时，忻州守军已达八千多人，由第十九军副军长于振河和日军一个名叫今村的少将指挥。忻州因为太原门户，日军占领时环城墙修筑了密集的钢筋水泥碉堡，这种被共产党官兵称为“水萝卜”的碉堡体积巨大，每座可容纳一个排的兵力，火力配备十分强大。从架设着双层电网的城墙到碉堡之间，是又宽又深的外壕和护城河，外壕里有暗道与碉堡相连。外围开阔地设置了大量的绊雷、拉雷和触发地雷。此时，忻州城的西门和南门均被堵死，东门和北门被火力网封锁。

三十日晚十九时，攻击忻州的战斗开始了。大雨令炮兵无法向前运动，步兵用油布裹着炸药，端着步枪开始了冲锋。外围战进行得艰苦而残酷，攻击部队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依旧没有明显的进展。天亮的时候，撤出战斗的命令到达。除了倒在泥水中的士兵遗体和在雨水中恣意流淌的鲜血之外，忻州的城墙依旧在远远的雨雾中矗立着——一夜的血战，共产党官兵没能接近城墙。

攻击忻州的战斗停止了十天之后，八月十一日晚，对忻州的第二次攻击打响。晋绥部队终于突破守军外围阵地上的几个要点，然后交战双方在这几个要点上展开了反复的冲锋和反冲锋，残酷的近距离拉锯战持续了一整夜，但是战场上始终处于胶着状态。凌晨三时，大雨又至，双方的作战动作明显地迟缓下来。天亮的时候，晋绥部队因难以取得进展再次撤出战场。

晋北战役结束了。

对于原定战役目的来说，晋北野战军仅仅控制了太原至大同之间的部分铁路段。

忻州之战的结局没有引起共产党方面足够的警觉，他们随之将夺取大同当作了新的战役目标。共产党方面坚持夺取大同基于这样的分析：与忻州不一样，忻州只是距离太原很近，而大同不是一般的县城，是中国西北的一座重要城市，平绥与同蒲两条铁路交会于此，占领它将打通晋察冀与晋绥两个解放区，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有重要意义。况且，目前大同是孤立的，由于铁路已被切断，阎锡山要想增援十分困难。大同虽距傅作义的地盘很近，但终究不属于傅作义的战区，即使他奉命增援想必也不会十分积极。

晋察冀军区与晋绥军区的战役设想是：第一步拿下大同，然后集中三个纵队出击平汉铁路，最后向正太路攻击，目标是另一座大城市——石家庄。

在大同西北方向的阳高县城里，聂荣臻主持召开大同战役作战会议。会议对拿下大同的时间估计为二十天左右，最后确定的攻击部队是：晋绥军区三五八旅，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七旅和八旅、教导旅的两个团、炮兵团，冀晋军区第一军分区的两个团、第五军分区的一个团。为了统一指挥，会议决定组成大同前线指挥部，由晋绥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为司令员，晋察冀军区副政委罗瑞卿为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杨成武为副司令员。

七月三十一日，外围战斗开始后，攻击部队当日就切断了怀仁至大同的铁路。国民党军决定固守大同，开始收缩兵力，大同守军千余人在八辆坦克的掩护下出兵接应怀仁方向的友军，结果遭到伏击。怀仁方向的国民党军向北移动时也遭到截击，损失了一部后撤退到口泉。大同守军八百人再次乘火车向口泉方向前出接应，因火车被阻击接应未果。聂荣臻部多方出击阻截，致使国民党军全部收缩于大同城

内，但是因为没有控制大同机场，国民党军从包头空运来一个大队的兵力，增强了大同城内的防御能力。

八月十四日，攻击大同城关的战斗开始。攻击部队连续攻克大同西北方向的两个军事据点，东北面攻占了白马城和卧虎湾，南面攻占了智家堡、七里村和水泉湾，并一度攻进了大同机场。攻击北面的部队遭遇守军顽强防御，双方都出现很大伤亡。尽管扫清外围的战斗比预想的艰苦，但攻城部队还是乐观地提出了“进大同吃月饼”的口号。部队开始挖坑道，并从四面同时攻击大同城垣。

由于外围守军全部退回了城内，大同城防兵力充沛，火力凶猛，工事坚固，攻城部队在初步攻击中就已显露出很可能“久攻不下”的迹象。此时，决定战场胜负的意外情况在战场之外发生了：就在共产党军队发起大同战役的四天前，蒋介石已经将属于阎锡山的地盘划拨给了傅作义——大同被从阎锡山的第二战区里划归给傅作义的第十二战区，蒋介石想以此为诱促使傅作义出兵大同。如果在平时，这一决定定会引起山西王阎锡山的勃然大怒，但是此时阎锡山不但一口答应，而且还主动请求配合作战——许以地盘城池，蒋介石这个小小的手腕，导致了晋察冀和晋绥部队的重大损失。

九月三日，傅作义出兵了。

聂荣臻部不但要继续与阎锡山的部队作战，而且还要面对他们一直想避开的傅作义的部队。

傅作义，一八九五年出生于山西荣河县安昌村一户普通农家。毕业于太原陆军小学堂和北京清河镇第一陆军中学，十六岁时曾以晋军学生军排长身份参加辛亥革命起义，二十岁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一九二七年，作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手下的一名师长，面对奉军的疯狂围攻苦守涿州三个月一战成名——国民政府的嘉

奖令为："涿州固守，弥见声威，立功殊伟。"一九三三年，率华北军第七军团于长城抗战。一九三六年发动绥远抗战。七七事变后与日军初战忻口，再战绥南，奇袭包头，大捷五原。曾写下绝命家书："余自幼从军，为国为民。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取义者也。"一九四〇年，国民政府通电全国授予他"青天白日勋章"，他称战功乃全体将士浴血苦战所为自己只有坚辞勋奖。

傅作义的六个师、四个纵队及一个保安旅和一个炮兵团兵分北、中、南三路向集宁发起进攻。此时，聂荣臻部对大同城的攻击还在艰苦而缓慢的进行中。傅作义的重兵增援令聂荣臻陷入两难的境地：如果坚持对大同的攻坚，从目前的战斗进展看，没有任何把握在傅作义部到达之前拿下大同；而一旦傅作义的援军到达战场，攻城部队必将面临十分危险的处境。如果放弃对大同的攻击，整个战局将在顷刻之间迅速恶化，后果对于晋察冀和晋绥解放区同样不堪设想。那么，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留一部分部队继续保持对大同的围攻，迅速调集主力部队北上迎战傅作义。

但是，从大同前线转去打援的部队刚刚出发，前面就传来一个坏消息：卓资山阻击线已被傅作义部突破——原本在估计傅作义是否增援的判断上已经出现失误；现在看来，对傅作义出兵作战的决心、速度和能力的判断依旧存在失误。

在卓资山防御的只有一个旅，一个旅的任务是防御三天。但是战斗一打响，这个旅的官兵发现他们面对的是傅作义部的整整三个师！卓资山不是一座山，而是位于归绥（呼和浩特）以东七十五公里处、横跨平绥铁路的一个车站小镇，距离塞北重镇集宁直线距离不足五十公里，向西可以直达归绥和包头。傅作义并不清楚聂荣臻部在这个小镇上到底部署了多少阻击部队，为了使增援行动不在这里受阻，傅作义从一开始就投入了三个师的兵力猛烈冲击。打起来他才发现，小镇

里的抵抗比想象的微弱得多，几个小时后枪声完全停止，小镇里遍布着五百多具阻击部队官兵的遗体。

卓资山失守，令聂荣臻感到了事态的严重。

中央军委在来电中对傅作义下一步的作战方向进行了预测：一是在卓资山停下来，二是攻击平凉，三是攻击集宁——从这个预测上看，是傅作义迷惑了共产党。就在傅作义大军出动的时候，他还在派人与共产党方面联络和谈事宜，这使共产党没能充分估计到他的作战的决心。而之所以判断傅作义失误，是因为共产党方面认为傅作义前来增援，仅仅是做个样子给他的老上司阎锡山看看而已——大同前线指挥部决定部队停下来，等局势进一步明朗了再行动。

等待的决定造成了再次失策。

从当时双方集结的兵力上看，晋察冀和晋绥部队一方仍占据优势，即使卓资山丢失，只要派出得力的侦察部队，严密监视傅作义的行动，保持各部队之间以及与大同前线指挥部的联络，随时对敌情作出反应，战场是存在寻找战机的可能的。但是，侦察既不严密，通讯也不畅通，整整两天都没判断出傅作义到底要在哪个方向作战。直到九月八日晚上，傅作义部主力已从平绥铁路的北侧秘密移动到集宁城下时，大同前线指挥部这才猛然醒悟傅作义要打集宁了。

塞外的九月，天寒草衰。

共产党官兵穿着单衣从四面八方火速向集宁疾进。

此时，傅作义部已经开始了对集宁的攻击。

集宁守城部队只有三个团。

九日，晋察冀和晋绥主力的先头部队经过上百里的急行军赶到集宁城下。十一日，晋察冀军区陈正湘的第四纵队赶到了，阻击作战于这天晚上打响。混战时刻，杨得志的第一纵队也到达战场。此时，傅作义攻城受阻，背后又遭到攻击，想往西撤，但是发现没有了退路。十二日早上，傅作义发现集宁的外围要点已经相继丢失，他的部队正处在即要阻击又要攻城的两面作战中。这时候，聂荣臻部主力实际上已经把傅作义的三个师分割包围了，如果以连续作战的气势对傅作义部发起最后攻击，将其主力部分歼灭是极有可能的。但是——也许是因为战役前线指挥部远在大同方向的缘故，通讯的不畅导致无法迅速掌握敌情，令战机稍纵即逝——十二日整整一个白天，聂荣臻部没有组织大规模的攻击，这让傅作义得到了宝贵的整顿部队的时间。

十二日傍晚，聂荣臻部的反击再次开始。已经重新部署兵力的傅作义部在空军的配合下攻进集宁城的西南角。傅作义想全力攻下集宁后固守待援，因此攻城的决心十分坚定。集宁城内的部队因兵力不足，逐渐收缩到难以支撑的地步。杨得志的第一纵队奉命向城内增援，结果，集宁战场上出现了聂荣臻部和傅作义部同时往城里打的局面。傅作义部冲进城后立即成为守军，与企图增援的第一纵队展开了激战。这时候，傅作义的精锐部队一〇一师到达了集宁附近。

大同前线指挥部命令：暂时停止对集宁的总攻，主力迅速集结向西，前去歼灭增援的一〇一师。

这是一个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如今都让人难以理解的军事命令。

临时改变作战方向，令部队仓促间开始移动。事先没有必要的侦察，道路和地形陌生，各部队行动没有达成一致，结果攻击一〇一师的行动不但没有取得效果，反而让集宁城下的傅作义部迅速恢复了阵地，并开始了策应一〇一师的战斗。十三日中午时分，跟随一〇一师东进的新编三十二师和新编骑兵第四师也相继靠近，开始对共产党军

队猛烈的合围攻击。战场形势急转直下，聂荣臻部由攻击转为阻击，当阵地全部被突破后，部队不得不紧急撤退。

十三日晚，聂荣臻部放弃集宁。

集宁的失守和主力的受损导致大同已无法攻克。

十六日聂荣臻部撤围大同。

大同、集宁战役的失败，是共产党人在战争初起时经历的切肤之痛。参战部队不但在兵力、武器、弹药和物资上损失巨大，晋察冀和晋绥解放区未来的前景更是不容乐观。

战后，傅作义曾这样说：

> 集宁会战，按当时的情形，我们是相当的危险，很有失败的可能，最后能够取得胜利，我认为是一个侥幸……第一〇一师参加战斗之后，共产党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在十二日晚上，他没有去攻击新编第三十一师，而去全力打一〇一师，这是共产党失败的原因。如果他那天晚上去攻新编第三十一师，我们的情况就相当危险了。

傅作义仅从战术角度分析了局部作战指挥问题。实际上，战役失败原因很多：对敌情的判断一再失误，自身防御作战能力不强，大同外围作战时没能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敌于城外，没有详细制定一旦大同攻坚受挫而傅作义又出兵增援时的应对方案。当然，更重要的是，发动大同战役本身就存在着问题。聂荣臻后来说：“发起大同战役，有考虑不当之处。因为，大同敌人的兵力虽不雄厚，而城防设施是颇为坚固的。当时，我军既没有重武器配备，又缺乏攻坚战经验，哪里有把握攻打大同？”——根本的问题是：当共产党军队还不具备与国民党军发生大规模正面作战的实力时，夺取大城市是否是冷静的、明智的、务实的战略选择？

贸然发动大同、集宁战役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很快就显现出来。由于驻扎在承德地区的晋察冀军区第一纵队被调往大同前线，热南和冀东兵力空虚，位于东北的郑洞国部和位于河北的孙连仲部趁机联合发动进攻，共产党人与东北地区的林彪部保持陆路往来的唯一通道承德落入国民党军之手。接着，冀东地区的迁安、乐亭、丰润、遵化等十五个县城相继丢失。

集宁和承德丢失之后，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处在了国民党军于东西两面形成的夹击之中。

张家口北依长城，南依桑干河，是平绥路东段的重要城市，为河北与内蒙古交通要冲，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抗战时期，这里曾是察哈尔省会，伪蒙疆政府所在地，日军驻蒙司令部也设在这里。日本投降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共产党军队将其占领。

九月十日，蒋介石下令向张家口发动攻势："以第十一、十二战区之主力，沿平绥路东西并进，向张家口攻击。以东北兵团之一部围击张家口附近匪军而歼灭之，并折断其退路。"国民党军的作战部署是：东线，孙连仲的第十一战区第十六、第五十三军由南口、怀柔一线向张家口进逼，第十三军出沽源，作牵制性佯动，第九十四军在北平为战役预备队；西线，傅作义的第十二战区以四个师加上阎锡山的第二战区的一个师会攻张家口。

这一作战部署被打入国民党军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获得。因为情报重要，在北平军事调处工作的晋察冀军区作战科长杨尚德专程回到张家口，他的突然出现让聂荣臻十分诧异。当聂荣臻看到从一支"顶球牌"香烟里取出的这份情报时，顿时感到形势的严峻。

是坚守还是放弃张家口？

在晋察冀军区高级干部中，持两种不同主张的人旗鼓相当。认为张家口守不住的理由是：敌人兵力火力强大，如果不是主动放弃，到作战失利时败退，损失将是巨大的。也有人认为西面有晋绥军区部队和杨成武的第三纵队阻击，东面有冀热辽军区部队和郭天民的第二纵队阻击，张家口可以守住。主张坚守的理由不是来自事实而是出于情感：张家口是日本投降后共产党人占据的唯一一座大城市，是晋察冀解放区首府，晋察冀解放区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怎么能轻易丢掉呢？

九月十五日，聂荣臻在晋察冀中央局干部大会上作了《不计一城一地得失，力争战胜敌人》的报告。从报告的题目便可以看出，共产党人的战略思想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会后，晋察冀中央局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在敌东西夹攻张家口的情况下，我拟在敌人进攻时只进行掩护战斗，不作坚守。"

第二天，中央军委回电：

……集中主力于适当地区待敌分路前进，歼灭其一个师［两个团左右］，得手后看情形如有可能，则再歼其一部，即可将敌第一次进攻打破。依南口至张家口之地形及群众条件，我事前进行充分准备，各个歼敌，打破此次进攻之可能性是存在的……此种歼敌计划是在保卫察哈尔之口号下进行动员，但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使主力行动自如，主动地寻找好打之敌作战。如届时敌数路密集不利于我，可以临时决定不打。若预先即决定不打，则将丧失可打之机，对于军心士气亦很不利……希望你们聚精会神，充分准备，寻找良机歼敌一两个团。打第一个胜仗，即能振奋军心民心……同时张家口应秘密进行疏散，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之，这种准备和积极布置歼敌计划并不矛盾……

此时，张家口成了诱敌的一个诱饵，如果不出意外，不但可以在运动中大量歼敌，甚至有可能粉碎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的企图。按照蒋介石的本意，他希望占领张家口的是他的嫡系孙连仲部，他并不愿张家口落入与他存有隔阂的傅作义之手。聂荣臻在制定保卫张家口的作战计划时，也注意到了利用这一矛盾——"傅作义不可能出很多兵向东"，晋察冀主力部队的布置因此偏重于东部。九月二十九日，张家口

东面的战斗开始，晋察冀军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纵队以及大量的民兵投入战场，不但将国民党军的二十二师、一〇九师、一三〇师和一一六师阻击于怀来一线，而且运用大规模的运动战，奇袭了一〇九师和一一六师，成功地遏制了国民党军凶猛的进攻势头。同时，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第八旅等部向平汉铁路展开了大规模的破击战，迫使国民党军迅速抽调部队南下。果然，当得知孙连仲的部队进攻受阻后，本来就对东进张家口有所顾虑的傅作义更加犹豫不前，部队虽然大造东进的声势，实则坐观孙连仲的部队挨打。但是，蒋介石必须拿下张家口，除了军事上的目的之外，还有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大会做铺垫的政治目的。为此，当国民党军东线进攻部队受阻后，蒋介石把张家口也划给了傅作义的第十二战区。

十月八日，情报显示，傅作义的主力部队出现在张北地区。

这是一个惊人的消息，令战场危险突然而至。

此时，晋察冀军区在张北方向上只部署了一个团，任务仅仅是“注意西面敌骑兵之扰乱”。

张北位于张家口长城以北。当孙连仲部出兵西进张家口时，晋察冀主力部队大多集中在张家口以东。张家口被明确地划归入第十二战区后，傅作义为了迅速制定作战计划，专门架设起电台测向仪器，根据无线电的方向和声音大小，得知了聂荣臻部主力的方位。他立即命令一部虚张声势东进，然后集中近两万兵力，避开聂荣臻部的西线设防地域，从集宁向东穿越了上百公里的大草原，以突然迅猛之势袭击了张北。负责监听并破译傅作义部电报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二局竟没能发现任何迹象，二局局长彭富九数年之后仍为此懊悔不已——傅作义为了达到突袭的目的，没有使用蒋介石的统一密码，而是自己另外搞了一套密码。十月八日攻下张北之后，傅作义部主力直逼张家口。

聂荣臻立即向张北派出增援部队。

张家口以北是平展的大草原，无险可依。增援部队遭到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部队被打散后官兵退守至狼窝沟。位于张北南面的狼窝沟距张家口直线距离仅二十多公里。此时，张家口市区内多数人还不知道危险已经临近，更不知道张家口北面没有主力部队设防，因此晋察冀解放区的党政机关和大批物资还没有转移。由于没有时间调动主力回援，只有派出担任市内防御任务的教导旅前往狼窝沟阻敌。狼窝沟的战斗进行得十分惨烈。教导旅官兵都是富有战斗经验的干部和老兵，但面对敌人强劲火力的攻击，特别是骑兵大兵力的冲击，阻击阵地连续失守。十月十日，傅作义部攻占狼窝沟。

张家口北面门户洞开。

蒋介石给傅作义的命令是：十一日占领张家口。

没有史料显示共产党人撤离时张家口时发生了混乱，多数史料都记载着十月十日那晚月亮高悬，月光如银。国民党军的轰炸机飞走之后，月光照耀着路上一连串的骡马大车，车上坐的是机关人员、医护人员以及伤病员，在他们的身边是钞票、布匹、药品、盐巴、罐头等生活物资。当时，有一群外国记者目睹了共产党人从张家口的撤离。他们对这个“面积和人口相当于一个波兰”的城市能够在敌人逼近时平静地撤离感到十分惊讶：“一切都是按部就班地进行，毫不慌乱。”有记者在这个城市里定制了一些信笺和皮大衣，居然发现在隆隆的炮声中工人们依旧在为他们从容地缝制。记者们看见有人耐心地把“漂亮的蓝地毯和缎被子”卷起来，装车的时候大家还在唱《八路军军歌》。工会组织甚至还为他们开了个欢送会，会上主持人建议在场的外国记者给美国产业工人联合会发电，电报的内容大约是：“我们是已组织起来的工人，现在在受到威胁的张家口集会，谨代表本地区的四十一万已组织起来的工人向你们致意……我们的一切成就都受到你们美国工厂

所制造的炸弹、枪炮和飞机的威胁。”共产党的工会干部表示，他们多次发出这样的电报，“但从未得到过回电”——“也许是被蒋介石干扰了吧，要不就是我们的美国兄弟根本不相信我们还存在。”记者们来到大街上，看见一眼望不到头的“装着大卷新闻纸”的牲畜大车——“他们把半个日报拉走了”，剩下的“半个”居然还在张家口印刷着。告别的时候，共产党干部与外国记者们一一握手，并平静地告诉他们：“张家口很快将变成一个战场了。”

机关撤离完毕，聂荣臻才乘坐一辆吉普车离开了张家口。然后是一辆载有电台的卡车，押车的是电台台长马萍和作战处长唐永健。

最后撤离的是教导旅官兵，时间是十一日上午九时，跟在他们身后冲进张家口的是傅作义的四个师。

张家口受到进攻的第二天，周恩来向马歇尔提交了一份备忘录：

在此三月中，政府已进占许多城市，摧毁了当地政府，进行了普遍的轰炸……他借口中共之围困大同而声言他们将进攻承德、张垣和延安。继承德之后又续占平绥路之重要城市集宁及丰镇，并发动对张家口的三路进攻。中共对大同的战役仅仅是牵制山西阎胡军之进攻，最近已正式宣布撤围，如此大同的威胁已不存在。而国民政府之进攻却在继续，他不惜以进攻中共解放区的政治、军事中心之一的张家口来迫使国共关系临于最后破裂之境。我兹特受命声明如下，请你转达政府方面：如果国民党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并已放弃政治解决之方针。其因此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当然全部责任均应由政府方面负之。

张家口被国民党军攻占之后，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梁漱溟绝望地说：“和平已经死了！”

十月十日，国民党军占领了共产党人在热河省内仅剩的一座城镇赤峰。二十三日，国民党军攻占高密，从而打通了胶济铁路。接着占领安阳并向邯郸推进。到一九四六年接近年底的时候，全国各解放区在国民党军的猛烈攻击下大片失守：长江以北的苏中解放区和豫皖解放区已全部沦为敌后；晋冀鲁豫解放区先后丢失四十六座县城；而张

家口和承德地区一系列县城的丢失，不但使关内与东北地区的联系被完全截断，而且令共产党人的中枢——陕甘边区的侧后出现了巨大的威胁。在蒋介石看来，战场态势已经十分明确：共产党军队处于节节败退、处处被动之中，东北的林彪部，山东、华中的陈毅和粟裕部，华北的刘伯承、聂荣臻部和西北的彭德怀部，都已经被压缩在狭窄的区域里，只要继续实施猛烈进攻，把他们切割成若干小股，然后赶进荒僻地带予以消灭，似乎已经不容置疑。

于是，在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的那天，蒋介石不失时机地给予了中国共产党以政治上的最后一击：宣布召开国民大会。

按照一九四六年一月国共在政协会议上达成的协议，国民大会必须在内战停止、政府改组、训政结束、宪草修正完成之后才能召开，这是国共通过谈判达成的重要政治原则。现在。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等于否定了之前所有和谈的成果，等于宣布与共产党人在政治上彻底决裂——在军事形势已经明确的前提下，急于确立国民党统治地位的蒋介石已经不愿再与共产党人进行政治游戏了。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国民大会开幕。

马歇尔拒绝出席开幕式，因为他“不希望在人们心目中被看成是附和国民政府对待国民大会的方针”。而司徒雷登以美国驻华大使的身份出席了开幕式。国民大会的混乱程度连司徒雷登都感到惊讶：“孙科博士，作为临时主持大会的人，不能控制同时争着说话的人以维持大会秩序。代表们显然被西方新颖的麦克风所吸引，抢着发言，用武断的口气提出离题的问题。诸如争取妇女平权、蒙古自治、主席团内增加西藏人名额等等。对这些离题的过分的热情能起控制作用的是大元帅，他坐在前排，不时地向执行主席传达提示条子。”会议设置了五十五个主席团名额，国民党占了四十六个，剩下的九个名额中“五个留给中共，四个留给第三党派——“假如他们将来愿意参加的话”。

此时，周恩来已率领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返回延安。

临行前，周恩来对马歇尔说："由于国民大会的开幕，国民党已经关上了谈判的大门……国民党方面特别是蒋委员长本人醉心于武力可以解决一切的想法，但是共产党永远不会屈服于武力，而是相信，只有人民才能解决问题。"

马歇尔与蒋介石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告诫蒋介石："整个春季国民政府对共产党的善意的完全不信任，已经被共产党对国民政府为和平解决分歧而提出的任何一项建议的绝对不信任所代替。在最近举行的谈判中，我和司徒雷登博士发现，已经不可能使共产党相信国民政府的善意，甚至不可能使他们相信我们自己的公平正直。在我看来，国民政府提出的甚至是最宽大的一些办法……都已经由于军事行动而失去了作用……据传，军事开支正消耗着国民政府预算的百分之九十，从而在我被催逼着提出由美国政府提供各种贷款的同时，使国民政府为支持广泛的军事努力而造成了财力上的真空。一旦财政崩溃，国民党就将陷于危险境地，而共产主义的蔓延将获得肥沃的土壤。国民政府从事战争的军事将领们几乎不习惯考虑财政上的限制，在美国军人看来几乎具有决定意义的、也是我本人多年来念念不忘的国民经济这一因素，对他们却是无所谓的问题。共产党人能够对于迫近的危机十分清楚，而且在制订计划时是加以考虑的。与这种经济问题不相容的是，国民政府的军事将领们认为，这种问题是可以用武力加以解决的。我不仅从军事角度不同意这种观点，而且觉得，不必等到足够的时间来证明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彻底的经济崩溃就会出现。"

马歇尔最后着重提醒蒋介石：

> 共产党军队已经是一支大得不容忽视的军事和社会力量，即使不考虑为了摧毁他们而必须采取的手段的残酷性，要靠军事行动消灭他们也多半是不可能的……我认为在这个国家面临一场彻底的经济崩溃之前，国民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把共产党摧毁。

马歇尔后来回忆说，当时他还没跟蒋介石谈及他认为“最值得忧虑的问题”，即“国民党崩溃的可能性，以及人民对国民党对这个国家的地方政府管理不善所感到的显然是日益增长的不满”。

蒋介石对马歇尔的回答是：政府“有信心在八个月到十个月的时间内消灭共产党的军队”。

马歇尔彻底绝望了。

一九四七年一月八日上午，马歇尔从南京乘飞机离华返美。

美国国务院随即发表马歇尔关于中国时局的个人声明，声明说中国“和平的最大障碍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彼此之间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完全的怀疑和不信任”。

马歇尔随即被杜鲁门总统提名出任美国国务卿。在这一职任上他经历了两次与中国有关的巨大的意外：一是中国共产党经过短短两年多的战争夺取了中国政权；二是在远东的朝鲜半岛上美国军队与中国军队进行了一场战争。当朝鲜半岛上战争进行到尾声的时候，马歇尔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是这个世界著名的奖项第一次授予一名职业军人。获得了这一奖项之后的一天，他在办公桌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授予十名军队将领以元帅军衔的情报，阅读之后马歇尔说：“这十个中国共产党人我认识其中的七个。”

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在冬季寒冷的风雪中，马歇尔认识的这些共产党将领正率领着他们的部队撤向更加偏僻的乡村。随着驻上海的董必武和驻北平的叶剑英率领最后一批谈判代表团返回延安，这片国土上所有的和平大门都已彻底关闭。

战争就要全面开始了。

# 第三章 哀莫大于心死

## 奇寒中的呐喊

东北民主联军三纵七师二十团三营九连五班长房天静的双脚已被严重冻伤，即使在冰天雪地里溃烂处依然流着脓血。实在是疼痛难忍，房天静抓了一把雪把脓血处擦干净，然后从一只冻梨上切下一片来，贴在溃烂的伤口处。冰凉的感觉让疼痛减轻了一些，但他站起来没走两步便再次跌倒。房天静身边的几个战士因为冻伤已无法站起，此刻正在雪地上慢慢地向前爬，他们的脚上都没有棉鞋，脸被冻得纸一样苍白，上面是一块又一块青黑色的冻伤。那些没有大衣的人把草绑在身上，大风刮过来草被吹得纷纷扬扬，整个人像是一簇在雪地里滚动的蒿蓬。干部的喊声在风雪的呼啸中断断续续："同志们……看看枪栓冻住没有！快接近敌人了……都别当孬种！"正是东北长白山地区最寒冷的时候，气温降到零下摄氏四十多度，白茫茫的山林在风雪中一片迷蒙，所有的生命仿佛都已僵硬，只有这支队伍在凛冽的风雪中跌跌撞撞。

这支队伍迎接的战斗，几乎是一个孤注一掷的行动。

一九四七年初的南满部队正处在最艰难与最危急的时刻。

内战开始后，林彪率东北民主联军主力退到松花江以北，以萧华为司令员的辽东军区部队和以曾克林为司令员的第三纵队、以胡奇才为司令员的第四纵队仍然留在了南满。南满地处安东（丹东）、通化、临江一带，是邻近中朝边境的一片狭小区域。尽管共产党人力图在这里建起一个能够让他们有吃有穿的根据地，但是，孤悬一隅的南满很快就受到国民党军的大规模围攻。相对于共产党人在松花江以北

建立的北满解放区来说，为避免战线过长，国民党军制定了“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即首先攻占南满，彻底消除长春与沈阳侧翼的威胁，然后全力进攻北满以占领整个东北。一九四六年十月，国民党军以九个师的兵力发起全线进攻，相继占领安东、凤城、宽甸、桓仁、通化等十七座县城，并逐步向南满根据地的腹地压缩。随着局势的日益恶化，大部分共产党地方政权陷入瘫痪，大部分共产党地方武装已经溃散。国民党军迅速恢复各级政权，实行保甲制度，布置情报网，建立地主武装，强行征兵征粮。到严冬来临的时候，南满根据地只剩下闬江（靖宇）、抚松、长白、临江、辑安（集安）五座县城和两条大山沟。这是一片仅有一百多公里的狭长地带，百姓因对共产党人心存疑虑而藏进了深山老林。大雪封山之后，聚集在两条山沟里的近四万东北民主联军官兵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困境，南满这片小小的根据地能否坚持下去成了最现实的问题。

南满恶劣的生存环境令林彪焦急万分。他命令南满领导人把需要转移的军火物资及早转移到中朝边境地带，把伤员安排在远离重要道路的乡村中，然后集中兵力与敌人在山林中运动周旋。如果敌人过于强大，他们要占什么地方就让他暂时占着好了。我军最根本的原则是保存实力，提高战斗信心，作战部队绝不能越打越少。十月三十一日，林彪致电中央军委：

> 敌将进攻南满及进攻开始后，我们前后有七八个电报，总是叫他们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反对分兵把口，反对打击溃战。但他们恰恰没有逃去这三个圈套，故打了很多击溃战，每次伤亡大缴获小，部队疲惫不堪，形势日益恶化。现决定陈云、萧劲光两同志担任南满的领导，免得南满垮台。该地区有我兵力九个师、四个炮团，占整个东北我军兵力五分之二以上，武装弹药比北满部队更好，地区全为山地，下层干部多，气候人口条件均好。故只要领导加强，才能好，有可为，否则影响整个东北局势甚大。

在初冬的寒风中，陈云和萧劲光从哈尔滨出发了。北满与南满是两个完全隔离的地区，从北满到南满必须绕一个巨大的圈子：先到牡丹江，然后折向昌图，进入朝鲜到达平壤，再从平壤进入中国吉林境

内的临江。这条充满危险的路程两人走了整整一个多月，终于到达南满，已是深冬时节。

南满部队的困境令陈云和萧劲光万分吃惊。

冰天雪地，官兵由于没有棉衣和棉鞋出现大量冻伤；粮食极度短缺，只有冻得如同石头一样的杂面窝头和酸菜；有的部队因为没有房子，官兵整日整夜在野外的雪地里烤火。更严重的是，大部分官兵认为南满已经没有希望，认为仗没有打好是指挥上的错误和无能，如果在无法解决的饥饿和寒冷中继续守在这里，结局不是到鸭绿江喝水就是得流亡到朝鲜。陈云和萧劲光最终了解到，南满部队领导已经做好放弃根据地把部队带到北满去的准备。

陈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陈云后来回忆说，这是他一生遇到的最艰难的时刻。

之前，陈云任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和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是中国共产党著名的领导人之一，以不事张扬却遇事果敢著称，被舆论称为中国共产党内“处理麻烦事件的能手”。十二月十一日，中共南满分局书记的陈云和辽东军区司令员萧劲光（之前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在南满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七道江会议”。萧劲光提出：以机动作战和敌后游击战配合，坚持南满斗争。南满部队师以上干部多持反对意见，认为这里地窄人稀，难以进行机动作战，更难以保障作战供给，去北满与大部队会合是唯一出路。最后时刻，陈云表态了，语气不容反驳：“我是来拍板的，拍板坚持南满。我们在背靠沙发（指苏联和朝鲜的支持）的形势下向前进，虽然是艰苦奋斗的前进，还是比退到北满最后被敌人打出国境线再打回来要合算……南满一定要坚持，三、四纵队全都留下，一个人都不走，坚持就是胜利。”

为什么要坚持南满？陈云的比喻是：东北的国民党军好比是一头牛，牛头和牛身子是向着北满去的，在南满留了一条牛尾巴。如果我们松开了这条牛尾巴，那就不得了，这头牛就要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危险；如果我们抓住了牛尾巴，那就了不得，敌人就进退两难。如果我们不坚持，撤到北满去，过长白山要损失几千人，敌人追过来打，我们还会再损失几千人。国民党军一旦没有了南满的后顾之忧，就可以全力进攻北满，那时北满也就保不住了，我们只能继续向北一直撤到苏联去。“我们都是中国共产党人，不能总在苏联住”，早晚还要打回黑龙江，打回北满和南满，这些战斗又会让从南满撤到北满的部队再损失几千人。如果我们坚持南满，“就不会失去犄角之势，就可以牵制敌人大批部队”，敌人在南满兵力分散让我们完全有可能坚持下来。

陈云坚持南满的决定，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虽然当时共产党人在南满处境艰难，但正是因为南满的存在，保持了东北民主联军在东北地区南北两线的存在，使得国民党军在进攻东北民主联军主力所在的北满地区时，不得不考虑到身后的威胁。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共产党人于东北地区南北两边形成的相互依存的态势，日益显示出其对于赢得战争最终胜利的重要性。

留下来不走，首先要解决生存问题。当时，为解南满物资之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筹措到一批粮食、药品和被服，由东满经火车运到朝鲜境内的惠山镇，这里与南满部队控制的长白县城隔河相望。河面结冰正好可以转运，但根据《雅尔塔协定》，两岸往来人员必须走桥，守桥人员一边是朝鲜士兵，另一边是苏军士兵。辽东军区副司令员萧华派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前往疏通。在万分艰苦的条件下，莫文骅还是千方百计地筹到了一卡车通化葡萄酒和一卡车冻猪肉，他带着酒肉前往长白县城宴请守桥的苏联和朝鲜军官。对方毫不客气，在一位上尉的带领下，一下子来了二十多人，大家喝得兴高采烈，频频举杯

祝斯大林、金日成和毛泽东万岁。第二次宴请后，苏军连长对莫文骅说：“守桥主要由我们负责，以后有什么事可以找我们。”朝军排长说：“这是朝鲜领土，过桥要经过我们才能放行。”莫文骅提出请给予东满运来的粮食、药品和被服放行，苏联和朝鲜军官均立即“慨然应允”。

“七道江会议”制定的战略方针是：四纵打出去牵制敌人，三纵担任内线作战保卫根据地。会后，四纵十师主动出击，向国民党军的侧后插去。在极端寒冷的气候下，战术动作无法充分展开，打的大多还是击溃战，被冻伤的官兵往往比战斗伤亡的还要多。但是，四纵的出击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南满根据地的压力。林彪对南满部队主动出击感到高兴，他提出了一个违反战术常规、也违反他谨慎性格的决定：打硬拼战。林彪的解释是：在群众条件不成熟，“甚难秘密地接近敌人”；敌人力量过于强大，做不到一打即溃；敌人距离交通线很近，便于机动增援等前提下，打各个击破的歼灭战还不具备条件。为了打击敌人的士气，只要“有六七成胜利的把握”，就要下决心猛打，打就死打硬拼，不惜伤亡惨重。林彪甚至表示，在一定时期内，不但南满要这样打，北满也要这样打。陈云和萧劲光表示同意，他们认为为改变南满的严峻局面，“不得不拼掉几个棋子”。

“棋子”就是血肉之躯。

保卫临江的第一战来临了。三纵第七、第八、九三个师从不同方向抗击着国民党军的进攻。由于四纵的穿插，国民党军不得不暂时放弃临江回头防御。就在国民党军回撤的时候，南满前线指挥部命令三纵、四纵主力开始出击。国民党军弹药充足，武器精良，特别是御寒装备充足，而南满部队粮弹缺乏，在零下四十摄氏度的气温中，不少官兵还穿着单衣。战斗打响前，萧劲光通知旅长彭龙飞来指挥所领受任务，当彭龙飞顶风冒雪中赶到的时候，胡子和眉毛上都结了冰，因

为没有大衣整个人围着火炉烤了很久还是哆哆嗦嗦地说不出话来，萧劲光“一阵心酸”。旅长都冻成这样，部队的情况可想而知。萧劲光立即让参谋连夜到临江取回五十万元北海票给了彭龙飞，他嘱咐这位旅长无论如何要带领部队坚持住。茫茫风雪中，南满部队与国民党军展开的是残酷的拉锯战。三纵七师向敌人发动攻击后，国民党军先是撤退，随即发起猛烈的反击。三纵再次发动攻击，国民党军还是在撤退之后再次发起反击。最后时刻，三纵难以继续僵持，只有以死硬拼，发动了不惜一切的进攻，国民党军终于向通化方向撤去。

无论是三纵还是四纵，都已无力追击，因为冻伤的官兵越来越多。黄昏时刻，天边的太阳如同一张白纸片贴在白桦林的梢头，枪油被冻结，枪栓拉不开，眼看着敌人在前边跑，但浑身已经僵硬，脖子向前伸着，陷在雪里的腿就是迈不开步。第三纵队中有许多新兵，大多是东北的穷苦青年，双脚被冻烂的房天静班长就是其中的一个。自从参加共产党的队伍，他没过上一天舒服日子，当国民党军进攻南满根据地时，部队连续转战，经常吃不上饭，晚上还会因为找不到宿营的房子而睡在雪坑里。一些新兵开始开小差，二十岁的房天静也想过一走了之，但好像又有点舍不得，他最终没有离开的重要原因是：共产党部队官兵一致。即使再苦，官兵有苦一起受，不打人不骂人，指导员对他就像亲兄弟一样。此时，房天静的指导员赵绪珍脸被冻烂，额头上的皮肤翻卷起来，眼睛被冰碴子完全遮盖，他躺在雪窝里断断续续地说：“咱们在诉苦会上咋说的？地主老财们是怎么欺负咱的？暖和的棉袄和皮大衣都穿在谁身上？大家都想想！”雪野上，九连的官兵开始哼唱《谁养活了谁》：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看一看，

没有咱劳动，粮食不会往外钻。

耕种锄割全是咱们下力干，

五更起，半夜眠，一粒粮食一滴汗，

地主不劳动，粮食堆成山。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瞧一瞧，

没有咱劳动，棉花不会结成桃。

纺线织布没有咱们做不了，

新衣服，大棉袄，全是咱血汗造，

地主不劳动，新衣穿成套。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谈一谈，

没有咱劳动，哪里会有瓦和砖。

打墙盖房全是咱出力干，

自己房，二三间，还有一半露着天，

地主不劳动，房子高又宽。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想一想，

创造世界，全是咱们的力量。

吃穿用着生活不能少一样，

不是咱，送上粮，地主早已饿断肠，

到底谁养活谁，不用仔细想。

此时，国民党第五十二军的一个师从辑安出动了，出动不久就发现侧后迂回着东北民主联军部队，于是立即往回收缩。三纵七师奉命无论如何要追上去。由于国民党军大部已经退回辑安，七师只追上了一个团。战斗中这个团被打散，其中的一个营被七师二十团包围在小荒沟。这是个只有四十多户人家的小山村，国民党军一进村就开始用积雪垒墙，垒一层往上面浇一层水，冰雪围墙冻得十分坚硬。傍晚，二十团在控制了村外的高地之后发动攻击，但连续攻击数次都没有效果。冬夜冰寒，风雪呼啸，水压重机枪因怕冻裂水箱不敢使用，轻机枪由于机油凝固已不能连发，步枪撞针冷缩后无法打响，手榴弹盖子

也因官兵手被冻僵难以拧开。七师师长邓岳和政委李伯秋决定天亮再打，官兵们在寒冷的冬夜里苦熬天明。清晨时分，炮兵到达了战场，二十团的集合号吹响了，但号响了半天也不见几个官兵。三连连长一瘸一拐地走来报告说："部队拉不出来了，全冻坏了！"尽管全团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可以投入战斗，攻击还是开始了，在炮兵的支援下，二十团没有冻伤的官兵攻进小荒沟与敌人开始了混战。

九连跟随营主力由小荒沟北山向南穿插，双脚已经冻烂的班长房天静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跑在最前面。当跑到一个小山包的时候，逃跑的敌人已经下了沟。沟里全是积雪，房天静抱着枪滚了下去。滚到沟底的时候，十几个敌人向他冲来，他连续扔出几颗手榴弹后继续追，最后发现自己已经远离了连队。房天静孤身一人，周围的敌人向他围过来，他跑到雪坡的高处喊："一班在左，二班在右，三班跟我上！"在敌人犹豫的一瞬间，他打伤了一名带头喊"快下手"的敌人，然后厉声说："谁不老实我就打死他！"房天静把一颗手榴弹攥在手里，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但是敌人却投降了。房天静的战果是：击溃一个排，歼灭一个班，击毙两名，击伤一名，俘虏七名。他荣立了特等功，并被三纵授予"孤胆英雄"的称号。不久，三纵文工团根据房天静的苦难身世和杀敌事迹写出了五幕十七场歌剧《复仇立功》。房天静看完之后，流了一夜的眼泪，他告诉指导员赵绪珍他想念已经死去的母亲。

一九四七年的新年到了，毛泽东发表的新年献词中没有提及战争：

在一九四六年，战后世界的光明面和黑暗面，进行了胜利的斗争，战后中国的光明面和黑暗面也进行了胜利的斗争。战后的世界和中国都发展了争取和平与争取民主自由的规模极大的人民运动。这个运动必然走向胜利……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我们和全国人民在一起，曾经用一切忍耐的努力来阻止内战的发生和扩大。不幸这个努力是被反动派的全面进攻和国民党一党的"国大"所破坏了。但是中国人民仍在经过两种努力来继续争取和平，即解放区各阶层人民粉碎反动派进攻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和国民党统治区各阶层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日

见高涨的群众运动。……只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坚持不屈不挠的奋斗，那么在不久的将来，自由的阳光一定要照遍祖国的大地，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一定在今后数年内奠定稳固的基础。

新年来临，蒋介石发布“侍天字第十七号密令”。回顾一九四六年诸战，蒋介石充满激昂的斗志：

本年一月之剿匪军事，全由我各级将领指挥有方，官兵忠勇奋发，为主义牺牲，为革命奋斗，多能达成艰巨任务，奠定统一基础，既足以安慰国家及阵亡将士之灵，亦足以湔雪我党国无穷之耻。唯念将士死伤之惨，以及冰天雪地之苦，不仅为之梦魂不安，兹将本年重要战役之关系与各地区经过得失，为我将士略述之：自四平街一役，奠定收复东北之基础，集宁血战，启导察绥全局之胜利，安东、承德与张垣之收复，重奠国防之锁钥。鄂北李匪之溃灭，豫北滑、濮之血战，苏北、鲁北、豫北、晋南及冀东各地奸匪之蹙败，以及平古、平绥、胶济、临枣与同蒲南段诸线之打通，使华北动荡不安之局势，渐告安定。此均足以配合政略之方针，达成国防大部之目的。迭闻战讯，衷心快慰。尤以暂编第三十八师之保卫大同苦战，二月第九十七军之固守临城为时十月，与冀省保安纵队保守保定勇毅坚守，确保重镇，使敌匪之丧胆，大局转危为安，军事反败为胜，更堪嘉赏……只要我将领在今后一年期内，淬励精诚，奋发努力，彻底消灭万恶之奸匪，扫除革命之最后障碍，则滔天大祸敉平于一旦，三民主义实现于全国，乃可告慰我总理与革命阵亡将士诸先烈在天之灵，我官兵之丰功伟绩，且将永垂于国民革命光荣灿烂之史页……

蒋介石在历数战场胜利之外，没有忘记巨大忧患的存在，那就是国民党政府官员和军事将领的腐败。他在新年发表的演说中，历数令人痛心的现象：“投机冒险”、“偷税走私”、“欺诈谋利”、“穷奢极侈，为所欲为，巧取豪夺”，“以致礼仪廉耻扫地无余”，以致“近年以来”国外舆论对国民党政权的评价是：“一则曰贪污，二则曰腐败，三则曰无能，四则曰自私。”蒋介石深感“道德的沦丧”和“精神的堕落”，是“任何国家和时代”所未有的。

与蒋介石有同样忧虑的是杜聿明。在东北的严寒中，杜聿明和他的副司令长官郑洞国一起消磨着漫漫长夜。酒酣耳热之际，郑洞国提醒杜聿明：东北国军占领区内的腐败，远比想象中的严重得多。在东北暂时休战的几个月里，共产党人只干了一件事，就是派大批干部和部队到乡村去，搞土地改革，建立基层政权，不但得到了民心，部队

也由此有了兵员，目前总兵力已经达到二十三万。可这几个月我们干了什么？跟着军队进入东北的大小官员们忙着搜刮民财，官场上“派系之间激烈角逐，纷纷任用私人，排除异己，上下沆瀣一气，纲纪荡然”。更可怕的是部队内部的腐败，高级将领带头，中下级军官效仿，克扣士兵，贪污军饷，走私军火，倒卖黄金，然后到处购买房产和土地，再这样下去军队如何打仗？杜聿明沉默了很久才说出一句话来：“人家共产党自有一套主张，懂得发动民众，争取民心，我们懂得什么？还不是大家都想着发财！你说我们在东北腐败，其实全国又何尝不是如此？这样下去，我们的天下不会有几天了。”

但是，一九四七年初，就东北的军事力量对比而言，国民党军依旧占据着优势：七个军的正规军，加上特种兵和地方武装，总兵力在四十万以上。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军装备精良，补给充足，而且占据着重要交通线和经济发达的大城市。

在占领了南满的安东、通化等重要县城之后，杜聿明认为必须尽快达成下一个作战目的：攻占南满共产党人的核心地带——临江地区。这次，杜聿明制定的是正面攻击和两翼迂回的攻击计划：左翼，第五十二军一九五师从通化出动；右翼，第五十二军二师由辑安北进；正面是新六军新编二十二师。杜聿明企图大军东移，构成重兵封锁线，以确保最终攻占临江。

一九五师推进的速度很快，四天之后就超出了掩护部队两天的路程。萧劲光和萧华认为战机已至，决定集中三纵和四纵主力，从敌人的侧后发起攻击，先吃掉独自冒进的一九五师。二月五日拂晓，战斗打响后气温骤降，东北民主联军官兵在没膝深的大雪中发起了冲锋。一九五师的先头营很快被歼灭，后续部队立即后撤，撤到一个叫高力营子的小镇时，被三纵官兵死死围住。由于极度寒冷，惯于夜战的共产党官兵不得不等到天明再发动攻击。夜幕降临，呼啸的狂风从雪野

上掠过，一九五师在师长陈达林的率领下，从没有被封死的西南角开始突围。三纵发现后立即追击，两军在冰天雪地中混战在一起。天亮的时候，三纵清查战果：毙伤五百多，俘虏四百多。

就在南满部队主动出击的时候，北满部队为了配合南满的作战，以减轻南满部队的压力，也开始了主动出击。

退守松花江以北的林彪部，如果不是出于对南满的支援，无论从哪方面讲此时都不应出击作战。松花江以南的国民党军处在隔江防御的态势之中，如果他们不出现大规模的移动，就没有将其割裂并集中兵力歼灭其一部的有利战机。况且，此时是东北最寒冷的季节，并不适合作战特别是攻坚作战。寒冷给林彪带来的唯一有利条件是：松花江已经完全封冻，部队不但可以从江面上直接出击，还可以方便地撤回来。

一九四七年新年刚过，东北民主联军集中第一、第二、第六纵队和三个独立师，共十二个师的兵力，出其不意地跨越封冻的松花江，对吉林、长春以北、松花江以南的国民党军发动了攻击。林彪的作战意图是：采取“攻点打援”的战法，一纵三师攻击国民党军新一军新编三十八师一一三团一个加强营防守的重要据点其塔木，其他部队埋伏在九台、德惠至其塔木的公路要隘处准备打援。

一纵三师越过松花江后，在零下四十摄氏度的严寒中行军一昼夜，于一月六日下午十三时将其塔木守敌围住。其塔木是松花江南岸一个有五百多户人家的小镇，“南通吉林，北达德惠，西距九台县城五十多公里”，是国民党军封锁北满的重要江防据点。这里的守军虽然只有一个营，但已得到一个辎重连和一个工兵排的加强，七百多人几乎都是富有作战经验的老兵。除设有炮兵阵地之外，守敌还沿着镇子四周挖了壕沟，架设了铁丝网和鹿砦，修筑了地堡，并在凡是可能成为攻击线路的地方用水浇出了一层厚厚的冰壳。黄昏时分，一纵三师对

其塔木的攻击开始了，实施主攻的八团一营一连动作凶猛，炸开铁丝网后官兵们向镇内冲去，但是遭到地堡火力的猛烈拦截。冲击的道路是一片开阔地，没有任何可以躲避枪弹的遮挡物，冲在最前面的连长吴彩民中弹牺牲，官兵们在指导员金士庆的率领下继续冲击，晚十九时终于占领镇边的一个院落，一百多人的一个连队只剩了三十多人。一连已经无力推进。而此时，从镇西攻击的二营虽付出巨大的伤亡，但还是没能突破前沿。从东南方向佯攻的九团的两个连也无进展。如果不能拿下其塔木，就无法把援敌引来，整个战斗就可能无功而返。八团幸存的官兵疲惫不堪，极度的寒冷又令他们难以野地宿营，官兵们只有挤在几个院子里取暖。但是，八团人员集中的情况很快被守军发现，炮弹随即在寒夜里呼啸而来，八团顿时一片混乱，伤亡再度出现，被迫撤出了已经占领的阵地。三师领导震怒，命令七团加入战斗，其塔木的国民党守军顽强抵抗，被压缩在镇子的一隅之后，依旧不断地发动反击。战斗在僵持状态中又过了一夜。

其实，三师不必迅速地将其塔木拿下，因为攻击的最终目的是把援敌引出来。

果然，九台方向的国民党军增援部队终于出动了。

负责在公路上伏击这股援敌的是一纵一师。一师六日到达预定伏击区后，一时无法判断敌人增援的兵力和路线，于是派出侦察人员去摸情况。一师侦察队长吴道坤有办法，他在九台至其塔木的公路边，截听了国民党军的电话。电话是其塔木的营长打给九台的团长的，电话打了三次，都是求救，第三次的时候，其塔木的营长说：“……团座，情况紧张，共军攻得很厉害，今夜明晨增援不到，我们……”九台的团长不耐烦了，说：“……最重要的就是沉着，部队已有命令，今天下午六时分三路驰援……九台的一路由我亲自率领，今晚在芦家屯宿营，明日中午赶到……在这以前，我要求你做到两点，坚持和镇

静……”黄昏时分，一师师长梁兴初选好了战场：“这里北距其塔木二十华里，南距九台六十华里”，地势低洼，四周皆有制高点，而且紧邻公路。布置好一个袋形的伏击圈后，剩下就是等待出击了。

这是个令参战官兵终生难忘的夜晚。北风呼啸，大雪纷飞，低温把树干冻裂，在黑暗中发出咯吱咯吱的怪响。伏击战场不但不能烤火，连抽袋旱烟都不许，官兵们啃了几口根本啃不动的玉米棒子，然后就一动不动地蜷缩在雪窝子里。他们使用了一切可能的御寒办法，用毛巾裹住脸，用乌拉草把脚包上，或者索性把自己埋在雪里躲避狂风。他们把枪抱在怀里暖着，有人甚至把棉衣脱下来包住机枪。每隔一会儿，干部们就碰碰战士，看他们是否在严寒中出了意外。士兵们苦熬着每分每秒，就盼着敌人的增援部队赶快到达，哪怕自己在拼刺刀的时候死去。半夜两点，最难熬的时刻，前边的情报传来：芦家屯的老乡说他们屯子里来了很多中央军。侦察员截听电话时，听见芦家屯的国民党军向上级报告说“路上无甚情况，只有几十个土匪被我击溃”——看来一师没有被敌人发觉，援敌正照预定计划前进。

天终于亮了。梁兴初站在山头上用望远镜瞭望，没有看见敌人的影子；他又向部队隐藏的伏击阵地上看去，只看见了白茫茫的雪，这个经历过万里长征的师长知道他的官兵们具有“非凡的忍耐力”。

七日中午，援敌沿着公路出现了。

新一军是国民党军的“王牌”，新编三十八师是“王牌中的王牌”，而一一三团又是新编三十八师的主力。主力的装备和架势果然不同凡响，一一三团开进得非常缓慢，开路的装甲车不断地停下来四处射击，后面的一个步兵也前进几步就扫射一阵。整个队伍走到张麻子沟的时候停了下来，等着后面一一三团的大队人马——团部、二营、三营、山炮连以及九台县的两个保安中队。

仿佛是有意对共产党官兵的忍耐力进行考验，一一三团在张麻子沟磨蹭了好半天才继续往前走。走了一段之后又停下来四面开炮，然后再走。中午十二时，敌人终于全部进入了伏击圈。

梁兴初看了看表，身边的一师政委梁必业说："可以开始了。"

当一师官兵在腾空而起的攻击信号中从雪窝里猛地站起来时，除了那些再也没能站起来的官兵之外，每个人都僵硬得如同一根棍子，站在原地摇晃了好一会儿。接着，愤怒的火炮、机枪和步枪骤然吼叫起来，官兵们从公路两侧不顾一切地冲下去，很快就把一一三团的队伍切成了两截，退往芦家屯的路也被一师三团封死了。一一三团混乱地退到公路边的村子里，但已无法阻挡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他们无法设想共产党军队能够在如此寒冷的在野地里等着他们，因为任何一个活物在野地里过夜都会被冻死，可眼前的这些共产党官兵不但活着，而且向他们迎面冲来时还大喊大叫："捉呀！捉'遭殃军'呀！"战斗进行了三个小时，一一三团基本被全歼。团长王东篱带着卫兵跑回张麻子沟，拼死抵抗后被围困在一个院子里，当弹药用尽的时候，王东篱不顾一切地往外冲，结果在乱枪之中栽倒在雪地里。

一师以包括冻伤在内的三百七十五人的伤亡，换取了被师首长称为"肥肉"的战果：毙伤俘虏国民党军一千一百余人，缴获山炮两门、迫击炮十三门、机枪六十四挺、汽车十二辆。

北满部队跨越松花江南下作战，歼灭了国民党军新一军的三个团，有力地策应了南满部队的战斗。南下作战还让林彪察觉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国民党军在遭到攻击的时候，无力调动强大的援军，这证明杜聿明因地盘占据得太大，交通线拉得太长，排兵布阵已经开始捉襟见肘。但是，南下作战也令林彪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就在战斗即将结束的时候，松花江一带遭遇寒流的袭击，作战部队出现大批的冻伤冻亡：一纵冻伤多达两千六百七十八人，六纵冻伤更是多达三千一

百二十四人……林彪在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特别提到部队的冻伤问题："在最近行动中天气甚冷，各部冻坏的颇多，六纵十七日夜行军中冻坏七百余，轻者手足冻肿，重者既发黑，都有冻掉指甲的，有的可能残废。"一月十七日，已经达到零下四十摄氏度的气温再次下降，东北民主联军主力部队"一昼夜冻伤约八千人"。一月十九日，林彪下令部队全部撤回松花江以北。至此，东北民主联军"一下江南"战斗结束。

一九四六年底至一九四七年初的北满解放区是一个奇特的地方——"粮食的过剩成了东北人民的负担。农民们在堆积如山的粮食和大豆上面光着身子挨冻。"这片区域田野广阔，土地肥沃，是世界上著名的粮仓之一。与南满根据地不一样，北满解放区内的粮食足以供养大军。但是，因为气候寒冷，这里不能种植棉花，因此这片区域里严重缺乏布匹。在东北暂时休战的日子里，曾有外国记者团乘美军飞机到达黑龙江，他们目睹的粮食过剩而布匹奇缺的情形，可以解释林彪为什么无法给官兵筹备更多的御寒被服。"买六码棉布需要一吨粮食，买一匹四十码的布需要十吨大豆。作为世界粮食产地的东北却无法将打下的粮食运到市场上去。它遭到四面封锁：三面是关闭了的苏联边境，一面是蒋的战线。"外国记者们原本认为中国共产党会得到的苏联援助，他们对苏联此时关闭边境感到十分惊讶——"它比蒋介石的封锁还要严。"

毫无疑问，在战斗中受伤的官兵会得到良好的照顾，食物的丰富也会令他们年轻的体格再度强壮起来。但是，那些被严重冻伤的官兵不得不面临着终生残废。

这一年，中国的山东也被冰雪覆盖。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冒着凛冽的寒风骑马走遍了部队驻扎的每一个村庄，他对官兵们高昂的士气感到满意。在一个连队驻地的院墙上，许世友看见一幅宣传画，画

面上有一座大山，两个人同时在往山顶爬，其中的一个人把思想包袱丢开后很快就爬到了山顶，而另外一个背着一大堆个人主义、家乡观念的包袱，累得满头大汗总是爬不上去。宣传画的下面还配有一首当时部队传唱的“爬山调”：

一百里路走了九十九，

剩下一里还得向前走。

擦把汗，加把油，

爬到山顶胜利在前头！

“爬山顶”是共产党人新近提出的一个口号。

内战爆发后严峻的军事形势，在共产党内部造成严重的影响。毛泽东发表了《三个月总结》一文，针对“对斗争前途怀抱悲观情绪的人们”，总结了几个月来的作战经验和教训，特别强调淮阴、承德、集宁等城镇的丢失，“多数是不可避免地要放弃和应当主动地暂时放弃的，一部分是仗打得不好被迫放弃的。不管怎样，只要今后仗打得好，失地即可收复。今后还可能有一部分地方，在不得已时被敌占去，但是将来均可收复”。毛泽东指出：“除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基本矛盾，蒋介石无法克服，为我必胜蒋必败的基本原因之外，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

一个月后，《解放日报》发表了具有毛泽东文风的社论《论战局》：“蒋军由战略攻势转为战略守势，解放区军民由战略守势转为战略反攻的重大转变时机，已经不远了。今后几个月将是这个重大转变的关键，对于解放区军民，今后几个月，犹如爬山到了过山顶的时候，这是全程中最紧张的一段”。“四个月来的总结就是：蒋军必败，我军必胜。四个月的战斗，已使战局达到这样一个境地，即是只要继

续过去的努力，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在蒋军占领地区坚持游击战争，我们就有可能在短期内由战略守势转为战略进攻。四个月的经验告诉我们，必须根本铲除对于美蒋的一切和平幻想，以决死斗争的精神来奋斗……”

共产党领导人的决绝与战场上官兵的决绝是一致的。

蒋介石也在承受着与共产党人周旋和作战所带来的痛苦。一九四七年初，他在《反省录》中这样写道：“本年实为余自革命以来最为艰难困苦之一年。二十年来共产党集其所有之实力与阴谋，向余作最猛烈之攻击，尤以其十年来竭尽一切破坏余在美国盟友心中之历史与地位，可无微不至。”就在蒋介石在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一个令他更加伤感的消息传来了：他最钟爱的国民党军青年将领之一，整编六十九师师长戴之奇，在苏北与华东野战军作战时于战场上举枪自尽。

对于蒋介石来说，这个冬天也格外寒冷。

## 哀莫大于心死

一九四六年冬天来临时，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对战局的分析是：“今冬明春，敌人可能登堂入室，占领主要城市，打通铁路线，并控制某些乡村，在我们腹地残酷纠缠。”

此时，在华东战场上，国民党军部署着二十三个整编师：淮阴一线六个整编师，苏中地区六个整编师，鲁南地区五个整编师，胶济铁路沿线六个整编师。陈毅部和粟裕部不得不分兵把口，节节阻击，以迟滞国民党军向解放区内部的逐步推进。山东和华中野战军的这种分兵态势，正是国民党军希望看到的，因为共产党军队武器装备差，只要在局部战斗中兵力不占明显优势，就无法阻挡国民党军的凌厉攻势。

十月五日，国民党军向鲁南解放区发起进攻。山东野战军节节阻击，先后放弃枣庄、峄县等地。二十七日，国民党军整编二十六师与整编七十七师从枣庄、峄县一线再次发起进攻，山东野战军又相继放弃了峨山、兰陵、傅山口、上桃园等地。为了遏制敌人的步步进逼，一纵司令员叶飞请示把敌人放进来，然后制造战机力求“歼其一部”，但是他的建议立即遭到了拒绝：“如果把敌人放到向城，临沂震动，军区和省级机关就要跑反了，必须迅速出击，阻止敌人东进。”一纵只有强行出击。在包围了战斗力较弱的整编七十七师的一个团后，装备精良的整编二十六师开来了八辆坦克，一纵的包围圈在坦克凶猛的冲击下溃散。

国民党军距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只有百公里了，危机令陈毅不得不将山东野战军第八师调至战场。何以祥的八师负责阻击整编七十七师，叶飞的一纵负责阻击整编二十六师，两支部队共为保卫临沂而战。八师包围了整编七十七师分散在几个村庄里的两个团。可是，即使一个团负责包围一个村子，八师在兵力火力上依旧不占优势，因此不敢贸然发动围歼战，交战双方就此形成僵持。整编二十六师的坦克又来了，三十二辆坦克形成集团冲锋。一纵三旅奉命阻击，共产党官兵没有打坦克的经验，只有用肉体在平坦的阻击阵地上与敌人的铁甲展开残酷的搏杀。三旅的官兵举着手榴弹、汽油瓶、炸药包向坦克冲去，前仆后继的身躯被坦克一一冲撞碾碎。包围着整编七十七师两个团的八师希望发起攻击，打破僵持，因此一再要求增援。而此时陈毅的兵力已捉襟见肘——“眼巴巴地可以消灭敌人的两个团，但就是缺少兵力，至少缺一个旅的兵力。”陈毅一根接一根地吸烟直至深夜，最后他说：“只好不打这一仗了！”

战斗结束后，整编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到战场视察，看见了令他“目击心伤，惨不忍睹”的情景：“在峄县东二十余里的圈沟镇沿着铁道

线附近，新四军叶飞将军所部伤亡千余人，死者断臂残腿，尸体累累。”马励武下令“尽快掩埋”。

这时候，华中战场作战双方的态势是：

国民党军已形成胶济线、鲁南、苏中和苏北四个攻击方向，其中以苏北和鲁南为攻击重点。四个方向的国民党军被编组为四个攻击兵团：宿新兵团，司令官胡琏，辖整编十一、六十九师以及四十一旅和预备三旅，分别由曹家集、宿迁向沭阳、新安镇（新沂县）进攻；峄临兵团，司令官冯治安，辖整编七十七、二十六师和第一快速纵队，由峄县地区向傅山口、向城进攻；盐阜兵团，司令官欧震，辖整编八十三、四十四、二十五和七十师，由东台地区向盐城、阜宁进攻；淮涟兵团，司令官李延年，辖整编二十八、七十四师以及第七军一七一师，由两淮地区向涟水进攻。国民党军已从南、西、北三面对山东和华中野战军形成了包围。其作战任务是：“在本年度十二月底以前，歼灭陇海路东段及其以南地区匪军，并收复各县而确保之。”

而陈毅部和粟裕部在国民党军的强势推进下，逐渐由解放区边缘向中心压缩，两军在各个方向与国民党军对峙的部队是：胶济线方向：胶东军区聂凤智的第五师、刘涌的第六师，鲁中军区孙继先的第四师、钱钧的第九师以及渤海军区宋时轮的第七师。鲁南地区：山东野战军叶飞的第一纵队、何以祥的第八师以及鲁南军区贺健的第十师。苏中地区：华中野战军管文蔚的第七纵队、陈庆先的第十纵队。苏北地区：华中野战军粟裕（兼）的第一师、谭震林（兼）的第六师、张震的第九纵队、成钧的第五旅、山东野战军韦国清的第二纵队和谭希圣的第七师。

战场已经移到了解放区的纵深地带。

严峻的军事压力使陈毅和粟裕感到，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必须由配合作战改为协同作战乃至联合作战，只有集中兵力首先争取一个方向或是一个战区的重大胜利，才能迅速改变战局以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这一认识，对于共产党人后来赢得令历史发生重要转折的淮海战役的胜利，至关重要——粟裕表示："随着战争向解放区纵深发展，战线逐步缩短，敌我双方兵力更加集中，战役的规模越来越大，将是战争发展的必然趋势。两大野战军会师，为我军集中兵力打大歼灭战创造了必要条件。争取主动、改变战局的关键，在于集中更大兵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只有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敌人的战略进攻，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使战局朝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

华中局致电延安并陈毅："为了改变华中局势，我们建议，以集中华中、山东两野战军攻下宿迁，得手后再向西扩展战果……"

陈毅致电延安并华中局："同意华中分局哿日（二十日）夜建议，山野、华野集中由淮海区向西行动的办法，并主张两个野指合成一个。"

此时，对于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来说，由于苏中、苏北与鲁南解放区相互依存，"统一指挥"已成为"今后取胜的基本条件"——"合则俱存，分则俱亡"。

两天以后，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致陈毅电："山野、华野两军集中行动，两个指挥部亦应合一。提议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如同意请即公布［对内］执行。"

摈弃分兵把守，两军合并作战，首战应在哪个方向？

粟裕认为，虽然目前鲁南形势严峻，并影响到华中的局面，但是"华中如不能坚持，则将使我大军局促于鲁中地区更为不利，造成山东

莫大困难”。“为此，必须抛开次要，求其主要”。集中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的主力，“沿陇海路西进，威胁徐州，直逼津浦，迫使鲁南、淮海之敌回援”。而陈毅认为，两个野战军应全部进入鲁南——“目前行动以迅速出击鲁南为最宜。在淮北，敌有准备，工事坚固，敌火下渡河有困难，战场不好。去鲁南，战场好，供应便利，易求运动战，可避开桂系。山野、华野同去，胜利有把握。”

经过反复商榷，陈毅、粟裕取得一致意见：缓去鲁南，继续在苏北作战。

具体的作战方向是：歼灭由宿迁向沭阳、新安镇进攻的国民党军。

这是两个野战军会合后的第一战，作为战役指挥者粟裕重任在肩。此前，无论是山东还是华中，由于解放区不断缩小，干部战士产生了埋怨和怀疑情绪，化解这种情绪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打胜仗。但是，参加战役的部队以山东野战军为骨干，粟裕对这些部队并不熟悉，部队指挥员们也不熟悉粟裕；两个野战军统一的指挥机关尚未建立，粟裕只身前来，对陈毅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很陌生，必须谨慎地处理好上下左右的关系；而且从抗战开始，粟裕一直在苏中地区指挥作战，对淮海地区的地形、民情缺乏了解，作战对手又多是粟裕以前从未交过手的——粟裕夜不能寐。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曾经说过，在解放战争中，他参与指挥的有“三个最紧张的战役”：宿北、豫东和淮海。

一九四六年冬，在江苏的北部，即将打响的就是宿北战役。

隐蔽待机的那两天气氛沉闷，粟裕在指挥部里整日盯着地图。在国民党军向华东地区进攻的四路纵队中，东台、两淮和峄枣这三路因为刚刚受到阻击，推进的速度必不会太快；只有从宿迁出动的这一

路，因为陈毅的主力在陇海路以北，而粟裕的主力还在盐城以北，所以必会乘虚快进。此时，粟裕心里有两个作战方案：一是攻击来敌的左翼，将向新安镇进攻之敌歼灭于五花顶地区，然后再攻击向沭阳进攻之敌；二是如果敌人左翼进展缓慢，就攻击敌人的右翼，集中兵力歼敌于宿迁以东。十二月十三日，宿迁之敌左右两个纵队沿着宿迁至新安镇（位于宿迁正北）、宿迁至沭阳（位于宿迁东北）的公路齐头并进，左翼整编六十九师占领晓店子和嶂山镇，右翼整编十一师到达曹家集和高圩一线。

当面之敌已经接近战场，粟裕必须作出决断。

前线指挥所设在一户农家里，三间坐北朝南的草房，院子被一道矮矮的土墙围着。粟裕苦苦地思索：右翼的整编十一师是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装备精良，附属有炮兵团，师长胡琏毕业于黄埔，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兵多将悍，与其作战必是一场苦战。况且，该师刚从鲁西南调到苏北，在不熟悉地形的情况下必会十分谨慎。相比之下，左翼的整编六十九师冒进的可能性极大。

整编六十九师新任师长戴之奇是蒋介石的坚定崇拜者，是蒋经国在江西青年干部训练班培养的心腹。抗战时期，蒋经国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组织起十几个师的青年军，戴之奇成为青年军的师长。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界元老为削弱蒋经国在军队的势力，除几个师外将青年军的大部分解散，而这时戴之奇已经成为第十八军副军长。在国民党军内部，多数人对戴之奇不屑一顾，认为不过是蒋家父子的一个死党而已。但是，戴之奇毕业于黄埔，参加过北伐，又再次毕业于陆军大学，抗战中率部参加了淞沪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等，平时谈起战略战术也是滔滔不绝。在向共产党解放区进攻的各路国民党军中，他的整编六十九师一直是急先锋。

粟裕想定的作战方案是：正面阻击整编十一师，把整编六十九师分割出来，集中优势兵力两翼夹击将其歼灭。

战场选择在宿迁以北公路两侧的几个小高地附近。

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的二十八个团奉命监视其他三路敌人；山东野战军第一、第二纵队，第七、第八师和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共二十四个团，奉命隐蔽向预定战场开进。

十二月十四日，整编十一师和整编六十九师继续分路推进。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以少数兵力顽强阻击火力强大的整编十一师，同时把整编六十九师放进了预定战场。黄昏，整编六十九师师部和二六七团进入人和圩，其他各旅紧随其后，他们与受到猛烈阻击的整编十一师之间已经出现了间隔。

十五日，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各部队到达合围地点。

同一天，整编十一师师长胡琏以宿新兵团前线指挥官的名义召集作战会议。会上，胡琏指责整编六十九师轻举冒进，戴之奇指责胡琏的部队推进缓慢。就在两个人争执不下的时候，突然接到了整编六十九师遭受围攻的消息，紧接着传来整编十一师师部附近出现共军的报告，胡琏和戴之奇都感到非常吃惊。

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的攻击开始了。所有的官兵都知道，这是破釜沉舟的一战。打好了，生存条件就会改观；打不好，无论是往南去苏中还是往北去山东，日子都会更加艰难。

在对整编六十九师的合围圈上，作战重点是负责穿插分割的一纵和负责攻占战场制高点峰山的八师。

一纵刚刚进入出击地域时，命令传来，说当面之敌已经溃退，一纵必须立即追击，与二纵一起截住逃敌。司令员叶飞不敢怠慢，三个旅急速向纵深冲去。但是，部队跑出没多久，叶飞就感到情况不妙：敌人并没有溃退的迹象，甚至连撤退的迹象都没有，村庄边的篝火一堆连一堆，敌人正在修筑工事。更严重的是，二纵的出击方向没有任何动静。叶飞立即命令部队停止冲击，回到原来的出发地。天亮时，一旅和二旅回来了，三旅的两个前卫团冲得太猛，通信员徒步追上他们时已是上午八点，部队想撤也撤不回来了，因为这两个团已经深入到整编十一师的纵深地域——孤军深入，处境危险，叶飞焦急万分。到底根据什么说敌人溃退了？让一纵追击的命令又是谁下的？

但是，被困在敌人纵深区域的两个团不但没有惊慌，而且还起到了搅乱敌人部署的奇效：他们抓到敌人的几个电话兵，查明在他们附近运动的敌人恰好是整编十一师的部队——既然到了这里，不如冲它个鱼死网破，于是他们不顾一切地展开了攻击。两个团，一部掩护一部进攻，冲进了整编十一师师部附近的村庄，歼灭其工兵营和骑兵营大部，还把整编十一师附属的那个炮兵团打散了。接着，他们占领了运河上的一座桥，这里距十一师师部不足三百米，如果不是兵力单薄，仗还没有正式开打胡琏就该逃亡了。整编十一师指挥部不知共军如何到达这里的，也不知到底来了多少共军，整整一夜都在紧急调动部队向师部靠拢。天亮之后，终于发现这是一小股兵力，于是立即组织反击。一纵的两个团边打边撤，竟然又从敌人的纵深地域撤回来了。

就在叶飞终于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八师对峰山的攻击进入了艰难时刻。峰山是一个海拔只有八百多米的小山包，但却是整编六十九师防御的支撑点，一旦丢失整编六十九师将四面无依。戴之奇命令预备三旅七团死守，七团在一天之内把山包上的树全部砍光，以扫清一切射击障碍，然后紧急挖掘壕沟，布置了密集的火力配备。这里是宿北

平原，山包下地势平坦，于攻击十分不利。八师赶到战场后，集中起五倍于敌的兵力从两面攻击峰山。西南方向的二十三团一营，在副教导员张明的率领下连续冲击三次，敌人猛烈的火力导致部队出现严重伤亡，冲击路线上遍布着遗体和伤员。天快亮了，如果拿不下峰山，势必影响整个战役进程，而此时原本有四百兵力的一营仅剩下四十多人了。副教导员张明决定最后再冲一次，在团炮火和机枪的支援下，四十多名官兵爬向鹿砦，撕开铁丝网，冒着敌人的机枪扫射，在壕沟里搭起人梯向山顶冲去。张明头部中弹，血流满面，视物模糊，但依旧冲在最前面。终于，从另一面攻击的二十四团一营一连冲上来了，连长郭继胜与张明在峰山顶会合。

峰山被攻占后，一纵从峰山以南楔入整编六十九师的侧后，彻底割裂了整编六十九师与整编十一师的联系。二纵和九纵也完成了对整编六十九师的压缩和包围。戴之奇命令不惜一切夺回峰山。预备三旅和六十旅的两个团，在飞机和炮火的支援下，向峰山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反攻，八师集中起所有的火力坚守不退。十六日晚，戴之奇请求胡琏救援。至十七日凌晨，胡琏除了哀叹“戴先生不堪设想了”之外，就是没有派出一兵一卒。戴之奇只好向南京求救：“恳求校长派兵或催令胡部相援，拯危局于万难之时。”蒋介石严令胡琏出兵，告诉他如果救不出戴之奇，拿着自己的脑袋来南京。十七日上午，胡琏派出两个旅发动猛攻，企图靠近整编六十九师，但遭到一纵三旅七团的顽强阻击。整编十一师一一八旅在飞机和榴弹炮的支援下，向七团阻击阵地发动数次进攻，七团的前沿成为一片火海，负责指挥的三旅参谋长谢忠良不断地调动部队增强阻击力量，但是到下午十三时，蔡林一线阵地还是被一一八旅突破。一纵开始两面受敌——整编六十九师在往外突，整编十一师在往里打。危急时刻，指挥部命令一纵撤退，说峰山的八师已经撤了。叶飞顿时火冒三丈：“大白天，开阔地，又处在敌人纵深，四面受敌，一个纵队万余人，怎么撤？”况且，敌人的炮火已经封锁了退路。叶飞决定坚决不撤，撤也要等到天黑。这是一纵最危险

的时刻，叶飞命令七团无论如何都要确保最后的阵地。七团以巨大的代价拼尽全力阻击，一个营又一个营战至最后都仅剩下五六个人。天暗了下来，叶飞下达了撤出战场的命令，一团和二团端着刺刀排成方队迎着向七团阵地攻击的敌人冲了上去。首先溃退的是距离整编六十九师师部最近的十八旅。

胡琏的十八旅不顾友邻擅自撤退，促成了戴之奇的整编六十九师的最后覆灭。

此时，整编六十九师的阻击阵地已经破碎。六十旅在旅长黄保德的带领下率先突围，很快就被一纵和八师包围歼灭。师部以特务营为前锋也开始突围，但因遭到猛烈的阻击被迫退了回去。十七日下午十四时，陈毅、粟裕命令各部队"集中全力解决人和圩之敌"——人和圩，整编六十九师指挥部所在地。这里的守军工事坚固，而主攻的二纵和九纵只有三门火炮，炮兵的抵近射击摧毁了两个碉堡，进攻在敌人的强势火力面前连续受阻。十八日零时，粟裕下达了严厉的命令：坚决攻下人和圩！他打电话给第二纵队司令员韦国清："二纵队继续突击，今晚把他解决。要严密几道包围网，不要使敌人跑掉。不要顾及疲劳，调四旅先去一个团，马上把人和圩搞下来。"在韦国清部署攻击的时候，粟裕的电话又到了："你们要不顾一切代价把人和圩搞下来，拖下去不好，要注意联络，决心要贯彻。如果今天不能解决，明天敌人增援，情况可能发生变化。"二十七团一营一连爆破组连续爆破，终于在人和圩守军的工事中炸开一个缺口，三班长周杰发率领几名战士挺身而出，用手榴弹巩固了缺口，营长杜郘三率领一连迅速从缺口处向里穿插。几个小时之后，二纵突进去两个团，九纵突进去四个营。

枪炮声逐渐密集起来的时候，戴之奇知道自己的最后时刻到了。

十八日早晨，蒋介石亲自打电话给胡琏，再次严令他不惜一切增援整编六十九师。但是，在胡琏的指挥部里，所有与整编六十九师的

联络都已中断，人和圩方向的枪声也渐渐平息。胡琏放下蒋介石的电话后，判断整编六十九师已经完了，立即命令部队就地构筑工事转为防守。

胡琏的判断十分正确，华中野战军官兵已经冲到了戴之奇指挥所的门口。

戴之奇在残部的簇拥下向村庄的东北角突去，当他终于意识到四面都是喊杀声时，朝自己的头部开了一枪。

宿北作战结束。

此战共歼灭国民党军两万一千余人。

人和圩打扫战场和清查俘虏的工作进行了整整两天。在俘虏中查出整编六十九师副师长饶守伟、参谋长张东彝、副参谋长章秉伊等人，并查实六十旅旅长黄保德自杀，三旅旅长魏人鉴和副旅长周绍宣等被击毙。可是，唯独师长戴之奇生不见人死不见尸。韦国清亲自提审了戴之奇的副官庞白林，庞白林说，混战之中他也不清楚师长的下落。提审的时候，韦国清身边坐着个名叫胡奇坤的随军记者，记者脚上的一双丝绒面料的棉鞋引起了庞副官的注意——记者向韦国清报告说，他随突击部队越过壕沟的时候，双脚陷入冰窟窿里，这双鞋是保卫科的高干事顺手从一个死尸的脚上扒下来给他换上的，如果需要上缴的话，他就立即脱下来——庞白林仔细端详了这双棉鞋后肯定地说，整个六十九师只有师长穿着这样一双棉鞋，这双鞋是人和圩区长吴飞天送给师长的礼物。沿着这条线索，清查人员找到了一具光着脚的尸体。拉开尸体上裹着的士兵棉衣，里面是国民党军中将军服，尸体的右太阳穴上有一个弹洞。

庞副官表情凄然：“这就是我们的戴师长。”

戴之奇的胸徽、日记和一把短剑被送到粟裕那里。

粟裕拿着这把“中正剑”端详良久。十个月前，粟裕作为华中军区的代表，曾去徐州与国民党军代表商谈“粟裕部与顾祝同部的摩擦问题”，当时戴之奇是国民党军徐州绥靖公署副参谋长。粟裕离开徐州时，机场上引擎轰鸣，国民党空军正在进行美制P-51战斗机的飞行编队训练。戴之奇对望着机群出神的粟裕说：“现代的空军威力真是伟大！”粟裕板着脸说：“遗憾的是，天上的飞机不能到地面来抓俘虏！”

粟裕指示：找副好棺木把戴师长埋了。

国民政府国防部在检讨宿北作战时批评徐州绥靖公署：“全兵力于苏北、鲁南作扇形展开，采取全面攻势。致各兵团在战略上形成隔离之状态，在战术上呈现突出之弱点。同时，未事先控置（制）第二线机动兵团，致各兵团遭匪各个围攻时，竟无法补救，招致重大之损失。”

虽然宿北战役规模不大，但粟裕认为此战意义重大：首先是促成了华中和山东两支野战军从此合而为一：“这仗打胜了，兄弟部队之间就产生了彼此的信任，两支野战军合并后的新的领导机构和所属部队也就产生了上下之间彼此信任。这一切，都是无价之宝。相反，如果这一仗我们被打败了，上下之间和兄弟部队之间就容易相互埋怨，就要花上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和相当大的努力，才能弥补过来。”其次是扭转了战场形势，并积累了打大规模歼灭战的经验：“继淮南、淮北被敌人占领以后，华中首府两淮又失守，敌人对我们形成半圆形包围的态势，敌人的兵力又处于很大优势，蒋家王朝的五大主力中的两个——整编第七十四师和整编第十一师也调到苏北战场来了，我们处于被动状态……这次战役将决定我们能否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将战役的主动权夺取到手……中央、军委要求我们打大规模歼灭战，这需要积累经验……这一仗打胜了，就可以成为两支野战军集中后战役规模越来

越大的一个良好开端，成为歼敌由小到大的一块中间阶石，踏上了这块阶石，再上一步去踩更高的阶石，就比较好办了。”由此，粟裕将宿北战役称为“华东战区第一个转折的标志”。

在当时依旧严峻的军事形势下，“转折”二字用得十分奢侈。

出现“转折”的，还有远在东北的林彪部。

一九四七年二月，东北的国民党军在杜聿明的指挥下，集中五个师的兵力第三次向南满部队发动进攻。南满部队命令三纵正面迎敌，四纵深入敌后袭击安东至沈阳铁路线两侧。三纵的七师和九师迂回包围了进至金川以南的国民党军暂编二十一师六十三团和一个山炮营，经过六个小时的激战将其全歼，然后集中全部主力反击通化以北的国民党军，相继收复柳河、辉南。在攻击辉南时，八师二十二团八连因战斗伤亡仅剩下十八名官兵。部队冲进县城后，小炮班长陈树棠孤身深入街巷，连续制服多名抵抗的国民党兵，天亮时竟一人缴获机枪一挺、六〇炮三门，步枪四十三支，陈树棠班长因此获得了“孤胆英雄”称号，和银质“红星奖章”一枚。不久之后，他再次创造一人俘虏五十三名国民党军的战绩，获得了当时共产党军队中的最高荣誉“毛泽东奖章”，并被提升为排长。六个月之后，陈树棠排长阵亡于辽宁开原八棵树。

辉南的丢失迫使进攻中的国民党军开始收缩。

为了策应南满部队的战斗，北满部队第二次跨越封冻的松花江南下出击。其作战方针依旧是远程奔袭以攻点打援，即先打九台以北的国民党军重要据点城子街，然后伏击从九台和德惠出动的援敌；歼敌之后围攻德惠，然后再伏击从长春和农安出动的援敌。然而，战斗一开始就出现了意外，北满部队刚刚越过松花江，城子街守军新一军新编三十师八十九团立刻弃城撤往德惠，攻点打援的计划眼看将化为泡

影。林彪立即命令一纵二师和六纵十六师昼夜兼程将敌八十九团截住。二师在冰雪中一个夜晚奔袭六十公里，天亮时出现在撤退的八十九团面前。几番交战后，终于迫使八十九团主力返回城子街。城子街立即受到六纵的猛烈攻击。这是林彪部第一次在白天对设防坚固的城镇实施攻坚作战。国民党守军对共产党军队已经拥有的强大火炮十分恐惧，在南北两面的防线相继瓦解之后龟缩一角等待增援。二十三日，在最后的总攻中，八十九团及附属山炮营两千七百多人全部被歼，负责攻坚的六纵仅伤亡二百余人。

接下来的战局转变出乎了林彪的预料。

城子街受到攻击的时候，驻守九台和德惠的国民党军并没有增援。于是，林彪决定直接攻击德惠县城，并部署了伏击长春援敌的作战计划。但是，攻击德惠的战斗却严重受挫。德惠既是长春北面的屏障，又是从长春进攻北满解放区的前沿，守军为国民党军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新一军五十师附属一个山炮营共七千人。而林彪投入的攻击兵力已近四万，尤其是三个炮兵团，使攻击的炮兵达到守敌的八倍。但是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四个师被分散在德惠县城的四个方向，炮兵也被平均配属给四个师，结果大大削弱了突击力量。四个方向的突击部队虽然都先后突入城内，但国民党守军纵深防御十分严密，结果各路攻击部队在凶猛的火力压制下被迫撤出，战场上形成了对峙局面。更严重的是，国民党军十二个团的增援部队已节节逼近，一纵、二纵等部队虽顽强阻击但终难以坚持。攻坚不利，打援不成，主力面临守军和援军的两面夹击，三月二日林彪被迫下令撤退。

撤退命令一下，战局骤然恶化。

杜聿明终于抓到了可将林彪主力歼灭的战机。他一面命令部队全力追击阻截，一面命令把松花江上游的丰满水电站的水闸打开，企图用大水截断林彪部北撤的退路。如果大水顺江而下，将会把平坦的冰

封江面冲碎，冰冷的江水加上破碎的冰块，几乎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林彪闻讯后，急令部队开始奔跑，争取在大水到达之前从冰封的江面上撤回江北。此时，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已无暇顾及回击追兵，所有的官兵都在雪地里向着那条冰封的大江狂奔。就在大水已到眼前的时刻，大部分部队撤回了松花江北岸，但依旧有一些官兵被大水阻截。这些官兵不顾一切地扑进冰块翻腾的江水中，挣扎着向北岸游去。近两公里宽的松花江江面上，冰块在激流的推动下发出巨大的撞击声，形成一片迷蒙的水雾。在零下四十摄氏度的低温中，官兵们的头上很快就结起冰碴，眼睛被遮挡得什么也看不见。干部们奋力阻挡冰排为战士开路，不会游泳的官兵被战友用绑腿捆住腰，游在最前面的官兵用枪托刺刀推开浮冰。终于有人上了北岸，被冻得浑身僵硬趴在岸边的雪窝无法站立，干部们用棍子敲打着他们："谁也不准躺下！快起来！快跑！"

林彪部的全线撤退，让杜聿明终于享受到胜利的喜悦，他立即发布新闻：德惠一战"歼灭共军十万"。然而，没过多久，蒋介石发来的一封电报让杜聿明吓了一跳。蒋介石没有通过杜聿明，直接命令新一军和第七十一军渡过松花江继续追击。杜聿明急忙打电话给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和第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要求他们迅速撤回原来的防区。但是，本来就不服杜聿明的孙立人和陈明仁都表示要坚决执行委员长的命令。杜聿明焦急万分，亲自跑到德惠，当面劝告两位雄心勃勃的军长："此次共军在德惠并未受到多大损失，这次撤退是受我军虚张声势所迷惑。现据情报，共军从我方被俘人员口中已了解到我们力量不大，很有可能卷土重来，你们必须迅速撤回原防，准备对付共军下一步的进攻。"

关于杜聿明坚持退回原防一事，事后国民党军内部，包括孙立人和陈明仁两位军长，皆微词多多。有一种说法是，如果当时杜聿明不加阻拦，两个军冲过松花江去，林彪部很可能受到重创，残部将被赶

到苏联或蒙古去——但是，杜聿明的判断的确没有失误，因为，新一军和第七十一军还没有撤回原地，林彪部的反击突然开始了。

这一次，是东北民主联军著名的“三下江南”作战。

林彪部的突然出击，令国民党军向长春方向紧急收缩兵力。新一军撤回德惠，第七十一军撤回农安。东北民主联军紧追不舍，二纵五师首先在靠山屯围住了撤退中的第七十一军八十八师二六二团。军长陈明仁急令八十七师和八十八师主力回头解围，但两支部队还没到达靠山屯，就得到了二六二团已被歼灭的消息。八十七师和八十八师主力立即往回跑，这才发现退路已被封堵。

一纵一师奉命疾速向西，包抄第七十一军的退路。三月十二日，终于与八十八师和八十七师主力迎头撞上。三团先敌开火，把敌人一部压缩在郭家屯村，二团则把另一部敌人压缩在姜家屯村。林彪立即命令所有的部队向这两个村庄合围。郭家屯的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守军数次突围，均被三团成功阻击，最后，三团一营从村西南攻了进去，三营从村东南攻了进去，迫使守敌从村庄的西北角突围，而三团投入早已准备好的预备队进行围歼，终于将残敌全部歼灭于野外。攻击姜家屯的二团在攻击受阻时，一营营长张立奎挺身向前，冲到村庄的围墙边时胸部中弹倒地。几乎与此同时，从东南方向攻击的三营营长也被守军的狙击手打死。二团政委胡云生正为两名营长的阵亡悲痛不已，一颗子弹迎面而来击穿了他的下巴。二团在副团长刘海清的指挥下，不惜一切再次发起攻击，打红了眼的官兵终于攻进村里的一个院落。院子外面枪弹如同暴雨般倾泻，官兵们在院墙上挖洞前进。守敌用机枪封锁洞口，士兵刘汉生冒死前冲，钻出洞一脚踹开敌人占据的一扇房门，把吓呆了的八个敌人逼在墙角处。指导员赞许地大喊：“刘汉生是第一功！”官兵们纷纷爬上墙头，边扔手榴弹边喊：“枪是老蒋的，命是自己的！快过来吧！”最后，守敌被压缩在一个大院子里，

八连副指导员让机枪掩护，自己猛地跳进院子，用枪逼住了一名军官，让他下令缴枪。军官愣了片刻，然后喊道：“兄弟们不要打了！缴枪！”这位军官就是八十八师二六三团团长兰松岩。

战斗结束了。

村外的雪地上摆放着阵亡官兵的遗体。

一营营长张立奎静静地躺在厚厚的雪上，副团长刘海清大喊：“在俘虏中把那个狙击手给我找出来！”营部书记在俘虏集中的地方询问了很久，还特别问了团长兰松岩，可是谁也说不清楚当时是谁开的枪。一纵一师政委梁必业对身边的炮兵营教导员刘宗参说：“你当指导员的时候，他是你的司务长，你负责把他埋了吧，一定找块干净的地方。”刘海清终生难忘一营营长最后的面容，那张年轻的脸比东北的大雪还要白——张立奎曾给梁兴初师长当过警卫员，小伙子长得漂亮，打仗机智而勇敢，平时爱干净，无论战斗行军多么艰苦，他总是努力穿戴得板板正正，出门胸前总挂副望远镜，进门习惯拍打裤脚和吹吹帽子上的灰尘——整整五十年后，年近古稀的刘海清再次来到姜家屯战场，当询问村庄里的老人们是否还记得当年打仗的事情时，老人们都说，那枪打得呀分不出个点，八路的枪不行，中央军的枪好，可八路还是打胜了。死的人呀，一片一片的，老鼻子啦，听说死的人里有两个特年轻的八路营长。刘海清问，还记得那两个营长埋在哪里了吗?老人们说，解放后，尸骨被起走，集中埋在郭家屯的烈士陵园里了。刘海清找到那个烈士陵园，但是大门上的锁已经生锈。镇政府的人用锤子把锁砸开，刘海清走进陵园，园子里满目荒草，荒草中矗立的全是无字的墓碑。老泪纵横的刘海清向那片墓碑深深地弯下腰去。

三月，松花江开始解冻。

杜聿明趁北满部队受江水阻隔不便南下作战之机，再次集中兵力向南满共产党部队发动攻势。此时，南满部队经过三次保卫临江的战斗，兵力消耗很大，每个战斗师已不足四千人。陈云在作战会议上说，坚持南满是我们的责任，再打下去，我们可能损失很大，但是会对全局有利，只要对全局有利，损失再大也值得。因此，“我们必须不惜以任何代价”，“打几个恶仗、硬仗、较冒险仗［乃是运动战］”，哪怕“将三纵、四纵队打掉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

决死的官兵们再次迎敌而上，在红石镇将国民党军八十九师和五十四师的一六二团死死围住，三纵和四纵十师合力凶猛攻击，激战之后，国民党军彻底崩溃，包括八十九师师长张孝堂、副师长秦世杰在内的八千多官兵跑得漫山遍野。共产党官兵四处喊：“放下武器！都到三源浦集合开饭！”于是国民党军官兵纷纷扔下枪向三源浦方向会集。东北民主联军中自此流传开一首名为《筛豆子》的快板诗：

国民党，兵力少，

南北满，来回跑。

北满打了它的头，

南满打了它的腰。

让他来回跑几趟，

一筐豆子筛完了。

筛豆子，大家干，

咱把反动派筛几遍。

南满消灭它几个师，

北满消灭他几个团，

机动兵力筛完了，

可筐再打歼灭战。

虽然东北战局还未出现决定性的转折，但共产党人在东北的军事处境开始向有利的方向转化。由于占据的地域过于广大，需要守卫的交通线漫长，国民党军日益感到兵力匮乏的巨大压力。杜聿明坦率地承认，从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他的部队在数次作战中屡遭“无谓的损失”，最大原因是“兵力配布分散”，机动兵力不足，“使匪得运用优势兵力，突破防区一点，而遭致军事上之失利”——杜聿明仅仅是从战略上进行了反思。而那位自杀身亡的国民党军整编六十九师师长戴之奇，生前在日记中写有这样一句令人心惊的话：哀莫大于心死。

内战刚刚开始，国民党军已经取得很大的军事进展。在这种局势下，一个无限效忠于蒋介石的战将，为何身未死时心已死？

## 农民厌恶马师长

“要吃苦，跟马励武。”

国民党军整编二十六师中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

官兵们除了抱怨转战辛苦，总在与共军打恶仗之外，还对他们的马师长带兵严厉和拖欠军饷严重不满。

宿北战役后，整编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在一九四六年的最后一天终于松了一口气。作为攻击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的主力，他的部队已经推进到距临沂咫尺之遥的峄县、向城、傅山口一带，只等着与共产党军队进行最后决战以攻占临沂。眼下，新年就要到了，前线静悄悄的，没有共产党军队运动的任何迹象，想必陈毅和粟裕也是要过年的。于是，一九四七年新年的那天上午，马励武在师部和同僚们吃了顿年饭，把部队交给副师长曹玉珩和参谋长郑辅增，然后独自乘车回峄县县城去了。他还有很多应酬，包括出席地方官员的宴请以及与第

二十七集团军司令李玉堂喝上几杯密切关系的酒等等。中午到达县城后，他把地方人士召集起来发表讲话，他讲了“新宪法的成就以及军民之间的合作”，强调“剿匪是为了让百姓过和平的生活”，同时还告诫各位：“共产党对人民就像猫对老鼠一样。他们把自己打扮成仁慈的人，你们不要上当受骗。”晚上，马励武在师后方司令部参加了新年晚会，看的是京剧《风波亭》。看戏的时候，他隐约感到今天演这出戏有点不吉利，看到岳飞遇害的时候心里更加不舒服，难道这出戏预示着战场真的要起“风波”？果然，京剧看到一半，李玉堂的电话来了：“前边已经打起来了。”

马励武时年四十三岁，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曾经当过蒋介石的副官。抗日战争中，他先后出任第二十九军军长、第二十六军军长，率部参加豫中会战、长沙会战、衡阳会战等。一九四六年上半年，第二十六军整编为二十六师，他成为整编二十六师师长。国民党军整编二十六师，辖四十一、四十四、一六九旅，是国民党军在华中地区战斗力最强的部队，“配备有坦克、榴弹炮、山炮、反坦克火箭炮、机枪、步枪、无线电设备、地雷、卡车、吉普车、设有无线电装置的指挥车、弹药、汽油、筑路设备，甚至轻便金属船只”——所有这些都由美国提供，连官兵的鞋带都是美国制造的。特别是配属的第一快速纵队，由蒋经国亲自创建，是蒋介石最得意的装甲步兵混成部队，包括野战装甲车在内的所有装备都来自美国，官兵也都在印度受过美国教官的严格训练，并且经历过缅甸战役的实战考验。

此时，没人知道，武器精良、火力强大的整编二十六师在国民党军序列中彻底消失的最后时刻已经近在眼前。

新年之夜，马师长在极度的焦虑中度过。通往前线的电话已经中断，凌晨时分，他通过无线电命令前方部队出击侦察，侦察的结果却是：公路已被封堵，有共军大部队和大量民兵活动的迹象，通过公路

回到师部将是十分危险的。马师长一下子不知所措了，唯一准确的判断是：自己不能返回前线亲自指挥作战了。

实际上，新年之夜，陈毅和粟裕并没有下达全面攻击的命令。

前线的慌乱，是国民党军与共产党地方武装发生交火导致的。

宿北战事结束后，国民党军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来到徐州，与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一起研究华中局势。他们一致认为，向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发动最后攻势是必要的和必须的。因为共产党中枢所在的陕北，地域狭窄供给贫瘠，目前已处在胡宗南部大军的围困之下，定难持久；东北的林彪部虽然近来有壮大的趋势，但终究龟缩于偏远的东北一角，对于关内战局不会造成重大影响。现在，只有陈毅部和粟裕部是国民党军真正的心腹大患。共产党在苏北的地盘已经一一失守，陈毅和粟裕的残部只能从苏北向鲁南撤退，如果一鼓作气寻找其主力展开决战，得手后中国的中心地域局势基本可定。

只有山东军区，地当中国心脏，山东半岛深入海中，沂蒙、崂山等山脉绵亘起伏于其间，地形错综复杂。共军自称前后经营达八年，根深蒂固，加以烟台、龙口与旅大仅一水之隔，易得外援，因此山东便成为共军最优良同时也可能守得最久的根据地。山东之得失，在国内战局中，也便有决定性作用。

宿北战役给向苏北进攻的国民党军以严重打击，迟滞了国民党军的向胶济线、鲁南和苏中发起的攻势。但是，戴之奇的整编六十九师的崩溃，只是使国民党军的包围圈上有了一个缺口，一旦其重新调整部署，这个不大的缺口即刻便可以封闭。此时的陈毅与粟裕部依旧处在敌人的夹击之中：南面，沿运河两岸，胡琏的整编十一师驻宿迁、钟纪的第七军驻泗阳；东南面，李良荣的整编二十八师驻涟水，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驻陈师庵；北面，与临沂对峙，王长海的整编七十七师驻台儿庄地区，周毓英的整编五十一、刘振三的整编五十九师驻枣庄地区，马励武的整编二十六师附第一快速纵队已突前至临沂西南

三十公里处。对于陈毅和粟裕来说，要想冲破国民党军的包围，两面之敌必择其一作战。

新年来临之前，陈毅和粟裕经过慎重思考终于下定决心："集中兵力歼灭鲁南之敌"：

> 今后的一定时期，山东将是华东的主要战场。如果继宿北战役之后再在鲁南打一个大歼灭战，不仅能打破敌人的包围圈，使山东、华中两路野战军完全会合，而且能为今后在山东作战创造良好的战场条件。鲁南巩固了，以后南下、北上或西进，我军都会取得行动的自由。

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致陈毅、粟裕的电报："鲁南战役关系全局，此战胜利即使苏北各城全失亦有办法恢复。"

问题是，先打刘振三的整编五十九师，还是先打马励武的整编二十六师？按照先打弱敌的常规，杂牌军整编五十九师好打。但是，目前在鲁南地区，国民党军主力是整编二十六师，只有将主力歼灭，局势才能真正好转，打弱敌一时解决不了鲁南解放区面临的严峻局面。况且，此时整编二十六师冒进突出，与左右两边的部队空隙很大，战场态势极其不利。

战役决心已下，山东和华中两野战军主力奉命秘密北上。参战部队被编成左右两个纵队：右纵队由第八、第九、第十师和第四师十团、滨海警备旅和鲁南军区特务团组成，兵力十二个团，由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政治委员向明，鲁南军区政治委员傅秋涛、副司令员郭化若指挥，任务是切断敌人向峄县、枣庄的退路，并阻击援敌，割裂整编二十六师一六九旅与四十四旅之间的联系，歼灭四十四旅于傅山口、台子堂地域；左纵队由陶勇的第一师和叶飞的第一纵队组成，兵力十五个团，直接归野战军司令部指挥，首先围歼卞庄（苍山），切断整编二十六师与整编五十九、七十七师的联系，歼灭一六九旅和第一快速纵队。鲁南第三军分区部队沿沂河东岸进行防御，保证战场

侧翼安全，并派民兵武装深入台儿庄一带进行敌后骚扰和监视敌人动向。山东和华中野战军的兵力已是马励武的整编二十六师的四倍。

战役发起时间为：一九四七年一月二日午夜。

在此之前，整编二十六师已经侦察到了陈粟主力向鲁南开进的情况，马励武也预感到自己突出的位置很可能成为陈粟的攻击目标，他向国民党军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请示，要求全师收缩至峄县，但是请求未获批准。马励武只好命令就地压缩阵地，以师部所在的马家庄为中心，在一个东西长二十五公里的狭长地带构筑起防御阵地，并部署了以坦克机动火力为中心的防御体系。

被阻隔在峄县县城里的马励武忐忑不安，一月二日晚二十二时，从前方传来的无线电通报说，整编二十六师各旅同时受到了猛烈攻击。

右路，八师二十二团在攻击尚岩的战斗中，面对四十四旅一个营的拼死抵抗，官兵们连续炸毁了围墙、鹿砦和地堡，冲进村内与国民党守军展开混战。混战时令人担心的事情出现了：从马家庄方向增援来的坦克开到了村口。官兵们犹疑了片刻，正想着怎么对付这些钢铁家伙，发现坦克被村口的水沟阻拦了。坦克冲不过来，只能停在那里向村内开火。官兵们商量了一下之后，决定索性不理睬它，继续村内的战斗。国民党守军除了少数逃亡外，一个营大部被歼。村里的枪声平息之后，村口的坦克转身跑回马家庄去了。入夜，四十四旅不但遭遇重创，且与一六九旅之间已被分割，师部马家庄完全暴露。

左路，一纵首先攻击卞庄和塔山，攻击持续到黎明时分，突然天降大雨。本来马励武已于前夜得到薛岳的同意，准备三日拂晓撤出战场，薛岳还答应派出飞机掩护整编二十六师退至峄县。可是，大雨使飞机无法飞临战场，大雨还使得快速纵队的坦克和装甲车陷入泥泞。

三日下午十五时半，一纵二旅占领塔山。卞庄的国民党守军开始大规模突围。雨云低垂，卞庄一带遍布河沟，突围部队行动受阻，遭到一纵毁灭性追歼。共产党士兵们围着不能动的坦克，一边用铁镐敲坦克的外壳，一边高声喊：“快出来，解放军优待俘虏！”一纵指挥部的一个参谋见此情景问：“怎么回事？”士兵们怕这个干部抢了他们的战果，说：“这是我们活捉的铁乌龟，与你无关。”参谋说：“我不抢你们的战利品，就怕它一发动跑了。”士兵中的一个班长狡黠地说：“它能跑得掉？烂泥地！再说，我们围了高粱秆，烧它！”国民党军的坦克驾驶员一听这话爬出来投降了。

这一天，左路的第一师已深深地插入整编二十六师与整编五十九师之间。

整编二十六师已被分割包围。马励武终于在峄县待不住了，三日一早，他带领两个连乘卡车冒险而出，企图回到他的指挥位置上，但是走到半路还是退了回来，因为他的侦察部队反复向他渲染前方战事的危急，令他最终失去了冲向战场的勇气。

此时，在瓢泼大雨中，山东和华中野战军左右两路纵队开始猛烈压缩，到四日凌晨，整编第二十六师师部和第一快速纵队被包围于陈家桥、贾头、作字沟等几个村庄里。

马励武战前预定的撤退方案是：在快速纵队坦克的掩护下，以卡车为主要交通工具快速移动，原则是坦克夹着卡车车队和炮兵车队沿公路滚动前进。马励武确信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样的铁流。

大雨逐渐变成了漫天雨雪，天地间一片朦胧。有参谋问粟裕是否改变总攻计划，粟裕回答：“不变，这是老天爷帮我们的忙。雨雪交加，道路难行，把敌人的重装备陷在那里，他就更难逃脱了。”

连续的雨雪确实帮助了共产党官兵。

四日上午十时，整编二十六师残部和第一快速纵队开始突围。坦克、汽车、炮兵和步兵混杂在一起，拥挤在通往峄县的公路上。在山东和华中野战军的四面围攻下，原来设计好的行军序列已完全混乱。更严重的是，由于公路被混乱的步兵和炮兵壅塞，同时公路上处处是民兵埋设的地雷和挖好的反坦克沟，比步兵行进速度快的坦克和汽车为了尽快逃离战场，纷纷开下公路想从野地里夺路而奔——这些钢铁机械一旦下了公路，末日也就到了。

这一带的地名叫“漏汁湖”，南北皆是沼泽洼地。连日的雨雪使本来就泥泞的田野更加松软。坦克、汽车和火炮下了公路之后，立即全部陷入泥沼，在绝望地不断轰鸣之后，只有不知所措地向四面开炮，柴油的烟雾和炮火射击的硝烟在寒风和雨雪中翻卷，使这一片田野成为一个奇特的疯狂之地。

共产党官兵与钢铁怪物的最后搏斗就这样开始了。他们在泥泞中奔跑虽然也异常艰难，身上的棉衣因被雨雪浸透而十分沉重，但战场上的奇景令他们热血贲张。两军的步兵扭打在一起，到处是咒骂和嘶喊，炸药包、手榴弹和手雷雨点般投向在泥泞中疯狂转动炮塔的坦克。有的官兵抱着点燃的秫秸往坦克的履带下面塞；有的爬上坦克，用铁锨、洋镐乱砸，或是把大团的泥巴涂抹在坦克的观察窗上。第一师三旅八连副班长李耀清爬上坦克后抱住了滚烫的炮筒，坦克炮塔急促地旋转，李耀清身体腾空但就是死不松手，这让他的战友们紧张得张大了嘴巴。坦克没能把他甩下来，里面的坦克兵突然掀开舱盖举枪就打，李耀清手快，顺势把一颗手榴弹塞了进去，接着就是一声闷响。战场上顿时响起了一阵欢呼：“李耀清！李耀清！”燃烧起来的汽车和坦克如同一支支巨大的火炬，浑身着火的战士如同一个个火球前仆后继地往坦克上扑，黑色的硝烟弥漫在白色的雨雪中。

整编二十六师和第一快速纵队的抵抗意志崩溃了。整编二十六师的几名军官下令官兵停止抵抗，第一快速纵队二三九团团长也率全团放下了武器。四日下午三时，战斗结束，国民党军整编二十六师四十四、一六九旅全部，第一快速纵队坦克营、工兵营、炮兵团、运输团和步兵八十旅，共三万余人全部被歼。

雨雪还在飘洒，但战场上充满欢乐。两个野战军的官兵、民兵和附近的百姓忙着收缴和清点战利品，这是他们前所未见的，令他们既惊奇又兴奋：数十辆坦克、成排的美式重型卡车拖曳的重型大炮；数百辆汽车上满载着弹药、被服和大米；各式吉普车，车上装满了子弹；还有满是洋文的罐头、饼干、糖果、香烟。成箱的重炮炮弹让官兵们犯了难，谁也不清楚这些涂着各种颜色的美国炮弹是干什么用的，赶紧找来懂点外国字的干部辨别，干部们把写有“H”标志的穿甲弹和“F”标志的燃烧弹分开，并且将它们与匹配的大炮放在一起。官兵们让被俘的国民党军坦克驾驶员加大马力，同时数十名官兵在坦克的前面和后面连推带拉，可就是无法将这个庞然大物从泥沼中开出来。“拉坦克比打坦克还难！”附近村庄里的百姓把自家的门板卸下扛来垫履带，最后终于把坦克弄上了公路。上千名国民党军的坦克驾驶员和汽车驾驶员被集合起来，一个共产党干部当场宣布他们从此成为共产党军队的一员，并且与他们每个人都握了手。这些几小时前还是国民党军的人，立即把坦克和汽车发动起来，往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方向开去。当这个浩大的车队开进临沂城的时候，民众把坦克和汽车团团围住左摸右看，致使街道堵塞甚久。山东野战军后方兵站专门设宴招待了这些坦克驾驶员和汽车驾驶员，共产党干部在祝酒时说：“诸位在抗日战争的印缅战场上，曾有过光荣的功劳……今天来到人民的队伍之中，为人民的事业奋斗……人民欢迎你们！”这句话让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兵受宠若惊，他们随即表示从此要做一支“人民的快速纵队”。不久，华东野战军的“特种兵纵队”在此基础上诞生。

按照预定作战方案，解决了整编二十六师和第一快速纵队之后，部队应立即转向西南，攻击整编五十九师和整编七十七师。但是，这两支国民党军在整编二十六师遭到毁灭性打击后，立即从鲁南退缩到苏北运河以南，以背靠国民党军徐州战区进行防御。于是，陈毅和粟裕改变原定计划，决定攻击峄县和枣庄。峄县之敌不难打，难打的是枣庄，这里在日伪占领时期便修有坚固工事，现在是国民党军在鲁南的重要据点，攻击中难免会出现较大的伤亡。但是粟裕认为，要巩固鲁南，把威胁侧翼的枣庄打下来，才可能改变战场态势，不好打也要打。具体方案是：第八、第九师和第四师十团、滨海警备旅负责攻击峄县，第一师负责攻击枣庄，第一纵队等部队负责战场打援。

陈毅、粟裕部连续作战的决心，不但来自改变鲁南军事形势的迫切心情，也与自鲁南战役发动以来友军的配合作战有关。

国民党军徐州绥靖公署所属部队多达八十个旅，被毛泽东称之为“全国第一强敌”。早在陈毅、粟裕部进行宿北战役的时候，毛泽东就认为，如果位于徐州战场的邱清泉的第五军和胡琏的整编十一师被投入鲁南战场，将对我军作战形成巨大的压力，于是要求刘伯承、邓小平的晋冀鲁豫部队尽快组织战役，“打两三个大仗”，“以拖住邱胡不使加入鲁南为原则”。

为了在最短时间内最大限度地歼灭或拖住敌人，刘伯承超常规地采取了不理会敌人的一线防御、直接大纵深地插入敌核心部位的战法，晋冀鲁豫部队发动了滑县战役。在敌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攻击部队悄悄地插入国民党军整编四十一师一〇四旅、整编四十七师一二五旅以及河北保安第十二纵队三路敌军的接合部，插入纵深达四十多公里，将敌分割在河南滑县以南的上官村、邵耳寨和朱楼等地。拂晓时分，晋冀鲁豫部队三纵主力和二纵八旅，在当地民兵的带领下摸进邵耳寨时，整编四十七师一二五旅的两千五百多名守军依旧在沉睡，

直到爆破鹿砦的爆炸声接连响起时才仓促应战。由于寨内没有防御纵深，守军指挥部很快就被冲击而来的晋冀鲁豫官兵占领。与此同时，六纵已把一〇四旅旅部和三一一团的两个营压缩在上官村的一角，国民党军守军向南突围，被战场外围的二纵压了回去；随后他们又向北面突围，被二纵十六旅四十八团截住全歼。守军旅长杨显明和副旅长李克源被俘。驻守朱楼的河北保安第十二纵队的四千余人也被七纵全歼，总队长何冠三和副总队长邱立明在突围中被俘。

追击国民党军逃兵时，二纵将一二五旅旅部和三七四团包围在了黄庄。二纵四旅旅长孔庆德和五旅旅长雷绍康让被俘的国民党兵进村去送劝降信，但遭到黄庄守军团长陈筱文的拒绝。入夜，四旅从北面和西北面、五旅从南面和西南面同时发起了攻击。四旅十团一连组成的突击队，在连长郭登玉和指导员孙福元的率领下，冒着国民党守军的火力封锁冲过鹿砦和壕沟，冲到寨墙下时郭登玉连长头部中弹倒下。官兵们竖起梯子向围墙上攀爬，在围墙墙头，孙福元带领二十多名官兵与守敌进行了残酷的肉搏战，用生命维持着冲击线上的突破口。守军的防御决心异常坚决，在残酷的冲击与反击的拉锯战中，双方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十三团二营二十一岁的副营长吴金科在搏斗中阵亡，十五团二十九岁的团长曹光岩在围墙上身中数弹牺牲。三小时之后，黄庄守敌被全歼，守军团长陈筱文被俘。

至此，滑县战役结束，战役歼敌万余，俘敌八千。

被俘的整编四十七师一〇四旅旅长杨显明和副旅长李克源均为川军出身，曾是川军名将的刘伯承友好地款待了他们。刘伯承还向他们问起昔日川军中的旧友旧僚。得知他们两人希望返回故乡时，刘伯承叮嘱道：“旅途珍重，后会有期。”

当陈毅和粟裕在鲁南即将对整编二十六师发起全面攻击的时候，刘伯承和邓小平在鲁西南的巨野、金乡和鱼台地区进行了一场更大规

模的战役，史称“巨金鱼战役”——这场战役距陈毅、粟裕部的预定战场仅两百余公里。在那段雨雪交加的日子里，陈毅和粟裕得知晋冀鲁豫部队就在自己的西面，该是多么的惬意，因为他们可以不用顾虑徐州方向国民党军的威胁，放心大胆地作战了。

巨金鱼战役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杨勇的七纵围攻聊城开始。接着，陈锡联的三纵越过黄河，向城高墙厚的巨野县城开始了攻击。从西门攻击的八旅二十四团进行山炮抵近射击后，七连二班班长康春和九班班长郭守忠等十八名战士仅用十几分钟就登上了城墙。二十分钟后，整个二十四团全部冲入巨野城内。从南门攻击的二十三团因炸药受潮，爆破城门未果，部队组织起猛烈的机枪和步枪火力，最终还是冲进了城。从城东门进攻的二十五团把城墙轰开了个缺口，经过激战开始向城内发展。一九四七年新年的第一天早晨，巨野县城被攻克。同时，七纵也攻克了聊城。

王近山的六纵对金乡的攻击不顺利。金乡守军为国民党军整编八十八师新编二十一旅，部队老兵多，装备精良，以善于防御和进行纵深作战闻名。六纵连日攻击未果后，三纵的七旅和九旅奉命加入战斗。金乡县城虽然不大，却有两层城墙，护城河又宽又深，城墙四面布满了地堡。六纵和三纵于一月四日二十三时发动总攻，但攻击数次还是未见成效，七旅参谋长兼十九团团长曹更修、二十六团三营副教导员邢成刚先后阵亡。这时候，整编第八十八师师长方先觉亲率刚刚调来的整编七十师一四〇旅从徐州出发，准备会合驻守鱼台的六十二旅开始北上增援。同时，国民党军整编六十八师、整编五十五师的三个团以及暂编第四纵队的三个团，也从菏泽、定陶出发东进增援。战场军情由于敌人大军逼近骤然紧张起来，刘伯承和邓小平经过紧急磋商决定“改夺城为围城打援”。鉴于整编六十八师前进速度缓慢，决定留少量部队继续围攻鱼台，集中七个旅的主力迎敌人而进，歼灭从徐州方向冒进增援的国民党军。

山东西南部的雨夹雪变成了鹅毛大雪。六纵在胡家海子、红庙和泮家庄一带截住了一四〇旅大部，将其二八〇团全部歼灭。三纵也捕捉到了六十二旅，双方随即发生激烈的遭遇战，战斗中七旅二十一团三营营长刘发康阵亡。六十二旅全部是日式装备，军官作战经验丰富，士兵军龄多为三年以上。他们在组织反冲击的时候动作凶猛，机枪手在前面扫射，后面投出密集的手榴弹，并且有榴弹炮的精确火力支援。八旅对杨庄的攻击几经反复，两个先头营终于突进村庄的时候，后续部队的前进道路被炮火封锁，已经冲进村的官兵被孤立包围，受到四面的疯狂射击。危急时刻，带领先头部队冲击的二十三团副团长张庆和，二十四团一营营长漆文富，二十三团二营营长杨汉中、教导员杨一年决定成立火线党支部，将还能战斗的官兵不分建制、职务重新编成战斗班组，人在阵地在！在受到炮火的集中打击和地面部队的反复围攻下，已经没有了弹药的两个营最后只剩下一百余人，而这一百余人也全部负伤。最后时刻，八旅旅长马忠全调来其他部队全力发动攻击。二十三团六连机枪手王振海被敌人包围在一座院子里。敌人占了南屋，他就跑到北屋射击；敌人占了房顶，他就隐蔽在墙角射击，接连打死二十余名敌人。敌人最后纵火烧房，王振海壮烈牺牲。炮弹打完了，炮班长杨长锁跟着步兵一路冲击一路投手榴弹，在连续投出两百多颗手榴弹后，杨长锁胳膊肿得已不能动，拉弹环的手上鲜血淋漓。整整一个小时的激战后，杨庄守军放弃阵地逃出了村。

一月十五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又在定陶以东歼国民党第四绥靖区的三个团。

此战，不但使国民党军打通平汉路的计划受挫，更重要的是保障了在鲁南作战的陈毅、粟裕部侧后的安全。

国民党军在总结战斗失败的教训时，充满这样的字眼儿：“整四十一师曾（曾甦元）师长坐视”、“整四十七师陈（陈鼎勋）师长亦静待”，“未使各部队行动切实协调”。国民党军作战，往往是一支部队遭到攻击时，其他部队要么按兵不动，要么出兵迟缓，要么增援的路线莫名其妙：“当刘匪主力于老岸镇、上官村围攻整四十七师一二五旅及整四十一师一〇四旅时，不使五军直攻濮阳、濮县，断匪后路，以捕歼之于战场，乃绕长垣迎击，遂使劳师无功。嗣右翼再向匪进击时，亦以动作迟缓，致刘伯承主力反南窜鲁西，窜扰黄泛区，致陷徐州方向作战于不利之状态。”

对于战争而言，任何一点作战，均在全局的配合之下。

国民党军整编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一九四七年一月五日日记：

这真是一空前的失败……这是谁的过错？我的师承担了过重的任务，而且又孤立无援——这是个极其严重的错误，尤其是部队已经长期处于既不能进又不能退的状况。土匪们趁机制定了一个完美的包围计划……土匪们一直非常痛恨我，怕我。我们攻下峄县和枣庄［在一九四六年十月间］之后，他们始终想打败我，可是没有找到机会。这次，我们战略上的错误给了他们机会。此外，突围那天下雨，也给我们增添了许多困难。我们在没有援兵的情况下，打了三天三夜［实际上只打了四十一个小时］，弹药和汽油都用光了，我们怎么能不打败仗？这是否意味着天助匪帮？老天爷为什么对我们这样残酷？

这一天，马励武的心情恶劣到了极点。下午，侥幸从战场逃脱的副师长曹玉珩带领少数残兵跑回峄县县城。溃兵个个怒气冲天，伤兵们则是呻吟哀号，整个峄县县城顿时人心惶惶，秩序混乱。有军官向马励武建议，部队最好全部驻扎在城外，只允许司令部住在城内，结果遭到马励武的一顿臭骂。他向薛岳请示说，整编二十六师已经完全丧失战斗力，要求退到后方休整。薛岳一口拒绝，严令他立即整顿部队，坚守峄县。马励武看着眼前的残兵败将一下子不知所措了。

三天以后，入夜时分，陈毅、粟裕部攻击峄县的战斗开始了。战斗持续到天亮，防御外围的守军纷纷逃进城内，马励武顿时紧张起

来，因为此时的一切征兆都表明，共产党军队已决心把他从这个县城里挖出来。更令他惊慌的是，十日，整整一个白天，射向城内的炮火格外猛烈，从爆炸的声音上判断，是共产党军队前所未有的重炮，城内的炮兵阵地因此受到了压制——马励武不知道的是，此刻，无论是美式大炮还是炮弹以及开炮的炮手，几天前还他在的指挥之下，现在这些士兵边打边喊："看见那团火了没有？那是一一四旅的旅部，是我打的！"这些被俘之后参加共产党军队的士兵，炮轰他们昔日师长时的高昂劲头引起了共产党干部的兴趣，干部们问："怎么前几天打仗的时候，这些大炮连响都没响？"炮手们回答说："你们运动太快了，赶得紧，哪有心思开炮！"

一天的轰击之后，黄昏，对峄县城防的攻击开始了。炸开城门，解决了在城门洞里向外射击的两辆坦克之后，共产党官兵冲入城内。此时，马励武正在城南天主教堂里的师指挥部里，而他的指挥只剩下了一个内容，就是向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和第二十七集团军司令李玉堂请求部队增援和空投弹药，但是他得到的回答却是："忍耐点老兄，总会有办法。"马励武恼怒到了极点，绝望到了极点，他在电话里吼着："必须在我有办法之前，你们的办法才用得上！我现在已经快没办法了！"接近午夜，城防防线垮了，攻城部队开始南北夹击，峄县城里混乱不堪，那座天主教堂的尖顶已被炮弹炸开了几个大窟窿。

马励武的最后时刻到了。他带领少数随从刚从指挥部里跑出来，就眼看着共产党官兵冲了进去。官兵们在里面找到了他的日记本、作战地图、望远镜、照相机、信件和一张他与蒋介石的合影，但被俘的参谋们谁也说不清师长跑到哪里去了。天亮的时候，马励武穿着士兵的衣服混在俘虏队伍中往城外走，他对身边惊慌的随从说："不要吭声，等有机会就逃走。"但是，虽然他把他的中将军服脱了，可身边的俘虏全是他的部下，当一位共产党干部站在他面前向他微笑的时候，他坦白了自己身份。

很快，马励武就在俘虏营里看见了整编五十一师师长周毓英。陈毅、粟裕部对枣庄的攻击颇费周折，周毓英部顽强抵抗了一个星期之久。由于枣庄城防坚固，攻击部队缺少爆破经验，致使陶勇的第一师付出了很大的伤亡。在粟裕加强了攻击兵力、爆破和炮火力量之后，第一师终于突入城内。一师宣教股长徐一丰率先冲进整编五十一师指挥部，他抓住一个军官便问："你们的师长在哪里？"在那个军官的带领下，在这栋大楼的防空洞里，包括师长周毓英在内的师部人员全部放下了武器。

马励武哀叹："此诚余带兵以来对内对外作战损失最惨痛一役也。"

被俘后的马励武在总结自己战败的原因时，强调了这样几个理由：首先是共产党官兵的士气比国民党军队要高，因为"共产党官兵大多是本地人，他们要保卫自己的土地。他们是'子弟兵'"。其次，国民党军队派系林立，彼此钩心斗角——"整个军官阶层弥漫着强烈的个人怨恨。"马励武坦诚地说自己属于何应钦派，因此他猛烈抨击陈诚和薛岳的指挥无能，战役中不但没有对他进行有效的增援，而且坚持让他的部队孤立突进，有故意把他推入重围的之嫌——"孤军深入已属兵家大忌，而况孤军久立不进也不退。"再者，运气实在糟糕，马励武反复抱怨在他的关键时刻遇到了倒霉的天气——"雨雪把地面变成了一张可怕的粘蝇纸"。

马励武不会想到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鲁南是解放区，解放区的贫苦农民不喜欢他和他的军队。有资料显示，山东解放区的贫苦农民，经过土地改革之后，土地占有由人均一亩半上升到近四亩，国民党军进入解放区之后，几乎每个村庄都提出了"保田保家乡"的战斗口号。只要战斗一打响，农民们不但在粮食供应、伤员护理和弹药运输方面全力帮助共产党军队，而且还直接参战。马励武指挥的第一快

速纵队在撤退时，之所以将坦克和汽车开下公路，就是因为公路上的二十二座大小桥梁都被沂南县的两个民兵爆破队炸断了。战役开始前，为了保证共产党军队迅速渡过沂河向战场运动，在寒冷的雨雪中，几百名木匠、铁匠、瓦匠和青壮年农民聚集在河上，三天三夜后，沂河上出现了一座宽六米，承受能力达三吨的大桥，这座桥使得山东和华中野战军的炮车能够顺利开赴战场。在战役进行中，郯城民兵负责沿着沂河东岸进行防御作战，这些民兵的主要武器就是自己制造的地雷，这些地雷在公路、土路和国民党军驻扎的据点四周被埋得密密麻麻，国民党军队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麻烦。令国民党军官兵极为恐惧的是，除了偶尔发现几个一闪而过的背影之外，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看见过与他们作对的任何一个对手。但是，当他们逃跑的时候，那些民兵成群结队地出现了。他们会藏在路边的沟里射击，然后高声喊道："你们被包围了！不要替老蒋送死了！"有时，堵住他们的竟然是乡村的孩子，这些孩子手里拿着粪叉或者镢头，居然也七嘴八舌地喊着同样的话，理直气壮地站在路的中央。不知为什么，面对孩子们因愤怒而涨红的脸，国民党兵往往把枪一扔，坐在地上对孩子们说："别打别打！叫你们的八路来吧！"

"马将军在农民中的名声很糟糕。"在前线采访的外国记者这样写道，"他的部队占领兰陵地区十五天，把那里的鸡、猪、粮食全都拿走了。我采访过的每个农民，几乎都说受到过国民党官兵的打骂。"

鲁南战役结束后的一月二十二日，中国的传统旧历新年来临了，外国记者看见数百名农民给刚打了胜仗的共产党军队送来了新年礼物：宰好的猪堆满三个大房间：

（我）问一些农民，他们的猪都被国民党军队抢走了，又到哪里去弄到这么多的猪呢？我了解到，几乎所有村庄都有现金捐款，每户拿出五十至五百元。他们用这笔钱到后方去购买生猪，并从五六十英里以外用扁担把猪挑回来。至于农民自己的年饭——一年中最丰盛的一餐了，他们说，今年是"豆腐年"。我问一个农民，他在最近蒙受重大损失之后，怎么还能捐这样多的钱，他用惊奇的目光看着我说："国民党军队在我们村待了三个星期，坏事干尽。

要不是我们自己的军队那么快赶来救我们，我们就毁了，什么都没有了。即使我把留下的所有东西送给我们的士兵，也不算多，我还有土地呢。”

只要赖以生存的土地不丢失，解放区的贫苦农民愿意不惜一切地支持共产党军队。共产党人的这个优势，被外国记者称为“大大抵消了美国所能向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提供的任何数量的军事技术援助”，而这种来自人民的力量是“推翻了正统军事公式的因素”，是“军事公式里巨大的未知数”。

农民遭到虐待，老百姓变成了国民党军队的敌人。为什么共产党军队就没有这些问题呢？因为他们的做法正好与国民党军队相反。他们首先而且唯一考虑的，是人民的态度。他们每一个行动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他们甚至有意使军队规模小于国民党军队，因为正如陈毅将军所说：“我们愿意有一支庞大的军队，可是这样，老百姓的负担就会太重了。”每个共产党士兵都是自愿当兵的农民，每个军官都知道他是为人民而不是为自己的军事前途去打仗。正因为这样，军民之间的关系是友好的，士气高涨，纪律严明，将领之间从未发生过纠纷。

马励武师长的下级，整编二十六师一位被俘的中层军官王昆上校说出了他们失败的真正原因：“军队的纪律已经垮了，百姓痛恨我们。”

## 姑嫂二人忙点灯

一更天，月似镰，俺娘看俺看得严。

二更天，月光明，心里有话说不清。

三更天，月中天，跟你跟到沂河干。

四更天，月昏昏，收下麦子就提亲。

五更天，月如灯，苦死也埋一个坑。

……

地处温带地区的中国农民对四季和时辰的变化异常敏感。他们对春种秋收更迭交错注入了太多的生活期待，祖祖辈辈的二更情暖、五更月寒的情感传承让他们既多愁善感又坚忍不拔。

本是春播的时节，三更月最亮五更霜更浓，催耕鸟叫得满山满谷清翠欲滴。可是，一九四七年春天，山东腹地的翻身农民们却心慌意乱：今年不但地种不上，还要拉着孩子背着老娘去跑反了。

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已岌岌可危。

虽然国民党军在宿北和鲁南的进攻受到挫折和打击，但始终没有放弃与山东和华中野战军决战的企图。在鲁南战役尚未结束的时候，国民党军趁陈毅、粟裕部无暇南顾，大举向共产党兵力薄弱的苏北地区进攻，至一月二十六日，国民党军占领了苏北解放区的大部，并将战线推进到陇海路一线。国民党军认为，以损失二十多万兵力的代价，占领物产丰富的苏皖地区，并将陈毅、粟裕部全部挤进山东境内，完全可以视为“战略上的胜利”。山东和华中野战军在连续作战后必定伤亡巨大，所以在占领陇海路两侧的军事要点时，国民党军并没有遭到剧烈的抵抗。于是，参谋总长陈诚断言：“国军部队虽略受损失，但就全盘战局而言，实属莫大之成功。”

此时，由于陈毅、粟裕部主力全部集结在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附近，国民党军因此判断，“共军大势已去”，很难再实施回旋作战，只剩下死守临沂这一条路了。蒋介石严令要一鼓作气，迅速在山东境内与共产党军队决战，不但要占领临沂，还要完全占领山东解放区，以彻底平定山东战事。为此，国民党军决心发动一次以夺取临沂为目标的“鲁南会战”。为了会战成功，陈诚亲自前往徐州坐镇督战，宣称：“这次会战关系重大，党国前途，剿匪成败，全赖于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国民党军调集了十九个整编师（军）共四十九个旅近三十万人，其中直接围攻临沂的部队达十一个整编师（军）共三十个旅。北线部队，由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指挥，兵力三个整编师（军）共九个旅，自明水、周村、博山南下，攻击莱芜、新泰和蒙阴一线，目标

直指山东解放区的后方基地。南线部队，由整编第十九军军长欧震指挥，兵力八个整编师（军）共二十一个旅，自台儿庄、新安镇和城头一线分三路向北攻击临沂。其他八个整编师（军）担负陇海、津浦和胶济铁路沿线的守备。同时，国民党军还从冀南、豫北战场抽调了四个整编师（军）集结于鲁西南地区，预备鲁南会战开始后，阻击刘伯承、邓小平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增援，或者是陈毅、粟裕部主力从临沂向西撤退。

一月二十八日，徐州绥靖公署下达作战命令。两天以后，欧震指挥的八个整编师（军）分三路开始大举进攻。国民党军攻击部队吸取了以往被共产党军队突袭分割的教训，采取集中兵力、稳扎稳打、齐头并进和避免突出的战法；而在兵力部署上，采取"烂葡萄里夹硬核桃"的战术，在三路攻击部队中，每一路中都有一个精锐的主力师作为骨干，大兵力谨慎地滚动前进，每天推进的行程不超过十公里。陈诚认为，如此庞大的兵力是陈毅和粟裕根本无力阻挡的，他对部下说："即使全是豆腐渣，也能撑死共军！"

为了保卫临沂，陈毅、粟裕部主力在奋力阻击的同时，曾命令三纵"从正面坚决抗击中路之敌"，企图诱使"敌之左右两路突出，以利我寻歼其中的一路"。但是，欧震不但没有冒进，在发现陈毅、粟裕部的意图后，左右两路部队反而立即向中路靠拢，甚至停止前进就地修筑防御工事。敌人这种极端的小心翼翼，使得陈毅和粟裕始终没能寻找到化解危急的机会，甚至在如何部署阻击上都感到万分棘手。南线的国民党军占领了郯城、码头镇、重坊一线后，欧震接到的作战命令是："分别包围歼灭奸匪主力于李家庄（位于临沂东南）以南、沭（沭河）沂（沂河）两河畔地区。"

国民党军南线部队逐渐靠近了临沂。

欧震之所以采取这种稳健的攻击方式，意图十分明显：既然是南北两线夹击，北线部队目前距临沂战场尚有一段距离，而只有等待北线全面逼近之后，决战的态势才可能形成。目前，对时间的流逝感到焦虑的只能是共军而不是国军。

北线李仙洲的部队推进很快，二月四日，其先头部队占领临沂西北方向的莱芜。

以保卫与争夺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为核心的生死决战已经迫在眼前。

就决战于临沂城下而言，无论是从正规军的兵力、一线作战部队的武器装备和双方所处的战场态势上看，陈毅、粟裕部都处于劣势。一旦死守硬拼，不但双方都将血流成河，而且陈毅和粟裕胜算的几率不容乐观。

此时，陈毅、粟裕部已完成两军合一的整编。

整编后的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的编制是：

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政治委员饶漱石，副司令员张云逸，副政治委员黎玉，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舒同。华东军区辖苏中、苏北、胶东、渤海、鲁中、鲁南六个二级军区以及华东军区直属的两广纵队和华东军政大学。总兵力三十万人。

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华东野战军编为十一个步兵纵队和一个特种兵纵队。步兵纵队采取“三三制”的编制，即每个纵队辖三个师，每个师辖三个团：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飞，辖第一、第二、第三师和独立师；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韦国清，辖第四、第五、第六师；第三纵队：司令员何以祥，政治委

员丁秋生，辖第七、第八、第九师；第四纵队：司令员陶勇，政治委员王集成，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师；第六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政治委员江渭清，辖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师；第七纵队：司令员成钧，政治委员赵启民，辖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师；第八纵队：司令员王建安，政治委员向明，辖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二十四师；第九纵队：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林浩，辖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师；第十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景晓村，辖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师；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政治委员张藩，辖榴弹炮团、野炮团、骑兵团、工兵团、战车营和汽车大队。另外，华东野战军第十一、第十二两个纵队，下辖四个旅，留在苏皖地区打游击。整编后的华东野战军总兵力二十七万五千人（不含第十一、第十二纵队），这个数字是内战爆发时山东和华中两地兵力总和的两倍多。

在后来规模巨大的战争中具有重要地位的陈粟大军由此形成。

一九四七年初，刚刚组建的华东野战军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由于歼敌的时机迟迟不出现，敌人从南北两面夹击推进，大军已经逼近临沂城下，下一步如何作战令陈毅和粟裕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二月四日，中央军委来电，电报提出一个惊人的建议：为了争取作战主动权，必要时可放弃临沂："敌愈深进愈好，我愈打得迟愈好；只要你们不求急效，并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临沂，则此次我必能胜利。目前敌人策略是诱我早日出击，将我扭打消耗后再稳固地进占临沂，你们切不可上当……"

"必要时放弃临沂"，并且"敌愈深进愈好"，无论当时还是现在看，这都是一个令人惊奇的建议，这一建议最典型地体现了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共产党军民对解放区的向往和追求刻骨铭心，自两淮失守苏皖解放区全部丢失之后，如果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再被国民党军占

领，华东军民的家园和归宿将在何处？但是，“敌愈深进愈好”，这又让人蓦然回想起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无数次诱敌深入的成功战例，而无论是陈毅还是粟裕，都曾是诱敌深入后“运动待机、各个击破”战略战术的亲身实践者。

陈毅和粟裕发现：欧震的南线部队密集推进，谨慎缓慢；北线李仙洲的部队却孤军冒进，快速深入。虽然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心存顾虑，但在蒋介石和陈诚的一再催促下，李仙洲率领的三个整编师（军）在占领莱芜后，继续强行向南，四日占领颜庄，六日占领新泰。由于深入到解放区内部作战，国民党军开始尝到种种苦处。莱芜地区的共产党地方政府组织起十万百姓，对国民党军必经的交通线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老百姓虽不能与国民党正规军作战，但他们把自家门前的道路破坏掉是轻而易举的事——连续七个昼夜，老百姓采取了分段包干的办法：“敌人在哪里修，就在哪里破；敌人修到哪里，就破到哪里；敌人白天修，我们晚上破。”由于交通线中断，李仙洲的部队越往解放区内部走补给越困难。王耀武命令粮食就地补充，弹药各部队自己负责运输，道路遭到破坏也由各部队自己修复——恶性循环由此开始：就地补充粮食，无疑就要向当地百姓征集或者抢夺，这再次加深了百姓对国民党军队的愤恨，结果道路被破坏得更加彻底了，直至让国民党军根本无法修复。而让各部队自己解决所有的困难，导致部队前进的速度开始放慢。李仙洲不断地向王耀武诉苦，王耀武只得派出三个师的兵力专门维护从吐丝口至莱芜、颜庄、新泰的漫长的补给线。

北线的国民党军走成了首尾不能相顾的一字形。

对于陈毅和粟裕来讲，战机终于出现了。

捕捉北线的战机就意味着：秘密移动北上，集中优势兵力，出其不意，歼灭北线的国民党军一部甚至大部，以瓦解敌人南北夹击的态

势，消除来自侧后方的威胁。然而，前提是必须放弃临沂。

这个不惜打烂家里坛坛罐罐的决定，对于解放区内的翻身农民们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因为他们必须承受家园被毁的一切后果。

鲁南的初春，形势动荡，人心浮动。

一个已经投诚的前国民党军将领再次倒戈。

郝鹏举，时年四十四岁，河南阌乡（灵宝）人。一九二二年参加河南督军冯玉祥的部队，曾任冯玉祥的机要传令员。一九二六年被派往苏联的基辅军官学校和莫斯科炮兵学校学习。回国后，先后任开封西北军官学校上校大队长和第二十五师炮兵团长。一九三〇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爆发中原大战，这个二十七岁的年轻军官第一次倒戈，背叛了培植他的冯玉祥投靠蒋介石。当冯玉祥的部队被蒋介石收编后，他被任命为由西北军改编的第二十五路军少将参谋处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投奔了在西安的胡宗南，靠着“聪明机灵，能说会道”，很快当上了第二十七军参谋长。国民党军在对日作战中一再失利，一九四一年，自感前途渺茫的郝鹏举索性到南京投奔了汪精卫伪政府，先后出任伪军第一集团军参谋长、汪伪政府训练部次长等职。但是，随着日本战败趋势的日益显现，郝鹏举又一次重新考虑自己的未来，在投奔蒋介石还是投奔共产党两条路之间徘徊不定。

日本宣布投降后，国民党为扩充军力大量收编伪军，蒋介石任命郝鹏举为新编第六路军总司令，虽然他对蒋介石存着巨大的戒心，并依旧暗中与共产党人保持着联系，但蒋介石的任命究竟还是让他喜出望外。可是，不久之后他便发现，虽然他又送汽车又送金条，蒋介石的嫡系们还是对他和他的部队态度傲慢，常常以“惩办汉奸”的口气敲诈勒索，不但克扣他们的军饷，甚至连武器弹药也拒绝补充。更让他感到岌岌可危的是，一九四五年秋，他的部队被调到津浦铁路沿线，

成为与共产党军队作战的前锋，而这无异于让他这种国民党军中的杂牌军变为炮灰。一九四六年一月，在共产党人的军事压力下，甚至是在陈毅将军亲自晓以利害下，郝鹏举率国民党军新编第六路军两万人投奔了共产党。他的投诚引起很大反响，陈毅曾说："历史上国民党军队起义到我们这边来，比较大的有两次，第一次是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赵博生、董振堂领导的宁都起义，大约一万多人；第二次是不久前高树勋在邯郸的起义，也是一万多人。这次郝鹏举起义的人数最多，他自称两万人，我看至少也有一万七八千。"

虽然已经背离了国民党军，但郝鹏举始终把自己的部队当成一份"财产"，一个与人民的军队"平起平坐"的特殊团体。他一面公开宣传自己决心和共产党人一起"为争取民族独立民主自由而奋斗"，甚至还公开说他拒绝了蒋介石给他送来的第四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的职务——"我今天给了蒋介石一个响亮的耳光！"但同时，因为害怕共产党在落实国共签署的整军方案时，对他的部队进行整编，所以又在官兵中煽动对共产党的不满，要求他的部队"官不离兵，兵不离官；总司令不离全体，全体不离总司令；弹不离枪，枪不离身，动我们一人，就全体自杀"。一九四七年一月，在国民党军向苏北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大举进攻之际，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派人给郝鹏举送来了国民党军第四十二集团军司令官兼鲁南绥靖分区司令官的头衔，诱劝他"立即正反，迅速占领房山至沭阳一线，配合由宿迁北上的国军，共同围剿苏北共军，建立奇功，报效国家。否则共军北撤，必将全力解决你们。深望切勿坐失良机，以免后悔"。郝鹏举终于动摇了，他认定这回共产党军队连同他们的解放区都会被国民党大军铲除干净，这个时候自己再不改换门庭就来不及了。一月二十六日晚，他率部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当时鲁南战役刚刚结束，蒋介石认为郝鹏举的举动足以抵消国民党军在作战中的损失——"还军于国"，"月缺重圆"。但是，准备领赏的郝鹏举立即发现，他在国民党军中地位更加低下了。参谋总长陈诚轻描淡写地告知他，答应他的第四十二集团军番号仅仅是个"号召"，"因为

国军的战区和集团军番号均已取消”。所以，他只能“用鲁南绥靖分区司令的名义指挥”部队。接着，陈诚命令他立即参加与华东野战军在山东的决战。

就在陈毅和粟裕已经决定放弃临沂的时候，一九四七年二月六日，华东野战军二纵发起了围歼郝鹏举北进部队的战斗。战斗进行得果决而迅猛，到第二天结束战斗时全歼郝鹏举的两个师，俘敌六千多人。战斗发生的时候，虽然围绕在华东野战军周围有国民党十几万大军，但是没有任何一支部队来援救郝鹏举。他从战场上狼狈溃逃时几次从马上摔下来，直至把脚摔坏了。走投无路的时候，他脱下军装，换上了百姓的衣服，当他准备派人向陈毅乞降的时候，被二纵官兵包围了，那一刻他大喊：“我的脚痛，请原谅我不能起来。你们辛苦了！我早就说不打了，打什么呢？”

解放区军民准备撤离临沂前夕，郝鹏举被押到陈毅的面前。他抢先说自己“万分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军长”。陈毅厉声道：“从你叛变到被俘，前后仅十一天，这证明了干民主事业的需要有为人民服务的自我牺牲的革命精神，凡投机取巧必致身败名裂，最后难逃人民的惩罚，你就是一个投机取巧的示范，这是第一；又证明了一支旧式的军阀部队不经过彻底改造，绝不能担负伟大的民主斗争任务，这是第二；又从事实上证明从美帝国主义到蒋介石到陈诚、薛岳等人惨败之余，转而求之于你郝鹏举去参加，你们之间的关系太丑恶了，因而力量是更腐朽了，故不堪一击，又证明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基于正义和爱国自卫，故名正言顺，力量伟大，一出手你们就纷纷落马，这是第三。”谈话结束的时候，陈毅告诉郝鹏举：“你既然到了此地，一切应由人民处理。”郝鹏举大喊：“我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军长！”

延安《解放日报》称：“郝鹏举是中国军阀中著名的反复无常的一个。”

不久之后，当山东的敌情进一步严重，中共华东局决定将之前历次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军高级军官全部北撤时，为防止意外，负责押送的干部在没有得到上级批准的情况下将郝鹏举处决了。

郝鹏举就这样在一片漆黑的无名野地里结束了他的一生。

他是解放战争中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被俘后被处决的国民党军将领。

事后中共中央追查此事，陈毅主动承担了责任。

二月十日，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第六、第七、第八纵队分三路从临沂地区秘密北上，位于胶东的第九纵队和位于渤海的第十纵队也开始向莱芜方向开进，全部主力预定十六日前到达莱芜、新泰地区集结。同时，由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指挥的第三纵队和刚刚打完郝鹏举的第二纵队，以及特务团、骑兵团和鲁南军区第十师共十八个团，伪装成野战军主力，在临沂以南宽大正面进行机动防御，迷惑和迟滞国民党军的南线部队。此外，地方武装奉命一路向西进逼兖州，并在运河上架桥，造成华东野战军拟向运河以西撤退的假象。

野战军主力放弃临沂北移，由于作战计划和意图不能详细对部队传达，很多官兵对避敌不战感到十分困惑。而临沂作为山东解放区首府，大批机关和政府人员也要同时撤离，原来为在南线与国民党军决战准备的粮草和弹药等大批物资，千辛万苦地转运到这里，现在这些物资还要跟随主力北上转运，路程遥远，困难重重。当部队离开后，临沂地区的贫苦百姓经受了巨大的考验，为了在国民党军到来的时候不至惊慌失措，老人、孩子、妇女不受地主还乡团的残酷报复，地方党组织事先组织农民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坚壁清野——把财产和粮食统统藏起来，有的村庄甚至还进行了人员的转移演练：

打锣报警表示敌人来到了……顿时，全村响起了乒乒乓乓的关门声和上锁声。人们十分安静地列队走向预定的集合点。连小孩都没有出声，也没有婴儿的啼哭。他们在黑暗中走了大概一个小时，到达山后的一个地方。在那儿，我们与其他四个村的人相遇，一起开了一个会。主持会议的人要大家回去检查一下，留下了什么能让国民党军偷去的东西……这是一个寒冷的夜晚，那些缠足的老太太，为了躲避敌人，跌跌撞撞地在黑暗中走着；老头子则拉着他们宝贵的骡子和母牛，走在坎坷不平的狭道上……

从临沂到莱芜，直线距离一百四十多公里。鲁中山区道路崎岖，雨雪严寒中，华东野战军十几万官兵夜行晓宿，以最隐蔽的方式连续行军。沿途的地方党政部门尽全力保障着大军的食宿和交通——这是一幅官兵们从未见过的壮观景象：在蜿蜒不断的大军的两侧、身后，甚至是前面，由贫苦农民组成的几十万随军人流浩浩荡荡地向前滚动。他们推着独轮车，挑着扁担，或者是用自己的肩膀，把部队作战需要的多达亿万斤的粮草、弹药和物资全部承载起来，部队前进一步，他们便跟随前进一步。他们的家乡可能已被国民党军占领，他们的父母妻儿可能正在深山中躲避，他们的家可能已被地主还乡团挖地三尺或者放火烧毁，但是这一路上他们并不特别的牵挂，因为他们的土地、粮食，甚至娶上的媳妇生下的娃，都是共产党来了之后才得到的，他们相信只要共产党还在一切都会再有的。他们已经铁了心将自己的命运和共产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与愿意和共产党官兵分享好日子一样，他们也心甘情愿与自己的部队一起承受苦难——生来便一无所有的他们在向战场走去的时候镇定而从容。

应该说，华东野战军如此规模的移动，是要冒行动过早暴露的危险的。一旦部队的北移被国民党军发觉，不但临沂必定不保，尚未完成北移作战部署的部队还会受到国民党军的猛烈夹击，这样的后果将比在临沂地区决战还要严重。但是，共军“主力作战略转移时，经由临沂、蒙阴、新泰、莱芜到东西山区小径，昼伏夜行，秘密前进，我空军既无法搜集，地面情报亦不易侦知，一时竟不知匪军主力所在。”——这里都是共产党解放区，解放区百姓对国民党军队守口如瓶是保守秘密的关键。

十五日，华东野战军主力秘密北进后的第五天，阻击牵制南线国民党军的部队撤出了临沂。

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的陷落，令国民党方面大喜过望，这一事件被渲染为内战以来“最伟大的胜利”。蒋介石欣慰地说：“国军克服临沂以后，陇海路两侧军事暂时可以告一段落，以后的问题都在黄河以北了。”而被蒋介石派往徐州督战的陈诚，虽然此时已经捕捉到陈毅、粟裕部北移的风声，但他实在不愿意由此损害他攻克临沂的功绩。他在给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的电报中说：“我军在苏北和鲁南与敌作战，歼敌甚众。敌军心涣散，粮弹缺乏，已无力与我主力部队作战，陈毅已率其主力放弃临沂，向北逃窜，有过黄河避战的企图，务须增强黄河防务，勿使其窜过黄河以北，俾便在黄河以南的地区歼灭之。”

就山东战场而言，在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中，没有比王耀武更了解共产党军队的人了。他认为：国民党军在苏北和鲁南从来没有歼灭过共产党军队的“一个整师和一个整纵队”。陈毅、粟裕部虽因作战勇猛伤亡很大，但共产党军队一向补充迅速，士气旺盛。因此，陈诚所说的共军“已无力与我军主力部队作战”显然是夸大其词。况且，他已经陆续接到华东野战军北进的情报，陈毅和粟裕必定存着歼灭他的南下部队的企图。于是，王耀武没经陈诚批准就命令李仙洲收缩兵力，不得继续孤军冒进。但是，蒋介石的手谕到了，口气之大足见他受陈诚的蛊惑有多深：

> 匪军在苏北、鲁南地区作战经年，损失惨重，士气低落，现已无力与我主力部队作战，并有窜过胶济路、北渡黄河避战的企图。为了吸住敌人，不使北渡黄河得有喘息机会，而在黄河南岸将敌歼灭，以振人心，有利我军以后的作战，切勿失此良机，务希遵照指示派部进驻新泰、莱芜。新、莱两城各有一军之兵力，敌人无力攻下，敌如来攻，正适合我们的希望。

王耀武只得命令李仙洲继续推进——当王耀武命令部队收缩的时候，陈毅和粟裕着实紧张了一下，有部队怕走了这么远的路却让敌人

逃脱了，建议追击或者截击，陈毅和粟裕因为部队尚未完成预定部署而没有采纳——蒋介石的命令让陈毅和粟裕松了一口气。

二月十九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军官训练团作了题为“剿匪战役之检讨与我军今后之改进”的演说，称“现在关内的匪军约可分为五部……此五部中，就我的观察，以陈毅一部最为顽强，训练最精，诡计最多，肃清最为困难。但自国军收复苏北攻克临沂以后，陈毅已失其老巢，就再不能发生过去一样大的作用了。”可是，就在这一天，航空侦察的情报被送到陈诚面前，他终于醒悟到华东野战军的真实意图，于是立即命令王耀武赶紧收缩部队。王耀武为了避免分散的兵力被华东野战军各个击破，命令第七十三军和整编四十六师星夜兼程紧急北撤，两军协同固守莱芜。但是，一切都晚了，华东野战军主力已于莱芜地区完成了对李仙洲部的战役包围。

首先受到攻击的，是从博山向莱芜收缩的第七十三军七十七师。十九日上午，师主力在师长田君健的率领下，沿博山至莱芜大道走到和庄附近时，突然间公路两侧枪声大作。鲁中军区警备五团首先截断了七十七师的退路，华东野战军第八、第九两个纵队同时向七十七师的行军队列展开了猛攻。七十七师慌乱中利用简易工事和村落进行顽强抵抗，并连续组织反击，但由于全师各部已被分割，七十七师很快便陷于首尾难顾的境遇中。战斗持续到黄昏，师长田君健和参谋长刘剑雄阵亡，副师长许秉涣被俘。

此战揭开了莱芜战役的序幕。

二十日晚，华东野战军向莱芜发起了全线攻击。

第六纵队负责切断莱芜守军的退路，他们攻击的目标是吐丝口镇。吐丝口位于博山、明水通往莱芜的“丫”字形公路的交叉点上，是国民党军出入鲁中地区的咽喉，设有李仙洲部的大型军用仓库，储有

上百吨弹药和数十万斤粮食，驻守在这里的是国民党军第十二军新编三十六师。这个师原是伪军，对当地地形十分熟悉，配有大型火炮等重装备，因此战斗一开始便进入残酷的拉锯战中。担任主攻的六纵十六师的突击部队以偷袭的方式解决了国民党军的前沿哨兵，然后强占围墙，撕开了突破口，一个小时后先头团突入镇子。但是，由于受到地面火力的猛烈阻击和天上飞机的狂轰滥炸，突入部队无力支持又退了出来。二十一日晚，六纵十八师五十三团再次发动攻击，官兵们不畏生死地猛打猛冲，十六师的三个团也开上来，与五十三团并肩突击。天亮时，六纵占领了吐丝口镇三分之二的街区，与国民党守军形成对峙。二十二日夜，六纵以六个团的兵力向吐丝口镇发起最后的总攻，敌人发射了大量的燃烧弹和照明弹，民房一座座地被引燃，小小的镇子变成了一片火海。攻击部队从各个方向连续突击，逐条占领街道，最后把新编三十六师师部压缩在了一座关帝庙里，国民党军凭借坚固的围墙进行顽抗。

此时，由于第四、第七纵队没能及时插入颜庄至莱芜之间的预定战场，致使整编四十六师与莱芜城内的第七十三军会合。二十日晚，奉命攻击莱芜的一纵并不知道战场敌情有变，拿司令员叶飞的话讲："原来由五个纵队担负包围李仙洲集团的任务不得不由我纵担当起来了。"一纵以迅猛的动作肃清了莱芜守军的外围据点，但随即便遭到敌人的猛烈反击。二十一日，在九架飞机的掩护下，两千国民党军向西关和北关突击，企图清除退路上的威胁，一纵官兵在血战中坚守阵地一步不退。就在一纵围困莱芜之敌的时候，身后却来了整编四十六师。面对腹背两面之敌，一纵决心抓住敌人纠缠到底，为主力的合围赢得时间。战士沙纪被敌人的炮弹炸得双目失明，他摸索着爬到正在投手榴弹的副连长身边，把自己的枪交给了副连长，然后握着手榴弹向敌人枪声最猛烈的地方冲去……直到二十一日晚上，一纵才将整编四十六师放入莱芜城。一纵以巨大的代价确保了野战军主力对莱芜的

战役合围。战后粟裕说，一纵“在整个战役中起了决定作用，应算是第一功”。

根据战场敌情的变化，华东野战军立即调整部署，决定以第一、第二、第七纵队组成西突击集团，第四、第八纵队组成东突击集团，于二十三日向莱芜及以北地区的两侧发动强攻。

猬集在莱芜城内的几万国民党军犹如惊弓之鸟，军官们对或是固守待援、或是向北突围意见不一。李仙洲不断地向王耀武发去求援电报，王耀武认为根据以往的作战经验，指望援军到莱芜解围是不可能的。即使陈诚派出部队前去解围，也会在半路遭到共军的截击。那么没等援军到达，莱芜守军就会被歼。同时，莱芜守军粮弹缺乏，几万人的部队指望空投无济于事，如果弹尽粮绝，莱芜守军还是死路一条。此外，被围困在吐丝口的新编三十六师一再请求解围，但目前那个方向已无兵可派，新编三十六师的下场也很可能是被歼。分析之后，王耀武的结论是：莱芜距离北面的补给站吐丝口镇只有十三公里，既然固守莱芜极为不利，与其坐等被歼，不如突围而出，与新编三十六师会合，这样东可支援淄博，西可保卫济南，又可以解吐丝口之围，难道李仙洲的几万大军连十三公里的路都走不出去？王耀武不信。他派他的副参谋长罗幸理飞往南京，将突围部署当面送请蒋介石审定。蒋介石给王耀武回了一封亲笔信，由于预感战局不妙，口气里有了一丝悲凉：

> 罗副参谋长带来的信已收阅。敌前撤退如部署不周密，掌握不确实，就会受到挫折。应作周密部署，并派强有力的部队担任后尾及侧尾的掩护。固守吐丝口的新编三十六师必须坚守原阵地，以作北撤部队的依托。我当严令王叔铭指挥空军集中力量轰炸扫射，竭力掩护部队转移。并祈上帝保佑我北撤部队的安全和胜利。

李仙洲接到命令后，立即部署，决定二十三日开始北撤。

也许李仙洲心里明白，此时撤退是极其危险的举动，因为陈毅和粟裕的部队必定会在他撤退的路上等着他。但是他依旧心存侥幸，认为他的两个军总兵力并不比陈毅和粟裕部少，而且自己的火力强劲，只要动作坚决迅速，损失是免不了的，但冲出去还是有把握的——纵然共产党军队一向胃口很大，也没听说他们一口吞下过国军的两个军。

李仙洲不知道的是，企图把他全部消灭的，除了华东野战军的官兵之外，还有跟随共产党军队作战的无数贫苦农民。如果李仙洲知道此刻支持着陈粟大军的农民的确切数量，不知他还有没有勇气走出莱芜城。

战后根据有关方面的粗略统计，莱芜战役中，鲁中地区参加各种战勤的农民已达到五百万之多，而直接在战场为华东野战军提供作战服务的就有五十多万。由支前民兵组成的四十多个"子弟兵团"随军行动，由青壮年组成的战场救护队抬着一万六千多副担架和一万多辆小车，华东野战军移动到哪里，他们便一步不离地跟随到哪里。莱芜县的十万农民，已经把以莱芜为中心向南北延伸而去的数百公里的公路完全破坏，使得国民党军的坦克和汽车根本无法通行。莱芜四周所有的大路小路上，布满了民兵的岗哨，国民党军队派出的任何一支侦察部队都会落入他们之手。战后统计，仅民兵抓获的国民党军侦察人员就有近四千人。与之相反的是，莱芜战役中，仅给华东野战军带路的农民就多达八千余人，其中不少是老人和孩子，有的妇女甚至背着孩子带领部队穿越蜿蜒的山路。陈粟近二十万大军云集狭窄的歼敌地域，官兵吃饭和骡马吃草是一个大问题。在那些日子里，鲁中大地到处是石磨和碾子的滚动之声，农民们自己吃野菜，把自己家中仅有的粮食奉献出来，男女老少，村村户户，碾米磨面，昼夜不息。莱芜县朱家宅子是一个仅有一百二十户人家的小村子，但仅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五日这天，全村就摊了一千八百五十斤煎饼，烙了一千二百斤白

面饼，碾出了两千八百斤小米，磨出了一千八百斤面粉，还筹集了近六千斤的柴草，然后男人、女人、老人和孩子一起推起木制的小推车将这些东西送上前线。

从那时起，鲁中地区一直流传着一首名为《快办给养送前方》的歌谣：

一更里来黑通通，

姑嫂二人忙点灯。

小姑推磨嫂烙饼，

赶办给养手不停。

二更里来月满窗，

嫂嫂淘米妹烧汤。

放上几碗煎锅豆，

干饭煮得香又香。

三更里来月正南，

干饭烙饼都办完。

拾掇拾掇快去送，

挑担样样准备全。

四更里来月儿歪，

姑嫂二人出庄来。

同志们前线多辛苦，

咱送给养理应该。

五更里来天露明，

前线将士正冲锋。

首长一见给养到，

夸着要给俺立功。

二十三日晨，李仙洲部集结在莱芜城北，决定以第七十三军为左纵队，整编四十六师为右纵队，指挥所与全部辎重跟随整编四十六师，在飞机的掩护下并行向北突围。危急时刻，又传来了一个令李仙洲万分惊骇的消息：整编四十六师师长韩练成突然“失踪”——原来，早在抗日战争期间，韩练成就与共产党人建立了联系。莱芜战役开始前，华东野战军派人深入到整编四十六师内部秘密开展工作。于是在整个战役中，韩师长都对李仙洲采取了敷衍和拖延的态度。在准备突围的关键时刻，他干脆在共产党干部的引导下，在莱芜城里藏了起来，放弃了对他的整编四十六师的指挥。

忐忑不安的李仙洲出了莱芜城，莱芜城立即被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占领，而此举意味着国民党军的后路已被截断。

李仙洲采取两个军四个师齐头并进的队形，企图依靠小纵深加强突击力量，一鼓作气迅速冲出华东野战军的包围。但是，当他的部队走到莱芜至吐丝口镇的路途中时，华东野战军部队从两侧的山地间排山倒海般冲了出来，拥挤在狭窄公路上的辎重、马匹和车辆以及惊慌失措的步兵立即被截成数段。国民党军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既是李仙洲的同乡，又是他的黄埔同学，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令下，王叔铭派出了几十架战斗机和轰炸机，并且亲自驾机飞临战场上空，对华东野战军部队进行轮番轰炸扫射，企图掩护李仙洲部冲出重围。但是，当双方地面部队混战在一起后，王叔铭的空军再难发挥效力。王耀武反复请求王叔铭加强空中打击力度，王叔铭在飞机上回答说：“我指挥着飞机轰炸，一直没有中断，可是敌人不怕死，阻止不住他们的前进，我有什么办法？”李仙洲被分割包围的各部已被压缩成一团，战场上到处是“缴枪不杀”的喊声。下午十四时，国民党军第七十三军和整编四十六师被歼于东西约三公里、南北约两公里的狭窄地域内。

李仙洲的指挥所已经溃散。他在与第七十三军军长韩浚逃离时左腿中弹。混乱的战场上谁也顾不上他，韩军长带领一部分官兵逃入吐丝口镇，而李仙洲在距离镇子仅剩几里路的地方摔倒，他再也跑不动了。吐丝口镇中的新编三十六师在华东野战军对撤退中的李仙洲部发起攻击时，并没有出兵相援，而是在师长曹振铎的率领下趁机向淄博方向逃窜了。倒在地上的李仙洲被换上了士兵军装，然后在几个军官的搀扶下企图继续逃亡，但是很快就被追击上来的华东野战军官兵发现了，因为他们认为几个国民党军官扶着一个“士兵”逃跑是一个古怪的举动。李仙洲被带走了。

几天之后，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特意来看望他。交谈中，陈毅拿个小板凳垫在他的伤腿下，说受伤的腿垫高点能减少疼痛。陈毅还对炊事员说：“李仙洲是山东人，爱吃水饺。”

莱芜战役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军、一个整编师、一个新编师，约六万余人。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第七十三军军长韩浚、副军长李琰、参谋长周剑秋，第七十三军十五师师长杨明、副师长徐亚雄，第七十三军一九三师师长萧重光、副师长柏柱臣，整编四十六师副师长陈炯、副师长兼整编旅旅长海竟强、整编旅旅长甘成城、整编旅代旅长曹威等被俘。

莱芜战役使国民党军鲁南会战计划遭遇重挫，位于南线的欧震部鉴于李仙洲部已被歼，只有暂时放弃进攻，被迫采取守势。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感叹道：“莱芜战役，损失惨重，百年教训，刻骨铭心。”

战斗结束之后，王叔铭驾机降落在济南机场，他立即用电话向蒋介石报告说：“地面上已无战斗，看样子我军已被全歼。”蒋介石惊恐地问：“你看清楚了吗？”王叔铭回答说：“我对地面上业已详细侦查，确未见地面上有战斗。”蒋介石只好说：“你再派飞机去看看！”

没等王叔铭再次起飞，蒋介石自己飞到了济南。听完王耀武的汇报后，他的心情恶劣到了极点：

> 你们只是在莱芜这个战役里就损失了两个军另一个师，损失了这样多的轻重武器，增加了敌人的力量，这仗以后就更不好打了。这样的失败真是耻辱。莱芜既已被围，你为什么又要撤退？遭到这样大的损失，你是不能辞其咎的。这次你选派的将领也不适当，李仙洲的指挥能力差，你不知道吗？撤退时他连后卫也不派，这是什么部署？你为什么派他去指挥？如派个能力好的人指挥，还不致失败。李仙洲已被敌人捉去，你们要知道，高级人员被捉去，早晚会被共产党杀掉的！

李仙洲被俘后受到共产党方面的优待。一九六〇年被特赦后，他在山东政协秘书处任专员。一九七八年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一九八八年在济南逝世，享年九十四岁。周恩来一直称他为“李大哥”，与陈毅一样曾嘱咐工作人员说：“李大哥是山东人，爱吃水饺。”

那些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负伤的华东野战军官兵，被从战场上一一转运下来。在伤员们转运的路上，鲁中大地每个村子的村口都设有村民观察哨，伤员还没进村，妇女和孩子们就跑出来迎接了。他们把伤员领回自己家里，大嫂赶忙把一直热着的米汤端上来，不能自己进食的重伤员被大娘揽在怀里一点一点地喂，老人的眼泪一滴一滴地掉落在米汤里。无数子弟兵就这样在乡亲们的照料下，愈合了伤口、强壮了身体，重新走向了远方的战场——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那布满如同沟壑般皱纹的笑脸、那如同老树般粗糙硬实的双手，那在所有无几的境遇里甘愿倾其全部的百姓，是共产党官兵刻骨铭心的依靠和难以忘怀的归宿。

## 囊形地带和中枢安全

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至今还没有成婚。

早在进入黄埔军校学习之前，他在家乡奉父母之命娶过一房媳妇，但自从进入黄埔一期之后，他似乎把这个媳妇忘记了，不久这个女人在家郁闷病逝。在以后的日子里，曾有不少人给他做媒，但他自己却并不着急，对外宣称“国难当头”，“谈何私事”。话是这么说，其实他一直在寻找适合自己的女人。一九三六年，胡宗南在杭州探望已经成为军统头目的戴笠时，在戴公馆意外地见到一位名叫叶霞翟的女军统，她是戴笠的学生，是第一位获得留美博士学位的中国女性。胡宗南和戴笠是生死之交，两人不分彼此，戴笠决定把这个女子作为一份大礼送给胡宗南。在戴笠的有意安排下，两人的关系迅速升温，直到胡宗南以一块白金手表作为定情物送给叶霞翟，胡宗南的终身大事总算有了些眉目。但是，抗日战争爆发了，沉默寡言的胡宗南上了前线，与叶霞翟不但很少见面，连书信都很少来往，他与这个军统女成员的关系好像又似有似无了。抗战中期，他相了一次亲，这件事由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长陈立夫牵线，女方是大名鼎鼎的孔祥熙的二小姐。据说，孔二小姐很是乐意，而胡宗南虽然还没见过孔二小姐，对这个豪放不羁的女子逸闻却听说过不少。思来想去，胡宗南还是不想放过个攀龙附凤的机会。相亲的时候，他故意穿一身破破烂烂的棉布军装，显出一副刚从沙场冲杀出来的样子，可还没与孔二小姐说上几句话，胡宗南就印证了关于这位小姐的所有传闻都是真的，他即刻打消了娶孔二小姐的念头。在给陈立夫的回信中，胡宗南还是以国家为挡箭牌谢绝了这门提亲：“国难当头，正我辈军人抗敌御侮、效命疆场之时，强虏未灭，何以为家？”

没人确切知道这个“西北王”的意中人到底是谁。

一九四七年，五十一岁的胡宗南立下誓言：等为党国建立“殊勋”之后，将庆功和结婚喜宴合在一起办。

胡宗南心目中的“殊勋”，就是占领共产党人的中枢——延安。

共产党人的政治、军事中枢——陕甘宁解放区首府延安在胡宗南统辖的战区之内。

陕甘宁解放区东临黄河中游，西抵环江，南至渭北山地，北靠长城，包括陕西北部、甘肃和宁夏东部约二十个县，面积近十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一百五十万。驻守在这里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防御部署是：第一纵队驻守延安地区，担任迎击国民党军进攻的主力；教导旅和警备第三旅七团驻茶坊、南泥湾、临真、固临一线，担任延安以南的阻击任务；警备第一旅、新编第四旅驻守关中军分区所辖区域；警备第三旅旅部率五团驻守陇东军分区所辖区域。整个陕甘宁解放区防御部队仅有五个旅，兵力总计两万八千人。

如果从兵力上讲，包围陕甘宁解放区的国民党军总兵力，几乎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十倍。其中第一战区胡宗南部的十五个旅，驻守陕甘宁解放区的南线，负责由宜川、洛川、宜君一线向北主攻，兵力十四万；晋陕绥边区总部主任邓宝珊部的两个旅，驻守陕甘宁解放区的北线，负责自榆林向南助攻，兵力一万二千人；西北行辕马鸿逵、马步芳部十个旅，驻守陕甘宁解放区的西线，负责由宁夏的银川、甘肃的镇原向东进攻，兵力五万四千人。而陕甘宁解放区的东边就是黄河，隔河是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地盘。

胡宗南认为，从战场地形和态势上看，共产党的老巢延安已被紧紧地围困于弹丸之地；而从兵力和武器装备上看，陕甘宁解放区内的共产党军队绝不是他的对手。只要时机成熟，一次大规模的攻击之后，不但延安势在必得，如果毛泽东等中共首脑人物来不及向北逃到外蒙，向东又过不了黄河的话，他就很可能把毛泽东等人一一俘获——作为戎马一生的党国军人，难道还有比这更显赫的战功吗？在荣耀的极点迎娶美人，难道还有比自己更成功的男人吗？

早在几个月前，胡宗南已奉蒋介石之命，对延安进行了一次大规模偷袭。胡宗南采取的是三面压缩和重点进攻的战术：从晋南和陕南抽调六个旅，会同封锁陕甘宁解放区的四个旅加一个装甲团，自南向北担任主攻；同时，马鸿逵的五个旅由宁夏向东助攻，阎锡山部晋西南地区总指挥杨澄源在东面和北面策应。

延安方面发现胡宗南的偷袭意图后，鉴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兵力太少，急调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陈赓部和晋绥军区第一纵队张宗逊部开赴延安。

位于太岳地区的第四纵队取直线昼夜兼程，从胡宗南与阎锡山两军的接合部直插黄河岸边，准备迅速渡河进入延安地区布防。这支本属于刘邓大军的部队一进山西就发生了意外：先头部队为给主力开路攻占了汾西县城，但当主力部队将要到达的时候，纵队训练科长葛来文率侦察排前往县城联络，不料却突然遭遇国民党军的伏击，葛来文阵亡——原来，先头部队把县城交给了当地的吕梁军区部队，而吕梁部队在阎锡山部的反击下又把县城丢了，这个消息没能及时通报给正奔袭而来的陈赓的纵队。在黄河东岸，陈赓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称张宗逊的两个旅已到达延安，延安的防御力量已得到加强。目前陈赓部位于胡宗南的侧后，胡宗南担心受到侧击，已将其整编第一师从陕北调回黄河东岸。这样看来，对延安更有效的防御，是在胡宗南的侧后展开一系列战斗，迫使其回援，从而瓦解国民党军对延安的攻击。同时，毛泽东还赋予了陈赓部开辟吕梁地区的任务："必须说服全体指战员，不要讨厌吕梁区居民落后，物质困难，应使人人明白发展吕梁区是保卫延安巩固太岳的重要条件。目前是蒋军与我军争夺吕梁时期，望全体努力取得胜利。"

为此，陈赓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和王震的晋绥军区第二纵队合成了一个战斗集体。陈赓对自己司令部的人强调："王震同志对党

忠诚，斗志顽强，在我们党内是出了名的。大家一定要尊重他。他直爽坦白，爱批评人，在党内也是出了名的。在今后的工作中，如果发现你们的错误而批评你们，甚至骂两句，你们一定要好好接受，不许不高兴……三五九旅是我们党的一支英雄部队，中原突围贡献很大，消耗也很大。才到吕梁山不久，没有什么补充，等于是个干部旅，都是老资格，有的战士比我们的连长资格还老。今后配合作战，不能叫他们打伤亡大的仗，因为他们伤亡一个战士就等于我们伤亡一个干部，你们可不准讲怪话。”王震来了，说话异常直率，他告诫陈赓部的官兵要准备在吕梁山里吃苦受罪：“我们吕梁地区物质条件很差，有些地方刚开辟不久。我们尽量动员一切力量保证部队作战，但也要说清楚，就是党政军民都动员起来，由于物质基础差，部队又多，很难让大家满意。我相信你们会把开辟吕梁作为我们共同的任务，决不会想在吕梁得到什么。你们先打了几个仗，装备改善了，但我们这里还是很穷、很苦。你们应当为吕梁山留下点什么。”陈赓说：“今后我们缴获的武器弹药，要尽可能的留给吕梁部队。”

两支部队联合指挥后，首先被攻克的是大宁县城，接着完成了对隰县的包围。

隰县是晋西南的战略要地，是阎锡山在抗战时期建起的一个工事坚固的军事重镇，国民党军第二战区晋西南总指挥杨澄源的指挥所设在这里，攻克隰县必然会给胡宗南和阎锡山都带来震动，将对国民党军偷袭延安的行动具有极大的破坏和牵制作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陈赓部对隰县发起攻击，战斗进行得干净利索。在迅速拿下县城东南的一个高地之后，部队兵分三路从三面攻城，七十团三营突击队首先搭梯爬上城墙，营长张鉴和教导员徐肇基带领全营突进城内展开巷战，并直插守军筑有三重围墙的指挥所。八连连长解全威连续投出用罐头盒制造的土燃烧弹，然后带领官兵在黑色的硝烟中发起冲击，班长焦子玉一头冲进指挥所，枪口直接顶在了上将总指挥杨澄源

的胸口上。杨澄源的手里还拿着阎锡山刚刚发来的电报，电报上写着：“援军无望，固守城垣。”杨澄源的副官连连说“不要开枪！我们投降！”

接着，王震部攻击中阳县城的战斗开始了。县城已被围困了十几天，但始终没能拿下，因为这座县城建在山上，当年日军在这里修建了大量的碉堡，最为坚固的是一座石筑的联体碉堡，碉堡由厚达两米的石拱石墙筑成，直达城内。刚刚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国民党军暂编四十五师一团团长张居乾严厉督战，王震部由于弹药不足和火力不够攻击始终不顺。陈赓部派出十三旅七十二团增援，王震命令这个团专门攻击那座联体碉堡。入夜，七十二团悄悄潜入前沿，黎明时分，在炮火的支援下，官兵们突然从阵地上跃起，对联体碉堡发动了猛烈的进攻。纷飞的弹雨中，七十二团团长、政委和参谋长先后倒下，但身负重伤的他们一步不退，坐在阵地上继续指挥作战。王震部的爆破队更是表现勇猛，官兵们对坚固的碉堡进行了前仆后继的反复爆破，先后使用的炸药达到两千多公斤。十二月十二日凌晨，两军合力攻克了中阳县城，拿下了守军指挥部，少将团长张居乾被俘。二纵官兵在这个指挥所里缴获了一封张居乾发给阎锡山的电报底稿，上面有这样的文字：“共军使用了原子性炸药，装置于数米之外，即可将碉堡完全炸毁。”——可以肯定，这个团长已经被持续不断的、撼天动地的爆炸震得精神恍惚了，不然他何以认为共产党军队使用的是“原子性炸药”？

战后，王震对身负重伤的七十二团团长和政委说：“果然是能打硬仗的好部队！”

为了更多地牵制、歼灭偷袭陕甘宁解放区的国民党军，十二月二十二日，陈赓和王震部又向位于晋西南的蒲县发动了进攻。

蒲县周围多是阎锡山部驻防时修建的断绝地，部队机动十分困难，且这里的国民党军布防密集难以分割。陈赓和王震决定主动放弃

隰县，将敌人诱至隰县附近，断其后方补给线，再给其严重杀伤。同时，“主力转攻蒲县，吸引敌人回援”，然后在运动中大量杀敌。蒲县的战斗打得异常艰难，久攻不下。三十日拂晓，陈赓部十旅副旅长楚大明率领一个连发起持续不断的冲锋，终于占领了可以俯瞰蒲县全城的一个高地，十旅官兵利用过去阎锡山部留在高地上的工事，居高临下，以猛烈的火力扫射城内的国民党守军。

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蒲县被攻克。

至此，吕梁战役结束。

吕梁战役不但成功地迟滞了胡宗南偷袭延安的行动，还使太岳、吕梁和陕甘宁三个解放区基本上连接起来。战役之所以选在了胡宗南的第一战区与阎锡山的第二战区的接合部，是共产党人看准了国民党军不同派系之间从来相互不配合的弱点。山西原本是阎锡山的地盘，但上党战役之后，蒋介石以阎锡山的部队无力防守为名，让他的嫡系胡宗南接管了山西南部。阎锡山明明知道这是蒋介石蚕食他的手段，但因作战失败而无力抗拒。因此，只要是胡宗南的部队与共产党军队作战，他一律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按照国民党军的战区划分，以山西南部中间地带的灵石为界，灵石以南是胡宗南的战区，灵石以北是阎锡山的战区。当蒋介石命令胡宗南接手晋南防务时，胡宗南不愿自己的兵力过于分散，并没有积极出兵灵石以南地区；而阎锡山竟然在胡宗南还没有接防的情况下，径自将自己部队北撤达五十公里，致使两个战区之间出现了一条宽大的防务空隙。战后，国民党军才醒悟到，陈赓部正是利用这个空隙打了进来：“越同蒲路、西渡汾河，窜犯晋西”，“连陷永和、大宁……隰县、蒲县、中阳等地”，“使延安与晋西、晋东连成一气，构成平遥、太原间之威胁，劳师费时，良为失策”。

由于侧后受到严重威胁，胡宗南不得不从陕北抽兵稳定晋南局势，整编第一师、整编九十师、整编三十师六十七旅、整编二十七师四十七旅被相继调至山西西南部的临汾、吉县一线。

胡宗南的部队收缩在几个重要的军事据点中，而陈赓、王震部因云集在贫瘠的吕梁地区给养很快出现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势必会对补给能力弱的我军造成被动局面。为此，陈赓向中央军委建议，部队转兵北上，攻击阎锡山部守备相对薄弱的汾阳和孝义地区，开辟粮源和兵源，然后再待机南下与胡宗南周旋作战。这一建议得到中央军委的同意。

从战斗力对比上看，阎锡山部较之胡宗南部相对较弱。

但是，接下来攻击汾阳和孝义的战斗结果却出乎了陈赓的预料。

汾阳、孝义位居山西中部，土地肥沃，村落稠密，地势平坦，田畴开阔，两座县城均建有完备的防御工事，易守不易攻；且这一地带一直是供给阎锡山大军的“粮仓”，加之直线向北便可迅速抵达山西首府太原，因此，阎锡山势必要全力抗击。

陈赓和王震的部署是：王震纵队的独立二旅和独立四旅攻击孝义；陈赓纵队的十、十一旅攻击汾阳，十三、独立二十四旅进至两城之间准备打援；王震纵队的三五九旅为总预备队。

阎锡山很快就判明了陈赓、王震部的企图，立即命令：“第六集团军集结于文水以南地区，第七集团军集结于平遥地区，第八集团军集结于介休地区，形成三路钳形攻势，并配合原汾阳、孝义的我军，将共军拘限于汾阳、孝义中间地区而歼灭之。”

陈赓本来拟定迅速攻占汾阳，但是部队到达时才发现，汾阳外围守军已经收缩入城，而汾阳城城墙坚固，城壕宽阔，部队在准备登城

工具时因木料奇缺难以实施攻击。鉴于这种情况，陈赓和王震临时决定：围困汾阳，攻击孝义，准备打援。

驻守汾阳的国民党军将领叫刘效增。陈赓和王震联名给他写信，劝他弃暗投明。刘效增予以拒绝，还把送信人的耳朵割下来一块示众。这一举动令陈赓怒火万丈，发誓一定要严惩刘效增——两年以后，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云集长江北岸准备发起渡江战役的时候，陈赓得到了刘效增率部起义的消息，心绪复杂的陈赓说："他现在起义了，好呀！我们不念旧恶，他割我们人耳朵的事，我们不追究了。让他自己进行自我批评吧。"

刘效增固守汾阳，但孝义却打了下来。

孝义城墙高达十米，护城河就有两道，碉堡群构成了一个立体火力网，王震部的攻击部队把山炮推到距城墙仅七十米的地方开始猛烈轰击，冲击部队的大小梯子、爆破杆、扫雷杆、炸药包也准备得十分充足。总攻开始后，爆破组和突击队配合密切，半小时就突破了城垣，经过一夜巷战，孝义城内两千守敌被全歼。

孝义失守让阎锡山很是吃惊，因为一旦晋中门户敞开，太原就直接暴露在共产党军队面前了。阎锡山本想向蒋介石求援，但鉴于上党战役失利后胡宗南趁机进占晋南的教训，阎锡山决心自己亲到平遥地区指挥九个师共二十五个团，分三路发动反击作战以夺回孝义，以免蒋介石这一次再派嫡系部队来"保卫太原"。

如此众多的兵力聚集在如此狭窄的地域里，难以各个击破的局面令陈赓和王震不容乐观。一月二十日，阎锡山的大军已推进至孝义十五公里，中路赵承绶的第七集团军暂编四十六师抢先冒进，被陈赓部的十一旅三十三团打了个反击。此时，守在汾阳城里的刘效增不断提醒阎锡山的参谋长郭宗汾："不要向孝义冒进，陈赓十分诡诈，不要上

他的当。”一直在窃听刘效增通话的陈赓很是着急，一旦阎锡山听从了他的劝告，那么只有放弃作战这一条路了。庆幸的是，郭宗汾很不以为然：“你不必顾虑，我们这么多部队，陈赓有什么办法，最多采取打了就跑的战术，跑到南山上去。”汾阳城里的刘效增还是不放心，再次打电话给阎锡山：“陈赓是个成了精的人，他蹲在南山上察看我们的活动，我估计他今天晚上就要行动了，请总座无论如何提醒各部队加强戒备。”此时，中路赵承绶的第七集团军由于挨了打，放慢了推进的速度，南路第八集团军司令孙楚部的八个团位于前出位置。二十一日下午，陈赓和王震部的十旅、十一旅、独立四旅、三五九旅一起发起了大规模反击。刚刚向阎锡山报告过“黄昏前占领孝义没有问题”的孙楚部即刻溃乱，孙楚在电话里声音越来越惊慌：“……突然发动反击……已经到了村前……我要转移了！”

在追击溃退的国民党军的时候，十旅副旅长楚大明率领二十九团官兵依旧冲在最前面，他直接冲进孙楚的指挥所，抓住了孙楚的副官杨纶元。杨副官向东一指说：“司令刚刚跑过这条小河。”楚大明大喊：“追！活捉孙楚去！”官兵立即奔向文峪河。北风呼啸，大雪漫天。楚大明带着一个连的官兵跑得满身热汗。文峪河上有一座小桥，敌人在桥头修了个碉堡。楚大明距离那座桥仅有百米了，如果他开枪孙楚定会栽倒在雪地里，但官兵们执意要追上他将其活捉。桥头碉堡里的敌人为掩护孙楚开始阻击，官兵们就从岸边跳到小河的冰面上企图过河追上孙楚，不料冰面并不像他们想的那么结实，跑到河中间冰面突然裂开，几个官兵掉到冰窟窿里，待将他们救上岸，迷蒙的风雪中孙楚早已没了踪影。

二十六日，赵承绶第七集团军七十一师和暂编四十六师被围在了中街村。

但是，陈赓和王震部对中街村的攻击却并不顺利。

由于怕各部队指挥员的钟表不准确，指挥部以通信科在屋顶上点燃火把为总攻信号。火把燃烧起来，自己的部队看见了，敌人也同时看见了，并由此确定出共产党军队指挥部的位置。于是，战斗还没有正式开始，陈赓的指挥部就受到了炮火轰击和飞机扫射。中街村背靠汾河，其他三面都是开阔地，攻击持续整整两天，在守军强大的火力面前未能奏效。十一旅三十二团九连由于攻击路线没选择好，官兵陷于守敌暗堡的交叉火网之中，导致这个连队的官兵全部牺牲。二十八日，十旅副旅长楚大明来到阵地前沿指挥战斗，当攻击在敌人强大的火力面前依旧受阻时，楚大明抓住一个冲击的时机，从掩体中一跃而起，他大声喊道：“跟着我，冲啊！”喊声未落，一排子弹倾泻在他身上，楚大明一头栽倒在阵地前沿。这是他自参加革命后，第二十九次也是最后一次在战场上中弹。

楚大明，一九一七年出生于河南省商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一九二九年当革命风暴席卷大别山的时候，这个小牛倌当上了县苏维埃常委和赤卫营营长。赤卫营被编入红军序列后，他从通信员逐渐成长为一名英勇善战的指挥员。他是著名的战斗英雄，在所有的战斗中每一次都冲锋在前。楚大名阵亡的消息传到指挥部，陈赓悲痛难忍。他交代：“把他的遗体保护好，随部队回我们太岳区安葬，要开隆重的追悼会。”

中街村四周工事坚固，村里有敌人的两个整师。天寒地冻，在开阔地上挖掘战壕向守军靠近十分困难，且阎锡山的各路援军正在接近，再战下去部队会遭遇更大的伤亡。

陈赓最终决定放弃攻击。

中街村中的国民党守军在增援部队的接应下，全部撤离了战场。

陈赓带领旅、团干部进入中街村，走到村北时，看见了十一旅二十三团九连的冲击地，在这条冲击地的两侧遍布着敌人的侧射地堡，其中还有三个重机枪地堡。陈赓说："严防敌人的侧射火力，是指挥进攻战斗的常识，可是我们的指挥员却没有注意到。这是置九连于死地的关键。"接下来，陈赓看见了他的九连官兵，全连的牺牲者依旧呈战斗队形，所有倒在雪地上的身体头部都冲着冲击的前方，陈赓哽咽了："这样好的连队，这样勇敢的战士……"

陈赓向军委写了战斗总结报告，主动承担了战斗失利的责任。

一九四七年二月，陈赓的第四纵队奉命返回晋冀鲁豫野战军。

王震很想弄点猪肉慰劳一下第四纵队。他对陈赓说："你们不必走得那么急，两个节（新年和春节）都在打仗，没有过，再住几天，补过一个年吧！吕梁虽苦，给每人弄上斤把肉吃吃，还是能做到的。"陈赓谢绝了："每人一斤，就是上万斤肉，这可不是个小数字。吕梁是个新解放区，底子薄，我们还是回太岳区过年吧。"陈赓命令把缴获的重武器全部给王震留下，为此他还亲自检查了移交武器的情况，要求留下的武器必须是完好的，如果机枪缺少零件或者坏了，就用自己部队的好机枪换下来。

在晋南遭受挫折之后，胡宗南把攻击重点转向了陕西境内的关中地区，为从陕中直接攻击延安做扫清侧翼的准备。

二月九日，胡宗南来到位于三原的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部，召集旅长以上将领参加作战会议。除了整编四十七旅旅长李奇亨和整编一六五旅旅长李日基因事未赶到之外，参加作战会议的有：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裴昌会、副参谋长薛敏泉、参谋处长汪承钊，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参谋长文宇一，整编三十六师师长钟松、整编七十六师师

长廖昂、整编十二旅旅长陈子干、整编二十四旅旅长张新、整编四十八旅旅长何奇、整编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等。

胡宗南首先讲话，大意是：我们要消灭共党，必须首先消灭他的武装力量。要达到这一目的，最重要的是拿下延安，消灭陕甘宁边区的主力，摧毁共党的首脑机构。我相信，我们可以在两个月内解决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问题，六个月内解决全国的作战问题。现在，我们必须首先夺取囊形地带，这关系着我军向延安进军是否能够顺利进展的问题，希望大家努力达成任务。

所谓“囊形地带”，是国民党军作战部门对陕甘宁边区关中地区的称谓。这一地区位于胡宗南攻击延安的出发地洛川、宜川的侧后，是陕甘宁边区自北向南插入胡宗南战区的一个突出地带。这一地带的存在，给胡宗南带来了很大的烦恼，因为它对关中和陇东两大地区内的各个城镇以及陇海路西段和陕甘公路都能构成威胁，而共产党人正是利用这一突出地带秘密进出物资，使国民党军对延安的经济封锁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缺口。同时，这一地带的存在，无形中使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线延长了近三百里，牵制着胡宗南的大量兵力。

为了达成对囊形地带的有效进攻，胡宗南拟订了一个作战方案。不料，这一方案遭到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部的强烈反对。军参谋长文宇一认为，胡宗南制定的从东、南、西三面发起进攻的方案，有把囊形地带里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赶走了事的意思，不符合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的作战原则。他主张先把突出的囊形地带的“袋口”封闭，然后主力部队再从三面迅速进击，一举把这一地带里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全部歼灭。整编第二十九军的方案得到了大多数将领的支持，然而胡宗南断然地说：“按绥署意见执行，一切责任由我负。军预备队置于三原附近，决定十四日拂晓开始攻击。所有参战的部队，统归刘军长指挥。”

将领们各自回部队准备去了。大家都清楚胡宗南的真实意图：既要占领延安，把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赶过黄河，平定陕甘宁的战事，又不能使自己的部队损失过大。那么，就只有自南向北大军平推，只要占领了延安和整个陕甘宁，就是胡宗南的最大战功。至于是否消灭了共产党人的有生力量，是否把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全部赶到阎锡山或者傅作义的地盘里以至对全国的战局产生什么不利影响，这一切和他胡宗南有什么关系?

十四日，整编第二十九军各部队自东、南、西三个方向开始集结。

三天之后，胡宗南的五万大军对囊形地带的全面进攻正式开始。

无论战场态势，还是兵力对比，囊形地带内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都无力进行有效的战斗。这一地带过于狭窄的地形难以用兵迂回，在三面受敌的情况下，如果迎战胜算的可能很小。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在胡宗南发动进攻的第二天，除了留下少量的地方武装骚扰敌军之外，关中地区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掩护党政机关主动撤离了。

几乎没有经过什么战斗，胡宗南就占领了囊形地带，这令他感到他迫切希望建立的那个“殊勋”已经可望可及了。

囊形地带的丢失，使延安面临的军事压力进一步加深。

至此时，华中解放区首府淮阴、华北解放区首府张家口、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已先后丢失。如果延安失守，共产党人除了林彪部所在的哈尔滨外，全国范围内其他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已全部丢失。

局势确实令人不安。

此刻，在延安的东北方向，晋察冀野战军也在进行反击作战。这是一连串异常艰苦的军事行动，被动作战往往伤亡大而歼敌少，国民党军始终保持着对北平、保定和天津这一三角地带的控制。

张家口失守后，晋察冀野战军已经退守山区。国民党军打通了平绥铁路，并计划采取钳形攻势一鼓作气合击易县、涞源一线，以分割晋察冀解放区的腹地，进而寻歼晋察冀野战军主力。国民党军以第九十四、第五十三军两路并进。晋察冀野战军决定集中第一、第二、第四纵队主力歼其一路，而第三纵队八旅二十三团一营担任将两路敌军分割开来的穿插任务。

一营营长朱彪是条血性汉子。打绥远时，国民党军守在集宁外围的一个山头上，部队仰攻不利，朱彪把通信班的几匹马集中起来，自己跨上一匹马带领战士往山头上冲，他的视死如归的气势把国民党兵吓坏了，扔下阵地跑了。事后，他受到纵队司令员杨成武的严厉批评。杨成武说，叫你当营长是指挥全营作战的，不是让你单枪匹马打冲锋的。打大同时，他率领一营杀进国民党军的一个据点，据点外围的部队听见枪声响了一会儿就停止了，因为担心一营遭遇不测，所有的部队合力冲击，冲进据点才发现一营与守军拼上了刺刀，据点里的三百多名守军已全部倒在一营的刺刀下。

但是，这一次，朱彪和他的一营遇到了残酷的战斗。当他们深深插入敌军攻击阵形的腹地时，总共二百四十人的队伍被国民党军两个团三千多人包围在了一个叫刘家沟的小村庄里。战斗进行得昏天黑地，朱彪派出通信员向团部求援，可派出一个牺牲一个，最后派出的一名年龄最小的通信员还没跑出去一百米就被密集的子弹射倒了。部队退守到村庄东北角和西北角的两个院落里时，朱彪要求官兵们再坚守一天，为主力部队歼敌创造条件。国民党军以十个连的兵力不断地发动冲击，密集的炮火把一营藏身的那两个院落几乎翻了个，所有的

围墙和房屋全部被炸塌，大火熊熊，浓烟滚滚，一营各连的伤亡不断增加。这时候，二连指导员站出来请求让他冲出去向上级求援，朱彪答应了，然后他眼看着这个指导员仅跑出去两百米就倒下再也不动了。国民党军在最后时刻出动了坦克和飞机。一营还活着的战士开始撕平时节省下来的钱，教导员曹良已经把所有的文件和自己的日记烧了。朱彪将一挺机枪压满子弹，再把剩余的枪支集中在一起，在上面堆了些柴草，重伤员被抬倒柴草堆上，轻伤员也纷纷爬了上去，他们准备在敌人冲到跟前时点燃柴草，与身下的枪支一起化成灰烬。敌人的炮火已经完全集中在他们坚守的这个点上，一千多发炮弹暴雨般落下，教导员曹良的眼睛被炸坏，朱彪的大腿和胳膊都被弹片打穿，浑身是血。接近黄昏的时候，一营仅剩的几十名官兵与敌人在院落内外进行着反复的拉锯战。天渐渐地黑了，朱彪发现攻击的敌人有点慌张，原来团长张英辉亲自带领部队冲进来了。

不久，当地百姓在易县西北角的南山上建起一座石碑，碑上刻着“钢铁第一营”血战刘家沟的经过以及在这场战斗中阵亡的所有官兵的名字。

尽管朱彪的一营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由于各参战部队没能很好地协同，晋察冀野战军的歼敌目的没有达到。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说：“那时候，我们的一些作战行动，往往为敌人的行动所吸引，费力气不小，歼敌却不多，有些仗打得不痛快，根本问题在于没有掌握主动权。”

胡宗南占领囊形地带之后，立即命令整编七十六师、整编十七师四十八旅以及骑兵第一旅等部队，攻击陕甘宁解放区位于陇东的庆阳、合水地区，企图吸引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主力西援，以利于在延安地区正面防御兵力单薄之时突袭延安。

三月一日，整编七十六师二十四旅占领庆阳。

二日，整编十七师四十八旅占领合水。

陕甘宁部队主力开始向西移动。

胡宗南立即命令四十八旅向南回撤，以加强从正面突袭延安的兵力。

整编十七师四十八旅旅长何奇，绰号“何大炮”。这个黄埔八期的毕业生曾在日本学习过炮兵指挥，回国后又在国民党军陆军大学进修过，满腹的作战理论，他自认为是国民党军中罕见的“孙吴之才”。当奉胡宗南之命率部向宁县回撤时，部下提醒他，占领合水的时候，合水已是一座空城，部队搜遍全城只发现了一个老汉和一只山羊，看样子共军不像是败退，所以我军行事需特别小心。但是，何奇不以为然，坚持命令部队走捷径，他说这条路上即使有共产党军队，也根本不敢拦截他的部队。

何奇不知道，他选择的这条捷径，是结束他生命的一条捷径。

三日，何奇命令焚毁合水县城的物资和粮库之后，率部出发。下午十五时，先头部队进入西华池镇。西华池镇是陕、甘两省物资进出的集散地，商业发达，市场繁荣，镇子里有居民千户以上。何奇进入镇子的时候，立即觉得自己选择的这条行军路线十分正确，因为镇上的居民不但没有躲避大军的意思，而且茶楼酒馆座无虚席，熙攘的人们神情自若，与惯常大军一到百姓逃散的景象完全相反。但是，何奇的部下还是感到了异样，军官们再次提醒说，情况好像不对劲，最好尽快通过。可何奇却进了一家饭馆准备摆宴吃饭，还命令部队今晚就在镇上宿营。宴席上酒喝到一半的时候，有侦察员来报告说，距此地大约二十里的山沟里，发现大批共军正在集结。何奇再一次很不以为然，说这个地区的共军只有三五八旅和少量地方部队，哪里来的大批共军？实际上，就在何奇喝酒的时候，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第一纵队已

经对西华池发动了进攻，只不过由于地形不熟和敌情不明，在何奇部署在西华池镇外围部队的阻击下攻击受阻。

第二天，双方形成对峙，何奇命令部队立即抢修工事。

晚上，巨大的爆炸声接连响起，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的攻击开始了。

这是个混战的夜晚。攻击何奇部的陕甘宁野战集团军，除第一纵队的两个旅之外，还加强了新编第四旅的一个团，但何奇部的阻击异常猛烈，共产党官兵虽然数次冲进镇子，并一度占领了部分街道，但始终无法扭转整个战局。整整一个晚上，何奇不断地接到防御阵地出现危机的报告，致使他连发数电向胡宗南告急。当镇子的东北角陷入白刃战时，辎重营的防御阵地被撕开一个缺口，何奇命令镇子外围的一四二团进镇增援。一四二团也正处在被攻击中，一营刚向镇子的方向运动，三营的阵地就受到了突袭。天亮的时候，一四二团靠近了西华池镇，但竟猛然发现自己暴露在一片没有任何遮挡的旷野中，埋伏在两侧的交叉火力、马克沁重机枪特有的尖锐的射击声令人毛骨悚然。胡宗南派来的飞机投下了大批弹药和干粮，但双方已经混战在一起，于是双方都抢到了一些。何奇得到一四二团的加强之后组织起反击，冲进镇里的共产党官兵开始后撤。但是，令国民党军意外的是，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紧接着又发动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攻击。一四二团团长陈定行认为他们最后的时刻到了：

> 夜幕降临之后，共军发起全线总攻，炮声隆隆，硝烟滚滚，杀声震天，顿时血肉横飞，陈尸遍野。许多阵地得而复失，告急之声，纷至沓来。第一四三团正面阵地亦被突破，团长杨荫寰急电求援。而我的一四二团已千疮百孔，自身难保，虽拼凑了一个连驰援，但杯水车薪，已无济于事了。此时整个形势令人沮丧，而共军愈迫愈近，“缴枪不杀”的喊话声清晰可闻。正在此时，有人主张突围，为了轻装逃命，立即火化文件，捣毁装具，顿时风声鹤唳，乱作一团，睹此情景，大有全部被俘之势。

何奇的指挥所向外延伸的电话线被剪断，何奇只有爬上旅部的房顶观察战况。天黑，风大，除了枪炮的闪光之外他什么也观察不到。突然，一颗机枪子弹穿透了他的大腿。何奇被抬进指挥所之后，数发炮弹又击中了旅部的房屋，连续负伤的他很快没有了气息。

即使如此，西华池镇依旧没有被彻底攻占，旅长阵亡后的四十八旅依旧在顽强抵抗。五日天亮的时候，增援的整编七十六师二十四旅已经接近，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围攻西华池的战斗被迫停止，各部队先后撤离战场。

西华池一战，是在敌情不明、地形不熟的情况下仓促发动的。虽然在局部战场我军兵力四倍于敌，但事先连四十八旅的驻扎位置都没有弄清楚，导致大部分兵力分散于攻坚战斗之外，没有形成有力的歼敌拳头。同时，四十八旅此前从未与共产党军队交战过，士兵战斗力强也是导致战斗失利的重要原因。

就在延安周围不断发生战事的时候，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一个惊人的论断：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将要到来。

此刻，中国共产党人正处在最困难的时期。毛泽东的论断不仅为党内一般干部难以理解，即使在党的高层领导中也存有相当的疑虑。毛泽东的论断被传达下去之后，有干部给延安打电报，直接问“高潮”到底是什么意思?

毛泽东所说的“高潮”指的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

毛泽东解释道：“总的形势是：革命高潮快要到来。这种高潮在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第一次是辛亥革命，第二次北伐战争，第三次是抗日战争，这三次都是全国规模的……现在全国规模的

第四次革命高潮，可能很快到来。第一次革命高潮无产阶级没有参加领导……第二次、第三次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领导的。这一次高潮是由共产党单独领导的。”

毛泽东的依据是：一、内战爆发以来，大举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已被歼五十六个旅，平均每个月被歼六个旅。如果再继续下去，中国的战场形势就会发生重大变化。二、蒋管区人民运动正蓬勃发展，全国各大城市的反对内战和团结自救运动的规模超出以往任何时期，反蒋的统一战线不但已经形成而且正在不断扩大。

就在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勾勒革命“高潮”的前景时，二月七日，蒋介石在南京的“国府纪念周”上发表了一个讲话，对军事形势的判断也是非常乐观：

> 至于军事，我党确有把握击灭共产党，以实现中华一统。我从历史上观察，历代的叛贼，妄图拖垮政府，不外有两个途径。其一，割据一方，负隅自固。其二，四处流窜，极力扩大其影响，试图引起各地骚乱。但流寇不能成功，负隅则确是可怕。如今共产党无法负隅，我军要打到哪里，就能够打到哪里，所以共产党绝不能成功。

至少在一九四七年二月里，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在延安开会的时候，也许谁都没有意料到，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个被称为“红色首都”的小城里召开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了——不久之后，毛泽东就撤离了延安。直至一九七六年离世，他再也没有返回他住了十年之久的那间充满烟草味道的窑洞。

# 第四章 战场的腰部

## 胡宗南：为人民服务处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日，国民党军飞机分别从西安、太原和郑州机场起飞，对延安及其附近地区实施了猛烈轰炸。

国民党军出动的作战飞机数量惊人，其规模甚至超过了对日作战时期。包括从南京调来的八架B-24重型轰炸机、二十四架P-51战斗机，加上之前已部署在西北战场的C-46、C-47运输机，P-40、P-47战斗机以及B-25轰炸机，仅西安机场就聚集了各种作战飞机近百架。国民党空军军官们认为，从作战的角度上看，延安地区面积不大，且共产党军队没有防空能力，集中如此大的空军军力绝对是小题大做。

一颗炸弹落在了毛泽东的窑洞前面，爆炸掀起的气浪冲进窑洞，冲倒了桌子上的热水瓶，正在伏案批阅文件的毛泽东一动未动。

之前，国民党政府已发出通告，限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办事处的谈判代表和工作人员于三月五日前全部撤离。对此，中国共产党的表态是："蒋方这一荒谬措施，无论是出于蒋介石本人的命令或是其他地方当局的胡作非为，都是表示蒋方已经决心最后破裂，放手大打下去，关死一切谈判之门……妄图内战到底，实现其武力消灭中共及全国民主势力的阴谋。"

蒋介石将胡宗南召至南京，详细商定了直捣延安的作战计划。

胡宗南意识到他建立"殊勋"的时刻到了。

自内战全面爆发以来，国民党军在各地战果不大，部队却损失不小，而共产党人的军事力量并没有明显削弱。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决定放弃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在东北和晋察冀转取守势，加强对陕北和山东的进攻——“我们在全国各剿匪区域中，应先划定匪军主力所在的区域为主战场，集中我们部队的力量，首先加以清剿，然后再及其余战场……凡是匪军的老巢……及其发号施令的首脑部的所在地，必须犁庭扫穴，切实攻占……在主战场决战时期，其他支战场唯忍痛一时，缩小防区，集中兵力，以期固守。”——至少在一九四七年初，蒋介石心目中的“主战场”已经走火入魔地集中在了延安这一个点上。

“摧毁匪方党、政、军神经中枢，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意志，削弱其国际地位”。胡宗南最终制定的作战计划是：右兵团由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指挥，率整编第一师三个旅、整编二十七师两个旅，整编九十师两个旅，由宜川北面的平陆堡至龙泉镇之间进入攻击位置，占领临真、金盆湾等地，然后沿着金延大道两侧向延安的东北方向攻击前进；左兵团由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指挥，率整编三十六师两个旅，整编十五师一个旅，整编十七师一个旅，由洛川北面的段仙子至旧县之间进入攻击位置，占领鄜县（富县）、茶坊、甘泉等地，然后沿着洛河东岸和咸榆公路向延安西南地区攻击前进。总预备队为整编第十师主力、整编七十六师的两个旅、整编十七师的两个旅等部队，集结在洛川、咸阳、平凉等地待命。另外，由整编七十六师的一个旅和陕西保安部队、甘肃保安部队组成陇东兵团，在攻击行动开始后，以营为单位伪装主力向保安、安塞、延安方向佯攻袭扰。整编十七师的两个旅负责保护后方交通线和前方的粮食与弹药补给。前进指挥所位于洛川，由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裴昌会中将任指挥所主任。

三月六日，胡宗南秘密登上了前往洛川的专列。

与他同行的，还有他的机要秘书熊向晖。

踌躇满志的胡宗南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十分信任的这位年轻的军官，竟然是一名中共秘密党员。熊向晖的这一身份直到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五日才暴露出来。那一天，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中的宴会上指着熊向晖向出席宴会的原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张治中说："认识吧？"张治中说："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周恩来说："他不是起义，是归队。"张治中正茫然惊愕时，周恩来解释说："他是一九三六年入党的共产党员，是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当年，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先看到了。"

就在熊向晖跟随胡宗南前往洛川之前不久，他刚刚经历了一次风险。负责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周恩来，在一次乘坐马歇尔的专机去南京时，把自己的笔记本丢在了专机上。笔记本中记有熊向晖的地址，在地址的旁边注有一个"熊"字。马歇尔的副官很快就以传递绝密文件的方式把笔记本送了回来，但是周恩来无法判断其内容是否被照相并送给蒋介石过目。周恩来立即设想了几个应急措施以保证熊向晖的安全，包括把他秘密转移到解放区去，或是让他申请结婚并出国留学。但是，观察了数天之后，熊向晖并没有发现胡宗南对他有任何怀疑的迹象。胡宗南还特意把熊向晖召去，对他说："你的婚期推迟三个月。要打延安了。打完这一仗，你再走……你写信告诉新娘子，就说我有急事要你处理，对她不要提打延安。"然后，胡宗南给了他一个公文包，让他根据里面的文件准备一份作战草图，同时草拟一份占领延安后的"施政纲领"——公文包里放着经过蒋介石核准的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和一份陕北共军兵力配置表。此时，熊向晖才确定，他的身份并没有因为周恩来的一次严重疏忽而暴露。按照中国人的判断，马歇尔肯定会翻看周恩来的笔记本，但是此事呈现的结果却仿佛是马歇尔并没有看过其中的任何一个字——美国人的心理不好猜测。

熊向晖，这位后来成为新中国著名外交官的共产党人，一九四七年当胡宗南全面进攻延安时，他给延安方面不断提供的绝密情报，由于事件的极其特殊，无疑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潜在的巨大影响，尽管后来绝少有人提及那段往事。

毛泽东曾说，熊向晖顶几个师。

胡宗南要求“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同时进行”。他责成熊向晖起草“施政纲领”时“要比共产党还革命”，以“彻底实行三民主义”为主旨，要点包括：“实行政治民主，穷人当家做主”；“豁免田赋三年，实行耕者有其田”；“普及教育，村办小学，乡办中学，县办大学”；“不吃民粮、不住民房、不拉民夫、不征民车”以及“拥护国民党”和“拥护蒋主席”等等。关于文件的名称，胡宗南说：“不要用‘收复’、‘光复’，那不是革命的字眼儿。要用‘解放’，这才是革命的字眼儿。”于是，纲领全名为“国军解放延安及陕北地区后施政纲领”。同时，根据胡宗南的要求，熊向晖还准备了一台可以随时收听延安广播的收音机，并带上了《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和《精忠说岳传》等长篇小说——胡宗南说，仗打起来，就是军长师长旅长们的事了，他只需要等着看捷报。于战火中阅读小说方能显出大将风度。

胡宗南在铜川下了专列，换乘吉普车继续前行，于三月九日到达洛川前进指挥所。第二天，胡宗南在洛川召开旅以上将领作战会议，会议最后确定的攻击时间是十四日拂晓。

“毛主席很想守住延安，粉碎蒋介石进犯延安的计划。”胡乔木后来回忆说。虽然毛泽东已做好放弃延安的最坏打算，但他仍对保住延安的前景持乐观态度。当有外国记者问他国民党军是否有进攻延安的企图时，毛泽东的回答是：“进攻延安的计划早已定了，还要打，但有很大可能是我们把进犯的军队打垮。”毛泽东的乐观基于他对形势的如下分析：向延安进攻的国民党军虽然强大，但终究是在向全国解放区

进攻失利之后，士气不免沮丧。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派系复杂，矛盾重重，各自为保存实力不会积极协同作战。而陕甘宁边区经过共产党人近十年的经营，民众有较高的战斗决心。西北部队虽兵力不多，装备也差，但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良好的军事素质和高昂的战斗士气，西北的地形也有利于我军的防御作战。只要充分利用一切有利的因素，采取积极防御、内外结合的方针，是可以粉碎胡宗南的进攻，胜利地保卫延安的。

三月六日，毛泽东电令陈赓率五个旅南渡黄河，袭击陇海铁路洛阳至潼关段胡宗南部侧后的重要据点，以调动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回援。为配合陈赓部作战，毛泽东又电令晋冀鲁豫野战军同时攻击平汉路：

刘（刘伯承）邓（邓小平）并告陈（陈赓）谢（谢富治），王（王新亭）孙（孙定国），韩（韩钧），滕（滕代远）薄（薄一波）王（王宏坤）：

鱼（六日）午电谅达。陈谢率五个旅寅（三月）皓（十九日）渡河袭占陇海潼洛线，为调动胡（胡宗南）军、保卫延安最好办法。你们休整务于寅删（十五日）前结束，期于寅皓与陈谢渡河同时攻击平汉线。第一个战斗结束后，应会合太行兵团连续举行第二个、第三个及更多战斗。你们应将后方移至太行一个时期，面向平汉、道清（河南道口镇至清化镇）作战，直接援助陈谢。此役关系重大，望速做准备。胡宗南指挥第一师三个旅、九十师两个旅、二十七师两个旅［一个团位于大宁］、三十六师两个旅、十七师两个旅、七十六师三个旅、十五师一个旅及一个保安旅、一个骑兵旅共十七个旅，除一部守备陇东、关中外，主力正向宜川、洛川、中部（今黄陵）之线急进，寅灰（十日）可集中完毕，寅删可能开始进攻［亦有可能延至寅删、寅号（二十日）之间］。我现布置内线纵深防御可能迟滞十天时间，主要依靠陈谢从外线解围。估计陈谢五个旅切断潼洛必能引起变化，即使突入延安亦难持久。而陈谢在潼洛之行动又需你们积极援助。此次胡军攻延带着慌张神情，山西仅留四个旅，西兰（西安至兰州）公路及陇海线均甚空虚，集中全力孤注一掷。判断系因山东及冀鲁豫两区失败，薛岳去职，顾祝同调徐，胡宗南实际上主持郑州军事。急欲抽兵进攻豫北，故先给延安一个打击。而我们则须保持延安及边区，以便钳制胡军。只要延安及边区存在，即能钳制大量胡军不敢东调。你们准备情形盼告。

军委

寅鱼亥（亥时）

保卫延安的防御部署全面展开了：以教导旅、警备七团在富县、临真以北地区进行运动防御；以第一纵队和新编第四旅于富县西南地域待命出击；以警备第一旅和警备第五团在关中及陇东地区寻机打小的歼灭战。后来临危受命指挥西北战场作战的彭德怀说："中央命我负责西北。有的同志说，队伍只两万多人，是不是太少了呢？我在会上讲了，不是人少的问题，问题在于我能不能代表这两万多人的勇敢，做他们的表率。"

十日，局势发生了变化。当负责外线作战的刘邓部和陈谢部还没准备就绪的时候，胡宗南的近十五万大军已经集结完毕，国民党军对延安发起的攻击近在眼前，毛泽东设想的以"内线防御，外线解围"的战略保住延安的计划似乎已经没有了实施的时间——胡宗南调动部队的数量和速度显示出他占领延安的决心异常坚决。

春寒料峭，彭德怀奉毛泽东之命前往防御前沿金盆湾、三十里铺和富县视察。这一线是胡宗南部自南向北进攻的必经之路，距离延安仅有四十多公里。高高的黄土坡间夹着深深的沟壑，放眼望去，天高云淡。在金盆湾，彭德怀问教导旅旅长罗元发能坚持几天，罗旅长回答说能坚持五天。彭德怀知道这个回答已经很有勇气了，因为部队的兵力实在太少，且平均每支枪不足十发子弹。彭德怀命令罗元发尽量阻击，但不是死守，要在保存自己的同时尽力迟滞敌人，在这个前提下争取把敌人阻挡一个星期。

彭德怀预感到：放弃延安已经不可避免。

几天前，彭德怀曾提出放弃延安，诱敌深入，将胡宗南主力部队消灭在内线。但是，毛泽东对他的建议没有表态。

十一日，中共中央召开书记处会议，是否放弃延安的问题被明确提出。在决定急调晋绥军区王震部的两个旅自吕梁地区西渡黄河加入

延安防御作战之后，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放弃延安的设想，并表示同意彭德怀关于在内线打击胡宗南的建议。毛泽东说，战场可以选在延安以北的山区。

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对放弃延安忧心忡忡，他骑马从枣园赶到毛泽东的住处王家坪，问毛主席“可否设法保住延安”，毛泽东对师哲说的“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的一番话堪称经典：

你的想法不高明，不高明。不应该拦挡他们进占延安。你知道吗？蒋介石的阿Q精神十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首先，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就都知道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这是主要的一面。不过，蒋委员长也有自己的想法：只要一占领延安，他就可以向全国、全世界宣布：“共匪巢穴”共产党总部已被捣毁，现在只留下股匪，而他只是在剿匪，这样，也就可以挡住外来的干预。不过这只是蒋委员长自己的想法，是他个人的打算，并非公论。但此人的特点就在这里。他只顾想他自己的，而别人在想什么，怎么想的，他一概不管。另外须知，延安既然是一个世界名城，也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他既然要背这个包袱，那就让他背上吧。而且话还得说回来，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嘛。

但是，对于陕甘宁解放区的百姓来讲，延安确实是让他们舍不得丢弃的无价之宝。一位农民给毛泽东送来了一担粮食，他说这些粮食够毛主席吃一年的，这样毛主席“就不必参加生产劳动了”。这位农民先在毛泽东的窑洞里住了一晚，毛泽东送给他一包糖；他又在朱德的窑洞里住了一晚，朱德送给他一些自己种的西红柿。毛泽东还收到一位农民的来信，这封被外国记者写成英文的原件再翻译成中文，读起来有点拗口，但内容是真实的。信件来自距延安不远的一个叫朱宁的村庄：

亲爱的毛主席：我们开始了崭新的生活。我们清算了十一家地主和恶霸，夺回了所有我们祖先开垦的大好土地——肥沃平坦的河边土地——现在这些地又是我们自己的土地了。我们算清并夺回了地主夺走的血汗钱。我们买了牛，买了驴，还有取暖用的燃料。我们炕上都有了枕头。农历除夕那天，几乎家家都有人去赶集，买羊肉包饺子，买红纸写春联，买布娃娃送给孩子。我们还都买了您的画像！当我们想起往年春节藏在山洞里，爬进地道躲债的时

候，再想到今天有肉馅饺子吃，我们打心眼里感到幸福。春节之后，我们一定按照您的教导，搞好生产。我们听说卖国贼蒋介石将要进攻您居住的地方——延安，他的企图绝不能得逞。我们即使掉脑袋，也要和他拼到底……

毛泽东在向百姓解释为什么要放弃延安时，他把延安比喻成一个装满金银财宝的大包袱，而把蒋介石和胡宗南比喻成半路打劫的强盗：

譬如有一个人，背个很重的包袱，包袱里尽是金银财宝，碰见了个拦路打劫的强盗，要抢他的财宝。这个人该怎么办呢？如果他舍不得暂时扔下包袱，他的手脚很不灵便，跟强盗对打起来，就会打不赢，要是被强盗打死，金银财宝也就丢了。反过来，如果他把包袱一扔，轻装上阵，那就动作灵活，能使出全身武艺跟强盗对拼，不但能把强盗打退，还可能把强盗打死，最后也就保住了金银财宝。我们暂时放弃延安，就是把包袱让给敌人背上，使自己打起仗来更主动，更灵活，这样就能大量消灭敌人，到了一定的时机，再举行反攻，延安就会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共产党人早在几个月前就把重要的物资进行了转移和疏散，仅高级干部交上来的重要文件和机要处保存的机密电报就达五万多份，根据毛泽东下达的“片纸只字也不要落在敌人手里”的指示，除了集中烧毁的十几箱文件之外，不能销毁的重要档案在万分机密的情况下于保安县的一个农场里藏了十六箱，于清涧县的十家塬子村藏了十三箱。延安还展开了完全彻底的坚壁清野，包括搬不走的家具桌椅也要一根木条不留。最难藏的是粮食，在村干部的带领下，百姓一袋袋地往山上背，实在背不动了，想出个就地掩埋的办法，先挖个又大又深的坑，把粮食埋起来，再用秫秸伪装好。在延安方圆二十里的范围内，农民们连碾米磨面的石磨都藏了起来，他们决心把胡宗南饿死在延安。

十三日，胡宗南对延安的大规模轰炸开始了。之后，便是地面部队分多路以密集队形发起的攻击。战斗最激烈处在金盆湾一线，国民党军整编九十师以五十三旅和六十一旅分两路发动持续冲击，但始终进展缓慢，原因除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层层阻击之外，还有民兵埋设的大量地雷给国民党军官兵造成了极大的心理恐慌：

金盆湾以南约有十里一段的地区，解放军到处埋设土造地雷，进攻部队在前进途中不时发生触雷事情，炸伤炸死人马不少。每前进一步，都要先派工兵进行搜雷扫雷工作，因之，行动甚为缓慢。占领金盆湾后，发生触雷事情更多，每一房舍或窑洞，门槛下、灶火里、坑洞里、水缸里、门背后、窗户上都有埋设或拴上地雷的可能，只要走进房内，谁要粗心大意，一举手一投足之间，就会被炸伤炸死。弄得人人精神紧张，谁也不敢进屋，谁都不敢动手。

十六日，胡宗南部全线突破保卫延安的第一道防御阵地。

同日，毛泽东命令陕甘宁边区所有部队统归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和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指挥。以张宗逊的第一纵队、王震的第二纵队、罗元发的教导旅、张贤约的新四旅共同组成西北野战兵团，彭德怀任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

为给党政机关和群众撤离尽量争取时间，彭德怀调整部署，白天以少量部队死守要点，夜晚出兵袭击敌人的主力，迫使胡宗南部每日推进不足五公里。此时，依然留在延安的几个外国记者，就放弃延安一事询问表情严峻的彭德怀和神态轻松的毛泽东。彭德怀说，蒋介石除了一点面子之外，什么也得不到，“如果他把他的军队全都消耗在面子上，他就完蛋了”。毛泽东则说：“延安当然能守住好，丢了它我们照样能过。”

十八日，延安城里已经可以听见清晰的枪声。胡宗南的主力部队逼近了延安南面的三十里铺。刚刚率部赶到延安的王震立即去看毛泽东，他充满担忧地问：“敌占领延安后，是不是想用重兵把我们击溃，消灭我们？”毛泽东说：“不会的。他是想把我们赶过黄河去。胡宗南可不是你王胡子，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下午，毛泽东、周恩来与西北野战兵团领导一起开会，研究撤出延安后的作战部署，毛泽东说：“敌人要来了，我们准备给他打扫房子。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敌人进延安是握着拳头

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头伸开，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要告诉同志们：少则一年，多则二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敌人大军压境，枪炮声越来越近，延安的大规模撤离却没有发生任何混乱。外国记者感叹道：“延安的孩子们在撤离城市的时刻都懂得‘城市无关紧要’，主要任务在于‘消灭有生力量’。他们一边像美国孩子计算全国棒球决赛的场次一样热切地计算着被消灭的蒋介石军队的数目，一边若无其事地跟随着母亲转移到山里。”记者问一个没有跟随母亲转移的孩子“为什么不和妈妈一起走”，这个正在自己准备小行李的孩子安静地回答：“妈妈不在我们的组里。”

傍晚，延安城里响起了一连串的手榴弹爆炸声，彭德怀冲进毛泽东的窑洞大喊：“主席还不快走！一分钟也不能待了！”毛泽东说：“我说过，我是要最后一个撤离延安的。我还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什么样子呢！”

此时，胡宗南的先头部队距延安只有七公里了。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晚二十时，毛泽东离开了延安。

最后离开延安的是彭德怀。十九日拂晓，将执行阻击任务的各部队撤退路线部署完毕后，彭德怀率兵团指挥机关顺着王家坪后沟的一条小路上山了。

十八日，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命令部队全力攻击，黄昏时分，整编九十师推进到距延安七公里处。这时，师长陈武接到先头部队六十一旅旅长的报告，说刚刚窃听到共军的电话，延安正在命令部队迅速脱离战场。陈师长异常兴奋，立即命令参谋准确核实左翼整编第一师的位置。不一会儿，他得到报告，整编第一师在杨家坪的左后方，从

距离延安的路程上算，比整编九十师落后了十五里。陈师长猛然醒悟到：如果按照既定速度推进，明天，等第一师到达自己现在的位置时，他的整编九十师早已进入延安了。陈武不禁庆幸自己的命运竟然如此之好，整个国军有多少个师长，而占领延安这个天大的功劳就这样神差鬼使地落在自己头上了！能得到的赏赐自不必说，胡宗南已经承诺，首先攻占延安的部队赏法币一千万元；更重要的是，自己很快就会名扬全国，然后直线晋升，高官厚禄，说不定还会永垂青史。

陈师长正兴奋得难以入眠，夜半时分，军长董钊的命令到了：明日上午九时，整编九十师由现位置出击，“攻击目标为宝塔山至清凉山之线及其以东地区”。——陈武顿感天塌地陷。军长的命令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不让整编九十师进入延安城，二是让整编第一师赶在自己前面占领延安。

陈师长的愤怒无以言表：“为将帅者要取信于人，最贵的是待下公平，其次是赏罚严明。如果存私心，图私利，必然招致上下不和、士不用命的恶果。我们九十师从十七日起连续两天担任强攻，牺牲很大，而第一师未遇激烈战斗，并且行动迟缓，落后十五里。这时眼看延安唾手可得，却来限制九十师的行动，偏袒第一师要它去立功，真他妈岂有此理！”

果然，第二天凌晨一时，整编第一师赶了上来，插到了整编九十师攻击的正面，强占了整编九十师前进的道路。陈武派出参谋前去阻挡，但却被整编第一师的人骂了回来。整编第一师的一个团长说：“我们奉命去占领延安，如果贻误军机，小心你们的脑袋！”陈师长知道占领延安不是个小事，不敢再轻举妄动。然而，紧跟在第一师后面，还有大量的行李和辎重，人马一齐上来壅塞了道路。这下陈武不干了，派出师警卫队挡住了整编第一师的行李和辎重。结果两个部队全部拥挤在一条小路上，乱成了一团。

让整编第一师首先进入延安，是胡宗南的命令。他的命令还包括：首先进入延安的部队只能是整编第一师的第一旅。胡宗南必须让自己起家的部队独占战功。

十九日上午十时，整编第一师和整编九十师拥挤着接近了延安城。整编第一师一六七旅首先占领了宝塔山，胡宗南的参谋人员请示说，是否向蒋介石报捷？胡宗南说等一等。等了一会儿，前线又传来报告说，陈武的整编九十师已进入延安城郊。胡宗南依旧没有向蒋介石报告。此刻，陈武已经站在宝塔山上，从这里可以看见延安城的全貌，听得见山沟里还有零星的枪声。陈武对身边的人说："过去有人出胡宗南的洋相，说他只是个做连长的材料，今天我看董钊的才能只配当一个排长，不配作军长，更不配作兵团司令。今天如果敌方有一支强大部队进行反击，我看延安城下非闹出大笑话不可。"说话的时候，陈武看见第一师的部队猬集在西山的山腰处，胡乱打机枪就是不敢前进。当西山山顶上几个彭德怀部的官兵撤走后，所有的枪声终于停止了。

消息传来：整编第一师第一旅"经过血战"，已经首先占领延安。

胡宗南在洛川指挥所得到的前方报告是：延安是一座空城，没有人，也没可以缴获的东西，整个战斗"歼敌"大约千余。

胡宗南经反复推敲，向中央社发出两则电讯稿，同时向蒋介石报捷：

［中央社西安十九日下午四时急电］陕北共军自企图南犯以来，国军即予以猛烈反击，昨［十八日］下午进抵距延安十公里处，经一度激烈战事后，今［十九日］上午十时，已收复延安，同时占领该县东南郊之宝塔山，战果正在调查中。

［中央社西安十九日下午五时急电］共军为配合莫斯科会议向西安发动之大规模攻势，今已为国军完全摧毁。共军之老巢延安，于本日上午十时为国军完全收复……据初步统计，共军伤亡约一万余，投诚二千余。国军乃于本日上午十时，完全占领延安。

很快，胡宗南接到了蒋介石的嘉奖电：

> 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占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来积愤，殊堪嘉赏！希即传谕嘉奖，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核，以凭奖叙。戡乱救国大业仍极艰巨，望弟勉旃。中正

胡宗南由中将晋升为上将。

享受荣耀的胡宗南很快就接到了蒋介石新的命令：十天后，中外记者团要来延安参观，必须做好一切接待准备，以让全中国人“领略中央实为其解放之救星也”。

三月二十四日中午，胡宗南进入延安城。

国防部组织的记者团就要来了，如何落实蒋介石的接待指示，让胡宗南费尽了脑汁。胡宗南命令工兵在延安近郊赶挖“坟墓”，以示战况之激烈；又把自己仓库里的旧武器和旧装备运到延安，以布置战利品展览。最头疼的问题是“俘虏”。当初占领延安时，对外编造了“生俘万余”的新闻，后来的宣传越来越走样，逐渐变成了“生俘两万余”。而共产党广播电台不断地声称，如果真是俘虏了两万人的话，你们敢不敢也像我们一样，把俘虏的姓名、职务在你们的电台上一一报告呢？经过研究，胡宗南命令整编二十七师完成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挑选一部分士兵充当共军的俘虏，还要挑选出三名军官，其中两个充当共军的团长，一个充当共军的旅长，并抓紧对这些“俘虏”进行对答问题的训练。胡宗南表示，他并不赞成弄虚作假，但是为了“革命”，不得已而为之。

几天之后，胡宗南亲自检查了“俘虏”的准备工作。在查问一个冒充共军被俘旅长的军官时，胡宗南火了。这个精心挑选出来的湖南人，见了胡宗南不停地点头哈腰，胡宗南厉声说，满口的国军腔，哪有一点像共军，真是统统不懂革命！共军要“骂娘”，就是骂蒋介石是卖国贼，骂国民党是刮民党。要用共军的语气，要表现出“被俘不屈”

的样子。这个湖南籍的下层军官无论如何不敢骂蒋介石，也装不出大义凛然的样子。胡宗南板着脸说：“做得好，升官；如果说出这是谁布置的，砍头。”胡宗南走后，这位军官开始享受旅长的伙食，并被装上了胡子，安排在一间光线较暗的房间里等着记者们到来。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三日《中央日报》记者龚选舞报道：

> 屋子里住的是中共一个旅的副司令员，胖胖的，腮下黑黑的，是二十天来没有“清算”过的胡子。他不愿讲话，讲起话来却是一大堆硬派的名词：“斗争”、“消灭国民党军”、“你们阵地战，我们就运动战”，“你打进我们的延安，我们也可以打下你们的西安”。当记者向他透露瓦窑堡已被国军克服的消息时，仍是摇头喷鼻，表示不相信这是事实。

胡宗南想出了种种花样，在彰显他的功绩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彰显他的思想。为了迅速把延安“布置”起来，他下令动用大型军用车队把西安那些想趁机捞上一把的商家们拉到延安来开业，他甚至还派人从西安招来一些说评书和唱大鼓的艺人。延安的南关很快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市场，茶馆和饭馆开张的时候很是热闹，但是陆续回来的延安居民始终不过两千，有一条名为铁匠街的街道始终没有一个人回家——没有居民，市场再热闹有什么用？胡宗南派人去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活动，强烈要求将延安改名为“宗南县”，而且决定把未来的“宗南县”开辟成一个著名的避暑胜地，把全中国的游客从庐山吸引到延安来。他指示有关部门赶快修建通往延安的铁路，还准备把西安的碑林搬到宝塔山来，然后让蒋介石题写“直捣黄龙”四个大字，刻在石碑上立于宝塔山山顶。胡宗南最得意的创举，就是在延安开设了一个“为人民服务处”。胡宗南曾派人到民众中调查“是国民党好还是共产党好”，得到的回答大多是“谁让我们安居乐业谁就好”；而问到一群孩子的时候，孩子们竟然唱起了“东方红”。胡宗南还听说，自国民党军占领延安之后，有共产党人经常潜回延安，尽管他张贴了奖赏布告，但就是没有一个民众前来告密。为什么延安被共党“赤化”得如此之深？胡宗南思考的结果是：共产党的“为人民服务”很有煽动性。于是，他立即命令成立“为人民服务处”，服务内容包括发放赈济、免费治病、代写

书信等等。“为人民服务处”挂牌那天很是热闹，因为张贴的通告说，延安城内不管男女老幼，只要来就发给救济金法币二十元，或者布二尺，或者米二升。“为人民服务处”门口拥挤了几天之后，胡宗南发现这样下去实在难以承担，更重要的是民众依旧不说国民党的好话，所有的服务内容只好停止。

接着，一个惊人的消息传遍了全中国：胡长官要结婚了。

新娘还是戴笠介绍的那个军统女成员叶霞翟。

《观察》周刊评论道：“胡宗南这个神秘的不娶将军，居然因为延安攻下，素志得偿而结婚了。他该是如何兴奋，以为从此西北可以稍定了，十年戍守自此可以稍松一口气了。”

对于五十一岁的胡宗南来说，他的结婚和他的“为人民服务处”一样，象征意义大于实际需求——“我和琴斋（胡宗南，别号琴斋）的婚恋，既是马拉松，又是闪电式。马拉松，光恋爱就谈了十年；闪电式，我头天在南京接到电报，第二天就飞西安结婚，第三天他又把我送回了南京。”叶霞翟说。

被莫大的荣耀、纷乱的幻想和无边的憧憬折磨得有些神经质的胡宗南，眼下最大的苦恼是：共产党在西北的主力军怎么说也有几万人，走到哪里也应该是浩浩荡荡的队伍，但是空军就是说他们没有发现任何踪影，难道数万人马辎重能钻到地下去？中共首脑机关，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大小电台，车辆随从，别说隐蔽不易，就是美国最新式、最灵敏的电台测向设备也没能找到他们的踪迹，难道中共首脑以及他们的机关散伙了不成?

胡宗南进入延安的第二天，他来到毛泽东住过的枣园窑洞，在窑洞里的桌子上他看见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

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

这张字条出自谁手?

走出窑洞，胡宗南举目望去，三月的陕北高原，乍暖还寒，草木萧疏，远方风沙弥漫。

毛泽东到底去哪里了?

## 孟良崮

支前干部吴相林带领着一支运粮队，昼夜兼程地走在山东腹地崎岖的山路上。走了好几天，他们进入一个村子，村里的景象让运粮的农民们瞪大了眼睛：村庄里的房屋全被拆了，院子和院子之间的围墙已被推平，所有的树也全都被砍了，房屋被烧得只剩下残破的墙壁。到处是鸡毛，猪圈里全是血，猪头和鸡爪子扔在路边。全村空无一人，能够喘气的东西，就剩下一条狗了。

不一会儿，村后的山上下来个大娘，见到他们就哭起来。大娘说，中央军在这个村子里住了七天，可把全村祸害苦了。六十多岁的她跑得慢，被中央军捉了，让她带路去刨窖找粮食，她刚说不知道，一脚就踢在了她腰上，她趴了一天也站不起来。中央军捉来个小伙子，先是打，叫他说出民兵活动的地方，小伙子始终不说，他们就从村里找来旧棉花套裹在他身上，点着火又不叫起火苗，用阴火烧着，小伙子惨叫了半个多钟头，就再也叫不出来了，三四个钟头后活活地疼死了……大娘正说着，一支担架队抬着伤员下来了，民工们冲吴相林喊："前边围了老蒋好几万，你们还在这歇着？"

运粮队的农民们眼泪汪汪地推起小车继续赶路。他们从家乡出发的时候，每个人都把小车装得满满的，最多的装了三百多斤粮食，小推车被压得吱扭扭地响。一路爬山过河，他们已经疲惫不堪，肚子也

饿得厉害。前边大炮又轰隆隆地响起来，农民们对吴相林说：“哥！咱接着走吧，上去帮着咱部队打那些狗日的去！”

一九四七年春天，莱芜战役之后，山东战场态势复杂，在解放区腹地进行的战争进入了万分残酷的绞杀状态。

内战爆发以来，国民党军侵占了山东解放区的大片土地，尤其是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的丢失，以及山东境内主要交通线和重要城镇为国民党军所控制，迫使共产党人的生存区域逐渐向山东东北部压缩。但是，国民党军在不断发起的进攻中已损失了二十四个旅的兵力，加上地方武装，国民党军在山东战场的兵力损失已达三十万。而华中军区部队却增长了百分之十二，包括地方武装在内，兵力总人数达到了五十七万之众，成为当时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最为庞大的一个军事集团。尽管山东解放区政府大力推广土地改革，构建起一个较为完整的生产和供应体系，但是，如此庞大的军事集团和巨大的战争消耗令解放区内的负担能力达到了极限。一九四七年春天，原华中野战军、华中解放区政府工作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全部转移到了山东，加上原山东野战军、山东解放区政府工作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还有在宿北、鲁南、莱芜三个战役中被俘的近十万国民党军官兵，一下子使山东解放区必须供养的人数超过了当时全国范围内的任何一个解放区。每一场战役的消耗也是惊人的，鲁南战役和莱芜战役的参战人数达到几十万，除去弹药、战地物资、救护物资等消耗，仅官兵每天需要的粮食就在五十万公斤以上。

山东共产党人的生存形势十分严峻。

一九四七年春，蒋介石重点进攻的目标除了延安，就是山东——“匪军的主力集中在山东，同时山东地当要冲，交通便利，有海口运输，我们如能消灭山东的主力，则其他战场的匪部就容易肃清了。”为执行蒋介石的重点进攻战略，三月，国防部撤销了徐州绥靖公署和郑

州绥靖公署，在徐州组成了陆军总司令部徐州指挥部，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统一指挥原徐州和郑州两个绥靖公署所属的所有部队，并将在冀鲁豫战场上的整编第二十七军和驻扎在武汉的整编第九师调往山东。

此时的山东战场上，集结着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中的“三大主力”，即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胡琏的整编十一师以及邱清泉的第五军。以“三大主力”为骨干，国民党军编成了三个机动兵团：第一兵团司令官汤恩伯，指挥整编二十五、二十八、五十七、六十五、七十四、八十三师；第二兵团司令官王敬九，指挥第五军以及整编七十二、七十五、八十五师；第三兵团司令官欧震，指挥第七军以及整编十一、二十、四十八、六十四、八十四师。再加上原来驻扎在山东的以王耀武为司令官的第二绥靖区和以冯治安为司令官的第三绥靖区的部队，国民党军的总兵力已达到二十四个整编师（军）六十个旅，共计四十五万人。

蒋介石的作战设想是：打通津浦铁路徐州至济南段和兖州至临沂段的交通，占领鲁南解放区，然后集中主力向泰安和莱芜方向强行推进，迫使陈毅、粟裕部主力进入鲁中山区与之决战，至少要把陈毅和粟裕赶到黄河以北去，从而占领整个山东解放区。

三月底，国民党军打通了津浦铁路的徐州至济南段和兖州至临沂段。大规模的作战开始向山东解放区的纵深地带推进。

陈毅和粟裕拟以三个纵队迅速南下，诱使敌军回援，然后以五个纵队的兵力或打南线之敌，或打增援之敌。但是，部队刚刚南下两天，作战意图就已暴露。当面的国民党军第一兵团紧急向后收缩，第二、第三兵团向南下的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展开了战役合围，陈毅、粟裕部被迫停止在新泰、蒙阴一线。

在山东战场上，国共双方的战略意图都已十分明确。

国民党军誓要攻占山东，而对于共产党人来讲，一个不容争议的前提是：山东解放区绝不能丢失。如果山东丢失，共产党人就损失了面积最大、兵力最多、地理位置最重要的生存空间，那么势必在全国战场的总体态势上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尤其是这个局面发生在延安已被放弃之后。

毛泽东致电华东野战军："不论什么地方，只要能大量歼敌，即是对于敌人之威胁与对于友军之配合，不必顾虑距离之远近。"——这是利用解放区内部优势的民情和有利的地形进行大规模运动作战的设想。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原地不动肯定是危险的。陈毅和粟裕制订了一个围点打援的"蒙泰战役"计划：攻击孤军防御泰安城的整编七十二师，诱使国民党军回援并相机伏击援军。

四月二十二日晚，华东野战军的三个纵队开始围攻泰安，以期吸引整编七十五、八十五师北援，但是战斗打响整整两天以后，不但泰安守军的阻击异常顽强，整编七十五、八十五师仿佛也已判断出华东野战军的意图，就是按兵不动，根本没有增援泰安的任何动向，这就迫使陈毅和粟裕的围点打援很快就演变成了对泰安城的攻坚战。

年初的时候，整编七十二师曾把被刘伯承部包围的整编八十五师救出战场，战后师长杨文璟得到蒋介石的通令嘉奖。三月，杨文璟来到山东战场后，他一心想再立新功。当他得知泰安已被包围的时候，并没有惊慌失措——"以现有兵力固守泰安，即使共军以三倍兵力来攻，也并不感到单薄。"杨文璟认为，泰安的防御工事十分稳固，附近的友军都在二十多公里的范围之内，只要自己守住泰安，把共军主力拖在这里，然后各路大军纷至，必定会把共军全部歼灭。

华东野战军攻击泰安城的战斗进行得十分艰苦。第三、第十纵队的联合攻击自外围开始就始终处在残酷的近距离搏斗中。交战双方都显示出极强的战斗决心，一个阵地往往需要反复争夺才能分出最终胜负。战斗进行到白热化的时候，双方的官兵相互交叉在一起，战场呈现出混战状态。经过反复的拉锯战之后，蒿里山据点被第三、第十纵队官兵攻占。负责防御的杨文瑔部三十九团急于脱离战场，被阻之后向南逃窜，一直逃进了兖州城。接着，泰安城南门被突破，杨文瑔部四十五团团长田其丰指挥部队沿着街道节节抵抗，一直退到防御岱庙的新编十三旅的阵地上。当岱庙附近发生混战的时候，杨文瑔的信心终于动摇了，他一面严令把攻进城内的共军反击出去，一面带领几个亲信企图由北门逃上泰山。但是，由于必须通过一段七百米的火网地带，杨文瑔向北门的突击没有成功。

返回师部后，杨文瑔开始地向周围的友军急切地求救，但是南面的整编八十五师距泰安还有十五公里，西面的整编七十五师距泰安还有三十公里，也就是说，在战斗开始后的整整四天里，这两支奉命协同整编七十二师作战的友军只前进了二十公里。而杨文瑔的整编七十二师此刻已是“粮弹告缺”，“伤员拥挤”，“士气颓丧”。最后的战斗在古建筑群岱庙里展开，华东野战军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喊话，有的干部甚至不畏生死从围墙上跳进去，近距离地宣传共产党优待俘虏的政策。跟在干部后面的“解放战士”也跟着喊：“弟兄们！我们原来是李仙洲的下属！现在在解放军里过得很好！”岱庙守军设置在院子里的四门榴弹炮和十六门迫击炮停止了射击，炮手们眼看着共产党官兵坐在了他们的炮位上。此时，新编十三旅旅长杨本固已放弃指挥，在卫兵的簇拥下奔出西门。

杨文瑔躲藏在师指挥部里，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从泰安以西的肥城方向赶来的新编十五旅上。新编十五旅在旅长江涛的率领下，已经前进到泰山上的南天门，并在那里与杨文瑔通了电话。杨文瑔在电话

里说："赶快下山吧！不然咱俩就没有见面之日了！"江涛立即命令部队强行下山。走到半路再与杨文瑔联络时，刚说了几句，就听见电话那头一声巨响，江涛知道一切都晚了。晨曦中，新编十五旅的官兵已能清楚地看见泰安城，全旅却处在了前进不得的境地，江涛满心的悲凉陡然而生，他喃喃自语道："杨先生！对不起了！"最后时刻，杨文瑔命令特务营爬到师部前面的一座大牌坊上不惜一切阻击，而他自己换上士兵服混进了溃散的人群中。天大亮了。第十纵队司令员宋时轮命令清查俘虏，杨文瑔很快就被指认出来。

杨文瑔，毕业于黄埔二期辎重科，在国民党军中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率部参加淞沪会战、常德会战、鄂西会战、长沙会战。一九四六年初上任整编七十二师师长，同年十一月被晋升为少将军衔。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在泰安被俘。一九七三年病逝于抚顺战犯管理所。

泰安战斗结束后，华东野战军沿津浦路西侧南下攻击宁阳，意在把国民党军第五军调动起来以创造战机，并威胁国民党军的补给基地兖州。经过两天的战斗，宁阳虽被攻克，但国民党军并没按陈毅、粟裕所期待的那样调动。此时，在山东腹地大范围的地域内，国共两军开始了捉迷藏般的机动，双方都试图发现对方的破绽以寻求战机。四月二十八日，国民党军占领蒙阴，华东野战军趁敌未稳，以四个纵队的兵力实施反击，国民党军立即退踞蒙阴山区。陈毅、粟裕不甘战机失去，拟攻击退守中的整编七十四、二十五、六十五师。但是，未等主力集结，国民党军第七军和整编四十八师已经靠拢过来，华东野战军只有撤退。五月三日，战机再次出现，华东野战军对刚刚占领新泰的整编十一师形成包围之势，这一次，邱清泉的第五军迅速推进，以期与整编十一师协同吃掉将被夹在中间的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只好再度命令部队撤退。

四月三十日国民党中央社徐州电：“逆沂河两岸北上的国军汤恩伯兵团，以压倒之势向前挺进，战果辉煌。”

五月四日国民党中央社徐州电：“临沂蒙阴道上国军汤恩伯兵团，又在青驼寺北造成空前大捷……国军正挟连胜雄姿，向共军夹击中。”

五月九日国民党中央社徐州电：“北上国军，九日晨进抵蒙阴要塞雁翎关一带地区，对集中莱芜之共军主力，即时展开决定性之歼灭战。”

战机一失再失，部队来回调动，这种被称为“耍龙灯”式的作战，引起了部队官兵的焦躁情绪，官兵中间开始流行一个顺口溜：“陈司令的电报嗒嗒嗒，小兵们的脚板啪啪啪。”陈毅、粟裕也十分焦急：如果再不寻找到歼敌战机，打一个像样的歼灭战，等到国民党军完成重兵调动，山东战场的形势只能更加恶化。

五月四日，毛泽东来电，强调“要有极大忍耐心”：

……敌军密集不好打，忍耐待机，处置甚妥。只要有耐心，总有歼敌机会。你们后方移至胶东、渤海、胶济线以南广大地区均可诱敌深入，让敌占领莱芜、沂水、莒县，陷于极端困境，然后歼击，并不为迟。惟（一）要有极大忍耐心；（二）要掌握最大兵力；（三）不要过早惊动敌人后方。因此，请考虑一六两纵是否暂缓南下为宜，因南下过早，敌可能惊退，尔后难于歼击……

五月六日，毛泽东再次来电，要求“忍耐待机”：

……第一不要性急，第二不要分兵，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凡行动不可只估计一种可能性，而要估计两种可能性，例如调动敌人，可能被调动，亦可能不被调动，可能大部被调动，亦可能只有小部被调动。凡在局势未定之时，我主力宜位于能应付两种可能性之地点……当着不好打之时，避开敌方挑衅，忍耐待机，这是很对的……山东地区狭窄，你们兵力甚大，转动不易，自应因地制宜……

为让国民党军放心大胆地前进，华东野战军主力又向后退了一点，撤至莱芜、新泰、蒙阴以东地区。这一带多岩石山地，山中小路

崎岖狭窄，其间的沂河和汶河夏天雨季来临前可以徒涉，对于机动能力强的我军来往不受制约，而却极其不利于国民党军重型装备的通行。

十日，国民党军推进到莱芜、新泰、蒙阴一线。第一兵团司令官汤恩伯遵照顾祝同的攻击部署，命令其整编七十四、二十五师自垛庄、北桃墟继续北进；第七军和整编四十八师各一部策应整编七十四师的行动；整编八十三师以一部保证整编七十四师侧翼的安全；整编六十五师在蒙阴守备，并负责掩护整编二十五师的左翼。

大敌当前，负责军事指挥的粟裕彻夜不眠。此时，进至沂水以南的国民党军第七军和整编四十八师一部在右翼似乎显得有些孤立，虽然该敌属于作战顽强的桂系，但这总是个分割歼敌的机会。就在部队已经开始调动的时候，粟裕接到前方的报告：九纵在坦埠以南受到整编七十四师的攻击。这一情况立即引起粟裕的警觉。接着，侦察部门截获了汤恩伯的一个作战命令，内容是：十一日攻击坦埠，整编七十四师主攻，整编二十五、八十三师为其左右翼，除以一部控制孟良崮等要点外，限于十二日拿下陈粟指挥中心所在地坦埠。同时，粟裕还查明王敬久兵团的第五军，欧震兵团的整编十一师等部，也于同日开始由莱芜、新泰向东出击。

经过分析，粟裕认为，国民党军的攻击计划有所调整，即采取中间突破的方式，直接攻击华东野战军的指挥中心，企图令华东野战军陷于混乱，最后形成决战态势。对手虽然来势凶猛，但是粟裕意识到，几个月来苦苦寻找的战机也许近在眼前了。“因为在此以前，敌军密集靠拢，行动谨慎，一打就缩，很难捕捉”。现在既然敌人已开始全线进攻，“并对我实施中央突破”，那么，“我应立即改变先打敌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师的计划，以反突破来对付敌人的突破，即迅速就近调集几个强有力的纵队，以‘猛虎掏心’的办法，从敌战斗队形的中间楔

入，切断对我威胁最大的中路先锋敌第七十四师与其友邻的联系”，然后将整编七十四师吃掉。

可以想见参谋人员的吃惊程度。

整编七十四师是国民党军最精锐的部队，全部的美式装备，被誉为蒋介石手中的“王牌”。况且，目前整编七十四师居于敌人攻击阵形的中间部位，粟裕的设想显然违反了我军打击薄弱环节、孤立歼灭翼侧之敌的原则。而粟裕的依据是：如果继续攻击第七军和整编四十八师，敌人很可能置我军的行动于不顾，继续执行中央突破的计划，那样我军将陷入两面作战、进退两难的境地。同时，虽然敌人的攻击阵形十分密集，一百二十多公里的攻击线上摆放了八个整编师（军），而且在兵力对比上我军处于劣势，但是整编七十四师已经处在我军的正面，我军不需要过多的调整就可以在局部达成五比一的兵力对比优势。只要在分割、包围、阻击等各方面部署严密，作战信心坚决，歼敌是有一定把握的。而且，战场上的强与弱是相对的。整编七十四师虽然强大，但它的弱点也是致命的，那就是重装备进入山区后机动能力将受到严重限制，使优势装备反成累赘。再有就是，整编七十四师是众所周知的蒋介石的嫡系，师长张灵甫年轻气盛，不可一世，这造成了该师与其他国民党军部队芥蒂很深，在我军坚决阻援的情况下，友邻未必会拼死援救。如果我们能将整编七十四师歼灭，将是对国民党军的一个沉重打击。

陈毅听完粟裕的阐述，说：“好！我们就是要有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概！不走了！打！”

决心下定，首先要把奉命攻击第七军和整编四十八师的部队追回来。部队已经出发，为了保密，电台都已处在静默状态，于是野战军指挥部的所有参谋奉命出动，有的骑摩托车，有的骑自行车，有的骑

马，有的干脆跑步前进，总算把前进中的第一、第四、第八、第九纵队全部追了回来。

华东野战军随即召开了各纵队首长参加的作战会议，决定以第一、第四、第六、第八、第九纵队以及特种兵纵队担任围歼任务，第二、第三、第七、第十纵队担任阻援任务。具体部署是：第一、第八纵队从整编七十四师的左右两翼迂回穿插，会同第六纵队断其后路。第四、第九纵队从正面出击。第一纵队以一个师阻击西面的整编六十五师，主力从整编七十四师和整编二十五师之间狭窄的缝隙楔入，割断这两个师的联系，并阻击整编二十五师，同时协同第六、第八纵队攻击整编七十四师的侧后。第八纵队从整编七十四师和整编八十三师之间楔入，以一部阻击整编八十三师，主力迅速攻占南面的万泉山，与第一纵队一起攻击整编七十四师的侧后。第四纵队在北面阻击向坦埠前进的敌人，然后攻占孟良崮。第九纵队在北面攻击雕窝。第十纵队在西北方向钳制莱芜的第五军并阻其南援，第三纵队也位于西北方向阻击新泰一线的整编十一师。第七纵队在东面阻击何阳方向的第七军和整编四十八师。第二纵队在东北面保障第八纵队的侧翼，并策应第七纵队的行动。同时，地方武装和民兵沿着公路进行破坏和骚扰。

从陈毅、粟裕的角度看，这确实是一个十分新奇、十分大胆的作战计划，因为在敌军密集的阵形之中把整编七十四师“挖”出来并实施围歼，要冒被四周的敌人实施反包围的巨大危险。

华东野战军战役发起时间被确定为十三日黄昏。

五月十二日晚，蒋介石在其官邸召开了军事会议。

这是一个致整编七十四师于死地的会议。

蒋介石的官邸军事会议，在国民党内被称为“官邸会报”，一般是以作战会商开始，以晚宴结束。能参加“官邸会报”的将领和官员，向来被认为是享有参与高层决策的最高荣誉。高层军政大员们在国防部旁边那座两层西式小楼的内走廊里脱下外套和帽子，然后在一副曾国藩手书的屏联下走进堂皇的大客厅。大客厅里一根一米多长的象牙，每每让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们津津乐道。十二日晚，在这间大客厅里，蒋介石和他的高级幕僚们像谈论一次出游计划一样，作出了在山东战场继续全面推进的决定，蒋介石特别强调要首先攻占坦埠。晚宴菜式不多，但都很精致。餐后水果是刚从广东空运来的新鲜木瓜。蒋介石和他的高级幕僚们万万没有想到，在这个傍晚，他们制定的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殊内容的作战计划，却导致了一个让共产党人永远津津乐道的著名的战例——孟良崮战役。

国防部第三厅向山东战场下达了作战计划。

五月十二日，整编七十四师开始向坦埠方向攻击前进。拂晓时分，其先头部队五十一旅以炮击为先导，向当面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许世友部的阻击阵地实施攻击。九纵的任务是牵引整编七十四师前进，既不能让其攻击速度过快，以便给穿插的部队争取时间，但也不能把他打回去或是令他原地不动。部队在坚守阵地的同时，适当反击，然后放弃阵地撤退，致使整编七十四师始终认为当面的共产党军队根本无力阻挡。十三日拂晓，整编七十四师依旧以五十一旅为前锋攻击前进，在马山和佛山等地又遭到许世友部的阻击。中午，马山阻击阵地被整编七十四师攻占，九纵七十四团扼守的大崮阵地也丢失，但黄昏时华东野战军经过反击又将其夺回。在这样的拉锯战中，整编七十四师两天之内仅仅前进了四公里。

在九纵阻击整编七十四师的同时，华东野战军各纵队按照各自的战斗任务迅速开始了行动。第一纵队叶飞部以小部队阻击整编二十五

师的同时，主力从整编二十五和整编七十四师之间的缝隙向敌纵深迅猛穿插，先后攻占了蛤蟆崮、天马山和界牌等要点，另一部则逼近蒙阴城，构筑起阻击整编六十五师的阵地——连夜的大雾，不但给迅猛穿插的一纵带来了辨别方向的困难，也给国民党军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整编七十四师的军官们曾经发现侧翼出现了运动中的大部队，但是由于大雾看不清，竟然主观地认为那是友军整编二十五师在向他们靠拢。其实，那是王建安的八纵刚从整编七十四师与整编八十三师之间的空隙穿过去。

第六纵队王必成部攻击垛庄的战斗十分关键，垛庄是整编七十四师的后方补给点，攻击是否得手关系到能否最终完成包围。担任攻击任务的六纵是从鲁南赶来的——不少军史家都把陈毅和粟裕在鲁南“埋伏”了整整一个纵队的兵力称为“神来之笔”——两万多官兵在四十八小时之内急行军一百二十公里，六纵于十四日下午开始了对垛庄的攻击。垛庄受到攻击，这令第一兵团司令官汤恩伯感到事情不妙，立即命令死守垛庄。整编七十四师也派出一个团，紧急加强垛庄的兵力。这个团在前往垛庄的路上与六纵十八师五十三团相遇，战斗的结果是这个团的团长被活捉。之后，六纵一举将垛庄拿下。

整编七十四师的退路已断。

张灵甫终于意识到自己有被包围的危险，下令全师向孟良崮和芦山地区收缩。

至此，华东野战军已基本完成对整编七十四师的分割包围。

低估张灵甫的军事才能是危险的。他知道孤军退守几座光秃秃的山冈是无法最终取胜的。张灵甫的设想是：凭借整编七十四师的实力，共军根本啃不动，只要整编七十四师用顽强的防御把陈粟牢牢地吸引住，四周的友军乘势合围，就能为与共军在山东决战创造出一个

最佳时机。蒋介石显然也发现了这一绝好的态势，他立即命令整编七十四师坚守阵地，吸引共军主力；命令位于新泰的整编十一师、位于蒙阴的整编六十五师、位于桃墟的整编二十五师、位于青驼寺的整编八十三师、位于河阳的第七军和整编四十八师，分别从西北、西、南、东四个方向上火速向整编七十四师靠拢。同时，命令位于莱芜的第五军全力南下，命令位于鲁南的整编六十四、二十师迅速北上。

于是，孟良崮战场陡然显出惊人的战役格局：陈毅、粟裕部的五个主力纵队虽然包围了整编七十四师，但国民党军却以十个整编师（军）的大兵力对陈毅、粟裕部实施了反包围——以孟良崮这座小石山为中心，在整编七十四师的外围，是华东野战军形成的包围圈；在华东野战军作战部队的外围，国民党军形成的一个更大范围的包围圈。狭窄的地域内聚集着数十万大军，交战双方的战斗距离如此接近，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层层交错，扭成一团。

对于陈毅和粟裕来讲，关键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全歼整编七十四师，同时还要最大限度地阻击多路增援敌军。

而国民党军的希望则在于：整编七十四师多坚持一天，外围部队对陈粟的合围就压紧一天，直到华东野战军无力承担两面作战时为止。那时，便是歼灭山东共产党军队的最后时刻。

十五日下午，华东野战军对整编七十四师发起总攻。粟裕率领少数参谋人员和机要人员组成前线指挥所，从坦埠移动到靠近前沿的一个山洞里。留在坦埠的陈毅不断地给各纵队司令员打电话，强调要尽快把整编七十四师这个"硬核桃"敲掉，阻击部队要坚决顶住增援之敌。陈毅知道"胜败在此一举"。

孟良崮，位于蒙阴东南约六十公里处的芦山之中。芦山是一片方圆约五十公里的山群，万泉山、雕窝、芦山、孟良崮等山峰起伏相

连，主峰孟良崮海拔五百米。崮，为山东腹地特有的一种坡度陡峭、怪石林立、草木稀疏、石质坚硬的石山。整编七十四师收缩在这里后，由于无法挖掘战壕，官兵们或用石块筑起掩体，或在巨大的岩石缝隙间设立射击阵地。华东野战军从陡峭的岩壁上仰攻，没有任何隐蔽物可以利用，而整编七十四师虽然在上山时丢弃了部分重型装备，但其步兵武器的火力依旧十分凶猛。攻击部队采取波次攻击的方式，一轮接一轮地前仆后继，整编七十四师不但组织起密集的火力拦截，而且还多次发动大兵力的反击，双方在陡峭得几乎站不住脚的石坡上混战在一起。因为占领和防御每一道岩石棱线都要经过反复争夺，肉搏已经无法避免，岩石间血肉横飞，到处是嘶哑的喊声和痛苦的呻吟声，岩石缝隙中很快塞满了双方士兵的尸体。

张灵甫，一个性格冷峻的职业军人，在十五日接近中午的时候，他平生第一次感觉到什么是恐惧。

张灵甫原名钟灵，字灵甫，生于陕西长安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十八岁入西安第一师范，国文成绩优良，对古诗词、书法、历史尤其喜欢。师范毕业后入河南军官训练团，不久经同乡同盟会著名人物于右任的推荐，入黄埔军校第四期。一九二六年毕业后，以排长身份参加北伐，右腿负伤，被提升为连长；后又参加中原大战，右臂负伤，被提升为营长。一九三四年率部追击长征中的红四方面军，因作战顽强得到陆军第一师师长胡宗南的赏识，升为中校团长。不久，张灵甫制造了一件轰动全国的新闻：他与原来由父母撮合的夫人离婚之后，娶了漂亮的四川姑娘吴海兰。由于婚后一直在外作战，当他听说有人在西安看见夫人和别人看电影时，立即向师长胡宗南请假，然后带着一把手枪回了西安。进家便吩咐夫人给他包韭菜馅饺子，当夫人走到菜地里蹲下割韭菜的时候，他向夫人的后脑勺开了一枪。开枪之后，夫人陈尸自家菜地，他径直返回了部队。张灵甫杀妻之事传出后，吴海兰的家人将其告上法院，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蒋介石电令胡

宗南将其押解至南京监禁。张灵甫是胡宗南军中最得力的军官，胡宗南没有派人押解他，而是给了他路费，让他自己去南京面见蒋介石。结果张灵甫经洛阳、郑州、徐州一路闲散游玩，刚走到半路盘缠就用光了，好在他模仿恩师于右任的书法足以乱真，就此一边卖书法一边继续游玩，半年之后才到达南京。张灵甫被关进模范监狱，除了不能走出大门外一切自由，而他大多的时间都在研习书法。一年后，经第七十四军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请求，张灵甫被秘密释放投奔第七十四军，从此舍“钟灵”名而以字“灵甫”行世。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张灵甫率五十一师一五三旅三〇五团参加上海保卫战和武汉保卫战，并在德安一战中率部仰攻日军山地阵地。他亲自带领突击队先从崎岖的峡谷间偷渡，再从陡峭的悬崖上攀爬，与正面攻击部队对日军形成夹击之势。日军发动猛烈反击，张灵甫腿部中弹却誓死不退，血战五天五夜后将日军击退，并与友军一起收复九江以南全部失地。德安一战令张灵甫名传天下，战后升为旅长，继而参加南昌战役、长沙会战、常德会战、衡阳保卫战，每每勇猛善战，一九四〇年升任五十八师师长，一九四四年秋升任第七十四军副军长，一九四六年夏升任第七十四军军长兼南京首都警备司令。国民党军整编后，第七十四军称整编七十四师，但兵力仍在三万人左右，全师装备精良，战斗力极强，被蒋介石誉为“国军模范”，参谋总长陈诚也在多个场合说：“全军多几个七十四师，战事就会平定了。”

整编七十四师开赴山东后，张灵甫的攻击行动十分踊跃，强占头功的架势令各路友军侧目。即使在孟良崮被包围之后，师参谋长魏振钺一再提醒：“此乃孤山，为兵家大忌，不易固守。”但张灵甫依旧认为，军人打仗要的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华东野战军决不敢贸然攻击赫赫有名的整编七十四师。但是，战事进行到十五日下午的时候，他发觉陈毅和粟裕这次决心要将他置于死地，特别是得知各路友军合围的速度十分缓慢时，他知道事态不是一般的严重了。张灵甫开始向友

邻部队呼叫增援，让他万分恐惧的是，被包围在中间的明明是他，可各友邻部队竟然向他发出了请求增援的呼叫。

华东野战军阻援部队的战斗同样打得极其艰苦。阻援部队的顽强战斗和不惜代价的反击，竟然让国民党军受阻部队纷纷以为自己是陈毅、粟裕部攻击的焦点，于是才出现了请求张灵甫出击救援的怪事。在攻击孟良崮战斗进行得万分残酷之时，阻援部队在十五日这天成功地阻击着各路援军：十纵把第五军钳制在莱芜方向；三纵把整编十一师阻挡在蒙阴以北；从蒙阴出击的整编六十五师被一纵和六纵队纠缠得一天之内只前进了不到十公里；而七纵在南面拦截着第七军和整编四十八师；从鲁南北上的整编二十、六十四师则陷入了地方武装和民兵的有力钳制中。

张灵甫的一世孤傲终于让他在危难之时面临着孤军作战的绝境。

就在张灵甫向坦埠发动进攻的时候，他曾与位于自己左前方的整编十一师师长胡琏通过电话：

张：请你们一起动！

胡：上级叫我们等你们动了之后我们再动。

张：我们已经动了。

胡：上级让我们等你们打了之后再动。

张：那么你们将动到哪里?

胡：坦埠以北约八十华里的地方。

离孟良崮最近的整编二十五师和整编八十三师，距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仅仅只有五公里，两个师的炮火完全可以与整编七十四师构成交叉火力。由于整编二十五师和整编七十四师被编在同一个攻击纵队中，负责指挥的整编二十五师师长黄百韬因此不敢怠慢。他采用密

集的人海战术，向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的阻击阵地发动轮番攻击，在一纵队前沿阵地官兵伤亡殆尽的情况下，整编二十五师占领了浮山和界牌，但依旧与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隔着一座天马山。

与黄百韬相比，整编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的心情就复杂得多了。张灵甫和李天霞同为黄埔毕业，又同是第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的亲信。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军整编时，两人暗地里竞争“王牌”师师长的位置，结果张灵甫因得到原第七十四军两任军长俞时济和王耀武的支持而把李天霞挤了下去，李天霞对此一直怀恨在心。两人的芥蒂在山东战场上又一次显露，按照攻击计划，整编七十四师归属第一纵队李天霞指挥，但是张灵甫坚持要归黄百韬指挥，因为他对李天霞极度不信任，认为一旦遇到困难黄百韬总比李天霞靠得住。

张灵甫发觉被围之后，曾向第一兵团司令官汤恩伯请求命令李天霞部火速增援。李天霞受命之后，仅派出一个团，冒充旅部番号，进至沂水西岸，可最终还是把沂水西岸的阵地丢了，导致张灵甫的一个旅被华东野战军分割出去。张灵甫在电话里向李天霞的一位团长发火了，说他已经禀报国防部，整编七十四师的右翼要是出了事，整编八十三师要负责。李天霞顺水推舟，立即命令这个团归张灵甫指挥。可是，他同时又给他的团长打去电话，暗示部队遇到情况就撤退。这还不算完，李天霞的整编八十三师不但没有再向孟良崮靠近一步，而且主力开始全部向东收缩，最终与整编七十四师拉开了一段无法弥合的距离。李天霞说：“张灵甫不是顶有办法吗？”

在蒋介石的严厉催促下，十五日，汤恩伯离开临沂前往孟良崮前线。走到半路，碰见刚从孟良崮跑出来兵团副司令官李延年。李延年对汤恩伯说“七十四师现在很狼狈”，劝汤恩伯不要再向前走了，因为垛庄已经被共产党军队占领，一旦陈毅、粟裕部掉头南下就麻烦了。汤恩伯立即返回了临沂。

此刻的孟良崮战场上，阵地几乎全部是呈四十五度角的陡峭而坚硬石坡，无论对于守方还是攻方，都足以令最勇敢的士兵生畏。岩石上无法挖掘战壕和掩体，仰面攀登上去，双方相互发现的时候枪口都已经近在眼前了。

十五日，国民党军战地报告：

十五日拂晓前，匪军陆续增加，不断扑犯，枪炮（弹）如雨，火光烛天……战斗惨烈，素所未见……拂晓，倾万泉山失守，匪即猛攻雕窝高地。同时，东北麓方面之匪蚁聚麇集，于其炽盛火力之下，逐波冲锋，势如潮涌……午间，垛庄方向窜到匪之第六纵队，便沿西麓进犯，于是战况更形紧迫。午后迄夜间，匪军更番迫近，我军抵死搏斗，反复冲杀……战斗尤为惨烈。

一向冷静的粟裕记述道：

围歼战是一场剧烈的阵地攻坚战。我军于十五日下午一时发起总攻，从四面八方多路展开突击。敌第七十四师和第八十三师十九旅五十七团麇集于孟良崮、芦山及附近山地，依托巨石，居高临下，不断对我发动反冲击。从战术上来说，依托阵地的反冲击，可以给对方以相当的杀伤，何况我军为了争夺每一个山头、高地，要从下向上仰攻，每克一点，往往经过数次、十数次的冲锋，反复争夺，直到刺刀见红，其激烈程度，为解放战争以来所少见。

十五日黄昏，整编七十四师已被压缩于东西三公里、南北两公里的狭窄山地间，人员、马匹和辎重全部密集地暴露在华东野战军的炮火打击之内，一颗炮弹就能造成惊人的伤亡。时值盛夏，石山坚硬，寸草不生，水源奇缺，国民党军飞机空投的粮食、水囊、弹药大多落在外围华东野战军的阵地上，张灵甫的数万官兵饥渴难支，疲惫不堪，伤亡惨重。下午，在飞机轰炸的掩护下，整编七十四师先向垛庄方向突围，被六纵阻击回来；再向西北方向突围，被一纵队堵了回来；又转向雕窝方向，一度占领雕窝，后又在九纵的凶猛反击下被迫撤回。在残酷的战斗中，整编七十四师头顶烈日，向九纵控制的地域发起冲击以争夺水源，九纵的一个连誓死不让国民党军接近水源，拉锯般的残酷争夺战中这个连几乎全部伤亡，双方官兵的尸体布满了水源四周。

死尸的味道和硝烟的味道混合在一起，在炽热的高温中弥漫。

晚上，张灵甫转移到孟良崮上的一个山洞里，微弱的烛光映在黑黢黢的石壁上，张灵甫再次向汤恩伯呼叫请求迅速解救。汤恩伯要求张灵甫主动向万泉山方向突围。张灵甫的回答是：“本部已无力向万泉山实施攻击。”入夜，张灵甫给仍在阵地上的五十七旅旅长陈嘘云打电话，要他撤到师部这边来，张灵甫说：“嘘云，我们最后也要在一块。”那时，整编七十四师师部与五十一旅的联系已经中断，而华东野战军从五十一旅阵地上发射的炮弹已经打到五十七旅的阵地上。

十五日夜，阴云遮蔽星月。

支前干部吴相林的运粮队已经接近激战中的孟良崮，他计算了一下，余下的路程大约还有十五公里。此时，运粮队的农民们都把外衣脱了，他们把衣服全盖在了粮食上，因为怕粮食被浓重的夜雾打湿了。前面是座大山，路窄山陡，车子无法推了。大伙说，去晚了，仗打完了，说不定能缴获很多大米白面，队伍就吃不上咱庄的粮食了，这等于没完成任务呀。于是，把粮食卸下来，把小推车藏好，所有的人把粮食背在了自己背上，多的背了一百多斤，少的也有七八十斤。吴相林扛着粮食口袋走在最前面，远远地看见天上盘旋着飞机，他数了数有十来架。

此刻，在战场上奔波的外国记者发现了共产党军队打胜仗的根本原因：孟良崮战役期间，国共双方的部队都在紧张秘密的调动之中。通常认为，军队路过村庄的时候，百姓们都会藏起来。“可是，这种概念是再错不过的了。”美国记者贝蒂·格兰姆说，当共产党军队开来的时候，“沿途的每个村庄都喜气洋洋，每一家的门前都有一盏把油盛在浅碟里点燃的油灯，从土墙的一些缺损处发出微弱的亮光。所有村民都站在那儿迎接队伍……”

……半夜以后，部队开始到达。先是四五个人组成的一个个小组，接着，一次来十个或十五个人。农民们拥到村外，在道路两旁列队，放在地上的油灯在他们激动的脸上投下古怪的、忽隐忽现的影子。一支由两面鼓、一对钹、一个喇叭和一支笛子组成的乐队，只要见到一位士兵从黑暗中突然走进那小小的光圈，就立刻演奏起来，让那吓人而又激动人心的喧闹声在夜空里回荡……无论部队已经如何疲惫，每个士兵仍然加快了脚步，就像马拉松比赛即将到达终点时那样。农民们一张张被稀奇古怪的影子扭歪了的脸，只要看见一支支闪闪发亮的美国机关枪，或者一架巨大的美国电动机车（汽车），就变得格外兴奋。人们一次又一次像举标枪似的伸出拳头，朝士兵们高呼："打败蒋介石！""你们是我们的子弟兵，我们是一家人！"

共产党的部队进村了，妇女们给官兵们洗衣服，官兵们给房东挑水劈柴。农民们聚集在官兵们身边，想听听外面发生的大事情。他们对武器格外感兴趣，一个共产党干部决定让乡亲们开开眼，他端起美国机枪打了一梭子，巨大的声响让农民们惊慌地向后躲闪，然后他们热烈地鼓起掌来。队伍离开村庄后，一个农民在官兵们住过的房子里发现了一支钢笔。这个农民竟然步行追了两天，把他认为与革命有着重要关系的钢笔送还给了部队——"他认为这样做有助于取得胜利和和平。"但是，农民们对国民党军队决不会这样做，"如果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丢失了，老百姓就只会把它留在自己手里，作为对他们从部队那里受到损害的一种赔偿"。

孟良崮的战斗打响以后，在通往战场的各条山路上，密集地行进着支前的独轮小车。农民们的小车上装载着战争所需要的所有物资：粮食、枪支、弹药、柴草、木料、药品、挖战壕的铁制工具、攀登用的木制云梯、棉衣棉被和大量的布匹，甚至还有给牺牲官兵准备的衣服和棺材。农民们冲上前沿抢救华东野战军的伤员，对面的国民党军朝他们喊："别抬了！丢下吧！小心被子弹打着！"但农民们依旧不顾一切地往下抬，他们中的不少人真的死在了弹雨中。在战场四周的山路上，到处可见由青壮年组成的担架队，妇女和老人们则跟在担架旁，不断地给伤员们喂水和干粮。伤员进村了，女人们看着浑身是血的官兵一边抹眼泪，一边用秫秸量伤员的脚，她们想让伤员穿上一双鞋底绣有"大吉大利"字样的新鞋。那些急需动手术的伤员要紧急转

运，大娘把昨晚上她眼巴巴地守了一夜的伤员送到村口，唠叨着嘱咐担架抬得稳一点，然后俯下身子对伤员说："孩子！你命大！咱娘俩日后见！"

孟良崮战役期间，随军常备支前民工七万七千人，二线常备支前民工十五万四千人，后备支前民工四十五万九千人，整个孟良崮战场上支援华东野战军作战的支前民工多达六十九万人——美国记者赫伯特·安布德从孟良崮回到美国以后说："我预言共产党将要取得胜利。"

十六日晨，张灵甫藏身的山洞开始遭到炮击。

华东野战军已经攻到咫尺之遥，整编七十四师到了它的最后时刻。

华东野战军的炮火发挥出最大的杀伤力，拥挤在一起的整编七十四师官兵密集地暴露在裸露的岩石上，炮弹在岩石上爆炸，飞溅的弹片和岩石的碎片令无处隐蔽的他们大片伤亡。华东野战军官兵从各个方向蜂拥而上，最后的白刃战在孟良崮山顶上展开。

上午八时，蒋介石发来急电："山东共匪主力今向我军倾巢出犯，此为我军歼灭共匪完成革命唯一之良机。凡我全体将士应竭尽全力，把握此一战机，万众一心，共同一致，密切联系，协力迈进，齐向当面之匪猛攻，务期歼灭共匪，以告慰总理及阵亡将士在天之灵。如有萎靡犹豫，逡巡不前或赴援不利，中途停顿，以致友军危亡，致匪军漏网逃脱者，定必以畏匪避战，纵匪害国贻误战局，严究论罪不贷。希望奋勉勿误。"在蒋介石的严令下，汤恩伯发电各部队："我张灵甫师连日固守孟良崮，孤军苦战，处境艰危。我奉令应援各部队，务须以果敢之行动，不顾一切，星夜进击，破匪军之包围，救胞泽于危困，以发扬我革命军亲爱精诚之武德与光荣，其有徘徊不前，见危不

救者，决非我同胞所忍，亦为恩伯所不忍言也。”整编二十五、六十五、八十三师等部队被迫发动猛烈的攻击。

负责阻援的华东野战军各部队拼尽最后之力誓死不退。而在围攻孟良崮的战场上，陈毅和粟裕不断给各纵队指挥员打电话：“谁拿下孟良崮谁就是英雄！”

雨云密布，天昏地暗。

山洞里的张灵甫已经绝望，决定与他的军官们集体自杀。副师长蔡仁杰拿着夫人和孩子的照片痛哭不已；副参谋长李运良把脸上涂上血污藏了起来，当初就是他一再向张灵甫表态：“军座，此虽孤山，但地形险要，我们要置之死地而后生，临险境而逢生。”

张灵甫开始给结婚不到两年的夫人王玉龄写诀别信：

十余万之匪向我猛扑，今日战况更加恶化，弹尽援绝，水粮全无。我与仁杰，决以最后之一弹诀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人民与部属。老父来京，未见痛极，生善待之，幼子望养育之，玉龄吾妻今永诀矣！灵甫绝笔，五月十六日孟良崮。

同时，张灵甫还给蒋介石写诀别信，诉说由于友军先是贻误战机，后又见死不救，尤其是李天霞部没有保证整编七十四师右翼的安全，从而导致了现在的战场结局。之后，张灵甫将整编七十四师副师长以下、团长以上的军官姓名一一在诀别信中报给了蒋介石，请求蒋介石给予其家眷以照顾。最后，张灵甫再次痛斥了国民党军各部队“各自为谋，同床异梦，胜则争功，败不相救”的现象以及对蒋介石赏罚不明的严重不满：

以国军表现于战场者，勇者任其自进，怯者听其裹足，牺牲者牺牲而已，机巧者自为得志。赏难尽明，罚每欠当，彼此多存观望，难得合作，各自为谋，同床异梦……匪诚无可畏，可畏者我将领意志之不能统一耳。

十六日下午十七时，首先冲到张灵甫藏身的山洞口的，是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特务团一营。官兵们在副团长何凤山的率领下，突破山洞西侧的阻击阵地后，与整编七十四师参谋长魏振钺率领的阻击部队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反复的搏杀中魏振钺被俘。一营继续向山洞逼近，冲在最前面的三连指导员邵至汉中弹牺牲。官兵们越过指导员冒着血的身体，呐喊着拼死向前，在击毙了张灵甫的卫队长后，他们开始向洞内扫射。

与张灵甫一起躺在血泊中的有：整编七十四师副师长蔡仁杰，五十八旅旅长卢醒、副旅长明灿、团长周安义等。整编七十四师参谋长魏振钺、副参谋长李运良，五十一旅旅长陈传钧、副旅长皮宣猷，五十七旅旅长陈嘘云，五十八旅副旅长贺诩章等被俘。

倾盆大雨狂泻而下。

雨水夹杂着血水到处流淌。

吴相林的运粮队终于登上了孟良崮，已经断粮的华东野战军官兵老远就跑来迎接。卸下肩头的粮食，农民们就去看俘虏，俘虏之多令他们惊讶不已，密密麻麻地足足坐了大约八亩地的地方。大伙议论说：“这些人比咱那两三个庄的人还多！”其中有个农民突然想起来了，忙说：“得问问他们，是谁在那个庄用阴火烧死那个小伙子的！”

孟良崮战役，华东野战军全歼国民党军整编七十四师和整编八十三师的一个团。国民党军伤亡一万三千余人，被俘一万九千六百七十六人。华东野战军伤亡一万两千一百八十九人，其中除其他原因的减员外，阵亡两千零四十三人，负伤九千三百余人。

交战双方的伤亡人数几乎相等，战斗的残酷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华东野战军的伤员和阵亡官兵的遗体被百姓们转移和安葬了，只剩下国民党军阵亡官兵血肉模糊的尸体横陈在孟良崮的岩石上。

四十四岁的张灵甫死了。

蒋介石获悉整编七十四师被歼灭后，认为是内战以来“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为此，第一兵团司令官汤恩伯被撤职，整编二十五师师长黄百韬被撤职留任，整编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被撤职押送军法处查办。

华东野战军在山洞中找到张灵甫的尸体。官兵们用担架抬着这具遗体开始转移，两天之后，由于天气炎热尸体开始腐烂，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决定就地掩埋。官兵们花了四百块大洋买了口上好的楠木棺材，将张灵甫的遗体擦洗干净，给他穿上了新衣服，安葬在沂水县野猪旺村后的一座小山冈上。跟随第六纵队转移的整编七十四师被俘军官要求最后看一眼他们的师长。经纵队司令员王必成同意，在纵队副司令员皮定钧的陪同下，九名将校军官在张灵甫的遗体旁跪成一圈，泣不成声。华东野战军在张灵甫的坟前立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张灵甫之墓。

之后，共产党方面广播了埋葬张灵甫的地点，希望他的家属到该处收尸。不久，张灵甫的棺椁被国民党方面挖走，重新安葬于南京玄武湖樱洲之上。

一九四九年四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国民党政权首府南京，解放军官兵们冲进城后，在玄武湖边看见了一座高大的墓碑，墓碑上写着：整编第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将军之墓。

五月二十日，新华社发表评论《祝蒙阴大捷》：

……从去年七月到现在，华东人民解放军已经歼灭了蒋介石正规军五十个旅……蒋介石以一百个旅使用于华东战场，欲以此决定两军胜负，这个主观幻想已接近于最后破灭。这次蒙阴胜利，在华东解放军的历史上更有特殊意义。因为：第一，这是打击了蒋介石今天最强大的和几乎唯一的进攻方向；第二，这是打击了蒋介石的最精锐部队；第三，这个打击是出现于全解放区全面反攻的前夜……

## 黄土沟壑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国民党《中央日报》载："毛泽东、周恩来等已迁往佳木斯，或已潜逃出国。"

毛泽东一行撤离延安后，径直向北偏东方向转移，三月十八日傍晚抵达延川县永坪镇以南的一个小山村。第二天上午九时左右，正准备继续上路的时候，停在村口的汽车被国民党军飞机发现，在猛烈的轰炸和扫射中，毛泽东乘坐的那辆汽车被打穿了几个窟窿，但所幸没有人员伤亡。又走了两天之后，二十一日晚，一行人抵达清涧县境内的一个名叫高家崄的小山村，这个只有二十多户人家的小山村位于咸阳至榆林公路以东约五公里处。

毛泽东打算在这里住几天。

胡宗南部已经从延安向北追击而来。

胡宗南将前进指挥所由洛川移至延安之后，站在作战地图前面对广袤的黄土沟壑，终于认识到无论获得了多么大的荣耀，现在他必须继续作战。毛泽东和彭德怀都还没有捉住，西北的共产党部队还没有受到重创，如果不把他们赶出陕西，或者把他们全部歼灭，自己的"殊勋"并不牢靠，说不定哪天此前所有的荣耀都会化为一场梦幻。虽然没有任何可靠的情报证明毛泽东和他的部队到底在哪里，但是胡宗南判定，共军主力一定固守在延水以北地域，并会聚集在绥德至延安的公路两侧，一为掩护中共首脑机关，二为"趁机窥复延安"。于是，他下达的作战命令是："以一部佯击共军正面，牵制共军主力，而以主力由

延川、清涧地区先切断黄河各渡口，而后向左旋回，包围共军于瓦窑堡附近而歼灭之。”

胡宗南的战役部署是：以整编第一师和整编九十师共五个旅为右兵团，归董钊指挥；以整编三十六师、整编十七师十二旅、整编十五师一三五旅共四个旅为左兵团，归刘戡指挥；另以整编七十六师二十四旅、一四四旅为右支队，掩护主力的右翼，共同完成攻占延川的任务。同时，整编二十七师三十一旅、四十七旅负责守备延安；整编十七师四十八旅、八十四旅和整编三十八师五十五旅调至延安附近，以确保延安的安全。这是胡宗南在没有得到确切情报的情况下，主观计划出来的作战方案。其核心内容是：采取两翼包抄的战术，向他猜测的彭德怀部集结地域实施合围。

与毛泽东分手后，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兵团到达梁村，梁村位于延安东北方向和青化砭西北方向两条公路的交叉点上，西北野战兵团指挥机构在这里正式组成：彭德怀任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副司令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彭德怀深知自己责任重大：无论是中共中央的安全，还是西北战场的成败，都直接关系到全国战争的进程，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重大的历史缺憾。他对身边的参谋们说：“中央把这么重的担子交给我，我要是指挥不好，犯了错误，那就是我彭德怀无能，对人民犯了罪，对不起中央的重托……带兵打仗是十分严肃而责任重大的事，稍一不慎就要死人，人命关天呀！”

在部队撤离延安的时候，彭德怀已经命令主力在青化砭、甘谷驿、茶坊一线集结待机，同时派出三五八旅二营佯装主力与胡宗南部保持着若即若离的接触——彭德怀试图把胡宗南逐步引向延安以北的安塞方向，目的是让敌人距离毛泽东一行远一些，然后在敌军的调动中寻找破绽创造战机。

果然，三五八旅二营的边打边撤让胡宗南进一步认定：共军主力确实在向安塞方向溃退。他随即命令整编第一师和整编九十师沿延河两岸向安塞方向攻击前进，整编第二十九军一部从正面向北攻击，同时命令整编二十七师三十一旅由临真向青化砭前进，保障主力侧翼的安全。

三月二十一日晚，彭德怀得到当地百姓的报告，说三十一旅正在准备粮草，计划二十四日占领青化砭。

彭德怀立即意识到：吃掉一股敌军的战机来了。

西北野战兵团指挥部制订了一个在青化砭伏击相对孤立的三十一旅的作战计划。

彭德怀将指挥部由梁村移动到青化砭西北的左家庄。

青化砭位于延安东北约三十公里处，小镇坐落在一条南北走向约二十公里的山谷中。两面是高高的黄土山崖，咸阳至榆林的公路和一条小河蜿蜒其中。从地形上看，走到青化砭，就如同走进一个狭长的口袋里，只要口袋的两头一堵，袋子里的人便无路可走。这的确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战前，彭德怀反复强调，这是撤离延安后的第一仗，胜败关系到今后的作战，一定要打得干净利索。因为黄土山崖上植被稀疏，彭德怀还特别强调了部队的隐蔽，因为一旦暴露或者走漏了风声，打伏击的计划就会泡汤——“一定要注意隐蔽，敌人来了就不顾一切地杀下去！要突然，要猛，一鼓作气把敌人歼灭在这沟槽子的公路上！”

二十三日，作战命令下达：第二纵队和教导旅埋伏在房家桥至青化砭以东，敌人进来后负责断其退路；第一纵队埋伏在西面的阎家沟

至白家坪，新编第四旅埋伏在青化砭东北方向的高地上，敌人进入后迅速截击将袋口紧紧扎上。

二十四日，各部队进入伏击阵地。

春寒料峭的黄土高原，黄土还没有完全解冻，山头背阴地上还留有残雪。从拂晓开始，官兵们在寒风中一动不动地隐蔽着，一直到黄昏时刻也没看见敌人。一些官兵沉不住气，纷纷议论说，这里距离延安这么近，部队调动时走过那么多村庄，也许已经走漏了消息？或者老百姓的情报有误，敌人根本没打算从这里经过？彭德怀对官兵们说，敌人一定会来，情报不会有错，这里是老解放区，咱们的群众决不会向敌人告密的！况且，胡宗南不是个草包，他的主力北上安塞，他不会不派部队保障侧翼的安全。况且他有大炮坦克，不会不走陕北这条唯一的公路，他一定能来！

彭德怀命令部队撤下去，明天天一亮再来埋伏。

让彭德怀空等一天的是整编二十七师三十一旅少将旅长李纪云。胡宗南的命令是让他二十四日占领青化砭，部队出发时间应是早上八点半，但是到上午十点钟他还在睡觉。前进指挥所打来电话，询问部队推进到何处，李纪云干脆回答说，干粮没有准备好，出动计划推迟一天。实际上，李纪云不按时出动的真正原因，是他心里不怎么踏实。前几天，他认为距离延安如此近的青化砭一带不会有共军主力，但情报显示，他的作战目的地并不像军座想象的那么安全。他给胡宗南发去了“势单力薄，恐有不测”的电报，结果遭到胡宗南的严厉训斥：“贪生怕死，畏首畏尾，非军人气魄，绝对要按规定北进，迅速占领青化砭，否则以畏缩不前论罪。”

李纪云以准备干粮为由推迟出动的情报很快被彭德怀得知。

西北野战兵团各部队于二十五日拂晓前再次进入伏击位置。

拂晓六时，三十一旅的便衣侦探和搜索连分别在公路两侧小心开路，旅长李纪云率领旅部和九十二团随后跟进。搜索部队在公路两侧的半山腰上不断地用机枪无目的扫射，飞机在低空盘旋，但无论是火力侦察还是空中侦察，一切都表明这里根本没有共军——即使没有百姓欺骗他们或者向他们封锁消息，三十一旅的搜索队和天上的飞行员确实眼力不够。同时这也再次证明，共产党官兵具有不可思议的与光秃秃的黄土完全融为一体的本领。既然没有敌情，三十一旅便走得掉以轻心，机枪连枪衣也没有卸下，迫击炮还装载在骡马背上的驮子里，长长的队伍缓慢地走进了青化砭附近的深壑之中。

在沟壑两侧埋伏着的西北野战兵团官兵紧张而兴奋，刚才还又冷又饿，现在个个浑身热汗。干部们按捺不住，请示彭德怀：敌人进入我攻击位置！是否可以攻击？彭德怀回答：“一定要等敌人全部进来了再关门！”

上午近十时，李纪云部官兵包括勤杂脚夫共三千人全部进了口袋。一颗信号弹腾空而起，沟壑两侧的军号声骤然响成一片。口袋的两头很快就被封堵，山头上的西北野战兵团官兵杀声震天地冲了下来。包括旅长李纪云在内，三十一旅还没有反应过来，潮水般的攻击已近在眼前。李纪云的部队完全被压缩在沟壑底部，瞬间被截成数段，手榴弹和炮弹密集地在沟壑间爆炸。由于两军官兵混战在一起，天空的飞机无法投弹，盘旋了几圈之后，赶快飞回去报信去了。一小股国民党军企图占领一个小高地，但很快就被打了下去。二纵司令员王震跟随官兵们冲到沟底，他看见公路两侧到处是国民党军的尸体，而他的官兵们有的在抓俘虏，有的在收集弹药，个个兴高采烈。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被西北野战兵团官兵捉住的时候，像根木头一样在公路上站着，嘴里正嘟囔着什么。

战斗持续了不到两个小时。三十一旅旅部和九十二团官兵无一漏网。被俘的军官除了旅长之外，还有副旅长周贵昌、参谋长熊宗继、九十二团团长谢养民等。

青化砭一仗，是典型的伏击战。伏击战的前提是战前不得泄露半点风声。万人以上的大部队，从各个方向向一个狭窄的地域集结，中间还撤下来休息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再次来到战场上。战场距离延安如此之近，必定不是人烟稀少之地，西北野战兵团集结时不可避免地会经过一些村庄，即使在小路上秘密行军也难免会碰上当地的农民、牧羊人、商贩以及各色人等。虽然国民党军使用了空中侦察和地面侦探的双重方式，搜索和盘查不可谓不小心细致，但是，他们居然没有得到一点西北野战兵团移动的消息，这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这是中国内战一个最为显著的特色。”美国记者贝蒂·格兰姆说，“大多数农民本来可以告诉国民党军附近有解放军的埋伏，但是，至少我采访过的被俘的国民党军官这么认为：这里的老百姓完全有本事不让他们知道对手在何处。”对此，彭德怀在战后感叹道：“古人写信，信封上写‘如瓶’二字。边区群众对敌人真是守口如瓶，不是自己人就不会给你说真话，青化砭这一仗，要不是在陕北，是很难打的。”

就在国民党《中央日报》说毛泽东等人不是到东北找林彪去了，就是已经跑到外国去了的时候，在清涧县高家崄村住了四天的毛泽东获悉青化砭战斗胜利的消息，致电彭德怀：“庆祝你们歼灭三十一旅主力之胜利，此战意义甚大，望对全体指战员传令嘉奖。”之后，毛泽东从高家崄出发到达了子长县任家山村。

在这个距离延安仅百公里的小山村里，毛泽东萌生了一个念头：留在陕北，哪也不去。他在三月二十七日发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表达了自己的这个决心：

宥（二十六日）电悉。积极歼敌方针极为正确，部署亦妥，已令陈（陈赓）、谢（谢富治）积极动作。现在不怕胡军北进，只怕他不北进，故陈、谢迟几天行动未为不利。傅作义的一〇一师等部向晋西北进攻，左云失守。阎锡山攻克孝义、兑九峪，有向中阳、石楼出扰之可能。数月内贺（贺龙）、李（李井泉）处局面将较紧，但只要陕北及陈谢在南线胜利，即有办法对付阎、傅。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

同日，毛泽东在给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和政治委员李井泉的电报中强调："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目前主要敌人是胡宗南，只要打破此敌，即可改变局面，而打破此敌是可能的。"

二十八日，毛泽东一行转移到清涧以北石咀驿附近的枣林子沟。这个小山村只有十来户人家。毛泽东住的窑洞的主人叫吴进增，他看见毛泽东时显得有些拘谨。毛泽东问："老乡，我们住在这里很打扰你，如果我们住进去，你住在哪里？"吴进增说："坡上是我兄弟家，我可以住在那里。"

二十九日晚，毛泽东在陕北农民吴进增的窑洞里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会议，会议正式讨论了中共中央是继续留在陕北还是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的问题。

毛泽东详细阐述了决定留在陕北的理由：一、中共中央在延安十多年，一直处于和平环境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了，如何向陕北人民交代？二、有人说陕北的敌我力量对比是十比一，敌人过于强大，出于安全考虑也要离开这里。但是，我们留在陕北，就可以牵制住胡宗南的二十三万大军，蒋介石就不能轻易地把这些部队投到全国其他战场上去，就可以减轻其他战场的压力。三、有人主张派军队进入陕北，加强中共中央的保卫工作。不妥。"陕甘宁边区巴掌大块地方，敌我双方现在就有几十万军队，群众已经负担不起。再调部队，群众就更负担不起了。"

任弼时主张不留在陕北，希望中央及部队全部东渡黄河到山西去。他认为，中央是指挥战争的中枢，各解放区的领导都主张中央转移到晋西北或者太行山等比较安全的地方去，以指挥全国战争，这个建议是从全局考虑的。现在中央在陕北的处境极其险恶，一面是黄河天堑，三面是敌人，军事上讲这样的位置如同绝地，万一让胡宗南一网打尽怎么办？

毛泽东说："哪里最安全？人民拥护我们的地方最安全，我看中央在陕北的安全有保证。"

争论到最后，大家说，要留在陕北就都留下。

但毛泽东又不同意，说不要让胡宗南真的把我们一网打尽。

第二天，会议形成最后的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继续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和军委工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东渡黄河前往华北，担负中央委托的工作。

决心已定，立即行动。

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前往晋绥解放区，毛泽东一行则离开枣林子沟前往子洲县。毛泽东主张只留下一个警卫班，其余官兵全部跟随朱总司令过黄河。但是朱德坚决不同意，命令警卫团的手枪连、骑兵连和两个步兵连留下来跟随毛泽东。

四月五日，毛泽东到达靖边县境内的青阳岔。

此时，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按照军事编制实行轻装，并编为四个大队，成立统一指挥的司令部，任弼时任司令员，陆定一任政治委员。为了保密，周恩来建议给每个人起个代号，任弼时叫史林，陆定

一叫郑位，毛泽东叫李得胜，周恩来叫胡必成。多年后，周恩来回述往事时说："我们领导革命战争时，在全国、在中央决定问题的只有三个人。当时中央书记处共有五个人，分散在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刘少奇同志和朱德同志，他们领导全国土改，搞根据地；在中央只有三个人，毛主席、周恩来与任弼时同志。所谓中央，就是这三个人嘛。"

就在毛泽东在黄土沟壑中不停地转移的时候，胡宗南也在艰苦地寻找着毛泽东和彭德怀的踪迹。在延安的东北部地区，胡宗南的八万兵力拥挤在一起，排成绵延数十里的方阵，行则同行，宿则同宿，"不走大道平川，专走小道山梁，不就房屋设营，多在山头露宿，不单独一路前进，而是数路并进"，就这样密集地在黄土沟壑中滚过来滚过去，胡宗南说这是"小米碾子式的战法"。青化砭一战令胡宗南吃惊不小，他命令部队各路之间互相靠拢，每天只走十至十五公里，虽然笨拙但能确保没有缝隙。彭德怀几次想歼灭其中的一股，都因为敌人太密集而无法下手——"以致三面伏击已不可能，任何单面击敌均变成正面攻击。"四月初，胡宗南占领了延川、清涧和瓦窑堡等要点，但依旧没有找到彭德怀主力的踪迹。部队在黄土高原的一道道山梁间爬上爬下，被拖得精疲力竭，给养也发生了困难，于是胡宗南命令一三五旅驻守瓦窑堡，整编七十六师驻守延川和清涧，主力则南撤至蟠龙镇和青化砭地区休整补充。

彭德怀立即决定再打一场伏击战，歼灭撤退中的敌人之一部。按照彭德怀的设想，撤至永坪地区的只有刘戡的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部和一个旅，西北野战兵团集中主力是可以全歼敌人的。但是仗一打起来却十分不顺利，参战部队战前准备不足，没有很好地勘察地形，也没有修筑好工事，攻击时间也选择不当，结果刘戡部很快占据了有利地形，并开始实施猛烈反击，而且董钊的增援部队也迅速向战场推进，彭德怀只好命令部队撤离。

永坪的战斗使胡宗南捕捉到了彭德怀主力所在的位置。胡宗南下达了新的作战命令：“以主力由蟠龙镇附近地区逐次扫荡牡丹川（延安市）以北各山沟，并向右回旋，会同瓦窑堡南下之一部，包围共军而歼灭之。”在胡宗南的命令中，有一个信息引起了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注意：驻守清涧的整编七十六师二十四旅七十二团将前往瓦窑堡接替一三五旅的防务。毛泽东电示彭德怀：“清涧之二十四旅一个团本日调赴瓦窑堡。该团到瓦后，一三五旅很可能调动，或往安塞，或往蟠龙，望注意侦察，并准备乘该旅移动途中伏歼之。”

十三日，西北野战兵团司令部在瓦窑堡桑树坪村召集干部会议。彭德怀住的那间小窑洞的门窗，被曾在这里驻扎过的国民党军拆走修工事了，眼下门窗用草帘子遮挡着，各纵队和各旅的干部们把黑乎乎的窑洞塞得满满的。彭德怀说，从青化砭和蟠龙镇出动的整编第一军的五个旅和整编第二十九军的三个旅，都被阻击在夏家沟、安家崖底和张喜沟一线。从该敌前进的态势上分析，一三五旅很可能经子长、蟠龙大道南撤，以便向北进的主力靠拢。我们要在这个旅还没有靠近主力的时候，对其实施围歼。彭德怀在地图上用手指画出了围歼一三五旅的那块地方，那个地方叫羊马河。

羊马河的地形很像青化砭。

会议确定的各部队的任务是：三五八旅以积极防御，把整编第一军吸引到西边去；独立第一旅和警备第七团负责阻击整编第二十九军；二纵、新编第四旅和教导旅在羊马河伏击。彭德怀特别强调：“一是要坚决挡住南线敌军主力的进攻，不让他同一三五旅会合；二是要速战速决，不能拖延时间。否则敌人增援上来，不但不能歼灭一三五旅，我们自己还会陷于腹背受敌。”

十四日清晨，一三五旅在瓦窑堡南郊集合完毕，沿着瓦窑堡至蟠龙的大道按照战备行军的序列开始向羊马河前进：四〇五团为前卫，

旅部、特务连、通讯连、工兵连、化学炮连、四〇四团、辎重营和卫生队为本队，后卫部队由四〇四团的两个连担任。一三五旅旅长祝夏年因腿部骨折正在西安住院，该旅现在由副旅长麦宗禹代理旅长职务。上午九时左右，旅部行进到三郎岔以北地区时，突然听见了枪炮声，搜索部队报告在大道两侧发现了西北野战兵团大部队。代旅长麦宗禹和参谋主任朱祖舒立即登上了西面的山坡，麦宗禹清楚地看到自己的部队已经进入了共军的伏击圈。他立即下达了一系列作战命令：四〇五团占领东山，掩护主力向蟠龙方向前进，主力通过后，该团迅速脱离战场，作为全旅的后卫掩护。四〇四团以一个营向蟠龙攻击前进，另两个营抢占西山的各要点，巩固现有阵地。炮兵开设射击阵地，重点支援四〇五团，用火力阻击共军的对该团的攻击。旅指挥所设在西山半腰上。通讯连立即与延安指挥所取得联系报告我旅遭遇共军伏击。

此时，以宽大正面向北“扫荡前进”的董钊和刘戡的八个旅也遇到了猛烈的阻击。实际上，阻击这九个旅的仅仅是王震部的三五八旅。但各部队的报告都称遭遇共军主力，于是司令部的通报说，我军正面出现共军主力，各部队要慎重行动，每一小时用无线电互相联络一次。整编九十师师长陈武认为“这下可把共军主力兜住了”，因此对每一小时就要联络一次很是不满意：“为寻找共军主力，不知跑了多少冤枉路，现在好容易追上了，却又胆怯起来，这不是故意放走共军的主力部队，要他们跑掉吗？真让人恼火！这样胆小还能同共产党打仗吗？”三五八旅采取逐次阻击的战术，打一阵撤一段，让胡宗南也认为总算抓住了彭德怀的主力，于是命令董钊和刘戡猛烈攻击前进——三五八旅果然把胡宗南的主力向西牵引而去。

在羊马河，新编第四旅十六团首先冲下去截断了一三五旅的退路，接着各部队从四面八方的山梁上冲击下来。接到一三五旅遭遇伏击的电报后，胡宗南立即命令一三五旅就地构筑工事，同时命令董钊

和刘戡迅速回转，不惜一切向羊马河推进。但是，董钊和刘戡部已经被彭德怀的阻击部队死死缠住。离一三五旅最近的整编三十六师派出一六五旅驰援，一六五旅攻下一道山梁又面对着下一道山梁，最后仅仅与一三五旅隔着两道山梁，就是无法突破西北野战兵团的阻击线。下午十六时，彭德怀命令首先集中兵力攻击一三五旅四〇五团，教导旅负责正面，独立第四旅和三五九旅负责左右两侧，新编第四旅负责牵制一三五旅旅部方向。四〇五团无法抵挡潮水般的攻击，所支撑的山头一个个失守，最后团长陈简被俘，四〇五团停止了战斗。接着，王震集中了二纵的全部炮火猛烈轰击四〇四团和一三五旅旅部的阵地，炮火下各部队迅速突破敌人的阻击前沿。黄昏时分，总攻开始，被俘的国民党炮兵也调转炮口协助共产党官兵进攻，四〇四团团长成耀煌被俘，一三五旅被全歼——“我被迫退到了沟里。”代旅长麦宗禹回忆说，“没想到这里正集合着大部解放军。在沟里我遇到一个战士，我随着这个战士到了他的部队，我就这样被俘了。”

战斗结束了，麦宗禹站在路边，他见到了王震司令员。他们“互通姓名，一如朋友相见”。麦宗禹随即跟着王震的部队一起转移。晚上在一个小村庄里休息，麦宗禹和王震一起吃了晚饭，谈了一会儿天，都感到十分疲劳，于是挤在一条土炕上睡下了。刚刚打完仗的王震很快就发出了鼾声，麦宗禹彻夜难以入睡。几个小时之前还和身边的这个人拼死厮杀，而现在却如同兄弟一样睡在一条炕上——麦宗禹后来说：“共产党人的胸怀令我非常敬佩”，“我一生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十七日，新华社播发了题为《战局的转折点——评蒋军一三五旅被歼》的社论。胡宗南仔细地阅读了这个社论的抄写稿。社论说：“一三五旅的被歼灭，标志着胡宗南从此走下坡路”，“胡军所集中的兵力，像瞎子一样，只能到处扑空，白天武装大游行，晚上几万人集中大露营”，“由于粮食缺乏，将士疲劳，减员异常巨大。据俘虏供：胡军每天只吃一顿稀饭一顿干饭”。“在陕甘宁边区军民方面，情况完全

相反。游击战争很快发展，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很快提高，军民团结很快加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作战方法很快被领会，因而愈战愈强”。“一三五旅的全部被歼灭”是“西北战局的转折点，同时就是全国战局的转折点”，“可以预料，四月开始后的两三个月内，蒋军将由攻势转变为守势，人民解放军将由守势转变为攻势”，“历史事变的发展表现得如此出乎意料，敌人占领延安，将标志着蒋介石灭亡；人民解放军的放弃延安，将标志着中国人民的胜利”。

胡宗南的心绪恶劣起来。身边的人小心地提出了“放弃延安”的建议。胡宗南认为这一步对国内外观瞻影响太大，蒋介石不会同意。经过反复商量，他筹划出了一个对付目前局势的方案：借口陕北地形复杂，部队不易展开，筹粮十分困难，且共军时聚时散，主力不好捕捉，拟以自己的部队固守延安，让青海的马步芳部和宁夏的马鸿逵部前出至陇东，背靠晋陕绥边区邓宝珊的部队守备榆林，东面以黄河为屏障，共同围歼共军于陕北。胡宗南思索着如何让蒋介石同意这个方案而自己又不受质疑。

此时，蒋介石正忙于对国民党军各级军官们发表讲话。而他的滔滔不绝之所以到了不厌其烦的程度，是因为国民党军的腐败和无能已经使他深感不安。

四月十五日：

……就我一年来的观察，指出我军各部队几个重要的缺点，希望大家特别注意，将来回到部队之后，更要切实改正。第一，国军装备笨重，运动困难，缺乏机动性，成为处于被动地位之“呆兵”……第二，国军将领精神被匪军所威胁，又慑于匪军的惯伎，不敢夜间行动，尤不敢与匪野战，因此处陷于被动地位，时时为匪所困扰……第三，国军在收复区内不能组织民众，训练民众，以收军民协力根本清匪的效果，是我们军事进展迟缓的一大原因……第四，忽视经济斗争与文化斗争的重要，以致不能确保军事的胜利。要知道经济斗争与文化斗争，是匪军欺骗人民重要的手段……第五，国军长官行动不能秘密，各级指挥部目标处处显著，为我军将领遭受伤与被俘的最大原因……第六，国军高级指挥官对于密码本与通讯机构，不能严密保护与监察，随便遗弃与泄露，实无异以情报间接供给匪军，这是我们军官最

大的罪过……第七，国军情报侦探技术的拙劣，以致敌情不明，作战失败……第八，现在匪军往往用佯动突击来欺骗我们国军，使我们不能捉摸他主力的所在。而我们则行动呆板，不知使用佯动、突击的方法来迷惑匪军……我们检讨最近一年来剿匪的经过，发觉匪军最大的长处，就是他能专找我们高级司令部和高级指挥官的所在地。凡是我们主力的调动，团长以上官长的行动，几乎都被他们发觉。结果我们前方的高级司令部，往往遭受袭击，高级指挥官往往被他们俘获。这是他们八年以来，处心积虑、聚精会神所研究出来对付我们的特种战术。他们认为运用这种战术，就可以少胜多，以弱灭强，威胁我们精神，瓦解我们国军。而事实上一年以来我们最吃亏、最损失的地方也确实在于这一点……

## 四月二十日：

……我们剿匪军事战术上还有一个失败之点，就是当友军被匪包围，所派的赴援部队往往在中途即为匪所阻挠、伏击，因而不能达成赴援的目的。或且被匪包围，甚至有时竟遭不测，全部覆没。这种失败的情形，在我们剿匪军事中发现的次数最多，因之我们不但在一二百里以外不敢勇于赴难，就是二三十里以内的地区，例如莱芜到吐丝口的距离，不过三十华里，整个一军兵力亦不敢单独赴援，必要两军并进才行。最后结果还是两军同时覆灭，你看兵多有什么益处？这可证明各将领怕匪，无勇气，无决心，则兵愈多失败愈大愈快的一个铁证，也是我们国军将领最可耻的一件事。大家要知道，在战事进行的当中，赴援部队能否达成任务，关系整个战局的胜败与全军的生死存亡，何可疏忽大意，而任其中途挫折，毫无意义的失败？即令前途非常险阻困顿，我们授命赴援，必须事前做精密的研究，顾虑周到，准备切实，一经出发，则就要不顾一切，勇往直前，非达成任务决不终止……以后我军如被匪军包围，部队长即应决心固守，立即依照所部兵力之多寡，选择适当的地形，构筑坚固的工事，静待敌来，予以歼灭。不到敌人之溃败，决不退走，万不可做突围侥幸之想，唯有如此，才是唯一的生路……

## 四月二十七日：

现在中外人士对于国军的观感，总以为我们军官没有一个不是贪污的，没有一个不是吃缺额的，经理的业务没有一个不是腐败的，国家发给士兵的粮饷，士兵总不能全部得到，而被军官从中克扣。外人对我们有这种观感，这真是我们革命军人的奇耻大辱！我们每一个革命军人对于这种讥评，一定都不能忍受。但是反观我们军队的事实怎么样呢？事实上我们上面发下去的经费，是不是都能到达士兵的手里呢？现在前方有些士兵没有饭吃，只能以小米充饥，衣不蔽体，鞋袜俱无，尤其是伤病的士兵，缺乏担架，缺乏医药，许多长官不加过问，听其自生自灭，痛苦非凡！这种情况，怎么能使士兵信仰长官？怎么能使他们见危受命，赴汤蹈火？如此下去，我们长官不但不能担负剿灭匪军的重大使命，而且要成为国家民族和革命先烈的罪人……你们如果不能与士兵同甘苦，甚或自己吃空，贪污营私，则不但军心涣散，不堪一击，不能达成剿匪任务，并且在危急的关头，你这样没有人格的上官，所部士兵一定会要断送你的性命。目前我们军队的精神和纪律，实在已经堕落到了极点，官长和

士兵之间的生活和情感完全脱节了，简直如同路人，漠不关心，甚至官兵同赌，各怀敌意。这真是我们国民革命军最恶劣的现象！……

毛泽东在王家湾已经住了一个多月。

王家湾在青阳岔的西南方向，村子很小，双羊河绕村向北流去。毛泽东住在半坡上薛如宪老汉腾出的窑洞里，窑里除了一张土炕、一张柳木条桌、两个小木坐墩外，还挤着满满一排酸菜缸。毛泽东在土炕上放了一个小炕桌，用来看文件草拟电报。五月四日，在这间昏暗的窑洞里，毛泽东收到了西北野战兵团攻克胡宗南重要的补给基地蟠龙镇的电报。毛泽东说："我彭习［只有六个不充实的旅］对付胡宗南三十一个旅的进攻，两个月作战业已将胡军锐气顿挫，再有几个月，必能大量歼敌，开展局面。"

六月六日清晨，国民党军飞机飞临王家湾村上空——一支蒋介石亲自派来的电台侦测小组发现了王家湾地区存在一个电台群，于是判定毛泽东就在此地。蒋介石命令胡宗南不惜一切代价围追捕杀，一直犹豫不决的胡宗南只好下了决心："就是牺牲两个师也要捉到中共首脑！"

六月七日，刘戡部三万兵力从西、南两个方向向王家湾直扑过来。

此时，负责警卫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的作战部队仅有四个半连，兵力二百多人。而彭德怀部的主力远在几百里之外的陇东。

形势顿时危急起来。

晚上，就向哪个方向转移的问题，毛泽东与任弼时再次发生争论。毛泽东主张向西转移，任弼时坚决反对，他认为，彭德怀部主力尚在陇东无法赶来，敌人目标明确，数量巨大，而且就是从西边来

的，如果往西走，万一与敌人迎面相遇怎么办？此外，西边除了刘戡的部队之外，还有马鸿逵的八个骑兵团，向西显然回旋的余地很小，甚至有被包围的危险。况且，“越往西，人烟越稀少，粮食也越困难”。只有向东走才相对安全，万不得已还可以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毛泽东一听过黄河就火了。他说，敌人估计彭德怀在陇东回不来，我们只好向东转移，他从西面和南面围过来，就是要把我们往黄河边赶，即使不把我们消灭，赶过黄河就是他们的胜利。“过黄河，我们迟早要过的，现在不是时候，现在向东是绝路，因为这是敌人早已算好了的，就是要我们落入陷阱。”

雷声隆隆，要下雨了，这是干旱的陕北少有的夏雨。

为转移而提前出发探路的人员已经向东走去，毛泽东坚决不走，持续了一整天的争论依旧在激烈进行。最后，周恩来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先向北走一段，然后再向西北方向转移。

毛泽东说：“我不过黄河。”

大雨倾盆而下，在王家湾住了五十六天的毛泽东再一次踏上转移之路——“党中央决定留在陕北以后遇到的第一次最大的危险降临了。”

## 战场的腰部

一场春季风沙覆盖了中国的中西部地区，黄色的沙尘从陕西北部一直弥漫到黄河中下游。当毛泽东迎着滚滚黄尘艰难地翻越黄土沟壑的时候，在中国国土腹地的黄河北岸，二十五岁的二连副连长王汝汉在残酷战斗中因失血过多而奄奄一息。

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开始攻击位于黄河北岸的河南汲县。选择这个攻击目标的原因是：经过共产党地下工作者

的努力，防守县城的国民党军整编三十二师有全部或者部分起义的可能。整编三十二师参谋长王启明和四二三团团长刘荣宗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攻击时他们将里应外合。

二连的任务是和兄弟连队一起扫除汲县东关的外围碉堡，以保证攻城部队的顺利登城。作战勇敢的王汝汉几天前才被任命为副连长，二连在最近的战斗中表现不佳，得了个“豆芽子连”的绰号，上级想以他的勇敢精神改变一下这个连的面貌。战斗开始前，王汝汉对二连官兵们说，这次无论如何要“打出个名堂来”。

国民党守军在东关方向集中了八门榴弹炮，坚固堡垒中的火力也十分凶猛。王汝汉带领二连接连拿下两个堡垒之后，第三个碉堡却迟迟拿不下来，数次爆破都因爆破手伤亡而未能成功。敌人的炮火封锁了他们前进的道路，可以隐蔽的房屋已全被炮火炸毁，整个东关是一片火海，砖头瓦片在腾空而起的硝烟中到处横飞，二连被压缩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之内。就在这时，国民党守军突然发动反击，两翼的连队遭遇极大伤亡。与王汝汉最近的那个连，所有的干部都伤亡了，活着的官兵因顶不住退了下去。这一下，本来就位置突出的二连骤然孤立地处在了敌人的纵深带。国民党守军很快就发现了这个孤立的战斗单位，随即发动了猛烈的围攻，二连还活着的官兵被压缩在东关附近的一座院子里。炮火密集地射向这个小院，到处是战友的尸体和伤员的呻吟。王汝汉把大家集合起来交代了两件事：第一、万一我牺牲了，由一排长史彦清代理指挥，并从司务长那里把我存的两千元钱（旧币）取出来为我交党费；第二、如果我负伤了，就把我打死，不要把我留给敌人。两件事交代完了，王汝汉堵在院墙的一个缺口处，一边射击，一边把六〇炮弹当手榴弹一颗颗地往外扔。子弹和炮弹用完之后，他就扔砖头和石块，最后用守军的尸体把缺口堵上了。

必须突围了，能出去几个就出去几个。王汝汉和一排长史彦清负责掩护，官兵们抬着伤员往外冲。第一次突围被国民党守军打了回来，重新选择方向之后再次冲击。这次突出去了十几个人，包括已浑身是血的王汝汉。史彦清没能活着出来，王汝汉眼看着他被机枪打倒，然后被一颗炮弹炸得身体碎裂飞扬起来。

晋冀鲁豫野战军对汲县的攻击以失利告终。

原因不仅仅是城外的卫河突然暴涨，河水漫出河床使攻击路线上沼泽一片；更重要的是，有情报显示，中共地下党员、整编三十二师四二三团团长刘荣宗突然叛变，共产党地下组织遭到破坏，虽然整编三十二师参谋长王启明率领少数起义人员冲了出来，但多数守军的起义已无可能，而且国民党军的增援部队已经接近。

在汲县战斗进行的同时，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另一支部队几乎迷失了方向。在令人睁不开眼睛的风沙里，官兵们无论如何也寻找不到准备攻击的目标，甚至连那条与昏黄的天地一般颜色的黄河也找不到了，而他们袭击的目标是黄河上的大铁桥——控制甚至炸毁这座重要桥梁的目的是截断平汉铁路，以切断国民党军北援的通道，保障野战军主力在黄河以北的作战。直到第二天晚上，这支部队才最终确定了袭击目标的位置，但国民党军整编六十六师先头部队的一个旅已经乘火车由河南的驻马店先于他们抵达铁桥，攻击的时机因此而丧失。

连续的失利之后，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开始向北移动，以寻找新的战机。

此时，由于国民党军集中优势兵力对陕北和山东同时展开重点进攻，战争在这片国土上呈现出一个“哑铃”状的态势，即集中在东、西两端的大量兵力在不断地作战，而处于中间地带的交战双方均在采取守势——这个中间地带就是所谓“战场的腰部”。

“战场的腰部”包括河南、河北全境，山东的鲁西南地区，山西的太行山地区、南部地区和西北部地区——这一范围大致与黄河流域相契合，是中国战争史上兵家必争的中原地区。从中国的版图上看，谁控制了中原，就等于控制了战争的主动权。此时，国民党军却把这个几乎可以决定战争胜负之地设定为“守势地区”，而把绝对优势兵力放在了荒凉的陕西北部和中国东部临海的山东半岛上，这一违反战略常识的思维方式至今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如果勉强寻找解释的话，也许是因为蒋介石已把占领延安的意义膨胀为击败共产党人的关键——稍微具备战略常识的人都会认为，这个“关键”是表浅且危险的。

处于“战场的腰部”的共产党一方的军事将领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在这个“腰部”狠狠地戳国民党军一下。将领们是这样想象的：一个人如果腰部被狠戳一下，头和脚就会自然地猛烈收缩。他们认为这是对陕北和山东战场所能做到的最好的帮助。如果此时共产党军队集中全力攻击中原，蒋介石立即会尝到令他懊悔不已的苦果——实际上，这一设想正在毛泽东的心里日渐成熟，过不了多久，一个具有战略转折意义的巨大事件就会发生，而这一事件与国民党军在总体战略上暴露的中原空虚密切相关——国民党军应该庆幸的是，至少在一九四七年的春季，蒋介石的重点进攻还没有完全形成军事上的彻底偏重，共产党一方的军队还没有来得及大规模地迅速调动，位于“战场的腰部”的将领们的愿望依旧停留在“狠戳一下”的阶段。

自内战爆发以来，晋冀鲁豫野战军和晋察冀军区部队在八个月的作战中，歼灭国民党军近三十万人，自身伤亡近六万，放弃了三十多座城镇，但始终没有让国民党军打通平汉铁路和同蒲铁路。在这一地域，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已大致相等，但质量开始出现差别。

在晋冀鲁豫战区，双方总兵力都在三十万左右。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三十万兵力中，野战军已达到十二万人，共六个纵队。随着战

场缴获的增加，部队的装备有所改善，特别是炮兵和工兵得到了加强。而国民党军方面，由于十七个旅被调到陕北和山东战场，总兵力仅剩下三十一个旅。其战略目标是依托黄河防线、交通要道和重点城镇进行防御。主要部队是：整编第二十六军王仲廉部的三个整编师、第五绥靖区司令官孙震部的两个整编师，连同地方部队共计十万人，沿平汉铁路和道清铁路守备豫北；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部的三个旅外加四个团，连同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部的地方武装共约三万人，沿同蒲铁路南段守备晋南；第四绥靖区司令官刘汝明部的两个整编师连同地方部队，沿黄河南岸和陇海铁路守备鲁西南；第五绥靖区司令官孙震部在二十个团的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包围豫皖苏解放区；整编第二十七军王敬久部的四个整编师约八万人分割晋冀鲁豫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

在晋察冀战区，聂荣臻部的总兵力约二十八万余人，国民党军的总兵力为三十四万四千人。国民党军主力部队的分布是：第三军驻守石家庄；第五十三军驻守保定；第九十四军驻守徐水至涿州一线，第二〇八师驻守北平附近；整编六十二师驻守天津和沧州；第九十二军驻守冀东，第十三、第九十三军驻守热河；暂编第三军、第十六军和第三十五军驻守察南地区。国民党守军因战线过长而布局分散，由于平汉铁路的保定至石家庄段始终在聂荣臻部队手中，津浦铁路和平绥铁路也时常被切断，因此，晋察冀战区内的国民党军大多处在被割裂的状态，很难组织起大规模的攻势。

豫北地区是“战场的腰部”的核心。这个以新乡为轴心的地带位于黄河北岸，是连接陕北与山东的枢纽。自蒋介石发动重点进攻以后，国共双方都意识到了这一地带的重要。国民党军部署十万重兵，修筑了大量坚固的工事，以保证东、西两个重点战场的连接。共产党一方的军事将领则决定对这一地带实施攻击，吸引国民党军增援，以缓解山东和陕北两个战场的压力，特别是缓解陕北所面临的军事压力。

战斗还没有开始，双方的作战意图已不是秘密。

正当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十万余人编成四个野战集团，在十万民兵、二十万支前民工的配合下，准备发动豫北战役的时候，国民党军陆军总部郑州指挥部根据情报作出的判断几乎与刘伯承、邓小平的作战计划吻合："刘匪伯承自黄河归故后，因对东西策应作战，均不可能，乃乘我豫境国军东调，豫北空虚之际"，以其主力"共五万余众倾巢向我平汉路北段进犯。企图以有力部队破坏我黄河铁桥，截断豫北交通，再以全力分别击破我豫北守军，打通晋冀鲁豫边区，而挽回共匪延安失败之颓势"。据此，各部要"确保辖区内各要点，并于滑县、汲县、新乡各附近地区，控制有力部队，捕捉好（战）机，求匪主力而歼灭之"。

刘伯承和邓小平决心继续作战，向"腰部"的核心位置狠戳下去。

晋冀鲁豫野战军兵力不占优势，只能依靠大规模的运动来调动对手。战区的南面是黄河，运动只能向北。刘伯承和邓小平的意图是：沿着国民党军视为命脉的平汉铁路两侧，攻击处于分散状态的敌人兵力薄弱的据点，彻底破坏平汉路上的安阳至汲县段，掌握卫河以北以西和平汉路以东地区的主动权，诱使国民党军王仲廉部跟踪北进，在其调动的过程中寻找战机歼敌。具体作战计划是：第一野战集团，由第一纵队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指挥，部队直指平汉线上的汤阴；第二野战集团，由第二纵队司令员陈再道指挥，部队强渡卫河，袭击沿路各据点并控制卫河的淇门渡口；第三野战集团，由第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指挥，部队攻击汤阴以南的淇县；第四野战集团，由太行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指挥，部队除以一部向汲县和新乡佯攻外，主力分别配合对汤阴和淇县两城的攻击。

四月三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开始向北移动，国民党军陆军总部郑州指挥部迅速作出判断，并立即制定了首先控制平汉路两侧、卫河两

岸的新乡、汲县、辉县地区，然后尾追刘伯承、邓小平部主力继而将其歼灭的作战计划。就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向北移动的第三天，国民党军也开始了急促的大规模调动：整编第九师从山东乘火车到达徐州，整编三十二师归整编第二十六军指挥，军长王仲廉亲率整编六十六师、整编四十一师的一个旅、整编四十师的一个团和第二快速纵队，由新乡地区沿着平汉铁路的东侧北进，唐永良的整编三十二师紧随其后。

十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完成了对汤阴的围困。

剩下的问题就是王仲廉部是否按照刘伯承和邓小平的设想向汤阴增援了。

国民党军汤阴守军将领孙殿英，是中国当代史上名气不小的人物。这位时年四十八岁的国民党军中将是河南永城孙家集人，早年收容土匪横行乡里，被收编后便成为职业军人。其人生中多变的政治立场令人眼花缭乱：先投靠地方军阀与国民军作战，再投靠国民军与地方军阀作战，然后脱离国民军投靠大军阀张宗昌。中原大战时，他先投靠冯玉祥和阎锡山与蒋介石作战，战局不利后又改换门庭投到了张学良麾下。蒋介石为了防范这个反复无常的异己，曾经任命他为青海屯垦督办，而他在西进路上与宁夏的马鸿逵打了起来，战败后被阎锡山收编。七七事变后，他先被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任命为冀北民军司令，接着被蒋介石任命为新编第五军军长。当时，他一头跪倒在地，称蒋介石为“再生父母”，表示自己从此将“忠心不贰”。他的部队在冀北和豫北多次与日军作战，虽无突出战果，终究是真枪实弹。但是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候，他竟率部投靠了日军，并出任伪第二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日本投降后，他的部队再次被蒋介石改编。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军整军时，他的部队被缩编为暂编第三纵队，驻守汤阴。这个翻云覆雨的人物制造的最著名的事件，是炸开乾隆和慈禧的陵墓，用

了整整三个夜晚偷盗财宝，那一年他二十九岁，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这个典型的胆大包天的土匪行为，使他的巨盗之名一夜之间出现在全中国的报刊上。有史料证实，他之所以成功地逃脱了举国声讨，是他把弄到手的皇家稀世珍宝分别送给了国民党的高层人物。

当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向汤阴发起攻击的时候，孙殿英立即向蒋介石求救："今晚能否支持过去，尚在不可知之数，请饬援军，飞驰前来，则职与均座或有相见之日。"在蒋介石的命令下，驻守新乡的王仲廉部分三路沿平汉路东侧北进增援。为了给主力赢得集结的时间，刘伯承、邓小平命令第三纵队九旅在汤阴以南阻击其前进，九旅二十七团战斗坚决，王仲廉的先头部队数次攻击都被击退。或许是阻击过于猛烈了，发觉有些不对头的王仲廉竟然率部退回了淇县。这一退，就没有了消息。接连数天，王仲廉部没有任何继续北进的迹象，这让等待打伏击的晋冀鲁豫官兵有些焦急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更加猛烈地攻击孙殿英，再次迫使国民党军前来援救。

第六纵队再次向汤阴发动了猛烈攻击。

果然，由于孙殿英不断告急，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严令王仲廉再次北进增援。十三日，由整编六十六师（欠八十五旅）、整编第三师、整编四十师三一六团、整编四十七师一二七旅和第二快速纵队组成的第一梯队，在六十六师师长宋瑞珂的指挥下，沿着平汉路东侧又一次开始向北移动。整编三十二师作为第二梯队随后跟进。

晋冀鲁豫部队除留少数攻击汤阴之外，其余大部队全部参加打援。伏击战的战场选在淇县东北二十公里处的河套地区。以平汉路为界，参战部队被混编为东、西两个集团，东集团自浚县的屯子、白寺一线向西打，西集团依托淇县以北的山地往东打。

十五日，王仲廉部的第一梯队进入了刘伯承、邓小平预设的伏击圈。根据预定作战部署，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第二纵队立即从两侧兜击，官兵们不分昼夜急促前进，迅猛迂回到敌人的身后，从敌人的第一梯队序列中把最前面的第二快速纵队分割了出来，包围在卫河以北、淇河以东的河套地区。

王仲廉发觉后，立即向后收缩，但是退路已被切断。

十七日，在王仲廉的指挥下，援军以坦克前冲后堵的阵形开始全线突围。被分割出来的第二快速纵队确实“快速”，黄昏时已经跑到了范庄和东、西郭村附近，大有一步冲出包围圈的趋势。

太行军区独立第二旅是刚刚成立的部队，战斗开始的时候，作为第三纵队八旅的预备队使用。经过一夜的穿插行军，部队到达巨桥村附近时，三纵副司令员曾绍山来电话说，原定八旅抢占屯子山截断敌人，但那里已被整编六十六师抢占，八旅插不进去了。现在，你们的正东方向，恰好是整编六十六师与第二快速纵队的接合部，那就由你们旅火速向东插，把敌人撕开，并坚决把第二快速纵队阻击住，直到黄昏时主力赶到为止。

独立第二旅的指挥员在急促的行军中对部队进行了简短的动员：“既然硬杠子让咱们扛上了，就要好好干它一场！”部队赶到一个名叫郑岗的村庄时，发现第二快速纵队正在滚滚烟尘中向南逃，整编六十六师紧跟其后，两支部队大约相隔三公里。副旅长张显扬决定率七十六团从这个缝隙间插进去。张显扬把七十六团分成了两路，二营为一路，由七十六团团长和政委带队，强占范庄；一营、三营为一路，由他亲自率领直扑东、西郭村。白天，已经穿过东、西郭村的第二快速纵队立即发现了他们，敌人掉头试图重新占领村庄，双方在平坦的田野中的开始赛跑。张显扬率领部队沿着麦田弯着腰快速前进，第二快速纵队的阻击火力铺天盖地倾泻而来。一营跑在最前面的是个矮个子

副排长，名叫张小堆，在接近西郭村村口的时候突然倒下了，独立第二旅指挥部顿时紧张起来，以为他光荣了，掩护火力全部转向了这个方向。然而，片刻之后，张小堆突然重新站了起来，并率领尖刀班冲进了村庄。他们从村西跑到村东，正赶上第二快速纵队刚刚占领村东头的一座小庙，张小堆和尖刀班的战士们没有犹豫就扑了上去，把这股国民党军赶跑了。

接下来，在主力部队没有到达之前，独立第二旅残酷的阻击战开始了。这支小小的部队处在整编六十六师和第二快速纵队之间。急于摆脱困境的国民党军在炮火和飞机的协助下展开了猛烈的进攻，企图把独立第二旅从战场上挤出去。在伤亡不断增加的战斗中，独立第二旅官兵感觉时间已经停止，有的连队全连都是伤员，有的连队连伤员也只剩下几个人了。“处境越来越困难。太阳似乎在空中不动。今天的黄昏为何如此姗姗来迟？”多年之后，独立第二旅政委余洪远依旧对那一天的鏖战记忆犹新。终于，地平线上出现了大部队的影子。三纵司令员陈锡联还没赶到就在电话里说：“你们抗得硬！纵队决定照顾你们，让你们多吃点肉，晚上总攻的时候专门给你们旅留个口子，让大家进去抓俘虏，搞点武器改善一下！”

国民党军第二快速纵队被分别被压缩在大、小湖营两个村庄里。两个村庄“房屋多是砖墙平顶，少数为旧式楼房，高约八米以上”，有利于部署防御火力。此时，第二快速纵队已把村庄周围的低矮房屋全部点燃，以期扫除晋冀鲁豫野战军进攻路线上的所有掩蔽物。负责总攻的三纵各部队在做最后的准备，正患阑尾炎的司令员陈锡联捂着肚子听取了汇报：七旅旅长赵蓝田说他们已经占领大湖营村西北角的二十多间民房和一座楼房，总攻准备可在凌晨四时前完成；九旅旅长童国贵说官兵们正在抢修工事，随时可以发动攻击；只有担任截敌退路的八旅一直没有消息。午夜时分，八旅旅长马忠全打来电话，说他的

旅和独立第二旅已经在大湖营以南地区展开，部队正在挖防坦克壕，只要敌人突围他们就和敌人决一死战。

十八日凌晨四时三十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对国民党军第二快速纵队的总攻开始了。炮弹的爆炸声、炸药的爆破声、手榴弹的炸裂声响成一片，三纵官兵迎着密集的火网不顾一切地迅猛穿插，将守敌分割成一块块地包围歼灭。当突击队冲入大、小湖营村后，激烈的战斗在每一处房屋附近展开。十九团三营官兵直奔敌指挥部，将第二快速纵队司令李守正，副司令蒋铁雄、袁峙山活捉，同时还缴获了这样一份由李守正签署的，第847号命令："如有将刘伯承捕捉到部，赏洋一亿元。"三营的官兵们说："这下他可以带着这张纸去见刘司令了。"官兵们还说："快速纵队真是快，来得快，跑得快，灭亡得也快！"

蒋介石获悉第二快速纵队被歼，如同听到整编七十四师战败："豫北四十九旅（第二快速纵队）李守正旅长的挫失，乃是由于指挥官在撤退时缺乏周密的计划和部署，致使优秀的将领和忠勇的官兵们作了无谓的牺牲，这都是我们的奇耻大辱。"

第二快速纵队覆灭后，王仲廉率部退回了新乡。

国民党军豫北防线已经破碎。

刘伯承、邓小平决定再一次重兵出击，目标是没有等来增援的汤阴城。

平汉路上的汤阴是一座古城。孙殿英把城防工事修筑得异常坚固，在高十米、宽二十五米的城墙上设有三层射击孔，没有水的护城壕挖得很深，壕底有暗堡和暗道与城内相通。城壕外围，修有二百四十多个梅花形的子母堡，设置着四道鹿砦和地雷区。城外围的张庄、

石家庄、马沟、杜庄等村庄都修有能够单独防御作战的“土围子”。拥有三个步兵师六个直属团的孙殿英自称他的汤阴城防是真正的固若金汤。

晋冀鲁豫野战军的计划是：一纵休整，二纵攻击崔桥，三纵和六纵联合攻击汤阴。

扫清外围“土围子”的战斗比最后的攻城要艰难得多。这些“土围子”的内部大多以铁轨为梁，然后覆盖上泥土，有三层射击口，里面一般都有两至三个连的兵力。不但火力强而密集，且凭借相互火力支援，里面的士兵经常冲出来反击。爆破手在平坦的开阔地上无法前进，三纵和六纵采用挖坑道的方式逐渐向前推进。几乎每攻克一个“土围子”，都以鲜血四溅的肉搏战结束。外围战斗持续了整整八天才平息下来，攻守双方都付出了惨烈的代价。

虽然汤阴城墙已完全暴露，但接近城墙仍存在着困难，因为从任何一个可以隐蔽自己的外围支撑点到城墙下，都要经过约两百米的毫无遮拦的开阔地，这片开阔地是孙殿英守军的重点火力封锁区。于是，攻城部队再次采取挖坑道的方式，挖一段，建起一个攻击出发阵地，然后接着再挖一段，再向前建起一个攻击出发阵地。共产党官兵挖坑道的情形，孙殿英站在城墙上看得很清楚。在国民党守军的密集扫射下，坑道还是挖到了城墙下。孙殿英开始向王仲廉求救。刚刚因为增援汤阴而受到打击的王仲廉对是否再次北进犹豫不决，但蒋介石一再来电催促王仲廉率整编三十二、六十六师火速增援，同时又命令位于安阳的整编四十师南下与孙殿英部会合，共守汤阴。王仲廉部行动缓慢，安阳方向的整编四十师刚一出动就受到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坚决阻击。南北两路增援的国民党军还在半路的时候，汤阴城已成一片火海。

晋冀鲁豫野战军在汤阴城下修筑了一百多个地堡火力点，开设了五十多处炮兵阵地，一万多米长的坑道和战壕蜘蛛网一样挖掘到了城墙之下。一贯奉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降”的孙殿英这一次没有投降，他绕着坚固的城墙来回转圈，事情怎样到如此境地令他恍惚不解。夜晚，炮击骤然而起，炮弹大雨般落在城墙上，砖石飞舞，烟尘翻滚。随着一声雷鸣般的巨响，自东北方向攻城的六纵把城墙炸开一个二十多米的大缺口，攻击部队蜂拥而入。同时，从西面攻城的三纵八旅的爆破组已经把大量炸药堆在了西门并点燃了导火索，由于炸药用量极大，汤阴城坚固的西门被炸得四分五裂，来不及撤离的爆破组所有官兵全部阵亡。城内的巷战持续到五月二日上午，汤阴国民党守军大部被歼。

孙殿英没了踪影。清查尸体和俘虏时都没有发现他。晋冀鲁豫野战军将清查范围扩大到城外的每一个地堡，最后，六纵参谋长武英带领五十四团侦察排在城东南石家庄村一个昏暗的地堡里发现了孙殿英。瘫在角落里的孙殿英虚弱得几乎无法站立，不久，受到极大精神刺激的他在牢房中抑郁而死。

五月七日，刘伯承、邓小平通电晋冀鲁豫野战军各纵队：

> 汤阴战役中，第六纵队以极不充实的部队，不惜以最大牺牲精神，勇敢突击，击退了敌十余次的反扑，终于圆满的无遗的达成彻底歼灭孙殿英所部的任务，特予嘉奖。另三纵八旅以果敢机敏的动作，不失时机炸开西门，突入城内，起了积极配合作用，特通报。

为了不给国民党军以喘息之机，刘伯承、邓小平接着下达了自汤阴北上攻击安阳的命令。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全部扑向了这座平汉路上的大城市。此刻，由于共产党军队的进攻，这一地区的土豪都已逃到安阳，安阳城里城外连同周围的村镇已是人满为患。安阳守军整编四十师严令各村各镇死守。于是各村各镇日夜抢修工事，不但强迫贫苦农民出工，连学校的教员和学生以及逃亡到这里的地主和家眷都被赶出来挖战壕。

安阳外围战斗进行了半个月，战事进展艰苦而缓慢。在城北安阳河上的安阳桥附近，争夺尤为激烈。平汉路西侧是大司空村和广益纱厂，东侧是三府村和袁世凯的故宅，交战双方对桥梁附近各村的争夺反反复复，袁世凯的故宅和陵墓由于建筑高大坚固成为国民党守军的防御阵地，当晋冀鲁豫官兵付出巨大牺牲攻克这里的时候，故宅豪华的花园已成一片废墟。至五月二十五日，鉴于安阳城池过于坚固，晋冀鲁豫野战军决定放弃攻城，同时撤离安阳外围战场转入休整。

周旋于“战场的腰部”的豫北战役历时两个月，牵制了蒋介石对山东和陕北发起的重点进攻，破坏了国民党军联系东西两面战场枢纽地带的防御部署。战役中，晋冀鲁豫野战军付出的巨大代价是旅团干部的伤亡。尽管战前各纵队都发出了旅团指挥员应该坚守指挥岗位掌握全局的指示，但是，每一次战斗一旦打响，这些年轻的干部很快就和他们的士兵融为了一体。在豫北战役中阵亡的旅团干部有：冀南军区独立第四旅旅长赵海枫，独立第五旅副旅长查茂德，第一纵队二十旅六十二团团长杨光义，第二纵队四旅十团团长王俊、十团政委柳润亭，第六纵队政治部保卫科长王信文，太行军区第五分区四十八团政委杨延桃。

在豫北战役进行的同时，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在四纵司令员陈赓和政治委员谢富治的指挥下，在山西南部对胡宗南部和阎锡山部进行了反击作战。

由于胡宗南部主力此时集中在陕北，阎锡山为了太原的安全也将主力回缩至晋中，因此晋南地区的国民党军仅有四个旅又四个团三万多人。陈赓部对这一地区的出击具有横扫一切的气势：第一阶段连续攻克翼城、新绛、浮山、河津、万泉、荣河、猗氏、曲沃、绛县等十座县城，控制了百余公里的同蒲路，夺取禹门口，先头部队直抵黄河东岸。第二阶段连续攻克临晋、永济、虞乡、芮城、解县、平陆、闻

喜、夏县、霍县、洪洞、吉县十一座县城，控制了黄河上重要的渡口风陵渡。

晋南作战的意义在于：山西南部，除临汾和运城外，几乎所有县城都被陈赓部所控制，特别是控制了禹门口和风陵渡，已有前出潼洛之势，直接威胁到胡宗南部的侧后，极大地配合了陕北彭德怀部的作战——作为“战场的腰部”的一部分，陈赓部对晋南的控制，等于切断了国民党军东西两面战场的联系。

从黄河北岸向北约两百公里，以铁路枢纽石家庄为核心，这一地区是“战场的腰部”的要害，因为这里南接晋冀鲁豫军区，北接东北战区，东、西两面紧邻山东战场和陕北战场。国民党军在这一地区驻有十个军，主要任务是确保北平、天津、保定等重要战略要点，保持关内与东北地区的联系。其军事部署的薄弱环节是石家庄外围和正太（河北正定至山西太原）铁路沿线，这一地带分属保定绥靖公署孙连仲部和太原绥靖公署阎锡山部管辖，因为是两军的接合部，一旦有了战事，出于各自保存实力的需要，两军相互增援的可能很小。

无论出于支援东西战场的需要，还是摆脱被动局面的需要，聂荣臻部都必须有所行动。三月三十一日，晋察冀军区部队对驻守石家庄外围和正太铁路沿线的国民党军发起了攻击。正太战役作战计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集中主力，攻击孙连仲部驻守的石家庄外围，孤立石家庄守军第三军，沿正太铁路东线作战；第二阶段向西发展，攻击阎锡山部管辖的内正太铁路西段，如果阎锡山自太原增援，就相机打援。

战役尚未展开，就出现了意外：孙连仲部在第九十四军军长牟庭芳的指挥下，十三个团加上地方武装，由高碑店、定兴一线向晋察冀解放区大清河以北地区发起了攻击。

聂荣臻认为，国民党军的进攻是“围魏救赵”的把戏，企图把晋察冀军区主力吸引回去，于是命令部队继续向石家庄外围集结。

四月三日，在电台一律静默的情况下，杨得志、李志民指挥的二纵和杨成武指挥的三纵向石家庄以北，陈正湘、胡耀邦指挥的四纵向石家庄以南，经过三天的急促行军，两支部队分别到达无极、行唐、新乐和藁城东南地区。

九日凌晨，晋察冀军区部队对石家庄外围各目标发起了猛烈的袭击。二纵和三纵各自攻克了攻击线上的据点，冲击到正定城下，攻占了正定火车站、炸毁了滹沱河铁桥，切断了国民党军向石家庄撤退的道路，将正定城紧紧地包围。

距离石家庄仅十六公里的正定城，是石家庄北面一座有着高大城墙的古城。守军为国民党军第三军七师及地方武装共六千余人，城防工事在当年日军设防的基础上不断加修因此十分坚固，城门、城角、突出部和城腰有高低碉堡和射击孔三百余处，城外一条十米宽的河流经正定的西、南、东三面，形成一道天然的防御屏障。

十一日黄昏，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队从东、南两面，第三纵队从西、北两面，向正定城发起了攻击。炮兵团的两个营首先对正定城墙进行了猛烈的炮火轰击，之后在二纵五旅马龙旅长和李水清政委的指挥下，十四团七连率先在东南角爆破突破，官兵们在班长刘海的带领下，抬着长达十二米多、重达六百斤的大云梯，通过了一百二十米宽的开阔地以及护城河，冒着国民党守军密集的子弹把大云梯架在了城墙上。突击组副班长王儒奋勇当先，第一个登上城头。城墙上的敌人拼命地射击，往下扔手榴弹和大石块，并用力向外推云梯，梯子组的官兵不断有人负伤倒下，被石头砸中掉下来的战士满脸是血。官兵们一边死死地顶住云梯，一边向上扔手榴弹，七连长紧随突击组登上了城头，突破口得以巩固。但是，仅有一个突破口无法支撑整个攻城战

斗。七班长黄树田带领几名战士抱着炸药包拼死抵进，在自身中弹的情况下还是把巨大的炸药包靠在了城门上。一声巨响之后，正定城门倒塌。凌晨，各路攻击部队冲入城内，激烈的巷战到十二日上午九时结束，第三军七师少将副师长刘海东和部下四千余人被俘。

与此同时，位于滹沱河南岸的部队攻克了栾城。

之后，聂荣臻部迅速转兵，从河北进入山西，直指阎锡山的地盘——阳泉。

阳泉是阎锡山的重要工业原料产地。为了不让矿区落入共产党之手，阎锡山立即命令赵承绶的第七集团军东援。三月二十四日，赵承绶率领第三十三军七十一师、暂编四十六师由太原和太谷乘火车紧急出动，并于二十五日到达阳泉。此时，阳泉以及四周的国民党守军兵力已达到两万多人。

聂荣臻迅速调整部署，将预备队第四纵队也投入战场，最终从西北、南和东南三个方向把阳泉围住。

阎锡山认为，聂荣臻的真正目的必是攻击太原，于是决定放弃阳泉，将赵承绶的第七集团军从阳泉收缩至寿阳，而后西进，在太原以东构成防线，与正在东进的孙楚的第八集团军一起，对聂荣臻部形成夹击之势。他发电给赵承绶，这样表述了他的意图："敌已西侵，攻省城的征候甚显。我已令第八集团军集结第三十四军和第十九军向东打；你速将阳泉部队集中寿阳，阳泉只留下几十个敌人打不了的力量即可，大敌来了能跑。等你把部队集中到寿阳，东西夹击敌人。"

赵承绶立即命令阳泉守军独立第十总队的荆谊部向寿阳转移。荆谊接到命令后，八千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沿着铁路向西跑。晚上，先头部队在阳泉至寿阳之间的测石驿附近与暂编四十六师会合。荆谊以

为自己安全了，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聂荣臻部的总攻击开始了。荆谊向西北，赵承绶向西南，彼此不顾地分头逃亡。二纵在太行军区部队的协助下追歼荆谊部，也许是带着大量的阳泉政府人员和他们的家属的缘故，荆谊部很快就被二纵在孟县以西地区围住，荆谊本人被俘。五月二日，趁敌空虚，晋察冀军区部队攻克阳泉，全歼阳泉守军。

战斗基本平息后，只有阳泉以西四公里处狮脑山的守敌还在顽抗，这让共产党官兵很是诧异，后来得知这是一支五百人的日军——日本投降已经两年，在中国的国土上居然依旧存在日本武装力量，他们被阎锡山收编并与共产党军队拼死作战，这是阎锡山颇为得意的“治国治军宏才大略”之一——三纵八旅二十三团的攻击持续整整两天，这股日军依旧不放下武器，直到三纵官兵完全切断了日军的水源之后，日军大队长藤田信雄才派代表送来一封信，内容大致是：敝国战败之后，兵无斗志，因回不了国，混碗饭吃，有些问题可以研究。从送信人那里，三纵官兵得知，这些日军担心的不是自己的生死，而是他们妻子儿女的安全。二十三团团长张英辉对送信人说，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纪律严明，不但保证你们人身和财产的安全，还保证你们下山之后有吃有住。二十三团三营营长马兆民跟随送信的人来到山上，藤田信雄向他致军礼，并表示愿意投降。日本军人列队架枪，捧上一本详细记载官兵名单、伤亡名单和武器清单的花名册。在交出电台的时候，日军军械官对电台仪表玻璃上的裂缝表示抱歉，说这决不是故意破坏，而是这个仪表玻璃早就裂了。藤田信雄再次表示出对他们的妻子儿女的安全的担心。马营长火了：“我们和什么敌人作战，都没残杀过妇女儿童！”藤田信雄犹豫了一会儿，向身边的军官示意了一下。在一个看样子只能容纳十几个人的小小的岗楼里，陆续走出来一百多名衣衫污秽、面容惊恐的日本妇女和孩子，这一情景让性格强硬的马营长突然感到一阵心酸——狮脑山上投降的日军，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向我军投降的最后一支军队”。

正太战役歼敌三万五千余人，晋察冀部队伤亡六千人。

战役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了一片。

一九四七年的夏天来了，中国北方的田野里到处弥漫着麦子成熟的气息。南京城里的蒋介石得到报告：在东北茂盛的玉米地里，林彪的部队也开始对国民党军发起攻击了。

## 夏季攻势

蒋介石的重点进攻并没有把杜聿明的东北战场包括在内，这让杜聿明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蒋介石根本没有意识到东北战场是影响全国战局的关键——南京的大员们普遍认为，东北距离南京很远，只要南京不受到威胁，就证明了国民党军处在战胜者的地位上——这是蒋委员长的短见，还是那帮幕僚的低能？杜聿明百思不解，苦恼万分。

一九四七年夏季来临时，东北战场的形势已发生微妙的变化。

首先，国民党军总兵力已不占优势，主力只能用于占领大、中城市和主要的交通线，所控制的地域越来越狭窄，面积仅为整个东北地区的百分之十二。兵力不足，除了国防部非但没向东北增兵，反而向华北调走一个军外，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作战消耗严重。内战爆发一年多，东北地区的国民党正规军已损失三个师十六个团五十一个营，总计二十二万五千多人。二是战斗力严重下降，作战时被俘和投降官兵比例大大增加。国民党军刚进入东北地区时，官兵大多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战斗力很强，不轻易缴枪，但随着兵员的严重消耗，补充的新兵不但人数不足且士气低落。至一九四七年五月，东北地区国民党军正规军有新编第一、第六军，第十三、第五十二、第六十、第七十一、第九十三等共七个军二十一个师，连同非正规军在内，总兵力约为四十八万。

一九四七年六月，东北民主联军的总兵力已经达到四十六万余人。野战部队共有十五个主力师、九个独立师、八个独立旅、七个骑兵团。这些部队由大量的翻身青年农民和改造过的俘虏兵补充，员额充实，每个师都在万人以上。同时，由于缴获甚丰，武器装备得到极大改善，特别是重武器的数量大大增加，炮兵连已达一百六十个之多。经过土地改革，共产党人在东北占据着多数面积的土地，拥有绝大多数农民的支持，农业和工业生产得到恢复，这为进行战争提供给了物质保证——五月二十日，毛泽东致电致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林彪和副政治委员高岗："东北在你们领导之下，改革了土地，发动了群众，建设了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在全国各区中，就经济论你们占第一位；就军力论你们已占第二位［山东为第一位］。"

杜聿明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林彪绝不会偏居北满一隅，东北民主联军必定要大举攻城。

五月上旬，杜聿明让郑洞国亲自到南京去一趟，面见蒋介石晓以东北局势之利害攸关："现在局势非常严重。据情报判断，北满共军很可能不久又要举行大规模攻势，依我们现有的这点兵力，很难对付。那时不仅南满守不住，连整个东北都有沦落共军之手的危险。你这次去见委员长，一定要陈明利害，无论如何要请委员长再给我们增加两个军的兵力。如果这一点做不到，那至少也要把第五十三军调回东北。"

但是，郑洞国在南京蒋介石的官邸里遭遇了挫折。蒋介石面容憔悴，表情严肃，当郑洞国将请求增兵东北的理由说完之后，他态度十分坚决地答复："东北的情况确实很严重，你们一定要设法稳定住局面。但目前我派不出军队到东北去，你们要自己想办法。东北固然重要，南京更为重要。现在各个战场的兵力都不够用，我不但不能给你们增加两个军，就是第五十三军也不能调回东北。你回去告诉熊主任

（熊式辉）和杜长官（杜聿明），根据目前情况，我军在东北应当采取收缩兵力、重点防御、维持现状的方针，将来再待机出动。现在要增加兵力是绝对没有办法的。”

第二天，郑洞国见了国防部长白崇禧，希望他能明白东北之重要，然后设法说服蒋介石增兵。令郑洞国没有想到的是，白崇禧和蒋介石的观点一致——“白将军认为华北比东北重要。”郑洞国不由得哀叹道：“东北守不住，华北更守不住。”

心情黯淡的郑洞国回到沈阳。“东北固然重要，南京更为重要”，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杜聿明，他沉默良久之后长叹了一口气，对郑洞国说：“眼下也只能按照委员长的指示精神办了，我们在一起苦撑吧。”

杜聿明制定了机动防御的部署，这个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将领此刻万般无奈，他既要确保已占领地区和主要交通线的安全，还要继续分割共产党人的各个解放区，这导致了他的兵力严重分散，最终基本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新一军守备怀德、长春、农安、德惠、吉林、老爷岭等地，借助松花江防止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南下；第七十一军和第十三军五十四师一部，守备四平、公主岭、昌图、清原、辽源等地，借助西辽河控制中长铁路的长春至沈阳段；第六十军和第十三军五十四师一部，守备梅河口、盘山、海城等地，控制沈吉铁路北段；第五十二军守备安东、通化，控制安沈铁路及其两侧地区；二〇七师守备沈阳、抚顺；新编二十二师、十四师在新宾、凤城地区机动；第九十三军暂编十八、二十二师守备赤峰、阜新、锦州；暂编二十师守备清原；第十三军四师守备承德、隆化。这是一个连不成体系的、构不成协同的防御系统，特别是其防御要害中长铁路长春至沈阳段两侧兵力明显薄弱。

精于计算的林彪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杜聿明最担心的事就要发生了。

中共东北局制定的夏季攻势的计划是：北满八个主力师和两个炮兵团越过松花江南下，在东满、西满、南满和冀察热辽部队的协同下，从各个方向向长春至沈阳铁路的中段展开攻势，歼灭两侧分散孤立之敌，打通南满与北满的联系并实现会师，彻底结束各解放区被分割的状况。如战斗进展顺利，便集中更大的兵力攻击中等以上的城市，彻底改变东北的战场态势。

平时沉默不语的林彪战前亲自向干部们传授了他创造的战术："一点两面"——战场上，兵力要集中于主要一点，即我军的主攻方向，而不是敌人的主要方向。"我们应以我们的要点来对付敌人的弱点"。"两面的战术要求，不在一个方面，而是两面，有时三面、四面。特别提出两面，主要是为了要同志们注意搞敌人的后路或侧翼"。"通常敌人遭受一面攻击时仍能安心抵抗，但遭受两面或三面四面的攻击，就不行了，就动摇了，这就促成了我主力的突破"。所以，"一点"是打垮敌人，"两面"是将打垮的敌人消灭。"三种情况"和"三种打法"——对有防御的敌人不能打莽撞仗，必须经过必要的准备才可以攻击；对退却的敌人则要打莽撞仗，要猛打猛冲；对欲退未退的敌人，即要打莽撞仗，又不要打莽撞仗，应先以小部队将敌人粘住并断其退路，待主力到齐准备后再歼灭敌人。

林彪事无巨细的战术指导，令东北部队的官兵受益匪浅：

第一，须注意莫太打急了，而应迅速侦察地形、敌情，选择冲锋目标与冲锋道路。第二，为实行一点两面战术，将九分之七的兵力与火力使用在主要突击方向，将此绝对优势兵力区分为三个梯队或两个梯队，在狭窄地段上突击，切戒主攻方向正面拉得太宽的大毛病。另外以九分之二的兵力用在另一个正面，在宽广的地段上攻击敌人。我之主力用在敌后面或侧面或正面，须依具体情况决定，何处便利于主力之突击，即用于何处。攻击开始时间不可太仓促，必须等待攻击点业已选好，兵力与火力皆已到达攻击准备位置，然后再突然开火，猛打猛冲、猛追……部队发现敌人时，须如猛虎扑羊群，猛打、猛冲、猛追，越迅速猛烈就

越好，不必详细侦察敌情和部署兵力……在这种战斗中，须反对动作迟缓和发现敌人时只打枪不猛冲的缺点。

一九四七年五月八、九两日，东北民主联军北满主力渡过松花江，由扶余、大赉地区出发，向中长路长春至四平段西侧迅猛奔袭；南满主力由通化以北之三源浦、柳河地区出发，奔袭沈阳至吉林铁路的中段地域。南满、北满主力以四平为中心南北对进。同时，东满、西满和冀察热辽部队也分别从吉林以东、郑家屯以北和热河西部及冀东地区发起攻击。

林彪的夏季攻势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因为兵力依旧占据微弱优势的对手拥有主要交通干线，而此时东北大地上的江河都已解冻，万一战斗失利，北满主力已无可能从解冻的松花江面上撤回安全地带。

越过松花江的北满部队主力相继攻占农安西北和西南的哈拉海、三盛玉、伏龙泉地区，其中第二纵队包围了怀德。

怀德是长春至沈阳铁路线西侧的重要屏障，北距长春约五十公里，南距四平约一百公里，一旦被攻克，长春和四平都将处于暴露状态。此时，怀德驻有国民党军新一军一五八师九十团、保安十七团，兵力五千。在距怀德还有十里路的地方，第二纵队司令员刘震与政治委员吴法宪分手了，刘震率部对怀德实施包围，吴法宪则带领直属队布置兵站运输、粮食接济、设置野战医院等事宜。五月十四日，两人在怀德城下会合。怀德建在地势较高的半坡上，四周平坦开阔，易守难攻，国民党守军建有一道四米宽、三米深的环城外壕，壕外设有屋脊形铁丝网、地雷场等，五米高的土筑城墙上则是密密麻麻的工事。刘震带领攻城部队指挥员前去察看地形，所有的指挥员面对如此森严的城防皆沉默不语。刘震发现城西南角有一条天然土沟，而这里恰恰是一五八师九十团与保安十七团的接合部，于是决定以这里一段一百五十米宽的城墙为进攻突破口。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情况突然复杂起

来：负责打阻击的五师师长钟伟报告：国民党军第七十一军八十八师的先头部队正向我急进，已与我师前哨阻击部队接火。第七十一军来援早在意料之中，但预料之外的是增援之敌来得如此迅速，万一攻城和阻援其中有一面失利，就会全局陷于被动，即使两边都黏住也不是好事。总攻时间迫近，刘震最终下定了攻城的决心。

关键是五师必须阻挡住第七十一军的增援。

同时，攻城部队必须尽快拿下怀德。

担任攻击的六师说：“请纵队转告五师，只要今晚挡住敌七十一军，怀德一定能拿下来！”

五师说：“叫四师、六师放心打，只要五师还有一个人，敌七十一军休想越过二十里堡一步！”

五月十六日十八时五十五分，炮火准备开始了。这是二纵首次使用大口径火炮，炮火的猛烈程度让趴在前沿等待冲击的官兵都十分惊讶。随着持续不断的剧烈爆炸，炮火开始向纵深延伸，形成一个半圆形的阻拦火墙，四师从西南向东北，六师从东北向西南，官兵们在炮火的掩护下开始向前冲击。冲在最前面的十二团七连六班管国仁小组连续爆破了几个工事，十七团一连长李希全率部迂回成功，十六团的一个名叫赵泽南的战士与国民党守军的一个少校在一座大庙的殿堂上追打了两圈后终于将其按在地上，然后炸开了大庙附近的碉堡。突破成功后，第二梯队投入纵深战斗，巷战开始了。二纵使用小部兵力沿着大街吸引守军火力，大部兵力则在街道两边的民房里逐屋挖洞前进，守军的防御体系很快就被打得支离破碎。夜半，守军团长项殿元率部退守城东北角的关帝庙，企图凭借高大的围墙和坚固的房屋顽强抵抗。二纵的攻击部队两次攻击未果，重新部署火力和兵力之后，再

次发动凶猛的攻击。团长项殿元被乱枪打倒之后，守军决心动摇，残部开始从东南角突围而出，被二纵的外围部队歼于城郊旷野。

攻击怀德的战斗进行之时，负责打援的一纵和二纵五师拼死阻击着第七十一军八十八师和九十一师。当怀德已被攻克的消息传来后，八十八师和九十一师的步兵和卡车拥挤在一起不知当进还是当退。就在这时，东北民主联军的攻击部队蜂拥而来。混战持续了整整六个小时，山坡上、村庄里、公路边和田野上到处是混战在一起的两军官兵，这让国民党军的支援飞机因分辨不出敌我而无法射击投弹。八十八师和九十一师的官兵在肉搏战中听见这样的喊声："兄弟们！我们也是七十一军的！去年在大洼战斗中被解放过来的！这里宽大俘虏，愿意当兵的欢迎，不愿意的发路费回家！枪是老蒋的，命是自己的！缴枪别打了！"国民党军官兵果然放下了武器，自动集中起来听候发落。激战中，第七十一军参谋长冯宗毅、八十八师师长韩增栋身亡，国民党军的精锐之师在这个名叫大黑林子的战场上一下子崩溃了。第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还不知道八十八师和九十一师的悲惨处境，为了自己的主力师不致全军覆灭，他亲率八十七师急速赶来力图解围。部队刚刚达到公主岭，杜聿明的电话打来了，陈明仁这才知道八十八师和九十一师已经完了。陈军长立即率领部队乘火车往四平方向撤退。正撤退时，共产党军队冲进了公主岭，陈明仁连同八十七师在被围的最后一刻跑了出来，其危机情景犹如杜聿明的描述："陈明仁之免于被围，真是间不容发。"

怀德失守令新一军慌忙向长春撤退。

自此，长春城门紧闭，商店关门，全城戒严，一时人心惶惶。

林彪没有下达攻击长春的命令。

一纵沿着铁路绕过四平继续南下，切断了沈阳至长春的铁路。

二纵则直逼四平城。

在北满主力南下作战的同时，南满部队的进攻方向是山城镇和梅河口。

五月十日，南满部队在司令员萧劲光、政治委员陈云的率领下，沿着四平至梅河口的铁路向西南发展，十四日全歼山城镇和草市守军，切断了吉林至沈阳的铁路。在杜聿明的严令下，国民党军新六军军长廖耀湘指挥一五五师发动反击，南满第三、第四纵队在南山城子地区与其展开激战。四纵十师三十团三营七连在夺取大华山阵地时连续五次冲锋，全连百十号人仅幸存一名副连长和三名战士，手中仅剩三支步枪和一枚手榴弹，但这四个人依旧发起了第六次冲锋。南满部队的决死精神，令号称“国军之花”的新六军一五五师官兵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国民党军拥挤在公路上，用重炮四处轰击，在数次突围未果的情况下，放弃辎重向辽宁境内的新宾方向撤退，南满部队官兵开始追击。三纵八师二十二团八连一排副排长陈树棠率领战士冲入混乱的敌军中，俘敌五十二人。二十五团炮兵连炊事班长带领两名炊事员往前沿送饭，半路上用一支步枪和一条扁担俘敌四十人。四纵十师二十八团班长薛得国和战士杨焕喜、鲍勇跑得飞快，用手榴弹炸毁了一辆坦克，致使敌人的退路堵塞，九辆坦克因此落入南满部队官兵之手。一五五师的溃败，致使通化守军弃城逃跑，战略要地梅河口暴露出来。

梅河口镇是吉林至沈阳铁路中段的一个大车站，是杜聿明的“东北五大战略要点”之一，他曾给守备这里的国民党军第六十军一八四师下达过“坚决死守，不准突围”的命令。一八四师用了一年的时间在梅河口镇修筑环城工事，城内储备了大量的作战物资，准备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坚决固守。

二十四日，南满部队第四纵队在副司令员韩先楚的指挥下，对梅河口镇发起攻击。下午十五时半，炮火准备开始。在炮火的掩护下，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连续爆破，打开了战斗通道，各突击部队经过激战，占领了外围的三六七、三六八两个高地。然而，从这两个高地到敌人的核心防御阵地，中间还有约五百米的开阔地。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在没有炮火支援的情况下，仓促发动了攻击，结果在敌人三面火力的压制下，冲击一次次失败，开阔地上布满阵亡官兵的遗体。

此时韩先楚才得知，情报称守军为五个营，但实际是七个营，兵力约七千人。夜晚，韩先楚召集会议研究战况。与会者认为攻击失利的重要原因是：对地形和敌情不熟悉，守军工事坚固，我军炮火发挥不够，选择的主攻方向不妥当。会议最后决定：放弃在开阔地的攻击。另外选择一个突破口，只要突进去，守军防御就会全线动摇。

被选择的突破口是火车站。

担任对火车站正面攻击的是三十团。

虽然进行了炮火掩护，三十团的攻击依旧伤亡很大。突击队每冲击到前沿，后续部队的通道都会被守军火力封堵，增援兵力和弹药无法跟上，突破最终以失利告终。最后，三十团把未伤亡的官兵编成两个连发起连续攻击，在侧翼二十九团的配合下，于二十六日上午九时占领了火车站。伤亡巨大的三十团从火车站向街区发展，官兵们用打穿房屋墙壁的办法接近守军火力点，然后实施连续爆破，随着进展道路的逐一打开，官兵们逼近了守军的核心防御阵地。

二十八日下午十六时，四纵所有的火炮都推进到距守军核心阵地仅四百米处，各团也选择好了各自的攻击出发地。最后的攻击开始后，被巨大伤亡激怒的官兵们奋勇冲锋，残存守敌最后退守到一座楼房内抵抗，二十八团官兵连续爆破，终于把楼房炸开了一个缺口，官

兵们冲进大楼，与负隅顽抗的敌人展开了近距离肉搏。核心阵地附近的守军两千余人逃出城，被三纵七师十九团围歼。

艰苦的梅河口战斗进行了五天四夜，国民党守军一八四师被全歼。

南满部队乘胜相继攻占了海龙、辽源、西丰、清原等城镇。

至此，松花江以西、吉林到梅河口之间以及长春东南的广大地区全部被东北民主联军占领，南满解放区与东满解放区连成了一体。更重要的是，南满、北满主力部队在彼此隔绝了一年多后，终于会师于四平城下，林彪朝思暮想的将两个拳头合成一个拳头以扭转东北战局的梦想至此成真。

捷报传到陕北，毛泽东异常兴奋，致电林彪和高岗，设想未来如何发动“全面反攻”，以夺取北平和天津这样的重要大城市：

> ……出师顺利，甚慰……目前你们以八个师南进，希望能于夏秋两季解决南满问题，争取于冬春两季向热河、冀东行动一时期，歼灭十三军、九十二军等部，发动群众，扩大军队。该两区共有人口一千五百万，为将来夺取长春北宁两路、长、沈、平、津四城必不可少之条件。夺取两路四城必须具备的条件有三：你们已在北满建立了强大的根据地，解决了第一个条件；现在正向南满作战，估计不要很久即可解决第二个条件，建立强大的南满根据地；第三步还要解决冀热辽地区的根据地问题。关内方面，我苏鲁军（华东野战军）负担最大，在他们面前，集中了三十二个整编师八十五个旅［包括被歼者在内］，直至此次歼灭七十四师，才使敌进攻发生了困难，今后再歼二三个师［军］，即可转入全面反攻。我刘邓军现攻安阳，六月间可以十万人渡黄河向中原前进。我彭习军［只有六个不充实的旅］对付胡宗南三十一个旅的进攻，两个月作战业已将胡军锐气顿挫，再有几个月必能大量歼敌，开展局面。陈赓部四个旅拟使用于西北。聂（聂荣臻）萧（萧克）罗（罗瑞卿）军上月正太作战歼敌三万余，缴枪一万五千以上，现须休息半月，约下月中旬拟打津沧（天津至沧州）线，配合你们作战。纵观全局，目前大部分地区已转入反攻作战，只待山东再打一二个胜仗，即可转入全面反攻。

与毛泽东相反，此时的蒋介石心绪复杂而凌乱，情报部门给他送来了林彪部队普遍使用的两本小册子，这两本小册子既令他沉迷又令

他恼怒："我得到这两个小册子之后，把它看得比任何兵书都宝贵，废寝忘食，昼夜钻研，逐字逐句的细心玩味，现在已读过五遍了。"这两本小册子，一本是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在哈尔滨编印的《目前的战役问题》，印发团部两份，师部四份，纵队六份，为高中级干部战术教材。另一本是《战斗手册》，供基层干部阅读使用，内容包括"指挥要则"、"打胜仗的根本办法"、"硬拼仗"、"运动战"、"一点两面战术"等。

五月十九日，蒋介石对国民党军军官发表了情绪激愤的讲话。他首先对"共匪"的小册子里要求"官兵一致"发表了阅读心得：

> 最近我们在东北作战，拿到了共匪的两个重要小册子，今天已印发给大家……你们必须逐字逐句细心地研读……上次美国军官二人被共党俘去，带到哈尔滨，后来据这两位军官回来说：他们在哈尔滨的时候，天气严寒在零度以下，共匪士兵既无手套，亦无好的鞋袜，共匪的政工人员看到士兵瑟缩不安，便立刻自己把衣服脱下说："没有手套算得什么，我们不穿衣服也一样可以行动呀！"他这样以身作则，为人表率，士兵当然无话可说。反观我们的长官和连指导员是否也能做到这样呢？我们的官长不但不能做到与士卒同生活，共艰苦，而且对于下级干部如何训练士兵，如何管教士兵，看也不去看他们一下，下级干部以为官长既然不来看我们，不来考核我们，我们也不妨懈怠一点。好逸恶劳，人之常情，现在既然是勤劳者无赏，怠惰者无罚，谁愿意去特别吃苦？这样一来，军队当然不能同心协力，与敌人做殊死的斗争……

接着，蒋介石痛斥了国民党军中自私自利乃至作战无法"协同一致"的现象：

> 我们高级将领……还有一个最不好的习惯，就是自私自利，保存实力，看到友军在艰苦作战，而自己袖手旁观，视若无睹。这样一来我们革命军亲爱精诚的精神，同甘苦、共患难的情意，就完全丧失了！这简直是亡国奴的心理，是万万要不得的！要知道我们战斗的基本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协同一致"！我们在同一战场上同友军并肩作战，友军的存亡就是我们的存亡，友军的胜败，就是我们的胜败，友军遭遇了危险，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不顾一切，前往救援。这才是军人的本分。如果以为匪军现在没有进攻我们，我们就可苟安一时，置友军的成败于不顾，试问友军消灭，我们难道还可以幸存，不被匪军各个击破吗？所以，"协同一致"是我们战胜求存必要的条件……

五月三十日，蒋介石飞临沈阳。

林彪的夏季攻势让他感到了东北局势的不妙。在沈阳召开的高级将领会议上，他要求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收缩兵力，重点控制大城市以保持住现状。会议显示出蒋介石与杜聿明之间的不协调：当蒋介石主张把长春以东的永吉（吉林）也放弃时，抱病参加会议的杜聿明不但当场坚决反对，而且再次提出将第五十三军从华北调回，但这一请求再一次遭到蒋介石的断然拒绝。

蒋介石走后，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先后放弃了安东、通化等中等城市，开始固守长春、吉林、四平、沈阳、锦州等几个大城市及周边城镇。

不久，一个严重的消息传来了：开原失守，中长铁路被切断，沈阳与四平失去了联系。

杜聿明对林彪的心思猜得很透：去年，东北民主联军守了一个月，也没能守住四平，部队最终被分割在南满与北满两个互不联系的地域。这一次，林彪部主力全线出击，既然已经打到四平城下，林彪势必想让国军也过过被拦腰截断的苦日子。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清楚，四平位居东北中部交通枢纽，连接沈阳、梅河口、长春、吉林，谁占领了这里谁就握有东北战场的主动权。

一方势在必夺，一方誓死不让，自内战爆发以来，东北战场上最惨烈的一场血拼已是不可避免。

六月初，双方开始战斗调动。廖耀湘的新六军一五五师和十四师向开原发动反击，重新打通了四平与沈阳之间的联系。与此同时，林彪部主力大规模地向四平集结，共十七个师的兵力机动于四平以南、东南及以北地域，准备阻击自沈阳北上和自长春南下的敌人的援军；而另七个师配属五个炮兵营，负责对四平实施攻击，攻击部队前线指挥为第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政治委员万毅。

李天佑的对手，是四平国民党守军总指挥，第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

陈明仁毕业于黄埔一期，是一名执著强悍的军人，以指挥果断、作战坚决、身先士卒著称于国民党军中。抗日战争中，他率部参加桂南会战，上级要求会战一旦失利，各部队可自行撤退。陈明仁认为如此部署极其不妥，他拒不执行这一命令，在万分艰难的情况下，指挥部队与日军血战七天七夜。此战，他的部队伤亡七千多人。战后，陈明仁率部进入昆明休整。蒋介石到达昆明时，看见一些衣着破烂的士兵在修工事，得知是陈明仁的官兵后大为震怒，认为这副样子真是“有损国格”。陈明仁来到蒋介石面前，他说：“我的部队衣服没穿好，不怪我而怪你，衣服是你发的，质料这样差，只穿一星期就破了，并且去年发给我们的还只有四成新。”蒋介石说：“总是你不行，你为什么不想想办法？”陈明仁回答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不认为我不行，我认为我什么都行。”果然，陈明仁率部进入滇西，攻克日军最坚固的松山、龙陵、回龙山阵地以及中缅边境重镇畹町。陈明仁强硬的性格不但让蒋介石觉得不好驾驭，连杜聿明对他的指挥都需颇费心思。在东北战场上，陈明仁的亲信对杜聿明总是让第七十一军处在冲锋陷阵的位置上牢骚满腹，因为谁都知道他在千方百计地避免自己的老部队新一军和新六军遭受损失。可是，陈明仁却一直得到他的部属的敬重，第七十一军团以上军官大多是他一手提拔的，部下们普遍认为跟着他不会吃亏。

蒋介石致信陈明仁：“四平乃东北要地，如失则东北难保。斯时为吾弟成功成仁之际，望砥砺将士，严行防守。”

陈明仁深知四平之战不可避免，同时也知道自己的第七十一军无路可退。此刻，他指挥的四平守军是个大杂烩，除了因八十八师和九十一师遭遇重创而残缺的第七十一军和前来增援的第十三军五十四师

外，五个保安团以及公主岭保安大队都是地方杂牌军。但是，四平城因之前被日本人占领，整个城市建筑布局完全符合防御要求，且各建筑物之间都有彼此相通的交通盖沟。陈明仁将四平全城划定出五个守备区域，各防御部队都有清晰的作战地点，各作战地点彼此又能构成协同，每处阵地都布置了两道防御线。而城西的中心地带被布置为核心守备区，这个区域内有中央银行、电力局、市政府等高大建筑，这些坚固的楼房组合起来犹如接连不断的工事群。陈明仁决定吸取林彪部坚守四平失利的教训，三万五千多兵力被集中部署在市区的重点部位，形成了一个让任何攻击者都会感到头疼的防御体系，即“陈明仁堡垒”。

李天佑的参谋人员绘制出四平守军的兵力配备和工事位置图，东北民主联军对陈明仁的布防情况有着惊人的准确了解。唯一遗憾的是，攻击部队，包括林彪在内，此刻存在着严重的轻敌现象。他们不知道四平守军在兵力和火炮数量上占据着绝对优势；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严重低估了四平守军的作战决心，认为第七十一军兵退四平，士气低落，只要猛打猛冲，敌人必垮无疑。各纵队充满必胜信心的请战书雪片一样到达林彪处，战士们纷纷把“三战四平，再立战功”的口号贴在了自己的炸药包和枪托上。

轻敌导致的后果极其严重。

总攻时间确定为六月十四日二十时，作战预定三至五天之内拿下四平。

六月十一日，先头部队占领了四平外围的几处重要据点之后，攻城部队在大雨中陆续近敌。十四日十六时，攻击部队进入了待命冲击位置。突然，二十架飞机飞临战场，低空盘旋之后，开始了密集的轰炸，轰炸重点是攻城部队的炮兵阵地和冲击前沿。这不是一个好征

兆，如果不是攻击时间已被泄露的话，至少可以看出国民党军对四平战场的投入规模和作战决心。

攻击部队埋伏着，没有理会敌机的轰炸。

天色渐暗，二十时，攻击四平的战斗打响。

攻城部队从西北、东北、西南三个方向突击，官兵们不顾一切地冲锋，但国民党守军工事坚固，火力凶猛，攻城部队一再冲上去又一再被迫退回来。只有在西南角，一纵二师四团一营连续爆破，在火力的掩护下，三连三排长史德红首先登上城墙，撕开了一道突破口，并占领了保安十七团团部所在的楼房。但是，这个被撕开的突破口太狭窄了，在其他方向都没突破的情况下，国民党守军大量部队向突破口蜂拥增援，飞机、炮火和各种火器也都向这里集中，狭窄的突破口上一时间弹片翻腾，血肉横飞。十五日、十六日两天，攻守双方在这个狭窄的口子上反复争夺，敌人的顽强出乎了攻城部队的预料。第七十一军八十八师新任师长彭锷亲临前沿，中弹负伤后依旧不退，前锋营两名营长先后战死，他们的士兵也全部阵亡在突破口上。而林彪部仅第一纵队就负伤五千人，阵亡一千四百多人，有的连队的干部全部负伤，全连一百多名官兵仅剩下七八个人。由于无法得到及时的救治，或无法被及时地抬下前沿，有的干部竟然连续负伤十一次，仍在作战的他们已是浑身血肉模糊。一纵一师师长江拥辉和政委梁必业冲上突破口，一颗炮弹落下来，掩护他们的一个班的战士瞬间全部阵亡。国民党守军的炮火轰击和飞机轰炸令前沿指挥员陷入两难：扑上去人多了，突破口狭小，一颗炮弹落下就能导致大量伤亡；扑上去人少了，又无力阻止敌人凶猛的反击。白天作战，攻击部队暴露，头顶上的飞机不停地盘旋，哪怕发现一人一马也要俯冲轰炸，因此不敢发动进攻，甚至不敢在白天调动部队。而东北地区日长夜短，全天二十四小时中只有不到八个小时是黑夜，黄昏时开始调动部队组织攻击，没打

多一会儿天就亮了。李天佑在指挥所里接到的报告称，即使白天不进攻，部队伤亡的人数比晚上攻击时伤亡的人数还要多。

十七日晚，受阻四天的四平城西北角终于被突破，因只有一个突破口而艰难平推的作战局面得到缓解。李天佑投入了预备队，国民党守军稍稍后撤，攻城部队开始向城内核心地带压缩。共产党官兵一座楼一座楼地进行艰苦的爆破，国民党守军一条街、一座楼、一间屋地进行顽强的阻击。在攻击交通宿舍大红楼的时候，攻击部队数次强攻未果，于是一部分兵力挖沟强行接近，一部分兵力迅速跑向已被占领的四平飞机场，从航空炸弹里挖出三千多斤炸药，再抬着炸药火速跑回大红楼前。一连八班副班长李广正带领爆破组连续爆破十二次，终于把这幢两百米长的联体大楼炸塌了一半，守军二六三团的一千一百多名官兵多半被埋在倒塌的废墟之中。

接下来的战斗缓慢而残酷。围绕着每一座坚固的建筑物，攻守双方的战斗始终处于胶着状态。国民党守军在楼房和工事内顽强抵抗，猛烈的火力组成立体火网，并在两军接触线上投掷燃烧弹。守军的炮火更是片刻未停，一边对前沿支援轰击，一边对东北民主联军攻击部队的后方实施封锁，其轰击的猛烈令攻城部队官兵大量伤亡。

陈明仁征用了一切可以投入作战的人员，包括政府官员、警察以及四平城内的平民百姓，他发给他们武器，要求他们立即参战。第七十一军直属队兽力营的两百多名马夫，在陈明仁的严令下，由一名五十多岁的老马夫率领，赶到战斗前沿参战，这些马夫在八十七师与五十四师的接合部坚守了四天，最后活下来的马夫不到三十人。

陈明仁决心与四平共存亡——“生死关头，欲走无路，唯有合力奋战，以战图存。”他先是立下遗嘱，然后把自己的棺材抬出来给大家看。他的命令是：独立死守，打光为止，转移和放弃阵地的命令只有军长一人有权发布。如果有人请示是否可以转移阵地等此类的问题，

不答复就等于不批准。第一道防御线的部队一律不准撤退，凡是后退者，第二线防御部队有权射杀他们。

十九日，东北民主联军把不久前缴获的七门美式火箭炮推了上来，对准中央银行和市政府大楼进行轰击，两座大楼很快就被占领。在攻击电信局大楼时，守军指挥者为第七十一军军法处长，攻击部队虽然已经占领大楼的下层，但国民党守军据守上层拼命射击，坚决不肯投降。最后，攻击部队在大楼下安放了大量炸药并且引燃导火索。巨响之后，大楼和守军一起毁灭。

电信大楼被炸毁的时候，陈明仁突围而出到了城东区。

西区核心区的守军并没有因为军长的转移而放弃抵抗。攻击军部大楼的是六纵十七师四十九团一营三连和五十一团的五连、六连，一营三连在指导员刘梅村的率领下冲进楼内，与国民党守军反复争夺十余次，残酷的肉搏战致使大楼内遍布着战死者的尸体。三连战到最后只剩下八个人，两个通信员冒死扛上来两大包炸药，瞬间将大楼炸得砖瓦飞迸，烈焰冲天。

二十一日，四平城西区被东北民主联军占领。

战斗已进行到第八天，李天佑的攻击部队付出八千余人的代价占领了四平城内的一半城区。

该日，林彪命令："决付出一万五千人的伤亡，再以一个礼拜的时间，将此仗打到底，达到完全歼灭敌人和打垮敌之守城信心。"

林彪向毛泽东报告后，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八天作战占领四平一半，你们决心再以一星期时间歼灭四平之敌，占领此战略枢纽，极为正确。四平占领，不仅对我军建立攻坚信心关系甚大，而且对全国正在斗争的广大群众是一大鼓励。"

但是，不但攻击四平东区的战斗依旧进展缓慢且伤亡巨大，而且杜聿明的部队已经开始从沈阳和长春南北两面增援而来。

四平危急令蒋介石十分震惊，他终于决定将第五十三军从华北调回东北，并严令杜聿明在六月三十日之前解四平之围。

在郑洞国的指挥下，第五十三军首先占领了本溪，解除了沈阳侧翼的威胁，然后一路向北直扑四平。杜聿明所能调出的全部增援兵力共九个师，很快就在四平以南、以北与林彪早就部署好的打援部队接火了。尽管林彪部顽强阻击，但终究兵力不足，难以在运动中歼灭来敌，只能迟缓其增援速度。郑洞国留下战斗力最强的新六军与林彪的打援部队周旋，然后亲率第九十三、第五十三军和第五十二军一九五师顽强地向四平靠拢。

担负掩护任务的新六军很快就遭到猛烈的攻击。一六九师在八棵树附近丢失了阵地，军长廖耀湘大为光火，严令师长郑庭笈迅速收复阵地。一六九师在飞机和炮火的掩护下发起不顾一切的反击，战斗终以林彪部队因伤亡过大撤出战斗而结束。

二十六日，向四平急速推进的郑洞国突然发现，一直监听中的林彪部的电台信号减弱了。郑洞国判定林彪的部队已处在转移之中，于是迅速命令部队全部投入正面进攻。

这一天，攻击四平东区的战斗虽在继续，但东北民主联军的攻势已经减弱。

林彪面临的局面是：攻克四平希望渺茫，增援之敌兵力强大，不但没有将其包围歼灭的可能，连将其阻截都无法有效地做到。而且，无论是攻城部队还是阻援部队此刻都面临着分兵两面作战的处境。

二十八日，郑洞国和第九十三军军长卢浚泉亲临前沿。第二纵队官兵拼死阻击，一步不退，激烈的拉锯战进行了整整一天，第九十三军全线没有任何突破。郑洞国正万分焦急时，突然接到侦察队的报告，说四平方向的枪炮声逐渐稀疏。郑洞国以为四平已经陷落，而一旦如此，无论是对苦战中的陈明仁，还是对于蒋介石的严令，他都感到没法交代。郑洞国要求卢浚泉的第九十三军黄昏之前必须突破林彪部的阻击线。

下午十三时，第九十三军的左前方突然传来猛烈的炮声，原来左翼的第五十三军在军长周福成的率领下突击成功。在联络了空军和炮兵的火力支援后，卢浚泉下令集中所有的坦克，向二纵的阻击阵地发起大规模的攻击。当敌人的坦克冲进二纵的防御阵地之后，二纵奉命撤出战斗。

郑洞国立即命令全线追击。

四平城内的陈明仁得到增援部队接近的消息，立即派出部队从城内向城外突击接应。

二十九日，增援四平的第九十三军先头部队到达四平南郊，第五十三军和新六军的一六九师到达四平西北的八面城。

林彪下达了全线撤退的命令。

六月三十日凌晨，一纵三师最后撤离四平战场，历时半个月的四平攻坚战结束。

这一天，是蒋介石严令解四平之围的最后期限。

四平之战，林彪部付出了伤亡一万三千余人的代价。

东北民主联军在东北地区发动的夏季攻势结束了。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四平保卫战，是中共中央从战略全局出发，为配合与国民党谈判斗争，阻止国民党军扩大军事进攻而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城市防御战。在此次战役中，东北民主联军在装备较差的情况下，依托工事，英勇顽强地抗击国民党军在飞机、坦克、大炮掩护下轮番疯狂的进攻，歼灭了国民党军大量有生力量，显示出东北民主联军的战斗力。”

至于四平攻坚失利的原因，长期以来争论不断，但所有的争论似乎都过于具体而丧失了反思的力量。四平之战结束十三天后，林彪给李天佑写了一封信，信中所言值得注意:

> ……要把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决定于条件的原则［这个原则我同你谈过］，革命的效果主义的原则，实践是正确与否的标准的原则，加以很好的认识……凡一切主观主义的东西，无论他是美名勇敢或美名慎重，其结果都要造成损失，而得不到胜利的。

林彪部从四平全线撤退的那一天，南京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发布了“采取紧急措施”的训令，其中的“紧急措施”之一是：全国通缉共匪首脑毛泽东。

此刻，毛泽东正在陕北近在咫尺的敌情中艰难地转战着。

这是一九四七年六月，是内战正式爆发整整一年的日子。

如同毛泽东眼前绵延曲折的黄土山路一样，此时中国的内战前景依旧让人捉摸不透。

# 第五章 破釜沉舟

## 共产党是否失败了?

一九四七年六月八日晚，雷电交加，大雨滂沱，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九军刘戡部的追击部队距毛泽东所在的王家湾仅隔一个小山头了。无论任弼时如何急切地催促，毛泽东就是不肯动身。毛泽东说，我看到敌人再走也不迟。

周恩来、任弼时和陆定一凑在一起紧急商量，商量的结果是：既然他要看到敌人才走，是否可以找一个同志留下来替他看?

毛泽东听到这个建议后，问三支队副参谋长汪东兴："敢不敢留下来等着敌人？"

汪东兴说："主席让我留下来，我就留下来，不看到敌人我不离开。"

毛泽东说："给你一个排，看到敌人再走，还要打他们一下。"

九日凌晨三点，毛泽东终于离开王家湾，在大雨中顺着村后的小路向西。

在陕北的黄土沟壑中来回转移的共产党中枢，与其所指挥的战争的巨大规模完全不成比例。相比之下，这个小小的指挥部就像一支深陷困境的孤独的游击队。但是，一直跟随着毛泽东的美国记者李敦白并没有因此感到恐惧：

……（毛泽东）与他的对手玩讽刺的猫捉老鼠的游戏。毛泽东故意将他的行踪以对方可以收到的电报送出……他刻意跟国民党追兵保持绝不超过一天行军路程的距离。毛知道胡宗南想要亲自抓住他，以成为蒋介石心中的英雄，他充分利用胡宗南的这层心态。在每个驻扎

地，毛泽东都会等他的侦察兵带来追兵仅剩一个小时的路程的消息，然后再慢条斯理地将外套穿上，骑上马，然后再领着他的小总部迅速冲下小路……

山路泥泞，毛泽东浑身被雨淋透。驮电台的骡子滚下山沟摔死了，警卫战士摸黑下山把电台拖了上来。山头的那一边枪声不断，警卫战士看见山头上人影晃动，那是刘戡的电台测向分队正举着天线侦测毛泽东的电台方向。

天蒙蒙亮的时候，毛泽东走上一条简易公路，他问身边的王家湾村民兵队长老白："附近有什么村子？"

老白说："最近的村子叫小河村，但距离公路太近，怕不安全。"

毛泽东说："就进这个村。"

民兵队长老白无意间指出的这个小村庄，注定要在中共革命战争史上留名。数天之后，共产党中央在这个村里召开的一次会议，决定了解放战争的一个重要转折。

毛泽东本想在小河村休息一下，至少把衣服烤干，但警卫战士刚把电台架设起来，侦察兵就报告说，刘戡的部队正朝着这个方向迂回。

一行人只好继续向西转移。

此时，刘戡正坐在王家湾村毛泽东住过的那间窑洞里。他的部下抓来了一个七十多岁的老汉和一个十多岁的女娃。被吊在树上的老汉紧闭双眼，滚在泥水里的女娃尖声哭叫，但刘戡最终还是没有得到任何关于毛泽东去向的信息。

大雨断断续续。

远处的山沟里和山头上，国民党军追兵的人喊马嘶之声清晰可闻。“隔了一个山，就像隔了一个世界哩。”毛泽东对身边的警卫战士说。在当地老乡的带领下，毛泽东一行在敌军的缝隙中绕来绕去，十日早晨天亮时，到达靖边县天赐湾村。

火升起来，人们忙着做饭和烤衣服，但是侦察兵的报告又来了：刘戡的部队已经越过小河村追过来；另一支国民党军追兵，董钊的整编第一军也自南而来，两支追兵现距天赐湾都不足十公里。机枪声从不远的地方传来，人们迅速收起电台，紧急准备转移，警卫战士被分成几个小组分别跑向村外，连毛泽东的内卫排也被派出去侦察了。

雨过天晴，刚刚露出的太阳瞬间就成为一轮烈日，撤出天锡湾的毛泽东走进一条山沟里。他说：“敌人向山上来，我们立刻就走。敌人顺沟过去，我们就住下。我估计，敌人并没有发现我们。”然后，毛泽东作出一个惊人的判断：敌人“十二点钟以后可能要退”。没有人认为毛泽东的判断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毛泽东开始罗列他的一系列理由：一、老百姓不喜欢国民党军队，不会对他们说实话，别看他们追得凶，实际上刘戡和董钊都不知道我们到底在哪里。二、他们从延安和安塞来，是为了执行蒋介石部署的袭击小河村的命令，他们既然已经占领了小河村，就算执行了命令也完成任务了，他们只要能向蒋介石交差就行。三、他们只带了四天的口粮，走到小河村就吃光了，老百姓又不给他们，他们不撤退大队人马吃什么呢？四、我们现在位于胡宗南与马鸿逵防线的接合部，他们两人向来钩心斗角，都想保存实力和削弱对方，他们谁都不会到这个接合部来与我们真枪实弹地打。

中午十二时刚过，各路侦察分队纷纷报告说，追兵顺着山沟向保安方向去了。

毛泽东一行在天赐湾住了七天。

电台架好之后，毛泽东给各解放区首长发了平安电报：

> 本月九日至十一日刘戡率四个旅至我驻地游行一次，除民众略有损失外无他损失，中央仍在卧牛城附近不远地方工作。我主力现在陇东作战，并准备于下月初调陈赓纵队过河，与边区部队协力歼灭胡宗南，夺取大西北。

此时，内战爆发整整一年。

国共双方都称已取得战争胜利。

国民党方面的舆论认为，经过一年的战争，共产党人丢失了绝大部分城市和几乎所有的重要交通线和交通枢纽，国民党军已经深入到解放区的内部，共产党军队连同他们的首脑机关都已被赶到乡村野外。即使在残存的解放区内，也因为土地面积的减少而发生了严重的生存困难，特别是自然灾害不断几乎导致经济的崩溃。在陕甘宁边区，粮食产量减少一半以上，军工生产的重要物资棉花的产量更是减少了百分之七十。当战争被推向解放区内部时，共产党军队必须依靠区域内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支持作战消耗，由此造成解放区百姓的战争负担越来越重。在山东战场，由于作战双方投入兵力近百万，又有一百三十万民工赶赴战场支前，“人力、物力的消耗空前巨大，山东的水都几乎要喝干”。而在晋冀鲁豫解放区，战争进行了一年以后，百姓承担的公粮份额与其收入比，由原来的百分之十二点三上升到百分之十四点九，“农民的鸡、猪、牲口看见的不多了，村庄的树也不见了”。

“共产党是否失败了？”

中国内战爆发一年之后，世界舆论就这个问题作出大量评述，似乎都倾向于认为蒋介石打了胜仗——“他占领了共产党在整个华北的大城市和约一百六十多个中小城市，你从地图上——地图上只标出城市——就可以看到他占了多少土地。甚至一九四七年夏在莫斯科，我也听到了这种流行的说法：‘太不幸了，中国共产党人不能取胜，因为他

们没有重工业。'……当我向莫斯科外交学院的一些学生保证，中国共产党正在取得胜利，他们坚决表示：'不可能，他们把城市都丢光了。'"

显然，中国共产党人并不这么认为。

毛泽东"对城市的丢失表现得很镇静"，他认为蒋介石占领大城市的结果，仅仅是得到了一些"空荡荡的大楼和美国的大号新闻标题"，重要的是国民党军队为此"损失了有生力量"。

朱德声称，共产党人要放国民党军进入大城市："我们放他们进来，他们驻在城市里，一派队伍出城要粮，我们就把他吃掉。吃得差不多了，我们就收复城市。"

而陈毅则说："按传统的军事战略，我们应该调最精锐的部队去保卫城市，并考虑我们能据守多久。但是，我们根本不这样做。我们所考虑的是，我们能消灭掉多少出动的蒋军，他们遭到重创之后，将于什么时候撤退，以及在他们溃退时，我们将如何进一步消灭他。"

刘伯承的理论是："得人失地，地可夺回；得地失人，人地两空。"他认为一年来的战争于共产党人很是合算："我以十七座城市换取了蒋介石六万军队，据说蒋喜欢这笔买卖，他还要继续干下去，我也乐于奉陪。"

国际舆论如果不是在政治上褊袒国民党政府的话，也因地缘文化的差异无法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计算方式。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人自建立自己的武装以来，始终在以这种计算方式来衡量着自己的得失。内战爆发一年，国民党军在总兵力上的损失证明了这一点。一九四六年六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国民党正规军已在战争中损失七十八万人，约合二百九十三个团；非正规军损失三十四万人，约合一百二

十八个团。由此，国共双方兵力对比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共产党军队总兵力由内战爆发时的一百二十七万人，增加到一百九十五万人，野战军兵力从六十一万人增加到一百零三万五千人；而国民党军的总兵力从内战爆发时的四百三十万人下降到三百七十万人，其中正规军兵力从两百万人下降到一百五十万人。共产党军队兵力的增加显然受益于经过土地改革翻身青年农民的参军热情，同时也得益于相当数量被俘国民党军士兵的立场转变。

国民党军总兵力的下降至少给他们带来两个危险：第一、缺乏战略机动兵力。其二百二十七个用于进攻解放区的作战旅中，因为要担负漫长的交通线和大量的大中城市的守备，能够投入战场进行机动作战兵力不足五十个旅。第二、后方守备空虚，由于战场集中在中国的北方，长江以南以及新疆、青海、宁夏等十九个省，仅仅驻防着二十一个旅，其中的湖南、广西、贵州、福建、浙江和江西六省间竟然没有一支正规军，这导致了战争必备的二线部队几乎不存在。

由于战争规模巨大，国民政府的军费开支已经占其全部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沉重的战争负担让国民政府感到了空前的财政压力。抗日战争结束时由于得到美国大量的装备、物资和资金而实力充足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一九四七年，美国资本在华投资占各国在华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八十，这些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一起控制着中国经济，民族资本遭到毁灭性打击，中国经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严重萎缩，全国的工业产量在一年中急剧下降近百分之四十。在国民党政府控制的农村地区，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农民生活日益悲惨，大量的农民逃离土地而选择流浪，一九四七年，仅河南、湖南和广东三省弃耕的农田就达五千八百万亩以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五月三十日写给国务卿马歇尔的信中说："由于粮食问题，中国的经济形势普遍比已知的情况更加糟糕……在长江流域的华南，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现在完全没有大米，大米都在富裕的地主手里。"

经济的恶化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一九四七年，国民政府财政收入为法币十四万亿元，而支出却高达四十三万亿元。转嫁巨大赤字的办法，一是向民众增加捐税，二是大量印刷纸币——“民国万税，百姓只有放屁方不纳税。”内战爆发时，国民政府的纸币发行量是三万七千亿元，而到一九四七年便猛然增到三十三万亿元，以至中国的印刷厂无法承担如此巨大的印刷量，需要美国和英国的印刷厂协助印刷。货币的大量发行引起物价飞涨，物价平均价格已是抗战胜利时的六万倍。有人因此推算出国民政府发行的一百元法币的购买力演变过程：一九三七年可以买两头牛，一九四五年可以买两个鸡蛋，一九四六年可以买六分之一块肥皂，一九四七年只能买到一颗煤球。

人民的生活得不到保障，抗议风潮四起，抗议的内容多是“反饥饿”、“反内战”。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国民党军界元老冯玉祥发表了一份《告全国同胞书》，称“玉祥是国民党员，在国民党的每个党员，都应该本着自己的天良来说真话”：

……自去年推翻政协决议，开始打内战以来，在国际上，美国的报纸没有一天不说：南京是坏政府，南京是独裁政府，南京是最贪污的官僚集团；又说世界不和平完全由中国打内战惹出来的，非共管中国不可……美国人要共管我们，我们自己还打什么？……经济的事，由二百二十元法币换一元美金，内部打起来了，就涨到一万二千换一元美金，最近到了两万八千至三万了。公务员的薪水，怎么长，也赶不上米价长得那么快。这样，人民怎么活呢？还怪人民抢米吗？……团有团的历史，军有军的历史，随意乱拨，残废的、受伤的和阵亡的官兵，怎么考查呢？故意地弄糟糕，军心涣散到了极点，许多有知识、有功劳的军官去哭灵，世界各国无不大声失笑……为什么许多军人，成军、成师、成团、成营到共产党里头去？就是拿着军人太不当人看。这样下去，赏罚不公，是非颠倒，还要出更大的乱子。政治全在用人得当，全在亲民，不拿人民当主人，还是什么民国？……人民是中华民国的主人，胜利（抗战）之后，又随便征粮，随便征兵，粮征走了，人民吃什么？儿子抓走了，他这一家人怎样过呢？人民都死光了，政府还有什么用？“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违背了民意，就是违背了天意，违背了天意，还有能不失败的吗？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舆论，谈论最多的还是国共双方军队的士气。

战争已经进行了整整一年，蒋介石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的是士气问题——“剿匪军事，到现在已经荏苒一年，我们不但尚未把匪军消灭，而且不能使剿匪军事告一段落，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匪军何以能用劣势装备而且毫无现代训练的部队来击败我们整师整旅的兵力？此其原因何在？结症何在？……主要的必然不在物质方面，而是在士气精神上面。”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不把与共产党军队作战“当作生死攸关的一件事”，这无疑是最危险的“失败的朕兆”：

……现在一般高级将领对于统帅的信仰，可以说完全丧失了！我亲口说的话，亲手定的计划，告诉前方将领，不仅没有人遵照实行，而且嫌我麻烦觉得讨厌！以为委员长年纪老了，过了时代，好像家庭里的一个老头子，唠唠叨叨，什么都管，尽可不必重视他……对于统帅的信心如果不能恢复，那我们今后作战不仅不能胜利，而且还要陷于更悲惨的境遇——大家都要作土匪的俘虏！

而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写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对国民党军队的士气问题有如下描述：

目前的军事行动，已超过了许多月以来的规模。国民党政府显然想要，而且非常需要在山东获得一次大的军事胜利，但他并未得到这个胜利……政府军有日益不愿打仗的迹象……当敌人是日本人的时候，不断的打仗似乎还有些道理，而这是打中国人的时候，就没有多大斗志了。这种士气的消沉，似乎反映军队中并不了解内战究竟为了什么。而在某些场合，他们就容易接受共产党要他们放下武器的呼吁。

美国记者葛兰恒访问了设在山东半岛深山里的一所“解放军官招待所”——实际上就是一所战俘营——“招待所”里住着五十多名被俘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

到达“解放军官招待所”需要步行穿过许多险峻的山谷和隘口。这里是一个极其秘密的地方，也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犹如香格里拉的缩影”。八间房屋分布在两个院子里。还有一个院子是俱乐部和食堂。窗户上都安了阻挡蚊子的纱布。这里吃得不错，每天有两斤四两粮食，两斤半蔬菜，每个月有四斤肉，而负责警卫的解放军干部和战士一律吃粗粮和咸菜。这里甚至还可以享受到“一个小小的奇迹”，即

两个“与人体一样大的外国搪瓷洗澡盆”，澡盆是解放军官兵靠人力千辛万苦才运进山里的。这里禁止使用“战俘”或“犯人”这样的字眼儿，被俘人员一律被称为“解放军官”，他们的被俘日被称为“被解放日”。他们由一个自己民主选出来的委员会管理自己，“只要他们不捣乱不逃跑，就会享受到充分尊重，有充分的言论和集会的自由”。这里的学习安排得十分紧张，内容包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之比较”等等——只有一位将领不愿意参加学习，他就是原国民党军整编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马将军除了学英语外，顽固拒绝学习任何别的东西。”

美国记者给这些被俘的国民党将领开列出需要调查的问题。在回答“什么人应该为这场内战负责”这一问题时，记者得到的结果是：认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应该负责的有二十一人；认为陈立夫兄弟应该负责的有十八人，认为陈诚应该负责的有十五人；认为乔治·马歇尔将军应该负责的有十一人；认为蒋介石和毛泽东应该共同负责的有三人，认为蒋介石应该单独负责的有六人，认为毛泽东应该单独负责的有一人，对此不发表意见的有三人。令美国记者感到吃惊的是，在这些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中，“很少有人，也许根本没有人”认为国民党能够在这场内战中取得胜利。一位国民党军的师副参谋长告诉记者：“早在山东战役开始之前，我们军官就都认为，国军很快就会打败……不是为了下面的三个理由，我早就离开部队了：我在部队人事关系很好；我曾向部队借了款，我要还债；我的家完全靠我的薪水生活。”当被问及你的部队失败的原因时，四十五票认为国民党军战略错误，四十四票认为国民党军情报工作差，三十八票认为低估了共产党军队的力量，二十四票认为国民党军最高统帅领导无方，同样的二十四票认为解放区百姓憎恨国民党军队，十八票认为国民党军队供应线太长，十七票认为国民党军士气低落，十二票认为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对内战漠不关心，同样的十二票认为装备差，十一票认为气候恶劣，

九票认为国民党军官之间存在矛盾，七票认为国民党军官被打死后士兵立即投降。

倔强的马励武将军终于愿意与记者交谈了。他首先对共产党在解放区搞土改的作法表示赞赏，认为只要坚持搞下去，必会取得更大的社会成果。但他对停止内战、实现和平的前景表示悲观："蒋介石本人知道战争必须停止，但是我认为他不会放弃战争。即使是错误的政策，他也会执行到底。因为他认为他就是政府，他必须维护他本人和国家的共同威信。而且，战争结束，他的事业可能也就结束了。"

"共产党绝不能打败我们。"虽然对国民党军无法遏止的腐败和普遍低迷的士气感到无比愤怒，但蒋介石依旧认为他有把握赢得战争，他的理由是军队和武器的强大："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匪军不如我们，尤其是空军、战车以及后方交通运输工具，如火车、轮船、汽车等，更完全是我们国军所独有，一切军需补给，如粮秣弹药等，我们也比匪军丰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据点，大都市和工矿的资源，也完全控制在我们的手中。"

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九日，蒋介石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试图在内战爆发一周年之际再次探询一下美国政府的立场。司徒雷登的具体立场是：中国的内战已到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委员长绝不能再犹豫不决，要不宣布与共产党重新开始谈判，要不宣布共产党是武装叛乱集团已危害民族利益，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司徒雷登敦促蒋介石立即做三件事：

一、采取紧急措施，发布宣言，向全国人民说清楚："如果共产党人拒绝最近的和平建议"，应该让他们对中国人民负责；如果共产党希望维护在立宪政府下出现的民主生活，他们就应该与国民党人一起工作，"从危险中解救国家"；

二、政府应该尊重公民的自由，“危机时期需要政府以极大的勇气和无私的态度厉行改革。否则政府不得人心，将为人民唾弃；

三、委员长本人应该“游历全国，发表演讲，唤起民众团结在新的运动周围”，一旦获得人民的支持，就不必“因共产党的军事力量或其他行动而担惊受怕”，同时还能“赢得美国及世界各国的充分同情”。

蒋介石接受了司徒雷登的建议。

司徒雷登所建议的“新的运动”是什么？

随着国民政府连续宣布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这个“新的运动”终于有了一个新名词：“戡乱总动员”。

六月三十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是否对共产党“正式颁布讨伐令”的问题。结果是与会者一致表示：“极应明令剿办，戡平内乱。”紧接着，七月四日，国民政府国务会议通过了蒋介石“交议”的《厉行全国总动员，戡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宪政，贯彻和平方针案》，并以国民政府名义颁布了《厉行全国总动员戡平共匪叛乱训令》。之后，又颁布了《立即实施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大纲》和《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办法》。

至此，无论是国内舆论还是世界舆论，一直以来对中国前景的种种猜测，终于有了明确答案，那就是战争。

从这一时刻起，国共两党已经没有任何和谈的可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为保卫解放区而进行的战斗已被明确定性为“武装叛乱”，共产党人已成为实现民主和实施宪政的最大“障碍和敌人”——蒋介石的心情畅快了一些，因为该明确的事终于明确了，这样一来，消灭共产党的战争“就简单多了，对于民众的号召也便利多了”——“国务会议通过

总动员令，实为对共匪的重大之打击，不仅军心一振，而民心亦得一致矣。”

这是中国当代史上的一个严重事件。

内战爆发一年以来，即使国民党军对各解放区大举进攻，即使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不同的战场都在进行反击作战，国共两党之间依旧存在着沟通的渠道，甚至还保持着沟通乃至和谈的态势，至少国民党方面没有如同一九二七年国共决裂时那样公开宣称对共产党人斩尽杀绝。同时，无论战争进行得如何惨烈，国民政府虽将绝大部分正规军都派往了各解放区战场，但终究没有宣布全国进入战争状态。

但是，这一切都随着“戡乱总动员令”的发出彻底改变了。

七月十三日，新华社发表了题为《总动员与总崩溃》的社论，言辞之尖刻，显然是毛泽东的文风：

> 七月四日蒋介石的“戡平共匪叛乱动员令”丝毫没有令人惊异。蒋介石早已决心与全国人民为敌到底，背叛政协路线到底，把内战打到底，把任何和平妥协之门关到底，所有这些人民都早已知道了。所以美联社说：“这个命令的实际意义没有象征的意义那么多。”它有什么象征的意义呢？它象征蒋管区的人民将要遭受更大的压迫。蒋介石既然正式宣布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为“共匪”，正式宣布任何和平运动为“法外之滋扰”，那么一切要求民主的人，要求和平的人，包括国民党内日见增多的倾向和平的人，就都可以公开逮捕残杀了。它象征蒋管区人民将要遭受更重的征兵、征粮、征税、派款、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破产和饥饿的灾难。蒋介石把这些灾难叫做“全国人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因此说如果今日削弱了国军，就是动摇了“全国人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它象征蒋介石将要进一步卖国，以获得美帝国主义的进一步援助，蒋介石的发言人已经暗示南京将要接受“与希腊相同的财政、政治和军事的监督”。但是最重要的，它是象征着蒋介石的统治将要总崩溃！事实上，蒋介石的真正总动员老早实行过了，在以前他是只做不讲；现在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总动员，只等着一个总崩溃了……

七月初，获悉国民政府宣布中国全面进入内战后，杜鲁门总统决定“就中国现在及未来的政治、经济、心理和军事情况，作一估量”。十一日，抗战期间曾担任过中国战区参谋长的魏德迈将军率调查团到

达中国，调查团成员包括来自美国国务院、财政部、陆军部、海军部的军事、政治、经济、新闻和公共事务等方面的专家和顾问。杜鲁门总统对魏德迈的指令是：只有得到中国政府对中国复兴计划提出令人满意的证据以及美国的援助能够切实做到被美国政府所监督的保证之后，美国才考虑对中国的援助。

自从下飞机开始，魏德迈就没有给蒋介石任何一种友好的表示。他首先声明他不是来旅游的，不接受任何应酬，因此拒绝了蒋介石的欢迎宴会，然后在简单听取了宋子文、孙立人等人就中国目前局势的介绍后，立即率领调查团离开了南京。一个月内，调查团走遍沈阳、抚顺、北平、天津、青岛、济南、上海、武汉、广州和台湾等地，会见当地的政府官员和各界人士，召开了一连串的座谈会。八月二十二日，魏德迈宣布考察结束。蒋介石准备了盛大的饯行宴会，魏德迈却要求把宴会改为他的演讲会。魏德迈的演讲让蒋介石和国民党高级官员目瞪口呆：

> 中央政府不能以武力击败中国共产党，而只有立即改进政治及经济状况以争取人民群众忠心的、热烈的、至诚的拥护。中央政府在共产党的猛攻之下能否屹立或倒台，将决定这种政治与经济状况改进的效率与时机……根据我的调查，我发现不少政府官员将他们的兄弟子侄安置于政府，任职于国营或私营公司之中，利用职权不顾国家与人民的福利而谋取巨利。假如诸君对各种大银行组织及其他新设的商业组织做一调查以确定这些组织已经赚了多少钱，这些钱已付给何人或何种人的集团，那是很有趣而且足以暴露真相的。

即使登上了返回美国的飞机，魏德迈对国民党官员的憎恶依然未消：“大多数人的品行是特别表现出贪婪、无能昭著，或者二者俱全。”

尽管对国民政府的种种腐败和无能了如指掌，魏德迈回国之后还是向杜鲁门总统提出了给予国民政府大规模援助的建议，他的唯一出发点是：为了防止苏联控制中国——“一个与美国友好或结盟的统一的中国，不但可供给重要的海空军基地，而且从它的幅员与人力来看，

也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盟友。”为此，魏德迈甚至提出按照联合国宪章“将满洲置于五强监护制度之下”，他担心由于国民党军队在中国东北的失败导致那一重要地域为苏联所控制。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军队作战的另一个原因，司徒雷登说得悲伤而无奈：“我们无法把所有的部队再运回来。光是把其中的一部分运到现在的阵地，美国已经花费了三亿美元。”

此刻，远在陕北的毛泽东又返回到靖边县的小河村。

小河村里一个穿着件粗白布褂子的十四岁女娃兰兰给毛泽东做了一双新布鞋。毛泽东穿了，很合脚。

兰兰的母亲问毛泽东：“苦日子啥时候能到头？”

毛泽东回答说：“快啦快啦。”

七月二十一日，在小河村，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史称“小河会议”。

天气热了，警卫战士在院子里搭起一个很大的凉棚，几乎把整个院子都遮住了。参加会议的除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杨尚昆之外，还有从前线赶来的彭德怀、习仲勋、马明方、贾拓夫、张宗逊、王震、贺龙、张经武、陈赓等将领。所有人都坐在从百姓那里借来的板凳上。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提出一个考虑甚久的“战争时间表”，即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大约需要五年时间：

> 我们说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来解决，这也用不着讲出去，还是要作长期准备，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而不要像蒋介石那样，先说三个月要解决共产党，又说几个月，到了现在又说是才开始。

后来解放战争的历史证明，从毛泽东提出这个时间表开始，到共产党人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其进程仅用了不到三年。毛泽东主张从现在开始，各主力部队要从解放区内打出去，将战争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毛泽东认为，尽管军事形势依然严峻，但改变形势的条件已经形成，战争不能按照蒋介石的计划继续在解放区内打下去，不能让战争使解放区民众的负担一日甚过一日，不能让土地改革后的解放区遭到彻底的破坏和毁灭。毛泽东说："蒋介石搞了个黄河战略，一个拳头打山东，一个拳头打陕北，想迫使我们在华北与他决战。可他没想到，自己的两个拳头这么一伸，他的胸膛就露出来了。所以，我们呢，给他来个针锋相对，也还他一个黄河战略：紧紧拖住他这两个拳头，然后对准他的胸膛插上一刀！"由战略防御转到战略进攻，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基本任务是：

> 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

这是一个惊人的决定。

此时，共产党军队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装备上依旧处于劣势，国民党军队占有其广大控制区内丰富的人力和物力，美国政府继续对其进行着军事和经济上的援助，战争所需要的巨大资源的天平依旧在向国民党一方倾斜。国民党军队的三十一个旅压在陕北战场上，五十六个旅压在山东战场上，在东北战场也保持着相当规模的兵力，而在这些区域里的共产党军队正在与国民党军队艰苦作战。陕北解放区首府延安、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和华北解放区首府张家口等重要城市相继沦陷敌手，全国范围内的解放区面积都在逐步缩小——无论从哪一方面讲，对于共产党一方来说，战况好转的迹象并没有显露。那么，毛泽东主张的进行全面反攻的依据何在？大兵团离开解放区，"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这一大胆设想的令人担心之处是：自创建以来就依赖根

据地生存的共产党军队，一旦离开解放区人力物力的依托，离开了解放区民众的支援，粮食弹药如何筹措？支前民工从何而来？官兵负伤安置在哪里？遭到包围后往何处突围？从战争爆发以来的态势上看，蒋介石不正在处心积虑地要把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从其控制区里赶出来加以消灭吗?

毛泽东站在被连绵的黄土高原所环绕的小河村里极目远眺。

解放战争的重要转折时刻就要来临了。

## 战略进攻

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冀鲁豫大平原上皓月当空。

在黄河中下游河南与山东交界处，一声炮响之后，自临濮至张秋镇约一百五十公里的河段上，晋冀鲁豫野战军十余万人马开始由北向南强渡黄河。

横亘于中国国土中部的这条大河，以浑黄的河水举世闻名，更以凶险的水情让任何一支试图跨越它向对岸实施攻击的军队望而却步。因为中原地理位置的格外重要，这条大河自中国的春秋时期起，便目睹了无数次惨烈的战争景象。但是，对于一九四七年六月间的那个夜晚，无论事后的叙述使用了怎样壮怀的词汇，当时的情景却完全出乎晋冀鲁豫野战军将领们的预料。

新华社记者李普现场报道:

沿岸八个县的水手，都参加了渡河工作。自从解放军开始渡河以来，蒋介石的飞机日夜频繁骚扰，但未能阻止我大军前进。船只分大小两种，于去年十一月开始建造，大的可以载运十轮大卡车两辆，小的可以载运三四十个人。水手们兴奋地谈说三十日晚上的动人情景：那天，第一次载运突击队的时候，大家悄悄地、紧张地动作着。河这边看着表，从开始到突击队抵达对岸放信号枪，恰恰是五分钟。有许多渡口是在猛烈的炮火下强渡的。在我经过的这个渡口，由一部分蒋军和还乡团防守，那天晚上蒋军们逃得很快，蒋介石的忠实走狗还乡

团还在做梦。等到他们知晓的时候，已经做了俘虏。解放军就是这样在五分钟之内粉碎了被蒋介石吹嘘的黄河天险等于四十万大军的神话。当记者和水手们谈起蒋介石的这个神话的时候，他们都莫不哈哈大笑。他们都是黄河上乘风破浪的老把式，他们展开了立功运动，看谁的船快，谁渡的次数多。十年前他们驶着船来往于济南、开封之间，他们说：等到把这两个地方解放后，就有生意做，黄河又要活跃起来了。

黄河的临濮至张秋镇段，是国民党军分割山东解放区与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边界。至少就防御而言，他们有充分理由在此部署巨大的兵力，以利用黄河天堑“防止共产党军队在被压缩得很狭窄的区域中流窜出来”。但是，由整编五十五师和整编六十八师共同构成的河防防线形同虚设。

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的那天，国民党方面正在开会讨论是否对共产党“正式颁布讨伐令”。没有史料确切地表明国民党的高官大员们对黄河岸边发生的军事行动有过分的惊骇。蒋介石最初的判断是：“刘、邓向北流窜不成，企图向南夺路。”参谋总长陈诚的语气更是轻描淡写：“共军刘伯承回窜鲁西，对战局稍有影响。”倒是毫无作战经验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预感到了什么，他坚持认为共产党军队在这个月圆之夜南渡黄河的行动“绝非好兆头”。

这确实是共产党人精心策划的一次意义重大的军事行动。

为了“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共产党人制定了三军挺进，“经略中原”的战略部署：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由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指挥，从国民党军南线的中部实施突破，攻占鲁西南，跃进大别山，以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平汉路以东、淮南铁路以西为作战范围。这路作战部队通称“刘邓大军”。以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由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富治指挥，从晋南南渡黄河，挺进豫西，以黄河、渭水以南、汉水以北、平汉路以西、西安以东为作战范围。这路作战部队通称“陈谢大军”。以华东野战军主力，由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指挥，挺进鲁西南，进军豫皖苏边区，

以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平汉路以东、运河以西为作战范围。这路作战部队通称“陈粟大军”。

共产党人的三路大军呈“品”字形配合作战，目标直指国土腹地的国民党控制区域。

从解放区内部向外线出击，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突击的矛头首先指向哪里？共产党人的选择是：大别山。刘伯承说：“大别山，雄峙于国民党首都南京与长江中游重要城市武汉之间鄂、豫、皖三省交界处，是敌人战略最敏感而又最薄弱的地区。这里又曾经是一块老革命根据地，有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广大群众，多年来一直有我们的游击队坚持斗争，我们容易立足生根。我军占据大别山，就可以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瞰制中原。‘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蒋介石必然会调动其进攻山东、陕北的部队回援，同我们争夺这块战略要地，这就恰恰可以达到我们预期的战略目的。”

毛泽东致电刘邓大军：采取跃进的进攻形式，“下决心不要后方”，长驱直入，一举插进敌人的战略纵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建立革命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

不要后方的军事行动是孤注一掷的行动。

七月四日黄昏，刘伯承和邓小平在寿张县蔡楼渡口乘坐一条大木船渡过了黄河。星垂旷野，月映中流。半渡时，天上来了飞机，投下的照明弹将黄河河面照得如同白昼。刘伯承和邓小平让船工们别害怕，说这是蒋介石怕咱们夜间渡河看不见特地来点灯了。船工们起劲地划桨。船靠南岸之后，刘伯承和邓小平立刻消失在夜色中。船工们聚集在一起，很是感慨了一番，说共产党队伍里有这样的将军定能成大事。正说着，一个小兵跑了回来，怀里抱着一大块猪肉，说这是刚才渡河的首长给船工们的谢礼。

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后，为堵塞黄河南线已被扯开的防御缺口，国民党军紧急做出应对部署：从豫北调整编三十二、六十六师，从皖西北调整编六十三师一五三旅，从豫皖苏地区调整编五十八师的两个旅，连同鲁西南地区的整编七十师，统一归属从鲁中调来的第二兵团司令官王敬久指挥，分两路向鲁西南的定陶、巨野方向推进。同时，命第四绥靖区司令官刘汝明部的整编五十五师和整编六十八师，死守黄河以南的郓城与菏泽地区。国民党军的军事调动出自一个简单明了的目的：以一部死守定陶和郓城，吸引刘邓部主力，待其久攻不下时，东、西两路展开钳形攻势，将刘邓部主力压缩于陇海路、黄河与大运河的三角地带，使之或者背水决战，或者退回黄河以北。

此刻，蒋介石并没有判明刘邓大军主力南渡黄河的真实意图。

刘伯承和邓小平渡过黄河后，住进一个名叫河西的村子。房东是个老实忠厚的农民，叫包承章，全家四口，六间砖泥房。主人把其中的四间腾出来，打扫干净，摆上了一张八仙桌和一把茶壶、几只茶碗。刘邓大军指挥部的电话和电台设在包承章家旁边的包承全家里，两家之间是一小片茂盛的桑树林，指挥部的汽车就隐蔽在林子里。刘伯承穿着灰色的军衣，邓小平穿着白色的衬衣，俩人坐在包承章家院子里的大槐树下，战士们向主人讨来些开水，并在桌子上的茶盘里放了些冰糖块。一群衣衫破旧的孩子在他们身边玩耍吵闹，刘伯承和邓小平偶尔停下正在商量的事，招呼着孩子们，往他们黑乎乎的小手里塞块冰糖。

此时，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已全部渡过黄河。他们是：第一纵队，辖一、二、十九、二十旅，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第二纵队，辖四、五、六旅，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王维刚；第三纵队，辖七、八、九旅，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彭涛；第六纵队，辖

十六、十七、十八旅，司令员王近山、政治委员杜义德。还有晋冀鲁豫军区独立一旅，旅长蔡爱卿、政治委员崔健功。

刘伯承、邓小平向中央军委报告了南渡黄河的总兵力：十二万三千五百一十八人。

十二万大军渡过黄河，向国民党军迎面扑来，发生于中原的剧烈战斗已是不可避免。

刘邓大军的意图是：利用东路来敌尚未到达作战区域之机，抢先攻击兵力较弱的西路来敌，以使突入中原的部队建立一个能够站住脚的战场。具体作战部署是：一纵四个旅攻击郓城，六纵和二纵的一个旅攻击定陶，二纵的两个旅攻击曹县，其余部队担负穿插掩护任务。

郓城是鲁西南的一座古城，作战双方都对这座古城感兴趣的原因是：晋冀鲁豫野战军希望以攻击行动吸引国民党军主力来援，以创造各个击破的战机；而国民党军企图通过对郓城的顽强防御，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牵制于城下，给东、西两路部队赢得形成钳击的运动时间。

郓城城防工事坚固，砖质城墙高七米以上，四座城门都建有碉堡群，街巷中的火力体系也相当完备。守军为国民党军整编五十五师。

七月四日黄昏，一纵对郓城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国民党守军很快就发现，利用郓城的坚固工事迫使晋冀鲁豫野战军盘桓于此的希望十分渺茫。攻击的炮声骤然响起时，正在召集军事会议的整编五十五师师长曹福霖立即命令军官们迅速返回部队，但往回跑的军官近三分之一因被炮火所伤未能到达指挥位置。侥幸安全返回城南关的八十七团代理团长余克浚立即部署防御作战。他把他的部队分成三个梯队，还特别为可能发生在壕沟里的肉搏战做了准备。八十七团的作战部署刚

刚下达，猛烈的炮火就把团部的围寨轰开了，紧跟着一纵的官兵冲了进来，余团长几乎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俘了。余克浚放下武器走出团部，看到十几名共产党士兵整齐地站在门外，“四周的工事里也整齐地伏着战士的行列”。——“这使我十分佩服，这是我理想中的好队伍，二十年来我所梦想的就是这样的队伍。”

在一纵二十旅拿下南关的同时，一旅也占领了城西关。

七日黄昏，当接近城墙的交通壕全部挖好之后，总攻开始了。在炮火掩护下，一纵二十旅突击队突上了城墙，但是遭到守军的凶猛反击。一旅一团六连连续爆破，终于把城墙外的鹿砦炸开一个大缺口。八班长温好然头部中弹，依旧抱着炸药包往上冲，冲到外壕边沿时，他的手部再次中弹。连长命令他下去包扎，他死也不肯。在随部队登城时，温班长的腰部再次中弹，倒下去的时候他朝战士们喊：“赶快进去打敌人！进去千万不要犯纪律！”温班长平时对战士很好，新战士哭了起来。副班长万祥勋说：“别哭！找敌人算账去！我只要不死就一定领着大家干！”守军的反击十分顽强，打到跟前还不肯放下武器。九连一排长孙先居带领的小组伤亡很大，他恼火了，一跃而起，竟然抓起正在射击的两挺机枪的枪管，硬是把守军的机枪抢了过来。

一纵各旅相继突破后，进入城内沿着街巷顽强攻击，目标直指设在城中教堂里的整编五十五师师部。

当师部受到攻击的时候，师长曹福霖换上便衣，与少数随从一起，秘密地从城东关逃出，一路向东逃到了嘉祥。但副师长理明亚没有如此幸运，他潜逃出去之后，在城外的庄稼地里被配合作战的民兵发现。他说他是伙夫，民兵们不信，因为他有一支漂亮的美式手枪，民兵们说：“如果不说实话就用刺刀穿了你。”理副师长立即坦白了自己的身份。当他交出财物时，民兵们拒绝了，说共产党有政策，只缴他的枪不缴他的金子。民兵们将他带回村里，给他做了一碗白面面

条，理明亚吃面条时，看见这些支持共产党军队作战的民兵们啃的是粗粮野菜馍馍，一时间感动得难以言表。第二天他被送到了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

郓城战斗结束后，刘伯承、邓小平总结了城市攻坚作战的制胜要点："攻城突击点的选择，应在敌人最忽略的地方。为使选定之突击点不过早被敌发现，他方以积极佯动吸引敌人"。"步炮兵指挥员均架有电话，交通情报非常顺畅灵通及时；步兵与炮兵在进展中，炮兵火力始终保持在步兵前面二十公尺的地方，轰击敌人为步兵开路"。"为防止一个突破口不能成功，亦可选定数个突破口，但于一个突破口成功后，位于其他突破口的突击部队，应立即转向成功之突破口，协同夹击敌人，扩大此一突破口"，"如此即须事先令各突击部队对每个突破口之地形道路有详慎之侦察与熟悉"。

一纵攻击郓城之时，六纵开始攻击定陶。定陶国民党守军为整编六十三师一五三旅。七月十日晚，六纵十六旅四十七团从东门、十八旅五十二团从北门同时发起进攻，五个小时后，部队攻入城内将守军分割围歼。

战斗中，一位被子弹击中跌下云梯的排长的伤势令包括刘伯承、邓小平在内野战军官兵们格外牵挂。这个农民出身的大个子排长二十六岁，曾在国民党军中当了六年机枪手，抗战胜利后，在一次国共军队冲突时被俘，随后留在了共产党军队里。他不善言辞，性格憨厚，高兴的时候喜欢摆弄自己的机枪，能蒙着眼睛把一挺最新式的机枪快速分解成零件，然后又飞速地重新装配起来，不高兴的时候，他就说些"共产党就几条破枪，根本打不过国民党"和"共产党干部就会收买人心，明天上战场还不是拿着匣子枪逼你去拼命"之类的怪话。官兵们都说他是"最难改造的那种大头兵"。一九四六年冬季里的一天，连队指导员让他讲讲曾经受过的苦，大个子顿时哭了起来。他是安徽阜阳水

围子人，五岁那年，父亲因拖欠租子被地主打断腿，爬回家没几天就死了。他家的房子被地主顶了租，母亲带着他和弟弟到处流浪讨饭。十七岁那年，保长把他抓到国民党军队里。因为担心母亲和弟弟，他逃过三次，每次被抓回来都被打个半死。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对别人倾诉自己的苦难，官兵们说一定要找到那个地主算账。部队打兰封时，他的机枪枪管都打红了。战后指导员表扬他作战勇敢，他坦诚地说战斗开始前他想溜号，因为在国民党军队时长官说共军打仗都让俘虏兵打头阵送死。但是，他亲眼看见了，战斗中干部们都冲在最前面。他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以后看我的。"很快，他当了班长入了党。在一次战斗中，他带领全班面对国民党军的疯狂攻击，坚守阵地一个昼夜，不但守住了阵地，而且全班无一伤亡。他的班被评为"模范战斗班"，他被评为"杀敌英雄"，他的名字出现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日的《解放日报》上。报纸上写道："党的教育，使王克勤从一个蒋介石手下的愚昧的奴隶，转而与广大人民相结合，很快地变成一员智仁勇全备的人民战士。"部队强渡黄河前，行军到一个村庄，由于这里是游击区，百姓们对共产党军队不了解，房东大娘带着儿媳妇躲了起来。王克勤和战士们睡在院子外，连房东家的一根草都没有动。第二天出发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挎包里多了十二个煮鸡蛋和一包香烟。他把一块银元留在房东家的桌子上，还留下了一张字条："我们知道您的儿子被国民党抓去当兵了，我们一定把他救出来！"在把鸡蛋和香烟分给战士们的时候，王克勤想起了自己生死不明的母亲，他说："记住，咱们要为人民打仗，要当人民的儿子！"七月十日晚上，他提着一筐手榴弹往城墙上爬，国民党守军的子弹击中他的胸部，他一下子从云梯上跌下来，腿也摔断了。王克勤坐在地上，一只手捂着冒血的伤口，一只手握着信号枪，直到看见突破口被打开，在发射了报告突击成功的信号弹之后，他才倒下。战士陈群背着他往救护所跑，在救护所他醒来了片刻，他对陈群说："我包袱里的几件衣服，分给大家吧，战斗打下来，大家缺衣服穿。"由于伤势严重，救护所紧急安排担架往后方转

运，王克勤在担架上又苏醒了片刻，这一次，他对陈群提出了个要求：“替我给毛主席写封信，就说是共产党把我救了……”立志要当人民的儿子的大个子排长王克勤死在了担架上。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八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撰写了《悼念王克勤同志》一文：“王克勤同志一年来建立了很多战功，树立起战斗与训练、技术与勇敢结合的为我全军所学习的新的进步的范例。我们对于他这种为人民立功不顾一切奋勇杀敌的牺牲精神和高尚品质，表示无限的崇敬。”

“做人民的儿子”，这是无论从伦理上还是从道理上，都令国民党军困惑不已的说法。而更令国民党军恐惧的是，成千上万的贫苦百姓宁愿牺牲一切，也要支援共产党军队作战。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南下的时候，黄河北岸解放区的支前民工多达百万，仅随军行动的担架队员和运输队员就达八万。鲁西南的百姓自己吃糠咽菜，却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准备了数量充足的物资，仅巨南县，三天之内就把一百四十万斤面粉送到了前沿。百姓们说：“哪怕十天不睡觉，也要让部队吃饱饭！”巨南县的妇女十五天内缝制了两万两千多双鞋子送到官兵们手中。共产党军队攻打郓城的时候，由民兵组成的战场外围封锁线长达百余里，村村设岗，昼夜巡逻，令溃败的国民党官兵几乎无路可逃。

郓城、定陶失守之后，国民党军收缩了战线。第二兵团司令官王敬久判断：共军不是西取菏泽，便是东取济宁。于是，他将整编七十师调到巨野东南的六营集，将整编三十二师调到金乡以北的独山集，将整编六十六师调到金乡西北的羊山集，自己则率指挥所和炮兵营到达了金乡。国民党军在菏泽与济宁之间摆成了一条长约五十公里的长阵。

此时的第二兵团是临时拼凑在一起的，王敬久对自己指挥的部队基本都不了解。但是，金乡是他的老家。回到老家的王敬久心情不

错，因为他修建的一座新居已接近完工。七月十二日，就在他大宴宾客庆祝新居落成的时候，突然传来消息，晋冀鲁豫野战军已出现在整编七十师驻地六营集附近，有分割国民党军的企图。王敬久立即命令整编七十师南移，向位于独山集的整编三十二师靠拢。可是，没过多久，传来了整编七十师移动受阻的消息。王敬久立即改变主意，命令独山集的整编三十二师北移，向六营集的整编七十师靠拢。王敬久的意图是：不管刘邓部的意图是什么，先让自己的部队收拢了再说。

王敬久摆出的长蛇阵是个容易被各个击破的部署，而且他为他的部队选择的集结位置同样危机四伏，除了整编六十六师所在的羊山集外，其余各部队都驻扎在地形狭窄的村庄里，即使装备优势也无从发挥。于是，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决定对王敬久部展开攻击：一纵负责切割王敬久部各师之间的联系，然后攻击位于独山集的整编三十二师；六纵协同一纵作战。二纵协同三纵围歼位于羊山集的整编六十六师。独立第一、第二旅负责阻击金乡的整编五十八师可能的增援。

王敬久比自己的部队收缩得快，他很快就跑到济宁城里去了。

七月十三日，整编三十二师从独山集出动，企图向六营集的整编七十师靠拢，但却受到一纵的猛烈阻击。由于一纵的兵力不足，整编三十二师除一三九旅遭遇重创外，师部和一四一旅终于进入六营集，与整编七十师会合。

六营集是个仅有两百多户人家的小村子，房屋多为土筑，根本无法抵挡炮火的攻击。时值酷暑，国民党军两个整编师的数万人马挤在一起，缺粮少水，未战先乱。整编三十二师师长唐永良与整编七十师师长陈颐鼎商量，决定向东北面的嘉祥突围。但是，王敬久指挥部来电，命令“坚不准动”。十四日早晨，指挥部再次来电，命令“两师并进”，经独山集解整编六十六师羊山集之围。十四日整整一天，突围战斗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傍晚，王敬久的命令再次到达，这次是要求唐

永良和陈颐鼎死守待援。然而，就在这时，一纵和六纵的总攻开始了。

这是一个闷热而混乱的夜晚。

六营集的北、西、南三个方向同时受到攻击。在持续不断的剧烈的枪炮声中，唐永良发现东面的战斗似乎微弱一些，于是认定那里是共军攻击的薄弱环节，立即命令所有部队集中向东突围。六营集的东面是一片很大的开阔地，国民党军蜂拥而出的时候并没有遭遇猛烈的拦截。但是，没有走多远，唐永良就后悔了：这里是共军有意留出的一个缺口，缺口外是一个早已布置好的大口袋。

“兵无斗志，将帅恐慌，是整个国民党军的膏肓之症。”在战斗中被俘的整编七十师上校参谋处长刘学基说，“刘伯承渡河后，我们王（王敬久）兵团的参谋部就手忙脚乱，朝令夕改，莫知所措了。弄得我们各级参谋人员，日夜拿着小红旗面对军用地图，不知该往哪里插。上下一样，两眼漆黑，人人皆知有敌情，但谁也不知解放军意图何在。有人说攻下郓城取菏泽，有人说攻下郓城取济宁，直到四日郓城被围吃紧，我师集结金乡后，将帅依然争论不休。五日奉命转进嘉祥，但夜达纸坊街时，忽又命令转到济宁。连夜马不停蹄，六日赶到济宁，人困马乏。九日又奉命进驻嘉祥。待十一日进抵杨官屯后，忽闻羊山集六十六师被围，于是全部人马大吃一惊。”——整编七十师接受美式装备训练足足一年半，刚上战场就陷入慌张混乱的调动中，它最终覆灭的时刻来临了。

当时天黑，大家争着往外跑，一出六营集不到十公尺，班长就找不到士兵了。人喊马叫，枪声从四面八方打过来，乱兵像疯人一样，向东跑一阵，一听枪声，又转身向西跑一阵，炮车、弹药、驮骡、马骑、牛车全部失掉管制，那真是乱兵、乱将、乱人、乱马、乱车、乱炮、乱冲、乱撞、乱喊、乱叫。彩号病号和被撞倒挤倒了的人，都来不及重新站起来，就被人马活活踏死……一七七团二营营长江树屏负伤卧倒，被师长的马踏死，而正副师长也终于丢掉了帽子之后，身边只剩下一个卫兵而被俘。

十五日天亮时，除整编三十二师师长唐永良带领少数随从突出去之外，包括整编三十二师一三九旅旅长唐化南在内的三千五百名国民党军被打死，被俘者达一万五千人之多，其中有整编七十师中将师长陈颐鼎和少将副师长罗哲东。

没过多久，惊魂未定的陈颐鼎和罗哲东接到了赴宴的邀请。宴请他们的是晋冀鲁豫军区副参谋长王世英，王世英与他们两人是黄埔军校的同学。酒过三巡，罗哲东回忆起大革命时期的生活："那个时候，革命军的士气是什么样子？与现在你们一样。革命军的人数很少，只有几杆破枪，把北洋军阀打垮了……那时候黄埔同学一见面，就问谁当了烈士，没有一个人怕死，以死为光荣。可是今天，这些东西都一去不复返了。"

接下来，攻击羊山集的战斗异常残酷。

蒋介石认为，刘邓部队连续作战，伤亡巨大，已是强弩之末。只要整编六十六师在羊山集把共军主力牵制住，待各路增援部队迅速到达后，就可形成与刘邓主力决战的态势。于是，他一面命令整编六十六师师长宋瑞珂死守羊山集，一面命令国民党军各路增援部队向羊山集快速集结。

羊山集的名字来自羊山。本是一马平川的鲁西南平原，在金乡和嘉祥一带突隆起几个小山包，羊山便是其中之一。小山下是个有着上千户人口的大村子，村庄四周是日伪占领时期修建的很深的壕沟。整编六十六师进入羊山集后，连日的大雨使壕沟里灌满了水，依山环水的地势使这里易守难攻。

对于刘伯承和邓小平来讲，迅速攻下羊山集就可掌握战场主动，如果久攻不克，就会面临被各路国民党军增援部队围歼的危险。国民

党军陆军总部徐州司令部参谋长郭汝瑰在日记中记述道:“羊山集命运决于此数日内，如共军不能将其攻下，则鲁西会战共军即系失败。”

七月十一日，王敬久亲赴羊山集检查防御。

十五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第三纵队开始了对羊山集的攻击。

整编六十六师系国民党军嫡系部队，老兵多，作战顽强，火力强劲，当晋冀鲁豫官兵已经攻进村时，整编六十六师组织起猛烈的反击，很快就夺回了被占领的阵地。为了尽快解决战斗，二纵和三纵不断加强攻击力量，不顾一切地反复冲锋，部队出现巨大的伤亡。三纵八旅二十二团屡次攻击无效，二营长吴锡山决心一死。他给团长徐学忠打电话说，如果我牺牲了，所有的钱都交党费，还要通知我的母亲。放下电话，吴锡山便率领全营再次发起冲锋，冲在最前面的他很快中弹身亡。二十三团和二十四团也在占领阵地后因无法坚持退了下来。二纵六旅曾在羊山集的西南角打开了突破口，国民党守军一度退到十字街的核心阵地，但是由于没有控制制高点，突击部队受到敌人侧射火力的猛烈射击。旅长周发田组织人员冲上去，去抢牺牲烈士的遗体，从他面前抬走的每一个人他都异常熟悉：十八团一营营长刘佩均、副营长王春成，二营教导员马瑞昌，三营副营长马金柱，作战参谋曹振东……

负责打阻击的六纵十六旅被紧急调来羊山集。在向羊山集开进的途中，尤太忠旅长看见沿途的玉米地里躺着二纵的伤员还没有转运下去，就命令部队组织抢运，而自己先去二纵指挥所向陈再道司令员报到。十六旅的官兵抢救伤员时心神不定，因为他们的任务是攻击羊山集，干部们催促战士快走，战士们却舍不得把伤员扔下。尤太忠旅长知道二纵和三纵这几天攻击受挫，但十六旅此刻的作战条件也不成熟，至少部队连地形都还没弄清楚呢。可是，当听说国民党军的增援

部队就要赶到时，尤太忠毫不犹豫地决定当晚发动攻击，并指定作战能力很强的四十六团担任主攻。

四十六团对羊山集的攻击过程，成为这支部队幸存者终生都感到遗憾的一件往事。炮火还没有上来，团长唐明春要求准备之后再发动攻击，但是他得到了“大局之下准备牺牲”的命令。国民党守军的火力十分凶猛，没有炮就只能用炸药包去炸。一营十几个人的工兵班轮番爆破，敌人的火力点没有炸掉几个，这个班很快就全班阵亡了。整整一个晚上，尤太忠的望远镜就没有放下过，他反复交代前沿部队：抓住了阵地就要巩固！不要被反下来！能占多少算多少！

四十六团二连长张天才，长脸，大眼睛，样子憨厚，打起仗来却胆子奇大，动不动就要刺刀见红。在攻下两个前沿阵地后，由于后续部队没跟上来，张天才奉命原地等待。此时，他的连队抓的七十多名俘虏成了累赘，由于牺牲，连队人已很少，既要看守阵地，还要看管俘虏。敌人再次进攻的时候，俘虏突然开始抢夺枪支，国民党守军趁机冲击，年仅二十一岁的张天才连长被乱枪击中。连长的阵亡令早已严重减员的二连无法组织起有效的作战，还活着的官兵开始往下撤。正向这里赶来的后续部队看见前面撤了，也开始往回撤，他们不知道，国民党守军的火力跟着就追射过来——这是令四十六团老兵不堪回首的往事。四十六团拼尽了全力。全团阵亡排以上干部十三人，战士六十五人，干部受伤三十四名，战士受伤四百四十八人。张天才连长的二连活下来的只有负伤的机枪班长和四名战士。挑着白馒头往阵地送饭的炊事员，看见遍布在战场上的尸体号啕大哭，任谁劝也劝不住，这个老兵坐在地上哭了很长时间。

天像被连日的炮火打漏了一样，大雨数日倾泻不止，整个羊山集一片泥泞，壕沟里的水已经齐胸高。攻击部队的官兵只穿一条裤衩站在壕沟里，个子矮的只在水面上露出一个脑袋。伤员的伤口被雨水泡

得发白溃烂，大雨令运送工作无法进行。那些战死者的尸体在积水中很快腐烂，发出令人窒息的气味。

大雨中，蒋介石的专机降落在开封机场。

蒋介石严令宋瑞珂死守羊山集，严令王敬久立即率整编五十八师和整编六十六师一九九旅北渡万福河增援羊山集。同时，从西安和潼关急调整编第十师、骑兵第一旅，从洛阳急调青年军二〇六师，从豫北急调整编四十师、从武汉急调整编五十二师八十二旅，从鲁中急调整编第五、第七、四十八、八十五师，由第四兵团司令官王仲廉统一指挥，驰援羊山集，蒋介石知道战事已经到了最后关头，抓住刘邓部久攻不利的机会，就有可能制造一个将十多万共产党军队彻底歼灭的军事奇迹。

刘伯承和邓小平调整了作战部署，决定在继续攻击羊山集的同时，抽调一纵十九旅和冀鲁豫军区部队在万福河北岸阻击援敌，适时放开一个缺口，让从金乡增援而来的整编六十六师一九九旅北渡万福河，然后立即切断该旅与随后跟进的整编五十八师的联系，集中主力将敌一九九旅全部吃掉。

二十二日，王敬久对整编五十八师师长鲁道源说："六十六师是陈诚的基本部队，你必须去解围，否则陈参谋总长不会饶恕你。"同时，王敬久还向一九九旅旅长王仕翘下达了最后的命令：限即日十二时到达羊山集，否则军法从事。鲁道源师长在传达这个命令时还附加了一句："不按时到达，就枪毙旅长。"旅长王仕翘在前进不能后有督战的情况下心情绝望："还是让我自杀了吧！有我在你们也跟着下不了台，我死了你们可以自己去寻找出路！"向羊山集开进的王旅长没有自杀，当他发现万福河北岸出现了一个缺口时，立即命令部队攻击前进。一九九旅刚过万福河，就发现与后面的鲁道源师长失去了联系，连一直紧跟在身后的督战队也没了踪影。王仕翘意识到：自己的后路被堵死

了。这时，他接到报告说，羊山集里的一个团已经突击而出迎接他了。王旅长只好率领部队硬着头皮继续前进。滂沱大雨中，一九九旅受到晋冀鲁豫野战军突然发起的猛烈攻击。只一会工夫，五九五团团长王鸿诏被打死，副旅长何竹负伤后被俘，王仕翘只身一人藏在一片高粱地里，很快就被搜查出来。王旅长对共产党官兵说："昨晚我算了卦，知道今天不吉利！"

整编五十八师见势不妙，退回金乡去了。

刘伯承、邓小平的对手已处于不利之势。国民党军各路援军虽多，但或被阻击，或尚在途中，或消极观望，而羊山集里的宋瑞珂部已是弹尽粮绝。蒋介石感慨宋瑞珂坚守羊山集整整两个星期，"实属党国中坚"。七月二十五日，深陷绝境的宋瑞珂接到了蒋介石的电报："羊山集苦战，中正闻之，忧心如焚。望吾弟转告部下官兵及诸同僚，目前虽处于危急之际，亦应固守到底。希吾弟赖上帝庇护，争取最后五分钟之胜利。"

刘伯承和邓小平上了羊山集前沿。

刘伯承问纵队指挥员"看了地形了没有"？有人回答"没有"。刘伯承火了："歼敌三千，自损八百，仗打得太蠢！一个指挥员不仅要负歼敌三千之责，也要负自损八百之责！"

二十七日，连绵的大雨骤然停止。傍晚，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对羊山集的最后总攻开始了。野炮、山炮、榴弹炮集中火力猛烈轰击，轰击的时间长达四十分钟，羊山集变成了一片火海。各路攻击部队在炮火的掩护下，相继突破了国民党守军当面防线。整整一个晚上，交战双方的官兵纠缠在一起奋力厮打，咒骂声、呼喊声、呻吟声直至凌晨才稍有平息。天亮后，在飞机的助战下，国民党残余部队开始突围，但是，羊山集已经被晋冀鲁豫野战军围得密不透风。

伤亡巨大的二纵六旅官兵一心要抓到宋瑞珂。十八团一营教导员韩镜发现羊山集村东北角一座带院墙的楼房像是指挥所，立即命令二连指导员葛玉霞带领这个连仅剩的三十多名官兵前去攻打这座楼。二连的攻击刚刚开始，楼里面就跑出来一个军官，喊："不要打了！我们投降！"这个名叫郭雨林的军官是整编六十六师的参谋长。他投降后对葛玉霞说："里面还有长官。"

一个小个子军官走了出来，向葛玉霞敬了个礼，他就是整编六十六师中将师长宋瑞珂。与宋瑞珂一起走出来的还有：副师长王开石、一八五旅旅长涂涣陶、一八五旅参谋长马权之、五五三团团长罗玉腾、五五四团团长李祝生。

二十七日夜半，羊山集北侧石头山之制高点被攻占。当即召集各旅、团长及幕僚人员、直属营长研究对策。一八五旅旅长涂焕陶说，逐屋守备，还可支持三天。我说羊山集制高点已被占领，全村情况了如指掌，已成瓮中之鳖，最多支持到次日中午。涂乃坚持逐屋守备。通信营长陈光复原想建议于天亮之前突出去，见涂坚持要守，未便说出。天亮之后，大雨倾盆，仍继续战斗。到二十八日下午，西北方向已被突破。我认为继续战斗下去，徒招致双方更多的伤亡，乃派一中尉附员浙江嘉善人某［姓名记不起］由羊山集东端出去找解放军的一个连指导员进来，表示停止战斗。

宋瑞珂，一九四六年四月内战爆发前，他在汉口与共产党代表签订"中原停战协定"；但是，仅仅两个月后，他率部首先围攻中原军区李先念的部队。宋师长被俘后说："你们包围得太紧，简直无路可走。炮火猛烈得使我们抬不起头来。我住的房子也落了很多炮弹，只差这么一点一切都完了……如果不是报着'固守待援'的心理，早就不打了。可是援兵呢？一纸空文。"

羊山集战斗，国民党军整编三十二师距整编六十六师只有五公里，整编七十师距整编六十六师只有十公里，但是，各路友军临阵脱逃致使整编六十六师被歼。蒋介石下令将第四兵团司令官王仲廉撤职查办，将整编三十二师师长唐永良送交军事法庭。国民党军陆军徐州总司令部参谋长郭汝瑰说："宋瑞珂在此支持两星期之久可谓难能。王

敬久以两师距宋十公里而不能救，王仲廉二十二日即已集中完毕开始前进，徘徊于冉堌集数日，如两王均于二十四日以后真面目攻击，则局面必大异于今日。余深知国民党腐败，王仲廉等均只知弄钱。”——谁都知道，一旦到了“文官贪财，武官怕死”的地步，任何事情都不可挽救，可是现在国民党军的武官不但怕死，而且“只知弄钱”，这仗还怎么打?

历时二十八天的鲁西南战役，晋冀鲁豫野战军共歼灭国民党军四个整编师师部及九个半旅，收复黄河南岸的大片地区。

此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被称为“战略进攻的序幕”：“鲁西南战役，是刘邓大军外线出击、进军中原的首战。它的胜利，粉碎了蒋介石的黄河战略，迫使其从陕北、山东、豫北各地抽调八个整编师驰援鲁西南，从而打乱了国民党军的战略部署，有力地配合了陕北、山东两战场人民解放军粉碎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作战，揭开了全国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

攻克羊山集的当日，刘伯承、邓小平鉴于部队连续作战，消耗很大，尤其是弹药消耗一时无法得到补充，致电中央军委，提出在陇海路南北机动两个月左右，同时积累南下所需物资和经费，之后直下大别山。

一天以后，毛泽东发来一封被邓小平称为“极秘密的电报”，电报的抬头很是郑重：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振林，华东局，邯郸局，并告陈赓、谢富治及彭德怀。毛泽东在电报中基本同意刘伯承、邓小平提出的“保持后方接济，争取大量歼敌，两个月后看情况”，但是接下来的话却令他们颇为震动：

……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

局势的危机很清楚：如果陈谢部和刘邓部不能及时向外线出击，以调动向解放区进攻的国民党军，特别是不能调动正在全力进攻陕北的胡宗南部主力，则很可能导致“陕北不能支持”。

“陕北不能支持”，共产党中央将到哪里去？

七月三十日，刘伯承、邓小平回电：

> 连日我们再三考虑军委梗（二十三日）电方针，确好顷奉艳［七月二十九日］电，决心于休整半月出动，以适应全局之需。照现在情况，我们当面有敌十九个旅，至少有十个旅会尾我行动，故我不宜仍在豫皖苏，而以直趋大别山，先与陈谢集团成掎角势，实行宽大机动为宜。准备无后方作战。

多年后，邓小平回忆说：“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

从鲁西南到大别山，直线距离也在一千公里以上。沿途必须通过的是国民党控制区，目的地是国民党控制区的腹地。刘伯承和邓小平把可能遇到的困难预想了一遍，但是他们依旧没能料到即将开始的大军南下将是怎样一段艰辛而危险的征程。

## 破釜沉舟

在陕北的小河村，毛泽东问陈赓：“你听说过‘破釜沉舟’的典故吗？”

陈赓回答：“我明白主席的意思，是叫我们过了黄河，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当然，打运动战是要大进大退，但不能退到黄河北岸来。”

毛泽东说：“两千多年前，在你们将要渡河的渡口以东，项羽去巨鹿打秦军章邯，他率部一过黄河，就把船沉了，锅也砸了，向全军表示只能胜利不能后退。你们这次过黄河南征就要有这样大的决心。刘、邓挺进大别山，搞得敌人手忙脚乱，到处调兵去追堵，胡宗南又

被钳制在陕北。这样，豫西的敌军不多，是个空子。你师出那里，具有战略意义：东向配合刘、邓和陈、粟，西向配合陕北，东西机动作战，大量歼灭敌人，开辟豫陕鄂新区。”

小河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将陈赓送至小河村外。陈赓劝毛主席过黄河以东躲避一下。毛泽东说：“不要担心。你们打得越厉害，打的胜仗越多，陕北人民的安全越有保障，我的安全也就越没问题。”他再次交代陈赓：“弹药不足，由蒋介石来‘补充’，伤员的安顿靠群众，我们从来是这样办的。根据地是创造出来的，不是一切都搞好了才去革命。”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九日，中央军委电：

（一）为着协助陕甘宁击破胡宗南系统，同时协助刘、邓经略中原，决将陈谢纵队使用方向改为渡河南进，首先攻占潼洛郑段，歼灭该区敌人，并调动胡军相机歼灭之。尔后，向豫西、陕南、鄂北进击，创建鄂豫陕边区根据地，作为夺取大西北之一翼。陈谢纵队仍属彭（彭德怀）习（习仲勋）序列不变，同时仍属晋冀鲁豫建制。（二）提议赵基梅纵队（第十二纵队）、秦基伟纵队（第九纵队）及孔（孔从周）汪（汪锋）三十八军与陈谢纵队一同南进，统受陈、谢指挥。（三）上述陈、赵、秦、孔四部统于电到二十天内完成一切政治、军事、经费、干部等项准备工作，未（八月）皓（十九日）以前渡河。

七月二十七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对羊山集发动总攻的那天，中央军委正式下达命令：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八纵队二十二旅、第九纵队以及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共二十九个团八万余人，组成“陈谢集团”以执行南渡黄河挺进豫西的作战任务。

此时，除了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之外，陈谢集团是最靠近陕北的一支部队，他们出击的路线是：从晋南和豫北的现集结地向南渡过黄河，直接攻击陇海铁路，威胁胡宗南重要的后方补给线。一旦陈谢集团出击成功，胡宗南不可能不调动攻击陕北的部队回防，而这正是毛泽东试图解决陕北危机的最直接的办法。

八月十一日晚，陈谢集团各部队从驻地向黄河岸边出发了。

部队刚一上路，便遇瓢泼大雨，本来常年干旱的晋南地区突降如此猛烈的大雨令官兵们惊讶不已。暴雨导致山洪突发，山路全被冲断，行军变得异常艰难，三天之后，队伍才走到阳城以西的一个镇子，这里距离黄河还有很远的路程，陈赓预定十五日赶到黄河岸边的计划已无法完成。

就在他们出发的第二天，中央军委催促渡河的电报到了，原因是刘邓方面压力甚大需要配合，更为严重的是陕北的局面也面临着危险：

陈谢韩（韩钧）并告刘邓：

真日（十一日）二十时电悉。现敌大军向刘邓追击，若你们于刘邓出陇海线后半个月之久方能渡河完毕，则对刘邓援助过于迟缓。又胡宗南主力正向榆林增援，三十六师两个旅本日到横山、榆林间，刘戡五个旅本日到石湾。彭习亦甚盼你们早日渡河，变动局势。

军委

未（未时）文

陈赓同时致电中央军委和刘伯承与邓小平：“深感不能如期过河，万分焦急。只要河水降到打不翻船时，就坚决渡河。”陈赓开始督促部队克服一切困难向黄河岸边突进。刘伯承、邓小平回电：“我们开进顺利，并不太紧张，你们晚些天过河没有关系。渡河要确保安全，不要急躁。”陈赓见电，万分感动，因为此时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周围，有国民党军三十多个旅，陈赓知道这是野战军首长为了宽慰他才这样说的。在以后的岁月里，每逢想起南渡黄河的往事，陈赓总是说：“我们吃的是刘邓的饭。”

二十日，四纵和九纵先后到达河南济源县黄河北岸的官阳渡口，第三十八军和八纵二十二旅也到达了山西平陆县的茅津渡口。

陈谢集团的渡河部署是：四纵各旅为左路，从官阳至青河口、大教至马湾段实施渡河，尔后主力迅速向陇海路突击，相机夺取洛阳；第三十八军和八纵二十二旅为右路，从茅津以东渡河，尔后一部向东奔袭观音堂车站，策应左路的攻击，主力则向西南发展；九纵为第二梯队，尾随四纵渡河，尔后向东南发展。

陈赓选择的渡河地段，是黄河的孟津至潼关段。这里自古便是黄河要冲，河道狭窄，水流湍急，两岸地势险峻，陡壁高耸，沟壑纵横。古老的渡口原本往来密集，但自抗战以来，北岸成为共产党控制区后，国民党军封锁了渡口，在南岸加筑起河防工事，部署了长达两百多公里的防御线。同时，在洛阳至潼关之间，国民党军还有两个师外加一个旅的二线防御部队。当刘邓大军在黄河下游突破河防强渡黄河后，这一河段的国民党军急忙赶修堡垒和交通壕，并开始昼夜在南岸巡逻。

陈赓站在黄河北岸心急如焚。连日的大雨使黄河暴涨，河水流速更加迅猛，北方籍的官兵会泅水的不多，依靠小木船在如此汹涌的水流中强渡，一旦翻船，人船都难以自救。况且，如果行动在此受阻，难免被南岸的国民党守军发觉，一旦敌人增强防御兵力，渡河将更加困难。

二十一日，四纵情报科长从上游来电报说：黄河上游的陕北和晋绥地区都没有下雨，因此涨水持续不了多久。

陈赓下达了强渡的命令。

二十二日，各部队秘密移动到河边的泛水线。

南岸的国民党军守军没有异常——黄河水急浪高的时候，不要说是共产党军队，就连有经验的船工都歇了。

二十三日凌晨，大雨。左路先头部队四纵十旅的突击队员下河了。一般情况下，陈赓是不同意指挥员跟随突击队行动的，但在周希汉旅长的一再要求下，陈赓不但破例同意了，而且对周希汉说："你过去，就只有前进，不要回来了。"突击队乘坐的是小木船。跟随他们下水的，是一群由济源县民兵组织的"葫芦队"。这些身上绑着葫芦的青年农民，个个是泅渡好手，他们在湍急的浊流中游在木船的前面和两侧，用充满血性的年轻的生命为突击队探水护船。船到河中央时，南岸的国民党守军发觉了，但是船上突击队员的机枪响了，"葫芦队"员手上的枪也响了。霎时间，黄河黑暗的河面上火光迸溅，爆炸声大作。突击队员和"葫芦队"的青年农民们不顾一切地向对岸靠近。

三十分钟后，第一批突击队员上了黄河南岸。

北岸部队开始了大规模的强渡。

因为船只很少，绝大部分官兵直接跳进河水中。不会水的官兵抓住的是一种黑糊糊的东西。这种奇特的渡河工具是当地老百姓帮忙做的，他们说元宵节耍龙灯的时候他们玩过这玩意儿，即用油布把棉花和秫秸包裹起来，分量轻但在水中浮力很大，而且即使中了子弹也仅仅是钻个孔。小船、油布包、木筏，甚至是门板，夹杂着巨大的胆量和勇气在黄河的急浪中翻滚。两岸的炮火都很猛烈，河面上水柱冲天。先上岸的突击队人数不多，但都是精选出来的官兵，他们勇猛地冲向国民党守军的防御据点。

在左路部队强渡的同时，右路先头部队二十二旅六十六团的两个连用偷渡的方式登上黄河南岸，之后迅速强占了五公里宽的滩头阵地，后续部队蜂拥而渡。

二十四日拂晓，陈赓乘船渡过了黄河。

这个夜晚陈谢集团的渡河行动引起了当地百姓的啧啧称奇，以至多年以后这一带还流传着“骑龙过黄河”的传说，说是陈将军的队伍到了河边，只见狂风怒号，河水翻腾，正无策的时候，一条巨龙自云中而落，颌首领命，大吼三声，驮起十万将士直飞南岸。

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四纵官兵，长久地难忘那天晚上游在他们身边的那些“葫芦队”队员。这些青年农民知道自己的队伍为什么要离开丰衣足食的解放区，为什么要冒着枪林弹雨渡河到国民党统治区去，于是，这些精壮的青年汉子舍弃妻儿父母跟随至此，并决心为自己的队伍冒死一拼。在四纵官兵的心中，这些侠肝义胆的乡亲就是无所不能神通广大的“龙”。

二十四日，渡过黄河的四纵十旅二十九团突袭了石头山国民党守军，主力逼近洛阳外围的横水镇。十三旅三十九团仅以伤亡八人的代价攻克了新安县城。二十六日，十三旅三十七团冒雨强渡洛河，全歼宜阳城守敌。二十七日，十三旅三十八团沿陇海铁路急行军三十公里，与三十九团一起攻占渑池县城。随着右路第三十八军和八纵二十二旅攻击张茅镇和观音堂车站的成功，陈谢集团突破黄河天险之后，以伤亡千人的代价，将陇海铁路截断，开辟了洛阳至陕县之间的战场。

洛阳，古都老城，豫北重镇，此刻已被陈谢集团包围。

不论是陈赓还是谢富治，面对洛阳城，都不禁陡生攻占的欲望。

二十七日，蒋介石急令胡宗南将董钊的整编第一军和刘戡的整编第二十九军从陕北的米脂、绥德南撤，以加强西安的防守。同时，命令追击刘邓大军的整编第三师、整编十五师、整编四十一师和青年军

二〇六师各派一个旅向西增援，连同原来驻守洛阳地区的四个旅，组成由李铁军为司令官的第五兵团；以分布在灵宝、陕县地区的新编第一旅、一三五旅、二十七旅、一六七旅以及青年军二〇六师一部组成陕东兵团，由西安绥靖公署陕东指挥官谢甫三指挥。两路大军的作战计划是：从东西两面形成夹击之势，歼灭陈谢部于立足未稳之时。

中央军委的电报连续到达。电报明确指出陈谢集团渡河后，主攻方向不应该向东，而应该向西，洛阳地区不应该使用主力，应该趁敌尚未部署完毕之时，出击陕东南地区，迫使胡宗南向陕南布防：

陈谢：

艳（二十九日）十五时电悉。（一）西面空虚，攻取较易，洛阳附近敌所必争，不应使用主力。（二）速以四纵全力、三十八军及二十二旅抢占陕县、灵宝、阌乡、洛宁、卢氏，相机抢占洛南、商县、商南。秦（秦基伟）纵位于新孟洛（新安、孟津和洛阳）地区，牵制洛阳之敌，以一部攻占宜阳、嵩县。（三）避开强固设防据点，专打守备薄弱据点，并力求运动战，求达机动迅速、广占敌区、多歼敌人之目的。（四）你们现在作战比在晋南时环境大不相同，每一大的行动计划必须事前报告军委，必须迅速报告敌情、我情、民情，我们方能及时帮助你们。此次渡河将重点放在东面，现在改变，丧失几天宝贵时间，给了胡宗南在西面完成部署的机会，极为可惜。但胡军主力尚在绥米（绥德和米脂）地区为我军所抑留，洛川以南只有几个旅及若干特种部队［炮兵等］，这点对于你们极为有利。

军委

三十日十三时

陈赓、谢富治立即意识到问题有些严重：“当时我们的主力在洛阳附近，如果攻洛阳，虽然敌人的第三师等部还未赶到，但亦无必克的把握。即使攻克，也不能巩固。”且“东西两面的敌人一旦靠拢，我们就很难展开，难于大量歼灭敌人。主力向西，乘虚歼灭陕县以西敌人，斩断敌人的东西联系，既能有利配合西北野战军作战，又便于多路向陕南、豫北挺进，开辟广大新区，更好地配合挺进中原的主力作战”。

陈谢集团立即全力向西。

九月七日，主力部队到达陕县地区。陈赓将指挥部设在陕县东南的菜园镇。这时，第三十八军和八纵二十二旅也前来会合了。

就在陈谢集团陈兵洛阳的时候，国民党军陕东兵团已经向东推进，到达了潼关以东地区，其兵力分布是：一三五旅和两个保安团重点防守陕县；新编第一旅和青年军二〇六师的一个团在灵宝东南一线防守，二十七旅的一个团由潼关增强灵宝方向，另一部和一六七旅的一个团在洛南和朱阳镇一带布防；整编三十六师的一个营和保安团防守卢氏县城。

陈赓决定：以一部监视陕县，另以一部奔袭卢氏，主力则绕过陕县，奔袭灵宝，割断潼关、陕县、卢氏之间的联系，创造各个歼敌的战机。

夺取灵宝，首先要攻克中国战争史中一个著名的要隘：函谷关。唐《元和郡县志》：“函谷关城，路在谷中，深险如函，故以为名。其中略通，东西十五里，绝岸壁立，岸上柏林荫谷中，殆不见日。东自崤山，西至潼津，通名函谷，号曰天险。”

攻击函谷关的是四纵十一旅。十一日夜，官兵们趁黑摸上去，接近关下的时候，国民党守军发觉，但是攻击已近在眼前。十一旅连续发起冲锋，最终把敌人压下山头，攻击中带头冲锋的三十三团一营营长熊广模阵亡。占领了函谷关，灵宝城尽收眼底。国民党守军为了稳定军心，加之认为共产党军队兵力不多，于是贸然离城出击，试图夺回函谷关上的高地。十一旅乘机发动全面攻击。混战中，新编第一旅旅长黄永赞及其部下五千六百余人被俘。

十一旅攻击灵宝的同时，十旅和第三十八军十七师攻占阌乡，十二旅攻克卢氏。陈赓一鼓作气，命令十旅、二十二旅和十七师逼近潼关，十二旅向洛南发展，十一旅和十三旅包围陕县。

十七日，在扫清陕县外围之后，十一旅攻东门，十三旅攻南门，五十五师攻北门，陈谢集团三路部队对陕县发动了全面攻击。国民党守军拥有十五门大口径榴弹炮，炮火被集中起来封锁东门，十一旅爆破组在仅有的六门山炮的掩护下，前仆后继，把两百公斤炸药送到了城门下。炸药引爆之后，整个陕县地动山摇，修筑城门工事的钢铁、木料、水泥、石块和大量的砖瓦在黑色的硝烟中飞溅起来，城墙被炸出了一个巨大的缺口。排长王荣泰大喊一声"上"，突击队员扑了上去。从突击出发地到被炸开的城门之间，有一片百米左右的开阔地，敌人在开阔地的一端构筑了工事和碉堡，机枪火力构成了密集的子弹封锁线。王荣泰的突击队中不断有人倒下，先是袁万才，然后是景文明，接着二班长包国士的胳膊被打断了。王荣泰喊："我们要是英雄，敌人就是狗熊！"他把官兵们分成两个小组继续冲击。宁子清的四班占领了两个方形碉堡，然后掩护后面的两个班夺取残存的城楼。城楼上的守军拼命往下扔手榴弹，第一个冲上去的二班长包国士再次负伤倒下，副班长萧金来命令一个俘虏把班长背下去。班长刚被背走，他自己也中弹了。已经攻到城楼跟前的四班，只剩下副班长谭连城和战士袁竹林，两个人顽强地与国民党守军对峙着。王荣泰突击队打开了开阔地上的冲击道路，后续部队蜂拥而上。三个小时之后，陕县被攻占，国民党守军一三五旅旅长蒋公敏以及四千七百名官兵被俘。

陈谢集团主力西进之后，在东线留下了秦基伟的第九纵队，目的是给敌人造成主力仍在豫西的错觉，以牵制国民党军东线李铁军兵团。

第九纵队的转战历尽艰难。

对于第九纵队来讲，黄河以南完全是新区。这里“没有群众基础，没有后方支援，没有情报来源”，走到哪里都有枪声，朝他们射击的除了国民党正规军外，还有大量的土匪和地主武装。

在伊河附近，九纵险遭灭顶之灾，拿秦基伟的话讲是“差点被李铁军的整三师包了饺子”。当时，九纵前指率二十五、二十七旅冒雨南渡洛河，并开始攻击宜阳，而秦基伟率领的纵队机关和数千民工正在伊河以北等待渡河。晚上，秦基伟亲自带人查看水情，夜间实在看不清楚，加上只有两只小木筏，于是只好在河边宿营，等待天亮。宿营的时候，秦基伟很不放心，因为这里距离洛阳城仅十五公里左右，一旦有情况，驻守洛阳的整编第三师个把小时就能赶到。白天的时候，部队受到飞机轰炸，虽然敌人不一定知道伊河边的部队是九纵的首脑机关，但我军的行踪肯定是暴露了。另外，已经过河的二十七旅收缩了警戒，秦基伟身边只有一个警卫营。为了安全，秦基伟让警卫营营长任登仕派一个排前出三里之外，向洛阳方向侦察警戒。第二天，天还没亮，秦基伟就带着警卫员沿着河边查看水情，天上飞来的飞机让他骤然紧张起来：如果是轰炸的飞机，应该是从东往西飞，但此刻的飞机却是南北横飞，显然是为地面部队侦察来的。秦基伟正在琢磨，远处枪声响了，是警卫营派出侦察排的那个方向。

最不想与敌人接触的时候，敌人来了。

秦基伟和警卫员跑回宿营地，大喊：“有情况！”还在睡觉的人匆忙穿衣服拿起枪。作战处长连图钉都来不及取就把作战地图从墙上抓了下来。

短促间部署的分工是：秦基伟组织警卫营抵抗掩护，政委黄镇组织其他人员撤退。

秦基伟给警卫营下的命令是：“就地抵抗，一步也不能退！”

营长任登仕带着两个连钻进青纱帐，副营长王德远带着一个连上了北山制高点。很快，警卫营就与围过来的一个营的敌人接火了。

在黄镇的指挥下，机关、文工团和民工队不顾一切地渡河。

夜幕再次降临时，九纵所有的人都已转移到韩城附近，警卫营却一直没有消息。秦基伟派出寻找警卫营的人仍旧没有回音，如果天亮之后还找不到他们，弄不好就是一个营全打完了。秦基伟既焦虑又难过。半夜时分，突然有战士闯了进来，是警卫营的！战士刚喊了一声“司令员”，眼泪就掉了下来。不一会儿，营长任登仕也回来了，说伤亡一大堆，仗打得太窝囊。秦基伟说：“谁说窝囊？这是胜仗！你们掩护了纵队机关和这么多人安全过河，你们立了大功！”

九月上旬，九纵二十七旅分东西两路攻击嵩县。东路由副旅长唐万成指挥，部队先克白杨镇，再克鸣皋，但是打到田湖的时候，遇到了大麻烦。田湖是个大寨子，守军是由一个叫宋天才的国民党军退役师长指挥的一群土顽和保安部队，这些人打仗光着脊梁，双手驳壳枪左右开打，一股不要命的劲头，加之寨子工事坚固，二十七旅攻击三次均未成功。最后，一个连用打穿寨墙潜进去的办法才解决了战斗，但是攻击部队伤亡很大。二十七旅的西路部队在攻击西赵堡的寨子时，也遇到同样的麻烦。国民党守军大喊：“当年日本人没打开西赵堡，八路皮定钧也没有打开西赵堡，你们更不行！”部队连续攻击三次均没奏效，晚上的强攻也没能得手。第二天重新部署，八十一团三营营长刘占华率队连续突击，最终打了进去，但同样伤亡巨大。

“离开了解放区，我们就变成了没爹没娘的孩子，唯一能帮助我们渡过难关的只有我们的弟兄姐妹——来自太行山的七千多名民工。”——第九纵队离开太行山南下的时候，解放区的数千翻身农民随军作战——“部队打到哪里，参战民工就跟到哪里，太行人民要用全力支援部队打出去！”这些民工每人负重八十斤以上，在连绵的阴雨中长途行

军，战斗打响时既要上前运送弹药又要向后转运伤员，每天都会遭到土匪武装的骚扰和敌人飞机的轰炸，但是他们的坚定而无畏令秦基伟终生难忘：

坦白地说，当时部队都有逃兵，但民工队伍中没有一个开小差的。形势那样紧张，那样混乱，但民工没有丢一点弹药，没有一个人掉队，没有一个人说怪话，那真是不穿军装的军队，甚至比军人还要过硬。毛主席写了一篇《愚公移山》，论起籍贯来，愚公也是太行山人。较起真来，太行山人何止能搬掉太行、王屋两座大山？在几十年风火血雨的革命斗争中，太行儿女同全国人民一道，搬掉的是整整一个黑暗的旧世界。

九月二十日，陈谢集团主力向西安方向前进，计划夺取潼关、华阴、华县、渭南、临潼、蓝田、商县、洛南、商南和山阳诸县，建立陕东根据地。

该日，蒋介石到达西安。

前一天，胡宗南从陕北回到西安。

无论是蒋介石还是胡宗南都认为，陈谢主力西进威胁西安乃是心腹大患。蒋介石命令：“三个月内彻底肃清陕北共匪，半个月打通陇海路。”胡宗南要求增加军力。无奈之下，蒋介石命令刚刚调往大别山的整编六十五师、位于晋南运城的整编第十师八十三旅和整编十七师八十四旅一部、位于陕北榆林的整编三十六师二十八旅等部队紧急空运西安。

如果陈谢集团主力继续向西，势必会与兵力强大的国民党军相遇。

刘伯承、邓小平来电，命陈赓部破坏洛阳至潼关间的陇海铁路，切断陕北战场与中原战场之间的陆路联系。部队奉命出击，炸毁观音堂附近的一座铁路大桥。陈赓亲自骑马到现场查看，指示工兵不要把大桥完全破坏了，只要炸掉两三个桥孔就可以了，他的理由是：现在

不是抗日战争时期，而是我们的战略进攻时期，这个地区经过反复争夺最后定是我们的，因此炸桥时“既要使敌人不能在短期内修复使用，也要考虑到我们将来修复时方便”。

陈赓已经把这一带当成自己的区域了。

但是，继续西进的道路已被蒋介石紧急调来的几万大军封堵。

二十五日，中央军委发来电报，指示陈谢集团改变部署，主力秘密折回向东，打东面的李铁军兵团的六个旅。两天后，中央军委再次来电，强调说明如果打李铁军成功，不但对陈谢自己有利，对陈粟和刘邓也是有利的：

……你们南渡后第一个月作战成绩很好，歼敌二万余，控制渑（渑池）、陕（陕县）、灵（灵宝）、阌（阌乡）、宁（洛宁）、卢（卢氏）六县。原定第二步打西潼线（西安至潼关）上之敌，第三步出汉水、豫西南。因西潼敌已先我集中兵力，把握较少，故改变计划，东打李铁军，并相机占领郑洛（郑州至洛阳）以南、平汉以西若干县。包括作战与休息在内，估计大约一个月左右时间。如此举成功，不但对你们有利，对陈粟、刘邓亦有利［陈粟现正在曹县打十一师，估计罗广文十师将向曹县增援，刘邓主力亦在豫东南作战］。在你们打李铁军期间，胡宗南可能集中三四个旅向陕、灵、阌、卢进扰，援助李铁军。故在打李铁军之后，你们还要准备回头打可能进至陕、灵、卢之敌，以期在几个月内，歼灭几万敌人，控制新（新安）、渑、陕、灵、阌、宁、卢数县于我手。此数县群众，看见我军歼敌这样多，胜利这样大，加上你们的群众工作，就会敢于起来向地主斗争，并援助你们［群众最快要几个月内才能广大发动起来，不要企图在几星期内就能发动］。那时你们就可以一部留在北面，主力南进，攻占豫西南及汉水流域，把局面向前开展一大步……

部队之所以要从解放区打出来，目的就是在国民党控制区里开辟出一片新的根据地，建立支持持续作战的基地，这就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真实含义。

二十六日，陈谢集团主力开始隐蔽东进。

这个举动完全出乎李铁军的预料。蒋介石正在西安督促胡宗南在潼关一线布防，东面的李铁军认为，共产党军队将从潼关附近继续西

进，于是他命令整编十五师六十四旅占领铁门、整编第三师进占宜阳。他的部队一路向西推进，是为了配合胡宗南向东设防，以对陈谢部实施东西两面夹击——然而，陈谢部隐蔽东进，正是为了寻机作战，他自己却迎面而来了。

十月一日，四纵十三旅在新安以西的铁门附近与国民党军整编十五师六十四旅遭遇，当时整编十五师师长武庭麟正跟随着这个旅行动。双方都对如此迅速地接触没有思想准备，十三旅仓促攻击，六十四旅仓促防御，战斗很快形成僵持。六十四旅发觉陷入包围后决定突围，但被十三旅顽强地打了回去。第二天，十三旅和刚刚赶到的十一旅一起再次对六十四旅展开攻击，六十四旅支持不住突围溃败，四纵官兵紧追不放，除师长武庭麟带领少数人逃脱外，六十四旅两千一百余人被俘。

李铁军获悉六十四旅被歼，顿时醒悟，立即命令整编第三师放弃洛宁，向洛阳收缩。陈赓决定趁热打铁，命令官兵不顾一切前扑，将整编第三师截住。十月三日，陈谢集团主力逼近韩城镇。这时候，天降暴雨，伊河水猛涨，部队无法渡河，致使整编第三师的三个旅在韩城镇靠拢，并与位于伊河南岸的宜阳守军形成犄角之势。

两军隔着伊河对峙数日。

陈赓盘桓良久，决定以佯攻洛阳的办法调动当面之敌，寻找战机。

此时，洛阳城内国民党守军力量薄弱，只有青年军二〇六师和少数保安部队。

十月八日，陈谢集团十三旅、二十六旅向洛阳以西迂回，分别攻击偃师、孟津；九纵攻击伊川和宜阳；十旅、十一旅攻击洛阳西部的

工业区。陈赓的真实想法是：如果不好打，就算是佯攻，吸引韩城镇的敌人回援，然后组织打援；如果好打，索性就把洛阳打下来。

洛阳受到攻击，城内的国民党守军不断告急，韩城镇的整编第三师匆忙回援。由于陈谢集团没有有效地控制洛河渡口和桥梁，致使整编第三师很快就到达洛阳城郊，接着一二四旅突破陈谢集团的阻击进入洛阳城内。

洛阳已经失去被攻克的可能。

陈赓果断决定停止对洛阳的攻击，将部队转移到铁门、新安一带。

至此，陈谢集团自南渡黄河以来，连续攻占县城十二座，歼灭国民党军四万余人，控制了陇海铁路两百五十公里的地段，割断了国民党军胡宗南与顾祝同两大军事集团间的联系，调动了进攻中原和进攻陕北的国民党军回援，并先后在嵩县、栾川建立起豫陕鄂第三军分区；在新安、渑池地区建立起太岳第五军分区；在卢氏、灵宝地区建立起豫陕鄂第一军分区，为豫陕鄂边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初步实现了中央军委预定的作战目标。

胡宗南的侧后被彻底搅乱了。

蒋介石也许此时才真正意识到，刘邓、陈谢南渡黄河从解放区出击的行动，远不像一些平庸的军事参谋们所说的那样，是共产党军队走投无路的绝望逃窜；也不像一些军事将领们所分析的那样，是共产党人为克服控制区内部的军事和经济危机而进行的攻城掠地，这实在是一次带有战略意图的协同军事行动。尽管蒋介石对这一行动将导致的后果还无法清晰地判断，但排解不开的复杂心绪却是异常真实的：毛泽东是个极难对付和揣摩的莫测之人。一九三四年秋，他从江西瑞

金的根据地跑出来，国军上下都说赤匪在末路穷途之时开始仓皇逃窜。可是，结果呢？让蒋介石至今想起来都心惊胆寒。

## “领导爬起来”

酷暑七月，陈粟不利。

让陈毅、粟裕感到十分突然的，是毛泽东六月二十九日发来的电报：

……蒋军毫无出路，被迫采取胡宗南在陕北之战术，集中六个师于不及百里之正面向我前进。此种战术除避免歼灭及骚扰居民外，毫无作用。而其缺点则是两翼及后路异常空虚，给我以放手歼击之机会。你们应以两个至三个纵队出鲁南，先攻费县，再攻邹（邹县）、滕（滕县）、临（临城）、枣（枣庄），纵横进击，完全机动，每次以歼敌一个旅为目的。以歼敌为主，不以断其接济为主。临蒙（临沂至蒙阴）段无须控制，空费兵力。此外，你们还要以适当时机，以两个纵队经吐丝口攻占泰安，扫荡泰安以西、以南各地，亦以往来机动歼敌有生力量为目的，正面留四个纵队监视该敌，使外出两路易于得手。以上方针，是因为敌正面既然绝对集中兵力，我军便不应再继续采取集中兵力方针，而应改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其外出两路兵力，或以两纵队出鲁南，以三个纵队出鲁西亦可……

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突然改变了一个月前要求陈粟不要分兵、坚持内线歼敌的方针——五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曾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电：

……歼灭七十四师，付出代价较多，但意义极大，证明在现地区作战，只要不性急，不分兵，是能够用各个歼击方法打破敌人进攻，取得决定胜利。而在现地区作战，是于我最为有利，于敌最为不利。现在全国各战场除山东外均已采取攻势，但这一攻势的意义，均是帮助主要战场山东打破敌人进攻。蒋管区日益扩大的人民斗争，其作用也是如此，刘邓下月出击作用也是如此。而山东方面的作战方法，是集中全部主力于济南、临沂、海州之线以北地区，准备用六七个月时间［五月起］，六七万人伤亡，各个歼灭该线之敌。该线击破之日，即是全面大胜利之时，尔后一切作战均将较为顺利……

在这封电报中，中央军委明确指出：山东战场的作战“于我最为有利，于敌最为不利”，其他战场的攻势均是为了“帮助主要战场山东打破敌人进攻”。但是在后来的电报中，中央军委要求华东野战军采取的

分兵行动，目的是为了配合即将出击中原的刘邓大军作战——“我军必须在七天或十天内，以神速动作攻取泰安南北及其西方、西南方地区，打开与刘邓会师之道路，如动作过缓，则来不及。”

此时，就全国战场而言，山东依旧是国共两军对峙最严重的地区。

就军事形势而言，陈毅、粟裕承担的压力最大。

孟良崮战役虽使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但蒋介石并没有放弃在山东实施重点进攻的计划：“沂蒙山之战，是我们革命军人生死存亡所关的一战，挽回颓势，把握胜利，就要从这一战开始。我决定把全副精神用在这个战场上。”蒋介石采纳了他的日本军事顾问提出的“并进不如重叠，分进不如合进”的建议，将山东战场上的攻击兵团重新编组，九个整编师共二十五个整编旅被部署在莱芜至蒙阴不到五十公里的战线上，以三四个师为一个方阵，“前后重叠，交互前进，企图迫使华东野战军在鲁中山区狭窄地带迎战”。

陈毅、粟裕仔细研究了要求他们分兵出击的电报。电报虽然只提到山东当面的敌情，但既然刘邓大军即将出击，全国战局必有重大发展，于是陈毅、粟裕决定：将华东野战军主力分成三路向敌人发动攻击。具体部署是：由叶飞、陶勇率第一纵队和第四纵队组成左路兵团，越过临蒙公路向鲁南挺进；由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率第三、第八、第十纵队组成的右路兵团，向鲁西的泰安、大汶口方向挺进；陈毅和粟裕直接指挥第二、第六、第七、第九纵队和特种兵纵队集结在沂水、悦庄公路两侧，各以少部兵力与北犯之敌接触，主力待机出击。此作战部署于七月一日开始执行。

这就是华东野战军战史上著名的“七月分兵”。

“‘七月分兵’是在未经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开始的。”粟裕后来回忆道，“在接到军委六月二十九日分兵指示前，我们是按照军委五月二十二日指示，准备以七八个月时间，即在一九四七年底之前，集中全部主力在内线各个歼敌的。接到军委六月二十九日分兵指示，到全军开始行动仅有一天多时间。”

“七月分兵”导致了一系列作战不利的后果，因此也成为华东野战军战史上颇具争议的行动之一。

从当时战场局势上分析，毛泽东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违反一贯主张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军事原则，冒着被各个击破的危险而采取分兵出击的举动，无疑是配合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出动中原所必须。按照当时陈粟大军所处的战场态势，坚持内线作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五十多个县城在手且连成一片，又有胶东、渤海和滨海三个地区可以周旋，如果组织得当，再取得一个如同孟良崮一样的胜利不是不可能的。山东战场的大规模作战势必牵制国民党军，抑或造成国民党军为增援而进行频繁调动，若能在机动中寻机大量歼敌，将是对刘邓大军最有利的配合。但是，毛泽东担心的是时间：刘邓大军的出动时间已无法更改，必须按时对其进行强有力的军事配合；虽然陈粟大军目前还无法预测战机到来的时间，可刘邓大军已是不能等待。

六月二十八日，叶飞、陶勇的左路兵团出发了。天降大雨，官兵在泥泞中向鲁南奔袭五百华里，深深地插入了国民党军的侧后。十天之后，左路兵团开始攻击费县，一夜之间便将国民党守军全歼。天亮的时候，国民党军的飞机来了，密集的炸弹把费县炸得天翻地覆。轰炸不但给左路兵团攻击部队造成伤亡，连被俘的国民党军三十三旅旅长翟紫封也被炸死了。

左路兵团接着攻击枣庄和峄县，迫使当面国民党军退守运河。但是，当左路兵团继续西进，试图攻击滕县和邹县，控制津浦铁路徐州

至兖州段时，巨大的麻烦来了。

滕县和邹县位于津浦铁路中段，是国民党军重要的物资补给站，战略防御工事极其坚固，两座县城里的守军均兵力充沛，粮弹充足。叶飞和陶勇同时对两座县城实施攻击，导致本不充裕的兵力被分散，加上攻城器材严重缺乏，弹药也因连日大雨被淋湿而失效，结果攻击持续了整整四天毫无效果。叶飞和陶勇决定放弃邹县，集中主力全力攻击滕县，但国民党军七个整编师已增援而来，左路兵团只有迅速撤离战场。

右路兵团的任务是攻击济宁和汶上。由于向泰安、大汶口攻击前进时一路顺利，于是认为攻击济宁时守军也会望风而逃。但是，在包围济宁城并占领了外廓城之后，突然发现守军不但兵力比预料的多，而且强劲的火力显示出顽强的守城决心。济宁守军为国民党军整编七十二师全部以及整编三十二、七十师各一个团，总兵力达两万余人。三纵八师奉命对内城实施攻击，守军炮火猛烈，城中街道狭窄，攻城官兵缺少防炮经验，没有在街道中筑起防御工事，结果伤亡巨大。在主攻方向东门，连续爆破连续失利，守军将城门堵塞得异常坚固，炸药根本无法接近城门，而城墙上的阻击火力密集而凶猛。三纵决定使用云梯强行攀爬城墙，部队准备了一天，七月二十日晚上继续攻城。临时制作的云梯不是太短，就是不坚固，不断被守军打断，有的云梯由于上去的人多而折断，攻击再度失利。在东南角攻击的九师一度攀登成功，突进城内七个连，但很快遭到守军的猛烈反击，突进去的部队被压缩在城内一角。守军集中炮火封锁突破口，攻击的后续部队无法增援，结果突进去的七个连的官兵全部战死。

济宁一战，三纵伤亡三千二百余人。

十纵的任务是攻击汶上县城。汶上守军为国民党军整编八十四师的两个团及地方武装，总兵力约四千余人。攻击部队认为守军战斗力

不强，战斗开始前急促接近，生怕守军弃城逃跑，部队打不了歼灭战。但是，战斗一打响，守军不但没跑，而且死拼死守，这使于十五日开始的攻击连续受挫。十八日凌晨，大雨倾盆，各个方向的突破都没有进展，不得不停止攻击。十九日再攻，八十七团攻东关，突击队被守军火力压制，爆破组派出的爆破手全部在中途阵亡。八十七团的参谋长叫雷英夫，是半年前从延安总部调来的。他在延安抗大学习的时候被毛泽东看中，并推荐给了周恩来做军事秘书。雷英夫在前沿再次组织爆破，一个名叫王金石的班长请缨出击。王班长不顾一切地打开了突击道路，但他随后便在冲击中中弹牺牲。东关被占领了，但其他攻击方向依旧没有进展。在西关方向攻击的八十二团官兵抱着的炸药包冲击时，手中的炸药包被守军密集的子弹击中爆炸，全团的攻击被迫停止。二十日晚上，十纵再次组织攻击，仍然无效，天亮时，得知国民党援军已经到达。

小小的汶上县城，十纵连续攻击六天未下。

作战严重失利的还有陈毅、粟裕亲自指挥的由第二、第六、第七、第九纵队和特种兵纵队组成的正面部队。

南麻，鲁中山区的一个小小的盆地，一个令华东野战军官兵刻骨铭心的地方。

驻守南麻的是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整编十一师，全师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在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和孟良崮战役中都曾与共产党军队交手，从未吃过大亏。师长胡琏以作战勇猛又工于心计闻名，国民党军中对他的评价是：带兵用人唯能；作战警惕性高，企图性强；重视战前侦查；注意对手的作战特点和指挥特点，能够依据对手的不同，或是选择有利地形顽抗，或是集中兵力猛攻。

六月中旬，胡琏从新泰向东推进，中途曾发生几十名官兵因为踩上地雷而身亡的事件，也曾遭到华东野战军小股部队的阻击，但这些都没能阻止胡琏推进的决心。占领鲁村之后，原准备驻扎在这里，但是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在孟良崮被歼，令胡琏变得格外小心谨慎。他认为鲁村四面环山，环山构成防御线需要众多兵力，兵力不足即会造成处处薄弱，麇集村中的数万部队一旦遭遇袭击，将面临四面受敌的危境。因此，胡琏请示徐州司令部要求移驻南麻。

迅速进驻南麻的整编十一师没有急于推进，而是在这里驻扎了二十天之久，胡琏作出十分周密的防御部署，然后督促官兵昼夜赶修工事。南麻北、西、南三面是山地，东北面是通往悦庄方向的小丘陵。北面山地上有一隘口通往博山，隘口狭窄，一个营的兵力就可以封锁自北而来的通道。这样地形可谓易守难攻。胡琏亲自带四个团驻守南麻，另外两个旅分别驻守在北麻、高庄、北刘家庄、吴家官庄等要地，这些要地靠得很近，各部队因此得以彼此靠拢。在胡琏的命令下，南麻四周方圆五公里的范围内，所有重要据点都修筑了以子母堡垒为中心的工事。这些隐蔽而坚固的工事依地形呈不规则形状，各地堡之间都有交通壕相连，交通壕上盖有厚厚的土石足以抵挡炮火的打击。每一处阵地前五百米内，所有的树木和庄稼都被砍光。在子母堡垒外围，设有三至四道鹿砦和铁丝网，还埋下了大量的地雷。由两千多个子母堡垒组成的南麻防御体系筑成后，胡琏组织了一次抗攻击演练，演练结束后他致电蒋介石，声称整编十一师是一座攻不破、摧不毁的堡垒。

应该说，选择打战斗力很强的整编十一师，是陈毅、粟裕有意为之，目的是“为了配合刘邓大军作战”，打一个像孟良崮“那样的大胜仗”。当时的战场态势也支持他们的设想，因为叶飞、陶勇和陈士榘、唐亮两路部队的分别出击，已严重威胁国民党军的后方基地，迫使鲁中的国民党军停止东犯转为西援，鲁中山区只剩下了整编第九师、整

编十一师、整编二十五师和整编六十四师。陈毅和粟裕认为围歼敌人的战机已经出现。同时，孟良崮战役后，华东野战军上下士气高昂，官兵们把国民党军主力称为“硬核桃”，把杂牌部队称为“烂葡萄”，都想寻找国民党军的精锐部队作战，说是“宁啃一个硬核桃，不吃三个烂葡萄”。

如果啃掉整编十一师这个“硬核桃”，战果可就更大了。

战后，陈毅和粟裕都承认，骄傲轻敌后果严重。

华东野战军主力围歼南麻国民党守军的部署是：第九纵队在北面以一个师进至南麻与鲁村之间，断敌退路，并向东攻击，纵队主力向北麻、南麻攻击前进；第六纵队在东面以一个师控制凤凰山一线，阻击南麻可能突围之敌，纵队主力向北刘家庄和南麻攻击前进；第二纵队在东北面以一部沿悦庄向儒林集攻击，主力则向吴家官庄和南麻攻击前进；第七纵队在东面以一个师控制青泉山、于家崮一线，另一部担任阻击任务，保障攻击南麻部队的侧翼安全；鲁中军区地方武装、胶东军区和渤海军区部队在外围钳制敌人，配合主力作战。

从兵力上讲，陈毅和粟裕占据绝对优势。

七月十七日，暴雨，近敌行动因恶劣天气而受阻。第二天一早，各纵队刚一到达指定位置，还未进行充分准备，攻击就开始了。

韦国清指挥的二纵奉命攻击南麻、吴家官庄的正面阵地。十七日上午，部队向攻击位置接近的时候，暴雨肆虐，积水成河，二纵的全部人马、枪械和弹药全被泡在了水里。十八日，韦国清命令五师和六师肃清南麻外围之敌，两个师经过一天的苦战逼近了守军的主阵地。

许世友指挥九纵奉命从西北山地攻击南麻，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三个师冒着大雨发起进攻。二十六师一部插入南新村与鲁村之

间，试图分割南麻与鲁村的联系。十八日凌晨，七十七、七十八团攻占了南麻以西的荆泉山之后，七十八团二营在七十六团的配合下攻击高庄西北的崮山高地。崮山高地是鲁村通往南麻的必经之地，周围都是不易接近的开阔地，整编十一师十八旅旅长覃道善认为有险可守，仅派出一个工兵营在此守卫。这个工兵营从来没与共产党军队作过战，缺乏实战经验和指挥经验，且官兵手中主要是工兵器材，战斗武器很少。该营营长孙敬山接到命令十分为难，但还是硬着头皮上去了。战斗一开始，工兵营就发生了混乱，当九纵官兵冲上高地时，孙营长带着他的官兵逃跑了。崮山高地可以俯瞰十八旅的全部防御阵地，崮山瞬间失守令覃道善旅长大为吃惊，急忙向胡琏报告，承认自己用兵失误，请求处分。胡琏立即乘吉普车赶到十八旅指挥所。了解情况之后，胡琏怒火满腔，说在整编十一师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临阵逃跑的先例，下令将工兵营营长枪决示众。十八旅全旅骇然，自此拼死防守。九纵各师在各自的攻击方向上都未能突破，与国民党守军在战场上形成僵持。

王必成指挥的六纵奉命攻击南麻南面的马头崮，十六师四十六团连续攻击均未奏效。再次攻击时，各连搭人梯向上攀爬，二连首先冲上崮顶，为后续部队开辟出通道。四连一班长陈来富只身突入阵地，用刺刀刺死几个敌人后，带领全班向崮顶冲击，但被崮顶的猛烈火力所压制。陈来富调整战术，绕到一座悬崖下攀登绝壁，从侧后登上了崮顶，守军因受到两面冲击而混乱。在一个小山洞洞口，陈来富发现了几具守军尸体，从尸体胳膊上的臂章上判断，这里是敌人的一个指挥所，陈来富立即组织全班对山洞展开攻击。在用手榴弹炸毁了洞里的机枪之后，一班的官兵冲进山洞，查实他们打死了胡琏师长的一个副官。战后，陈来富被六纵授予了“马头崮战斗英雄”称号，被华东野战军授予了“华东二级人民英雄”称号。

六纵十七师五十一团强渡沂河时遭到数倍守军的反击，敌人配合反击的火炮多达二十门，五十一团全团被迫卷入残酷的背水一战中。一连长张家富牺牲，接替他指挥的三位排长都相继负伤。二连长给营长写了张字条，表示宁可战死不后退一步。八连和七连被敌人分割，战至最后仅剩两名战士，两名战士打光子弹后也牺牲了。当交战双方都付出了五百多人的伤亡时，五十一团幸存的官兵开始后撤。王必成调来四百多副担架抢运伤员，担架队白天过河时遭到飞机轰炸，伤亡的人数再次陡增。

与此同时，十八师各团向柴粮山的攻击也严重受挫。大雨滂沱，夜色漆黑，攻击部队被恶劣的天气和守军的火力所压制，天亮之后又遭到飞机的猛烈轰炸。攻击持续整整三天，柴粮山高地四周到处是逐渐腐烂的尸体。

华东野战军主力对南麻的攻击已显露出失利的迹象。

南麻受到攻击之后，胡琏向徐州司令部求援，国民党军整编二十五师和整编六十四师的四个旅奉命向南麻增援。增援部队指挥官黄百韬记取了在孟良崮增援缓慢的教训，深知如果这次再不全力推进，必定受到严厉制裁，于是面对七纵的顽强阻击，国民党军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采用三个营为一个冲击单位的滚动式战法，一批垮下来，另一批立即出动，持续不断，昼夜不停，导致七纵官兵每分每秒都陷于苦战之中。

此时，攻击南麻正面阵地的二纵也陷入了极大的困境。胡琏的子母堡垒给攻击带来的困难远远超出他们的预想。这种堡垒的特点是外围利用鹿砦、铁丝网、照明设备以及大量的地雷和集束手榴弹给予攻击部队极大的杀伤，而在堡垒的中心则隐蔽着大量的反击兵力，当攻击势头减弱之后，以中心堡垒为引领的反击立即开始，与其相连的小堡垒则进行两侧的火力打击。胡琏制定的防御策略是：当受到攻击

时，利用外围阵地，以小兵力向攻击部队进行袭击，迫使攻击部队过早展开，等到攻击部队占领前沿之后，立即组织纵深优势兵力集中一点进行反击，反击时必须使用炮火反复延伸射击，以密集的火网给予攻击部队严重杀伤，然后坚决恢复前沿。胡琏甚至还鼓励部队使用假投降等手段，配合阵地内的隐蔽火力突然开火射击。二纵官兵在以往的战斗中从未遇到这样的子母堡垒，也很少遇到如此顽强的作战对手，一时间攻击面临着严重的困境，部队的伤亡远远超出歼敌数量。六师师长滕海清指挥部队攻击石线山，瓢泼大雨中，爆破组在敌人密集的火力网中向子母地堡接近，伤亡惨重。十六团二营四连在向子母堡实施爆破时，一个排的守军突然手持冲锋枪从侧面的地堡中反击而出，四连在两面夹击下同样伤亡惨重。六连奉命前往支援，二排长孙继先率先冲入敌阵展开肉搏战，战士们在他的带领下与敌人混战在一起。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刺刀弯了就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血水和雨水在泥泞的战场上横流。十几个敌人把孙继先围住，高喊“抓活的”，孙继先拉响了一颗燃烧弹，然后纵身扑向敌人。二排还活着的官兵在大雨中眼看着他粉身碎骨，心如刀绞。十五团六连班长李志远在相继炸毁四座子母堡后牺牲，他被泥浆包裹着的身体因多处被炸已经无法辨认。十三团三营长冯福林脱下满是泥和血的军衣，赤膊上阵，连续爆破，最后也中弹倒下。

南麻战役是解放战争中代价十分惨重的一次战役。

战斗结束后，九纵伤亡四千多人，六纵伤亡两千多人，负责正面攻击的二纵伤亡四千多人，其中六师十六团二营只剩下二十多人，十七团有的连队从战场上只下来六七个人，其中的八连只活下来两个人。

南麻战役进行了整整五个昼夜，歼灭国民党守军一个团。

七月二十日，国民党军增援部队突破华东野战军阻击部队的防线。

二十一日晚，陈毅、粟裕下达了撤出战斗的命令。

撤出南麻地区的部队奉命北移到临朐西南地区休整。

但是，此时临朐已被国民党军整编第八师占领，陈毅、粟裕向胶济线以北转移的通道被阻断了。

情报显示，进入临朐的是整编第八师的先头部队，师主力尚未到达。而且，敌人还没有来得及构筑防御工事。陈毅、粟裕认为，应该抓住此一战机，将整编第八师的先头部队歼灭，以鼓舞士气。于是，命令第六、第九纵队围攻临朐，第七纵队负责阻援——一向作战周密谨慎的粟裕，在部队刚刚遭遇重大伤亡的情况下，决定再次发起攻坚战斗，这不仅具有相当大的冒险性，还显示出一种无法克制的急躁。

临朐三面环山一面环水，平时可以徒涉的沂河和弥河因天降大雨河水暴涨，导致临朐城外一片汪洋。

二十四日，离南麻战役结束仅仅过去两天，攻击部队在大雨中再次准备出击。二十五日拂晓，第六、第七、第九纵队到达临朐城外时，获悉整编第八师主力已经先于他们进入临朐——如果说在整编第八师主力尚未到达的时候，对临朐的攻击还具有趁敌未稳的突袭性，那么在敌人主力到达之后依然发起攻击就显得十分冒险了。但是，粟裕的决心没有改变。

二十六日，攻击开始。

临朐外围守军营长在剧烈的枪声中逃回城内，即刻被整编第八师师长李弥枪毙——李弥决心拼尽全力死守临朐。

攻城部队突击南关，对城墙实施爆破时，因炸药受潮，连续五次送上去的炸药包都没有响。夜晚，部队再一次实施突击爆破，终于将城墙炸开了一个口子，十四团一下子冲进去七个连，但突破口很快就被守军封堵，两个团的守军进行猛烈反击，突进去的部队坚持了三小时后全部伤亡。

二十九日，二纵、六纵、九纵队联合发动攻击，但攻击依然受挫。

此时，国民党军整编第九师和整编六十四师已经临近。

三十日，部队经过五天五夜的战斗，极度疲劳，伤亡巨大，已面临所承担的作战任务的极限，且“平地水深过膝”，粮食供应和伤员转运都十分困难。粟裕被迫下达撤出战斗的命令，部队开始向诸城方向转移。

临朐成为又一个南麻。

南麻、临朐战斗的接连失利，使原来设想的左、右两路部队南北夹击国民党军的计划已无法实现，不但令陈毅和粟裕的正面战线出现前所未有的危机，也给侧翼出击的兵团带来了极大的危险。

左路兵团一纵和四纵，因孤悬于敌后，被国民党军紧追不放。叶飞和陶勇在监听国民党军的无线电话时，发现一纵被称为“西瓜”，四纵被称为“面包”，而敌人来往通话中充斥着“吃西瓜、啃面包”之类的狂妄之言——国民党军的五个整编师开始合围一纵和四纵，后续赶来的三个整编师也在急速接近。可以说，左路兵团已经身陷重围。

陈毅和粟裕万分焦虑，迫切希望他们东返。从当时的情况看，向北、向南突围无望，西面是敌人重兵把守的津浦路，只有向东渡过沂河进入沂蒙山是唯一的出路。但是，此时，山洪暴发，沂水上涨，无

法徒涉，况且国民党军也知华东野战军只能向东，已经做好了迎击的准备。叶飞和陶勇彻夜研究，认为绝不能向东进入敌人的伏击圈，遂决定出敌意外，向西突破津浦路，寻求与右路兵团部队会合的可能。

为了顺利地向西突围，必须先让一支部队向东佯动，"这支部队必须是强有力的，这才能造成主力东去的声势；而且又必须是具有牺牲精神的，在敌人重围之中，很可能遭受重大伤亡，甚至为主力突围而牺牲"。陶勇提出让四纵彭德清的十二师承担这一危险的任务。叶飞后来回忆说："一、四纵队的部队，过去经常吵架。有时狭路相逢，少不了争前恐后，互不相让。互相有点看不起，因为都是主力部队，什么时候总要争个高低。但配合作战一直很好，总感到同是新四军的部队，不能丢人现眼。这种感情确是微妙得很。它绝不是山头主义，也不是小团体主义，也不是风头主义，而是渗透着阶级友爱的革命英雄主义。所以在严重关头，团结一致，显示了自我牺牲精神。"

七月二十四日，两个纵队开始向东移动，并与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师和整编四十八师激战一日。国民党军急调增援部队一齐向东压来。大部队向东突围的假象已经造成，彭德清师继续向东接近沂河，而一纵和四纵主力则趁机掉头向西而去。二十八日晚，在滕县以南，他们跨过津浦铁路进入了鲁南。

……那是独山湖水网地带，七八十里路汪洋一片。部队全部暴露，任由敌机疯狂扫射。连绵阴雨，被服装具全部湿透，鞋袜全无，赤脚在水荡或泥泞里行进。村庄已被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抢掠一空，粮秣无着。到处散布着还乡团的地主反动武装，不时响起冷枪，突然飞来流弹。确是吃尽了苦头，受到了考验，部队遭受很大损失，非战斗减员不少。有一次过河，水流湍急，谭启龙（一纵副政治委员）同志骑的马力气小，加上过度疲劳，一个浪头涌来，连人带马都给冲走了。刚巧我在一边，顺手一把拉住，否则，恐怕他就见马克思去了。部队极为狼狈，空着肚子行军作战，疲劳程度是无法形容的，倒在路边的泥坑里就睡着了，炮弹和炸弹的交替爆炸也唤不醒我们……

八月一日，突围部队终于在鲁西南泗水附近与和右路兵团部队会合时。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看到一纵和四纵的官兵"身上除了短裤、背

心和枪支子弹袋之外，什么都没有了。他们浑身泥水，脚板都泡烂了，许多人还流着血。”在这种情况下，一纵和四纵的战士们仅仅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发一双鞋子，睡一个好觉，吃一顿猪肉。”

此时，右路兵团的第十纵队奉命在梁山地区阻击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师和整编八十四师。他们得到的指令是：“你们十纵队的屁股只能朝北，不能朝南。”以一个纵队对付两个整编师，十纵兵力明显处于劣势。但是这支部队以打阻击闻名，孟良崮战役中，就是他们挡住了整编第五师的增援。

梁山，唐宋时黄河溃决，形成大泽，故又称“梁山泊”。如今，虽然八百里水面已经消退，但大雨又使这里成为一片沼泽。在阻击国民党军的战斗中，十纵水里跑火里钻，阵地在残酷的拉锯战中反复易手，官兵们撤退了又粘上来，与敌人的两个整编师围着梁山纠缠不休。最后，他们被强敌挤进黄河与运河交叉的狭窄的三角地带。整编第五师师长邱清泉向蒋介石报告说，共军的第十纵队已在五师囊中。

十纵的突围行动十分壮烈。面对只有北渡黄河才能脱险的绝境，官兵毅然决然地向那条在暴雨狂啸的大河扑去。没有渡河器材，也没有船只，背后三面敌人合围而来，天上的敌机狂轰滥炸。担任阻击的部队誓死坚守，决心打到最后一个人，主力部队则在轰炸下拼死强渡。十三日，敌人终于冲到黄河南岸，纵队的侦察营、部分机关干部、勤杂人员、大量的伤员以及四千多民工、数百匹骡马被国民党军截住。除了侦察营少数官兵突出来之外，其余大部分人员被俘或失散。

“七月分兵”以来，山东战场各部队连续作战失利，导致国民党军占领了胶济线，作为华东野战军重要的物资基地和数万名伤员安置地的胶东地区也面临被占领的危险。特别严重的是，在持续近两个月的

战斗中，陈粟大军战斗减员和非战斗减员总计高达五万人，是华东野战军组建以来前所未有的损失。

八月六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央军委电报：

刘邓，陈粟，并请转告陈（陈士榘）唐（唐亮）叶（叶飞）陶（陶勇）：

目前整个形势对我有利，敌已分散，我已集中。敌机动兵力分置于鲁中、运东（运河以东）、陇海三处，加以鲁西敌新受巨创，士气不振，我则以一部牵制鲁中之敌，主力位于鲁西南；敌虽想从运河陇海两线向鲁西南进攻，但估计短时间内尚不可能；敌目前既怕你们全力向东攻邱（邱清泉）欧（欧震），又怕你们全力向南攻陇海。在此情况下，你们全军可以安全休整十天内外，鼓励士气，整顿队势，以利争取新胜利。此次华东各部虽有几仗未打好，但完成了集中兵力、分散敌人之巨大任务。待陈粟率野直及六纵到郓（郓城）巨（巨野），我军实力更厚，领导更强，对于争取新胜利极为有利。中央特向你们致慰问之意，并问全军将士安好。

中央

未（八月）鱼（六日）

八月四日，粟裕起草了关于南麻、临朐战役的初步总结电报。电报详细分析了“七月分兵”后，华东野战军在战略战术上的不足之处；同时强调，对整个反攻局势和前途过分乐观的估计是造成失利的重要原因——“……认为敌之重点进攻已被粉碎……在具体部署上亦着重于截断敌人退路。但敌人并未退窜……七月分兵，失去重点……既无足够打援部队，即不能取得充分的攻坚时间……过去九个纵队集中使用时，每战只要求歼敌一个整师，与歼其援队之一部或大部。但此次分兵之后，由于过分乐观和轻敌所致，仍作歼敌一个师［南麻］与对付其援队之打算，故兵力与要求不相称，致不能取胜……过去敌人不敢增援，但近来……较前大为积极，其增援队攻击甚猛。而我军之重心则又置于攻坚方面，故南麻临朐两役均因援队逼近而撤回。”陈毅和谭震林看后，都有不同意见，认为在战略上没有问题，是“军事部署上的错误与战术上的不讲究”。因为意见不一，粟裕起草的初步总结电报未

能发出，他当即另行起草了一封短电发给中央军委。作为战役的主要指挥者，粟裕认为自己应对作战失利负责：

中央军委并华东局：

自五月下旬以来，时逾两月，无战绩可言，而南麻临朐等役均未打好，且遭巨大之消耗，影响战局甚大。言念如此，五内如焚。此外，除战略指导及其他原因我应负责外，而战役组织上当有不少缺点及错误，我应负全责，为此请求给予应得之处分。至整个作战之检讨，俟取得一致意见后再作详报。

粟

八月四日午时

陈毅为粟裕的自责深感不安，认为作战不利不能让一人承担责任，有必要与谭震林、粟裕坐在一起把这个问题谈清楚。

但是，谭震林要率第二、第七纵队去胶东休整。临走，谭震林给粟裕留下一封信，他在信中指出“数十万大军的指挥，如果不能看远是很危险的”；同时认为“如果拿五仗未打好的主要原因放在乐观这点上去检讨是不能把问题彻底弄清的”。

粟裕在给谭震林的回信中，承认军事指挥和作战部署上存在错误，但他坚持认为“过分乐观”是作战失利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过分乐观而发生轻敌，由于轻敌而企图‘啃硬核桃’，企图‘一锅煮’，企图歼灭十一师后乘胜歼二十五、六十四等师，而与叶陶各纵会师蒙阴。因此部署上就以攻坚为主，而不以打援为主……”在回信的最后，粟裕表示：“一切军事部署上、战术指导上的缺点、弱点和错误，我应负其全责。今后当遵照你的来信及时地加以改正，并诚恳地接受你对我的帮助……”

野战军指挥部转移到郭店之后，陈毅与粟裕做了彻夜长谈。

史料中没有那夜长谈的记录，但可以肯定，长谈尽显共产党人知人克己的气度，这从档案里留存的八月六日陈毅发给中央军委的长电中即可看出：

（一）……最近粟、我共谈，粟态度可佩，昨夜长谈，对今后共同工作很有好处。

（二）我认为我党二十多年来创造杰出军事家并不多。最近粟裕、陈赓等先后脱颖而出，前程远大，将与彭［德怀］、刘［伯承］、林［彪］并肩迈进，这是我党与人民的伟大收获。两仗未全胜，彼此共同有责，不足为病。谭、我本此观点，互相研究教训，粟亦同意……

（三）我本挽三人共谈，谭因东行，故谭未参加。谭临行遗书，此书临别我看了一遍，对粟有帮助……我们对战役指导部署历来由粟负责。过去常胜者为此。最近几仗，事前我亦无预见，事中亦无匡救，事后应共同负责，故力取教训以便再战。军事上一二失利实难避免，虚心接受必为更大胜利之基础……

陈毅只有一个目的：领导爬起来。

胜败交替是战争的一般规律。陈毅说："先打几个胜仗，又碰了钉子，又打了几个胜仗"，"我党二十余年的历史也是胜败的反复，胜利了便轻敌，种下栽跟头的因素，失败又是胜利的因素。领导上主要是在栽跟头之后，如何领导爬起来"。

三十日，毛泽东给陈毅、粟裕发来了一封绝密电报。电报措辞严厉地批评陈粟大军"在惠民留驻时间太久"，"二十多天毫无积极行动"。而当前国民党军各部"均向刘邓压迫甚紧，刘邓有不能在大别山立脚之势，务望严令陈（陈士榘）唐（唐亮）积极歼敌，你们立即渡河并以全力贯注配合刘邓"。

毛泽东的电报令陈毅和粟裕清晰地理解了此刻关系到战争全局的作战意图：除留下内线部队坚持与国民党军纠缠之外，华东野战军主力要和刘邓大军一样直插中原，搅乱国民党控制区，完成战争的战略转变。

华东野战军立即于鲁西南发动了沙土集战役。

九月三日，华东野战军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八、第十纵与特种兵纵队以及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全部云集在菏泽以东的沙土集地区。

战役目标是：围歼沙土集附近的国民党军整编五十七师。

陈粟部的连续失利给国民党军造成一个巨大的错觉，认为山东的共产党军队“已溃不成军，不堪再战”，且“南有陇海路，东有津浦路，北面和西面有黄河”，共产党军队已处在“四面被围，无路可走”的境地。于是，自孟良崮失利以来国民党军的谨慎变成了骄狂——“一个团也敢成一路尾追我们。”此时，国民党军依旧认为陈粟部在向北逃窜。于是，以整编第五师为中路，整编八十四师为右翼，整编五十七师为左翼，其余部队为策应，协同向北追击。九月五日，整编第五师进至郓城以南一线，整编八十四师到达巨野附近，整编五十七师六十旅进至郓城西南一线，其一一七旅位于六十旅的右侧。七日，整编五十七师与整编第五师之间拉开了大约二十公里的间隔。

粟裕的部署是：北线第三纵队，以一部钳制整编第五师，切断该师与整编五十七师的联系，主力由东北向西南方向攻击；第六纵队在第三纵队右侧攻击，以求夹击围歼整编五十七师于新兴集以北地区；南线第八纵队由南向北攻击沙土集；第四纵队负责阻击整编第五师可能的西援，以求彻底割裂整编第五师与整编五十七师的联系；晋冀鲁豫第十一纵队对整编六十八师所在的菏泽方向进行警戒；第十纵队控制郓城以南阵地，协同第四纵队阻击整编第五师。第一纵队为战役预备队。

七日黄昏，攻击部队对整编五十七师形成合围。

八日，总攻开始。沙土集四周地势平坦开阔，攻击部队没有任何掩护，官兵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冲击前进。这是没有悬念的一战。华东野战军的攻击兵力至少大于整编五十七师四倍以上。夜幕降临时，三纵从北面破寨。接着，八纵从东南方向、六纵从西北角相继突入。三个纵队的猛烈攻击致使守敌迅速压缩，整编五十七师中将师长段霖茂率百人卫队化装突围，刚一出村便成为俘虏。凌晨三时，守军因无心再战纷纷投降。

沙土集一战，歼灭国民党军整编五十七师师部和两个旅共九千五百余人，其中俘虏七千五百余人。华东野战军攻击部队伤亡和失踪两千三百人。战后，国民党方面检讨道："本作战，国军在各战场抽调兵力，逐次投入鲁西南地区……但因协调联络不足，多次形成孤立，遭匪袭击，整五十七师更因友军救援不及，在沙土集覆没。"

沙土集战斗结束三天之后，毛泽东致电陈毅、粟裕："郓城、沙土集歼灭五十七师全部之大胜利，对于整个南线战局之发展有极大意义，特向西兵团全军将士致庆贺与慰问之忱。"

沙土集一战改变了陈毅、粟裕部的被动局面，迫使国民党军从山东内线战场和刘邓大军周围抽调回四个整编师。此后，在中国辽阔的中原地带，一个影响到整个战争进程的新局面产生了。

## "共军北渡黄河公算最大"

"我这一生，这个时候最紧张。听见黄河的水要来，我自己都听得见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四十多年后，邓小平依旧对那个时刻记忆犹新。

羊山集战斗之后，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南下，准备进行休整。

然而，战场形势突变。

国民党军各路部队开始向鲁西南战场移动而来。一九四七年八月六日，整编第七师和整编四十八师进至定陶、曹县之间地区；整编第三师和整编四十师及骑兵第一旅进至红船口和临濮地区；整编六十八师进至鄄城以南；整编五十八师进至巨野以南；整编第五师和整编八十四、八十五师已西渡运河。国民党军大兵力快速推进，于鲁西南的一角，对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形成钳形攻击态势。

更严重的是黄河南岸老堤即将决口的传闻。连日的大雨使黄河水位猛涨，滦口附近的水位已经由平时的两米猛增到三十米以上，每秒流量已达到两千零三十四立方米。这一惊人的水情数据表明决口的传闻并不虚妄。如果国民党军要炸毁黄河大堤，那么，刘伯承和邓小平一方面要面临兵力占据绝对优势的敌军的合围，另一方面要面临黄河之水滔天而来，这对于聚集在狭窄地域里的晋冀鲁豫野战军来讲无疑是灭顶之灾。

所以，跃进大别山必须越早越好，越快越好。

晋冀鲁豫野战军政治委员邓小平说：“中原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正当敌人的大门，其中大别山是大门边。”

兵分三路跃进大别山的部署是：西路由杨勇的第一纵队组成，并指挥中原独立旅，沿曹县、宁陵、项城之线以西南进，直插河南南部；东路由陈锡联的第三纵队组成，沿城武、虞城、鹿邑、界首之线以东南进，直插安徽西部；中路由中原局、陈再道的第二纵队和王近山的第六纵队组成，沿单县、虞城、界首、临泉之线以西南进。

刘伯承催促参谋人员迅速了解黄河水情，确切了解陇海路以南、淮河以北、津浦路徐州、蚌埠段以西、平汉路郑州、信阳段以东地区的地形、河流、交通和道路情况，并在地图上准确地标示出来。刘伯承说：“当前陇海路南至长江边广大地区，敌兵力薄弱，后方空虚，正

是我跃进大别山的大好时机……机不可失，时不我待，我们要立即行动了！”

大雨还在下，刘伯承指挥部的院子里涨满了水。已经来不及与陈毅、粟裕详细沟通了，刘伯承只与他们通了一次电话：

“我们上马了。”

“牌怎么打法？”

“一张鹅牌。”

“鹅牌”，牌九中的一张牌，一边一点，一边三点。刘伯承的意思是：以少数兵力牵制敌人，掩护野战军主力出发。

为了掩护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南下作战，毛泽东命华东野战军第一、第三、第四、第八、第十共五个纵队，暂由刘伯承、邓小平指挥。华东野战军的任务是：在刘邓大军跃进的反方向，坚持内线作战，以牵制国民党军。

一九四七年八月七日黄昏，刘邓大军兵分三路，开始了中国革命史上一次著名的军事行动——千里跃进大别山。

为了保密，野战军各纵队都更换了代号，代号是以纵队参谋长的姓加上村庄地名组成的。野战军直属纵队参谋长是李达，纵队代号就叫李家庄；一纵参谋长是潘焱，纵队代号是潘店；二纵参谋长是王蕴瑞，纵队代号是王家园；三纵参谋长是曾绍山，纵队代号是曾家庄；六纵参谋长是姚继鸣，纵队代号是姚关屯。是夜，西路的第一纵队和中原独立旅，从马楼和孟庄之间约八公里的缝隙间，钻出了国民党军的合围线；东路的第三纵队避开独山集和羊山集之间的敌人，向南绕

行，顺利穿越封锁线；中路部队在略有小战之后，也开始向陇海路急促接近。

蒋介石接到刘邓部大规模南移的情报后，立即命令各路部队迅速南追。但是，在徐州的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的判断却是：刘邓部要渡黄河北退。于是，命令各部队立即向北阻截。顾祝同的判断来自空军的情报："黄河边有共军甚多，正纷纷北渡黄河。"——空军的情报无大失误，因为刘伯承特别命令第十一纵队和冀鲁豫军区部队在黄河边架设浮桥，佯作大规模渡河之势——陆军总部徐州司令部因此认为："共军主力似已北渡黄河，如未能渡过，明日必在郓城一带发生战斗……"蒋介石和顾祝同一南一北的作战命令，让国民党军各路部队不知所措。八日，当顾祝同终于明白刘邓部北渡黄河是虚晃一枪的时候，急令部队掉头南下追击。但是，此时蒋介石又判断刘邓部主力南下必是佯动，隐藏着"北渡黄河北窜"的目的，因此下令各部队再次掉头向北，赶在刘邓部之前达到黄河岸边。对此，陆军总部徐州司令部参谋长郭汝瑰深为不满："蒋介石这些处置，都是代替前方指挥。前方报了情况，他才决定处置；等到命令下达，情况又已变化。他毫无统帅的越前处置，徒追随情况下命令干涉琐事，除拘束指挥员外，绝不能适应战况……"

八月十二日，刘邓大军各路部队全部越过陇海铁路。中央军委特发来电报，电报中提到了共产党人十几年前的长征：

刘邓，并告陈粟：

有三点请你们斟酌：（一）鉴于二万五千里长征时期休息太少，疲劳太甚，减员太多，而那种性急有许多是不必要的；此次我军南进，必须减少不必要的性急，力争少走路、多休息；情况紧急时应当走几天长的，但应跟着休息几天，恢复疲劳。（二）在目前几个星期内，必须避免打大仗，专打分散薄弱之敌，不打集中强大之敌，待我军习惯于无后方外线行动，养精蓄锐，又在有利于我之敌情、地形条件下，方可考虑大仗。（三）不要希望短期内就能在大别山、豫西、皖西等地建立巩固根据地，这是不可能的，这些都只能是临时立足点。必须估计到我军要有很长时间［至少半年］在江河之间东西南北地区往来机动，宣传群

众，发动群众，并在歼灭敌人几十个旅之后，方能建立巩固根据地。（四）以上三点，如刘邓认为可行，则请告知陈（陈士榘）唐（唐亮）、叶（叶飞）陶（陶勇）一体遵行，使大家有精神准备，以利战胜蒋介石。

军委

未（未时）文

在陇海路以南休整两天之后，十六日十一时，刘邓大军开始向黄泛区前进。

此刻，蒋介石依旧认为“共军北渡黄河之公算最大”，而刘邓部越过陇海路不过是“北渡不成向南流窜”，下一步刘伯承的企图必是“越过平汉路西窜”。国民党军国防部新闻局局长邓文仪称：“山东共军败北，已了如指掌。为策应山东而窜鲁西南之刘伯承残部又陷入泥潭，一部在黄河南岸成了死棋，一部在单县、曹县、虞台彷徨，一部抱头鼠窜误入睢杞包围圈，强大的国军已经完全控制鲁西南局面，最后决战即将展开，聚歼顽敌计日可待。”

造成蒋介石与顾祝同判断失误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方面知道共产党人往往不按常规出牌。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刘邓大军的十万人马会不要后方，孤军从黄河边直下国民党统治区的腹地。国民党方面认为共产党人还没有这个胆量与实力，况且这种类似自杀的举动也违背基本的军事常识。

刘邓大军陷入了黄泛区散发着腐烂气息的泥沼中。

一九三六年，国民政府为阻挡日军南下，在黄河郑州段的花园口掘开了大堤，人为地迫使黄河改道，由安徽北部注入淮河。黄河决堤，给河南、安徽和江苏三省一千多万百姓带来空前的灾难，中国国土中部的辽阔平原变成一片汪洋——“洪水猛溢，尸浮四野，赤地千里，饿殍载道。”十年后的一九四七年，蒋介石下令将黄河恢复故道，

其真实意图是以黄河天险阻止共产党军队南北机动。结果，黄河大水一退，在豫东鹿邑至项城之间，出现了宽约四十里的沼泽地域，沼泽内，积水浅处没膝、深处齐腰，如逢雨季寸步难行。

夜晚，步兵、骑兵、炮兵、辎重、担架、大车一齐踏入泥浆，官兵们在齐膝深的泥沼中艰难地移动，炮兵、辎重和担架队很快陷入困境。平日，野炮都是由大车拉的，最重的榴弹炮得用十轮卡车拉，现在官兵们只能把那些炮卸下拆散，再用人力扛着或抬着通过泥沼，但仍有十分沉重的部分无法移动。马匹嘶鸣，挣扎着往下沉，眼看着就没了踪迹。大队人马整整走了一夜，天亮时，发现仅仅前进不足十公里。在薄明的天色下，逐渐清晰起来的大沼泽让官兵们心惊肉跳：一眼望去，茫茫一片，除了泡在泥水中的三四棵枯树或一两个房屋的屋顶外，四野荒凉，空气中弥漫着从污泥里冒出的腐腥味。

第六纵队排长刘占魁回忆说：

敌人的飞机飞过来了，几乎贴着水面飞，机枪子弹嗖嗖地射着，扔下的炸弹一掀就是几丈高的水柱，没有地方隐蔽的骡马、大车被轮番轰炸，趴在车下的许多战士，连同车辆和牲口一起被炸死了。炮兵连的一个战士腿被炸断了，抱着断腿在叫：“排长！排长！”我顾不得头上的敌机嗡嗡地叫，爬到他身边，刚从衣服上撕下一块布，要给他包扎伤口，这个战士头一歪在我怀里牺牲了。

许多年后，刘伯承也回忆说：“有的地方，明明看着水已干涸，但一脚下去，却是稀烂的胶泥。前脚起后脚陷，使劲越大陷得越深，甚至拔不出来，马匹的驮鞍早就卸下了，各种炮也都尽可能地拆散，扛着涉渡。马匹吼叫着，越挣扎越下沉。炮车轮越旋转越往下钻。”

十八日夜，刘邓大军终于走出黄泛区，在河南东部渡过了南下途中的第一条大河——沙河。

此时，有关刘邓部动向的情报被不断地送到蒋介石面前，刘邓大军沿途所过之处的地主民团也不断地纷纷告急。最令蒋介石吃惊的

是，一张地图被十万火急地送到南京，说是河南某县的官员在共军宿营的地方捡到的，而这竟然是一张湖北省地图！刘邓的部队已经渡过沙河，蒋介石从地图上顺着河南、湖北一路看过去，他终于醒悟到：刘邓部并非在向南逃窜，而是有目的地在向湖北的某个地方奔袭，而这个地方只能是大别山，因为那里是共产党武装的老巢。蒋介石立即部署各路部队火速赶往河南南部，以阻止刘邓大军渡过汝河。

汝河，“河床深陷，河堤陡峭，水深丈余，无法徒涉”，是刘邓大军南下需要面对的第二条大河。

二十二、二十三日两天，第一、第二、第三纵队顺利渡过了汝河。而由纵队副司令员韦杰率领的第六纵是最后一支渡河部队，其先头部队是十八旅。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野战军指挥部跟随六纵抵达汝河北岸的黄刘营。十八旅旅长萧永银并不认为渡过汝河有什么难处。河不宽，水不急，对岸只有一些零星的枪声。萧永银命令五十二团立即渡河，上岸后抢占地势较高的大、小雷岗村，构筑掩体，以待掩护后续部队渡河。二十三日拂晓，五十二团顺利地过去了一个营，占领了小雷岗村，并向大雷岗村延伸。

二十四日上午，河岸四野一片寂静。中午时分，汝河南岸突然烟尘滚滚，在西侧的公路上，黑压压的国民党军蜂拥而至。五十二团参谋长沈伯瑛顿时紧张起来，立即请示旅指挥所，建议趁敌不备之时冲击一下，但是他没有得到同意的答复。这时候，国民党军开始炮击小雷岗村。

十八旅的官兵冒着敌机的轰炸在汝河上架起了浮桥。

天黑了，纵队副司令员韦杰赶到了，萧永银将旅指挥部前移到汝河北岸一间距渡口只有百米远的草房里。

国民党军把汝河南岸一线的村庄都点燃了，大火将夜空照得黑里透红。

十八旅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对岸敌情不明，不敢贸然打过去；可如果继续等待，一旦敌人在南岸布防完毕，后续部队渡河将面临巨大危险。

韦杰和萧永银均举棋不定。

深夜，刘伯承和邓小平来了，他们对十八旅整整一天没有采取有效行动感到十分不满。野战军参谋长李达说：现在，我们的前面有整编十五师和整编八十五师，后面追击的是整编第七师和整编四十八、五十八师，敌人追击部队的前锋已经与我们的后卫部队四十六团接上火了。

韦杰和萧永银这才感到情况的严重。

刘伯承说："如果让后面敌人赶到，把我们夹在中间，不但影响战略跃进，而且还有全军覆灭的危险。自古狭路相逢勇者胜！从现在开始，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敌人的飞机大炮，我们要以进攻的手段对付进攻的敌人，从敌人阵地上杀出一条血路冲过去！"

邓小平说："现在除了坚决打过去以外，没有别的出路。桥断了，再修！敌人不让路，就打！今天过不去汝河，后面敌人明天就赶到了。我们决不给敌人以时间……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和牺牲，坚决打过去！"

刘伯承亲自部署了渡河方案："十八旅从中间杀出一条路，抗住两边敌人，作为野司、纵直的前卫，奋力攻击前进。十六旅接替五十二团的防务，固守大、小雷岗村，保护浮桥，保护大军安全渡河。十七旅继续在左翼迟滞敌军西援。"

尤太忠的十六旅立即接防了大、小雷岗村阵地，萧永银的十八旅开始准备冲击。旅政委李震率五十二团为左翼，萧永银率五十三团为右翼，共同组成第一梯队，沿着大雷岗村向南杀出一条路来。五十四团为第二梯队，前后各一个营，保护野司和纵直过河。萧永银对官兵们说："刘司令员和邓政委就在五十三团，他们要和我们一起冲锋。我们要誓死保卫首长，我们要准备牺牲。大家枪上刺刀，手榴弹开盖，遇到敌人就打，打完了再往前冲。我们旅打剩一个团，团打剩一个营，就是全部打光，也要打开一条通路！"

子夜二时，十八旅的冲击开始了。

炮火冲天，弹雨横飞，腹背受敌，决死一战。十八旅官兵攻下一个村庄，接着又向前面的村庄扑过去。刘伯承守在电话机旁，萧永银不断地打来电话报告说："还在继续打！"泥楼、大杨庄、王庄、车桓庄，冲击迅速向南延伸，一条长约五公里、宽约三公里的通路被打开了。

有史料说，十八旅之所以能在国民党军重兵布下的防线上打开南渡汝河的通道，当面整编八十五师一一〇旅旅长廖运周有意避战起到了重要作用——廖运周，中共地下党员，在后来的淮海战役中率部于战场起义。新中国诞生之后，有人曾问及廖运周当年在汝河边的战事，廖运周回答说他的部队"根本就没怎么打"。他曾向团长们交代："共军打到哪个村庄，你们就撤出那个村庄"，共军要是"不要命地往前冲，我们就把枪往天上打，不能去硬碰硬。"战后，当他的上司指责他有意放走共军时，廖运周声辩说他这是为了保存实力。

当十八旅不顾一切冲击的时候，在河边担负掩护渡河任务的十六旅承受着巨大的作战压力。十六旅的当面，是国民党军整编八十五师六十四旅。十八旅政委李震战后回忆说：

他们任务显然比我们艰巨。我们现在是从敌人的薄弱部位打开一条通路，把部队掩护出去，而他们则要遏住桥头堡垒里的敌人，使其不能前进一步。这样他们就得受敌人的三面火力夹击，并一直要坚持到天黑……部队伤亡很重，有的连队三分之一，有的连队三分之二，营长牺牲，派作战参谋前去指挥，刚到营指挥所，就又牺牲了，于是教导员代替指挥。有的连队没有干部了，战士便独立作战……

此时的汝河渡口一片混乱。机关人员、炮兵部队、后勤部队和大量辎重拥挤在狭窄的浮桥上。抢渡的队伍中还有野战军文工团的队伍。出发前，文工团员们每人发了一张面饼，并通知他们渡河后的集结地是彭店。指挥部怕他们把这个地名忘了或是失散后需要寻找部队，特别要求文工团员们把地名写在手背上。后来成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的徐怀中，曾是抢渡汝河的晋冀鲁豫野战军文工团中的一员，他记下了当时的情景：

路上看到机要部门在焚烧文件地图，一辆吉普车在燃烧，人喊马叫，气氛相当紧张。文工团队伍登上汝河浮桥，浮桥是由小船排列搭成的，上面铺了木板和秫秸，踩上去便剧烈地摇晃，许多人一上桥就摔倒了，爬起来又跑。数架敌机轮番向浮桥投弹扫射，河里不断冲起高高的水柱，两个男同志架一个女同志，脚不挨地，很快冲过河去。抬头看，刘伯承司令员站在岸边，他保持着素有的军人姿态，在看着部队通过浮桥，时不时挥一挥手，示意跟紧队伍。大家很受感动，又担心着，希望刘司令员尽快离开渡口才好。

二十五日下午十六时，刘邓大军后续部队四万多人和两百多辆大车渡过了汝河。

第六纵队副司令韦杰最后一个通过浮桥。

然后，浮桥被后卫部队四十六团的工兵炸毁。

一年零四个月之后，率部在汝河当面阻击刘邓部的国民党军整编八十五师师长吴绍周，已经升任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官兼第八十五军军长。在淮海战役中，吴绍周在双堆集乘战车逃跑时被中原野战军俘虏。刘伯承和邓小平在战俘所见到了他，提到汝河边的战斗往事时，吴绍周说，当时双方兵力悬殊，我们又有飞机大炮，阻挡你们很有把握。但是，还没等我部署完毕，你们就冲过来了。刘伯承告诉

他，自己是二十五日早晨从大雷岗村方向渡过汝河的。吴绍周听后大为吃惊，当时他的指挥部就在大雷岗村附近。他对刘伯承说：“天呀！幸亏没有打上你们任何一位！”

追击到汝河边的国民党军看见河边躺着不少刘邓部的伤员。

在前有阻击后有追兵的情况下，付出巨大牺牲的十六旅只带走了部分轻伤员。这里不是解放区，没有百姓跟随在部队的后面转运伤员，而部队还要长途奔袭作战，重伤员只能被遗留在战场上——“部队要走了，带不上你们，只能靠自己，能回家的先回家，回不去的将来再去找部队。”那些身负枪伤、弹伤的重伤员躺在依然缭绕着硝烟的汝河边，看着自己的队伍迅速远去；而那些因鲜血即将流尽而奄奄一息的官兵，很快就长眠在了这条大河的岸边。

刘邓大军一路南下，国民党军的布防形同虚设，怒不可遏的蒋介石斥责国军追击部队“迟出早归，形似旅行”。为此，他撤销了陈诚的参谋总长职务，这一职务由他自己亲自兼任。

二十六日，刘伯承、邓小平到达淮河北岸。

淮河是这支十万人的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最后一道关口。

此时，这条位居中原的大河正值高水位期。刘邓大军到达岸边，只找到十几条小船。十几条小船如何把全部人马短时间内渡过河去?刘伯承亲自来到渡口，拿根竹竿试探水情，认为完全可以架设浮桥。部队正在架桥的时候，一个小个子马夫连同他喂的马徒涉过河的情景引起了刘伯承的注意，他立即命令各部队：停止架桥，按照马夫过河的路线迅速徒涉。

大队人马部队就这样浩浩荡荡渡过了淮河。

二十七日晚，在汝河边未能截住刘邓大军的整编八十五师追抵淮河北岸。师长吴绍周命令部队立即在刘邓部过河的地方徒涉，不料，国民党军的前卫人马刚一下水就被陡然暴涨的河水冲走了。

淮河的洪峰到了。

吴绍周哀叹道：“共产党有命，刚刚过去水就涨了。”

之后到达淮河边的国民党军十多个旅全部停在了北岸。陆军总部徐州司令部参谋长郭汝瑰说：“追击刘伯承各路国军均为淮水所阻。据云：刘军渡淮河系徒涉，国军一到即涨水，可谓奇矣。刘部进入大别山，陈赓部进入伏牛山，已形成掎角之势，从此中原无宁日矣。”

如果说在国民党军的眼里，刘邓部向南纵深跃进的举动不合军事常理，而在兵力、武器和机动手段上均占据优势的国民党军队，竟然让刘邓部在其控制区内冲过了千里征途，这一现实更加不可思议。

刘邓大军看见了前面高耸的山峰——大别山。

连绵的山脉是共产党军队永远的家园。

大别山，绵亘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处，平均海拔千米，是淮河与长江的分水岭。山脉的北部荒山耸立，南部漫坡上植被茂盛。腹地的潜山、霍山、英山等县境内崇山叠嶂、人烟稀少、土地贫瘠，是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武装的发源地之一。土地革命时期，红四方面军在这里建立根据地。自那以后，一九三二年，由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在受到严酷“围剿”时从这里西撤四川；一九三四年，由吴焕先和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在这里转战之后撤向陕北；一九三八年，由高敬亭率领的新四军第四支队曾从这里东进；一九四六年由李先念率领的中原军区主力被迫从这里突围而出。这里是中国腹地的战略要地——“中原形势决定于两个山，一个是大别山，一个是伏牛山。敌人最关切

的还是大别山，它比伏牛山更重要，中原要大定就要把大别山控制起来。大别山是一个战略上很好的前进的基地。它靠近长江，东面一直顶到南京、上海，西南直迫汉口，是打过长江的重要跳板……”一九四七年八月下旬，万分疲惫的刘邓大军循着共产党红色武装的足迹，第五次踏上了这块承受了太多血雨腥风的土地。

刘邓大军中的一部分官兵，当年在这里参加红四方面军，经过万般残酷的转战之后，他们再一次回到了故乡。

十七旅旅长李德生出生在大别山中李家洼村，母亲早逝，他十四岁参加红军，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整整十五年他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部队向大别山腹地行进途中，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李德生决定回家看看。到了李家洼村，李德生找到自家门口，别说家人，连老屋都没有了。好不容易找到叔伯嫂子家，叔伯嫂子认出他后惊喜地喊：“是德生回来了！德生回来了！”叔伯嫂子告诉李德生，因为他当了红军，父亲被国民党军抓走折磨死了。围过来的乡亲摸着李德生的满是补丁的灰布军装，啧啧感叹道：“穿得这么好啊！”叔叔给李德生做了面条，面条上有一块不知道放了多少年的又黑又硬的鸡肉。跟随李德生的参谋张方山费了很大的劲才把鸡肉嚼烂吃了。离开李家洼后，李德生对张方山说：“穷人家来了客人，要面子，上面放块肉，客人都知道这块肉不能吃，主人下次还要用的。你吃了，他们上哪里再弄鸡肉去？”张方山参谋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三纵司令员陈锡联听说母亲找到他的司令部来了，有点不相信。参谋们对他说，六纵昨天行军时找了个向导，向导说他哥哥当红军走了快二十年了。六纵就问你哥哥叫什么，向导说叫陈锡联。参谋们正说着，一个战士用一辆木制手推车推进来一位老太太，陈锡联一看，正是他的母亲。母亲和陈锡联说了三天的话，整整三天，母亲一边说话一边流泪，因为她找自己的儿子找了整整三年，直到有人说她的儿

子已经死了。部队又要走了，陈锡联把自己的毛毯和被子留给了母亲。几年以后，部队攻打襄阳的时候，有人对陈锡联说，在炮火最猛烈的城西北角，有位讨饭的老人到处打听陈锡联，因为战场上太危险，老人被战士们劝走了。陈锡联始终没有弄清楚这件事是怎么一回事，但自在大别山里与母亲见了一面之后，此生他再也没见过万般惦念他的可怜的母亲。

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所面临的生存困境，比他们预想的要严重得多。

大别山一直是桂系的地盘。

蒋介石一生除了无法战胜共产党人外，另一个心腹大患便是桂系。一九二六年，在北伐战争中不断扩充的桂系已经兵强马壮。因对桂系庞大的势力深感不安，蒋介石密令第一军军长何应钦解散桂系的第七军，何应钦认为极其不妥难以执行。消息走漏后，八月，桂系军队总指挥李宗仁联络武汉、浙江、湖南的军力开赴南京外围，重压之下蒋介石第一次被迫辞职下野。一九二八年一月，蒋介石复职，为了统一中国，以忍让的态度借桂系之力讨伐北方军阀，而此时桂系已经发展到十六个军外加七个独立师。一年以后，国民党统一了全国的军队，桂系各部队虽然番号改变，但其强大的实力在国民党军中依旧咄咄逼人。一九二九年三月，蒋介石下令兵分三路会攻桂系控制的战略要地武汉，蒋桂战争终以桂系兵败而结束。但是，桂系在这一年的年底重组“护党救国军”，联合粤军起兵反蒋。正当起兵因粤军首先撤退而面临危境时，北方的阎锡山和冯玉祥也起兵反蒋了，桂系军队立即成为阎锡山反蒋大军中的一部分，中原大战就此爆发。虽然桂系在大战中因内部分化兵退广西，但是一九三一年五月，一个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了，李宗仁出任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及军事委员会常委。抗战爆发后，桂军参加了空前惨烈的台儿庄

会战与武汉会战，以凶悍的战斗力和顽强的意志力威震日军。抗战胜利后，李宗仁被任命为北平行辕主任，白崇禧被任命为国防部长，桂系的两大军事首领均位居要职。一九四八年秋，当林彪的百万大军从东北南下入关后，国民党政权已经岌岌可危，李宗仁和白崇禧立即重组军力，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再次逼迫蒋介石下野。在桂系的历史上，诸多起伏与诸多征战皆有赖于桂军的实力。桂军以治军严格、作风顽强著称于国民党军中。

桂系经营大别山区的时间长达二十多年，建立了周密完善的保甲联防制度，并培植起大量的地主民团武装组织，不少军官和老兵甚至已在这里娶妻生子。

大军所至，必需粮草。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数万官兵的吃穿将成为最紧迫的问题。因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曾经四进四出大别山，这里的百姓不再相信共产党军队进来就不走了，所以刘邓大军每到一村，村中的百姓皆躲避一空。不要说征粮，即使拿钱买都买不到。而如果进入敌占区买粮，官兵们的北方口音只要一说话就会暴露。更为严重的是，追击刘邓大军的国民党军也随即进入大别山，国共双方的军队在大山里来回周旋，当地百姓无以供给如此众多的部队，他们要活命就必须保护自己的粮食，唯一的办法就是“坚壁清野”。六纵十八旅副政委刘昌回忆道：“我们虽然说不走了，但谁相信你？老乡们就看你能不能待下去。我们来了，敌人也跟着来了，老乡知道你的部队好，但你不占优势，再一拍屁股走人，他们就要遭罪。国共斗争可是生死之争，没有半点含糊，搞不好是要掉脑袋的。所以，老百姓怕国民党，也怕共产党，不敢和解放军接触。这个我们没有估计到，以为是老根据地，有群众基础，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官兵们一路奔袭作战，脚上的鞋子都已经烂了。可这里不是晋冀鲁豫解放区，没有人给队伍上的官兵缝制

军鞋，即使官兵们想买贫穷的大山里也买不到，于是只好赤着脚行军。六纵政委杜义德指着自己脚上的一层层稻草对官兵们说："这叫草鞋，红军长征就是穿着它走过来的，我们在大别山里再苦，能有长征苦吗？"他号召南方的战士教北方的战士打草鞋。六纵十七旅参谋陈品德刚参军，因为不会打草鞋，只好找来些破布用绳子把脚包起来，可是没走多远绳子就散了架，双脚被山石磨得直流血，为了不掉队只能忍痛坚持着。陈品德回忆说："正走着，我看见路边有一只胶鞋，就是国民党兵穿的那种，上面有个破洞，可能是人家觉得破，不要了。我那个高兴呀，忙捡起来穿上，鞋小，挤得脚难受，可是好多了。只有一只鞋，我就两只脚轮流穿，走了四十多里鞋也没破。我就想，这鞋真好，将来能有一双多好，起码能穿好几年。我还想，这个国民党兵扔了一只鞋，总不会也像我一样只穿一只鞋吧，另一只鞋说不定也会扔掉。我就很注意路两边，希望再捡到一只，可注意了两三天也没发现另一只……"

面对部队在困境中出现的动荡，邓小平说："我们必须打几个大的胜仗，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大别山站住脚，群众才能真正发动起来。不然，你再说绝不再走了，他也会怀疑的。"

十月初，三纵盯上了追踪他们的国民党军整编八十八师六十二旅，并经过七个昼夜的急行军把敌人围住了。战斗打响之后，美式装备的六十二旅拼命突围，三纵官兵拼死阻击，战斗从早上打倒晚上。三纵打六十二旅的时候，桂系的整编四十六师前来增援，三纵七旅二十一团拼死阻击。攻击六十二旅的九旅和八旅加紧攻击，最后突进对方阵地，六十二旅副旅长唐家楫被俘。

接着发生的高山铺战斗战果巨大。这次刘伯承盯上的是国民党军整编四十师和整编五十二师的八十二旅。整编四十师在刘邓大军南下途中，一路追击纠缠。最近，这个师又加强了八十二旅，八十二旅原

属黔军序列，虽然拥有美式装备，但终究来自国民党军中战斗力最弱的部队。整编四十师和八十二旅在蒋介石的命令下拼命追击，以至于孤军深入。刘伯承和邓小平认为机会来了，送上门来的不但是块“大肉”，而且是块上好的“臀尖肉”。

战场选在一个叫高山铺的山谷里。

一纵和中原独立旅占领了山谷两端的制高点，布置了一个大口袋；六纵尾追敌人并负责系紧口袋嘴，二纵和三纵待机歼敌。十月二十五日，大雾弥漫中，整编四十师的队伍行走在公路上。中原独立旅的四团九连化装成游击队，穿着各色服装，拿着老旧武器，引诱敌人上钩。上午九时，进入山谷的整编四十师遭遇突然攻击，一下子乱了的队伍不久就摆成了反击阵形，双方在公路两侧反复争夺，伤亡巨大的战斗一直持续到夜晚。国民党军的侦察情报称“高山铺最多只有共军一个旅”。位于蕲春城里的师长李振清开始催促部队全速前进。第二天上午，整编四十师在各种火力的掩护下，向一纵的阻击阵地发起猛烈攻击，在洪武垴阵地阻击的官兵全部阵亡，后续部队用刺刀和手榴弹又把阵地夺了回来。中午，国民党军开始分两路迂回前进，遭到猛烈阻击后，决定回撤时已经无路可撤。夜幕再一次降临，六纵十八旅旅长萧永银命令五十四团官兵：“冲上去，与敌人混战，用刺刀、手榴弹把敌人的敢死队搞垮。”五十四团扑了过去，即刻与敌人开始了肉搏战，四十分钟后敌人溃退。二十七日早上，大雨，整编四十师和八十二旅多方向组织突围，但均没有成功。刘伯承命令六纵投入战斗，此刻的战场兵力对比已达到我十七个团对敌五个团。下午十四时，战斗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一万三千多人，其中俘虏九千五百余人。

面对丰富的缴获，官兵们纷纷把敌人尸体上的鞋扒下来，穿在自己已经磨烂的脚上。

国民党军方认为，疲惫不堪的刘邓部无论如何都打不过兵强马壮的整编四十师。二十八日早上，高山铺的战斗已经结束，武汉行辕还在为整编四十师准备馒头和大饼。李振清师长在蕲春城内一再给武汉行辕发电报，说他的部队坚持下去绝对没有问题，要求派飞机去空投弹药。但是，空军飞行员却报告说，高山铺一带没有发现任何人影，反过来询问李振清的部队到哪里去了。

围困大别山的国民党军总指挥是白崇禧。

十一月三日，国民党军“大别山作战会议”在南京国防部召开。蒋介石说：“共军刘伯承部自强渡黄河，配合陈毅作战以来，屡遭我军重创，以逃逸大别山区，意图苟延残喘。为彻底剿灭刘伯承部共军，阻止其负隅顽抗，死灰复燃，进剿大别山已刻不容缓。须知战机稍纵即逝，不能有半点迟疑。希望诸位，制定出切实可行的作战计划，彻底肃清刘伯承部共军，则全国军事即将进一步改观。”会议制定的作战方针是：“集中主力先于大别山击破刘伯承部，同时并在鲁中、鲁西、胶东、黄泛区各方面以一部兵力追剿，不让陈毅部恢复或妨碍我大别山方面的作战。”在讨论大别山战区的作战指挥时，蒋介石的心腹们都主张大别山作战不同一般，应该由国防部统一指挥，至少也得让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但是，当有人提出让国防部长白崇禧指挥时，蒋介石竟然同意了。

我听到这一意见时，心中一惊，认为蒋介石平时不愿意白崇禧掌握兵权，未事先得他同意而在会议上提出，必使他尴尬不堪，这时我特别注意蒋、白二人的表情。这天蒋坐会议桌顶端正中的一把椅子上，这把椅子靠背比所有椅子的靠背都高些，据说这是由于他在西安事变时腰部受伤，要高背椅子使他坐直才不疼痛。这时，他的右边坐的是白崇禧，蒋听见这一建议后，并不烦恼，从容地扭转身问白：“健生兄，你看如何？”“看主席怎么决定吧，我服从命令。”白崇禧也满不在乎似的，脸上毫无表情地回答。

于是，白崇禧在九江设立了国防部长九江指挥所。

面对国民党军的向心合击战术，刘邓采取了“敌向内，我向外，敌向外，我亦向外，将敌牵到外线，以小部牵制大部，以大部消灭小部”的战略战术，打击或拖散敌人。一九四七年底，野战军第十、第十二纵队分别向桐柏、江汉进击，随之成立了桐柏军区和江汉军区，让淮河和汉水变成了中原解放区的两条内河。

白崇禧始终没有足以集中进攻大别山的兵力，因为此刻国民党军的精锐部队都在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手中。

不久，国防部长九江指挥所后移到了武汉。

冬天到了，刘邓大军的十万官兵还没有棉衣。中央军委为他们筹措了十五万套棉衣、一百万银元和大量的药品物资，但是无法运进敌军围困的大别山。大别山区不种植棉花，部队就地筹措布时，不惜违反纪律向店铺“借布”。四十九团到达团风镇，发现镇上有一家布店，官兵们要求向店主借布，店主小心地问：“借几尺？”官兵们说，店里所有的布都要借走。店主急了，说：“我们全家要靠这些布吃饭呀！”官兵们只好说可以给他写借条。可是，借条并不能让百姓维持生存。二纵六旅政委刘华清的部队到了广济县的周家湾村，干部们对百姓说：“我们来这里征集棉花和棉布，请你们积极支持我们，现在谁帮助了我们，将来全国解放了，人民政府是不会忘记他的。”一个叫李玉秀的大娘把自己准备做寿衣的黑土布送来了，大娘说：“你们打老蒋是为我们穷人好，这块布说啥你们也得收下。”好容易有了布，但是颜色不一，就用稻草灰、黑锅烟或是黄泥水做染料，把布放在大锅里用染料煮。染出灰黑色的军装布，队伍中却没有人会裁缝。刘伯承要求官兵自己动手，并亲自给大家做示范，他用个碗扣在布上，画出个大圆圈，然后说：“这就是领口！”于是上上下下都照着裁，但还是有人把领口开在了胸口或者后背。

一九四八年新年，晋冀鲁豫野战军官兵穿着自己做的各式各样的棉衣，在寒冷的晨雾中列队站在高低起伏的山坡上。晨曦初露的时候，他们看见了身材高大的司令员刘伯承和矮个子政治委员邓小平。邓小平面容消瘦，走路很快，穿着一件肥大的军棉袄，他对全体官兵们喊道："紧紧把敌人拖住！坚持到最后胜利！给大家拜年了！"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吸引了国民党军近九十个旅的兵力，打乱了国民党军向山东和陕北进攻的计划。与此同时，陈谢大军挺进豫皖鄂边区，并向伏牛山完成展开；陈粟大军挺进豫皖苏边区，直接威胁着陇海路沿线。至此，解放战争中"三军鼎立，经营中原"的局面已经形成。

毛泽东撰写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现在，战争主要地已经不是在解放区里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里进行了，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了……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具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国家内，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还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世界的东方，在这里，共有十万万以上人口［占人类的一半］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到进攻，不能不引起这些被压迫民族的欢欣鼓舞……

解放战争刚刚进入第二年，无数共产党官兵为了战争的转折付出了生命。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时约十二万四千余人，转出的时候仅剩下五万八千多人。但是，即使在最艰难困苦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依旧坚定这样一个信念："建立一个爱国、民主、不贪污的政府"和"一个独立的、自由的、富强的国家"。

# 第六章 朗照边区胜利花

## “打他三个钟头再走不迟”

要说苦，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最苦。

西北野战军的称谓来自一九四七年七月三十日周恩来的一封电报：“西北野战兵团定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彭为司令兼政委。”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副政治委员习仲勋，参谋长张文舟，政治部主任徐立清。

西北野战军下辖三个纵队以及两个旅和一个山炮营：第一纵队，司令员张宗逊、政治委员廖汉生，辖独立第一旅、三五八旅；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辖独立第四旅、三五九旅；第三纵队，司令员许光达、政治委员孙志远，辖独立第二、第三、第五旅。另外的两个旅是：新编第四旅，旅长张贤约、政治委员黄振棠；教导旅，旅长兼政治委员罗元发。西北野战军总兵力约四万五千人。

陈毅过去曾有个疑问，为什么中央在一九四七年夏秋间的来电中常常表扬西北野战军？“好像中央对华野领导颇有不满，特意抬高西北压华东似的”。但是，一九四八年一月，当陈毅辗转到达陕北杨家沟之后，才明白“西北野战军是作战条件最苦的一个野战军”。

> 麦面有一年多没有吃到了，小米也很难吃到，主要是吃黑豆，过去是喂马的马料，有时还要吃野菜吃糠……他们每打一仗每门山炮只准打五发炮弹，迫击炮每门只能配五到十五发炮弹［华东每门山炮过去三百发炮弹，每门迫击炮二百发，外线出击后炮弹少了。山炮每门一百五十发，迫击炮一百发，就感觉不能打仗了］，他们听了我的报告，说你们这样大的家务，给我们可以打一年……

西北野战军以数万兵力对付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所承受的军事压力可想而知。但是，为了配合陈谢、陈粟和刘邓三路大军出击外线

作战，彭德怀还是决心不顾压力把胡宗南的部队尽可能牵制在陕北。

彭德怀选择的作战目标是向北攻击榆林。

榆林地处陕西、山西和绥远三省交界地，自明代起就是著名的边塞重镇——“榆林府，习弓马，好战斗。兵民参半，以饷为命。”自古即为兵城的榆林，北倚长城，三面环山，多为沙丘。无定河、榆林河绕城冲积出开阔地，土壤肥沃，物产丰富，商旅繁华。城垣为砖石结构，城南的凌霄塔高地可以俯瞰全城，并控制一个小飞机场。

自内战爆发以来，榆林一直是国民党军包围和进攻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的重要据点。榆林一旦失守，“不仅晋、绥、陕边区之匪可连成一气，且将予匪囊括河套，直接沟通俄、蒙国际通路之利，于是榆林成为匪我必争之要点”。

至少在彭德怀准备攻击榆林之际，榆林国民党守军的作战心态正处在复杂微妙的时候。

民国初期，榆林是陕北镇守使井岳秀的地盘，井岳秀后任陕北国民军总司令，镇守榆林二十多年。一九三六年，井岳秀因手枪落地走火身亡。抗日战争爆发后，井岳秀的陕军被蒋介石收编，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把驻扎在兰州的邓宝珊的新编第一军、驻扎在岷县的鲁大昌的一六五师、驻守榆林的高双成的八十六师（井岳秀部）等部队合编成第二十一军团，任命邓宝珊为军团长率部进驻榆林。邓宝珊在榆林经营十年，联络地方，扩展部队，连年加固城防工事，建立起稳固的社会和军事根基。但是，邓宝珊不但不是蒋介石和胡宗南的嫡系，而且在他统领陕军的历史上还曾与共产党人过从甚密。内战爆发后，蒋介石在榆林设立了“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邓宝珊出任总司令。为了确保包围共产党首府的包围圈不出现军事或政治缺口，蒋介石和胡宗南都认为，有必要向榆林派驻嫡系部队。胡宗南了解到，他的心腹将领

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与当年井岳秀的部下现任第二十二军军长左世允是同乡，于是派董钊到榆林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副司令官。左世允军长外迎内拒，董钊在榆林待了半年，除了视察过一次部队和在城郊主持修筑了一些防御工事外，无事可做，最后只好返回西安。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国民党军已准备进攻延安，胡宗南奉蒋介石之命，拟将整编三十六师二十八旅派驻榆林，除加强防务之外，最要紧的是监视榆林守军。这一次，胡宗南为让榆林方面接纳这支嫡系部队，特地将一个名叫徐保的团长提升为二十八旅少将旅长，因为他了解到徐保的父辈与邓宝珊有交情。国民党军空军动用了二十多架C-46型和C-47型运输机，将二十八旅官兵空运至榆林。

此时，邓宝珊指挥的部队约一万五千余人。

彭德怀的攻击计划为：二纵、新编第四旅和教导旅攻击鱼河堡、归德堡和三岔湾等地，然后包围榆林城的西面、北面和东南；一纵并指挥绥德军分区四团和六团攻击响水堡，掩护二纵渡过无定河之后包围榆林城的南面和西南；三纵和独立第五旅攻击流泉河和青云山，独立第二旅攻击高家堡和乔岔湾，上述部队包围榆林城东。彭德怀攻击榆林的兵力达八个旅又两个团，总计约四万五千人，几乎是西北野战军的全部兵力，同时也是榆林国民党守军的三倍。

邓宝珊想不到共产党军队会攻击他，他认为自己是共产党人的朋友。

邓宝珊，甘肃秦州直隶州（天水）人，十三岁父母先后辞世，十六岁即到伊犁从军。一九一〇年成为同盟会员参加了辛亥革命，后参与国民军西北军的组建，直奉战争中已升任师长。一九二四年，李大钊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北方组织开始在国民军中活动，邓宝珊自此受到共产党政治主张的影响。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与共产党人邓小平、李子洲都有来往，与后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更是有着

深厚的友情。一九三二年，邓宝珊出任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面对省内武装林立、民生凋敝的景象，他决计整编军队，不扩一兵，专心生息，安抚百姓。由于军政成就显著，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邵力子等人鼎立推荐他出任甘肃省府主席，但因蒋介石对他猜疑很深未果，他被任命为陆军新编第一军军长，而第一军的兵力只有两个旅。“西安事变”后，国共抗日联合统一战线建立，他派兵驻守鱼河堡并叮嘱：“维护陕甘宁边区到榆林这一段公路的交通安全，保护来往车辆和人员顺利出入。”在整个抗日战争中，邓宝珊的部队一直与共产党人的陕甘宁边区保持着和睦相处的关系，他本人还多次到延安与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晤谈。一九四三年十一月，邓宝珊从西安返回榆林途中来到延安，因偶感风寒在延安停留半个月，毛泽东给他送去了十张狐皮让他做件大衣。邓宝珊走后，十二月，毛泽东又给他去信，信中说：“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

八月二日，邓宝珊接到了彭德怀部主力正向榆林挺进的情报。他笑着对同僚们说：“共产党对榆林还用得着这样大的兵力？他们真的要进榆林也不一定要使用武力嘛。”邓宝珊确信彭德怀部不会攻击榆林，如果真的要进攻，至少事先也会和他打个招呼。但是，情报连续到达，而他并没有接到共产党方面的任何解释。邓宝珊有一种严重的不安——他不愿意和共产党打仗，但又不能不备战了。

五日，西北野战军逼近榆林。

邓宝珊召集了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外围据点，集中兵力固守榆林城。具体作战部署是：二十八旅八十三团守南城，八十二团守南门外的凌霄塔和三义庙据点；总部特务营一部和第二十二军的工兵营、辎重营和补充营守西城；八十六师炮兵营、工兵连和军通讯营守北城，二五七团和八十六师直属队守东城。

晚上九点，突然下雨，雨越下越大，彻夜未停。

大雨中一个消息传来：奉命从三岔湾紧急调回榆林的新编十一旅一团和二团以及防守高家堡的二五六团遭到猛烈攻击，损失巨大，一团团长王永清和二团团长周效武均受伤被俘。

七日凌晨，榆林已被包围。

蒋介石飞到了延安。

国民党军的最高统帅以占领者的姿态进入共产党人的“巢穴”，这一事件在国民党方面看来极具象征意义。于是，接到蒋介石来延安的指令后，胡宗南立即忙碌起来。飞机在西安与延安之间往来多次，洋瓷脸盆、澡盆、马桶、沙发、钢丝床、山珍海味、西餐用具以及西餐厨师等等一应俱全地被运抵贫苦的延安。八月七日上午，“美龄号”专机在延安简易机场尘土飞扬的跑道上降落，蒋介石被安排住进延安最好的边区外交宾馆里。

彭德怀部对榆林的攻击，令蒋介石深感不安。一方面，他始终认为西北的共产党军队已无力作战，特别是进行坚固城池的攻坚作战，因为他们不仅兵力少得可怜，而且武器简陋、弹药缺乏，在国民党军的追击下，于贫瘠的黄土高原上来回转移必定人马困顿；另一方面，他最不放心的正是陕西的北面，邓宝珊本来就不可靠，加之榆林防御兵力有限，一旦榆林不保，则宁夏孤立，胡宗南失去北面的作战配合，必将影响整个陕北的战局。

到达延安的当天下午，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了旅以上军官会议，专门研究出兵增援榆林的问题。与会者有罗泽闿（国防部作战三厅厅长）、王叔铭（空军副总司令）、胡宗南（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裴昌会（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薛敏泉（西安绥靖公署副参谋长）、

董钊（整编第一军军长）、刘戡（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等将领。罗泽闿首先介绍了当前国民党军在山东作战的情况，要求胡宗南部主力趁陕北共军胶着于榆林城下之际，迅速寻求与彭德怀部决战，最低限度也要迫使陕北共军主力东渡黄河。胡宗南表示接受这一作战任务，但他强调了两点困难：一是目前正值雨季，汽车运输补给困难；二是要集中主力与彭德怀部决战，咸榆公路的守备就会兵力不足，长途运输补给将面临危险。蒋介石当即表示，空军把运输机集中在西安机场，为作战部队进行空投补给。他要求胡宗南不要担心补给问题，尽快按照国防部的意图拟定作战计划。会议接着讨论了几个重点作战问题：（一）榆林守军必须固守，以待援军；（二）由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指挥整编十七、三十六、九十师沿咸榆公路前进，到达瓦窑堡补给后继续北进；（三）整编三十六师迂回行动，避开绥德、横山正面共军的阻击，走保安、靖边一线，沿着伊盟南端边缘前进，限令十一日抵达榆林，与榆林守军形成合力内外夹击；（四）整编三十六师一路上的补给由空军负责逐日空投；（五）由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指挥整编第一师和整编三十八师，跟随整编第二十九军保持一天的行程，随时准备配合作战。

晚上，蒋介石单独与胡宗南再次研究了榆林作战问题。当胡宗南说此次共军打榆林的真正意图，也许是准备在米脂以北伏击我增援部队时，蒋介石说，今后陕北作战，不必再强调稳扎稳打了，要用急进猛打的战法，弥补以前与共军作战显露出的缺陷。蒋介石特别强调，迂回增援的整编三十六师不但要隐蔽，而且行动要快，要达到出乎共军意料的奇效。蒋介石告诫胡宗南："陕北为主要战场，为匪之首脑所在，如不肃清，后患无穷。本令七月底肃清，现延长一个月，八月底定须肃清。"

第二天一大早，蒋介石开始在延安城里转悠。没有人知道他此时此刻的感受。在枣园，蒋介石终于看见了他的对手毛泽东曾经住过的

那间窑洞，与当地农民的窑洞没有任何区别，门窗是没有油漆过的陈旧的木头做的，窑洞内墙面剥落，靠窗的那张榆木桌的桌面坑洼不平，简陋的床也是榆木钉起来的。窑洞外面的院子里有棵树，树下有个石凳，还有架纺线的纺车。随从告诉他，这间窑洞的旁边和下面，是周恩来、朱德和刘少奇等人的窑洞，这些窑洞无论外观还是内设都是一样的。尽管从一九二七年国共决裂开始，蒋介石就知道共产党人已被逼进了山林和乡村；特别是一九三四年，国民党军通过五次大规模的“围剿”占领了共产党人的首府江西瑞金，迫使他们千里万里地走向中国西部人烟稀少的地带之后，毛泽东与他的部队面临危境、身处绝境的情报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可是，此时，面对破败的延安小城和这些近乎原始的窑洞，蒋介石还是感到十分震惊。他无法想象毛泽东何以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保持着旺盛的斗志，有效地指挥着他的军队在全国的战场上与政府军对抗，并且能在这样的桌子上把文章写得既尖锐犀利而又文采飞扬。

蒋介石回到边区外交宾馆，审定了胡宗南送来的作战计划后，当天就离开了这个让他心绪不宁的地方。

这是蒋介石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延安。

蒋介石离开延安的时候，榆林城墙上每一个垛口都悬挂起一只装满炭火的铁丝笼子。邓宝珊奉命固守待援，而他面前的榆林城已是烟火缭绕，满城通明。八月七日晚上，彭德怀的三五八旅七一六团和独立第一旅二团开始攻击榆林城外唯一的制高点凌霄塔。凌霄塔四周是开阔地，加上炮火有限，官兵们只能用挖壕的方式一点点接近。从七日黄昏到八日凌晨，壕沟终于挖到塔下，冲锋随即开始。凌霄塔守军是二十八旅八十二团三营，战至又一个黄昏，三营包括营长古遂东在内全部伤亡，西北野战军占据了这一制高点。消息传来，邓宝珊亲自到南门找到二十八旅旅长徐保，声色俱厉地命令他必须把凌霄塔夺回

来。徐保知道此战如果打不好，无法向提拔他的胡宗南交代，于是严令八十三团副团长王宗义带兵出城向凌霄塔反击。王宗义出击的时候，徐保命二十八旅的炮兵全力支援，邓宝珊也令第二十二军的炮兵同时开炮，凌霄塔四周顿时弹片横飞，烈焰升腾。在优势火力的掩护下，王宗义率一个营的官兵不顾一切地冲击，三小时之后，守卫凌霄塔的两个连的官兵全部伤亡，王宗义收复凌霄塔阵地。

向榆林城西发起攻击的三五八旅七一五团三营遇到了难题。攻击的路线是一片沙漠，无遮无拦，无法构筑攻击工事，官兵们只能把自己埋进沙子里，只露出眼睛面向城墙。沙土在太阳的烘烤下能把鸡蛋烤熟，官兵们很快就因为缺水而支持不住了。风刮起来的时候身上的沙子刚被吹走，前面的城墙上就飞来了子弹。连城墙都不能接近，还谈什么攻城？官兵们万分焦急。九日中午，守卫城西门的辎重营二连长杨谦之接到报告，说哨兵发现城外西沙梁的共军正在摇动白旗，看样子想投降。杨连长立即命令一名排长带领二十名官兵出城接受投降。一排长还没走到西沙梁，突然遭到射击，杨谦之这才明白共军在诈降。诈降的是埋伏在炽热的沙子中的三营九连。二十多名国民党官兵拼命往回跑，九连的百十名官兵拼命追击，双方在松软的沙丘上开始了赛跑。城墙上的杨连长知道受骗了，但城下双方混杂在一起无法开枪。直到自己人接近城门的时候，城墙上的机枪才开始不分敌我地射击，残存的国民党官兵跑进了城，九连还活着的官兵挤在了城门洞里。半夜两点，一声巨响，小西门附近的城墙被炸开一道缝隙。藏在城门洞里的九连官兵呐喊着往城里冲，瞬间就与国民党守军厮打在一起。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后续部队没能上来——三五八旅指挥员无法判断炸药把城墙炸开了多大的口子，也无法判断七一五团三营是否占据了突破口，派上去查看情况的人因为负伤未能及时报告，随后派出去的一个排绕来绕去也没与九连接上头，因此后续部队始终没有跟上去。而就在这个时候，邓宝珊派出的两个连的增援部队到达，同时

所有的炮火开始转向西门轰击，九连最后被迫撤往城外，撤出来之后这个上百人的连队只剩下四人。

攻击城北的部队也进展不顺。在占领大部分外围阵地后，遭到守军猛烈的反击，从七日黄昏到八日拂晓，双方在城外阵地来回拉锯，彼此伤亡都很大。九日夜半，国民党守军退回城内，走前将北关的民房全部点燃，大风之下，火势凶猛，北关一片火海，彻夜燃烧。

十一日中午，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榆林非急攻可下，而钟松仍有可能迅速增援，似宜决心暂停攻城，集结部队，准备于十二日夜或十三日打钟松。”可是，彭德怀已无法执行这个部署，因为钟松的整编三十六师绕过彭德怀预设的阻击阵地，其先头部队已经接近榆林。

钟松，国民党军整编三十六师师长，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是胡宗南的同学，在西安绥靖公署所属各部队中，他是资历最深的长官，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整编三十六师也是国民党军嫡系部队的主力，下辖三个旅，每个旅三个团，全部美式装备，兵力万人之众。

因预想到彭德怀部很可能围城打援，整编三十六师以极快的行军速度长途跋涉，从榆林以北长城之外的沙漠地带绕道，于八月十二日到达距榆林不足十五公里的苏庄子、天鹅海子一带。

彭德怀对榆林的攻击以及围城打援的设想，都因整编三十六师的迅速机动和出其不意而失去了战机。

十二日黄昏，彭德怀下达了从榆林撤围的命令。

钟松进入榆林城，邓宝珊设宴款待。

彭德怀部攻击榆林失利的客观原因是：榆林城防坚固，守军抵抗顽强，援军增援迅速，而攻击部队缺乏攻城兵器，特别是弹药奇缺，

攻击时间也不充裕。主观原因是：攻击官兵缺乏攻坚作战的经验，多次出现第一梯队与第二梯队失去联系，从而导致攻击行动相互脱节。同时，对国民党军增援部队的行军速度估计不够，部署阻援措施不力。

榆林失利，给毛泽东带来了危险。

就在钟松的整编三十六师迂回榆林的同时，刘戡率整编第一军和整编第二十九军主力全力向绥德、米脂推进，虽然目标依旧是寻找毛泽东的行踪，但其行动已对位于无定河与黄河之间的西北野战军后方机关和野战医院构成威胁。毛泽东要求彭德怀立即控制归德堡与镇川堡之间无定河两岸，同时要求“我无定河、黄河间各后方机关，必须迅速移至黄河以东，望贺（贺龙）、习（习仲勋）立即部署移动”。

一直盼望毛泽东在持久的军事压力下不得不东渡黄河的胡宗南，立即被贺龙、习仲勋率领的中共西北局、边区政府、野战军机关和野战医院强渡黄河的行动迷惑了。尽管大雨倾盆，但是通过电台测向、空中侦察和地面侦察，黄河上共产党人的庞大队伍确实在顶风冒雨地渡河，这一情景令胡宗南异常兴奋，他认定彭德怀北攻榆林不克，损失巨大，只有掩护着毛泽东一行东渡黄河，以免被歼。于是，胡宗南立即命令整编第一军军部指挥整编第一师守备绥德，整编第二十九军以及整编九十师向葭县（佳县）急促推进，同时命令钟松的整编三十六师由榆林向镇川堡方向前进，“协同第二十九军压迫彭匪主力于葭县附近黄河地障而歼灭之”。

整编三十六师刚刚进入榆林城，官兵因为长途迂回跋涉，极度疲惫，原本打算在榆林城内休息几天。但是，胡宗南要求他们迅速南下的命令到了，并说将派飞机给整编三十六师运送给养。当时，邓宝珊正忙着处理榆林战斗的善后，掩埋死亡人员，筹集军民急需的粮食，哪里还顾得上整编三十六师。钟松向驻榆林的中央银行分行借了点

钱，给各旅解决急需的吃饭问题，然后，全师于十四日上午从榆林出发了。出发前，从西安飞来的四架飞机投下了一些因为天气炎热而发酸了的面饼，对于一万多人的整编三十六师来讲这无异于杯水车薪。钟松把补给的希望寄托在各旅团留下来的辎重营和运输队上，钟松命令他们接收到胡宗南空投的补给之后立即追赶部队。钟松不曾想到的是，胡宗南答应的补给直到他的部队被全歼之后也没有运到榆林。

此刻，指挥着百万大军的共产党中枢在国民党军的追击和围捕下，其颠沛之艰辛与危险，是当时各个战区的共产党将领以及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军将领无论如何都难以想象的——毛泽东的这段历史往事之所以令人感叹，是因为当这一小队人马在荒凉的山谷间由于命悬一线而来回转移之时，毛泽东仍旧指挥着分散在全国各个战区的部队作战，而且，各个战区的共产党将领不断地听到毛泽东发出“蒋介石很快就要完蛋了”的呼声。

小河会议之后，毛泽东一行开始向东转移。为了保密，他们的代号由“三支队”改为“九支队”。八月一日晚，毛泽东到达靖边县青阳岔，这是自离开延安后毛泽东第二次来到这个村子。住了一夜之后，第二天在闷热的天气里继续赶路，到达横山县的小水沟村。这是一个贫苦的小村子，因为窑洞很少，大部分人睡在了露天。毛泽东住进村长李文运的家里，战士们在李家的石炕上支起一扇门板给毛泽东当办公桌。但是，刘戡的部队很快就接近了，于是再走。下雨了，他们在一个叫石湾镇的村子里弄了点饭吃，没来得及烘烤一下衣服，就接着向肖崖则村方向行进。刘戡的部队始终跟在后面，毛泽东刚离开火石山，刘戡就进了村；毛泽东刚离开石湾镇，刘戡跟着就进了镇，这个国民党军将领总是能在毛泽东睡过觉或者歇过脚的窑洞外摆出姿势留个影。八月三日，到达肖崖则村时，毛泽东已浑身湿透，鞋里灌满了泥浆。听说刘戡的部队在石湾镇宿营了，毛泽东说：“那好，我们也陪他住下吧。”他和周恩来挤在农民李俊成的窑洞里睡了一夜。第二天，

走到子洲县的巡检寺村，寻找住处的人还没回来，毛泽东一行人就在雨中等着。这时候，西北野战军攻击榆林的战斗打响了。九支队先到了绥德的李家崖，然后又到了黄家沟，在大雨和泥泞中不断地与刘戡的部队周旋。毛泽东盼望着攻击榆林得手的消息，但最终传来的是整编三十六师从北面的沙漠绕路增援，攻击榆林失利的报告。西北野战军从榆林撤退的那一天，毛泽东一行急促地离开了黄家沟，因为他们必须赶在国民党军前面渡过无定河，通过绥德城。在泥泞的路上走了大半夜，到达无定河边，一座九孔大桥横跨在河上，当时还有民兵守着。过桥之后，毛泽东听说要炸掉大桥，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说刘戡要用这座桥就让他用，他是暂时用用，我们可是要永远地用。抢在刘戡前面通过了绥德城，八月十四日，毛泽东一行到达米脂县的井家坪。

这天，整编三十六师离开榆林，开始全速南下。

局势陡然间危机四伏：黄河以西，无定河以东，南北约二十公里，东西约三十公里，在这样一片狭长的地带内，毛泽东已处在国民党军十几万兵力的南北夹击之中。

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提出了攻打整编三十六师的设想："钟松本早在榆林接受投粮，估计本下午可能向南走二三十里，明日必向镇川前进，其目的是占米脂。刘戡五个旅十六（日）上午可到绥德。明日集中八个旅打钟松于归德、镇川线以东以北山地是好机会，不知部署来得及否。"

这时西北野战军主力正集结于榆林东南、沙家店西北地区，北面是沙漠，东面是黄河，西南面是无定河，虽然回旋的余地很小，但正处在整编三十六师南下的必经之路上。彭德怀当日回电，决心打整编三十六师。但是，富有作战经验的钟松南出榆林后，并没有直接走鱼河堡至镇川堡的公路，而是改走无定河西岸，绕过了彭德怀预设的伏

击阵地。西北野战军官兵眼看着国民党军从河对岸走了过去，隔河却无法展开攻击。

为了摆脱危险，也为了令彭德怀不要顾及中央放手作战，九支队决定自行转移。原定的路线是渡过无定河向西，再次返回小河村一带，绕到敌人的后面去。但是，连日大雨，河水暴涨，无法徒涉，又没有找到船只，无奈之下只好向东北方向转移。毛泽东疲惫之极，但坚持不坐担架。在陈家岔住了一晚之后，第二天过乌龙铺，继续向东。雷电交加，白昼如夜，到达葭县西面的曹家庄时，百姓已睡，不便打扰，战士们找到一个无人居住的破窑洞，毛泽东立即召集会议。战士们站在村口的大槐树下避雨，都说这里离黄河很近，看来很可能要过黄河了。但是，刘戡的部队已从乌龙铺出动。九支队立即再次上路。黑暗中只能借助闪电的光亮辨路，耳边是山洪暴发的隆隆声响。黎明时分，毛泽东到达葭芦河边，原来细小的水流现在已是一片汪洋，根本无法通过。河的两侧是高山，后面是刘戡的追击部队。毛泽东和任弼时商量了片刻，决定向西北方向前进，那里是绝壁山峰。毛泽东挥挥手说："咱们上山！"汪东兴嘱咐战士上山不要留下任何痕迹。毛泽东说："不用不用，竖块牌子，上面写上'毛泽东由此上山！'"山顶上有个小村庄，叫白龙庙。毛泽东往石头上一坐，说："不走了！就在这里休息，等敌人上来，打他三个钟头再走不迟！"站在这里，可以看见远处的葭县县城，刘戡追到葭芦河边仍没找到毛泽东的踪迹，于是架起大炮开始猛轰葭县县城。

八月十八日清晨，九支队继续转移。雨下得更猛，天像漏了一样。下山的时候，被洪水推着走，大家挽着手，免得被水冲走。下到山谷里，向北走到葭芦河上游，找到河面相对较窄的地方开始架浮桥。警卫战士在湍急的河水中几次架桥都没有成功，毛泽东坐在河边石头上低头看文件，山顶上白龙庙方向枪声密集，是后卫部队与追击的敌人打上了。汪东兴建议将毛泽东设法弄过河去，毛泽东不愿意。

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浮桥终于架成了，周恩来在桥上来回走了几趟，然后让毛泽东过河。毛泽东坚持让机要人员、电台和文件先过，自己最后才上了桥。他刚一过去，轰隆一声，浮桥被洪水冲垮了。第二天，毛泽东一行到达梁家岔。

晚上二十三时，彭德怀来电：“拟于明日拂晓包围沙家店附近敌之两侧而歼灭之，因此不能到中央住地去，请中央转移到刘全塌［离梁家岔二十里］以靠近主力。”毛泽东命令九支队轻装，准备七天的干粮，把文件烧毁，准备随时向西突围。他说：“沙家店一带要打大仗，两军主力都集中在这里，地区狭小，打得好，我们转危为安，不走了；打不好，我们就往西走，出长城，进沙漠。”

形势所迫，对国民党军整编三十六师的作战，将决定共产党人在陕北的命运。

在必须破敌一路，并给予坚决打击时，选择整编三十六师为攻击目标的理由是其孤军深入的态势。钟松成功地增援榆林，得到蒋介石的褒奖，再次从榆林出发向刘戡靠拢时，整编三十六师的行动果断而急促，其一二三旅和一六五旅四九三团为第一梯队，由镇川堡绕过沙家店向乌龙铺前进，其师部和一六五旅（欠四九三团）为第二梯队，在沙家店以西跟进，拟于乌龙铺与刘戡部会合，然后两军合力一举将彭德怀部消灭在黄河边。

彭德怀决心集中主力，趁钟松与刘戡两部的夹击之势尚未形成，利用整编三十六师一字排开孤军深入的时机，坚决迅猛地插入两部之间狭窄的缝隙，在沙家店地区伏击整编三十六师。西北野战军的部署是：许光达的第三纵队并指挥绥德军分区第四、第六团进至当川寺南北的高地，牵制钟松的第一梯队，并阻击刘戡可能的增援；王震的第二纵队和教导旅、新编第四旅进至东沟、高家疙塔、宋家井地域，攻击钟松的第二梯队；张宗逊的第一纵队在高柏山、老虎疙塔地域，由

西南向东北方向实施攻击，先配合第二纵队打钟松的第二梯队，然后集中兵力打其第一梯队。

大雨滂沱。

陕北是中国著名的干旱地区，连日不断的瓢泼大雨令当地百姓十分惊异，认为雨水是共产党带来的——“胡宗南是旱老虎，共产党是及时雨。”

但是，雨下得太大了，四野汪洋，山洪暴发，向预定战场开进的官兵步履维艰。更严重的是部队已断粮多日。西北野战军之所以兵力很少，与中国西北地区无法养活大军有关。部队作战时，让彭德怀最感困难的还不是敌众我寡，也不是弹药缺乏，最要紧的是官兵们吃什么。连续的转战，各部队携带的粮食已消耗殆尽。听说有个部队连黑豆都没有了，年近五十的彭德怀让警卫员把自己仅有的四斤小米送过去，他自己则以粗糠和压碎了的黑豆充饥。陕北的贫苦百姓曾倾尽全力支援共产党军队作战。民兵封锁道路，埋设地雷，组织担架队，老人、妇女和孩子们把家里能吃的南瓜土豆都拿了出来。担架队里有个叫金有发的青年农民，父亲是陕北的老红军，一九三五年红军东征时战死在黄河边，弟弟刚刚参军，几天前攻击榆林时死在了城墙下。金有发参加担架队上前线后，他的妻子把自家藏在山里的十几斤谷子挖出来，连夜推碾子磨米。小米碾好的时候，发现背上的孩子已经饿死了。女人把孩子的小尸体埋在草丛中，背着小米循着枪声找到了部队。彭德怀知道后眼泪汪汪：“没有老百姓，哪有中国革命？边区人民对我们恩德如山，咱们要惜民命，再也不能增加人民的负担了！哪怕是杀马杀骡子吃，也要坚决打好这一仗！”

二十日，彭德怀发布歼敌动员令：

彻底消灭三十六师，是我西北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开始；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的开始。为着人民解放事业，继续你们无限勇敢精神，立即消灭三十六师，活捉钟松，号

召你们本日黄昏以前胜利完成战斗任务！

拂晓，攻击在瓢泼大雨中开始。

一纵和二纵首先将整编三十六师师部和一六五旅包围在沙家店地域，随之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不是说彭德怀部主力连同共产党首脑机关已经退到黄河边，正在仓皇渡河吗？钟松对突然遭到攻击有些不知所措，立即命令部队在泥沟以北、张家坪以东迅速构筑防御工事进行抵抗，同时急令前面的第一梯队一二三旅迅速向沙家店靠拢。

乌云低垂，大雨时断时续，天昏地暗之中，西北野战军的攻击异常凶猛，一六五旅各团没来得及筑起工事，西北野战军官兵已经冲到眼前了。钟松不断地催促一二三旅赶快靠拢，可就是不见一二三旅的影子。战斗持续到黄昏时，一六五旅待援无望已斗志全无，官兵在泥泞中跑得满山遍野都是，西北野战军官兵忘记了肚子空空，大叫大喊地追击着，喊声和雨声混合在一起让钟松听起来毛骨悚然。天黑了，钟松终于意识一切都完了。他和一六五旅旅长李日基脱下军装，换上早就准备好的老百姓的衣服，准备丢下部队独自逃离战场——至少李日基旅长有着丰富的逃亡经验，十二年前的一九三五年七月，工农红军准备穿过大草地北上甘南时，李日基奉胡宗南之命前往草地边缘的毛尔盖阻击红军。那时他是西北补充旅一营营长。在遭到红一军团二师四团的攻击后，李日基砸了电台带领少数士兵开始逃跑，在原始森林中流浪了数日之后，才得以回到松潘县城——这一次，他和钟松师长再次在大雨和黑夜的掩护下成功逃脱，但是他们的部队彻底垮了。

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是个心事重重的军官。当时，他的旅距离师部约十五公里的路程，之间需要经过几座山梁和几道沟壑。刘子奇认为，如果没有侧翼的保护，又是夜晚，贸然回援沙家店凶多吉少。可是，师长的命令又不能不执行。在与参谋长罗秋佩商量之后，决定先把配属他指挥的一六五旅四九三团派回去——他们的旅受到了攻击，

有什么理由不去解救？至于自己的一二三旅，等天亮以后再行动不迟。第二天拂晓六点，一二三旅出发了。夜里先出发的四九三团已经到达乌龙铺南面的山梁，一二三旅主力刚刚通过乌龙铺，刘子奇听见了沙家店方向传来的密集的枪炮声。刘子奇立即开会研究，最后决定离开前面的四九三团，抄近路直接向攻击三十六师师部的左翼前进，以三六八团为先导，先行抢占常高山制高点，以掩护主力推进。

三六八团对常高山的攻击，立即遭到西北野战军的阻击，阻击部队是新编第四旅七七一团的一个营。这里是彭德怀部攻击整编三十六师师部的侧面，战前没有料到一二三旅主力会跨越山梁直接增援，如果让一二三旅从这个方向突进去，战场局面就会朝不利于西北野战军的方向陡转。于是，阻击一二三旅的战斗突然成为能否全歼整编三十六师的关键。七七一团一个营的官兵死守阵地，一次又一次把冲锋的国民党军压下去。刘子奇旅长也知道这里是战场的薄弱地带，遂命令部队反复冲锋，显示出坚决突破的决心。但是，反复冲锋都未能奏效。刘子奇突然发现，西北野战军有从他的两翼延伸战线的意图，于是命令三六七团派一个营到左侧山梁担任掩护。这个营刚一爬上山梁，就遭到隐蔽在那里的西北野战军的袭击，营长当场死亡，其余官兵除死伤之外立即全部跑散了。中午的时候，刘子奇与师部的联络中断，他猜想师指挥所可能受到攻击，于是提出是不是可以撤了？谁知，三六七团团长同意撤退，三六八团团长不同意。刘子奇知道两个团长争吵的原因：如果撤退，三六八团必须担任掩护全旅的任务，这个团的团长怕一旦掩护完毕自己却撤不下来，于是坚决主张要死大家一块死。争执不下之际，胡宗南的电报到了：“固守待援，将派飞机参加战斗。”

刘子奇只有指挥一二三旅拼死攻击了。

这时，罗元发率领的教导旅出现在常高山附近。

教导旅的任务是从常高山以西新编第四旅与二纵之间的战斗缝隙插进去，配合二纵攻击钟松的整编三十六师师部。他们到达这里的时候，罗元发旅长发现情况十分紧急，绝不能让一二三旅从这里突过去。他立即命令二团团长王季龙带部队冲上去，抢占制高点，配合新编第四旅的阻击。罗元发爬上常高山，在山顶上找到了指挥作战的七七一团副团长，两人商量了一下，决定教导旅从右翼出击，不但要阻击住一二三旅，还要将它包围吃掉。

教导旅主动改变预定作战计划，并勇敢地承担起更为艰巨的作战任务，成为沙家店战役取得最后成功的重要因素。

此时，刘戡的部队距离整编三十六师仅十几公里。虽然他在电报中说他的五十五旅已经“就近来援”，而他本人则亲率主力“继后即到”。但是，他派出的部队始终没能突破许光达率领的第三纵队的阻击线。

十九日下午，对一二三旅的最后攻击开始了。

战后刘子奇回忆道：

> 解放军由正面和右侧同时发动反攻，以压顶之势从两面高山杀下，向整第一二三旅全线阵地猛冲，有的阵地被轮番连续冲击发生白刃肉搏，死伤枕藉，干部伤亡很多，炮兵营长亦遭炮火击毙，山炮一门被击毁，两门因无炮弹已成瘫痪，骡马被打得四散乱奔。派往后面掩护并与援军联络的一个加强排也无踪无影。在战斗紧张时候，虽由西安派来三架次飞机参战，投下几枚小炸弹，对解放军丝毫没起作用。首先第三六八团阵地全部被毁，团长失踪，官兵没退回一人。由于一个团被消灭后，旅只残存三个小山头的阵地，解放军的火力更加猛烈地集中在这块狭小的阵地上，更显得锐不可当。第三六七团的大部官兵伤亡，阵地失守，电台被炮弹打得粉碎，同各方联络断绝，情况不明。各路援军均被解放军阻击未到，而解放军则不断向阵地周围拥来。这时候我看到前途已经绝望，立即带着残部突围，多次冲击俱未成功，混战到将近黄昏时，终于全军覆灭。

刘子奇突围未成被俘。

沙家店一战，西北野战军毙伤国民党军整编三十六师两千余人，俘虏四千余人，总计六千余人。西北野战军伤一千四百三十五人，亡三百七十九人，失踪二十五人，总计一千八百三十九人。

沙家店战斗在危急的情况下扭转了西北战局，基本改变了西北战场上的敌我形势。战斗结束后，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一行亲临沙家店战场，毛泽东对官兵们说："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是夜，胡宗南在日记中写道：

本夜作战会报判断匪以全力攻三十六师师部，其对五十五、一二三、一六五各旅皆为牵制隔绝，使眩惑于眼前形势，不敢奋进，使三十六师师部陷于孤立而被消灭。夜不能睡。

## 半岛之争

陈粟大军出击外线之后，地主武装杀回沂蒙山区。

地主武装对翻身农民实施的报复，暴露出人性中最黑暗的一面：

这支代表着中国最腐朽、最黑暗势力的反动武装，像一股凶恶的"泥石流"，由西向东向胶东大地倾泻。敌人所到之处，一片血海，一片废墟，一片荒芜。还乡团屠杀人民之多，杀人手段之残忍，更是闻所未闻：刀铡、水淹、开水烫、火烧、绞刑、刀子割、断肢、活埋、剖腹挖心、用烧红的铁锅烙烤……种种酷刑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活埋群众时，还把人头露在外面，然后用铲刀铲去，说是"平均地权"。井里填满了尸体，水塘被染得猩红，不少村庄成了"无人村"。在林泉庄，全家被杀害的七十五户。小朱洞村三十户人家，除三户恶霸外，其余二十七户全被杀绝。在莱阳城外，他们一次就屠杀群众三千余人。当时真是村村遭劫，户户蒙难，尸曝旷野，十室九空……左村一军属宫大娘是军属模范，被拉去枪决，敌人先一气杀死十八个人，还打着问她："现在你积极吧？拥军吧？"在骑马埠一个村敌人就杀七十二人，每逢一个沟，就看见血淋淋的人头、断腿、被折断的骨头……

疯狂的报复源于共产党人发动的土地改革运动。在中国这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里，土地问题远远超出了均贫富的范畴，它涉及推翻封建制度、确立民生权力以及重建道德伦理等一系列社会变革。如同

大革命时期爆发于中国南方的农民运动一样，极少数垄断土地并大比例占有财富的官僚地主与绝大多数赤贫农民之间不可调和的生存矛盾，已成为这个国家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势力水火不容的阶级死结。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六日，被胶东军区授予“支前模范”称号的贫苦姑娘解文卿被地主武装捉住了。这个半年前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村青妇会和妇救会会长，从她生下来那天起就饱受苦难，直到共产党人来到她的家乡，她才知道只有把天底下的地主老财都消灭干净穷人才能活下去。解文卿身材瘦小，但在帮助共产党军队作战时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她组织妇女缝制军鞋军衣，昼夜磨米磨面，前线打起来了，她像男人们一样冲上去往下抢运伤员。在华东野战军攻击掖县的战斗中，她和七名青年妇女往返战场三次，一双赤脚磨得血肉模糊。躺在担架上的伤员喊：“大姐！别为我遭罪了！把我扔了吧！”解文卿递给伤员一只煮熟的鸡蛋，说：“兄弟！你得活着！穷人指望你呢！”土改开始后，她勇敢地冲进地主家，把粮食财物抬出来，分给最贫苦的乡亲。当华东野战军转移外线作战后，村里的大地主解保国带领保安队回来了，一口气活埋了八个人，说不把解文卿交出来就把全村人都埋了。解文卿站了出来。她被吊在房梁上，手指和脚趾被剪断，四肢被打断，牙被一颗颗撬掉。最后，大地主解保国在她身上绑满了谷草点着了。

贫苦姑娘解文卿死的时候刚刚年满十九岁。

地主武装是跟在国民党军的后面进入解放区的。

陈粟大军出击外线之后，山东解放区兵力空虚，国民党军队发动了旨在彻底清剿山东解放区的“九月攻势”。

“九月攻势”是一次声势浩大、军种齐全的军事行动。参战的陆军部队有整编第八、第九、二十五、四十五、五十四、六十四师，共六

个整编师二十个旅，配属重炮十三团，工兵第二、十五团，装甲炮兵营、战车营、宪兵十七团以及四个保安队组成的胶东兵团，由陆军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范汉杰兼任司令官。参战的海军军舰有“永积”号、“永顺”号、“长治”号和其他配属舰只。国民党军空军青岛、济南和徐州三个基地的部队几乎倾巢出动，其中青岛基地出动P-51型飞机十五架、B-25型飞机六架、C-46型飞机八架、C-48型飞机一架、PT-19型飞机两架；济南基地出动P-51型飞机十二架；徐州基地出动P-52型飞机四架、P-51型飞机二十四架。空军总部还派出一个侦察机中队参战。

此时，在山东战场上，除了胶东兵团之外，曹振铎的整编七十三师和霍守义的整编十二师部署在济南及其周围；胡琏的整编十一师和沈澄年的整编七十五师集结在莱芜和济南；周志道的整编八十三师和李振的整编六十五师一八七旅负责清剿鲁中山区；杨干才的整编二十师、刘振三的整编五十九师、余锦源的整编七十二师、王长海的整编七十七师防守兖州、徐州一线，并负责清剿鲁南山区；李良荣的整编二十八师防守临沂以及陇海铁路徐州至海州段。

无法理解蒋介石为什么要将如此规模的兵力集中在国土东部的一个半岛上，尤其是在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已经开始向国民党控制区实施大规模移动作战之后。这种军事上的大规模移动，显示出共产党人在最后时刻不惜放弃解放区的决心，其战争目的已经超越了“保卫解放区每寸土地”的阶段。此刻，全国各个战场上的共产党军队的战争目标已直指国民党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蒋介石依旧固执地认为山东半岛，特别是胶东地区，必须由国民党军队完全占领，那么只能有一种解释，即临海而又富裕的胶东半岛对于共产党人来讲是生死攸关的地方。

胶东地区，指的是山东胶河以东的那片半岛地域。这片深入到渤海与黄海之间的半岛，东、北、南三面环海，呈牛角形，东西约一百

二十公里，南北约九十公里，胶济铁路贯穿其中。半岛的北部是丘陵，南部是开阔的平原，这里人口稠密，物产丰富，河流纵横，交通便利，半岛南部的中间地带是胶州湾出海口。

胶东解放区拥有烟台、掖县、招远、莱阳和海阳等十几个县，这里的十几万民兵是华东野战军最重要的后备兵员。其中的烟台，是当时由共产党人控制的少数几个城市和港口之一，烟台港与仍在苏军控制下的大连港货物往来频繁，共产党人在东北地区组织生产的炮弹、炸药、枪支、药品和布匹等物资，都是通过大连与烟台两港之间的运输转运到内地的。胶东解放区本身还拥有十几处兵工厂和被服厂。这一切都使胶东成为支援华东和华北战场的重要军事供应基地。山东战场上的伤员也大多集中在这里休养，连同后方机关和干部家属，结集在这里的共产党人有五万之多。

“九月攻势”的最终目的是：截断烟台与大连之间的运输线。完全控制胶东半岛，封锁渤海湾，断绝共产党华东野战军的后方供给，断绝华东联系东北与华北的海上通道。

南麻、临朐战役之后，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陈粟大军分成外线和内线两个兵团。外线兵团由陈毅、粟裕指挥，挺进鲁西南，协助刘邓大军的作战。内线兵团由许世友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治委员，指挥第二、第七、第九、第十三共四个纵队，在山东解放区内坚持作战。

国民党军队发动“九月攻势”的时候，内线兵团的四个纵队正处在分散状态：许世友、饶漱石率第九、第十三纵队在掖县、平度、招远一带休整，谭震林率第二、第七纵队和第一纵队的独立师、第四纵队的第十师在胶济线以南的诸城地区休整。

“九月攻势”令山东战场的形势又一次紧张起来。

八月二十三日，陈毅、粟裕致电谭震林、许世友："胶东为我全军军事供应之主要基地，冀鲁豫亦部分供给，如果敌向胶东腹地进犯，对我战争供应影响甚大。因此我东兵团四个纵队及胶东、滨北之地方所有地武应立即紧急行动，齐心协力，单独负起保卫胶东基地光荣任务，以彻底粉碎敌人进攻。"陈毅、粟裕建议：第二、第七、第九及第十三纵队，应立即靠拢于铁路线附近，集中力量，求得先歼敌之薄弱一部，以打开胜利之序幕。

位于胶济路以南地区的谭震林对如何作战有不同看法。谭震林认为，只有通过胶济路以南的作战，才能打破国民党军对胶东的进攻。理由是：胶东的地形难以打歼灭战，现在范汉杰只知道胶东有九纵，二纵和七纵一旦北进就会暴露目标。如果国民党军集中起几个师围过来，就很可能打成正面消耗战。在刚刚结束的南麻、临朐战斗中，二纵、七纵、九纵伤亡很大，损失的都是连排干部和老兵老骨干，战斗力一时难以恢复，因此绝不能再打消耗战了。目前，山东内线部队的作战目的是拖住敌人，而不在于歼灭多少。十三纵如果积极阻击，坚持一个月没有问题。即使丢了胶东，只要主力在，胶东就可以恢复；如果主力严重受损，胶东则难以确保。谭震林主张，由他率领二纵和七纵南下鲁中，打国民党军整编二十八师和整编八十三师，许世友率九纵前来会合，留下十三纵在胶东地区阻击敌人。总之，谭震林不同意在胶东内部作战。

位于胶东内线的许世友和饶漱石也处在困难之中。九纵正忙着补充新兵、恢复建制、鼓舞士气；十三纵刚由地方武装组建，只有一个旅的编制，战斗力未完全形成。因此，饶漱石不同意谭震林的意见，他希望谭震林率第二、第七纵队前来胶东会合，以加强胶东内线的作战实力。

而陈毅和粟裕也坚持认为，必须坚持胶东内线作战。他们在给谭震林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表示，胶东是唯一的军火、医药、电料和各种军需器材的补充地，兵员也比其他地区丰富，如果胶东遭到破坏，对今后的战争进程影响巨大。内线兵团的四个纵队，官兵基本上都是胶东人，眼看着自己的家乡被敌人占领而部队则要南调作战，对士气会产生很大打击。况且，国民党军的整编二十八师和整编八十三师也不是那么好打的，即使攻击取得一定成效也不见得能调动胶东之敌。陈毅、粟裕希望内线兵团集中兵力在胶东内部作战，争取先歼灭冒进的敌整编二十五师一部或大部。战斗过程往最坏处想，即使被敌人封锁，四个纵队近十万人杀出一条血路也不成问题。

二十五日，毛泽东亲自致电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饶漱石、副政治委员黎玉：

饶黎，并告陈粟，刘邓：

敬（二十四日）亥（二十三时）电悉。蒋介石似乎判断我主力必守胶东，企图以四五个师向胶东进攻，吸引我主力进入内线后，即在青岛、平度、掖县线建筑坚固工事加以封锁，以两个师左右守备该线，然后以三四个师向东攻击。彼似希望此计迅速成功，以便抽出两三个师用于他处。目前彼在临沂以北使用了二十个旅，与向大别山对付刘邓之兵力约略相等，而在鲁西南对付陈粟之兵力则甚薄弱，在陕北对付彭习之兵力，自三十六师被歼后已甚感不足［仅有七个机动旅］，在豫西对付我陈赓之兵力则完全没有。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必在胶东方面力求速决，以便抽兵。因此，我们完全同意你们以一部位于内线，以主力［二、七、九纵］位于外线，以利持久之方针。只要许谭率三个纵队位于外线［诸城一带］，寻机打一二个小胜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敌即不敢向胶东深入，胶东大部至少一部可保全。

毛泽东

未（八月）有（二十五日）申（十七时）

据此，许世友的第九纵队必须离开胶东南下了。

但是，连日暴雨，无法行军。

二十九日，中央军委来电，改变了二十五日电报中的作战设想：

饶黎［转震林］，陈粟：

接饶黎二十八日十时电，华东局及九纵被迫留在胶东，震林率二、七两纵在诸城，这样，实际上比饶黎许率九纵到诸城或震林率二、七纵到胶东都要好些。这样，胶东有九纵、十三纵及广大地方部队，可以逐步形成有力的内线作战兵团，直接保卫胶东，可以采取于运动中半歼灭半击溃之作战方针［即对敌一个或二个旅，以歼灭其一部、击溃一部为目标而部署战役作战，注意多打小胜仗］。震林在诸城应完全遵照饶黎指示休整待机，在胶东外线直接配合内线，目前不要南下临沂或陇海。作战时应注意打小规模歼灭战，每次以歼敌一团一旅为目标，不打无把握之仗。

军委

二十九日十二时

这个电报的含义是：许世友的第九、第十三纵队不要南下与谭震林部会合，谭震林的第二、第七纵队也不进入胶东腹地与许世友会合。同时，不同意谭震林部南下打敌整编二十八师或整编八十三师，而是让他们在诸城一线配合胶东内线的作战。

山东内线兵团分兵两处的现状没有得到解决。

这种现状在国民党军重兵压境之时显然不利。

胶东阻击作战就这样开始了。

范汉杰的进攻部署是：以李弥的整编第八师一部固守沙河，主力集结于昌邑、岞山地域担任左翼；阙汉骞的整编五十四师（欠一九八旅）集结于胶县、高密地域，担任右翼；黄百韬的整编二十五师和王凌云的整编第九师为中央突击部队，黄国梁的整编六十四师跟在整编二十五师的后面担负策应；整编五十四师一九八旅控制铁路枢纽蓝村，由范汉杰的兵团指挥部直辖。

国民党军以火炮飞机轰炸开路，地主武装跟在后面一路狂杀。

许世友的第九、第十三纵队不但要面对绝对优势的敌人，而且还身处密不透风的合围之中，无论阻击的决心如何坚定，作战的斗志如何果敢，结局似乎没有悬念。十三纵队是由胶东军区新编第五、第六、第七师组建起来的。三个新编师，组建时间最长的不到七个月，最短的才仅仅十天。纵队、师、团领导尚未配齐，机关不健全，武器装备很差，官兵作战经验不足。九月六日，国民党军三个整编师向平度发起大规模进攻。整编二十五师在火炮和飞机的支援下，猛攻十三纵三十九师一一七团一营和二营的阻击阵地。十三纵官兵陈旧的枪支很多打不响，还没有多少作战经验的胶东子弟用刺刀和手榴弹与敌人顽强对抗。战斗到七日下午，一营和二营的阻击阵地被国民党军突破，十三纵官兵退守平度城关。八日，整编二十五师集中主力向平度城发动攻击，同时以优势兵力猛烈攻击蟠桃山、金花山、紫荆山，平度失守。

与此同时，由十三纵三十八师一一三团坚守的掖县城西阻击阵地丢失。十六日，战况急转直下。整编五十四师一九八旅和整编二十五师的四十旅开始攻击莱阳。十三纵三十九师在莱阳的西、南两面同时阻击，终因兵力火力悬殊阵地很快失守。十八日，黄百韬的整编二十五师占领了胶东解放区的中心城市莱阳。

莱阳失守后，整编第九师进占招远以南的夏甸，整编第八师一六六旅到达夏甸以北四十公里的道头。道头一带是许世友的第九纵队主力集结地域。许世友部已经被逼到了东西仅七十公里、南北不足四十公里的沿海一角，如果道头失守就会被赶下大海。

九月九日，得知国民党军占领诸城之后，位于胶济路以南的第二、第七纵队发动了攻击诸城的作战。谭震林决定乘敌未稳发动反击，以调动胶东内线的敌人，配合许世友在胶济路以北的作战。当天

午夜，二纵五师十三团分两路突击东门，在连续爆破之后占领了门楼，接着三个营全部投入战斗向城内发展。十日拂晓，七纵十九师占领了西关，二十一师占领了南门外的村庄。中午，二纵和七纵队已经控制了诸城东、西、北三面的城楼。国民党守军整编六十四师一五六旅旅长困守在核心工事里不断地向师长黄国梁呼救，黄国梁亲率一三一、一五九旅由高密南下解围。谭震林命令二纵六师前去阻击，但敌增援部队行动迅速，在六师尚未到达时就已越过了六师预定的阻击地。十一日拂晓，二纵和七纵主力已经占领诸城城内的大部分阵地，并接近了一五六旅指挥部。眼看战斗就要取得最后的成功，但由于攻城部队没有及时向上级报告，不清楚城内战斗进展的谭震林认为敌人的增援部队马上达到，城内的攻坚作战又一时结束不了，于是下令放弃攻击部队撤退。

谭震林部的作战没能调动胶东的敌人，被压缩在海边的许世友必须突围自救。突围只剩了一个方向，就是与大海相反的道头方向。许世友决定，以十三纵阻击国民党军整编第九师，以九纵实施反击作战。九纵二十五师和二十七师担负反击任务。十八日，二十七师八十一团控制了道头以北的三个村庄，将整编第八师一六六旅四九八团一营分割并展开围攻。村庄里的国民党军凶猛突围，双方在旷野之中展开混战，午夜时分国民党军的这个营基本被歼。与此同时，八十团控制了道头以东的村庄，协同担任主攻的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二十七师七十九团一起向道头发动攻击。国民党守军武器精良，火力猛烈，但无法阻挡九纵官兵的决死一战。道头外围很快被突破，守军设置在西门阁楼上的重机枪阵地连同阁楼一起被炸毁。凌晨，四九八团团长亲自提枪督战，团督战队据守着每一个路口，战况开始残酷起来。九纵官兵对道头外围唯一的制高点反复攻击未果，天色将明，再战不利，二十五师师长聂凤智下令撤离。

与诸城的战斗一样，许世友部对道头的攻击也没有达到全歼守军的目的。不同的是，道头一战令国民党军整编第八师向后收缩了阵地，这使得它与整编第九师之间的距离被突然拉大了。这是许世友部突围的最后时机——部队处在敌人重兵合围中，身边还有五万多伤员与干部家属，大批的胶东百姓为躲避国民党军跟在部队的后面，这一切都令许世友无法组织机动作战。他决定向敌人两军之间稍纵即逝的缝隙迅速插进去。二十二日黎明，先头部队将遭遇的整编第九师侧翼部队击溃，九纵二十六师顽强地阻击尾追的敌人，华东局和内线兵团机关人员及主力部队官兵一昼夜行军一百八十里，终于进入大泽山区。

国民党军继续向胶东半岛的尖角压缩：二十六日占领龙口，三十日占领蓬莱，接着，共产党人控制的唯一港口城市烟台被占领。范汉杰的胶东兵团以伤亡近一万五千人的代价，先后占领了胶县、高密、平度、昌邑、掖县、荣城、栖霞、招远、龙口、黄县、蓬莱、福山、烟台、牟平、诸城等十五座城镇。至此，共产党人失去了胶东解放区的大部分地区——从全局而言，这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饶漱石、许世友和黎玉联名致电中央军委，报告他们撤离胶东、转移敌后的理由："内线已坚持三个星期，为减少尔后作战困难，决向敌后转移。今晚敌已发觉我主力一部转出，飞机不断在上空搜索轰炸，估计敌人除有一部分迅速占领我海口城市外，另一部分将西返尾追，造成我愈集中敌愈分散，便利歼敌局面并逼敌无法深入农村，可减少我损失。逼敌无法从胶东抽兵，加重其他地区压力。在我主力转到敌后，尚留十三纵三十七师并配合地武四个团坚持斗争，掩护疏散。我们电谭率二、七纵到路北与我们会合，以便集中歼敌。为不使我们位置暴露，我们电台全部暂时停止工作数日……"

九月十六日，中央军委致电陈毅、粟裕、饶漱石、黎玉、许世友、谭震林，要求必须坚持在胶东，不求他们打胜仗，“只要不打败仗就好”，并反复强调“一个月至多两个月，局势就会变化”：

我们认为震林所率二、七两纵目前不宜离开滨海，只要该区有粮食，就应留在该区打些小胜仗，即使一二月不打胜仗，只要不打败仗就好。如地区狭小，不便集中行动，则以纵队或旅为单位，暂时分散在诸城、莒县、沂水、临朐、日照等县广大乡村也有利，一可钳制八十三师、二十八师、四十五师等部，二可策应胶东内线。大约坚持一个月至多两个月，局势就会变化。如二、七纵出鲁南或苏北，则八十三师、二十八师等部必跟去，亦不见得容易歼灭，对于胶东则减少直接配合作用。胶东方面敌至多使用十二个旅进攻，而在占领平度、掖县、莱阳、龙口、招远、蓬莱、黄县诸城，留出大量守备兵力之后，其机动兵力就不多了，利于我军各个歼敌。一个月后，敌有很大可能调走一部兵力，故该方面只要我军不打败仗，局势亦可能好转。

接到电报后，谭震林率领第二、第七纵队开始北上，向许世友部接近。许世友的第九、第十三纵队在大泽山停留四天后，留十三纵继续与国民党军周旋，九纵在胶河与潍河之间南下。十月一日，山东内线兵团的第二、第七、第九纵队终于在胶济路以北的朱阳会合。

范汉杰发现山东内线兵团主力向西跳出了包围圈，立即命令整编第九师尾追九纵和十三纵队深入大泽山区，整编六十四师（欠防守诸城的一五六旅）由高密向北阻截。

谭震林和许世友决定集中主力打上一仗，以扭转被动局面。作战计划是：以二纵和九纵攻击脱离高密、孤军北进的整编六十四师于胶河西岸的饮马镇地区，以调动胶东的国民党军回援，减轻胶东解放区的损失；同时，以七纵和独立师等部担任阻援；十三纵由大泽山向北攻击掖县，策应主力在胶河的作战。

十月二日，整编六十四师主力进至范家集、流河一带，先头部队到达了预定战场饮马镇。由于情报有误，谭震林和许世友误把先头部队当作了整编六十四师主力，于是命令部队全线出击。整编六十四师先头部队受到攻击后，师主力急忙收缩，在范家集、三户山地区构筑

工事，准备固守待援。二纵和九纵队没能实现分割敌人主力的目的，但是当晚他们就把整编六十四师主力围住了。

三日夜，二纵对三户山发动了攻击。由于缺乏攻击子母碉堡的经验，火力使用不够集中，在伤亡严重的情况下撤出了战斗。四日，二纵再次发起攻击，官兵们冒着敌机的轰炸冲锋，在九纵的配合下，最终突破了守军的防御工事，于五日拂晓攻占三户山，歼灭整编六十四师一五九旅的一个团，为后续部队攻击师部所在地范家集夺取了有利阵地。

五日下午，九纵攻击范家集，二纵攻击西侧的林家庄。二纵在几百米的攻击正面集中起五个迫击炮连、一个重迫击炮连以及多门山炮，进行集中火力压制，战斗至午夜，驻守林家庄的整编六十四师四七五团被全歼。九纵对范家集的攻击虽然进展缓慢，但昼夜持续不断，被困范家集的整编六十四师师长黄国梁向范汉杰紧急呼救。但是，范汉杰派出的三路援军都受到了猛烈阻击。整编第九师在东面发动了轮番进攻，战斗持续到十月九日，依旧无法突破当面的阻击阵地。整编四十五师二一二旅和整编六十四师一五六旅，在南面沿着五龙河两岸向范家集方向攻击前进，遭到七纵主力和独立师一个团的顽强阻击。整编四十五师的二一一旅，从西面由潍县东渡潍河增援三户山，由于奉命阻击的西海军分区部队没有按时占领阻击阵地，二一一旅得以渡过潍河占领山阳庄地区，对许世友和谭震林部的侧背形成巨大威胁。情急之下，许世友和谭震林果断改变了攻击范家集的计划，调二纵主力立即向西迎击。战斗由此变成了围点打援。从战场态势上看，只要九纵把整编六十四师围紧，东、南两个方向的阻击坚决，从西面来的敌二一一旅兵力单薄，二纵主力完全有将其一口吃掉的把握。

为了彻底歼灭二一一旅，韦国清的二纵制定了一个一网打尽的作战计划：四师和五师一部攻击青龙山，由北向南和东南攻击；六师以奔袭的方式迂回到二一一旅的背后，攻占潍河东岸的二八八高地，控制潍河渡口，对二一一旅实施合围。六师十八团的先头部队抓到了二一一旅搜索排长，十八团团长沙风从俘虏口中弄清了二八八高地的基本情况：高地位于范家集以西十八公里的潍河东岸，俯瞰山阳庄和潍河渡口。高地上的守军是一个连，还有一个排控制着渡口。十八团二营急速行军，于凌晨四时到达高地南侧，秘密接敌之后猛打猛冲，一举攻占高地并控制了渡口。二一一旅的后路因此被截断。二一一旅得知后路被断，立即组织突围。负责正面攻击的十六团相继突破外围阵地，国民党守军反击猛烈，十六团团长孙云汉果断决定一、二、三营合力直捣守军旅部。十六团官兵分成小组，运用小炸药包的威力，边爆破边推进。入夜，经过两个多小时逐房逐屋的争夺，十六团攻占了二一一旅旅部所在的西圩子。二一一旅残敌在最后时刻向西北和西南两个方向突围，分别被六师十八团，四师十、十一、十二团分割歼灭。十八团的一名战士从一堆尸体的下面俘虏了二一一旅旅长张忠中。

二一一旅七千多人马，除三百多人在援军的接应下逃回潍县，其余伤亡三千人，被俘四千多人。

此时，在胶东解放区内部抗击国民党军的任务全部落在了十三纵身上。胶河战役开始后，十三纵主力奉命攻击掖县，这是这支由翻身农民组成的部队第一次打县城攻坚战。

十三纵联络了当地的民兵组织，民兵们得知要收复掖县，爆破队和地雷队纷纷集中起来，把国民党军埋设在十三纵攻击路线上的地雷挖出来，再埋到敌人的地盘里去。民兵们还和十三纵的侦察员一起，

化装进城侦察守军的防御部署，民兵们只有一个要求：把残害百姓的地主还乡团全部抓起来。

十月三日凌晨，第二纵队对三户山发动攻击的那天，十三纵对掖县的攻击同时开始了。巨大的爆炸声将掖县守军惊醒，等他们冲上阵地的时候，发现城防已经被炸开了三个大缺口。率先突进去的是一〇九团二营，官兵们沿着东门大街向钟鼓楼攻击前进。一一〇团突破后，沿着城墙攻击北城楼。一一四团一营沿着城墙向南发展，三营直插西门。一一一团除留一个营在城西北的烟潍公路上警戒之外，主力也冲进了北门和西门。国民党守军在核心阵地组织起猛烈的抵抗。十三纵各团从不同的方向开始逐屋争夺，激烈的战斗在不断的伤亡中向前推进。四日上午十时总攻开始，战至下午六时，掖县城区里的两百多个碉堡全部被摧毁，守军团长刘其凡和副团长杨子明等被俘。

范汉杰急调胶东地区整编第八师和整编五十四师昼夜兼程回援。

十三纵撤离掖县，收兵转移，决定到栖霞以南地区休整。

胶河战役令共产党人在胶东面临的危机得到了极大的缓解。

然而，蒋介石也认为胶东战局说明国民党军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十月十九日，蒋介石带领国民党军联合后勤总司令部副总司令黄维、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和第三厅厅长罗泽闿到达青岛，召集了“胶东军事检讨会议”。会上，蒋介石连续发表了题为《剿匪军事之新阶段与新认识》和《范家集战役之讲评与国军今后应注意之事项》的讲话，讲话中充满了不知从何而来的乐观情绪：

……这次胶东半岛的作战，可以说是我们国军第一次大规模作战，参加战场的有陆军、空军和海军……在整个剿匪战事中有极其重大的价值，占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三个月零六天的时间，可以说是国家转危为安，革命事业转败为胜的关键……是决定我们剿匪胜利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我们剿匪的军事亦随之而告一段落，从明天（十月二十一日）开始，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

蒋介石认为，他亲自制定的三个战略目标：占领延安、占领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和封锁共产党军队海上交通，现在都已实现了。他之所以强调“我们剿匪的军事亦随之而告一段落”，是准备将整编第九师空运徐州或石家庄；将整编二十五师从烟台海运至大别山。因为此时共产党三路军队进军中原已造成中原地区国民党军兵力匮乏。为此，范汉杰拟定了胶东地区的全面防御部署：整编第八师守备烟台、蓬莱和龙口；整编五十四师一九八旅守备平度，并以一个团加强莱阳；整编六十四师在蓝村和马山一带休整待命；整编四十五师退回潍县地区。

这就是胶东解放区最困难的时候，毛泽东曾经强调：“大约坚持一个月至多两个月，局势就会变化。”毛泽东的预想正在成为现实：在刘邓、陈粟和陈谢三路大军主力跳到外线作战的同时，留在解放区内部的部队只要顽强坚持，把国民党军的主力吸引牵制住，当国民党军不得不撤出解放区回援外线战场的时候，他们的被动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共产党军队在战争全局上赢得主动权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到来了。毛泽东甚至电示谭震林和许世友，要求他们不要急于回到内线去，因为他们的任务是把蒋介石准备调出山东的部队尽可能拖住。毛泽东特别指出，对于守备胶东的敌军不要忙着去打，而准备调走的整编第九师和整编二十五、六十四师应该成为首要打击对象。

谭震林和许世友决定先打那个准备空运徐州或石家庄的整编第九师。这实际上是一场追击战，即使没有力量将整编第九师包围歼灭，也要尽可能消耗其实力，拖延其时间。十一月六日，整编第九师到达朱阳镇地区。由于侦察有误，谭震林和许世友将整编第九师运送棉衣的两个团当成了师主力，七纵和九纵贸然出击，不但没有将敌人分割，反而导致了整编第九师有组织地开设了防御阵地。十一日，在整编六十四师的接应下，整编第九师掉头东返，开始向胶县方向撤退。谭震林和许世友紧追不舍，在命令二纵围攻高密的同时，七纵和九纵

沿胶济线紧紧地跟着整编第九师。二十六日，二纵一鼓作气把高密打了下来，因为整编第九师迅速收缩，七纵和九纵顺势收复了胶县。

这时候，担任牵制任务的十三纵在胶东海阳地区包围了整编五十四师的主力。消息传来，范汉杰立即命令该师位于平度的一九八旅增援。谭震林和许世友认为机不可失，决定不再追击整编第九师，转而攻击孤立的一九八旅。二十四日，一九八旅被九纵包围。范汉杰又调整编第九师的五十七旅和七十六旅增援，结果七纵一部将五十七旅阻击在灵山，另一部将七十六旅包围于南阡。范汉杰见海阳之围未解，又有两个旅被围，急调在蓝村、马山一带的整编六十四师增援，同时将整编第八师四十二旅的三个团由烟台海运至青岛。在敌人重兵云集的情况下，谭震林和许世友将主力撤到莱阳以南。

国民党军整编第九师最终也没能被空运至徐州或石家庄。十一月底，这个师和整编二十五师一起，通过海运到达上海，再从上海被转运到中原。

谭震林部和许世友部以伤亡五千的代价，严重迟滞了国民党军向中原的调动，迫使占领胶东地区的国民党军孤守着青岛、滨海、莱阳、即墨、烟台、福山、蓬莱和龙口等据点，这些据点沿海岸线分布成狭长的一线，其中只有莱阳处在胶东解放区的腹地，谭震林和许世友决定把两个多月前丢失的莱阳夺回来。

十二月四日，七纵对莱阳城发动了攻击。当晚，二十师攻下南关，二十一师控制了东关，十九师控制了西关大部。第二天，莱阳城内的国民党守军发起全面反击。攻城部队在城墙下开始进行坑道作业，由于不断受到炮火袭击，部队出现较大的伤亡。

范汉杰立即对莱阳实施增援。但是，整编六十四师的两个旅、整编五十四师的一个旅、整编第九师的一个旅均被二纵阻击于水头沟以

南。

九日凌晨，攻城战开始。二十师利用坑道破城未成，官兵随即强行登城。六十团率先于南门附近突破。中午，二十师占领守敌的榴弹炮阵地，十九师占领了山炮阵地，五十七团冲进北门向南发展，守军退缩至城隍庙核心阵地。城隍庙核心阵地工事复杂、堡垒坚固、火力凶猛、粮弹充足。七纵久攻不下，国民党援军逐渐接近。中央军委电示，如没有攻克的把握，应放弃攻击改为打援。但是，谭震林和许世友决心已下，一定要收复这座城池，不然无颜见解放区父老。他们决定由熟悉莱阳城的十三纵三十七师接替七纵继续攻击。此时，三十七师距莱阳城二十多公里，在师长高锐的率领下，官兵多为胶东子弟的三十七师迅速开进，一鼓作气冲进莱阳城，接着就发起了攻击。一一一团爆破组把城隍庙围墙炸开了缺口，突击队蜂拥而上。接着，一〇九团在南面、一一〇团在西南角先后突破。莱阳城被收复。

在收复胶东的作战中，解放区的农民倾注了巨大的战斗热情。他们筹集起大量的粮草，冒着炮火，送到山东兵团的阵地上。掖县上万民工在七天之内向前线运送了七百多万斤小麦，平度县的百姓在几天之内就筹集了八十多万斤面粉和一千多万斤柴草。潍北县张氏村的农民得知部队急需柴火，而方圆几十里的树木都已被国民党军队砍去修建工事了，村长王日光和村里的老人们商量的结果是，只有砍自己家两块老墓地里的树了。张家本族墓地里长的松柏在潍北和潍南一带十分著名，树木的树龄都在百年以上，人称“张氏松”。在老人们的支持下，村长召集全村开会，参加会议的千名农民都同意把松树献出来。砍树时的气氛十分悲壮，墓地里香火缭绕，全村男女老少跪倒拜了祖先之后，刀砍斧劈之声彻夜不绝。天亮的时候，上千方木材装上大车，浩浩荡荡地运往了前线。

从战争全局上看，山东位于战场的右翼，陕北位于战场的左翼。

左右两翼牵制，皆是为了中原。

因此，就整个战争的演变而言，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国民党军在陕北与山东同时进行的艰苦作战，绝不仅仅为了半岛之争。

没有人知道蒋介石是否看出了这一点。

## 朗照边区胜利花

晋察冀军区所处的位置，是当时全国战场的中间地带。东是陈毅、粟裕的山东战区，西是彭德怀、习仲勋的陕北战区，北是林彪、罗荣桓的东北战区，南是刘伯承、邓小平立足的大别山战区。至少在一九四七年夏秋，相对于国共两军在各个战区进行的大规模战斗而言，这个中间地带显得有些平静。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一日的小河会议上，周恩来就战区歼敌成绩排了个队：华东、晋冀鲁豫、东北、晋绥、陕甘宁和晋察冀。

这次排队对晋察冀军区来讲很丢面子。

聂荣臻在总结内战爆发一年以来晋察冀军区作战不理想的原因时说："军事指导上犯了一些错误，执行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运动战的方针不够大胆。那时有一种保守性，'怕失地盘'……在这样的思想下，主动性不足，集中主力主动进攻敌人，大量歼灭敌人，这种指导思想不明确，因而运动战的思想就不能很好贯彻。这使得我们的自卫战争，在这一年中胜利是很不足的……比起晋冀鲁豫等友邻区来，我们还是落后的。"

之前，中共中央决定重组晋察冀野战军指挥机构：杨得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第一政治委员，杨成武任第二政治委员，耿飚任参谋长，潘自力任政治部主任。野战军下辖第二纵队，司令员陈正湘、政

治委员李志民；第三纵队，司令员郑维山、政治委员胡耀邦；第四纵队，司令员曾思玉、政治委员王昭。同时还成立了由野炮、山炮和迫击炮三个团合编成的炮兵旅。

晋察冀军区二级军区也做了调整：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政治委员林铁，辖四个军分区和三个独立旅；冀晋军区，司令员唐延杰、政治委员王平，辖四个军分区和两个独立旅；察哈尔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兼），政治委员刘杰，辖三个军分区和一个独立旅。

新组建的晋察冀野战军面对着两个对手：一个是保定绥靖公署孙连仲集团，拥有四个军以及整编六十二师和青年军二〇八师，主要分布在北平、天津和保定的三角地区；另一个是张垣绥靖公署傅作义集团，拥有八个师又四个旅，主要分布在平绥铁路沿线。国民党军的作战要点是：重点守备北平和天津，对平、津、保三角地带主动出击。以保定绥靖公署的主力编成机动兵团，利用铁路和公路机动作战。罗历戎的第三军守备石家庄。

晋察冀野战军决心打个翻身仗改变排名最后的现状。

只是，翻身仗不是那么容易打的。

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耿飚等人经过反复研究，于八月十九日向中央军委上报了两种作战方案，中央军委回电同意其中的一种，即以三纵攻击北平西南方向的涞水、涿县和定兴，调动敌人主力西援；二纵和四纵进至保定东南的任丘以南地区待机，待敌人调动后，进至大清河地域歼敌。针对野战军官兵因急于歼敌而略显浮躁的情绪，朱德和刘少奇专门打电报给杨得志，嘱咐要有作战不利的思想准备，还要具备足够的耐心：“部队行军宿营都要紧缩、灵敏，避免笨重累赘，善于利用群众掩护及地形熟悉的条件，即能寻求在运动中突然袭击或打埋伏的好机会，去消灭敌人。如多次布置无效亦不必灰心，

下级亦不宜说怪话，能长此灵活运用，一年内能一二次收效亦可算成功，或可大量歼灭敌人。”

领受作战任务后，三纵司令员郑维山和政治委员胡耀邦决定：奔袭平汉路上徐水至保定间的国民党军的两个营，得手后破坏这段铁路，调动国民党军主力西援。如果不能调动敌人，就直接向北攻击涞水县城，为主力创造打援的战机。

九月二日，三纵急促行军七十里奔袭徐水至保定间，结果除攻克保定北面的漕河以及附近的几个小堡垒外，其他的攻击行动均未能取得进展，部队只好按预定计划向北攻击涞水县城。六日，郑维山率第八、第九两个旅抵进涞水城，当晚就发动了攻击。涞水城是国民党军平、津、保三角防御体系西翼的重点警戒据点，也是平汉铁路保定以北的一个护路要点。守军为第九十四军五师十三团。十三团装备好、火力强；涞水城防工事坚固，城西又有拒马河之阻，易守难攻。八旅和九旅打了一个晚上，只占领了县城外围的两个据点。一天之后再次组织攻击，也只占领了县城的东南两关。

但是，对涞水的攻击调动了敌人。第九十四军四十三师已抵达涞水以东的高碑店，五师十五团和一二一师三六一团开始向涞水增援。同时，第十三军四师、第十六军二十二师奉命集结于平汉路北段准备增援，第十六军一〇九师也有增援的迹象。此时，三纵七旅奉命在拒马河东岸的南、北义安村之间守河上的便桥，以保障第八、第九两旅对涞水的攻击。七旅的行动出现重大疏漏，他们只对北义安村进行了防御，南义安村被国民党军顺利占领，拒马河便桥因此失去控制，导致国民党军增援部队蜂拥而来。二十四日，三纵被迫撤离战场。

涞水之战正打得别扭的时候，位于大清河以北的国民党军第十六军九十四师兵分两路渡河增援，晋察冀野战军认为战机已至，遂决定吃掉该敌收复大清河以北地区。但是，当第二、第四纵队主力渡过大

清河后，发现情报有误，当面只有九十四师的一部位于昝岗和板家窝。而国民党军第十六军二十二师主力到达霸县之后，在雄县和开口各前出了一个营，于是野战军指挥部决定改打这几处孤立之敌。敌人看似好打，攻击却均以失利告终。二纵虽一度突进了板家窝，但暴雨猛烈，攻击受阻。再攻击时，守军已经压缩，组织起严密的防御线。四纵对昝岗的突击也因暴雨一度中断，后来又发动数次攻击，终因守军工事坚固、火力猛烈被迫终止。

晋察冀野战军出击涞水和大清河的战斗得不偿失。

战后统计，歼敌五千二百七十八人，部队伤亡高达六千七百七十八人。

国民党军增援涞水的各路部队逐渐靠近，二十多个团在大清河北岸摆出了决战的架势，而晋察冀野战军第二、第四纵队总计才十八个团，加上冀中军区的五个团，兵力上并不占据优势，武器装备上更处于劣势。为了避免被动，二纵和四纵队全部撤离了战场。

聂荣臻和杨得志都向中央军委发出了检讨电报。聂荣臻认为，战斗失利的原因是“决心太厚，包围敌人过多，兵力分散，不能速战速决”。杨得志认为，主要原因是战前侦察和搜集情报不够，对敌人工事的坚固和火力的猛烈估计不足。朱德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他准备亲自去野战军指挥部指导作战——“大清河北战役因围敌过多，不能最后解决……但此次士气旺盛，干部之有牺牲精神，较以前不同。罗（罗瑞卿）因病未去，聂（聂荣臻）初离开，杨（杨得志）、杨（杨成武）初出马，未获大胜，后方干部难免浮言。朱拟去野战军一时期，随同杨、杨等打一两个好仗，将野战军竖立起来。”

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回电晋察冀野战军，显示出极大的宽容，甚至嘱咐他们不必顾及配合全国战局的问题：“此次大清河战役，

歼敌一部，虽未获大胜，战斗精神极好，伤亡较多并不要紧。休整若干天，按照该区具体条件部署新作战，只要有胜利，无论大小，都是好的。一切按自己条件独立部署作战或休整，不要顾虑东北或别区配合问题。”

秋日的华北平原一片金黄。

杨得志、杨成武和耿飚日夜寻找着可能出现的战机。

此刻，林彪已在东北发动秋季攻势。为增援东北战场，蒋介石先后抽调第九十二军二十一师、第十三军五十四师、第九十四军四十三师等部队出关增援，国民党军在华北战场因而显出兵力空虚之势。为此，蒋介石全面调整了华北战区的兵力部署，以防备晋察冀野战军乘虚而入：第十六军驻守大清河以北的雄县、定兴、涞水；第九十四军五师驻守北河店、固城和徐水；新编第二军的两个师驻守保定。这一部署表明，除主力第三军继续镇守石家庄之外，国民党军位于晋察冀战场的部队将全部移动到保定以北的铁路沿线，以确保华北乃至东北铁路线的畅通。

经过反复研究，晋察冀野战军决定再次出击保北。

出击保北的作战意图依旧是调动敌人准备打援：二纵配属独立第七旅围攻徐水，破坏徐水至徐河桥之间的铁路，扫清沿线敌人的碉堡，诱使国民党军出动增援；三纵和四纵在徐水以北和以东地区集结，准备在运动中歼灭可能从北、东两面出动的援军；独立第八旅负责监视石家庄方向的第三军。

所谓“保北”，指的是涿州到徐水的那段铁路线。晋察冀部队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攻击这里，是因为这一地段对于国民党方面十分敏感——驻华北的国民党军大都分布在平汉铁路沿线，晋察冀部队的

作战目的，很大程度上是要在华北牵制国民党军，以配合林彪部在东北的作战。而保北地区是国民党军调兵出关的主要集结转运地，一旦位于保定与北平之间的徐水受攻，国民党军绝不会见死不救，否则徐水失守将导致平汉铁路线中断。

关键是，对徐水的攻击一定要狠，否则无法调动敌人增援。增援的敌人可能来自两个方向：一是徐水以南的保定，一是徐水以北或东北的固城和容城。当然，如果能够把驻守石家庄的第三军调出来加以伏击则更理想，这样不但能够打击国民党军在华北的主力部队，还能使孤立的石家庄防御更加薄弱，为今后攻打石家庄创造条件。虽然从目前的态势上看很难调动第三军，但关键还是对徐水的攻击是否坚决。

就在晋察冀野战军决意再战保北时，十月六日，蒋介石来到北平召集华北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副主任王叔铭，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张垣绥靖公署主任傅作义以及各军军长、各师师长共四十多人。本来是研究作战的会议，但军长和师长们在报告情况时却纷纷诉苦，强调本部队粮食和被服供应所面临的困难。此时，在华北地区，国民党军各部队基本上都驻扎在被解放区包围的孤立城市里，除了靠运输接济外，供给似乎别无办法。蒋介石提出要节制使用配发的物资："对于本地的粮食和物资要能切实控制"；同时，他暗示可以到解放区里去抢："对于附近二三百里匪区内的粮食，亦要派军队去搜集"，"第三军现在驻石家庄，四面为匪军所包围，交通阻绝，真是孤军远戍，试问中央有什么办法来接济你们"？会议最终也没能针对华北共产党军队可能发动的攻击制定出有效的军事对策。

徐水守军，是国民党军第九十四军第五师的一个团和一些地方保安队，配有一个榴弹炮营。徐水城防经过多年修筑，防御工事十分完

备，城墙上有碉堡，墙腰上还有三层射击孔，城角筑有地堡，形成了以城内钟楼为核心的严密的火力体系。在城墙防御线的外围，宽七米、深六米的护城河里灌满了水，护城河前设置有铁丝网和大量的地雷。

十月十一日，二纵在司令员陈正湘和政治委员李志民的指挥下，迅速清扫外围据点后直逼徐水城下。十三日下午四时，攻城战斗打响。二纵官兵深知攻击力度对整个战局的影响，因此战斗一开始就显示出誓夺徐水的凶狠阵势。猛烈的炮火轰击后，各路爆破组蜂拥而上，徐水城四面城墙顿时弹片横飞，硝烟弥漫。机枪集中火力掩护云梯队强行架梯，巨大的云梯被运送到城墙下，城墙上的子弹、手榴弹和砖瓦石块雨点般倾泻下来，城下的机枪手拼命地射击，力图把城墙上的火力压制下去。在不断的流血伤亡中，巨大的云梯竖立起来，转眼间云梯上便爬满了强行登城的官兵。城墙上的国民党守军用持续而猛烈的火力将云梯打断，上面的二纵官兵们落叶般纷纷跌下。已经登上去的部队是十团一营，他们没有站稳就遭到敌人的猛烈反击，后续部队没能跟上，一营在城墙上殊死搏斗，最后全部伤亡。入夜，修好的云梯被再次竖起来，直至拂晓，攻击部队终于攻占了南关和北关。第五旅的三个突击连甚至一度冲进入城内，但由于第二梯队受到火力压制，得不到后续支援的三个连被国民党守军打了回来。

二纵对徐水不惜牺牲、意在必夺的反复攻击，令国民党军意识到再不增援徐水就完了。孙连仲命令整编第二十八军军长李文率第九十四军的两个师和独立九十五师各一部共六个团，在战车第三团的配合下，由高碑店、定兴，经固城南下；第十六军的两个师共四个团从新城、霸县出发，向西经容城增援。

晋察冀野战军三纵、四纵和独立第七旅等部队奉命立即插入固城与徐水之间拦截。命令要求无论飞机大炮的火力如何凶猛，各部队必

须死守阵地一步不退。

李文深知他的部队必须紧密靠拢，绝不能孤军冒进，更不能让晋察冀野战军寻找到分割他的缝隙。为此，他宁愿与阻击的共产党军队打成僵持也不分兵。而这时，二纵对徐水的攻击举步维艰，伤亡不断增加，国民党守军表现出固守待援的极大的耐心和决心。

攻击和阻援都处在了僵持状态，这种状态拖延下去对晋察冀部队极其不利。晋察冀野战军迅速调整部署，决定二纵继续围攻徐水，主力则立即向平汉路以西地区转移，引诱北路援敌西进，迫使敌人分散兵力。野战军指挥机关当时位于徐水至保定以东白洋淀附近的东西马庄一带。机关人员在政治部主任潘自力的率领下跟随主力部队先行出发了。杨得志、杨成武和耿飚带着几个作战参谋和警卫员随后上路。

离开东西马庄不一会儿，就听见身后有人大喊："首长停一下！首长停一下！"气喘吁吁的骑兵通信员送来一封电报，电报是正在完县参加土地会议的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发来的："石门（石家庄）敌七师并六十六团由罗历戎率领于昨（十六日）晚渡河北进，当晚停止于正定东北之蒲城一带。今（十七日）续北进，上午在拐弯铺一带休息。"——野战军负责情报工作的二局局长彭富九截获了孙连仲发给罗历戎的电报，电报要求第三军派一师北上保定，另一师留守石家庄。

这一消息令杨得志、杨成武和耿飚先是大吃一惊，接着便是喜出望外——想把罗历戎的第三军从石家庄调出来，原来只是一个奢望，现在突然变成了现实，而这意味着整个战局也许会发生重大变化。

第三军在国民党军中算是老牌部队，其前身可追溯到一九一五年护国战争时驻粤滇军序列。一九二五年八月该部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朱培德任军长。从那时起，无论国民党军的编制序列如何变

化，第三军始终保持着北伐时的番号，这在国民党军中独一无二。抗战爆发后，第三军参加晋南中条山会战，坚守阵地，遭遇日军重兵包围。在惨烈的突围战中，第三军军长唐淮源、十二师师长寸性奇相继阵亡。至突围战结束，第三军十二师官兵无一生还，第七师官兵只有少部分突围出去。一九四五年八月，重组后的第三军十二师留守甘肃兰州，军部率第七师开赴石家庄。

罗历戎，四川渠县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二期。从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当见习排长开始，他就是胡宗南的部下，因此也是蒋介石嫡系军官中的一员，参加过蒋桂大战、蒋冯战争、中原大战。一九三五年十月，他在胡宗南的第一军七十八师任副师长，曾与长征后到达甘肃山城堡的红军激战。抗战爆发后，他跟随胡宗南参加淞沪会战，当淞沪守军在日军炮火与飞机的猛烈轰炸下，因伤亡惨重而全线撤退后，他率七十八师在无锡苦战三天三夜不退，将从金山登陆后一路向北的日军击退。一九三九年升任第一军副军长，一九四二年升任第三十六军军长，一九四五年一月升任第三军中将军长。

第三军驻防石家庄后，罗历戎的日子很不好过。周围的县城已被一一攻占，他被迫放弃了石家庄外围据点，收缩部队固守市区和机场，准备应付聂荣臻部对他的最后一击。部队开赴石家庄前，他曾向胡宗南请求补充装备，胡宗南回答道：“武器装备要重庆运来，时间不许可，目前不会有什么大战事。你们到华北有了海口，一切补充均无问题，有的是美械装备。主要的是争取时间，行动越快越好。”但是，当罗历戎的部队在石家庄集结完毕时，却归属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指挥了。石家庄已经成为一座孤城，四周都是华北解放区的地盘，罗历戎曾请求孙连仲派兵增援，但由于国民党军在华北的总兵力已经捉襟见肘，孙连仲对罗历戎说，现在全国各个战场都吃紧，没有多余的兵力支援石家庄，只能再加强一个团，剩下的事就只有靠你自己了。罗历戎又向他的老上级胡宗南求救，胡宗南的部队深陷于陕北战

场且至今没能寻到毛泽东，他回电罗历戎："增加兵力就近向北平请求，石家庄现有一军兵力和加强工事，防守应有把握，否则只有毁灭。"罗历戎真正成了左右无援的孤军，当石家庄最后一个外围据点正定被晋察冀军区部队攻克后，他产生了离开石家庄到保定去的想法。

十月初，在北平参加华北军事会议时，罗历戎特意面见蒋介石，陈述了石家庄守军粮食弹药补给的困难，建议减少石家庄的守备兵力，加强机动兵团的力量——罗历戎知道此时蒋介石正为缺少机动兵力而发愁。蒋介石说："石家庄应该固守，可将第三军抽调一个师到保定，加强机动部队。"罗历戎想到孤守石家庄无异于坐等攻击，于是自告奋勇地表示他可以亲率部队北上。蒋介石当即批准了。

几天之后，共产党军队攻击徐水，孙连仲命令第三军北上保定增援，罗历戎所盼望的离开石家庄的机会终于来了。

除留三十二师固守石家庄外，第七师与二十二师六十六团以及军直属队均被命令北上保定。罗历戎知道，在这种时候，他率部离开石家庄不是没有危险性。因为从石家庄到保定，虽然只有一百八十公里的路程，但必须通过解放区。孙连仲建议用空运的方式运兵，被罗历戎拒绝了，不是他胆子大，而是他想到了部队到达保定以后的日子——空运可以把部队连同自己安全地运走，但不可能把营具辎重全部带走。到了保定，部队要什么没什么，找谁去解决？罗历戎侥幸地认为，从石家庄到保定的路上，也许会遭到民兵甚至是解放区老百姓的袭扰，好在晋察冀野战军主力此刻正在保定北面作战，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跑到他跟前来，他的大部队一路扫荡，安全地到达保定应该没有问题。

谨慎的罗历戎严密封锁了部队出动的消息，一时间整个石家庄城只准进不准出。十月十五日下午，第三军出动了，所有的营具都被装上大车，连私人的箱笼也被全部带上，仅牲口大车就装载了两百多

辆。罗历戎的保密工作起到了效果，第三军浩浩荡荡的队伍离开石家庄整整一天之后，聂荣臻才得到了有关情报。罗历戎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本想离开晋察冀野战军必定要集中全力攻击的石家庄，转移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带去，结果却是他的出动不但使第三军这支历史悠久的部队遭遇灭顶之灾，而且他个人的后半生也将彻底改变。

在空旷的乡村土道边，杨得志、杨成武和耿飚三个人蹲在地上看地图。他们心里很清楚，这一仗要是打好了，与国民党军在这一地区的对峙局面就可以打破，一再面临失利局面的野战军就会因此"竖立起来"。眼下，部队必须停止西进，立即掉头向南，在运动中将罗历戎部歼灭。问题是战场应该选择在哪里？参谋长耿飚说："我们既不能让罗历戎到达保定，也不能让他到达方顺桥。必须把围歼战场选择在方顺桥以南，甚至望都以南。"望都、方顺桥自南向北位居平汉铁路线上，是从石家庄北上保定的必经之地。司令员杨得志同意，他说："如果让他接近保定，驻在保定的敌刘化南部就会接应他。"政治委员杨成武紧跟着说："至少要把罗历戎部阻击在保定以南五十里处，围歼才有把握。否则，我们围歼罗部时，屁股后面就会受到威胁。"耿飚伏在地图上看了很久，最后他用手指头在地图上画出个圆圈说："就在这里打！"

耿飚选择的战场名叫清风店。

清风店北距保定和南距新乐各为九十里，正好处于目前罗历戎部和刘化南部所在位置的中间。如果把战场往北移至望都和方顺桥之间，那就离保定近，我伏击部队就有后顾之忧。如果把战场往南移至定县以南，则离新乐太近，罗历戎率部经过该地时，现在保北战场的我军主力必然不能及时赶到，这样就将导致伏击落空。而清风店离我们现在的位置为二百余里［直线距离为一百八十多里］，但是距离最南面的我野战部队约一百五十里，按照我军的行军速度，加一把劲，可以争取在十九日拂晓先于罗历戎赶到这个地区，及时布设伏击圈，包围和消灭敌人。因此，从南北距离来衡量，清风店是理想的战场。另外，从地形上看，虽然总的来说这一带是平原地区，但是清风店的地形略有起伏，且其南面有条唐河，等罗历戎一过河，我军就控制渡口，将敌军包围于较低处，这样有利于全歼敌人。

战场已经选定，制胜的先决条件是：不能让罗历戎早于晋察冀野战军到达清风店。为此，杨得志、杨成武和耿飚仔细地计算了敌我双方的行军速度，甚至把我军行军中吃饭和休息的时间都计算得很具体：通常部队强行军速度最多为每小时七公里，但这个速度难以长时间保持，且每四个小时就要吃饭和暂短休息，不然很难保证达到战场后能有体力立即投入作战。而因为新乐到清风店一路都是解放区，罗历戎部晚上不敢行军，他们携带着辎重和家眷，每小时能走五公里就不错了。如果再有解放区内民兵的袭扰，他们的行军速度定会被严重迟滞。杨得志、杨成武和耿飚的计算结果是：晋察冀野战军主力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走完一百二十五公里左右的路程，这样才能赶在罗历戎的前面到达清风店地域。

耿飚蹲在地上起草了作战命令：除了攻击徐水的部队不动外，其余各部立即掉头南下，不惜一切代价赶往方顺桥以南的清风店。

政治委员杨成武开始起草战斗动员令。数十年之后，这个动员令依旧令当时的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记忆犹新，他认为这个动员令写得“气势磅礴，火药味浓，鼓动性强，似乎千军万马就在眼前”：

前线全体指战员：

配合兄弟地区反攻，打大胜仗的机会到来了！我们面前是蒋匪忠实走狗罗历戎亲率第七师和六十六团四个团。敌人轻率远逃，行军疲劳，孤军深入，心理恐慌，已经给我们造成打大歼灭战的充分条件，我们已调了绝对优势兵力和炮兵来歼灭敌人！一、集中一切兵力、火力，猛打！猛冲！猛追！发挥三猛战斗作风。狠打、硬打、拼命打，毫无顾虑地冲垮敌人！包围敌人！歼灭敌人！二、不顾任何疲劳，坚决执行命令！不顾夜行军、急行军！不管没吃饭、没喝水！不管连天、连夜的战斗！不怕困难！不许叫苦！不许怠慢！走不动也要走！爬着滚着也要追！坚决不放跑敌人！全体干部以身作则，共产党员起模范作用。三、高度发挥作战机动性，哪里有敌人就冲向哪里，哪里枪响就冲向哪里，哪里敌人没消灭就冲向哪里！各连、各营、各团、各旅，步兵、炮兵在统一命令和指挥意图下，要积极主动，密切协同作战！谁消极观望就是犯罪！敌人顽抗，必须坚决摧毁；敌人溃逃，必须追上歼灭！同志们！坚决、干净、彻底、全部歼灭敌人！活捉敌人军长罗历戎！活捉敌人师长、团长！创造晋察冀空前大胜利，看谁完成任务最多、最好，看谁胜利果实最大。打胜仗的比赛！缴枪捉俘虏的比赛！为人民立大功！

二纵四旅原来的任务是攻打徐水，之后奉命到容城一线去打阻击，然后又奉命撤离战场向西转移，现在的命令是不惜一切向南奔袭，这种急行军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八个昼夜，杨得志站在路边喊："能坚持住吗？"官兵们回答："胜利就在咱的大腿上！"九旅二十五团一营三连也已连续作战行军七个昼夜，连队向南奔袭后不久，有的战士跑着跑着睡着了，因而扑通一声倒在地上。干部们只好队前队尾地来回跑。这不是平常的行军，不能顾及出现掉队，跑不动跟不上就不管了，让后面的官兵收容，能带上几个就带上几个。也不管什么建制了，跑得最快的战士放在全连的最前面，跑得最快的连放在全营的最前面，跑得最快的营放在全团最前面。不管白天黑夜，天塌下来也不能停步。为了不走冤枉路，派出去的侦察员必须每隔十里就找个新向导，也顾不上礼貌了，半夜翻墙跳进老乡的院子，然后喊："有壮实的吗？快点出来带个路！"

天亮了，摇摇晃晃奔跑着的队伍只听得一片粗重的喘息声，没有人说话。三纵九旅二十七团二营有个又高又胖的战士，山西人，名叫殷勇，体重至少在一百八十斤以上，外号"大洋马"。马克沁重机枪要用大骡子驮，没有骡子也要把机枪拆开两个人扛，可他一个人抓起来就跑，加上他打仗不要命，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只要"大洋马"的机枪上来了，战士们就大喊大叫地来了精神。有一次他在战斗中负了伤，上去好几拨民工都没能把他抬下来，后来弄了副大担架又上去了，民工们拼命抬就是抬不动。指导员急了，增加了四名战士，与民工一起终于把他从阵地上弄了下来。殷勇还有一点让官兵们十分喜欢，就是他能唱山西民歌。他人高马大肺活量大，嗓子亮堂堂的，九旅大部分官兵是山西人，于是只要有空大家就闹着让他唱。在这个万分疲惫的时候，指导员命令殷勇开唱，只要是山西民歌，什么哥哥妹子，什么大溜溜二溜溜，放开嗓子唱。为了让他唱得响亮些，营长让通信员把干粮都集中给他吃，不够就去给他找红薯。殷勇，这个高大且勇敢的

战士，扛着他的马克沁重机枪，边跑边唱，嗓子大得出奇，一个营前前后后的官兵都听得见。

继续向南，绕过保定，就进入解放区的地盘了。天大亮的时候，官兵们眼前出现的景象让他们又惊又喜：乡亲们早就为部队做好了饭。“沿街两侧摆满了粗瓷大缸、陶瓷小盆、柳条编的挎篮、苞米叶子织的箩筐，农家所有盛食物的家什全摆开了，里面盛着新出锅冒着热气散发着油香的葱油饼、红皮沙瓤的红薯、香喷喷的烫面包子，不凉不烫的茶水，冒着腾腾热气的盐茶鸡蛋以及花生、核桃和红枣。”杨成武回忆说，“真难以设想，他们是以什么样的速度准备好早餐的，因为从冀中军区到基层，中间隔着那么多层次，就是把消息传到村一级，也得几个钟头啊！”

杨得志晚年回忆起那天的情景依旧心头滚烫：

大路上每隔五十米左右就有一口大缸，缸里分别装的是开水、带枣的小米稀饭、加了糖的玉米面粥。为了保温，有些大缸的外面包上了厚厚的棉被，想得多周到呀！缸与缸之间是临时架起的锅灶，锅里贴着当地老乡爱吃的玉米饼子。乡亲们把带着黄腾腾“锅巴”的玉米饼子，送到战士们的手里还是热乎乎的哩。这是人民的心哪！守候在路两旁的大部分是妇女同志。她们提着篮子，端着簸箕，里边不仅有馒头、大饼、烧鸡、鸡蛋和大红枣、黄柿子，还有军鞋、毛巾、慰问袋和撕成绑带那么宽的新布条。有的鸡蛋是染红了的。老大娘一边往战士们的口袋、挎包里塞，一边念叨着：“这是俺儿媳妇坐月子用的，带上吃吧！多杀顽固军，保俺过好日子。”看到有的战士鞋子破了，用绳子绑在脚上，大嫂们一拥而上，争着给战士换新鞋。有的战士脚跑肿了，新鞋穿不上，她们便把战士的脚揽在怀里，轻轻地挑泡、挤水，然后一层层地包上布条。战士含着热泪继续前进，她们追上去，把新鞋挂在战士脖子上，疼爱地说：“拆布的工夫脚要先见水，湿透了再拆，要不，会疼呀！这新鞋等脚消了肿，再穿，不要紧，里边有垫子，软和的！”姑娘们把绣了花的慰问袋送到战士手里，说：“里边有吃的有用的，还有信。”有的大胆的姑娘问战士：“你叫什么名字？能当英雄吗？”我们的战士红着脸，跑了。有的老大爷把烧鸡撕成碎条，紧跟着脚步不停的战士，一边往战士的嘴里送，一边嘱咐：“孩子吃吧，打起仗来就没有工夫了。记住，千万小心，躲着点枪子呀，那东西不长眼。”

杨得志和杨成武遇到了冀中区党委和行署支前指挥部的吴树声，他们对这位共产党地方干部印象极其深刻。吴树声说：“区党委书记林

铁同志让我转告野司首长，冀中两千万人民决心做到，前线要什么，我们有什么，部队有什么要求，我们保证做到！”吴树声果然说到做到，仅仅一夜之间，冀中地区组织起支前民工十万，担架一万一千副，牲口九千六百头，大车三千四百辆，成千上万的支前百姓跟随在晋察冀野战军的后面，连绵百里，浩浩荡荡。

杨得志接到情报：罗历戎已经接近定县。

从新乐到定县，二十五公里的路程，罗历戎走了不只一昼夜。

罗历戎严重低估了他的部队进入解放区可能遇到的困难，严重低估了在这片土地上贫苦农民对国民党军队的厌恶程度。

自从石家庄出动以来，一路冷枪冷炮就没停过。每经过一个村庄，哪怕是一个很小的村子，部队都会因为受到袭击而被迫停下来。路上随时有踩上地雷的可能，村口往往是遭到民兵突袭的鬼门关。没完没了的、没有规律的袭击让他的官兵们个个神经紧张，最终军官们一致认为只有停下来才最安全。谁想宿营之后更不安宁，整个晚上土炮轰轰地响，手榴弹不时地飞进宿营地。最困难的是吃饭喝水的问题，不是说可以到解放区里抢粮食吗？现在到了解放区可粮食在哪里呢？所到之处，老百姓都进行了最彻底的坚壁清野，别说粮食柴草，就连水井都填死了。

史料显示，直到被包围的时候，罗历戎对晋察冀野战军的动向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可晋察冀野战军对他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共产党军队拥有数量众多的耳目，农民们给杨得志送来的情报内容丰富得五花八门：罗历戎部队的宿营位置，张三李四家各住了多少兵，炮架在了村东还是村西，士兵手上拿的什么枪，中午吃的是什么饭，做饭的锅看上去有多大尺寸，长官坐的小汽车停在谁家的院子里，大部队是几点出发的，走的是哪条路以及现在走到了哪里。农民

们甚至从第三军指挥部宿营的那个村子为杨得志和耿飚弄来了一大堆他们称为“帖子”的东西，这些帖子实际上是第三军宿营时，在各单位住宿的房门上贴的写有单位名称的字条：参谋处、副官处、军务处、军法处、军医处、新闻处、人事室、野战医院……让杨得志惊讶的是，有一张“帖子”上竟然写的是“魔术团”三个字——农民们报告说，顽固军带的“魔术团”，都是十三四岁的娃娃，晚上还搭台子演戏哩！

十九日，罗历戎自定县向清风店方向继续北进，中午，部队渡过唐河。下午的时候，他接到飞机接连投下的两封信件，信件的内容是一样的：“我们发现共军大批密集部队南来，距你们很近，请第三军急急做战斗准备。”

罗历戎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无法理解“共军大批密集部队”是从哪里来的。紧接着飞机又来了，空投下大量的弹药和饼干，这一下罗历戎觉得真的不妙了。他决定放弃到望都宿营的计划，命令部队进入清风店附近的南合营、高家佐、东同房、西同房、东南合村、西南合村、小瓦房等二十多个村庄内，第三军军部和第七师师部以及两个团进入西南合村，紧急构筑工事准备作战。同时，他急电北平行辕李宗仁和保定绥靖东署孙连仲派兵支援。

此时，虽然双方都无法确定对方的具体位置，但晋察冀野战军以惊人的行军速度赶在罗历戎之前到达了清风店战场。到达战场的部队没有在预定位置发现敌人，战后才知道杨得志他们把罗历戎的行军速度计算快了。没有发现敌人的先头部队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向前搜索，摸索了十几里后与罗历戎的部队接火了。

驻扎在保定的孙连仲得知罗历戎部遭遇晋察冀野战军后，也有点想不明白。二十四小时前还在攻击徐水的共军主力，怎么会突然出现在百里之外的清风店？况且现在的徐水城不是依旧处在被攻击中吗？这样看来，也许共军不是仅仅冲着罗历戎的第三军来的，很可能是想

攻打他的保定。所以，如果出动主力增援，保定就成了一座空城，这岂不正中了共军的诡计？于是，接到罗历戎的请求后，孙连仲并没有马上派兵，而是派空军出动飞机对南下的晋察冀野战军实施轰炸和扫射，企图迟滞其前进的速度。

仓促进入防御状态的罗历戎认为，即使共军向他包抄而来，远距离奔袭后必定疲惫不堪，而在同一时间里，共军需要在徐水和清风店两面作战，那么最终谁吃掉谁还很难说呢。他又给孙连仲去电，提醒他的司令官：这是歼灭共军主力的良机，如果增援部队行动迅速，就有望获得空前的胜利。

十九日晚，晋察冀野战军将罗历戎所在的村庄包围。

第二天拂晓，攻击开始了。杨得志、杨成武和耿飚命令部队猛打猛冲，不要顾虑敌人的增援，即使增援的敌人很近了，对罗历戎的攻击也要继续下去，坚决把第三军吃掉。但是，急切的攻击除了付出伤亡之外，进展并不理想。罗历戎部集中在以西南合村为中心的几个村子里，形成了梅花形的协同防御体系，加上这支国民党军嫡系部队火力强劲，晋察冀野战军在没有分割敌人的情况下，连续急行军后马上发起的仓促攻击严重受挫。

晚上，杨得志、杨成武和耿飚分析了战场情况，认为战斗必须速战速决，拖延下去很可能发生不利的变化。而要想得手，必须分割敌人，打破罗历戎的梅花形防御体系，具体战斗部署是：十一旅主力攻击东、西同房；九旅攻击高家佐；四旅和六旅攻击第三军军部所在的西南合村。

二十一日，战斗进入白热化。南合营村首先被二十九团七连突破，守军十九团一千多人放下了武器。接着，东、西同房也被攻占。高家佐村打得艰苦，九旅二十六团二营冲击的时候，与正往村外突围

的敌人迎面相撞，激烈的混战随即爆发。打到最后，二十六团所有的干部都冲到了前沿，率领官兵死打硬拼，终于拿下了这个村庄。

部队攻击西南合村时，遭到罗历戎部守军的顽强抵抗。此时，第三军已全部退入西南合村，一万多人拥挤在一个村庄里，形成了一个坚硬的死疙瘩。罗历戎期待着援军的到来，他相信援军到达的时刻，也就是他出击反攻的时刻，共军定会在两面夹击下迅速溃败。因此，必须坚守，等待援军。他亲自上阵督战，企图封堵被共军撕开的口子，以使西南合村的防御阵地保持完整。

晋察冀野战军指挥部就设在距西南合村不远的一个村子里。在激烈的枪炮声中，杨得志、杨成武和耿飚知道守住突破口对战役取得最后胜利意味着什么：北面部队的阻击打得十分艰苦，敌人的援军正拼死向这里突进。只要攻击部队在突破口上坚持到总攻开始的时刻，罗历戎的末日也就到了。而如果突破口丢失，就得重新组织突破，不但时间不允许，是否能重新撕开缺口不可预知，况且部队将会面临更大的伤亡。

第二纵队四旅上去了。

四旅是野战军南下奔袭部队中距离最远的，当罗历戎距清风店还有四十五公里的路程时，四旅距清风店尚有一百多公里，然而他们硬是靠自己的两只脚提前到达了战场。

杨成武给四旅旅长萧应棠打电话："一定要守住突破口，为主力最后总攻创造条件。部队有伤亡，等打完仗给你们补齐，给你们补整建制的老兵！"

四旅十团和十二团立即冲了上去，官兵们以巨大的生命代价坚守着突破口。十团二营营长平秀茂阵亡，五连连长和指导员相继牺牲，

其他连排干部全部负伤。在没有干部指挥的情况下，班长黄树英指挥官兵坚守阵地，团政委钟云先代表团长郑三生在阵地上宣布了黄树英的任职命令——黄树英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军的副军长。十二团副团长张清润阵亡后，政治处主任和平接替指挥。他原来是十团的政治处主任，十二团原政治处主任几天前在攻击徐水的战斗中牺牲，他因此被调到十二团，接替指挥后不久他也牺牲了。接着，三营教导员段延苟、九连连长岳中也倒在了布满战死者尸体的突破口上。危急时刻，旅长萧应棠命令十二团使用预备队："有多少用多少，都拿上去，不要怕伤亡，守住突破口！"预备队一上去，就与国民党守军展开了肉搏战。

这个时候，保北一线的阻击战也进行得异常残酷。

主力部队南下后，二纵司令员陈正湘和三纵司令员郑维山手里只有四个旅，而北面的援军是整编第二十八军军长李文率领的五个师。陈正湘和郑维山留下第五旅继续攻击徐水，指挥第七、第八旅和冀中独立第七旅，在没有任何遮挡的大平原上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了殊死战斗。从十八日开始，二纵的阻击阵地始终被猛烈的枪弹覆盖，被硝烟包裹得几乎无法喘息的官兵退守到村庄里，利用每一座民房、每一堵墙、每一棵树与企图突过去的国民党军纠缠。二十日，李文投入了所有的预备队全力攻击，所有的火炮都参加了战斗，仅在何家庄阵地上，一小时内就落下了一万多发炮弹，而一旦炮火停止，二纵的官兵就像死不绝一样又冒了出来。二十一日，孙连仲乘飞机飞临战场上空，这里距离清风店只有一个小时的汽车路程，蒋介石在电报中训斥孙连仲无能，命令他必须全力增援第三军。飞机上的孙连仲一面骂罗历戎突围不利，一面埋怨李文指挥不利。但是，被二纵和三纵封锁的道路就是无法打开。三纵第八旅死死地卡在南下的道路上，敌人枪炮猛烈，阵地上硝烟弥漫，白天被遮蔽得如同黑夜。在国民党军攻击部

队的后面，数百辆汽车上坐满了官兵，只等道路被打通后向第三军被围困的村庄急驰。

下午三点，二纵和三纵的阻击开始显出难以支持的迹象。先是史各庄阵地失守，然后是西留营、半壁店和山东营等阵地丢失。更严重的是，漕河以南的阻击阵地也丢失了，保定的国民党军开始出动，北上接应南下的增援部队，南北两军相距仅剩六公里。清风店那边还没有总攻的消息，这里的阻击还要坚持下去，陈正湘命令部队不惜一切占领新的阻击阵地，决不能让这里的敌人接近清风店。

杨得志担心北线以少对多的阻击战，去电询问战斗情况，陈正湘和李志民的回答是:“打下去，熬下去，阻住敌人就是胜利！”

共产党官兵必须用血肉与敌人熬时间。

在清风店的西南合村里，罗历戎有点熬不住了。他向李文报告说，部队不得不准备突围了。李文回电说他的汽车队很快就到，让罗历戎坚持住。罗历戎将李文的电报用大字抄出，张贴在西南合村里以鼓舞士气，但他本人的士气已是十分低落。他曾想向石家庄逃跑，但因路途远而凶险被迫放弃，他不知道的是:唐河渡口已被晋察冀野战军控制。罗历戎不断打电报给李文，诉说他与共军作战之惨烈，要求增援部队快速抵达，要求派空军进行大规模轰炸。他还用报话机直接向孙连仲喊话，说这里没有饭吃，如果援军再不来，他就准备自杀了。孙连仲回答说，只要再坚持两昼夜，援军必到，那时第三军就可以为党国立大功了。

二十二日凌晨，晋察冀野战军对清风店的总攻终于开始了。西南合村遭到空前猛烈的炮火袭击，从村庄四面响起了杀声。罗历戎跑到第七师指挥所，在那里他换上了一套士兵军服，然后与李用章师长一起向西南方向逃窜。晋察冀野战军官兵知道这是决死的一战，因此显

示出了不顾一切的决斗精神。指导员李德胜抱着一个十公斤的大地雷，冲进西南合村一个堆满弹药的院子里，拉响地雷后，又扔出十颗手榴弹，整个院子飞上了天，他自己却安全地回来了。班长高老二率领六名战士端着刺刀冲锋，把一个连的敌人吓得都举起了手。战至二十三日上午十一时，西南合村的战斗基本结束。

二局局长彭富九来到野战军指挥部，看见司令员杨得志正在用旧报纸糊信封。杨得志说："老彭，你来了，好，这次你们的情报搞得很好。"彭富九说他是赶来搜查密码的，得早点去，晚了敌人会烧掉。西南合村内还有零星的枪声，杨得志派一个排跟着彭富九进了村。彭富九在俘虏中查出电报员，电报员说密码已经烧掉。彭富九看了他一眼，说："你再说烧，我就枪毙你。"国民党军电报员自己走到一间屋子里，从顶棚上把电报密码本拿了出来。彭富九回到野战军指挥部时，杨得志送给他一把手枪、一支卡宾枪、一件国民党军的军大衣。

罗历戎没逃出多远，就被晋察冀野战军独立第八旅官兵俘虏。他自称是炊事员，认为在巨大的俘虏群中共产党方面没人能认出他来。不幸的是，当独立第八旅官兵查找哪一个是罗历戎时，一个俘虏兵将一块小石子丢到了他跟前。

罗历戎立即要求见聂荣臻。

身为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生，他曾是时任政治教官的聂荣臻的学生。

七天之后，在定县野战军指挥部，聂荣臻见到了国民党军第三军被俘高级将领，除军长罗历戎外，还有第三军副军长杨光钰、副参谋长吴铁铮、第七师师长李用章。聂荣臻对罗历戎说："你愿意留下，我们提供学习机会；愿意回家，我们放你走。但是，不管留下还是回家，都要认识过去的罪行。"

罗历戎留了下来。经过十二年的关押，一九六〇年冬被特赦。后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

清风店一战，晋察冀野战军以九千一百九十二人的伤亡，俘敌一万一千零九十八人，毙伤敌六千一百五十五人。聂荣臻说：“这次歼灭战打得很干脆，从军长到马夫没有一个逃跑掉。”

战后，朱德赋《贺晋察冀军区歼蒋第三军》诗一首：

南合村中晓日斜，

频呼救命望京华。

为援保定三军灭，

错渡滹沱九月槎。

卸甲咸云归故里，

离营从此不闻笳。

请看塞上深秋月，

朗照边区胜利花。

## 打倒蒋介石才有饭吃

将米糠、秕谷、瓜菜和几把碾压成片状的黑豆，加水熬煮，就制成了当地叫“糠菜糊糊”的粥状食物。沙家店战役后，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主要依靠这种食物充饥。

一九四七年夏秋以来，陕北先旱后涝，庄稼严重歉收。贫瘠的土地即使在风调雨顺的年份，也养活不了当地百姓，天候稍微有些变化便会导致饥馑遍地，更不要说供养军队了。于是，是否有粮食，决定着西北战场上兵力不多的西北野战军能否打仗、打什么规模的仗和仗打得怎么样。

八月三十一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本世（三十一日）以备战伏击姿态，积极筹带两天粮食，半月以来给养不定，艳（二十九日）遇雨，有些疲劳现象……"几小时之后，彭德怀再次致电毛泽东："本日筹粮，两天敌亦未动，野战军明拂晓前出发南进。"

九月三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敌人南进甚快，如陇东三县有粮，又有歼敌机会，则打一二仗再出去也好……"第二天，毛泽东再次致电彭德怀："如粮食情况许可，请考虑在九里山地区歼灭九十师一部……"

沙家店战役之后，胡宗南的部队已经深陷于陕北战场。八月二十三日，陈赓、谢富治率部南渡黄河，沿豫北边界一路向西，相继占领新安、灵宝等地，逼近豫陕交界处的潼关，威胁着胡宗南的战略基地西安和关中地区。胡宗南不得不将董钊的整编第一军和刘戡的整编第二十九军从陕北回援南撤。为了继续拖住胡宗南部主力，配合陈谢集团作战，中央军委命令西北野战军拦截向南撤退的国民党军："我军似宜扭住刘、董于大小劳山以北、永坪以南地区，协助陈、谢得手，削弱董、刘，使其恐慌动摇，进退维谷，至时机成熟时，各个歼灭之，或与陈、谢直接会合于渭水以北根本解决之。"

但是，西北野战军没有粮食，加之连续作战官兵疲惫，彭德怀要求大部队休整两天，抓紧时间筹粮，先派第二纵队南下抢占先机。九月九日，王震率领二纵在延川西北伏击了国民党军整编七十六师和整编第一师一六七旅一部。仗打得很勉强，原因还是缺粮。饥饿的官兵体力不足，加上大雨不断，战斗伤亡很大。王震要求官兵们与敌人"比忍受困难的能力"，但无论如何人是要吃饭的，哪怕是糠菜糊糊。

九月十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延长一带有粮，利于我军在此地区寻机灭敌。"——作战的地区有粮食甚至比有敌人还能鼓舞战斗力。彭德怀立即决定：以张宗逊的第一纵队为左兵团，以张贤约的新编第

四旅和罗元发的教导旅为右兵团，以许光达的第三纵队为中央兵团，向陕西北部靠近黄河的交口地区开进，在关庄、岔口一带阻击胡宗南部主力。

胡宗南的部队从米脂以北出发，沿着榆林至咸阳的公路南撤。为了避免途中遭到彭德怀部的袭击，南撤部队分成四个梯队，紧密靠拢，梯形交替，“小米碾子式”地相互掩护前进。胡宗南规定：每天行军十至十五公里，集团宿营。如果遭到袭击，立即收缩，固守待援。

十四日上午九时，西北野战军发起了攻击。南撤的国民党军各部立即停止前进，集结在延安东北的关庄、岔口、上刘家河一线，部署出纵横八公里的防御阵地。战斗持续到黄昏，天又下起雨来，彭德怀部在战场上与敌人形成僵持。

十六日，国民党军居然不再顾及西北野战军的阻击，大部队前后左右构成防御队形继续向南行军。在放过两个旅的先头部队后，彭德怀部再次发动攻击，但当面的国民党军过于紧密，且火力十分强劲，彭德怀部既难以分割又阻截不住，战斗再次被迫停止。

持续六天的阻击作战，毙伤敌人三千三百余人，自己伤亡一千五百零三人。彭德怀总结道：“开始以为敌人只有一个旅，结果越打越多，打出来五个旅。二纵队又想一口吞，生怕敌人跑了，把敌人出路一堵，结果啃不动，只好放开一个口子，让他跑掉。”

三天之后，南撤的国民党军到达延安以及富县地区。延安以东以北百公里的交通线上，仅留下整编七十六师师部、二十四旅一部和整编三十六师一六五旅一部，西安西北的黄龙地区也仅有六个团分散驻守。此时，胡宗南部主力集结在延安和西安周围，其他地区均防御薄弱。彭德怀因此制定了一个兵分内线、外线的作战计划：第一、第三纵队和新编第四旅、教导旅继续在陕北内线作战，攻击延川、延长、

清涧等孤立据点内的国民党军；第二纵队南下出击外线，开辟黄龙解放区，配合内线作战，同时解决日渐紧迫的粮食问题。

中央军委致电彭德怀、贺龙、习仲勋：

彭并贺习：

二十三日二十时电悉。（一）决定你军主力［六个旅］在内线一个月至一个半月，完成歼敌休整补充三项任务，然后打出去，望按此部署一切，主要是筹粮一万五千大担。（二）王震两个旅相机攻占劳山、甘泉等地，阻敌数天后，即可先出渭北。

军委

二十三日二十四时

为了加强西北野战军的力量，中央军委批准以警备第一、第三旅和骑兵第六师组成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王世泰任司令员，张仲良任政治委员，全纵队兵力一万一千人；以新编第四旅和教导旅组成西北野战军第六纵队，罗元发任司令员，徐立清任政治委员，全纵队兵力一万二千人。

此时，毛泽东已在朱官寨停留快一个月了，他住在村边的一孔窑洞里。令人惊异的是，整日以糠菜糊糊煳口的毛泽东，此时却以飞扬的思绪和高涨的斗志，撰写了一篇又一篇充满才智与激情的文章——山村荒凉偏僻，土窑四壁斑驳，柳木炕桌粗糙不平，煤油灯忽闪忽闪，粗瓷碗边沾着糠菜残渣，空气里弥漫着劣质烟草的味道，毛泽东头发长长的，下笔犹如龙飞凤舞：

……七月间我们冀鲁豫及山东人民解放军开始出击，在鲁中、鲁南各地取得胜利，特别是在鲁西南连续歼灭敌人九个半旅，获得空前的大胜利。八月十一日我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李先念诸将军所部，越过陇海路，接着渡过涡河、黄泛区、颍河、沙河、洪河、汝河、淮河，如入无人之境。八月二十七日到达大别山地区，威震长江南北。八月十二日我苏北人民解放军大捷，于盐城歼灭蒋伪军四十二集团军第一师全部。八月二十日我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王世泰诸将军所部西北人民解放军，在米脂以北歼灭胡宗南之整编第三十六

师，西北战场我军转入反攻。八月二十三日我陈赓、谢富治、韩钧、孔从周、秦基伟诸将军所部，在洛阳、陕县间南渡黄河，进入陇海以南、平汉以西、汉水以北广大地区。九月八日我陈毅、粟裕、陈士榘、唐亮、叶飞诸将军所部华东人民解放军进入鲁西南，在菏泽以东、郓城以南之沙土集歼灭蒋军五十七师全部。我人民解放军在南线诸战场上，东起苏北，西至陕西，南抵长江，已经转入反攻。长江以北诸省的伟大解放战争已经揭幕了，我们已经打到蒋介石的后方去了。人民解放军在南线诸战场的攻势，加上我晋察冀人民解放军现在正在进行的对平汉北段的攻势，以及我东北、热河、冀东人民解放军早已于五月间就开始了的伟大攻势，组成了人民解放军全面反攻的总形势。

人民解放军的大举反攻，标志着战争情势的根本改变……

蒋介石匪帮的兵力，其正规军被歼灭的，到八月底止已达到一百十四个旅九十万人，伪军、地方军和特种部队被歼的三十五万三千人。这就是说，蒋介石的正规军已有一半曾被歼灭、或受到歼灭性打击，其伪军、地方军和特种部队已被歼灭三分之一，因而大大地削弱了蒋匪的军事地位。匪军中不但士气低落，而且在一切高级文武官员中，在整个反动派阵营中，都充满了失败情绪。没有前途，没有出路，灰心丧气，慌乱动摇，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贪污腐化越陷越深，互相埋怨见死不救，这就是整个匪军营垒的现状。再打一年、两年，蒋介石匪帮就离全军覆没不远了……总起来说，人民反对，兵力削弱，后方空虚，这就是蒋介石的三个致命弱点……蒋介石在以往还处于战略攻势地位，还能以进攻一地来鼓励他的士气，但是从今以后，战略攻势既然属于人民解放军方面，蒋介石的崩溃必然加速……

因为朱官寨距国民党军盘踞的榆林很近，同时又难以搞到粮食，在佳县县委书记张俊贤的建议下，九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一行向南又向西，转移到佳县境内的神泉堡。

神泉堡村坐落在佳芦河以南，东面是条大川，南面有条又长又深的沟，全村只有三十多户一百五十多人，十分宁静。在这里，中央军委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

本军是中国人民的军队，一切以中国人民的意志为意志。本军的政策，代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主要有如下各项：

（一）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及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二）逮捕、审判与惩办以蒋介石为首的内战罪犯。

（三）废除蒋介石统治的独裁制度，实行人民民主制度，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项自由。

（四）废除蒋介石统治的腐败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

（五）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及陈立夫兄弟等四大家族及其他首要战犯的财产，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改善职工生活，救济灾民贫民。

（六）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乡村田地，由乡村人民按照人口及田地之数量质量，平均分配使用，并归其所有。

（七）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及自由加入中国联邦的权利。

（八）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否认内战时期蒋介石所借的一切外债，要求美国政府撤退其威胁中国独立的驻华军队，反对任何外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和使日本侵略势力复兴，和外国订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条约，联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

周恩来说：“在去年七月就提出打倒蒋介石，行不行？还不行。当时提的口号是武装自卫，还不能公开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因为当时主客观条件还不具备。”现在为什么可以提而且必须提？“一方面，我们已用事实证明给老百姓看，我们有力量打倒蒋介石；另一方面，老百姓也不要蒋介石，就连上层分子、中产阶级也不想给蒋介石抬轿子了，也要推翻他了。”为什么要全国进行战略反攻？“因为在全国他还占有四分之三的土地、三分之一的人口。只有战略进攻，才能彻底消灭他。口号一提出，战争行动就要配合，就是全国性反攻，就是打出去，突破解放区的界线，我们的行动完全是为实现这个口号的。”

不提便不提，一提就排山倒海。

在同时颁布的由六十七条口号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训令”中，打头的十五条口号全是关于“打倒蒋介石”的：

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

打倒背叛政协协议的蒋介石！

打倒破坏停战协议的蒋介石！

打倒内战祸首蒋介石！

打倒独裁者蒋介石！

打倒反革命的蒋介石！

打倒屠杀人民的蒋介石！

打倒欺骗人民的蒋介石！

打倒摧残人权的蒋介石！

打倒横征暴敛的蒋介石！

打倒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

打倒蒋介石才有和平！

打倒蒋介石才有饭吃！

打倒蒋介石才有民主！

打倒蒋介石才有独立！

黄龙山，位于洛川、黄龙和白水三县交界处。黄龙地区东有黄河，西有洛河，北依陕北高原，南通关中平原。西北野战军如果能在这里立足，不但可以解决粮食问题，而且还能占据西北战场的战略要地。

黄龙同样是胡宗南进攻陕北的重要军事基地，驻扎在这一地区的国民党军是：新编第九旅（欠二十七团）和陕西保安第三、第七团守备铜川、耀县；整编第一师第一旅三团守备澄城、合阳；整编九十师五十三旅一五八团和师属野炮营守备韩城；整编第一师一六七旅五〇一团守备宜君、中部（今黄陵）；整编九十师六十一旅一八二团和整编十六师新编第九旅二十七团守备宜川。

九月下旬，西北野战军外线部队第二、第四纵队向黄龙山地区进发。二纵司令员王震和四纵司令员王世泰决定攻击韩城。位于陕西东部的韩城，是黄河西岸的一个重镇，是黄河与汾河汇流的三角地带，这里有禹门口、芝川镇等渡口，是晋陕两省间的交通要道。第二、第四纵队首先攻占芝川，接着于十月十日拂晓包围了韩城。官兵们一直等到夜幕降临才发起攻击。国民党守军利用厚实的城墙，组织起炮火与轻武器协同的防御线，二纵和四纵攻击一夜未能达到作战目的。这时，国民党军两个团的增援部队已经靠近，二纵和四纵得到情报后遂决定围城打援。可是，刚准备调动部队迎击援敌时，韩城守军突然弃城逃跑了。十一日上午二纵和四纵控制了韩城以及禹门口、芝川镇渡口。

下一步如何作战，王震建议挑选国民党军物资储存丰富的城镇打，以便解决部队急需的粮食和过冬的棉衣。十三日，王震、王世泰致电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并告中央军委，决心从韩城北上攻打宜川：

> 目前胡匪有如长蛇，首尾不能自应。建议集全力攻歼洛川、耀县线守备薄弱城镇之敌，准备野战中歼灭胡匪败疲之师。其条件：（一）该线粮食多［特别是洛东］，群众及运输方便。（二）一二三旅是残部补充部队，战斗力弱。（三）洛、宜、耀、同（同官）敌人资财甚多。（四）敌冬装尚未北运，南撤时霜夜露宿高原山头，绝难维持战斗力。（五）野炮即可使用两门，炮弹有七百多发，带二百发。如我野战军主力南下攻洛川，一部顺便打下宜川，则二、四纵队主力休息两天后，相机于运动中打敌二十八旅，或消灭合阳之敌后，迅速转回袭占耀县或同官。

宜川并不好打，因为这座县城是国民党军封锁陕北的重要堡垒，多年以来始终驻有重兵，城防工事轮番加修，县城内外堡垒层层叠叠。特别是城墙外围地雷密集，一批批的守军不断地埋雷，到底埋了多少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那么，为什么要打这座县城？王震认为：“敌人自以为枪弹充足，工事坚固，地形险要，我军会望而生畏，

不敢来攻。可是，敌人有敌人的打算，我们不但不怕，恰恰相反，还要好好利用敌人的这种心理，给予狠狠打击，将他们全部消灭掉。”

部队官兵对攻打宜川也顾虑重重。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自保卫延安以来连续作战，部队已经相当疲劳，粮食严重短缺，伤亡还没有来得及补充，许多连队只有二三十人，最多的也不过四五十人，“连不成连，营不成营”。第二纵队副政委王恩茂在十九日的日记中写道：“王司令始终未改变攻宜川计划，但我一直到今天认为攻宜川把握不够，守城敌人有三千多，而且并不是那样没有战斗力，有三个山头，工事比较坚固，敌刘戡所率七个半旅已到延安附近，还有增援的可能，我们部队人数不太充实，受不起伤亡……”

王震的作战部署是：二纵独立第四旅攻击城西南的七郎山主阵地；三五九旅攻击城北的老虎山和虎头山；四纵警备第一、第三旅攻击城东南的凤翅山。

担任主攻任务的独立第四旅旅长顿星云和政治委员杨秀山去宜川周围看地形，亲眼看见了国民党守军的工事有多么复杂，回来杨秀山直接对王震说：“这一仗不能打。我们部队减员很大，攻击力量不足，敌人防御巩固，攻击费时。”独立第四旅因作战伤亡严重缺员。顿星云旅长告诉王震，以十三团三营为例，每个连队只剩十五人左右，十连全连只有八个人六支枪。

王震说：“你们可以把勤杂人员动员起来，把炊事员、通信员、马兵统统补充到连队去，打他个冲锋嘛！”

杨秀山说：“敌人工事太坚固，一般的冲锋恐怕不行。”

王震说：“我带两门野炮放在河滩里，专门打七郎山西南角，掩护你们。”

打下物资丰厚的县城，解决部队急需的粮食弹药，这对王震来讲是头等重要的事。

十月二十日晚，二纵和四纵对宜川的攻击开始了。

王震集中了所有的火炮轰击掩护，他在炮兵阵地上挽起袖子亲自操炮。这些野炮基本上都是前几天打韩城时缴获的，炮手大多是被俘的国民党军士兵，现在他们依然穿着国民党军军装，但战斗热情很高。接着，王震又跑到独立第四旅十四团，与官兵们一起射击冲锋。攻击前，他对率领十团冲锋的旅长顿星云和政治委员杨秀山说："咱们比赛，看谁先打上去！"——"要对敌人仇恨，像王胡子那样一说打仗满身都是劲，恨不能一口把敌人吞下去。"杨秀山战后回忆说，"他到十四团，趴在那里射击，那真是冒险啊！可是谁把他也没办法。"

当三五九旅消灭了老虎山守军之后，七郎山的侧射威胁消除，秘密潜伏在敌人阵地下面的独立第四旅的一个连奋力攀登，正面攻击的部队也开始全线冲锋，国民党守军出现了混乱。紧接着，七郎山三个营的守军连同一个重机枪连全部被歼。这个突破口的撕开，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各个方向的攻击部队不顾伤亡硬打硬拼，将敌人的堡垒一个一个攻下。虎头山和凤翅山的守军丢弃阵地逃跑，宜川城里的守军一看外围阵地失守，开始向外突围。二纵和四纵队狂追猛打，最终以伤亡百人的代价，毙伤俘虏国民党守军三千三百余人。二十一日，二纵副政治委员王恩茂在日记中写道："我原想宜川打不下，今天中午将宜川打下了，心甚愉快。王司令始终未改变攻宜川决心，这是很好很对的。"

国民党军增援部队由延安向宜川急促赶来。由于没有战机可寻，王震决定四纵撤往固临地区休整，二纵东渡黄河进入晋南。缴获的大量弹药都给了四纵，这支新组建的部队顿时装备起来。由于战斗缴获太多，王震命令所有的战利品都要带走，不管是司令员还是战士，都

要背上几发炮弹或者扛上一箱子弹。独立第四旅旅长顿星云背了四发迫击炮弹，二纵副政委王恩茂的坐骑上驮了两箱子弹，他还和纵队宣传部长刘英轮换背一发野炮的炮弹。王震本人则扛着一发炮弹兴冲冲地走在官兵们中间。

就在第二、第四纵队在黄龙作战的同时，西北野战军内线部队第一、第三纵队开始了对延长、清涧地区的攻击。

十月四日，他们包围了清涧县城。

清涧是榆林至延安公路上的要点。在陕北，北上绥德和榆林、南下延安和西安必须经过清涧。县城的城墙一半建在山谷里，一半建在山腰上，地势险要。城防面积达八十平方公里，筑有大量碉堡和坚固工事。守军为国民党军整编七十六师。

整编七十六师是中央军嫡系部队，现任师长廖昂。胡宗南占领延安后，该师奉命驻守延长、延川和清涧一线。廖昂不得不从守备清涧的部队中抽出一个团去三十公里外的瓦窑堡。虽然整编七十六师大兴土木修建防御体系，但官兵们仍对防守清涧信心不足。廖昂曾与参谋长刘学超、二十四旅旅长张新商量，考虑到清涧和瓦窑堡均兵力不足，一旦遭遇攻击，各顾各都难逃厄运，相互增援更是无从谈起，因此想将部队从清涧和瓦窑堡撤到延安附近去。但是，胡宗南没有批准。廖昂只有退而求其次，建议从瓦窑堡调回一个团加强清涧防御，胡宗南最后的批示是：只准调回一个营。这个营被布防在延长，当受到三纵攻击的时候，营长傅瑞光请求廖昂派兵增援，廖昂怕增援部队遭到伏击借口拖延，二十四旅旅长张新也要求该营“保持师的荣誉，牢记军人魂，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结果，这个营很快就没有任何消息了。

发现自己被围之后，廖昂向胡宗南建议放弃清涧，让整编七十六师转移到绥德，与驻守在那里的整编三十六师一六五旅会合。胡宗南依旧不同意。廖昂又提出，驻守绥德的一六五旅南下，驻守瓦窑堡的七十二团西进，重兵集结于清涧，共同防御彭德怀部的进攻。这下胡宗南火了，指责廖昂是在有意为彭德怀创造打援的机会。

结果，清涧处于孤立之中，廖昂的整编七十六师四面无援。

十月六日黄昏，彭德怀下达了攻击清涧的作战命令。攻击部署是：第一、第三纵队攻击清涧县城；新编第四旅在青化砭和甘谷驿一线阻击从延安方向来的援敌；教导旅在清涧北面切断清涧与绥德的联系，并准备阻击绥德方向的援敌；绥德军分区四团和六团围困子长之敌并相机歼灭。彭德怀确实下定决心，不让廖昂跑掉，他要求官兵做好包括夜间爆破和白刃搏斗在内的一切准备。

秋雨连绵，攻城部队逐步扫清了清涧城的外围据点。尽管胡宗南派来飞机进行猛烈的轰炸和扫射，但未能减弱廖昂的压力。城外的防御阵地一旦发生危机，阵地上的军官就会报告“粮弹即将告罄，如不派兵增援将陷弹尽粮绝境地”。然而，廖昂知道，阵地上无论粮食还是弹药都十分充足。胡宗南就是不答应派部队增援，廖昂给胡宗南发去一封充满绝望情绪的电报：“能战则战，不能战则守，不能守则走。既不能战，又不能守，又不能走，唯死与降耳。”这封电报似乎起了作用，七日胡宗南回电称，已命令刘戡率五个旅火速增援清涧；同时还说要再派飞机前来助战，让廖昂注意对空联络。飞机真的来了，廖昂以为投下的是粮食和弹药，谁知道竟是三十亿元法币，既不能当弹药使用也不能当粮食充饥。但是，毕竟援军要来了，廖昂认为凭借清涧的防御体系和他为数不少的部队，解清涧之围并不是没有希望。

九日，刘戡的五个旅到达永坪，这里距清涧只剩了一天的路程。如果刘戡突破我军的阻击线，清涧之战就不是打廖昂了，而是一纵和

三纵将受到县城内外之敌的两面夹击。彭德怀意识到战役必须速战速决，可是，清涧外围的重要制高点笔架山还没有夺取。

彭德怀一面命令教导旅和新编第四旅前去阻击援敌，一面命令一纵司令员贺炳炎立刻拿下笔架山。贺炳炎认为部队已经伤亡过大，再去攻击陡壁上的据点十分困难。彭德怀亲自上了三五八旅的阵地前沿，与旅长黄新廷和政治委员余秋里一起察看地形，调整部署。弹片横飞，大家让彭德怀下去，彭德怀说："你们不怕，我怕什么？"他要求三五八旅十日白天拿下笔架山，攻城部队十日夜晚发动总攻，十一日拂晓前一定结束战斗——"决不能功亏一篑！要在敌援军到达前攻下清涧，活捉廖昂。"

十日拂晓，清涧城里的廖昂没有听见太多的枪声，却看见城西笔架山上的防御部队蜂拥下逃。有人报告说，共军拂晓时爬上了绝壁，大喊"缴枪不杀"，守兵惊慌逃跑，军官们根本制止不住，笔架山已经丢失，整个清涧因此失去了西面的屏障。

一个被俘的士兵被释放回来，带来了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的一封劝降信。廖昂和张宗逊在黄埔军校时是同期同学。见信后，二十四旅旅长张新力劝廖昂投降，参谋长刘学超态度暧昧，但廖昂却态度强硬："那怎么可以？再怎么说也不能放下武器！"

廖昂再次与援军联络，下午十六时传来消息，援军先头部队已到达清涧西南高地，并说明了联络号音。廖昂立即派人前去联络，结果人刚一出城，就遭到猛烈射击，再派出的人要么被打死要么负伤逃回。

天黑了，廖昂感到了恐惧。

一纵和三纵以连续爆破炸开了清涧城的东门和北门。攻击部队从这两个突破口潮水般涌入，激烈的巷战在黑暗中展开，整个县城里到处回响着枪弹声、刺杀声、奔跑声和呻吟声。二十四旅旅长张新再次向廖昂建议投降，廖昂仍是不肯。突然，电话线和电线都断了。通信营长薛明道去抢修线路，从此一去不复返。七十团团长彭晓棠被抬进指挥部，廖昂看不清楚他哪里负伤了，只听得一阵阵的惨叫，于是用手摸过去，竟满手是血。没多一会儿，七十团一营长王定超也被抬了进来，抬他的兵说营长的下颚被手榴弹炸烂了。

午夜，城内的枪炮声愈加激烈，而且越来越近。廖昂说只有拼死突围了。但参谋长刘学超认为突围的时机早已错过，不突围还可以凭借工事抵挡一阵子，眼下只要一出去就会被打死。刘学超说完，回到自己的窑洞，他的窑洞里已躺满伤员，根本无处容身，他只好转身又走出窑洞。刘学超先是看见廖昂换上了士兵的军装，接着看见廖昂开始烧东西。一开始他以为是在烧文件，但走过去仔细一看，廖昂烧的是胡宗南空投的三十亿元法币。廖昂没有将这些钱分发给官兵以鼓舞士气，他更不想让这些钱落在共军手里，危机近在眼前的时刻，他竟然十分耐心地一张张地烧钱，这让刘学超感到了害怕。

拂晓时分，廖昂给胡宗南发出最后一封电报，大意是“所有兵力全部投入，但很难固守”。然后枯坐着一动不动。刘学超想着他的同事被共军俘虏受到优待的传闻，竟然倒头躺在炕上睡着了。不一会，巨大的声响把刘学超惊醒，他听见廖昂喊：“赶快把门顶上！”外面的枪炮声震耳欲聋，“缴枪不杀”的喊声和“我们不打了，愿意缴枪”的叫声混杂在一起。一个军官在喊：“都集合！都集合！”看来是集体投降了。接着，门被撞开了，西北野战军官兵冲了进来。廖昂穿着士兵军装，面色惨白，窑洞的地上散落着他平时喜欢戴的那顶皮帽和他的私人牙章。

当天下午，西北野战军就押着俘虏，带着战利品撤离了清涧。

刘戡的增援部队被阻击在距清涧约十公里的地方。西北野战军撤离清涧后，刘戡还是没敢进城，他围着清涧绕了一圈儿，把守备绥德和子长的部队接了出来，然后一起回延安去了。

听说廖昂被俘后吃不下睡不着，彭德怀找他谈了一次话并留他一起吃饭。警卫人员端上来一盆面条，廖昂惊讶地说："副总司令太艰苦了。早听说彭副总司令生活俭朴，万万没想到你就吃这样的饭，名不虚传！"彭德怀沉下脸说："这样的饭不好吗？中国老百姓吃不上这样的饭的有的是。我彭德怀吃这样的饭已经是享受了。你们这些达官显贵看到这样的饭大惊小怪，觉得难以下咽，正说明国民党腐朽透顶，注定要被人民打倒！"

清涧战役后，西北野战军主力北上，对陕北重镇榆林发动了第二次攻击，可最终还是以失利告终——数十年后，彭德怀在其《自述》中写到："第二次打榆林，只想到中央在米脂、绥德一带不安全，打下榆林就放心了，未考虑其他方向。"

鉴于胡宗南已把榆林地区的一部分兵力空运回西安，榆林只有守军九千余人，彭德怀认为再次攻打榆林的条件已经成熟。理由是："马军（马鸿逵部）不会怎样积极增援，胡（胡宗南）军来不及，以后又没有多少机会来打；打开了又可以得很多东西，这样一想，便以为大概可如意而得。"

最实际的动机，还是想得到粮食和弹药，解决部队的困难。

事实证明，彭德怀的判断有误。

十月二十七日拂晓，西北野战军内线主力部队开始了对榆林外围的攻击作战。

这时候，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在北平。接到驻守榆林的第二十二军军长左世允的急电后，他立即飞往张家口与傅作义商量对策。傅作义认为，胡宗南已经自顾不暇，而自己这里要防御的察绥防线过长，难以抽出更多的兵力增援榆林。最后，两人商定，从第三十五军中抽出暂编十七师的一个加强团，六千兵力由副师长梁泮池率领，与邓宝珊一起由包头乘汽车前往榆林。同时，傅作义亲自飞往宁夏，要求马鸿逵派兵东进陕北增援。

十一月二日黄昏，西北野战军第一、第六纵从城南、第三纵从城东和城北对榆林发动强攻。上次攻击榆林之后，国民党守军在城墙上加修了许多火力点，加上攻城部队准备的云梯长度不够，攻击刚一发起便严重受挫。用来攀城的二十多架云梯都被夺走，攻击部队出现很大伤亡。拂晓，从城北突进去一部分官兵，但国民党守军在军官的督战下挥舞大刀疯狂砍杀，突入的部队被迫退出。

三日凌晨，攻击部队强攻不成，改为坑道作业，试图以此接近榆林城墙实施爆破。此时，邓宝珊的增援部队已经到达榆林西北方向的扎萨克，马鸿逵的部队也已经向榆林出动。傅作义给榆林守军空投信件称："援军已到，正计划包围匪军。我们不仅要保卫榆林，并要将匪歼灭。此次榆林军民英勇坚决，固守名城，作义谨向诸君致深切慰问，并祝成功。"

西北野战军的第二次强攻开始了。由于测量不准，新编第四旅挖好坑道后，爆破点距离城墙还有四米，结果城墙没被炸开。独立第一旅的坑道爆破效果巨大，在城东南将城墙炸开一个宽二十米左右的缺口，但是缺口被炸开的瞬间，并没有部队进行冲击，突破口随即被敌人密集的火力封锁，攻城部队难以突破，缺口很快就被守军用沙袋补上。但是，两处爆破已使城内守军惊慌失措，以为共军顷刻就要攻进来了，一个士兵在混乱的大街上大喊："八路进城了！八路进城了！"

他的排长随即命令士兵射击，造成了城内居民的极大恐慌。在弄清楚共军并没有进城后，大喊大叫的士兵和命令开枪的排长都被枪毙了。

两次攻击不成，增援之敌接近，彭德怀不得不考虑打援了，于是决定留少量部队继续围城，第一、第三、第六纵队主力北进打邓宝珊部。但是，部队走到半路发觉情报不准，邓宝珊距离榆林尚有一段路程，而西面的马鸿逵部已经到达泥河，并仍在迅速向东推进。彭德怀立即改变作战部署，命令部队向榆林西北约三十公里处的元大滩迎击——两次攻城之后，向北急行军，再急促折向西，进入陕北与宁夏交界处的沙漠地带，部队官兵疲惫，粮食极度短缺。

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马鸿逵部本非国民党军嫡系。马鸿逵长期割据宁夏，盘踞一方，从来以拥兵自卫保存实力为原则。但是，这一次，因意识到榆林失守必会危及宁夏，在蒋介石的反复催促下，加上傅作义亲自请兵，十一月七日马鸿逵部主力出动了。增援部队为一六八旅、暂编第九旅、骑兵第十旅、宁夏保安第一总队的两个团以及炮兵和工兵等，总计三万五千余人，由马鸿逵的次子、整编十八师师长马敦静率领，辎重和给养由一千多匹骆驼组成的运输队驮运随行。

马军出动后，行军速度不快，但中途接到蒋介石空投的命令："此次援榆，关系西北全局和贤世侄（马敦静）父子前途，希加速进军。"马敦静顿时不敢懈怠。部队再往前走，与彭德怀部的一小队侦察骑兵遭遇，短促的激战后，侦察骑兵全部牺牲，马军在一个侦察员的遗体上找出一张字条，上面写着："马匪到达巴兔湾一带，只是骑兵一部，已停止前进，似不再东犯。"马敦静认为，由此看来，增援行动还没被彭德怀发觉——"老汉（马鸿逵）这步棋走得高，共产党到现在还不知道咱们的真实情况，今天夜里若平安无事，明天来个急行军，一冲就

可以进入榆林。等共产党知道我们来了，想调集兵力打也迟了。”于是命令部队急促前进。

马敦静的先头部队很快就在元大滩与彭德怀部主力遭遇了。

十四日，马敦静部进入元大滩，依托沙梁建起环形防御线。天一黑，却发现部队已被三面包围。晚十九时左右，西北野战军主力向马军开始了全面攻击。双方的步枪和机枪交叉互射，短兵相接后拼了刺刀、铁锹和洋镐。马敦静请求胡宗南派飞机支援，胡宗南回电说晚上飞机不能起飞。午夜，残酷的肉搏战仍在继续，核心阵地内部突然乱枪响起，过了好一会儿才知道，是一六八旅五〇二团营长李寿春的马脱了缰，饲养员追马时没有回答口令，结果自己人和自己人混战起来。凌晨两点，核心阵地附近的肉搏战逐渐平息。马敦静在惊恐中熬到天亮，拂晓时分西北野战军官兵撤退了，于是他立即命令部队西撤至巴拉素。

在巴拉素，马敦静给左世允军长发电报，询问榆林战况，并希望第二十二军出城接应。左世允回电说：“战况虽趋缓和，但共军仍兵围城下，榆林守军尚感不足，实无迎接之力。我们以大张出击之势，牵制共军以迎贵军。共军已成强弩之末，实不堪贵军一击。共军主力位于城东和城南两方面，榆溪河以西也有大部队。唯城北兵力薄弱，贵军从城北方面突进榆林较为容易。如从芹河沟之路突进，将共军压迫于西河方向，内外夹击，奏功更伟。即请垫高，以便策应。”马敦静看完电报，大为不满，对部下说：“他们已叫共军吓破了胆。我们自己干吧，万一进不去榆林就回宁夏。”马敦静决定部队由乌拉尔林滩方向绕道向榆林前进——对于彭德怀的打援计划来讲，这就意味着敌人从侧翼绕走了。马军在执行这个命令的时候，因为乌拉尔林滩在西北方向，官兵发现部队向西走以为是撤退了，先是掩护前进的骑兵团发生了混乱，接着是步兵纷纷夺路而逃。当面监视他们的西北野战军主力

突然向担任掩护任务的宁夏保安总队发动了袭击，当即俘敌两千多人。激战中，保安第四团团长弓长舒带百人往宁夏方向逃去，当晚在一个村庄里全部被俘。保安总队司令马全良带着几个随从从战场上逃脱，见到马敦静，哭喊着说：“部队改变路线，为啥不告诉我？让我在那里孤军作战，这是对我有意陷害。”马敦静说：“牺牲了小部不要紧，救出了大部还是你的功劳。”此战，马敦静损失了四千三百二十六人。

但是，马敦静绕道增援榆林的计划出乎彭德怀的预料，致使西北野战军主力围城打援的作战计划落空。

十八日，在榆林守军的接应下，马敦静部进入榆林城。

同时，邓宝珊部也从伊盟十八里台到达榆林。

至此，无论攻城，还是打援，战机已失。

第二次攻击榆林，西北野战军伤三千三百三十三人，亡六百六十八人，失踪三百三十四人。毙伤邓宝珊、马鸿逵部约五千人，俘虏一千八百零六人。

围困虽解，但心有余悸，蒋介石、胡宗南、邓宝珊、左世允都希望马敦静部留下来，“屯兵榆林，以观后变”。但是，马鸿逵坚决不同意，为了确保自己的地盘和实力，他要求马敦静立即回师宁夏。马敦静认为自己增援榆林建有大功，想借机向蒋介石和胡宗南取宠，所以并不愿意马上撤军，父子之间发生了激烈口角。邓宝珊为了防止马军擅自撤离，以控发给养为手段，吃一顿发一顿，让马军想走都走不了。当得知彭德怀移军三边之后，马鸿逵的态度强硬起来，他在报话机中对马敦静说：“你是我的儿子，就马上返宁。他们不发给养也要走，沿路可以宰骆驼吃，宰马吃，征蒙民的牛羊吃，我这边即派马承

贤骑兵队驮运粮食接你们。如果父命不受，咱们就从此断绝关系，我再也不管你了。”此刻，马鸿逵已经为出兵榆林感到了后悔，因为他的部队伤亡太大了，为此他抓紧实行“一官罚五”和“一兵罚三”的措施：凡是有战场失踪的，所在家庭必须加倍出丁入伍。普通百姓家哪有那么多的壮丁，于是出现了老老少少拼凑起来的部队，当地百姓称之为“冤枉团”。许多百姓为了证明自己的儿子不是逃兵，竟然不远千里跑到元大滩战场去寻找尸首。

马敦静带着部队回到了宁夏。

毛泽东走进了佳县县城。正逢赶集日，街上很热闹，他在羊肉摊边吃了碗羊杂碎，然后到白云山上的庙宇去赶庙会。他被一台山西梆子戏的唱腔吸引了，坐在板凳上看，后来人太多挡住了他的视线，他就站在板凳上看。他对随行人员说：“这戏叫《三官排宴》，戏里的老生就是杨四郎，老旦是佘太君，都唱得不错！”

山上的道观香火旺盛。毛泽东对身边的汪东兴说：“神学把神的意志无限夸大，说什么上帝创造和主宰着世界，说上帝用六天时间创造了天地万物和人，第七天造物完毕休息去了，你相信吗？”

毛泽东的口气显示出他是绝对不信的。

此刻，毛泽东只有一个信念：打倒蒋介石，创建新中国。

## 瑟瑟秋风中的反腐与作战

作为国民党中权倾一时的人物，陈诚在国民党内部始终处于毁誉参半的漩涡中。

陈诚，字辞修，号德馨，一八九八年出生于浙江省青田县高市乡外村。他的祖上世代为农家，父亲是晚清秀才，戊戌变法后在家乡任

新式小学校长。身为长子的陈诚自幼身材矮小，体弱多病，但性情顽皮，天资聪慧。小学毕业后，步行百里考取了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毕业那年已经十九岁，经同乡同学吴子奇介绍，与吴子奇的妹妹吴舜莲成婚。婚后他决心继续闯荡人生，以备取生的名义进了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直皖战争爆发后，保定军校停办，陈诚南下广州在粤军第一师服务。保定军校复课后，他拿到毕业文凭，被分配到浙江绍兴浙军第二旅六团三连当见习官，不久补为少尉排长。两年后，曾为保定军校教官的邓演达奉孙中山之命组建新军，陈诚前往投奔被任命为上尉连长，担负孙中山大元帅府的警卫。一九二三年，他跟随孙中山西征时胸部中弹在医院养伤，身材瘦长并同为浙江人的粤军参谋长到医院慰问伤兵，对他抚慰有加，这是陈诚此生第一次见到蒋介石。

一九二四年，黄埔军校成立。经任教练部副主任的邓演达推荐，陈诚入校任教育副官。由于他出身炮科，后又调任炮兵科教官兼炮兵队区队长。一天晚上，他正独自危坐攻读《三民主义》时，巡视路过的校长蒋介石推门而入，为其苦学精神十分感动，蒋介石拍着陈诚的肩说："好，好。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你努力吧！"黄埔军校成立炮兵营，陈诚被任命为第一连连长。一九二五年二月，国民革命军东征，蒋介石亲临炮兵阵地，见到陈诚出色地指挥炮兵轰开了淡水城城墙。三月，叛军陈炯明部以两万兵力反击，黄埔教导第一团千余人在棉湖附近抗击。蒋介石和苏联顾问鲍罗廷跑上炮兵阵地，朝陈诚喊："你的几门山炮都哑了吗？你这个炮兵连长也不想想办法，把炮架起来打打看！"右臂已经负伤的陈诚奔向炮位，亲自操作，连发三炮，炮炮击中陈炯明的大本营。蒋介石对鲍罗廷说："这个炮兵连长不错！"这一年九月，为了统一广州，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陈诚再次指挥炮兵为攻克惠州城建立殊功。战后，他被蒋介石提升为炮兵第二营营长。次年，再升第一补充师三团团长。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他率队攻克杭州、苏州、南京，升任二十一师少将副师长。一九二七年，国共决裂，二十一师师长严重因不愿屠杀共产党人解甲归田，陈

诚却向蒋介石表示“与钧座共进退”，七月他被提升为二十一师师长。一年后，又被蒋介石任命为总司令部中将警卫司令兼炮兵总指挥。

从进入黄埔军校到参加北伐战争，并非出身名门的陈诚由一个上尉连长升任中将司令，其间只用了短短四年的时间。

一九二九年，年仅三十二岁的陈诚任第一集团军十一师师长，他公开选拔军官，条件是：不贪财，不怕死，会带兵，能打仗，没有不良嗜好，忠于蒋介石。他的严肃治军使得十一师后来成为国民党军精锐主力之一。同时，他大量网罗黄埔军校毕业生，在国民党军中形成了日渐强大的黄埔势力。一九三〇年，当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中原大战决战时，陈诚率部首先攻克郑州，这时候他已升任第十八军军长兼十一师师长。反蒋战事暂时平息，由蒋介石夫妇做媒，辛亥元老谭延闿的三女谭祥嫁给了陈诚，已有家室的陈诚当即表示：“一切听从领袖安排。”他迅速与原配吴舜莲解除了婚姻关系，并在蒋介石夫妇的主婚下，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在上海再次结婚。

陈诚对国民党军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曾向蒋介石荐言：国民党军中派别复杂，编制混乱，各自为政，流弊百出，人事上多有门户之见，作战上多怀异己之心。“溯自袁世凯滥政以来，养成割据称雄、拥兵自卫、不顾国家民族之痼习”。这样的军队“实于国军统一团结有甚大之影响”，而且前途“不卜可知”。

“西安事变”发生，他随蒋介石同被张学良扣留在西安。他质问张学良：“你把老头子扣起来，把中国交给你，你有什么办法搞好？”张学良无言。日军侵入华北后，他向蒋介石坦言：“我国因军事落后，且未有充分作战准备，不宜实施迅速决战之战略。但我国国土广大，人口众多，经济资源分散在各地，具有长期作战之条件。故我国对日作战之最高指导方针，不能不根据优劣相反之客观条件，实施持久消耗战略。在此大方针下，国军作战之具体运用，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为

持久抵抗时期，第二期为敌我对峙时期，第三期为我总反攻时期。在抗战第一时期，国军对日寇之攻势，仅作有限抵抗；而后主动转进，以消耗敌人战力，保存我军主动，借以空间换时间，扩大战场，分散敌军兵力，以求达成提早阻止敌人前进，建立长期抗日力量之目的。”

陈诚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指挥淞沪会战。一九三八年六月，他又被任命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武汉会战。一九三九年七月，他上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驻守鄂西、鄂南、鄂北、湘西、川东等地，拱卫国民政府之陪都重庆，率部先后参加长沙会战、桂南会战、南昌会战、上高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一九四三年二月，他成为中国远征军司令官。当日军向河南、陕西、山西发动大举进攻时，蒋介石调任陈诚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于是他从滇西南急赴豫西指挥作战。

抗战结束后，作为国民政府军政部长，陈诚负责整个受降工作和对国民党军的整编工作。一九四六年六月一日，他出任国防部参谋总长。不久，四十五岁的陈诚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这是国民党军中除蒋介石外的最高军衔。

陈诚早已认定自己的一生必定要与蒋介石共命运。因此，他要求国民党军各级军官听到“蒋总司令”或“蒋委员长”的时候，都要立即肃静立正。他在国民党军中呼吁“服从统帅，信仰领袖”。但他强调：“我们认识领袖，信仰领袖，并不想利用领袖。”他把蒋介石比喻成“一块宝石”：“大家都是爱护宝石的，可是爱护宝石的出发点各人有不同，珠宝商想把它做成装饰品去赚钱，强盗想把它抢去变卖发财，只有正人君子，才能以晶莹坚润的宝石之种种德性为法而涵养其高贵的人格，完成其事业。”在国民党军中，陈诚素有“苦干、强干、硬干、快干”之称，他给自己制定了“三不主义”：“不耻过，不敷衍，不贪小便宜”。在长期的军事将领和高级幕僚的生涯中，他每每被蒋介石派往军

纪混乱、战绩不佳的部队和战区去，所到之处皆全心全意尽心尽责，成为国民党军中唯一与蒋介石没有任何间隙的高级将领。

一九四七年八月，陈诚再次充当了这样的角色。

这一次，蒋介石需要整肃的战区是东北。

林彪发动夏季攻势之后，国民党军在东北的军事形势每况愈下。

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充满着对中国东北地区前途的悲观情绪："处于惊惶失措中的国军正狂热地在各处构筑壕堑，心目中图以仅有的'马其诺'式的战略防御自卫。并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冷淡、怨愤与失败的情绪正在国军士兵中迅速扩展，造成投降主义与逃亡现象。""国军既遭损失又感精疲力竭、国军军官的豪华生活与士兵饷金和生活菲薄，待遇间的不均引起的愤恨日增，以致他们毫无兴趣在远离乡井的异乡与不友好的人为伍作战。"美国人对东北地区的行政长官熊式辉和军事将领杜聿明均不满意："熊式辉工作不得力，不能指挥所辖军队，杜聿明将军是中国东北部队的总指挥，可是他完全不能胜任。"如此一来，"危害已经造成，而且无法挽回。"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的评论更是充满了讥讽："国民党可以炫耀自己在东北取得了以下三大成就：一、它已经把美国所训练和装备的七个军的兵力至少断送了一半，并且还大大削弱了剩下部队的战斗力。二、它继续俄国人的洗劫之后，进一步把日本人遗留下来的强大的工农业经济破坏殆尽。三、它丧失了许多满洲人的好感，这些满洲人并未像台湾人那样起来造蒋介石的反，而是倒向共产党那边去了。"

为了挽救东北的战况，蒋介石决定：一、缩小控制地区以迁就现有兵力；二、归并东北军政指挥机构，以便统一权责。所谓缩小控制区，就是放弃一些外围据点，集中兵力固守大城市；而所谓归并东北

军政指挥机构，就是将东北行辕和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两套指挥机构合二为一。

蒋介石最初考虑，让华北和东北两个战区合并，让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兼任东北行辕主任。陈诚奉蒋介石之命数次到北平劝说，但是李宗仁坚决不干。

此时，陈诚正处在失意状态。多年来的得势使他在国民党内树敌颇多，特别是就任参谋总长以来，顾祝同、熊式辉、刘峙、汤恩伯、杜聿明等高级将领对他更添嫉恨，认为他目中无人，排除异己，偏重他的嫡系部队而对其他部队多有为难。内战爆发后，随着国民党军在全国战场上的接连受挫，作为参谋总长，陈诚不得不为作战失利承担舆论上的责任。虽然没有证据表明陈诚早存去东北之心，但是，这一年的四月间，他已秘密派人去东北调查熊式辉和杜聿明“贪污腐化”的证据。为此，熊式辉提醒杜聿明：“陈诚这个家伙现在窘极无聊，出坏主意。据可靠消息说，陈诚在关内指挥作战都失败了，想来东北出出风头，挽回他的面子，现在正想打我的主意。我走了你也难顶他，我们两人要想法子对付这个小鬼。”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二日，陈诚到达东北召集军事会议。当时，国民党军中盛传陈诚将要主政东北，但陈诚本人对此只字不提。在此期间，陈诚做了一件令熊式辉和杜聿明十分尴尬的事：在四平作战时，杜聿明曾请求蒋介石为坚守四平的第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和增援四平的第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分别颁发青天白日勋章和云麾勋章。由于当时新六军没有按照杜聿明的命令完成任务，因此他唯独没有为廖耀湘的新六军请功。而陈诚这次来东北，专门亲赴铁岭为新六军举行了补授勋章仪式，拉拢部队的意图十分明显。同时，在记者招待会上，陈诚用刻薄的语气表明，政治腐败和指挥失当是导致东北国军成为“瓮中之鳖”的主要原因。

熊式辉认定自身难保，连续给蒋介石写了七封辞职信。蒋介石一再复信，安慰熊式辉“以国事为重，继续主政东北”，同时表示“决不更动东北人事”。收到蒋介石的回信，熊式辉踏实了一些，正准备整军备战，国民政府的命令到了：撤销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长官部机构与东北行辕合并，任命杜聿明为东北行辕主任、郑洞国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又过了几天，国民政府的命令又到了：撤销熊式辉的职务，陈诚兼任东北行辕主任。此时，杜聿明因病情加重已离开东北。熊式辉深感被蒋介石和陈诚所捉弄：“我历来认为蒋是一个权谋家，但未料到会这样整我，以后谁再为他卖命？……陈诚是想在东北出风头打几个胜仗，以挽回他在蒋介石面前丢掉的信任。东北共军不是陈诚想的那么容易打……等着瞧他的好戏吧！”

八月初，陈诚带着从保定军校就一直追随他的亲信将领罗卓英到东北上任。没有人认为在治理东北军政事务上，陈诚会比熊式辉和杜聿明干得更好，尤其是东北籍的军官和士兵们。但是，陈诚自己决心大干一场。

陈诚做的第一件事是“反腐败”。

腐败是国民党军政官员的痼疾，无官不贪已是公开而普遍。陈诚连续撤换了包括辽宁省府主席徐箴，第五十二军军长梁恺、副军长刘玉章等人的职务。有人提醒，撤换将领也许会导致部队投奔共产党。陈诚的回答是：“谁要投，就让他去投。他今天投，我现在就缴他的枪！”针对东北部队纪律败坏、买卖武器、暗中经商、贪污勒索和滋事扰民的现象，陈诚派出督察组和点验组日夜严查，无一疏漏，最终将一批贪污腐败分子查了出来：汽车团团长冯恺倒卖军车汽油，日俘管理处少将处长李修业在办理日本人回国手续时大肆勒索钱财，少将参议刘介辉收编伪军时吃空额等等。这些人统统都被陈诚或是查办囚禁，或是拉到野地里枪毙。

陈诚对东北国民党军中的一种古怪现象大为惊讶，这就是各部队都在大城市里私设了“留守处”。所谓“留守处”，实际上是由各级军官派武装士兵看守的私人公馆或秘密住所。这些私人公馆或秘密住所里养着太太或者情妇，藏着贪污抢夺来的财物，还经营着各种各样的生意。陈诚发现，不管长官本人以及他的官兵驻扎在哪里，东北的每一支作战部队在大城市中都设有这样的“留守处”，上到司令、军长，下到营长、连长，仅沈阳市里为“留守处”服务的官兵竟多达两万五千余人。陈诚下令解散所有的“留守处”，其人员限期返回作战部队。陈诚还查出了很多只挂牌子和领取经费的“地方干部”，他们都是从被东北民主联军占领的乡镇流亡到大城市里来的，但仍以原来的地方机关名义“办公”，这些只拿钱不干事的“干部”统统被陈诚集中到了干训团，强迫他们接受政治和军事训练。还有大量被东北民主联军俘虏又释放回来的官兵让陈诚十分头疼，这些官兵游荡在沈阳等国民党军重点防御的大城市里，惹是生非不说，还为共产党做宣传。陈诚规定，所有被俘官兵必须接受集训，然后统一分配到一线部队，任何部队不准私自收留，更不允许在城市里游荡。

整顿风气的同时，陈诚开始了整军。他砍了许多由收编伪军组成的虚报编制坐吃空饷的保安队，把东北原有的九个保安司令部、十一个保安支队以及交警部队等扩编为十个暂编师，把骑兵支队扩编为骑兵师，并从苏北把第四十九军调入东北。这样，连同东北战场上原有的八个军，国民党军在东北地区的作战部队已达九个军。而且经过大力抓捕壮丁，原来缺额的部队也基本满员。陈诚将整个东北战区的部队重组为四个兵团：第一兵团，司令官孙渡，辖第六十、第九十三军以及秦葫港口司令部，一七二、一七四师，东北保安独立第一师，热北骑兵第九支队，骑兵第三军等；第二兵团，司令官陈明仁，辖第七十一军、新一军以及一七三师，骑兵第十师，保安第一、第二旅等；第三兵团，司令官周福成，辖第五十二、第五十三军以及一七一、一七七师；第四兵团，司令官廖耀湘，辖新六军、第六军以及一七五、

一七八师和骑兵第二军；东北行辕直属部队为：第十三、第四十九军，保安第六支队，暂编五十四师，第六补给区司令部以及炮兵、装甲兵、通信兵和辎重部队等，总兵力约五十万。

反腐整顿完毕，陈诚决心采取主动进攻的战略，迅速打破僵局，积极寻机与东北民主联军主力作战，以期收复整个东北。他的军事部署是：第六十军主力驻守长春外围之吉林、九台；新一军驻守长春、德惠、农安、公主岭地区；新六军驻守铁岭、沈阳和抚顺；第七十一军驻守四平；第五十二军一九五师驻守四平外围的梨树和八面城；第五十二军主力驻守营口、辽阳和本溪；第五十三军驻守昌图、西丰和开原；第六军驻守沈阳东面的抚顺和营盘之间；第四十九军驻守锦州；第九十三军驻守朝阳、北票和阜新；一八四师驻守沟帮子和大虎山；第十三军驻守承德、平泉、隆化和丰宁。

“陈诚很好，无畏而正直……能干而廉洁的将军，可惜去晚了，一年前就该把他派去。”美国人魏德迈说。

“东北的败征已见，全部沦陷只是时间问题，任何人都不能起死回生，陈诚更不是能够挽狂澜于既倒之材。”李宗仁说。

“很难说他有什么过人的天才，尤其在指挥大兵团作战方面，他是远不如杜聿明将军的，这一点在后来的东北战场上得到了更加充分的验证。”郑洞国说。

然而，陈诚对自己、对东北战局皆充满自信。

无法得知陈诚的自信来自何处。没有史料表明他在美国人或是蒋介石那里得到了什么具体的承诺，也没有史料表明他在物资和兵力上得到了特别的支持——陈诚良好的自我感觉的危险之处在于：他严重低估了自己的对手。

此时，东北民主联军的实力远远超出了陈诚的预想。

东北民主联军从建制零散、兵力薄弱、武器落后的被动状况，仅仅经过两年的艰苦时光，就已发展成为一支无论兵力、装备和作战能力都已具备惊人实力的部队，这在世界战争史上也堪称奇迹。

陈诚和蒋介石一样，完全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现实：在东北，国民党军只占据着少数大城市，就整个东北地区而言，广大的县镇乡村都在共产党人的掌控之下。于是，东北民主联军完全可以依赖东北得天独厚的人力和物力资源，迅速壮大自己的力量。就在陈诚扩充军队的时候，林彪也在迅猛地扩大着他的部队：原西满军区部队被编为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陶铸、参谋长高体乾、政治部主任袁升平，辖十九、二十、二十一师；原冀察热辽军区三个独立旅被编为第八纵队，司令员黄永胜、政治委员刘道生、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邱会作，辖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师；原冀东军区三个独立旅被编为第九纵队，司令员詹才芳、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中叔、参谋长彭寿生，辖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师；原独立第一、第三师和东满独立师被编为第十纵队，司令员梁兴初、政治委员周赤萍、参谋长黄炜华、政治部主任刘型，辖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师。经过扩编，东北民主联军已经拥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野战纵队，共二十七个步兵师，另外还有八个独立师、两个骑兵师、五个炮兵团，总兵力已达五十一万八千多人。

东北民主联军的总兵力，已与陈诚扩军之后的国民党军兵力大致相等。

更重要的是，东北民主联军的扩军一发不可收拾，其兵力增长速度十分惊人。

陈诚无法拥有的是林彪部强大的后备兵员。在整个东北，拥护共产党的所有翻身农民，都是东北民主联军潜在的士兵。在中共东北局的指导下，地方政权组织训练了大量的二线部队，数量达到七十多个团二十万人之众，这些二线部队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参加战斗或补充兵员。同时，东北乡村广袤而肥沃的土地为东北民主联军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官兵们个个新军衣、新棉袄，戴着暖和而又神气的皮帽子。一旦与国民党军接火，国民党军官兵对东北民主联军几乎使不完、用不尽的炮弹子弹感到十分奇怪，他们无法想象，共产党人在东北地区已建立起强大的军用物资筹集、生产和供应体系。东北民主联军的军工干部，都是政治坚定、性格坚强的共产党人，他们白手起家，艰苦创业，迅速建立起一大批能够有效地支撑战争进程的军工企业。一九四七年秋，从中共东北局写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其军工企业的规模：佳木斯以北的兴山：子弹厂、手榴弹厂和炼钢厂；鸡西：手榴弹厂、迫击炮弹厂、机械厂；东安：化学厂、电器材料厂；珲春：迫击炮弹厂；图们以北的石岘：手榴弹厂；齐齐哈尔：六零炮弹厂；牡丹江：修炮厂；哈尔滨：炮弹厂；辽东辑安：手榴弹厂、九二步兵炮弹厂、山炮弹厂。

八月，陈诚调兵遣将准备作战，以实现他对蒋介石的承诺："用六个月时间恢复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优势地位。"陈诚知道，如果不把北宁路锦州至沈阳段以西的东北民主联军部队彻底肃清，关内关外的联系就随时有被切断的危险，所以作战首先要从扫荡北宁路开始。郑洞国等将领认为："陈诚将军的意图从军事战略角度上讲，在一定意义上是有道理的。"

八月二十九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罗荣桓：

林罗：

未（八月）巧（十八日）电悉。（一）计划甚好，甚慰。（二）希望你们能于九月下旬开始作战，配合南线。（三）新的作战，似宜以有力兵团进攻山海关、沈阳线上之敌，以另

一有力兵团进攻中长线（哈尔滨至大连）上之敌，以求分散敌人，各个击破，重点放在中长路或山沈（山海关至沈阳）路，由你们酌定。（四）十分希望你们能于明年四月底五月初，以三至四个有力纵队开始平绥线（北平至包头）上之作战，首先在张家口、北平间打开一个缺口，将大量山野炮弹及黄色炸药向南线各军输送。他们对此如大旱之望云霓。（五）最艰苦之战争是在南线，这里负担了对敌军主力一百五十七个旅之作战［北线为七十个旅，其中东北占二十六个旅］，而山东、苏北大部已被敌占。中央必须留在关内，我亦暂时不能离开。

毛泽东

二十九日十七时

林彪、罗荣桓决定发起秋季攻势：首先以冀察热辽军区主力向北宁线发动攻击，切断关内与关外的联系，然后趁国民党军西援之机，出动北满和西满部队主力攻击中长铁路，在长春与四平之间寻找歼敌战机。为了加强作战指挥，林彪、罗荣桓决定成立两个前线指挥部：辽东军区组成第一前线指挥部，司令员萧劲光、政治委员萧华，统一指挥南满的第三、第四纵队以及三个独立师；冀察热辽军区组成第二前线指挥部，司令员程子华、政治委员黄克诚，统一指挥第八、第九纵队以及北宁线上的作战部队。

辽西走廊，一片狭长的丘陵地带，北宁线和锦承线穿越而过，是连接东北与华北的交通要道。九月六日，陈诚为“确保辽西走廊之安全，彻底解除北宁铁路之威胁”，以暂编五十师（欠一个团）为左路，以暂编二十二师（欠一个团）为中路，以暂编六十师为右路，分别从绥中、锦西、义县向建昌方向攻击前进，以肃清北宁线上锦榆段附近的东北民主联军部队。

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前线指挥部决定，以第八纵队歼灭暂编二十二、五十师，吸引锦州外围方向的第九十三军增援，然后投入第九纵队，合力围歼第九十三军主力。

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第九纵队，都是刚刚组建的部队。这两个纵队之前一直处在东北与华北之间的咽喉地带，长期以来，既要保持关内关外联系通道的畅通，又要保障出入东北的干部、家属和部队的安全。因为生活艰苦，战斗频繁，供应不足，特别是丢失了承德和赤峰等城市之后，部队一直处境艰难，无论兵力还是装备，都无法与北满主力相比。官兵们心里憋着口气，总是觉得仗没打好，总希望能打个胜仗提提气。划归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之后，要打组成新纵队的第一战了，官兵们个个劲头十足。

八纵的部署是：以二十四师和二十二师的一个团等部队，由二十四师师长丁盛指挥，歼灭三道沟、大小白石水之敌，限十三日黄昏开始行动；以二十三师进至药王庙，十四日凌晨派出一个团到黄土岭一线控制高地，保障丁盛部侧翼的安全；以独立第一师集结于六家子，伸展部分兵力至青石岭、香炉山一线监视敌人；以二十二师主力两个团在十八台一线集结待命。

十三日夜，二十四师七十二团在预定战场三道沟没有发现敌人，而二十二师六十六团因为走错了路不知战场在哪里。两个团正在彷徨之中，梨树沟门村方向传来激烈的枪声，于是来不及等待命令，部队便往发生战斗的方向奔跑。原来，二十四师师部在梨树沟门村与国民党军遭遇了。侦察员判断敌情后报告说，遇到了敌人的“花子队”（地方武装），顶多两千多人。丁盛立即命令部队扑上去。官兵们打起来才发觉情况不对，在猛烈的火力阻击和有组织的反复冲锋下，先头部队的一部分官兵竟然被敌人冲散了。紧急核实情报后才知道，当面的三千多敌人就是预定的攻击目标：敌暂编五十师的主力。丁盛正焦急的时候，七十二团和六十六团先后到达战场，八纵在局部形成了兵力上的绝对优势，丁盛遂下令发动进攻。暂编五十师支撑不住向大屯方向退却，丁盛集中三个团围歼了暂编五十师的第二团，然后又集中兵力围歼第一团，结果混乱中让第一团跑了一部分。这一仗让八纵司令

员黄永胜有点后悔，如果情报准确，在梨树沟门村投入两个师，肯定就把暂编五十师包饺子了。

暂编五十师在梨树沟门村吃了亏，已经到达新台边门村的暂编二十二师急忙撤退，一下就退到了距锦西不远的杨家杖子。这里是山间谷地，谷地里有一大片当年日本人开铝矿时留下的房子。暂编二十二师在这里集结后准备撤往锦西。

八纵跟踪而来。

十五日夜，二十三师首先赶到杨家杖子，立即以一部兵力胶着敌人，主力相机占领外围要地，切断了暂编二十二师的退路。但是，二十三师的电台与纵队失去了联系，第二天早上纵队才知道情况。黄永胜立即命令二十二师和独立第一师赶往杨家杖子，与二十三师合力吃掉暂编二十二师。同时，他命令刚在梨树沟门村打完仗的二十四师迅速进至杨家杖子以东，阻击可能从锦州方向增援的敌人。

十六日下午，八纵从三个方向向杨家杖子发动了攻击。各攻击方向的爆破组连续爆破之后，暂编二十二师仓促构筑的防御工事纷纷被毁，国民党军只抵抗了一会儿便开始向南突围。由于迂回包抄的部队速度不快，部分敌人逃出了八纵的包围圈。两小时后，战斗基本结束，暂编二十二师（欠一个团）大部被歼，少将副师长苏景泰和少将参谋长宁坚以下两千五百余人被俘。

消息传来，陈诚既意外又吃惊，决定驻守锦州的第四十九军向杨家杖子出击。郑洞国等大部分将领都反对这个出击计划，认为此时共军大部兵力集结在锦西地区，第四十九军孤军深入有被歼灭的可能。作战会议就此争论激烈，最后陈诚寡不敌众，被迫收回了自己的命令。但是，军事会议结束之后，陈诚还是向第四十九军军长王铁汉下达了出击杨家杖子的作战命令。

十九日，王铁汉率第四十九军的七十九、一〇五师（各欠一个团）共一万余人到达杨家杖子。

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前线指挥部责成黄永胜统一战场指挥，并命令詹才芳的第九纵队火速赶到战场参加战斗。

二十一日，杨家杖子第二次战斗开始。

八纵各路攻击部队向当面敌人展开了攻击。但是这一回官兵们感到对手不太一样。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军的前身是东北军警卫部队，“九一八”事变后改编为一〇五师，张学良任师长。抗日战争中，该部参加过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和长沙会战等战役，颇有战功。内战爆发后，该部先在苏北地区与陈粟部作战。一九四七年八月，陈诚到东北上任后，将该军调至东北战场，驻守锦州。与暂编二十二、五十师相比，第四十九军战斗力强劲，火力也十分猛烈。

八纵各部队爆破均未成功，反复攻击也没有进展，第四十九军用强大的火力封锁住前沿，而且还不断发起猛烈的反击。战斗进行了一个下午，八纵仅仅攻占了杨家杖子周边的几个外围阵地。晚上，天下起了雨，八纵借着雨势重新发动攻击。二十三师六十九团二营击溃了当面敌人的一个营，占领了第四十九军侧后的高地，对王铁汉的军部构成了威胁；二十二师在夺取杨家杖子东北和西北的外围堡垒之后，一部分官兵一度突进了杨家杖子。王铁汉的部队被压缩在杨家杖子和毛家屯两个村庄里，防御体系并没有受到致命的破坏，依旧有相当强大的防御和反击力量。王铁汉要求把共军的攻击部队放进前沿之后，立即组织猛烈的反击，逐次消灭共军的有生力量。第四十九军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兵懂得军长的意思，仗打得一退一进很有节奏，与八纵和九纵形成了残酷的拉锯战。

二十二日，在陈诚的命令下，防御锦州的国民党军全部主力——第四十九军二十六师、暂编六十师和暂编二十二师各一个团出动，增援杨家杖子。陈诚的意图很明显：用王铁汉的第四十九军把共军黏住，等增援部队到达后进行猛烈夹击，将共军辽西地区部队就地全歼。

陈诚的增援部队走到虹螺岘、五岭山一线时，遭到八纵二十四师和九纵二十六师的顽强阻击。

这时候，八纵对杨家杖子的围歼战已进行了一昼夜。这一带人烟稀少，粮食接济不上，官兵们只能在战斗间隙挖红薯和弄点生玉米吃。敌人的增援十分坚决，如不迅速解决战斗，很可能会陷入被动。黄永胜意识到，战斗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敌我双方就看谁能坚持到最后一刻了。他给各部队下达了“完不成任务者，按级执行军纪”的最严厉的命令，要求部队立即再次对杨家杖子发动攻击。八纵集中了所有的火力掩护突击部队向前运动，在投入两个团的预备队之后，二十二日下午十七时，八纵官兵将国民党军逐渐压缩在了狭窄的地段内。第四十九军开始突围，后面是八纵的穷追猛打，前面是九纵二十五师的拼命截击，国民党官兵纷纷缴械投降。

王铁汉带着百人卫队，脱离战场侥幸逃生。

从梨树沟门村到杨家杖子，八纵和九纵连打三仗，总计歼敌一万两千多人，除各种物资之外，缴获的武器足够装备两个团。战斗结束后，他们在当地民兵的配合下，“采取铁路大翻身破坏法”，彻底破坏了锦州至山海关之间的铁路，再次切断了国民党军关内与关外的联系。

本想使北宁路更加安全，没想到现在反被截断了，愤怒的陈诚再次部署打通北宁路，与东北民主联军于辽西地区进行决战。但是，部

署还没有落实完毕，林彪部主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十纵队突然开始了突袭中长路的战斗。就在第八、第九纵队在辽西发动攻势的时候，陈诚命令驻守铁岭的新六军的两个师乘火车增援锦州，同时请求华北的傅作义派兵北上。新六军主力的出动，造成了中长线的兵力空虚，林彪认为战机已至，遂命令各部队轻装向中长线奔袭前进。

韩先楚的三纵日夜兼程一百公里，于十月一日攻击了开原以北的威远堡，在夺取外围阵地之后，七师十九团主攻第五十三军一一六师师部所在地——天王山高地。连续攻击未果之后，二日傍晚，十九团重新组织战斗。三纵所有的火炮向一一六师师部轰击，攻击主峰的是一营三连。三连的两个排负责迂回，一个排担任正面攻击，班长庞国兴率领突击组奋勇冲锋，冲上主峰后俘敌二十余名，缴获机枪三挺。战后三连立大功，奖旗上写的是“攻下险要阵地，决定全面胜利”。一一六师师长刘润川见大势已去，率残部向西南方向突围，但遭到猛烈的阻击。刘润川换了便衣逃进高粱地，很快就被三纵官兵搜查了出来。

接着，第三、第四纵队逼近了开原和铁岭。

国民党军开始迅速收缩，收缩的速度十分惊人，新六军主力一天之内返回了铁岭，林彪随即放弃了攻击开原的计划。

在陈诚的请求下，蒋介石将原驻守华北的第九十二军二十一师，第九十四军四十三师，第十三军五十四师，暂编第三军十、十一师以及骑兵第四师调出增援东北。华北国民党军北上增援部队由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指挥。侯镜如吸取了王铁汉的教训，大部队缓慢推进，绝不分散兵力，致使东北民主联军始终没有战机可寻。

十月中旬，国民党军重新打通了北宁路。

十一月九日，林彪下令东北民主联军秋季攻势结束。

林彪于一九四七年秋发动的一系列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军正规军三个师部、两个师、九个团，总计四万七千余人，非正规军一个师部、两个师、十个团加三个营，总计两万两千余人，合计六万九千余人。缴获各种火炮一千零五十一门，各种枪支近八万支（挺），各种枪弹二百七十六万发，手榴弹十二万枚，汽车三百一十一辆。东北民主联军再次把控制区域扩大了近四万平方公里。

一九四八年元旦，陈诚在他发表的“告东北军民书”中说：“目下国军已经完成作战准备，危险期已经过去。”

他的话音未落，林彪部的新一轮更加猛烈的攻势又开始了。

也许陈诚真的不清楚，此时不仅仅是东北地区，在整个中国的各个战场上，国民党军的“危险期”已经来临。

东北凛冽的风雪使陈诚这个浙江人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寒冷。

陈诚不会想到，这是他在中国东北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冬季。在林彪大军的席卷下，他很快就丢了东北军政最高指挥官的职位，被蒋介石派到遥远的台湾去建立“后方基地”——而蒋介石对陈诚的这一任命，已经成为诠释国民党政权“危险期”是否来临的一个极具意味的象征。

## “他们也未必愿意永久打仗”

一九四七年冬天来临的时候，共产党人萌生了攻击和占领一个国民党军设防坚固的大城市的念头。这种念头在过去的一年中还是不可思议的，因为那时他们在国民党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下，被迫退出了所有已经占据的大城市。

令聂荣臻产生这一念头的那座大城市是石家庄。

石家庄那时名为石门，它犹如楔进华北解放区腹地的一颗钉子。可以说，自正太战役开始，晋察冀部队在华北地区发动的每一场战役，都有孤立它的意图。聂荣臻对夺取这座城市几乎到了朝思暮想的程度，因为拔掉这颗钉子，就割断了国民党军队山西与中原、华北与山东之间的联系，就可以把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接起来。那样一来，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就真的可以在华北地区自由驰骋了。

清风店战役刚刚结束，聂荣臻立即意识到，石家庄四周全是解放区，这座城市已经成为深陷于解放区内部的一座“孤岛”。十月二十二日，他与萧克、罗瑞卿、刘澜涛四人联名向中央军委发去了攻打石家庄的电报：

> 敌第三军军部直属队，率第七师全部及第二十二师之第六十六团［共四个团及一个军部和一个师部］在定县、望都之间被我包围，经两昼夜激战，已于今晨被我全部歼灭［内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已被活捉］。现石门仅有三个正规团及一部杂牌军，我拟乘胜夺取石门。军委是否批准此方针，请即复。

他们的作战理由是：“石家庄没有城墙，守军只有三个团，周围二十公里长的战线，第三军正、副军长被俘，内部动摇，情况也容易了解。乘胜进攻，有可能打开，即使打不开，如能诱使第十六军等部南援，在石家庄、保定之间将其消灭，也是十分有利的。”

但是，石家庄终究是国民党军自内战爆发以来重点防御的大城市。

对这样规模的城市发动攻击，晋察冀野战军并没有十分的把握。

更重要的是，晋察冀野战军在清风店战场上缴获了一份《石家庄半永久防御工事、兵力部署及火力配系要图》，从这份要图上看，石家庄的防御不像想象的那么薄弱。

石家庄之所以没有城墙，是因为它是近代才逐渐形成的一座城市。一九〇〇年平汉铁路穿过这里，并设立了一个小车站。而此前，这里仅仅是河北获鹿县的一个小村庄，相传只有十来户人家，十来户人家都姓石，所以名叫“十家庄”或“石家庄”。一九〇三年这里成为正太铁路的起点，一九〇七年铁路通车后设立了铁路局，自此商贾云集地面繁华。石家庄在华北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平汉、正太和石德三条铁路交会于此，这里西出太原、东接山东、南连豫鄂、北通北平，扼守着太行山和华北平原。内战爆发后，石家庄成为国民党军在华北战场的重要战略依托，驻守城中的第三军连年修筑城防工事，虽然该城没有城墙，但第三军还是围绕城市边沿修筑了三道防御体系，碉堡总数达到六千多个。第一道防御体系，是当年日军修筑的封锁沟，沟深三米、宽两米、周长约为三十多公里，沟外设有地雷群、铁丝网、鹿砦等防御设施，沟内设围墙、电网，每隔数十米筑有碉堡一座，碉堡、暗堡和交通壕、散兵坑彼此相连。第二道防御体系，是以环绕市区的大建筑物和北兵营为依托构成的内市沟，内市沟宽五米、深五米、周长为十八公里，沟内修筑有碉堡和地堡组成的工事，还筑有一条周长二十五公里的铁路，上有铁甲列车昼夜巡逻，犹如活动的堡垒。第三道防御体系，是以市区的正太饭店、大石桥、铁路工厂、电灯厂和火车站构成的核心阵地，阵地上部署着严密的火力网。

虽然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已率主力离开了石家庄，但城内的留守总兵力依然高达两万五千多人。其中，三十二师主力和第三军直属的两个坦克连、一个山炮连、一个汽车连和一个野炮营配置在第二、第三道防线上；外围的第一道防线由石家庄外围十九个县的地主武装防守；国民党河北省保安第五、第九、第十团分别负责防守元氏、获鹿以及大郭村机场等要点。守城部队由三十二师师长刘英统一指挥。

刘英认为，晋察冀部队没有飞机、坦克和重炮，就连山炮和野炮都不多，想攻下石家庄这样的大城市，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凭石家

庄的工事，国军可坐守三年。”刘英的自信还来自蒋介石对他的承诺：“共军若敢进攻石家庄，兄当亲率陆空大军前去支援。”——刘英也知道这种承诺不可能兑现，但这无疑是一个小小的师长能够得到的最高礼遇了，他已经受宠若惊。还是身在保定的孙连仲做了点实在事，他给刘英空运来了一个步兵团、一个炮兵排以及八吨弹药。

二十三日中午十二时，毛泽东复电晋察冀野战军：

清风店大歼灭战胜利，对于你区战斗作风之进一步转变有巨大意义。目前如北面敌南下，则歼灭其一部，北面敌停顿，则我军应于现地休息十天左右，整顿队势，恢复疲劳，侦察石门，完成打石门之一切准备。然后，不但集中主力九个旅，而且要集中几个地方旅，以攻石门打援兵姿态实行打石门，将重点放在打援上面。

毛泽东设想的是“围城打援”，与聂荣臻的设想有出入，但是聂荣臻下定决心要占领石家庄：“我们也知道石家庄是设防城市，可是设防再坚固，也要兵来守，兵不多是不行的，再说即使打不下来，也没有什么危险，四周都是解放区。何况不论从兵力上、士气上看，打下的可能性很大，所以决心打石家庄是对的。”

二十五日，晋察冀野战军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讨论和部署攻打石家庄的作战计划。三十一日，年过六旬的朱德亲自来到会上，他对野战军的干部们说：“今天到会的都是旅以上干部，你们如何学会攻坚战术，对这次作战将起重要作用。要把石家庄当作一所难得的大学校，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他如同老教员一样，讲授如何打地堡和暗堡，如何迫近作业和坑道作业，如何集中火力支援突击队，如何避免过大的伤亡。朱德说：“打下石家庄，可以学会打攻坚战，学会打大城市。”为了加强攻击时的炮兵力量，他还特地从华东野战军调来一个榴弹炮营。朱德对晋察冀军区炮兵旅的干部们说：“炮兵很重要，为步兵开辟道路，可以减少伤亡，炮不打，口不开，打开缺口可以胜利向纵深推进，扩大战果……打炮时要猛，要突然，火力齐整集中，集中里

面还要再集中，还要注意运用不同地形实施射击，不打则已，一打就打得猛，打得准，打得狠。步、炮协同好，胜仗不断打。”

晋察冀野战军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攻击石家庄后，如果国民党军抽调主力南下增援，就在半路歼其一部，然后继续攻城；如果国民党军不增援，则一举攻克石家庄。为此，决定集中第三、第四两个纵队和冀中军区独立第七、第八两个旅、冀晋军区独立第一、第二两个旅和炮兵旅，共五万六千人攻打石家庄；以第二纵队和独立第九旅、第三、第九军分区部队在定县南北地区展开，构筑阻击工事，准备阻击援敌。攻击石家庄的具体作战部署是：第三纵队从西南、第四纵队从东北担任主攻；冀中军区部队从东南、冀晋军区部队从西北担任助攻。炮兵分成四个炮兵群，第一炮兵群以山炮、野炮和迫击炮二十四门配属第三纵队攻击方向；第二炮兵群以山炮、野炮、战防炮、重迫击炮和榴弹炮十七门，配属第四纵队攻击方向；第三炮兵群以野炮和迫击炮十五门，配属独立第七旅；第四炮兵群以山炮、野炮十二门，为炮兵指挥所机动火力。

晋察冀野战军的精心准备，体现出他们首次攻击大城市前谨慎的心态。官兵们反复斟酌攻坚作战的每一步：如何挖掘坑道、如何把炸药送上去，如何破坏鹿砦和电网，如何巩固突破口……登城的云梯如何才能轻便而结实更是让他们彻夜难眠，最后他们研究出一种可以折叠的“合页云梯”，下半部靠在沟的外沿，上半部可以折到内沿的墙上，上面铺上木板，可以迅速通过大量人员。三纵一个名叫刘维春的战士琢磨出一种巨大的弹弓，可以把炸药包弹射出去，对破坏铁丝网和碉堡效果奇好。而何增奎排长发明的九二重机枪夜间瞄准器，实际上就是个白铁皮卷成的大喇叭，但确实好用，不用标尺但准确度极高。听说守军的内市沟里有铁甲列车，列车是快速活动的，很不好打。侦察员多次潜伏侦察，最后计算出提前瞄准的办法：列车的速度是每秒八至十米，一千二百米的射击距离，炮弹飞行时间约两秒，事

先瞄准沟内的一棵大树，等列车到达二十米之外另一棵大树的时候开炮，炮弹就能与列车正好撞上。为了让炮火更猛烈和更突然，炮兵们竟然把火炮秘密地推到了最前沿，不但将炮身埋入了地下，上面还铺上了各种伪装，只待攻击命令一下，炮口就能突然伸出来射击——这些年轻的战士，都是解放区内的翻身农民，他们身上聚积了太多的战斗热情，当他们把自己的发明和建议向朱德总司令汇报时，朱德微笑着对他们说："我们很快就要接二连三地攻打全国所有的大城市了，你们的每条建议都是革命的宝贵财富！"

此刻，同样在进行作战准备的是解放区内的几十万百姓。不到十天，近十万民兵、民工和万余副担架、万余头牲口、四千多辆大车、八万多发各种炮弹、一百五十多万发各种枪弹、六万多斤炸药、二十多万斤各种攻坚器材以及二十四万斤主副食被送到了前线。

十一月三日，晋察冀野战军攻击部队相继渡过滹沱河，完成了对石家庄的包围。

六日凌晨，外围攻击战开始。冀晋军区独立第一、第二旅猛烈攻击机场，国民党守军在飞机的掩护下数次反击，但最终无法控制局面。七日拂晓石家庄机场被独立第一、第二旅占领。同时，四纵十旅的攻击目标是外围的云盘山据点。云盘山不是山，是距离外市沟仅六百米的一个大土堆，是石家庄外围唯一的制高点，顶部平坦并建有一座庙宇，守军仅为一个连，但筑有三层钢筋水泥地堡，还有地道直通市区。四纵十旅第一次攻击时，爆破组用二十五公斤炸药把云盘山地道口炸开了一个缺口，突击组刚一冲上去，就受到国民党守军的猛烈火力压制。十旅政委傅崇碧换了个突击连，连夜组织挖壕沟，直至在守军的地堡下放置了几百斤炸药。八日凌晨，十旅再次攻击，在炮火的配合下，伴随着巨大的爆炸声，突击部队冲上了山顶。傅崇碧亲自走上山顶察看守军的地堡，发现果然坚固，炮弹只在地堡上打出了一

片白点，而自己的部队得以冲上来是因为炸药威力巨大，地堡里的国民党守军一个不落都被震昏了。

石家庄外围据点被肃清之后，攻击部队采取土工作业的办法逐步迫近守军的第一道防线。外市沟防线实际上就是石家庄的外围地下城墙，环行的开阔地沟里布满了地堡和电网，并有地面和空中的交叉火力配合拦截。八日晚，三纵七旅首先在西兵营爆破成功，将外市沟炸开了一个大缺口，二营突击进去夺取了守军的前沿阵地。接着，四纵十旅在云盘山以西突破，十二旅也从西北方向突破，冀晋军区部队突破后占领了高柱村、市庄、柏林庄，冀中军区部队自东南方向突破，包围了元村和彭村。至九日，除了少数据点之外，石家庄外市沟防线已被全部突破。

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命令，派少数兵力继续围困和攻击剩下的几个据点，其余所有部队迅速向第二道防线推进。

内市沟的第二道防线由国民党军三十二师主力防守。

为了接近守军前沿，大规模的土工作业又开始了。无法设想那是一个何等奇特的景象。从上千米之外向攻击目标挖壕沟和坑道的攻城战法，在人类战争史上极其古老。挖掘的过程中没有枪炮之声，夜幕下四野一片寂静，但挖掘却以巨大的规模进行着。支持晋察冀野战军作战的民兵都是精壮的农民，他们拿着自家打理田地的农具，带着母亲或媳妇准备的干粮，从四面八方会集到石家庄城外。与他们一起挖掘的还有晋察冀野战军官兵，这些官兵本来就是农民，他们与土地打交道的本领几乎是天生的。在石家庄第二道防线外侧约两千米的开阔地上，成千上万的战士和农民挥汗如雨，却悄无声息。晋察冀野战军官兵把这种作业称之为“改造地形”：他们挖出又宽又深又长的坑道，密密麻麻地伸向国民党守军的前沿，挖出的土则用来填塞守军的防御壕沟。他们还要在坑道中挖出各种各样的掩体，挖成单人掩体后再挖

成井筒再掏成丁字形，使通道与掩体互相连接。当坑道挖到靠近守军防御阵地和防御壕沟时，他们就挖出一个巨大的炸药室，然后放进去数千公斤的黑色炸药。工兵部队的技术人员趴在坑道上面一遍又一遍地计算着土层的厚度和炸药的威力，以达到他们设想的最理想的爆破效果。

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国民党守军从前沿的壕沟里探出头来一看，不禁魂飞魄散，有人立即进城向师长刘英报告。刘英无论如何难以置信，等亲自来到前沿着实吓了一跳。他弄不明白共产党军队到底用了什么办法，到底使用了多少人力，一夜之间在他的第二道防线外侧挖出了如此密集而绵长的交通壕。更可怕的是，一夜之间自己的部队竟然没有捕捉到任何动静。刘英知道大事不好，他立即跑回指挥部，向石家庄周围各友邻部队连续发出四十多封求救电报。然而，等天大亮的时候，刘英更加恐惧了，因为除了保定的孙连仲回电让他“固守待援”之外，北平和南京方面竟然没有任何回音。

炮声响起来了。

爆炸声惊天动地。

大口径榴弹炮压制守军纵深，山炮打碉堡，平射炮和步兵炮打地堡，迫击炮轰击守军前沿。攻击部队炮火准备的猛烈程度，在晋察冀野战军历史上前所未有。

一个名叫魏巍的前线记者记述了二十三团突击四连的战斗：

十一月十日，暗淡的落日，照着石家庄。尽管敌机来回地扫射轰炸，我军已经以各种形式的阵地，迫近了敌第二道防线五十多米的距离。四点，总攻的炮声开始响起。密集的炮火连续排射，引起了整个战壕兴奋的骚动。大家挤着、看着、指着、叫着。眼看这道两丈多深，布着电网的深沟的里沿上，那些用铁轨构成的密密的地堡和密密的枪眼，顷刻都被烟雾罩住。这时，同志们纷纷脱下棉衣，有绑鞋带的，紧腰的，还有人就在鞋底上磨起刺刀来。

战壕里贴满了花花绿绿的标语："坚决解放石家庄！""打到哪里占到哪里！""打进去就不出来！"

三纵八旅二十三团首先爆破成功。他们的地道是斜着向下挖的，一直挖到国民党守军内市沟的下面，官兵们用一口大棺材把炸药运了进去。炸药被引爆的那一瞬间，深深的内市沟先是土石向天空腾起，然后纷纷落下使沟壕变成了缓坡。冲击部队的官兵蜂拥而上，刚刚落下的泥土十分松软，前面的官兵一踏上便陷了进去，后面的官兵停不下来，只有踩着他们的身体前进。在血肉铺成的突破口上，八旅的四个团潮水一样冲击上去。傍晚时全旅攻入第二道防线，占领了东里村和西南兵营。

四纵十旅二十九团二营六连指导员王鸿禧，是晋察冀野战军著名的战斗英雄，六连长在保北战役中牺牲之后，连队军事指挥员的职位一直没人接任，王鸿禧决心带领全连再立战功。战前，他带着三排长阎连喜和八班长张喜顺到内市沟前沿侦察，阎连喜和张喜顺都曾在驻守石家庄的国民党军第三军里当过兵。张喜顺说，当年在国民党军当兵的时候，他"在内市沟里垒过砖头"，因为站岗的时候他的连队跑了三个兵，连长说是他放跑的，在禁闭室里关了半个月，拷打的伤口溃烂化脓，疼得他死去活来。巧的是，逃跑的三个士兵中，一个被打死了，一个被抓回来枪毙了，只有一个成功地跑到了解放军队伍里，这个士兵就是现在的三排长阎连喜。侦察的时候，王鸿禧就觉得八班长的情绪不对劲，果然，战斗一打响，张喜顺打疯了一样，挎着只装满手榴弹和炸药包的荆条篮子拼命往上冲。攀登的梯子被炸断了，他跌落下来浑身是血，但爬起来继续投手榴弹，边投边喊："同志们！冲呀！别让王八蛋们跑了！"卫生员上来了想给他包扎一下，他把卫生员推到一边，顶着火焰喷射器喷出的火焰一寸一寸往前爬。六连的官兵个个打红了眼，一个战士从一个死去的国民党兵身上扒下军装穿在自己身上，然后孤身一人跑进敌人的一个大碉堡里，碉堡从里面爆炸了，砖石瓦块冲天而起。爆炸声平息下来，指导员王鸿禧冲过去查看

了一番，他把一支手枪递给了已经站不起来的张喜顺：“你恨的那个连长被打死了，这是他的枪。”

随着各路攻击部队的全面突破，战斗随即在城中的第三道防线展开，交战双方逐屋逐房地争夺。十旅政委傅崇碧带领两个侦察连深入市区。他们在混乱陌生的市区里摸索了两个小时，午夜时分占领了一座高高的水塔。傅崇碧命令其中的一个连继续向前摸索。不久，侦察员气喘吁吁地跑回来报告说，他们捉到了三十二师的师长和副师长。傅崇碧不相信，战斗还在激烈进行，怎么就捉到了最高指挥官呢？他急忙赶过去，用手电筒一照，俘虏中确实有两个将军，一个是三十二师师长刘英，另一个是副师长杉定颐。原来这个连向前摸索的时候，竟然摸到了大石桥附近的守军指挥部。

傅崇碧对刘英说：“我代表解放军前线指挥部命令你，立即写信让你的部队投降。”见刘英没有理睬，傅崇碧火了，拔出手枪哗啦一下顶上子弹：“不写就枪毙你！”刘英写了，并让他的参谋给各部属送去。

十二日中午十一时，石家庄国民党守军停止抵抗。

接着，冀中军区第七、第八旅攻克了元氏县城，毙伤俘获守军河北保安第五团五千余人，击毙团长魏永和。

至此，石家庄及其附近地区全部被晋察冀野战军攻占。

此役，晋察冀野战军伤五千零九十人，亡九百八十八人，失踪六十九人。国民党军死伤三千一百五十六人，被俘两万一千一百三十二人。

蒋介石说：“这是我们重要都市第一次失陷。”

共产党人将这座城市由“石门”更名为“石家庄”。

从军事角度讲，在晋察冀野战军攻击这座地理位置极其重要的大城市的行动中，国民党军方面竟然毫无作为，不但没有任何增援的举动，甚至连这个想法都没有，这着实令人不可思议。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华北这个重要的铁路枢纽一旦丢失，将对全国战局产生攸关影响，况且这里是距北平最近的一个重要军事堡垒。国民党方面如果不是决定放弃的话，他们的无所作为还能有什么更合理的解释呢？问题是：在全国战局正处于极其微妙之际，石家庄如此轻易地失守，军事上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第一次走进了大城市。

晋察冀野战军发布了进入石家庄的"约法九章"：

……力争解放石家庄与保证入城纪律优良，此为各参战部队的两大中心任务，望各级首长负责，全军努力，充分顺利同时完成。为此发布入城纪律要项如下：

一、实行一切缴获归公，增加边区财政收入，统一分配胜利品，坚决反对本位主义、自私自利、发洋财及贪污腐化现象。高度提高政治自觉性，不受各种形色所引诱，保持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发扬人民军队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精神与作风。

二、一切行动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入城后卫戍机关为维护秩序所公布的一切纪律和规定，任何部队人员必须切实遵守，并自觉的（地）成为遵守与维持秩序的模范，防止居功骄傲，不听指挥。一切物资的没收与处理，户口的清查、反革命的逮捕，均由地方党政机关负责，调查材料可交有关机关，不得私自动手，以求处理完善。

三、严禁破坏机器、工厂、医院、电灯、自来水、电话电线、玻璃及一切城市建筑和设备［除军事行动必须］。向全军深入说明，城市一经解放，即为人民的城市，为人民所有；深入思想教育，教育全军爱护物资，爱护建设，反对破坏行为。解放后的石家庄，对发展解放区生产建设，繁荣经济，支援前线，作用极大，任何损失将为人民的损失，必须加以爱护。

四、不许自行动用与搬运一切物资资财及房舍用具，对仓库、贮藏室只有爱护的任务，报告的责任，没有动用的权利。一切军用物资，除战场缴获者外，统归军区机关处理。

五、不侵犯城市工商业，不侵占学校、不私入教堂，尤应保护城市贫民的生命财产，讲话和气，买卖公平，对于新从蒋介石与日寇长期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人民，应给予同情和帮助，加强对广大人民的宣传解释工作。

六、于战斗结束之后，除逮捕奸犯外，严禁私自鸣枪或投掷炸弹等。凡试枪试炮，必须经卫戍机关或高级军事机关之批准。

七、加强战斗团结，防范部队之间、部队与地方人员的不团结、闹纠纷等现象的发生；强调互助、互让，如发生问题，均应以冷静态度寻求解决。

八、严禁个别人员徘徊闲游茶楼酒馆，尤其娼寮地区，不许大吃大喝，注意军风纪与军装整齐。

九、非因军事特殊需要，不准民工、民兵进入城市，并予以善意的说服解释。

但是，还是发生了“争缴获、争功劳”等问题。十二月一日，朱德在晋察冀野战军团以上干部会上作了讲话：

凡是依靠党的力量、群众的力量，就能取得胜利。相反，个人英雄主义，一切听我的，就不行。这次开展了立功运动，动员了群众，但争功就要不得。人家的功，你争来有什么用？功是谁的？是战士和工人、农民的，领导人不经过他们，就一点功也没有。中国的工人、农民在革命战争中流了许多血，世界上晓得他们英勇，但不晓得那样多的名字，那样多的详细的事迹，有时就记住了他们的领导人。比如我是总司令，有时把我当作他们的代表，把他们的功挂在我的名字上。如果我因此而夸功，那岂不可笑！不经过工农群众，哪里来的功！纪律很重要。打开了城市，缴获的东西，第一不能打烂，第二必须归公，决不能归私。以后大城市打下来以后，一个时期内应该实行军事管理。一面打仗，一面建立家务，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要这样建立起来。

“一面打仗，一面建立家务”，共产党人自这一时刻起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崭新的任务也许比打仗还要艰难，解放大城市之后管理大城市将是一个重要的任务。

毛泽东致电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第二政治委员杨成武、参谋长耿飚：“庆祝晋察冀我军攻克石家庄歼灭两万余人之大胜利。”

一九四七年就要在开始解放大城市的紧张而兴奋中结束了。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杨家沟是一个很大的村子，全村二百七十多户人家，仅地主就有七十二户。这里不通大道，偏僻安静，窑洞很多，适合召开较大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彭德怀、贺龙、林伯渠、张

宗逊、习仲勋、马明方、叶剑英、张德生、甘泗淇、王维舟、李井泉、王明、谢觉哉、李维汉、赵林、李涛等。

中国共产党人的这次会议，在解放战争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周恩来所作的军事报告用大量的统计数字说明了共产党方面令人乐观的前景："战争的第二年，各条战线无例外地转入主动。开始于七月的刘邓渡河，使南线形势根本改变。现在，南线不但是大别山，就是江汉、桐枣地区也已站住了脚。比小河会议时不同，敌已完全被动。敌二百四十八个旅中，受过歼灭或歼灭性打击的达到一百四十五个旅。地区则发展得更快。停战令时原有二百三十万平方公里，现已恢复，约占全国的百分之三十二。解放区人口现有一亿五千万。在蒋管区群众斗争方面，学生运动在全面内战爆发后发生了三次高潮：抗暴、反饥饿、反内战、反暴行。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工人斗争也是如此。农村游击战争在粤、闽、浙、皖有很大发展。""我军到十月份已发展到二百二十万以上。而敌人作战部队下降到二百五十六万。"

而毛泽东所作的主题报告名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为了将解放战争进行到底，毛泽东在这篇报告中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这是值得毛泽东一生骄傲的军事论述，是指导共产党军队赢得解放战争胜利的军事法典：

一、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

二、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

三、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

四、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人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

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

五、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

六、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

七、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

八、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

九、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

十、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的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读后，不仅惊讶于毛泽东对战略战术的精通，更不解的在于国共战争正处在决战前夕，共产党人竟然把自己的战略战术公开给对手，这在世界战争史上十分罕见。他在给国务卿马歇尔的信中说："就大使馆所能断定的来说，毛氏的详尽分析共产党战术与战略是对共产党军队确定如何作战的一个非常率直的解释。共产党毫不迟疑地说明他们的战略，也许是表示共产党对国民党军事思想与情报之鄙视，应该承认这种战略到现在为止并不是没有成功的。"

无法得知蒋介石如何看待毛泽东关于战胜他的军队的战略战术。不久前，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出席参议院和众议院联席会议时，呼吁美国政府承认他所领导的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呼吁必须以经济援助给予中国国民党政府——马歇尔的呼吁让蒋介石心情复杂：美国人这个时候发表这样的呼吁至少有两层意思：第一，盟友明

确地感到自己的政府已经摇摇欲坠，而共产党人也许会赢得胜利。第二，没有美国人的援助，自己面对的局面会迅速恶化。蒋介石写出了“本月反省”：

> 全国各战场皆陷于劣势被动之危境，尤以榆林（陕西）、运城（山西）被围日久，无兵增援；十二日，石家庄陷落之后，北方之民心士气尤完全动摇；加之，陈毅股匪威胁徐州，拆毁黄口（江苏）至内黄（河南）的铁路，而后进逼徐、宿（安徽）；陈赓股匪窜扰豫西，南阳、安阳震动；江南各省几乎遍呈风声鹤唳之象；两广、湘、豫、浙、闽伏匪蠢动。李济深、冯玉祥且与之遥遥相应，公然宣告叛国，以诚存亡危急之秋也。

蒋介石开始冷遇美国驻华大使，因为司徒雷登在接受《燕大双周刊》采访时主张：中国民众应该和蒋介石一起，采取“积极的办法”挽救危局。他开列的“积极的办法”有三：一、人民应该行使自己的权利，民主不能单靠政府来负责，否则就会出现严重的腐败问题。二、美国应继续向中国提供各类援助并派遣专家，以帮助和刺激中国政府，使其觉得有存在的希望才会进行改革，反之，在现在的情况下让政府自动改革是根本不可能的。三，政府内部应进行革新。政府也有自由分子，但遭到了压制。这些人应该得到大家的帮助，以便有所作为。司徒雷登说：“国共问题靠武力是解决不了的，和谈现在已无希望，只有用这种积极的办法试一试。如果实现了，共产党方面一定有好的反应，他们也未必愿意永久打仗。”

毛泽东终于决定离开陕北了。

毛泽东要去的地方，是河北境内一个名叫西柏坡的村庄，村庄距离晋察冀野战军刚刚攻占的石家庄很近很近。

以往，毛泽东的电报里常常出现“南线”和“北线”，这只是毛泽东心中以黄河为界的战场划分，并不具备地理上的“南”与“北”的概念。毛泽东不在乎黄河是如何弯曲流淌的，他把黄河以北以东的东北、华北、山西等战场皆称为北线，把黄河以南以西的山东、河南，直至长

江北岸，乃至包括黄河以西的西北战场都称为南线。毛泽东离开陕北去河北，等于从南线战场转移到了北线战场。

“他们也未必愿意永久打仗。”

共产党人渴望结束战争的愿望空前强烈，因为他们渴望着建设一个新的中国。但是，此时结束战争的方式在他们心中已发生决定性的变化，那就是以更加猛烈的作战把对手彻底铲除。

# 第七章 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 黑发美少年

一九四八年元旦来临的时候，东北民主联军中开始传唱一首歌，歌名叫《黑发美少年》：

冷万中是个卫生员，

十七岁的黑发美少年。

战士们冲锋陷阵，

他紧跟随在身后边。

……

十七岁的黑发美少年的作战地点在彰武，时间是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东北民主联军结束秋季攻势后，十月十三日，毛泽东致电林彪提出了更大规模的冬季作战设想:

林:

十二日十时电悉。关内除李宗仁系统可能抽调少数出关外，各战场蒋军均感兵力不敷应用，很难抽援东北。胶东整八师及某部前有抽调说，是否实行，尚待证明。你们攻克吉林后，应将主攻方向转至北宁平绥两线。沈阳、锦州间，锦州、山海关间，山海关、天津间，天津、北平间，北平、张家口间均为很好作战地区。依据关内各战场经验，在敌尚有能力举行大规模进攻时期，因敌高度集中前进，我集中的大军很难求得运动战机会。在现时敌已被迫分散于黄河、长江间六七个战场上，采取战略守势时期，我集中大军更难求得运动战。但如我兵力不太大，则尚有许多运动战机会，且可大量歼灭分散守备之敌。故目前南线各军的野战机动兵团，大体都是以五个旅至十个旅的兵力组成之，其余则以纵队以旅为单位分散作战。你们今后野战兵团之组成，除若干特别情况外［例目前打吉林，将来打锦州或他处］，亦应注意此种经验。依你们现有兵力，可以组成一个有九个师左右的头等野战兵团，几个有四个或五个或六个师的二等三等野战兵团，同时在几个区域机动作战。

毛泽东

十三日十六时

林彪拟订了作战计划：第一步，以四个纵队进攻锦州、沈阳一线；以两个纵队进攻锦州、山海关一线；以两个纵队进攻营口、沈阳和开原一线；以一个纵队加两个独立师进攻开原、四平、长春、吉林一线。第二步，以三个纵队、必要时使用四个纵队，进入冀东攻击平绥线。

但是，林彪很快就意识到目前他的部队出关作战是不现实的，他回电毛泽东，建议将出击冀东的作战推迟到一九四八年春天："我军拟利用锦州到沈阳一带河流皆已结冰，便于大部队行动，投入最大兵力，在锦州和沈阳间作战。为适应打大据点和打大增援作战的需要，'我们拟明年四、五月，再扩大一百个新兵团'。关于到冀东和平绥路作战，林（林彪）、罗（罗荣桓）、刘（刘亚楼）认为：'目前如去大军，则补充供给困难，去不大的部队，则分散兵力，打小仗仍不易找，打大仗感兵力不够。故暂时不去，拟在明年开冰后，再看形势动作。'"

毛泽东就东北战场发动大规模战役的设想，目的是在"张家口、天津间打开一个至两个缺口"——这一设想，是后来林彪部发动辽沈战役，并首先突破锦州的最初动因。毛泽东回电，同意东北部队暂不出关的建议，但再次强调了打开张家口与天津间的缺口，打通东北与华北战场的作战设想：

……

（一）结冰期内，你们集中全力在山海关、辽河地区作战是完全正确的，你们明年建军计划也是正确的。（二）现时到解冰尚有三个月，在此期内，如果我军只在许多战斗之间进行若干短时间的休息补充，而不进行大休整，待解冰以后再进行大休整，则估计可能利用冰期歼灭大量敌人，可能将沈阳、铁岭、抚顺、本溪、锦州、葫芦岛、秦皇岛等几个大据点之

间的中小据点、广大乡村及锦州以西、以北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归于我手。只要办到这一点，尔后就只剩下打大据点的问题了。（三）不论冬季作战胜利大小，解冰以后，你们可将冀热辽的两个纵队派至冀东作战，而以主力在满洲打据点。（四）你们两个纵队派至冀东，配合晋察冀全力在明年春夏两季，不但占领北宁路津榆段的大部，而且可能在张家口、天津间打开一个至两个缺口，使东北、华北开始打通联系，从东北输送炮弹、炸药至华中、中原和西北，此种任务极为重要。

……

林彪决定首先攻击东北国民党军的要害：北宁铁路线上的沈阳至锦州段。因为这里是“敌人与关内的唯一的陆上联络线和输血管，同时也是敌人素来薄弱的地区”。东北国民党军集中兵力固守大城市的状况，迫使林彪只能打大仗，即集中四至五个纵队发动城市攻坚作战，或集中六至七个纵队打大规模的运动战，因为可供攻击的小的据点已不存在。林彪期望着“大的战果”：“在东北，由于过去的客观情况，从没有超过两个纵队以上的兵力用于攻城和三个纵队以上的兵力用于打援。所以今年冬季是我们最能集中最大兵力作战的良好时机，因而我们能举行大的运动战和大的攻城战，能把东北作战提到空前未有的大规模，预计可能获得伟大的战果。”此时，经过整训和扩充，林彪部的兵力比秋季作战时多了近二十二万人，总兵力已经达到近七十四万，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东北地区兵力首次超出了国民党军，而且一超就是近十六万人。

东北民主联军发动秋季攻势后，因为铁路交通已被切断或时通时断，盘踞在大城市中的国民党军，不但陷入了断粮断电的困境，兵员补充也面临极大的障碍。为此，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告诉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说目前国民党军在中国东北地区武器弹药“严重短缺”，原因是这里的军队大多是由美国训练和装备的，在过去这是一大优势，现在美国的装备运进东北已极为困难。美式武器所需的弹药中国自己又不能制造，如果美国方面再不想办法，国民党军队的美式装备就将成为一种劣势。而主政东北的陈诚认为，除了武器弹药之外，关

内不能及时补充兵力、筹集不到大军所需的粮食也是问题，而最令人担忧的头等问题是部队普遍士气低落。

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也说到士气问题:“士气都是饱满与旺盛的，一部分部队因四平一仗，元气损伤过大，略见减退，但不久即告恢复，现部队已建立起一种好的斗争意志与战斗作风，在连续作战、远距离的奔袭、气候严寒与大兵团行动、给养、住宿困难等情形下，已养成忍苦耐劳的习惯，过去顾虑伤亡、喜欢叫苦、不愿走路、不愿待机、不习惯于大踏步进退的心理与现象，现在是一般的消失了。现在没有打上仗或未能担负主攻的部队，常常表示不快意，每一战斗开始，部队争相请命，要求给予艰巨任务，以担负艰巨任务为荣。”

等待河流结冰是令人焦急的。

十二月初，东北地区气温终于降到了零下二十多摄氏度。

河上的冰冻结实了，载重车可以通行了，东北民主联军官兵穿上厚厚的棉衣，脚上是垫着新鲜乌拉草的靴子，在一尺多深的积雪中出动了。

十二月十五日前后，二纵和十纵包围了沈阳以北的法库，七纵包围了法库以西的彰武，八纵包围了彰武以南的新立屯，一纵、三纵、六纵进至法库、新民与沈阳之间，四纵逼近沈阳，九纵到达沈阳西北方向的新民附近。

东北民主联军全线出动，陈诚骤然紧张起来，他立即命令驻守铁岭的新六军新编二十二师增援法库。新编二十二师的出动给林彪带来了战机，他命令十纵二十九师围困法库，不得使守军逃窜；二纵和七

纵主力迅速转向法库东南，从侧翼发起进攻；三纵迂回至铁岭，切断新编二十二师的退路，割断其与新三军十四师的联系。

十六日，新编二十二师进至铁岭与法库间的镇西堡、娘娘庙一线，向法库以东的二纵阵地发动了进攻。二纵当即反击，并以五师向敌人侧后迂回。新编二十二师发觉自己成为攻击对象之后，急忙趁后路未断之际向铁岭回撤。十七日，二纵五师在调兵山附近抓住了新编二十二师的后卫一部，官兵们立即冲了上去，果断而勇猛的出击给敌人造成巨大混乱。但是，让五师师长钟伟焦急的是，各友邻部队没有一支前来助战，结果战斗打成了个击溃战，还是让敌人跑了。钟伟给林彪发去电报："……此次调兵山战斗，我们十七日十二时包围敌人，除报告纵队外，即时出击敌人。当时四师在沙后所东北，六师在锁龙沟东南，他们不仅可以听到，而且可以看到。除四师一部包围沙后所以外，其他部队均未自动截击敌人，放过了应得的战果……大规模运动战中，各师、团指挥员切实负责照顾战斗的胜利，做到机动配合策应是非常重要的，否则要放弃许多可能争取的胜利……"

新编二十二师的被打，再次调动了国民党军。二十日，陈诚急调驻守长春的新一军五十师和暂编五十三师、驻守四平的第七十一军八十七师和九十一师、驻守开原的第五十三军一三〇师和暂编三十师、驻守辽南的第五十二军第二师赶赴沈阳和铁岭地区，以解除林彪部对沈阳构成的军事威胁。

国民党军的大规模调动，是林彪一直等待的，他决定放弃攻击四面环山、工事坚固的法库，以二纵和七纵向西攻取彰武，进一步调动并分散国民党军。作战部署是：二纵、七纵和东总直属炮兵主力统一归二纵司令员刘震指挥，负责攻击彰武；一纵和十纵二十九师进至石佛寺西北地区；三纵和六纵主力进至法库以南，阻击沈阳地区出援之敌；一纵三师继续佯攻法库；十纵三十师监视四平之敌；四纵向沈阳

城郊进逼；辽东军区部队牵制沈阳守军；八纵除留二十四师继续包围新立屯之外，主力和九纵一起在锦州至沈阳铁路线以北准备阻击国民党军增援部队。

彰武是沈阳以北铁路线上的一个重要据点，由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军七十九师的三个团据守，兵力约万人。

二十二日，二纵进至彰武城的东南和东北，七纵进至城西和西北，共同对彰武形成合围之势。随后，七纵二十师攻占城西南的制高点高台山；二纵六师十七团攻占沙坨子地堡群，为炮兵准备了射击阵地；七纵十九师夺取了车站以西地带，二纵五师肃清了城东北的各据点。外围战斗结束后，林彪没有催促部队对彰武实施攻击，他希望总攻准备进行得细致而周全。二纵司令员刘震经过反复勘察地形，最终决定了两个突击主方向，每个方向上重叠部署三到四个突击团，对彰武城发动持续而猛烈的突击。

二十八日，总攻开始。

炮火准备异常猛烈，参战的八个炮兵营集中起六十六门火炮轰击城墙，仅二十分钟就打开了一个宽大的突破口。然后，炮火逐步延伸，每次延伸距离两百米，每次延伸为两分钟急袭射击，每门炮发射炮弹八发。这是东北民主联军首次实施炮兵计划射击，不间断的炮火支援步兵纵深作战，标志着这支部队在炮兵火力运用和射击技术上有了巨大飞跃。随着炮火的延伸，二纵五师十四团、六师十八团为第一梯队，五师十三团、六师十七团为第二梯队开始向城内突击。一梯队的正副班长都配备了汤姆式冲锋枪，加上每个班配备的重机枪，攻击火力十分凶猛。在二纵的突击方向上，十七岁的卫生员冷万中紧跟在突击队员的后面，他在弹雨中奔跑，扑向每一个负伤的战士，为他们包扎伤口，然后护着他们向下转移。炮弹的爆炸声震耳欲聋，子弹在身边呼啸而过，冷万中充满稚气的脸涨得通红，军帽下露出浓密的黑

发。他呼唤着官兵们的名字，少年的声音穿透嘈杂的枪炮声在战场上回荡。在城防突破口，冷万中连续抢救了七名伤员，突然间，他的叫喊停止了。敌人的第一颗子弹划过他的额头，血遮住了他的眼睛；第二颗子弹打碎了他的耳朵，他的军衣被染红了；第三颗子弹穿进他的喉咙，他抽搐了一下，一头栽倒在阵地上，手里的纱布飞扬起来。

黑发美少年死了。

五个小时后，彰武城万余守军被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军七十九师少将副师长李佛态以下官兵近七千人被俘。

这是林彪部第一次在白天发动城市攻坚战。

自此以后，东北民主联军对城市的攻击大多在白天。

彰武的战斗刚刚结束，林彪即命令一纵、八纵、九纵继续向北宁路前进，准备彻底切断锦州至沈阳间的交通联络。三十日，八纵主力攻占黑山县城，并开始向沈阳西郊逼近；九纵在一纵的配合下进占大虎山和台安，之后一纵转进辽中地区。

陈诚认为，林彪部伤亡过大难以再战，于是部署了在法库以南地区与林彪部主力作战的计划：新六军军长廖耀湘指挥新三军和新六军主力为右路，由沈阳、铁岭一线向西推进；新五军军长陈林达率四十三师、一九五师为左路，由沈阳向北推进；第七十一军军长向凤武指挥第七十一军和新编第一军为中路，由沈阳向西北推进。国民党军共五个军东起铁岭，西至新民，沿着辽河两岸百公里的正面呈扇形全面出击。

陈诚大军出击的那天正是一九四八年元旦。

他不知道，自这一天起，他的对手的称呼变了。

林彪和罗荣桓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李济深所组织的军队亦称民主联军，为了使我党领导的武装的名义，不与别党武装的名义混淆，和使我党所领导的武装有统一的名义，我们建议将东北民主联军的名称取消，而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两天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复电："望即由东北民主联军经新华社发表通电，声明该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为中华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人民民主而奋斗的东北人民军队，兹为与全国人民解放军的称号取得一致，特向全国人民及各地解放军宣布，自某月某日起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改称司令员。你们照此办理即可，中央不需对外发表公告。"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二十时，林彪、罗荣桓致电中共中央："我们拟利用元旦日，宣布东北民主联军改名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十二月三十日十七时，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发出通令："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于一日起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部，其简称'东总'亦改为'东司'。"

就在这一天，林彪发现陈诚的三路大军中，左路的新五军因推进快，位置已经突出出来，且新五军力量相对薄弱。东司立即部署：六纵在路上阻击新五军并诱其深入；二纵、七纵火速到达新立屯以北、以西地区集结，待命攻击；三纵插到新五军的右翼，切断其向新民的退路；十纵、一纵、独立第二师、四纵共同切断国民党军右、中两路与左路新五军的联系；八纵、九纵从辽中地区返回新民以西待命参战。

新五军军长陈林达，黄埔第四期毕业，他率部出动的时候，绝对想不到自己将成为东北战场上第一位被俘的国民党军军长。

元旦那天，新五军从沈阳乘火车出发，到达巨流河车站下了车。寒风凛冽，陈林达向四野望去，雪原茫茫，他深为陈诚命令他的部队在新年之际出动而不快。陈林达的理解是，这次作战顶多是一次驱逐

行动，把沈阳附近的共军主力赶得远一点而已。林彪的部队刚在彰武那边打完一仗，绝对不会立即主动迎战五个军的兵力，他需要休整就必定会再向北面转移。作为三路大军中的侧翼，新五军只要推进到预定位置，就算完成了任务。临行前，陈诚调拨给他十天的粮食弹药，而驱逐行动根本用不了十天。于是，陈林达命令各部队临时雇用当地老百姓的大车，拉上三天的粮弹上路，剩下的都存在巨流河车站，必要时再用汽车往上送。准备完毕后，新五军沿着公路向巨流河北面的公主屯方向推进。

第二天，陈林达的军部到达安福屯。这时候，已经推进到公主屯和黄家山附近的前锋部队报告说：遇到了共军的阻击。陈林达认为，这也就是少量共军为迟滞他的推进而进行的骚扰性阻击，他命令四十三师向黄家山、一九五师向十里堡和五家子攻击前进，并且开始与右路和中路的友邻部队寻求联络。

阻击新五军的就是负责诱敌深入的六纵。为了给包围新五军的主力部队赢得调动的时间，六纵顽强地抗击着新五军不断发起的集团冲锋，阵地上厚厚的积雪很快就被灼热的枪弹融化了，六纵官兵在泥雪中滚来滚去，前沿阵地上的拉锯战反复进行着。三日黄昏时分，新五军四十三师终于巩固住了一个小高地，但就新五军全部主力部队来讲这一天几乎是原地未动。

三日的阻击战至关重要，因为正是这一天，二纵、三纵、六纵、七纵和炮兵第一、第二、第四团开始急促地向公主屯地区开进。四日，新五军对六纵的阻击阵地加强了攻击力度，但是陈林达发现，尽管炮兵火力猛烈，但只要一冲上共军的阻击阵地，部队很快就会像雪球一样滚下来，他终于知道自己的部队不敢与共产党军队近距离肉搏。数次攻击之后，依旧没有进展。黄昏又至，陈林达猛然发觉附近有林彪的大部队正向他接近，他立即命令用重炮攻击当面共军的阻击

阵地，然后严令各部队迅速地突击过去。但是，当面的阻击不但越来越强，而且六纵还向他发动了反击。位于前沿的一九五师遭到猛烈攻击后，丢弃阵地一直后撤到安福屯，与陈林达的军部挤在了一个村子里。

陈林达不知道，攻击一九五师的，是已经赶到战场的第三纵队。

五日拂晓，新五军被包围在了公主屯及其西南地区。

陈林达立即向陈诚请求退守设有坚固防御工事的巨流河车站。陈诚召集幕僚紧急会商对策，东北行辕副参谋长赵家骧主张新五军放弃公主屯，会同各路大军据守辽河以南和沈阳——如果按照赵副参谋长的建议，立即命令三路大军一齐收缩，林彪歼灭新五军的计划很可能落空。但是，陈诚犹豫再三，还是向陈林达下达了“改取守势，在原地固守三天，以吸引匪军主力”的命令。同时，他命令新六军变更行军方向，向公主屯进击，“以解救新五军之危”；命令第七十一军立即转向西北，“支援新五军之作战”。

陈诚命令新五军固守待援，是因为他不相信林彪能够吃掉他的一个军。而这正是林彪所期待的战场态势——无论是关内还是关外战场，但凡国民党军下达“固守待援”的命令之后，鲜见哪支被围部队最终能够等来增援而将其解救出去——尽管有四个军的兵力距离陈林达仅咫尺之遥。

“固守待援”的命令决定了新五军覆灭的命运。

六日拂晓，呼啸的狂风刮得雪尘漫天飞舞，气温已经降至零下二十五摄氏度。二纵六师的前卫十七团到达王道屯，和他们一起到达的还有七纵五十七团。情报显示，这个只有三十多户的小村子里驻扎着新五军的野战医院，二纵和七纵占领这里的目的是切断前、后闻家台

村的联系。两支部队都抢着发动进攻，而他们不知道，他们攻击的已不是一个野战医院，而是一九五师退到这里的一个整团。国民党军锯倒大树，在村外构筑了防御工事，在村内的房屋墙壁上也挖了很多射击孔。五十七团最前面的二营没有任何防备，首先发动进攻的五连遭到密集火力阻击，伤亡严重。六连接着冲了上去，也没有火力的掩护，带头冲击的营长中弹牺牲，教导员也负了伤，二营只好撤了下来。从另一个方向攻击的十七团一营也不顺利，他们虽然组织了火力掩护，但三连冲上去的时候，由于突破口过于狭窄，官兵们拥挤在一起，遭遇敌人大量杀伤。接替三连冲击的一连依然被阻击在突破口附近。这个时候，两个团的指挥员才搞明白，村子里有敌人的大部队而不仅仅是一所医院。调来增援兵力后，再次组织攻击，村内守军开始夺路而逃。后来才知道，王道屯内的守军是新五军一九五师五八五团——这次战斗被林彪列入“打莽撞仗”的教训战例之一，但他对二纵和七纵官兵猛打猛冲的战斗作风还是表示了赞赏。

这天上午，困守安福屯的陈林达接到报告，说存放在巨流河车站的粮弹已经装上卡车和大车，但是公路已被共军切断，如果这些物资出动肯定要被共军截获。陈林达开始后悔没把粮弹全部带上，而此时各师阵地不断被突破压缩，共军的炮火已经打到安福屯了。陈林达被迫率新五军军部和一九五师一起退守闻家台村。到了这里之后，军部与四十三师的联系彻底中断了，陈林达被困在一个孤零零的村庄里。

是守还是撤?

到了这时候，陈诚仍是犹豫不决，原因是各路增援部队都报告说他们在“顽强前进”。

林彪把攻击闻家台村的主攻任务交给了二纵。二纵前指副司令员吴信泉认为晚上攻击容易让敌人跑散，遂与副政委李雪三决定天亮后发动总攻。

三纵的任务是向沈阳方向警戒和阻击增援之敌。司令员韩先楚认为与其被动地等着打援，不如主动向闻家台村发起攻击。三纵侦察科长郑需凡是个胆子奇大的人，他穿着美式军服、骑着一匹高头大马竟然在闻家台村里大模大样地转了一圈。回来，郑需凡向韩先楚报告说，村子里有好几千人，而且不少是机关模样的人。韩先楚听了更加心痒。有人认为三纵是负责打阻击的，不能抢人家二纵的主攻任务；也有人认为，眼皮底下的敌人不打说不过去。究竟是打还是不打？最后韩先楚和政治委员罗舜初拍了板：打！他们的理由是：八师和九师继续警戒沈阳方向，七师连夜攻击闻家台村将国民党守军黏住，这更加有利于天亮后二纵发起总攻。

漆黑的冬夜，风雪猛烈。七师迅速制定了战斗方案：十九团和二十一团在两侧助攻，集中全师所有的炮火全力支援二十团主攻。二十团将突击任务交给了三营。命令一下，三营的爆破手们轮流冲上去爆破，在连续牺牲了八名爆破手后，终于将敌人的防御工事炸开了一个突破口。突击队员随后跟上，国民党守军火力密集，七连二班长公方臣腹部中弹，肠子流了出来，他坐在雪地里不停地喊口号，直到没有了声息。九连冲到距守军指挥部仅一百多米的地方，官兵们占据了一个小院子作为继续冲击的依托。敌人拼死反击，想把他们打出去，九连誓死不退，连长和指导员都身负重伤，战斗英雄侯成安站出来代理指挥。小院几乎被敌人的炮火炸平，房屋和柴草被点燃，四周烈焰冲天，九连官兵利用断墙残壁死打硬缠。敌人组织起“敢死队”，把战场上的尸体叠起来当掩体，推着尸体向前移动，然后突然跳起来边扫射边冲锋。随着侯成安的负伤，九连最后只剩下一个班的战斗员了，一个班中只有三人没有负伤。

一营上来了。一营长赵兴元，久经沙场的战斗英雄，但他还是被小院里的情景惊呆了。院子里摞满了伤员和尸体，院外也躺满了国民党守军的伤员和尸体，伤员和尸体密集得令人插不进脚。地面已经被

鲜血染红，然后被炮火烘干。赵营长发现了奄奄一息的三营教导员张林经，张教导员挣扎着想向他交代战场情况，被赵营长制止了。赵兴元叫来担架，对张林经说："老张！放心！我的一营也不含糊！"

赵营长决定不但要把这个据点守住，并且还要把附近的一座平房攻占了。凌晨两点，一营二连开始向平房冲击。守军的两挺机枪疯狂扫射，突击队不顾一切地前进，甩出的手榴弹如同大雨落下。冲到平房门前，官兵们上了刺刀，守军转头就跑。二连端着刺刀追，但是守军黑压压的拥挤在一起如同一堵墙，追击的官兵挤都挤不进去。平房被攻占，一营教导员负伤，二连伤亡过半。

黎明来临了。

国民党守军开始反攻平房阵地。在一次又一次的拉锯战中，平房的一角轰然倒塌。然后，那里突然没有动静了，好像二连突进去的官兵已全部阵亡。二连指导员带领一个班前去增援，但途中全部倒在了一片开阔地里。副连长齐继忠又带着一个班上去了，国民党守军迎面反击，齐继忠被子弹打倒，他推着个大炸药包开始一点点地往前爬，身后是长长的血印。平房那边，守军的反击队已经摸到门边，正要冲进去的时候，门里面突然站出一个人，是二连党龄最长的战士老张。老张叉着腿，端着一挺机枪，吼："谁也不许进来！"话音未落，老张拉响了绑在身上的三颗手榴弹。

爆炸过后好一会儿，国民党军官兵大喊："平房里的共军死光了！"喊声未落，平房里又冲出一个人来，这是二连坚守平房的最后一名战士，名叫常学理。已经负伤的常学理是被手榴弹的爆炸声震醒的。他的棉衣已经着火，拖着一挺机枪，靠在了平房的门边。敌人组织起军官反击大队，二百多人一律穿美式军大衣，戴美式钢盔，端着崭新的美式冲锋枪，他们喊着口号开始朝一个人防守的平房冲锋。

新五军的军官们喊：“誓死保卫军部！”

常学理也喊：“坚决消灭新五军！”

突然，军官大队的军官们掉头就跑，原来赵兴元营长率领一连冲过来了。

二十团政委刘振华也跟上来了，他说：“老赵，新五军让咱打残废了！兄弟部队就要发动总攻了！”

沈阳城里的陈诚彻夜不眠，他还在为是否命令新五军突围而犹豫不决。情况显示增援部队确实在进攻，但各路都没有多大进展。

负责打阻击的十纵始终处于血战之中，他们当面是国民党军新三军和新六军的五个师。十纵是新组建的部队，林彪特别嘱咐司令员梁兴初：“抗击敌人必须沉着，顽强防御，并机动进行小规模反击，坚决反对不敢硬拼的游击习气。敌人攻击精神差，只要能抵住几次冲锋，敌人就不敢再前进。”但是，十纵的对手兵力充沛，火力强大，且有十多架飞机进行战场支援。六日，战斗整整持续一天，八十七团在两小时之内先后伤亡两百多人。在三营的阻击阵地上，六小时内先后伤亡四名连长。七日，国民党军集中四个师的兵力，在二十架飞机和八个炮兵营的火力支援下，再次对十纵的阻击阵地发动攻击。十纵的阻击前沿一片火海，阵地失而复得，又得而复失。在几个阵地丢失之后，梁兴初到三十师指挥所亲自组织反击。黄昏，在正面宽大的阻击战场上，各部队同时发起冲击，两小时后失去的阵地再次被恢复。

六日晚，陈诚终于下达了让新五军向沈阳撤退的命令。

但是，一切都晚了。

七日，天亮起来的时候，东北野战军的总攻开始了。攻击部队集中了六十多门火炮，向被压缩在闻家台、黄花山两个村庄里的新五军残部进行猛烈的轰击，接着二纵和三纵从不同的方向发起了最后冲击。

苦战一夜的三纵官兵直接冲击陈林达的军指挥部。二十团一营一连三排副排长李永凤踢开大门，举着一枚拔出保险针的美式鸭嘴手雷，大声喊："谁动一下，我就撒手！"

新五军指挥部里一片惊慌："别撒手！我们投降！"

李永凤问："谁是陈林达？"

角落里走出来一个换上了士兵军服的小个子军官："鄙人就是陈林达。"

二纵打得十分凶猛，一路冲进闻家台村，当他们冲进新五军指挥部时，发现陈林达已经被三纵抓住了。二纵的一个干部厉声问："你们是哪个单位的？"刘振华政委回答："我们是三纵七师二十团的。"那个干部又问："谁让你们来打的？"刘振华说："韩司令让我们来打的。"二纵的那个干部不由分说把陈林达押走了。

刘振华将此事报告韩先楚，委屈地说："我的二连和九连都打光了！"

韩先楚司令员说："都是解放军，谁抓了陈林达都一样。"

与陈林达一起被俘的，还有一九五师师长谢代蒸、四十三师师长留光天等一万三千余名官兵。加上被打死打伤的七千多人，新五军全军两万余人全部被歼。东北野战军缴获了大量的优良装备，包括各种

火炮二百余门、轻重机枪七百多挺、步枪和冲锋枪六千多支以及各种车辆一百三十多辆。

国民党军战史对此战的叙述是："七日午前，军长陈林达中将，亲率第一九五师主力，向南突围，不料行至黄家山以南之艾家屯，又遭匪埋伏截击，增援之国军，亦分别被阻，俱无进展，战至七日正午，新五军竟陷于覆没。"

陈诚心力憔悴，在把驻守辽阳的第五十二军主力和驻守四平的第七十一军主力紧急调回沈阳后，他就因胃病病倒了。

一月十日，蒋介石到达沈阳。

东北行辕召开了师长以上将领参加的军事会议。谁都知道这种时候召开这样的会议只能是追究责任和处分将领。行辕副司令长官郑洞国很快得知，蒋介石一下飞机就与陈诚谈了话，陈诚已把新五军的覆灭归咎于众将领不服从他的指挥，并要求蒋介石惩办新六军军长廖耀湘。郑洞国立即找到随同蒋介石前来的国防部参谋次长刘裴，请他必要时为廖耀湘说几句求情的话。距离开会时间还有两分钟的时候，大家看到蒋介石在陈诚的陪同下脸色铁青地走进了会议室：

> 会议一开始，蒋先生便大发脾气，痛责在东北的众将领指挥无能，作战不力，把好端端的队伍都一批批送掉了。他愤愤地责问众人："你们当中绝大多数是黄埔学生，当年的黄埔精神都哪里去了？简直是腐败！像这样下去，要亡国了！"蒋先生的浙江口音本来略显尖细，此刻由于过于愤怒，声音都有些发颤了。在场的人吓得无一人出大气。蒋先生足足骂了约十几分钟，大家以为骂也骂得差不多了，岂知他话锋一转，又接着大骂起廖耀湘将军和李涛将军来，切责其不服从命令，拥兵自保，见死不救，致使新五军全军覆没。

出乎在场人的预料，廖耀湘和李涛突然站起来，申辩说他们根本没有接到增援陈林达的任何命令，他们不能为新五军的失败承担责任。陈诚立即反驳说，他曾让罗卓英将军给廖耀湘打电话，命令新六军就近解新五军之围。双方在罗卓英是否打过这个电话上针锋相对，

措辞激烈，争吵不休，而其他将领则一声不吭。这种高级将领们当面吵架的情形以前并不多见，蒋介石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

争吵到最后，陈诚将军在无可奈何中，神情沮丧地站起来说："新五军的被消灭，完全是我自己指挥无方，不怪各将领，请总裁按党纪国法惩办我，以肃军纪。"蒋先生原本打算惩办廖、李二人，现在见陈氏自己承担了责任，只好改口说："仗正打着，俟战争结束后再评功过吧。"说罢即离席而去。蒋先生离席后，陈诚将军接着又说了几句自我检讨的话。最后表示："我决心保卫沈阳，如果共党攻到沈阳的话，我决心同沈阳共存亡，最后以手枪自杀。"言毕即宣布散会。

会后，蒋介石做出重大决定：将第五十四军的两个师由山东调往沈阳，同时成立"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并在锦州成立冀热辽边区作战机构，以连接东北和华北两个战区。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国民党军陆军副总司令卫立煌被任命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总"总司令，郑洞国、范汉杰、梁华盛、陈铁、孙渡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赵家骧任参谋长，彭杰如任副参谋长，范汉杰同时兼任冀热辽边区司令长官。

蒋介石刚刚回到南京，就接到了东北战事恶化的消息：在新立屯被林彪部围困了近一个月的第四十九军二十六师共九千余人，在弹尽粮绝、冻伤很多、士气低迷之时突然受到猛烈的攻击。一月二十六日，二十六师师长彭巩英率部分路从新立屯东北、西北和西南三个方向实施突围，但除彭师长带领的约五百余人逃到阜新之外，其余全部被东北野战军围歼于突围途中。国民党军二十六师突围的方式出乎预料，全体官兵学着共产党军队的样子：反穿大衣，头裹毛巾，一声不响，秩序井然。往外走的时候，遇到哨兵询问，回答说是八纵的。后来居然在途中与八纵的一支部队擦肩而过。他们过去了好一会儿，八纵的干部们觉得有点不对头，怎么仗还没怎么打就有部队往外撤？这才醒悟到是敌人想跑，于是各部队掉头便追，追出去几十里终于追上

了。二十六师的官兵也没有乱，数千人呼啦一下坐在雪地里缴枪投降了。

忧心忡忡的蒋介石在一周反省录中写到：

> 东北新立屯与沟帮子各要点相继失陷，共匪紧逼锦州，沈阳形势孤立，国军若不积极出击，做破釜沉舟之决心，则沈阳二十万之官民皆成瓮中之鳖；故分致各军、师长手书，望其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以九死一生之志冲出一条血路。

蒋介石致手书首先安抚的，是敢于当面争辩的新六军军长廖耀湘："惟吾弟益加振奋自勉，为各军之模范，须知东北国军乃以弟部为骨干"，故应"有难当先，有急必援，先人后己"。接着，他又手书给二〇七师师长罗友伦："此次在沈相晤，以时间匆促，仍未能面询详情"，"尚望益自奋勉，雪耻灭匪，依照昨日会中指示，努力发扬革命精神，时时以彻底执行命令，誓死达成任务。"

陈诚寝食不安，如坐针毡，他一反矜夸自傲的态度，开始与东北的高级将领们亲近起来。他劝说郑洞国陪他去了南京，面见蒋介石时，再次陈述国军在东北的失利确实由于各将领不服从命令所造成，而不是他的指挥无能。他着重申述东北的高级将领们如何难以调动，如何自私自利只求自保，如何腐败堕落等等。其间又不断地说"不信可以问郑副司令"。郑洞国面带难色，"垂首不语"，他后来回忆说："当初你把持一切，凡事不容别人过问，现在却要我来证明这个证明那个，岂不可笑？"——陈诚终于知道自己的军事生涯就此结束了，因为蒋介石在听完他的陈述之后说了这样一句话："你安心养病，别的事就先不要管了。"

当众发誓"同沈阳共存亡"，否则"以手枪自杀"的陈诚以病重为由，向蒋介石提出了辞呈。

一九四八年二月五日，陈诚黯然离开沈阳，此时他主持东北军政不足六个月。

在国民党内一片“杀陈诚，谢天下”的呼声中，陈诚住进上海陆军医院，同时辞去了参谋总长职务。

东北野战军冬季攻势第一阶段作战结束。

此战，歼灭国民党军约五万八千余人，切断了北宁铁路，致使国民党军据守的东北要地沈阳门户洞开。

天寒地冻，气温常常降至零下四十摄氏度，东北野战军官兵在野外作战时，身体暴露的部分很快就会冻伤，手一摸到金属枪管就会被粘下一层皮。即使穿着大衣和棉鞋，也会在雪地里冻得爬不起来。加上很少能吃上热饭，东北野战军在冬季攻势中出现大量的冻伤：“特别因为东北村庄散小，大兵团集中作战，有时不能宿营。战士棉衣鞋袜被汗水及雪打湿，停止或宿营时往往得不到烤干和温暖休息，部队遇到大的非战斗减员。自冬季攻势以来，不到半月，已冻伤八千余人。其中很重的约三分之一，有一部分将成残废。”除非战斗减员外，战场上的减员数字也显示出战斗之残酷，仅在歼灭新五军的战斗中，东北野战军伤亡高达一万多人。

成千上万的东北翻身农民倒在了冰天雪地里。

这些北方少年身材匀称魁梧，鼻梁高而挺直，他们性格朴实直率，他们为人仗义豪爽，他们倒下的时候年轻的黑发和养育他们的黑土地永远融在了一起。

## 卫立煌：“我参加共产党好吗？”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卫立煌到达沈阳。

此时，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对卫立煌的上任心绪复杂。因为在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中，卫立煌是一个另类人物。

时年五十一岁的卫立煌，出生在安徽合肥东郊卫杨村，十五岁那年因家贫无以为生，应招到庐州军政府当兵，后进入湖北学兵营，结业后投奔粤军，成为孙中山的一名卫兵。跟随孙中山的时光，被卫立煌称为一生中的黄金岁月，他终生都以孙先生的信徒自居。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将广东军队改编为建国粤军，随后蒋介石又将粤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亲任军长，何应钦任副军长，王懋功任参谋长，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此时，卫立煌已是第一军第三师九团团长。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他升任第一军十四师师长，与他一起提升的还有第二师师长刘峙、第三师师长顾祝同。这一年的秋天，北方军阀孙传芳兵分三路渡过长江直指南京，卫立煌的十四师血战四昼夜，为保卫南京立下殊勋。但是，战后何应钦提拔刘峙为第一军军长，顾祝同为第九军军长，他仅为第九军副军长——卫立煌不是黄埔出身，这是国民党军中称他为“嫡系中的杂牌”的缘故。蒋介石任用高级将领常以黄埔出身为标准，仅这一点就让卫立煌对蒋介石含恨终生。

虽然卫立煌与蒋介石有解不开的芥蒂，在政治上他也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但是出身贫苦的他必须为社会地位的提升而努力，因此他的人生似乎已经无法与蒋介石剥离，他们之间形成了共同进退、荣辱相连的依附关系。

一九三二年，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时任第十四军军长的卫立煌奉命率部向黄安（今红安）七里坪增援。途中，遭遇红军的突袭。当红军冲到距军部不足两百米的地方时，卫立煌产生了就要成为俘虏的恐惧。身边的特务连用上了最精良的二十响快慢机，卫立煌也把携带的英国自动步枪拿出来，密集的火力挡住了红军

的冲击。在以后的日子里，卫立煌多次说起他差点就被红军捉去。他没有畏惧不前，率部继续向鄂豫皖苏区核心地带攻击。红四方面军开始转移，卫立煌带着一个师从小路迂回直插鄂豫皖苏区的军政中心金家寨。国军占领金家寨的消息传来，蒋介石喜出望外，除了巨额赏金以外，国民政府特别颁布：将安徽的六安、霍山、霍邱与河南的固始、商城五个县的部分地区划出，以金家寨为中心建立一个新的县，并以卫立煌的名字命名为“立煌县”——在国民党执政中国的日子里，以人名命名县名者，在此之前只有一个，即孙中山的故乡广东中山县。

但是，卫立煌的战功再一次没有与他的升迁联系起来。顾祝同早就当上江苏省府主席了，原本认为安徽省府主席非己莫属的卫立煌被调到鄂东任清剿总指挥，接着又被调到皖西任清剿总指挥，最后又被调到江西任清剿纵队指挥官。他对这样的不公极其愤怒，干脆撂挑子回南京了。有人问他战事正紧怎么回来了，卫立煌说：“仗打赢了，全是别人的功劳；输了，全是我的责任。我又不愿意与那几位（陈诚等）共事。”蒋介石一气之下准备撤他的职，但驻守福建的十九路军突然倒戈，卫立煌被任命为第五路军总指挥，率领他的第十四军、宋希濂的三十六师、冷欣的第四师和汤恩伯的八十九师，沿闽江而下直扑福州外围，伏击了十九路军并与其达成接受改编的协议。“福建事变”结束之后，卫立煌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被国民政府授予陆军上将军衔。

抗日战争爆发，平津危机，卫立煌主动请缨率第十四军北上与日军作战。日军在山西遭到严重打击后，聚集十四万兵力猛攻北进太原的战略要地忻口。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卫立煌为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统领晋北全部中央军和晋绥军近十万兵力在忻口以北建立防线阻击日军。中国抗战史上著名的忻口大战爆发。日军的三个师团和特种部队发动猛攻，卫立煌指挥部队奋勇阻击。数日后，阻击防线在南

怀化以南被日军撕开一个战役缺口。卫立煌严令部队实施反击，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了殊死的肉搏战，第九军军长郝梦龄、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独立第五旅旅长郑廷桢先后殉国，卫立煌的部队官兵伤亡数千人。忻口战役持续二十三天，日军付出伤亡四万多人的代价，始终未能突破中国军队的防线。卫立煌写下了《第十四集团军军歌》：

这是我们的地方，

这是我们的家乡，

我们第十四集团军英勇坚强。

为祖国的生存而奋斗，

团结得好比钢一样。

服从命令，保卫边疆，

联合民众，抵抗暴强，

把自己的力量献给祖国，

完成中华民族的解放。

一九三八年四月，卫立煌率部向中条山转移时，借道延安——部队向中条山转移，本不用绕道陕北，之所以借道延安，是卫立煌有意为之。尽管在国共分裂后他坚决地站在蒋介石一方，并且在与红军作战时毫不手软，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卫立煌对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有过明确的反对言论——卫立煌在政治上的“不坚定”始终是蒋介石的一块心病。那年春天的延安之行，对卫立煌的人生影响深刻。国民党军的庞大车队出现在陕北，立即成为当地的一大奇景。车队最前面是两辆黑色的小汽车，卫立煌与第二战区参谋长郭寄峤、副参谋长文朝籍以及戴着金丝眼镜的副官罗香山坐在第一辆车上。让卫立煌感到惊讶的是，距离延安城至少还有三十里，他就看见了“欢迎卫副司令长官”的标语。车至延安城外，欢迎的队伍排列在道路两边，副官罗香山告诉卫立煌，从欢迎的人数上看应该是延安倾城出动了。前来迎接卫立煌

的是八路军参谋长滕代远和陕北留守处主任萧劲光，他们一起在欢迎队伍的夹道中步行走进延安城。远远地，卫立煌看见前面有个人似乎在等他，那个人一看见他便热情地迎上来，卫立煌认出来了那人是毛泽东。

这是卫立煌第一次见到共产党领袖毛泽东——自那以后，渡过坎坷人生的他再次见到毛泽东时，已经是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的一九五五年了——延安的共产党领导人设宴款待他，毛泽东面色不那么丰润，但谈锋极健乃至滔滔不绝。毛泽东称赞卫立煌抗日坚决，与八路军相处友善。毛泽东还谈到山西战场的重要以及日本在中国的战略。卫立煌参观了延安抗日大学，副校长罗瑞卿介绍说，现在学习的是第四期学员，有四五千人之多，一起吃小米杂粮，一起住简陋的窑洞，除了西藏和新疆以外全国各省的学员都有，不但有爱国青年，还有少爷、小姐和太太，甚至有国民党党员，都是经过千山万水来到延安的。从大后方和沦陷区来的学员们为什么如此清苦而精神愉快？为什么他们对创造一个新中国的政治远景抱有如此巨大的信心？受到感染的卫立煌应邀上台讲话，他讲述了自己与日军作战的经历，强调没有八路军的合作他杀不了那么多鬼子，面对四五千名爱国青年他发誓决不退过黄河。离开抗日大学后，卫立煌想去看望林彪，因为这位八路军师长在与日军作战时被他指挥的晋军误伤，现正在延安二十里堡养伤。走到半路，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身上没带钱，于是就让随行的军官们凑，但大家都没带过多的现金，这让卫立煌感到很尴尬，因为按照国民党军队的规矩，上司看望受伤的师长时至少要送数千元的现款。卫立煌只好空着手去了。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十年之后，在中国的东北，他将与眼前这个躺在病床上的共产党将领成为血拼的对手。

晚上，毛泽东陪同卫立煌观看文艺晚会。

……毛泽东氏陪卫入场时，全场鼓掌数分钟之久，由李富春宣布大会意义，毛致欢迎词，首先说明卫是坚持华北抗战的领导者，此次过延安，希卫对边区工作加以指示，请卫训

话。全场掌声雷动。卫姿态英伟，身着普通军衣，在不断掌声中讲话：此次奉命赴某地，系指挥黄河南北两岸部队，继续领导抗战，直到最后胜利。这次抗战中已把我国的弱点缺点完全暴露出来了。第一是不团结现象，因而受到了局部失利，但由于抗战继续坚持，我们的弱点逐渐消失了。第二没有组织，没有坚强的领导，今后要把全国人民组织起来，筑成一道万里长城，来打击日本强盗的进攻。最后他称边区各地的人民组织实为全国的模范，应该把边区的好的例子更加发扬起来。

当晚，卫立煌下榻在延安城里唯一的“洋房”——一座耶稣教堂里，共产党人给他准备的夜餐是雪白的馒头和红色的广式香肠。

第二天，卫立煌离开延安向西安方向开进。到达西安后，他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和前敌总指挥的名义，签发了一道手令：“即发十八集团军，步枪子弹一百万发，手榴弹二十五万发。”临发货时，卫立煌又命令加上一百八十箱牛肉罐头。当时，国民党军后勤部调拨给第二战区的牛肉罐头只有几百箱——这是抗战期间，国民党方面给予共产党方面的最大的一次补给。

卫立煌与共产党军队总司令朱德私交甚厚。他在自己的军事生涯中见过各种各样的“司令”，朱德的谦虚朴直和信仰坚定令他万分崇敬。朱德曾毫无隐讳地向他讲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包括滇军生活、留学海外、信仰共产主义的过程、在井冈山打游击的艰苦、长征时的艰险以及共产党人的理想。卫立煌对周恩来也很敬重。一九二五年，国民革命军东征时，周恩来担任东征军政治部总主任，是卫立煌的上级；一九二六年北伐开始，周恩来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卫立煌是第一军的一名团长。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之后，流亡香港的卫立煌在是否回国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周恩来辗转带信给他，信中有这样一句话：“你在太原结识的朋友欢迎你回来。”

一九三九年一月，卫立煌调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第一战区是当时中国抗日战场上最大的战区，所辖范围东至山东及江苏、安徽的北部，北至冀察两省与晋东南，西至潼关，南至信阳和淅川，战区统辖

十个集团军，并可调动第二、第三、第九、第十战区的部队，兵力达到两百万人。按照国民政府惯例，凡是战区司令长官，都兼该战区内最大一个省的省府主席。但是，自卫立煌任战区司令长官以来，许久未接到省府主席的任命。忍无可忍的时候，他直接向蒋介石提出要求，说他的战区范围太大，军政统一迫在眉睫。九月，河南省府主席的任命终于下达。在卫立煌的辖区里，凡有国民党军与共产党武装发生摩擦，他都保持着中立态度，这使他受到蒋介石的严厉训斥：

蒋介石：八路军三年中大大有了发展，编制如前，人数剧增，由四万人增加到四十万人。我多次要你注意，你没有认真对待。

卫立煌：八路军力量增强，有利于抗日。他们一部分在防区，一部分在敌后作战，虽归我指挥，但其力量的发展，我们无法限制。

蒋介石：你发一百万发子弹给八路军，数量这么大，事先怎么不请示?

卫立煌：我军北伐以来，凡是对敌作战的部队，所用弹药都是实报实销，不用先向上级请示。八路军若无弹药，如何去打仗？他们归我指挥，我怎能下令让没有弹药的部队去打仗？八路军如果把弹药积存起来，不去打日本，那我就要负责。据各部汇报，他们打灵巧战术，又在敌后打游击战，现在没有任何实据说他们只游不击。

朱德告诉卫立煌，说延安知道卫先生处境不太好，让他“必要时骂骂八路军”。但卫立煌表示，他宁可保持缄默，也决不会骂八路军。

一九四三年新年之夜，蒋介石设家宴辞岁，卫立煌接到赴宴邀请，但是他没有去。一月，卫立煌被革去上将军衔，同时被免去河南省府主席职务，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北行营主任。这一年冬天，中国远征军在缅甸作战失利，卫立煌被蒋介石召到重庆，他的上将军衔得到恢复，蒋介石希望他接替陈诚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官。卫立煌再创荣誉，自忻口指挥中国军队发动抗战中第一次大规模阵地战后，他再次指挥中国军队发动了抗战中最大规模的反攻战。中国军队强渡怒江，翻越高黎贡山，继而攻占腾冲、松山、龙陵、芒市、畹町，并最终打通了中印公路。卫立煌获得一枚青天白日勋章，他的照

片登上了美国《时代》杂志，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称他是国民党军中最能干的将领。

一九四五年初，国民政府任命卫立煌为陆军副总司令，而总司令是北伐时就与他有间隙的何应钦。他十分不满，先是称病，不久就开始了长达一年的出国旅行考察。

一九四七年十月，卫立煌回国后，立即被蒋介石召见。蒋介石希望他接替陈诚，挽救东北的危险局面。

卫立煌说："辞修已在东北，驾轻就熟，现在换人恐怕不好。"

蒋介石说："他要是胜任，我就不借重你了。"

蒋介石选择卫立煌去东北的动因是：在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中，卫立煌能拼善打，以资历和声望论他能担当这个职务；而论人事关系，东北的杜聿明、郑洞国、范汉杰、廖耀湘，都曾是远征军中的将领，而卫立煌统领远征军的经历令他在美国军界有较高的声誉，他的上任肯定会得到美国的支持。卫立煌犹豫不决。此时，共产党领导的军事力量在东北已有七十万正规军，地方武装将近百万，而国民党军作战部队不足五十万。更为严重的是长春至沈阳、沈阳至锦州的铁路都已中断，这就意味着据守在几个大城市里的国民党军都已成为孤军。蒋介石单独宴请了卫立煌，特别向他说明：如果不能挽救危局，卫本人没有责任；政府绝无放弃东北之意，三四月间将有三至四个军增调锦州；目前先派二十架大型运输机专为长春、沈阳、锦州运送给养。

卫立煌决定上任。

蒋介石的这番话感动了他：

东北是一个比西欧大国还要大的地方，那里重工业占全中国一半以上，是我们民族复兴的生命线，得失影响国际视听和全国的人心。"安危须仗出群才"，没有得力的人才是镇守不

住的。过去几十年，有几次靠你挽救了危险的局面，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现在到了这个紧要关头，我看只有你能担任这个艰巨重任，才让你去东北，相信你一定能够挽回不利形势……我看你用不着顾虑，你一定能把这个事办好。万一战局失利，责任也不能由你来负。

卫立煌的夫人对他决定上任东北十分恼怒，说人人都知道东北快要完了，连我这个没有军事头脑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你为什么偏偏“去替陈诚当替死鬼”？卫立煌的回答是：“要革命就不能怕死。”没有证据表明，卫立煌在政治上倾向了共产党方面。从他的人生轨迹上看，只有他对蒋介石不满是真实的，而且是刻骨铭心的——“将来我有了兵力非把这个不讲信义的人搞垮不可。”卫立煌一再受到蒋介石政治集团的排挤时，他的选择“多少有点利用共产党与蒋介石的矛盾来反蒋的意味”。但是，作为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卫立煌的政治胆量可谓惊人，他确实提出过参加共产党的要求。抗战时期，他曾向他的秘书赵荣声说：“我参加共产党好吗？怎么参加呢？”提出这个问题后，他要求赵秘书立即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去找林伯渠当面问一问。听了赵秘书转达的卫立煌的请求后，林伯渠的答复是：“卫先生若能作为一个执行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员，比他参加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更为有利。”

卫立煌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要求？

也许除了他自己别人永远无法得知。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卫立煌飞抵沈阳。

卫立煌的战略是：固守沈阳，以待事变。他对他的副参谋长彭杰如说：“共军目前采用的战法是围城打援，我们绝不能轻举妄动，上其圈套。只有蓄积力量，固守沈阳，以待时局的变化。”所谓“时局的变化”，就是鉴于中国东北特殊的地理位置，美、苏两国必然会争夺这一势力范围，只要固守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不要说东北问题，整个中国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沈阳非长期固守不可！美国人是坚决反

共反苏的，沈阳系东北重镇，有战略价值，决不会坐视不理。现在东北问题，苏、美等国利之所在，势在必争。第三次世界大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只要我们保存实力，占据地盘，事情即有可为。”

卫立煌认为，固守沈阳还是有把握的，因为他有足够的守备力量和坚固的防御工事。况且，他知道林彪攻击四平的失败已证明共军还不具备攻坚大城市的能力。固守沈阳的策略被卫立煌坚持到了极致：无论林彪打到什么地方，无论各地守军如何告急，甚至蒋介石一再电令催促他出击，他都一概不为所动。

卫立煌到东北上任不到十天，林彪发动了辽南战役：第四纵司令员吴克华指挥第四、第六两纵队以及辽南独立第一师攻击辽阳和鞍山；第一、第二、第七纵队阻击从沈阳出援之敌；第八、第九纵队以及热河独立师、骑兵师牵制和打击从锦州出援之敌。

位于沈阳以南的辽阳，是沈阳外围防御线上的一个重要据点，守军一万五千余人，由暂编五十四师师长马辙指挥。东北野战军的攻击部署是：四纵自城东、南、北三面攻击。十一师为主攻部队，主攻点是城东的高丽门；六纵自城西攻击；两纵队突破城垣后向市公署和转盘街发展并求得会合。

二月一日，四纵开始扫清外围的战斗。

六日凌晨，总攻击开始。十一师在六十多门火炮的支援下，撕开了高丽门附近的突破口，各团顺势冲入，城内国民党守军向城中心收缩。在城南方向，十二师三十四团爆破组炸开了小南门，仅用了十分钟便突入城内。城北的十师二十八团、城西的十八师五十二团也先后爆破成功，突进城垣。五十二团猛攻国民党县政府，四十九团实施迂回切断了守军的退路，五十一团则向火车站发动攻击。几小时之后，

守军五十四师师部被包围，师长马辙率特务连突围。下午十五时左右，辽阳战斗结束，守军万余人被歼，其中俘虏九千五百余人。

卫立煌没有出援。

东北野战军第二、第六纵队休整四天之后，又对鞍山发动了攻击。鞍山四面环山，城市被穿城而过的铁路分为东西两区。西区为平地，是日本统治时期的制钢所所在地；东区有几处小高地，楼房较多；东南面的神社山和东北面的对炉山可以鸟瞰市区。鞍山守军主力是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军二十五师，兵力一万三千余人，城防重点是神社山核心阵地，师指挥所位于西区的制钢所，守军指挥官是二十五师师长胡晋生。

十九日清晨，东北野战军对鞍山的攻击一开始就十分猛烈。二十五师师长胡晋生命令神社山、对炉山的部队死守，主力向师指挥所靠拢。敌人的移动给攻击部队带来攻击战机，四纵和六纵先后将守军包围于制钢所、中央银行、市政府等地。中午，六纵主力和十一师攻击制钢所、十二师攻击市政府和中央银行，十师攻击对炉山。至午夜，守军被全歼。

鞍山受到攻击时，驻守沈阳的国民党军只向浑河以西和沈阳以南作了象征性的增援。

接着，第三、第十纵队开始攻击开原，第一、第二、第六、第七、第八纵队开进新民地区，以吸引沈阳的国民党军出援，四纵则与辽东独立第一师一起迅速南下直扑营口。

新民是沈阳至锦州间的重要据点，如果失守，沈阳与锦州两地将彻底失去联系，卫立煌被迫出援。出援部队新六军新编二十二师、新三军十四师和暂编五十九师进至巨流河以东时，遭到了东北野战军的

阻击而不得前进。卫立煌接到出援部队受阻报告的同时，陆续接到了开原失守和林彪主力逼近铁岭的消息，他担心铁岭失守会危及沈阳，急令出援部队撤回铁岭。但是，他接着又收到了营口方面传来的消息：守军第五十二军暂编五十八师师长王家善，在内缺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下，率部八千余人宣布战场起义。拒绝起义的第三交警总队和第五十二军营口前进指挥所警卫连约三千余人被歼，营口丢失。

上任短短的二十多天，辽阳、鞍山和营口相继丢失，三个师的兵力损失殆尽，卫立煌眼看着沈阳由此成为一座孤岛。

鞍山失守的那天，蒋介石做出一个重要决定：将驻守沈阳的国民党军主力撤至锦州一线，与原在锦州、山海关等地的部队连接为一体。

这个决定让决心“固守沈阳”的卫立煌大吃一惊。他上任之后，是把沈阳当成战略基地来经营的，各方面都下了很大的本钱，他没想到蒋介石这么快就改变了当初全力保住东北的承诺。卫立煌无比愤怒。但又无法抗拒命令。他认为如果蒋介石坚持这样做，当然只有服从，但是把部队从沈阳撤至锦州谈何容易？途中不但要跨越几道河流，更重要的是要突破林彪主力的全力阻击，就目前东北国民党军的士气而言，很可能没走到锦州就会全军覆没——“这样不行，我们都知道共产党惯用的方法，总是‘围城打援’，我们已经上当多次了。如果我们的主力由沈阳远出锦州，正好循着共军辽北、辽西根据地的边沿，他们早已埋伏好了。何况我们要经过三条大河——辽河、大凌河和绕阳河，我们的大部队又带着重武器和很多辎重，有被节节截断、分别包围、各个击破的危险。我方在沈阳的部队残缺不全，非经过相当时期的整补不能用，因此我们只有坚守沈阳，等待部队整补完毕，才能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打通沈锦路。”卫立煌建议郑洞国去一趟南京，向蒋介石当面陈述利害，说服蒋介石收回决定，允许东北“剿总”固守沈阳，

坚持到扭转战局的那天——“沈阳有兵工厂，抚顺有汽油，本溪有煤炭，粮食也可以想办法，完全能够坚持下去。”

郑洞国以为，东北的国民党军分散据守在孤立的城市里，无异于等着林彪的部队分而歼之，这在战略上是极其被动的。如果能够“正视战争失利的事实”，先将主力设法撤出，保存实力，休整补充，或许能够卷土重来。但是，他也清楚卫立煌强调的困难和危险确实存在，目前东北的国民党军“一旦失去城市依托”，很可能还没撤到锦州就会全军覆没。二十三日，郑洞国飞抵南京。蒋介石正在庐山休养。郑洞国又飞抵九江，换汽车到庐山脚下，然后乘轿子上山。在景色秀丽的“美庐”别墅里，他终于见到了神情疲惫的蒋介石。郑洞国将卫立煌的请求陈述之后，蒋介石立即拒绝了：“这样不行，大兵团靠空运维持补给，是自取灭亡，只有赶快打出来才是上策，况且锦州方面又可以策应你们。你回去再同卫总司令商议一下，还是想办法向锦州打出来吧。”郑洞国赶紧强调说：“解放军已占领锦州至沈阳间要隘沟帮子，巨流河、大凌河等河流已解冻泛浆，大兵团的辎重行李很多，很难通过。加上沈阳的部队缺员很多，战力尚待恢复，非经一段时间整补，否则很难战胜解放军。”蒋介石不耐烦地挥挥手，用很不高兴的腔调责备说：“北伐前，樊钟秀带几千人，由广东穿过几省一直打到河南，难道你们这些黄埔学生连樊钟秀都不如吗？”

蒋介石忽略了一个事实：卫立煌不是黄埔生。

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命令卫立煌将东北国民党军主力撤至锦州。

蒋介石于一九四八年三月间作出这一决定，从战略上讲，应该承认是富于远见的：此时，国民党军在东北只占据着个别大城市，相互间的联系以及补给的道路几近完全中断，国民党军在东北扭转战局的可能已经微乎其微。在这种局势下，唯一正确的策略，就是立即退守锦州、山海关一线，加强这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形状狭窄的“走廊地

带”，这样既可以与华北的部队保持相互配合，彻底切断共产党军队关内与关外的联系，还可以把林彪的部队彻底关在长城以外，以确保华北的安全。诚然，兵出沈阳南下是危险的，但无论如何也要比半年之后林彪占领锦州的时候再出来要安全得多。

军事危机将至，将领各有所思，对于国民党军队来讲这是致命伤。

如果卫立煌迅速执行了蒋介石的决定，中国解放战争的进程——具体地说，就是后来决定国民党政权命运的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是否能够如历史已经呈现的状态发生，从而使战争在一九四九年基本结束，将很难预料。当然，历史无法预料。卫立煌没有执行蒋介石的指令，执意将国民党军置于林彪的枪口下，并最终导致其全军覆灭于东北地区——虽然身经百战，却坚持固守沈阳，在可能查阅到的史料中，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军事上，始终无法找出卫立煌这样做的具有说服力的原因。

郑洞国回到沈阳，向卫立煌报告了蒋介石的态度。卫立煌立即召集高级军事将领会议，大家都觉得没有把握打通锦州，何况也不能丢下长春和四平等地的十几万部队不管，于是一致同意卫立煌的主张。

见东北的军事将领都不想撤，蒋介石被迫同意“暂保现状”，但还是强调待条件许可，“由沈阳、锦州同时发动攻势，打通沈锦路，将主力移至锦州”。——东北的几十万军队，大都是美式装备的精锐部队，在全国战局日渐吃紧的情况下，保全他们对于蒋介石来讲至关重要。

但是，林彪没容卫立煌喘息，就向四平下手了。

一九四六年五月的四平保卫战和一九四七年六月的四平攻坚战，给林彪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现在，他虽然准备再次对战略要地四

平发起攻击，但不能否认依旧心存顾虑。林彪制定了两套作战方案：能打下来更好，打不下来就改打援——东北野战军对四平的再次攻击，改变了国民党军两个高级将领的人生命运，这两个人就是郑洞国和曾泽生。

卫立煌与蒋介石的争执令郑洞国倍感前途渺茫，因为在撤与守这一战略决策上拖延时日，“势必要将东北的几十万军队葬送掉”，郑洞国萌生了从东北战场脱身的愿望。他以治病为借口，向卫立煌请假，得到了准许。但是，林彪部主力向四平的集结使卫立煌改变了决定，他担心四平失守会导致长春和永吉失守，于是取消了准许郑洞国离开东北的决定，苦留他与“剿总”参谋长赵家骧一起去长春维持局面，同时命令永吉守军第六十军撤至长春。郑洞国自觉身为军人，在这种时刻“不容讨价还价”，遂决定先飞赴永吉部署撤退事宜。临行，他面见卫立煌，恳切建议“在放弃永吉的同时也放弃长春”，因为“长春距离主力太远，被解放军吃掉的可能性很大，与其将来坐待被歼灭，不如主动提早放弃，将东北的国民党军主力集中于沈阳锦州之间，这样尚能战、能守、能退，还可以保存一部分有生力量”。

三月八日清晨，郑洞国、赵家骧秘密飞抵永吉，向曾泽生军长传达了撤至长春的命令，并要求第六十军当天晚上开始行动。曾泽生有点不知所措，希望时间稍微宽限。赵家骧说：“曾军长，永吉距长春二百余里地，周围都有共军出没，万一走漏风声，第六十军就出不去了。兵贵神速，还是出其不意，马上就行动好些。”曾泽生只好服从命令，为了避免引起混乱，他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但是由于第六十军官兵散居在民房里，撤退的消息还是很快传遍了全市。军队还没有完全撤出，永吉市区已是一片混乱，国民党政府官员、军官家属、地主商人拖家带口，汽车或马车把出城的道路完全壅塞。军特务营奉命维持秩序，以保证部队通过，但是路上积雪很厚，行进依旧缓慢。曾泽生没有按照上级的指令炸毁小丰满水电站，城外响起的巨大爆炸声

只是在销毁不能带走的弹药。冰天雪地，在长达上百公里的路上，撤退简直成了一场灾难。先头部队过了河就炸毁桥梁，根本没人顾及后面的部队。跟随逃亡的地方官员和家属哭天喊地。财政厅长携带着大量钞票，由于桥梁被炸汽车无法通过，钞票被路上的官兵一抢而光。第六十军的突然出逃使林彪大为吃惊，他立即命令部队火速追击。追击的部队兵力有限，曾泽生亲自组织掩护战斗，结果只有落在后面的运输团遭到东北野战军的打击。第六十军侥幸撤进长春的时候，重武器和大量辎重都已损失殆尽，被长春守军新七军接应进城后，官兵们这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包括曾泽生军长在内，没有人知道，第六十军自进入长春起便开始了他们噩梦般的日子。

尽管第六十军出逃了，四平还是要打。

四平坚固的城防还在，但国民党守军气数已尽。年初的时候，陈诚把第七十一军军部和八十七、九十一师调走了，四平城里只剩下八十八师和一些保安队，总共才有一万八千多人。八十八师师长彭锷对自己拥有的精良武器和坚固工事很有信心，但官兵们的议论还是传到了他的耳朵里："四平是口没有盖上盖子的棺材，共军早晚要来打。"彭师长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长春和沈阳的增援上。

卫立煌根本没有增援四平的打算。

东北野战军一九四八年三月间发动的四平之战没有任何悬念。三月十二日清晨，猛烈的炮火把四平城防打成一片火海，第一、第三、第七纵队和独立第二师从五个方向同时突破，当天就攻占了大部分市区，严重压缩着国民党守军。第二天天亮之后继续攻击，竟然连二十四小时都没到就结束了战斗，一万八千守军被打死打伤四千余人，其余的全部缴械投降。

四平之战，证明了东北野战军作战能力的迅速提升，也证明了东北国民党军战斗力的严重下降。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和副司令员粟裕发来贺电，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在速战速捷东北战场中，又悉四平街之大捷，创我军攻占现代化永久筑城地带之先声，使反动派胆寒而民主人士欣慰，自此东北全部光复指日可下，除继候捷音外，得与你们并肩作战，为光复全中国而努力并学习你们攻坚战术，彻底粉碎蒋匪乌龟政策。谨驰贺，并向东北解放军全体同志致亲切的敬意。

有确凿的史料显示，到东北上任之初，卫立煌接到过一封绝密电报：

前次在巴黎发出的电报，已到达目的地，对方有回信，谓可以利用目前情况相机行事。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乃至有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

抗战胜利后，卫立煌偕夫人出国旅行考察，在英国见到了夫人的姨女婿汪德昭。汪德昭是法国科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法国原子能委员会顾问，一九三三年到法国勤工俭学，是法国著名物理学家保罗·郎之万的学生，也是居里夫人的女儿约里奥·居里的学生。受法国共产党员郎之万的影响，汪德昭成为中国留法学生中的左派领袖。令汪德昭感到意外的是，卫立煌对蒋介石的不满竟然不加掩饰，他们之间很快就无话不谈了：

卫立煌说：“将来回国，蒋还是要用我的。”

汪德昭说：“那你就起义么？”

“我决心这样干！”卫立煌说，“现在感到难办的就是我的意见，没法传到延安方面去。”

汪德昭说：“回到巴黎，我可以找到适当的关系，取得联系，寻求配合。”

卫立煌上任东北后，邀请汪德昭回国到他身边工作。身为研究自然科学的学者，舍弃优厚的物质条件，跑到遍地战火的东北，去做自己并不了解的军事工作，汪德昭究竟为了什么？汪德昭的职务是：东

北“剿总”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可惜的是，汪德昭多年旅居外国，和中国的共产党素无来往。返国之后，找不到解放军这一方面的线索，倒不如以前在巴黎找外国共产党方便。”但是，卫立煌和汪德昭都清楚曾经有过的“回音”：“可以利用目前情况相机行事”。

此段史料出自卫立煌的秘书赵荣声的回忆，而毕业于燕京大学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员赵荣声是共产党派往卫立煌司令部的，那时他的名字叫任天马。

历史真是让人摸不透。

唯一明朗的是，自卫立煌上任之后，国民党军在东北的军事局势急转直下。

## 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从陕北米脂县杨家岭村向东，大约走到绥德县吉镇附近，毛泽东遇到了一群当地的农民。

农民们显然认出了毛泽东，纷纷围过来搭话。

毛泽东问：“这里离黄河有多少路？”

农民们大声回答：“五十里！”

毛泽东这次向东移动，不再是与追击他的国民党军兜圈子，而是要离开他住了十多年的陕北。两天后，毛泽东看见了黄河。当地的百姓把他送到河边，他顺着黄河西岸向下游方向走了大约十几里，在吴堡县川口以南河神庙附近一个叫园则塔的渡口上了船。船靠东岸之后，毛泽东回头朝西望了好一会儿，他说：“陕北是个好地方！”

那一天，是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春天温暖的阳光照射着中国西部连绵起伏的黄土沟壑。

自那一天起，毛泽东此生再也没有回过陕北。

国民党军在东北连续丢失城镇和损失军队的消息传到南京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写给国务卿马歇尔的报告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国民党“政治与军事的崩溃现在正迅速地接近早已预料的高潮。这方面最显著的证据就是：军队士气的涣散，不仅在无精打采和消极漠不关心上面可以看得出来，而且也在拒绝服从命令或者甚至做出违反命令的行动等上面也能看得出来。中国人称后者从民族利益来讲是自取灭亡的做法”。

在遭受一系列挫折与失败后，国民党军开始检讨和反省，并制订出名为“总体战”的新的战略——不知在各个战场都已手忙脚乱的蒋介石是如何观察出“总体”来的?

为什么在兵力和装备均处于优势的情况下，国民党军却“常遭失败，甚至将领被俘，造成革命军前所未有的耻辱”？蒋介石得出的结论是：共产党打的是“人民战争”，而国民党打的是单纯的“军事戡乱”，没有发挥“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和军事的总体威力”。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顾祝同对此解释说：“戡乱军事，进行已近两年，而匪祸蔓延，匪势仍甚猖獗，检讨我们所以不能迅速消灭共匪的原因，一方面由于共匪组织严密，能够控制其占领区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竭泽而渔，从事全面叛乱，并深入我后方，大肆破坏活动，秘密传播毒化思想，瓦解人民战意；一方面由于我们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配合不够，未能将全体人力物力动员起来，以致不能发挥军事政治经济的总体力量。”

蒋介石认为，若要挽救危局，就必须做到共产党军队的四个长处，即宣传、组织、主动和保密：“这四个长处都是属于精神方面的，

决不是单凭武器和物质所能做到的。我们要赶上他，压倒他，也要从精神方面努力，也就是先要从政治工作做起。我以前在江西剿匪的时候，曾经提出过‘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地方行政与军事相配合，同样也适用于军中政治工作与作战业务相配合。”蒋介石严重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作为一个政党和一个政权，所代表和所依赖的是哪一个社会阶层。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是一个政治分水岭，从此国民党与共产党所依靠的社会阶层已划分清晰。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大地主和官僚资本阶层显然无法代表中国民众的绝大多数，站在少数阶层的立场上追求关乎一个政权和一个国家命运的“总体”效益，近乎梦呓。

这一点，足以解释当这片国土上爆发内战时，中国民众为什么对国共两军采取的是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几乎生存在贫苦农民中间，其密切的军民和军政关系，使得每一场战斗都有数量巨大的农民支撑着。一个在林彪发动的冬季攻势中被俘的国民党军营长被他所看见的景象惊呆了：成千上万辆牲口大车从战场的边缘铺天盖地而来，大车上装着给东北野战军准备的大饼、窝头、大葱、猪肉和咸菜。当这些东西被运到战场上之后，农民们又帮东北野战军装载缴获来的美式炮弹。那些在作战中负伤的官兵被抬上担架，农民们用自家厚厚的棉被把他们包裹起来。大车上甚至还拉上了和丈夫一起被俘的国民党军官的太太们，农民们招呼着：“上来暖和一下吧！以后别跟着他们遭罪了！”一些大车的牲口被从车辕上卸下来，帮东北野战军拉缴获的汽车和大炮，大炮和汽车陷在融化了的泥雪里，附近村庄的妇女和孩子抱着垫车轮的柴火甚至门板蜂拥而至。这个坐在雪地上的国民党军营长站起来就参加了东北野战军，他说他总算弄明白了国民党军为什么没什么希望。

曾驻留在华北战场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看到过令他震惊的悲惨场面，他为自己把这些场面记述下来向他的读者表示歉意，但他同时

认为不记述下来读者就不会真正了解内战中的中国。在华北平原一个叫秦德沟的村庄里，只有二十八户人家，跟随国民党军返回的地主武装杀绝了二十四户，原因是这些农民在共产党人主持的土改中分了地主的土地。屠杀是半夜开始的，“他们把十个人投到一个枯井里活埋。又逼着另外十四个人躺在一条沟里，然后填土活埋。被活埋的人当中有一个刚两个月的婴儿、一个十岁的男孩和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一个年仅二十二岁的妇女，她和她的丈夫都是极端贫困的农民，共产党人给他们分了土地，女人当了村里的妇女主任。后来，丈夫跟着共产党的军队出去打仗了，这个年轻女人的厄运来了：

> 当国民党进村，逃亡地主也跟着还乡了。这个地主亲自跑去把这个妇女交给国民党军队说：“她是八路。”“你就是共产党。”一个军官说，“你一定会唱歌。”接着，那个军官把她带到兵营里，强迫她唱歌。一连三天，她被迫从一个班到另一个班，唱的是能记得的童年时的歌。一些士兵糟蹋她，但也有些士兵见她哭泣而感到羞愧，就走开了。天黑的时候她被关起来，夜里被带去供国民党军官泄欲。第四天，她被送进监牢。他们不给她东西吃。她的叔父给她送饭。有一天，叔父看到饭留在牢房外没动，才知道她已被杀害。他到处寻找，在附近的一座桥下找到了她和另外三个人被肢解了的尸体。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八日，国民党军“华中绥靖会议”在南京召开，国防部长白崇禧对“总体战”进行了说明：共产党有很强的组织能力，能以党的力量控制政治军事，“可称是党政军一体化”。解放区的男女老少都是战斗力，壮丁都是民兵，由民兵升入军区部队，再由军区部队升入野战军。他们采取囤粮于民的政策，使用粮草就地供给，并不需要辎重补给，可谓运用社会全部人力物力支持作战。因此。国军仅凭军队对抗是绝对不能及的——“现在戡乱战争，由于未实现坚壁清野，未能把战地的人力、物资确实控制起来，散在各处的群众和物资，为敌军所利用，所以刘伯承能率大军闯过黄河，陈毅胆敢于孤军深入苏北，袭击我军后方。‘总体战’方案，在军事方面，使要以国军主力进行机动作战，以一部分兵力扼要固守，来对付共军的窜扰。这就要求政治方面，加强基层组织，能对付敌军的裹胁。在经济方面，实行坚壁清野，使敌无从掠夺。这样密切配合起来，就可以打击共军

的求兵、求食、求战的‘三求政策’了。”总之，“必须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紧密配合，军队与民众协同一致，全面动员起来，才能发挥总体战的力量”。

“总体战”的内容是什么?

首先在军事上，将西北、中原和华东战场重新划为二十个绥靖区，撤销原来战区的司令长官，绥靖区司令官统一指挥辖区内的军事、政治、经济和党务，实行自卫自足政策，彻底控制辖区内兵员粮食等物资，大力组建保安团等地方武装，清查户口，实行联防。绥靖区的建立，意味着国民党军防御战略的调整：“对东北方面，持久消耗打击匪军，使其战力不能成长。对华北方面，采取主动攻势，使东北之匪陷于孤悬分离，截断其补给。在华中方面，为匪我作战重心，首以建立封锁，阻止匪继续扩大窜扰；次为划建绥靖区，控制战场，争取人力物力，使匪无法生存活动；三为编组有力而机动之兵团，穷追猛打，以击灭匪军主力；四为挺进匪区，捣其巢穴，以断绝匪之生力。”

其次是政治战，其基本内容是“强化保甲制度”——“组训民众，人必归户，户必归甲，甲必归保，而不遗漏一人，不散失一分力量。”政治战的目的是：全面控制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枯竭共产党军队的兵源和粮源。为此，国民党提出“四自”政策：自清：组织自卫队，严格保甲制，进行乡镇户口总检查，切实做到廓清闾里；自剿：“有民皆兵，人不离枪，枪不离手”，发现共匪随时痛剿；自卫：“不论男女，无分老幼”，全体动员卫家卫乡，不容共匪入境活动；自富：“寓兵于农，寓农于兵”，农闲训练，竭力耕耘，“开辟合理外源，减少中央负担”。

经济战内容的有趣之处在于，国民党决定仿照共产党的做法实行土地改革。国民党执政中国以来，不但没有实行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主张，反而使土地更加集中在地主富农手中——占农村人口不到百分之

十的地主富农，掌握着全国百分之七十多的农村土地。对于这一点，蒋介石也承认："我们没有实行总理的土地政策，无异于表示我们没有实行三民主义的能力，这是人民对于政府不能真正拥护，对于本党不能真正信任的最大原因。"于是，国民党决心进行土地改革。蒋介石说，可以由国民政府贷款给佃农，使之向地主分期还本，若干年后佃农即可领得耕地成为自耕农。"这个办法，地主与佃农双方都可以接受，是很好的方法"。问题是，这个暗藏陷阱的"土地政策"会使佃农更加贫困，心知玄机的地主们当然愿意接受，但是佃农们呢?

蒋介石在主张"总体战"的时候，再次回顾了自己当年"围剿"中央红军时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成功。但是，他忘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当年他的对手并不是毛泽东。

渡过黄河之后，毛泽东骑马沿黄河东岸南下，又循湫水河上行，三月二十四日到达山西临县交镇三塔村。虽然国民党"总体战"战略已隆重推出，但是毛泽东依旧对共产党人赢得战争胜利充满信心，他说："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六十个月。六十个月，五年也。这六十个月又分为两个三十个月：前三十个月时我们'上坡'、'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到我们占优势；后三十个月叫做'传檄而定'，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仅仅十三个月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一路向南追击溃逃的国民党军，那时候果真是"根本不用打仗"了。

四月十二日，毛泽东在翻越五台山的路途中，与周恩来一起去看了山上的寺庙。在寺庙里，毛泽东看见一尊菩萨的胸前被挖出一个洞。寺庙里的人说，土改时农民与寺庙清算土地和财产，说菩萨的胸膛里藏着黄金，于是就挖出洞找金子。毛泽东说："原来菩萨得了心脏病，群众是来给他施行手术治病的。你们要把他好好保护起来，原封不动，以便对日后来参观的群众解释，说他害了什么病，为什么给他

实施手术。”走到山下，毛泽东看见一座龙王庙，里面香火缭绕，很是热闹。毛泽东问住持这庙是否也遭到了破坏，住持回答说，这庙不但没有遭到破坏，农民们还曾专门派人来护庙。毛泽东说：“你们看，从这里应得到的结论是多么明显！群众对山上的菩萨和山下的这位龙王的态度是多么的不同。山上的那位菩萨同农民群众的利益距离太远了，而龙王管着天雨，对农民关系太密切了。群众就是这样认识，这样对待问题的。”

当毛泽东离开陕北，向全国战场的核心地带走去时，国民党的“国民大会”开幕了。国民党决定要以“民主国家”的惯例，为中国人民选举出“合乎民意”的总统和副总统来，“使整个国家走上民主和法制的轨道”。或者说，蒋介石希望以此使国民党政权合法化。当然，合法化的前提要把共产党排除在外。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谈话称，希望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被容纳到国民政府中去，而“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不愿意在中国政府中或任何其他地方的政府中有任何共产党人”。

包括蒋介石在内，国民党军政大员们没有一个人会料到，此届“国民大会”连同“首届总统”只有短短不到两年的寿命，但当时的“国民大会”还是开得天翻地覆——所有政治阴谋中的拉帮结派、明争暗斗、钩心斗角很快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大会的唯一历史作用是，为国民党政权的最后倒台埋下了又一个祸根。

首先是谁当总统的问题，没人怀疑蒋介石是当然人选，但蒋介石本人却提出他不愿意当总统，他主张首届总统应该由一位党外人士担任，并且应该符合下列标准：一、在学术上有成就，二、在国际上有声誉，三、对国家有贡献。蒋介石当众宣布自己无意竞选总统，之后就退出了会场，结果与会者的思维顿时陷入混乱。有人揣测蒋介石的意思是要推选北大教授胡适当总统，甚至揣测也许蒋介石已经征求了胡适的意见。混乱之后，出自黄埔的多数国民党军政大员认为，蒋介

石实在不愿当总统也好，但是要当有实权的行政院院长。而戴季陶等国民党中的强硬派坚决主张由蒋介石来当总统，认为除了蒋介石之外别人都没有这个资格。争论的结果是：“一致推举蒋做总统候选人”，由陈布雷打电话向蒋介石说明。

陈布雷的电话打了，蒋介石还是推辞。

十分棘手的问题上了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蒋介石到底当不当总统候选人？两种对立的意见开始重新争论。可是，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争吵了，行政院院长张群索性道破了天机：“并不是总裁不愿意当总统，而是依据宪法规定，总统是一位虚位元首，所以他不愿意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如果常委会能想出一个补救办法，规定在特定期间，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置的权力，他还是要当总统的。”高官大员们恍然大悟，当即推举张群、陈立夫和陈布雷三人去面见蒋介石，转达中央常委会的意见：如果他愿意担任总统，就在宪法外另立条款，赋予他以必要的特殊权力。

蒋介石立即同意了。

所谓赋予总统必要的特殊权力，就是“国民大会”后来通过的《请制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案》。根据这个条款，未来的总统将被“授予总统采取紧急措施之权力”，从而拥有一切军政大权，而只要共产党还没被彻底清除，都可以算作是“动员戡乱时期”，虽然大家心照不宣的是：共产党根本不可能被彻底消灭。

果然，蒋介石顺利“当选”为总统。

四月十三日，走过艰辛的路途，毛泽东到达河北阜平县一个叫城南庄的村庄，他准备在这里住些日子歇歇脚——就是在这里，毛泽东

电请陈毅、粟裕前来共商“在黄淮地区打几个大仗的问题”。而后来的历史证明，正是这几个大仗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的最终倾覆。

南京的“国民大会”仍在轰轰烈烈地开着，总统的选举搞妥之后，副总统的选举开始险象环生。副总统的主要竞选者是李宗仁。李宗仁是国民党军桂系的领军人物，是蒋介石一生最大的政治夙敌。抗战结束后，李宗仁任北平行辕主任，这是一个“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虚职，因此副总统选举对他来讲无异天赐良机。有充分的史料表明，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得到了美国人的支持。美国人的意图很明确：蒋介石政权衰败的趋势日渐明显，美国在中国利益的代表需要更换人选，而合适的人选是在抗战中因指挥台儿庄战役而颇得中国民众口碑的李宗仁。司徒雷登大使在给国务卿马歇尔发去的电报中说：“蒋介石作为国民党统治的象征已光辉大减”，而“李宗仁将军正博得舆论信任”。李宗仁“博得舆论信任”，与他的竞选口号有关：“肃清贪污、改革政治、实行民主主义、铲除豪门资本。”——对于蒋介石的统治集团来说，这样的口号颇有揭老底的性质。于是，司徒雷登大使感慨地说：“现在需要的是能感召人的领袖，而这似乎是蒋委员长所不能做到的。”

李宗仁公开了竞选副总统的决定，并在南京成立了他的竞选事务所。

竞选对手随即出现，国民党立法院院长孙科说他也要竞选副总统。而之前当李宗仁一一估量可能出现的竞争对手时，也曾想到过孙科，为此他特意请白崇禧私下探问一下孙科，孙科的回答是：“副总统在宪法上无权，我无意参加竞选，祝德邻（李宗仁）先生胜利。”

孙科，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儿子。

孙科的出现令李宗仁意识到，蒋介石准备与他作对了，因为国民党内部谁都知道孙科对蒋介石唯命是从。同时，李宗仁也感到了自己

处境不利：孙科是孙中山之子，容易得到人们的支持；在总统非蒋介石莫属的情况下，自己与蒋介石都是军人，让一位不是军人的文官和一位是军人的总统搭档更容易被人们接受。果然，当李宗仁飞到上海和南京进行竞选活动时，蒋介石在南京黄埔路官邸召见了李宗仁，明确表示已决定提名孙科为候选人，希望他放弃竞选以免党内分裂。李宗仁当即表示："我之前向你请示过，你说是自由竞选，那时你如果不赞成我参加，我是可以不发动竞选的，可是现在就很难从命了。"——李宗仁的理由是："如今已经粉墨登场"，如何"掉头逃到后台去呢"？

蒋介石说："你还是自动放弃的好，你必须放弃。"

李宗仁说："委员长，这事很难办。"

蒋介石说："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到？"

李宗仁不快了："这倒很难说。"

一九四八年，蒋介石已是威风不在。

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首领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竞选活动。为了筹集竞选经费，李宗仁、白崇禧都贡献了自己的部分私产，而凡是以往借助桂系势力发财的那些门下故吏，如安徽省府主席李品仙、安徽地方银行行长张岳灵等也都纷纷解囊。桂系起家之地广西，更是把省府的大部分公款拨到了李宗仁的竞选事务所，以支持庞大的竞选开支。桂系在国民党内和社会中的所有文武官员全体出动，拉票声势之浩大弄得蒋介石与他支持的孙科寝食难安。李宗仁将竞选主张整理为：实行民主主义、清算豪门资本、征用外国存款、实施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战士授田、保障人民四大自由。很快，整个南京城开始盛传"李宗仁通共"。李宗仁在宴请千余名"国大"代表时慷慨声称他"不怕戴红帽子"，此话出于此人此时此种场合着实令人吃惊，更何况立法院刚刚

通过了一个阴森森的《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其目的在于“依法制裁共产党和同情者”。——“特种刑事法庭之成立即在制裁共军。今日吾人已不允许对共军再有同情心理，凡同情共军者请退出去！”于是，南京城里的中外记者们纷纷感到中国的政治颇有些光怪陆离。

四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就攻打长春乃至锦州的问题致电东北野战军，同时要求晋察冀野战军做好一切准备配合东北野战军即将发动的大规模作战——聚集在南京的国民党高官大员们并不知道，令国民党政权开始倾覆的战役已经在中国的东北蓄势待发。第二天，周恩来、任弼时先行离开河北与山西交界处的城南庄，向解放战争最后的指挥中心西柏坡走去。

就在这一天，“国民大会”的副总统选举开始了。李宗仁、孙科、程潜、于右任、莫德惠、徐傅霖，所有候选人得票都没有超过半数，只有让前三名即李宗仁、孙科和程潜进入第二次选举。第二天，四月二十四日，副总统选举进行第二次投票，结果是：李宗仁得一千一百六十三票，孙科得九百四十五票，程潜得六百一十六票。还是没人超过半数。

第三次投票前风波骤起。二十四日下午，蒋介石一面召见“国大”代表指示要把票都投给孙科，一面派人暗示程潜放弃竞选，并许诺说只要程潜把他控制的选票投给孙科，不但将来可以起用程潜一派的人，而且还可以补偿程潜花费的所有竞选经费。程潜当即予以拒绝，愤然决定放弃竞选。程潜的退出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这意味着李宗仁必须单独面对蒋介石和孙科了。桂系要员们连夜在白崇禧的寓所召开紧急会议，第八兵团司令官汤尧说：“既然老蒋这样无道理，不竞选也罢，花这多钱，惹这多气，真划不来。而且一张票要送旅费几千元，德公为竞选费快破产了，又何必呢？到下届大选再参加不好吗？”白崇禧说话了，一句反问很有意味：“下届又要过六年，你看老蒋还能

支持到六年以后不倒吗？”会议最后商量出一个以退代进的策略：李宗仁和程潜一起宣布退出竞选——我们相继退出，“选举便流产了”。“蒋先生既不能坐视选举流产，只好减轻压力恢复竞选常规，则我就必然当选”。

第二天，南京各大报纸纷纷刊载出李宗仁放弃竞选声明：“因受压迫不能竞选，所以即日退出竞选。”为了给公共舆论指明谁是幕后指使，李宗仁还特别补充说，有人说他参加竞选的目的是“逼宫”，为了“肃清流言，消除误会”，他“不得不放弃竞选，以免影响大会的进行”。

蒋介石和孙科顿时成为众矢之的。

处境尴尬的孙科也突然宣布放弃竞选，原本定于二十五日举行的第三次投票无法进行，“国民大会”竟然面临被迫停开的局面了。一天之后，蒋介石被迫召见白崇禧：“你去劝劝德邻，我一定支持他。”——从千方百计阻止他竞选，变成许诺一定支持他，李宗仁希望的局面终于出现了。更重要的是，经过明争暗斗的政治博弈，李宗仁竟然成了国民党内争取民主改革的代表人物，他得到了几乎所有对蒋介石心有不满的人的同情和支持。

二十八日，“国民大会”终于复会，第三次投票结果是：李宗仁一千一百五十六票，孙科一千零四十票，程潜五百一十五票。虽然这个结果表明蒋介石依旧在全力支持孙科，但李宗仁依旧占据着得票第一的位置。根据选举法，淘汰第三名，只剩前两名。那么，在第四次投票中，即使一票之差，也可以决定胜负。因此，双方都在最后时刻使出了一切手段：

那时南京的大饭店、大旅馆，如中央饭店、首都饭店、安乐酒店、龙门酒店、广东酒家、大三元等等都被李宗仁、孙科包了，用以招待国大代表。人们进出吃饭可以不要钱，不

过要凭着国大代表的徽章才能享此权利。各处都有李、孙专派的招待员招待，这些代表吃完就走，派头十足。

二十九日上午，第四次选举开始。唱票的时候场面热闹，每唱到孙科的时候，孙派代表就热烈鼓掌；唱到李宗仁的时候，李派代表就热烈鼓掌；当李宗仁的票唱到一千四百张时，孙科和支持他的代表纷纷离开了会场，会场里只剩下李派代表更加热烈的掌声。投票结果是：李宗仁一千四百三十八票；孙科一千二百九十五票。

李宗仁当选国民政府首届副总统。

第一个上门祝贺他当选的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白崇禧的话暗含玄机："老蒋不听美国分治的办法，所以现在美国很希望德公出来与共产党议和，南北分治。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取蒋代之，才能成为美国支援对象。不然美国援华，总不能援桂吧。再说整个局势由老蒋弄垮了，还怎样议和呢？共产党也就不肯议和了。所以现在势所必争，得不着副总统，就全军覆没了。"

而刚从东北战场脱身的陈诚，会后在家中宴请国防部所有部、司长以上官员。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现在桂系军阀极度猖獗，但我认为这是回光返照。不过道路传闻，他们有逼宫企图。我现在特提出警告，如果他们不自量力地胡作非为，须放着我陈辞修不死。"

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国民大会"闭幕，蒋介石在闭幕词中说，我们现在正处在戡乱建国最艰难的时期。

中国共产党人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就在国民党设想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办法弥补他们与中国民众之间日益扩大的利益裂痕，并准备与共产党人展开一场包括改善民生的"总体战"的时候，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发生了。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上海青年学生为反对美国支持中国内战举行了近两万人参加的示威活动，学生们高举的标语是："替千千万万死在美国援助下的中国人报仇"。几乎是同时，上海申新纺织厂近八千名工人为争取改善生活待遇而罢工，罢工引起连锁反应，五千多名舞女和她们的家属因为国民党当局"禁舞"而捣毁了国民党设在上海的社会局。紧接着，在昆明发生的事情更加恐怖，云南省府当局袭击了云南大学，当场打死五名学生，抓走了一千多名学生，其中的三百多人被关进"感化营"，七百多人被直接关进了监狱。一位美国记者说："西方人恐怕很难想象这些情景。要做一个合适的比较的话，美国人需要想象一下，凌晨三点钟，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们正在宿舍里酣睡之际，全副武装的纽约市警察加上几十名民主党（即执政党）的特务，突然闯进校园，杀死几名学生，还逮捕了一大批，以'叛国'、'共产党'或者干脆就以'危险分子'的罪嫌，不经审判关入监狱。这在中国是常事。"令美国记者感到奇怪的，国民党当局何以在内战爆发仅仅两年中就显示出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双重危机。

本来想对学校实行思想统治，结果事与愿违。在学校以及被拘留被捕学生的"感化营"里，宪兵、特务和三青团都不断攻击中共，恣意渲染它的罪恶。这样大肆宣传的结果，产生了两方面的作用。身受恐怖统治之苦的学生心想，为什么那些如此可恶的家伙偏偏要当着他们攻击共产党呢？为什么亲手打过他们的人却偏偏要声嘶力竭地宣传共产党的野蛮？为什么恰恰就是那些思想最开明的老师被骂为共产党？为什么那些年过三十、身穿大褂、腰插手枪、横行霸道的"学生"，会突然之间跳出来，硬说一个经常在图书馆里埋头读书的学生是共产党？……一言以蔽之，一切进步的思想的行动——都成了"中共"和"八路"的同义词。学生们不免要问：难道这一切都是共产主义吗？蒋介石迫使人民把自己的思想和要求，以至自己内心的希望都同共产党的口号联系起来。如果你老是把一个人说成是共产党，久而久之，很可能最后他自己也会说："莫非我就是个共产党？……如同一个魔术师凭空变出兔子来一样，中国的秘密警察硬是从本来没有共产党的地方制造出共产党来……成千上万的学生从国民党地区投奔解放区，为共产党人数不多的队伍提供了十分需要的知识分子……

毛泽东已经到达河北某处的情报送到蒋介石面前，这是一个比学生们的抗议口号声更令他惴惴不安的消息。

蒋介石已经无法有效地控制中国的政治局面，对于一个政权来讲这无疑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 沉重的门板

一九二四年的一天，每个月都要找十名学生当面测试和谈话的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问站在他面前的那位年仅二十三岁的学员：

“你叫什么名字？”

“徐象谦。”

“你是什么地方人？”

“山西人。”

“在家干过什么？”

“当过教员。”

蒋介石显然不感兴趣，他挥挥手，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蒋介石无法预料到，这个看上去身材纤瘦根本不像军人模样的学生，将成为一个以毕生的军事才能与他作对的人。

一九四七年夏出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时，徐向前的病还没有完全康复。他在抗战后期得了严重的结核性胸膜炎，在缺少医疗器械和有效药物的环境中，这种病几乎等于必死无疑的绝症，在延安它已经夺走了另一位共产党将领关向应的生命。曾经指挥红四方面军十万大军的徐向前虚弱得无法站立，病痛令他长时间地辗转于病床和担架之上，但他最终以指挥作战的决心和意志奇迹般地挺了过来。

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八日，徐向前出生于山西五台县永安村，乳名银存，表字子敬，号象谦。以“向前”为名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这个看似瘦弱的山西人终生都有坚定的信仰和不屈的意志，自三十岁那年成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后，他的名字长久地出现在国民党当局“通缉匪首”的名单中。历史注定他要与另外一个著名的山西人对抗到底，这个人就是阎锡山。一八八三年，阎锡山出生在山西五台县河边村，与徐向前的家乡仅隔一条小河。虽然大了整整十八岁，但阎锡山和徐向前是真正的同乡。徐向前平生第一次穿上军装，就是在阎锡山创办的太原国民师范学校里，那所学校的军事教官全是阎锡山队伍里的营级军官。抗战时期，徐向前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如果从国共合作抗日的战区划分上讲，他接受的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指挥。在随后爆发的解放战争中，徐向前的主要作战对手还是阎锡山，他指挥部队一直战斗到把阎锡山赶出他盘踞了整整三十八年的山西。

一九四七年底，拖着病体的徐向前把攻击目标对准了山西南部的运城。运城位于晋南平原的同蒲路上，西可出击关中，南可威胁陇海，为连接晋、陕、豫三地之战略要冲。这里原来是阎锡山部队的防地，内战爆发后，胡宗南派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率四个整编师进入晋南配合阎锡山部作战，南京国防部随即便将临汾以南划归成胡宗南的西安绥靖公署辖区。徐向前对这座城市耿耿于怀，因为晋冀鲁豫部队曾经打过两次，都没有把这座城市打下来。

第一次攻击是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当时运城的守军是整编十七师四十九团，外加四个连的炮兵和保安团，共约四千余人。陈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十、十一和十三旅以及太岳军区部队，先后攻占了机场和西关、北关，胡宗南急令整编第十师十旅和青年军二〇六师的一个团由韩城东渡黄河增援，陈赓被迫放弃了攻击。

第二次攻击是在这一年的十月，当时陈谢兵团已经南渡黄河向外线出击，为了不使晋南地区的国民党军牵制陈谢部的行动，晋冀鲁豫军区奉中央军委之命对运城实施攻坚。担任攻坚任务的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新亭。运城城墙坚固，堡垒密布，堑壕连绵，防御纵深达十余里，守军为整编三十六师一二三旅三六九团、整编十七师八十四旅二五〇团以及阎锡山的保安部队等，兵力已达万人以上。十月八日，王新亭指挥攻击部队从东、西、北三面将运城包围。艰苦的攻坚战随即开始。当时，八纵不但兵力不多，装备也差，对一座工事坚固的城池发起攻坚，攻击部队竟然只有两门火炮，“其中一门还是牛车拉的，撞针很短，要用镢头撞一下炮屁股，才能打出一发炮弹”。于是，只有采取挖掘坑道迫近城墙实施炸药爆破的办法，这使得作战进行得十分缓慢，攻守双方皆伤亡很大，战斗始终在运城城墙外壕外围胶着拉锯。徐向前不断地给王新亭打电话，希望攻击部队不怕伤亡，“专心致志地攻城”。这种“专心致志”的外围战斗持续了一个月之久，虽然最终拿下了七座碉堡并占领了飞机场，但只将攻击前沿推进到距运城外壕一百米左右的地方，而准备爆破城墙的坑道距离城墙还有数十米的距离。整编三十六师在师长钟松的率领下，从太阳渡和茅津渡北渡黄河，于十一月十二日到达距运城仅几十里的杜马村和柳沟一线，只要他们翻过中条山主峰，就可以居高临下直扑运城。王新亭的八纵没有能力一面攻城一面打援，遂决定在运城周围只留下五个团监视守军，八纵主力与王震的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联合打援。

主力一旦撤离攻城前沿，战场局面立刻险象环生。前往打援的部队必须跨越中条山南北走向的鱼脊形沟壑，这些沟壑沟深壁陡，黄土高梁之间只有羊肠小道相连，大部队行动非常困难。况且，在这种地形上，谁占据主梁的脊线，就能得地形之利。整编三十六师在渡过黄河后，已完全控制有利地形。尽管如此，十五日黄昏，王新亭的八纵和王震的二纵还是分别对柳沟和杜马村的援敌展开了攻击。战斗持续

数日，双方伤亡都在三千以上，战斗打成了一场消耗战。最终，整编三十六师突破防御阵地，大队人马到达运城。战后，王新亭向徐向前检讨说：“我们在指导上的主观错误，乃对此南北横断、东西水阻、绝壁深沟、天井窑（之地形）；对在杜村、马村、七里坡有敌来时挖的工事之利害关系认识不足。我预伏在敌通过道路东西两侧十五里地左右，夹击敌二十里行军纵队，敌发觉我即成密集队形，跑进村落防御，我跟着猛扑，不得手，伤亡甚重。”更严重的是，增援部队到达之后，运城守军发动了大规模反击，王新亭留下围城的五个团无法控制战局，之前挖好的攻城阵地遭到严重破坏，对运城的攻击已无可能。

八纵攻城的时候，老百姓给予了大力支援，不但运送粮食弹药和转运伤员，听说攻城部队需要木料，运城周边几十里的百姓家家都把门板卸下来送上阵地，这些门板在运城守军发动反击时全部被烧毁。

战后统计，老百姓送上阵地的门板总数达到十七万块之多。

门板没有了，家还能叫家么?

部队撤离战场的时候，官兵一路看着百姓家家不能闭户，低落的心情难以言表。中央军委发来电报：“……运城未克，打援又未全歼，在指战员中引起一时情绪不好，是很自然的，但我军精神很好，一二次仗未打好并不要紧，只要你们虚心研究经验，许多胜仗就在后头，望将此意向指战员解释……”但是，晋冀鲁豫官兵坚持认为，必须打下运城，不然无颜见父老——官兵们一再期望打下运城的另一个原因是：“城内物资极丰，武器弹药甚多。”

第二次攻击运城失利之后，王新亭和王震的部队都在运城以北地区休整。十二月一日，他们一起去了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河北武安县冶陶镇，向徐向前提出了第三次攻打运城的请求。徐向前遂与军区第二副司令员滕代远、第一副政治委员薄一波将战斗计划报给中

央军委，表示部队战斗热情高涨，装备也得到了应有的改善，攻击时可以使用的榴弹炮、山炮、野炮和重迫击炮已有四十门。四日中央军委复电：“（一）同意你们打运城。（二）王震纵队应位于黄河北岸的要点，确实保证河南敌不能北渡，方有把握，否则敌必增援，攻运仍无把握。（三）彭（彭德怀）张（张宗逊）主力本月休整，下月上旬向渭北出动。王震纵队须于该时西渡，勿误。”

此时，运城及其周边守军已达一万三千多人，由国民党军整编三十六师一二三旅三六九团团长覃春芳指挥。

王新亭和王震将他们能够指挥的三万多兵力全部投入了战场，主力被部署在运城西、北两个方向上：二纵的两个旅由西关地段实施突击，八纵的两个旅加上独立第三旅的两个团由老北门实施突击。同时，独立第三旅的一个团和二纵独立第六旅的一个团在东北和东南担任钳制任务，二纵独立第六旅的另两个团与周边五个县的游击队围攻运城东面的安邑县城，太岳军区的三个团和各县地方武装在黄河北岸的茅津、太阳、沙窝、风陵、吴王等渡口负责阻援。从这一作战部署上看，如果敌人的援军北渡黄河增援，因为阻援部队兵力不强，依旧必须停止攻城转而打援。这样，攻城和打援都面临相当的风险。

十六日，大雪纷飞，晋冀鲁豫部队第三次攻打运城的战斗打响。

攻城依旧采取的是人工爆破的办法。敌人的外围碉堡巨大而坚固，负责主攻的二纵接连受挫。这一次，官兵们决心拼到底，前仆后继的爆破一直持续到二十一日，独立第四旅十二团把十二号大碉堡炸毁了，负责从城西南发起攻击的三五九旅也把九号大碉堡炸哑了。运城守军急忙向胡宗南和阎锡山去电，形容共军攻击兵力与火力异常强大，他们只能“绝对殉城，以报国家”了：

养（二十二日）黄昏前，匪复开始以步枪协同向城北、城西两面猛攻，烟雾障天，手掷弹如雨，并携带大量炸药到处爆炸，城内外落多型炮弹达千余发。匪以十倍以上兵力硬与我

拼，激战彻夜，北门外最坚固之十九号碉及西门外最坚固之西大碉均经陷落，其他各点亦多残破不完，守军弹药缺乏，又无空军助战，大部壮烈牺牲，匪已迫近北城及西南角数十公尺，危在旦夕。设有不幸，职等绝对殉城，以报国家，所有物资，除尽量使用外，余当竭力破坏，免资匪用，敬请释念，并早定收复晋南之策。但为挽救一线生机，仍请飞电胡主任及中央，立即投送大量弹药，日夜派机助战，尤其黄昏及拂晓前后，大量轰炸，并立即派军救援，为祷。

总攻时间原定为二十五日黄昏，但是，二十四日这天，胡宗南四个旅的增援部队已在陕县渡过了黄河，王新亭和王震遂决定将总攻提前，争取在援敌到来之前突破运城城防。

二十五日拂晓，总攻提前开始。接敌的坑道还没有完全开辟，坚固的城墙还没打开缺口，攻城突击队拥挤在外壕边缘，掩护火力不足以压制守军密集的枪弹，尤其是城墙下守军的重机枪阵地事先没有被发觉，导致突击部队伤亡巨大。两天两夜之后，攻击仍没有进展。这个时候，如果时间拖延，致使增援之敌过于靠近，就必须抽调攻城部队前往迎敌，攻城很可能面临再次失败。徐向前给所有攻击部队下达了死命令："坚持到最后五分钟，一定要把运城拿下来。"但是，缺乏炮弹的火炮根本无法把城墙轰开，最有效的办法还是把坑道挖到城墙下，然后进行大规模爆破。王新亭和王震研究的结果是：在火力封锁下强行接近城墙外壕，在外壕下挖掘放置炸药的坑道。

任务交给了八纵二十三旅。王新亭要求二十三旅在一昼夜内完成爆破坑道的挖掘。二十三旅旅长黄定基把任务交给了六十九团。团长张国斌认为七连的交通壕已经挖到距城北外壕二十多米，况且这个连有很强的土工作业能力，于是把任务交给了七连。七连接受任务的是二排长刘明生。刘排长挑选出九名官兵并分成战斗小组。第一组：排长刘明生，战士乔永亮、郭海顺和李少贵；第二组：班长崔有福、战士郭宪章和常豫恭；第三组：副排长申士功，战士车元路和张有才。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行动，他们每人不但要带上土工作业的工具，还

要背上一块铺着湿棉被的沉重的门板，以抵挡国民党守军密集的子弹。

夜晚，风雪交加，第一组出发了。通过铁丝网的时候被敌人发现，城墙上扔下来手榴弹和照明弹，乔永亮牺牲，刘明生、郭海顺负伤，行动被压制在开阔地上。第二组接着上去了，郭宪章负伤，崔有福和常豫恭通过铁丝网冲到外壕边缘，在那里，他们看见已经负伤的李少贵正一个人拼命地挖着。

到了预定的联络时间，张国斌团长拼命拉联络绳，但就是没有回音。第三小组战士车元路请求让他上去看看，张团长答应了。

车元路消失在黑暗中。张团长趴在雪地里焦急地等着，拉联络绳依旧没有反应，直到凌晨几乎被冻僵的时候，他听见有人小声说："团长！前面爬过来一个人。"车元路浑身都是冰碴，血浸透了军衣冻结在冰碴里，张团长赶紧叫卫生员包扎，卫生员发现他竟然有五处枪伤。车元路报告说：在外壕里挖掘坑道，不断受到炮火射击，挖好的坑道被炸塌了，现在正用门板支撑坑口拼死往里挖。报告完毕，车元路要求返回，张团长不准他再上去，车元路说他就是根联络绳，只要他活着，指挥所与外壕的联络就中断不了。

车元路，山西晋城常家庄一个孤苦的流浪儿。父亲给地主当长工病死，母亲被国民党军打死，哥哥被抓走从此没了消息。在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的时候，他参加了共产党军队。他所在的那个排，所有的战士，没有一个年龄超过十八岁的，在六十九团被称为"小鬼排"。但是，这些贫苦孩子打起仗来十分勇敢。车元路刚到部队，就赶上攻打曲沃的战斗，他的腿被子弹打穿，竟然还追上了一个逃跑的国民党军官。为此，小战士车元路荣立了特等功。

再次上去，车元路遭到猛烈的射击拦截。子弹围着他呼啸，手榴弹在四周爆炸。他终于滚进外壕的时候，身上不知道哪里又负了伤。在城墙外壕下挖坑道的人几乎全部负伤，国民党守军知道这些跑到外壕里的士兵在干什么，因此所有的火力都射向这里，坑道不断地被炸塌，人员不断地负伤，但坑道依旧在顽强地向前延伸。作业工具坏了，战士们就用手挖，每个人的指甲都掉了，血淋淋的双手不停地在坚硬的冻土上抠着。车元路又要返回了，外壕三米多深，因为再一次负伤，他仅爬出去就使出了全身的力气，刚登上梯子，几颗手榴弹在身边爆炸，这一次他伤在头部。车元路回到指挥所的时候，张团长一把把他抱在怀里。他一边报告情况一边说："没伤到我的骨头！"报告完毕，他带着两名战士再次返回。守军的机枪封锁更加猛烈，城墙上点起了大火，国民党兵在上面喊："你们打不进来！别送死了！"车元路在这片开阔地上往返了五次之后，依旧活着，他让六十九团所有的官兵感到十分惊讶又十分崇敬。最后一次回来时，他给指挥所带来了好消息：坑道已经挖了近六米深，可以容纳三千公斤炸药。为了运送炸药的人的安全，在通往坑道的交通壕里，每隔几米还挖了避弹坑。

增援的国民党军距运城仅有一天的路程了。

二十七日黄昏，八纵二十三旅爆破队仅用四十分钟就把三千多公斤炸药送了上去。十七时三十分，天崩地裂般的爆炸声响过之后，运城城墙被炸开一道二十多米宽的缺口。八纵的突击队员乘势拥入，与守军在突破口上展开拉锯战。敌人发动了猛烈的反击，第二梯队被截断，王震命令独立第四旅增援。第四旅在旅长顿星云和政委杨秀山的率领下，冒着守军的侧射火力，向突破口拼死突击。第四旅十四团副团长吴智光阵亡，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团级干部全部负伤。在付出巨大代价后，八纵突击队从城北突进城区，二纵突击队从城西突进城区。二十八日拂晓，国民党守军终于支持不住了，开始从东门和南门向外

突围，四千多人在永济附近被追歼，三千多人在平陆县七里坡附近被追歼。

蒋介石获悉运城失陷的消息，认为有碍整个晋南战局，命令胡宗南立即“从速收复”。但是，胡宗南得知运城失守后已经收缩了增援部队。

徐向前认为：“打下运城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不仅把守运城的一万多敌人全部歼灭，消灭了敌人有生力量，可以说是典型的攻坚歼灭战。而且，在精神上摧毁了敌人防守这种城市的信心，打破了敌人固守据点的信心。同时，我们创造了攻坚的宝贵经验。”

国民党军在山西南部固守的城市，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临汾了。

此时，就整个北线战场而言，蒋介石已无法顾及战区的广泛地域，特别是在华北地区，国民党军的兵力更显得捉襟见肘。

为什么兵力超过聂荣臻部队的北平行辕作战总是失利？蒋介石认为，重要的原因是行辕下属的张垣和保定两个绥靖公署不听指挥、互不合作，而且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缺乏指挥才能。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日，蒋介石下令：“保定、张垣两绥署即行撤销，另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调傅作义、孙连仲兼北平行辕副主任，并特任傅作义为华北剿匪总司令，冀、晋、热、察、绥五省军队归华北剿匪总司令管制。”蒋介石的这一变动最终还是出现了机构重叠的尴尬局面：首先是总部设在北平的总司令部与北平行辕的关系极其微妙，国防部的解释是：“总部负责指挥军事，行辕负责军政，对总部亦有监督之权。”其次是傅作义与阎锡山如何相处的问题，国防部的解释更加含糊：“总部辖区包括冀、晋、热、察、绥五省，惟太原绥署仍保留。晋省战区之划分，系太原绥署指挥太原附近军队作战，华北总部指挥雁北军区。”——这个解释不但让表面上拥有山西军事指挥权的傅作义感到别扭，

阎锡山自然更加不满，因为这个山西霸主的军事管辖范围仅限于他的家门口“太原附近”。

傅作义上任之后，大力贯彻“总体战”的思想，将所能指挥的正规军编为由第十六、第九十四军组成的平汉兵团，由第六十二、第九十二军组成津浦兵团，以及原属于他的各军组成的平绥兵团。三个兵团分守三个方向，“以主力对主力”，“以集中对集中”，分别实施“机动防御”。

而就各野战军的实力而言，晋察冀野战军规模排在倒数第二，总兵力不足十三万。聂荣臻对指挥员们说：“你们不断打胜仗，缴到武器大量上交，加上土改搞好，兵源问题解决了，我们就可以扩编和装备新的纵队，我们的力量就会大大加强。”

打下石家庄后，晋察冀野战军的作战区域依旧局限在保定附近。因为以攻坚作战难以取胜装备优势的敌人，所以他们大力破坏平汉、平绥铁路，试图迫使傅作义的部队分兵作战。但是，傅作义坚守“集团推进”的策略，将主力集结在保定以北地区，晋察冀野战军始终没有找到战机。为调动和分散敌人，一九四八年一月中旬，郑维山的第三纵队对保定以北的涞水发动了攻击，傅作义即要顾及救援涞水，还要确保保定，于是被迫分兵——傅作义命令第三十五军军长鲁英麟率新编三十二师和一〇一师北援涞水。这一命令铸成了一个无可弥补的大错。

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是傅作义起家的部队，一九三一年他成为这个军第一任军长。而新编三十二师和一〇一师又是傅作义最珍爱的两个主力师，他把一〇一师称为“一块金子”，把新编三十二师称为“一块银子”。

一月十二日拂晓，“一块银子”在寒冷的大雾中刚渡过拒马河，就与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九旅三营遭遇。三营的任务是作为预备队保障主力围攻涞水，大雾中，他们弄不清楚河东来敌有多少，但随着阻击阵地被凶猛的攻势相继突破，这才感到情况有点不对劲，部队退入河西的庄町村西北角。第三十五军军长鲁英麟率领军部到达河东，他怕已经过河的新编三十二师孤立前出，遂命令他们暂时撤回来，等天亮以后一起向前攻击。师长李铭鼎曾率部与共产党军队作战，打大同、占张垣都是胜仗，因此认为军长的命令实在没有必要，新编三十二师就这样在庄町村驻扎了下来。李铭鼎不知道，就在他的部队安营扎寨的时候，三纵司令员郑维山严令九旅夺回庄町村——因为这里一旦被敌人占领，就会对攻击涞水的部队构成严重的后方威胁。

九旅突然发动了攻击，遭到新编三十二师的猛烈抵抗，仗打了整整一天未见进展。三纵司令员郑维山和政治委员胡耀邦立即决定缓攻涞水，调三纵主力全力攻击庄町村。同时，野战军指挥部命二纵在庄町村以南、拒马河以西对一〇一师进行钳制性进攻，命一纵一旅在涞水至高碑店的公路北侧占领阵地准备阻援。

十二日黄昏，三纵开始了歼灭新编三十二师的战斗。“一块银子”果然是支老练的部队，夜战时冷静地埋伏在工事里，等攻击部队冲到跟前五十米时，才投掷出大量的手榴弹，然后在各种火力的掩护下发起反击。三纵各营突击队都是一波倒下第二波接着上，一夜之间攻击往复发起，倒在血泊中的官兵难以计数。国民党军官兵边打边喊：“是野战八旅咱们就打，不是就滚开！”在他们心里，华北的共产党军队中只有第三纵队八旅算是能打仗的部队。

打他们的就是八旅。

八旅二十二团二连从村庄的西北角首先突破新编三十二师的防御线，七旅和九旅的部队跟着占领了守军的前沿阵地。

但是，战斗持续了一夜，三纵没能把新编三十二师分割开。

天亮的时候，拒马河上游枪声大作，国民党军骑兵第四师从一纵一旅阻击阵地的北面绕道，向三纵的背后杀了过来。地平线上太阳初升，骑兵的马刀在晨曦中挥舞成一片耀眼的旋风。三纵的前面是一个步兵师，后面是一个骑兵师，一个纵队对付敌人的两个师显然力不从心。但是，已经没有退路了，杨得志给郑维山打来电话，命令三纵“一步也不许后退，谁退则诉诸军法”！

八旅的二十二团和二十三团处在骑兵冲击的正面。两个团在继续攻击庄町村的同时，所有的机枪都原地掉头集中向骑兵射击。冲在前面的骑兵连人带马扑倒后，冲击的阵形显出了迟疑。这时候，战场到了谁能坚持到最后的关键时刻。郑维山将三纵所有的大炮都调到了庄町村战场上，三纵各旅各团开始拼死向村内突击，二十二团一营营长阎同茂带着突击连冲在最前面，官兵们把敌人投掷过来的手榴弹扔回去，然后就冲上去拼刺刀。战至上午九点，除一部被渡过拒马河增援的两个营接应而出之外，新编三十二师驻扎在庄町村内的两个团基本被歼。此役，晋察冀野战军伤亡近万人。在村内一户百姓家的菜园里，躺着一具盖着棉被的尸体，俘虏辨认说：“这是我们的师长李铭鼎。”

“一块银子”完了。

第三十五军军长鲁英麟得知新编三十二师覆灭的消息时，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一夜之间“一块银子”就这样突然丢了，这让他回去如何向司令长官交代？六神无主的鲁英麟正不知所措，他的车队突然混乱起来，这一次他的耳朵听得很真切——枪声从四面响了起来。

攻击鲁英麟军部车队的是一纵一旅，他们原来的任务是阻击可能增援庄町村的敌人，当发现公路上出现一列长长的车队时，旅长曾美毫不犹豫地下达了攻击命令。这是一次短促的攻击，几辆汽车燃烧起来之后，没有战斗力的军部立即散了伙，各级军官争相逃命，很快就被打死二百多、俘虏四百多。一旅缴获甚丰，军部的八十多辆汽车上拉满各种物资，跟随军部的一个榴弹炮连的全部装备也被缴获了，特别是他们头一次有了三门美式一百五十毫米大口径榴弹炮，而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全军才有四门这种“命根子”一样的重型武器。

第三十五军参谋长田世举被打死，只有军长鲁英麟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第二天，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播发了一条消息：第三十五军军长鲁英麟自杀殉国，地点是在涞水以东高碑店火车站的一节空车厢里。

没有人确切知道鲁英麟为什么要自杀。当他的军部受到袭击的时候，他向前来增援的新编骑兵第四师师长李春方要了几匹马，带着少数亲信逃到高碑店火车站，住进车站内的一个小邮局里。整个晚上，他拿着打开保险的手枪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边走边嘟囔着：“总司令起家的三十五军断送在我手里了……”一旁的副官劝他睡觉他不听，政工处长夺他的手枪几次都没能夺下来。半夜时分，傅作义从北平打来电话，副官只听得鲁英麟连续说“是，是，是”，没人知道傅作义在电话那头说了些什么。第二天天刚亮，在站台上徘徊的鲁英麟趁副官不注意，突然跳进一节空车厢，等副官赶上来的时候，车厢内传出一声沉闷的枪声。

鲁英麟和傅作义同是保定军校第五期学员。

虽然第三十五军损失惨重，但鲁英麟的死还是让傅作义十分痛苦。

傅作义说："胜利是在顿挫不诿、再三再四反复冲杀中得来的，不牺牲就不会有胜利。"

一个月之后，在傅作义管制的战区内，重创再一次降临。

三月，徐向前指挥部队开始攻击那座孤零零的城市——临汾。晋冀鲁豫部队对晋南重镇临汾的攻击，成为解放战争中耗时最长，伤亡最大的城市攻坚战，战斗的残酷显示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将作战重心转向城市之初所遭遇的艰辛。

临汾位于汾河谷地中的同蒲铁路线上，是晋南著名的军事重镇。依自然地形砌在黄土高坡上的城墙周长约十公里，基部厚达三十米，倾斜的墙面高达十四米，顶部宽达十米，可以并行三辆大车。整座城市西傍汾河，城内地势高于城外，西、南、北三面均为开阔地，城墙东南加修有护卫城，称为东关，面积有主城的三分之一。临汾城防工事经过日军和阎锡山军队的逐年加修，成为一座易守难攻的坚固堡垒。城防由四道防线组成：第一道是外围警戒阵地：以城市周围较大的村镇为依托，筑有碉堡、明暗火力点、鹿砦、电网和地雷区，各点驻有一个连至一个营的兵力，配有火炮、机枪，可以单独作战，也可以相互支撑。第二道是护城阵地：以环城的二十七座堡垒构成，其中三座一组呈品字形，距离城墙五十至八十米，碉堡周围配备有地堡、火力点、铁丝网和地雷，各主碉堡内既有暗道通往城内，又能与城墙上的防御工事构成立体火力网。第三道是外壕和城墙阵地：外壕深二十米、宽三十米，紧贴城墙；城墙上设置着火炮以及机枪射击阵地和防御火力据点；城墙的腰部修筑有机枪、步枪和喷火器的发射掩体；城墙的根部挖有地堡，地堡上布设着射击口。第四道是城内纵深阵地和地道工事。城墙内有内壕，壕内每隔十五米修有暗堡，城内的主要街道和建筑上设有大量的巷战据点。临汾守军，由胡宗南的两个团加一个炮兵营和阎锡山的六十六师组成，再加上各种杂牌武装、还乡

团、保安队、保警队约八个团，总兵力三万余人。守军指挥官是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晋南武装总指挥梁培璜。

晋冀鲁豫军区组成了以徐向前为司令员的前线指挥所，统一指挥第八纵队的三个旅、第十三纵队的三个旅、太行军区的两个旅、吕梁军区的两个旅、太岳军区的八个团，总兵力约五万三千余人。

临汾是国民党军在晋南的最后一个军事据点。如果攻击得手，便可以使晋冀鲁豫和晋绥、吕梁解放区连成一片，徐向前的部队就可以北上晋中直指阎锡山的老巢太原了。

徐向前在战前动员会上说得更明确：以后与国民党军的作战，在本战区内，就是要肃清敌人遗留的城市据点；将来打出去解放全中国，要收复很多很多的大城市，从现在起就要积累城市攻坚的作战经验，要把“晋冀鲁豫军区的野战军培养成为专门的攻坚部队”。徐向前要求以攻击运城的经验来指导此战：一、注意攻击准备；二、强行坑道作业；三、采用连续爆破；四、巩固突破口向两翼发展；五、步炮协同延展纵深；六、兵力使用反对平均主义；七、坚决执行命令，不打滑头仗；八、要有忍劲，坚持最后五分钟。

攻击临汾的时间定于一九四八年三月十日。

但是，接连发生的两件事令徐向前警觉起来：首先是十三纵奔袭阎锡山的六十六师一个团的时候，竟然扑了空，六十六师师长徐其昌率增援部队绕道汾河西岸，最终带领一个团的正规军和三个团的保安部队顺利进入临汾城；接着，胡宗南为加强西安守备，决定将他的三十师三十旅从临汾撤出空运回西安，而且已经运走一个营了——徐向前领略了阎锡山的狡猾，同时认为，如果让战斗力最强的三十旅跑了，攻打临汾的行动就无法达成牵制胡宗南主力以支援西北野战军的作战目的。

徐向前决定将攻击时间提前三天。

七日，晋冀鲁豫部队首先用炮火封锁了机场，使得胡宗南的三十旅无法继续撤出临汾。接着，八纵和十三纵在雨雪交加中开始了肃清外围的战斗。梁培璜将主力逐渐调回主要城防阵地，用杂牌武装在外围各据点与晋冀鲁豫部队拼死纠缠，这使得外围作战进行得缓慢而艰苦。战斗中八纵连遭不幸，先是连日阴雨导致交通壕坍塌压死数十名官兵，接着因看地形隐蔽不好伤亡了两个营长和一个副营长，最后二十四旅旅长王墉在前沿阵地上中弹阵亡。三十三岁的王墉旅长是大学生，文武双全，智勇兼备，战时身先士卒，果断坚定，平时军衣整洁，仪表堂堂，他的死令徐向前万分痛惜。他写信给晋察冀军区参谋长王世英：

> 这次攻临尚未进入决定作战，八纵因干部看地形不隐蔽，亡营长一，副营长一，伤营长一，挖交通壕因土质松，连日阴雨天又解冻，又挖得大与宽，致土塌下，压死者数十人，我已下了一个训令纠正这一现象，但昨天二十四旅旅长王墉同志又到前方地堡看地形，被敌冷枪击中头部而牺牲，真正令人不胜悲愤……

晋冀鲁豫部队兵临城下，阎锡山抽不出兵力增援，只有不断地打电报给梁培璜，命令他“人尽物尽，城存成功，城亡成仁”，因为“保卫临汾，就是保卫太原”。梁培璜复电阎锡山：“本人已下决心与临汾共存亡。”

临汾西靠汾河，城南、城北的城防工事之外均是深远的开阔地，易守难攻。二十二日夜，攻击部队开始猛攻临汾东关。担任攻击任务的是刚刚组建不久的十三纵，其三十八旅从东南方向突击护卫城垣，三十九旅从东北方向突击电灯厂。但是，攻击不断失利。炮兵曾把城墙轰开一个小口子，因射击技术不熟练，轰开的时间过晚，导致步兵在敌人猛烈火力的拦截下伤亡重大。

至三十日，攻击临汾的战斗进行二十二天，攻城部队已付出伤亡近四千人的代价。徐向前不得不改变攻击战术，各攻城部队奉命即刻转入隐蔽挖壕作业。十天以后，四条通向临汾城防外壕的坑道挖好。

四月十日，八纵二十三旅被调过来攻击东关。两小时的火力准备之后，一万六千斤炸药被点燃了，刹那间，整个东关砖石横飞，火光冲天，临汾城外壕被炸开两处大缺口，一个宽五十七米，另一个宽二十五米，二十三旅的两个突击营开始急速突进，六十六师师长徐其昌被迫带领少数卫兵退到主城内。

东关失守后，临汾守军陷于危机。三十旅伤亡了四百多人，六十六师也只剩下七百多人。阎锡山告诉梁培璜："依现有力量死守，不要希望援兵解围。"梁培璜只有强令临汾市民参加战斗，男女老幼日夜加固碉堡工事。由于长时间处于被围状态，临汾城内物资严重匮乏，更危险的是满城无论兵民皆人心慌张。为了维持战斗力和城内秩序，梁培璜下达了严厉的命令："奉令进攻迟缓者杀；奉令赴援迟缓者杀；未奉令放弃阵地者杀；邻阵被攻有力不援助者杀；邻阵被陷不坚持本阵地者杀；滥行射击、虚报弹药、阵前无敌尸者杀；谎报军情企图卸责者杀；主官伤亡次级不挺身而代行职务者杀。"让梁培璜心惊胆战的是共产党军队的大规模挖掘，他登临城墙看见四野泥土翻飞，但却不见一个人影。他命令在城墙下挖防御坑道，坑道底部放置水缸，监听城墙外面挖掘的声音。结果，水缸一个接一个被放置在城墙下，"吭吭"的挖掘之声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梁培璜听后寝食难安。

晋冀鲁豫官兵挖掘坑道的作业异常艰苦。在与临汾守军"对挖、对听、对炸"的对峙中，坑道几乎是一寸寸地向前延伸着。为了尽量不被敌人发觉，官兵们使用了很小的工具，甚至用手挖掘，手破了缠上棉絮接着挖。敌人的反坑道挖得很密集，晋冀鲁豫官兵们不得不时常改变挖掘方向，这使坑道因为弯曲而进展得更加缓慢。

攻击临汾的战斗正处在艰苦的僵持中，战局陡变，傅作义和阎锡山集中兵力准备偷袭石家庄。中央军委认为必须保住石家庄，询问徐向前是否能在短时间内攻克临汾，是否能抽出两至三个旅的兵力北上，在太谷附近阻击阎锡山的主力部队。在尽可能调动周边兵力支援石家庄方向后，徐向前坚持认为，对临汾的攻击已经持续一个多月，部队已经伤亡近万人，如果放弃攻击不但功亏一篑，更重要的是损害攻击部队的斗志，还会使晋南战局陷入复杂化。徐向前坚持攻击临汾的决心得到了朱德的支持。朱德写信给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薄一波和第二副司令员滕代远：

> 我很顾虑你们怕伤亡，又打不开，不如不打。这样决心，那就前功尽弃，敌人守城更有信心，我们攻坚的信心又会失掉，部队也学不会攻坚。如此损失更大，又毫无代价。请你们考虑，如向前有决心，应支持他一切，如炮弹炸药手榴弹之类，源源供给向前，撑他的腰。我在军委动身时已告剑英，打临汾决不可自动放弃，更不可由后方下命令叫他放弃。

四月底，十五条进攻坑道和四十条掩护坑道都已经靠近城墙。

国民党守军开始了近乎绝望的破坏行动，炮火轰击、飞机轰炸持续不断，挖壕的坑道一次次被炸塌，晋冀鲁豫官兵一面反击一面修复，一个连全部伤亡后就再换上去一个连……还是门板！还是需要大量的门板！这种近乎原始的攻城方式，需要如此巨大数量的门板，实为解放战争中的战争奇观。临汾城附近数十里的百姓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不但日夜做军粮、抬担架、护理和转运伤员、输送弹药补给，而且人人都把自家的门板卸下来送上前沿，数量和打运城时一样达到了十几万块之多。这些上面还贴着门神画的门板，不但能够支撑被炸塌的坑道，而且是掩护官兵作战的“土坦克”，背着铺上了湿棉被的门板在弹雨中爬行，官兵们觉得安全多了——百姓将自家门板送给军队攻城的行为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对于百姓来讲是真正的毁家助战；对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来讲，百姓的家门是他们的生命归宿，不打下临汾如何能在进门的那一刻看见百姓的笑脸?

徐向前给夫人黄杰写了一封信：“昨日整夜未睡成觉，但今天精神亦不算坏，近来因事多、说话多，时常感觉胸背有些酸困与痛，但只要注意休息后，可少恢复，勉强下去还可以，只要不走路、不久坐即可支持下去。”接着，徐向前对八纵司令员王新亭说：“就是胡子打白了也要把临汾打下来，打不下来我和你到五台山当和尚去！”

五月初，八纵二十三旅的三条主坑道与巨大的爆破洞终于挖掘完毕。从政治部主任到战士，长长的队列开始传送炸药。为了防止炸药潮湿，所有的人都把衣服脱了盖在炸药上面。炸药的堆积数量十分惊人，看来徐向前和他的官兵决心把临汾城炸上天：一号主坑道装黑色炸药六千一百多公斤，二号主坑道装黄色炸药二千五百公斤以及硝氨炸药五百公斤。徐向前发布了解放临汾《紧急动员令》，号召“全体指战员以百倍紧张的精神紧急动员起来，扫除一切倦怠、松懈、烦腻、迟疑的现象，坚决、勇敢、积极、顽强，坚持最后五分钟的精神，争取解放临汾的最后胜利”！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七日傍晚的那场爆炸是古城临汾从未经过的。

惊天动地的巨大爆炸声还未停止，临汾城墙已被炸出了两处近四十米宽的大口子，八纵突击部队蜂拥而入。徐向前给中央军委发去电报：“八纵全部十九时五十分已攻入临汾，刻已进入三个团，正巷战中。”

十八日，天明时分，临汾城被攻占。

八纵二十三旅官兵战功卓著，战后被中央军委授予“临汾旅”称号，这一称号至今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之中。

临汾守军六十六师师长徐其昌和整编三十师三十旅副旅长谢锡昌逃出城后被捉。临汾守军总指挥梁培璜当晚也逃出城，过了汾河藏进

一片麦地里，第二天早上太阳出来后，他被晋冀鲁豫官兵俘虏了。

梁培璜被带到徐向前面前时，光着脚，徐向前让人给他拿来了一双鞋。

徐向前问：“你是保定军校第几期的？”

梁培璜答：“第三期。”

徐向前问：“打了几十年仗，难道没记住‘无必救之军者，则无必救之城’这条城防法则吗？”

梁培璜答：“知道。”

徐向前问：“明摆着临汾是座孤城，阎锡山远水救不了近火，胡宗南自顾不暇，蒋介石更帮不上手，你为什么还要死守？”

梁培璜无话。

临汾攻坚战斗之难，时间之久，消耗之大，战况之惨烈，在晋冀鲁豫军区战史上前所未有。在历时整整七十二天的攻坚中，部队伤亡一万五千三百余人，消耗各种炮弹九万五千余发，子弹一百六十四万余发，炸药五万公斤。战后，徐向前一一察看了临汾城外壕、城墙、火力配备据点、被炸药炸开的突破口。在后来的临汾战役总结中，他说：“假如说我们指导得好，打得好一些，是不是可以不需要七十天时间，早一点打下呢？是可能的。是不是不需要伤亡那样多？也是可能的。”

攻打临汾的攻坚部队，大多是新组建的部队，官兵也多是本地子弟，他们在父老乡亲的注视下艰苦作战，不畏牺牲。而如果没有百姓倾尽全力支援，耗时之长、伤亡之大的战役难以支撑。战后统计，临

汾城周边动员支前民工二十万人，运送门板二十六万块、梁木十万根，粮食几百万斤。当付出巨大代价的百姓看见徐向前的队伍向北开去的时候，他们觉得包括自己孩子的性命、自己家的粮食和门板在内，所有的付出都很值得。

北边，是阎锡山的老巢太原，打下太原就意味着山西全境的解放。

## 麦子是个好东西

时年六十五岁的阎锡山，是国民党山西省政府主席、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位沉潜阴鸷、复杂多变的奇异人物。

他的祖上原是贫苦人家，家道的转机是从曾祖父经商开始。曾祖父通文字、工心计、巧计算，从粮食店学徒逐渐升到了掌柜，可惜积劳成疾，四十一岁壮年即病逝，但他已使阎家从贫困者跻身于资产拥有者之列。从祖父开始，阎家开始购置田地，做小生意和放高利贷，成为一户家境殷实的地主。阎锡山的父亲叫阎书堂，喜欢算卦卜占，热衷于观察天象变化。他的墓志铭中有这样的记述："方在乡塾，即耽玩易象卜筮，涵濡既久，于阴阳否泰、盈虚消长之理，深有所悟而善观时变。"阎书堂十四岁便弃学经商，他雇佣佃农耕种购置的农田，自己则跑到县城开了家钱庄，号"积庆长"。钱庄在放高利贷的同时，利用银两和制钱的比价不稳买空卖空，进行金融投机，一时间生意兴隆。

阎锡山六岁时，母亲因病过世，他被寄养在外祖父家，这个生性顽劣的孩子受了儒家文化教育——"摘抄古圣贤修己治人之名言要语，自题曰《补心录》。"十五岁那年，阎锡山被父亲带到县城，当了钱庄的少东家兼伙计。这是阎锡山人生中的重要时期，他站柜台、开票据、做交易、算得失，参与高利贷发放和金融买卖投机的所有公开和

秘密的活动，这个比父亲多读了几年儒学的青年很快就适应了市场变幻、人情冷暖、金钱万能的氛围，也学会了投机取巧、唯利是图、尔虞我诈和逢场作戏的本领。要不是一九〇〇年间的一场大变故，阎锡山很可能沿着一个金融商人的道路一直走下去了——一笔大生意由于判断失误导致钱庄破产，父亲无法应付上门兑现的人群，带着儿子开始了狼狈不堪的逃亡生涯。阎家钱庄的命运与当时国家的命运惊人的一致：那一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以及整个大清朝廷开始逃亡。钱庄少东家一夜之间成了饥寒交迫的游民，阎锡山卖过烧饼，为清军出过兵差，做过马夫和各种帮工，备受屈辱的生活令他第一次把国破和家危联系在一起，他对繁华城市里的高官贵人和显赫权势愤恨不已："公虽年未及冠而对社会不平了解颇深，更感于清廷政治窳腐，军事失利，外交无能，遂有改革社会、挽救危亡之大志。"

十九岁，阎锡山考入山西武备学堂，一年后被选赴日本士官学校留学。他先入日本振武学校，学习日语和近代科学，后入日军弘前步兵第三十一联队实习，再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日本留学的经历，给阎锡山的人生留下深刻印迹，他崇尚日本军国主义，同时结识了孙中山先生，成为孙中山、黄兴组建的"铁血丈夫团"中的一员，并参加了同盟会。回国之后，他先在山西陆军小学任教官，然后一路高升，辛亥革命前已是新军第四十三混成协八十六标标统，其兵权相当于一个团长。当时，整个山西新军混成协只有两标。辛亥革命中，他成为山西革命首领之一，清廷的山西巡抚被杀后，他先投靠袁世凯成为山西都督，后又投靠段祺瑞成为山西省长。至此，这个五台县里的钱庄少东家完成了人生的重大转变，开始了他经营山西的毁誉参半的漫长历史。

"他的态度古板，说话慢条斯理，他的双手像舞蹈者一样，有节奏地做着各种姿势，俨然在用他的双手主宰着万国的兴亡，划出时间和

空间，爱抚着城市和村庄。”这个说话时喜欢手舞足蹈的一方霸主，在连年的军阀混战中立场摇摆不定，唯一的目的就是确保他在山西的统治。他始终如一地把中国的山西省当作自己的私人地盘来经营，如同当年经营他的阎家钱庄一样。他大力发展山西经济，建立完善的教育体系，甚至不惜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把山西境内的铁轨缩短间距，使山西成为任何政治、军事和经济势力都无法自由侵入的堡垒式的私人领地。阎锡山的“保境安民”策略让山西始终置于战火之外，直到日本军队攻占娘子关和雁门关一线。日军兵临山西，一向反共的阎锡山出自保卫山西的目的，与坚决抗日的共产党人拉上了关系，他甚至主动请共产党人到他的地盘里成立抗战组织。但是，当中国的抗战进行到最艰苦的时候，他又开始与日本方面私下媾和——“一切事情都不能做得太绝对，抗日要准备联日，拥蒋要准备反蒋，联共要准备反共。”阎锡山从不在乎国家利益，在他看来只有山西才是他的“国家”。日本军队眼看就要垮了的时候，他再次转变回到反共的政治轨道上来，将自己与蒋介石的命运捆绑在一起，因为他知道，共产党人的军事力量已经强大到仅靠他一人无法抵挡的程度。

“如果阎锡山在他的战区内死掉，或者活下来，而没有用他那做着各种姿势的双手去折腾老百姓，那么，他死后或许可能变成一位受人尊敬的人物，但到最后，山西农民却恨阎锡山比恨蒋介石更甚。”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阎锡山喜欢高谈阔论社会变革的哲理，他对玩味乌托邦的空想，远比对抗日战争中令人厌恶的苦差事感兴趣得多。”——阎锡山“折腾老百姓”的手段与中国其他军阀有很大的区别，区别的根本在于他有一套自创的“理论系统”，这个“理论系统”可谓千奇百怪，标新立异，乃至令人匪夷所思。

阎锡山认为，世间的真理之一就是“以贱养贵”，贱者不但要尽“养贵”的天生职责，而且在“养贵”的过程中受到伤害恰是贱者体现价值的必须：“理之生贵于情之生，有情之生贵于无情之生，生贵于无生。以

贱养贵，是用之也，非伤之也。因用而伤之，所以成其用也。且也，植物吸取万物而发挥其精华，动物吸取植物及无生物而发挥其精华，人则吸取万物而发挥其精华，是贱者之用，借养贵者而更显著也。”

阎锡山认真研究过共产党的理论，心得颇多，他声称自己的理论与共产党的不一样，共产党运用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且“共产主义不能说它没有，但看不见它何时可能”。他的理论法宝是“中的哲学”。所谓“中”，即在事事物物中“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且不能离开事物讲“执中”，而要“针对事物的发展变化讲‘时中’”。阎锡山认为，这是世界上唯一靠得住的理论——“唯心偏，唯物也偏。撂了物的心，等于腐物的微菌；撂了心的物，就是毒害人的蛇蝎。咱不唯心，也不唯物，咱是唯中。”

阎锡山主张“按劳分配”，认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不是最好的社会制度，宣称自己搞的“社会主义”才是最合理的。他宣称“生产资料是资，生活资料是产。资供生产，应归公有；产供生活，仍应私有。资本主义病在资私有，不病在产私有；共产主义不病在资公有，却病在产公有。按劳分配是资公有、产私有的社会制度，既利生产又利生活，是人类合理的社会制度”。至于共产主义，阎锡山认为“有其理无其事”。——“共产党是以共产主义作号召，他不能放弃共产主义，放弃共产主义就不成其共产党了。假如仅以此为号召，其祸人类犹小；若强行之，其祸人类必矣。”

理论无法挽救逐渐显露的统治危机，阎锡山又提出一个崭新的口号：“兵农合一”。他宣称，这一新理论超过了他以往的任何理论以及世界上任何一种社会学说，是全宇宙间最合理的理论，“是走向大同社会的不二法门”，能够“俱利无损地解决了社会问题”。他甚至认为正是因此他补救了马克思主义的不足，如果马克思“死而有知，一定可以得到个安慰”。所谓“兵农合一”，实际上是中国周代的“井田制”和唐代的

“府兵制”的改版，是阎锡山为了应对共产党人的土地政策给他的统治带来的压力而想出的控制农民的手段。这个手段的核心，就是把农民军事化编组，平时耕田上缴赋税，战时出壮丁上战场。土地由政府从地主那里租来，再转租给农户：“地是谁的还是谁的，由国民兵出租种地，公家担保租子必须照缴。”事实证明，这种极其彻底的剥削理论进一步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沦为赤贫。孔祥熙等七十多名国民党高级官员联名打电报给阎锡山，明确反对“兵农合一”，因为“地方及乡村干部组织庞大，职权太高，分工复杂，生杀予夺，勒索凌辱，人民不堪其苦”，从而导致山西境内的百姓纷纷逃至北平、天津、洛阳、西安等处，逃离家园者“大多衣食无着，颠连困苦，其状甚惨”。然而，山西百姓越民不聊生，阎家就越富有。阎锡山的父亲不但大肆强买好地，同时大搞商业和金融投机，去世时这个老太爷积累的钱财达六百多万元。阎家的祖宅也日益扩大，成为山西境内最豪华的建筑群。阎家开办的各种企业和商号更是遍布全省，财富无数。

阎锡山对被共产党军队俘虏后释放回来的官兵，采取了严格的审查制度，强迫他们必须写自传和交代材料。他还在被俘官兵中开展“自白转生”运动，会场上竖立着绑人的立柱，上面挂着绳索，旁边放着棺材、木棍、刀枪，火炉、烙铁和各种皮鞭，然后强迫被释放的官兵跪着交代被俘经过。暂编第十总队团长张国栋被酷刑折磨致死；副团长邓自立被刺刀刺死；炮兵团长郭如彬因自白不彻底，又有人揭发他说过“阎锡山已成瓮中之鳖”，竟被当场活埋了。“自白转生”运动扩大到山西全省，各县县长不断把县、区、村干部集中起来，连续三天不准吃饭和睡觉，交代自己是否与共产党有关系。结果，这样的运动导致了山西全省的杀人竞赛，口号是“有关系的交关系，没有关系的找关系，找了关系交关系，交了关系没关系”。暂编四十九师一团团长赵俊义的做法，被阎锡山标榜为“俊义奋斗法”。这个团长最突出的本领就是杀人，在盂县他把抓来的三十多名农民全部刺死，在寿阳他杀了一百四十多名疑为共产党侦探的农民。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二日，文水县

云周西村被第六十一军七十二师二一五团一营包围，共产党员刘胡兰被抓后拒绝“自白”，阎锡山的部队用铡刀将这个年仅十六岁的女子铡成两截。

阎锡山的末日就要到了，这一点他自己很清楚。

因为不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壮大了，而且山西的百姓对他恨之入骨。

阎锡山需要帮助。虽然他曾经奉承蒋介石：“公留党在，公去国危。”但是他也曾致电蒋介石：“礼让为国”，赶紧下野。历史上的恩怨离合令他无论如何也不敢指望蒋介石，于是他想到了美国人。晋南重镇临汾被共产党军队围困时，阎锡山派人去北平面见美国驻华武官包瑞德，然后又去南京面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司徒大使询问：“在共军的进攻之下，阎将军的地面越来越小，军队越来越少，阎将军的最后办法是什么？”阎锡山的手下描述了太原大保卫战的设想，并提出阎将军希望得到美国方面的直接帮助。司徒雷登表示，美国不可能直接参加对共产党军队的作战。况且，现在国民党军队到处失利，国民政府必须自己想办法挽救局面。阎锡山决定亲自与美国人直接交涉，他给司徒雷登发去一封电报，时间是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电报可谓句句语出惊人，皆在陈述他的“最后的办法”是推行“平等”，以便让共产党丧失煽动民众的理由：

> 美大使询山西戡乱实际有效办法，我们很惭愧，实在不够个彻底有效办法；不过自从新办法实行之后，不至于如已过的束手无策。实际有效办法的原则为四平等。就是是非平等、生活平等、劳动平等、牺牲平等。因共党是由不平等处来煽动人民，由残杀来强制人民，一变已过历史上比如以舟碰舟的两军决胜的办法，为如以水覆舟面的战法，遂成为有胜无败政略性面的战略。我们戡乱欲实际有效，是先人民去了不平，使共党无法煽动；再使人民持上武器，使共党无法强制。破了他的如以水覆舟政略性的面的战法。

阎锡山准备给予人民的“四平等”是：一、在乡村建人民座谈会，讨论施政得失，有绝对纠正之权，使人民得到是非平等；二、实行平

民经济，贫富能得到同样的生活物品，做到生活平等；三、实行兵农合一，解决土地问题，去掉地主剥削，做到劳动平等；四、实行编组优待，抽签当兵，除去认为当兵是贫人保护富人不平等的反感现象，做到牺牲平等——司徒雷登对这样的怪论不感兴趣，让秘书将这个“实际有效办法”翻译成英文存档。

看来司徒雷登是指望不上了。

临汾被晋冀鲁豫部队攻占后，阎锡山手中大约还有十三万军队，他最忧虑的是自己控制的地盘日益缩小，经济来源几乎全被切断，而十三万兵力每月所需的军粮高达五百八十五万斤。如何解决粮食问题？阎锡山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抢。如何才能抢到手？阎锡山思考的结果是：“军队要学会跑”，也就是说向共产党军队学习运动战。为此，他专门发表了一个“对各干部唯一活路的指示”：

共匪一贯的到处拆碉拆城，我们到处建碉建城。共匪不要碉不要城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没有飞机大炮，所以他要拆碉拆城。我们因为有飞机大炮，我们要建碉建城。共匪不要城可是想出了个不要城的办法，就是会跑，使我们打他，百打百空。因此，他能以少数的兵力控制住大的地面，要粮有粮，要人有人，要衣有衣，要鞋有鞋，且有大量的手掷弹地雷。我们的兵去了，他跑了；我们的兵住下，他调上一百里、二百里、五百里、六百里，甚至一千里八百里的兵来打我们，他能调上绥远的队伍打中阳，调上四平街的队伍打忻县，你住的多，他调的多。他这个会跑不只是有政权、有壮丁、有粮食、有衣、有鞋、有手掷弹、有地雷，他并且有情报，能调多数打我们的队伍，俘虏我们的官兵，缴我们的枪支，把我们的部队作成他们的兵役大队，枪械弹药的输送队，此即他们所谓之“一跑万有，一跑万胜”。共匪能把孙子的“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这种从来未实现的兵法，实现在他们的军队中……

我们有飞机，有大炮，占了这飞机大炮的光，学下个守，受了飞机大炮的害，没有学下个跑。非有兵不能控制村庄。没有兵的地方，行政人员不敢再地方行政；有兵的地方，反成了为敌人送礼。我们派上一连兵住一个村庄，他拿上三连两连来打；我们派上一个营兵控制一个村子，他拿上二营三营来打；甚至我们住上一师二师，他拿上三师五师来打……这证明了我们有飞机大炮，反造成了两个死路：就是分散开叫敌人打死，集结回来自己饿死，这真成了子弟靠祖产，不只把吃苦耐劳没有了，把闹家业的志气也丢了。我们要想分散开不叫敌人打死，集结到一地，不至于饿死，也必须学会跑。这面的战法上跑，就等于饿了吃饭，冷了穿衣，谁也不能例外，且也无法在这跑之外另想一个办法……优势的敌人来了，我们跑

了；敌人要聪明，他也跑了，他跑了，我们再回去；敌人要不聪明，他住下了，我们调上三倍五倍的兵力把他消灭了。可以说，能跑，多少县城也是我们的，多少村庄也是我们的；不能跑，多少县城也是敌人的，多少村庄也是敌人的……我们今天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什么是东风？就是只要我们军政能迅速配合起来跑，我们即可打通临汾、打通大同……

根据学会跑着打仗的策略，阎锡山把忻县、太原、榆次、太谷、汾阳和平遥六城列为“死守城”，意为任何时候都不能撤退；其余各县为“固守城”，必要时可以放弃；然后，以主力部队组成“闪击兵团”，担负跑起来机动作战的任务。其具体部署是：第四十三军暂编三十九师和第十九军六十八师驻守太原以北的忻县和黄寨；第三十四军七十三师，暂编四十四、四十五师位于平遥、灵石地区；第十九军暂编三十七、四十师，第三十三军七十一师、暂编四十六师以及暂编第九、第十总队位于榆次、太谷、祁县一线；第四十三军七十师和第六十一军七十二师位于汾阳、孝义地区；第六十一军六十九师位于文水和交城；工兵师位于晋源、清源；第四十三军暂编四十九师、暂编第八总队和各种特种部队守备太原。阎锡山集中了第三十四、第四十三、第六十一军的共十三个团组成担任机动任务的“闪击兵团”，任命第三十四军军长高倬之为“闪击兵团”司令。

一九四八年夏，山西的麦子熟了。

阎锡山所属各部队都挂出了“军食司令部”的牌子，制定了在晋中“快割、快打、快交、快运”的抢麦子计划。

徐向前决定：攻击晋中，保卫麦收。

一九四八年五月九日，中央军委决定将晋冀鲁豫和晋察冀军区合并，成立华北军区，任命聂荣臻为司令员，薄一波为政治委员，徐向前为第一副司令员，滕代远为第二副司令员，萧克为第三副司令员，赵尔陆为参谋长，罗瑞卿为政治部主任。

华北军区调整下级军区为：北岳军区，司令员唐延杰，政治委员赵振声；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政治委员林铁；太行军区，司令员鲁瑞林，政治委员赖若愚；太岳军区，司令员刘忠，政治委员王鹤峰；冀南军区，司令员徐深吉，政治委员王从吾；冀鲁豫军区，司令员赵健民，政治委员潘复生。

同时，以晋冀鲁豫军区前方指挥所组成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兵团下辖三个纵队：第八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新亭；第十三纵队，司令员曾绍山，政治委员徐子荣；第十四纵队，司令员韦杰，政治委员甘渭汉。以晋察冀野战军指挥部组成第二兵团，司令员杨得志，第一政治委员罗瑞卿，第二政治委员杨成武，兵团下辖四个纵队：第二纵队，司令员陈正湘，政治委员李志民；第三纵队，司令员郑维山，政治委员李水清；第四纵队，司令员曾思玉，政治委员王昭；第六纵队，司令员文年生，政治委员向仲华。

原晋察冀军区第一纵队仍属北岳军区，司令员唐延杰，政治委员王平；第七纵队仍属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政治委员林铁。

华北军区总兵力约二十四万。

六月下旬，徐向前派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周士第前往西柏坡，当面向毛泽东汇报晋中战役计划。毛泽东留周士第一起吃饭，他边吃边说：“保卫麦收这个口号很好，可以调动广大人民参加战斗的积极性。晋中人民要收麦子，阎锡山要抢麦子，这是一场极其严重的斗争。敌人要抢粮就要出动，你们就有机会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毛泽东最后说：“此次战役是保卫麦收的战役，但是战役的重心还是要放在消灭敌人方面，消灭了敌人就是最有效地保卫麦收。”

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发动晋中战役的作战部署是：一部进至太原以北，切断忻县至太原的铁路，保卫忻口至太原铁路线两侧地区的麦

收；一部进至文水、汾阳、孝义地区，切断汾阳至太原的公路，压缩阎锡山的部队，保卫平原地区的麦收；一部逼近介休、灵石地区，切断灵石至平遥的铁路，保卫这一地区的麦收；一部逼近榆次，向北切断榆次至太原的铁路和公路，向南切断榆次至太谷的铁路和公路，保卫榆次地区的麦收；一部切断太谷至祁县的铁路，保卫这一地区的麦收，主力则集结于东观镇地域，待机歼灭阎军主力；一部扫除平遥以东、以南地区之敌，保卫麦收，主力集结于该地域以东，待机歼灭阎军主力。

第一兵团总兵力约六万人。与阎锡山相比，无论兵力还是装备都处于劣势。

徐向前认为晋中作战有三大困难：一是敌人兵力多，装备好，工事坚固，机动性强；二是我军经过两个多月的临汾攻坚战，消耗大，特别是干部缺口大，官兵疲劳，部队新，缺乏大兵团野战经验；三是平原作战烧柴极缺，初步计算，部队和民工每天烧水做饭就需要烧柴三十万斤，而平原地区无法供应。即便如此，徐向前还是把作战目标定在歼敌四至六个师上，他的理由是：一，战役目的是为将来解放太原创造条件，应尽可能地利用野战机会多多歼敌；二，敌人为抢收麦子大部分兵力都已分散，只要指挥得当，分次大量歼敌是可能的；三，二十万民工支前，可以解决作战部队生活问题。晋中百姓对阎军十分痛恨，只要喊出“保卫麦收”的口号，就能够大量动员民众。

六月四日深夜，徐向前电告中央军委：

战役第一步，以分进合围态势，割裂阎匪防御体系，斩断其交通，分割包围其要点，肃清外围某些据点，清剿地方杂匪，确保晋中收麦；第二步，相机攻取某些要点，诱敌主力与我决战，而于野战中求得消灭其主力一部，以达削弱阎匪实力，缩小阎占区，创造攻取太原之有利条件。

晋中平原纵贯山西中部，汾河与文峪河流淌其间，自北向南是太原、榆次、祁县、汾阳、平遥、孝义、介休等河谷盆地，盛产小麦、谷子、玉米、棉花、大豆、烟草等作物。此刻，号称山西粮仓的晋中平原上到处飘荡着成熟的麦香。

徐向前命令地方部队佯装主力进至风陵渡，造成主力将要渡过黄河支援西北战场的态势，同时命令吕梁部队进入孝义和汾阳地区活动，自己则率领第一兵团主力向晋中敌人的侧背方向隐蔽开进。

十一日，吕梁军区部队突然出现在孝义、汾阳以西的高家镇地区；第二天，太岳军区部队沿同蒲路北上占领了灵石县城。十三日，因判断徐向前部主力已向西北开进，阎锡山下达了出兵合击高阳镇的命令。奉命率部前去歼灭高阳镇“土共”的部队，是“闪击兵团”司令高倬之指挥的十三个团。阎锡山的主力被诱调出巢，祁县、平遥、介休一带兵力空虚，徐向前立即率领主力向预设战场前进，他决心首先歼灭高倬之的第三十四军。十八日，八纵、十三纵相继对介休至祁县之间的各据点发起攻击，之后绕过坚固的子洪口要塞，迅速迫近同蒲铁路。同时，吕梁部队趁势发动反击，以两个团的兵力袭击了阎锡山派去合击高阳镇的七十师，打死了师长侯福俊。

徐向前主力的突然出现，令阎锡山感到十分意外，他再次尝到了“共军能跑”的厉害。为了确保太原的绝对安全，他立即命令“闪击兵团”回师东“跑”，并命令榆次、太谷的部队快速南下祁县，与高倬之部靠拢。

徐向前决心围歼回窜的第三十四军于介休与平遥之间。

大雨倾盆，部队埋伏在野外阵地上，等了一夜，却没有看见敌人。

高倬之的第三十四军没走通常的路，而是从汾阳以东渡过汾河直插平遥县城。与第三十四军一起增援高阳镇的第六十一军七十二师和炮兵团则正沿同蒲铁路返回介休。

徐向前当即改变作战计划，火速调动主力北移进行拦截。

八纵终于在介休与平遥间的张兰镇包围了七十二师和炮兵团。

七十二师和炮兵团不是普通的部队，在阎军中他们被叫做“亲训师”和“亲训团”。所谓“亲训”，就是由阎锡山亲自训练出来的部队。这支部队是内战爆发后阎锡山亲自组建的，他把最好的武器配备给这支部队，把最贴身的军官安插到这支部队做督导，把军事指挥最优秀的军官配置到这支部队。七十二师师长陈震东更是他认为忠诚可靠亲自选定的，因为一九三〇年他与蒋介石打仗时陈震东曾出任敢死队队长，后来阎锡山把自己二儿媳的妹妹嫁给了他。

当“亲训师”和“亲训团”进入八纵的伏击圈时，纵队司令员王新亭判断了好一会儿，因为他远远地看见队伍里有不少人骑着大洋马，他知道在后面追击敌人的吕梁部队里也有大洋马，怕打错了。位于最前面的二十三旅旅长黄定基举着望远镜仔细观察，直到看清队伍中的步兵每人都背着一个柳条编的、形状如同一个筐的背囊时，才判定是阎锡山的队伍，于是开火了。八纵官兵把当面敌人压缩在铁路与汾河之间狭窄的河滩上，然后开始猛冲猛打，因为眼前的不少大炮实在令他们眼馋。“亲训师”和“亲训团”打起仗来就乱了套，虽然装备好人员足，从官到兵都神气得很，但终究是刚成立一年多的部队，从没与共产党军队打过大仗，除了能够背诵阎锡山的古怪理论之外，极度缺乏实战经验。因此，三小时之后，三千多人被打死，四千多人被俘虏。师长陈震东负伤，在少数卫兵的保护下从战场上逃脱。二十四门崭新的山炮和十二门崭新的重迫击炮全部落在八纵手里，几个旅长纷纷要

求把炮留在纵队，司令员王新亭大着胆子向徐向前打电话请示，结果遭到严厉的批评。但批评之后，徐向前还是给八纵多分了几门炮。

高倬之见势不妙，率“闪击兵团”迅速逃进平遥县城。

二十二日夜，第一兵团指挥所侦听到，阎锡山部第十九军军部将率暂编四十师和“亲训师”残部由平遥向北开往祁县。徐向前立即命令十三纵主力在祁县与平遥之间的洪善以北实施伏击，同时命令吕梁部队渡过汾河实施堵截。二十三日清晨，这股敌人开始由平遥向祁县“跑”，但是刚一动身就遭到阻击。由于汾河涨水，吕梁部队没能及时渡河，导致暂编四十师的一个团和跟随他们的太原民卫军一部跑进了祁县，其余部队则被十三纵主力压缩在北营村内。夜晚，第十九军军长温怀光和暂编四十师师长曹国忠丢下部队，带领少数亲信逃回了平遥县城。第二天天亮之后，北营村里的敌人试图突围，但很快就被歼灭在村外的野地里，第十九军参谋长李又唐被俘。

精锐部队的损失令阎锡山非常痛心。

蒋介石严令“大胆决战”，“死保晋中”，于是阎锡山决定与徐向前拼了。他命令第七集团军中将司令官赵承绶指挥决战。赵承绶命令被困在平遥的高倬之率第三十四军的两个师立即北上，命沈瑞率第三十三军的两个师由祁县南下，而第十总队由祁县北面的榆次出击。自二十六日起，阎锡山的部队向祁县与洪善一线发起猛攻，第三十三军拼命向南，试图迅速与从平遥北上的第三十四军靠拢。担负切断两军的吕梁部队压力巨大，在遭到数倍于己的敌人连续猛攻下，最终无法支撑，撤出了阵地，退往汾河以西。同时，八纵因动作缓慢，没能及时出击，导致第三十三军终于与第三十四军会合。自此，交战双方在平遥与祁县一带形成“顶牛”状态。

晋中战役第一阶段战斗结束。

阎锡山部被歼一万七千余人，徐向前部伤亡四千余人。

无法得知阎锡山又总结出了什么新的“理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军队绝对打不了“运动战”，还是大兵力聚集在一起安全些。问题是，共产党人把成熟的麦子守得严严的，老百姓家家都在大平原上日夜抢收。如果麦子抢不到手，部队聚集在一起吃什么?

徐向前认为，阎锡山虽然摆出了决战的架势，但他不敢让赵承绶部再向南走，因为那将距离太原过远，而如果我军继续向北靠近太原，反倒可能创造战机。此时，太原周边的太谷、榆次地区，麦收正在紧张地进行。徐向前决定大军北上，一方面保卫麦收，进一步断绝阎锡山的粮源；一方面诱敌调动，实现野外歼敌目标。作战要点是：拦头切断敌人逃往太原的通道，在预设战场聚歼赵承绶部主力。

六月，骄阳如火。部队连续作战，体力消耗很大，八纵司令员王新亭请示让部队休息两天。徐向前回答得很严厉：“不行，走不动，爬也要爬到指定的位置上！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运动战，要求动作要快，等歼灭了敌人才能休息！”

赵承绶很快就发觉了徐向前部正向他的侧后运动，于是立即命令部队停止对洪善一线的攻击，回师北撤太原。七月二日，第三十三军主力进至太谷地区，第三十四军和第十总队也开始向祁县集结。

徐向前急令八纵紧紧咬住第三十四军，并以一部攻占徐沟；十三纵则袭占东观镇，力争把敌人逼进徐沟、太谷和榆次之间的三角地带予以包围。

三日至六日，是太岳部队官兵经受巨大考验的日子。他们的任务是切断榆次至太谷间的铁路，封堵赵承绶部主力逃往太原的通道。赵

承绶为了撤回太原大本营，不至于在外成为孤军，连续投入七十一师全部，暂编四十六师一个团，第九、第十总队等共计十个团的兵力，在大量火炮和数架飞机的助战下，向太岳部队阻击阵地发起猛烈攻击。阻击防线是否能守住，是能否全歼赵承绶部主力的关键。徐向前对太岳部队司令员刘忠说："再疲劳也要打，把钉子钉在那里，坚持最后五分钟，坚持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惨烈的阵地争夺战持续了四个昼夜，双方都付出巨大的代价。太岳部队官兵在兵力和武器装备都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凭借着慨然赴死的决心，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敌人始终无法逾越的铁壁铜墙。阵地上不断发生肉搏战，战死者的尸体在酷热的气温中散发出刺鼻的味道。

突围无望，赵承绶决定放弃沿着铁路线北撤的计划，命令部队离开铁路从榆次与徐沟之间夺路北返。他不知道，如此一来，他便一头闯进了徐向前预设的包围圈。此时，十三纵和八纵的一部已插入徐沟以东，断其归路；太岳部队向西接通了十三纵的预定战场；吕梁部队已东进到榆次西南；八纵主力则北上徐沟东南。至此，赵承绶三万余人的部队将陷入东西不足十公里、南北不足五公里的狭长地带中。

徐向前已经病得无法走路，他被担架抬到位于徐沟以南的兵团指挥部张家庄。到达张家庄后，他发出的指示是：赶快收拢部队，如果一时无法收拢，能收拢一个班就收拢一个班，能收拢一个连就收拢一个连。旅长走前面，追上去加强包围，包围起来两面做工事，先不要打，但必须守住，敌人要来就把他们打回去。

如果说徐向前有忧虑，那就是兵力不足。经过长时间的连续作战，部队严重减员的情况他很清楚。为此，徐向前曾专门给中央军委和华北局写了份报告：

临汾战役伤亡一万五千余，另逃亡两千余人，晋中战役伤亡五千人，共减员两万三千人。临汾战役后，补充新兵一千六百人，俘虏六千余人，伤员归队六千人，共一万三千六百

人。至晋中战役，俘虏大部尚不能补充，因须进行一定教育。现部队三个纵队轻重武器及炮兵已大体配就，但连队极不充实。八纵一个主力团，每连战斗员最多者六十六人，少者二十七人。十三纵三十七旅为人数最多者，每营多只两个步兵连，每连两个排，每排两个班。部队目前正连续作战，不给敌以喘息机会，力争在野外歼灭阎军主力，及攻取某些必要据点，以造成围攻太原之有利条件。否则，增加今后攻太原很多困难，支付更大代价。但连续战斗必将大伤部队元气。为此，恳请迅速补充新兵一万五千人［每纵五千人］。

八纵虽已将敌人包围，但敌人的建制基本完整，在兵力严重减员的情况下，纵队领导们都认为这个仗不好打，只有徐向前毫不动摇，他说："非打不可，有意见打完仗再提。做好工事可以吃饭睡觉。总之有一条，不准让敌人突围，谁让敌人跑了就找谁是问！"

十日清晨六点，总攻开始了。

晋中平原上的村镇都很大，一般都筑有坚固的围墙，房舍也多是青砖结构，被围里面的敌人非常集中，可借助围墙后的房屋和野战工事进行抵抗。于是，战斗只能从最艰苦的逐屋爆破开始。

十三纵、八纵二十二旅、太岳部队攻击太常村，第三十四军军长高倬之就在这个村子里。一天激战之后，第三十四军军部和七十三师全部被歼，但换上农民衣服的军长高倬之跑掉了，七十三师师长王檄祖被俘。八纵二十三、二十四旅攻击南庄，战斗进行得异常艰苦，南庄的碉堡火力极其凶猛，部队伤亡巨大，直到炮兵赶来支援，攻击部队才冲进村。敌人被压缩在几个村庄里，携带的粮食已经吃光，连骡、马、羊都吃光了。十五日，徐向前组织了一百多门火炮向残敌猛烈轰击，各部队拼死向核心地带冲去，守军在最后时刻施放了毒气弹，十三纵三十九旅的两个突击连全部中毒。最后时刻，第三十三军的两个师和第十总队约万人被压缩在小常村一处，已经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战斗持续了一天一夜后，十六日下午小常村被攻克。第七集团军司令官赵承绶，第三十三军军长沈瑞、参谋长曹近谦等被俘。

徐向前问赵承绶："还认识吗？"

赵承绶说："认识。"

十年前，为了与阎锡山协商联合抗日，徐向前作为中共代表曾到过太原，那时赵承绶向他的官兵介绍说："请俺们五台徐向前将军训话！"

徐向前问："你看我们指挥作战上还有什么缺陷？"

赵承绶说："要能看出来，哪会走到这一步。"

徐向前问："太原还有多少粮食？"

赵承绶说："阎锡山历来是不准管粮的问枪，管枪的问粮。不过，估计只能维持几个月的样子。"

晋中一役，徐向前部歼敌正规军七万余人，非正规军三万余人，俘敌赵承绶以下将官十六人，毙敌师长以上军官九人，缴获各种火炮三千七百零四门，步机枪三万余支，火车头十五个，车皮二百零七节，其他军用物资和粮食无算。

赵承绶部覆灭后，阎锡山给晋中各县守军下达的命令还是那个"跑"字：一跑万有，一跑万胜，谁跑得快就能活着回来。晋中各据点的守军纷纷逃往太原之时，徐向前将各部队撒出去乘胜狂追，往往几个士兵就能追上上百个敌人。晋中的百姓也纷纷跑出来抓俘虏，清源县的一个老头用条扁担就缴了十九名敌军的枪。三位新华社记者俘虏了三十七个敌人，缴获两挺机枪和十几支步枪——"敌人只知道拖枪跑，不知道停下来射击，直至累倒在地……什么笔杆子、锄把子、伙夫、马夫，都跑去抓俘虏，抓都抓不赢。"

至七月二十一日，徐向前部已经占领了除太原以外晋中地区的全部县城。

共产党军队直逼太原城下。

阎锡山距离最后覆灭的日子不远了。

在这个麦子成熟的夏天，在比邻山西的河北战场上，东北野战军十一纵三十二师九十六团二营在接近隆化中学的时候，教导员宋兆田发现连接隆化中学北门有一座横跨沙河的桥，桥北的敌人驻守在一个桥形碉堡里，而攻击部队战前没有发现这座非常隐蔽的碉堡。

两个战士奉命爆破。

他们抱着炸药包冲上去了，可宋教导员迟迟听不到爆炸声。

桥下没有可以放置炸药包的地方。两名爆破手中一个负责掩护，一个冲到桥下用手托起炸药包拉开了导火索。

桥形碉堡在剧烈的爆炸声中被炸毁。

在二营工作的师宣传干事程抟久对宋兆田教导员说，负责掩护的战士叫郅顺义，那个牺牲的爆破手叫董存瑞。

部队冲进了隆化中学，程干事与宋教导员在被炸毁的碉堡前看着一大堆断砖残瓦谁都没有说话。几十年后，程抟久回忆说："我们多想找到一点儿他留下的东西啊。"年轻的爆破手什么也没留下来，只在中国革命史中留下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至今为全中国人民所熟知——十一纵三十二师九十六团二营六连班长董存瑞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喊道："为了新中国，前进！"

在战争中倒下的所有的士兵，在这些翻身农民子弟的心中，"新中国"这个名词与世世代代弥漫在土地上的麦香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为了这个梦想的实现，他们情愿去死，哪怕粉身碎骨。

# 第八章 把汉江变成内河

## 烽烟起洛阳

南线局势依旧不乐观。

问题的核心还是大别山。

大别山位居中原，中原地跨河南、湖北、江苏、安徽、陕西五省，平汉、津浦与陇海铁路贯穿其间，对于全国战场而言，中原的战略地位异常重要。

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立即遭到白崇禧的大军围攻。历来与蒋介石矛盾重重的白崇禧，这次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异常坚决，因为华中地区是他的老巢。白崇禧动用了三十万兵力，攻击的势头十分猛烈，随着包围圈逐渐压缩，刘邓大军面临着严峻的局面。

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千里突进敌人据守的战略要害地域，是典型的外线作战，其目的是尽可能大量地吸引国民党军主力，以利全国其他战场的战局；但是，从刘邓大军所处的局部上讲，面临的又是新的内线作战，因为必须在强大的攻击下生存下去，否则建立和巩固根据地无从谈起。令刘邓和他们的官兵们痛苦的是，生存下去的唯一的办法不是作战而是避战，因为无论从兵力还是装备上讲，他们都无法与合围而来的国民党军抗衡。

在大别山里到处转战的日子危机四伏。

为了不至于陷入国民党军的合围，重要的军用装备就地掩埋，轻装下来的东西都给了老百姓。刘伯承和邓小平决定把指挥机关分成前

方、后方两个指挥部：邓小平与野战军指挥部副司令员李先念、参谋长李达带领第二、第三、第六纵队在大山里与国民党军兜圈子；刘伯承与野战军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带领第一纵队争取跳到包围圈外面去，扰乱国民党军的进攻阵形。

雨雪交加的黄昏，刘伯承与邓小平在大梧黄站附近分手。

考虑到前程莫测，刘伯承对身边的人说："如果我们北上受阻，不幸被敌人冲散，大家就原路向南集中，到文殊寺去找邓政委。"

部队走了没几天，就被国民党军追上了。一纵二十旅五十九团侦察参谋吴晨给旅长吴忠送来两个俘虏。俘虏说他们是整编十一师搜索连的，任务是侦察设营。吴忠看到俘虏身上的设营地图时，吓了一跳：整编十一师的设营地，正是刘伯承准备宿营的小寨村！"我带了一辈子兵，打过无数次仗，从没怕过，可那一刻，我真正是怕了。"吴忠立即派旅作战科长陈雷去向刘伯承报告。可陈雷一会儿就回来了，说没有找到刘司令员。纵队司令员杨勇急了，派参谋处长李觉再去找："一定要找到！背也要把老先生给我背出来！"过了一会儿，杨勇得到报告说，找到了，刘司令员在六十二团。

跟随六十二团行军的刘伯承太累了，一进小寨村，警卫员还没给他准备好房子，他就躺在一间满是稻草的房间里睡着了。机关刚架好电话，侦察员报告说，这一带发现了敌人。接着，一位当地的老人也凑过来说，你们怎么能住在这儿？周围全是国民党兵。这个寨子四边都是水，只有进寨的一座桥，昨天下午国民党兵还来看过，看完就走了。这时，远处有零星的枪声传来，军政处长杨国宇把刘伯承推醒，刘伯承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他问那位老人，你怎么知道是国民党军队的？老人说，你们的部队不带锯子和斧子，不砍我们的树。国民党军走到哪都带着锯子和斧子，在村边挖大坑，然后把砍下的树搭在大坑上。刘伯承知道这是在修工事，他再问老人，他们穿的什么衣服？老

人说，比你们整齐，是黄的。杨国宇催促刘伯承快走，刘伯承叫来作战参谋王文祯，让他去找二十旅旅长吴忠。王参谋按照地图去找，结果闯进国民党军的一个团部，机警的他撒腿就跑。王文祯还没有回来，四周的枪声已密集起来，刘伯承上了马。

军政处长杨国宇回忆：

刘给了我一个大指针说：一百八十度。我说没有桥。他不管，还说朝一百八十度走。结果硬是朝一百八十度走到河岸，又转来朝二百七十度过桥，又不走了。问：张际春在哪里？李雪峰在哪里？还有什么二局到了没有，他们知不知道在哪里集合。我一一做了回答。说军政处的参谋全派出了，接引他们到集合点。快走吧！这时已听远处有机枪声，但不激烈。但我们到集合点时，二局、通信、区党委的、政治部的都比我们先到集合点。真快！……我们刚集合好，向南行时，飞机来了。在我们上空，因为浓雾笼罩着，什么也看不见。刘在马背上对我们说：天助我也！天助我也！并说西游记的作战思想确有独到之处，每当走到绝路之时，就是腾云驾雾……走了不到十里，刘突然找我问：邓政委现在在哪里？天呀，只有马克思知道。

白崇禧的大军已占领大别山区的所有县城和重要村寨，但始终没有追上刘邓部主力，于是对这一带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封锁策略。刘邓部长期处在敌人的追击中，官兵日日都在辗转跑路，得不到休整和补充，战斗力与供给都面临巨大考验。六纵十七旅旅长李德生后来回忆说：

敌七师、四十八师是桂系精锐，善于山地作战，在大别山地区长期盘踞，各地都建有谍报网，反动势力盘根错节，他们用残酷的手段胁迫群众空舍清野，使我军吃不上饭，找不到向导，给我们的生存立足带来严重困难。敌人几倍于我，紧追不舍，企图扭我作战……部队每到天黑就行动，走到凌晨两三点宿营。由于敌人也在山里乱窜，常常不期而遇。有时饭还没煮好，发现敌情，就将没煮好的米带上又走……有一次一夜走了一百五六十里。由于净走山路，草鞋穿上半天就磨穿一双，打草鞋来不及，战士们就用破布包在脚上走，更多的战士是打赤脚行军……我十几万大军，千里跃进，深入敌人纵深地区，远离后方依托，所遇到的困难，非身历其境，是难以想象的……痢疾、疟疾流行，造成大量减员；阴雨连绵，道路泥泞，山高路窄，重炮和大车都不便行动；山地、水网作战，大家没有经验；因无安全后方，伤员难以安置，成了指挥员打仗最大的顾虑……

一九四八年二月七日，中央军委致电刘伯承、邓小平：

刘邓：

你们指挥所现在何处？如果尚在大别山，似宜移至淮河、陇海、沙河、伏牛山之间，指挥你们三个纵队、陈（陈士榘）唐（唐亮）四个纵队、陈（陈赓）谢（谢富治）一个半纵队，共八个半纵队，在淮河、汉水、陇海、津浦之间集中，机动打中等的及大的歼灭战。这是因为：（一）粟裕准备机动；（二）你们准备派两部机动；（三）将敌人主力吸引至淮河、汉水以北，利于粟等机动，并利于大别山、江汉等地放手发展；（四）北面缺乏指挥中心；（五）北面有巩固后方，可为依托，利于打歼灭战；（六）必须打歼灭战才能解决问题。以上望统筹见复……又你们三万五千新兵，似宜分作两批补充各纵，头一批补充二万至二万五千，留下一万至一万五千，几个月后在歼灭战中补充那些损失较大的部队，因为今年再无新兵。

军委

丑（二月）虞（七日）

这是中央军委第一次要求刘邓大军从大别山区转移出来。

“现在南线最要紧的战场是大别山，该区是否能站住脚的问题，尚未解决。”毛泽东认为，战争发展到这一阶段，不打大的歼灭战，是不能解决中原问题的；而要打大的歼灭战，刘邓、陈粟、陈谢三军必须协力。刘伯承和邓小平都赞成将部队移出大别山：“我野战部队在大别山内，一时很难打到好仗，辗转消耗亦不合算，集中做宽大机动，并利于粟的行动，实属必要。”

二月二十四日，邓小平率前方指挥部北渡淮河，在安徽临泉县南部的韦寨与刘伯承率领的后方指挥部会合。四月初，他们开始一路向西，至五月下旬，移动到河南中部的宝丰县境内。与此同时，二月二十八日，陈再道率第二纵到达河南新蔡以南的谢家集；三月二十七日，陈锡联的第三纵队九旅和王近山的第六纵队渡过淮河到达安徽阜南一带；二十八日，第三纵队司令部和七旅、八旅进至安徽西北部与河南交界处的双碑湖地域。

至此，刘邓大军主力全部转出大别山区。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一举突入国民党统治区纵深，使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他们拖着国民党军辗转作战，部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一九四七年八月，大军南渡黄河时，全军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纵队，总兵力十二万四千余人。七个月后，一九四八年三月，部队转出大别山时，野战军直属队减员四千四百三十二人，第一纵队减员一万六千三百一十五人，第二纵队减员一万八千五百八十二人，第三纵队减员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人，第六纵队减员一万二千三百零六人，总兵力仅剩五万八千六百人。

刘邓部主力顺利转出大别山，这令蒋介石十分恼怒，他认为几十万部队追击合围，即使不把刘邓部全歼，至少关在大别山里饿死冻死是可以做到的。蒋介石立即命令胡琏兵团（整编第十八军）一部自豫中的漯河向东压缩，对休整中的刘邓部主力进行袭扰；同时命令张轸兵团（辖整编十、二十、五十八师）配属整编四十八师进驻豫东南的固始、潢川一线，控制淮河，切断刘邓部主力与大别山区的联系。

为了掩护刘邓部休整，中央军委命令华东野战军陈士榘、唐亮的部队以及陈赓、谢富治的部队采取行动：“目前两星期内你们的任务是钳制十一师及其他平汉郑信（郑州至信阳）段之敌，使其不能威胁刘邓主力在沙（沙河）、淮（淮河）间集结及补上新兵。”

此时，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正在攻击宜川、洛川等地，山西的徐向前指挥晋冀鲁豫部队正在围攻临汾城，胡宗南为确保西北地区的大本营西安，令驻守在洛阳至潼关线上的主力部队自新安、宜阳、洛宁、陕县、灵宝地区全部回缩，除以一部驻守河南与陕西交界处的潼关外，大部队全部撤回西安外围一线。于是，在郑州至潼关之间，四百多公里的地段上，只剩下了驻守洛阳的孤军——青年军二〇六师。

陈士榘、唐亮、陈赓、谢富治提出攻打洛阳。

三月七日，中央军委一天之内连续致电陈士榘、唐亮、陈赓、谢富治。第一封七日凌晨二时到：

> 你们率三、四、八纵应以夺取洛阳并准备歼灭孙元良（整编第四十七军）援兵之目的，迅速对洛阳及洛郑线（陇海线上的洛阳至郑州段）发起攻击，希望能于两周内外完成此项任务。

第二封七日午夜二十四时到：

> 洛阳这样的重要城市，顾祝同决不会不增援。你们占领黑石关、偃师、新安后，应以一部攻击洛阳，吸引敌人来援，集中全力歼灭援敌，重点放在打援上面。敌援兵可能主要是孙元良，十一师亦可能来一部。请刘、邓令十一纵速向十一师佯攻以钳制之。

中原重镇洛阳位于黄河中游，北依邙山，南近洛水，地扼陕西、山西、河南三省要冲。国共双方都知道这座城市对中原战局的影响。对于共产党人来讲，夺取了洛阳，就意味着在国民党军中原战线上撕开了缺口，以切断国民党军中原与西北两个战场间的联系。同时，夺取了洛阳，还能把中原解放区与山西解放区连在一起，使中原战场有更为广阔和深远的后方依托。而对于国民党军来讲，洛阳是连接郑州与西安的枢纽，枢纽一旦失去，中原和西北两个战场都将陷于孤立，两个战场如需相互增援就要绕行秦岭，如此一来不但中原被动，西北也将陷入危境。

青年军二〇六师，洛阳国民党守军主力，配属有陆军总司令部郑州指挥部的榴弹炮连、战防炮连、野战炮连和重迫击炮连，加上地方武装，总兵力约两万余人，总指挥为青年军二〇六师师长邱行湘。所谓“青年军”，是蒋经国根据蒋介石“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在抗日战争期间动员知识青年参军组建的几个师。蒋经国组建青年军的目的，一方面是国民党军扩军的需要，另一方面是要与共产党争夺青年，因为当时许多中国青年纷纷跑到延安去了。蒋氏父子试图把青年军办成培训干部的学校，青年军各师师长均由蒋介石亲

自挑选。二〇六师是内战爆发后在洛阳新组建的，官兵大部分是从中原各城市招来的青年学生，嫡系将领邱行湘被蒋介石任命为师长。

邱行湘，黄埔第五期毕业生，在校期间，校长蒋介石曾讯问："你来黄埔是为什么？"邱行湘答："革命，革命，还是革命！"蒋介石赞赏道："邱行湘是黄埔的模范生，日后定是模范将领。"他曾给参谋总长陈诚当副官处长，率部驻守洛阳前是第九十四军五师师长，在国民党军中以作战凶悍著称。当时，二〇六师只有三个团，邱行湘到任后，从郑州、开封、许昌等地又招了三千多名青年学生，将部队扩充为六个团。他效仿共产党军队的做法，在全师上下进行连队评比以励斗志，还办了本名为《革命青年》的师刊。

蒋介石用专机将邱行湘接到南京谈话，着重强调了"军事的成败，关系到党国的安危。如果不打败共产党，我们都将死无葬身之地"。当听邱行湘说洛阳没有警备司令部时，蒋介石当即写了张字条加封邱行湘为"洛阳警备司令"。蒋经国也在南京亲自宴请了邱行湘，并表示"装备方面，你可以与愚兄我经常联系"。返回洛阳时，邱行湘说他准备为党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邱行湘知道"洛阳的安危关系整个战局的成败"，但是自己兵力有限，学生兵又吃不得苦受不得累，这样的部队实在不适合打野战；而优势则是学生兵政治性强，不会轻易缴枪投降，可以依靠坚固工事顽强坚守。因此，邱行湘放弃了洛阳外围邙山、龙门等险要阵地，决定在城内修筑火力覆盖周密的城防体系，让每一处地方皆成为能够独立作战的"小而坚"的据点，让洛阳全城堡垒化。邱行湘认真勘察了洛阳城的地形后，请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的新闻处长赖钟声绘制图纸，然后开始了大规模的城防建设。他的第一道防线是城边的九龙台、潞泽会馆、大王庙、发电厂、周公庙和火车站一线。在这条防御线上，邱行湘修筑了一系列即能独立作战又能相互支援的堡垒，堡垒的周边是

犬牙交错的壕沟和铁丝网，主要功能是护卫城墙，保卫城门。第二道防线是守备城垣，在城墙上下、瓮城内外，邱行湘修筑了无数明碉暗堡，射击孔密如蜂窝，构成的立体火力网可以阻拦来自任何方向的攻击。第三道防线是核心阵地，以洛阳中学为中心，除了更为坚固的碉堡之外，还修筑了一个水泥钢筋的大隐蔽部作为指挥所。邱行湘把每一个重要据点都设计成三层：上层俯瞰射击；中层与地面齐平射击；下层则在地下，专门对付攻击方的架梯手、爆破手和挖坑道者。他还下令拆毁城墙外的一千五百多间民房，以防这些民房被作为进攻掩体。满城百姓哭跪，邱行湘说："事关洛阳的存亡，顾不得那许多了。"他下令将存放在郑州的弹药全部搬运到洛阳，并把二〇六师的军官家属也从郑州统统搬迁到洛阳，以此断绝军官们临阵脱逃的后路。

该做的事全做完后，邱行湘亲笔写下"固若金汤"四个大字，悬挂在洛阳东城门的正中央。

蒋介石的指令是："固守一个月。"

二〇六师副师长赵云飞忧心忡忡，以为洛阳防御线过长，四周防域面积过大，六个团的兵力实在难以坚守。邱行湘说："我知道守不住。但是，我们必须尽力而为，战斗到最后时刻。"邱行湘认为，只要洛阳能坚持一段时日，郑州、西安、许昌方向的援军便会大规模到达，那时候如果共产党军队还不撤，洛阳地域将成为两军决战的战场。

果然，二月底，当发现共产党军队有"进犯洛阳的企图"后，蒋介石除命令二〇六师"固守洛阳既设阵地，协同外围兵团聚歼来犯之敌"外，同时命令驻守在驻马店一带的胡琏兵团向许昌集结，命令已从郑州南下的孙元良兵团回撤郑州集结，两军统归陆军总司令部郑州指挥部主任孙震指挥，以"确保洛阳"。

陈赓、陈士榘担心的是久攻不下：部队缺乏攻坚大城市的经验；攻城打援的老办法已被国民党军熟知；小部队佯攻洛阳敌人会不为所动，而我久攻不下将给敌人增援的时间；大规模的援军一旦到达，我军打援是否能得手很难预料。如果要避免攻城失利又打援不成的局面，唯一的办法就是趁敌还未形成增援态势的时候，迅速攻下洛阳。陈赓、陈士榘决定投入优势兵力攻城，力争三至五天解决战斗。因为胡宗南的部队已经西去，无力东顾；孙元良兵团固守郑州，虽然靠洛阳很近，但因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且孙元良一向只求保存实力，所以估计不会孤军出动积极增援。在这种情形下，一旦洛阳战役打响，蒋介石只能调动他的嫡系胡琏自漯河北上增援。胡琏兵团是国民党军在中原战场的重要机动部队，但是他要么途经郑州与孙元良兵团一起西进增援，要么孤军自临汝、登封沿道路崎岖、易遭伏击的小路直驱洛阳，而无论胡琏兵团如何行动，以最快的速度到达洛阳至少也要五天时间。

中央军委命令，洛阳战役由陈士榘和唐亮统一指挥实施。

三月七日，陈士榘、唐亮发布洛阳战役作战部署：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应于九日二十四时前完成对洛阳车站、北关、东关之敌的包围，力求首先解决洛阳北站和东关之敌，以便主力迫近攻城”；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主力于“九日二十四时前完成对洛阳西宫及飞机场及西关、南关之敌的包围，应首先切断西宫与洛阳城之间联系，或首先解决西宫及西关之敌，使其不能退缩城内”；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除以一部夺取并控制黑石关至偃师之间的两侧阵地之外”，主力于八日黄昏前进至郭镇、堤东、府店镇一带作预备队，“负责阻击可能由郑州西援洛阳之敌”；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一部攻占新安、宜阳一带，监视潼关方向的敌情。部署规定：“十日开始攻击，力求于十二日午前解决全部战斗。”

九日黄昏，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强渡伊河、洛河，在一〇五榴弹炮和八五山炮的掩护下逼近洛阳城。入夜，三纵八师二十三团偷袭城关东，九师同时攻击北关方向的东西车站。三纵在占领西车站后，继续突进，在九龙台据点受到挫折。九龙台是洛阳城东北的一个土台子，顶部面积不过一百多平方米。传说在洛阳建都史上，九个皇帝曾到上面游玩，土台子因此得名。八师对九龙台发起连续冲击失利后，决定监视这里的守军，集中主力攻击东门。陈谢集团第四纵攻击周公庙和发电厂时也不顺利。周公庙是袋形双层工事，是邱行湘发明的“小而坚”的典型堡垒，由于这里是攻击西门的必经之路，因此国民党守军达一个团之多。四纵十旅三十团在攻击路线上遭到来自地面堡垒和地下暗堡的猛烈阻击，没有任何隐蔽物可以利用，即使付出了巨大牺牲冲进碉堡群，也如同进入迷魂阵一般，正不知何处可进可退，攻击部队的官兵大多被火力射杀。发电厂是洛阳城防体系中最复杂的外围防御阵地，四纵十一旅多次攻击未能得手，也决定改为监视，然后集中主力攻击西关和南关。占领两关之后，十旅回头再打周公庙，官兵搭起人梯攀上壕壁，连续爆破，工兵排除了所有的地雷，山炮摧毁了两个最大的堡垒，周公庙守军终于支持不住，千余名官兵缴枪投降。至此，洛阳城的第一道防线除几个坚固据点之外，大多数堡垒基本肃清，洛阳城外与城内的联系已被切断。

邱行湘不断致电蒋介石，号称洛阳守军“士气旺盛，连挫凶锋，斩获甚众”。

蒋介石严令孙元良和胡琏昼夜兼程驰援洛阳。

陈赓鉴于未扫除的外围据点会威胁攻城部队的侧后，建议将攻城时间推迟一天。陈士榘不同意，因为国民党援军已在急进洛阳的路上。陈赓不再坚持。陈士榘、唐亮决定十一日开始攻城：三纵八师二

十三、二十四团攻东门，二十五团攻北门，四纵十旅攻西门，十一旅攻南门。炮火准备于黄昏十七时开始。

十一日黄昏，三十多门火炮的炮火开始了。早有准备的邱行湘立即命令炮火反击，洛阳城内外顿时成为炮战战场。国民党守军炮火猛烈，且有位置极佳的炮兵观察所，因此攻击部队的炮兵阵地很快就受到猛烈轰击。但是，攻击的炮兵也测出了国民党守军炮兵阵地的位置，轰击的准确度逐渐提高，不但压制了守军的反击炮火，还把各个城门前的防御碉堡轰掉不少。

炮火准备之后，雷声滚滚而来，天地间一片昏暗，洛阳城的四个城门同时受到了猛烈的攻击。攻击西门的四纵十旅处境困难，因为他们身后还有没被占领的发电厂据点。山炮运不上来，只能用轻武器掩护爆破组对城墙实施爆破。但是西门的外壕又宽又深，只有一条通道可以接近城门，通道被国民党守军的火力严密封锁，致使爆破小组的接近多次受阻。陈赓下决心先将发电厂据点拔除。半夜，发电厂终于被攻占，山炮开始上运，但大雨倾盆，道路泥泞，牲口无法使用，人力推炮十分艰难，直到天亮，才把山炮推到西关。

担任东门主攻第一梯队的是三纵八师二十三团。二十三团决定以一营为突击队，二营、三营继后。八师把山炮、战防炮、步兵炮、迫击炮、六〇炮组成两个火力队，为一营提供火力掩护和火力支援。一营把作战方案报了上来：一连突破，二连为第二梯队，三连为预备队。团长石一宸和政治委员王良恩对这个方案不满意，说这个方案打小县城和土围子还可以，现在咱们打的是防守坚固的大城市洛阳。营长张明感到了压力，他不断观察地形，与官兵们反复讨论。一营的一个年纪很小的理发员很想为战斗做点什么，他到老百姓中间搞了个调查，竟然画出一张东门敌情图，图上画满了各种奇怪的符号，甚至还画着一条死去的狗。这张图被送到营指挥所，把张明营长看糊涂了，

他找来小理发员询问，小理发员解释说，长线条是外壕，上面的短线是桥，老百姓说上面有座桥可以过去。桥头的圆圈是百姓们说的“大坟包”，可能就是敌人的暗堡。张明营长特意问到那条狗，小理发员说，百姓们说前几天有条狗跑上去莫名其妙地死了，估计是碰上了电网。张明最后的计划是：三连负责爆破火力点和铁丝网等障碍，一连攻击城门，二连攻击瓮城。这一次，团长同意了他们的攻城计划。突击开始后，张明带领二连向前运动。爆破员马景春在弹雨中抡着缠着绝缘胶带的大铡刀猛砍电网，连续破开了三条通道，后面的爆破员抱着炸药包扑上去，炸毁十三道障碍物和数座碉堡后，二连接近了瓮城。大雨倾盆，天地漆黑。二连侦察员回来了，说小理发员画的那座桥果然在。张明立即命令二连发起攻击。命令刚一出口，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后背，鲜血顿时染红了军衣。二连迅速通过小桥，在炮火和机枪的掩护下，十三名爆破队员前仆后继连续爆破，终于把城门炸开一道三米宽的口子。排长宋苍富率第一突击组冲向缺口。已经负伤的张明趴在冲击阵地上，他知道必须迅速突破东门，强占城楼，准备迎击国民党守军的反击，如果动作稍慢，部队很可能被压制回去。他果断地命令预备队投入战斗，与二连一起扑向第二道城门。即使在大雨中，敌人的炮火仍旧十分猛烈。一个爆破队员在冲击的时候，怀里的大炸药包被铁丝网意外地拉响。后续的爆破队员拼死向前运动，把四个大炸药包放在了城门下，一声巨响之后，东门的第二道城门被炸开了。副连长沙培琛和七班副班长陈福才率先冲进城门，投弹组和爬城队跟了上来，东门的城楼终于被占领。凌晨四十分，陈士榘在指挥部接到三纵的报告：“张明这个营攻得好，东门已被炸开突破了！已占领城楼，城里电灯还亮着呢！”但是，敌人的炮火越来越猛烈，后续部队受到火力压制，无法及时跟进，张明的一营只控制着城楼左右百十米的阵地。

这个时候，邱行湘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除了命令炮火封锁被突破的东门之外，他并没有组织预备队进行大规模反击以及时封堵城墙

防御线上的突破口。漆黑的雨夜中，洛阳四面的城门同时受到攻击，邱行湘无从判断哪个方向最危急。更严重的是，平时表决心很有一套的青年军此时陷入了极度的惊恐之中，学生兵纷纷偷偷逃跑躲进城中的民房里，邱行湘已无法有效地指挥他的部队。

坚持在东门的一营终于迎来了大部队。

十二日凌晨，三纵二十四团跟随二十三团突进城内；二十二团和二十一团奉命暂时停止在东北方向的攻击，迅速转至东门战场跟随二十四团突入；随后，二十五团和二十七团也从东门冲进城。至此，攻入洛阳城内的部队已达六个团。在西门和南门攻击的陈谢集团四纵午夜再次发动攻击。洛阳城的东门距离南门很近，攻入城内的华东野战军三纵二十三团转向南门，从里面打，四纵的部队从外面打，十二日下午，南门被突破。接着，担任突击队的十旅二十八团二营五连，在弹药消耗殆尽的情况下冲开了西门。

战后，突破东门的华东野战军三纵八师二十三团一营被授予“洛阳营”的光荣称号，营长张明被评为“甲等战斗英雄”。突破西门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四纵十旅二十八团二营五连被授予“洛阳英雄连”称号。

十二日黄昏，“固若金汤”的洛阳城四门已全被突破。

蒋介石给邱行湘发来电报：“已饬外围兵团兼程驰援，希激励三军，坚守阵地。”邱行湘遂带领残部五千余人退守核心阵地，他希望自己创造第二个“四平街奇迹”：战至一兵一卒，等待援军到来。

大雨越下越猛。

十三日晚，对核心阵地的攻击开始。国民党守军依托有利地形和坚固工事，火力之猛，特别是重武器火力之密集，出乎攻城部队的预料。三纵和四纵连续发动进攻，各部队都受到猛烈阻击。十四日，战

场局势复杂起来。尽管孙震曾反复陈述增援的困难："我四十七军自三十八师临时奉命西调后，仅有四个团的兵力，黑石山守备至少需一个团，尚余三个团，实无力出击；十八军因连日大雨，道路泥泞，十一日由许昌到禹县，已行九十里，十二日可抵登封附近。至速须十三日可到府店镇附近，与孙军会合，发生策应作用。"但是，蒋介石严令必须不惜一切增援洛阳，甚至命令整编三十八师停止西调，归孙元良兵团指挥，"与胡兵团并肩向洛阳急进"。孙震只好一面命孙元良的部队快速增援，一面命胡琏的整编第十八军由登封附近跃进洛阳。

陈士榘决定十四日下午对洛阳城内的核心阵地做最后一击。

这是最后的时刻，也是最后的机会，如果攻击失利只能撤军，否则，时间拖延下去等来的只能是敌人大队援军到达战场。

邱行湘将青天白日旗高高地悬挂在核心阵地大楼的楼顶，以示坚守到底的决心——"连日阴雨，气候恶劣，飞机很少活动，援军更无消息。但我自恃工事坚固，粮弹充足，士气旺盛，解放军即使付出两千人的代价，也不一定拿得下我们的核心阵地，而久攻不下，势将撤退。我认为只要守住核心阵地，就可以打出第二个四平街来。"

攻击部队把所有的火炮集中起来，包括刚刚从外围阵地缴获的火炮，不下达轰击目标，不规定发弹数量，只是命令"各炮急促射击一小时"。邱行湘的核心阵地，是一个不足两百平方米的正方形小圩子，南北两面排列着五座楼房，四周是高大的围墙和深壕。邱行湘登上楼房观察，发现共产党官兵正在抢运城里的物资，汽车、大车与大量的官兵和百姓满街走来走去，像搬家一样，其阵势如同要把整个洛阳城搬走。除此之外，一切寂静，这种寂静令他害怕，他正准备看看共产党军队是否在挖地道，炮声响了。猛烈的炮火持续了两个小时，万余发炮弹打到不足两百平方米的圩子里，工事炸塌，碉堡炸飞，楼房点燃。邱行湘的头部被弹片击中受伤，身边的四团团长朱驱被当场炸

死。狭窄的小圩子里面拥挤着近五千人，在炮火的打击下血肉横飞，呼喊惨烈，整个核心阵地成为一片火海。

三纵八师和四纵十旅从两个方向向核心阵地突击。

一个小时的激战后，核心阵地成为废墟，守军全部被歼。

在洛阳守军即将覆灭的时候，一架小型飞机飞临洛阳上空，这是蒋介石派来的，想把邱行湘师长接走，但是整个洛阳火光冲天，浓烟蔽日，飞机根本无法降落，盘旋了一会儿飞走了。

四纵十旅二十八团十连的官兵冲进一座楼房，里面还活着的国民党官兵都举起了双手。官兵们问："师长在哪里？"其中一个军官说："这里没有师长，我是参谋长符绍基。"十二连官兵在一个暗堡里俘虏了五十多人，又在一座楼房里俘虏了八十多人，集合俘虏的时候，其中一个头戴士兵帽的俘虏突然逃跑，立即被十二连指导员按倒在地，这就是青年军二〇六师赫赫有名师长邱行湘。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五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播发消息："国军坚守核心阵地，寸土必争，屡建功勋。现我国军劲旅已进抵洛阳，共匪处于内攻失利，外受包围，有被歼之命运矣！"

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播发这条消息的时候，邱行湘已被押送到四纵十旅的司令部里。陈赓把手里邱行湘的照片与当面的这个人对照了之后，说："你是邱行湘吧，黄埔五期的？我是陈赓。"

邱行湘说："久仰，久仰。"

陈赓说："你是哪里人？"

邱行湘说："江苏溧阳。"

陈赓说：“那里是我们新四军的老根据地。”

邱行湘说：“是的。我家是贫农，陈毅将军在我家住过，你问陈毅将军就知道了。”

陈赓说：“你的家庭成分倒还不错，可惜你是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服务。”

陈赓对二〇六师的那些死去的学生兵感到非常惋惜：“这次战斗，你们打得很苦，死伤很重。我们本来不需要使用这样大量的炮火，但你们固执不放下武器，而我们又想早点解决战斗，想使洛阳人民早点过安定的生活，所以不得不把这样猛烈的炮火加在你们身上。现在你们大概体验到了，你们工事做得再好，也无法阻挡解放军的进攻。”

南京很快获悉洛阳失陷，立即宣布邱行湘“殉国”，并准备给他开“忠烈追悼会”。此时，邱行湘正在被送往太岳解放区的途中，他在路上给家人写信说：“旧的邱行湘已经死去。”

增援的国民党军到达洛阳城郊的伊河和洛河。连日大雨，河水暴涨，渡河器材没有着落，一整夜没能渡过一兵一卒。胡琏打了工兵团长一个耳光，但架桥速度依旧缓慢。十七日，胡琏的整编十一师和整编三十八师终于到达洛阳。

华东野战军和晋冀鲁豫野战军作战部队已撤至洛阳以西休整待命。

洛阳已是一座空城。

洛阳的城防工事完全被毁，共产党军队就在洛阳城外，兵力少了守不住多了又拿不出。此时，平汉路和陇海路东段都很吃紧，三月底，胡琏的部队又被调回驻马店，洛阳只剩下了整编三十八师的一二

四旅。四月三日，一二四旅主力开往偃师，洛阳城内只剩下三七一团和一个保安团。

陈赓决定再打洛阳。

这次打洛阳，陈赓决心永久占领这座中原重镇。

四日，攻击开始，洛阳守军跑得漫山遍野。至五日十一时，歼灭国民党守军四千六百余人。

洛阳之战，是转入战略进攻以来，共产党人在南线战场夺取的第一座城市。

为了攻占这座城市，六千多名官兵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为了永久占领这个城市，四月八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提出共产党人管理好新解放的城市的具体政策。电报说："极谨慎地清理国民党统治机构，只逮捕其中主要反动分子，不要牵连太广"；"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界限，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都叫做官僚子资本而加以没收……一切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企业，严禁侵犯"；"严禁农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斗争地主。对于土地在乡村家在城里的地主，由民主市政府依法处理"；"一切作长期打算。严禁破坏任何公私生产资料和浪费生活资料，禁止大吃大喝"，"城市已经属于人民，一切应该以城市由人民自己负责管理的精神为出发点。如果应用对待国民党管理的城市的政策和策略，来对待人民自己管理的城市，那就是完全错误的。"这封电报同时发给了其他战区的领导，因为这些政策不但适用于洛阳，"也基本上适用于一切新解放的城市"。

中共中央任命的市委书记和市长上任，洛阳这座古城开始了新的历史。

此时，中共中央作出了一个影响未来解放战争进程的重大决定：再建中原军区和组建中原野战军。

刘邓大军转出大别山，与陈粟大军、陈谢集团齐聚中原，准备在平汉路以西、汉水以北、陇海路郑州至潼关段以南的广大地区机动作战，如何统一指挥三军的问题随之显露出来。

五月九日，中共中央发出《华北、中原两解放区的辖区和人选》的通知。其中关于中原区的领导任命如下：

（一）除华中解放区现辖境地外，凡陇海以南长江以北直至川陕边区均属中原解放区。（二）中原中央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李先念、宋任穷、粟裕、李雪峰、陈赓、张际春、谢富治、刘子久十二同志为委员。在中原局下，建立豫皖苏分局，以宋任穷为分局书记。（三）刘伯承为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陈毅为军区及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李先念为军区及野战军第二副司令员。陈毅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及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宋任穷为副政委。苏北兵团仍属华东军区建制，但在作战上受华东野战军指挥。

中原野战军由刘邓部和陈谢集团组成，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九、第十一纵队。原晋冀鲁豫野战军的第十、第十二纵队已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分别改编桐柏军区和江汉军区部队，原陈谢集团中的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已于一九四八年五月并入豫西军区。中原野战军分为两个兵团：以原属刘邓大军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纵队组成第四兵团，李先念为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锡联为第一副司令员，陈再道为第二副司令员，苏振华为副政治委员；以原属陈谢集团的第四、第九纵队成立第三兵团，陈赓为兵团司令员，谢富治为政治委员。第十一纵队仍归华东野战军指挥。

中原军区的重建以及中原野战军的编成，形成了南线战场的指挥中心。而陈毅加入中原局和中原野战军领导层的意义在于：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不但可以一起指挥中原野战军，也可以一起指挥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即后来的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

军——的协同配合，将对解放战争赢得最后胜利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

一九四八年春夏之交，洛阳战役的结局令国民党军在中原战场上出现了不可弥补的漏洞，而随之发生的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原野战部队指挥系统的调整完毕，这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原巨战的先兆。

## 只准活着打下去，不准活着退下来

客观地说，从一九四八年开始，“解放区”这一名称就已经成为历史。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深入到国民党统治的广大地域作战，共产党人渡过了必须建立根据地以求生存的艰难时期，将领们已经把作战目光移向了更广阔的战场，他们指挥的军队对解放区的依赖逐渐减弱。昔日生死攸关的解放区，已经变成一个“实际控制地域”的普通军事概念，甚至成为一个钳制国民党军主力的“拉锯地带”。在解放区坚持内线作战的部队数量有限，他们以极强的军政素质以及与贫苦农民的血肉联系，顽强地履行着所承担的战略任务。

令人不解的是，国民党军仍热衷于对解放区的清剿和占领。当外线的广大地区已经频现危机的时候，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高层官员，仍固执地持有自一九三〇年以来形成的对付共产党人的思维定式——那一年，国民党军对共产党人创建的中央苏区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国民党方面认为，只要占领共产党人的根据地，就是赢得了与共产党军队较量的胜利。这一思维定式令国民党军的行动在一九四八年春天呈现出一种古怪的偏执状态。

一九四八年春，国民党军占领山东解放区后，重新划分了山东战场的绥靖区，除原有的第二、第三绥靖区外，又增加了第九、第十、第十一绥靖区，使山东战场的总兵力达到十三个整编师：第二绥靖区司令部驻山东济南，司令官王耀武，辖整编第二师、整编四十五、七

十三师，防区为济南周围地区、胶济铁路中段和西段以及莱芜、新泰、蒙阴等城镇。第三绥靖区司令部驻江苏贾汪，司令官冯治安，辖整编五十九师和整编七十七师三十七旅，防区为临沂、韩庄、枣庄、台儿庄、贾汪等地。其整编七十七师一三二旅驻防徐州。第九绥靖区司令部驻江苏海州，司令官李良荣，辖整编八十三师和整编四十四师（欠一六二旅），防区为沂水、新安镇、海州和日照等地。第十绥靖区司令部驻山东兖州，司令官李玉堂，辖整编十二、七十二师和整编三十二师一四一旅，防区为滕县、兖州和大汶口等地。第十一绥靖区司令部驻山东青岛，司令官刘安祺，辖整编三十二、五十四师，防区为青岛、城阳、即墨等地。隶属于这一绥靖区的整编第八师一〇三旅防守烟台、威海卫。

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日，中央军委致电华东局，决定将内线兵团改称山东兵团："许（许世友）谭（谭震林）率七纵、九纵、十三纵为山东兵团，担负山东战场作战任务，受华东局节制，其作战、休整、补充等计划，经过华东局考虑向军委提出意见，得军委批准然后执行。目前应争取于丑号（二月二十日）以前完成休整任务，丑月（二月）下旬开始新作战行动，以一部监视胶东之敌，主力向胶济西段机动。"

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谭震林，所辖部队：第七纵队，司令员成钧，政治委员赵启民，下辖十九、二十、二十一师；第九纵队，司令员聂凤智，政治委员刘浩天，下辖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师；第十三纵队，司令员周志坚，政治委员廖海光，下辖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师。总兵力八万一千六百七十四人。山东兵团组成后，许世友捕捉的第一个战机是：袭击济南至潍县间的胶济铁路西段。

在这段铁路线南北两侧，分散着桓台、邹平、周村、张店、淄川、博山等地，而居于中心地带的周村显然是关键点。对于如何作战，大多数纵队指挥员主张逐渐推进，一层一层地打进去，最后集中主力攻占周村。只有九纵司令聂凤智主张不在外围与敌纠缠，而是以主力直接攻击周村，揳入敌人内部来个中心开花。许世友和谭震林采纳了这个看似有些冒险的方案，因为虽然中心突破容易四面受敌，但这一带的国民党军“逢城必守，逢镇必防”，造成兵力部署“活像一只岔开八只脚的大螃蟹”，这里搁一个营那里放两个营，周村由于处在外围防御的腹地，因此守备松懈，只部署着整编三十二师的五个营。况且，如果采取由外向内层层突破的作战方式，必会导致战时的延长和伤亡的增加。

三月十日，山东兵团各纵队在大雨中从胶东向西急速开进。十一日，七纵十九师攻击张店，国民党守军弃城逃跑。十二日，渤海纵队攻占邹平，次日占领周村以西的章丘。但是，本该于十日午夜主攻周村的九纵，直到十二日才抵达攻击出发地，他们耽误在泥泞的路上。大雨淹没道路，无法分辨方向，九纵一夜只走了十几里。就在他们艰难开进的时候，整编三十二师师长周庆祥察觉到了危险，他立即命令新编三十六旅和一四一旅放弃邹平、长山等地，连夜收缩至周村，从而使周村的国民党守军由三千人骤然增加到一万五千余人。战场局势的突变令决心打个“中心开花”的聂凤智陷入两难。有人认为，敌情已经发生变化，要打也要等重新调动其他纵队到达后再打，不然万一打成消耗战，兵团要追究责任。电台被大雨淋湿无法使用，与兵团的联系处于中断状态。聂凤智思考甚久，天快亮的时候，他终于做出决定：“打他个立足未稳措手不及！错了我负责！”

国民党军一四一旅还在向周村收缩，九纵各师奉命迅速向周村隐蔽接近。大雨滂沱，都在抢时间的双方居然撞上了。九纵二十六师七十八团发现有一支队伍正与自己平行前进，仔细一看对方戴的是大盖

帽，于是偷偷抓回来一个，一问才知道是一四一旅的部队。七十八团的官兵立即冲过去，混乱中抓了一部分，其余的国民党兵疯狂地朝周村跑去。七十六团也在大雨中发现前面有支队伍，前面的国民党军也发现了后面的部队，但判断是同去周村的友军，七十六团见敌人未行动也就未动，尾随着这支国民党军一直到周村。

十二日凌晨四时，九纵对周村发起了攻击。整编三十二师师长周庆祥仓促召集军官会议，但是部署异常混乱，急忙赶至周村的各旅、团之间的联络电话线瞬间就被炮火打断了，周庆祥的指挥就此失灵。七十三团七连攻击周村北门，因梯子被打断，攻击两次受挫，在连长刘奎基的率领下，爆破手用炸药炸塌了北门，部队突了进去。七十五团在东门突破顺利，开完军官会后还没能返回指挥位置的团营长们被截在了半路，周村内的守军因为没有指挥，抵抗一阵后便失去了斗志。战场上到处是“缴枪不杀”和“我们优待俘虏”的喊声。七十九团八连四班的喊话让三百多名守军放下了武器。敌四二二团团长决定投降后，让勤务兵把解放军官兵叫进驻地的院子里，满院子的国民党兵竟然呼叫起来：“解放军长官来啦！可好啦！”

二十二个小时后，周村被攻占。

除师长周庆祥化装逃跑外，国民党守军一万五千余人全部被歼。

关于聂凤智决定连夜对周村发动攻击一事，在战后的总结会上有人认为“仗虽然打赢了，但军事上是冒险的”。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坚决地表示：“打是对的！我怕的是你们不打！”政治委员谭震林表情严肃：“军事斗争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冒险性，兵团就是让你们打！谁要是不打，我就送他四个字：机会主义！”

张店和周村被攻克后，胶济线西段的国民党军防线全线动摇。许世友期待的“中心突破，四面开花”的局面终于出现了。二十日，七纵

攻占淄川。同时，鲁中军区部队攻克桓台。蒙阴、沂水、莱芜、博山等地的国民党守军惊悉张店、周村、淄川一一失守，纷纷望风而逃。至此，渤海与鲁中两个解放区连成一片，济南至潍县之间的铁路线被切断。

驻守济南的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判断：共产党军队很可能趁势南下，攻击济南附近的兖州，切断津浦线上徐州至济南间的联系。出于重点防卫济南和津浦铁路的需要，他抽调胶济线上的兵力，向兖州方向增派了两个师。这样一来，胶济路中段的潍县孤立地暴露了。

山东兵团请示中央军委：东进攻占潍县。

三月九日，蒋介石偕国防部第二厅厅长侯腾、第三厅厅长罗泽闿、第四厅厅长杨业孔等人到达徐州。在听取了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郭汝瑰的汇报后，蒋介石面无表情地说："赤化区人民都同情共匪，我军进剿时，可以烧毁房屋，杀戮附敌的人民，以破坏他们的根据地。"郭汝瑰听后，"顿觉毛骨悚然"："伊训示对赤化区烧、杀，余甚不同意。烧杀不过引起人民反感而已，此非为国为民之道也。"

自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以来，坚持在山东内线战场的部队，一直处在艰苦的移动作战中，由于兵力和武器都与国民党军相距悬殊，面对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侵蚀和占领，被迫地周旋作战令他们十分痛苦，因为这支部队的绝大多数官兵都是当地贫苦农民的子弟，他们对父老乡亲因为他们的离开而遭受苦难倍感不安。而解放区内贫苦农民遭受的蹂躏，其残忍程度令人难以置信。"一旦他们开了口，就很难制止那泉涌般的痛苦回忆"，美国女记者葛兰恒记述道，"即使表情冷漠的农民，也会泣不成声，没法再接着往下讲。"山东兵团九纵接到潍县百姓写来的一封信，这封信被许世友保存到二十多年后的一九七〇年，那时，他已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员。这位经历过残酷战争的将领把这信重新拿出来给部队官兵看，是想让在和平时期

生活甚久的他们了解，军队在任何时候的作战都具有“复仇”的含义，军队的作战意志永远不能消沉——

……国民党伪军自占领潍县后，烧、杀、抢劫、抓丁、抢粮，无所不为，潍北全县被拉去牲口两千余头，粮食被抢精光，被抓壮丁难以统计。更残酷的是广大群众被残杀。两年多来，潍北人民被残杀者已有千余，直到今天寒亭据点周围的死难同胞仍曝尸旷野，无人收拾。纸房区李家营一村，即被活埋七十余人。残暴手段更令人闻之毛骨悚然，铡刀铡和活埋已成为蒋匪的普遍手段。有的先割耳、舌，而后活埋；有的妇女被拔去头发铡死；有的妇女被剥光衣服，绑在树上轮奸，并用烧红了的枪条插入阴户，活活搞死；有的被剥光衣服绑在树上用开水浇，把全身烫起水泡，再用竹扫帚扫，名为“扫八路毛”；有的用剪刀剪碎皮肉，名为“剪刺猬”；有的全身被刀子割开，丢在火红的锅里，叫做“穷小子翻身”。纸房东庄蒋匪在街口安下十二口铡刀，按户抓人铡死。邢家东庄一次被铡十二人，妇救会长一个四岁小孩，也被铡成三段。贫农韩在林兄弟三家十五口，有十四口被铡死，剩下一个老母苦苦哀求给她留下一个后代而不得，她看到自己的孙子全部被铡死，悲痛得自己也上吊而死。高里区清景村一次被杀被铡十二人，军属尉传姊之母被敌人用钳子拔去头发，又割开腿肚子，再加上盐，活活地被折磨死了……自去年三户山战役后，才迫使敌退出部分据点，我全县党员及广大群众，始含泪忍痛收拾了死难同胞的尸体，但都骨折肉烂，不可辨认。这是潍北人民的血海深仇，永世难忘！死难的穷哥们，在临死时都殷切盼望为他们报仇，杀尽蒋贼。高里区一个妇救会长，死时曾对大家说：“告诉共产党、解放军，一定为我们报仇！”亲爱的同志们：你们是华东野战军的主力军，你们是胶东的子弟兵，你们屡打胜仗，有了你们就有了希望，有了依靠。你们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不能让你们走，要你们给咱们报仇。要求你们坚决彻底消灭蒋匪军和“还乡团”，要求你们像在孟良崮一样消灭敌人，在潍县留下英雄的胜利，立下大功，这是我们对你们高贵的信仰，也是人民对自己军队的命令！……

“人民对自己军队的命令”——这种激愤的请求尚无前例。

第九纵队发布的攻打潍县的政治命令，其措辞到了咬牙切齿的地步：

……为保证战斗的胜利，要求所有进攻的部队只准进不准退，有我在，不准敌存，发挥你手中武器的最大效能，大量的（地）杀伤敌军……只准活着打下去，打到胜利，不准活着退下来。告诉敌人，不投降，就坚决消灭！为了保证战斗胜利，要有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最高度的克服困难的毅力，任何困难都要克服，绝不低头！革命的英雄主义肯在困难面前低头？毛主席、朱总司令的队伍是从来不怕困难的，因此就要保持常胜的素质，不叫苦，不气馁，叫苦、气馁就是耻辱！为了保证战斗胜利，要求各级干部同志们站紧（稳）你们的岗位，深入指挥和工作，战斗如有挫折要亲自侦察组织；政治工作者要保持战斗中部队思想的健康，当必要时，你们要身先士卒打开局面……如果我们在阵营中发现个别的怯战分子、动摇分子，要以有效的方法给（使）他们勇敢，否则就要严厉地制裁。为了保证战斗胜利，要

求炮兵同志们，火力队准确射击，保证步兵的成功，要像步兵一样的为胜利忘记一切、为胜利贡献一切！……同志们！攻城令下了，立功的时间到了，报仇的时间到了，各按照你的战斗计划，按照你的立功计划，在统一命令下，行动起来吧！只准前进，不准后退，只准胜利，一定要胜利！胜利的（地）歼灭潍城守军万岁！……

潍县号称“鲁中堡垒”，是国民党军重兵设防之地，城防经过常年修筑，已形成三道永久性和半永久性的防御体系：城壕深五米、宽八米，城墙全部由青石砌成，高达十三米、厚达六米。城墙外筑有约两米高的矮墙，距城墙最远处二十八米、最近处六米，其间设置了密集的火力点，并以交通壕连接。矮墙外，挖有宽、深各六米的护城河，在距离城墙两千米的距离内，九十多座堡垒密布，碉堡前附设有地雷、鹿砦。潍县城内分为东西两城，之间有白浪河穿过，河宽约十米，上面有五座桥梁贯通。两城的突出部或制高点，已全部筑有火力堡垒和炮兵阵地，城垣里挖了大量的屯兵洞。其中西城高出东城五米，是整个潍县的城防重点。此刻，潍县仅西城留有一个小洞，其他所有城门都被堵死，西城与东城联系只能靠城关把文件扔下来，外围守军几乎没有逃回城里的后路。

潍县国民党守军指挥官，是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兼整编四十五师师长陈金城。内战爆发后，整编第九十六军一直驻守在济南附近，除陈金城的基本部队整编四十五师之外，其他部队归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指挥驻守济南，因此陈金城在潍县的总兵力只有两万四千余人。

四月一日，王耀武飞抵潍县与陈金城商讨防御问题。王耀武没敢进城，只在机场与陈金城匆匆见了一面。王耀武强调：放弃不重要的据点，实施兵力集中；多做城墙下的地堡，以利“地平线以下作战”；一旦潍县受到攻击，济南和青岛会两路增援。陈金城头疼的是兵力不足，因为在他指挥的部队中，大多是杂牌武装。他告诉王耀武：“有工事还得有兵来守。过去第八军在此处是按三个旅九个团兵力构筑工事的。现在我们因兵力少，不能利用，只好放弃。”王耀武说：“到必要

时我可空运一个旅来。”陈金城的回答是：“等到必要时机场也就无法保持了。”

就在王耀武抵达潍县的时候，二一二旅旅长汪安澜与张天佐吵了起来，张天佐曾是国民政府昌乐县县长，现在是潍县地主武装的头目。汪旅长不愿意和杂牌部队一起作战，主张他的部队与张天佐的杂牌武装各守一地，打起仗来相互不发生关系。东西两城，汪旅长大度地让张天佐挑选一地。平时总是吹嘘“保安总队对于打共产党军队比国军的正规军有经验”的张天佐已经吓坏了，坚决要求他的部队完全听从陈军长的统一调遣，而他自己决心与陈军长的军部“共存亡”。两人争吵到陈金城那里，陈金城偷偷给汪旅长写了张字条，汪旅长看后不吭声了。陈军长的字条上写着：“我们现在的军粮非完全依赖他不可，否则目前就有断炊的危险。”

此时，山东兵团已向潍县开进。

许世友的战役部署是：以第九纵队、渤海纵队和鲁中军区部队主攻潍县县城；渤海军区第三军分区部队包围潍县以西的昌乐；胶东军区西海军分区部队包围潍县以北的寒亭；第七纵队和渤海军区新十三师担任西面的阻击打援；第十三纵队三十九师和胶东军区新五师，滨北、南海军分区部队担任东面的阻击打援；第十三纵队三十七、三十八师为兵团预备队。

关于东西两城，先打哪一个的问题，第九纵队指挥员提出先打西城。潍县的东城低于西城，守备力量相对薄弱，易于攻城部队突破。但是，许世友也明白，潍县的东西两城相距很近，如果先下东城，攻击部队就会处在西城国民党守军的瞰制之下，将在极其不利的态势中再攻城墙高大、工事坚固的西城。于是，兵团决定：集中兵力先攻西城，打掉陈金城的指挥机关，然后以西城为依托，居高临下攻击东城。

四月十日，九纵二十六师开始扫清城关外围据点的作战。七十六团采取炮轰母堡、爆破子堡、小组突击的战法，连续扫清了一系列碉堡群。七十七团出击城外北面的北宫据点失利后，迅速转入土工作业，挖掘坑道逼近守军据点的核心。白天看见共产党官兵拼命挖掘，晚上不断有报告说地下有挖掘声，恐惧逐渐蔓延，北宫据点内的国民党守军营长决定逃跑。命令一下，一个营的官兵一哄而散。天亮的时候，七十七团顺利占领北宫。七十八团同时攻占了东北关。接着，为逼近敌人重点防守的西城，攻击部队开始了大规模的土工作业。从十五日开始，官兵们一连挖了八个昼夜，挖掘交通壕七万多米、坑道两百多米、地堡四百多、防炮洞两万多个，总作业长度达到七十多公里。国民党守军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大规模的挖掘，心惊胆寒之中使用各种火炮猛烈轰击，但是眼前的坑道还是在不断地向城墙接近。

陈金城体味到了许世友打下潍县的决心。

然而，共军挖掘八天八夜之后，不但没有发动攻击，反而向后撤退了，至少站在城墙上已经看不见共军的影子。陈金城认为，共军在他的炮轰之下“伤亡惨重”，定是已经“无力攻城”了。这个消息被报告给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王耀武立刻在济南召开庆祝大会，宣称“潍县十里内已无敌踪”，“昌乐之围预计日内可解”。二十二日上午，大喜过望的陈金城竟然命令部队在飞机的掩护下开始“追击”。但是，整编四十五师刚一出城，就遭到猛烈的火力打击，部队仓皇地逃了回来。这一下，陈金城迷惑不解了：共军到底是撤了还是没撤？正在迷惑的时候，二十三日晚，潍县城外炮声骤起。这不是一般的炮击，而是他与共产党军队作战以来听到过的最惊天动地的炮击：“炮声震耳，瓦屋齐鸣，弹雨如注，血洒遍地。因城厢人众，弹着集中，守军伤亡，日益增多。当时据军医报告，负伤官兵在两千两百人以上，骡马被炮火击毙者甚多，尸横狼藉。”接着，更大的爆炸声持续传来，山东兵团攻城部队埋设在坑道里的几千斤炸药将潍县城垣炸出数个缺口。

陈金城知道，潍县的最后时刻来临了。

九纵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和七十五团迅猛突到城下。二十七师七十九团在团长彭辉和政治委员陶庸的率领下，冲过外壕，对城墙外的矮墙和地堡连续爆破，不顾一切地向城墙靠近。这个夜晚，七十九团被写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英雄谱。这是一支全部由胶东子弟组成的部队，想必潍县百姓写给九纵的那封信对他们的冲击最强烈。战前，官兵们专门准备了一面大旗，上面写着："把胜利的旗帜插上潍县城"。七连长王保凤率领突击排冲入守军阵地，在六连的支援下很快就占领了矮墙。八连排长赵永斌指挥爆破手刘庸亭、栾子明、王官钧、宋文章扛着顶端绑着大炸药包的长木杆，连续六次爆破，终于将突破口炸开。八连长曲曰平率领两个排扑向突破口，战士王定文用肩膀顶着云梯，上面扔下来的石块下雨一样，他浑身血肉模糊但始终未倒。班长王玉荣第一个爬上城头，接着，战士张义德也上来了，他手里高举那面写着战斗口号的大旗。国民党守军立刻将所有的子弹倾泻过来，张义德被打倒，副连长王义成再次举起大旗。八连上去了，另一侧的四连也上去了，冲在四连最前面的是已经三次负伤的排长左思甲。

潍县城墙的顶面很宽，可以并行两辆汽车。首先登城的四连和八连拼死阻击扑上来企图封堵突破口的敌人。所有的官兵都已负伤，弹药接济不上，他们使用了砖头、石头、铁锨和铁镐。八连副连长已经六次负伤，浑身是血，但仍站在指挥位置上，所有的战士都能听见他的呼喊。九连终于突上来了。接着，七十九团参谋长丁亚跟着五连也上来了。城墙很高，下面很黑，国民党守军发现他们要下城向城内突，机枪子弹狂风一样扫射过来。放下去的梯子被打断了，他们又放下软梯，但还是不够长，五连副连长已经顺着软梯下去，这会儿悬在半空，正在软梯上接绑腿。丁亚参谋长很着急，因为如果不迅速下去，后面的部队上不来，天一亮就前功尽弃了。五连长孙端芝把驳壳枪一插，喊了声："跟我往下跳！"官兵们不顾一切地跳下去。西城城

墙有五层楼高，五连半数官兵严重摔伤，那些还能站起来的官兵，立即在城墙下开始了殊死的战斗。他们连续攻占二十多幢房屋，最后，近两个排的官兵被国民党守军压缩在一所学校里。干部大多已经负伤和牺牲，三排长杨学良站出来指挥战斗，他们在潍县城内孤军坚持了近二十个小时。

此时，二十七师的后续部队上来了五个连。陈金城判明突破口的方位后，调集一个团的兵力开始猛烈反扑。这是七十九团的关键时刻，城里的五连仍在孤军坚持，城墙突破口已经拥上来敌人，而且天亮了。敌人的六架飞机加入战斗，掩护步兵营轮番进攻。七十九团政治委员陶庸在城墙上高喊："七十九团就是打完了，也要守住突破口！"二营长孙宝珍率领官兵冲上来，三营教导员孙洪文也带着一个排上来了，他的身后跟着七十九团团长彭辉。敌人成堆地往突破口上拥，炮弹落在二营指挥所，指挥战斗的团参谋长丁亚被砖头瓦块埋起来，警卫员把他扒出来后，电话铃响了，他只听见一句"主力快上来了"电话就断了。七十九团坚持到了纵队主力登城的那一刻。

战后，山东兵团第九纵队二十七师七十九团被授予"潍县团"荣誉称号。

为了增援七十九团，九纵司令员聂凤智命令二十五师七十三团白天强行攻城。许世友说：这个决心下得好，"我们困难，敌人更困难，当前的关键是千方百计迅速投入后续部队。要克服一切困难，向纵深打进去！"二十五师也是胶东解放区的老部队，七十三团在团长孙同盛的率领下，一营主攻城阁，三营在突出部掩护攻击，二营为预备队。一营调集了十名特等射手封锁守军反击的射击口，接着，三连长率领爆破组炸开突破口，后续部队扛着云梯奋力爬城。二十四日中午十三时三十分，一排首先登上城头，三连也紧跟着上来了。至十五时，二十五师已有九个连登城，并控制了城墙制高点。

西城防御大势已去。陈金城率部进入东城。

蒋介石亲自打来电报："吾弟固守名城，激战兼旬，备极艰辛，已饬王司令官率队和青岛派队星夜驰援，务望坚守阵地，并须多控制机动部队以便夹击，而竟全功……"本已绝望的陈金城顿时感到莫大的荣耀，他立即复电："……亲电奉悉，已传令三军，士气为之一振，连日激战，官兵前仆后继，奋不顾身。现在潍县附近共军已增加有五个纵队之多，钧座若能速派大军前来东西夹击，不难歼灭鲁东南共军之主力。生等将战至一兵一卒，奋斗到底，以报党国……"回电以示效忠之后，陈金城意犹未尽，于是召集旅长汪安澜、专员张天佐、县长张哲等人肃立于孙中山和蒋介石像前宣誓："我等受党国培植多年，丁兹大难，甘愿以身献国，决心与城共存亡，如有偷生怕死，畏缩不前，愿受党纪国法严峻处分，此誓。"

但是，东城的防御很快就瓦解了。

二十六日黄昏，九纵对东城发起攻击，鲁中部队在南北两面钳制助攻，炮兵阵地被布置在西城，炮弹从高高的城头直落东城。而在东城的东门，许世友则虚留着一条"生路"。九纵二十七师八十团一营一连，在连长史洪田的带领下渡过白浪河，连续爆破东城城墙，二十分钟后全连突进了城内——山东兵团参谋处《阵中日记》："潍东城战斗至今晨八时已突进七个团，占领该城二分之一，当即俘虏敌三团长以下两千余人，至十二时战斗结束，全占该城，全歼守敌。"

二十七日凌晨三时，"决心与城共存亡"的陈金城电告王耀武，说他准备突围："战局危急，拟即向仓上转移，希即转饬青岛方面即时派飞机来潍县掩护突围。"然后，他跟着汪安澜和张天佐率领的约三百人的队伍冲出东门。预伏在潍县东郊的西海部队开始了追歼，旷野里四面响起杀声，炮弹密集地在身边爆炸。天亮的时候，三百人的队伍被兜堵聚歼。张天佐死于乱枪，汪安澜逃到济南，陈金城躲在铁路边的

洼地里，不知什么原因突然昏迷，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在俘虏群里了。

四月二十七日，潍县战役结束。

战役消耗炮弹两万九千零三十八发，轻重机枪子弹四十四万八千余发，炸药一万八千六百八十三公斤，山东兵团伤亡七千九百八十人，歼敌四万五千六百七十人。

美国驻南京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对潍县战役的评价是：

> 当潍县争夺战开始的时候，政府军便奉命自济南与青岛移调军队去解救潍县之围。从济南调去的政府军三个多师，遭遇劣势的共军，因为无心奋力作战，未能冲到潍县。从青岛调去的政府军没有与敌人作战，就返回青岛了。政府在潍县的失败实足以显示：政府军的不忠、士气低落和缺乏作战意志。

潍县战役的胜利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巨大的政治影响。首先，国民党军在山东仅剩下济南、青岛、兖州等为数不多的据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控制了山东的广大地域，山东战场的军事优势已完全倒向共产党人一方。同时，张天佐等地主武装头目被打死，对被他们残害的山东贫苦百姓来讲，“其意义甚至超过了蒋介石主力的被歼”，因为以张天佐为首的反动地主武装“给以山东的灾难是十分深重的”。

经过短暂的休整补充，山东兵团又开始了津浦路中段的作战。

五月二十九日，鲁中军区部队逼近泰安，国民党守军整编八十四师一五五旅不战而退，弃城逃跑，鲁中军区部队随即向泰安南北两面扩展战果，相继占领大汶口和泗水。六月九日，七纵围攻曲阜，国民党守军突围逃跑。十五日，七纵一部和鲁南军区部队攻占邹县。当山东兵团的一系列作战完成后，津浦路上的重要据点兖州已处于被围态势中。

兖州南屏徐州，北护济南，是国民党军坚守山东战场的防御要地。

七月十二日黄昏，山东兵团对兖州发起攻击。攻击的第一炮，就将兖州城墙西南角的碉楼轰出个大窟窿。炮兵们高兴地喊："誓把碉楼打成灰！"在强大而猛烈的炮火轰击下，兖州城墙的城楼、城垛纷纷倒塌。七纵的攻城部队乘势发起冲击。通过外壕时，架桥未成，六十团一连班长杨树宽带领架桥班的十名战士站在齐肩深的水里，冒着敌人的炮火用肩膀顶住浮桥，直到九个连的攻城官兵顺利通过。突击排长王玉胜率领爆破班将二十多斤重的炸药包送到城墙下，巨大的爆炸声混合在炮火声中惊天动地，高大的兖州城墙被炸开一个高八米、宽十米的缺口。晚上二十时四十五分，七纵二十师六十团一营一连一排一班长高振才第一个登上城墙，而后七纵和十三纵主力相继突入。战至第二天黄昏，国民党守军开始突围，被早已埋伏在泗河东岸的部队聚歼于兖州城东南郊外。整编第十二军中将军长霍守义突围出城后，见遍地都是自己部队的伤亡官兵，又适逢国民党军飞机不分敌我地疯狂扫射，霍守义自觉部队跟随自己多年，"今天落得这样的残局，好不凄惨"。遂让副官邓超叫来解放军，表示整编第十二军缴械投降。

是役，歼灭俘虏国民党守军两万七千余人，唯第十绥靖区司令官李玉堂化装潜逃。

战后，霍守义向记者谈了兖州战役的基本经过，发表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七日的《大众日报》上：

兖州被围后，我指挥防御，一直没有安稳地睡过觉。那些日子真像是过了十几年，到今天脑筋尚未恢复过来，还时常发愣。在不大利于进攻的城东面作战时，突出点大铁桥与金口坝甚至一夜争夺三次，算是没有丢，满以为守得不错。谁知以后，突围的溃军也就在那一带被歼。解放军攻击防御重点的西关后，我才知道糟了。三个点经几次反扑无效，终于收缩兵力，只好放弃。我又连忙在西关外加修了能容纳一营人的临时据点。十号晚上，解放军向这里进攻，我伤亡八十多，也就撤进了城。同时我急调三三四团来守城墙，我叫马团长留一个营做机动，他怕来不及策应，把两个营都放上，经不起解放军的炮火，马振铎自己负了伤，

并向我报告兵员伤亡了三分之二。十二号晚上，解放军拥进城。始终主张死守的李玉堂也不得不承认大势已去——在抗守中，十二军已经被歼灭一大半了。天明的时候，他命令我支持到天黑突围，可是步炮攻势凶猛，败兵一片混乱，七零八落，第二线根本控制不住。要是能早些突围，伤亡也就不会这样大了……兖州是徐州、南京的大门，这在前年莱芜战役李仙洲被俘时，南京就这样指示过的。现在兖州解放了，济南孤立了，更处于易攻难守之势，难以保住。兖州战事一开始，第十绥靖区司令官李玉堂就天天向徐州剿总电告战况，每天都要求"速派援军"。我们夸大了城外解放军的数量，希望能早到援军。同时，我又通过电报直接电请蒋介石，我在抗战中曾出过力，为什么不救？我现在被围，又无援军到来，是故意要消灭我吗？但是，南京方面气都不吭。徐州的刘峙，为了保住大门，接连来电：援军已由鱼台、济南、徐州出动，不日即可合围。刘峙又电王耀武，限吴化文部的援军十二日晚到达，否则有意外，由吴负全责……在鱼台的邱清泉也来电："请准备弹药，不日可到。"但是，从徐州出来的黄百韬部，本来说两天即可赶到，后来又转到豫东去了。这次的援军不出来犹罢，中途折回，困守中的士气一落千丈。从济南出来的援军，第一天到了界首，王耀武即说济南吃紧，于是所谓的援军就回头了。第二次以每日七八里的速度出来援助，被解放军阻歼于大汶口。王耀武的援军只是装模作样的，而邱清泉方面更没有下文。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作战也需要增援，而从战争的广义上讲，增援共产党军队作战的是人民。潍县战役时，支前的百姓达十五万人。正是春夏交替粮食困难时节，潍县方圆百里所有的村庄倾其所有，家家户户昼夜碾米磨面。仅担任主攻任务的九纵就收到门板五万块、土工作业工具两万件、粮食四百五十万斤、牲口大车和手推车一千辆，九纵的两千三百多名伤员被百姓的担架抬下战场。兖州战役时，沂南县六十二岁的钟德安老人报名支前，村干部劝他年纪大了不要去了，老人说："你们说俺老，瞧着，运粮行军，要是咱落后，算白活了！"老人和年轻人一样，推着一百五十斤粮食上路了。几天后，家里人赶上支前队伍想把他换回去，老人硬是要留下来，他说："打国民党反动派是俺的事，俺从来没有充过孬。"直到战役结束，老人和其他民工一起"光荣地复员了"。

山东百姓自发组织的武装更是具有惊人的战绩：

民工们正在执行转运任务，忽然，从高粱地里钻出五个穿军装的国军，抬着一个负伤的人，看样子是军官。一分区民工一营二连指导员郝子恒同志喝令站住，进行盘查。他们解开自己的包袱，打开提包，里面全是关金票，大约有四十亿元，每人身上还带着金表。郝指导员又叫他们包好，原封未动。蒋军们声言："已经过几次查验，准许放行到邹县去疗养。"机

智的郝指导员，看看蒋军伤兵的穿戴，又带着这样多的关金，心想一定是个不小的头子，就对他们说："我们各村都驻有部队，你们没有通行证走不开。你们可跟我们到团里去，给你们开个路条，才能通行。我们团部有卫生队，也能给你们上药，过去我们已治好很多俘虏伤兵了。"他们只得无可奈何地跟着走。抵团部后，经过检查，根据蒋军伤兵身上所带的证明文件及蒋介石的委任状，才知道他叫周北翔，在蒋军内历任上校及少将参谋长等职，现任蒋军联勤总部第十三分监部少将分监。

潍县战役刚刚结束，军民正忙着打扫战场，突然有命令传来，通知所有的军民离开城墙附近，然后就传来了轻重机枪的射击声、火箭筒和炸药炮的爆炸声，潍县城墙再次笼罩在硝烟烈火之中。潍县的百姓很奇怪：这是干什么呢？难道又打上了？——九纵司令员聂凤智请示许世友同意，举行了一次真枪实弹的攻城演练，目的是巩固部队攻坚战的作战能力。而这种需要消耗大量弹药的事情，以往的任何时候都不曾发生过。

聂凤智说："这就是攻克济南城的预演。"

没有什么比这一事件更能显示山东部队不可遏止的作战渴望了。共产党官兵决心不再放弃家乡的每一寸土地，从今往后，用鲜血和生命攻克的每一个村庄城镇都必须永久占有，决不能让国民党军带着地主还乡团再回来。而在山东部队的作战渴望中，最迫切的是攻占国民党军在这片土地上的指挥中心——济南。

## 泾渭河谷

把西北地区归于南线战场，在地理概念上是勉强的，但在一九四八年上半年，这一概念专指陕西境内发生的战事。

在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离开陕北之前，西北野战军已经开始战略进攻，部队逐步发展为五个纵队，总兵力七万五千多人，装备也得到一些改善。但是，在西北战场上，国民党军仍有四十四个旅，总兵力

达三十多万，其中有十七个旅分布在陕甘宁解放区周围，其他各旅分布在豫西、晋南和陕南，国共两军的兵力对比仍是五比一。

从解放战争整个进程上看，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无论是兵力还是装备从来没有占据过优势，甚至在向西北纵深地域发起攻击的时候，这支部队在军事力量上仍然处于劣势——西北地区不是中国政治经济的重心所在，从自然地理的角度上看，贫瘠的西北地区若没有地面和空中运输线的维持，便不可能供养大量的军队，而这正是西北野战军的薄弱环节。

但是，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召开的杨家沟会议上，彭德怀还是提出了开辟西北外线战场的建议。毛泽东也认为："陕北和其他战场的我军主力都要转入外线作战，到国民党统治区去，打它、吃它，不让敌人得到喘息的机会。"周恩来也清楚西北野战军面对的困难，但他依旧强调必须打到外线去：

> 把战争引到外线，要在全军动员，说明在边区内部把敌人消灭了很多，配合了全国反攻，十个月来你们负担的任务最重，敌人比任何地方要多，我们能够把敌人消灭，并且能够到外线消灭敌人，这是指挥的正确，大家的努力得来的。我们打出去时会遇到在内线所没有遇到的困难问题，如减员等，我们要克服这个困难，我们要在外线生根，我们不但要发展大西北，还要往西南发展，在这点上我们西北野战军当仁不让，后来居上，因为我们参战最晚，而打出去又是最后。

打出去，就意味着迎战胡宗南乃至马步芳的数十万大军，就意味着西北野战军必须在脱离后方的情况下孤军作战。

最大的困难还是官兵吃什么。

西北野战军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彭德怀提出三个转入外线的出击方向：一、向北攻击榆林，二、向西攻击陇东，三、向南攻击陕中。向北再攻榆林，一路粮食困难，攻城任务艰巨，况且驻防榆林的邓宝珊已经派人来和谈，再打不合适；向西打陇东，路远缺粮，而且

不见得能够抵挡马家军的骑兵部队，如果打成战场僵持，胡宗南趁势再来夹击，局面就更困难了；那么，唯一可以考虑的出击方向是向南，南面的宜川、韩城一带国民党军防御薄弱，特别是宜川只驻守着整编七十六师二十四旅的两个团，如果战斗打响后胡宗南出兵增援宜川，黄龙山道路曲折便于打伏击战。更重要的是，打开南进的通道，不但可以威胁西安，而且沿途多是产粮区，可以解决部队紧迫的粮食问题。

宜川战役计划的要点是："先以一部兵力围攻宜川，调动黄陵、洛川等处敌军来援；野战军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先歼援敌，然后再夺城。"

二月十二日，西北野战军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纵队分别由志丹、绥德、米脂地区向宜川开进，王震的第二纵队则由晋南西渡黄河向宜川靠近。

二十四日，第三、第六纵队形成了对宜川的包围态势。

彭德怀电告第三纵队司令员许光达和第六纵队司令员罗元发："攻城要猛，但攻而不克，以逼敌呼救求援。"

宜川守军二十四旅旅长张汉初事先接到过关于彭德怀部正在南下的电报："共军主力部队由延川南下，经延长集结在临真镇一带，意图不明；同时由禹门渡口渡河的王震纵队有向西北进攻的模样。"但是，由于刘戡的整编第二十九军三万多人的部队已经集结在洛川、黄陵一线，所以张汉初万万没料到宜川会受到如此猛烈的攻击。二十七日，宜川外围阵地太子山、七郎山、老虎山相继失守，二十四旅被迫全部压缩在城内。张汉初认为彭德怀部这次非把他消灭不可，于是十万火急的求救电报一封接一封发出。

胡宗南终于沉不住气，下达了增援的命令：“（一）整二十四旅应坚守待援，吸引匪军主力，以为我攻势之支撑。（二）整二十九军军长刘戡即率整二十七、整九十师（实共四个旅十个团）沿洛川、永乡、瓦子街向宜川疾进，歼灭犯匪，并解宜川之围。”

胡宗南部向宜川增援，只能走三条路：第一条是经过瓦子街到宜川，这是一条公路，道路好走，距离又近；第二条是经过石堡到宜川，道路条件差，距离也远；第三条是翻山越岭的小路，辎重不容易通过。

彭德怀判断，胡宗南要兼顾守军和援军，必定要选第一条路。

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是一个苦命的将领。自从胡宗南大军占领延安以来，他的任务就是专业救援：救蟠龙、救榆林、救清涧，无论何时何地哪个部队被围，都是他带兵前往救援，但是至今还没有成功援救的先例。刘戡是黄埔一期毕业生，蒋介石极为欣赏的一名战将，抗日战争中曾率部北上冀晋，在紫荆关、阳泉等地与日军血战，后转至晋南中条山一带与日军周旋作战。一九三九年出任第九十三军军长，一九四四年升至第三十六集团军司令官，率部在洛阳以南的龙门抗击日军的三路进攻，之后在河南灵宝和卢氏一带顽强阻击，迫使日军付出巨大代价之后撤退。当时日军在往来电报中称：“遭到有力敌军阻截，前进更加缓慢，甚至秦岭山脉的山路也被敌军占领。要突破该地，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时间也难奏效。”抗战结束后，刘戡被提升为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奉命驻防陕北，在胡宗南的西安绥靖公署指挥下与共产党军队作战。刘戡的苦日子由此开始了。

接到增援宜川的命令时，刘戡正在西安过春节，与他同在一起的还有整编二十七师师长王应尊、整编九十师师长严明和副师长邓钟梅。命令一来，大家都很扫兴，但都认为彭德怀就那么点部队，不会

有什么大仗可打——刘戡和他的师长们并不知道，他们不但将面临一场大战，而且他们永远也回不了西安了。

二十五日，刘戡约两万人的增援部队由洛川出发，按照整编二十七师、军部和整编九十师的序列，沿着洛宜公路向宜川急进。

这正是彭德怀判断的敌军增援的那条路线。

第二天，整编二十七师到达永乡附近。侦察员报告说，在东北方向约二十五公里处的观亭发现大量共军。师长王应尊立即命令派出搜索营前往侦察。果然，搜索营不但受到攻击而且损失大半，跑回来的人说弄清楚了，共军是彭德怀的第一纵队主力。王应尊立即将情报报告给刘戡，建议先集中兵力攻打观亭，然后由观亭前去宜川解围。理由是共军既然包围了宜川，又集结大兵力于我增援的半路，显然是想围城打援，如果不先把这股共军打掉，不但不能完成解围宜川的任务，自身也会有遭遇伏击的危险。况且，顺着观亭附近的一条山梁可以直达宜川，从迅速增援的角度讲也是有利的。刘戡赞同王应尊的想法，他在西北战场上与彭德怀交过手，十分熟悉西北野战军的战法，他不愿意为宜川把自己的部队葬送掉。因此，他致电胡宗南说准备先打观亭。

刘戡等着胡宗南的回音，在永乡附近停了一天。

这让彭德怀很是焦急，他担心刘戡退回去，使打援的作战计划落空；更焦心的是刘戡走得太慢，而西北野战军的粮食已经不多，多等一天就多消耗一天，万一刘戡三天不动，即使最后敌人进入了伏击圈，官兵们饿着肚子如何作战?

二十七日晚上，刘戡等来了胡宗南的回电——回电如此迟缓的原因是胡宗南的参谋长盛文跳舞去了，命令是由一个处长转达的：不准

停留，兼程推进。

刘戡虽然感到危机四伏，但是他无法抗拒命令。第二天，在向公路两侧派出掩护部队之后，整编第二十九军的主力上路了。

刘戡的命令是：今日必须到达宜川。

天空开始飘落小雨，雨中夹杂着雪粒，天地间潮湿而阴冷。

部队刚走出不远，前面就响起了枪声。先头部队一八一团在向一座山梁攀爬的时候，遭到阻击。一八一团奉命突破阻击，掩护后续部队前进。但是，当整编九十师师部走到瓦子街附近时，来自南面的枪炮声和手榴弹声开始密集起来，看来后路是否通畅成了问题。不一会儿，北面也枪声大作，部队在公路上拥挤在一起走不动了。刘戡命令接通与二十四旅的电台联络，驻守宜川的张汉初旅长报告说："围城之敌分向西北和西南方向逃窜"了。这个报告令刘戡恍然大悟：彭德怀的主力冲这里来了。

雨夹雪已经变成了漫天大雪，四野一片迷蒙。

严明主张赶快撤到瓦子街以西去，不然部队就真要被围在这里了。但是这个建议显然与胡宗南的命令相违背，因此没有人吭声附和。王应尊主张趁公路南侧尚未发现共军，部队可向黄龙山撤退，然后绕路去宜川，这样不但不违背胡宗南的命令，还可以跳出眼前的包围。刘戡比较认同这个建议。但是，如果绕路的话，本来打前锋的整编二十七师就成了后卫，雪大路滑，大部队走出去之后，谁也无法预料整编二十七师是否会遭遇危险。刘戡对王应尊师长说："要待深夜十二点以后才能行动。天降大雪，道路泥泞，等大部队走完了，恐怕你的部队走不出去，因为你的部队正在前面打，势必你要担任掩护任务，走在最后。"王应尊当即表示："我走最后没关系。"这让刘戡颇有

些感动。刘戡让军参谋长刘振世给严明打电话，想征求他绕道黄龙的意见，谁知道严师长正在睡觉，参谋长曾文思接电话时很不耐烦：“仗还没打，就想跑，这种仗我们还没打过。”刘戡被迫下达了“就地宿营”的命令。

暗夜里，雪落无声。刘戡思索良久，最后决定：“明日拂晓前继续沿公路前进，一举突到宜川。”

第二天早上，严师长睡醒了，他给王应尊打来电话，说如果突围的话，他手上还有两个营可以用。王应尊马上报告了刘戡，刘戡一下子火了：“算了，打完了事！”

彭德怀部已经完成了对整编第二十九军的包围。

彭德怀不能再等了，因为部队已经断粮。他给中央军委打电报：“敌整编二十七师、九十师进到宜川西南之王家湾、任家湾以南高地。昨晚大雪数寸，本晨敌未先动。我无粮不能等待，故向该敌围攻。”——无法想象彭德怀的官兵在大雪之中是如何度过饥寒的长夜的。二十九日早晨六点，一纵独立第一旅在旅长王尚荣的率领下开始攻击瓦子街，堵塞了刘戡部的退路。战斗一打响，刘戡立即指挥部队突围，整编九十师一面争夺瓦子街，一面向瓦子街东南的高地派出部队，试图抢占向南逃跑的通道。彭德怀立即意识到，战斗刚开始就出了问题：由于“无粮不能等待”，而担任控制瓦子街以南高地任务的二纵因距离远目前尚未到达阻击阵地。如果高地让刘戡部占领，就等于战场上开了个口子，战斗很可能打成一个不成功的击溃战。一纵司令员贺炳炎和政治委员廖汉生几乎同时意识到了这个危险，他们立即命令三五八旅一部向瓦子街东南高地发动攻击。这个旅的一个团负责洛川方向的警戒，一个团是纵队的预备队，只有七一四团可以投入。黄新廷旅长和余秋里政委从七一五团调出一个营给了七一四团团长任世鸿，命令他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那个可能导致战役失败的口子。任世鸿立即

率领部队冲了上去，与前来抢占高地的整编九十师五十三旅的两个团撞在一起。

这是西北野战军军史上罕见的一场混战。天色昏暗，大雪纷飞，两军搏杀，分外眼红。彭德怀在当天的一份电文中写道：“每攻一山峰，须反复数次，用刺刀才能取得。”为了突破阻击阵地，打开南逃的生路，整编九十师在各种轻重火器的掩护下，以整连整营的规模向七一四团展开猛烈的冲击。在七一四团二营的阵地上，经过三十多次的攻击与反击之后，所有连队的建制都已不完整，特别是干部伤亡巨大，老战士纷纷站出来接替指挥位置。突击排长陈占元连续投掷手榴弹，最后身中数弹阵亡。副营长陈占彪带领官兵继续突击，最后也中弹倒在雪地里。六连二班长刘四虎带领七名战士刚冲过山脊，就有四名战士中弹牺牲，刘四虎被守军投过来的手榴弹压制得不能动弹，他趁敌人封锁火力的空隙突然跃起，最后的冲锋中又有两名战士倒下，刘四虎独自一人端着刺刀冲上敌阵，吼叫着一连刺倒七个敌人。敌人发现上来的只有他一个人，十几名士兵端着十几把刺刀将他围起来，刘四虎跌倒在战壕里，围过来的敌人一起用刺刀朝他刺下来。战斗结束后，战友们在战壕里发现了浑身是血的刘四虎，由于脸已经被刺刀刺烂，开始的时候大家根本认不出这是谁，还是营长认出了他，营长抱着刘四虎满脸是泪：“全身一共十一处，光是头上和脸上就有五处，全是刺刀伤啊！”营长下令一定要救活刘四虎。

刘四虎活了下来，被誉为“英雄的战士”。

但是，刘四虎的团长任世鸿没有活下来。

任世鸿，第一纵队赫赫有名的团长。他身经百战，勇敢坚毅，深得彭德怀信任。青化砭战役时，任世鸿的团打伏击又狠又猛；羊马河战役时，任世鸿带领一个连吸引敌人，灵活机动；蟠龙战役时，任世鸿是最后一个撤离战场的。彭德怀得知任世鸿阵亡的消息后，不禁失

声道："怎么是他？怎么是他？"一年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统一番号，彭德怀指定任世鸿曾任团长的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三五八旅七一四团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

七一四团在不到两百平米的山头阵地上激战十个小时，与任世鸿一起牺牲的，还有参谋长武治安，团政治委员徐文礼、副团长薛长义负伤。

入夜，刘戡发现经过二十九日一天的战斗，整编第二十九军已经损失了一半兵力，已经没有可以机动的部队了。王应尊和严明都知道，停在此地不走，结局一定是被歼。刘戡认为明日共军将继续猛攻，趁夜突围尚有逃生的可能。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如果部队突出去了，只能撤往西安方向，那么谁对胡宗南的增援命令负责呢？刘戡希望师以上指挥官共同负责，可整编九十师师长严明坚持要刘戡下达命令。结果是，全军原地不动，等到明天再说。

三月一日拂晓，彭德怀部发动全线攻击：二纵由南向北，四纵由北向南，三纵和六纵的一部由东向西，一纵沿瓦子街公路及南北两山自西向东。刘戡部的阵地逐渐缩小，三十一旅旅长周由之和四十七旅旅长李达已经阵亡。整编九十师各旅都已失去控制。师长严明和参谋长曾文思撤退到一个高地上给胡宗南发了封电报："部队已损失三分之二，战局极为严重，我等团长以上决心成仁，以报校长及钧座培育之恩德。"曾文思认为师长过于悲观，严明说："现在谁肯为我拼命？赶快把电稿传到团，团长以上人员一律要坚决自杀！"电报文稿被传给了部队，不知结果是提高了士气还是削弱了士气。此时，各个阵地上的厮杀已进入白热化，团长以上人员似乎用不着自杀，五十三旅副旅长韩指鋮、一五八团团长何怡新被打死，一八一团团长吴汝熙失踪。下午，随着各个阵地相继瓦解，刘戡的军部和师部都已处在被攻的境地。

严明不断地逼迫曾文思和他一起自杀。曾参谋长借口观察战局，始终与他保持十米以上的距离。曾文思对严明当通信营长的儿子严守礼说：“你要特别注意，防止师长自杀！”严守礼说：“咱们突围吧！”曾文思说：“你们把师长拖到山下军部去，我随后也下去。”于是，严守礼和副官架着严明下山，曾文思也跟了下去，两人在山沟里会合了。严明埋怨说：“你真害死人！在山上我手头还有几个连，可以找机会冲出去，现在叫我怎么办？”曾参谋长说：“你为什么不早说？再上山吧！”严明说：“还来得及吗？就在这里动手自杀吧！”曾参谋长说：“为什么？到军部去，要死大家死在一块！”这时，公路上人头攒动，混乱不堪，只见人流向西涌，一阵激烈的枪响之后，人流又像潮水一般向东涌去，很快又被挡了回来。严守礼将严明扶上滑竿（去年三月严明率部进攻延安时，翻车腿断，愈后行动不便，随身备着一乘滑竿），曾参谋长有意慢慢落在后面，然后他与严师长脱离开，自己到公路边的山岩里藏了起来。严明乘坐滑竿往山上行进时，被机枪子弹打死。

刘戡烧毁了机密文件、砸毁了电台之后，准备自杀，但手枪被军参谋长刘振世夺了下来。刘振世要求军长突围，刘戡在突围中捡着一颗手榴弹，他看了一眼随即拉响了手榴弹上的拉环。

也许除了刘戡本人，整编第二十九军并没有哪一位团长以上军官自杀。整编二十七师师长王应尊在警卫营长刘中甫的带领下突围时被俘，王应尊混在俘虏队伍里，天黑的时候跑进山，两天以后回到西安。被俘后逃脱的团以上军官还有：整编二十七师参谋长敖明权、五十三旅旅长邓宏仪、六十一旅旅长杨德修、五十三旅参谋长宫润章、一五七团团长王公堂，一八一团团长吴汝熙等。被俘的团以上军官是：整编第二十九军参谋长刘振世、军部参谋处长吴正德、整编二十七师副师长李奇亨、整编九十师参谋长曾文思、五十三旅副旅长李秀

岭、六十一旅参谋长张缉熙、一四〇团团长邢志东、一五九团团长安梗南、一八三团团长刘侗夫。

躲在山岩中的曾文思看见一个解放军小战士向他招手，于是他走了出来。在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的战场上，这个没有留下姓名的小战士勇敢而自信，他从容的姿态是那一段峥嵘岁月里的奇异瞬间：

> 一个第三五九旅的战士，大约有十六岁的样子，单独从公路东边走过来，背着一支步枪，一面招手，一面呼唤着："同志们！出来集合，有枪的自己送过来。"我为了自己的安全，便和我的卫士跑到这个小战士的跟前站着，不一会儿就集合了三十多个，一半有枪的把枪机交给这个战士，仍旧背着枪。但这时枪声还很急，流弹乱飞，我向小战士建议我们这一队暂时疏散隐蔽，听他的哨音再集合，他同意了。然后又从东边过来一小队战士，成单行慢慢地走过去，轮流地喊着："同志们！不要怕！欢迎你们！我是整第三十一旅在青化砭解放的；我是整第一三五旅在羊马河解放的；我是整一六七旅在蟠龙解放的；我是整第一二三旅在沙家店解放的……"到了下午四点钟的样子，战斗全部结束，凌乱的枪声还是继续着，我们原来那一队又集合起来，跟随小同志到丁家湾去。

刘戡陷入重围的时候，胡宗南已无兵救援。

三月一日早晨，固守宜川县城二十四旅旅长张汉初听见"瓦子街任家湾方向炮声隆隆，清晰可闻。五个小时后，炮声慢慢沉寂下去，接着机枪声也听不到了"。张汉初判断刘戡部凶多吉少，宜川更是危在旦夕，遂决定率部突围。

二日晚，西北野战军发起总攻击，战至三日上午八时，全歼宜川守军五千余人。宜川全城被猛烈的火力覆盖时，张汉初身边只剩了两名卫士，绝望之中他跳城而下摔伤腰部，被两名解放军的饲养员俘虏。

宜川一战，西北野战军以伤四千一百九十三人，亡一千零五十九人的代价，歼灭胡宗南一个整编军军部、两个整编师师部、五个整编旅的十个团，总计两万九千余人，其中毙伤七千五百二十三人，俘虏两万一千九百六十二人。

新华社通过广播通知国民党方面：刘戡和严明的遗体已经妥善装殓，希望派人前去接收。

胡宗南派人把两人的遗体运回西安。

刘戡和严明被蒋介石追认为陆军上将。

三月十三日，蒋介石致电胡宗南：“宜川丧师，不仅为国军剿匪最大之挫折，而其为无意义之牺牲，良将阵亡，全军覆没，悼痛悲哀，情何以堪！”

蒋介石将西安绥靖公署参谋长盛文撤职了。

宜川战役后，彭德怀的部队仍是缺粮。

彭德怀决定继续南下，围攻洛川，控制陕西中部的黄龙地区，筹备粮食。

三月四日，作战部署发布：第一、第四纵队攻击洛川西南方向的宜君和中部，第二纵队攻击洛川南面的澄城和白水，第三、第六纵队合力攻击洛川。

九日，在一纵和四纵的攻击下，中部国民党守军新编陕西保安十五团第一大队投降，宜君守军也弃城逃跑，中部和宜君被攻占。十日，二纵攻占白水后，在向南面的蒲城推进时，纵队司令员王震胃部出血，被紧急送往黄河以东的晋绥军区后方医院。

洛川位于西安与延安之间，是胡宗南重要的物资储备基地和战略集结地，守军主力为整编九十师六十一旅。旅长杨荫寰在宜川遭到围攻时就不断地向延安和西安求援，胡宗南急令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五兵团司令官裴昌会率部火速从豫西回撤洛川。

彭德怀还是决定一边围城一边打援。

大雪变成了持续的冷雨，部队没有充足的火炮，而且炮弹奇缺，只能采用炸药爆破的手段艰难地发动攻击。第三、第六纵队两次冲击洛川城防均未得手，彭德怀面临着无论攻城还是打援都异常艰难的局面。他知道部队冒着大雪、忍着饥饿攻打宜川，伤亡很大，未能休息和补充即南下继续作战，战斗力较宜川战役时必有所下降。但是，他急切地想拿下洛川，因为洛川城内有大量的物资，特别是囤积着大量的粮食。能弄到粮食，关乎西北野战军下一步作战的实施。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再次提到粮食问题，他为计算粮食消耗所付出的精力甚至大于指挥作战：

> 洛川地主少，富农多，且存粮不少，拟可筹一万三千石，可供攻城部队一月半。中部、宜君拟只筹一万石，缴敌一千一百石，可供一纵队两月。四纵现在同官西，就三原、淳化、关中地区粮，估计两月不成问题。二纵须从白水、澄城、合阳筹粮一万五千石。以上筹粮计划争取在三月底完成，如确能完成，四月份粮食不困难，三、六两纵攻克洛川后，即开至南线，休整就食，主要靠河东接济。一、二两纵攻延安，求得四月底至五月上半月解决延安之敌，然后出陇东、陇南就粮。唯打延安需要粮食至少一万二千石，须河东从小船窝、马斗关运输五千石，山西筹一千石，如属可行时，野战军在黄龙区再筹六千石，即可解决打延安战役粮食问题。否则，只有暂时放弃打延安的计划。

但是，对洛川城的攻击一再失利，导致彭德怀的筹粮计划落空。更严重的是，胡宗南汲取了宜川战役的教训，命令增援的裴昌会兵团各部队齐头并进，步步为营，互为掩护，决不允许冒进和分散，白天前进十五公里，晚上再后退七公里宿营，整整七天的行军，第五兵团仅仅向前推进了五十二公里，而且到达宜君之后就原地不动了。彭德怀不断要求部队诱敌调动，但裴昌会一概不予理会，延安方向的守军更是坚守不出。这边洛川久攻不下，那边打援无从下手，局势逐渐严峻起来，因为数万人马集中在黄龙山区，既没粮食又无战机，如果不适时撤离的话，人马饥饿之时很可能遭到国民党军的南北夹击。彭德怀决定放弃这次围城打援的计划，迅速撤离，去寻找一个可以筹集到粮食、可以把胡宗南打疼的作战地域。

他看上了西府地区。

西府是古称，指的是西安以西、泾河与渭河之间的地区，包括宝鸡、咸阳等市县。由于胡宗南把主力置于西安以东的洛河东西两岸地区，西府地域的兵力相对薄弱。特别是胡宗南的重要后方基地宝鸡，仅有整编七十六师师部、一四四旅四十团和陕西保安二十一团防守，兵力一共两千多人。

四月初，除留第三纵队继续包围洛川之外，西北野战军主力分为左、中、右三路进军西府。二十五日，第一、第二、第四、第六纵队控制了陇海铁路长约七十五公里的地段，对宝鸡形成了包围。

胡宗南急调裴昌会兵团自宜君驰援宝鸡，并将驻守在西安附近的青年军二〇三师主力用火车运抵泾河一线。同时，南京国防部命令青海马步芳部的整编八十二师自甘肃东进，增援西府西北面方向的长武和彬县。到了这时，胡宗南才突然发现自己的兵力已是捉襟见肘，陕北的战局已不再任由国民党军掌控，特别是孤悬于陕西北部的延安，牵扯着西北战场的大量兵力，但是随着毛泽东已经东渡黄河，重兵防守延安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失去了必要。

解放战争中的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由此发生。

国民党军准备放弃延安。

驻守延安的整编十七师师长何文鼎多次来电，请求他的黄埔同窗胡宗南放弃延安。他强调说，延安与后方仅有一条"毫无保障的补给线"，从延安到洛川上百公里的路上，一支警戒部队都没有，如果现在不主动放弃，说不定哪天整编十七师就会让彭德怀包了饺子。何文鼎甚至已经制定了撤退方案：用飞机把重装备运走，部队轻装绕道宁夏和甘肃回到关中。他的理由是：虽然路途遥远，但相对安全。

何文鼎已是度日如年。彭德怀攻打宜川时，他曾奉命派一个旅增援，但是部队刚一出动，就传来了刘戡自杀的消息，他立即把自己的部队撤了回来。宜川距离延安咫尺之遥，何文鼎心惊胆战地等着大战降临。但是，彭德怀没有攻打延安，而是西进宝鸡了。何文鼎立即再次打电报给胡宗南，认为这是从延安安全撤退的最后时机。

他的请求终于被胡宗南批准了。

胡宗南没有批准的是他绕道撤退的建议。

四月二十一日凌晨四时，延安四周的防御阵地上响起了破坏工事的巨大爆炸声，城内销毁物资的火焰也随之冲天而起，滚滚浓烟遮蔽了渐渐亮起来的天色。医院忙着转移伤员和病号，警察局长忙着布置潜伏特务和安置秘密电台。南关的仓库被点燃，里面储存的面粉、小米、布匹和药品等被混乱的人群哄抢一空。在通往城南门的路上，地主、官吏、下级军官和他们的家眷们拥挤在一起夺路而逃，有人甚至将孩子弃之不顾。延安满城惊恐的景象令何文鼎万般无奈，他对参谋长梁文铁说：“不要走了，叫回来吧，改日再行动。”梁参谋长说：“已经不可能了，走吧。”

所有的路上都挤满了人，重机枪手把机枪全扔了，一门重炮陷在沟里拖不出来，炮手索性把炮炸毁了。走到延安以南的甘泉附近时，前面突然响起枪声，山头上出现了一支阻击部队。何文鼎赶快派出部队驱逐，主力进入甘泉城里宿营。第二天，没有遭遇阻击到达茶坊。第三天也没有遭遇阻击，甚至连枪声都没有，沿路的村镇都没有人迹，下午整编十七师到达洛川。在与驻守洛川的整编九十师六十一旅会合后，两支部队一起南下。前边的道路出现了被破坏的痕迹，部队的行进速度因此迟缓。二十六日，何文鼎发现落在后面的炮兵没跟上来，派人去联络却一直没有回音，致电胡宗南请求派飞机空中侦察，

飞行员报告说没有发现炮兵的踪迹——炮兵肯定已被共军弄走了，何文鼎突然感到有些恐惧，就在这时候前面枪声大作。

前来阻击整编十七师和杨荫寰的六十一旅的，是西北野战军许光达的第三纵队。许光达的部队虽在兵力上不占优势，但官兵打起来毫不手软。由于没有作战准备，整编十七师出现了混乱。散乱的官兵、行李辎重以及跟随撤退的陕北行署的行政人员拥挤在公路上，手榴弹在人群中爆炸，然后就是密集的机枪子弹。何文鼎指挥十二旅的两个团拼死冲击，双方在三十米的距离内僵持下来，谁也不肯后退谁也没再攻击。最后，何文鼎调来坦克发动冲击，谁知对面的三纵官兵并没有惧怕，他们竟然爬上坦克用手榴弹把坦克上的装甲连长砸得满头是血——国民党兵搞不懂那个共产党士兵为什么不拉响手榴弹而仅仅把手榴弹当成一只铁锤使用。

二十八日，整编十七师开始渡洛河。前天就命令工兵营先行到渡口架桥，但是由于河水上涨，架桥有困难，那个工兵营长居然带着部队跑了。愤怒而无奈的何文鼎命令十二旅掩护，主力部队徒涉过河。虽然身后还没有追击部队，但整编十七师仍笼罩在形同溃败的巨大恐慌中。下午，河水突然暴涨，重武器和车辆都已无法过河，正在北岸商量办法的时候，侦察飞机投下信件，说有共产党军队追击而来，催促整编十七师赶快渡河。何文鼎立即命令按照十二旅、师部、直属单位、杨荫寰部和四十八旅的顺序强行徒涉，重武器和车辆抬着过河。此时，西北野战军已经接近北岸，洛河渡口乱成一团，国民党兵扔下重武器纷纷抢渡，负责掩护的四十八旅也放弃掩护任务参加到抢渡中。不少官兵在踩踏中被淹死，几乎所有的重武器和各种车辆辎重全部被西北野战军获得。何文鼎因怕丢失全部重武器受到处分，致电胡宗南请求派飞机把那些重武器炸毁。胡宗南命令他打回去把重武器夺回来，何文鼎没有执行。

五月一日，整编十七师撤到蒲城之后做了清点：被俘虏或者自动投降三千人，负伤五百人，死亡三百七十人。重炮两门、山炮十三门、野炮八门、坦克八辆、汽车四十八辆、吉普车七辆全部丢失。

几天以后，蒋介石来西安，见到何文鼎，蒋介石给了他四个字："怕死！无耻！"

国民党军占领延安的时间是：一年零一个月又三天。

合众社南京四月二十二日电："延安失守，对国民党军说来，是士气上的大失败。因为延安曾是共产党中国的象征几乎有十年，而政府于去春占领延安为反共战争的转折点。"

路透社南京四月二十三日电："延安败走基本上标明了一个事实：国民党永远不能期望仅依靠军事以赢得对共产党的胜利。"

与此同时，彭德怀部攻击宝鸡的战斗可谓势如破竹。

对于驻防宝鸡来说，胡宗南太大意了，他没想到彭德怀部会从洛川急速南下攻击宝鸡；当然，他也并不了解宝鸡丰富的物资对于彭德怀的部队来讲是值得付出代价的。

防守宝鸡的国民党军，除地方杂牌部队外，主力是整编七十六师师部和一四四旅，师长徐保。徐保的部队残缺不全，二十四旅在宜川战役中受到重创，正在整补之中；新一旅此时也正在汉中整训，徐保能够指挥的作战部队极其有限。徐保的大名在胡宗南的部队里人人皆知。他嗜赌如命。当团长的时候，刚领到全团的军饷，一夜之间就输个精光。天亮的时候，军需主任向他要钱，他让军需主任集合部队说要亲自发饷。他走到全团官兵面前说："这个月的饷，团长领来了！"士兵们面露喜色，他又嬉笑起来，"我们团运气不好，昨天晚上团长把钱统统输光了。兄弟们，不要急，团长今晚再去把钱翻回来，明天全

团发双饷，好不好？”全团官兵听见“发双饷”，竟然齐声高喊：“好！”更奇怪的是，胡宗南知道这件事后，把徐保叫去训斥：“我问你一个问题，古来名将，谁是赌棍出身？你答复！”见徐保不吭声，胡宗南走了。直到天黑回来时，徐保依旧笔直地站在那里。胡宗南说：“没用的东西！还不出去！到经理处再领全团一个月的饷，下次不得胡来！”被提升为整编七十六师师长后，徐保根本不住在宝鸡，所有的事务都交由参谋长袁致中处理，而他则远在西安的公馆里醉生梦死，除了赌钱就是召妓。二月里的一天，他突然想起自己是师长，于是到宝鸡的师部去了一次，对师直属部队的官兵讲讲话，算是履行了一次职责。

四月二十四日，宝鸡陷于危境，徐保来了。他没到师部去，就在他的休息室与参谋长袁致中和警备司令刘进商讨对策。刘进的警备部队实际上是个空架子，没有任何可以支配的作战部队，因此他建议放弃宝鸡，撤退到南面的秦岭上抵御共军。徐保一听就火了，他决心坚守宝鸡，并调整了守军的部署，命刘进率领一个步兵团（新一旅的一个新兵团）撤至宝鸡以南的益门镇，确保渭河桥的安全，宝鸡专署、警备司令部、县政府和其他行政人员一律跟随刘进撤离。这个决定正合刘进的心意，当夜，宝鸡警备司令就跑了。

晚上，胡宗南来电，命令徐保固守，并告诉他国防部已令马家军星夜驰援。徐保似乎更有底气了，大骂刘进是胆小鬼，对不起胡长官的栽培。骂完了，他又将师部重新调整一番，只留下几个作战参谋，其余人员统统撤出宝鸡。他还让警卫部队给他准备好一辆吉普车，加足汽油，把他的全部行李都放在车上。最后，他觉得再没什么可做的了，开始静等。一直等到二十五日深夜，炮声骤起，徐保知道他回报胡长官栽培的时候到了。

先是外围战况不断地报来，都是一连串的糟糕消息：城西北的马家原、何家原以及西堡子被共军突破，守在那里的保警队炮声一响一

哄而散。接着，飞机场和北安堡相继失守。天亮的时候，西北野战军已经开始进攻城关了。徐保没有料到他的部队就这样让共军进了城，统统没有任何抵抗的决心和斗志。他的指挥部在全城地势最高的金台观，徐保放眼看去，觉得攻城的共军远比胡宗南向他通报的多，宝鸡城四周已全是共军。这时，从西安开来的铁甲列车队长向他建议，把师部转移到铁甲车上去，铁甲车上有火炮和机枪，弹药充足，还储存有三天的给养，坐在里面不但安全，还可以横冲直撞。徐保立即采纳了这个建议，命令一个叫连奎筠的参谋去通知工兵营坚守东堡子河车站，掩护师部向车站里的铁甲车转移。但是，连参谋没跑多远就被打死了。徐保带着一个连仓皇跑到铁甲车上。上了车徐保就命令往西开，但没开多远就发现了共军，前面的铁轨已被拆了，于是又往回开，开到车站以东的木桥附近，桥东的铁轨也被拆了，铁甲车陷于既不能退也不能进的危境之中。徐保向窗外看去，看见一群解放军官兵跑了过来，把他的铁甲车围住，有的爬上车顶，有的钻到车底，他还听见了“欢迎投降！优待俘虏！”的喊声。

这是徐保师长的最后时刻：

参谋一科科长李如彬向徐建议，速带少数人跳车突围，涉渭河向南逃跑。徐同意了这个办法，就和他的参谋长袁致中商议说：“眼看大势已完，我先撤出，你在车上继续作战。”袁致中则哭丧着脸说：“师长，我的家小在西安，万一我尽忠了，请师长多加照顾。”这话激起了徐保的愤怒，厉声大喊：“那么你突围渡河去，我留在车上，一个革命军人还怕死吗？”袁致中听后只好说：“师长，你快准备吧，再迟一会儿更不好突围了。”徐保匆忙换了一身士兵服装，又给胡宗南拍了电报，大意是：“我决心尽忠……”然后令无线电排将密码烧毁，又将身上带的党员守则、军人读训一本一本地都撕毁，还说：“不想我徐保今天会落到这个地步。”他手持手枪，刚走到铁甲车的门口。一颗炮弹轰的一声，他就倒在车厢内，满身是血。这时战斗更为激烈。包围铁甲车的解放军在铁甲车底已满积柴草，并再三警告，如不投降，就要放火烧车。至此，袁致中才被迫表示愿意全部投降。在解放军允许他们投降以后，铁甲车上所有的官兵统统放下武器，跳下车来，排队投降。而东堡子的工兵营早在两小时以前也被缴械投降。战斗遂告结束。被炮弹击伤的徐保经急救无效，于数小时后死亡。徐保的尸体被解放军送到北边山上掩埋了。还指令他的随身副官李玉林要记清这块地方，好让胡宗南和徐保的家属来找。

占领宝鸡的西北野战军官兵被堆积如山的物资惊呆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战利品，从生活物资到武器弹药应有尽有，而且物资多得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搬运完。就在官兵们在宝鸡城内忙着搬运物资的时候，不利的消息传来让彭德怀大吃一惊：从君宜增援而来的裴昌会兵团突破了四纵的阻击，四纵未向上级请示，也没通知友邻部队，自行撤退到岐山县东北的山里去了，从而使裴昌会兵团正向宝鸡长驱直入，现距野战军司令部仅十多公里了。同时，青海马步芳的整编八十二师的四个骑兵团也突破了六纵教导旅的阻击，已经到达彬县，正向宝鸡急速推进，而且还切断了野战军向陕甘宁解放区撤退的退路。

形势骤然紧张起来。野战军主力已处于国民党军队西、北两面的夹击之中，特别是第一、第二纵队此时的位置几乎是背水侧敌，从野战司令部所在的凤翔南屈家村已经可以听见国民党军攻击的炮声。彭德怀为四纵阻击不力震怒，也为眼前足够西北野战军使用两年的物资弹药不能搬走而十分痛惜。他下令将搬不走的物资弹药全部销毁，然后各部队迅速撤出宝鸡。但是，部队正分散在各处搬运物资，需要电台逐个通知，还要迅速制定撤离的计划和路线。彭德怀交代第一、第二纵队指挥员：情况紧急，能集中一个团就撤走一个团，能集中一个旅就撤走一个旅。野战司令部的人催促彭德怀迅速转移，因为还有部队没有联系上，他就是不走，彭德怀说："只要部队撤出去，我个人没什么，我带警卫营去打游击！"

五月三日，匆忙撤出宝鸡的西北野战军主力在甘肃平凉、泾川之间的花锁镇通过西兰公路，涉泾河向陇东开进，准备夺取屯子镇后，歼灭青海马步芳的部队，以彻底摆脱敌人。五日，六纵机关和教导旅进入屯子镇，准备策应一纵夺取肖金镇。但是，马步芳早就盯上了六纵，六纵在不明敌人意图的情况下，被马步芳的骑兵团包围。

六纵在屯子镇里拥挤不堪，马步芳的骑兵旋风一样冲杀过来，同时密集的炮弹将小镇轰成一片火海，六纵官兵因无处躲藏伤亡巨大。危急之下，彭德怀亲率野战军司令部指挥第一、第四纵队向屯子镇攻击，最终对马步芳的三个骑兵团实施了反包围。被包围的骑兵拼命突围，双方以白刃战来回拉锯数次。马步芳的骑兵第八旅增援而来，被阻击在屯子镇的西南方。由于原来围攻六纵的骑兵转身突围，六纵趁机出击，在镇子的西南角打开突破口冲了出来。

五月六日，彭德怀命令主力向甘肃东部的宁县、正宁方向转移。

整编八十二师师长马继援亲率部队截击，战斗持续一天之后双方都付出了巨大代价。马继援回忆道：

> 在为时八小时的战斗中，第一线部队死伤惨重，尤其韩小侠营有一大半被打死，营长韩小侠、副营长沙万青、连长铁万良等负重伤，连长李成让毙命。杨修戎团全团排以下官兵死伤不计其数。团长杨修戎在惊恐万状之中竟冒险逃出第一线，到马继援处放声大哭，诉说部队损失很大，解放军居高临下，火力猛烈，特别是右翼阵地无法攻击前进。因为右翼阵地面前的解放军，利用几棵大柳树，树上架设着三挺机枪，火力封锁严密，打得他们伏地不敢抬头。马继援看到杨修戎这副狼狈相，便声色俱厉地斥责说："你说我怎么办？我们向沟底退吗？阿大（指马步芳）对你栽培多少年，没有薄待你吧？从来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你擅离阵地，不顾全局。你看，在敌人的炮火下，连我藏身之地也没有，我的大乘马（原是马步芳最爱惜的一对新疆大青马，在马继援赴陇东时送的），也被打伤不能行动。今天你向我要援兵，我从何处调？你要赶快上阵督战！无论如何，在今天黄昏前攻上马头坡，若不能完成任务，你不要与我见面。"……马继援面如土色，满头大汗，忙于在报话机上拼命喊话，向外线告急。正在这紧急关头，谭呈祥率领整编第一〇〇旅，从屯子镇转头赶到马头坡西南芦家岭地区，与解放军后卫部队接触，使马头坡解放军受到严重威胁，解放军看到形势不利，主力向三不同（地名）方向撤出战斗……

彭德怀部艰苦转战，终于在五月十二日回到关中地区，摆脱了国民党军的追击合围。

五月二十六日，彭德怀主持召开了西北野战军第二次前委扩大会议。在会上，他对第四纵队干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你有电台，完全可以请示报告，敌人力量大抗不住也可以报告，而你既不抗击于岐山

之东，又不抗击于岐山之西。你撤，既不通知友邻部队，又不告诉我们，总该打个招呼吧？部队在行军路上住老乡的房子，走时还给房东打个招呼，你们的组织纪律性哪里去了？”接着，彭德怀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怕暴露我军企图，过分强调战役的突然性；因粮食困难，战役准备不充分；对四纵内部存在的问题了解不深；对胡宗南增援宝鸡的力度和速度判断不足；对马步芳的实力估计过小；尤其对胡宗南与马步芳能够配合作战认识不够——一生都在最艰苦的战场上作战的彭德怀不徇私情，他说：“你不恨敌人，我就恨你。”他也承认自己脾气不好：“我是阎王老子开饭店，鬼都不上门。”但是，就在彭德怀痛骂四纵指挥员的这次会上，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最后说：“彭德怀同志是有德可怀，有威可畏啊！彭总坦荡的胸怀，你愈了解他，甚至受到他的批评越多，便越能深刻地感受这一点。”

西府陇东战役，国民党方面称为“泾渭河谷战役”，并且认为国民党军取得了“大捷”。实际上，国民党方面明白，如果兵力最少、装备最差的彭德怀部也出击到外线作战了，说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已经能够在全中国的任何地方发动相当规模的战役。而就在西北野战军艰苦地进行战场牵制的时候，刘邓和陈粟大军在中原打响了一场大仗。

## 打龙亭

一九四八年初，粟裕改变了毛泽东提出的一个重大战略计划。

尽管所有关于解放战争的记述都涉及此事，但仍有评价不足之嫌。因为后来的历史证明，粟裕的判断和建议，对整个解放战争的进程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这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将领对中国人民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在军队的高级将领中，极少有人敢于和善于对毛泽东的决断提出反对意见。毛泽东一旦作出决定，特别是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

略决定，鲜有改变的先例，他不是一个能够轻易被说服的人。

三月十日，毛泽东尚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他致电刘少奇：“我们拟于三月二十日动身东移，约于四月十五日左右可到你处，届时拟约粟裕一商行动计划。”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已到河北阜平城南庄，他再次致电陈毅、粟裕：“为商量行动问题，请陈毅、粟裕两同志于卯有（四月二十五日）至卯世（四月三十一日）数日内同来平山中工委开会为盼。”

四月二十五日，陈毅和粟裕从河南濮阳出发，日夜兼程，于三十日赶到城南庄。毛泽东一改会见党内同志从不迎出门迎接的习惯，大步出门与粟裕握手。“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欢迎你，粟裕同志！”毛泽东显出了一些激动，“十七年了呀，有十七年没见面了吧？”

粟裕说：“是的，十七年不见了，主席。主席好吧？”

毛泽东和他的一个兵力甚众的方面军最高军事指挥员竟有十七年没有见过面，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十七年前，应该是一九三一年，那时粟裕二十四岁，担任中央红军六十四师师长。俘虏国民党军师长张辉瓒的战斗，就是粟裕率领六十四师打的。龙冈的山雾之中，六十四师将“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十八师不漏一人一枪全部歼灭，战后全师官兵的梭镖和土枪都换成了五响快枪汉阳造。“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毛泽东如此赞誉年轻的师长粟裕和他率领的同样年轻的红军士兵——“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在之后的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粟裕先后担任红十三师师长、红四军参谋长、红一军团教导师政委、红十一军参谋长、红七军团参谋长兼二十师师长。在残酷的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一颗子弹从左臂穿过，粟裕的骨头、血管和神经都受到严重损伤，被送到包扎所的时候，胳膊已经

肿得粗过大腿。医生要锯他的胳膊，粟裕不同意，只同意做手术。没有麻药，医生用麻绳把他捆在长凳上，一刀一刀地切开，将子弹取出。治疗只能靠盐水，每天把满是脓血的布团从伤口抽出来，然后再把另一个浸着盐水的布团塞进去。在巨大的痛苦中养伤的时候，医院受到国民党军袭击，粟裕一口气跑出二十里得以逃脱。一九三四年七月，他被任命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参谋长，率部离开中央苏区，向闽浙赣皖边区进军。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他出任红十军团参谋长。一九三五年初，红十军团在皖北遭国民党军重兵“围剿”，粟裕脱险后在浙江南部的大山里打了三年游击，那时毛泽东已落脚在遥远的陕北。抗日战争中，粟裕成为新四军和苏中战略区的领导人。抗战结束，内战爆发，粟裕在前线指挥的苏中战役、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蒙阴战役、孟良崮战役等，连续给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一九四六年秋，当山东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统一行动时，毛泽东曾明确指示：“战役指挥交粟负责。”

虽然十七年没有见过面，但毛泽东对粟裕信任有加。

一九四七年夏，毛泽东在考虑扭转战略局面的时候，提出派一支得力部队南下，去长江以南开辟新的战场。关于这支得力的部队，毛泽东选定的是粟裕的纵队：“叶、陶两纵出闽浙赣，创立闽浙赣根据地。”毛泽东认为，刘邓挺进大别山，粟裕深入江南，必定能迫使大量国民党军从长江以北向长江以南回援，我军便可以转守为攻。粟裕对毛泽东这一惊人的计划持谨慎的态度。鉴于当时华东野战军经过几次大战急需休整，短时间内不可能执行如此重大的任务，于是他请示并得到军委同意将南下的计划推迟半年执行：“迅速插入敌后作大发展，是能逼敌迅速回头，减轻正面压力及解放区人民痛苦，但完全没有根据地作依托，在目前大规模作战是困难太大。叶（叶飞）、陶（陶勇）进入鲁南则受此困难特大，故不能久停寻机歼敌，加之雨季，到处皆水，对我军行动限制甚大。”

七月，刘伯承、邓小平开始执行挺进大别山的计划，九月，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主力同时进军豫皖苏，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大举进入国民党统治区，这让国民党军不得不重新调整战略部署。十月十五日，毛泽东亲自致电陈毅、粟裕，再次筹划南渡长江之事："……战局可能发展得快，六个月内［十月至三月］你们各纵在河（运河）淮（淮河）之间作战，另准备以淮南独立旅恢复淮南。六个月后［约在明年四月］，你们须准备以一个或两个纵队出皖浙赣［不是闽浙赣］边区……"毛泽东同时催促说："我们发给你们电报中，有许多未接你们复电，不知你们是否收到及是否同意。嗣后，你们收到我们电报，请复电说明收到某日某时电，同时对该电内容哪些可以实行，哪些与情况不符不能实行，表示你们具体意见。"第二天，粟裕回电，表示刚到豫皖苏，需要巩固根据地，如果根据地不巩固，南下作战将没有依托。且叶飞、陶勇两纵队在此前的作战中都伤亡万人有余，至少需要半个月的时间补充休整。几天后，毛泽东致电陈毅、粟裕："你们全军除休整者外，酉（十）戌（十一）两月均依现态势分散作战及工作。"渡江南下的事情又一次搁下了。

一九四八年初，国民党军在对陕北和山东发动的重点进攻中损失重大，于是蒋介石改变了战略部署，在中原集结了六个机动兵团，在加强长江防线的同时，对进入大别山区的刘邓部进行大规模"清剿"。刘邓部在处境异常艰难的情况下，不断要求其他战场和部队的策应和支援。毛泽东认为，扭转战局的最好办法，还是派一支部队向江南实施战略跃进，迫使国民党军从北向南回援。于是，渡江南下一事再次提出。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央军委致电粟裕，明确指示：

关于由你统率叶（叶飞）、王（王必成）、陶（陶勇）三纵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任务问题，我们与陈毅同志研究有三个方案：（甲）就现态势再休整半月，你率叶、王、陶三纵乘敌不备从宜昌上下游渡江。陈（陈士榘）、唐（唐亮）指挥三、八两纵及陈赓主力进入汉江地区，打入十五师等部，掩护你们渡江。此举缺点是新兵与干部来不及送上。（乙）丑（二）、寅（三）、卯（四）三个月照原计划进入伏牛秦岭以南、长江以北、平汉以西地区。除作战外，你率叶、王、陶三纵在该地区争取休整一个整月，然后渡江，陈、唐指挥

三、八两纵及陈赓主力在江北任掩护。此举好处是新兵和干部可以送上，缺点则敌人可作（做）准备。（丙）丑、寅、卯三月至伏牛、长江之间作战，辰（五）月全军北返，你率叶、王、陶择地休整两三个月，秋季渡江。此举好处是准备充分，缺点是要到秋冬之间才能实现调动敌人之任务。以上三案各有优劣，请你熟筹见复……

毛泽东判断，粟裕率部渡江南下，“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敌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因此，粟裕“以七八万人之兵力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然后“以跃进的方式分几个阶段到达闽浙赣，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防不胜防，疲于奔命”。

三十一日，粟裕回电，表示执行中央指示，着手准备渡江事宜，并提出了三月和五月两个出动时间供中央决定。但是，粟裕同时提出，渡江后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转战到闽浙赣地区，“如是恐将有半数之减员”，且伤员“沿途无游击区安插，只任其置于民家”，官兵这样损失“甚为可惜”。粟裕认为，我军在战略反攻中已经取得优势，“但在数量上和技术上并非优势”。而如果三个野战军能够合力在中原打几个歼灭战，“使敌人机动兵力大为减少”，那么“我军在机动兵力的数量则将逐渐走向优势”。一旦我军在“数量上及技术上取得优势，则战局的发展可能急转直下，也将推进政治局势的迅速变化”。

粟裕的电报措辞委婉，但能够显露出他对南下渡江作战的不同看法，相信毛泽东能够读懂。但是，毛泽东坚持进入长江以南开辟战场的计划。

三月上旬，粟裕率领三个纵队转移到黄河以北的濮阳，并派出干部准备船只同时探查渡江路线。

粟裕明白毛泽东的战略决策，是为将战争引向敌人的后方，以配合我军在中原战场的行动。但这一行动是否能够达成战略目的？是否能够改变中原战场乃至整个战争的态势？到底是分兵南下渡江作战有

利，“还是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有力”？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历史告诉我们，谁想统一中国，谁就要控制中原。”粟裕经过反复思考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在中原打大歼灭战，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战争态势。

首先，三个纵队加上地方干部近十万人，孤军进入江南国民党统治区，渡江后要在敌占区转战数省，行程几千甚至上万里，在远离解放区和没有后方的情况下，面对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必将需要连续作战，但是兵员补充、粮食和弹药供应以及伤员的安置都会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而如果沿途留下一些部队建立小的游击区，又会导致兵力分散，不仅无力攻击大城市，即使出现战机也不能贸然去打。

其次，三个纵队的兵力渡江南下，必定调动国民党军回防江南，但不可能如预料的那样有二三十个旅之多，因为国民党军在中原战场上多为精锐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部队，蒋介石不会把这样的部队调往江南去打游击，只能让一些二三线的部队来与我周旋，这样就起不到瓦解中原重兵的目的。

再者，目前在中原战场，特别是在黄淮地区，我军打大歼灭战的条件逐渐成熟。中原地区幅员广阔，铁路干线和大中城市坐落其间，需要国民党军重兵守卫，敌人的机动兵力因此相对减少，这就给我军带来了在运动中调动敌人打歼灭战的机会。况且，黄淮地区地势平坦，虽“便于敌人互相支援，但也有利于我军实施广泛的机动作战”。尤其是在铁路和公路已被破坏的情况下，“敌人重装备的机动将受到很大限制”，我军则可发挥徒步行军的长处“实现战役上的速战速决”。更重要的是，中原地区靠近山东和晋冀鲁豫解放区，部队打大仗可以及时得到人力物力的支持，伤员的治疗和安置能够得到较好的保障。

最后，要在中原战场打大歼灭战，“就必须组成强大的野战兵团”，既要有足够的兵力“担负突击任务，各个歼灭敌人”，又要有足够的兵力“担负阻援和牵制敌人的任务”。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的十

个主力纵队此时都位于中原地区，完全能够承担打大歼灭战的任务。如果华东野战军的三个纵队前去江南，结果又没能将中原战场上敌人的精锐部队调走，则势必造成我军的兵力分散，造成在中原战场大量歼敌的困难，那么将“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敌我兵力对比”。

总之，应该集中优势兵力，依托有利的条件，将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封锁在长江以北，在北方的广阔战场上将其精锐主力歼灭，以改变整个解放战争的态势。

历史将证明粟裕的判断具有惊人的预见性。

但是，“要不要向中央提出建议”，粟裕心存顾虑，“主要是担心自己看问题有局限性，对中央如此重大的战略决策提出不同看法，会不会干扰统帅部的决心”。最终，粟裕还是下决心将自己的判断上报中央：“作为一个战役指挥员，在即将执行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时，应当结合战争的全局进行思考，从全局上考虑得失利弊，把局部和全局很好地联系起来。全局是由许多局部组成的，从局部看到的问题，也许会对中央观察全局、作出决策有参考价值。”

四月十八日，粟裕以个人名义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了他此生写下的篇幅最长的电报。电报长达两千多字。主要内容是：建议第一、第四、第六纵队暂不要过江，集中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主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向敌人的近后方，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派出几个旅或团作为游击部队，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向长江以南敌人深远后方，派出多路游击部队，消灭敌人地方武装，破坏敌人的兵源、粮源和其他战争资源，策应我军在中原地区的行动。电报最后说：“如中央认为上述意见可行，则建议集中华野之大部佯攻［或真攻］济南，吸引五军来援而歼灭之。而后除以一部相机攻占济南外，主力则可紧逼徐州，与刘邓会师，寻求第二个歼灭战。”

——不久之后，华东野战军就发动了改变华东战场态势的济南战役，以及最终决定整个中原战场胜负的淮海战役。

粟裕的长电令毛泽东陷入深深的思考。

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电请陈毅和粟裕来城南庄当面讨论。

见到粟裕，毛泽东说："你们打了那么多漂亮的大胜仗，我们很高兴呀！你们辛苦了。这次要好好听听你的意见哩。"

城南庄会议从四月三十日开到五月七日，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听取了粟裕的汇报。随后会议立即研究决定：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暂缓渡江南下，集中兵力歼敌主力于长江以北，为未来渡江南下作战铺平道路。

毛泽东也同意粟裕的建议。五月五日，他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和华东局，通报了中央与陈毅、粟裕商讨的结果。毛泽东虽对自己的想法有所保留，但基本上采纳了粟裕的建议。他命令粟裕的部队不过长江，但是要过黄河：

> 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使江淮河汉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逐一解决，正如去年秋季以后将战争引向江淮河汉，使山东、苏北、豫北、晋南、陕北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解决一样，这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惟目前渡江上有困难。目前粟裕兵团［一、四、六纵］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的道路，即在少则四个月多则八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三个纵队，在汴徐线（开封至徐州）南北地区，以歼灭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在此期间，由该兵团派出十个营，附以地方干部，陆续先遣渡江，分布广大地区，发展游击战争。以上计划，是我们和陈粟及一波、先念所商定者。粟裕兵团，待陈粟由中央回去，结束政策学习及军事训练，约本月底渡河作战……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连毛泽东都没有想到，随着中原战场上的战役越打越大，粟裕的建议竟然成为包括淮海战役在内的一系列巨大战役的最初蓝图。毛泽东还没有想到，令他朝思暮想的打到长

江以南去的渴望得以实现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不是去开辟根据地，更不是去打游击战争，而是摧枯拉朽地占领整个南中国了。

既然粟裕认为可以在中原战场打大歼灭战，毛泽东就向粟裕提出了歼敌十一二个旅的作战目标。当时中原战场上的国民党军，其一个作战旅相当于一个师的兵力约八千人，毛泽东要求粟裕的歼敌数约为十万人，这与粟裕当时指挥的总兵力数相等。粟裕说："我深感自己肩上担子沉重，觉得这次是向中央立了军令状，一定要把仗打好，用战场上的胜利来回答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亲切期望。同时通过实践来检验自己的战略构想，证明在中原黄淮地区集中兵力打大歼灭战是切实可行的。"

粟裕的压力可想而知。

中原地区，国共两军重兵对峙，其态势是：

国民党军有正规军二十五个整编师，共五十七个旅。其中十三个整编师担任重点城市和铁路线的守备，十二个整编师和四个快速纵队被编成四个兵团执行机动作战任务。其作战意图是：控制陇海铁路东段、津浦铁路和平汉铁路南段的交通线，以郑州、信阳、蚌埠、开封、商丘和徐州等城市为据点，趁共产党领导的中原部队处于分散整训之机，集中一切机动兵力寻找决战战机。同时，监视和堵截在濮阳地区整训的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粟裕部）渡黄河南下进入中原战场。

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的十个纵队，此时正在河南境内移动。其中华东野战军第三、第八和第十纵队在河南中部的许昌和襄城一带休整；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第六纵队以及两广纵队、特种兵纵队在河南北部的濮阳整训；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位于郑州西南地区，第十一纵队位于豫皖苏地区。

无论在兵力还是在装备上，粟裕都没有优势可言。

毛泽东认为，解决中原问题，关键是歼灭国民党军的精锐主力：邱清泉的整编第五军和胡琏的整编第十八军——“夏季作战的重心是各方协助粟兵团歼灭五军，只要五军被歼灭，便取得了集中最大力量歼灭十八军的条件，只要该两军被歼灭，中原战局即可顺利发展。”当时，整编第五军驻守鲁西南，整编第十八军驻守驻马店。鲁西南是一个由黄河、运河以及陇海铁路徐州至开封段构成的地区，邱清泉的整编第五军位于这一地区的中心定陶一带，其守备任务就是堵截华东野战军于黄河以北。

为了指导中原作战，朱德到达濮阳。他对华东野战军官兵们说，对付整编第五军这样的精锐部队，要采用钓大鱼的办法，“他来攻，我就退，有条件就阻击一下，没有条件就不阻击，把他拖得很疲劳，弹药也消耗得差不多时，再用大部队去奔袭歼灭他”。你们一定要下决心钓到一两条大鱼。官兵们毫无拘束地递上来一大堆字条，总司令戴上老花镜一张张地看，然后一个个地回答问题。官兵们的提问五花八门：

“咱们几年能够打败蒋介石？”

“只要吃掉几条大鱼，就很快了！”

大家鼓掌。

“我们掌了权首都定在哪里？”

“南京、武汉都可以考虑，我看还是北平好些，那是明清两朝帝王之都，气派大得很哩！”

大家再次鼓掌。

“全国解放了谁来当总统？”

朱德笑起来：“我们不叫总统，叫主席。主席吗，当然是毛主席！”

大家热烈地鼓掌。

五月二十三日，华东野战军发布求歼整编第五军的作战部署。第二天，陈士榘、唐亮指挥第三、第八纵队，从许昌地区向东南方向的淮阳移动——“使五军被诱至淮阳地区再北返，以疲劳敌之兵力，而便利于我们于鲁西南首先歼灭一些敌人。”整编第五军立即做出反应，南下前往淮阳迎击，准备在胡琏兵团北上增援时，协力歼灭第三、第八两纵队。就在这时候，粟裕率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第六纵队和两广纵队、特种兵纵队乘机南渡黄河，达到山东菏泽、巨野一带，进入了中原战场。

粟裕的行动出乎预料，国民党军立即北移，向鲁西南地区集结。至六月十五日，包括北返的整编第五军在内，鲁西南战场上已有十一个整编师，国民党军以密集的阵形决心在鲁西南与粟裕决战。

粟裕还不具备决战的条件。主力尚未集中，打援兵力不足，地形于我不利，无法分割敌人。粟裕计算了一下，要歼灭整编第五军这样的精锐部队，突击集团至少需要四至五个纵队，另外还需要同等的兵力负责打援。华东野战军有三个纵队远在许昌和南阳地区，短时间内难以集中，即使把第三、第八纵队从河南东部紧急调来，再加上中原野战军的第十一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的两广纵队，粟裕手中的全部兵力也不足六个纵队。如果这时候打第五军，只能派出一至两个纵队负责打援，在无险可守的大平原上，一至两个纵队的兵力是难以阻击国民党军的大规模增援的。而突击部队在三至五天内不能解决战斗，一旦增援部队到达战场，局面将不可收拾。同时，鲁西南地区的重要交通

线几乎全部在国民党军的控制之下，我军作战区域狭窄，距离黄河很近，处于背水一战的地势，因此没有绝对把握不能贸然作战。

但是，这是留在中原作战的第一战，不但必须打，而且只能打胜不能打败。

粟裕最终决定：先打开封，后歼援敌。

粟裕的依据是：开封是省会城市，攻克将对中原战局产生重大影响，所以一旦开封面临危机，蒋介石绝不会按兵不动，势必会调兵增援，而无论敌人从哪一路增援，我军都可以在运动中寻机歼敌。特别是，开封守敌相对孤立，可能增援的国民党军主力大多在上百公里之外。开封守军虽号称三万，但除了一个正规旅之外，大多是地方部队和特种兵部队，仗打起来，指挥不统一战斗力便会打折扣。况且我军经过攻打洛阳等城市的战斗，积累了攻坚大城市的作战经验，爆破技术、炮兵技术都有了空前提高。

六月十六日，粟裕下达了攻打开封的作战命令。

国民党军对粟裕改变作战意图毫无所知，国防部和徐州“剿总”认定粟裕的部队企图夹击邱清泉的整编第五军，于是加紧了向鲁西南地区的调兵速度。

十七日凌晨，第三、第八纵队开始了对开封城四关的攻击。

粟裕的攻击部署是：三纵“首先肃清南关东部及城东宋关、曹关守敌”，尔后依托宋关、曹关从东、北两面实施攻城；八纵“首先肃清南关西部及西关守敌”，尔后依托南关、西关从南、西两面实施攻城。

开封，中原古城，有六门四关，城墙高大而坚固。城防名义上归国民政府河南省主席刘茂恩指挥，实际上他只能指挥地方部队，正规

军由整编六十六师师长李仲辛指挥。整编六十六师刚从商丘调来，负责守卫城内制高点龙亭，下属的三个团分别防御曹关和西关，刘茂恩的地方部队则负责防守南关和宋关。由于国民党方面认为粟裕不会轻易攻击开封，因此城内并没有储备足够的弹药和粮食，城防工事也没有最后修缮完成。

粟裕对开封的攻击起到了奇袭的效果。在三纵的猛烈攻击下，曹关和宋关的防守很快就支持不住了，国民党兵纵火烧关之后溃退。李仲辛师长命令封堵城门，不许地方部队往城里逃，但是刘茂恩却强行命令打开城门，结果地方部队溃败进来，三纵的官兵也跟着冲了进来。攻击曹关的八师因大火无法靠近，眼见着曹关被完全烧毁。占领宋关的九师接着对宋门发动了攻击。十九日凌晨一时，二十五团在炮火的掩护下实施爆破，爆破手把炸药送上去，还没来得及点燃导火索，炸药包就被守军的子弹击中，爆破手牺牲在巨大的爆炸声中，冲击的通道被打开。后续的爆破手直接爆破城门，连续爆炸之后，宋门城门被炸开一个大洞，突击队员蜂拥而入。城关内的大街上布满了碉堡，天黑无法辨别敌与我。由于没有控制住宋门城楼，国民党军在城楼上向下射击，后续部队的冲击被阻断，突击队困守城关坚持不退。八纵的爆破组在南门连续爆破，午夜突破南门，但突击队冲进去后，突破口被守军火力封锁。八纵再次组织起由二十三人组成的爆破突击队，连续爆破了十一次，终于炸毁了南门城门。后续部队与反击而来的国民党守军激战数小时，巩固了突破口，使大部队冲进城内。

李仲辛师长终于明白自己在火炮的部署上出现了不可挽回的错误。他本来认为北门外的沙丘高于城墙，必是共军首先攻击的方向，于是他把炮兵主阵地设在了城北。没想到共军攻击的是城南和城东。而共军的炮火准确度高，城内据点大多在步兵到达之前就已被摧毁。李仲辛不断向郑州指挥部告急，郑州指挥部除了让他坚守待援之外，还命令他使用“特种手榴弹”——一种含毒的黄磷手榴弹。

激烈的巷战开始了，国民党军从郑州和徐州派出大量飞机对开封城进行猛烈轰炸。这是没有任何目标的毁灭性轰炸，这种对一座城市的毁灭性破坏令解放军官兵十分震惊。成吨的炸弹直接倾泻在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民宅、商店、学校和著名的古建筑相国寺都在熊熊燃烧。开封女子师范学校的七百多名学生，有四百多人在飞机的轰炸中死伤。大量的市民为躲避轰炸拥向城门逃生，占领城门的解放军官兵接到了打开城门的命令。有官兵说，打开城门守军也会逃跑，混乱中根本无法鉴别。纵队首长再次下令：必须打开城门！解放军官兵敞开城门，开封市民扶老携幼而出。但是，国民政府河南省主席刘茂恩也混在市民中逃跑了。

国民党军飞机的猛烈轰炸迟滞了粟裕部的攻击。

但是，随着河南省政府和开封绥靖公署被攻占，城内只剩下核心阵地——整编六十六师指挥部龙亭。

龙亭，坐落在宋代故宫的遗址上，台基高达十三米，四周围墙坚固，潘家湖、杨家湖和西北湖从三面环绕，正北面开阔的运动场上是国民党守军炮兵的主阵地。攻击龙亭，只有潘家湖与杨家湖之间的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已被台基上布设的密集的火力点严密封锁。

三纵和八纵数次攻击龙亭都没有成功。

二十一日，粟裕重新调整攻击部署。火炮抵近轰击，摧毁了大部分工事。在步兵冲击的时候，围墙下巨大的地堡里冲出大量守军，占领有利地形后居高临下地射击。攻击部队冒着密集的火网前仆后继攀上围墙，然后在台基上与守军开始激烈的肉搏战。肉搏战持续了整整五个小时，残余的国民党守军终于投降。

整编六十六师师长李仲辛带领卫兵企图翻越围墙逃跑，被乱枪打死在龙亭的围墙上。

二十二日天亮的时候，国民党军飞行员向郑州指挥部报告：“龙亭附近遗尸甚多，并有汽车向南门开。城西北汽车纵横，似已破坏。体育场附近汽车向北门开，全城已无我军符号，东西两门开放，城内安静。”

他们看见的是共产党官兵打扫战场的情景。

就在第三、第八纵队全力攻打开封的时候，粟裕用了“近三倍于攻城部队的兵力，由野战军直接指挥，担任阻援和牵制敌人的任务”。华东野战军的第一、第四、第六纵队在开封以东，阻击邱清泉兵团西援开封；中原野战军第九纵和豫皖苏军区一部插入开封至郑州之间，阻击从郑州出动企图东援的孙元良兵团；中原野战军第一、第三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在上蔡地区猛烈地阻击北援的胡琏兵团；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和晋冀鲁豫独立第一旅位于巨野地区，从侧后牵制邱清泉兵团。

开封一战，国民党军死伤一万二千一百二十二人，被俘两万六千一百一十三人，共计损兵三万八千二百五十三人。华东野战军阵亡、负伤加上其他减员共计一万一千六百二十三人。

开封失守，南京震惊。

六月二十四日，国防部长何应钦出面解释开封何以失守，他解释的原因是“匪军突破得太快”：

参谋部配备开封之兵力，原有国军三团、保安队六团、临时又加入国军一团，共十个团。原期至少能守十天以上，预计我援军击破沿途匪军，到达开封城外，则不需十天。在开封地区之内外夹击，定可形成。不料匪于十七日开始攻城，十八日即突破城垣，发生巷战，

此事实出意外。参谋部得此消息后，顾总长即飞郑州，最高统帅亦飞往巡视，期能使援军早日到达，终以开封城被匪突破太快，援军赶救不及，至二十二日城内电讯中断，情况不明。

蒋介石严令邱清泉兵团和驻守山东菏泽的第四绥靖区刘汝明部加速向开封推进，另以整编七十五、七十二师由第六绥靖区副司令长官区寿年指挥，由鲁西南与河南交界处的民权地区迂回开封，迫使粟裕在开封地区决战。

这正是粟裕愿意看到的战场态势。

粟裕攻打开封的主要目的便是诱敌来援，现在敌人兵分两路向开封开来，这正好给了粟裕在运动中寻机歼敌的机会。他果断地命令部队放弃开封，把城市的包袱甩给国民党军，以使我军能够迅速机动，集中力量寻歼来敌。

粟裕盯上了战斗力相对较弱的区寿年兵团。

现在的问题是，敌人的两路援军靠得太近，要想办法把他们分开。

粟裕的部署是：以第一、第四、第六纵队和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组成突击兵团，由第一纵队司令员叶飞指挥，负责围歼区寿年；以第三、第八、第十纵队和两广纵队组成阻援兵团，负责将邱清泉兵团与区寿年兵团隔离，防止邱清泉东援；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负责阻击郑州方向的援军；冀鲁豫军区和豫皖苏军区部队破坏陇海路徐州至民权段，配合野战军作战。

六月二十六日，第三、第八纵队撤离开封。

第二天，邱清泉的部队进入开封。

邱清泉重占开封，国民党军认为，粟裕部经过开封战役，“似无积极企图”，“必向津浦路前进”，于是命令邱清泉和区寿年两兵团全力出击，尾追第三、第八纵队寻机围歼。但是，区寿年性格多疑，他认为在没有摸清粟裕的真正意图时，还是谨慎为妙。所以，虽然奉命追击，但是他的部队推进很慢，最后在开封东南方向的睢杞地区停了下来。而邱清泉兵团对此一概不知，依旧在快速前进，结果两军之间一下子拉开了约四十公里的间隙。

二十七日下午，粟裕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报中央军委：

职部明晚与睢（睢县）杞（杞县）地区发起对区兵团作战，此间可能集结部队已全部用上，恳请钧座以有力一部钳制十八军之北来。此间各部要分割邱、区联系，又要实施战场分割，故无法抽出部队对付南面。据敬（二十四日）息蒋已令胡琏进至周家口堵击我军。如何请示遵。

当天傍晚，中原野战军回电：“我们决以一部监视整编第十八军，主力主动进攻北进之吴绍周兵团，吸引十八军回援。”

粟裕下达了围歼区寿年兵团的作战命令。

二十九日晨，区寿年兵团部、整编七十五师和新编二十一旅被包围。

区寿年呼叫邱清泉，得到的回答是：他们也遭到大批共军的猛烈攻击——粟裕的阻援兵团已经割断了邱清泉与区寿年的联系。

邱清泉这才意识到，粟裕丢下开封不是在撤退，而是挖了一个巨大的陷阱，现在共军要向区寿年下手了。邱清泉不是一个见死不救的将领，得到区寿年被围的消息后，他立即命令部队向区寿年靠拢。

邱清泉兵团的推进速度十分惊人，当粟裕的阻击部队还在构筑工事的时候，他先头部队已经冲到了眼前。粟裕命令三纵在陈皮岗和许

岗一线、八纵在许庄和高阳集一线、十纵在桃林岗一线坚决阻住邱清泉，保障叶飞指挥的突击兵团对区寿年兵团的围歼。

阻击战斗在残酷的拉锯中开始了，危机频现。邱清泉的整编第五军是国民党中央军嫡系主力，攻击凶狠，作战顽强。二十八日，整编八十三师攻击杞县，阻击部队面对敌人强大火力的凶猛进攻一退再退，最终邱清泉占领杞县县城。二十九日，九十六旅和一三九旅对八纵展开更加猛烈的攻击，在炮火的掩护下，步兵从正面冲击，坦克和装甲车从侧面迂回包抄，八纵的前沿阵地再次被突破。晚上，八纵发动反击，与敌形成战场对峙。这一天，邱清泉兵团推进了五公里。

七月一日，邱清泉获悉粟裕将对区寿年发动总攻，便督促部队不惜一切向区寿年兵团靠拢。阻击战斗因此达到了空前惨烈的程度。整编八十三师趁三纵九师接替四纵十二师阵地的时机，突然发动攻击，九师二十五团的阵地被突破。在陈士榘的严令下，二十五团调集了九个连的兵力从下午开始反击，傍晚才夺回阵地。在许岗阻击的三纵二十四团在打退四十五旅的一次攻击后，指挥员麻痹大意，在当面国民党军突然发动的第二次突击时措手不及，许岗阵地失守。入夜，二十二团开始顽强反击，反击在付出巨大的伤亡后失败，三纵撤到藤店一线重新建起阻击阵地。

最艰难的阻击战，发生在宋时轮的十纵阵地上。十纵的阻击线在桃林岗，这里是邱清泉兵团东援开封的必经之路。战斗一开始，整编第五军的飞机和大炮就将桃林岗阵地轰成了一片火海，在坦克的前导下，二〇〇旅的攻击采取了“肉弹战术”，督战队在后，前面的冲击队一波倒下一波又上，当国民党军冲上十纵的主阵地后，两军士兵混乱的肉搏开始了，双方的尸体叠堆在一起。十纵官兵已经两天没有吃饭没有睡觉了，不断报来的伤亡数字令粟裕万分担心，他指示十纵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可以放弃一线阵地后撤，但要在二线阵地再守一天。可

是十纵的一线阻击阵地就是没撤。最后，二〇〇旅集中两个团的兵力发起集团冲锋，地上炮火猛烈，天上的飞机俯冲扫射。桃林岗阵地上已经没有任何可以燃烧的东西了，仍然冒着火焰的是双方官兵的尸体。十纵的顽强令国民党军十分吃惊，战后他们认为“十纵队应列入华野之头等部队”。

华东野战军的阻击战持续整整十个昼夜，国民党军国防部战报称：“连日经五军猛烈攻击，因匪逐村顽强抵抗，尤以桃林岗据点匪我反复争夺，得而复失者数次。尤许岗据点亦经我连日猛攻，七月二日始得攻占，唯我伤亡甚重，匪军抵抗顽强，无法进展。”

就在阻击部队顽强作战的时候，叶飞的突击兵团对区寿年兵团开始了艰难的围攻。

四十六岁的区寿年人生经历颇为曲折。这个广东人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他是国民革命军将领蔡廷锴的部下，曾随蔡廷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因政见不同脱离起义军回到国民党军集团。中原大战后，他所在的部队被改编为第十九路军。在国民党军中，第十九路军颇为特殊，曾因不愿“围剿”红军、坚持联共抗日而发动“福建事变”，宣布成立与蒋介石对抗的“人民革命政府”，区寿年出任“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第三军军长。“福建事变”遭到蒋介石的军事镇压后，第十九路军番号被取消，区寿年离开军队远赴欧洲。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回国投奔李宗仁，出任第五路军一七六师师长，率部参加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一九三八年被晋升为陆军中将。抗战胜利后，他任国民党军第六绥靖区副司令长官，驻守河南商丘。

区寿年作战一向谨慎。这一次，他在睢杞地区停下来，是因为他获悉共军正在西面移动，他停下来是为等着与邱清泉会合。区寿年不知道，他不但没有把邱清泉等来，而且此处将成为他军人生涯的终结地。

刚受到粟裕部围攻的时候，区寿年并没有太多的慌张，他认为自己兵力上万和武器优质，至少短时间内粟裕拿他没办法，而只要等来邱清泉的整编第五军，两军合力定能把粟裕部打退或者歼灭。

果然，叶飞突击兵团的外围战打得很艰苦。打杨拐村的是六纵十六师四十八团。一营发动攻击的时候，以为村子里只有一个连的守军，结果一个营伤亡过半，一营长牺牲。二营再次攻击又一次失利。四十七团三营接着攻击，营长也牺牲了。六纵副司令员皮定钧上了前沿，这才弄清楚守军是一个团。先是调来火炮支援，接着又组织了突击队和爆破队，连续攻击之后，一度冲进了村，但国民党守军立即发动反击，突击队又被反击出来。杨拐村面积不大但地势很高，控制着四周开阔的平畴，如果攻不下来，总攻发起时将成为挡在冲击路上的巨大火力点。二十七日夜，粟裕打来电话，说话异常严厉："明天打下杨拐，如果打不下来，送脑袋来！"此时，双方都已打得筋疲力尽，都明白到了咬紧牙关的最后时刻。皮定钧决定：攻三面，放一面，一个团从三面猛攻，两个团埋伏在放的那一面，把敌人歼灭。十八师侦察连为第一梯队，四十六团三营为第二梯队，攻击连夜发起，天亮时杨拐村守军终于崩溃。

陈小楼村守军是新编二十一旅旅部和六十二、六十三团加一个山炮营，这里是区寿年兵团东北方向的支撑点。六纵十八师、四纵十一师和中原野战军十一纵一部先是迫近作业，然后开始强攻。双方在村庄围墙附近进行着反复争夺，突破口几次被打开，又几次被封锁。最后，十八师五十四团三营打得只剩下一个连的兵力，营长负重伤，七连二排长陈廉接替指挥，但很快陈廉也中弹倒下。五十四团已经没有了完整的建制，村庄里的战斗还在逐屋进行，最后二营四连指导员尤学仁率领战士冲进新编二十一旅旅部，俘虏了旅长李文密。陈小楼村残余守军投降。

随着杨拐村、陈小楼村等外围村庄相继被攻占，收缩到龙王店的区寿年决心死守待援。他拒绝了整编七十五师师长沈澄年的突围建议，他想凭借着自己的实力坚持到与邱清泉一起夹击粟裕部的时刻。此刻，他还有兵团直属队、整编七十五师师部、十六旅四十六团可以指挥，还有四辆坦克和上百门火炮，弹药也很充足。龙王店是个大镇子，四周有坚固的围墙，围墙外是开阔的平原，地形易守难攻。区寿年命令加固围墙，同时还在围墙外挖了壕沟，砍光所有的庄稼设置鹿砦。在镇子里，国民党军拆了民房，用大量木料门板修筑起纵横交错的防御工事，把老百姓的柜子箱子装上泥土变成障碍物。区寿年等待着最后的一拼。

六月三十日，粟裕部致电中央军委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

（一）我艳（二十九日）晚发起攻击，已歼七十五师六旅直及一个团、新二十一旅旅直一个团。本晚拟肃清六旅、新二十一旅之后，东（一日）晚会攻区寿年指挥部、七十五师师直、十六旅与战车营。邱清泉率五师、七十师、八十三师仍与我在杞县附近对峙中。蒋令邱兼程东援，以解区之围。

（二）胡琏现已到何处？此战役可达全歼区兵团［七十二师、七十五师、新二十一旅］之任务，唯须迟至冬（二日）晚才能结束。因我兵力已全用上，对胡琏北援顾虑甚大，恳请尽力滞留，并将胡部动态随时示知。

（三）为使徐（徐州）商（商丘）之敌不能西援，请军委令许（许世友）谭（谭震林）有力一部迫近滕县，求得歼二十五师一部［因西援仅二十五师］，威胁徐州。如何请考虑决示。

军委回电告诉粟裕，西援的国民党军整编二十五师“二十九日开始车运，估计本日可达商丘、柳河之线”，许世友的山东兵团出动阻援已经来不及，因此要求粟裕部自己“速以一部防御二十五师”。至于胡琏部，本日中原野战军已发动作战，因此粟裕部战场的“南面顾虑不大”。

时间异常紧迫，七月一日晚，粟裕下达了对区寿年兵团发起总攻的命令。

一纵南攻，四纵西攻，六纵东攻。

炮火轰击了一个小时，三个方向的突击同时开始。国民党守军的第一道防线很快被撕开，冲击到第二道防线前，十八师官兵受到火焰喷射器的拦截，数道火龙扑射过来，数十官兵当场被烧死烧伤。五十一团团长彭光福命令第二梯队拼死向前，在守军更换火焰喷射器燃烧器的时候，五十一团的官兵已经冲了上来。晚上二十二时，三个方向的突击向着区寿年的兵团指挥部合围而来。

大势已去，区寿年决定突围。

十八师五十二团从东门突进去后，看见四辆坦克从街上迎面开来。由于没有打坦克的准备，官兵们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就在这时候，坦克遇到了问题，敌人构筑东门防御工事的时候，用大量装满土的草袋把东门堵得死死的，这道障碍果然坚固，坦克企图撞开冲过去，但连续撞了几次都没有撞开。四辆坦克也不知如何是好了，一辆沿着围墙向南开，一辆向北开，其余的转着圈不知道往哪里开才好。五十二团的官兵立即围了上去，一阵敲打之后，两辆坦克投降了。八连二排长印永鑫追上那辆南逃的坦克，跳了上去。坦克停下来，炮塔急速旋转，印永鑫被炮筒扫了下来，左胳膊摔得鲜血直流。他倔强地爬起来，让战士托着他又爬了上去，这回他趴在炮塔上，任炮塔如何旋转也掉不下来了。他摸到炮塔盖子，咣当一声掀开了，追着坦克的战士们欢呼起来。炮塔里伸出一支手枪，并且开了一枪，这一枪正打在团作战参谋周启贤的肚子上。官兵们愤怒了，高喊：“打死他们！打死他们！”印永鑫举起手榴弹喊：“不投降我就炸死你们！”炮塔里伸出两只手，一只手里举着块白手绢，另一只手举着一双白手套。印永鑫拽出来一个人，后面的三个人自己爬了出来，其中一个穿着将军服的

人说："送我到你们粟司令那里去，我和他是朋友。"受伤的周启贤参谋捂着肚子给了他一脚："你算什么玩意儿！我们司令哪会有你这样的朋友！"

这个自称与粟裕是朋友的人，就是区寿年。

与区寿年一起被俘的还有兵团参谋长林曦祥和整编七十五师师长沈澄年。

印永鑫被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并荣获"人民英雄奖章"一枚。

区寿年被俘的时候，蒋介石给邱清泉下达了一纸手令：

雨庵军长弟勋鉴：

龙王店失陷，区寿年、沈澄年二同志若非阵亡，必已被俘。中原战局严重万分。两日来连电令弟全力东进增援，而弟违令迟滞，视友军危急不援，以致遭此最大之损失。得报，五中惨裂，不知所止！故今午特飞杞县，甚望与弟空中通话，督促急进，以救榆厢铺与铁佛寺友军之危！此时，唯有弟军急进，一面救援七十五师在榆厢铺之一旅与铁佛寺之七十二师；一面与西进之二十五师会合，方能挽坠势，亦所以保全弟军不致孤危被歼也。二十五师今午已攻克王老集，刻正攻击董店，距铁佛寺仅四公里之遥，则七十二师或可在今晚与二十五师会合。但弟若再不全力东进，则该两师已受龙王店失陷的影响，仍觉兵力单薄，孤危可虑。总之，无论战局如何变化，仍须以弟部与二十五师、七十二师会合作战，方有转败为胜之望，否则必被各个击破。如此次中原失败，则国家前途不堪设想！而此责任全在吾弟所率领第五军负之。以弟部不唯中原之主力军，而且为全国各军中之主力也。因未能在战场上空与弟通话，故在徐州停机，写此一函空投，以期吾弟能负重责，挽回全局，将功赎罪也！

顺颂

戎祉

中正手启

此信空投时被华东野战军一纵官兵缴获。

按照战役计划，粟裕部在歼灭区寿年兵团后，应该迅速撤离战场。但是，部队还没行动，意外发生了：黄百韬的整编二十五师突破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的阻击防线，已经推进到距龙王店以东仅二十多公里的帝丘店，此刻仍在攻击前进中。

如果让黄百韬靠近，我军就很难携带大量伤员安全撤离战场。即使能够撤出，也必被大量敌军尾追，战场态势将恶化。

必须趁黄百韬长途增援，部队尚未展开之际，迅速给以歼灭性打击，为我军撤离战场创造条件。

粟裕命令第四、第六两纵向东跑步迎击。

七月三日，叶飞指挥一纵一师向王老集反击，三师切断帝丘店与王老集之间的联系，四纵攻击田花园，六纵攻击刘楼，两广纵队配合四纵包围黄百韬。官兵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迅速行动，四日对黄百韬所在的帝丘店形成合围。黄百韬登上坦克率领部队反攻，将田花园和刘楼丢失的阵地又夺了回来。五日，粟裕部对帝丘店的总攻开始，由于发动仓促，官兵连续作战十分疲惫，除一纵外，四纵、六纵、八纵都没有达到战斗目标。

黄百韬所在的帝丘店是个小村子，全村只有一眼水井，盛夏时节，烈日当空，整编二十五师的粮食和水都发生了危机，而空投的药品根本不够近万名伤员使用。六日上午，杜聿明飞到战场上空与黄百韬通了话。黄百韬充满悲伤：“二十二年庐山训练时，我俩是上下铺，彼时我名黄新。我自十九年剿匪以来，从未叫过苦，但是我今天不能不告急，免误全局。”他要求杜聿明赶紧转告邱清泉施加压力，牵制共军。然后，黄百韬便开始焚烧文件，并下令枪杀所有俘虏。在给前沿的团长打电话时，他要求官兵和他一起“成仁”：“你不要希望我有一兵

一弹之增援。黄昏后，空军更是爱莫能助。共军由何处突入，即在该处死拼到底，向天高呼‘领袖万岁’，卧在原地死而后已。”

但是，黄昏后，黄百韬突然发现攻击减弱了。

粟裕部已不具备歼灭黄百韬的基本条件了，因为邱清泉正向粟裕部的背后迂回，北上的胡琏的整编第十八军已经到达太康，刘汝明部也到达了商丘，粟裕意识到自己有被合围的巨大危险。

七月六日下午十八时，粟裕下达了向陇海路以北转移的命令。

黄百韬在最后一刻得以解脱，他获得了蒋介石亲自颁发的青天白日勋章。

邱清泉因增援不力再次受到训斥，他一气之下请假回浙江永嘉老家休养去了。

持续二十个昼夜的豫东战役结束。

豫东战役，被粟裕称之为“最复杂、最剧烈、最艰苦”的战役。参战的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以及冀鲁豫地方部队达二十余万人，国民党军参战部队更是多达二十五万余人。华东野战军以三万三千人伤亡的代价，歼灭了区寿年兵团，打击了黄百韬兵团，削弱了邱清泉兵团，歼敌总数为九万四千人。

战役初步改变了中原战场国共两军的战略态势。

毛泽东由此看见了集中主力在长江以北与国民党军决战的前景。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他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对党内的通知：“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这是一个具有重

大历史意义的决定，它导致的结局不仅仅是大量地歼灭国民党军，而是奠定了赢得解放战争最后胜利的基础。

华东野战军打下开封之后，粟裕曾经进城认真看了看龙亭，没有人知道这位具有优秀军事指挥才能的将领是否会想到——“龙亭”具有登临其上俯视天下之意。

## 把汉江变成内河

当豫东硝烟未落之时，在湖北的北部，“长于攻坚”的六纵开始攻击“有山有水有坚城”的襄阳和樊城了。

襄阳和樊城于汉水中游隔水对峙。两城地处桐柏山、武当山孔道，北通关中、洛阳，东连武汉三镇，西扼川陕大道，南接沙市、宜昌。清代地理学家顾祖禹称襄樊为“天下之腰膂”。“膂”者，脊骨也。这是一座可以俯视疆土之城。

一九四八年六月五日，从大别山中转战出来的中原野战军在河南南阳彰新庄召开纵队干部会议，刘伯承说，从战争进程的角度看，国民党军五个最重要的军事集团（卫立煌集团、李宗仁集团、胡宗南集团、顾祝同集团和白崇禧集团）中，白崇禧集团将是国民党军的最后防线。现在，国民党军有三怕：怕林彪入关，怕打过长江，怕大军入川。在这“三怕”中，中原的国民党军就占了“两怕”，因为这个区域既可渡江也能入川。而在中原国民党军的防线上，汉水区域是其最大的弱处：

> 中原区有三山（泰山、大别山、伏牛山）、四河（长江、淮河、黄河、汉水）。我们依托三山逐鹿中原，把四河变成我们的内河。黄河、淮河已变成内河。应背靠武当山向东南发展，白河、汉水流域是古战场。将郧阳、均县、房县划归鄂豫陕，南漳、保康、谷城划归桐柏，当阳、远安、荆门划归江汉，就是将汉水变为我们内河的开始。长江也会像黄河一样变为我们的内河。

刘伯承的“内河理论”，是个把拓展解放区的咄咄逼人与山水情怀的豪迈热烈融合在一起的战略设想——“我们中原区的任务就是将战争引向蒋管区，利用敌人的人力、物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并把这个区域变为向东、向南、向西进攻的基地。”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设想，刘伯承认为将战场选择在豫鄂陕交界处为最佳，因为这里既有伏牛山、武当山为依托，又有桐柏、江汉可做前进阵地，而国民党军因长江、汉水和大巴山的阻碍，机械化大军难以快速调动。

十三日，刘伯承、邓小平下达了襄樊战役作战部署。襄樊战役，将举中原野战军全军之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指挥第二、第四纵队组成西兵团，奔袭豫鄂边界处的老河口和谷城，控制汉水西岸，直趋襄阳和樊城；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宏坤指挥军区主力部队以及第六纵队组成南兵团，奔袭襄阳，并在汉水西岸形成对敌兜击。第一、第三纵队组成东兵团，或向北面的南阳移动，或尾击可能从南阳南犯的国民党军王凌云兵团，或侧击可能从信阳西犯的国民党军张轸兵团，或转至驻马店地区作战策应襄樊。

襄樊战役正在准备，粟裕部在豫东与邱清泉的整编第五军开始鏖战，中央军委两次致电中原野战军要求他们出兵策应。

刘伯承、邓小平除命令第九、第十一纵队直接归粟裕指挥外，立即停止了襄樊战役的实施，集中中原野战军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赶赴河南上蔡地区，全力阻击从驻马店北上的胡琏兵团，以消除粟裕部侧翼的威胁。

一直被刘伯承“藏”在桐柏山解放区腹地的王近山的第六纵队出动了。刘伯承决心以六纵的六个团、桐柏军区二十八旅的三个团、第三军分区的两个团、陕南军区十二旅的两个团和两个地方武装独立团，

共十五个团约两万兵力，由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宏坤统一指挥，先打老河口，再攻襄阳和樊城。

七月二日夜，六纵在瓢泼大雨中自豫南与鄂北交界处的新野出发，向老河口奔袭。官兵一个昼夜奔跑了近八十公里，当先头部队抵近老河口时，国民党守军一六三旅正向谷城撤退。六纵渡过汉水追击，追至谷城以北，一六三旅又放弃谷城向南逃跑。此时，陕南军区十二旅已经攻占谷城，截断了一六三旅的退路，并随即发动袭击，歼灭了一六三旅的一个营。桐柏军区第三军分区的两个团歼灭一六三旅的一个连后，强渡汉水，截击并全歼一六三旅辎重营。四日，六纵和陕南军区部队沿汉水两岸向襄阳和樊城逼近。

襄阳和樊城是国民党军第十五绥靖区的防地。

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副司令官郭勋祺。

康泽在国民党内是一个名人。他虽然毕业于黄埔，却长期从事政治工作，曾任南京《中国日报》社长，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干事兼组织处长等职。他出身贫苦，学习勤奋，性情刚强。自黄埔军校毕业后，因成绩优异被选派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与后来成为共产党将领的邓小平是同班同学。回国后，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一九三〇年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成立宣传大队，他被选任为大队长，在战争中显示出出众的宣传才华，得到蒋介石的特别信任。抗日战争中，他先后在南京、武汉、重庆忙于国民党的青年干部培训。一九四五年，受蒋介石指派赴欧洲考察，一九四六年秋回国，年底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一九四七年夏，国民党军按防御区设立绥靖公署和绥靖区，康泽被任命为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隶属武汉行辕，归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指挥。

康泽实战经验不足，也没有嫡系部队，能够指挥的只有一〇四、一六三、一六四旅以及炮兵十四团七连和三个保安团。其中，一〇四旅几乎全是新兵，虽然武器好但战斗力差；一六三旅和一六四旅老兵多，有一定的战斗力，但这两支部队是川军将领刘湘的旧部，与川军没有任何渊源的康泽根本指挥不动。

为此，康泽特别推荐原川军将领郭勋祺来当他的副手。

郭勋祺在国民党军中也是一个独特的人物。他十七岁入川军，二十六岁已升至旅长。一九二二年，陈毅自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在四川万县与郭勋祺结识。由于与陈毅来往密切，郭勋祺政治上逐渐倾向共产党，与吴玉章、刘伯承等人也交谊日深。一九二七年四月，陈毅暴露了共产党员身份，去重庆寻找郭勋祺求助，郭勋祺让陈毅在自己家里住了一晚，第二天送给陈毅三百块大洋和一套西服，并派副官和卫兵护送陈毅上船离开重庆。一九三一年，郭勋祺被川军将领刘湘起用，率独立第二旅参加围攻洪湖根据地的战役。他与共产党人最激烈的一次作战，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当时，毛泽东率中央红军到达贵州北部，试图西进四川，然后北渡长江，与位于川北的红四方面军会合。蒋介石严令刘湘出兵入黔堵截。刘湘左右为难：川军没有必要与红军硬拼，但如果红军真的进了四川，还必须能死打硬拼把红军赶出去。刘湘考虑再三，选定了郭勋祺，因为他认为郭勋祺对自己忠诚，同时又有些同情共产党。郭勋祺率教导师第三旅进入贵州，当中央红军来到赤水河边的土城时，遭到郭勋祺部的猛烈阻击——眼看着红军要入川了，郭勋祺决定死打硬拼。在此之前，中央红军从未与川军交过手，川军的凶狠令红军官兵记忆深刻。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记述是：“到了上午十时左右，敌人显然没有仓皇溃逃。红军固然打得很好，但敌人打得也不错，实际上敌人反而越战越强了。中午时分，毛和他的部下意识到他们正在进行一场危险的战斗。敌人并不是不堪一击的黔军，而是驻守宜宾的川军总司令刘湘手下的精锐部队，

前线指挥员是外号‘熊猫’的郭勋祺。敌人的兵力也不是他们原来所想的两个团，而是两个旅即四个团，至少一万人……”——郭勋祺的阻击令中央红军被迫放弃了北渡长江的计划。抗日战争中，郭勋祺是国民党军中著名的爱国战将。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他率一四四师在武汉与日军血战，左腿重伤后坐在担架上继续指挥战斗。战后，郭勋祺升任第五十军军长。国民党军第五十军与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驻扎在同一地区，因为他与新四军军长陈毅的旧谊，两军相处甚洽。郭勋祺的“亲共”倾向逐渐引起蒋介石的警觉，一九三九年冬，蒋介石以“作战不力”为由撤掉了他第五十军军长一职。内战爆发后的一九四七年，应康泽的请求，蒋介石命他出任第十五绥靖区副司令官。

康泽孤军驻守襄阳和樊城，最大的苦恼不是他的副手的政治倾向问题，而是兵力不足。一六三旅守老河口，一六四旅守樊城，一〇四旅守襄阳，襄阳的防守兵力显然不够。他请求白崇禧把吴绍周的整编八十五师二十三旅调来，以加强襄阳防御，可是二十三旅仅在襄阳待了两个月，就被吴绍周调走去与粟裕作战去了。康泽只好从一六三、一六四旅中各抽一个团来加强襄阳。

一六三旅已经遭受重创，这是康泽实战指挥经验不足的证明。当一六三旅报告说他们受到袭击，并说袭击他们的部队多是晋南和豫北口音时，康泽判断可能是刘邓部的主力从豫东战场回来了，而且很可能是陈赓的部队。于是，他命令一六三旅向襄阳收缩。这一命令是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草率作出的，结果导致一六三旅一撤就停不下来了，不但中途受到严重打击，而且残部最终竟没敢撤回襄阳，而是往沙市方向跑了——本来就兵力不足，这一来又损失了大半个旅。

六日，刘邓部的攻击部队并没有到达，驻守樊城的一六四旅却不知为什么开始往襄阳城里跑。渡过汉水的官兵混乱地拥挤在襄阳北门，要求打开城门让他们进去。根本没有下过撤退命令的康泽询问郭

勋祺，郭勋祺说这是一六四旅的擅自行动。康泽勃然大怒，严令一六四旅回去守城。一六四旅官兵只好重回樊城，但是很快旅长就打来电话，说樊城已经无法守了，因为就在他们撤出去的这么一会儿工夫，城里的民心变了——“我们回来以后，老百姓对我们很冷淡，民心已经变了呀！”

襄阳城是刘邓部攻击的重点，也是国民党守军防御的重点。

襄阳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山是城防居高临下的据点，筑有大量的防御工事。城南和城西南的凤凰山、羊牯山等高地以汉水为屏障，可以俯瞰全城，控制通向城南和城西的通道。城垣和大山都修有坚固的地堡和碉楼，城垣四周的开阔地、道路和死角埋设了大量的地雷。康泽的防御部署是：一〇四旅十五团加十四团的一个营守城南和城西的羊牯山、真武山、琵琶山、虎头山、凤凰山、文笔峰、铁帽山等高地；十四团（欠一个营）守襄阳城垣；十三团一营担任河防和前哨部队，主力集结在东门机动；一六三旅四八八团残部守万山和大山头等阵地；一六四旅的一个营守老龙堤。

对于襄阳，必要“先攻山后攻城”，因为不占领城外的诸山，就连城墙都接近不了，更谈不上攻城。

王近山决定先包围襄阳，断其水陆退路，然后攻占城南诸山。

七日，六纵十八旅袭占南漳和宜城后，没有发现增援的迹象，于是六纵十七旅、陕南军区十二旅和桐柏第三军分区部队对城南诸山开始了轮番攻击。尽管对强攻工事坚固的山头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因没有远射程火炮的支援，攻击还是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十七旅五十团二营攻击的琵琶山，山上的防御兵力是守军的一个连。八日，二营的攻击受挫。九日。经过一个白天的准备，旅长李德生命令四十九团三营再次实施攻击。在有限的炮火支援下，七连副连长率突击队冲过两

百米的开阔地，三班长赵存虎挥动铡刀去砍铁丝网，铁丝网又粗又密无法砍断。七连的两个排已经上来了，敌人的火力集中在这里，每一秒钟都有人伤亡。赵存虎急了，轮刀猛砍支撑铁丝网的木桩，砍倒数根木桩之后，铁丝网整体倒下。突击部队冲过铁丝网，分两路冲向山头，与守军展开近距离肉搏战，最后以伤亡三十多人的代价占领山头阵地。敌人发动反击的时候，三营官兵冒着飞机的轰炸和火炮的轰击连续打退六次冲锋。到第二天黄昏时，坚守主阵地的九连全连仅剩十六人，但琵琶山主阵地仍旧在我军手中。

与此同时，四十九团二营向真武山发动了攻击。真武山是外围城防的主阵地，山上大庙里有敌人的一个团指挥部。二营趁真武山守军抽出部分兵力增援琵琶山之际，经过猛烈的火力准备，六连在连长胡玉海的率领下，迅速突破了第一道防线。指导员郭松珍带领二排冲击地堡，六班长指挥正面火力掩护，副班长许心喜带着爆破小组迂回到地堡侧后，炸哑了地堡的机枪，刺杀了反抗的守军连长，活捉三个士兵。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里，二排连续解决十八座地堡，占领了第二道防线。接着，跟上来的五连和六连集中力量向上头的大庙攻击，官兵每占领一处就点火为号，两条火龙最终会合于大庙，真武山被攻占。

但是，国民党守军依旧占据着虎头山、羊牯山等山头阵地，王近山各部面对坚固的工事和猛烈的炮火攻击进展艰苦而缓慢。

九日，白崇禧电令康泽："匪众我寡，守备襄樊则更单薄，着即放弃樊城，秘密集中，全力固守襄阳待援"。"已令整编第七、第九师主力分道兼程来援，因抽调兵力需时，务须能固守到七月二十二日"。

一六四旅在飞机的掩护下放弃樊城，于九日下午十六时渡过汉水进入襄阳。

可以看出，王近山的兵力定是捉襟见肘。不然，他决不会让一六四旅轻易渡过汉水移至襄阳，一六四旅的到达令对襄阳的攻击更加困难。

王宏坤提出“襄阳作战须重新考虑”。

王近山不同意放弃攻击。

这是一个严重的时刻。

攻击部队的顾虑是：国民党守军的策略是凭借险要地势和坚固工事固守，待增援部队到达后出击反攻。敌人以主力部队守大山，就是要与攻击一方拼消耗，只要拖延足够的时间，援军必定到达，守住襄阳城不成问题。而对于王近山的部队来讲，不夺取城南诸山，就很难接近城关；但是与敌人逐一争夺外围山地，既消耗时间又损耗弹药和兵力，这样攻下去似乎正中守军下怀。

此时，交战双方都已到了体力和心力即将消耗殆尽的时刻，这种时候制胜的关键只有战斗意志。

刘伯承命令王宏坤继续攻击：“不许顾虑伤亡，不准讲价钱，以求彻底胜利。”

十二日，襄阳作战命令下达，其核心要义是：绕过尚未攻占的虎头山和羊牯山等山头，使用地方部队对这些山头进行佯攻钳制。主攻部队六纵攻击西门，桐柏军区二十八旅攻城东南，陕南军区十二旅攻城东北，三路攻击部队最后会合于城内的康泽司令部。

这是王近山的建议。

这个建议意味着不攻山先攻城。

王近山认为，根据襄阳城的地形特点，如果坚持攻城必先夺山的战法，只会扬敌之长露我之短。襄阳城西南高地与汉水之间有一条狭长的走廊，直通西门。这条走廊距虎头山和羊牯山的距离超出了守军火力封锁的范围，襄阳城内的守军火力也不足以完全封锁。六纵如果把主攻方向放在西门，就可以避开敌人山头主阵地的火力，直接打击康泽守军的要害。总而言之，要断然改变攻襄阳必先夺山的惯例，采取猛虎掏心的战术，打开城西走廊，从西门一竿子插进城中。

王近山宣布，打襄阳开特例，为三件事设三个特等功：登城第一名、缴获四门化学迫击炮、活捉康泽。

十三日，六纵四十九团和五十团控制了攻击西门的唯一通道大石桥。六纵十八旅同时攻占了城东北角阵地，将桐柏军区二十八旅接应过汉水，从而对襄阳城形成了钳形合围态势。

就在襄阳城岌岌可危的时候，蒋介石给康泽发来电报，命令康泽把城外各山头全部放弃，守军退入城内坚守待援："共军必无远射炮和重武器，弃山守城，固守待援。"蒋介石的这一命令给襄阳守军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令人吃惊的是，蒋介石不但认为襄阳的"危险期已将过去"，而且还信誓旦旦地说"只要信赖余言"定会逢凶化吉：

> 南北两方援军最迟必于二十日前赶到襄阳，中正负责督促，勿念。至电中（指康泽致蒋介石电报）所述匪部装备与战况，以余判断，认为危险期已将过去。匪逼至襄樊外围各据点，激战恶斗已达数昼夜。匪部攻势之损失，将比我军伤亡更大。而且对方作战皆无后方，弹药之接济，照屡次战役之经验，匪部弹药决不能持久三日至五日时间。尤其各种炮弹之补充更为缺乏。在过去数日之激战，其枪炮攻势虽甚凶猛，但其炮弹必因争夺外围山地消耗殆尽。何况山炮之威力并不能轰破我坚固城墙耶！故此次如我决心退守城内，集中全力防御匪部来攻之办法，则必能击退匪部，确保安全；有时且可乘机转为攻势，歼灭疲乏之残匪；况且有我空军昼夜来助战，非匪之可能及也……只要信赖余言，坚忍镇定，匪虽凶横，其如何乎！

白崇禧坚决反对弃山守城，认为有违"居高临下，恃于形势"的军事原则。他严令康泽立即夺回丢失的真武山，恢复城南山头的防御阵

地。但是，康泽是蒋介石的亲信，是蒋介石专门派来坐镇襄阳的，他没有理会白崇禧的命令，于十四日中午将外围虎头山、羊牯山的守备部队全部撤进了城内。

导致襄阳城防最后瓦解的致命决策生效了。

战后，白崇禧司令部的战役总结将矛头直指蒋介石："襄阳城西南各高地能瞰制全城，羊牯山离我城西南角仅四百公尺，轻重机枪及火炮可以纵射西南城垣，瞰制南面城垣，诚为阵地之锁匙部。自放弃西南各高地之次日晚，匪即突破城防工事。守山地几十日匪攻不下，退守城内一日即被攻陷，足证放弃西南高地之失策。"

但是，襄阳终究是白崇禧的地盘，一旦失守会对他的后方构成威胁，因此他还是决定派兵增援。就白崇禧的兵力部署而言，驻守南阳的王凌云兵团距离襄阳最近，所辖整编第九师和整编十五师也有战斗力，但是白崇禧顾虑刘伯承围点打援的惯用战术，担心刘伯承的主力正在某个地方等待王凌云出动呢，于是不敢从南阳出援。唯一可以出动的是驻守信阳的整编第七师和驻守确山的整编二十师。这两个师如果出动，从信阳向西北走泌阳，再折向西南走唐河、新野，五天即可到达襄阳，但是这条路线要经过解放区，且中途还有唐河和白河阻隔——敌前渡河乃兵家之忌，白崇禧认为也十分危险。于是，他选择了一条怪异的增援路线：由河南的驻马店、确山和信阳乘火车到湖北的孝感，然后从孝感一路向北，步行经应城、京山、钟祥，过蛮河，由宜城到达襄阳——这条路线乘车至少两天，步行至少七天，即使衔接迅速，行军急促，到达襄阳也需十天。白崇禧对这个决策的解释是：远敌渡河出乎共军预料，且增援部队沿途只过他的控制区，定会十分安全。其实，白崇禧的真正意图是：一旦襄阳失守，增援部队可以控制宜昌一线，以防共产党军队南渡长江——襄阳是白崇禧的地盘，守军长官却是蒋介石的人，想守地盘又不愿意救人，白崇禧在这种矛盾

中很难下定必救襄阳的决心，也许这才是导致他的增援路线十分怪异的根本原因。

刘伯承命令江汉军区部队在钟祥一带发动攻势，致使白崇禧的先头增援部队一七二旅不敢孤军冒进，在京山、钟祥一线停了下来，等待整编二十师的主力——这种散漫行军式的增援，几乎等于放任刘邓部攻击襄阳。

十五日黄昏，襄阳总攻战打响。六纵十七旅由旅长李德生指挥担任第一梯队，四十九团一营从西关经大石桥攻击西门，其余兵力为预备队；十六旅由旅长尤太忠指挥纵深战斗，其四十七团三营为主攻，由城西北配合十七旅攻城。四十六团为第二梯队，由西门攻击；十八旅为第三梯队，准备巷战；陕南军区十二旅攻击东北角，桐柏军区二十八旅攻击东南角，策应西门主攻。

二十时二十分，火炮抵近轰击西门城防工事。爆破组在炮火中连续爆破，把城墙炸开了一个大洞。突击队员趁硝烟未散迅速跨过大石桥，竖梯登城。梯子很快就被守军炸断了，第一批攀梯的官兵全部摔下，其中的一部分官兵牺牲。一营三连李发科排长发现炸开的大洞距离地面不太高，他蹲下身让战士踩着他的肩膀上去，战士岳秀清和冯秀林两人因此率先登上城头，后续部队不顾伤亡在突破口击退守军的数次反击，将突破口牢牢巩固。战后，四十九团因打开西门的战功被授予“襄阳特功团”称号。

西门被突破后，在西北角攻击的四十七团也转由西门突入。

巷战在黑暗中开始了。四十九团向十字街，四十六团向十字街东南，四十七团向西北角，五十团向北街，五十二团向米花街，五十四团向南门里。攻击部队不与少数守军纠缠，迅速分割穿插将城内守军割裂。天蒙蒙亮的时候，守军阵地只剩下东街杨家祠堂内的绥靖区司

令部和鼓楼两处了。上午十点鼓楼守军投降。攻击部队把康泽的绥靖区司令部包围得水泄不通。杨家祠堂是个四进院落，四角筑有坚固堡垒，中心是一座三层主堡，互相有坑道相连。此时，康泽在坑道里，郭勋祺则在中心碉堡里负责指挥作战。康泽司令部里的特务营和宪兵队数百人在郭勋祺的督战下拼死顽抗。僵持至下午十六时，王近山指挥部队开始了最后的攻击，炮兵射击，工兵爆破，步兵冲击，杨家祠堂的围墙被轰垮，塔楼工事被炸塌。八十三团三营教导员张景纯和五十四团二营副教导员要秉仁率部冲进了康泽指挥部的核心区。

五十四团二营六连指导员王秀斌跟着俘虏找到康泽进入碉堡的坑道口，战士高鸿岭和杨凤臣钻了进去，他们沿着狭窄潮湿的坑道，想在横七竖八的尸体中寻找康泽，但是没有找到。二营副教导员要秉仁决定再细找一遍时，看见陕南军区十二旅三十四团的官兵押着一个微胖的军官过来了，战士们说他是康泽，但被俘的军官说："我不是康泽，我是郭勋祺。"

要秉仁带领战士又下了坑道，他觉得没有捉到康泽，战役等于白打了。他们扒开每一具尸体辨认，当他拉开一具尸体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个洞口，洞里有四五具尸体，尸体有人为摆放的痕迹。要秉仁踢了一脚，一具"尸体"的腿抽搐了一下，战士们一拥而上将这具"尸体"拖了出来。要秉仁认定这个人不但活着，而且和康泽有点像。"尸体"来到院子里后，集合在那里的俘虏们说："康司令也来了！"要秉仁这下松了一口气。

襄阳攻坚战于七月十六日黄昏十八时结束。

刘伯承命令将郭勋祺送至河南宝丰中原军区政治部。自一九二六年在重庆分别，刘伯承与郭勋祺已有二十二年未见了，刘伯承见到郭勋祺不禁感叹道："从那时分别到现在，这中间的变化多大啊！"郭勋祺没有忘记一九三五年的土城战役，他慨叹那一仗令红军损失惨重，

于是对刘伯承说："过去战场上的对抗，我很惭愧。"刘伯承说："明打不算，不要介意。"陈毅收到了郭勋祺要求见面的信，信封上写的是"仲弘兄"收，参谋们不知道"仲弘"是谁，陈毅拿过信说："鄙人也。"接着，他专程从山东赶到宝丰来看望郭勋祺。一见面，陈毅便对郭勋祺说："你呀你，大炮是没有眼睛的，你怎么跑到襄阳去了？"刘伯承和陈毅共同劝郭勋祺"从现在做起，为人民立新功"。刘伯承要求他回四川，做川军上层将领的工作，为日后解放四川做准备。

康泽于十五年之后的一九六三年四月九日，作为第四批特赦战犯从北京昌平秦城监狱被释放。此后，他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一九六七年六十三岁时病逝于北京。

襄樊战役历时十四个昼夜，中原野战军以伤亡三千七百人的代价，毙伤、俘虏国民党军约两万一千人。

襄樊战役不仅令中原野战军控制了汉水中游，更重要的是威胁了国民党军的总后方，对国民党军主力白崇禧集团形成了牵制，这一战役的重要性在未来的淮海战役中将真正显现出来。

刘伯承在《襄樊战役总结》中写道：

一、这一战役的胜利，是由于敌我两军对战于豫东、平汉线，将敌主力吸走，襄樊孤立，蒋、白两敌初判断我无力攻襄，襄阳可以固守，发援迟缓，一到我攻下，援兵已来不及。这与六月刘邓与胡琏对战，粟裕与邱清泉对战，陈士榘得钻隙攻克开封相类似。极似打篮球，双方相互牵制，以一人乘机钻隙投篮的方法。二、攻克老河口、谷城等地，是三个兵团东西对进，配合得宜，使敌一六三旅大部被歼。陕南部队截断谷城起了初战胜利的决定作用。三、攻城指导上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的钳形突击，十三日后，我鉴于虎头山、羊牯山永久筑城不易攻下，襄阳城东西两面守备薄弱，乃变计划以郧（郧县）白（白河）独立团佯攻该两山之敌，以六纵全力攻襄阳西门，孔庆德全力攻城东南，刘金轩（陕南军区司令员）五个营攻城东北，而将三军突击队会合于城内杨家祠堂康泽司令部，此乃襄阳全胜的关键。在攻城中王近山指挥和第六纵起主导作用。

接着，刘伯承严厉批评了攻占襄阳之后，六纵与地方部队之间为抢夺俘虏和战利品发生的冲突。在这一事件中，两支部队甚至相互开火出现了伤亡。刘伯承责令六纵向陕南军区和桐柏军区部队写信认错，并通报全军。刘伯承特别表扬了桐柏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入城之初他就命令部队不得争夺战利品，并带领官兵们去城垣阵地捡国民党军丢弃的子弹，竟然捡得子弹二十四万发、黄色炸药几十箱。

对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来讲，攻占大城市还是新鲜事，他们不但缺乏攻打的经验，更缺乏占领的经验。

但是，无论如何，“长江也会像黄河一样将变成我们的内河”。

解放军官兵和他们的高级将领们，此时已经具备了足够的勇气和力量，他们就要开始大规模的攻城作战了。

# 第九章 决战的序幕

## 群众的集体意识

“我认为共产党阴险暴戾，深刻精到，机警疑忌，严密笃实。但是共产党没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懂辩证法，你们以后对辩证法要好好研究，才能应付他们。这次我发一本辩证法给你们，希望你们回去认真研究。”——一九四八年八月，国民党军“军事检讨会议”在南京召开，蒋介石给每一位与会者发了一本黑格尔的著作。

这是蒋介石在中国大陆召开的最后一次军事会议。

南京，六朝市井，秦淮金粉，这座长江下游的古都在一九四八年的夏天溽热难耐。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从全国各控制区乘飞机向这座城市聚集，南京机场顿时格外忙碌。由于彼此的战区已被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阻隔，长时间未见面的高官们纷纷在楼馆中觥筹交错，南京各大饭店和餐馆无不高朋满座生意兴隆。军政大员的府邸前尽管有军警守卫，但访客依旧昼夜不断，无论如何谁也不会错过这个联络上司、处理私密的绝佳时机。尽管会议事先严格保密，但依旧没能躲过记者们的耳目。军事大员们如此整齐地聚集在一座城市里，记者们被来来往往的金灿灿的将星弄得眼花缭乱：笔挺的军服，铿锵的佩剑，英武的随从，闪亮的皮靴，每位军中翘楚的头发都在不同牌子的头油打理下纹丝不乱——这真是一个疆域广袤的国家，眼前的排场很符合一个大国的风范。

共产党人也在开会，毛泽东召集的会议，是自撤离延安之后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会议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玉米灌浆，高粱初红，中国北方天高气爽，秋色斑斓。除了置身东北战场的林彪和西北

战场的彭德怀因为战事紧张未能前来之外，中共中央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在向那个庄稼掩映的小村聚集。已经不是从前去陕北的时候了，现在交通便利了很多，他们变换着乘汽车、骡马或者牲口大车等交通工具，虽然有些地段仍需要步行，但这些共产党领导者大都经历过长征，走路对他们来讲不是什么艰难的事情。如果中途没有自己的部队或地方政府所在地可以驻扎，他们就在路边的百姓家里喝上碗面糊糊吃上块烙饼，然后在房东的大炕上沉沉地睡上一觉。他们的棉布军装颜色稍有差异，这是各地被服工厂染料配方不同的缘故。老战友见面交换的礼物，比从前阔绰了一些，可能是一支缴获的自来水笔、一支手电筒，或者是几盒美国产的香烟。警卫战士掀着门帘，他们先后进屋，柳木桌上是房东送来的红枣和花生，墙角火炉上大铁壶里的水已经烧开，正呼呼作响。略带喧哗的寒暄刚起，茶香和烟草气味就混合在一起弥漫开来——这是一个已经空前强大的政党，她的领导者们面色黝黑，神情自信，言谈之间充满对未来的憧憬。

国共两党会议的召开，不是时间上的巧合，而是决战的先兆。

战争进行到第二年，国民党军的总兵力在急剧减少。两年间，国民党军共损失兵力约二百六十四万，其中被俘一百六十三万，毙伤九十六万六千多，还有数万部队倒戈，再加上溃散和逃亡的人数，到一九四八年六月底，算上重新补充的兵员，其总兵力从内战初期的四百三十万下降到三百六十五万。其中正规军一百零五个整编师（军），共二百八十五个旅（师），约一百九十八万余人；非正规军五十三万余人，特种兵、海军和空军约四十五万余人；后方机关和军校约六十九万余人。而其部署在第一线的正规军仅有二百四十九个旅（师），共一百七十四万人。具体分布是：东北战场卫立煌集团三十四万余人，连同非正规军四十四万九千人；华北战场傅作义集团二十八万四千人，连同非正规军三十九万七千人；西北战场胡宗南集团二十六万八千人，连同非正规军三十一万四千人；华中战场白崇禧集团二十六

万七千人，连同非正规军三十五万七千人；徐州战场刘峙集团五十万四千人，连同非正规军七十万五千人；山西战场阎锡山集团七万人。在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和西北战场上，国民党军正规军只能担任战略要点和交通点线的守备以及附近地区的防御作战任务，能够进行战略机动的部队所剩无几。除上述五大战场之外，在长江下游、大巴山以南、兰州和贺兰山以西的广大地区，国民党军正规军的驻守总兵力不超过三十六个旅，共约二十三万八千人。

两年来，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共损失兵力约八十万。但是，因为有近一百一十万解放区青年农民参军，加上四十五万伤愈归队官兵，并且有近八十万国民党军俘虏兵穿上了解放军的军装，连同在战场上倒戈的国民党军部队在内，总兵力已由战争初期的一百二十余万，发展到近二百八十万。其中，野战军四十九个纵队（军），一百六十八个步兵师（旅），五个骑兵师（旅），三个炮兵师（旅），二十个教导团、九个补训团、一个工兵团、一个战车团，总兵力一百四十九万；地方军区有五个一级军区、三个二级军区、二十八个三级军区和一百一十三个军分区，总兵力一百二十五万。南方各省游击队约四万人。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国民党军的军力对比为一比一点三，其中正规军军力对比为一比一点三二。

蒋介石真的要全面认真的检讨了。

参加国民党军“军事检讨会议”的人数是空前的，除了蒋介石、何应钦和顾祝同之外，各主要战区的司令官以及陆海空军的主要将领几乎悉数到会：白崇禧、林蔚、刘裴、萧毅肃、关麟征、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郭忏、汤恩伯、范汉杰、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李默庵、霍揆彰、孙立人等，只有战区局势十分紧张的胡宗南、刘峙和黄百韬派来了代表。再加上国防部各厅厅长、各局局长，各“剿总”、绥署参谋长，各军军长和参谋长等，共计一百二十多人。会议由蒋介

石、何应钦、顾祝同三人轮流主持，会议内容是全方位的一系列“检讨”：一、剿匪军事之总检讨；二、对匪军战法之研究及我军战法之检讨；三、我军机械化装备及后勤之检讨；四、华中作战之检讨；五、总体战之检讨；六、兵员征补之检讨；七、提高士气之办法。国防部长何应钦陈述的会议主旨是：“对当前剿匪应有全盘性之重要决策，对于政府各部门需要如何协力应主动提出切合实际之办法。过去剿匪失败，由于没有实行总动员，仅系纯军事的剿匪，虽有完备之总动员令，但无执行机关，以致政治经济各方面均未动员。今后如何运用全国人力、物力以及政治经济用以配合军事行动，应提出完善方案。”

八月三日，蒋介石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可谓痛心疾首：

过去两年来的剿匪军事，我们全体官兵牺牲奋斗，固然有若干成就，但就整个局势而言，则我们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到今天不仅使得全国人民的心理动摇，军队将领的信心丧失，士气低落，而且中外人士对我们国军讥刺诬蔑，令人实难忍受。这是我们革命历史最大的污点，更是我个人最大的耻辱！今天趁大家集会一堂的机会，我要求大家认清我们目前剿匪首要的急务，是改造我们一般官兵的精神和心理，要恢复我们革命的自信心，加强我们精神的武装，才能真正发扬我们革命军奋励无前的士气，来消灭背叛国家民族的共匪。因此大家在会议期中，对于自己平时的精神思想、生活行动，必须彻底反省，彻底检讨，在会议以后，能真正有一番起死回生的改革，才能达成此次会议的任务，也才能完成我们军人剿匪戡乱救国救民的使命！

“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所”，这样的措辞严重刺激了与会将领们的自尊。尽管他们对形势的判断大多不持乐观态度，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甚至十分悲观，但大家依旧对蒋介石的话感到难以接受。特别是蒋介石表示：“本来抗战胜利后，我个人的事业可以告一段落，但是我担心你们搞不赢共产党，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会生活不下去，没有饭吃，为使党内同志和广大官兵能有生存权利，我才又被迫勉强带领大家干，谁知道我军许多将领信心不足，士兵士气低落，作战屡次失败，很不争气，使我非常为难。”——形势是很严峻，国民党不但军事上屡屡失利，政治上也问题重重。但是，如果把失利的原因全部归结于在前方作战的将领和他们的官兵，仿佛只有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南

京大员们才是正确的，这是什么道理？——国民党军将领们的议论是：“话很沉痛，但说怕大家没饭吃，说得有失体统。”

蒋介石警告他的高级将领们“死无葬身之所”，毛泽东则要求共产党的高级将领们想出一个经过几年作战才能彻底打败蒋介石的时间表，同时想出新政权建立初期的那些必须程序。显然，这是一个令人愉悦的议题。

之前，毛泽东刚从城南庄来到西柏坡。而他之所以滞留在城南庄，是因为他准备去苏联会见斯大林。毛泽东此前从来没有走出过国门，他似乎从来没有产生过离开他的祖国的愿望，但是战争进行到如此地步，毛泽东必须下决心去遥远的苏联，因为这是时势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人赢得战争已经不是悬念，但最后夺取政权和建立政权，建立更广泛的政治联盟是必须的，尤其是与社会主义苏联的联盟。

毛泽东的出访之事，只有少数人知道，包括杨成武。毛泽东当面要求杨成武准备一个战斗力最强的师，由杨成武亲自率领护送他去东北，然后从东北出境转道去苏联。在聂荣臻的主持下，杨成武挑选的部队是二纵四旅，他们详细研究了行动路线，甚至选择了过平绥路的地点。但是，有史料表明，包括聂荣臻在内，凡知道这件事的人，大多不同意毛泽东去，理由很简单：战争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候，毛泽东不宜离开。不久，杨成武被通知那个机密任务取消。毛泽东从城南庄转移到一个名叫花山的村庄。他改变了去苏联的路线，准备自花山出发，经内蒙去外蒙，再由苏联方面派飞机来接。毛泽东在花山等待斯大林的最后回音。五月十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大意是：我们欢迎你来访，但中国解放战争正处在紧要关头，在这个时候，统帅不应离开自己的岗位太远。如有重大问题需要同我们商量，我们可以派一位负责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来听取你的意见。毛泽东随即取消了出访苏联的计划，并于五月二十七日到达西柏坡。

斯大林派来的负责同志——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到达西柏坡的时候，已经是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那时中国解放战争的进程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米高扬到达西柏坡的那天正好是北平和平解放的那天。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上看，毛泽东是否出访苏联对中国的命运来讲并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客观地说，苏联方面在中国解放战争中并没有像国民党方面宣传的那样起到关键作用。在那段日子里，最令人担心的却是毛泽东自身的安全问题。至少在五月里，蒋介石每天都焦急地等着空军报告好消息，他期望着一个准确的报告，说毛泽东已经死了。如果这个消息真的传来，“军事检讨会议”上弥漫的就会是另外一种气氛了。然而，毛泽东没有死。五月十八日，国民党军的飞机突然飞临，航空炸弹准确地击中了毛泽东住房。毛泽东不但没有受伤，甚至连惊慌都没有，他所困惑的是国民党军轰炸的准确程度。

聂荣臻当时的秘书范济生回忆道：

一天早饭时，冀晋军区电话报告，有六架国民党飞机，沿阜平西大庄大道飞往阜平城上空，现拐向史家寨。我接完电话马上报告了聂总，聂总要我保持与冀晋军区的联系。我刚回到房间，冀晋军区又电告，六架飞机转向南飞。再报聂总后，时间不长，就听到敌机声。一架野马式战斗机飞临我们驻地城南庄上空，对着城南庄到易家庄之间几个驴驮子扫射。聂总得知敌机转向我们驻地方向飞来，随即到院中观察。敌机一到，聂总就去动员毛泽东去防空洞。毛泽东工作了一夜，刚刚上床休息，不肯去。敌机对驴驮子一扫射，聂总急了，要我搬来行军床，要几个人用担架把毛主席抬到防空洞去。毛主席见此情景，说“自己走，自己走”。这时，先来的那架战斗机刚走，又来了一架B-25轻型轰炸机。聂总等人陪同毛主席刚到防空洞，敌机就投下了第一枚炸弹。我到防空洞时，看到聂总，赵尔陆（华北军区后勤部司令员）用身体挡着毛主席，毛主席从他两人身体之间向外看。听不到敌机声了，聂总才请毛主席回房休息。这次敌机共投了四枚杀伤弹，其中一枚落在聂总住房前面，一枚落在营门前没有爆炸，聂总曾要工兵来把炸弹拆走。饭后，毛主席出去散步，见到没响的炸弹，蹲在旁边观看。聂总在院中见此情景，急步跑到毛主席跟前，拉起毛主席就走，一边走一边说“不能在这里看！”我从没见聂总急成那个样子。聂总扯得快，毛主席也没争，但莫名其妙。毛主席走后，聂总要我再催工兵来拆走。

直到解放战争接近结束的时候，才从缴获的国民党档案中查明，当年在城南庄的时候，司令部小伙房的司务长刘从文竟然是国民党特务，是他向国民党空军报告的轰炸目标。

九月八日，在西柏坡中央机关小食堂，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董必武、彭真；中央委员有：徐向前、饶漱石、贺龙、邓小平、陆定一、曾山、叶剑英、聂荣臻、滕代远、薄一波；候补委员有：廖承志、陈伯达、邓颖超、刘澜涛。重要工作人员罗迈、杨尚昆、胡乔木、傅钟、李涛、安子文、李克农、冯文彬、黄敬、胡耀邦等列席。

此时，共产党人对未来乐观展望的根据是：通过两年的战争，人民解放军不但大量歼灭了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大大加强了自己军队的数量、武器装备以及战斗力，而且将解放区扩大到二百三十五万平方公里，约占全中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解放区内拥有城市五百八十六座，占全中国城市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九；解放区内人口约为一亿六千八百万，占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六。在长江以北的战场上，国民党军已经完全处于守势，其龟缩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枢纽已成为人民解放军的直接攻击对象。

毛泽东还强调了他对国际形势的乐观估计：没有必要担心新的世界大战爆发，也没有必要担心美国会干涉中国内政。美国与苏联之间迟早会达成某种妥协，美国不会大规模地直接卷入国共之间的战争，他们既没有这个意愿也没有这个能力。如果美国迫于某种压力硬要干涉中国内战，最坏的情况是少量出兵帮助国民党军控制一些大城市，这只不过要我们前去攻打的时候组织更大的兵力和多费点时间而已。

共产党人开始设想将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国家。毛泽东说，我们要建立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这个政权不仅仅是工农，还包括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甚至包括从蒋介石阵营里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政权制度采用民主集中制，即人民代表会议制而不是采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也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解放军叫人民解放军，“以示与蒋介石的政权根本不同”。毛泽东说，我们要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那么，战争还要进行几年才能彻底打败蒋介石？

毛泽东在内战爆发时就计算过，他认为战争持续的时间在三至五年之间，最坏的情况下也许要打十五年。一九四七年七月，在陕北小河会议上，毛泽东肯定了五年的估计，并解释说，根据过去一年的战绩，这个估计是可能实现的。现在我们有九十万野战军，六十万地方军，如果把野战军发展到一百五十万，就足以解决问题——“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来解决，但不对外宣布，还是准备长期作战，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不像蒋介石那样，先说几个月消灭我们，不能实现又说再过几个月，到了现在又说战争才开始。”一九四八年三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情况的通报》中，使用数学方式进行推论，再次提出五年消灭国民党军的估计：“我们的方针是稳扎稳打，不求速效，只求平均每个月消灭国民党正规军八个旅左右，每年消灭敌军约一百个旅左右。事实上，从去年秋季以后，超过了这个数目；今后可能有更大的超过。五年左右［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消灭国民党全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周恩来从兵力对比上进行了计算。他认为，我军现有兵力两百八十万，根据现在的歼敌进度，以收容俘虏兵百分之六十计，今后三年内可收容俘虏兵一百七十万，同时动员两百万翻身农民参军，除去消耗，我军的兵力可能接近五百万，那时攻一城即得一城。而国民党军在战争第一年损失约一百五十万，仅仅补充了一百万；第二年损失约

一百五十二万，补充了一百四十四万，两年实际损失六十五万；第三年，国民党军估计要损失一百五十二万，按补充一百万计，兵力将减少到三百一十二万左右；第四年减少到二百六十万人左右；第五年将减少到一百五十二万人。国民党军补充兵力递减速度为每年八十万，那么第五年国民党军将实际减少至一百八十八万人左右，除去近一百万的机关人员，实际作战兵力将不足九十万。九十万兵力只能勉强防守个别大城市。到这个程度，国民党军可以算是最后崩溃了。

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会议制定了详细的建军和作战计划。建军的核心内容是：充实野战军，增加特种兵，整顿地方部队，减少后方机关。共产党人计划在今后三年内发展到二十个野战兵团，七十个步兵纵队，共两百一十个步兵师，再加上九十五个炮兵团，三十个骑兵团，四十七个工兵团以及五百个团的地方部队。作战计划的核心内容是：战争第三年继续发展外线进攻，深入国民党统治区，准备打具有决战性质的大会战。

战场重心在长江以北，重点战场在中原和东北。

会议制定的歼敌指标是：三年内歼灭国民党军正规军三百个旅以上。这一歼敌任务按照战区进行了分配：华东野战军歼敌四十个旅左右，并攻占济南、苏北、豫东和皖北地区的大中城市；中原野战军歼敌十四个旅左右，攻占鄂豫皖三省若干城市；西北野战军歼敌十二个旅左右，钳制胡宗南集团使之不能施行战略机动；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徐向前部）歼敌十四个旅左右，攻占太原；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二、三兵团（杨得志部、杨成武部），歼敌三十五个旅左右，攻占北宁（北平至沈阳）、平绥（北平至绥远）、平承（北平至承德）、平保（北平至保定）各铁路沿线“除北平、天津、沈阳三点之外的一切城市”。

国民党方面已经没有任何依据来计算什么时候打败共产党了，“军事检讨会议”不得不深究无法逆转的军事危机。进入一九四八年以来，西北战场刘戡部的五个师被歼于宜川战役，中原战场区寿年兵团六个师被歼于豫东战役。对于前者大家谈得很少，因为谁都知道胡宗南是蒋介石最信任的人，说多了也许会引出麻烦，于是与会者集中火力直指邱清泉的整编第五军在区寿年被围时见死不救的“无耻行为”。会议还研究了与共军作战的战法问题。前线的将领们并没多说什么，倒是从来没有打过仗的南京的高官们不断地夸夸其谈。陆军大学教育长徐培根提出“包围不如突破”，前线的将领们一致反对：共军通常没有固定战线，遵循的是“打不赢就走”的战法，他们根本不接受攻击，也不给你攻击的机会，战前连鬼都没有一个，你突破什么？等他“打得赢就打”的时候，找准弱点环节，集中数倍兵力猛烈袭击，你还没稳住阵脚，战斗就结束了，然后跑得又是鬼都没有一个，你向谁突破？

“军事检讨会议”翻印分发了三本共产党军队的小册子。一本是华东野战军的《攻坚战斗》，这是专门针对国民党军的堡垒防御而写的战术指导文件。其中有以炽盛火力压制后，封锁敌方射击孔，掩护梯子组和突破组进行突击等实战内容。国民党军修筑的堡垒一般高出地面，目标暴露，纵深很浅，只要一点被突破便会全线崩溃，导致阵地和城市丢失和大批官兵被俘，这是国民党军防御上的很大弱点。但是，与会者对这本小册子并没有特别重视。第二本是东北野战军编印的《目前的战役问题》，这是蒋介石专门批示印发的。小册子里基本上是毛泽东的战略观点的集中，特别是其中变内线防御为外线进攻的阐述，蒋介石感到十分重要。但是，前线的军事将领们认为，蒋介石连具体战斗的细节都横加干涉，现在让大家关心整体战略转变问题又有什么意义？第三本小册子是华东野战军编印的《战斗手册》，基本内容是要求基层指挥员必须掌握的战术技巧和战役原则。这本小册子是国防部决定翻印的，翻印之前专门让参谋们对《战斗手册》中的每一条都加上了批注和对策。比如，“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条，参谋们加

上了“打破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批注和“把农民争取过来”的对策。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看后眉批道：“如果能把农民争取过来，仗不用打就胜了，战争也根本不会发生了。”

“军事检讨会议”进行到第三天，何应钦在他的军事报告中抛出了“重磅炸弹”，他公开了两年来国民党军的实际作战损耗，而这原本属于万分机密的数字：死伤、被俘和失踪总计三百万人，损失步枪一百万支、轻重机枪七万挺、山炮野炮重炮一千多门、迫击炮和各种小炮一万五千多门，再加上损失的战车、装甲车、汽车、通讯器材和各种弹药，惊人的数字引起极大的震动。有人悲观地说，这仗无论如何不能再打下去了；有人指责国防部指挥无能，南京的大员们都是饭桶；有人呼吁政府赶快请求美国干涉，不然中国就是苏联的天下了；也有人开始攻击陈诚，因为陈诚在战争初起时曾保证过在三个月内消灭共军，现在应该把他揪出来问问。何应钦在这个时候把这些数字披露出来，用意很清楚：一九四四年蒋介石和陈诚不但迫使他交出了军政部长的职位，还让他去纽约当联合国军事参谋团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完全剥夺了他的实权，军政大权都在蒋介石和陈诚手中，因此军事上的失利不但没有他的任何责任，谁该负责自有公论。

蒋介石那天没有到会，听说何应钦的讲话后，十分震怒。

第二天，蒋介石特地穿上军装走上了讲台，说他二十多年来经历过许多艰难困苦，但总是抱着大无畏的精神和百折不挠的决心。两年来与共军作战虽然受到挫折，但大家要同心同德，共度时艰，绝不可以散布悲观失败的论调以至影响国军士气。说到士气问题，蒋介石的态度比何应钦直率得多：

> 我体察一般高级干部的情绪，大多数对于革命前途信心丧失，心理动摇，以为本党的地位，真是岌岌不可终日，这种现象的发生，是我个人最感惭愧痛心的一件事。因为今天一般高级将领，不是我亲自领导出来的干部，就是我亲自教育出来的学生，我不能使他们对主义建立生死不渝的信心，对革命抱定百折不回的志愿，这就证明我个人领导无方，教育失败，

我对国家就不能辞其责任！……现在我们大多数高级将领精神堕落，生活腐化，革命的信心根本动摇，责任的观念完全消失！这样的将领，如何可以领导部下，和万恶的共匪来作战呢？尤其使我痛心的，这两年以来，有许多受我耳提面命的高级将领被俘受屈，而不能慷慨成仁；许多下级官兵被匪军俘虏，编入匪部来残杀自己的袍泽，而不能相机反正。这真是我们革命军有史以来所未有的奇耻大辱！我一想到这些人都是我多年领导的部下，我心中更觉沉痛万分，无地自容！……如果今天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对于自己的精神思想还不能彻底觉悟改革，对于过去那种失败主义的心理还不能扫除净尽，不能重新建立革命的信心和决心，那无论我们有多少军队，有怎样精良的武器，将来总要被共匪所消灭。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固然要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所……那我们真是上无以对总理和先烈，下无以对全国人民和万世子孙了……

就在蒋介石讲这番话的时候，国民党军高级将领阵亡和被俘数字已经达到令人惊骇的两百一十六名之多。

究竟是因为我们的武器不如敌人精良，部队不如敌人众多呢？还是因为我们一般高级将领自己的精神堕落，生活腐化，以致部队情感隔阂，士气消沉，战力消失呢？我要求今天在座的各位高级将领反躬自问一下，你们今天是不是还能保持东征北伐时代的革命精神，对于敌人无所畏怯，对革命的前途具有信心呢？你们对于主义是不是还能像过去一样的绝对信仰，对于上官的命令是不是毫不犹豫的彻底执行呢？对于部下是不是还能像过去一样亲爱如家人兄弟，与之同甘苦、共生死呢？你们对于自己的同胞，是不是还像过去一样的休戚相关，荣辱一体，协同动作，赴援必先呢？

但是，国民党军队的信念和士气丧失，远不是高级将领们“反躬自问一下”就能够挽回的。

军队的主体是士兵，士兵的处境和状态决定一切。

“军事检讨会议”的最后几天，在前线打仗的将领们终于获得了发言的机会。几乎所有的发言者都在申诉各自的困难，要武器、要新兵、要军粮、要器材、要车辆、要弹药，当然还要钱。新疆警备总司令宋希濂说，他见过的绝大部分基层官兵都十分厌战，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要打仗。现在几百万法币还抵不上一块钱，物价的飞涨使士兵的待遇严重降低，士兵开始吃不饱穿不暖，许多中下级军官每月所得已不能维持其家用最低限度的生活。宋希濂认为，蒋总统既然说政府还有九亿多美元的基金，那就应该自八月起，所有官兵的副食费一律

改发现洋，每人每月三元；将校尉级的薪金也改为发现洋，自每人每月五元起至三十元不等，借以维持官兵的生活。宋希濂后来回忆：“我的发言尤以我的建议得到与会者许多人的同情。”

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都面临着如何保持高昂士气的问题。

在即将到来的决战前夕，共产党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共产党人从不讳言自己所领导的军队是一支农民军队，也承认在这支军队里农民习气浓重，并认为如果这种习气不改变，对于即将到来的巨大战争能否打赢至关重要。

为此，毛泽东严肃地提出了部队整训问题，要求部队努力克服存在的以下问题：一、组织不纯问题。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发展壮大中混进来一些不良分子，特别是大量俘虏兵的进入给部队带来很大的问题。战争进行到一九四八年，军队的大多数连队中，俘虏兵已占到一半以上，有的连队甚至占到百分之八十。这些战士大多是贫苦出身，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的一些人依然沾染着旧军队的习气，特别是不懂得为谁打仗的道理，“吃谁家粮就当谁家的兵”的雇佣思想严重。对于战争性质的认识更是混淆：“打内战是不应该的，其责任国民党蒋介石要负，共产党毛泽东也要负。”二、思想不纯问题。一些官兵对战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不愿意过艰苦的战争生活，不愿意到国民党控制区作战，尤其是怕打到长江以南去，认为会遇到巨大的困难。还有人惧怕美国出兵援蒋，怕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怕战争没完没了地打下去。三、对党的政策不理解或理解不深，政策水平低，违反政策和纪律的事时有发生。有人执行命令不彻底，缴获不完全归公，个别人搜俘虏腰包甚至杀害俘虏。特别是对土地改革政策，不少人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不了解土地改革与解放战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四、部队内外关系问题。有些干部存在着严重的军阀主义倾向，对下级干部和战士缺乏阶级情感和平等思想。而在同级关系上表

现为本位主义，没有整体观念。有的干部计较个人名誉、地位，争功诿过。战士中也存在着绝对平均主义思想，不尊重干部，不服从指挥。在军政关系上，不尊重地方政府，不爱护群众的人力物力，有的甚至打骂百姓和政府干部，搞“枪杆子主义”。

对此，共产党人开展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式整军运动”。

毛泽东特别批评了林彪。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林彪和东北局发出一封长达两千字的电报，批评林彪没有按照中央规定的报告制度做出综合性报告。林彪的理由是：“常委各同志均极忙碌，事实上只各顾自己所分的工作，并皆对各部门的工作难求于全部了解，对做全貌的报告遂甚感困难。”毛泽东说：“你们收到中央规定报告制度六个月以后才声明理由，是不对的，并且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像大别山那样严重的环境，邓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规定向中央主席做了综合性报告，并将邓小平来电转给你们阅读。你们的环境比大别山好得多，何以你们反不能做此项报告”？“我们认为所以使你们采取此种态度的主要理由，并不是你们所说的一切，而是在这件事上，在你们的心中存在着一种无纪律思想”。

林彪当即作出检讨并写来了综合性报告，毛泽东在回电中所阐述的观点，可以视为共产党军队所以进行新式整军运动的目的：“你们这次检讨是有益的”，否则，“就不可克服完全不适用于现在大规模战争的某些严重地存在着的经验主义、游击主义、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在即将与国民党军进行大决战的前夕，“这一问题的性质是如此重要，即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才能由小规模的地方性游击战争，过渡到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整个战争，由局部胜利过渡到全国胜利”。

国民党军“军事检讨会议”结束后，蒋介石命令下发的小册子名为《为什么要剿共》——题目就显得颇为奇怪：二十年前国民党就致力于剿共，甚至在抗战时期也没有停止过，现在还在阐述“为什么”。

蒋介石的这个“为什么”不只是说给军队听的，他还想告诉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百姓，因为他对这个国家的民心所向已经甚为忧虑。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国民政府的军事预算已经达到四百六十九万八千六百亿元，这是一个天文数字，而一九四八年上半年的财政赤字已经达到二百六十万亿元。为了弥补财政赤字，除了加重田赋、税收和大举外债内债之外，国民政府决定增发货币，到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止，增发的货币达到六百零四万五千亿元，从而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与一九四七年相比已经上涨了五百万至一千万倍。

英国传记作家菲利普·肖特对那时中国形势的叙述可谓经典：

……政府滥印钞票以支撑内战，造成通货膨胀和工薪贬值；渗透性的普遍腐化使得合法的工商业无法生存——所有这一切使得曾是国民党核心支持者的那些集团转而反对它了……这些都是国民党病入膏肓的征兆。但这种无可救药却是根植于蒋介石创建的统治体系的实质之中。它太衰弱太多派系倾轧以至无法以暴力强加其意志了，它也太腐败太漠视公众福利以至掌握不到基础广泛的支持了……与之相反，毛（毛泽东）依靠的是“群众的集体意志”，而它却是足够了。

“群众的集体意志”，就是军心和民心所向。

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在战争进入第三年的时候，都明白了“群众的集体意志”对于一个政党和一支军队的生死攸关重要性。但是，当大决战即将来临之际，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军队已经成为了中国“集体意志”的拥有者。

## 黄土黄

对于决战在即的国共两军来讲，西北战场始终是块鸡肋。

从政治、军事和地理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必须保持相当控制实力的地带，因为它不但是内地与广阔的西北地区联系的枢纽，而且还是东部决战战场的侧翼。但是，地广人稀和粮食匮乏又使得西北战场没有决战的条件，于是也就没有必要投入大量的兵力。此刻彭德怀指挥

着不足十万兵力的部队，在那片黄土地上艰苦地游战，他们最主要的任务似乎不是歼灭多少敌人，而是把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牵制在那里。当一九四八年中原战事紧张起来之后，蒋介石不止一次命令胡宗南，让他抽调兵力东进增援中原战场，但是每次都因为彭德怀部的攻击而没能成功调动——只要彭德怀的部队还在那片黄土地上，蒋介石的主力军事集团之一——胡宗南的部队——似乎连潼关都逾越不了。历史的进程证明，在国共两军于东北、华北、山东、中原进行大决战时，不但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始终转战于西北一隅，而且胡宗南部也一直被牵制到战争几乎快要结束的时刻。这就是西北战场微妙而独特之处。

对于规模宏大的解放战争来讲，没有任何理由忽视西北战场的重要性，尤其是在两军决战即将开始的时候。

胡宗南是在蒋介石召集“军事检讨会议”的前夕发动攻击的。有人认为胡宗南是奉蒋介石之命不得不主动进攻，也有人认为他是为了拖延或者拒绝抽调几个主力旅去中原而发动攻势的。实际上两者皆有之。西府、陇东战役后，胡宗南部经过休整，仍有约二十五万兵力，再加上宁夏马步芳部和青海马鸿逵部以及榆林地区的邓宝珊部，西北战场上的国民党军共有十九个整编师、五十个作战旅，连同特种部队和非正规军，总兵力约四十万。即使彭德怀部也在不断的扩大之中，到一九四八年六月，西北野战军总兵力也仅仅有五个纵队，兵力约六万八千左右，加上地方部队，总兵力依旧没有超过十万。胡宗南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经过西府、陇东之战，彭德怀部已被歼过半，元气大伤，没有六个月以上的休整，无法再次投入作战，这正是他发动新攻势的好时机。

胡宗南的判断影响了国防部，蒋介石电令：“应捕捉千载良机，西安绥署应彻底轻装不分地域越境穷追，使西北战局获得决定之好转。”

但是，正在这时候，中原战场告急，蒋介石又命令胡宗南抽调兵力增援中原。为了保存实力，胡宗南只空运了整编三十师至太原，然后将整编十三、二十七、六十五师调到陕西与河南交界处——与其说是在增援中原，不如说是为防止中原的共军西进自己的地盘。同时，趁着彭德怀部战后休整，胡宗南虽不能像蒋介石说的那样“不分地域越境穷追”，但是将彭德怀部向北面挤压的确是他所期望的。因为宝鸡一战，胡宗南感到彭德怀距离西安实在是太近了，西北野战军大有直接攻击西安的可能。为此，他调集整编第一师以及整编十七、三十六、三十八、九十师约十万兵力，集结于渭河北岸，以三原、蒲城、大荔这三个相互距离约百公里的城镇为支撑点，构筑工事，互相依托，在巩固西安、屏障关中的前提下，逐步向黄龙山南麓蚕食，以期将彭德怀部封锁在粮食困难的黄龙山区伺机歼灭。

彭德怀再次面临大军压境被迫作战的局面。

根据敌情，彭德怀、张宗逊（西北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赵寿山（西北野战军第二副司令员）、甘泗淇（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提出，建议华北第一兵团（徐向前部）暂缓与阎锡山的作战，协助西北野战军与胡宗南打上一仗。但是，鉴于华北第一兵团很难抽调出来；同时，兵力过于集中粮食也没法解决，中央军委没有同意。毛泽东来电通报敌情，说胡宗南原有两种动向：一种是奉蒋介石的命令以两至三个整编师南下中原，一种是分路进攻黄龙。虽然最初毛泽东不大确信第二种动向，但是现在胡宗南竟然这样做了。而胡宗南如此做法，“必是他不愿出兵中原宁可冒险北犯。无论他出哪一着均于你们有利，均可歼击获胜。你们首先准备歼击可能北犯之敌是正确的。”

没有兵力支援，彭德怀也决定作战。他确定了一个“两翼牵制，中央突破”的作战计划：四纵骑兵六师吸引整编第一师北上，四纵再以一个团在洛河东岸阻击整编第一师可能东援；三纵独立第二、第五旅各

一个团，二纵独立第六旅的一个团以及黄龙军分区十团等部，组成左翼兵团，由三纵参谋长李文清指挥，抗击整编十七、三十八师的进攻，保障野战军主力的左翼和运输线的安全；一纵、二纵、六纵以及三纵、四纵主力共十一个旅，组成右翼兵团，由野战军司令部直接指挥，隐蔽集结，准备歼灭整编三十六师。

从部署上看，彭德怀依旧兵力不足，特别是打援和阻击兵力薄弱。

七月下旬，胡宗南部继续向北进攻。三十日，整编十七、三十八师主力在飞机和火炮的掩护下，向彭德怀部坚守的阵地发动猛攻，遭到左翼兵团的顽强阻击。整编第一师也向位于黄龙西南方向的宜君实施了攻击，遭到骑兵第六师的阻击。而整编三十六师除留下一二三旅三六九团守备白水之外，主力以黄龙附近的石堡为目标，沿着白水至宜川的公路继续推进。当敌人的先头部队发现石堡地区有彭德怀部主力伏击的迹象时，随即停止推进，在一个东西约十二公里、南北约五公里的地带构筑工事，转入防御。

彭德怀盯住了整编三十六师，希望他继续推进至石堡，然后将其围歼。

但是，整编三十六师无论如何也不肯前进了。

彭德怀随即命令左翼兵团主动后撤，吸引整编十七、三十八两师继续北进，拉大他们与整编三十六师的间隔。

整编三十六师依旧没有前进的迹象。

彭德怀果断改变计划，决心主动向整编三十六师发动进攻，把他从当面敌人密集的阵形当中掏出来吃掉。他给各部队下达的任务是：一纵协同二纵歼灭整编三十六师二十八旅八十四团；二纵攻击二十八

旅八十二团；三纵协同六纵攻击一六五旅四九三团，并以一部攻击一六五旅主力；四纵和警备四旅一部先攻击二十八旅八十四团一部，然后攻击一二三旅；六纵攻击四九三团后，协同三纵攻击一六五旅。各部队七日夜到达攻击出发地，并完成一切攻击准备。

整编三十六师师长钟松心情矛盾。这个师在沙家店战役中已遭重创，胡宗南不愿意丢失这个番号，命令从战场侥幸逃脱的钟松用这个番号重新编组一个三十六师，现在他率领的这支部队已经不是“原装”的了。由于与彭德怀部作战吃过亏，钟松变得十分小心谨慎，这是他得知石堡附近可能有伏击后停下来的原因。但是，他内心深处还是有一种求战的欲望，他希望通过这次作战一洗沙家店一战的耻辱，向胡宗南也向蒋介石证明他是一个能打仗的指挥官。

八月七日，当彭德怀部开始向整编三十六师移动的时候，胡宗南突然发现自己的判断出现了失误：他认为彭德怀要攻击的是整编三十八、九十师，因为前方报告说，这两个师当面的共军至少有两个纵队以上。因此，他命令整编三十六师除以二十八旅坚守现阵地外，其余部队集结于冯原镇以东，准备策应整编三十八、九十师作战。可是，上午七时，整编三十八、九十师当面的共军突然撤了，占领了阻击阵地之后才发现，在这里阻击的共军最多不过一个团。胡宗南得到这一消息后十分惊骇，一时弄不清彭德怀的真实意图，只能命令各部队构筑坚固据点准备应付局面。

这时候，钟松意识到了自己的危险，他立即给驻扎在黄龙以南的第五兵团司令官裴昌会打电话，请求派兵增援。

但是，已经晚了。

八日，彭德怀部对整编三十六师的攻击骤然开始。

从上午十时至下午七时，炮火轰击长达九个小时，壶梯山主阵地上弹片腾飞，硝烟弥漫，防御工事几乎全部被毁，防守壶梯山的二十八旅不断地向钟松告急。

胡宗南终于明白彭德怀要干什么了，他立即命令整编三十八师回头增援钟松，同时命令整编三十六师确保壶梯山阵地。

无论是彭德怀还是胡宗南都知道，壶梯山是冯原镇的主要支撑点，而冯原镇是黄龙山东面的门户，对于整编三十六师来讲，如果壶梯山阵地失守，冯原镇以南就无险可守了，彭德怀部就可以居高临下直扑渭南地区，然后直接威胁西安了。

主攻壶梯山的任务交给了王震的二纵。彭德怀对王震说："这个打不死的钟松又交给你了。你熟悉他，他也知道你，不过他怕你，你不怕他。"王震说："打不死就继续打，打成肉酱为止。"

壶梯山是一座伸向平原的孤山，陡坡上草木稀疏，薄田交错。二十八旅在山坡上构筑了大量工事，山顶上的大庙已被改造成大堡垒，是敌人的指挥中心。王震认为："如果把大庙拿下来，敌人整个防御体系就会瓦解。当然，要拿下来也不是容易的事。"他命令二纵以独立第四旅从东、三五九旅从北，独立第六旅从西，三面同时发动仰攻。

仰攻令二纵官兵在突破地堡时付出了很大的牺牲。

彭德怀冒着炮火来到了王震的指挥所。指挥所距离前沿很近，搭制的材料简陋到几乎起不到防弹的作用。王震一看见彭德怀就火了，说这里太危险，赶快下去，出了事没人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彭德怀也瞪了眼："怎么你可以在这里，我在这里就不行？你死得，我就死不得？"王震急了："你是不是不相信我的指挥？"彭德怀说："我看我的，你指挥你的，我不干预你。"两个将领多年来同生共死，但往往到

一起就顶起来，尤其是在打仗吃紧的时候。“我和王胡子像是一个槽里吃草的两头湖南骡子，吃着吃着就踢起来。”彭德怀曾这样比喻他和王震的关系，“但我们拉起套来，使的却是一股劲。”

由于攻击进展不顺，总攻时间一推再推。

王震下到三五九旅，纵队副政治委员王恩茂下到独立第六旅，副司令员郭鹏下到独立第四旅，参谋长张希钦去了炮兵阵地。

二纵决定下午四点开始总攻。

王震给炮兵阵地下达了轰击命令后，抓起棍子就往山上爬，爬到七一七团的阵地时，守军开始反击。团长胡政正从望远镜里观察，看见王震不但上来了，而且还想继续往山上爬，胡政急忙上前拦住了他。王震将其推开，喊道：“敌人反扑得这么凶，还在这里看镜子，快给我冲！”胡政知道王震的脾气，立即率部迎面冲了上去。战后，部队官兵中流传说，王胡子在阵地上打了胡团长，这让王震感到很不安。直到三十八年以后，年逾古稀的王震还在解释：“人们说，打壶梯山时我打了胡政。没有的事。我要往前冲，他阻拦我，我只用双手这么推了一下……”

壶梯山守军发动了反击。胡宗南派来的飞机由于看不清地面标志，乱扔炸弹，不但使防守部队遭到损失，连守军的电台都被炸坏了，整编三十六师与上级的联络由此中断。二十八旅旅长李规再次向钟松请求增援，钟松口气生硬：“没有部队增援，无兵也要守住阵地。如果放弃阵地，就以违犯军法论处！”李规怒不可遏：“如果我放弃阵地违犯军法，那么你也要连坐！”此时，二十八旅的各个阵地上都发生了肉搏战，八十二团的两个营已退守二线阵地。团长董文轩力求重新建立防御线，但部队已被分割，他只有向山顶的核心阵地退缩。

王震发现山顶上的守军有逃跑的迹象，对身边的参谋和卫生员说："快告诉炮兵，往山顶高吊射击！敌人要跑！"参谋和卫生员跑去传达命令，等了一会儿却没见炮兵开炮，王震对身边剩下的警卫员说："大个子！你快去再向炮兵传达我的命令！"年仅十八岁的"大个子"叫吴宪军，山东人，他和王震的关系不一般，他不但是王震的警卫员，还是王震的党小组长。吴宪军拒绝执行这个命令，因为他走了司令员身边就没人了。王震说："有这么多部队，我死不了的。"吴宪军还是说："那不行，我不能去！"王震火了："放走了敌人我枪毙你！"吴宪军一脸严肃："我以党小组长的名义向你提出要求：你要保证在我回来之前，不能离开这里。"王震说："我保证，快去！"吴宪军去了，等他完成任务跑回来的时候，发现王震确实原地未动。吴宪军很高兴，因为类似这样的事在以前的党小组会上他批评过王震，现在看来司令员的这个缺点已经改正了。这个年仅十八岁的小警卫员满意地对王震说："你这次表现不错，值得表扬。"

壶梯山守军二十八旅八十二团已无法支撑，团长董文轩在山顶的大庙里已经能够听见解放军的呐喊声，他甚至看见一面高举着的红旗距离大庙很近了。

董文轩不知道，此刻举着红旗向他冲过来人，一年前还是整编三十六师的一名士兵。十一团四连副排长杜立海在沙家店战役中被俘，后加入西北野战军，他思想进步很大，作战十分勇敢。作为攻击山顶大庙的先头部队，四连在冲击中遭到两座地堡的火力封锁，杜立海带领一个班炸毁地堡后，高举着红旗冲在最前面。就在接近山顶的时候，杜立海摇晃了一下差点倒下，但他依旧举着红旗往上攀登，终于将手里的红旗插到了山顶上。当卫生员上来为他包扎的时候，发现杜立海的肠子已经从腹腔掉了出来，鲜血染红了半截身子。

八十二团团长董文轩最终逃下山，跑回了冯原镇的二十八旅旅部。

壶梯山失守令整编三十六师全师动摇。参谋长张先觉建议后撤待援，师长钟松和副师长朱侠表示同意。与此同时，第五兵团司令官裴昌会命令整编三十师放弃韩城向整编三十六师靠拢，同时命令驻扎在澄城的整编三十八师十七旅归钟松指挥，以加强整编三十六师的兵力。黄昏，钟松命令一二三旅的炮兵向壶梯山猛烈炮击，掩护主力沿着冯原镇至澄城的公路向后撤退。

九日早晨七时，被一夜的撤退弄得疲惫不堪的钟松接到了一个让他愤怒的消息：二十八旅旅长李规在电话里说，因为晚上撤退看不清路，早上的时候才知道他们已经退到了洛河以东的澄城。规定的撤退计划是：二十八旅掩护全师的撤退行动。现在，他们居然撤得比师部还快，一下子就跑到了澄城！参谋长张先觉无奈地问钟松怎么办，钟松半天没有吭声。八时，奉裴昌会之命增援的整编三十八师十七旅来电话，说他们已经从澄城出动了，估计上午十时能与整编三十六师会合。这个消息让钟松的情绪好转了一些。但是等了半天，只等来了十七旅的一个参谋——整编三十八师十七旅根本没有出动，因为二十八旅撤到澄城之后狼狈不堪的状况把他们吓坏了，他们不愿为与自己没有隶属关系的整编三十六师冒险。

此时，彭德怀部对整编三十六师已经开始了全面追击。

中午的时候，钟松接到一六五旅旅长孙铁英的电话，说发现有共军的大纵队正从两侧迅速南进，估计很快就要到达师部附近。钟松大惊失色，不知该怎么办。参谋长张先觉建议撤入澄城，副师长朱侠不同意。钟松沉默了一会儿，带着警卫走了。朱副师长说他要到工兵营和特务营去，也走了。师部四周开始响起密集的枪声，突然，钟松从一二三旅后方阵地打来电话，命令张参谋长“酌情把师向后移动”。

整编三十六师撤退的部队拥挤在一起。钟松命令撤到澄城的二十八旅旅长李规去解救一六五旅旅部，李规认为命令不合理，拒绝执行。接着，钟松又命令李规增援在王村镇被围的四九四、四九五团，李规回答："没有部队，无力增援。"

王震跟随追击部队跑到了王村镇附近，他刚登上一个高坡准备观察时，密集的子弹朝这里打来，在他脚下溅起一团尘土。他喊："大个子！快调炮兵来！"吴宪军拉他让他隐蔽，王震急了："不要拉我！"话音未落，一颗炮弹打过来，吴宪军还没来得及扑上去，炮弹爆炸了，王震的后脑勺流出鲜血。吴宪军喊："司令员！你负伤了！"王震伸手一摸，满手鲜红："娘的，真打着了。"吴宪军不由分说背起王震就跑，边跑边哭。王震迷迷糊糊地说："都怪我，大个子！我对不起你！"这已是王震在战争中第七次负伤，伤势严重但所幸没有伤及关键，他立即被送往黄河以东的后方医院。

王震倒下的时候，整编三十六师一二三旅已经跑得没了踪影。张先觉紧急召集师直属队突围，往外跑的时候，他看见副师长朱侠边喊"杀！杀！"边带领特务营向杨家凹东南突围，结果没跑多远就被乱枪打死了。张先觉被俘。查明身份后，他被送往三五九旅政治部。共产党干部要求他写信给被围困在王村镇里的一二三旅旅长孙铁英，劝其投降。张先觉拒绝了——"次年，该旅在五丈原被歼，孙负伤被俘，我和他见面，深悔当时没有写信劝降。"

当彭德怀部围歼整编三十六师时，相距仅二十五公里的整编十七师和整编三十八师不但没有增援解围，反而放弃韩城向合阳撤退了。

澄合战役，西北野战军毙伤整编三十六师包括副师长朱侠以下三千余人，俘虏师参谋长张先觉，南京国防部驻整编三十六师少将高参李秀、少将战场视察官马国荣以下官兵六千余人。

西北野战军伤亡两千三百余人。

此战再次证明，即使在兵力不足和战场条件恶劣的情况下，只要勇于作战，是可以与强敌周旋到底的。

钟松再次从战场逃亡。

而在壶梯山战斗最紧张的时候，告诉钟松“如果我放弃阵地违犯军法，那么你也要连坐”的二十八旅旅长李规，最终自己应验了对别人的威胁。他从战场逃脱后，八月二十四日，奉命到大荔县中学开会，一进县城就觉得气氛不对，城内布满荷枪实弹的军警，原来热闹的大街上空无一人。走到大荔中学门口，看见门前停放着一排汽车，其中的一辆囚车特别显眼。有人告诉他，胡宗南带着参谋长、副参谋长、参谋处长、副官处长、情报科长和执法队已经到了，脚镣、手铐等刑具以及行刑人员也都带来了。大荔是裴昌会的第五兵团兵团部所在地，胡宗南打算在此召开渭北各师旅以上部队长会议，检讨壶梯山战役失败的原因。李规后来回忆说：“事先准备好了圈套，美其名曰检讨会，实际是对我们进行军法会审，我当时还在梦中。”

会议一开始，胡宗南就指名让李规首先汇报。李规对作战进行检讨的时候，把大多责任归结于钟松的指挥：一、战役发生前，我军对共军大部队的动向不明，以为当面不过是共军的少数地方武装，因而对敌情重视不够；二、没有派出兵力占领介牌山，仅按师部的指示在壶梯山部署了兵力，右翼无依托，左翼的八十四团二营距离壶梯山十多公里，空隙很大，以致战斗一开始二营就被消灭，共军大部队依靠介牌山居高临下攻击壶梯山。壶梯山守备部队既没有左右支援，也没有炮火支持，官兵伤亡很大，导致阵地失守；三、八十三、八十四团残部撤退时，师里没有规定序列撤退路线，导致全师挤在一条路上发生混乱，这是造成中途溃败的主要原因。李规汇报完毕，胡宗南脸色阴沉了一会儿，突然，他拍着桌子大声说：“第二十八旅旅长李规，图

谋不轨，既不固守壶梯山的主阵地，又不听从命令解刘家凹之围，擅自将部队撤离主阵地达二十余里。在该师前线战斗紧急的情况下，不派部队增援出击，以致该师遭受重大损失影响整个战局。这些事实，绝对不能令人容忍，着即将李规逮捕交军法会审。”话音未落，武装执法士兵就把李规架了出去，将他关押在会议室旁边的一间教室里。

之后汇报的是守备壶梯山的二十八旅八十二团团长董文轩。董团长说他的工事全都被猛烈的炮火摧毁，官兵伤亡殆尽，当预备队上来时，阵地已经被突破，他战斗到最后一刻才冲了出来。话音未落，他和李规一样被执法士兵架了出去，与李规关押在同一间教室里。

接着就轮到钟松了。西安绥靖公署副参谋长沈策严厉指责整编三十六师对全力加强壶梯山阵地的命令置若罔闻，当二十八旅闻风逃窜后，师主力不但不及时恢复阵地坚守待援，反而放弃阵地逃跑以致损失巨大。沈策的话被愤怒的钟松打断了，钟松认为责任是大本营的：

壶梯山战役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大本营对情况判断错误。当整三十八师在合阳喊叫共军的主力在他们的当面时，我们当面早已发现了很多共军，而大本营硬说根据情况判断共军主力在第九十师、三十八师的当面，整第三十六师当面只是少数牵制部队，于是三令五申地要整第三十六师主力集结冯原镇以东，准备策应整第九十师、整第三十八师作战。其实共军声东击西，以少数兵力把整第九十、三十八两师吸引到合阳地区，而以大兵团秘密运动到整三十六师方面。所以当壶梯山战斗一开始，就遭到数倍于我的共军攻击，此时主力又被截成数段，除分别突围外，只有全军覆没。可是大本营把失败的责任推到第一线指挥官身上，如何令人心服！

胡宗南几次企图阻止钟松说下去，但是钟松仿佛豁出去了。最后，忍无可忍的胡宗南拍案而起：“你钟松能干，我胡宗南不好，但是我就不要你干！”

胡宗南的脸气青了，当场下令：“第三十六师师长钟松撤职关押，师长由整第七十六师师长李日基充任，第七十六师师长由谢义峰升任。”钟松仍不服，经大家劝阻，才没有再说。胡宗南气得回到休息室，把桌子一推，全部茶具摔坏了，会也不开了。大家都三五成群地坐在树荫下抽闷烟。还是第五兵团司令官裴昌会提议，找几个人去劝说劝说，可是胡宗南基本部队的将领都不敢去，只好叫了几个非嫡系将领去求情，并向胡宗南保证以后要绝对服从命令

打好仗，同时整编第三十八师把情况扩大的责任推到参谋长慕中岳身上，算是认了错，这才重新开会。

后来李规才知道，胡宗南原准备将他在大荔就地枪决，只是经过将领们的斡旋才改为押解到西安会审。不久，李规在中共和民革地下组织的营救下成功越狱——他“奔赴延安，走上了革命道路”。

澄合战役后，胡宗南采取了宽正面大纵深的防御态势。

同时，西北战场的国民党军整编师、旅恢复了军、师的番号。

九月底，彭德怀决定发起新的战役。这一次，他选定的目标是第十七军和第三十八军。当时，第十七、三十八军和第三十六军残部，位于大荔周边地区，以城镇和村落为依托，防御正面宽二十公里，纵深达到三十公里，各据点之间均有较大的空隙。如果攻击这一地域，可能增援的是距离最近的第七十六、第九十军。

十月五日拂晓，彭德怀部各纵队突然对第十七军据守的各个据点展开全线攻击。一纵三五八旅七一四团直逼第十七军军部，途中歼灭了正在撤退的四十八师的三百多人，俘虏了师长万又麟。同时，二纵、四纵也切断了第十七军与第三十八军之间的联系。

第十七军军长康庄因病在后方治疗，部队由副军长兼十二师师长陈子干指挥。此时，他已经与四十八师失去了联系，正感到有点莫名其妙的时候，突然主阵地受到猛烈攻击。陈子干亲自到前线观察，发现左右两翼都有彭德怀部的大部队运动，他这才证实了四十八师被歼的预感，也知道了攻击他的是西北野战军二纵。

晚上，裴昌会说第三十八军已来增援，但是夜间难以靠拢。于是，陈子干决定趁共军的合围圈还没有完全形成，立即突围。三十六师已经撤不回来了，三十四师也被打垮了，军部直接暴露在攻击之

下，光靠军直属队是顶不住的。陈子干命令部队突围时不准开枪，遇到阻击时用刺刀打开突破口，他想悄悄地脱离战场。但是，先头部队很快就被打回来了，于是改由十二师警卫连开路，绕道沿着洛河摸索前进。当陈子干终于跑出包围圈，与第三十八军取得联系时，已经是六日上午十时了。他用电报命令三十六师自行突围后，就和这个师再也联系不上了——深陷包围的三十六师战斗到六日拂晓的时候伤亡巨大，被迫突围后，侥幸渡过洛河的只有一个营长带领的两百多人，师长张泽民跑进一座小庙休息时被游击队俘虏。

彭德怀接着将攻击的矛头指向了第三十八军。

第三十八军奉命增援第十七军，但是，六日拂晓其前锋五十五师报告说，前面的第十七军正在向后溃退，连五十五师都已经与共军接战了。军部立即命令各部收缩兵力，转移到工事比较坚固的东汉村，那里是一七七师五三〇团的防地。但是，军部刚转移到那里，就发现东汉村附近有共军的大部队在移动。晚上，战事好像缓和了一些。七日凌晨，侦察员报告说，通往大荔的公路已被切断；接着，通信连报告说，军部与兵团指挥部的电话有被共军窃听的痕迹。于是，军部自行切断电话线，中断了他们与兵团指挥部的联系。上午十时，东汉村受到猛烈攻击。从西汉村增援的一七七师受到阻击而不能到达。不久，东汉村守备阵地开始动摇。军部命令预备队出击，但依旧无法冲破包围；军部请求兵团增援，但始终没有得到答复。下午十五时，兵团司令官裴昌会终于来了电报，说兵团司令部正向洛河西岸转移，命令第三十八军固守现有阵地，并说第十七军现归第三十八军指挥。第三十八军好容易找到第十七军参谋长宋志坚，宋参谋长说他身边已经没有部队了。

八日下午十五时，第三十八军军部再次转移，在警卫营的掩护下趁夜色奔向洛河桥。九日拂晓，在洛河桥附近遇到了第一军一六七师

的部队，刚觉得安全了一些，可一六七师一看见第三十八军溃败下来的部队，立即向后撤得不见了踪影。军部只好自己在洛河边上收容散兵，经过清查，共损失官兵四千多人。

第三十八军副军长李振西在战斗前偷偷回了西安。战斗一开始，他就被胡宗南在家里找到了，胡宗南命令他立即返回前线。他出了西安，看见了一片混乱的景象，这种景象令他感到西北战局已经今非昔比：

> 我在途中遇到第九十军、三十八军的眷属，纷纷向后跑。据说前方打得很厉害，部队已经垮下来，当时枪炮声还很激烈，溃兵乱窜，情况已经不允许我继续前进。只好沿着洛河西岸，准备到大荔第五兵团部联络一下再看。可是当我下午四时左右至羌白附近时，第五兵团部已由大荔逃出，正在那里架设电台，同前方联络。据说第九十军、第三十八军情况不明，第一军增加上去，也没有消息。第三十六军只在大荔城内留一个师暂时维持秩序，主力已经撤过洛河。当时我看他们慌成一团，有继续西逃的样子，便又折回，准备随第一军找寻部队。黄昏后，我到船舍镇洛河桥头时，满河滩都是溃兵，也分不出是哪一军哪一师，对岸枪声打成一片。我只好弃车，挤在溃兵伙里一同向西逃跑。直跑到七日早饭时，在蒲城龙阳镇附近，先后碰到了第九十军军长陈子干、第三十八军军长姚国俊、第五十五师师长曹维汉、第一七七师副师长张玉亭，才知道十月五日夜十二时左右，驻永丰阵地第九十军的一个团突然被解放军包围，军与师、师与团之间的对话中断。第五兵团司令官叫第三十八军驻胭脂山上的第五十五师就近派一个团去解围，第五十五师第一六五团刚到永丰镇南塬塬边，就被潜伏的解放军猛袭，立即溃败下来。第九十军军长陈子干听说后路被截断，赶忙向铁镰山上撤退。第三十八军第五十五师受第九十军影响，也退到铁镰山打虎寨附近。天明时东西汉村的第一七七师又被包围。第三十八军军长姚国俊，听说第五十五师撤退了，第一七七师被包围了，也跑到铁镰山……这时两个军部、四个师，都挤到铁镰山上，汽车、大车、炮车塞住了道路，当面解放军跟踪追击，永丰的解放军从中间横插进来，一时乱成一团，根本无法形成有组织的抵抗。空军虽然长时间盘旋上空，但是敌我不分，无法发挥它的作用。七日晚十点左右，我们先后跑过了洛河，直到第二天才在蒲城、渭南一带收住脚，有的还跑到了富平。第三十八军的第一七七师，自六日早突然被解放军包围后，各方联络中断，孤军困守，经过一天激战，伤亡过重，无法继续抵抗。黄昏前后，开始突围。在突围中，第五三〇团全团被歼，团长王力行、营长邹建舫被俘……当日上午增援上去的第一军，由于第九十军、第三十八军均已溃退，也被迫沿洛河东岸退到大荔附近改取守势，七日早也全部撤过洛河。由于当时解放军没有穷追，我们才在渭南、蒲城地区站住了脚。总计是役第三十八军伤亡被俘一万多人，第九十军六千多人，第三十六军一千多人，共计一万七千多人。

第三十八军的重武器几乎全部落在二纵手里。

追击的时候，伤愈归队的王震又与他的大个子警卫员顶撞起来。当他在指挥所里得知七一七团攻下守军阵地后没有及时组织追击时，大发雷霆，高喊：“快传达我的命令，让他们迅速追击敌人！”传达命令的人刚走，第三十六军被冲垮的消息传来。王震看见敌人逃跑，但没有部队追击，急得直上火，刚好警卫员吴宪军在地上摆好了饭菜等他吃，王震一脚把饭菜踢了：“敌人都跑了，还吃他娘个鬼！你赶快给我去三五九旅告诉徐国贤，叫他们马上追击，追到天边也要把敌人给我消灭！”吴宪军告诫王震不能离开这里，要特别小心流弹，然后转身跑了。回来的时候，吴宪军发现王震不见了。他一直追到了十二团，看见一个战士正拉着王震不让他往前冲，子弹乱飞，炮弹四处爆炸，吴宪军飞身扑向王震，王震抡起手里的爬山棍朝吴宪军打去，吴宪军抓住棍子抱住王震，两人便厮打在一起。王震喊：“你敢打人！你违反纪律，要是放跑了敌人，我枪毙你！”身高力大的吴宪军把王震按在地上喊：“你别叫，今天是你的错，你要枪毙我，也得等打完仗！”追击的二纵官兵从他们身边跑过去，官兵们对眼前的情景已经习以为常，只是议论说“司令员和大个子又打起来了”。

十二日拂晓，彭德怀集中全部主力攻击第六十五军。上午十时左右，一纵、三纵、六纵先后攻至东西汉村，将第六十五军一八七师包围，二纵将一六〇师包围在大濠营村。在西北野战军主力的攻击下，第六十五军开始向南撤退。战至下午十六时，三纵歼灭一八七师五六〇团全部和五六一团的两个营。黄昏时分，胡宗南的增援部队突破西北野战军的阻击防线，与一六〇师会合。十三日，更多的增援部队赶到了战场。已经无力决战的彭德怀命令停止攻击撤出战斗。

荔北战役，西北野战军歼敌两万五千余人，伤亡九千六百余人。

壶梯山战斗之前，王震到先头部队检查战役准备情况，当发现连队准备的午饭是玉米棒子时，他对司务长说：“一定得让同志们吃上顿

肉。这是个硬仗，冲在前面的同志，不知有几个能回来。”他让大个子警卫员吴宪军把随身携带的银元拿出来，让司务长去弄肉。等司务长回来了，他亲自动手收拾肉，然后一锅一锅地炒，直到亲眼看见每位官兵都吃到肉为止。大个子警卫员吴宪军目睹过包括他的司令员在内的太多的流血牺牲，还是孩子的他并不十分清楚他们所进行的出生入死的战斗对全国战场的影响有多大，他的心中只有司令员的安危，因为这是他的战斗岗位，为此，年仅十八岁的他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

山东孩子吴宪军并不知道，此时此刻，在他的老家山东，正在进行一场规模更大的城市攻坚战。这次攻坚战，因为揭开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国民党军大决战的序幕而被载入了中国革命史册。

## 济南战役：一次严重作战

一九四八年五月间，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省政主席王耀武从南京返回济南。虽然军事形势已如大战前夜，但他下了飞机哪也没去先回了家。

王耀武走进母亲的房间问安，他自幼丧父，母亲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他是个孝顺的儿子。目不识丁的母亲从儿子的脸上看出他忧心忡忡。王耀武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说济南现在不大安全，建议母亲搬到南京去住。接着，他去了自己的房间。夫人郑宜兰是福州地方法院推事的女儿，是王耀武以连长之职随北伐军入闽时结识的，两人婚后相敬如宾，十分恩爱。王耀武把当前的局势向夫人诉说了一遍，郑宜兰听了很是悲伤，她表示按照丈夫的心愿尽快带着母亲和孩子离开济南，她还安慰丈夫一切不必挂心，放心打仗，打完仗快些到南京团聚。

济南守军很快就知道了他们的司令官南迁家人一事。

谁都知道这一举动无疑是一场血战即将来临的信号。

一九四八年春夏之际，有三座省会城市成为共产党人的攻击目标：华东野战军粟裕部作战范围内的山东济南、东北野战军林彪部作战范围内的吉林长春以及华北军区徐向前部作战范围内的山西太原。战争双方都很清楚：全国的战局发展至此，无论以上哪座城市发生战事，导致的后果绝不是一座城市的得失，而是引燃国共双方大决战的导火索。毛泽东苦苦思索的是，从哪座城市下手才能导致最理想的战争走向?

蒋介石也在紧张地判断，哪座城市的失守会动摇长江以北的整个战线?

王耀武是应蒋介石之命飞往南京的。

在刚刚过去的两个月内，王耀武的第二绥靖区损失近八万兵力，济南周边三百公里的区域皆为共产党人所控制，济南已经成为一座孤城。王耀武深居简出，深思熟虑之后得出两个判断：一、共军必攻济南，二、济南无法守住。王耀武认为，必须果断地放弃济南，将所剩兵力集结在兖州及其以南地区，与驻守徐州战区的部队连接起来，巩固徐州至兖州之间的铁路交通，只有这样山东以至中原战局才有支撑下去的可能。

在南京机场迎接王耀武的，是蒋介石的贴心幕僚陈布雷。陈布雷与王耀武是至交。寒暄之后，王耀武不避讳地说出了放弃济南的想法，陈布雷当即表示赞同，但他也直言不讳地说恐怕无法说服蒋介石。

蒋介石为王耀武安排了家宴。夫人宋美龄亲自下厨炒了几个菜，其中有王司令最爱吃的红烧鸡块炖粉皮。家宴在宋美龄的营造下弥漫

着一种温馨的氛围。酒过三巡之后，王耀武小心地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果然，蒋介石认为必须确保济南。他的理由是：一、济南是华东战略要地，济南至徐州的铁路已修好通车。为了不让华东与华北的匪区打成一片，不让共军掌握交通的动脉，必须守住济南。二、不能使驻扎在青岛的美国海军陷于孤立；否则，不但在军事上，政治上也于国军不利，且会影响美国对我们的援助。三、我们有空运大队，随时可以增派援军。在空军优势的条件下，济南并不孤立，没有后方也可以作战。蒋介石的话令王耀武印象深刻：

> 济南如果被围攻，我当亲自为你督促主力部队迅速增援。只要你能守得住，援军必能及时到达，我有力量来解你的围。为了确保济南，必要时还可以增加防守部队。打仗主要是靠士气，鼓励士气，首先自己不要气馁。你要知道，我们的失败是失败于士气的低落。你们如不发愤努力，坚定意志，将死无葬身之地。

心情矛盾的王耀武去见了行政院院长张群。张群情绪不高："主席总是说政治配合不上军事。兵员粮食困难也要怪我们。军队一打就败，地区不断地缩小，地区愈缩小，兵员粮食就愈没办法。这样下去，真是危险！"王耀武又见了国防部长何应钦。何应钦情绪激愤："抗战胜利后，我们与共产党作战以来，我们的将领送给共产党的礼很多，你也送礼不少。陈辞修曾夸口说只需要三个月、六个月就可以解决共军的主力，可是现在已打了两年多了，不但没有解决共军的主力，我们的军队反而已经被消灭了约有两百多万。这样下去，真是不堪设想。希望你守住济南，不要再向共产党送礼了。"

王耀武返回济南的时候，南京各大报纸都刊登了消息："王司令长官在文化堂信心百倍以告国人——济南城防稳固，工事坚强，部署完成，确有保卫大济南安全之把握。设若奸匪冒险来犯，必予迎头痛击！"

毛泽东原来把夺取第一个大城市并永久占领的希望寄托在林彪身上，因为当时夺取长春的条件最为成熟。长春国民党守军约十万人左

右，正规军和非正规军、中央军和地方军之间矛盾复杂，且具有滇系背景的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正在酝酿起义。但是，林彪认为攻击长春消耗很大，目前还没有必胜的把握，建议围困克城。

六月二十五日东北野战军开始围困长春。

于是，毛泽东将攻克大城市的战略意图转移到山东济南。

七月十六日，毛泽东一天之内起草多封电报，发致华东野战军，催促发起攻击济南的作战行动：

第一封电报发致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谭震林：

> 你们歼灭八十四师后除一部兵力歼灭济宁、汶上之敌，并负责扼守运河要点阻止可能之敌东渡以外，主力应不惜疲劳抢占济南飞机场，并迅速完成攻击济南之准备，以期提早夺取济南。

第二封电报发致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和副参谋长张震：

> ……攻克兖州又歼八十四师甚好甚慰。望鼓励士气，于尽可能短促时间完成对济南之包围［首先夺取飞机场］，并乘胜夺取济南。如果可能，你们应争取于十天内外夺取济南。

第三封电报发致粟裕、陈士榘、张震、许世友、谭震林：

> ……许（许世友）谭（谭震林）已歼灭八十四师，济（济宁）汶（汶上）敌已南逃，邱（邱清泉）兵团可能停止东进。许谭在现地休息一二天，应不惜疲劳减员迅即北上包围济南，并争取于十天内外攻克之。

济南北靠黄河，南倚群山，重要的战略地位使这座古城几乎变成了一座军事要塞。此刻，济南城内驻守着王耀武部九个正规旅、五个保安旅和特种兵部队，兵力约十万。同时，在南面还驻扎着邱清泉、李弥和黄百韬的三个机动兵团约十七万人，一旦济南受到攻击，他们

随时可以北上增援——从战场态势上看，粟裕面临的敌情比林彪面对长春时要严重得多，济南是三座城市中似乎最没有把握攻取的一座。

毛泽东的催促令粟裕很是不安。

华东野战军的内线兵团与外线兵团尚未完全会合，仅靠位于内线的山东兵团很难独立完成既攻济南又打援军的任务——无论攻城还是打援，夺取济南都必将是一场恶仗。且华东野战军主力经过几个月的连续作战，部队减员严重，特别是基层指挥员和战斗骨干损失严重，尚未来得及补充。部队的作战物资消耗甚大，目前秋粮尚未收获，生产和支前存在着冲突，数十万大军作战的粮食供应任务繁重。如果仓促攻击济南，稍有不慎打成夹生饭，后果不堪设想。

粟裕经过缜密考虑致电中央军委，提出目前攻击济南尚有困难，建议休整一个月，然后集中华东野战军主力发动济南战役。

……以许谭现有兵力攻济南与打援，势难得手，如以许谭专任攻济南，兵力虽可，但时间需长，敌仍可能来援。如邱刘（整编六十四师刘镇湘部）两兵团北援，则许谭专任打援，亦感兵力不够。因此，建议许谭与我们争取休整时间一月，而后协力攻打济南，并同时打援，于打援中选择有力阵地，求歼邱兵团之大部或全部，均属可能。为求迅速攻占济南，必要时，此间可抽出几个长于攻坚速决的部队参战［估计有半月时间即可］。只要济南解决，打援方面又取得胜利，则战局可能迅速向南转移，今冬攻占徐州之计划，似属极大可能……

中央军委回电，同意粟裕部休整一个月，但需提出休整完毕后的作战计划。

八月十日，粟裕等华东野战军领导联名向中央军委提出了三个作战方案：一是集中全力转到豫皖苏和淮北路以东作战，目的是“截断徐蚌铁路，孤立徐州”，作战重点是打援，求得在运动中寻歼邱清泉的整编第五军——这个方案的好处是将战争完全推出了解放区，减轻了解放区百姓支撑战争的负担，同时可以分散邱清泉和黄百韬两部兵力，也许能产生打大歼灭战的战机；缺点是大军外线作战，“供应极感困

难”，陇海路又便于敌人机动增援，阻击的压力大，打不好孤立徐州的目的不易达到。二是集中主力首先攻占济南，用必要兵力阻击增援之敌——这个方案的好处是可以使济南守军的兵力和工事不至于继续加强，“便于我军之攻击”，迅速占领济南也有利于“全国战局及政局”；缺点是，济南非短期可以攻占，战时若长，阻援部队负担过重，一旦阻援出现不利，对济南的攻击将会形成僵局。同时，把重兵放在攻打济南上，兖州和济宁等城市可能会被国民党军重新占领，对大局也是不利的。三是将前两个方案合并考虑，攻占济南与阻击打援同时进行，即先重点打援，得手后集中主力攻占济南——这个方案的好处是在预定战场打援便于达成歼敌目的，“只要援敌被歼，则攻济南有保障”。如打援与攻城皆能取胜，就会使下一步“孤立徐州”实施作战成为可能。而且部队依托解放区作战，补给相对容易。

粟裕提出初步战役设想后，同时建议中原野战军主力“向信阳或南阳汉水流域进击”，吸引黄维的第十二兵团南下，“使其不易北援”；陈谢兵团在郑州附近发动攻势，牵制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使其不能东援。

两天后中央军委回电。这是一封著名的长电，大战在即的紧要关头，统帅部与前方将领关于作战方针的讨论皆为商榷的口吻，这种语气温和的作战电报在中外战争史上十分罕见，尽示共产党人的开阔襟怀。

显然，毛泽东与粟裕的想法有很大不同：

……你们所提三个方案我们正考虑中，待你们和许谭会商提出更接近实际的意见以后，再正式答复你们。现我们只提出一些初步感想，作为你们会商时的参考材料：

（一）九月作战，预计结果有三种可能。第一，打一个极大的歼灭战。这即是你们所说的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五军等大部分援敌。第二，打一个大的但不是极大的歼灭战。这即是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分但不是大部分援敌。第三，济南既未攻克，援敌亦不好打，形成僵局，只好另寻战机。

（二）你们第三方案之目的，是为了争取第一种结果。其弱点是只以两个纵队占领飞机场，对于济南既不真打，而集中十一个纵队打援，则援敌势必谨慎集结缓缓推进，并不真援。邱（邱清泉）、区（区寿年）兵团之所以真援开封，是因为我们真打开封。敌明确知道我是阻援，不是打援，故以十天时间到达了开封。如果你们此次计划不是真打济南，而是置重点于打援，则在区兵团被歼，邱黄（黄维）两兵团重创之后，援敌必然会采取［不会不采取］这种谨慎集结缓缓推进方法。到了那时，我军势必中途改变计划，将重点放在真打济南。这种中途改变计划，虽然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好，但丧失了一部分时间，并让敌人推进了一段路程，可能给予战局以影响。

毛泽东的意思很清楚：粟裕仅用两个纵队攻打济南显然兵力少了，国民党军立即就会识破这是在围城打援，于是他就不会不顾一切地增援；如若敌人不积极增援，集中十一个纵队的庞大的打援计划何以实现？其结果很可能是攻城不成，打援也不成。

……在使用许谭全力而不要其余各纵参加，或者即使参加也只是个别的师，至多不超过一个纵队的条件下，我们目前倾向于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达到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援敌之目的，即采取你们第二方案，争取上述第二项结果。我们觉得这样做比较稳当，比较能获结果。因为此次作战，是在区兵团主力被歼，邱黄又受重创，二十五师（黄百韬部）后撤的情况之下，虽然新来了八师（李弥部）、六十四师（刘镇湘部），至多只能抵上区兵团主力之被歼及二十五师之后撤。你们集中六至七个纵队不但能阻住援敌于适当地区，而且能歼灭其一部分，至少能保障攻克济南。这就是我们所想的攻城打援分工协作计划。

粟裕明白了，毛泽东认为阻援不足以动用十一个纵队的兵力，只要六七个纵队，不但能阻击住，而且还能歼敌一部，这样就可以从阻援兵力中腾出四五个纵队用于攻克济南。

不管你们采取第二方案或第三方案，在兵力部署方面，叶飞（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所指挥的三个纵队，应于本月下旬结束整训，北移嘉（嘉祥）巨（巨野）地区。已经在北面之各纵及正在移动中之第三纵，则应适时驻于兖济或其以南地区。即是说，除韦（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司令员韦国清）吉（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副政治委员姬鹏飞）之五个旅可以临时决定参战位置外［该部似以担任攻击徐蚌段为宜］，一切正规兵力均应位于正面，先求阻击，然后寻机歼其几部。而不要企图以叶飞三个纵队尾邱黄之后，作夹击邱黄之部署。如果你们是企图打援，则邱黄决不分散走两路而让你们夹击其一路。那时敌之部署，极大可能是以一部位于运河以西［例如金乡］以钳制我军一部，而以主力沿津浦路北进援济。或者相反，以一部扰击津浦路，而主力沿运西北上援济。因此，我军必须事先先夹运（运河）而阵，并构筑几道防御工事，以便随时转移兵力于运东或运西阻击与歼灭援敌。

毛泽东对粟裕预想的打援计划也提出了异议，认为采取尾追分割的办法不妥，建议在运河两岸设置伏击战场。

粟裕表示坚决执行军委的部署，但坚持济南战役分两个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以足够（兵力）攻占机场及达到吸引援敌之力量［约两至三个纵队］，使用于济南方面外，其余应全部使用于打援，以求于第一阶段歼援敌六个旅，迫使援敌其余各路不敢继续猛进。然后于战役第二阶段集中主力［东兵团全部及西兵团三至四个纵队］攻占济南，仅以一部担任阻援。如此才能争取攻济时间，才能保证打援无问题……

济南毕竟是一座重兵驻守的大城市，在它南面的豫北和苏北一带，又有随时可以机动增援的众多兵力，作为前方战场指挥员，粟裕必须在战前想到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比如国民党军以大兵力迅猛增援，一旦突破我军的阻击防线，济南城内的守军也许会趁势反击而出。但是，毛泽东断定国民党军已难以实施大规模的协同作战。如果国民党军是一支上下一致、彼此协同、全力作战的部队，我军对攻击济南这样的大城市必会三思而行。

粟裕要求调苏北兵团主力参战以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

中央军委批准苏北兵团除在苏北留两个旅之外，其余两个纵队加一个旅全部北上参战。同时再一次致电粟裕：

粟裕同志：

……此役关系甚大，根据敌我两方情况，你的顾虑是有理由的……攻克济南之时间不能预先只规定一种，而应预先规定三种，即二十天、一个月、两个月。这三种时间中，我们固然要争取第一种，其次是第二种，但这在战役发起之前只是一种理想，是否实现要依攻击过程中敌之防御能力如何才能确定。或者二十天左右即可攻克，这样我阻援兵团是有把握阻得住援敌的［包括歼敌一部分］；或者要一个月左右才能攻克，这样我必须歼灭援敌几个旅，虽然不一定是六个旅，但歼其三至四个旅是完全必须的，否则就不能阻住援敌，我攻济必功败垂成。但最重要者是一个月左右还不能攻克济南，必须大量歼灭援敌，例如六个旅、八个旅或更多些，根本停止了援敌前进，给我以所需要的一切攻城时间，例如一个半月，两个月，或更多些［打临汾曾费去七十二天］才能克城，你们的根本出发点应放在这种情况上。

我们不是要求你们集中最大兵力，不顾一切硬攻济南，这样部署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要求你们的是以一部兵力真攻济南［不是佯攻，也不是只占飞机场］，而集中最大兵力于阻援和打援……在此种形势下同意你的意见，第一阶段以足够攻占机场及吸引援敌之力量［两至三个纵队］用于攻城，其余全部用于打援。依情况发展，如援敌进展得慢，而攻城进展顺利，又有内应条件，则考虑增加攻城兵力，先克城，后打援；如援敌进展得快，则应全力先打援，后克城。

军委

俭（二十八日）丑（夜）

至此，“攻济打援”的作战方针基本形成。

在随后致许世友的电报中，毛泽东特别阐述了“攻济打援”的意图所在：“此次作战目的，主要是夺取济南，其次才是歼灭一部分援敌，但在手段上即在兵力部署上，却不应以多数兵力打济南。如果以多数兵力打济南，以少数兵力打援敌，则因援敌甚多，势必阻不住，不能歼其一部，因而不能取得攻济的必要时间，则攻济必不成功。”

华东野战军制定的作战计划是：以三十二万总兵力的百分之四十四约十四万人攻击济南，同时以百分之五十六的兵力约十八万人阻援。攻城的主攻方向是济南城西，因为西面守军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有战场起义的可能。

野战军组成了攻城兵团和打援兵团：

攻城兵团战斗序列是：第三纵队八师、九师，第九纵队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师，第十纵队二十八、二十九师，第十三纵队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师，两广纵队三个团，渤海纵队七、十一师，鲁中南纵队四十六、四十七师，渤海军区四个团，冀鲁豫军区六个团，野战军司令部警卫团，特种兵纵队一部。打援兵团战斗序列是：第一纵队一、二、三师，第二纵队四、五、六师，第四纵队十、十一、十

二师，第六纵队十六、十七、十八师，第七纵队十九、二十、二十一师，第八纵队二十二、二十三师，第十二纵队三十五、三十六师，鲁中南纵队四个团，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第三旅，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旅，特种兵纵队一部。

攻城兵团以第三、第十纵队以及鲁中南纵队组成西兵团，由十纵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刘培善统一指挥，攻占机场后向内城发展。另外，西兵团还负责指挥两广纵队、野战军警卫团、冀鲁豫军区部队围攻济南以南的长清和济南以西的齐河。同时，攻城兵团以第九纵队和渤海纵队组成东兵团，由九纵队司令员聂凤智、政治委员刘浩天统一指挥，肃清济南东郊外围据点后协同西兵团攻城。攻城兵团以第十三纵队为预备队，配属在济南的东南方向。

打援兵团则按照“夹运而阵”的部署：第四、第八两纵队及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第三旅位于鲁西南的金乡、城武、巨野、嘉祥地区，构筑防御工事，阻击可能由豫东商丘和皖北砀山地区出动的援军；以鲁中南军区四个团及第七纵队一部位于鲁南滕县至官桥之间，准备阻击自徐州方向出动的援军；以第一、第六、第七纵队主力、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苏北兵团第二、第十二纵队，配属纵队炮兵第二、第三团的两个连，集结于济宁、兖州和滕县以东地区，待机歼灭沿津浦路北上的援军。

粟裕计划九月十六日发起攻击，预计十五至二十天攻克济南。

蒋介石深知“济南稳则徐州稳，徐州稳则中原稳”。一九四七年二月莱芜战役失利后，他曾亲自到济南当面告诫王耀武：“济南在政治、军事、地理上都很重要，如发生问题你要负责。”但是，到了一九四八年春，济南至潍县、济南至青岛和济南至徐州之间，国民党军各部都已被一一歼灭，济南周围三百公里的地区都已被华东野战军控制。美

国军事顾问团主张将王耀武部从济南撤至徐州，但蒋介石坚持认为这是美国人不懂得中国军事地理而提出的糊涂建议，济南必须固守。

九月初，蒋介石得知华东野战军开始向济南方向云集，立即命令将驻守青岛的整编七十四师（孟良崮战役后重建）五十七旅和驻守徐州的整编八十三师十九旅紧急空运济南。同时命令邱清泉的第二兵团集结于豫北商丘一带，黄百韬的第七兵团集结于苏北新安镇一线，李弥的第十三兵团集结于苏北宿县一线，以备北上增援济南。

王耀武的幕僚们一致认为，共军绝不会放过济南，济南很快就会受到攻击。因为，一、共军为了巩固后方必须占领济南；二、共军已经具备了相当的攻坚能力；三、之前，共军对胶济铁路、津浦铁路和济南附近地区的公路不断破坏，最近却一反常态开始加紧抢修；四、共军又开始大量释放被俘官兵了，在莱芜战役中被俘的大部分军官已被释放回济南，同时共军对潍县、兖州战役中失散的国军军官家眷给以格外照顾，每人都发了路费让他们回到济南城，连从潍县等地跑到济南的商人也到处说共军如何好，要知道，共军每在大战发动前都要做这些工作。

王耀武知道，由于整个城防防御正面太大，兵力不足导致机动兵力很少，而守备区域内处处都要设防，拿第二绥靖区参谋长罗幸理的话来讲，济南防御系统犹如“大人穿小孩的衣服”。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加强每一个据点的防御工事。王耀武下令济南全城征工征料。他亲自视察施工情况，重点检查机场、四里山、千佛山、砚池山、茂岭山、洪家楼、黄台山等主要据点。为了检验坚固性，他命令炮兵对准砚池山和茂岭山工事进行破坏性轰击，结果令他十分满意。他对陪同他检查的整编七十三师师长曹振铎说：“这样坚固的工事，共军想攻下一个据点，是极不容易的事。我们如再守不住，那真太无用了。”曹师

长说："我在抗战时也没有做过这样好的坚固工事。我们的工事做好了，就怕共军不敢来；如来攻，定会把他们击败。"

为了抢夺粮食，蒋介石用四架运输机空运来大量的金圆券，王耀武命令各部队或在解放区的边缘，或派人潜入解放区的内部，用金圆券将村镇百姓手里的粮食抢夺殆尽。为了解决兵源不足问题，王耀武开始扩编地方武装，先是招募社会闲杂人员组成了约两千人的"救民先锋总队"，又招收青年学生组成了约八千人的"青年教导总队"。国防部军事新闻通讯社少将主任刘子瑛急就特写一篇，题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王耀武认为文章写得很好，特送刘子瑛面粉十袋煤炭一卡车。接下来，士气是个大问题。王耀武深知，打仗不是打谁的兵多，最终打的还是士气。此时，国民党军中认为打不赢共产党已成共识，这种念头经过被释放回来的被俘官兵的宣传得到进一步强化，最令人担心的是这种想法在军官中尤为普遍。王耀武决定采取"正面教育"的手段。他评选"战斗英雄"，为立功官兵授奖，还指示商会出钱、妇女会出人组成"慰劳队"，去部队赠送慰劳品，演戏、唱歌，替官兵缝补浆洗。提高王耀武的个人威望，也是提高士气的重要内容，济南各大报刊连续刊登吹捧文章，称誉王耀武"当年三捷长沙，近日砥柱黄河，古城名将，相得益彰，济南城防，坚如磐石，固若金汤"。

但是，蒋介石认为，王耀武本人的士气就很成问题。他先后派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和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来济南视察防务。郭汝瑰是工兵出身，他对王耀武就城防阵地的构成作了理论上的阐述，比如他认为城内修建的碉堡过于暴露，容易受到火炮的直接轰击，建议把几只羊放到碉堡里去开炮试一试。杜聿明则热衷于他在东北与林彪作战的体会，不但没有对济南防务提出任何积极的建议，反而与王耀武的高级将领们发生了冲突。因为王耀武希望徐州方面至少调来一个师加强济南防御，而无论是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还是杜聿明，都不可能再抽出一兵一卒给济南，因为他们必须确保徐州的安

全。杜聿明说，只要加强工事，济南便可以守住，只要守上十五天，增援部队就可以到达，如果守不住，再增加多少兵力也同样守不住。王耀武的高级将领们根本不相信增援部队能在十五天内到达，而如果不增兵，济南顶多能守上三五天。杜聿明很生气，他向蒋介石报告说，济南守军将领的思想有问题。还是陪同视察的陆军总部第三署署长徐志勖和副署长程有秋说了真话：济南防御摊子太大，兵力和火力都显不足。

王耀武利用现有兵力制定了济南城防部署：济南全城被划分为东西两个守备区，守备的重点是机场以西以南。东守备区自城北洛口至城南八里洼，以外围黄台山、茂岭山、砚池山、千佛山一线为主阵地，由整编七十三师十五、七十七旅和整编第二师二一三旅、特务旅、保安六旅等部队防御，整编七十三师师长曹振铎统一指挥，司令部设在城内窗后街西头。西守备区是城北洛口至城南八里洼一线以西地区，以外围周官屯、白马山、青龙山、张庄飞机场、商埠西端一线为主阵地，由整编八十四师一五五、一六一旅、整编第九十六军独立旅、整编第二师二一一旅、青年教导总队、救民先锋总队和保安八旅等部队防御，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兼整编八十四师师长吴化文统一指挥，司令部设在城西的商埠。同时，以空运济南的部队为总预备队，由整编第二师师长晏子风统一指挥。

九月十四日，王耀武再飞南京，请求蒋介石必须增加济南的防御兵力，至少要给一个师。王耀武反复陈述：过去与共军作战，增援部队大多没有到达指定位置，原因是对共军的阻击能力估计不足。如果济南受到攻击，增援部队不能及时赶到，济南就危险了。蒋介石终于答应将整编七十四师从徐州空运到济南。得到了一个师，虽然还是口头上的，王耀武稍微松了一口气。但当蒋介石把他带到紫金山中的一块空地时，他的心情再次异样起来。蒋介石对他说，这里是筹划中的国民革命军将军墓地，少将以上的将领战死都将埋在这里，图纸已经

画好，只是时局紧张不知能否按计划施工。接着，王耀武再次听到了蒋介石近来频繁重复的那句话：我们弄不好会死无葬身之地。

离开那片长满青草的山坡，王耀武立即回到自己在南京的别墅看望母亲、妻子和孩子。母亲老泪纵横，妻儿悲喜交加。王耀武只在家里待了一个晚上就返回了济南。他不知道的是，与母亲妻儿一别，此生竟天各一方。

九月九日，华东野战军攻城部队自济宁、汶上、泰安和莱芜地区向济南隐蔽开进，至十五日夜逼近济南城下。

王耀武判断共军的主攻方向在西面，目标首先是占领机场，遂将预备队整编八十三师十九旅调往机场方向，并将整编七十四师五十七旅收缩入城，准备用于城西防御。

十六日午夜，济南战役正式打响。

华东野战军攻城兵团在东、西、南、北各百里的广阔范围内，同时向济南外围据点发起猛烈攻击。根据济南外围据点纵深大、空隙多的特点，各部队迅猛穿插，大胆楔入，开始割裂济南外围的防御系统。西兵团十纵由西向东攻击，拂晓时分，守军十九旅五十五团闻风撤退，二十八师官兵追敌至济南以西的古城附近，歼灭整编第二师二一一旅的一个团部。在向古城攻击时，突击部队一度受阻，后改用土工作业的手段挖掘交通壕近敌。夜幕降临，二十八师在开阔地的深壕内再次发起攻击，守军最终放弃阵地逃跑。此时，二十九师已开始攻击玉符河边的常旗屯据点。常旗屯据点是敌二一一旅旅部所在地，前面的玉符河宽约百米，深约两米，坝高三米，河边堡垒成串，设置有地雷区。二十九师八十七团三营在营长胡成群和教导员刘华的率领下，强渡突破。七连三排长张宪臣率领全排边涉水边攻击，三十九名官兵，攻击到堤坝前时，只剩下了腿部受伤的张排长和参军才一个多

月的战士李洪绪。张排长踩着李洪绪的肩膀爬上堤坝，炸毁一座地堡之后，用绑腿将李洪绪拉上来，两人在守军反扑时坚持不退，一直等来后续部队。

西兵团的两广纵队和野战军警卫团包围了济南西面的长清县城。长清是济南外围防御的重要据点，由县自卫队两千余人负责防守，最高指挥官是这个县的县长。县长在西兵团开始攻城后，命令守军在东门里的大操场集合，准备济南方向的增援部队到达时趁势突围。但是，左等右等不来。上午十时传来消息说，增援的整编第二师受阻来不了了，县长立即命令部队回到原阵地上。可是，西兵团的官兵已经攻入城内。据守县城南门外险要阵地石麟山的守军也跑回来了，被守城官兵用绳子一个个从城墙外拉进了城。石麟山丢失，长清也就完了。于是，县长又命令全体到北门集合，准备突围。此时长清城里已经大乱，试着从北门突出去的先头部队很快就没了消息。紧跟着，县长也没了踪影，听说他绕到西北角逃出去，但没逃多远被解放军捉到了。长清县守军，除被打死打伤之外，其余全部被俘，被俘官兵被解放军集合在一起，俘虏们这才发现，腰插驳壳枪向他们交代俘虏政策的竟然是保安队十二中队队长。俘虏们彻底绝望了，一起混饭这么长时间，竟然不知道队长原来是潜伏的共产党。

东兵团九纵的攻击目标是城东的防御高地茂岭山和砚池山。茂岭山是济南防御体系中重要的外围阵地，就在这里受到攻击前的几个小时，王耀武还到这里检查了工事。茂岭山守军是整编七十三师十五旅，王耀武上山的时候，十五旅官兵正在用门板构筑类似屏风一样的障碍物。王耀武一见就火了：“做这个有什么用？茂岭山、砚池山是济南城东的屏障，关系济南存亡，将来失掉，我要杀人！”官兵强调现在已很难征到修筑工事所需的材料，王耀武一面指示赶快把材料运上来，一面指示把不合格的碉堡炸掉重修。官兵正在炸碉堡的时候，东兵团的攻击开始了。九纵二十五师七十四团的三个连同时发动冲击，

四连八班首先攻占一座碉堡，一排在东北角爆破成功，二排在连续攻击后全排只剩下九人，但最终还是将守军压缩到了茂岭山阵地的西南角。两个小时后，七十四团占领茂岭山主阵地，并且迅速扫清山腰残敌。此战，七十四团伤亡巨大，战斗中人员连续合并五次，最后全团只能编成三个排。与此同时，二十五师七十五团在付出重大伤亡后，攻占了砚池山阵地，阵地上还活着的六十名守军投降。

茂岭山和砚池山相继陷落，令本来以为这两个高地至少能够守上十天半个月的王耀武顿感意外，他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解放军以火力封锁守军堡垒的射击口，奋不顾身、一波又一波地向前猛冲，并向堡垒里投掷爆破筒，堡垒很多处被炮火及爆破筒炸坏。整编七十三师也集中炮火向来攻的解放军猛烈还击，掩护防守茂岭山、砚池山的部队反击，双方争夺甚烈。此时解放军又增加部队冲上来，并以猛烈炮火阻止守军增援，守军伤亡颇众。被视为济南屏障的茂岭山、砚池山，经一夜的血战，被解放军占领了。有的官兵被炮火及炸药的爆炸震晕过去，醒来后方知阵地已被占领，他们已经做了俘虏。在茂岭山后面的十五旅的一个营，未与解放军激战，即由该营营长朱国华带着向后撤退。七十三师师长曹振铎派人拦住，并向我报告要求加以惩办。我为了镇压部队溃退，就命令按'连坐法'把朱国华枪决了。"——这个名叫朱国华的营长被押到洛口以南凤凰山附近的一座小石桥边，被执法队一枪打死了。无法得知这位营长还没看见共产党军队就向后跑的真正原因，他也没有机会为自己申辩了。

东面两个重要高地的丢失，给王耀武造成很大的压力，他认为自己原来判断华东野战军从西面主攻是错误的，于是将已经部署在西面的十九旅和五十七旅调了回来，同时命令整编七十三师预备队和十九旅一起向茂岭山和砚池山反击。但是，反击未成，伤亡巨大：四十八团团长李朴阵亡，二三〇团团长周羽重伤——"好好的队伍，从东到西，又从西到东，只晃了这么几下，就晃完了。"被俘的国民党军军官

埋怨王耀武只知道把预备队来回调动。而王耀武不知道，正是他将西面的预备队调往东面，从而使得华东野战军预定的主攻方向上兵力薄弱，这对日后的作战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十七日，王耀武接到蒋介石的电报，蒋介石告诉他："共军有以优势兵力在我援军尚未到来以前攻下济南，再集中力量向我北上援军反击的企图，望我官兵报定与济南共存亡的决心，必能将敌击溃。已令刘总司令、杜副总司令督促援军向济南迅速前进。"但是，就在王耀武接到蒋介石电报的时候，他在《中央日报》上看见了这样一条消息："济南外围已有接触。战云笼罩下之秋季会战显有在津浦路中段进行之迹象。"——王耀武明白了，这绝对是刘峙搞的鬼，此刻强调徐州防卫，目的就是不增援济南。果然，王耀武给刘峙打电话，刘总司令根本就没有增援济南的任何打算。

十八日，战斗集中在西面的飞机场和东面的马家庄。

凌晨二时，在济南以西防御的整编第二师二一一旅旅长马培基让卫兵弄来了月饼，他对独立大队大队长瞿赓扬说："老弟，我们过个节吧。"瞿队长明显感到了马旅长悲凉的心境，言外之意是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打死了。吃完月饼，瞿队长率领两个连发动反击，这两个连的骨干全是"中美训练班"出来的学生，作战凶猛，果然把当面的一支攻击部队压了下去。但是，攻城西兵团拿下机场的决心已定。此时，从徐州来的整编七十四师正在空运，当炮弹落到跑道上的时候，满载后续部队的运输机根本没有降落，立即掉头飞走了。

已经被空运到济南机场的整编七十四师的七个连，由五十八旅一七二团团长刘炳昆率领。刘炳昆是王耀武的老部下，长期受到王耀武的关照，在此危急时刻见到王耀武他有些激动。尽管他带来的这七个连没有任何武器，因为刘峙连轻武器都没让他们携带，但是刘团长还是向王耀武要求战斗任务，并且要求把他派到作战最吃紧的地方去

——刘炳昆的七个连到军械仓库领取枪支弹药后，被派往东面战斗最残酷的马家庄。

华东野战军攻城东兵团攻占茂岭山和砚池山后，立即向济南外围城垣发起攻击。王耀武命令守军在马家庄一线建立阻击阵地。东兵团攻击部队集中炮火掩护步兵反复冲锋，一度占领了马家庄的一半阵地。王耀武命令十九旅上来增援。东兵团的官兵利用房屋作掩护阻击十九旅，十九旅则在房屋墙壁上打洞强行推进，致使马家庄一线每房必争，双方都付出了很大的伤亡。十九旅旅长赵尧亲手枪毙了十几个溃兵，但依旧不能阻止士兵怯战。战至午后，赵尧负伤，十九旅“死尸累累，伤兵后运，络绎不绝”。

就在战斗胶着的紧急时刻，王耀武听到了一个令他彻底绝望的消息：负责济南城西防御的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兼整编八十四师师长吴化文倒戈了。

吴化文，出生于山东掖县一个农民家庭。十七岁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原大战时追随韩复榘后又投靠蒋介石。抗战时期，被汪伪政权任命为第三方面军上将总司令。抗战胜利后，他奉蒋介石的命令开赴兖州，担任兖州周边铁路掩护和维修任务，以保障国民党中央军李延年部北进受降。一九四七年五月，出任整编八十四师师长。潍县战役中，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陈金城被俘，王耀武为了拉拢吴化文死守济南，保荐他升任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兼整编八十四师师长，指挥相当于八个旅的兵力，负责济南城西守备。吴化文是国民党地方军出身，一直与黄埔系貌合神离，加上他从军打仗只为自己的实力，因此随着历史的沉浮不断地改换门庭。内战爆发后，他认为蒋介石军事力量强大，又有美国人的援助，因此对蒋介石抱有幻想，但同时也时时提防着自己被吞并。随着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节节胜利，特别是整编八十四师的一个主力旅在大汶口被围歼，他在恐惧中开始重新考虑自己

的前途。吴化文倒戈经过十分复杂，他对于共产党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他当过伪军的历史更是他心中不可化解的疙瘩。共产党人对他的策反几乎动用了他身边所有的人，包括他的夫人。在围攻济南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共产党方面在加大军事打击力度的同时，也加大了对他的政治争取工作。共产党人提出上、中、下三策供吴化文选择：一是单独起义，解放济南；二是里应外合，配合解放军解放济南；三是顽抗到底。共产党人正告吴化文：解放军一定要解放济南，一定能够解放济南。为自身着想，他必须早日有所行动，如果不能扣住王耀武，让出路来也算立功。

十九日晚，吴化文率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部和整编八十四师师部以及一五五旅、一六一旅、独立旅等部约两万人宣布起义，并将济南机场和周围防区移交给了宋时轮、刘培善指挥的攻城西兵团部队。吴化文在起义通电中说：

……自倭寇入侵，全国燃起抗日烽火，化文等于抗战初期，奋起御侮，并无二致。嗣受蒋贼曲线救国政策所愚弄，丧失民族立场，铸成大错。抗战胜利以后，人民巨创深痛，乃复昧于大义，重受蒋贼欺蒙，参加反共、反人民内战，一错再错，罪孽弥深，清夜扪心，渐悔交迫。爰于九月十九日率全体官兵，在济南战场，毅然起义，图能力赎前失，走向光明大道。今后誓当站在人民立场，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主张，服从中共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与华东诸军政首长领导，在人民解放军的统一号令下，为坚决驱逐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为彻底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完全解放全中国人民而忠诚奋斗，凡人民解放军宣言所载之各项基本政策，诸如打倒蒋介石独裁统治，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惩办内战罪犯，肃清贪官污吏，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废除蒋介石统治之独裁制度，实行人民民主制度……皆系中国人民之迫切要求与救国救民之最好途径，化文等必当奉为圭臬，引为准绳，鞠躬尽瘁，永矢不渝……

吴化文的战场倒戈，对济南守军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对于王耀武。王耀武平时对吴化文没有丝毫警惕。杜聿明来济南视察城防时，曾提醒王耀武要警惕吴化文的反复无常，王耀武却表示吴化文不会有什么问题。九月十七日那天，王耀武视察茂岭山阵地后约见吴化文，发现吴化文的表情有点慌张。吴化文走了之后，王耀武还对身边

的人说，吴军长被共军吓糊涂了。从那时起，王耀武打电话总是找不到吴化文，接电话的人说他去部队了，其实他正在准备起义。

十九日晚，整编八十四师一五五旅的一个团长跑到王耀武那里，惊慌地报告了吴化文倒戈的消息。王耀武大惊失色，立即派特务团、装甲汽车连加强司令部的警卫，同时分别给蒋介石和刘峙打电报报告情况：“吴化文部投共，济南腹背受敌，情况恶化，可否一举向北突围？”王耀武连夜拟定了坚守和突围两种方案。由于觉得突围不可能得到蒋介石的批准，于是仍然决定固守待援。而实际上，他已经决定出逃。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牟中珩回忆道：

> 王耀武用急电将吴化文起义情况报告蒋介石，并立即召集副司令官牟中珩、参谋长罗幸理到其室内，惊慌失措地说：“吴化文投敌啦！济南大势已去，我要到第一线的开元寺去，今后的战局由罗参谋长负全责指挥。”当时罗幸理看了我一眼说：“可由副司令官负全责。”王耀武说：“不行！副司令官与吴化文意见很深，留在此地恐怕吃他的亏，也要离开。”罗已知王耀武要逃走，乃对王说：“那好吧！我本想与济南阵地共存亡，这样我也不准备牺牲啦，我准备被俘。请司令官到了后方时，对我妻子的生活关照一下。”王又指示罗：“一般文件即行烧毁，只带重要文件，速将绥靖区司令部移往城内省政府去，将原来重点坚守商埠的计划，改为坚守济南城。”随后，王耀武又找来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庞镜塘、第四兵站总监部副总监郑希冉［带一小包黄金］以及副官、卫士数人，策划一起逃走。王、牟、庞、郑等人首先到了四里山二一三旅旅部。王耀武给前方两个旅长打了电话，令其坚守阵地。然后伙同泰安县长及便衣队十数人［王耀武是泰安县人］，加上庞镜塘、郑希冉等一起向南逃窜。我见王耀武向南逃走，心想我是黄县人，应往东走，将来可以回家或到青岛去，于是决定不与王耀武同行，便由四里山回到司令部，与罗幸理见了一面。当时罗幸理正忙着往城内搬家，对我说：“那好吧！咱们自便吧！”我离开司令部后，便沿着黄河南岸东行，逃至高密县境内，就被当地解放军查获了。王耀武、庞镜塘、郑希冉等人向南逃窜，因城南系山区，解放军兵力布置得较密集，他们又转回洛口企图北逃，选了几条路，均未走通。整整窜了一夜，就是钻不出去，天明时只得又回到城内。

九月二十日，济南外围防御据点已被全部扫清。

华东野战军准备攻城了。

在《华东野战军秋季会战战勤计划》里有这样的内容：预计南北线伤亡五万人，其中阵亡的约占百分之二十，共一万人（北线四千

人，南线五千人），每人包尸布五丈（一尺二寸阔土布），共需土布五万丈（北线两万丈，南线三万丈）。另需准备百分之十的干部棺材，共一千口（北线四百口，南线六百口）——毛泽东说：“此次攻济是一次严重作战”。

的确，血战即将开始。

## 济南战役：不停顿地攻击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五日，毛泽东致电粟裕、谭震林，指定正在养病的许世友担任济南攻城部队指挥员：

> 此次攻济是一次严重作战，请考虑在许世友同志身体许可情况下，请他回来担任攻城主要指挥员，王建安（山东兵团副司令员）同志辅之。因王初到东兵团，不如许之熟悉情况，据饶漱石同志说，许休息若干天是可以回部工作的。攻济任务完成，他仍可去休息。如何，请酌办。

济南攻坚注定要付出巨大牺牲。

毛泽东看重的是许世友勇猛的作战作风。

接受任务的许世友认为，济南攻坚必须像杀牛一样杀其要害，对济南守军要采取“牛刀子战术”：集中兵力和火力，东西并举，数把尖刀冲开血路，向守军的心脏凶狠地剜下去。许世友给攻城各部队提出的要求是：不能摆困难，不能找借口，各自解决自己当面的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停止攻击！要不停顿地攻击！攻击攻击再攻击！

吴化文的战场起义，使济南城防西线敞开了一个口子，城内守军正在惊慌失措中调整部署以封堵缺口。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连续突击，绝不能给敌人以喘息的时间。九月二十日，粟裕电告许世友、谭震林以及第十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刘培善：“……战局可能迅速发展，望令各部就现态势以三、十及十三纵并力迅速向商埠攻击，

得手后则全力攻城。”许世友命令西兵团当晚对济南城西守备区商埠发动攻击，并将总预备队十三纵投入到这个作战方向。

就在许世友即将发动攻击的时候，中央军委致电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提醒他们必须保障济南外围的安全，因为吴化文已经起义，而攻城兵团又即将发起攻击，王耀武很可能向天津或青岛或临沂等处突围逃跑，“华东局应立即布置通往临沂、枣庄、青岛、运河、鲁西南各路之地部队及民兵的节节堵击，是为重要”。并通报说，“刘峙已令邱清泉兵团集结临城待命援济”，“应迅速集结阻援打援兵团，全力于邹（邹县）滕（滕县）地区”，准备歼灭邱清泉的援军。为此，粟裕迅速调动打援兵团在济南外围形成了三道防线，并将叶飞的第一纵队主力放置在济宁与兖州之间适时机动。

没能逃亡出去的王耀武此时的绝望是可以理解的：没有任何外围阵地可以依托，西面防线已经敞开口子，在援军可能来援的各个方向上粟裕的十八万人马正严阵以待，而济南城下许世友的十四万部队已经跃跃欲试，那么还有什么理由要坚守下去呢？王耀武分别给徐州和南京发出电报，再一次提出了向北突围的请求，结果遭到蒋介石的严厉斥责：

俊才弟鉴：吴逆叛变，事出非常，闻之痛心。陈明仁守四平街，知不可守而守之，东北数省赖以保全。济南之于华北，亦犹四平之于东北数省，战略要地，务从固守，各路援军已兼程急进矣。

蒋中正 民国三十七年九月二十日

王耀武看了电报，在“固守”二字旁画了四个圈，在“援军”二字旁画了四个叉。然后他对身边的参谋长罗幸理说：“七点召开旅长以上军事会议，决定死守，团长赵峙山（第二绥靖区特务团团长）也来。”

会议气氛惨淡。罗参谋长首先读了蒋介石、顾祝同、刘峙的几封来电，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没人吭声。王耀武发言说：“老先生是英明的，我们要相信他。济南是战略要地，他责令我们固守，杜副司令并已亲自督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等三个兵团来援，只要我们能坚守一个星期，援军定可到达。老先生是关怀我们的，我们应当听从老先生的指示，尽力坚守。”

一散会，王耀武下令征召城内壮丁补充部队，将老幼妇孺全部疏散，并且在攻守双方的分界线上设立明显的标志，以利于空军大面积的轰炸。除此之外，他还做了一件特殊的事，这件事显示出他内心极度的不安和矛盾：他打电话给军法处和军事监狱，命令将所有在押犯人全部释放。对于关押的共产党员和俘虏的解放军官兵，军官发给金圆券五元、士兵三元，全部送出城去一个也不许伤害。

王耀武知道共产党军队首先攻击的应该是吴化文让出的阵地。他命令部队占领济南城西商埠的土围子，掩护主力迅速变更部署：守备黄河南岸的特务旅和保安部队，以及守备外围的所有部队全部撤回市区，配置在外城和内城各要点；守备西区的整编第二师二一一旅和保安部队配置在商埠的各要点上；以整编七十四师一七二团的七个连和保安部队一部，固守绥靖区司令部所在的邮电大楼。王耀武心里很清楚，商埠守不了多长时间，因此命令将外城和内城城墙附近的民房拆毁以扫清射界。于是，在共产党军队还没有攻城的时候，济南的外城和内城附近就燃起了大火。

济南外城以西是一片狭长的工业和商业区。如果要接近济南西边的外城，必须首先占领这个区域。这个区域的四周挖有宽九米、深六米的外壕，外壕的里侧是约三米高的围墙，沿着围墙每隔二十米修有一座地堡。而在商埠内，各大建筑物上都设有双层射击阵地，四周用

沙袋构成掩体，形成能够独立作战的支撑点。在各主要街巷和路口，还有活动堡垒、地堡、鹿砦和栅门。

九月二十日，皓月之下，炮火骤起，呐喊震天。

攻城部队从西、南、北三面对商埠发动了猛烈攻击。

从北面首先插入商埠的，是十纵二十九师八十五团。副团长刘竹溪率领先头营冲到官扎营前街西口的时候，守军已经溃逃，但守军已将西门用土坯砌成的很厚的土墙封闭，马匹和辎重无法通过。官兵们把重武器从马背上卸下来用人背，继续往里冲。当冲到官扎营东口和天桥以西时，遭到了天桥至火车站一线守军的火力阻截。这时，三营和特务连上来了，三营长刘振溪向刘竹溪报告说，七连的看护员李恩海是济南人，对这一带路很熟悉，可以当向导。刘竹溪与李恩海商定绕过正面守军的路线之后，决定留下二营钳制当面之敌，自己率领三营和特务连绕路前进。

商埠区内到处是枪声和混战的呐喊声，黑夜里穿行在复杂的街巷里如同进了迷宫。三营和特务连迅速绕过天桥，穿过铁路，插到了馆驿街与小纬一路的十字路口。刘竹溪把八连和特务连留下攻击街心的碉堡，其余部队沿馆驿街北侧继续向东前进。大街上到处是守军的街垒和火力点，他们不得不采取从街巷和院落中横穿而过的方式。他们携带着大量的小炸药包，这种小炸药包大的八九斤，小的只有三五斤，既可以炸碉堡，也可以对付坦克。在巷战中，把小炸药包往墙上一贴，爆炸后就形成一个洞，横穿居民区的时候，一连串地炸下去，就可以形成一道由若干个洞口组成的“胡同”。三营穿越馆驿街，经顺河街继续向东，他们看见了济南外城城墙。

来到城墙下的七连即刻遭到城墙守军的火力阻截，官兵们投掷小炸药包和手雷艰难突击后，终于看见了济南外城的普利门——刘竹溪

率领的突击队已经插到商埠守军的背后，将商埠与济南外城分割开来。但是，刘竹溪的突击队插到这里，就意味着将东西两面受敌，而他们必须坚守在这里等待后续部队打进来。

天亮了，普利门附近的守军在炮火和坦克的掩护下发动了反击。

反击方和防御方都利用复杂的街巷互相摸索。双方都是小股兵力，火线犬牙交错，根本没有前后方的概念，都是突然相遇，猝不及防，短兵相接，照面就打。每个院落里都发生了遭遇战，刘竹溪突击队中的营指挥员、军医、卫生员、炊事员都变成了战斗员，几乎每个人都需要单独作战。俘虏和伤员无法后送，只能派少量兵力看管照顾，伤员在流血，俘虏想逃跑，七连先后有两名卫生员为此牺牲。看护员李恩海带着三名担架员组成火线救护组，却两次被守军堵在房子里，他们用手榴弹、扁担和担架硬是把冲进来的敌人赶了出去。三营的包扎所设在馆驿街中段北侧的一个有两层楼的院子里，当敌人冲进来的时候，军医刘文昌、许安福率领包扎所的卫生员占据着二楼，用手枪和手榴弹把敌人打了出去。

八连和特务连移交阵地后也摸了上来。他们前进到后影街和馆驿街交叉路口时，发现至少有两个连的守军正向东运动，八连扑上去就打，这股守军在突然而至的打击下仓皇四散。在一个街巷口，一排副排长霍德荣抓住了一名守军士兵，这股守军蜂拥向街巷的另一头跑，谁知那头二班的机枪响了。在巩固阵地的战斗中，八班副班长程兆在一处房顶上设置了一个十分理想的射击点，有效地掩护了后续部队的攻击。但这个射击点随即成为敌人的重点打击目标，炮弹铺天盖地打下来，程兆的机枪始终没有停止射击，直到他和脚下的那间房子同时被炮弹击中，程兆的身躯混合在瓦砾之中轰然倒下。

八十二团攻击到纬十路时，街口突然烈焰腾空，国民党守军把堆积的数千桶汽油点燃了。大火之中，汽油桶接连爆炸，震天动地，热

浪灼人。八十二团官兵仅仅顿挫了片刻，立即向火海两侧迂回，守军见状仓皇撤退。在追击的过程中，守军又几次返身发动反击，双方展开了殊死的搏斗，由于后续部队没有及时跟上，八十二团的先头部队弹药已经耗尽。爆破手魏有志在数次负伤之后，抱起一个二十斤重的炸药包迎着守军冲了过去，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胜利的转机。

残酷的街巷战中，解放军官兵一次次穿墙作战，冲进了一个又一个市民家中。正值中秋，家家都已准备好了过节的东西，但是战争使市民无奈地弃家逃离。解放军官兵遵守群众纪律，在很累也很饿的情况下，谁也没动那些美味的食品——不知道那个家就在这一带的看护员李恩海是否看见了自己的家门?

位于正西方向的三纵，其攻击分工是：八师二十三团攻击西南卡子门，突破后沿商埠中部的经四路向东发展；九师二十团突击铁路工厂、二十五团突击北卡子门，而后沿商埠北面的经一路和经二路向东发展。在炮火的掩护下，二十三团的突击队员抱着炸药包，冒着守军的反击炮火，越过电网和壕沟，向西南卡子门连续爆破九次，终于将城门炸开一个缺口，后续部队迅速拥入。二十团首先肃清了铁路工厂的外围地堡，连续炸毁四道工事后突进工厂里面。二十五团接收了吴化文部守备的两个工事，然后向西北卡子门实施攻击。至午夜十二时，第三纵队和鲁中南纵队的各突击部队已全线突破商埠防御阵地，开始向济南城中心地带推进。

天亮的时候，当八师攻击到经四路与纬八路交叉路口时，街心的一座坚固街垒横在前进的路上。师长王吉文得知攻击受阻后跑到前沿，路口弹如雨下，王吉文和营团干部开始研究如何摧毁这个堡垒。就在这时候，守军发射的一颗炮弹在附近爆炸，一块弹片嵌进王吉文的左肺。王师长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后，发现军医正在给他打针，他说：“不要给我打针了，快去前面抢救负伤的战士，他们治好了还可以

参加战斗！”王吉文拒绝上担架，让担架队赶快上前沿去把受伤的战士抬下来。王师长躺在战场硝烟弥漫的路口，直到血流殆尽。

从商埠南面发起攻击的是十三纵，三十七师的一〇九、一一〇团为先头突击部队，分别攻击西卡子门和东卡子门。一〇九团突击顺利，战前一营长田军曾带连排干部仔细观察了攻击路线，因此，二连和三连的爆破组准确地对西卡子门实施了爆破，巨响之后，砖石腾飞，碉堡和各种障碍物顷刻瓦解。当大部队对西卡子门发动冲击的时候，国民党守军的一个火力点复活。一连机枪手抵近射击，掩护二连的爆破手往上冲。傍晚时分，西卡子门守军的火力点被全部肃清，二营沿着大槐树南街攻击前进，三营沿着道德东街向前发展，一个小时后，一〇九团奉命停止前进，开设阵地掩护一一一团向纵深推进。

一一一团向东冲击的时候，遇到了省立医院据点的顽强抵抗。省立医院内的守军，是刚从火车站方向调来的整编第二师二一一旅六三二团，该团到达后立即部署防御，抢修工事，团部指挥部设在医院中心楼楼下的地下室里。西卡子门方向的枪声越来越近，连医院的哨兵都开始受到冷枪的袭扰，感觉不妙的六三二团派出搜索队，搜索队官兵看见了令他们心惊肉跳的情形：在医院的四周，共产党官兵正在穿墙挖洞，他们就要接近攻击医院的位置了。六三二团立即收缩兵力，准备迎战，并规定战斗口令是“王先生”——取王耀武司令官亲自指挥之意。团长王彬基宣布：“战斗开始后，会形成巷战和局部被包围，我们黄埔同学要对得起党国和司令官，我们要决心与阵地共存亡。”话音未落，医院就受到了攻击。这时候，六三二团接到了王耀武令他们出击的命令，副团长带领六连真的出击了。但是，刚冲到纬八路路口，他们突然发现在前面执行掩护任务的坦克挂出了白旗，副团长立刻命令赶快撤退。

三十七师一一一团四连一排绕到东侧，利用民房作为掩护接近医院，官兵们翻墙进入炸毁一座地堡，将省立医院的北门打开，二营乘势冲了进去。这时，医院里已经混乱，所有的窗户都被打碎，到处是“缴枪不杀”的喊声。六三二团团长最后在发报机中说了句“各自好自为之”就再也没了消息，副团长和几个营连军官头上顶着弄湿的毛毡藏在一张大桌子下面，一边躲避弹雨，一边把五六十枚手榴弹捆扎在一起投了出去，趁着巨大爆炸弥漫开的硝烟，这些军官脱掉军装混在难民中逃走。

在东卡子门攻击的一一〇团攻击受阻，三十七师师长高锐命令三营长刘坤和教导员王文从守军的侧翼插进去，然后与二营实施内外夹击。三营从一〇九团撕开的突破口钻进去，迂回到西卡子门守军的侧后，与二营协同发起攻击，东卡子门终于被突破。三营一鼓作气，连续穿越几条街道，午夜时分攻到了汽车站附近，并继续向外城城墙接近。天色微明时，城墙上的守军突然发现城墙下来了一支队伍，于是在炮火的掩护下发动猛烈反击。三营顽强抵抗，致使守军无法弄清楚攻击城墙的到底有多少人。最后，守军抓来了几十名市民，让他们走在反击部队的前面，这一情景让三营官兵十分吃惊。刘坤营长迅速作出决定：部队不得开枪，后撤，前沿只留几名特等射手。三营主力后撤的时候，特等射手们弹无虚发，专门打押解市民的国民党军官兵，射击精确得连市民也不怕了，一些人开始逃跑，一些人干脆转身和押解他们的守军扭打起来。国民党守军开始沿街道两旁放火，三营官兵在火焰中趁势冲上去，一面追击撤退的守军，一面和市民们一起救火。

二十一日，商埠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

三纵、鲁中南纵队和十纵已经从不同方向靠近了济南外城最重要的两座城门：普利门和麟祥门。整编第二师拼死防守，双方在普利门

正面逐条街巷地争夺。整编第二师副师长唐孟壑命令独立大队全面出击，要求至少把共军压制到纬二路以确保普利门的安全。独立大队的工兵先在顺河街放火，然后步兵趁乱出击，出击之后才发现，共产党官兵已经用穿墙打洞的办法逼近了普利门，连下水道里都布置了监视哨，独立大队的反击部队刚一露头，就遭到了猛烈的火力阻击。黄昏到来时，攻城部队突然向普利门和麟祥门一线猛烈开炮，整编第二师独立大队大队长瞿赓扬看见了他惊骇的景象：

……整个阵地天昏地暗，炮弹空中飞行的奇异声，使人胆战心惊。炮弹爆炸声、伤者的惨叫声、建筑物的倒塌声，合在一起犹如天崩地裂。这样猛轰了一个半钟头，方告停止。圩墙内外，一片火海。这时解放军的指挥枪咯咯咯地在各方响着，响一次就有一次冲杀。其声势之大，攻击之猛烈，为内战中所罕见。“血流成河”这句形容战场的老话，用在当时普利门内外，也是恰当的。那里是血水横流，尸横遍地。青年会在炮击时楼被削平了，工兵营全部被歼，法院大楼也听不见还击的枪声。我命一营三次冲出去，均有去无回。至此我所指挥的部队，已被歼灭得差不多了，仅存二三十人。迎贤门里至南边马路，圩墙内也是死尸满地，道路堵塞，圩墙上的守兵，已稀稀落落，所剩无几了。我乃到普利门里小庙后面梁团二营指挥所同该营营长研究如何抵御，他呆若木鸡，一言不发，最后方说：“我去墙上看看。”他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外边解放军仍是一个劲地进攻，我又顺着圩墙向南跑到三团指挥所同梁为学团长商议怎么办，梁也束手无策。

独立大队的官兵混乱地拥挤在街道边的商店和民房里。

二十二日凌晨五时左右，街道上突然响起“缴枪不杀”、“如果不缴枪，就叫你坐飞机”的喊声。一个国民党军士兵刚把枪伸出窗外，就被飞来的一颗子弹打死。然后，商店和民房的门被共产党官兵打开，一名干部宣布了共产党的俘虏政策之后，整编第二师独立大队的大部分守军放下了武器。

火车站是王耀武重点防御的部位，守军是整编第二师二一一旅和一个铁甲车队。

十纵从商埠北面向火车站开进的时候，沿途受到二一一旅的猛烈阻拦，十纵果断穿插，将二一一旅的六三二团和六三三团割裂开来。

二一一旅旅长马培基命令守备大华电影院的六三一团加强营增援六三三团，但增援部队刚推进到邮电大楼以西的时候，就与攻击部队迎面撞上了。在邮电大楼防御的五十八旅一七二团居高临下从窗口和堡垒以猛烈火力封锁马路，暂时迟缓了攻城部队的推进。十纵官兵开始迂回包围六三三团和六三二团的阵地，当六三三团和六三二团无法坚持溃败下来后，战斗延伸到了邮电大楼和火车站。国民党守军将火车站附近的民房全部烧毁，封锁了通往车站的所有通道，并在站内轨道上部署了两列载有数百名铁路警察的装甲列车。列车来回移动射击，给火车站防守部队以火力支持。

十纵采用爆破的方式逐屋推进，并且在建筑物内挖掘地下坑道至通敌人的工事和碉堡下面，然后引爆炸药。二十八师八十五团在陈景三团长和张维滋政委的率领下，穿越铁路对火车站形成东西夹击的态势；八十六团在团长刘天祥和政治委员翁默清的率领下抢夺了天桥，从北面向火车站插入一刀。铁甲列车依旧在来回扫射，攻击部队受到火力压制。十纵司令员宋时轮命令炮兵将其击毁，特种兵纵队炮兵三团用棉被、麻袋把火炮轮子裹起来，将十四门野炮隐蔽推进到距铁甲列车仅两百米处，然后突然以猛烈的轰击摧毁了铁甲列车。随着防御火力的减弱，千余名守军被压缩在车站之内。

二一一旅旅长马培基意识到大势已去，决定突围。他命令六三一团团长刘沛然率残部掩护，自己和参谋长张显源带着特务连等两百多人从火车站大楼内的地下室里钻出来，向车站北面的天桥方向逃去。奔跑中，马培基的腹部被子弹击中，他一头栽倒在地，由于无人救护，终因流血过多死亡。参谋长张显源也负了伤，在混乱中下落不明。这股逃敌除伤亡者外，突出去的七十多人大部分被俘，小部分官兵换上便衣混进了难民中。

二十二日，商埠绝大部分地区已被攻占，只有个别坚固据点还在战斗，其中第二绥靖区司令部所在地邮电大楼是最顽固的据点。

此时王耀武的司令部已经转移到城内，但是邮电大楼里的守军仍在顽强固守。防守邮电大楼的部队，就是空运到济南的整编七十四师一七二团的七个连，由那个希望报答王耀武栽培之恩的刘炳昆团长指挥。刘炳昆到达济南后，王耀武把蒋介石送给自己的“中正”佩剑送给了他，这让他很是激动，当场刺破手指表示：“请司令官记住，我的老家是湖南长沙！”王耀武明白，刘团长准备付出生命。他派刘炳昆固守邮电大楼阵地，并告诉他邮电大楼和附近的工事全都是钢筋水泥修筑的，司令部里还储存有大量的食品、罐头和弹药。刘炳昆到达阵地后，在电话里对参谋长罗幸理说：“万一阵地失守，请给我的妻子打个电报。”王耀武接过电话说：“你这种精神很好！只要有此精神，阵地就一定丢不了，给你妻子的电报也不用打，我立刻把你这种忠勇精神电报给老先生，保你为少将旅长！”

刘炳昆防守的地域，除邮电大楼之外，还包括附近的上海银行、中国旅行社和德国领事馆等数座大楼。

三纵司令员孙继先和政治委员丁秋生心急如焚，因为攻城指挥部的命令是：“务于二十二日午前，完全扫除商埠及城郊之敌。”

邮电大楼位于纬二路，鹤立鸡群般地矗立在一片钢筋水泥建筑物中，四处伸出的大地堡控制着周围的街巷，楼顶上是坚固的火力掩体，配有轻重机枪和三门火炮。附近的每栋楼房也都是可以单独作战的大堡垒，机枪火力点总数在百个以上，步枪射击孔在千个以上。

三纵开始攻击了，楼上倾泻下来的手榴弹、迫击炮弹、六〇炮弹和机枪子弹如同骤雨，孙继先组织起十几门掷弹筒连续发射炸药包，同时又派出数支爆破队不惜伤亡连续爆破，邮电大楼高大的围墙终于

被炸开缺口，坚固的楼体也被炸出了几个大窟窿，突击队员从突破口拼死往里冲。排长张峰冲进一楼时，守军从楼梯上扔下炸弹和毒气弹，毒气散过之后，依旧能够站起来的官兵顽强地往二楼爬。

刘炳昆的指挥部设在三楼。此时，他已脱掉军装，只穿一件白色衬衣，腰间挂着那柄“中正”佩剑，胸前是一支美式冲锋枪。他刚刚处决了一名胆怯的排长，面对环绕在他身边的十几名军官，他脸色铁青地说：“养兵有什么用？就是为了在战场上卖命！商埠已经只剩下我们在打，我们要打出个样子给王司令和蒋总统看！”邮电大楼对面的德国领事馆已无法支撑，这对邮电大楼的防御构成了威胁。刘炳昆电话请示王耀武，要求把守备德国领事馆的残余部队撤到邮电大楼来，王耀武担心部队撤过马路的时候会遭受伤亡，两人正在商量时德国领事馆内的守军已经投降了。

邮电大楼在三纵和十纵的持续围攻下，守军伤亡惨重，被打死的人不断地被从楼上抛下来。下午十六时，二十九师把火炮直接推到楼前抵近射击，爆破组连续七次爆破了三十五公斤炸药，邮电大楼开始摇摇欲坠了：

> 大楼的门窗被炮火打得燃烧起来，烟雾弥漫，火光由门窗喷出，大楼的西半部只剩下钢筋水泥的残破的楼架子。解放军随即冲进大楼的院内，枪声、手榴弹及炸药的爆破声，震得地动楼摇。防守大楼的残部仍想把冲进院内的解放军打出去，曾数度反击，争夺甚烈，官兵伤亡众多，被迫退缩一隅。

攻击部队冲进大楼，在楼梯和各个房间开始最后的清剿。国民党守军利用能够利用的所有东西，包括桌椅、沙发、成袋的面粉、弹药箱等等，搭建起阻击掩体进行最后的抵抗。督战军官们端着机枪在房间里扫射，逼迫士兵到走廊里作战。五连的九名战士冲进一个巨大的房间里，班长赵十顺发现一只铁皮柜子上架着三挺机枪，三名机枪手站在那里已经举起双手。这就是一七二团的指挥部。几十具尸体横陈在地上。在正中央的大桌子后面，椅子上垂头坐着一个人，腹部和头

部都已受伤，胸口处插着一柄短剑，血流了一地——最后时刻，刘炳昆用“中正”佩剑自杀了。

二十二日下午，商埠区被攻城部队占领。

王耀武的残余部队全部退守城内。

这时候，杜聿明指挥的增援部队在大雨中出动了。

蒋介石飞临济南城上空。他的这一举动令幕僚们很是担心，他们曾经劝阻他不要去，说让空军司令代替一下就可以了，但蒋介石坚持要去。座机在济南城上空盘旋几圈之后，蒋介石与王耀武通了电话。蒋介石用尽可能温和的声调问：“俊才，你在哪里啊？”王耀武仰望天空回答：“我在城内指挥作战。”蒋介石说：“你已经挫败共军的数次进攻，证明你的十万将士都是党国的忠勇之士，全国军民都希望你再次创建天下奇功。”王耀武说：“学生明白。”

济南老城分内外两城，内城套在外城里，无论内城还是外城都有高大坚固的城墙。外城自北向西向南向东排列的城门是：小北门、永镇门、普利门、麟祥门、永绥门、新建门、中山门、永固门、永靖门和垦吉门。

王耀武认为，攻击商埠区的作战已使共军遭受严重伤亡，至少需要三至四天的准备和恢复才可能攻击外城。于是，他将主力部队十五旅、十九旅和五十七旅集中于内城，将七十七旅、二三一旅和绥靖区特务旅以及保安六旅部署在外城进行防御。

华东野战军攻城部队确实极度疲劳，减员来不及补充，伤员还没有全被抬下去，弹药和其他攻城作战器材也消耗严重，按照一般的作战规律，虽然不至于如同王耀武估计的那样需要休整多日，但两天还是需要的。

许世友命令：持续攻击！即刻攻击！决不给王耀武喘息的时间！

二十二日黄昏，对济南老城的攻击不顾一切地开始了。

外城是济南城防的第二道防线，城墙由大石块和大方砖砌成，墙高八米、厚十米，城门楼是火力支撑点，城墙顶部设有母堡和子堡，城墙中部设有三层火力发射点，城墙外的外壕宽八米、深四米，内外设有铁丝网。

二十二日十八时三十分，攻城部队东西兵团的炮兵一齐开火，炮火准备长达一个小时。炮声一响，国民党守军立即开火，轻重机枪、毒气弹和火焰喷射器全部向城墙外倾泻，外城城墙下一片火海，毒气夹杂着浓烟翻卷升腾，令人窒息。

十三纵负责攻击西南方向的永绥门，三个团齐头并进：三十七师一〇九团攻击城门正面，一一一团攻击北侧，三十八师一一二团攻击南侧。一〇九团五连爆破组在炮火的掩护下，很快在外壕爆破成功，并把外城城墙炸开了一个两米宽的缺口。在团长田世兴的命令下，登城突击队开始冲击。二营四连五班长赵守令率领的战斗小组率先登城，将红旗插到了永绥门上。守军的炮火集中在这个狭窄的突破口上，步兵也开始了反击，先头登城的二营与后续部队被割断，跟随四连突破的营教导员姚江在反复争夺突破口的战斗中阵亡。二营营长宫本江督促后续部队全力突破，六连冒着猛烈的炮火实施登城，与四连一起巩固和扩大了突破口，一营和三营的官兵蜂拥进入外城。

十纵的任务是突破永镇门和小北门，主攻部队是二十九师。师长萧锋和政治委员李曼村最后确定：八十五团攻击永镇门，八十六团攻击小北门，八十七团和八十九团为第二梯队。永镇门是济南外城最坚固的城门，城高壕深，城楼工事密集，火力强劲。就在八十五团发动攻击的前一刻，国民党守军突然向这里进行了炮火反准备，伴随着数

十架火焰喷射器一起发射，永镇门外顿时烈火熊熊，已经到达突击前沿的二营官兵伤亡惨重，所有的攻城器材都被烧毁。更严重的是，团属炮兵暂时无法接近射击，只能依靠步兵的炸药包强行爆破。二营教导员于耿光指挥爆破组在烈焰中强行爆破：第一爆破组组长赵同起带领两名爆破员首先将城门外的鹿砦炸飞；接着第二、第三爆破组先后炸毁了暗堡和地堡；第四爆破组不顾一切地直扑城墙，一声巨响之后，城墙炸塌了一角。由于城墙太厚无法洞穿，爆破组只有前仆后继地往上送炸药，在倒下了数名战士之后，终于把二十一包重三百七十多斤的炸药堆在了城墙下。爆破队副队长苟德光冲上去点燃炸药，三丈高的城门楼倒塌。三排长李振恒冲在最前面，并首先登城。刚上去就有五名守军士兵扑了上来，他打倒一个，其余的退守到地堡中，李振恒腿部中弹，他爬到地堡前将点燃的炸药包塞进去，巨大的爆炸将他抛出很远，他的耳朵被震聋了。三排官兵在城墙上抗击着守军的反击，牢牢掌握着突破口，让后续部队向外城里猛插。进入外城之后，巷战局面混乱，夜晚无法准确辨别地标，发生的几乎都是遭遇战。特务团团长蔡振华牺牲，八十五团副团长刘竹溪负伤，八十六团二营长曹振国牺牲，牺牲的还有石长才和魏和两位营长。

聂凤智的九纵和袁也烈的渤海纵队在城东主攻永固门。此时，永固门外还有历城和千佛山两个据点没打下来。聂凤智提出：绕过这两个据点直接攻击外城，而这两个据点的守军断然不敢出击，更不敢贸然开炮，因为开炮可能会误伤他们自己的部队。聂凤智还把上级要求他们“助攻”的命令，传达时擅自改成了“主攻”，有干部说这样擅改命令不好，聂凤智说：“先攻进济南有什么不好？东面打好了，西面才能顺利！”于是，九纵对永固门的攻击一开始就显出了不惜一切的狠劲。聂凤智有一张王牌，就是在鲁南战役中缴获的四辆十五吨重的美式轻型坦克，坦克上配备有火力强劲的三十五毫米平射炮，而王耀武守备济南的坦克全部是陈旧落后的日式坦克。坦克开路，这在共产党军队以往的作战中极其罕见。当九纵的坦克向国民党守军冲过去的时候，

守军官兵个个目瞪口呆，他们不知道共产党军队有了坦克，而且还是美式的，于是大喊："别误会！我们是保六旅的！"见坦克不理会他们，纷纷掉头就跑。在坦克的助战下，九纵肃清了永固门的外围，然后用坦克上的平射炮把城门轰开，七十三团突击队员蜂拥而入。永固门城门太窄，坦克无法进去，步兵就用各种办法把城门凿大了，官兵们实在是太喜欢坦克了。

战后，山东兵团在战斗总结中特意把坦克夸奖了一番："攻击永固门的战斗中，坦克共消耗炮弹约七百发，机弹一千八百发，我七十三团步兵未经爆破，即直接架梯顺利完成登城任务，极少伤亡……（坦克）火力命中精确，很短时间内即完成任务，颇得好评。"山东兵团政治委员谭震林在战后致毛泽东的电报中也特别提到了坦克："我军坦克队已参战，战术上采用游击战，突然出现，达到了掩护步兵前进、压坍敌人地堡之作用。连续作战两次，仅一个驾驶员因胆大，开窗展望，手负轻伤外，余无损失。"

弹片横飞的激战之时，那位年轻的坦克驾驶员要"展望"什么?

二十三日，济南外城已被全部攻占。

上午九时，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和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飞临济南上空，用无线电话联络到王耀武，刘峙说："你们的困难我知道。援军进展很快，几天就可以到济南。你们必须坚守待援。需要什么，可以空投。"王叔铭接着说："总统很关怀你们，叫我们竭力援助你们作战。盼你们坚守待援。"王耀武已经不再指望援军尽快到达，他对王叔铭说，共军的各级指挥部和大量后续部队均集结在济南四周，空军要炸尽管炸好了。

王耀武的守军退守内城。

许世友的攻城部队已经精疲力尽。

从一个一个歼灭外围所有的据点开始，到一个一个突破外城所有的工事和堡垒，华东野战军攻城部队的官兵已是伤痕累累，血迹斑斑，当他们穿过在炮火中成为一片废墟的城市，穿过布满交战双方战死者尸体的街道，从不同的方向推进到济南内城的时候，顿时表情严峻：与外城一样高大的城墙和城门森严地矗立在他们的面前。

## 济南战役：决战的序幕

绝望到极点的王耀武与千里之外的南京通了电话，被济南战况的各种消息折磨得心力交瘁的夫人听见丈夫的声音，哽咽着问："你在哪里？"王耀武说济南打得很紧，但他还好。然后询问母亲的状况。夫人不得不告诉王耀武母亲因想念他病倒了。王耀武听后心如刀绞——他的白发母亲此生再也没能见着自己的儿子。

参谋长罗幸理报告了外城的战况：城东的共军已从永固门拥入，保安六旅利用民房逐屋抵抗，但旅长徐振中被俘后，东面的防御垮了。东北方向的十九旅被压缩在一隅，前沿支离破碎，旅长赵尧已经没有可以调动的部队。城西的普利门也已失守。西南方向，特务旅旅长张尊光率部反击无效，共军逼近了内城坤顺门。驻守齐鲁大学的青年教导总队向内城撤退时被截击，总队教育长张叔衡控制不了部队，共有千余人投降。目前，外城的残余部队都已撤进内城。城内地域狭窄，房屋过多，遮蔽角大，因此重武器，特别是火炮，全部放在了体育场里。罗参谋长最后建议说，原以为济南至少可以守二十天，但照现在的态势，共军明天或后天就会占领整个济南，到准备后路的时候了。

准备后路？后路是什么？

济南城四周已经布下天罗地网，出去不被打死就会被活捉。

战死成仁？妻儿母亲怎么办？

译电员送来一份密电：“王司令台鉴：二十三日九时，空军王副司令徐州刘总司令凌空督战，拟与你通话，务请迎候。国防部。民国三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王耀武不禁怒火中烧：“凌空督战！我们败就败在这里！”

罗幸理也觉得没什么可指望的了：“他们的援军在哪里？坐牛车也该到了！”

国民党《中央日报》消息：

> 刘峙总司令二十三日偕王叔铭副总司令同飞济南上空，指挥陆空军作战。两氏目击据守济南环城阵地及千佛山、马鞍山、四里山各据点之国军奋勇与匪搏斗，并见城内秩序甚佳。刘总司令自机中以无线电话与城内王耀武主席兼司令官晤谈。据称：济南国军连日来，毙伤匪两万余人，国军虽有伤亡，但士气仍振奋，官兵共抱坚守到底之决心，并有办法击退来犯之匪。刘总司令得悉此种情况，极感欣慰，当多方予以勉励，深信渠到必能达成任务。

王耀武召开了军官会议。他说，现在守城阵地只剩下内城了，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最后阵地，内城如果被突破，我们为党国而战的历史就此结束。本司令不想把济南城交给共军，共军也不可能一夜之间拿下内城，希望大家同心同德，没准能打出一个奇迹，等到援军的到达。

整编七十三师师长曹振铎态度坚决。他认为内城城墙又高又厚，城墙上筑有三道射击阵地和消灭死角的侧击掩体，可以构成严密的火力网，完全能够抵御共军的攻击，以延长作战时间等待援军。整编第二师师长晏子风却认为援军不可能到来，唯一的出路是与共军谈判。在此之前，晏子风曾冒着炮火跑回王耀武的指挥部，要求准许他和山

东省党部主任庞镜塘出城与共军谈判，但王耀武不准。再次遭到拒绝后，晏师长说自己有病不能指挥部队了，他指定副师长唐孟壑和参谋长田豫生代替他指挥——内城受到攻击后不久，晏师长带着卫兵出逃了。

王耀武无话可说，他让参谋长罗幸理在省府大楼内继续指挥作战，自己则转移到内城更核心的地带去。走的时候，他对省府的行政官员们说："你们不是军人，没有什么责任，形势就是这个样子，回家照顾家人去吧。"当即，有人向王耀武表示了离别之情，也有人表示愿意跟着王耀武走。王耀武对愿意跟随他的官员说："那么我们就一块走吧！"王耀武摘下了他佩带的手枪，这支手枪枪柄两面都镶嵌有银片，一面刻着"王耀武将军惠存，美军中将麦克鲁赠"，另一面是同样内容的英文。王耀武交代身边的人把这把手枪锁在抽屉里，然后他带上钥匙与随从和警卫分乘几辆吉普车出了省府——王耀武把随身手枪留在省府里的举动令人奇怪，但更让人奇怪的是他随后的行动。他似乎漫无目的地在内城里转圈，先乘车、再坐轿，又乘船，跟随他的人都不知道司令官要干什么和要去哪里。王耀武在大明湖南岸上了一艘游船，游船驶向城北的北极庙。下船之后，王耀武走进北极庙西侧的成仁寺地下室，他的副参谋长等人已经在地下室设立了一个简易指挥所——这是王耀武济南城防的最后的指挥所，也是他军事生涯的最后指挥所。

二十三日黄昏，济南城突然亮如白昼。从青岛起飞的B-29轰炸机将炸弹密集地投到济南城区之内。城西的火光格外刺眼，济南最大的一座汽油库在轰炸中被击中。在轰炸济南的飞机中，有一架运输机格外显眼，因为它专门负责向市区投掷燃烧弹，整座城市因此烈焰熊熊——这架运输机是国民党军驻青岛的第十一兵站特别向陈纳德开设的航空公司租用的，想必机组人员都是美国人。

此时，华东野战军攻城部队已伤亡过万。

是否立即攻击内城?

有指挥员认为，部队必须停下来补充休整，哪怕是两三天；也有指挥员认为，这个时候对于攻守双方同样艰难，自己停下来补充整顿，守军也就得到了喘息时间；还有指挥员建议，压缩补充休整的时间，二十三日晚休息一夜，二十四日攻击内城。但是，攻城部队已经集结在济南城的腹部，如果不迅速攻下内城，不但在敌机的轰炸中会徒增伤亡，而且一旦让国民党守军得到喘息，战役拖延下去，敌人的增援大军一到，战场局面将转变为被动。

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决定，不怕疲劳，不顾伤亡，即使外城残敌尚未完全肃清，即刻向内城发动攻击，迅速攻陷济南内城，二十三日晚十八时，许世友下达了攻击内城的命令。

一个小时的炮火准备之后，各纵队突击队开始强行架设浮桥，或徒涉、泅渡过护城河，以抵近济南内城城墙。

十三纵三十七师由西南角的坤顺门两侧实施突击。主攻部队一〇九团团长田世兴在抵近前沿时面部中弹，伤势严重。接着，突击八连涉水过河，炸开铁丝网和城墙下的地堡后，正准备爆破城墙，国民党守军发射了大量的燃烧弹，瞬间形成一道宽四十米、长一百米的火墙，突击队的电话线被炸断，人员和器材损失严重，打开的攻击通道被重新封堵。八连的爆破组依旧顽强地向城墙下运送炸药包，爆破队员用长竿撑到陡峭的城墙上，用长绳拉响炸药。为了恢复与后方的联系，战士们在敌人的火力封锁下来回爬行修复电话线，电话班长林树一牺牲后手里还攥着被烧焦的电话线，而从指挥所爬向前沿传达命令的通信员，一个又一个中弹倒在途中。尽管爆破组把数十包炸药送了上去，连续爆破后仍未将城墙炸开，有的炸药包爆炸后仅仅炸出个小

坑，这让爆破队员大骂缴获的洋炸药效力太低。实际上，是战士们操作有误：美国制造的TNT炸药需要每块都插进一枚起爆雷管，而爆破队员把这种炸药想象成自己制造的土炸药了，十几块甚至几十块捆绑在一起，以为只要插进去三五个雷管就能引爆，于是洋炸药因为插进去的雷管有限只能引爆两三块炸药。爆破效果不好，三营长急了，组织官兵架梯登城，但梯子太重导致行动缓慢，敌人很快就发现了架梯的位置，梯子被手榴弹炸断。

与此同时，渤海纵队在新东门的攻击也未取得成效。

九纵二十五师从东南角一度登上城墙，但因后续部队没能跟上，登上城墙的官兵全部牺牲。

午夜时分，攻城各部队均未打开突破口，战场一时间寂静下来。

月光如水，繁星闪烁，济南内城依旧矗立在夜空下。

许世友的指挥部里悄然无声。

激战关头，任何迟疑都会给战局的演变带来不可预测的后果。

攻城部队已经连续战斗七天七夜，继续攻击下去也许难以迅速奏效，但如果拖到天亮还没有成效，部队暴露在敌人飞机和火炮的轰击下，将会出现更大的伤亡。

许世友说："我们的困难大，敌人的困难比我们更大！现在就看谁的决心硬过对方。我们要跟敌人比毅力，比顽强，比后劲。胜利往往就决定在最后的五分钟！"

九纵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战前曾接受过一面旗帜，旗子上写有"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十个大字。这是山东解放区的老百姓授予九纵

的，九纵又把旗帜授予了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三营七连。七连指导员彭超接过旗子的时候，代表全连表了决心："我们的血要流在城上，决不流在城下，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就一定把红旗插上城头！"

再次攻击前，七十三团团长张慕韩接到了纵队司令员聂凤智的电话："现在就看你们的了！"张团长放下电话，立即来到三营，与官兵们一起分析之前攻击失利的原因。官兵们说，爆破组的同志大多是在路上负伤的。城墙根那里却是安全的，因为敌人投下的手雷和炸弹不等爆炸，就顺着斜坡滚下护城河了。伤亡最多的是在小石桥到城墙根这段路上，这说明步炮协同和冲锋时机的掌握出了问题，让敌人抓到规律了。大家建议在炮火准备的时候，就把突击队带到城墙下面，把梯子准备好，炮火一延伸，马上就突击，给敌人来个措手不及。有人对护城河里敌人设置的照明设备有顾虑，七十三团政治部主任王济生说，这件事由我负责解决。最后，他对大家说："记住，你们一上城头就把那面红旗插上，它是我们胜利的标志，后面的部队看着它呢。"

二十四日凌晨一时三十分，对济南内城的攻击再次开始。

炮火准备得很充分，步炮配合得也顺利，原来担心突击队就在城墙根，炮弹稍微偏一点落到城墙下，那里的两个班就完了，但是炮弹却像长了眼睛一样发发落在城墙上。七十三团突击三营长兴奋地报告说："爆破组上去了！""梯子组上去了！"梯子足有三丈长，三排副排长任桂学带头爬上去，爬到半截才发现梯子还是不够长，距离城头至少还有一人高。梯子组的战士急眼了，干脆把沉重的梯子扛了起来，但是依旧不够长。连长萧锡谦喊："不够高也得突！二班长上！"二班长李永江膀大腰粗，作战凶猛，人称李二虎。听见连长的命令，他一个箭步就上了梯子，二班的战士也都跟着他上了梯子。为了增加高度几乎陡立起来的梯子摇晃着，梯子组的战士在下面死死地抱着。李永江一步步地向城墙顶端接近，梯子不够高，后面的人喊："踩着我的脑

袋！”喊话的是战士于洪铎。李永江抓住城墙上的残砖，登在于洪铎的肩头，用力一跃飞上城头。他身后的战士也不顾一切地往上登，被踩掉的砖头纷纷落下，砸在梯子组战士的头上，他们还是死死地抱着梯子不放手。

城墙上的炮火已经延伸，一群国民党守军正往这里跑，企图封堵突破口。李永江端起机枪开始扫射，于洪铎没来得及举枪就与一名国民党兵扭打在了一起。解决了这股冲过来的敌人后，七连官兵一起冲向城墙上的重要据点气象台。守军的敢死队扑了上来，七连官兵死守不退。激战中，三营和二营先后登城，迎着反击的敌人向两侧发展，城头上的战斗开始惨烈起来。枪炮声、兵器的撞击声和肉搏的咒骂声混杂在一起。七十三团官兵在突破口上整整坚持了三个小时，用极大的牺牲巩固和扩大了突破口。

第二梯队上来后，团长张慕韩意识到，大部队聚集在城墙上，如果遭到敌人的炮火反击，后果不堪设想。他立即命令全团下城往里面冲。但是，负责携带下城绳索的战士牺牲了，而城墙有十几米高。

不知谁喊了一声：“同志们！跳呀！”

九连二班长王其鹏带头跳下去，其他官兵也纷纷纵身往内城里跳。

张团长向纵队指挥部报告：“七十三团已经冲进去了！”

七连指导员彭超向通信员小宋喊了一声，小宋应声登上城墙的东北角，那面百姓所赠的红旗呼啦一下展开了。

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战后被授予了“济南第一团”的光荣称号。

血战真正来临了。

整编七十三师七十七旅旅长钱伯英接到王耀武的命令后，立即赶往内城西南角上的坤顺门督战。除了七十七旅之外，这里还加强了整编第二师二一三旅一部、整编三十二师五十七旅一部。守军以绝对优势兵力从东、南、北三面向登城部队进行猛烈反击。狭窄的城墙突破口上，敌人在各种火器的掩护下蜂拥而至，企图把登城部队赶下城去。冲上去的三连和九连已经冲进内城，后面的部队依旧在顺着云梯往上爬，城墙突破口上只有七连在坚守。由于突破口的宽度有限，加上左右两侧的攻城部队还没有得手，致使这里的守军利用两侧碉堡的火力全力掩护对突破口的反击。坤顺门城楼顶部的大碉堡和城内高大楼房的火力点也集中向突破口射击，后续部队被严重压制，突破口上的七连处于孤军作战的危境。排长王玉亭率领小炮排迅速开炮，炮弹在五十米处爆炸，迟缓了守军的反击。机枪班长王芝云在向一个火力点射击的时候负伤，接替他的射手李玉臣也倒在了王班长身边，二班副班长举着两颗手榴弹拼死向前，把那个火力点炸毁之后，他抱起一块大墙砖向冲过来的守军扑了上去。七连在战斗中迅速减员，副营长张本信一边喊着“坚决守住突破口”，一边端着机枪扫射，他两次中弹倒下又两次站起来，直至最后牺牲。这个年仅二十一岁的基层指挥员的两个哥哥在之前的战斗中已经牺牲，攻城前上级把他列入重点保留的人不让他参战，但是张本信坚决请战，最终血染战场。此刻，登城时负伤的营长张世礼躺在城墙下，他知道城墙上的情况万分危急，他命令重机枪连连长高瑞珠立即组织重机枪手登城，高瑞珠亲自带着两挺重机枪强行登城，刚爬上城墙便遭到守军的猛烈射击，高瑞珠牺牲在突破口上。一营长田军率领一连和二连不惜代价增援城头上的七连。不断有战士在登城的时候中弹从云梯上摔下去，那些登上城头的官兵因为缺乏火力掩护而无法展开。

天亮了。国民党军开始向突破口增援。一〇九团副参谋长梁凤岗、一营长田军和三营教导员牟灿都在城头指挥作战，他们的呐喊声激励着官兵们进行最后的血战。一连长周炳头部中弹，倒下的时候仍然端着机枪。一排机枪班长曲光喜的手臂被打断，他把打完子弹的机枪扔下城墙，独臂举着一把铁镐扑向敌群。一连副班长是在莱阳战役中解放过来的战士，在炸毁了一座碉堡之后，他端着刺刀与围上来的守军周旋，直到被刺倒在城墙上。一连八班十六岁的士兵石仁芳胳膊和大腿两处负伤，他拒绝班长把他背到安全的地方去，他拖着炸药包爬向守军的火力点，在炸药包爆炸的同时他身中数弹牺牲。

十三纵三十七师师长高锐调动了所有的火力支援城头，两门山炮被架在齐鲁医院的楼顶上直接向坤顺门城头轰击，山炮和榴弹炮的炮筒都打红了，但是依旧无法完全压制守军的反击火力。城墙下的二营官兵在营长宫本江和教导员姚江的率领下冒死登城。守军的火力更加猛烈，突击队员冲进护城河时就已被大量杀伤，而冲到城墙下的官兵重新竖起云梯，爬到一半的时候，梯子被炸断，官兵们全摔了下来，教导员姚江牺牲——突破口，一个被炸开的城墙斜坡，已经层层叠叠摞满了牺牲官兵的遗体。那些躺在斜坡上尚有一丝气息的伤员用最后的力气喊:“从我们身上踩过去！踩过去，冲啊！”

四个小时后，突破口被国民党守军重新占领。

已经突进内城的三连和九连被分割在城里。

绝不能停止冲击！坚决把突破口再次打开！

十三纵三十七师师长高锐和政治委员徐海珊命令：一一〇团三营接替突击坤顺门的任务；一一一团从一〇九团曾经打开的突破口打上去。

一一〇团三营长刘坤和教导员王文立即率领官兵抵近坤顺门。二十四日上午八时，在三营即将发起突击的时候，纵队司令员周志坚来到前沿。这里距离城墙仅二十米，司令员对三营官兵说，济南战役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城里的百姓盼望我们尽快打进去结束战斗，我们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是无论如何要突进去！最后，司令员问："大白天发动攻击，你们能行吗？"

官兵们齐声喊："能行！"

营长刘坤命令：七连实施爆破，九连架设云梯，八连全力登城。

战斗重新开始了。纵队所能集中的火炮、火箭筒和机枪一齐向城头开火，三营官兵抬着几百斤重的巨大云梯冲向城墙。抬云梯的战士不断倒下，不断有人接替上去，云梯再次靠上了城墙。城上的守军拼命往下扔手榴弹。云梯訇然倒下，但城下的官兵蜂拥而上，云梯再次竖立起来。终于，在九连长秦嗣照的呐喊声中，官兵们再次登上城墙，城墙上立即成了肉搏场。在残酷的刺刀对刺中，国民党军肝胆俱裂，九连官兵趁势逼上去，把跑不及的守军往城墙下推，如果敌人抱住了他们，他们就与敌人一起跳下城墙。守军聚集起十倍以上的兵力开始第四次反击。九连长秦嗣照负伤，指导员张福善牺牲。三营营长刘坤身负重伤躺在地上，当他看见班长李来祥端着机枪猛烈射击的时候，用已经微弱的声音喊："李来祥！你小子是好样的！"

突然，城墙上的守军混乱起来，因为他们的身后出现了攻击部队。

被分割在内城里的三连和九连，在与上级失去的联系的情况下，从俘虏的口中得知突破口被守军重新占领。九连指导员刘健和三连长吕洪团研究决定，以一部分兵力顶住敌人，抽另一部分兵力打回去，策应团主力恢复突破口。他们首先占领了突破口附近的一座楼房，然

后组织火力向守军的背后开火。他们的策应令攻城部队当面压力骤减，后续部队得以在短时间内大量登城。

由于突破口狭窄，登城官兵密集，国民党守军的炮火和飞机轰炸给部队造成大量的伤亡——三十七师师长高锐负伤，在官兵中享有极高威望的师政治委员徐海珊牺牲。

战后，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三十七师一〇九团获得“济南第二团”的光荣称号。

王耀武的最后时刻到了。

二十四日凌晨一时，在省府内指挥作战的参谋长罗幸理与徐州“剿总”参谋长李树正通了一次电话，报告了济南战况的危急。李参谋长除了说些安慰的话之外，表示他也没有别的办法。子夜过后，华东野战军攻城部队已经突入内城。拂晓时分，罗参谋长又与在大明湖成仁寺的王耀武联系了一次，王耀武说共军突破了西门十五旅的防线，内城阵地已经瓦解。就在这时，部属进来报告说，没水了，共军占领了趵突泉的水厂，把这里的自来水掐断了。接着，电也没了。接近中午的时候，内城的巷战更加激烈。王耀武又打来电话，语气低沉地说：有组织的抵抗已全部崩溃，“情势困难，各自珍重”——这是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参谋长罗幸理与他的司令官王耀武的最后一次通话。

此时，成仁寺指挥所的防御阵地已经被严重压缩，仅剩下张公祠至铁公祠之间四百米左右的狭窄地带。王耀武知道他必须选择出逃了。

王耀武在面临绝境，准备外逃之际，对副参谋长干戟和我（国民党山东省府秘书王昭建）说：“这地方叫成仁寺，犯了地名，一进门我就很不高兴。蒋先生给过我们每人一支佩剑，上面镌有不成功便成仁的字样。这是他对我们的期望，也是我们的素衷。今天失败到如此地步，我们要不要成仁呢？我认为我们不能自杀，即便自杀也成不了仁！因为，内战不同抗战，如果自杀，徒死无益，反会留下骂名，被人讥笑。所以，我决定带几个人突围，不能

在此坐以待俘。”他又指着我说：“你回家，你是当地人，谅无危险。干载是湖北人，口音不对，地方不熟悉，在济南举目无亲，你帮帮他的忙。”言毕，干载哭了，绥区的几个处长也哭了。之后，王耀武便与参谋杨筠、副官宋广义、卫士徐超等向西而去。我约在十五分钟后也走了。

王耀武命令十五旅一部利用北极阁通往城外的坑道向北突围。该部突围的时候与华东野战军攻城部队发生激战，王耀武趁乱跑到了城外的一个小村庄里，他换上百姓的衣服后向东逃亡。

在省府指挥部里，参谋长罗幸理得知王耀武逃跑之后，分别给仍在作战的各部队指挥官打了电话，说：“王先生已走，你们各自想办法吧。”然后，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赶快走吧，我在这里没关系，我和陈毅认识。”说着，他拿出许多罐头、食品和香烟，一一分给每个人。大家各自东张西望了一会儿，蹑手蹑脚地都走了。

随着攻入济南内城的共产党官兵越来越多，城内各要点的国民党守军大都放弃了抵抗，攻城部队向省府大楼和王耀武的指挥所迅速推进。

九纵二十五师七十三团的一个班长负伤后被俘，在被处决前，国民党军的一位军官审问了他。审问记录在济南战役结束后被缴获，山东兵团政治委员谭震林把这段审讯记录用电报的形式发给了毛泽东：

“你来做什么？”

“毛主席命令我来打济南！”

“你有把握吗？”

“完全有把握，有信心！”

“你已被俘，怎么办？”

“我们的人多得很！”

这个自豪地宣称“我们的人多得很”的普通战士倒下的时候，正是他的战友们攻到济南内城省府的时刻。

防守省府的整编八十三师十九旅五十六团团长黎殿臣一撤再撤，最后试图占据三面临水的汇泉寺作最后的抵抗。这时，十九旅的五十五团和五十七团已经撤退到北极阁附近，旅长赵尧派人给黎团长送来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司令官已走，以下人员也都各自走路，现在济南已无人指挥。我们相聚多年，希弟速来一会儿，部队暂指定人员指挥，切盼！”黎团长当即带着几名卫兵去找旅长，见到赵旅长的时候，另外两个团长也都赶来了，赵旅长正在骂：“妈的，他们都走路，我们也走！你快写手令，命令部队向北极阁撤，重武器不要了，统统丢到湖里！”黎团长写好手令，派人送出，然后换上了一身士兵的军装。另外几个团长也忙着换衣服，旁边的卫兵看着团长们的举动谁也不吭声。换好了衣服，在赵旅长的带领下，几个“士兵”团长开始往城外跑，跑到城墙北面发现没有去路，又掉头往回跑。这时，他们看见自己的士兵正沿着北极阁北面城墙上的交通壕向西逃，交通壕内拥挤不堪，到处是丢弃的枪支弹药和行李。溃兵们越往西越拥挤，因为整编七十三师的溃兵也加入了进来。黎团长独自一人悄悄地用绳索溜下城墙，不久就被搜索的解放军官兵发现了。

省府大楼里，省府总务处长乔玉江向罗幸理建议与共产党军队谈判，罗幸理让他出去看看情况再说。一会儿，乔处长回来了，说：“在前面见到了解放军的指挥官，他说山东兵团司令部参谋长要你前往接谈停战。这样解放军就不强行攻击，可以减少双方的死伤，也可以减少你对战争应负的责任，山东兵团参谋长已在二门口外，希望考虑。”罗幸理随即和乔玉江一起走了出来。他们看见成队的解放军官兵正往大门内拥，先头部队与防守省府的警卫部队枪口对枪口对峙着，但双

方都没有开火。一位姓黄的解放军干部对罗幸理说：“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将军要我转告你们，他要你们停战，放下武器。如果停战，对你们有好处，可以减轻你们的责任和双方的伤亡，请你们认真考虑。”罗幸理当即表示愿意停战。他回到指挥部里，大部分人员都同意停战，但手枪警卫排的一些官兵不愿意。罗幸理对他们说：“能战则战，不能战就逃，不战不逃只有缴械，哭有什么用！”在一位连长带领下，解放军官兵进来开始收缴武器。

华东野战军攻城部队占领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部的时间是：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下午十六时三十分。

经过八天的战斗，济南被攻占。

此时，由于粟裕打援兵团的重兵部署，由于惧怕重蹈豫东战役中区寿年兵团的覆辙，虽经蒋介石三令五申和严厉督促，邱清泉、黄百韬和李弥的三个兵团依然行动迟缓，当济南已被攻占的时候，邱清泉兵团才推进至城武、曹县地区，而黄百韬、李弥两兵团尚在集结之中。

济南战役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一个绥靖区司令部，一个整编军部，两个整编师部，十个旅又一个团；非正规军一个保安司令部，四个保安旅，四个团的地方武装和特种兵一部，共计十万余人。

华东野战军攻城部队伤亡二万六千余人，其中阵亡官兵二千九百三十余人。

山东百姓对华东野战军的作战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战役期间，支援前线的粮食达一亿四千万斤，这个数字按照参战官兵和支前民工的总人数计，可以吃上两个月，而运送这些粮食需要小推车五十万辆，因此支前民工达五十一万四千人。百姓以“一切为了

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决心，昼夜奔走在千里运输线上，车拉、人挑、畜驮，灯笼火把，风餐露宿，他们将大批弹药、粮草和作战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其中九纵获得门板两万两千五百块，锹镢八千把，麻袋两万条。维护交通的百姓日夜抢修公路和桥梁；跟随作战部队的百姓冒着枪林弹雨抢救转运伤员；战区内的民兵则昼夜站岗放哨，堵截抓捕国民党军逃散官兵，在百姓编织的天罗地网中，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几乎无一漏网。

山东寿光县公安局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报告：

一、自济南战役开始时，我们即根据地委指示，作了全县的布置，推动全县盘查行人。县各机关住屯田村，西临洱河，在村西北角修了一个大木桥，是沧潍公路必经之桥，我们在这里每天有两个岗哨盘查行人。本月二十八日早八点时候，政卫队战士刘金光、刘玉民、张宗学三武装同志正在此处站岗，这时从西边公路上来了两个胶皮脚大车，车上拉着两个女人五个男人，我们三个同志看其形迹可疑，即令其站住，检查一下。问其从哪里来，他们说：“从济南来是逃难的。”

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答：“做买卖的。”

就每个人问其姓名。答：“徐超、李爽、万元选、乔玉龙、乔堃［即王耀武］。”还有两个女人。

又问：“你们是哪里人？”

答：“我们都是济南人。”

此时乔堃用白手巾蒙头，并用棉被盖着身体，躺在车上装病。我们听了他们的口音都不像济南人，此时我们三个同志，见其形迹可疑，因距机关不远，即送到机关来了。

二、检查与个别谈话。到机关后由审讯干事王洪涛同志检查，查出赤金小元宝二个，银币十一元，本币六千余元，并通行证一纸［是益都街长杨某给他写的］。王洪涛同志即与他们谈话［此时王耀武仍然是在车上用白手巾蒙着脸装病］，我们遂先问其随从。

问徐超：“你是哪里人？干什么的？想到哪里去？”

答：“我是济南人，是做买卖的，我自济南逃出想到青岛去找朋友做点买卖，先维持生活。”

又问李爽："你是哪里人？是干什么的，想到哪里去？干什么？"

答："我是济南市里人，是做买卖的。我在仁丰纱厂做工，因为济南完了，房子烧了，想到青岛去找我父亲，我父亲在青岛卖鱼。"

又问万元选："你是哪里人？是干什么的？想到哪里去？"

答："是开饭铺的，因为没有办法了，想到青岛去，找点工作谋生活。我是济南人。"

根据以上三个人的谈话，他三个人的语音都不像济南人。另外他三人都说上青岛也有可疑。同时又问："你们这些人在哪里找到一块的呢？"他们有的说在周村，有的说在明水，有的说在济南一块出来的，都不一致。而且他们的神情上态度上，都不像老百姓，也不像商人。

又问两个女人："你俩是哪里人？干什么的？想到哪里去？"

答："俺是潍县南关人，在济南做买卖，卖烟卷的，在济南二三年了，俺要回家去，在益都西门外碰上这车，才跟上的，可问车夫。"

问："这些男人，你们认得么？"

答："不认得，路上遇上的。俺路上很困难，要饭吃，跟着他的大车走。［大车是哪的？］大车是他们雇的。"

我们根据女人的口音，是潍县，看样子很老实。

又问乔玉龙："是哪里人，干什么的，想到哪里去？"

答："我是点心铺的，在三大马路纬十二路，我是济南人，想到青岛去，因为青岛有朋友开车行，找他想办法，车上那个病人——乔堃是我叔父，他在济南叫炮震聋了，吓出病来了。我与他一块到青岛去。"

又问乔堃："你是哪里人？干什么的？"［这时候王仍在车上蒙着手巾，盖着棉被，装病很重的样子不能下车，伸出舌头给我们看不会说话。但是看样子，很大的脸，围腮胡不像老百姓。我们拿起头上的白手巾细看，脸上的皮肤很白，热天的时候，很像戴军帽的痕迹，估计他最低限度是个官。我们即叫他下车谈话。最后他起来要下车时，乔玉龙即跑过去把他背下来。一会儿他要大便，乔玉龙从衣服内拿出很多的一把白色的手纸来，我们从这些地方估计，若是个官还不是小官，商人绝无这样子。］

问："你是什么时候出的济南？都在何处住过？"

答："我是这月十八日晚上，我看了看济南炮火很厉害，本来无办法，我就出了济南，在北关住了一夜，又到北边个小庄里住了三晚上，看看济南不行了，才向这走，又在明水住了

一晚上，在周村住了三晚上，又在益都住了一晚上，今天到这里来的。”

问：“你都是在谁家住的，在什么客栈与饭店？”

答：“我是想不清，他们可能知道［指那几个人］。”

问：“你要到何处去，去干什么？”

答：“我想到青岛去，因看济南无办法了，想到那里找点买卖做。”

……

五、开始审讯。当即于本日下午三点半，由王股长进行审讯。王耀武一到禁闭室就不断要求谈话，提审员提出他［指王耀武］时，叫他头里走，他不肯走，表现恐惧。他告诉提审员说：“我们俩并肩走吧。”及到提审室时，态度失常。审讯经过：

问：“你是哪里人？”

他即说：“你是县长吗？［当时他向屋周围看望］”

又问：“我问你是哪里人，你问我是否县长干什么？”

答：“我已经到这个地步，干脆我就说了实话吧，我是王耀武呀！那几个人是我的卫士。我要找县长谈谈……”

当时就发现他是王耀武，遂即马上派人去追那放走了的三个男的，二个女人。结果他们是分开走了，找到潍县才找到两个男的，两个大板车和那两个女人［现在潍县公安局扣押］，那一个男人西去了，没找到。发现了王耀武之后，当晚又做了饭给他吃了，由我们县刘政委、张县长与他谈话，王耀武谈话如下：

1、从本月二十四日十二点半的时候，我即出来了，到了济南外围的一道工事里隐蔽着。这一夜下了一夜雨，我住了一夜。二十五日一天我即到了周村，在周村雇的大车，二十七日到益都，夜间走了一宿，二十八日即到了此地［指屯田村］。

2、这次济南失守主要是士气低落，即上级长官，虽然口里不做声，也是不高兴。总之基层问题没解决，士兵每天吃不饱穿不暖，还能打仗吗?

3、济南失守主要［因］吴化文投降，他在投降前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会，以后一个团长告知我。那时仅有四十分钟，不过电话还能联系，我即告他说：“你要攻城，不攻城，随你的便吧。”他就拉着走了。这次投降的原因，一方面是吴化文很滑；主要是何志斌这个旅长因他过去被俘受了解放军教育，叫何把吴拉拢投降的。

4、你们［指我们］这个宽大政策真厉害，我们就是怕你们这个宽大政策。

5、第二［个］失守原因是飞机场失守，当时拾到你们的炮弹皮看是野炮，估计是在黄河北打过来的，这样远［十五里多］落到飞机场三发炮弹，结果飞机运到七个连就不敢运了，那七个连都吓散了。

6、我筑工事在济西里山二十多里，准备济南不利，即撤到那个地方去，那里早准备着给养。结果你们不打那里，从东西攻进来了。东面是徐振中（保安六旅旅长）守东门间不大的一块地方，才上去两天，就被你们从那里攻进城来，好像你们早已知道徐振中在那里守一样。解放军进城以后，我找不到徐振中了。

7、国民党老是落后，共产党老是进步，共产党进一尺，国民党进一寸。我见到你们这边整风，我也叫下边整风，结果不管事。因为他们［指基层］光说不做。另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四大要素都不如你们，因此国民党不行。

8、明天最好送我到华东局去谈谈，最好发个电报去，来个卡车送我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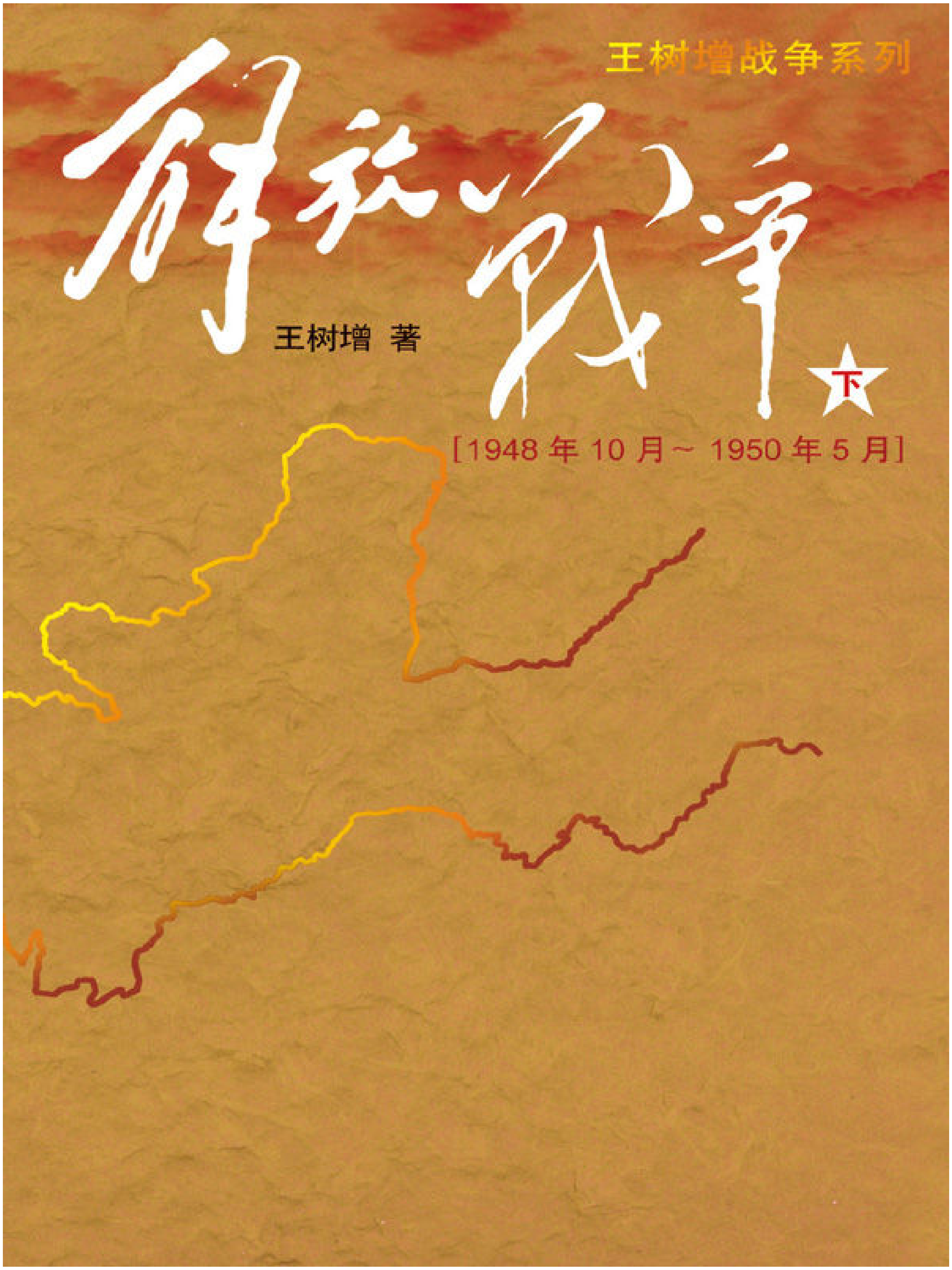
此报告现存于山东省档案馆。

十月三日，新华社发表了题为《庆祝济南解放的伟大胜利》的社论，这篇由毛泽东亲自审定的社论称：济南战役的胜利"证明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已经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抵御的了，任何国民党城市都无法抵御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

"济南战役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序幕。"

一九四八年秋季，中国北方广袤的田野上弥漫着庄稼成熟的浓郁气息。

国共两军的决战时刻已经来临。


王树增战争系列
解放战争
王树增 著
下
[1948 年 10 月～ 1950 年 5 月]


王树增战争系列
解放战争
王树增 著
[1948年10月～1950年5月]
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解放战争.下，（1948.10—1950.5）/王树增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ISBN 978-7-02-007373-3

I.解…II.王…III.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83867号

责任编辑：脚印 李羽壮 装帧设计：刘静

责任校对：杨益民 责任印制：王景林

解放战争（下）（1948.10—1950.5）

王树增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680千字 开本 680×1000毫米 1/16 印张 45.25 插页 4

2009年10月北京第1版 2010年5月第6次印刷

印数 130001—15000

ISBN 978-7-02-007373-3

定价 6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 第十章 辽沈战役：高粱红了
  - 高粱红了
  - 战锦方为大问题
  - 塔山不是山
  - “大门”的关闭
  - 慢慢地陷落
- 第十一章 辽沈战役：死亡的开端
  - 短暂的沉寂
  - 血浸黑山
  - 胡家窝棚
  - 不说老实话我揍你
  - 死亡的开端
- 第十二章 淮海战役：喊杀之声不绝于耳
  - 祝总统赴美休养一路平安
  - 侧翼的开裂
  - 老头子为什么不来徐州
  - 喊杀之声不绝于耳
  - 让那些醉生梦死的人醒悟过来
- 第十三章 淮海战役：惊人的态势
  - 王老汉游击队
  - 蹂躏战术
  - 惊人的态势
  - 沉闷的晚宴
  - 黄维：上尉司书方正馨
- 第十四章 淮海战役：勇敢地向前进
  - 战争罪犯的名单
  - 将革命进行到底
  - 邱清泉：让他崩溃好了
  - 勇敢地向前进
- 第十五章 平津战役：坦克驶过东交民巷

  - 文章要从西线做起
  - 隔而不围，围而不打
  - 风雪中矗立的枕木
  - 天下人会提壶送酒欢迎你
  - 金汤桥
  - 坦克驶过东交民巷
- 第十六章 钟山风雨起苍黄
  - 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
  - 钟山风雨起苍黄
  - 榴花原是血染红
  - 最后的故园
- 第十七章 熟透的李子
  - 熟透的李子
  - 关中决战
  - 一片孤城万仞山
  - 悠远的驼铃
  - 凌乱的海滩
- 第十八章 士兵的山河
  - 大迂回大包围
  - 金门岛
  - 给解放军长官磕个头
  - 大陆的最后一战
  - 士兵的山河

# 第十章 辽沈战役：高梁红了

## 高梁红了

一九四八年初，毛泽东对东北战局的最大忧虑是：国民党军放弃东北，全部撤回关内。

东北地区的地理位置极其特殊——这是国土向东北方向延伸出去的一片相对独立的区域，与华北地区相连接的部位仅仅是一片走廊般的狭长地带，辽东湾深深地嵌入这片狭长地带里，使这个被称为"鸡形国土"的颈部最窄处不足三百公里。从战场地理上看，东北地区虽然幅员辽阔，但如果其颈部一旦被占据，整个东北地区就等于关上了大门。那个时候，无论东北、华北乃至全国的战局将发生什么变化，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这扇大门的开合，取决于谁能掌控这扇大门的开合——东北战场的这种军事态势，在战争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决战前夕，显得格外令人瞩目。

美国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视，因为这一地区与苏联接壤。从长远军事利益看，中国的东北是美国在远东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美国希望东北能够成为遏制苏联的前哨堡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美国政府极力怂恿和支持国民党军抢占东北，并出动大批飞机和军舰将国民党军运送到这一地区，目的就是把刚刚进入东北的兵力薄弱的共产党军队歼灭或者赶走。

但是，随着战争进程的演变，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已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特别是一九四八年初，林彪指挥不断壮大的东北野战军取得冬季攻势胜利之后，美国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军事较量所持有的立场发生陡转。他们建议蒋介石放弃东北，将那里的国民党军主力撤入

关内。美国人的理由是：首先，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有被彻底歼灭的危险。美国驻华使馆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说：“在满洲，少数几个主要城市仍然在被包围之中，而由山东经海路运到葫芦岛的那支强大的和装备极佳的援军，又一直无法打通该港与沈阳地区的陆上交通。在满洲的政府军队的补给和增援全靠空运，他们的部队和军需品因防御作战而日益枯竭，其地位如果不是到了生死关头的话，也是很严重的”。因此，“舍建议以撤退来解救目前陷入在该处的政府军队外，就别无他途可寻”。其次，美国已经无法承担国民党军在东北地区存在和作战的巨大成本。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在写给国防部的报告中说：“我深信继续据守被孤立的满洲城市是徒劳无益的，这些城市的军需民食完全依靠空运，而中国民用及军用航空运输能力的总和，犹远不足以满足需要的浩大吨位。空运的补充、保养和燃料的花费——在一个缺乏现金信用的国家中——足以导致经济上的灾难。另一方面，空运对于供应上，仅能做无效的帮助。”

美国力主国民党军从东北地区全面撤退，这一建议在战略上是具有相当合理性的。但是，对于共产党人来讲，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当时蒋介石采纳了美国人的建议，解放战争的进程将呈现出另一种样式。因为，尽管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受到严重打击，但是，国民党军在东北、华北、中原、华东和西北的五大军事集团中，仍以中原和东北两个军事集团的兵力最多、装备最好。如果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全部撤入关内，势必大大加强国民党军在华北和中原地区的作战力量，而且这种加强意味着巨大作战集团的战略移动，使华北和中原战场上陡然增加巨大兵力，这将给长江以北战场上的共产党军队带来不可预知的军事压力。

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一九四八年二月七日，当东北野战军还在进行冬季作战的时候，毛泽东在给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的电报中，明确提出“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毛泽东的这封电报被视为辽沈战役的最初动因：

> ……你们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蒋介石曾经考虑过全部撤退东北兵力至华北，后来又决定不撤。这主要是因为南线我军尚未渡过长江及北线我军尚未给蒋军以更大打击的缘故。但最近你们已连续取得几次大胜仗，如果你们再有几次大胜仗，杨（杨得志）、罗（罗瑞卿）、杨（杨成武）又出平绥、出冀东，南线我军又有积极行动，蒋军从东北撤退的可能性就将突然增长，其时间可能在夏季，或更早一点。因此，你们应准备于一个月内外完成现地区之作战，而于一个月以后再进行一个战役［包括打几仗］，然后进入大休整，准备应付上述可能的新形势。但不知部队情况许可这样做否。你们上次电报曾说锦州方向无仗可打，该方向情况究竟如何。如果我军能完全控制阜（阜新）、义（义县）、兴（兴城）、绥（绥中）、榆（榆关，即山海关）、昌（昌黎）、滦（滦县）地带，对应付蒋军撤退是否更为有利。对于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如果我军尚无足够力量阻止其撤退，则撤退后的蒋军似将控制锦州、承德、北平、天津四角及其中间地区，并打通津浦路北段，其给养当然会很困难，士气会更衰落，但兵力则较集中，这些可能情况亦须预先见到。当然蒋军死钉在东北不撤退的可能性也有，但除非我军强大到使其无法撤退，否则是难于设想的。

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十分明确，即冬季战役之后，东北野战军的作战目的，既不是攻占几个不重要的城市，也不是设法巩固现有的地盘，而是要从松花江附近向南长驱直入，迅速插到关闭东北地区“大门”的位置，即锦州、承德一线，彻底截断国民党军从东北撤退到华北的通道，并以决战的态势将其在东北地区就地全歼。

出乎毛泽东的预料，林彪对于这一战略部署顾虑重重，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优柔寡断。

毛泽东与林彪就这一问题反复商讨的过程，虽然不能称之为“争执”，但争辩是明白无误存在的。令人焦灼的是，共产党人的长时间的商讨，恰恰发生在国民党方面就是否撤退争执不休的时候。于是，一九四八年上半年，国共双方同时就东北地区军事部署问题所进行的争辩，不仅仅是战略上的较量，也是关乎内部关系的严峻的政治考量

——当时的情势是，作战双方，谁最早于统帅与将领之间取得思想和行动的完全统一，谁就将赢得东北战场上的军事主动。

毫无疑问，国民党军在东北地区已经陷入被动：数十万大军被孤立在长春、沈阳和锦州三个地域内，长春与沈阳之间、沈阳与北平之间、沈阳与大连之间的铁路已被切断，国民党军的补给全部依靠空运，由于处境极其困难，官兵厌战情绪严重。而在驻守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中，中央军嫡系部队与地方杂牌部队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导致不少高级将领已有向共产党方面寻求出路的意向——从军事上讲，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只有暂时固守城市的能力，出击作战并且战而制胜已经是完全不可能了。同时，在国民党军占据的大城市中，沈阳百分之九十的工矿企业停产，长春的商店仅剩下寥寥几家在勉强经营。由于物价飞涨，市民的生活几近陷于绝境。美联社电讯称，长春市居民"吃到饭的仅占百分之二十，其余百分之二十一吃粥，百分之二十三吃豆饼，百分之十七吃树皮，百分之十九行乞街头"。经济的崩溃引发巨大的骚乱，锦州两万多市民一夜之间将一家大粮店抢了个精光，长春大学两千多名学生和教职员工一起冲出国民党军的封锁投奔到解放区。

为此，毛泽东明确指出，东北战区的决战时机已经成熟。

对于立即关闭东北的"大门"，就地全歼国民党军的战略设想，中共东北局的领导是完全赞成的。林彪收到毛泽东电报的第三天就回电表示："我们同意与亦认为将敌堵留在东北各个歼灭，并尽量吸引敌人出关增援。这对东北作战及对全局，皆更有利。今后一切作战行动，当以此为准。"但同时又表示："敌主力自锦州以北撤退的时机，大约在我军歼灭吉林、长春、四平等地敌人以后，又加上关内他的局势甚紧张时，即会开始。但只要吉林、长春敌被我抓住和未歼灭前，沈阳的敌人不会退的"。而"锦州附近敌守城不出，守兵亦较多。我军在该

处无主力。故该处无大战斗”。电报显示，林彪认为，虽然必须将国民党军截歼于东北，但目前在锦州一线没有作战条件。

由于卫立煌采取保存实力的战术，国民党军始终据守城市不出，东北野战军无法利用运动战大量歼敌，因此，作战目标只能从沈阳、长春、锦州中选择一处发动城市攻坚战。四月十八日，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致电中共中央，提出攻打长春的作战计划，并再次陈述了攻击锦州“不甚适宜”——虽然林彪一向以作战谨慎闻名，但还是难以解释他为何对于攻打锦州到了小心翼翼的地步。电报篇幅很长，在此摘录的原因是此电引起毛泽东极大的不悦：

……第一步实行围城，以十天到半月的时间，进行攻城作业和各种攻城准备，并扫清外围。在此期内，极力吸引沈阳敌人北上增援。如敌增援，则主力南下，在四平附近野战中展开大规模的反击，歼灭敌人；如敌不增援，则我军即对长春发动全面总攻，计划在十天半月左右的时间内全部结束战斗；在总攻击发动后，战斗已进行到重要阶段时，估计届时沈阳之敌必利用我军消耗与疲劳大举北上增援，则我军仍坚持将城打下……如在锦州附近之范汉杰兵团不与沈阳之敌会合，仅沈阳之敌北上增援，是较易应付的；如锦州附近之敌与沈阳敌人会合，再向北增援，则使我军攻城和打援皆发生困难。因此，我们建议晋察冀以四个纵队或三个纵队兵力，开到承德以东或山海关以北地区歼灭和钳制敌人……以上是我们对作战的根本意见。其他意见亦曾深入考虑，均认为不甚适宜。我军如打铁岭或抚顺或本溪或新民，敌均能立即组织三个师以上的兵力守，而集中十个师以上的兵力增援。敌增援距离甚近，又因辽河、太子河的妨碍，我军攻城打援皆不便。本溪与铁岭两点，如我军主力向该方向前进时，敌甚至可能暂时撤退，让我军扑空；如我军主力向义县前进，义县之敌必然自动撤至锦州；如我军攻锦州，则所遇敌人更较长春强大；如我军等候敌人打通锦沈线，则不知要等到何时，且即令敌出来打通，但我主力一向锦沈线前进时，而敌必自动收缩，使我军扑空；如我军向锦州、唐山之线或冀东或平绥前进时，在敌目前采取放弃次要据点，集中兵力固守大城市的方针下，则必到处扑空，或遇到四五个师兵力守备的城市。且大军进到那些小地区，衣服、弹药、军费皆无法解决。同时……在我主力南下情况下，长春之敌必能乘虚撤至沈阳，打通锦沈线。如我军以很多兵力［如三个纵队］入关，沿途仍不易求小仗打，遇大的战斗［又攻占又打援］则又吃不消。而留在东北的部队，既不能打大仗，又无小仗可打，陷于无用之地。故目前只有打长春的办法为好。

应该说，首先攻打长春，并不符合毛泽东的战略设想。因为攻打长春很可能带来一个后果，即长春失守后，国民党军因为卸下了一个

沉重的包袱，从而下定从东北地区全面撤退的决心。但鉴于林彪表示“十天半月左右的时间内全部结束战斗”，毛泽东同意了东北野战军攻打长春的作战计划。同时，毛泽东还是致电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和谭政，认为他们在此前的电报中就“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所提出的困难并不完全符合实际：

> ……（一）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意见。（二）我们可令杨（杨得志）、罗（罗瑞卿）、杨（杨成武）［正在商量中］以三个纵队出至承德、北平之线以东地区，或者可能出至承德以东地区，起配合作战之作用。望令该地区准备八万人的粮食及其他协助事项，该三纵到达时间可能在辰（五月）删（十五日）以前，亦可能在辰删至辰哿（二十日）之间。但你们主要不要依靠杨、罗、杨。（三）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你们所说打沈阳附近之困难，打锦州附近之困难，打榆锦（山海关至锦州）段之困难，以及入关作战之困难等，有些只是设想的困难，事实上不一定有的。有些是实际困难，在你们打开长春南下作战时会要遇着的，特别在万一长春不能攻克的情况之下，要遇着的。因此，你们自己，特别在干部中，只应当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

东北野战军对长春的攻击遭到严重挫折。

当林彪正准备发动长春战役时，长春国民党守军为了出城寻找粮食和保护长春机场免受炮火威胁，出动新七军的一个半师和第六十军的一个师，占领了长春西北约三十公里外的小合隆镇。林彪认为长春守军的出动带来了战机，他立即命令各纵队奔袭小合隆镇进行合围，以期吸引长春守军出城增援，而后集中东北野战军主力攻击长春。

一纵二师经过三天的隐蔽行军，于四月二十四日到达长春西南的驿马站，由于没有仔细进行战前侦察，在不知国民党军暂编六十一师主力已经达到的情况下，仓促迎敌，受到猛烈侧击伤亡严重。一纵整理部队后，再次发动坚决的攻击，暂编六十一师被迫向北撤退。与此同时，六纵对长春机场展开了攻击，歼灭暂编五十六师师部和一个团，占领大房身机场。长春守军总指挥郑洞国获悉机场丢失的消息后，严令新编三十八师和暂编六十一师进行反击。二十五日，争夺机

场的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就在交战双方几乎形成僵持的时候，一纵主力的到达使负责侧翼掩护的暂编六十一师发生混乱。新编三十八师师长陈鸣人态度强硬，他拒绝了一些军官提出的撤退建议，认为只要一退，位于最前面的两个团就完了，所以必须不惜一切坚决顶住，然后有计划地实施撤退。他严令炮兵还击，并投入预备队全力增援。看到部队显出犹豫动摇的迹象时，他命令卫士打开铺盖铺在后撤的道路上，然后他躺在上面说："我就睡在这里了，看你们哪个要跑！"但是，新编三十八师和暂编六十一师还是退回了长春。

长春守军没有按照林彪预期的那样出援，已经出动的部队也迅速撤回了长春。东北野战军"计划在十天半月左右的时间内全部结束战斗"的前景突然渺茫起来。五月二十九日，东北野战军领导致电中央军委，提出"改变硬攻长春的决心，改为对长春以一部分兵力久困长围，准备乘其撤退时在途中追歼该敌，而使我主力转至热南承德、古北口之线"作战；或者"主力仍留长春、沈阳间加强整训，以一部进行围困长春，待攻城训练和准备更成熟，和敌人困难更增加时，再行攻城"。

可以想见毛泽东接到这封电报时的感受：攻击长春不成，何时再行作战，林彪之意是要等长春守军突围，或者守军困难增加而我军准备更充分时——这是一个没有预定时间的模糊概念。而毛泽东最担心的恰恰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国民党军在战略部署上会出现重大变化，从而导致关闭东北"大门"的设想落空。

六月一日，中央军委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要求他们回答：

林、罗、刘：

请回答下列问题：（一）你们对长春使用几个纵队，是否已展开全力攻击。（二）八天作战我军伤亡多少。（三）长春外围工事是否均已夺取。（四）是否已和六十军接触，该军战斗力如何。（五）部队打堡垒战术是否已由集团冲击的老办法，改变为小组攻击的新办

法。（六）八天作战中是否已采用坑道爆炸方法。（七）是否已实行军事民主，即遇到困难时由连队指挥员在火线上开会反复研究攻克敌阵的方法［大家想办法］。（八）现在是否已停止攻击或者还在继续攻击。（九）你们指挥所在何处。是否已召集纵、师干部开会，详细检讨经验。最前线是否有你们的代表执行阵地指挥职务。（十）沈阳方面反应如何，有无准备增援意图。（十一）徐向前同志指挥之临汾作战，我以九个旅［其中只有两个旅有攻城经验］攻敌两个正规旅及其他杂部共约两万人，费去七十二天时间，付出一万五千人的伤亡，终于攻克。我军九个旅［约七万人］都取得攻坚城经验，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大胜利。临汾阵地是很坚固的，敌人非常顽强。敌我两军攻防之主要方法是地道斗争。我军用多数地道进攻，敌军亦用多数地道破坏我之地道，双方都随时总结经验，结果我用地道下之地道获胜。如果我军不惜伤亡，以两个月时间夺取长春，你们估计是否有此可能？局势将会怎样。

军委

一日七时

这些问题全是对林彪刚刚开始攻打长春又突然弃攻改围的疑问。

当天晚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复电，回答了军委询问的所有问题，并再次强调：“此次如攻长春，我们拟以新老八个纵队直接投入攻城，以两个纵队阻援。我攻城兵力与守城兵力对比，不到三与一之比；但即三与一之比，打援兵力则绝对悬殊。故要攻城则不能同时打援。如敌不增援，我军在攻城战中逐屋争夺，消耗必大。能否维持消耗到底，而获得结束战斗的结局，尚无把握。”至于何时能够拿下长春，电报说：“目前对长春地形条件还不够具体了解，不知地形条件对我是否有利，须待实地侦察后才能看出。因此，我们对此战局无最后的确定见解，拟待侦察地形后，才可通过其他条件得出较有把握的意见。”

既然战前准备如此不充分，当初建议首攻长春的依据又是从何谈起的呢？

三日中午，中央军委再次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就攻打长春再次开列一系列问题要求他们回答：“（一）以两个或三个纵队及几

个独立师攻城，以七个至八个纵队准备打援，是否可能。（二）两种打法是否可能：（甲）能强攻则用强攻办法；（乙）不能强攻，即攻占一半或三分之一之后，改用长围，构筑坚阵，以一部围困该敌，主力休整待机。（三）你们弹药方面是否经得一次大消耗。”

五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复电中央军委，提出东北野战军目前作战的三种方案：一、“正式进攻长春”，但“无把握”，万一失利，“将来带着失败情绪去执行围困沈阳、锦州、天津、北平的任务，是不利的”。二、以“少数兵力围困长春”，主力南下热河、冀东作战，但这也是一个“不宜于采取的方案”，因为部队南下后粮食补给困难，而如果此时长春守军“在沈阳敌人接应下退回沈阳”，就可能造成我军“两头失利的结局”。三、“对长春采取较长期的围城打援”，然后攻城，“这一行动除多费几个月的时间以外，没有其他坏处，但能有把握地歼灭敌人和拿下长春”。

显然，电报中提出的第二种方案，已经接近毛泽东关闭东北“大门”的设想。但是，林彪依旧认为：“只有在长春敌被歼灭后，由东北到热河的铁路公路尽可能的向前延伸以后”，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热河、冀东才“较为有利”。七日，中央军委回电，基本同意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提出的第三种方案：既然东北野战军领导坚持首先解决长春，而拿下长春也有重要的意义，那么就必须坚定这一信心。但是，毛泽东仍旧期待着林彪能够尽快南下作战、关闭东北地区的“大门”。所以，他要求东北野战军“在攻长春的三个月至四个月的时间内”，“必须同时完成下一步在承德、张家口、大同区域作战，或在冀东、锦州区域作战所必需的粮食、弹药、被服、新兵等项补给的道路运输准备工作”。

围困长春的决策就此开始执行。

关闭东北“大门”的设想被暂时搁置。

一个多月过去了，长春国民党守军没有发生大变化的征兆，据守沈阳的卫立煌更是无论如何也不出动。

关内的中原战场上战事越演越烈，关外的东北战区却在僵持中寂静无声。

共产党人的幸运是，蒋介石没有认同美国人提出的国民党军从东北全面撤退的建议。蒋介石决心“确保东北”的理由有三：首先是政治上的考虑。此时，他刚刚当选中华民国大总统，而长春、沈阳和锦州这样的重要城市，象征着“国家力量的存在”，因此，放弃东北显然对他的政治声誉不利。其次是战局上的考虑。蒋介石认为，只要东北还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国民党军，并且占据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就能够牵制共产党人的数十万大军，使之不能离开东北进入关内——美国建议从东北撤退的理由是加强华北的军事力量。但是国民党军撤退后，林彪的大军就会跟着进入华北，华北反而不能稳固了——“东北是华北的屏障，要保华北，必须确保东北。”再者，就是迫于东北籍国民党政要和军队高级将领的压力。当国民党军放弃东北的传言频起时，东北籍的政要和将领们纷纷向国民政府请愿，而从东北兵败而归的陈诚更是受到千夫所指：“如果东北失掉，华北失掉，华南也不保，难道都像陈诚一样想逃到美国去吗？”在这种压力下，蒋介石无法决断国民党军是否从东北全面撤退。

当从东北全面撤退的建议被拒绝后，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曾向蒋介石建议，至少要将国民党军主力从长春撤退到沈阳，这样能够集中兵力固守沈阳和锦州一线。但是，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认为，长春必须坚守，因为长春可以牵制林彪部主力，使其不能集中兵力威胁沈阳。蒋介石也反对放弃长春，但是他的理由有点古怪：长春是满洲的都城，放弃在国际上影响太大——所谓“满洲的都城”，是日本侵略中国期间的一场政治闹剧，长春从来都不是都城，只不过曾经是一

个全世界都不承认的“伪都城”，没人知道蒋介石担心的国际影响从何谈起?

蒋介石与卫立煌都认为，东北不但必须坚守，而且能够守住。卫立煌说：“目前东北确已面临极艰苦之阶段，但我军兵力今后若集中，战略方面采主动，战术方面采机动，则东北战局之扭转并非难事。”但是，在如何死守东北的问题上，蒋介石与卫立煌矛盾尖锐。矛盾的核心正是毛泽东所担心的：是否加强锦州方向的兵力。蒋介石多次要求卫立煌打通沈锦线，将主力从沈阳撤退到锦州。卫立煌一再拒绝执这一命令的动机令人费解。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卫立煌认为，从沈阳向锦州的撤退行动，必然会给林彪带来战机，致使撤退中的国民党军遭到围歼——卫立煌的担心不无道理，此时林彪正因为他坚守不出而寻找不到实施运动战的战机，如果国民党军主力大规模地跨越数条河流向锦州移动，显然是个将其截击围歼的好机会——至于全国战场的格局，卫立煌并不关心，他只关心自己的政治和军事生涯。作为军事将领，上任不久就出现重大闪失，这对他的个人声誉损伤太大，他可不想为蒋介石承担这个历史责任。卫立煌坚信，只要他不出击、不移动，林彪就拿他没办法。蒋介石对于卫立煌坚守不出、毫无作为忧心如焚。他在日记中写道：“国军若不积极出击，作破釜沉舟之决心，则沈阳二十万之官兵皆成瓮中之鳖。”

客观地说，蒋介石虽然不同意从东北全面撤军，但他作出的将国民党军主力从沈阳撤至锦州的决定，在战略上是有其合理成分的。蒋介石和毛泽东一样把注意力集中在了锦州。一旦东北的“大门”锦州在手，就等于掌握了自由进出东北的权利。从国民党军的角度讲，只要锦州不丢，不但可以把林彪的大军关闭在东北地区，使之不能进入华北战场，而且北可照应东北战场、南可支援华北作战，在全国战场兵力已经匮乏的情况下，这似乎是唯一可行的战略设想。

但是，卫立煌就是不执行。

时间在来回争执中流失，最后，蒋介石无奈地作出妥协，他放弃了将沈阳国民党军主力撤至锦州的设想。六月，当东北野战军开始围困长春的时候，蒋介石电告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东北之战略要求在于固守目前态势，使不再失一城一兵，即有利于关内作战。”——这是争执之后一个不了了之的结局。

对于不久之后爆发的辽沈战役而言，蒋介石最终的妥协对于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来讲是致命的。

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认为，如果国民党军既不从东北全面撤退，也不从长春局部撤退，就这样以现有态势固守长春、沈阳和锦州，那么“从共军手中采取主动和击败他们的机会将不会再有了”。

七月，东北战区依旧沉寂。

东北野战军仍在围困长春，攻击长春的时机还没显现。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领导再次开会研究战局，二十日，他们致电中央军委：“最近东北局常委重新讨论了行动问题，大家均认为我军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的攻长春。”南下作战的具体目标是：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和山海关。如果进展顺利，“即进行夺取承德和打增援的战斗”，直至继续南下配合华北野战军“夺取张家口”。

二十二日，中央军委回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行文中暗含着批评：“攻击长春，既然没有把握，当然可以和应当停止这个计划，改为提早向南作战的计划。在你们准备攻击长春期间，我们即告诉你们，不要将南进作战的困难条件说得太多太死，以致精神上将自己限制起来，失去主动性。现在你们已经将注意力移到向南作战方面，研究南面的敌情、地形、粮食等项情况，看出其种种有利的条件，这是

很好的和很必要的……”——时间已经耽误了一个多月，在无法对长春实施攻击的情况下，终于醒悟到必须南下作战，但在作战意图上依旧与毛泽东的战略设想差距甚大。林彪南下作战的目标，是北宁线上的几个小城市，对于如何关闭东北的“大门”还是没有作战方案。

毛泽东并不认为林彪在有意避战，林彪打仗精于计算，毛泽东对他总是试图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战果的作战风格了如指掌。但是，毛泽东认为，目前东北的战局已经不是着力于这种计算的时候了，拥有几十万大军的东北野战军到了进行大规模决战的时刻了。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这封电报，不但没有涉及关闭东北“大门”的作战设想，而且在东北之敌尚未歼灭之前，出关去华北地区作战，那么东北战场上的数十万国民党军由谁来打？为了使东北野战军南下作战的目标和目的更加明确，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开始了充满解释、争辩、询问和劝说的电报来往。

三十日，毛泽东致电林彪：“关于你们新的作战计划，我们觉得你们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然后再向承德、张家口打傅作义。如果你们不打范汉杰，先打傅作义，则卫立煌将以大力集中锦唐线，卫、范协力向西援傅，那时你们可能处于很困难地位。”

林彪对先打锦州很是为难。八月一日傍晚，他在回电中强调：“锦州经常驻有六七个师的兵力［内为九十三军两个师，五十四军三个师。另外还有暂五十五师和暂五十一师，两个军直属队和一个兵团直属队］，城市工事业已完成，故我们不拟攻锦州。但该敌万一出来增援，在增援中歼灭其大部时，那时当然可以乘胜攻锦州，但根据去年冬季在沈阳附近作战的经验，敌人是不敢出来增援的。”

接着，六日和八日，林彪连续致电中央军委，要求在东北部队南下作战时，华北地区的杨成武部（华北军区第三兵团）要出动配合：

“不宜我们先行动调动傅作义向北向东，而应是杨成武部先行动调动傅作义向西，以便我们与杨（杨得志）、罗（罗瑞卿）部队（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开展战局，和更迟一步与杨成武部会合，歼灭傅作义调到了西线的力量。”

中央军委第二天回电，表示杨成武部将于二十一日出动，杨得志部会先几天向平古（北平至古北口）、平张（北平至张家口）线出击，以保障杨成武部的行动。同时，这一线的国民党军主力，距东北野战军即将作战的锦榆线（锦州至山海关）“极远”，所以“你们应迅速决定并开始行动”。

毛泽东焦急地等待着林彪南下作战的消息。

然而，十一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说部队出动的时间“仍是无法肯定”：

……东北主力数月来均未作战，指战员均甚急迫要求作战，部队随时皆可出动。但在现在地区无战机可求，南下则因大批粮食的需要无法解决，向热河运粮道路甚远，必须利用铁路、汽路。但今年雨水之大，为三十年来所未有，铁路、汽路冲毁甚多，近日来形势更猛。原估计未（八月）删（十五日）左右可修好的铁路、汽路、桥梁，以现在形势来看，能否如期完成仍无把握。我们现在只待郑家屯（辽源）南北运粮道路修复，形势稍减［因全军皆无雨具］，即可随时出动，决不以杨成武部行动之迟早为标准。但目前对出动时间，仍是无法肯定。

毛泽东终于忍无可忍了：

……关于你们大军南下必须先期准备粮食一事，两个月前亦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两个月以来，你们是否执行了我们这一指示一字不提。现据来电则似乎此项准备工作过去两月全未进行，以致现在军队无粮不能前进。而你们所以不能决定出动日期的原因，最近数日你们一连几次来电均放在敌情上面，并且因此又均放在杨成武是否能提早出动上面。你们六日十九时电，虽曾提到粮食问题，但是你们说：“如杨成武部出动时间能提早，则我们出动时间亦能提早。”你们八日十七时电则全未提到粮食问题。但说敌情严重，并作出结论说：“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当着我们向你们指出不应当将南面敌情看得过分严重，尤其不应当以杨成武部之行动作为你们行动的标准，并且同时即确定了杨成武的行动时间以后，你们却说［相距不到三天］：“决不以杨成武部行动之迟早为标准”，而归

结到了粮食问题。对于你们自己，则敌情、粮食、雨具样样必须顾虑周到，对于杨成武部则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试问你们出动遥遥无期，而令该部孤军早出，傅作义东面顾虑甚少，使用大力援绥（归绥），将杨成武赶走，又回到东边来对付杨（杨得志）、罗（罗瑞卿）及你们，如像今年四月那样，对于战局有何利益，你们对于杨成武部采取这样轻率的态度是很不对的。对于北宁线上敌情的判断，根据最近你们几次电报看来，亦显得甚为轻率。为使你们谨慎从事起见，特向你们指出如上。你们如果不同意这些指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

毛泽东极少用如此严厉的口吻批评一位战区将领。严厉的批评中既反映出他对东北战局的焦虑，也反映出他对林彪寄予着极大期待，他期待着东北野战军为全国战局的转变发挥重要作用。

接到毛泽东起草的这封电报后，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感到了问题的严重。第二天，他们致电中央军委，委婉地解释了毛泽东批评他们的有关问题，并再一次强调："由北满运粮到热河路途遥远需要铁路，但铁路要八月有日（二十五日）才可能修到阜新，因此，预定部队在八月底开始南下。现则突因异乎往年的大雨情况，故部队原定的出动时间遂无十分把握做到。目前仍尽力争取早日出动，只要雨势不继续上涨能逐渐下降，则仍可能做到按时出动。"

为了适应南下作战的需要，中共东北局请求将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机关分开。八月十四日，中央军委任命林彪任东北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兼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罗荣桓任东北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兼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刘亚楼任东北军区第一参谋长兼东北野战军参谋长，谭政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可以看出，中央军委赋予了林彪在东北战区指挥作战的绝对权力。

林彪终于下定了南下作战的决心。

九月三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报告了他们拟定的南下作战部署："我军拟以靠近北宁线（北平至沈阳）的各部，突然包围北宁线各城，然后待北面主力陆续到达后，进行逐一歼灭敌人，而以北线主力控制于沈阳以西及西南地区，监视沈阳敌人，并准

备歼灭由沈阳向锦州增援之敌或歼灭由长春突围南下之敌。对长春之敌，以现有围城兵力，继续包围敌人，并准备乘敌突围时歼灭该敌。”——林彪南下作战的目标，重点在锦州至沈阳之间，强调的是准备歼灭从沈阳出动增援或从长春南下突围的敌人，锦州依旧不是作战的主要方向——林彪还是没有下定集中主力攻击锦州以彻底关闭东北“大门”的决心。

五日，毛泽东在回电中同意了东北野战军的作战部署，但还是着重提醒道：“在你们未攻锦州以前，长、沈敌人在你们强大兵力威胁之下，是否敢于有所行动，还不敢断定，恐怕要在你们打锦州时，才不得不出动。”电报发出仅仅一天之后，毛泽东再次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要求他们“重新考虑作战计划”——这是解放战争史上一封具有重大意义的电报：

……你们同意我们五日电所提意见，甚好甚慰。我们准备五年左右［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是具有可能性的……你们如果能在九、十两月或再多一点时间内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就可以达到歼敌十八个旅左右之目的。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因为锦、榆、唐三点及其附近之敌相互孤立，攻歼取胜比较确实可靠，攻锦打援亦较有希望……如果在你们进行锦、榆、唐战役［第一个大战役］期间，沈、长之敌倾巢援锦［因为你们主力不是位于新民而是位于锦州附近，卫立煌才敢于来援］，则你们便可以不离开锦、榆、唐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于此，你们应当注意：（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三）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粮食、弹药、新兵等］和处理俘虏事宜……

置长春和沈阳守敌于不顾，确立攻击并控制锦州的决心，确立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最终“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辽沈战役的总体作战原则由此确定。

九月初，东北军区部队和东北野战军部队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移动。夜晚，火车一列接一列地向南开进，白天空车返回，太阳落

山之后继续运载部队和物资南下。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后勤部长李富春负责运输，军工部长何长工负责调运军火，铁路总局局长吕正操负责调度车辆，野战军后勤部副部长李聚奎负责物资供应。他们不但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和最秘密的情况下将主力部队送往前线，而且还要从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城市将大量的粮食、弹药和物资运往前线。火车是做了严密伪装的，在接近前线的地区，部队下车开始步行。与大军随行前进的，是支援东北野战军作战的民工，这支声势浩大的支前队伍赶运着从火车上卸下来的物资：七千多万斤粮食、一万一千多吨油料、一千多万发子弹、十五万枚手榴弹、二十万发炮弹、五万斤炸药、上百万套棉衣、棉帽和棉鞋以及大量的医疗和通讯器材。

十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保证战役将在十二日于锦州、义县间打响。

这一天，国民党军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厅长郭汝瑰到达沈阳。

冬天就要来到了，困守长春的国民党军的给养已成严重问题。

蒋介石要求卫立煌打通沈阳至长春间的铁路，以使长春守军向沈阳撤退："十月份必须打通长、沈交通。如果此时共军集中四平街一带，则国军打通沈阳、锦州线。等共军向辽西移动，则长春守军经西丰方面突围。"

郭汝瑰带着经过蒋介石修改的作战计划面见卫立煌。

卫立煌坚决反对长春守军突围，认为国民党军如果从长春突围，"只要两天便会被全部歼灭"。而"如果沈阳方面出兵援助，则沈阳方面也必定乱得站不稳阵脚"。卫立煌对郭汝瑰说："沈阳援助长春突围，犹如纵井救人，长春既不能救，而沈阳也不能保。如沈阳一旦不保，

则东北共军举六十万大军入关，必将导致华北华中危急。为今之计，沈阳只能固守以自保。至于长春，请政府目前加强空运。”郭汝瑰立即给卫立煌算了一笔账：政府对长春空运所消耗的经费，几乎占据了美国援华款的一半，在一亿两千五百万元的援款中，“必须以五千万元买汽油”以维持空运。长春每月空投物资已达九十多吨，现在再也没有运力增加了。距东北下雪大约还有八十多天，按照每天消耗六十吨物资计算，长春每日最多储存过冬物资三十吨，下雪前最多可以储存两千四百吨，而这一数字绝不可能令长春守军坚持到明年三月开春。况且，还没把长春过冬所必需的取暖燃料计算在内。

卫立煌沉默不语。

沉默还是等于拒不执行。

无奈的郭汝瑰向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新六军军长李涛寻求折中的办法。廖耀湘认为，目前沈阳平安无事，并非因为国军采取了守势，而是因为林彪还没有进攻。如果沈阳增加两个军的兵力，方可以固守一段时间。因此，需打通营口至沈阳的铁路线，将锦州方向的两个军由营口运至沈阳。于是，郭汝瑰带着他草拟的“立即打通营口，将锦州方面部队转用于沈阳”、“长春方面尽量加强空运，以图度过严冬”的折中方案回南京去了。

没有证据显示，当东北野战军大军南下时，国民党军方面有任何察觉。

卫立煌置身在孤岛般的沈阳城内，关乎生死的战场信息也被阻断了。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辽沈战役前夕国共双方发生的争执与争辩，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并因此形成了最后完全不同的结局。

自内战爆发以来，东北战区的共产党人以超人的毅力经受住了空前严酷的政治和军事考验，他们的政治坚定性是非凡的，他们所面临的决战是解放战争中全国战场上的第一次。作为战区最高军事指挥员，林彪的任何谨慎都是合理的。大军出动，将士用命，林彪必须承担外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因此，无法也不能要求一个战区将领能够和毛泽东一样对战争的全局拥有明晰的洞察。但是，“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共产党人在有不同意见的时候，经过民主讨论最终形成统一；而一旦形成统一，最高统帅部的战略部署便能够得到最坚决的执行——这是共产党人的得天独厚的政治优势，这种政治优势是国民党所不具备的，这也是导致他们最终失败的根源之一。

东北的黑土地上，高粱正红，丰收在望。

得知林彪的几十万大军已经出动，毛泽东焦灼的心情终于松弛下来。

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收获季节——就像秋风将遍野的高粱吹红一样——已经不可逆转地来临了。

## 战锦方为大问题

那一天，连接华北和东北的北宁铁路线上突然燃起了一条火龙。国民党军侦察机飞行员报告说，大批共军和百姓混杂在烟尘和烈火中时隐时现，有把这条铁路从地图上彻底抹掉的企图——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和参谋长黄志勇指挥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四、第六、第八师和骑兵师、炮兵旅，对山海关至昌黎间上百公里的地段，发起了自西向东的猛烈攻击。他们在执行这次作战任务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此刻所进行的作战，将对中国当代历史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后来所有的战史都是这样叙述的："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东北野战军拉开辽沈决战的序幕，战役首先在北宁线打响。"

正是高粱红遍田野的季节，向北宁线发动攻击的官兵，脑海里并没有"序幕"的概念，他们只想将被国民党军恢复的北宁线再次切断，因为这里对于华北和东北的国民党军来讲是异常敏感的部位。

十三日，三十一师九十三团攻克石门，三十二师主力攻克安山车站，九十六团攻克张庄车站，三十三师九十九团占领后封台。十四日，三十三师和三十二师九十六团对昌黎形成包围，国民党守军于黄昏时弃城遭到围歼，晚上昌黎城被十一纵占领。接着，官兵们继续向山海关方向推进，于十七日攻占北戴河，并威胁秦皇岛港口。秦皇岛港内停泊的国民党军海军舰艇向十一纵实施猛烈的炮火拦截，以掩护步兵增援秦皇岛。与此同时，国民党军第六十二军的两个师紧急出动，企图趁机夺回昌黎。十一纵主力立即掉头西返，十八日在昌黎附近与增援之敌展开激战，昌黎再次落入国民党军之手。三十一师将第六十二军一五一师拦截，激烈的拉锯战后，国民党军被迫退回滦河以西。冀察热辽军区的三个独立师同时包围了兴城，并一举攻占绥中。

从铁路交通上讲，华北与东北的联系通道已被截断。

这是决战前夕林彪最希望看到的战果。

东北野战军南下部队迅速向北宁线云集。十一日，由司令员吴克华、政治委员莫文骅率领的第四纵队自台安出发，由司令员詹才芳、政治委员李中权率领的第九纵队自北镇出发，官兵们渡过大凌河后直插锦州以北，切断了锦州与义县间的联系，并于十六日包围义县，致使义县守军无法向锦州收缩。十二日，由司令员段苏权、政治委员邱会作率领的第八纵队自吉林八面城南下，渡过辽河，直插锦州以北。由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吴富善率领的第七纵队自四平附近出发，南

下到达北镇后，越过大凌河，插入锦州以南，截断了锦州守军的南逃之路。十四日，由司令员韩先楚、政治委员罗舜初率领的第三纵队和由司令员苏进、政治委员邱创成率领的炮兵纵队主力以及第二纵队五师由辽源、四平等地乘火车南下阜新，二十日前后接替四纵和九纵包围义县。

北宁线上的战斗已经打响，鉴于过去因兵力分散招致各个被歼的教训，国民党军国防部命令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集中力量守锦州、锦西、葫芦岛及秦皇岛、山海关两区。"范汉杰立即收缩兵力，将在锦州以南驻守高桥的暂编五十四师撤回锦州；以驻守锦州的第九十三军暂编二十二师主力向北增援，解救义县守军；同时将驻守锦州的暂编六十二师调到锦西以确保海路安全。

为了不使驻守在锦西、葫芦岛地区的第五十四军收缩锦州，四纵绕过锦州继续南下，切断了锦西与兴城间的联系；七纵在四纵十二师的配合下攻占高桥、塔山和西海口，将锦州与锦西两地完全割裂开来。而九纵从义县南下不断向锦州靠近，先头部队二十五师遇到小股敌人就歼灭，遇到大股敌人就避开，二十五日凌晨，插到锦州北面的二郎洞、营盘、达子营一线；跟进的二十七师七十九团在锦州以北控制了锦承公路和铁路，八十团和八十一团则包围了锦州北面重要的制高点帽儿山；二十六师包围了位于薛家屯的国民党军暂编二十二师。

林彪致电二十五师，要求他们赶快构筑阻击工事，在锦州以北站住脚。林彪的担心是有根据的，因为这里距离锦州太近了，国民党军决不会允许作战对手在这一带存在。

二十五日天刚亮，国民党军飞机对九纵阵地开始了猛烈轰炸，锦州城内的炮兵也开始向这个方向轰击。七时左右，锦州守军以两个师的兵力发动反击，企图夺回锦州北面的制高点，同时解救被包围的暂编二十二师。九纵二十五师官兵死顶不退。七十五团五连卡在锦州至

义县的公路上，一个连抗击着国民党军一个团的反复冲击，前沿的机枪手被炮弹炸起的泥土埋了数次仍在战斗。在五姓屯阵地坚守的是七十四团二连，连长张全身负重伤，依旧在指挥战斗，敌人连续冲锋十次，两次接近阵地前沿，二连打得只剩下二十多人，阵地依旧在手。敌人的反击越来越猛，二十五师指挥所几乎成了前沿，部队一边阻击四周山上的敌人，一边为指挥所挤出一块地盘来。指挥所刚刚设置起来，就跑进一个人来喊："你们这里怎么这么安静？"警卫员拦住他问："你是谁？"来人答道："帽儿山的，长官让我来打听消息。"原来这个冒失的家伙是国民党军的一个副排长。

师长曾雍雅意识到，混战中什么危急情况都可能发生。

没过多久，师指挥所接到七十四团报告：该团防守白老虎屯的一连与团部失去了联系，派去联络的战士全部牺牲在半路，一连也一直没有派人出来。唯一知道的是，他们被有坦克支援的敌人压缩在了村子里。白老虎屯距锦州两公里，位于锦州至薛家屯的公路上，是锦州守军北出解救暂编二十二师的必经之路。向白老虎屯攻击的国民党军多达一个团。一连在连长陈学良和指导员田广文的率领下，连续击退敌人的十五次冲锋。田广文一边战斗一边喊："同志们，打戴大檐帽的！打机枪射手！"坚守屯子北面的三排，多数官兵已经阵亡，八班阵地上只剩下战士姚湘云一个人，在敌人蜂拥而上的最后时刻，姚湘云冲进敌群拉响了手中的手榴弹。屯子东面的一排和二排与敌人混战在一起，一排长陶禄负伤，二排长吕绍德浑身是血，已经无法站立，他在阵地上爬来爬去指挥作战，直到血流殆尽。

"同志们！我们虽然不是一母所生，但我们同是革命兄弟！我们一起守住阵地，坚决打退敌人的冲锋！"天黑之后，指导员田广文清点了一下人数，全连只剩下三十七人，能够使用的只有一挺机枪，每个人的子弹也只剩下几发了。分散防守已经不可能，田广文和陈学良决定

将剩下的战士集中到一起阻击敌人。三十七个人刚转移到一间房子里，敌人就围上来了。田广文对连长说：“老陈，咱们宁可战死也不服软。”陈学良对指导员说：“咱们和阵地共存亡。”在两个连队指挥员达成共同意志的时候，由于已经没有炮弹，炮手王绪把他最心爱的小炮拆了，然后把零件藏在一口酱缸里；司号员马玉峰把号扔进火堆里，通信员也把联络旗撕碎了，大家把自己身上携带的筷子、皮带、枪套都扔进火里，然后望着陈学良和田广文。田广文说：“既然大家愿意死在一起，那么我们就和敌人拼了。敌人如果上来了，就用木棒敲他们！用石头砸他们！用牙咬他们！只要不死就夺他们的枪！”

田广文那一年二十三岁，这个出生在河北遵化一户贫苦农家的青年十六岁参加八路军，在战斗中经历了生死考验，十九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热爱给予他人生希望的部队，作为政治指导员，他比战士们更多地懂得一些为老百姓打出个人人平等的新中国的道理。因此，他认为就是死了，自己也没有白活。他把十八岁的神枪手赵桐凤拉到身边，将最后几颗珍贵的子弹拿出来，让他瞄准墙头上那个露出头的机枪手。赵桐凤的枪响之后，那个机枪手扑通一声栽了下去，然后四周突然安静下来。国民党兵在很近的距离喊：“八路兄弟们！交枪吧，跑不了啦！”田广文让会说南方话的赵桐凤喊：“蒋军兄弟们，你们有的也是南方人，我们南下大军，早就把你们的家乡解放了，你们家分了房子还分了地，现在你们打我们，你们有良心吗？你们也是穷人，为蒋介石卖命为了什么？”又安静了片刻，国民党兵又喊：“你们快投降吧，人这辈子为了啥，还不是吃喝玩乐，送了命不值得……”田广文对“吃喝玩乐”这个词异常反感，他扔过去一颗手榴弹，爆炸声响过之后，又安静下来。突然，北面不远处响起了机枪声，陈学良连长听了一会儿，说：“增援部队上来了！是咱们的水压重机枪的声音！”

七十四团三营终于打进了白老虎屯。

一连活下来的官兵仅有二十七人。

蒋介石命令卫立煌立即增援锦州。

这一命令还是遭到了卫立煌和廖耀湘的联合反对：要解锦州之围，应由华北的傅作义部出兵。只有关内出兵之后，沈阳方面才可出击，以期在锦州城下两军会合。当共军已经扑来时，命令部队从沈阳出动，这不是往林彪挖好的火坑里跳吗?

但是，驻守锦州的范汉杰不断地打电报求援。

九月二十四日，蒋介石召卫立煌到南京开会——这一天，济南被华东野战军攻陷，蒋介石终于有时间顾及东北了。

卫立煌到达南京后，蒋介石指示国防部第三厅与卫立煌商讨东北作战问题。第三厅提出的建议显然经过蒋介石授意：“如共军攻锦州，国军应放弃沈阳，全力援锦，以求一决定性胜利。同时，敌我主力决战之时，长春守军立即突围南下。如共军对锦州只是虚张声势，则国军可袭击彰武，歼灭共军部分有生力量，并破坏铁路后，立即撤回沈阳。此时，如判定共军主力在辽西，长春亦可立即突围。”

可是，卫立煌还是主张固守沈阳，“对锦州陷落的后果全不顾及”。

二十六日，蒋介石亲自主持军事会议。第三厅再次阐述：沈阳已成孤点，当共军攻击锦州时，沈阳守军应破釜沉舟向彰武、新立屯攻击前进，如此尚可死里求生，不然拖延下去锦州有失，沈阳将成为第二个长春，那时欲突围亦不可得。这一次，蒋介石严令卫立煌照此计划实施。

试想，如果第三厅的这个作战计划得以实施，一九四八年九月开始的辽沈战役将呈现出何等复杂的态势：沈阳的主力出动增援，锦州守军必会配合反击，林彪是否能应对两面之敌很难预料；而如果长春守军再突围而出，必会对林彪部的侧后构成巨大威胁。何况，在这种战场态势下，华北的傅作义出兵东北的可能性极大，锦州战场不但与华北陆路相接，海运登陆到达战场也不过数十里的路程。那时候，就远不是毛泽东所设想的“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问题了，东北的“大门”地带将会出现一场胜负难料的巨大混战。

卫立煌对是否增援锦州还是没有明确表态，却要求参谋总长顾祝同与他同去沈阳指挥作战。

军事会议达成的唯一结果是：从二十七日开始，将郑庭笈的第四十九军从沈阳空运到锦州。

在这个时刻，国民党军对锦州的任何增援都会构成严重的问题，林彪命令第八纵队火速封锁锦州机场。

但是，八纵却出了差错。

锦州有两处机场：一处位于锦州北面的流水堡，是张学良主持建造的，已多年废弃不用；另一处位于锦州西南的唐庄子与小岭子之间，是当年日军建造的，目前仍在使用中。自东北野战军发动冬季攻势以来，锦州的陆路交通已被阻断，这座机场成了维系锦州守备的重要设施，同时还担负着从锦州至沈阳和长春的空运任务。九月初，东北野战军南下之后，范汉杰抢修了机场的防御工事，第九十三军暂编十八师的一个团重点防守机场，新八军八十八师布防在机场西南一带，以掩护机场和高桥方向的安全。

自二十四日开始，锦州机场异常忙碌，每天起降飞机多达五十架次以上。林彪命令八纵主力协同九纵围歼八十八师，同时命令八纵队派出一个团用炮火封锁机场。二十六日，范汉杰在命令暂编十八师加强守备的同时，严令第九十三军军长盛家兴指挥八十八师黄纹徽部、一八四师杨朝纶部向九纵已经占领的锦州西北高地展开猛烈反击，以解除林彪部对锦州机场构成的威胁。就在这一天，林彪对八纵下达了封锁机场的指令，要求绝不允许一架飞机起降。但是，八纵报告说，他们不知道应该封锁哪个机场。林彪接到电报后异常恼火：控制机场的目的，就是不能让敌人的飞机继续向锦州运送兵力和物资，当然要打仍在使用的机场！在被八纵耽误的两天里，仅二十六日一天，锦州机场就有四十七架次飞机起降，而国民党军每降落一架飞机，就给锦州守军增加一份力量。

当日，林彪把封锁机场的任务交给了九纵。

封锁机场必须攻占帽儿山。

帽儿山是座石头山，山势陡峭，国民党守军修筑了大量的碉堡和地道。九纵司令员詹才芳和政治委员李中权在山下的一座小庙前观察了很久，最后决定下午十六时开始攻击。东北的天色暗得很早，在夕阳即将融入暮色的时候，九纵的炮火准备开始了。沿着陡峭的山坡，官兵在炮火的掩护下从帽儿山的西面开始攀登。工兵在前面用大刀、斧头和铁锨砍断铁丝网，用爆破筒炸开鹿砦。担任突击任务的八十一团七连炸毁三座地堡，迂回到山坡的南部，堵住了守军的退路。战斗仅仅进行了三十分钟，除一名副师长逃回锦州之外，帽儿山守军全部被歼。晚上，八十一团和纵队警卫营的官兵忙了整整一夜，将炮兵纵队的远射程大炮硬是拉上了山顶。

二十八日上午，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军七十九师的两个团已被空运至锦州机场，下午十三时又有二十多架飞机飞临机场上空，但是这时

候炮弹从帽儿山上飞来了，机场跑道立刻被炮火所覆盖，正在起降的五架飞机被击毁，其余的飞机纷纷掉头飞回沈阳——自九纵用炮火控制锦州机场之后，国民党守军再也没能恢复空运，直到锦州被东北野战军攻占。

二十六日，顾祝同和卫立煌飞抵沈阳。

卫立煌立即找廖耀湘商量对策。廖耀湘也认为蒋介石的计划没有考虑到辽西的地形和东北国民党军的实情，并认为既然要撤退，就必须寻找一个安全撤退的稳妥办法。他为卫立煌提供了这样一个方案：由辽中向南突袭攻占营口。理由是：林彪正准备进攻锦州，辽南因此相对空虚；而沈阳的各部队相对集中，两天之内就可集结完毕；从辽中到营口距离不远，只有一天急行军的路程；到达营口后，既可从海上直接增兵葫芦岛和锦州，还可以经陆路向北突袭义县的侧背，达到增援锦州的目的；同时，营口港还可以使部队得到必需的补给。卫立煌基本同意廖耀湘的方案。廖耀湘接着劝告说，我们要主动向蒋介石提供对策，否则总统会认为我们在避战。作为部下，我们不能一再抗拒蒋介石的军令；同时看着锦州危急而袖手旁观，在道义上也说不过去。卫立煌最后决定，把廖耀湘的这个方案和他自己死守沈阳的方案同时送给顾祝同，让顾祝同报请蒋介石任择其一。

卫立煌打电话请顾祝同吃晚饭。

晚饭只有顾祝同、卫立煌和廖耀湘三人。

卫立煌把廖耀湘推到前台，让他向顾祝同阐述袭占营口的计划，同时也将自己固守沈阳的作战计划连同作战要图拿给了顾祝同。顾祝同说，总统的命令并不是你们所理解的如何安全从沈阳撤退，而是要求你们出击辽西，东西对进，夹击锦州地区的共军，以解锦州之围。在无法出兵增援锦州这一点上，卫立煌和廖耀湘的看法一致，那就是

一旦兵出沈阳，走不了多远，就会遭到林彪的围歼。所以，两人极力解释为什么不能直接出击辽西增援锦州，说林彪之所以兵围锦州，用的一定是围城打援的战法，如果按照总统的命令去执行，很可能锦州之围未解，先断送了沈阳的国军主力。顾祝同脸色严肃，说他是来监督命令执行的，总统的命令绝不能违抗，但他可以把上述意见报告给蒋介石。

就在顾祝同与卫立煌、廖耀湘谈话的时候，林彪对攻打锦州依旧心存顾虑。他给中央军委发去电报，说打下义县、高桥、锦西和兴城之后，如果山海关守军没撤，准备先打山海关；如果山海关的敌人撤了，“则回头打锦州”。林彪的作战意图是将锦州外围之敌全部扫清，将可能对锦州实施增援的通路彻底截断，然后再全力攻占锦州。林彪的审慎所显出的犹豫令毛泽东再次焦急：

……歼灭义县、高桥、兴城、绥中、锦西五处之敌以后，如能同时打锦州、山海关两处，则应同时打两处。如果不能同时打两处，则先打山海关还是先打锦州值得考虑。因先打山海关然后以打山海关之兵力回打锦州则劳师费时，给沈阳之敌以增援的时间。如先打锦州，则沈阳之敌很可能来不及增援，继续陷于麻痹状态［目前已是麻痹状态］，我则可以主力移攻山海关、滦县、唐山、塘沽，并且只要有可能便应攻占葫芦岛、秦皇岛，完全肃清锦州、塘沽之线，直迫天津城下，迫使国民党用空运方法从沈阳调兵增防平、津。除此以外绝无其他方法增防平、津，而空运方法则是很迟缓的，并且是运不完的。这个时候，你们全军休整一个月至多四十天［不要超过四十天］，然后分为两个集团，以一个集团第一步攻占平承线，第二步攻占平张线；以另一个集团攻沈、长，如此方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我军则完全处于主动地位。你们现在就应计算到这些步骤。

同是这一天，蒋介石的电报到达沈阳，要求卫立煌必须出兵辽西增援锦州。

卫立煌再次找来廖耀湘，两人又看了一遍电报，廖耀湘显得有些冲动：

“沈阳主力不能在葫芦岛、锦州两地部队未会师之前单独出辽西！这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如何配合的问题，我们不是不愿意执行或故意抗拒总统的命令，而是为了如何更好地挽救当前的局势，为了救全沈阳的主力。我认为总司令应该再犯颜直谏，坚持我们共同认为是真理的

主张。”卫立煌听了之后，半吞半吐地说：“不能单独出辽西，这是真理！”半晌又重复一句：“这是真理！”然后，他愤然地说：“我宁愿不干了，也绝不愿使沈阳主力单独出辽西。”

卫立煌和廖耀湘一起来到顾祝同的住所：

卫一见顾就非常激动地说：“我们两个是多年同事和共患难的好友，我的事情，就好像你自己的事情一样。我这次遇到平生以来从未遇到的困难，无论如何希望你帮忙解决……我们不是不愿执行总统的命令，也不是不愿意行动，只是在空间和时间上如何配合的问题。我们只是要求在葫芦岛与锦州的部队会师之后，东西两方同时并进，以避免被共军各个击破。”……顾祝同推脱说：“我已把你们的意见电告了总统，但总统考虑后仍然要你们执行他原来的命令和计划。我是奉命来监督命令执行的，我不能再向总统说话。”卫立煌发急地说：“因为你代表总统，所以我一再请求你负责向总统进言，采纳我们的意见。这是关系几十万人命运的国家大事，你我都有责任。”……顾祝同也带着一点激动的口气说：“但总统命令你们立即行动！”卫立煌按捺不住内心之气愤，站了起来气急地说：“单独出辽西，一定会全军覆灭！你不信，我两个赌！”

二十八日，林彪决定先攻锦州。

这天早上，顾祝同把廖耀湘找来，指责他不站在总统的立场上而附和卫立煌，说总统极为关心东北部队的命运，让你们经辽西出锦州，“就是要把你们救出去，你们反坐着不愿意行动”。顾祝同对争执不下而耽误时间十分焦急，他告诉廖耀湘如果再贻误战机，他就不能代他们对东北的局势负责了：“你们必须服从命令，先开始行动，才能再说话！”廖耀湘表态说：“我愿同卫总司令商量，我们先令部队向巨流河、新民地区集中，请总长再把我们的意见报请总统最后裁决。”顾祝同依旧坚持说：“先开始行动再说。”

卫立煌只好同意先集结部队。

虽然卫立煌对顾祝同表示“单独出辽西，一定会全军覆灭”，但他还是没有想到，不久之后，当沈阳的国民党军主力开始向锦州增援时，走到半路果真就全军覆灭了。

二十九日，顾祝同飞回南京去了。

这一天，毛泽东再次致电林彪，他开始担心时间问题：

> 卫立煌赴宁（南京）与蒋、顾、何（何应钦）会商，二十七日返沈，必是决定接出长春之敌和增援锦州之敌无疑。因卫如不接出长春之敌，则难向锦州增援，但接出长春之敌估计需要十天左右时间，向锦州增援又需要十天左右时间，故你们攻取义县、锦州、锦西三点必须顾及此种时间性……当然，卫立煌亦有不顾长春，径向锦州增援之可能，假定如此，你们更应于攻克义县之后，力求迅速攻克锦州。否则敌援接近，你们集中全力去打援敌时，锦州、锦西两处之敌势必集中一处扰我后路，并使尔后难于歼击该敌。若你们能够迅速攻克义县、锦州两点，则主动权便可握在你们手中，否则，你们可能产生如像过去半年那样处在长、沈两敌之间，一个也不好打的被动姿态……因此，你们能否取得战役主动权［当然战略主动权是早已有了的］，决定于你们是否能迅速攻克三点，尤其是锦州一点。只在两种设想之下，你们可以在未占锦州的情况之下，也能获得战役主动权，这即是：你们能于沈敌北上迎接长敌时，能打一个极大的胜仗，歼灭敌军十万左右；或者于沈敌援锦时，你们也能打一个这样的大胜仗。但是我们不知道确有此种把握否？我们觉得首先攻占锦州是有较大把握的，并且是于全局有利的……

毛泽东最后批评林彪："我军从九日出动至今日已二十一天，尚未开始攻击义县，动作实在太慢，值得检讨。"

还是这一天，傅作义突然做出一件连蒋介石都颇感意外的事，他表示可以由华北出兵增援锦州。国防部第三厅根据傅作义的请求作出的出兵计划是："先由海上运送一个军去葫芦岛，以稳定该方面之战局，然后以三四个军由陆上沿着北宁路东进，与锦州守军内外协力击破当面敌军，然后配合东北国军于辽西作战。"

傅作义的举动令锦州战局面临突变。

东北野战军对义县的攻击即刻开始了。

义县位于锦州以北约五十公里处，城北是大凌河，城东、南、西三面是护城河，锦州至承德和阜新的铁路在此交会。国民党守军十分清楚义县是锦州北面的重要屏障，为此他们精心修筑了以县城为中心的环形防御体系，除了城墙、外壕、工事、堡垒和各种火力点外，还把城墙外五百米范围内的民房全部拆除，然后利用有利地形修筑了几

处强固的防御支撑点，如南关的老爷庙、西南的武家小庙、城南的火车站和棉花厂、城北的张家大院等等。义县守军主力为第九十三军暂编二十师，全师约七千人，加上地方武装，总兵力达万人以上，总指挥为暂编二十师师长王世高。

东北野战军南下部队已包围义县。由于参战部队尚未全部到达战场，义县外围的战斗曾一度停止，这给王世高师长造成了错觉。他认为解放军改变了作战计划，定是先打锦州，然后再打援军，对义县采取的是围困战术。于是，命令部队抓紧加固工事。但是，二十四日，义县外围战事突然重起，王世高再次紧张起来。而更让他恐惧的是，解放军官兵在义县外围接近城墙的开阔地上开始了大规模的土工作业，仅仅两三天的工夫，开阔地上的壕沟和坑道就已经纵横交错了，有的坑道距离防御前沿仅有百米之遥，而且火炮也已运动到距阵地前方仅两三百米的地方。王世高能够判断出，只要这些大炮一开炮，他修筑的那些堡垒顷刻间就会被轰得粉碎。为了消除这一隐患，王世高命令炮兵从城内进行轰击，但是弹药消耗众多之后，发现效果并不明显。王世高召集团以上军官登上城墙观察，同时发动基层官兵研究对策，可所有的人都表示毫无办法。最后只能不间断地开炮，因为至少可以缓解一下官兵的恐惧心理。直到山炮营的炮弹打光了，其他型号的火炮炮弹也不多了，王世高只能站在城墙上，眼看着解放军官兵在城外的各个村庄间出出进进，来来往往。

二十九日，是一个让王世高感到荣幸的日子，蒋介石给他发来一封电报，还亲切地称他为“吾弟”：“世高吾弟，义县安危，影响整个东北战局，该师连日英勇歼敌苦战，殊堪嘉许。现已令锦州范主任大力增援，尚望勉励官兵再接再厉以尽全功。”王世高兴奋地对部下说，咱们义县打得好，连委员长都重视了，只要我们把共军阻击在城墙外，保住义县，固守待援，我们就算是成功了。但是，话音未落，王世高就接到报告说，城南的主阵地已被突破，守在那里的二营长刘雄负伤

后被抬进城里，现已死在医院里了。王世高即刻发出一道训令："义县乃锦州屏障，如义县不保，锦州将垂危；若锦州失守，整个东北就完了。东北完，华北亦完，国家兴亡在此一战。务必督饬官兵，坚守阵地以尽全功。如有擅自放弃阵地者，军法从事，格杀勿论。"

攻打义县的部队，是由司令员韩先楚和政治委员罗舜初统一指挥的东北野战军三纵主力、二纵五师和炮兵纵队主力。

二纵五师的攻击方向上，有一个坚固的据点叫武家小庙，距义县城墙只有一百五十米，这里有五个大地堡，二十一个小地堡，院子里还有四个掩体，守军是暂编二十师二团一营二连。五师十四团十连在领受攻击任务时，团领导交代说，这个据点是全师总攻出发地上的一颗钉子，不拔下来将会影响全局。战斗将是十分艰苦的，对这个据点的攻击不亚于破城攻坚战。十连是五师战斗力最强的连队，全连一百六十八人，仅党员就有七十二人。十连的战斗准备得很充分：团工兵排把五百公斤炸药捆成大小不一的炸药包，预备了五十二根爆破筒，团里还给他们补充了一千五百发冲锋枪子弹，突击班的战士不但把子弹袋全部装满，每人还携带了半面袋子弹。三十日十二时二十八分，攻击开始。在副连长任克功的指挥下，爆破组连续八次爆破，架梯组在投弹组的掩护下在外壕内架起梯子，突击班首先登上壕沟，占领了西南大地堡和一段围墙。爆破组战士张作培炸掉东南大地堡后，突击班冲进了武家小庙。但是，后续部队遭到守军火力的猛烈拦截，率领冲锋组的十连长刘德牺牲在外壕里，副指导员申明率领预备组冲上来，守军的反击开始了，任克功副连长身负重伤，全连官兵只剩下二十多人，除了副指导员申明之外，连、排干部全部伤亡。

十四团立即组织增援。但是，在武家小庙右侧不足三百米的地方，有一个大地堡群，而左侧三百米就是薛家窑据点，一百五十米外的城墙上又有守军的火力支援。增援武家小庙的三营长刘培珍牺牲在

冲击的路上。向武家小庙反击的国民党军越来越多，原来这里有一条暗道通往城内。八班副班长王凤江站了出来。这时候的八班，只剩下他和战士刘茂才两个人，其余的战士都是别的班的。当敌人再次冲上来的时候，王凤江高喊着：“不能退！党员更不能退！”战士们也喊：“我们不是党员，我们也不退！”在王凤江的指挥下，战士们将一箱子迫击炮弹拧掉保险扔了出去。十连在武家小庙坚持七个小时，让国民党守军付出死伤近四百人的代价，为部队进入总攻阵地赢得了时间。王凤江在以后的战斗中屡立战功，战争结束后他成为全国英模代表。一九五一年一月三日，在与英军皇家来复枪团的作战中，这位中国人民志愿军中著名的战斗英雄，牺牲于朝鲜半岛一个名叫釜谷里的小镇上。

东北野战军对义县的包围不断地紧缩，王世高召集副师长韩润珍、一团长赵振华、二团长王灿景、三团长陈敬熙、政工处长赵文侯和军需处长李联翰紧急磋商。王世高说，锦州已经十分吃紧，增援看来无望，死守下去死路一条，突围出去才会有生路，要突围就往北面突，因为向北才能远离锦州战场。大家谁也不吭声，等于就是同意了。于是决定第二天天黑以后突围。几个人磋商完毕，天已经快亮了，心情沉重而复杂的军官们返回阵地的时候，突然听见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义县已被城外发射来的炮弹炸得火光冲天。

十月一日拂晓，东北野战军对义县的总攻开始。

总攻从西南和东北两个方向同时发起。三纵九师担任突击任务的是二十五团一连。二班由班长吴新禄率领，官兵冒着守军密集的火力，通过几十米的开阔地，在外壕上架起了桥。但突击队通过时，桥被守军的炮火炸断。吴新禄跳进壕沟，用自己的双手和头部撑起桥板，子弹打到他身上，他依旧站立着，直到突击队从他头顶的桥板上冲过去，直到他停止了呼吸。八师二十二团突击二排登上城墙，排长

孟庆印和战士王跃东最先冲进突破口，并用火力掩护后续部队突破。冲进城内的部队遇墙挖洞，遇房跳窗，迅速穿插，逐渐接近义县防御核心地区。二纵五师十四团在外围战中已经伤亡很大，在总攻中全团再次伤亡百人，一营长林克宽牺牲，政治处主任许乐夫负伤。一营在副营长白青天的指挥下，从城西南一直打到城东北，白青天负伤倒下，团长薛剑强亲自指挥一营，政委任茂如率领二营顽强攻击，团组织股长张明远在率领三营攻击鼓楼时中弹牺牲。

暂编二十师的指挥所被包围。王世高见大势已去，给他的顶头上司第六兵团司令官卢浚泉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该师自战斗开始，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官兵上下无不全力迎战。我云南健儿（暂编二十师原为滇军部队）日夜奋战可谓不负钧座之望。解放军已冲杀到指挥所门口，喊杀声、叫话声，闻之激愤，还步步为营，始终抱宁死不屈之志，坚不投降，奈孤立无援，赤胆忠心献党国，呜呼！全军将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电报发出后，手榴弹已经扔进来，指挥所内外百余名守军放下了武器，王世高被俘。

暂编二十师一团长赵振华也被俘了：

大约两点钟左右，马排长抬着机枪撤退到掩蔽部，我说你就堵门口吧。顷刻间，解放军已爬上房头，手榴弹抛到掩蔽部门口，接着就是一排冲锋枪子弹扫下来，马排长应声倒在我面前。"出来！缴枪不杀！"解放军战士连喊几次，我便丢了手枪，跨过马排长的尸体，从掩蔽部钻出来。解放军在我身上检查了一遍，没有拿去我的任何东西。有五六个解放军把我带到办公室，个个都是威风凛凛的，有个左手用绷带吊着，右手提着一支自来得手枪的人，他指着我说："你这个不要命的家伙！"……不一会来了一个穿草绿色呢军服的军官，他把帽子向桌子上一掼，问我："你就是赵振华，这样顽强。"我说："军人守土有责，各为其主。"他哼了一声说："守老爷庙的是不是你的部队？"我回答："是的。"他说："你马上下令叫他们停火。"我说："你们能够抓到我，去解决他们自然也容易。"我想如今命在旦夕，何必在临死前下达这样的命令。我这样回答后，他并没有再逼我也就走了……六点多钟，来了几个解放军，接着我的吉普车开来了，他们把我和蒋啸天（暂编二十师一团副团长）以及我的妻儿都送上了车，一个解放军军官对我说："不要害怕，放下武器，咱们就是朋友，你们到后方学习学习就理解了。"……汽车开到街上，沿街坐着被解除了武装的官兵，垂头丧气，狼狈不堪。见我的汽车来了，都抬起头来看，但我没有勇气去看他们……十月三日中午，我被叫到解放

军首长那里，那个村子里停着不少大小汽车，到了首长屋里，他叫我坐下，态度非常和蔼，随后他走到一张敌情要图旁，用手指着图问我：“守老爷庙的部队，是不是你那个模范连？”我回答：“不是，是临时拼凑起来的。”……墙上挂的是第二十师在义县防御配备要图，上面的工事位置，兵力部署，小到连排，都与我们自己绘的丝毫不差。我当时大吃一惊……接着首长对我说：“你对我们解放锦州有何看法？”我答：“你们可以打下义县，你们不可能打下锦州。”他接着问为什么，要我说说理由。我说：“义县仅几千人，弹尽援绝，因而守不住，锦州十几万人，沈阳和葫芦岛都可增援，并且葫芦岛与锦州近在咫尺，可由海上调来大量援军，又有坚固的工事和雄厚的兵力，你们打不下锦州。”他又问我：“你知道济南前几天被我军解放了吗？全歼王耀武部队十几万人。”我听了半信半疑。他笑着说：“我军打锦州还是容易的，你不信看着吧。”

九月三十日，蒋介石飞抵北平。在北平的圆恩寺中，他给驻守锦州的范汉杰写了一封信，让范汉杰在“决定突围”、“死守待援”和“不能守”中选择其一。空军的飞机立即起飞前往锦州空投此信。不久，范汉杰的回电到了，内容是：死守待援。蒋介石立即命令国防部第三厅与傅作义商量如何增援锦州。傅作义表示，可以海运独立九十五师和新五军去葫芦岛，但陆路增援部队只同意抽调第十六军和第六十二军，因为华北的聂荣臻部已经攻占集宁，归绥方向的军事压力日渐明显。第三厅向蒋介石汇报之后，蒋介石决定先将独立九十五师海运到葫芦岛，并以第六十二军代替新五军由秦皇岛开赴葫芦岛，增援部队统归驻守锦西、葫芦岛地区的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指挥。

十月二日，蒋介石飞抵沈阳，召集军长以上会议。

关于东北战局，无论卫立煌和廖耀湘有什么意见，在蒋介石面前已经没有任何作用。蒋介石的意图非常明确：锦州的范汉杰已经把林彪的主力拖住了，大军必须立即自海路和陆路全力增援锦州，以期与东北的共产党军队进行最后决战。至于决战的结局，蒋介石说得也很清楚：能够歼灭林彪主力，保住东北当然最好；东北即使不能确保，撤退之前也要给林彪主力以重创。蒋介石特别警告说，锦州一失，沈阳的下场将不如长春，因为现在长春还可以指望沈阳增援，到那个时候沈阳依靠谁来增援——“形势的发展，实在出乎所料。锦州是东北我

军的咽喉，势在必保。我这次来沈阳，是为了救你们出去。你们过去要找共军主力找不到，现在东北共军主力已经集中在辽西走廊，正是你们为党国立功的好机会。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成功的……万一你们这次不能打出去，那么来生再见……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死了没什么，可你们还年轻，再不听我的话，一个一个都让共产党把你们抓了去！”到会的第四十九军军长郑庭笈说，老头子的最后一句话真是不祥之兆。

林彪到达了郑家屯（辽源）。

在这里，一份重要的情报让他在大战之前再次犹豫起来。

国民党军从华北、烟台抽调的部队已陆续海运至葫芦岛，连同原来驻守在锦西地区的四个师，共十一个师组成东进兵团，暂由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指挥，自锦西经塔山、高桥增援锦州；同时，由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指挥的十一个师及四个旅以及重炮、战车、装甲车等部队，组成西进兵团，从沈阳北出攻击彰武、新立屯，策应长春守军突围，然后掉头向西经阜新向义县、锦州方向攻击前进，以期与东进兵团在辽西走廊对东北野战军形成南北合击。

林彪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

他的形容是:“准备了一桌菜，来了两桌客。”

考虑多时，十月二日晚二十二时，林彪起草了一封发给中央军委的电报，表示在锦州方向援敌已至的情况下，攻打长春更有把握:

（一）得到新五军及九五师海运葫芦岛的消息后，本晚我们在研究情况和考虑行动问题。

（二）估计攻锦州时，守敌八个师虽战力不强，但亦须相当时间才能完全解决战斗。在战斗未解决前，敌必在锦西、葫芦岛地区留下一两个师守备，抽出五四军、九五师等五六个

师的兵力，采取集团行动向锦州推进，我阻援部队不一定能堵住该敌，则该敌可能与守军会合。在两锦（锦州、锦西）间敌阵地间隙不过五六十里，无隙可图。

（三）锦州如能迅速攻下，则仍以攻锦州为好，省得部队往返拖延时间。

（四）长春之敌数月来经我围困，我已收容逃兵一万八千人左右，外围战斗歼敌五千余，估计长春守敌现约八万人，士气必甚低。我军经数月整补，数量、质量均大大加强，故目前如攻长春，则较六月间准备攻长春时的把握大为增加，但须多延迟到半月到二十天时间。

（五）以上两个行动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

罗荣桓和刘亚楼阅过之后，电报以特级绝密的形式发出了。

接着，林彪一行从郑家屯向锦州开进。

路上，罗荣桓再三考虑，认为发出的电报多有不妥：南下攻势已全面展开，临时改变攻锦计划改打长春，不但有违军委的战略部署，而且很可能造成战场混乱。第二天早晨，罗荣桓和刘亚楼一起去找林彪，表示坚持攻打锦州的计划为好。林彪特意征求了刘亚楼的意见，刘亚楼表示同意罗荣桓的建议。林彪思索了一会儿，决定向机要处要回那封电报，但是，电报已在凌晨四点发出去了。罗荣桓建议不等军委回电重新表态，林彪表示赞同，于是重新起草了电报：

……我们拟仍攻锦州。只要我军经过充分准备，然后发起总攻，仍有歼灭锦敌的可能，至少能歼灭敌之一部或大部。目前如回头攻长春，则太费时间，即令不攻长春，该敌亦必自动突围，我能收复长春，并能歼敌一部……

电报签发时间为十月三日九时。

此时，林彪一行已到达彰武以北的冯家窝棚。

而中央军委在林彪的第二封电报到达之前，于三日十七时和十九时，连续发来两封由毛泽东拟稿的电报，措辞之严厉显示出毛泽东焦灼的心情：

……在五个月前［即四、五月间］，长春之敌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在两个月前［即七月间］，长春之敌同样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攻锦部署业已完毕，锦西、滦县线之第八、第九两军亦已调走，你们却又因新五军从山海关、九十五师从天津调葫芦岛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你们指挥所现到何处？你们指挥所本应在部队运动之先［即八月初旬］，即到锦州地区，早日部署攻锦。现在部队到达为时甚久，你们尚未到达。望你们迅速移至锦州前线，部署攻锦，以期迅速攻克锦州……

应该说，从战场态势上看，林彪的顾虑不是完全没有依据的，作为战场指挥员，他必须考虑到部队攻坚之时敌人可能实施的增援与夹击。只是，林彪对蒋介石亲赴北平督促增援，并飞抵沈阳亲自督战，表示出巨大的担心，这导致他把敌情估计得过于严重了——此时的林彪并没有预见到，攻锦之战将给东北野战军带来一连串巨大的战机，并让他创造出军事生涯中的辉煌战绩。

收到林彪的第二封电报后，毛泽东立即复电：“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

整整十五年后，罗荣桓病逝，毛泽东写七律《吊罗荣桓同志》，再次回首当年战锦往事：

记得当年草上飞，

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

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鷃每闻欺大鸟，

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

国有疑难可问谁？

十月五日，林彪到达锦州西北十五公里处的牤牛屯，他在这个距锦州咫尺之遥的地方开设了攻锦指挥所。

第二天，毛泽东来电，他告诉林彪：“你们到锦州附近指挥甚好。但你们不应距城太近，应在距城较远之处，以电话能联络攻城兵团即妥，务求保障安全。”

大战已经不可避免。

无论如何，林彪面对的战局充满未知的凶险：如果在锦州攻坚之时，阻援部队无法顶住自葫芦岛来的强大援军，锦州之战将演变成什么样子?

那个令东北野战军所有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人难以忘却的阻援地，名叫塔山。

## 塔山不是山

应该说，迄今为止，关于解放战争的叙述，对于塔山之战评价仍有不足之嫌。这场发生在一九四八年十月上旬的阻击战，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一个局部战场——塔山之战的胜负，不但关乎辽沈战役的进展乃至结局，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自此以后解放战争的进程。

塔山之战的这一价值，作战双方从高级将领到普通官兵，当时都没有或者不可能有清晰的认识。在那个狭小的局部战场上，每分每秒都经受着生死考验的他们，无法设想国共两军在东北地区的交战将由此演变成何等规模。他们仅仅知道：这是一场血拼，为了达到作战目的，必须不惜代价。

战争的代价首先是官兵的鲜血和生命。

国民党军如果从锦西北上增援锦州，有三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沿着传统的老路北上锦州，但要经过虹螺山区，地形有利于林彪部署阻击，因此危险性很大。第二条是从打渔山岛沿着海岸崎岖的小路北上，但这条路周边地幅狭窄，不便于大部队展开，会严重影响推进速度。第三条就是从塔山方向沿着公路和铁路直逼锦州外围，这是一条最佳的增援路线。

位于锦西与锦州之间的塔山，是个只有百十户人家的小村子。这里东临锦州湾，西接白台山，山与海之间最狭窄的一段，仅有十二公里宽。北宁铁路从村子的东侧穿过，山海关至沈阳的公路与铁路并行。村南有条干涸的河滩，架有一座铁路桥。村子周边地势平坦低洼，村西通向高桥的地方，是一片宽约八千多米的开阔地，散布着一些高差不大的小丘陵；东边靠着锦州湾的山包就是打渔山岛，涨潮的时候是岛，退潮的时候是和海岸连成一片的滩涂。从海边往西，地势逐渐抬高，西面的白台山高两百米，是唯一的防御制高点。

塔山不是山。

从防御的角度看，塔山无险可守。

布防塔山的命令是突然到达的：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一纵队以及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四、第六、第八师和炮兵旅，统一归第二兵团指挥，阻击从锦西、葫芦岛增援锦州的敌人。

林彪已到达锦州北郊，他看着眼前的锦州城，不放心的却是塔山。西北方向的廖耀湘兵团距离锦州还远，至少暂时无法对攻取锦州构成威胁；但是，东南塔山方向的增援之敌却离锦州近在咫尺。林彪口授电报给塔山防御线上的指挥员们：

……锦西以北之大小东山，锦州以南之松山街，皆为敌人阵地，故两锦敌人距离只有三十里，锦西敌人可能抽出六个师左右向北增援……故我军绝对不能采取运动防御方法，而必

须采取在塔山、高桥及其以西、以北布置顽强勇敢的攻势防御。以四纵一两个师的兵力，构筑工事，加强防御的军政训练，准备在此线死守不退，在阵地前大量消耗敌人有生力量［近距离开火］，准备抵抗敌人数十次猛烈进攻……这完全是一个正规战，绝对反对游击习气，必须死打硬拼，不应以本身伤亡与缴获多少计算胜利，而应以完成整个战役任务来看待胜利。

第二兵团确定的塔山防御部署是：以四纵位于东起打渔山、西至白台山的十二公里正面，担任主要防御任务，其中以塔山左右八公里为重点防御地段；以十一纵位于四纵以西担任辅助防御；以独立第四、第六师位于锦西以南，独立第八师位于山海关附近，积极牵制敌人。

根据上述任务，四纵司令员吴克华、政治委员莫文骅确定：以十二师和十一师三十二团为第一梯队，担任正面防御任务，重点守备塔山堡、塔山桥、白台山等几个要点；以十师和十一师主力为预备队；两个炮兵群分别支援塔山东西部队的作战。布置任务的时候，莫文骅对干部们说："我们这回是死守！要不惜一切代价，以鲜血和生命，死守到底，一步不退！敌人打到营部，营部就是第一线；打到团部，团部就是第一线；打到师部，师部就是第一线；打到我们纵队部，纵队部就是第一线！总之，敌人打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是第一线！后边就是锦州，往后没有我们的地方。就是天塌下来，一步也不能退。就是打到最后一个人，打到最后一口气，也要坚决完成任务！"

四纵已经做好拼光了的准备。

十月八日，大雨倾盆。

位于防御第一线的十二师把三十四团放在塔山，三十五团放在白台山，三十六团和师部位于后面的潘家屯，官兵们开始冒雨抢修防御工事。

林彪还是放心不下，他又发来一封电报，举正反两例告诫四纵：无论困难多大，只要有死战的决心和勇气，必能克敌制胜：

> ……我九纵去年冬季作战中表现战斗作风甚差，经过东总指出后，他们全纵奋发努力，今年来表现得能攻能守，二十六号锦州外围战斗中二十五师一个连的兵力控制白老虎屯阵地，敌四个主力步兵团，配合十一辆坦克、五六架飞机向他们进攻，该连顽强死守，伤亡过半，在最危急时，全连指战员将表打碎，钞票焚烧，准备全部牺牲，但最后由我反击将敌击退，保持了阵地……这一战例盼你们很好发扬，九纵是新部队尚能做到，四纵更应做到。十一纵的底子亦不比九纵差，也应做到。主要是自上而下到每个指战员都下决心，就能创造光辉战，使敌胆寒，使我全军胜利得到保证……八纵一个连五日守锦州以东之小紫荆山，敌向其进攻，该连连长畏缩放弃阵地，已于昨日公审枪决。八纵此次锦州附近作战远落后于九纵之后，可见不努力者即落伍。

就在四纵向塔山地区开进的时候，十月六日上午九时，葫芦岛外驶来了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巡洋舰“重庆”号。在海军总司令桂永清、陆军大学校长徐永昌、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联勤总部参谋长吕文贞等人的陪同下，蒋介石亲临葫芦岛部署援锦作战。

蒋介石在舰上接见了驻守锦西地区的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卫立煌派到葫芦岛的东北“剿总”副司令官陈铁、范汉杰派驻葫芦岛的冀热辽边区副司令官唐云山等将领。下午十三时，在葫芦岛上的第五十四军军部，蒋介石召集高级将领会议。进入军部的时候，看见墙上挂着阙汉骞军长写的一副对联：“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蒋介石哼了一声，没人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与将领们研究完有关塔山作战的问题后，蒋介石又召集了锦西、葫芦岛守军团以上军官会议。这个会议开得很特别，蒋介石上来就问各位带了《剿匪手册》没有？与会者个个面露窘色。于是，蒋介石从自己的衣兜里拿出来一本。这本十几年前由他亲自主持编撰的小册子，意在教导国民党军官兵如何消灭共产党武装，国民党军中称之为蒋介石的“圣经”——蒋介石一字一句地读起来，并不断地停下来进行解说，最后才提到即将开始的作战：“当前这一仗有决定性的意义，必须打好。打败了，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完了，连历史都要翻转过来。你们以前跟着我革命、抗日的光荣成就

便将化为乌有，个人的前途也就只有毁灭。”散会之后，蒋介石走到院子里，端坐在一把椅子上，和与会军官们一一合影——几十位军官轮流站在身后拍照，蒋介石面无表情地一动不动。

此时，增援锦州的部队陆续到达，因为部队来自不同战区，作战指挥官问题弄得十分复杂。蒋介石坚持让侯镜如指挥，他对大家说：“这是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我这次带他来，要他在葫芦岛负责指挥，你们要绝对服从命令。这一次战争胜败，关系到整个东北的存亡，几十万人的生命，都由你们负责。你们要有杀身成仁的决心。”但是，侯镜如坚持说自己的部队还没来，他要先回唐山（第十七兵团部）去接部队。蒋介石只好命令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暂时代为指挥——无法理解蒋介石为何在大战来临前煞费苦心地更换将领，任命侯镜如，意味着将锦州的范汉杰和沈阳的卫立煌派来的指挥官统统放在了一边，他应该知道如此钩心斗角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蒋介石离开了葫芦岛。

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表示：“总统亲来葫芦岛比增加十万大军强得多。”况且，目前葫芦岛与锦西地区的兵力已比当面的解放军多了两倍，完全有把握在侯镜如到达之前拿下塔山——毕业于黄埔的阙汉骞军长明白，关键时刻的头功含金量很高。

阙汉骞决定十日向塔山发动进攻。

凌晨四时，暂编六十二师一部趁海水落潮之际，在夜色的掩护下偷袭了打渔山。在打渔山防御的是四纵十二师三十四团的一个排，工事还没有完全修好，官兵们也没有思想准备，结果两名班长牺牲，排长和四名战士负伤，剩下的官兵撤守到第二个小山包上。纵队指挥部接到打渔山一线阵地失守的消息后，认为丢了这个前沿，国民党军就可以从葫芦岛登陆后绕过塔山增援锦州，于是决心不惜一切夺回。纵

队副司令员胡奇才亲自到了十二师指挥所，当即命令二十九团一营和三十四团一部进行反击。几个小时的激战后，十二师夺回几个小高地。这时海水已经涨潮，打渔山成了孤岛，国民党军官兵被困在上面，十二师的反击部队也无法攻击，于是在这个局部战场上战斗暂时停止。

天亮了，国民党军开始向塔山实施全线攻击。山炮、野炮、加农炮、榴弹炮等数十门重炮一齐开炮，加上海面上军舰的轰击和空中飞机的俯冲扫射，硝烟和烈火瞬间把范围不大的塔山完全覆盖。敌人猛烈的火力几乎摧毁了塔山防御阵地上所有的工事，地堡被掀开，掩体被炸塌，昨天从几里地外扛来支撑工事的铁轨被炸得飞上天空，枕木熊熊燃烧。炮火准备之后，国民党军的攻击一开始就显出一举突破的态势，整连、整营，甚至整团的冲锋阵形，密密麻麻，层层叠叠，在每一处局部阵地上，攻守双方的兵力对比都相差几倍甚至十几倍。

防守白台山七号阵地的是三十六团警卫二排，全排四十三名官兵。国民党军一五一师分成数股先试探性攻击，然后逐渐加大兵力。二排在副排长姜万昌的指挥下，连续打退敌人的四次攻击。敌人又增加了两个连，在四架飞机的火力支援下，分成两个梯队开始了第五次攻击。进攻的敌人前面的倒下，后面的补上，其顽强为三十六团官兵前所未见。在抗击敌人第六次冲锋的时候，二排的干部全部伤亡，全排只剩下九个人。战士冯日江和潘福禄带头发动反击，在重炮的轰击中，冯日江被埋在土里，其余的八名士兵全被震昏。侧翼阵地上的一排长肖殿盛没等连里的命令迅速组织增援，在三班副班长朱贵的带领下，一排的士兵冲上七号阵地把冯日江从土里扒出来，把进攻的敌人压了下去。

奉命向塔山正面三十四团阵地进攻的，是国民党军第八师。这个师的官兵正处在牢骚满腹的怨愤中，因为他们的军长阙汉骞不按时给

他们发饷，而是把军饷换成金条去搞投机倒把。部队驻守锦西地区后，军长、师长将大凌河北岸钢厂的钢铁运到天津和上海倒卖，连用于修筑工事的上百吨钢筋也同时被倒卖了。大官们个个赚得腰包鼓鼓的。好容易等到发饷，官兵们领到的都是金圆券，大家当着长官的面，把这些根本不值钱的票子撕了，宣称“你给老子多少钱，老子就给你打多少仗”。此次作战，应该是没有参加前一次作战的一九八师上战场，而不是刚刚打完一仗的第八师，部队的规矩应该是劳逸平均，但谁都知道一九八师是阙汉骞的基本部队，第八师是由原胡宗南的部队编成的，于是阙汉骞军长就以“八师是五十四军的老大哥，是范汉杰主任的老部下，解锦州之围的作战，于公于私八师都应该挺身而出”为由，又一次将第八师派上战场。

第八师猛烈的炮火准备一开始，正面的三十四团伤亡便严重，团长焦玉山，政治委员江民风，参谋、通信员和电话员，团指挥所七个人三人负伤。在九架飞机的支援下，第八师成集团冲锋阵形不断发起攻击，三十四团一连和三连的接合部一度失守，一营投入预备队后才把敌人反击下去。战斗持续到下午十五时停止。但一个小时后，炮轰重新开始，国民党军企图用炮火掩护躲在海滩上不敢动的官兵撤退。三十四团立即乘机发动反击，打渔山方向的敌人大部被歼，少数跳海逃生。

第一天战斗，国民党军伤亡一千一百人，四纵伤亡三百一十九人。

第二天的战斗从清晨开始，国民党军采取中央突破的方式，在两翼的策应下全力向塔山核心阵地攻击。炮火准备后，塔山村被轰成一片废墟，村边的防御工事全被摧毁。防守塔山村口的三十四团一营一连一排和二排五班的前沿阵地很快进入混战状态。由于伤亡过大，一连被迫后撤。防御地堡又一次被炸塌，五班战士几乎全被埋在土里，

副班长迟德山刚从土里爬出来，就与冲上来的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敌人占据了塔山村的前沿，战斗在残垣断壁中展开。三十四团政治委员江民风率领四连增援上去，塔山村里几乎每间房屋都成为搏斗的战场，双方官兵扭打在一起，刺刀、枪托、石头和牙齿都是搏斗的武器。一连长刘景山带领八班把敌人逼到村东南的一座大院里，官兵们刚冲进去却被另一股敌人包围了。赶来的九班冲杀过去，院子里的八班拼死往外突，大门被敌人的机枪封锁，大个子战士李清林一声怒吼，硬是把院墙撞出个大窟窿，战士们钻出来拼死反击。一营副营长鲍仁川率领营预备队冲过炮火的阻拦杀入敌阵，二营教导员于厚德负伤倒下时还在呐喊："不要管我们，和敌人拼了！"二营官兵插入敌人的突破口，在敌人的身后堵住了其退路，终于使得塔山村前沿阵地得到稳固。

在侧翼防御的白台山阵地上，三十六团警卫二排只剩下五班长徐智忠一人，他来回奔跑射击，机枪打坏了之后，高举着一颗手榴弹冲入敌阵，与敌人同归于尽。四连奉命接替阵地，副连长胆怯动摇，丢下指挥位置向后逃跑，七号阵地遂被敌人占领。十二师立即调三十六团六连和三十五团的两个连从两翼包抄，惨烈的激战后将阵地夺回。中午的时候，国民党军暂编六十二师从塔山左翼迂回，遭到三十四团三营的顽强阻击。八连长姜云忠指挥全连用手榴弹和刺刀逼退敌人；九连长龚福堂在阵地出现危急的时刻，带头冲入敌阵展开肉搏战；七连三班九人坚守桥头堡阵地，三人牺牲，五人负伤，但阵地始终没丢。下午，阙汉骞再次组织攻击，进攻的部队刚冲到前沿，支援的炮火却停止了，冲锋的步兵也跟着停止了。四纵立即集中炮火轰击冲锋集团的身后，在正面进行猛烈反击，迫使敌人从塔山防御阵地的正面撤退。

十一日的战斗，国民党军伤亡一千三百人，四纵伤亡五百六十三人，其中坚守塔山一线阵地的三十四团伤亡最大，战斗开始前有一百

七十八人的一连，战后只剩下了七名战士。

国民党军第八师副师长兼参谋长施有仁记述道：“由于有海空军助战，我们的攻击部队才在自己炮兵火幕的掩护下，缓慢前移。当海空军活动稍一中止，步兵攻击即行顿挫……尤其是前进到距敌阵地一千公尺以内，共产党部队的坚强抗击和英勇出击，更使我攻击部队无法前进。对付共产党小部队的阵地出击方面，也完全依赖浓密炮兵火力的阻击掩护，如果炮火运用稍不及时，就会动摇溃退。”

这一天的下午，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率第九十二军二十一师到达战场。侯镜如把他的司令部设在锦西中学里。此时，从华北调来的独立九十五师刚刚到达；从塘沽海运来的第六十二军后续部队官兵由于晕船声称还不能作战；而从烟台来的第三十九军更是倒霉，船到葫芦岛外的时候，海面上刮起八级大风，船只根本无法靠岸，只有在海上颠簸一个昼夜，官兵们连胆汁都吐出来了。军长王伯勋下船就骂：“这样拉扯，军队不要打仗就拖垮了。我这半年就是东一下西一下地胡乱调用，仗却没打。现在部队晕船这个劲还没过去，立刻使用上去，岂非开玩笑，太把人当牛马了。上面可以给我们这样的任务，而我却没法向下面交代。我决心这回完了以后，不再干下去了。”——果然，一年后，这位军长在贵州率部起义了。

在锦西中学里，侯镜如召开军长、师长、参谋长参加的军事会议。第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汇报了两天来攻击塔山遇挫的经过，特别强调解放军的战术是：步兵不冲到阵地前沿，他们连枪都不打，看上去好像阵地上无人防守，等接近障碍地带的时候却突然开火，“打得我第一线步兵抬不起头来”。步兵无法突破障碍物，炮火又无法将障碍物彻底摧毁，导致步兵在前沿陷入进退两难之境，部队因此伤亡很大。第十七兵团参谋长张伯权提出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第五十四军参谋长杨中藩提出的，他主张用主力攻击白台山以西地区，因为那里地势

平坦开阔，防御力量薄弱，而且可以迂回塔山，打得好的话没准可以一举全歼塔山共军。另一个方案是张伯权自己提出的，即仍然按照前两天的打法正面推进，理由是这里地势高，可以发挥优势火力掩护步兵攻击，同时也可以避免重新部署兵力——值得注意的是，从战场战术上讲，杨中藩的主张显然有道理，因为机械化部队一旦转到地势开阔地带，不但会使四纵的阻击更加困难，而且塔山的侧后也容易出现威胁。那样的话，无险可守的塔山就十分危险了。但是，杨参谋长的方案被否决了。否决的原因十分微妙：首先，张伯权的建议是侯镜如授意的，侯镜如根本没有作战积极性，蒋介石命令他来葫芦岛他不得不来，但本意还是保存实力为上策。侯镜如对张伯权说得很明白："按照我们目前的情况，对塔山、锦州是不能打进去，若打进去也出不来，如果打不进去，还可以多维持几天。"其次，蒋介石派来的总统府战地督察组长罗奇也主张继续正面攻击。这位督战官认为，正面攻击符合总统指示的基本精神，如果变更就要重新请示，不然谁也无法承担责任。罗奇说："葫芦岛有四个军，沈阳西进有五个军，加上锦州的两个军，共有十一个军的兵力，再加上海、空军的优势，无论在数量上和火力配备上，我军都比共军占绝对优势，只要官兵用命，抱杀身成仁的决心，是一定可以完成这次任务的。"罗奇自告奋勇，准备亲自指挥独立九十五师攻击塔山——罗奇曾在独立九十五师当过师长，他很为自己带过的这支部队自豪，声称全副美式装备的独立九十五师是"没有打过败仗的"，他已用五十万金圆券在师里组织了一支敢死队。会议最后决定：其余部队由第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指挥，第五十四军八师攻击塔山铁路桥，第六十二军的两个师攻击白台山，第九十二军二十一师和暂编六十二师为预备队，第五十四军一九八师和暂编五十七师担任锦西、葫芦岛守备。

此时，南京总统高参军罗泽闿与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乘飞机到达葫芦岛。侯镜如陪同他们视察前方阵地的时候，卫立煌低声对侯镜如说："你这个兵团解锦州之围，并率部与廖兵团会师是不容易办到

的。”卫立煌的意思很清楚：廖耀湘兵团距离锦州还有几百公里，锦州范汉杰的两个军正被林彪围困，锦西、葫芦岛的部队还要担负陆路和海上防务，因此能够用于塔山方向的攻击部队也就不到两个军的兵力。侯镜如发现卫立煌与自己观点一致，于是更不愿意让自己的第九十二军冒险了。

雄心勃勃的罗奇建议休战一天，说他要带独立九十五师的军官去看地形。

十二日，塔山无战事。

国民党军没有攻击，引起了四纵指挥员的警觉。在抓紧时间加固工事、补充弹药的同时，纵队派出侦察小组去摸敌人的情况。三十四团侦察排七班的战士个个胆大出奇，他们装扮成农民，不但混进了国民党军阵地，还拖回来一个人，一审问，竟然是第九十二军二十一师的一个副团长，名叫高录臻。根据这位高副团长的口供，四纵队立即相应调整了防御部署：十二师三十五、三十六团继续防守白台山；三十四团集中防守塔山；塔山以东阵地交给十师二十八团；十一师三十一团移动到塔山的侧后，归十二师指挥，与三十二团一起作为四纵的预备队。经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批准，十一纵把白台山以西的阵地接过来，同时给四纵加强了一个炮兵团。

十三日，四纵政治委员莫文骅称之为“对塔山存亡有决定意义的惊天动地的一天”。

凌晨时分，在三十四团防守的塔山村阵地前沿，一连的巡逻哨兵和两个送饭的炊事员突然发现一股敌人已经爬进第一道战壕，他们立即呼喊起来：“敌人摸进来啦！”一连官兵纷纷从掩体中跳出来，朝第一道战壕扔手榴弹，所有的机枪也同时响了起来。偷袭的是罗奇组织的独立九十五师的敢死队。一连长刘景山带领预备队迅速往前冲，把

这支敢死队的退路堵死了。在一连官兵的前后夹击下，敢死队除了被打死打伤的之外全部投降。

天亮了，国民党军飞机飞临战场上空，重炮也开始了轰击。独立九十五师在第八师和一五一师的配合下，向塔山一线阵地开始了疯狂攻击。战前，罗奇和林伟俦宣布，攻下塔山的，每人加三个月的军饷；攻不下来军法处置。独立九十五师采用波浪式战法，以团为单位分成三个冲击波次，一次冲击波为一个营，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第一波受挫后第二波接上去。独立冲击的时候，出现了国民党军作战少有的现象——军官冲在了队伍的前面。九十五师攻击的正面，是十师二十八团的阵地。战斗一开始，双方的炮火都集中到了这一点上，阵地上泥土飞溅，弹片横飞。独立九十五师的炮火准备长达两个小时，然后步兵潮水一样涌上来，二十八团的机枪和手榴弹无法遏制这种轮番攻击，双方官兵很快就在阵地前沿拼上了刺刀。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混战，国民党军一波后退，另一波又冲上来，二十八团的官兵不停息地拼杀，死不退步。地堡塌了，就在战壕中打；战壕被炮火炸平了，就在弹坑里打。在前沿出现危机的时刻，三营冒着炮火从侧翼冲上来。十师师长蔡正国对二十八团的惨烈战况十分焦灼，向纵队指挥部报告战况的时候，话说到半截电话线就被炸断了。为了预防万一，纵队将十一师的一个团移动到了二十八团的侧后。电话线恢复之后，莫文骅对十师政治委员李丙令说："转告蔡师长，一步也不许退！一定要死守！"

独立九十五师新一轮攻击开始了，攻击队形密集得犹如一阵狂风。在前沿混战的时候，二十八团的预备队不断对敌人实施反冲锋，这使得双方的混战范围不断地扩大。双方的炮兵都已无法进行火力支援，阵地上只有刺杀声风一样刮过来刮过去。六连一班长孔守法和两名战士被分割在敌人的阵地上。孔守法决定在敌人的背后坚持战斗，一个新战士有点犹豫："咱们就三个人，这不是给敌人送肉吃吗？"孔

守法说：“要想活下去，就要继续战斗，想立功现在就是机会！”两个战士说：“跟着班长干！”他们脱下棉衣，里面穿的黄色衬衣与国民党军士兵的军装颜色相近，然后他们从一个躺在战壕中的伤兵口中得知附近有个炮兵观测点，于是摸过去把这个观测点打掉了。他们在敌人的阵地上找到一箱手榴弹，三个人就往敌群中拼命投掷，结果听见敌人在前面喊：“炮来啦！炮来啦！”战斗中，一个战士负伤了，孔守法让另一个战士护送负伤的战士回去，自己依旧在敌人的阵地中寻找战机。最后，孔守法竟然在混乱中回到了自己的阵地上，这时他和他带领的两个战士已经打死打伤了上百个敌人。

二十八团二连指导员程远茂指挥的阻击阵地，在塔山铁路桥与高家滩之间，这里也是独立九十五师重点攻击的地段。本来他们在这里修筑了六个地堡，但战斗一开始地堡就被敌人的炮火掀掉了五个，与营里的电话联系也随之中断了。通信班长报告说，电话线被炸烂了，根本无法接通。程远茂给了他一支步枪，说：“去右翼射击！只要在路上能听见我们还在射击，就知道阵地还在！”通信班长刚走，程远茂就被炮弹炸倒，血流了一脸。这时，敌人又顺着河滩开始了冲锋，密集的队伍，一色的冲锋枪，队伍中还掺杂着挑弹药的人。当敌人进至几十米的距离时，二连一排开火了。敌人的冲击火力非常凶猛，一排不断地有人倒下：一班只有五个人了，五个人已全部负伤；右翼的二班也没有几个人能战斗了。程远茂抹了抹脸上的血，把阵地上能战斗的人重新组织起来，指定二班长担任代理排长。这时，一个名叫张连喜的弹药手主动要求担任机枪射手。张连喜拖着机枪向前爬，架设好之后，没有隐蔽自己就开始了射击。张连喜的子弹让敌人滚下去不少，可还有十几个敌人冲了上来，后面的敌人把尸体堆起来，推着这道尸体墙向前移动。程远茂只有三发子弹了，他决心留下最后一发给自己。就在程远茂和他的战士们耗尽弹药的时候，右翼的高粱地里射出了密集的子弹，增援部队呐喊着钻出了青纱帐。程远茂的一排最后只活下来七个人，而在他们周围敌人的尸体有一百多具。

黄昏将至，侯镜如又一次召集军长、师长参加的军事会议。师长们纷纷叫苦：共军的炮火太猛，“这是在华北战场没有遇到过的”，这样打下去等于白白送死。罗奇一下子严厉起来：“开会前接到总统来电，现在锦州战事非常激烈，要侯司令官坚决执行命令。这一战关系到党国安危，我代表总统来督战，如有奉行命令不力者，将报请严办！”各位师长不敢再叫苦，于是把矛头转向空军和海军，说空军和海军向来不听陆军的，飞机助战不力，海军的舰炮也没有起到作用——听说军舰大炮的口径大得吓人，一发炮弹就足以让半个塔山飞上天，可是共军的工事怎么还是那样结实？

十三日，国民党军伤亡一千二百四十五人，四纵伤亡一千零四十八人。

东北野战军对锦州的总攻就要开始了。

在距离锦州仅四十公里的塔山，国民党军增援部队没能向锦州前进一步。

令国民党军难堪的是，塔山之战打了三天，战场情报十分清楚，当面阻击部队只有一个纵队，前沿阻击兵力最多只有四个团，在阻击地根本无险可守的情形下，看似唾手而得的塔山，怎么四个军的部队轮番攻击，在付出惨重伤亡之后，就是无法逾越呢？

十四日凌晨，独立九十五师再次出动两个营对三十四团坚守的前沿阵地实施偷袭，短兵相接后，国民党军占领了塔山桥头堡阵地。三十四团立即反击，双方在黎明前夕开始了殊死搏战。天亮了，罗奇获悉偷袭成功，命令第八师开始集团冲锋。四纵的增援兵力即刻到达桥头堡阵地，独立九十五师顶不住退了下来。师长朱致一请求二十一师上来支援，但是侯镜如接到报告说，独立九十五师并没有占领塔山前沿，他怕自己的部队上去白送死，命令二十一师原地不动，转由一五

一师和一五七师向塔山右翼发动攻击。但是，无论哪支部队，就是无法突破，战场伤亡不断增加。

坚守塔山的解放军官兵，从他们进入阵地的那一刻起，谁都没准备活着下来。三十四团五连三排战士刘殿臣，决心在战斗中考验自己是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在向塔山桥头堡反击时，他的头部和右臂负伤。当敌人再次发动攻击时，他从昏迷中醒来，端着机枪又冲了上去，再次负伤倒地。战友们喊着他的名字，希望他再次醒来。果然，他跌跌撞撞地站起来了，接着就开始追击敌人，一颗炮弹迎面飞来，爆炸声响过之后，刘殿臣的身体血肉模糊，他用最后的力气对战友们说："为我报仇！为我报仇！"三十六团宣传队二组组长周殿信负责从阵地上抢运烈士的遗体。漆黑的夜晚，他在战场上爬行搜寻，由于双方官兵的尸体混在一起，他先分别军装的颜色，战友的军装是浅黄色，国民党军的军装是深黄色；分辨不清，就寻找棉衣内左胸处的胸标，战友的胸标上都写有名字和单位；如果连胸标都没有了，就摸帽子，战友的帽子与国民党军的帽子的区别是没有透气孔。确定之后，周殿信就把烈士的遗体放在自己身上开始往回爬。在塔山之战的六天中，他背回了两百六十七具烈士的遗体。

一九四九年年底，在中国战场采访的苏联著名作家西蒙诺夫在广西桂林附近对第四野战军一个名叫卜凤刚的副班长产生了兴趣："他是一个矮小结实、有着一张看来很是健康的宽阔圆脸的农村青年。"——塔山战役是卜凤刚入伍之后参加的第一次战斗，他没想到他会因此成为闻名全军的战斗英雄。战斗开始前，他所在的班有一名战士参加了纵队召开的士兵代表大会，战士回来对全班战友说："只要守住塔山，就可以保证兄弟部队拿下锦州，国民党反动派再也回不到咱东北来了。"这句话给只有十七岁的卜凤刚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是丹东人，父亲是雇农，母亲曾是地主家的用人，送他参军的时候，父亲对他说："你是长子，但你不要顾家，说什么也要把共产党分给咱的地给保

住。”卜凤刚不识字，让战友帮忙写了份决心书，并在上面按了自己的手印，表示在战斗中坚决做到以下五点：一，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二，如果食物不够，就让同志们先吃；三，死守阵地，如有同志负伤，将他背下火线后，再回到阵地上去；四，进攻在前，退却在后；五，为父母报仇。战斗开始后，排长带领他们班坚守一座地堡。第一天，排长的腿被炸断；第二天，班长胸部受伤；第三天，全班伤亡很大。最后，当敌人再次冲上来的时候，地堡塌了，副班长牺牲，连卜凤刚算上，阵地上只剩下三个人。卜凤刚说："咱们三个人要活活在一起，要死也死在一起。”三个人在阵地上又坚持了四天，四天里他们甚至还出击了一次，因为他们看见连里派来增援的三名战士被敌人的机枪射倒在半路上，卜凤刚爬出去救他们，爬到半路他打死了一名敌人，带回来一名俘虏和一挺机枪。十四日那天，卜凤刚带领两名战士向国民党军的阵地爬去，然后喊："锦州已经给我们打下来啦！缴枪吧，我们不为难你们！”竟然有十几名国民党军士兵带着机枪跑过来投诚了。受到鼓舞的卜凤刚送回俘虏后再次爬出去，尽管阵地上炮火猛烈，但他仍然爬到了最前沿，他在那里喊："锦州已经被我们占领了！你们什么办法也没有了！投降吧！”几分钟之后，又有十几名国民党军士兵跑了过来。卜凤刚回到战壕后，战友对他说："你应该得到一枚毛泽东奖章。”——西蒙诺夫记述道："他觉得在他的生命里似乎有某种东西已经起了变化”，“七天以前，他，一个立下决心要保卫自己的土地和为自己父母复仇的青年农民，第一次用步枪向敌人准确射击。而现在，七天之后，他已经成为了一个饱经锻炼的战士了”。

后来成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的高玉宝，那时是三十五团的一名通信员。战斗最激烈时，三十五团的两个通信班只剩下五名战士，而电话线已全部被炸断，传达命令只能靠通信员。十四日下午十五时，团长命令高玉宝通知九连上六号阵地，因为六号阵地上已经没有人了。高玉宝跑到九连，九连正在吃饭。接到任务后，指导员对全连官兵说："大家吃饱了！这是我们一生中的最后一顿饭！”第二天中午，团

长再次喊高玉宝，命令他通知警卫连上来，因为六号阵地上又没人了。这一次，高玉宝跟随警卫连上了六号阵地。正是国民党军独立九十五师冲锋的时候，高玉宝看见了令他一生难忘的情景：一个弹坑里，九连幸存的一名战士在往外爬，想去抓前面的机枪。战士的腿已经断了，只有一片肉皮连着，但断腿被一截树桩挂住了。战士挣扎几下之后，从腰间把刺刀拔出来，向断腿处剁了几下，把腿剁断，然后他抓起断腿向已经冲到面前的敌人扔过去。就在敌人愣神的瞬间，战士的机枪响了。增援的警卫连被敌人的火力封锁，阵地上那个断了腿的战士又从土里扒出来一个眼睛被炸瞎的战士，两个人一人压子弹一人射击。警卫连冲上来的时候，把两个战士抱起来要送他们下去，可两个人都不愿意，说他们可以自己爬下去。战斗结束后，高玉宝试图找到这两个战士，但是没有找到——很多年以后，高玉宝到塔山去扫墓，在塔山战役的花名册里找到了这两个战士：失明的战士名叫宁吉高，断腿的战士名叫冯兆生。

守卫塔山正面阵地的三十四团，战至最后全团只剩下二十一人。

高玉宝所在的三十五团，全团幸存者不足百人。

在以后的日子里，高玉宝长久地怀念着全部阵亡在六号阵地上的九连，不知道这个连的弟兄们最后的那顿饭吃饱了没有？

罗奇决定，十五日休战，准备一天，十六日重新发动进攻。

但是，一切都晚了。

十六日拂晓，锦州守军的一名副团长侥幸逃出重围跑到塔山，他证实了锦州已经失陷、范汉杰全军覆灭的消息。

企图从塔山增援锦州的将领们顿时紧张起来，因为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能否拿下塔山，而是林彪的主力会不会掉头来打自己。

十六日上午，蒋介石再一次飞抵葫芦岛。大家在机场等候的时候，突然飞来两发炮弹，落在距机场千米远的地方，大家一下子觉得还是不让总统的专机降落为好，可是“美龄”号专机已经落了下来。蒋介石一言不发地上了一辆吉普车，前往第五十四军军部，一进屋他就开始大骂：“你们不是东西！给了你们这多部队，又配备了海空军协同作战，用了几天时间，连个塔山都攻不下，你们不配为黄埔生和总理的信徒！”不一会，一封电报被送到蒋介石手上，“侍从递给他一副金框的花镜，在阳光照射下，但见他两鬓霜白，面有倦容，眼眶内饱含泪水，两手捧着电文边看边在颤抖。看完了，他狠狠地说：‘我和他们拼了！’”

蒋介石时年六十一岁。

历经漫长纷乱岁月的花甲老人落泪何为?

今天，塔山村东山冈上矗立着一座纪念碑，碑文的最后一句是：

塔山阻击战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 “大门”的关闭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四日十时，锦州总攻战打响。

第二天傍晚十八时，东北野战军攻占锦州。

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化装逃跑，十六日下午，在锦州以南高桥附近一个名叫谷窝棚的小村庄里，被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后方机关抓获。当时，他用浓重的广东口音称自己是一个“沈阳难民”。

范汉杰，广东大埔人，毕业于黄埔一期。一九二七年任浙东警备师长，是黄埔同学中最早升任师长的人。他曾赴日本考察军事，还曾

赴德国军事学校见习。一九三六年九月，由陆军第一军军长胡宗南保荐，任第一军副军长，随后与胡宗南率部开赴上海，指挥长达两个月的淞沪抗战。一九三八年九月，升任第二十七军军长，兼任郑州警备司令。第二年，率第二十七军进入晋东南，在此后的两年中，于中条山地区指挥对日作战。一九四四年，胡宗南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后，他在第一战区任中将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

内战爆发后，范汉杰的职务频繁调动：先在东北行营任副主任，两个月后改任南京国防部参谋次长；又过了两个月，被任命为陆军副总司令兼郑州指挥所主任；不到一年，他又奉命赴山东战场出任第一兵团司令官。在进攻胶东解放区的作战中，他的第一兵团连遭重创：十月，整编四十五、六十四两师于胶河以西被许世友的山东兵团所歼；十一月，在高密附近，又被许世友的山东兵团追歼万余人；十二月，在莱阳战役中，第一兵团再一次损失一万七千人。一九四七年底，范汉杰被解除职务，调回南京专任陆军副总司令。

一九四八年一月，范汉杰陪同蒋介石到沈阳视察，这是他人生命运的转折点。当时，东北野战军的冬季攻势已经结束，国民党军被压缩在锦州、沈阳和长春三个孤立的城市中，特别是新五军的两个师在公主屯被全歼，令东北国民党军面对的局势危机四伏。蒋介石在沈阳召开军事会议，追查了新五军被歼之责。从沈阳回到南京后没有几天，范汉杰就被任命为冀热辽边区（五月，该司令部移至锦州，改为锦州指挥所）司令，重点防御秦皇岛至锦州一线。蒋介石的这一任命，将范汉杰推到了一个随时可能爆发的火山口上——此时，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都已经把注意力集中到了锦州。

范汉杰以安排家眷为名向蒋介石提出辞职。蒋介石说，安排家眷的事可责成广东省府主席宋子文代为办理。范汉杰坚持亲历亲为，大有不安排好家眷就无法赴任东北之势。蒋介石只好给了他一个月的假

期。范汉杰回到广东。把散居在潮汕的子女带到青岛，从那里转赴台湾的亲戚处上学。然后，他极不情愿地去了东北。八月二日，范汉杰到南京参加整军会议，蒋介石请他吃饭，席间蒋介石对他说："你回锦州以后，遇事可向卫司令联系。"范汉杰明白，这是在提醒他处理好与卫立煌的关系，而这肯定是因为卫立煌向蒋介石报告了对他的不满。范汉杰随即以将帅不和、不利作战为由再次提出辞职，但蒋介石还是不准。从蒋介石官邸出来后，范汉杰又去向参谋总长顾祝同辞职，并要请假到台湾去看望子女。顾祝同说他不能做主，只能允许范汉杰到杭州做短暂休息。范汉杰真的置东北于不顾，只身去了杭州，在那里他给卫立煌发去一封电报，还是要求辞职。十八日，范汉杰被召回南京，蒋介石很不高兴："你们都不干，我又能怎么样！"然后脸一沉说："限二十日回到你的防地去！"范汉杰回到东北后，立即去沈阳面见卫立煌，提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陈铁是赴任锦州的最佳人选，因为他知道陈铁是卫立煌的人。而卫立煌却说："不要辞，不要辞，大家都是老朋友，要共同努力。"——"我已了解卫、廖都对我不满，以及东北局势危机，内部意见分歧，矛盾很多。卫极力拉拢廖耀湘、周福成，也煞费苦心。但我仍以军人服从为天职，在危难之时顾全大局，回到锦州继续供职备战。"

至此，锦州未战，将心已乱。

卫立煌为锦州设计的城防配备图看起来很美观。按照这个图纸，防御部队以连为单位，每连都要修筑一个坚固的据点，据点由坑道闭锁式子母碉堡组成；连的指挥所要能储存弹药和粮食，还要有厨房、厕所和急救所等设施；阵地外围要挖宽、深都达两米的外壕，并架设铁丝网。虽然修筑工事的部队每天发额外津贴，但是从五月开始直到九月，城防工事只完成了三分之一，且大部分据点都没能按照卫立煌的图纸进行施工，原因是缺少钢筋和水泥。被要求容纳一个连的碉

堡，最大的只能容纳一个班，最小的仅能容纳一个步兵组。即使这样，卫立煌来锦州视察的时候，居然还感到比较满意。

无论是卫立煌，还是范汉杰，他们都认为林彪不可能绕过长春和沈阳直接攻击锦州。但是，到了八月下旬，范汉杰陆续接到了东北野战军南下的情报，情报说有很多马匹拉着的火炮在锦州与义县之间的大凌河徒涉。接着，义县周围的第九十三军暂编二十师与林彪的部队发生了前哨战。而在锦州的南面，空军飞行员的侦察报告说，热辽边区地带夜间运输繁忙，从北面南下的林彪的部队正在继续向南包抄，在兴城、锦西附近与第五十四军暂编五十七师不断发生战斗，此间的铁路和公路也被破坏了。范汉杰终于确信，林彪真的要绕过长春和沈阳直接攻打锦州了。

范汉杰立即决定将义县的暂编二十师调回，集中三个军的兵力于锦州阻击林彪的进攻。具体防御部署是：新八军全部集中锦州，归第六兵团指挥，驻守锦州东面的紫荆山到松山一线，其中暂编五十四师守紫荆山，暂编五十五师守南山，八十八师为总预备队；第九十三军附第六十军一八四师担任锦州北面和西南面的防御，重点守备飞机场地区，其中暂编十八师守女儿河、车站一线，暂编二十二师配属一八四师的一个团守自二郎洞向东一直延伸到旧市政府一线；一八四师主力为第六兵团总预备队；由沈阳空运来的第四十九军七十九师的两个团守笔架山一线。

防御部署报告给卫立煌，卫立煌既不同意暂编二十师从义县退守锦州，也不同意新五军从山海关增援锦州。随着锦州机场被东北野战军封锁，空运其他增援部队的计划随即搁浅，范汉杰更觉锦州防御兵力严重不足。让范汉杰担心的还有士气。防御锦州的国民党军主力是第六兵团，第六兵团的基本部队原属于滇军。在国民党军内部，中央军嫡系部队与云南滇军部队间很少来往，范汉杰要求第九十三军军长

卢浚泉兼任锦州警备司令的时候，这位云南人说：“这个任务很麻烦，干不了。”五月，同为云南人的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六兵团司令官孙渡调任热河省府主席。孙渡上任之时得到蒋介石的承诺，说可以把第六兵团所属部队调到热河，这让滇军将领和官兵很是高兴了一阵，他们认为就此可以离开危险的东北了。但是，蒋介石的承诺始终没有兑现，孙渡临走对新上任的第六兵团司令官卢浚泉说：“以后的战争是决战阶段了，要小心些。”

东北野战军兵临城下，锦州守军的粮食和弹药都成了问题。为了让官兵们吃饱饭，东北“剿总”政工处长主持召开了一个“筹募大会”，号召锦州市民为部队捐款捐物，但是地方官员们却在大会上“挺身而出，为民请命”，说锦州城内物价飞涨，市民的日子已经很苦了，根本无力再拿出任何东西来支持国军。关于弹药，负责后勤的第三处处长说，国防部调来的弹药运到葫芦岛后，全部由卫总司令直接调配，于是它们都被空运到沈阳去了，锦州没有得到一发炮弹——这个处长在锦州城池未破之前就逃跑了。至于粮食，国民党军第十兵站总监说，加上美国救济总署救济的面粉，锦州的粮食只能吃到十二月二十日，因为每天空投的粮食大部分都落到了共军的阵地上，是否派部队去抢？

尽管如此，十月二日，当蒋介石空投信件，询问范汉杰对于锦州问题的态度时，范汉杰的选择依旧是“死守待援”。从一个职业军人的判断上讲，范汉杰认为以锦州作为牵制林彪主力的诱饵，廖耀湘兵团从西北、葫芦岛援军从东南，两路大军夹击而来，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决战态势。但是，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廖耀湘兵团推进缓慢，而葫芦岛援军就是打不过塔山，范汉杰突然对自己死守锦州的表态懊悔起来。他终于醒悟到，无论多么合理的作战计划，只要国民党军实施起来，后果往往难以预料。于是，他决定尽早从锦州撤退，撤到锦西与关内来的增援部队会合，然后再掉头与林彪在锦州地区进行决战。六

日，他打电报给卫立煌，提出锦州守军撤退计划。卫立煌在回电中口气强硬：“锦州坚守不动，以免影响全局。”

锦州是华北与东北之间的咽喉要道，自古就有“山海要冲，边关锁匙”之称。尽管范汉杰的城防工事有敷衍之嫌，但终究经过多年的不断修建，锦州城墙高而厚，四个城门外还有外城，形成新旧两城的格局。范汉杰在城内的主要街道上修建了大量的地堡，并结合高大建筑物部署了射击掩体。锦州全城防御被划分为六个警备区和三个外围据点：第一警备区在西南方向，以老城为主，利用城墙形成的环形体系进行防御；第二警备区在西北方向，以合成燃料厂等据点为核心阵地，并与交通大学、省公署大楼相连接；第三警备区在东北方向；第四警备区在东面，以锦州铁路大楼、中纺公司、火车站为核心阵地；第五警备区以第六兵团司令部为核心，控制中正大街的两侧。在外围，有女儿河据点、城北据点、城东南据点等，配备有坚固工事和铁甲列车。范汉杰要求：分兵把守，各负其责。

林彪站在锦州北面的帽儿山上，通过望远镜能够看见范汉杰指挥所的屋顶，但他还是心中忐忑。回到山下，他听取了作战处长苏静关于部队攻打义县时挖掘交通壕迫近前沿的汇报。林彪问，在义县挖掘交通壕时动用了多少部队？苏静说，根据二纵五师参谋长汪洋的报告，五师除尖刀连外，其他部队都参加了挖掘。林彪立即口述了一封电报，这个指挥着几十万大军的将领，在电报中甚至规定了交通壕的尺寸和挖掘时的姿势：

二、三、七、八、九纵及各师：

此次锦州战役各部需充分发挥义县战斗中挖交通沟的经验，各部须严守以下原则：

（一）每个师需以六个营的兵力［三分之二的兵力］全力用于挖交通沟，只留下担任尖刀的部队则在后面进行充分的突击准备的军政工作。绝不可只依少数部队挖交通沟。

（二）挖交通沟时要有不怕伤亡、不怕疲劳的精神，大胆进至距敌五六十米处，沿途展开由前向后挖，或前后同时挖。

（三）每个师要挖五条或三条交通沟。

（四）每条沟须高宽各一米达（米达，今统称米）五。

（五）挖沟部队可于夜间接近敌人挖，白天撤回休息，以少数部队控制交通沟。

（六）挖沟时先须以卧倒姿势挖卧沟，然后逐渐挖成站沟。

（七）以上指示必须坚决执行，不可懒散、怕疲劳不执行。今后我东北全军的基本任务是攻大城市，故各部须在此次挖沟中在思想上与作风上打下坚固基础。则今后作战就增加了重大的必胜因素。只要我肯挖交通沟，则不管敌火力如何激烈，工事如何坚固，都将使其大大丧失作用。

（八）各部应立即开始向着自己的攻击目标和地区挖交通沟，此次战役结束后须将挖交通沟作一总结检讨报告。

林、罗、刘

十月七日

东北野战军司令部《阵中日记》这样记载：“可以说，战役的胜利是挖沟挖出来的。”——夜幕降临，数万官兵拼命挖掘，锦州城四周彻夜都是锹镐之声。天亮以后，城墙外的开阔地上布满纵横交错的壕沟，这些壕沟一直挖到了守军的阵地前沿，国民党军官兵连解放军说话的声音都可以听到，但是就是打不着人，这让他们万分惊恐。

攻打锦州外围据点的残酷出乎了林彪的预料。

七纵负责攻击城南的一系列高地，其中最高点是罕王殿山，山上有几十座水泥碉堡，由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军七十九师二三五团和暂编五十四师二团、暂编五十五师三团等部共同防守。九日清晨，在炮火的掩护下，七纵二十一师六十二团官兵不顾伤亡连续爆破地堡，于八时三十分占领罕王殿山的南侧，但立即遭到守军预备队的猛烈反击。

双方来回拉锯达十一次之多，直到黄昏时分，反击的国民党军才退回城内。与此同时，二十师在左翼攻击大架山，这是一个可以控制北宁铁路的高地，守军为暂编五十五师的一个加强营。二十师五十八团一营于九日凌晨乘夜色穿插，被国民党守军哨兵发觉，穿插即刻演变成强攻。在一营的猛烈攻击下，守军一部逃过女儿河。凌晨五时，二营向主峰发起攻击，在占领几个小高地后，遭到守军的反扑，混战中二营将反击击退。战至十一日，攻击部队越过女儿河继续向前推进。十三日，七纵在打退锦州守军的连续反扑后，攻占飞机场。

在七纵的右翼，九纵攻击的是南山高地。二十六师七十七团采用夜间渗透的方法，占领了罕王殿山以东的阵地。这个团的一连在攻击大岭山时，连续冲击均遭守军的猛烈反击，全连伤亡百分之七十后，终于拿下阵地。七十三团于十二日夜袭击刘家屯，守军逃回锦州城内。

八纵在东面夺回失守的小紫荆山后，二十四师、二十二师六十五团和纵队山炮营及二十三师迫击炮连联合攻击北大营。这个锦州城外修建最早的军营呈正方形，周围地势开阔。十一日清晨，北大营围墙的东北角被炸开，七十团七连在连长靳宝谦的率领下首先突入。十二日，八纵继续向前攻击，二十三师六十七团在八家子歼灭暂编五十四师二团三营的五百多人，直逼锦州城墙。十三日，八纵开始攻击东大梁。东大梁是一个高地，可以俯瞰锦州城东的大部分地区，是锦州东门防御的最后屏障，因此修建有大量的防御工事、火力点、雷场和地堡，守军为暂编五十四师一团一营。凌晨时分，二十四师七十一团一营和三营并肩突破。夜雾弥漫，炮兵射击效果不佳，多个爆破组接连冲击爆破出现严重伤亡。天亮以后，攻击按时开始，在守军密集的阻击火力下，三营长安全福牺牲，之后八连长和九连长也倒下了，三营的突击部队攻击受挫。左翼的一营在营长张进、教导员吕作绪的率领下，连续成功地爆破地堡，突击队很快攻占了前沿，冲击中一连长徐

殿云负伤，二连副指导员张立春阵亡。锦州城内守军出动两个营的兵力疯狂反击，一营一连幸存官兵只有十七人，二连也只剩下二十三人还在战斗。团预备队二营到达战场后，交战双方陷入混战，直至黄昏，七十一团才最后攻占东大梁。

锦州外围防御的重点在城北，守军为第九十三军暂编二十二师、暂编十八师和一八四师各一部。

位于锦州西北的合成燃料厂，是日本人于一九三七年修建的。现在，国民党军把这座工厂修成了一个坚固的军事要塞，以三个巨型碉堡为核心，围绕着子母堡，配备有迫击炮和各种火力，工厂的四周被开辟成空旷的开阔地。二纵六师十八团官兵挖了三个昼夜，把交通壕推进到距碉堡近百米的地方。十日黄昏，在师、团炮兵的火力支援下，十八团发动了攻击。通过开阔地的时候，二营四连的爆破组受到火力阻拦，数次冲击后依旧没能接近碉堡。十一日，十八团官兵们继续挖掘交通壕，这一次，他们挖到了距碉堡仅剩十米的地方，这让合成燃料厂内的守军产生了巨大的恐慌。为了减少爆破地堡带来的伤亡，六师的炮兵琢磨出一种特殊的山炮射击方式，即先用两发不带引信的炮弹对水泥碉堡进行轰击，然后用一发带引信的炮弹最后将其摧毁。十一日下午，攻击再次开始，炮火支援得到了加强，官兵们奋力冲锋，合成燃料厂守军一八四师五五〇团的一个加强营被全歼。

在六师攻击合成燃料厂的同时，四师开始攻击十二亩地据点。这是一个环形的防御体系，控制着锦州城北进出的道路，高地的顶部修有五个巨型碉堡和三十多个子母堡，外围有雷场和两道屋脊形铁丝网以及一道鹿砦，鹿砦外还有雷场。四师十二团官兵连续两天冒着守军的炮火顽强挖掘，最终挖出了近十华里长的交通壕，还构筑了一个巨大的掩体作为攻击出发地和临时指挥所。山炮连的官兵为以最佳射击效果为步兵开路，在附近的一片坟地里隐蔽了十八个小时，将每座碉

堡都进行了准确的观察和仔细的测量。炮兵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攻击开始后，十五分钟的炮火准备将守军前沿暴露的工事全部摧毁。六连接着发起冲击吸引守军火力，五连先头排开始了纵深爆破。在通过雷场的时候，由于守军埋设的是压发雷，先头排准备的排雷长杆不起作用，副连长李德明喊："同志们！停留就是伤亡，往前冲呀！"先头排官兵不顾生死踏雷而上，为后续部队开辟出一条通道。三排冲到外壕边的时候，壕深水深，梯子不够长，部队被阻再次受到火力压制。紧急时刻，后续部队冒死运上来三百公斤炸药，把外壕炸开了一个大缺口，三排冲下了壕沟。梯子已被炸断，战士王天臣站在齐腰深的水里，把梯子的一头架在沟沿，一头顶在自己的头顶上，喊："同志们！从我这里过！"从王天臣头顶上过去的副班长丁占元率领六名战士攻占了一座子母堡。在守军的反击中，指导员罗昶双腿被打断，他坐在地上继续指挥作战。五连包括连部通信员和连队炊事员在内，全部加入了巩固突破口的战斗，副指导员顾金杨率领爆破小组炸毁七座碉堡，扩大了战果。锦州城内的国民党军紧急增援，负责阻击的九连抗击着一个营的冲锋，指导员和一排长先后阵亡。九连一班的阵地是一个突出点，守军的炮火集中在这里，阵地上的官兵全部伤亡，只剩下一名战士还在战斗。这名战士左脚已被打断，他坐在地上扔手榴弹，身边的手榴弹扔完了，就到处滚动收集战友遗体上的弹药。当敌人再次冲上来的时候，他居然站了起来，端着机枪猛烈扫射。敌人的三发子弹击中他的腰部，他倒下来，但很快又跪起来，他撕破棉衣堵塞伤口，然后端起机枪继续扫射。最后，冲上来的三个敌人把他抱住，他用牙齿咬敌人的脸、脖子和鼻子，生生地把一个敌人咬死了，剩下的两个敌人吓得放下他跑了——这个战士名叫马凤岐。

十一日下午十六时四十分，十二亩地守军终于举起了白旗。

黑山团管区也在锦州北面，这里靠近铁路和公路，是进出锦州的大门。管区以楼房为主，平房和碉堡混合在一起，同样设有外壕和鹿

砦等防御设施。六师十六团的指挥所设在合成燃料厂旁的一条排水沟里，十二团指挥所设在刚刚占领的十二亩地中心碉堡里。两个团的官兵又开始挖交通壕，数千米的交通壕挖得又宽又深，有的地段甚至可以通行火炮。十三日上午十时，攻击开始。十二团二营四连突破前沿后，受到守军暗堡火力的压制，架设梯子的战士全部牺牲。三营本是助攻，但突破顺利，于是变为主攻，官兵们很快占领了部分碉堡。由于这里已经接近城墙，锦州城内守军的反击十分顽强，双方多次进入肉搏战状态。十二团官兵利用敌人的尸体作掩体死守阵地。危急时刻，三营长李希权率领官兵以决死的精神端着刺刀反击出去，在国民党军惊恐万状的一瞬间，一营和二营突然发动了冲锋。战斗中，一营长赵先顺、二营长陈殿元和教导员张耀佩先后负伤。战至下午十五时，随着残敌逃进锦州城内，二纵肃清了锦州西北外围的敌人。

锦州北面的三纵打得最苦。

配水池是锦州城北一个坚固的据点。攻击开始前，七师二十团一营长赵兴元请求担任主攻任务，因为他觉得一营有专打硬仗的传统，且自己对配水池进行过仔细侦察。但是，赵营长也清楚，一旦请求得到批准，包括他自己在内，一营全体官兵将九死一生。

配水池是个小高地，与十二亩地、大疙瘩互为犄角，控制着锦州北面出城的道路。伪满时期，这里就修建了大量的钢筋水泥碉堡和砖石结构的永久性工事，后来驻守锦州的国民党军连续加修，以主楼为中心设置了数道环形防御工事，有的地堡的钢筋水泥厚度达到一米以上，炮弹打上去只会留下一个白点。

守卫配水池的是暂编二十二师一团八百人的加强营。

一营的攻击开始了，三连在西北，二连在东北，双向进行突击。三连很快冲到壕沟里，但是，壕沟里每隔百米就有一个暗堡，三连官

兵受到猛烈阻击。更严重的是，守军事先在沟内埋了大量的航空炸弹，当三连进入沟内准备爬上去冲锋的时候，守军引爆了这些炸弹。剧烈的爆炸过后，三连只有指导员一个人还活着。二连在营教导员的带领下也攻进了壕沟，官兵们迅速冲上去，占领了东北角的四间红房子，为后续部队打开一个缺口。赵兴元立即将二连进攻方向改为主要突破口，命令一连加入战斗，他的营指挥所也跟着到了前沿。丢失红房子的国民党守军立即组织反击，所有的火炮和机枪都集中到这里，红房子的屋顶顿时被炸塌。赵兴元命令一连坚守，二连阻击敌人的反扑。反击的敌人攻势凶猛，数次进攻后，推进到红房子墙根。敌人往断壁里扔手榴弹，里面的一连往外扔手榴弹，隔着一道断壁双方谁也不退。一连战士李长修腹部受伤，自知必死的他端着机枪从断壁里跳出来猛烈扫射，直到倒下为止。红房子的混战残酷地持续了七个小时，国民党军的反击多达二十七次，双方官兵的尸体在百平方米的范围内堆积重叠在一起。一营的大部分官兵都已伤亡，赵兴元命令把所有的伤员和武器集中在一起，前面倒下一个，后面补充一个。三连三排长刘永秀两条腿被炸断，他对赵兴元说："营长，我不行了，你得为我报仇！"警卫员小范也受了重伤，赵兴元把自己的衣服给他盖上，鼓励他说："你一定挺住，我马上就能解决战斗！"小范流着泪把自己身上的干粮袋解下来递给赵兴元，他说："你要吃饱啊营长！"然后他提出了一个请求："营长，我是党员，是打锦州时牺牲的，是光荣的。你一定要告诉我的爸爸妈妈。我是沂水人。"

国民党军决心把失去的前沿阵地夺回来，再次出动了一个营的兵力，在两架飞机和五辆坦克的掩护下，向一营的侧后包抄而来。此时的一营只剩下二十多人，官兵们战斗了一天，一粒米一滴水未进，团指挥所决定让一营撤下来，但遭到营长赵兴元的拒绝："我们营在壕沟里还倒着几十号人，有牺牲的，有受伤的，我们不能丢下他们撤！"他要求团里支援一些弹药，决心继续战斗下去。在赵兴元决定不撤之后，伤员们再次拿起武器，有的战士在自己身上捆好了爆破筒，准备

与敌人的坦克同归于尽。最后时刻，团里的火炮推进到公路边开始向敌人的坦克进行轰击。增援的三营到达配水池的西北，侧配合一营发动了攻击。十三日二十四时，三纵七师攻占了配水池守军的最后一个碉堡群。

赵兴元的一营五百多官兵，战后只活下来六个人。

配水池被攻占后，残酷的战斗在大疙瘩据点打响。

大疙瘩是锦州城北一个孤立突出的山头，是国民党军暂编二十二师二团三营防守的重要据点。据点北面临河，阵地核心是一座巨型钢筋水泥母堡，上下两层，四周筑有方形内壕，排列着三十多座子堡。国民党守军凭借着坚固的防御系统，组织起一支“决死队”，“决死队”员在前沿战壕中跪成一排，背着大刀端着机枪高喊：“老八路！有本事就过来吧！”

担任攻击的是三纵八师二十四团三营。

三营决定由九连担任突击队。

十二日十三时，炮火准备之后，九连长杨清河带领三排开始攻击。大个子战士杨增耀抡着大铡刀砍开了铁丝网，但顷刻触雷牺牲。冲过壕沟的二排和三排受到火力压制无法前进。这时候，国民党守军的“决死队”从一条带盖子的沟里突然冲出，二排端着刺刀迎上去，双方立即混战在一起。一排和八连赶到后，“决死队”退了下去。但守军的火力封锁依旧十分严密，后续部队上不来，弹药接济不上，两军混战又使炮兵无法支援，守军的反击一轮接一轮，双方混战到黄昏未分胜负。九连和八连，两个连四百多官兵只剩下四十多人，攻击被迫停止。晚上，二十四团调整作战部署，决定由二连和七连从两侧发动进攻。十三日凌晨，攻击再次开始，守军的“决死队”再次冲出，混战持

续到中午，兄弟部队插到了守军的侧后，二十四团的攻击部队炸毁守军隐藏的盖沟后，攻占附近的碉堡，但核心阵地上的那座巨型母堡依旧没能攻克。七连爆破手张成友在接近母堡时倒下；爆破手吴连义再次接近，但很快也中弹倒下；另一名爆破手王玉环接着再上。负伤的吴连义苏醒后往母堡方向爬，在距离母堡三米远的时候，他突然站起来，把一根爆破筒塞进了母堡的枪眼，爆破筒很快被里面的敌人推出来，吴连义把爆破筒再次推了进去，并且用身体顶住。与此同时，王玉环也上来了，也把爆破筒塞了进去。两声巨响惊天动地，吴连义和王玉环与敌人的大母堡一起飞上了天空。

林彪下达了锦州总攻令，总攻时间是十四日上午十一时。

此刻，塔山方向的四纵未让近在咫尺的国民党援军前进一步，而从沈阳方向增援锦州的廖耀湘兵团仍在缓慢移动，林彪只需关注能否在最短的时间里拿下锦州城了。

东北野战军为总攻锦州准备的火炮数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九百余门之多，其中重型山炮、野炮、榴弹炮和加农炮多达三百二十余门，而锦州国民党守军的火炮数量仅为七十门。东北野战军的炮兵把火炮推到距前沿仅数百米的射击阵地上，炮口林立对准了锦州城内所有的防御目标。东北野战军还动用了装甲部队，这支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成立的坦克大队，已经发展到三个营的规模，十五辆坦克被火车从北满运到锦州前线，然后官兵们将坦克开过结着薄冰的大凌河，到达锦州北面二十公里处的集结地——在一次城市攻坚战中，投入如此数量的火炮和坦克，这在东北野战军的作战史中尚属首次。

十月十四日，清晨时分，锦州城内的国民党守军首先开炮，掩护步兵向城西北二纵和三纵的阵地发动反击，但是很快就被这两个纵队的火炮打了回去。这个小小的交火过后，城内城外一片寂静。九时三十分，惊雷般的炮声骤然响起，东北野战军的几百门大炮一起将密集

的炮弹暴雨般倾泻在城墙上和城内守军的防御目标上，国民党守军立即陷入巨大的混乱之中。锦州城的主要防御工事都集中在外围，城内的工事大都尚未修筑完善，从城外逃回城里的官兵和原来负责城内防御的官兵拥挤在狭小的工事里，而这些工事根本无法承受东北野战军最大强度的炮火轰击。卢浚泉的第六兵团炮兵团逃回城里后，拥挤在兵团司令部旁边，这里根本没有合适的炮兵观察所，但炮兵们怕司令官把他们往城边上赶，谎称这里完全可以射击，于是当城外的火炮轰击开始后，他们奉命还击时只能漫无目标地胡乱发射。东北野战军的炮弹落在范汉杰的指挥部里，他迅速转移到地下室，但是，地下室的地窗玻璃已被震碎，幕僚们惊慌地到处躲避。外面的官兵跑进来，用沙袋把大门堵上。不一会儿，炮兵团的军官跑来报告说："炮兵阵地已被共军的炮火破坏，我们已经无力还击。"——范汉杰后来回忆道："我到哪里，解放军的炮兵即跟到哪里，好像完全了解我的位置一样……我军炮弹接济不上，炮兵阵地已被解放军的炮兵所控制，我军发了几颗炮弹之后，解放军炮兵即集中火力向我军炮兵阵地及步兵阵地猛烈轰击，士兵在壕沟里动也不敢动。各部队的电话因炮击而中断，伙食又是送不上去，伤员有时也救护不下来，阵亡的也不能及时埋葬。士气的低落和苦闷是罕见的，城内已成黑暗的死胡同。"

预定的总攻时间是十一时，但是由于二纵和三纵在清晨反击国民党军的时候，已经乘势进入到攻击出发地，于是总攻在十时左右提前开始了。

九纵突击分队在炮火延伸的时候，扑到南面城墙的突破口。七十五团一连七班是尖刀班，第一名旗手倒下，又一名战士举起红旗继续冲击；战士又倒下了，班长罗恒斌再举红旗，三次负伤之后，他把红旗插到了突破口的左侧。与九纵并肩攻击的七纵，先头部队是二十一师六十一团和二十师五十八团。十时二十五分，六十一团七连越过小凌河，六班一跃登城成功。五十八团突击连还在炮火准备的时候就发

动了冲击，官兵们说：“宁愿让自己的炮弹打死，也不愿让敌人的炮弹打死。”战士林鸣和举着红旗冲在前面，登上城墙后，他高举着红旗站在最高处猛烈摇摆，鼓励战友们登城。林鸣和立即成为守军射击的目标，在身中数弹之后，他手里的红旗还在摆动，直到口吐鲜血一头栽倒。八纵从城东突破，担任突击任务的是二十二师六十四团一营，在营长毕恩波和教导员乔治州的率领下，一营猛打猛冲，在距突破口百米之处遭到守军的火力阻拦，毕恩波营长身负重伤。第二次组织突击时，师配属的各种火炮和机枪加大了掩护力度，一营终于突破成功，后续部队蜂拥入城。三纵的正面城垣被炮火轰开了一处三十米宽的口子，十九团和二十三团的两个突击营冲过开阔地，迅速接近城墙。十九团一营一连一排战士黄德福首先把红旗插到突破口上，这面红旗已被守军的子弹打得满是弹洞。

二纵是总攻锦州的主要突击方向。五师十五团连续爆破防御障碍，坦克分队迅速通过前沿。步兵突击的时候，在守军的炮火拦击下出现大量伤亡。八连二排在排长靳文清的率领下拼死向前，六班副班长尚福林第一个登上城墙。守军的一个连向突破口反击，三连和八连死守不退。五班战斗组长梁士英用爆破筒把反击的敌人逼了回去，守军利用铁路路基构成第二道防御线抵抗。坦克分队的四辆坦克猛烈撞击用石头堵塞的铁路桥桥洞，但是石墙的后面还有一道厚厚的土墙，冲在最前面的坦克被榴弹炮击中，驾驶员王振武负伤。董来扶驾驶另外一辆坦克抵近射击，摧毁了两座碉堡。然后坦克分队集中炮火，将铁路上三节车厢里的守军火力点全部消灭，步兵抵近了铁路路基。再次发动攻击的时候，铁路西侧的一座坚固碉堡里突然射出密集的子弹，三连和八连的冲击被压制。五班战斗组长梁士英再次站出来，要求让自己前去爆破。连长答应后，梁士英脱下棉衣，抓起一支爆破筒和两颗手榴弹，向碉堡爬过去。在距离碉堡十米远的时候，他利用一道土坎作掩护扔出手榴弹，然后趁着爆炸的烟雾起身跃到碉堡下，将爆破筒塞了进去。就在他转身离开的时候，爆破筒被守军推了出来；

他再次回头塞了进去，但里面的守军还在用力地往外推，这一次梁士英没有松手。他向后看了一眼，听见排长在朝他大喊：“快回来！快回来！”梁士英还是没有松手。来自东北贫苦农家的战士梁士英，知道自己和很多战友一样必须死在这里了，他朝排长喊：“不能回去！不能回去！”

爆破筒爆炸了。

三连和八连越过铁路路基，朝当面守军杀过去。

清晨时分，一名解放军战士在锦州城郊敲开了一户百姓的家门，开门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农家妇女。当听说部队需要一名带路的向导时，妇女看了看停在她家门口的那些拉弹药的大车，说她可以带路。战士说她带着孩子不能去，前边很危险，需要个强壮的男人。妇女说，男人们都去帮大军打仗了，村里再找不到其他人了，她可以把孩子交给他奶奶。官兵们眼泪汪汪地不愿意，可村子里确实没有什么人了，运输队又迷了路。这时候，妇女已经坐上了第一辆拉弹药的大车。运输队到达前沿后，官兵们折了根柳树条让她拿着，说这是事先定好的规矩：凡是手里拿着柳树条的百姓，就证明他们已经帮助过部队了，后续部队就不能再麻烦人家了。

锦州城郊青年农民金铁九也拿着这样一根柳树条回家了。他家住在城南，仗打起来之前，九纵的一个指挥部就设在他家里。仗打起来之后，他和村里的年轻人一起参加支前，他的任务也是当向导，把部队带到距离锦州城墙最近的地方。城墙附近有敌人的火力，解放军官兵怕伤着他，让他在后面指路，两个战士在他前面，往前爬一段就用手中的小铲挖一个坑，然后让他爬过去藏在坑里躲避枪弹。官兵们不停地对他说：“小心着！擦破了一块皮，我们也没法向你爹你娘交代！”把部队送到地方后，青年农民金铁九举着柳树条往家走，一路上碰见很多举着柳树条回家的乡亲——整整六十年后，当年给解放军带

路的农民金铁九已经离世，但是他的儿子金铁光是解放军中的一员，并且至今仍然驻守在锦州城下。

东北野战军的坦克冲进了市区，掩护步兵进行激烈的巷战。

下午，锦州城内已是一片火海。范汉杰召集锦州指挥所参谋长李汝和，第六兵团司令官卢浚泉，炮兵指挥官桂协华，第九十三军军长盛家兴、参谋长殷开本，暂编十八师师长景阳等紧急磋商。他们分析的战况是：塔山方向的侯镜如依旧没有突破阻击的迹象，廖耀湘也被阻击在新立屯地域，而目前共军已经全面攻入市区，市内又没有坚固工事可守，外援无望，只有待毙。范汉杰征求将领们的意见，大家一致主张向锦西方向突围。遂决定突围部队统一归盛家兴指挥，北面的部队先向北突击吸引共军火力，掩护突围部队从东门出去，渡过小凌河后，向高桥、塔山方向前进，以期与侯镜如的部队会合。

黄昏时分，范汉杰、卢浚泉、李汝和、桂协华一起，带着特务团一部，从兵团指挥部北面的坑道向东门移动。他们刚一出动，立即受到火力阻击，特务团猛力回击，掩护他们爬过土墙，越过铁丝网和外壕，到达女儿河边。卢浚泉对桂协华说："要分成小股各走各的，把武器都丢在河里，不要再喊我司令官，叫我老李，喊范主任老刘。"走到南山的时候，他们再次被发现，于是一伙人跑散。

天已经黑了。

照明弹和炮弹、手榴弹爆炸的火光映红了锦州城，密集的枪声和喊杀声彻夜不绝。

高级将领出逃的消息一经传开，锦州守军的士气彻底崩溃了。

配属三纵攻城的十七师四十九团一营打到铁路医院时，前面出现了一个举着白旗的国民党军军官，军官喊："别打了！别打了！"一营

长王子玉问："你来干什么？"军官说："我们长官说要起义，来联系谈判。"王营长说："在这种条件下谈判起义，不行！你们只有投降！"军官递上来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解放军，我师决定起义，现提出三个条件：第一，保护私人财产；第二，保护家属安全；第三，保留建制。五十五师师长安守仁。"国民党军新八军五十五师是刚刚组建的部队，由热河地区的地主武装和交通警察部队拼凑而成，主要军官由第六兵团调任。十四日上午城垣被突破后，卢浚泉命令他们夺回锦州北面的阵地，这个把死亡和战败责任转嫁于人的命令把师长安守仁和官兵们惹火了，于是军官们开始商量起义。正在商量的时候，有人报告说范汉杰和卢浚泉准备逃跑，于是起义的事被当即定下来。安守仁师长召集团以上军官宣布起义决定，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

东北野战军总部拒绝了五十五师的战场起义，命令其放下武器。

十七师顺利地通过五十五师的阵地，攻进锦州老城。

十五日下午十八时，持续三十一个小时的锦州攻坚战结束。

穿着不合身的棉衣、戴着破毡帽的范汉杰在逃跑的路上遭遇盘查，九纵的战士认为他很可疑，要把他带到纵队部去，他不去，说："我无话可说，你们枪毙我吧！"于是战士们就拖着他走，拖了几步，他喊："我的脑袋出血了，不要再拖了，我承认我是范汉杰，快给我上药吧！"战士们把他带到九纵司令部，詹才芳司令员和李中权政委问他做了俘虏有何感想，范汉杰说："贵军攻锦是我们万万想不到的，没有雄才大略、深谋远虑的大战略家是不会出此一招的。我现在无颜见我的部下卢浚泉等将领，我深感对不起他们，我盼望贵军能放我回去，我很想念他们。"

范汉杰不知道，卢浚泉已在距锦州十五公里的一个名叫娘娘宫的地方被俘。第九十三军军长盛家兴在火车站附近被八纵二十四师七十

一团官兵抓获。新八军军长沈向奎侥幸逃出战场。一年后，改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军军长的他在东南沿海的金门岛，率部再次与解放军进行了一场血战。

锦州战役，毙伤国民党军一万九千余人，俘虏（包括投降）国民党军八万余人，东北野战军伤亡两万四千余人。

十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致电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诸同志，并转东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

庆祝你们此次歼敌十万解放锦州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出现于你们今年秋季攻势的开始阶段，新的胜利必将继续到来。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全歼东北蒋匪军队、解放全东北人民而战！

十九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锦州之战，“部队精神好，战术好，你们指挥得当，极为欣慰，望传令嘉奖”。

锦州的胜利，对于东北人民的全部胜利与最后胜利是有决定性意义的。敌人失去了锦州，其实际意义，就等于失去了全东北。孤守长、沈之敌，从陆上逃跑的后门，从此被紧紧地关闭起来了。东北敌人的最后被歼，及全东北的最后解放，已经为期不远了。

锦州的失守，对于国民党军在东北的命运来讲是致命的——锦西侯镜如的增援部队在海边进退两难，廖耀湘兵团在半路上不知所措，被围已久的长春粮弹已绝，兵力空虚的沈阳人心惶惶。至此，东北地区的“大门”已经被人民解放军完全关闭。

## 慢慢地陷落

“长春是在没有多少战斗的情况下慢慢地陷落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记述道，“二十万老百姓早已陆续溜出城，通过火线出去了。人民解放军收割了郊区的庄稼，并为附近农民运送庄稼提供了三千辆大车，城里颗粒未得。蒋只给他的部队空投粮食，而这些粮食还引起了部队之间的摩擦。六十军的士兵都是思念家乡的云南人，他

们说大部分粮食都投给‘蒋的嫡系’，美国装备的新七军了。在长春每一个士兵都知道大势已去，但又不敢投降。他们的长官警告说‘共产党杀俘虏’。”

长春被东北野战军围困之后，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搭乘美军飞机进入长春，他看见长春市中心有一个很大的圆形广场，广场的一头是个旧货市场，“买卖从医院和工厂偷盗出来的货物，以及官员们从老百姓那里搜刮来的东西”。广场的另一侧是国民党当局专门处决犯人的刑场。“被处决的都是些什么人呢？一个二十岁的姑娘，据说是共产党。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子，据说是间谍。一个五十六岁的老妇人，罪名是散布谣言。”处决时是在后面用手枪射击，“尸体向前扑倒”，围观的人们随即跑散。“在刑场的上方，高高悬挂着的蒋委员长的画像。画家把他画得咧着嘴，微笑着”。

早在一九四八年六月，经中央军委批准，东北野战军决定对长春采取“久困长围、政治攻势、经济斗争”的策略，并随即组成第一前线围城指挥所，萧劲光任司令员，萧华任政治委员，陈光、陈伯钧任副司令员，唐天际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解方任参谋长，统一指挥野战军第十二纵队三十四、三十五师，第六纵队十八师，独立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师和一个炮兵团，对长春实施严密封锁。

六月五日，林彪、罗荣桓、谭政联名下达《围困长春的办法》，其基本要义是：“断绝对长春的交通与一切商业关系，使城外各地物资，首先是粮食、柴草、蔬菜等项生活资料，不流入长春，使守军得不到长市外围的供应。同时，应用炮火及高射武器控制空域，使国民党军飞机不敢低飞投掷和着陆，以此限制其空运。”长春周围二十五公里以内被划为封锁区，“除军事所必须者外，应禁止人员车马自由通行”。“为反对长春守军的人口疏散政策”，对从长春城内出来的市民

“必须予以相拦”，“使守军对城市人口不能大量和迅速地疏散，而达成减少其粮食之困难”。但特别规定，对出城市民不得“殴打和开枪”，“只宜采取劝阻的方法”。

围困长春的解放军部队十万，被围困的国民党守军也是十万。

早在三月间，时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的郑洞国认为：“蒋、卫之间在东北撤与守这个战略决策问题上僵持不下，拖延时日，势必要将在东北的这几十万军队葬送掉。”他向卫立煌请假，要求到北平治病，决意离开东北。然而，郑洞国没有走成。先是四平遭到攻击，接着永吉守军第六十军撤退长春，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和卫立煌的恳留下，郑洞国赴任长春，出任第一兵团司令官兼吉林省府主席。他后来回忆道：“从那时以后，直到这年十月长春和平解放前夕，我度过了一生最为艰难和最痛苦的一段时光。”

长春四面被围，物资匮乏，士气低落，民心浮动。

郑洞国到任后，立即着手整顿防务，安定人心，以图长期固守。

对于长春城防，郑洞国忧虑不多，因为这座城市曾是伪满洲国的“都城”，因此城内和郊区早已修建了大量永久式、半永久式防御工事，特别是城市中央的原关东军司令部、在乡军人会、空军司令部和大兴公司四座高大的建筑物，已经成为巨大而坚固的堡垒，不但有坑道彼此相连，而且厚墙铁窗和钢筋水泥的屋顶一般炮弹根本无法击毁。中正大街上的中央银行，外墙全部由坚固的花岗岩砌成，厚度达一米以上，内部存放有大量的弹药、粮食和淡水，还能自行发电，郑洞国的司令部就设在这里。

让郑洞国不放心的是长春的部队。

长春守军主力是新七军和第六十军。新七军是陈诚于一九四七年冬天以新一军新编三十八师为基础扩编的，算是中央军嫡系部队。全军兵力三万左右，军长是原新编三十八师师长李鸿。但是，在这个军所辖的三个师中，暂编五十六师的前身是伪满部队，被改编时全师虽有七千兵力，但战斗力很弱，师长为新七军原参谋长张炳言；暂编六十一师也是由地方部队改编的，兵力也有七千多，战斗力不比暂编五十六师强多少，师长是新编三十八师原副师长邓士富；新七军全军只有新编三十八师能打仗，这个师基本保持了抗战时期的老班底，兵力一万二千人，且装备精良，师长是新一军原参谋长史说——算得上是国军精锐的新七军，实际上只有一个师可以指望。第六十军是一支老牌滇军部队，全军三万官兵大多是云南人，自他们进入东北战场以来，在国民党军高层的眼中，这个军一直是个不稳定的因素。先是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在海城起义，接着在吉林地区的作战中一八四师残部和暂编二十一师大部被歼。经过整顿之后，以一八四师番号重组的部队，干脆被调到新五军去了。此时，第六十军下辖暂编二十一师，全师九千人，战斗力很弱，师长为陇耀；暂编五十二师，全师六千人，因为成分复杂，基本上没有战斗力，师长为李嵩；一八二师为老部队，全师一万人，战斗力强，师长为白肇学。

主力部队的战斗力已是隐患，更严重的是，新七军与第六十军之间隔膜很深。滇军向来不被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所尊重，长期受到歧视使云南籍官兵充满怨恨。两支部队的防区以长春市中心的中正大街为界，新七军驻守西半部，第六十军驻守东半部，两支部队共同驻防一城，不但互不来往，而且在中正大街的分界线处竟然设置了岗哨，拉起警戒线，俨然随时可能交战的对手。为了稳定第六十军军心，郑洞国上任后，保荐曾泽生军长兼任第一兵团副司令官。郑洞国还严厉告诫新七军的军、师将领们，必须注意与第六十军保持友好关系，以在危难时刻能够同舟共济。

让郑洞国忧心如焚的还有粮食。

上任之初，他就命令部队抓紧采购军粮，但是长春内外已经无粮可买，这导致了军队到市民家中强行搜购。到了五月，长春守军共采购和储存一百五十万公斤军粮。新七军因为驻守的时间长，有家底；而第六十军刚从永吉撤入长春，只能现购现吃，购不到就向新七军借，新七军从自己喂马的饲料里给了第六十军一些大豆和豆饼。郑洞国派部队出击城外去抢粮食，一度打到长春三十公里外的地方，但很快又就被东北野战军打了回来，不仅没有抢到一粒粮食，暂编五十六师和暂编六十一师都损失了部队，更糟糕的是大房身机场丢了，对长春的补给空运就此中断。长春市长尚传道在全市进行了一次户口清理和余粮登记，结果表明，无论守军还是市民，长春的粮食只能吃到七月底。

此时所有的迹象显示，林彪部并没有再次攻打长春的意图。

看上去，林彪是要等着长春自己气数渐尽。

空运补给断绝之后，守军出现饥饿现象。新七军和第六十军的六名师长联名给蒋介石发去一封电报，诉说长春守军被围之艰苦境况，并请求派大军前来解围。蒋介石给六位师长每人都回了一封回电，内容大同小异：“我对你们及部下士兵如兄弟子侄一般，我没有一刻忘记你们的艰困。但是，如不准备好，赴援部队会在途中被歼，希望你们艰苦卓绝，支持到底。”接着，蒋介石给郑洞国发来一封密电，命令他长期固守，叫他把长春市民的一切物资粮食完全收归公有，不再允许私人买卖，然后由政府计口授粮，按人分配。郑洞国找到市长尚传道。尚市长明确表示：“我不能办这件事，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不能保证市属人员不贪污和勒索，办的结果，一定骚扰不堪。如果您遵照电令一定要办，请您另派市长。我实在没有这个本事。”尚传道最后说，即使把全市的粮食都收上来，“横竖只能吃到七月底”。

郑洞国决定不按蒋介石的命令办，他自己推出了一个《战时长春粮食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准许市民留下能吃到九月的粮食，其余的粮食，一半卖给部队用作军粮，一半可以自由交易，但交易的时候必须按照政府制定的价格，哄抬粮价者严惩。结果，粮食问题没有解决，投机倒把瞬间盛行，引起粮食价格一路飞涨。一斤高粱米的实际价格只有几元钱（东北流通券），但到三月价格就涨到千元。飞机空投的万元钞票已经不够用了，郑洞国不得不命令长春银行发行大额钞票，开始时每张价额一百万元，以后逐渐递增到五百万、一千万、三千万、五千万、一亿，最后是一亿五千万。一斤高粱米的价格，到了十月已达到两亿五千万至三亿的天文数字。

郑洞国不得不采用了"治乱世用重典"的方法来对付粮价上涨，到处抓不按政府制定的价格买卖粮食的人。但是，囤积和倒卖粮食的不是手中无粮的普通市民，而是守军中的上级军官、军需人员以及与他们勾结的不法粮商。郑洞国"下令枪毙了一名营私舞弊、倒卖军粮的军需官，以杀一儆百"。由于长春的物价比关内其他地区高出成百上千倍，于是，长春的国民党军政大员开始大量向北平、上海、长沙、昆明等地成百成千亿地汇款，这些钱在长春只能买到几斤、十几斤高粱米，可到了内地就可以换成几十两、上百两的黄金。当长春的生存岌岌可危之时，横财令国民党军政大员们顿时成为巨富。

随着气候一天比一天冷，长春的燃料也面临危机。国民党守军开始拆民房，砍市内的树木，甚至把马路上的柏油也挖起来当燃料了。郑洞国命令第六十军暂编五十二师出击，占领长春东郊强行开采煤矿，结果又被围城的东北野战军打了回来，战斗中两百多名官兵被打死，其中包括暂编五十二师三团团长彭让。

战争中的受难者首先是平民。

一九四八年五月至十月间，同时被困于长春的普通市民处境悲惨。郑洞国回忆说：“七月以来，市内已有饿殍出现，许多老百姓因粮食吃光或被军队搜光，只得靠吃树叶、草根度日，结果因身体极度虚弱而病死、饿死的人愈来愈多。有的人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倒下就死去了，尸首也无人安葬，后来街市上甚至出现了卖人肉的惨剧……大约在八月间，蒋介石在庐山上发来电令，让我将长春城内居民向城外疏散，以减轻守军压力。于是我下令开放南向沈阳、东向永吉两条路口，放老百姓出市区。但老百姓到解放军阵地前，要查明身份才能放行，致使大批拖家带口的市民麇集在南郊和东郊两军阵地之间的空隙地带，一时出不去，欲退又回不来，加上一些土匪趁机抢劫，弄得百姓惨状百出，终日苦号之声不绝，以后在这些地方饿死、病死的人无法计数……长春本是个美丽的城市，此时却满目疮痍，尸横遍地，成了一座活生生的人间地狱。”

为了减轻城内粮食的压力，同时也给东北野战军围城部队制造混乱，长春规定一个警察要赶出去八个人，一个保长要赶出去三户人家，成千上万饥饿的长春市民开始拥向城东和城南的封锁线，巨大的饥民流给东北野战军围城部队带来相当大的压力。同时，这也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如果把封锁线敞开，不但围城的效果会大大减弱，而且因为人流巨大无法甄别，国民党守军会随着饥民趁机而出；但是，又不能让真正的百姓饿死冻死。九月九日，林彪、罗荣桓致电毛泽东，详细报告了几个月的围城给长春守军带来的巨大打击：大部分守军官兵每天只能用四两大豆维持。最近两个月，长春守军逃出来投诚的日渐增多，目前已经达万人以上，其中正规部队的官兵占投诚总数的一半以上。长春城内由于粮食已绝，国民党当局散布谣言，大量饥民开始向我军的哨卡冲击。一开始我军采取阻拦的政策，结果导致大量饥民停留在敌我警戒线之间。因为被赶出来的饥民的身份证件以及财物都被国民党当局没收了，他们已无法返回，几天之内这个中间地带便饿死两千多人。为了饥民的生存，我军三天内收留了两万多

人，但顷刻之间，双方警戒线中间地带又被大量饥民塞满。经过反复地研究，在中央军委的指示下，十一日，东北野战军首长致电萧劲光、萧华、陈伯钧、唐天际、解方：

从即日起阻于市内、市外之长春难民，即应开始放行。凡愿出来者，一律准其通过。因长春民食早已用尽，如不放出，将使市民大批饿死。望你们依此作出计划，分批地但又是尽早的开放，做到于十天内放完。对出城之难民，应发动地方党及军队力量，尽一切可能组织救济，宣传慰问，对老弱走路无力者，帮助人力及马车的输送。第一步应就附近各县分批疏散安置，发动群众救济，使其出城后不再死去，或者少死，借以挽回影响，取得民心。混在难民中的特务，应予以清查扣留；敌方官兵则一律收容，送吉林解放团训练。中学二年以上学生、技术人员、专家等应努力争取来我区服务。以上开放难民出城，不是对长春敌人解围，围困敌人的工作，仍需继续，不得松懈。关于防止敌人利用秋收出城抢粮，及组织军民抢割抢收等，即照兵团指挥部的计划加紧进行，将执行情形望随时电告。

放行开始后，长春饥民蜂拥而出。为收容这些饥民，围城指挥所会同地方党政组织在前沿和后方设置了数十个收容所。鉴于不少饥民见了馒头拼命吃被胀死的教训，收容所规定一开始只能供应稀饭，然后再逐渐增加馒头。东北野战军围困长春期间，共向百姓发放救济粮四千多吨，食盐五万多斤，救济金六亿元。关于一九四八年夏秋，长春市民在围困中的死难数字，长期以来说法不一。根据有关数据统计，长春在伪满“定都”时人口六十万左右，抗战结束后减少到五十万。内战爆发后，地处战场的长春动荡不安，城内人口不断外流，一九四八年初的统计人口约为四十万，其中包括十万国民党守军和家眷。在东北野战军对长春尚未形成合围封锁之前，长春人口再次大量外流，普通市民从陆地上跑，地主官僚们乘飞机跑，长春市人口减少至三十万左右。这一数据与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全国解放战争史》中提供的“居民约三十万”的数据相吻合。自东北野战军采取放行政策之后，长春出城饥民约二十万，到长春解放时，长春市民统计人口约为“五六万人”。因此，国民党长春市长尚传道后来在回忆录中提供的数据应该有一定的可信度：“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

长春市民可以出城，但是城内的国民党守军度日如年。

进入八月，长春守军除了新七军新编三十八师和第六十军一八二师两支主力部队每天有几两高粱米和大豆之外，剩下的四个师只能发代替口粮的代粮金。由于无粮可买，发的钱只能买到一根黄瓜，于是只有熬菜汤喝。卫立煌尽最大努力向长春实施空投，空投的粮食总数约有五千多袋，够十万守军维持两个月，但是其中三分之一落在了城外，剩下的经过长官贪污倒卖之后，真正到士兵饭碗里的所剩无几。

饥饿的长春守军开始收到各种各样让他们心情异样的东西：《蒋军官兵投诚通行证》、《告东北国民党军书》、《告长春市民书》、《告滇军六十军官兵书》、《告困守蒋军官兵书》、《包围长春漫谈》等等。饿得两眼昏花的守军官兵没有心思了解解放军要“漫谈”什么，但是这些传单上的内容还是让他们夜晚辗转反侧。解放军向国民党军官兵指出了三条路：一、困到最后饿死病死，然后城破被歼；二、如果指望向沈阳突围，路上要经过许多解放区，东北野战军主力和广大的翻身农民正在等着歼灭你们；三、举行反蒋起义，走革命的光明之路，这样到了解放区可以分到土地，还可以工作和学习。在这些宣传单中，有一些被称为“慰问袋”的东西：一个布袋子，里面除了装宣传品外，还有一个馒头，或者一块烙饼以及其他零星的生活品。袋子送到前沿之后，让守军官兵自己过来拿，或者让老百姓送进去发给守军官兵。中秋节的时候，慰问袋里竟然还有月饼。在送给第六十军官兵的慰问袋里，包月饼的纸上写有这样一首诗：“中秋佳节月儿圆，抛下双亲在云南。投降起义归故里，弃暗投明好儿男。”

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长春四周的喊话声此起彼伏。白天还有长官监督，可是到了晚上，特别是后半夜，声音听得清清楚楚。解放军官兵通过自制的土喇叭“老乡”、“兄弟”地彻夜呼喊，甚至指名道姓地喊着某位军官或某位士兵的名字：“你们为谁卖命，死了又为谁？”“出

来吧，我们发路费让你回家！”“为什么云南部队和嫡系部队的生活待遇是两个样子？”“我们这里的肉包子管够！”

不断有国民党军官兵悄悄跑到解放军的前沿阵地上来。第六十军跑过来的最多，开始是零星的官兵，后来发展到集体投诚，跑过来的整班有五十七个，整排有十个，整连有三个。第六十军暂编二十一师一个团长的妻子和暂编五十二师师长李嵩弟弟的孩子跟随饥民跑了出来，解放军官兵很好地安置了他们，还让他们带着食品送进城去。李嵩的弟弟对哥哥说：“共产党军队很仁义！”

在第六十军里，最痛苦的是军长曾泽生。

长久地徘徊之后，曾军长打电话给他的两个师长，一八二师师长白肇学和暂编二十一师师长陇耀，请他们立即到军部来。

曾泽生说：“部队的前途、出路问题，我们过去已谈得很多，今夜请你们来，就是要商议决定如何办。”

陇耀师长性格直率，他已经察觉出了什么，所以痛快地表示：“商议什么，军长怎么决定就怎么办！”

白肇学性格沉稳，他表示要寻找个万全之策。

曾泽生将带领第六十军起义的想法说了出来。

这是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二日晚二十二时左右。

此时，东北野战军已经包围义县并开始了外围战斗，沈阳的卫立煌正在为是否将主力从沈阳派往锦州方向的旷野之中犹豫不决，锦州的范汉杰在大军压境之际打来的电报除了沮丧就是绝望。于是，无论对在围困中煎熬的长春国民党守军来说，还是对渴望解放长春这个东

北重要工业基地的共产党人来说，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就这样来临了。

长春城中寂静沉闷，路灯下哨兵的身影清冷孤寥。

陇耀立即表示拥护："我们六十军，这些年来受嫡系的气太多了，排挤、歧视、分割、装备坏、待遇低，送死打头阵，撤退当掩护，赏是他们领，过是我们背，这样的窝囊气，我早就受够了，我拥护起义！"

白肇学的表情极其痛苦，他最后建议：把部队拉出去，放下武器，官兵解甲归田。他说："我少年从戎，本想为国为民，御侮安邦。但是几十年来，我所看到的确是自相残杀。我不是铁石心肠，我的心伤透了。"

两个师长当即争论起来，焦点是：第六十军是否调转枪口对准蒋介石。争论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三时仍然没有统一意见。

两个小时后，心绪复杂的曾泽生去了白肇学的一八二师，看见白师长"满眼血丝"，仿佛在生一场大病，白师长告诉军长："从你那里回来后，一直睁着眼，想到天亮。"曾泽生说："肇学，我们滇军有过护法讨袁、拥护共和的光荣历史，那几次光荣的起义，一八二师的前身都曾参加过，你知道吗？"白师长悲愁地说："现在还提那些干什么。"曾泽生说："你看，今天的蒋介石比当年的袁世凯如何？"白肇学毫不犹豫地说："更坏！"曾泽生趁势进一步逼问："那你为什么不同意起义呢？"白肇学默默地望着曾泽生，突然，他抓住军长的手说："钧座，我赞成你！"

尽管蒋介石对滇军一直多有防范，但在东北战局岌岌可危的时刻，他对他的一个军长和两个师长秘密谋划起义之事竟然毫无所知

——温暖湿润的亚热带地区的云南人，与酷寒中的东北地区的战事纠缠在一起，是国共内战中一件令人感叹不已的往事。在一九四八年的冬天即将到来的时候，国民党军至少有两个军的数万云南官兵被困在东北战场上，一个是长春曾泽生的第六十军，另一个是锦州卢浚泉的第九十三军。

出生于云南永善的曾泽生，毕业于云南讲武学堂。抗战时期就在第六十军供职，从团长升至师长。抗战结束后，滇军被整编为两个军，即第九十三军和第六十军，曾泽生因廉洁自持的品行和治军有方的才干，战胜了包括"云南王"龙云的儿子在内的对手，升任第六十军军长。滇军与蒋介石的关系，自北伐起就一直处在貌合神离的状态中，滇军首领从来都警惕着蒋介石对云南的蚕食。抗战胜利后，一个消息令滇军官兵兴奋异常，重庆国民政府命令滇军部队进入越南接受日军投降。本来以为这是云南人的巨大殊荣，谁料正当滇军跋山涉水朝越南开进的时候，杜聿明奉蒋介石之命突然进入昆明，包围了"龙公馆"，并向留守云南的滇军发动了攻击。龙云被软禁在南京，已经进入越南的滇军奉命从那里直接去东北作战。龙云托人带话给曾泽生："蒋介石让滇军去打八路，一是不去，不能不去的时候也要留个心眼，保存好实力就不怕老蒋。"滇军官兵就是在这样的心情下开赴遥远而寒冷的东北的。

自从到达东北战场，第六十军永远被部署在第一线，不断地受到林彪部的打击，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屡屡见死不救。一九四六年五月，一八四师就是在孤守无望、等援无望的情况下在海城起义的。自那以后，蒋介石似乎察觉到了滇军内部存在巨大的反叛可能，为此，他曾派蒋经国专门对第六十军进行了一次慰问，还不断地给曾泽生发来称兄道弟的亲笔信。但是，这一切还是无法排遣云南人内心的痛苦。这种痛苦和对家乡的思念混杂在一起，令在东北作战的云南官兵没有一天不在想解脱的出路。

十月三日，因为等待援军无望，而再拖延下去，困守中的部队只有待毙。郑洞国遂命令“拼死向沈阳突围”。清晨，新七军新编三十八师开始向长春西郊突击，两个小时后部队被打了回来。第二天，郑洞国命令第六十军派出一个团，配合新编三十八师再次出击。新七军军长李鸿来到第六十军前沿指挥所，曾军长对李军长说：“突围，六十军是没有希望，你们还可以。”谁知李鸿也表示出前所未有的悲观：“五十六师，不行！连六十一师、三十八师都靠不住。现在是师长有师长的盘算，士兵有士兵的想法。简直是离心离德！现在圈在城里，还能这样守着；出去，也就散了！”尽管国民党军炮火依旧猛烈，但就是无法推进到东北野战军的封锁前沿，郑洞国这才意识到：“军心已彻底涣散，士兵们已不能也不肯卖力气打仗了。”

十日，蒋介石给郑洞国空投下紧急公函：“目前共军主力正在猛攻锦州，东北局势十分不利，长春的空投物资亦难维持。望吾弟接信后迅速率部经四平街以东地区向东南方向转进。行动之日派飞机掩护，沈阳方面也有部队在路上接应。”郑洞国立即通知两个军长前来商议。但是，新七军的李军长说他病了，而曾泽生坚决反对突围：“现在城外共军兵力雄厚，而我军是兵无斗志，根本突不出去……就是突出去，这七八百里地，中间没有一个国军，官兵又都腿脚浮肿，不要说打仗，就是光走路都成问题。”既然两位军长是这种态度，郑洞国只好把将领们的意见报告给蒋介石。

十五日，锦州失守的消息传来。

第二天，蒋介石派飞机空投下一封措辞严厉的“国防部代电”：

长春郑副司令洞国并转曾军长泽生李军长鸿：酉（十月）灰（十日）电手令计达，现匪各纵队均被我吸引于辽西方面，该部应遵令即行开始行动。现机油两缺，而后即令守军全成饿殍，亦无再有转进之机会。如再迟延，坐失机宜，致陷全盘战局于不利，该副总司令军长等即以违抗命令论罪，应受最严厉之军法制裁。中正删日（十五日）已来沈指挥，希知照。

不突围是死，突围也是死，横竖都是一死，不如落一个坚决执行命令的军人名声。郑洞国决定：十六日晚准备，十七日“四面出击”，十八日开始突围。

这是令曾泽生焦虑不安的一天。十四日，他已将与共产党方面联络的人派出，预定的返回时间是十五日，但是直到十六日中午还没有消息。而目前的局面是，第六十军必须在十八日前起义，否则就要跟随郑洞国突围。一旦长春近十万守军四面出击，混战不可避免，那时候就一切都不可挽回了，包括他自己的人生命运。坐立不安的曾泽生一直等到黄昏时分，派出去的联络人终于平安返回，带回的消息是：共产党方面接受第六十军起义。

曾泽生来到暂编二十一师，营以上军官都被召集起来，曾泽生在陈述了滇军被歧视和排挤的往事以及目前长春守军的困境后，问大家应该怎么办。有人说“军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但曾泽生坚持让大家发表看法：“这是关系全军官兵前途的大事情，应该大家考虑，以免将来有二话。”又有人说可以向沈阳突围，曾泽生说：“我们走不到沈阳，就会被消灭。”突然，一个军官喊：“咱们起义！”大家惊恐地回头看这个军官，又转回头看他们的军长，曾泽生等了一会儿，说：“这是可以走的一条路，我赞成这个意见，你们同意起义吗？”满屋子的军官齐声回答：“同意！”这时候，陇耀师长站起来说：“二十一师全师赞成起义，请钧座下命令！”曾泽生说：“立即向新七军布防。”

曾泽生接着去了一八二师，他对军官们说：“暂编二十一师已经决定起义了，我赞成他们，你们怎么办？”大家一致说：“起义！”曾泽生随即命令一八二师同时向新七军布防。他对白肇学师长说：“如果新七军想剿灭我们，就坚决和他们打！”

整个过程没有发生任何抗拒——这是一群在异乡饱受苦难的云南人。

第六十军中还有一个不是由云南人组成的暂编五十二师。曾泽生以开会为名把师长李嵩和三个团长叫到军部，云南士兵们的枪一下逼住了他们：“和我们一致行动，不然就先枪毙你们，然后剿灭全师！”李嵩用电话把副师长和副团长们都召来，他拉着副师长欧阳午的手说：“起义！起义！别拿脑袋开玩笑！”

但是，下午，欧阳午还是给郑洞国打了电话。郑洞国根本不相信这是事实，他知道暂编五十二师和其他两个来自滇军的师素有矛盾，因此认为这也许是第六十军内部发生了矛盾，暂编五十二师在故意夸大其词。郑洞国没有在意。然而半夜，新七军副军长史说跑来报告说，半个小时之前，军部附近突然遭到乱枪袭击，第六十军在与新七军的分界线以东加强了兵力，给他们打电话，总机说通往第六十军的电话线在三个小时前被拆除了。

如果第六十军起义，长春将有一半城区即刻被解放军占领，那么突不出去的新七军必定面临厄运。

十七日拂晓，郑洞国终于接通了第六十军的电话，第六十军新闻处长在电话里对郑洞国说：“曾军长命我转告您，六十军已决定光荣起义了。如果司令官赞成我们的主张，欢迎您和我们一同起义；如果您不赞成，我们也不勉强，就各行其是好了。”郑洞国要求与曾泽生通话，被拒绝了。但是，郑洞国特别记住了曾泽生转告的另一句话：“决不向您开第一枪。”

清晨，长春所有的军政要员都来到郑洞国这里，众人正在商议对策的时候，第六十军政工处长来了，送来曾泽生的一封亲笔信：

桂庭（郑洞国，字桂庭）司令官钧鉴：

长春被围，环境日趋艰苦，士兵饥寒交迫，人民死亡载道，内战之惨酷，目击伤心。今日时局，政府腐败无能，官僚之贪污横暴，史无前例，豪门资本凭借权势垄断经济，极尽压榨之能事，国民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此皆蒋介石政府祸国殃民之罪恶，有志之士莫不痛心

疾首。察军队为人民之武力，非为满足个人私欲之工具，理应救民于倒悬。今本军官兵一致同意，以军事行动，反对内战，打倒蒋氏政权，以图挽救国家于危亡，向人民赎罪，拔自身于泥淖。公乃长春军政首长，身系全城安危。为使长市军民不作无谓牺牲，长市地方不因战火而糜烂，望即反躬自省，断然起义，同襄义举，则国家甚幸，地方甚幸。竭诚奉达，敬候赐复。并祝戎绥。

曾泽生 敬启

郑洞国说："信我留下，就恕不作复了。请你回去转告曾军长，他要起义，请他自己考虑，要我和他一路，我不能干。"

这一天，曾泽生就国民党军第六十军起义向全国发出通电：

全国各团体、各报馆转各界同胞钧鉴：

蒋介石以权诈盗窃国柄，钳制民意，词严恫吓，假行宪之名，愚弄天下，对外不惜出卖国家民族，献媚于美帝国主义；对内不惜摧残国本，制造反人民战争。吾人经八年之艰苦抗战，创痛剧深，莫不希望和平，方冀产生民主政府，建设自由、平等之新中国。讵料蒋介石贪残险狠，倒行逆施，光复以还，变本加厉，时至今日，蒋区人民流离颠沛，水深火热，而蒋政府及其所属官吏之一起贪污腐化行为，会愈积极置国家民族之生死于不顾。吾人出关以来，举凡接收统治人员之贪污狼藉，东北同胞之流离失所，身经目击，为之疾首痛心。尤以今日之长春，死伤枕藉，饿殍载道，推源祸首，实由蒋家集团祸国殃民流毒所致。吾人至此，实已忍无可忍。为争取国家生存及人民生活，誓高举义旗，齐集毛泽东主席领导之下，参加人民阵线，拥护土地改革，与全国反蒋革命军民携手同心，打倒蒋介石，彻底肃清美蒋在中国的统治，建立独立、民主、和平、富强之新中国！明及履及，终始此心，在维鉴领。

长春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第一八二师师长白肇

学、暂编第二十一师师长陇耀及全体官兵同叩

十八日，郑洞国决定突围的时间到了，但没有任何部队执行这个命令。

沈阳方面派来掩护突围的飞机飞临长春上空，飞行员报告说看见大批部队正向城外走，请示如果是第六十军是否可以实施轰炸。郑洞国的回答是："算了吧。"

曾泽生的第六十军陆续出城，东北野战军接管了半个长春。

出城后的第六十军官兵远远就闻见了久违的饭香，解放军官兵已经为他们准备了白米饭和猪肉炖粉条——几个月后，原国民党军第六十军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曾泽生任军长。改编命令发布之后，全体官兵都换上了东北野战军崭新的黄色棉军装。

十九日，郑洞国接到新七军副军长史说和参谋长龙国钧的通报，说他们已经与解放军方面接洽，决定全军放下武器。郑洞国厉声骂道："龙国钧！你和史说随我做了几年事，我待你等不薄，今日为何要学张学良、杨虎城卖我求荣？"——新七军放下了武器，意味着整个长春将被东北野战军占领。

此时，在长春城内，国民党军的地盘，就只剩下郑洞国所在的那座孤零零的中央银行大楼了。

杜聿明代蒋介石发来电报，说将派直升机接郑洞国出长春，问市内还有没有可以降落的地点。郑洞国回电说："现在已来不及了，况亦不忍抛离部属而去，只有以死报命。"独自待在房间里的郑洞国想及自黄埔毕业后，参加国民革命军东征和北伐，参加古北口抗击日军的血战，参加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昆仑关会战，参加中国驻印军队反攻缅北战役，在亚热带崇山密林中艰苦鏖战十四个月，身为军事将领多年征战最终落得如此下场，不禁万念俱灰。二十日晚二十三时，他给蒋介石发出最后一封诀别电报：

十月十九日下午七时亲电谨呈，职率本部副参谋长杨友梅及司令部与特务团［两个营］全体官兵及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共约千人，固守央行，于十月十九日竟日激战，毙伤匪三百人，我伤亡官兵百余人。入夜转寂，但匪之小部队仍继续分组来接近，企图急袭，俱经击退。本晨迄午后五时，仅有零星战斗。薄暮以后，匪实行猛攻，乘其优势炮火，窜占我央行大楼以外数十步之野战工事。我外围守兵，均壮烈成仁。刻仅据守大楼以内，兵伤弹尽，士气虽旺，已无能为继。今夜恐难度过。缅怀受命艰危，只以德威不足，曾部突变，李军覆灭，大局无法挽回，致遗革命之羞，痛恨曷已。职当凛遵训诲，克尽军人天职，保全民族气

节，不辱钧命。唯国事多艰，深以未能继续追随左右，为钧座分忧，而竟革命大业为憾。时机迫促，谨电奉闻。职郑洞国十月二十日二十三时亲印。

二十一日凌晨，跟随郑洞国的副参谋长杨友梅等人事先与解放军达成协议：中央银行守军朝天开枪，做出猛烈抵抗的样子。枪声大作中，大楼里的郑洞国认为最后时刻已到，他穿好军装，平躺在床上，准备自杀，但发现手枪没有了。正在寻找的时候，几个卫士把他抱住，时任吉林省府秘书长的郑安凡跪在地上恳求他不要走绝路，副参谋长杨友梅接着走了进来，请郑洞国"下去主持大计"。郑洞国下到楼下，看见解放军官兵已经布满大楼前厅。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哈尔滨公报》：

于长春放下武器之蒋军第一兵团及新七军全体高级将领，近日已安抵解放区后方。其中主要者计有敌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兼吉林省政府主席、陆军中将郑洞国、第一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新七军军长李鸿、副军长史说、参谋长龙国钧，三十八师师长陈鸣人、副师长彭立克，五十六师师长张炳言、参谋长刘大名，六十一师师长郑士富、副师长宁伟等将校军官百余名。人民解放军为欢迎他们放下武器，特派员沿途妥加护送并予以优待，其家属与所有随从人员及全部行李财产均一路同行。他们一路上看见解放军纪律严明，群众庄稼丰收情景，均感到极其新颖，大部表示愿在解放区参观。昨日路经我第一兵团司令部时，一兵团各首长均先后予以接见，并于今日上午设宴招待郑洞国等。新七军军长李鸿，因正在患病，昨日以专车送往后方医院休养治疗。

一九五〇年，郑洞国去上海就医路过北京，当年围困长春的解放军将领萧劲光和萧华请他吃全聚德烤鸭，他们希望郑洞国出来"为人民做一些事情"，至于做什么、怎么做，完全尊重他个人的意愿。郑洞国后来回忆说："共产党人这种恢宏大度的胸襟，使我非常感动和钦佩。"在上海养病期间，他提出参加新中国建设的请求，经毛泽东主席亲自提议，郑洞国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不久，他接到毛泽东派人送来的请柬。毛泽东和郑洞国同为湖南人，他操着郑洞国熟悉的乡音与他谈天说地，并且亲手给他点燃了一支香烟。谈话间，郑洞国突然问了一句毛泽东不知该怎样回答的话："你的马列主义为什么学得这样好？"——郑洞国直到离世一直保存着一本一九四八年他刚到解放区

时得到的东北版的《毛泽东选集》，他认为毛泽东写得最好的文章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朗朗地笑了，最后他回答郑洞国："……拜人民为师，这就灵了，学马列主义也就容易学好……"

一九四八年，东北雪花飘落的时候，国民党军只剩下一个兵力空虚的沈阳以及在沈阳以北呼啸的寒风中进退两难的数十万官兵了。

# 第十一章 辽沈战役：死亡的开端

## 短暂的沉寂

即使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当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包围锦州的时候，国民党军从沈阳出动增援锦州的攻击路线，确实令人匪夷所思。整整五个军的浩荡人马，不是沿着铁路和公路直接向南，取最近的路线奔赴锦州，而是从沈阳向西朝着新立屯方向，乃至向北朝着与锦州相反的彰武方向出动了——这一古怪的选择，无论如何看不出其中有任何战略上的玄机，如果不是蒋介石在无奈之中对他的东北将领们作出了某种退让，还能有什么更合理的解释呢？

按照蒋介石的意图，廖耀湘兵团应沿北宁线向南，迅速抵达锦州，与塔山方向的增援部队形成对林彪的南北夹击。但是，卫立煌和廖耀湘都不愿意执行这一命令。争论甚久之后，廖耀湘提出向西绕道新立屯增援的方案。廖耀湘的真实意图与卫立煌十分接近：即使沈阳出兵增援，也要等到塔山方向的部队与锦州的范汉杰部队会合之后，才能接近锦州。不然，沈阳守军主力只要一出沈阳，"背辽河、新开河与饶阳河三条大水侧敌行动"，定会遭到林彪部主力的分割围歼，最终增援锦州不成，沈阳的主力也没了。廖耀湘对蒋介石振振有词地阐述道："在锦、葫两地军队未会合进抵大凌河沿线之前，沈阳西出的部队，在时间和空间上，不能够与东进部队直接协同。锦州共军居于内线，那他就可能集中全部主力先打破一翼，最大可能是先打破由沈阳西出的主力。因之，我认为沈阳主力应先集中于新民、彰武地区，完成一切准备，俟锦、葫两地军队会师之后，再东西对进，以夹击共产党军队，才是万全之策。"

包括蒋介石在内，谁都能看出卫立煌和廖耀湘的私心：两人都不愿为锦州的范汉杰损失自己的力量，特别是兵出沈阳会有巨大危险的时候。贸然出兵，一旦失败，锦州未救，沈阳丢失，导致东北战局失利的巨大责任定会落在自己的脑袋上——廖耀湘坚持西出新立屯的意图是：如果锦州真的被林彪攻占，他还可以毫无危险地退回沈阳。蒋介石已经没有时间与东北的将领们纠缠从哪条路增援更为合理，他只需要卫立煌和廖耀湘立即向锦州方向出动。他考虑的不仅是将国民党军主力从沈阳撤出的问题，蒋介石决心"与东北的共产党军队进行决战"——"在撤退东北之前，一定要给东北共产党军队一个大打击，一定要来一次决战，否则华北就有问题。"

十月八日，廖耀湘兵团开始集结。

这是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区最豪华的兵团，几乎囊括了卫立煌的所有主力部队：新三军从沈阳出发，向西北方向的彰武攻击前进；新六军跟在新三军的后面；第四十九军跟在新六军的后面；第七十一军和骑兵第一旅从新民出发，向西南方向的黑山地区接近；新一军从辽中出发，目标是新立屯——新一军在抗战时期是闻名世界的远征军，郑洞国和孙立人都当过这个军的军长，现在的军长是潘裕昆。新一军自进入东北后，军作战部门不断给官兵放映各种战斗电影以强化战斗氛围；后勤部门也将随军医生、护士、教员和厨师集中起来办了训练班；政工处长汤道福是个恪尽职守的军官，为了提高官兵士气，他专门从沈阳招募了一批"女政工队员"，在将有点姿色的介绍给军主要长官之后，他在沈阳南昌街五号办起一个"军官之家"，"经常邀约各级部队长由前方来到这里吃喝嫖赌"。新一军代理参谋长陈时杰后来这样描述道："在廖耀湘带领着我们出动，特别是我们发现前进的方向，好像不是朝着那个倒霉的锦州的时候，各级部队长们很乐意回味那些愉快的时光。"

毛泽东对廖耀湘兵团如此兴师动众的增援行动表示出极大的蔑视，他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该部署表示极怕我攻锦打援战法，采取逐步推进、看势行事的谨慎方针。因此你们不要顾虑该敌难于阻止，大约九个师左右即够阻止该敌。"

东北野战军的阻击部署是：在彰武以东和东南地区，野战军第五、第六（欠十七师）纵队，节节防御，诱使廖耀湘兵团继续向西甚至向北；在新立屯以西，第十纵队以及配属该纵队的第一纵队三师和独立第二师阻止廖耀湘兵团向黑山、大虎山前进，使其不能靠近锦州。

林彪谨慎地在这个方向部署了十个师。

九日，五纵在司令员万毅、政治委员刘兴元、副司令员吴瑞林和副政治委员唐凯的率领下，在大雨中急行军，于清晨时分到达秀水河子、叶茂台、彰武以北地区，工事还没有修完，新六军新编二十二师和骑兵部队以及新三军五十四师就到了。五纵官兵立即迎战，十五师在叶茂台、十三师在彰武以北，战斗在双方之间来回拉锯，黄昏时分，十五师在付出极大的伤亡后，基本控制了叶茂台阵地。廖耀湘显然对占领彰武更感兴趣，因此，新三军向彰武地区的攻击十分猛烈。十三师三十八团一营的阻击阵地在战斗开始两个小时后失守，一营官兵撤到一个村庄里利用民房继续抗击。三营和二营在危急时刻两翼夹击收复了阵地。但是，新六军一六九师已经迂回到了三十八团的侧后，三十八团奉命撤退，彰武以北的阵地再次被国民党军占领。

晚上，为了诱使廖耀湘继续北进，林彪命令六纵在秀水河子西北、彰武东北地区集结，同时命令五纵撤到彰武的东南方向布防，只留下十四师担任彰武县城的防御。

十日清晨，锦州外围和塔山方向同时开始了激战，在锦州东北三百公里之外的彰武，廖耀湘兵团也开始了对县城的攻击。新一军五十师和新三军五十四师在十辆坦克、五架飞机的支援下联合作战，五纵十四师各团在彰武外围阵地顽强阻击，阵地防御战在交战双方武器和兵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残酷地进行着，突击与反突击、迂回与反迂回的拉锯战持续了八个小时。黄昏时分，五纵与当面的敌人形成对峙。

为了不刺激廖耀湘快速增援锦州，林彪决定把彰武县城让给廖耀湘。当晚，十四师撤到新开河的西岸。五纵官兵炸毁了河上唯一的一座水泥桥后，利用河西丘陵地带的有利地形，在通往锦州的各条公路两侧建起了更坚固的阻击阵地。同时，按照林彪的命令，六纵在彰武西北地区集结完毕。

放弃彰武带来的最大损失是：东北野战军南下大军的后勤补给线断了。毛泽东似乎并不在意这一点，他认为放弃彰武更为有利："只要不怕切断补给线，让敌进占彰武并非不利。目前数日你们可以不受沈阳援敌威胁，待锦州打得激烈时，彰武方面之敌回头援锦，他已失去时间。"虽然对补给线被切断有思想准备，但是，正在锦州酣战的东北野战军主力急需各种作战物资，特别是弹药的消耗量十分惊人。战后统计，整个辽沈战役期间，东北野战军仅枪弹损耗达六百九十七万四千发。供应的中断将对战局产生严重影响。当时，通辽地区是连接哈尔滨至锦州前线的运输枢纽，从哈尔滨运到前线的物资都要在通辽车站转运，当彰武被国民党军占领之后，只能另外开辟运输通道。林彪和罗荣桓要求中共东北局负责后勤的领导"要好好为党负责"。中共东北局当即指派辽吉省委书记陶铸、省政府主席阎宝航星夜赶到通辽，协同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副政委陈沂，全力打通运输线。最后决定：由内蒙古的甘旗卡，经库伦旗，进入辽宁的旧庙直到阜新，开辟出一条三百余里的通道；再由通辽经内蒙古的余粮堡、八仙筒、下洼，进入辽宁直到北票，开辟出一条长约六百余里的通道。成千上万的百姓赶

来帮助解放军修路，数百里的路途上昼夜尘土飞扬，可供汽车通行的道路奇迹般在最短的时间内建成了。

国民党军占领彰武后，南京立即播发了“国军进展神速，击溃共军主力，占领战略要点彰武，切断共军的后方补给线”的消息。廖耀湘认为，西进兵团占领彰武，他的任务到此为止。此时，他已经知道塔山方向没有进展，而锦州的外围已被突破。如果锦州都守不住，还拿什么对林彪的大军实施南北夹击？廖耀湘向卫立煌通报了自己的行动计划：“兵团主力暂时控制在彰武和新民之间新开河以东地区，以一部分兵力前出到新立屯、黑山地区。”卫立煌立即表示同意——这时候，廖耀湘已经为自己想好了一条后路：万一锦州失守，沈阳也守不住的时候，就把部队经过辽中撤往营口。

十二日，蒋介石派到沈阳的总统府参军罗泽闿到达彰武。廖耀湘特意带着罗泽闿看了在新开河上架设的浮桥，他告诉罗泽闿，这里的河岸全是流沙，过了河全是丘陵，这些都不利于部队机械化装备的行动，“无论进退都是一个大障碍”。之后，廖耀湘再次阐述了将兵团主力置于新开河以东的建议。卫立煌也认为，廖耀湘兵团主力控制在新开河以东是明智之举，如果渡河前进的话，万一锦州失守，部队将会陷入进退维谷的危险境地。但是，罗泽闿认为，这一部署与委员长的命令不符。罗泽闿一回沈阳就给蒋介石发报。晚上，蒋介石电令廖耀湘：星夜渡过新开河，进占新立屯，然后向锦州前进，“如再延误将以军法从事”。廖耀湘接到电报后心情沉重：“你们一定要这样做，一定要送掉兵团的主力，那我也不能再负责任，就由你们去吧！”

十四日清晨，廖耀湘下达了全军渡过新开河的命令：新三军的十四、五十四师和暂编五十九师渡河后向新立屯开进；新一军自己架设便桥，由东向西突击新立屯；新六军和第四十九军在新三军、新一军

的后面跟进，后卫部队最迟十六日全部渡河；第七十一军和二〇七师三旅渡河后向黑山推进；第四十九军以一个师在彰武担任侧后掩护。

廖耀湘知道，兵团自渡过新开河后，就“再没有向沈阳后顾的余地”，除了一直冲到锦州城下，别无更好的出路。他只希望锦州的范汉杰能够多守几天，好让他的部队进占新立屯，然后越过阜新直逼义县。当然，由此立下巨大的战功也说不定。此刻，第七十一军先头部队的前锋到达黑山地区，这里距离锦州已经不远了，部队的顺利推进证明这一地区还没有林彪的主力，大军冲过黑山应该不是问题——廖耀湘得到的战报并不准确，第七十一军距离黑山还有六十里以上，距离锦州更有两百多里，官兵们正为总是把他们放在前锋的位置而满腹牢骚。

第七十一军是中央军嫡系部队，但不是廖耀湘的基本部队，军官大多是原军长陈明仁提拔起来的，大家总觉得跟着陈明仁军长不会吃亏，跟着廖耀湘就很难说了，因为在国民党军中，最高长官往往珍惜自己的基本部队，危急时刻惯于牺牲非基本部队。更重要的是，第七十一军现任军长向凤武和他的师长们都与廖耀湘结有宿怨。一九四六年攻打四平的时候，第七十一军八十七师暂归当时的新六军军长廖耀湘指挥，结果八十七师损失惨重，廖耀湘把责任全部推到师长黄炎身上，导致黄炎被蒋介石“撤职查办”，时任副军长的向凤武也受到“申斥”。现在，不但黄炎重新当上了八十七师师长，而且向凤武还当上了军长。可是，第七十一军又一次归廖耀湘指挥了，军官们普遍认为廖耀湘定会把他们当作替罪羊。为了以防万一，该军在出发前已经做了善后工作，包括把下级军官的家眷全部迁入沈阳，还有一小部分干脆迁往了关内。

东北野战军第五纵队边打边撤，廖耀湘兵团顺利地进占新立屯。

十六日十八时，锦州被东北野战军攻占。

对锦州战况不甚了解的廖耀湘，受到顺利进占新立屯的鼓舞，立即下令十七日继续向阜新推进——“当时我心里已经决定，不管十六日第七十一军是否能占领黑山，兵团主力十七日立即向阜新跃进，黑山交第七十一军继续攻击。”

十七日拂晓，廖耀湘接到暂编六十二师师长刘梓皋从塔山发来的电报，电报说：“锦州已被共军占领。”廖耀湘立即给沈阳的卫立煌打电话，要求“一切马上须重新考虑”！卫立煌也说：“很严重！应该好好考虑！”

在此之前，由于锦州的范汉杰是否能守得住，塔山方向的侯镜如兵团是否能够突破阻击到达锦州与范汉杰会合，一切都是未知数，因此廖耀湘并没有更长远的忧虑，唯一要想的是自己别推进得太快，至少要等侯镜如与范汉杰会合之后再说。现在，前面的锦州突然没有了，身后的沈阳也有了相当的距离，廖耀湘在这个瞬间感到了不知所措。

十月十五日下午，蒋介石又一次飞抵沈阳。无法得知他的座机是否飞越了锦州上空，他是否最后一次俯瞰了那座城市——那个时刻，锦州城内正在进行激烈的巷战，范汉杰已经逃往城外的旷野中。

接着，在蒋介石的要求下，杜聿明也到达沈阳。

杜聿明发现蒋介石的思路已不甚清晰。蒋介石说，他已经给锦州的范汉杰和长春的郑洞国都空投了信件，让他们能守就守，不能守就赶快突围。特别是长春的郑洞国，如果不赶快突围的话，沈阳就不能等他了。杜聿明虽不敢明言，但他认为锦州和长春，无论退与守，都关系到整个东北的总体战局，应该与卫立煌等东北将领们商议之后，再作决定。况且，目前两座城市的守军都已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郑洞国突围时被林彪歼灭，林彪定会掉头全力围攻沈阳，那时候东

北的局面将不可收拾。但当蒋介石追问他的意见时，杜聿明却敷衍地说："目前敌我情况未明，很难提出意见。"

蒋介石让杜聿明去廖耀湘那里了解情况。

与杜聿明一起乘火车赶往廖耀湘兵团部的，还有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和第二厅（情报厅）厅长侯腾。廖耀湘在新民火车站迎接了他们，然后一行人驱车去新立屯前线视察。这时，已经是十六日的下午，廖耀湘把他得到的关于锦州危急的消息透露给杜聿明，并表态说："如果范汉杰能守住锦州，飞机再能够及时空投补给，由塔山方向和我这个方向共同夹击前进，是可以成功的。"

显然，这样的表态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廖耀湘最后告诉杜聿明，他现在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立即停止刚刚下达的向阜新跃进的命令。

杜聿明立即从新民返回沈阳，到达时已是十六日深夜。

卫立煌的参谋长赵家骧向杜聿明通报了锦州守军被歼的消息，然后告诉他说委员长已经走了。

蒋介石从沈阳直飞葫芦岛，在那里大骂了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同时命令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立即收复锦州。然后，他飞回了北平。

十七日，是蒋介石混乱不堪的一天。他先从北平给卫立煌空投了两次手谕，前一个手谕的内容是："据空军侦察报告，窜锦州共军大批向北票、阜新撤退，令廖耀湘兵团迅速向黑山、大虎山、锦州攻击前进"；第二个手谕的内容是：设法增援长春，帮助郑洞国突围。不久，蒋介石就接到报告：卫立煌坚决反对廖耀湘继续推进，但他也没有命

令廖耀湘撤退——锦州已经失守，卫立煌认为廖耀湘兵团“再无西进必要”，应该迅速撤回，否则有被“包围消灭的危险”。但是慑于蒋介石必须收复锦州的命令，他又不敢独断下令廖耀湘兵团撤退。紧接着，长春郑洞国的电报也到了，说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已经宣布起义，新七军也放下了武器，此刻他正单枪匹马带领卫士孤守大楼，“殊死作战”，并准备“以死保命”。

第二天，蒋介石再飞沈阳。

到达沈阳后，蒋介石召集东北将领开会，强硬地命令卫立煌和廖耀湘继续向锦州攻击前进：“协同葫芦岛、锦西间已集中的部队，一举收复锦州。”卫立煌坚持不表态，无论蒋介石如何催问，他都是左右躲闪，含糊其辞。蒋介石又让杜聿明表态，杜聿明说应该先研究一下是否能够收复锦州。赵家骧摊开地图，详细介绍了当前林彪部的兵力分布情况，最后的结论是：林彪的总兵力“超过我军近两倍，而且无后顾之虞，可集中力量同我决战。我军既要保沈阳，又要收复锦州”，目前部队处在南北两线分路推进，有被林彪各个击破的危险。所以，继续攻击锦州的计划要慎重考虑。这一分析显然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蒋介石又让身边的罗泽闿表态，罗泽闿愿意按照蒋介石的旨意办事，他说委员长的看法是对的，我们的空军和炮兵都具有优势，定可南北夹击一举收复锦州。

此时，蒋介石已经决定放弃东北，他的目标是：“将东北各精锐部队撤回江南，保卫南京。”而从东北撤退有两条路，即经锦州从陆路撤退，或经营口从海路撤退。蒋介石极力主张收复锦州从陆路撤退是基于以下考虑：首先，林彪的主力部队因攻击锦州损失巨大，国防部的统计数字是“毙伤匪六万以上”。因此，蒋介石认为，林彪的主力部队非经一个月的休整不能再战，而廖耀湘的新一军和新六军都是颇具作战实力的部队，再加上空军和优势炮兵的支援，一举击退锦州的共产

党军队应该没有问题。其次，林彪的主力打下锦州之后，有向锦州四郊转移的迹象，这说明锦州城内不会有多少共军了。再者，如果从海上撤退，由于运输力量不足，庞大的部队难以全部安全撤出。只有全力打通锦州的陆路通道向华北撤退，才是最快捷有效的办法——蒋介石的想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如果从海上撤出东北地区如此庞大的部队，运力不足姑且不说，没到海边就将会遭到东北野战军的分割围歼；即使到了海边，因为要等待船只，大量部队麇集海滩，一旦遭到攻击，岂不要被赶下海去?

只有把已关闭的“大门”重新打开。

但是，会议没有按照蒋介石的意愿达成任何决定。

心情恶劣的蒋介石当晚飞回北平去了。

蒋介石不知道，廖耀湘不但没有向锦州继续推进的想法，而且根据自己的计划已经准备带领整个兵团向营口撤退。廖耀湘经过反复陈述，终于得到杜聿明的勉强首肯，杜聿明附加的条件是：退到营口地区后，经盘山、沟帮子向北打，与侯镜如的东进兵团会合。

廖耀湘立即部署向黑山发动攻击。

廖耀湘的部队从彰武、新立屯、新民向南，无论是去营口还是去锦州，都必须经过黑山——“我当时认为准备行动中，最急要的一着，是先攻占黑山。因为无论向哪个方向行动，出营口、退沈阳或继续向锦州进兵，都以先攻占黑山为有利。”在命令第七十一军全力攻占黑山的同时，廖耀湘把自己的计划向他的心腹将领新一军军长潘裕昆、新三军军长龙天武、新六军军长李涛透露了：“必须立即行动或采取预备行动，在必要时独断专行，尤其而后战况千变万化，不可能也不可以

等待蒋介石每每不合时机的指示。”廖耀湘的决心是：“只要能救出兵团主力，我就决定干，个人的罪责，出去以后再说。”

应该说，一九四八年十月下旬，东北野战军占领锦州和长春后，在国民党军的东北将领中，头脑还算清晰的就是这个廖耀湘。作为在一线直接指挥部队的将领，他更多关心的是官兵们的出路——就东北战局未来发展而言，如果廖耀湘的建议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廖耀湘兵团能够迅速移动到营口，而不是整整五天原地不动，整个战役的走向将是另外一个样子。

十八日晚，廖耀湘一切准备完毕，他打电话给卫立煌，报告明天拂晓进攻黑山。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卫立煌犹豫了，他说明天蒋介石要在北平召集会议，还是等他从北平回来之后再作决定。

廖耀湘不知道，他的等待是致命的。

从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七日开始，东北战场上的态势微妙而复杂，国共双方的主力部队近百万人，聚集在辽东那片相对狭窄的地域内，相互的距离很近，彼此的位置没有多少秘密可言，各自的调动也很难隐蔽进行。国民党军方面，大城市只剩下孤独的沈阳，据守已经失去意义，但主力部队依旧有数十万之众，装备精良，能够得到空军的支援。且这些部队大部分已处在运动战状态，随时可以机动。就撤离东北的最终目的而言，夺路而出的可能性不但存在，而且只要调动合理，运动迅速，在锦州附近与东北野战军进行决战的机会是存在的。而在东北野战军一方，攻占锦州之后，死守既不是明智之举，也不是战略目的。虽然东北的“大门”已经关闭，但攻打锦州的主力部队仍处在两面受敌的态势中，沈阳和长春仍在敌手，海岸港口也在敌人的控制中。因此，无论是选择葫芦岛方向的侯镜如兵团，还是选择新立屯方向的廖耀湘兵团，都必须迅速调动部队实施大规模的战略围歼，在

国民党军还没有来得及机动之前对其进行持续不断的打击。这也是毛泽东“关门打狗”的战略设想的要义。

在双方都存在战机的情况下，战机很可能稍纵即逝。

任何一方的犹豫不决，都将导致彻底的被动。

国共双方的决策层开始了紧张的磋商，这是战争智慧与政治意志的空前较量。

早在部署攻击锦州作战的时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就提出了“先攻锦州再打锦西”。那时，他们并没有把持续攻击的目标，定在从沈阳出来的廖耀湘兵团上，而是选择了葫芦岛、锦西方向的国民党军增援部队。因为，打下锦州之后，主力部队距离锦西很近便于调动，而且锦西的国民党军相比廖耀湘兵团数量不大。这一战役设想一直持续到东北野战军主力攻克锦州之后。

但是，毛泽东有一个巨大的担心，即此时国民党军可能从东北全面撤退。沈阳守军先接应出长春的郑洞国部，在锦州已被我军占领的情况下，走陆路撤入华北将很困难，那么由营口走海路撤退的可能性很大。营口港封冻的时间是十一月，那么，国民党军必须在十一月以前从海路撤退，否则就走不了了。之前，坚决主张先打锦州，就是为了关闭“大门”，不让东北的国民党军撤入关内；现在，如果蒋介石从海上撤退的计划得以实现，不但原来设想的战役目标没有完满达成，而且一旦东北的国民党军主力撤入华北和中原，势必严重影响已经启动的淮海战役的实施。从这个意义上讲，迅速打下锦西和葫芦岛，继而封闭营口港，不但可以寻歼东北国民党军主力，更是彻底关闭东北“大门”的战略设想的延续。

但是，十七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在给军委的电报中，认为不宜对锦西立即发动攻击，而应先集中力量解决长春突围之敌。理由是：锦西方向的敌人不敢单独向锦州靠近，必等廖耀湘到达相当位置之后才可能前进；而留着锦西之敌不打，就可以一直诱使廖耀湘兵团继续南下，使他们距离沈阳更远。如果廖耀湘坚持不动，就向锦西之敌佯攻，目的还是诱使廖耀湘大胆前进，一直把他引到大虎山、沟帮子、锦州一线，再将其分割围歼。而在这期间，先把长春解决了。

当天傍晚，毛泽东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和谭政，提出："先打锦西，后打葫芦岛，争取十一月前完成夺取锦、葫任务。"毛泽东的分析是：如果开始攻击锦西和葫芦岛，廖耀湘兵团就有可能增援，于是就不能在十一月港口未封冻前从营口撤退。只要廖耀湘兵团不撤，打完锦西和葫芦岛之后，再回头慢慢将其吃掉。当然，如果蒋介石不顾一切要将主力从陆路撤退，显然更应该迅速攻占锦西、葫芦岛、山海关、唐山一线。毛泽东最关心的是时间，他询问林彪："锦州作战我军伤亡及缴获情形，你们觉得打锦、葫有何困难，仅休整十五天能否作战，均望告。"之后，毛泽东又补充道："如你们能于两星期内，完成休整及攻锦、葫的准备工作，于长（长春）、沈（沈阳）刚刚会合之际，即发起攻锦、葫，必出蒋、卫意料之外，若你们能以十五天左右时间攻克锦西，则沈阳增援必难赶到。"

十八日，长春守军第六十军起义之事已经明朗，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立即致电中央军委，告知部队已经开始进行攻击锦西和葫芦岛的侦察与准备。中央军委回电，再次强调了迅速派出部队置于沈阳与营口之间的重要性：

我们所最担心的是沈敌从营口撤退向华中增援。据悉蒋介石在天津征集五万吨轮船，似是准备十一月从营口撤兵……假如蒋、卫利用你们打锦、葫的时机，迅速全军退至营口据守，利用海道运粮接济，然后逐步运向津榆（天津至山海关）或华中，则有使你们无法阻止之虞。我们不知道你们部队是否可以利用蒋、卫踌躇不决之时，很迅速地攻下锦、葫，然后迅速以主力回围沈阳。即使如此，攻锦、葫总需相当时间，而营口方面全无守备。因此，提

议在日内长春解决后（第六十军起义）除留几个独立师监视郑洞国及新七军［假定该部反正的话］外，攻长各纵及几个独立师应迅速全部南下位于沈阳、营口之间。时间应在十一月上旬，过迟则无保障。并须以一个纵队控制营口，构筑坚守阵地，阻绝海上与陆地的联系，使蒋、卫不敢走营口。即使他们走营口，我可先行抗击，以待主力到达聚歼……

十九日，战场态势出现了新的情况：由于廖耀湘命令第七十一军迅速占领黑山地区，而塔山方向的国民党军依旧在试图突破阻击线向锦州推进，这似乎说明蒋介石并没有将东北的国民党军从海路撤退的意图，而是仍然坚持着从东、西两面向锦州夹击的作战计划，于是，林彪有了新的战役设想：

……如沈阳之敌仍继续向锦州前进时，则等敌再前进一步后再向敌进攻；但有若干征候敌不再前进，或有向沈阳撤退转向营口撤退的象征时，则我军立即迅速包围彰武、新立屯两处敌人，以各个击破方法，将新一、新三、新六、七十一、四十九军全部歼灭，使之不能退回新民、沈阳和退至营口……

林彪的理由是：部队攻击锦西，须在没有任何遮蔽的海岸“与敌十二个师作战”，海岸的狭窄地带不利于部队展开，且敌人在那里已经筑有坚固工事，“战斗不能很快解决”。而如果这时候廖耀湘兵团趁机攻打锦州，则会使我军“既打不下锦西，又未能消灭向锦州前进的敌人，则对我不利”。

当天下午，中央军委回电，同意东北野战军改变先打锦西和葫芦岛的计划：“如果长春事件（第六十军起义）之后，蒋、卫仍不变更锦葫沈阳两路向你们寻战的方针，那就是很有利的，在此种情形下，你们采取诱敌深入打大歼灭战的方针甚为正确。”

此时，国民党军高层依旧在钩心斗角。应蒋介石之召，杜聿明和卫立煌同去北平，在飞机上他们达成一致，即共同抗拒蒋介石收复锦州的计划，迅速将廖耀湘兵团撤回到新民地区，等部队准备好之后再说收复锦州之事。杜聿明提醒卫立煌，如果蒋介石提出从东北撤退，

只能从营口采取海路撤出，绝不能通过锦州从陆路往外冲。卫立煌对此有些犹豫，说等见到蒋介石再说吧。两人在午饭前到达北平。

下午，会议在蒋介石下榻的东城圆恩寺行邸举行。这又是一个争吵不休的会议。卫立煌坚持固守沈阳，蒋介石坚持收复锦州，两个人的对立令会场上弥漫着焦灼不安的气氛。当杜聿明表示他也倾向于卫立煌的意见时，数天以来，被东北战局弄得身心疲惫的蒋介石突然发怒了，但是他的话却令与会者颇感意外：

> 马歇尔害了我们的国家！原来在抗战结束后，我决定军队进到锦州后再不向前推进。以后马歇尔一定要接收东北，把我们所有的精锐部队都调到了东北，弄得现在连守南京的部队也没有了，真害死人！

杜聿明了解蒋介石，他知道蒋介石已决心放弃东北，但为了顾全个人的声誉、国际的影响和国内的政治压力，他绝不会让放弃东北的命令从他的嘴里说出来，他需要部下把这个建议提出来，然后他做出勉强批准的样子，以防今后万一出现什么问题，有人来为他背负这个历史责任。于是，杜聿明提出两个方案：一是东北的国民党军全部从营口撤退；二是以营口为后方基地，向黑山、大虎山攻击前进，如果攻击成功就收复锦州，如果不成就经黑山地区向营口方向撤退。显然，第二方案基本符合蒋介石的意图。但是，卫立煌一直闭口不言。而傅作义在蒋介石的逼问下不得不表态时，却说了一句含义深刻的话："这是两条心。"

会议进行到傍晚十八时仍没结果，由于傅作义要请卫立煌和杜聿明吃饭，蒋介石只好宣布"吃了饭再来开会"。

晚饭之后，杜聿明说他"腰疼坐不住，不能去开会了"。

傅作义和卫立煌也表示不去开会了。

傅作义询问卫立煌："听蒋先生今天的言谈，沈阳没救了，我们华北该怎么办？"卫立煌沉默良久，对傅作义说出了肺腑之言："廖兵团一完，按共军过去的作风，两个月内可以消化完毕，那时林彪就会增加到百万大军。因此，你绝不可守城。国共问题是可望用政治来解决的。蒋的政权是否存在，只是少数人的生死存亡问题，不是中国人的生死存亡问题。"卫立煌的话震动了傅作义——整整二十年后，当重病在身的卫立煌躺在北京的医院里，医生禁止一切来访时，只有傅作义在卫立煌的坚持下进入了他的病房。傅作义对卫立煌说："过去那么大的困难都过来了，这点病算什么。"卫立煌用微弱的声音回答傅作义："这次你帮不上忙了。"——当年的那个晚上，卫立煌临走时，傅作义对他说自己绝不会让北平古都遭到破坏。

蒋介石一直在圆恩寺行邸中等着，最终谁也没来。

杜聿明觉得自己在这里完全是自蹈泥潭，东北的战局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而眼下徐州方面已经十分紧张，于是决定明天一早向蒋介石提出立即回徐州。

杜聿明没有想到，深夜，总统府参军罗泽闿来了。罗泽闿直截了当地说："老头子要你到东北去接替卫立煌，要我来征求你的意见。"杜聿明非常干脆地回答："我有病不能去。"接着，两个人开始了冗长的谈话。罗泽闿反复给杜聿明戴高帽子，说老头子认为只有你才能挽救东北，特别是在卫立煌和东北的将领们都不听指挥的时候，老头子希望你能为他为国家分担责任。杜聿明坚持说，卫立煌有才能，完全可以处理好东北的战局。他还特别强调了自己负责的徐州方面的危机："现在徐州的部队都沿铁路线摆着"，"万一共军发动攻势"将败得一塌糊涂。东北已经这般模样，谁也不能撒豆成兵，现在主要的是徐州，万一徐州出了事，别说南京危急，连半壁江山都可能没了。至于东北，老头子应该赶快决断，能守就让卫立煌守，不能守就赶快从营

口撤退，免得被林彪一口一口地吃掉。谈话持续到凌晨二时，罗泽闿最后问：“那么老头子的命令下来你怎么办？”杜聿明说：“就是下命令我也不去。”罗泽闿走了。

两个小时后，二十日凌晨四时，中央军委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发去一封在解放战争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电报。共产党高层迅速统一意见，制定出合乎实际的决策，显示其拥有赢得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上下一致，官兵一心。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再次强调了对国民党军从营口撤退的巨大担忧——事实证明，当规模巨大的辽沈战役即将结束的时候，毛泽东的担忧部分地变成了现实——这封重要的电报，其意义在于共产党人已经下定决心全歼国民党军廖耀湘兵团：

（一）你们行动方针已有电示，即不打锦、葫而打廖耀湘。我们完全同意你们建议，如廖耀湘兵团继进，则等敌再进一步再进攻之。一经发觉敌不再进或有退沈阳退营口的象征时，则立即包围彰武、新立屯两处敌人，以各个击破为方法，以全歼廖兵团为目的。望即本此方针即刻动手部署，鼓励全军达成任务。

（二）因敌有随时退至营口可能，望令十纵准备。一经发觉敌有退营口的象征，即兼程开营口守备。

（三）高（高岗）、伍（伍修权）建议以十二纵及三个独立师由钟伟（第十二纵队司令员）指挥，由四平以北上车，赶于二十四日以前全部运抵清源，以急行军开至鞍山、海城，堵塞敌向营口退路。此计划甚为必要，请即电高、伍照此速办，愈快愈好。唯十纵仍须准备从打虎山（大虎山）开营口，以占先机。当然，十纵目前可在打虎山不动，待敌有退营口征候时迅开营口。

（四）高、伍又建议以其余各独立师及二线兵团，由萧（萧劲光）、萧（萧华）指挥，向法库、彰武、新民急进，配合锦州主力歼敌，我们认为这也是完全必要的。惟第一，以十二纵及三个独立师共六个师开鞍山、海城是否足够，如敌全力退营口，我六个师恐难抵御，是否应该加一二个独立师于营口方面。第二，去彰武、新民与敌接触的时机，不可过迟，也不可过早，似宜适时隐蔽开至法库以北，待你们主力业已发起攻击，抓住了廖耀湘时，突然断敌向沈阳退路为宜。以上两点请酌复高、伍。

（五）蒋介石十五日到沈阳时，即携杜聿明同来，是帮助卫立煌指挥撤退的。外国通讯社十八日讯，蒋介石又到沈阳。目前数日是敌决策时机。撤退是十五日就决定了的，如何撤退则或许昨、今两日已经决定，或者尚待决定，并且决定之后又可改变。望你们密切注视这数日的动态，不失时机，争取大胜。

林彪立即构想出一个规模巨大的歼灭战蓝图：东北野战军主力迅速北上，在黑山、大虎山地区阻截廖耀湘兵团，不让他继续南进再占锦州；同时在黑山的东北方向，把廖耀湘向沈阳撤退的后路完全堵死。由此，对廖耀湘兵团形成一个巨大的合围圈，死打硬拼，最后将其完全歼灭。

二十日早上六时，彻夜难眠的杜聿明站在了蒋介石行邸的大厅里。这是杜聿明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他不愿意去东北，但他又是蒋介石的门生，从黄埔毕业后就一直追随蒋介石，直至成为国民党军中级别甚高的将领，他不愿意有违蒋介石的意志。杜聿明在大厅里站了一会儿，看见罗泽闿从楼上下来，罗泽闿对杜聿明说："老头子要你去。"

杜聿明与蒋介石的谈话进行得十分艰难。杜聿明说徐州形势很紧张，蒋介石说现在东北最为重要；杜聿明说现在东北士气不振，员额不全，需要整补才能打仗，蒋介石说有空军和火炮的优势就可以打。当站在一旁的罗泽闿再次附和蒋介石的时候，杜聿明终于找到了发泄的对象，他对这个"一步登天的小鬼"讲了一个古老的故事：当年秦王伐楚时，曾问李信和王翦需要多少兵力，李信年轻气壮，说只需要二十万，老成的王翦说至少需要六十万，秦王当即就把王翦撤了职，结果李信大败而归。杜聿明讲完才说，既然罗参军有这样的高见，请校长让罗参军去给卫立煌当参谋长，这样既不需要改变指挥机构，还可以达到速战速决的效果。罗泽闿一听，吓坏了，忙说："不能去，不能去。"杜聿明问蒋介石"收复锦州有几分把握"，蒋介石说"六成把握总是有"。这令杜聿明十分吃惊，六成把握就敢决战，蒋介石不是急糊涂了就是老糊涂了。他不顾礼节反驳说："算到六成，只有失败，没有胜利。"蒋介石停顿了一会儿，说出一番话，还是关于美国人的：

> 锦州是我们东北的生命线。我这次来时，已经和美国顾问团商量好，只要我们保全锦州，美国就可以大量援助我们。现在应研究如何把锦州的敌人打退，将沈阳的主力移到锦

州，保全锦州，以后我们一切都有办法。

如果杜聿明的回忆准确无误的话，便可以解释国民党军在东北被全歼的根本原因：如果廖耀湘兵团迅速从营口撤退，尽管毛泽东反复提醒和催促，但当时东北野战军还没能在营口方向形成阻击线，国民党军主力是有可能撤出东北的。但是，为了得到美国的援助，挽救军事和经济的困境，蒋介石只有屈服在美国人的旨意之下：美国不希望看到中国的东北全部被共产党人拥有，美国的军事影响至少需要维持在中国东北的“大门”附近，即占据锦州、葫芦岛、营口一线的海岸线和狭窄的辽西走廊咽喉部位，这样才能遏制苏联把中国的东北变成共产主义阵营的势力范围——美国顾问团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他们哪会考虑东北国民党军的处境?

最后，杜聿明再次陈述了他昨天提出的两个方案：决定撤退就要赶快撤，不撤就整补部队之后再打仗，而整补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至少需要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

蒋介石连说：“太久了！太久了！”

说到杜聿明上任东北的问题，杜聿明不敢说坚决不去，但提出必须补充兵员和装备的条件。蒋介石一听还需要他向东北增兵，再一次火了：“为什么共军能打游击，就地筹粮，而我们黄埔生不能做到？你们黄埔生都不服从我的命令，不照我的计划执行，懦怯畏敌，这样子我们要亡国灭种的！”杜聿明已被折磨得心力交瘁，他身不由己地说出了“我应该不计名利，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话。蒋介石立即表示：“既然你如此不计名利，去东北给卫立煌当副总司令吧，司令部设在葫芦岛。”杜聿明觉得自己无力推托，他对蒋介石说：“我认为徐州比较重要，如果校长认为葫芦岛重要的话，那就由您决定好了。”蒋介石想都没想就说：“葫芦岛重要，就这样决定，你去葫芦岛指挥。”——多年后，杜聿明回忆当时的心境时说：“算了吧，反正江山是他的，部队

是他的，他要丢就丢，要送就送。万一我坚持自己的意见，从营口撤退不下来，我就有杀头之罪。我作为他的部下，只好接受他的命令。”

二十日下午，杜聿明就任东北“剿总”副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的命令发布——国民党军在东北存在三年，由杜聿明开场，也即将由杜聿明结束。

这一天傍晚十八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签发了《全歼东北敌人的政治动员令》：

……我东北全部兵力将更大集中南线作战，兵力之雄厚为空前所未有，以此压倒优势的强大兵力，杀向居于极端劣势的敌人，是无往不胜的。各部在此形势下必须有连续打大胜仗的雄心，一口吃掉敌人七八个师至十数个师，一次俘虏敌人七八万至十数万。因为客观条件与我们主观力量允许我们这样做，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在锦州、长春已取得圆满与伟大的胜利，但我们绝不能满足这一胜利。应该乘胜扩张战果，不让敌人有喘息整理的机会。由于敌之退路已被我堵住，敌必拼死挣扎，企图逃脱其覆灭的命运，故战斗会是极其激烈的。我各部决不可轻敌，不可因为打了胜仗漫不在意，必须像锦州战斗一样，以勇猛果敢、前仆后继的精神，不怕困难、不怕疲劳的精神，争取大胜，争取全歼东北蒋匪军，解放沈阳，解放东北全境……

杜聿明和卫立煌一起返回沈阳。在飞机上，卫立煌明确表示：“我不同意就不参加意见，也不执行他的命令。”

无奈的杜聿明只好打电报让廖耀湘到沈阳开会。

心急如焚的廖耀湘立即从新立屯赶赴沈阳。

东北将领们的会议瞬间就变成了无休止的埋怨和泄愤，最后唯一达成的意见是：无论是从海路撤退，还是争取收复锦州，都得先把黑山攻下来。

深夜，廖耀湘返回新立屯。卫立煌和杜聿明彻夜难眠。杜聿明的担心是：如果廖耀湘兵团行动迅速，就有可能从营口撤退，否则“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卫立煌问：“那沈阳怎么办呢？”杜聿明的看法是：

“沈阳久守是无望的。”卫立煌马上说：“新立屯的后路一断，黑山再过不去，廖耀湘危险得很。咱们叫工兵到辽中架几座桥，万一廖退不到营口，也可以退到沈阳。”后来，杜聿明回忆道：“卫的意思还是尽可能巩固沈阳，而不愿廖兵团从营口撤退。当然，蒋介石的内心是决定放弃沈阳，但又不明确对卫指示，而要卫以周福成的第五十三军守沈阳，卫当然感到兵力太少，想把廖兵团拉回沈阳。”但“卫又迫于蒋介石”的严令，“不敢事先毅然决然将廖兵团撤回沈阳，想等到情势危急再令其撤回”——卫立煌不会想到，一旦情势真的危急了，廖耀湘也就没有任何退路了。国民党军高层的这种各有所私，断送了廖耀湘兵团整整五个军的兵力。

第二天，杜聿明飞往葫芦岛，他发布的命令是：自二十三日起，恢复由塔山向锦州的攻击。

二十一日那天，国共两军中各有一支部队接受了攻击命令：

廖耀湘兵团的第七十一军奉命以两个师为主力，由北向南包围黑山并攻击之，二〇七师三旅在兵团直属重炮团的掩护下，自胡家窝棚由东向西正面攻击黑山。

东北野战军第十纵队奉命指挥本纵队配属第一纵队三师、内蒙古骑兵一师，在南起大虎山铁桥、西至水淦宽二十五公里的弧形正面展开防御，死守黑山。

锦州战役之后，经过数天的沉寂，国共两军再次迎头而上。

尽管战局的演变将会千变万化，此时关于东北战场有一点是坚决而明确的：当东北的“大门”关闭之后，毛泽东要对数十万国民党军动手了。

# 血浸黑山

一九四七年八月里的一天，六纵副司令员梁兴初被一位参谋带到林彪的住处。盛夏时节的哈尔滨阳光灿烂，绿树的投影在俄式小楼斑驳的外墙上摇曳。梁兴初看见林彪正在屋里踱步，罗荣桓则安静地坐在一张桌子的后面。

梁兴初走到林彪面前，林彪抓起一把豆子塞给他——“今天我算是掉到豆囤里去了。”——梁兴初的早餐是一碗豆浆和一碟黄豆。

能在林彪面前偶尔开个玩笑，梁兴初是一个特例。他在红军时期曾是林彪指挥的红一军团侦察连长，一九三六年九月，当毛泽东率领陕甘支队走下岷山的时候，二十二岁的梁兴初换上国民党军中校军服混进哈达铺县城，为毛泽东带回来一大堆报纸杂志，使得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知道在陕北还存在着一块红色根据地，这使中国工农红军最终落脚在黄土高原上。现在，这个瘦瘦的江西人已成为作战勇猛、性格刚烈的纵队指挥员。

罗荣桓向梁兴初说了叫他来的原因：独立第一师在红军时期是湘赣红军独立师，又有三五九旅的老底子，这样一支老部队不能老是独立师，现在决定以这个师为骨干组建第十纵队，准备让你去当纵队副司令员。

梁兴初说话不客气：“宁做鸡头，不为牛后，要去十纵就当司令，不然就回一纵当一师师长。”——之前，任命梁兴初为一纵副司令员时，他要兼任一师师长；任命他到六纵当副司令员时，他要兼任十六师师长；现在他干脆要回一师去。

罗荣桓微笑着，林彪没有说话。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八日，东北野战军第十纵队正式组建，下辖二十八师（原独立第一师）、二十九师（原独立第三师）和三十师（原东满独立师），纵队机关由独立第一师的后方机关和东满吉敦军分区直属机关共同改编而成。纵队司令员梁兴初，政治委员周赤萍。

一年后，十月二十一日，林彪发给梁兴初和周赤萍的电报不足百字：

> 长春敌十万起义投降，锦州敌十万被歼，沈阳陷于孤立，有企图向锦州突围，与锦西北上之敌会合，妄想夺回关内。令你们即返黑山、大虎山，选择阵地，构筑工事，顽强死守，阻击敌人，掩护主力到达后，聚歼前进之敌。

第十纵队的指挥员们坐在指挥部的热炕上心情紧张。

黑山、大虎山地区犹如一处隘口，西面是医巫闾山脉，东面是大片的沼泽，中间布满丘陵，北宁铁路和公路蜿蜒其中，是沈阳通往锦州唯一的走廊，黑山和大虎山对峙在走廊两侧，如同两道大门，开则南北通达，闭则人车堵塞。十纵奉命在此阻击廖耀湘兵团的意义十分明显：把这一大团国民党军拖住，死死地封闭在这里，不让他们向沈阳撤退，也不让他们通过这里往营口撤退，等主力赶到并完成攻击部署后，把廖耀湘兵团一口吃掉。

即将在这里突围的，是国民党军的五个军，全部的美式装备，拥有飞机、大炮和坦克，他们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必然要拼个鱼死网破。而十纵除了轻武器和手榴弹之外，刚组建的三个山炮营并没有多少炮弹；加上配属过来的一纵三师和内蒙古骑兵一师，兵力还不到敌人的五分之一；且在这片丘陵中间，防御正面宽达二十五公里。情报显示，敌人的先头部队已进至距黑山六十公里的芳山镇，十纵官兵赶到阻击阵地后已没有多少时间构筑工事；这时候的东北天寒地冻，由于后勤补给线受到廖耀湘兵团的威胁，官兵们的棉衣还没有运到——十纵指挥员们感到压力巨大。

“要想打好这一仗，不咬咬牙是不行的。”梁兴初说，“现在，林、罗首长看着我们，各兄弟部队更在看着我们。打好了，不仅是标志着东北的全部解放，更重要的是蒋介石又一个‘十万主力军’被我们从他的军簿上一笔勾销；打坏了，十万大敌就将逃入关内，这对我们的整个解放战争又将意味着什么呢？那只能说，我们对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大家看，我们现在就站在这样严重的任务面前，我们对待自己，难道还能有其他第二个要求吗？没有了，要求只能是一个，那就是：只准打好，不准打坏！”政治委员周赤萍接着说：“在十万大敌面前，我们是处于劣势；但从整个战役来看，我们却处于优势。要我们十纵一口吃掉敌人，当然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们却能够咬住他们，狠狠地咬住他们，只要我们一口咬住不放，引来的必然是无数把钢刀锐箭，将敌人剁成血泥肉酱！这样，即使我们被扯掉了几颗牙齿，有什么值得吝惜；即使有些伤痛，有什么不能忍受！”

十纵指挥员会议结束时，已经是午夜，部队立即向指定地域开进。官兵们并不清楚他们将面临的是什么样的战斗，只知道这时候让十纵上去必有名堂，因为十纵在开原休整六个月以后，至今还没轮上他们打像样的大仗。由于身上还是单衣，官兵们都裹着毯子，因此他们戏称十纵是气死西北风的“毯子队”。夜行三十公里，接近了黑山，天色渐渐发白，官兵们看见黑山城外人声鼎沸，原来政治部和后勤部的同志们提前赶到，向当地的百姓们提出了帮助的请求。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大娘，举着一件破棉袄，希望能披在哪个战士的身上，大娘的儿子被国民党军拉去当差已经死了，此刻她举着的这件破棉袄就是她儿子平时穿的。梁兴初望着这个在黎明前刺骨的寒风中瑟瑟发抖的老人，心中一阵酸楚。

清晨七时，十纵各部队进入阵地。

二十八师守黑山地区，控制黑山县城。其八十三团守大白台子、牛屯和大边壕阵地，八十四团守黑山城北和城东的高家窝堡阵地，八十二团为师第二梯队，师炮兵阵地位于黑山城北高地，师指挥所位于城北高地上的天主教堂里。

二十九师守黑山县城以西地区。其八十五团守彦屯、小白台子、王母将屯阵地，八十六团守司屯、黄土坎、姜屯阵地，八十七团为师第二梯队。

三十师守大虎山地区。其八十九团守大虎山、万家、大边壕以北阵地，九十团守大虎山以南四台子、三台子、二台子以及铁路桥阵地，八十八团为师第二梯队。

内蒙古骑兵一师（欠三团）为纵队总预备队，担任主阵地前沿的警戒和掩护任务。

纵队炮兵团位于腰台子，纵队指挥部位于黑山城里。

部署完毕，各部队开始紧急修筑工事。

黑山一带，山不是黑色的，在清晨的光线下一片苍白。阵地上没有树木，连草都很少，尤其是城东的一〇一高地，全部由灰白色的岩石构成，根本无法挖掘工事和掩体。黑山附近的百姓扛着自家的门板、木料和麻袋倾家出动，老人们不断安慰着手忙脚乱的官兵："孩子，别慌，天塌下来我们替你们顶一半！"年轻人跑到铁路上拆铁轨、挖枕木，高声喊着号子往阵地上扛。很快，阵地上就修起了堑壕、射击掩体、指挥所、观察所和救护所等，每个火力点都铺设了一层钢轨、数层木板和一米厚的泥土，大虎山阵地前还挖出一条防坦克壕。一〇一高地由于岩石坚硬，修筑工事的进度很慢，官兵们与百姓商量之后，决定在石头上垒出工事来。往高地上运土的百姓排成长龙，老

人和孩子们用簸箕一点点地往上端，妇女们把自家的粮食口袋拿来装土。一夜之间，军民们生生地在一座石山上又堆起了一座山。这座由泥土堆积起来的工事，虽然并不那么坚固，但是在十纵官兵心中，这是一座最坚固的堡垒，他们吸着老乡递过来的旱烟袋开始擦枪。

就在十纵构筑阻击阵地的时候，廖耀湘命令第四十九军主力和骑兵第三旅向黑山地区接近，国民党军推进到半拉门地区时，遭到独立第二师的阻击。战斗进行了一天，虽然廖耀湘的炮火猛烈，第四十九军还是没能向前迈进一步。二十二日，廖耀湘命令新三军十四师继续向黑山攻击前进，十四师再次与独立第二师发生激战，仗打到天黑依旧没有任何成效。独立第二师完成阻击任务后，撤出了阵地。下午，廖耀湘改命新一军军长潘裕昆为总指挥，要求他二十三日必须占领黑山。

二十三日，潘裕昆下达的作战命令是：拂晓，新一军向黑山正面阵地发起攻击；第七十一军侧击黑山的左翼；二〇七师侧击黑山的右翼；骑兵团威胁共军的后方交通线；步兵事先利用夜晚接近攻击出发地；炮兵主力迅速占领射击阵地，拂晓前一小时进行炮火准备，炮弹使用量为五个基数。

但是，新一军新编三十师师长文小山对这个作战命令提出了异议。他提醒潘军长：“廖耀湘平时的指挥多损人利己，我们对此不能不有所顾忌。”文小山主张：第七十一军执行正面攻击黑山的任务，新一军可以承担“炮兵支援之副任务”。同时。他对林彪的部队特别善用游动炮兵感到担心，认为沿着公路两侧必定有“难以应付”的炮兵埋伏着。潘裕昆一听很有道理，立即打电报给廖耀湘，要求改变作战计划。廖耀湘在回电中口气严厉：“此系不计牺牲，务求攻占黑山走廊之命令，仍限即着手准备攻击部署。”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联名致电各纵队，要求官兵必须抱有“决一死战”的决心：

以下指示，请仔细阅读：

（一）沈阳、新民、彰武、新立屯之敌，正全部经打虎山（大虎山）、黑山向南总退却。

（二）我军决全力乘敌撤退中，与敌决一死战，以连续作战方法求得歼灭全部敌人。此战成功，则不仅能引起全国军事形势的大变，且必能引起全国政治形势之大变，促成蒋介石的迅速溃灭。我全体指战员须振奋百倍勇气与吃苦精神，参加此一光荣大决战，不怕伤亡，不怕疲劳，不怕遭受小的挫败，虽每个连队遭受最大伤亡［每个连即打散，或剩几个人，也不害怕］，但对全国革命说来，仍然是最值得的。

（三）争取此战完全胜利的基本条件有三：（1）在干部和战斗员中有充分之认识和动员。（2）各级干部每次攻击之前，均须走在部队前面，迅速侦察地形，指挥员勇敢积极的标志，是肯自动走在部队前面，亲自侦察地形和布置攻击准备，但并不是指随便暴露目标，或在部队冲锋时也跑在前面，这仅仅是个人勇敢，对战斗指挥无大益处。（3）须严戒……在未侦察地形状况，未等部队大部到齐，未将兵力、火力很好配备，未将敌人退路截断，及仓促地乱打乱冲。这次大战只要我各级干部严守准备好了再猛攻的原则，则必然横直打胜仗。这就是在接近敌人前，指挥员迅速侦察地形，选好主攻点，将最大部分之火力、兵力集中于该点附近，并采取纵深配备，然后先将敌人的重要建筑物以炮火实行破坏射击，待已大体破坏后，即以火力进行数分钟的压制射击，步兵即开始猛冲猛追，只要采取这种打法，则横直打胜仗。我们所担心就是怕部队不实行这个打法而将仗打坏。因此，你们必须将此电印发各级，各级均应开会研究此电，特别是战术办法必需使每个干部弄明白，因许多干部是新提升的，原有的干部也有许多还没有弄明白。

（四）敌在锦州、长春失败之后，实行退却之敌人士气甚低，且进至乡村后，每个乡村所容兵力有限，又无坚固工事，只要我军采取以上打法，则必然胜利。

二十三日天一亮，黑山前沿阵地枪炮声骤起。

继塔山阻击战之后，辽沈战场上又一场艰苦的阻击战，在这个寒冷的早晨开始了。

国民党军的炮火倾泻在黑山前沿阵地上。担任前沿警戒任务的内蒙古骑兵一师一团立即进入战斗准备。骑兵部队没有阵地防御作战经验，加上远道奔袭而来官兵疲劳，在阵地遭到重炮轰击的时候，部队

就已出现了伤亡。国民党军二〇七师三旅在作战飞机的掩护下蜂拥而上，其一部同时悄悄地迂回到主阵地的侧背，对骑兵一团形成了三面包围。敌人的逼近令残酷的白刃战随即开始，国民党军步兵的美式枪刺与解放军骑兵的马刀撞击交错，阵地上一片呐喊声和呻吟声。

在各连阵地都已出现危机的时候，骑兵一团团长平安负伤。在最前沿的二连阵地上，指导员图门和连长布和吉雅也先后负伤，二连的蒙古族汉子宁可战死也不后退，直至拼尽最后一个人。接近中午的时候，骑兵一团奉命转移至大虎山阵地，黑山前沿阵地即被二〇七师三旅攻占。

国民党军第七十一军九十一师二七二团的两个营，对尖山子前沿警戒阵地发动了攻击，在这个阵地上防御的是十纵二十八师八十二团二营七连。七连长田老保是土家族人，十三岁参加红军，经历过无数血战，但他依旧对国民党军攻击的凶猛程度感到吃惊。国民党军先从平缓的西坡往上攻击，在距离山顶五十米的地方被七连击退；接着又从山势陡峭的东坡强行攀爬，再次被七连打下去；最后，国民党军采取多路同时攻击的战术，在加强了炮火的支援力度后，一波接一波地连续发起冲锋，七连的阵地几次丢失又几次夺回，最后七连奉命放弃警戒阵地后撤。

中午时分，十纵突然发动猛烈反击，国民党军攻占的几个前沿据点马上丢失了。下午十五时，潘裕昆组织起第二轮攻势，五十分钟后再次受阻。太阳快落山了，潘裕昆将第七十一军全部投入到正面，发动了第三次攻势。在第七十一军九十一师的先头部队将要接近核心阵地的时候，十纵再次发动反击，九十一师官兵没有交锋就往回溃逃，以致引起其他攻击部队争相撤退。在暮色中观察战场的潘裕昆意识到，今天占领黑山的任务已经不可能完成了。

廖耀湘下令将九十一师师长戴海容就地枪毙——“后来戴趁机脱逃了”。戴师长“趁”的什么“机”，怎样逃脱的，不得而知。也许当他看见自己的部队在解放军的刺刀面前溃不成军时，他就意识到可能要掉脑袋了。廖耀湘枪毙他的命令还没有下达，他已经主动从战场上消失，并且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晚上二十时，梁兴初和周赤萍召集十纵师以上干部开会。梁兴初首先传达了两小时前林彪和罗荣桓发来的电报，电报说锦州方向的主力部队已隐蔽出发，预计三天之内到达黑山、大虎山战场，完成对廖耀湘兵团的包围。电报中的一句话令在场的干部们热血沸腾：“务使敌在我阵地前横尸遍野而不得前进，只要你们坚守三天，西逃之敌必遭全歼！”

午夜时分，二十八师侦察队送来一名他们捉到的“舌头”，这令梁兴初喜出望外。这是国民党军第七十一军八十七师师部的一名传令班长，班长的军装口袋里鼓鼓囊囊地装满了送往各团的作战命令——后来，八十七师上校参谋主任胡煅夫是这样记述他们的作战命令是如何到十纵手里的：“军部召集各师师长和参谋长开会，研究兵团部下达的作战命令和我军次日的战斗方案，决定仍以八十七师担任攻击。作战命令大约在当晚二十四时许付印完毕。在军部传令班长送命令给各部队的途中遇到解放军的埋伏部队，传令班长被俘，战斗命令被缴获。”上校参谋主任接着强调说：“此事发生后，引起极大的恐慌。”

从这些作战命令判断：明天，国民党军的攻击目标，主要集中在二十八师的正面防线上，目的是拼死打通黑山和大虎山走廊。梁兴初立即调整了防御部署，让二十八师抓紧时间加固工事，准备迎战。

此时，廖耀湘也在阅读二〇七师三旅送来的一份“共军文件”，这份文件是他们在战场上缴获的：“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固守大虎山阵地，俟后续主力部队的到达，将敌人包围歼灭之。”——面对交战对手

的这样一张阵地传单，廖耀湘恐慌的已不仅仅是作战命令的丢失了。廖耀湘判断，在黑山阻击的解放军，兵力已经得到加强，而且任务是死守，那么目的只能是一个：等待攻击锦州的主力到达战场。廖耀湘立即决定，不再等待攻下黑山，现在就向营口撤退。当他把自己的想法用电话报告给卫立煌时，卫立煌同意向营口撤退，他同时提醒廖耀湘："万不得已时，可退回沈阳。"

廖耀湘即刻下达了全军向营口撤退的命令：新六军明天拂晓强行通过黑山，新三军和第四十九军紧随其后，新一军和第七十一军负责掩护。廖耀湘给新一军军长潘裕昆下达的作战任务是：两天之内，不惜一切代价攻占黑山，以掩护整个兵团通过这条走廊——"能占领黑山更好，不能占领，则以猛烈攻击，阻止黑山守军之反击，以免截断或扰乱兵团主力之转移。"

夜幕降临，国民党军的精锐部队就要上来了，梁兴初对那个血战前的夜晚印象深刻："深夜，我站在黑山城南山头上，夜幕笼罩大地，越向北，越发漆黑一团。随着一阵令人沉闷的寂静之后，不时传来一阵急促的枪声和短暂的爆炸声，这正是我小股出击部队，在炸断敌人的冲锋要道，袭扰敌人的夜间调动。我好像看见那根无形的战斗导火线，正在嗞嗞作响地燃烧起来。明天，明天该是这些狂妄、愚蠢的敌人遭到狠狠痛击的第一天吧？"

二十四日拂晓，廖耀湘集中第七十一军、新一军和新六军以及二〇七师三旅，共六个师的兵力，在两百余门火炮和两百架次飞机的支持下，向黑山、大虎山发动全线攻击。第七十一军和新一军暂编二十二师向大虎山迂回攻击，二〇七师三旅和新六军一六九师的突击方向是黑山以东的高家窝堡一线。

战斗一开始，梁兴初就紧张起来。在黑山城北二十八师的正面防御线上，主阵地前山坡平缓，地势开阔，有公路和河道通往县城，便

于机械化部队运动，应该是敌人突击的理想方向，但是这里却没有动静。可是，城西的三十师师长方强报告，新六军的第一次攻击已被击退，发现敌人大部队有向西迂回的模样；城东的二十九师师长刘转连报告，第七十一军向白台子八十三团三营阵地实施了突击，但开始的时候仅仅投入了一个排的兵力，三营很快将其击退。现在，只有八十六团五连的阵地还处于激战状态。梁兴初顿时觉得不对劲，他立即上了二十八师指挥部。师长贺庆积报告说，敌人向高家窝堡一线的攻击很猛烈，第一次就投入了三个营的兵力，分别向一〇一高地、九十二号高地和石头山高地同时冲锋，尤其以对一〇一高地的攻击最为猛烈。贺师长话音未落，高家窝堡方向的爆炸声再次响起。梁兴初朝那个方向望去，只见一〇一高地、九十二号高地和石头山高地完全被烈火和硝烟所覆盖，天上的数架飞机在疯狂地盘旋轰炸，地面重炮也在实施密集轰击，几个高地上浓烟夹杂着火光令人心惊——梁兴初明白了，国民党军放弃了正面攻击，采取两侧迂回的战术，而且将攻击重点放在了一〇一高地附近的几个阵地上，因为一〇一高地靠近黑山县城，如果这一点被突破，整个黑山的防御体系将被割裂。梁兴初对贺庆积说："敌人躲开了咱们的刀锋，从侧翼攻击刀背，你要把刀尖给我翻转过来！"

贺师长说："你要相信我的二十八师！"

一〇一高地一线阵地，战前曾被视为侧翼掩护地域，因此兵力部署相对薄弱，只有八十四团二营防守。向这个方向攻击的是国民党军二〇七师三旅。廖耀湘毫不动摇地把这支作战凶猛的部队当做一把尖刀，从侧面朝着黑山防御线的核心部位猛插下去——从兵力上讲，二〇七师的规模相当于军，其下辖旅的规模相当于师。

在敌人猛烈的火力准备中，二营阵地上的工事全部被毁，尤其是一〇一高地，战前在石山上堆起的土山工事已成为一片废墟。二营官

兵从坍塌的工事中爬出来，一边抢救伤员，一边向冲上来的敌人进行反击。连队指挥员们不断地提醒战士：“走不近不打，瞄不准不打。”在敌人几乎拥上阵地的时候，二营官兵突然猛烈射击，然后跳起身迎敌而上。几个小时之后，二营的几个高地前敌尸累累。下午，敌人的轰炸再次开始。二〇七师得到了廖耀湘兵团几乎所有重炮的支援，成吨的钢铁炮弹倾泻在小小的阵地上，然后巨大的冲锋人流又开始向上涌。

首先是石头山阵地失守。这个阵地上只有二营的一个排，坚硬的石头阵地没有任何隐蔽之处，修筑的工事早已荡然无存，官兵们用机枪、步枪、石头连续击退敌人的三次突击。当阵地上只剩下四名战士的时候，二〇七师的第四次突击开始了。两小时之后，这个排的官兵全部阵亡。

接着就是九十二号高地失守。石头山阵地被攻占后，九十二号高地的侧翼暴露，致使二〇七师得以从西面和北面同时发动冲击。高地东侧的阻击阵地因为受到敌人正面炮火的猛烈轰击，无法对九十二号高地进行火力支援。防守这个高地的是二营四连。指导员刘宝珊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他对他的官兵们说：“同志们！显出我们的阶级本色吧！刺刀见血才是英雄好汉！”一排长李勇发决心一死，他把自己口袋里的一支钢笔和一些零用钱掏出来，交给刘宝珊作为他最后一次党费，然后他对指导员保证说，一排没有一个人是草包！李勇发的排里有个班在全师赫赫有名，这就是宁死不屈的“大功赵连才班”，李勇发决心让这面荣誉之旗染上自己光荣的鲜血。在即将冲往前沿的时候，李勇发朝着刘宝珊笑了一下，他说：“指导员！为我们感到高兴吧！”在短短的二十分钟之内，敌人连续发起三次突击，上百具尸体布满高地的前沿。一排的官兵前仆后继，耳边响彻着排长李勇发嘶哑的喊声：“打呀！林彪的投弹手们！狠狠地打他们呀！”敌人又调来一个营，在阵地下黑压压的，九十二号高地上，四连只剩下二十多人。猛

烈的炮弹又倾泻下来，炮火准确而缓慢地节节延伸，敌人跟在炮火的后面一点点地向上爬。四连还活着的官兵已没有子弹，阵地上的石头也扔光了。六连增援的两个班全部伤亡在半路上，最后时刻，团指挥所命令四连撤到一〇一高地上去。转移的时候，李勇发发现几名战士依旧在阵地上与蜂拥而上的敌人搏斗，他端着刺刀返身跳入敌群中。在厉声命令战士按照命令撤退的同时，李勇发被敌人团团包围。他的刺刀随着他的身体剧烈地旋转，敌人的美式枪刺在他的身体上插进去又拔出来，这个希望战友们为他高兴的勇敢的排长始终未倒。直到他刺倒了第五个敌人的时候，数粒子弹穿透了他的腹部和腰部。

九十二号高地失守后，一〇一高地完全孤立。

阳光穿透寒冷的空气照在这片颜色苍白的低矮丘陵上。

这是下午十四时左右，在二十九、三十师的防御正面，敌人不但有配合高家窝堡方向的企图，而且向西迂回的迹象十分明显。至此，南起大虎山铁桥，西至水淦，十纵全线进入激战状态。

占领九十二号高地后，二〇七师立即向一〇一高地发动猛攻。高地上所有的工事都已坍塌，六连大部伤亡，连同撤到这里的四连和营部通信班在内，阵地上只有二十多个官兵。在抗击了二〇七师的四次冲击后，大量的敌人从阵地的三面一齐冲上来，一〇一高地失守。

高家窝堡一线阵地的全部失守，使黑山城暴露在国民党军的攻击前面。

整个黑山阻击线因此岌岌可危。

二十八师师长贺庆积集中了所有的山炮，开始向一〇一高地实施猛烈轰击，同时命令预备队八十二团一营和三营，由八十四团团长蓝芹统一指挥，坚决恢复高家窝堡一线阵地。刚刚占领一〇一高地的国

民党军在光秃秃的石山上无法躲避猛烈的炮火，蓝芹团长指挥的反击部队不顾一切从三面冲了上来。前两次的冲锋，都因敌人的炮火封锁了冲击线没有成功。第三次，冲击发起后，一营一连长倪恩善被剧烈的爆炸震昏，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包扎所里，他跳了起来，朝正在冲锋的连队奔去，战士们看见连长不但没有光荣，而且还举着驳壳枪冲上来了，都跟在倪连长的后面拼死向上突。战士张连发第一个冲上一〇一高地，他扔出几颗手榴弹后，连续刺倒四名敌人，为后续部队打开了冲击道路。一连官兵都冲上去后，交战两军在狭小的高地顶端扭打在一起。半小时之后，占领一〇一高地的国民党军留下百余具尸体退了下去。二十八师乘势在各个方向进行局部反击，数支小部队直接插入国民党军当面的阵地：八十六团一营袭击了水淦，俘虏国民党军第七十一军八十七师的一个班；八十二团一连袭击了高家窝堡防线西北方向的十里岗。

新六军新编二十二师六十六团向大虎山迂回，他们占领了五台子阵地。接着，这个师在重炮的支援下，连续向三台子和四台子猛攻，并派出部队开始向纵深迂回。三十师八十八团三营跑步抢占了一个名叫青台泡的村庄，截住了正在迂回的国民党军，随即利用村庄里的民房和土围子进行阻击，致使新编二十二师六十六团伤亡五百多人后被迫退回。

主攻部队攻击受挫，令廖耀湘十分不安。就在黑山、大虎山一线阵地发生激战的时候，廖耀湘的主力部队正在缓慢地向前移动。下午，新六军军部和一六九师到达胡家窝棚附近，新编二十二师已经推进到大虎山附近，廖耀湘的兵团指挥部紧跟在新六军的后面。由于黑山、大虎山走廊依旧在东北野战军手中，廖耀湘命令新六军停止前进，转为向黑山、大虎山发动攻击，攻击部队由新六军军长李涛指挥，一六九师支援二〇七师，新编二十二师直接攻击大虎山。同时，

廖耀湘还命令第四十九军和新三军十四师为兵团先头部队，在新六军的掩护下强行前进，为整个兵团撤退开路。

黄昏时分，第四十九军推进到黑山东北通向沈阳的公路上。廖耀湘觉得一天的厮杀虽然没有多大进展，但部队已经全面撤行至走廊附近，他所在的胡家窝棚距黑山县城仅仅还有六公里，只要二十五日李涛指挥二〇七师三旅和新六军一六九师联合对黑山、大虎山实施突击，当面的共军定会无法支持而溃退，那时候整个兵团就可以一举突破这个倒霉的地方了。

夜幕降临，黑山、大虎山一带的战斗暂时停歇。

一整天的战斗，国民党军损失很大，其中二〇七师伤亡官兵千人以上。

十纵各师也出现较大的伤亡，仅在高家窝堡一线，伤亡官兵已达五百，其中二十八师八十四团二营基本上打光了。

晚上，十纵召开了作战会议。根据战场通报，锦州方向的主力正昼夜疾驰，明晚之前定会到达战场。而在廖耀湘兵团的后面，五纵和六纵正像赶鸭子一样在驱赶他们，今日黄昏已把廖耀湘赶到黑山和大虎山的跟前。廖耀湘明天必定拼死突击，十纵能否顶得住，明天是关键。但是，明天敌人的主要突击方向会在哪里？会不会因为今天在高家窝堡一线受挫，明天他们又回到正面来实施攻击？各位师长意见不一。梁兴初倾向于这样的判断：敌人在明知正面阵地防御工事坚固、防御兵力大的情况下，一般不会往刀尖上碰，今天他们躲开正面侧击高家窝堡就是证明。今天发生在一〇一高地上的反复争夺，定让敌人感觉这个方向的防御工事相对薄弱，地形也暴露出易攻难守的弱点，他们已经往这几个高地上打了上千发炮弹，他们不会让这种轰炸效果只起一天的作用，明天定会继续在这个方向上加大兵力，企图一举突

破后直接攻击黑山县城，彻底打开向南撤退的大门。梁兴初对他的师长们说："今天我们头上挨的是千磅炸弹，明天就是万磅炸弹。只要主力没有赶到，十纵的任务就没有完成，打光了也要打下去！"

为了加强一〇一高地的防守，纵队对防线进行了局部调整：三十师的防御地带向北延伸，以适当缩短二十八师的防御正面，二十九师集中力量防御城北。

深夜，贺庆积师长赶回二十八师后，提出加强一〇一高地防御的三条建议：一、连夜抢修工事，二、八十二团上去，三、在高家窝堡前沿开设师指挥所——"我是师的主要指挥员，我应该到第一线去指挥。"——最后一条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副师长说要上前沿也应该是我去，贺庆积火了："师长和副师长谁的职务高？谁官大就服从谁！"

这个夜晚，一〇一高地上人声嘈杂，十纵官兵和当地百姓一起，再次扛着铁轨、木料和泥土在这个被战火烧焦的石山上紧急加固工事。伤员们已经被转送下去，阵亡官兵的遗体已裹上百姓事先准备好的血被抬了下去。但是，充满血腥味的阵地上依旧随处可见残肢。十纵和二十八师的指挥员们上了阵地，送上来一些御寒的衣服，战士们可以识别出哪件衣服是从哪位首长身上脱下来的。当地百姓也筹集了不少棉衣和大衣送了上来，还有热水和食物。在一〇一高地旁边的九十二号高地上，贺师长的临时指挥所也在搭建。官兵们在夜色中看过去，心中弥漫起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明天恐怕要战死在这里，和自己的师长一起战死。

二十五日清晨，太阳还没有升起来，贺师长就到了九十二号高地，八十二团的鲁团长汇报了他的作战部署：二营守一〇一高地，三营控制附近的小高地和公路，一营担任预备队。

国民党军的攻击开始了。攻击重点果然是一〇一高地。廖耀湘命令所有的重炮集中火力进行轰击，天上的十几架飞机也投下了五百磅的重型炸弹，这种炸弹每一颗都能在石山上炸出一个巨大的石坑。一〇一高地顿时地动山摇，八十二团不但要对付敌人步兵的冲击，还要组织对空火力逼迫敌人的飞机不能低飞。新六军一六九师和二〇七师三旅在一个小时内，发动了三次全线攻击，第四次攻击时，一个连的兵力猛冲石头山阵地，八十二团二营的一个排与冲上山顶的国民党军混战在一起，敌人的重炮群突然对这个混战中的小高地进行轰炸，致使双方官兵全部伤亡，突然寂静下来的石头山高地被国民党军占领。与昨天一样，石头山阵地失守，对九十二号高地形成了巨大威胁，四个营的国民党军从两个方向向九十二号高地进行夹击。八十二团二营五连长和指导员先后阵亡，最后阵地上只剩下十名战士。在敌人大量拥上阵地的时候，十名战士全部战死，九十二号高地再次失守。在一〇一高地，国民党军在突击受阻后，对高地实施了报复性的狂轰滥炸，然后以每个波次两个营的规模，接连不断地发起冲击。八十二团二营四连和六连，在营长侯长禄的指挥下殊死抵抗，最后将阵地前的国民党军尸体堆起来作为掩体，等冲上来的敌人到达二十多米的距离时，四连和六连的官兵突然跃起射击，同时投掷大雨般的手榴弹和爆破筒。

时间已近中午，廖耀湘对他的整个撤退计划有了万分紧迫的感觉，他几乎把所有能投入的部队都派到了黑山、大虎山一线，这使各个阵地的战斗很快就进入混乱的白热化状态，以致无法辨别双方争夺的要点是在哪里。

八十二团的鲁团长和方政委都已负伤。

一〇一高地再次出现危机。在新六军军长李涛的督战下，攻击部队组织起一支大约三百人的“敢死队”。同时，尉级军官也组成了一支

“效忠党国突击队”，在两个团的配合下，“敢死队”和“效忠党国突击队”排成五六道人墙，开始轮番冲击一〇一高地。坚守在一〇一高地上的二营弹药耗尽，当阵地被突破之后，战斗瞬间演变成肉搏战。下午十五时左右，在二营全部伤亡的情况下，一〇一高地再次丢失。

整个黑山防御线危如累卵。

二十八师决心在天黑之前夺回一〇一高地。八十二团得到纵队从三十师八十九团抽调的一个营的增援。傍晚十八时，五个连的兵力对一〇一高地、九十二号高地和石头山阵地同时发起反击。夜幕降临前，丢失的阵地再回十纵之手。

连日的苦战中，一〇一高地旁边的下湾子村百姓冒死往高地上送饭，全村男女老少往返阵地达九百多人次，送上去的干粮达两千多斤。村子里的罗天瑞的大娘，在子弹的呼啸中多次往返高地，最后一次她被炮弹震昏，满脸是血地仰面躺在地上，战士们爬到跟前去救她，看见她在怀里死死抱着一口袋干粮。战后统计，下湾子村牺牲在一〇一高地上的百姓竟达四百多人。

死去的黑山百姓与东北野战军官兵葬在了一起。

天又黑了。

二十五日一整天的战斗，还是没能突破黑山、大虎山走廊，廖耀湘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首先，向营口撤退的路在大虎山以南已被完全截断。为整个兵团开路的第四十九军先头部队被不明番号的共军大部队包围，军长郑庭笈直到黄昏时才报告这一可怕的消息。虽然有新编二十二师浴血奋战的掩护，第四十九军不但没有向前突击开路，反而就此擅自停留在了大虎山附近。更严重的是，那个郑军长竟然直接向沈阳的卫立煌请示行动方向，而卫立煌竟然让第四十九军的两个

师、新六军的新编二十二师和新三军的十四师不再执行向营口撤退的预定计划，改道直接向沈阳撤退。其次，经黑山去沈阳的路也被截断了。新三军的一个师受到共军的袭击，该师在后退的时候，不是立即控制公路要点等待新一军的跟进，而是一路狂逃，结果同样被不明番号的共军大部队包围——所有的迹象都表明，林彪的大部队已经向黑山方向渗透过来。

如果向营口和沈阳撤退的路都已被截断，那么整个兵团该往哪里去?

廖耀湘顾不得多考虑，决心按照自己的预定计划，不顾一切地往营口方向突击。他命令新一军、第七十一军和新六军在黄昏前停止对黑山的攻击，由新六军一六九师和二〇七师三旅掩护，兵团主力向胡家窝棚撤退，第七十一军今晚接替一六九师和二〇七师的阵地，掩护全兵团后撤。各军军长都表示接受这个命令，只有第七十一军军长说他们在黑山打了三天，部队伤亡巨大，官兵十分疲惫，今晚不能行动，请求明天拂晓后再接防，因为夜间交接阵地容易受到共军的偷袭。不知为什么，廖耀湘居然答应了——几个小时之后，廖耀湘才发现，他的部队被阻击在黑山、大虎山整整三天，第七十一军又加上了这个不识时务的请求，他的人生和他的整个兵团恰恰因此被彻底断送了。

二十六日凌晨三点，已经打得筋疲力尽的十纵接到了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电报:“北上主力已到达，敌已总溃退。望协同一、二、三纵队从黑山正面投入追击。”

十纵官兵用血肉之躯堵在黑山，硬是没让廖耀湘的五个军闯过去，四千一百四十四名官兵为此付出了生命。

战后，黑山百姓在黑山城北修建了烈士陵园，陵园中矗立着一座十米多高的纪念碑，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罗荣桓的题词是：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明晃晃的太阳被包裹在冷冽的晨雾中，东北国民党军最黯淡无光的日子来临了。

## 胡家窝棚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在锦州以北、沈阳以南那片范围不大、村庄稀疏的地域内，国共双方总数已达百万以上的主力部队，前所未有地密集地扭结成一团。双方的任何一支部队，都可能与对手擦肩而过或者迎头相撞，战场呈现出纷杂交错的局面。

在黑山被迫停滞了三天，廖耀湘仍下定决心向营口撤退，虽然似乎为时过晚，但他的主力部队依旧在缓慢地移动。移动中的各部队掩护阵地的交接仓促而草率，行军秩序也随之自行其是，最后甚至连各军的行军方向都不一样了，有的部队向南面朝营口，有的部队向东面朝沈阳，这种近乎失控的状态令廖耀湘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祈祷他的部队在撤退路上不要发生什么致命的意外。而此时，东北野战军的数支主力纵队在林彪的严令下，正向这个狭窄的地域日夜兼程地合拢。出发前，没有哪个纵队得到过到达目标的明确指示，命令仅仅是朝着可能发生战斗的方向迅速逼近，寻找廖耀湘兵团并且抓住他们——双方都在游移的状态中，发布的命令因此朝令夕改，部队官兵更是高度紧张，双方的军事指挥员日夜焦虑不安。

林彪给各纵队下达的命令是：第五、第六纵队插入敌后，切断廖耀湘兵团向沈阳的退路；第一、第三、第八纵队担任正面攻击，直逼廖耀湘所在的黑山地区；第二、第七、第九纵队作为第二梯队迅速向前靠拢；位于长春的第十二纵队和各独立师兼程往南压。东北野战军

中，只有第四、第十一纵队的到达命令是具体的：留在葫芦岛方向，与塔山当面的国民党军继续对峙，决不让刚上任的杜聿明突破防线威胁锦州，绝不能让他加入到廖耀湘的战场上来。

究竟在哪里与廖耀湘决战，林彪并不十分清楚。

在野战状态下一次吃掉十万以上的精锐对手，这样的仗林彪还没打过。

廖耀湘的主力到底要往哪里走，林彪也没能最后确定。

因此，各纵队走走停停，始终在等待攻击目标的明朗。

八纵到达北镇的大吴屯后，接到停止待命的电报；几个小时后，他们又奉命向正安堡、大虎山一带前进；刚要动身，又让他们原地继续待命。六纵奉命攻击彰武，以为廖耀湘的主力在那里，结果十八师冲进了城却扑了个空；林彪又命令他们到泡子地区寻找敌人，司令员黄永胜率领部队急促行军到达预定位置，结果又扑了个空；黄永胜判断廖耀湘主力可能在新立屯附近，要求继续寻战，林彪却让他们原地隐蔽。

在这种局势不明朗的频繁调动中，东北野战军的一支非主力部队——以左叶为师长的独立第二师，意想不到地成了围歼廖耀湘兵团的巨大战役中的关键一环。

独立第二师自战役发动以来，执行的作战任务基本上是在战场边缘钳制和机动。锦州攻坚战进行期间，他们在黑山以南的绕阳河西岸，缠住了廖耀湘的第七十一军的一个师，清一色的日式“三八大盖”枪长刀利，阵地白刃战打得异常艰苦，却把敌人纠缠得苦不堪言。二十日，林彪命令他们从盘山南下进攻营口，阻止敌军从海上增援或逃跑。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林彪专门派野战军作战处长苏静带领一个重

炮连从锦州出发，直接去找独立第二师并参与指挥。二十二日，苏静还在半路上，林彪发现国民党军并没有向营口撤退的迹象——实际上，廖耀湘已经决心从营口撤退，只是兵团主力被十纵死死地挡在黑山无法脱身——林彪认为独立第二师到达营口后可能无仗可打，遂又命令他们北上新民对廖耀湘兵团实施侧击。于是，在地域狭窄而又部队密集的战场上，他们与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军、新三军十四师和骑兵第三旅先后遭遇。独立第二师且战且进，二十三日到达盘山时，苏静处长到了。经过研究，他们决定在大虎山以东地区阻击敌人，并等待林彪对他们作战请求的批复。

二十五日中午，北面黑山方向的阻击战接近尾声，南面却传来营口已被国民党军占领的消息。苏静和左叶师长紧急磋商后，认为独立第二师不能再等了，廖耀湘肯定要从营口逃跑，独立第二师必须立即出发，在廖耀湘可能逃跑的路上去撞，撞到敌人就开火，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把敌人死死地缠住——这是在没有接到野战军司令部命令的情况下，独立第二师自行赋予的任务。

夜幕降临后，独立第二师开始向南急行军，因为无法预料前面会出现什么情况、遇到什么对手，官兵们都处于随时战斗的状态。师长左叶宣布了“战斗当先，缴获不计”的作战规定，即不准因为贪图缴获就停下来，不准因为要抓俘虏而去追击溃敌。

晚二十二时左右，独立第二师到达大虎山至台安的公路与绕阳河的交会处。刚上公路，前面就传来报告说，侧面发现敌人。左叶定神一看，顿时紧张起来：仅仅二十米开外，正走着一大群戴着钢盔的部队。左师长立即命令不要惊动敌人，设法截断敌人的退路，全师做好战斗准备。

这是一支被夜行军折磨得疲惫不堪的部队，官兵都摇摇晃晃半睡半醒似的，整个队伍呈散漫的四路移动状——这是廖耀湘派往营口方

向开路的第四十九军一〇五师的前卫团。一〇五师二十五日从半拉门出发，虽然廖耀湘心急火燎，但先头团却走得缓慢拖沓。

独立第二师的包围阵形形成后，左叶师长下达了攻击命令，这个命令十分特别，左叶师长说：“不许开枪，上去就掐脖子，哪个敢反抗就用刀捅。”仅仅二十分钟后，这个懵懵懂懂的先头团就被静悄悄地解决了——俘虏供认：在后面跟进的大部队是第四十九军军部、新三军十四师和一九五师。

苏静和左叶意识到，廖耀湘兵团果真要从营口逃跑；更重要的是，开路的第四十九军几乎已经逃出即将合围的包围圈了。现在的问题是：独立第二师敢不敢冲上去，堵住这支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精锐部队。

漆黑的夜晚，独立第二师附近没有兄弟部队；部队刚刚组建，新兵只进行了半年的军事训练，缺乏战斗经验，尤其是残酷战斗的考验；部队的装备与当面敌人的装备相差甚远，携带的弹药也不多；他们并没有接到必须发动攻击的指令，他们可以将情况向上级报告，在得到增援后再行动。但是，左叶师长没有犹豫，当即决定扑上去。因为敌人要跑了，让敌人在自己的眼皮底下跑掉，是独立第二师全体官兵的耻辱。一声令下，官兵们朝着一眼望不到边的敌人冲了过去——独立第二师，干部不是河北人就是山东人，个个有北方人的倔犟秉性；战士是清一色身材高大、体格强壮的辽河流域的翻身农民，苦出身的孩子吃得苦不惜命。

一〇五师不知道先头团出了事，仍然散漫地向前走着，直到机枪响起来，才发觉受到攻击，顿时四下逃散。独立第二师官兵遵照师长的命令，没有追击逃敌，而是拉开架式往前打，先把第四十九军军部率领的两个师打跑了，又发现前面的一个村子内外住满敌人，敌人正

在开早饭，连警戒哨都没有派。独立第二师一阵猛冲猛打之后，国民党军在朦胧的天色里跑得乱成一团。

二十六日天亮的时候，独立第二师在大虎山以东冲过了北宁铁路。

官兵们并不知道，此刻，他们距廖耀湘兵团指挥部所在地胡家窝棚已经不远了。

由于廖耀湘向营口方向突击的意图已经明确，二十四日午夜，林彪紧急电令从锦州方向赶到大虎山地域的八纵司令员段苏权率二十三、二十四师向狼洞岗子一带前进，彻底截断敌人逃向营口的退路。国民党军新六军新编二十二师六十五团迎头撞上的，是与他们番号一致的八纵二十二师六十五团。两个六十五团遭遇在一个名叫赵家窝棚的地方，八纵六十五团在副团长蔚彰的指挥下，坚守阵地达十二个小时，三营副营长赵存志牺牲，一营副营长肖悦荣身负重伤。一连副连长蒋林布率领一排与敌人展开肉搏战，蒋林布在刺死一个敌人的同时，被敌人的刺刀刺中头部，他在倒下的那个瞬间拉响了手榴弹，与包围他的敌人同归于尽。阵地上的一排最后除三名战士外全部伤亡。数十年之后，八纵六十五团的十四名战士，依旧被记忆在当年的纵队司令员段苏权的心中：黄召化、刘春甫、刘海洲、邵才、徐志远、杨宝珍、杨振宽、周北清、贾贵、张彬、冯振奎、王勤禄、张德顺、周玉迟——他们都在阵地上拼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

独立第二师的主动攻击和八纵付出的重大伤亡，无意间造成了战场态势的一系列重大变化，使东北野战军围歼廖耀湘兵团的战役出现重要转机，同时也弥补了林彪在战役部署上的一个重大疏漏：

首先，独立第二师义无反顾的攻击，给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军军长郑庭笈造成一个致命的错觉。在受到攻击的那一瞬间，从猛烈程度上

判断，郑庭笈不但认为自己遇到了林彪的主力部队，而且认为这些部队早就等在这里准备将他吃掉。同时，他得出了撤往营口的路已被林彪封死的判断。当遇到的攻击被他夸大数倍之后，郑军长没有向廖耀湘报告，而是直接向沈阳的卫立煌请示，他的描述严重影响了卫立煌的判断，促使卫立煌彻底放弃了从海路撤退的计划。

其次，郑庭笈的判断也严重搅乱了本来比卫立煌清醒得多的廖耀湘的思路。廖耀湘从一开始就不赞成从锦州方向撤退，他认定走营口海路是唯一可靠的撤退方式。当锦州攻坚战还在进行的时候，廖耀湘的主张是否能被实施，就已成为毛泽东的巨大担心。即使在黑山地区的突击被阻之后，廖耀湘依旧有率领整个兵团向营口撤退的机会，因为东北野战军的合围还没有形成，第四十九军的突击进度已证明跑出去的机会是存在的。但是，当廖耀湘得知郑庭笈遭遇“共军主力的猛烈阻击”而无法前进的时候，他也作出了“营口之路已经被截断”的判断，并由此开始在原地举棋不定、徘徊不前。廖耀湘的难以决断，无疑为东北野战军最终对他形成合围提供了宝贵的时间。

再者，基于郑庭笈的这个判断，第四十九军受到攻击的时候，不但没有实施正面对攻，按照廖耀湘赋予的任务向营口方向坚决突击，反而向后退缩了。第四十九军的这一举动，引起后面部队的连锁反应，那些本来已经冲到了东北野战军合围圈边缘的国民党军，也开始纷纷往回跑，这一跑，他们就重新跑进林彪预设的口袋里去了。

应该说，二十五日晚上，如果郑庭笈在后续部队的依托下强行推进，至少他的第四十九军和跟在后面的新三军十四师，也许可以避免被东北野战军全歼的下场。因为，此时营口已被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军占领，毛泽东正在为此焦急不安，并对林彪的疏漏表示出极大不满：“你们事先完全不估计到敌人以营口为退路之一，在我们数电指出之后，又根据五十二军西进的不确实消息，忽视对营口的控制，致使五

十二军部队于二十四日占领营口，是一个不小的失着。”毛泽东的担心是，一旦廖耀湘打开通往营口的通道，就等于在付出巨大代价关闭了锦州这扇“大门”，却让东北的国民党军主力从“侧门”溜走了。

二十五日这天，蒋介石再次飞抵沈阳，他在北陵机场召见了卫立煌，他给卫立煌的指示是：严令廖耀湘兵团“按照原定计划日夜兼程，继续西进”。所谓“原定计划”，即向锦州方向推进，进而收复锦州，从陆路撤出东北。此时的蒋介石至少大致知道廖耀湘兵团的处境和危机，但没人知道他为什么仍旧让廖耀湘继续执行那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计划。

二十六日，东北野战军各纵队相继赶到战场，对廖耀湘兵团的合围最终封口。

无论是向锦州推进，还是向营口撤退，廖耀湘都没有机会了。

六纵接到的命令依旧在不断地更改：二十四日，命令在半拉门一带修筑阻击阵地；部队赶到预定地域后，又命令他们向台安前进；刚刚出发，又接到命令，让他们转向大虎山方向。二十六日凌晨，六纵十六师向大虎山以东、北宁线以南地域急行军，十八师向厉家窝棚和十七户方向前进。凌晨四时，部队到达指定地域后，与正向沈阳撤退的国民党军新三军十四师遭遇，六纵立即在一片没有任何遮拦的开阔地上展开并投入战斗。

新三军被六纵截住，是国民党军内部混乱导致的：昨天黄昏，空军侦察机飞行员报告说，在彰武以南，发现了长达五里的大队伍，问是不是自己人，不是就开始轰炸。这本是个万分重要的情报，因为这一情报显示，通往沈阳的道路很可能将被截断。但是，廖耀湘的参谋长杨焜除了提醒新三军军长龙天武小心一下之外，并没有把情报报告给廖耀湘；更致命的是，龙天武军长竟然也没把这个情报当回事。晚

上，新一军军长潘裕昆来到新三军军部接防时，提醒他赶快走，龙天武却坚持天亮以后再说——“兵团部而后与新编第三军失掉联络；新编第三军的三个师而后被分别包围、歼灭，就是由于解放军的这个纵队的深入造成的。后来知道这个纵队就是第六纵队。”

六纵十六师四十六团在遭遇敌人的那一瞬间没有任何犹豫，尖兵班打死姚家窝棚村口的哨兵后突入村内，一个班受到村内敌人的围攻全部牺牲。在查明村内是新三军十四师的一个营之后，四十六团立即组织四个步兵连和一个机枪连发起攻击，官兵们突入村庄与敌人展开逐屋争夺战，敌人利用优势火力拼死抵抗，四十六团的五个连苦战四个小时，付出了伤亡数百人的代价，才把村庄里的敌人肃清。四十六团占领姚家窝棚后，位于附近的姜家窝棚、朱家窝棚和铁家窝棚里的国民党军开始猛烈反击，交战两方来回冲杀，在铁家窝棚方向的四十六团二连二排官兵全部战死，团政委张天涛，营长何仑元、贾连克，副营长李甬祥，连指导员孟宪章先后阵亡，但是四十六团的阵地稳固如山。与此同时，四十七团以两个连出击孙家窝棚，堵住了敌人的退路；十八师五十二团二营把厉家窝棚里的敌人赶了出去，五十三团在丁家窝棚与敌人形成对峙。

早晨七时，六纵司令部进至姚家窝棚。因为受到炮火攻击，后又转移到辛家窝棚。十六师侦察队伏击了国民党军的一个汽车队，俘虏了东北“剿总”司令部的一名少将参议。参议说，廖耀湘决定往新民方向撤退，四个主力军已经集中在胡家窝棚一带，准备沿着公路集团推进。司令员黄永胜立即感到了局面的严重：四个军的主力部队，这就意味着六纵要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而能不能把敌人堵在这里，关系到能否全歼廖耀湘兵团。来不及请示并等待回复了，黄永胜和政治委员赖传珠、副司令员李作鹏当即决定：六纵就在这里死堵，打到最后一个人也在所不惜。

此时，由于六纵在来回穿插中不断地变化战斗位置，林彪一时间找不到他们了，他在司令部里不断地问参谋长刘亚楼，六纵跑到哪里了？刘亚楼说他也不清楚。很少表露情绪的林彪火了，说黄永胜简直是乱弹琴，如果让廖耀湘跑了，非要严办他不可。刘亚楼再次给六纵发去电报，要求他们迅速寻找敌人并实施攻击，否则严厉处分。不一会儿，六纵的电报到了，黄永胜报告说，六纵为了截住廖耀湘，一天两夜急行军一百公里，没有时间吃饭，也没有时间架设电台，现在终于把所有的敌人都堵住了，六纵决心以十六师死守阵地，十八师向东北突击，决不让敌人跑掉一兵一卒。林彪大喜，立即回电，命令六纵保持阵地，等待各纵队加入最后的战斗。

新三军十四师遭到阻击后，龙天武和新一军军长潘裕昆商量，决定绕道翟家窝棚向东北突围。六纵得到情报后，立即抽调十八师五十四团跑步前进，坚决把翟家窝棚的敌人堵回去。为了加强防线，黄永胜指定李作鹏统一指挥战斗，防守重点是北宁路上的厉家窝棚火车站。

六纵还在修筑工事的时候，新三军强大的突围行动开始了。阵地上沙石腾空，弹片横飞，村庄里的民房和草垛被炮弹击中后燃烧起来，整个厉家窝棚烈焰熊熊。六纵所有阵地都进入了激战，五十二团二营打退敌人的十四次攻击，十六师的九个连打到最后只剩下不足十人，残酷的战斗一直持续到天亮。在六纵的阻击战打得最苦的时候，五纵赶到了半拉门一带，与新一军新编三十师遭遇，五纵队猛烈穿插，一下子就把新一军的序列打乱了。然后，五纵和六纵一起彻底堵住了廖耀湘向沈阳撤退的道路。

一纵是从锦州以南面向黑山急行军的，因为路途长，他们连续走了三天四夜。部队没有时间吃饭，更没有时间休息，官兵们边走边啃干粮，一刻不停地往北赶。他们必须渡过那条几百米宽的大凌河，十

几天前他们南下打锦州的时候，曾经徒涉这条河，但这次徒涉时河面上已经漂浮着薄冰。官兵们在河边脱下鞋袜和裤子，在腿上擦上猪油、羊油或者牛油，在班长的督促下喝了御寒酒，然后相互搀扶下了河。河水冰冷刺骨，官兵们牙齿直打颤。大凌河附近的百姓们听说大军过河，纷纷提着开水壶跑来，官兵们上岸后立即被百姓围住，百姓递过来热水，干部们在黑暗中喊声不断："集合！检查装备！立即出发！"

二十四日，由师长江拥辉、政治委员黄玉昆率领的一纵一师到达黑山西面的药王庙，由师长贺东升、政治委员王树君率领的一纵二师到达岗营子地域，由师长刘贤权、政治委员方国南率领的三师在完成后卫阻击任务后也赶了上来。二十五日凌晨，没有休息的一纵官兵立即投入穿插作战，方向是自西向东，不管前面是哪股敌人，插进去将其打乱再说。三师向杨家窝棚和王家屯方向的穿插进展很快；二师在三师的左翼向东直插杨家屯，截住了新三军的一个炮兵营；一师在三师的右翼投入了战斗。

一师三团插到大兴庄附近的时候，发现有一大股敌人正在修筑工事，同时还发现了敌人的一个重炮部队。团长王敬之和政治委员张集华当即决定：一营在右，二营在左，猛打猛冲。在突然的攻击中，国民党军混乱起来，纷纷向东猛逃，三团紧追不舍，歼敌两千多人。在这次战斗中，三团的一名战士出了名：在大兴庄东侧，有一个敌人的火力点，一营二连几次冲击都被打了回来，这让入伍不到一年的战士白玉清很是愤怒。他顺着一条小水沟绕到村头，准备从侧面消灭这个火力点，谁想迎头撞上五十多个敌人。白玉清在击毙了领头的军官后，跳上一道断墙，扯开嗓子喊："一排向左！二排向右！坚决消灭敌人！"五十多名国民党兵顿时惊呆了，全部放下了武器——战后，聪明勇敢的白玉清被授予"孤胆英雄"称号，并获"英雄奖章"一枚。

一师一团追到黄家窝棚发现了敌人。团长杜秀章和政治委员柴川若顾不得后面的部队没跟上来，立即命令二营从正面发动攻击，警卫连绕到敌人的后面进行堵截。两个小时之后，战斗结束，清查一千五百多名俘虏时才发现，他们攻击的是国民党军的一个师部和一个团部，官兵们把新三军十四师师长许颖和副师长董党民捉到了。

接着，一师又奉命经黑山城北向前穿插，命令要求他们不管敌人有多少，一旦接敌就决不能放手。刘贤权师长到达黑山县城的时候，在一座教堂里见到十纵司令员梁兴初，被数天艰苦的阻击战折磨得憔悴不堪的梁兴初看见刘师长，在电话里喊："同志们！一纵上来啦！总攻就要开始啦！"

二十六日清晨，廖耀湘发现了自己面临的危机。

先是第七十一军与新六军一六九师、二〇七师三旅交接防务的时候发生混乱，遭到解放军的猛烈攻击。战斗一直延伸到黑山以东的胡家窝棚附近，四面的枪声已经清晰可闻。新三军军长龙天武打来电话，说他的司令部附近也发生剧烈战斗，西面的第七十一军已经开始后撤，解放军快要打到他的司令部来了。廖耀湘命令他离开指挥所立即去掌握部队，并且按照计划继续向营口方向撤退，龙军长答应之后，廖耀湘就再也没有得到这个军长的任何消息。廖耀湘不知道，龙军长在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已经不能掌控他的任何一个师了，放下电话后他确实离开了指挥所，但不知去向。后来才知道，这个军长扔下部队独自一人逃出战场，一直逃到沈阳。失去指挥的新三军的三个师已被紧紧包围。放下龙天武的电话，廖耀湘又试图与新一军军长潘裕昆通话，但是电话未能接通。八时左右，廖耀湘到胡家窝棚附近的新六军去找李涛军长。李涛也不知道第七十一军、新六军一六九师和二〇七师三旅的确切位置和情况，廖耀湘命令他务必掌握那两个部队，把阵脚先稳下来再说，然后设法掩护胡家窝棚的兵团指挥部、直属部

队和新六军军部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大虎山以东地域，因为新编二十二师还坚守在那里。李涛痛快地答应了——实际上，李涛知道新编二十二师也出现了危机，因为昨晚他们报告说发现共军的大部队在向南移动，这显然就是冲着新六军来的，但李涛竟然没有向廖耀湘报告这个情报。或许，李涛知道此时任何情报都没有实际意义了，最关键的问题是自己的安全和出路。

从李涛那里出来，廖耀湘带着随从副官跑到胡家窝棚东面的开阔地去观察战况，他亲眼看见胡家窝棚以西一带正发生着激烈的争夺战——那就是六纵正与新三军交战；廖耀湘还看见东面新一军军部所在的村庄硝烟四起，估计也在混战之中。胡家窝棚以东有一条小河，解放军正沿着这条小河插进来，看来是要截断新一军与兵团指挥部的联系。解放军官兵距廖耀湘仅仅只有几百米了，子弹在他的头顶上乱飞，廖耀湘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回到兵团指挥部了，于是他决定去七八里之外的新一军新编三十师司令部去——“还没走到新三十师师部，我回头一看，胡家窝棚村庄内已发生战斗，兵团指挥部与新六军军部可能已被打散了。”

廖耀湘心中弥漫起一种无可名状的绝望：胡家窝棚，兵团指挥中枢，就在自己出来的这么一会儿，共产党军队居然打了进来，自己的指挥部都完了，还能有什么别的指望?

袭击胡家窝棚的是三纵七师二十一团三营。

这个营的官兵没有想到他们袭击的是廖耀湘的指挥部；更没有想到他们攻击的时候，廖耀湘竟然就在距离他们仅仅几百米的地方看着，然后跑了。

三纵打完锦州后，从锦州出发向北连续行军，二十四日越过十纵的防线向前突击，二十五日清晨进入一块平原地带，庄稼收割完毕的

田野空阔寂寥，三纵正准备休息一下，突然遭到猛烈的炮击，官兵们这才意识到他们已经深入到犬牙交错的战场上来了。各部队立即散开，九师首先占领詹家屯，然后向黑山东北部的五间房和烂泥泡发起攻击。同时，八师也在左翼向当面的第七十一军展开攻势。第七十一军后撤，三纵跟踪追击，二十六日凌晨追到胡家窝棚东北地域。九师主力在小谢屯附近遭遇新三军的南逃队伍，二十五团当即猛冲，歼其一部；七师则经过尖山向胡家窝棚方向继续追击。

七师的前卫营是二十一团三营。他们在得知北山有国民党军第七十一军的一个营后，立即前去寻敌，但到达时发现敌人已经逃跑。三营在副团长徐锐的率领下尾随其后寻找战机。在公路上，他们碰上了几个被国民党军拉去当差逃出来的百姓，百姓告诉徐副团长，前面那个叫胡家窝棚的村里，国民党军佩戴短枪的比拿长枪的多，小汽车也多，而且还拉了不少电话线。村庄附近，不少国民党军的汽车、大炮和马车正在过河呢。

徐锐副团长迅速和三营副营长李德章商量，两个人共同认为：那个叫胡家窝棚的村子里，至少是个国民党军军部，而且正在准备逃跑，三营应该不管三七二十一，冲进去打他个措手不及。三营的作战部署是：八连配属重机枪两挺，迅速穿过胡家窝棚西北开阔地，在村东头截断敌人的退路；七连配属重机枪一挺，首先攻占村庄西北的高地；营部跟随七连行动，九连为预备队。

二十六日清晨六时，三营开始向胡家窝棚接近。那时廖耀湘刚从胡家窝棚的兵团指挥部出来。守在胡家窝棚西北小高地上的国民党军竟然认为接近的八连是后撤的友军，所以没有阻拦射击，致使八连三排安全地通过了开阔地。到达胡家窝棚西北边的时候，八连才被发觉，三排官兵迅速展开，向一个无名小高地发起攻击。即刻，胡家窝棚里所有的拦截火力——重炮、迫击炮和各种机枪一齐向他们压下

来，三营被压制在没有遮蔽物的旷野里。直到此时，他们还不知道，自己攻击的是有严密警戒和强大火力的廖耀湘的兵团指挥部。但是，三营没有退缩，官兵们知道，火力越猛，证明胡家窝棚里名堂越大，三营就是全死在这里，只要缠住敌人就是胜利。

八连二排在朝鲜族排长任炳全的率领下，冲到村东头的一座小桥上，堵住一辆汽车，车上坐满了国民党军军官，军官们没有抵抗就下车投降了。二排把这些军官关在路边的一座民房里，继续向前冲。冲到河滩上的时候，他们眼前一亮：整整十八门榴弹炮排列成一排正在发射，旁边是近百辆汽车。这些大炮和汽车让二排官兵分外眼红，他们根本没有顾及炮兵阵地上到底有多少敌人，立即扑了上去。瞬间，国民党军的这个重炮阵地就成了肉搏场。炮兵阵地上至少有国民党军的一个营。敌人在瞬间的惊慌之后，发现冲过来的不过二十几个人，立即开始了疯狂地围攻。二排，这个不顾一切的小小战斗单位，随即被淹没在残酷的厮杀之中。二排一名副班长从肉搏战中冲出来，跑到营部报告了情况。副团长徐锐心情复杂，敌人火力封锁严密，暂时没有办法前去增援，只能集中兵力尽快攻占胡家窝棚村西各高地，以解救孤身作战的二排。

早晨七时——廖耀湘已经在村东的开阔地观察了一会儿，最后决定不返回遭到攻击的胡家窝棚而去新编三十师师部——就是这时候，八连三排在机枪的掩护下攻占了村西北的几个小高地，胡家窝棚里的国民党军开始反击，三排在击退敌人的三次反击后大部伤亡。最后，三排长阵亡，阵地上只剩下战士楚长发一个人。八连指导员率领一排拼死增援，但与敌人厮杀几个回合之后，一排也大部伤亡。副团长徐锐把迫击炮连的十二名炮手全都派到了这个方向，但阵地依旧万分危急。

八时，七师的山炮连赶来了。九连拿下无名高地后，七连也拿下了另一个高地，胡家窝棚西面的阵地全部被突破，村庄里的国民党军纷纷向东溃逃。八连和七连乘势往村庄里冲，冲进去之后才发现打的是廖耀湘的指挥部，这让官兵们很是惊讶。

徐锐副团长和三营副营长李德章直奔河滩，他们看见了一生都难以忘却的情景：百余辆汽车和十八门榴弹炮尚在，但是，二排所有的官兵全部战死，交战两军官兵血肉模糊的遗体凌乱地散布在旷野上。这片河滩本是当地百姓的坟地，坟地间原本枯草摇曳，搏斗后这里的枯草已被压平，大片的血迹已经凝结。掩埋二排官兵遗体的时候，徐副团长和三营官兵边挖坑边哭。胡家窝棚村东，自此出现了许多新坟，混合着血浆的新土微微隆起呈暗红色。

林彪突然收不到廖耀湘兵团司令部的电报信号了，大为疑惑不解。

三纵的一支小部队在总攻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把廖耀湘的兵团司令部、新六军军部连锅端了——三纵七师二十一团三营的攻击虽然偶然，但意义重大。他们不但使廖耀湘兵团的十万大军因失去指挥而陷入混乱，更主要的是，林彪终于十分精确地判明了廖耀湘的位置，并随即制定出东北野战军即将发起的围歼战的核心所在。

林彪下达的命令是：不要休息，不要睡觉，不要吃饭，哪里有廖耀湘的部队就往哪里打！哪里有枪声就往哪里打！直到把廖耀湘兵团彻底歼灭为止！

二十六日上午十时左右，廖耀湘跑到新编三十师师部。

这里靠近黑山，东北面是新一军的五十师。

从胡家窝棚方向突进来的解放军官兵仍在继续深入，试图把新一军与新三军分割开来。廖耀湘命令新编三十师和五十师就地抵抗，同时派人去把新一军军长潘裕昆叫来。

一个小时之后，从胡家窝棚逃出来的兵团参谋长杨焜和新六军军长李涛以及司令部的军官们也跑到这里，廖耀湘证实了：胡家窝棚的兵团指挥部已被冲散，一个专门负责作战的参谋被打死，还有一部分司令部的军官被俘。廖耀湘当即命令新六军副军长刘建章指挥一六九师向胡家窝棚实施反击。

接着，新一军军长潘裕昆和第七十一军军长向凤武先后赶到。两位军长报告说，新一军的司令部也受到攻击，但军部突围出来了，损失不大，已经命令所属部队向新编三十师靠拢。而第七十一军主力现在正集结在新编三十师和一六九师之间。廖耀湘命令第七十一军仍归新一军指挥，特别命令把负责胡家窝棚防御的那个师长抓起来听候处置。

目前，还有新三军、第四十九军和二〇七师三旅没能联系上。

廖耀湘利用新编三十师的电台向卫立煌报告了战况，并说他的决心仍然是向营口方向撤退。

下午十六时，让廖耀湘感到一丝安慰的是，新六军新编二十二师师长罗英带着一辆卡车和警卫部队来了，要接廖耀湘和李涛去他们那里——新编二十二师是廖耀湘和李涛的基本部队，两个人在抗战期间都曾当过这个师的师长——罗英向他的两位前辈和上司报告说，他的一线部队虽然受到攻击，但目前情况尚好，师部位于大虎山附近公路边的唐家窝棚，第四十九军军部就在距他不远的陈家窝棚。说到第四十九军奉卫立煌之命向沈阳撤退之事，罗师长十分气愤，说卫立煌也命令他这样做，但除了廖司令官的指示，他不执行其他任何人的命

令。廖耀湘决定自己跟着罗英走，至于目前部队应该如何，新一军军长潘裕昆认为，无论是沈阳还是营口都不能去，部队只要一移动就有被分割的危险，唯一的办法是就地抵抗——“共军在不能忍受我们的火力杀伤后，会自行撤退。”廖耀湘说，各部队就地防御，等到把新三军和第四十九军的情况搞清楚之后，再作之后的决定。

廖耀湘离开新编三十师师部，向南过了大虎山至沈阳的铁路，黄昏时到达新编二十二师师部所在地唐家窝棚。在那里，他终于与第四十九军军长郑庭笈取得了联系，郑军长解释了他直接向卫立煌请示的原因后，说大虎山移动至辽河边的沼泽地带是旧地图的标识，现在沼泽地已经干涸，全部都是庄稼地，部队可以通过。他的军部旁边有一条公路，直通辽河边的老达房，再经大民屯就可到达沈阳，这是目前唯一没被截断的一条退路，且沿途还没有发现共军的行踪。廖耀湘追问：“凭什么说沿途没有共军？”郑庭笈说，他的军部特务营已经到达老达房，正在那里征集船只，渡过辽河不成问题。郑庭笈劝说廖耀湘顺着他提供的这条路线赶紧撤往沈阳。就在这时候，卫立煌来电，口气已不再是商量，而是命令廖耀湘迅速率兵团退回沈阳。

“我感到恐惧，感到羞愧，因为我退营口的主张现在彻底失败了。”晚上，精神恍惚的廖耀湘躺在床上，陷入一种极端的矛盾和痛苦中。枪炮声不断地传来，新编二十二师师部附近也发生了战斗。师长罗英在与他的团长们通电话时，明显地感到各个团长都在埋怨和叫苦。新三军还是没有联系上。据说二〇七师三旅已经被打散了。现在，摆在面前的有三种选择：一是按照潘裕昆军长的主张就地抵抗，但这只能是把覆灭的时刻稍微延长一点儿而已，因为部队已经严重缺乏弹药，特别是炮弹，十几万人聚集在几十个村庄里，当地的粮食很快会被吃尽，空投也没有指望，蔓延的饥饿足以让全军崩溃。二是按照郑庭笈军长的主张退向沈阳，但是退向沈阳的行动也绝不可能像他说的那么容易，前边不但有大河，必定还有强敌，林彪绝不会低能到

为自己敞开通往沈阳的大门；况且身后已经有了强敌，部队一旦开始移动，“就可能在运动中被层层包围截断”。三是继续坚持当初退往营口的主张，但是，扪心自问一下，这种可能性是否还存在？——“我当时很痛苦地最后下决心，经由老达房地区退向沈阳。”——廖耀湘痛苦的是，如果退往沈阳，有可能突围而出的是新六军的新编二十二师、十四师和新一军的新编三十师以及第四十九军的一个师，而其他的部队就很难有生存的希望了。

廖耀湘打电话给郑庭笈军长，命令他立即派部队前去通往沈阳的道路上搜索。

郑庭笈军长仍信誓旦旦地说，撤退沈阳的路上没有敌踪。

廖耀湘下达了全兵团向沈阳撤退的命令。

这一命令在二十六日深夜下达，规定二十七日拂晓执行。

可是，连廖耀湘自己都认为，一切都可能来不及了。

潘裕昆军长接到这个命令后告诉廖耀湘说：“这是很危险的。”廖耀湘说：“这是卫总司令的命令。”潘军长“声音颤动”地表示：“我将尽我的力量去做。”

廖耀湘在这场战役中犯了太多的错误：攻击黑山和大虎山的时候，他舍不得使用最精锐的新一军和新六军，让作战力并不强的第七十一军去进攻，结果因为攻击未果严重耽误了突围时间。在已经意识到东北野战军主力合围而来的时候，他在向哪条路突围的选择上犹豫不决，再三反复，如果他在第一时间果断地选择，并在事后始终坚持，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在预计向营口撤退的路上，一个小小的独立师就导致他认为撞上了林彪的主力，他在国民党军中服役多年的经历使他形成了某种思维定势，他无法设想也无法理解一支小部队怎么能

够毫不犹豫地以卵击石。在到达新编二十二师师部之后，也许是认为自己到了老部队便安全了，他竟然用明语在电台中呼叫和调动部队——有史料证明，廖耀湘的呼叫全部都在东北野战军的监听之中，他呼叫的电台出现在哪里，哪里就会受到攻击——先后毕业于中国黄埔军校和法国陆军大学的廖耀湘，在一九四八年的初冬时节里表现失常了。

此时，东北野战军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纵队和炮兵纵队，对合围在黑山、大虎山以东、绕阳河以西、无梁殿以南、魏家窝棚以北约一百二十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廖耀湘的五个军，展开了大规模的分割和围歼。其中，第一、第二、第三（附属十七师）、第十纵队和炮兵纵队由黑山、大虎山正面自西向东突击；第七、第八、第九纵队由大虎山以南向北突击；第五、第六（欠十七师）纵队由二道境子、绕阳河自东向西突击。

廖耀湘在新编二十二师师部等待着二十七日拂晓的到来。

此刻，一个名叫齐一飞的战士，在攻击胡家窝棚的战斗中身负重伤，他的战友将他安置在距胡家窝棚不远的一个村庄里。

齐一飞的家，在距胡家窝棚一里半的东尤屯。

齐一飞苏醒后，首先想到的是连长李德山。在向胡家窝棚穿插的时候，按照打到谁的家乡就向谁表示祝贺的老规矩，全连提出了“为解放齐一飞的家乡而战斗”的口号。连长李德山还特意说他应该回家看看，还说很想吃一顿他的家人包的饺子。但是，冲到胡家窝棚西面的开阔地时，出事了。一排炮弹打过来，李德山连长被炸倒。齐一飞正要上去救连长，另一排炮弹把他也炸倒了，他被埋在泥土里。当他挣扎着从泥土中爬出来，爬到连长跟前时，发现连长头部中了弹片，满脸是血。他想背连长去找担架，刚站起来，就昏了过去。战斗结束

后，齐一飞被救下战场。躺在担架上他慢慢地醒过来，他问身边的炊事员老刘，连长在哪里？老刘半天没说话，只是流眼泪。天亮了，院子里又抬进来不少伤员，急救人员来回忙着，四周声音嘈杂。齐一飞突然发现眼前的景象似乎有些熟悉，特别是院子里的那座镶嵌着大大的“福”字的影壁和大门口的那棵老榆树——这不是地主毛奎山的家吗？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同志！咱东尤屯屯子小，不能叫你们全都到屋子里去，大清早的让你们受罪啦！”齐一飞听出来了，这是屯西头的齐贵田大爷。自己就躺在自己家的村子里！齐一飞让炊事员老刘到对面的院子里去问问，那是不是自己的家。如果是，就告诉他爷爷，说他的孙子已经参加了毛主席的队伍，让家里别挂念他，千万别说他在这里，也别说他受伤了。不一会，老刘回来了，紧跟着，齐一飞听见了爷爷的大嗓门：“齐一飞？那是我的大孙子！他在哪儿？”老刘把爷爷引进屋子的时候，齐一飞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他不想喊爷爷，不想让爷爷看见他现在这个样子，因为爷爷会心疼死的；他也不想因为这里是他的家乡，自己就被留下来养伤，他要跟着部队走，死也要死在队伍里，连长的仇还没报呢！老刘返回到他的担架边，告诉他，家里一切都很好，土改时分了三垧好地和地主毛奎山家的几间好房。

老刘顺从齐一飞的意愿，没有让他与家人见面，把他送到另外一个村子里养伤去了。

两个月之后，战士齐一飞伤愈归队。他跟随部队跨黄河，过长江，一直打到海南岛。整整九年后的一九五七年，齐一飞请假回家探亲。东尤屯家里的爷爷和奶奶白发苍苍，最小的弟弟已经上了高中，只有村子里的井台、小庙和那棵大榆树依旧是那般模样。临归队前，爷爷领着他往村外走，在一块地头上，有一座被绿油油的庄稼环绕着的砖砌的坟。爷爷说：“当年打胡家窝棚的时候，一个连长牺牲了，我们把他埋在了这里。”

齐一飞看见墓碑上写着：烈士李德山同志之墓。

齐一飞放声大哭。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七日拂晓，蒋介石在他日记本上写道：

东北全军，似将陷于尽墨之命运。寸中焦虑，诚不知所止矣。

## 不说老实话我揍你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七日清晨，杜聿明被专机从葫芦岛接到北平。见到蒋介石，杜聿明发现他已“变得很虚心”：

“现在廖兵团电讯已失去联络，罗参军有个很好的意见，马上调海军运输舰将葫芦岛的部队海运营口登陆，策应廖兵团从营口撤退。你看怎么样？”我想蒋介石听信了罗泽闿的意见，已将沈阳主力送完，现在又要送掉葫芦岛的部队，心中对罗愤恨已极，就转身对罗说：“罗参军的意见‘真好’，是一个很好的战术作业，可是你有没有考虑调兵舰要几天？”蒋介石见我的口气不对，怕同罗闹起来，就接过来说：“我想两三天。”我又问：“由葫芦岛运到营口要几天？”蒋又说：“三四天可能运完。”我说：“这就是说，要将葫芦岛的部队运到营口，至少也要一个星期。在这一周内，廖耀湘要是存在的话，就可以自己打出来退到营口，否则一两天就完了。再把葫芦岛的队伍调去，不是等于送死吗？”这时蒋介石完全没有前几天那种逢人便骂的威风，变得很虚心，甚至表现出对我言听计从的样子。他问我：“你看怎么办好？”我考虑了一下说：“我看廖耀湘已经靠不住了，只有赶快调船把营口的部队撤退。沈阳是否能撤得出来还有问题。”蒋介石说：“好！好！我叫桂永清准备船，沈阳叫周福成指挥第五十三军、第六军、第二〇七师［该师只调一个旅去辽西归廖指挥］死守，你马上到沈阳去见卫总司令，召集周福成、赵家骧［已发表为第六军军长］等部署沈阳防务，等部署完毕你再回葫芦岛。”我当时觉得罗泽闿可恨，蒋介石可怜，现在蒋既然信任我，明知无法挽救也只好再去一趟。我站起来说：“那么学生就去了。”蒋介石说：“你赶快去吧！”

至少在这天上午，蒋介石对东北战场形势的判断是混乱的，混乱发生在最高军事统帅身上，无疑是国民党军的又一个灾难。一个细节证明了这种混乱到了什么程度：杜聿明告辞刚要走，蒋介石接到空军的电话，说侦察机发现“现在有一万多人由辽中向沈阳前进中”。蒋介石立即说：“我料定是廖耀湘，赶快派飞机去同他联络。”——刚才还

决定调军舰去营口接应，没过几分钟就判定廖耀湘正向沈阳撤退，蒋介石凭什么断定那“一万多人”就是廖耀湘?

杜聿明离开北平前往沈阳。飞机飞过锦西的时候，他觉得有必要先在葫芦岛停留片刻，于是命令飞机降落。

此时，锦西方向的国民党军还在根据杜聿明的指令，在打了十几天也没有进展的攻击线上实施突击——从战役大局上看，当廖耀湘兵团已被围歼的时候，国民党军依旧在这个方向根据与廖耀湘兵团南北夹击收复锦州的预案发动攻势，其行为显得荒诞而令人费解。

二十五日，国民党军一五七、一九八师和新二师，全部展开在塔山侧翼的东西尖子山、靠山屯、前后瓦庙一线，炮兵也进入了攻击阵地。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在召集指挥员开会的时候，判断国民党军不但还要发动进攻，而且会避开塔山当面四纵的阵地，将主要攻击方向转向十一纵的阵地，企图沿着老锦西大道迂回塔山的侧后北上。

果然，二十六日拂晓，十一纵三十三师的阵地遭到猛烈的炮火轰击，接着，一九八师和一五七师兵分两路开始进攻。一五七师动用团的规模，波浪式地冲击九十七团的阵地，九十七团一营连续击退敌人的两次进攻后，二连长王长海和指导员王金禄指挥全连实施反击，扑入敌阵展开白刃战，在一连和三连的配合下把敌人压了下去，但是阵地上只剩下二十八名官兵，巨大的伤亡令他们全部退入二线阵地。这天拂晓，九十八团在魏家岭的警戒阵地同时受到猛烈攻击，一营三连三排副排长崔占发率领全排连续打退敌人的五次冲锋，弹药打光之后，官兵们就跳出战壕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最后除四名重伤员被转移到二线阵地外，三排其余官兵全部阵亡。

黄昏的时候，九十七团团长夏绍林和九十八团团长于庆华分别指挥两个团的预备队实施反击，将丢失的阵地重新夺回。

二十七日清晨，国民党军再次发动攻击。三十三师各团阵地都遭到长达两个小时的炮火轰击，随着上万发炮弹的倾泻，阵地上所有的防御工事全被摧毁。三十三师的山炮营企图对敌人的炮火进行压制，但反而受到敌人炮火的反压制。直到上午十时，国民党军的炮火开始延伸，步兵才发起冲击。一九八师和一五七师齐头并进，九十七团一营和三营因为伤亡过重，一线阵地再次丢失。与此同时，国民党军新二师和一〇三师向九十八团一营阵地也发动了猛攻，一营在副团长郭宝玺的指挥下，利用有利地形顽强抵抗，一度将敌人压制在阵地前，但当国民党军投入第二梯队后，九十八团的一线阵地丢失。

国民党军此时的攻击，已不再是威胁锦州的问题，而是一旦让他们突进来，将会影响野战军对廖耀湘兵团的围歼作战，尽管他们距离黑山战场还有相当的距离，但在主力集中打围歼战的时候，侧后方冲来兵力不小的一股敌人，总是会让围歼战打得不怎么舒服——罗荣桓直接把电话打到三十三师，要求他们坚决顶住。

国民党军的四个师在夺取一线阵地后，开始用炮火实施大面积、大纵深的延伸轰击，掩护步兵向二线阵地冲击，企图一举占领老锦西大道两侧的要点。坚守福寿屯阵地的九十七团二营，在营长段勋臣的指挥下艰苦作战。六连长程栋和指导员韩运武与当面的国民党军一个加强营苦苦纠缠。沙河营阵地上的九十八团一营二连在击退敌人的多次冲锋后，杜连长率领一个排从侧翼冲进敌人的一个连阵地，敌人向他包围过来，他连续刺倒十六个敌人后，倒在地上口吐鲜血气绝。危急时刻，九十七团副团长胡兆友指挥三营九连和团警卫连冒死实施反冲锋，导致敌人的冲击队形一下子出现混乱。九连长窦怀生中弹牺

牲，副连长刘成义打红了眼，负伤之后拒绝包扎，呐喊着带领战士继续冲锋，当把阵地夺回来的时候，他躺在阵地上血流殆尽。

三十三师尽了最大的努力。

十一纵司令员贺晋年打电话给纵队副司令员兼三十三师师长周仁杰，建议他把师指挥部向后移动一下，这个长征时就英勇善战的指挥员坚决不撤，周仁杰说："我们一定坚守指挥阵地，有进无退！"

国民党军再次加强了炮火强度和步兵数量，三十三师全线阵地陷入惨烈的激战中。九十七、九十八两团伤亡巨大，最终二线阵地被敌人突破。这是整个防御作战千钧一发的时刻，三十三师动用两个营加两个连的预备队，在九十九团参谋长刘仁绪和师警卫营副营长廉登富的率领下，兵分两路向敌人发动反击，国民党军没有任何抵抗，退潮般地滚滚而去，三十三师夺回了大部分丢失的阵地。

杜聿明下达了停止进攻的命令。

杜聿明的命令，让觉得攻击还算顺利的将领们很是诧异，因为他们听说此时塔山正面的解放军已经撤退，第六十二军的弟兄们已经进入塔山村，"一举收复塔山"的消息已经传到南京去了——"塔山、白台山之线的解放军不知去向，也看不见阵地前线各处的行人来往，查不到解放军的行动意图。"第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颇为疑惑，他判断这一定是共军有计划的举动，意在诱使他离开阵地再加以歼灭，或者是准备袭击葫芦岛后方然后实施合围。林军长制止官兵冒进，派出搜索队前出侦察。可是，塔山阵地前的村庄里找不到任何一个村民，更看不到任何一个解放军官兵。搜索队不敢再前进，在塔山阵地上停下来报告。林伟俦亲自上了阵地，他还叫班以上人员都上来，看看共军死守不退的阵地到底是什么样子。林伟俦很快就为他的这个决定后悔了，因为他看见的情景让他心惊肉跳：

国民党军横尸累累。在这些官兵的尸体上，大部插着竹签标语：“你为四大家族殉葬”，“你为什么这样来送死”，“你的家中妻子在怀念你”等等。我当时认为这种标语能瓦解军心，影响士气，就叫随从人员拔掉。但尸体遍野，拔不胜拔，即调集卫生队迅速掩埋。我继续在阵地侦察，虽然是白天，也无法通过解放军原来设置的纵深鹿砦、木桩、铁丝网，还怕遇到触发地雷和拉发爆破筒，乃急调工兵部队排除各种障碍物。我进入塔山村时，村中空无一人，见不到解放军一个尸体，足见是有计划的行动。我恐怕在村中遭遇伏击，不敢随处行动。我从塔山转到白台山脚二〇七高地一带时，沿途堡垒星罗棋布，障碍物纵深，交通壕连贯，构成了铜墙铁壁般的坚固阵地。在许多堡垒工事中插满了标语，如“沉着瞄准杀敌”，“与阵地共存亡”，“为人民立大功”，等等。解放军在塔山的阵地是如此完整。我环顾塔山周围，几十里内树木很少，解放军怎能在十多天的时间里，找来这样多的木材，做出这样的奇迹呢？这真是我们所不能想象的……当时国民党军的班以上人员观看塔山工事时，有些人还夸口说：“这样的阵地堡垒我们攻不下，将来我们照样做出来，他们也是攻不下的。”

杜聿明对葫芦岛增援部队的将领们说，现在廖耀湘兵团情况不明，共军很有可能来攻锦西，你们各自退回原来的阵地守着，等我从沈阳回来后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各将领这时恍然大悟，一致认为只有守不能攻了。”

杜聿明当天飞往沈阳。卫立煌一见他就说，我早就在老头子面前划了十字，一出辽西走廊定会全军覆没，他不相信，现在我说中了吧。杜聿明、卫立煌和赵家骧开始商量如何应对眼前的局面，三个人一致认为，现在东北的国民党军已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从营口调回部队来没有把握，从沈阳向营口撤退更没有把握，万一调不来又逃不掉，最后不是被俘就是被蒋介石惩办。还是按照蒋介石的指令，叫周福成（第八兵团司令官兼第五十三军军长）守沈阳好了。于是，他们把周福成叫来了——“周本来是一个迟疑不决，好讲困难的人，可是这次接受任务很痛快，接着就回去部署了。”周福成走后，赵家骧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他低声对卫立煌说：“我看周有问题。”卫立煌惊恐地看了他一眼，两个人话未说但心里都明白，“有问题”就是也许要起义？说到廖耀湘兵团为什么这么快就完了这个关键问题，卫立煌强调说：“我始终未给廖下过命令。他的攻击部署、撤退计划，我都不清楚。”——当时，连杜聿明都觉得这话未免有点离奇，一个战区总司令，不

但没有给他的下属下达过任何命令，而且连下属的作战部署都不知道，这打的是什么仗？杜聿明提起在北平时蒋介石接到的那个电话，说蒋介石判定空军看见的那“一万多人”是廖耀湘的队伍，卫立煌很是不屑一顾：“要是廖耀湘能回来的话，郑庭笈早就回来了。”——二十五日晚上，卫立煌命令郑庭笈撤回沈阳，可是直到现在还不见人影。很快，卫立煌就查明了，空军发现的“一万多人”，既不是廖耀湘，也不是郑庭笈，而是国民党辽宁省府派到辽中和台安一带趁火打劫的保安部队，以及混杂在他们中间往战场外逃跑的地主富农和他们的家眷——这群与战役毫无关系的乌合之众人数竟然达到了万人以上。

终于，有两个人出现在杜聿明面前：身穿百姓衣服的新一军军长潘裕昆和新三军军长龙天武。

杜聿明问，你们的部队在哪里，他们说不知道。

杜聿明又问，你们的司令官廖耀湘在哪里，他们也说不知道。

这是十月二十八日上午，此时此刻，廖耀湘正将自己埋在一堆高粱秸里，地点在绕阳河边一片收割后的旷野中，他的身边只剩下新编二十二师副师长周璞。

二十六日晚二十一时，林彪给各纵队下达的命令是：

一、今夜及明日、后日各部队均应勇敢主动寻敌攻歼。

二、应集中主力各个击破敌，最好以三个师围敌一个师，以二、三个团歼敌一个团。

三、应各抓住一股敌人，先包围后，经过几个小时准备再发起攻击；对溃退的敌人立即发起冲锋。

二十七日凌晨，东北野战军对廖耀湘兵团发起最后总攻。

九个纵队从各个方向向以胡家窝棚为中心的狭小地域展开了迅猛突击。这是这片国土上罕见的奇特战争场面：双方都无法辨明攻守阵地，双方的建制混杂在一起，数十万人马在一个漩涡般的战场上急速地周旋作战。被追歼的国民党军弄不清到底哪个方向受到了攻击，更不知道攻击他们的是林彪的哪支部队，他们从这一天的凌晨就开始奔逃，与上级指挥机关瞬间就失去了联络，部队的各级长官纷纷没了踪影，不同建制的官兵本能地拥挤成一团，在方向不明的奔跑中忽而停下来忽而又继续跑，看见身边的人扔了枪举起手就跟着举起手，然后在解放军官兵的喊声中，懵懵懂懂地朝着方向不明的地方走。走累了，黑压压的俘虏群蹲下来歇一会儿，这时候茫然四顾，身边的官与兵谁都不认识谁，四周的旷野上枪炮声连成一片，不远的地方还有部队在向不同的方向跑，忽而又听见解放军官兵喊："到这里来集合！有吃的有喝的！谁再跑就打死谁！"

东北野战军各纵队各师指挥员都已进入各自为战的状态，只要大致方向正确，师长们就带着自己的部队朝可能有国民党军的村庄冲过去。打起来的时候，也弄不清攻击的到底是敌人的哪支部队，更弄不清当面到底有多少敌人，已经打红了眼的官兵如入无人之境，他们奋力追击，大喊大叫，追上一群敌人就让少量战士看管着，部队继续往前追。各级干部都有点手忙脚乱，面对遍地被丢弃的枪支、火炮、弹药、汽车、坦克，他们一时不知道如何收集才好，更无法明确地标出哪些物资是自己部队缴获的。政工干部带着几个战士在管理和甄别俘虏的过程中满头热汗，数百数千名俘虏来自好几个番号完全不同的部队，他们除了重点清查团以上军官，特别是那些可能藏在俘虏群里的师长、军长以外，干脆就现场号召国民党军官兵加入解放军，使自己迅速成为一名"解放战士"，然后只要换上顶帽子就能帮着管理俘虏，或者跟着部队去参加追歼作战。不可能一个人一个人地做工作了，索性临时用树枝搭起一个"解放门"，只要从这个门里走过，就算是被"解放"了，门那边就握手拥抱成为同志和兄弟——这个办法显出奇效，绝

大部分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兵从“解放门”蜂拥而过，然后如释重负地长出一口气，脸上露出轻松的笑容。

辽沈战役中这场规模巨大的围歼战，是东北野战军主力在长途奔袭之后完成包围并且迅速转入作战的一场战役，因此它的战场情景与解放战争中任何一场大规模的战役都有所不同。对于被围歼的国民党军来讲，中枢指挥机关过早地被打乱，主要指挥者的犹豫不定，主力部队之间联络中断，官兵普遍士气低落以及各级军官无一例外地临阵逃脱，造成了一个巨大军事集团战斗序列的迅速瓦解和溃散，从而导致十几万人的部队在受到攻击的时候陷入盲目乱撞的境地。而对于东北野战军来讲，这不是久困之后缓慢的蚕食，也不是备战之后顽强的攻坚，而是急速地赶过来、凶猛地杀进去。从干部到战士都懂得冲进去把对手搅乱了再说的道理，将敌人割裂并分别歼灭是他们惯用的战法。一个纵队可以撕开当面敌人防御线的连接点，将其切成几段后再逐一歼灭；一个班长也能熟练地使用中间突击两面迂回的战术——严格地说，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七日，东北野战军对廖耀湘兵团的攻击，是世界战争史罕见的全方位、大纵深的追歼战。

国民党军第七十一军八十七师上校参谋主任胡煅夫回忆道：当第七十一军接到“争取时间，夺路撤回沈阳”的命令时，“全军上下欣喜若狂”，官兵们终于“认为有了一线希望”，“可以避免彻底覆灭的命运”——二十七日凌晨，在黑山作战期间损失惨重的第七十一军，就是怀着这样死里逃生的心情，丢弃了伤员和所有的重武器脱离战场的。当他们撤到胡家窝棚附近时，发现那里人山人海，各军各师的部队都有，场面一片混乱，特别是大量的伤员躺在被遗弃的大炮和汽车下面无人顾及，令官兵们感到极度恐惧。更让官兵们茫然的是，不但一些东北籍的军官跑了，而且军长向凤武也不见了。之前，当廖耀湘将第七十一军归新一军军长潘裕昆指挥后，第七十一军的军官们很是不服，因为论资格他们的向军长要比潘裕昆老得多。于是，向军长在发

了几句牢骚之后，突然从军部消失了。接着，参谋长王多年也找不到了。有人说参谋长是辽宁人，人地两熟，化装之后投奔他的朋友青岛绥靖区司令官刘安祺去了。第七十一军自从无人指挥后，各师和各团开始各自为政，但在这个时候，已经没人知道向哪个方向逃跑最安全，结果在厉家窝棚附近大队人马被包围。

军长向凤武和副参谋长陈桂谟一行离开部队后，跑到一个位于三岔路口的小村边，在一堆玉米秸垛里藏起来，想等到天黑再跑。不知过了多久，他们突然听见有人喊："这里有人吗? "他们中间的一个人即刻从玉米秸垛里钻出来，接着又钻出来两个人——或许，他们认为自己已被发现，不出来就可能被打死。这个误会铸成了他们在这场战争中的结局。喊话的是九纵二十六师七十六团的战士。二十六师奉命向营口方向追击，官兵们跑到这个三岔路口迷路了，想找个老乡问一问。一看见有人，官兵们客气地问去营口怎么走，结果钻出来的三个人支支吾吾都说不清楚。官兵们立即警惕起来，因为这三个人都是南方口音。七十六团侦察股长和组织股长把这三个人分开盘问，他们都说是在沈阳做生意的买卖人，沈阳马上就要打仗了，他们准备返回老家。但问他们的老家在哪里，一个人说是天津，另一个人说是汉口，第三个人直往两个股长手里塞金条。再三追问后，他们才承认是第七十一军被打散的人。于是，玉米秸垛里的其他人也出来了，七十六团政治委员与其中一个年纪较大、满口金牙、中等身材的胖子单独谈话，这个人很快就承认他是第七十一军军长向凤武。

第七十一军侥幸逃出战场的是九十一师师长戴海容。二十三日，他的九十一师在黑山战场上不战而退，廖耀湘没能枪毙他，因为他在战场上扔下部队跑了。戴海容一路跑回沈阳，但他不敢在沈阳停留，用重金买了几张飞机票，带着夫人和几名亲信飞到北平。当飞机在北平落地的时候，戴师长还没有来得及松口气，就被国民党军宪兵盯上了。他们的样子不但一看就是从东北战场逃出来的，引起宪兵注意的

还有他们携带的沉重的大皮箱——皮箱里装着一千多两黄金。在被宪兵围住之后，犯有临阵逃脱罪的戴师长不敢纠缠，只好忍气吞声将一半黄金送给了宪兵，然后他又跑了。几个月后，当武汉警备司令陈明仁奉命组建新的第七十一军时，原本想收留他当副军长，但他在东北临阵逃脱和在北平机场分金条的事泄露了，戴海容立即被关押。后经朋友说情被释放，他径直跑到香港去了。

二十七日凌晨，位于陈家窝棚的第四十九军陷于四面火炮的轰击中，部队瞬间失去控制，在炮击下毫无目标地乱跑。东北野战军十纵的围歼开始了。随着包围圈越来越小，第四十九军军、师、团之间联络都已中断。军长郑庭笈率军指挥所人员和一九五师师长罗莘莱跑到一个步兵团里，随即被包围在李家窝棚。“二十七日激战整日”，罗师长指挥部队冲了几次都没冲出去。半夜时分，郑庭笈和罗莘莱偷偷率领特务连突围，向东北方向的辽河跑去。天亮了，他们不知道自己已经跑进七纵直属工兵连的警戒区，一群解放军官兵围住了他们，连同郑庭笈在内的八个人都还穿着军装，在黑洞洞的枪口下他们举起了双手，身上的加拿大手枪、子弹和地图、文件等都被收缴。这时候，有个解放军战士喊出了郑庭笈和罗莘莱的名字——这是个刚刚被俘又立即被“解放”的原第四十九军的士兵。

在这个夜晚，位于黑山北侧的新六军同时受到几路围歼。首先是十纵自西向东从正面发起攻击，接着东南方向的后路被八纵截断，最后五纵从西北方向插了进来。五纵的穿插给新六军带来致命的混乱，十三师三十九团插得最猛，竟与新六军的部队迎头撞上。正是凌晨时分，谁也看不清谁，只见一股人流向三十九团前进的反方向跑，张团长以为自己的官兵把方向搞错了，直喊：“谁让你们往那边跑？都给我回来！”结果遭到对方的喝斥：“咋呼什么！暴露目标枪毙了你！”接着，就有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前来问张团长是哪部分的，并说他们是新六军警卫营的，正在保护参谋长突围。张团长在黑暗中又惊又喜，忙

说我们是五十师的，也在奉命突围，接着就示意部队开始动手。这股国民党军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全部当了俘虏，包括企图突围的新六军参谋长黄有旭。

新六军军长李涛和第九兵团参谋长杨焜一直跟着廖耀湘，但是一伙人跑着跑着就被冲散了。李涛不化装则已，一化就把自己弄成了乞丐模样，他穿着一件女式旗袍上衣和一条花棉裤，居然在混乱的战场上没有受到盘问。也许他迷失了方向，连续跑了十几天，依旧还在战场内转着圈，最后他被十纵二十八师通信营的哨兵注意上了，引起这位解放军哨兵怀疑的依旧是他的南方口音。尽管哨兵在他的包袱中搜出一支钢笔和一枚印章，但李军长依旧在装疯，他抓起高粱米饭胡乱往嘴里塞，一会儿说自己是沈阳难民想回锦州的家，一会儿说自己是铁岭县府的文书想回湖北咸宁的家。盘问他的解放军干部让他写出铁岭县府科以上人员的名字，他写不出来。当解放军干部问，你觉得黑山这边的仗打得怎么样时，李军长一下忘记了自己的乞丐身份或者是文书身份，军事术语不由自主地说了出来："战术颇佳"，"运动神速"，"炮火猛烈"……解放军干部又向他要身份证件，他竟然说"丢在胡家窝棚"了——无法自圆其说的李涛，终于无法掩饰下去，他说自己是新六军参谋长丁一安，并且要求换上军装。换上军装，吃饱了饭，他看着一直陪着他的解放军干部说："我不是丁一安，我是李涛。"与李涛走散的兵团参谋长杨焜几乎逃到了沈阳，在距沈阳还有十五公里的地方，他听说沈阳也不行了，于是掉头往营口跑，想从营口乘船逃回关内。走到黑山以东的一个路口时，他被解放军哨兵发现并拦住盘查。杨焜自称是在锦州被"解放"的一名文书，还拿出一张上面贴有他的照片的"解放证"。解放军哨兵还是觉得眼前的这个人好像和上级发下来的需要特别注意的某个人很像，于是把他带到机关继续盘问。杨焜一会儿说自己是个散兵，一会儿说自己是个上士，最后在照片的比对之下，他承认了真实身份。

在胡家窝棚以西，当新三军军部受到攻击的时候，包括警卫部队在内，所有的官兵几乎没做任何抵抗就开始溃逃。当时，新三军军长龙天武和新一军军长潘裕昆正在一起，两人头天晚上谈到半夜，忧心忡忡，情绪低落，都觉得已经没有任何出路。派去探查周边情况的侦察队回来说，只有右前方大约有共军的一个纵队。但是，二十七日拂晓，远不止一个纵队的解放军官兵冲了过来。新三军司令部里很快就没有人指挥了，右翼的新一军防御线也随即被冲垮。解放军官兵将两个军分割开，然后发动猛烈的攻击。新一军代理参谋长陈时杰记述道："新一军整个主力被分割在周围约四五公里的环形零散村落上，解放军的包围圈如同一条不断的铁链子。我军虽然不断地从包围圈内外发动逆袭，但终于无力打断这条坚固的铁链。最激烈的战斗，是在前后孙家窝棚一带，被包围的新一军主力就在这里。"在孙家窝棚村里，新一军主力五十师凭借着村庄里的房屋和围墙进行抵抗，尽管攻击的解放军不断喊话要求他们投降，但是均被拒绝，于是整个孙家窝棚招致毁灭性的炮火打击，五十师很快就被歼灭了。潘裕昆和龙天武决定放弃指挥逃离。

两位军长相依为命地开始了亡命之旅。他们带着几个人乘一辆吉普车和一辆装行李的卡车向沈阳方向跑。过一条小河时，两辆车都陷在泥水中，两位军长丢掉汽车和行李徒涉过河。跟随他们的，还有南京国防部派到东北"剿总"的少将参议郭树人——"水深没膝，河面结有一层薄冰。过河后，寒冷打颤。因裤管和皮鞋内都灌进冰水，走路时哧哧作响，我俩成了落汤鸡，退逃大为不便，龙天武仅夹军用皮大衣一件，我只提皮包一个，此时只有护兵一名跟随。"黄昏时，在混乱的战场上，两位军长在一个小村庄附近收容了属于自己司令部的几十名官兵，他们一起展开对空联络板，朝着乱飞的空军侦察机挥手，但是侦察机像没有看见他们似的飞走了。两位军长只有继续逃亡。一路上，他们不断地收容溃兵，还收容了身边已没有任何部队的暂编五十九师师长梁铁豹。所有的公路和村庄都有可能朝他们射击或者盘查他

们的解放军，因此他们没日没夜地在荒野上奔。二十八日黄昏，他们竟然成功地走到新民火车站，并且顺利搭上一列开往沈阳的火车。

新一军副军长兼新编三十师师长文小山没有那么幸运。部队被打散以后，他和副师长谭道善、参谋长唐山一直躲在黑山东边的一个洼地里，结果被五纵十五师机关的一名炊事班长发现了。五纵在围歼战中，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都加入了抓俘虏的行列。仅二十七日一天，全纵抓的俘虏就超过两万。有抓俘虏警觉性的炊事班长，发现了藏在洼地里的这两个国民党军官后，马上觉得有名堂，因为他俩个个细皮嫩肉，而且年龄偏大，于是炊事班长横着扁担大喝一声："干什么的？"文小山说他是做饭的，炊事班长一听，说到自己的行当上来了，抓过他的手看了看，上面没有裂口，又闻了闻，身上没有油烟味道，顿时火了："不说老实话我揍你！"文小山师长立即说了老实话。

二十八日凌晨，东北野战军围歼廖耀湘兵团的战斗基本结束。

廖耀湘的五个军和特种兵部队共十万余人被歼。

解放军官兵们和成千上万的当地百姓开始打扫战场，掩埋阵亡官兵的遗体，向后方转运大量的伤员。排成长列的俘虏群也要向后方押运。在辽西平原上，到处散落着国民党军遗弃的武器和物资，军民们收集和清点着战利品，缴获物资被装上大车，这些大车首尾相接一眼望不到边。被俘的国民党军汽车兵被动员来开汽车，但依旧有大量的火炮无法拉走，百姓们把自家的骡马拉来，帮助解放军拖拉这些重武器。东北野战军炮兵纵队二十七团政委张英被紧急召到特种兵司令部，说在野外发现了十几门完好无缺的美式重炮，只是牵引这些重炮的汽车让敌人开跑了。张政委立即筹集款项向百姓购买马和骡子，最后终于把那些大炮全拉走了。在这个基础上，东北野战军组建起第一个重炮团。

林彪不断询问廖耀湘的消息。

二十七日拂晓，廖耀湘在第四十九军军部吃了早饭后，便和李涛等人一起从陈家窝棚朝老达房方向移动，准备按照郑庭笈军长指的路从老达房向沈阳撤退。但是，走出几里之后，前面的新编二十二师六十四团发生战斗，剧烈的枪声令廖耀湘心里一沉，他最不愿意见到的情况还是发生了：经老达房通往沈阳的路已被截断。廖耀湘立即命令六十四团攻击前进，打开缺口。但是直到六十四团团长阵亡的消息传来时，当面堵截他们的解放军不但没有被击退，而且冲击过来的官兵越来越多。廖耀湘命令新编二十二师主力火速上来，但是新编二十二师主力“久候不至”。廖耀湘决定返回第四十九军军部，半路上遇到新二十二师副师长周璞，周璞报告说，第四十九军军部受到袭击，新编二十二师主力被阻隔在那里根本上不来。当时，廖耀湘身边只有新六军特务连的两个排，周围到处是枪弹的射击声和炮弹的爆炸声，廖耀湘观察了附近的地形后，决定先去路边水渠北面的村庄里，在那里组织部队抵抗到晚上，然后雇一名当地的百姓带路，趁夜色沿田间小路回沈阳。但是，当廖耀湘快要接近那个小村庄时，发现村庄已经被解放军占领，于是又赶快跑回来。为了防止人多目标大，廖耀湘命令特务连分散隐蔽警戒，而他和李涛等人藏匿在一个洼地里直到夜幕降临。

天黑了，该走了。

但是，分散警戒的特务连不知上哪里去了。

廖耀湘身边只剩下李涛、周璞、新六军的一名高级参谋和他的随从副官。

廖耀湘决定往南走。几个人刚走不远，发现随从副官没影了。

再次徒涉白天往返的那道水渠时，身边的周璞突然大叫起来，他掉进一个没顶的深坑里了。他的叫声引来解放军的巡逻队，四周响起搜索的脚步声。这时候，新六军军长李涛也不见了。

把周璞拽出来后，剩下的三个人继续向南。走了一夜，天快亮时，他们绕过一片小树林，发现旁边的村庄里战斗还在进行，廖耀湘估计那是新编二十二师六十四团的残部。三个人小心地绕过村庄往前走，走着走着，那位高参不知不觉走进一个看似平静的小村庄。突然，高参的身后有人叫了一声，接着高参被抓了。远远地落在后面的廖耀湘和周璞立即钻进田野中的高粱秸垛里。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八日，是廖耀湘一生中最漫长的一个白天。他蜷缩在高粱秸垛里，忍受着饥渴和寒冷，远处传来的零星枪炮声不断提醒着他此时的处境——廖耀湘，湖南邵阳人，农家子弟，一九二六年考入黄埔军校，因成绩特优，由蒋介石亲自批准赴法国军事学校、法国陆军大学留学，毕业时成绩名列全校第一。一九三八年，三十二岁的廖耀湘升任国民党军新六军新编二十二师副师长，随部赴广西参加昆仑关大战，先以残酷的拉锯战阻敌增援部队，后以代理师长之职指挥新编二十二师与第六十军协同作战，全歼守关日军，攻占广西南部要地昆仑关。一九四二年春，廖耀湘率部参加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成功地解围陷于日军四面攻击的二〇〇师，新编二十二师因此被盟军誉为“世界上最精锐之部队”。第二年，新编二十二师进入印度，为打通中印公路，廖耀湘率部与孙立人的新编三十八师共同发动反攻缅北作战，战役期间擢升新六军军长。一九四六年一月，新六军奉命从驻地湖南进入东北战场，廖耀湘在平生第一次领略东北寒风之凛冽的时候，绝不会想到仅仅两年后他竟然落得无处藏身。

夜晚终于来了，两个人继续逃亡。在一条田间小路上，他们遇到一个当地的百姓，用重金购买了些食物和两套衣服，吃了东西换了衣

服之后，他们终于走到辽河边。要想逃出战场就必须过河，但是河边到处都是解放军官兵，他们藏在草丛里，等了很久也等不到机会。路边不断地有人来往说话，他们突然听见有人说沈阳已被东北野战军占领。

绝望的廖耀湘决定往回走，朝着葫芦岛的方向走。

几天之后，他们到达靠近锦州的一个名叫中安堡的地方。

中安堡当地有句俗话："一过山海关，吃饭到中安。"意思是凡在锦州一带赶大车跑运输的把式们，都要在这里歇脚，这里的饭馆、旅店一家挨一家，价钱便宜饭菜丰富。

其中的一家小客栈名叫谢家饭店。

这个不起眼的小客栈注定将留名中国当代战争史。

小客栈的掌柜叫谢连方，他总觉得住进来的那个胖子很不顺眼，因为他不但神情紧张，穿的衣服与身材也不协调。当时，中安堡的民兵都被组织起来盘查过往行人，于是当民兵队长赵成瑞来巡查的时候，谢掌柜把这个情况汇报了。赵队长马上对胖子进行盘查。胖子自称叫李德胜，原籍江苏，现住黑山县北姜屯，昨天跑买卖被乱军抢去了财物。胖子保证自己说的是实话，还说家里有妻儿老小，恳求赵队长放了他。赵队长将信将疑，把胖子带回农会继续盘问。中途，胖子掏出个蓝色小布袋，拿出一个金镏子和金元宝，悄悄地往赵队长手里塞。赵队长一下子觉得这个胖子肯定有问题。三纵后勤部的李股长特意赶到农会，胖子又对李股长说自己叫胡庆祥，湖南东安人，被乱军抢了财物之后，向朋友借了这身衣服跑出来的。李股长越看这个胖子越像通缉中的廖耀湘，但又一时拿不准，决定将他带到警卫连继续审查。到了警卫连，连部卫生员恰恰是个"解放"战士，他一见胖子就

说："你不是廖耀湘吗？"胖子说："我不是。我见过廖耀湘，他是秃脑门，没胡子，大肚子。我是胡庆祥。"警卫连里还有个炊事员，廖耀湘在新编二十二师当师长的时候，他是师里的炊事员，这个解放战士一见廖耀湘就说："我给你做过饭。"可廖耀湘还是不承认。接下来的盘问没完没了，每一句询问都折磨着廖耀湘的神经。但是，新编二十二师副师长周璞因为被断定是普通勤务兵被释放了，于是廖耀湘决心等待可能出现的一线生机。

廖耀湘被三纵带走了，官兵们撤离战场时，只好带着他一起行军。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东北日报》：

一天夜里，他想翻墙逃走，押送他的战士一梭子子弹打出去，大喝一声，吓得他搭到墙上的腿又缩了回来。林指导员告诉他："你最好自己承认，不然新解放的战士也能把你认出来。"他还是否认，并乞求给他开通行证，放了他，达不到要求就装病不肯走路。后勤部让他坐卡车，司机是新解放的战士，一看就说："没错，他就是廖耀湘！"十一月十一日后勤部段政委亲自审问，在无法抵赖的情况下，廖耀湘终于低头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三纵司令员韩先楚命令七师政治部主任刘振华负责把廖耀湘押到沈阳去："林总要见他，林总和廖耀湘是黄埔的同学。"临走，韩先楚把他披着的那件军大衣给了廖耀湘。在去沈阳的路途中，神经松弛下来的廖耀湘与身边的解放军干部们聊起天，当他听见解放军官兵唱起"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就打新六军"这首歌的时候，甚至还笑了。

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与新六军誓不两立。一九四六年的四平之战中，廖耀湘从本溪以猛烈的火力北上增援，令在宽大防御线上阻击的三纵伤亡严重。几天以前，三纵官兵终于冲进了廖耀湘位于胡家窝棚的兵团司令部，现在官兵们唱起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很有意思，特别是当着廖耀湘的面。

廖耀湘兵团，一个兵力庞大、火力强劲的战略机动兵团，长时间徘徊于无用武之地的境地，不断地失去战场突破的战机，不断地延误突围生还的时间，最终在两个昼夜内招致全军覆灭的结局——对于国民党军来讲，损失之惨重，前所未有；而对于人民解放军来讲，战果之巨大，史无前例。

十月二十九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和东北局，他们已经梳理出了这场曾令他们眼花缭乱的大规模围歼战的基本脉络：

从敌高级军官口供与缴获敌人作战命令及敌人行动位置等材料研究，敌廖耀湘兵团此次被歼经过如下：

当我军包围锦州尚未攻击时，廖耀湘奉命向彰武前进，切断我军联络线，策应辽西作战。当锦州战斗业已基本结束时，蒋介石十五号下午到沈阳，立即决定廖兵团与锦西之敌立即向锦州前进，十八日敌占新立屯，十九、二十日两日继续向黑山前进，二十三、二十四日敌以新六军与二〇七师一个旅猛攻黑山未奏效，新一军企图向北镇包围，二十四日夜敌发现我五、六纵队赶到新立屯以东，二十五日十二时发现我三纵赶到打虎山（大虎山）以西时，敌遂改变攻锦计划，转向台安、盘山、营口方向前进，但二十五日敌四十九军与新六军之骑兵到达台安、盘山受我独立二师之迎击，敌误以为台安方向有我主力，于是又改变计划，各军皆从打虎山以东地区向新民、沈阳转进，但不意遭我五、六、七、八纵共四个纵队的顽强堵击，又受到我一、二、三、十纵队的猛烈攻击，遂全部被歼。

毛泽东发来电报，虽只有寥寥一语，但欣喜之情充溢字间：“庆祝你们歼敌十二个师的伟大胜利。”

紧接着，中共中央致电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诸同志及东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们：

庆祝你们此次在辽西地区歼灭东北敌军主力五个军十二个师的伟大胜利。东北我军在两星期内连获锦州、长春、辽西三次大捷，使敌人损失二十六个整师共约三十万人的兵力，对于全国战局贡献极大。尚望激励全军，再接再厉，为全歼东北匪军，解放沈阳而战！

沈阳，国民党军在整个东北的军事指挥中心，已在林彪的刀锋之下。

## 死亡的开端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七日，深夜二十三时三十分，毛泽东起草了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

（一）围歼五个军，俘敌数万，极为欣慰。

（二）当面敌人解决后，望以有力兵团［不少于三个纵队］星夜兼程东进渡辽河，歼灭营口、牛庄、海城一带之敌，堵塞敌人向海上的逃路。

（三）廖兵团被歼后，蒋介石将从葫芦岛运一部兵力加强营口，并令沈阳一带敌军向营口迅速退却，此点你们必须充分的估计到。

（四）如果在目前的数日内，沈阳一带敌军已经或正向营口逃跑，则你们全军须迅速向营口、海城方向进击。

一个小时之后，毛泽东再次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

刚发二十七日二十三时半电给你们，接到你们二十七日十八时电及十一时半电，你们业已部署迅速向鞍山、海城前进，歼灭沈阳南下之敌，甚好甚慰。希望你们立即抽出几个纵队于明（今，原电文中笔误）［二十八］日兼程东进，如能于二十九日渡过辽河，则沈阳逃敌跑不掉，否则，沈阳之敌有于三十日退到营口的可能。

廖耀湘兵团覆灭后，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只剩下散布在沈阳及其周围的辽中、新民、铁岭、抚顺、本溪、鞍山、营口等几个据点内的十几万人了。

沈阳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城市，是东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北宁线、中长线、沈吉线、沈丹线贯穿市区。流经沈阳城南的浑河，在三岔河附近与太子河交汇后注入辽东湾，河水注入大海的地方就是营口。

营口是东北残存的国民党军唯一可能出逃的“水门”。

自东北野战军攻占锦州后，毛泽东不断地给林彪打电报，反复强调东北之敌可能从营口逃跑，并催促林彪派部队前往营口构筑阻击线。但是，林彪一直判断廖耀湘已经没有从营口撤退的可能，于是一个重大的疏漏出现了：驻守辽阳的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军军长刘玉章，自告奋勇地提出由他率领部队袭占营口——“以营口为后方，必要时可保辽南。”杜聿明同意了。第五十二军动作神速，十月二十三日拂晓“从辽阳、鞍山出动”，二十四日黄昏便占领了营口——这种一反常态的果决不免令人疑窦丛生，这个军长似乎已有借机脱离东北战场的小算盘。

林彪得知这一消息后，由于黑山战场正在激战状态，没有部队可用于机动，只好电令远在长春以南公主岭地区的第十二纵队火速奔赴营口。从长春南下的铁路已被破坏，十二纵官兵在司令员钟伟的率领下，徒步沿中长铁路昼夜兼程，走到铁岭时已是三十日，这里距离营口还有数天的路程。

营口的“水门”，对于东北国民党军来讲，至少目前是敞开的。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三十一日，东北野战军作出“同时歼灭营口与沈阳之敌”的决定：第一、第二、第十二纵队及辽北独立一、三、四、十二、十三师奉命攻打沈阳，第七、第八、第九纵队及独立二师、内蒙古骑兵一师和第一兵团各独立师奉命攻击营口。

当廖耀湘兵团被围歼时，沈阳附近的国民党军已开始收缩：驻本溪和抚顺的二〇七师一旅和二旅，驻铁岭的第五十三军一一六师，驻辽中的新一军暂编五十三师等部队纷纷退回沈阳。当廖耀湘兵团全军覆灭后，东北地区残存的国民党军作出的抉择是：营口的第五十二军撤退，其他部队继续固守沈阳。

卫立煌没有让沈阳守军向营口撤退，尽管他知道那座“水门”依旧敞开着。他没能挽救东北国民党军最后的部队，其原因十分复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卫立煌认为，沈阳的十几万部队根本走不到营口，就会像廖耀湘一样被包围和歼灭。此刻，他和他的军队都已失去与共产党军队作战的勇气和信心，尤其是要离开城市和堡垒置身于无边无际的旷野之中。

在旷野呼啸的寒风中，利用战斗的间隙，东北野战军官兵配发了棉军装和狗皮帽子，然后数支大军从各个方向向沈阳急速推进。人马呼出的热气在黎明前清冷的天色中缭绕，公路上塞满汽车和大车，成千上万的支前百姓和解放军官兵混杂在一起形成一股巨流。当夜晚来临的时候，东北烟袋锅闪出的光亮从这股人流中跳跃而出如同繁星。此时，在这片土地上，无论军与民都已经没有隐蔽行军的必要，他们的任务就是尽快地靠近沈阳，然后发起凶猛的冲锋将其占领——对于东北地区的解放军官兵和翻身农民来讲，这是一个做了很久的梦。

三十日，一架专机降落在葫芦岛的锦西机场，飞行员给杜聿明带来一封蒋介石的亲笔信，大致内容是：“沈阳秩序混乱，你马上去沈阳找周福成将防务调整好，再回葫芦岛。”杜聿明当即乘机前往沈阳。但是，飞机即将到达沈阳上空的时候，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打来空中电话：“沈阳北陵机场已混乱，不能降落，光亭兄（杜聿明别号）你千万不要降落，等我向老头子请示后再说。”飞机在沈阳上空盘旋，杜聿明等了一会儿，王叔铭又打来电话说：“老头子要你不去沈阳，仍回葫芦岛。”

杜聿明心乱如麻。他从飞机上向沈阳望去，看见城南好像有部队在移动，可机场似乎没有发生战斗的迹象。但是，既然王叔铭打来电话，沈阳肯定是靠不住了。如果位于沈阳市区内的机场都已不能降落，说明沈阳城已经处在共产党军队的攻击中。杜聿明立即想到两个

问题：首先是卫立煌的安全。深陷沈阳的卫立煌从地面逃出来的希望几乎为零，如果听任他落入共产党军队之手，除了国民党军颜面扫地之外，又如何对得起他本人？卫立煌与蒋介石一向不和，蒋介石不会像对待他亲近的将领那样设法营救。另外，如果沈阳陷落在即，营口和葫芦岛的部队必须马上撤退，否则很快就会成为林彪的下一个攻击目标。

杜聿明立即命令飞机直接飞往北平。

中午十二时左右，飞机降落在北平西苑机场。杜聿明刚走出机舱，就看见蒋介石披着一件黑斗篷，正准备上机场上停着的另一架飞机。面对突然出现的杜聿明，蒋介石感到有些惊讶。在杜聿明的请求下，蒋介石走进机场的空军作战室。蒋介石问杜聿明："沈阳情况如何？"杜聿明说："我只到机场上空，见机场以南有零星部队南逃，机场北部似乎共军已窜到，但未见发生战斗，沈阳可能靠不住了。"蒋介石"沉默不语"。杜聿明接着说出了他认为最要紧的事："对卫总司令的安全应该考虑……"未等杜聿明说完，蒋介石就打断了他："沈阳别的机场情形如何？"杜聿明说："不清楚。"

这时王叔铭也下飞机来到作战室，他向蒋报告说："沈阳已混乱，北陵机场已失，东塔机场也落炮弹，城内还有一个民航机场，我叫留一架飞机等卫先生。"蒋这时未回答王的问题，转过来问我："你还有什么事？"我说："以目前情况看，沈阳已无希望，请校长决定大计，营、葫队伍要赶快撤退，华北如何部署，而最重要的是徐州……"蒋听到这里站起来，边走边说："你回葫芦岛等命令。"我说："撤营口部队的船一直未到。"蒋说："我催桂永清马上去。"

蒋介石说完，走出作战室，向他的专机走去。杜聿明知道，没有时间了，也没有机会了，他推了一下跟在蒋介石身后的王叔铭。王叔铭明白杜聿明的意思，他上前一步，小声地问："是不是把卫先生接出来？"蒋介石说："叫他到葫芦岛指挥。"

有了蒋介石的这句话，杜聿明和王叔铭都松了一口气。尽管如何把卫立煌从混乱的沈阳接出来还是一个难题，但终究蒋介石表态了，这样如果卫立煌脱身至少不用顶着“临阵脱逃”的罪名。

蒋介石向南京飞去，杜聿明立即飞回葫芦岛。

在最后时刻，蒋介石对多年跟随自己征战的将领如此冷漠，这令不得不返回战场的杜聿明心绪黯然，因为谁都知道此刻的东北危在旦夕。

“一直到解放军进入沈阳市区，蒋介石还不命令卫立煌离开沈阳。”卫立煌的秘书赵荣生记述道，“他为了向美国老板表示他还有一个大将军在沈阳，国民党还没有失败，还占着东北的司令部呢，拖一个小时也好，拖十分钟也好。蒋介石对卫立煌怀疑，卫立煌到东北九个半月，一直是派特务暗中监视，一举一动都有人向南京报告。有时蒋介石嫌特务汇报不及时，更直接打电报询问‘剿总’参谋长赵家骧：‘现在卫总司令在干什么事情？’赵家骧给蒋介石回电说：‘总司令端坐总部，一言不发。’”

没有证据显示，卫立煌要在最后时刻背叛蒋介石，这个曾与共产党人关系密切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也没有出逃的计划。但是，当他听说防守沈阳的第五十三军有些军官不但正在策划起义，并且有扣留他的企图时，他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的出路了。严格地说，当时卫立煌已没有指挥部队的大权，蒋介石明令沈阳防御由第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指挥。能够得到蒋介石的如此信任，并取代卫立煌而成为最高军事指挥官，周福成受宠若惊。他下决心死守沈阳的重要心理依据是，他是第五十三军老资格的军长，而在防御沈阳的十四万国民党军中，只有第五十三军保持着完整的三个师，其他部队都已残缺不全，周福成认为他可以有效地掌握部队。

这是一个极其混乱的时刻。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已经包围沈阳，几乎每一个方向都发生了战斗。由长春南下的十二纵及各独立师，经过三百多公里的急行军，已插入铁岭与抚顺之间。三十六师先占铁岭；三十五师截住撤退中的第五十三军一三〇师的一个团并将其歼灭；独立一师和独立三师攻占沈阳东面的前台屯一线；独立四师解放了本溪；独立十师解放了抚顺。由辽西战场东进的第一、第二纵队日夜兼程，攻克沈阳以北的新民与巨流河后，插向沈阳以西——至此，沈阳已完全暴露在东北野战军的攻击之下。

第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不知道，自己的部队内部早已分崩离析，各师师长甚至包括他的副军长，都已与他同床异梦。

国民党军第五十三军由原东北军部队整编而成。与很多东北军的老部队一样，其官兵与共产党军队的来往，可以追溯到西安事变前的陕北。一九三八年武汉会战结束后，一二九师师长周福成升任第五十三军军长。之后，该军参加了南昌会战、长沙会战、鄂西会战、滇西反攻和入缅作战。内战爆发后，一九四七年七月，第五十三军从华北战场调入东北战场，周福成被任命为国民党军第八兵团司令官兼嫩江省府主席，同时兼任第五十三军军长。

“那时的东北战场，民主联军已经掌握了主动权，我暗自打量，认为时机已到，但找不到适当的人和共产党联系。”——第五十三军副军长赵镇藩，在陕北时就与共产党人有来往，当年李克农到洛川面见东北军将领，就是由他负责接待的，那时他是同样属于东北军的第六十七军参谋长。第五十三军进入东北战场之际，也是共产党人开始向这支军队内部进行政治渗透之时。一九四七年七月，第五十三军刚刚到达铁岭，就有一位中年妇女找上门来，她叫李书城，是赵副军长的同乡，而且两家人是世交。李书城直截了当地对赵镇藩说，自己是有七年党龄的共产党员，随即拿出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吕正操的亲笔

信，信上明确地劝说赵镇藩“把握时机，采取行动，率部起义”。赵镇藩问：“你怎么敢来？不怕我把你扣押起来吗？”这位女共产党人表情严峻：“不怕！要怕我就不来了！我们共产党人以完成党的任务为最大光荣，其他不计！”赵镇藩表示：第五十三军的四个师中，争取其中的三个师长问题不大，只有一三〇师师长王理寰“没有把握”，而“军长周福成非常顽固，不易争取”。“虽然做不到整体行动，部分起义是没有问题的”。随着东北战局的剧烈变化，第五十三军各师师长都感到前途渺茫。十月二十二日，一一六师奉卫立煌之命从铁岭向沈阳撤退，但是，走在最后担任掩护任务的三四六团被包围了。丁赞尧团长给赵镇藩打电话问怎么办，赵副军长的回答是：“见机行事。”结果这个团在丁团长的带领下投诚了。

此刻，沈阳城破在即，第五十三军也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

令赵镇藩没有想到的是，军中的起义谋划者正是他认为“没有把握”的一三〇师师长王理寰。

一九四八年五月，在开原战役中被俘的一一六师原师长刘润川、原副师长张绍贤、原参谋长吴和声以及三九〇团原团长傅广恩被解放军释放。这些军官请求周福成军长收留他们，周福成却异常恼怒地说：“这几个东西都被共产党训练好了”，定是被派回来劝说拉拢来的。命令王理寰把他们看管起来，不能让他们与官兵见面。王理寰让他们暂时住在自己的师部，然后打电话给沈阳的卫立煌。卫立煌“遂保送他们到南京中训团受训，保持原来军阶”。三九〇团原团长傅广恩临去南京时，交给王理寰一封信，信中的话令王师长“心中很为踌躇”，时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的吕正操在信中告诉王理寰：“是非进止，早在洞鉴。兄举足轻重，翘望以待。”

十月二十二日，一三〇师奉卫立煌之命从新民撤回沈阳。王理寰在陪同周福成视察防区的时候，劝说军长就如何应对眼前的局面“研究

研究”。不料周福成火了：“你不用怕，沈阳一丢，美国必出兵，国际战争就起来啦！蒋总统命令，不得已时还有焦土毁灭呢，什么也不交给共产党！”王理寰说：“焦土毁灭未免惨无人道，于心不忍，识时务者为俊杰，军长想想吧！”周福成很不以为然地说：“哪个战场里也不能顾虑这个。王理寰，你的勇气哪里去了？塔岗战役（一九三八年春，第五十三军在河南淇县塔岗阻击日军进犯）打坏了眼睛你还指挥，今天怎么泄气了？”王理寰说：“塔岗是抗日，现在是内战，谁给蒋介石打天下！”周福成气得把桌子一拍，大声嚷起来：“王理寰你疯啦！赶快回去，把阵地整理好！否则我要处置你！”

王理寰回去了，但他并没有“整理阵地”，而是开始筹划起义了。

二十三日一早，王理寰去了一一六师，刘德裕师长一见面就说：“听说你昨天和‘老五板’（周福成的外号）拌嘴啦？你说的我都同意，你可千万别忘了我。”王理寰格外认真地问：“这是造反，弄不好可要掉脑袋。你同意吗？”刘师长说：“我同意，弄好了就不掉脑袋。你办吧。”王理寰接着去了暂编三十师，师长张儒彬去阵地了，只有副师长王冠英在。王冠英见王理寰一脸沉重，忙问：“外边情况怎么样？咱们打算怎么办？”王理寰将打算起义的事说了，并告诉他一一六师刘师长也同意。王冠英说：“我同意，张师长没问题，等他回来我向他讲。”王理寰最后去了驻守在浑河沿的东北第二守备总队，总队长毛芝荃回答得更痛快：“什么时候开会，通知就参加。”

二十九日上午，心存异心的军官们在沈阳同泽街二十三号开会。参加者有：暂编五十三师师长许赓扬、一三○师师长王理寰、沈阳商会副会长卢广绩等。会议决定了各部队之间的联系方式以及如何与共产党方面取得联系。

三十日上午，派去与共产党方面联系的人回来了，带回一封信：

王师长：

来信敬悉，兄等深明中国大局，以此义举，实为钦佩。我们以一部暂住飞机场，但绝不发生误会。特此敬复，并致敬礼。

管松涛 罗春生

十月三十日

管松涛，辽北军区独立一师师长；罗春生，辽北军区独立一师副师长。

还是这天上午，卫立煌的夫人韩权华在北平接到宋美龄的电话，宋美龄告诉她总统已命令卫立煌到葫芦岛指挥。韩权华马上问可否立即告诉卫立煌？宋美龄说：“当然可以。”然后电话就挂断了。

卫立煌当即决定离开沈阳。

他知道王叔铭在浑河民航机场给他留了一架飞机。

这是一九四八年十月三十日的中午。

国民党军驻沈阳的空军部队已开始全面撤退，沈阳的几个机场顿时一片混乱。大多数准备逃亡的军政大员集中在北陵机场，一部分人员和行李已经被运走，但是随着聚集而来的人越来越多，只要有一架飞机降落，急着逃亡的人便蜂拥而上，结果导致飞机严重超载无法起飞，机场的地勤人员和空军派来的部队动用了武力，可在飞机上的人谁也不肯下来。混乱之中，三架留在机场专门运送地勤人员和家眷的飞机见势不妙，在只上了一部分人员的情况下擅自起飞了。三架飞机依次在跑道上滑行的时候，机场人员纷纷从指挥塔台上跑出来追赶，但是无论如何呼喊飞机还是飞走了。下午，从北平飞来几架飞机，见机场地面人头攒动，竟然没敢降落，盘旋几圈之后也飞走了。此后，

北陵机场就再也没有任何飞机起降，机场上的大批军政官员和家眷们不知如何是好。突然，有人说，飞机在浑河机场降落了，军政大员和家眷们扛起行李疯狂地向浑河机场奔去。

卫立煌一行到达浑河机场，发现那里已被逃亡的人群挤满。国民党军空军派来接卫立煌的飞机刚一降落，机场上的人流就不顾一切地冲上去，以至最后连飞机的舱门都关不上了。飞行员跳着脚大骂之后，悄悄地告诉卫立煌，让他立即去东塔机场。

历史在这一刻出现的情景犹如舞台上演出的戏剧：

浑河机场上，飞行员先是发动了几次飞机，然后声称飞机有故障发动不起来了，说搬上飞机的行李可以不拿下来，但是人都要下来帮助推飞机，等飞机发动了大家再上来，不然这一飞机的人谁也走不了。已经挤上飞机的军政大员和家眷们犹豫再三，只能下来。可是，等所有的人都下了飞机后，飞行员突然关上舱门，飞机轰然一声滑向跑道，然后飘飘然地起飞了——那些准备逃亡的人不但没有逃走，连贵重的细软也让飞机带走了，可以想象那一瞬间出现的巨大的绝望，军政大员和家眷们在跑道上奔跑着、呼喊着，然后捶胸顿足，放声大骂，嚎啕痛哭。

下午十五时半，卫立煌到达东塔机场，这个身经百战的将领此时身心疲惫，万念俱灰。在浑河机场使用欺骗手段飞上天空的那架飞机在东塔机场降落了。飞行员不开舱门，蜂拥的人群上不来。卫立煌在卫兵的扶持下先上了一辆卡车，然后卡车的后门对准飞机的舱门，舱门一开，卫立煌瞬间被推进飞机里。那一天，同在东塔机场的一位名叫胡圣一的国民党军采购处长目睹了当时的情形：

此时军人的卡车同时也开近机舱门，有不少人跳上了卫的卡车，蜂拥而入，这些大员们哪里挤得过他们。因此，顿时造成混乱，除了喊叫怒骂而外，枪把子、手杖都挥舞开了。大员们由卫兵拥护着多数还是挤进去了，当时由卡车上挤掉下来的人也很多，其中有国民党合

江省主席吴翰涛夫妇、嫩江省主席彭济群、“剿总”政务委员会委员王家桢等。还有几个人扶着机翼爬到机顶上，其中一个军人打破机窗想由窗口进去，当飞机发动徐徐前进时，那些在机顶的和机窗口的都被甩下来受了重伤。

跟随卫立煌上飞机的有：东北“剿总”参谋长赵家骧、政务委员会副主任高惜冰、安东省府主席董彦平、辽宁省府主席王铁汉、沈阳市长董文琦、新编第一军军长潘裕昆、新编第三军军长龙天武等。

飞机离开沈阳的时间是：一九四八年十月三十日下午十六时。

黄昏时分，在葫芦岛，杜聿明和侯镜如在锦西机场迎接了卫立煌。

听说所有的军政大员都没有来得及带行李，杜聿明命令给他们每人发两条军用棉被和一件棉大衣。

“差一点见不了面！”卫立煌一下飞机就对杜聿明说。

卫立煌一走，蒋介石连续收到周福成的两封密电：

特急（2007密）

大总统钧鉴：卫立煌总司令于三十日下午逃走，沈阳秩序尚好，敌屡攻未逞，恳火速补济给养、弹药。谨禀。53A周福成三十晚。甲电。

十万火急（2116密）

大总统亲密，王理寰已叛乱，现正解决中。如何再陈。53A周福成三十晚。乙电。

蒋介石立即命令周福成代理卫立煌的职务。

得到这纸任命的周福成趾高气扬：“我受蒋委员长付托，与城共存亡，我有两个月的粮食，足够的弹药，一定和共产党拼个你死我活。迫不得已时，委员长有命令，焦土作战，我和沈阳市同归于尽。你们

穿大褂的不必拿我们穿二尺半的作政治资本，向共产党换取位置。我受委员长栽培，只听委员长的话，其他的我都不听！”

十一月一日，东北野战军对沈阳实施总攻。

攻击部署是：第二纵队司令员刘震、政治委员吴法宪统一指挥第一、第二纵队，由沈阳西、西北两面实施突破；第一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政治委员萧华指挥独立一、三、四、十二、十三师，由沈阳东面和北面突破；司令员钟伟、政治委员袁升平指挥第十二纵队由沈阳的南面向北突破。

一日拂晓，攻城部队仅用二十分钟就突破了国民党守军的第一道防线。

新一军暂编五十三师在师长许赓扬的率领下宣布起义。

第五十三军一三〇师集体放下武器，让开沈阳北大门一带的阵地。

上午十时，攻城部队进入沈阳市区。

一纵三师攻击的西面，是最顽固的国民党军二〇七师的防区。二〇七师并没受接受周福成的指挥而是在独立作战。防区内工事坚固，堡垒错落。三十一日晚，三师突破第一道防线时，遭到炮火和坦克的火力拦截。纵队司令员李天佑和政治委员梁必业带着炮兵团赶来支援。一日凌晨，未等三师发动新的攻击，二〇七师突然发动反击。九团一营教导员孙玉章组织前沿的政治喊话，解放军官兵警告二〇七师官兵，沈阳已是一座孤城，只有投降才有活路。喊话收到了效果，一座碉堡里伸出一面白旗，几分钟后，国民党军的一个上尉连长走出来，声称是谈判起义的，孙教导员说：“你们只有投降！”一营趁势向第二道防线前进。守军疯狂抵抗，率领突击班前进的三连副指导员董

克勤中弹牺牲。三连和一连的官兵怒不可遏，以伤亡几十人的代价突破了第二道防线。

一日清晨，二纵四师十二团一营在团参谋长程璠的率领下，冲进沈阳市区，迎头撞上国民党守军的一个装甲团。装甲车轰隆隆地开过来，来不及作出战斗反应的官兵纷纷跑进旁边的一座大楼里，开始商量如何对付这些钢铁家伙。从大楼向下看，装甲车分三路包围了大楼，机关炮猛烈地射击，大楼的窗户被打得粉碎。一营的战士中，至少有一半人是打锦州时被俘后参加解放军的，而且大多是新兵。这些新战士面对装甲车的攻击显得有些慌张，程参谋长大声喊：“装甲车能上楼吗？”大家说：“不能！”程参谋长又喊：“我们在楼上的暗处，装甲车在楼下的明处，有什么可怕的？”一连长许维国带领一个爆破组，决心做出个样子给战士们看看，他们突然冲出大楼，把一根爆破筒塞到了一辆装甲车的下面，一声巨响过后，战士们看见装甲车里的弹药被引爆，其余的装甲车纷纷退了回去。受到鼓舞的官兵开始向装甲车发动围攻，战斗中排长陈开美和副排长王洪勋等二十多名官兵付出了生命。最后，一个国民党军副营长举着白旗乘坐一辆吉普车来了，一路使劲地喊：“别打了！别打了！”到了跟前，这个副营长问：“你们是二纵刘震司令的队伍吗？”程参谋长说：“没错！”于是他们说装甲车团要投诚——装甲团六十辆装甲车，让一连官兵打坏两辆，剩下的五十八辆让投诚的国民党军官兵开着到四师师部报到去了。

东北野战军官兵在沈阳市区错综复杂的街巷中不断应对各种各样的局面。有的建筑物里国民党守军拼死抵抗，密集的子弹导致不少官兵伤亡，但说不定哪条街上会突然走出来一队国民党兵，说他们要投诚，于是，几个战士就能领回来一大群投降的国民党军。一个国民党军副营长举着白旗跑过来，把街上的解放军干部往院子里拉，然后喊：“全体集合！”院子里的国民党兵已经列队完毕，队列的后面还有八辆坦克。副营长递上来印花的名片，说他们的营长早就跑了。解放

军干部刚开口介绍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国民党军便一起举起了一张彩色的纸，他们喊："都知道了！"——那些彩色的纸，是东北野战军印制的传单。

上午九时左右，国民党军东北第二守备总队司令部派来一辆吉普车，要接二纵五师十四团的解放军代表去接洽谈判。十四团政治处主任王佐邦带着三名股长以及几名战士到达五马路的一幢楼上。出面谈判的是守备总队总队长毛芝荃、副总队长佟道和参谋长胡大谟。三个人提出的中心条件是承认他们"火线起义"。王佐邦主任说，我们既没有接到上级关于你们起义的通报，双方更没有事先达成某种协议，因此现在我们无权承认你们"火线起义"，守备总队只能立即交出防御地图，所属部队全部撤出防区，到指定地点集中。于是，就是否"火线起义"的问题，双方剧烈地争论起来。争吵的时候，守备总队司令部里的电话铃声不断，大多是报告部队被打散或者投降的消息，弄得气氛愈加紧张。最后，副总队长佟道和参谋长胡大谟同意先达成停火协议，但是总队长毛芝荃就是不同意，坚持必须给他一个"火线起义"的承诺。正在这时，突然有个国民党军军官大喊大叫地冲上楼，端着冲锋枪就朝天花板扫射："我们早就起义了，他们还打我们，谈判个屁！"顿时，王佐邦主任身边的战士也端起枪对准了毛芝荃。双方僵持的时候，王主任说："刚才那一梭子是朝我放的，这说明你们既不想起义，也不想投诚，而是想打，那就请便吧。"说完，就要走人，被副总队长佟道和参谋长胡大谟拉住，他们还是要求继续谈判。再次谈到"火线起义"的时候，毛总队长拿出两个证据，说他早就下令部队不抵抗，同时还与高级将领们商量过起义的事。但王佐邦主任说，从没有看到过守备总队起义的迹象，无论如何不能认定为"火线起义"。毛队长提出派代表去东北"剿总"司令部找人查证——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为去那里要路过还在抵抗的二〇七师的防区，而且王主任还要化装成国民党军军官。好容易到达东北"剿总"司令部，得知那里已经宣布投诚，司令部里混乱不堪，解放军官兵和国民党军官兵出出进进，根本找不

到可供查证的人。只好又回来继续争吵。下午，楼外突然枪声大作，毛总队长的警卫部队被解决了，毛芝荃这才让步，交出了防御部署图，下令部队去指定地点集中。当毛总队长本人被要求留在原处听候处理时，他又愤怒了，说先是起义，后是投诚，现在怎么又成了俘虏？两天后，王佐邦主任带着慰问品看望了他——国民党军东北第二守备总队最后被定性为“火线投诚”。

十二纵攻击到东北“剿总”司令部时，没有遇到抵抗。有人来联系起义，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周彬说：“什么时候了，还起义？叫他们赶快放下武器！”于是，东北“剿总”副参谋长袁克征前来商谈，坚持要求起义。周彬请示了纵队司令员刘震，刘司令“也是不同意起义”。双方争论长达两个小时，袁副参谋长说他回去商量一下。一会儿，他回来了：“我们可以考虑交枪投诚，但请保障我们几个将官的安全。”在得到不但保障个人生命安全，而且还保障个人财产安全之后，袁副参谋长在放下武器的文件上签了字。傍晚十八时，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全体残留人员集体交枪。

在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司令部里，解放军官兵没有找到周福成。

下午，二纵六师十六团一连官兵报告说，他们在一家银行的楼内发现了“国民党军的大官”——一连长黄达宣率领两个排在大西门里附近的世合公银行外发现了国民党兵，于是发起攻击。国民党兵往银行里退，但始终没有开枪。黄连长和他的官兵冲了进去：

有一间大房子光线很暗，桌子上摆得非常杂乱，酒瓶、罐头、电话机狼藉一片。战士们的枪口对准屋内所有的人，室内气氛显得异常紧张。瞬间，只见一个外穿大衣内穿便服的人走过来，他低声对黄达宣说：“我叫周福成，我们正和你们第三纵队（实为辽北军区独立一师）联系起义。”黄达宣说：“你们要老老实实，我们的政策你们是知道的。”与此同时，又把周福成的警卫人员缴了械。一切解决得很顺利。但外面不时还传来稀疏的枪声。此时赶来的营长马志高对周福成说：“你放下武器这很好，可是你们的第二〇七师还在浑河一带顽抗，你马上命令他们投降。”周福成为难地说：“第二〇七师我指挥不动。”

二纵六师师长张竭诚说：“你若早点起义，我们何必动用这么多军队？”

周福成说：“你们辛苦了。”

二日下午十六时，国民党军二〇七师残部被歼灭后，沈阳全城被人民解放军占领。

东北野战军主力对沈阳发起总攻的时候，在沈阳的西南方向，第七、第八、第九纵队对营口形成包围。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军军长刘玉章正万分焦急，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亲率“重庆”号巡洋舰以及二十多艘登陆舰和商船抵达营口港。为了掩护撤退，刘玉章集中起两个团的兵力和全部的火力，对急速赶来的东北野战军实施反击。当晚，第五十二军主力开始登船。九纵的重炮团和已经抵近海岸的部队猛烈射击。至二日上午十时，第五十二军一万四千人被歼，另一万人乘船逃脱。

营口守军撤退的同时，驻守锦西和葫芦岛的国民党军第六十二军、第九十二军二十一师和独立九十五师被海运至秦皇岛，第三十九军和第五十四军被海运至上海、南京后转运徐州战场。

九日，东北野战军收复锦西、葫芦岛。

三天后，驻扎在承德的国民党军第十三军撤入关内。

至此，辽沈战役结束。

辽沈战役，是解放战争中第一个具有决战意义的大规模战役，战役“为解放华北和全中国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此次战役，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参战部队为：两个兵团部、十二个步兵纵队、一个炮兵纵队、一个铁道纵队以及独立师、骑兵师

等，约七十余万人，加上地方部队和补训部队约三十万人，战役投入总兵力约一百万。国民党军先后投入五个兵团、十六个军、五十一个师（旅），连同特种兵和保安部队，共约六十万兵力。战役历时五十二天，东北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司令部、锦州指挥所、四个兵团部、十一个军部、三十六个师（旅）以及非正规军九个师（总队），共计歼敌四十七万二千人。其中毙伤五万八千六百人，俘虏三十二万四千三百人，起义、投诚九万零九百人。战役缴获：各种火炮六千五百四十六门，轻重机枪一万六千二百九十三挺，长短枪支二十万三千九百七十一支，飞机九架，坦克一百六十辆，装甲车一百八十辆，汽车两千两百六十一辆，战马两万三千五百九十五匹，大车一千零六十二辆，电台三百五十三部，炮弹两万七千零一十八枚，枪弹两千四百三十五万发。至战役结束，东北人民解放军共损失人员六万九千二百一十三人，其中阵亡一万零四百零一人，负伤五万三千三百二十九人，失踪一千八百四十七人。

辽沈战役震惊世界。

路透社十一月一日电："国民党在满洲的军事挫折，现在已使蒋介石政府比过去二十年存在期间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了崩溃的边缘。"《泰晤士报》评论说："中共占领东北，又将出现一个由北向南的征服形势……现在看来，中国如果要统一，似乎将从东北出发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情绪悲观："我们非常不愿意地得到这样的结论：国民党现政府之早日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了。"美国驻华使馆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称，东北的失利，是"国民党军最后一连串军事失败的开始"。美国政府认为："满洲的丧失对政府是一个大悲剧，因为满洲是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这亦是原来吸引政府到那里去的原因，军队和资源的损失，尤其值得注意，没有军队和资源，在华北的安全的抵抗就成为不可能。"

直至多年以后，国民党方面还有人在反思东北失败的原因，主流观点认为，这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内部腐败和经济混乱导致的结果。也有人认为“这只是促成失败的一个原因，而非失败的根本原因”：

我们银行准备金不足，但总算还有银行；还有不少准备金，钞票也是精印出来的。请问毛泽东的银行在哪里？准备金在哪里？他们的钞票是在布条子上盖一颗印，写上多少元就算是多少元，怎么不见他们金融受影响？这是事实呀！这个事实是根据军事上的成败而存在的，人家天天打胜仗，所以布条子也可以取得人民的信任。我们天天打败仗，什么券人民也不信任。

十一月七日，卫立煌从葫芦岛到达北平。

蒋介石下令：“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军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

在北平孤独地住了几天后，卫立煌飞往上海，然后飞往广州。他立即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后被军用专机“送”到南京上海路家中软禁。一九四九年初，国民党政权垮台在即，卫立煌终于得以与夫人到达香港。这一年的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卫立煌给毛泽东发去一封贺电：

北京毛主席：

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中国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请代致电贺忱。

煌十月江（三日）电

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五日，卫立煌从香港回到广州。

一天后，毛泽东致电：

卫俊如先生：三月十六日电报收到。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望早日来京，藉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

卫立煌到达北京后，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留他吃晚饭，又留他看电影。

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七日，北京天降大雪，在数十年戎马生涯中指挥过三分之一的国民党军队的卫立煌，因患病离世，终年六十四岁。

卫立煌离世的时候，当年将他从沈阳救出的杜聿明，刚刚获得特赦走出北京的功德林监狱——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七日，卫立煌从葫芦岛到达北平。八日，杜聿明也从葫芦岛撤到北平，但是第二天他就离开了，“以赴刑场之心情”重上战场。杜聿明后来说：“我的恐惧心理一直上涌，觉得徐州战场好像一个刑场，我一到徐州，不是被打死，即是被俘，思想上萦绕着去不去徐州的问题：去则大势已去，处处被动挨打，毫无办法；想称病到医院去治病，既怕对蒋介石失信［十一月三日复信蒋介石，同意到蚌埠去指挥］，又怕已准备好的即将起飞，忽然不去，别人也会笑我胆怯避战。”

杜聿明离开的那天，十一月九日中午，傅作义为他设宴饯行。酒过三巡之后，杜聿明口气肯定地对傅作义说：“东北共军将近百万，很快就会入关，他的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及战力远远超过关内共军。从军事上讲，共产党一年以内将统一中国。”傅作义立即想到了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的那席话：“满洲和它的三十万左右最优秀军队的丧失，是对政府的一个令人吃惊的打击。就我看来，军队的丧失是最严重的结果，这实在是国军死亡的开端。”酒席还没结束，又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起义了。起义发生在中原地带大运河附近，就是杜聿明将要前往的那个“刑场”。

杜聿明独自走进北海公园。

湖水静谧，残雪斑驳，年代久远的白塔高高地矗立在萧瑟的林木之上。

杜聿明留给北平的最后一句话是：“别矣故都，此生再看不到你美丽雄伟的画面了。”

下午十四时半，杜聿明飞往南京。

此刻，在中国国土的腹部，一场比辽沈战役更大规模的厮杀——国民党一方称之为徐蚌会战，共产党一方则称之为淮海战役——已经爆发了。

# 第十二章 淮海战役：喊杀之声不绝于耳

## 祝总统赴美休养一路平安

孔夫子有言在先：“有文事者必有武备。”

两千多年后，一个秋凉时节，雕梁画栋的孔府成为军事大本营。

华东野战军前委驻扎在孔府，前委扩大会在孔林里召开。四周枝叶繁盛的松柏树龄都在百年以上，刻有历代文字的巨大石碑已被岁月剥蚀得斑斑驳驳。一群刚刚打完一场城市攻坚战的将领们，置身在弥漫着松脂气的幽深之处，激烈地讨论着下一步的作战方向。

解放战争中淮海战役的战场，并不在通常意义上的华中淮海地区。这场规模巨大的战役战场纵横千里：东自黄海边，西至河南商丘，北自山东临城，南至淮河北岸。这是一片介于黄河与长江之间、以徐州为中心的广阔地域，北上越过陇海路可直通平津，南下越过长江可直达京沪，陇海和津浦两条铁路、运河和淮河两条水路交错其间，是历史上兵家必争的中原战略要地。

就淮海战役的演变进程而言，军史界素有“小淮海”与“大淮海”之称。

济南战役后，华东地区的战场态势已发生变化。国民党军徐州“剿总”自一九四八年九月开始收缩兵力，邱清泉、李弥、黄百韬的三个兵团集结在徐州以东、以西地区，苏北海州一线兵力部署相对薄弱。华东野战军攻击济南时，预计国民党军将自徐州方向大规模增援，但是国民党军的增援行动没有实施，华东野战军兵力雄厚的打援兵团没能接敌。济南失守后，国民党军失去了徐州北面的屏障，因此，在长江

以北的中原战场上，国共军事力量形成近距离对垒：华东和中原两大野战军总兵力达六十万以上，而国民党军七个机动兵团、九个绥靖区司令部的正规军和地方部队总兵力也将近百万——兵力庞大的两军对峙于一个相对狭窄的空间里，双方都企图迅速判明对方的意图并作出决策：华东野战军考虑的是如何进一步扩大战果，而国民党军必须应对徐州军事集团北面门户洞开的局势。

济南战役还正进行的时候，粟裕考虑华东野战军打下济南后有两个作战方向：一是在徐州以西寻找战机。在这个方向上作战，还可以与刘邓指挥的中原野战军协同，但战场被夹在国民党军华中与徐州两大军事集团之间，回旋的余地不大，兵力上也处于劣势。二是南下出兵徐蚌线，攻占淮阴和淮安，这样不但会使徐州一带的国民党军退守长江，还可以将山东和苏北战场连接在一起。

九月二十四日，粟裕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首次提出“淮海战役”一词：

军委，并华东局，中原局：

（一）至此刻为止，攻济战斗已突入内城六个团，目前敌极混乱，决乘此时机于白昼继续攻歼该敌。如内城之敌解决，则固守城南郊千佛山、马鞍山之敌亦易解决［齐鲁大学之敌昨已投降］。估计攻济战斗日内即可完全结束，但援敌邱（邱清泉）兵团直至今晨才开始自商丘以北分向曹县、成武间地区北进，而黄（黄百韬）兵团则尚未完全集结。以现有材料估计，该兵团之六十四师亦到达砀山地区。李（李弥）兵团则尚在固镇及其以东地区。似此，如援敌知济南已被我完全攻占，则停止北援而转为加强戒备，以防我主力南进之可能性，戒备似较继续北援之可能为大。如敌仍继续北援，我们当按既定之方针歼灭援敌。如敌停止北援，则我们下步行动，拟作如下建议。

1、为更好地改善中原战局，暴露津浦线，并迫使敌人退守［至少要加强］江边及津浦线沿线，以减少其机动兵力，与便于我恢复江边工作，为将来渡江创造有利条件，以及便于尔后华野全军进入陇海路以南作战，能得到交通运输供应的方便，和争取华中人力、物力对战争的支持，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该战役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苏北兵团［须加强一个纵队］攻占两淮，并乘胜收复宝应、高邮，而以全军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今江苏邳县）车站沿线两岸，以歼可能来援之敌，如敌不援或被阻，而改经浦口、长江自扬州北援，则我

于两淮作战结束前后，即进行战役第二步，以三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结束淮海战役，尔后全军转入休整。

2、只进行海州作战，仅以攻占海州、新浦、连云港等地为目的，并以主力控制于新安镇（今江苏新沂）、运河车站南北及峄（峄县）枣（枣庄）线，以备战姿态进行休整。此案对部队休整［只有攻城部队须稍事休整，至昨黄昏为止，攻城部队之六个纵队仅伤亡八千余人，昨晚及今晨伤亡尚不在内，依此伤亡并不算大］更便利，但会增加今后攻占两淮的困难［敌可能增兵］。

3、全力向南求援敌之一部而歼灭之，但在济南攻克［后］，敌人加强警惕，可能退缩，恐不易求战。

4、全军即进入休整，如此对部队有好处，但易失去作战之秋凉气候，和济南失守后加于敌人之精神压力。

……

粟

敬（二十四日）七时

中央军委致电中原野战军征求意见。

第二天，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副司令员陈毅、参谋长李达回电："济南攻克后，我们同意乘胜进行淮海战役，以第一方案攻两淮，并吸打援敌为最好。"

二十五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

饶（饶漱石）粟（粟裕），告许（许世友）谭（谭震林）王（王建安），刘（刘伯承）陈（陈毅）李（李达）：

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目前不需要大休整，待淮海战役后再进行一次休整。淮海战役可于十月十号左右开始行动。你们应利用目前半月时间，使攻济部队获得短时休息，然后留一个纵队位于鲁西南起牵制作用，吴化文亦应移至鲁西南，其余全部南下，准备进行几个作战：（一）估计不久邱兵团将退回商砀地区，黄兵团将回至新安镇、运河车站地区，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二）歼灭两淮高宝（淮阴、淮安、高邮、宝应）地区之敌，为第二个作战。（三）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为第三个作战。进行这三个作战是一个大战役，打得好，你们可以歼敌十几个旅，可以

打通山东与苏北的联系，可以迫使敌人分散一部兵力去保卫长江，而利于你们下一步徐州、浦口线上之作战。因此，你们应在酉（十月）灰（十日）以前做好有关这一战役的充分的准备工作，要开一次像上月曲阜会议（华东野战军制定济南战役计划的会议）那样的干部会，统一作战意志，调整内部关系。

军委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华东野战军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讨论淮海战役的作战方案。

二十八日，毛泽东再次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致华东野战军，强调“淮海战役第一个作战并且最主要的作战是钳制邱李两兵团歼灭黄兵团”。那时，黄百韬的第七兵团已沿陇海路西进至苏北的新安镇，毛泽东特别提醒，新安镇距离徐州很近，一旦黄百韬遭遇攻击，位于徐州附近的李弥的第十三兵团和邱清泉的第二兵团增援便利，因此这一战役会比济南战役规模更大，需要一个月或一个半月的时间。十几天后，毛泽东就淮海战役作战方针再次致电华东野战军，确定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要求华东野战军“以两个纵队担任歼灭敌一个师的办法，共以六个至七个纵队”，分割歼灭黄百韬兵团的三个师。同时还要以“五个至六个纵队，担任阻援和打援”，“使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不敢以全力东援”。

至此，华东野战军和中央军委共同达成的淮海战役作战计划，依旧属于“小淮海”的范畴。所谓“小淮海”，主要指战役规模而言——尽管毛泽东起草的电报在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时，标题定为《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但是，共产党决策层当时预想的作战核心是：歼灭黄百韬兵团，将控制范围伸展到苏北和苏中去，迫使驻防在徐州附近的国民党军主力回撤长江，至少是回撤一部分兵力，使收缩紧密的徐州军事集团开始疏松，从而乘势占领鲁南和苏北地区的一系列重要城镇。毛泽东希望华东野战军在十一、十二月完成上述作战之

后，一九四九年一月开始休整，三月主力西进配合中原野战军“将敌打至江边各点固守”，然后秋季“主力可以举行渡江作战”。

此时，毛泽东和粟裕都无法预料，一旦战役发动将演变为何等规模，更没有预料到此战最终能将国民党军徐州军事集团全部吃掉。

十月十三日，为配合华东野战军歼灭黄百韬兵团的作战，中央军委命令中原野战军向陇海线上的郑州发起攻击。

郑州之战是淮海战役正式发动前一次重要的战役。

郑州之战不仅结局出乎预料，更重要的是，此次作战推动了“小淮海”向“大淮海”的转变。

郑州扼守平汉、陇海两条铁路的交会处，是国民党军重兵把守的中原重镇。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后，为加强徐州地区的防御以屏障南京，国民党军将驻守郑州的第十六兵团全部东调，其防区由驻守新乡的第十二绥靖区第四十军接替。于是，在郑州以南的战场上，国民党军仅剩三个兵团。其中，黄维的第十二兵团位于河南确山，担负随时准备增援徐州的任务；宋希濂的第十四兵团位于湖北沙市，张淦的第三兵团位于湖北与河南交界处的枣阳、随县，担负阻止共产党军队南下渡江的任务。

中原野战军决定：由刘伯承、李达指挥第二、第六纵队和中原军区部队，继续在豫西牵制黄维和张淦两兵团；由陈毅、邓小平指挥第一、第三、第四、第九纵队，在华北军区第十四纵队的配合下，对郑州发动攻击。其作战部署是：第一、第三纵队组成东兵团，第四、第九纵队组成西兵团，两面夹击；豫皖苏军区部队插到黄河铁桥以南，阻止郑州国民党守军北撤；华北军区第十四纵队和豫北地方部队牵制新乡地区的国民党军，使其不能南下增援。

二十一日夜，中原野战军各部队包围了郑州。

本来作战目标是牵制郑州附近的国民党军主力，令其不能东援将被华东野战军围歼的黄百韬兵团。

但是，仗还没打就出现了意外。

这是中原野战军第一次攻击大城市，二十二日凌晨，准备打一场艰苦攻坚战的官兵进入攻击位置的时候，突然有报告说，郑州国民党守军已经弃城逃跑——从军事常理上讲，对郑州这样的重要战略枢纽的有效防御，至少需要二十个团以上的兵力，但是，此刻担任郑州防御任务的国民党军只有分属于不同军的两个师。这种如同弃之不顾的部署令人无法理解，唯一的解释是：此时国民党军的兵力已到捉襟见肘的程度。

驻防郑州的第四十军一〇六师原驻扎在新乡，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东调后他们奉命接防，官兵们打心眼里不愿意在这里白白送死。而原来驻守在城内的第九十九军二六八师早已军心涣散，因为第九十九军的主力此时也已东调蚌埠，官兵们说，既然老头子都不要郑州了，那还守它干什么?

郑州守军一路北逃，企图向新乡守军靠拢。

如此重要的城市，没打就占领了，这令攻城部队颇感意外。

在九纵司令员秦基伟的攻城部署中，有一支被他称为“北支队”的部队，由豫西四分区司令员张显扬和二十七旅副旅长唐万成指挥，这支部队不参加攻城，而被部署在郑州西北二十公里处的薛岗、苏家屯、双桥和杜庄一线，任务是堵截郑州守军北逃和防御新乡守军南援——这一部署证明秦基伟确有先见之明。

郑州守军的弃城而逃，使原来预想的城市攻坚战瞬间变成了野外追击战。

二十二日清晨七时，郑州守军逃到薛岗一带，被二十七旅七十九团堵住。阻击阵地上的七十九团官兵即紧张又兴奋：公路上挤满了黑压压的国民党军，步兵和一眼望不到边的辎重车辆混在一起，从阵势上看如同郑州守军大搬家。但是，当敌人迅速开设炮兵阵地，炮弹大雨一样倾泻下来时，七十九团的艰苦时刻到了。为了打开北逃的通道，国民党军集中火力和兵力于一点，很快就将七十九团二营的阵地打成一片火海。敌人连续发起冲锋，被打下去后，又重新冲上来，二营阵地上开始了充斥着呐喊声和呻吟声的肉搏战。这时候，从古荥镇出动接应郑州守军的国民党军一〇六师三一八团已经接近战场，其前锋到达七十九团阵地背后的双桥附近，并准备从那里向南发起攻击。在双桥阵地阻击的是四分区基干团的三营。南北两路国民党军用明语喊叫对方，急切地催促对方向自己靠拢。中午时分，依旧没能突破的郑州守军意识到了处境的危险。二六八师组织起敢死队，敢死队员三百多人为一组，一手挥舞大刀，一手提着集束手榴弹，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发起集团冲锋。当敢死队冲上二营阻击阵地的时候，营长王凤书和教导员郭纯夫率领五连迂回到敌人的侧后，官兵们突然向敌人的冲击阵形拦腰杀进去，二十七旅副旅长唐万成率领正面部队趁势出击，位于阵地西侧的独立团也发动反击，最终把二六八师的攻击浪潮压了下去。

此时，郑州守军已经全部走出郑州城，队伍的前锋在薛岗被阻，指挥中心还在老鸦陈寨，后卫部队过了距郑州六公里的十二里屯——国民党军暴露在郑州以北的旷野中，已无回撤的任何可能。

秦基伟认为，凡是突围逃跑的队伍，总是两头强中间弱，于是命令二十六旅突击逃敌的腰部老鸦陈寨，攻击时间定在下午十五时。

下午，没等二十六旅发起攻击，第九十九军参谋长佘辉庭亲自指挥三个团，对七十九团的阻击阵地发起猛烈冲锋，企图在薛岗与苏家屯两个村庄之间撕开一道缝隙。在几十门火炮和机枪的掩护下，三个团的步兵冲进两村之间的洼地，北面赶来接应的国民党军也开始向这个洼地靠拢，南北两敌之间的距离仅剩一千五百多米。七十九团官兵在密集的两面炮火中，利用每一道土坎和每一道断墙顽强抵抗。秦基伟给团长任应和政治委员田耕打电话："坚决顶住，郑州之役全胜，此是关键一着。"十五时，二十六旅对老鸦陈寨的攻击战打响。炮火把寨墙轰开后，各团从四面突入寨内，国民党军拥挤着四处逃散，老鸦陈寨旁边的公路上车炮拥塞，人马践踏。从北面增援的国民党军远远望见一片溃败的景象，竟急忙收缩兵力开始回撤。郑州守军北逃不成，就往东朝开封方向跑，但是七十六团早已在那个方向等着他们呢，混乱的队伍刚一出现，立即受到迫击炮和重机枪的拦截射击。惊慌失措的郑州守军只好又往回跑，最后全部拥挤在方圆不足两公里的野地里。

郑州之战最后的战果是：歼敌一万一千余人，除第四十军军长李振清负伤逃跑之外，第四十军少将参谋长尹继英、一〇六师少将师长赵天兴被击毙，第九十九军少将参谋长佘辉庭、二六八师少将高参李福五等被俘。

本来是配合华东野战军的牵制作战，由于国民党军出人预料地将郑州放弃，毛泽东原来设想的淮海战役（小淮海）结束后再西进作战的任务，已经提前完成。这就使得战场态势呈现出新的格局，即中原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已处于从东西两面夹击徐州的作战态势上。

中原野战军占领郑州的当天，毛泽东致电陈毅、邓小平、粟裕等人，建议中原野战军"迅即全军东进"：

> 刘峙认为我华野有出苏北企图，停止邱（邱清泉）、孙（孙元良）向鲁西南行动，以李（李弥）兵团之第九军加入东面防堵，以邱兵团由商丘向砀山收缩。白崇禧则为对付我二、六、十纵，以黄（黄维）张（张淦）两兵团向桐柏方面进攻，陈邓攻郑作战完全不受南面威胁。因此，为了保障我华野全军在淮海战役中完全胜利，请你们准备着，在攻克郑州休息数日后，迅即全军东进，相机攻占开封。或者不打开封，直出徐蚌线。不但钳制孙元良、刘汝明，并且钳制邱李两兵团各一部……

同一天，毛泽东再次致电陈毅、邓小平、粟裕等人：

> 目前极好的形势是白（白崇禧）部黄（黄维）张（张淦）两兵团被我二、六、十纵吸引到桐柏山区，在相当长时间内不可能回头进到黄泛区，威胁东北面我军之行动，有利于我陈邓在攻郑胜利后，以一部或大部或全部向东行动，协同三（第三纵队）广（两广纵队）两纵，不但牵制孙（孙元良）、刘（刘汝明）全部，而且可能牵制邱、李一部。具体行动在攻郑后决定，我们预计是以一部留郑州、淮阳之线，以主力于邱李两兵团大量东援之际，举行徐蚌作战，相机攻取宿县、蚌县（蚌埠），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破毁津浦路，使敌交通断绝，陷刘峙全军于孤立地位……

这是毛泽东根据战场态势变化作出的一个重要的设想，即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共同进入徐州战场。其中，建议中原野战军对宿县、蚌埠发起攻击，已经明显带有合围刘峙集团进而展开决战的意图。

宿县，徐州以南津浦铁路线上的重镇。

蚌埠，宿县以南津浦铁路线上的重镇。

一旦占领宿县与蚌埠，就等于截断了徐州战场上国民党军南撤的退路。

出乎陈毅、邓小平的预料，郑州丢失后，国民党军随即放弃了开封，全部兵力东撤蚌埠以拱卫徐州，致使中原野战军未费一枪一弹重新占领开封。

开封被占的那天，即十月二十四日，陈毅、邓小平向中央军委提出了中原野战军东进作战的三个方案：一、向东歼击集结在蒙城附近

的孙元良兵团；二、向东直接出击徐蚌线，攻占宿县、蚌埠；三，东进至河南商丘地区，待黄维兵团东进时寻机歼敌。

第二天，中央军委复电，认为中原野战军“应从现地取捷径”南下蒙城集中，因为位于皖北的“蒙城是机动地带，可东、可西、可南、可北”。然后，再从蒙城“直取蚌埠，并准备渡淮南进”，“控制淮河以南、长江以北、淮南铁路以东、运河以西的广大地区”。如此一来，徐州战场上的国民党军必定要“分兵南压”，或者是位于华中的白崇禧集团要“调兵向东”，华东野战军就可以集中兵力“歼灭刘峙系统五十五个师的三分之一左右，即十八个师左右，取得大胜”。

陈毅、邓小平回电，认为挺进淮南不妥，因为地域狭小，缺粮缺水，大兵团难以机动，因此主张部队集结在河南与安徽交界处的永城、亳州、涡阳中间地区，这样“无论出宿蚌线或打孙元良均更方便”。而目前还是“以力求歼击孙元良为第一要着，如不好打，则向宿蚌线进攻”。就在这时，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准备攻击湖北与河南交界处的老河口地区，驻守在那里的国民党军是宋希濂的第十四兵团第二十军，白崇禧急忙命令黄维西出增援，这就使得黄维兵团短时间内不可能再掉头向东。同时，孙元良兵团的两个军已从蒙城北进至永城，而刘汝明的部队也有放弃商丘东移的迹象。根据国民党军的行动变化，陈毅、邓小平再次致电中央军委，提出改变原拟的作战方案，新方案的要义是：中原野战军全部进入徐蚌战场，负责牵制邱清泉和孙元良两兵团，如能达成歼敌目的，可直接东进攻击徐州，配合华东野战军歼灭黄百韬兵团。

十月二十三日，华东野战军发布《淮海战役预备命令》，准备进行歼灭黄百韬兵团的作战。此时，粟裕密切关注着徐州战场上国民党军的动向，当中原野战军占领郑州和开封后，他意识到，徐州东西两面的战场很可能被打通，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将由战略上的配

合作战发展成战役上的协同作战，而且战役规模会比原来预想的要大得多。虽然粟裕指挥着华东野战军的十五个纵队，加上暂归华野指挥的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共计十六个纵队，而在中原野战军的作战方向上仅有四个纵队，但是，三十一日，粟裕向中央军委提出了淮海战役统一指挥的建议："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这是粟裕在建议发动"淮海战役"之后，提出的又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建议。

十一月一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

第二天，陈毅、邓小平回电："本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惟因通讯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谭方面多直接指挥。"

至此，"小淮海"的战役构想开始向"大淮海"的作战意图推进。

十一月二日，东北野战军攻占沈阳。

战争局势顿时大为改变。

经过济南战役和辽沈战役，国民党军损失兵力合计八十三个师，共约一百万人，这一数字占当时国民党军总兵力的一半。经过补充之后，国民党军总兵力在二百九十万左右，其中正规军兵力由一百九十八万降至一百五十六万。与此同时，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已经迅速增长到三百一十四万人。这是一个微妙的时刻：战争进行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总兵力第一次超过国民党军，超过的数量是二十万。更主要的是，共产党人控制的国土面积大大增加，特别是东北和华东两大解放区，总面积已经达到一百六十六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八千七百零八万，拥有县以上城市二百六十三座，其中有十座省城、一个特别市（哈尔滨）和三个出海口城市（安东、烟台、威海

卫）。济南的工业基础和山东的便利交通，使之成为重要的战争后方基地。东北地区更是资源丰富，工业发达。一九四八年东北、华北和山东地区普遍丰收，即使在贫瘠的陕甘宁地区作物收成也达到八成以上，晋绥地区更是出现了十年以来最大的丰收——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已经没有后顾之忧。

四日，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参谋长陈士榘和副参谋长张震，联名发布《华东野战军淮海战役攻击命令》，命令明确战役发起时间为：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日。

就在华东野战军发布攻击命令的这天，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顾祝同到达徐州。

东北战场上的彻底失败，给国民党军的北方防御体系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失去东北后，华北的太原、保定、承德、大同、归绥等据点，因互不相连而处境危险，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等大城市间的联系也已被切断，傅作义集团的五十万大军只能长蛇般地分布在几个重要据点上，随时可能面临夹击。阎锡山的十万人马被包围在太原孤立无援。而在西安、汉口、徐州方面，虽分别聚集着三个重兵集团，但已无法构成完整的战略防线——胡宗南的西安集团二十三万人被彭德怀死死地纠缠在西北地区，既不能东进华北，也不能南下华中；白崇禧的华中集团二十三万军队退守长江的防线还没有建立起来，处在既非进也非退的无从确定状态；而徐州集团虽兵力达七十万之众，但是，济南和郑州丢失后，徐州“剿总”部署的“三足鼎立”防御体系已经瓦解，密集的重兵因此全部暴露在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的攻击之下。

蒋介石明白，如若再失中原，等于江山已失一半。

但顾祝同带来的作战方案，与蒋介石的战略意图有相当的差距。

顾祝同认为，徐州必须死守。

杜聿明说：“古今中外的战史中还找不到这样一种集中会战的战略先例。”

杜聿明第一次看见由蒋介石主持拟定的“徐蚌会战计划”，是十一月三日，那时他还在东北的葫芦岛指挥锦西的国民党军撤退。上午，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许朗轩奉蒋介石之命从南京专程飞来，给杜聿明送来一份会战计划和一封写有“如果吾弟同意这一案，请即到蚌埠指挥”的亲笔信。杜聿明基本上同意蒋介石的计划，即“将主力集中在蚌埠附近与共产党军队决战”。但他认为“各兵团任务行动必须明确规定”，而目前的会战计划“过于笼统”；徐州战场上的部队同时南撤，“行动必须迅速，否则有被共产党军队发现，然后各个击破的危险”。至于他本人，“须待葫芦岛部队撤离完毕后”，才能再去蚌埠。所以，建议由刘峙总司令指挥实施这一计划。许朗轩临走时，杜聿明再次强调，徐州的行动必须迅速，否则几个兵团都“有被共产党军队牵制无法撤退的可能”。杜聿明后来说：“以当时的情况，徐蚌会战的准备工作重于葫芦岛的撤退，我应该马上到蚌埠去，可是我怕背放弃徐州之罪名，所以就想借指挥葫芦岛部队的撤退，来推卸放弃徐州之责。预计在葫芦岛守军撤退完毕时，徐州附近的部队亦可撤退到淮河附近了，然后我再到蚌埠去指挥。”

从杜聿明的叙述中可以判断，蒋介石的计划是：国民党军从徐州全面撤退，退守到淮河南岸一线，凭借河川构筑防御体系，“待共产党军队攻击顿挫时，机动转移攻势以便寻机击破”——“济南解放后，在淮海方面，蒋介石决心放弃徐州，坚守淮河，他的着眼是徐州乃四战之地，易攻难守，后方联络线过长，兵员粮弹补充困难［据徐州第一补给区刘永焜司令说，徐州粮食储备只有二十一天］；且蒋介石一生唯心迷信，四面楚歌垓下被困的历史故事就是发生在徐州（古彭城）

附近地区，这更使他有所避忌。蒋介石的总企图是：退守淮河确保南京外围，企图在淮河附近地区挫败共产党军队主力，来争取第二线战略配置的时间。”

从军事态势上看，全面退守淮河的战略，是符合当时战场实际的。在无险可守的中原地带，国民党几十万大军仅仅龟缩在几个大据点内和主要铁路线两侧，而徐州至长江北岸尚有相当的距离，相对于长江以南面积广阔的国民党控制区来讲，徐州此时的态势几近孤悬。如果以徐州为中心进行死守，不但过长的后方补给线有随时被切断的可能，且一旦解放军大军插到长江边，徐州战场上的几十万国民党军必定面临覆灭的厄运。此刻，徐州战场的东面已在华东野战军的控制下，北面的傅作义迫于聂荣臻、林彪大军的压力已无可能南下增援，西面的胡宗南被纠缠得无法脱身。如果徐州的几个主力兵团再被吃掉，那么拿什么守长江保南京？那时候，唯一可能支援徐州的，只剩位于华中的白崇禧集团了。但是，蒋介石明白，桂系的将领们巴不得看他的热闹呢。

当东北战局已经无法挽回的时候，蒋介石开始考虑退守淮河保卫京畿的问题。他对驻守徐州的刘峙不怎么放心，因为刘峙虽有资格威望，但人过于优柔寡断，而随着徐州局势的日益紧张，关键时刻一旦贻误战机必将酿成大祸。蒋介石计算了一下，以徐州军事集团的兵力，对付粟裕不成问题，如果刘伯承的部队加入进来，徐州战场上的兵力就显得薄弱了，就需要把白崇禧指挥的部队，特别是精锐的张淦兵团和黄维兵团投入淮海战场。白崇禧是华中“剿总”总司令，刘峙是徐州“剿总”总司令，在一个战场上谁指挥谁都不合适，于是，他决定在蚌埠成立“国防部指挥所”，指定白崇禧为主任，统一指挥徐蚌战场上的所有部队。白崇禧表示同意，但就是不去上任。当蒋介石催促他的时候，他突然变卦说，刘峙一个人对付得了，完全没有必要再让他

去统筹兼顾。蒋介石突然意识到，白崇禧终于等到了报复自己的时机。

五个月以前，当李宗仁最终当上副总统后，蒋介石立即把白崇禧的国防部长撤了，历史上桂系一再反戈的教训，令他决不允许桂系在核心部门权力过大。可是现在中原出了麻烦，始终不让白崇禧兵权过重的蒋介石，这次除了让他继续指挥华中的部队外，还请他同时指挥徐州的部队。白崇禧秘密飞到安徽合肥，与桂系将领李品仙、夏威等人商量对策，大家一致认为，淮海战场形势险恶，还是不去为好，这样不但可以狠狠报复蒋介石一下，而且也给了刘峙一个人情面子。白崇禧的拒绝确实让蒋介石很是为难，为了弥补刘峙的无能，他决定将杜聿明调来辅佐，但是杜聿明的态度也不积极。同时，身在徐州的刘峙已被弄得心灰意冷。徐州“剿总”的高级幕僚们纷纷埋怨蒋介石多此一举，刘峙更是按捺不住心中的不满，他对总统府派来的少将参军李以劻说：“白健生（白崇禧）是寡妇改嫁，对老头子可以抗衡论理，不听调动；我好像是童养媳长大，骨头多大，当婆婆的都摸得清，服从是无条件的。”

大战在即，将领们却无一人同心同德，蒋介石的恼怒难以言表。

全面退守淮河以确保长江防线的计划迟迟得不到落实的另一个原因是，国民党军国防部内部，甚至是徐州方向的一些高级将领们，都对此计划持不同意见——统帅与将领之间存在不同意见实属正常，问题在于这种情况若发生在共产党内部，经过讨论和协商，很快就会达成统一的意志和坚决的行动；而一旦发生在国民党内部，就很可能演变成一场无法挽救的灾难。淮海战役爆发前，国民党军国防部曾召开军事会议，与会的高级将领虽都同意“守江必守淮”，但对于如何“守淮”还是出现两种不同方案：一是全面退守淮河南岸；二是放弃陇海铁路沿线所有城市，集中兵力于徐州和蚌埠间的津浦路两侧，寻机决

战。会议研究的结果是，实施第二个方案。换句话说，国防部把蒋介石的“徐蚌会战计划”给否定了——“自徐州到蚌埠间二百多公里的铁路两侧，摆了数十万大军，既弃置徐州永久工事而不守［徐州那样庞大纵深的据点工事，只留一两个军，几乎等于不守］，又将各兵团摆于铁路两侧毫无既设阵地的一条长形地带，形成鼠头蛇尾、到处挨打的态势。”——谁都不明白，国防部的高级幕僚们为何拟出了这样一个“出奇的”作战方案。

但是，即使这样一个方案，也没能得以迅速实施。

顾祝同到达徐州后，邱清泉、李弥、孙元良、黄百韬等人在究竟是“守徐”还是“守淮”的问题上仍旧争执不下。孙元良、李弥与蒋介石的观点一致，认为“徐州易攻难守，补给线拉得太长”，不如退守淮、蚌地区，这样“补给线短，前面凭淮河天险，后面有重叠山峦，右面是沼泽地带，可以节约兵力，集中重兵打击共产党军队”。但是，邱清泉和黄百韬盛气凌人，豪情万丈：“徐州既设阵地，又有储备粮弹，乃兵家必争之地。既为我所有，又何必撤退？我们有铁道、公路，并有空运，补给方面何难之有？徐州不仅要守，而且要以此为基点夺回失地！”这一观点符合顾祝同的意愿，于是顾祝同说他去向老头子汇报。

此时，蒋介石已经心力交瘁。

在整个辽沈战役中，六十一岁的他一直坐镇北平，其间三飞沈阳、两飞葫芦岛，结果“在北平吐血，回南京后连续吐血”。他将目前的军事形势描述为“对日战争结束以来之‘最严重者’”。蒋介石发现，国民党军失去东北后，国人似乎已不相信他在淮海地区即将爆发的大战能够取胜，不少报刊开始大肆渲染“政府可能南迁广州”的话题。蒋介石通过国民政府派驻联合国的代表直接上书马歇尔，他向美国人提出的要求既出乎中国人的预料，更出乎美国人的预料——蒋介石在要

求加速提供军火的同时，建议美军军官以顾问的名义“实际指挥中国军队”。

蒋介石不知道，在美国人看来，他的政权已经不值得任何援助了。

十月二十三日，当东北战局已经明朗化之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院请示了两个问题：“一，我们可以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内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以便组织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并且更有效地进行反共战争吗？二，我们可以赞成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某一位能够给国民党军队和非共产主义党派争取尽可能有利的条件而结束内战的政治领袖吗？”

心急如焚的蒋介石没等马歇尔答复，又责令南京驻美国大使顾维钧把他写给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亲笔信递进了白宫：

华中之共产党军队现在已到达距宁沪甚近地区。如果我们不能阻遏这一浪潮，中国便将失去民主。我因此不得不向阁下再作直接与迫切之呼吁。中国军事局势之一般恶化可以归因于若干因素，但其最基本原因是苏联政府不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缘故。阁下无疑当能忆及中国政府系由于美国政府之善意劝告而签订该约。我几乎不必再次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如无苏联之继续援助，则不能占领满洲而成为如此之威胁……我以反对共产党主义在全世界进袭与侵入之民主共同防卫者之资格要求你迅速给予并增加军事援助，并发表关于美国政策之坚定声明，支持我国政府从事奋斗之目的。当此在华北华中正展开重要战斗之际，此一声明足以鼓舞军民士气，并巩固政府之地位。阁下如能尽速派遣一高级军官与本政府共商有关军事援助之具体计划，包括美国军事顾问参加指挥作战，本政府当无任欣快之至。

美国人没有让蒋介石“欣快之至”，因为他们认为蒋介石关于苏联插手中国内战的说法是一种危言耸听。而马歇尔的回答对于蒋介石来讲更为冷酷：“即使无中国政府在过去屡次不接受美国劝告之情形，当此中国政府在民政和军事两方面的权威分崩离析之际，美国从事如此荒唐不经之冒险，实是勇而无谋之举。”

十一月五日，中原野战军攻占南阳。

毛泽东信心十足地说："我军已不需要再以三年时间［从今年七月算起］歼敌三百个正规师，才能达到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之目的。我军大约再以一年左右的时间，再歼其一百个师左右即可能达成这一目的。"

顾祝同从徐州回到南京，许朗轩也从葫芦岛回到南京，因为受到杜聿明的影响，许朗轩指出，死守徐州的兵团在配置上存在大问题，"如果得不到修正，再一次会战可能是在南京附近"。蒋介石没来得及理会许朗轩的危言，因为他刚刚看到一篇让他十分恼火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是：祝总统赴美休养一路平安。

谁说总统要赴美休养了?

这不是在暗示他下台还能是什么?

此时，不可预知演变规模的"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已经不可逆转地发动了——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深夜，华东野战军开始包围黄百韬兵团。

## 侧翼的开裂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五日，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司令官黄百韬从徐州返回新安镇。在火车上，他对第二十五军军长陈士章说："可惜我这计划批准太晚，现在撤退恐怕来不及了。"——十七天后，刚满五十岁的黄百韬在极度的怨恨和恐慌中死于混乱的战场上，这使他成为内战爆发以来第一位陈尸旷野的兵团级高级将领。

火车轰隆隆地向东开去，窗外是萧瑟的无边旷野。

黄百韬不断把目光转向北面，试图在已经枯黄的庄稼地的尽头发现些什么，为弥漫在心头的惴惴不安寻找理由。

此刻的黄百韬正走在一条危险的边界线上。

华东野战军占领济南之后，国共两军沿山东南部和江苏北部的接壤地带重兵对垒。北面的华东野战军随时可能大军南下，而驻扎在这一地带的第七兵团的任务就是要阻止这一攻势，以护卫徐州的侧翼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讲，黄百韬所处的战场位置，是真正的前沿，而且是坐落在巨大火药桶上的前沿。

进入十月以后，黄百韬每天都能接到粟裕部频繁调动的情报，调来调去的纵队番号有十几个之多，他没有任何办法阻止势必爆发的恶战，唯一能做的是将整个兵团迅速撤退到徐州附近去。十月下旬，黄百韬向刘峙陈述了自己的判断：粟裕部主力将会合其在苏北的三个纵队，夹击第七兵团，刘伯承部将从西南方向牵制徐州"剿总"的各主力兵团，使其均不能增援第七兵团，待第七兵团被消灭后，"再循序各个击破各兵团"。共产党军队的这一作战意图"已甚明显"。而徐州战场上的国民党军分布于陇海铁路沿线，目前"四面八方均有敌情，备左则右寡，备前则后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唯一有效的办法是："集结各兵团于徐州四周"，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备战，深沟高垒，各兵团互相衔接"，趁共产党军队"尚未会合之前"将其各个击破。黄百韬特意向刘峙说明：不是他怕死，"而是这样才能持久"。刘峙据此向蒋介石请示，直到十一月四日深夜，徐州"剿总"才得到国防部的回复：第七兵团撤退徐州。

第七兵团总兵力达十二万人以上。

重兵撤退不是一两天就能完成的。

令黄百韬焦虑不安的是时间已经晚了。

黄百韬回到距徐州一百二十公里的新安镇，正准备以最快的速度给各军下达紧急撤退命令，同时还要布置火车将粮食、弹药、被服和其他军用物资迅速转运徐州。突然，电话响了，电话是刘峙打来的，内容是：第七兵团原地等待海州方向的第四十四军，该军划属第七兵团序列，并与第七兵团一起撤退。

这就是说，黄百韬至少要在新安镇再等两天才能开始撤退。

黄百韬的情绪有些失控，他在电话里大喊："第四十四军什么时候可以到达？本兵团究竟何时可以撤退？"——"大概对方无具体答复，只听得黄将耳机摔在桌上。"

这是十一月五日的晚上，黄百韬和他的第七兵团的悲剧命运，就从这个莫名其妙的电话开始了。

这一天，华东野战军指挥机关已发现黄百韬准备向徐州撤退，特别是驻扎在海州的第四十四军也出现了西撤的迹象。如果让黄百韬及时撤往徐州，必将使徐州集团的国民党军紧缩成更为坚硬的一团，不但将来分割和攻击都将出现困难，整个淮海战役的战略设想也许会因此落空。于是，粟裕当即决定将战役发动时间由八日晚改为六日夜。粟裕在将这一决定上报中央军委的同时，给华东野战军各纵队下达了分割包围黄百韬兵团的命令。作为前线指挥员，粟裕明白，关键时刻谁争取了时间就能占据战场主动，战机的捕捉很可能就在一两天甚至一两个小时的失掉或争取之间。

刘峙给黄百韬下达的命令来源于蒋介石。

蒋介石发布这一命令来源于他对战场态势的错误判断。

当获悉解放军已开始向徐州大规模调动时，蒋介石始终认为，粟裕首选的攻击目标不是新安镇的黄百韬，而是位于新安镇以东海州、

连云港方向的第九绥靖区部队。根据这一判断，十一月四日，蒋介石命令黄百韬兵团的第一〇〇军星夜开赴海州加强防御。但是，仅仅过了一天，第一〇〇军刚走到半路，蒋介石突然改变主意，不但命令第一〇〇军掉头回来，还让驻守海州的第四十四军向徐州收缩，同时命令黄百韬在运河以东、陇海路以北掩护第四十四军撤退。蒋介石朝令夕改的严重性在于：黄百韬遭遇攻击的态势已经明朗，在这种情况下，竟然不惜让整整一个兵团痛失最后撤退的时机而等待一个军，并由此导致了黄百韬因撤退不及而陷入包围。蒋介石不知道，正是由于黄百韬兵团的被歼，致使国民党方面策划的"徐蚌会战"开始瓦解。更令人不解的是，如果蒋介石不希望海州的第九绥靖区部队因孤悬一隅而被吃掉，紧邻连云港的第四十四军完全可以从海路撤退，何必在这个时间等同于生命的危急时刻，非让第四十四军走陆路，而且还是沿着危机四伏的两军对垒线横向移动?

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刻，看似荒诞的事情就这样真切地发生了。

蒋介石的命令，不但给华东野战军送来两天的时间，还把原来不在粟裕歼敌计划内的一个军也送了进来。

六日，是黄百韬极度焦躁的一天。他召集了第七兵团作战会议，各军军长、兵团司令部正、副参谋长以及各处处长，还有负责补给的兵站分监等悉数参加。会议决定了第四十四军到达新安镇后的撤退部署：

第一〇〇军在现驻地占领阵地，掩护兵团主力西撤右侧背之安全，明日与第二十五军在陇海铁路北侧交叉掩护撤退，渡过运河后，占据碾庄圩西面之彭庄、贺台子等村庄；

第二十五军待第四十四军通过阿湖后，跟随第四十四军西撤，在陇海铁路炮车以北占领阵地，与第一〇〇军交叉掩护西撤，渡过运河

后，占据碾庄圩西北大小牙庄、尤家湖等村庄；

第六十四军通过运河后，以一部占领运河西岸，以一个营占领滩上阵地掩护兵团主力渡河，大部占领碾庄圩东面之大院上、小院上、东楼及碾庄圩北之小费庄、吴庄等村庄；

第四十四军渡过运河后，占据碾庄圩车站及铁路以南各村庄；

第六十三军待兵团撤走后，经窑湾渡过运河，于碾庄圩南面集结；

兵站除用卡车载粮弹药品随部队行动外，其余粮弹被服用火车直运徐州；

兵团部通过运河后位于碾庄圩。

各部队七日凌晨五时开始撤退行动。

会议刚开完，第九绥靖区司令官李延年和总统府少将参军李以劻乘火车自海州到达新安镇。黄百韬立即向他们说明，现在第七兵团的位置十分不利，一旦遭遇攻击在新安镇孤立无援，而侧敌西撤到不了徐州就会被歼，如果第四十四军还不到达，将“陷全局于不利”。

此时，第四十四军已经离开海州向新安镇移动。之前，听说第一〇〇军前来增援，李延年很是兴奋。但是，到了五日的晚上，海州一个长期为刘峙搞贩盐生意的老板找到李延年，劈头就说：“老总（刘峙）来电要我随司令官一道回徐州。”李延年有些奇怪：“我回徐州干什么？”盐店老板说：“不要海州了！”老板走了之后，李延年才接到刘峙的电话，说第一〇〇军不来了，第四十四军立即西撤。李延年不禁感叹道：“刘经扶（刘峙，字经扶）看钱财比国家的事还大，真是岂有此理！这样泄露军事机密，不败如何！”六日凌晨，第四十四军开始撤

退。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国民党军一旦放弃一座城市，撤退已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而几乎是一座城市的整体搬迁。在海州，除了财政、盐务、司法、商业、学校等部门的少数人员乘船去上海外，社会团体和行政人员一律步行共同撤退，其序列是：第九绥靖区司令部和直属队，第一挺进支队，第四十四军军部，行政区专员公署，各县县政府、国民党党部、保安队，最后是大批的学生和商民，绵延不绝的队伍可谓浩浩荡荡。

黄百韬不知他的第七兵团等待的是这样一支因军民混杂而行进缓慢的队伍。

六日夜晚，黄百韬在焦急中整夜未眠。

此刻，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着他：三个月前，第七兵团司令官区寿年在豫东作战中被共产党军队俘虏，这才使自己有机会接任这个梦寐以求的高级职务。现在想来，这到底是自己的幸运，还是命运设下的一个巨大的陷阱呢?

黄百韬的人生经历复杂曲折。

他原籍广东，生于天津，毕业于河北工业专科学校。因为不是黄埔出身，仕途一直备受阻障。他深知自己在国民党军中没有任何靠山，因此战则争先，退则谨慎，无论发生什么事皆忍气吞声。内战爆发后，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被歼于孟良崮，战后蒋介石痛骂黄百韬解围不力，黄百韬独自承担了一切责任，让指挥作战的汤恩伯、顾祝同保全了面子。接下来的豫东作战，更让黄百韬心有余悸。当时，他为解救区寿年兵团的整编七十二师深陷重围，要不是各路援军迅速接近，他很可能就和区寿年一起被俘了。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从战场侥幸逃脱后，他竟迎来了人生最高点：为掩盖区寿年兵团被歼的恶劣影响，蒋介石大肆宣传黄百韬的“豫东大捷”，并亲自为他戴上青天白

日勋章。同时，在顾祝同的举荐下，黄百韬接任第七兵团司令官一职。这一下，黄百韬有点受宠若惊了，他说：“国家厚我，领袖厚我，有死而已。”可是，当上第七兵团司令官，黄百韬才明白自己也就是个杂牌兵团司令。在第七兵团下辖的五个军里，只有第二十五军是老部队，其余全部是临时拼凑来的，特别是第六十三、第六十四军原为粤系部队，军官们大多说一口广东话，总是不习惯苏北和鲁南的气候。于是，黄百韬在他五十岁生日的那天，特意请第六十三、第六十四军的军官们吃饭，以自己原籍广东为理由努力拉拢关系。黄百韬心知肚明，在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的眼里，非黄埔出身的他永远入不了主流。

此刻，第七兵团所处的战场位置就可以说明一切：在蒋介石制定的退守淮河的计划中，第七兵团被规定为最后的掩护部队；而当蒋介石改变计划决定死守徐州时，他的兵团一下子便首当其冲了。

午夜，黄百韬让卫兵把总统府少将参军李以劻找了来。

黄百韬对李以劻说：“国防部作战计划一再变更，处处被动，正是将帅无才，累死三军。这次会战如垮，什么都输光了，将来怎么办？国事千钧重，头颅一抛轻，个人生死是不足惜的。”他让李以劻和李延年明天一早先走，“以免路上出岔子”。黄百韬的判断是：粟裕的纵队都在急促南下，先打第七兵团是肯定的。接着，黄百韬的一番话令李以劻十分震惊，多年以后他忆及那夜的情景时，认为是“黄百韬在六日深夜的最后留言”：

> 作战厅郭汝瑰、许朗轩、张宗良等人作出这样的计划来，使人伤心。大军作战，随时变卦，动摇军心，影响士气，难道他们不知道？兵团兵力十几万人，陈毅主力三十多万，如果集中来攻，李（李弥）兵团必败。尤以西撤途中，侧面受敌，随地应战，立足未定，各个击破，最堪忧虑。请告刘老总（刘峙）注意，要其他兵团快点集结，迟了就会误大事。如我被围，希望别的兵团来救。古人说，胜利举杯相庆，败则出死相救。我们是办不到的。这次战事与以前战役性质不同，是主力决战，关系存亡，请告老总，注意激励各级战场指挥官，否则同归于尽，谁也走不了。请你面报总统，我黄某受总统知遇之隆，生死早置之度外，决不

辜负总统期望。我临难是不苟免的，请记下来，一定要转到，国民党是斗不过共产党的，人家对上级指示奉行到底，我们则阳奉阴违。

天快要亮了，允许第七兵团撤退的命令还没有到达。

早晨六时，黄百韬决定不等命令，让非战斗人员先行乘车西撤。

然后，他在兵团部里大喊大叫，询问第四十四军到了哪里，距离新安镇还有多远。

六日晚，华东野战军按照预定战役计划开始行动。第一、第四、第六、第八、第九、第十一纵队、鲁中南纵队、苏北兵团的三个纵队和特种兵纵队，组成正面突击集团，向新安镇、阿湖地区全面推进。

至七日，第四、第八纵队在四纵司令员陶勇和政治委员郭化若的统一指挥下，四纵占领运河东岸一线，八纵渡河继续向南。鲁中南纵队突破郯城城垣，第一、第六、第九纵队和苏北兵团的三个纵队向新安镇迅速靠拢。在新安镇以南，苏北兵团第十一纵队由宿迁出发，沿运河以西向窑湾、运河车站急进，江淮军区的两个旅北进至土山镇以北。与此同时，由谭震林、王建安指挥的第七、第十、第十三纵队由临城、枣庄一线向南发起攻击，以牵制国民党军冯治安部，吸引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北援或滞留在徐州附近，保障正面突击集团对黄百韬的围歼。冯治安部受到攻击后立即退缩韩庄、台儿庄一线。十纵直逼冯治安部第七十七军的前沿，其先头部队强渡运河；十三纵以一部主力包围台儿庄，一部由台儿庄以西强渡运河；七纵攻占万年闸后向南强渡运河。

这一天，第四十四军终于疲惫不堪地到达新安镇。

于是，自凌晨开始，第七兵团开始了逃亡似的大撤退。其撤退的部署是：第一〇〇军以一部于城头以东接应第四十四军，主力则沿着

公路向西，占领运河东岸以北地区，掩护兵团主力通过运河；第六十四军渡过运河，占领陇海路南侧地区，掩护兵团主力向西开进；第二十五军（欠一四八师）以一部位于新安镇东北方向的阿湖警戒，主力掩护第四十四军和第一○○军主力西撤，然后撤退到大许家；第六十三军担任后卫，先在新安镇南侧展开，掩护主力撤退后，经窑湾渡过运河并向南防御；兵团部和直属部队跟随第六十四军行动。

撤退一开始，黄百韬就发现了一个重大失误，这就是没有提前在大运河上架设渡桥。第七兵团从新安镇西撤徐州，必须西渡南北走向的大运河，而十多万人马于危急时刻渡河，远不是一两座渡桥就可以解决问题的——黄百韬临死终于意识到，他的这一失误几乎是致命的。在有关史料中，可以寻找到十一月五日左右黄百韬派工兵前往运河架桥的命令，但是，不知为什么，直到七日运河上关乎生死的渡桥也未能架起。于是，十多万人马拥挤在一起，从仅有的一座运河铁桥上通过，这种渡河方式不要说同时还要作战，仅长长的队伍陆续通过就需要耗费多天。黄百韬发现这一巨大失误之后，命令在运河铁桥北面架起一座平行的浮桥。第二十五军被要求占领牛山，向东进行警戒，掩护第四十四军先行撤退；第一○○军被要求占领炮车，向北进行警戒，掩护兵团主力渡河。此时，第七兵团所有的将领都意识到解放军会随时追到眼前，因为北面各个方向都已是枪炮声大作。第一○○军军长周志道说，要架桥也得首先在炮车以西架桥，让第一○○军撤退时有个后路，不然他可不敢去占领炮车担任掩护任务；接着，第六十三军军长陈章说，他不愿意和兵团主力拥挤在这里，他要带着自己的部队去窑湾渡河。军长们从各自利益出发的主张，把黄百韬弄得不知所措，于是架桥的事竟然再也没提，他只是要求各军务必渡河后到碾庄圩集结。

没过多久，传来一个可怕的消息：声称要“自己渡河”的第六十三军受到攻击。黄百韬计算了一下，第六十三军才走出去二十公里，这

说明共产党军队已经打到跟前了。

七日晨，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到达临沂。

此时，粟裕获悉驻守在台儿庄附近的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的两位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有起义的可能”。何基沣、张克侠一旦起义，将会使徐州东北方向门户洞开，华东野战军部队可顺利通过第三绥靖区的防区，向南越过陇海路直接插入徐州与碾庄圩之间，彻底截断黄百韬兵团的退路。而这样一来，紧缩在徐州附近的敌人将陷于孤立。粟裕致电谭震林、王建安并报陈毅、邓小平、中央军委、华东局、中原局，报告徐州的敌人可能要南撤，战役可能将朝着“夺取徐州或孤立徐州”的方向发展，建议中原野战军主力“直出津浦路徐蚌线”，彻底截断徐州之敌南逃的退路。

晚上，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到达临沂以西的码头。

粟裕与野战军副参谋长张震经过彻夜长谈，再次明晰了淮海战役将从围歼黄百韬兵团发展到在徐州地区与国民党军徐州军事集团进行决战的可能。天明时分，粟裕起草的著名的“齐辰电”发出：

军委、陈邓，并报华东局、中原局：

甲、由于近来全国各战场的不断胜利，尤其是东北的伟大胜利与完全解放，促成战局的急剧大变化。在此情况下，蒋匪有采取下述两种方针可能：

第一，以现在江北之部队再加上葫芦岛撤退之部队，继续在江北与我周旋，以争取时间，加强其沿江及江南及华南防御。

第二，立即放弃徐蚌、信阳、两淮等地，将江北部队撤守沿江，迅速巩固江防，防我南渡，并争取时间整理其部队，以图与我分江而治，俟机反攻。

乙、蒋匪如果采取第一方针，使我在江北仍有大量歼敌的机会。如果能在江北大量歼敌，则造成今后渡江的更有利条件，且在我大军渡江之后，在苏、浙、皖、赣、闽各省不致有大的战斗［如果在江北大量歼灭了敌人，则严重的战斗要在华南才有打的］，也不致使上

述各省受战争之更大破坏，使我军于解放后容易恢复。但如此，对江北及华北各老解放区的负担仍将加重，又为不利。

如果蒋匪即采取第二方针，可以大大减轻我江北及华北各解放区的负担，使这些解放区迅速得到恢复，但我今后渡江要困难一些［困难仍完全可能克服］，并于渡江之时在苏、浙、皖、赣各省尚须进行一些严重的战斗和部分的拉锯战，且在江南大量歼敌的条件亦较江北差一些，这又是不利的一面。

丙、我们不知各老解放区对战争尚能支持到如何程度，如果尚可能作较大的支持的话，则以迫使敌人采取第一方针为更有利。如果认为迫使敌人采取第一方针是对的，则我们在此次战役于歼灭黄兵团之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新海敌主力已西撤］，而以主力转向徐（徐州）固（固镇）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而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消灭之［或歼孙兵团，或歼黄维兵团］，同时以主力一部进入淮南，截断浦蚌铁路，错乱敌人部署与孤立徐蚌各点敌人。为此，在战役第一阶段之同时，应即以一部破坏徐蚌段铁道，以阻延敌人南撤。

管见是否有当，请即电示。

粟 张

齐（八日）辰（七—九时）

如果歼灭黄百韬兵团后，挥军南下两淮，很可能将国民党军主力赶过长江；而如果西进徐州，不仅可以抑留目前驻守在徐州、蚌埠间的敌军，还可以调动黄维兵团北上增援徐州，以利我军寻机歼敌。那么，是将国民党军主力抑留在长江以北逐次歼灭，还是将其赶过长江留待日后歼灭?

“齐辰电”的重要意义在于：首先，粟裕提出在歼灭黄百韬兵团之后，不依原定设想大军南下推进两淮，而是将攻击目标集中在全歼国民党军徐州集团上，从而把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军主力彻底歼灭。这一战役设想，已经大大接近了“大淮海”的模样；其次，电报从夺取全国胜利的角度，得出了把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军主力歼灭之后，将有利于未来的渡江战役和取得全国胜利的判断。其中未来在长江以南“不致有

大的战斗”，“严重的战斗要在华南才有打的”等预测，历史证明惊人地准确。

九日，中央军委复电到达：

粟张，并告华东局、陈等，中原局：

齐辰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应。

军委

佳（九日）亥（二十一—二十三时）

晚年的时候，粟裕仍说：“这个电报虽短，但是字字千钧。”

至此，共产党方面对淮海战役的设想升华到战略决战的高度，即将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军主力歼灭在徐州地区。

华东野战军已开始对黄百韬兵团实施合围：第一、第六、第九纵队和鲁中南纵队，穿过新安镇及其以西地区，沿陇海路南侧在黄百韬兵团的身后追击；第四、第八纵队穿过邳县、官湖地区，直抵运河东岸，对黄百韬兵团的右翼构成威胁；第十一纵队和江淮军区的两个旅沿运河西岸北进，挡住了黄百韬兵团左翼掩护部队第六十三军的去路；而在黄百韬兵团的前方，由台儿庄地区南下的第七、第十、第十三纵队，与从宿迁地区北上的第二、第十二纵队和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南北对进，切断了黄百韬兵团与徐州的联系。

就在黄百韬兵团即将深陷重围的时候，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起义了。

第三绥靖区沿运河两岸驻守在徐州东北方向的贾汪至台儿庄一线，其防御任务是：“利用运河一线既设工事固守以屏障徐州，同时保

障黄百韬兵团与徐州之间的联系”。绥靖区下辖第五十九、第七十七军，共四个师的兵力。

何基沣，一九二三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进入冯玉祥的西北军。一九三八年，他在第二十九军抗击日军的作战中负伤，养伤期间秘密前往延安两个月，几次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的接见，并于一九三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他与时任国民党军第七十七军军长的冯治安是拜把兄弟，回部队后出任第七十七军一七九师师长。一九四二年，冯治安升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时，举荐他出任第七十七军军长。抗战胜利后，随冯治安部驻守鲁南与苏北交界处的台儿庄、贾汪一线，出任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

张克侠，一九二四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任职于冯玉祥的西北军。一九二八年，在冯玉祥夫人的支持下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二九年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以特别党员身份重回西北军工作。抗战爆发后，出任第二十九军副参谋长、第五十九军参谋长、第三十三集团军参谋长等职。一九四五年，出任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

第三绥靖区是支杂牌部队，一直受到国民党军嫡系部队的歧视和排挤。抗战胜利后，第三十三集团军奉命开赴徐州受降，冯治安大喜，因为接收城市既可以使部队得到装备的补充，还可以聚敛大笔钱财物资。然而，部队到达徐州后，才知受降与接收已由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十九集团军办理完毕。不久，第三十三集团军被改为第三绥靖区，沿运河两岸驻守在徐州东北方向的贾汪至台儿庄一线。随着徐州战场局势日益吃紧，官兵们终于明白自己是要“打头阵、当炮灰”了。

共产党人与西北军的关系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对西北军将领冯玉祥的影响。一九三一年，西北军的第二十六路军曾在“围剿”中央红军的宁都前线起义，起义部队被改编后成

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针对西北军，周恩来曾明确指示：我们过去在敌军工作中，总是认为士兵出身苦，最革命，一直重视在士兵中开展工作，而轻视做军官的工作。今后要注意保存现有秘密党的力量，不到不得已，决不能搞起义。就是说在国民党军的非嫡系部队里，只有到蒋介石要消灭这个部队，使这个部队无立锥之地时，才有起义的条件。内战爆发后，在邯郸战役中率部起义的高树勋，在济南战役中率部起义的吴化文，都是党的秘密党员长期工作的对象，而且他们都曾是西北军的将领。

一九四八年冬天，第三绥靖区置身在防御华东野战军南下的第一线，而且这条防御线已是徐州北面的唯一屏障。

周恩来电告华东局，让他们派人与第三绥靖区中的特别党员何基沣、张克侠取得联系，因为，关键时刻到了。在国民党军内部潜伏了近二十年后，他们要以大兵团起义的方式让开运河防线，以确保华东野战军南下大军渡过运河直扑黄百韬兵团。

被派往第三绥靖区的，是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政治部联络部长杨斯德和敌工科副科长孙秉超。

起义时间定在十一月八日，起义联络口号是“杨斯德”。

八日上午十时，起义行动开始：张克侠率第五十九军向台儿庄集结，何基沣率前线指挥部和直属部队向台儿庄以南的汴塘方向集结。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第五十九军三十八师和一八〇师、第七十七军一三二师和三十七师一一一团，总计两万三千余名官兵撤离了防御阵地。

第三绥靖区司令官冯治安发现起义动向后，并没有采取任何阻止行动，而是独自离开部队去徐州向刘峙请罪去了。

起义部队让开了东起台儿庄、西至临城的上百里防线，致使黄百韬兵团向徐州撤退的路线右翼敞开了一个大口子，华东野战军第七、第十、第十三纵队从这个大口子里直插徐州东侧，迎头堵住了黄百韬的西逃之路。

毛泽东称，何基沣、张克侠的起义，是淮海战役“第一个大胜利”。

国民党军第六十三军军长陈章刚上任不久。兵团从新安镇撤退的时候，第六十三军奉命掩护。七日，掩护任务完成后，所有的官兵都逃命一样心急火燎，只有他沉着地迟迟不动，他对军官们说：“我们广东部队从南方打到北方，共产党没什么了不起。”他让军主力先走，自己带着四五六团殿后。四五六团是他的基本部队，他曾经在这个团当过营长和团长，现任团长李友庄是他的同乡。陈军长走得很傲慢，无论军官怎样提醒说身后不断有信号弹升起，他依旧要在距窑湾十公里的堰头停下休息。八日拂晓，陈军长宿营的卢圩子村遭到袭击，身边的副官处长被打死，军参谋长独自向窑湾镇逃去。最后时刻，还是李友庄团长赶来救他了，四五六团在解救军长的路上受到猛烈截击，只有一个营冲到了陈章的身边，士兵们拉着他往窑湾镇跑的时候，他还嚷嚷着：“等我收拾了一批共军再走。”辎重和机密文件等都已丢失，逃到窑湾镇后，陈章住进一五二师师部。师部已经没有粮食，卫兵给他端上来的仅仅是几个芋头，于是陈军长立即派出一支“人民服务队”去抢粮。八日晚，黄百韬来电话，命令他赶快向北突围，渡过运河到曹八集集结，但陈章认为没有船只大军无法渡河，请求空军空投粮食弹药。飞机还没来，他已被追击而来的解放军包围了。陈章下达了“连坐法”，组织起督战队，谁临阵退缩就地枪决。他还把窑湾镇百姓全部赶进一座天主教堂，说是为防止百姓与共军里应外合。部署好了，陈军长宣布：“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后生。我们要第六十三军一战成名天下知。沉着地顶他一两个浪头，好戏就在后面！”

无法理解这个军长的勇气从何而来。

此时，第六十三军已远远落在整个第七兵团的后面，被孤立地围困在运河边的一个小镇里。

八日，黄百韬的兵团部渡过运河，到达碾庄圩附近的一个小村里。

当时，李弥的第十三兵团集结碾庄圩西南方向的八义集。

黄百韬当即乘吉普车前去会见李弥——两位兵团司令官谁都没有想到，这是他们此生的最后一次见面。黄百韬急切地亲自上门，最主要的是恳求李弥兵团不要过早地向徐州撤退，因为他的部队还没有完全渡过运河。黄百韬诉说了第三绥靖区的起义给他的右翼造成的无法弥补的缺口，诉说了第七兵团被海州的撤退人员所拖累此刻还拥挤在运河桥上。李弥想了一会说，刘峙总司令判断共军要打徐州，已令第十三兵团向徐州撤退："我们兵团部和第八军今晚开始移动"，第九军明天"把防务交给贵兵团后"也要"往徐州集中"。李弥告诫黄百韬："老兄做准备吧，这回可能要发生主力战。"黄百韬万般无奈地说："打就打吧，这也是一个机会，过去找共军主力找不到，这会儿送上门来，总得干他一下。现在的问题是我的大部队还没有渡河，看情况，还要两天才能渡完。"黄百韬希望李弥待他的兵团渡过运河站稳脚跟，再动身撤退，但李弥坚持迅速撤退是徐州"剿总"的命令，黄百韬只好告辞。

黄百韬百思不得其解：明明是第七兵团已处在被围歼的状态中，刘峙如何判断出徐州要受到攻击？唯一可以解释的是，当华东野战军对第七兵团发动攻击的时候，中原野战军从徐州的西面也发动了攻击，而且大有继续向东推进的势头。李弥坚持他的兵团必须立即开拔，置原来所承担的掩护黄百韬兵团西撤徐州的任务于不顾；而且即

使徐州下达了新的命令，黄百韬兵团尚未完全渡过运河，根本无法接替李弥兵团的防务，李弥在这时候大军撤走，等于在黄百韬兵团的左翼又敞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第十三兵团过早的撤退，导致了黄百韬兵团最后陷入重围。黄百韬至死也不明白，如果李弥能与自己相互掩护向徐州撤退，不是更有利于两个兵团的安全，也更有利于徐州的安全吗?

就在黄百韬几近绝望的时候，被蒋介石责令指挥徐州作战的杜聿明到达南京。当得知共产党军队已经渡过运河，第三绥靖区部队已经起义，黄百韬兵团已经被包围后，杜聿明用惊奇的口气问："为什么徐州附近我军主力不照徐蚌会战计划及早撤退到蚌埠呢？"参谋总长顾祝同知道杜聿明是在质问他，于是生气地说："你讲得好，时间来不及呀，李延年还未撤退回来，共军就发动攻势了。"

十一月十日下午十六时，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国防部第二厅厅长侯腾报告说，华东野战军已经占领贾汪，迫近运河以东地区，一部已渡过不老河插入曹八集和薛家湖附近，碾庄圩的后路已断。刘邓的部队在徐州以西与邱清泉兵团接战，邱部正在且战且退。黄百韬兵团过运河桥时伤亡惨重，目前被围在碾庄圩。孙元良兵团已到宿县附近，刘汝明兵团正向蚌埠推进中。判断是：共军以一部牵制我军，主力准备歼灭黄百韬兵团。接着，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汇报作战计划：黄百韬兵团死守碾庄圩，第六十三军死守窑湾，李弥兵团附第七十二军守备徐州，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迅速东调，解围黄百韬兵团。蒋介石问杜聿明有什么意见，杜聿明已经不想发表任何见解，他只是说，不了解前方情况，等到徐州后再说吧。蒋介石当即说："好！好！你到徐州，一定要解黄百韬之围。我已经把飞机替你准备好了，你今晚就去。"至此，杜聿明才知道，他看过的那份"徐蚌会战计划"早已不见踪影，目前的战场局势已经不可收拾。

十日，黄百韬兵团从碾庄圩出动，继续向徐州撤退，但却突然听见曹八集方向传来枪声，曹八集是通往徐州的必经之路。黄百韬忙派人去探查，原来第一〇〇军四十四师受到了攻击。

自第七兵团撤退以来，四十四师始终处在激战中，因为该师奉命保卫运河铁桥以掩护所有的人马从桥上通过。掩护任务以巨大伤亡为代价基本完成，四十四师要撤退了，第二十五军却奉命把铁桥炸了。第一〇〇军军长周志道高声喝道："老子还有一个师没有过桥呢，我看哪个敢炸！等打完了仗，老子到国防部去和黄百韬打官司！"铁桥暂时未炸，但是在四十四师通过的时候，被拥塞在桥头的一辆弹药车爆炸了，等待炸桥的第二十五军以为解放军追来了，立即实施了炸桥，结果四十四师一三一团还是没来得及过河。刘声鹤师长心中充满忿恨，认为自己的部队完全是在给黄百韬当牺牲品。于是，部队到达曹八集的时候，本来的任务是坚守这个通往徐州的要点，但大多数军官主张接着向前冲，因为冲过去自己就能逃过一劫。刘师长在两难中决定采取半冲半守的方式。他没想到，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对他的攻击异常猛烈和顽强，而黄百韬根本没有积极增援他的意思。最后时刻，四十四师陷入包围，刘声鹤决定"宁可拼光，不要留一颗子弹和一支好枪给共军"。当十三纵官兵冲进他的指挥所时，他把随身的手表和派克钢笔砸碎了，喊："兄弟们！你们快逃命吧！这就是我师长的葬身之所！"随即举枪朝自己的头部开了一枪——"子弹从右侧射入，贯穿整个脑部"。

四十四师覆灭，曹八集失守，通往徐州的路彻底断了。

黄百韬立即召集会议，主张迅速反击大许家和曹八集，无论如何也要向徐州靠近。各军、师长都表示，只要靠近徐州，多走一里算一里。只有第六十四军军长刘镇湘表示反对。刘军长不同意的理由很奇怪：他的阵地已经修筑好了，而且修得很好很隐蔽，不和解放军打一

仗不合算。就在这个时候，徐州派来的飞机投下了蒋介石的手令：“着该兵团就地抵抗。”——“此次徐州会战，关系党国存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地形、工事、兵力，我部优越，胜利在握。望激励将士，以尽全功。”

所有的争论到此为止。

黄百韬立即部署死守碾庄圩。

碾庄圩，这个小小的村庄，此刻聚集了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兵团部，第二十五、第四十四、第六十四、第一〇〇军，警卫营、通讯营、工兵营、战防炮营、重炮营、汽车大队、医疗队，各军的留守处和各军的野炮营。救护车、野战汽车、弹药库、仓库、医院使一个小村庄拥挤不堪。而在碾庄圩四周的各个方向上，华东野战军所有的部队都在喊着一个口号：“追上去！追上去！把黄百韬围住！”

当徐州战场上所有的国民党军将领都意识到大战将至时，杜聿明却不得不从战场之外向他认为的这个“刑场”飞来。飞机起飞后不久就迷失了方向，一直向北飞到黄河边飞行员才猛然醒悟飞过了。于是，又掉头往回飞，一直到午夜前后“还没找到徐州”。飞行员说，再过一个小时还找不到，油就没了，那就一切都完了。就在油料快要耗尽的时候，飞机的一侧出现了灯光，飞行员急忙降落下去，发现这正是徐州。

杜聿明到达徐州时，已是十一日凌晨一时。

杜聿明认为这真是“天要灭蒋”。

此刻，在以碾庄圩为中心南北约三公里、东西约六公里的狭窄地域里，黄百韬的第七兵团已被华东野战军围成铁桶一般。

## 老头子为什么不来徐州

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司令员周志坚上了前沿，碾庄外围阵地上的情景让他感到了不安：

> 大宋庄枪炮轰鸣时，我到了小宋庄。当时伤员还没来得及运走，我们牺牲的干部、战士的遗体和敌人阵亡官兵的尸体仍在原处，我要看看这个仗是怎么打的，敌人的部署是否像我观察到的那样，我们的战士是在哪里牺牲的，是炮打死的还是枪打死的，我战前的判断是否正确……这些，要在战场保留原状时才能看得清清楚楚。我看见了小宋庄血染的战场，我的心里有些不安，我们的牺牲太大了。这么个小小的村落，死了这么多人……

碾庄圩位于陇海路以南、运河以西，是十几个自然村落组成的一小片区域。这里是运河西边的低洼地带，洼地、水塘、沟渠错落其间。为了防洪水，民房都建在土台子上，村落四周也都夯有高出地面两到三米的土围墙。碾庄圩是徐州以东的重要防御据点，原是李弥的第十三兵团驻地，因此区域内筑有大量坚固的野战工事，特别是在各个村落四周，建有大量的碉堡和地堡，预先设置了可以相互交叉的火力点。黄百韬接管这一防区之后，兵团部位于碾庄圩，第六十四、第一〇〇、第四十四、第二十五军分别配置在碾庄圩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上，十多万人马密集地收缩在一起，准备在空军的支援下固守待援。

华东野战军对碾庄圩的攻击，采取四面向中心突击的战法：六纵向北突击，十三纵向东突击，四纵沿着铁路线向西突击，九纵向西北方向突击。十一月十一日，突击部队向各自正面的敌军阵地发起猛攻。四纵攻击碾庄圩以北的小牙庄、尤家湖阵地；八纵攻击碾庄圩以东的大院上、吴庄阵地；九纵攻击碾庄车站附近的第四十四军；六纵和十三纵攻击彭庄、贺台子阵地。野战军指挥部要求连续突击，速战速决，三至五天内解决战斗。但是，突击一开始，却发现困难要比想象的大得多。除了沟塘密布、村落分散、工事坚固等原因外，各攻击

部队经过几天的急行军，官兵异常疲劳，炮兵也没能及时跟上，因此，在前两天的战斗中，突击部队伤亡很大，战场推进缓慢。

十三纵攻击小宋庄，守军是第一〇〇军六十三师。六十三师师部位于大宋庄，但前沿伸展到了距大宋庄一里地的小宋庄。这是一个仅有十几户人家的村庄，防御部队是六十三师专门组织的一支突击队。得到机枪加强的突击队，采取密集火力掩护下的多点防御战术，使得十三纵的攻击一开始就受到严重杀伤。十三纵付出巨大伤亡攻占外围地堡后，深入小村庄的战斗变得更加残酷。守军利用村里的民房修筑起核心工事，几乎所有的墙角都修有碉堡，碉堡上设有四层射击孔，射击孔设计得很小，很难将其封锁。而且，在小村里的墙缝、门缝、窗户乃至屋檐下，到处都是机枪射击点。十三纵往往发动数次冲击，才能推进一步，即使占领了一座民房，民房也会即刻被守军的燃烧弹点燃。攻击部队的营、连干部情绪焦躁，都说从来没有打过这么难打的仗，也没见过这么顽强的敌人。在夺取了一座民房后，需要冲过一片空地，但是空地被守军火力封锁着，于是官兵想从墙上掏个枪眼以掩护爆破。枪眼刚刚掏好，墙那边就塞进来一颗手榴弹，急忙把手榴弹拾起来扔回去，可第二颗手榴弹又塞了进来，官兵们只好用稻草把枪眼堵上。接着，让十三纵官兵吃惊的事发生了：在守军的逼迫下，几个百姓举着火把走了过来，要在攻击部队占领的房子里放火。官兵们朝天开枪，不停地喊："不要过来！不要过来！"百姓扔下火把跑了。守军又用一根长竹竿挑着燃烧的棉花往房顶上甩，刚刚占领的房子还是让守军点着了。十三纵再次发动攻击的时候，守军让百姓站在民房的门口当盾牌，机枪就架在这些百姓的肩膀上。十三纵的官兵们很痛苦，战斗已经让他们的许多战友伤亡，而面前惊恐万状的百姓又令他们想起自己的父母，他们高声喊："老乡！我们掩护你们！快跑！不要给他们挡子弹！"百姓们惊惶地到处乱爬，守军混在百姓中趁机猛烈射击，在密集而纷乱的弹雨中，攻守双方的官兵和那些无辜百姓的呼喊声混杂在一起。

一纵在窑湾与第六十三军的激战也到了最后关头。第六十三军的顽强抵抗触发了一纵官兵的斗志，他们发誓要把窑湾拿下来，把第六十三军就地全歼。第六十三军之所以顽强抵抗，是因为他们听见碾庄圩方向传来激烈的枪炮声，他们误认为那是增援部队赶来了——他们确实得到过支援，从徐州飞来了三四批飞机，每批三架，往窑湾镇空投粮食。但是，窑湾镇阵地十分狭窄，空投的粮食大多落到了外围一纵的阵地上。一纵再次发动攻击的时候，加强了火炮的打击力度，猛烈的炮击使第六十三军的阵地上硝烟弥漫。炮火准备之后，一师在东门，二师在北门，三师在南门，同时开始了最后冲击。一师很快向窑湾镇插进去，但是二师和三师几次攻击都没奏效，于是临时改变部署，二师六团从东门突入接应攻击北门的四团，三师也从东门往里突击——“老兵油子多，仍然负隅顽抗。”一纵指挥员们感到这个对手有点难打。

此时，那个发誓要让第六十三军“一战成名天下知”的陈军长有点慌了，因为各个阵地上的战斗都已进入混乱状态。一八六师副师长伍少武跑到指挥部报告说，五五八团的阵地已被突破。陈章冒着炮火前往一八六师师部，师部里满地的文件，师长张泽琛却不见了。军官们说，中午的时候，张师长把胡子剃了，换上了便服，说要去巡视阵地，可直到现在也没回来——张泽琛师长跑得很快，居然一路跑回广州，广州的报纸迅速登出了他从战场突围而出的“英雄事迹”。陈章要求一五二师师长雷秀民、副师长黎天荣与他一起返回军部，重新组织部队进行抵抗。但是，一转身的工夫，雷师长也不见了——雷师长拉着一八六师五五六团团长黎安福也跑了。回到军部，陈章拿着手枪站在门口不进屋，一脸的阴沉。黎天荣副师长前去组织预备队，路上遇见军参谋长宋健人，可转眼间宋参谋长也不见了——宋健人是当地人，曾在窑湾镇当过区长。

陈章和黎天荣决定突围。

他们跑到四五四团阵地的时候，陈章用广东话大骂："丢他妈！叫死守阵地，怕死鬼先跑了！"接着，一纵的攻击部队就冲到了跟前。黎天荣发现军长陈章也不见了，身边的一个连长说，他听见几声左轮手枪的枪声，还听见军长在喊："张黑（张泽琛）害死我！"黎天荣断定军长已经自杀——第六十三军军长陈章，刚刚从副军长的位置上得以提升，因此他不想死。混乱中，他带着几名卫兵跑到运河边，想用几块木板泅水过河，但刚要下水就身中数弹。随行的一八六师副师长伍少武也同时中弹。在他们身后，想用木板渡河的官兵中弹毙命和淹死在运河里的达百余人。

黎天荣知道自己冲不出去了，于是返回阵地坐下来等待被俘。

国民党军第七兵团第六十三军，是在淮海战役中首先全军覆灭的一个军。

是役，华东野战军一纵歼敌"两个师五个团一万三千多人"。

十二日，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前进到距碾庄圩不足五公里的过满山。

刚到过满山，中央军委就发来电报，指出华野前指的位置太靠前，命令粟裕后撤五公里，粟裕转移到土山镇东南的火神庙。从前沿回来的参谋对他说："黄百韬可真难打呀！一百多米宽的正面，就有二十多挺机枪，子弹像泼豆子一样！我们的官兵就这样一波一波往上冲！"粟裕打电话问四纵司令员陶勇，让他如实报告部队伤亡数字。陶勇报告说，眼下四纵伤亡已达四千三百多人。

粟裕、陈士榘、张震分析了进攻缓慢的三个原因："一、地堡、交通壕结合，不易爆破，再加敌人不断地反击；二、收缩一团，分割不易，必须逐庄攻击；三、指挥不一，动作不协同，炮火无统一指挥。"

晚上，粟裕召集六个主攻纵队的指挥员开会，他说：“黄百韬兵团已由运动之敌变为驻守之敌，我军的战法必须由运动战转为村落阵地攻坚战，用迫近作业的办法突破敌人的坚固防御阵地，利用暗夜把交通壕挖到敌人阵地前沿，然后突然发起攻击。要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其首脑，乱其部署，逐个争夺敌人的火力点和所占村庄。”

碾庄圩四周突然寂静下来。

黄百韬让参谋长魏翱派小部队去侦察一下，结果侦察队刚一露头就被打了回来，侦察员报告说碾庄圩四周成千上万把铁锹正在拼命挖土。

黄百韬还没想明白粟裕到底要干什么，南京的飞机来了，给他送来一枚勋章。碾庄圩几天坚守，共产党军队攻击受挫，顾祝同在南京极力宣传“碾庄大捷”，何应钦更是激动地宣称：“黄百韬真是英雄！”徐州的刘峙则认为目前“态势非常有利”：“共军在邳县以北地区运河两岸被黄百韬兵团截成两部，一部在运河东岸过不来，一部分在西岸退不回去，被飞机轰炸扫射，死伤很大，胜利在望！”而空军为了配合南京的宣传，特派飞机给黄百韬空投地空联络电台，结果飞机出了故障无法空投，机上的一位空军科长竟然抱着电台跳伞在碾庄圩着陆，这位兄弟神勇义气，碾庄圩地空联络从此畅通——“阵地发现紧张时，空军轰炸立刻应援；空军发现情况，地上亦立刻了解。”

只有杜聿明认为局势不妙。

杜聿明到达徐州之后，第一感觉就是刘峙的总司令部“非常混乱”。所谓“混乱”，指的是刘峙及他的参谋部人员对战场态势几乎没有任何独立的判断和果断的处置，前方的各兵团都在夸大自己当面的敌情，这使得徐州的总司令部始终陷于盲从之中。为什么总司令部连共产党军队的基本情况和意图都不清楚？除了指挥机构的无能之外，杜

聿明还看出了另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徐州附近的百姓总是欺骗国民党军：

> 徐州附近的百姓对国民党军实行了严密的封锁，国民党军的特务只能派出，无法返回。徐州四周密布的特务电台完全失去了作用，甚至有许多地区百姓以虚报实，或以实报虚，迷惑国民党军。如丰县、黄口间仅有解放军二、三野之一部，而国民党军从百姓方面得来的情报是二野主力；又如二野主力已先到涡（涡阳）、蒙（蒙城）地区阻击黄维兵团，而国民党军得来的情报则是这方面没有解放军的部队。

对于战争中交战双方的任何一方，这种受到百姓抛弃的境遇是极其危险的——杜聿明知道这不仅仅是情报不准的问题。

由于这种混乱，南京军事会议上作出的解救黄百韬兵团的计划，徐州方面根本没有执行。杜聿明就此询问刘峙，刘峙说："情报显示，徐州附近到处都是共军主力，如果派部队去碾庄圩，徐州受到攻击怎么办？"——任何战场上的任何部队，兵力总是有主次之分，怎么会到处都是主力？

杜聿明提出了两个方案：一、命令黄百韬的第七兵团至少坚守碾庄圩七至十天，以李弥的第十三兵团守备徐州，第七十二军为总预备队，以邱清泉的第二兵团和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会合黄维的第十二兵团，向西先与刘邓部决战，然后回师向东击溃陈粟部，以解黄百韬之围。这个方案能够实施的关键，是黄百韬能否坚持七至十天。二、以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守备徐州，第七十二军为总预备队，以邱清泉的第二兵团和李弥的第十三兵团全力解黄百韬之围，同时命令黄维的第十二兵团疾驰徐州。这个方案可以稳定黄百韬的军心，缺点是黄维兵团很可能被刘邓部所牵制，那么攻击陈粟部的兵力也许会略显不足。

刘峙坚决反对第一个方案，因为黄百韬根本坚持不了那么长时间，而如果向西打刘邓不成，向东救黄百韬也不成，那样就会酿成大祸。关于第二个方案，徐州总司令部的人都认为，这一思路符合蒋介

石的命令。刘峙犹豫再三之后，决定邱清泉的第二兵团和李弥的第十三兵团联合向徐州以东攻击前进，逐步靠拢碾庄圩，解救黄百韬的第七兵团。行动开始的时间是：十一月十三日。

徐州“剿总”决定解救黄百韬，以两个兵团的规模向东实施突击，对于华东野战军来讲，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此刻碾庄圩的围歼战正处在艰难阶段，而国民党军从徐州增援黄百韬仅有五十公里的距离。

南阳战役后，刘伯承率参谋人员分别乘坐一辆吉普车和一辆大卡车，进入淮海战场。十日，在河南与安徽交界处的一个小村庄里，刘伯承与陈毅、邓小平会合了。当日，在陈赓的第四纵队指挥部，中原野战军召开军事会议，会上没有人对华东野战军吃掉黄百韬兵团感到担忧，各纵队指挥员都在黄百韬兵团之外寻找着战机。刘伯承让大家聚集在军事地图前，主张在地图上“摆个阵势”看一看：“怎么摆法呢？就是我们的主力直捣津浦路，破坏徐州、蚌埠之间的铁路，攻占宿县。大军集结在这一段铁路线上，会产生一个什么结果呢？这就叫先声夺人。蒋介石这时会怎么想呢？他就不会考虑支援徐州，而是考虑防守淮河、防守长江和保卫南京的问题了。这时杜聿明会怎么想呢？突然后路被切断了，他就不会想去援救黄百韬，而是他的后路怎么办？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会怎么想呢？他们会很快龟缩徐州，考虑如何保存实力、保存自己的问题。这时，徐州就成了瓮中之鳖，我们就来个瓮中捉鳖。这个集团如果南逃，我们可以南北夹击，不过估计他不敢，他没这个胆量。他当然想打通津浦路，但是不可能。他们要向西跑，就要通过我们解放区一千多公里，注定要失败。唯一的办法就是丢掉辎重往南跑，目前东南还有个缺口。我想杜聿明还在想哩，还在犹豫不决，不愿意丢掉辎重。如果他们现在真想跑，真有可能跑掉；如果犹豫不决，我们还有时间补救。那就叫韦国清这个集团赶快堵住东南方向的那个口子……”

中原野战军将未来作战设想上报给中央军委。

十四日，中央军委致电中原野战军：

……（二）目前数日内必须集中精力，彻底解决黄兵团全部及宿蚌段上敌人。（三）我们很担心寒（十四日）删（十五日）两日不能解决黄百韬，又担心阻击兵力不足或阻击不得力，邱李能够靠拢黄匪。希望粟裕同志照元（十三日）酉（十七至十九时）计划，集中力量首先解决黄匪二十五军、四十四军、一百军，留下黄之兵团部及六十四军，吸引邱李东进，然后以韦（韦国清）吉（姬鹏飞）、谭（谭震林）王（王建安）两集团向邱李东西合围，乘势猛击，歼其一部，构成徐州与邱李间之阻绝阵地……只要此着成功，整个形势即有利于我。（四）请刘陈邓集中全力于歼灭宿县之敌后迅速南进，歼灭现已进至固镇等地之刘汝明（第四绥靖区司令官）六十八军及可能跟进之五十五军。此着胜利，则黄维兵团处于孤立地位，较易对付……（六）在黄百韬全部被歼，邱李与徐州之联系已被确实切断，敌已无法打通之情况下，究竟先打邱李，后打徐州，还是先打徐州，后打邱李，值得考虑。但同时打两个敌人则不适宜。我们现在设想，在黄百韬被歼、邱李被围的情况下，估计蒋介石必令邱李迅速猛烈突围回徐州，因此必须集中华野全力，首先完成对邱李之包围，其中主要是以最强大兵力隔断徐州与邱李之联系，在徐州与邱李之间构筑稳固的突不破的阻绝阵地，同时举行对邱李之猛攻，歼灭其三分之一左右的兵力，使其无法动弹。然后再看形势，或者继续完成歼灭邱李再打徐州，或者先打徐州再灭邱李……（七）此战役为我南线空前大战役，时间可能要打两个月左右，伤员可能在十万以上，弹药、民工需要极巨，请华东局、中原局用全力组织支援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黄百韬兵团在碾庄圩的抵抗给华东野战军的攻击带来了巨大的困难，而且徐州方向两个兵团的增援部队已经出动，按照直线距离计算顶多两天即可到达碾庄圩地区。但是，此刻，共产党决策层对国民党军统帅部、徐州“剿总”司令部以及战场上国民党军数个兵团的能力均表示出极大的蔑视，他们坚信在碾庄圩华东野战军可以对付国民党军至少是三个兵团的重兵突击，由此，他们把目光转向了碾庄圩以南一百多公里外的黄维兵团。

于是，淮海战场的战局变得错综复杂。

当国民党军集中兵力向东解救黄百韬的时候，他们没有看到共产党方面理应作出的剧烈反应，刘邓部主力不但没有加入碾庄圩战场的迹象，而且朝着徐州的东南方向插了过去，直逼他们此刻万分敏感的

部位——“东南方向的那个口子”。而这个口子，是徐州战场上的国民党军“撤至淮河防线”的唯一退路。

蒋介石万分忧虑地发现，在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徐蚌”战场上，处处被动的局面已经显现。他连日不断地调动部队，不断地发出各种指令，国民党军在淮海战场上投入的兵力已经达到六十万之众。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又一件令他猝不及防、懊恼不已的事发生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陈布雷自杀了。

时年五十八岁的陈布雷是总统府国策顾问、委员长侍从室主任，辅佐蒋介石长达二十年之久，是蒋介石最亲近的幕僚，蒋介石所有的讲话和文件几乎都是陈布雷起草的。这位浙江慈溪人，曾任报纸主笔，文章精炼，才思深厚。他在蒋介石和陈果夫的介绍下加入国民党，不但成为蒋介石离不开的文件主笔和批阅人，还是蒋介石与其他国民党军政高级人员间的联系纽带，在国民党中被称为“逾百万雄师”之重臣。十一月十三日，人们发现他躺在卧室的床上，脸色蜡黄，双眼微睁，嘴巴张开，时已气绝。

两天前的下午，秘书蒋君章发现，参加完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陈布雷面色憔悴，神情恍惚。由于夫人和孩子长期生活在上海，陈布雷的生活由秘书和副官照料。吃晚饭的时候，一向沉默寡言的陈布雷突然谈及自己的人生往事，最后他说：“国事艰危，与其说是共产党弄的，不如说是给自己人弄的。”接着，有朋友来访，陈布雷在送客时又说：“布雷老了，本无轻重，误了总统的大事，即使粉身碎骨也不能补救万一。”有人分析，导致陈布雷自杀的原因，是十一日蒋介石在临时会议上对陈布雷大发雷霆。为蒋介石处理重要文电和讲话的陈布雷从来忠心耿耿，但是他的执拗性格也让蒋介石偶感头疼，为此了解他的蒋介石总是让步——“由他去好了”。几天前，蒋介石提出“抗战要八年，剿匪也要八年”，遭到陈布雷的坚决反对。陈布雷对蒋介石

说：“抗战是抵御外侮，现在打的是内战，不能相提并论。”蒋介石愤怒地对陈布雷拍了桌子。十一日，陈布雷作为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发言，他极为忧心地谈到国民党军将领腐败、士气低落，谈到国民党军政大员的聚敛横财、贪污无能。蒋介石当场打断了他的发言，说他“脑力衰弱，宣传工作没有抓好，应该休息了”。

从未当众受过羞辱的陈布雷表情呆滞地退出了会场。

十二日和十三日，陈布雷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开始给他所能想到的所有亲人、同事、朋友以及他的“总统”书写遗书。这个性格孤傲的文人，自觉“已无生存人世之必要”，但即使在“肠断心枯”之时，他还是在遗书中详尽交代了自己身后的事情……陈布雷写给蒋介石的遗书有两封。在第一封遗书中，他说自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值此党国最危难之时期，而自验近来身心已毫无可以效命之能力”。在第二封遗书中，他讲了放弃生命的“理由”，那就是目前蒋介石受到各方抨击，是因为自己没有尽到宣传之责，为此“无可自恕自全”：

> ……党国艰危至此，贱体久久不能自振，年迫衰暮，无补危时，韩愈有一“中朝大官老于事，讵知感激徒媕婀”，布雷自问良知，实觉此时不应无感激轻生之士，而此身已非有效危艰之身，长日回皇，渐愤无地。昔者公闻叶诋总理之言，而置箸不食，今我所闻所见一般老百姓之中毒素宣传，以散播关于公之谣言诬蔑者，不知凡几。回忆在渝，当三十二年是时，公即命注意敌人之反宣传，而四五年来，布雷实毫未尽力，以挽回此恶毒之宣传。即此一端，又万万无可自恕自全之理。我心纯洁质直，除忠于我公之外，毫无其他私心，今乃无地自容之悔疾，出于此无恕谅之结局，实出于心理狂郁之万不得已……

关于陈布雷的死，后来大多数舆论归结于“死谏”二字。

陈布雷与蒋介石的真正矛盾，起于他提出与共产党方面进行和谈，结束战争，以避免国民党政权的彻底垮台。陈布雷清醒地意识到，如果战争延续下去，国民党军的结局只能是失败。东北战场彻底失利、徐蚌大战即将爆发，陈布雷觉得自己跟随蒋介石数十年，到了

必须进谏忠言的时候。陈布雷告诉蒋介石，他“同意文白（张治中）将军的建议，早谈比晚谈好”。蒋介石脸色阴沉地说，现在与共产党谈判，我们“连平起平坐的地位都没有”了。陈布雷劝说道：“只要党存在下去，就有先生的地位。”蒋介石一下子火了：“美国人逼我，桂系逼我，现在连你也逼我。这个党除了我，谁能斗得过毛泽东？白崇禧？何应钦？张治中？你说！”蒋介石认为“徐蚌会战刚刚开始，谁胜谁负还没有揭晓”。陈布雷决心把话说得更清楚些：“我们只有这么一点力量了，这是我们可以和他们谈判的资本；如果连这点力量也没有了，那时我们想谈也谈不成了。”蒋介石说：“我知道你已经很累了，我看你还是休息休息吧。”陈布雷流了泪，他恳求蒋介石这次听一次劝告。蒋介石依旧说：“你累了，休息去吧。”

绝望的陈布雷决心彻底休息。

蒋介石为陈布雷题写的挽联是：当代完人。

就在陈布雷自杀的那天，美军副总参谋长魏德迈和国民政府代表蒋匀田正在华盛顿的一座大楼里审视一张中国地图，魏德迈在中国地图上画来画去，试图寻找一条最后的防御线——如果共产党军队在徐州战场上得手，国民党军队将在哪里抵挡随之而来的泄洪般的攻击呢？令人吃惊的是，魏德迈最终画出的这条防御线既不是淮河，也不是长江，甚至不是珠江，他把国民党军的防御线一下子画到了中国东南方向的台湾和西南方向的云南：

> 如果徐州失守，惟有退保中国东南与台、澎地区。照地理的形势说，自福州至昆明三角地带，较易防守，所以我划一条代表战略地带的红线。惟四川省的经济价值甚高，不应轻易放弃，所以我划一条虚线，以为试守之计……现在美国海军尚固守青岛基地，目的即在支持平、津三角地带傅作义的守军，使能牵制中共军队，不能即刻大批南进，盼拖长时间，以便布置防守东南半壁的战略基地。

无法得知蒋介石看到美国盟友为他画出的这样一条防御线时是一种什么心情。

粟裕已经将攻击碾庄圩的作战部署调整完毕：

各攻击纵队和特种兵纵队的重型火炮被统一编成三个炮群，支援攻击作战；第四、第六、第八、第九、第十三和特种兵纵队为攻击部队，由山东兵团政治委员谭震林、副司令员王建安指挥；第七、第十、第十一纵队为阻援部队，负责阻击邱清泉、李弥两兵团，由第十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刘培善统一指挥；苏北兵团司令员韦国清、副政治委员吉洛指挥第二、第十二纵队和中原野战军第十一、鲁中南纵队，向徐州的东南方向攻击前进，侧击邱清泉、李弥两兵团。第一纵队为预备队。

十三日晚，华东野战军对碾庄圩的攻击再次开始。

由于采取了土工迫近作业的战法，尽管逐村逐屋的争夺战依旧十分激烈，但黄百韬的前沿阵地不断被蚕食，外围的小村庄一个个地丢失，攻击部队的官兵逐渐地向碾庄圩核心阵地靠近。

与此同时，在碾庄圩的西面，阻击徐州东援之敌的战斗打响了。

邱清泉和李弥两兵团沿陇海铁路两侧，各以两个军的兵力向东进攻企图解围黄百韬：第八军进攻寺山，第九军进攻团山，第五军进攻魏集，第七十军进攻邓家楼。四个军的兵力，拥有数百门重炮和数十辆坦克，还有空中火力支援，虽然杜聿明对增援行动能否缓解徐蚌战场的危机持怀疑态度，但是，仅就两个兵团的进攻而言，由于距离很近，只要推进十几公里后，重炮就能打到碾庄圩，因此向黄百韬靠拢应该问题不大。

中央军委的决策是，决不能让增援的敌军到达碾庄圩，但也不能打得太狠让敌人缩回徐州。

在徐州以东的阻援战场上，华东野战军官兵显示出野战阵地防御以及大兵团对垒的惊人的勇气和战斗力。十纵在北面防御团山、寺山一线，七纵居中防御魏集一线，十一纵在南面防御邓家楼一线。从军事地理上看，这里并不利于打阻击战，地势开阔，除少数村庄和小丘陵之外，无险可守。于是，阻援部队决定集中兵力防御几个重要的据点，加大阻击阵地的纵深，采取节节抗击、不断出击的战法，将国民党军两个强大的突击兵团死死地拖在这里。

七纵司令员成钧压力巨大，因为这是从没遇到过的面对强敌的阻击战。在七纵的阻击地段，大部分是平原开阔地，只有一些小小的乱石山，构筑工事十分困难，却有利于敌人坦克的进攻。特别是，碾庄圩就在身后约四十公里处，阻击阵地纵深不足二十公里，可供机动的余地很小。成钧在阵地编成中突出重点，构筑了“品”字形支撑点，组织起强有力的第二梯队和反冲击小组，准备在此给敌人大量消耗。邱清泉兵团第五军二〇〇师的进攻十分猛烈，七纵一线阻击部队经过一天的战斗后，转移到薛山、大石山一线。夜幕降临，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官兵们连夜在满是石头的小山上构建工事。天亮了，国民党军步兵的进攻还没开始，工事就被敌人猛烈的炮火摧毁。十九师的一个连在薛山光秃秃的阵地前沿连续打退敌人的三次冲锋，七班战士张龙喜用机枪顽强封锁着一个山口，山口中已经横陈着三十多具国民党军的尸体。由于防御地段同时受到第五军和李弥兵团第九军的协同攻击，十四日黄昏，七纵再次从薛山、大石山一线后撤至乱石山阵地。

十一纵的当面是国民党军第七十军。第七十军火炮达七十门以上，加上飞机的低空扫射，十一纵的阻击阵地上烈焰升腾。敌人在坦克的支持下蜂拥而上，十一纵官兵在阵地上顽强抗击一整天，黄昏时

分两军步兵在阵地前沿相接，肉搏战的厮杀中阵地来回易手，天黑时前沿的一条战壕丢失。接下来的两天，十一纵官兵扼守着马山、中山、张庄、刁泉等阵地。敌人的炮弹打来时官兵们躲在石缝中隐蔽，步兵冲来的时候再呐喊着冲上前沿。在狼山阵地上，九十二团的一个加强营抗击着敌人三个方向合击，战斗从上午打到黄昏，加强营最后仅剩下一个班的官兵，但阵地依旧在手。十五日，根据上级命令，十一纵撤退到二线阵地。

宋时轮的十纵扼守在团山、寺山一线，这是李弥的第八军和邱清泉的第五军重点攻击的地段。十纵二十八师抢占了约十公里宽的阵地，仅用一天时间就挖掘出数条战壕和大量掩体。敌人的进攻开始了，八十四团二营抗击着整营整团的攻击，两军反复厮杀后都出现严重的伤亡。坚守在一个路口的苗树柏班，是一个勇敢的战斗集体，在人员伤亡、弹药将尽的情况下，他们同时控制着左右两面的敌人，当机枪子弹用尽时，班长苗树柏说："就是用刺刀拼，用石头打，也要把敌人挡在寺山口之外！"然后，他带领战士挥舞铁锹铁镐硬是把当面的敌人顶了回去。在二营的阵地上，两个团的敌人已经冲上来了，四连和六连所有负伤的官兵都加入了战斗。七班副班长崔学元右腿三处中弹，一只脚被炸烂，依旧在扔手榴弹；卫生员于家深抓起枪直冲山顶，然后猛烈射击以压制敌人；最后，营教导员常俊邦把仅有的一排子弹交给副排长崔明柱，把最后一颗手榴弹交给战士杨光宝，命令他们向敌人发动最后的反击。战士们向黑压压的敌人冲了过去，这是二营一天之内发动的第十次反击。

在团山方向，李弥的第八军二三七师在猛烈的炮火支援下占领了团山。第八军军长周开成不相信解放军会放弃这个山头，"上去一看，原来是座秃山，解放军是为了避免伤亡才撤走的"。周军长的预感是对的，当晚团山阵地就受到猛烈反击，不善于夜战的国民党军很快就被赶了回去。周开成认为，在飞机、大炮、坦克的协助下，两个兵团"一

定可以救出黄百韬”，但是，在团山，一个被俘的解放军战士告诉他：“我们有很多部队，步步为营，村村为战，稳扎稳打，一定能吃掉黄百韬！”

杜聿明亲自来到团山，李弥命令周开成必须夺回团山的两个村庄。周军长叫人去向二三七师师长孙进贤传达他的命令：“杜老总亲来督战，要努力作战，千方百计夺回这两个村子。”杜聿明目睹了第九军官兵反攻团山的战斗，巨大的伤亡令他吃惊。他对周开成说：“今天攻击部队虽然完成了任务，但伤亡太大，以后要设法减轻伤亡为好。”这一天，杜聿明还目睹了第八军四十二师一二五团攻击侯庄的战斗。原以为这个小村庄里顶多有解放军的一个连，于是四十二师命令炮兵猛烈轰击，准备在杜聿明面前打个漂亮仗。但是，师炮兵阵地一开炮，立即受到猛烈的炮火压制，不但炮兵连长负了伤，团山指挥部也受到炮击，副师长李振甫被炸伤。在投入预备队并加强了一个战车营之后，一二五团终于在黄昏时打进侯庄，进了村才发现解放军踪影全无——“这一天第一线的攻击，除我部占领了侯庄外，全线都无进展。”第八军参谋长袁剑飞说。

邱清泉在攻击战术上表现出令人奇怪的固执。他的一个坚定不移的判断是：共产党军队一向打了就走，因此只要坚持住，几天后如果无法解决战斗，他们就会主动撤退。因此，他拒绝了第五军参谋长陈毓秀提出的建议。陈参谋长说，从南面潘塘方向对徐州以东解放军的阻击部队实施大迂回，也许能够迅速突破。邱清泉却坚持正面进攻：“只要共军一撤退，我们就算大功告成。”第五军军长熊笑三也建议迂回作战：“如果这样打法，共军必然会逐次抵抗，极力迟滞我们的推进。这样不仅旷日持久，救不了黄百韬，而且我们因是正面进攻，反而会伤亡重大。”邱清泉反问道：“如果迂回不成，被共军钳制住怎么办？”邱清泉的参谋长李汉萍明白，从兵团的角度上讲，第七十四军被留在徐州当预备队，第十二军一一二师是老东北军的部队，根本不敢

用在第一线，因为他们没准在关键时刻就投靠了共产党，目前全兵团只有第五军能够使用。邱清泉不愿意为了黄百韬损失自己的主力，因此根本没有必要费大力迂回，正面进攻挺好打起来也方便。

十三日，十纵二十八师阵地受到第五军的猛烈攻击。在飞机轰炸和重炮轰击之后，数十辆坦克夹杂着步兵冲击而来，十纵在官兵伤亡严重的情况下，不得不转移至二线阵地。十四日凌晨，八十二团一营宋家烈营长刚到解家台子阵地，就接到纵队司令员宋时轮的电话，宋时轮要求他们只要还有一个人，还有一口气，就不能把阵地丢了。上有敌机扫射轰炸，下有成团的步兵冲击，一营官兵死战不退。上午十时，坦克冲向了一营三连的阵地，三连一排不但要打坦克，还要向坦克后面的步兵实施反击。战至中午，一排只剩下七人，二排也只剩下八人，但是宋营长依旧没有下达撤退的命令。下午，一营所有的迫击炮和重机枪都没有弹药了，宋营长咬紧牙关命令他们继续坚持，二连向敌人的侧面发起了最后一次反击，然后还活着的官兵分路突围而出。

十四日一整天，国民党军第五、第八、第九军各一个师，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分三路向十纵的阻击阵地发起了全线进攻，企图在十纵防区的正面撕开一个缺口。战斗一直持续到十五日凌晨，邱清泉和李弥两兵团依旧进展缓慢。这时候，增援作战已经进行到第三天，增援部队只前进了不到十公里，如果按照徐州至碾庄圩的直线距离计算，邱清泉和李弥只推进了不到三分之一的路程。这一结果令南京国防部、徐州“剿总”和参战将领们大为意外。

顾祝同和郭汝瑰受蒋介石指派到达徐州。

顾祝同见面就问：“共军不过两三个纵队，为什么我们两个兵团还打不动？”

杜聿明辩解说：“打仗不是纸上谈兵，画一个箭头就可以达到目的地的。况且敌人已先我占领阵地，兵力在陆续增加，战斗非常顽强，每一村落据点，都得经过反复争夺，才可攻占。”

此时的淮海战场云谲波诡。

杜聿明私下对顾祝同说，徐州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决不能告诉郭汝瑰，因为郭汝瑰与共产党方面有联系——“我指挥作战的方案，事先决不能让郭知道。如果郭知道的方案，我就不照原方案执行。”

历史证明，杜聿明的警觉是对的。

郭汝瑰乘飞机在碾圩庄上空盘旋了一圈，他要验证空军总司令周至柔的报告：“轰炸很有效果，共军伤亡很大，黄百韬已无危险。”周至柔的这一报告，加之共产党军队在徐州东面的顽强阻击，已引发南京国防部得出这样一个判断：“共军的主力转移到徐州方向，对黄百韬可能仅监视而已。”在碾庄圩上空，郭汝瑰与黄百韬通了无线电话，这才知道第七兵团一直受到猛烈攻击。

蒋介石亲自致电邱清泉：“党国存亡，在此一举，吾弟应发扬黄埔精神，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不惜一切牺牲，将当面敌人击溃，以解黄兵团之围。”然后，蒋介石限令邱清泉一天之内到达大许家、八义集，与黄百韬会师。邱清泉一下心情烦乱起来，此时，“风传南京比徐州更加惊慌混乱，各部院准备向西南迁移”。邱清泉愤愤不平地对他的参谋长李汉萍说：“我们在前方拼命，南京路隔千把里，倒自相惊扰起来，准备逃跑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这种仗还有什么可打？老头子为什么自己又不来呢？如果他自己坐镇徐州，谁又敢不替他卖命？当然现在徐州是危险的，那也可以坐在飞机场指挥嘛！”

深陷碾庄圩的黄百韬在与郭汝瑰通话后，用电话告诫各军军长“必须进一步加强工事，准备独立作战，以尽军人天职”。然后他感叹道：在国民党军中，“谁肯不顾自己的损失而急别人之难？谁肯自冒牺牲而解救别人之危”？

第七兵团司令部机要秘书李世杰说，那一天黄百韬想到了孟良崮上的张灵甫。

## 喊杀之声不绝于耳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六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人：

……（二）若华野于歼灭黄兵团后，能接着歼灭邱李几个师，将该两敌打得不能动弹，则于大局极为有利。（三）若中原（中原野战军）于攻克宿县后能续歼固镇一带之敌，并以一部进驻蒙城，则可能推迟黄维向宿县进攻时间，并威胁蚌埠。（四）李延年现在蚌埠充六兵团司令官，辖九十六军、九十九军。据李称三十九军［即原驻烟台、后运锦西，现运浦口之八军王伯勋部两个师］十六日可到蚌埠、凤阳，请刘陈邓加意注意。由锦西南运之五四军［阙汉骞四个师］，是否亦将加至蚌浦线，则尚待侦察。假定该部亦到，则南线将有黄维、刘汝明、李延年、王伯勋（第三十九军军长）、阙汉骞（第五十四军军长）等部共计二十五个师，是一个大敌，必须妥筹对策。（五）中原华东两军，必须准备在现地区作战三个月至五个月［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吃饭的人数连同俘虏在内将达八十万人左右，必须由你们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统筹解决。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

随着中原野战军和中原军区部队加入淮海作战，参战的野战军连同地方部队总兵力已达六十万人，而且战役规模和战场范围越打越大，为此，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总前委的成立，不但从作战指挥上保证了淮海战役的顺利进行，而且显示出将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军主力一网打尽的宏大气魄。

这封电报值得注意的另一个要点是：中央军委要求华东野战军歼灭黄百韬之后，须对邱清泉和李弥两兵团发起攻击；中原野战军则须迅速攻占宿县，对李延年等部构成威胁；其次，预想到战役未来的发展规模，对战役所需的庞大的后勤保证提出了要求。

电报发出的当日，中原野战军攻占宿县。

攻占宿县的行动，对于决战态势的最终形成具有决定意义。

攻占宿县，截断徐州与蚌埠之间的联系，在淮海战役发起之前只有设想没有具体部署。刘伯承的设想是，如果我军攻占宿县，邱清泉兵团很可能要被迫南顾，这样将会减轻华东野战军的作战压力。随着战局的发展，国民党军的调动印证了刘伯承的预想。黄百韬被围之后，蒋介石急忙将孙元良兵团从宿县调往徐州，以便腾出邱清泉和李弥两个兵团的主力增援黄百韬。同时，国民党方面已经显示出随时放弃徐州的迹象。于是，攻占宿县成为能否全歼国民党军徐州军事集团的一个关键。宿县若失，津浦线徐蚌段将被截断，徐州附近的国民党军将被堵截在淮海战场上。

中央军委连发电报，强调攻占宿县、截断津浦路的迫切性：

九日致电陈毅、邓小平等：“陈邓直接指挥各部，包括一、三、四、九纵应直出宿县，截断宿蚌路。”

十日再次致电陈毅、邓小平：“你们主力是否已达宿县附近，并开始向宿县攻击。你们务须不顾一切，集中四个纵队全力攻取宿县，歼灭孙元良等部，切断徐蚌路。华野三、两广纵亦应用于攻击徐宿段，至要至盼。”

十日又一次致电陈毅、邓小平：“你们应集全力［包括三、广两纵队］攻取宿县，歼灭孙元良，控制徐蚌段，断敌退路，愈快愈好，至

要至盼。”

十一日，获悉中原野战军拟于当夜进至徐宿线之后，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你们真（十一日）夜到宿县附近时，将要遇到的敌人是孙元良的一个兵团部、两个军部及三个师，望你们努力争取歼灭此敌。此战胜利，即完成了包围徐州的战略任务。然后以宿县为中心控制整个徐蚌线，构筑几道防线阻止徐敌南逃，待其南逃时协同华野全歼徐敌。”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中原野战军决定以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富治指挥第四纵队、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和两广纵队，向津浦路宿县至徐州段实施攻击，求歼由蒙城向徐州北进的孙元良兵团；同时，以第三纵队和第九纵队一部攻占宿县；以第二、第六纵队和豫皖苏军区地方武装牵制正向蚌埠以西的阜阳、太和推进的黄维兵团；以第一纵队位于宿县西北方向为预备队。

由于孙元良兵团主力已经先期车运徐州，因此陈赓和谢富治指挥的部队仅截击了位于后卫位置的第四十一军军部和一二二师的三千余人。并在宿县以东的三铺地区，歼灭了没有参加起义的第三绥靖区机关和第七十七军三十七师的约四千多人。与此同时，九纵和豫皖苏军区独立旅等部队占领蚌埠以北固镇、任桥地区，三纵和九纵一部在滂沱大雨中日夜兼程于十四日对宿县形成包围。

宿县位于徐州以南、蚌埠以北，是津浦线上的一座古城。内战爆发后，这里成为国民党军徐州军事集团的重要后方补给基地，县城内囤积着大量的粮食、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装备。这里还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据点，维系着徐州军事集团与南京国防部保持联系的唯一陆路通道。宿县城墙高厚，工事坚固，护城河宽十米，水深没顶，城内的主要街道都设有路障和堡垒。县城的东关是城防要地，连接火车站，是进出宿县的门户。

宿县守军主力，是隶属黄百韬第七兵团的二十五军一四八师，加上交警第二、第十六总队，陆军第六支队，装甲第七营等部队，兵力总计一万三千余人，由国民党军津浦路护路中将司令官兼宿县最高指挥官张绩武统一指挥。

对于维系后路安全的宿县，徐州“剿总”不可能不重视，但是，此时宿县守军的兵力已显十分单薄。其原因，除了蒋介石严令徐州出动重兵解救黄百韬，而徐州为了防止兵力空虚，不得不将驻守在宿县的孙元良兵团北调之外，也与刘汝明部的明哲保身有重要关系。当初，刘汝明的第八兵团奉命从商丘撤至蚌埠，鉴于宿县守军一四八师战斗力弱，刘峙曾要求刘汝明无论如何留下一个师以加强宿县防御，刘汝明十分不情愿，但又不敢违抗命令。第八兵团的徐振业团长奉命进入宿县，可徐团长见到张绩武时，张绩武说还没有接到徐州的命令，徐团长不禁喜出望外，立即带领全团官兵乘火车跑了。等张绩武接到命令，请求刘汝明部接防时，刘汝明以军事指挥之反复乃兵家大忌为由，拒绝再去宿县——后来，当宿县以南的蚌埠受到攻击，南京的门户即将敞开时，国防部才知派刘汝明保卫京畿乃大错，因为他只想保存自己的实力，至于丢失一个战略要点关他一个兵团司令官什么事?

三纵对宿县的攻击坚决而凶猛。十五日傍晚十七时，随着六门重型榴弹炮的猛烈轰击，对宿县的总攻开始了。在东关，七旅工兵连续爆破，王元中、李德清小组先炸开了护城河桥上的鹿砦，李生华、黄金祥小组接着爆破城门，黄金祥牺牲在距离城门十余米的暗堡前。四班长翟福明和战士张海亮随即冲上去，张海亮中弹倒下，负伤的翟福明抱着炸药包顽强地爬向暗堡，最后与暗堡同归于尽。二班长张建文和战士罗德友冲到城门下，把城门炸开一个缺口，并把黄金祥的遗体拖了回来。最后，李常福、何伯宽、韩长成、陈立海四个战士抱着五十多斤的炸药包再次冲到城门下，这一次城门被彻底炸塌了，突击队蜂拥入城。国民党守军在装甲车的掩护下向东门实施反击，双方在突

破口上展开了白刃战，当第二梯队八旅到达战场后，战斗逐渐转入巷战。攻击西门的九旅在护城河上架桥时，受到城门两侧暗堡火力的严密封锁。七连官兵连续五次架桥均没成功，二十五团团长张庆和冲上前沿亲自指挥，第六次架桥成功。为此，负责打通攻击通道的七连仅剩下十六人。二十五团三营八连长高玉歧为了巩固突破口，负伤后仍然提着一挺机枪坚守不退。九连冲上来后，三营完全占领了突破口，掩护后面的一营迅速登城。接近午夜的时候，三纵的三个旅在城中心十字路口会师。这时候，宿县全城只剩下最高指挥官张绩武和他的司令部的三百多人困守在城西南的一座教堂里。

三纵司令员陈锡联对张绩武发出最后通牒，命令他放下武器。张绩武不从，三纵的攻击再次开始。官兵们缴获了敌人的三辆装甲车，三辆装甲车随即掉转炮口向教堂射击。张绩武率领残部冒死突围，但四面都是喊杀声。班长李正堂带领战士郝占敖、邢四娥、李耀宗、王国双、姜永生冲进一座院子，郝占敖控制着院门口，一个国民党军军官抱着枪企图往外冲，郝占敖一步上前夺下他的枪，大喊："不准动！动就打死你！"院子里的守军接着喊起来："不打了！不打了！我们缴枪！"清点俘虏时，不见张绩武。班长李正堂盯上了俘虏群中一个满脸锅灰的人，因为这个人总是问："你们对俘虏官杀不杀？"

李班长问："叫什么？"

这个又小又瘦的人说："方晓兮。"

"干什么的？"

"商丘兵营管理所中尉书记。"

书记，即国民党军中管理文书文件的普通军官。

李班长瞪起眼睛："不对！你是大官！"

宿县攻坚，三纵歼敌一万两千余人，俘虏张绩武和他的少将参谋长韦编。

宿县被攻占之后，徐州战场上的国民党军被孤立，且徐蚌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被分割成了南北两块。

毛泽东对中原野战军攻占宿县给予极高的评价："在战役发起前，我们已估计到第一阶段可能消灭敌人十八个师，但对隔断徐、蚌，使徐敌完全孤立这一点，那时我们尚不敢作这种估计，这种形势的造成，主观上是因为我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会合并攻占宿县，客观上是敌人只有某种程度的防御能力［对于这一点决不可轻视］，很少有攻击能力［对于这一点必须有充分认识］。"

宿县战斗中，三纵官兵缴获了国民党军一四八师副师长钱卓伲的日记。这是一本二十天前刚刚启用的新日记本，钱副师长计划这本日记本可以使用半年，只是不知"须记下多少愁怨"。他刚从宜兴老家休完假返回宿县，新日记本启用的第一页，就记述着这位多愁善感的军人排遣不掉的哀伤。

十月二十五日：

离宿县已十日，返宜兴休假亦已八天。国事蜩螗，民不聊生，所见所闻均是一片叹怨声……待关外共军内调，局势当更危难。西北一隅尚属偏安。今郑汴撤守，陇西当非净土，鲁南鲁西，大战一触即发，刻四川以东、长江以北已烽火遍地。即江南各地亦不安宁。经济方面，金圆券之信用根本动摇，游资物价一如币改前，难望稳定。每一国人无不亟亟不可终日。

十一月十二日：

津浦南段态势日急，共军主力在徐州东北西三方面猛扑，徐州从滁县铁路日夜有破坏，交通通讯时断时续。因军运繁忙，客车今日起暂停驶。下午余到街中巡视，民众均精神紧张仓皇，宿县之今日已如死城矣。下午一时许，宿县西门外三五华里处，交警十六总队派队与敌接火，双方兵力虽不多，而战则激烈。薄暮，北门外亦接战。

日记只记述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五日，这是宿县失守的那一天，日记断断续续的最后记述是：“为免家中挂念，上裴哥一电，告共军围攻已三昼夜。”“今晨二时许，共军向车站交警阵地猛扑，我守军撤入城内，车站屯有大米一万八九千包及其他食盐等物资甚多。到此时，东西南北关已尽失矣！”最出人意料的是，身陷绝境的钱副师长，不知因何想到了宿县以北几百公里外另一个身陷重围的人：“此次陈毅所部全力谋击溃我黄兵团，共军兵力亦优势，闻黄焕然（黄百韬，字焕然）此番极为难苦。”

此时，围攻碾庄圩的战斗仍在艰苦地推进。

在碾庄圩的东面，八纵攻击的是国民党军第六十四军。包括军长刘镇湘在内，这支广东部队不愿听黄百韬的指挥，打起仗来却十分凶狠。八纵二十二师六十五团和六十六团合力攻击四七五团防守的唐家楼村。官兵们打进村子之后，遇到猛烈的火力拦截。四七五团布置的射击孔大多贴近地面，攻击部队即使匍匐前进也会遭遇杀伤。敌人的多数工事都筑成夹层，可以从冲过去的部队的后面进行隐蔽射击。激战持续一整天，八纵的两个团攻占了半个村庄，战斗中六十六团政治委员李树桐牺牲。第二天，两个团调整了攻击部署，六十五团的两个营因为伤亡减员合编成一个营，由团长刘佐亲自指挥。战斗中三连长和指导员相继牺牲，副连长田胜美把全连剩下的战士编成两个班，战至最后，田胜美负伤，全连只剩下四个人，但终于攻占了唐家楼村。十五日以后，在加强炮火掩护后，八纵分别由火烧房子村的西北和大院上村的西南向碾庄圩进逼。

在碾庄圩的北面，四纵攻击的是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军。第二十五军是黄百韬的嫡系部队，因此一直被部署在碾庄圩充当黄百韬的预备队。在这个方向上，一个村庄丢失后，黄百韬命令必须夺回，但是上去的部队接连被四纵歼灭。前沿村庄失手后，第二十五军的阵地暴露

在四纵的炮火打击下。四纵右翼攻击部队用了八小时攻占大兴庄，歼灭第六十四军的一个团的大部，取得村落攻坚战的第一个胜利，为此纵队司令员陶勇进了大兴庄，与官兵们一起总结攻坚制胜的经验。大牙村的攻坚进行得十分艰苦，十二师的突击队在撕开守军前沿阵地后，遭到猛烈的连续反击，残酷的白刃拉锯战随即展开。突击排长李公然率领一个排在突破口拼死坚持，最后全排大部伤亡，李公然在白刃战中连续刺倒十几名敌人，全身七处受伤，至死不退，突破口的保持使后续部队得以突进。

在碾庄圩的西南，首先遭到毁灭性打击的是第一〇〇军四十四师。四十四师在曹八集受到六纵猛攻的时候，军长周志道想率部队前去解救，同时也可以顺便向邱清泉的增援部队靠拢，这种不"同舟共济"的想法立即遭到黄百韬的拒绝。周军长只得命令四十四师残部想法向军部靠拢，同时派出两个团前去接应。但是，空中侦察机飞行员报告说，看见四十四师大约两千多官兵正缓慢地向北走，手里都没有拿武器。周军长这才知道，他的四十四师大部分官兵都已成为俘虏。

第一〇〇军军部在彭庄，村庄里还有军直属炮兵营、特务营、六十三师师部和三个步兵团。彭庄是个较大的村庄，周围地堡密布，战壕交错，距离碾庄圩三公里，是碾庄圩外围重要的防御支撑点。经过总结经验和多方面准备，十四日黄昏，在强大的炮火准备后，六纵十八师由西南和西北、十六师由东和东南同时开始了强攻。十七师则位于彭庄与前黄滩之间，一方面阻断彭庄之敌撤退的后路，一方面阻击前黄滩之敌可能对彭庄的增援。六纵的攻击开始后，第一〇〇军连续实施反冲锋，同时集中炮火猛烈轰击。战至午夜，双方在战场上形成胶着。六纵迅速调整部署，将十七师一部也投入到对彭庄的攻击中。十五日凌晨二时，六纵的攻击重新开始，当两个团插进彭庄之后，第一〇〇军的防御线被割裂。

凌晨时分，冷雨飘洒。十六师四十八团二营在接近祠堂时，与国民党守军的一个机动分队在雨雾中迎头相撞，肉搏战结束后二营伤亡很大。官兵们接着往前冲，谁知前面又出现了一座祠堂，祠堂内的守军火力猛烈。五连长刘志成率领二班顺着一条河沟向祠堂接近，他身边的战士不断地有人倒下，最后刘连长终于冲到祠堂的围墙下，把炸药包从守军的射击孔塞了进去，但很快被守军推了出来，刘连长再次把炸药包连同两颗手榴弹一起塞了进去，随着剧烈的爆炸，围墙被炸开一个缺口，五连蜂拥而入。四十六团三连爆破员张庚发连续爆破几座地堡，又抱着机枪猛烈射击，弹尽后举着手榴弹冲入敌群，英勇牺牲。五十二团三营八连二排长陈永祥率领突击组第一个冲入突破口，与守军仅隔一道墙展开激战，墙内守军的手榴弹密集地投过来，突击组很快就剩下陈永祥和两名战士了。三个人利用废墟迂回前进，边前进边不断地吹哨子，喊："一连在左！二连在右！"最后一直冲到第一○○军的核心阵地，陈排长对着第一○○军军部的窗户猛烈射击，然后大喊："你们被包围了！"

彭庄的混乱令黄百韬焦急万分。他命令第四十四军军长王泽浚派一个营前去增援，但是自顾不暇的王军长手里已经没有可以调用的预备队，只能从自己的阵地上临时抽调一个连，可是这个连还没有冲到彭庄，就听溃逃下来的第一○○军官兵说彭庄已被攻占。第一○○军军长周志道在三百多官兵的簇拥下，向北逃跑。途中，一颗子弹将他的胸部贯穿，他被卫兵们抬着消失在雨雾中。

彭庄守军开始向碾庄圩方向奔逃。

六纵官兵在后面猛追。一位名叫许云海的班长带着一个战斗小组追上了一个戴眼镜的大胖子。胖子双手抱着头趴在地上。许班长说："别害怕！解放军宽待俘虏，站起来跟我走！"胖子站起来就跑，许班长说："再跑我就开枪了！"胖子又一下趴在地上，直说："不要打！不

要打！”押解这个胖子让许班长很是费心，因为胖子走几步就趴下来。押解到团部后，团政治处主任问：“你是什么官？”胖子说：“秘书长。”许班长从胖子身上搜出一份文件，文件上写着：“呈副军长杨收”。胖子犹豫了一下，说：“我是第一〇〇军副军长杨诗云。”

碾庄圩的南面就是陇海铁路，第四十四军军长王泽浚在碾庄圩火车站指挥战斗时左手被炮弹炸伤。王军长心情恶劣，此刻，在他的防区前沿，几乎所有的村庄都被当面的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攻占。十四日上午，一五〇师四五〇团防御的村庄被突破，团长杨南邨被俘，官兵仅有四十多人得以逃脱。十五日拂晓，四四八团放弃了自己的阵地，跑到车站附近。四四八团撤退后，四四九团因为侧翼暴露，也没请示就从车站月台阵地撤走了。军山炮营已经没有炮弹，黄百韬不但不给他补充，还命令王泽浚把山炮全部交给碾庄圩的兵团部，说以后由兵团的榴弹炮支持他作战——让一个部队上交武器，这在军中是件很敏感的事情，等于表明这支部队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已经得不到信任。第四十四军从海州撤退后归属黄百韬指挥，王军长本来就觉得在整个第七兵团中自己颇有点孤家寡人的味道，负伤之后他请求兵团榴弹炮支援车站方向的作战，结果炮弹倒是打过来了，但全部打到了第四十四军预备队的头上，用无线电紧急呼叫并且明确指出偏差后，炮弹依旧往预备队的脑袋上落，这让第四十四军的官兵十分气愤。王泽浚认为，如果再这样打下去，第四十四军真的要反了。而接着发生的事，更让备受伤痛折磨的王军长万分恼火：副官处长让汽车兵随时把汽车准备好，由于天冷，汽车兵怕一旦跑的时候汽车不好发动，为了给发动机预热，他们在乱成一团的枪炮声中发动了汽车。汽车发动的声音让惊慌失措的一五〇师官兵们听到了，于是风传军部要撤退，一五〇师立即放弃了车站西面的两个村庄，结果导致九纵官兵从这个敞开的缺口冲了过来。

从碾庄圩火车站撤退下来，黄百韬命令王泽浚即刻收容溃兵。王军长好容易把一些溃兵集中起来，但是黄百韬不许第四十四军进入碾庄圩，附近的其他部队也怕引起自己的混乱拒绝收留。于是，第四十四军惊魂未定的官兵被派往前黄滩和彭庄附近的几个小村里构筑工事。王军长命令四四八团的两个营守前黄滩，四四九团的两个营、军直属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和一五〇师直属队的两个连编在一起守小李庄。

从十五日开始，在距碾庄圩仅有一公里的前后黄滩、小李庄附近，华东野战军官兵开始昼夜不停地挖坑道。黄百韬不断地派出小部队进行短促突击，但仍旧无法阻止坑道的快速延伸。最后，前后黄滩与碾庄圩的交通和电话都被断绝了。接着，攻占彭庄之后推进到这里的六纵对黄滩发起了攻击。

王泽浚神思恍惚："共军白昼紧迫作业，采取渗透战术，每日黄昏前即开始攻击，猛冲猛打，通宵达旦，一刻不停，短兵相接，喊杀之声不绝于耳，阵地报失，噩耗频传。在十六、十七两日，部队弹尽粮绝，虽然前一天曾空投粮弹，但早已用光，即使将被击毙击伤之骡马烹食，但粥少僧多，无济于事。"

四四九团团长萧德宣的电话打到军部时，王泽浚正在吃饭，电话是一六二师副师长李秾接的：

> 萧德宣在电话上向我报告："师长（赵璧光）又丢了部队跑了，有人看见他向军部跑去，我已将前面敌军打退，请师长赶快回来，安定军心。"萧德宣声音很大，王泽浚也在旁边听到。电话刚完，赵璧光突然来了。王泽浚怒不可息地把眼一瞪，把饭碗一摔，指着赵璧光大骂："你这个狗东西！"我连忙推了赵一掌说"快回去，没事了"，赵璧光一溜烟地跑了。

但是，第四十四军的黄滩前沿阵地还是丢失了。

华东野战军围歼黄百韬兵团的部队距碾庄圩仅剩了不到一公里。

黄百韬任命第二十五军副军长杨廷宴为碾庄圩警备司令，命令他组织敢死队去收复阵地，但是敢死队的几次出击都以失败告终，整个碾庄圩都已被伤兵充斥——“伤员包头扎脚，卧者坐者，有的呻吟，有的吵骂，血迹遍地，脓腥熏人，凄惨情状，目不忍睹。”

在攻击黄滩的战斗中，六纵官兵们居然簇拥着六辆坦克发动了冲锋——在济南战役中缴获的日式小坦克，隶属于华东野战军坦克大队，坦克员奉命加强对第四十四军最后残余部队的攻击力量。国民党军官兵不知道共产党军队已经有了坦克。因此，当他们在战场上看见坦克的时候，很容易联想到是徐州的邱清泉、李弥兵团到了，一个国民党军连长兴奋地跑上去，结果即刻被打死了。六纵十七师师长梁金华化装成国民党军军官，命令把坦克直接开到第四十四军一五〇师四四九团的前沿阵地上，四四九团团长萧德宣在那一刻看见了这样的情景：

浓雾中突闻马达声自远而近，三辆坦克直开到我团阵地前约三十公尺处，上口露出一个半身的人高声喊道：“我们是第二兵团的，来给黄司令官取联络的，你们的兵团部在哪个庄？你们是哪个部队？”阵地上所有官兵都从战壕里站起来看，我也从指挥所出来走到地堡上，这时阵地前沿张启汉营长大声喊道：“情况不清楚！不准和他讲话！进入阵地！”那坦克向我们上空打了三炮，急开到第四十四军后黄滩指挥所和前黄滩第一六二师阵地与我团阵地之间的旷地上成三角配备停了下来。这样，我团同军指挥所和第一六二师的联系被割断了。

徐州以东阻击战进行到第三天的时候，杜聿明意识到，这种正面突击恐怕很难奏效，如果增援行动再拖延下去，黄百韬兵团必定被歼。十五日夜，杜聿明向邱清泉下达了新的作战计划：从徐州东南迂回潘塘、张集、房村，从侧翼向北攻占大许家，配合正面东进的增援部队，打开解围黄百韬兵团的通道。

邱清泉接到命令后左右为难。部队从徐州出动的时候，兵团参谋长杨毓秀提出过迂回增援的方案，但是被他否决了。现在，当他把杜聿明的计划告诉杨参谋长后，杨毓秀明确表示已经不可能实施迂回

了，因为迂回作战必须使用精锐部队，就第二兵团来讲，可以使用的第五军和第七十军全在徐州东面突击华东野战军的阻击部队；第十二军是杂牌部队，战斗力很弱，不敢使用；第七十四军刚刚组建，战斗力也不强，尤其是缺乏迂回作战的经验，闹不好就会被歼灭。但是，杜聿明的命令又不能不执行，邱清泉和杨毓秀商量了半天，最后决定还是让第七十四军去。

第七十四军接到命令后，军长邱维达满腹狐疑，问参谋长李人俊这是不是意味着第七十四军将孤军深入，李参谋长无法解释，只能说军令不得违背。

于是，大军混战的战场上，巧合的事情猝然发生，因为此时粟裕也派出了一支部队向潘塘赶来。

潘塘位于徐州东南十八公里处，是杜聿明解救黄百韬兵团的增援部队的侧翼，也是华东野战军派出的阻援部队的侧翼。这里距离徐州机场仅八公里，当津浦铁路被中原野战军切断后，这里便成为徐州国民党军唯一的交通命脉——这是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敏感之地。

在碾庄圩以西、徐州以东，阻击邱清泉、李弥两兵团的战斗打得十分艰苦，增援之敌虽被迟滞，但终究在一点点地向黄百韬兵团推进。如何给邱清泉和李弥的增援部队以更有力的打击？粟裕盯上了潘塘这个敏感地带。早在部署围歼黄百韬兵团的作战时，粟裕已将苏北兵团的三个纵队派往新安镇以南的宿迁、睢宁一带，为的是堵截徐州之敌南逃。现在，粟裕决定使用苏北兵团，命令他们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到潘塘，侧击邱清泉东援部队的后路，并威胁徐州机场，用攻其必救的战法，迫使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因西顾徐州而不敢全力东进。

十六日凌晨三时，在漆黑的夜色中，两支对向开进的队伍在潘塘东南张集附近突然撞到一起。天亮之后，毫无准备的双方将领都大吃

一惊：在以潘塘为中心的五公里范围内，交战双方的部队已经交错地纠缠在了一起，谁都不清楚对方从哪里赶来，究竟有多少兵力。第七十四军军长邱维达接到的侦察报告说，当面出现了共军五个纵队的番号，其中一支部队距军指挥部仅三里；而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滕海清也吃惊地发现，国民党军的一支大部队与他的指挥部仅隔着一条水沟。

二纵没有迟疑，立即展开部队实施攻击。

第七十四军退守潘塘镇，并与旁边的第十二军一一二师于一凡师长取得了联系。

潘塘镇战斗随即打响。

潘塘镇战斗的猝然发生，令粟裕和杜聿明都感到庆幸。粟裕的本意，是派部队侧击敌人的侧翼，并威胁徐州机场，以造成敌人增援部队的混乱。没想到恰恰截住了偷袭华东野战军阻援部队的第七十四军。如果让第七十四军从侧翼插进去，在碾庄圩以西的阻击部队将会受到极大威胁。而一旦阻击线被扯开，黄百韬兵团很可能冲出包围圈。杜聿明的本意，是想用侧击的方式打通增援黄百韬的路线，但极其凑巧地阻击了粟裕侧击救援部队和袭击徐州机场的行动。如果机场再被袭击或者占领，不但邱清泉和李弥的东进兵团后路将断，徐州与南京的空中通道也将被截断。

庆幸之余，潘塘镇遭遇战还是让杜聿明和邱清泉都吓出了一身冷汗。他们知道第七十四军战斗力很差，根本无法抵挡解放军任何一支部队的攻击，而附近的第十二军一一二师是东北军的老部队，政治上很不可靠，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们投靠了共产党，徐州的后方就更加危险了——据一一二师师长于一凡回忆，他们当时真有起义的想法。于是，杜聿明亲自指挥，国民党军开始向潘塘镇火速增援。

二纵司令员滕海清提出的口号是：“越坚决，越大胆，就越能胜利。”二纵的潘塘之战打得坚决果断。在敌人组织起猛烈反击的时候，各部队的前沿都出现了激战，作战双方的伤亡都很大。曾被授予“华东一级人民英雄”称号的六连副连长龙加夫在战斗中阵亡。这是一个具有丰富战斗经验的基层指挥员，曾编写过一本《龙加夫打子母堡手册》，成为当时全军的军事教材。部队遭到敌人反击的时候，龙加夫带领六连冲了上去。上去之前，他把几枚银元交给指导员算是交了党费，然后把上衣脱下来叫指导员设法转交给他的母亲。冲击的路上，龙加夫被数粒子弹穿透胸膛，负伤倒下后他又重新站起来，抱着一束手榴弹跌跌撞撞地扑向敌群。六师十六团三营长鲁锐也阵亡了。鲁营长皮肤白皙，身材高大，梳着分头，英俊潇洒，八年前他穿着学生长衫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他当政工干部时学识丰厚，威信极高；当军事干部时作战勇猛，身先士卒，荣立过一等功。鲁营长牺牲后，棉上衣已被鲜血浸透，但脸还是那么白净。三营官兵发现，营长的所有财产都在他军上衣的两只口袋里，右边的口袋里是一支小烟袋和一个烟荷包，左边的口袋里是他用硬纸做的一副扑克牌，上面的红桃、方块、黑桃和梅花图案都是他用红薯刻成的字模印制的。与扑克在一起的还有一张小纸片，上面写满了字，最后的几行字是：“我是淮海人，在这次伟大的淮海战役中，我要率部队打先锋，不惜贡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由于国民党军增援部队大量到达，粟裕命令苏北兵团撤出潘塘战场。

第七十四军不但没有被歼灭，而且潘塘方向的解放军撤了，这令邱清泉大喜过望，于是通电告捷，说他的第二兵团猛烈反击，歼灭当面共军大部。徐州“剿总”当即开始渲染“潘塘大捷”，锣鼓声一时间响彻徐州的大街小巷。“大捷”惊动了国防部，南京派出携带大量现金的战地慰问团赶赴徐州。慰问团阵容浩大，由国防部新闻局长邓文仪亲

自率领，成员有参政员、立法委员、新闻记者、上海工商界名人、美军顾问团新闻处成员等三十多人，到达之后无论官兵每人一律赏大洋两块。出乎邱清泉意料的是，慰问团提出要到战场现地参观，邱清泉只好不断描述战场如何危险，这才把事情搪塞过去。但是，有一件事邱清泉吹嘘之后不好隐瞒，那就是他说第二兵团俘虏了共军的一个整营，并且武器齐全。俘虏可以搪塞说已经押送走了，可是缴获的武器总要让记者们看看，只好临时凑起来二百多支各种枪支，堆在一起让记者们拍照。邱清泉还树立了一个火线“接通电话线”的通信兵作为典型，但是无论是徐州“剿总”还是邱清泉本人谁也没见过这名士兵。南京国防部决定授予这个通信兵青天白日勋章。于是，邱清泉赶紧命令政工部门“临时找了一个士兵冒名顶替接受了这枚青天白日勋章”。

此时，为解救黄百韬兵团，淮海战场上的各路国民党军都被调动起来，但却在各个方向上受到猛烈而顽强的阻击。其中，在徐州以东距离黄百韬最近的邱清泉和李弥两兵团，依旧被阻击在距碾庄圩咫尺之遥的地方。

十六日，邱清泉的第五军四十五师攻击孙庄，遭遇顽强阻击。邱清泉亲自来到前沿督战，在兵团参谋长的建议下，战场上成立了督战队。督战队宣布：只许前进，不许后退；谁要后退，格杀勿论；即使逃到徐州，没有特别通行证抓到当场枪毙。邱清泉还命令四十五师师长郭吉谦组织敢死队，办法是重赏和连升三级。开始要求自愿报名，但报名的只有七个人，于是又改成上级指定。敢死队在火炮的支援下拼死冲锋，残酷血战之后还是被打了回来。

李弥的第八军四十二师在坦克的支援下攻击麻谷子村，村庄的外围是道水围子。飞机投下了五百磅的重型炸弹和大量的燃烧弹，整个村庄变成一片火海。“共军不是被炸死就是被烧死了”。李弥说，“只要搜索一下就可以占领了。”但是，冲击的步兵在接近水围子时，还是遭

到猛烈的射击——“天色已晚，解放军又善于夜战，国民党军不仅未能扩大战果，反被解放军赶出土围子，并被大量杀伤在水围子中，尸体几乎填满了水围的沟渠。”李弥不禁感叹道：“他们是人不是神，就是钢铁都要融化，为什么能这样顽强？”

邱清泉和李弥的先头部队几乎可以看见碾庄圩了。

被围困在碾庄圩里的黄百韬也可以听见西面的枪炮声了。

但是，碾庄圩已经濒临陷落。

首先覆没的是第四十四军。

“入夜战斗更为激烈，通讯设备全部被击毁，军、师之间通讯从此断截，火力猛烈，炮火连天，火药气味辛辣刺鼻，房屋着火，火势熊熊，墙壁倒塌，犹如天崩地裂一般，烟尘弥漫，对面几乎不见人。已伤者再伤，死者重遭炮击，尸横遍野，目不忍睹。”第四十四军一五〇师四四九团团长萧德宣决定不打了。他把可靠的军官布置在团指挥所的门口，然后请来了师长赵璧光和四四八团团长何亚颜。

我先讲了形势，然后问：“师长，何团长，是打？是坚守？是投降？还是退到兵团阵地上去？”赵、何低头不语，沉默了约十分钟，我团第二营营长余孟刚大声说道：“要打，叫师长、何团长去打，我们是不打了！”赵于是说：“现在只有你们团是完整的，仲勋（萧德宣）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干好了！”我说，孟刚的话很有远见，不过还是请师长和亚颜兄决定。赵璧光说：“不打就投降吧！不过，这怎么对得起军长啊！”我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军长也跑不掉。”我当即叫营长余孟刚带着第四连连长陈华，拿了我写好的字条向解放军阵地走去，要他们两人把字条交给解放军任何一个团以上政治机关都行。字条上写着：“国民党第四十四军第一五〇师师长赵璧光决定战场起义，请即派部队前来占领阵地。”我恐赵、何变卦，没让他俩出去，我即下令集合队伍。这时，师直只剩下一个迫击炮营二百多人，何团长就剩下一个光杆团长了。师参谋长李鼎等十余人不愿集合，向兵团部逃去。全部二千二百六十多人，清点人数后，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派了一位教导员和营长来接替阵地，说道：“欢迎！欢迎！你们快向西撤下去休息，我们掩护！”

此时，第四十四军指挥部已被炸塌，军长王泽浚被埋在瓦砾之中。挣扎出来后，他只身逃往附近的四八五团指挥所，但该团团长康即戎不知去向，指挥所里只剩一名炮兵排长。排长让他的军长赶快跑，王泽浚对炮兵排长说："我就在此地，你们不要管我。最好你去找你的连长，叫他自打主意，突围逃命也好，在此继续抵抗也好，投降共军也好，我都不管。"炮兵排长马上去找他的连长，可是不一会儿又回来了，他告诉军长："共军已经解除了我们的武器，要我们去集合，你最好不要暴露，也同我们去吧。"话音未落，解放军官兵已经出现在王泽浚的面前。王泽浚说他是个排长，于是解放军官兵让他躲在工事里，一再嘱咐说小心别让炮弹炸着。半小时之后，一位解放军干部来了，从表情上就可以看出，他已经知道了王泽浚的身份——天亮了，王泽浚虽然穿着一件士兵的大衣，但里面穿的是黄色毛织的将官军服。

王泽浚见到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政治委员江渭清和副司令员皮定钧。

王必成问："黄百韬对你们很好吗？"

王泽浚说："他怎么能对我好呢？我们是川军！抗战初期出川的时候，是三十四个团，被老蒋摆弄来摆弄去，到昨天晚上和你们作战，只剩下四个团了！一共十二门山炮，一门丢了，一门打坏了，还有十门，一发炮弹也没有，连炮带骡马，全都交给了黄百韬，放在碾庄圩。人家换过好几次美国装备了，我们还是汉阳造的破枪！"

王必成再问："你有什么感想吗？"

王泽浚没有答话，他摇一摇头，"转动在眼角儿的泪珠儿簌簌地滚滴下来"。

十七日上午，顾祝同飞到碾庄圩上空，用地空联络电台与黄百韬通话。他告诉黄百韬，增援的邱清泉和李弥打得很艰苦，建议第七兵团主动向西突围，争取与邱清泉和李弥的部队会合。黄百韬明白，这就意味着增援无望了，他没再埋怨什么，只是说："我总对得起总长，牺牲到底就是了。"黄百韬放下电话，对身边的第二十五军军长陈士章说："反正是个完，突围做什么？送狼狈样子给邱清泉看着快意吗？不如在此地一个换一个地打下去，最后不过一死，也对得起党国和总统、总长，叫黄埔同学看看，也好鼓励他们以后不要再钩心斗角地只图私利。万一党国转危为安，也是我们的贡献。"

其实，顾祝同也知道，不要说向西突围，即使是在碾庄圩，黄百韬的第七兵团也已经无法坚持了。

## 让那些醉生梦死的人醒悟过来

十一月十九日，逼近碾庄圩的华东野战军没有发动攻击。

连日来，不断地向徐州和南京发出告急电报，均渺无回音。黄百韬命令各部队紧急修筑隐蔽所，然后他去看望了负伤的第一〇〇军军长周志道，身后的副官手里提着二十听牛肉罐头和十盒骆驼牌香烟。接着，空中的一架飞机被击中着火，机上的空军上校竟勇敢地从起火的飞机上跳了下来。这个乐观的家伙一落地，就不断地渲染邱清泉兵团已经十分靠近，预计明晚就可以到达碾庄圩。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第七兵团各部队，一身褴褛的官兵们脸上出现了一种夸张的兴奋。不一会儿，又一架飞机飞来，给碾庄圩空投了一些东西，其中有南京印刷的《中央日报》和《扫荡报》，两份报纸都在第一版的显著位置登着黄百韬的戎装半身像。

黄百韬已经不像报纸上登出的那个人了，他面色苍白，消瘦憔悴。此刻，从碾庄圩的任何一个方向看过去，都可以看到解放军近到

眼前的阵地，冷炮冷枪时不时地呼啸着掠过头顶，解放军官兵的身影在战壕的前沿时隐时现。更令人恐惧的是被风吹过来的持续不断的喊话声：“弟兄们！不要为蒋介石送死了！投降吧！”

黄百韬把自己关在隐蔽部里。

西面，炮声隆隆，听上去邱清泉和李弥还在朝碾庄圩攻击。

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邱清泉和李弥的增援行动有明显的避战迹象。战后，国民党方面在军事检讨中也说“邱李尽了力”。但是，国民党方面所有的军政大员都无法解释，为什么两个强大的兵团就是打不到碾庄圩，特别是从徐州到碾庄圩只有短短的五十公里的距离，特别是当面阻击的华东野战军只有三个纵队——成钧指挥的第七纵队、宋时轮指挥的第十纵队和胡炳云指挥的第十一纵队。

十九日，邱清泉、李弥的部队推进到麻谷子、火神庙一线，前面就是大许家——大许家距碾庄圩只有十几公里，十几公里仅是步兵一个短途奔袭的距离，坦克开过去更是用不了一个小时。

第八军四十二师从正面发起持续进攻后，不但伤亡很大，而且进展缓慢。于是，军长周开成决定改变一下打法，命令一七〇师从右翼迂回攻击麻谷子。麻谷子位于火神庙以南，一条公路从村庄中穿过，将村庄分成两半。村庄周围有围墙，围墙外有地堡，墙根有散兵掩体。村子的西面和南面有一条小河，村北是个大水塘。这是令一七〇师幸存下来的官兵困惑不已的地方。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他们都没有弄清楚到底是哪个纵队在与他们血战，也不知道在这里阻击的有多少解放军官兵。有人说，能在这样猛烈的攻击下守好几天，至少得有一个团，也有人说起码要几个团。仗打得最残酷的时候，一个负伤后被国民党军抓到的解放军战士对他们说，纵队的番号不能告诉你们，反正在前面的几个村子里，代号“三四五”或“六七八”的部队正等着你

们呢，只要你们敢往前，一定会打得你们一个不留。说到在麻谷子村有多少人，晚上你们不进攻的时候是一个营守着，白天你们进攻的时候是一个连守着，“信不信由你们”。

一七〇师五〇九团团长姚轻耘不相信他的对手只有一个连。师长杨绪钊的部署是，搜索部队在麻谷子西南角的徐庄攻击，五〇八团在麻谷子西北角小王庄掩护五〇九团的正面攻击。姚轻耘建议，要打就两团夹击三个点一起打，但五〇八团团长庞铮不愿意，说他没有接到与五〇九团同时攻击的命令。于是姚轻耘只好自己干——“干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他命令机关人员在后面给全团做饭，二营警戒徐庄方向，三营为预备队警戒公路两侧，一营发起攻击。一营连续上去几次，都被打了回来，村边小河上的桥已被炸断，一营“攻到沟边，解放军一排手榴弹打出来，炸得泥水四处飞溅，官兵们都像鬼一样”。黄昏，三营采取偷袭的方式，从村子的西北角往里摸，刚接近村边就受到火力阻击，一下子死了十几个人。晚上，姚轻耘想把团指挥部移到小徐庄去，以免夜间受到袭击，师长杨绪钊坚决不同意，命令五〇九团将指挥所设置在公路右侧。姚团长十分恼火，因为这明明是让自己堵在公路上给后面的师部挡子弹。不一会儿，师长的命令又来了，说小徐庄方向有冷枪袭击，命五〇九团团部驻防小徐庄，以“掩护师部的安全”。姚团长刚刚移驻小徐庄，还没来得及构筑工事，解放军官兵突然从麻谷子村冲出来反击了。五〇九团立即混乱起来，枪炮胡乱射击，哭喊声连成一片。解放军的反击过去之后，杨绪钊命令五〇九团连夜实施攻击，天亮时一定要拿下麻谷子村。战斗开始后，二营首先在村边遭到伏击，队伍一直退到团部附近才勉强收容起来。一营的进攻很猛烈，因为全团所有的炮火都被集中起来支援他们，一营一度攻到村庄的围墙边，半个村子都已经燃烧起来，但还是无法突进麻谷子村。营长张其光在电话里向姚轻耘报告的战况令他记忆很深：

第二连连长郝毓秀被打死，排长非死即伤。第三连连长也受伤，排长无一幸免，由上士排副王建惠代理连长。不多时，王建惠也受了伤。全连八十多人，剩下三十几人。营长张其

光的小腿被打穿了。光第一营负伤抬到师部去的就二百多人，丢下的尸体还不知有多少。我将情况向军、师作了汇报，并急忙用第三营把第一营换下来，等待上级的命令。也许是抬下去的伤亡人数太多了的缘故，一直到天明，军、师部都未来命令叫我攻击。

五〇九团未能在天亮时拿下麻谷子村，姚团长接到了第五军四十五师崔贤文副师长打来的电话。姚轻耘知道，这是邱清泉兵团想证实一下李弥兵团是否还在侧翼保护着他们。当崔副师长听说第八军还在麻谷子附近磨蹭时，就在电话里向姚团长吹嘘说："我就在你们南面的庄子。我们攻许湾，两次猛攻，共军就被我们打走了，缴获了很多武器……希望你们今天拿下麻谷子，明天解碾庄圩之围。"姚轻耘刚放下电话，就听见许湾方向枪炮声大作，二营报告说许湾乱了，第五军的一个团被打得到处乱跑。姚团长马上接通了崔副师长的电话，崔贤文坚决否认他们丢了阵地，甚至连受到攻击都不承认。但是，二营这时送来了一位解放军的排长——这位排长在反击的时候，被五〇九团二营前哨士兵的山东口音迷惑了，以为是自己的部队，没有任何防备就冲了过来——这个解放军排长显然还沉浸在反击许湾的自豪之中：白天第五军攻打许湾之所以得手，是他们逼迫很多老百姓抬着梯子在前面爬外壕，于是我们就撤了。他们以为打胜了，一个团住进许湾村，不知道我们在村子里埋伏着一个营，这个团还没有布防好，我们就内外夹攻干了起来，不但把这个团打跑，还吃掉了他的一个营。姚团长这时候再找崔副师长——"电话已断，不知什么时候他已逃走了。"

一天一夜的攻击，五〇九团伤亡两百五六十人。姚轻耘给师长打电话说："麻谷子西南面不能攻，上有围墙，下有外壕，壕里有水，壕外有鹿砦。许湾已被共军占了，我的右翼无依托。我看麻谷子西北面地形复杂，容易接近，如果第五〇八团不能攻击，我想和他换防。"杨绪钊当然能听出来姚团长的"别有用意"，他哼了一声就把电话挂断了。不一会儿，命令来了，五〇八团从西北面攻击，五〇九团在原阵地配合攻击。又过了一会儿，师长的电话又到了，声称"五〇八团马上就要进村了"，要求五〇九团"全力攻击策应"。姚团长心里很不舒服，

因为自己死了那么多人，等于白白地给五〇八团创造了立功的条件。可是，没过一个小时，师长的电话又来了，命令姚轻耘“全力进攻”以掩护五〇八团“收容撤退”。姚团长的心理瞬间就平衡了——五〇八团进攻的时候，到了村边没有受到火力阻击，团长庞铮以为大功告成，一面报告师部，一面命令部队爬围墙。结果，刚爬进去，手榴弹就下雨一样地扔过来，侧面还有解放军的包抄反击部队，五〇八团的两个营被打得七零八落，溃散的官兵逃到麻谷子以北的火神庙一带才被收容。

黄昏，李弥严令第八军一定要拿下麻谷子，并派来一个榴弹炮连和一位战场督战官。接下来的战斗很快就进入了残酷的搏杀。兵团的榴弹炮和一七〇师的山炮把麻谷子村轰击成一片燃烧的废墟，村里的围墙全部倒塌，树木变成了巨大的火炬。但是，当国民党军的攻击部队冲到废墟前面的时候，解放军官兵突然从废墟中站立起来，扔出了铺天盖地的手榴弹。在督战队的威逼下，国民党军把当地的百姓和被俘的解放军全部集中在第一线，再次开始攻击。解放军放过第一线的人群，当国民党军接近壕沟的时候，各种火器对准壕口猛烈射击。战斗持续到午夜，五〇九团的伤员已经堆满前沿。凌晨二时，姚轻耘害怕解放军趁他疲惫发起两翼出击，壮着胆子给师长打电话要求撤退。一直在前沿观察战斗的杨绪钊被战斗的残酷所震撼，说：“不能再硬攻了，停止攻击，保持原阵地，明天再说吧！”

姚轻耘说：“我无法解释攻不下麻谷子的原因。”

天又一次亮了，杨绪钊师长在阵地上转了一圈就不见了，姚轻耘后来才知道麻谷子战场“换了指挥官”。新指挥官是四十二师师长石建中。石师长命令一七〇师五〇九团在右翼攻击麻谷子西南角，四十二师一二五团在左翼攻击麻谷子西北角，在榴弹炮和飞机的全力支援下迅速向前推进。

因为，碾庄圩快完了。

十九日夜幕降临的时候，碾庄圩四周炮声大作——“万炮齐发，排空而来。这样的轰击，除夜间十一时停止约两个小时外，一直继续到次日天明。”华东野战军对碾庄圩的总攻部署是：陶勇、郭化若指挥第四纵队，于碾庄圩东门向南、向西实施佯攻，造成守军的错觉；王必成、江渭清指挥第六纵队攻击西门；张仁初、王一平指挥第八纵队由东南攻击；聂凤智、刘浩天指挥第九纵队由南面攻击。

配合八纵的炮兵，是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炮兵一团的八门榴弹炮，加上八纵自己的各种火炮，一共五十七门。前一天晚上，六千多发炮弹打出去，步兵的冲击仍在前沿失利。为了弄清楚是不是炮兵的射击出了问题，八纵炮兵团长武鸣亭白天带人上了前沿。上去的时候，看见前沿战壕里的步兵向他投来责难的目光，武团长心情沉重。八纵的前沿距离碾庄圩只有几十米，在这几十米的距离内横着一道很深很宽的天然水壕。水壕前面的开阔地上布满工事。此刻，敌人的明堡和暗堡大部分已被摧毁，鹿砦和铁丝网也被毁坏不少，碾庄圩的围墙被轰出了几个大缺口。从这个效果上看，炮兵的射击准确而有效，但为什么步兵在冲击的时候依旧受到杀伤呢？一个步兵班长向武团长比划着说，炮火延伸之后，我们跳下水壕架起桥就往上冲，但刚爬上水壕，敌人的机枪就响了，上去一个打倒一个。到处都是敌人的火力点，我们两个小组的人全被火焰喷射器打着了。看不清敌人是从哪里射击的，好像全在鹿砦后面。武团长匍匐着往前爬，终于弄明白了，前沿的鹿砦下面藏有秘密火力点。

十九日晚，总攻炮火准备开始后，八纵的炮兵按照常规进行破坏性轰击，四十五分钟内就发射了近五千发炮弹。当炮火延伸时，守军的火力点开始射击，炮兵缩短射距重新开始覆盖轰击。这一下，步兵们在前沿大喊：打得好！他们已经上天了！二十三师六十七团是八纵

的先锋团，九连为团突击队，突击队由副营长李浩德亲自率领。炮火再次延伸的时候，班长刘忠厚拿着几个写有红色箭头的木牌独自往前爬，一直爬到壕沟边。壕沟那面守军的火力点开始猛烈射击，刘忠厚看清了每一处火力点的位置，然后把标志着通道的木牌子一一插好。往回爬的时候，他看见几具战友的遗体，他们是昨天倒在这里的，由于距离敌人太近，还没能把他们抬下去。刘忠厚把那些攥在已经僵硬的手中的手榴弹一一收集起来，手榴弹上满是凝固的血浆。带血的手榴弹被分给准备发起冲锋的战士，大家都没有说话，默默地开始脱棉衣，棉衣棉裤都脱下来，浑身只剩下衬衣衬裤，然后官兵们把手榴弹和子弹袋扎在身上。一个小战士看见副营长李浩德也把棉衣棉裤脱了，瞪大眼睛不断问：副营长和咱们一起上？副营长和咱们一起上？他是个“解放战士”，身上还穿着国民党军的棉军服。班长刘忠厚对他说：“副营长是共产党员。我也是。”

初冬时节，脚下的土地已经冻结，冷风呼啸，刺刀上结着一层白霜。

总攻的信号弹腾空而起，九连不惜一切地扑了上去。

敌人的机关枪从不同方向构成一个密不透风的火网。刘忠厚身边的战士曹佃安扑通一声倒了下去。刘忠厚想去救他，被曹佃安推了一把。冲到壕沟边的时候，刘忠厚看见自己插的木牌子还在。在向壕沟对面投掷了一排手榴弹后，他们越过壕沿跳进冰冷的水中。壕水过胸，守军的手榴弹和炮弹雨点般落下来，激起的水柱挡住了视线。刘忠厚带领全班拼命划水，上岸后爬围墙的时候，两次攀爬都被爆炸的气浪推了回来。刘忠厚听见有人喊：“大家踩着我上去！”一看，是曹佃安，不知负伤的曹佃安是怎样泅过又宽又深的壕沟的。九连开始在弹雨中叠罗汉，到处是嘶哑的喊声：“爬过围墙就是胜利！党员冲在前面！”刘忠厚踩着曹佃安爬上围墙，看见一排长孙向银头部中弹，血流

满面。碾庄圩的围墙被九连撕开了，六十四、六十七、六十八团洪水般地蜂拥而上。突然，一个国民党军冲出来抓住了刘忠厚的枪背带，是个戴大盖帽的，刘忠厚转身开枪，那人倒了下去。九连开始抵抗守军的反击，守军动用了数架火焰喷射器，九连官兵的身上都着火了。李浩德副营长说："刘忠厚！带两个人从右侧消灭它！"话音未落，李副营长中弹，重重地倒在地上。刘忠厚心里一揪，喊："沈献瑞！跟我来！"两个人奔跑着，跳跃着，穿过被炸毁的碉堡和掩体，绕到了火焰喷射器的侧后，一口气扔出了七八颗手榴弹。火焰熄灭后，冲锋的杀声再起。

支援九纵突击的，是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炮兵三团的六门日式榴弹炮，九纵炮兵团的十六门山炮、山东兵团炮兵团的三门野炮和一门日式榴弹炮。昨天，九纵的攻击也没有成功。当时，六纵副司令员皮定钧正好来九纵，他兴奋地告诉聂凤智，第四十四军已经被他们打光了。由于前几天九纵打的就是第四十四军，官兵们都认为自己啃了骨头让六纵吃了肥肉。为了尽快取得攻击进展，聂凤智亲自率领二十五师萧镜海师长和部分营团干部到前沿侦察。九纵的攻击方向在八纵的旁边，遇到的问题与八纵相同，那就是守军的火力点难以摸清。尤其是通过水壕的时候，守军正面有二十多挺轻重机枪，一齐开火时如同刮起大风。如果走桥将给突击部队造成严重伤亡。能不能涉水呢？七十三团五连十九岁的战士李方欣自告奋勇去探水深。小战士把棉衣脱了，腰上别上几颗手榴弹，消失在浓雾中。过了很久，李方欣爬了回来，为了让纵队首长相信水壕可以徒涉，李方欣手里抓着一把草，说是从水壕对岸拔下来的。

突击队员脱了棉衣棉裤，向水壕掩蔽接近。七十三团二连一排长张清华率领突击小组刚到水壕边，浮桥就开始下沉，战士们跳下水用肩膀扛着，但是守军的子弹倾泻过来，战士们倒下，浮桥断裂。张清华立即改为徒涉，突击队全部下了水。刚一上岸，迎面就撞上守军的

一挺机枪，张清华和战士陈阿四扑上去，一把抓住枪管硬是把机枪夺了过来。战士张天佳背着二十多颗手榴弹，冲上前去拼命地投掷，二连巩固住了突破口。副营长杜常德率领的小组连续摧毁守军的地堡，也站住了脚。另一侧的七十四团一营在营长孙光美的率领下，本来是助攻的他们颇有点主攻的劲头，二连长范金鳌率领突击队只用了十五分钟就突破水壕攻到了围墙边。

八纵和九纵的攻击部队交会在了一起。

碾庄圩的围墙被突破后，出现在官兵们眼前的是由一排汽车组成的防御工事，汽车的后面还有一道围墙。两个纵队的突击部队合力往前攻，守军开始组织反击，战斗进入残酷的胶着状态。七十三团团长张慕韩向师指挥部报告战况。聂凤智刚刚监听到第六十四军军部在电话里用广东话通话，而身边的随军记者孔东平正好是广东人，第六十四军在电话里说“黄百韬要到大院上村的军部来，要求派人去警卫”。聂凤智立即面命令炮火在碾庄圩与大院上村之间进行拦截轰击，同时在电话里对七十三团团长喊：“我们要比敌人还要凶！打到哪里就钉在哪里！你们快要和黄百韬见面了，砸开围墙，把他给我掏出来！七十三团是毛主席提过名的！”——九纵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历史上获得过很多荣誉：“孟良崮战斗模范连”、“潍县战斗模范连”、“胶县城第一连”、“周村战斗模范连”、“高密城第一连”。在济南战役中，七十三团首先登城，荣获“济南第一团”称号。

二十日凌晨时分，碾庄圩第二道围墙被炸开。

八纵和九纵官兵呐喊着冲进碾庄圩，与国民党守军展开逐房逐屋的争夺战，黄百韬没出他的隐蔽部。

兵团部的外面“房屋成墟，草棚着火，汽车破碎，人尸马骸，累累皆是”。黄百韬向徐州发去电报：“今夜敌向碾庄圩发动攻势，战斗至

为惨烈，现碾庄圩已成火海，统计落弹不下两万发，通讯设备均被摧毁，兵团部已无法指挥。我已两天未出隐蔽部，外边情况一无所知。”然后，他命令第二十五军残部向南突围，但是军长陈士章已经化装独自逃跑了。黄百韬又写字条给第六十四军军长刘镇湘，命令他从大院上村突围出来，向碾庄圩的西北方向靠拢。第七兵团情报二处处长廖铁军冒死把字条送进大院上村，刘镇湘看信之后说：“突围出去？重武器都丢光了，出去又有什么用？”副军长韦德和参谋长黄觉都觉得应该突围，可是刘军长坚决不同意。黎明时分，大院上村四周枪炮隆隆，刘镇湘作出一个令人惊讶的举动：他打开自己的大皮箱，把国民党军将官大礼服拿出来，然后开始打扮。他穿好大礼服，挂上勋章，穿上皮靴，顿时浑身金光闪闪，这让置身在枪炮声中的军官们不禁毛骨悚然。

刘镇湘军长说他要为委员长尽忠。

此时，华东野战军各路攻击部队已在碾庄圩的第七兵团部与第二十五军军部会合。九纵七十三团七连长萧锡谦和指导员迟浩田带领官兵冲进黄百韬的司令部，他们缴获了黄百韬的美式吉普车，车上有一副象牙制作的麻将牌和一具紫铜火锅。兵团部里的两箱机要文件和密码本完好无损，黄百韬睡的行军床上遗留着一支手枪和一瓶安眠药。

在大院上村里，穿好大礼服的刘镇湘还没说他打算用何种方式尽忠，黄百韬就带着第七兵团参谋长魏翱、兵团部第三处处长谭岳、第二十五军副军长杨廷宴跑了进来——黄百韬“坐了好久说不出话来”。

二十一日拂晓，一名随军记者跟着华东野军攻击部队进了碾庄圩：

整个碾庄圩像开了锅，抓俘虏的叫声隔三四里路都听得见，一股股红色火舌、一片片白色烟幕，迎着清晨的阳光升起，炮弹仍在不断地爆炸，成千上万的俘虏从突破口里被带出来，所有的道路都被塞得水泄不通。他们一边走一边哭诉：“同志呀！我们是来投降的，我们

已经五天没得东西吃啦！”骡马一群一群的，都饿得不跑不叫了，许多已经被敌人割去大腿或屁股去充饥了。在一切地方，从庄外到街道、到院子、到每一间屋子里，一切有用的东西，从泥土到砖瓦、到木头、到桌凳、到汽车、到炮弹的纸壳子，都筑成了密集重叠的防炮工事。满地满墙及每个防炮洞都被炮弹打得成了土坑。东场上的八门榴弹炮都被打成了麻子。在房子里，在街道上，在汽车底下，在防炮工事里，到处都是敌人的伤兵和尸体。街上到处贴着大字的记录“捷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张是：“……邱兵团不日即可与我会歼共军……”飞机还整日在散发“告在共军中的国军官兵书”，希望他们重回国军去，可以“提升授奖”。可是我把一张递给一个刚放下武器的士兵时，他摇摇头说：“我受苦受够了，要不是当官的不让，我们早就投降过来了。”

国民党军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驾驶一架轰炸机飞临碾庄圩上空，他一眼就判断出碾庄圩已经陷落。在与黄百韬通话后，才知他在第六十四军军部，第七兵团残余部队还大致保持着大院上、小院上等几个小村庄。王叔铭与刘峙紧急磋商后，决定集中空军力量轰炸出一条狭窄的区域，然后步兵在炮兵和坦克的支援下采取多梯队纵深突击，把黄百韬解救出来。刘峙还特别提出了三点建议：一，请总统亲临徐州指挥；二，速空运两个军增援；三，请总统速下决心全力东进，对徐州的安全可置不问——没人知道，刘峙“是想推脱责任故意说漂亮话，还是想借此让杜聿明在徐州负责指挥，他好离开徐州去蚌埠以求自身安全”。

蒋介石命令黄百韬立即突围。

但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一切都没有实际意义了，所有的决定只不过是程序上的必须，或者说是为面子上说得过去而已。

李弥的第八军终于攻占麻谷子村——先是发现当面的解放军有撤退的迹象，可向前推进的时候，阻击阵地上却没有了解放军的踪影，只在战壕中发现一个被毁坏的六〇炮炮架。不远处，有人在晃动着白手巾，国民党军官兵小心地进了村，看见一队解放军正从村后撤退，机枪还在拼命地射击，不一会儿人和枪声都没了踪影。可那些白手巾还在晃动，冲上去一看，原来是从碾庄圩方向逃出来的第七兵团的伤

兵。第八军军长周开成命令一七〇师实施追击，四十二师为预备队，然后自己陪同李弥进了麻谷子村，一路上“看见树枝上挂着血肉模糊的手、脚之类的东西”。向前推进的一七〇师很快报告，他们已经推进到火神庙，没有发现共军的阻击部队——这里距碾庄圩只有不到十公里了，可碾庄圩那边的枪炮声已越来越弱。

无论邱清泉还是李弥，谁都没有再向前推进的意愿了。

二十日，停止在火神庙的一七〇师报告说，第一〇〇军军长周志道到了他们的阵地上。无法得知负伤后的周军长是如何在炽烈的火网中逃出来的，他和他身边的随从全部穿着士兵军服。周志道见到周开成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整个垮了！”周开成立即用吉普车将他送往徐州，徐州的刘峙派飞机把他送到上海治疗，蒋介石授予他一枚青天白日勋章。

接着，第二十五军军长陈士章也跑来了。他在碾庄圩被攻陷的时候，丢下部队独自逃跑，居然安全地跑到了这里。这个陈军长在吃了点东西后，可能觉得自己临阵逃脱实在说不过去，或者想起来自己曾是黄百韬最信任的人，第二十五军也是黄百韬和顾祝同的基本部队，于是他夸张地向周开成军长要坦克，表示要亲自驾驶坦克返回碾庄圩把黄司令官接出来。周开成派给他三辆坦克，他真的去了，但不一会儿就回来了——陈军长说他没有找到黄司令官。然后他上了周开成派的车，去了李弥的兵团司令部。

在李弥的兵团部里，杜聿明、邱清泉、李弥三人聚集在一起，正在研究“共军为什么打得这样好”。研究的结果是：“一、共军情报迅速准确，运用兵力恰到好处；二、共军战士勇敢善战；三、共军军纪严明，深得民心，处处得到老百姓的帮助。而国军这三点恰恰相反。”

碾庄圩被攻克后，黄百韬的第七兵团只剩下第二十五军和第六十四军残部，收缩在尤家湖、大院上、小院上几个村庄里。

二十一日黄昏，华东野战军最后的攻击开始，四纵攻击第二十五军，八纵和九纵联合攻击第六十四军。

第二十五军残部大约还有五千余人，军长陈士章已经逃离战场，副军长杨廷宴跟随黄百韬到了第六十四军军部，第二十五军残部此时没有了有效指挥，但该军是黄百韬起家的基本部队，因此在最后的时刻依旧企图依靠村庄抵抗。尤家湖村四周有一道两米高的防洪水的围墙，围墙外还有很深的壕沟，村子四周修建了三个独立的支撑点，并以地堡群为骨干组成了前沿阵地。攻击开始前，四纵司令员陶勇提出一个作战原则：先肃清尤家湖附近的村庄，把尤家湖孤立起来，使敌人处在既无退路也无援兵的处境里，这样不用硬攻便可以大量俘敌和缴获——“官兵们很欣赏这一方案”。在肃清尤家湖附近的残敌后，四纵将所有的炮火和重武器都集中到尤家湖村，把整个村子围得密不透风，纵队指挥员都上了前沿，不断地强调“少杀多俘虏”。为了使战斗更加顺利，野战军还专门给四纵调来两辆坦克，坦克轰隆隆地发动着，大有大军压境之势。接着，便是前沿的大规模喊话，无数支土喇叭环绕着尤家湖村，解放军官兵扯开嗓门讲政策、喊口号，刚刚被俘的第二十五军官兵也跟着张三李四点名道姓地让守军放下武器赶快过来吃馍。于是，那个在以往的历史中名不见经传的尤家湖村出现了一道奇异的场景：村庄里死寂一片，没有一星灯火；村庄外火把熊熊，喊声不断。躲藏在村子里的国民党军精神几近崩溃。当四纵十一师在坦克的引导下冲进村庄的时候，第二十五军残余部队只进行了局部的抵抗。四纵以伤亡四百人的代价，杀伤和俘虏第二十五军残部近五千余名官兵——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军覆灭了。

在大院上村的东边，华东野战军第八、第九纵队的联合攻击同时开始。第六十四军残部被压缩在大院上附近的几个村庄里，他们不断受到增援部队已从大许家方向靠近的鼓舞，准备抵抗到底。八纵主力和九纵七十七团攻击三里庄和小院上村，九纵七十六、七十八团攻击大院上村。无论哪个方向的攻击，炮火支援都是空前的，不但纵队和各师的火炮被集中起来，而且在碾庄圩缴获的重迫击炮也都用上了。第六十四军在猛烈的炮火中伤亡惨重，但是依旧在极力抵抗，尤其是黄百韬所在的大院上村抵抗特别顽固。攻击大院上村的两个团艰苦推进，严重的伤亡令不少战斗班只剩下几个战士，两个团的建制都被打乱，一个连缩编成一个排，一个排缩编成一个班，但是从白天到夜晚攻击没有一刻停止。二十二日上午十时，大院上村被攻克。

没有发现黄百韬。

黄百韬和第六十四军军长刘镇湘、第二十五军副军长杨廷宴等人逃到一五六师四六六团坚守的小黄庄。刚到那里，团长张越秀就报告说，共军方面曾来人联系要求我们投降。黄百韬立即说，今天晚上可以和共军方面联系。吃了一点东西后，一行人离开小黄庄向西，跑到一五九师师部所在地吴庄。黄百韬只想尽可能地向西靠拢，希望能跑到大许家去，因为到了大许家，才可能有接应他的部队——此时，正是第二十五军军长陈士章带领三辆坦克寻找他的时候，从大许家冲出来的坦克没有进入近在咫尺的吴庄，原因不明。黄百韬发现一五六师师部也不安全，一些官兵看他的眼神怪怪的，有人告诉他，该师师长钟世谦和副师长李振中已经派人去和共产党军队联系投降的事了。

下午十六时，一个更坏的消息传来，小黄庄的四六六团因在投降的事情上犹豫不决而遭到攻击，张越秀团长被俘，一起被俘的还有第七兵团参谋长魏翱、第六十四军参谋长黄觉、兵团部情报处长廖铁军、兵团第三处处长谭岳等高级军官。黄百韬感到了死亡的逼近。黄

昏，他让第六十四军军长刘镇湘率残部突围。刘镇湘临走前，黄百韬对他表白了心中的万分绝望：

> 我年老了，而且多病，做俘虏我走不动，而且难为情。我牺牲以后，使别人还知道有忠心耿耿的国民党人，或可让那些醉生梦死的人醒悟过来，国民党或者还有希望。你年龄还轻，尚有可为，希望你们突围出去，再为党国做点事。

“刘镇湘佩上满身勋章向共军冲锋而去”。

之后，国民党方面才确切得知：刘镇湘军长并没有战死，而是被解放军官兵俘虏了。

捉住刘镇湘的，是解放军的一位副连长，名叫胡相法。

十五岁参加八路军的胡相法，是部队中有名的战斗英雄，淮海战役开始的时候他成为副连长。部队奉命攻打第六十四军，他的任务是插到大院上村与小院上村之间，然后加入对大院上村的攻击。在穿插的过程中，他率领加强排爆破了两座碉堡，俘敌五百多名。部队攻占大院上村后，加强排继续向残敌逃跑的方向追击，途中遇到了想与解放军联系投降的国民党军军官，胡相法当即命令这个军官带他去第六十四军军部。胡相法不知道，此刻为他带路的是第六十四军的副参谋长。这是一个极其大胆的举动，因为在向第六十四军军部靠近的时候，需要不断地路过国民党军设立的岗哨，胡相法镇定地走进第六十四军残部盘踞的腹地来了。军部暂时设在一个大车店里，胡相法走进去的时候，里面大约有二十多名国民党军军官，其中还有几名女军官，一个军阶很高的人正在大车店的中间来回踱步。

副参谋长报告说：“共军前线最高指挥官来了。”

刘镇湘显然不相信这个年轻人是“最高指挥官”。

但是，胡相法大声说：“要起义，就放下武器跟我们走！”

旁边的一名国民党军军官突然拔出手枪，但立即被一直跟着胡相法的三排长初元发击毙了。

几名女军官惊叫起来。

刘镇湘脸色苍白地坐下来。

胡相法说："考虑好了就走吧。"

刘镇湘走出了大车店。

外面的国民党军官兵似乎察觉到了什么，胡相法跳上一个大碾盘，朝天打了一梭子，然后喊道："你们军长投降了！都缴枪吧！"

年仅十八岁的胡相法和他带领的十几名官兵，俘虏了包括第六十四军军长、副参谋长和军部机关人员在内的一千六百多人。

不久，胡相法的家乡山东乳山县开始流传一首歌：

百里昆仑山哟，

太阳金灿灿。

红旗飘飘满山巅哟，

穷人心里好喜欢，

好呀么好喜欢。

雄鹰飞高山哟，

豪杰来人间。

俺村出了英雄汉哟，

人人都把英名传，

英呀么英名传。

黄百韬身边只剩下了第二十五军副军长杨廷宴。

有史料说，黄百韬在突围的路上被炮弹炸死。

但是，根据杨廷宴回忆，黄百韬死于自杀。

黄突出后，走至一茅棚附近，只剩我们两人，见四面皆有解放军包围，无法再走，即举枪自杀，但并未断气，我又加了一枪。

黄百韬死前曾向杨廷宴说了如下一段话：

我有三不解：一，我为什么那么傻，要在新安镇等待第四十四军两天？二，我在新安镇等待两天之久，为什么不知道在运河上架设军桥？三，李弥兵团既然以后要向东进攻来援救我，为什么当初不在曹八集附近掩护我西撤？

杨廷宴侥幸从战场上逃脱：

他自杀后，我伤心痛哭，这时来了一个解放军战士，我诳他说："他是我哥哥，我母亲叫我来探看他，他死了我怎么回去向母亲说呢？"这个解放军战士同情我，还帮助我把黄埋了，让我走了。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晚上，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司令官黄百韬，就这样被他的一个忠实的下属和一个富有同情心的解放军战士草草地掩埋了。掩埋的具体位置不清，大约在小黄庄以西、碾庄圩车站以北几公里处的旷野上。

就在黄百韬被埋进旷野的那一天，徐州城外突然缓缓地走来一支队伍，满城的国民党军顿时不寒而栗：解放军动员支前民工将大约四千余名黄百韬兵团的伤兵抬进了徐州城。国民党军第八兵团司令官李弥说："这件事比张良的楚歌还厉害。"

有记者追问道："黄百韬到哪里去了？"

杜聿明回答："他回家休息去了。"

杜聿明无法回避的问题是：黄百韬兵团全军覆没，下一步徐州战场该怎么办?

# 第十三章 淮海战役：惊人的态势

## 王老汉游击队

在某种程度上讲，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中旬，是高涨的作战积极性把黄维的第十二兵团引入了绝境。

华东野战军全力围歼黄百韬兵团时，淮海战场上另外三个国民党军的重兵集团，始终是毛泽东关注的重点：在碾庄圩以西、徐州以东，邱清泉的第二兵团、李弥的第十三兵团和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负责向东进攻以解救黄百韬，同时防卫徐州；在徐州以南，刘汝明的第八兵团和李延年的第六兵团，奉命沿津浦铁路北进参加会战；在徐州的西南方向，黄维的第十二兵团从河南境内的驻马店地区出发，不断东进向徐州靠近。由于华东野战军的顽强阻击，东进的邱清泉和李弥两兵团被迫停滞在碾庄圩西面的大许家，孙元良兵团因为徐州防务不敢轻易出动，于是，徐州附近的三个兵团近距离地扭结成一个坚硬的集群；而沿着津浦路北进的刘汝明和李延年两兵团，特别是李延年兵团，由于惧怕遭遇分割围歼，推进得十分迟缓；只有黄维兵团，始终在不顾一切地东进，以至最终形成孤军插入淮海战场的态势。因此，在黄百韬兵团被围歼的过程中，积极东进的黄维越来越成为注视的焦点——从淮海战场的全局看，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进展的态势，将成为共产党方面如何进行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作战的重要决策参数。

按照中央军委九月间作出的决定，歼灭黄百韬兵团后，华东野战军应以五个纵队的规模，向东攻占海州、新浦、连云港和灌云地区，以“打通山东和苏北的联系”——从这一计划上看，华东野战军向东运动至苏北地区，带有撤离中心战场休整部队的意向。但是，随着黄百韬兵团的被围，国民党军在徐州附近摆出了决战的态势，毛泽东遂对

战役的发展作出新的判断：如果黄百韬被歼后，蒋介石将徐州战场上的兵力撤至蚌埠以南，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即向徐蚌线推进；如果蒋介石不将徐州战场上的兵力南撤，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即可寻机歼灭黄维和孙元良兵团，“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起来”；如果黄百韬被歼之后，黄维兵团尚未赶到徐州附近，可以将其阻击在中途，把作战目标指向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割裂黄维与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之间的联系，“完成攻徐作战之战略展开”。

为了达成这一战略目的，十一月十三日，中央军委电令华东野战军在围歼黄百韬的同时，部署阻援部队，诱使企图解救黄百韬的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不断向东深入——“使其跑不掉，然后徐图歼灭之。”这一战略设想的核心是：在吃掉黄百韬的同时，华东野战军必须将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与徐州割裂开，并准备下一步围歼这两个兵团。这也是国民党军向碾庄圩的增援能够缓慢推进到大许家附近的原因，只不过无论是邱清泉还是李弥，都没有意识到华东野战军阻援部队不断主动放弃阵地的真实意图。因此，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作战的最初设想，基本上围绕着歼灭邱清泉和李弥两兵团的思路展开的。为此，中原野战军准备抽派几个纵队给华东野战军，参加续歼邱清泉和李弥的作战，并主动要求在南面担负阻击黄维兵团北上的任务。

但是，围歼黄百韬兵团的作战，牵扯着华东野战军的大部兵力，从邱清泉、李弥的侧翼插进去将其与徐州彻底隔开的作战，始终没有达成目标。

这时候，在战场的南面，黄维兵团已经推进到安徽西北部的太和、阜阳地区。

中原野战军指挥员进行了仔细的研究，认为黄维兵团下一步的动向可能有三种：一是暂停；二是出亳州、涡阳向永城，或出涡阳、蒙城向宿县；三是向东开至蚌埠，以护卫南京。根据这一分析，他们向

中央军委提出“如黄维出永城或宿县，我以集中一、二、三、四、六、九及华野三、广（两广纵队）共八个纵队，歼击黄维”的建议。理由是：“黄维在远道疲惫、脱离后方之运动中，只先来三个军七个师，其中强师只有三个。”但先决条件是，华东野战军在十六日以前能“消灭黄百韬三个军以上”，然后“抽调出三个纵接替陈谢四纵及华野三、广纵之任务，或现在就有余力能够接替，以便我们及时调动这三个纵队作战”。中央军委复电表示，“我诱邱、李东进，断其后路之计划，恐不一定能实现”。一切要等华东野战军歼灭黄百韬、中原野战军攻占宿县之后，“才能决定下一步作战方针”。

十八日，黄维兵团东进至蒙城附近；李延年兵团正向蚌埠开进；刘汝明兵团则由蚌埠向宿县前进，准备担负蚌埠至宿县之间的铁路守备任务。根据这一态势，淮海战役总前委认为，歼灭黄百韬之后，华东野战军如果不进行休整，接着打战斗力很强的邱清泉、李弥两兵团，“诚非易事”。同时，中原野战军需要阻击黄维、刘汝明和李延年三个兵团，也相当困难。如果续歼邱清泉、李弥两兵团的作战陷入僵持，中原野战军又没有把握同时阻敌三路重兵，那么无论华东野战军还是中原野战军都可能陷于被动。因此，总前委向中央军委提出，放弃打邱清泉和李弥的计划，转打孤军插入战场的黄维兵团。

但是，拥有十二万人马的黄维兵团不是弱敌。

黄维兵团刚刚编成不久，下辖第十、第十四、第十八、第八十五军以及第四快速纵队。其中的第十八军，即原整编十一师，是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装备精良，作战能力强，现任军长杨伯涛；第十军，即原整编第三师，曾被歼灭过，后以原整编十一师十八旅为基干重新组建，军官均由十八旅调来，十八旅旅长覃道善为现任军长；第十四军，即原整编第十师，前任军长罗广文曾任第十八军十八师师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个军总是和第十八军一起行动，战斗力与

第十八军相仿，现任军长熊绶春是黄维的黄埔同学和同乡；快速纵队由第十八军一一八师配属的战车坦克部队组成，师长尹钟岳兼快速纵队司令官。以上各部队基本出自同一渊源，关系融洽，有共同作战的意识。从这一点上讲，黄维兵团中只有第八十五军是个例外。与其他军长均为陈诚派不同，第八十五军现任军长吴绍周属何应钦派，这使这支部队不但作战风格与其他部队不同，而且与其他部队之间存在着严重隔阂——黄维不能有效掌握的第八十五军，不久就以惊人的战场之举，致整个兵团于死地。

此时，从第十二兵团普通官兵的角度讲，有一点是一致的，大家都对作战目的和作战方针不甚明了。兵团组建之后，奉白崇禧命令进入河南“扫荡”中原解放区，部队在伏牛山里“往返奔波，雨雪载途，人马俱感疲惫。特别是快速纵队因道路不良，机械和燃料损耗甚大，急需休养整顿”。本以为“扫荡”完毕就会南下回家，可又奉命向苏北的徐蚌战场推进，而且“不得以任何借口迟延行动”。于是，兵团除把生病负伤的官兵和笨重的行李辎重送回武汉之外，绝大多数军官的家眷们也留在了武汉。大军匆匆出发，挂念妻小担心前途的心绪自此弥漫。

蒋介石给黄维的命令是：“徐州会战业已开始，情况至为紧急。黄兵团应兼程急进，务期于十三日前到达指定地点。”

黄维兵团东进之路比伏牛山里好不了多少。路途上横着南汝河、洪河、颍河、西淝河、涡河、北淝河、浍河等一条条大河，这给战车、坦克、重型火炮、汽车和大量的胶皮大车行军带来很大的困难。更大的困难是解放军的跟踪和阻击。兵团一开始行动，各个方向的追击、侧击、阻击不断地袭扰而来，行军路上的道路和桥梁一再被毁，这令官兵们越走越觉得前面充满危险。

当中原野战军占领宿县之后，黄维兵团已成为淮海战场上一个显眼的作战目标。只是黄维自己无法意识到这一点，蒋介石更是看不出

这一点。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作战积极的黄维兵团即使推进到涡河边了，依旧归国民党军国防部直接调遣。虽然奉命进入徐蚌战场，但黄维兵团从来没有被划归徐州“剿总”指挥。因此，远道而来第十二兵团的官兵都不清楚，他们如此拼命赶路去靠近那个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徐州，到底是为了什么?

但是，阻击他们的中原野战军官兵明确地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战。

在涡河北岸，一个名叫桑金秋的连长在阻击阵地上被第十八军一一八师发射来的炮弹炸倒了。醒来时，桑连长想站起来继续指挥战斗，但是他已站不起来，满口的血让他说不出话来，他不让人把他抬下去，认为只要自己还在阵地上就是对全连的鼓舞。他爬到战壕边，用手指在壕壁上写着：一排长蒋歧凤代我指挥。写完了，他仰面倒下，满眼是灰蒙蒙的天空，耳边是剧烈的枪炮声和厮杀声。他的头部还在汩汩地流血，他想到了死亡。

二十三岁的桑金秋是河南濮阳人，为了不饿死，十九岁那年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他还不知道“推翻旧世界”的道理，只是感受到了官兵同甘共苦的温暖。第一次参加作战时，他很害怕，在老班长的鼓励下，扔出了第一颗手榴弹。在邯郸战役中，他所在的部队阻击着国民党军一个师的进攻。副连长牺牲之后，全连的干部和班以上骨干全死了，一百多人的连队只有二十四名战士还活着。桑金秋平生第一次看见了什么叫死亡。当上级命令他们撤下去的时候，他又哭又喊：“这么多人都死了，我们不能下去，死就死在一起！”那次战斗的残酷场面令他终生难忘：夕阳下，与敌人尸体相叠在一起的八十多个战友，他们昨天还和自己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从阵地上下来后，桑金秋变了一个人，只要遇见敌人，就想打个痛快，他已经不在乎自己的死活了。部队南下大别山，他和几十名伤员与大部队离散。他们偷袭

了敌人的一个仓库，搞到几十条麻袋，从此，这支小部队的官兵人人裹着麻袋与敌人周旋。他们吃过山里各种各样的树叶和野草，流浪了半年之久，当终于与大部队会合时，一纵的指挥员们抱着他们哭成了泪人。而他的团长说的一句话让他刻骨铭心："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为的是给人民打天下，天塌地陷也打不垮！"

桑金秋，一个贫苦农民的孩子，一个解放军年轻的连长，在那条名叫涡河的大河边，准备为了人民的解放"光荣"了，他在等待自己血流殆尽的时候。阻击战还在残酷地进行，黄维兵团炮火猛烈，密集的机枪子弹下雨一样，前边的人倒了，后面的继续往上冲，钢盔连成片黑压压地涌动着。眼看敌人要冲上阵地了，机枪组长于金山端着机枪跳出战壕，二排长王常林和五班的战士乘势发动了反冲锋。不一会儿，营教导员上来了，命令卫生员把桑金秋抬下去。躺在担架上的桑金秋，看见了夕阳辉映下血红色的涡河。野战手术之后，他被支前民工往后方转运，一直运到距濮阳不远的一个村庄里。桑金秋突然想家了，参军四年，他从来没有回过家。房东老乡知道了他的心思，跑到他的家乡传了信。几天后，父亲来了。父亲说，母亲想他想得眼泪都哭干了，但是听说儿子当了连长，父亲又高兴得大哭一场。桑金秋把自己仅有的一块钱塞给父亲，他说："告诉我妈，儿子打仗就是为了所有的穷人都不挨饿！全国就要解放了，仗打完了我就回家，让她等着我！"

桑金秋连长说这番话的时候，黄百韬兵团被华东野战军全歼。

淮海战场上的态势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杜聿明被刘峙叫去商量对策。刘峙说他打算放弃徐州向西撤退。杜聿明在地图上看了一会儿，认为刘峙对战局的估计过于悲观。他对刘峙说："目前还未到考虑这一方案的时候。如果能集中兵力，再调五个军加到李延年兵团，且同黄维兵团南北夹攻，打通津浦路这一段，

是上策。其次是将徐州三十万兵力与黄维兵团协同一致，安全撤到淮河两岸，亦不失为中策；但在目前情况下，已不像十一月那样可以安全撤退，万一撤退不当，在野战中被消灭，反不如坚守徐州尚可以牵制敌人南下。而且，战守进退的决策，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军事前途，目前我不敢轻率地出主意，必须由老头子本着他的企图下决策。”刘峙听了杜聿明的意见后，“嘴唇动了几下，表示很为难的样子，但未说什么”。

二十三日上午九时，蒋介石接到黄百韬兵团覆灭的战报。

两个小时后，南京国防部开会研究徐州战守进退问题。

何应钦、顾祝同等都认为：“如果把这批精锐部队输光，就再也没有力量与共军较量了。”因此，主张徐州全部主力退守淮河。但是，作战厅长郭汝瑰提出，退守淮河首先要回答三个问题：一、苏北方面淮阴如何守备，是不是放弃？二、徐蚌间的交通如何打通？必须要等交通线打通之后，才能决定徐州主力转移问题。三、前两个问题决定之后，才能决定蚌埠和淮河一线如何守备。于是，暂时休会，派飞机去徐州接刘峙、杜聿明和徐州“剿总”参谋长李树正来南京。

应该说，黄百韬兵团被歼之后的几天，是淮海战场上的局势最微妙的时刻，作战双方的决策层都在紧急磋商下一步的行动，因为稍有延迟便可能造成被动。但是，至少在二十三日这天的下午和晚上，国民党军最高决策层的紧急磋商休会了。

就在这一天，共产党方面作出了重大的战略决策。

二十三日晚二十一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发往淮海战场。这封电报的重要意义在于提出了“隔断徐蚌，歼灭刘峙主力”的战役设想。淮海战役进行至此，将国民党军徐州军事集团全部隔离在长

江以北加以全歼，这一宏大战役目标的最终确定使淮海战役整体战略规划清晰了。

还是这一天，晚二十二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也向中央军委发出了一封意义重大的电报，电报的内容是：围歼黄维兵团。此时，在淮海战场上，黄维兵团的作战积极性，与其他停滞不前等待蒋介石最终决定的兵团相比，实在是过于显眼了，好像生怕被共产党方面忽视了似的，这种危险的孤军冒进着实令人费解。该兵团的先头部队凶猛地突击中原野战军的浍河防线，在一个叫南坪集的地方与阻击他们的第四纵队打得昏天黑地，其中的一支部队已经突破浍河向纵深发展。淮海战役总前委提出的战役预想是：以中原野战军全部及华东野战军一部首先歼灭黄维兵团，以华东野战军主力阻击徐州方向的增援之敌，并争取歼灭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各一部：

粟、陈、张并报军委：

一、今日敌十八军从上午到黄昏，在坦克二十余辆掩护下，向我南坪集阵地猛攻竟日。我虽伤亡较大，但未放弃一个阵地。另敌一个多团，于午后到南坪集以东十里处突过浍河。

二、我决心放弃南坪集，再缩到南坪集十余里处布置一个囊形阵地，吸引十八军过河展开，而以四、九两纵吸住该敌，并利用浍河割断其与南岸三个军之联系。同时，于明夜以一、二、三、六纵及王（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司令员王秉璋）张（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政治委员张霖之）十一纵向浍河南岸之敌出击，求得先割歼其两三个师。

三、我们因九纵须协同四纵抓住主力十八军，故决心使用王张十一纵由东向西突击，以利割裂敌人，同时饬令华野二纵在西寺坡车站南北构筑工事，阻击可能西援之李延年兵团及刘汝明部。

四、歼击黄维之时机甚好，因李延年、刘汝明仍迟迟不进。因此，我们意见除王张十一纵，请粟（粟裕）陈（陈士榘）张（张震）以两三个纵队对李（李延年）、刘（刘汝明）防御，至少以四个纵队参入歼黄维作战，只要黄维全部或大部被歼，较之歼灭李、刘更属有利。如军委批准，我们即照此施行。粟陈张意见亦请速告。

刘 陈 邓

梗（二十三日）二十二时

二十四日上午，刘峙、杜聿明和李树正被接到南京，蒋介石召集的会议继续进行。对于国防部作战厅提出的徐州主力向南进攻，李延年的第六兵团和黄维的第十二兵团同时向宿县进攻，“南北夹击以打通徐蚌间交通”的主张，刘峙和李树正没有异议。杜聿明也大致同意，但他建议以李弥的第十三兵团先击退共军，控制运河线后再回师向南，不然恐怕侧后会出现威胁。蒋介石认为分歧不大，让杜聿明立即回徐州部署打通津浦线作战。杜聿明提出了一个让蒋介石最头疼的问题：兵力不足——“必须再增加五个军，否则万一打不通，黄兵团又有陷入重围的可能。”蒋介石要求杜聿明“先回去部署攻击”，他说：“五个军不行，两三个军我想法子调。”

杜聿明当即飞回徐州。他认为，如果能够得到几个军的加强，南北夹击打通津浦路应该不成问题，而只要津浦路一通，徐州战场上的主力就可以全部南撤，这样至少可以避免黄百韬那样的命运。

飞机飞临黄维兵团上空的时候，杜聿明与黄维进行了简短的地空通话。黄维说：“当面敌人非常顽强，应想办法，这样打下去不是办法。”杜聿明说：“今天老头子已决定大计，马上会对你下命令的，请你照令实施好了。”

回到徐州，杜聿明命令孙元良把徐州防务交给李弥，于二十五日开始与邱清泉兵团一起向宿县方向攻击前进。

就在杜聿明下达作战命令的时候，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到达淮海战役总前委：

刘、陈、邓并告粟、陈、张：

梗二十二时电悉。

（一）完全同意先打黄维；

（二）望粟陈张遵刘陈邓部署，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

（三）情况紧急时，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

军委

二十四日十五时

刚刚下达了打通津浦路作战命令的蒋介石心情郁闷，因为如何处理黄百韬兵团的后事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黄百韬是“徐蚌会战”中第一位全军覆灭而且死于战场的兵团级将领，处理不好会对军心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如何处理党内的舆论、桂系的诋毁以及国际视听，这些都关乎自己地位的稳固。显而易见，照常规将战败的责任直接推到黄百韬身上，至少在大战仍在进行的时刻不合时宜，必须把黄百韬的尸骨找到运回南京厚葬，并追授上将军衔发放厚恤以安抚家眷和军心。问题是，内部的所有指责都可以想办法消除，国际舆论如何应对?

同在这个晚上，毛泽东也没有睡意。淮海战役即将进入第二阶段作战，平津战役的筹划也已接近最后决策阶段，繁重的工作完全打乱了毛泽东的作息节奏，但昼夜不眠并没有令他感到疲惫。在给淮海战役总前委发出电报之后，他提笔给清华大学一位名叫吴晗的年轻教授写回信——在超乎寻常的繁忙中，毛泽东竟饶有兴趣地读完了吴晗写的《朱元璋传》：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淮海战场上大决战的态势已经形成。

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将合力作战，封闭徐蚌地区国民党军的所有主力，先围歼黄维兵团，然后再解决刘峙和杜聿明指挥的部队，

不让其退到长江以南去；而国民党军虽然制定了向淮河两岸退却的计划，但是为了顺利撤出，必须再向这个战场增加兵力，以保持住一条撤退的通道。此时，共产党方面投入战场的兵力已达六十多万，国民党方面投入的兵力多达八十余万，总计近两百万的兵马交错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巨大战场。

淮海战役总前委的部署是：以中原野战军第四、第九纵队，豫皖苏军区独立旅位于宿县以西、浍河以南的南坪集地区，与黄维兵团保持接触，并逐步将该敌引诱至浍河以北，利用浍河割断敌人。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纵队和刚刚归建的第十一纵队，隐蔽集结在浍河以南的曹市集、五沟集、孙疃集、胡沟集一线，待黄维兵团在浍河以南处于半渡状态时，分别由东西两翼实施向心突击，配合正面各攻击纵队将黄维兵团分割围歼。同时，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和特种兵纵队一部归中原野战军指挥，参加歼灭黄维兵团的作战。而华东野战军第二、第六、第十、第十一、第十三纵队，位于宿县、西寺坡地区，阻击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北援，力争歼灭其一部，保障中原野战军侧背安全；第一、第三、第四、第八、第九、第十二、鲁中南、两广纵队以及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第三旅位于徐州以南夹沟至符离集之间，横跨津浦路两侧构筑阻击阵地，阻击邱清泉和孙元良两兵团南援。

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如果成功，就可以使徐州的杜聿明集团陷于孤立，也可以让华东野战军主力在围歼黄百韬之后得到短暂的休整，以便下一步在淮海战场上集中力量攻击杜聿明集团。但是，虽然有华东野战军的南北阻援，围歼黄维兵团的任务毕竟需要中原野战军独立完成。这也就是毛泽东后来将淮海战役比成一锅“夹生饭”的原因：“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有完全煮熟，硬是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无论在全局上还是在局部上，国民党军都占据

着兵力和武器装备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大规模的战略决战，中原野战军压力巨大。

中原野战军参战部队只有七个纵队和三个旅，部队自大别山转出后，未能得到及时的补充，从兵力上讲，除了第一、第四纵队各有九个团外，其余的纵队只有六个团，九纵只有五个团。平均下来，每个纵队只有一万五千至一万六千人左右，其中的第二、第十一两个纵队仅有一万两千多人。这也就是说，整个中原野战军，可以参战的总兵力约十二万人，与对手黄维兵团的总兵力持平。但是，就武器装备而言，中原野战军与黄维兵团差距巨大。在大别山的时候，因为部队终日转战和大量的减员，重武器都被埋在了山里，重炮也都被炸掉了。目前，除有限的几十门山炮、野炮、步兵炮和两百多门迫击炮外，部队的基本作战武器是轻重机枪、马步枪和手榴弹，而且弹药严重不足。这样一支部队，独自攻击国民党军强大的作战兵团，在以往的历史上还从没有过。

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在干部会上告诫大家：“打仗总有主攻方向和牵制方向，总有吃肉和啃骨头。过去我们顿顿吃肉，现在啃一回骨头就受不了的样子，这是什么思想？这是什么思想方法呢？我要告诉大家，不要以为上回啃了骨头，这次就让你吃肉。要准备这次啃骨头，下次还啃骨头，第三次还是啃骨头！”政治委员邓小平则代表中原野战军表达了这样的决心：“这是决战，要把蒋介石的脊梁打断，即使在这场决战中，中原野战军全部打光，其他各路大军也能渡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邓小平提出了“拼老命”的口号，要求“人人都要有烧铺草的决心”——中原地区的百姓有个习俗，人死了之后要把他睡过的铺草拖到野地里烧掉，所以人死了也叫“烧铺草”。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准备“烧铺草”。

二十二日，他们率领淮海战役总前委指挥部从豫北开始移动，二十三日到达临涣集以东的小李家村，并在那里安营扎寨。小李家村位于宿县至徐州的铁路与徐州至阜阳的公路之间，是国民党军黄维兵团、邱清泉和孙元良两兵团以及李延年和刘汝明两兵团三路大军南北夹击的会合点——世界战争史上还没有过这种将战役最高指挥部设在战场的核心地区，战役高级指挥员和他们的士兵们近在咫尺的先例。徐州的刘峙和杜聿明如果知道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此时所处的位置，该如何感想?

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奉命与黄维兵团死死纠缠，以引诱黄维兵团一步步地进入包围圈，同时为其他部队赢得战役展开的时间。

四纵司令员陈赓对官兵们说，野战军主力在大别山苦战一年，相比之下，四纵兵强马壮，理应多承担艰苦的作战任务，多打硬仗。他亲自带领各级指挥员到南坪集地区察看地形，最后决定由旅长刘丰和政治委员胡荣贵率领十一旅坚守南坪集主阵地，十旅为右翼，九旅为左翼，十三旅为预备队。

南坪集是蒙城至宿县公路上的一个集镇，紧靠浍河南岸，集镇的背后是一座大石桥，桥上可以通过坦克和重炮，这里是东进的黄维兵团必须突破的地方。

二十三日，黄维兵团以第十军在左、第十四军在右、第十八军居中、第八十五军随后跟进的攻击阵形，在坦克和飞机的支援下，突破十三旅三十八团的前沿阻击阵地，向南坪集猛扑过来。上午八时，第十八军的三个团，在八架飞机和二十辆坦克的掩护下，向十一旅正面阵地发动多路突击。第十八军的突击显示出精锐部队强大的火力威力，重炮倾泻着炮弹，坦克成排地驶过开阔地抵近射击，然后以火焰喷射器、机枪和自动化步枪为先导，步兵随之发起集团冲锋。十一旅三十一团三个营的阵地同时受到攻击，最多的时候敌人的正面攻击队

伍多达五路。十一旅集中炮火极力压制敌人的火力，反坦克小组抱着炸药包和集束手榴弹冲向坦克，坦克越过沟堑时，预先放置的柴草被点燃，整个前沿烈火熊熊，浓烟滚滚。八连张小旦排位于前沿的突出阵地上，工事很快就被炮弹炸平，排长负重伤，三个班长全部牺牲，卫生员魏树荣带着剩下的几名战士顽强地固守阵地。正面攻击受阻后，黄维把攻击重点转向东侧，企图迂回南坪集侧背强渡浍河，但受到三十二团的坚决抗击。

下午，敌人将空中和地面火力全部集中在南坪集西侧杨庄前沿上，特别是三十一团二营六连坚守的宽约四百米的地段。六连的工事全部被炸塌，全连暴露在裸露的阵地上。一排和二排很快只剩下几个人，所有的连排干部全部伤亡，最后由党员战士张开指挥战斗。一个营的敌人以火焰喷射器开路，从三排阵地上突进来。阵地两侧的五连和十一连全力用交叉火力封锁突破口，但敌人的后续部队蜂拥而入，一直冲到杨庄阵地的背面，这里距离二营指挥所仅有几十米，距离三十一团指挥部也不过两百米。危急时刻，三十一团团长梁中玉抓起两颗手榴弹，率领预备队冲了上去。阵地上的树木已全被炸断，十几辆坦克正向二营指挥所集中射击，炮弹落在了指挥所的工事顶上。梁团长喊着二营长的名字：“祁大海！祁大海！”营教导员杜守信从硝烟中跑过来，他腰上别着几颗手榴弹，手里提着一只汽油瓶，正准备去打敌人的坦克。杜教导员报告说，营长去六连阵地了。梁团长经过迫击炮阵地时，对炮兵们说，打完了炮弹，和我一起向六连阵地上冲！预备队赶来后，一班长高凤山提着机枪冲到杨庄村口时中弹倒下，副班长孙水平喊：“决心给班长报仇的跟我上！”炮兵连和预备队很快冲进杨庄与敌人混战在一起，逐屋的争夺战演变成白刃肉搏，这是国民党军士兵最惧怕的作战方式，他们开始潮水般地往村外跑，一名士兵正要架设火焰喷射器，被排长曹国华一把夺了过来，副班长孙水平的刺刀同时插进了这名士兵的后背。

大雨突然倾泻而下，地面上流淌着鲜红色的雨水。

梁中玉团长刚为夺回阵地松口气，旅指挥部的电话便追了上来，命令他们撤退到浍河北岸。梁团长有些迟疑，旅参谋长王砚泉在电话里喊:“你们已经完成了任务！后面的口袋已经布置好了，让敌人过河，把我们的背水一战变成他们的背水一战，明白了没有? ”——中原野战军四纵十一旅在浍河南岸顶了整整一天，伤亡巨大。撤退时，梁中玉团长几次回望浍河南岸，回望他的许多官兵永远倒下的地方:“我们冒着大雨，沿着泥泞的道路向浍河北岸转移了。在雨雾弥漫的夜色里，在广阔的田野上，到处燃烧着一堆堆的火光，敌人猬集成一堆堆，度过这漫漫长夜。炮火逐渐稀疏了，刹那间，大地显得很安静。但是透过南方的夜空，透过敌人烧起的黯淡的火光，我仿佛听见了大军行军的脚步声，我仿佛看见铁钳已在敌人的身后合拢。”

此时，中原野战军三纵位于孙疃集，一纵位于郭家集、界沟集，二纵位于白沙集，六纵和陕南军区十二旅位于曹市集，十一纵位于胡沟集，这是一个袋装形的巨大的阵地，只等黄维兵团在浍河边处于半渡状态的时候，发起两翼向心突击。

二十三日夜，黄维兵团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命令十一师强渡浍河，开辟桥头堡阵地。虽然当面的解放军已经撤退，但该师工兵营长还是在指挥架桥时被打死了。当先头部队在几个渡口强渡成功后，第十军和第十八军开始了大规模的渡河。

二十四日中午，黄维兵团指挥部进驻南坪集。

至此，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被浍河分成了两半：第十、第十八军已到浍河以北，第十四、第八十五军尚在浍河以南。

突然，第十八军十一师搜索队传回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在至宿县的公路上有共军大部队在运动，公路两侧还发现了鱼鳞式阵地，阵地的纵深很大，看上去是供大兵力使用的。”同时，第十军方面也发现大批共军正由西向东直插侧背方向。更可怕的消息是：浍河南岸的第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报告说，第八十五军从蒙城出发时留下一些伤兵，准备顺涡河送往蚌埠，现在所有的伤兵都已被俘，只有几名轻伤员逃了出来——蒙城已被共军占领。

一切迹象表明，兵团似乎处境不妙。

二十四日晚，黄维召集军事会议。他问第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和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兵团的任务是要打到宿县，与徐州的杜聿明会师。看现在的情况，我们应该怎样打法，才能完成任务？”吴军长不吭声，杨军长则认为，共军似乎大军云集，布置了天罗地网，看来他们放弃涡河和浍河阵地都是有意为之，目的就是诱我深入，现在我们已经成了“不着边际的孤军”，只不过还没到“被四面包围的绝境”。杨伯涛坚决反对继续执行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说如果继续打下去，只能在共军的大纵深阵地里“越陷越深”，大兵团在没有后方的情况下作战绝对是死路一条。杨伯涛建议：“趁共军还没有对我形成包围，兵团星夜向固镇西南的铁路线靠拢，到固镇八十多里，急行军一气就可以赶到，在那里一方面可以取得后方补给，一方面可以与李延年兵团合股，然后再沿着津浦路往北打，这样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吴绍周当即表示同意。黄维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犹豫不决，直到午夜十二点，他终于决定第十二兵团全线撤退：“我认为难以击破当面的解放军，即使攻击再有进展，解放军仍然是节节阻击，而我军则处于解放军的袋形阵地之内，态势不利，特别是北淝河和涡河，成为我军背后的障碍和威胁。如果坚持战斗，将会被解放军困死。因此，决定终止战斗，脱离当面的解放军，向铁路线固镇方向转移。”

但是，等杨伯涛部署完转移事项回到兵团部汇报时发现黄维又犹豫了。原来，黄维派军作战处长去给第八十五军送转移命令，但是这个处长连同他乘坐的吉普车一起失踪了，黄维认为，必须要确知这个处长失踪的真正原因后才能有所动作。杨伯涛只好命令第十八军就地等待。

黄维兵团在浍河两岸不进不退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二十五日中午。

还是没有查清军作战处长到底上哪去了。

南坪集附近的公路上已经出现了少量的解放军部队，黄维只有决定不顾蒋介石的作战命令全兵团向宿县以南的固镇转移。

转移命令下达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十六时。

黄维从感到处境不妙到正式下令转移，中间过去了十几个小时，这十几个小时的犹豫不决让黄维后悔莫及。

中原野战军发现黄维兵团有缩回去的迹象，立即全线迅猛出击。第一、第二、第三纵队从西北和西面，第四、第九纵队从东北和北面，第六纵从南面，第十一纵从东南面，同时向黄维兵团猛扑过来。

第十八军是黄维兵团行动最迅速的一个军，二十五日傍晚十八时，他们就从浍河以北撤到了浍河以南一个叫双堆集的村庄。杨军长很想连夜行军，一举突出包围圈，可是战车、坦克以及数百辆汽车无法夜间行军，于是黄维决定在双堆集附近宿营。此时，第十二兵团各军的分布位置是：第十八军主力和快速纵队在双堆集，该军所属的四十九师和骑兵团在罗集的东南；第十军位于南坪集东南地区；第十四军到达东平集以西的浍河南岸；第八十五军在南坪集以南；兵团司令部位于双堆集东北的一个小村庄里。

入夜，黄维意识到了局势的急剧恶化：第八十五军遭到猛烈袭击，一个团长被打死，部队一度陷入混乱；第十四军到达浍河南岸后，未能按照兵团命令沿浍河占领阵地，导致解放军渡过浍河展开攻击，第十四军仓促迎战中被冲得七零八落，向南撤退的官兵直接冲进了一一四师师部所在的村庄，一一四师师长夏建勋急忙组织部队阻击，好容易控制了部队，但是他的一个团被解放军截断，团长朱达失踪，只零星跑回来少量官兵，该师的炮兵部队和辎重部队也全部被掳走了。第十军军长覃道善见势不妙，命令十八师和七十五师派部队收容第十四军的溃兵，但派出的部队都受到了攻击。

同样心绪不安的是位于双堆集附近的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自兵团从河南驻马店地区出发进入淮海战场以来，他一直认为整个兵团走在一条自投罗网的路上，为此他多次提醒他的司令官黄维：第一，进入淮海战场后，不断拾到共军的传单，“整个篇幅充满鼓舞动员的文字，宣示这一次是打垮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决定性的一战”，还有就是“看你黄维哪里逃”。第二，共军的动作有点反常。过去刘邓和陈粟两军都是各自为战，现在却紧紧地靠拢在一起，显然企图不小。第三，过去共军一贯采用侧击、尾击、突然袭击等变化多端的运动战术，而这次采取的是迎头堵击，堡垒式的坚固工事到处可见，显然有打硬仗的味道。第四，这次共产党方面动员军队和民众的工作空前广泛，各地地方武装和民兵都云集到徐海地区来了。比如，一份情报清楚地表明，桐柏山区一个名叫“王老汉游击队”的武装，已经跟在第十二兵团的后面进入了淮海战场。由此可见，第十二兵团处境非常严峻。现在，经过一天的混乱，部队被“局促于双堆集”，结局很可能是“深陷泥淖”。

二十五日这天，中原野战军已将黄维兵团的四个军合围在宿县西南以双堆集为中心东西不到十公里、南北不到五公里的地区内。

黄维终于意识到，他和他的兵团已经落入陷阱。

黄维时年四十四岁，他出生在江西贵溪一户贫苦农家，少年时就显示出坚韧的性格和勤奋的品质。师范毕业后在家乡当教员。二十岁那年，黄埔军校首次秘密招生，他在中共党员方志敏的帮助下，虽然个子矮小但还是被军校录取了。在黄埔期间，他成绩优秀，毕业后留校担任区队长，曾率黄埔生跟随蒋介石参加东征、北伐，因作战勇敢迅速升为团长。后受到时任第十八军军长陈诚的厚爱和信任，被提拔为旅长、师长，其间曾奉命赴德国深造。抗战爆发后，率第十八军六十七师参加淞沪抗战，战斗中该师四〇二团阵地仅剩一角，面对日军的凶猛冲杀，官兵誓死不退直至全部阵亡。一九三八年，黄维升任第十八军军长，蒋介石送给他一张六寸照片，上面写着："培我将军惠存"——黄维，号"悟我"——不是蒋介石写错了，而是有意为之，"培我者，培养我也"。黄维自此改号"培我"。

黄维带兵严厉，治军有方，清廉自律，口碑颇佳。但因是陈诚派的将领，多次受到何应钦的排挤，一九四〇年，他辞去第五十四军军长一职，改任青年军编练总监部副总监。黄维心平气定，他为培训入伍生的军官学校写校歌，那座学校位于江西横峰县莲荷村，从歌词上看想必是在战火中依然保有美丽的地方：

山青青，水洋洋，

莲荷山水青，

莲荷山水长。

中华儿女来四方，

操戈执戟聚一堂。

聚一堂，练刀枪，

远征三岛来还乡。

来还乡，永不忘，

莲荷山水青，

莲荷山水长。

两个月前，黄维出任第十二兵团司令官，这是国民党军内部矛盾互相平衡的结果，当时，黄维任新制军官学校校长兼陆军第三训练处处长。新组建的第十二兵团的基本部队是第十八军，胡琏是第十八军军长，还曾指挥过第十军，因此理应由胡琏出任兵团司令官。但是，第十二兵团驻扎在华中"剿总"白崇禧的地盘上，白崇禧对第十八军和这个军的后台陈诚成见甚深，对胡琏也"屡有攻击"，这就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另外考虑司令官的人选。他征求了正在养病的陈诚的意见，陈诚推荐了自己派系的骨干黄维。由于陈诚与何应钦之间、白崇禧和陈诚之间矛盾错综复杂，这一推荐遭到何应钦和白崇禧的反对，但是参谋总长顾祝同表示支持，于是任命最终确定。黄维去南京面见蒋介石，表示自己"离开部队久了，带兵有困难"。蒋介石说："打仗是现在最重要的任务，不把共产党消灭，所有事情都办不了，你不能从你个人来考虑。"而被任命为副司令官的胡琏心里不服，声称牙痛跑到上海治病去了。黄维最后对蒋介石说："打完了这一仗，我还是回去办学校，第十二兵团司令仍应给胡琏。"

二十五日夜，蒋介石获悉黄维兵团被围。

此时，全国战局的持续恶化令蒋介石忧心忡忡：东北林彪大军已有入关迹象，张家口地区大批的解放军正在调动，所有情报都显示那里大战在即；在西北战场上，胡宗南连日与彭德怀苦战之后，其主力第七十六军军长李日基竟然被捉走了——国民党军的司令官和军长们总是被俘的状况已无法控制，但第七十六军的遭遇也过分离奇：第一任军长廖昂在清涧战役中被俘，第二任军长（即整编七十六师师长）徐保在宝鸡被打死，现在的第三任军长李日基又在永丰镇被王震部的

官兵活生生地堵在了窑洞里。以上情况仅仅发生在一年多的时间之内，胡宗南的仗到底是怎么打的?

二十七日，毛泽东以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的名义，为新华广播电台撰写广播稿，规劝黄维下令投降:

宿县南坪集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官黄维将军及所属四个军军长、十一个师师长、各团营连排长及全体士兵们:

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将军、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将军向你们讲话。

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官黄维将军及黄将军所属全兵团官长士兵们:我们和你们都是中国人。你我两军现在在打仗。我们包围了你们。你们如此大军，仅仅占住纵横十几华里内的六七个小村庄，没有粮食，没有宿营地，怎么能够持久呢?不错，你们有许多飞机、坦克，我们在这里连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也没有，南坪集的天空是你们的，你们想借这些东西作掩护向东南方面突出去。但是，你们突了两天，突破了我们的阵地没有呢?不行的，突不出去的。什么原因呢?打仗的胜败，不决定于武器，而决定于人心。我们的士兵都想打，你们的士兵都不想打，你们将军们知道吗?还是放下武器罢。放下武器的都有生路，一个不杀。愿留的当解放军，不愿留的回家去。不但对士兵、对下级军官、对中级军官是这样，对高级将领也是这样，对黄维也是这样。替国民党贪官污吏打仗有什么意思呢?你们流血流汗，他们升官发财。你们送命，他们享福。快快觉悟过来罢。放下武器，我们都是一家人。打内战，打共产党，杀人民，这个主意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定下的，不是你们多数人愿意的，你们多数人是被迫打仗的。既然如此，还打什么呢?快快放下武器罢!过去几天，我们还只是布置包围阵地，把你们压缩在一片豆腐块内，还没有举行总攻击。假如你们不投降，我们就要举行总攻击了。我们希望黄维将军仿照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为了爱惜兵士和干部的生命起见，下令投降。如果黄维将军愿意这样做，着早派遣代表出来和我们的代表谈判投降办法。你们保证有秩序的缴枪，不破坏武器和装备，我们保证你们一切人的生命安全和随身财物不受侵犯。何去何从，立即抉择。切切此告。

刘伯承 陈毅

黄维不会投降。

正面作战是军事较量，他不惧怕。

被俘后，曾有人问他，为什么在南坪集受到阻击后，不迅速向固镇、蚌埠方向转移，还积极地抢渡浍河，导致后来陷入重围，黄维高声说：“我还想打嘛！”但是，至少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下旬那些清冷的日子里，黄维感到了困惑：“兵团部对于徐州地区的战况，一直没有得到国防部及其他上级的指示，兵团部的无线电通讯始终没有和刘峙、杜聿明取得联络，只不过推断徐州在大战而已。至于双堆集战场，是秋后毫无隐蔽物的广阔平原，所占据的村落都是土墙茅草盖的小房子，老百姓已逃跑光了，当地几乎毫无可以利用的物资，不仅无法征集粮食，就连燃料、饮水和骡马饲料，都极为困难。”

无法知道那个时候，黄维是否还有攻击浍河防线时的作战积极性。

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已失去脱离战场的一切可能，十二万装备精良的大军落入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无数支“王老汉游击队”的罗网之中。

## 蹂躏战术

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十七时，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军一一〇师师长廖运周刚刚到达双堆集附近，黄维就派人来把他找到兵团部。

黄维对廖师长说：“刚才空军侦察报告说，午后十五时，共军对我兵团的包围圈已经形成，他们正在构筑工事。你对此有什么主张？”

廖师长说：“司令官有何决策尽管下命令，我师保证完成任务。”

黄维说：“我想乘敌立足未稳，打他个措手不及。因此，决定每个军挑一个师，四个主力师齐头并进，迅猛突围。”

廖师长说："司令官的决策英明。我师请求打头阵，愿当开路先锋！我们既然能攻占共军堡垒式工事和河川阵地，现在突破共军临时构筑的掩体当然不在话下。我请求立即回去准备行动！"

一时间，黄维对眼前这位他并不熟悉的师长的勇气感到有些意外。

从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和渊源上讲，廖运周所在的第八十五军不在黄维的势力范围内。第十二兵团组建的时候，与黄维私交甚好的国民党军第九绥靖区司令官李良荣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出任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官，并把自己的基本部队第二十八军带过来。经过黄维和李良荣两人的共同请求，蒋介石发布了调动命令。但是，由于第二十八军隶属白崇禧的华中"剿总"建制，部队被白崇禧扣住不放，接着李良荣又被蒋介石调任福建省府主席，于是，国防部临时以第八十五军替代第二十八军编入黄维兵团，并经何应钦提名，任命第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为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官兼第八十五军军长。这个改变依旧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可是，白崇禧又扣住第八十五军不放。第八十五军的前身，是国民党中央军教导师一部，一九三七年由第十三军的第四师和八十九师组建而成，首任军长王仲廉。部队组建后，参加了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宜枣会战、长沙会战等战役。内战爆发后，第八十五军被调往山东，先后参加蒙泰战役、孟良崮战役和阻击刘邓大军南下大别山作战。调入第十二兵团之前，该军下辖二十三、一一〇和二一六师。这支原属于何应钦派系的部队，纳入白崇禧的华中"剿总"序列后，白崇禧计划让该军防守汉口大门，而将自己的桂系部队收缩在内线，因此他不愿意把这个军划归给黄维。为了扣住这个军，白崇禧把第八十五军编入他的第三兵团序列，调到湖北东北部的广水、应山方向去了。黄维不能刚上任就少一个军，因此向蒋介石反复力争，国防部也坚持要白崇禧把第八十五军"吐"出来——"几费周折，白崇禧才把这个军吐出来"，可是他"吐"得很慢。当黄维率第十二兵团已向淮海战

场出动的时候，该军还以交接防务为名在湖北境内迟迟不动，经过黄维的反复催促才勉强出发。出发时，军长吴绍周对前方情况一无所知，所带粮草弹药也严重不足，所以一路走走停停，直到十一月二十一日才到达安徽阜阳，比黄维规定的归建时间晚了半个月。因为部队没带粮食，当地又征不到粮食，黄维兵团渡沙河时架的桥也被拆毁了，收音机里又传来黄百韬已被包围的消息，吴绍周不愿意再往前走了。但是，黄维不断地发电催促，第八十五军只好饿着肚子赶路，二十四日由蒙城赶到赵集附近，由此被彻底拉入了淮海战场。

始终担心无法控制第八十五军的黄维，在二十六日下午，被眼前这位名叫廖运周的师长的果敢精神感动了。这正是需要有部队为全兵团拼命的时候，也是全兵团迅速突围出去的最后时机，连自己的嫡系部队第十八军都没有哪个师长能够在关键时刻表现出如此的忠诚与勇敢，如果此次整个兵团能在一一〇师的冲锋下一鼓作气突出罗网，那么这个廖师长将成为自己军事生涯中的最难忘的人——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军一一〇师师长廖运周的行动，很快就会让黄维刻骨铭心。

“我于一九二七年，经孙一中、靖任秋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八月在叶挺第二十五师七十五团参加南昌八一起义。”——尽管共产党方面在情报收集、政治策反和在敌方营垒内安插秘密党员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惊人的建树，但在国民党军一线作战部队内部，一名资深的共产党员能够隐藏如此之久，并被逐步提升至师长的位置，其大胆、耐心和智慧令人惊叹。

黄埔毕业的廖运周自一九二八年起，就接受党组织的委托秘密从事地下兵运工作。一九三七年，廖运周所在的部队开赴河南焦作，与豫北管区合并成师，当时的豫北管区的司令官张轸，北伐时曾是以程潜为军长、林伯渠为党代表的第六军的一名师长，因此政治立场是反蒋的。廖运周迅速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是：“在这

个部队隐蔽精干，发展势力，掌握兵权。”自那时起，廖运周一直隐蔽在一一〇师，历任团长、旅长、副师长和师长等职。这一漫长的潜伏过程是艰辛和危险的。内战爆发后，晋冀鲁豫中央局国民党军工作部的秘密联络员进入河南新乡一一〇师驻地，见到廖运周。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一一〇师的行动计划是：“在有解放军接应的前提下举行起义，起义前的任务是收集军事情报。”一九四六年九月，第八十五军奉命出动，掩护第五军向徐州移动。一一〇师在河南民权县刚下火车，官兵们就听见了剧烈的枪声——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部队正在攻击位于郑庄寨的第八十五军军部。军长吴绍周在电话里呼叫一一〇师火速增援，廖运周很想利用这一机会与刘邓的司令部取得联系，但是情况不明，缺乏渠道，只能向吴绍周报告说自己也受到了包围，正在激战之中，以拖延增援军部的行动。天亮之后，刘邓部因攻击效果不佳，战斗伤亡严重，被迫撤离战场。廖运周立即向军长报告了这一情况，以致吴绍周以为是一一〇师经过“英勇作战”把围困军部的共军打跑了。后来，邓小平托人告诉廖运周：“郑庄寨战斗是有意不打一一〇师，而专打第八十五军军部，目的是为了牵制第五军，使他不能开往徐州，打了第八十五军起了牵制作用，这就是胜利。至于我军有损失，那与你们无关，你们是无能为力的。”

一九四七年，一一〇师开赴山东战场，邓小平随即指示，将一一〇师地下党的关系转到中共华东局。同时，陈毅也再次强调：“当前搞情报比起义贡献大。”这一年的夏天，一一〇师地下党委正式成立，廖运周任书记，副官处副官的刘浩任副书记。他们开始整顿队伍，凝聚进步力量，把顽固派分子排挤出去，将一大批年轻军官团结在身边。这期间，国民党军豫北战场作战计划和蒋介石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的作战计划及电报密码，都是由他们搞出来然后送至距一一〇师驻地最近的解放军部队的。秋天，一一〇师地下党组织关系转入中原军区，邓小平的指示是：“积极准备，耐心等待，在最有利的时机起最大的作用。”

让一一〇师的秘密党员和准备与蒋介石分道扬镳的进步军官继续隐蔽下去是困难的——“有的同志逐渐流露出一些急躁情绪，对长期隐蔽在敌人内部缺乏耐心”。而随着国共两军决战态势的日益明显，开赴一线战场作战似乎不可避免，于是隐蔽下去的危险性越来越大，特别他们搞不清楚什么时候才是“最有利的时机”。邓小平说：“组织上没有忘记你们，只是目前还没到时机，起义要在军事上、政治上起最大的作用。不是万把人、几千支枪的问题，你们要考虑到全局，不应计较局部得失。”——第八十五军一一〇师，是一颗埋藏在国民党军作战部队中的定时炸弹，引爆必须等待能够带来最烈破坏效果的时机。

一九四八年九月，第八十五军划归第十二兵团，奉命进入徐蚌战场。一一〇师地下党委再次开会，认为起义的有利时机可能到了。但是，全师官兵不愿出动的情绪也让廖运周有些着急，因为部队拉不出去，战场起义的计划就会落空。他破例发给所有官兵每人三个月的薪金和大米，并允许官兵到汉口、广水等地探一次亲，之后部队才勉强出发。第八十五军突破浍河后，黄维意识到兵团已陷入包围圈，军长吴绍周去南坪集开会回来，连夜向师长们布置转移行动：“共军有纵深配备，正在向我军两侧迂回，我军将被包围，现在黄司令官已下决心转移。第八十五军主力放在南坪集附近，占领阵地，向西北警戒，掩护第十八军和第十军转移。待两军通过后，第八十五军经罗集向固镇以西地区集结。兵团司令部在第十八军后跟进。”吴绍周告诉廖运周，一一〇师暂归黄维直接指挥，向湖沟集方向武力搜索。

廖运周很着急，因为黄维已经察觉危险正准备逃脱，可当下没有把情报送出去的条件。他对吴绍周军长说：“为什么把我师划归黄维直接指挥？这样分割使用有诸多不便。为什么要第八十五军掩护第十八、第十军转移？他们各自掩护直接转移不是更好吗？第八十五军由赵集直接开往固镇西北地区不是更好吗？”这种挑拨的话让吴绍周沉默了好一会儿，吴军长最后说：“武力搜索的兵力可大可小，把你的三二

八团给我留下当预备队吧！”——吴绍周的这一决定让廖运周很满意，因为一一〇师目前只有三二八团不好掌握，廖运周一直担心这个团会是起义时的一个麻烦。

二十五日拂晓，廖运周集合部队准备出发，吴绍周派人来通报说，军作战处长郑家兴乘吉普车给一一〇师送命令时，在师部附近被共军连人带车捉走了，一一〇师原地待命。晚上，一一〇师奉命赶到双堆集。廖运周见到了黄维，主动要求承担突围前锋的任务——廖运周的想法是，只有担任前锋，才能与第十二兵团的其他部队脱离开，而一一〇师如能在突围时举行战场起义，很可能致使黄维的整个突围计划瓦解。从黄维那里回来后，廖运周让师侦察连副连长、秘密党员杨振海立即出发。杨振海要直接找到解放军前沿部队接上头，请他们在一一〇师突围处的左翼“闪开一个口子”，等一一〇师过去后再将口子重新封上。

二十六日晚上，黄维异常紧张，明天的突围成功与否，关系到整个兵团的生死。此刻，他与李延年、刘汝明之间的距离不算远，他很怀疑共军能将他的十二万人马合围起来，而四个师的强大兵力并排突击，遭到阻挡是肯定的，但还没有突不出去的道理。黄维唯一的担心来自他所熟知的国民党军无法克服的弊端：在危急时刻，谁也不愿意损失自己的部队去配合或援救友邻。一旦明天突围受阻，兵团将被围在双堆集地区，即使共军吃掉自己不那么容易，但友邻部队增援不力，官兵作战意志消沉，重蹈黄百韬兵团的覆辙也不是没有可能。在这个夜晚，黄维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如此积极地进攻作战，是不是犯了个鲁莽的错误?

廖运周派出去的侦察连副连长杨振海，很快就被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十二旅的前哨捉住了。六纵当天与黄维兵团打了整整一天，特别是十二、十六和十七旅的杨庄、李庄、葛家庄前沿阵地，终日都处在

激战之中，虽然阵地没有被突破，但是官兵伤亡很大。入夜，黄维兵团退缩双堆集后，前沿的硝烟还未散尽，一个国民党军军官就闯了进来，要不是这个军官不断地强调有紧急机密情报要送给前线首长，弄不好就被打红了眼的十二旅官兵当场打死了。纵队司令员王近山得知消息后，命令把“俘虏”送到纵队指挥所审问。杨振海一进指挥所，作战参谋武英立刻喊道：“老伙计！你还没死呀！”不明内情的王近山司令员听说这是刘邓首长派到一一〇师做地下工作的同志，觉得在前沿发生这样的事真是出人意料。

杨振海拿出一份黄维兵团突围计划图。这份作战图让王近山感到明天将有大战，因为黄维准备用四个师强行夺路，且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所有的火炮和从南京派来的飞机将全力助战。当听说一一〇师准备起义，要求为其让开通道的时候，王近山和六纵政治委员杜义德一时不知该如何答复。首先，他们对廖运周不甚了解，不知道一一〇师的起义是否有诚意。其次，即使起义是真心实意的，但敌人四个师向纵队前沿发起进攻，如果给一一〇师让开一个口子，万一其他敌人趁机冲出，将是一个巨大的麻烦。另外，谁能保证一一〇师没有顽固军官，万一廖运周控制不住部队，把他们也放了过来，他们一旦调转枪口从我军的背后进攻，只有四个旅的六纵如何对付得了强大兵力的前后夹击？如果让黄维兵团从六纵的阵地上跑了，这就出大事了。

王近山、杜义德立即请示野战军首长，刘伯承、邓小平当即指示：“要不惜任何代价，坚决粉碎黄维的突围，同时要严密组织，保证一一〇师起义成功。”邓小平还特别提到：“廖师长在汉口的家属，我们安排转移，请他放心。”六纵指挥员立即部署迎接一一〇师起义的具体事项：为了以防万一，不能让起义部队进入村庄，须在阵地纵深地域划出一条通道让其通过。而十六、十七旅将位于起义通道两侧占领阵地，如果起义部队中途哗变，两侧同时开火；如没有发生哗变，就集中火力消灭跟在一一〇师后面的敌人。王近山对杨振海交代：一、

一一〇师的行动必须提前一至两个小时，争取在敌人全线突围之前把队伍拉出来；二、起义部队必须沿划定的通道出来，如果越界就会遭到火力打击；三、起义部队出来之后，须到指定地点集合。杨振海提出，在起义部队通过的通道边沿须标上路标，同时，派人进入一一〇师帮助把部队带出来。

六纵派出的人是作战参谋武英。武英化装成农民，与杨振海一起在前沿部队专门为他们制造假象的枪炮声中，接近了第八十五军的阵地，武英当即被哨兵扣押送往一一〇师师部。

此时，已是二十七日凌晨。

获悉情况后，廖运周再次到了黄维那里，他有一个难题需要化解，即黄维布置四个师齐头并进突围，如果一一〇师被安排在中间，将很难单独地脱离战场。廖运周对黄维说："四个师齐头并进不如用三个师好，把第十八军的主力师留在兵团作预备队，可随时策应第一线的作战。我师先行动，如果进展得手，预备队主力师可以迅速跟进，扩大战果。"黄维再一次受到感动，眼前的这位师长不但勇挑重担，而且还能为兵团整体考虑，于是，他拍着廖运周的肩膀说："还是运周兄，好同学（黄埔同学）！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坦克、榴弹炮随你挑！第十八军的一一八师在后面跟进，掩护你们！"廖运周见黄维没有丝毫怀疑，进一步说："我已经派便衣深入敌后，如果发现空隙，我们准备利用夜色提前行动。"黄维的嘱咐是："有机会你就前进，要当机立断！"

在武英的建议下，一一〇师分为四路纵队，按正常速度前进。最前面的三二九团，由武英、杨振海和团长刘协候率领；三三〇团为后卫；后卫的后面再放一个可靠的连队负责收容；中间，是由师部、直属队的炮兵营、运输营、特务连、化学炮连、通讯连、工兵连组成的队伍。

廖运周必须向军官们宣布起义的决定了。

在双堆集附近黑暗的旷野中，一一〇师营以上军官聚在一起。

我开门见山地说：“现在，我们已被解放军全部包围了，黄百韬被消灭，蒙城、宿县被占。蚌埠的李延年不敢前进。我们是援兵没有，退路已无，弹粮即尽，解放军却在不断地增援，这样下去我们只能坐以待毙。蒋介石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我们为什么还要为他卖命？共产党、解放军的所作所为大家都很清楚。很多人要求我利用朋友关系（当时还不能公开我们的身份）给解放军写封信，为我们提供方便，使我们脱离战场，投靠解放军，举行起义。现在，我们已派杨振海与解放军联系上了，见到了他们的南线司令员，解放军对我们将采取的行动非常欢迎。你们赞不赞成这样做？”话音刚落，大家就异口同声地说：“我们赞成！”接着，我向大家宣布了行军序列，并提出下列要求：一是以四路纵队按解放军规定的路线急行军。解放军保证不向我们开枪，也不允许任何人向解放军开枪。同时公布了与解放军的联络信号和我们官兵左臂上的标志。二是任何人不许掉队，走不动就用车拉。三是要严守秘密。四是不愿意走的现在可以提出来。其实这不过是给每个人的心上加一个砝码，估计他们就是不愿走，谁也不敢提出来。大家都说：“愿意跟老师长走！”

起义部队的标志是：一律在左臂上扎白毛巾或白布。

通过通道的标志是：沿途插着高粱秆。

两军接触时的联络信号是：打三发枪榴弹。

天已经放亮，初冬的浓雾笼罩着田野。黄维兵团开始了强行突围，由一一〇师开路，后面跟着其他两个师。一一〇师的行军路线，从双堆集到预定的集合地点吴大庄和西张庄，距离大约有十五公里。一一〇师的三二八团被留在黄维身边，师部和两个步兵团总人数约有五千多人。黄维在步话机中不断地询问廖运周突围进展，廖运周一律回答“一切顺利”。但是，险情还是发生了。接近六纵阵地的时候，按照事先的约定，三二九团发射了三颗枪榴弹。可六纵阵地上没有任何反应，左翼第十八军的队伍躁动起来。杨振海立即跑到第十八军那里，解释说一一〇师正在偷袭共军阵地。这边一一〇师跑起来，大约跑了十分钟，前方阵地上的机枪突然开始猛烈扫射，手榴弹也跟着飞了过来。先头部队慌忙准备还击。武英立即让刘团长不要还击，命令

部队卧倒，然后他绕了个大圈子向六纵阵地上猛跑。跑上阵地，碰见十二旅副政治委员张子明，武英说："怎么搞的？不是事先通知了起义的事，而且还规定了信号，为什么还要开枪？"张子明回答说："早上雾大，没有看见信号。再说你们的时间比规定的晚了一个多小时！"就在这时，一一〇师身后枪炮声大作：跟在他们后面的第十八军的突围部队，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遭到六纵的猛烈伏击。黄维在步话机中的语调开始变得疑惑起来。他大声呼喊廖运周："长江，长江，你到了哪里？"廖运周回答："武昌，武昌，我们到了赵庄，沿途畅行无阻！"黄维喊："跟着你们的十八军的那个师，遭到密集的火力袭击，伤亡很大！"早晨七时二十分，一一〇师跑成了八路纵队，最终到达指定地点——吴大庄和西张庄村附近。

吴绍周军长在步话机中询问廖运周的位置，廖运周回答说："我们被共军包围了，请求增援。向导死了，因此无法判明本师现在的具体位置。"然后，他命令全师所有步话机一律关闭，电台停止使用。飞机飞到一一〇师队伍的上空，开始了不顾一切的猛烈扫射，看来吴绍周和黄维都已经意识到了什么。一一〇师的士兵躲进一片树林里，他们还不清楚起义之事，不知道飞机为什么要轰炸自己，更不清楚他们是否已经"突围成功"。喘息平静之后，他们发现树林里的草丛中有很多粗布口袋，打开一看，是大米、白面、猪肉、粉条、盐巴和白菜，许久未吃饱的一一〇师官兵们顿时欢呼起来。

从起义兵力上看，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廖运周带出来的人不算多，但是，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作战初期，一一〇师的战场起义发生在黄维兵团试图突围的关键时刻，这对黄维的心理打击是沉重的，对国民党军士气的挫伤更是致命的。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后来说："第一一〇师师长廖运周叛变，是加速黄维兵团失败之关键。"

二十七日拂晓，一一〇师脱离战场后，突围与反突围的战斗愈加激烈。

六纵的作战位置在双堆集的东南，是黄维向李延年和刘汝明两兵团靠拢的最直接的方向，因此这里承受着阻击黄维兵团的巨大压力。二十五日午夜，第十八军偷袭了六纵十七旅五十团的阵地，敌人一度打进村来，在四十九、五十一团的增援下，五十团经过艰苦反击把敌人赶了回去。二十六日，第十八军再次在坦克和飞机的助战下，向六纵指挥的陕南军区十二旅三十五团阵地发动攻击，小刘庄一度失守，又是进行艰苦的反击才夺回。二十七日，一一〇师通过之后，包围圈上的通道即被六纵封死，跟在一一〇师后面的国民党军突围部队继续强攻，向十二旅防御的小李庄、杨庄等阵地发动猛烈突击。坚守小李庄的一营在营长李更生的指挥下，不顾坦克已经迂回到身后的威胁，与突入村庄的国民党军反复争夺阵地。飞机在小李庄上空低空扫炸，坦克引导步兵强行推进，狭窄的阻击阵地上平均一分钟落下十发以上的炮弹。残酷的战斗进行了一个白天，最后时刻，双方在前沿枯萎的茅草中拼了刺刀，一营的干部和骨干几乎伤亡殆尽，全营两百多人最后只剩下四十多人，阵地犹在。

在廖运周起义的同时，中原野战军命令各纵队趁势迅猛出击，进一步压缩黄维兵团。各纵队在白天出击了。国民党军的B-29轰炸机投下重磅炸弹，强击机尖叫着俯冲轰炸，地面的炮火十分猛烈。九纵各旅在混战中与突围的国民党军展开了村庄争夺战。四纵向突围之敌出击后，当面的国民党军措手不及仓皇后退，四纵官兵随即猛追，连克十余个村庄，三十团的一营和二营竟然插入纵深袭击了第十四军军部。

二十八日傍晚，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致电中央军委报告战况：

（一）经昨感（二十七）日夜作战，已将敌压缩至东西十五里、南北四五里的长窄狭小地区。敌曾以大量飞机、坦克，多次猛攻我六纵阵地，企图打开通路，向东南方逃走，均被一一击退，且俘敌三百余人。我由西向东由北向南压缩，部队亦甚勇猛，但因天气昏暗，部队混乱，敌亦因突围未成，依托原有阵地顽抗，故我目的今俭（二十八）日拂晓前停止攻击，共已俘虏约二千人。另最先逃出至大营集之四九师一个多团，已被我全歼。

（二）敌之基本意图，似仍为向东南突围，但突围不成，则只有死守待援。刻遇到之最大困难是十万大军拥挤于狭小地区，天冷露营，没有饭吃，空投数量极小，士气甚低，遭我阻击和炮击伤亡不小，队形亦已混乱。

（三）现我们从敌人固守着眼，正等待弹药到达，即于后艳（二十九）夜开始攻歼敌人，采取集中火力，先打一点，各个歼灭的战法。

（四）我们六个纵队，从十九［皓］日涡阳阻击起，到今二十八［俭］晨止，共伤亡不过六千人，士气很高。加上华野七纵及炮兵配合，全歼该敌确有把握，但须十天左右时间才能完成。原来根据敌人总突围及廖起义的情况，估计可以迅速解决战斗，此种情况业已改变。

（五）华野七纵因敌改成固守，故仍留用为总预备队。

黄维兵团在最初的突围行动中，损失最大的是第十四军。这个军的各师都遭到猛烈阻击。军长熊绶春正为收拢部队着急上火的时候，参谋长梁岱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这让他几乎认为自己产生了某种幻觉。四天前，梁参谋长在浍河南岸的战斗中失踪，官兵们在战场上只捡到他的皮包，熊绶春认为他阵亡了，一面让士兵到处寻找他的尸体，一面给汉口的后方基地通报消息，同时刻不容缓地给梁夫人发了抚恤金——在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第十四军参谋长梁岱的遭遇可谓奇特，他先后被解放军俘虏两次。在浍河南岸，他没被打死而是被俘了，那时他刚到第十四军上任不久，第十四军的官兵大多还不认识他，因此他把自己伪装成军部书记员，最后居然没被解放军审查俘虏的干部甄别出来。解放军干部问这个“军部书记员”，敢不敢回到第十四军去，如果敢就可以放他回去，条件是要替解放军带几封信。梁岱答应了。夜里，解放军干部又来了，给他三封信，一封给黄维，一封给熊绶春，一封给第十四军八十三师师长张用斌，信被缝进梁岱的棉衣襟下。然后，几个解放军战士把他送到前沿阵地，指着前面的一个

小村庄说："那里就是第十四军军部，那边是你们部队的前哨，到了那里，你说是自己人，他们就会让你过去的。"梁参谋长沿着解放军指的方向开始往前爬，第十四军的前哨发现他时，说什么也不相信他是军参谋长："不许动！什么参谋长！参谋长早就阵亡了！"梁岱因此在前沿被扣留了一夜，蹲在一堆稻草里几乎被冻僵。直到天亮之后，前哨才与军部联系上，军长熊绶春立即让前沿部队的团长送梁岱回军部。

"我一进门，熊绶春立即抱住我哭了起来。"

梁岱身上带的是劝降信，信的大意是：放下武器，就有生路，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熊绶春看了信之后，连同给黄维和张用斌的信一起撕了。

第十四军八十五师二五五团政工室主任洪雨卿日记：

十一月二十七日我们在白大庄溃退下来，共军的追击炮火打得非常密的时候，我就倒在地上，这样由共军的子弹里逃了出来。他们（指二五五团官兵）满地乱奔乱跑伤亡了许多……逃出活命后，清查人数，我政工室的干事李维沛阵亡了，第三连连指文宪锡及第五连连指陈维基负伤了。团部里的官兵伤的、亡的、被俘的有好多。大家逃到兵团司令部村子前面的田中集合，这时团长也收集些零星队伍来了，他说了几句话，带着部队就走了。这时天又黑了，前面有共军，后面的村子兵团部不准我们过去，没有指挥官的官兵困守在田野里，求进不得，望归不得，只有死路一条了。兵团部的大炮坦克对着共军，共军的机枪大炮对着兵团部，我们这六七百没有指挥官的人马就在这两方枪炮口的中央，如果双方要开火，我们夹在这中间会被打成肉酱。有些官兵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吓得哭哭啼啼，我这时仰卧在田中，只有听天由命。听说我们军部亦被冲散，军长失踪了，师部也弄得溃不成军，第十师也被打得乱七八糟，二五三团团长阵亡，队伍散了，我团第一营营长罗凤阳负伤，第三营孙亘营长负伤逃跑，只有第二营尚有点力量，但所有的机关枪都丢光了，照这看来，第十四军是被打垮了。天已经黑了，我只穿一件大衣，身上冻得发抖，这时我心里千头万绪，伤心地流出泪来。

按照淮海战役总前委的部署，此时，华东野战军主力在黄维兵团的南北两个方向上，负责阻击邱清泉、孙元良兵团南下和李延年、刘

汝明兵团北上，以粉碎国民党军打通津浦路南撤的企图，并将黄维兵团彻底孤立起来。

邱清泉的部队还没有从增援黄百韬的战场中完全撤出，接到南下命令的那一刻他的心绪立刻变得十分糟糕。第五军军长熊笑三对兵团参谋长李汉萍说：“邱先生这次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消沉。过去每次作战都是大叫大喊，要杀这个要杀那个，神气十足，这次连话都不愿意说了。”邱清泉虽不再大叫大喊，但依旧是满腹怨恨：“这打的是什么仗？怎么要我同时执行两项任务呢？大概不把我打光，他们是不甘心的。”——邱清泉所说的“他们”，除了指向徐州的刘峙、杜聿明之外，恐怕更多的是指向南京的蒋介石，因为蒋介石的命令十分严厉，要求他的第二兵团一天之内到达宿县北面的符离集，以期与黄维兵团会合。邱清泉认为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在华东野战军的坚决阻击下，尽管沿着津浦路东侧南下的邱清泉兵团以决一死战的态势向前攻击，但是在付出很大伤亡之后，连续攻击四天只推进了十多公里，从江苏徐州附近进入安徽北部的褚兰一线后，部队便无论如何也推进不了了。

与邱清泉相比，沿津浦路西侧向黄维兵团靠近的孙元良似乎积极许多。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在八月间以第四十七军为基本部队改编而成，原下辖第四十一、第四十七、第九十九军，但第九十九军很快就被调去守备蚌埠，并改归李延年的第六兵团指挥，因此孙元良实际上只指挥着两个军。之前，根据蒋介石退守淮河的计划，十月底，第十六兵团从郑州撤退，第九十九军移防蚌埠，军主力则移至河南商丘，准备作为守淮总预备队。但是，十一月初，当获悉黄百韬兵团被围后，徐州“剿总”命令第十六兵团迅速东进，担任徐州南面的守备任务。孙元良十分恼火，认为刘峙“坐失主动与敌决战的良机，而今又完全处于被动”；同时，他认为消灭黄百韬的不是共产党军队而是南京国

防部——“国防部对敌情算不清，对共军企图断不明，要部队白白送死，实可叹息。粟裕主力十几个纵队南下，离新安镇一百里时，还不让黄百韬西行集结徐州，反而要他掩护第四十四军，贻误良机，为了救一个军而害了五个军。这样指挥，安有不败？现在共军正在整理部署，如果我们再犹豫不撤，将来只能坐以待毙。”孙元良极力主张将徐蚌主力尽快撤离战场，“能救多少算多少”，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此刻，蒋介石向南攻击的命令很符合孙元良的主张，因此第十六兵团前进的积极性颇为高涨，官兵们都认为这样就可以远离那个危险的徐州了。

二十四日，孙元良兵团向宿县方向发起攻击，他声称自己的战术是“钻隙迂回，囊括席卷”。黄昏，第四十一军一二二师三六五团袭占孤山集以北，那里是华东野战军阻击部队的前沿阵地，三六五团随即揳入笔架山主阵地。夜晚，第四十七军一二五师占领官桥以北的高地。二十五日，第四十一军一二四师攻占白虎山、孤山集。一二二师在孤山集东南的纱帽山，受到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的顽强抵抗，三六四团在炮火掩护下的攻击数次受挫。这时，南京来的一个中外记者团到达战场，刘峙和杜聿明要求孙元良在记者们面前打出个样子来。于是，当记者团登上第四十一军位于白虎山的指挥部时，孙元良集中兵团所有的山炮、野炮和化学炮一齐向纱帽山轰击，飞机也投下大量的燃烧弹，整个纱帽山完全被硝烟和火焰所覆盖。当面的华东野战军阻击部队再次后撤。配合攻击的一二五师趁机攻占纱帽山附近的几个高地和津浦线上的四堡火车站——虽然“钻隙迂回，囊括席卷”的战术没有得以施展，但孙元良认为至少在二十五日这天第十六兵团的表现还算完美。

但是，从二十六日开始，攻击就不那么顺利了。一二二师三六五团推进到卢村砦、三六四团推进到园山时，突然遭遇猛烈反击，残酷的拉锯战随即展开，并持续了整整两天。孙元良开始惶恐了：黄百韬

兵团被歼后，粟裕部主力正在迅速南下，如果自己在此地长时间僵持，不仅不能与黄维、李延年兵团会师打通津浦路，而且徐州主力很可能也落入包围之中，那时就要重蹈黄百韬的覆辙了。特别是，听说在左翼并肩推进的邱清泉兵团进展很缓慢，自己可不能一不留神成了冒进的孤军。二十七日，孙元良把他的预备队一二七师加强到第四十一军的侧翼，企图打开一个缺口冲过纵深阻击地带，到达宿县与黄维、李延年会师。但是，一二七师遭到前所未有的顽强阻击。尽管这天正值南京的立法委员们到战地观战，但第四十一军每一次攻到卢村砦的围墙下，都会被凶猛的火力反击回来。孙元良觉得在南京大员们面前很丢面子，而那些立法委员个个都被近在咫尺的残酷拼杀惊得目瞪口呆。

节节阻击孙元良兵团的，是由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两广纵队和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第三旅等部队组成的西路阻击集团。而在卢村砦一线阻击的，是战斗力和装备都相对薄弱的两广纵队。两广纵队只有三个团，每个团只有两个营，其中二团在之前的战斗中伤亡两百多人，还没有得到补充，三团是新组建的部队，大多数是济南战役后新补充的国民党军被俘官兵，还没来得及进行整训。纵队严重缺少重武器，每个团只有三门旧式山炮。在前两天的阻击战中，从纱帽山阵地撤退时，三连班长曾发腿部负伤无法行动，在血流殆尽之前，他一个人在战壕里用机枪和步枪轮流射击，直到子弹打光，当国民党军冲到他跟前时，他拉响了藏在身上的最后两颗手榴弹。二十八日，两广纵队以一团防守卢村砦和瓦房，二团防守大方山和黄山，三团防守秤砣山。上午七时，孙元良兵团向两广纵队二线阻击阵地发动猛攻。一个小时后，第四十一军在第二次冲锋时突破一团坚守的瓦房阵地，一团经过惨烈的反击夺回部分阵地，但到上午九时因伤亡巨大被迫再次放弃。第四十七军攻击大方山，在那里阻击的二团四连连长、副指导员和所有的班排干部、骨干全部伤亡，大方山失守了。这使得敌人可以直接攻击卢村砦，卢村砦一旦失守，孙元良兵团就可长驱直入与黄维

兵团会合。纵队命令二团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大方山。二团组织起四个连的兵力，在团营炮火的支援下，在一团和三团各一个连的加强下，十时三十分发起反击，三十分钟血战后，大方山阵地被夺回。战斗中，包括五连长曾福在内的四名连级干部负伤，副连长陈玉麟和四连副指导员刘观胜阵亡。

卢村砦是孙元良兵团攻击的重点。两广纵队连续打退敌人的多次冲锋，随着坚守在阵地上的官兵不断牺牲，下午的时候阵地出现难以支持的迹象。孙元良集中了大量火炮，野马式战斗机也全力助战，对卢村砦实施轮番轰击，不但前沿阵地上的工事全部被毁，卢村砦全村的房屋都已被炸平。在最困难的时刻，上级发来电报，严令不准后退，并通报说第九纵队正在向卢村砦增援。黄昏，孙元良以两个团的兵力全力猛扑，一团团长彭沃表示，包括他在内，全团哪怕只剩最后一个人，也要死在阵地上。五连二排在排长林权的率领下坚守在前沿，当敌人冲上阵地的时候，全排跃出战壕发动反冲锋，冲锋中林权中弹倒下，全排近乎疯狂地与敌人展开搏杀。反复的争夺中，一团营连干部十三人伤亡，全团除一个排还保持着建制外，其他各连还活着的战士只能编成一到两个班。最后时刻，纵队警卫连、侦察连和文工团以及所有的机关后勤人员全部划归一团指挥。晚上二十时，警卫连和侦察连刚上去就遭遇敌人的再次攻击，瞬间伤亡近三十人。二十八日晚至二十九日拂晓，孙元良兵团一反常态，整夜攻击不止。天亮时，敌人再次组织大兵力向大方山、卢村砦发动轮番冲击，这时候九纵的主力部队赶到了战场。

二十九日，孙元良和邱清泉的攻击势头明显减弱。

仍然深陷包围圈的黄维万分惊愕，因为距离他最近的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不但没有积极增援反而开始退缩了。

二十五日，刘汝明兵团的第五十五军和李延年兵团的第九十九军，距离黄维已经不足四十公里。但是，顾祝同突然飞临战场上空，命令部队立即撤回浍河南岸，并一定要炸毁浍河上的新马桥。李延年和刘汝明都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不清楚为什么要撤退。通过浍河桥时，官兵人心浮动，争相抢渡，发生了因拥挤死伤或落水死亡的严重事件。部队刚撤到浍河南岸，顾祝同又命令两兵团按原路前进。刘汝明顿时火了，派参谋长去蚌埠当面质问坐镇指挥的顾祝同："大军已经前进六十多里了，无缘无故地撤回来，现在为什么又要前进？"顾祝同窘迫地在地图上指来指去，但还是没有解释清楚："据空军侦察，共军四个纵队正在由泗水、灵璧方面向南挺进，这样我援军侧背就大受威胁，故命令大军撤到浍河南岸，然后以浍河为依托，再向前推进，才能安全可靠……"——顾祝同所说的"共军四个纵队"向南挺进，其实是国民党军溃散部队、地方民团和官吏们混在一起逃离战场的人流。此时，黄维兵团已经处于危境，增援行动却朝令夕改，大军往复人困马乏，国民党军官兵们怨声载道。二十九日，刘峙从徐州刚到蚌埠，刘汝明就告状说，李延年兵团的第九十九军推进缓慢，导致他的第五十五军目前过于前突。刘峙给第九十九军军长胡长清打电话，要求他快速前进，胡长清竟然一言不发把电话挂断了。刘峙苦笑地对刘汝明说："他把电话撂了。"刘汝明惊讶地发现刘峙连自己的嫡系部队都指挥不了了。

黄维自知突围无望，决定固守待援。

第十二兵团的防御部署是：第十八军守双堆集，担任纵深防御；第八十五军向西南防御；第十四军向东及东北防御；第十军向南及东南防御。兵团部位于双堆集以北的小马庄。同时，在双堆集与金庄之间修筑临时机场，以求空中补给。黄维还下令把所有的汽车装满泥土，与坦克一起排成一字长蛇，构成城墙样的防御工事。

包围黄维兵团的中原野战军也改变战术，采取“地堡对地堡，战壕对战壕”的办法，稳扎稳打，逐步攻击，以大规模的迫近作业，把交通壕一直挖到敌人的防御前沿，攻占一村巩固一村。

黄维开始布置一种被他称为“蹂躏战术”的局部作战：

在开始的几天中，每天都抽调一至三个有力团配以战车和炮兵的火力，向解放军的阵地据点突击，第八十五军的部队也一再向双堆集以东解放军所占领的村庄突击，有的被攻占了，有的并未攻下。当时的企图是以攻为守，想扩大所占地区和阵地据点，借以振作士气和俘虏解放军人员以取得情报，并抢掠一些可以吃的东西，企图用这种不断对有限目标的小规模突击的蹂躏办法，给解放军造成伤害。但是，军、师长们宁愿把兵力麇集于狭小地区之内，不敢疏散兵力，扩大阵地。因此，对于一些村庄，有的攻下后又把部队撤回，有的白天攻下，晚上又被解放军反攻夺走，以致形成拉锯战。

毫无疑问，黄维的“蹂躏战术”给双方士兵带来了肉体和精神的残酷蹂躏。双堆集周边的战场是没有任何隐蔽物的平原，村庄稀落，树木很少，双方士兵只要一接战便立即处在近距离的射杀中。阵亡士兵的尸体混杂在一起，等到天黑下来的时候，双方都派出人员寻找和运回，开始还在相遇的时候再次爆发战斗，后来便各自行事了。第二天，新一轮的厮杀在这片血迹未干的土地上重新开始。

蹂躏战术的结果是，黄维兵团的作战地域不但没有扩大，反而被逐渐压缩在以双堆集为中心的狭窄地区内。整个兵团的十二万人马中，已有三万人被歼或起义，只有第十八军的十一师和第十军的十八师还是完整的部队，其余部队均残缺不全，黄维能够掌握的机动突击兵力仅剩七到八个团。

第十四军八十五师二五五团那个爱写日记的政工室主任洪雨卿记述道：

二十八日：我们好容易挨到天亮，我带着被冲散收容起的官兵找着了部队，田野和沟渠中打死的、烧死的官兵遍地都是。我们就地加强工事，同敌人只相距一亩地而对峙着。昨天早晨吃了点红薯和菜豆等，到今晨才到村子里找了两个烂的生红薯吃。田地里、房子里、坪

里到处都睡的是人，团部各室的官兵都挤在团长住的一间小屋里，我和连长睡在地上，草都没有一根，夜里脚冻得发痛时，常起来走来走去。

二十九日：我们被围困在这里已经四天了，打得弹尽粮绝，人马吃的东西都发生了恐慌，官兵们都说："我们的生命是过一刻算一刻，过一时算一时。"两天来都吃的红薯和红萝卜，死了的骡马都剥皮吃了。再围两天，我们连红薯根也没的吃了。勤务兵花国负伤哭回来了，我将他送到伤兵住的地方去，几百伤兵都睡在那里呻吟啼哭，没人理会他们。我团的伤兵围着我说："我们两天都没有东西吃，长官替我们想办法呀！"然而各人都是难保自身，我又有什么办法想呢?

三十日：被包围在这田地里要吃没吃要住没住的，一切都感到不安。十二时我到伤兵处，伤兵哭的哭，叫的叫，满地睡着都是人，有的伤兵一天只吃一碗黄豆和一碗稀饭，有些伤兵竟没有吃什么。傍晚时，忽然飞来一颗炮弹，将墙炸倒半边，砖头泥土飞了我满头满脸，当时我的脑筋被炸晕了，我旁边的一个卫兵被炸死了，杨副官受了伤。我想在前几天在大白庄没有死，那是第二世为人，今天这是第三世为人。

身经百战的刘伯承，将眼前的战局视为一个胃口很好的人上了宴席，于是嘴里吃着一块，筷子里夹着一块，眼睛又盯着碗里的一块。他说："我们现在的打法，就是吃一个（黄维兵团），挟一个（杜聿明集团），看一个（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从淮海战役总前委指挥部所在的小李家村延伸出来的电话线，连接着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各纵队，中原野战军各纵队之间也互相接通了电话，这些电话线把双堆集如同蜘蛛网包裹猎物一样包裹起来，其周长已经达到七十公里——深陷重围的黄维兵团覆灭，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 惊人的态势

十二月一日，双堆集上空嗡嗡响了一阵，一架小型飞机降落了，从飞机上下来的是那个借口牙疼一直待在上海的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官胡琏。

胡琏的突然出现让黄维有些感动，毕竟谁都知道这个时候深入战场的危险，可是，胡琏带来的消息却将黄维推入无法排解的痛苦和困惑之中——蒋介石下达了新的命令：徐州主力绕开黄维兵团全面撤

退，黄维兵团须在双堆集牵制共军主力，掩护杜聿明集团的左侧背，以便该部迅速向蚌埠集中。

黄维顿时不知所措。

原来的计划不是从白崇禧那里调几个军增援徐蚌战场吗？不是南北大军对进夹击，解救第十二兵团于重围，同时打通津浦路以退守淮河吗？不是需要扩大所占范围，击溃当面共军，以求突围而出与刘汝明、李延年两兵团会合吗？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原来的计划全然不算数了，现在的决定意味着以牺牲第十二兵团为代价，换取杜聿明集团的安全撤退。说得更明白点，就是南京国防部决定舍弃自己和十多万官兵的身家性命。黄维怎么都不相信这是真的，而胡琏告诉他这是老头子亲自拍的板。

徐蚌战场的态势并没有按照蒋介石的预想演变：从白崇禧那里调几个军增援遭到阻碍，从徐州南下的孙元良兵团遇到阻击不得前进，从蚌埠北上的李延年兵团攻击未成已开始后退，孤零零地身陷双堆集的黄维兵团被包围得越来越紧。

十一月二十八日，蒋介石再次电召杜聿明到南京开会。

杜聿明到达南京后，先与顾祝同在蒋介石官邸内的小客厅单独谈了一阵子。杜聿明问："原来决定再增加几个军，为什么连一个军也没有增加？弄到现在，形成骑虎难下的局势。"顾祝同说："你不了解，到处牵制，调不动呀！"杜聿明有些恼火："既然知道不能抽调兵力决战，原来就不该决定打！令黄维兵团陷入重围，无法挽救！目前挽救黄维的唯一办法，就是集中一切可集中的兵力与共军决战，否则黄维完了，徐州不保，南京也就危险了！"顾祝同情绪低落："老头子也有困难，一切办法都想了，连一个军也调不动。现在决定放弃徐州，出来再打，你看能不能安全撤出？"杜聿明马上明白蒋介石又变了。这一

变，结局必然是黄维完了，徐州也完了。在无法增加兵力的情况下，打下去已经不可能，守徐州也没有把握，那么要变就彻底变！杜聿明对顾祝同说："既然这样困难，从徐州撤出来问题不大。可是，要放弃徐州，就不能恋战；要恋战，就不能放弃徐州。如果'放弃徐州，出来再打'，就等于把徐州的三个兵团也送掉了。现在只有让黄维守着，牵制住共军，将徐州的部队撤出，经永城到蒙城、涡阳、阜阳间地区，以淮河为依托，再向共军攻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顾祝同明白，现在以什么方式"解黄维兵团之围"都没有用了，徐州主力能够安全撤出就算万幸，哪里还有再打回去的道理?

这时候，何应钦来了，进来就问："怎么样？就不能打了么？"杜聿明把上述意见又向何应钦重复了一遍，何应钦沮丧地说："也只好这样了。"杜聿明请求何应钦和顾祝同不要把这个方案拿到会上讨论，顾祝同明白个中含义："会后我同老头子说，你同他单独谈。"——一九四八年春，顾祝同上任参谋总长时，杜聿明曾告诉他，郭汝瑰与解放军有联系，决不能让他当作战厅长。当时顾祝同说："你不要疑神疑鬼，郭汝瑰非常忠实，业务办得很好。"可是，随着国民党军作战计划的不断落空，在军事形势危在旦夕之时，顾祝同面对杜聿明的提醒不得不格外小心。

蒋介石披着黑色斗篷来了，他向大家点点头说："好好，就开会。"

在杜聿明的记忆里，这次会议开得乱糟糟的：

照例由第三厅厅长郭汝瑰在敌我态势图前报告作战计划。他说："目前共军南北两面皆为兼顾纵深工事，我徐蚌各兵团攻击进展迟缓，如继续攻击，旷日持久，徒增伤亡，不可能达到与黄维兵团会师之目的。建议徐州主力经双沟、五河与李延年兵团会师后西进，以解黄维兵团之围。"他还滔滔不绝地讲了这一案的理由。我有点忍不住，就大声问郭汝瑰："在这样河流错综的湖沼地带，大兵团如何运动，你考虑没有？"一时会场乱糟糟地大吵大笑。有人问我："左翼打不得，右翼出来包围攻击如何？"我说："也要看情况。"刘斐在旁边给我打气，

连说：“打得！打得！”又有人问我：“你的意见如何打？”我笑而未答。经过一阵乱吵乱嚷，才沉静下来。顾祝同对蒋介石说：“要光亭（杜聿明）到小会议室谈谈。”

杜聿明和蒋介石进了小会议室。

任凭别人怎样嚷嚷，留在会议室里的何应钦和顾祝同一声不吭。

无法得知杜聿明在小会议室里与蒋介石说了些什么。

蒋介石从小会议室出来之后，首先问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今天午后要黄维突围的信送去没有？”王叔铭回答说还没有，蒋介石说：“不要送了。”然后，他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谁也没有再说话，于是散会。

至少在此时，蒋介石接受了杜聿明从徐州全面撤退的建议。

至于黄维兵团，实在是万不得已，只有当作一个牵制解放军并准备最终舍弃的棋子了。

杜聿明返回徐州，开始布置撤退。

可以肯定地说，作出这样的决定，是蒋介石的无奈之举。除了战场上部队攻击不力等因素外，最大的无奈，是作为三军统帅的他竟然已经无法有效地调动军队了。

与蒋介石作对的，是他的政治宿敌白崇禧。

此时，在平津地区，傅作义指挥的约五十万兵力实际上已经处在被包围的状态；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内，没有一个完整而有战斗力的军；剩下的只有白崇禧的张淦兵团和胡宗南、宋希濂指挥的几个军了。蒋介石曾计划空运胡宗南的第一军到徐州，但是胡宗南的部队被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苦苦纠缠着，而且空军也表示没有这么大的运

力，同时胡宗南本人坚决反对将自己的主力调走，于是这个计划作罢。尽管当初调黄维兵团进入徐蚌战场时遭到白崇禧的极力阻挠，但是蒋介石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再次试图从华中“剿总”所属的部队中抽调两个军增援徐蚌战场，他选中的是驻守在湖北荆门的宋希濂的第十四兵团。

蒋介石连续发出几封加急电报，命令第十四兵团下辖的第二十、第二十八军立即开赴武汉集结，并要求宋希濂迅速赶到南京当面接受任务。消息传来，第二十军全军躁动。第二十军原属川军序列，军官和士兵绝大部分是四川人，当初跟随宋希濂调往鄂西时，全军官兵都很高兴，因为距离四川很近了，现在让他们开赴距离四川越来越远的徐蚌地区，无疑是个晴天霹雳。而更重要的是宋希濂本人颇为迟疑。之前，一个在徐蚌战场上待了半年的记者告诉过他：“前途很不乐观。军事上国军完全处于被动，对于共军行动几乎是个瞎子，而共军对于国军则了如指掌。尤其糟糕的是，政治上的腐败无能和军队纪律太坏，弄得老百姓怨声载道。”宋希濂思虑再三，觉得“与其贻误于将来，不如慎之于事先”，于是以“对徐州方面情形不熟悉”为由，去电蒋介石请求他收回成命。蒋介石马上回电宋希濂：“今后战争重点在徐蚌。徐蚌为首都门户，党国安危所系，希吾弟毅然负此艰巨，迅即赴徐与刘总司令及各将领妥善部署，勿再延迟为要。”宋希濂只好从荆门乘汽车到沙市，然后再乘船到达武汉，当面向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请示。

白崇禧将宋希濂带进他的办公室。他告诉宋希濂，东北地区林彪的部队很快就要入关，徐州方面局势已难以收拾。然后，他很私密地提示宋希濂：到南京后可极力请求免调，实在不行就千方百计地拖延。白崇禧表面的理由是：自黄维兵团被调走之后，武汉地区只剩下一个张淦兵团以及鲁道源、张轸、陈明仁的几个军了。这些部队中，除张淦兵团的第七、第四十八军还有战斗力外，其余部队大多是临时

编成的，尚不具备作战能力。如果宋希濂的部队再被调走，武汉地区就会“显得更加空虚”。而且，徐蚌战场上刘伯承、陈毅的部队加上地方武装兵力可至百万，即使宋希濂的部队加入进去也不可能解徐州之围，更何况时间已经来不及了。而宋希濂体会到白崇禧的真实意图的是如下一番情景：

> 白站起来，走到墙上挂的一幅大地图面前，以很兴奋而又带有几分自信的语气说：“我们如保有武汉，必要时可同共军进行和谈，即万一武汉保不住，亦可退据湖南、广西、云贵及四川一带，保有西南半壁，以和共军抗衡。只要能拖延一个时期，国际局势一定会起变化，我们将来可得到大量的援助，主要是美国的援助，则事情还大有可为。”

白崇禧确实有了蒋介石一旦崩溃、由桂系出面维持局面的野心。华东野战军吃掉黄百韬兵团后，他对他的作战处长覃戈鸣说：“他们（蒋介石）快完了，我们（桂系）不能为他陪葬。要一百八十度地向左转，李任潮（李济琛）或许可以作桥梁，可以试一试。”——白崇禧的所谓“试一试”，是指在蒋介石掌握的国民党军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血拼之时，桂系趁机保存和扩大实力，采用备战与和谈两种手段与共产党方面周旋，以期保有桂系主宰的半壁江山。白崇禧认为，经过两年多的战争，利用共产党的力量削弱蒋介石权势与实力的目的已基本达到，目前除了以第一军为骨干的胡宗南集团、以第五军为骨干的邱清泉兵团和以第十八军为骨干的黄维兵团之外，蒋介石手上已经没有多少可以机动作战的嫡系部队了，桂系获得话语权的时候已经到了。此刻的白崇禧似乎有些忘乎所以，以致他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即忽视了宋希濂这个黄埔出身的将领与桂系没有任何历史渊源和利益关系——“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希望蒋介石仅存的主力部队在徐蚌地区被消灭。到那时，蒋介石非滚蛋不可。蒋走后由李宗仁取而代之，这正是四月间副总统竞选时，桂系使用了种种手段和大量金钱要李宗仁当选的目的。我心想，那时成了你桂系的天下，哪里还有我宋希濂的地位呢？”

宋希濂到达南京后，立刻将白崇禧的话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全神贯注地听宋希濂汇报，“对于每一段话，每一细节，以及白崇禧当时的表情，都问得很详细”。宋希濂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即蒋介石握住了他的手——“这是生平以来第一次，蒋介石对我们这样的部属和学生是从来不握手的”。接着，蒋介石对宋希濂吐露了肺腑之言：“这次叫你们来，主要就是要把你们兵团的全部力量东调增援徐蚌地区的作战，来挽救目前所处的不利形势。自黄埔建军二十多年以来，我们革命事业的危机，从未有过如今天这样的严重。现在徐蚌地区所进行的决战，关系党国的存亡。希望你的部队尽速东开，加入战场后，先以全力解黄维兵团之围，然后再会同徐州的部队，击破共军，稳定战局，巩固首都和长江以南地区，这是非常重要的。”宋希濂提到部队的调运及补给，蒋介石说顾总长会专门开会商定。临别，蒋介石又嘱咐宋希濂：“最要紧的就是越快越好。”

蒋介石为调动白崇禧辖区内的部队费尽周折。白崇禧极力利用四川籍官兵的思乡情绪煽动第二十军抗命，同时他告诉华中“剿总”运输司令部，没有他的命令决不允许将该军装船调运。尽管蒋介石一再发电催促，白崇禧就是不予理睬。顾祝同派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许朗轩飞至武汉，面见白崇禧恳谈后还是无效。许副厅长动用了自己的老师、白崇禧的参谋长徐祖贻的面子，第二十军才勉强开始移动。而当第二十八军调动时，白崇禧同样坚决不同意，迫使顾祝同亲自出面周旋，白崇禧的态度依旧模棱两可。蒋介石无奈，下令调第十三绥靖区的第二军，白崇禧的反对态度更加强硬。那时，第二军九师已经在汉口集结完毕，白崇禧派出警卫部队把运载该军的轮船看守起来，任何物资都不许装运上船。最后，蒋介石亲自打电话给白崇禧，两人的口气越来越强硬，最后竟然吵了起来——“蒋骂白不服从命令，白说‘合理的命令我服从，不合理的命令我不能接受’，双方交锋了几十个回合，一次电话讲了半个多钟头，毫无结果。蒋介石气得满脸通红，将电话机使劲往桌子上一摔，用他的宁波土话骂了声‘娘希匹’。白崇禧

命令集结在沙市的第二军军部不许开赴武汉，同时命令汉口的九师开回沙市去。这样一来，其他部队自然更不能调了。”

最终，蒋介石从白崇禧手中调出投入淮海战场的部队，除了目前已经被包围的黄维兵团之外，只有第二十军缓慢移动到了淮海战场的南端，对于缓解徐蚌地区国民党军的危机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而被蒋介石耳提面命增援淮海战场的宋希濂，在白崇禧的严令下又回到了他在湖北荆门的原驻地。

从纯粹的军事角度看，白崇禧强调长江防线的安全，缺少常识上的依据。淮海地区已呈两军绞杀的状态，双方投入的兵力已近决战规模，而决战意味着孤注一掷的最后一搏。因此，白崇禧未必不清楚这个浅显的道理：对于长江防线的最佳防守，只能是在淮海地区与对手尽一切力量决一死战，最大程度地杀伤交战对手的有生力量，而不是坐等江北完全失利后再死守一条大河。尽管这条大河是长江，但江北陷落，主力尽失，所谓的长江防线必然形同虚设。这个浅显的道理被后来的历史所证实。在这种情况下，白崇禧只强调自己防区的守备，置淮海战场上的国民党军主力于不顾，如果不是桂系集团盼望着蒋介石垮台，还能又有什么更合理的解释呢？事后曾有人问过白崇禧，为什么拒绝去华东任职，拒绝向淮海增兵，如果他能够去华东指挥，并能迅速调主力进入战场，徐蚌会战的结局或许不会这样糟糕。白崇禧的回答十分坦率：“不糟又怎样？打胜了还不是老蒋的天下！老蒋的成功！北伐时我打的胜仗还少吗？结果怎样呢？现在叫他也尝尝失败的滋味。”——就执政的国民政府而言，副总统代表的派系处心积虑地盼望着总统指挥的作战失败得越彻底越好，在如此荒谬的现实中，国民政府所谓的“戡乱战争”还怎么能打下去呢？

十二月一日，黄维兵团被围困生死难料，徐蚌战场没有得到任何增援部队，侧翼无从部署兵力进行有效保障，徐州国民党军主力的撤

退就在这种情况下仓皇开始了。

两天以前，中央军委致电华东野战军，对徐州之敌可能要向两淮或武汉逃跑作出预测，后来又估计敌人也有可能从连云港逃跑。华东野战军接到电报后立即开会研究，有人提出把主力放在徐州以东及两淮，以防意外；也有人主张围死徐州，不让杜聿明的主力出来。粟裕认为，徐州之敌必会逃跑，但经过连云港逃跑，由于受到船只和背海作战的限制，可能性不大；经过两淮逃跑，受河川纵横不利于大兵团运动的限制，可能性也不大；只有沿着津浦路西侧南下这一条路，因为那里地势开阔，道路平坦，可以与位于蚌埠附近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呼应，还可以有机会解救黄维兵团。因此，华东野战军主力应呈弧形部署在徐州以南津浦路两侧地带，不把徐州围死，诱使杜聿明离开坚固工事环绕的徐州城，将其包围在野外加以歼灭。

杜聿明制定的大撤退路线，正是粟裕预测中的这条路。

为避免引起混乱，徐州主力撤退计划是在绝对机密的情况下制定的：十一月三十日晚，以全面进攻迷惑共军，第十三兵团派遣一个师先行占领徐州以西与安徽交界处的萧县，第二兵团担任后卫掩护，第十六、第十三兵团主力以及兵团直属部队、徐州警卫司令部指挥的地方军警部队，一律在黄昏时出发。撤退的路线是：第一步到达安徽与河南交界处的永城附近，第二步到达津浦路以西、蚌埠与宿县之间的蒙城、涡阳、阜阳地区。撤退需“以滚筒战术逐次掩护进行”。所谓“滚筒战术”，即各兵团形成圆筒式态势，以应对解放军四面八方的包围。各部队须携带七日给养、五百公里油料和弹药，到达阜阳以前中途不补给。

但是，让杜聿明最终绝望的是，尽管一再强调保密，但是所有的部队和整个徐州城还是事先知道了撤退的消息，城市瞬间陷入巨大的混乱之中。首先是各部队官兵抢购绳索扁担，征用车辆。接着，国防

部保密局派来从事破坏的人不知为什么提前行动了，爆炸重要设施和物资的声音惊动了所有的市民。徐州警备司令亲自率人到各公私银行查封现金，到了银行才发现早已人走楼空——巨富者的撤退居然能够早于军队，这让杜聿明十分吃惊：“老头子钱就是命，连泄露军情都不顾，叫我怎能打胜仗！”接着，一些军官化装成伤员擅自潜逃和用重金贿赂飞行员乘机逃走的事情接连发生。徐州市面已经大乱，“在撤离前三天，几十万人麇集在市内，有顶房卖屋的，有卖家具衣物的，有在街头抢劫的，有在戏院放手榴弹捣乱的，徐州市府有烧公文的。二十九日，天尚未黑，商店已关门大吉。三十日，散兵游勇、流氓地痞、土豪恶霸在街上横行，将领官吏各色人等拥拥挤挤，汽车轧死市民已无人过问。这一天，徐州‘剿总’开始烧毁公文与地图，整日车辆滚滚，人心惶惶，大有大难临头之势”。

三十日晚，徐州国民党军各部队只接到了一个立即出发“经萧县永城撤退到滁县”的简单通知。没有撤退路线、行军序列和撤退区域的划分，大部分官兵并不知道滁县在什么地方。由于时间仓促，人心惶惶，导致整个撤退混乱不堪。徐州“剿总”军官教导队出发时，已经没有人指挥，十三个大队只集合起五个就开拔了。第七十七军军长王长海对集合起来的工兵营、通讯营、特务营说：“赶紧走！赶紧走！”之后自己跳上汽车就没影了。大量的伤员拦住卡车要求上去，但是没有人理睬他们。补给司令部储存的大批武器也没能运走，仓库里的粮食还有很多，于是命令一律焚毁。徐州城顿时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国民党军官兵们为了轻装，把大量的枪支弹药和军装被服遗弃在街道上，被遗弃的还有两辆坦克，其中的一辆竟然没有熄火，突突地轰鸣了一整夜，直至油料耗尽。

本来是危急之时的军事行动，结果却犹如整个城市在搬家。跟随国民党军一起撤退的，还有徐州国民党党部机关人员以及被裹挟的大批青年学生和市民，总数达到三十多万人。这些由各色人等组成的人

流，附着在撤退军队的后面，不但致使道路严重堵塞，而且这个巨大累赘令军队的撤退速度严重下降。

杜聿明的恼怒无法遏制，他已经意识到，徐州主力的撤离行动从一开始就变成了仓皇逃跑：“执行撤离徐州计划，怕泄露企图无法撤出，在南京会议上对作战厅长郭汝瑰都未作说明。可是我离开南京当日，即有人通知国民党在徐州的政治、经济、党务各部门要尽先撤退。于是徐州机场一时拥挤不堪，连刘峙本人也未能先走，一直等到二十九日早晨才起飞……第十三兵团先遣萧县之一师行动迟缓，尚未确实占领萧县……第十六兵团三十日也未照命令对解放军佯攻，反而退守孤山集、笔架山、白虎山之线，当晚解放军攻占孤山集……三十日晚，因各部队拆撤电线，误将对指挥部联络电线拆乱，对各兵团电话均不通，一直到十二月一日早晨指挥部撤走时亦未通话……由于第十六兵团误将掩护部队撤退日期提前一日，在三十晚即撤退，这时解放军已追至萧县附近，所有后尾人员全部被俘，一日晚徐州解放。”

在杜聿明从徐州撤退的当日，华东野战军发布《全歼当面敌人争取战役全胜的政治动员令》，指出敌人放弃徐州的意图已明，要进行带有决战性质的作战：

……我华野全军的任务：第一步，是在黄维兵团未被歼灭前，坚决阻击由徐南援之敌，及可能由蚌再行北援之敌，保证中原兄弟兵团侧翼安全；第二步，当徐州之敌倾巢南犯，或向西南犯窜，或图由两淮逃走，则应不顾一切，不惜任何伤亡代价，坚决的干脆的予以全部歼灭，不让敌人逃到江南……这次淮海战役是一个带有决战性质的战役。如果我们全歼黄维兵团取得第二个大胜利，对于江北战局将是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而全歼邱、李、孙兵团的决战胜利，对于全国战局将是有决定性意义。中央早已指出，这样就等于基本上解决了蒋介石的主力，中国问题在军事上也获得了基本解决。这一个决战，将是我军在江北最关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一仗，也是我军在江北最大和最后的一仗……

为此，华东野战军提出的口号是：

“配合兄弟兵团，争取全歼黄维兵团的大胜利。”

“全歼邱、李、孙兵团，争取淮海战役的全胜。”

“勇猛、坚决、干脆、彻底的全歼敌人，不让敌人逃到江南去。”

“整理组织，充实战力，大胆提拔基层干部，准备一战再战。”

“在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决战中，为人民立大功。”

十二月一日拂晓，华东野战军前沿部队和抵近徐州的侦察部队纷纷报告：杜聿明主力已经撤退。粟裕、陈士榘、张震立即命令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纵队和鲁中南、两广等十一个纵队以及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第三旅采取多路多梯队平行追击、围追和超越拦截的战法猛追猛打。华东野战军各纵队在“路标就是路线，枪声就是目标，追上就是胜利”的口号下，开始了淮海战役中最大规模的追击和堵截作战。

冀鲁豫军区部队位于徐州至萧县公路东侧，他们最早发现了杜聿明集团的撤退。一日凌晨，军区司令员赵健民带着几个参谋赶到阵地前沿，看见了令他们惊讶不已的情景：望不到头的车队拥挤在公路上，车与黑压压的步兵混杂在一起向前滚动。赵司令员立即向野战军副参谋长张震报告，张震让他们不要马上阻拦敌人，等杜聿明的主力彻底脱离徐州后，再实施攻击。二日凌晨，张震打电话告诉赵健民，说徐州已被渤海纵队占领，现在可以实施攻击了。冀鲁豫军区部队立即扑上去，截住了徐州“剿总”联勤总部的车队，五十多辆十轮大卡车以及车上的辎重完整无损地被缴获。

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旅奉命向前追，况玉纯旅长突然发现前面一片灯火，官兵们都以为是支前民工大队上来了，况旅长却在嗡嗡的马达声中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他登上一个小高地，这才看清公路上灯火杂乱，汽车灯、手提的马灯、手电筒和火把照亮夜空。况旅长立即命

令部队停止前进，各团指挥员跑步到旅部开会。这时，侦察排带回来一个俘虏，审问后弄清楚了：当面的敌人是邱清泉的第五军，这个军的四十六师已经过去，四十五师和二〇〇师跟在四十六师的后面，军榴弹炮营和兵团部两侧有两个团掩护，后面就是杜聿明的大部队了。况旅长顿时紧张起来。第五军是支老牌部队，打起仗来骄横无比。眼下，独立第一旅只有两个多团的兵力，旅政委率领的直属队还未赶到，参谋长带人组织后勤运输去了——"我觉得我们这支部队好像海上参加捕鲸的一只小木船，突然发现大鲸鱼要从这一角突围，而我们的捕鲸船和巡洋舰都不在这里，我们这只小木船如何下手？"团长和政委们都来了，大家吵成一团，有的主张等主力来了再打，因为敌我力量悬殊太大，打起来后果不好；有的主张立即扑上去，把敌人打乱了再说。吵了一阵之后，意见很快得到统一：决不能让杜聿明从自己的眼皮底下走过去，虽然可能打不赢他们，但可以扭住他们不放，就是把独立第一旅打光，也要把敌人拖住等待主力到达！

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旅是一支地方部队，是由县大队和区游击队组成的队伍，官兵绝大多数是冀鲁豫平原上土生土长的翻身农民，他们手里拿的是简陋的武器和自己制造的手榴弹和大刀。但是，此时置身战场的每一名干部和战士，都被刚刚传达的"政治动员令"鼓舞着：这是长江以北最后的决死一战，打胜了，全国的胜利便可以预期；打败了，胜利的日子不知会延迟到哪一天。为了胜利的到来，如果这个时候胆怯了，如何对得起父老乡亲，如何称得上是毛泽东的战士?

凌晨二时，两发红色信号弹升空。

独立第一旅两个团的官兵呐喊着向当面强大的、几十倍于己的敌人扑了上去。一团扑上公路，公路上的车队顿时熄灭了灯光，然后手电筒和火把也熄灭了，片刻混乱之后，机枪咯咯地响了起来，步枪也响成一片。一团的官兵没有恋战，扑向前面一个叫青龙集的要点，迎

头占领了阻击阵地。三团也向另外一个方向扑上去，抢占了一个叫襄山庙的要点。两个团南北呼应，瞬间就把公路横切出一个六公里宽的裂口。第五军很快就发现撤退的道路已被割断，仅仅沉寂了片刻，大量的照明弹升起来，汽车灯也随之打开，坦克和装甲车轰鸣着组成战斗队形，开始向青龙集和襄山庙发动猛烈反扑。

邱清泉不相信解放军的主力会这么快追上他。从徐州撤退的时候，他很得意地耍了个手腕，命令骑兵第一旅旅长张荣率领部队反方向出击，以此迷惑解放军。但是，骑兵旅在徐州以东大约五十里的地方遇到阻击，骑兵们仅仅打了一下便拍马往回跑。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华东野战军上了邱清泉的当，他们根本没有理会这支跑来跑去的骑兵。追赶第五军主力时，骑兵旅的马匹跑得浑身是汗，骑兵们说再照这样跑下去，没等追上主力就要吃马肉了。当这支骑兵追到襄山庙附近时，正碰上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旅三团，骑兵们立即被打散了。

在青龙集和襄山庙两处阻击阵地上，独立第一旅的官兵被邱清泉的第五军团团围住。除了当面的二〇〇师之外，已经走过去的四十五、四十六两师也回头加入了战斗，敌人成团的冲锋一拨接一拨，阵地上的肉搏战反反复复。当阵地再次被突破后，特务连连长把棉衣一扒，端着刺刀向敌人冲上去。官兵们的刺刀捅弯了，就抱住敌人乱咬，用脚踢，用铁铲子砸。肉搏的时候，官兵们大喊：“别当美国人的走狗了！”“给蒋介石卖命犯不着！”但是，第五军是支能打硬仗的部队，阵地上到处是厮打咒骂声。最后时刻，独立第一旅预备队三营的官兵耐不住性子要求出击，况旅长问他们准备往哪个方向出击，他们说要往邱清泉的兵团部里冲，这个回答令况旅长心头一震，说：“把爆破组全带上！”

在搏杀的最后关头，国民党军冲击阵形中落下来几发重磅炮弹，独立第一旅的官兵们喊起来：“主力来啦！”最先赶到的是华东野战军

第三纵队，接着是第一纵和两广纵队。一纵司令员叶飞见到独立第一旅幸存下来的官兵时，拿出缴获的美国香烟招待大家："敌人瞧不起你们这地方部队，可你们不到一个旅就把一个兵团扭得团团转！"

自三日晚开始，华东野战军不顾敌人的总兵力大于自己，不顾体力严重透支和后勤供应无法跟上，全军上下如同在一场大歼灭战之后追击残敌一样狂追不舍。"全国的胜利就要来了！蒋介石就要完蛋了！"在不分昼夜的奔跑中，灿烂无比的胜利曙光始终在官兵们的前方闪烁。各纵队的建制很快就乱了，各部队都在各自为战，追上杜聿明尾巴的，咬住不放，死缠乱打；插入敌人序列中的，四处开花，乱搅乱闹；有的部队甚至跑到了杜聿明大部队的前面，迎头阻击，拼死不让。十二纵司令员谢振华在一个高地上看见了令他终生难忘的情景："乌云笼罩着天空，大地灰蒙。杜聿明所属的汽车、辎重、摩托车、坦克、炮队、马车、大车，部队和家眷，散乱无序，人马嘈杂，向西南逃窜。"部队袭击了杜聿明的直属队，顷刻俘虏数百人，夺下重炮六门和六十多辆重型卡车及一辆吉普车，当听说这辆吉普车是刘峙的专用车时，官兵们几乎把吉普车翻了过来希望把刘峙捉住。

四纵追上了李弥兵团的第八军，第八军是杜聿明指定的掩护部队，但他们根本没有执行掩护任务，并且跑得飞快。由于公路堵塞，他们干脆下了公路在野地里行军。四纵在追击中以昼夜六十多公里的速度奔跑，不少官兵因为饥饿和困倦摔倒在路边的沟里，最后，他们在萧县以西的郝汉楼一带接敌，实施攻击后得知敌人是第八军的四十二师。四纵十师三十团不顾一切发起进攻，俘获四十二师副师长以下两千有余。在一个叫阎间的村庄里，四纵和反击的第八军展开剧烈的争夺战，前沿被国民党军突破后，整个村庄被燃烧弹烧成一片火海，二营教导员号召全营官兵拼到最后一个人。官兵们人人身上的棉衣都着了火，他们在地上打几个滚后，浑身冒着烟就拼起了刺刀。正打得激烈的时候，有部队来增援，相互并不认识，一问是两广纵队的一个

侦察连，这个连奔跑到这里，见有战斗就主动参加。第八军的反击被打退后，丢在阵地前的尸体足有四百多具。国民党军第七十七军军部和特务营与四纵七十六团二营并行赶路，天黑，双方谁都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对劲，幸亏营部通信员觉得他身边走着的人自己根本不认识，于是二营开火了，第七十七军军部一下子乱了，二营乘势抓了三百多人。正打得热闹，一个军官骑马跑来训斥道："你们是哪一部分的？都是自己人，不赶紧走在这里吵嚷什么？"营部通信班长詹美玉上前抓住军官的腿将其拉下马，军官大喊："我是副军长许长林！"——当许副军长发现自己当了俘虏之后，立刻表示要见陈毅，声称陈毅是他的同学，詹美玉说："我们司令员很忙！我也很忙！"

聂凤智指挥的九纵在追击中不断受到敌机轰炸，官兵们恨得咬牙切齿。部队两天两夜始终在奔跑，跑着跑着，与撤退的国民党军混在一起了。其中一个团竟然在国民党军的序列中又走了大半夜，敌我双方都没有察觉，后来侦察营的人发现了这一情况，居然悄悄地把这个团从敌人的序列中又带了出来。二十五师七十四团三营跑进一个村庄准备休息一下，营长披着件缴获的美式陆军短大衣刚躺下，有个士兵跑来要卸他所在的房屋的门板。他问："哪个连的？"士兵回答："我是八连的！"三营长说："把你们连长叫来！"连长被叫来了，却是个头戴大盖帽的国民党军军官。三营长的警卫员一步上去下了这个国民党军连长的枪，门外顿时乱了，国民党军士兵大喊："我们被共军包围了！"三营官兵这才知道和敌人住进了同一个村庄，于是立即打起来。三日拂晓前，二十七师刚把米下锅，就接到了继续追击的命令，他们用锅里没熟的米饭和纵队直属队换了点干粮立即出发，终于在芒砀山与一纵的追击部队会合，彻底封住了杜聿明集团撤退的道路。

在所有的撤退部队中，数李弥的第十三兵团跑得最快。三十日从徐州附近出发时，李弥对第九军三师师长周藩说，徐州这几十万人怎么走得动？让我们在后面掩护，不是叫我们当替死鬼吗？我决定不和

他们走在一起，避开萧永（萧县至永城）公路，直接向薛家湖走，不在他们的后面挨打，从他们的右翼绕过去，看谁跑得快。杜聿明给李弥兵团规定的撤离时间是十二月一日，李弥给部队下达的撤退时间却是十一月三十日，这个所谓的掩护部队瞬间就成了整个徐州国民党军主力逃跑的前锋。为了跑得更快一些，李弥有意切断了与杜聿明的联系，让杜聿明根本找不到他和他的第十三兵团。二日，第十三兵团已经跑到距徐州百里之外，李弥依旧说没有过危险区，要等过了薛家湖才算相对安全。他对参谋们说：不要和他们（指杜聿明和邱清泉）黏在一起，一有情况大家都走不了。如果他们没有冲出去，我们冲出去了，我们就算成功了。黄昏，第十三兵团跑到洪河集，李弥发现前面有灯光，命令部队停止前进。通讯营在路边发现了电线，通讯营长把电话机接在线上，听见杜聿明正在电话里问附近的部队"李弥在哪里"，监听电话的副官脱口说了句"在这里"，于是李弥不得不接听电话了。杜聿明愤怒地质问李弥："为什么不和指挥部联系？为什么不执行'剿总'命令？"李弥说他不知道指挥部在哪里，也没有接到任何命令。实际上，命令就在他的参谋长吴家钰的口袋里。

杜聿明到达一个叫孟集的地方后，与李弥兵团的第九军撞在了一起。第九军应该在后面担任掩护，因此杜聿明又奇怪又生气："你们为什么和指挥部走在一起了？你们的司令到底在哪里？谁叫你们提前撤退的？马上带部队回去占领原来的掩护阵地！"第九军军长黄淑不得不带领部队往回走，没走多远就与追击他的解放军遭遇了。李弥得知后，命令第九军不要理睬杜聿明的命令，边打边往回撤，但是第九军已经被解放军纠缠住，根本无法脱离战场。李弥不禁火冒三丈："他们为了保存自己，把我们连累上了，可以走时不让走，现在想走走不了。我们就失败在这些人手里！"

三日，杜聿明所在的孟集混乱到了极点。

四周都有枪声。在邱清泉的右翼，一个撤退前在徐州刚组建的补充旅莫名其妙地失去了联络，第十六兵团派出一个团去寻找，联络官进了一个村庄后遇到一位军官，那个军官说：“我们就是补充旅，十分欢迎，请贵团进村休息。”联络官信以为真，通知全团进村，刚进去就被缴了械，原来那个军官是一个解放军干部冒充的。而第二兵团的一个后卫营，遇到解放军的一支大部队，营长急中生智冒充共产党军队，竟然也躲过了一劫。李弥兵团第八军的两个团在混乱中自己和自己打起来，双方都出现了严重的伤亡，打到天亮才从服装上辨认出对方。在孟集附近的村庄里，所有的房屋都住满了人，到处是车辆、散兵和从徐州跟随而出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后续到达的部队只能露营。但是，刚住下来，就有报告说解放军打进来了，究竟从哪打进来的，打进来多少部队，谁也说不清，于是整个孟集人心惶惶，草木皆兵。杜聿明的住处有一座碉楼，指挥部第二处处长李剑虹为了安全上去查看，结果吓了一大跳，碉楼里竟然藏着几个带着手榴弹的来路不明的武装人员，审问了半天也没弄清楚他们到底是解放军的便衣还是共产党的民兵，这令杜聿明感到十分恐惧。天黑了，孟集村里突然枪声大作，人呼马叫，满村都是“抓八路”的叫喊声。东面的部队报告说“当面之敌攻击甚烈”，西面的部队报告说“共军已窜到我附近”，混战最后蔓延到杜聿明的住所门口。杜聿明不断地给邱清泉打电话，命令他带部队前来增援，邱清泉派出几辆坦克在孟集周围巡逻穿梭，坦克兵心存恐惧，边巡逻边开炮，流弹落在孟集村里，造成了更大的混乱。天快亮的时候，枪声停止了，打得最积极的是指挥部特务营，特务营长杜宝惠是杜聿明的侄子，他声称“共产党军队到了，不打不行”，但是谁也没有见到解放军的任何影子，只看见几具“似农民非农民的尸体”，而在孟集村外露营的坦克兵和辎重兵倒是被打死不少。杜聿明命令查清责任，最后查明的结果是：几名电话兵在夜里查看线路时，相互之间为了联络，不断地喊“来了！来了！”结果，被担任警戒

的特务营听到了，以为解放军的追击部队来了，于是开了枪，并逐渐演变为一场大混乱。

令杜聿明心烦意乱的，还有邱清泉固执地要求停下来，因为走在后面的第五军四十五师师长郭吉谦报告说，他们已被华东野战军压缩包围，眼看就要被歼灭了。邱清泉立即命令第七十二军派一个师回头增援。第五军军长熊笑三、第七十军军长高吉人、第七十二军军长余锦源极力反对，他们认为四十五师的任务是掩护兵团主力撤退，发生战斗和受到损失很正常，兵团主力应该继续撤退，如果停止行动回去解救四十五师，主力部队岂不成了掩护部队？弄不好就成了黄百韬，会导致全军覆没。邱清泉坚决不同意，他说："牺牲别人可以，郭吉谦是我的战将，在苏北、鲁西、豫东一带屡立战功，如果今天不将他救出重围，将士会寒心，都会骂我没良心，将来谁还会为我作战？"于是，邱清泉兵团停了下来。

正当杜聿明焦头烂额之际，蒋介石的作战命令到了：不准再撤退，立即解救重围中的黄维兵团——在南京当面达成以黄维兵团牵制共军、掩护徐州主力全面撤退的计划时，杜聿明就曾反复强调"要撤就不打，要打就不撤"的原则，何以在自己走到半路的时候又变卦了？如果要和共军打，何不在工事坚固又有给养保障的徐州打，偏偏要等自己走到荒郊野外的时候再打？这不是明明要把自己往共军已经张开的嘴里送吗?

蒋介石的命令是飞机空投下来的一封亲笔信：

> 据空军报告，濉溪口之敌大部向永城流窜，弟部本日仍向永城前进，如此行动，坐视黄兵团消灭，我们将要亡国灭种，望弟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协同由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

杜聿明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不执行这个命令，按照原计划继续向永城方向撤退，等主力撤到淮河附近之后，再发动攻击解救黄维兵团。

但是，片刻之后他又犹豫了："万一沿途被解放军截击，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又不能照预定计划解黄维之围，蒋介石势必迁怒于我，将淮海战役失败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我，受到军法制裁。这样，我战亦死，不战亦死。"杜聿明用电话将蒋介石信中要旨通知各兵团，令部队就地停止，各司令官到指挥部来商讨决策。

于是，从徐州撤出的国民党军，在出发后第三天到达孟集的时候，原地停了下来。这一停顿是致命的——蒋介石再次改变预定计划，最终铸成了杜聿明集团的悲惨命运。

所有的指挥官看了蒋介石的手令，"都十分惊慌，默不发言"。只有邱清泉表现强硬，他认为可以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从位于萧县西南方向的濉溪口打下去。接着他就发了脾气，指责李弥的第十三兵团在萧县掩护不力，导致后续部队的车辆遭受重大损失。李弥派来参加会议的副司令官陈冰不服气，说这是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掩护部队过早撤退造成的。杜聿明追问孙元良的意见，孙元良因为惧怕邱清泉不敢说退，表示他听从命令。于是，邱清泉为杜聿明打气，说他可以担任主攻。杜聿明让大家把信再看一遍，他说："我们敢于负责就走，不敢负责就打，这是军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慎重。"大家再看蒋介石的手令，都认为措辞强硬，只有打了。于是杜聿明制定了攻击部署：第二兵团主攻，第十三、第十六兵团负责侧翼掩护。

会议散了之后，杜聿明复电蒋介石表示执行命令，并请求空投粮食和弹药。

接着，国防部的正式命令到达：

（一）淝河方面李延年兵团正面之共军已大部北窜。据空军侦察，濉溪口、马庄一带西窜之共军不足四万，经我空军轰炸，伤亡甚重。（二）贵部应迅速决心于两三日内解决濉溪口、马庄一带之共军，此为对共军各个击破之唯一良机。如再迟延，则各方面之共军必又麇集于贵部周围，又处于被动矣，此机万不可失。万勿再向永城前进，迂回避战……

后据情报证实，国防部命令里所说的空军的轰炸，炸的根本不是解放军部队，而是当地赶集的老百姓。杜聿明明白了，何应钦、顾祝同等人并没有始终如一地支持自己，而是任由郭汝瑰随便摆布蒋介石却坐视不管——“蒋介石所以变更决心，是被郭汝瑰这个小鬼的意见所左右。”

杜聿明在孟集耽误整整一天，他后来才后悔自己“太懦怯，不果决”。但在当时，他的想法是：“逃也晚了，打也无望。想来想去，觉得江山是蒋介石的，由他去罢。”

蒋介石的回电到达：“无粮弹可投，着迅速督率各兵团向濉溪口攻击前进。”

邱清泉火了：“国防部混蛋！老头子也糊涂！没有粮弹，几十万大军怎能打仗？”

粟裕发觉杜聿明集团有向濉溪口攻击前进以便向黄维兵团靠拢的迹象后，决心集中华东野战军的全部主力围堵杜聿明，乘其立足未稳、阵脚混乱之际，在南面实行坚决阻击，在东、西、北三面实施猛烈突击，“截堵其向西南突窜道路，压迫其向北、向西北，并先集中主力揳入其纵深，割歼其后尾一部，而后再分批逐次各个歼灭之”。在上报中央军委的同时，粟裕、陈士榘、张震即刻命令山东兵团政治委员谭震林、副司令员王建安指挥第一、第四、第九、两广纵队及冀鲁豫军区的两个旅，由北向南猛烈攻击，以求揳入敌之纵深；苏北兵团司令员韦国清、副政治委员吉洛（姬鹏飞）指挥第二、第八、第十一纵队，由西南向东北实施攻击，第十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刘培善指挥第三、第十和鲁中南纵队，由东南向西北攻击，布置纵深阻击阵地，坚决阻敌南窜。

四日凌晨，当邱清泉兵团开始向濉溪口方向实施突击时，杜聿明突然发现就是这一天的原地停止，致使华东野战军不但追上了他，插入了他的左右两翼，而且已经绕到了他的前头——从徐州撤出的国民党军主力已经被四面包围了。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五日，淮海战场上出现了一种令人心惊的态势：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将国民党军的两个重兵集团分别包围在狭窄的地域之内：中原野战军包围的黄维兵团总兵力达十多万人，华东野战军包围的杜聿明集团（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兵团）总兵力达数十万之众。从局部的兵力对比上看，实施包围并且企图将对手全歼的解放军并不占据优势，武器装备和火力强度也与对手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包围既成事实，能否吃掉却令人担心。更令人不安的是，被包围的两个国民党军重兵集团相距很近，随时可能冲破包围合成一股；且在这两个包围圈的边缘，还有国民党军的两个兵团（刘汝明、李延年兵团）随时准备冲进来。一旦敌人三股合流，将成为一个巨大的军事集团，这个集团即使不发动有计划的决战，抱成一团滚动起来也很难分割阻挡。

此时，在淮海战场的北面，林彪率领的百万大军已经越过古老的长城进入华北地区，一场被称之为“平津战役”的规模巨大的作战业已开始。

战争进行到一九四八年底，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军队显现出惊人的意志和勇气，当然，还有前所未有的献身精神和决一死战的英雄气概——对于淮海战场上的共产党官兵来讲，凛冽寒风中的大战已经近在眼前。

## 沉闷的晚宴

内战爆发以来，国民党军第十八军军长胡琏始终作战强硬。他虽然在与黄维竞争第十二兵团司令官时没有取胜，但即使作为第十二兵团的副司令官，他的升迁速度在黄埔第四期中也是出类拔萃的。他之所以得到蒋介石的特殊信任，除了在抗战期间指挥作战有出色表现外，内战爆发后所显示出的坚决与凶猛也表明了他对蒋介石的绝对忠诚。第十二兵团奉命调往淮海战场时，他没有跟随兵团行动，有议论说他是因竞争兵团司令官失败在闹情绪。但是，当第十二兵团深陷重围之际，他竟然回到了部队，在战火纷飞的双堆集来往穿梭，完全可以逃离绝地的他最后时刻留在了黄维身边，并奇迹般地乘坐一辆牛车从重围中脱身而出，这令这位四十一岁的少壮派陆军中将的经历充满传奇色彩。

胡琏是被蒋介石从上海召到南京的，因为蒋介石发现在这样生死攸关的时刻，胡琏仍然没有和他的部队在一起。胡琏赶到南京，以标准的军人姿态站在蒋介石面前。蒋介石问他有什么办法能使第十二兵团的处境转危为安。胡琏当即表示愿意飞赴双堆集，鼓舞士气并协助黄维指挥作战，蒋介石对胡琏的勇敢精神感到十分满意。他给了胡琏八个字："固守下去，苦斗必生。"然后，蒋介石亲自安排了一架小型飞机送胡琏飞往双堆集。天气不好，可胡琏进入战场的心情迫切，他对第三厅厅长郭汝瑰说，明天一早就飞，"我认为做人应当'临难勿苟免'"。胡琏与郭汝瑰私人关系不错，曾多次向郭汝瑰表示他的人生理想就是做曾国藩那样的能够拯救国家危亡的大英雄，但郭汝瑰却不以为然，认为胡琏"其志可悯，不辨是非"。

十二月一日，胡琏在双堆集降落。

得知杜聿明准备从徐州撤退，第十二兵团必须牵制刘邓部主力，掩护杜聿明大部队的侧翼，满腹困惑的黄维不知如何才能在这个没有补给的包围圈中固守下去。双堆集的局势正在迅速恶化，解放军的包

围圈逐渐压缩，自知死期不远的黄维劝胡琏飞回南京去，说他在南京联络和催运空投比在战场上的作用更大。胡琏表现坚定："被共军四面包围，已是家常便饭，我们现在只要打下去，共军还是一下子吞不了我们的。"黄维甚至想到了兵团覆灭之后的事情，认为千兵易得，一将难求，胡琏还年轻，没有必要和自己一起死在战场上，如果能保全性命，还可以为第十二兵团十多万官兵料理善后。在黄维的反复催促下，也为了去南京催促空投事宜，胡琏从双堆集飞走了。

四日，胡琏在南京再次面见蒋介石，说他和黄维打算突击刘伯承的第一、第二纵队防线，然后向西面的蒙城、涡阳方向突围。蒋介石没有同意，命令他们向东南攻击，配合李延年兵团夹击刘邓部。当胡琏报告了双堆集内的危急情境后，蒋介石又改口说，可以依情况自行决定攻击方向，局部歼灭当面共军，以待李延年兵团夹击而来。胡琏没有反驳蒋介石，尽管他知道李延年兵团已被死死阻击在曹老集一线，根本谈不上什么南北夹击。

胡琏决定飞回双堆集。五日天阴下雨，飞机不能起飞。南京的冬季潮湿清冷，街头"百物下跌，一片凄凉情景"。就在胡琏等待天气好转的时候，蒋介石收到黄维的电报："黄维五日以竟日惨战粮弹尽绝，过去几日所投粮不足所需十分之一，弹不足三分之一，官兵日食一餐尚不得饱。须急速空投以维士气。"蒋介石感冒了——"官邸汇报时，他不时地鼻子抽缩，我在他背后就座，疑惑他是伤感在抽泣，及到他反过身来问话，才见他面无伤感的表情。"

六日，胡琏飞回双堆集后对黄维说，老头子同意突围，"不要管杜聿明，也不要指望李延年"了。

黄维陷入更深的困惑之中："我们对蒋的上述指示，感到莫名其妙，以为蒋的方寸已乱，已经没有整个部署，而是零碎应付了。我们

认为如果只是自行突围，将会不可收拾，至少要空军有力掩护，否则宁可坚持下去，打一天算一天，以免杜聿明立即跟着垮台。”

黄维和胡琏都明白，突围无望，坚守也是时日无多，只有“打一天算一天”，因为中原野战军对第十二兵团的蚕食进攻使双堆集的境况每分每秒都在恶化。

黄维兵团被围后，几乎每天都尝试突围，导致残酷的拉锯战在各个方向持续不断。这是国民党军中有较强战斗力的部队，特别是胡琏的第十八军，作战凶悍，意志顽强。但是，黄维不得不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那就是维持大军作战的给养日渐缺乏。在不断紧缩的狭窄的包围圈里，挤满了部队、伤员和阵亡官兵的尸体，平原上没有可供隐蔽的障碍物，伤员只好挖地洞躲藏起来。兵团所控制的村庄越来越少，所有的汽车都装满土当成了野战工事，汽车下壕沟里的官兵忍受着饥饿的煎熬。尽管南京尽力向双堆集空投粮食和弹药，但毕竟数量有限，而且由于飞机不敢低飞，有限的空投准确度很差，相当一部分成了解放军的给养。更让黄维兵团官兵们恐惧的是，每当夜幕降临，解放军官兵就带上工具，隐蔽地向前沿运动，在距离两军战斗线约五六十米的地方，他们排成一条长龙，然后先挖散兵坑，再挖可以站立行走的交通壕。黄维的官兵想尽了办法，使用炮击、出动坦克企图阻止解放军的这种行为，但是解放军土工作业的规模实在是太大了，根本无法全面顾及，只能眼看着包围圈四周的坑道和壕沟越挖越近——中原野战军的这种耐心蚕食犹如猎人在缓慢地收网。

在密如蛛网的战壕里，中原野战军各纵队开展了“吃苦耐劳比赛”。干部们反复强调，既要修好工事，又要减少伤亡。一纵三旅七团三班战士刘青云掩体修得好，机枪被打坏了，自己却没有受伤，于是受到表扬。一纵还把拍下来的战地照片印出来，贴在香烟盒上，香烟是后方军民慰问前沿送来的，吸烟的官兵都知道香烟送上来不容易，

弄不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因此都说“吸一支烟要打倒一个敌人”。就在包围圈里的黄维的官兵忍饥挨饿的时候，在几十万支前民工的帮助下，大量的食物被送上中原野战军的阵地。各部队的炊事员为让官兵吃上热饭热菜想尽了办法，送饭筐的底部铺上麦秸，上面盖上两床棉被，菜都装在小罐子里。官兵们最喜欢吃的是肉包子和肉饼，不断有国民党军的散兵受不住肉包子的诱惑跑过来，把枪扔在一边抓起包子就吃。

争夺村庄的战斗每天都在进行。每丢失一个村庄后，国民党军的溃兵就往双堆集跑，使本来就拥挤不堪的双堆集因此更加混乱。中原野战军不断发动袭击，炮弹和子弹可以直接打到包围圈的核心地带，每一发炮弹落下来都要死一批人。新的攻击开始的时候，突然一声巨响，一种比大炮还要厉害的又圆又大的东西在双堆集上空爆炸，刺眼的火焰冲天而起，鹿砦和工事、泥土和死尸一起飞上天空。“共军使的是什么？”国民党军官兵惊惶地互问。这种被称做“飞雷”的东西，是中原野战军的特殊发明。它是用铁皮卷成一个大弹丸并装上炸药雷管，然后安放在一个设有发射器装置的特质大木筒或是经过改装的汽油桶里，使用时先瞄准目标，再利用筒内发射火药的冲击力将大弹丸射出。这种弹丸重二十多斤，爆炸的杀伤力极大。

让国民党军官兵感到头痛的，还有密密麻麻的标语牌和到处散发的传单。其中有一种传单，是介绍解放军的俘虏政策的，被国民党军官兵称为“八路通行证”，凡是逃过来的国民党军官兵，几乎人人都拿着这种“通行证”。解放军官兵趴在前沿没完没了地喊话、打快板、唱歌：“李延年，刘汝明，蚌埠逃，杜聿明又被饺子包，黄维的粮草吃完了，你们还是缴枪把命保！”“太阳一出白天到，我们又要开饭了。白面花卷红烧肉，请你们过来吃个饱！”一个名叫张明虎的国民党兵跑来了，后面的机枪追着他扫射，解放军官兵一边用机枪掩护他一边喊：“别怕！再跑三十米你就解放啦！”终于跑进战壕的张明虎显然是饿坏

了，他先吃了一张油饼，又吃了四个花卷和两张高粱饼，接着喝了一大罐子热汤，最后才停下来吸上解放军干部递过来的旱烟袋。“你们是好人。”张明虎说。他说他从前在家给东家扛长工，身边的解放军官兵纷纷向他介绍说自己从前是铁匠、木匠或者是佃农——“原来都是一条裤子一根绳。”当天晚上，张明虎就参加解放军对一个村庄发起的进攻。天亮的时候，大家发现张明虎没回来，都以为他光荣了，正难过的时候，张明虎蹦蹦跳跳地回来了，肩上多了挺机枪，兴高采烈的样子。

五日，刘伯承、邓小平下达《对黄维作战总攻击的命令》，命令是以给陈赓、谢富治、陈锡联、王近山、杜义德的电话形式下达：

十一时五分下达命令如下：

一、敌黄维兵团经我半月作战，已损总兵（力）至少三分之一，战斗部队至少损失五分之二，其主力十八军［包括十八师］亦已残破，这是我各部队英勇作战的重大结果。

二、根据总的作战要求及当面实际情况，颁发命令五条如下：

甲、从明鱼日（六日）午后四时半开始全线对敌总攻击，不得以任何理由再事延迟。

乙、陈谢集团（陈赓、谢富治指挥的第四、第九、第十一纵队及豫皖苏独立旅）务歼沈庄、张围子、张庄地区之敌，锡联集团（陈锡联指挥的第一、第三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务歼三官庙、马围子、玉王庙、许庄之敌，王杜集团（王近山、杜义德指挥的第六纵队及华东野战第七纵队和陕南军区十二旅）务歼双堆集以南玉王庙、赵庄及以西南周庄、宋庄之敌，并各控制上述地区，然后总攻双堆集，全歼敌人。

丙、总攻战斗发起后应进行连续攻击，直到达成上述任务为止，不得停止或请求推迟。

丁、各部应不惜以最大牺牲保证完成任务，并须及时自动的协助友邻争取胜利。

戊、对于临阵动摇贻误战机分子，各兵团、各纵队首长有执行严格纪律之权，不得姑息。

（三）本命令用口头直达连队。

命令中所说的“不得以任何理由再事延迟”，指的是各部队反复要求把战壕挖得距离敌人近些再近些，因为平原上作战没有任何隐蔽物可以利用，一旦发起攻击官兵在冲过开阔地时往往伤亡巨大，这一要求因为土工作业的规模太大致使总攻时间一推再推。现在，在双堆集的西北方向，被包围的杜聿明集团已开始突围，企图向黄维兵团靠拢，华东野战军正在苦苦地阻击，尽早歼灭黄维兵团已经刻不容缓。

对双堆集的总攻部署是：陈赓、谢富治指挥东集团，向双堆集以东地区攻击；陈锡联指挥西集团，向双堆集以西攻击；王近山、杜义德指挥南集团，向双堆集以南攻击。

六日十六时三十分，血战开始。

陈赓指挥的东集团自包围黄维的那一刻起，就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因为这里靠近津浦铁路，能够最快地向刘汝明、李延年两兵团靠拢，因此黄维兵团不断地试图从这个方向突围，东集团官兵在顽强的阻击中不断地向前压缩，但战斗中部队出现了很大伤亡。总攻发起前，陈赓跑遍了所有的出击阵地现场检查，还特意与支援他们作战的华东野战军四门榴弹炮的指挥员通了电话，因为炮弹不足，陈赓要求在火力准备时齐射，以造成瞬间火力上的震慑作用。同时，他告诉冲击部队，榴弹炮只能打几发，等炮弹打出去之后，前沿的火力要一起开火，使敌人不知道咱们缺炮弹。最后，他来到四纵重点攻击的李围子村的正面，这里距离前沿只有四十多米，国民党军的炮火十分猛烈。陈赓计算了一下，连同华东野战军支援的火炮，他能够集中起来的重火器仅有榴弹炮六门、野炮四门、山炮十三门、“飞雷”发射器十五个。检查完了，陈赓一转身，看见通讯连的战士正跟着他拉电话线，陈赓说：“不需要拉了，我已经不起作用了，只有观战了！”

李围子村里的国民党军是第十四军十师。之前，四纵曾对李围子村发起过三次攻击都没有成功。总攻开始之后，各种重火器猛烈发

射，李围子村的外围工事大部分被摧毁，四纵官兵乘势发起冲击，二十九团突破西北角的阵地，二十八团三连冲到鹿砦前遭到守军两个连的反击和火焰喷射器的杀伤，连长牺牲，战士王小四浑身是火，他滚向当面的敌人拉响了手榴弹。三次冲击后，三连只剩下了一个班，在指导员的率领下，依旧保持着冲击阵形。二十八团一连从三连的左侧投入战斗，直接攻击守军的核心阵地。三十一团和三十二团二营也相继突破前沿向纵深发展。战斗很快蔓延到李围子村内，近距离的搏杀进入最残酷的阶段。

此时，一个被四纵官兵称为“老班长”的炊事员萧建章倒在了前沿，这让官兵们异常难过。萧建章是一九四二年入伍的老同志，是战士们最信任的老管家，无论多么艰难的时刻，只要看见老萧的身影，战士们心里就踏实许多。平日，战士们有话都愿意对老萧说，特别是老萧给他们包包子的时候，一边包一边与官兵们念叨着，话语温和如同父亲。近几天，战士们眼看着老萧瘦了下去，他说送上前沿的粮食和肉都是用命换来的，自己是个伙夫没资格吃。尽管老萧蒸的肉包子咬一口直流油，挑上阵地时冒出来的香味打老远就会飘过来，但是他挑着担子的身影已经开始摇摇晃晃了。总攻开始前一个小时，老萧把包子蒸好了，他吃了个高粱面窝窝头，挑着担子又上了前沿。走到李围子村口的时候，天上的敌机来了，几梭子就把老萧打倒了，他趴在饭筐上，血流在盖着包子的棉被上。战士们扑上来，不停地喊着“老班长，老班长”，老萧眼睛里的光逐渐地暗淡下去，嘴里不断地嘟囔：“几点啦？几点啦？”战士们哭着说：“老班长，你放心，天黑之前不拿下李围子，你就白心疼我们了！”在黄昏的旷野上，老萧的身体逐渐冷了下去。

对双堆集总攻开始九十分钟后，李围子村被攻占，第十四军十师师部和两个团被全歼，国民党军官兵被四纵猛烈的攻击吓傻了，做了俘虏还到处乱跑乱喊：“打惨了！打惨了！”乱跑乱叫的时候，看见他

们的师长张用斌身负重伤，被解放军官兵抬着出了村。张师长是被从另一个方向攻击的一纵一旅二十八团一连一排机枪班长陈文打倒的。二十八团在突击的时候，突击队员一个跟一个倒下，陈文所在的三班，三名机枪弹药手两个倒下一个掉了队，只剩下陈文一人。他扑进战壕里，三名国民党兵抓住了他，他不顾一切地与敌人扭打在一起，突然一个高个子军官跑来了，边跑边喊："不要乱！不要乱！我是师长！"陈文瞅准空隙一梭子打过去，大个子军官倒下了，那三个国民党兵瞬间傻眼了："师长负伤了！师长负伤了！"

九纵和十一纵打的是张围子，这里的国民党守军十分凶悍，其中的第十军七十五师二二三团被胡琏命名为"青年团"，战斗力很强。张围子是双堆集东侧的重要支撑点，可以得到双堆集内兵团炮兵的火力支援，因此在硬对硬的战斗中，守军大多宁死不退。九纵和十一纵分别从不同方向实施突击。九纵二十六旅七十八团刚从河南赶到淮海战场，思想准备不足，也没有周密组织步炮协同，导致最初的攻击失利。连续两次冲击失利后，二十六旅旅长向守志汲取教训，将交通壕向前延伸了四五米，把平射炮抵近前沿，充实了突击队的力量。冲击再次开始，突击队突破前沿，连续击退守军的三次反击。七十六团三连，全连最后只剩下九班长郝俊和通信员马绍孔等十七名官兵，他们自动编成两个突击班，由指导员周福祺率领，拿下了最后一个地堡。战斗中，七十八团参谋长陈鸿汉、七十六团三营教导员路光华牺牲。十一纵将炮兵阵地前移，迫击炮发射的炸药包由五至六公斤增大到六至八公斤，纵队的半数迫击炮都被调来专门发射炸药包。九十二团发起攻击后，遭到密集的炮火拦截，副团长何炳确和突击营长牺牲，九十一团团长李光前和该团突击营长也相继负伤。八日凌晨，张围子被攻占。

在西集团攻击方向，三纵刚刚结束一场血战，地点在一个名叫杨大庄的村庄附近。那里也是黄维兵团企图突围的重要方向，敌人不断

地使用四个团以上的兵力突击三纵九旅二十六团的阵地。二十六团被团团包围后，坚守阵地的官兵反复反击，最终前沿失守，二十六团后退村内，仅占据着村子西南的一角。二十六团的勤杂人员全部投入了战斗，用刺刀与敌人在村内逐院逐屋争夺，最后在四纵的增援下，将冲击的国民党军打退。总攻开始后，三纵攻击的重点是马围子村，这是由三个相距几十米的自然村落组成的村子，在此据守的是国民党军第十军十八师五十二、五十三团。三纵七旅十九团攻击东马围子，八旅二十二团攻击西马围子、二十五团攻击中马围子。十九团一举突破前沿，俘虏守军营长以下官兵百余名，但是，向纵深发展的时候遭遇困难。在守军的猛烈反击下，十九团七连长李家海牺牲，全连最后只剩下两名新战士和三名伤员。二十二团冲入守军主阵地时，因遭到火力封锁前进受阻。在投入预备队后，冲击部队和突击队拥挤在一起造成更大的伤亡，攻击被迫停止。

在双堆集，作战双方都知道，战斗到了最艰苦的时候。此刻，黄维兵团是否能够坚持下去，已成为牵引淮海战场战局变化的关键因素：如果在短时间内增援不力，黄维无法坚持而被歼灭，已被围困的杜聿明集团便会凶多吉少，因为那时已经腾出手来的中原野战军必将加入到围歼杜聿明的战场上来。同时，无论是包围黄维兵团的中原野战军，还是包围杜聿明集团的华东野战军，其中的任何一方一旦出现攻击无力，乃至被敌人反击突破，将不可避免地陷于战场被动，黄维与杜聿明于南北两面实施反包围的可能性不是没有。

虽然胡琏带来了蒋介石的最新命令，但黄维依旧没有下定突围的决心，他仍寄希望于李延年兵团的北进和杜聿明集团的南进。

李延年兵团奉命从蚌埠地区北上向双堆集靠拢，因遭到华东野战军六纵和地方武装的阻击，推进迟缓。为了解救黄维，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亲率战车部队加入淮海战场，分别支援第九十九军和第五十四

军由蚌埠以北的曹老集地区发动新的进攻。五日晚，中原野战军第二纵队赶到，在曹老集以北构筑起又一道阻击防线。就在中原野战军主力对双堆集发动总攻的那天，国民党军第五十四军以坦克为先导，向二纵四旅的阻击阵地发起猛烈进攻。四旅的官兵利用简易工事顽强阻击，以巨大的伤亡代价节节抵抗，尽一切可能迟滞敌人的推进速度，至八日撤至严家圩和集南崔一线。但是，自九日开始，无论国民党军的空中火力、炮兵火力及战车火力如何凶猛，就是无法再向前推进一步。二纵官兵就像打不绝一样，阻击阵地上一拨人牺牲又一拨人上来，虽然敌人的进攻昼夜不停，但二纵官兵在阵地上誓死不退。蒋纬国的战车部队受到围攻，一辆战车被击毁，乘员全部被俘，战车指挥官被打死。蒋纬国火冒三丈，要求把被击毁的战车连同指挥官的尸体夺回来。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只好命令部队重新开始攻击，但是，攻击中一九八师的一个副团长被打死，五百多名官兵伤亡。战斗结束后，阙汉骞认为这里是沼泽地区，不适合战车作战，将蒋纬国的战车部队客气地送走了。蒋纬国后来说:“我们是尽人力以听天命。这样的大战，关系国家存亡，绝非少数人勇敢能挽回战局的。”

在双堆集的西北方向，杜聿明集团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开始向南进攻，以执行解救黄维兵团作战计划。华东野战军在东、西、北三面积极进攻，在南面顽强阻击，试图逐步收缩包围杜聿明集团的包围圈。五日晚，邱清泉的第二兵团进至濉溪西北的青龙集、陈官庄以西、以南地区，但是，担任掩护的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的阵地被突破，华东野战军攻入了第十六兵团的纵深阵地。同时，在东北方向担任掩护的李弥的第十三兵团阵地也遭到攻击，华东野战军官兵如同一把锋利的尖刀，插入了第十三兵团与第十六兵团的接合部——崔庄阵地。驻守在这里的国民党军，是李弥兵团的第九军二五三师。战斗刚一打响，二五三师团长孔志坚擅自率部撤逃。第九军军长黄淑严令一六六师预备队恢复阵地，待一六六师终于恢复阵地时，率部进攻的副师长刘君立被击毙。李弥暴怒，下令黄军长将孔团长押送兵团部枪决。

邱清泉命令第七十军一三九师的一个团去增援被包围的第五军四十五师，当郭方平团长率部赶到襄山庙时，当面华东野战军一纵、三纵、九纵的攻击部队已经撤退。邱清泉要求四十五师师长郭吉谦赶紧西撤，说十几万部队都在等着他呢。五日早晨，四十五师到达孟集以东的旷野中，邱清泉命令郭吉谦立即攻击孟集西边的几个村落，解救被围困的四十六师的一个团。郭师长说："部队行动了一夜，未曾休息，早饭都不曾吃，请求缓一些时间。"邱清泉没有答应。郭吉谦只好命令一三三团在左翼主攻，一三四团在右翼助攻，师指挥所和一三四团指挥所在一起，一三五团为预备队。当一三三团就要突入解放军的阻击阵地时，却被从另一个村庄里冲出来的解放军官兵反击下来。一三三团团长姜铁志之前在解救黄百韬的战斗中攻击不力，邱清泉曾声称要枪毙他，因此当他的团再次溃败下来之后，他在电话里向郭师长报告时竟然号啕大哭，说他的团新补充的兵太多，一见解放军就往回跑，怎么撵也撵不回去，请求长官宽恕原谅。天快黑时，尽管右翼的一三四团攻击略有进展，但郭吉谦担心天一黑解放军会发动大规模反击，于是决定不打了。邱清泉接到战报后很无奈，他让四十五师撤下来转入防御，把四十六师调上去与当面的解放军对峙——此时，华东野战军已经攻到距孟集以西只有一公里的地方，这对置身在孟集村内的杜聿明的指挥部和邱清泉的兵团部构成了巨大威胁。入夜，邱清泉的兵团部搬往陈官庄，杜聿明的指挥部也开始转移。

六日，杜聿明的指挥部向夏砦移动。中午时分，路过李石林村，孙元良和邱清泉神色紧张地找到他，说要商讨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于是，三个人一起到了李弥的兵团部，开始了各怀心思的紧张磋商。自徐州撤退之后，部队损失兵力已近三万，目前各军位置混乱，官兵士气普遍低落，对于蒋介石下达的解救黄维兵团的作战命令，几个人都认为显然已经无法执行。孙元良主张放弃解救黄维的行动立即突围，他说："目前林彪已率大军南下，我们进攻进展迟缓，掩护阵地又处处被突破，再战下去前途不乐观，现在突围尚有可为。将在外，君命有

所不受。目前只有请主任（杜聿明兼任徐州‘剿总’司令部前进指挥部主任）当机立断，才可拯救大军。”邱清泉当即表示赞同：“良公的见解高明。”李弥一直没有表态，直到最后才说：“请主任决定，我照命令办。”

杜聿明内心的矛盾难以排解。他认为，如果三天前按照“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话办，不顾黄维兵团而全速撤退，便不是眼下这种处境了，顺利突围保全住徐州主力，也算是对得起老头子。可是，现在恐怕晚了。眼下各部队都已处在被围态势中，万一突不出去，部队被打散，重武器丢光，这样既违抗了命令，也不能保全部队，还有什么脸面去见老头子？三天前，在孟集见到蒋介石的手令时，极力主张解救黄维兵团，甚至请求担负主攻任务的邱清泉显得有些尴尬，他不断地说：“亡羊补牢，犹未晚也。”杜聿明接下来的话还是模棱两可：“只要能打破一方，一个兵团突破一路，还有一线曙光，我也同意。万一各兵团打不破共军，反不如照他的命令坚持打到底，老头子有办法就请他集中全力救我们出去，否则我们只有为他效忠了事。在我判断，林彪入关后南下，至少还要一个月，在这一个月之内，我们牵住共军，请老头子调兵与敌人决战，还是有希望的。如果目前林彪已南下，老头子调兵也来不及了，关键就在这里。”杜聿明说完之后，在场的将领谁也没表示愿意为蒋介石效忠，反而开始讨论如何利用空隙逃出包围圈。杜聿明最后的表态是：“只要大家一致认为突围可以成功，我就下命令。但各兵团必须侦察好突破点，重武器和车辆非至不得已时不能丢掉，笨重物资可先破坏。你们能做到这一点，我就可以下命令。”

这天下午十五时，杜聿明集团做出了分散突围至阜阳集中的决定。

所有的将领都不曾想到分散突围会有被各个歼灭的危险。

从军事角度上看，这一决定是极其荒谬的：虽然受到围困，但未到分崩离析之际，况且尚有巨大的兵力和优势的武器可以实施集团作战。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更加紧密地协同作战，才可能置于死地而后生，哪怕是牺牲一部分兵力，但至少可以保全相当一部分兵力。仅就这一点而言，黄维之所以能坚持到现在，正是与他没有仓促地决定突围，而是死死地抱成一团抵抗有关。军事上的任何突围，都会给对手提供猛烈分割围歼的机会，这是万不得已时孤注一掷的举措。更何况，杜聿明采取的不是全力突击一点破茧而出，而是各个兵团分头突围。

这一决定，导致了六日晚国民党军徐州主力内部的巨大混乱。

首先是杜聿明的指挥部乱了。杜聿明决定甩掉机关和后勤人员轻装突围，消息走漏后，引起机关和后勤人员的极度恐慌。指挥部办公室中将主任郭一予非常气愤，只得自己想办法另谋生路。他认为自己与陈毅是老同学，如果能够与陈毅接上头，生命也许会有保障。再说，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政策谁都知道，何不前往投降？他当即约政务处长左偕康面谈，左处长也持有同样的主张。然后，他们又与跟随杜聿明出逃的徐州市各机关负责人商量，大家也都表示赞成。于是，杜聿明指挥部机关人员和国民党徐州党政机关人员临时组成了一个队伍，取名叫“非战斗人员还乡队”，他们决定走到解放军的阵地上去投诚。出发前，特别规定谁也不准携带武器，如果发现携带武器就要逐出本队。这是一支人数巨大、情绪慌乱、组织松散的类似难民的队伍，集合起来很不容易，出发的时候更是人声鼎沸。刚走出几里地，就遇到突围的国民党军与阻击的解放军发生战斗，“非战斗人员还乡队”被夹在战火中间混乱了一阵之后，没有被打死的全都跑了回来。

然后是李弥的立场发生了动摇。李弥回到兵团部后开会布置突围，但军官们普遍说准备不足，最好等到天亮以后再说。派出去的侦

察队回来报告说，东北方向解放军的部队很多，而且工事坚固，恐怕无法突出去。这时，杜聿明的电话来了，询问侦察的结果，李弥表示他的兵团突围出去很困难。接着是邱清泉的立场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他给杜聿明打电话说：“坏了！坏了！今天攻击全无进展，西面和南面共军阵地重重，无法全军突围，简直是自我毁灭！这样做如何对得起老头子？”邱清泉的突然变卦令杜聿明措手不及，也令正在部署突围的第二兵团参谋长李汉萍十分不解，李参谋长的分析是：首先，邱清泉一贯持有一个奇怪的想法，那就是解放军打仗坚持不过十天，只要自己能够坚持十天，解放军一撤就等于自己打了胜仗。其次，他不敢突围。在以往与解放军的作战中，邱清泉一向图谋保存自己的实力，一九四八年六月豫东会战时，正因为他的部队迟迟不进，才导致了区寿年兵团最终覆灭，为此他受到蒋介石的处分。在向徐州以东攻击的时候，也正是因为他和李弥都没有不顾一切拼死相救，又导致了黄百韬兵团的最终覆灭。现在，黄维兵团处在被包围中，即使他侥幸突围成功，最终结果还是等于见死不救，这一次蒋介石也许不会再饶恕他了。再其次，突围具有极大的冒险性，不突围而固守待援，不但可以避免因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受到军法处置，而且暂时不会殃及自己的生命安全——“邱清泉实际上很怕死”。

杜聿明意识到突围计划要泡汤了。他马上与李弥取得联系，李弥立即表示同意邱清泉的建议。但是，当杜聿明给孙元良打电话的时候，第十六兵团部的电话已经不通了。

六日晚上，距离孙元良兵团阵地最近的李弥兵团的官兵听见了剧烈的爆炸声，那是孙元良兵团的官兵正在炸毁大炮和多余的弹药。然后，孙元良兵团所在的高楼方向炮火连天——孙元良急不可待地单独突围了。

孙元良兵团的单独突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此时，第十六兵团总兵力约为三万两千多人，按照以师为单位的突围计划，顺序为：一二二师打头，接着是第四十一军军部、一二四师、兵团部、一二五师和第四十七军军部，一二七师担任后卫。各部队将重武器和装甲运输车全部炸毁，并规定避免与解放军的阻击部队硬打，要求采取钻空隙迂回的战术。黄昏十七时，兵团部移动到一二五师师部的位置，孙元良本人到达第四十一军军部，接着突围行动开始了。走了不久，兵团部和直属队的队伍就被第四十七军炮兵的马匹冲乱了。官兵们逃跑心切，撤退的方向本来是向北，但越走越往西，四处响起剧烈的枪炮声，人喊马嘶，惊天动地。更可怕的是，当先头部队与阻击的解放军接战后，附近的部队不但根本没有突围的迹象，在通过邱清泉的第五军防线的时候，第五军竟然向孙元良的突围部队猛烈开炮，孙元良兵团受到解放军和邱清泉的前后夹击，在黑夜中顿时乱成一团。兵团副参谋长熊顺义与孙元良失散，逃跑中遇到一二七师三八〇团团长孟达观，他只有跟着这个团继续逃跑，半夜时分逃到第五军的纵深阵地，这才知道其他两个兵团改变了突围计划，根本没有行动。此时，在第五军阵地的北面，炮声、机关枪声大作，照明弹、信号弹腾空而起。熊副参谋长想，若不趁此机会突出去，待在第五军寄人篱下的日子不好过，于是带领三八〇团继续向西突。谁知刚走出第五军二〇〇师的前沿阵地，该师的大炮机枪就向他们开火了——“打得死伤枕藉，惨不忍睹。虽经一再向熊笑三交涉，但均无结果。拂晓后，我率领该团残部重返包围圈中。”

漆黑的夜晚，孙元良兵团的溃兵受到冀鲁豫军区部队、豫皖苏军区部队、民兵和老百姓的追击和搜捕。冀鲁豫军区三分区部队在夏邑东南的张屯追上了孙元良兵团第四十七军一二五师一部，俘敌一千五百多人，缴获重机枪二十多挺、轻机枪四十多挺、步枪五百多支，并在俘虏中查出了一二五师师长陈仕俊和副师长黄崇凯。豫皖苏军区一声令下，民兵和百姓立即张开大网，在各个路口布置了岗哨。他们在

户庙子地区截获逃敌数百人，俘虏二十多名军官，其中有第四十一军副军长李家英。枣集区民兵排长王克进抓到了两个穿着老百姓衣服的人，经过审查，是第四十一军军长胡临聪和一名工兵营长。为此，豫皖苏军区奖励给王克进耕牛一头。颍阜县黄岗区副区长贾守让带领三名民兵夜间巡逻，一下子就截住三十多名国民党军溃兵。蒙城县的一个老人在路上拾粪的时候，看见三名国民党军逃兵经过，举起粪铲子就喊“缴枪不杀”——这把粪铲子至今陈列在淮海战役纪念馆里。

最终，孙元良兵团除一二二师师长张崇文、一二四师师长严翊逃跑外，第四十一军军长胡临聪、副军长陈远湘、参谋长刘伯余，第四十七军军长汪匣锋、副军长李家英、参谋长李传霖，一二五师师长陈仕俊、副师长黄崇凯，一二七师师长张光汉均被俘。

跑回包围圈里的熊顺义见到了杜聿明，杜聿明让他收容部队。被收容的官兵不愿意让打他们的邱清泉的第五军收容，都往第七十四军跑，结果第五军差点与第七十四军打起来。最后杜聿明裁定，孙元良兵团残部一律归第七十四军军长邱维达指挥。熊副参谋长一共收容了一万六千多人和数百匹骡马——孙元良兵团在这个混乱的晚上损失了约一半人马。

始终和孙元良在一起的兵团参谋长张益熙跑到第七十四军阵地上的时候，由于身负重伤已经奄奄一息，他请求邱维达让医生带着盘尼西林来救他，并说他中弹负伤之后孙元良扔下他跑了。

谁也不知道孙元良跑到哪里去了。

孙元良兵团突围之后，杜聿明的防线出现了缺口，邱清泉命令第五军四十六师去封堵这个缺口。四十六师实际上是由杂牌部队改编的，该师的军官都是第五军调来的，因此官兵之间隔阂很大。四十六

师刚冲上去就被打了回来，尽管师长陈辅汉亲自拿着手枪督战，但士兵们根本不知道他是谁，陈师长反被溃兵乱枪击中负了伤。

放弃突围计划的杜聿明集团，自七日起反复向陈官庄的东南方向攻击，企图冲过华东野战军的阻击线，沿津浦路以西南下与黄维兵团会合。攻击战最激烈的地方，是位于陈官庄东面的鲁楼村，这里是杜聿明靠近黄维的必经之路。担任攻击的部队是邱清泉的第七十军和第七十二军。战斗进行得十分惨烈，鲁楼村在交战双方之间数次易手。华东野战军十纵打了两天之后，由于部队伤亡很大，十一纵官兵上了阵地接着打。邱清泉命令第七十军九十六师派出两个营，掩护担任主攻的第七十二军再次发动正面进攻。九十六师二八八团团长周德宣亲率两个营配属两辆装甲战车向鲁楼村的西侧发起助攻。装甲战车引领步兵一路推进到鲁楼西南面的村庄边沿，但是遭到土堤上十一纵官兵的凶猛侧击，二八八团的两个营伤亡惨重，一辆装甲车被击毁。邱清泉获悉还没攻下鲁楼村，大发雷霆，扬言要法办二八八团团长周德宣。九十六师师长邓军林极为不满，他对邱清泉说："九十六师担负的任务是侧面攻击。如果司令官指定九十六师担任主攻鲁楼的任务，我便立即回去部署。"——邓师长言下之意是：为什么不法办担任主攻却久攻不下的第七十二军？于是，邱清泉再也不提法办周团长了。

第十六兵团司令官孙元良终于有了消息。

孙元良在突围中曾经被俘，他谎称自己是名中尉副官，在混乱的战场中居然逃脱了。十八日，他终于逃到信阳车站。在候车室里，他给驻守信阳的第五绥靖区司令官兼河南省府主席张轸打电话，请求张轸帮助他向蒋介石报告。张轸让国防部保密局豫南站长秦舞基前去接待。秦舞基安排孙元良去了第五十八军军部，然后他向南京国防部保密局汇报了孙元良的情况。第二天，蒋介石命令孙元良经汉口到南京听候处理。后来，孙元良在四川重新组建第十六兵团，并仍然出任兵

团司令官兼任重新组建的第四十一军军长。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昔日的国民党军陆军中将为何许人也，但在他的七个子女中，行五的儿子却被广泛熟知。老五原名孙仲祥，做了电影演员之后，又名秦汉。

八日，胡琏又从双堆集飞了出来，再次回到南京站到蒋介石面前。这位浑身散发着硝烟气味的将领向蒋介石建议，必须立即命令黄维兵团突围，因为再不突围就来不及了。胡琏陈述的如下理由让蒋介石动了心：第十八军和第十军都是党国中坚，特别是第十八军，干部都是有用之材，如果损失殆尽，对于党国来讲是莫大的损失。当日，蒋介石给黄维及所属各军军长们写了亲笔信，同时签署了给黄维兵团的"嘉奖令"。蒋介石在给黄维的信中说："决用空军全力拯救你的突围，可径行同空军总部联络。"

晚上，蒋介石请胡琏和宋希濂在他的官邸吃饭。在座的还有参谋总长顾祝同、参谋次长林蔚、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以及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吃饭的时候气氛沉闷，谁也不愿意多说话。饭后，在会客厅里放映了一部电影，影片的名字是《文天祥》。电影放映完毕，蒋介石站起来向在场的人点点头，然后低着头缓步上楼去了。

宋希濂对那个晚上的情景终生难忘，他甚至说，那个晚上的气氛导致他在一年后被解放军追得走投无路时想到了自杀：

> 我们一起待了三个多钟头，蒋介石几乎没有说什么话，很似李后主"无言独上西楼，别是一股滋味在心头"的情景。当时，我被这幕悲剧所感动，几乎掉下泪来，默默地走出蒋的官邸，坐在汽车上一路想着："老头子多可怜呀！"当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我率残部逃到西昌，被解放军围困于大渡河畔走投无路时，曾有过举枪自杀的意图，正是这种思想的反映，正是这部《文天祥》影片的影响。

文天祥，南宋大臣，率军抗击元军南侵兵败，退入广东。一二七八年在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北）被俘。次年被押解到大都（今北

京），元廷万般利诱威逼均不从，六年后被斩于柴市。狱中作"留取丹青照汗青"之传世诗句。

无法知道，此时此刻，蒋介石为什么要请他的高级将领和他一起回望数百年前那位为南宋朝廷凛然赴死的前人?

## 黄维：上尉司书方正馨

十二月九日，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依旧在双堆集四周艰苦作战，向黄维兵团核心阵地的每一步推进都要付出生命代价。

中原野战军六纵和华东野战军七纵攻击大小王庄，守军是国民党军第十八军一一八师，一一八师即胡琏指挥过的原整编十一师一一八旅，是内战爆发以来解放军遇到的强硬对手之一。黄昏，华东野战军七纵二十师五十八团在炮火的掩护下强行攻击，击溃一一八师三五二团，占领大王庄。第十八军十一师三十三团随即协助三五二团发动反击，双方在血腥的搏斗中反复争夺阵地，最后华东野战军因伤亡太大退出战斗，只剩替换上来的五十九团的一部分官兵坚守在大王庄的西南角。指挥攻击的中原野战军六纵司令员王近山和政治委员杜义德命令十六旅四十六团增援。十日凌晨四时，四十六团参谋长张超指挥一营和三营分四路向大王庄反扑，政治委员钟良树指挥二营在侧翼火力掩护。四十六团是著名的"夜老虎团"，长于夜战和近战，官兵们刚冲进大王庄就与国民党军拼了刺刀，最终把敌人再次赶出大王庄。但是，几个小时之后，天亮了，第十八军的重炮轰击持续了五十分钟，将大王庄炸成一片火海，然后两个团的国民党军再次冲上来，大量的坦克在两侧迂回，华东野战军的五十九团和中原野战军的四十六团腹背受敌。敌人的坦克在阵地旁来回碾压，四处开炮，五十九团和四十六团官兵缺乏反坦克武器，数量有限的火箭弹很快就打光了，轻、重机枪全被打坏，机枪手也全部牺牲。四十六团一营长高俊杰指挥战士们用爆破筒和集束手榴弹打坦克，但是收效甚微。一营二连排长张大

兴多次负伤，全排二十五名战士最后仅剩两人，但依旧守在战壕中誓死不退。残酷的拉锯战一直打到黄昏，双方战死者的尸体堆了一层又一层。华东野战军七纵二十师六十团加入一个营后，巩固了大王庄阵地。

中原野战军六纵十六旅四十六团一营教导员左三星，是大王庄战斗的幸存者之一，他对那天的惨烈战况刻骨铭心：

大王庄原是个有四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庄，无数的炮弹已经差不多把它轰成了废墟。战斗一开始，我们就觉得不对劲儿，这股敌人凶狠异常，成堆地上，剩了单个的也敢上；有炮时上，没有炮时也敢上；枪法也准得很，拼刺刀也厉害……仗打完了，我到处打听，这才知道上来的是黄维的第十八军三十三团，名不虚传的“老虎团”，打日本人时就很厉害，蒋介石还给他授过勋，打起中国人也忒狠……敌人靠他们的坦克在中午冲进了村庄。我们与他们逐屋争夺，先打枪，后打手榴弹，最后拼刺刀。三十三团那狗日的，还硬是和我们个顶个！当时守大王庄的是华野七纵五十九团一营和我们中野六纵四十六团一营和三营，华野那个一营三连是个老功臣连，这回全拼光了，营长哭得眼睛都淌血呀！泣不成声地说：“可惜我的三连呀！”……我的身边全是尸体，敌人的，我们的，每个人都是拼刺刀拼死的。我实在没劲了，就对通信员说：“看看敌人又上来没有？”……干部们不是牺牲，就是负了重伤。我们二连四班长王凤鸣就将阵地上两个野战军三个营的人都组织起来，说：“跟我来。”数数人，仅仅只有二十一个了……敌人的冲锋又一次被打下去。我身边连小声哼哼的声音都没有了，全牺牲了……大王庄很静，静得听得见血往黄土里渗的吱吱声。打起仗来什么都忘了，这会儿我心里突然很难过，牺牲得太多了！三十米外一个人好久没动，我以为是尸体，突然，他动了一下，我一看，是三营长吴彦生。他们三营也只剩下他一个了……敌人又打炮了，我们一看，撞见鬼了！只见黑压压地拥上来一大片，鬼叫鬼叫地冲了过来，三十三团还真打不完！我心里想，这下真的要和阵地共存亡了……正在这时，华野的增援部队来了，好整齐的队伍，一个个小伙子白净清秀，正副班长清一色的卡宾枪、冲锋枪，一百五十多人迅速占领有利地形，阻击敌人。原来，我们六纵都没有部队派了，华野七纵首长将纵队警卫连使上了，真是打得倾家荡产呀！……不过这回敌人没那么经打，虽然人多，但也给打下去了。后来我看了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写的文章，原来三十三团也打光了，后来上的全是第十八军的汽车兵、后勤兵，连伙夫、马夫都上了。可是我们也伤亡大啊，这一百五十多人的警卫连撤下来的时候，我站在村口数了数，只剩下十七个了……

大王庄被攻占后，小王庄守军惊慌起来。

驻守小王庄的是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军二十三师，师长黄子华。这个师由湖南军阀的地方部队改编，拿该师官兵们自己的话讲：“我们师

和整个第八十五军在黄维兵团中是最受歧视的部队。”特别是第八十五军一一〇师起义后，二十三师的无线电收音机被封闭，对空联络电台被禁止使用，师部通往军部的电话和文件“都必须经过第十八军转接”。由于改换的地空联络信号无人告知二十三师，导致国民党军飞机轰炸了这个师的阵地——“六十七团副团长陈乃光被炸成重伤”。同样，也许是一一〇师战场起义的缘故，解放军对二十三师的攻击似乎手下留情。尤其是华东野战军七纵十九师攻占小王庄附近的小周庄后，二十三师师部所在的小王庄完全暴露在七纵的炮火打击之下，但是七纵没有发动猛烈进攻，只是前沿阵地上标语插得更多了，喊话也更起劲了：“你们廖师长过来了，你们也过来吧！不要再给蒋介石卖命了！我们这里有大白馒头吃！”国民党兵正饿着肚子，解放军把热腾腾的大米粥送到前沿，国民党兵吃完了，把粥桶和碗都给砸了，送饭的解放军战士只是笑了笑，并没有生气。师长黄子华不断接到解放军的劝降信。副师长周卓铭对黄子华说：“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一一〇师能起义，为什么我们不能？”黄子华决定派人去解放军那里找廖运周了解情况。派去的副官杨耀华不久就回来了，说：“解放军确实很好，热情诚恳，并已派人同来。”黄子华对解放军提出了条件：“我们有很多伤病官兵不能同走，要请解放军设法安置”；“我们的后方在武汉”，为家眷的安全，“暂勿将投诚的消息宣布”；投诚后，“官兵的去留根据个人的意愿”等等，解放军全都答应了。九日晚，按照预先规定的方案，二十三师官兵开始向解放军阵地移动。移动前，黄子华担心他的军长吴绍周受牵连，想把军长也带出来，于是派周副师长去第十八军军部，找滞留在那里的吴绍周，可直到规定的移动时间到了，也没见周副师长回来。后来才知道，根本不信任第八十五军的第十八军士兵，说什么也不让周副师长通过警戒哨靠近第十八军军部。

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军二十三师参加投诚的部队有：师直属部队和所属的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三个团，二一六师六四八团残部，第八十五军直属辎重团和卫生大队的一部，共计一万人。

十日凌晨，依旧与解放军对抗的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军，只剩下二一六师的两个团了。但是，黄维兵团的两个主力军，即第十八军和第十军依旧在顽强抵抗。

中原野战军三纵攻击的马围子村是个坚固的据点，国民党军守军是第十军十八师。三纵的攻击自六日开始，屡次攻击均未得手。对面的十八师五十二团原属第十八军，后划归第十军，初级军官强硬，士兵作战凶狠。九日，三纵再次攻击马围子，十九团在炮火的协同下突破东马围子的一角，二十三团连续三次冲锋都遭到守军密集火力的杀伤。司令员陈锡联向邓小平报告，纵队已经伤亡近四千人，有的连队只剩下几个人了，各旅各团机关和直属队人员已全部编入战斗单位。邓小平对陈锡联说，只要能在长江以北把黄维和杜聿明这两坨敌人吃掉，无论付出多大的伤亡都值得，要坚决战斗到底。早晨，陈锡联去了攻击出发地，他对官兵们说，这是全国胜利前的大决战，三纵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把当面的敌人消灭掉！十一日，三纵对马围子的攻击再次开始，七旅十九团一营从正东主攻，三营从东南助攻，二十一团为预备队；八旅二十二团从西南主攻，二十三团从西北助攻；九旅二十六团从东北主攻，二十五团为预备队。为了加强攻击强度，三纵官兵连夜加修了交通壕，准备了近两千公斤的炸药。下午十六时三十分，纵队所有的火炮加上一纵支援的火炮将马围子村的前沿工事摧毁。炮火延伸后，十九团三营率先佯攻，吸引守军的火力，一营趁机发起冲击，二连一班带着炸药、手榴弹、机枪沿交通壕向敌人的地堡实施连续爆破，地堡内的守军拒绝投降最终全被炸死。天黑时，十九、二十二、二十三团最终突破到西马围子守军的前沿。谁知前沿的鹿砦上突然射出一道道紫红色的火龙，冲击部队一下子被火焰包裹，官兵们浑身燃烧着大火依旧向前滚动。敌人发动了猛烈的反击，肉搏战随即开始。四连班长李本林扑倒一个敌人，这人挎着盒子枪，胸前还挂着只望远镜，一问才知道是第十军十八师五十二团团长唐铁冰的勤务兵——四连已经打到五十二团团部来了。李本林命令那个勤务兵

进地堡叫他们的团长出来投降，但是勤务兵进去之后不出来了，李本林朝地堡门口打了一梭子，喊：“再不出来，老子要送炸药了！”话音一落，里面直喊：“别炸！别炸！”然后走出来一串国民党军官兵，其中就有唐铁冰。

在三纵突击马围子的同时，中原野战军四纵和九纵向杨围子村发动了最后攻击。国民党军第十四军军长熊绶春率领他的军部和十师、八十五师已经在这里据守多日。解放军挖掘的壕沟每晚推进几十米，挖至一村消灭一村，现在已经挖到离杨围子村不远的地方——“夜间咳嗽声都可相闻”。由于得不到粮食补充，第十四军的上千匹牲口被打死在外壕里，官兵们每天用马肉充饥，牲口残尸的腐烂气息四处弥漫。村子里的房屋早已被拆掉生火取暖，伤兵无处安身，又不准他们挤在工事里，于是村子四周的旷野上哀号声不止。十一日下午十六时三十分，四纵司令员陈赓集中起百余门火炮和几十具“飞雷”，对第十四军的前沿和主阵地实施了猛烈轰击，整个杨围子村几乎被夷成平地。接着，两个纵队的五支突击队发起攻击，突击队的后面，是四纵的十、十一、十三旅和九纵的一个旅。激战九个小时后，杨围子村外围被突破。

第十四军八十五师二五五团那个爱写日记的政工室主任洪雨卿的日记本被解放军官兵缴获。日记本最后记述的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一日的情景，这是国民党军第十四军被歼灭的那一天：

> 昨夜敌来猛攻外围阵地，许多敌人已到了我们的鹿砦外面做工事，看情况我们生死存亡就在今天可以解决，这时我的心是破碎的，不管死伤或被俘，只希望在今天了结这被围困的日子。

史料中没有这个心已破碎的国民党军军官是生是死的记载。

熊绶春是黄埔三期毕业生，同样毕业于黄埔的陈赓过去与他很熟。陈赓给熊绶春写了劝降信，并限他二十四小时答复。熊绶春看信

之后问："他们会不会杀我们这样的人？"参谋长梁岱极力劝说自己的军长，说我们在这里与其说是"等援"不如说是"等死"，指望李延年兵团救援根本没有可能，我们原本不也是来增援徐州的吗，结果自己却被围困只好等待救援，"赴援的变成了待援的怎么会有人再来援呢"？熊军长沉吟良久，低声说："不知谷副军长会不会同意？"梁岱说，他同意就一起投降，不同意就派人监视他。第十四军副军长谷炳奎被请来了，听说要投降，谷副军长放声大哭："大家都同意，我何能独异？不过我们追随校长几十年，怎能对得起他？"梁岱开始起草投降信，信的最后写的是熊绶春和谷炳奎的名字。但是，谷副军长不愿意，说劝降书不是他写的，签军长一个人的名字就可以了。熊军长很不高兴，说："两个人都不署名，就用参谋长的名义写明奉谕函复便是了。"天黑之后，一名排长去给陈赓送信。直到第二天早晨，二十四小时的最后期限就要到了，送信的排长还没有回来。中午，四纵的炮火打击重新开始，十师的阵地首先被突破，炮弹已经打到了军部隐蔽部的顶上，泥土下雨似的散落。梁岱看见熊绶春神情异样：

熊绶春面色惨白，伏在地上翻翻自己的皮包，把皮包里的一些信件烧掉了，又拿出妻子的照片，边看边流泪。当时我想不出什么话来安慰他，只说："现在还不至绝望，何用这样悲观！"他这回真是垂泣而道了："我没有什么怨恨，只是连累了你，你接任这个参谋长，不到三个月便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是我连累了你啊！"说毕，眼泪脱眶而出。

黄昏，四纵官兵冲进杨围子村，"哨子声，喊话声，冲锋和脚步声，震动了隐蔽部"。梁岱突然发现一直不说话的军长站了起来，"独自一个人向隐蔽部门外冲出去"，"刚一出门，一颗炮弹正落在隐蔽部的门口"——国民党军第十四军军长熊绶春被炸死在暗下来的天色中。

参谋长梁岱再次被俘。

解放军干部看见他，认了出来，因为上次他被俘的时候，这个解放军干部审查过他，于是问："原来又是你，你不是书记官吗，怎么成了参谋长了？"

一起被俘的熊绶春的卫兵对梁岱说：“我要去参加解放军了，不能照顾你了，请你自己保重吧。”

梁岱连同第十四军遗弃在战场上的三千多名伤兵一起向后转送。路上碰见一位骑着马戴着眼镜的解放军干部，他问梁岱：“你们军长呢？”梁岱回答说已经阵亡了。干部又问：“尸体在哪里？”梁岱回答说在杨围子村里。

他叫我留下熊军长的卫士，并吩咐那个卫士说：“我派人协同你找，一定要找出来，好好埋葬，立个牌，让他家人好查。”熊绶春的尸体找回来后，埋在南坪集附近一个土堆里，立了个木牌，写有“第十四军军长熊绶春之墓”几个字。

梁岱后来才知道，这位骑着马戴着眼镜的解放军干部就是著名将领陈赓。

越打越大的淮海战役震惊了全中国和全世界。

就在第十四军军长熊绶春被埋葬的那天，一位美国青年坚持要进入中国的淮海地区，想亲眼看看致使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彻底崩溃的战场到底是什么样子——二十七岁的美国陆军准尉西默·托平从美军驻菲律宾马尼拉的部队退伍后，来到中国学习汉语并担任《纽约时报》业余记者。他曾搭乘调停国共停战的美军飞机去过延安。当时，涉世未深的他向共产党领导人提出：“为什么你们不把你们党的名称改为土地革命党？”并强调说如果改了名称美国人民会高兴。面对他的提问，共产党领导人笑得很厉害，他们告诉他：“因为我们是共产党人，所以我们称自己为共产党。”

一九四八年冬，这位年轻的美国记者在南京感受到了异样，因为这座城市“处处弥漫着行将灭亡的气息”。大街上一大群一大群掉队的、开小差的或者从战场侥幸逃出来的国民党军官兵，穿着邋遢且长满虱子的黄色棉军服到处闲逛。成千上万的难民露宿在人行道上，每

天早上负责清洁的卡车都要拉走那些在头天晚上冻死或者饿死的人。疯狂的市民把米店的门挤塌了，警察开了枪。通货膨胀使外国人也得扛着成麻袋的纸币付酒店的账。南京早已实行戒严，城墙上的十几座城门晚上九点之前就关闭了。停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频繁，黑暗中不断有枪声传来，“诚惶诚恐的人们即使进入梦乡还得接着与噩梦进行搏斗”。美军联合顾问团的八百名工作人员突然撤离南京，这是华盛顿发来的指令，因为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随时可能打进南京。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暂时还没有走，他的客厅里每天都挤满各色人等，大部分是请求得到他和美国政府保护的富有的中国人——“他们围坐在漂亮的老式红木茶几旁，一边品尝着中国清茶，欣赏着墙上的条幅字画，一边倾听着大使的同情之辞”。

西默·托平从南京飞到徐州，他在南京和徐州机场看到的情景让他确信国民党政府恐怕支持不了多久了：南京机场上挤满准备逃亡的达官贵人和他们的家眷，大型运输机“犹如拾荒者一趟又一趟地把国民党军将领的贵重物品从北方运来，这无疑是向世人宣告，某一座城市又落入了共产党手里”。而在徐州机场，他看见国民党军空军依然持有的巨大军力：C-46、C-47运输机，P-5野马式战斗机和B-24、B-25轰炸机，数百架次地飞往战场。但是，战场上传来的战果，却令美国人和南京的蒋介石一再失望，原因是“国民党军飞行员坚持要在他们认为安全的高度作战”。到达徐州后，西默·托平深入到邱清泉和李弥两兵团增援黄百韬的攻击战场——“七十五毫米和一○五毫米火炮炮弹不断地在村庄与村庄之间掠过，砸向共产党军队坚守的村庄。战火如此惨烈，但仍有些农民固守着自己的土棚屋、土地和一两头猪”，当然，“与农民们一起坚守村庄的还有共产党的官兵们”。他看见了交战双方士兵的尸体，发现其中二十多具解放军士兵的尸体都有第二次创伤。西默·托平愤怒地指出：这是杀俘行为！他不愿意再看下去，在返回徐州机场的路上，他又看到了士兵的尸体，其中一个士兵“头就像熟透的罗马甜瓜一样开着大口”。

返回南京后不久，西默·托平决定从蚌埠方向再次进入淮海战场，因为他听说黄维兵团和杜聿明集团都已被围，他百思不得其解，如此庞大的兵力和优势的装备怎么可能瞬间陷于如此危境？他在南京搭上了一列火车，车厢里挤满难民，车厢两侧堆着防止袭击的装满泥土的麻袋，身边还有一群奉命开往前线的国民党军官兵，这些官兵阴沉着脸吃着辣酱油拌的冷米饭。火车终于到达蚌埠，西默·托平拜会了国民党军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目前我们正准备围歼陈毅和刘伯承。”刘总司令对记者说。

西默·托平要求刘总司令能够让他进入战场，刘峙的态度含糊了。很快，他就听说“黄维的部队和坦克被共产党围攻的炮火炸得四分五裂，十二个步兵师中至少有一个已经反叛了”。年轻的美国记者更加坚定了深入战场的决心，他确信只有他亲眼看见的才是真实的，他要对得起付给他薪水的《纽约时报》和这份报纸的所有读者。等待中，他碰见了同样寻机进入战场的伦敦《每日快讯》记者比尔·希尼·史密斯、拉契·麦克唐纳和帕特里克·奥多诺凡，他们发现蚌埠城内的一家小店里竟然有一瓶约翰·尼沃克黑带威士忌出售，于是花了二十美金买了回来，干杯的时候才发现，酒瓶里装的是中国人喝剩下的黑褐色茶水。

新华社再次播发了刘伯承、陈毅敦促黄维投降书：

黄维将军：

现在你所属的四个军，业已大部被歼。八十五军除军部少数人员外，已全部覆灭。十四军所属不过两千人，十军业已被歼三分之二以上。就是你所依靠的王牌十八军，亦已被歼过半。你的整个兵团全部歼灭，只是几天的事。而你所希望的援兵孙元良兵团，业已全歼，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已陷入重围，损失惨重，自身难保，必被歼灭。李延年兵团被我军阻击，尚在八十里以外，寸步难移且伤亡惨重。在这种情况下，你本人和你的部属，再做绝望的抵抗，不但没有丝毫出路，只能在人民解放军的强烈炮火下完全毁灭。贵官身为兵团司令，应爱惜部属与生命，立即放下武器，不再让你的官兵作无谓牺牲。如果你接受我们这一最后警告，请即派代表到本部谈判投降条件，时机紧迫，望即决策。

刘伯承 陈毅

一九四八十二月十二日

此时，黄维兵团已被压缩在以双堆集为核心的小小范围内。四周阵地不断被突破，双堆集内人心惶惶，只能依靠严厉的战场处罚来维持局面：一一四师三四一团苏营长因放弃阵地逃回，被第十军军长覃道善枪毙；七十五师刘团长接替一一四师的阵地防守小杨庄，几天之后官兵伤亡殆尽，刘团长率残部突围回来后，经黄维批准被枪毙了。即使这样，整个第十二兵团战斗力已严重减弱，战斗人员已严重减少，兵力最多的团只剩三四百人，最少的仅剩下百余人，有的团已被全歼。

在双堆集战场上的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也倍感压力：同时攻击黄维、杜聿明两个集团的战斗尚未最终解决，而从蚌埠北援的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推进到澥河南岸的何集附近，距黄维兵团所在的双堆集已经不远了。蒋介石从武汉调来的第二十、第二十八军正在向蚌埠开进。情报显示，蒋介石还准备从华北、西北调集兵力投入淮海战场。因此，必须迅速歼灭黄维兵团，才能够保持战场的主动性。此时，围歼黄维兵团的中原野战军，官兵伤亡已近两万人，本来就家底不足的他们感到兵力严重不足。十二月十日早晨，华东野战军粟裕、陈士榘、张震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报军委，华东局：

……自孙元良兵团基本被我解决后，邱、李两兵团仍图向南突进，以图与黄维兵团合股，故于虞（七）、齐（八）两日以全力向我南线大回村至青龙集之线阵地突击。经两日激战，均被我击退，敌伤亡甚大……刻邱、李除仍未放弃向南突进的企图外，已加强工事，转入防御，其地堡网及附防御等，均已构成。我们必须采取稳打强攻办法，才能奏效。因此，全歼该敌至少需半个月至二十天时间［敌尚有四十个团左右兵力］。但在黄维兵团未解决之前，我们必须以三至四个纵队位于南线，防阻邱、李向南突进，以保刘陈邓中野作战之安全。该三四个纵队只能采防御，暂不能以全力采进攻，只有北面的三个纵队可采全力攻势。因此全歼邱、李兵团，恐时间还需延长……据参考消息称：宋希濂兵团已到浦口，正向蚌埠开进……我们最担心对李延年阻击兵力不能胜任［因六纵王（王必成）江（江渭清）部自战役以来，伤亡七千余人，骨干太弱，人数不充］……目前中野及华野已分成三个战场作战，兵力均感不够……为此，我们建议再由此间抽出一部分兵力，以求先解决黄维［对邱、李暂

采大部守势，局部攻势］，尔后中野负责阻击李、刘［解决黄维后可能不敢北进］，我们再集中华野解决杜、邱、李兵团……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收到电报后，当即决定从华东野战军围困杜聿明集团的部队中再抽调两个纵队，以求首先迅速解决黄维兵团。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表示，中原野战军要人有人，要枪有枪，特别是重武器，要无私援助，打黄维的最后时刻，要把华野的大炮全部拉上去。

当天晚上，华东野战军第三、第十三纵队及鲁中南纵队开始南下，十三日到达双堆集战场。陈毅对华东野战军官兵说："你们是代表华野去打仗的，我给你们提三条意见：第一要首先打进去，只有首先打进去，才是对兄弟部队的最大支援；第二要虚心向兄弟部队学习，主动搞好团结；第三缴获的战利品，大到武器弹药和俘虏，小到日用品和纸片，都全部交给兄弟部队，不准任何人打埋伏。"

十四日，在双堆集的东北方向，中原野战军六纵司令员王近山指挥的部队与华东野战军三纵司令员孙继先指挥的部队站在了一起，在他们即将发起攻击的当面，是双堆集国民党军最要害的防御阵地尖谷堆。这是一个高二十多米的土堆，是平原上唯一的制高点，距黄维的兵团指挥所不足一里地。国民党守军的阵地上筑有两米宽、一米高的围墙，周围是由大量暗堡组成的环形防御工事，西面不远处就是黄维兵团的榴弹炮阵地和临时机场。

华东野战军三纵派出的突击队，是二十三团的"洛阳营"；中原野战军派出的突击队，是十七旅四十九团的"襄阳营"。两个纵队的指挥员都各自对自己派出的最精锐的部队作了战斗动员。十七旅旅长李德生对"襄阳营"提出"向华野部队学习"的号召，并要求突击营发扬善于攻坚的尖刀精神，发扬在打襄樊的战斗中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要求"襄阳营"首先打进去。三纵司令员孙继先则对"洛阳营"的官兵们说，

与中原野战军最精锐的营并肩作战是很光荣的，当年打下洛阳，就是两个野战军相互配合作战的结果，在光荣的“洛阳营”的红旗上，染有中原野战军老大哥部队的鲜血，如今两个英雄营将要并肩突击，咱们要发扬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首先打进去！

在华东野战军“洛阳营”的突击阵地上，中原野战军官兵们已经为他们挖好了又宽又深的交通壕，挖了一夜的官兵满脸泥土，憨厚地对华东野战军官兵歉意地笑着说：“昨晚上，我们每人背块门板就来这里作业了，时间太紧，不然还可以挖得更宽更深，距离敌人更近些。”

攻击信号弹升空了，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的火炮集中在一起同时发射，双堆集四周天摇地动，烈焰熊熊，黑色的硝烟遮蔽了天空。炮火轰击持续了一个小时，国民党守军阵地上的工事被全部摧毁。“洛阳营”和“襄阳营”呐喊着冲了上去，每一个官兵都抱着首先突进去的决心。两面英雄的旗帜在战火中高高飘扬。

“襄阳营”营长何满岗率领官兵突入敌阵，与国民党守军展开激烈的厮杀。最前面的一连三排不断有官兵倒下，最后只剩下三名战士，小战士李正全认为应该有个“头”才好，建议让“杀敌英雄”刘乃江站出来担任指挥，另外一名战士庄金凤表示赞同。刘乃江集中了炸药和手榴弹，并掩护小李和小庄在敌人的尸体上收集弹药，然后三个人坚守突破口不退，直到后续的二连二排增援上来。“洛阳营”在冲击的一开始就出了意外。营长张明命令司号员吹冲锋号，但是司号员小郭站起来的时候摇摇晃晃的，他一手按着腹部，一手艰难地把军号举到嘴边，军号只颤抖地响了一声，小郭就一头栽倒在地。“洛阳营”全体官兵就在这短暂而悲壮的号声中出击了。教导员把驳壳枪一举，率领二连冲在最前面。前方的一个大地堡里，敌人的火力十分猛烈，教导员中弹倒地，他躺在地上大声喊：“往前冲！往前冲！咱们要首先打进去！”一连的两个排吹着联络口哨沿着围墙发展，突然，他们看见密集

的手榴弹飞向当面的敌人，原来是“襄阳营”的官兵跟进掩护着他们呢。二连战士李景坤抓住敌人机枪手的脖子奋力厮打，十七岁的小战士朱冬的左胳膊被子弹打断，但他的右手依旧在不断地投出手榴弹。

这是对黄维兵团部外围阵地的最后一次压缩。

对于黄维兵团来讲，这是最后的抵抗，因为再往后退就是双堆集了。

黄昏，双堆集核心阵地的西北角出现了信号弹，这是“洛阳营”和“襄阳营”占领阵地的信号。支援两个英雄营作战的炮火立即进行延伸射击，在被占领的阵地与黄维兵团部之间构成了一道火墙，挡住了敌人的增援部队。

与此同时，东、西两攻击集团也相继占领老五庄、杨子庄等阵地。

双堆集核心阵地已完全暴露。

黄维知道，尽管李延年和刘汝明兵团已经近在咫尺，但是一切都没有意义了。

十五日，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对黄维兵团的最后攻击开始。

黄维给蒋介石发电报，说他决定突围，希望空军能够配合。

上午九时，国民党军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飞到双堆集上空与黄维通话，表示“不能照计划实施”。黄维回答说：“你不能照计划实施，我只好自己断然处置了。”然后，他召来第十军军长覃道善和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决定分别突围——“四面开弓，全线反扑，觅缝钻隙，冲出重围”。第十八军向双堆集西北突围，集结地点是蒙城；第十军向双堆

集东北突围，集结地点是津浦线上的怀远；其余部队向东突围，集结地点是蚌埠东南方向的滁县。突围命令下达后，部队即刻混乱起来。战车营的战车在狭窄的包围圈里乱开，导致其他部队以为突围提前了，于是各部队开始逃命般的溃散。

第十军军长覃道善的突围部署是：十八师、一一四师和军部由小王庄向东北方向突围，七十五师向东南方向突围。命令破坏所有的重武器，抛弃所有的辎重行李。十五日黄昏，十八师师长尹俊指挥部队在小王庄打开一个缺口，尹俊逃出战场。覃道善率领一一四师跟在十八师的后面突围，但缺口很快被解放军封堵，封堵之后无论怎样冲击就是无法突破，一一四师的国民党兵纷纷缴械投降，覃道善和师长夏建勣一同被俘。七十五师师长王靖之突围时负重伤，被解放军官兵用担架抬出混战之地。

黄维开始突围的时候，第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被指定乘坐第三号坦克，紧跟在黄维和胡琏的坦克后面。但是，第三号坦克很快就停了下来，因为一座浮桥被黄维和胡琏乘坐的坦克压断了——“这正合我的心意，与其到南京去送死［因我所带的第八十五军战斗部队均已先后投降解放军，剩下的只有我这个光杆军长了］，倒不如待在这里被俘。”吴绍周和两名随身卫兵爬出坦克，坐在地上等待解放军的到来。四小时之后，中原野战军一纵的搜索队到达，吴绍周和卫兵们把枪交了，然后向俘虏集合地走去。

第十八军的突围计划是：由十一师向正西突围，黄维和胡琏乘坐坦克亲自开路，只要打开一个缺口，就不顾一切地往外冲；军长杨伯涛率领一一八师和炮兵、工兵残余人员向西北方向突围。黄维命令第十八军官兵将能够携带的武器，如轻重机枪、冲锋枪、六十毫米迫击炮和步枪等，人手一支尽量带上，不能携带的火炮全部破坏，不能破坏的重要部件埋在土里。通讯总机和电台一律砸坏，特别是一台美国

进口的大功率电台，在杨伯涛的亲自监督下被砸毁了。至于伤员已经无法顾及——“只在野地里给他们挖了一些壕沟而已”。本来约定的突围时间是黄昏之后，但是黄维和胡琏认为天黑之后坦克行动不了，于是提前开始行动。这一提前行动没有通知杨伯涛，等杨军长听见人声鼎沸走出掩体瞭望的时候，发现西北方向一片乱军，这才知道黄维和胡琏已经跑了，于是他也立即开始了逃亡。

杨伯涛和一一八师师长尹钟岳指挥身边的部队左突右杀，始终找不到一个可以冲出去的缺口，事先准备为他们冲锋开路的那位“最勇敢的营长”一上去就被打死了。双堆集内剧烈的枪炮声似乎已经减弱，黑暗中到处是“缴枪不杀”的喊声，尹钟岳试图向十一师突围的方向靠拢，却发现一路都是十一师被打散的溃兵。追击十一师的解放军官兵迎头冲过来，杨伯涛跳进了一条小河中——“我在没有没顶的水中感到水寒彻骨，便急忙挣扎上岸，走了不到一百公尺，冲出一队解放军，上来两个战士将我左右挟住，急走十余里，到一个指挥部给我烤火烤衣。我不加隐讳，自报姓名军职。”

一一八师师长尹钟岳在混乱中被俘。

十师师长王元直逃出战场十余里之后，发现依旧无法逃出解放军和民兵的搜索，绝望之中吞下了十几片安眠药，昏倒后被解放军官兵发现，经紧急救治后苏醒。

突围前，黄维和胡琏也准备了安眠药，准备不能脱身的时候自杀。

他们还相互约定：谁侥幸逃出去，谁就负责照顾两家的家属，同时负责一切善后事宜。

他们乘坐的坦克几乎是疯狂地开着，但是开了不久之后就坏了，黄维和胡琏只有跳下车各自逃命。

中原野战军三纵特务营教导员范天枢，十五日晚带着几名战士在战场搜索。黑暗中，通信员桑小六发现一个人躺在地上。这个人戴着钢盔，穿着全新的细布棉军衣，上衣左口袋边上挂着一只指北针，右口袋边沿插着两支钢笔。桑小六掀掉那人戴的钢盔的时候，那人用手护了一下，范天枢上前看见那人手腕上戴着的那块手表“又大又亮，想必十分贵重”。

范天枢问：“你是干什么的？”

那人回答：“八十五军军部上尉司书方正馨。”

范教导员心想，这人至少应该是个师长。

“上尉司书方正馨”被送到旅部之后，由旅敌工科长宋禹负责审问。

“方正馨”坚持说自己是上尉司书，并说自己民国十七年当小学教员，“当了六年教员，一年科员，以后就出来当兵了”。

宋禹科长笑起来：“就算你民国十七年当教员和科员，那才到民国二十四年，现在是民国三十七年，你还有十三年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晚上，宋禹科长将“上尉司书方正馨”和在马围子村被俘的国民党军第十军十八师五十二团团长唐铁冰关在了一间屋子里。半夜，解放军卫兵听到唐铁冰说：“你怎么也被俘了？”“上尉司书方正馨”紧张地说：“不要多说话。”

第二天，宋禹科长问唐铁冰昨晚的事，唐铁冰不承认他说过什么话。宋禹严厉地警告他说：“你还是多替自己想想吧！”

俘虏要往后转送了，唐铁冰吞吞吐吐地报告说：“长官明鉴，他确实不止是个上尉，他好像是我们的兵团司令官。”

纵队敌工科燕科长来了，把被俘的第十八军副军长兼十一师师长王元直和黄维同时找了来，两人一见面，王元直愣了一下。

“上尉司书方正馨”写下了一份“如姓名职务不符，愿受枪毙”的保证书。

他被带走之后，燕科长问王元直：“他是不是黄维？”

王元直犹豫了一会，低声说：“有点像。”

最后，燕科长和宋科长把特务营战士李永和叫到了“上尉司书方正馨”面前——李永和是解放战士，过去曾给黄维当过十几年的马夫——两位科长看着“上尉司书方正馨”把那份“愿受枪毙”的保证书撕了。

黄维说：“我是黄维。”

从蚌埠出发前往解救黄维兵团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军刚走过一座铁路大桥，就看见前面有个人坐在一辆破旧的牛车上摇摇晃晃地驶过来——牛车上坐的，正是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官胡琏。

胡琏对第二十军的军官们说：“部队搞光了，你们不要去了。”

“对黄维兵团之作战，从十一月十八日阻击作战始，至十二月十五日全歼黄维兵团止，共经二十八天。整个战役过程概分三段：从十一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为阻击作战的第一阶段；从二十四日夜我全线出击到十二月二日止为完成包围，紧缩包围，准备攻击，及对付敌人攻

击的第二阶段；从三日夜起至十五日夜为对敌攻击并全歼敌人的第三阶段。”——此次作战，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歼灭黄维兵团“四个军十一个整师共十万余人”。攻歼主力部队中原野战军伤亡三万余人。

十五日这天，滞留在蚌埠的美国青年记者西默·托平在铁路大桥边，看见李延年和刘汝明两兵团掉头后退：“他们的坦克和卡车队轰隆隆地驶过铁路大桥，紧随其后的是长长的步兵队伍，全部撤到了淮河南岸的安全地带。”

西默·托平知道黄维兵团定是已经覆灭，他开始关注淮海战场上另一位被围困的国民党军将领杜聿明：

徐州守备军的残部、杜聿明麾下的第二、十三、十六兵团和坦克兵团，在西撤时遭到了共产党的顽强阻击。绝望中，最后他们在蚌埠西北约一百英里的永城镇停了下来，构成了一个防御圈。至此，他们撤离徐州后仅仅行进了六十英里的路程。在环形防御的边缘，杜聿明部下刨开冰封的土层，将美式六轮大卡车深深地埋在褐色泥土里，然后在车后面修挖堑壕和散兵坑。坦克和大炮被拖到中心地带为环形防御增加火力掩护。随同部队一起南下的士兵家属、政府行政官员、学生以及其他平民则蜷缩在防御圈内，遭受寒冷的冬月雨雪的折磨。

对于杜聿明来讲，接到黄维兵团全军覆灭的消息时，他内心的寒冷远甚于旷野上呼啸的寒风。

# 第十四章 淮海战役：勇敢地向前进

## 战争罪犯的名单

十二月十六日上午，国民党军第八军军长周开成被兵团司令官李弥叫了去。

李弥先给周开成两筒加力克香烟，然后交给他一封陈毅写的劝降信。周开成看了之后说："现在一无饭吃，二无弹药，怎么打仗呢？今天上午有人报告，说共军部队都换成了民兵，是否把野战部队调到双堆集解决黄维去了呢？"

李弥说："黄维已经完了。"

周开成十分惊愕地看着李弥，不知如何是好。

几个小时之后，刘峙从蚌埠给杜聿明发来电报："黄维兵团昨晚突围，李延年兵团撤回淮河南岸。贵部今后行动听委员长指示。"

接着，蒋介石的电报到达："第十二兵团也已突围，弟部须以积极手段求匪弱点予以击破，并向外扩展，以求脱离包围，总之弟万不可固守一地，坐待围困也。"

杜聿明说："我接到这个电报后，心中完全凉了。"

杜聿明心情之恶劣，已不在于黄维兵团的覆灭，而在于李延年兵团的回撤。因为这明白无误地表明，蒋介石已决定让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自生自灭。杜聿明实在想不明白，如果决定突围，为什么不双方同时行动？先是只顾徐州不顾黄维，后又只顾黄维不顾邱清泉和李弥，现在黄维已被歼灭，解放军完全可以全部移至陈官庄战场。杜聿

明再次致电蒋介石陈以利害，强烈建议迅速从武汉和西安抽调大军，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实现淮海战场的两军决战。杜聿明认为，只有这样也许还能扭转战局。

晚上，杜聿明的电报到达南京的时候，南京国民党军空军俱乐部礼堂灯火通明，蒋介石正在为执行“徐蚌会战”轰炸任务的空军有功人员颁发嘉奖令。突然，一声巨响从天而至，一颗重磅炸弹在俱乐部旁边爆炸了，蒋介石立即在警卫的护卫下匆匆离开。炸弹是从一架B-24轰炸机上投下来的，投弹者是第八大队飞行员俞渤等五人。这几名国民党空军飞行员早就有投奔解放军的想法，当他们得知徐蚌战场上黄维兵团已被全歼的时候，决定一不做二不休驾机起义，先把炸弹扔在蒋介石的脑袋上。炸弹虽然投偏了，但爆炸声引起南京城的巨大混乱，全城彻夜戒严。俞渤和他的同伴计划直飞沈阳，由于天气不好，且油料准备不足，只好在石家庄机场迫降。机组人员一下飞机，就看见了机场上朝他们挥舞的无数面欢迎的红旗。

惊魂未定的蒋介石寝食难安。在长江以北的巨大战场上，东北地区林彪率领的百万大军已经入关，将傅作义集团分割包围。接着，无论如何催促杜聿明和李延年南北对进解救黄维，但黄维还是无法支撑下去，第十二兵团的十二万人顷刻间灰飞烟灭。黄维被歼之后，不但杜聿明的两个兵团处境迅速恶化；更严重的是，如果长江以北的战事全部崩溃，南京就在长江边上，毛泽东是否会一鼓作气直取自己所在的南京城？蒋介石已经无暇顾及杜聿明了，决定马上收缩兵力，以确保长江防线的安全。

蒋介石连续致电刘峙，强调对淮河和长江的防守：命刘峙部的后方人员全部撤到长江以南；李延年第六兵团第九十九、第九十六军和刘汝明第八兵团第五十五、第六十八军以及白崇禧指挥的第四十六军担任淮河一线防御，如果遭到进攻要逐次抵抗，以争取时间将主力全

部撤到长江以南；第五十四、第三十九、第六十六军立即开赴南京，归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迅速完成长江防御作战的准备。同时，第二十八军和第五十二军也迅速退守长江一线。蒋介石严令刘峙："依淮河地嶂抵抗，非万不得已不得撤退。"

尽管黄维兵团的覆灭使国民党军长江以北的战局进一步恶化，但是，蒋介石在黄维兵团被歼的第二天就决定全面撤守淮河和长江，从而将傅作义和杜聿明两大军事集团置于完全不顾的境地，还是显得过于惊慌失措了。从当时的战场态势上看，解放军主力部队依旧面临着两大强敌，还没有时间、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即刻去突击淮河、长江进逼南京——如果支援傅作义集团作战也许显得鞭长莫及的话，匆匆将唯一可以协同杜聿明集团作战的蚌埠部队后撤，致使近在咫尺的杜聿明因此孤悬于解放军的重兵之中坐以待毙，理由是什么呢?

蒋介石的惊慌失措引起了杜聿明集团人心浮动。第五军军长熊笑三主张利用夜色组织步兵强行冲开一条血路，战车团长赵志华则主张白天突围，第五军二〇〇师师长周朗甚至主张"我们来个假投降"。而杜聿明心里知道，此时"弄假也会成真"。第七十二军军长余锦源去了兵团部，看见邱清泉正与第七十四军军长邱维达喝酒。邱清泉边喝边玩弄他那把精致的手枪，邱维达说："你手枪里不是有三颗子弹吗？"邱清泉说："最后一颗要做我的朋友。"一见余锦源进来，邱清泉提高了嗓门："你要注意啊，我俩要不是黄埔同学的话，我是很怀疑你的！我听到共军的电台里整天叫余锦源！"余锦源说："这是宣传攻势，与我有啥关系？"

十七日这天，陈官庄四围解放军的阵地上广播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广播稿上来劈头就是一句"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显然这是毛泽东的行文风格:

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李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

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十五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南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你们的飞机坦克也没有用。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人们叫做土飞机、土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十倍吗？你们的孙元良兵团已经完了，剩下你们两个兵团，也已伤俘过半。你们虽然把徐州带来的许多机关闲杂人员和青年学生，强迫编入部队，这些人怎么能打仗呢？十几天来，在我们的层层包围和重重打击之下，你们的阵地大大地缩小了。你们只有那么一点地方，横直不过十几华里，这样多人挤在一起，我们一颗炮弹，就能打死你们一堆人。你们的伤兵和随军家属，跟着你们叫苦连天。你们的兵士和许多干部，大家很不想打了。你们当副总司令的、当兵团司令的，当军长师长团长的，应当体惜你们的部下和家属的心情，爱惜他们的生命，早一点替他们找一条生路，别再叫他们作无谓的牺牲了。现在黄维兵团已被全部歼灭，李延年兵团向蚌埠逃跑，我们可以集中几倍你们的兵力来打你们。我们这次作战才四十天，你们方面已经丧失了黄百韬十个师，黄维十一个师，孙元良四个师，冯治安四个师，孙良诚两个师，刘汝明一个师，宿县一个师，灵璧一个师，你们总共丧失了三十四个整师，其中除何基沣、张克侠率三个半师起义，廖运周率一个师起义，孙良诚率一个师投诚，赵璧光（国民党军第四十四军一五〇师师长）、黄子华（国民党军第八十五军二十三师师长）各率半个师投诚外，其余二十七个半师，都被本军全部歼灭了。黄百韬兵团、黄维兵团、孙元良兵团的下场，你们已经亲眼看到了。你们应当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学习这次孙良诚军长、赵璧光师长、黄子华师长的榜样，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的唯一生路。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淮海战役的局势越演越烈，黄百韬和黄维两个兵团相继被歼，人民解放军面对的军事压力依旧存在：

首先，杜聿明虽然被重重包围，但这是由国民党军两个具有相当战斗力的兵团组成的极其坚硬的集团，而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因连续作战，除粮弹需要继续补充和官兵极度疲劳之外，部队因严重伤亡造成的减员没能来得及补充。华东野战军在给中共华东局和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经过围歼黄百韬兵团，阻击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以及追堵杜聿明集团，歼灭黄维兵团的一系列艰苦作战，部队干部伤亡

巨大，“除团以上干部可勉强维持外”，“营连干部若要补齐，至少需要五千以上”。一线作战连队干部尤其缺乏，目前大部分连队有连长没有指导员，有指导员没有连长，抑或有正职无副职或有副职无正职，“少数连队只有一个连干部”。

其次，如果立即对杜聿明集团发动全面进攻，于全国战局不利。此时，平津战役已经进行了十天，华北军区的第二、第三兵团和东北野战军的第二兵团包围了张家口和新保安，切断了傅作义集团西撤的退路。但是，东北野战军主力刚刚越过长城，对傅作义集团的完整包围尚未最后形成，特别是华北地区的出海口还没有封闭。毛泽东认为，在华北出海口还没有封堵的情况下，如果淮海地区的杜聿明集团被迅速解决，势必导致蒋介石命令长江以北国民党军仅存的军事力量——傅作义集团从海上南下逃跑，国民党军也有能力从上海调集大量船只北上接走平津之敌。如何防止这一不利局面的发生？唯一的办法就是对杜聿明集团采取“围而不歼”的战略，给蒋介石一个杜聿明也许能够生还的错觉，使其不易下定完全放弃长江以北的决心。

为“关照淮海战役与平津战役之间的联系”，毛泽东明确指出：“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指挥之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兵团［已歼约一半左右］之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并提议华东野战军“整个就现阵地态势休息若干天”，对杜聿明集团“只作防御，不作攻击”。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又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要求中原野战军“各纵迅速完成战后整备，待李延年第三次北进时担任南线防御，并准备于华野对杜聿明作战接近解决时，放敌深入，围歼其一部”。同时，华东野战军“仍应坚持十天休整计划，即使杜聿明于此时期内突围，仍以一部抗击之”。

毛泽东已决心将长江以北的国民党主力予以全歼。

毛泽东打电报给淮海战役总前委，提出：“黄维歼灭后，请刘、陈、邓、粟、谭五同志开一次总前委会，商好在邱李歼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以总前委意见带来中央。如果粟谭不能分身到总前委开会，则请伯承到粟谭指挥所，与粟谭见一面，了解华野情况，征询粟谭意见，即来中央。”——毛泽东希望刘伯承在十二月二十至二十五日能到西柏坡。

共产党领导层已经开始展望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的前景了。

蔡凹村，位于安徽萧县与河南永城间的交界处，是黄淮大平原上一个普通的村落，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就在村北一间土坯砌成的房间里。十七日晚，淮海战役总前委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这里召开。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驱车赶来，粟裕与刘伯承至少有十七年没见过面了，他特意派人去符离集买了两筐烧鸡回来。此时，歼灭杜聿明军事集团“已是稳操胜券”，将领们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着重讨论了眼下部队休整问题和未来渡江作战问题，并决定由粟裕与张震连夜起草渡江作战计划。第二天一早，刘伯承、陈毅带着总前委的意见前往西柏坡，邓小平则返回了中原野战军司令部所在地——宿县以西的小李庄。

为保障部队顺利休整，同时防止杜聿明突围而出，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调整了部署：华东野战军，以谭震林、王建安指挥第一、第九纵队和渤海纵队，以宋时轮、刘培善指挥第四、第十纵队和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第三旅，以韦国清、吉洛（姬鹏飞）指挥第二、第八、第十一纵队，为包围监视杜聿明集团的一线部队，一线部队“边围困边休整”。二线部队的休整布防位置是：第十二纵队于薛家湖、山城集和火神段，冀鲁豫第三分区两个团于夏邑，两广纵队和野战军总部警卫团于会亭，豫皖苏独立旅和野战军骑兵团位于酂阳，鲁中南纵队位于永城，第三纵队位于铁佛寺和百善，第十三纵位于马村桥，第六

纵队位于三铺，第七纵队位于萧县，第三十五军位于山城集。中原野战军，除以豫皖苏军区五个团位于淝河沿岸向蚌埠方向警戒之外，主力集结于宿县、蒙城、涡阳地区，担任战役预备队，随时准备协同华东野战军对杜聿明集团发动总攻，或阻击蚌埠方向可能来援的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

由于蒋介石命令李延年兵团撤退，包围杜聿明的华东野战军没有了后顾之忧，而这也意味着杜聿明集团已是插翅难逃。

长江以北的一次次大规模战役，已使国民党军总兵力急剧下降——“他们就像漏斗里的沙子因为伤病、死亡、投诚、起义而迅速流失”。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作战也同样会面临严重伤亡，但是其兵员补充速度令人惊讶。有资料统计，在围歼黄百韬和黄维兵团的战斗中，华东野战军共伤亡官兵七万三千三百多人，其中的一万两千七百名轻伤者经过治疗迅速归队。同时，在华东野战军各级指挥机关、后勤部门和直属部门中，非战斗人员越来越少，无论是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的参谋、干事，乃至纵队的文工团员，甚至是首长身边的警卫人员，都将到一线战斗部队作战视为无尚的光荣。他们中不少人是富有战斗经验的老战士，对参加作战有着不可遏制的激情与斗志。前线战斗激烈的时候，连村子里的百姓都上阵地去救护和支前了，他们对自己还在干机关事务和保障工作感到不自在，他们总是对传到指挥部的“阵地告急”之类的话十分敏感，一有机会就迫不及待地提出“我上去”。在华东野战军休整期间，有一千多名参谋、干事、文工团员、后勤人员下到团以下部队任职，各纵队师、团的侦察、通讯和警卫人员也大量地被充实到基层部队。那些在作战中勇敢坚强的战士被迅速提拔起来。他们个个身上伤痕累累，他们已经在部队认识了不少字，懂得了干部身先士卒的道理，他们被战士们推举出来，经过组织讨论和批准，接到任职命令后都会郑重地对战士们说：“从今以后请大家监督，别的不敢说，打起仗来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我保证做到！”

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武装也迅速被升级为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在极短的时间内，接受升级的部队官兵达十一万多人。其中十六个地方基干团全体升入野战军序列，这些基干团“均有两年以上的历史，党员占百分之三十以上”。而更为普遍的是地方民兵加入野战军。这些平日种地、战时参加边缘战斗的青年农民，对能够加入野战军欣喜万分。他们穿上解放军军装，拿起正规军的武器，顿时觉得自己骄傲而光荣。他们中间很多人已经有了妻儿，深夜跟随野战军大部队开拔的时候，妻子老娘就站在村口，他们当民兵的时候就羡慕解放军长长的队伍，现在他们也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了，于是学着野战军官兵的口吻说：“不打败老蒋不回家！”

更令国民党军将领不可理解的是，昨天还与解放军打得你死我活的士兵，很可能在被俘仅仅几个小时之后，就喊着“缴枪不杀”朝你冲过来了。围歼黄维兵团作战最艰苦的阶段，陈赓指挥的第四、第九纵队伤亡严重，“有的连一天伤亡三任连长，还有的因伤亡大，几个营并成一个营打”。陈赓提出对部队进行整编，因为“每个团与其保持三个营的架子，不如整编为两个营，战斗力要比三个营强”。十旅旅长周希汉不同意，他说：“我们这个营，原来有五百多人，连续战斗伤亡了五百多人，现在还有五百多人。”陈赓奇怪地问：“你这个账怎么算的？是不是算错了？”周希汉说：“我没算错，是蒋介石给我补充的。”那些被俘的国民党军士兵，只要放下武器和报出你的苦出身，立刻就会被好几双手握住，解放军官兵热诚地对他们说：“兄弟，你解放了！”然后，这个递过来一个热馒头，那个递过来一根纸烟，那种感觉好像不是当了俘虏，而是迷路掉队好容易才回来一样。成千上万的国民党军俘虏兵，几乎一夜之间成了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的战士。于是，连队开会的时候，一个话题总是讨论个没完没了：过去是为谁卖命？现在是为谁打仗？华东野战军里竟然出了这样的现象：打黄百韬时被俘的国民党军士兵，到打黄维的时候因作战勇敢已经成为战斗英雄，有的

甚至当上了排长、连长。周恩来说：“这种情形是世界战史上所少有。”

陈官庄附近的战场暂时沉寂了。

十八日，蒋介石派来的一架C-47型飞机在陈官庄临时机场降落，把杜聿明的参谋长舒适存接往南京。第二天，这架飞机又飞回陈官庄，从飞机上下来的除了舒适存之外，还有国民党军空军总司令部第三署副署长董明德。

舒适存和董明德给杜聿明带来了蒋介石和王叔铭的亲笔信。

蒋介石的信写得很长，大意是：一，第十二兵团这次突围失败，完全是由于黄维性情固执，一再要求夜间突围，不照我的计划在空军掩护下白天突围的缘故。十五日晚上黄维的突围毁了我们的军队。二，弟部被围后，我已想尽了办法，华北、华中、西北所有的部队都被牵制着，无法抽调，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在空军掩护下集中力量击破一方实行突围，哪怕突出来一半也好。三，这次突围，要以空军全力掩护，并投掷毒气弹。如何投掷，已交王叔铭派董明德前来与弟商量具体实施办法。而王叔铭的信写得很简单，大意是：校长对兄及邱、李两兵团极为关心，决心以空军全力掩护突围，现派董明德兄前来与兄协商一切。董明德是我们的好朋友，请将各方面考虑与明德兄谈清楚，弟将尽力支援。

参谋长舒适存告诉杜聿明：“委员长指示，希望援兵不可能，一定要照他的命令迅速突围，别的没有什么交代。”

杜聿明不愿意突围，他认为在没有增援的情况下，独自突围等于死路一条。但是，限于蒋介石的命令，又有自己不甚熟悉的董明德在场，他不得不开始协商空军掩护突围的具体方案：突围开始时，空军

出动B-24、B-25轰炸机及P-51驱逐机，每天一百架次，支援地面部队，掩护侧翼安全；步兵进入攻击位置后，发出三颗红色信号弹，飞机获得信号后，立即投下催泪性毒气弹，随即机翼上下摇摆，表示投弹完毕，地面部队趁共军视线模糊之际，一举突破并占领阵地，随后发出三颗绿色信号弹。董明德随机带来了八百多具防毒面具，空军还准备再空投两千具，空投代号被定为“草帽”。

杜聿明将师以上军官召集起来开会。为保密起见，任何闲杂人等不得进入会场。杜聿明对大家说：“总统很关心我们这些忠勇将士，为把我们救援出去，特派空军总部的董副署长来，计划用飞机掩护突围。空军在共军的上空，观察得很清楚，还可以用火力压制共军，大家只要把陆空联络信号规定好，便可以顺利突围。各将领要掌握好部队，准备行动。”接着，董明德把航空照相图挂起来，详细讲解了空军的行动计划和地空联络的要点。最后李弥问：“空军要给我们投足粮食弹药，我们还要进行防毒面具的使用练习，这需要多少时间？”董明德回答：“一个星期差不多。”

开完会，杜聿明给蒋介石写回信，他依旧向蒋介石阐明，突围是“最不可取的方式”：就目前局势而言，上策是，由武汉、西安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加上蚌埠地区的主力部队，进入淮海战场，在邱清泉、李弥两兵团的配合下，与共军决战。中策是，邱清泉、李弥两兵团持久固守，争取“政治上的时间”，而所谓“政治上的时间”，除了指国际形势的变化（蒋介石始终认定第三次世界大战要爆发）和攻击形势的变化（解放军因伤亡导致攻击力量不足）外，最重要的是国民党军不要把主力部队丢光了，以便将来万一需要与共产党人和谈的时候有资本。下策是，照令突围。

董明德和舒适存准备回南京汇报，陈官庄却突然风雪大作，飞机无法起飞。董明德和杜聿明挤在同一间屋子里长吁短叹。闲聊的时

候，董明德表示，他认为从各方面讲，仗都不能再打下去了：“你们这里被围，平津危急，北平西苑机场已失，空军损失甚大。如果你们这里无办法，平津也不保。以前还有人主张和谈，听说老头子不同意，现在无人敢谈。总之，南京现在慌乱一团，任何人也拿不出好办法。”杜聿明在绝望之中竟然预测到弄不好蒋介石会跑到台湾去：“这一战役关系国民党的存亡，在傅作义牵制着林彪大军之时，我们既不能集中兵力与刘邓决战，又不能断然主和。如果强令两兵团突围，一突就完。这支主力一被消灭，南京不保，武汉、西安更不能再战，老头子只有跑到台湾去，寄生于美国人篱下了。”董明德建议杜聿明到南京去面陈看法，杜聿明认为说什么都没有用了：“对老头子很难，他有他的看法，不会接受意见，有时接受了，他也不执行。这次战役就是未能照计划事先集中兵力决战，中途又一再变更决心，弄到现在，我去也晚了，无法挽回。”叹息不已的董明德显然比杜聿明更悲观，他说“陆军将领有钱，可以跑”。杜聿明回答：“钱有什么用？跑到国外当亡国奴……还是人重要，部队重要！”

一个被俘的李弥兵团的军官带着陈毅写给杜聿明的信回到包围圈里。这个军官显然已经吓坏了，哆哆嗦嗦地说不出来话。李弥向杜聿明报告此事，杜聿明含糊地让李弥看着办。但是，李弥坚持要求杜聿明见见那个送信的军官，于是那个军官被带到杜聿明的住处。杜聿明认真地看了陈毅写给他的信。信的开头很客气，后面口气越来越硬，信中有这样的话：“你为什么为‘四大家族’服务，不为人民服务？”杜聿明顿时一头雾水：共产党说的“四大家族”是指什么？但是，他明白什么是“为人民服务”。杜聿明想的是，如果共产党方面能够保全他的部队，他可以考虑同意陈毅的劝降条件。

杜聿明拿着信去试探邱清泉的态度。邱清泉只看了一半，一句话没说就把信扔进火盆中了。杜聿明也没再说什么，离开了——“这次在包围圈中，邱大事小事都请示我，还算搞得不坏，但还未到谈心的程

度。这件事邱不同意，我就无法做。弄得不好，反而事未成而身先死，并落个叛蒋罪名，我觉得太不值得。”

李弥与邱清泉是性格完全不同的人。

杜聿明一直认为，邱清泉是蒋介石派来牵制他的，因此对邱清泉格外小心。而李弥虽然喊打喊冲的时候少，但与杜聿明更亲近一些，只是他的一个要求令杜聿明很不理解——李弥要求把第六十四军的番号给他的第十三兵团。第六十四军原隶属黄百韬的第七兵团建制，一个多月前，这支部队在碾庄圩被华东野战军全歼。没人知道李弥为何想起这码事——在危在旦夕的围困中，李弥竟然依旧热衷于扩充实力，这种军阀式的贪心和野心已经畸形到了令人费解的程度。杜聿明真的把第六十四军的番号给了李弥，李弥在缺衣少食的包围圈里开始大量提拔和任命这个军的各级军官。他将第九军副军长李荩宣提拔为第六十四军军长，然后把他的亲信们一一都安排了职务，从正、副师长，正、副团长一直到正、副营长，正、副连长。官都任命完了，兵从哪里来？于是以一支跟随部队的地主武装为基础，加上抓捕和收容游荡在包围圈里的散兵，最后勉强凑了大约四千多人。只是，李弥任命的师长和团长们还没来得及上任，陈官庄就被华东野战军攻破了，倒霉的国民党军第六十四军再次被歼灭。

邱清泉情绪多变。有时他表现出不客观的乐观，在他的军官们面前总是一副不在乎的样子：“何必这样悲观呢？即使将来真正总崩溃，几十万散兵游勇如潮水般地向外流，鱼还会有漏网的，难道我们就不能混出去吗？何况我们打败了，还可以到大别山区打游击呢！”但是，有时他又破罐子破摔，他对他的参谋长李汉萍说：“现在情况已到了绝望的关头，不能不准备万一。将来我万一战死后，你是参谋长，可以代替我指挥。在你指挥时，也要和我一样，指定代理人，免得在情况紧急时无人统一指挥作战。我今年已经四十八岁了，看也看够了，玩

也玩够了，什么都享受过，就是死也值了！”李汉萍的描述是：“邱清泉判断解放军必将发起大规模歼灭战，自己已死在眉睫，因此情绪更为悲观。一连几天，带着后方医院女护士陈某到各军去饮酒跳舞，每天醉醺醺地回来后蒙头大睡，万事不管。”即使邱清泉已处在醉生梦死的状态，他也没有放弃从包围圈中突出去的企图。

二十八日凌晨二时，邱清泉部的一个师与华东野战军八纵的一个团在蚌埠北面的刘集村激战一夜。八纵十二师二营已伤亡殆尽，只剩下预备队五连六班的七名战士，班长名叫王道恩。王道恩决定带领身边的战士，向当面企图突围的敌人发动攻击，尽管阵地前的敌人数量是他们的两百倍。

七个战士分成两个小组，分两路摸进村子，很快就发现敌人的一个炮兵阵地，看样子是个炮兵连。王道恩向两个小组做了个手势，突然大喊：“蒋军兄弟们！你们被包围了！放下武器！缴枪不杀！”一个敌人开了枪，子弹擦着王道恩的耳边飞过去，王道恩一个点射，射倒了几名试图抵抗的敌人。“谁反抗就打死谁！”刚刚占领村子的国民党军弄不清楚到底来了多少解放军，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一个军官说：“别打！我们投降！”但是，那个军官迅速地弯下身，拿起一挺机枪就要射击，被王道恩即刻开枪打倒。在受伤军官的呻吟声中，一百多名国民党兵举起了手。

迅速地处理俘虏之后，国民党军的反击开始了，数百名敌人在漆黑的夜色中蠕动，曳光弹的光亮下，成片的钢盔寒光凛凛。

七名战士都上了刺刀，准备一死。

王道恩决定还是主动发动攻击，而且要朝着敌人的核心工事猛打猛冲。核心工事是一条环形的战壕，王道恩和战士们一起扔出手榴弹，然后往战壕里冲。敌人顺着战壕向后跑，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

六班带的手榴弹很多，足有几大筐，仅王道恩一个人就扔出了百十来颗，最后打得战壕里的敌人直叫喊着要投降，六班的战士端着刺刀扒拉着数数，又是一百多人。

七个战士兴奋极了，接着向村子西北角敌人最后的阵地开始攻击。这是一个梅花形的子母堡群，最大的堡垒直径有十五米，敌人的师部就设在里面。攻击开始的时候，大小地堡里的机枪同时射击，弹雨横飞，打得六班战士根本抬不起头来。一个战士在弹雨中慢慢往前爬，爬着爬着回头指给王道恩看："班长！他们在这里！"黑暗中，王道恩看见了敌堡群前面的一块空地上密密麻麻地躺着一片尸体。这是突击队六连，昨晚激战的时候，从连长到战士全部倒在了这里。

七个战士就是为了报这个仇冒死发动攻击的。

但是，看见眼前的情景，他们还是哭了。

王道恩，沂蒙山里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在村里庆祝日本鬼子投降的锣鼓声中，他参加了八路军。他上过几年小学，还在八路军开办的识字班学习过，懂得些道理，加上作战勇敢，很快就成为华东野战军中有名的战斗英雄。这次参加反击邱清泉兵团突围的战斗，领导让他的六班当预备队，他很有点不服气。但是，当敌人占领了刘集村的大部分阵地，上去的连队没有一个人下来时，他牙咬得咯咯响。王道恩问六班的战士有没有胆子发动反击，大家都说这回死就死了，兴许能把阵地夺回来。

王道恩说，敌人根本不知道咱们只有七个人，干脆就朝那个大母堡打，打他个天翻地覆。于是大家再次准备手榴弹，包括自己携带和从战场上收集的，个个身上都挂满了，大筐里也装满了。王道恩一声令下："投！"七个人的手榴弹一颗接一颗地飞出去。最终，硬是将敌人设置在母堡前的防御线炸开了一道缺口。七个战士并排往上冲，敌

人的机枪盲目扫射，战士们左躲右闪，他们爬上了母堡的顶部，一齐往射击孔里塞手榴弹。母堡里发出沉闷的响声，然后，一支枪挂着条白毛巾伸了出来。接着，三挺重机枪、六挺轻机枪和一支接一支的步枪跟着扔了出来。

天亮了。刘集村内的敌人大部分被消灭。

王道恩的六班的战果是：毙伤敌人两百七十人，俘虏六百多人，缴获轻重机枪三十九挺，步枪七百多支，迫击炮九门。

令人惊奇的是，六班七名战士竟无一人伤亡。

二十岁的班长王道恩荣立“一等战功”和二级“战斗模范”称号。

二十九日，陈官庄上空湿冷的云层终于裂开一道缝隙，在包围圈里等得心急如焚的飞行员起飞了，董明德带着杜聿明写给蒋介石的信也随机飞走了。接着，空投的飞机飞来了，投下的既不是粮食也不是弹药，而是上万份“黄百韬烈士纪念册”和南京印刷的《救国日报》。被围困在陈官庄的国民党军官兵看见这些东西不禁朝天大骂，都说老子要吃饭！杜聿明的副官捡着一张《救国日报》，只看了一眼便面色惨白，回到指挥部，他小心地将报纸递给杜聿明。

杜聿明先看见了“战争罪犯”这几个字，接着，“杜聿明”三个字赫然入目。

新华社陕北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电：

此间各界人士谈论战争罪犯的名单问题。某权威人士称：全部战争罪犯名单有待于全国各界根据实际情形提出。但举国闻名的头等战争罪犯，例如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孙科、吴铁城、王云五、戴传贤、吴鼎昌、熊式辉、张厉生、朱家骅、王世杰、顾维钧、宋美龄、吴国桢、刘峙、程潜、薛岳、卫立煌、余汉谋、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杜聿明、汤恩伯、孙立人、马鸿逵、马步芳、陶希圣、曾琦、张君劢等人，则是罪大恶

极，国人皆曰可杀者。应当列入头等战犯名单的人，自然不止此数，这应由各地身受战祸的人民酌情提出。人民解放军为首先有权利提出此项名单者。例如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在作战中施放毒气，即已充分构成了战犯资格。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皆有权讨论和提出战犯名单。

蒋介石接到杜聿明的复信后，回电："听说吾弟身体有病，如果属实，日内派机接弟回京医疗。"杜聿明复电蒋介石："生虽有痼疾在身，行动维艰，但不忍抛弃数十万忠勇将士而只身撤走。请钧座决定上策，生一息尚存，誓为钧座效忠到底。"即使为了一个军人的名声，杜聿明也不能一走了之——"遗弃官兵，落得万人唾骂，不如继续守下去。"况且，他已经被列入了"战争罪犯的名单"。

万分绝望的杜聿明发现，一九四九年的新年到了。

## 将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鲁中南报》刊登快板书《见面》：

太阳出来红彤彤，

满地白霜无迹踪。

一夜行军一百二，

前面来到永城东。

追上主力老大哥，

一见就像亲弟兄。

相亲相爱把手拉，

满脸喜得笑融融。

同志说：

"你们送面又送米，

保证前线大胜利，

跋山涉水多辛苦，

可得好好把功评。”

民工都说：“别客气，

论功同志数第一。

不管民工和主力，

打仗支前都是为自己，

彻底消灭蒋介石，

争取全国大胜利！”

一位五十五岁的支前担架队员离开家乡已经一个多月了。黄淮大平原上，冬天清寒湿冷，老担架队员再一次转运伤员回到民工营地后，眼睛里布满血丝。急救所长给他量了体温，摄氏三十九度半。急救所长很吃惊，因为这位老担架队员每天都像年轻人一样跑很远的路，从没有听他说过哪里不舒服。急救所长要求他全面检查一下，脱下他用布条缠着的鞋子，才发现他的双脚已经红肿，十个脚趾完全溃烂，渗着脓水。急救所长要求老担架队员立即住院治疗，但是他没有答应，他慢慢走回民工住的草棚里，在铺草上躺了下来。

在担架队里，没人知道他的身世，甚至不清楚他的名字，只知道他是一个穷苦的老汉。

一个月前，解放军的大部队到达淮海战场边缘的一个小村庄，住进村庄里最贫苦的一位老汉家里，那阵子官兵们都亲热地叫他“老大爷”。老汉听村里人私下里议论过，说穷人的苦日子就要熬到头了。当了积极分子的那帮穷哥们儿，帮着工作队建立民兵武装，帮着村干部斗地主分田地。他们把他领到地主家的地头，说这块好田从此归他了。他从十六岁起就在这块地里干活，熟悉这块地里的每一粒泥土，

那天，他手里攥着一张很大的地契，在地头上蹲了大半天，总觉得自己是在做梦，又总怕梦醒时地没了。解放军的战役打响了，村里组织支前队的时候，人们发现他已经准备妥当：身上穿的是从地主家的箱子里翻出来的新棉袄新棉裤，脚上是工作队分给他的一双厚实的黑布鞋，腰间系了一条很宽的布带子，上面插着支烟袋，挂着一只碗，还斜背着一条米袋子。他扎的绳索担架床很结实，上面铺着一张狗皮以及一件高粱叶和茅草混编的蓑衣。村干部和工作队的同志都说前边敌人的子弹不长眼睛，劝他在家里好好种自己的地。他说如果没有共产党和解放军，他这辈子都不会有自己的土地，也不会穿上一件新棉衣。最后，他被编入从二线救护站往后方急救所转运伤员的担架队。这可不是个轻松的活儿，早上天不亮就从营地出发，天黑了才能回来。他抬担架抬得仔细，天黑路滑，他一步步走得很小心，生怕担架上受伤的同志再受一点疼。遇到国民党军飞机轰炸，他就整个人趴在伤员身上。他从家里带出来的那只碗，成了伤员的尿壶和便盆，他把碗伸进担架上的棉被里时总是说："孩子！大爷接着呢！大爷不嫌弃！"要是遇到重伤员，他和他的同伴走再多的路都不歇脚，抬到急救所的时候，他总是坐在地上喘粗气。他脚上的那双黑布鞋早就磨烂了，脚上的血和泥土粘在一起，已经没有了脚的模样。在铺草上昏沉沉地躺了三天后，老汉听见身边的乡亲们说，队伍在前边打了大胜仗，上级决定这支担架队的队员复员回家。他爬起来就走。急救所长让他留下来治疗，他怎么也不愿意，说心里一直惦记着分给他的那块地。急救所长赶忙去给他找药，回来的时候发现老汉已经走了。

从前线走回老家，老汉冻伤的双脚上那黑炭般的颜色蔓延到了膝盖，回家的最后一段路他是一点点爬着向前的。

到家的第五天，老汉死了。

徐乃祯老汉去世的时候，一九四九年的新年刚刚过去。

那些被他从前线转运到急救所的解放军官兵，那些在残酷的战争中因为他而获得救治得以活下来的解放军官兵，终生都不会忘记河南商水县固墙乡胡吉村的这位贫苦老汉。

淮海战役，对于此前从来没有发动过如此规模作战的共产党一方来讲，支撑战役能够进行下去的战场消耗，其数量之巨大令他们十分吃惊，也让他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淮海战役打响十六天后，中央军委致电中原局、华北局、华东局：

……现据华东局皓（十九日）电报告：在这六个月中，前线参战部队和民工近百万人，每月需粮约一亿斤。从十一月份起，华东、华中已筹粮二亿五千万斤，但用到前线上的，因距离远，只有二亿斤，今后仍将筹粮南运。惟距离六个月需要，相差甚大，需要中原、华北分担这一大量粮食的供应……现决定中原局应速令豫皖苏分局立即动手筹集和保证中原野战部队及华野转入豫皖苏地区作战部队的粮食，并应从豫西运粮食去。华北局应速令冀鲁豫区调集一亿斤至一亿五千万斤粮食，供给华野部队需要……

淮海战役打响十九天后，中共华北局致电冀鲁豫区党委：

……淮海战役正在胜利展开。准备在徐蚌地区再歼灭敌军四十五个师，以利今后突破长江防线，进兵江南，彻底摧毁蒋介石统治的中心。因此需要筹足大量粮秣，指定由华北区拨给华野粮食一亿至一亿五千万斤。我们已复电同意，由冀鲁豫拨运小米一亿斤。此事关系革命战争胜利者至巨，希速筹划，并准备组织运输，待命调拨，万勿延误……

淮海战役打响四十天后，华东野战军致电华东局：

……战役第二阶段，中野和华野全军进入豫皖苏三分区，战场吃粮人数约计一百三十万，其中中野主力及地方部队二十万，随军民工五万，后方临时转运民工十五万；华野部队及新兵、俘虏共五十万，随军民工二十万，后方转运民工二十万。另有马匹四万，抵十万人消耗。每人每日以二斤加工粮计，每日共需加工粮二百八十万斤。据此，一个月共需加工粮八千四百万斤，合毛粮一亿一千余万斤……据估计冬季下雪，交通运输困难，必须预将一个月过冬粮食筹集，并于一月十日左右运到适当地点，军食始得无虞……

据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兼后勤司令员刘瑞龙写给淮海战役总前委的报告显示：仅就粮食而言，至一九四八年底，战役发动后五十天消

耗约两亿两千万斤，其中山东供粮八千万斤，华中供粮七千万斤，豫皖苏供粮六千万斤，冀鲁豫及豫西各供五百万斤。按照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人数，加之“新兵、俘虏及常备临时民工一百三十万人统筹”，以四个月计，还“需吃粮三亿一千二百万斤”。除了粮食之外，支持战争需要的还有众多的物资，包括弹药、柴草、马料、木料、铁器、被服、担架、医疗用品和通讯器材等等。十二月三日，华东野战军致电华东局：

……此一战斗规模甚大，除对蚌埠警戒之六纵及归中野指挥之三个纵队外，我所有兵力全部展开，我们将尽力完成军委所予歼灭邱李孙之任务。为保持炽盛火力与连续作战……请军区急送八二迫炮弹三十万发，山炮弹五万发，炸药三十万斤［并附足够导火索雷管］，到徐州以东大湖车站，我们派仓库接受……

如此巨大的作战物资，主要的运力却是人，是在淮海战场那片广阔的土地上一心支持共产党的老百姓。东起黄海之滨，北到山东渤海，南至苏北江淮，西到豫西山区，支前的男女老少负载着规模巨大的战争所需要的每一样东西，一步不离地跟在解放军作战部队的身后，支持着前线每一分每一秒钟的攻击或者坚守。据战后的统计，淮海战役期间，山东、中原、华中和冀鲁豫四个地区，共出动支前民工五百四十三万人，其中随军常备民工二十二万人，二线转运民工一百三十万人，后方临时民工三百九十一万人。这些支前民工携带着二十万副担架、八十八万辆大车小车、三十万副挑子、七十六万头牲口奔走在前线与后方之间。

山东出动的支前民工，根据任务的不同分成三种，即随军常备民工，每期三个月；二线转运民工，每期一至三个月不等；后方临时民工，每期一个月。这些操着山东口音的青年农民，在通往战场的平原与丘陵之间走成了一眼望不到边的人流。他们为每个作战纵队备有随军行动的担架五百副，每副担架配备民工五人，还准备了七千五百副备用机动担架。他们开辟出四条运送伤员的主要路线，每条线路上隔三十里设一小站，隔六十里设一大站，各交通路口都有服务点，大量

的伤员被裹在棉被里，不断地变换着担架，一站接一站地转送下去，最后安置在后方野战医院或者农民们家中暖和的炕头上。山东民工运送粮食弹药和各种物资的路线多达七条：由临朐经临沂、郯城到新安镇和睢宁；由日照、沭水、大兴庄、陈镇到新安镇；由诸城、莒县、井家店到郯城；由曲阜、邹县、滕县、枣庄到邳县；由曲阜以东绕泗水、平邑、向城转向台儿庄、贾汪；由临沂的丰程镇、磨山、道河站、土山至双沟；由新安镇向西经炮车、运河站、曹八集到徐州，然后再到萧县、瓦子口、大吴集。一位名叫唐河恩的山东支前农民，手里拿着根从家乡带出来的竹棍子，在连续五个月的支前途中，把经过的每一站的地名都刻在竹棍上。他和他的运输队跋山涉水，行走千里，等把粮食完整无缺地交到解放军手里的时候，他的竹棍上已刻有八十八个城镇和乡村的名字。

苏北地区的支前民工，由于跋涉在淮海战场与国民党控制区之间，常常遭到敌人飞机的轰炸，于是每每只能在夜里出动。小推车上挂着小油灯，成千上万盏小油灯在漆黑的原野上形成一条延伸数十里的亮线。在一次运送大米的过程中，原来的目的地是宿迁，等这条亮线延伸到那里之后，部队已经向前推进了，于是亮线继续延伸，延伸到睢宁还没追上，延伸到符离集还是没追上，最后一直延伸到了濉溪口。这时候，民工们的鞋子已经全磨烂了。在此之前，这些青年农民从来没有出过远门，支前让他们离开家乡已经有七百多里，而且他们还要走回去。

被运到战场上的每一粒粮食，都是百姓们用最原始的石磨磨出来的。由于所需数量巨大，淮海战场周边各省的乡村里，妇女、儿童和老人点灯熬油，日夜不停地碾米磨面。妇女们还要为前线缝制军衣和军鞋，上百万双鞋出自不同女人之手，由于各地风俗不同，各种各样的厚底大布鞋源源不断地送到解放军官兵手中，那些鞋帮上绣着鲜艳的花朵、鞋底上纳着“杀敌立功”字样的军鞋，让官兵们无论如何都舍

不得穿，直到他们牺牲的时候还别在腰间。妇女们常常遇到紧急任务，比如突然要缝制几万顶军帽，说是前线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兵自愿参加解放军后要求戴上一顶这样的帽子，于是几十个村庄里油灯又是几夜未熄。

沉重的弹药把民工们的小推车压得吱扭扭地响。前线宁可吃不上饭，就怕弹药断了供应。后方人员筹集的炮弹、子弹、炸药、手榴弹和各种枪支，在各个转运站内堆积如山，等待装车的民工们排队排出去几十里地。一辆小车有时只能装两颗炮弹，但只要装上车，民工们就把它们当成宝贝，用自己的棉被和棉衣盖着，然后一路呵护，送到前线时尽管已经精疲力竭，还是不愿意走，非要看着自己运来的炮弹如何被推进炮膛打到敌人的阵地上去。他们为能运上去一箱子弹或一箱手榴弹感到很自豪，对身边那些车上装着油盐蔬菜的民工说起话来很是骄傲，而那些民工们说，你那些是给老蒋吃的，我们这些是给咱大军吃的，谁也别饿肚子！

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此前没有如此大规模战役供应的经验，但是，他们不缺乏动员群众的经验。动员的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告诉百姓解放军为什么打仗。中国的贫苦百姓也许和杜聿明一样，并不知道“四大家族”指的是谁，但是，他们知道村子里的地主恶霸是谁就足够了。他们眼看着共产党的工作队来了，那些欺压盘剥百姓的人威风扫地了，而且他们分到了世代梦想的土地。他们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他们相信这句话的真实性，因为他们亲眼看见老蒋的军队确实不行了。很少有人意识到，有着支前经历的数以百万的农民，是一股多么巨大的宣传力量。当他们从战场上往回走的时候，见到国民党军的俘虏队伍就会停下来问：“啥地方的？在家给地主干过吗？受过欺负吗？把帽子换了吧！”一回到村里，支前民工个个都成了见过世面的人，他们会对村民们说：“‘人’是什么？就是叉开两腿站着，顶天立地地站着！”

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被俘后看见的情景令他终生难忘：

第十二兵团十一月由确山出发，经过豫皖边境时，老百姓逃避一空，几乎连个带路的向导都找不到……蒙城、永城一线，第十八军也光顾过，真有“军行所至，鸡犬为空”的模样。我那时还认为黄河改道冲洗，造成一片荒凉，再加上双方拉锯战，更使人烟稀少……这次我当了俘虏，被解放军由双堆集附近押送到临涣集集中，经过几十里的行程，举目四顾，不禁有江山依旧，面目全非，换了一个世界之感。但见四面八方，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行人如织……我从前也打这些地方经过，茅屋土舍，依稀可辨。只是那时门户紧闭，死寂无人。而这时不仅家家有人，户户炊烟，而且铺面上有卖馒头、花生、烟酒的，身上有钱的俘虏都争着去买来吃。押送的解放军亦不禁阻，他们对馒头、花生是久别重逢……还看见一辆辆大车从面前经过，有的车上装载着宰好刮净的肥猪，想是犒劳解放军的。我以前带着部队经过这些地方时，连一撮猪毛都没看见，现在怎么有了，真是怪事。通过村庄看见解放军和老百姓住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有的在一堆聊天欢笑，有的围着一个锅台烧饭，有的同槽喂牲口，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与军装制式不同外，简直分不出军与民的界限……我们这些国民党军将领，只有当了俘虏，才有机会看到这样的场面……

民心所向是什么?

是代表人民的利益，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

是不横行乡里，不草菅人命，不横征暴敛，不贪赃枉法，不独裁专制。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无论是对于正在夺取政权，还是正在巩固政权的所有政治集团而言，这是必须牢记的。

一九四八年冬，在淮海战场上，共产党人和老百姓一个大缸里喝水，一个锅台上做饭，一张热炕上睡觉；老百姓则倾其所有，不畏战火，甚至不畏牺牲，心甘情愿地支持共产党人。而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那些经历着一场又一场残酷战斗的子弟兵，更是与这片土地上最广大的贫苦百姓血脉相连，生死相依。山东来的支前民工回家的时候，有不少人是从徐州乘坐火车回去的。当浩浩荡荡的民工队伍走进徐州城的时候，街道上挤满了欢送他们的解放军官兵。在中山路附

近，街道中央矗立着一座“胜利门”，民工们兴奋地一一从门下通过。徐州市民看见不少民工身上穿着从战场上缴获的国民党军的大衣，都说：“看这样子，‘中央军’真的完蛋了。”民工中绝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坐过火车——他们高兴地说：“坐火车回家过年，多美！”

“一九四九年的元旦，并没有给蒋介石带来任何欢乐。”

南京城里，“大人先生们一反往例，谁也不敢擅离职守去上海寻欢作乐，秦淮河歌声虽炽，但官僚们敛足不前。”

陈官庄包围圈里，每天至少需要粮食肉类等二百四十吨，弹药和其他各类物资一百六十吨。总计四百吨的数量，每天需出动飞机一百二十架次。国民党军空军的两个空运大队都不够用，还要租用美国人陈纳德开设的航空公司的飞机。同时，必须调动所有水陆交通工具，日夜不停地从各地向南京大校场机场运送物资。一九四九年元旦前后，通往机场的公路上车辆往来如梭，南京城上空飞机一架接着一架，国民党军联合勤务部、空军和国防部第三、第四厅联合指挥，为空投陈官庄忙碌的人员达万人以上，动员规模在国民党军的空投史上尚无前例。蒋介石要求，必须把空投的数量和杜聿明实际接收的物资数量，每天列成详细的报表送到他的侍从室。但是，这两个总数总是无法吻合，无论蒋介石如何训斥，就是无法查明具体原因。

杜聿明的参谋长舒适存的报告是：“陈官庄的骑兵变成步兵，马早已吃光了。陈官庄能烧的都烧光了，木桥和棺材也光了，大米猪肉无法煮熟，需要的是大饼和罐头，希望投大饼时用投物伞，免得碰到地面都成了碎末。陈官庄有大小两个投物场，投下物品时，部队、家属都抢，有的被物品压死，有的在争夺物品时相互对打，有的开冷枪射击。”

为了把空投的大米猪肉改为大饼罐头，南京城内外，包括句容、汤山等地，凡是制作大饼和饼干的工厂和作坊被迫日夜生产。为了查清空投数量与杜聿明实际接收数量不符的真实原因，国民党军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陪同蒋经国亲自飞到陈官庄上空查看。蒋经国从空中看下去，陈官庄简直就像个光怪陆离的大市场，到处是各色降落伞搭起的帐篷，各色人等来来往往，壕沟外围却是死寂一片。飞机在一千公尺的高度试着顺风空投，发现只有一半左右的物资能够落在陈官庄预定的空投场内，其余的都落到了壕沟外围。蒋经国让飞行员飞低一点再投一次，飞行员说解放军的对空射击很厉害，损失一架飞机，不知能顶多少麻袋大饼和饼干。

更令蒋介石不安的是，各方要求他下野的呼声越来越高。

坊间流传，有人向美国政府吹风说，鉴于蒋介石已经失去民心，应当迫使其交出手中的权力，或许可以重开国共之间的谈判。蒋介石一听到风声，立即派张群约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想探听一下美国政府的态度。司徒雷登直言不讳地告诉张群，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蒋委员长是结束战争的主要障碍，应该削除他的权位，而中国人民的思想和要求是美国制定政策的主要因素”。

在这种形势下，推波助澜的角色登场了，这就是一直令蒋介石如鲠在喉的桂系。白崇禧通电要求国共间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建议邀请美、苏、英三国共同斡旋中国和平。副总统李宗仁接着提出，和平的前提之一是蒋介石下野。桂系认为，蒋介石在政治上已经人心尽失，军事上已经山穷水尽，到桂系出马维持局面的时候了。况且，如果让毛泽东打过长江，不但蒋介石彻底完了，桂系也必定自身难保。白崇禧暗中指使心腹联络桂系旧部，并准备采购武器壮大力量，还派人到香港和上海秘密试探共产党方面对重开和谈的态度——桂系的和谈只是为了拖延时间，他们希望在整备桂系军力后，加上蒋介石残存的力

量，与共产党方面讨价还价，以争取桂系能够占据半壁江山的最好结果。

但是，实现和谈的首要的条件是蒋介石下台，因为不但蒋介石不肯和谈，共产党方面也不会与蒋介石和谈。

白崇禧找来了宋希濂，话说得开门见山：

现在的形势已经变得更坏，黄维兵团十多万人已经被全部歼灭。这样，共军的力量更增大了。杜聿明所率的那三个兵团恐也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消灭。华北方面，天津已被共军占领，在北平附近的傅作义部已成瓮中之鳖，被消灭只是时间问题。可以说，已经没有什么兵力可以再进行决战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设法同中共恢复和谈。利用和谈以争取时间，在长江以南地区编练新军一二百万人。如能做到这一点，还可与共军分庭抗礼，平分秋色。否则这个局面是很难维持下去了。但要想同中共恢复和谈，必须请蒋先生暂时避开一下，才有可能。现华中地区属于黄埔军校系统的部队大部分掌握在你的手里。你如能和陈明仁、李默庵、霍揆彰等会商一番，然后由你领衔电蒋先生力陈不能再战的理由，请蒋先生暂时休息一下，我想他一定会很重视你们的意见的。

宋希濂十分惊讶白崇禧的无所顾忌和迫不及待。他答复白崇禧：一、从他和蒋介石二十多年的师生关系上讲，这样做“道义上恐怕说不过去”；二、他是蒋介石的部属，这样做“从军纪上来说恐怕不大好”；三、陈明仁等将领是否同意这样做，“还没有把握”。白崇禧劝说道，道义和军纪当然要考虑，“但目前要以顾全大局为主”，“不要过分从小节上考虑问题”。宋希濂提议，能否让民间民意机构出来表这个态？白崇禧说：“这当然是要做的，但恐怕作用不大。”于是，宋希濂说：“这个问题关系较大，请让我好好考虑一番再说。”

果然，蒋介石很快就看到了由湖南省府主席程潜、河南省府主席张轸以及湖南、贵州、河南、广西、江西五省参议长领衔发布的通电：

连年内战，民生凋敝。在东北、华北、徐州大战之余，正可凭长江天险，分兵据守，取得暂时休息整顿。现在人们厌战，群情思治。请总统暂时下野，稍事休息，由副总统代理总统职权，维持局势。俟大局稍有好转，再请总统复职。

一九四八年的最后一天，陈官庄四周突然炮声隆隆。

华东野战军前委命令：黄昏时刻，火炮齐射，每门火炮发射炮弹五枚。

炮弹从数百门火炮的炮膛里射出，骤雨般落在陈官庄狭窄的包围圈里，国民党守军在炮火中奔跑哀号，由于人员密集，瞬间被炸死炸伤的竟达三千多人。

这是华东野战军官兵送给国民党军杜聿明集团的新年“礼物”。

此时，陈官庄包围圈里已经犹如地狱。

在这片十几平方公里的荒凉原野上，除了杜聿明集团的官兵之外，还有从徐州逃出来的军阀、官僚、银行家和地主，以及被裹挟而出的教员、学生、工人、小贩、和尚、戏子和妓女。伤员们躺在用各色降落伞搭起的简易帐篷里呻吟，大量冻僵的尸体散落在他们四周。没有伤病但被饥饿折磨得神情恍惚的官兵到处搜寻可以吃的东西，附近的几个小村庄已经被反复洗劫了几遍，百姓不但粮食被抢光了，身上的衣服也被扒光了，所有的家具、门框、房梁，甚至坟地里的尸骨，都被国民党军当柴禾烧了。村子里仅剩的一些妇女，无论年纪大小，无一能躲过国民党军的强奸。跟随杜聿明跑出来的铜山县长耿继勋到处乞讨，在没有乞讨到任何食物的时候自杀了。学生、教员、工人身上的东西被搜光后，被补充到国民党军队里，白天被驱赶到旷野上挖战壕和站岗，晚上被像囚犯一样被关起来。更悲惨的是那些女学生，大部分以“女护士”的名义被补进各军师团部，为了能够得到一点食物，她们成了军官们的临时“太太”。饥饿使所有的人变得疯狂。部队开始每天还能够领到几碗米，煮成粥的时候只见水不见米粒，但很快就什么也没有了。有时领来的是一头毛驴，用枪打死之后，心肝肺肚放在两只大锅里煮，锅由军官亲自持枪把守，但还是没有煮烂就发

生了混乱——士兵们为抢到一点肉而相互火拼。军阶稍微高一些的军官有大饼和罐头吃，因为空投场被他们派出的亲信用机枪严密封锁着。有个别空投袋落在了空投场外，士兵们相互争抢，有时打开来一看，是子弹，有时打开来一看，是些小菜瓜子，包装纸上写的字是“兵团司令部茶食”。更让士兵们愤怒的是，好容易抢来了一大包，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土。也有抢到大饼的时候，但是，抢到者刚咬了一口，就被一颗子弹打倒了，开枪者跑上来接着咬，很快又被打倒了——“一张大饼要送十几条人命才啃得完”。

专门接送负伤的国民党军将领的飞机只来过两架。第一架还未在临时机场降落的时候，负伤的将领们已经被担架抬到现场。飞机刚一降落，担架兵和卫兵急忙上去安排床铺，但是，华东野战军的炮弹飞过来了。国民党军的飞行员吓坏了，急忙起飞，结果只带走了两个担架兵和两个负伤将领的行李。第二架飞来的时候，飞机上装载着大量高级军官的家属捎来的东西和南京国防部犒劳军官们的物品，卸下这些东西花了很长的时间，结果华东野战军的炮弹又飞来了，飞行员照例紧急起飞，飞机飞到空中的时候，人们发现腿部负伤的第五军四十六师师长陈辅汉，双腿还悬挂在没有关上的机舱门口，直到飞机飞得很高了，陈辅汉晃荡的双腿才被飞机里的人拉进去。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陈毅和邓小平经过两天的行军，到达接近战场的一个名叫张菜园的村庄。前沿阵地上已经被官兵们装扮一新。树枝搭建的门上贴着各种战斗标语，坑道门口的上方挂着块匾额，上面写着“1949”的字样。陈毅和邓小平不但要求检查备战、纪律和取暖，还特别要求讲究战壕卫生，要求官兵们认真刷牙。炊事班正忙成一团，他们要让官兵们吃上饺子，而且还有四菜一汤，菜都是荤的，牛肉、猪肉、鸡肉和羊肉都有。后方慰问的各种瓜子、糖果和香烟发下来了，会吸烟的官兵靠在战壕向阳的一面边晒太阳边吸烟，美滋滋地眯着眼睛。突然，传来了锣鼓声和喇叭声，文工团的同志们顺着战

壕上来了，他们的到来让官兵们欢呼起来，演出立即开始。唱歌、说唱、快板，弦子拉得吱扭扭的，全是官兵们家乡的小曲。还有短剧，剧名叫《三班长》，演的就是刚刚立功的那个又高又瘦的山东人，这个山东班长一个人抓了俘虏一百多。让官兵们感到新鲜的，是刚从包围圈里逃出来的国民党军的一个剧团，他们也演出了一个短剧，剧名叫《包围圈里》，说的是陈官庄包围圈里的悲惨情景。

新年里最重要的工作，是对包围圈里的国民党军发动政治攻势。有喊话的广播的唱歌的，有给敌人的前沿送馒头的，有用风筝送宣传单的，有在前沿插标语牌和贴漫画的，有送俘虏兵和家属进包围圈里劝降的，可谓天上地下，白天黑夜，四面八方。不断有国民党军官兵跑到解放军这边来，有的纵队甚至为此在包围圈上开了个小口子，上面插的标语牌上写着："这是生路！"还有不少国民党军官兵跑到解放军的阵地上买东西吃，解放军官兵自信而骄傲地看着他们，并不加以阻拦，来去任他们自由，只清查一下人数就放行。华东野战军一位年轻的排长，觉得喊话撒传单不过瘾，竟然让国民党军投诚人员带路，亲自跑到敌人的战壕里当面做工作，很快，他就带着一个连的国民党军官兵回来了。处于交战状态中的双方官兵相互来往，恐怕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前所未有。有的国民党军官兵在解放军的阵地上待了几天后，又回到包围圈里去，他们立即被围起来问这问那："那边不打人？""有没有吃的？"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天一黑，就有更大一群国民党军官兵跑了过来。一些解放军官兵趁机进入包围圈里，这些侦察人员或者在敌人的阵地上住几天后安全返回，或者干脆不返回而是潜伏下来。

大批官兵投诚，已经成为陈官庄包围圈里国民党军将领的一个巨大的心病。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接到报告说，早上的时候前沿阵地发现一头大肥猪，拉回来一看，大肥猪的肚子里放的全是"投诚证"。无法制止混乱的邱清泉说他终于找到了原因：他住的院子里有一棵大

树。四墙如框，框里面是这棵树，也就是木，那么就是“困”了。于是，他命令立即把这棵树砍了。邱清泉的迷信在国民党军中很有名，当年他率部驻扎在河南商丘的时候，曾找各种理由反复要求调离，原因是“商丘”与“伤邱”同音。

第十三兵团司令官李弥和第九军军长黄淑来到前沿。李弥对官兵们说：“我和你们军长都来了，你们真的挨不下去，就把我和你们军长杀着吃了好了。”然后，他们把军官们集合起来训话，李弥语调低沉：“各位同生死共患难的兄弟们，你们忍饥受寒已经十多天了，这叫忍人之所不能忍，为人之所不能为。只有大智大勇的人才能做到。现在补给虽少，但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只要把这厄运挨过，你们的事业将来一定成功。天生人，必养人，总有一天命运会好转的。大家求老天爷不下雨，不下雪，多晴几天，空投就多些，吃饱了肚子就好办，有人如果实在受不了，要投共军，我绝不阻拦。但希望不要把武器带走，将来还要见面的。”

一九四八年的最后一个晚上，蒋介石请李宗仁和孙科等四十余名政府要员到总统府，征询人们对他下野的看法。让他没想到的是，在场的大多数人都认为他应该辞去总统职务。

那是一个令蒋介石心情灰暗的夜晚，他的面前摆放着《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明天一早将要在南京见报。这是一篇尽力为蒋介石摆脱尴尬，并扭捏地表示愿意与共产党方面进行和谈的文章。该文不知出自哪位幕僚之手，行文拖沓，颠三倒四，色厉内荏。

首先，表明蒋介石面对当前的军事失利“不胜其惭惶悚栗”：

……溯自抗战结束之后，政府唯一的方针在和平建设，而政府首要任务，在收复沦陷了十四年的东北，以期保持我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但是三年以来，和平建国的方针遭逢了阻挠，东北接收的工作竟告失败；且在去年一年之中，自济南失守以后，锦州、长春、沈阳相

继沦陷……政府卫国救民的志职未能达成，而国家民族的危机更加严重。这是中正个人领导无方，措施失当，有负国民付托之重，实不胜其惭惶悚栗，首先应当引咎自责的。

然后，将内战的责任完全推到共产党一方：

……抗日战事，甫告结束，我们政府立即揭举和平建国的方针，更进而以政治商谈军事调处的办法解决共党问题。不过经过了一年有半的时间，共党对于一切协议和方案都横加梗阻，使其不能依预期步骤见诸实施……我政府迫不得已乃忍痛动员，从事戡乱，这是最近的历史事实，在世人心目中记忆犹新。共产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已历二十五年，而中正在此二十五年之中，无时不期待共党以国家民族为前提，循政党政治的常轨，共谋和平相处之道，以树立民主的弘规。三年以来，政治商谈之目的固在于和平，即动员戡乱之目的亦在于和平，但是近日时局为和为战，人民为祸为福，其关键不在政府，亦非我同胞对政府片面的希望所能达成。须知这个问题的决定在于共党，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党一转念之间。

接着，表示只要共产党方面愿意实现和平，蒋介石不在乎“个人的进退出处”；而如果共产党方面坚持打下去，南京政府有“决胜的把握”：

……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等具体办法；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们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中正毕生革命，早置生死于度外，只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如果共党始终坚持武装叛乱到底，并无和平诚意，则政府亦惟有尽其卫国救民的职责，自不能不与共党周旋到底。尤其是京沪战区为政治中枢所在，更不能不全力保卫实行决战。我深信政府不仅在此有决胜的把握，而且整个国家转危为安，和全体人民转祸为福的枢机亦在于此……我们这一代遭逢了中国五千年历史空前未有的变局，也就是担负着五千年历史空前未有的使命，我们只有忍受一时的痛苦与牺牲，为国家民族的生存，历史文化的延续，生活方式的自由和后世子孙的滋长而奋斗……

与此同时，毛泽东亲自撰写的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发表了，题目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其文文锋犀利，观点鲜明，文风豪迈，风趣幽默。

毛泽东开篇就说：“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在我们的敌人方面也不怀疑了。”接着，他列举

了一系列详细的统计数字，表明内战爆发以来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并针对国民党政府的“和平呼吁”明确表示“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喘息的机会，使已经受伤的野兽养好创伤，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

毛泽东再次列举了一连串应对战争负责的国民党军政大员的名单，对国民党军的战争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以蒋介石等人为首的中国反动派，自一九二七四月十二日反革命政变至现在的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中，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满身鲜血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吗？难道还没证明他们是一伙职业的帝国主义走狗和卖国贼吗？请大家想一想，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以来，从一九四五年十月重庆谈判和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以来，中国人民对于这伙盗匪曾经做得何等仁至义尽，希望与他们建立国内的和平。但是一切善良的愿望改变了他们的阶级本性的一分一厘一毫一丝了没有呢？这些盗匪的历史，没有哪一个是可以和美国帝国主义分得开的。他们依靠美国帝国主义把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同胞投入了空前残酷的大内战，他们用美国帝国主义所供给的轰炸机、战斗机、大炮、坦克、火箭筒、自动步枪、汽油弹、毒气弹等等杀人武器屠杀了成百万男女老少，而美国帝国主义则依靠他们掠夺中国的领土权、领海权、领空权、内河航行权、商业特权、内政外交特权，直至打死人压死人强奸妇女而不受任何处罚的特权。难道被迫进行了如此长期血战的中国人民，还应该对这些穷凶极恶的敌人表示亲爱温柔，而不加以彻底的消灭和驱逐吗？

在新年献词的最后，毛泽东描绘了一九四九年的中国：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一九四九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成就，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铁路公路交通将要全部恢复，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将要摆脱现在还存在的某些游击性，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

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

中国共产党人的口号是：将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四九年初，在黄淮大平原凛冽的寒风中，几十万解放军官兵等待着出击的战斗命令。

## 邱清泉：让他崩溃好了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日，淮海战役总前委常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中原野战军副政治委员邓子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致信在淮海战役中光荣负伤的所有伤员：

伟大的淮海战役，自十一月七日开始以后，在第一第二两阶段当中我们已经歼灭了蒋匪军正规军三个兵团部，十四个军部，三十六个整师，连零碎团营被歼灭的，加上山东保安旅共折合四十一个师还多。现淮河以北广大地区，除杜聿明所率之邱清泉、李弥两兵团残部，正被我包围聚歼在永城东北的狭小地区很快将要全部歼灭外，已无匪军踪迹，淮海广大地区获解放……

你们都是淮海战役中负伤的，而极大多数又都是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围歼黄维兵团中负伤的，蒋匪的第十二兵团——黄维兵团是蒋匪最精锐兵团之一，现黄维兵团已经全部被我歼灭，这对于争取淮海战役的全部的胜利，有极重大的意义。你们不论是进攻中负了伤或阻击中负了伤都是光荣的，你们奋不顾身的英勇杀敌，以至光荣负伤，是值得全军敬佩和广大人民敬佩的……

我们当前的任务是消灭当前蒋匪军，争取淮海战役的全部胜利，并准备继续向前进军，消灭淮河以南的敌军，打到南京去，消灭江南地区的敌人，争取在一年左右根本推翻国民党统治，把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望你们安心休养，遵守院规，早日痊愈，重回部队，更光荣伟大的胜利在等待着你们……

同伴们都已返回南京，年轻的美国记者西默·托平还是决定独自深入淮海战场。他从国民党军蚌埠卫戍司令部的一个军官那里搞到一张通行证——那个军官“根本无暇关心一个疯狂的美国人的行踪”。蚌埠城里的一位神父找来两个铁路工人做他的临时挑夫，铁路工人急于返

回陷入战场中的老家看个究竟。新年过后的第二天，西默·托平身穿一件美军绒面夹克，戴着一顶黄色的绒线帽子，向淮海战场的腹地出发了。他们很快就进入了“无人管辖地区”——从蚌埠向北，过了淮河大桥和一个名叫曹老集的村镇，便无人能说清前面广阔的地区由谁来维持社会秩序了，那里是淮海战役巨大战场的边缘。国民党军逃兵和土匪们混杂在一起，在“无人管辖地区”肆意抢劫村民和行人，常常会因为一件并不值钱的东西杀人越货。西默·托平好容易走出这一带，随即落入民兵手里。他无论如何不明白，为什么所有的农民们都站在共产党一方，而且农民们表现得如此理直气壮，他们拦住他的时候手里拿的是美式汤姆森冲锋枪，一见到他就喊：“这是坏人！”——“留着庄稼茬的褐色田野由于疾风被吹成了一个个小雪堆而变得斑驳有致，一簇簇草顶或瓦顶的土坯房构成了一个个小村落”。西默·托平被带到村子里的民兵指挥部，身边的铁路工人一个劲儿地解释“他是一个美国记者”，他把早就准备好的一封用中文写的信拿出来，信中说明了他的身份和他要去解放军那里采访的目的。民兵们根本不相信。他只好又拿出两年前他访问延安时与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一起吃饭的照片，气氛这才似乎缓和了一些，可扣押他的民兵们还是一脸茫然，因为他们都不识字或是识字不多。民兵们为了显示自己是有战斗力的，自豪地说，不久前他们配合解放军把国民党军第六、第八兵团赶跑了，迫使他们退回了蚌埠。西默·托平这才醒悟到自己已经置身战场：

> 许多已经腐烂的士兵尸体仍抛在野地里尚未掩埋，任凭成群哇哇叫的黑乌鸦和村狗撕拽着。国民党军队留下的狭长掩壕和散兵坑仍四处可见。村边精心栽植的一些柳树当时为了构筑火力开阔地带也被砍倒了。村民们正在制作土坯，准备修复和翻盖被炮火摧毁的墙壁和屋顶。我们还看到成群的国民党伤兵被北面的解放军释放后，正一瘸一拐走在回南方老家的路上。

民兵们拍着胸膛告诉美国人：“农民现在成了土地的主人，地主老财们已经完蛋了。”西默·托平终于感受到他早就有所耳闻的土地改革的威力。在共产党人控制的区域里，所有的村庄都进行了这一翻天覆

地的运动，共产党领导的工作队分成小组深入到农民中间，讲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农民为何受到的盘剥，然后把最贫苦的农民组织起来与地主清算土地财富——黄淮平原土地肥沃，但是，地主占有绝大部分土地，而且地租高达百分之五十以上，“有些豪绅还采取暴君的方式，指派打手对那些交不起租子的或还不起高利贷的农民进行毒打，地主强迫农民做长工或抢去他们的女儿做丫头或小妾来抵债的事情屡见不鲜。在南京，委员长高谈三民主义；但在全国，封建主义却肆意横行”。西默·托平曾过夜留宿的一个村庄里，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逃到长江以南去了，全村每个成年农民平均分到了二亩地——“国民党只注重城市，忙于打内战，毫不关心农民的疾苦。而毛泽东找到了乡村革命的原动力”。

在民兵指挥部里，西默·托平躺在装满高粱米的麻袋上过夜。早上，当他被爬到脸上的老鼠惊醒时，一位民兵给他送来了早餐：两只煮熟的鸡蛋、一块高粱面饼和一壶开水。

第二天，西默·托平在民兵的带领下继续往战场纵深走。一天一夜之后，他看见了一位解放军指挥官，西默·托平无法根据他的自我介绍确认其身份，因为解放军的指挥官没有任何军阶标志，可以说明身份的仅仅是他“仁慈友好”的态度。再往前，解放军指挥官拒绝了西默·托平深入战场的要求，他的证件、照相机和打字机等也都被拿走了，一个自称姓吴的副政委和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同他谈了话。吴副政委说，不能让一个美国人再接近战场核心了，因为“负不起这个责任”。西默·托平又在粮食口袋上睡了一夜，早上的时候，解放军给他送来的早餐是米饭、鸭蛋和开水。他再次对吴副政委表示，他并不在乎战场是否危险，吴副政委冷着面孔回答：“我们在乎。”然后，吴副政委毫无回旋余地命令他立即离开战场，他的最后一句话令西默·托平印象深刻：“你们美国人帮不了我们。”西默·托平走出屋子，向战场的核心方

向瞭望，原野空旷无际，天边阳光耀眼。突然，一阵喧闹传来，原来村子里的一户农民在举行婚礼：

> 爆竹声中，喜滋滋的新郎把他的新娘引进了家门。由一头小毛驴和牛拉着的轱辘车是用红绸装饰过的。新娘盘腿坐在车上，微微地低着的头上盖了一块绣花盖头，身上穿的绣花绸缎旗袍外面套了一件清朝式的大袖对襟棉袄。新郎则穿一件羊皮长袄，头戴一顶宽边汉帽。他们摆宴招待来客，农民们一边吃着馒头和喝着自制的白干，一边尽情欢歌。

这是一月六日，中国农历腊八。

在不远处的陈官庄战场上，华东野战军对杜聿明集团发起了总攻。

没有人知道这位青年农民为什么要在战火连天之时办理他的终身大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位幸福的年轻人一定是位刚刚分得土地的翻身农民。此时此刻，在这片土地上，翻身农民憧憬未来的欲望最为强烈，不远处隆隆作响的解放炮声在这些农民听来，宛如催生欲望的丰收锣鼓。

西默·托平睁大眼睛，为眼前同时演绎着新生与毁灭的历史瞬间，感到前所未有的惊异。

华东野战军对杜聿明集团的总攻部署是：

以十个纵队、二十五个师（旅）组成东、南、北三个突击集团。

东集团：孙继先司令员、丁秋声政治委员指挥的三纵、陶勇司令员、郭化若政治委员指挥的四纵、宋时轮司令员、刘培善政治委员指挥的十纵和袁也烈司令员指挥的渤海纵队共九个师，由宋时轮、刘培善统一指挥，负责围歼李弥的第十三兵团。三纵首先从东南方向发起攻击，得手后谋求与从北面发起攻击的一纵打通联系，楔入邱清泉、李弥兵团的接合部，阻击邱清泉向东增援，保障从东面发起攻击的四

纵、十纵的侧翼安全；四纵从东偏北方向突破后，向耿庄、秋庄、夏凹、胡庄、贾庄攻击前进，协同从北面发起攻击的渤海纵队和一纵歼灭国民党军第八军和第五十九军残部；渤海纵队以一部包围陈阁，主力向王庄、孔楼、马庄、陈庄发展，协同一纵、四纵队作战；十纵首先攻占刘园、李庄、赵园，得手后主力一路向西发展，最后协同三纵、四纵围攻第十三兵团部所在地青龙集。

南集团：滕海清司令员、康志强政治委员指挥的二纵、张仁初司令员、王一平政治委员指挥的八纵、胡炳云司令员、张藩政治委员指挥的十一纵共五个师加三个旅，由苏北兵团司令员韦国清、副政治委员吉洛（姬鹏飞）统一指挥，自南向北攻击李弥兵团。二纵一部攻占范庄、李明庄，协同八纵、十一纵作战；八纵一部协同北集团的九纵夹击刘集，主力攻占魏老窑、魏小窑后向陈官庄发展；十一纵在二纵的右翼，首先攻占徐小凹、李楼，而后向鲁楼、乔庄发展，协同东集团的三纵作战，并保障该纵的侧翼安全。

北集团：叶飞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的一纵、聂凤智司令员、刘浩田政治委员指挥的九纵、谢振华司令员、李干辉政治委员指挥的十二纵队共六个师加两个旅，由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山东兵团政治委员谭震林、山东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统一指挥，一纵从北面发起攻击，首先攻占贾庄，而后向东南方向发展，与三纵打通联系，分割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协同四纵和渤海纵队围歼第八军和第五十九军残部；九纵以一部从西面佯攻，牵制刘集国民党守军，主力占领左砦、郭营后向王大庄、刘庄、赵庄发展；十二纵从西北方向发起攻击，协同一纵作战，并保障其侧翼安全。

战场外围堵截任务由鲁中南纵队、豫皖苏军区独立旅、两广纵队、野战军警卫团、冀鲁豫第三军分区基干团、十三纵、七纵、六纵等部队担任。

特种兵纵队除指挥各纵队炮兵团协同步兵作战外，直属重炮被编成四个炮群支援三个突击集团的作战。

中原野战军部队集结在宿县等地休整，同时担任战役总预备队。

一月六日十五时三十分，华东野战军的三个突击集团，在三十分钟的炮火准备之后，连续爆破突击，向杜聿明集团的纵深防御阵地发动了总攻。

九纵首攻郭营便投入了大兵力，著名的“潍县团”，即二十七师七十九团以及八十一团一营、三营和师特务营一部，并配属了四辆坦克。猛烈的炮火准备后，攻击部队开始爆破作业，七十九团一营迅速扫清外围工事，随即突破国民党守军前沿。八十一团一营二连突入后，直插郭营村东南角，截断了敌人的退路，然后主力正面突击，分割围歼。两小时之后，郭营守军第十二军一一二师三三六团被全歼，上校团长杨英华以下七百人被俘。

一纵三师攻击夏庄至夏砦间的地堡群，守军是邱清泉兵团第五军的四十五师。首先向地堡群实施爆破的，是特务连二排副排长庄德桂率领的四班。特务连经过之前的一系列战斗，全连只剩下十几名老同志了，刚刚补充进来的全是解放战士。而庄德桂排长率领的四班，八名战士中只有两名老同志。庄德桂按照事先侦察好的路线，带领四班爬到距地堡群三十米的地方，然后他向身边的两名战士发出了前去爆破的命令。但是，这两名解放战士你看我、我看你犹豫不决，庄德桂抱起一只炸药包冲了上去，随着猛烈的爆炸声响，前沿的鹿砦被炸开一个大缺口。四班突进去，占领了一线的一个地堡，里面的二十多名守军把枪扔出来投降了。但是，当四班向二线地堡攻击的时候，一颗子弹打中庄德桂的右眼，他重重地跌倒在地上。几名解放战士扑过来抱住了他，随后跟进的二排长柴文德冲过来，要把庄德桂抬下去，庄德桂说：“干部少，新兵多，我不能下去！”他用纱布抹了抹脸上的

血，托着十几斤重的大炸药包向前面的一个大暗堡爬去。国民党守军发动了反冲击，庄德桂用手不断地抹着从眼睛里流出的血，当他爬到大暗堡前面的壕沟时，敌人已经快冲到跟前了。庄德桂把大炸药包往前一推，拉响了导火索。剧烈的爆炸声中，敌人的残肢被裹在灰黑色的硝烟里飞上天空。奄奄一息的庄德桂抓起一颗手榴弹，缓慢地向另一座地堡爬，没爬出多远就一动不动了。解放战士几乎都站了起来，边冲锋边呼喊着:“兄弟们！咱们豁出去了！上呀！”

八纵攻击魏小窑村，守军第七十军三十二师九十六团不断发动反击，两军僵持了好一阵。接近黄昏的时候，八纵重新发动攻击，一连四班长姜起禄和副班长李德傅炸开了守军野外阵地前的鹿砦，指导员高荣木带领二班和八班扫清几座地堡，部队开始向村内发展。三排副排长朱佐亭率领的突击队动作迅速，二线碉堡里的守军还没来得及反应便成了俘虏。二班长孙景成带领战士杨尔侨、杨贵亭和解放战士向春恒、黄希平冲向了村子东南守军的地堡群，他们把母堡的门口堵住，迫使里面的十几名敌人投降，然后顺着交通壕继续搜索追击。当他们冲到一个巨大地堡的门口时，听见里面有人在喊:“不许后退！”孙班长断定这就是守军的指挥所，于是塞进去一只点燃了导火索的炸药包。爆炸声响过之后，里面有人哭喊着:“缴枪啦！别打啦！”几十名国民党守军举着双手出来了，其中有九十六团副团长尹洪义和二营长林禄昌。

十一纵官兵攻击李楼之前，已经把交通壕挖到距守军很近的地方，他们不断地喊:“老乡！投降吧！马上就要总攻啦！”李楼里的士兵答:“后面督战队的机枪架着呢，要攻就赶快攻，不然我们想过去都过不去了！”十一纵的攻击准备炮火刚刚延伸，突击队就冲到了敌人的阵地前沿。“赶快跑！八路上来啦！”一部分守军官兵开始往后跑，却被老兵拦住了:“要吃饭的就别跑！”混乱中，十一纵的爆破组在前面连续爆破，根本不理会战壕里惊慌失措的敌人，后面的战斗很快就变

成了抓俘虏的追击。国民党守军在空旷的田野上跑得到处都是，十一纵官兵们边追边喊："别跑啦！赶快过来开饭吧！"

夏庄守军是第七十军一三九师四一六团。叶飞指挥的一纵二师四团二连在西北、四团八连在正北、六团二连在东北、五团五连在东南，不同方向的攻击同时发起。攻击前的重炮轰击令二师官兵十分鼓舞，因为夏庄村里的地面建筑物和六个制高点全被炸塌。接着，一发烟幕弹爆炸了，这是步兵攻击开始的信号。四团二连的爆破班是八班，四个爆破小组直扑三个暗堡，三声爆炸几乎同时响起。副班长李会福抱着一个三十多斤的炸药包，把夏庄西北角的一个大碉堡炸飞了。八班战士计划连续爆破十包炸药，炸到第九包时，冲击的道路已经被打开。六团二连七班的爆破也很成功，爆破手冲上去的时候，国民党守军把枪全扔在战壕里，跑到地堡里躲了起来，七班的爆破手收缴这些枪支后冲着地堡喊："不出来就炸了！"这时，纵队的延伸炮火已经把守军的退路封锁，突击排在指导员王兴记的带领下冲入夏庄。王指导员身上三处负伤，浑身是血，但手中的驳壳枪仍高高地举着。后续部队相继冲进村，突击排迅速包抄到村庄的后面，把一群正在逃跑的敌人堵了回去。王兴记和排长蔡兆洪、副排长王成任每人带领几名战士守住村口的几条小路，决心不让一名敌人跑出去。四班长韦求和被炮弹炸倒了，脸上全是血，苏醒后他顺着交通壕也爬了上来，守住了一条小路的路口。战斗结束后，当他被抬下战场时，对指导员王兴记说："我正在争取入党。"

在支援夏庄作战的炮兵连中，名叫坂本贤介的炮兵教官被流弹击中。坂本贤介是日本东京人，儿时随父亲来到中国，曾就读于上海。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参加了日本地下反法西斯组织——日本反战同盟会，不久却被强征入伍。他积极在日军中进行反战宣传，并为中国军队提供战场情报，最后被日军当局判处死刑。押送刑场的途中，他被新四军部队救出。抗战胜利的那一年，坂本贤介参加了中国共产

党，并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的一员，先后参加了鲁南、莱芜、孟良崮、豫东战役。他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娶了一个名叫蒋荷菊的中国姑娘，在浙江义乌生的孩子取名为“义生”。在攻击夏庄战斗开始的时候，他指挥四门火炮抵近前沿，以直接瞄准的方法实施精确射击，夏庄国民党守军的六个制高点全是被他指挥的火炮击毁的。他的阵亡令官兵们十分悲伤，官兵们把他的遗体擦洗干净，为他穿上了一身新军装，运到义乌县隆重地埋葬了。坂本贤介的墓碑上刻着他的中国名字和他的生卒纪年：蒋贤礼，1913年——1949年。

陈官庄战场沉寂多天之后的猛烈炮击令杜聿明猝不及防。

“士无斗志，一击即垮，东西两面许多阵地被解放军突破。”

第七十军军长高吉人身负重伤，副军长邓军林即刻升任军长。

在杜聿明的请求下，国民党军空军派来飞机向华东野战军各个方向的攻击部队进行猛烈轰炸和扫射。

但是，华东野战军的攻击强度未见减弱，邱清泉兵团“南北阵地各部队纷纷告急”。

陈官庄临时机场上空飞来一架小型教练机，飞机给杜聿明送来了迅速突围的命令，同时要接走负伤的第七十军军长高吉人。飞行员彭拔臣送完命令，看着高吉人被抬进机舱后，正准备起飞，却发现他的驾驶座位被另一位军官占据了。彭拔臣说：“教练机不能多带人，你占了我的位子，谁来开飞机？”那位军官说：“老弟，将就一点，快起飞吧！”彭拔臣说：“这无法将就，请你让开！”于是那位军官自报家门，说他是徐州“剿总”办公室主任、陆军中将郭一予——“中将还不配坐飞机吗？还不够资格吗？反正我有坐飞机的资格，谁能把我怎么样？要不，大家都不走好了！”这时，飞机外面的一些高级军官和家属们开始

大吵大闹，有的说要坐大家都可以坐，有的说管他是什么中将把他拉下来。正争吵不休的时候，解放军的炮弹打到机场来了——“我急得满头大汗，心想再飞不走交不了差，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屁股坐在中将的腿上，推动引擎起飞。谁知有个倒霉的‘剿总’总务处上校科长黄绍宽，挤在飞机的推进器旁边偏没有走开。推进器一转动，他的手臂断了，腰上裹的金条和银元也被打得满天飞舞，推进器也发生故障不动了。解放军的大炮又打过来，一颗炮弹恰好命中飞机左翼，机尾机脚都受了伤，再也飞不动了。那些瞎起哄的人一哄而散，机场上连警戒兵也跑光了。那位瞎耍赖的中将也早已不知去向。只有高吉人因为跑不动在飞机上干喊救命。哎，太乱了！太不像话了！”最终滞留在战场上并被俘虏的飞行员彭拔臣，事后一想起那个情景便怒不可遏。

总攻发起当日，华东野战军各突击集团先后攻占夏庄、何庄、窦凹、李楼、魏小窑、郭营、李明庄等十三个村落据点，歼敌近万，其中俘虏国民党军第七十军九十六师副师长田瑞生、第五十九军一八○师参谋长何觉哉以下约七千余人。

七日，华东野战军各攻击集团继续向陈官庄纵深阵地突进。

这是杜聿明集团崩溃的前夕。

在包围圈的各个方向上，攻防双方的战斗进入最艰苦的阶段，随着华东野战军攻击部队的迅猛插入，国民党军的整个防线开始支离破碎。

在没有任何隐蔽物的原野上，陈官庄守军据守的每一个小村庄都被炮火夷成平地，在燃烧的树干和飘散着烟灰的瓦砾中，国民党军官兵不知所措。老兵们把军官逼在战壕的角落里，商量着是投降还是继续打下去，新兵们紧张地听着老兵与军官的对话。此时，老乡关系成为将他们维系在一起的唯一因素，安徽籍士兵跑了很多，湖南籍士兵

和湖北籍士兵们正在选一个领头的，以便逃跑的时候有人带着，或投降的时候有人交涉。最后，如果老兵们和军官一致认为投降是最好的出路，就立即让军官去和当面的解放军联络；而如果老兵们和军官决定打下去，他们就朝着家乡的方向磕几个头，然后壮着胆子说：“撂倒一个够本，撂倒两个老子赚一个！”

随着攻击向陈官庄核心防御阵地压缩，攻击村落据点的战斗呈现出两种极端的状态。有的村落据点，解放军的攻击刚一开始，国民党守军就举起了白旗，成群的国民党兵排成队从战壕或地堡中走出来，然后就开始要吃的要香烟。解放军官兵对不听招呼的国民党兵大声呵斥着，让他们在规定的地方坐下来；指挥员们忙着请示上级，因为前面村落里的情况连国民党军官兵都说不清楚，他们不知道该不该继续攻击。而另一些村落据点，华东野战军攻击部队从上午打到下午，就是打不下来，不知道被围已久的国民党军哪来的那么多炮弹，前沿的冲击道路被猛烈的火力严密封锁，派上去的爆破组伤亡严重，发起冲击的连队也伤亡严重。当一种淡黄色的烟幕升起来的时候，冲击中的官兵们突然感到呼吸困难，双眼什么也看不见，他们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毒气弹是什么，烟幕下官兵全都倒在地上痛苦地滚动着。这一瞬间，战场一片死寂。

七日黄昏，李弥兵团部所在地青龙集被突破。

入夜之后，战斗进入僵持状态。

一纵攻击到距陈官庄不远的河堤附近时，三师多次强攻，仍然无法突破敌人的防线，而河堤拿不下来，就无法进一步割裂邱清泉与李弥两兵团间的联系。三师调整了部署，投入了预备队，经过与守军的反复争夺，终于有一个营突上河堤，占领了一段长约两百米的堤埂。但是，立足未稳，国民党守军便发动了反击，双方在河堤上开始残酷的白刃战。肉搏之中，国民党军的飞机疯狂轰炸，然后，淡黄色的烟

幕又升起来了。坚持在河堤上的解放军官兵用湿手巾掩着口鼻，战至最后全营只剩下十几名官兵，但这两百米长的堤埂依旧在手。

十一纵的谭连长奉命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摸上去，在当面敌人的后腰部占领一块阵地，以便在主力再次发动攻击的时候，切断国民党守军的退路。谭连长在夜色中找了很久，才发现敌人的两个据点之间，有一条“抗日沟”——抗战期间当地军民挖的交通壕——他决定从这里摸上去。谭连长刚进了“抗日沟”，就被国民党守军发现了，大约有一个排的兵力扑了上来。一排副排长王斌带领二班顶上去，几支汤姆枪猛烈射击，把守军压在地上动弹不得。谭连长命令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开始挖交通壕，冻土很硬，铁锨铮铮作响，官兵们大汗淋漓。谭连长在阻击的二班和挖交通壕的官兵之间来回跑，一边跑一边喊：“既然上来了，咱们就不退了！死也死在这里！”

在谭连长的南面，一支突击队已经打到敌人的阵地前，官兵们占据着交通壕的两端，一面阻击守军的反击，一面清扫交通壕里的残敌。两端带头的副班长都对身后的战士们表了决心：“负伤了也要完成任务！”但是，向交通壕里摸索的时候险象环生。副班长黄发礼突然被两个敌人抱住，黄发礼喊：“是自己人！”趁敌人犹豫的一瞬间他开了枪。前面，交通壕里挤着几十个敌人，一个戴着皮帽子的军官冲过来把黄发礼的枪抓住了。黄发礼说：“别误会！我是一营三连的！”皮帽子问：“刚才谁打的枪？”黄发礼说：“不知道，可能是后面！”手电筒照了过来，皮帽子看见黄发礼一身国民党军军装，放心了——黄发礼，一个小个子战士，一个多月前他还是黄维兵团里的士兵，在运河附近被俘虏后没几天，他就参加解放军投入了包围杜聿明集团的战斗，虽然身上的军装还没来得及换，但是他说“自己的立场早就换了”。趁敌人松懈下来，黄发礼突然一个信号，后面的战友一起冲过来，数支冲锋枪猛烈扫射，交通壕里顿时乱成一片，然后就是寂静，

敌人的尸体把交通壕塞满了。“去向连长报告”，黄发礼说，“我们占领了这段交通壕，等天亮了，就让主力从这里冲进去！”

李弥跑进邱清泉兵团的防地，第九军也放弃阵地向陈官庄防线跑了过来。邱清泉和李弥的部队拥挤在一起，引起了巨大的矛盾。杜聿明规定，突围的时候，两个兵团轮流当前锋，先由邱清泉兵团发动攻击，李弥的部队担任掩护；然后，李弥兵团越过邱清泉的部队继续攻击——“更替跃进，突出重围”。

邱清泉在指挥部里把第十二军一一二师师长于一凡骂了一顿，说他的三三六团在郭营被歼灭，三三五团在左砦投降，而这两个团的损失影响了整个战局。于一凡抗辩说：“我是一个师，却担负着一个军的防御正面，在冰天雪地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谁能维持下去？”邱清泉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向于师长下达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命令：“你坐飞机回南京去暂时休息一下，我给总统打电报！”于一凡顿时愣住了——谁不想赶快想脱离战场？但是，此时此刻，这一奢望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于是他用异样的眼光看着邱清泉，觉得眼前的一切都不怎么真实：是不是邱司令官的脑子出了什么问题？

邱清泉已经没有了平日不可一世的狂妄，他被眼前国民党军“一泻千里的崩溃”弄得惊恐万状，“终日呆坐在敌我态势图前垂头丧气”，不断地自言自语道：“真正崩溃了！真正崩溃了！”七日晚上，参谋长李汉萍发现邱清泉喝得酩酊大醉，蒙着头睡在床上什么也不闻不问——“我恐怕当晚崩溃，向他请示办法。他怒气冲天地说：‘让他崩溃好了！’”

八日，美国记者西默·托平还没有完全走出战场。身后的炮声似乎减弱了，他问身边的护送他的解放军战士：“炮火已经停止，徐州守军是否已经完蛋？”

“是的”，解放军战士肯定地回答，“杜聿明就快完蛋了。”

西默·托平在一个村庄里与解放军官兵一起享用了一顿猪肉和米饭——“寂静的黑夜似乎都变得鲜活起来，到处都能听到士兵情绪高昂的歌声。每一位共产党战士看来都粗略地了解淮海战役的总战略以及来年夏季将在长江上展开的下一步行动……我凝视着夜色，豁然觉得明智起来。我明白我们错过了作出重大抉择的岔路口，毛泽东走的是他的革命道路，而我的国人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另一条路。我现在意识到，美国人与共产党人自由交往的时刻已不复存在。在延安，不再会有友好的宴会和气氛和谐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辩。毛泽东正致力于他的革命事业，任何外国人——无论是美国人还是俄国人，都无法左右他的方向。”

西默·托平走到另外一个村庄，他遇到了一个“自一九三六年以来一直在解放军的队伍中任职，这期间只见过他妻子和家人一面”的干部。这位干部在西默·托平的笔记本上写道：“为了民主，为了自由，为了幸福，我们愿和我们的美国朋友一起战斗到底。”签名是“田武昌”——因为没有写明职务，因此，无论是西默·托平还是今天的我们都无从查明这是否是个真实姓名，一个猜测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给部队起代号时，通常喜欢借用中国大城市的名字。

心绪复杂的年轻的美国记者已经喜欢上了纪律严明的解放军官兵。他很愿意让充满好奇心的他们摆弄他随身携带的照相机，并按照官兵们的请求现场操作了他的那台英文打字机，然后不厌其烦地回答解放军官兵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一位年轻的步兵战士问及有关自助餐厅的问题”让西默·托平着实吃惊。无法得知提出这个问题的士兵，他是从哪里得知世界上还有“自助餐厅”这种代表着悠闲富裕生活的东西的，也无法得知这个士兵如何在身处战火之时怎么会想

到这个问题的。最终，这位年轻的解放军战士的自信令西默·托平震惊：“等全国解放了，再过二十年，我们也将有自助餐厅！”

八日夜，陈官庄战场上，已经被压缩得非常小的包围圈的四周，到处都是挖战壕的声音，铁锨镐头在月光下闪着光亮。华东野战军官兵决心把战壕一直挖到国民党军残存部队的眼皮底下。

四连一班副班长杨金堂二十二岁，他身材高大，平时身上总是两支枪。这几天他害了眼病，两眼肿得像两只铃铛。班长让他下去休养，他说不要紧。晚上，任务来了：四连以一个班的兵力，用迅猛的战斗动作抢占距敌二十多米远的一座大坟包，并且坚守住，掩护全营挖战壕。一班争取到了这个任务，杨金堂带着三名战士上去了。刚往前爬出不远，敌人就发觉了，机枪子弹打过来，杨金堂的手被子弹打穿了，脖子上也被子弹擦着直流血。连长爬上来问他行不行，他让连长赶快去指挥挖战壕，不用管这里。敌人很快发起反击，在爆炸的火光中，杨金堂脖子上的血冒着热气。击退敌人的反击后，身边的三名战士都因负伤被抬了下去，阵地上只有他一个人了。月亮渐渐向西倾斜，杨金堂的半个身子已经麻木，脖子上的血结成了冰块。在意识逐渐丧失的时候，他不断地提醒自己要坚持住，他的汤姆森枪依旧在“咯咯”地响着，当面的敌人始终抬不起头来。战壕已经挖到距当面守军仅三十米的地方，那边杨金堂的汤姆森枪突然不响了。连长派人上来一看，昏迷了的杨金堂右手扣在扳机上，左手握着一颗烈性手榴弹。

黄淮大平原上又一个寒冷的黎明来临了。

以陈官庄为中心，在杜聿明集团最后龟缩的几座村落的四周，华东野战军官兵决心要把他们脚下的土地挖个底朝天，无数条战壕向着国民党守军最后的阵地前沿一寸寸地接近。在凛冽的寒风中挖掘了整整一夜的官兵知道，战壕距离敌人的前沿越近越好，那样等冲锋号响

起来的时候，他们就会从战壕里一跃而起，端着汤姆森枪瞬间冲到敌人面前——那个敌人最好就是杜聿明！

## 勇敢地向前进

淮海大战的最后时刻到来了。

从徐州南撤的国民党军杜聿明集团，被华东野战军包围在陈官庄附近地域，至今已经一个月有余。

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当炮声再次从陈官庄战场轰然鸣响时，攻守双方的官兵都知道，这是这块已经尸横遍野的大平原上的最后一搏。

在狭窄的包围圈四周，华东野战军各突击集团火炮狂吼。东面，李弥兵团已经崩溃，各军官兵疯狂西逃，潮水般涌进邱清泉兵团的防御阵地，然后越过那里已经残破的阵地继续向西溃败。邱清泉兵团各部队协同已经混乱，各个村落据点之间被华东野战军穿插分割，兵团部的指挥系统已经失灵。

九日上午，国民党军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亲自飞到陈官庄上空指挥轰炸，企图为西逃的杜聿明的部队炸开一条通道，但是轰炸似乎没有起到作用——“车辆部队大白天向陈庄、刘集地区运动，解放军从而发现了国民党军突围的方向，对于东、南、北各方的攻击更加猛烈。”

杜聿明意识到陈官庄危在旦夕，决定离开这个被困已久的村庄。

与他同行的是邱清泉，两人准备去第五军军部。

第五军军部所在地陈庄，虽距陈官庄不足两里地，但是，需要穿过两个村庄之间的临时飞机场。走出陈官庄后，暴露在旷野中的杜聿

明立即感受到死亡的气息。到处是尸体和伤员，临时机场上，用降落伞搭建的各色帐篷大多已经破碎，在寒风和爆炸的热浪中疯狂地舞动着，大地因此显出神经质般的动荡不安。炮弹不停地向临时机场倾泻，尸体的残肢和泥土混合在一起飞溅。没有听见那些伤兵、溃兵和从徐州撤出来的非军事人员的呼喊，只是当杜聿明跌跌撞撞地踩上一堆软绵绵的东西之后，脚下才发出呻吟声——旷野上，几乎所有的人都缩在土坑里，身上盖着枯草和泥土。

华东野战军十纵二十八团占领青龙集后，该纵二十九师越过青龙集直插陆菜园，八十七团在八十五团一营的配合下，将国民党军第七十二军包围。十纵与这支国民党军有过多次交手的经历：一九四七年四月泰安战役中，十纵会同三纵一部全歼整编七十二师师部和两个旅，俘虏中将师长杨文瑔以下官兵共一万五千多人。泰安战役后，国民党军重新组建整编七十二师，整编第十师副师长余锦源出任师长。一九四八年六月睢杞战役中，整编七十二师再次被华东野战军包围，最后时刻余锦源曾准备投降，因包围他的华野主力转移才免遭被歼。同年八月，整编七十二师被扩编为第七十二军，余锦源升任军长。此时，余锦源指挥部队利用一片老坟地起伏的地形作最后顽抗。在政治喊话无效的情况下，十纵发起了猛烈攻击。地堡相继炸毁，前沿阵地守军立即溃退，余锦源率领军部逃到距陈官庄不远的胡庄。十纵二十九师八十七团紧追不舍，与兄弟部队一起又将胡庄包围。数十门大炮被推上来，炮兵做好了轰击准备，八十七团官兵再次喊话："你们被包围了！快放下武器！不然我们就开炮了！"

第七十二军的副军长谭心急忙召集三十四师师长陈渔浦和二三三师师长徐华商量如何是好。商量的结果是：派二三三师特务连长杨法治带领两名通信兵打着白旗、拉着电话线到当面解放军的阵地上要求谈判。解放军认为一名连长不够资格，谭心改派二三三师参谋长余勋

闳出面。于是，十纵二十九师八十七团政治委员宫愚公、副团长雷英夫和余勋闳在双方警戒线上开始了谈判。

第七十二军一二二师师长熊顺义被余锦源叫到军部。熊顺义发现军部里的气氛有点不对头，便拉住副军长谭心问个究竟，谭心说："这个仗打不下去了。杜、邱、李三人现在拿不出主张，他们准备各自逃命，不管部队了。我们不能作无谓的牺牲，与共军联系，大家不打了，都是中国人，自己拼什么？共军已经答应，只要我们不打，保证我官兵生命安全。"谭心问熊顺义是否同意，熊顺义立即表示："事已到此，大势所趋，当然大家跟着走。"

在两军警戒线上，余勋闳再三表示，第七十二军在胡庄还有两个团的兵力，意思是他们还是有相当战斗力的。宫愚公政委说，解放军在胡庄四周集中了两个师五个团、三个炮群共六十多门大炮，如果不想投降就打打看。余勋闳赶紧提出了两个条件：一、对外宣传不要说第七十二军是投诚的，而要说被歼；二、投诚之后，如果有官兵愿意回家希望准予离开。双方最终达成的协议是：

人民解放军第十纵队前方指挥所政治委员宫愚公与七十二军代表余勋闳先生拟定火线协议条件如下：

（一）七十二军立即放下武器，在其放下武器的条件下，人民解放军准许如下之条款：

（1）保证所有放下武器人员生命财产之安全。

（2）保证所有放下武器官兵眷属之安全并予照顾。

（3）保证所有放下武器之官兵不做人格上之侮辱。

（4）在宣传上可以尊重七十二军军长之意见。

（二）七十二军必须遵守下列条款：

（1）保证所有在职人员一律点交清楚。

（2）保证所有武器一律点交清楚齐全并不做任何破坏。

（3）放下武器后，七十二军立即转入指定地点。

（三）以上条款统限于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九日晚十时四十分起生效。

十纵八十七团派出一名营教导员跟随余勋闳进入胡庄，走进了第七十二军军长余锦源的指挥部。余锦源还是有些犹豫不决，八十七团的那位营教导员说："时间不多了，我们的炮兵早就等得不耐烦了。"余锦源和谭心又提出了四个条件：一、双方必须再假打一个小时；二，武器弹药不好点交；三、先发给余锦源一张通行证，让其离开部队，不跟随士兵一起走，不与解放军高级首长见面；四、将谭心的家眷从镇江接到徐州。四个条件十纵都同意了。余锦源写下了"全军放下武器"的命令。

九日晚至十日拂晓，国民党军第七十二军残部一万五千名官兵放下武器，全军进入当面解放军的阵地。解放军信守承诺，愿意留下来的欢迎，愿意走的很快被释放，释放证明上注明的是"参加战场起义"。

一二二师师长熊顺义还是趁乱逃跑了。他经徐州、郑州跑到武汉，参加了孙元良重新组建的第十六兵团，还当他的一二二师师长。一九四九年年底，当他再次被解放军追得走投无路时，在四川率部起义。

第七十二军投诚之后，十纵立即进入胡庄阵地，陈官庄已在眼前。

在胡庄的西南方向，第七十四军军部已经乱成一团，军长邱维达给侧翼的第七十二军打电话，发现电话线断了，派作战科长前去联络，这才知道第七十二军正在与解放军商谈缴枪的条件。邱维达顿时有些惊慌，命令特务连向胡庄方向警戒。接着，邱清泉打来电话说："李弥兵团已垮了，共军已经突到投掷场附近，请你注意，我以后不能

统一指挥了，请你自行决定。”——这是邱维达与邱清泉的最后一次通话。情况肯定是万分不妙了，邱维达立即召集军官会议，决定销毁一切文件和笨重的行李器材，五十七师坚守阵地，掩护五十一、五十八师转移。同时规定，如果突围出去的话，部队一律到安徽阜阳集合。命令下达之后，参谋长江崇林跟随五十八师、军长邱维达跟随五十一师开始向西突围。没走多远，他们便受到猛烈的阻击，五十一师虽一度突破阻击线，但接着两侧同时受到夹击，师长王梦庚死于乱枪之中。跟进的五十八师因被分割而陷入困境。邱维达在卫兵的保护下开始在混乱的战场上盲目奔逃。

李弥给第八军军长周开成的命令是：“各军军长带一个最好的团，到西面的张庙堂附近准备突围，其余的部队指定一个师长负责指挥。”周开成立即带领部队向西运动，但刚一动就受到炮火拦截。侧翼的第一一五军军长司元恺说他支持不住了，二三七师师长孙进贤说他的阵地已被突破，因为南面第七十二军那边已经敞开了口子，第八军现在等于腹背受敌。不一会儿，四十二师师长伍子敬在电话里报告说，他们那边情况危险。周开成当即表示派运输团前去增援，但是伍师长竟然说“不要来了”，然后就挂断了电话。周开成不知道，四十二师已经投降。

接受国民党军第八军四十二师投降的，是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三十四团。这个团插入敌人纵深阵地后，正准备向当面之敌发动进攻，发现前面的阵地上有人晃动白旗。一个名叫杜德政的副官径直走进三十四团二营营部，呈上一份由四十二师师长伍子敬、参谋长盛钟泰、政工处长刘智亭和几名团长集体签名的请降书。四纵三十四团团长秦镜答复：令参谋长盛钟泰二十分钟内前来投降。盛钟泰原是李弥兵团司令部的作战处长。杜聿明集团被包围后，四十二师师长石建中被炮弹炸伤，他被调到这个师任参谋长，协助新上任的师长伍子敬指挥作战，伍子敬原是这个师一二六团团长。盛钟泰并不熟悉部队，在前沿

阵地上，看见解放军送过来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后，开始考虑自己的出路。目前，四十二师仅伤员就有上千人，军心涣散，无力再战，于是他提出投降。军官中，除新上任的一二六团团长李心恺主张拼死突围外，其余的一致赞成举白旗。于是，大家都在投降书上签了字。盛钟泰把自己的白手绢系在一根木棍上，派人举到阵地前沿去，好让当面的解放军看见。听说解放军叫他亲自去投降，他毫不迟疑地立即去了。双方各自提出条件之后，他又气喘吁吁地跑回来，说解放军提出的条件，四十二师都可以接受，官兵的性命马上就可以保全了。

四纵三十四团命令二营在其阵地敞开一个口子，让投降的四十二师走过来。

接受敌人整师的投降，在三十四团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团长秦镜说：“伍子敬，中等身材，长相不错，面带愧色，向我交出了他佩戴的手枪。”

四十二师投降后，第八军军部的指挥完全失灵，周开成带领二三七师师长孙进贤、视察官龚厚斋、参谋长袁剑飞、副参谋长田兴翔和副官、参谋们向西奔逃，打算去陈官庄附近找李弥。一行人好不容易冲过炮火拦截地带，突然发现前面又出现了拦截部队，迎面一挺机枪黑洞洞的枪口正在对着他们。他们认为这里应该是第一一五军一八〇师的防御阵地，于是，卫士排长郑一峰喊：“军长在这里，不要打枪！”——实际上，周开成闯入了正准备向陈官庄发动攻击的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二十九师八十五团五连的阵地。

周开成后来回忆说，当时我想起了陈毅曾经写来的劝降信，于是派卫士排长郑一峰前去找解放军接洽投降。“过了一会儿，郑一峰带来一些解放军，其中一位是伍排长。我将手中的三寸白朗宁手枪交给伍

排长，并说：‘向你们投降。’同时叫卫士排将四五口径的冲锋枪放下，交给解放军，其余的人也放下了武器。伍排长说：‘放下武器，就是朋友。’”但是，同样是当事人的第八军参谋长袁剑飞回忆说，由于误认为前面出现的是第一一五军，于是派卫士排长郑一峰前去联系，郑一峰过去不久就向他们招手示意，一行人中除二三七师师长孙进贤看出不对劲跑了之外，其余的人毫无戒备地走了过去，走到跟前“都愣住了，原来不是什么友军，而是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十纵二十九师政治委员李曼村讲述的情景与袁剑飞的讲述基本吻合：“周开成以为是友军阵地，先派一名卫士排长前来联系。这个排长刚进我阵地，便当了俘虏。在我的命令下，敌排长回头向周开成等人招手，周开成在随从簇拥下走来，一到阵地，敌排长介绍：‘这是我们军长。’我们风趣地回答：‘军长来了，欢迎，欢迎！’这样，我们又抓了一个军长。”

黄昏时，杜聿明和邱清泉到达第五军军部所在地陈庄。

第五军官兵也处在惊慌失措的状态中，来自四面的炮弹目标准确地落在村庄里，爆炸的火光中到处是躲避炮火的混乱人影。由于杜聿明的参谋长舒适存第二次飞往南京后再没回来，司令部人员和警卫部队由副参谋长文强带领，从陈官庄跑出来聚集在陈庄西面的旷野里。文强找到一个地窖躲了进去，并在那里开设了临时指挥所。地窖的四周，所有能开动的坦克和装甲车挤在一起，马达轰鸣着，盲目地到处乱撞，车灯不分白天黑夜地闪来闪去，没人知道这是因为胆大还是因为胆小。

第五军是杜聿明于一九三八年以二〇〇师为骨干创建的，是国民党军的“五大主力”之一。一九四五年邱清泉任军长后，全军在昆明接受了美军的训练，装备也是国民党军中最好的，除大口径榴弹炮和其他各种口径的火炮之外，还特别编有骑兵、工兵、汽车、战车等部队，各师都配备有喷火器连。此时，第五军下辖四十五、四十六师和

二〇〇师，每个师兵力约一万人。第五军现任军长熊笑三，是杜聿明、邱清泉一手培植起来的，尤其是邱清泉信任有加的心腹将领，这也是他俩在最后时刻跑到这里来的原因。

但是，杜聿明和邱清泉刚刚进入陈庄，华东野战军的炮火就延伸到了这里，熊笑三当着杜聿明和邱清泉的面开始发牢骚："打了四十天，陈庄从来没有落炮弹，兵团部刚来，炮弹就跟来了，这就是因为人来得太多暴露了目标的关系！"——熊笑三心情恶劣，因为他的第五军已经四分五裂。

上午的时候，熊军长坐镇最精锐的二〇〇师师部，指挥四十五、四十六师在毒气弹的掩护下突围，向二〇〇师的防御阵地靠拢。但是，飞机的轰炸根本不像空军吹嘘的那样能炸出一条突围之路。直到下午十四时，两个师的靠拢没有任何进展，怒火万丈的熊笑三在电话里向四十五、四十六师喊："别来了！别来了！飞机扔下的毒气弹没一个爆炸！"

四十六师很快没了消息。

四十五师报告说他们受到猛烈攻击，已经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

四十五师一三三团和一三四团的一个营退守陈官庄附近的刘庄，立即遭到华东野战军几个纵队的同时围攻。华东野战军官兵知道，只要把当面的国民党军第五军打掉，整个淮海战役就算胜利结束了，因此战斗积极性空前高涨。爆破组长王恩尧在战斗动员时，专门强调了打第五军的意义，然后说："我第一个去爆破，无论我负伤了还是光荣了，你们接着干，一定要把突击道路打开！"斜阳的光芒十分耀眼，王恩尧在机枪的掩护下，抱着炸药包冲过百米开阔地，顺利地炸掉第一座碉堡，身后的一连二班一声呐喊，直接冲进敌人的前沿工事。国民党守军开始反击，二班战士韩进贤冲在最前面："不要怕！立功的时候

到了！”他和副班长赵兴才的双手已被燃烧弹烧坏，催泪弹的烟幕令全班战士都睁不开眼睛，他们寻着敌人枪声的方向继续冲击。从右边攻击的二排在过开阔地时伤亡严重。五班副班长郁国才拼死上前，炸掉了当面敌人的一个暗堡。硝烟散尽之后，他从敌人的死尸中抓起一挺加拿大机枪，高声喊：“都别动！不然打死你们！”趁守军不知所措的时候，二排后续部队冲了上来。国民党守军开始向后跑，纵队的山炮连及时封锁了守军的退路，兄弟部队也从侧面冲上来。在太阳刚刚沉没到大平原尽头的时候，退守刘庄的第五军四十五师全部被歼。

与此同时，一纵在与四纵、十一纵打通联系之后，三师对国民党军四十五师师部和剩余部队据守的丁枣园发动了攻击。此时的三师伤亡很大，但官兵们知道当面的敌人更困难。在丁枣园阵地前沿，到处是被打坏的大炮、战车和敌人的尸体。八团首先冲过前沿，打到丁枣园东南角的集群地堡前，并顶住了守军的猛烈反扑，七团也占领了村东面的出击阵地。突然，受到包围的丁枣园守军沉寂下来。过了一会儿，七团阵地前面出现一个人影，那个人喊：“不要打枪！我是新闻室主任，是奉四十五师师长的命令来谈判的！”一营教导员董明儒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团政治委员徐放，徐放一面向师里报告，一面与团长黄河清上了前沿。前沿那边又传来喊声：“我们师长请你们派个代表过来谈谈！”这时，三师指挥部的指示到了，同意七团前去谈判，命令九团迅速插到丁枣园以西，八团插到东南和西南两面，将包围圈进一步收紧，加大对国民党军守军的压力。

七团派出的代表是宣传股长金乃坚。金乃坚走进国民党军四十五师一三三团团部，团长姜铁志和他握了手，说：“劳您的驾来跑一趟。”一三三团各营营长挤满了狭窄的隐蔽部，金乃坚掏出“飞马”牌香烟，营长们都伸出了手，烟雾缭绕中气氛似乎有所缓和。金乃坚简要地介绍了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战况，然后说：“你们已经穷途末路，没有救兵了。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你们的生命和财产的安

全。愿意留下的欢迎，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负伤的我们负责治疗。”姜铁志要求享受起义待遇，金乃坚断然予以拒绝。此时，在丁枣园村四周，响起了声势浩大的喊话声，参加喊话的有刚刚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军官兵，这些官兵根本没等上级的命令就成班成排地走到解放军的阵地上，放下武器，接过干粮，边吃边喊：“弟兄们！别当冤鬼了！”七团见金乃坚久不回来，正要重新部署攻击，金股长安全回来了，后面还跟着四十五师的电话兵。电话接通之后，那个新闻室主任再次确认他们提出的条件都得到了同意。不一会儿，丁枣园村前沿阵地上出现了一队人，走在前面的是国民党军四十五师师长崔贤文。

来到七团团部，崔贤文把随身携带的手枪、指北针、望远镜和子弹交了出来，然后被带到三师指挥部。三师政治委员邱相田回忆道：“我抬头看看这个大个子，帽耳朵耷拉在脸上，棉大衣紧紧裹住身体，尽管他还想装得神气些，但是，二十几天的围困，几昼夜的沉重打击，浑身狼狈不堪的痕迹却怎么也掩饰不了。他们面向坟堆站立着，一时没有话说。”

邱相田要求崔贤文下令全师放下武器。

崔贤文说，我们的失败是败在战略上而不是战术上，第五军还是能打的，并且再次提出要享受“起义”待遇。

三师师长陈挺厉声喝道：“只有无条件放下武器，才能得到人民的宽大！”

崔贤文愣了一下，忙说：“我们部队过来之后，请长官们饶恕一点。”

丁枣园通往朱小庄的土路上，四十五师师部和最后残余部队约八千人争先恐后地向解放军阵地走来。国民党军官兵把武器放在指定地

点后，跟在解放军干部的身后往邻近的一个村庄走，一眼望去村庄里已是炊烟升腾，估计馒头已经出锅了。

邱清泉兵团的第五军只剩下二〇〇师了。

在陈庄第五军军部里，所有的人，包括邱清泉在内，不断地催促杜聿明尽快下达全面突围的命令："趁早突围总可突出去，还可再干。如果迟疑不决，那就整个完蛋。"但是，杜聿明始终不表态。

因飞机损坏没走成的第七十军军长高吉人胸部伤势严重恶化，在混乱中他也被军医和心腹军官们抬到了陈庄。第五军副军长郭吉谦去掩蔽部看望他时，高吉人表情绝望，话语吃力："杜先生、邱先生他们突围，我的伤这么重，怎么办呢？给我出个主意吧。"郭吉谦说："你的伤这么重，如果跟着一块儿突围，甭说别的，沿途颠动也把你颠动坏了。依我看，不如留在此地不动，共军来了，见你的伤这么重，会原谅你的。"高吉人沉思了一会儿，说："你说得对，听你的话，我就不走了。"——"后来杜聿明、邱清泉等人突围时，高吉人被解放军送到后方医院医治，重伤治好了，可是他又跑到蒋介石那边去了。"

第五军军部人心惶惶，只有军长熊笑三变得诡秘起来。他先跑出隐蔽部，接着，隐蔽部四周机枪、大炮、手榴弹声大作，然后他跑回来对杜聿明说："已经打到司令部来了，要下决心！"说话间，他把一条白布条抓在了手里。杜聿明听了一下，那些声音都是从一面响起来的，知道这是熊笑三在逼迫自己下达逃亡的命令，就说："这是你们部队自己打的，你出去看看为什么这样？"熊笑三出去一下回来之后，那些声音果然停止了。黄昏，熊笑三又对邱清泉说："如果个人单独行动，就有办法出去。"邱清泉问："你有什么办法出去？"熊军长还是那句话："只要让我个人行动，准能出去就是了。"

李弥终于出现在陈庄。

他来向杜聿明“请示机宜”，杜聿明却没有任何机宜可示。

杜聿明、邱清泉、李弥坐在掩蔽部里“默然相对”。

时间已是一月十日凌晨，是突围、逃跑，还是投降，杜聿明必须作出抉择。

从枪炮声判断，解放军已经攻到了第五军军部附近。

杜聿明终于放弃天亮之后与空军配合突围的原定计划，决定即刻分头突围。李弥、邱清泉和熊笑三表示要和杜聿明一起走。杜聿明说：“这不是让敌人一网打尽吗？我们就这样走，如何对得起部下？赶快分头通知他们自找出路！”于是，邱清泉忙着给还能联系上的各部队打电话，已经没有部队可以指挥的李弥坐在那里不说话。杜聿明催促他必须与部队取得联系，李弥离开了。邱清泉的参谋长李汉萍意识到，这也许是最后的分手了，他将李弥送出了隐蔽部——“阵地周围的炮火，映得漫天通红，滚滚浓烟，轻重机枪和手榴弹声一阵紧似一阵，各种颜色的曳光弹，如无数道流星在阵地上空飞来飞去。”李弥请李汉萍留步，然后他万分伤感地说：“炒豆子的时候到了，我早就知道有今天。”

李弥的身影消失在纷乱的枪炮声中。

李汉萍知道从徐州出来的几十万人马就要覆灭了。

在第五军军部里，杜聿明和邱清泉突然发现，就在他们布置突围的时候，第五军军长熊笑三不见了。熊笑三说过“如果个人单独行动，就有办法出去”，到底是什么办法？他是如何在混乱的战场上独自一人跑出去的？没人知道。后来人们知道的是，他一跑就跑到数千公里之外的台湾岛上去了。

杜聿明给蒋介石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各部队已经混乱，无法维持到明天，只有当晚分头突围。"电报发出后，隐蔽部里一片死寂。过了一会儿，邱清泉说："现在陈庄三面已被包围，只有西南方一个缺口可走。大家突出重围后，谁能到达南京，谁就向总统报告这次全败经过及今晚的情况。"于是，大家动身走出陈庄隐蔽部：走在最前面的是杜聿明，随后跟着邱清泉、徐州警备司令谭辅烈和第二兵团参谋长李汉萍。黑暗中，"四人鱼贯地右手搭在前一人的左肩上，由二〇〇师工兵营长作向导"，向陈庄西南方向邱清泉说的那个缺口突围。

尽管四个人如同游戏般互相搭着肩膀走出了隐蔽部，但是，刚出隐蔽部这个小小的队伍就在爆炸的火光中瞬间解体了。

杜聿明在十几名卫兵的簇拥下向正西仓皇而去。

李汉萍跑出陈庄后辨不清方向，天大亮后被解放军俘虏。

杜聿明的黄埔同学谭辅烈消失在混乱中，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以及后来的命运。

邱清泉突出陈庄后，"时而跑到东，时而跑到西，不停地高声大叫'共产党来了'。"天色渐渐明朗，邱清泉发现他仍在陈庄以北的张庙堂附近，难道整整一夜一直在原地转圈？邱清泉最终没能突出重围。但是，也没有确切史料记载他是如何死亡的，极有可能的推测是死于炮击或流弹。邱清泉尸体被发现的地点是：张庙堂村西南四百米处的旷野中。

杜聿明指挥部副参谋长文强率领机关人员冒死到达陈庄第五军军部时，发现杜聿明等人已经跑了。杜聿明的机要秘书冯如石把重要书信、电报底稿、蒋介石的来电等文件在火光的照明下撕成碎片，然后扔在风中。机关人员看到如此情景只好各自逃跑。文强率领几名卫兵

在拂晓时分跑不动了，他们坐在一块沙地上，当一群解放军官兵朝他们冲过来时，他们没有做任何抵抗投降了。

十日黄昏，在庄西场园村，一个被俘的国民党军军官突然冲出巨大的俘虏群往南跑。被解放军战士抓回来后，他用浓重的湖南话解释说，他被炮弹震晕了，总觉得面前有人拿着手枪要枪毙他——国民党军第七十四军军长邱维达想逃到附近的第十二军去，跑到大王庄附近的时候，他带着的队伍已经全乱了，一会儿往西跑，一会儿往东跑，军部和师部都已跑散，黑暗中他发现身边的卫兵一个都不见了。往西跑的溃兵挤在一起，只要前面枪声一响，拥挤的队伍就四处跑散。邱维达实在跑不动了，解放军冲到他面前时，他“举起手来当了俘虏”。

第十三兵团参谋长吴家钰，第九军军长黄淑、副军长李荩宣、参谋长顾隆筠此刻都躲在第二兵团第五军二〇〇师师部里。第十三兵团在陈官庄东面被击溃后，黄淑奉李弥的命令收容第八军、第九军和第一一五军残部，这些残余部队躲在二〇〇师的后面，正拼命地挖掩体以躲避到处飞溅的弹片。黄淑派出一个工兵营去陈庄方向接李弥，准备一起突围，但工兵营一去不复返，李弥也没有任何消息。九日午夜，二〇〇师师长周朗接到第五军副军长郭吉谦的一封信，信中说：“杜主任、邱司令官、军长（熊笑三）先走了，要我通知你各奔前程，目标安庆，前途珍重。”信封里还夹着五百元金圆券。周朗把信给黄淑看了，黄军长认为，兵团司令官李弥未到，如果自己这样跑了，“丧失军人气节”。于是，周朗“独自离开了掩蔽部”。拂晓时分，二〇〇师已经完全溃散，师部四周到处是炮弹爆炸的火光和解放军官兵的喊杀声，黄淑这才通知一六六师师长肖朝伍、三师师长周藩和二五三师师长王青云已各自突围。于是，他自己也跑出了二〇〇师师部。枪弹乱飞，杀声震天，黄淑感到已无处可逃，他找到一个残破的隐蔽部蹲下来，一直蹲到解放军官兵出现在他面前，那时是一月十日早晨七时。

最后，防守陈官庄的第七十军抵挡不住华东野战军的猛烈攻击，决定放弃阵地逃亡。高吉人负伤后，九十六师师长邓军林升任第七十军军长，他命令参谋长魏珍通知九十六师和工兵团速到陈官庄东面的空地上集合，并通知三十二师师长龚时英自行选择突围方向，至于一三九师因已无法联系索性由他们去吧。九十六师和工兵团集合完毕后，邓军林、魏珍以及其他指挥部人员在特务营的保护下，跟随刘志道师长率领的师直属队和二八六团一起向西跑。刚出陈官庄，就发现人喊马嘶，枪声四起，流弹风一样从头顶或身边掠过。魏参谋长建议投降，其余的人不吭声，邓军林十分恼怒："你们怕死！要投降你们去，我不阻拦，我不投降！"于是，只好继续往西跑。跑着跑着，前面的路被汽车和乱兵堵塞无法通行，后面解放军的喊杀声越来越近，部队一下子溃散了。九十六师特务连冲出一条血路，掩护邓军林带着几十名卫兵冲了过去。但是，又一道封锁线横在了眼前。邓军林意识到自己已经被盯上了。盯上他们的是华东野战军一纵二师。战士陆尤富和李振亚看准了一名很胖的军官猛追，那个军官先扔下了一支汤姆森枪，接着又扔下了一支左轮手枪，陆尤富没捡枪还是追。胖军官最后跑不动了，喊："我没枪啦！我没枪啦！我是个上士，优待啊！优待啊！"陆尤富把这个胖军官交给李振亚，继续去追其他的俘虏。胖军官掏出一个小布包对李振亚说："这是金戒指，你要吗？"李振亚摇摇头。胖军官一会儿说自己是上士，一会儿说自己是特务长，还不断地在俘虏群中打听谁是广东老乡。负责审查俘虏的副指导员李德从他的皮夹子里找到一张名片，李德大声地念起来：陆军第九十六师师长兼第一快速纵队司令邓军林。胖军官说："这就是我。"

华东野战军各纵队从四面围攻陈官庄的动作猛烈而坚决，冲在最前面的是十纵八十三团。这个团的二营和三营在团政治委员孙乐洵和副团长孙成才的率领下，午夜时分冲到陈官庄外围敌人用大卡车和坦克组成的环形围墙前。他们从一名国民党军军官口中得知杜聿明要逃跑，立即向纵队请示允许他们发动攻击。纵队司令员宋时轮的命令

是：不顾孤军深入，不顾伤亡，坚决冲进去！两个营的攻击突然开始，不少国民党军官兵为躲避炮弹和寒风还躺在大卡车和坦克的下面，二营长曹文章奉命指挥四连攻东门，五连攻东南面的小高地，六连攻东北角，三营长朱福修奉命率七连攻击正北的汽车坦克围墙。战斗在夜色中进行，二营六连和三营七连的攻击受到敌人的猛烈抵抗，朱福修指挥七连成功地炸毁一座暗堡之后，终于突破钢铁的围墙，后续部队冲进陈官庄。朱福修营长想找个地方当他的营指挥所，七连副连长皮俊生说，前面有个地下室挺合适。朱营长带人举着蜡烛走了进去，微弱的烛光下，眼前的情景令官兵们十分惊讶：大约十五平方米的长方形地下室，地上铺着红色的地毯，中间的一张长方形桌子上凌乱地摆放着饼干、牛肉干和大饼等物品，一条黄绿色的皮马裤旁边，有一只没有打开的降落伞伞包，上写着“杜聿明亲收”的字样，角落里遗落着一只印章盒，扁形皮面，四边镀铬，里面有一枚长方形的石质印章，上面的篆文是“杜聿明”三个字。

朱福修营长喊：“快追！就是上天入地也要把杜聿明捉到！”

十日拂晓，华东野战军四纵十一师卫生处驻地，一位老乡在村头发现田里有十几个人鬼鬼祟祟的，这些人见到有人来了都趴了下去，其中的一个人走过来，问村子里有没有军队。老乡说，这方圆百十里都住着解放军。于是，那人把一枚金戒指塞到老乡手里，嘱咐老乡不要告诉别人看见了他们。老乡拿着金戒指很快报告了十一师卫生处，卫生处通信员樊正国立即和小崔前去查看，那十几个人还在田野里。

小樊跳上一个坟包，发问：“哪一部分的？”

“你是哪一部分的？”他们反问。

“我们是十一师，你们哪一部分？”

“我们是十一师送俘虏下来的。”

小樊机警地端起枪来，喝令：“不许动！你们说说十一师师长叫什么名字？”

“我们是刚从后方来的，不知道师长叫什么。”

小樊立刻命令他们：“举起手来！向前走三十步！”同时嚷着吩咐小崔：“通知二排上去从侧面警戒！”

这十几个蒋军带着的都是汤姆枪、卡宾枪和快慢枪，然而他们摸不到究竟，就在我们两个小通信员面前乖乖地放下了武器。

查问的结果，其中一个自称是《中央日报》的记者；一个说是汽车司机；一个穿着普通士兵军服的高个儿自称是军需处长；其余八九个是当兵的，都穿着和普通士兵不一样的美式军装。

华东野战军四纵十一师负责后方勤务指挥的陈茂辉主任审查了这几个俘虏。陈主任掏出一包“飞马”牌香烟递了过去，“军需处长”却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来一盒美国香烟，埋头抽起来。

“你是哪一个单位的？”我开始问他。

“十三兵团的。”

“干什么的？”

“军需处长。”

“姓什么？”

“我叫高文明。”

我笑了笑，说：“高文明，这个名字倒起得不坏。十三兵团有几大处？”

“六大处。”

“你把六大处处长的名字写出来吧！”

想不到这么一个问题就难倒了他。他到口袋里掏笔，一伸手，就露出了一段雪白的胳膊，手腕上戴着一只高等游泳表。掏了半天，掏出来的是一包美国香烟；再掏，又是一包美国香烟；再掏，掏出来的是一包牛肉干；再掏，又是一包牛肉干。最后，才掏出一支派克笔。但是，只写了几个字就写不下去了，手在发抖。

“写呀”，我说，“难道你们一起的几个处长的名字都不知道吗？”

“我知道！我知道！”他说着，又在纸上写。可是，好半天，还是在描着原来的那几个字：军需处长高文明。

我说："你老老实实说你是干什么的就对了，不必顾虑。我们的俘虏政策是宽大的，只要放下了武器，不论大官小官，一律优待，除了战犯杜聿明以外。"

好半天，他一声不吭。

我又说："蒋介石是失败了，黄百韬被打死，黄维兵团也被歼灭了。黄维想逃走，可是没逃成，也被活捉了。想混是混不过去的。"

他一听见黄维的名字，立刻怔了一下，问："黄维在哪里？"

"你可以见到他的，两三天内就可以见到。"

"军需处长"要求休息一下。

站在一旁的一位解放军干部对自称是《徐州日报》记者的副官尹东生说："你是安徽人，去找你的老乡去。"然后，将"军需处长"和自称是汽车司机的兵单独带走了。杜聿明后来回忆，他们被带到第十三兵团的俘虏群，见到那里面有许多部下，他"既惭愧又恼火"，惭愧的是觉得对不起部下，恼火的是感到解放军已怀疑他了——"我们到一间磨房里休息，解放军监视得很严。这时，'战犯'这个名称一直缠绕着我。张国印（杜聿明的司机）见我心神不定，就多次劝我夜间逃跑。我自己觉得腰腿疼痛，行动艰难，逃出去走不动会死，被解放军发现也会死，与其被处死，不如先自杀，还可以做蒋介石的忠臣。一刹那间执拗得仿佛死神来临，见警卫人员刚离开屋，就顺手拿起一块小石头在脑袋上乱打，一时打得头破血流，不省人事。所幸解放军及时发现，将我抬到卫生处抢救，不久即清醒过来，好像做了一场噩梦。"

第二天，陈茂辉主任又来了，问："你叫什么名字？"

"军需处长"不耐烦地说："你们已经知道了，何必再问呢？"

华东野战军四纵将敌"军需处长"押送到野战军总部的时候，得到收条一张：

收到战犯杜聿明一名

此据

十一日十时

参四科（盖章）

参四科，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第四科，负责收容国民党军重要战俘。

新中国成立后，杜聿明作为重要战犯被关押。

一九五七年，他的女婿杨振宁博士获得诺贝尔奖，周恩来总理托人前往美国祝贺，并带去了杜聿明给女儿女婿的一封信：“亲爱的宁婿，我祝贺你获得诺贝尔奖金，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两年后的十二月四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一九五九年赦字第一号通知书下达，五十五岁的杜聿明被特赦。一九六一年，他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一九六三年，杜聿明的夫人曹秀清将四个儿女分别舍在台湾和海外，只身离开美国回国与丈夫团聚。一九八一年五月，杜聿明病重入协和医院，女儿杜致礼从美国回到北京，当她抱住病床上的父亲时，已经昏迷多日的杜聿明热泪长流。七日，杜聿明病逝于北京，享年七十七岁。

李弥是个谜。

从陈庄第五军军部出来之后，李弥凭借指北针找到了第九军三师师部。他给还坚守在周楼村阵地上九团团长甫青云打电话，询问“是否能守得住”，甫团长说可以，于是李弥决定去九团，“免得被乱枪打死”。跑到九团团部后，李弥对三师师长周藩说：“南京老头子他们正在想和平停战，快有结果了。只要你们能守几天，就有希望放你出去。”周藩说：“没吃没喝，怎么能守得住？等南京谈判，那不就饿死了！”凌晨时分，周楼阵地遭到猛攻，解放军官兵冲进来三十多人，但

在守军的抵抗下全部阵亡在阵地前沿。李弥说：“很好，就这样守！”但是，华东野战军对周楼村的炮击开始了，炮兵营长被炸掉一只手，村后阵地上的几百名官兵被打散。周藩决定投降。李弥同意“可以写个条子送出去”，以便“拖到天黑，我们就溜掉”。条子送出去之后，十日中午时分，被华东野战军九纵二十七师俘虏的第九军一六六师师长肖朝伍让他的副官带进来一封劝降信。李弥看了信之后，让那个副官先回去，但那个副官出去不久又回来了，又带来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解放军要你们立即投降，主官出来报到，部队放下武器集合听点收，否则就要立即攻击，不得再延误。”

李弥说：“他们要主官出去报到，看你们哪一个愿意去吧！”他同时放声大哭起来，边哭边说：“我不能死呀！我死不得呀！我若能回去，对你们的家属一定要照顾的，你们都可以放心！”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让我去报到。第九团代团长甫青云是他的小同乡，是他一手提拔的心腹。我故意说：“那就叫甫青云出去报到吧！”甫青云听说叫他去报到，也放声大哭说：“我不能去呀！”我说：“好吧，不用哭了！我去就是了，你们放心吧！”李弥说：“还太早，现在才三点钟，再等一会才好。”我说：“好吧！”他叫甫青云给他找士兵的棉大衣和胶鞋，而且说要负过伤的大衣更好。我知道他是要化装伤兵混出去，到黑夜逃跑。不久，大衣和胶鞋都拿来了，他和两个副司令官及团长都化了装，把脱下来的皮鞋拿出去给士兵穿。接着第九军的参谋长顾隆筠也来催降，他一到门口，见我就说：“你快去吧，他们对我们很客气，不要顾虑，没有什么关系。”进门后，他对李弥说：“啊，司令官也在这里。”同时向他一鞠躬。李弥说：“是呀，你千万不能告诉他们说我在这里。”他连连点头。李弥又眼泪汪汪地说：“你们去吧，如果我能出去，我会照顾你们的家属，你们放心吧！”他还哀求顾隆筠和跟我同去报到的参谋长张炳琪、军部军需主任周济等不要揭露他，让他逃出去。顾隆筠只报以同声相哭。约十六时，我仍然以部下对长官的礼节向司令官、副司令官各行一鞠躬告别，并说：“再见！”

周藩带领国民党军第九军三师残部投降的同时，已经化装成伤兵的李弥因被俘混杂在一个俘虏群里。这个俘虏群由华东野战军第十二纵队负责押送——“为了集中力量歼灭更多的敌人，我们抽不出更多的部队和时间押送清理俘虏，只派了纵队警卫营的一个连将两千名俘虏押送到临沂野战军政治部收容所。途中跑了几十个人，后经查明，逃跑的人中，有第十三兵团司令官李弥，是化装逃跑的。”李弥一路逃亡，先到徐州，再到济南，又经青岛南下。蒋介石召见了他，让他担任重新组建的第十三兵团司令官兼重新组建的第八军军长。几个月

后，他率部在中国的西南一角抵抗，最后逃入缅甸境内。一九七三年他病逝于台北，享年七十一岁。

李弥得以逃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战场的混乱。

《大众日报》记者目睹了淮海战役临近尾声时的战场：

> 十日拂晓，记者由鲁楼进入这最后全歼十余万蒋匪的大战场，十数路漫长的俘虏行列已在晨雾中押下来，行列的先头已隐没在五六里外的村落里，后尾却还在战场的中心集合地未动，零散的敌官兵又不时从各个角落奔出来自动加入到行列中，有数路俘虏队伍并没有解放军看押，他们也自动地朝着大队俘虏的方向走，并不时地问走过的解放军同志："官长，到俘虏营走哪条路？"……记者跨过鲁楼河向陈官庄走去，四野没有一棵麦苗，也没有树木。在庄东的临时飞机场上还停放着一架被击毁的小型飞机，同时上空三架蒋匪运输机仍在投掷着弹药和大米。匪二兵团驻地陈官庄和匪五军驻地陈庄周围排列着数不清的各式车辆：十轮卡、大小吉普、水陆两用汽车、水陆两用战车、坦克、装甲车、救护车、炮车……一眼望不到边际。有的汽车和装甲车被用作了隐蔽部的顶盖和卧室。许多载满胜利品的车辆正由解放军战士指挥着驶出战场。野地上也堆满了一片弹药武器，解放军战士从四面八方向这个中心区奔来，每个人都背着好几支枪……战场上遍地都是马皮牛皮和骨骼，饥饿不堪的敌军俘虏和伤兵在汽车上找到大米，用茶缸、洋铁罐、洗脸盆各式工具就地煮起饭来。有的饭未烧熟，伤兵们拥上来抓了就吃……

冒着浓烟的巨大战场上，零星战斗依旧在个别村落附近进行着，顽抗的国民党守军与围歼他们的华东野战军官兵依旧在血拼，受伤和死亡还在发生。更多的官兵和支援他们作战的百姓则忙着抢运缴获的物资和收拢大量的俘虏，由于绝大部分被俘的国民党军军官都称自己是"军需官"，于是来不及仔细甄别，统统集合在一起尽快押离战场。而最重要的工作，是必须抢运所有的解放军伤员，军民们一起在战场上奔跑着，呼喊着，他们不想让已经负伤的官兵再出现意外，因为所有的官兵都知道激战之后的胜利已经到来。

纷乱的战场上，一个柔弱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棉衣上全是泥水，一缕秀发从军帽中散落出来，贴在满是汗水的脸上。华东野战军绝大多数官兵都认识她，因为她是野战军文工团最漂亮的女孩，在官兵们看过无数遍的歌剧《白毛女》中扮演喜儿。此时，国民党军的飞

机依旧在轰炸和扫射，这种轰炸和扫射已经变成了一种不分敌我的疯狂屠杀。子弹从一架俯冲扫射的敌机上下雨一样落下，她扑在了正在抢运的解放军伤员身上。

“喜儿”死了。

文工团员陈洁，多才多艺，勇敢热情，青春如火，笑脸如花，她年仅二十四岁的生命被弹片撕碎的那一刻，是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下午。

雪野晴空，硝烟正在逐渐散去。

该日，历时六十五天的淮海战役结束。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饶漱石、张云逸、粟裕、谭震林、陈赓诸同志，华东人民解放军和中原人民解放军的全体同志们:

淮海战役自去年十一月六日开始，至今年一月十日已完全胜利结束。在这六十五天作战中，你们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南线的主力黄百韬兵团全部五个军十个师，黄维兵团全部四个军十一个师［内有一个师起义］，杜聿明所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全部十个军二十五个师［内有一个骑兵旅］，冯治安部两个军四个师［内有三个半师起义］，刘汝明部一个师，孙良诚部一个军两个师，宿县和灵璧守军各一个师，以上共计正规军二十二个军，五十五个师，加上其他部队，共消灭敌军兵力约六十万余人。至此，南线敌军的主要力量与精锐师团业已就歼。你们生俘了战争罪犯国民党徐州“剿总”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杜聿明，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及国民党军其他高级将领多名，击毙了国民党第七兵团司令黄百韬。你们击退了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的增援，迫使他们向沿江一线逃窜，从而使淮河以北地区完全解放，使淮南一带地区大部入我掌握。凡此巨大成绩，皆我人民解放军指挥员与战斗员、人民解放军与人民群众，前后方党政军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所获的结果，特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和慰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七日

淮海战役从根本上动摇了蒋介石统治集团的政权根基。

文工团员陈洁被鲜血浸透的棉军衣口袋里，有一本用花布装饰封面的歌本，歌本里面有她刚刚写的一首歌词：

烈火般的战斗，

似我们的青春。

我们高声歌唱，

勇敢地向前进！

淮海战役，人民解放军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共有八万八千八百一十八名官兵负伤，两万五千九百五十四名官兵阵亡。

一九四九年初，大地冰封，高天朔风，中国北方的原野上缭绕着年轻的解放军官兵嘹亮的歌声：“我们高声歌唱，勇敢地向前进！”

# 第十五章 平津战役：坦克驶过东交民巷

## 文章要从西线做起

“共产党的高级人员南方人多，先听他是什么口音，再就是看手指头，这些人最爱吸烟卷，左手的指头总是黄黄的，这些都是可以识别的。”国民党军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在他的作战室里对政工处上校督察员王越说。王越刚刚被任命为“援晋兵团”第一线联络官，而“援晋兵团”的任务并不是要打到山西去，而是要“沿平汉线南下”直捣共产党人的“心脏河北阜平”——“这次你去，注意对高级俘虏要优礼相待。好好干！好好干！”

傅作义，一个因为不属于蒋介石的嫡系，从而在国民党军的派系倾轧中苦苦周旋的高级将领，此刻突然策划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即派出一支秘密部队去偷袭他的防区内的共产党中枢机关，以期将共产党的首脑人物一网打尽。当然，行动最成功的标志是能够抓获南方口音极浓、手指被卷烟熏得很黄的毛泽东。五十三岁的国民党军陆军上将傅作义，在国共两军于中国北方所进行的最后一个具有决战意义的战役——平津战役——的进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且心路复杂的角色，这种复杂性在他策划的这一“惊天动地”的偷袭事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傅作义所统辖的华北战区地域广袤，东部是辽阔的华北大平原，潮白、永定、大清、滹沱等数十条大小河流东西贯穿，大运河则南北贯通其间。西部是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太行山及其支脉绵延于河北与山西交界处；北部是内蒙古的沙漠地带，燕山山脉横亘于长城内外。在这个区域内，有河北、山西、绥远、察哈尔、热河五省和北

平、天津两市，同时还有包头、归绥（今呼和浩特）、集宁、张家口、大同、太原、石家庄、承德、唐山、秦皇岛等重要城镇。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大举进占这个连接着东北、西北、中原和华东的重要战略区，但是，除了占据了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和铁路交通沿线的重要城镇之外，无论从政治还是军事的角度看，国民党人从来没有真正掌握过这一广袤的地域。华北的广大乡村和部分城镇，仍在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范围内，经过一九四七年的石家庄战役，这两个解放区已经连接成一片，形成总面积达二十三万平方公里的华北解放区。华北解放区包括陇海路以北、津浦路以西和以东的部分地区，同蒲路以东、平绥路以南和以北的部分地区。解放区内拥有耕地一亿六千三百万亩，县以上城市一百七十六座，人口四千四百万，其中有一百万军民是政治坚定和经过战争考验的共产党员。

一九四八年五月初，共产党的政治和军事中枢从陕北移动到了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这不但是解放战争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也足以证明共产党人对华北地区政治、经济和军事具有足够的控制力。五月九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建立，刘少奇兼第一书记，薄一波、聂荣臻分任第二、第三书记。同时，华北军区组成以聂荣臻任司令员，薄一波为政治委员，徐向前、滕代远、萧克任副司令员，赵尔陆任参谋长，罗瑞卿任政治部主任。

这一年的九月至十月间，国民党军统帅部的大员们，包括蒋介石在内，都在为东北地区的大战而穿梭忙碌，不断地经过或逗留于傅作义所在的北平。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来到北平，在出席傅作义为他举行的晚宴时，发现坐在位首的是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心里颇为疑惑，因为在国民党军大员们的印象中，这个邓宝珊好像与共产党方面关系密切。

“华北唯有积极进攻共军，不断歼灭其有生力量，方能支持华北局势。否则，局势一旦成被动，终将不可收拾。”傅作义打算最近即进攻石家庄，征求我对此有何意见。我立即赞同其意见说：“第三厅亦早有意增兵于华北，使总司令能伺机乘虚南下袭击共军。”傅作义紧接着要求说：“如果政府能增加四个军，我将保证能攻占邯郸、忻县，并解大同之围。”我提醒傅作义说：“用数个军攻击，采用空军补给，可不守后方联络线，以免分散兵力，则攻击效果更佳。”“如果这样，能增加五个军，则扫荡整个华北有余。”傅作义听后大喜这样回答，并告诉我“准备攻打石家庄时，在南口设伏，必能消灭聂荣臻的第三、第四纵队”。我听后觉得他气很壮，战略上也有见解，但暗想国民党东北局势危殆，全国到处紧张，哪里抽得出五个军来？由于我听他一番豪言壮语，把我初见时暗想的他与邓（邓宝珊）可能有特殊关系的印象完全打消了。

有史料表明，那时傅作义已开始就和平解决华北问题，秘密地与中共北平地下党人进行某种试探性接触。但他同时又策划着攻击石家庄和偷袭西柏坡这两个危险的行动。

随着东北的战局日渐危急，蒋介石不断催促傅作义出兵增援。无奈之下，傅作义派出第九十二军去葫芦岛增援范汉杰，但是他对形势的估计是清醒的，那就是国民党军在东北大势已去，他必须保存华北地区的军事实力，以便应付接下来可能发生在华北的大战。傅作义没有料到的是，东北地区的几十万国民党军迅速地崩溃了。十月，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开始围攻太原。国民党军统帅部认为，如果太原失陷，不但山西的阎锡山不能自保，一旦解放军掉头向西，陕西的胡宗南也不能自保。为此，蒋介石征求傅作义对死守太原的意见，傅作义突然发现，这是阻止蒋介石调动华北部队增援东北战场的极好机会。据情报部门报告，由于对太原的围攻，解放军在冀中地区兵力薄弱。于是，傅作义想出一个“围魏救赵”的办法，即组织“援晋兵团”偷袭石家庄和西柏坡。如果能够趁虚而入，直取石家庄，将直接威胁共产党中枢所在地西柏坡的安全，围攻太原的徐向前的第一兵团必然回师救援，这样既可解太原之围，又可以借机把自己的部队部署在平汉线上，造成一种紧张的气氛，以遏制蒋介石从华北抽兵的企图。只是，从傅作义策划偷袭行动的过程上看，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如果偷袭西柏坡成功，傅作义将名垂国民党军史册。

傅作义说："我们这次总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共产党的心脏。我们这次不但在军事上打垮共产党的整个指挥系统，取得胜利，同时要配合政治作战和经济作战。就是在解放区进行政治宣传，发动民众支援我们，同时摧毁其行政系统；在经济方面，破坏工业设施，大量使用边区票以打乱共产党的经济手段。"

偷袭行动策划精细：调郑挺锋的第九十四军的三个师、李士林的第一〇一军的一个师以及刘春方的新编骑兵第四师、鄂友三的整编骑兵十二旅，共同组成袭击石家庄的联合部队。同时，杜长城率配备美国最新侦察装备的国防部驻华北新式技术大队和大量政工人员跟随行动，准备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内部进行"政治作战"和处理"高级俘虏"。再调集十个"人民服务队"跟随部队担负监视行动和做地方工作的双重任务——所谓"人民服务队"，由国民党党部政工局训练的青年学生组成，每队十六人，每人配备卡宾枪一支。为了更有成效地进行"经济斗争"，联合部队携带着大量伪造的解放区的纸币，以沿途大量购买物资并广为散发。

傅作义对他策划的行动信心十足："如步兵顺利到达滹沱河，即命骑兵进袭平山县西柏坡共产党中央所在地。"

但是，参战的军事和政工人员心绪复杂：一方面是有些兴奋，因为这个任务不同寻常，弄不好就能得到天大的功劳，所得犒赏应该够这辈子花费的了。另一方面又有些害怕，因为谁都知道，行动必须经过解放区，一年前，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就是因为没在意这件事被俘虏了。政工处上校督察员王越从傅作义那里回来后，有人提醒他说："河北根据地绝对不是好进的，我的老弟！一定要送上门去，当心被吃掉！"

十月二十四日，偷袭部队在第九十四军驻地河北涿县集结完毕。然后，步兵在中间，骑兵在两翼，分路南下。第九十四军军长郑挺锋

坐在吉普车上穿行于卡车车队之间，吉普车的后面挂着一个拖斗，拖斗里坐着几位戎装女兵，据说是第九十四军负责“政治作战”的政工人员。车队顺着公路出发没多久，发现公路上被挖出了一道道横沟，横沟是按照十轮卡车的轮距尺寸挖出来的，车开过去正好卡在两条横沟中间动弹不得，于是还没被卡住的卡车只好离开公路走麦田。但是，麦田里的沟沟坎坎间埋着地雷，数量之多扫不胜扫，结果是部队寸步难行。过了高碑店，好容易磨蹭到定兴县城，发现全城空空荡荡，第九十四军官兵翻动百姓财物的时候，箱子盖一开地雷就爆炸了。第二天继续走，走到徐水附近，部队遇到阻击，阻击并没有持续多久，当面的火力就撤了。下午部队进城后，发现徐水也是一座空城。郑挺锋得到的情报互相矛盾：各师都报告说解放军的大部队一直跟着他们，但侦察队的谍报员说附近根本没有解放军的大部队。二十六日黎明，郑挺锋接到国防部的电报，说聂荣臻的“第七纵队”正沿着公路经过保定向南行进——郑军长只相信国防部的电报，因为“国民党军部队行军作战，只能靠本部队的谍报搜索三十里以内的动态，其他敌情要靠国防部第二厅提供，诚如盲人骑马”。于是，催促部队急速前进。下午，大队人马终于到达保定。

机械化部队，三天之内只走了一百三十公里，这是什么“偷袭”？

傅作义的第一〇一军驻扎在保定，军长李士林见到郑挺锋劈头就问：“你们干什么来了？”

郑挺锋说：“闹不大清楚，明天总部来人再作部署。”

李士林说：“你们不知道，我倒知道得很详细。”他拿出一张报纸，说是跑单帮的商人从石家庄带来的，报纸的大标题十分醒目：傅作义派郑挺锋、刘化南、刘春方、鄂友三、杜长城妄图偷袭石家庄市。

郑挺锋倒吸一口凉气：怎么偷袭刚走到半路，共产党方面就知道了？

两个人不禁感叹："'剿总'内部的共产党太多！"

傅作义的司令部里，有一个专门刻蜡板的人，凡是不发电报的文件均由他刻印下发，他的名字叫甘霖。这是一个小人物，司令部里绝大多数人既不知道也不关心他的来历。这一天，甘霖接到一份需要刻印的文件，内容为偷袭石家庄和西柏坡的作战计划。他刻完了这份文件，即搭车离开北平去了徐水，在那里他给位于平山县孙庄的华北军区司令部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作战处长唐永健。打完这个电话，甘霖就不见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甘霖曾出任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同时，北平《益都报》采访部主任刘时平从鄂友三那里也听到了这一消息，他立即告诉了傅作义办的《平明日报》采编部主任李炳泉，然后他们向北平地下党负责人之一崔月犁作了汇报，崔月犁通过地下电台把情报转发给了中共华北局。

收到情报，聂荣臻和薄一波感到事态严重。此时的石家庄，实际上是一座没有大部队防守的空城，不远处就是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一兵团现在山西太原，二兵团现在平绥铁路一线，三兵团现在绥远，身边已无部队可调。在向周恩来报告之后，他们作了紧急部署：调冀中军区七纵统一指挥地方军民，迅速沿平汉路两侧布防，力争把敌人阻挡在滹沱河以北；发动地方部队和民兵破坏公路和铁路，埋设地雷，设置路障；组织游击队打击敌人的骑兵部队，尽一切可能迟滞其前进速度；调距离最近的第二兵团郑维山的三纵昼夜兼程从平绥线南下。

毛泽东开始连续撰写广播稿，以犀利的文辞表达共产党人对所谓"偷袭"的蔑视，并号召华北军民"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彻底粉碎傅作义偷袭的"梦想"：

十月二十七日：

……此间党政军各首长已向保石线及其两侧各县发出命令，限于三日内动员一切民兵及地方武装，准备好一切可用的武器，以利作战，尤其注重打骑兵的方法。闻蒋傅进扰石家庄一带的兵力，除九十四军外，尚有新骑四师及骑十二旅，并附属爆破队及汽车百辆，企图捣毁我后方机关、仓库、学校、发电厂、建筑物。据悉，该敌准备于二十七日集中保定，二十八日开始由保定南进。进扰部队为首的有九十四军军长郑挺锋，新编骑四师师长刘春方、骑十二旅旅长鄂友三。此间首长们指示地方各界，切勿惊慌，只要大家事先有充分准备，就有办法避开其破坏，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此次务希全体动员对敌，不使敢于冒险的敌人有一兵一卒跑回其老巢……

十月三十一日：

……蒋介石最近时期是住在北平，在两个星期内，由他经手送掉了范汉杰、郑洞国、廖耀湘三支大军。他的任务已经完毕，他在北平已经无事可做，昨日业已溜回南京。蒋介石不是项羽，并无“无面见江东父老”那种羞耻心理。他还想活下去，还想弄一点花样去刺激一下已经离散的军心和人心。亏他挖空心思，想出了偷袭石家庄这样一条妙计……傅作义出骑兵，蒋介石出步兵，附上些坦克和爆破队，从北平南下了。真是异常勇敢……这里发生一个问题：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现在北平是这样的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二〇八师在那里。通州也空了，平绥东段也只稀稀拉拉的几个兵了。总之，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他们却还在那里做石家庄的梦！

毛泽东有意把傅作义“偷袭”大军的部队番号、将领姓名和行动日期说得一清二白，而且特别告诉傅作义“偷袭”石家庄的危险是北平空虚了，这不能不令国民党军心惊胆战。

二十八日凌晨，郑挺锋开始向石家庄方向进攻，同时，新编骑兵第四师和整编骑兵十二旅奉命绕道偷袭西柏坡。但是，步兵的进攻速度迟缓，即便有快速机动能力的骑兵也只谋求与步兵并排移动，根本没有跃马向前的意思。步兵离开保定没多远，就受到来自正面的坚决阻击，而且两侧村庄不断有冷枪射出，脚下更是处处地雷。第九十四军官兵惊惶地追问冷枪是从哪里打来的，最后军部的结论是：很可能是从“地道战夹壁墙”里射出来的——这一带曾是共产党抗战武装的游击区，军民发明的地道战曾让日军焦头烂额。突然，大部队停止了前进，原因是前边的伤员抬下来了，个个血肉模糊、呻吟呼号，负责“政

治作战”的女政工人员吓得藏到了军长的拖斗车下。郑挺锋命令炮兵开设阵地，对准前面的村庄猛烈轰击。轰击了好一阵，除了炮弹的爆炸声和冲天的火光外，不见任何别的动静。派出去的侦察队回来报告说，前面村庄里根本没有解放军的大部队，甚至连老百姓的影子都没看到。

二十九日，郑挺锋遇到了解放军的大部队。在保定到望都之间的方顺桥一带，司令员周彪指挥冀中军区七纵开始了顽强阻击。七纵的正面阵地上冲击与反冲击来回拉锯，黄昏的时候，郑挺锋的部队才突破阻击线进入望都。进城的时候，扫雷队发现城门边有一颗埋了半截的地雷，工兵排雷刚排到一半地雷响了，原来这是一颗假雷，下面连着一颗真雷，排雷就等于引爆了。新编骑兵第四师进入指定的村庄宿营，刚准备做饭，村内突然一声枪响，部队即刻混乱起来，师长刘春方命令后撤三十里再宿营。由于后撤仓皇，没来得及通知比邻的整编骑兵十二旅，结果，鄂友三部遭到七纵二十旅和民兵的袭击，一个团被大部歼灭，鄂友三本人率残部撤往保定方向。上校督察员王越深切感受到“河北根据地绝对不是好进的”这句话的含义——“有时东村步枪在响，有时西村机枪连发，间或有重机枪声和迫击炮响，这究竟是民兵还是正规部队，谁也不敢下个断语……我的感受是：鞍马劳顿一天，盼到宿营，但所有的村庄和民房却是不祥的来源，总是不敢合眼，生怕你正睡着，忽然会由炕洞、墙角、锅台、地下或者想不到的地方钻出共军游击队来，被打死或者被活捉。”

三十日上午十时，郑挺锋的主攻部队到达清风店——这就是去年十月间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全军覆灭的地方——飞机侦察报告说，唐河沿岸有共军的大部队在布防，所有的桥梁都已被破坏。郑挺锋命令在飞机、榴弹炮和轻重机枪的掩护下，正面投入一个师强行涉水强攻，另一个师从右翼迂回助攻。当面的七纵又一次开始了顽强阻击，尽管部队装备相对较差，但十九、二十、二十一旅官兵在手榴弹上绑上黄

色炸药，当敌人的坦克和步兵冲上来的时候，他们前赴后继猛烈投掷。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一个营的国民党军突破唐河，七纵十九旅五十六团二营六连随即冲了上去，与敌人展开面对面的肉搏战。一营冒着炮火增援二营，在一口枯井前与冲过来的敌人相撞，惨烈的肉搏战随即开始。夜幕降临，当国民党军退下去的时候，躺在枯井边的敌人的尸体竟达两百多具。

郑挺锋终于意识到，“正面强渡伤亡太大”。

三十一日下午，炮弹、子弹呼啸着掠过唐河，落在郑挺锋的指挥部周围，只是，虽然枪炮声大作却不见步兵进攻，郑挺锋一阵错愕之后反应过来：“共军要撤退了。突然撤退，显然别有所图。假如共军真的撤了，我们是否过河？如果过河，共军左右迂回反扑，我们则成背水之势，必造成重大伤亡。另外，共军会不会在唐河南岸撤退，却在上下游两侧绕过河北岸，从背后包抄我们？”郑挺锋正左右为难，从平绥线南下的华北军区第二兵团三纵，为回援石家庄到达北留营地区，对郑挺锋部的侧翼形成了威胁。

傅作义得知解放军主力到达战场的消息后，立刻命令郑挺锋北撤。

郑挺锋“顿时觉得轻松”了。

华北“剿总”副秘书长兼政工处长王克俊说：“援晋兵团这次胜利在望，忍痛撤退，完全是受了东北战局的牵制。尽管如此，我们这次行动也有很大收获，凡是我们到达的地方，共产党的行政系统整个被打乱了，就是这一下，也不是一年半载能缓过气来。”——没有任何史料证明王克俊所说的“很大收获”指的是什么。至于“共产党的行政系统整个被打乱了”，能够查阅到的仅有杜长城率领的那支国防部驻华北新式技术大队在一个名叫潘营的村庄里搞破坏的情景，因为情报报告解放

军曾有一个纵队司令部在这个村里驻扎过，于是新式技术大队“身着不伦不类的杂服，手提卡宾枪在紧张地东跑西窜”，他们炸完房子炸地道，整个村庄被他们破坏得一片狼藉，老远“就能瞭见烟雾腾空”，“火焰在吞噬着一堆堆的土布、杂货和家具”。

国民党军华北“剿总”的“偷袭”行动就这样草草收场了。傅作义不但没有看到任何一位有南方口音的“共产党高级人员”，而且他很快就发现，他的华北战区已经暴露在东北野战军百万大军的枪口下了。

辽沈战役结束后，华北战区国共两军的实力是：

国民党军华北“剿总”总司令部：总司令傅作义，副总司令陈继承、刘多荃、上官云相、宋肯堂、邓宝珊、吴奇伟、冯钦哉、郭宗汾，参谋长李世杰，副参谋长梁述哉。下辖第四兵团，司令官李文；第九兵团，司令官石觉；第十一兵团，司令官孙兰峰；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天津警备司令部，司令官陈长捷。华北“剿总”总兵力为十二个军四十二个师（旅）：第十三军，军长石觉；第十六军，军长袁朴；第三十一军，军长廖慷；第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第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第八十六军，军长刘云瀚；第八十七军，军长段云；第九十二军，军长侯镜如；第九十四军，军长郑挺锋；第一〇一军，军长李士林；第一〇四军，军长安春山，第一〇五军，军长袁庆荣。另有独立九十五师、骑兵新编第四师以及骑兵第五、十一、十二旅。加上所属绥远、大同等地驻军、特种兵和地方部队，总兵力为五十万余人。

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共有三个野战兵团、十一个步兵纵队、三十一个步兵旅和两个炮兵旅：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周士第，参谋长陈漫远，政治部主任胡耀邦，下辖第八、第十三、第十五纵队；第二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参谋长耿飚，政治部主任潘自力，下辖第三、第四、第八纵

队；第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李井泉，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天焕，下辖第一、第二、第六纵队。加上归冀中军区建制的第七纵队、归华北军区直辖的第十四纵队以及冀中、北岳、冀鲁豫、太行、冀南、太岳、晋中等七个二级军区部队，再加上石家庄警备司令部和晋绥第八纵队，总兵力为四十六万余人。

如果仅就华北地区双方的军事实力而言，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还没有与国民党军进行决战的条件。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前景双方都看得很清楚：辽沈战役结束后，已无后顾之忧的东北野战军百万大军一旦入关，傅作义的华北战区便首当其冲；只要林彪跨过长城，华北战场上国共双方的实力对比瞬间就会发生剧变，而这一变化无论对蒋介石还是对傅作义来讲，都是灾难性的。

于是，辽沈战役战火刚熄，国民党军与美军顾问团便开始忧心忡忡地考虑万分棘手的华北问题。

美国人对国民党军在华北地区的前途持悲观态度，他们认为傅作义最终无法“抵挡共产党在华北所能集中的力量对他的进攻”。导致美国人悲观的原因是，国民党军队崩溃的速度太快，似乎一切努力都来不及了：在淮海战场，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对付徐州地区的那些劣等国民党部队，能在两星期内到达南京附近的长江沿岸”；而北面的长城门户已经对林彪大军敞开，无论是蒋介石或是美国人“都不能得到采取军事措施的充分时间以挽救军事局势”。

但是，至少在辽沈战役刚刚结束的时候，蒋介石和傅作义虽然都对东北如此迅速失守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可他们并没有如同美国人一样极度悲观。蒋介石认为，在关内，国民党政权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并没有被动摇，军事实力上也仍处于优势，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华北地区难以对国民党军主力形成真正的威胁——“华北国军战意战力均

佳，且已有坚强部署，共匪窜犯占不了便宜去”，只要“适时加强战力，整个战局无虞”。局势的“严重程度还不至于威胁华北的生存”。

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傅作义，对形势的估计都建立在这样一个认识上：按照一般的军事常识，刚刚打完一场大战的部队，不经过补充休整就无法连续作战。他们对林彪入关时间的估计是一致的：四到五个月以后。四到五个月以后，他们期望什么？竟然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国民党高层对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抱有令人匪夷所思的坚定幻想，这个幻想的核心是：美苏必战而苏俄必败，苏俄一旦失败，中国共产党连同他们所领导的军队也就跟着瓦解了——且不说此时苏联和美国都没有进行一场全面战争的任何想法，在经历了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国都需要休养生息；退一步讲，即使苏美两国真的开战，有什么理由得出中国共产党会立即垮台而国民党军将由此获胜的判断？国民党高层一直热议的这一话题，连美国人都觉得不可思议。或许只有一个理由能够解释这种荒诞的存在，那就是国民党人对中国共产党人及其武装力量的认识依然固定在一九三四年以前，那时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是依附于总部设在苏联的共产国际而生存的。国民党人这种政治上的幼稚、肤浅和残疾是其一败便不可收拾的根本原因。于是，当蒋介石再次强调“美国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时，国民党军军官们“没有一个人显露出兴奋或愉快的情绪，相反，每个人都显得心情更加沉重”。

不过，蒋介石和傅作义也都清楚：林彪即使不能即刻入关，但终究会入关；第三次世界大战即使爆发，但爆发的时间也不是他们说了算的。因此，面对华北这盘险棋，两个人都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并由此导致在决策上产生了巨大矛盾。

就国民党军战区司令官而言，傅作义在政治和军事生涯中与蒋介石最为疏远。蒋介石之所以把华北的军政大权交给他，原因是傅作义

在华北地区根基很深，且多年来指挥作战屡有出色的表现。朱德在谈到这位对手的时候曾说：“在作战上他学了日本人的一些办法，也学了我们的一套，在华北方面他的力量现在远比我们大，所以傅作义是比较难打的。”内战爆发后，傅作义成功地解围包头和归绥，从当时晋察冀和晋绥部队手中夺回了集宁和张家口等要地，除了一九四八年一月他的主力部队第三十五军在涞水遭到毁灭性打击外，他在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作战中还没有过多地失手。只是，无论蒋介石如何重用，傅作义依旧对蒋介石抱有戒心，对华北的战局也抱有强烈担忧。

早在一九四八年初，他刚上任华北“剿总”总司令的时候，阎锡山就曾为他提出“三策”：上策为修筑坚固堡垒，坚守唐山至塘沽一线，坚决阻止林彪大军入关；中策为退出北平，坚守张家口至包头一线，与山西的阎锡山军队以及甘肃、青海的马家军联合抵抗；下策是坚守北平。傅作义对此印象深刻。在东北战局尚未明朗之前，他采取的是以北平为中心的机动防御策略。东北野战军打响辽沈战役之后，他的参谋人员又向他提出了三种方案：第一、全部撤回到西北老家去，全军移至绥远附近，全力控制西北，休养生息，以便与共产党军队对抗到底；第二、放弃承德、张家口和保定等城市，以一部分兵力控制北平，主力则集中坚守在天津、塘沽的出海口附近，确保华北的滩头阵地，以便在危急时掌握海路出口；第三、把属于西北军系统的嫡系部队转移到西北，把归华北“剿总”指挥的蒋介石的中央军留在津、沽地区，各守各的地盘。显然，第三种方案有派系隔阂和分散兵力之嫌，至少是不能公开说出口的，傅作义只把前两种方案交给将领们讨论。但无论多少种方案，无论什么样的方案，对于傅作义来讲，实际上就是要么守要么撤的问题。

是守是撤，颇费思量。

辽沈战役前，蒋介石的方针是“东北求稳定，华北求巩固”，而辽沈战役的结局使他希求的两者都落空了。面对林彪大军随时可能入关威胁华北的局面，国民党军国防部提供了两种方案供蒋介石选择：第一，趁共军全力进行淮海战役之机，集中傅作义的主力部队突袭兵力空虚的济南，然后傅作义的主力留在山东地区作战。这个方案的好处是，不但能夺回山东这个战略要地，牵制共产党军队在淮海战场上的兵力，还可以将华北的国民党军主力撤出，以加强未来江南作战的实力。第二，将傅作义的主力部队通过海路全部撤到长江以南。

应该说，在辽沈战役刚刚结束的时候，如果仅从纯军事的角度看，国民党军国防部关于华北战区的决策可圈可点：东北失守，华北最终将无以坚守，而南面淮海大战正炽，胜负尚难预料，与其孤军固守华北，不如彻底放弃，将华北国民党军主力完整地迅速移至江南，以为将来决战的军事准备。同时，数十万华北主力突然南下至淮海战场的侧后，将对正在进行淮海战役的解放军主力造成巨大威胁。而从海路直接把傅作义的部队转运到江南，更是共产党方面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因为淮海战役的作战目标，就是要把国民党军滞留在长江以北加以歼灭。如果顾此失彼，让傅作义的主力毫无损失地南撤，不但是巨大的遗憾，也是战略上的严重失误，对未来的江南作战将产生十分不利的后果。

但是，在傅作义主力是否南撤的问题上，蒋介石犹豫不决。从全国的战局上考虑，保存傅作义这支唯一可以机动的兵力加强长江防守，无疑是一个最佳选择；可放弃华北将在政治上产生巨大影响，同时海上运输也存在着诸多困难，船只不足和渤海湾冰冻期将至都是必须考虑的因素。让蒋介石犹豫不决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判断傅作义根本不愿意南撤。

蒋介石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傅作义坚定地认为：即使从平、津地区全面撤退，也不能撤到长江以南去，原因很简单：首先，他的嫡系部队官兵大多是绥远人，西北人恋家，谁也不愿意跑到遥远的南方过水土不服的日子；其次，无论蒋介石如何器重，自己终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一旦离开自己起家的华北，在派系角斗激烈的国民党军中，自己很可能沦落于寄人篱下甚至被吞并的地步；再者，国民党的前途明眼人已经看得清楚，跟着蒋介石走到底未必有什么好结果。那么，如果向西北地区撤退，傅作义只能带走他的嫡系部队，华北地区的中央军是不可能跟着他走的，且西北地区地广人稀，物资缺乏，运输和补给都有困难，并不利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傅作义思量再三，认为最理想的方案是"暂守平津，以观时局的变化"。

十一月三日，国民党军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许朗轩在葫芦岛部署撤退事宜后路过北平，傅作义让他转告蒋介石：必须把葫芦岛所有的撤退部队留在华北地区，否则他不愿意守平津，他"将带领自己基本部队四处游击作战"。

第二天，蒋介石电召傅作义到南京共商华北问题。

五日，何应钦、白崇禧、郭汝瑰和傅作义，在南京斗鸡闸二号何应钦的官邸进行商谈。傅作义再次强调华北兵力薄弱，难以顶住林彪百万大军入关，说他准备把归他指挥的中央军交出，带着他的基本部队退到绥远去打游击。何应钦急忙劝解说，如果华北兵力分散在平绥线上，一旦被分割截断就满盘皆输了，华北不保全国的局势将不可收拾，你一个小小的绥远如何能保得住？游击来游击去还不是被消灭？不如把全部兵力退守平津，这样至少可进可退。为此，何应钦答应可以给傅作义三个军的美式装备：

> "如果你能招募大批兵员，我可以立即将两个军的美式武器装备运到天津，由你扩建三个军，以增强华北国军力量。然后以津、沽为根据，逐渐挽回颓势，华北不还是大有可为吗？"

傅听后犹豫片刻，突然面露喜色地说：“也有办法。”

我（郭汝瑰）坐在傅的右侧，小声地问：“什么办法？”

“各个击破共军。”他小声回答。

无法得知傅作义的“各个击破”的含义到底是什么。

蒋介石最终的决定是：在华北地区采取“暂守平津，控制海口”的方针。

为了促使傅作义积极执行这一方针，蒋介石除了把华北的党政军财大权，包括中央银行的支付权，全部交给傅作义之外，还答应将美国援助的“七万支步枪和两亿发子弹补充傅作义所部”，并“允其可以不经过南京政府直接接受美援”。

有史料证明，傅作义在积极备战、扩充部队、囤积粮食、修筑碉堡的同时，确有从海上撤退的打算。他曾计划把华北“剿总”搬到天津去，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包括把自己基本部队在张家口的财产和军官们的家眷转移到天津，将自己的私人财产通过美国商人秘密转移到香港，并着手在天津修筑临时飞机场等等。但是，西北军出身的傅作义还是没有放弃向西的念头。因此，当他部署防线的时候，既兼顾了蒋介石“控制海口”的要求，又满足了自己“保持西部基地”的企图。于是，东起唐山、西至柴沟堡（今怀安），在五百公里的狭长地带上，傅作义的部署如一条兼顾东、西两面撤逃的长蛇阵。

至于傅作义准备的另外一手，即与共产党方面的和谈，他对心腹军官是这样说的：“让你们干什么就干什么，反正最后不会把你们牺牲掉。”

即使毛泽东已经得知傅作义有和谈的意向，也没能消除他对傅作义集团的一个最大的担心：南撤。

辽沈战役结束后，中央军委关于解决华北问题的计划是：

……东北主力除四纵、十一纵等部即行南下外，其余在沈营线（沈阳至营口）战斗结束后，应休整一个月左右，约于十二月上旬或中旬开始出动，攻击平津一带，准备于战争第三年的下半年即明年一月至六月间，协同华北力量歼灭傅作义主力，夺取平津及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完成东北与华北的统一，以便于战争第四年的第一季即明年秋季，即有可能以主力向长江流域出动，并使政治协商会议能于明年夏季在北平召开……

毛泽东原来构想的平津战役的时间是在一九四九年的上半年。

这与蒋介石和傅作义预想的林彪入关作战的时间没有大的出入。

在东北野战军按计划休整并进行入关准备期间，中央军委计划以华北现有兵力首先夺取归绥和太原，彻底肃清傅作义集团的后方，同时歼灭阎锡山集团，为进行平津战役做前期准备。

归绥是傅作义嫡系部队的后方基地，守军为一个军三个师约四万人。

十一月五日，华北军区第三兵团主力包围了归绥城。中央军委催促他们在傅作义的援军尚未到达的时候尽快攻城。于是，第三兵团把总攻时间定在了十六日。然而，就在第三兵团准备攻城的时候，中央军委接到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建议增兵太原的电报。第一兵团自十月发起太原战役后，攻击一直不顺利，部队伤亡很大，为了尽快解决太原，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和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周士第要求增加两个纵队到太原前线。华北地区的野战部队中已没有可以机动的兵力，中央军委考虑，傅作义正在是守是退的问题上徘徊，如果攻击傅作义的后方基地归绥，也许会促使傅作义的主力提前西退，而杨成武兵团在攻取归绥的同时没有阻援的把握，太原这边如果久攻不下，这两个点就都成了问题。

九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

周：

请以电话与聂薄商量：（一）杨成武停止攻归绥［因无打援把握］，即在归绥、卓资山、集宁地区休整，待东北我军南下攻平津时再攻归绥。（二）杨（杨得志）罗（罗瑞卿）耿（耿飚）率三四两纵队及八纵一个旅即开保定、石家庄之间休整补充至十五日为止，十六日开始向西参加太原作战。（三）在本月及十二月内给徐（徐向前）周（周士第）一万俘虏及新兵的补充。（四）杨罗耿另外两个旅加入七纵集团在平保（北平至保定）线活动。

毛泽东

十一月九日

毛泽东已经明确了华北作战的战略原则，那就是"抑留傅作义部队于平、张、津、保地区，以待我东北主力入关协同华北力量彻底歼灭该敌"，"不使其西退，亦不使其得由海上逃跑"。

那么，如何"抑留"傅敌？

十五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提出了他们的建议："令杨成武部暂不攻击归绥的方针很好"，但还不够，因为对太原的攻击也可能成为促使傅作义西逃或南撤的因素，因此"亦可暂不攻太原，而集中力量迅速包围保定或张家口"，"对所包围之敌，采取围而不攻的办法，以达到拖住敌人的目的。使傅作义及其所属之中央军，既不能撒手南下，亦不能撤退绥远，亦不能集中兵力守天津或守北平"。"如我部攻城，他来增援则正便于我军歼灭"，等到东北野战军全部入关，"合力发动攻势"，就能够全歼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地区。至于阎锡山的太原，到那时已成一座孤立的死城，"可随时轻易拿下，故太原之敌横直可歼灭的，并可有意留在打了平津之后作为那时无仗可打时的目标"。

毛泽东接受了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建议。

这一建议对中央军委最终制定平津战役的战略方针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十七日，徐向前、周士第复电，同意暂时不攻击太原的方针。

十八日，中央军委指示华北军区第二兵团随时准备向张家口出动，同时命令冀中军区第七纵队停止对保定的攻击。

中央军委进一步认为，停止对归绥、太原和保定的攻击，已足以麻痹傅作义集团，但要抑留傅作义的主力，从根本上解决华北问题，最重要的是东北野战军的入关越快越好。

但是，让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存在着诸多困难：在刚刚结束的作战中有的部队伤亡严重，新兵尚未完全补充到部队，大量的俘虏还没来得及做转化工作，东北籍的战士不愿离开家乡，入关的思想动员工作尚未进行，后勤的物资准备也没有展开等等。中共中央书记处对东北野战军提出的困难进行了集体讨论，最终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致电东北野战军，强调抑留傅作义集团的紧迫性，强调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的重要性，特别指出“欲抑留蒋、傅两部于华北，依华北我军现有兵力，是无法完成的”，在没有把握阻止傅作义率部西撤、也没把握阻止华北敌军海运的情况下，“傅系一退，蒋系必同时南撤”，那时我军就会面对“两头失塌”的不利局面。为此，中央军委提出两个方案供东北野战军考虑：一、“提前于本月二十五日左右起向关内开动”，占领华北要地，“然后大举歼敌”；二、“仍按原计划休整到十二月半”，傅作义要撤就让他撤，东北野战军入关后“即沿平汉路南下，先在长江中游作战，逐步东进与刘、陈会攻京沪”。

此电发出的第二天，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命令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的电报还是不容置疑地下达了：

林、罗、刘［绝密］

（一）傅作义经过彭泽湘及符定一（民主人士）和我接洽起义。据称傅起义大致已定，目前主要考虑者为起义时间、对付华北蒋军及与我党联系等问题，现符定一已到石门（石家庄），明后日即可见面。我们拟利用此机会稳定傅作义不走，以便迅速解决中央军。

（二）望你们立即令各纵队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此种可能性很大］。

（三）望你们在发出出发命令后，先行出发到冀东指挥。

（四）我们已令杨、罗、耿在阜平停止，并准备出张家口附近协同杨成武阻止傅作义西退。徐、周已复电同意停攻太原。

（五）如何部署，盼复。

军委

十八日十八时

十九日上午九时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回电：“我们决遵来电于二十二日出发。”

这一天，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罗荣桓就入关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政治动员：

……我们的任务是进关，一二天后就要开动部队，去拿下北平、天津，必须紧急地动员起来……蒋介石想撤退华北，要部队南下，傅作义却想西跑和三马会合，徐州战役已经歼灭敌人十九个师，现在敌人已经更加混乱了……所以我们现在要赶快进关去……关里解放军到关外来坚持了东北人民解放战争，实现了一个全东北的胜利，在这个过程中，也获得了关内各解放军胜利的配合，使得东北胜利能够很快到来。现在东北解放军到关里去是义不容辞的，和关里解放军配合起来解放全中国，这是光荣的任务。同时还要指出，只有全国的解放，东北的胜利也才能巩固，农民分得的土地也才能保持。东北战士怕入关，怕离家远了，将来回不来了。要和他们解释，解除这个顾虑，胜利已经快了，我们最多只有一年即可求得全国的胜利。全国胜利后，铁路都修通，回家是容易的，那时是光荣的凯旋而归，如果现在要逃跑回家去，那是泄了气，那是耻辱，不仅没有欢迎，而且还会被欢送回部队来，过去立的功也掉了。要号召全体同志保持永远的光荣……我们要去打下北平、天津与华北大会师，要动员我们干部。现在干部中少数发生了堕落的想法，东北解放了，享受享受啊，年龄大了，身体不好，要休息，要做地方工作。这种思想是不对头的，要批驳，要学三纵队罗政委（罗舜初）的精神，他给飞机轰炸震伤了耳膜，在这里休息，他要沙副司令（沙克）回去告

诉部队，不久就会回去，一定要进关去，走不动爬也要爬进关去，就是要这股劲头，全国胜利只有一年了，咬咬牙就过去了。现在是参加全国大解放的一年，要克服不前进的想法，身体不好也要坚持下去，不准许请假，身体有病也只能短期在部队休息，不能离开部队，不准许请求调动工作。全国胜利的时候已经到来了，这是对自己的斗争历史是要做总结的时候了，你为什么在这种总结的时候当孬种呢！……

毫无疑问，东北野战军百万大军入关，是解放战争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对推进解放战争的进程起到了重要影响。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因在沈阳开会的各纵队、各师参谋长、政治部主任需要时间返回部队，经中央军委批准，将入关出动日期由二十二日推迟至二十三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十个纵队和特种兵全部，分别由锦州、沈阳、营口地区向冀东地区开进”。八十万官兵全部的狗皮帽子，簇新的棉军装，各式美制新式武器，后面跟着十五万支前民工、三千辆汽车、八千辆大车和十四万匹牲口——东北野战军入关了，浩浩荡荡地向着长城蜿蜒而来。

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写道：

共产党的东北部队用投降的国民党士兵扩编了他们的队伍，用缴获的美国武器加强了他们的火力，在胜利地攻陷长春和沈阳之后，几乎未加休整，即南下向北平和天津推进。这是两个著名的城市，一个是美丽的古都，另一个是巨大的商业港口。他们背着装备，在二十天里徒步行军六百英里。他们乘坐着倔强的牛或者骡拉着的大车。他们驾驶着美国卡车，拖着从东北缴获的大炮。他们渡过已经开始冰冻的河流，用手榴弹开道。他们越过荒凉的群山和沙漠荒野以及长城上岩石筑起来的关隘。他们一跨入河北平原就有成千辆农民的大车迎接他们并随后跟着大军载运粮食和饲料。冀东一个县有五万农民冒着风雪，只用三十六小时就修复了一百八十英里的公路。

为了给东北野战军争取入关时间，并进一步抑留傅作义主力于华北，中央军委决定：首先突击平张线，迅速包围张家口，迫使傅作义西援，进而拖住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军。

二十七日，平张线作战部署下达：杨成武、李天焕指挥华北军区第三兵团于三十日左右迅速包围柴沟堡、怀安或张家口、宣化诸点守

军“一个军左右之兵力”，“并相机举行攻击，吸引东面敌人向西增援”；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指挥第二兵团部于十二月一日“集中于易县西北紫荆关地区隐蔽待命”，“准备以五日行程进至涿鹿地区相机作战”；程子华（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黄志勇（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参谋长）部“数日内在平谷地区集中”，等杨成武部抓住敌人之后，迅速“超越密云、怀柔、顺义线上之敌”，“向延庆、怀来地区相机作战”；冀热察军区部队在宣化、怀来之间破路，阻击张家口和宣化守军南撤和北平守军可能的增援。

“毛泽东同志发起平津战役，文章是从西线做起的。”聂荣臻说。

二十五日，华北军区第三兵团由绥东地区出发，分三路向张家口地区急进。二十九日，得知张家口方向出现危机，傅作义派出了他的嫡系部队第三十五军前往增援。该军在北平的丰台和长辛店集结后急促向西开进。同是这一天，第三兵团向张家口以西五十公里处的柴沟堡和郭磊庄发动了攻击。这是位于河北、内蒙古和山西三省交界的两个小镇，是傅作义部署的长蛇阵的最西端，虽距繁华的北平和天津并不遥远，但中国人却往往称之为“口外”，这种称呼含有那里荒凉偏僻之意。

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向“口外”发起的攻击，标志着“平津战役即告开始”。

## 隔而不围，围而不打

“你们看我们这些高级人员，每个人都是红光满面，还像个倒霉的样子吗？”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四日，傅作义在张家口对他的将领们说，“虽然目前军事情况非常紧急，但只要我们指挥运用适当，将士用命，局势尚非不可挽救。”

坐在傅作义面前的“红光满面”的将领们是：第一〇五军军长袁庆荣、第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察哈尔省保安副司令兼张家口警备司令靳书科、一〇一师师长冯梓、二六七师师长温汉民、二五一师师长韩天春、二五八师师长张惠源、二五九师师长郭跻堂、二一〇师师长李思温、整编骑兵第五旅旅长卫景林、整编骑兵十一旅旅长胡逢泰等。

第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格外“红光满面”，因为他的增援作战进展顺利。十一月二十九日从北平出发，四百多辆汽车翻越八达岭以及以西的崎岖山路，三十日下午到达受到威胁的张家口地区。其一〇一师继续往西向万全推进，第一〇五军二五一师和整编骑兵第五旅一起向包围张家口的杨成武部展开攻击。很快，杨成武部向西南方向撤退。一〇一师除留下一个营驻守万全县城，其余部队旋即凯旋张家口。十二月二日，驻扎在张家口以南宁远堡的第一〇五军遭到袭击，一〇一师再次出动，第三十五军军部率二六七师跟随推进，战斗进行得也很顺利，没等天亮，杨成武部又向西撤退了，侦察兵报告说宁远堡以西十五公里内已没有共军踪迹。三日，张家口附近没有任何敌情，第三十五军拟于四日返回北平。正准备启程的时候，华北“剿总”电话指示：总司令即来张家口，郭军长在与总司令见面之后，第三十五军五日动身。

郭景云和他的第三十五军心情轻松。军长忙着应酬，官兵们则在张家口市内闲逛——没有人会预料到，第三十五军在张家口耽误的这一天，对于傅作义的这支主力部队生死攸关。

傅作义是为部署放弃张家口而来的。

本着“保持海口”的作战方针，必须逐步放弃张家口，但傅作义认为张家口是他的西线重镇，加上他误认为杨成武部对张家口的进攻不过是局部作战，他完全可以趁林彪尚未入关，华北的解放军处于分散状态时，派出主力部队在张家口速战速决，给袭击张家口的杨成武部

以歼灭性打击。于是，他派出了主力部队第三十五军驰援张家口，同时把驻守昌平的第一〇四军主力向北调往怀来，驻守涿县的第十六军调往康庄和南口，以便能够随时向西策应，确保平张交通线的畅通。现在，既然已经把张家口附近的解放军赶跑了，傅作义还是决定执行从张家口撤退的计划。

傅作义要求撤退工作要秘密进行，还要求把撤退变成一种“荣誉”：

傅又召集孙兰峰（第十一兵团司令官）、袁庆荣、曾厚载（察哈尔省府秘书长）、周钧（察哈尔省民政厅长）和我（靳书科，张家口警备司令）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傅指示我们在张家口来一次“荣誉交代撤退”。就是在撤退之前，将所有的军事物资，包括武器、弹药、服装、粮秣以及其他物资做一次清点，在撤退时能带的尽量带走，不能带的一律造具清册，将储存物资的库房加封上锁，留交不愿意跟我们走的当地工作人员，替我们作一次“荣誉交代”。

在被迫从大城市撤退时，将一切可能被敌对方利用的物资和设施破坏，这符合一般的战争行为。如今，傅作义不但要求对带不走的物资保护和封存，而且还要登记造册，此举显然是在给自己留下后路。只是，“交代”尚可解释，“荣誉”又从何谈起?

下午十六时，傅作义飞回北平，他在机场对那几个“红光满面”的心腹将领说：“何时撤退，等我到北平研究之后，再行电告。”

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虽然占领了万全，但在张家口外围孔家庄一带，华北军区第三兵团二纵击退了第一〇五军的攻击；一纵则渡过洋河，袭击并攻占张家口南面的沙岭子车站，破坏了张家口至宣化间的铁路；而在宣化以南，冀热察军区部队破坏了下花园至怀来间的铁路；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十二旅占领了平张线上的要地新保安。此时，张家口至北平的铁路已被截成数段。更重要的是，傅作义的主力部队都被吸引到了平张线上：整编骑兵十二旅于张北；第三十五、第一〇五军的六个师和整编骑兵第五、十一旅于张家口；第一〇一军的一个

师和第一〇五军的一个师于宣化；第一〇四军的两个师于怀来，第十六军的三个师于南口和昌平——这正是毛泽东所期望的态势。

为了不使张家口之敌趁东北野战军尚在入关之时向东突围，而驻守在怀来、南口的敌人向西接应，中央军委命令华北军区第三兵团以两个纵队在张家口以西待机，其中一纵固守张家口至宣化间的阵地，彻底切断两地间的联系；第二兵团以主力包围宣化、下花园两处，构筑向西、向东两面阻击工事，务必使张家口之敌不能东退；如果张家口和宣化之敌绕道向北平撤退，第二、第三兵团则坚决予以阻截；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迅速直扑怀来和南口，切断北平与怀来间的联系。

此时，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已逼近北平北部的密云。

密云县城坐落在潮河与白河汇流的三角地带。如果不拿下密云，不能控制渡口，先遣兵团的辎重车辆将难以通过。侦察情报显示，密云守军仅有一个保安团，加上警察，兵力不过一两千人。但是，奉命发起攻击的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十一纵三十一师，在攻击县城外围据点时发现敌情有变：傅作义的第十三军一五五师四六四、四六五团及以二九七师的八九〇团已经从古北口返回，致使密云守军骤然增加到四个团。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十一纵立即命令已经渡过潮河和白河的三十二师掉头回来，配合三十一师对密云实施强攻。

攻击密云，本来是顺手牵羊的战斗，为的是尽快切断平绥路，谁知十一纵却被粘在了这里。战斗的艰难程度，大大超出了纵队指挥员的预料。五日凌晨，攻击开始之后，三十一师两个突击连连续爆破，反复冲击，但均以失利告终，部队在通过开阔地时出现很大伤亡，最后不得不改变攻击方向。三十二师的突击队在实施爆破时也受到猛烈阻击，九班十二名官兵中，十一人被敌人的隐蔽火力打倒，只剩下战士王挺发一个人背着三十多斤的炸药包还在一点点地向前移动，后续部队的官兵都紧张地看着他。突然，就要爬到城墙边的王挺发开始往

回爬，爬到一棵小树前用刺刀拼命地砍树。敌人射出的子弹打在小树上，连长让机枪全力掩护，官兵们不知道王挺发到底遇到了什么情况。不一会儿，王挺发拖着砍倒的小树又往城墙爬去，只是爬行的速度明显缓慢了。城墙上扔下密集的手榴弹，爆炸的烟雾和飞溅的泥土把王挺发掩埋了。后续部队的官兵扯着嗓子喊："王挺发！王挺发！"烟雾稍散后，王挺发的身影又出现了，他抱着炸药包一点点地朝爆破点靠近，看得出他每爬一下都要付出全身的力气。爬到爆破点后，官兵们正在担心他拉响炸药之后是否能够迅速离开，就在这一瞬间，巨大的爆炸声响了，密云城墙被炸塌了一个缺口。连长大喊："冲！"突击队冲到外壕边，才发现壕沟里布满尖桩，上面横着一根树干，粉身碎骨的王挺发就是顺着这根树干爬过去的。

突击队突入之后，突破口被国民党守军重新封闭，后续部队被阻击在城墙外，突入的部队被包围在城内。敌人开始了凶猛的反击，双方官兵先是拼刺刀，后来就扭打在一起。当敌人暂时退下去之后，突击连仅剩下二十多人，幸存下来的官兵重新编组，在敌人的尸体上捡拾弹药。敌人的反击又开始了，指导员喊："准备手榴弹和刺刀，拼了！"副连长率先冲进敌群，一口气捅倒几个敌人。机枪班长被三个敌人刺倒，战士曹守昌奔过来营救，在与敌人肉搏的时候，机枪班长用尽力气把匕首刺进一个敌人的眼眶里，之后气绝身亡。突击队只剩下了八个人，一排长对七个战士说："咱们光荣也光荣在了关内，值！"黄昏，后续部队终于撕破敌人的阻击，突破口被重新打开，突击部队蜂拥入城。

经过一天的血战，密云守军六千余人被歼。

第十一纵队付出了伤亡一千五百余人的代价。

密云的丢失令傅作义有些吃惊，他深知密云对于北平安全的重要性。同时，空军的侦察报告说，解放军正从东、西两面大规模地向平

张线调动。傅作义由此判断：东北的共军已经入关，有会合华北共军切断平张线直下北平的企图。于是，他决定第三十五军和第一〇四军二五八师迅速离开张家口返回北平，以增加北平的防御力量。为了使第三十五军能在平张线被切断之前顺利撤回，傅作义命令驻守怀来的第一〇四军主力向西接应，驻守南口的第十六军向康庄方向牵制共军行动。同时，为了北平的安全，傅作义还命令驻守天津、塘沽地区的第六十二、第九十二军主力增援北平；第十三军放弃怀柔和顺义，撤到通县附近；第一〇一军主力放弃涿县和良乡，撤退到丰台、长辛店和门头沟一带。

张家口和宣化守军奉命向沙岭子阵地实施两面夹攻。沙岭子是第三十五军南撤北平的必经之地，华北军区第三兵团一纵一旅顽强阻击了三天，终因伤亡严重被迫放弃阵地。沙岭子丢失后，张家口至宣化间的铁路线重新敞开，第三十五军开始撤退了。

第三十五军是傅作义的绝对主力和嫡系部队，下辖一〇一、二六二、二六七师。应该说，如果第三十五军按照原计划，十二月四日动身返回北平，那么这支部队也许就不会成为平津战役中以命运悲惨而闻名的主角。但是，傅作义来到张家口，郭景云等了一天，就是这一天的等待最终酿成大错。五日，本来计划是清晨出发，到了中午部队还没开动，原因是郭军长舍不得军修械所里的机器设备，非要把设备拆下来装车一起拉走不可。而张家口的一些官员听说第三十五军要回北平，纷纷要求跟随撤走，郭景云统统答应，让他们到第三十五军驻地集合。之前，张家口主要军政人员的家属都已乘火车转移到了天津，但是还有不少官吏没走，比如省参议长杜继美、省党部委员马仰贤、省党部特派员赵城壁、市参议会议长兼市党部书记长高炳文、《商业日报》社长贺天民等。这些官吏带着他们的家眷和贵重物品，甚至还带着大米和面粉，浩浩荡荡地塞满了第三十五军的驻地。人和东西开始混乱地装车，场面看上去根本不是军队在紧急调动，而如一

个城市在搬家——这些官吏们谁都没想到，只需两天的路程，他们却走了半个多月依旧滞留在半路，最终除了高炳文侥幸逃到北平之外，所有的人包括他们的家眷，在经过苦难的折磨之后都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天气很好。虽然磨蹭到中午才出发，但是车队行进顺利。过了沙岭子，又过了宣化，郭景云预计下午就能到下花园。但是，刚离开宣化不一会儿，前面就响起了枪声，一〇一师师长冯梓报告说，下花园以南的公路被挖断，三〇一团正一边作战一边修路。下午十四时，车队到了下花园，前面又响起枪声，先头部队三〇一团停在一个叫鸡鸣驿的小镇附近的山脚下，又开始了一边作战一边修路。作战倒没有多么激烈，但公路被破坏得很厉害，路面上是一道道又宽又深的大沟，这些大沟挖得令国民党军官兵直发愁：公路的一面是绝壁，绝壁下是铁路和并行的公路，而铁路和公路的另一侧就是洋河，横在公路上的大沟从绝壁一直挖到河岸，不但附近无处取土填沟，即使从远处弄来土也都滑到河里去了。由于修路的时间太长，等得不耐烦的郭军长亲自跑过来，看了大沟之后深有感慨："真他妈的挖到点子上啦！他们地形熟，这一手做得多绝！"

熟悉地形的是支持共产党的当地百姓。

好容易把大沟填上，车队继续前进。黄昏时分，郭景云命令全军宿营鸡鸣驿。由于车队庞大，人员混杂，天黑时才基本安置完毕。其间，不断有报告说，鸡鸣驿以北、下花园以南，鸡鸣驿至新保安的公路两侧，都发现有共军接近并在构筑工事。郭景云召集军官会议，大家都认为情况严重，绝不能让共军构筑工事，需要连夜出击。但是，郭景云却不以为然："叫弟兄们好好休息，明早以二六七师为前卫，来个拂晓攻击，一下子就可冲过去。其余部队于早八点准备完毕，待命出发。"

第二天，二六七师和一〇一师三〇二团首先行动，一〇一师的其余部队负责掩护两侧和后面。果然，前面枪炮声连成一片，到上午十时左右，枪炮声依旧没有停歇的迹象。有点着急的郭景云打电话询问，二六七师师长温汉民回答“正在激战之中”。又等了两个小时，前面还没传来打通道路的报告，郭景云向傅作义请求飞机前来助战，然后带着几个参谋上了前沿。

二六七师遭到阻击的那个地方叫西八里。

阻击他们的是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四纵十二旅。

第三十五军从张家口出发的时候，毛泽东连续致电华北军区第二兵团，要求他们以最快的手段“全力控制宣化、怀来地区”。宣化、怀来距离北平的天然门户八达岭近在咫尺，而且那里驻有傅作义的第一〇四军，如果让第三十五军越过宣化、怀来与第一〇四军会合，华北地区的战局将陷入困难境地。

此时，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绝大部分部队尚在涿鹿以南，只有第四纵队政治委员王昭和十二旅旅长曾宝堂率领十二旅在平张线上活动。

以十二旅阻击第三十五军，显然兵力悬殊太大。

第二兵团立即命令主力徒涉洋河，急速赶往新保安地区；同时命令十二旅不惜一切代价，在西八里、新保安和东八里地域把敌人纠缠住。

十二旅攻占新保安后，以西八里为前哨，火车站为主阵地，东八里为预备阵地，决心至少坚守一昼夜，等待兵团主力部队的到达。

第三十五军的突击能力异常强劲，兵力和武器都处于绝对劣势的十二旅阻击战打得十分艰苦。敌人在大炮和飞机的助战下攻势凶猛，

十二旅在付出巨大伤亡之后只能节节撤退，他们一直撤到了新保安县城的西关。在那里，十二旅三十四团二营又一次迎敌而上，四连在营长墨双科和连长王相印的指挥下连续冲锋，但终究无法阻挡具有优势火力的第三十五军的进攻，新保安车站等阻击阵地很快丢失。

通往新保安的公路上，停满了第三十五军的汽车，前面不断传来的激战消息令所有的人惊慌不已。增加紧张气氛的还有傅作义派来的飞机，这些飞机不知为什么总在公路上空盘旋，当它们扔下炸弹的时候，第三十五军官兵和官吏们只有纷纷躲避轰炸。郭景云为此愤怒之极，因为在张家口外围作战时，空军就把一〇一师二团的白营长炸死了，白营长是郭军长当团长时的老连长，这让郭军长从此对空军恨之入骨："飞机又炸自己人啦！那架飞机的号码是905号，我已向总部发电报追问。飞机上也有八路了，这仗还怎么打！"

第三十五军终于攻占新保安。

副军长王雷震主张决不能在新保安停留，大队人马必须连夜前进。他的理由是：共军肯定会有大量的后续部队到达。新保安北靠大山，南临洋河，县城如在锅底，万一发生不测，让共军把两头的道路堵死，第三十五军将进退两难。而如果马上行动，两个小时就可以通过怀来，即使遇到阻击，怀来的地形较为有利便于应付。在王雷震的说服下，郭景云决定继续前进。但是，就在车队即将开动的时候，突然命令重新下达："驻下！明天再走！"

无法得知郭景云为何突然变卦，执意要在新保安睡上一觉。

是夜，尽管前方警戒部队数次报告，"新保安四周到处都是锹镐之声"，但是郭景云始终置之不理。

第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的这一决定，进一步把傅作义的这支主力推向了绝境。

凌晨三时，毛泽东严令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务必全军立即行动，阻住该敌，如被突走，由你们负责。"兵团司令员杨得志立即命令给王昭发电报，要求十二旅"一定坚持到大部队赶到"。兵团政治委员罗瑞卿说："要大家都清楚，如果让三十五军从我们手里逃过新保安，与怀来一〇四军会合，那我们第二兵团是交不了账的，是要铸成历史大错的。"

八日拂晓，华北军区第二兵团主力陆续赶到新保安地区。

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立即以四纵十一、十二旅和三纵九旅占领新保安以东一线；以八纵四旅和独立第一旅占领新保安以西一线，组成第一道包围圈；以三纵七旅、八旅分别占领碱滩、沙城、鸡鸣驿，构成了第二道包围圈。

傅作义得知第三十五军受困于新保安，急令第一〇四军军长安春山为"西部地区总指挥"，统一指挥第一〇四、第三十五、第十六军夹攻当面的解放军，以掩护第三十五军返回北平。同时命令张家口的第一〇五军向下花园、新保安方向攻击前进，策应第三十五军突出包围圈。

安春山随即作出部署：第一〇四军二五〇、二六九师即刻从怀来出发，向新保安外围阵地进攻，限九日前打通与新保安的联系，将第三十五军接应出来；第三十五军在第一〇四军发动攻击的时候，即由新保安向外围阵地实施攻击，突破包围后向北平撤退；第十六军派出一个团，限九日上午八时前，接替二六九师在怀来的城防，军主力则固守康庄，在第三十五军和第一〇四军通过之前不得失守。

八日下午十四时，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潘自力向第二兵团各部队发出电报，措辞严厉，强调谁放跑了敌人“一定要追究责任”：“军委已严厉责备我们到达太迟，致使三十五军得以东突，影响整个作战计划，并要我们确实包围住三十五军于现在地区，并隔断其与怀来的联系。如果跑掉，由我们负责。我们已对军委负了责。因此，我们亦要求你们严格而又确实地执行我们的一切命令，谁要因疏忽或不坚决而放走敌人，是一定追究责任的……”

自八日开始，第三十五军在飞机和大炮的掩护下，顺着公路向东突击，在东八里一线与第三、第四纵队撞在了一起。阴云密布，雪花飘飞，双方官兵在公路附近的各个阵地上来回拉锯，东八里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四纵司令员曾思玉在一座山头上与政治委员王昭见面了，王昭为终于迎来了主力万分高兴，他大声喊：“老兄！你们大大的辛苦！”曾思玉说：“没让三十五军跑过去，十二旅立了头功！”

晚上，三纵主力全部赶到战场，第三十五军再次退回新保安县城。

九日，第三十五军再次突围。三纵和四纵一面硬顶，一面组织突击队硬攻，双方的对峙线纵横交错，致使天上的国民党军飞机根本弄不清该如何轰炸扫射，只能在阴云下乱飞。这一天，第三十五军连东八里都没有打到，天黑时，部队再次退回新保安县城。

与此同时，在新保安的西北方向，第一〇五军在军长袁庆荣的率领下开始向东突击，企图从张家口打到新保安，解救被围的第三十五军。八日下午，该军的二五八师向华北军区第三兵团二纵五旅十四团的阵地发起猛攻，虽曾一度突破，但黄昏时分阵地又被十四团官兵夺回。九日，第一〇五军出动两个师加骑兵一部，先向十五团的阻击阵地攻击，未果后转向十四团的阵地实施重点突击。这里是距张家口仅五公里的平展地带，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地貌，敌人受到猛烈的火力

拦截后，纷纷趴在地上不敢前进，军官们急得大喊大叫，摇着小旗吹着哨子，先是用石头打，用皮靴踢，最后用枪逼，大群的敌军再次发起攻击。三营七连长黄树田全身七处负伤，四连、八连和九连的官兵端着刺刀发动了反冲击。战斗一直进行到黄昏，十四团放弃第一线阵地转入二线防御阵地。可是，当敌人刚上了第一线阵地的时候，五旅在旅长马龙和政治委员李永清的率领下突然发动反击，一个小时后将阵地恢复，第一〇五军攻击部队只得向张家口城内退去。

在新保安的东面，从怀来方向出击接应第三十五军的第一〇四军推进坚决。也许受到了傅作义任命其为“西部地区总指挥”的鼓舞，军长安春山不但指挥着自己的第一〇四军，而且还可以指挥第十六军和第三十五军，因此作战情绪空前高涨。按照他的计划，二六九、二五〇两师加强一个野战炮营后，全力向新保安方向攻击前进。攻击部队出发后，不断传来一路顺利的消息，说他们已经接近新保安了，是否让第三十五军赶快向外冲。安春山立即与郭景云接通了电话，本以为郭景云会喜出望外，谁知他在电话中表现得异常冷淡。安军长问：“你是否接到了命令？”郭军长冷冷地说：“接到了。我是没办法了，看你的吧！”然后就挂断了电话。郭景云是否对傅作义没任命他为“西部地区总指挥”不服气？但是，这是他的第三十五军危在旦夕的时刻，郭军长总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当儿戏吧?

奉命到怀来接防的第十六军的那个团还没到，安春山派他的卫士乘坐吉普车去接，过了很久吉普车也没回来，突然却有一个士兵跑回来了，说他们遇到大批共军正朝怀来开来——“共军的军服、帽子、武器都和我们一样，只是帽子上没有青天白日徽章。”安春山给第十六军军长打电话，但是电话不通，有人向他报告说，康庄与怀来之间的电话线被剪断了。接着，安春山得知，从新保安至怀来间的公路完好无损。他马上意识到安全撤退的机会仍存在，便通过电台跟第三十五军政工处长通话，让他转告郭军长，要争取时间，两面夹击，迅速突

围。话说到此，电台信号受到严重干扰，听不清了。安春山又给郭景云发去一封电报，要求他迅速率领部队突围，与第一〇四军的攻击部队会合。但是，不知为什么，郭景云根本没回电。

第一〇四军的攻击部队和阻击他们的由郑维山指挥的三纵打得昏天黑地。在距离新保安很近的马圈附近，三纵截住了第一〇四军的两个师，尽管根本没有有利的阻击地形，三纵官兵还是不顾一切地用身体挡住了敌人。因为伤亡严重，第一道阻击阵地很快丢失，二十团团长张文轩亲率部队反击，把失去的阵地又夺了回来。敌人采取多批次多梯队的连续冲锋，二十团的一二线阵地多次易手。这时候，新保安方向的第三十五军出动了。三纵开始两面受敌。下午，两面的敌人几近疯狂，第一〇四军每占领一个村庄，傅作义的总部就发来电报说奖励大洋若干。仗打到最激烈的时候，突围的第三十五军和接应的第一〇四军相距不足四公里。危急时刻，三纵的干部们站到了最前沿，与战士们一起端起了刺刀，呼喊着向当面敌人冲过去，纵队也投入了最后的预备队，从两翼向敌人包抄过去。国民党军官兵无法承受肉搏战的残酷，仅营长就伤亡了六名，当部队出现后退的迹象时，一退就演变成了无法遏止的溃散。

安春山再次与郭景云取得了联系。

我即用无线电话请郭景云讲话，要他九日上午，无论如何要抓住这千载一刻的机会，果断突围，并把全面情况告诉了他。他说："你必须令二五〇师来新保安接防。"我说："新保安是死地，不能防守，二五〇师进去，马圈必被解放军占领。我们的任务是速向北平集结。如果进去了，又得打出来，甚至你我都出不来，这是为什么？"他说："他妈的，我是不走啦！"我劝他："不走不好，新保安不能守。"说话间，无线电话中断了。又要了一个小时才叫出来。我问他："老兄，请你快出来，我在怀来等你。"他说："你是收容我吗？"我说："这是什么话？请你在患难中不要胡思乱想，不要闹意见。"我说话尚未完了，他就骂起来："他妈的，我是不走了。"我郑重地告诉他："错过了今天这个机会，你是不可能再出来了。"

傅作义的电话打过来，命令安春山到新保安去，一定要把郭景云接出来。安春山说，新保安到怀来间的路已经打开，傅长官命令他他

都不出来，我有什么办法拉他出来？安春山最后问傅作义：是否还想到北平集中？还是在这里与共军决战？傅作义的回答竟然是：“你看着办吧！”

郭景云与安春山一直心存芥蒂，这在第三十五军和第一〇四军中已不是新闻。郭景云认为，安春山既然奉命前来解围，打进新保安才算完成任务，打到城边让自己出去，那是故意看自己的笑话；而安春山对解救郭景云本来就不积极，只不过因为傅作义下令他才派出部队。安春山很久之后才查清，傅作义那封任命他为“西部地区总指挥”的电报，被第三十五军的译电员译成了“西部收容总指挥”——这是一个古怪的错误，这个错误导致的后果竟然是送了郭军长的命。郭景云认为，这一任命是对他的莫大侮辱，他宁死也不愿意被别人收容，特别是他一向看不起的那个“安小个子”。

九日下午，怀来以东康庄方向的第十六军来电，说共军正在准备对其实施攻击，康庄通往北平的要道上已出现共军踪影，如果第三十五军再这样耽误下去，大家谁都别想撤回北平。

安春山给郭景云发去最后一封电报，再次要求他突围，说不然的话第一〇四军就要撤了！

郭景云没有回电。

黄昏，驻守康庄的第十六军真的受到了攻击。

安春山担心怀来不保，立即给前去新保安解围第三十五军的两个师发电报，命令他们互相掩护迅速撤回怀来。

郭景云连同他的第三十五军，就这样失去了最后的机会，被彻底包围在新保安城内。

攻击康庄的，是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

九日拂晓，先遣兵团第四纵队的三个师突然出现在怀来、康庄、八达岭一线，将国民党军第十六军指挥部、一〇九师、九十四师的一个团和二十二师的一个团包围在康庄。第十六军见势不妙，立即向北平方向突围，刚刚到达的四纵迅速投入作战。午夜，四纵二十九团三营在公路上截住了黑压压的一股敌人，官兵们大声喊：“你们被包围了！”趁敌人慌乱之际，后续部队赶上来将这股敌人全部缴械。另一股敌人闯进了三十六团三营的防区，团长江海立即组织部队截击，三十五团闻讯包抄过来，二十九团也从敌人的身后追了上来。至十日上午八时，第十六军的六千多官兵被歼，四纵控制了康庄。

四纵还没来得及打扫战场，突然有情报说，从怀来向北平撤退的第一〇四军在三家子车站烧毁了不便携带的装甲车后，正在攻击冀热察军区骑兵部队的阻击阵地和四纵十一师三十五团的防区。四纵司令员吴克华决定用两个师追击，一个师在八达岭一线打阻击。十日下午十六时，第一〇四军按照二五〇师、军部、二六九师和第十六军一部的序列走出怀来县城。四纵十一师跟踪追击，十师的两个团抄近路直奔横岭断其退路。在十八家子，十一师三十二团二营终于抓住了逃敌的尾巴，歼其一个后卫营，然后官兵们继续追击。追到横岭已是午夜，十师占领了附近的高地，堵住了第一〇四军军部和二五〇师。十一师三十二团向敌人排成长阵的队伍横切过去，敌人即刻跑得满山都是。

安春山很快就与部队失去了联系。半夜，他带着二五〇师九十三团逃到一个叫黄土洼的村子，突然发现走错了路。本来准备向南跑，直奔门头沟，现在的方向却是东南，快跑到南口去了。大部队已经丢光，安春山心情沮丧，他决定不走了，在一个距山口不远的小村庄里住下，他说要与二五〇师取得联系，联系不上他就不出山。但是，一

队人马刚住下，山上就传来了枪声，安春山急忙命令一直跟着他的二六九师师长慕亚新指挥残余部队掩护军部撤离，同时命令特务营抵抗。但是，慕师长很快就没了踪影。接着，工兵连和骑兵也散了伙，连安春山的拜把子兄弟、特务营营长也没打任何招呼绕过军部逃跑了。追击而来的解放军越来越近，痛苦万分的安军长要举枪自杀，副军长王宪章拦住他说：“何必闹着这一套！你要决心死，我陪你就在这里小屋子里抵抗，打死算完。不愿在这里死，咱们就逃跑。”安春山说：“那么咱们就跑吧！”

安春山带着二十多人顺着山沟跑，到处可见负责盘问的民兵。跑着跑着，身边的人越来越少，跑到妙峰山附近的时候，还是被民兵俘虏了。安春山化装成伙夫，由于他年纪大，很可怜的样子，民兵相信了他的话，安慰他说：“革命自愿，决不勉强。放下武器，既往不咎。”还给他发了张还乡证明和几块钱路费——国民党军第一〇四军军长安春山，丢失了所有的部队，独自一人跑回了北平城。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在长江以北、长城以南，国共两军的战场态势是：淮海战场，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已经歼灭了黄百韬兵团和黄维兵团大部，并将从徐州撤退的杜聿明集团包围在了陈官庄地区。平津战场，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和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已经把傅作义集团中的主力分割包围在平张线上，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正在迅速入关，将对平、津、塘地区的国民党军实施分割包围。

虽然傅作义十分不情愿南撤，但为避免北平与天津间的联系被切断，以确保最后时刻拥有天津的出海口，傅作义命令第四兵团司令官李文兼北平防守区司令官，放弃南口、昌平、通县、宛平等地，集中兵力固守北平；命令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兼津塘防守区司令官，放弃唐山、芦台、汉沽等地，将第八十六、第八十七军分别撤至天津

和塘沽一线，第六十二军从北平回防天津，集中兵力固守天津、塘沽两点。

为将国民党军傅作义集团彻底消灭在平津地区，十一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平津战役总方针电报，提出了对傅作义集团实行“隔而不围”、“围而不打”的战略部署：

……从本日起的两星期内［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唯一的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因此，在目前两星期内一般应采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

所谓“隔而不围”，是以入关的东北野战军迅速插入北平、天津、塘沽、芦台和唐山诸点，割断敌人的相互联系，防止其逃跑，但不作战役性包围。即，对北平、天津、塘沽“隔而不围”。

根据这一原则，东北野战军自十二日起，全力向平、津、塘地区开进：

左路由野战军直接指挥，直插天津、塘沽之间。九纵十三日占领唐山；十四日占领芦台和汉沽；十九日占领津、塘之间的要地军粮城；二十日攻占天津东部外围各据点和飞机场；二十一日占领咸水沽、新城一线，割断了天津与塘沽之间的水陆联系。八纵向天津城郊推进，十九日占领杨村，歼灭国民党军新编三三三师两千余人，俘虏师长宋海潮；二十日攻占北沟、北仓和宜兴埠；二十一日占领天津外围的杨柳青；二十二日进占白塘口、双港一线，切断了天津守军向大沽口的退路。

中路军由第一兵团统一指挥，三纵十三日占领北平以东的马驹桥、廊坊一线，十七日占领北平以南的南苑机场，十九日击退国民党军对南苑机场的反击逼近北平东南郊。十纵十四日占领廊坊，切断平

津铁路；十五日控制了廊坊、旧州一线。六纵十六日占领永乐店、马头镇、张各庄、安平镇一线。华北军区七纵十三日占领房山、良乡，十五日占领黄村、南苑、庞各庄、安定车站一线。一纵则赶至北平与天津之间，切断了北平守军退往出海口的路线。

右路由第二兵团统一指挥，四纵十四日占领南口、八达岭一线；五纵、十一纵分别从北平的西郊向丰台、宛平、石景山进攻；十一纵十四日占领西郊机场，十五日占领海淀、门头沟、西黄村和石景山等地；五纵十四日占领宛平和丰台，十七日五纵、十一纵逼近西直门和德胜门。

所谓“围而不打”，是以华北军区主力部队将张家口、新保安之敌严密包围，待命攻击。

十五日，华北军区第三兵团相继占领张家口各外围据点，切断了张家口对外的所有联系；同时，北岳军区部队和骑兵第三、第四、第五师占领了张北、康保、商都等地，对张家口形成了第二道包围圈；西北野战军八纵和地方武装在集宁、丰镇、卓资山一线，形成了第三道包围圈。为了加强对张家口的包围，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的三个师于十七日自南口出发，二十日抵达宣化、张家口地区，使包围张家口的兵力达到十万以上，张家口国民党守军被歼的命运已成定局。而华北第二兵团则不断地收缩着对新保安的包围。三纵在新保安以东和东南、四纵在东和东北、八纵在西和西南，三个纵队层层筑垒，大修工事，把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围成铁桶一般。

至此，华北战区的国民党军已被分割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五个相互孤立的地区。国民党军统帅部关于华北战区或守或撤的所有争执到此为止，因为华北战区的前景已经明朗。

无论是东北野战军还是华北军区的官兵，求战情绪前所未有地高涨，因为他们都知道自己已是绝对的胜利者。“隔而不围”令他们急不可耐，“围而不打”更令他们不能忍受。等待时手痒，而且还费粮食，第二兵团的官兵不断地在新保安四周挖交通壕，附近的百姓给他们送上来不少土豆和萝卜，他们在寒冷的地窝子里取暖，吃烤土豆，喝萝卜汤。接着，大规模的政治攻势开始了，喊话、往城里扔宣传品，派被俘的官兵回去做工作，还在城墙四周竖起巨大的标语牌：“不要再为老蒋卖命”；“放下武器就是一家人”；“打掉傅军命根子，活捉匪首郭景云”；“艰苦斗争两年半，报仇立功在今天”——华北军区官兵与傅作义的部队在这一战区艰苦周旋了两年多，他们与第三十五军有解不开的仇恨。

郭景云的日子难过之极。新保安外围支撑据点丢失殆尽之后，城门就永远地关上了，郭景云感觉这个小县城如同一口棺材。飞机每天空投的给养根本不够用，况且，那些白花花的大米和增加营养的蛋黄粉大部分都被投到解放军的阵地上去了。城外送进来据说是一位解放军的司令员写的劝降信：“你们突围已不可能，困守只有被歼，现给新保安准备下八万发炮弹，你们如接受劝告，应即派人接洽，将部队开到指定地点，听候改编。”郭景云把这封信在军官会议上念了一遍，然后烧了。除了粮食之外，弹药也严重匮乏，特别是重炮炮弹没有了。也许城外的解放军知道第三十五军没有炮弹了，于是他们公然地扛着云梯在城墙上演习爬城，时间是每天上午九时至下午十五时。解放军官兵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大呼小叫，如此胆大妄为令第三十五军官兵既心惊肉跳又感到很大的羞辱。打吧，弹药本来就不多，而且只要一开枪，这些解放军就没了踪影，白白浪费弹药；不打吧，谁知道他们的演习什么时候就变成了真的，爬着爬着就真的爬进来了?

“围而不打”不是永远不打。

流传在新保安四周前沿战壕中的一张油印传单上写着一首“诗”：

三十五军好比山药蛋，已经放在锅里边，

解放军四面来烧火，越烧越煮越软绵。

同志们，别着急，山药不熟不能吃，

战前工作准备好，时间一到就攻击。

既然已经与敌人脸对脸了，华北西部成为平津地区大规模歼灭战的首选之地已成必然。

## 风雪中矗立的枕木

第三十五军虽然是傅作义主力中机动能力最强的，但还算不上是真正的摩托化部队。近距离使用的时候，全军的重武器还需要骡马牵引，只是在远距离或者紧急机动时刻才使用汽车。这次从北平增援张家口，全军动用汽车多达四百多辆，因此无论是行军还是驻扎，在荒凉的华北西部，一眼看去也算是浩浩荡荡。

可以想见，四百多辆汽车拥挤在方圆不足一平方公里的新保安城内，该是一种什么情景——“别的都好说，这四百多辆汽车是傅总司令的命根子，不能不要。”困守在新保安城内的第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说。

第三十五军的军官们认为，目前所有的解围行动都成泡影，东去北平和西退张家口都已无望，孤零零的新保安守军只剩下两条逃生之路：一是徒步向南，只要能突围进入南山就可以脱险；二是顺着桑干河谷向大同方向突围，但桑干河流域都是山地，四百多辆汽车根本无法行军。军官们反复劝说军长，人是第一位的，有人就有东西；人要是没了，就什么都没了。郭景云曾一度狠下心，打算轻装突围，但最终没能下令，原因还是舍不得汽车。郭景云命令汽车兵把主要的零件

拆下藏起来，以免万一落在解放军手里，但是汽车兵们不愿意拆，每天还是把车身擦得铮亮。四百多辆保养良好的汽车，全被部署在小城内的各个路口充当防御屏障——宁死都不愿意被安春山“收容”尚可谓有军人的骨气，但舍命不舍财的秉性却像一个乡村土财主。或者说，郭景云仍对傅作义不可能不救他的起家部队抱有幻想——“要相信总司令，他决不会舍下第三十五军不管。”

十二月十四日，杨得志、罗瑞卿、耿飚致电中央军委：“我兵团全部正对新保安敌进行土工作业，缩紧包围，一切攻击准备工作拟于十六日完成，待军委命令攻击。”第二天，中央军委回电：“加紧完成对三十五军的攻击准备甚好。实行攻击时间需待东北主力入关，确实完成对平、津两地的包围之后，大约在二十日左右。”

十九日，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越过新保安开赴张家口。

同日，华北军区第二兵团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请示中央军委，决于二十二日向新保安发起总攻。

二十一日中午，新保安外围战打响。

赶到战场的东北野战军的榴弹炮，令整个新保安县城摇摇欲坠。

郭景云立即给傅作义打电报，说解放军炮火之猛烈“平生罕见”，要求派飞机助战并空投炮弹。

傅作义的回电是：“明早七时派飞机十架前往助战，另十吨弹药于明晨由青岛起飞运往。”

回电没能解除第三十五军官兵的恐惧，因为没人知道今天晚上是否挺得过去?

郭景云的城防部署是：由新保安城南门向北画一条直线，东半边由二六七师加保安团并配属一个山炮连防守，其中八〇一团守东南，八〇〇团守东北，保安团守东关，七九九团为预备队；西半边由一〇一师加一个山炮连防守，其中三〇三团守西门以北，三〇一团守西门以南，三〇二团为预备队。军部位于城中央的鼓楼附近。

第二兵团把突破点选择在城东，因为防守西城的一〇一师是傅作义的“常胜师”，作战凶狠，能攻善守，而防守东城的二六七师战斗力相对较弱。此刻，二六七师从官到兵士气消沉。几天前，防御东南角阵地的八〇一团团长李上九听说城外的解放军给一〇一师师长冯梓写了封劝降信，他马上找到冯师长问：“这次仗还有没有希望？”当听到冯梓回答说“没希望”时，李上九说：“没希望咱们还打个什么？你如果有什么行动的话，我愿意跟你一起走！”或许城外的解放军已经知道了这一切，二十二日早上总攻一开始，东北野战军的两个重型榴弹炮团、第二兵团直属炮团，再加上各旅的迫击炮，一百多门火炮全部集中到了二六七师防区的正面，东门城楼和东面城墙在铺天盖地的轰击中倒塌，第二兵团以两个纵队的兵力——四纵和八纵——开始实施联合突击。

东城墙被轰开一个缺口之后，距城墙仅百米远的四纵十一旅三十二团突击六连开始攻城。爆破组用十公斤的炸药炸塌了护城河岸。由于心急，官兵们未等炮火延伸就向前冲击，结果十多名官兵被自己的炮火误伤，但突破口的硝烟中很快就飘起了一面红旗。接着，五连跟了上来，与六连一起在守军的反击中努力巩固突破口。与此同时，十旅二十八、二十九团在炮火的支援下也炸开东门冲入城内。

与四纵并肩攻击的八纵不太顺利，二十二旅六十四、六十六团在西北角、二十三旅六十七、六十八团在城北，同时发动的突击均受到挫折。六十六团冲到城墙下时，城墙的中下部突然砖头滑落，里面伸

出来许多事先没有发现的暗堡火力点，六十六团在遭受重大伤亡后冲击受阻。八纵及时调整攻击部署，利用四纵巩固的突破口向城内突击，并再次组织强行爆破。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萧应棠、二十三旅旅长赵文进、二十二旅副旅长郑三生都上了最前沿。“就是死也要死到城里去！”六十四团三营和六十八团一营的突击队员决心再次一搏。二连由三十六人组成爆破组，每人背着三十六公斤炸药，在通过百米开阔地时大部分官兵伤亡，仅剩下许学顺等四名战士。许学顺用炸药炸开鹿砦的时候负伤，随行的三名战士相继牺牲。负伤的许学顺在敌人密集的火力封锁下爬来爬去，把牺牲战友的炸药包一次又一次搬运到城墙下，当他用最后的力气点燃导火索之后，一声巨响，城墙终于被炸开了一个缺口。

新保安城东面的防御阵地被撕开了两个缺口，这直接导致二六七师的防线全面崩溃。由于与师部的联系电话打不通，李上九冒着炮火跑到师部所在地，对师政工室主任林泽生说：“不行了，部队打完了，共军已经突进城了！”李团长的报告让林泽生意识到，最后的时刻可能到了，他让政工室人员各自逃生，然后去寻找他的师长，但是师指挥所里已经没人了。在特务连长的带领下，他在一个临街商店用来储存货物的地窖里见到了师长温汉民。当时，温师长正在往外走——“可能要去督战，满脸流露出一股杀气。”而在温汉民的身后，副师长张振基正努力拦着他。地窖里的参谋人员一声不吭地坐着，一个参谋悄悄抓过林泽生的手，在他的手心上先写了一个“死”字，然后又写了一个“俘”字。

在新保安的西面，一〇一师的作战能力果然很强。三纵九旅本来把主攻方向选择在西门瓮城的西北角，由于守军的阻击火力十分严密，突击队根本冲不过去，于是改变突击方向，从西门一个被炮火轰开的缺口往里突。但是，部队突进去才发现，缺口里面和瓮城两侧隐藏着许多暗堡火力点，九旅官兵的多次突击都因伤亡太大而未获成

功。同时，七旅十九团和二十一团在其攻击方向上也多次爆破失败，最终改为利用四纵的突破口登梯爬城。当九旅和顽强的一〇一师对峙的时候，七旅的两个团终于爬上城墙，官兵们迅即顺着城墙内侧向一〇一师的背后插过来，一〇一师的防御开始出现松动。然而，对于一〇一师来讲，更严重的问题来自从东面溃败下来的二六七师。二六七师的官兵一群群地向一〇一师的防区里拥，不但造成巨大的混乱，而且影响了一〇一师的士气。

二六七师师长温汉民决定率师部向郭景云所在的鼓楼方向撤退。可是，师部的队伍刚出隐蔽部就被打散了。街上弹雨横飞，抵抗部队正与冲进城的解放军激烈互射，温汉民命令警卫官兵全部上刺刀，命令司号员吹号与鼓楼那边的军部联系，希望得到他们的火力掩护。终于跑到鼓楼附近的时候，温汉民发现二六七师的官兵和伤员都拥挤在这里，而在鼓楼东面和南面的大街上，解放军的突击部队就要冲过来了。温师长看得很清楚，在解放军的冲击队伍前，有人举着小红旗，小红旗一挥，炮弹就飞了过来。温汉民觉得鼓楼防御阵地肯定保不住了，遂决定往一〇一师阵地上跑。但从那边跑回来的官兵说，那里也处于混战之中，温汉民最后决定去找他的八〇〇团，八〇〇团的主要任务是看守汽车而不是作战，温汉民认为他们可能保存得较为完整。但是，八〇〇团的刘副团长也正向鼓楼跑呢，见到温汉民，哭着向他报告说：“我们不行了！”温汉民火了，拔出手枪喊：“赶快去截住部队！”话音未落，解放军官兵冲了过来，温师长带领的师部残存人员瞬间被冲得七零八落。

二六七师政工主任林泽生从一具尸体上扒下一双胶鞋，把自己那双不便逃跑的皮鞋换了下来，然后跑到城墙角下的一个地洞里，与一群伤兵藏在了一起。不一会儿，洞外打进来一梭子子弹，然后他听见有人喊：“里面有人没有？”林泽生急忙回答：“有！是伤兵！”外面喊：“是伤兵就不要乱动，都把武器扔出来！”——带头走出地洞的林

泽生望了一下天空："说也奇怪，天也紧随着下起大雪来。好像是要埋葬整个旧的世界。"

一〇一师师长冯梓于二十二日下午十五时与郭景云通了最后一次话。郭军长说："完啦，你过来吧。"冯师长说："我这儿没完，我派部队把你接来吧。"说到这儿，电话断了。冯梓刚给工兵连下达了冲到军部去把军长接出来的命令，脸被硝烟熏黑的二六七师副师长张振基跑进了他的隐蔽部，气喘吁吁地对冯师长说："东边已经完了，军部那边过不去啦！"冯梓一下子心情恶劣起来，他思索了片刻之后，把三〇二团政工主任王德全拉到一边说："设法和共军联系上，说咱不打啦，败局已定，为什么要再死人呢？"王德全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就去。"

被围困在新保安的时候，冯梓曾收到过城外解放军送进来的一封劝降信，信写得很简单："我是甄梦笔，甄华是我的新名，我这几个字，你还可以认得出来是我写的吧？你们完啦！快率部起义吧！"冯梓确实有这么一位老同学，一九二六年大革命时期两人都在太原上学，那时冯梓就知道甄梦笔是国民党中的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开始"清党"，甄梦笔被俘，经营救出狱后去日本留学了。抗战时期，冯梓和甄梦笔还见过一次面，那时冯梓在一〇一师当营长，甄梦笔曾到他的部队教官兵们用日语向日军喊话——现在的甄梦笔，也就是甄华，是华北军区第二兵团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部长。

"你们完啦！"这句话令冯梓很受刺激。他认为在一〇一师搞起义不是那么容易的。傅作义是从一〇一师师长的位置上提升为军长的，这个师的三名团长都是傅作义的心腹学生，一向被傅作义称为"跑不了的干部"。冯梓把信烧了，决心"死守待援"，因为他不相信傅长官会扔下他们不管，如果投降也得由傅长官下令，不然实在对不起长官，也对不起一〇一师。

但是，此刻，冯师长等不得长官的命令了。

下午十六时，新保安城内的枪声已稀疏，政工主任王德全把一名解放军干部和两名战士领了进来。冯梓见状没说什么，抓起电话命令各团停止战斗。

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一〇一师投降了。

此时，四纵十旅和十一旅已经攻占鼓楼。

冯梓被带到鼓楼上，十旅政治委员傅崇碧说："你这个顽固的家伙也有今天！"接着，官兵们又带来了另一位国民党军师长，他就是二六七师师长温汉民。

从二十二日早上起，郭景云就不断地叫参谋长田士吉到外面听是否有飞机的声音，一直到下午也没见总司令昨天说的飞机前来助战，郭景云渐渐地有些不知所措了："再写个电报问总司令，还要我们不要？"二六七师已完全溃败，一〇一师联络中断，新保安城内满城都是解放军的喊杀声，军部附近的枪声越来越烈，特务营、工兵营、通讯营已全部投入战斗。郭景云决定去找一〇一师，但外面横飞的枪弹令他根本无法出门。他又命令推两大桶汽油来——"我们不能被俘，要死大家死在一处，限十分钟推来！"然后，郭景云给傅作义发出最后一封电报："你见死不救，眼看追随多年的部下坐以待毙，于心何忍？"

十六时，第三十五军一〇一师准备投降的那一刻，解放军官兵已经冲到郭景云军部的房顶上。郭景云一面骂汽油桶总是推不来，一面掏出了自己的手枪。

这时候，飞机来了，仅有一架，绕着新保安飞了一圈，然后走了。

郭景云掏出手枪自杀的时候，副军长王雷震在场：

> 天已黄昏，我听到从郭所在的方向发出枪声，枪弹从我的棉帽顶上擦过，我初疑是门外解放军打进来了，紧接着听到第二响枪声，郭就倒在了血泊中。

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用来打死自己的手枪，被华北军区第四纵队十旅二十九团官兵收缴，他们把手枪交给了旅政治委员傅崇碧，傅崇碧后来把这支手枪“献给了平津战役纪念馆”。

二十二日十八时，杨得志、罗瑞卿、耿飚致电东北野战军总部、华北军区并中央军委：“战斗已解决，敌人全歼，战果待查，从总攻开始到结束，共十一小时。”

新保安作战毫无悬念地结束了。

当初，郭景云在绝望之时，曾准备将四百辆汽车浇上汽油点燃，然后利用暗夜趁漫天大火率部突围。华北“剿总”司令部认为，这倒是个孤注一掷的办法，也许能突出来一部分人马。可是，傅作义“犹豫再三下不了决心”，一是怕部队在突围中被解放军吃掉，二是舍不得四百多辆汽车。现在，打下新保安的解放军官兵对塞满了整个小城的数百辆美式十轮大卡车感到万分惊讶和欣喜。

第三十五军覆灭之后，西北方向百公里外的张家口岌岌可危。

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已将张家口严密合围。之前，毛泽东曾致电第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和副政治委员李天焕：“如果你们包围不力，部署不周，让敌逃跑，则你们应负严重责任。”杨成武、李天焕表示：第三兵团将“昼夜严密监视敌人，准备随时打垮敌人一切突围逃跑的企图”。二十日，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到达时，第三兵团已控制了张家口四周所有的制高点，特别是在北半部，兵团的火炮可以直接覆盖张家口的北部市区。

张家口国民党守军的最高指挥官，是第十一兵团司令官孙兰峰。由于张家口四面皆山，第十一兵团采取的是“依城野战”的防御方式，即把部队分成守城部队和野战部队两部分：野战部队以第一〇五军的二一〇、二五九师，第一〇四军的二五八师以及整编骑兵第五、十一旅组成，由第一〇五军军长袁庆荣指挥，担任城市外围的机动作战任务，白天出城骚扰，抢掠马草饲料，晚上回城；守城部队由第一〇五军二五一师、察哈尔保安司令部所属的三个保安团和独立野战炮营、铁甲大队、侦察大队组成，由察哈尔保安副司令兼张家口警备司令靳书科指挥，担任守卫张家口市区的任务。自从傅作义命令固守张家口后，孙兰峰根据张家口的军粮、民粮和武器弹药的储备情况，认为他能够“坚守三个月，以观整个战局的演变”。

二十二日黄昏时分，获悉第三十五军被歼灭之后，傅作义给孙兰峰发来密电：“张垣（张家口）被围已无守备意义，可相机突围转至绥远。”

突围命令是保密的，原因是怕引起张家口的混乱。但是，这天上午，傅作义的一封无法保密的“电报”已经引起惊慌，这封“电报”的内容是：上午十时，一架军用飞机降落张家口，接三个人立即去北平。傅作义让孙兰峰通知这三个人做好准备，这三个人的身份是：察哈尔银行经理张慎五、察哈尔田粮处长曹朝元和察哈尔财政厅长白玉瑾——傅作义突然把张家口三个掌握财经大权的最富有的人接走，这一举动意味着什么?

孙兰峰决定，二十三日早，第十一兵团主力向商都县方向突围。

第一〇五军军长袁庆荣、副军长杨维垣、军参谋长成于念决定分路突围，即步兵部队向北从大镜门撤离，骑兵部队向南从茶坊方向撤离，两部人马冲出包围圈后再向绥远转进。同时，命二五九师于当晚

向大镜门外围一线进行试探性进攻。为了保密，袁庆荣强调通知部队的时候一律口头传达。

二十三日凌晨，先行出动的二五九师传来“进展顺利”的消息，于是第一〇五军的大部队出动了。二五八师集合完毕，在向城北的大镜门方向开进的时候，参谋长王鸿鹄看到了令他担心的情景：“冷风刺骨，东南天空，已出现了鱼肚白，地上的景物，已能察看出来。行进路附近的两旁，有些障碍物还没有排除。行进队伍的两侧和间隙，夹杂着不少地方行政人员及其亲属，还有车、马混杂其间。这些人跟随突围的部队逃生，真是自找危险，也是部队的累赘。”袁庆荣率领第一〇五军军部出了大镜门，他很快就发现这根本不是在紧急突围，一眼望不到头的队伍行动迟缓而散漫，尽管二五九师依旧在报告“进展顺利”，但眼前的情景还是让这个作战经验丰富的军长心惊肉跳。袁庆荣严令部队跑步前进，说对延误大部队突围的军官将执行阵前枪决。

早上七时，靳书科按照往常一样起床上班，按照往日的程序准备听取汇报，突然，警察局长撞门而入，惊慌地喊：“部队昨天晚上开始撤退啦！”靳书科吃了一惊，说这不可能，因为昨天会上只说第一〇五军要出击作战，并没说到撤退的事情。警察局长说，第一〇五军不但连夜把带不走的东西毁掉了，而且早上出发的时候还带上了家眷——“如果是出击，带家眷干吗？”靳书科立即跑到第十一兵团司令部去找孙兰峰，一进门就看见满院子已经捆扎好的行李。他大声质问孙兰峰这是怎么回事，孙兰峰的回答令他“气得话都说不出来”：“欣然（袁庆荣，字欣然）没有告诉你吗？详细情况我也不大了解，完全是欣然计划的。我想不是欣然不通知你，而是因为还没有作出最后的决定。欣然走时在电话里对我说：他先带部队去打一下，如果能打出去，我们就决定撤退；如果打不出去，他们还要固守。过早通知你怕市上骚动，对城防发生影响。等欣然来电话我再通知你吧。”

张家口国民党守军的混乱由此开始。

靳书科立即通知他指挥的各城防部队，除留少数警戒人员之外，其余全部到大镜门外集合。此时张家口市内已经大乱，到处找不到各部队的负责军官，而孙兰峰的兵团司令部正在出城。靳书科突然想起来傅长官所说的“荣誉交代”，他认为如此各怀鬼胎的撤退，肯定是突不出去的，与其突不出去被打死或当俘虏，还不如留下来向解放军来个“荣誉交代”。靳书科正和参谋长焦达然商量的时候，二五一师师长韩田春跑来催促他赶快走：“赶快收拾一下走吧！我在大镜门外东山坡等你！”

大镜门，张家口的北城门，坐落在两山对峙的峡谷之中，砖砌拱门，门洞宽不足七米，城门外是通往张北的一条南北走向的山沟，山沟长达十余里，两面群山耸立，沟的东侧是大清河，西侧是简易公路，越往北沟越窄，在距大镜门约三公里处分成两岔，一条继续向北经过陶赖庙通往张北，另一条向东拐通往乌拉哈达、高家营方向。大镜门城门上高悬着清代察哈尔都统高维岳书写的四个大字：大好河山。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大好河山”下的大镜门已是混乱不堪。城门本来就狭窄，原来布设的铁丝网、鹿砦和地雷都没有清除，部队和市民拥挤在一起人喊马嘶，地雷不断地被踏响，使这里的景象惨烈如同战场。突然，骑兵部队冲过来了。按照袁庆荣的秘密部署，骑兵部队应从城南茶坊突围，但是，骑兵部队向南走了十几里又返回来了，坚持要从大镜门跟随野战部队一起走。据骑兵指挥官说，听说二五九师突围进展十分顺利，那么他们也就没有必要分头行动以“分散共军注意力”了。于是，在这个寒冷的早晨，大镜门外的山沟里，拥挤着张家口守军的骑兵、步兵、炮兵共五万多人，还有骆驼队、辎重马匹以及数万名跟随逃亡的市民。

围困张家口的华北军区第二兵团，事先对张家口守军可能的突围方向判断有误，将防御重点部署在西面和西南面，北面和东北方向只派出一纵三旅和六纵依山据守。二十三日拂晓，兵团指挥所观察到了大镜门外的混乱情景，接着就接到一纵和六纵的报告，杨成武判定张家口守军正在全力向北突围，随即下达了围歼突围守军的命令：在大镜门外那条山沟的分岔处西甸子和朝天洼，一纵三旅坚决阻击，挡住守军撤离的正面；六纵由朝天洼至大镜门以北地域向南攻击；东北野战军四纵的一个师迅速插入朝天洼、西甸子以南地域向北攻击；二纵和一纵的一个旅由东面的黄土梁向大镜门攻击；东北野战军四纵的两个师和二纵并肩向张家口以北出击；一纵另一个旅、北岳军区部队以及内蒙古两个骑兵师迅速在守军的突围方向上构筑第二道和第三道阻击阵地。命令限各主力部队二十三日晚二十二时必须赶到作战位置。

三旅坚守的阵地是朝天洼和西甸子，这里是张家口守军逃亡绥远的必经之路。

昨晚，二五九师出了大镜门后，除遇到零星短暂的阻击之外，没有遭遇大的战斗，于是他们不断发回“进展顺利”的报告。但是，拂晓时分，当他们走到朝天洼、西甸子时，突然受到猛烈的火力侧击，部队由此停了下来，二五九师官兵这才发现他们置身的地方两面山峰陡立，山沟已变得格外狭窄。师长郭跻堂立即组织攻击，但是，攻击数次均告失利。回想起出了大镜门后一路静悄悄的情形，郭跻堂突然想到解放军也许在“引蛇出洞”，这一想法令他顿时感到自己处境不妙。

山沟两面的山，当地人称为“穷山”，都是裸露着黄土碎石的陡壁，上面除了稀疏的荆棘之外，没有任何草木。当二五九师爬上山坡的时候，一纵三旅的官兵像从碎石黄土中钻出来一样，机枪子弹和手榴弹下雨般地打下来，然后就是端着刺刀不顾一切地反冲击，没有任

何防备的二五九师瞬间就垮了，垮下来的部队带着巨大的烟尘滚下来。

惊恐不安的二五九师还没来得及报告，解放军的炮弹已经打到了后面的第一〇五军军部附近。

太阳很高的时候，孙兰峰带着骑兵卫队来到第一〇五军军部，进门就朝袁庆荣喊：“你的部队呢？”袁军长说，二五九师还在前面打，情况不明。孙兰峰要求必须迅速打开通道，因为后续部队都在山沟里等着呢。留在市区的保安部队已经与解放军接战，因为骑兵部队擅自返回，现在的目标太大了，解放军很可能已经发现我们的突围企图。袁庆荣只好再次命令二五九师坚决突击，同时命令炮兵全力向当面解放军的阻击阵地轰击——“他们固守的高地尽管被炮兵炸成了一堆黄土，但仍纹丝不动地挡住我军前进的路。在这前不着村后不靠店的地方窝着，官兵们怨声载道，我的心情更加烦乱无章。”

正面阻击第一〇五军的一纵三旅到了最艰苦的阶段。

阴云密布，天寒地冻。三旅八团官兵根本无法修筑阻击工事，因为冻土比石头还坚硬，刨几下之后手掌会被震裂，血流出来，很快就冻成了冰。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冻土已被炮火打成了粉末，于是官兵把身体半埋在泥土中，等待着新一轮的战斗。敌人的攻击再次开始，阵地上被炮火的硝烟笼罩。八团指挥员从观察点往下看，发现公路上的车辆密密麻麻，国民党军挤成了一个巨大的疙瘩。在攻击阵形的前面，几个国民党军军官举着蓝色的旗子，后面是在督战队监视下弯腰爬山的队伍。一营和三营阵地上的机枪响了，蓝色的旗子倒了下去，但是督战队的大刀仍旧闪闪发亮，挤成疙瘩的敌人还在往上冲。不久，团长邹林接到一营长杜子钦的报告，一连的阵地丢失了。邹团长严厉地命令，马上组织反冲击，把丢失的阵地夺回来！命令刚说完，电话线就被炸断了。邹团长命令身边的战士徐二喜去查线，然后

摸到一营的阵地上，向杜营长传达他的命令：子弹打光了用手榴弹，没有手榴弹就拼刺刀、石头、铁锹和铁镐，一定要守住阵地！徐二喜跑了出去，等了好一会儿电话还是没有接通，电话排副排长赵秀山冲出了团指挥所，向一营的阵地摸上去：

……只见山坡上的积雪不见了，岩石被捣成了粉末，到处是黑色的弹坑，到处是敌人的尸体。一连阵地上敌人尸体更多。我看着周围的同志们，个个脸上都青一块紫一块，不少人的身上缠着绷带，撕得稀烂的衣服上，被鲜血染成了紫黑色。一眼就可以看出，他们与敌人打了交手仗。果然，我向杜营长传达了团长的命令后，营部的通信员对我说，一连刚才跟敌人抡了拳头。战士宋玉打光了子弹和手榴弹以后，便和敌人拼起刺刀来。刺刀刺钝了，他又抡起枪托，把一个敌人的脑袋砸掉了一半。因为用力过猛，枪托断了，他抱住另一个敌人，喊了声“共产党万岁”，便和敌人一起滚下悬崖。共产党员陈水的刺刀刺断了，他赤手空拳扑向一个拿小旗的敌人指挥官，把敌人摔倒，骑在身上，两只手像一把老虎钳子掐住脖子，一直把敌人掐死。接着他又拾起一颗手榴弹，向溃逃的敌人追去。他追上一个扛机枪的大个子，对准后脑勺就是一手榴弹，顺手夺过机枪便向敌人扫射。就在这个时候，忽然有一颗子弹打中了他，陈水同志倒下了……

返回团部的时候，赵秀山看见了躺在一块大石头旁边没有了呼吸的徐二喜，十八岁的战士手里攥着一根电话线，身后是一条长长的血迹。

敌人以整团的兵力实施人海冲击，守在阻击阵地最前沿的三连，在敌人冲上阵地的时候一起向敌群扑上去。副指导员赵彭身负重伤，最后时刻带领仅剩下的四名战士与敌人肉搏，最终全部阵亡。接着，八团团部特务连和警卫排官兵也扑了上来。警卫排长郭静抡着枪托左击右打，最后被大群的敌人围住，敌人的数把刺刀同时刺向了他，他摇晃了一下，抱住一个敌人狠狠地咬了下去。

三旅官兵用血肉之躯把张家口守军堵在了西甸子和朝天洼附近的狭窄山沟里，直到主力部队赶到。

二十三日下午十六时左右，拥挤在山沟里的国民党军突然混乱起来，有人不停地喊：“张家口被共军占领了！”

打进张家口的是东北野战军四纵和华北军区二纵。

占领市区之后，两支部队没有停留，立即北出大镜门追击。二十三日夜，他们与北面的阻击部队一起，将逃出张家口的国民党军压缩在西甸子、朝天洼、乌拉哈达、黄土窑子之间宽不足一里、长不足十里的狭窄的山沟里。

天降大雪，寒风呼啸。

二十四日拂晓，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和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开始了大规模围歼作战。解放军官兵猛烈穿插，纵横厮杀，狭窄的简易公路上，各种大小车辆全部被推翻，成千匹马到处奔跑嘶鸣，遍地是武器、弹药和物资，成群的骆驼在狂奔，失去指挥的数万国民党军官兵在风雪中四散奔逃。

部队溃散之后，第一〇五军军长袁庆荣、副军长杨维垣、二五八师师长张惠源、师参谋长王鸿鹄等人在三百多名溃兵的簇拥下，开始向深山逃亡。山路蜿蜒，山坡陡峭，一行人气喘吁吁，爬上一座山顶的时候，大家谁也不说话，有的人蜷曲着躺下，多数人僵硬地坐着，因为所有的东西，包括大衣，都跑丢了，山顶上寒风刺骨。不久，有士兵报告说，四周都出现了解放军的搜索队，一行人这才知道，跑了一夜也没有跑出包围圈。天亮了，炮弹飞了过来，炮弹打得很准，不少士兵被炸死，张惠源师长的后背打进了一块弹片，幸亏没有伤到骨头，但血把棉衣很快就浸透了。袁庆荣一行人又往西面的山头跑，追击而来的解放军官兵开始从三面逐渐接近，袁军长的身边只有一名班长还扛着一挺机枪，其余所有士兵的枪早就扔了，因为没有子弹了。有人建议在机枪的掩护下向山下的沟里跑，但是，从山沟的三面射来的火力十分凶猛，满山满谷都是“缴枪不杀”的喊声。无处可去的袁庆荣向西边的一条小沟摸去，张惠源钻进东面的小山沟，王鸿鹄则选择了另外一条山沟并藏在了一个山洞里。

天大亮了，袁庆荣的一条腿摔伤了，他拿着根树杈当拐杖，终于跑不动的时候，他的面前出现了解放军官兵愤怒的眼睛。

察哈尔保安副司令兼张家口警备司令靳书科和二五一师师长韩天春、参谋长焦达然等人在部队的掩护下，向张家口东北方向的乌拉哈达和高家营方向逃亡。晚上，漆黑的风雪中，掩护部队一路逐渐丢失。二十四日天亮的时候，在高家营，他们遇到了整编骑兵第一旅的残兵，旅长胡逢春已经被俘，所有的团长都脱离了队伍不知其踪。靳书科正准备重新组织队伍，突然有大部队迎面而来，靳副司令和韩师长用望远镜观察，有点疑惑：队伍既不像友军，也不像是共军，因为他们穿的是美国制造的人字布的草绿色军装。想了一会儿，靳书科突然想起来，这种军装从颜色到样式，是国民党军在东北的主力部队穿的，他这才反应过来，自己遇到了从东北入关的林彪的部队。部队立即溃散，溃散中韩天春摔伤了不能再跑，靳书科则在半山腰藏起来，但没过多久就被搜查出来。

国民党军第十一兵团司令官孙兰峰最终逃出了战场。他曾被俘，但是没有暴露身份，在随俘虏队伍转移途中逃跑。在一个向导的带领下，他在风雪中走了整整七天，手脚都被冻伤之后才走到商都县附近，与从张家口战场逃出来的残余部队会合，最后到达绥远。

张家口一役，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兵团部、一个军部、五个师、两个骑兵旅，共计五万四千余人。

二十四日二十四时，中央军委致电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李天焕：“庆祝你们于数日内歼灭新保安、张家口两处敌人并收复张家口的伟大胜利。”

无论是在新保安，还是在张家口，被俘的国民党军中下级官兵被集中在一起，有伤病的人得到了良好的治疗，每个人还都领到了毛

巾、肥皂、牙刷和一袋火车牌牙粉。但是，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六纵十七旅旅长徐德操，强烈要求枪毙国民党军第一〇五军军长袁庆荣，理由是“这个人太坏”——袁庆荣被追到山沟里的最后时刻，指挥追击的指挥员徐德操发现他已丧失抵抗能力，随即命令战士不准开枪，并让警卫班下去把袁庆荣扶上来。谁知道袁庆荣竟然开枪抵抗，打伤了好几名警卫战士。徐旅长向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建议要坚决制裁这个顽固分子，杨成武对徐德操说：“战场上他打死了我们的人，那是另外一回事。已经俘虏了，就不能枪毙他，不能违背我党、我军的俘虏政策。”

几天后，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奉命西进归绥，路过张家口的杨得志、罗瑞卿和杨成武一起会见了袁庆荣，问及刚刚结束的战斗，袁庆荣面对赢得胜利的解放军将领们说：

> 张家口和新保安被贵军分别包围后，敝方深知前途很不乐观。但总部仍命令两地坚守待命，万勿擅自行动。我们为了及时了解有关情况，自形势紧张以后，电报联络一刻也没停过。当二十一日下午六时两地联络突然中断时，我曾亲自命令电台注意新保安的情况，发现任何呼号立即向我报告。可惜任何声音都听不到了。接着，贵军就对张家口发动了总攻。我们根据总部命令，立刻组织突围。原以为贵军主力布置在西边，于是我们就出大镜门向北突围，为了牵制贵军主力，我命令骑兵、汽车、大车向西突围，不料突围受挫，他们也转向大镜门了。这一下子就乱了。人拦住了车，车挡住了人，马难以奔，人不能跑，建制混乱，指挥失灵。就这样，大势已去，不可收拾……

后来，由于傅作义亲自向毛泽东呈请，毛泽东不但批准了傅作义提出的释放袁庆荣的请求，而且还给他分配了工作——袁庆荣新的工作是在共产党领导的一支坦克部队里任副军长。

在傅作义的华北战区西线战场，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中，只有第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的生命永远结束在了那个荒凉的小城中。

他的遗体被照了相，穿上一身新棉衣，然后装入棺材埋葬了。

第三十五军被俘军官乘坐十轮大卡车被送往涿鹿时，再次经过新保安城外寂寥的旷野，在一片萧瑟的树林边缘，他们看见一根粗大的

木桩矗立在那里，那是一根铺垫铁轨用的黑色枕木，枕木上是一行红色大字：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中将军长郭景云。

风雪漫天，黑色的枕木和红色的字格外刺眼。

至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随着新保安和张家口守军的全军覆灭，华北国民党军傅作义集团中的傅系主力已被歼大半，平津战场的西线已无大敌。

## 天下人会提壶送酒欢迎你

尽管北平城四周已是炮声隆隆，英国驻华使团北方代表菲茨杰拉尔德先生，还是决定为他的小女儿正式取名为安西娅举办一次家宴。家宴之后，在北京大学教书的朋友建议他去找一下马龙，说马先生算命在北平城内名气很大，可以预测一下可爱的安西娅的人生前途。

他们到达马龙先生家的时候，发现“门口停放着一辆国民党军的军用汽车”，一个一脸惊异的国民党军上校刚从门里出来。上校说，马龙先生给他算的结果是他马上就可以离开北平——“城市已经被团团包围，这个卦荒谬得令人难以置信”。可是，就在上校走上军用汽车的时候，传令兵递给他一道五分钟前收到的命令，内容是立即收拾行装赶到南苑机场直飞南京。

“太妙了！太妙了！”上校手舞足蹈地惊呼着。

一九四八年底至一九四九年初，北平城笼罩在一片复杂的情绪之中。这座曾是元、明、清三朝都城的古老城市以高大的城墙举世闻名。冬日昏暗的天空下，皇城明黄色的飞檐和街巷土灰色的瓦顶交错在一起，在城墙的环绕和挤压下显得格外拥挤局促。自东北野战军大军入关之后，北平所有的城门都关闭了。城门之外，解放军的包围前沿已推进到距离城墙不远的地方：在城西，机枪和大炮已经架在了万

牲园（动物园）、紫竹院一线；城南永定门护城河的南岸，也已经被完全封锁。从现代战争的城防角度讲，北平防御之薄弱令人惊讶，因为除了城墙之外，整座城市再没有任何其他防御设施。国民党军守城部队为防止解放军攻城，曾决定把靠近城墙的民房拆除以扫清射界，但拆除行为遭到房主们的强烈抵抗，北平居民组织起来持械守家，对抗几乎演变成一次规模不小的战斗，最终导致扫清射界的行动不了了之。

由于围城和封锁，市内粮食开始短缺，粮商们的囤积使粮食价格飞涨。严寒中的北平还需要取暖，以往煤炭都是从西山由骆驼队驮进城，但是城西的阜成门关闭了，城内的煤炭很快脱销，整座城市在西北风的抽打下哆哆嗦嗦地缩成一团。每天，各座城门内都聚集着要求出城的市民，但是“剿总”的命令是军民一律不准出城，如果出去了就不许再进来。由此，全城的生活日用品只能依靠空运。一开始，南苑机场还可以使用，但是随着解放军的包围圈日渐紧缩，南苑机场被占领了。傅作义被迫在天坛开辟临时机场，参天的古柏被砍倒数百棵，可机场刚修成不久，就遭到猛烈而准确的炮击。于是，改在更靠近城中的东单修建临时机场，但前提是必须拆除壮观的东单牌楼，没有人愿意承担拆除这座明清建筑的责任。最后妥协的方案是招商拆除，合同上写明拆的时候不能损坏一砖一瓦，战争结束后还要负责恢复原样。东单临时机场修好了，结果再次遭到猛烈而准确的炮击，除小型飞机可以降落之外，大型飞机根本不敢接近。

东城的朝阳门曾经开放过，虽然只在上午开了一会儿，但是城外的菜农小贩和城内的居民可以在瓮城里会合，连外国驻华使团的中国厨子们都跑去买菜了。一个小时后，所有的蔬菜和日用品被一抢而光，然后城门轰隆一声关上了。食品的短缺严重地影响了小饭馆的生意，因为他们没有了原料。但是，储备丰厚的大饭庄生意更加兴隆，守城的国民党军军官拼命享乐，以吃喝玩乐消磨备受煎熬的时光。由

于下级军官和士兵对居民的骚扰，傅作义每天上午都要召开军官会议，听取有关军民关系和敌情侦察的汇报。城内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无一不漏地参加，而每次散会之后照例是聚餐，全部由北平最有名的大饭庄包办——招牌菜烤鸭每天一定上桌。城内的各大戏院也是场场爆满，戏班子不得不白天加演，但戏票依旧供不应求，大声叫好的观众大多是国民党军军官。最奇怪的是，浴池也日日客满为患，从早到晚热闹非凡，军官们浑身泡得红萝卜一般，裹着浴巾叫来点心和茉莉花茶慢慢品尝。掌柜们虽然挣到了银元，但是心里却越来越不踏实：老主顾都不见了踪影，满堂子的兵爷算是什么世道?

航空公司整日被团团围住，达官贵人不惜一切代价举家逃离。东单临时机场能够降落的小型飞机座位有限，因此机票的价格贵得惊人。如果持有美国签证，将被视为“一等乘客”，可以得到特殊关照；持香港签证的人被列为“二等乘客”，也基本可以飞走；而去台湾或者中国南方各省的都列在“三等乘客”以下，什么时候能够挤上飞机就很难说了。那个鼓励傅作义与共产党战斗下去的大学教授胡适，不知是以几等乘客的身份飞走的，总之他“穿件棉袍，拿着皮包”走得很早，并且此生再也没有回过这座让他功成名就的古城。

以见多识广闻名的北平市民，虽然对修筑在各条街口的临时工事可以视而不见，但是物价飞涨已经不能使他们处变不惊。“通货膨胀率达到幻想才能构思出来的数字”，如果某人达成了某一项交易，即使打发小伙计以最快的速度去取钱，回来的时候必定要在商定的价格上再加上一二百万元——当然是金圆券。在北平城里，一百万金圆券只能兑换一美元，如果你能有机会兑换的话。“在被围困的那些日子里，北京王府井的下水沟里和马路上到处是乱扔的金圆券，尽管面额百万，但老百姓却把它们踩在脚下”，金圆券实际上已经成为一堆废纸。“不过，这样说也不大确切，这堆废纸的纸质还不错，许多人用它贴了墙壁”。政府发行的金圆券失去了根本信誉，早已废除的银元突然成了流

通的主角——无法得知北平的民间如何存有这么多的银元，可见中国社会对国民党政权的前景早有悲观的预测。

人心惶乱的时候，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足为怪。有人请来美国斯佩尔曼大主教在北平举行公开演讲，大谈美国士兵如何在日军的铁蹄下拯救了中国，却对眼前人人担忧的解放军围城之事一字不提——“而他们几乎就在北平的门口”。新当选的国民政府副总统李宗仁也来到北平，规模盛大的招待会的来宾五花八门：国民党军高级军官、北平高级行政官员、各国领事馆和使团代表、宗教领袖、大学教授，甚至还有满清王室的后代——不是哪位王爷的大公子，就是哪座王府里的三格格——“这是一个有意宣示李副总统即将与南京政府对抗的信号”，因为“满清的贵族宁愿看到共产党的胜利，也不希望国民党的统治继续下去”。一位中国籍的基督教牧师，在一次集会上大讲他的旅行见闻，见闻的主要内容是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如何美好，听众中有不少国民党军高级军官，他们不但“全神贯注地边听边记笔记”，而且还神秘声称他们正打算实行一个“突然而巧妙的行动”——至于是什么行动没有具体说明，但社会普遍猜想不是“起义”就是“投降”。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国民政府开始将大量珍贵文物向台湾运送，中央博物院、故宫博物院、中央图书馆、北平图书馆被运走的文物无以计数，仅故宫被运走的文物就达五千七百一十二箱——北平的暗夜中，故宫巨大的宫门里不断地驶出遮盖严密的大卡车。

包围北平的解放军正在进行攻击前的一切准备，攻城部队打算使用大炮轰击和挖掘地道两种方式，突破包括护城河以及地堡群在内的城墙，然后插入纵深，分割守军，实施各个歼灭。对于如何用大炮轰开城墙，聂荣臻专门请教了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请教的内容是：轰击哪里既不损坏古老建筑物，又对居民住宅破坏最小，还可以作为解放军攻击入城的突破口。梁思成说，北平的城门中，有好几座都是从来没有损坏和修复过的明代建筑，如果毁坏将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梁思成建议，如果要炮轰，最好选择北城墙东部的城门附近，因为那是个新城门，是日本人占领北平时修的，城门里面曾是清代的科举考场，自庚子年被烧毁之后，就成了一块巨大的空地。

此时的北平城内，布满了共产党领导的地下工作者，其中党员有三千多人，外围人员达五千人之多。在中共晋察冀分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的领导下，人数众多的地下党员已经渗透到国民党党、政、军各部门和社会的各个阶层，就连各国驻北平的外国使团里也发现了他们的踪影。一天，菲茨杰拉尔德先生正在值班，有人向他报告说，“外交使团大院里有三名共产党”，“听差的领班和看门人都是”，“另一个是老李，电工班班长，他是头头”。菲茨杰拉尔德平时很喜欢那个热心帮助别人且彬彬有礼的电工老李，此刻，他突然明白了，老李确实是个关键人物，因为“他在任何时候都能使整个大院陷入一片黑暗”。

无论从哪方面来讲，外有大军压境，内有“电工老李”，北平已经失去了在军事和政治上坚守的任何可能。

这是微妙而重要的历史时刻，共产党人以逐渐缩紧围困的方式，耐心等待着这座古城的内部发生“突然而巧妙的行动”。

国民党军华北“剿总”总司令部设在中南海，傅作义的办公地点是居仁堂。

这位身经百战的将领，此刻正处在戎马生涯中最痛苦的时刻。在意识形态上，他与共产党格格不入，尽管在抗战期间，他与共产党抗日武装的将领们关系良好，但是一旦两军对垒，他必须维护自己的军事实力和势力范围。内战爆发后，他在一次次的两军较量中不断占据上风，以致成为当时晋察冀野战军和晋绥野战军的一个强硬对手。但是，作为国民党军战区最高军事指挥官，他和绝大部分国民军高级将领有一个根本的不同，这个不同不是什么秘密，无论国民党人还是共

产党人都很清楚：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他的戎马生涯与蒋介石没有任何派系上的关连。这个一直转战于中国北方的军事将领，甚至很少到南方去，北方的平原草场和山地戈壁是他军事生涯赖以延续的基地，他不会为蒋介石无条件地奉献一切，他有他自己的利益所在。他治军严格，作战凶猛，爱护官兵，并且十分留恋故土。蒋介石任命他为华北“剿总”总司令的时候，他很不愿意离开张家口去北平上任，因为他知道蒋介石的中央军不会听他指挥，他也不愿意把自己的部队绑在蒋介石的战车上。直到他的部队在涞水战役中损失严重，他才正式把指挥部迁移到北平。

尽管北平的豪华大楼和数座王府任他挑选，他最初还是将总部设在了城外西郊公主坟附近的营房里。他不准他的官兵随便进城闲逛，不允许他们穿呢子服和皮鞋，他自己带头穿士兵服和黑布鞋，他不愿意骚扰北平居民的正常生活，也不愿意他的部队由此滋生腐化。上任北平后不久，他与蒋介石的矛盾便显露出来。在华北地区的军事指挥上，他提出有权使用战斗序列中的所有部队，但遭到副总司令兼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的反对。陈继承是蒋介石的军统嫡系，他强调中央军的行动必须经他批准，其中有的部队例如青年军二〇八师只有他才能使用。傅作义对这样的侮辱愤怒之极：“想靠中统、军统两条绳索来捆缚我的手脚，要我充当地主豪门的鹰犬去咬沿门乞讨的百姓，我是不干的！”——无法确切地理解傅作义所说的“地主豪门的鹰犬”和“沿门乞讨的百姓”各指的是什么，可以肯定的是，傅作义与蒋介石集团在政治上存有分歧。由此，他曾三次向蒋介石提出辞职，并推举陈继承接替他的职务。蒋介石再三挽留无效后，只好把陈继承调走了。蒋介石给了傅作义四个军的番号让他扩军，鉴于一九四七年蒋介石曾给过他两个军的番号，但随即把他的第三十五军和第一〇四军调到河北和东北去的教训，傅作义拒绝了。之后，他做了一件让蒋介石无可奈何的事：国民政府选举的时候，蒋介石为了控制选票，密令国民党军各部队中的国民党员重新登记，说如果不登记就自动取消党籍。当时，傅

作义的部队中只有国民党员，却没有国民党的组织机构，于是这件事被无限期地拖延下去，结果竟是傅作义部队里的国民党员全部自动脱党了。傅作义在他的司令部里悬挂着精心撰写的标语：我们多一分努力；总统少一分忧劳。但他同时对心腹说："我们就为这样的人，为几个家族而战吗？我们付出了血的代价，才取得了抗战的胜利，不能前门拒狼，后门引虎！"

一九四八年十月三十日，国民党军廖耀湘兵团全军覆没，东北野战军开始攻击沈阳，卫立煌在慌乱中准备乘机撤离，蒋介石在北平城的圆恩寺亲自指挥东北作战——傅作义把贴身卫士和勤务兵支开后，将他的心腹华北"剿总"副秘书长兼政工处长王克俊约进内室。傅作义与王克俊探讨了"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的问题，最后结论是"必须走自己的路"。傅作义话语严峻：

> 我是准备冒着三个死来做这件事的：第一，几年来，我不断对部属讲"戡乱、剿共"的话，而今天秘密地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他们的思想若不通，定会打死我；其次，这件事如果做得不好，泄露出去，蒋介石会以叛变罪处死我；再者，共产党也可以按战犯罪处决我。但是，只要民族能独立，国家能和平统一，咱们还希望什么呢？

刘厚同，傅作义的老师及同乡，深得傅作义的信任。一九四八年初，中共晋察冀分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中共北平地下学生委员会负责军事策反的王甦等人辗转找到他，委托他做傅作义的工作走和平的道路。十月，刘厚同从天津来到北平，经过他的引见，中共北平地下党得以结识傅作义的长兄傅作仁、第三十五军副军长丁宗宪、国民党河北省府主席楚溪春等人。此时的傅作义顾虑重重，主要是怕控制不了蒋介石的中央军部队，怕得不到共产党方面的谅解，怕蒋介石大规模轰炸北平，还怕被国民党军同仁看作是叛逆。刘厚同对傅作义说："忠应忠于人民，而非忠于一人。目前国事败坏成这个样子，人民流离失所，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人民希望和平，政府必须改造，如果你能按照历史的发展，顺人心，起来倡导和平，天下人会提壶送酒欢迎你，谁还会说你是叛逆？"

十一月，刘仁要求北平地下学委通过傅作义的女儿再做工作。傅冬菊，天津《大公报》记者，爱人周毅之是中共地下党员。北平地下学委书记佘涤清将他们调到北平工作，他告诉傅冬菊：“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你父亲有接受和谈的可能，希望他放下武器，与共产党合作，和平解放北平。”傅冬菊回家对父亲说：“我有个朋友是共产党，他希望父亲与共产党合作，和平解决问题。”傅作义一方面希望有人能够从中联络，一方面又怕女儿上了中统特务的当。女儿坚定地说这是“真共产党”的意图，傅作义问：“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傅冬菊回答说是毛泽东派来的，“傅作义表示可以考虑”。

中共北平地下党人通过滴水穿石般的努力，策反了许多国民党军政人员。傅作义的第九十二军军长黄翔，在地下党员李介人的策动下，已同意率部起义；王甦说服了傅作义的铁甲车总队第一大队长于维哲，一旦解放军对北平发起攻击，他就率队从前门向永定门前进以配合解放军。地下党员杜任之等人做通了第三十五军副军长兼二六二师师长丁宗宪的工作，丁师长表示：“总司令若不走和平道路，我们一个师单独起义。”北平地下党人甚至做通了国民党军统北平站站长徐宗尧的工作，让他在北平尚未解放之前，保护政治犯和档案材料。

但是，由于长期的政治隔阂和军事对立，共产党方面与傅作义的沟通联络，依旧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虽然多个渠道不断向傅作义传达共产党方面希望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意图，但是都没有十分确定的、能够落实的沟通渠道。就在傅作义依旧处在矛盾和焦灼中时，蒋介石电召他去南京开会。

东北全军覆没，淮海岌岌可危，蒋介石再次提出将华北的部队通过陆路、海路全部南撤。而傅作义宁可在万不得已时西撤归绥，也不愿南撤江南后被惯于排斥异己的蒋介石吞并。于是，他对蒋介石说：“在我看来，固守平津是全策，退居江南为偏安，非万不得已，不能将

华北部队南撤。若是平津有失，徐蚌方面就将有共军的三个野战军了。”危局之下，傅作义的果敢正是蒋介石所需要的，但他仍忧虑地感叹道：“林彪部队已达百万之众，加之华北聂荣臻部，这个压力，要哪一个单独承受都不是轻易的事。”傅作义表示：“林彪最少需要休整三个月才能入关，平津方面大的战事当是在明年开春之后。这期间，我可以再扩充二十万至五十万部队，可以加固津塘六十公里弧形阵地，完善北平碉堡群系统。对付林彪、聂荣臻虽说不多么宽裕，也不至于让总统过多忧虑。”坚守平津，这正是蒋介石梦寐以求却已难以实现的，于是他当即表示尊重傅作义的意见——“固守平津，置主力于津塘，以利尔后行动。”

傅作义从南京回到北平，这时候，林彪大军入关并逼近北平的情报传来了。傅作义寝食难安，他指示电台日夜监视林彪、聂荣臻的电台位置。接着，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第三十五军在新保安被围，第十六军在康庄被歼，第一〇四军从怀来突围而出却下落不明。更令他吃惊的是，颐和园附近发现了解放军的踪迹，位于西郊公主坟的总部受到威胁，于是紧急决定将“剿总”司令部搬进城。搬运动用了北平城内所有的汽车，但是依旧不够用，军官、士兵、家属们争抢上车，宛如大祸临头，连笨重行李都不要了。司令部撤离的当晚，公主坟被解放军占领。

总部进城之后，傅作义选择的办公地点是原国民党北平行辕旧址，即中南海里的居仁堂。

没过几天，第一〇四军军长安春山回来了。

部队已经被歼，只剩他一人蓬头垢面地站在傅作义面前。

傅作义没有训斥安春山，他知道说什么都没用了。

傅作义召集了一次兵团司令、总部各处长、军长、独立师师长参加的军事会议，让大家就目前严峻的军事形势发表意见。中央军嫡系部队的两个兵团司令官石觉和李文主张，要在傅长官的率领下与共产党军队决一死战，否则没有前途，也对不起党国和校长的多年栽培。接下来，安春山发言，他直言不讳地主张不能再打了，说三年内战已经看出了结果，共产党那边越打越强大，国民党军已经没有了打的资格。如果非要打，出北平到涿县去打，北平人口稠密，文物古迹多，人民不愿意在这里开战，只要人民不愿意的仗就不能打。傅作义没想到安春山说出这样一番话，他同时听见总部的处长们小声议论："身子已经掉在井里，耳朵是挂不住的，军事行动已绝对不能挽回。"休会时，傅作义把安春山叫到办公室，开口便问："你今天的发言是否代表共产党来向我劝降？"安春山说："绝对不是！我是从客观出发，说出了心里话！"傅作义训斥道："你说话的场合太冒险，如果石觉、李文他们当场提出要惩办你，我怎么处理？有什么话不能先对我说？向共产党求和，是通敌，是犯罪，是有危险的！你必须在会上承认你说错了！"复会之后，傅作义表示完全赞同石觉和李文的决心。接着，安春山也说他接受傅长官的训斥，坚决拥护两位司令官的意见。

晚上，傅作义让安春山来见他，见面还是问："你是不是接受了共产党的和谈任务？"安春山否认后，傅作义提出几个问题让安春山思考：

——仗能不能再打下去？如果打仗不能解决问题，能不能走？要走往哪里走？如果不能打也不能走，求和行不行？

——求和是不是投降？是不是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背叛？

——我们过去虽和共产党有过一段历史交往，但在日本人投降后，又打了几年仗，共产党要我们这些人吗？共产党对你我、对我们的部下杀不杀？用不用？信不信？

为提防蒋介石的中央军，傅作义调整了北平城内的军事部署，即让自己的嫡系部队负责中南海周围的警卫，同时部署在阜成门、西直门和德胜门一线，因为西城外是解放军主力部队所在的位置，控制住西直门或者德胜门，日后就能保证和谈人员的安全出入。傅作义把中央军部队全部部署在了北城、南城和东城。为防止内部叛乱，他还在景山上部署了一个野炮团，城内部署了三个师的预备队，以备中央军有什么举动时能迅速地控制各个城门。

十二月十四日，傅作义派出他的心腹、总部少将联络处长李腾九出城与共产党方面联系。共产党方面派《平明日报》采访部主任李炳泉跟随李腾九来到中南海——《平明日报》是傅作义上任北平后办的报纸，而李炳泉是一九四〇年入党的中共地下党员。李腾九把李炳泉带进傅作义的办公室，这是傅作义第一次秘密会见公开身份的共产党代表。李炳泉表示："我受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的派遣来见傅先生，欢迎傅先生作出决断，进行和平谈判。"傅作义提出，由《平明日报》社长崔载之作为他的代表，"到解放区见中共方面的领导"。李炳泉当即回答："可以。"崔载之，傅作义的又一个心腹，负责宣扬傅作义部的战绩，同时因能对时局说出真言，深得傅作义的赏识。为了保证绝密和安全，傅作义命令李腾九从此称病在家，专门负责收听崔载之发回的电台信号；李炳泉也向李腾九介绍了另一位名叫刘时平的北平地下党员，以便在他陪同崔载之出城之后，李腾九仍能与共产党地下组织保持联系。

十五日，崔载之、李炳泉以及报务员、译电员和司机共五人，携带电台一部，乘坐一辆吉普车，从北平西南的广安门出城，准备直接驶往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去见毛泽东。这一十分唐突的举动立即遭到挫折。一进入解放军的控制区，他们就不断地受到拦截，最终他们被告知，可以去的地方不是平山县，而是解放军的平津前线指挥部，于是他们又回来了。十六日，五个人再次从西直门出城，一出城门便进

入了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的防区。在纵队司令部，崔载之和李炳泉向贺晋年司令员、陈仁麟政治委员谈了傅作义要求和平谈判的情况。当晚，十一纵致电林彪、罗荣桓、谭政：

（一）由北平地下党南方局支部关系人李炳泉来接头称：他们经过李腾九［傅之联络处长］、傅冬菊［傅的女儿，系准备吸收的党员］劝说傅作义投降。八日开始，十日傅答复条件：（1）参加联合政府，军队归联合政府指挥。（2）一定时间起义，要我为他保密。（3）要求林彪停止战斗，双方谈判。十四日晚的条件：（1）军队不要了。（2）两军后撤，谈判缴械。（3）由傅发通电缴械。上述过程已于十三日晚由电台报告了华北中央局。

（二）参加此事者还有傅之《平明日报》社长崔载之。该员已与李炳泉到了我部，他们带有电台［留在城内］、密本与傅通报［报务员、译电员与李、崔已到我部］。

（三）据李称，傅作义现在心里着急，神经错乱，每日啃扫帚，并要求我速派代表谈判。并称傅不能控制中央系军队，李腾九可掌握傅在城内之骑兵四师［刘一飞］、保安团［许宝廷］。现李炳泉在我部等待答复处措办法。

林彪、罗荣桓、谭政向中央军委转发十一纵的电报之后，同时表示：“攻下北平、天津，全歼守敌，我军皆有绝对把握，因此，谈判内容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有利”。“必要时我们可到通县附近直接主持这一谈判”。

林彪、罗荣桓率东北野战军指挥机关从沈阳入关后，十二月七日到达河北蓟县以南约十公里处的孟家楼，这里距北平、天津、唐山各九十公里。二十一日晚，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到达孟家楼。

这是一座普通的河北农家小院，“两边厢房住着参谋秘书，警卫人员，南边三间正房，东边是林彪的住室，西屋是挂满了作战地图的作战室。正房的前面，又是一个小院，但没有厢房，只有低矮破旧的门楼”。这样一个极其简陋的农舍，就是指挥着百万大军的平津战役指挥部。

聂荣臻到达孟家楼后，刘仁也奉命到达孟家楼。

中央军委对如何与傅作义谈判作出指示："谈判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基本原则"。目前，傅作义三个军的嫡系部队，第一〇四军被歼，第三十五军和第一〇五军被围于新保安和张家口，北平城里的傅系部队只有第三十五军的一个师、第一〇一军的两个师和一个骑兵师，北平、天津、塘沽守军大部分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因此，谈判中"可以考虑提出允许减轻对于傅作义及其干部的惩处，允许他们保存私人财产，但傅作义必须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同时，要试探傅作义是否有命令国民党军中央军放下武器的权力，如果他没有这个权力，"则可向他提出让路给我们进城解决国民党中央军"。

平津前线指挥部命令十一纵护送傅作义的代表到司令部来。

罗荣桓命令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作战处长苏静负责接待。

为了避免暴露司令部的位置，苏静找到一个叫八里庄的村庄，并在村西头农民周庆海家安排好了三间房子。

苏静和崔载之、李炳泉的接触，不能算是谈判，只能算是交谈。正值隆冬，几个人坐在炕上聊了一天。崔载之反复强调，傅先生是有诚意的，决非阴谋把戏，为了不使蒋介石的中统破坏，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傅先生想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平、津、张、塘一线，甚至包括包头、绥远的问题。崔载之提出了三个需要着重商论的问题：第一，傅作义想要加强傅系军队的力量以制约蒋系部队，希望能把被围困在新保安的第三十五军的两个师放回北平，如果共产党方面不放心，可以让解放军掺杂在第三十五军里面一起进城；第二，为了搞到一些蒋介石的飞机，希望林彪停止对南苑机场的火力控制；第三，为了杜绝美国人拉拢傅作义的企图，傅作义准备通电全国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傅作义参加联合政府，军队则由联合政府指挥。

十九日，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来到八里庄，与崔载之和李炳泉进行了会谈。刘亚楼明确表示不能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共产党方面对解决平津问题提出的条件是，傅作义可以留下两个军，同时把蒋系中央军军长、师长以上人员逮捕起来，然后宣布起义。崔载之用电台向傅作义汇报了解放军提出的条件。傅作义在回电中明确表示：北平城内中央军比他的部队兵力多出几十倍，逮捕其军长、师长以上全部军官不宜实施。

此时，在北平以西的平张线上，傅作义的嫡系军队在新保安、怀来、康庄等地情况危急，这进一步促使傅作义和谈心切。自派出代表秘密联络共产党方面后，傅作义召集了一次军官会议，探讨和平与战争的问题。会上，他说出的一番话令军官们怦然心动——这些军官大多数出身贫苦农家，一向认为自己出生入死地混到如此地位，是人生成功光宗耀祖之事，他们第一次听到"给地主当了看家护院的打手"这样的话：

> 人家共产党公布了土地法大纲之后，就不应再打仗了。我们为了实现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曾叫周北峰领导一个土地局，几年也提不出一个解决办法，即使有办法，也不能施行。这些年来我们就是给地主当了看家护院的打手，能分他们的土地吗？和平并不是失败，如果一定说是失败，那也只是我傅作义一个人的失败，对你们来讲是胜利，我把你们从绝境带到生路上来。

就在崔载之奉傅作义之命出城的那一天，国民党军国防部军令部长徐永昌受蒋介石派遣到达北平。徐永昌和傅作义是多年的好友，他力劝傅作义迅速从塘沽和青岛分路南撤。傅作义回应说，塘沽已被林彪包围，山东已全在共产党人的掌控中，无论是海路还是陆路，实际上都已中断而无法撤出——傅作义有些担心，蒋介石也许捕捉到了自己与共产党方面接触的某种风声？

二十二日，傅作义的起家部队第三十五军在新保安覆灭，军长郭景云自杀，这个消息对傅作义打击巨大——他"坐立不安，精神恍惚，

打自己的嘴巴，有一天撞在门框上，摔倒在地，卫士急忙扶起，傅大哭一场”。刘厚同得知消息后立即去看望傅作义，傅作义见到刘厚同便说：“这一下我的政治生命算完了。”刘厚同对傅作义说：“旧的政治生命完了，可以开始新的政治生命。时至今日，万不可胡思乱想了，还是顺应人心，当机立断，抓紧和谈为是。现在咱们与中共和谈的资本已不如过去，但议和一成，北平免遭战祸破坏，城内军民生命财产得以保全，还是得人心的。共方信守协议，咱们还是有光明出路的。这也是唯一的出路了。时不我待，不能一误再误。”

两天之后，张家口守军突围失败，五万余人的部队被歼。

至此，傅作义的嫡系部队基本丧失。

二十三日，蒋介石派蒋纬国带着他给傅作义的亲笔信飞到北平。蒋介石已获悉傅作义正在与共产党人谈判，因此他在信中劝告傅作义：西安双十二事变上了共产党的当，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平生一大教训，现在你因处境又主张与共产党人合作，我特派次子前来面陈一劝。蒋纬国极力劝说傅作义撤到江南去，说只要把部队经过海路、陆路南撤，不但能够得到美军的援助，而且蒋介石有意任命傅作义为华南军政长官。蒋纬国所说的“美军的援助”很快就被证实了，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尔吉专程飞到北平，与傅作义会商撤退之事——白尔吉的出面证明，就如何把华北的国民党军撤出，美国人确实与蒋介石协商过。只是，蒋介石也许没有料到，美国人答应帮助国民党军南撤，目的不是为了支持蒋介石，而是要抛开蒋介石支持傅作义。尽管傅作义反复强调自己仅是个“地方负责人”，美国人要给援助应该到南京去说，白尔吉还是向傅作义表示，美军愿意帮助傅作义从华北撤离，今后要抛开蒋介石支持傅作义。傅作义有些火了：“我是个中国人。我相信中国人能够解决好我们中国自己的事情。毋需外人来干涉。”

当天，傅作义给毛泽东发去一封电报。除了再次表示自己的和谈没有任何政治私心之外，傅作义诚恳地提出双方立即停止军事对抗，希望共产党方面不要用缴械的方式让他为难，并且表示他相信毛泽东的政治风度：

> ……（1）今后治华建国之道，应交贵方任之，以达成共同政治目的［余前曾来电赞同毛主席新民主主义与联合政府之主张］。（2）为求人民迅即得救，拟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面和平统一。（3）余绝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4）在过渡阶段，为避免破坏事件及糜烂地方，通电发出后，国军即停止任何攻击行为，暂维现状，贵方军队亦请稍向后撤，恢复交通，安定秩序。细节问题请派人员在平商谈解决，在此转圜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责余为难。过此阶段之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望能顾及事实，妥善处理，余相信先生之政治主张及政治风度，谅能大有助于全国之底定……

两天后的二十五日，傅作义突然听到了一个让他吃惊的消息：中共中央公布了蒋介石等四十三名战争罪犯的名单，他的名字赫然列在名单之中。登载这一战犯名单的报纸上还专门发表了一条短讯，说像傅作义这样的战犯不惩罚不可能，减轻惩罚是可能的，出路就是缴械投降——两天前，傅作义还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强调“盼勿以缴械方式责余为难”，现在共产党方面的态度竟然是这样，傅作义的沮丧可想而知。他对他的参谋长李世杰说：“你好好准备打仗吧！双方条件相距太远，根本不能谈！”

心绪混乱的日子里，傅作义甚至想出了一个效法当年张学良的解脱办法：先发一个呼吁和平的通电，然后把指挥权交给第四兵团司令官李文，自己到南京去向蒋介石请罪。傅作义的这一想法，受到参谋长李世杰的坚决反对，李世杰说如果这样做，任何方面都对不起：把部队交给李文，李文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不可能与共产党方面和谈，如果他坚持要打，北平必毁于战火，那样一来对不起北平市民和几十万官兵；而发一个通电就走，蒋介石必定认为你临阵脱逃，绝不会原谅你。共产党方面也会认为你有始无终，既怕打仗又怕和平。对于自己更是不负责任，蒋介石要军法处置你怎么办?

傅作义无言。

傅作义的处境被北平的街头巷尾编织成各种传闻——“突然传来一则消息，说警备司令傅作义企图自杀，虽然被他的参谋救下来了，但伤势严重。”英国人菲茨杰拉尔德先生记述道，“这条消息当然不会出现在当地报纸上，可谣言还是不胫而走。”可是，不久之后，当这位使团代表出席美国领事的宴会时，看见“椅子上赫然坐着一个人，身体健壮，精力充沛，看不出受过什么伤”，而“此人就是傅作义将军”。

一九四九年元旦那天，毛泽东起草了给林彪的电报，对争取傅作义作了具体指示，同时解释说，把傅作义列入战犯名单，其实是为了他的安全以保障和谈能够顺利进行：

林：

亥（十二月）世（三十一日）各电均悉。

（一）新保安、张家口之敌被歼以后，傅作义及其在北平直系部属之地位，已经起了变化，只有在此时才能真正谈得上我们和傅作义拉拢并使傅部为我所用。因此，你们应该认真进行傅作义的工作。

（二）你们应通过平市党委将下列各点直接告诉傅作义：

（甲）目前不要发通电。此电一发，他即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和他的部属都可能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我们亦不能接受傅所想的一套做法，傅氏此种做法是很不实际的，是很危险的。

（乙）傅氏反共甚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队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地解放北平，或经过不很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劳，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罪，并保存其部属。北平城内全部傅系直属部队，均可不缴械，并可允许编为一个军。

（丙）傅致毛主席电，毛主席已经收到。毛主席认为傅氏在该电中所取态度不实际，应照上述甲、乙两项办法进行方合实际，方能为我方所接受。

（丁）傅氏派来谈判之代表崔先生态度很好，嗣后崔可再出城来联络传达双方意旨。惟我们希望傅氏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偕同崔先生及张东荪（燕京大学教授）先生一道

秘密出城谈判。

（戊）傅氏此次不去南京是对的，今后亦不应去南京，否则有被蒋介石扣留的危险。

（己）略

（三）上列六点最好由北平市党委派一个可靠同志，经过傅作义亲近的人［出城谈判之崔某如何］的引进，当面直接告诉傅作义，并告傅作义保守机密。如张东荪出城不能保守秘密，则张可以不出来。

军委

一日二时

六日，王克俊和华北"剿总"土地处少将处长周北峰一起，到了位于李阁老胡同的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家。周北峰，傅作义的同乡，一九三七年在山西大学任教时结识傅作义，自那以后成为傅作义的"外交官"。抗战时期，周北峰曾代表第七集团军兼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傅作义去延安，因为八路军的一二〇师在傅作义的防区内，中共中央曾派人到山西汾阳会见傅作义，傅作义即派周北峰代表他回访延安。周北峰在延安见到了毛泽东，并与贺龙、萧克会晤。日本投降后，他还曾作为傅作义的代表，在张家口与苏联红军接头；国共谈判期间，他在和谈小组里出任傅作义的谈判代表。在张东荪家，中共北平地下党学委秘书长崔月犁告诉他们，城外一切都准备好了，联络口号是"找王东"，即往东走的意思。崔月犁还让张东荪把一块白布缝在一根木棍上，说"通过火线的时候就摇晃着这个旗子走吧"。

汽车照例出西直门，只到了万牲园（动物园）西面的白石桥停住了，护送他们的军官说，这里距前沿战壕只有五百米，汽车不能再往前开了，只能下车步行。周北峰和张东荪夹着皮包、戴着皮帽、拄着木杖在寂静的土路上走着，军官不断地提醒："走路中间，两边有地雷！"到了前沿，军官停住脚步，说："你们小心点，听见打枪就卧倒，等那边招手，你们再过去！"两个人直点头，军官转身走了。他们

又走出大约一百多米，前面一声喊：“站住！”解放军战士把他们领到海淀镇的一个大院子里，见到解放军干部时两人急忙说“找王东”，于是被招待吃了一顿面条，然后上了一辆吉普车。吉普车开进西山附近的一个村庄又不走了，他们在那里休息了一个晚上。第二天继续出发，下午十六时到达河北蓟县的一个村庄，这个村庄还是八里庄。

八日，聂荣臻到达八里庄，会见了张东荪和周北峰。周北峰说，傅作义要求他们谈清以下几点：“一是平津塘绥一起解决。二是平、津等地允许其他党派报纸存在。三是政府中要有进步人士参加。四是军队不要以投降方式解决，可调到城外用整编的方式解决。”聂荣臻特别问到张东荪“傅作义能否下令蒋系部队出城”这一关键问题，张东荪肯定地说傅作义表示他能够控制局面。

九日凌晨，获悉聂荣臻的汇报后，中央军委复电指示，除第一条外，其他原则同意。之所以不同意第一条，是因为必须先解决平津问题，两军对垒需要大量军粮，这将给百姓带来巨大负担。塘沽、绥远问题可之后解决。

九日上午十时，林彪来到八里庄。

傅作义的“外交官”和燕京大学教授终于见到了这位蜚声国共两军的身材瘦小的将领，并同时领略了他的不苟言笑和言简意赅：

> 林彪首先说：“周先生，你昨天与聂司令员谈的，我们都知道了。今天我们谈一下傅先生的打算、要求和具体意见。”我说：“昨天夜间我已与傅先生打了电报，说我们已安抵蓟县，并与聂司令员见了面，约定今天正式商谈。傅复电很简单，只是‘谈后即报’四个字。”林彪说：“那好吧，咱们今天作初步的会谈。你来是只谈北平问题呢？还是傅先生势力范围内的所有地区都谈呢？”我说：“傅先生的意思是，我们的商谈应以平、津、塘、绥为中心的所有他的辖区一起谈。”林彪说：“那很好，请你电告傅先生，平、津、塘、绥可以一起谈。不过请再次告诉傅先生，希望他这次要下定决心。我们的意见是：所有的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在接受这样条件的前提下，对傅部的起义人员，一律不咎既往，所有张家口、新保安、怀来战役被俘军官，一律释放。傅的总部及他的高级干部，一律予以适当安排。”

之后，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又两次来到八里庄，具体谈了如何使傅作义的部队解放军化以及如何使地方解放区化的问题，并特别谈到对傅作义部在新保安、张家口被俘官兵既往不咎、对傅作义本人不作战犯看待等问题——“不但不作战犯看待，还要在政治上给他一定地位”。最终，会谈的内容由刘亚楼负责整理成一份“会谈纪要”，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和周北峰在上面签了字。

这份“纪要”的最后一段是附记：“各项务必于元月十四日午夜前答复。”

周北峰回到北平，从内衣夹缝里取出“会谈纪要”交给傅作义。

“傅看完后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唉声叹气。”

周北峰提醒傅作义注意那个最后限期，傅作义过了好一会才说：“你可电告解放军，你已回到了北平。这个文件，过两天再说。”

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对抗多年之后，如今不但要放下武器，而且所有的军队一律要被改编为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这让傅作义一时间难以决断。在那些痛楚的日子里，他不止一次问自己的部下：“咱们过去的历史就这样完了吗？”

## 金汤桥

陈长捷，国民党军天津警备司令。

一九三七年九月，在中国军队对侵华日军发起的平型关战役中，他是与林彪同在一个战场作战的国民党军第六十一军军长。当时，林彪率八路军一一五师越过五台山，插入晋东北灵丘一带，在平型关以东的河南镇抄袭日军。陈长捷奉阎锡山之命按兵不动。当日军开始袭击国民党军第十七军阵地时，第六十一军紧急出击，在大雨中与日军

激战，将日军死死牵制在战场上。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东部大败日军之后，位于战场西面的第六十一军受到日军的猛烈夹击，在傅作义的严令下，陈长捷的主力团拼死抵抗，战至最后除一个通讯排外其余官兵全部殉国。十一年后，一九四九年一月，当陈长捷准备与林彪拼死作战的时候，他已是年近五十二岁的资历甚老的将领了。

陈长捷出生在福建闽侯一户贫寒家庭。这个南方人自从戎的那天起，就与中国北方结下了不解之缘，其戎马生涯始终与北方的著名将领傅作义紧密关联。二十岁时，陈长捷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七期，傅作义是第五期学员。毕业后，受傅作义的邀请，陈长捷投奔阎锡山的晋军。一九二七年阎锡山投向国民革命军，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他任晋军第十五旅旅长，在与奉军的作战中战功卓著，战后升为晋军第九师师长，驻扎在天津南郊小站地区，那时的天津警备司令是傅作义。抗战爆发后，他的部队归属傅作义任司令官的第七战区序列，一九三七年，他出任第六十一军军长兼七十二师师长。陈长捷作战勇猛剽悍，但是，他不是黄埔系的，因此在国民党军中难免落落寡欢。一九四八年五月，在偏远的兰州任第八补给区司令的陈长捷得到一纸任命，这一任命令他颇感意外并由此改变了他的人生：出任国民党军天津警备司令。

傅作义上任华北“剿总”司令官后，急需在北平和天津两个战略要点安置得力将领。当时的北平和天津都是特别市，直辖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蒋介石十分重视这两个北方重镇的权力所属。傅作义以再三辞职的手段，终于把蒋介石安置在自己身边的亲信陈继承挤走，接下来，在天津的问题上傅作义也不向蒋介石让步。傅作义认为，天津是他在华北的最后基地，是可能据守的最后堡垒，也是他一旦面临绝境时的南撤出海口，必须选择一个既能够与自己贴心，又能够有效指挥驻守天津的国民党军中央军的人，他最后选择了陈长捷。陈长捷不但是他的老同学老部下，而且因作战勇猛在国民党军中享有一定的威

望。特别是陈长捷是南方人，国民党中央军将领也多是南方人，这样一来也许容易沟通，蒋介石就曾因陈长捷是阎锡山、傅作义系统中少有的南方人而拉拢过他。所以，如果推荐陈长捷，无论傅作义系统还是中央军系统都不会抵触，蒋介石也不会激烈反对。

果然，蒋介石批准了这一任命。

一九四八年五月，陈长捷从兰州飞抵北平，傅作义当面向他交代了扼守天津、确保北平的重要性。六月三日，他赴任天津，开始了其军旅生涯最后几个月苦守孤城的艰难时光。

天津，人口两百万，是当时华北第二大城市，地处水路要冲，西面一百二十公里就是北平，东面七十公里可经塘沽出海，明清以来便有“京畿门户”之称。东西宽不足五公里，子牙河、北运河、南运河、金钟河、新开河、墙子河等河流穿城而过，将城区切割分块，又将城郊侵蚀成洼地之后汇入海河。

从地势上讲，天津是个易守难攻的城市。这座城市的城防堡垒始建于日军侵占天津时期，日军曾在主要交通要道上修建了大量碉堡。一九四五年美军接防时又加修了一些铁丝网。内战爆发后，时任天津警备司令的牟庭芳，曾得到两亿元拨款，受命修建坚固的城防设施，但是，在修了两座红砖碉堡后，牟庭芳的部队调走了，钱也被他带走了。一九四七年初美军撤走，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上官云相在天津设立指挥所。不久，白崇禧在北平召开“绥靖会议”，强调“平津地区将有大战”，要求天津必须修建永久防御工事。于是，上官云相以及当时的天津警备司令林伟俦和天津市长杜建时开始了大规模的城防建设：修建周长四十多公里的蜂腰形城防线，构筑高四米、宽两米的护城土墙，城墙上构筑上千座红砖水泥立式大碉堡，墙外挖有宽十米、深三米的护城河，环城架红色铁丝网。同时，在天津西南方向修

建引水设施，以便在必要时引进运河水造成大片水淹区。而在城防线内侧则修筑一条环城公路，四面留有八座城门，布设重兵把守。

陈长捷接替天津警备司令后，发现他可以指挥的守城部队并不多，仅有第八十六军三个师、第六十二军两个师、第九十四军一个师以及两个保安师和一个警备旅，再加上临时增编的人员武器都不全的第六十二军三一七师和第九十四军三〇五师等，一共才十多万人。更令他担心的，是那个耗资巨大的天津城防设施。一九四七年修筑的城防工事虽然坚固，但当时想不到国民党军溃败如此之快，更想不到天津有一天会变成一个孤立据点，都认为将来打仗的前线将在距天津几十里之外的地方，天津是后方而不是前线，因此修筑的城防工事仅仅是按一个军九个团的兵力配置设计的，不但范围很小且迫近市区，天津外围的不少重要据点都没有划在防御线之内。同时，当时国民党军将领大大低估了解放军的攻坚能力，认为他们没有大炮，无非是抱着炸药包冲上来炸碉堡，因此修建碉堡时仅用了红砖和水泥，根本没有使用能够抵御炮击的钢筋。陈长捷说："我们总是对解放军估计过低。"

陈长捷知道傅作义让他守天津用心良苦。

在傅作义的安排下，北平和天津的高级军官家属不断地从塘沽乘船南运上海，张家口和北平的嫡系军官家眷也不断地从北平乘火车到达天津——在傅作义的心目中，天津是华北战场的大后方，只要这个后方稳固，人心就不至于垮塌。陈长捷和傅作义都没有想到，国民党军在东北和淮海战场上迅速覆灭，东北野战军近百万大军很快入关，并且随即威胁到北平与天津。让陈长捷不理解的是，傅作义竟然从东部调兵向西，增援新保安和张家口，这使得唐山、芦台、杨村、天津、塘沽直接暴露在林彪的围攻之下。陈长捷后来说，如果不是共产党人实施"围而不打"的战术，傅作义也不会把平津地区的兵力分散到

西线去，而傅作义的防御重点如果始终在津塘，那么解放军想拿下天津不是易事。

十一日，陈长捷召开天津城防会议，他判断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将是城的西北角和天津西站，因此命令着重在这个方向加修钢筋水泥堡垒，并在市内各主要马路中心、胡同巷口修筑碉堡，在中原公司、南开大学、跑马场、西车站、北车站、北洋大学、警备司令部等市内高大建筑物上加修火力据点。为防止解放军进一步逼近城垣，将运河水引进护城河，关闭护城河入海通道，使护城河水深增加三米。为防止河水封冻，每天派人砸冰，河水上溢后，津保公路以南十多平方公里的地区变成一片泽国。但是，大规模的城防工事加修刚刚开始，陈长捷突然接到北平参谋长李世杰的电话，说“空军情报，有解放军的一大纵队——很大的，已到宝坻，向天津方向行动中，请紧急布防”。由于天津附近的驻军已被傅作义西调，陈长捷问李世杰：“用什么部队布防？”李世杰说：“急抓吧！现在从南口调第六十二军当夜乘火车急运天津。”

陈长捷焦急不安。第九十四军和第六十二军原来驻守天津、芦台和杨村一线，第三十五军在新保安被包围后，傅作义命令这两个军立即赶往平绥线，后因第三十五军被歼而停止在半路。接到回防天津的命令后，两个军急忙上路。当天晚上，第六十二军乘坐的列车刚刚通过杨村至豆各庄间的大桥，大桥就被炸断了，第六十二军仅有两个师跑回了天津，而另外一个师连同第九十四军的两个师回不来了。

部队还在慌乱调动的时候，蒋介石派国防部次长李及兰、总统府参军罗泽闿、联勤总部参谋长吴光朝乘专机来到天津。这三个人都是市长杜建时在陆军大学时的同班同学，因此三人都住在了杜建时的家里。他们带来一封蒋介石的亲笔信，内容是让天津守军撤退到塘沽，然后从海上南撤，以加强江南的防御力量。杜建时的基本立场是：守

天津是死路一条，现在天津到塘沽之间的军粮城等要点虽然已出现解放军的踪迹，但估计兵力不大，还可以冲过去。李及兰答应给杜建时一个军方名义，让他把天津的国民党军全部带走。杜建时知道，要做成这件事，陈长捷是绕不开的。他随即电话邀请陈长捷和第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第八十六军军长刘云瀚商量此事。两位军长都是中央军系的，他们不断暗示杜建时须立即行动——之所以要“暗示”，原因很简单，陈长捷不是中央军系，他不听蒋介石只听傅作义的。此时，陈长捷已经或多或少地风闻了傅作义与共产党方面秘密接触的信息，同时他在傅作义的军事部署和调动中也揣摩出了他根本无意南撤。陈长捷不断打电话试探傅作义是否南撤的真实意图，傅作义一律以“待考虑考虑”和“坚守就有办法”作为回答，于是陈长捷决定坚决执行傅作义的指令，因为如果傅作义没有南撤之意，天津一撤就等于把傅作义和北平城置于了死地。陈长捷觉得他宁死也不能做出背叛长官的事情。

“如果你们把部队带走，我只有自杀！”他对杜建时说。

陈长捷如此坚决，况且北平的傅作义不南撤，天津单独撤也许会在中途被解放军围歼，于是只好决定坚守。

杜建时去机场送他的老同学时，彼此竟都有“生离死别之感”。

陈长捷决心固守天津，但是，天津的国民党军都能看清作战前景，因为东北和淮海战场上国民党军的命运就是例子，于是前沿上的任何一点动静都会让他们万分惊恐，只有不断地扔手榴弹和胡乱开枪才能缓解严重的不安。

三三三师从杨村撤往天津时遇到袭击。火车被拦截，司机跑得没了踪影，师长宋海潮判断，袭击他们的肯定是民兵，因为白天的侦察情报显示，附近几十里之内并没有解放军的踪迹。于是宋师长命令原地宿营，天亮后修好铁路继续前进。但是，第二天拂晓，冲锋号骤

响，数以千计的解放军从四面八方冲上来，三三三师师部和直属部队瞬间被冲垮了。宋海潮在最后时刻躺在地上装死尸才得以侥幸逃到天津，向陈长捷汇报了被袭击经过之后，宋师长请了病假。他的一个团长，是个老兵，在打游击上很有一套，这个老兵的一番话令宋海潮彻底绝望了：

我问他："如果我们守不住，解放军打进来，我们是否可以将部队拉出来打游击？"他说："不行，不行。过去孙殿英当土匪时，走到哪里住到哪里，吃到哪里，没有人管。现在可不行了。老百姓全听共产党的，打游击的人住到哪里，哪里就有人通风报信。解放军知道了，马上就来打你。"

宋师长脱下军装，换上便衣，当了老百姓。

中央军委为平津战役制定的作战方针是：先打两头，后取中间。

"两头"的一头指的是平津以西的新保安，另一头指的是平津以东的塘沽。

塘沽位于天津的东南方向，是华北地区国民党军重要的出海通道，也是重要的海上补给站。驻守塘沽的国民党军最高指挥官是津塘守备区司令、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

十二月下旬，平津前线指挥部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以东北野战军第二、第七、第九纵队共十个师的兵力，由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吴富善统一指挥，首先夺取塘沽和大沽，将华北国民党军从海上撤退的通路彻底封堵。

中央军委在电报中提醒林彪、罗荣桓、刘亚楼：

……攻击塘沽的迟早，以我军由大沽或塘沽附近是否可以炮击塘沽海港和完全封锁塘沽来作决定。如果不能完全封锁，该地敌人仍有由海上跑掉的危险［据外国通讯社报道，国民党有一批军舰在塘沽附近］，则我军应不惜疲劳，争取于尽可能迅速的时间内歼灭塘沽敌人。如果塘沽海港能由炮火完全封锁，敌人无法逃跑，则可从容部署攻击，不必性急……

战场形势要求先打塘沽，军委的指示也是先打塘沽，但是塘沽地形十分复杂，东临渤海，其余三面全是盐碱滩，即使在冬季也不结冰，因此既不便于构筑工事，也难于展开大兵团作战。且东北野战军进入塘沽后，侯镜如已经把他的指挥所搬到军舰上，以便随时可以逃跑，因此东北野战军一旦发起攻击很难全歼守敌。

在孟家楼的那座农家小院里，林彪一直沉默着看地图，而罗荣桓和刘亚楼翻看着塘沽前线发来的一大摞电报。最后林彪说："塘沽、天津两地之敌，都要在很短时间内彻底歼灭，这是含糊不得的，也是不允许含糊的。推迟攻击时间，军委不一定同意，就是同意了，可塘沽的地形是变不了的，也还是很难把敌人全部歼灭。"罗荣桓说："是呀，打塘沽是我们入关后的第一个大仗，如果打不好，势必影响整个平津战役。"这时候，刘亚楼表示，他可以亲自"去一趟塘沽前线，再看一看地形，与邓华、吴富善同志进一步研究一下，看到底有没有办法打好这一仗"。林彪、罗荣桓同意了，林彪特意嘱咐刘亚楼："让萧华也一起去看看。"——萧华时任东北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司令员。

十二月二十六日，刘亚楼、萧华到达塘沽前线第七纵队指挥部。

邓华指着地图告诉刘亚楼："塘沽东为渤海，南为海河，我们无法四面包围，炮火也很难封锁海口，敌人可背海顽抗，实难断敌退路，全歼敌人。除渤海、海河之外，周围河沟很多，虽宽一丈左右，但水深及腰，潮来更深。除铁路与路东一条小道有桥以外，其余不易通过。而敌则可凭河沟坐守。西面、北面直到海边，均为草地、盐田，广阔平坦，草地潮湿泥泞，挖沟有水，盐田冬不结冰，不便徒涉，部队难以展开攻击。敌人以塘沽外面盐滩地为防御前沿，从正面向纵深层层设防，并有陆上和海上炮火作掩护。我进攻部队虽可利用盐堤作为冲击出发地，但发起冲击后就进入平坦的盐田，完全暴露在敌人密集火力之下，那代价就太大了。"

刘亚楼问："你们试攻的情况怎么样？"

吴富善回答："我们用少量部队进行了试探性攻击，虽占领了几个村镇和一些盐滩地，但伤亡较大。二十师攻击海滩车站，歼敌七百余人，自己伤亡六百余人。二纵和我们的情况一样，二师配合他们的部队攻占塘沽西北的新河镇，歼敌一百四十余人，自己伤亡四百余人。我们只好命令部队暂停攻击。"

之后，刘亚楼、萧华、邓华、吴富善一起去了前沿阵地，刘亚楼看见的是"无遮无拦的平坦开阔地、纵横交错的沟渠和未结冻的绵延盐田"，还有停泊在远处海面上的国民党军军舰。

晚上，在七纵指挥部，刘亚楼表示，军委要求先打塘沽，"一是为了控制海口，防止平津守敌从海上逃跑"；二是先将两头的敌人歼灭，孤立中间的北平、天津，迫使平津之敌放下武器。现在看来，以三个纵队打塘沽和大沽，难以速战速决，且要付出很大代价。"如果坚持打下去，攻占塘沽有把握，全歼守敌则不可能，最大可能是歼灭一部，而大部逃窜，结果是得失不合算。更重要的是费力费时，将拖延解放平津、解放整个华北的时间"。

会议一直开到深夜，刘亚楼试探地问邓华和吴富善："如果我们把先打塘沽改变为先打天津，你们看怎么样？"

邓华一下子提高了嗓门："要是这样，我们就想到一起了！先打塘沽得不偿失，先打天津是有把握的！"

吴富善则说，昨天，我们还与二纵司令员刘震、九纵司令员詹才芳一起议论过，大家都认为"如果先打天津，可以争取时间，不仅天津守敌跑不了，对切断北平之敌东逃的去路，也更为有利"。

二十七日，刘亚楼和萧华赶回孟家楼。

刘亚楼的建议是："先打天津，同时也不放弃对塘沽的包围"，即使塘沽的一部分守军跑了，也扭转不了华北国民党军覆灭的命运。

罗荣桓已启程去西柏坡参加中央的会议，林彪独自思索良久"方下定决心"致电中央军委，要求改变先打塘沽的作战计划：

军委：

（一）据我在塘沽附近各部队对地形侦察的报告，均说该地地形不利作战，除西面外其他皆为开阔宽广之盐田，且不能作战，涉之水沟甚多，冬季亦无结冰把握［因海潮起落关系］，不便接近也不便构筑工事。且敌主阵地在新港靠近海边码头，我军无法截断其退路。该处停有兵舰，敌随时可以逃入军舰退走。故两沽战斗甚难达到歼敌目的，且因地形开阔，河沟障碍，我兵力用不上，伤亡大而收获小，亦必拖延平津作战时间。我在两沽附近的部队，皆认为攻两沽不合算。

（二）我原在两沽附近的部队，已大部西移到达天津附近。

（三）我们意见目前我军一切准备防平敌突围，但由于我目前未攻两沽，敌多半不敢突围。在此情况下，我军拟以五个纵队的兵力包围天津，进行攻天津的准备。在我未攻击前，如敌突围则先打突围之敌。如我准备成熟时，敌尚未突围，则发动总攻歼灭天津之敌。盼军委电示。

林、刘

艳（二十九日）十一时

当天晚上，中央军委回电：

林、刘：

二十九日十一时电悉。

（一）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

（二）高（高岗）、罗（罗荣桓）昨日到此。

军委

艳亥（二十一至二十三时）

为了防止平津守军突围，中央军委发出了一系列指示，除参加攻打张家口的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归建之外，调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和第三兵团参加平津作战。中央军委特别提醒林彪，要防止平津之敌被迫从陆路突围，如果让他们沿平汉路南下，正在围困杜聿明的刘、邓、陈、粟部队将压力更大。一九四九年一月上旬，华北军区两个兵团到达北平郊区，至此，加上东北野战军的围城部队，包围北平的兵力已有四十多个师五十余万人。北平围城力量加强之后，平津前线指挥部决定成立天津前线指挥部，并以东北野战军第一、第二、第七、第八、第九纵队和特种兵纵队大部及第六、第十二纵队各一个师，由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统一指挥攻取天津。刘亚楼为天津前线指挥部总指挥。

一月七日，林彪就攻击天津作战部署致电中央军委。电报详细报告了天津国民党守军的兵力、部署、城防以及我军攻击突破的重点方位。之后，电报还特别说明，天津守军以十几万部队守一个比济南大三倍、比锦州大十倍的城市，必定处处薄弱，因此预计战斗能够迅速解决。天津拿下后，主力部队“将移北平附近准备攻城”。在报告投入攻击天津的总兵力时，林彪认为投入的兵力有些多了，原因是各部队都要求参战——十二纵说自部队成立以来从来没有打过“主要攻坚战”，这次无论如何要锻炼锻炼，“故允许其以两个师参加”。另外，“刘亚楼要求六纵一个长于巷战的师参加攻天津”，“亦已同意”。电报中流露出来的极度自信以及兵力绰绰有余的心境，在以谨慎闻名的林彪以往发出的所有作战电报中前所未有。

林彪的自信是有理由的。

仅就攻击十三万守军的天津而言，东北野战军投入的兵力火力堪称奢侈：五个野战纵队，二十二个师，特种兵纵队的十二个团，共三

十四万人，参战的山炮、野炮、榴弹炮和大口径加农炮达五百三十八门，还有三十辆坦克和十六辆装甲车跟随步兵冲击。其具体部署是：

第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政治委员梁必业统一指挥第一、第二纵队，配属地炮八十九门、高射炮十五门、坦克二十辆和两个工兵团，加上纵队所属的大口径火炮二百七十三门，组成西集团，由西向东攻击前进，从和平门附近南运河西岸突破，在金汤桥与东集团会师，然后向南城攻击；

第七纵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吴富善统一指挥第七、第八纵队，配属火炮六十七门，高射炮八门，坦克十辆和两个工兵营，加上纵队炮兵大口径火炮一百六十九门，组成东集团，由东向西攻击前进，从民族门地区突破，先冲向金汤桥，而后攻击北城；

第九纵司令员詹才芳、政治委员李中权统一指挥第九纵队及第十二纵队三十四师，配属特种兵部队地炮二十四门，装甲车十六辆，加上纵队炮兵大口径火炮九十六门，组成南集团，由南向北攻击前进，从城南尖子山地区突破，围歼天津南城守军；

第八纵队独立四师主力、第二纵独立七师一部和野战军总部警卫团两个营，在城北的民生门、丁字沽等处实施佯攻；

第六纵队十七师为总预备队，随时准备从城西加入西集团方向的作战；

第十二纵主力位于军粮城地区，向塘沽方向警戒，并防止天津守军向塘沽突围。

刘亚楼对这一部署的解释是：“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他对二纵司令员刘震说：“你们的

对手是林伟俦的六十二军，可是块难啃的骨头！”刘震的回答是：“嘿！虽然骨头不如肉可口，但啃起来更有味道哟！”

解放军重兵攻击在即，天津守军惊恐万状。市内禁止燃放鞭炮和敲锣打鼓，除加派宪兵警察巡逻外，晚上实行了严格宵禁。一个从外围据点逃进城的连长声称解放军已经开始攻城，并说他们的最高指挥部设在杨柳青。陈长捷当晚就请求空军派飞机轰炸，炮兵也集中火力向杨柳青轰击。天津城内已实行灯火管制，不允许百姓们点灯，可有人说全城一片黑暗，解放军摸进来的时候不容易发现，于是又全城征集煤油灯往前沿阵地上送，大型碉堡上也立起了探照灯。十几万条麻袋装上土，被连夜运往前沿，与麻袋一起运上去的，还有数万只空罐子——空罐子挂在铁丝网上，稍微触动就响成一片。

“没有一个连的碉堡群据点能抵抗到二十四小时以上的。”驻守在城北的第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对天津城外围据点的丢失速度感到震惊。

尽管攻城部队具有压倒性优势，但外围作战还是显示出战争的残酷。二纵攻击南运河西侧，守军仅是第六十二军六十七师一九九团的两个加强连，敌人的防御阵地上有深壕、鹿砦和坚固的碉堡，二纵四师十一团官兵拼死冲击，担任突击的九连一排和二连二排强行爆破，在向纵深发展时九连长邹洪奎中弹牺牲。二连在攻击中伤亡不断增加，攻占守军阵地不久就遭到猛烈反扑。八连在接替二连之后，三班的阵地被守军突破，已身负重伤的战士王和用手榴弹与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八连增援上来的官兵在三班的阵地上与反击敌人展开肉搏，敌人退下去之后，阵地上留下的国民党军遗体有数十具之多，而上百名失去行动能力的伤兵在寒风中哀号不止。

一纵在扫清外围的时候，将作战能力最强的一师一团投入了作战。一团三营在营长朱家礼和教导员苏章的率领下，七连攻占三庆门

和西营门外的地堡群，但八连在攻击四座坟地堡群时却遇到困难，连续爆破厮杀几十次依旧打不下来，国民党守军借助坚固工事和火炮的有力支援，一个连队打光了再换上来一个连。“八连光指导员就牺牲了两个，朱家礼的眼睛都打红了”。团长刘海清一面命令三营坚持正面攻击，一面命令部队趁暗夜利用已经打下的地堡挖交通壕。哪个地堡被打下来，就把交通壕挖到哪里，最终使四座坟地堡群孤立起来，然后一团集中兵力发起攻击，将国民党军的外围据点扫清。

东局子是天津东郊的一个镇，距离城垣约两公里，是遮蔽津东守军阵地的一个重要外围据点。一九〇〇年庚子之役时，八国联军曾在这里设立兵营，自那以后这里一直有完备的防御工事。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军二九三师八七七团奉命坚守，这个团的官兵大部分都是东北人，因此成为二九三师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攻击东局子的是七纵十九、二十一师各一个团，攻击前官兵们就开始挖掘交通壕，并成功地抓获了敌人的俘虏，弄清了东局子守军的防御部署。大雾弥漫，攻击开始，在准备炮火尚未完全摧毁守军前沿工事时，南北两面的突击队便发起了冲击，突击队员立刻陷入守军精心编织的火网中。八七七团团长田子永命令位于前沿的部队阻挡一下，然后把解放军的突击队放进来，接着关闭所有的壕口，使冲进来的解放军官兵全部暴露在阵地上，随即炮兵按照事先的精确测距集中炮火猛轰，七纵的攻击部队因伤亡巨大被迫撤退。拂晓时分，七纵改变突击部署，再次发动进攻，火炮直接轰击守军的碉堡、炮兵观测所和指挥所，突击队员奋勇向前。七纵官兵久经沙场，但从未遇到如此密集的地雷区，战后在清理战场时，仅在一小块洼地里就挖出了未爆炸的地雷八十多枚。八七七团指挥所被包围后，团长田子永命令部队停止抵抗。

东局子的失陷，令陈长捷感到他的部队根本无力抵抗解放军的猛烈攻击：“第八十六军举其精萃力量用在东局子支点上，只经解放军一

日夜的猛攻强袭，即被突陷，炮火日夜支援，也没起作用，一个大团干净灭亡，这使得原来软弱的第八十六军就全部丧胆了。”

一月六日，林彪、罗荣桓致信给陈长捷等人，告知解放军即将举行天津战役，希望陈长捷学习长春的郑洞国放下武器，如抵抗只能是遭致杀身之祸。经陈长捷同意，国民党天津参议会的四名代表于八日、十日和十一日三次出城，与天津前线总指挥刘亚楼会谈。他们带去了陈长捷的要求：只放下重武器，陈长捷部携带轻武器撤至塘沽，然后从海上南撤。刘亚楼当即拒绝，并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向陈长捷提出四条意见：“一、天津为华北主要工业城市，人民解放军甚望和平解决，以免遭受战火破坏。二、一切天津国民党军队应自动放下武器，人民解放军保证这些军队官兵生命财产的安全及去留自便。三、人民解放军停战二十四小时，等候天津守军的答复。四、如果天津守军不愿自动放下武器，则人民解放军将发动进攻，天津守军的首领们，应担负天津遭受战火破坏的责任而受到严厉惩罚。”最后，刘亚楼让代表们转告陈长捷：“上述限二十四小时内答复，天津守军至迟应于一月十三日十二时前放下武器，否则，我军将于十四日开始攻城。”

十一日拂晓，第六十二军前沿阵地对面的土推上，一个穿解放军军服的人高声喊话，说要派通信员送一封信来。林彪要求天津国民党守军放下武器的最后通牒，被解放军的通信员通过前沿阵地送到第六十二军军部。军长林伟俦先与第八十六军军长刘云瀚商量了一下，然后携带信件去见陈长捷。陈长捷看信之后默不作声——他与蒋介石中央军的两位军长没有沟通的可能。杜建时把陈长捷请到密室里单独商量，陈长捷说：“我让他们打，谁不打就不行。我让他们降，他们不降我就毫无办法。还是等北平和平谈判成功，一起行动吧。”杜建时又把两位军长请到密室里，两位军长说：“陈是司令，要他说话，我们不能领头。”杜建时问：“如果解放军发动进攻，你们能支持多久？”林伟俦说他可以顶一个星期，而刘云瀚表示他顶不了多长时间。最后，林伟

俦催促说，解放军的通信员还在外面等着呢，陈长捷说："复他一封吧。"于是他开始口述，大意是：武器是军人的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军人的耻辱。如果共谋和平，请派代表进城商谈。信写好后，第六十二军派了一位科长陪同解放军的通信员出城，但刚出城门就遭到射击，科长带着信跑了回来。第二天拂晓，土堆上又有人高声喊话，第六十二军再派那位科长带着信和一些水果出了城，这回他把陈长捷的回信交给了解放军代表。

陈长捷曾就天津是战是和请示傅作义，傅作义的答复是："你们打好仗，就好办，要能打才能和。"傅作义的态度统一了大家的立场，那就是坚守天津，等待北平的和谈结果。

最后的限期到了。

一月十三日，林彪下达了攻击天津城的命令：

刘，一、二、七、九、十二纵队，并十七师首长，并报中央：

（一）天津之敌毫无投降的诚意，仅在拖延时间。

（二）各部应按计划明［寒］（十四）日开始攻击，坚决歼灭该敌。

林

元（十三日）十九时

陈长捷很清楚固守天津的结果是什么。他给各军发出一个命令："如果我战死，由副司令林伟俦继承。各级主官如果战死，也要预先指定继承人。"

东北野战军攻城部队从四面八方逼近天津城垣。

四万多百姓冒着严寒开凿结了冰的大清河，好让载着弹药、柴草、粮食的船只顺流而下；上百万支前民工为解放军抢修桥梁、路基；为了在护城河上架桥，天津附近双口村的六个铁匠一夜之间锻打出四十三根铁柱子——不知守城的国民党军官兵是否听到了这响彻夜空的锤声？

十四日，总攻开始。

清晨，天津城笼罩在浓雾之中。上午十时，五颗信号弹升空之后，五百多门大炮一齐怒吼，数千发炮弹倾泻在国民党守军的阵地上。暗堡被炸塌，铁丝网和鹿砦飞上半空，护城河岸坍塌，城墙裂开豁口。

攻城部队以坦克为前引，工兵开始爆破排雷，突击部队扑向城垣。

西集团一纵二师四团的突击营看见友邻部队的突击地段插上了红旗，其实那是排除障碍后插在突击通道上的红旗，但是四团官兵认为友邻部队已经冲上去了，于是一跃而起也发起了冲击，提前冲击使他们受到了自己炮火的误伤，但是两个师的突破口被迅速打开，四团"红三连"战士王玉龙首先把红旗插上天津城头。在阻击守军反扑突破口的战斗中，三连和八连在城头与敌人混战在一起。当后续部队潮水般地拥上来时，"红三连"官兵已伤亡大半，连长史德红中弹牺牲。

二纵六师十六、十七团在和平门南侧并肩突击，四师十团二营和三营在南运河北侧并肩突击。十团五连爆破手黄才、韩志明、李明禄、鲁景成等二十四名战士前仆后继炸开了突击通道，架桥队扛着笨重的芦苇桥在守军的猛烈火力下顽强靠近，前面的战士倒下，后面的战士立刻接替，七连最后只剩下负伤的指导员和五名战士——芦苇桥的架设竟然付出了七十多名官兵的伤亡代价。三营副营长丁剑锐认

为，护城河的冰面也许可以通过，这样可以避免在芦苇桥上拥挤，他喊：“谁去侦察？有勇气的站出来！”战士纪毓生站出来，高声答道：“我去！”弹雨中，纪毓生滚进了护城河，不一会他爬了回来，面孔已经被硝烟熏黑，军装上被子弹穿了几个窟窿。他大声报告：“冰很厚，完全可以过人！情况不确实杀我的头！”教导员说：“真是有种！我代表营党委宣布给你记大功！”经过猛烈的突击，九连班长杨印山带领全班登上城头，旗手高福田身中数弹，倒下的时候还抱着旗杆；旗手刘士凯刚接过红旗也牺牲在城头；机枪班长张勋接过红旗，站在城头拼命地挥舞。

西集团突进之后，一纵一师一团和兄弟部队一起向市内穿插，在南马路的一幢灰色楼房附近前进受阻。前去了解受阻情况的纵队侦察科长范鲁刚被炮弹炸倒，一团长刘海清批评二连进展太慢，这让二连官兵的脸上很挂不住，因为二连是诞生在井冈山的红军连。官兵们正在组织爆破，参谋冯玉带着一辆坦克上来了，刘海清要求坦克把楼房上的火力点搞掉。冯参谋和坦克手嘀咕了一下，然后用大木棒在坦克的后屁股上连敲几下，坦克便向目标径直冲过去，连发几炮，守军的火力点被摧毁。

东集团七纵二十一师六十一团在突击时，派出侦察员王国才率先冲到护城河边探路，一个守军火力点在炮击后的废墟中复活了，密集的子弹将王国才打倒。爆破队员们喊着“为王国才报仇”的口号，战士滕青云和王农用装满炸药的布袋，在雷区炸开了一条八米宽的通道，接着又炸毁了一座残存的碉堡和一道铁丝网，部队越过了护城河。后续部队把梯子架设在冰面和城墙上，半个小时便登上城垣，打开了突破口。八纵二十四师突击的是天津东北面的重要门户民权门，突击前的炮火准备十分有效，大口径火炮猛烈轰击了守军的重要火力点长江造纸厂、染料厂、北宁公园和天津北站，野炮和山炮集中轰击前沿阵地。担任突击尖刀的是七十团一连，爆破组连续炸毁铁丝网、电网和

鹿砦，突击部队在架桥的时候出现伤亡，官兵们从护城河的冰面上通过，炸开民权门附近的一座大碉堡，打开了冲击的通道。一排机枪班副班长李合第一个登上城墙，用机枪掩护突击部队冲击，突击队员在突破口上与守军展开激战，连续打退守军的数次反扑。旗手钟银根双腿被打断，他伏在一面写有“杀开民权门”大字的红旗下，用尽最后的力气将红旗插到民权门的城头。旗杆被炸断，钟银根再次负伤，战士李泽山冲上来，把红旗高高地举起来。

突击部队顽强地向天津城中心的金汤桥突进。

战前，总指挥刘亚楼说，哪支部队先冲到金汤桥，就授予哪支部队“金汤桥部队”的荣誉称号，因为只要占领位于天津城中心的金汤桥，天津国民党守军就将被完全切割。但是，这个称号至今没有授出，原因是无法确定究竟是哪支部队首先冲上了金汤桥。几乎每个方向的突击部队，都能用准确无误的事实证明自己应该得到这个荣誉，每一支部队都可以说出自己的哪个连队的哪名战士首先冲上了桥头。那是一个视荣誉胜于生命的重要时刻，无数面红旗在枪林弹雨中数次倒下，又数次地被竖立起来。在天津城大街小巷的残酷战斗中，官兵们跟随着自己部队的用鲜血染红的旗帜左突右杀，呐喊着朝当面的敌人冲过去，朝象征胜利的金汤桥冲过去——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当数面红旗在冷冽的风中于金汤桥上高高飘扬的时候，天津城从此旧貌换新颜。

天津城防崩溃之后，杜建时站在中原公司的楼顶上观察全城战况，发现局势已经不可挽回。他回到办公室，在给蒋介石起草天津陷落的电报和焚烧机密文件时，炮弹落在了市政府大楼的楼顶，随从人员保护着杜建时进入地下室躲避。晚上，他召集陈长捷和林伟俦、刘云瀚两位军长到位于海光寺的警备司令部地下室作最后商讨。四个人一直认为，继续打下去毫无希望，应该放弃核心阵地的抵抗。陈长捷

打电话给北平总司令部，得到的回答仍旧是“再坚持两天就有办法”，陈长捷把电话摔了，地下室里的人最后决定发表一个“和平宣言”。

十四日夜，天津巷战激烈，突然，满城响起大喇叭的广播声：“林彪将军注意，天津守军同意放下武器，请即命令停止攻击。”但是，解放军没有停止攻击，而这个广播却使守军军心大乱。四十三师师长饶启尧接到陈长捷的电话，说林伟俦、刘云瀚两军伤亡很大，司令部附近仍处在炮击之中，秋副司令有话要说。国民党军天津警备副司令秋宗鼎在电话里说：“现在司令的意思只有停止战斗了。”饶师长反问：“如何才能停止呢？”秋副司令说：“插上白旗嘛！”饶启尧愤怒地喊：“插白旗，我没学过！”放下电话，站在一旁的四十三师副师长余和、参谋长徐季春“立即哭起来”。大势已去，四十三师师部所在地——耀华中学的楼上挂出了白旗。

天津国民党守军各部队都挂出了白旗，但是天还没有亮，即使挂出白旗解放军官兵们也看不见，或者看见了他们的攻击也不可能骤然停止。因此，十五日天亮的时候，持续了一夜的天津城内的战斗仍在继续。一纵一师一团开始攻击中原公司大楼。不断有守军的溃兵朝中原公司大楼里拥，大楼里面的守军就朝他们射击。一团二连从大楼的侧后炸开窗户冲进楼区，三连也从大楼的南侧破门而入，占领了一楼的大厅。楼上的守军不断地射击，扔出手榴弹封锁着楼梯口，一团的官兵强行向上攻击。一营在中原公司里的战斗牵制了敌人的火力，给攻击附近国民党军天津警备司令部的二营创造了条件。二营四连和五连在营长张述珍和教导员吴鸿年的率领下，连续爆破核心工事的院墙，炸毁了警备司令部院子里的碉堡，开始逐楼进行攻击。六连副连长徐恒吉率领二排向院子东侧的一幢大楼冲去时，被子弹打倒了。身后的副排长邢春福和战士傅泽国、王义凤用手榴弹将门卫的机枪炸毁冲进楼内。

这座楼房，是陈长捷的办公地点。

楼内的国民党军机关人员纷纷举手投降。

邢春福、傅泽国和王义凤冲进了一楼陈长捷的作战指挥室，室内空空，各种城防作战地图完好无损地挂了一墙，其中有一幅用于逐日标记“天津国军战况”的巨大图表，桌子上摆放着陈长捷签署的“早二时邀杜市长，林、刘军长会商战局”的通知。邢春福、傅泽国和王义凤接着冲进了大楼对面的忠烈祠地下室。穿过一条小走廊，下到地下室的一个大厅里，里面几十名军官见他们冲进来，慌忙将手枪扔在桌子上举起了双手。

傅泽国喊：“谁是司令？”

没有人说话。

但是，一个军官悄悄向一块白布门帘那边努了努嘴。

邢春福、傅泽国和王义凤立即奔过去，听见白门帘里面有人正在打电话：“解放军离我不远了，正和警卫部队激战……”

王义凤大喊：“别动，举起手来！”

对着电话说话的，就是国民党军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而电话的那一头，是在北平总司令部里的傅作义。

傅作义刚说完“可以接洽和平”，就听见电话里传来“举起手来”的喊声。

陈长捷对傅作义说的最后的一句话是：“他们，进来啦！”

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梁必业见到了陈长捷：

“我们都把你们包围了，你们怎么不往海上撤？”

“大哥不让撤。”

“我们都打进来了，你们为什么不突围？”

“大哥让再看一看。”

十五日下午十五时，天津守军战斗力最强的第六十二军一五一师，在二纵和八纵的重重包围下，于城北宣布放下武器投降，天津全城攻坚战至此结束。

天津战役，历时二十九个小时，东北野战军全歼国民党守军十三万余人，生俘包括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副司令秋宗鼎，第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第八十六军军长刘云瀚，二十六师师长张越群、副师长何卓，二八四师师长罗先之，二九三师师长陈膺华、副师长陈琨，六十七师师长李学正、副师长刘顺初，一五一师师长陈植等人在内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东北野战军攻城部队伤亡两万三千三百二十人，其中阵亡四千一百零六人，负伤一万九千二百一十四人。

“大哥”傅作义所在的北平，成了一座真正的孤城。

## 坦克驶过东交民巷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国民党中央社南京电：“昨日上午十时许，京（南京）市感觉轻微地震，为时约十余秒，室中水盂动荡，座椅也摇晃。”对于南京的国民党政权来讲，真正的地震是两条消息：一是人民解放军仅用二十九个小时攻占了天津；二是十四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这是对国民党提出愿意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正式回应。

毛泽东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明确指出：

……情况已非常明显，只要人民解放军向着残余的国民党军再作若干次重大的攻击，全部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现在，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内战的政策，业已自食其果，众叛亲离，已至不能维持的境地。在此种形势下，为着保持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力量，取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的目的，中国第一名战争罪犯国民党匪帮首领南京政府伪总统蒋介石，于今年一月一日，提出了愿意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中国共产党认为这个建议是虚伪的……

一月十日，“为着统一领导夺取平、津，并于尔后一个时期内［大约有三个月］管理平、津、唐及其附近区域一切工作起见，中央决定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同志组成总前委，林彪为书记，所有军事、政治、财政、经济、粮食、货币、外交、文化、党务及其他各项重要工作均归其管辖，以一事权而免分歧”。

平津战役总前委组成后，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由蓟县以南的孟家楼移至通县宋庄。

十三日，傅作义获悉解放军即将对天津发起总攻，急忙派华北总部副总司令兼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前去与共产党方面谈判。邓宝珊、周北峰、副官王文焕、参谋刁可成一行四人乘车出德胜门，过土城到防御前沿下了车。前边有几匹马拴在树上，共产党方面接应他们的人已等在那里。越过前沿战壕，继续骑马前行，在清河镇换乘吉普车，行驶一个多小时后，车停在通县西面五里桥村的一座院子门口，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在门口迎接。

会谈一开始，邓宝珊就问：“你们要打天津了？”

林彪说：“是，我们已下命令了。”

邓宝珊又问：“你们打天津准备打多久？”

林彪说：“三天。”

邓宝珊说：“恐怕三十天你们也打不下来。”

聂荣臻说：“三十天打不下来就打半年，半年打不下来就打一年，非打下来不可。”聂荣臻告诉邓宝珊：“我军已开始进攻天津，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只谈北平问题。”

当天夜里，邓宝珊的电台截获陈长捷发往北平的电报：“天津起火了。”傅作义的参谋长李世杰回答：“灭火。”此后陈长捷那边就再也没声音了。天快亮时，东北野战军作战处长苏静告诉邓宝珊：“天津战事已接近尾声，国民党军部队全部瓦解，城防司令陈长捷被俘。”几乎一夜未睡的邓宝珊说：“不打就好了。”

天亮了，谈判正式开始。

参加谈判的是林彪、罗荣桓、聂荣臻、邓宝珊和周北峰，苏静和刁可成担任记录。

林彪首先指出：“整个形势都对我们有利，死守北平是不可能的。但为保障北平居民和城市不受损害，我们仍希望和平解决，但不可再拖时间。”随即，林彪提出三个条件：一、限傅作义部一个军一月二十一日开至北平城外十五至三十公里地区，其他部队再陆续开出；二、在德胜门设立开出傅作义部队的联合指挥所；三、这一行动实现后，我方可派军政负责人入城。邓宝珊表示可以照办，同时提出三个问题：一、共产党方面可否派出代表与他一起回城；二、傅作义起义之后的去向；三、自己可否接替傅作义完成对其部队的改编。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的回答是：派东北野战军作战处长苏静随邓宝珊一起回城；只要傅作义能站到人民一面，共产党方面是不会亏待他的；解放军还是“希望傅作义继续办理北平和平解放事宜”。

谈判一直进行到深夜，双方谈了对傅作义部队的改编原则和具体办法，对傅作义总部和部队团以上人员的安排以及对北平文教、卫生等行政单位的接收办法等等。此时所谈及的对傅作义部队的改编，只

涉及北平的部队，关于绥远的部队，林彪说：“绥远的问题，党中央指示缓缓再谈。但如果北平的和平解放能顺利完成，使中国数百年古都的文物能够完整回到人民怀抱，绥远的问题就好谈了。毛主席说，将用一种更和缓的方式，我们叫它做绥远方式。”

十六日，五里桥村内就北平和平解放的谈判已达成初步协议；天津议会大楼门前已挂出人民解放军“天津市军管会”的牌子；蒋介石在南京中山陵检阅首都军警三万人之后回到官邸，嘱咐中央银行和中国银行的经理把存在美国的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接着他给北平的傅作义发去一份电报，请求傅作义在与共产党人达成某种协议之前给他的嫡系军官们留一条生路：

> ……相处多年，彼此知深，你现厄于形势，自有主张，无可奈何。我今只要求一件事，于十七日起派飞机到平运走第十三军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的武器，约要一周，望念多年之契好，予以协助……

国民党军第十三军由两个主力师编成于抗战期间的长城脚下。国民党军著名将领钱大钧、汤恩伯、王仲廉都曾出任该军军长。此时，第十三军隶属石觉的第九兵团。

傅作义复电：“遵照办理。”

然后，他让王克俊给林彪发电报，通报蒋介石的电报内容，“要求城外解放军部队在有飞机来时”炮击天坛临时机场。

中午，傅作义在中南海勤政殿邀请北平的学者教授们吃西餐，他的参谋长李世杰称这一举动为“最后一席话”。北平城内除已经南去的著名学者梅贻琦、陈寅恪、冯友兰、袁敦礼、袁同礼外，留下的二十多位社会名流前来一聚，傅作义问大家对时局的看法，徐悲鸿说：“北平两百万市民的生命财产，系于将军一身。当前形势，战则败，和则安，这已是目前的常识问题。”杨人楩教授说：“如果傅先生顺从民

意，采取和平行动，我们作为历史学家，对此义举，一定要大书特书，列入历史篇章。”

晚上，国民党北平前市长何思源来了。内战初起时，何思源由国民党山东省府主席调任北平市长，因为对国民党的腐败极度厌恶，他与蒋介石安插在北平的特务不断发生矛盾，一九四八年六月被蒋介石撤职，自此赋闲在家。何思源警告傅作义，说如果命令军队抵抗下去，将是很危险的事。

就在何思源和傅作义谈话的时候，中央军委的电报到达平津战役总前委：

……积极准备攻城。此次攻城，必须作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务必使各纵首长明了，并确守这一点。让敌人去占据这些文化机关，但是我们不要攻击它，我们将其他广大城区占领之后，对于占据这些文化机关的敌人再用谈判及瓦解的方法使其缴械。即使占领北平延长许多时间，也要耐心地这样做。为此你们对于城区各部分要有精密的调查，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做一项纪律去执行。为此，你们必须召集各攻城部队的首长开会，给以精确的指示。为此，你们指挥所要和每一个攻城部队均有准确的电话联系。战斗中每一个进展均须放在你们的指挥和监督之下……

与此同时，毛泽东为林彪、罗荣桓起草了一封致傅作义的公函，措辞之严厉类似最后通牒。公函的前半部分历数傅作义部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将内战爆发以来傅作义部攻占解放区的七十七个市、县、镇、村一一列举——“贵部军行所至，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毁村庄，掠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同时指出，天津本有希望和平解放，最终被迫使用武力完全是傅作义的责任。信函的后半部分，为傅作义指出两条“自赎”之路，一是自动放下武器，二是离城接受改编，并为此规定了最后期限：

上述两项办法，任凭贵将军和贵属自由选择。本军并愿再一次给予贵将军及贵属以考虑及准备之充分时间。此项时间，规定由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七日上午一时起，至一月二十一日下午十二时止。如果贵将军及贵属竟敢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欲以此文化古城及二百万市民

生命财产为牺牲，坚决抵抗到底，则本军为挽救此古城免受贵将军及贵属毁灭起见，将实行攻城。攻城时，本军将用精确战术，使最重的打击落在敢于顽抗者身上；而对于不愿抵抗之贵属，则不给任何打击，并予以宽待。城破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决不姑宽，勿谓言之不预。

十六日晚，在通县五里桥村谈判的人吃完晚饭，决定第二天由邓宝珊、王焕文、刁可成陪同苏静一起进城，与傅作义直接会谈。分手的时候，林彪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封未封口的信，对邓宝珊说："请邓先生将这封信交给傅先生。"说完，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离开了五里桥村。

邓宝珊看了这封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的名义写给傅作义的信函，十分震惊："这封信太出乎意料，措词很严厉，傅作义不一定会受得了。"邓宝珊无法预料傅作义在看了这封信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或者，还是暂时不让傅作义看到这封信为好?

十七日，苏静脱下军装换上了便衣，因为没有便衣，他与一直在此的北平地下党员李炳泉互相换了衣服。然后，与邓宝珊一行上路。傅作义派王克俊在德胜门迎候他们，苏静住进位于东交民巷的傅作义总部联络处。

就在苏静秘密进城的时候，何思源正在北平城内奔忙着。他遍访了傅作义的各军军长，劝他们顾念两百万北平市民和几千年的文化古迹，放弃武力对抗，争取和平前途。这些军人们表情冷淡，都说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中午，何思源与北平参议会长许惠东，召集北平工商、教育界人士在新华门对面的参议会开会，到会的有北平中央军的各军军长、傅作义部队的高级军官以及北平市长刘瑶章。会议决定以大会的名义通电南京和中共双方。通电包含三个意思：一是要求把北平改为北京，北京人最讨厌叫北平而不称北京；二是要求在北京设立中央政府；三是北京人喜欢中央政府有统一全权，要求按照毛主席提

出的八条进行改革。何思源、许惠东忙着草拟电文，拟出一段，记者们就抄一段，然后拿着往外跑。——“当时军人都在座，都一言不发，也无人表示反对。”

十八日，凌晨三点，安放在何思源家屋顶的两枚定时炸弹爆炸了——据国民党军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说，是蒋介石命令毛人凤派人去北平执行暗杀行动的。爆炸过后，何思源一家六口一死五伤，死者是何思源还在上中学的次女何鲁美，夫人何宜文受伤最重，在协和医院急救后脱险，何思源本人被倒塌的砖瓦砸伤——蒋介石对这个结果很不满意，认为应该派狙击手把何思源直接打死。受伤的何思源立即出城，汽车出了西直门在国共两军对垒的前沿战壕边绕来绕去，最终在西郊蓝靛厂附近遇到一位解放军连长。何思源受到了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政治委员莫文骅的接待。何思源说：“现在国共双方，城下对峙，枪炮一响，文化古都将顷刻变为灰烬。我们受两百万北平市民的委托，希望国共双方以大局为重，对北平这座古城实行和平解决。”莫文骅表示：“我们当然希望和平解决北平，但现在的关键在于傅作义将军的态度。”何思源说：“为了保护北平这座七百年古都的文化古迹，为了保障两百万市民的生命财产不受损害”，傅作义“已经表示和平解决的主张”。莫文骅笑了：“我们认为不是傅作义保护了北平城，倒是北平古城保护了傅作义。”何思源要求见毛泽东，一位解放军干部对他说：“主席不在这里，住得很远，不好去。”

十八日，傅作义去东交民巷看望苏静。

十九日，苏静、王克俊、崔载之等人一起草拟并草签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其主要内容是：

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议的彻底和平，保全北平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经双方协议下列各项：

（1）自本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时起双方休战。

（2）过渡期间，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组织与人选详见附件。

（3）城内部队兵团以下［含兵团］原建制、原番号，自二十二日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指定驻地约一月后实行整编，整编原则详见附件。

（4）移驻城外之部队可携带一星期之补给量，以后由联合办事机构负责补给之。

（5）华北总部成立结束办事处，其工作为对出城部队之管理约束，并与联合办事机构联合办理出城部队补给事宜，其结束之时间使以上工作已逐步移交于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及其补给机构接管完毕时为止。

（6）城内秩序之维持，除原有警察及看守仓库部队外，根据需要暂留必要部队维持治安；候解放军警卫部队入城后逐次接替之。但傅先生仍得留必要之部队。

（7）北平行政机构及所有中央、地方在平之公营公用企业、银行、仓库、文化机关、学校等，暂维现状，不得损坏遗失。听候前述联合办事机构处理，并保障其办事人员之安全。

（8）河北省政府及所属机构暂维现状，不得破坏损失，听候前述联合办事机构处理。

（9）金圆券照常使用，听候另定兑换办法。

（10）军统、中统情报人员停止活动，听候处理，除违背此项命令，别有企图，从事破坏行为有确凿证据者依法办理外，一律不究既往。

（11）一切军事工程一律停止。

（12）在不违背国家法令下，保护在平各国领事馆、外交官员及外侨生命财产之安全。

（13）联合办事机构建立后，即释放政治犯，原华北区被俘高级军官于北平接交后一律释放［下级军官可随时释放］。

（14）原华北伤患兵之医疗，阵亡者之安葬，遗族之抚恤，军眷之安置，在双方协助下，仍得由华北总部结束办事处妥为办理。

（15）邮政电信不停，继续维持对外联系［由平津前线司令部派军事代表检查］。

（16）各种新闻报纸仍继续出刊，俟后重新审查登记。

（17）保护文物古迹及各种宗教之自由与安全。

（18）人民各安生业，勿相惊扰。

协议附件

（1）联合办事机构以七人组成之，解放军方面四人，国民党军华北总部方面三人，解放军方面为主任，华北总部方面为副主任，解放军方面参加者为：叶剑英、陶铸、戎子和、徐冰，叶剑英为主任，华北总部方面由傅先生指定之。

（2）联合办事机构系临时性质，接交完毕后则一切归军事管制委员会管理。在接交期间，联合办事机构及军事管制委员会均直接归平津前线司令部指挥，仍然由联合办事机构移交平津前线司令部接收转交军事管制委员会管理之。

（3）部队移驻城外后，即着手整编为人民解放军，人民解放军制度包括各点：1、建立政治组织及工作。2、实行官兵平等，废除打骂制度。3、执行命令政策。4、服从群众纪律等。人事方面，概由解放军同意任命，其原则如下：1、能力称职、愿继续服务者，留原职继续服务。2、能力优异者且可提升。3、不适者予以调整。4、志愿深造者予以学习机会。5、不愿继续服务者，保障其生命财产眷属之安全，如愿返籍者并可予以便利。

（4）前述正文附件各项，除正文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系由双方代表根据一般需要及政策成立协议者外，其余各项均经双方代表分别请示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林司令、罗政委、聂司令及华北总部傅总司令同意修正后议定者。

二十日，傅作义对外公开宣布北平和平解放。

接着，北平各大报纸都刊登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

傅作义必须面对他的高级军官们，特别是中央军系的将领们。

二十一日上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军官会议气氛紧张而怪异。参加会议的包括国民党中央军系和傅作义系的所有高级将领。傅作义首先讲话，大意是：为了保全几十万官兵的生命，为了保全北平两百万人民和几百年的文物古迹，我不得已才选择这条道路。大家是我的部下，历史责任由我来负，我对大家负责到底。愿意跟随我的，我欢迎；不愿意走的，我派飞机送走。但是无论走留，都要保证你的部队不出事。

会场一片沉默。

接着，王克俊开始宣读《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

宣读之后，还是沉默，沉默持续了好一会儿，中央军系的第四兵团司令官李文、第十六军军长袁朴、第九兵团司令官石觉、第三十一军军长廖慷、第九十四军军长郑挺锋等人表示反对。袁朴哭喊道：“对不起领袖呀！对不起领袖呀！”

李文和石觉表示：“我们两个是蒋委员长的学生，有着特殊关系，不能留在这里执行，请总司令容许我们各带必要的几个师长，飞回南京。”傅作义当即答复：“可以容许，但不得影响部队服从协议的执行。你们要带走谁，连同你们两位离职后的代理人都是谁，请你们当场指定，不要影响部队的安定。”石觉和李文当场指定了所有的代理人，并写了姓名交给傅作义。

在共产党方面网开一面的情况下，国民党军第四兵团司令官李文，第九兵团司令官石觉、副司令官兼第十三军军长骆振韶，第十六军军长袁朴、副军长冯龙，第十三军副军长胡冠天、参谋长全英，第十六军二十二师师长黄剑夫、九十四师师长周士瀛，被傅作义派飞机送回南京。

二十六日，随着共产党方面派出的联合办事机构成员陶铸进城，标志共产党方面开始对北平实施接管以及对国民党军开始整编。联合办事机构设在颐和园里，双方就接管北平的程序、范围和具体办法反复磋商，特别是就军队改编问题制定了详细方案，最后决定：国民党军华北总部及其所属的两个兵团以及八个军的建制全部取消，以师为单位一律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师。留任的国民党军军官必须先集中受训，本人和家属的待遇与解放军干部一样；不愿意留任的军官只要不闹事，都算是对北平和平解放做出贡献，一律发给归家证明书、三个月的军饷和连同家属在内的车票和船票，除了武器和公家物品之外，全部私产都可以带走，并且根据职务不同可以带一至两名卫兵——共产党人对于不愿意参加改编的国民党军军官的宽大，不但出自

于共产党方面一贯的政策，还出于一个现实的原因：顽固军官走得越多越好，这样可以减轻改编部队时的阻力和困难。

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写道：

> 人心向背的急剧改变，乃是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最直接原因。但是，人民转而拥护共产党，还不足以确保在短期内就能推翻蒋介石。因为共产党不但是开展推翻中国旧社会的革命，也在进行着打败蒋介石军队的战争。其所使用的策略是革命和战争两者的结合。进行战争一般是用军事手段克敌制胜，进行革命则通常是用政治手段把大部分敌人争取过来。中国共产党人对战争和革命的艺术作出的贡献，主要是把政治和战争这两种斗争形势空前密切地结合起来使用，简直把两者融为一体了。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国人传统节日春节的除夕。

傅作义离开他在中南海里的办公处，出城回到了他原来在西郊的营房里。

一月三十一日上午十二时三十分，解放军正式接管北平城防，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但是，当解放军接管北平西部的复兴门、阜成门和西直门的时候，却遭遇国民党守军的拒绝，解放军官兵当即包围了这三座城门的国民党守军，并且要缴他们的械。电话打到负责城防的国民党军三一一师师长孙英年那里，孙师长立即赶到阜成门，向负责接管的解放军营长说，他奉军管会华北总部方面郭载阳副主任的命令，不移交城西的这三座城门，解放军营长态度强硬，说他是奉军管会共产党方面陶铸副主任的命令来接管的，一时间两人有点剑拔弩张的意思——孙英年年轻气盛并深受傅作义的信任，上个月傅作义召集军官会议时，就是战是和征求大家的意见，孙英年站出来大声说：“打！”傅作义问：“你能打几下？”孙英年回答：“一下半！我的师可以参加一次大纵深出击，还可以参加守城防御战，就这么一下半！”傅作义问：“一下半打完了怎么办？”孙英年回答：“不成功便成仁！”傅作义神色严肃：“死

有很多死法，为什么非要打仗打死？孙英年，你当营长的时候，我会在你的营部住上一星期；可你现在当了师长，几次要我去检阅你的部队我都不去，因为军事已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了。不用说你一个美械师，就是再有十个、二十个美械师，也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对军队已不感兴趣了。”孙英年再问：“总司令为什么不在一年前领导我们走这条路？”傅作义厉声说：“一年前我说这样的话，会有人掏枪打死我，也许就是你！”交接城门的事闹到北平军管会那里，军管会命令孙英年立即来见陶铸副主任，陶铸一见孙英年便厉声道：“还要脑袋不要？为什么不交西三门？”曾向孙英年下令的郭载阳也在一旁说：“旧军队出城时由你们师守城门，现在已经都出城了，不交那三个城门干什么用？”觉得委屈的孙英年正要争辩，陶铸说：“孙师长，你已经是解放军了，一切行动都得请示报告，赶快去交城门，迟了我真缴你的枪！”

二月一日，风波再起，邓宝珊始终没敢送给傅作义看的那封措词激烈的信函被全文刊登了。傅作义看完之后，愤怒之极：“太不像话了，怎有这等事，部队已经出城了，城防也交了，我再也没有用了！”傅作义他提笔给林彪、罗荣桓写信，说自己在战争中负有罪责，应该得到惩处。同时他还给毛泽东写了信，让毛泽东指定时间、地点，说战犯傅作义要去自首。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致电中央，说：“傅作义写了一封长信给我们，极力争辩他北平之不抵抗，不是为了保全个人生命财产的打算，而是为了避免人民的损失。对我方的通牒内容，表示不满，颇有气愤之意。”中央回电表示，“我们已经公开宣布赦免断不会再有不利于他的行动”，中央希望林彪入城后与“傅、邓见面扯开谈一次”。

八日下午十五时，林彪、聂荣臻、叶剑英在北京饭店宴请傅作义和邓宝珊，对《人民日报》刊登信函之事进行了坦诚的交谈。林彪说：“关于‘通牒’，是符合傅将军过去的行为和事实。事后公布此信，

乃是对傅将军过去的错误做一结论，以便根据北平和平解决协议开始与傅将军做新的合作。既不因过去之罪而抹煞近日北平之功，也不因近日之功而含糊过去之罪。至于平津战役中的失败，并非个人才能问题，在东北、华北战场解放军的胜利，也非个人才能问题。国民党违反人民的利益，为人民所反对，必定失败，在任何战场，任何人指挥下，均无例外地要遭受失败，非仅华北一处如此。只有站在人民立场，才会胜利。”

让傅作义最终释怀的，是十几天以后，他在西柏坡与毛泽东的会面，毛泽东对他的热情和信任令他颇感意外。他先在北平向叶剑英表达了拜见毛泽东的愿望，不久后，叶剑英告诉他毛泽东回电欢迎他“来此一谈”。傅作义飞往石家庄，杨尚昆在机场迎候，然后他们一起乘车去西柏坡。二十二日，傅作义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了。谈到绥远问题，毛泽东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放嘛，等待他们起义。最后，毛泽东问：“傅将军，你愿意做什么工作？”傅作义表示他不能再在军队里工作了，最好让他回到河套一带去做点水利工作。毛泽东说，你对水利工作感兴趣吗？河套水利工作面太小了，将来你可以当水利部长嘛，那不是更能发挥作用吗？军队工作你还可以管，我看你还是很有才干的——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九日，傅作义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一九七四年四月，傅作义病危，身患重病的周恩来到医院看望，他拉着傅作义的手说：“傅先生，毛主席说你对北平和平是有功劳的。”傅作义已说不出话来，但是周恩来的话让他流了泪。三天之后，四月十九日，傅作义在北京医院去世。

古都北平的新的时代到来了。

二十二日深夜，人民解放军入城式报告摆在了西柏坡毛泽东的案头。毛泽东彻夜不眠，兴奋异常，他对平津前线指挥部拟定的入城部队穿越西方帝国主义的领事馆和兵营云集的东交民巷表示极大的赞同，毛泽东说：“穿过得好，好，好。”他认为应该“把美国造的坦克、重型大炮都拉出来，要经过美国领事馆门前”。

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所属的装甲团、摩托化炮兵团、战车团、高炮团等，除了执行任务的部队之外，全部开赴南苑机场训练十天。刚从战场上下来的美制坦克和装甲车以及十轮大卡车拉着的美制重型加农炮、榴弹炮，把原来准备入城式使用的日式、德式武器全部换了下来。

二月三日，天刚蒙蒙亮，北平市民纷纷拥上街头。

上午十时，四颗信号弹升上天空，隆重的北平入城式正式开始。

三辆装甲车、竖立着毛泽东、朱德肖像的彩车和军乐队为先导，由北平南面的永定门出发，当车队行进到前门时，市民们的欢呼声震耳欲聋。十二时，炮兵部队开过来了，接着是坦克部队、摩托部队和骑兵部队，最后是高举着功勋战旗、胸前戴着立功奖章的步兵队伍——“全世界的记者第一次看到了共产党军队的新的力量。光是机械化辎重就走了两个小时，内有铁甲装甲车和成百辆拉着野战炮或防空炮的道奇卡车。没有一件是俄国馈赠的，全是缴获的美国武器。城内两英里处，卡车上站满了男孩、女孩和工人，他们爬上车欢迎胜利者。士兵们挥舞着人群送给他们的纸旗。”——队伍行进到前门之后，向东转，进入了东交民巷。

“凯旋入城的解放军沿着东交民巷前进。清王朝统治时期，除了前门和皇宫本身的南门——天安门之间的广场，东交民巷是唯一一条能够东西通行的街道。毫无疑问，解放军之所以选择这条道路入城，是

要强调新政权的独立和它拥有的权力，藐视迄今为止外交使团直接控制下的外国使馆区的独立地位。自从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中国军队倘若走过这条大街，就是违反条约。可是，沧桑巨变，事过境迁，再也不会有外国卫队去阻止解放军前进的脚步了。”

平津战役，是解放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中的最后一战。

战役历时六十四天，人民解放军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一个“剿总”总部、一个警备司令部、两个兵团部、十三个军部、四十九个师（旅），连同非正规军部队在内，共计五十二万一千人。其中毙伤三万余人，俘虏二十三万余人，接受投诚八千七百余人，和平改编二十五万余人。

中共中央致电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薄一波诸同志及东北人民解放军、华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华北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连同东北、华东、中原、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以及南方人民游击战争的胜利在一起，已经奠定了人民解放斗争在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现当伟大的北平古都被解放的历史节日，特向我全体英勇的三百余万人民解放军致敬意。一切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解放军入城的时候，北平百姓在解放军的坦克上写下了一行字，这让经历了太多流血与牺牲的官兵们心中陡然升起一股温存的情感，他们想象着写下这行字的人该是与即将到来的日子一样美丽：

“你们来了，我们非常快乐！”

# 第十六章 钟山风雨起苍黄

## 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

一九四九年一月四日，蒋介石来到自李宗仁位于南京傅厚岗的住宅。李宗仁后来回忆道：

> 蒋说："过去的事不必再提。徐蚌失败后，共军立刻就要到江北，你看怎么办？"我说："我们现在样样都站在下风，但是也只有和共产党周旋到底，做一步算一步！"蒋摇摇头说："这样下去不是事！我看我退休，由你顶起局面，和共产党讲和！"我说："你尚且不能讲和，那我就更不行了！"蒋说："……我看你还是出来，你这姿态一出，共军的进攻可能和缓一下。"我仍然说："总统，这局面你如支持不了，我就更支持不了。无论如何，我是不能承担此事的。""我支持你"。蒋先生说，"你出来之后，共产党至少不会逼得我们这么紧！"我还是坚决不答应，蒋先生便回去了。次日，蒋先生派张群和吴忠信（国民政府秘书长）二人来找我，还是逼我出来继任总统，好让他"退休"。我便很露骨地表示，当今局势非十六年（民国十六年）可比，蒋先生下野未必能解决问题，张、吴二人未得结果而去。不久，蒋先生又找我去谈话。我还是坚持。蒋先生说："我以前劝你不要竞选副总统，你一定要竞选。现在我不干了，按宪法程序，便是你继任。你既是副总统，你不干也得干！"

几个月来，白崇禧策划了一系列要求蒋介石下台的舆论风波，而明知蒋介石无法维持局面的李宗仁三番五次地拒绝出山，目的就是把蒋介石一步步逼上绝路。此刻，蒋介石的困境也许是桂系首领们早就希望看到的——由他们营造的一个共识似乎已经形成：既然仗打下去没有希望，那么只有与共产党讲和；而只要蒋介石在台上，毛泽东就不可能坐下来谈，因此必须换一个人——好像有意配合桂系"逼宫"似的，国民党朝野突然充满了要求与共产党和谈的呼声，报纸上类似《首都飞出和平鸽》的文章连篇累牍，各路头面人物开始轮番在南京中央广播电台进行"和平演讲"，尽管这种演讲与国民党军在战场上的惨败相比显得有些滑稽。

蒋介石的无奈，更多的源于军事、经济、政治和外交上的巨大压力——桂系的兴风作浪只不过是落井下石而已。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美国人马歇尔离开中国时，蒋介石曾信誓旦旦地表示：政府“有信心在八个月到十个月的时间内消灭共产党的军队”。然而仅仅过去了两年，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除太原、西安、新乡以及西北马家军所盘踞的少数据点之外，中国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已全部在共产党人的掌控之中，军事上的惨败令国民党军在北方的所有精锐主力损失殆尽，几百万的军队、全部的美式装备，大多已经变成人民解放军的兵员与武器，而且这支日渐强大的军队就要从北向南压向蒋介石眼前的那条大江边了。

为了维持庞大的战争开支，国统区的经济已完全崩溃。一九四八年，南京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九百万亿元，不断增加的纸币发行量，导致无法遏制的通货膨胀，物价以天文数字疯狂上涨。一九四五年可以买两枚鸡蛋的一百元钱，到一九四九年春只能买到五十万分之一两大米。上海的物价指数上涨了近十四万倍，桂林的粮食价格比一九四五年上涨了二十七亿倍。南京政府发行的金圆券在这个国家完全失去了信用，百姓只要手里落下金圆券，就得立刻去买能够买回的任何东西，他们甚至“不愿留着金圆券过夜”——“由这样一个政府的资产作保证的新钞票只是一堆废纸而已”。政府税收的逐年加重和强行抽丁扩军，迫使大量农民逃离家乡，土地因此荒芜，农村经济遭到彻底破坏。

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治危机越来越烈。为了求得生存，学生、教员、工人、手工业者和城市平民举行的罢课罢工、游行示威日甚一日。当上海的平民冲击米店和杂货店的时候，警察“把头扭过去，装作什么都没看见的样子”，然后他对站在一旁的记者说：“我干吗要抓他们呢，说不定明天我也会跟他们一块干呢。”美国记者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从这个警察所说的话，可以听出旧社会的丧钟已经敲响了。社会制度的保卫者竟然准备跟老百姓一块干，这就充分说明政府的权力正在崩溃。”国民政府的信誉度下降到了最低点，就连蒋介石的亲信也对

这样一个政府失去了信心。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刚刚组成半年的以翁文灏为行政院长的行政内阁提出辞职，国民党内再没有任何人愿意接替行政院长之职，蒋介石强迫孙科出面组阁，孙科在邀请国民党内一些核心人物担任内阁成员时均遭拒绝，折腾了一个月之后内阁才勉强组建——“除去蒋委员长的直属亲信人员和某些高级军官而外，没有多少中国人继续心悦诚服地支持他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这个政府特别是蒋委员长已较过去更加不孚众望，并且愈来愈众叛亲离了。”

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行政院被迫迁往广州，而负责军事指挥的国民党军国防部却迁至上海——无论是表象还是实质，国民党政权都已支离破碎。

美国政府把国民党政权的结局看得清清楚楚。美国国务院提出的“重审并制定美国对华政策”的报告，在全面分析了中国的人口、地理、历史、资源、社会矛盾和当前国共两军的战争形势后，作出结论：“全力以赴地援助国民党政府是一条规模巨大没有尽头和十分冒险的行动路线”。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和二月连续两次提出对华政策建议书，建议的内容还是不再支持国民党政府，“除非它证明即使没有外援也能有效地抗击共产党”——尽管美国政府从来没有真正停止对国民党军的援助，但至少已经停止了对蒋介石政府的大规模援助。更重要的是，美国人正在积极推进国民党政权的“换马”行动，司徒雷登表示：“我们反对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蔓延，并急于在中国帮助制止此种蔓延；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能通过一个失去本国人民支持的政府来这样做。”美国人在万般无奈中之所以还要有所动作，目的是尽量帮助国民党政权保持“半壁江山”，以阻止国民党政权的迅速垮台，同时遏制未来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可能的结盟。

美军顾问团撤走了，团长巴大维在呈给华盛顿的工作总结中，分析了国民党政权迅速崩溃的原因：

我认为，中国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犯下的第一个致命的政治与军事错误，是他们完全将军事力量集中于重占前日本统治区，忽视了长期形成的、已有悠久根基的原有区域的民情，忽视了以创建有效的地方管理来赢得解放区民众的认可和支持。此外，受政治摆布而在军事上却无能的高层指挥造成的战略决策失误，也使国民党军队备受困扰。本应巩固华北就行了，可军队却被命令还要同时去占领东北，而且还是一项毫无后勤保障能力的任务。蒋政府总希望用最少的兵力占领最多的地盘，结果造成了自己的兵力散布在数千英里的铁道线上。鉴于这些部队的物资由华中各基地供应，占领铁路显得至关重要。可要守住铁路，就必须占领铁路沿线的各大城市。随着时间的推移，具有进攻能力的野战部队，逐渐退化成了卫戍部队和交通运输护卫队，这就不可避免地丧失了攻击能力。对共产党的军事力量、民众的支持以及技战术等，从一开始就严重估计不足。共产党在铁路沿线的广大农村占据了支配地位。要在这些区域维持有效的控制越来越难。国民党缺乏能与共产党抗衡的合格的野战部队，这也使得后者变得日益强大。国民党的可用资源有限，但其对手不但能随意调用人力物力来制定战略，而且还巧妙地利用了国民政府的战略战术失误以及经济上的脆弱等……自我抵达中国之日起，就没有一场战斗是因为缺少弹药或装备而失败的。在我看来，他们的军事失利，完全归咎于那算得上是世界上最糟糕的领导能力以及其他许多毁灭斗志的因素。是这些东西使得部队完全丧失了作战意志。

这位在中国生活甚久的美国军人，最终触摸到了这块土地上自建立起封建帝国之后便逐渐生成，并由国民党人继承和发展下来的最致命的弊端：

有一点必须明白，那就是在国民政府所有的组织机构中，充斥着中国人特有的家庭、经济、政治等方面的裙带关系。不管一个人多有能力，他决不会仅仅因为是该项工作的最佳人选而获得一个要职。他必须得有后台。从举不胜举的例子里不难看出，这总后台便是委员长本人。他给他在军队中的老关系以足够的支持和信赖，使得他们稳居要职，不管他们称职不称职。这种做法的直接后果，便是在与共产党作战中暴露无遗的荒谬战略和错误战术。

一九四九年一月，淮海战场上的杜聿明集团已在突围中全军覆没，二十一日，北平的傅作义与共产党方面达成了和平协议，蒋介石在南京以“因故不能视事”为名宣告引退。

在南京黄埔路官邸，蒋介石召集党政军高级人员举行告别会。李宗仁对当时的情形印象深刻，因为事后他发现蒋介石再次耍了一个令

他愤怒不已的政治手腕：

> 蒋先生首先发言，将目前的局面作详细的分析，最后的结论说，军事、政治、财政皆濒于绝境，人民所受痛苦亦已到达顶点。我有意息兵言和，无奈中共一意孤行到底。在目前情况下，我个人非引退不可，让德邻兄依法执行总统职权，与中共进行和谈。我于五年之内决不干预政治，但愿从旁协助，希望各同志以后同心合力支持德邻兄，挽救党国危机。蒋先生声音低沉，似有无限悲伤，与他平时训话时的慷慨激昂，截然不同。他说话时，众人中已有人黯然流泪……全场空气万分哀痛。CC派少壮分子、社会部长谷正纲忽忍泪起立大声疾呼说：“总裁不应退休，应继续领导，和共产党作战到底！”蒋先生以低沉的语调说，事实已不可能，我已作决定了。随即自衣袋里掏出一张拟好的文件，告诉我说，我今天就离开南京，你立刻就职视事，这里是一项我替你拟好的文稿，你就来签个字罢。在那样哀伤的气氛中，四周一片呜咽之声，不容许我来研究，甚或细读这一拟好的文稿。那气氛更使得我不得不慷慨赴义似的，不假思索地在这文件上签了名字。蒋先生便收回去了。我问：“总统今天什么时候动身，我们到机场送行。”蒋先生说：“我下午还有事要处理，起飞时间未定，你们不必送行！”说着，他走向门外。

但是，众人散去后，当李宗仁细看蒋介石拟定的文稿时，发现里面根本没有“引退”、“辞职”的字样，只是说：“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之规定，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什么叫“因故不能视事”?宪法的解释是：总统被暴力劫持而无法履行职责。现在没有人劫持蒋介石，他应该是“辞职不能视事”；总统的职权也不是“代行”而应该是“继任”。愤怒的李宗仁要求蒋介石修改文稿，蒋介石承诺说要修改到李宗仁满意为止。可是，第二天早上，文稿一字未改地已经登报了。那些依旧守在风雨飘摇的南京城中的外国记者说：“他闪烁其词地为自己卷土重来埋下了伏笔。”

傍晚，在陈诚、陈仪、汤恩伯、蒋经国、俞济时等人的陪同下，蒋介石乘飞机离开南京飞往杭州。

第二天，蒋介石回到浙江奉化溪口老家。

蒋介石心里很清楚，那些“和共产党作战到底”的表态全是空话。

打仗是需要本钱的，这个本钱说到底就是军队。

在战争即将向长江以南推进的时刻，国共双方的军力变化令人难以置信。

战争进行了两年零两个月后，国民党军损失兵力累计达四百九十五万。虽然经过不断的补充，至一九四九年二月，其总兵力还是从四百三十万下降到二百零四万。除了空军十万余人、海军三万余人之外，陆军正规军虽然还有七十一个军二百二十七个师的番号，但只有一百一十五万余人，加上非正规军十七万五千余人，特种兵十三万五千余人，后方勤务部队、机关、军校四十五万人，能用于作战的陆军部队最大量也只有一百四十六万余人，且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和漫长战线上，已无法在战略上组成有效防御。

国民党军的兵力部署清单已显得有些简陋了：

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位于长江下游，总司令汤恩伯，兵力十九个军六十个师，共计三十二万八千余人，非正规军两万三千余人，特种兵三万二千余人；

福州绥靖公署，位于福建地区，绥署主任朱绍良，兵力两个师八千余人，非正规军两千余人；

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位于台湾岛，总司令陈诚，兵力两个师一万二千余人，非正规军三千余人，特种兵八千余人；

华中“剿总”司令部，位于长江中游，总司令白崇禧，兵力十二个军三十七个师，共计二十万八千余人，非正规军一万一千余人，特种兵两万一千余人；

长沙绥靖公署，位于湖南、江西地区，绥署主任程潜，兵力三个军九个师三万三千余人，非正规军四千余人，特种兵两千余人；

广州绥靖公署，位于广东省，绥署主任余汉谋，兵力两个军八个师共计四万六千余人，非正规军一万七千余人，特种兵八千余人；

桂林绥靖公署，位于广西省，绥署主任李品仙，兵力三个师一万二千余人，非正规军五千余人；

重庆绥靖公署，位于西南地区，绥署主任张群，兵力六个军十六个师八万六千余人，非正规军一万一千余人，特种兵八千余人；

西安绥靖公署，位于陕西省，绥署主任胡宗南，兵力十三个军三十三个师，共计十六万三千余人，非正规军一万二千余人，特种兵两万四千余人；

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位于青海、宁夏和甘肃地区，公署副长官马步芳、马鸿逵，兵力三个军十二个师八万余人，非正规军一万二千余人，特种兵一千余人；

新疆警备司令部，位于新疆地区，总司令陶峙岳，兵力三个整编师十六个旅六万余人，非正规军一万二千余人，特种兵九千余人；

太原绥靖公署，位于太原地区，绥署主任阎锡山，兵力六个军十四个师四万二千余人，非正规军两万二千余人，特种兵七千余人；

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绥远指挥所，位于绥远及榆林地区，指挥所主任董其武，兵力一个军七个师三万余人，非正规军两万三千余人，特种兵三千余人；

第十二绥靖区，位于河南地区，司令官李振清，兵力一个军一个师七千余人，非正规军一万五千余人，特种兵三千余人；

第十一绥靖区，位于山东青岛，司令官刘安祺，兵力两个军七个师三万五千余人，非正规军三千余人，特种兵一万五千余人。

上述部队，只有白崇禧、胡宗南、马步芳的部队编制比较充实，尚有一定的作战能力。

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其野战军和地方部队总兵力，截至一九四九年二月，已达到令人惊叹的四百万以上。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将所有武装力量分为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队三类，统一称呼“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实行正规编制，统一称号，纵队一律改称军，师和旅统称师，地方部队以警备旅、独立旅为最高单位，游击部队仍然保留纵队和支队的名称。野战部队按三三制编组，设野战军和兵团两级。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军为：西北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和东北野战军。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各野战军番号改按序数排列的决定》：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领导地方部队的军区分四级，一级军区共有五个：西北军区、中原军区、华东军区、东北军区和华北军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四个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野战部队，已是一个拥有汽车、坦克、装甲车、重型火炮，甚至还有一百零三架飞机的强大野战阵容：

第一野战军，十五万五千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参谋长阎揆要，政治部主任甘泗淇。部队组成是：

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辖第一军，军长贺炳炎，政治委员廖汉生；第二军，军长郭鹏，政治委员王恩茂；第七军，军长彭绍辉，政治委员罗贵波，共计九个步兵师。

第二兵团，司令员许光达，政治委员王世泰。辖第三军，军长黄新廷，政治委员朱明；第四军，军长张达志，政治委员张仲良；第六军，军长罗元发，政治委员徐立清，共计九个步兵师；第八军（不久该军归华北军区建制），军长姚喆，下辖两个步兵师。

野战军下辖两个骑兵师。

第二野战军，二十八万余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参谋长李达。部队组成是：

第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谢富治。辖第十军，军长杜义德，政治委员王维纲；第十一军，军长曾绍山，政治委员鲍先志；第十二军，军长兼政治委员王近山，共计八个步兵师。

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辖第十三军，军长周希汉，政治委员刘有光；第十四军，军长李成芳，政治委员雷荣天；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政治委员谷景生，共计九个步兵师。

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辖第十六军，军长尹先炳，政治委员王辉球；第十七军，军长王秉璋，政治委员赵健民；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共计九个步兵师。

野战军下辖军政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特种兵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达。

第三野战军，五十八万一千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粟裕，第一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参谋长张震，政

治部主任唐亮。部队组成是：

第七兵团，司令员王建安，政治委员谭启龙。辖第二十一军，军长滕海清，政治委员康志强；第二十二军，军长孙继先，政治委员丁秋生；第二十三军，军长陶勇，政治委员卢胜；第三十五军，军长吴化文，政治委员何克希，共十二个步兵师。

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政治委员袁仲贤。辖第二十四军，军长王必成，政治委员廖海光；第二十五军，军长成钧，政治委员黄火星；第二十六军，军长张仁初，政治委员王一平；第三十四军，军长何基沣，政治委员赵启民，共十二个步兵师。

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郭化若。辖第二十军，军长刘飞，政治委员陈时夫；第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政治委员刘浩天；第三十军，军长谢振华，政治委员李干辉；第三十三军，军长张克侠，政治委员韩念龙，共计十二个步兵师。

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政治委员韦国清。辖第二十八军，军长朱绍清，政治委员陈美藻；第二十九军，军长胡炳云，政治委员张藩；第三十一军，军长周志坚，政治委员陈华堂，共计十二个步兵师。

野战军下辖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政治委员张凯；两广纵队（该纵队后归四野建制），司令员曾生，政治委员雷经天；教导师以及军政干部学校。

第四野战军，九十余万人，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参谋长萧克，政治部主任谭政。部队组成是：

特种兵司令部，司令员万毅，政治委员钟赤兵。

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辖第四十军，军长罗舜初，政治委员卓雄；第四十五军，军长陈伯钧，政治委员邱会作；第四十六军，军长詹才芳，政治委员李中权，共计十二个步兵师。

第十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政治委员萧华，辖第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政治委员梁必业；第四十七军，军长曹里怀，政治委员周赤萍；第四十九军，军长钟伟，政治委员徐斌洲，共计十二个步兵师。

第十四兵团，司令员刘亚楼，政治委员莫文骅，辖第三十九军，军长刘震，政治委员吴信泉；第四十一军，军长吴克华，政治委员欧阳文；第四十二军，军长吴瑞林，政治委员刘兴元，共计十二个步兵师。

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赖传珠，辖第四十三军，军长李作鹏，政治委员张池明；第四十四军，军长方强，政治委员吴富善；第四十八军，军长贺晋年，政治委员陈仁麟，共计十二个步兵师。

野战军另辖骑兵五师、一六五师、整训五师。

华北军区野战军，二十三万八千人，司令员聂荣臻，政治委员薄一波，副司令员徐向前、滕代远，参谋长赵尔陆（四月赵尔陆调第四野战军，唐延杰继任），政治部主任罗瑞卿。部队组成是：

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士第（五月三日前为徐向前），辖第六十军，军长张祖谅（五月三日前军长兼政治委员王新亭）；第六十一军，军长韦杰，政治委员徐子荣；第六十二军，军长刘忠，政治委员袁子钦，共计九个步兵师。

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李志民（五月三日前为罗瑞卿），辖第六十三军，军长郑维山，政治委员王宗槐；第六十四军，军长曾思玉，政治委员王昭；第六十五军，军长邱蔚，政治委员王道邦，共计九个步兵师。

第二十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李井泉，辖第六十六军，军长萧新槐，政治委员王紫峰；第六十七军，军长韩伟，政治委员旷伏兆；第六十八军，军长文年生，政治委员向仲华，共计八个步兵师以及俘训第一、第二旅。

军委直辖铁道兵团，司令员滕代远，副司令员吕正操，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何伟，参谋长李寿轩，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支队。

一九四九年除夕之夜，在浙江奉化溪口，蒋家从宁波请来一个戏班子在蒋氏祠堂演戏，蒋介石设年夜宴招待左邻右舍，他说："今天请诸位来此喝杯淡酒，往后还要请诸位到南京去喝酒！"

这一天，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发言人的身份发表谈话，他告诉"南京的先生们"，"必须立即动手逮捕一批内战罪犯"，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蒋介石，该犯现已逃至奉化"，"此事你们要负完全责任，倘有逃逸情事，必以纵匪论处，决不姑宽"。毛泽东说，我们的口号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二十二日，新上任的代总统李宗仁发表文告，宣称愿立即与共产党方面进行和谈，并且决定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五人为和谈代表。第二天，他又命令行政院施行七项"和平措施"："一、各地剿匪总部一律改为军政长官公署；二、取消全国戒严令（接近前线者例外）；三、裁撤戡建大队，交归国防部另行安置；四、释放政治犯；五、启封一切在戡乱期间抵触戡乱法令而被封之报

纸、杂志；六、取消特种刑庭，废除特种刑事条例；七、通令停止特务活动，人民非依法不得擅自逮捕。”李宗仁表示愿意将共产党方面提出的“八项条件”作为和谈基础。

之前，毛泽东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表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毫无疑问，上述每一条，对于国民党政权都是致命的。

没有人相信国民党政权的当权者会接受这八项条件。

毛泽东将国民党呼吁和谈的无奈与居心看得十分透彻：

> ……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百余年来，前仆后继。无数先烈的鲜血，洒遍了锦绣山河，亿兆后起的人民，表现了英雄气概。此次人民解放战争之所以胜利，是由于全国人民不畏强御，团结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一致奋起，相与协力，从而使人民解放军获得各方面的援助，使人民的敌人完全陷于孤立。胜负之数，因以判明。现在残敌尚存，诡谋时作。求喘息谓为求和平，待外援名曰待谈判。口诵八条，手庇战犯，眼望美国，脚向广州。欲求人民解放斗争获得最后胜利，必须全国一切民主力量同心同德，再接再厉，为真正民主的和平而奋斗……

蒋介石的目的，是用政治手段迫使共产党军队停止在长江北岸，以争取时间缓解军事压力，重整军事实力，最终达到国共双方划江而治的目的。国民党军没有放松继续战争的准备。南京行政院副院长吴

铁城公开表示："新政府的唯一目标为继续与共产党作战。"蒋介石在溪口老家建立了三十七部电台，继续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指挥着军队和特务系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奉蒋介石的指示，反复强调反对和谈的言论："我如不能战，既亦不能和；我如能战，则言和又徒使士气人心解体。故无论我能战与否，言和皆有百害而无一利。"一月二十九日，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顾祝同给各部队发出密令："吾人为求捍卫国家民族及党与军之生存，应下最大决心，与之誓不两立，坚决从事长期自救、自卫与救民之战争。"至于与蒋介石离心离德的桂系，也并不认为应该与共产党方面进行真正的和谈。李宗仁上任不久便召开了长江防务会议，声称："我们有海空军，共产党则没有，共军官兵都是北方人，他们不适合在江南地区长久作战，因此，我们要在上海守六个月到一年是不成问题的。"而白崇禧的态度是："我们以前是穿草鞋出身的，最后还可以上山打游击，同他们拼一下！"国民党军计划在江南设立十一个编练司令部，将军队重新扩编至三百五十万至五百万人。

二月二十二日，就在傅作义到达西柏坡的那一天，李宗仁派出的"上海和平代表团"也到达西柏坡，其成员是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和江庸，年龄最小者六十八岁，最大者七十三岁。经过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非正式商谈，双方最后达成八点秘密协定："一、谈判以中共与南京政府各派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二、谈判方式取绝对秘密及速议速决。三、谈判以中共一月十四日声明及所提八条为基础，一经成立协议立即开始和执行。其中有些部分须待联合政府办理者，在联合政府成立后执行之。四、谈判协议发表后，南京政府团结力量与中共共同克服可能发生之困难。五、迅速召集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六、南京政府参加新政协及参加联合政府之人选，由中共［包括民主人士］与南京政府商定之。七、南方工商业按照原来环境，依据中共城市政策，充分保障实施。八、有步骤地解决土地问题，一般先进行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

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和江庸将秘密协定带回南京。

就在这一天，李宗仁在广州劝说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迁回南京，但遭到行政院长孙科的拒绝。但是，当孙科听到新华社广播说愿意与国民党方面进行和谈的消息后，立刻飞回南京召开会议，决定了他们的“对共和谈的三项原则：“一、和谈双方必须建筑在平等的基础上，共方不能以战胜者自居而迫我接受屈辱条件；二、有鉴于铁幕内各国之惨痛遭遇，政府断不应接受由中共作为执政党之联合政府。政府为此应向共方提议划疆而治；三、中共所提八条要求，政府决不能全面接受，只能在两个政府共存的原则下，以其为谈判基础。”

毛泽东发表了《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一文，以辛辣的文笔写道：“在野”的蒋介石在奉化“继续指挥他的残余力量”，李宗仁自上台所下的命令“没有一项是实行了的”，孙科的行政院号召战争，但进行战争的国防部却“既不在广州，也不在南京，人们只知道它的发言人在上海”。这样一个“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国民党而要求所谓‘全面和平’”是非常滑稽的。事实上，国民党“既没有什么力量实行全面和平，也没有什么力量实行全面战争。全面的力量是在中国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这一方面”。

共产党人已经开始考虑建国大事。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西柏坡召开。这是中国当代史上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也是共产党人向全国进军的思想准备会议。毛泽东在会议报告中讲述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全国胜利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应采取的基本政策，中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以及全党同志要警惕胜利之后的糖衣炮弹的攻击等问题。

毛泽东告诉全党同志：“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会议之后，二十三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出发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一行人乘坐十一辆小汽车和十辆大卡车上路，毛泽东对他的警卫排长阎长林说：“等全国解放了，我们再也不搬家了。”当天没有按计划到达保定，晚上在河北唐县附近的淑闾村住下，毛泽东住在农民李大明家，他先和村干部谈话，然后坐在小木凳上写文件。

毛泽东在农民李大明家摇曳的油灯下筹划建立新中国的时候，国民党军陆军副总司令关麟征和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宋希濂走进了蒋介石在奉化溪口的“一栋小平屋”。蒋介石面对自己的黄埔学生，谈了国民党在短短三年之间惨败的原因：

我们自黄埔建军以来二十多年的过程中，遭遇过许多的挫折，但从未失败到像今天这样严重。抗战胜利后，我们的军事力量，较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强大得多，为什么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会弄到今天这个地步呢？军事上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军队的战斗意志太薄弱了！一个师甚至一个军，一被共产党军队包围，只有几个小时甚至一天工夫，就被完全消灭了。共产党军队飘忽，我军常不容易找到他的主力，与他进行决战。一个部队被围，指挥官勇敢沉着，选择要点，固守待援，本是我军捕捉和歼灭对手的最好时机。但每当增援部队快要到达的时候，被围部队已被共产党军队吃光了。结果总是扑了一个空，反而把其他的部队也拖得筋疲力竭，给共产党军队更多可乘之机。就这样使得共产党的力量一天一天地壮大起来，而我们则日渐削弱……我们过去统一两广和北伐时期，能以少胜多，以一当十，是因为官兵具有不贪财、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抗战时期，许多部队大体尚能保持这种传统的精神而英勇奋斗。在抗战胜利后，很多部队完全丧失了这种精神，尤以许多中上级军官，利用抗战胜利后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骄奢淫逸，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原因。

临别，蒋介石嘱咐关麟征和宋希濂，你们是我的学生，“千万不可轻信旁人对我的毁谤诬蔑”。

二十四日中午，毛泽东一行到达保定，晚上到达涿县。二十五日凌晨二时，毛泽东在涿县换乘火车，于上午抵达北平清华园车站，然后乘车至颐和园。下午十七时，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在南苑机场检阅部队后，入住香山双清别墅。这一天，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也迁入北平。

四月一日，国共谈判在北平正式开始。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是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共产党方面的代表是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毛泽东接见了国民党的谈判代表，他说："人民的要求，我们最了解。我们共产党是主张和平的，否则也不会请你们来。我们是不愿意打仗的，发动内战的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嘛。只要李宗仁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毛泽东还认为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国帝国主义靠不住；第三，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然还没有残破，但那点子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现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为了和谈，他不搞和谈，这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哩！我看六亲中最靠得住还属共产党。只要你们真正和谈，我们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是守信用的。"

谈判正式举行。李宗仁方面确定的谈判原则是：拒绝共产党方面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和渡江占领京沪的要求，坚持就地停战并划江而治的立场。而共产党方面在这两个问题上态度强硬：一、无论国民党方面是否同意将八项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是否愿意在和平协议上签字，人民解放军都要渡过长江，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挡人民解放军向江南进军；二、国民党军队决不能保留，必须一律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尽管似乎不存在和谈的基础，共产党方面还是尽了最大努力，毛泽东对张治中说，为了减少南京代表团的困难，可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的名字。毛泽东还致电第二野战军刘伯承等，要求暂停对安庆

的攻击；致电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要求推迟攻击太原的时间；致电第三野战军粟裕等，将渡江作战时间由十五日“推迟至二十二日”。

周恩来拿出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张治中的第一感觉是：“充满了降书和罪状的口气”；第二个感觉是：“完了，和是不可能的”。但是，国民党方面的和谈代表们“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国民党失败是肯定的，“既然注定失败，何必还一定拖累国家和人民”。于是，他们只能在“词句力求缓和，避免刺眼词句”方面进行修正，同时对军队改编和联合政府两项也作了若干修正，目的是“希望南京方面或者能够接受”。共产党方面经过研究，“接受了所提修改意见中的过半数”。十五日，周恩来拿出《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并声明“这是不可变动的定稿，在本月二十日以前，如果南京同意就签字，否则就马上过江”。

十六日，国民党代表飞回南京。

第二天，周恩来做了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政治报告。他说：“南京代表团和我们固然有距离，但他们有一个概念是好的，即国民党的失败是一定的，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是一定的，他们承认失败，承认错误，因而愿意交出政权，交出军队。不过，南京代表团虽有此认识，南京政府却还没有这个认识，至于广州、溪口就更不用说了。”

二十日晚，共产党方面得到李宗仁和何应钦的复电：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

和谈破裂，战争不可避免地将继续下去。

和谈之前，李宗仁在给毛泽东发出的电报中提到了国共两党的历史：“以往恩怨是非，倘加过分重视，则仇仇相报，宁有已时，哀吾同

胞，恐无噍类，先生与弟将同为民族千古之罪人矣。”——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他的大多数岁月血雨腥风，共产党人曾在国民党的残酷镇压下血流成河。二十二年前的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死于蒋介石刑场、秘密监狱和暗杀的爱国人士，数以万计”，“当我们回顾这二十二年来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心中是充满了对于二十二年来前仆后继、为革命事业死难的先烈的哀思，充满了对于二十二年来恶贯满盈的反革命罪犯的痛恨”。

这种痛恨，刻骨铭心。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令》：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诸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诸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陈毅、饶漱石、粟裕、谭震林诸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林彪、罗荣桓诸同志，太原前线人民解放军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诸同志，各野战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南方游击区人民解放军同志们：

由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已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拒绝。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负责人员之所以拒绝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是因为他们仍然服从美国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匪首蒋介石的命令，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推进，阻止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经过双方代表团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表示了对于战犯问题的宽大处理，对于国民党军队官兵及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的宽大处理，对于其他各项问题亦无不是从民族利益与人民利益出发作了适宜的解决。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决心将他们发动的反革命战争打到底。拒绝这个协议，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在今年一月一日所提议的和平谈判，不过是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向前推进，以便反动派获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势力。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南京李宗仁政府所谓承认中共八个和平条件以为谈判基础是完全虚伪的。因为，既然承认惩办战争罪犯，用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国民党反动军队，接收南京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以及其他各项基础条件，就没有理由拒绝根据这些基础条件所拟定的而且是极为宽大的各项具体办法。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命令你们：

（一）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

（二）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

（三）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及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协定。

（四）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逃散，并愿意于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愿意再一次给该政府以签字的机会。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朱德

命令发布之日，长江江面上已是万帆如林。

## 钟山风雨起苍黄

在中国国土的中部，有一条巨大的河流。

这条名叫长江的河流，发源于青海唐古拉雪山，自西向东流经青海、西藏、四川、云南、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省市自治区，最后在上海注入东海，全长约六千三百公里，将中国的国土分成南北两半。长江上游峡谷幽深，激流险滩；下游烟波浩淼，水天一色。

在新中国诞生之前，这条江上没有桥梁。

共产党人的革命发源于江南。在他们与国民党政权抗争的艰难往事中，有两次被迫从江南撤向江北的刻骨铭心的记忆：一九三四年，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在国民党军的重兵追击下于江南转战甚久，最后从长江上游的金沙江河段冒险过江，跳出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十一年后，抗战结束的一九四五年，在国共双方和谈接近破裂之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方面政治和军事的双重压力下，将分布在江南的抗日武装主力全部撤回江北。

从此，长江以南，再没有共产党领导的主力部队存在。

长江横亘在那里，仿佛是一条不可逾越的楚河汉界。

一九四九年春天，长江两岸油菜花开灿烂之时，又一次来到这条大江边的共产党人，准备重回始终萦绕在他们梦境中的锦绣江南。

共产党人的梦想可以追溯到一九四七年七月，那时在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正与国民党军进行艰苦的拉锯战，无论是在东北战场，还是在山东战场，乃至在大别山地区，共产党人都承受着巨大的军事压力，中央军委曾设想派华东野战军一部渡过长江，在江南开辟战场，迫使大量的国民党军从长江以北回援江南，以转守为攻。但因条件与时机均不成熟，计划最终未能实施。一九四八年一月，中央军委又一次计划以华东野战军一部挺进江南，又因条件不具备未能实现。十月，中央军委设想于一九四九年秋季举行渡江作战，但辽沈战役很快结束，淮海战役胜局已定，平津战役已经开始，形势发展比预想的快，十二月十二日，淮海战役总前委召开全体会议，虽然当时杜聿明集团还未被最终吃掉，但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却是渡江。在对气候、水情和敌情诸方面进行反复研究之后，渡江战役发起时间被初步定在来年的三月下旬或四月初。

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几个大的野战军必须休整至少两个月，完成渡江南进的诸项准备工作。然后，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开进。”二月九日，淮海战役总前委再次在河南商丘开会，拟定三月底开始渡江作战。届时，第三野战军四个兵团分别在江阴、扬州、南京、芜湖、铜陵、贵池段展开；第二野战军一个兵团在安庆东西段展开，另外两个兵团除以一个军在黄梅、宿松、望江佯动外，其余五个军为总预备队。同时报请中央军委，建议第四野战军派出三个军约二十万兵力迅速南下，进至武汉附近牵制白崇禧部，配合第三、第二野战军渡江作战。三月二十一日，淮海战役总前委、第

三野战军前指、中共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机关人员乘火车分批南下，进驻蚌埠东南郊的孙家圩子。三十一日，在孙家圩子的一户农家茅舍里，邓小平主持总前委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四月十五日全线发起渡江作战。

因为，随着江南雨季的到来，一旦进入四月底五月初，长江水势将会猛涨，两岸湖区会被淹没，水面变得极其宽大，将给渡江作战造成困难。一旦大军拥挤在江边而不得过江，最终势必"不得不后撤以就粮草"。

但是，随着共产党代表与国民党代表在北平开始和谈，十一日，离预定的渡江作战仅剩四天，中央军委决定："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十五日渡江推迟至二十二日渡江。"十二日，中央军委致电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要求第四野战军的两个军于四月十五日前"迫近汉口"，"钳制白崇禧部不敢向南京增援"，以利第二、第三野战军夺取南京。十五日，国共双方和谈代表签署《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中央军委致电总前委和第二、第三野战军领导："和平谈判决以二十日为限，本日即向南京代表团宣布，彼方是否签字，必须在该日以前决定态度，该日以后我军即须渡江。"十七日，中央军委再次致电："南京是否同意于二十日签字，决定于美国及蒋介石的态度，因此把握不大。南京方面认为我军渡江有很大困难，他们不相信我军能够大举渡江。我们估计他们二十日以前可能不理我们，要看一下我军能否于二十日以后真能渡江"。"故你们应按原计划，确定于二十日渡江不要改变，并必须争取一举成功，是为至要"。总前委表示，第三野战军的作战地段，是国民党军的主力所在，只有那个方向也许困难多一些，但第三野战军前指"有把握胜利完成"。因此，二十日开始渡江，二十二日向长江南岸发起总攻，那时就不能停顿了，必须"一气打到底"。所以，若二十日不能发起作战，必须十八

日“先期通知延期”，否则全军处于半渡状态，“如加停顿必陷于非常不利”。十八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二十二日实行总攻——“请你们即按此总方针坚决地彻底地执行之。此种计划不但为军事上所必需，而且为政治上所必需，不得有任何的改变”。“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希望我二野、三野全军将士，同心同德，在总前委及二野、三野两前委领导下完成伟大任务”。

一月二十五日，蒋介石宣布下野的第四天，在溪口召集国防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顾祝同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等人研究长江防御。蒋介石认为，长江防御过于宽广，国民党军难以处处设防，因此必须择其重点，即京、沪、杭三角地带，以最后拱卫与坚守淞沪。据此，蒋介石计划将长江防线划分为两大战区：上海至江西湖口间八百余公里的地段由汤恩伯负责，湖口至湖北宜昌间近一千公里的地段由白崇禧负责——“用海、空优势，与长江天险之利，拒止匪于长江以北，争取适当时间，重新整备新生力量，企图再举。”

根据蒋介石的指令，汤恩伯开始构筑江防工事，封锁长江交通，部署水雷和滩头地雷，“清剿”江南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武装，并重新部署了他的部队：

淞沪防卫司令部第三十七、第五十二、第七十五军和淞沪警备司令部交警第一、第五、第七、第十一、第十八总队，沿海岸线自南向北防守金山卫、吴淞、白峁口段和整个上海地区；

第一绥靖区所属第四、第二十一、第五十二、第一二三军和江阴要塞部队，自东向西沿长江防守白茆口至镇江以西桥头镇段，机动支援部队第五十四军位于镇江以南的丹阳、武进和句容地区；

第六兵团和南京卫戍总部第二十、第二十八、第四十五、第九十六军，防守桥头镇至苏南与皖东交接处的铜井段，重点是南京地区，

机动支援部队第九十九军位于镇江以西、南京以东的龙潭、下蜀地区；

第七绥靖区第六十六、第八十八军沿长江于安徽东南部江段防守铜井至铜陵段，第八兵团第五十五、第六十八军防守铜陵至安徽与江西交界处的湖口段，以上两个防区的机动支援部队第十七兵团第一〇六和第七十三军位于安徽东南部的泾县、宁国、歙县地区。

同时，战车部队四个营加一个连指挥一百三十六辆战车、二十门大口径榴弹炮于上海地区；五个团的炮兵部队控制于南京和上海地区；海军海防第一舰队一部支援上海地区作战，第二舰队支援第一绥靖区和第六兵团作战；江防舰队支援第七绥靖区和第八兵团作战。此外，第十二、第十八、第六十七、第七十四、第八十五和第八十七军位于浙赣铁路及以北地区和浙江东部地区，担任第二线防御。

负责防守湖口至宜昌段的白崇禧，则把二十七个师摆在江防一线，把十三个师部署在长沙和南昌地区的纵深地带。

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存在明显缺陷。首先，将重兵部署在上海周围，显然有重上海而轻江防之嫌。即使没有足够军事常识的人，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如果长江天堑守不住，背靠大海的上海又何以支撑？为此，不少国民党军高级将领提出异议，但都被汤恩伯以“总裁的决定”为由拒绝修正，直至从上海至湖口八百多公里的江防被人民解放军全线突破时，汤恩伯才紧急从上海、南京方向调兵加强长江江防，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其次，将长江防线分割成以湖口为分界的两个防区，湖口以东是汤恩伯的防区，全部由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防御，兵力相对充足，且江防长度只有八百多公里；而在湖口以西，白崇禧的防区长达上千公里，却几乎全部由桂系部队防守，区区二十七个师散落于千里江岸，以致形同虚设。更微妙的是，蒋介石在部署江防计划的时候，专门强调不要把湖口以东的防御计划向白崇禧透露——如果白

崇禧知道湖口以东的部署，那就不只是让蒋介石下台的问题了。汤恩伯将重兵集中在南京、上海而置江防空虚于不顾，一旦解放军迅速突破江防，便可以从侧翼对白崇禧部形成合围。要知道从湖口方向到白崇禧所在的武汉，直线距离也就两百多公里。蒋介石只顾上海和南京，难道没有让渡江之后的解放军与白崇禧的桂军杀个昏天黑地的企图?

实际上，此时的国民党军，已无法有效地坚守两千公里的长江防线了。白崇禧的四十个师尚有一定的战斗力，而在汤恩伯的部队中，除第四军和第五十四军等少数几个军尚未遭遇毁灭性打击之外，其余的部队都是被重创后重建或新建的，兵员数量不足编制的一半，武器装备也残缺不全。刘伯承在分析了国民党军的部署后指出:“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军的主力已基本丧失”，目前既不能配置其坚固的一线，也不能部署厚实的二线，由于“战线长、兵力少”，国民党军只能采取这种“东重西轻，顾此失彼，外强中干，点线脱节的处置”。因此，在其整个防线上，任何一点都很薄弱，一旦被突破将导致全线断裂。

即便如此，陈兵长江北岸的解放军官兵所面临的，不但有几十万国民党军的抵抗，还要从那条水急浪高的大江上冲过去。第二、第三野战军官兵大部分是北方人，多不熟悉水性，不少人连游泳都不会，基层指挥员也缺少指挥大规模渡江作战的经验。解放军还没有空军、海军以及水上作战武器，以对付敌人大口径岸炮和水面舰艇的攻击。更重要的是，长江北岸的出击地域大多是刚刚解放的地区，当地百姓尚未全面发动，不但粮草筹集困难重重，而且严重缺少船只和熟悉长江水情的船工水手。

一九四九年二月底至三月初，第二、三野战军先后从河南的漯河和沈丘、安徽的阜阳、江苏的徐州和海州等地南下，向长江北岸集

结。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到达安徽南部的安庆和望江地区。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到达桐城以北的庐江地区，第九兵团到达巢湖以东的无为、含山地区，第八兵团到达南京以东的扬州、仪征地区，第十兵团到达临近江阴要塞的泰兴、靖江地区。战役总前委进驻安徽合肥东南的瑶岗村。

第二、第三野战军云集长江北岸之后开始了大规模的渡江准备。

百万大军横渡长江，所需船只数量惊人，而国民党军在部署江防时，焚毁匿藏船只必为头等大事，这一点始终是共产党人的心头之患。早在济南战役刚刚结束，淮海战役尚未开始的时候，华东野战军已派出干部去苏北等地筹集船只。现在筹船成为更加紧迫的任务。此时，江北的船只绝大部分或被国民党军破坏、或已被拉到江南，对解放军不甚熟悉的当地百姓也把自家的船只藏了起来。共产党人对群众工作并不陌生，他们对作战必须取得百姓的支持有深切的体会。于是，官兵们深入到百姓家中，以最大的耐心、最诚恳的态度拉近彼此的距离，然后以最朴实的道理让长期生活在国统区的百姓知道世上有决心为人民打天下的军队。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记述道："昨日到今日，我与群众谈话足有三十余人，房东老太太今日第一次赏光与我搭话，不胜欣慰之至。"陈赓还把他的收音机悬挂在街上，让百姓们聆听新华社的广播——"一时拥挤不堪，群情兴奋"。终于，百姓们把沉入江底的船打捞上来，把藏在芦苇深处的船摇出来，贴上了"渡江胜利"的大红纸。千辛万苦筹集的船还是不够，共产党人想到了山东、河南、安徽、苏北的老解放区，老解放区的百姓听说大军要打南京，将所有的海船和河船都贡献出来。精壮的汉子们把船抬到火车站，船只被火车运走的时候，他们敲锣打鼓如同欢送自己的丈夫或是儿子参军。至渡江前夕，第二、第三野战军共筹集船只九千四百只，渡江的第一梯队，每个军平均能有五六百只，一次可渡万人。

有了船，还需动员江边百姓中的船工或是水手参战。这是一个更为艰苦的工作，因为参战就可能伤亡。讲义气的船工、水手们在明白了这些年轻的解放军官兵为什么要赴汤蹈火之后，竟然誓与解放军同生共死，他们说：“我们大家是一条生命。”父亲带着儿子，哥哥带着弟弟报名参战，参战的船工水手中不少已是年近六旬的老人，他们在长江上划了一辈子船，熟悉江面上的每一个漩涡，他们报名的时候就表示自己已经老了，死了没什么可惜的，万一不死还能看见那些欺压他们的地主恶霸如何没了风光。由于船只多数隐蔽在内湖和内河里，为了能够在战役发起时迅速地把船只运到江边，在百姓的支持下，军民在阴雨泥泞中疏通了总长达数百公里的废弃河道，还修建了数百座能够躲避敌机轰炸的隐蔽船坞。解放军为江边百姓的支持感动不已，制定出许多伤亡抚恤、贫困救济和船只补偿政策：船工水手每人每天发放两斤大米，顿顿都有酒，隔三天吃一顿肉，还发鞋子和衣服。官兵们甚至还参加了船工水手们的烧香祈祷仪式，他们和百姓一起把香火和大碗烈酒高高地举起——船工水手们请求神灵保佑他们的船一帆风顺，将大军平安送到大江的南岸；官兵们则但愿攻击风卷残云，将解放的红旗插到国民党政权的统治中心南京城上。

这时候，一个现象引起了高层指挥员的注意，那就是部队官兵的文化素质普遍不高，而这将成为今后作战的一个不利因素。渡江之后将是大规模的追击和占领，人民解放军将要接管诸多的城市，可是一些官兵不但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全国人都成共产党党员”，而且连长江、黄河的具体地理位置都没弄明白，说自己“过了长江还过黄河”。为此，中央军委专门发出一封要求对全军各部队进行地理常识教育的电报：

……营连干部有人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全国人都成共产党党员，过了长江还过黄河……关于地理常识的教育极为重要。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制印长江以南及西北、西南的简明地图一张，图上有大的河流、山脉，有省界，有大城市及中等城市的名称。在省名及大城市名的旁边注明该省该市的人口总数。在各野战军自己担任占领和工作的区域内，标注重要县镇的

名称。图幅不要太大，以纵横一公尺左右为适宜。除发给营部以上各级机关每处一张外，如能每个连队有一张，使一切识字的连排长及战士都能阅看，则极为有益。我们认为，此种地图常识的教育，将使指战员们增加勇气和对于任务的明确性。望酌量办理为要。

大战在即，大量的作战物资和武器弹药被源源不断地运抵长江北岸。从船只、车辆、弹药、作战器材和工程器材，到维持大军运转的生活物资：木材、钢铁、汽油、粮食、油盐、饲料、医药、担架和被装，两个野战军的后勤部门以及地方党政机关昼夜操劳，依旧事繁如山。时任华东野战军后勤部供给部被装处长的张云茂，留下一份关于日常用品的工作汇报，今日读来依旧可以想见六十年前长江北岸的繁忙情景：

一、分几部分：

（1）渡江前必须解决的：单衣、子弹袋、炸药袋、米袋、马料袋、日用品［鞋、牙刷、牙粉、肥皂］，机枪衣、炮衣、蚊帐、俘虏被子、行军锅、油布、瓷碗、菜盆、饭包。

（2）必须批准的：腰皮带、斗笠、枪背带、卫生部手术衣、开刀房用具、手枪套、皮包、驳壳枪套、保险带、九龙带、工装衣、准备帽。

（3）无关轻重的：干部垫单、包袱皮、鞋掌、草鞋。

二、已经决定者：

（1）单衣。二月二十日交齐七十万套，三月半交齐七十万套，纵队以上干部发材料自做，营以上干部服二万套，便衣二月半发材料，第一批即运四十万套。

（2）子弹袋十一万三千条，现存八万，补充三万三千条即补。

（3）炸弹袋三十万条，三月半发一半，三月底发一半。

（4）米袋、马料袋按标准发，时间另定。

（5）鞋子三百万双，二月底交齐一百三十万双，三月底交齐一百七十万双，马上拨三十万双，现有二十七万多双。鲁中南二百二十万双，胶东六十万双，徐州三十万双，济南十万双，昌潍十四万双，共三百四十九万双，集中在济南、潍县、博山、徐州。

（6）机枪衣、炮衣、轻机衣后边已发，重机衣及炮衣由各兵团做。

（7）被子解决十五万条，已做好五万成品，另二百万方尺，现在二百五十万方尺可解决十万条，此外来不及。

（8）蚊帐，连以上每人一顶，战士每人十二方尺［五尺］，大蚊帐数字太大，到江南解决。

（9）日用品，确定发代金，每人按二万元预支，二月半付款。毛巾八千、牙刷六千、肥皂四千，牙粉二千。

（10）行军锅已在徐州布置了，按我之预算做的。

（11）油布，公用油布过江前解决，每人五尺油布过江后解决。

最关键的，还是供应百万大军的数量巨大的粮食。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曾致电中央军委：“粮食，是最困难的问题，主要是就地筹粮，但仍须后方准备大量接济。”两个野战军，加上随军常备民兵、民工等，据华东支前委员会报告显示：“每月需粮九千万斤”。于是，“徐州以北、以西之存粮”需全部南运，还要在运河以东的淮南、苏中地区筹粮六千万斤，这无疑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当粮食暂时接济不上时，部队开始吃野菱角和野荸荠，官兵们说这东西比打淮海时吃的黑豆和高粱面难吃多了——“不是讲长江沿岸是鱼米之乡吗？”陈赓向官兵们解释：“我们这么大的部队路过此地要吃饭，人民的负担很重，这些东西还是百姓从沼泽地里挖出来的，这就不简单了。现在我们好赖还能吃饱肚子，比长征那阵好多了，那时要有这个吃，不知道要少死多少人！”在早春的严寒中，吃完野菱角的官兵赤着上身，在当地百姓的指点下，泡在冰冷的水里练习游泳和划船，演习上船、下船、划船、堵漏、水上射击、铺上芦苇或木板通过江岸淤泥地，还有渡江队形、登陆冲击、滩头爆破和分队协动等等。刘伯承来到第四兵团，他对官兵们说：“大家想想，你们兵团是怎么来的呢？一部分是从土地革命中，奋斗了二十多年，经过了千百次战斗，到了今天的；有一部分是山西省的决死队，在和内外敌人斗争中一点点发展起来，到今天也奋斗十几年了；另一部分是我们在太行山、太岳山，从抗日战争中培养起来的；还有就是我们艰难困苦开辟了中原，建立

起来的地方武装……我们部队是在党的领导下，千辛万苦、流血牺牲建立起来的，我们要珍惜自己的光荣，我们要在中国历史上最后最大的战争中，创造更大的光荣！”

渡江作战部署:

以第二野战军第三、第四、第五兵团九个军及地方部队共三十五万兵力，组成西突击集团，由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副政治委员张际春、参谋长李达指挥，于安徽西南部的枞阳镇（含）至望江段渡江。其中，第三兵团陈锡联、谢富治指挥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军，以第十军包围安庆守军，封锁安庆及其东西江面，掩护兵团主力渡江；第十一、第十二军由安庆以东至枞阳镇段渡江。第四兵团陈赓指挥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军，由望江至西面的马当段渡江，其中第十三、第十五军附第十四军四十一师为第一梯队，第十四军主力为第二梯队。第五兵团杨勇、苏振华指挥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军，由安庆以西至望江段渡江，其中第十六军为第一梯队，第十七、第十八军为第二梯队。

以第三野战军第七、第九兵团七个军共三十万兵力，组成中突击集团，由野战军第一副政委谭震林指挥，于安徽东南部的裕溪口至姚沟段渡江。其中，第七兵团王建安、谭启龙指挥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四军及特种兵纵队炮兵第二团、骑兵团，由枞阳镇（不含）至姚沟段渡江，第二十一、第二十四军为第一梯队，第二十二军为第二梯队。第九兵团宋时轮、郭化若指挥第二十五、第二十七、第三十、第三十三军及特种兵纵队炮兵第四团和第一团一部，由姚沟（不含）至裕溪口段渡江，除以一部兵力在当涂、芜湖正面牵制对岸守军外，第二十五、第二十七军为第一梯队，第三十、第三十三军为第二梯队。

以第三野战军第八、第十兵团八个军、三个独立旅共三十五万兵力，组成东突击集团，由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粟裕、参谋长张震指挥，于江苏东部的江阴至浦口间渡江。其中，第八兵团陈士榘、袁仲贤指挥第二十、第二十六、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军及警备第七旅、特种兵纵队炮兵第三团和第一团一部，除以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军和警备第七旅位于全椒、乌衣、仪征、扬州地区，逐次歼灭浦口、浦镇、瓜洲地区守军，封锁长江江面，牵制南京、镇江地区的国民党军，并视机由南京、镇江正面渡江外，第二十、第二十六军由三江营、口岸、京口段渡江。第十兵团叶飞、韦国清指挥第二十三、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一军及警备第六、第八旅和特种兵纵队炮兵第五、第六团和第一团一部，由龙稍港至张黄港段渡江，第二十三、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军为第一梯队，第三十一军为第二梯队。

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第四十、第四十三军以及江汉、桐柏、鄂豫军区部队共二十万兵力，由萧劲光统一指挥，进至武汉以东、以北地区，牵制白崇禧集团，策应第二野战军渡江作战。

一百二十万官兵，集结在国土中部那条大江的北岸，他们在弥漫着油菜花香的春雾里等待着热血贲张的战斗时刻。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十八时，解放战争史上的著名战役——渡江战役——打响了。

就在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的那个瞬间，中突击集团的第七、第九兵团所在的裕溪口至枞阳镇一百公里的正面，数千只木船高挂风帆突然出现在暮色映照下的长江江面上。按照预定计划，首先发动攻击的，是第九兵团第二十五、第二十七军，官兵们黄昏将至时把隐藏在堤坝后的木船拖出来翻坝入江，但是，第二十七军第一梯队七十九师各团还在拖船的时侯，二三五团三连在王凤奎连长的指挥下已全部登船待命。团长王景昆下达了“整理好船只，听令开

船”的命令。王凤奎立即命令通信员将命令传达至各排，可这个心情激动的小通信员把命令传达成了：“将船整理好，开船！”二排长林显信领受命令后，给全排传达时直接简化为“开船”。结果，早已按捺不住的二排的三个班骤然开船，其中以五班最为心切，他们的船如离弦之箭冲向江心。在二排的带领下，三连的船全部立即离岸，接着各连的船也开始离岸。还没到发起攻击的时间，指挥员想把他们叫回来，可哪里叫得回来？王景昆团长向师长萧镜海报告，萧师长果断地命令全师出动，二三五、二三七团的木船密密麻麻地冲了出来。接着，并肩渡江的第七兵团第一梯队第二十一、第二十四军突击队的船只也冲上了江面。

中突击集团的冲击正面，是国民党军第八十八军的防区，国民党军竟然没有发现长江上冲向南岸的几百只木船，在突击部队的船只距南岸仅有两百米左右的时候，他们才开始炮火轰击。天色已暗的江面上水柱冲天，北岸的炮兵部队按照战斗预案立即开始压制射击。二十一时许，最先出击的第二十七军七十九师二三五团一营三连五班的船率先靠上长江南岸夏家湖滩头，官兵们冲上江岸架梯攀登陡崖，梯子被国民党军的炮火炸断，战士李世松肩扛断梯让战友们踏着自己的肩膀往上登——五班全体战士乘坐的那条船，战后成为光荣的“渡江第一船”；这只木船上的战士，作为百万大军中首先登上江南土地的最前锋，他们的英勇无畏具有震撼中国和世界历史的意义。与此同时，第七兵团也开始了渡江突击。二十一时三十五分，第二十四军七十、七十一师分别登陆闻新洲和紫沙洲，继而突破当面国民党军第八十八军的防线。七十二师攻占陈德洲，歼灭守军第八十八军一四九师一部。第二十一军六十三师强行登陆长生洲和汆水洲，歼灭国民党军第五十五军二十九师一个加强营。

按照约定，登陆成功的船都要高挑起红色信号灯报告消息，并且要在占领的江边高地上燃起篝火。第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在北岸向南

望去，数十里长江南岸已是灯火成串，篝火绵延。他带领指挥部人员登上第二梯队的船朝南岸划去。只能载二十多人的小木船在江面上剧烈颠簸，炮弹不断在船边爆炸，老船工扯开嗓子唱着小调：“大军过江啦，大军胜利喽……”船上的官兵边划船边射击，同时跟着老船工扯开嗓子唱，小司号员则鼓足了气不停地吹着冲锋号。“我觉得，这一定是奔流不息的长江千万年来度过的最壮丽的一夜。”聂凤智回忆说。在踏上江南土地的那一刻，聂凤智立即口授了一封电报：“我们已胜利踏上江南的土地！”——他要求把电报“用最快的速度发给党中央和毛泽东”。

至二十一日晨，第三野战军中突击集团已有十个师二十八个团登上长江南岸，建立起长约一百二十公里、纵深约十公里的滩头阵地。

天亮了，一夜惊魂未定的汤恩伯从上海赶到芜湖，命令南京的第九十九军主力前往增援江防。但是，当这个军南下到达第八十八军防线后面的宣城时，这一地段的国民党军江防部队第二十、第五十五、第八十八军已经放弃阵地逃亡了。于是，第九十九军既没构筑二线防御阵地，也没退回南京自己原来的阵地，而是加入逃亡行列向杭州跑去。

中突击集团的突破，令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从中间断成了两截。

二十一日黄昏，东、西两集团同时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渡江突击。

十七时，西突击集团第二野战军的炮火准备开始了，三百余门火炮经过一个小时的连续炮击，南岸国民党军的江防阵地大部分被摧毁。十八时，渡江第一梯队，第三、第四、第五兵团的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五、第十六军分别从各自的江段登船。大雨瓢泼，东北风劲吹，雨雾利于隐蔽，东北风把船帆鼓满，天助大军出击。在位于桐城的野战军前线指挥部里，刘伯承接到的第一个战况电话，是

第十一军参谋长杨国宇打来的，杨参谋长的四川话抑扬顿挫："我们的大炮打过去啦！激起的水柱子有几丈高哇！现在我们开始渡江啦！"第十一军出发前，江北的出击地热闹非凡，宣传队员用松枝搭起一座"凯旋门"，突击队员们一一从门下通过。炮兵把炮口摇起来，喊："保证步兵老大哥打过长江！"军乐队手中的乐器闪闪发光，炮火准备的第一发炮弹刚一出膛，他们就猛劲吹奏起了《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突击队的船只冒着敌人的炮火冲向南岸，钢盔和圆锹都是奋力划水的工具，不断地有船只被击沉，官兵们利用简易救生器材在水浪中奋力游泳，枪声和炮声撼动着大江两岸。第十五军船到江心时，敌人打下一连串照明弹，炮弹随即落在明亮的江面上，军长秦基伟对十四师师长向守志喊："告诉第一梯队对准目标，掌握好方向，个把船漂下去无碍大局。第二梯队按计划起渡，成败在此一举，一定不能犹豫！"一三一团一连四班的船被炸出个窟窿，江水开始往船里灌，战士们拼命往外淘水，已经负伤的副班长赵强把缆绳拴在自己的腰上，跳入被炮火炸得上下翻腾的江水中，然后不顾一切地向南岸游去，一上岸，赵强就转过身来将船一点一点地拉上岸。零点将至时，第十五军十四师第一梯队官兵全部登上长江南岸。

二十一日夜，第二野战军突击部队先后渡过了十六个团，控制了长约一百公里、纵深约十公里的登陆场。第二天拂晓，第四兵团指挥部渡过了长江，司令员陈赓后来记述道："晨光熹微，鱼贯如船，微风南送，疾驰如飞。不一时，船登彼岸，踏上了江南大地，当时满怀兴奋，不可言喻……"

西突击集团渡江的同时，东突击集团第三野战军第八、第十兵团在长江下游也开始了突击。

行动一开始就出现了意外。

渡江作战发起前一天，第二十军渡江出发地泰州以南口岸附近的江面上，突然闯进来一艘英军军舰。这艘名为“紫石英”号的护航驱逐舰，配备有四英寸前后主炮六门和数门高射炮。英军军舰不顾警告，逐步进入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炮兵第三团的防区，并且突然开炮射击。炮兵第三团立即还击，炮弹雨点一样准确地落下来，“紫石英”号的炮塔被击毁，指挥台被击中，舰长斯金勒少校死亡，副舰长威士敦上尉负伤。“紫石英”号因航线失控，向南岸靠近时搁浅，军舰被迫挂出了一件白色的衬衫。下午，原本停泊在南京的英军驱逐舰“伴侣”号赶来增援，结果依旧招致猛烈的炮击，来自长江北岸的榴弹炮弹，穿透了“伴侣”号的联装主炮，舰长罗伯臣中校受伤，“伴侣”号急忙转舵驶往江阴。

就在这一意外酿成外交事件的时候，第二十军的渡江作战开始了。江面上大风骤起，第一梯队五十八师的船被江浪所阻，在内河河道内无法全部拖出来，最后第二十军不得不取消五十八师的作战任务，改由师预备队六十师跟随五十九师渡江。五十九师也出师不利，第一梯队一七七团的船因大风失去控制被水浪冲散，其中二营和三营的船连同船上的官兵一起被吹走，不但与师、团两级失去了联系，而且他们竟然随风飘过了长江，于午夜在南岸的德胜港和铁皮港附近登陆。天亮的时候，成功登陆的五十九师的一七五、一七六团在南岸艰苦地巩固滩头阵地，后续的六十师只过去了一个团又两个营。

第二十三军在距离渡江时间还有两个小时的时候，攻击部队的正面江面上再次出现两艘英国军舰。“紫石英”号受伤搁浅，“伴侣”号受伤逃走，在香港的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和英国外交大臣、海军大臣紧急磋商后，决定派遣正在上海访问的“伦敦”号和“黑天鹅”号一起，在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副司令梅登中将的率领下，再次救援“紫石英”号。“伦敦”号是一艘排水量七千吨的巡洋舰，装备有六英寸前后主炮十二门，四英寸副炮八门，四十毫米高射炮十余门。二十一日上

午，两艘军舰驶过第三野战军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军阵地前的江面，然后全速驶入第二十三军的防区。第二十三军六十八师二〇二团和六十九师二〇五团在英舰的炮击中损失严重，二〇二团团长邓若波被炸死，政治委员陈坚负伤，全团受伤者达四十多人。特种兵纵队炮兵第六团和第二十三军的炮兵开炮还击，“黑天鹅”号多处起火，“伦敦”号指挥塔被击中，舰长卡扎勒负伤，梅登的将军服也被飞溅的弹片撕裂，两艘英舰仓皇驶向长江下游。

“这一事件意义极其重大”。外国记者报道说，“三十年前，只要有英国军舰在长江出现，就足以使中国内战的战局顿时改观。如果二十年以前发生这样的事件，停泊在中国沿海的所有外国军舰就会纷纷开进长江教训那些不安本分的中国人。各国使节也会严厉要求中国赔礼道歉，外国报刊也会喧嚣鼓噪要求进行报复……可惜现在不是一九二九年而是一九四九年了。”

东突击集团开始大规模渡江。二十一日午夜，第二十三军攻占王坍港、天生港、下三圩港和桃花港；第二十八军攻占徐村、朱家垫、新老沟；第二十九军攻占石碑港长山北麓。第十兵团的第一突击梯队建立起正面宽五十公里、纵深长十公里的滩头阵地。第八兵团第二十军二十二日占领扬中岛，二十三日登上长江南岸。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军也于这天早晨占领镇江与浦口。

就在东突击集团打响渡江战役之际，二十二日凌晨三时，国民党军江阴要塞守军宣布起义。江阴要塞东临上海，西临南京，控制着二十多公里的长江江面，是护卫南京的重要的江防门户，国民党军设有炮兵总队、守备总队、游动炮团和工兵营等部队。早在一九四七年，共产党人就开始在江阴建立地下组织，专门从事要塞的策反工作。这一年的秋天，地下党成功地在要塞守军中发展了三名中共特别党员，至要塞起义之际，这三名特别党员的职务是：江阴要塞炮台总台长、

江阴要塞工兵营长、江阴要塞步兵总队长。最后，江阴要塞参谋长也成为中共特别党员。渡江战役发动前，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派出得力干部打入要塞，适时加强了起义领导力量。江阴要塞的起义，让扼守长江下游咽喉部位的战略要地落入人民解放军手中。

新华社长江前线二十二日二十二时电：

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从一千余华里的战线上，冲破敌阵，横渡长江。西起九江［不含］，东至江阴，均是人民解放军的渡江区域。二十日夜起，长江北岸人民解放军中路军首先突破安庆、芜湖线，渡至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港地区，二十四小时内即已渡过三十万人。二十一日下午五时起，我西路军开始渡江，地点在九江、安庆段。至发电时止，该路三十五万人民解放军已渡过三分之二，余部二十三日可渡完。这一路现已占领贵池、殷家汇、东流、至德、彭泽之线的广大南岸阵地，正在向南扩展中。和中路军所遇敌情一样，我西路军当面之敌亦纷纷溃退，毫无斗志，我军所遇之抵抗，甚为微弱。此种情况，一方面由于人民解放军英勇善战，锐不可挡；另一方面，这和国民党反动派拒绝签订和平协定，有很大关系。国民党的广大官兵一致希望和平，不想再打了，听见南京拒绝和平，都很泄气。战犯汤恩伯二十一日到芜湖督战，不起丝毫作用。汤恩伯认为南京江阴段防线是很巩固的，弱点只存在于南京、九江一线。不料正是汤恩伯到芜湖的那一天，东面防线又被我军突破了。我东路三十五万大军与西路同日同时发起渡江作战。所有预定计划，都已实现。至发电时止，我东路各军已大部渡过南岸，余部二十三日可以渡完。此处敌军抵抗较为顽强，然在二十一日下午至二十二日下午的整天激战中，我已歼灭及击溃抵抗之敌，占领扬中、镇江、江阴诸县的广大地区，并控制江阴要塞，封锁长江。我军前锋，也已切断镇江无锡段铁路线。

长江天堑，一苇可渡。

此前，长久地缠绕在解放军官兵心中的关于长江的激流巨浪、南岸敌人的坚固工事和猛烈炮火，江面上可以轻易将帆板木船撞翻击沉的国民党军军舰等等，所有的预想在他们双脚踏上南岸那湿润的土地时，便都已成为过去。长江这条巨大的河流水流平稳，强劲的江风正好鼓满了船帆，敌人的防御工事根本不足以阻挡登陆冲击，而国民党军岸炮的火力强度与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毫不匹配。防守长江南岸的国民党军一触即溃，解放军先头渡江部队除了看见他们逃跑的背影之外，很少能够看清他们的面孔。国民党军海军的舰艇不是在解放军的渡江炮火准备中受伤，就是被江面上暴雨一样投出的手榴弹吓得掉头

就跑。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军海军共有九十七艘舰艇投诚起义，其中包括最大的主力巡洋舰“重庆”号和海防第一舰队旗舰“长治”号护航驱逐舰。渡江战役进行中，驻泊镇江的国民党军海军第三机动艇队的二十三艘舰艇和驻泊在南京以东江面上的海防第二舰队的九艘军舰和二十一艘舰艇起义，成为国民党军海军最大规模的倒戈，令蒋介石企图用舰艇封锁长江江面的作战计划顿时化为乌有。

二十二日清晨，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第三十五军一〇三、一〇四师抵近与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仅一江之隔的浦口，官兵们已经能够清楚地看见南京城的轮廓了。侦察科长沈鸿毅奉命率领侦察连官兵首先过江，军政治委员何克希对沈鸿毅的指示是，首先攻占总统府和国防部第二厅（情报厅）。

长江上的炮声令南京陷入混乱。

国民党军的城防部队已无影无踪，南京的警察也把制服脱下来不知躲到哪去了。随着各种权力行政部门的纷纷南迁，街头那些华丽的小汽车消失了，官员们居住的新旧洋房均朱门深掩，剩下看房子的仆人们在绿草如茵的院子里议论着街面上越来越耸人听闻的消息。美国人曾夸奖蒋介石是“中国的一种建设性力量，因为他振兴了人民的道德”，但是，此刻蒋介石所“振兴”的“人民的道德”得到了验证。南京城的大规模骚乱开始了：国民党高级官员的豪华官邸首先遭到洗劫，衣衫褴褛的平民“爽朗地笑着，互相间呼叫着，欢天喜地地到处拿别人的东西”。从战场上溃败下来的国民党兵拥入南京城，他们把沙发、地毯和所有的家具从一座座豪宅的窗户上扔下来，然后用牲口大车或人背肩扛地运走。国民政府行政院的每一座办公大楼，都被仔细地搜索了一遍——“一个笑眯眯的士兵，枪也不要了，一只手拿着一盏台灯，小心翼翼地往外走。一位老妇人，灰白的头发向脑后绾成一个发髻，身穿一件破烂黑色大襟衣服，手中拿了四块精致的刺绣坐垫，颤悠悠地

迈着那双按旧习俗裹成的小脚，喜不自禁”。南京机场更是陷于秩序的空白，几十架军用和民用大型飞机正忙着装货，“一个国民党军将军扯着嗓子命令士兵将他的大钢琴和其他家具搬上一架空军飞机”。“立法院的委员们正排队登上另一架飞机，他们中间有人戴着适合南方气候的软布帽，还有一两个人带着网球拍”。并不是每一个国民党大员都能够顺利出逃，国民党南京市长邓杰带着市政府金库里的三亿元金圆券逃跑时，被他的私人司机和卫兵痛打了一顿，被打断双腿的邓杰再也无法逃往任何地方了。黄昏，长江边的军火库和油库爆炸着火，接着立法院的黄色大楼也着火了。浓烟滚滚中，城内的外国记者纷纷跑向南京饭店，据说一个临时成立的“治安维持委员会”正在那里开会。待记者们穿过满城拥挤的难民和溃兵赶到时，“看到委员们正围坐在餐厅里的小饭桌旁，一边饮茶一边构思着欢迎共产党的标语口号”。其中有一位漂亮的女孩，“上身的卡其布衬衫外套了一件棕色的男式毛衣，袖子挽得高高的，正坐在一位戴眼镜的男子旁边”。记者们听到他们在商量：“明天早上，我们准备派出一个代表团，由西北门出去，把共产党领进城。”

南京临时治安维持委员会给毛泽东发出了一封电报：

> 毛主席勋鉴：
>
> 南京守军于二十三日撤退。南京人民为安全计，联合发起各界组织治安维持委员会，推青苑为主任委员，贻芳为副主任委员，及委员十三人。地方尚称稳定。恳请电饬京陵外围野战军，对南京予以和平接收，以慰民望。何日入城，并请电示，以便欢迎。南京治安维持委员会主任委员马青苑，副主任委员吴贻芳及委员等同叩梗酉。

马青苑，国民党军退役将军；吴贻芳，金陵大学校长。

二十三日凌晨三时，几名外国记者乘坐一辆民用吉普车向南京西北门开去，在离西北门还有约一公里的地方，几道手电光突然射来，吉普车被拦截下来：“什么人？干什么的？”当解放军战士听说他们是法国和美国的记者时，惊呼：“美国人！美国人！”然后他们仔细打量

着这些外国人的脸，说：“你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三野战军第三十五军一○三师侦察连已进入南京城。

此时，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已经离开南京。

二十二日早晨，人民解放军大举渡江的时候，李宗仁与何应钦、白崇禧分乘三架专机飞往杭州面见蒋介石，四个人坐在沙发上谈了一两个小时，对于危在旦夕的处境没有作出任何实质性的决策，只有蒋介石表态说，对于今后的任何作战计划他都完全支持。傍晚，白崇禧飞回汉口，何应钦飞往上海，李宗仁则飞回南京。这是一个凄凉的晚上，没有任何电文需要处理，也没有任何事情需要决断，李宗仁孤独地坐在办公室里，听着远处越来越清晰的炮声，为自己的何去何从苦思冥想。共产党方面曾让人带话，让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甚至说必要时他可以调桂系的一个师进入南京保护他的安全；共产党方面还承诺，如果南京受到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攻击，李宗仁只要能守一天，解放军就可以赶到增援他——毛泽东认为，在最后时刻，李宗仁不会选择蒋介石而会选择共产党。二十二日夜，解放军迫近南京城郊，汤恩伯的电话打来了，说机场很快将被封锁，再不走就走不了了，“务必请代总统至迟于明日清晨离京”。二十三日清晨，李宗仁乘车前往机场。飞机起飞之后，在南京上空盘旋两圈——“东方已白，长江如练，南京城郊，炮火方浓”。李宗仁对机组人员说：飞桂林。

李宗仁以离开南京的方式拒绝了共产党方面的合作愿望。

同时，他以代总统的身份离开，标志着国民党政权在中国的统治就此结束。

二十三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一〇三师侦察连冲进南京国府路（今长江路）上的总统府大楼，侦察员徐传翎进入蒋介石的办公室，屋子里面黑乎乎的，他打开电灯看见了办公桌、笔筒、茶杯，还有一本悼念黄百韬的纪念册。侦察员魏记善、何鹏跟着进来了，他们与徐传翎一起，每个人都在蒋介石那把能够转动的座椅上坐了坐。总统府大楼外，侦察员卢登秀、王安滋爬上总统府门楼，扯下了已经被冲锋枪打破的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

太阳升起来了，照耀着南京城，照耀着紫金山，照耀着向中国大陆的东方奔流而去的长江。

西方记者评论道：

南京的易手在军事上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但却具有十分重大的政治意义。这座离海二百三十五英里、位于长江岸边的拥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二十年来一直是中华民国的象征。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孙中山就是在这里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一九二九年，蒋介石就是在这里建都，以此为剿共战争大本营的。当时，共产党还只是孤处华南的一支小小的游击队。当年的这些游击队发展壮大，今天成了四百万雄师，攻占了蒋的首都，而蒋竟无还手之力。这就说明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解放军的大部队进入南京城，南京市民把茶水倒进他们从皮带上解下来的碗或瓷杯里，中央大学的学生已经会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工人、市民、店员手持自制的小红旗拥挤在街道的两旁，一位穿着讲究的青年妇女，怀抱一个婴儿站在欢迎的民众中间——“她叫丁明俊”，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回忆说，“从一九四八年以来，她就冒着生命危险，协同在国民党军国防部供职的丈夫，精细安排，巧妙伪装，曾多次掩护我地下党的领导人和联络人员，并一次次将重要情报藏在婴儿的襁褓之中送给党的组织”。此刻的她，“俊俏白皙的脸上泛着红润，漂亮的大眼睛里含着激动的泪花”……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 榴花原是血染红

一九四九年四月，与摧毁蒋家王朝的渡江战役同时发起的，是人民解放军对阎锡山堡垒式的巢穴太原城的最后攻击。

华北军区野战兵团对太原的攻击与围困已长达六个月。

久攻不下导致的严重伤亡令解放军官兵对这座城市恨之入骨。

一九四八年七月晋中战役结束后，中央军委致电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周士第，要求他们“以尽可能短促时间完成攻城准备”，“争取于十天内外夺取太原”。但是，第一兵团在晋中战役中伤亡很大，难以连续作战，徐向前和周士第要求太原战役以“围困、瓦解、攻击、逐步消弱”为原则，在包围太原的同时部队进行必要休整，将发起攻击的时间后延至十月十八日，“争取三个月内”结束战斗。中央军委表示同意。

华北军区第一兵团五月才刚刚成立，晋中战役后全兵团千人以上的团仅有两个。除辖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旅的第八纵队和辖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旅的第十三纵队是老部队外，辖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旅的第十五纵队是刚从地方武装升级组建的。兵团兵力不很充实，武器也有些简陋：每个连平均有步枪九十支、轻机枪六挺；

每个团有八十二毫米迫击炮六门；每个旅有山炮四门、一百二十毫米迫击炮六门；每个纵队有山炮四门，一百五十毫米迫击炮四门。兵团的总兵力为七万七千九百人。加上支援他们作战的华北军区炮兵第一旅和西北野战军第七纵队独立十、十二旅，再加上归七纵指挥的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独立第七旅、第三纵队独立第三旅以及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二旅，准备对太原实施攻击的总兵力为十一万五千人。

晋中战役后，为了守住最后的堡垒太原城，阎锡山迅速补充损失的兵员，组建了第十、第十五两个兵团。其中第十兵团以王靖国为司令官，辖第十九、第三十三、第四十三军；第十五兵团以孙福麟为司令官，辖第三十四、第六十一军。同时，蒋介石还给阎锡山空运来第三十军黄樵松部四个团和八十三旅沈湛部三个团，共计两万多人，由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孙楚直接指挥。加上太原绥靖公署下辖的独立第八、第九、第十总队，炮兵师、工兵师以及冲锋枪团、飞雷团和列车作战部队等，再加坚贞师、铁血师、神勇师等非正规部队，太原守军总兵力达十五万。

虽然太原已成孤城，但阎锡山的看法是："共产党凭的人多，用的是波浪式冲锋的人海战术，所以到处取胜，谁防不住这一手，谁就要失败。我们一定要凭借碉堡群组成的据点工事，充分发挥火力，做到以铁弹换肉蛋，共产党就没有办法。"阎锡山打算在太原周围修建一万个碉堡，而碉堡的种类与他的性格一样古怪复杂：高低上有一层的、两层的和三层以上的；质材上有砖砌的、石砌的、砖加水泥的和钢筋水泥的；形状上有高碉、低碉、人字形、十字形、圆形、三角形、六角形、宝塔形，顶部有尖顶、平顶和圆顶；功能上有杀伤碉、伏地碉、警戒碉、侧射碉、好汉碉、半径碉；兵力配备上有半班碉、班碉、排碉、机枪碉和炮兵碉；作用上有面向四周的、面向两侧的、反向射击的——名为"没奈何碉"；分布上有品字形、菱形、梯形和梅花形。凡此种种，都是阎锡山坐在家里，用文明棍在地上画出来的。他

画出一个样子来，就让侍从参谋照着画成图样，然后立刻交付施工。施工完毕令各部队派代表参观，回去照着样子大量修建——“这完全是阎锡山幻想的产物，并非由经验或试验而来”。懂得军事工程的军官对阎锡山古怪的设计提出不同意见，比如根据一般的军事原理，高碉目标和死角都很大，并不适合作战。这下子阎锡山生气了：“真是些书呆子，根本不认识共产党！共产党既会说话又会组织，能把死人说活，能把民众全组织起来，能叫小脚妇女打冲锋，用的是人海战术，前赴后继，一波跟一波，一浪跟一浪，徒手上来，夺你的机关枪，你有多少子弹，能打死这些不怕死的人？只有深沟高垒，使他爬不上来，然后用手掷弹手雷消灭他，才能守住阵地。”

由此，阎锡山称他的太原为“可抵一百五十万军队”的碉堡城：“我们今日的碉堡及一切工事，可以说就够个不失败的阵地了。降一等说，我们的碉堡工事，够一个杀十个；我们的枪炮弹，可有杀伤一百五十万敌人的火力。只要大家不滥发，我们更属保险。”一位当时进入太原的美国记者惊叹道：“任何人到了太原，都会为数不清的碉堡感到吃惊，高的、低的、长的、圆的、三角形的，甚至藏在地下的，构成了不可思议的严密火网。”

太原位于晋中盆地北部，东倚罕山，西临汾河，南接平川，北靠丘陵，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以各式碉堡为核心，阎锡山构筑了一个由前进阵地、外围要塞和城垣主阵地组成的城防系统。每个据点都有众多的子母堡和屯兵所，堑壕、交通壕、坑道、鹿砦、铁丝网、电网等构成交织火力网，既可独立作战，也能相互支援。众多的坚固据点，最终形成的是一个巨大的环形防御体系，北起青龙镇、曲阳，南至武宿、小店镇，西起石千峰，东至罕山，周长百里，控制着太原周边全部交通要点和制高点。阎锡山还修建了环城铁路以利兵力机动。

喜欢制造理论的阎锡山，给太原防御作战计划起名为“总体战”。他下令成立“总体行动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人力、物资、运输、食粮、治安、宣传、慰劳、救护、房管、救济等十余个部门。随后，他为“总体战”亲自制定了“十二条行动纲领”——这是一堆内容杂乱、措辞生僻的奇思怪想：

> 战斗城以太原城的要塞圈为起点，其范围内所有男女成员，均须编组起来，直接间接向战斗目标努力，建立起地利上的工事坚固阵地，与人民的坚强意志的团力，尤须提高旺盛的自学互学精神，严密的管理政治生活行为，彻底执行铁的纪律，使战斗城成为严密的民众学校，保证战斗城的任务圆满完成；战斗城的成员养成亲爱互助、忠贞团结、上下一致的整体团力，并以进步的斗争作风，保证不懦、不懒、不偷及永不变节的革命本质；彻底划清国家与国家敌人，坚决地铲除国家的敌人，使战斗城范围内，皆为国家的成员，没有一个伪装，没有一个两面人，建立起与国家的敌人不并立的精神；实行精兵政策，确定选官练兵，加强杀敌技能，紧密军中战斗空气，提高杀敌企图，一切为了前线，一切支援部队，作到守必固，攻必克；实施兵农政治，组成生活、生产、战斗合一的体制，紧密社会政治空气，选训种能干部，发挥说服感化的种能功效，壮大开展力量；战斗城范围内的战斗成员，无一人不劳作，且无论是精神劳作，均须每日每人二小时［或每周一日］的建设劳动，实现以企图支配身体，以物质表现力量；战斗城内，实行历史上的战斗经济，在只求共生、不谋私蓄的原则下，以劳动结果的生活剩余，增加再生产的资本；实行人物管制，凡有害战斗城的人物往来，绝对管制，无益于战斗城的人物来往，相当管制；普遍实行军训，统一戡乱认识，集中戡乱力量，加强杀敌技能，以适应战斗城的战斗需要，加强青年及儿童战时教育，培植革命新生力量，新闻报章以报导剿匪杀敌，推崇战斗英雄、劳动英雄、加强宣传、揭发匪军阴谋为重心，并实行娱乐机会均等，以激励战斗情绪。

果然，太原城所有的男女老幼都被编入作战组织。其中由壮丁和学生组成的甲级和乙级参战队的任务是参军、做工、肃伪、运输、担架、守城、守碉；老年助战队的任务是担架、运输、做工和守护；妇女助战队的任务是缝洗、看护、募捐、慰劳和炊饮；少年助战队的任务是传话、宣传、歌咏和募捐。阎锡山对自己的创想很满意，他说这是“满天星的布置”：“一旦有事，关上大门，一起上房，院守院，街守街，成了天罗地网。”

为了向世人表明自己与太原共存亡的决心，阎锡山在绥靖公署举办了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会场的门口摆放着一口棺材，会议桌上摆

放着五百多瓶毒药——“我阎锡山决心死守太原，如果失败，我就和我的军官们饮此毒药，同归于尽”。外国记者们目瞪口呆，阎锡山看着乐此不疲，他特意向记者们介绍了一位站在他身边的日本人，并着重让记者们观看了这个日本人佩戴的手枪，阎锡山说他的任务就是在最后时刻把我打死——“这个任务，非日本人不可，我的侍从们是无勇气下手的。”

长期与阎锡山部周旋作战的解放军官兵知道，他们面临的是一场必须付出巨大代价的战斗。与阎锡山同为山西人的徐向前因此出言谨慎：“首先争取一直连续地打下去，在最快时间内全歼敌人是上策，先打再围带打而下之即消耗较大是中策，下策即必须增加力量再攻下之，即影响别线作战，只是最后之一途。”

战役预定发起时间是：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八日。

解放军正在进行作战准备的时候，太原守军受到济南城失守的震撼，十月一日，七个师突然分三路出城抢粮。华北军区第一兵团立即决定趁敌人出城之际提前发起太原战役。

然而，拿下太原城的作战，其时间持续之长和付出代价之惨烈，还是出乎出言谨慎的徐向前的预料。

五日，战役开始。第八、第十三纵队迅速包围驻守在太原城南小店镇附近的暂编四十四师及七十二师的一个团，同时还包围了小店镇东南黑窑地区的暂编四十五师及南畔地区的暂编四十九师的两个营，并于六日清晨全歼该敌。晚上，第十三、第十五纵队配合，对南黑窑东北方向的武宿地区发起攻击，由于没有切断敌人的退路，大部敌人乘铁甲列车撤退，部队攻占了武宿机场。在太原城北，七纵独立十二旅和警备第二旅攻占李家山高地，以炮火控制了新城机场。但是，要想攻下太原，必须首先攻占城东的东山防线。东山是护卫太原城的天

然屏障，南北长八公里，东西宽十五公里，主峰高出太原城五百米，可以俯瞰整个太原城区，自北向南并列有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和山头四大要塞。由于解放军的攻城战从城南发起的，阎锡山的兵力已被吸引到太原城防的南线，东山防线上兵力薄弱。

十日，重病中的徐向前从西柏坡回到太原前线。

十五日，攻击东山的战斗打响。

东山柳沟村地下党支部书记赵炳玉来了，他告诉徐向前，东山的东北方向有一条山间小路，只要部队隐蔽前进，可以直插牛驼寨要塞的纵深。七纵沿着这条小路到达敌人阵地核心部位，连克九座碉堡，顺利攻占牛驼寨要塞大部，歼灭守军一个团。十五纵则自东向西，首先攻占东山东南方向的重要阵地石嘴子，然后与七纵一起切断了东山与太原间的联系。虽然十三纵在攻击山头要塞的外围据点马庄时受阻，但东山的大部分阵地已被占领，太原城已在第一兵团官兵的眼下。

二十一日，阎锡山发动了坚决而猛烈的反击，上百门山炮、榴弹炮“一天内即发射炮弹一万多发”，七纵占领牛驼寨后修建的阻击工事全部被毁，坚守阵地的七旅十九团因严重伤亡而后撤，牛驼寨阵地失守。

为了再次攻占四大要塞，第一兵团集中兵力和火力，重新调整了攻击部署：七纵再攻牛驼寨，八纵攻击小窑头，十五纵攻击淖马，十三纵攻击山头。

二十六日，对攻战再次打响，双方都投入了巨大兵力：第一兵团先后有二十七个半团投入战斗，而阎锡山部除了守城西、城南和城北

的五个师外，其余部队全部投入到东山战场。重兵交火，战斗空前惨烈。

淖马要塞距离太原城两公里，由十余个阵地相连组成，主阵地修在山顶，四周有五层劈坡，守军为国民党军第三十军和独立第八总队各一部。十五纵投入四十三旅一二八团全部和一二九团的两个营攻击主阵地，四十四旅一部和一二九团的一个营左右迂回，一二七团为预备队。敌人在执法队的督战下顽强抵抗，十五纵多次攻击未果。入夜，爆破队员连续爆破后冲上第一层劈坡，在第二、第三层劈坡间与守军对峙。天亮后，一二九团接着爆破，终于突进敌人的主阵地。接下来的两天，阎锡山部以四千人的兵力，在炮火的掩护下连续发动反击，负责坚守阵地的一二七团官兵以交叉火力夹击敌人。侧翼迂回的四十四旅经过艰苦作战，从主阵地以西突破了敌人的防线，一二七团则在五个小时内连续爆破，攻克了要塞上的高大炮碉。阎锡山威逼守不住要塞军法从事，守军独立第八总队司令赵瑞不得已率部起义，淖马阵地最终被十五纵占领。但是，淖马要塞位于牛驼寨与山头两要塞之间的突出部，不利于坚守。阎锡山命令第十九军军长曹国忠率部反击，淖马要塞再次失守。十五纵连续发动三次反击，激战三天才又重新夺回失去的阵地。

阎锡山对赵瑞的阵前起义是十分恼怒，下达了“当场打死倡议投降者”的命令，并让各部队每天向他汇报一次官兵的政治情绪。然后，他将史泽波的“奋斗团”派上来据守淖马要塞——史泽波本人和“奋斗团”的军官全是在上党战役和晋中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后释放的，回来之后经过了阎锡山残酷的“洗脑”训练。

十三纵负责攻击的山头要塞，是距太原城五公里的一串高大的丘陵，四周有劈坡二至六层，每层高四至六米。守军为阎锡山部独立第九总队全部、七十三师一个团、暂编三十九师和独立第八总队各一个

营。十三纵的炮火准备开始后，敌人躲进避弹坑或窑洞，当炮火转移步兵发起冲锋时，敌人用手榴弹和燃烧弹阻击冲击的第一梯队，用炮火封锁跟上来的第二梯队。三十八旅向山头主阵地发动的攻击连续受挫，兵力从一个团逐渐增加至三个团，战斗依旧难以取得进展。在阎锡山的请求下，蒋介石将整编第十师八十三旅（后改称八十三师）四千五百人由榆林空运到太原，阎锡山立即命令该部接防山头要塞。十三纵三十八旅再次组织三个团实施攻击，除一一三团攻占了五号阵地外，一一二、一一四团攻击失利。三十七旅接替伤亡严重的三十八旅后继续攻击，最终攻克山头要塞。

八纵攻击的小窑头要塞，位于太原东门外四公里的山岭上，由一至十五号阵地组成，四周劈坡高达十米，劈坡上建有坚固的钢筋水泥堡垒。守军为阎锡山部暂编四十五师一个团、独立第十总队的一个连和保安第六团一部。攻击发起后，八纵二十四旅和二十二旅六十四团连续攻占了一至六号阵地，第二天又连续攻占了八至十五号阵地。这种似乎不太正常的顺利，即刻引起八纵指挥员的警惕。果然，敌人在炮火的掩护下发动突然反击，三个团的兵力蜂拥而上，随着炮弹一起落下的还有燃烧弹和毒气弹，刚刚占领阵地的二十四旅官兵被迫全线撤退。撤退时，七十一团三营据守的阵地受到左右夹攻，整整七个小时的激战中大部分官兵伤亡。特务连长赵全福用一挺机枪拼死掩护团部撤离直至鲜血流尽。七十一团团部也只撤出来团长、参谋长等十七人。在随后的拉锯战中，八纵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旅全部投入战斗，六个昼夜之后，小窑头各阵地相继被重新攻克。

七纵攻击牛驼寨的战斗更为激烈。牛驼寨位于太原城东北五公里处，是个能屯兵五千人的巨型要塞，由三个集团阵地和十座主碉堡构成，四周的劈坡有十一层之多，守军为独立第十总队主力和六十八师。七纵的攻击数次失利，随后投入独立第三旅和独立十二旅。苦战四天之后，独立第三旅攻占七号碉堡，独立十二旅攻占三号、八号、

十号碉堡，并迫使二号碉堡守军投降。孤立的九号碉堡守军闻风而逃。但是，敌人很快就组织起反击，战场执法队上了前沿，炮兵发射了大量毒气弹，独立十二旅不但正面压力巨大，而且由于五号、六号碉堡尚未攻占，敌人卡在独立十二旅的退路上。七纵组织力量猛攻五号、六号碉堡，经过近二十个小时的血战，终于将两座堡垒拿下。敌人全部退守四号指挥碉堡，依据有利地形顽强据守，七纵经过九次爆破和五次强击，最终攻克四号碉堡，占领牛驼寨要塞。

太原四大要塞攻防战，是国共两军战史上的一场惨烈战事。东山上的每一个据点、每一座碉堡都经过了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残酷过程，每一个面积不大的阵地上，每天都要受到至少八百门火炮的轮番轰击，陡坡上已无法重新建构工事，只能用战场上的尸体堆积防护掩体。阎锡山部攻击凶狠，防御顽强，在督战队前面官兵作战几近疯狂。徐向前部无论兵力还是装备都处于劣势，官兵流血牺牲，前仆后继，昼夜厮杀，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战斗接近尾声的时候，总指挥徐向前旧病复发，胸部大量积水，胸腹间剧痛难忍，他躺在担架上就是不肯后撤，前沿官兵的巨大伤亡令他彻骨心寒。战事暂时平息之后，东山上各主要阵地焦土厚达一米，战死的官兵尸体交错叠摞。

此战，阎锡山部损失兵力万余，徐向前部伤亡八千五百余人。

争夺太原外围四大要塞的战斗还在进行的时候，一个令人心惊的消息传来：策反国民党军第三十军起义的秘密行动暴露，潜入太原城内的第一兵团第八纵队参谋处长晋夫下落不明。

国民党军第三十军，前身为西北军嫡系部队吉鸿昌部。一九三一年被蒋介石收编为第二十二路军，一九三一年第二十二路军被改编为第三十军。该军先后参加对鄂豫皖苏区、湘鄂川黔边苏区的“围剿”作战，抗战期间参加过徐州会战、武汉会战、豫南会战、常德会战等。内战爆发后，一九四六年上半年，国民党军整编时，第三十军改编为

整编三十师，下辖三个旅，分别驻防山西翼城、河南洛阳和山西垣曲。一九四八年七月下旬，该师紧急空运太原，隶属阎锡山的太原绥靖公署，恢复第三十军番号，奉命防守太原城，军长黄樵松。

黄樵松，号怡墅，时年四十五岁，河南尉氏县人，自幼家境贫寒。一九二二年参加冯玉祥部学生团，后在西北军第四十三军高树勋部任团长、旅长和师长。抗日战争中，率部与日军血战北平琉璃河、山西娘子关、山东台儿庄等地，与联合抗日的共产党人关系良好，曾对进入他的部队宣传抗日的共产党人表示：“你们回到延安，请对毛主席说，我将来要走延安的道路。”内战爆发后，黄樵松出任第三十军副军长，在运城、临汾等战役中饱尝打败仗之苦。因此接到空运太原的命令时，他拒绝从命，说阎锡山有本事就让他自己打吧！胡宗南多次派人劝说，黄樵松才勉强成行。临行前他对友人说：“厮杀半生，如今还要打内战，国家何日得安宁，人民何日得苏生！”一九四八年十月，黄樵松被任命为第三十军军长，率部驻守太原城北郊。

黄樵松刚到太原不久，便接到在邯郸战役中起义的老上司高树勋的信：

……今太原孤城果何所恃乎？以言待援，千里之内无兵可援；空中运输，机场已被控制。你们出城反扑数次，损兵折将，防御圈日渐缩小，太原解放定然为期不远。一旦城破被俘，其境况如何？临汾之役三十旅的覆没可谓殷鉴。弟等何以踏此履辙，应三思之。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还不早下决心，尚待何时？人家亲信部队郑洞国，在危急之时不听蒋之乱命，自动放下武器。你们为的什么？有何代价？况我西北军历来是革命的，在蒋贼分化欺骗收买之下，部队部分地走向崩溃，多数干部流离失所，无法生活者比比皆是。回忆过去能不痛心……

高树勋在信的最后特别附注：“一、见信后，速派负责人员来取联络。如须我去时，我可到你附近商谈。二、我保证你们起义后原番号、原部队仍予保留。三、我们可大胆地与人民解放军配合，直取太

原，活捉阎锡山，为人民除害，为国家立功。如捉阎有困难，可将防地让与解放军，将部队开到另一地区休整，以备将来之用。”

黄樵松不断地给旧友同僚打电报，探寻吴化文在济南起义后的情况，探寻共产党人是否守信用，他得到的回答都是肯定的。

十月三十日，黄樵松派他的谍报队长王正中、谍报员王玉甲手持他的亲笔信从东山前线出走，到达华北军区第一兵团第八纵队司令部。徐向前得知消息后，立即派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前去办理此事，并将高树勋连夜请到第八纵队司令部，以会商第三十军起义之事。黄樵松在信中表示：“为了拯救太原三十万父老兄弟姐妹出水火，我决心起义，站到人民和正义这方面来。”同时，黄樵松提出四个条件：起义后黄本人参加山西省政府组织；保持原部队和原番号；得到补充和休整；部队暂不调到别地。胡耀邦表示可以同意。最后，双方商定了起义办法：“解放军攻取太原时，第三十军交出防守的大小东门，放解放军顺利进城，第三十军即撤到城外集结，进行补充整编。”

十一月二日，徐向前亲自致信黄樵松：

樵松军长勋鉴：

来函收悉。贵军长为早日解放太原三十万人民于水火，拟高举义旗，实属对山西人民之一大贡献。向前当保证贵军起义后仍编为一个军，一切待遇与人民解放军同。惟时机紧迫，为更缜密计，事不宜迟。至于具体问题，兹特请高总司令树勋将军，并派本军政治部主任耀邦，来前线代表向前全权进行商谈。

专此即颂军祺

徐向前 启

十一月二日

谍报队长王正中表示，需要有人直接进城区与黄军长面商落实起义之事。

胡耀邦请示徐向前要求亲自进城，徐向前没有同意。

最后，第八纵队选定的是纵队参谋处长晋夫。

晋夫，又名靳甫，时年三十一岁，河南洛阳西吕庙村人。一九三七年参加八路军，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赴延安学习参谋业务。历任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参谋、参谋科长、军分区参谋主任和纵队参谋处长等职。

胡耀邦对晋夫说：“晋夫同志，组织上考虑来考虑去，认为你去执行这个任务比较合适。这个任务是深入虎穴，要同敌人斗智斗勇，环境复杂，任务艰巨，可能还有生命危险。”晋夫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只要党需要，为人民牺牲自己也心甘。”参谋们为晋夫准备了简单的行装，然后看着他换上便衣，把入城路线图和一块旧怀表揣在口袋里。八纵的领导都来为晋夫送行。高度近视的司令员王新亭摸了摸晋夫单薄的衣服，把自己身上的毛背心脱下来，看着晋夫穿在身上。晋夫在大家的注视下走上了可以俯瞰太原城的那道山梁。

太原城外的解放军指挥员并不知道，此时的太原城内已经发生变故。

三日早晨，黄樵松为了全军顺利起义，将起义计划告诉了二十七师师长戴炳南，并命他向各团传达。戴炳南，山东即墨人，其父曾在阎锡山手下当过参谋和副官，拿阎锡山的话讲，“我们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人”。戴炳南中学毕业后加入国民党军，在黄樵松的提拔下一路升迁，黄樵松当团长他是营长，黄樵松当旅长他当团长，黄樵松当军长他是师长，两人相处整整十六年，黄樵松认为他无可置疑是自己人。

但是，就在黄樵松向戴炳南透露起义计划后，戴炳南思量了一下午：投降共产党，不愿意；自杀，不值得；那么就只剩下一条路了，向阎锡山告密。晚上，戴炳南驱车直奔太原绥靖公署。阎锡山听了黄樵松的起义计划后，大惊失色，急忙下令以召集紧急军事会议为名诱捕黄樵松。毫无戒备的黄樵松到达之后立即被下了手枪。阎锡山质问道：“黄军长，总统和我都很器重你，到太原后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叛变？”黄樵松坦然地说：“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不愿意打内战，我要弃暗投明。事已至此，由你看着办吧！”阎锡山把手中的文明棍一敲，喊道：“捆起来！”

惊魂未定的阎锡山立即召开第三十军各师团军官会议，当场宣布戴炳南为第三十军代军长，同时颁发给他一面常胜军旗，上书“晋民爱戴”四个字。其他校官则每人发毛毯一条、日本呢子军服一套和金圆券十万元。阎锡山说：“黄先生一时错误，想同共产党合作，我知道共产党那一套，全是骗局。你们深明大义，不仅保卫了太原，还稳住了南京，这是历史上少有的，我很感激，诚心敬佩。”

四日拂晓，晋夫、王正中、王玉甲以及以警卫员身份陪同晋夫进城的第八纵队侦察队副队长翟许友被捕。

阎锡山向南京请示处理办法，蒋介石回电：“黄樵松速解南京审办。”

六日，阎锡山的宪兵队将黄樵松和晋夫等人用飞机押往南京。

黄樵松和晋夫，两位殊途同归的硬汉，狱中的折磨没有令他们屈服。黄军长对看望他的家人说：“我终于找到了真理，看到了光明，为真理而死，死得其所。”国民党军军事法庭让晋夫承认，他就是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一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晋夫笑说：“我是堂堂正正解放军的全权代表，是来接受第三十军起义的！”黄樵松更是怒不可遏：

“我不是叛变！而是不愿意替蒋介石当炮灰，不愿意打内战！”两个硬汉当庭相互微笑。黄军长说：“解放军是我请来的，要杀杀我，为什么判他有罪？”晋夫说：“黄军长，你没罪，有罪的正是他们，该杀的也正是他们。死，吓不倒我们，人民会替我们报仇的！”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黄樵松和晋夫被秘密处死。

近一个月的重刑拷打已将晋夫折磨得骨瘦如柴，临死时他一只胳膊依旧处在被折断的状态，当敌人的枪口对准他的胸膛的时候，晋夫高喊：“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

黄樵松死后，囚室中遗有一块白丝手帕，上有“死而无悔”四个字；在写给妻子的遗书中，黄军长说：“为正义而死在首都金陵，那就是难能可贵了。”这位戎马一生的将领遗世《榴花》一首：

> 昨日梦中炮声隆，
>
> 朝来满院榴花红。
>
> 英雄效命咫尺外，
>
> 榴花原是血染红。

整整二十九年后的十一月二十七日，黄樵松、晋夫、王正中的骨灰被移至太原双塔寺烈士陵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松柏掩映，晋风缭绕，黄樵松清俊的面容以及晋夫疏朗的脸庞始终清晰动人，而他们眼前的太原城已如血染榴花般繁盛夺目。

原计划是在攻占东山要塞之后，乘机夺取太原城。但是，自战役发起之后，华北军区第一兵团主攻部队持续作战一个多月，官兵疲惫，伤亡严重。而黄樵松第三十军的起义失败，又令里应外合的攻城计划落空。同时，国民党军八十三师已空运太原，阎锡山为了保持太原的对外联系，在解放军攻打东山防御据点时，竟然抢修出五个临时

机场。封锁太原已不可能。因此，第一兵团致电中央军委："决定停止战役进攻，暂时转入休整补充。"十一月十六日，中央军委复电："再打一二个星期，将外围要点攻占若干，并确实控制机场，即停止攻击，进行政治攻势，部队固守已得阵地，就地休整。待明年一月东北野战军入关攻击平津时，你们再攻太原。"

十九日，太原前线作战部队进入围城休整阶段。

围城太原长达五个月之久。

其间，部队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完成了整编：华北军区第一兵团改称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周士第、王新亭，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陈漫远，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原第八、第十三、第十五纵队依次改称为第六十、第六十一、第六十二军，原西北野战军第七纵队改称第一野战军第七军，华北炮兵第一旅改称炮兵第三师。各部队普遍进行了兵员补充、纪律整顿、政治学习和战场练兵，军政素质得到空前提高。

同时进行的，还有战役物资准备。据战后统计，整个太原战役期间，近百万山西百姓加入了支前工作，百姓共筹集一亿斤小米、一千七百余万斤小麦，四千二百余万斤木柴，六千九百余万斤谷草，三百一十余万斤蔬菜，一百二十余万斤盐，这些维持大军生存的物资，被从方圆三四百里之外源源不断地运抵太原城下。因为太原守敌工事坚固，解放军还需大量的攻城物资，于是，山西百姓又一次倾其所有，五十余万块门板、五万多根粗木、二十九万根房檩和五十多万条口袋被送上了阵地。有资料显示，为了支援太原战役，按当地一人一个晌午为一个工计算，山西百姓累计出工达二十一亿多个，这一惊人的力量足以把阎锡山盘踞的太原城连根拔起。

人民解放军太原前线司令部公布了《告困守太原国民党军官兵书》：

人民解放军很快就要对太原举行总攻击了。本军曾三番五次劝告阎锡山和你们的许多高级军官，希望他们停止抵抗，和平合理的解决太原问题。但战犯阎锡山却死不接受本军的忠告，并梦想以太原城人民和你们的生命来维持他们的罪恶统治……蒋阎官兵们，本军现又调来了强大兵团，无论兵力火力，都超过你们多少倍。请你们仔细想想，太原这座孤城，能够抵挡得住强大的人民解放军的进攻吗？北平、天津、锦州、沈阳、长春、济南等城都抵挡不住，太原还比这些地方强些么？你们要好好记住，不要相信阎锡山什么“战斗城”、“铁城”、“钢城”等等鬼话，什么林立碉也好，钢骨水泥碉也好，都是经不起人民解放军强大炮火和大量黄色炸药打击的……人民解放军就是不打你们，只要完全截断你们的粮食接济，再围上你们个把月，请问你们受得了受不了？……蒋阎军士兵们，你们都是被抓来卖命的工人、农民、学生或小商人。你们的家，大部分都得到了解放，而且还分到了土地和房屋。你们应该要求你们的官长马上投降。如果他们不听，就应该利用一切机会跑过来。你们应该秘密串通，打死监视你们的特务，打死逼迫你们作战的军官，万一跑不过来，就要在本军攻击的时候，自动放下武器，千万不要抵抗，白白送了自己的生命。蒋阎军军官们，你们切不可再继续与人民为敌，再继续为战犯卖命，你们应该要求阎锡山和你们的上级长官，马上投降。如果他们不听，就应该毫不犹豫地率领你们的部队投降过来。万一不能，就要在本军攻击的时候，命令你的部下不要抵抗，趁早放下武器。蒋阎军官兵们，请你们记住这两句最要紧的话：如果你们企图顽抗，就是自寻死路；只有投降过来或不抵抗才是生路。

“本军现又调来了强大兵团”，这绝不是虚张声势。

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央军委决定调第十九兵团杨得志、罗瑞卿部，率第六十三、第六十四、第六十五军；第二十兵团杨成武、李天焕部，率第六十六、第六十七、第六十八军，南下太原城下。同时，根据中央军委的指令，第四野战军抽出炮兵第一师的两个重炮团赶赴太原前线。

华北军区参谋长赵尔陆致电太原前线司令部：

东总（东北野战军指挥部）派炮一师率两个炮团参加攻（太原）并作战。野榴炮二团二千人，野炮二十四门，十生的榴弹炮十二门。重炮三团三千一百人，日式十五生的榴弹炮三十二门。另附两个高射炮连，共七点五高射炮八门。弹药均自带……

至一九四九年四月，集结在太原城下的解放军总兵力“已达到三个兵团、十个军、三十六个步兵师，三个步兵旅，两个炮兵师，共三十二万余人，拥有火炮一千一百五十余门”。

此时，彭德怀受毛泽东的委托，从西柏坡到达太原前线。他立即去榆次以南的峪壁村看望病中的徐向前。徐向前的肋膜已两次出水，胸背疼痛难忍。彭德怀向徐向前传达了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徐向前介绍了攻打太原的部署与准备。因自己无法到前线去，徐向前请彭德怀留下来指挥攻城，待拿下太原后再回陕北。彭德怀同意了——十四年前，长征到达川北黑水河地区的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见到的第一个红四方面军的将领就是徐向前，自那以后他们始终对对方充满敬意。整整三十八年后，彭德怀已含冤离世，徐向前回忆太原战役时说：“那时下命令、写布告，仍用我的名义签署，实际上是彭老总在挑担子。他新来乍到，对敌我情况都不熟悉，但慨然允诺，勇挑重担，实在难得。”

解放军重兵云集太原城下，阎锡山陷入极度的痛苦中。

从政治本质上讲，阎锡山与共产党势不两立。北平和平谈判期间，傅作义曾致电阎锡山告白心中纠结：“北平坚守已四十日。天津失陷后，情势愈紧，虽极力撑持，但以平市人多粮缺，内部复杂，士气消沉，民情浮动，均不及太原甚远。自蒋公离京，政府力倡和平，群情沸腾，将形内溃，纵全毁无补华北，不得已于养日（二十二日）上午十时先行协议停战，军队保持建制番号，一个月后实行整编。过渡期间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处机构，处理军政事项，以待中央之整个解决。事急应变，心情痛苦万分，盼钧座速赐指教。”阎锡山在回电中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和谈，但提醒傅作义一定要设法保留自己的军队，最后时刻还可以到他的太原来。但是，转过身，他便在高级军官会议上大骂傅作义“出卖了北平人民”。李宗仁开始与共产党方面和谈后，

白崇禧为阎锡山鼓气：“今和平前途殆将绝望，今后唯积极备战，军民一体，共同奋斗，匡计时艰。先生镇守并（太原）垣，艰苦卓绝，保此名城，屹立无恙，贤劳在望，景佩良殷。”阎锡山在给李宗仁的电报中也没表明反对立场，但在给国防部次长徐永昌的电报中却主张死战：“和是政治的事，军事方面仍应积极备战，以作和的后盾。匪是集中人海，我应集中火海，在军师以外组建炮兵两个军，迫炮一个至两个军，重机枪两个至三个军，配合空军海军消灭渡江之匪，一战可转移优势。”

阎锡山死守太原的决心源自他的根本利益和某种幻想：太原是他经营三十八年的独立王国，他在这里拥有巨大的个人资产，他决不会轻易丢弃他毕生经营的财产；太原还是重工业城市，有几十座钢铁厂和兵工厂，能制造火炮和多种常规武器以及各种规格的弹药，他自信有能力将战争坚持下去。同时，他认为国民党至少能够拥有江南的半壁河山，虽然他与蒋介石之间存在巨大的矛盾，但是在反共这一点上他们可以密切合作；他还坚定地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就要爆发，美国很快就会出兵中国帮助国民党消灭共产党。于是，阎锡山提出的口号是：“不死太原，等于形骸，有何用处！”

然而，信誓旦旦准备了棺材、毒药、手枪、口号的阎锡山并不想死。

如何才能逃离危险的太原城呢？最保全面子的办法，就是南京来电让他出去。阎锡山先打电报给山西驻南京的军事代表杨源，让他通过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李宗仁请求，调任他为行政院长，但李宗仁没有同意。三月下旬，解放军向太原发起总攻的迹象越来越明显，阎锡山又给原来做过他的秘书长、现任国民党政府部长的贾明德去电，要求他向李宗仁请求谋职：“为了拯救晋民，咱拟在中央占一位置，名位高下，在所不计，副主席亦可。”贾明德一下就明白了阎锡山

的用意，他向李宗仁明确提出：“先去一电，请其来京，俾脱险境。”这一次，李宗仁同意了。

三月二十九日，阎锡山召集太原高级军政人员开会，口气温和地念了李宗仁的电报：“和平使节定于月杪飞平，党国大事，诸待吾兄前来商决，敬请迅速命驾，如需飞机，请即电示，以便迎迓。”电报念完，会场寂静，阎锡山接着说：“此去南京，多则五天，少则三天，咱便回来和大家共守太原。”

下午，阎锡山带着几名侍从人员，秘密出太原南门，到达汾河西洪沟临时机场，乘坐陈纳德为他准备的一架小型飞机，离开了太原。

太原守军所有的将领都以为，阎锡山过几天就会回来，因为他没有带走任何家人，特别是没带他平时最依赖的、最钟爱的五妹阎慧卿。阎锡山临走告诉阎慧卿：“咱一定回来，如果万一回不来，咱一定派直升机来接你和梁化之，咱已交了飞机定金，到了危险的时候，一定将你们二人接走。”

阎锡山此一去，再也没有回过山西。

他曾经用来表示将与太原共生死的毒药，让他的五妹阎慧卿和梁化之吃下去了。梁化之，阎锡山的心腹特务，阎慧卿的秘密情人。两人在太原城破之际，服毒自杀于绥靖公署东花园钟楼地下室。最后时刻，阎慧卿给阎锡山发出诀别电报：“连日炮声如雷，震耳欲聋，弹飞如雨，骇魂惊心。屋外烟焰弥漫，一片火海，室内昏黑死寂，万念俱灰。大势已去，巷战不支。今生已矣，一别永诀，来生再见，愿非虚幻。妹今发电之刻尚在人间，大哥阅电之时已成隔世。”

四月二十日，解放军对太原的攻击又一次打响。

第十八兵团于城东南首先插入敌阵，与从南线插入的第十九兵团和晋中军区的三个独立旅会合后，切断了太原守军的退路，之后，与位于城北的第二十兵团和第七军的两个师合力围攻，至二十二日，太原城所有外围据点全部肃清，阎锡山的十二个师悉数被歼。

二十四日十七时半，对太原城的最后总攻开始。

在一千多门大炮的猛烈轰击下，太原城垣和各种各样的碉堡纷纷坍塌。第十八兵团和第七军主力由城东的大东门，第十九兵团由城南的首义门，第二十兵团由城北，爆破队员炸开城门和城墙，突击队登梯爬城，两个小时后攻城部队全线突入城内，四个小时后将残余国民党守军包围于市中心。攻击绥靖公署的时候，官兵们听见他们的指挥员站在弹雨纷飞的高墙上呐喊："同志们！南京被咱们占啦！"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上午十时，太原解放。

阎锡山统治山西的历史至此结束。

出卖黄樵松和晋夫的国民党军第三十军军长戴炳南被搜出后公审枪决。

太原战役历时六个月，对于攻击一座省会城市所用的时间和代价来讲，在解放战争中绝无仅有。

此战，攻守双方伤亡均在三万以上。

太原城破之后月余，章士钊、邵力子致信李宗仁："夫阎君不惜其乡人子弟，以万无可守之太原，已遁去，而责若辈死绥，以致城破之日，尸与沟平，屋无完瓦，晋人莫不恨之。"

太原战役之后，随着大同的和平解放，华北自此无战事。

## 最后的故园

在杭州与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见面之后，四月二十三日，蒋介石返回奉化溪口老家。

第二天，全家人一起收拾家产行装。下午，蒋家妻儿老小离开溪口，换机飞往台湾。

蒋介石和蒋经国留在了空荡荡的溪口老家。

是夜，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内外形势已临绝望边缘，前途充满阴影，精神之抑郁与内心之沉痛，不可言状。"

蒋介石对蒋经国说："把船准备好，明天我们要走了。"

"太康"号军舰一直在象山港待命。舰长黎玉玺问："领袖准备到什么地方去？"蒋经国说："我也不知道，不过以这次取道水路看，目的不外两个地方，一是基隆，一是厦门。"

第二天上午，蒋介石在先祖母墓前伫立良久；下午，又再拜别祖堂——"天气阴沉，益增伤痛。大好河山，几至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谁为为之，孰令致之？"

十五时，蒋介石离开溪口，于象山港登舰。

这是蒋介石人生中记忆最深的一天——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时年六十二岁的他自此离开了故园，直至离世也没能得以再见故乡，除了在无数往事组成的破碎梦境之中。

中国的江南，气候湿热，水田遍布，植被茂盛，河流纵横，山峦逶迤，峡谷幽深。已经渡过长江的百万解放军必须持续战斗下去，直

到长江以南的土地上再没有国民党军的一兵一卒。

二十二日，渡江战役总前委发出指示，要求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部队迅速出击“截断浙赣路”，以堵截京沪杭地区国民党军向华南、西南撤退，同时切断位于上海的汤恩伯集团与位于湖北的白崇禧集团之间的联系：

第二野战军陈锡联、谢富治指挥第三兵团，除以第十军担任芜湖、安庆地区的警备外，兵团部率第十一、第十二军南下，向位于皖南的徽州前进；陈赓指挥第四兵团东移，向位于赣东北的上饶挺进；杨勇、苏振华指挥第五兵团向浙西南的衢县前进。第三野战军宋时轮、郭化若指挥第九兵团，除第三十军暂时警备芜湖之外，其余各军迅速东进，向苏浙交界处的长兴、吴兴前进；王建安、谭启龙指挥第七兵团，主力转向皖东南的宣城，在第九兵团侧后东进至宣城、广德地区；第八兵团，除第三十五军警备南京、第三十四军警备镇江之外，其余各军归第十兵团指挥（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政治委员袁仲贤分别担任南京警备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从扬州一线急速南下，尾追南京、镇江地区的南逃之敌；叶飞、韦国清指挥第十兵团，第二十九军攻占苏州，并向上海方向警戒，其余各军南下长兴、吴兴与第九兵团会合。

渡江部队的作战目标十分明确：向着南中国人口最稠密，经济最发达，也是国民党政权统治的核心地带——宁沪杭地区猛烈挺进。

这是在湿滑的水田小路上和蜿蜒的丘陵山道上的大规模追击作战。一路都没有发生重大的战斗，只有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的混乱逃亡和解放军官兵风卷残云的迅猛追击。

第三野战军第二十军在苏南溧阳以西，追上了国民党军第二十八、第四十五军和联勤总部等各一部，歼敌一万二千人。第二十三军

攻占溧阳县城后，追上国民党军第四、第二十八、第五十一军各一部，歼敌九千人。第二十五军在皖南渡过青弋江，追上国民党军第二十军和第九十九军一部，将该敌包围在方圆不足两公里的山洼里，随即发动猛攻，击毙军长杨干才，俘虏副军长陈亲民、参谋长胡显荣以下一万三千余人。第二十六军在句容和溧阳地区，追上国民党军后卫部队七千余人，并予以歼灭。第二十七军追至青弋江以东的寒亭，歼灭国民党军第八十八军四十九师一个团；又在寒亭以东的宣城附近，再歼国民党军第九十九军九十二师大部、第八十八军一四九师残部和第二十军一三四师残部。第二十八军截住了从南京和镇江南逃的国民党军第四十五军后勤部队、第四军一部和第五十一军四十一师一部，歼敌五千，然后会同第三十一军一部占领宜兴县城。第二十九军沿宁沪铁路东进，于二十七日解放苏州。随着第三野战军各军相继到达宁杭公路，从南京、镇江方向南逃的国民党军第四、第二十八、第四十五、第六十六军大部以及第五十一、第九十九军各一部，全部被追至位于浙、皖、苏交界处的朗溪、广德间的山区中。随后的朗溪、广德围歼战如同瓮中捉鳖，第三野战军多达七个军的攻击部队从四面八方冲进合围圈，毫无还手之力的国民党军漫山遍野地逃窜。从二十六日战至二十九日，第三野战军共歼灭国民党溃军六万余人，俘虏包括第六十六军军长罗贤达，第四十五军副军长陈阵，第四军副军长李子亮、参谋长罗野平，第二十八军参谋长黄疆强等国民党军高级将领。

第二野战军渡江部队的正面，是向皖赣交界处的祁门、浮梁方向逃跑的国民党军第八兵团刘汝明部，该敌在位于皖南的长江防线崩溃后，企图在皖浙边山区建立阻击阵地，以掩护主力在浙赣线上构成新的防线。第二野战军主力直出浙赣线上的贵溪、上饶、衢州和义乌——“切断浙赣线这着棋在战役上的意义，大体相当于淮海战役中打宿县这一着。”二十三日，野战军下达作战部署：第三兵团进击徽州，第四兵团进击上饶，第五兵团进击衢州。命令要求“各部队应尽量加强行军速度，增大里程，以免迟延，丧失战机”。连绵的阴雨中，疲惫之极

的第十一军官兵看见了被黄澄澄的油菜花环绕的殷家汇小镇，皖南贵池的秀丽景色令他们万分惊讶，他们径直向这个湿漉漉的小镇冲了进去。小镇上的国民党军第九十六军军部已空无一人，官兵们缴获了大量的军用物资后，开始调集部队围歼附近的第四十六军一七四师。一七四师是桂系部队，曾在大别山里追堵刘邓大军，新仇旧恨汇集在一起，第十一军官兵即刻发动攻击，将一七四师的大部歼灭。第十二军在泥泞的道路上急行军，先头部队三十五师在师长李德生和政治委员李如海的率领下取山路捷径，于二十七日夜插到徽州，截断了当面逃敌的退路。军主力赶到后攻入徽州城，将国民党军第一〇六军二八二师等残敌歼灭。第十三军攻占弋阳、贵溪，迫使国民党第六十八军八十一师投诚。第十五军追上了国民党军六十八军的一四三师，激战后师长阎尚元以下两千四百人被俘。五月四日，第十五军四十四师奔袭铅山，四十五师抢占横峰、上饶，浙赣铁路至此被截断。军长秦基伟的命令是："不为小股掩护之敌所阻，不为成群逃散之敌所惑，不为缴获所拖累，不为城镇所抑留，不为山高路窄、风狂雨暴、人困马乏的情况所动摇。"第十五军官兵竟然日行百里，翻越武夷山，一直追到福建省境内，突袭了国民党军第五十五军残部。十四日，向守志的四十四师前锋直抵南平，此城位于闽江边，顺江而下可遥望福州。第十六军追击至浙赣线上的玉山，国民党军第八兵团司令部，第五十五、第九十六军，第九编练司令部以及从南京逃到此地的国民党军联勤总部等残敌被歼。该军五十一师迅速南下，突入福建境内，占领闽北的浦城，其前锋沿也抵达了闽江边的南平。第十八军在全速追击的时候，得知前面的逃敌是国民党安徽省府主席张义纯率领的省保安部队，于是连续数日不停步，追上敌人立即打响了围歼战，在保安部队各团相继被歼或投降后，张义纯带着三十多人逃进深山。五十三师一六〇团参谋长范柏青率二营五连，在当地百姓的带领下进山搜缴，在被解放军追得无处可藏的时候，一个大个子在树丛中站起来喊："不要打了！不要打了！我们投降！"——此人就是张义纯。

至五月七日，从浙江中部的义乌到江西东部的东乡，第二野战军追击部队控制了约四百公里的浙赣铁路线。

由于骡马和汽车都留在了江北，因此追击全靠官兵们的两只脚，除了极度疲惫、下雨路滑、道路不熟外，最严重的困难是吃不上饭、穿不上鞋和雨具奇缺。在北方作战的时候，即使下雨，在雨中继续战斗浑身湿透也没关系，因为天很快就会放晴，干燥的阳光会将衣服晒干，会使身体重新暖和。但是，南方雨季漫长，天气阴冷潮湿，连续几天在雨中急行军，夜晚穿着仿佛永远也不会干的衣服睡觉，许多官兵都病倒了。粮食也出现了问题，不但数量短缺，而且供应远跟不上部队的追击速度。好容易从百姓那里借来米，习惯啃干粮、吃大饼的官兵却吃不惯，而且他们绝大部分人都没有煮米饭的常识，各部队里的南方人都成了“大米饭师傅”。在北方时，官兵们很少为鞋子操心，解放区百姓缝制的布鞋宽大结实，鞋底上还有“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字样，官兵们往往脚上穿一双，背包里还有一双新的。过了长江，鞋在雨水里沤泡、在泥泞中磨擦，很快就报销了。于是，会打草鞋的老兵又成了“草鞋师傅”。官兵们边跑路、边打仗、边学编草鞋。第五兵团第十八军一六〇团追击敌人六天之后，计算了一下，一路上全团打草鞋八百多双。第三野战军第二十八军副军长萧锋随部队到达泗安附近的公路时，迎面看见了骑在水牛上的野战军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和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宋时轮说他们连续走了整整四天，路过一个村庄向百姓买了几头水牛“权当坐骑”。

即使万般艰苦，踏上江南土地的官兵们心中依旧充满期待，因为他们从小就听老人们讲过，苏杭是人间天堂，把天堂夺过来归天下所有的穷苦人——当然也包括自己——流血流汗算得上什么？令他们感到极大满足的是，一路上到处可见敌人丢弃的武器和物资，到处可见掉队、负伤和生病的国民党兵，他们从北到南历经无数次残酷的战斗，他们的许多战友牺牲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他们今天终于看见了

什么是胜利什么是失败。那些被遗弃在路边的国民党兵向他们讨要吃的；一些吓坏了的军官家眷干脆跟在他们的后面以求安全；路边的电线杆子上、残墙断壁上贴满了字条，内容都是国民党军官兵告诉家属或亲人自己现在哪里，是否还活着。

奉命攻击南昌城的官兵心情激动，二十二年前，共产党人就是在这座城市里打响了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十三军在弋阳乘火车向南昌靠近，兵团司令员陈赓亲自在车站上为部队送行。五月二十日，先头部队三十七师逼近南昌城下抚河东岸。二十一日拂晓，官兵们迫不及待地冲过抚河，南昌保安团四百多名守军即刻投降。就在三十七师决定一鼓作气冲进南昌城时，南昌守军一七五、一八八师突然发动反击，三十七师渡过抚河的部队被反击之敌割断。危急时刻，师长周学义和政治委员雷起运亲率后续部队强渡抚河，守军在猛烈的攻击下弃城逃跑。二十二日拂晓，南昌城被三十七师占领。

六月六日，陈赓进入南昌城：

今日冒雨到南昌，这是我历史上第四次至此：第一次是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南昌叛变，我险遭不测，逃入武汉；同年八月，南昌起义，从起义至退出南昌止，我和李立三担任肃反工作是为第二次；一九三二年冬，在红军中负伤，返沪治疗，至次年春，不意被捕，押解南昌，蒋介石亲自见我劝降，我始终不屈，是为第三次。这次则以胜利者姿态来此，前三次入城，或为亡命客，或者站不住，或为阶下囚，但均表现了我党之艰苦奋斗。无有前三次，则无今日人民之光荣。

此时，在江南的东部，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第二十一军到达钱塘江边，官兵们隔江遥见的便是人间天堂杭州。杭州国民党守军第八十五军和第四十五军一部已经弃城南逃。但是，当第二十一军兵分两路向杭州逼近的时候，还是发生了战斗。六十一师在灵隐寺一带的山地展开，向火车站方向推进，他们遇到浙江国民党保安部队的抵抗。官

兵们担心国民党军可能要炸毁钱塘江大桥。六十二师官兵在六和塔附近控制大桥制高点后，真的看见敌人点燃了安放在大桥上的炸药包。

杭州本可无战事。

早在半年前，国民党浙江省府主席陈仪，因为希望和平解放天堂之城，劝说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起义。但是，陈仪壮志未酬，因汤恩伯的出卖，最终倒在了蒋介石的行刑令下。

陈仪，浙江绍兴人，辛亥革命时期结识秋瑾、徐锡麟等志士，留学日本时又与鲁迅交往密切。一九二四年军阀混战，他被孙传芳任命为浙江省主席兼第一师师长。因为信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他在孙传芳部任职时曾暗中谒见蒋介石，并被蒋介石任命为第十九军军长。一九二八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先后担任过福建省府主席、第二十五集团军司令官、重庆行政院秘书长等职。一九四五年，出任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一九四八年春，国民党军在军事上已处于被动，蒋介石感到江南更需加紧经营，所以力劝陈仪出任浙江省府主席，陈仪再三推脱无效后勉强就任。这一年的秋天，共产党人通过长期潜伏在陈仪身边的地下党员开始与他商谈起义之事，陈仪认为：“要我为解放做贡献，我手中这点微不足道的兵力，起不了多少作用。我至多做到不抵抗，也就是和平解放，为地方保存点元气。不过，我和汤恩伯关系甚深，他现在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他会听我的话的。他若放弃抵抗，掉转枪口，作用就大了。”陈仪的轻率造成了他的终生遗恨——他虽是国民党省府主席，但当有记者问“全国正在戡乱救国，浙江有何准备”时，他竟痛快地说：“拿什么东西来准备？船到桥头自然会直！”这句话被登在报纸上，立即引起社会轰动。更重要的是，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日，他直接派亲信给汤恩伯送去一张纸片，纸片上“没有上下款，也没有具名”，只有开列的五条内容：“一、释放政治犯；二、停止修筑工事；三、保护一切属公财物，不得破坏；

四、按照民主主义原则改编所属部队；五、取消战犯名义，给予相当职位。”还有一条，陈仪要求口头传达给汤恩伯：“开放长江渡口，迎接解放军渡江。”

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是国民党军中颇受争议的高级将领。陈仪之所以如此信任他，原因是他与陈仪的关系非同一般。辛亥革命后，陈仪任职浙江省府时，收留了浙江武义县一个求学无着的青年，青年名为汤克勤，身体强壮，字写得好，陈仪将他收留在自己指挥的第一师中，后又资助他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回来后，汤克勤先在陈仪手下当连长，后被陈仪推荐进入南京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任参谋。自此，汤克勤置身国民党军权力中心，虽然“在军界资历较浅，结识蒋介石又较晚”，但由于一直受到陈仪的关照褒奖，竟一路升迁直到当上了国民党军陆军副总司令兼南京卫戍司令。为此，汤克勤将自己改名为“汤恩伯”，以志不忘恩师提携。一九四七年，汤恩伯率部进攻山东解放区时，所辖精锐主力整编七十四师在孟良崮被歼，蒋介石当着许多高级将领的面大骂汤恩伯无能，然后撤了他的职。汤恩伯对恩师陈仪说，多年追随蒋介石，为其出生入死，结果招致如此羞辱，自己只有自杀。陈仪告诉汤恩伯，自杀不如反蒋。陈仪就任浙江省府主席后，即向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提出重新起用汤恩伯，于是汤恩伯被任命为衢州绥靖公署主任，之后又调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

但是，为了投靠蒋介石，汤恩伯还是出卖了陈仪。

据说，蒋经国受蒋介石的指令对汤恩伯大肆利诱，先是让汤恩伯“全权处理”库存在上海的二十万两黄金和价值三十亿法币的物资，接着又把汤恩伯的家眷和全部财产空运到了台湾。

中共地下党获悉汤恩伯出卖陈仪的消息后，立即派人赴杭州请陈仪火速飞往江北，共产党方面的承诺是：“只要一过江，他的安全我方

将完全负责。”但是，陈仪没有想到利与欲会令人心险恶到何种程度，特别是那个人不是别人而是汤恩伯，陈仪说：“贵党的消息，一定有来源，但这不会是可靠的。恩伯和我的关系，你是知道的，他简直就像我的儿子，志安坊（位于上海）的房子也是他送我的……我和恩伯的关系这样深，他如果不赞成，可以直接向我建议停止这一活动，何必出卖我？”

二月二十七日，陈仪在上海被捕。

四月二十八日，解放军攻占南京后，陈仪被秘密押至台湾。

一九五〇年六月九日，陈仪自被捕之后第一次见到汤恩伯，这也是他此生最后一次见到这个令他万般悔恨的人。那是在国民党军国防部的军事法庭上，汤恩伯被蒋介石指派为审判陈仪的出庭证人，汤恩伯说：“我对犯人陈仪，一生受恩深重，难以言喻，正图报不暇，何肯检举他？只因我忠党爱国情深，不得不忍痛检举，不能再顾到陈仪对我的深恩大德。”——相信汤恩伯至死都无法说清到底是什么令他难以言喻。

十八日凌晨，被判处死刑的陈仪被押往台北马场町刑场。

陈仪生前曾这样表露过他对世间美好生活的憧憬：

入其境，田野辟，道路平，学校、工厂多，山林葱翠，河川通畅，衣服、屋宇皆整洁，及至旅舍，招待亲切，宾入如归。

这番朴素而亲和的景致，就是陈仪不惜为之赴死的人间天堂。

埋在钱塘江大桥上的炸药响了，大桥震荡了一下却没有倒塌——在中共地下党的努力下，国民党军的一个工兵营，已把埋好的炸药悄悄搬下来一大半。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日十三时，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第二十一军进入杭州城。

与此同时，在长江的中游，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开始秘密渡江，江对岸就是中南地区最大的城市武汉。

早在三月间，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由萧劲光、陈伯钧指挥，从平津线迅速南下，任务是迫近汉口，牵制白崇禧集团，保护渡江部队的侧背安全。然而，渡江战役发起后，位于武汉、宜昌地区的白崇禧，不但没有对邻近的第二野战军渡江部队发动侧翼攻击，而且主力部队迅速从武汉地区向南撤退，试图依托洞庭湖，在长沙、衡阳以东组织起新的防线，以确保湘、赣、粤、桂各省安全。同时，驻守宜昌地区的宋希濂部则向西撤退，在大巴山、恩施地区布防以确保川陕门户。

白崇禧置解放军大举渡江于不顾，依旧在保存实力以图守住自己的地盘。

然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五月一日，第四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到达开封。

五日，从平津线出发的野战军主力部队前锋到达陇海线。

十日，林彪、萧克致电萧劲光、陈伯钧:

……由于沿江粮食困难和我军须争取今年年底占领两广，因此渡江行动须尽量提前。湖北全境之敌较北平之敌所多无几，湘、赣两省之敌约等于天津守敌，我军兵力绝对优势，同时我华野（第三野战军）、中野（第二野战军）皆已南进，对敌威胁甚大，白崇禧已准备逐步南撤。因此，你们先头两个军［共八个师的兵力］应争取提前到达江边，并极力争取先头部队即到立渡，后续部队陆续继渡。望注意采取多路前进、宽正面的袭抢船只和利用敌人逃窜的方法，求得袭渡成功……

十四日，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第四十三军向长江北岸的国民党军发动袭击，于湖北东部夺取了西起团风、东至武穴的约五十公里的渡江地段。十五日晨，第四十三军突击队在大雨中强渡长江，南岸驻守黄石港和铁山地区的国民党军五个营起义。第四十三军一路向南迅猛推进，十七日占领鄂城、黄石、大冶、阳新，然后进入江西占领了瑞昌、九江等地。而第四十军一一八师于十五日对武汉发动攻击，相继占领汉口、汉阳。国民党湖北省府主席、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十九兵团司令官张轸，率领国民党军第一二八军的三个师和第一二七军的一个师在武昌贺胜桥、金口地区起义。十七日，武昌解放。

至此，白崇禧的武汉三镇易手。

白崇禧心力交瘁。他对汤恩伯的淞沪防线不抱任何希望，对李宗仁就任代总统以来的表现也十分不满，认为李宗仁对蒋介石过于迁就，而在与共产党方面交涉时也无所作为，致使长江以南的局势变得越发不可收拾。五月二日，在李宗仁的力主下，桂系首领们齐聚桂林，大家商讨的结果是：出台一个李宗仁致蒋介石备忘录。备忘录的中心意思是：几个月来，国民党之所以难以扭转局势，关键是蒋介石仍在幕后把持一切。如果蒋介石不肯放手，就请复职；如果不肯复职，就必须答应以下条件："一、关于军政人事，代总统有权予以调整；二、移存台湾的金银、外币，应由政府命令运回大陆，以应军政开支；三、移存台湾的美援军火，应由政府运回大陆，分发各部队使用；四、所有军队，一律听从国防部指挥调遣；五、党中央（国民党）的决策，只能作为建议，不能强制执行；六、拟请蒋先生出国考察，并设法争取外援。"

在桂系策划彻底剥夺蒋介石权力的时候，离开溪口的蒋介石在"太康"号军舰上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草拟了一份文告："当此国家民族存亡生死之交，中正愿以在野之身，追随我爱国军民同胞之后，拥护李

代总统暨何院长（何应钦）领导作战，奋斗到底。”可是，几天之后，蒋介石就读到了李宗仁从广州转来的备忘录。蒋介石怒火中烧，他给李宗仁的复信中说，人事权、美军装备调拨权和军队指挥调遣权，代总统尽可按职权行使，哪个拦着你不成？至于出国考察一事，蒋介石告诉李宗仁：“殊有重加商榷之必要。”理由是：“过去，彼等主和，乃指我妨碍和平，要求下野。今日和谈失败，又贾我以牵制政府之罪，强我出国，并赋我以对外求援之责。如果将来外援不至，中正又将负妨害外交，牵制政府之咎。国内既不许立足，国外亦无法容身。中正为一自由国民，不意国尚未亡，而置身无所，至于此极！”至于那些黄金外币，是为了安全转移到台湾的——“一切出纳收支皆依常规进行，财政部及中央银行部册具在，尽可稽考，任何人亦不能无理干涉，妄支分文！”

让蒋介石把运到台湾的黄金外币、美式枪械再运回来，表现出桂系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简单幼稚。此刻，蒋介石并没有在宁沪杭地区与共产党军队决一死战的意图，因为他知道处于溃败中的国民党军已没有这个作战能力，因此在长江防线崩溃之后，他任凭宁沪杭一线门户洞开。而他之所以严令汤恩伯死守上海，唯一的原因是：上海仍存有约值三亿多元的黄金和白银，必须争取时间全部抢运到台湾去。蒋介石的命令是，不能全部运走，拿汤恩伯是问。况且，蒋纬国已经从中给了汤恩伯好处。所以，他怎么会把日后在台湾维持“生计”的财物吐出来呢？对于这一点，汤恩伯理解得很明白：“总裁无意死守上海牺牲实力，只要把金银运完就了事。”

上海，这座矗立于东海之滨的巨大都市，孤零零地暴露在人民解放军即将发起的强大攻势下。

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和工商业中心。渡江战役打响后，长江防线上的大量国民党军撤退到上海，至五月底，上海及附近地区的

国民党军已达九个军二十五个师，连同上海交警总队和保安部队，总兵力约二十二万多人。蒋介石从溪口乘军舰到达上海后，召集国防部长徐永昌、参谋总长顾祝同、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联勤总司令郭忏和宁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淞沪防卫司令石觉等高级将领召开作战会议，提出死守上海六个月，如果万一守不住也要把上海搬空、打烂和炸光。上海地区地势平坦低洼，沟渠河流纵横，并不利于大兵团机动作战。上海的防御工事早在抗战前就开始修筑，日军占领上海后进行了加修，形成周边长约八十公里、纵深宽约十公里，可供十个军展开的巨大的城防体系。以四千多座碉堡为核心，上万个野战工事由密如蛛网的战壕相连，组成了外围、主阵地、核心阵地三层阵地防御线。上海国民党守军弹药和物资储备充足，仅各类炮弹就储备有五百万发以上，另有机枪弹一千五百万发、冲锋枪弹二百万发、枪榴弹五十万发和手榴弹五十万枚。

毛泽东在解决上海问题上十分谨慎。

上海是一个很特殊的城市，共产党方面最担心的是：西方国家可能的干涉；把这座工商业城市打烂了；占领之后是否能顺利接管。最初，根据情报，中央军委认为“上海和平解决之可能性甚大”，因为“国民党在沪军队有迅速撤走可能”，同时“上海资产阶级不赞成在上海打仗”。所以，当距离上海最近的第三野战军渡江之后，中央军委曾多次指示他们不要过于迫近上海，甚至连苏州、昆山、太仓、吴江、嘉兴等上海外围城镇都不要过早占领。其中特别强调：“争取在数日内完成进驻上海的准备工作，以便在国民党迅速退出上海时，我军亦不至毫无准备地仓促进去。”

但是，汤恩伯还没有放弃上海的打算。

中央军委遂决定以第三野战军主攻上海，第二野战军在浙赣线战备休整，同时保护第三野战军侧背的安全。

粟裕提出了三种作战方案：一是围困战法。但这样会使上海六百万人陷入生活绝境，而上海国民党守军有海上通道，我军不一定能围死；二是避开守军重点防御的吴淞地区，从苏州河以南突击入城，这样部队可以减少伤亡，但因主战场选择在市区，城市必将被打烂；三是迂回吴淞，威胁上海国民党守军的海上退路和物资通道，迫使其在吴淞地区与我军决战，这样部队伤亡可能很大，但可以保护上海城市的完整和百姓的生命安全。粟裕倾向于第三种方案，这一方案也得到了总前委和中央军委的同意。

五月七日，蒋介石乘“静江”号轮船驶离上海前往浙江定海。

十日，第三野战军下达了《淞沪战役作战命令》，命令确定首先攻占上海外围，截断上海守军的逃路，然后对上海城区发起总攻。作战部署是：第十兵团在战场的北面，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军由江苏常熟、苏州地区出动，十四日拂晓前攻占吴淞、宝山，如一时难以攻克，则留一部监视，主力由吴淞口插至黄浦江边，封锁黄浦江口，阻截一切国民党军舰只出海；第二十六军控制昆山、安亭等地，策应第二十八军作战；第三十三军集结在常熟为兵团预备队。第九兵团在战场的南面，第二十军攻占浙江与上海交界处的平湖、金山地区，待第三十一军接替阵地后，向黄浦江右岸集结；第三十军在第二十军的左翼，沿嘉兴、金山以北，顺着黄浦江右岸向上海东南部的奉贤、南汇地区攻击，截断国民党守军的海上逃路；十五日，第三十一军主力加入浦东作战；第二十七军集结于浙江与上海交界处的嘉善地区，控制大东滨铁桥，进击上海西南部的松江和青浦地区。

在上海与南京之间，有个小小的丹阳城。

在第三野战军对上海发起攻击之前，上千名共产党干部从各地拥入这座小城，接受接管上海这座大城市的集训。他们中间，有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人刘晓，有从香港赶来的长期从事统战工作的共产党人

潘汉年，也有准备未来担任上海市文化局长的剧作家夏衍，还有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中国第一任上海市长陈毅。共产党人意识到，根据以往接管北方城市的有限经验，也许不足以应付上海可能发生的一切，先不说如何接管大规模的工商企业、如何对待民族官僚资本家，如何处理国民党遗留的各级政府机构，如何确保新货币人民币的顺利流通，如何建立有效的城市管理系统，等等，仅面对如此多的外国人就是一个新课题。

之前，占领并接管南京的时候，面对城中的各国使馆和大量的外交人员，解放军官兵的不知所措令人担忧——他们渡过长江，冲进南京城，发现混乱的市区中只有使馆区异常安静，靠近一看，使馆里的外国人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入城的解放军很快查明，各国使馆都没有逃走，除了苏联使馆之外。苏联使馆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前的行为令人不解，这或许是即将掌握全国政权的共产党人将要面临复杂国际关系的一个征兆。一九四九年二月初，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的时候，曾通知并建议各国使馆与他们一起南迁，出乎国民党方面预料的是，没有一个国家的大使馆表示愿意跟着国民政府走，只有苏联例外。苏联大使馆南迁广州的举动，令共产党人有些不安。在人民解放军接管北平的时候，也是苏联领事馆率先关门，当时有舆论称："苏联此举理由不明，一般认为，苏方欲表示其与中共并无关系。"就在苏联关闭北平领事馆的同时，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见了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米高扬见面就说："我们只带着两个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意见。"毛泽东向斯大林的特使详细介绍了夺取全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问题。他告诉米高扬，中国共产党人的口号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显然，苏联人对中国形势的发展感到意外和吃惊，他们终于意识到，此前对这个近在咫尺的国家和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估计，是多么的不切实际。尽管如此，苏联大使馆还是独自跟随国民党政府南迁了。

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都对中国共产党人一知半解，而在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官兵们对西方国家也完全陌生。几名外国记者在南京城中美联社大楼里办公的时候，进来三名解放军战士，带路的是在这栋大楼里工作的一名记者家的用人。当解放军战士得知记者们正向美国发报的时候，突然紧张地端起刺刀退了出去，然后就有一大群解放军官兵把大楼严密地包围起来。外国记者们没吃没喝地被困两天之后，解放军官兵突然撤走了，没有人来说明包围和撤离的理由。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留在了南京，他回忆说："在六点钟，我因听见我卧室的门被推开而觉醒，看见有好几个武装士兵进来。我大声地问他们想要做什么，他们就退出去了。其中有一两个带着怒气喃喃自语。我从床上迅速起身，看看有什么事情发生。那时候，就有十个至十二个武装士兵回到我的卧室来。他们的发言人颇有礼貌地解释说：他们只是逛着玩，并没有什么恶意。又问我懂不懂他的话。当我回答说我完全懂他的话时，他又重申他的保证。但见我不十分热诚地欢迎他们，就领着其余的人走了出去。"——解放军士兵竟然在凌晨"逛"入美国大使的卧室，尽管事出偶然，还是令人惊异。有资料说，他们无意中进入美国大使的卧室"完全是出于好奇"；也有记述说，他们曾指着司徒雷登屋子里的东西大声宣布"这些东西很快就会属于人民"。为此，中央军委特意致电渡江战役总前委："此次南京检查如果属实，应认为为违犯纪律行为，迅以查究。"

丹阳集训二十天后，共产党干部已做好接管上海的一切准备，穿着布军装、打着绑腿的上海市长陈毅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们接管上海！"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第三野战军对上海发起攻击。

在第九兵团的攻击方向，十四日，第二十军攻占平湖、金山，并继续向松江移动；第二十七军攻占松江、青浦；第三十军攻占奉贤、

南汇，进至川沙。而在第十兵团攻击方向，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军均遭遇敌人的顽强阻击。吴淞地区是国民党军撤退上海的最后通道，因此也是他们重点防御的地段。敌人利用密集的钢筋水泥碉堡和稠密的火网封锁攻击道路，并在坦克和装甲车的掩护下连续实施反冲击。两军交火后，汤恩伯又从市区抽调第二十一军和第九十九军九十九师加入作战，致使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军的攻击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代价。前沿阵地一日之内数次在双方之间易手，渡江之后一路顺利的解放军官兵意识到，他们又要面对一场苦战。

敌人采取主堡与小堡相结合、暴露与隐蔽相结合的方式，以构成子母堡式的交叉火力网。主堡都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四面有枪眼，胸、背墙厚达一米多，外面再铺盖枕木、积土和草皮，因此抗力很强……

华东野战军调整了作战部署：第三十三军九十九师加强给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三军九十八师加强给第二十八军；第三十军攻击川沙、高桥地区守军，并用炮火封锁黄浦江江面。部署决定全军“变急袭猛扑的运动战法，为逐堡夺取的攻坚战法”，“采用迫近作业攻坚战术”，逐段逐点地将攻击向前推进。炮兵掩护步兵前进，步兵用炸药包爆破堡垒，用集束手榴弹炸毁敌堡枪眼。

阴雨连绵，敌人的堡垒被一个接一个地清除掉，第三野战军缓慢却又坚韧地扩展着攻击成果，迫使上海守军集中更多的兵力于吴淞口两侧地区。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七日十三时三十分，蒋介石离开定海。飞机飞越台湾海峡，下午十六时五十分在澎湖列岛上的马公（澎湖）机场降落。

蒋介石离开了中国大陆。

汤恩伯命令所有一线部队尽力抵抗以争取时间，然后集中上海所有的舰船抢运黄金白银、重要物资和坦克重炮；同时，等待从青岛、福建、台湾出动的舰船到达以撤走主力部队。

二十日，中央军委致电粟裕、张震：

（一）据邓（邓小平）饶（饶漱石）陈（陈毅）电，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业已大体就绪，似此只要军事条件许可，你们即可总攻上海。（二）为使侦察及兵力配备臻于完善起见，总攻时间似以择在辰（五月）有（二十五日）至辰世（三十一）之间为宜，亦可推迟至巳（六月）东（一日）左右，如何适当，由你们决定。（三）攻击步骤，以先解决上海后解决吴淞为适宜。如吴淞阵地不利攻击，亦可采取攻其可歼之部分，放弃一部分不攻，让其从海上逃去。（四）攻击兵力必须充分，如觉兵力不足，须调齐兵力然后攻击。（五）攻击前必须作战役和战术上的充分准备。

二十二日，粟裕接到侦察报告，苏州河以北的敌人已开始向吴淞收缩企图从海上逃跑，野战军司令部遂决定将攻击时间提前。

二十三日夜，第三野战军对上海发起总攻。

第二十、第二十三、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军分别从东、南、西三面突入城区，第三十、第三十一军继续在吴淞以南的高桥方向作战，第二十五、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三军继续在吴淞以北的月浦方向作战。

二十五日凌晨，攻城部队解放了苏州河以南的全部市区。

阴雨连绵之后，天空突然晴朗。

汤恩伯、石觉、陈大庆等人在警卫部队的护送下乘车到达吴淞镇。

此刻，攻入苏州河以南市区的解放军官兵被阻于苏州河南岸。攻击上海的战斗打响之前，总前委有一个特殊规定：攻入市区后，不准

使用重武器，以免破坏城市建筑和造成市民伤亡。但是，苏州河北岸的高楼都已成为守军的火力据点，敌人用严密的火网封锁了苏州河河面。攻击部队数次攻击桥头，因不准使用重武器，攻击连续受挫，官兵伤亡很大。第二十七军官兵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把榴弹炮拉了上来，炮手们精确瞄准了对岸的百老汇大厦，然后向军长聂凤智请求下达开炮的命令。不用炮火很难攻下桥头，而一旦开炮，大上海的标志性大厦顷刻间会被夷为平地。心情沉重的聂凤智军长上了前沿，在距离苏州河不到十米远的一个路口召开紧急党委会。这是一个关乎大上海命运的会议，指挥员们紧急商量的是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问题：

有的同志尖锐地指出：“前面的战士在流血，不能再拖延了！我们倒要问问军首长，是爱无产阶级的战士，还是爱官僚资产阶级的楼房；是我们干部战士的鲜血生命重要，还是官僚资产阶级的楼房重要？”我说：“现在我们争论的焦点，不在于战士重要还是楼房重要。第一位的问题，是苏州河北岸有上百万人民群众。一炮打过去，会伤亡多少人？不打炮，我们要伤亡一些战士；打了炮，会伤亡多得多的人民群众。我跟大家一样，爱惜战士的生命；大家也跟我一样，爱惜人民的生命。爱战士与爱人民，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作为人民军队的指挥员，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最优先考虑的必须是人民的安危。说到底，我们是为战上海而流血，而牺牲，不正是为了解放上海人民，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吗？要算账的话，首先要算这个大账。再说，现在那些楼房还被敌人占着，再过几个小时，我们从敌人手里夺过来，它就不再属于资产阶级，而将属于人民。我们没有任何权利毁坏它，必须尽最大努力去保全它。”

第二十七军指挥员们决定正面佯攻，待天黑之后实施两侧迂回渡河。

苏州河北岸守军，由淞沪警备副总司令兼第五十一军军长刘昌义指挥。聂凤智决定通过地下党直接找刘昌义，要求他明晓大义率部放下武器。

刘昌义是老西北军冯玉祥的旧部，由于受到蒋介石的排挤，长期处在没有实际兵权的赋闲状态。人民解放军兵临上海，汤恩伯开始吹捧他很能打仗，说他作为西北军名将要为作战出力。五月二十二日，

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召集作战会议，正式请他出任淞沪警备副司令，同时宣布了汤恩伯的命令：第七十五、第五十四、第三十七军全部撤离，留下第二十一、第五十一、第一二三军组成北兵团继续坚守，北兵团司令由刘昌义兼任。这一命令把当时在场的国民党上海市长陈良吓坏了，因为主力一撤上海就完了。而刘昌义清楚，这是汤恩伯要带着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放弃上海了，因为第二十一军原是川军部队，第五十一军原是东北军部队，第一二三军是由苏北民团改编的——杂牌军奉命留下掩护嫡系部队逃跑。刘昌义一口答应出任警备副司令，因为他觉得自己可以“相机起义”。

二十三日，共产党地下组织果然找到了他，刘昌义与苏州河南岸的解放军通了电话。然后他借口视察前线，乘坐一辆吉普车直接来到苏州河南岸，见到第二十七军八十一师政治委员罗维道，双方具体商讨了起义协议。

二十五日晚上，吴淞码头出现了惊人的混乱，撤退的国民党军争先恐后地抢着登船，士兵们武装保护着自己和上司的财产强行夺路，许多人被践踏而死。踩着别人的身体或者用枪打开通道的人冲上船，放下软梯和吊绳让自己的同伴爬上来，软梯吊绳因为负重过大而断裂，拥挤着爬船的人纷纷落水。无法挤上船的官兵竟然开枪朝船上射击，船上的官兵慌乱地开枪还击。有些船因为怕超重而提前开船，致使在船桥上的人落在水里，岸上的炮兵愤怒地架起迫击炮向舰船开炮，一时间吴淞码头枪炮轰鸣犹如作战。第二十九军八十五师二五四团三营二连代理连长陈文宝和指导员王绍云奉命插向吴淞口。官兵们一路看见江面上漂浮着被敌人丢弃的各种杂物，“成捆的布匹在江水中翻滚”，江岸上到处是“东倒西歪的战车、大炮、汽车”，地上白花花的银元、报纸和文件在枪炮掀起的气浪中舞动。

这天晚上，刘昌义率苏州河北岸的国民党军撤离阵地。

第二十七军分两路跨越苏州河，接防了国民党军第五十一军的阵地。

在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压力下，国民党军第二十一、第一二三军大部放下了武器。

汤恩伯乘“太湖”号兵舰驶离吴淞口前往定海。

二十七日凌晨一时，最后一艘撤运上海国民党守军的货轮“大公”号载着深夜放弃阵地的第五十二军二九六师几千名官兵驶离黄浦江。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午，中国南方最大的城市上海解放。

第三野战军发布的《入城十项守则》是：

一、无故不得打枪。

二、不住民房店铺，不准打扰戏院及一切娱乐场所。

三、无事不上街，外出要请假。

四、不准车马在街上乱跑。

五、不准在街上吃东西，不得扶肩搭背，不准拥挤街头。

六、买卖要公平。

七、驻地打扫清洁，大小便上厕所。

八、不准卜卦算命，赌博宿娼。

九、不准封建结合，徇私舞弊。

十、不准在墙壁上乱写乱画。

二十八日下午十四时，陈毅市长走上黑色的大理石台阶，上海市政府大厦的楼顶上飘扬着一面夺目的红旗。

渡江战役至此结束。

渡江战役，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九个军部，三十二个整师，共计四十三万八千余人，其中毙伤两万两千余人，俘虏三十一万四千余人，起义三万四千余人，投诚六万七千余人。人民解放军伤亡四万九千八百余人，其中牺牲一万零五百余人，负伤三万五千四百余人。

五月二十五日上午八时，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第二十一军六十一师先头部队占领溪口。

溪口因锦溪和剡溪汇合于此而得名。小镇水环山绕，景色秀丽，镇东有武岭屏障，镇口有一拱形门洞，前额有于右任题“武岭”二字，后额也有“武岭”二字系蒋介石题。镇傍溪水而建，两里长街，沿街黑瓦粉墙，蒋介石的出生地玉泰盐铺和蒋经国的出生地丰镐房均在长街之上。丰镐房，老式住宅临溪而建，砖门后一段洁净甬道，过月门入一小庭院，正北大厅匾额为吴稚晖书“报本堂”三字，两旁为两层厢房，回廊迂绕，挂满各式宫灯，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卧室设于楼上。

第二十一军六十一师师部暂置于丰镐房内。

南京、溪口、上海，蒋介石最后的故园，皆旧人远遁，新主乍临。

# 第十七章 熟透的李子

## 熟透的李子

“许多河口、城市和重镇都像熟透的李子一样，落在农民的筐里。”一九四九年春在中国的外国记者写道，“南京在第四天被攻占。在上海，邮递员出城来引路。胜利者来到了，他们在十字路口画上前进的箭头。他们不要人民送来的食物，甚至连开水也不喝。他们露宿在中国银行周围的人行道上，不进里面去，‘里面有钱，咱们进去会惹事的’。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队。他们对最卑贱者和蔼可亲，而对最高贵者却横眉冷对。他们是中国共产党训练和领导的农民。”

“最强大的军队”中之一员，第四野战军的九十余万官兵没有“露宿在中国银行周围的人行道”上——这是毛泽东手中一支阵容强大的战略预备队——他们占领平津地区之后，在中国北方春天的城镇中驻扎下来，然后用一种心满意足的眼光欣赏着和煦的春风如何将河冰慢慢融化，如何将田野边的垂柳渐渐染上鲜嫩的鹅黄。

团以上干部可以带妻子到北平参观三天，晚上还可以在长安大戏院看京剧名角演出。干部们参观故宫的时候，带队的人介绍说，能进到这里来也就是李自成了。“到北平的大饭店来住，大家心里都不是滋味。多少战友在自己的身边倒下去，他们什么都没有得到，想到这些，大家心里就酸酸的难过。”第三十八军一一二师三三四团团长刘海清在大饭店里睡不着觉，“没有别的，接着干吧！全国还有多半块地方没解放呢，怎么着也不能让牺牲了的同志们血白流……”

并不是所有的官兵都这么想。

家在东北、华北等解放区的部分干部战士开始想家了。

第四野战军政治部秘书长王阑西、宣传部副部长陈荒煤在报告中写道:“想回家，想找老婆，不愿意南下。仅第四十六军在整训中来队探亲的家属即达四万人，影响了部队，出现思想波动。有的战士要求回家，想把自己家里的生活水平提高一步；有的反映当地土地改革政策落实不好，生活困难；有点病的同志则想趁机打报告回家。还有些年纪大、文化水平又不高、发展比较慢的同志，打算找个人出路，说‘老粗打天下，老细（有文化的）坐天下’，往后我们吃不开了。”林彪和罗荣桓认为，部队发生思想波动，关键在干部，干部的主要问题是居功骄傲，不守纪律。野战军连续七天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整顿思想，统一认识。林彪告诫指挥员们:“共产党员要集体主义，不然革命永远不能胜利。”

四月十一日，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朱德作南下动员报告，第四野战军的指挥员们听到了总司令生动的描述:

> 我听说有些同志害怕江南的炎热，害怕南征的艰苦，说什么广东热得很，把苞米面贴到墙上马上就烤熟了。你们不要笑啊，这说明有些同志对江南的情况不了解，产生一些顾虑是可以理解的。我可以告诉大家，江南的夏天虽然比江北热一些，但还没有热到那种程度。祖国的南方很可爱，实在是好得很哪！我的家乡是四川，四川俗称“天府之国”，那里四季常青，气候宜人，而且富庶得很哪！还有两湖、两广，也是富饶的鱼米之乡。古人说，湖广熟，天下足，可见那里的大米是多得很的。广西、广东更是山奇水清，一年数熟之地。总之，祖国的南方是人人向往的地方，同志们完全可以打消顾虑。当然，要向江南进军，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困难，也是没什么了不起的。这比起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反“扫荡”时遇到的困难要少得多了。只要我们做好克服困难的充分准备，就可以战胜一切困难，就可以无往而不胜！

从冰封的松花江边一直打到华北大平原，第四野战军官兵必须继续振奋精神、坚定意志，因为在前面还有南中国的千山万水需要跨越，还有盘踞在中南和西南的几十万国民党军有待歼灭。

第四野战军南下作战的区域，首先是豫鄂湘赣粤桂六省。

中南六省总面积一百一十五万平方公里，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个区域大部分处在长江以南，夏季炎热多雨，冬季阴冷潮湿，区域内河流纵横，水网交织，山峦险峻，林木茂密，十分不利于大兵团机动作战。驻守这一地域的国民党军，是白崇禧集团和余汉谋集团，总兵力共三十个军八十个师约五十万人。

为了南下作战，中共中央决定第四野战军与中原军区领导机关合并，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以林彪为司令员，罗荣桓为第一政治委员，邓子恢为第二政治委员，萧克为第一参谋长，赵尔陆为第二参谋长，谭政为政治部主任，陈光、聂鹤亭为副参谋长，陶铸为政治部副主任。

九十万大军南下，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第四野战军在战争中不断完备的后勤保障系统开始了昼夜不停的运转，供给、军械、战勤、通讯、运输、卫生等部门筹集了大量的粮食、弹药、汽油、药品、被服等等提前出发，沿途开设转运物资和接待部队的大小兵站，火车、汽车、牲口大车以及人力在部队将要经过的路线上穿梭奔忙。最为急迫的是干部的准备。南下作战，一路上要不断地占领和接管城市和乡镇，每一个地方都要建立新的政权机构，干部的需求数量是惊人的。

经中共中央批准，招收知识分子、技术工人和各种专门人才的启事刊登在《人民日报》、《北平解放报》和《天津日报》等报纸上。于是，在那个春天里，凡是拥护共产党和愿意为新中国出力的青年，纷纷报名参加“南下工作团”。协化女中学生王曼力在一个刮着大风的夜晚，悄悄走出位于北平阜成门外武定侯胡同内的家门。她是著名的中长铁路中方局长的女儿，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生院的父亲执意要让女儿成为科学家，但是几天前王曼力在长安大戏院看了解放军宣传队的演出，舞台上那些穿着棉布军装、留着乌黑短发的年轻女军人令她心驰神往，而她们嘹亮的歌声自那天起一直在她心底回响：“向

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王曼力抱着被子、提着皮箱拦下一辆三轮车，车夫说大风天得收八角钱，王曼力兜里只有三角钱，她只好告诉车夫自己要去旃坛寺参加解放军，车夫没收钱将她送到南下工作团驻地。十七岁的王曼力参军了，与她同住一屋的战友还有北平蒲伯阳医院院长的女儿蒲以祥、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周培源的女儿周如燕……“南下工作团”采取部队建制，总团相当于军，各分团的大队、中队和分队相当于师、团、营。被招收入伍的青年大多数是大学生。集训的时候，周恩来对他们讲了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讲了共产党诞生以来二十八年的奋斗历程。在北大的民主广场，朱德用三个小时鼓励青年树立革命的人生观，投身到全国解放的洪流中去，这位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戴着草帽犹如一个老农，让青年学生们十分惊奇又赞赏不已。叶剑英在先农坛体育场讲话时语重心长：“南下工作团是你们参加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开端。你们比前辈动身较迟，但你们面前的路更长。将来你们可以骄傲地告诉儿女，你们曾英勇地南下，参加过解放全中国的伟业。”

姑娘们穿着旗袍，烫着头发，小伙子穿着皮鞋和衬衣，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他们是新来的。他们很快就换上了北方的蓝棉制服，穿上棉鞋，戴上有帽沿和护耳的帽子。他们睡在集体宿舍的铺板上，一天吃两顿小米和青菜。他们在教室和图书馆里，坐在随身携带的马扎上，学习各种技术课程，但主要是学习适应新的生活方式：集体活动，批评和自我批评，同农民打成一片。他们有时到老乡家住上几个星期，帮助老乡干农活，有时也向工商业者学习一点工商业方面的知识，准备去管理人民解放军解放的新城市。

这是太阳喷薄欲出的时刻，这是新生的政权百业待兴的时刻，上万名青年义无反顾地跟随人民解放军走向这片国土的南方，他们就像这个春季里的种子一样被播撒在南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无论那里是繁华的都市还是偏僻的乡村、边陲，他们的人生自此在异乡落地生根。至今，在南中国的都市或乡镇里，偶尔还会听到有人说起“南下干部”——已至耄耋之年的他们，依旧固执地操着东北、河北、河南或山东的乡音，他们沧桑的容颜在已成为南方人的儿女们心中，犹如一段遥远的家世传奇。

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第四野战军调整了编制序列和主要指挥员：

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第一副司令员陈伯钧，第二副司令员韩先楚，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参谋长解沛然，副参谋长潘朔端，政治部副主任袁升平。下辖第四十军，军长罗舜初，政治委员卓雄；第四十五军，军长陈伯钧，政治委员邱会作；第四十六军，军长詹才芳，政治委员李中权。

第十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政治委员萧华，第一副司令员李天佑，第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彭明治，政治部主任刘道生。下辖第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政治委员梁必业；第四十七军，军长曹里怀，政治委员周赤萍；第四十九军，军长钟伟，政治委员徐斌洲。

第十四兵团，司令员刘亚楼，政治委员莫文骅，第一副司令员黄永胜，第二副司令员刘震，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吴法宪。下辖第三十九军，军长刘震，政治委员吴信泉；第四十一军，军长吴克华，政治委员欧阳文；第四十二军，军长吴瑞林，政治委员刘兴元。

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赖传珠，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第二副司令员贺晋年，政治部主任萧向荣。下辖第四十三军，军长李作鹏，政治委员张池明；第四十四军，军长方强，政治委员吴富善；第四十八军，军长贺晋年，政治委员陈仁麒。

特种兵司令部，司令员万毅，政治委员钟赤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苏进，副司令员贾陶、匡裕民，副政治委员邱创成，政治部主任唐凯。

铁道兵团归军委直接指挥。

毛泽东在香山接见了即将南下的第四野战军师以上干部。毛泽东要求他们对国民党军穷追猛打，凡是中国的地方都要去，“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有人问：“遇到美英帝国主义的军队打不打？”毛泽东的回答是：“打！像打国民党反动派一样地打！”最后，毛泽东说：“我们三路大军浩浩荡荡就要下江南了，声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同志们！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

四月十一日，除已经渡江的先遣兵团第四十、第四十三军以及先行出发的第四十二军外，第四野战军的九个军出动了：第四十七、第四十一、第四十八军沿平汉铁路南下，在花园口附近渡黄河；第四十六、第三十八、第三十九军沿着平大公路南下，在东明附近渡黄河；第四十五、第四十九、第四十四军沿津浦铁路南下，在寿张附近渡黄河。为了使行军不至于拥挤，各师间拉开六十至七十五公里的距离，每天行军约三十公里左右。

第四野战军官兵神采飞扬，因为战争已如摧枯拉朽。

但是，他们很快就会知道，战争依旧按照严酷的规则在持续，这个规则就是：哪怕一个小小胜利的取得，都需要以高度的警觉与谨慎、不懈的士气与意志、不可避免的流血与牺牲为必要前提。

第四野战军必须首先扫除南下路上的两个障碍：安阳和新乡。

此时，河南境内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安阳和新乡仍孤零零地被国民党军占据着。

野战军司令部命令先行出发的第四十二军打安阳，随后跟进的第四十七军会同华北军区第七十军打新乡，作战部队统一由第十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指挥。

安阳是一个独特的城市。内战爆发以来，这座城池从来没有被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攻克过。一九四七年五月，在豫北战役中，晋冀鲁豫野战军曾对安阳发起攻击，仅外围战就打了半个月之久，最终因攻击无效被迫撤退。一九四九年一月，第二野战军曾准备用陈赓兵团把新乡打下来，但毛泽东认为会影响渡江战役的准备没有同意——“将来由东北部队在南下途中附带扫清即可。”

聂荣臻转来了关于安阳城防的情报。

安阳在日军占领时期就修建了城防。抗战胜利国民党军进占后，每受到一次攻击就加修一次城防，直至把这座城市修成了一个坚固碉堡。城墙高且厚，护城河宽且深，环城两百多座碉堡有地道与城里相通。城墙外的两道水城灌满从漳河引来的河水。延伸出去两公里内，五十多个村庄、工厂、河流被用来修成火力据点以构成严密的防御火网，各据点不但有交通壕连接，且交通壕里还修有暗堡。安阳国民党守军庞炳勋部，是个各路顽匪会集的大杂烩。内部派系林立，头目有总指挥兼专员赵质宸，副总指挥兼一三四师师长郭清、参谋长兼保安第三旅旅长吴尽仁，另外还有王三祝部、王景昌部、程万福部、刘乐仙部等等。土匪、地主、恶霸、还乡团、特务、国民党军聚集在一起，气焰凶悍，号称“解放军打不过我们”。

由于是野战军南下的第一仗，出发前，朱德亲自找来第四十二军军长吴瑞林，嘱咐他：“安新地区是华北、中原的战略要冲，京广线必经之地。我们要大举向中南进军，非搬掉这两块石头不可。先遣兵团的第四十军南下时，从那里路过，打了他们一下，没吃掉他们。敌人就错误地认为我们没有飞机、坦克，奈何他们不得，这次你们一定要好好地收拾他们。”朱德关切地询问吴瑞林带了多少炮弹，吴瑞林答：“有各种炮弹两千七百余发。”朱德说：“少了，应该有五六千发。”又问带了多少炸药，吴瑞林答：“带两千五百公斤。”朱德说：“少了，要

带一万公斤。”当得知吴瑞林指挥过攻克临沂、鞍山等城市的攻坚战后，朱德说：“榴弹炮也少了，再调给你们一个榴弹炮团。”吴瑞林回来后，与军政治委员刘兴元一商量，决定“带七万斤炸药，六万发炮弹”——“把辽沈、平津缴获的弹药都带上”。

吴瑞林亲自来到安阳城外，绕城一圈察看地形，回来后与一二四师师长徐国夫、一二五师师长彭龙飞、一二六师师长胡继成、一五五师师长廖仲符共同研究，决定采取“奔袭大包围和小突击的战术”，将安阳外围坚固据点的守军先行歼灭，然后由一二四、一二六师各选四个营组成突击队，待榴弹炮消灭敌人的工事后，歼灭外围两道堑壕里的敌人，最后用炸药爆破的方式解决两道水城。

四月十六日战斗打响。

第四十二军各师急促前进，当天包围安阳城并开始清扫外围。一二四师在攻击高楼庄时，由于事先侦察不够，部队穿插至深壕受阻。面对守军的凶猛反击，攻城部队猝不及防，在几个方向上都被打了回来。一二五师三七四团攻击东关园据点，守军仅两百余人，三七四团尽管兵力火力都占据优势，可还是有近百名官兵伤亡。一二六师三七七团攻击傅家庄，炮火把敌人的据点打得千疮百孔，官兵们奋勇冲击，歼灭和俘虏守军两百多人，三七七团也伤亡一百五十多人。安阳城第一道水城外的八个据点，第四十二军整整打了八天；打第二道水城的时候，先用重炮将城墙上的明堡、暗堡轰掉，然后用炸药反复爆破将水城炸开，经过七天的激战，才将第二道水城与城墙间的敌人歼灭。

安阳外围作战出现的伤亡，令军长吴瑞林心情沉重，他向野战军司令部发出了检讨电报。林彪把这封电报转发给各部队，以此提醒官兵们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

总结教训之后，第四十二军开始了认真的总攻准备：官兵们昼夜不停地进行土工作业，挖掘出数十条交通壕和爆破护城河的坑道，构筑了上千个防炮洞、弹药室和救护室。炮兵和爆破部队周密地侦察和计算，上万公斤黄色炸药被运上前沿。担任攻城任务的各师突击团，专门组成了负责爆破城墙的爆破连，以弥补炮兵和工兵的力量不足。五月五日十八时，安阳总攻战打响。一二四、一二五师担任主攻，自城西突破；一二六师在城北实施助攻；一五五、一六〇师加上军警卫团等部队在城东和城南佯攻，以伺机登城。步兵发起冲击前，一百四十门火炮对安阳城进行了半个小时的轰击，之后爆破连的官兵在炮火的掩护下爆破城墙。六日清晨，安阳城墙被炸开一道二十多米宽的口子，一二六师三七六团瞬间就抢占了突破口。艰苦的外围作战使第四十二军官兵对这座小城积累了太多的仇恨。突入城垣后，官兵们竟然回头把刚才炸开的铁丝网重新围好，把护城河重新封堵并灌满了水，他们决心不让一个敌人从眼前的这座小城中跑掉。自称“天兵神将”的安阳守军被迅猛分割包围，城内的百姓纷纷出来给解放军带路，告诉他们哪里藏着土顽和恶霸，逐街逐巷的清剿持续至黄昏十五时，安阳守军被全歼。

距离安阳不远的新乡，守军是国民党军第四十军。当初，朱德对吴瑞林说过：“新乡工事也很强，是国民党军第四十军的一个师在那里守备。但是不要紧，只要你把安阳先打下来，他们就会投降的。你不必担心。”果然，安阳那边炮声隆隆，新乡这边南下的解放军大部队昼夜不停滚滚而过，而停在城外没走的解放军架起了大炮，新乡四面的防御阵地都在射程之内，从城墙上朝外观望的国民党军惊慌不已。第四十军代理军长李晨熙是庞炳勋的旧部，同时他也是第四野战军炮兵团副团长冉影的表兄。冉影给李晨熙写了一封信托人带进城去。第三天，李晨熙派人派车将冉影及第四十军侦察科长李希才接进城。当听冉影说他的部队就是专门来打新乡的，李晨熙有些半信半疑：“你们过去了两个军，不是都没打吗？”冉影明确告诉他：“我们现在要打了。

我们军这次的任务就是打新乡。我来这一趟是为了避免流血，避免人民遭受损失，为你们指一条出路。”经过耐心的劝说，李晨熙最终率新乡一万七千守军接受和平改编。

安新战役歼灭国民党军三万三千余人，其中俘虏一万三千余人，毙伤两千五百余人，改编一万七千余人。

但是，这个插曲式的战斗却历时二十天之久，第四十二军主攻部队伤亡达两千七百零四人——这些官兵没能看到出发前朱德总司令告诉他们的“实在是好得很”的锦绣江南。

第四野战军特种兵部队已进入湖北，政治部主任唐凯随着火炮、坦克、装甲车车队驶入一个名叫姚家集的小镇时，突然，一辆吉普车逆向开来停在他面前，通信员报告说：“前面的墙上有一张告示是写给你的！”唐凯急忙赶去，看见一张标语一样的红纸，纸上写着：唐凯同志，你的母亲在此等你！

唐凯，自十四岁离开家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已经整整二十年没有回过家乡了。

不一会，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被人搀扶着出现在镇口。

镇上的百姓们说，老人听说这里要过队伍，已经等了几天了。

唐凯叫着“妈妈”跑了过去。

年迈的母亲望着眼前这个英武的解放军干部，从头到脚来回看就是说不出话来。最后，她用颤巍巍的手从怀里掏出一盒不知揣了多久的纸烟，捧给儿子说：“抽烟吧。”

唐凯，一个在以往的战斗中八次负伤，至今身体里还嵌有弹片的汉子，将衰老的母亲拥在胸口失声痛哭。

母亲领着儿子爬上山坡，山坡上有几座长满青草的土堆，里面埋着唐凯参加共产党后家里被国民党军杀害的七位亲人，有他的祖父、祖母以及他的哥哥们。

唐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孝敬母亲，他把南下前部队发给自己的蚊帐留了下来。他告诉母亲："以后，再也没有谁敢压迫咱穷人了。我还要去打仗，把天下所有的受苦人都解放出来。"

五月五日，第四野战军主力全部到达长江以北指定地域。

九日，中央军委致电林彪、萧克：

（一）你们主力已越过陇海线，快要到湖北境内了。根据长江北岸地区的粮食状况，大军久驻困难必多。又据白崇禧的意图，不是准备在衡州（今湖南衡阳）以北和我军作战，而是准备逐步撤退至衡州以南。因此，你们全军似有提早渡江时间的必要，并且不必全军到达北岸然后同时渡江，可以采取先后陆续渡江的方法。根据华野、中野从渡江［四月二十一日］至占领杭州、上饶一线并歼敌十二万人只需要两个星期的经验，你们从渡江到占领吉安、攸县、湘乡一线，大约有四个星期左右即够。如果你们主力能从六月十号左右开始渡江，则七月十号或略迟一点即可达上述一线，你们兵力展开在广大地区之后，粮食问题就不感困难了。（二）你们十三个军的使用问题，现在就宜大体确定。我们意见，湖北一个军，江西两个军，湖南三个军，共六个军可以固定下来。其余七个军及曾生纵队（两广纵队），应全部推进至以郴州为中心的区域，并准备在该区域与白崇禧打一仗［应估计白崇禧约二十五万人左右，可能在该区域和我军作战］。如果这七个军七月中旬前后能到攸县、湘乡之线，则八月中旬或下旬即可集中于郴州区域休整一个月，九月中旬或下旬以后即可向两广前进。（三）据曾生（两广纵队司令员）称，奉你们之命率一个国民党师（指由原国民党军一五七师和平改编的独立二十四师），辰（五月）灰（十日）从北平出发，要巳（六月）灰才能集中开封，需要一个月时间与广纵合编，要午（七月）灰左右才能由陇海线南进。请你们指示曾生，该部应争取八月底、九月初到达郴州地区，方能不失时机和主力一道向两广前进……

同时，中央军委决定，将第二野战军陈赓兵团划归林彪指挥，以增加对桂系的攻击兵力。

但是，第四野战军对白崇禧集团的攻击却一再延迟。

白崇禧发现第四野战军只有两个军渡江之后，调动所辖主力第七军，对前突至江西鄱阳湖以西地区的第四十三军实施攻击。为了将白崇禧主力吸引在长沙以北与岳州、南昌之间，不至于打一下就导致白崇禧全面撤退，林彪命令第四十、第四十三军立即停止南进，陈赓兵团也暂时不渡赣江，待大部队到达后对其实施大包围、大分割。但是，白崇禧突然停止不动了。而在西面，担负从宜昌、沙市渡江任务的第十三兵团，原准备直接向江北的国民党军宋希濂部发动攻击，夺取船只并迅速渡江。但无论是毛泽东还是林彪，都担心当面的宋希濂会因此退入鄂西和湘西山区。经过反复磋商之后，林彪命令第十三兵团："对敌在江北的五个师实行奔袭和迂回渗透的办法，使敌来不及渡江南退，使我能乘虚夺取江岸，抢得船只并以一两个师在江北，敌人尚未歼灭以前即插至长江以南，使敌江防瓦解，并断敌退路。如此既能解除渡江的困难，又能减少渡江以后前进的困难，并能达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目的。"

另一个迟滞第四野战军继续南进的问题是粮食。数十万大军每天必须消耗的粮草是一个惊人的数字，由于连年的灾害和国民党军的疯狂征抢，处于极度饥荒中的百姓无力供应如此庞大的部队。而从北方运粮需要时间，通往前线的道路、桥梁和铁路都已被南撤的国民党军破坏，连日的大雨更使得载重运输举步维艰。野战军官兵绝大多数是北方人，天气时而暑气蒸腾，时而阴雨淋漓，粮食供应不上，背负装备很重，常需急行军或强行军，对付蚊虫叮咬的蚊帐也准备不足，于是造成严重的非战斗减员。野战军后勤部第三分部部长邱国光报告说："一般连队发病率达百分之二十五，严重者达百分之七十。如第三十九军疟疾发病率达百分之四十七，第四十一军在三天行军中中暑三百多人"。

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致电中央军委：

粮食问题现成为影响行动的根本问题。赣西北、鄂南一带原来就是产粮少、人口少的地区，又加以国民党军队的征粮和地主将粮食贱价出卖与分散，又正值青黄不接之时，而我地方工作人员尚未到达，因此粮食成为严重的困难。我四十军在鄂南的部队，四十三军在南浔以西的部队，均连续来电叫苦。有的部队一天只吃一顿干饭、一顿稀饭，群众纷纷逃跑，并怨声载道。现在唯一办法，只有靠河南、湖北两地运粮到前方去。已令四野主力停止于长江与襄河以北就粮和休整，以待粮食的筹集，准备在本月底或七月初再发动作战……

基于上述情况，中央军委同意第四野战军由从原来的迅速渡江作战，转为暂缓渡江并进入休整状态，集结主力，筹集粮食，调整编制，进行适应江南的作战训练。

第四十五军驻扎在湖北鄂城休整，部队路过河南潢川时参军的高中学生凌行正得到了他的第一身军装，军装是从解放了的东北运来的。整整五十六年后，凌行正还记得军装的肩部、肘部、膝盖、臀部，“在这些容易被磨损的地方”，东北的百姓又加垫了一层布，“并且用针线缝制成蛛网状”。崭新的布鞋，“鞋底和鞋帮都密密麻麻用针线纳过，鞋头有两道用黑皮子包着的梁”。老兵告诉他这叫“大鼻子鞋”。同时发下来的还有一双白布袜子、一双绿色绑腿带、一枚五角形的八一帽徽，还有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胸章的背面写着部队番号和他的姓名。在这以前，凌行正穿的每件衣服和每双鞋都是娘缝的；而自此以后，他知道革命队伍将给与他一切。

就在第四野战军主力停在长江边进行休整的时候，宋希濂部突然向湖北荆门、当阳一线发动了攻势。林彪判断，这是宋希濂策动局部反攻的开始——实际上，缺粮的不只是林彪的部队，宋希濂的部队也没有粮食吃了。距离秋收还有两个月，所依靠的川粮供应不上，宋希濂知道湖北当阳还有不少存粮，因此，他的行动与其说是局部反攻，不如说是外出抢粮。林彪还判断，随着宋希濂的行动，因第四十三军停止南进，一直未敢轻举妄动的白崇禧也将有所动作。所以，林彪认

为应该迅速抓住敌人的突出部分，主力部队实施两侧纵深迂回，求得“对此地区敌人突然发动全线攻势”。

所谓“全线攻势”，就是向位于鄂西宜昌、沙市方向的宋希濂部和位于湘赣方向的白崇禧部同时发起攻击。

连续大雨，河川汪洋。

第四野战军南下之后面对强敌的第一场作战开始了。

令林彪没有料到的是，宜沙战役和湘赣战役不仅进行得异常艰苦，而且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战役目标。

白崇禧此时心情恶劣。他的部队已从长江一线不断后退，士气低迷，缺额严重，粮食不足，军饷无着，更重要的是，他知道无论是桂系还是自己都已前景暗淡。渡江战役发起前，北平和平谈判期间，毛泽东在会见李宗仁和白崇禧的私人代表时，曾表示共产党方面愿意与桂系和谈，虽然人民解放军必须过江，但只要桂系的军队不出击，人民解放军就不与桂系打，等将来具体商讨解决的办法。毛泽东甚至许诺，如果白崇禧喜欢带兵，一旦和谈成功，“我们可以请他继续带兵，请他指挥三十万军队”。毛泽东说：“这样做，不是我们没有力量打赢他，而是让国家和人民少受损失。”但是，白崇禧拒绝了，宣称自己决不投降。白崇禧的底气，大多来自他认为桂系军队仍有相当实力可与共产党分庭抗礼，同时李宗仁主政之后桂系也可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是，局势不但没有出现转机而且愈发日下，蒋介石依旧遥控着国民党的军政大权。不久前，行政院长何应钦因说话没人听愤然辞职，桂系提出请副院长居正出面组阁，但立即遭到立法院的否决，李宗仁无奈推举了阎锡山，这才得到立法院的通过。在研究组阁名单时，李宗仁力主白崇禧任国防部长，阎锡山飞到台湾呈请蒋介石批准，结果白崇禧的提名被蒋介石否决，国防部长这一要职被阎锡山自己兼任了。

白崇禧只能争取在军事上有所作为。

在湘赣方向上，他的部署原则是：非桂系的部队部署在交通要点，桂系部队部署在随时可以撤退的地区，各军的位置是：第九十七军位于岳阳及其以南铁路沿线；第五十八军位于铁路线以东的平江、浏阳一线；第一二六军位于平江以东的长寿街、铜鼓、官渡一线；第四十八军位于铜鼓以东的奉新、高安、上高一线；第四十六军位于上高以南的新余、分宜、宜春一线；第七军位于湘东与赣西交界处的醴陵、萍乡一线；第一〇三军驻守长沙西北方向的益阳；第二十三军驻守赣南铁路线上的吉安。另外，陈明仁部的第一兵团位于长沙、湘潭及其以西地区。

林彪一下子投入了十个军，作战总兵力达四十三万余人，可见他要把白崇禧集团围住并一口吃掉的决心之坚决。

湘赣战役的部署是：第十五兵团的先头部队第四十三军以一个师监视奉新一线守军，主力插到奉新南面的高安地域，截断敌人退路，并割裂其与左翼敌军的联系，争取抓住白崇禧的一个师甚至是一个军；第四十八、第四十四军在九江至武穴一线南渡长江，分别向奉新北面的武宁方向、高安以南的分宜方向前进；第十二兵团第四十军于岳阳以东的通山、通城地域集结，第四十五军从第四十军的北面渡江南下，该兵团待十五兵团打响之后，第四十军立即出击浏阳、醴陵，第四十五军越过铜鼓直插萍乡，第四十六军一个师沿着粤汉铁路南下抢占铁路桥梁；陈赓的第四兵团则西渡赣江插向萍乡。

林彪沿用了他的惯用战法，即以小兵力前出抓住一部敌人，围而不打吸引敌人增援，同时主力两翼包抄，最后形成巨大的合围圈。在这一战役部署中，前出的部队是否能抓住敌人，是完成所有作战设想的前提——“你们须充分地估计到敌人对侧翼甚敏感，而正面则较麻痹，因此你们必须以四十三军全力首先抓住奉新、高安两处之敌［这

是敌之突出部］，并首先抓住奉新的一个团，这是此次战役是否扑空的决定关键。”

但是，正是这一“关键”出了问题。

奉新与高安，一北一南，位于赣江以西，驻守在这里的是白崇禧部第四十八军一七六师。七月九日凌晨，第四十三军一二九师先遣团进至奉新以西的上富地区，保障主力顺利插向高安以南，以达到包围高安守军的目的；而一二八师待一二九师占领上富之后，渡过锦江插入奉新以南，达到包围奉新守军的目的。战役发起前，一二九师三八五团获悉，上富守军仅有国民党军青年军约两百人，但是，拂晓时分，当三八五团三营准备对上富发起攻击时，突然获悉守军中还有桂系的一个连，兵力不占优势的三营行动迟疑，结果上富守军闻风逃跑。而在奉新方向，一二八师三八四团距奉新还有约二十公里时，战前侦察说可以徒涉的潦河因连夜大雨河水突然上涨，三八四团临时紧急寻找船只，直到次日凌晨全团才得以渡河并实施攻击，但奉新守军早已逃走。与此同时，驻守高安的一七六师师部率一个团也在这天西逃上高。

第四十三军在上富、新奉和高安三处扑空，虽然部队立即发起追击，但是沿途桥梁被毁，追击速度缓慢，抓住敌人无望。于是，“先抓住敌人一部，而后吸引敌人增援”的作战前提在战役打响后不久就已不复存在。林彪判断白崇禧部将全线撤退，随即命令萧劲光的第十二兵团迅速南下，陈赓的第四兵团立即西渡赣江，两兵团取捷径奔袭萍乡截住西逃之敌。

就在这时，野战军司令部接到情报：白崇禧部第三兵团司令官张淦准备以第四十八军扼守上高、宜丰一线。据此，林彪认为只要敌人肯停下来，包围敌人的可能性就依旧存在，于是命第四十三军停止追击以迷惑敌人，同时命令第十二兵团和第四兵团加速前进赶到战场。

但是，还是晚了，白崇禧发现林彪有两侧迂回的企图，已于十三日下达了全线撤退的命令。

当白崇禧的主力部队跳出林彪的合围圈后，湘赣战役的作战目的已无实现的可能。

为了日后休整安全和保护铁路桥梁，林彪命令部队继续追击。

十七日，第四十六军占领平江；十九日，第四十军占领浏阳。

湘赣战役结束。

与湘赣战役同时进行的宜沙战役，第四野战军的对手是宋希濂。宋希濂拥有第二、第十五、第七十九、第一一八、第一二二、第一二四军，其中的第二军和第七十九军等部队全部美械装备，有很强的战斗力。宋希濂还在湘西大量收编地方武装，新编成五个师、一个独立旅和一个暂编军，总兵力号称有三十五万人。宋希濂的作战方针是：以主力防守长江南岸，以阻止解放军过江，并以有力部队守备北岸的宜昌、沙市两大据点，非万不得已不轻易放弃。

宜沙战役的部署是：第四十七军从襄阳、南彰一带南下，插入当阳与宜都之间；第三十八军南下至汉水两岸的宜城、钟祥一线隐蔽，待宋希濂部队进入荆门后，插入荆门以南断其退路并吸引援军；第四十九军从京山、天门一线西进至沙市以北，待第三十八军将要插到荆门时，突然西渡汉水迂回包围江陵与沙市之间的敌人；第三十九军集结于京山、天门一线，在第四十九军后跟进；湖北军区独立第一、第二师及两个独立团执行前哨诱敌任务。

上述部署，依旧是使用少量部队吸引敌人，两翼投入主力包抄合围的战法。战役的关键在于，部队运动的时候，必须高度隐蔽，因为

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当面敌人就会立即撤退，从而致使战役意图落空。

宜沙战役刚一开始，还是在关键之处出了问题。

七月九日，第四十七军右翼先头部队一四一师一部在南进途中，与正在北进的宋希濂部第二军九师一部遭遇，但是，一四一师的先头部队没有察觉，官兵们在雨中过河，衣服装备都已湿透，进了村子正忙于晾晒衣服和弹药，结果突然遭到敌人袭击，部队伤亡和被俘百人，更严重的是这一遭遇暴露了战役的意图。

国民党军第二军军长陈克非将情况报告宋希濂后，宋希濂立即命令部队全线后撤。

林彪也随即命令各部队从合围敌人改为追击逃敌。

这是第四野战军历史上少有的艰苦追击。官兵们在潮湿闷热的天气中开始奔跑，一路上全是奇怪的地名："三十五里路"、"四十八道河"，果然是山环着山水绕着水，不断有官兵因中暑和生病倒下。山区正值夏荒，新谷尚未成熟，群众因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了解已跑得无影无踪，有官兵因为饥饿误吃了桐子而中毒，好容易买到新收割的蚕豆，甚至会连皮带壳吃下去以充饥。鄂西山路狭窄崎岖，河谷幽深，羊肠小道高悬于崖边，官兵们的鞋子早已磨烂，双脚红肿。当暴雨突降时，纵横的河流因暴发的山洪水流湍急，渡河时常常有官兵被水冲走。地形生疏，又无地图可查，也无向导可寻，部队常常走错路。重装备根本上不来，因为重炮难以通过泥泞的水田和遍布的河流，而没有重武器的火力掩护，对敌人发动攻击势必会伤亡过大。

十三日，宋希濂各部已退入宜昌、沙市、江陵以及沿江的各渡口。

同时，宋希濂的指挥部也开始从宜昌往长江南岸撤离。

仗打到这个地步，只能坚决阻止敌人逃过长江。

第十三兵团命令：第四十九军围攻江陵和沙市，第四十七军及湖北军区独立第一、第二师围攻宜昌；第三十八军迅速在宜昌与宜都间的古老背一带渡江南进，切断宋希濂部的南逃退路。

十五日凌晨，第四十七军和第三十九军从东、西、北三面逼近宜昌城。

获悉宜昌危急，正在湖南常德收编地主武装的宋希濂，立即换乘各种交通工具北上赶往宜昌，当他乘坐一艘小兵舰驶往古老背时，发现江面已被封锁。尽管岸上的解放军官兵们并不知道宋希濂就在小兵舰上，但依旧猛烈开火，小兵舰四周落下密集的迫击炮弹，机枪子弹更是暴如骤雨。宋希濂对当时的情景记忆深刻：

> 舰上士兵有两人负伤，没有装甲的一些船舱被打了许多窟窿。我立于一块厚达六七公分的钢板后面，虽子弹打得钢板噼噼作响，因不能穿透，所以颇安全。舰上的平射炮及机关枪亦以猛烈火力向岸上回击。事后我常常想起，如果当时没有兵舰来接，我乘小火轮回宜昌，必然在中途被解放军所截俘；如果当时在古老背的解放军有平射炮的话，那艘兵舰可能就被击毁了。

十五日中午，宋希濂到达宜昌。此时，第四野战军已放缓了正面攻击。宋希濂判断林彪必是在实施两翼迂回以堵住他的退路。于是，命令一部分兵力阻滞解放军的攻击，主力全部退出宜昌一线，向邻近湖北与四川交界处的巴东转移。

宜昌国民党守军大部逃走，十六日凌晨三时，第四十七军进入宜昌城。随后，第三十八军占领当阳、石门、桃源和慈利；第四十九军占领公安、澧县、临澧和常德。

宜沙战役结束。

湘赣战役和宜沙战役的发动，割断了宋希濂部与白崇禧部的联系，当宋希濂部从湖北西移四川之后，白崇禧部的侧翼就完全暴露了，而第四野战军先后占领湘鄂赣的广大地区，主力直指湘中逼近长沙，为尔后的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数十万大军兴师动众，仅仅把对手向前平推了一下，实在算不上打的是胜仗。一个特别值得警觉的教训是：自渡江战役之后，国民党军已基本上放弃死守城市的作战方式，特别是白崇禧的桂军更是熟悉山地河川作战，兵力不大但机动性很强，战术已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甚至是游击战，这一变化恐怕连游击战的创始者毛泽东都始料不及。当然，失利的原因还有那令北方官兵捉摸不透的烟雨蒙蒙的江南气候。第四野战军第一参谋长萧克说：

> 有些人喜欢谈三国，谈到赤壁之战，大家都笑话曹操，说他的军队是北方人，一到湖北，不服水土，加上别的原因，打了大败仗。他战前没有看出来，倒是周瑜看出来了，五万人马敢于打他八十三万。四野的高级指挥员，大部分是南方人，长征到北方才十多年，便忽视以至忘记了南方的气候和生活特点。

湘赣战役结束后，由于白崇禧部南撤，江西方向只剩下国民党军第二十三、第七十军和一些地方武装，总兵力约为三万余人。野战军司令部命令第四十八军自南昌南下，扫清江西境内的国民党军残余部队，打开进入广东的通道。

第四十八军官兵追击残敌所经过的地方，是一连串他们在老兵口中曾听过的地名：兴国、赣州、信丰、茨坪、茅坪、瑞金等等。这是共产党人红色武装的发源地，每一个地方都与共产党人的历史血脉相连。怀着一种异常的心情，官兵们猛打猛追，残敌望风逃遁。当激烈的枪声再一次震荡赣南山谷的时候，茅屋的门板后面露出一双双惊恐疑惑的眼睛——母亲们把孩子搂在怀里，妇女们把脸涂黑躲藏起来。中国共产党人红色武装走过的艰难岁月，伴随着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血

雨腥风，赣南的每一间茅屋、每一棵树木和每一块石头都遭受过国民党军的刀砍火烧。当年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撤离苏区之后，从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七年，整个苏区被屠杀的红军家属及拥护红色政权的贫苦农民达八十万人。而那些幸存下来的百姓，自此只有在梦里才能重见他们拥有过的天堂般的日子：穷苦人获得了宝贵的土地，苏维埃国家由工农当家作主。十多年过去了，清晨嘹亮的军号声和晚霞中儿童团的歌声都已远去，赣南闭塞的山谷中不再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百姓们只知道共产党人带着红色武装远远地走了，他们的儿子、丈夫或者是兄弟从此没了消息。然而，一九四九年的夏天，突然间，茅屋外有人用北方口音在喊：“我们是当年的红军！毛主席的队伍回来啦！”

第四十八军一路迅猛向南，不断地包围和歼灭溃逃的敌人。国民党军已不成建制跑得零乱而慌张。解放军官兵上山搜剿的时候，老人们站在路口指路，他们熟悉山里的每一条小路；年轻人拿起柴刀和棍棒，跟随部队呐喊不止。官兵连续追了四天四夜没有停止，极度的疲惫使他们不得不边跑边打盹，干部们停下来开会研究敌情的时间只要超过五分钟就鼾声四起。国民党军官兵被追上的时候竟然在路边睡得死了一样，听见解放军官兵大喊“你们被解放了”之后，他们把枪一扔，眼也不睁：“既然解放了，就让我们再睡一会儿吧。”

第四十八军一四三师一直追到当年中央苏区的南部边界信丰。一九三五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的时候，就是从这里突围而出的。此时，信丰大桥上已被国民党军安放了大量的炸药，冲到这里的先头部队化装成国民党军，竟然顺利地与布防在这里准备炸桥的敌人换了防，然后官兵们把守军全部俘虏了。他们给俘虏规定了几条纪律：可以做饭，可以睡觉，可以夫妻亲热，可以保管自己的武器和财物；不准打枪，不准逃跑，不准破坏武器，不准抢百姓的东西和欺负妇女。国民

党兵十分惊奇，对解放军说："早知道对我们这样好，早就不走了，也不用打了，在赣州不动等着你们到多好。"

第四十八军官兵与当地的游击队员们见面了。

这些游击队员自红军离开之后就没放下手中的枪，他们面容憔悴，光着脚板，衣衫褴褛，第四十八军官兵送上缴获的国民党军军装，游击队员们说宁可光着身子也不穿，于是一四三师师长张兴华命令官兵们把自己身上的军装脱下来给游击队员每人凑一套衣服、一双鞋子。游击队员们说："鞋子我们不要，留给大军穿，你们一天跑那么多路，我们还要做鞋给你们呢。"

官兵们问一位女游击队员："你多大了？"

女游击队员说："你们离开江西根据地那年我二十岁，你们走了十五年了。"

官兵们说："二十岁加十五年，是三十五岁。有几个小孩了？"

女游击队员说："中国不解放，我就不结婚。"

官兵们说："全国快解放了，你该结婚了，祝你今年结婚！"

女游击队员对官兵们说："我们祝全国解放！"

在第四野战军官兵们的眼前，山重水复，征程漫漫，尚未解放的大江南一直铺展到遥远的南海之滨。

## 关中决战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偏居西北的胡宗南不知如何是好了。

内战爆发以来，胡宗南军事集团始终没有受到大规模攻击，其原因连胡宗南本人也十分清楚：既不是他拥有无坚不摧的部队，也不是他善于排兵布阵，而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西北战场上兵力始终处于弱势。

一九四九年二月，西北野战军正式改称第一野战军，下辖七个军并两个骑兵师。其中的第七、第八军和骑兵第一师远在山西、绥远和晋绥地区作战。在即将发起新战役的前夕，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报告了他所能指挥的兵力情况：

……我军概况，现有九万五千人［警四旅改为十二师，四千人在内］，一、二两军五个师，每师平均七千八百余［师编制］。三军七师近八千人，九师不到六千人。四军三个师多者五千人，少者四千人。六军两个师，每师五千人。刻一九四八年全军伤亡四万二千九百七十余［其中有被俘失踪逃亡九千人］，干部占一万一千人［班级占六千余人，连、排级近四千人，营级以上及医务人员等一千人］。医愈归队者已有两千余人。经过冬季整训，干部已补齐，预备干部有四千余人。党员占全军比例三分之一强。俘虏兵约占全军百分之八十，连队比例更大，班长绝大多数是俘虏兵，排长、副排长亦近半数，连指挥员各军中均有个别。绝对多数是四川人［除四纵外］，基本上已成为南方军队……

一九四九年春，国民党军在西北地区仍有二十五个军六十一个师（旅），总兵力达四十万人。其中，西安绥靖公署胡宗南集团辖第一、第三、第十七、第二十七、第三十、第三十六、第三十八、第五十七、第六十五、第六十九、第七十六、第九十、第九十八军，共十三个军三十三个师，除两个军在四川整补外，其余全部位于陕中渭河流域。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马步芳、马鸿逵、马鸿宾集团辖第十一、第八十一、第八十二、第一二八、第一二九、第一二〇、第九十一、第一一九军，共八个军二十四个师，驻扎在甘肃、青海、宁夏三省内。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陶峙岳部辖整编四十二、七十八师以及整编骑兵第一师及两个独立骑兵旅。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邓宝珊部辖第二十二军，约一万人，驻守陕西榆林地区。

双方力量悬殊，尽管为牵制胡宗南于西北战场，彭德怀率部不断地周旋作战，但胡宗南并没有感受到军事上的巨大威胁——相对于辽沈、淮海、平津战场而言，西北地区国共两军基本处于对垒状态。

但是，到了一九四九年春，胡宗南认为，共产党人已能够腾出兵力大举西进，因为在整个北方，国民党军只剩下西北这块地盘了。早晚会有那么一天，西进的解放军大部队会与彭德怀部一起，如同对付杜聿明那样把他合围于西安城下。胡宗南开始迅速收缩兵力，决定凭借秦岭依渭水列阵，并与青海、宁夏的马步芳和马鸿逵的部队连接，共同抗击共产党军队将要对西北发动的攻势。

一月十七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二、三月间拟开二中全会，希彭贺习三同志均能到会；如有可能，并望张宗逊、王震二同志中能来一人。时间在北平攻克后再通知，如情况许可，西北我军能在你们动身前打一仗再休整为好；如不可能，则不强求。"

二月一日，第一野战军下达"春季攻势"作战命令。

正值天降大雪，部队行动困难，毛泽东再次致电彭德怀：

> 依据你处当面敌情是否有利于即打一仗。如无甚大有利，可以暂时不打。以便你及王震出席二中全会，留张宗逊（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和赵（赵寿山，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甘（甘泗淇，第一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在一起指挥部队继续休整。太原大同解决后，华北三个兵团二十三万人可全部用于西北，至少徐（徐向前）周（周士第）、杨（杨得志）罗（罗瑞卿）两兵团十七万人可以用于西北。彻底解决胡（胡宗南）马（马步芳和马鸿逵），占领潼关、西安、汉中、天水、兰州，有待于徐杨等部到达。太原、大同大约可在三月内解决。休整一个月至两个月，大约在六月徐杨等部即可协同你部攻西安。二中全会定于三月一日开会，希望你及贺（贺龙）习（习仲勋）王（王震）诸同志均能到会，二月二十八日以前必须到达中央。如能打一仗，则你及王震不能到会，故不打为宜……

但是，彭德怀必须作战，除了干扰胡宗南的退守计划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部队已"三月无粮，须取数县才能解决吃饭问题"。彭德怀

没有一口吃掉胡宗南的奢望，但对胡宗南的行动加以干扰还是能做到的。

十七日，彭德怀动身前往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

十八日，在副司令员张宗逊的指挥下，第一野战军向胡宗南发起攻击。

第四军从洛水西岸的黄陵出击，当面的国民党军是第七十六军二十师。二十师是两个月前由三个保安团临时拼凑的。师长褚静亚上任时向胡宗南提出两个条件：一是对三个团长的任命不要插手，二是必须训练几个月再投入作战。胡宗南向来把部队视为自己的私产，团长以上职务的任命绝对一手包办。褚静亚本想用这个先决条件把这份危险的差事推掉，不料胡宗南却一口全部答应，这使褚静亚的心里越发不踏实。他认为如果胡宗南在部队的人事权上都肯让步了，可见国民党军的作战前景暗淡到了什么地步。

褚师长冒着大雪去耀县、白水等地接收保安团，按照胡宗南部一个师的编制规模，他至少能接收一万两千人，但是到了地方才发现，三个保安团加在一起竟然只有三千五百人，而且多数士兵没有棉衣，军饷也欠了好几个月，饥寒交迫简直就是一帮乞丐。褚师长急忙申请补充员额，催发军饷，领取必须的棉衣和武器。就在他刚刚着手编练部队的时候，胡宗南的作战命令到了：二十师开赴前线，把第六十九军替换下来。

临时拼凑起来的二十师在风雪中开拔了，目的地是西安以北的重镇铜川。褚静亚率部到达那里，发现第六十九军已南撤耀县。于是，毫无防备的二十师立即受到攻击，几小时之后部队就顶不住了，混乱不堪地开始往耀县跑，后卫部队不断地被追上咬住，好不容易申请来的行李和军粮丢弃一路。撤到耀县的第六十九军见到二十师的溃兵

后，认为解放军大部队马上就要打来了，全军急忙接着向南撤往三原方向。二十师见状跟在第六十九军的后面继续溃逃。

胡宗南的战术是，只要解放军进攻，主力立即后撤，只留少数部队抵挡，以求保存实力待机反击——“今后我们的战略，是要大踏步的撤退，大踏步的前进，来歼灭共军主力。也许我们一下进到陕北，或者一下退到四川。”

逃到三原的褚静亚本想收容部队，可是胡宗南的命令又到了，让他立刻向南开至泾阳附近抵挡彭德怀部的攻势——“如违抗命令，当军法从事。”褚静亚只好带着他的残余部队连夜出发。

二十八日夜，第一野战军第四军将褚静亚包围。

第四军首先向二十师的右翼发起攻击，二十师毫无招架之力，一个团仓促筑起的防线瞬间即被突破。黄昏将至时，第四军官兵打到了褚静亚的师指挥部，指挥部里所有的人顿时四散逃跑。褚静亚和他的参谋长张凌汉，被逐渐逼近的解放军官兵压迫到落着残雪的麦田里被俘。

第一野战军占领了渭河以北的铜川、耀县、蒲城、富平。

但是，他们很快发现自己很难站住脚。

西面的马步芳害怕胡宗南全线后撤，从而使自己的侧翼完全暴露，迅速派出四个骑兵团从甘肃东进陕南前来增援。而胡宗南此时在咸阳以北也集结着第一、第六十九、第三十八、第九十、第六十五、第三十六军等部共十一个师。

第一野战军没有歼敌的机会，遂全军沿咸榆公路向北撤退。

三月十一日晨七时，正在撤退中的第四军后方突然传来枪声。军长王世泰随即赶到十师师部了解情况，原来是马步芳的骑兵先头部队追上来了。由于敌人距离很近，只能打一下再走。马步芳的骑兵果然凶狠，风尘滚滚，马刀闪亮，喊杀着直扑十师二十八团一营的阻击阵地。冲击未果之后，又转向二十八团三营以及二十九团一营和三营的阵地。骑兵呼啸而至，一营和三营的防线被撕开。位于二线阵地的二十九团二营没能组织起有效防御，部队在慌乱后撤时失去控制。十师师长高锦纯立即命令参谋长李振华亲自前往二十八团组织抵抗，同时命令三十团不惜一切实施反击。二十九团团长张亚雄指挥一营拼死抗击，子弹专打骑兵的马匹，二连指导员杨象红埋了文件后，带领官兵与那些落下马的敌人展开肉搏战，连支部书记刘福光带领的两个班全部战死。

马步芳的骑兵部队由二四八师师长马得胜率领。出击之前，马得胜首先到西安拜见胡宗南领受指示，胡宗南还特别安排飞机让他在空中巡视战场，这使他的虚荣心得到充分满足。此时，眼见着彭德怀部伤亡严重，马得胜的战意越来越浓。他跨上一匹高头大马，一把摔掉身上的军大衣，露出式样漂亮的蓝色毛衣，在四名随从的簇拥下，挥舞战刀，策马大叫，向两军交战的前沿阵地疾驰而去。也许是马得胜的毛衣和行为都过分显眼了，密集的炮弹准确地朝他落下来，在腾空而起的烟火中马得胜一头栽下马。

师长死了，骑兵顿时混乱起来。

二十八、二十九团官兵趁势猛冲，三十团将三个连的骑兵压进一条山沟里，除俘敌数十名外其余全部击毙。

此战，马步芳的骑兵二四八师损失八百多人，五百多匹战马被解放军打死或缴获。

第一野战军发动的春季攻势，实际上是拉锯式的出击作战。胡宗南部大多未战即撤，第一野战军虽歼敌不多，但出击打乱了胡宗南收缩战线的部署，而且官兵们还弄到三百七十三万斤粮食。

要想解放大西北，第一野战军必须增强兵力与装备。

四月二十五日，太原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中央军委致电徐向前、周士第和罗瑞卿："十八及十九兵团改隶第一野战军建制，尔后行动整训及补给等统听彭德怀同志指挥区处。"

第十八、第十九兵团入陕需要时间。

这时候，北平和平解放后被改编的原国民党军的七个团，正由第一野战军第六军副军长张贤约率领向陕西开进。胡宗南的情报人员把这支西进的队伍当成从华北战场开来的大兵团了，于是胡宗南紧急召开疏散会议部署主力部队撤守计划。胡宗南没想到的是，会议一结束，张宗逊就得到了情报。

五月十一日，张宗逊致电彭德怀与中央军委：

（一）最近西安情报电悉，敌军内部传出消息称：胡宗南及其绥署、一军、六十五军、三十六军、九十军、三军、二十七军，于辰（五月）删（十五日）南撤，西安、宝鸡各留一指挥所，分别由罗列（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兼参谋长）、沈策（国民党军第一一四军军长）负责。密息：留三十八军［高陵及以南］、十七军［十二师三原，余西安］、五十七军［乾、礼］（陕西乾县、礼泉）、六十九军［咸］（陕西咸阳）为掩护部队。

（二）为了在关中地区歼敌一部，重点地打乱其撤退计划，尽量抢救其搬余物资不致破坏，并更有利徒步我下一战役开进，本日召集各军首长讨论后，拟于辰删出动。第一步以歼灭三原地区之敌为目标；第二步看情况逐次夺取咸阳、西安、宝鸡，歼灭以上地区之敌……

胡宗南原本认为，解放军大军进攻西安，起码要待两三个月增援兵力到达之后。况且，即使大举合围西安，也只能从外围逐次打起，不可能直接插向西安就打，而外围作战起码要消耗掉一两个月的时

间。但是，情报显示，彭德怀的部队已经南下，并且朝着西安直扑而来。胡宗南立即陷入难以决断之中：是否守西安？如何守西安？

此时的西安已经秩序大乱。年初，西安绥署机关提前向汉中撤离，国民党陕西省府、中央银行西安分行、官员们拥有股份的企业也开始了逃亡。接着，物价狂涨，黄金银元和美钞的黑市交易公开化，大街上全都是倒卖黄金银元的交易人群。胡宗南更是为自己撤离西安做着各项准备。他首先制定了新的征集“绥靖经费”措施，除加强各种税收之外，还勒令西安的富商巨贾每人都要“捐献”黄金，说是用来作为储备，以发行地方性货币券稳定迅速攀升的物价，但谁都知道这只是胡宗南临走前要大捞一笔。胡宗南平时总是斥责部下在搜集共产党情报方面低能无用，可是这一回，富商巨贾们的名单很快就呈报上来了，且几乎无一漏网，每个人的名字后面都注明了“某人金条五十根”或“金条十根”等必须“捐献”的数额。结果，富商巨贾们纷纷逃亡，机场和火车站被他们堆积如山的行李挤得混乱不堪，西安四周的公路上也挤满汽车和大车。胡宗南命令把富商巨贾们强行扣住，但被扣的人“自愿捐献”的大多是房屋——这些高堂大屋平时确实很值钱，可这时候胡宗南要那么多房子干什么？胡宗南还命令把西安城内的青年学生组织起来，因为他认为即使在秦岭打游击也需要大批基层军政干部。在陕西省教育厅的主持下，西安高中以上的学校都不上课了，学生们被编成“西安绥署学生总队”——满城的百姓都说，连孩子也要编进队伍跟着军队跑了，这世道不是天塌地陷了吗？

胡宗南最终决定撤出西安，时间定在五月二十日。

胡宗南的理由是：长江是一条天险防线，如能守住便可以形成南北对峙，那样守住西安才有特殊意义，因为在长江以北只有西安是尚存的重要据点，进可攻退可守。如今南京都已失陷，西安成为瓮中之

鳖，毫无坚守的价值。况且蒋介石已制定了以四川为基地、固守西南以待后图的计划。

然而，十七日午夜，胡宗南提前撤往汉中，因为第一野战军正向西安包抄而来。第一军向岐山和临平、第二军向武功和咸阳、第六军经咸阳向西安。十八日，第一军攻占礼泉和乾县，第三军进至临平，第二军攻进咸阳。第六军则配合第二军攻占咸阳后抵近渭河，由于渭河大桥已被国民党军炸断，部队在炮火的掩护下强行徒涉，十七师五十团渡过渭河后，打下西安西北方向的门户三桥镇，小镇外的铁轨上停着一列火车，火车司机听说要去打胡宗南，忙说："赶紧上来，我来开车。"第六军官兵乘坐火车直逼西安城下。

西安城内已宣布戒严。省府院子里彻夜都在装运行李，大量的小汽车拥挤在通往机场的路上，数百辆卡车蜿蜒在通向宝鸡的路上。警备西安的第十七军开始撤退，序列是军部、警卫营、工兵营、通讯营、无线电排，第十七军撤走后的西安城交自卫总队防守。但是，第十七军出发时，却未见自卫总队的影子。军警卫营长阎进杰打电话找总队长，总机却说电话接不通。阎进杰说："接不通我枪毙你！"谁知总机回答说："枪毙我也接不通，再说你也枪毙不了我。"阎进杰一阵恼怒之后，突然觉得有些诧异，他把电话打到自卫总队守卫连，连长说："解放军已经到了西门外，正在喊话要求我们投降。"阎进杰问为什么不开枪，连长说我们没有子弹了。阎进杰又跑到南门，南门已经上锁，说是根据自卫总队的命令谁也不许出城，阎进杰强行打开城门仓皇逃走——"我想肯定自卫总队叛变了。"

西安自卫总队起义并让出了防区。

五月二十一日，张宗逊、赵寿山致电中央军委：

我六军于二十日拂晓，由咸阳渡过渭河，歼保二旅一部，于十一时进入西安城。守敌十七军于我军渡渭后南逃。胡（胡宗南）、董（董钊，时任国民党陕西省府主席）两匪十八日

（应为十七日午夜）逃后，伪党政机关及公营企业多被抢劫，电厂、机器厂、面粉厂闻被破坏。三桥镇有火车头四部，工人自动开车载运我进攻部队追击敌人。

第一野战军第六军进入西安城，军长罗元发将军部设在城内杨虎城将军的公馆里，他向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报告时讲得很详细：这里有大沙发、大地毯，楼梯和楼板都是一条一条的木板，踩上去咯噔咯噔地响，可惜大沙发破了，因为战士们进来时，以为这个黑糊糊的东西是暗堡，照着上面打了一梭子。

这一天，胡宗南的各军在撤退中都发生了混乱。第三十军三十师的任务是掩护主力撤退的右侧背，该师在三原集结后，连夜向西行军与第五十七军会合，然后一起向宝鸡方向撤退。第五十七军由原青年军二〇三师改编，官兵多是二十多岁的四川小伙子，配备着美式卡宾枪和冲锋枪，军长徐汝城是蒋介石的黄埔得意门生，于是全军从军长到士兵个个盛气凌人。胡宗南在给三十师的电报中，命令他们掩护第五十七军“转进”。三十师师长王敬鑫放眼望去，不知如何才能掩护这样一支队伍：第五十七军行军如同百姓搬家，军长的吉普车上携妻带女，军官们也大多带着家眷，大量的行李和辎重装满强征来的车辆。由于大队人马行动迟缓，第一野战军第一军和第四军很快就追了上来。第五十七军先丢车辆，后扔辎重，粮弹沿途抛弃，公文到处散落，担任掩护的三十师成了后卫收容队。逃到距凤翔县城还有几公里的地方，突然前面一声炮响，第一野战军第一军二师迅速抢占凤翔东北的姚家沟，切断了第五十七军和三十师的退路。撤退的长龙被围困在公路上，徐汝城的吉普车被打坏，他跑到王敬鑫那里商量对策，王敬鑫拍着胸脯让徐军长放心，说三十师哪怕打到一兵一卒。但是，三十师组织的数次突围都被打了回来，有军官劝王敬鑫赶快带着队伍跑了算了，可王敬鑫认为，如果三十师逃脱致使第五十七军被歼，胡宗南肯定饶不了他。拂晓时分，第一军和第四军的最后攻击开始了。徐汝城率先扔下部队带着家眷逃走，第五十七军即刻兵败如山倒，三十

师也跟着溃散了。二十二日清晨，王敬鑫被打死，第五十七军和三十师八千余人被俘。

后陕中战役，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全部退守秦岭一线。

二十五日，彭德怀自太原返回位于乾县秦家庄的野战军司令部。

彭德怀认为，如果继续向西攻击宝鸡，很可能会受到马步芳、马鸿逵部队的侧击，因此部队应暂时停止进攻。毛泽东也认为，在第十八、第十九兵团没有到达之前，以彭德怀现有的兵力，打胡和打马无法兼顾，因此致电第一野战军："你们应耐心等候三、四个星期，不要性急，待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打几个好仗，即可直取兰州，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只要胡马不走，仗是总有的打的。"

就在毛泽东的电报发出之日，第十八兵团在司令员周士第的率领下从太原沿同蒲铁路向陕西开进。而杨得志、李志民率领的第十九兵团已从禹门口西渡黄河进入陕西。

第十八、第十九兵团尚未到达战场，彭德怀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二马来了。

在中国的西北部地区，盘踞着拥有独立军事力量的"二马"，即青海的马步芳和宁夏的马鸿逵，俗称"青马"和"宁马"。二马中，以青马马步芳的势力最大兵力最强。此刻，马步芳与马鸿逵正在争权夺利。无论对青马还是宁马，蒋介石虽然表面笼络，但一直存有戒备。多年来，他把二马的势力严格限制在青海、宁夏两省范围内，西北军政长官和甘肃省府主席这两个重要职务却始终不让二马染指。但是，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防线，原来的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滞留北平，蒋介石为了利用还没有受到严重打击的二马的军事力量，提出可以让二马中

的一人当西北军政长官，另一人当甘肃省府主席，条件是二马必须派兵东出陇南增援胡宗南作战。

马鸿逵获悉国民党政府准备把西北大权交给马家的消息后，主动邀请马步芳商讨西北大局，马步芳却一直没有回应，因为他已派人去广州活动，并最终得到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支持。马鸿逵只好独自盘算个中利害：马步芳的实力比他大，不如主动推荐马步芳当西北军政长官，自己当甘肃省府主席，这样还可以把他的宁夏省府主席职位交给儿子马敦静，甘肃与宁夏的地盘一连接，自己的实力也就扩大了。由此，他亲自到青海去见马步芳，马步芳显得异常谦虚，说他要在马鸿逵的领导下共同防御共产党——此时马步芳的真实想法是：不但自己要当西北军政长官，而且还要让儿子马继援当甘肃省府主席。

五月十八日，国民政府在广州任命马步芳为西北军政代理长官。马步芳到兰州就任之后，将长官公署的各级官吏全部换上自己的人马，连驻守兰州的部队也都换成了青马军。兰州城连日狂欢，青海还组织了数百人的代表团，携带大量珍贵礼品和几千匹战马，浩浩荡荡地开进兰州以示庆贺。而马鸿逵却门庭冷落，因为甘肃省府主席的任命迟迟不到。他不断地去找马步芳交涉，开始还受到热情接待，后来马步芳干脆拒不见面了。马鸿逵忍无可忍，逢人便骂："这样昏天黑地，荒淫无耻地干，怎么能担任大事！"

但是，青马的青海兵团以及宁马的宁夏兵团还是出动了。

二马的出击，除必须履行国民党方面交出西北大权的先决条件之外，也是出于"甘肃东翼暴露，兰州倍感威胁，决难自保，必须夺回西安，宁、甘、青诸始能安全"的考虑。李宗仁和白崇禧都对二马的出击喜出望外，不断地催促其迅速推进，而已经撤守秦岭的胡宗南却喜忧参半：二马的参战自然可以牵制和缓解彭德怀部的攻击，甚至有夺回咸阳和西安的可能；但同时也打乱了自己保存实力撤守川滇的部署。

无奈中，胡宗南只有派兵北出秦岭与马家军联合作战，攻击发起时间预定为六月十日。

因为兵力处于绝对劣势，彭德怀最终决定撤退：“华北各兵团（第十八、第十九兵团）未到关中前，除特别有利外，暂不向敌进攻，如敌向我反扑，拟于咸阳、兴平、礼泉、长安地区各个歼敌。”

彭德怀的撤退导致了敌人的推进速度愈发加快。

那时，同蒲铁路从太原只通到灵石，自灵石以南以西的霍州、临汾、运城、华阴、渭南一直到西安只有步行。在彭德怀的不断催促下，第十八兵团先头部队第六十一军，以每天四十公里的速度昼夜急行，终于在六月十日赶到西安地区。彭德怀立即命令一八二师担任西安防务，以便第六军向宝鸡移动；一八一师确保咸阳；一八三师位于咸阳西南面的渭河北岸布防，掩护咸阳的侧翼。

一八一师任务严峻。一个师要抗击四个师的敌人，还有从未交过手的马步芳的骑兵。全师成马蹄形紧靠渭河形成阻击线后，背水背城而战已没有任何退路。因为连续行军而极度疲惫的官兵精神紧张，他们刚刚在太原结束一场血战，现在又要在咸阳等待着一场血战的来临。

侦察参谋王青山带领侦察班前出侦察，没走多远就见西边尘土飞扬，马步芳的骑兵来了。王青山只要回去报告敌情，就算完成了任务，但是他决定派侦察员尚洪申回去报告，自己留在这里顶上一阵子，因为后面的部队刚进入阵地，工事修得还很仓促，顶上一阵子就可以为部队争取迎战的时间。连同王青山在内，一共十二个人，他们想找一个有利的阻击地形，但周围是一片无险可守的平地，而马步芳的骑兵瞬间就冲到了眼前。疾驰的骑兵没想到有人在这里阻挡他们，冲在最前面的骑兵中弹落马后，后面的骑兵呐喊着策马冲来，王青山

和十一名战士背靠背围成一个圆圈，用冲锋枪组成一圈火力抵抗敌人的冲击。数百匹马围着这个小小的圆圈疯狂地砍杀，残忍的砍杀持续了三个小时，直到王青山参谋和十一个年轻的战士全部倒在血泊之中。

咸阳保卫战开始了。

六月十二日下午，马步芳的骑兵分两队向一八一师的阵地实施两翼攻击。在三团二连的阵地前，冲锋的马队受壕沟阻拦，前面的马匹掉进沟里，后面的骑兵收不住马，被迫拥挤在沟前，二连的机枪开始了猛烈扫射。一团二连三排的阵地被骑兵冲开。一营长陈钊命令三连二排等骑兵冲上来之后，先扔手榴弹，然后用在太原缴获的日本战刀砍杀骑兵。刀光闪闪，血溅数尺，二连三排失守的阵地最终被夺回。十三日，步兵加入了对咸阳城的攻击。一八一师阻击阵地的前面先是出现了大批耕牛，在被枪炮声惊得狂奔乱跑的耕牛后面，步兵和骑兵开始了联合冲锋。一八一师官兵血肉模糊地倒在飞舞的马刀之下，至十四日中午前沿阵地已大部分丢失。只有左翼三团一连一个排的阵地被围后，指导员郑国俊率领官兵连续打退敌人的九次冲锋，全排每一挺机枪的枪管都打红了，这个孤立的阵地始终没有丢失。用来掩护冲击队伍的耕牛已全部跑散，敌人冲到咸阳城边的壕沟里，攀城用的梯子不够长，步兵就人摞人地往上冲，一八一师官兵不断地往下扔手榴弹，咸阳城下的壕沟里血肉横飞。吴家堡阵地距离咸阳城墙最近，此刻，前沿上只剩下副排长魏海东一个人，骑兵冲上来的时候，没有了子弹的魏海东挥舞大刀，连续砍倒数名敌人，最后敌人的三把马刀同时砍向他才把他砍倒。马步芳的骑兵已经攻到咸阳城下，战斗进入最残酷的拉锯状态。

突然，战场上一声呼啸，马步芳的骑兵们愣了一下，然后就飞速撤退了。

有消息说，解放军的大部队已渡过风陵渡，“如果今天攻不下咸阳城，明天恐怕就站不脚了”，马步芳立即命令骑兵拂晓前撤出战场。

而胡宗南的部队十四日才进至渭河两岸，当获悉马步芳的部队遭遇猛烈抗击后，他立即命令自己的部队后撤三四十公里。身边的人问：打不下咸阳如何收复西安？胡宗南的答复是：校长仍然器重我是因为我还有军队。

七月初，随着第十八、第十九兵团全部进入西北战场，第一野战军的总兵力从十五万五千余人，一下子猛增到十二个军、三十五个师，共三十四万余人，连同地方部队，人民解放军在西北战场的总兵力达四十余万人。特别是，从郑州至西安的铁路已经修复通车，这使第一野战军的粮弹补给及伤员转运状况大为改观。

西北战场的战略大转折终于来临了。

第一野战军下达“关于消灭胡马军的战役指示”：

……我们的战役目标，是要全歼胡、马军主力的全部或大部。敌我对比我只占相对优势，不能采取一举聚歼，只能采取分割歼灭，钳制抗击一个方面，集中主力歼灭另一个方面，一块一块地分割歼灭敌人。总的方面如此，局部方面也如此。得手之后，乘胜扩大战果。当战斗发展我已取得绝对优势时，就要扩大包围圈，求得不失时机的迅速的完全的包围敌人。当敌人情况不利突围逃跑时，就要不惜一切，不顾疲劳，进行连续的猛烈的追击，务使在追击中全歼敌人，达成战役总任务……我们盼望已久的与胡、马匪军的决战就要开始了，这个决战的胜利，就决定了整个西北的迅速解放……

第一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制定了“钳马打胡”的作战方针，即以一部兵力牵制二马，集中主力在宝鸡以东地区歼灭位于扶风、眉县的胡宗南部主力。这是自战争爆发以来，彭德怀在西北战场第一次指挥如此“奢侈”的兵力：

第十九兵团并指挥骑兵第二旅，在东起泾河东岸、西至永寿以南以西构筑工事，钳制二马的两个兵团，确保沿咸阳至凤翔公路作战的

部队右侧后安全；

第二兵团隐蔽集结于临平镇以东、乾县以南地域，十二日向法门寺、益店镇及其南北取平行攻击前进，截断位于罗局镇以东的胡宗南部第三十八、第六十五军和青马军第一一九军西撤宝鸡的退路，会同第十八兵团将上述三个军包围并歼灭；

第十八兵团并指挥第一兵团第七军，沿着咸凤公路及其以北一线作战，向武功以南以西攻击前进，会同第二兵团围歼第三十八、第六十五、第一一九军；

第一兵团于十二日开始，沿渭河南岸各个歼击周至至眉县地区的胡宗南部第九十、第三十六军，得手后向宝鸡以南挺进，截断胡宗南主力的退路，并相机策应渭河北岸的作战；

第六十一军卫戍西安并歼灭位于西安以南的胡宗南部第十七军十二师；

野战军指挥所七月十一日到达咸阳。 `

此役，最关键是第二兵团的行动。彭德怀特别提醒兵团司令员许光达：部队要隐蔽开进，遇到小股敌人不要纠缠，要迅速突然插入敌后，攻占罗局镇和眉县车站，切断敌人向宝鸡的退路。

胡宗南与马步芳协商的防御作战计划，仅仅规定了各自的防御范围，并没有切实可行的联合作战预案。东起武功的漆水河，西至扶风的益店镇、罗局镇和眉县车站，上百里的防线上，并列摆放着第三十八、第六十五、第一一九、第九十、第三十六共五个军，各军、师、团之间都有相互重叠。一些军官讥讽这样的防线如“羊拉屎”，而第十八兵团司令官李振却说：“这是没有军事修养的人说的话。”宝鸡指挥所主任裴昌会视察了前线，嘱咐部队趁麦子成熟之际多搞点粮食。防

御漆水河阵地的一七七师师长刘孟廉问，可否从麦子成熟维持到水果成熟的时候？裴昌会答："这倒没问题，打太原的共军还没有过河，光西北的共军，是不容易把我们撵走的。别说等到水果成熟，我们还要在这里过年哩。"到了武功西郊的第一一九军阵地，军长王治岐问，彭德怀最近是否有攻击的迹象？裴昌会答："太原虽然被共军占领，但是山西是阎锡山统治多年的地方，共军还不容易在短期稳定山西局势，所以大部兵力也不是短期内能运转起来的。就是过来几个军，只要我们同马家联络好，以逸待劳，仍然可以打个好仗。"

七月十日下午，扶眉战役开始。

杨得志率第十九兵团附骑兵第二师首先在战场的北面向二马展开佯攻，使其不敢大举南下渭河协同胡宗南部作战，保障野战军西进部队右翼的安全。同时，为掩护野战军主力西进歼敌的作战意图，保障野战军西进部队左翼的安全，警备西安的第六十一军军部率一八一、一八二师南下，向位于西安以南子午镇一带的胡宗南部第十七军十二师发起了攻击。

野战军主力夹渭河两岸插向扶风、眉县地区。关中酷暑，骄阳如火，干燥的黄土地上烟尘浮动，西进部队的官兵在不间断奔跑中汗渍斑斑，焦渴难耐，指挥员们喉咙嘶哑，仍不断地喊："快点！不然敌人就跑了！"十一日黄昏，第二兵团主力到达益店镇、青化镇后，由北向南迅速穿插，迂回到敌第三十八、第六十五、第一一九军的侧后。一天以后，沿渭河北岸西进的第二兵团与沿渭河南岸西进的第一兵团将敌人的四个军围在了长宁镇以西、罗局镇以东热似烤锅般的渭河河滩上。

这时候，第二兵团张志达率领的第四军能否及时赶到并守住罗局镇，堵住敌人西撤宝鸡的退路，保证野战军主力将罗局镇以东所有被分割围住的敌人歼灭，已成为达成作战目的的关键。

一年前，第四军还是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的时候，野战军主力部队攻占宝鸡后受到裴昌会兵团的猛烈反击，负责侧翼掩护的四纵阻击阵地被突破，在未向上级请示和通知友邻部队的情况下，四纵自行撤退到岐山东北的山里去了，使裴昌会兵团得以向宝鸡长驱直入，导致战局的突然恶化和部队的重大损失，战后四纵曾受到彭德怀的严厉批评。此时，再一次向这个地域奔跑的第四军官兵心情异样，他们知道彭德怀把这个任务交给第四军，除了信任之外，不能说没有让他们一洗前耻的含义。第四军的三个师全速前进，十二小时内急行军八十公里。十二日凌晨三时，十师的先头部队三十团和师指挥所到达渭河边。没有桥，官兵们用绑腿结成长练，手挽着手涉水强渡，更有一些官兵迫不及待地扑进水里，边渡河边喝水借以浇灭喉咙的干渴。过了河，天快亮了，爬上罗局镇土塬的尖兵与敌人接了火，三十团的先头营将敌人击溃后，发现胡宗南的部队正沿着铁路两侧撤退，抓到的俘虏说这是第六十五军。先头营不顾一切地扑了上去，横着冲进第六十五军的行军序列，第六十五军逃散得如同泛滥的洪水。十师控制了陇海铁路西安至宝鸡段上的咽喉部位——罗局镇。

胡宗南罗列在渭河河滩上的主力要想西撤宝鸡必须经过罗局镇。

第十八兵团司令官李振十分惊愕：“共军究竟由哪里来？来了多少人？为什么各方面都没有情况，偏偏第三十八军的后方发生了战斗？”此时，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第六十二军和第一兵团第七军已经从渭河的北南两面合力插入胡宗南的第三十八军的后方。第三十八军军长李振西和李振两人反复研究，都认为共军决不会这么快就到达自己的后方纵深，眼前出现的部队很可能是一些地方零散武装，“企图打乱我们的阵势”。但是，当各部队相继打响遭遇战的消息不断传来时，李振感到情况有些不妙。他立即决定机械化部队先从眉县车站撤往宝鸡，然后给宝鸡的裴昌会打电话请示行动方案。谁知电话总机说裴昌会此刻正在睡觉，李振把电话再打到裴昌会的指挥部，指挥部的人也不敢

叫醒他。天大亮之后，裴昌会的电话终于接通，听说整团整师的解放军已经到达罗局镇附近，裴昌会说："西兰公路和渭河南北都没有发生战事，凭什么说有一个师左右的兵力在我军的后边进攻？"他要求李振不准夸大事实，让共军少数部队影响全盘，先抓几个俘虏来问问再说——"事后我们才知道，出现在第三十八军后方的解放军，并不是什么神兵，也不是我的夸大，同时解放军也不是一个师，而是一个军，在老百姓的带路和严密封锁消息的情况下，由马继援和王治岐两军的作战境地上，越过了我们认为不能通过的大沟悬崖，一夜间走了一百五六十华里，横插到我们的后方，占领了益店镇、罗局镇、眉县车站，切断了我们的退路。"

第四军十师像钉子一样钉在了罗局镇。

十二日十五时，野战军主力向被包围在渭河滩一线的胡宗南部发起总攻。李振正忙着调集部队应战，第一一九军军长王治岐跑来说，他的部队已被切成豆腐块，无法形成有效的抵抗：二四四师从武功向扶风撤退时遭到伏击，两个团被击溃，一个团根本没有跑出来，另一个团向渭河以南逃走了；二四七师师长陈倬带领一个骑兵团正在突围；一九一师师长廖凤运下落不明；军参谋长郭宝贤西撤时"因为体弱在途中被俘"。接着，第三十八军一七七师溃败下来的军官跑来报告说，师长刘孟廉带着五三一团的一个营遭到袭击，刘师长负伤；五二九团被迫南渡渭河逃跑。李振意识到局面已经难以收拾。

第一野战军的攻势愈来愈猛，包围圈愈来愈小，李振的第十八兵团部和李振西的第三十八军军部被挤压在一块。眼看无处可退，李振西和李振开始商量如何逃脱，最后决定渡过渭河各自逃命。但是，解放军官兵已经冲到了第三十八军军部的窑洞顶上，李振西和五十五师师长曹维汉、副师长石涤非等人在卫兵的掩护下往外冲，五十多个卫兵大部分伤亡。李振西拽着曹维汉钻进青纱帐，跑到一个叫祁家坡的

村庄时再次陷入包围中，五三〇团团长带着一个营赶来救援，结果这个营全部伤亡，团长王立志被打死。李振西跑到渭河河滩上，在溃兵的拥挤中下了河，但河面已被解放军的火力封锁。他在几名士兵的保护下顺流而下，然后上岸躲藏在麦田中，直到午夜才顺着渭河南岸的河滩开始往宝鸡跑。到了宝鸡才知道，分路逃跑的兵团司令官李振已经负伤——“我到第五兵团吃罢晚饭后，满以为能好好地睡一夜，谁知睡到半夜，解放军又追到宝鸡。于是我们又急忙逃跑，除第一一九军军长王治岐带几十个人沿渭河逃天水外，其余兵团司令、军、师、团长都挤在散伙里，拥进了大散关（秦岭北沿的西部关口），到双石铺（今陕甘交界处凤县）才停住脚。”

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十四日凌晨三时，第一野战军第四军攻克宝鸡，第三军占领凤翔。

国民党军战史称此战为“关中会战”：“主决战方面包含宁夏、陇东及第五（含陇南兵团）等兵团，但无统一指挥，不仅未能使打击力统合发挥，且诸马只知道拥兵自重，互相猜疑，各自为战，于不愿损耗各自兵力下，遇局部小挫而擅退，影响全局，功亏一篑。”而西安绥靖公署既不知道二马的兵团“因小挫而退”，又不清楚彭德怀“援军之壮阔”，“正如兵法所云：‘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

扶眉战役是第一野战军在西北战场进行的一次带有战略决战性的作战。战役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野战军从此由相对劣势转为绝对优势，并且完全掌握了西北战场的军事主动权，为尔后继续西进歼灭二马集团解放整个西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胡宗南已无力返回关中，在秦岭徘徊数日之后，残部沿川陕公路继续南撤，西兰公路、陇海铁路因此完全敞开。

大漠孤烟，长河落日。

遥远的大西北已暴露在第一野战军的攻击之下。

一九四九年盛夏，在溽热潮湿的江南，第二、第三野战军正准备向丛林密布的东南以及山高水险的西南实施攻击；第四野战军正在中南水网交错的洞庭湖一带与白崇禧部对峙；而在天高地阔的大西北，第一野战军在把胡宗南残部逼进险峻的秦岭之后一鼓作气向西横扫而去。

## 一片孤城万仞山

“云雷天堑，金汤地险，名藩自古皋兰。”

一座坚城位于甘肃中部的皋兰山麓，黄河自城北流过，群山三面环绕，西北为河西走廊，东南为河套平原。

第一野战军官兵在这座坚城之下流了太多的血。

西进之初，没有多少人认为青宁二马会死守兰州。原因很简单：兵力不占优势的二马擅长的不是守城而是野战。

扶眉战役后，胡宗南集团的兵力只剩下十万，分散于秦岭北麓一线。而没受太大损失的青宁二马向西退守，准备利用平凉一线的有利地形，阻止彭德怀部沿西兰公路向甘肃和宁夏推进。马步芳以西北军政长官的名义草拟出“关陇会战指导腹案计划”，派公署副长官刘任在兰州至平凉之间的静宁召集军事会议，二马指挥官们最终制定的作战部署是：宁马以第一二八、第十一军共六个师和一个骑兵团、两个炮兵营，于平凉以东以南构成弧形阻击防线；青马的第八十二、第一二九、第九十一军西移六盘山，待机向平凉以南的华亭方向实施突击；胡宗南部则适时从秦岭方向协同作战。

二马不退却积极应战，正中彭德怀的下怀。第一野战军计划以第十八兵团的四个师相机追击胡宗南残部，占领双石铺，佯装进攻汉中，掩护第一兵团行动；第一兵团西出天水，然后转向北"袭占会宁和定西"，抢先截断平凉之敌的退路；第十九兵团沿西兰公路追击二马，"如敌先期通过会宁、定西时"，则准备会攻兰州；第二兵团协同第一、第十九兵团"侧击西撤之敌"。而如果二马固守平凉，不再西撤，"我亦以三个兵团围歼之"。

毛泽东对第一野战军在扶眉战役后即刻发起对二马的作战非常赞赏：

……打胡胜利极大，甚慰。不顾热天乘胜举行打马战役是很对的。打完这一仗应休整一短期，然后再进，惟休整时间亦不宜太长，以恢复疲劳，整顿队势，补充缺额为原则。如能于八月上半月完成打马战役，休整半月至一月，九月西进，十月占领兰州、西宁及甘、凉、肃三州（指甘肃张掖、武威、酒泉），则有可能于冬季占领迪化（今乌鲁木齐），不必等到明春……照我想，只要平凉战役能歼两马主力，则西北战局即可基本上解决，往后占领甘、宁、青、新四省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问题，没有严重的作战问题……

但是，"只是走路和接管"的美好愿望从一开始就遭遇了挫折。

马鸿逵看到马步芳的作战计划后心情恶劣。将宁马的部队全部放在第一线，而青马的部队则在后面待机，马鸿逵认为这是马步芳给他挖的一个陷阱：打胜了，马步芳坐享其成；打败了，马步芳在平凉的部队会立即西撤。那么，无论胜败，吃亏的都只能是宁马的部队。马鸿逵立即给宁马前线总指挥卢忠良下达了"保存实力，退守宁夏"的命令，宁马各部接到命令后瞬间就没影了。这导致不敢单独应战的青马部队也随即向西退去——马步芳的平凉会战还在纸上时就已经泡汤了。

失去战机的彭德怀命令部队向西猛追。

自七月二十一日起，除第十八兵团的两个师于西安、四个师于宝鸡负责钳制胡宗南外，第一野战军第一、第二、第十九兵团兵分三路向西推进。

二马各自朝着自己的老窝撤退：宁马的第一二八、第十一军撤到平凉及东北地区，第一二〇军位于天水，全军背靠宁夏；青马骑兵第八师和第八十二军骑兵十四旅撤退到平凉以南的固关、张家川，二四八师、一〇〇师位于平凉以西的静宁、隆德，一九〇师退到静宁以南的威戍，全军背靠兰州。

彭德怀希望通过野战将二马主力予以歼灭，以避免日后对兰州和西宁等城市发动攻坚作战。因为此时在第一野战军的追击部队中，除第十九兵团参加过太原战役外，其他主力部队大多没有攻坚城市的经验。

在分兵追击的过程中，二马终于有部队停下来准备抗击了。

彭德怀有了实现野外决战的最后战机。

此时，马鸿逵正在闷热难耐的南方。他先飞往台湾面见蒋介石，出来后对随从的亲信说："老蒋这个时候才叫我到甘肃去，他早做啥着呢！"马鸿逵不但在台湾购置了房产，甚至还在香港购买了房产，并联系陈纳德安排好从宁夏转移财产和出国定居等问题。然后他飞往广州，向行政院长阎锡山郑重交涉为什么迟迟不发表他的甘肃省府主席任命。就在马鸿逵飞来飞去的时候，马步芳给马鸿逵的前线总指挥卢忠良打来电话："你们的主席（马鸿逵当时是宁夏省府主席）将要担任甘肃省主席，现在要好好打，不能再退了。"接着，马步芳派来一个慰问团，给宁马军官们颁发奖章和慰劳品，师以上军官发的奖章都是镀金的。马鸿逵的儿子马敦静召集第八十一军军长马惇靖、二五七师师长马英才等商议，认为尽管马步芳把奖章镀了金，还是不能听他指

挥，应该按照马鸿逵“不打硬仗”的原则，继续向宁夏撤退。就在这时，马鸿逵从广州打来电话：“甘肃省政府主席发表了，在三关口要抵抗一下。”

这就是宁马军停下来准备作战的原因：马鸿逵终于当上甘肃省府主席，不打一下不好意思；更主要的是，马鸿逵明白，时局到了这个时候，保存实力乃至保存他的宁夏，已经没有多少必要了，让宁马军与西进的解放军拼一下，无论胜败都可以换取一点政治资本，因为他将来很可能要在蒋介石的台湾生存下去。

宁马军“抵抗一下”的地点，名叫任山河。

任山河地区位于六盘山东麓，扼守着通往宁夏南部重镇固原的要道。这里山峦叠嶂，沟壑交错，断崖峭壁高达数十丈，其前哨阵地即三关口。八月一日，第一野战军第十九兵团六十五军一九三师向三关口发起猛攻。第六十四军及第六十三军一八八师攻击任山河。刚刚还烈日当空，突然暴雨夹杂冰雹而至，因为没有树木涵养雨水，雨水瞬间就变成了山洪，正在攀爬沟壑的官兵不少人被倾泻的洪水冲走。第六十四军军长曾思玉命令停止攻击。再次攻击于第二天中午发动。五七四团的六个连在炮火支援下沿山路向任山河村逼近，途中受到宁马军正面火力的阻击，然后又突遇两侧伏兵的侧射。二营六连六班在敌人反击时坚守不退，班长燕飞被敌人的马刀刺中，肠子从破裂的腹部流出，他系紧裤带接着冲杀直至阵亡。在五七四团从正面攻击任山河的同时，五七二团突击宁马军七七〇团的阻击阵地，因地形不利攻击受阻；五七一团和五六八团联合攻击宁马军第十一军主力据守的罗家山阵地，激战之后与敌形成对峙。曾思玉决定调山炮营到罗家山阵地。下午十六时，第三次攻击开始，五七四团首先击溃任家河村守军，然后迂回到罗家山阵地的侧后。大雨中，宁马军受到两面夹击，

各部队拥上通往宁夏的公路开始全线撤退。八月二日，第六十四军突进固原县城。

青马军“抵抗一下”的地点名叫固关。这里确是个关口，卡在陕南进入陇东的咽喉部位，四面崇山峻岭，一条山道穿越其间，过了关口后可直达天水。此时，青马的主力几乎全部聚集在这一带，前面是骑兵十四旅，后面是骑兵第八师、一〇〇师和一九〇师。如果能在这里打个围歼战，青马军的历史便可能到此结束。因此，王震的第一兵团计划由第一军和第七军的一个师正面攻击固关，其余主力部队待青马军各部前来增援时全力打援，然后形成合围圈以求全胜——当然，前提是青马军肯在这一带不惜一切进行决战。

至少处于最前沿的骑兵十四旅旅长马成贤决心血拼。有军官提醒他，固关地呈凹形，狭长扁窄，不利于骑兵作战，应该转移阵地，以图保存实力再战，但马成贤信誓旦旦，说这是骑兵旅立功的时机，无论如何要死守固关。骑兵十四旅的三个团加重武器营、战防炮连展开了阻击阵地，马成贤命令全旅以“简而固”的办法构筑防御工事。二十七日下午，前哨骑兵飞马报告：“共军大部队顺着陇州至固关的公路密集急进，还有更多的部队在南北两侧似有移动，正面前哨部队已与共军接战。”骑兵十四旅的军官从望远镜里看见了大军接近的黑压压的阵势，令他们惊讶的是，在黑压压的步兵群前面还有一个庞大的炮兵群，于是他们再次向马旅长建议：大批的战马极易暴露目标，骑兵难以抵挡炮火的轰击，部队还是赶快后撤为好。马成贤似乎有点下不来台，说“共军行动不会这么快”，即使他们真的来了，我们也要干到底。但是一转身，他还是和后面的骑兵第八师师长马英取得了联系，让他们随时准备上来增援。

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对第一军军长贺炳炎和第七军军长彭绍辉说，当年我们红二方面军走出草地，遭到马家军的围追堵截，很多战

友都牺牲在陇东这块土地上。这次我们西进，拳头伸出去后，就要把马家军彻底打碎歼灭。第一兵团的攻击部署是：第一军一师附炮兵团攻击固关，其中二团和三团分两路实施攻击，一团为预备队。三师八团跟进掩护其右翼安全，后面的序列是军部、三师和二师。二十八日凌晨，炮兵团发射的第一发炮弹，就落在了骑兵十四旅的旅部，马成贤当时不在指挥部，几名通信兵被当场炸死，逃出来的军官对炮打得如此准确惊异不已——肯定是老百姓告的密！他们这么解释这发长了眼睛的炮弹。接着，一线阵地几乎同时受到攻击。青马的骑兵以凶悍著称，但打阵地战却没有章法。中午的时候，二线阻击阵地被相继突破。骑兵们认为马背上才是他们相对安全的地方，于是只要顶不住解放军的攻击，便立即从阻击阵地上跑下来跨上马顺着公路杂乱地向西逃。

马成贤有些慌了，不断地打电话给后面的骑兵第八师让他们赶快增援。师长马英说部队已经出动，十四旅只要再坚持最后五分钟就行。但是，好几个五分钟过去了，还是不见骑兵第八师的援兵上来。有人报告说，马师长的骑兵正在战场外围转圈呢。马成贤明白了，马英是要等自己伤亡大半之后再上来争功。焦急的马成贤决定亲自去前沿督战，刚一上去就被一发炮弹炸断了胳膊。卫兵簇拥着他下去急救，他嘱咐参谋长马尚武，不要把他负伤的消息传出去，以免影响士气，并说他要到马继援军长那儿告马英的状。马成贤被抬了下去，左翼二团团长马福魁满脸是血跑来请求撤退，马尚武不敢下命令，犹豫不决之际再次给马英打电话，对方还是说“再坚持最后五分钟”。

这是与马家军作战时令彭德怀最头疼的事：马家军几乎一触即溃，骑兵撤退的速度很快，两翼实施包抄的部队无论怎样不停歇地前进，总是赶不到撤退的骑兵前面。此刻，只有第七军二十师官兵翻越大黑山，赶到了预定的包抄地点。但是，包括骑兵第八师在内的青马主力已经撤走，二十师的官兵把坚持拼上一把的骑兵十四旅围住了。

十四旅混乱的人马被压缩在狭窄的公路上，马匹集中的地方遭到炮火的猛烈轰击，参谋长马尚武已经无法控制部队：

……官兵们互不相顾，四处逃命。但炮弹如急雨，倾泻于马群。峡内石块乱飞，硝烟弥漫，全部处于火海包围之中。不到半小时，峡内人马死尸堆积，血水染红了固关河。当时天气炎热，臭气冲天，几乎令人不能呼吸。残余人马，突围两次，都被击溃。我的乘马中弹倒毙，随即逃南山丛林，又被解放军截住去路，随行的营、连长数人，亦被解放军打死。解放军向我们喊话："不要怕，放下武器，投降！"但是我又转身窜入北山林中，向平凉方向逃去。这次战斗中，除被击毙的官兵外，约有千名官兵和负伤人员被解放军俘虏，战马三千多匹中，除部分马匹负伤残废外，约有七百多匹被擒，余均死于炮火中。团长级以下的官兵，仅有四百多名逃生，先后集中于定西。

无论对宁马还是青马，彭德怀都没有达成围歼的作战目的。

宁马部队退守宁夏，青马主力则退守兰州。

兰州攻坚战已不可避免。

第一野战军开始向兰州急进，随军西进的作家杜鹏程记述道：

大雨倾盆，河水奔腾叫嚣，电光频频闪烁，雷声在头顶上爆炸，天地间成了可怕而恐怖的世界！部队在大雨中一个拉一个前进，牲口跌倒了，在泥潭水泽中挣扎，人被水推走了，不时可以听到跌倒的叫声，雨水从脖子里下来，顺裤腰往下流。部队又跑步，前边有枪声。既冷且冻，浑身湿透，雷声、雨声、水声，在这茫茫大川里，什么也看不见、也听不见……走了二十里后找不到村庄，我们站在雨里淋了两个小时。说也奇怪，很多战士坐在泥泞大雨中睡得呼呼的，疲劳到什么程度可想而知……

八月四日，第一野战军下达向兰州、西宁攻击的预备命令，决定以一部牵制宁夏马鸿逵部，集中绝对优势兵力，首先歼灭青、甘地区的马步芳部，并准备阻击新疆方向可能的援敌：第一兵团（欠第七军）附第六十二军为左兵团，沿西兰公路取武山、陇西、临洮，得手后渡大夏河经临夏直取西宁，截断青马从甘肃撤守青海的退路。第七军主力在东面控制天水，与第十八兵团合力打通天水至宝鸡的铁路，保护左兵团的交通运输补给。第二兵团为中路军，由庄浪与秦安间的莲花镇西出，经通渭向兰州以南、以西攻击前进，包围兰州守军；如

果兰州守军先退或北窜，该兵团即西进，协同第一兵团攻击西宁或尾敌北追。第十九兵团（欠第六十四军）为右路军，第六十五、第六十三军由甘肃、宁夏交界处的隆德、固原一路南下，经兴隆镇、会宁、定西，向兰州以东攻击前进；第六十四军控制固原及其以北牵制宁马。命令要求各部队于九日之前完成进攻兰州、西宁的一切准备。

中央军委复电：

> 八月四日发来歼灭甘、青匪军的预备命令，一般甚好。惟请注意左兵团所取之路线似过于迂回，且经临洮、临夏渡黄河直取西宁，系深入马（马步芳）家老巢。过去四方面军曾打算走此路西渡，因遇阻路险折回。望令一兵团负责仔细调查此路道路、粮食情况及渡河条件，尤其是回民关系如何，对大军经过具有决定意义……据一般了解，青马残暴，在其主力未被歼前，对我敌意甚深，而回民中间又不若宁回（宁夏回族）曾受我好影响，故对深入青马老巢寻其主力作战，必须谨慎行事，大意不得。望以此意告王震为要。

彭德怀告诫指挥员们：虽然在之前的战斗中青马军一打即溃，但接下来与马步芳在兰州的决战，必会是一场艰苦的攻坚作战。解决了兰州这个西北第二大城市，“就基本上解决了西北问题”。我们绝不能再让青马军跑了，让他跑回老巢青海去，“那里是辽阔的少数民族地区，人烟稀少，粮食短缺，就将增加进军作战的困难”，更重要的是要延长解放大西北的时间。彭德怀说：“我们不怕他守，而是怕他跑掉。如果他真的不跑，就到了我们把他消灭的时候了。”

十九日至二十日，右路第十九兵团推进到兰州东南二十五公里处的定远、郭家庄地区；中路第二兵团推进到兰州以南二十公里的阿干镇，并接着向兰州城以西迂回。

第一野战军从东、南、西三面包围了兰州。

西北坚城矗立在眼前的万仞山峦之间。

如果历史允许假设的话，如果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仍然是张治中而不是马步芳，兰州血战就有可能避免。

马步芳，共产党人的死敌。一九三五年秋，中央红军长征进入甘肃南部的时候，青马的骑兵疯狂围追刚刚走出草地的红军官兵；一九三七年冬，青马军倾巢出动，在河西走廊将红四方面军西路军冲散，屠杀无数；一九四八年，西府战役中，青马军增援榆林时曾残酷杀害被俘的西北野战军官兵……青马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之间积累了太多的仇恨。此刻，一九四九年夏，坚城兰州城下，攻守双方都没有试图和平解决的任何意愿，只有血战到底。

马步芳曾说："如果给我十架飞机，我就能把青天白日旗帜高举十年。"

而从战场态势上讲，青马可谓孤军守兰州。

在兰州以及河西走廊地区，国民党中央军部队包括第九十一、第一一九、第一二〇军等部队，从序列上讲隶属于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指挥。但是，在官兵们的心里，这些部队的军事归属，似乎与军政长官马步芳没有任何关系。在中央军部队中，没有人承认自己是马步芳的部下；如果说他们还有指挥官的话，那只能是公署副长官刘任。而就在第一野战军兵临兰州之际，刘任已和中央军系的军官们达成一个"密议"：兰州城不可守，如果马步芳要守，就让他自己守好了，与中央军没什么关系——在国民党军大势已去的时刻，西北中央军军官们的想法是：南京、上海都守不住，兰州还有什么可守的？解放军占领兰州之后，必将南下进入四川，攻占富饶广袤的西南，而不会深入荒凉的河西走廊，更不会"急于向戈壁千里的新疆挺进"。那么，仗打到兰州后，西北战事就要告一段落，只要躲在河西走廊深处，等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是没有可能的。再说，马步芳向来看不起中央军，他

的势力在西北越来越大对中央军有什么好处？用共产党的力量把他彻底铲除难道不是件好事么？

与马步芳有直接军事联盟关系的是胡宗南。无论胡宗南如何表态要全力支持青马军作战，但是，连马步芳本人都难以相信这种承诺。关中会战时，两军在一个地区作战都没有实现任何协同；一旦兰州受到攻击，远在秦岭的胡宗南怎么可能以远水救近火？更何况彭德怀大军西去正是胡宗南求之不得的，他刚好利用这个喘息的时机收拢残部扼守秦岭，以便不利之时向西南撤退——遥远的兰州城与胡宗南有什么关系？另一个军事联盟者是宁夏的马鸿逵。当马鸿逵极力争取甘肃省府主席的职位时，马步芳竟然打电报给广州的阎锡山，说“甘肃省主席一职，原拟请马副长官鸿逵兼任，因他坚辞不就，可否由职暂行兼任”？马鸿逵因此与马步芳彻底闹翻了。为了让二马齐心协力抗击解放军向西北的进军，阎锡山把两人叫到广州从中极力调和，终于两人决定一起飞回兰州“并肩战斗”。可是，第二天一早，马鸿逵就变卦了，说他要先回宁夏整理部队，然后再去增援兰州，说完自己先飞走了。

马步芳的儿子、第八十二军军长马继援并不主张固守兰州，他认为骑兵不善于守城，不如在兰州以东的定西一带，利用有利地形与彭德怀部周旋，或许还有寻机得胜的可能。第八十二军参谋长马文鼎的主张折中，但从军事上讲别具用心，他建议部署少量部队在兰州城外围的险要据点，用阻击战和反击战消耗解放军的有生力量，主力则一律在黄河北岸布防。当解放军付出巨大伤亡逐一攻克外围据点后，青马军即将粮弹物资转运一空的兰州城放弃。彭德怀的大军进入兰州城，仅二十万市民和几十万部队的吃饭问题就能让他们陷入困境。更何况黄河天堑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防线，彭德怀要想渡过黄河，在重兵布防之下“既无船又无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青马主力却能够得到河西走廊和青海广大地区源源不断的粮食弹药接济——老蒋与共产党划长江而治不成，青马与共产党划黄河而治不是没有可能的。

但是，马步芳还是决定孤注一掷坚守兰州。

皋兰山是兰州南面的天然屏障，主阵地被削成五至十米高的峭壁，峭壁上筑有钢筋水泥碉堡群，峭壁的腰部设有隐藏的机枪掩体，峭壁外侧是深五米的壕沟，各条壕沟都筑有暗堡和野战工事，彼此有交通壕连接。皋兰山中央是营盘岭阵地，东与马家山、西与沈家岭阵地衔接，彼此可以相互策应增援。而在兰州的东南方向，窦家山阵地是兰州的东大门，也是防线上的要冲；十里山是城东屏障，阵地南接窦家山，西连马家山，西兰公路从其山谷中自东南折向西北，主阵地周围挖有三道外壕，山腰绝壁之上有重机枪火力点。兰州的西南是沈家岭、狗娃山，狗娃山西侧是兰州通往临夏的公路，沈家岭下是兰州通往阿干镇的公路，这两个阵地犹如兰州的钥匙，锁好之后兰州便可坚如磐石。

马步芳的军事部署是：第八十二军负责兰州内线作战任务，其中一〇〇师负责防守十里山、窦家山、马家山等要点，二四八师负责防守皋兰山营盘岭阵地，一九〇师负责防守沈家岭和狗娃山一线。第一二九军的两个师为预备队。黄河以北由新编第一师、骑兵第八师和在固关被歼后补编的十四旅等部队防守——当然，还有中央军和宁马军的“配合”行动：第九十一军和第一二〇军以及马鸿逵的第八十一军防守黄河沿线，时机成熟时切断西兰公路的交通补给线。战役指挥部成员是：总指挥马继援，副总指挥刘任、马步銮、卢忠良、赵遂、马文鼎。宁夏兵团为总预备队，准备以两个师的兵力策应兰州作战。

至少在字面上，青马军对部署信心十足：以坚决的守城消耗共军实力，一旦时机成熟，中央军和宁马军两面夹击，与青马军一起聚歼彭德怀部于兰州城下。

悍匪守城，恶战在即。

第一野战军各部队到达兰州外围的第二天，第十九兵团第六十三、第六十五军各一部即对兰州东南的马家山、古城岭发动了攻击；第二兵团第四、第六军各一部对兰州西南的营盘岭、沈家岭和十里山阵地的攻击也同时展开。两军刚一接战，战斗便显出残酷。第一野战军攻击部队在坚固的堡垒和密集的火网面前伤亡严重，官兵于陡立的悬崖坡面上根本看不见敌人的影子，但敌人的子弹和手榴弹却暴雨一样沿坡落下。眼看着攻击受挫，青马军突然一片呼啸，在猛烈火力的掩护下成连成营地发动反击，双方官兵即刻进入白刃战，青马军的马刀狂风一样挥舞，第一野战军官兵血肉飞溅。各个阵地上的冲击与反冲击数次往复，攻击兰州外围据点的战斗没能取得任何进展。

彭德怀下令全线停止攻击，而且一停就是三天。

野战军司令部致电位于前线的第二兵团司令员许光达、副政治委员徐立清、参谋长张文舟，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李志民、副政治委员葛晏春、参谋长耿飚，并告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参谋长张希钦，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士第、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王新亭：

进攻兰州的战术指示：

一、青马匪军为今日敌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在全国也是有数的顽敌。我们对他须有足够的估计，并作充分的精神准备，力戒轻敌、骄傲、急性。进攻时须仔细侦察，精密计划，充分准备，做正规的进攻。任何疏忽、大意与侥幸心理都是错误的。

二、须集中优势兵力、火力、技术于一点，一个一个山头、房舍、阵地，逐次地歼灭敌人。不攻则已，攻必须奏效。

三、进攻中，须充分准备歼灭敌人反冲锋部队，组织歼灭敌反冲锋的火力，构筑抗击反冲锋的工事。对沟与交通壕内，须有打击反冲锋的配备。进攻队形，须加强纵深配备。攻占沿路阵地后，须立即构筑工事，配备顽强的防御，使这样的阵地作为诱敌深入反扑的坚固据点。

四、集中优势的炮火射击一点，得手后再击另一点。密切步炮协同。炮兵须反复精细地侦察敌人兵力的具体配备，组织良好的战场观察，切忌盲目的射击。须知，再优势的炮火，

在顽强的敌人面前并不是万能的。

五、对敌人外壕陡壁的克服，须用挖对沟、改造地形来接近，用炸药来破坏。因弹药运输困难，炮击只能是补助的。用连环爆炸破坏陡壁，会有好的效果。

一天后，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张宗逊：“马步芳既决心守兰州，有利于我军歼灭该敌。为歼灭该敌起见，似须集中三个兵团全力于攻兰战役。王震兵团从上游渡河后，似宜迂回于兰州后方，即切断兰州通青海及通新疆的路并参加攻击，而主要是切断通新疆的路，务不使马步芳退至新疆，为害无穷。攻击前似须有一星期或更多时间使部队恢复疲劳，详细侦察敌情、地形和鼓舞士气，做充分的战斗准备，并须准备一次打不开而用二次、三次攻击去歼灭马敌和攻占兰州。”

第一野战军没有休息“一星期或更多时间”。

八月二十五日拂晓，炮声大作，攻坚兰州的战斗再次打响。

第六十三军军长郑维山与青马军有着深仇。一九三七年春，他是西渡黄河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八师政委，在河西走廊与青马军的作战中，八师可谓无日不战，战无不恶。郑维山眼见身边的战友一一倒在青马军的马刀之下。十二年后，西进祁连山，再战青马军，他发誓要为昔日惨死的战友们报仇。初次攻击失利后，郑维山亲自带领军师指挥员勘察战场，选取了兰州东南十公里处的窦家山主阵地为突破口，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实施连续突击。战前，郑维山专门去了担任突击任务的一八九师五六六团，他对官兵们说，我们都是铮铮铁汉，窦家山我们坚决攻下，兰州的东大门我们一定砸开，再强的敌人我们也要消灭他！

二十五日十时二十分，第六十三军的炮火准备开始了，几十门大炮持续轰击了半个小时，由于战前的仔细侦察和炮兵的精确计算，窦家山阵地瞬间烈焰升腾，砖石横飞。郑维山在山下望去，炮火延伸之

后，一面红旗从阵地的陡坡上急速上移。五六六团三连奋力冲击，守军暗藏的火力点复活了，三连冲在最前面的战士倒下一片。副连长王勇禄站出来，他抓着两颗手雷，迎着倾泻而下的弹雨向上攀爬。所有机枪、步枪都在为他掩护，官兵们一边喊着他的名字一边仰面射击。无法得知这个铮铮铁汉的身上到底中了多少枪，王勇禄的军衣被呼啸而来的子弹扯烂，帽子早已被打飞，他攀爬的速度越来越慢，身后留下一道道鲜红的血痕，可他就是没有停下来。王勇禄终于爬到暗堡跟前，他挺起身扑到射击口上，把手雷塞了进去。暗藏的地堡被炸毁，三连指导员魏应吉一跃而起，带着冲锋枪排扑了上去，连续夺取几个碉堡之后，站稳了脚跟。青马军发动反击的时候，刺刀排上来了，一色精壮的小伙子，在冲锋枪排的掩护下，端着刺刀杀气凛凛地迎敌而上。刺刀与马刀撞击在一起，阵地前喊杀声和鲜血的喷溅声响成一片。青马军的督战军官在阵地的后面吼叫着，指导员魏应吉一挥手，几名战士跟着他绕到阵地的侧后，几挺冲锋枪突然向督战军官扫射过去，前面的敌人听到身后响起枪声，纷纷丢弃阵地开始溃散。三连的红旗插上了窦家山阵地的核心碉堡上。

窦家山主阵地的失守，令总指挥马继援惊慌不已，他急令一〇〇师不惜代价夺回阵地。一〇〇师组织起千人敢死队，敢死队四周是督战队、执法队，先在阵前歃血盟誓，然后冲了上来。第六十三军炮兵团集中了所有的火炮进行压制，附近的一八七师五六一团也开始猛攻十里山阵地加以牵制，一八八师五六二团全团官兵奋力往窦家山阵地上送弹药，一八九师的八个营梯次排开决心一死。虽然遭受到炮火的杀伤，青马军的敢死队还是很快冲到了跟前，赤膊大刀，吼声如雷。处在最前沿的五六六团官兵端着刺刀，一声呐喊之后全团出击，交战双方如同两股洪水撞击在一起。这是窦家山阵地上的决死时刻，两军杀得阵地上血流成河。兵团司令员杨得志的电话打到五六六团团长潘永堤的前沿指挥所，他说他在看着窦家山，彭老总也在看着窦家山，只要把敌人的敢死队压下去，窦家山从今以后就再不会流血了。郑维

山组织起所有轻重机枪猛烈拦截青马军的后续部队，炮火更是延伸到敌人的纵深堑壕和屯兵地，当冲上前沿阵地的敢死队所剩无几的时候，残敌被五六六团那些还活着的官兵压缩在窦家山的西沟里，带着仇恨的手榴弹大雨一样落入沟内。

二十五日黄昏，兰州的东大门敞开了。

第二兵团第六军十七师五十团三营七连指导员曹德荣，是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老兵，他面色黝黑，身体强壮，尽管身上总是背着好几条米袋和步枪，可行军时腰板总是挺得直直的。五十团初攻兰州时没有打好，在营盘岭阵地上伤亡很大。停止攻击的命令下达后，三营官兵不愿意从已经占领的阵地上撤下来，因为很多战友为了这块阵地付出了生命。当然，他们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理由，即当年打蟠龙的时候，他们曾和守军粘在一起，等待部队再次攻击，而他们的做法得到过彭老总的表扬。于是，十七师师长程悦长同意了他们“粘在上面”的请求。在部队重新准备进攻的三天里，曹德荣和三营官兵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坚守不退，青马军白天往下扔手榴弹，晚上往下扔浸了汽油的棉花包，无论敌人如何攻击或恐吓，没有粮弹接济的三营硬是死死地和守军粘在一起。部队对营盘岭阵地的攻击重新开始后，突击队迫不及待冲上来与三营会合，三营官兵即刻投入到夺取前沿阵地的血战中。营盘岭主阵地峭壁陡立，碉堡坚固，执行爆破任务的官兵先后倒在陡壁前，攻击部队因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下伤亡很大。曹德荣已经两次负伤，浑身血迹斑斑。他抱起三个大炸药包，喊了一声“跟我来”，两名战士应声而出。三个人向峭壁艰难地接近，途中一名战士牺牲，曹德荣和另外一名战士终于到达峭壁下。这是一面一丈高的光滑绝壁，上面就是敌人的主碉堡，没有可以安放炸药的地方，也寻不到可以充当支架的东西。头顶上敌人的机枪狂风一样扫射，部队被压制得无法抬头。曹德荣把身体贴在峭壁上，双手把炸药包高高地举起来，然后对身边的战士说：“你下去！”战士犹豫着，望着他熟悉的指导员

那张长着络腮胡子的黑脸，泪水涌了出来。曹德荣已经点燃了导火索，他使劲吼道："我命令你下去！"战士转身滚下去的那一刻，他听见指导员的最后一句话是："为穷人报仇的时候到了！"

营盘岭守军的第一道防线被炸开了一个缺口。

下午，在攻击营盘岭最后一个堡垒时，十六师和十七师的两个团从两面夹击而上，青马军二四八师师长韩有禄在最后时刻亲自督战，一边发银元，一边组织督战队和敢死队，然后呐喊着发动最后的反击。在机枪的扫射下，敢死队纷纷倒下，五十团官兵们端着刺刀、喊着曹德荣的名字迎面冲上来，守军不断向后收缩最终潮水般退下去。

五十团官兵把曹德荣布满弹孔的遗体小心地抬下阵地，曹德荣黝黑粗糙的十指上缠满了手榴弹拉火环和拉火线。

"他是我们的万古师表。"彭德怀说。

兰州城西南的沈家岭，是兰州外围防御阵地中距兰州城和黄河铁桥最近的一个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垮了，黄河铁桥被截断，青马军的唯一逃生之路也就没有了。因此，马步芳在这个阵地上放了整整一个师。初攻失利后，第四军决心以三个师的绝对优势兵力实施连续攻击，主攻部队是十一师三十一团，团长王学礼。

攻击的信号弹再次升起，三十一团分两路开始冲击。炮火将敌人前沿的碉堡工事大部摧毁，爆破组在前面连续爆破，三十一团一步步向前推进。在侧翼攻击的三十二团的配合下，沈家岭第一道防御阵地很快被突破。但是，在向第二道防御阵地突击的时候，青马军的反击开始了。青马军采取惯用的战术，反击坚决而频繁，兵力不断增加，交战双方陷入近距离的混战中。王学礼极力保持着有效的指挥和与师指挥所的联系。满山遍野的青马军一律光着脊梁，军官们手提马刀大

喊大叫。混战一直持续到中午，三十一团各级干部绝大部分负伤或阵亡，能够战斗的官兵不足一百七十人，可青马军的反击还是一波接一波。二营教导员田有胜在营长和大部分干部伤亡后，依然顽强发起了新的冲击，在反击的敌阵中冲开一道缺口，占领了第二道防线上的一道堑壕，这道堑壕为三十一团提供了一个立脚点。尽管如此，三十一团能够战斗的官兵越来越少。弹药手赵发祥所在的班只剩下他一个人，他想到附近阵地上的兄弟班去，但又想到自己战前写的决心书上有“剩下一个人也要拼到底”这句话，于是决定一个人坚守阵地。他寻找到敌人丢弃的一挺机枪，在一道交通壕的拐弯处利用有利地形不断地扫射，这个小小的阵地竟然始终保持着。四连司号员孙明忠只有十九岁，是全团出名的机灵鬼，军上衣的下摆总是搭在膝盖上，可战友们知道，每到作战时他肥大的军衣下腰间都要插满手榴弹。战斗打响后，孙明忠紧跟在连长后面。连长牺牲了，全连只剩下十几名官兵，他拿起连长的驳壳枪和指挥旗，代替连长指挥官兵抗击敌人的反冲击。阵地上的子弹打光之后，他跑到敌人遗弃的一座碉堡里，背出来七箱手榴弹和三箱迫击炮弹。他一边分发弹药一边喊：“同志们！为牺牲的战友报仇！”二连三排的几名官兵扛着三挺重机枪向沈家岭的核心阵地里钻，迎面与三百多名青马军遭遇，官兵们架起机枪一步不退，机枪一挺又一挺都被打坏了，只剩下一挺机枪时，这挺机枪立即成了敌人集中射击的目标。官兵们轮流当射手，排长张生禄负伤后，六班长白生文上去；白班长负伤后，六班副班长金鼎山上去；金副班长阵亡后，指导员赵占国上去。敌人退守到一个隐蔽的火力点里，硝烟中一个人突然端着刺刀冲了上去，子弹迎面打在他的身上，他还是向前冲，冲到敌人的火力据点前，他把刺刀径直捅进了火力点的射击口，身体随之重重地压了上去。当后续部队冲上来时，官兵们在他几乎被打烂的遗体上找到了半片“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胸章背面残留的字迹是：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接下去，写着他名字的地方是一个弹洞。

黄昏时分，在震耳欲聋的总攻炮火中，冲锋号骤然响起，沈家岭主峰上杀声一片。三十一团团长王学礼，耳朵已被炮火震聋，双眼布满了血丝。他的官兵幸存者已不多，他已经没有力气悲伤了。当最后的冲锋发起时，王学礼站起来，举起驳壳枪，声音嘶哑地喊："同志们！跟我上！"密集的子弹风一样刮过来，王学礼重重地倒在地上。

王学礼团长牺牲一个小时后，沈家岭阵地被第二兵团第四军攻占。

沈家岭攻坚战，第四军伤亡三千人以上。

兰州城破在即。

二十二日午夜，马步芳把一切军政事宜交给儿子马继援，离开兰州去了西宁。

二十五日下午十四时，马继援召集师长以上军官会议，宣布撤离兰州。撤离部署是：第一二九军军长马步銮负责黄河铁桥上的秩序，按照一〇〇师、二四八师、新编第一师、三五七师的顺序通过铁桥北渡黄河。一九〇师在沈家岭方向全力阻击，等全军撤完之后最后撤离。

决定作出后，马步銮率领一个由参谋和军法人员组成的撤退疏导小组上了黄河铁桥。但是，按计划最后撤退的一九〇师却最先放弃了阵地。一九〇师的提前撤离引起连锁反应，各部队争先恐后地放弃阵地撤退，全都拥挤在黄河铁桥上。一〇〇师距离黄河铁桥最远，等他们到达的时候，铁桥上已经人马壅塞，后续部队被冲进兰州市区的解放军截住，激烈的巷战随即发生。突然，一发炮弹命中铁桥上一辆装满弹药的汽车，剧烈的爆炸之后，黄河铁桥上大火冲天。冲过来的解放军官兵逐渐逼近铁桥，机枪严密封锁桥面。没有过桥的青马军官兵

开始混乱地四散，桥上的人马被挤落坠入黄河，一部分官兵见无法上桥冒险泅渡过河，人马淹毙的尸体顺流而下。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兰州解放。

兰州之战，第一野战军伤亡八千七百余人。

二十七日，马步芳离开西宁飞往重庆。

马继援率领残部向西撤退。

马继援对一九〇师师长马振武说："父亲（马步芳）来电话，乐家湾飞机等着哩，我们一同走吧。"马振武说："军长，你走，我不去了，我没有钱，出去会有困难，我再也不好意思向你们伸手了。"马继援遂带领四十名卫兵朝西宁方向逃去。

三十日晚，青马军残部在大通县桥头镇召集军官会议。马振武传达了马继援的指示，大意是我暂时离开你们，以后大家还会见面，你们要把武器埋起来待机而动。马振武说："现在长官（马步芳）和军长（马继援）已经飞走了，我们对他们父子还有什么效不完的忠呢？我们也不必到草地去打游击，因为过去我们一到藏民毡房，他们献哈达，殷勤接待；现在我们去，恐怕连一碗糌粑也不会给。我看还是回西宁去，共产党要杀，就不说了；不杀的话，我们还是个尕百姓。"可军官们都对回西宁充满恐惧，因为当年在河西战役中青马军残杀了无数红军。

这一天，马继援携家眷从西宁飞往重庆。

两天以后，马振武在桥头镇再次召集会议，决定投降，并草拟了给彭德怀的电报。大部分青马军军官们都签了名，只有骑兵第八师师长马英不签，他说他的部队还算齐全，他要到草地上去打游击。

九月六日，第一野战军第一军主力和第二军前卫师进入西宁。

在接受青马军残部投降的时候，青马代表提出了一些附加条件：现有骑兵全部接受整编；所剩步兵予以遣散回家；保证官兵的生命安全。第一野战军第一军副军长王尚荣厉声说道：“你们还有什么资格讲条件！不投降就干净彻底全部消灭掉！”

国民党军马步芳军事集团就此灭亡。

兰州战役的幸存者说，之所以阵亡的官兵太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仗打到最惨烈的时候，天空晴朗，万里无云，敌我双方相互看得十分清楚——难以想象，六十年前，在大西北的阳光照射下，年轻的解放军官兵流淌出的热血该是何等惊人地鲜艳。

## 悠远的驼铃

宁马军第八十一军军长马惇靖，站在宁夏中宁县黄河石空渡口附近的一个小沙洲上，等待着解放军代表傅崇碧的到来。

这是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中午。

晴朗高远的天空下，黄河中的沙洲灿灿地耀眼。

此时，第一野战军向宁夏推进的部队与宁马军第八十一军隔河对峙。第八十一军虽然表露出求和的意愿，但双方在谈判地点上意见不同：第八十一军代表主张在他们控制的黄河北岸，而解放军方面坚持要在黄河南岸，并表示“明天如果不签字，我们就发动进攻”。僵持之中，谈判中间人突然想到，那段黄河河水的中间正好有一片小沙洲，既不算南岸也不算北岸。于是双方同意了——“这个小沙洲，幸福地被我们选作和谈地点。”受第一野战军第十九兵团联络部长甄华的委托，马鸿逵的少将电讯处长孟宝山充当了谈判中间人，他在记述这一刻的

时候特别使用了“幸福”一词——“沙洲的下端，却是一个整的河流，象征着有分歧的水线经过这个沙洲汇合为一流了。”

这一刻，恰是宁马军最后瓦解的开端。

马鸿逵和马鸿宾是叔伯兄弟。在宁夏，无论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马鸿宾都无法与马鸿逵抗争，因此长期安居一角以求自保。当彭德怀率部大举西进的时候，马鸿宾的部队只有第八十一军一个军，由他的儿子马惇靖任军长。虽然马鸿宾的部队参加过阻截红二十五军的战斗，内战爆发以来也与彭德怀部发生过数次作战，但在抗战期间马鸿宾与共产党人的关系较为和缓。他认为自己与共产党人没有太多的仇恨，所以没有与解放军血战到底的愿望。他曾对要求他备战的马鸿逵说：“我看共产党向西北进军，目的不在我们方面，而是为了消灭胡宗南主力。等胡宗南解决了，我们插上共产党的旗子，接受和平，就可保得安全。”

与马鸿宾不同，马鸿逵十分清楚自己对共产党人做过哪些事：抗战时期，他对宁夏中共地下组织进行过大规模破坏，不但逮捕了大批共产党人，而且还下令杀害中共宁夏工委书记崔景岳、回民工作团长马文良等人，至今几十名共产党人还被关押在宁夏的监狱中。内战爆发后，除了奉蒋介石或胡宗南之命不断与彭德怀部作战之外，他还把在三边被俘的解放军警卫团的一名团长和一名政委押解到南京，这两名解放军干部很快被蒋介石在雨花台处决了。心绪不宁的马鸿逵开始在宁夏扩编军队，在原有的第十一军和第一二八军之外，他新编了一支“贺兰军”，说这是取岳飞《满江红》中“踏破贺兰山阙”之意，将来可以到贺兰山里去打游击。经过改编，马鸿逵拥有的军队达八万人，由他的儿子马敦静任总指挥。马步芳的青马军主力在兰州被歼后，马鸿逵宣布宁夏将采取“打光、烧光、放水”的办法抵抗解放军的进攻，他对军官们说：“将放弃的地方，一面放水，一面烧仓库，节节抵抗，

直至军队打完为止。并控制好飞机场，以便最后派飞机把你们接出去。银川城内放火时，先由我的公馆烧起。”

此时，马鸿逵很想与马鸿宾当面商量一下是否逃离宁夏这个关乎后半生的问题。但是，邀请发出后，马鸿宾没有来，派来了儿子马惇靖。马鸿逵显然对堂兄在这个时候只派个晚辈来应付感到不快：

他问：“你父亲为什么不能自己来，他愿不愿意走？”

我答：“父亲的意思是他年纪大了，再加上家口重，如果出走，日后生活如何办呢？”

他问：“难道你父亲不怕共产党害他吗？”

我答：“父亲想共产党不一定会害他的。”

我问：“你走后宁夏怎么办？”

他答：“给共产党送礼就要送全礼，我先走重庆，接着叫老大走（长子马敦厚，时任宁夏骑兵指挥官），因老大沉不住气，又不听老二（次子马敦静，时任宁夏兵团司令官）的话，留下他会误事的，到必要时再让老二走。”

九月一日，马鸿逵飞往重庆。

此一去，他再也没有回过宁夏。

马鸿逵住进重庆歌乐山下的连家花园，与徐永昌等国民党大员商讨西北战局。徐永昌一开口，马鸿逵立即明白了，蒋介石不但根本没有守宁夏的意思，而且还想把他的军队调出来加强给胡宗南。马鸿逵感到了一种悲凉，在蒋介石眼里，他的宁马军只是个卖命打仗的卒子而已。“我的部队我知道”，马鸿逵说，“都是宁夏娃子，宁夏人恋家，如果调出来，马上就垮了！”徐永昌的脸色顿时难看起来，寄人篱下的马鸿逵马上改口说，他的部队可以与胡宗南会师，然后南下四川。马鸿逵派参谋处长带信飞回宁夏，让宁马军经固原到川边向胡宗南部靠拢，团以上军官的家眷则用飞机全部转移四川。但是，宁夏的军官们不愿意执行这个决定，纷纷表态说愿意在宁夏打到一枪一弹——宁马

军的军官们都明白，马鸿逵和马敦厚走了，马家的财产也转移走了，在部队打光之前，马敦静也会走的。他们有钱，而普通军官们一旦离开宁夏，不但什么都没有了，最后连尸首也将埋在异乡。

马敦静的防御部署是：破坏青铜峡公路，占领黄河东岸的重要屏障牛首山阵地；必要时执行马鸿逵的放水计划；宁夏所有的部队自南向北沿黄河东岸在中宁、金积、吴忠堡和灵武地区设置三道防御线，采取分区防守、纵深配置、层层抵抗的方式死守宁夏。

就在马鸿逵离开宁夏的时候，第一野战军第十九兵团开始向宁夏进军。作战部署是：第六十三军一个团附军工兵营和第六十五军工兵营组成先遣队，二日从兰州出发，负责扫清残匪，整修道路，筹集粮食；第六十三军一八八师进至甘肃东部与宁夏交界处的靖远以北地区，然后西渡黄河向中宁方向攻击前进；第六十五军与第六十三军主力五日出动，与一八八师夹黄河并进；第六十四军与西北军区独立第一、第二师由宁夏南部的固原方向出动，经同心县城向中宁以北推进，以截断中宁守军的退路。

第十九兵团大军所至，宁马军纷纷不战而逃。

一八八师和第六十三军主力及第六十五军沿黄河两岸进入宁夏河套地区。

马敦静并不是能带兵打仗的人。第十九兵团一路推进，他虽然部署了防线，行动上却毫无作为。军官们报告说，解放军已经过了同心，就要达到中宁了。马敦静却说只要把船全部拉到河西，共产党军队就过不了黄河。军官们提醒他说，那是古代打仗的办法，现在光大炮的射程就有三十公里，黄河根本挡不住解放军的攻势。马敦静听后，再也没有任何主意。接下来，军官们发现他们的总指挥神经似乎有了问题，他忽而命令部队准备南下去找胡宗南，忽而又说去河西走

廊去找公署副长官刘任，忽而又命令随从带上三万银币准备进山区打游击。最后，军官们无论什么时候见到他他都在吸食鸦片。

马鸿逵离开宁夏之后，马鸿宾认为与解放军方面和谈的时机到了。但是，他很快就得知，马鸿逵临走前给主要将领留下一个指示，说宁马军的事全部由马敦静说了算，绝不允许其他人插手。显然，这个“其他人”指的是马鸿宾。于是，马鸿宾准备以老一辈的身份去见马敦静，但马敦静始终避而不见。此时，彭德怀已派出代表找到马敦静，希望他和平解决宁夏问题。马敦静说给他两天时间，以便与各位将领们商量。两天过去之后，马敦静没有任何动静。马鸿宾认为他在银川很危险，于是准备了汽车，装上自己的财产，决定带上家眷远走绥蒙。宁马军的军官们得知后，纷纷劝说他不要走，他们请求马敦静立即与马鸿宾商量宁马军的前途问题。

见到马敦静，马鸿宾训斥道：“你避不见我为啥？家务事尽可商量。你阿大走了，你能否负责？能的话，该拿出个办法来。不能嘛，看谁能干，或者几个人来干，共同负责。我看以和为好，打不出什么名堂来。至于你阿大的安全问题，不要考虑，那好办，就说军队掌握不住了。”马敦静低头不语，马鸿宾又说：“你回去，连夜召开军官会议，大家商量出个办法来，签字盖章，共同行动。”然而，马敦静再次没有了动静。

此时，马鸿宾的儿子马惇靖已命令第八十一军从中宁全部西撤到中卫县城，同时命令驻守在甘肃靖远的两个团也迅速向中卫撤退。但是，从靖远撤退的两个团还是在黄河边被解放军第十九兵团追上并缴了械。在中卫县城里，马惇靖召集绅士们开会，宣布第八十一军决不抵抗解放军，请百姓们不必惊慌，同时请绅士们出城四十里，到沙坡头去向解放军说明第八十一军不抵抗的意愿。

曾思玉的第六十四军已经逼近中卫。

十三日，在同心县城马家湾的沙滩处，马鸿宾的代表见到了曾思玉。曾军长说，上级要求我们十五日打到银川，“为了宁夏人民免遭战争的损害”，我们的进军已经推迟了数天。现在，宁马军“仅有两个前途”，“要和平解决，照北平方式；要抵抗，就坚决彻底消灭”。请转告马敦靖，“战与和的决心最好快下”。

为了给宁马军最后考虑的机会，第六十四军开始“原地待命”。

十六日，代表们回到银川，向马鸿宾转达了解放军第十九兵团的和谈诚意。马鸿宾说：“毛泽东比蒋介石好，我们当然跟着毛泽东。马敦静虽是我的侄儿，但我们多年不来往，此刻他不找我，我也不能去找他。只有第八十一军马惇靖部我能负责。我给他打电话，让他在石空渡与你们见面，研究起义，其余另作商量。”

十七日，国民党军军令部长徐永昌和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在银川降落。马敦静以为这是父亲走了之后，蒋介石派人来督促他打仗的，可见了徐永昌才知道这架飞机是去包头途经这里。马敦静请示徐永昌宁夏该怎么办，徐永昌敷衍地说可以利用山区打上几仗；马敦静请求王叔铭派飞机支援，王叔铭扔给了他“自顾不暇”四个字。晚上，马敦静得知伯父马鸿宾搭乘徐永昌的飞机去包头了。那时，傅作义受毛泽东的委托，与邓宝珊一起来到绥远，以期最后促成董其武率领的绥远部队起义。蒋介石获悉傅作义到达绥远后，立即派徐永昌和王叔铭飞赴包头。徐永昌转递了蒋介石的亲笔信，希望傅作义最后时刻能够回心转意。傅作义告诉徐永昌：“国民党丧军心民心，大势已去，任何力量都不可能挽回。”对于马鸿宾关于宁夏前途的询问，傅作义的忠告是：“和有利，战不利。”

十九日晨，马鸿宾飞回银川后，急电马惇靖速与解放军开始和谈。

于是，在那个天空湛蓝的中午，第六十四军副政治委员傅崇碧，带领作战处长唐皎、联络部长牛连璧等人，乘坐一只牛皮筏子前往黄河中的那片小沙洲。

马惇靖带着几名随从，心情紧张地看着那只牛皮筏子晃悠悠地渡河而来。

双方见了面，傅崇碧直言不讳："要和，就放下武器；如果继续抵抗，我们就坚决、彻底消灭，严惩主战者。"

沙洲上没有坐的地方。马惇靖说，在这里谈话不方便，不如到中宁县城去谈。于是，双方乘坐各自的牛皮筏子再次渡河，然后上了傅崇碧的吉普车，直接去了第六十四军军部——"途中，我们有意让他们见识了我军的战车、大炮和部队的阵容。"傅崇碧后来回忆说。

曾思玉军长接见了马惇靖。他代表第十九兵团提出的条件是：第八十一军以中卫城关为中心，集中待命整编；第八十一军应保护武器和物资，准备点交给解放军；组织黄河以北的船只，于二十日晚和二十一日晨移交河南岸的解放军；停止中（中卫）银（银川）公路的汽车运输，并负责保护公路桥梁；中卫伪政府等候人民政府接收。同时，解放军保证马鸿宾全家生命财产的安全，在中宁县城内的马鸿宾家的财产，凡是解放军动用过的一律归还或赔偿。

晚十九时，双方在协议上签字。

解放军一方的签字人是曾思玉，宁马军一方的签字人是马惇靖。

第八十一军的起义，使马敦静保卫宁夏的第二道防线不攻自破。

马敦静立刻把所属的三个军十一个师重新进行了调整：贺兰军和第十一军撤向灵武、银川地区，并在黄河以东分四个区域进行防御：

第一二八军二五六师位于灵武；保安第三师位于吴忠堡；三五六师和骑兵二十旅位于金积地区；保安第一师位于金积以西和牛首山。

第十九兵团决定攻击金积地域的宁马军。

第六十四军奉命拿下牛首山。牛首山南北四十公里，东西约十公里，隔黄河与贺兰山对峙，公路盘山而过，中间经过黄河天险青铜峡，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十七日晚，一九一师先头部队突然袭击东寺据点，十八日即控制了牛首山各个制高点。十九日，五七三团开始攻击青铜峡。青铜峡守军三五六师二团的一个营放弃峡口阵地，向北逃往金积，五七三团和五七二团并肩紧追。与此同时，一九二师绕过牛首山的侧面，向金积防线发展。这是一片荒凉的沙漠草原，马敦静在这里部署了两个骑兵团。由于地形有利于骑兵作战，一九二师不断受到骑兵的袭扰。师长马卫华命令炮兵把炮架起来朝骑兵轰击，开始时骑兵还试图重整队伍发动冲锋，但很快就被密集的炮火拦截，马上的骑兵被炮弹打得七零八落。

一九一、一九二师突破青铜峡后直逼金积。

马敦静急忙命令部队准备向河西走廊撤退，他打算去投靠从兰州逃到那里的中央军，但是军官们说没有办法解决运输问题。傍晚，第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来电话，敦促他赶快来军部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但是，马敦静没敢去，因为他听说卢忠良有向解放军投诚的意图。

第二天一早，马敦静离开宁夏飞往重庆。

一九一师五七三团三营向汉渠以南的西滩村发动攻击。这是一个大土围子，围墙的四角筑有地堡，外墙外还有一圈地堡。官兵们在向前运动的时候，交织的火网封锁着冲击的道路，密集的子弹把地面上

的沙土打成一片烟尘。炮兵把火炮推了上来，数挺重机枪集中了火力，三营官兵在火力的掩护下向土围子里硬冲，西滩村的守军终于溃败，纷纷从村北逃了出去。五七二团三营绕路向金积穿插，一直插到距县城只有几公里的杨家湾堡，两门山炮和三门迫击炮凌晨时分调了上来，在一间民房里将墙壁掏出几个大窟窿，然后对着杨家湾堡的围墙开始了猛轰。迫击炮发射的“飞雷”炮弹把宁马军吓坏了，这种长长的东西带着炸药包，一个接一个地落在地堡里，炸得守军无处躲藏。不一会儿，杨家湾堡围墙上的堡垒里打出白旗，三百多名幸存的守军放下了武器。

一九一师包围了金积。大炮已经架设完毕，正在准备攻城的时候，县城的西门打开，一辆挂着白旗的汽车开过来，来人呈上一封信：“兹派贺兰军保安第一师上校副师长崔清平，前往贵军洽谈起义事宜。如蒙允诺，请将部队如何改编、驻防地点及一切起义的善后问题，详告为盼。”签名者是：第一二八军副军长何晓霆、保安第一师副师长崔清平，三五六师副师长谢修臣和一〇六六团团长马克仁、一〇六八团团长鹿鸿起。

一九一师政治委员陈宜贵说：“金积全线停火命令只能由军部下。待我请示一下曾思玉军长再作答复。”

曾思玉军长的答复是：欢迎放下武器，但这不能算起义，只能算是投诚。

崔清平说：“就是缴枪投降也可以。”

金积防线洞开之后，第六十四军直指银川以南、黄河东岸的重镇吴忠堡。

二十日，由宁马军贺兰军军长马全良领衔，第一二八军、贺兰军、第十一军和省保安司令部下属保安师等部军官，一并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彭副总司令发出通电：

国民党秉国以来，领导无方，纪纲不振，民生凋敝，致战祸弥漫全国，强者死于炮灰，弱者流于沟壑。刻又战事迫近西北，面临宁夏，全良等不忍地方七十万军民遭受涂炭，爰于本月二十日停战，服从毛主席领导，实行民主，俾人民登于衽席，国基安如磐石。至于军事如何改编，政治如何革新，听候协商，一切服从。

第二天，彭德怀发出复电：

贺兰军马军长（马全良），一二八军卢军长（卢忠良），十一军马军长（马光宗）：哿（二十日）电悉，诸将军既愿宁夏问题和平解决，殊堪欣慰，望督率贵部即速见诸实行。此间即电告杨得志司令员知照。即派代表至中宁与杨司令员接洽。特复。

彭德怀

马（二十一日）酉（十七至十九时）。

马鸿逵在重庆见到了他的二少爷马敦静，父子相对而泣后用电台接通了宁夏。报话机里传来马鸿逵的秘书处长马友梅的声音，说将领们都来哩，可士兵都散啦。马鸿逵让将领们过来说话，等了半天，没有一个将领愿意和他讲话——“马鸿逵转过身来，仰面惨笑”。

二十二日，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耿飚等人在中宁县城内接见了贺兰军参谋长郑毅民，并把和平解决宁夏问题的协议书交给宁马军方面，要求二十四日十二时以前派代表来证实签字，否则解放军对宁马军将坚决予以歼灭。郑毅民立即飞回银川，马鸿宾决定接受解放军的协议，然后派人火速赶往中宁签字。

二十四日下午十四时，“第十九兵团和国民党军宁夏军政代表和平解决宁夏问题的协议”签字。协议涉及的条款是：

一、所有宁夏部队，迅速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指定地点［附件一］集中，听候处理。在此期间内不得擅自移动，否则发生任何冲突事件，人民解放军概不负责。

二、宁夏一切党政军机构、市政机关、公营企业、牧场、公共财产和建筑及所有武器、弹药、仓库、物资、公文、档案等，立即造具清册，听候点交，不得破坏、隐藏、转移、盗卖。所有监狱犯人，听候接收处理。曾经俘去之我方人员不得杀害，应全数释放交出。蒋系特务机关人员，一律不得放走。

三、凡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之地区，原宁夏当地军政机关部队应负看管物资、维持治安之责，不得发生任何破坏损失事件。

四、在宁夏部队方面执行以上三项条款时，人民解放军方面保证宁夏参加和谈部队全体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

五、为了切实执行以上四项协议，决定双方在银川组织联合办事处，处理以上事项。该办事处由九人组成，解放军方面五人，并指定一人任主任，宁夏方面四人，并指定一人任副主任。

但是，此刻宁马军已经大乱，凡有建制的部队都不复存在。银川军用仓库被焚烧，居民遭到乱兵抢劫，宁马军的万余名官兵，马背上驮着抢来的东西，各自向自己的家乡奔逃。贺兰军军长马全良和副军长王伯祥连夜出城奔向吴忠堡，向第六十四军军长曾思玉求援，请求解放军赶快进入银川控制局面。一九一师五七二团二营和三营连夜出发，北渡黄河后，搭乘马鸿宾派来的四十辆汽车驶入银川。官兵们迅速占领城门、钟鼓楼等制高点，追歼逃兵并维护秩序。

和平解决宁夏问题协议签字之时，重庆的连家花园突然军警云集，便衣警卫遍布山头。过了一会儿，蒋介石来了，说来看看称病不出的马鸿逵。蒋介石径直走进马鸿逵的房间，正躺在床上的马鸿逵急忙下床，就势抱住蒋介石的腿哭喊：“我对不起总裁，对不起党国……”蒋介石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有责任。”陪同蒋介石的行政院长阎锡山也说：“没啥，没啥，从头再来。”蒋介石让马鸿逵到台湾去，可乘中国航空公司或中央航空公司的飞机，但是“不要惊动陈纳德的飞虎队”。

蒋介石走后，马鸿逵感慨道：“败军之将，鸡犬不如。”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十九兵团在银川举行了入城仪式，

马鸿逵用一万七千块银元租了中国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连同大少爷马敦厚、二少爷马敦静、四姨太刘慕侠、五姨太邹德一、六姨太赵兰香等一起飞赴台湾。逃亡的过程充满惊险，先是飞机在湖南上空突然剧烈上升，飞行员说下边的解放军正在打高射炮；试图与白崇禧取得联系，地面回答说正在激战中，飞机既不能降落，白崇禧也没空说话；降落到广州机场加油后，军用飞机已挤满跑道，飞行员不顾塔台警告强行起飞，飞到台湾海峡上空时，天气恶劣必须返回，但这时候只有汕头机场还在国民党军的掌握下。在汕头机场降落后住进宾馆等待天气好转，可是军警来了，说汕头的部队正在撤退，再不走就无法保证安全，于是全家四处寻找失踪了的飞行员。凌晨，飞行员回来了，但他已经喝醉无法驾机，只好又花大价钱让副驾驶操纵飞机勉强起飞，折腾到第二天中午才在台北降落。知道在台湾的日子不会好过的马鸿逵并没久留，他先转香港，再转美国，最后在美国靠养马度过余生。一九七〇年一月十四日，马鸿逵病逝于洛杉矶市郊，享年七十九岁。

自清朝以来，二马家族数代统治青、宁、甘地区的历史，在一九四九年夏末戛然而止。

对于西北战场上的第一野战军官兵而言，面前已经没有了强敌，只有浩瀚的沙漠、戈壁和壮阔的草场、雪山。

此刻，在北平城内，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和从全国各地聚集而来的各党派、各团体和各阶层的代表人士，正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兴奋中筹划着建立一个崭新的政权和国家。北平城里所有能够集会的地方各

种会议昼夜不停，他们讨论着建立一个政权和国家所必需的一切，从国体、国歌、国旗，一直到经济文化等各部门的设立。而在长江以南，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的官兵已经初步适应了江南，他们已习惯在细雨敲打芭蕉的叮咚声中追击，他们的脸色在江南稻米的滋养下开始红润起来。云集江南的三个野战军兵力多达几百万，他们彼此相连地分布在长江流域的河网之中，准备一鼓作气给国民党军残余力量以最后的打击。而第一野战军的几十万官兵，正远离其他野战军孤军深入到国土的西部。对于广袤的大西北而言，他们的人数和他们要去的那片土地的面积不成比例，即使他们高举着红旗高唱着战歌开进的时候，依旧犹如一线细沙。

这支部队的统帅是彭德怀。

在共产党军队的高级将领之中，没有哪一个人像他一样一生都在过苦日子。他满脸皱纹，面容憔悴，坚硬的头发上沾满征尘。他的身上永远是那身打着补丁的旧军装，骑在马上犹如一位历尽战火的老兵。很少有人看到过他的笑容，没有任何嗜好的他总是用微怒的眼神看着敢于面对他的人。自战争爆发以来，他就在西北战场上，一直没有离开过，他率领着从来没有充实过和强大过的部队与劲敌周旋作战，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总是在盘算着如何用最少的军粮和最少的弹药消耗，把一场兵力上不占优势的战斗或是战役坚持下来并取得胜利。他的将领和官兵们敬畏他，他们在行军路上看见过他蹲下身安慰一个饿得哭泣的穷孩子，他们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看见过他怒目圆睁地跑上前线指挥所。他一无所有，有的仅仅是一个革命者不屈的意志，一个军事将领不畏一切艰难困苦誓打胜仗的勇气。

宁夏和平解放后，彭德怀在兰州看望了马鸿宾。

马鸿宾准备了豪华的宴会，等了很久，一辆破旧的吉普车开到门口，车上除了司机之外，只有一个表情严肃的共产党干部。这个干部

拍拍身上的尘土从吉普车上跳下来，径直走到吸着水烟的马鸿宾跟前，说：“我是彭德怀。”马鸿宾以及站在他身后的宁夏的绅士们颇有点不知所措，因为他们看惯了马步芳、马鸿逵的排场和威风，而这个人民解放军的副总司令、西北几十万解放大军的统帅，竟然没有一个随从，没有一个卫兵，没有笔挺的将军服，也没挎着手柄上镶嵌着宝石的佩刀。在与惊讶不已的马鸿宾谈话的时候，彭德怀一句也没有谈及战争，仅仅问了马鸿宾一些家庭琐事，还与他谈了老年人的养生的问题。最终，彭德怀没有出席准备好的盛大宴会，只在马公馆的后室里，尝了尝马鸿宾的夫人和子女们亲手做的几样清真菜。

马鸿宾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的挖心话。”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不善滔滔不绝，他的凛然正气和铮铮铁骨就是他的“挖心话”。

第一野战军开始向大西北的纵深挺进。

彭德怀连续致电毛泽东：

由平凉至迪化（乌鲁木齐）二千二百四十至二千三百公里。步行日以三十五公里计，需时六十六天，每四天休息一天，共需三个月才能到迪。其中星星峡东西约四百公里，无人烟，缺水粮，柴水均须预备运送。三四月间系风季，安西至星星峡处常起旋风。黄旋风来势缓，人可避。黑旋风来势猛，事先如无准备，人可吹走。酒泉至迪化严冬时温降零下三十至五十，非皮帽衣服毡靴难过冬……

……入甘后，地广人稀，粮食接济不上，军队前进甚速，夺取敌粮与民间借粮不能磨粉，大多吃整麦子。供给标准或按照军委规定，体力相当减弱。因为打胜仗，所过地区，群众欢迎，部队战斗情绪还是很高的。但进军新疆，在干部与战士中还存在着怕走远路，怕回不得家，怕走草地、过沙漠，怕冷等恐惧心理。排除这些恐惧，入疆前须有一个月的准备。……运输很困难。十八及十九兵团各有汽车百余辆，多系逾龄，机件缺损，经常能用者各三四十辆。一、二兵团，集中野勤（野战军后勤部）共近百辆，经常能用者，亦不过六七十辆。平凉、天水敌均有计划撤退，车油及其他重要物资均运走，仅天水缴汽油二百桶。甘肃民间大车很少，人力畜力也不大，初到地区亦不宜多动员……

兰州失守后，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和国民党军中央系第九十一军和第一二〇军等部约四万余人，向西逃入河西走廊。他们认为彭德怀部攻取兰州和宁夏后，不会继续西进而会南下入川，因此在那里等待时局的变化。为了防止他们继续向西进入新疆，第一野战军决定以第二兵团和第一兵团部率第二军实施追击，部署是：第二兵团沿兰州至新疆的公路及其右侧地区前进，其中第六军为右路，绕腾格里沙漠边缘西进；第三、第四军附野战军炮兵团、战车营为左路，一直向西直取武威、酒泉。第一兵团第二军则沿着西宁至张掖的公路北进，翻越祁连山直取武威与酒泉之间的张掖。

九月四日，第二兵团自兰州附近出发，沿途国民党残军纷纷溃逃或投诚。十九日，第三军先头部队占领武威以西的永昌；二十一日，第四军先头部队占领张掖以东的山丹。接着，第二兵团集中各军的骑兵和兵团战车营，每个步兵营加强六门山炮，分乘二十辆汽车，组成快速纵队，由第三军军长黄新廷率领，从武威出发直扑酒泉。

第一兵团部率第二军从西宁北出。之前，关于走哪条路，在军党委会上出现争论，兵团司令员王震来到会上，他说："当然走平路最好。我们从这里出发，顺着兰新公路前进，沿路碰上零星敌人，打点把子仗，天亮启程，天黑宿营，多舒服，多正常！可是你没算算，我们从这里绕道河口，比翻越祁连山要多走五六天的路程。等我们赶到民乐、张掖，敌人早就乘留在酒泉的一千多辆汽车逃到新疆去了。到那时，我们再跟着逃敌的汽车跑，在没有人烟的戈壁滩上追击敌人，一路挨着饿、忍着渴、冒着风、顶着雪，再在几千里的戈壁上饿死几个，渴死几个，拖死几个，将会是个什么局面呢？我们现在从西宁前进到门源，翻过祁连山，虽然艰苦一点，我们走的是弓弦啊！二百多里路，可能艰苦，那里海拔高，可是咬牙坚持，用两天半或三天的时间，就可以翻过山到达民乐嘛！我们这支经过长征的部队，而今在没有敌人追击堵截的情况下，翻不过祁连山吗？一下山我们就直插民乐

县境，那将是什么形势呢？到那时我们和六军二兵团的同志们会合在一起，把敌人解决了，坐着汽车开进新疆，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闻到新疆的稻米香了，那当然是我们亲手种出来的。”

从青海西宁直接北进甘肃张掖，直线距离三百五十多公里，这是一条没有人烟之路，终年积雪的祁连山横在中途。第二军的先头部队是五师十四团，十四团给每个官兵发了些牦牛肉和几两烧酒后，部队向着祁连山出发了。刚一上山就遇到暴烈的冷雨，不能停下来，只有顶雨攀爬。不一会，大雨变成了鹅毛大雪和冰雹，祁连山白茫茫一片，湿透的衣服立即冻结得如同铁片。弯曲的山路上布满碎石和冰雪，十四团自扶眉战役，连续作战两个月，一直没能休整，许多官兵已经穿破的布鞋很快就烂了，脚板先是裂开口，接着就肿起来。干粮冻成了冰块，根本啃不动，喝两口烧酒，但很快更觉寒冷彻骨。不断有人摔倒再也没有爬起来。十四团团长刘发秀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命令官兵谁也不许停，就是倒下也要继续往前爬。团政委在队伍的最后面收容。有个外号叫“笑哈哈”的战士平时体格强壮，上山的时候扛了六发迫击炮弹，好几只水壶和好几条干粮袋，走着走着就栽倒了，班长回过身想扶起他，他冲班长笑了一下，就再也没睁开眼。二十八个小时后，官兵们通过祁连山无人区。十四团翻越祁连山冻死一百三十人，还有一百多人因双脚冻坏而不能走路。

王震致电第二军军长郭鹏、政治委员王恩茂、副军长顿星云、副参谋长陈实：“……牺牲的百余名指战员们的尸体设法掩埋。请令五师在民乐以南地区集结休息，用白洋买牛肉炖烂饮食……”

五师没有休息，下了祁连山之后，立即向民乐县城发动攻击，十四团三营七连副连长付玉书带领两名战士炸开城门，三连和七连由西向东冲进城去，俘虏守军旅长王子喧、团长莫耀中以下近四百人。十三团下山之后，迅速攻击三堡，俘虏守军团长唐仙知等二百余人。十

九日黄昏，五师逼近张掖。十三团官兵发现从兰州西逃的国民党军第一二〇军二四五师的两个团已经到达张掖，国民党兵正在生火做饭，十三团趁敌未稳发起攻击。国民党军已无心作战，十分钟后，二四五师的两个团及张掖保安团的两个连，共七百五十九人被俘。张掖被攻占之后，逃至张掖以南周家庄地区的国民党军第九十一军二四六师七三六团，在团长王振声、副团长胡胜祥的带领下前来投诚。接着，逃至张掖以北的太平堡地区的国民党军第一二〇军一七三师骑兵团也放下了武器。

远在重庆的蒋介石获悉解放军攻占张掖十分惊愕。蒋经国记述道："共军已由青海民乐突入张掖与武威之间，而我驻张掖部队已星夜西撤。此后我新疆部队，将更无法东调而孤悬万里，我塞外十万忠贞战士势将束手待擒。"蒋介石悲伤地感叹道："真不知如何善其后也。"

已逃到酒泉的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和所属部队已经分崩离析，所辖五个师除二三一师较为完整之外，其余的部队均已残缺不全。九月二十二日，第一野战军部队兵临酒泉城下，公署副长官刘任与公署政工处长上官业佑、第一二〇军军长周嘉彬、骑兵学校校长胡兢先等人乘机逃往重庆。第九十一军军长黄祖埙未能赶上飞机，大哭之后，带领一九一师副师长等人翻越祁连山经青海逃往云南。剩下的将领们经过两天的争论，于二十四日通电起义。

九月二十七日，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和第二兵团司令员许光达抵达酒泉。

河西走廊宣布解放。

二十六日，国民党军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领衔，新疆国民党军整编四十二师、整编骑兵第一师、整编七十八师各师长旅长通电起义：

我驻新将士，三四年来，秉承张文白（张治中）将军之领导，拥护对内和平，对外亲苏之政策。自张将军离开西北，关内局势改观。而张将军复备至关垂，责以革命大义，嘱全军将士迅速归向人民民主阵营，俾对国家有所贡献。峙岳等分属军人，苟有利于国家人民，对个人之毁誉荣辱，早置度外。现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大会已举行集会，举国人民所殷切期成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新中国已步入和平建设之光明大道。新疆为中国之一行省，驻新部队为国家戍边之武力，对国家独立、自由、繁荣、昌盛之前途，自必致其热烈之期望，深愿在人民革命事业之彻底完成，尽其应尽之力。峙岳等谨率全军将士郑重宣布：自即日起，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八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全军驻守原防，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之命令。谨此电闻，敬候指示。

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七万名官兵从酒泉西出玉门关向新疆挺进。

出发前，他们的司令员王震指着地图告诉他们："比南泥湾怎么样？大几百倍！"——戈壁沙漠，雪山盆地，人烟稀少，气候复杂，这是路途更为遥远的征程：从酒泉到迪化一千二百五十三公里；从迪化到伊宁六百八十九公里，从酒泉到喀什两千五百四十七公里，从喀什到和田五百一十四公里。没有铁路，陆路艰险，绝大部分官兵必须徒步，走在最前面的是由一千多名官兵和七万八千多匹骡马和骆驼组成的先遣队。至一九五〇年三月，第一兵团第二、第六军先后进驻南疆和北疆，新中国的五星红旗插遍天山南北。

在解放战争中，向着大西北跋涉而去的几十万解放军官兵，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永远地留在了遥远的西部，连同他们的子孙。

西部，天空高远寂寥，沙漠一望无垠，戈壁风声呜咽，夕阳照在满是沙尘的脸上，前行的身影后面是越来越远的故园双亲——从历史的角度而言，那悠远的驼铃将最深地铭刻在战争的记忆之中。

## 凌乱的海滩

一九四九盛夏时节，有一支部队正向与第一野战军相反的方向挺进：穿越赣闽边界的崇山密林逼近东南沿海。

这支部队的作战目标，是中国大陆最接近台湾岛的那片海滩，他们甚至准备攻击海滩外坐落在湛蓝海水中的岛屿，当然也包括那个面积达三万五千八百平方公里的台湾岛——蒋介石已经落脚在这个岛上，并且有长期盘踞下去的迹象。

渡江战役之后，国民党军江防部队除被歼灭者，大多跑到福建、舟山群岛和台湾岛上去了。这些部队“重武器散失殆尽，兵员严重缺额”，即使依旧保有原来精锐主力的番号，但士气衰败，不再有战斗力。为了在福建沿海重新组织起防御线，国民党军国防部在驻守福建的第二十二兵团的基础上，对逃到福建境内的所有部队进行了整编，由于番号庞杂，建制残缺，整编后的部队仍然是个大杂烩：第六兵团，司令官李延年，下辖独立五十师以及第二十五军，军长陈士章；第七十三军，军长李天霞；第七十四军，军长劳冠英；第九十六军，军长于兆龙；第一〇六军，军长王修身。第八兵团，司令官刘汝明，下辖第五十五军，军长曹福霖；第六十八军，军长刘汝珍。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官李良荣，下辖第五军，军长熊笑三；第九军，军长徐志勋；第一二一军，军长沈向奎。另外，成立福州绥靖公署军官团，由侯镜如任团长，以将逃入福建的所有军官集中受训。整编后，福建沿海地区的国民党军正规军为三个兵团十个军二十七个师，约十二万人。

同时，国民党军国防部成立了舟山防卫司令部，由原国民党浙江省府主席周岩任防卫司令。指挥由原第四十五、第二十一军残部合编的第二十一军，由保安部队合编的第七十五军，原编制内的暂编第一军和散落在象山半岛及附近岛屿上的第八十七军。整编后，国民党军浙东和舟山防卫部队共四个军十一个师，约六万人。

这些从长江边撤退下来的国民党军残余部队，背靠大海建立起没有纵深、没有协同的防御线，包括蒋介石在内，没有人认为他们能够

背水而存——如果人民解放军席卷而来的话。而蒋介石的侥幸心理，来自渡过长江之后的解放军停止在浙赣铁路和洞庭湖一线，没有继续推进。

在中南和西南方向，由于白崇禧集团的顽强对峙以及部队需要适应江南的作战特点，第四野战军开始了长时间的休整备战。此时，毛泽东最大的担心，并不是向中南和西南的进军会长久停滞，而是在攻击沿海大城市的时候美国会武力干涉：

……二野目前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此项准备是必须的，有此准备即可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但在上海、宁波、福州等处被我占领，并最好由三野以一部兵力协助山东攻占青岛［假如上海占领后，青岛敌军尚未撤退］以后，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就很少了，那时二野就可以西进了……

随着渡江战役的顺利进行，中央军委决定第二野战军在推进到浙赣线之后停止前进，目的是掩护向上海发起攻击的第三野战军的侧翼，同时待命机动以对付随时可能出现的西方武力干涉。而随着青岛、上海、宁波等沿海城市相继解放，毛泽东立即把作战目标指向了国民党军栖身的福建沿海方向——“应该迅速准备提前入闽，争取于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五月底，总前委作出决定，拟以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的三个军出兵福建全省。惟第十兵团刚刚打完淞沪战役，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张震、副参谋长周骏鸣致电中央军委，要求将第十兵团入闽作战时间延至六月二十五日，以便部队休整、补充、动员和准备。六月十四日，毛泽东复电，认为“如果准备工作尚未做好，延至七月上旬亦可”。同时，毛泽东明确提出要尽快解决台湾岛的问题：

……请开始注意研究夺取台湾的问题，台湾是否有可能在较快的时间内夺取，用什么方法夺取，有何办法分化台湾敌军，争取其一部分站在我们方面实行里应外合，请着手研究，并以初步意见电告。如果我们长时间不能解决台湾问题，则上海及沿海各港是要受很大危害的。

此时的第三野战军已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军事集团。其中，野战部队共有四个兵团、十五个军、四十五个师、一个特种兵纵队、一个教导师，甚至还有了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海军部队，即华东军区海军，全军野战部队兵力达七十三万以上。同时，华东军区辖山东和浙江两个二级军区，上海和南京两个警备区，苏北、苏南、皖北、皖南、胶东、渤海、鲁中南七个三级军区，济南、徐州、青岛、昌潍四个警备司令部，还有第三十二军，后备兵团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师及华东军政大学等部队，兵力也达十八万之众，第三野战军拥有的总兵力已达到一百二十一万。这支强大的军事力量，被部署在昔日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带，也是中国工农商贸业最发达的地域，以求这一地区局势的占领和稳定——在某种程度上讲，这个地区的占领和稳定，是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人手中夺取政权的最直接的象征：第三野战军的四个军位于浙江，五个军位于上海地区，两个军位于南京、镇江地区，其中的第二十、第二十三、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军为解放台湾的预备部队。除此之外，第十兵团的三个军奉命撤出上海准备入闽。

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政治委员韦国清，副司令员成钧，参谋长陈庆先，政治部主任刘培善，辖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一军。

七月二日，第十兵团离开江南稻荷交映的苏州、常熟和嘉兴地区，向着那片将令他们付出鲜血与生命的海滩出发了。

毛泽东心情舒畅。人民解放军陈兵百万于江南，对于这片国土上残存的国民党军来讲，这是一支巨大的机动力量；同时，一支大军在向广袤的西部挺进，另一支劲旅面向东南直逼蒋介石的栖身之地。这一态势令人惬意。毛泽东从香山的双清别墅搬进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在这座古木参天、水波荡漾的昔日皇家园林里，他正被一个比战争更为复杂的事情缠绕着，那就是如何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这是中国当代史上最繁忙的夏天，因为一个伟大的梦想接近实现。

六月十五日至十九日，新政协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毛泽东说：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人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毛泽东用了两天时间写出《论人民民主专政》回答了这一问题：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或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果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对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邀请柳亚子泛舟颐和园，柳亚子问及人民解放军有什么妙计得以迅速进军江南。毛泽东说，打仗没什么妙计，如果有什么妙计的话，那就是知己知彼，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决策。还有，人民的支持是最大的妙计，我们有一百万军队过江，没有人民的支持是不能成功的。卫立煌致电朱德，告之他八十五岁的母亲在合肥，希望解放军进驻合肥时，“加以维护”让老人“免受惊恐”。毛泽东致电邓小平、饶漱石、陈毅：“望转合肥县政府对卫立煌家属予以保护为盼。”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主任薛愚来信，诉说他们与进入北平的军委机关就房屋问题引起的争执，毛泽东请时任平津卫戍区司令员的聂荣臻派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朱早观“查明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告诉他。毛泽东特别嘱咐聂荣臻：“如无大碍，宜让北大。”毛泽东给在上海的

宋庆龄写信："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敬候，专程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为克服财政经济困难，陈云召开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区财政会议，拟定在城市和农村乡镇发行二千四百亿元公债（旧人民币）。毛泽东急切致电在上海的陈云，询问"（一）二千四百亿元的用途；（二）为什么需要二千四百亿元之多，是否可以减少；（三）估计城市工商业家对此项公债的态度将如何，是否会拥护，如不拥护，是否有失败之可能；（四）利息四厘是否适当，为什么是适当的；（五）为什么规定明年十一月起还本付息，三年还清，期限是否太促，为什么要如此规定？"毛泽东说："安贫者能成事。"他致电斯大林，表示中国共产党人目前面临着两大任务：军事任务和经济任务。毛泽东说："解决军事任务，即最后消灭敌人，我们能够完成，因为我们有经验和有必须的力量。但解决第二个任务——并不比第一个任务次要，为前途着眼比第一个任务更重要——很需要你们的帮助。不解决这一经济建设的任务，我们便不能巩固革命的果实，便不能完成革命。"

"共产党是决不会成功的。"在多雨溽热的台湾岛上，蒋介石正忙于在岛内岛外来回穿梭。他试图建立起一条能够令共产党军队完全停止下来的防御线，以便国民党军残存部队能够喘息一下，乃至重整旗鼓。蒋介石乘坐军舰一次又一次往返在舟山群岛和福建沿海一带，接见将领，整顿军队，制定防御计划。他还数次飞到西南重庆等地，希望白崇禧和宋希濂能够在云贵川建立起一块与解放军对峙的地盘，至少在那片纵列着高山大川的地域里能够与解放军周旋几年。他不断地应行政院长阎锡山的邀请去广州参与政事——尽管李宗仁提醒他作为国民党总裁，从宪法的角度讲"仅是一个平民"。六十二岁的蒋介石在频繁的奔波中心力交瘁，军事形势的恶化令他深感绝望，而特别痛心的是美国人对国民党政府垮台表现出的惊人的冷漠。六月二十日，蒋

介石下令空军封锁所有被解放军控制的沿海口岸。但是，美国方面明确表示：不承认国民党政府有权封锁解放军占领区各港口，因为该地区不在国民党政府的控制之下。更有甚者，来自日本东京的消息称：“盟军对于台湾军事颇为顾虑，并有将台湾由我移交盟国或联合国暂管之拟议。”理由是，英、美唯恐国民党政权“不能固守台湾，为共军夺取而入于俄国势力范围，使其南太平洋海岛防线发生缺口”。蒋介石认为此乃“昧尽天良”，表示：“余必死守台湾，确保领土，尽我国民天职，绝不能交归盟国。”在离乱和屈辱中，蒋介石痛定思痛，着手准备整训党政军：“党政军干部并应痛改过去松懈散漫的恶习，以群众力量来维护党纪；且保证每一个党员都应服从革命的领导，执行革命的纲领。铲除空言不实，因循敷衍，徇情任私，麻木不仁等官僚作风，而代之以实事求是，精益求精，急公尚义，严正不苟，是非分明，赏罚公允的新作风。”蒋介石决定，“以定海、普陀、厦门和台湾为训练干部之地，建设则以台湾为着手之起点”。为此，他开始研读毛泽东的《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

如果想保住台湾，必须先保住福建。

六月十二日，蒋介石在台北召开“东南区军政会议”，以期建立东南五省统一军政指挥机构，以台湾为基地，从东南沿海一带逐次抵抗，以争取时间苦撑待变。然而，将领们依然无法“急公尚义”。从上海退守的第三十七军军长罗泽闿上来就开了炮：“汤恩伯身为统帅，在上海撤退时，带头逃跑，将部队遗弃不顾。照这样的行为，将何以对部下，更何以对党国，应该自杀以谢国人！”汤恩伯拍案而起：“你罗泽闿能说会道，在会场上说话如同猛虎一样。但是同共产党作战，连绵羊都不如！你的部队在浦东不战而溃，使共产党军队直逼黄浦江岸，危及上海守军后路，使得整个局势逆转，以致指挥部再无回旋余地。你还说我该自杀，你就早该自杀！”当着蒋介石的面，双方都要求上军事法庭来进行裁判。于是，会议“无果而散”。

二十一日，蒋介石飞抵福州，在福州机场大楼召开国民党军驻闽团以上军官会议。他特别强调了福建的重要性：“大家应该知道台湾将是党国的复兴地，它的地位的重要性异于寻常。比方台湾是头颅，福建就是手足，没有福建即无以确保台湾。以福建而言，守不住闽江以北，闽南也难以确保。今后大家要树立雄心壮志，与共匪顽强斗下去。最迟到明年春，世界反共联军就会和我们一起驱逐赤俄势力，清除赤色恐怖。希望大家回去转达所述，知道我的希望和决心。在共匪未入福建之前，迅速整顿，做保卫福建的准备，用自己热血来巩固台湾，国土就一定能够恢复。”会后，蒋介石专门留下朱绍良、汤恩伯等高级将领，告诉他们，台湾岛上半数以上人口原籍为福建，南洋一带的侨胞也是福建籍人居多，因此福建一旦失守，无论台湾还是海外，所有的人必定认为国民党彻底失败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影响。蒋介石说：“为了大局，福州是不惜死守的。”

七月下旬，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即将进入福建。

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张鼎丞致电中共华东局：

……当前的困难是严重的。主要是群众尚未发动，缺乏支前力量，粮食非常困难，工商业停滞，物资十分少，人民币未占市场，未有信用，物价十分高，某些地方买不到东西……我十六万人挤在狭小穷困地区，有崇山峻岭，交通运输又十分不便，因此部队一个月未吃肉，甚至吃不到菜，吃盐水汤，以至不少士兵晚上眼盲看不见道路，秋季三双鞋子都穿破，发动士兵打草鞋，每双要三千五百元人民币，买麻也很难买到，疟疾、痢疾、中暑，各种病员很多，三个月的药品，一个月就用完了。已布置打福州的部署中，有两个军必须走几百里的山路，甚至有不少山区连马也走不通，要士兵来抬山炮上去，很难动员民夫，又无粮草准备。因此，部队一面是行军作战，一面又要筹粮运弹，每个士兵要负运四十斤至五十斤重弹药，尚有三分之二存在江山（位于闽浙赣交界处）未运上来……

八月四日，第十兵团下达福州战役作战命令：第三十一军为左路，限十五日黄昏对连江、长门守军发动攻击，断其海上退路；第二十九军为右路，限十六日黄昏向福清、长乐守军发起攻击，断其向东、向南之海陆退路，同时阻击泉州等方向可能的北援之敌；第二十

八军配属炮兵大部为中路，限十五日黄昏对大湖、闽清之敌发起攻击，会同左右迂回部队围攻福州。

山峦连绵，丛林茂密，仅有的山路多年失修，桥梁已全被国民党军破坏，第十兵团在几乎无法行军和生存的大山中向福州接近。而驻守福建的国民党军认为，只要在几条主要公路上布置足够的兵力，利用入闽通道上的一座座大山，起码在短时间内解放军无法靠近福州。

“最迟到明年春，世界反共联军就会和我们一起驱逐赤俄势力。”死守待变，是蒋介石的希望所在。

但是，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英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冷战已初见端倪，而中国政权性质发生的变化势必对这种冷战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可是，没有迹象表明，东、西方两大阵营中的任何一方，愿意冒重新卷入军事对抗的危险来全面介入中国的内战。

此时，美国人最大的愿望不是拯救国民党政权，而是保住他们有限的在华利益，重要的是确保美国在南太平洋的军事利益。为了平息公众就美国对华政策失败发出的指责，美国政府发表了对华政策白皮书，即《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着重1944—1949年时期》，试图表明蒋介石政府的倒台在于其内部的腐败，而不在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误，况且美国政府也从来没有支持过国民党政府打内战。白皮书一经发表，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无论是中国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都对其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蒋介石认为，白皮书的发表是美国政府对国民党政权的背叛，犹如一个人“自断其臂”，目的是“掩饰其对华政策之错误与失败”。在白皮书发表的当天，他在日记中写道：“耶稣被审判的时候，他是冤枉的，但是他一句话也不说。”而毛泽东连续撰文，对美国人的自欺欺人极尽讽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别了，司徒雷登》：

……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还在过去的三年内，用美国的卡宾枪、机关枪、迫击炮、火箭炮、榴弹炮、坦克和飞机炸弹，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现在这种情况已近尾声了，他们打了败仗了，不是他们杀过来而是我们杀过去了，他们快要完蛋了。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之类，确实是困难，但是比起过去三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日上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走了。

在这之前，他安排美军舰队撤离了中国青岛。

这位燕京大学的老校长满心的矛盾与痛苦：

此刻，长期以来一直深藏在我心中的矛盾开始浮出，这个矛盾，就是我个人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看法。国民党里的许多人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平心而论，我对其中不少人是由衷地敬佩。我知道他们是一些正直的、有公益心和有教养的人。可是这个党从执政伊始就容忍了各级官员的贪婪受贿、懒散无能、搞裙带关系和派系斗争——一句话，那个被它推翻了的腐朽的官僚制度的一切弊病它都有了。抗战胜利后，为了集中军队和秘密警察的力量去摧毁共产党，那些弊病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了。政府逐渐失去了民众的支持，甚至失去了威望。当共产党的军队势如破竹地向长江挺进时，宏大的江防计划在政治纠纷、叛逃、出卖和混乱的撤退中成了泡影。然而，正是这个政府却一直以各种名义获得了大量的美援，它所真心实意制定出来并体现在许多个别人物身上的主张和目标，也正是我们全然信赖的。令人痛惜的是，相形之下，共产党却不谋私利，也不贪污，官兵生活在一起，勤俭节约，纪律严明，思想灌输十分彻底。他们进入南京之后，这一切都显得十分突出。他们对民众几乎秋毫无犯，虽然到处借东西，但总是如数归还或照价赔偿……从表面上看，共产党发动了一场强有力的运动，它要在千百万中国人中培养那种他们曾经感到明显需要，而基督教布道团和别的文化势力一直在努力培育却收效甚微的一些品质与能力，诸如进行组织工作的能力、严格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又是自觉的组织纪律性、把公共的事业放在个人和家庭之上、大公无私地为百姓服务、青年理想主义者的热忱和忠贞。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成就，尤是把他们与国民党的一切缺点相对照那就更为突出了。

司徒雷登告诉他的美国友人："关于这个国家未来局势的发展，我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好的坏的可能性都有。但有一点我是清楚的，即无论我们是成功还是失败，我们的国家都将受到这一结果的巨大影响。"

就在美国国务院发表白皮书的那天，对于蒋介石来说又一个打击接踵而至：国民党长沙省府主席、国民党军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与驻守湖南的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率部在长沙通电起义。

八月五日，第四野战军第四十六军一三八师开进长沙。

九月，程潜、陈明仁应毛泽东邀请到达北平。见到毛泽东，陈明仁主动提起四平之战，言自己深感愧疚。毛泽东讲的道理是：当时你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谅解，只要站过来就行了。陈明仁不知道的是，当第四野战军已逼近湖南时，毛泽东了解东北部队对四平之战的记恨，曾在五天之内三次电告林彪要善待陈明仁。毛泽东将程潜接到丰泽园的菊香书屋，程潜曾出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军政部长，是国民党军湘系的主要将领。毛泽东请他吃家乡饭，毛泽东说："二十多年来，我是有家归不得，也见不着思念的乡亲。蒋介石把我逼成个流浪汉，走南闯北，全靠这一双好脚板，几乎踏遍了半个中国。"

第十兵团官兵也有一双好脚板，他们翻越闽北的一道道山脉逼近福州城。

八月十一日，扫清福州外围战斗打响。右路第二十九军攻占福州西南面的永泰。之后，八十五师东进，攻占福州以南的东张、宏路、海口；八十七师北进，攻占福州南面的青圃。至此，福州守军的南逃之路被截断。左路第三十一军九十三师攻克福州以北的丹阳、连江；九十一、九十二师沿闽江向东攻克福州以东的重镇马尾。至此，福州守军的海上逃路被截断。中路第二十八军八十二师攻克福州西北方向的大湖、小北岭，打开了福州的北大门；十六日，八十四师进占福州以西的溪口。至此，第十兵团的三路大军采取迂回包抄的钳形攻势对福州形成了包围。

国民党福建省府主席兼福建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第六兵团司令官李延年见外围迅速崩溃，死守福州根本无望，十六日，除留少数掩护部队外，命令其余部队分批渡乌龙江南逃。而朱绍良、李延年则乘机转至厦门再逃台湾。

得知守军弃城的消息后，第十兵团即刻向福州实施攻击。

十七日凌晨，第二十八军八十二师二四五团首先由城北突进市区。

国民党军残余部队或望风而逃或放下武器。

福州没有大战。

第十兵团一鼓作气，第二十八军主力由北向南攻打平潭等福建沿海岛屿，第二十九、第三十一军沿福厦公路向与台湾隔海相望的那片海滩急促推进。

在扫清以平潭岛为中心的一系列沿海小岛屿时，第十兵团开始领略海战的艰难。木船在海浪中颠簸，不断地被敌人的炮火击中，不熟悉水性的官兵被海潮冲走。靠近海滩的时候，海岸火力封锁猛烈，在泥泞中抢滩的官兵不断中弹倒下，海滩的滩泥被鲜血染红。平潭诸岛守军是李天霞的第七十三军残部和劳冠英的第七十四军残部。第二十八军官兵的舍生忘死令国民党兵心惊胆战，即使在船只中弹沉没之后，官兵们依旧奋力泅水登岸，一拨倒下一拨跟着冲上海岸。李天霞在解放军发起攻击前，就把他的军部从平潭县城撤到了靠近码头的观音澳。九月十五日晚二十时，八十二师二四四、二四五团首先从平潭岛东部的海岸突破。十六日凌晨，二四四团官兵占领平潭县城。国民党兵立即慌乱起来，这时候他们才发现，指挥官们早已逃走了，于是他们丢弃了大量武器装备，划着小舢板朝着台湾方向而去——高级将

领们逃到台湾后立即受到军法审判，第七十四军军长劳冠英虽然后来被释放出狱，但不得不以开杂货店维持生计。第七十三军军长李天霞和第六兵团司令官李延年分别被判处八年、十二年徒刑。李延年通过关系疏通，一年后得以假释，但三餐不继潦倒困顿的日子从此开始。

第二十八军攻占平潭岛时，第三十一军和第二十九军大举南下。第三十一军九十二、九十三师取左右两翼夹攻之势直逼闽南要地漳州，城内的国民党守军闻风弃城而逃，十九日下午九十二师占领漳州。第三十一军攻占了厦门岛北面对岸的刘五店地区、西北面对岸的集美地区。打下平潭岛的第二十八军，以一个加强师乘船南下，在泉州湾登陆，接着继续从陆路推进，到达厦门岛北面对岸的石井地区。至二十八日，第十兵团主力对厦门和金门形成三面包围之势。

为了防止厦门守军逃跑，达到全歼敌人的目的，第十兵团决定同时攻击厦门和金门，并开始了渡海作战的准备。

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唐亮、代理参谋长袁仲贤，副参谋长周骏鸣、政治部副主任张凯致电第十兵团指挥员：

> ……同意你们来电部署，依战役及战术要求，最好按来电同时攻歼金、厦两地之敌。但请你们考虑，依据金、厦两地之敌兵力……及我方准备程度［尤其是船只］，如以五个师攻厦门［有把握］，同时以二个师攻金门，是否完全有把握？如考虑条件比较成熟，则可同时发起攻击；否则是否以一部兵力［主要加强炮火，封锁敌舰，阻援兵与截逃］钳制金门之敌，首求攻歼厦门之敌，此案比较稳当，但有使金门之敌逃跑之最大坏处。究如何，请你们依实情自行决之，总以充分准备有把握的发起战斗为宜。

第十兵团渡海作战，最重要的准备工作，是征集船只和船工。但是，到了十月初，第二十九、第三十一军只征集到够三个团使用的船只，而第二十八军只征集到够一个团使用的船只，且绝大多数船是平底江船，并不适合出海作战。于是，第十兵团决定，以第二十九、第三十一军攻取厦门，以第二十八军攻取厦门岛与金门岛之间的大嶝岛和小嶝岛。

厦门为中国东南沿海重要门户，东与金门岛相望，西、南、北三面与大陆隔海。此时，岛上国民党军残余部队的总指挥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汤恩伯。汤恩伯五万兵力的防御部署是：第五十五军七十四师位于西北部，一八一师位于东北部，二十九师的一个团、第六十八军的一个师以及要塞部队位于厦门市内，第五军一六六师位于东南部，二十九师的两个团防守鼓浪屿。十月七日下午，蒋介石抵达厦门——“在港口即闻大陆炮声隆隆作响，此地与共军相隔不及九千米。”蒋介石严令汤恩伯“巩固金、厦”。

十月十五日，第二十九军八十七师的一个团和第二十八军八十四师的一个团开始攻击大嶝岛。

细雨蒙蒙，阴暗天色笼罩海岸。先头部队官兵用向百姓借的木盆木桶盛放弹药，为了让个子矮小的战士安全渡海，侦察连还在港汊中打下木桩系上了绳索。第二十九军八十七师二五九团副政治委员方政和参谋长陈博率领一营，团长曹国平、政治委员李锋率领二营和三营出动了。一营三连指导员季文达带领先头班刚冲上前沿，就踏上了地雷，季文达和一个班的战士全部伤亡。第二十八军八十四师二五一团二营从宽大的正面发起攻击，官兵们冒着敌人的岸炮搭起人梯攀崖而上，刚一登上崖顶，副营长王志美踏雷阵亡。天快要黑了，上岸的官兵必须逐个消灭敌人的地堡，从地堡里射出的交叉火力极其凶猛，增援的国民党军舰艇也靠近岛屿助战，二五一团和二五九团因此推进缓慢。天亮时，涨潮了，交战双方必须面对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后续部队上不来，消耗了一夜的弹药也一时间接济不上。二五一团和二五九团指挥员研究后决定，背水一战勇者胜，拼尽最后的力量向守军发动坚决的攻击。攻击重新开始后，打了一夜的国民党军放弃阵地，纷纷泅水游向小嶝岛。傍晚时分，大嶝岛被攻占。二五一团和二五九团一鼓作气，天黑时攻占紧挨着大嶝岛的小嶝岛。

小嶝岛的南面就是金门岛。

攻占大嶝岛和小嶝岛的重要性在于，国民党军认为第十兵团下一个作战目标一定是金门岛。

国民党军第十八军十一师奉命紧急增援金门。

但是，第十兵团的作战目标却是厦门。

第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和九十三师的一个加强团佯攻鼓浪屿，给敌人造成错觉，调动其纵深部队南援，掩护在北面实施的正面攻击；第二十九军八十五、八十六师和第三十一军九十二师在炮火掩护下，从厦门的西、北、东北部登陆，主攻方向为北面高崎两侧十五公里宽滩头阵地，突破防御线后直接攻击厦门；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军各一部以炮火钳制金门守军，待厦门战斗发起后，如大金门守军增援或撤逃，则第二十八军的四个团和第二十九军的一个师合力攻击大金门。

第三十一军官兵对鼓浪屿的攻击一开始就出现了问题。下午四时三十分，九十一师二七一团和九十三师二七七团的两个营，分别从海伦湾和沙坛湾起渡后，海上的东南风突然变成了东北风，且风势猛烈。船队逆风行驶，帆篷被刮掉，桅杆被折断，一些船只艰难地试图靠近滩头，即刻受到敌人海岸炮火的拦截，部队和船工都出现严重伤亡。一些船只甚至被狂风吹回了出发地。夜晚十一时，第二梯队再次强行起渡，但还是因为风浪太大和炮火猛烈，大部分突击队员没能登陆，只有两个排的官兵冲上了海滩。这些最先登上鼓浪屿的官兵犹如孤军，却是一支最勇敢无畏的孤军。二七一团一连八班长丛华滋率领全班冲锋时，官兵相继全部阵亡在滩头的泥水中。三连二排船上的船工和水手全部伤亡，失去控制的木船中弹沉没后，全排只有五名战士还活着，他们在副排长的率领下登上岸，但在攻击海岸敌阵时全部牺牲。副团长田军与二连一排官兵一起冲到鼓浪屿海边的一块大岩石

下，他们用炸药炸开鹿砦和铁丝网，攻占了滩头的碉堡，然后向筑有围墙的一座堡垒冲去。三班长牺牲后，副排长李荣德率领三班的战士攀登围墙，战士们说排长我们先上，李荣德说我经验多我先上，李荣德刚一攀上去，一排子弹横扫过来，致命的那颗子弹射穿了他的颈部，李荣德的鲜血滴落在围墙下的战士们的身上。九十一师炮兵二连在船只沉没后，十余名官兵涉水登陆，连续突破守军的防御工事，直抵鼓浪屿岛日光岩西侧的制高点。他们在日光岩上坚守两天两夜，战士们一个又一个地牺牲，最后只剩下了指导员赵世堂。当敌人冲上来的时候，他拉响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二七一团团长王兴芳被官兵们的巨大伤亡所激怒，他亲率特务连乘船逆风抵达滩头。但是，船只随即被炮火击中，三名船工牺牲，王兴芳头部负伤。满脸是血的王兴芳指挥部队在悬崖下强行攀登，但由于守军火力太猛，特务连官兵大部伤亡，王兴芳再次中弹，这次伤在前胸，战士们抬起他向后撤退时，他停止了呼吸。

午夜，第三十一军命令停止对鼓浪屿的攻击。

第三十一军对鼓浪屿的强攻虽然失败了，但却成功地牵制和调动了国民党军，从而保障了兵团主力攻击厦门的行动。

第二十九、第三十一军主力对厦门的攻击坚决而猛烈。九十二师突击队在石湖山堤段登陆，恰逢落潮，滩头裸露，突击队员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他们必须通过海岸上的烂泥滩。淤泥竟然深及膝盖，一个人中弹倒下，后面的接着向前跋涉，只要还有人活着，冲击线就还在往前伸。付出巨大的伤亡后，突击队员爬到了铁丝网前，国民党守军突然发动反击，双方官兵瞬间就撞在了一起。第二十九军在这个宽大登陆点的两翼成功登陆，并立刻实施策应掩护。后续部队见状，也开始不顾一切地登岛，突击队终于突破敌人的海岸防线，建立起稳固的登陆场。第二十九军八十五师登陆后向高崎方向猛攻，一举

占领机场。十六日，第二十九、第三十一军主力占领了厦门的北半部。被俘的国民党军第五十五军七十四师师长李益智被俘后说：从你们攻击起直至抵滩，我们一直被鼓浪屿方向的激战所迷惑，放在岛的腰部的机动部队左顾右盼一阵后，被调去增援鼓浪屿了。于是，当你们突然猛攻北半岛时，我们在那里的部队只有挨打。你们选择多泥滩多陡岸的地段作为主攻方向，实出我们意料。

此时，成千上万的国民党军官兵和他们的家眷拥挤在厦门南面的海滩上。

奉蒋介石之命死守厦门的汤恩伯也在乱兵当中。他的卫兵焦急地用步话机联系舰艇前来接应，但是海水正在退潮，舰艇难以靠岸，汤恩伯在海滩上感到了恐惧。他在步话机里的焦急的呼叫，被第十兵团司令部监听到了，兵团司令员叶飞命令部队迅速向海滩追击——“但我们的追击部队只顾追击敌人，不向后方联络，报话机呼叫数次一直叫不通，汤恩伯在海滩上足足停了一个小时，才喊到小艇夺路而逃。”

第二十九军和第三十一军后续部队大批登岛。

陆续登陆的官兵们，在厦门海岸登陆场看到的是深陷在泥沼中的烈士遗体。十七岁的战士小陈，攻击前向班里的战友说，如果他牺牲了，先不要告诉他家里，等全国都解放了再让他娘知道。小陈是独生子，三岁时父亲病逝，娘把他拉扯大，当解放军的队伍路过他们村时，他娘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唯一的孩子送到了队伍上。李教导员直挺挺地躺着，他是中弹后被上涨的海水淹死的。部队入闽前，在浙江嘉兴他收到家里的一封信，得知父亲病重，他准备把自己积攒的钱寄回家去。在去军邮所的路上，他碰见了炊事班长，得知炊事班长的母亲也病了，李教导员就把自己攒的钱全给了这个老炊事班长。现在，他躺在泥滩上，那位老炊事班长生死不明。民运股长李新兴是个面容俊朗的山东青年，他的口袋里还有未婚妻的一封信，战前他们约定打完

厦门后就结婚。当年那位大眼睛的姑娘，牵着马把李新兴送到队伍上。打淮海的时候，姑娘推着小车支前，恰巧与李新兴碰上了，两个人在前线见面喜出望外，李新兴的战友们也兴奋异常。战友们都说李新兴那小子的对象实诚，将来准能生几个大胖小子。大眼睛的姑娘留给李新兴的念想是一双新布鞋。李新兴从淮海平原一直奔袭到东南沿海，直到牺牲在海水退去后的泥滩上，官兵们看见他竟然光着两只脚——那双一针一线缝出的布鞋依旧是新的，它被包裹在李新兴背包的最里面……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七日，厦门解放。

蒋介石飞至广州。

李宗仁终于忍无可忍，他对蒋介石不再客气了：

因为国事已至不可收拾的地步，不得不畅所欲言。你过去每把事情弄糟了，总是把责任和过失推到别人身上。例如东北剿共失败，徐蚌会战的全军覆没，你说是军队不听你指挥；又如发行金圆券，引起全国的经济恐慌，人民破产，自杀成群，你不躬自反省，反责备人民不拥护你的经济政策。再如你纵容特务，滥捕学生和爱国人士，引起舆论指摘，你不自疚，反说本党同志不听你的话使然………凡此种种，真是不胜枚举！你主政二十年，贪赃枉法之风甚于北洋政府时代。舆论讥评我们为“军事北伐，政治南伐”。其实，此种评语尚是恕辞，因北洋官僚政客对舆论抨击尚有所畏忌，而我国民政府则以革命旗帜为护符，凡讥评时政的，即诬为“反动分子”，以致人人缄口，不敢因片言惹祸。你对此情形竟亦熟视无睹，明知故纵！记得在南京时，魏德迈特使曾在国府饯行席上痛诋中国官员贪污无能。他以一外国官员公开侮辱我政府，实不成体统，时与会众人中，竟有当场掉泪的，不知你亦有心闻否？究作何感想？你此番已是第三次引退，你当时曾对张治中、居正、阎锡山、吴忠信各人一再声明，五年之内绝不过问政治。此话无非暗示我可放手去做，改弦更张，不受你的牵制。但事实上你所作所为却完全相反……

第三十一军军长周志坚走上了海滩。成群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兵正在集中，海滩上还聚集着打扫战场的解放军官兵和前来看解放军的老百姓——“到处是白花花的银元，部队在捡，老百姓也在捡，部队共捡了几万块。”

一颗流弹打了过来，穿透了周军长的裤子。

“谁乱打枪？”

“是我走的火！”一个班长站起来报告说。

周军长看了看这位脸上结着深红色血痂的年轻班长，摆摆手说：“算了，没事。”

这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对来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代表们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在遥远的厦门，那片与台湾隔海相望的海滩已经寂静。

一直到蒋介石与毛泽东两人先后离世，没人知道，隔海对峙是否是他们永远缠绕于心的伤痛。

# 第十八章 士兵的山河

## 大迂回大包围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在金色温暖的阳光照耀下，巨大的红丝绸灯笼挂在紫禁城殷红的城墙前，在和煦的微风中轻轻摆动。”英国记者菲利浦·肖特写道，“国民党统治时期作为装饰城楼用的、在一块用敲平整了的石油桶焊接在一起的钢板上绘制的蒋介石的一幅两层楼高的褪了色的肖像画，已经被悬挂在广场一侧城墙上的一幅毛的同等大小的画像所代替。”毛泽东“以其高音调的湖南口音，面对着拥挤在下面用墙围着的狭窄广场上的一万多人，重复说道：‘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长达两个半小时的军事检阅开始，骑兵在前面开路，“后面是长长一大串缴获的美军货车和坦克”，货车和坦克上站着年轻的解放军官兵。受阅陆军师师长是时年三十一岁的李水清，他和第六十七军一九九师政治委员李布德，并排走在掌旗兵和护旗兵的身后，在他们的后面是十二个步兵方队。接受检阅的战车团，由缴获的日式轻型坦克组成，团长田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词作者田汉的儿子。尽管有心理准备，但当《义勇军进行曲》在天安门广场上骤然响起的时候，这位年轻的军官还是热泪盈眶。随后是欢呼的市民，人群中传出“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喊声，毛泽东应答的嗓音通过话筒传到下面：“人民万岁！”随着夜幕的降临，异常壮观的焰火表演开始，“整个北京都可以看得到”。“舞蹈者们手提彩色纸灯笼，上面贴着铁锤和镰刀以及红星等标志，在广场下面形成了一条彩色的飘带”。

苏联作家西蒙诺夫被新中国诞生时的喧闹所激动，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承认这个新生政权的国家”。西蒙诺夫在上海和天津等地参加了各种庆祝活动——“有一个穿着蓝色工人上衣的中年人向我走来。显然，他是刚刚开始学习俄语的。他直望着我，继而困难地、可是用心地说出俄语来，他问：‘同志，请告诉我，你爱新中国吗？’”

“是的，同志，我非常爱新中国！”西蒙诺夫激动地回答了他。

这一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朱德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

全体战斗员、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后勤工作人员同志们：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部队，今天和全体人民在一起，共同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部队，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所援助的蒋介石反动政府的革命战争中，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敌人的大部分已经被歼灭，全国的大部分国土已经解放。这是我们全体战斗员、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后勤工作人员一致努力英勇奋斗的结果。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感谢。

但是现在我们的战斗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残余的敌人还在继续勾结外国侵略者，进行反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革命活动。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实现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目的。

我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工作员，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毛主席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朱德

白崇禧集团，就是国民党军残余部队中最坚硬的一块。

为了保存实力，白崇禧已从武汉退守长沙，又从长沙退守衡阳。

当第四野战军于长江两岸进行休整的时候，白崇禧也在重新组合溃散的部队和整编地方武装。白崇禧的作战方针是："以维护粤、桂、川、黔之安全，并相机打击匪军之目的，即以主力于湘江两岸地区，采取持久，力求创机歼敌，各以一部在湘西及鄂西方面，利用山岳地障，拒匪进犯，并相机策应湘江方面之作战。"为此，宋希濂部沿鄂西、湘西布防，担负巴东、慈利、大庸（今湖南张家界）之线作战；白崇禧部主力于宝庆（今湖南邵阳）、衡阳地区布防，依托湘江、资水、沅江，背靠滇、桂、黔，构成一条东南自粤北乐昌与余汉谋集团相连、西北至湘鄂西与宋希濂部呼应的"鄂湘粤联合防线"。

白崇禧部共计拥有五个兵团、十四个军、三十个师左右的兵力。其各军的位置是：第四十六军位于粤北与湘南交界处的章宜、乐昌；第九十七军位于湘南章宜以北的郴县和汝城；第四十八军位于郴县以北的永兴、耒阳；第七军位于耒阳以北的衡阳和泉溪；第五十八军位于衡阳以北的衡山；第一〇三军主力位于衡山西北之蒋市，其中的一个师位于蒋市以西的永丰；第七十一军位于永丰以西的青树坪；第一兵团部和第十四军位于青树坪西南方向的宝庆、新化；第一〇〇军位于湘西南的怀化、芷江；第一二五军位于衡阳以北地区；第一二六军位于湘南零陵；第五十六军位于湘南与桂北交界处的全州；暂编第五、第六军分别位于湘西沅陵、溆浦地区。

在长沙以南、衡阳以北地区，第四野战军与白崇禧的主力部队近在咫尺。

几乎自共产党武装诞生的那天起，桂系军队始终是国民党军中最难对付的。其主要因素是桂系不同于其他国民党军部队：善于山地作

战、短促突击和战场机动，攻势一旦发动凌厉而坚决，如有山岳等有利地形可为凭借，打起阻击来十分顽强。现在，如何抓住白崇禧的主力，实现大规模歼灭作战目标，是摆在林彪面前的一大难题。

林彪曾向中央军委提出避开白崇禧的正面，以主力沿粤汉铁路两侧进入广东的作战计划："如敌在茶陵和攸县地区（湖南东部）与我作战，则我以陈赓兵团由南向北和由东向西攻击；以十二兵团（萧劲光部）、十五兵团（邓华部）由北向南攻击。如敌不在茶陵、攸县地区与我作战而退湘江与我对峙或退入广西，则我全军等候宜昌、沙市部队南下，其他各部沿粤汉路两侧入粤，先解决广东，然后再进入广西……"

中央军委回电，对林彪的计划持有不同意见。中央军委认为，广东境内的国民党军残敌不过四万余人，而在广东地区游击队就超过四万，因此，广东问题"只需要两个军加上曾生的（两广纵队）两个小师即能够解决"，不需要派出大军进入广东。野战军目前的作战计划，还是沿用了近距离迂回包抄的办法，这个办法在之前的宜沙、湘赣战役中已证明效果不佳。白崇禧最后与我军必有一战，战场"不外湘南、广西、云南三地，而以广西的可能性为最大"。因此，野战军主力应第一步准备在湘南，第二步在广西，第三步准备把白崇禧赶进云南决战。而"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这样做的原因是："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中央军委认为，第四野战军"应准备把白匪的十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甚至还要准备追至昆明歼灭之"。毛泽东认为，对付白崇禧需要八个军的兵力，即投入四野的五个军和暂归四野指挥的陈赓兵团的三个军，

这八个军很可能需要深入到广西、云南境内包抄白崇禧。毛泽东给林彪确定的作战范围是“豫、鄂、湘、赣、粤、桂六省”。

接着，中央军委进一步阐明了对白崇禧集团实施“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思路：由陈赓兵团组成一路，从白崇禧目前布设的防线西侧，即江西境内直插广东，解决广东之后向西直插广西南部，把白崇禧的老巢彻底封住；而第四野战军主力则在白崇禧布设的防线的中部向前推进——“不管他愿意同我们打也好，不愿意同我们打也好，近撤也好，远撤也好，总之，他是处于被动，我们则完全处于主动，最后迫使他不得不和我们在广西境内作战。”

九月九日，毛泽东致电林彪、邓子恢，详细部署了对白崇禧集团的作战。这一次，毛泽东的指示详细到了军一级的行动：

> 关于进攻部署：（一）陈赓邓华两兵团第一步进占韶关、翁源地区，第二步直取广州，第三步邓兵团留粤，陈兵团入桂，包抄白崇禧后路。陈兵团不派任何部队入湖南境，即不派部去郴州、宜章等处。（二）程子华兵团（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除留一个军于常德地区，另一个军已到安化地区外，主力两个军取道沅陵、芷江直下柳州。（三）另以三个军经湘潭、湘乡攻歼宝庆（湖南邵阳）之黄杰（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匪部，与程子华出芷江的两个军摆在相隔不远的一线上。对衡阳地区之白崇禧部，只派队监视，而不作任何攻歼他的部署和动作。（四）这样一来，白崇禧部非迅速向桂林撤退不可，而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判断白部在湖南境内决不会和我们作战，而在广西境内则将被迫和我们作战。因此，陈赓兵团不要派部出郴、宜。现在茶陵、攸县之我军，亦不要作攻歼衡阳白匪之部署，而应两路齐出芷江、宝庆，位于白匪西侧。然后，以芷江之两个军，先期突然出柳州，在柳州地区占立根据地。估计白匪三个军［第七、第四十六、第四十八军］及鲁道源（国民党军第十一兵团司令官兼第五十八军军长）之五十八军在我主力威胁面前，不敢过早分散主力，李品仙（国民党军桂林绥靖公署主任）防御柳州一带兵力必不甚多。我军［两个军］可能在柳州以西以北区域即融县（广西融安）、罗城、天河（广西罗城）、宜山、思恩（广西环江）、宜北区域建立根据地，并切断柳州通贵州的铁路线。陈赓兵团则于占领广州后，即经梧州向宾阳、南宁地区前进，位于广西南部。我在宝庆之三个军［主力］则于白匪向桂林撤退时，尾敌南进……白崇禧是中国境内第一个狡猾阴险的军阀，我们认为非用上述方法，不能消灭他……

毛泽东大迂回大包围的设想，与辽沈战役初期，要求东北野战军奔袭锦州关上东北地区大门的战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从兵力上讲，白

崇禧集团再强大，与压在南中国的人民解放军三个野战军相比，真正是“本钱小”的一股孤悬于湘中的残敌而已。这股残敌从局部近战上可能很坚硬，但从全局态势上已没有与他在局部周旋的必要。白崇禧集团的东侧，已经完全处在人民解放军的控制下，陈赓兵团从江西南下广东的通路畅达无阻，而畏缩在广东的国民党军余汉谋集团兵力薄弱，只要派出一支能冲能打的部队，进入广东之后兜个大圈子一直插广西南部沿海，就可以把桂系的后方彻底捣毁，从而把白崇禧完全包裹在国土的腹部。如此一来，白崇禧如何决战，也不过是最后的挣扎。如果他跑向云南，会有分布在西南四省的第二野战军等着他。更何况，不到万不得已，白崇禧是不会往云南跑的，他死也要死在他的老家广西。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第二野战军主力向西南进发时，经过华中地区的杨勇的第五兵团，除第十八军外，第十六、第十七军如遇战事，暂时归林彪指挥并参战。同时，第五兵团作为第四野战军战役预备队使用。

第四野战军战役部署是：以第四兵团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军和第十五兵团第四十三、第四十四军共十七个师以及两广纵队，组成东路军，由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指挥，南进广东；以第十三兵团第三十八军以及野战军直属第三十九军共八个师，组成西路军，由第十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指挥，向湖南西部的芷江、黔阳前进，占领靖县、通道，截断白崇禧西撤贵州的通路，而后准备向南出击柳州；以第十二兵团第四十、第四十五、第四十六军以及野战军直属第四十一军和第十三兵团第四十九军，共同组成中路军，由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指挥，担任进占宝庆，截断湘桂铁路，歼灭白崇禧部第七十一军等任务；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八军，在白崇禧部撤退的时候占领衡阳，而后继续西进归第五兵团建制；第四十七军集结在湘西监视宋希濂部，保障战场侧翼的安全，并有掩护第

二野战军入川的任务。林彪特别强调：中路军和第十八军不能过早地向前推进，不能在两翼迂回包围还没有到位的时候，把白崇禧过早地赶入广西。

九月十三日，衡宝战役拉开序幕。

西路第十三兵团主力分别从湘西北的常德、桃源和临澧、澧县南下，向沅江南岸的沅陵逼近，以截断白崇禧部西撤贵州的退路。

但是，白崇禧很快给了毛泽东和林彪一个意外：战役的进展并没有按照毛泽东所设想的发展，白崇禧与所有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不一样，他不按常规出牌。于是，林彪与白崇禧，两位极具才华且性格独特的军事将领的对阵，注定要险象环生。

按照部署，中路军集结完毕的最后期限是十月一日。

毫无疑问，新中国的诞生，对依然置身前线的第四野战军官兵来讲，是一个巨大的精神鼓舞。但是，一九四九年十月，就战争双方在衡宝战场上的大喜大悲而言，国民党军官兵，特别是中高级将领们，他们最大的奢望仅仅是拼个鱼死网破或许能死里求生；而解放军官兵们却以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憧憬着未来美好而长远的日子——战争进行到最后时刻，必然会产生一个悖论：人人都清楚必须给残敌以最后的彻底歼灭，但是，没有人愿意被战争的最后一颗子弹击中。

当中路军集结的时候，东、西两路军开始向白崇禧部的两翼运动。

西路第三十八、第三十九军南下湘黔边界后，一路攻占沅陵、泸溪、辰溪、溆浦等地，而后继续向芷江和怀化实施攻击，国民党守军纷纷南撤，第三十八、第三十九军猛烈追击，控制芷江至靖县一线

后，突入白崇禧鄂湘粤联合防线的左翼。东路军在陈赓的指挥下，由赣西迅速南下逼赣粤边界。

两翼已被割断，但是，白崇禧并没有全面撤退。

难道白崇禧不怕失去两翼而身陷包围?

是什么让白崇禧依旧顶在中路军的正面?

林彪决定中路军二日向当面的白崇禧主力实施推进。

九月三十日，第十二兵团下达作战命令：第四十军首先奔袭并抓住白果市之敌，尔后向南面的渣江攻击前进；第四十五军在第四十军西侧，首先抓住永丰、蒋市之敌，尔后向南面的演陂桥攻击前进；第四十一军在第四十五军西侧，首先抓住青树坪之敌，尔后向南面的黑田铺、宋家塘攻击前进。以上三个军的任务是：突破衡（衡阳）宝（宝庆）公路后，威胁白崇禧向广西的退路。同时，在战场的东侧，第四十六军南下攻击耒阳；第十八军南下向郴州推进。

林彪命令中路军大举推进有两个意义：一是在两翼迂回之后迫使白崇禧南撤，二是抓住他的一两个军就地吃掉。

十月二日十六时，中路军分三路展开攻击。至五日拂晓，各军均向前推进二十至五十公里，在湖南的中南部控制了青树坪、花门楼、渣江一线，与白崇禧主力形成近距离对峙。

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在这时发生了。

林彪预料当面的白崇禧不是继续对峙下去，就是留下掩护部队后让主力南撤广西。但是，谁也没料到，白崇禧突然对林彪实施反击了。

白崇禧调乐昌的第四十六军、郴县的第九十七军、耒阳的第四十八军乘火车北上，会同原来部署在衡宝线上的部队组成新的防线，并把十三个师的主力部队全部集中在这条防线上，以第四十八军一个师和第七十一军两个师组成第一梯队，以第七军主力为第二梯队，向从中路推进的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一军展开了猛烈突击。在受到第四十一军的阻击之后，白崇禧令第四十八军和第七军的一个师推进到渣江以南，继续阻击第四野战军中路军的南进。同时，命令第四十六军的两个师集结在衡阳为预备队，第一二六军和第九十七军各一个师西移湘粤交界处的武冈和新宁，以保障防线左翼的安全。然后，白崇禧命令第四十六、第九十七、第七、第五十八和第一二六军各一部共五个师，从东西两面向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一军实施夹击。

衡宝公路全长不过两百余里，白崇禧调集如此大的兵力，迎着林彪的中路军而上，全面反击的意图十分明显。

面对白崇禧的大兵力反击，林彪认为中路军的兵力与白崇禧部相比不占优势，况且中路军处在原作战计划的行动中，并没有与白崇禧部决战的充分准备。同时，野战军指挥部还未判定白崇禧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因此，林彪连续给各部队发出电报，核心的意图是停止攻击行动，收拢部队准备迎战。这些连续发出的电报，表现出林彪在不明敌情时紧张的思考，而紧张来自事前没有决战的准备而致目前战线上的部队呈东、中、西三路过于分散。

四日深夜，林彪命令中路军各部队："目前我第一线兵力不够优势，各部即在原地停止待命，严整战备，等候我兵力之集中。"五日上午，命令第十二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副政治委员唐天际、参谋长解方并各军、师长："目前已突过衡宝公路之我军，则应在水东江、宋家塘以南地区集结，在公路以北者暂勿南进"。"各部皆须作敌向我进、向东或向南撤退以及在原地不动等三种情况的处置，并以机动精神处理

情况”。同时，林彪命令程子华的西路军从湘西向东移动；杨勇的第五兵团第十八军沿粤汉线向北移动，第十六、第十七军向衡宝公路靠近。无论白崇禧是如何打算的，林彪的最后准备是：集中兵力应对白崇禧的决战。

但是，意外又一次发生了：第四十五军一三五师没有接到野战军和兵团命令他们原地停止的电报，依旧按照作战计划以强行军的速度南下。五日夜，当第四野战军中路军全部停止在衡宝线以北时，一三五师已经越过衡宝公路，单独插到白崇禧主力部队集结的腹地灵官殿地域。

六日拂晓，白崇禧发现了一三五师。

白崇禧很为这支部队奇怪的行动所困惑。

桂军第七军军长李本一命令位于灵官殿附近的部队尾击一三五师。

这是一个令林彪万分紧张的时刻。

白崇禧在两翼受到威胁的时候，集中兵力实施坚决的中间反击，这在作战常理上似乎讲不通，因为在两翼并不安全的情况下，试图中间单独突破是鲁莽而危险的。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从白崇禧的角度讲，如果能够集中兵力出其不意地实施中间反击，乃至在突破之后形成局部的围歼，这又不失为凶险的一着，不但可以打破两翼受制迂回的被动，如果反击得手就可破解僵持已久的战场格局。沿着白崇禧的反击思路，林彪逐渐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在我军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后，西路、中路、东路部队开始向南推进，但南进部队在时间和空间上缝隙很大，中路军较东西两路军晚行动十八天，西路军和中路军分置于湖南的西部和中部，中路军与东路陈赓的第四

兵团甚至相隔一省，而只有这样的战场态势才会导致白崇禧的一种误读——共产党军队兵力分散，侧翼迂回部队短时间内不至于构成严重威胁，可以在衡宝一带集中兵力尽快实施反击，以争取时间消灭共产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将来自战场正面的压力尽可能解除，同时还可以为日后撤退赢得战场空间。

中央军委大迂回大包围的决策核心，就是抓住白崇禧的主力将其歼灭，只不过原来设想的决战战场在广西，现在由于白崇禧的误读，林彪意识到决战只能在湖南进行，而且时机就在眼前。原来还在为一三五师的冒进而担心，现在一三五的行动势必引起战场态势的急剧变化。这是一个稍纵即逝的战机，一向以作战谨慎小心闻名的林彪认准战机出现之后决心下得极其果断。

六日十一时，林彪直接致电一三五师：

……盼你们以少数部队迟滞水东江（位于衡阳西北）方向之敌，主力即向湘桂路前进，必须不顾一切艰苦和危险，坚决迅速破坏湘桂路，求得翻毁数十里和炸毁桥梁，使敌不能决心南退。只要敌人不退，则能全歼桂军，使战争提前结束。故你们的任务甚重大，望坚决灵活地完成任务。我大军在水东江、宋家塘以北能压迫敌人，故你们不要过分顾虑后方……

林彪命令一三五师："你们暂时归我们直接指挥，望告电台，特别注意联络我们。"并规定一三五师的师、团电台要随叫随到，兵团和军的电台只能收听不得指挥。同时，林彪命令中路各军主力向衡宝公路以西进击，西路第三十八、第三十九军则由西向东进击，以求对白崇禧主力形成东西两面夹击。

第四野战军的所有官兵都知道，一旦林彪独揽大权就是要有大仗了。

一三五师，师长丁盛，政治委员韦祖珍，副师长吴瑞山，参谋长刘江亭，政治部主任任思忠。

此刻，这支误闯敌人纵深的部队，注定要一战成名。

作为中路军中的一支，第四十五军一三五师一开始就插得很猛。十月二日开始接敌，四〇四团先遣部队在青树坪和永丰之间打伏击，俘敌两百。然后全师以四〇三团为前锋，四〇四团和师部居中，四〇五团为后卫，一天急行军四十公里，三日清晨，与从耒阳北上的桂系第四十八军一三八师遭遇，一三五师猛冲之后没有恋战一路推进，结果又与桂系主力第四十八军一七六师遭遇。这一次，一三五师前进受阻。四日，西面的第四十一军开始攻击青树坪，一七六师分出一部兵力向西移动增援。一三五师乘虚再进。午夜，四〇三团占领位于衡宝公路上的水东江后，迅速通过公路向南直插，五日中午到达灵官殿。师指挥部架设电台一联络，这才知道中路军所有部队都停止在了北面，只有他们单独插到了衡宝公路以南。

师长丁盛和政治委员韦祖珍沉默了。

直到接到林彪发来的电报，一三五师指挥员才明白自己的位置至关重要——他们必须在这里缠住敌人，打乱敌人的部署和计划，将敌人更多地吸引到这里，以使主力部队对敌人实施包围。

六日清早，一三五师准备出发，执行向湘桂铁路穿插的任务，以切断位于衡阳的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的退路。然而，桂系第七军一七一师突然向四〇五团的阵地冲过来。团长韦统泰命令副团长韩怀智带领三营冲出阵地，抢占附近的山头，然后全团与进攻之敌展开战斗。一七一师一次进攻不成接着再次冲击，激战至黄昏双方打成僵持。丁盛师长知道战场危机四伏，果断决定撤出战斗，继续执行向湘桂铁路穿插的任务。此时，对于林彪来讲，一三五师是否能够控制湘桂铁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敌后的存在和他们不断的横向运动。林彪希望一三五师能够在敌人集结的核心部位尽力搅动，不但要使白崇禧的反击无法顺利进行，而且一定要让他产生撤退的念头。

七日拂晓，左翼的四〇三团前卫一营在师参谋长刘江亭的率领下，悄悄通过七壁岭山口国民党军的警戒阵地，由于天黑又不熟悉路，一营进入了一个敌人驻扎的村子。天亮时，双方才发现对方，于是即刻混战成一团。一营边打边撤，逐渐与团里失去联系。与此同时，团主力在团长刘世斌和政治委员李济宗的率领下，也是由于在陌生地域里行军，走到七壁岭时陷入国民党军一七六师的包围。只剩下两个团的一三五师没有停下来，继续向湘桂铁路走去。突然，四〇四团前锋报告说前边发现敌人，师长丁盛这才发现自己已处于包围之中。

丁盛向林彪报告了一三五师面临的危境，林彪的指示是：像钉子一样钉在敌人的心脏部位，不惜一切代价与敌人死死纠缠，等待各路主力部队从外围向这里合击。

四〇四团和四〇五团官兵开始就地构筑工事，他们决心与敌人死缠硬打，即使到最后时刻需要各自为战，也要像膏药一样贴在敌人身上。

白崇禧无法得知一三五师是误入他的阵地纵深的，他不明白林彪派出一支部队孤零零地插入他的核心部位的目的是什么。但他知道，即使这支部队规模不大，也是非常危险的，必须迅速铲除。

然而，七日的战斗持续一天之后，一三五师依旧楔在敌人的心脏里。

被一七六师包围的四〇三团已被打散。三营长蕲宝春阵亡。一营受到一个团的敌人的围攻，战斗到最后发生肉搏战。在四〇三团血战的时候，四〇四团侦查参谋张佑带领一个班正在寻找他们。八日，在四〇四团二营的接应下，四〇三团开始突围向师部靠拢。突围中伤亡很大，警卫连长周国亮和指导员宋全来带领的四十多名官兵，除十余

人最后冲出包围圈外，其余的三十多人全部牺牲，不少人抱住敌人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

九日黎明，一三五师穿越敌人的封锁线，抵达官家嘴地区秘密宿营。

一三五师，一支兵力不大的孤独的部队，从一开始就打乱了白崇禧的整个作战计划，接着他们以视死如归的精神在敌人的纵深东打西突，在白崇禧的后方交通线上死缠硬磨，为战局的突变带来了奇异的效果。

面对越来越看不懂的战场态势，白崇禧终于坚持不住了：西面，共产党军队已经由芷江、黔阳地区向武冈方向东进；东面，陈赓的部队已经进入粤北地区；而深入到整个防线侧后的这支部队还在来回乱窜，衡宝地区似乎隐藏着某种不祥的预兆。于是，白崇禧命令全线撤退。他打电话给第七军参谋长邓达之："长官部和第三兵团部决定今晚撤出衡阳，回广西去。第七军率一七一、一七二、一三八、一七六师为后卫，原地掩护长官部和第三兵团撤退，至明日九时方可撤走。这个任务很艰巨，撤退时不论任何牺牲，都不要停留，纵然后尾部队有些撤不下来，也就算了……"

林彪等待的时刻终于来了，他生怕白崇禧顶着不撤，桂军密集地纠结成一团就很难分割围歼；一旦他下令撤退，且不说军心斗志会在瞬间垮掉，单是分路逃跑就会让各部队间出现众多的缝隙。

林彪立即下达了全线出击的命令。

林彪给部队的要求是："凡遇到敌人一个团或一个师的兵力时，应首先将敌人退路切断，围而不攻，等友军到达后再做有准备有配合的进攻"；"凡未抓住敌人的部队，则应参加包围友邻我军所抓住之敌，

或继续猛追求得抓住一部敌人”；“必须以三至四倍兵力的对比，去包围和歼灭敌人”，“必须求得在此次追击中歼灭白匪一部，并争取吸引大部，以便歼灭”。林彪告诉各部队指挥员：“目前作战条件最有利”，“故各部必须奋勇追击与作战”。

林彪最后一次直接指挥那个孤悬敌后的一三五师，命令他们坚决阻击南逃之敌。然后，他放手不管了：“在追击运动战中，野司根据密息，只能规定各部队行动的方向，但各兵团、各军必须以机断专行的精神，加强对各师的具体指挥，不可以一切等候我们的指示，以免失掉机会。”

八日，第四十军一一九师插入白崇禧部的右翼；第四十五军一三四师追上桂系第四十八军一七六师；第四十九军一四六师追上桂系第七军一七一师；第四十六军占领了白崇禧的指挥部所在地衡阳。

白崇禧也许早就料到这时候的桂系已经不经打了。

六日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从衡阳乘火车撤往广西。

七日上午，白崇禧自己乘飞机撤回广西。

此时，桂系逃往广西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越过宝庆西去，一是从祁阳南下。而那个一直在敌人腹地左突右冲的一三五师正卡在宝庆方向的退路上。

一三五师在界岭、鹿门前和黄土铺一线拉开散兵线。

部队刚刚部署完毕，南撤的国民党军就烟尘滚滚地开来了。

在黄土铺阻击阵地上，四〇五团团长韦统泰告诉他的官兵们，现在是最后拼命的时候了。敌众我寡，被动防御很可能被敌人大兵力突

破，不如饿虎扑羊一样冲上去，先在敌群中杀个天昏地暗将其打乱了再说。团参谋长张维率三营在左翼的黄土铺，韦统泰和团政治委员荆健率一营在中央的土地堂，副团长韩怀智率二营在右翼的双合亭，四〇五团分三路冲入了敌阵——四〇五团不知道，来敌是白崇禧最精锐的嫡系部队第七军军部和直属队。四〇五团的突然冲击使第七军的撤退队形一下子乱了。二营包围了一七二师的后卫和第七军军部的先头部队，混战中这部分敌军大部被歼；三营包围了第七军的卫生营，战斗进行得更为顺利；一营冲击的是第七军最具战斗力的部分：工兵营、警卫营、战炮营和通讯营。其中警卫营最为精锐，一色的桂系老兵，作战凶狠异常。一连多次攻击都没有奏效，四连和警卫连加入之后，才把第七军的警卫营击垮。二连冲入敌阵后，即刻与敌人开始白刃混战，战斗最激烈时全连被分割成十八处，官兵进入各自为战的状态，连、排干部全部伤亡，十二个班长只剩下一个，战士杨贵峰、李凤海和徐福宽站出来代理排长，宋学义、苏永庄、冯华贵、姜玉永代理班长，在连长李九龙的带领下死死地卡在公路上。已经两次负伤的李连长对官兵们说，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不让一个敌人过去。

战斗结束后，一营活着的官兵已不足一个连。

四〇四团在鹿门前插入敌人撤退的队形中，把第七军的一七二师与其军部分隔开，然后攻占了公路周围的数个制高点，将一七二师堵住并压缩在鹿门前至界岭之间的山谷中。十日拂晓，四〇五团的二营和三营增援鹿门前，四〇四团从山谷的正面，四〇五团从山谷的侧后，两个团合力向一七二师发动攻击。这时候，在山谷的东北方向，四〇三团打进来了，三个团对一七二师形成夹击态势。五个小时之后，桂系一七二师被全歼，一三五师俘敌四千三百一十一名。

七日凌晨的时候，第四十军一一九师沿湘桂线分两路追击。追到第二天，官兵们也没见着敌人的影子。这个师的官兵绝大部分是东北

人和山东人，在泥泞的山路上追出两昼夜后人困马乏，师长徐国夫命令部队暂时停下来休息，生火做饭。师部进到杨家桥附近的一小山村里，那户农家刚刚办完喜事，老乡说没见有国民党军从这里过去，这让徐师长心里十分不踏实。饭做好了，徐师长刚端起碗，村后北山方向突然响起机枪声，徐师长扔下饭碗就往外跑。作战科长朱余荣说，可能是部队的机枪走火了。徐国夫说："不可能！不可能！哪有机枪走火的？"他跑上山头一看，一个连的国民党军正往山上爬，徐国夫急令警卫营上去把敌人压下去，然后命令距离师指挥所最近的三五五团迅速控制附近山头。就在师部附近出现敌人的同时，正在休息的三五六团的一名炊事员也发现有敌人偷袭，七连迅速冲了上去，三排长卢道德率领全排占领了制高点，二营也抢占了杨家桥西北的毛草岭主峰，一营在杨家桥以北抢占了高地。经过对俘虏的审问，徐国夫得知，这是桂系第七军一七一师的先头部队。徐师长大喜，因为他们跑到逃敌的前面来了。

一一九师所处的位置正在白崇禧部逃往广西的另一条必经之路上。野战军司令部直接电令一一九师：坚决堵住南逃之敌，打到最后一人一枪。

九日黄昏十八时，桂军第七军一七一师、第四十八军一三八、一七六师的攻击开始了。一小时后，进攻的敌人加强到一个团。三五六团在师属炮火的支援下，不断发起反击，顶住了敌人的轮番攻击。二营坚守毛草岭阵地前沿的是六连，副营长任志盛负重伤，指导员庞玉明阵亡，连长徐佩林带领全连寸土必守，阵地始终得到保持。在杨家桥东面的无名高地上，三五五团一营三连打得机智灵活，小个子连长徐长副指挥颇有章法，手榴弹箱子成排地放在脚边，敌人只要近了就大雨一样落下去，火力密集覆盖之后，一个排乘势发动反冲击。一排和二排轮流战斗，三排作为预备队，就这样连续打退敌人的六次冲锋。十日天亮之后，敌人再次发动攻击，主攻方向转向了右翼的三五

七团，兵力加强到了两个团。三五七团官兵血战不退，六连阵地在敌人发动第十次攻击的时候一度失守，预备队七连在副连长公茂英和排长孟庆印的率领下夺回阵地。在冲击中，公茂英、孟庆印以及战斗英雄班长曹水和先后阵亡。七班长王文柱自动站出来指挥作战。最后时刻，一一九师师部的机关人员和勤杂人员全部上了前沿，在子弹、手榴弹和迫击炮弹全部打光的情况下，官兵们举起了石头，与拥上阵地的敌人展开肉搏战。

一三五师和一一九师，死死地卡在白崇禧部南逃的两条必经之路上，使白崇禧的四个主力师陷入重围。白崇禧命令已经撤退到祁阳、冷水滩一线的第四十六军一八八师和第七军二二四师回援。但是，奉命回援的部队已经不敢推进。

十日，第四野战军中路军的八个师，对被围困在黄土铺地区的桂系的四个师发起总攻。林彪要求“各部皆应组织火力、兵力实行重点突破和连续扩张的战术”。白崇禧部四个师的溃兵在雨夜中逃入山林。中路军各部队随即展开抓俘虏的竞赛，这里山水相绕林木茂盛，因此敌人得一个个地搜出来——“入夜千万个火把，照亮了五峰山区，形成一幅极其壮观的捉俘图。”至十一日上午，除一三八师师部率领一个团侥幸逃出合围外，白崇禧的四个主力师两万九千人全部被歼，第七军副军长凌云上、参谋长邓达之，一七一师师长张瑞生、参谋长李有金，一七二师师长刘月监，一七六师师长李祖霖、副师长刘克威以及参谋长袁纪等被俘。战后，毛泽东告诉程潜：“被歼者是七军两个师及四十八军两个师，地点在祁阳以北。消灭这些部队时白崇禧坐视不救，自己退到桂林，各军退到东安、零陵、冷水滩一带，听任七军四十八军苦战四天被歼干净。”

接着，西路军相继攻占湘西的武冈、宝庆、大庸和桑植，歼灭国民党军第十四军六十三师一部，六十二师大部，第一二二军大部，第

一二二军军长张绍勋被俘。

十月十一日早晨，衡宝战役结束。

衡宝战役历时三十三天，歼灭国民党军四万七千五百余人，第四野战军伤亡四千余人。

支撑整个战役的，除第四野战军并第二野战军共十个军的官兵外，还有从后方运上战场的三十九万发炮弹，二十二万发手榴弹和枪榴弹，三百五十一万发枪弹，两万六千吨粮食，两千九百吨海带和咸鱼，十一万九千件雨衣，九万床卫生被，九百三十吨药品。

那些永远倒在湘南土地上的官兵，没能看见他们为之出生入死的新中国。那些在战斗中活下来的官兵，绝大多数人是在战斗的间隙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的。“花桥战斗当天下午，我们军里几位领导在向芷江前进途中休息时，从缴获的收音机里听到了正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的实况广播。”时任第三十八军政治委员的梁必业回忆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欣喜若狂，立即用电报、电话、骑兵等所有通讯工具向部队作了传达，号召部队英勇作战，用实际行动来庆祝新中国的诞生。”

新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一位共产党军队的将领，在他写给女儿的信中说：“让爸爸们，把新民主的地基铲得平平的，让你们后一代，能够在我们的国土上建筑起一座自由、快乐、文明、进步、庄严、华丽的世界。”

“华丽”一词，令人神思飞扬。

一九四九年十月，第四野战军与白崇禧军事集团的对峙终于破解。

对于进军全中国的人民解放军来说，在这片国土的中南方向，两广以及川贵的大门已经敞开。

## 金门岛

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攻击金门岛严重失利。

此战，是解放战争史上一个永远作痛的创伤。

金门岛作战，开始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午夜，先后共有九千零八十六人登岛作战，其中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军官兵八千七百三十六人，船工和民夫三百五十人。战斗在十月二十七日午夜结束。登岛作战人员大部阵亡，部分被俘，无一人生还。

六十年过去了，位于厦门以东约五点五海里的大金门岛，依旧不在共产党人的手中。

“指挥员尤其是我的轻敌，是金门失利的最根本的原因。”战后，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说。

厦门以东海面上的大金门岛状如哑铃，东西长十六公里，南北最宽处约十三公里，岛的腰部仅宽三公里，面积一百二十四平方公里。东部山高岸陡，礁石林立，不易攀登和登陆；西部较为平坦，北岸是泥沙滩，为登陆的理想地段。大金门岛附近还有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几个小岛。

至少在二十四日登岛作战发动之前，第十兵团对国民党守军的兵力判断是：第二十二兵团部率第二十五军和二〇一师守大金门，第五军二〇〇师和一六六师残部守小金门。第十兵团指挥员认为：“从台湾调来的二〇一师是一九四八年睢杞战役后重建的，战斗力不强；守小金门的第五军是淮海战役后重建的，也并非当年邱清泉的第五军可

比”。岛上“能作战的不超过一万两千人”，“同时金门岛上也没什么工事”。

厦门之战发起前，第十兵团曾设想同时攻取厦门和大小金门，最终因为登岛作战必须的船只无法筹备充足，“金厦并取”的作战计划被否定。在第三野战军指挥员的建议下，第十兵团最后确定的作战方案是“先厦后金”。但是，同时攻取金门的设想并没有被放弃。这在当时有相当的合理性：国民党军残部逃到厦门和金门岛上，军心不稳，建制不全，兵力不大，而且情报显示汤恩伯既没有死守厦门的信心，也没有死守金门的决心，第十兵团如能一鼓作气拿下金厦，蒋介石盘踞的台湾岛就完全暴露了。

十月中旬，第十兵团第二十九、第三十一军开始攻击厦门，第二十八军的任务虽然是监视金门并以炮火钳制，但在命令中依旧有“如发现金门守军增援厦门或逃跑，则立即向金门发起攻击”的部署。可是，直到厦门之战结束，金门守军既没有增援厦门，也没有逃向台湾，汤恩伯的总部和厦门部分守军反而逃到了金门岛上。

第十兵团决定立即攻击金门，作战计划是：由第二十八军副军长萧锋和政治部主任李曼村等组成前线指挥所，指挥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军各一部攻击大金门岛，同时以第三十一军一部攻击小金门岛。后因船只不够，第三十一军的任务取消。作战计划改变为：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军先攻大金门，后攻小金门。

十月十八日，第二十八军前指下达作战命令：第二十八军八十二师二四四、二四五、二四六团，八十四师二五一团，第二十九军八十五师二五三团，八十七师二五九团，共计六个团的兵力，攻击大金门，得手后，再以八十五师的两个团攻击小金门。作战时，集中兵力分数路在金门岛北面西段海岸突破。登陆后首先站稳脚跟，阻击东面国民党军的增援，主力歼灭金门县城守军，随后向东攻击砂美、北太

武山地区的国民党军。具体部署是：二四四、二五一、二五三团为第一梯队，二四五、二四六、二五九团为第二梯队。第一梯队以团为单位，分别在福建沿海的莲河、澳头以及大嶝岛起渡，二四四团在金门岛北岸的龙口与后沙间登陆，迅速攻占后半山、双乳山，控制金门岛的腰部——琼林至沙头一线，并向岛的东部警戒，掩护二五一、二五三团进攻位于金门岛西面的金门县城；二五一团在金门岛西北海岸的西保与古宁头之间登陆，迅速攻占湖下和榜林，协同二五三团攻击金门县城；二五三团在古宁头登陆，迅速占领林厝、埔头，并直接攻击金门县城，歼灭金门岛西半部的国民党守军。而后，第一梯队会同第二梯队围歼东部之敌，占领全岛。

命令同时规定：第二十八军前指移至莲河，前指负责指挥各梯队渡海；八十二师指挥员跟随第一梯队，负责统一指挥登陆部队作战。

金门岛作战发起时间定为十月二十日。

第二十八军前指预计三天结束作战。

这一作战计划，与其说显示出严重的轻敌，不如说表现出令人惊讶的草率。

相对于台湾海峡东侧的台湾岛而言，大金门岛可谓是海峡西侧的前哨阵地，是台湾岛最后的防御前沿，国民党军如果不想有一天被从台湾岛上赶下大海，必须死守桥头堡阵地金门。而这就意味着，攻取金门的战斗势必会是一场苦战。

但是，如此至关重要的战斗，战场最高指挥权被托付给了军长和政委都不在位的第二十八军军部。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局面，是因为第十兵团刚刚攻占厦门，指挥员们正忙于接收和管理这座风景如画的城市。而第二十八军军长朱绍清因严重的胃病，在部队南下时留在福州

治疗。那时，第二十八军八十三师奉命驻守福州，担任警备和军管工作；八十四师的两个团奉命赴闽北参加剿匪；八十二师及八十四师二五一团奉命继续南下。一个军在一个省内被拆成三块，军政治委员陈美藻因此也留在了福州，以便主持“第二十八军全面工作”。还有，第二十八军参谋长吴肃在部队进入福州前就已被调走，而这一重要的军事指挥岗位一直无人接替。

与此同时，承担攻打金门岛作战任务的部队，来自不同建制的两个军四个师，即使在解放军官兵擅长的陆地作战中，于并不开阔的战场如此配置部队也有零乱之嫌，更何况是各部队仍感生疏的渡海登岛作战。渡海作战需要作战部门、情报部门、后勤部门的密切协同，而且一旦登陆，上岛部队与后续部队将被大海分割在两个联系脆弱的区域里，这就更加需要指挥与准备的充实和完备。遗憾的是，第十兵团指挥员没有参加作战指挥，第二十八军前指只有一位副军长负责，至于登岛后对不同建制部队的指挥，干脆交给了八十二师——如此零乱的部队和如此单薄的指挥，已不是“轻敌”二字便可了断的。

战后，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说：“金门尚未解放之时，我即将兵团部移驻厦门，这是一个失策。因为这影响了解放金门的准备工作……我为什么发生这个失误呢？这是因为轻视了金门，认为金门没有什么工事，金门守敌名义上是一个兵团，即李良荣兵团，实际只有两万多人，而且都是残兵败将；厦门是有永久性设防工事的要塞，守军是汤恩伯集团，兵力充足，已被攻克了，则认为攻取金门问题不大。厦门是通商口岸，如果接管工作不搞好，发生混乱影响很大，对海外都有影响。所以我才作出将兵团指挥所移驻厦门、协助厦门市委主持接管工作的决定，而把解放金门的任务交给第二十八军执行……”——这是叶飞的遗憾，也是历史的遗憾，因为在金门战斗基本平息之前，第十兵团的其他指挥员也没有亲临前线。

第十兵团轻率地将作战指挥任务交给了军政主官都不在位的第二十八军军部，第二十八军军部又轻率地将登岛作战指挥任务交给了八十二师，八十二师师长钟贤文开始只知道八十四师的二五一团将配合作战，当十八日作战命令下达的时候，他才知道还要指挥第二十九军八十五师和八十七师各一个团。钟贤文师长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因为之前军部关于攻打金门的作战计划，都是直接布置到团一级，所以他没有机会与各团指挥员取得必要的战前联络——“兄弟部队各团领导都没有找过我，我也没有到兄弟部队各团去过，我同这些团的领导同志毫无联系。”在这种情况下，登岛后由八十二师统一指挥的作战命令，“仿佛是一纸空文”。

对于渡海作战来讲，“有兵无船，等于无兵”。第二十八军副军长萧锋为找不到足够的船焦急万分：“我们报告兵团首长，我们以往哪次战前准备，都没有遇到这么多困难。”厦门刚刚解放，百姓对解放军不甚了解，“沿海渔民有的弃船逃跑，有的带船藏匿”。即将渡海的部队要么“找到船找不到人”，要么“找到人又找不到船”。而且，“靠新区群众开船打金门实在没把握。船开到海中间，他们可能跳下海就走，让我军自己同敌舰去撞，打大练岛打平潭都有这种教训”。但是，第十兵团对于第二十八军提出的问题“未置可否”，只是一再嘱咐萧锋“抓紧找船找船工”。没有海军和空军支援，渡海作战就不可能占据优势，况且攻取金门岛的部队只能依靠木船。官兵们到处找船，军侦察营副营长郑培唐好容易在泉州湾找到五条船，亲自带着船工往回开，经过金门岛附近的时候，船工们借口风大不肯前进，于是被迫中途休息一夜，等早上醒来时，船工全部逃走，五条船谁都不会掌控船，郑培唐只有丢下船步行回来。便衣连成绩不小，找到二十多条船和六十多名船工，全连小心伺候着船工，每天好酒好菜款待，虚心向他们请教驾船技术，但是，因为绝大多数官兵听不懂闽南话，双方交流起来十分困难。

由于缺乏必须的船只，原定二十日发起的攻击一再推迟。

时间一再推迟的结果是可能打下金门岛的时机最终丧失。

战机丧失的重要标志是国民党军增援部队已在金门岛登陆。

问题是，关于金门岛上到底有多少守军，这一个本该在战前搞清的问题，在攻击开始之际依旧是一笔糊涂账。

第二十八军指挥所从福州南下时，没带侦察电台，于是战役情报只能靠兵团负责收集，第二十八军则负责战术侦察。但是，军侦察科长兼侦察营长张宪章说，他们在陆地上搞侦察十拿九稳，面对大海他的侦察兵无用武之地。隔着大海的金门岛戒备森严，渡海上岛侦察没有任何可能，远远地用望远镜观察，只能看到岛上汽车来来往往，海岸到处是守军挖工事翻出来的土堆。八十二师通讯科长吕会英偶然侦听到守军电台的通话，敌人兴致很高地说，“来了几船活的”，又“来了几船死的”。经过分析，第二十八军前指认为，活的可能是指增援部队，死的可能是指武器弹药——“我们把这些情况都向上级报告了，但没有引起上级的重视。”

实际上，在打大嶝岛的时候，副军长萧锋就发现，俘虏中竟然有胡琏的第十二兵团第十八军十一师三十一团的官兵。当时他便疑窦丛生：胡琏的第十二兵团不是在潮汕地区吗？怎么到了这里？他亲自审问了两名被俘军官，军官说第十八军十一师是十月九日到达金门的，兵团的其他部队还在调动之中，但具体调往哪里不清楚——汕头之敌已经增援金门，说明金门之敌打算死守。萧锋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兵团，兵团指挥员对此表示怀疑：“不大可能吧，胡琏还在潮汕地区未动。”

叶飞开始关注胡琏的动向，最终得知第十二兵团确实已从潮汕地区撤出。叶飞赶紧问参谋人员，胡琏兵团是否已到金门？得到的回答是，胡琏兵团正在海上徘徊。就在这时候，机要部门送来一封截获的电报，电报显示胡琏向蒋介石请求将第十二兵团撤回台湾。叶飞的判断是：想撤回台湾的胡琏不愿意增援金门，正在海上磨蹭呢，最好趁他还没增援的时候，迅速攻占金门——历史在这一瞬间造成的不幸是：情报部门送来的那封电报是之前截获的。而更严重的是，情报部门没有截获蒋介石给胡琏的回电，回电的内容恰恰是严令胡琏坚决而迅速地增援金门。

叶飞给萧锋打电话的时间是二十二日上午十一时。由于船只准备严重不足，原定的攻击时间已经推迟两天，叶飞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老萧呀，广东潮汕地区胡琏兵团几个军，已乘船向东北方向撤退，有的船停在金门、厦门东南海域。他们究竟要往哪里撤，还搞不清楚，我们要抢在胡琏登陆之前攻击金门。"

第十兵团的攻击决心十分坚决，但是攻击部队搞到的船还是不够。被藏在渡海起渡地的船，只有一百二十条，连第一梯队全部乘载都不够。如果第一梯队上岛兵力不够，或是没有船只保证第二梯队跟进，那么整个渡海作战必会凶多吉少。在萧锋副军长的请求下，第十兵团决定再推迟一天，二十四日夜发起战斗。

二十四日上午，第二十八军前指召集攻打金门前的最后一次作战会议。

至此，登岛部队已经准备了三百只船和维持三天的粮弹。

而实际上，仅运载第二十八军的攻击兵力就需要六百只船，且三天结束战斗的预想没有任何依据。

各师团指挥员在发言中显然喜忧参半：部队求战情绪很高涨，已经做好竹制救生器材，二五三团还缺一个营的船，二五一团还有三分之一的船帆没有修好……而说得最多也是心里最没底的是：胡琏兵团到底上了金门岛没有？一个半小时的讨论之后，大家都同意“今晚发起攻击”。萧锋强调说，今晚发起攻击是必要的，战斗估计有三种可能：一是按设想打下去，二十六日解决战斗；二是敌人增兵，战斗遇到困难，不怎么好打；三是最坏的情况，那就是遇到艰苦的战斗，付出四五千人的伤亡，但是为了解放台湾，付出代价是值得的。“渡海作战我们没有经验，主客观条件很勉强，我们要凭着英勇战斗打好这一仗”。

会后，萧锋向第十兵团作了汇报，叶飞司令员表示，只要第一梯队能上去两个团，船来回两次，再上去第二梯队，就可以拿下金门县城。萧锋说大家最关心的是金门守军兵力问题。叶飞回答说，据内部电台侦察报告，岛上兵力还没有增加，胡琏兵团的三个军还坐船停在海上，到金门去台湾尚未决定，“我们一定要抢在胡琏兵团的前头拿下金门”！

叶飞随即批准了第二十八军于当天夜晚发起作战行动。

第二十八军没有呈报作战命令，叶飞也没有要求审核作战命令。

战后，作为兵团司令员，叶飞说：“这是当时我的疏忽，参谋机关也疏忽了此事。”

事后得知，叶飞司令员和第二十八军前指得到的敌情情报严重有误。此时，在大金门岛上，除了原有的国民党守军外，胡琏的第十二兵团第十八军十一师和一一八师已在十月十日登陆。至于情报所说的“胡琏正在海上徘徊”，那是国民党军第十九军的三个师，离开汕头开至金门海域，因为风浪太大无法登岛而在“徘徊”。二十三日夜，第十九军军部和十三师的两个团登陆；二十四日白天，第十九军十八师师

部和一个团登陆；二十四日黄昏，第十九军十四师师部和两个团登陆，海面上还剩下四个团也在不断地登陆中。于是，在第二十八军发起金门作战的那个晚上，大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守军已经增加到三个军，即沈向奎的第二十五军、高魁元的第十八军、刘云瀚的第十九军，实际兵力至少在六个师以上。更令人惊讶的是，二十四日下午，登陆的国民党军增援部队还在海岸上举行了反登陆作战演习，演习的地段正是第二十八军作战计划中第一梯队将要登陆的地点——无法判断这是国民党军的情报格外准确，还是纯属巧合。但第十兵团的作战情报落后于实际情况是无疑的，而这种迟误对于前线作战部队来讲意味着灭顶之灾。

二十四日十八时，攻击金门的第一梯队部队：二四四、二五一、二五三团和二四六团三营，共八千人登船待命。十九时半，心绪不宁的萧锋来到莲河起渡地，再一次检查了部队的登船情况，然后他向金门方向看了一眼："天色暗淡，用肉眼还隐约可见大金门岛的轮廓。"二十时，警卫员朱亮宏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有新情况！请副军长赶快回指挥所！"跑回指挥所的萧锋听到了他最不愿听到的消息：今天下午胡琏兵团在大金门登陆一个团，在小金门登陆一个团。但是，第十兵团表示：攻打金门的决心不变，今晚出击计划不变——"我们要和胡琏抢占金门岛"。

尽管兵团指挥部获得的情报，与胡琏增援的实际兵力相差很远，但终究是察觉到胡琏已经增援金门岛了。萧副军长命令第一梯队原地待命，他决定再与兵团指挥部商量一下是否发动攻击。

等待渡海作战的官兵显然对取胜信心不足，这种信心不足很大程度上来自敌情不明。得知胡琏已经在金门岛登陆的消息后，二四四团团长邢永生给八十二师师长钟贤文打来电话："再见吧！我们可能再见不着啦！你再见不到我，我也见不到你啦！我们回不来啦！"钟师长听

了心里万般难受——“邢团长一贯作战勇敢，接受战斗任务毫不含糊”，连他都准备牺牲了，可见部队对战斗缺乏信心的程度。八十二师党委当即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钟贤文师长、王若杰政委和龙飞虎副政委一致认为，大金门岛上援兵已到，出战对我不利，应该向上级建议暂缓攻击。但是，师党委的一致意见最终还是没被反映到军里。战后，钟贤文师长说：“从当时的情况看，即使我们打了电话，上级也不会同意。”

萧锋给兵团政治部主任刘培善打电话，这是避免金门作战严重后果的最后一次机会：

> 我说：“刘主任呀，您是第二十八军的创建者，是第二十八军的老首长，历来关心第二十八军。在关键时刻，你要帮我们说话呀！现在可是关键时刻啦，是关系第二十八军命运的重要关头。现在敌人到底增加了多少？十多天以前，我们打大嶝岛，就发现胡琏兵团的一个团啦！看来敌人增兵是师的单位了。”刘主任回答说：“大嶝岛歼灭的敌人，说是胡琏兵团的，恐怕不确切，敌人一贯会吹牛撒谎。据侦察，胡琏兵团在大小金门各登陆一个团，是今天下午才上岛的，什么工事也没有筑，情况没有大的变化。兵团已经研究过了，我们要抢在胡琏兵团之前占领金门，今晚攻击金门的决心不要改变，按预定方案打吧！”听到兵团首长决定不改变作战决心，我当时把心一横，就向刘主任提出：“这个仗肯定不好打啦，我要求随第一梯队过海指挥战斗，同胡琏兵团拼个死活……”刘主任回答：“老萧你不要过海，还是按预定方案由第八十二师师长他们过海统一指挥岛上战斗。只要我们第一梯队三个团能上去，船只来回两次，运过去五个或六个团，就能打下金门县城！老萧呀！你在莲河很好地组织第二梯队过海，明天我就到莲河来协助你指挥。”我对刘主任说：“刘主任你来，我欢迎。说实话，您要深思熟虑。情况不明，准备不足，打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听我话说得如此严重，刘主任问：“你的意见怎么办？”我明确地回答：“我建议停止发起攻击，待查清敌情，筹备足够的船只再打……”听我这么说，刘主任只说了声“按原定计划执行，决心不能变”，就放下了电话。

二十四日二十一时三十分，近三百只木船载着第一梯队八千名官兵冲进波涛汹涌的夜海。

这八千名官兵中的干部和老兵起到了主心骨的作用，他们绝大多数是山东人，许多人在来福建之前连大海都没见过。他们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勇敢坚定，尽管在战争接近胜利结束的时候，他们会对遥远的家乡和未来的日子有各种各样的憧憬，但是只要战斗命令下达，

他们便决心与敌人血战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八千人的率队干部是：团长邢永生、参谋长朱斐然、政治处主任孙树亮率领二四四团，副团长刘汉斌率领二四六团三营，起渡地点是莲河和大嶝岛的阳塘；团长刘天祥、政治委员田志春、副团长马绍堂、参谋长郝越三和政治处主任王学元率领二五一团，起渡地点为大嶝岛的东蔡和双沪；团长徐博、政治委员陈利华和参谋长王剑秋率领二五三团，起渡地点是后村。

按照计划，各部队在海上会合，然后联合登岛。

但是，船只刚一出海，战斗序列即被打乱，因为木船靠风行驶，受风向和水流的影响很大，同时又是夜间行驶，各船和各营、连之间都没有通讯工具联络，只有团一级指挥员才可用步话机通话，但团指挥员只在一条船上，而且事先有规定，夜渡不得使用步话机和一切有声响的联络工具，结果各船既不能彼此联系，也相互看不见，更谈不上统一调度，只能靠船工的经验各自向金门岛靠拢。

风向变了，北风变成了东北风。

渡海第一梯队乘坐的木船开始向西偏移，二四四团二营和三营的部分船只偏移得最远，插到了二五三团的方向，而二五三团一营的船不知为什么向东偏移，插到了二五一团的方向。

大金门岛在漆黑的夜色中出现了，海浪拍击岛岸的声音越来越响，船队遭到守军炮火的猛烈拦截。午夜时分，没被击沉的船只先后撞上金门岛的龙口、胡尾乡和古宁头滩头，战斗随即开始。二四四团由于严重偏离登岛地点，导致兵力分散，在遭到守军的反击后，团长邢永生紧急呼叫炮火支援。邢团长发出呼叫的时间是二十五日凌晨一时半。萧锋急令大嶝岛上的炮兵团开炮，三个炮群的榴弹炮和山炮全力轰击，掩护第一梯队抢滩登陆。而金门岛上的守军也开始了更加猛烈的炮轰，刚刚靠向滩头的船只纷纷中弹起火。凌晨二时，二四四团

报告，抢滩成功，要求炮火延伸射击；二五三团报告他们也即将开始抢滩。但是，以后的几个小时内，大金门岛上火光闪闪、炮声隆隆，却不见各部队报告进展情况。第二十八军指挥所里气氛紧张。

凌晨三时到六时，三个小时内，登陆部队在金门岛北岸，从东到西突破了大约十五里左右的滩头，占领了龙口、西山、观音亭山、胡尾乡高地和古宁头北山等要点。二五一、二五三团并不知道敌人兵力已经增加，依旧按照预定作战方案向纵深发展，直指金门县城。大金门一线守军二〇一师的防线被摧垮，二五一团抓了不少的俘虏，但混乱的暗夜里无人看管因此跑了不少。在金门岛的西面，二五三团团部和三营已经控制古宁头滩头阵地。

天亮了，登陆部队各团先后恢复了与前线指挥所的联系，包括萧锋在内，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虽然二四四团登陆时受了些损失，而且情况不大明了，可从整体上看，第一梯队的登陆是基本成功的。”萧锋命令二五一团抓紧时间收拢部队，二五三团继续向金门县城实施突击。

但是，放松下来的心情没有持续多久，接下来传来的都是不利的消息：二五一团三营在岛的西部安岐附近遇到守军的猛烈反击，由于登岛时遭遇炮击，弹药随着船只沉没，战斗进行得十分艰苦。加入战斗的二营伤亡严重，而一营登岛时官兵分散一时难以收拢，团里已经无力支援苦战的三营。在二五三团方向，先头部队二营在埔头以南与守军激战，团里正设法组织后续部队支援二营，因为只有保持住现有阵地，才有可能向金门县城继续攻击，但是组织后续部队的兵力已捉襟见肘。

更严重的问题发生得出乎预料。

八十二师指挥员并没有跟随第一梯队出发。

也就是说，登岛各部队现在没有统一的战场指挥。

出发前，由于各团的船只都不够，尤其是二四四团，团长邢永生急得火冒三丈。他先把跟随二四四团出发的军侦察营的人赶下了船，让他们跟随第二梯队登岛，弄得侦察营副营长郑培唐很不高兴，认为二四四团看不起侦察营。最后还是萧副军长做了工作，才让已经上船的侦察兵们下了船，把船让给先行登岛的二四四团。侦察营下船的时候，因为船都泊在浅海里，通信员只好在齐腰深的海水中，一条船一条船地通知，通知到最后，发现侦察营二连指导员崔芹芳带领的那条船不见了，那条船上除了崔指导员外，还有军侦察参谋王刚和三个步兵班、一个重机枪班和一个六〇炮班。找不到索性就不找了。事后得知，崔指导员带的那条船，为了争取时间，人员上船之后先行划到深海中去了，结果这条船上的官兵最终跟随二四四团登岛。两天后，指导员崔芹芳被俘，参谋王刚下落不明。即使把侦察营赶下去，二四四团的船还是不够。于是，邢团长请求八十二师的指挥员把他们乘坐的那两条船腾出来，而八十二师的指挥员们竟然答应了。邢团长的部队驶向了大海，把师长、政委和参谋们留在了海滩上——“当时，我们还没有把这个问题看得多重”，师长钟贤文说，“因为当时设想，第一梯队的船很快就会返回，不出四五个小时，不等天亮，我们师指挥所就能跟随第二梯队登上金门。”

但是，第一梯队的船一条也没回来。

船只没有回来运载第二梯队的原因，除了被金门岛守军炮火击中，船只或受损或沉没以及船工伤亡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第一梯队在涨潮时靠岸，为了避免在抢滩中出现更多的伤亡，每一条船都随着上涨的海水尽量前驱，但是部队登岛之后大海退潮了，所有的船都被搁浅在金门岛的滩涂上，不但在下次涨潮之前不能动弹，而且很快就在守军的炮击下燃烧起来。

战斗进行到此时，攻取金门岛的部队暴露出极度缺乏渡海作战的常识：首先，第一梯队的重要任务不应该是“向纵深发展”，而是要全力开辟登陆场和坚守登陆滩头阵地，为迅速到达的第二梯队创造有利的登岛条件，待后续部队登岛集结后才可向纵深推进。但是，从登岛部队的行动上看，急于向纵深发展而忽视了登陆场的巩固，这显然并不符合登陆作战的一般规律。其次，对于渡海登陆作战而言，关系胜败的重要因素，是第二梯队能否迅速地实施后续登陆。如果后续部队因某种原因行动迟缓，甚至是无法实施继续登陆，那么登陆作战就不会有取胜的希望，因为兵力有限的第一梯队必将受到以逸待劳的守军的猛烈反击。在得不到任何加强和背水作战的脆弱境况下，孤军作战的第一梯队显然是无法支撑到底的。问题是，导致船只无法返回的原因，不是不可避免的战斗损耗，而是自然规律所致——在发动渡海作战的准备中，第二十八军忽视了可以预见的、有固定规律的潮汐涨落，而这一忽视造成了作战中的一连串灾难。

船只无法返回，第二十八军前指所有的人都手足无措。

后悔没有跟随第一梯队出发的钟贤文师长急得倒在了师指挥所里。

萧锋和李曼村紧急研究补救措施，临时指定登岛的二五一团团长刘天祥统一指挥部队作战，同时命令第二梯队各部队赶快找船，并且请求兵团在厦门帮助搞船。

二十五日上午九时，天空晴朗，阳光耀眼。心急如焚的萧锋来到海边，用望远镜向大金门岛观察：大金门岛的西北部海岸还在发生战斗，守军的坦克正向滩头阵地冲击，飞机轮番俯冲扫射轰炸，海面上的国民党军舰艇也在开炮。看样子，第一梯队各部已经陷入守军的全面反击中。敌人正在恢复海岸防线，以防止第二梯队的登岛。十一时，二五三团团长徐博报告，他的部队在埔头以南遭到金门县城方向

守军的反攻。接着，二五一团团长刘天祥报告，他们团搁浅在滩涂上的所有船只都被炮火击中焚毁，上船准备等潮水上涨后向后转移的伤员全部牺牲。同时，从俘虏口中得知，胡琏兵团已经上岛，台湾的李延年兵团也在向金门增援之中。

仅从登岛各团团长的报告上分析，增援金门的国民党军部队比想象的多很多：二四四、二五一团当面守军是第十二兵团第十八军一一八师；沿着海岸线攻击而来的是第十八军十一师和第十九军十八师；二五三团当面守军是第十九军十四师。萧锋打电话问兵团指挥部，金门岛上到底上来了多少援军？回答是：确悉已经增加了一一八师——直到二十五日中午的时候，第十兵团指挥部对金门敌情依旧不甚清楚。萧锋请求兵团在厦门动员几条机动船，以便赶快把第二梯队和八十二师指挥所运上去。兵团答应立即找船，同时命令登岛部队坚持到天黑，天黑后开始向大金门岛增援。

下午，二五一团在守军步兵和坦克的联合冲击下伤亡巨大，副团长马绍堂负伤。二五三团已无力攻击前进，退守在几个村庄里等待第二梯队到达。二四四团联系中断，团长邢永生等人下落不明。大金门守军夺回观音亭山、胡尾乡高地和龙口等要点，把登岛的解放军官兵全部压缩在滩头附近。接着，二五一团刚报告说，敌人的坦克已经离我们只有几百米了，通话就中断了——此时，负伤的副团长马绍堂和政治处主任王学元指挥官兵拼死抵抗，王学元中弹阵亡，团长刘天祥带领所剩官兵向古宁头转移。黄昏，二五一、二五三、二四四团官兵都撤退到古宁头海边。二五一团恢复了与前线指挥所的联系，要求第二梯队夜间一定要登陆，他们准备在海边接应——刘天祥团长无法得知，第二梯队永远也来不了了。

终于又搞到几条船之后，就是否增援的问题，第二十八军前指内部发生分歧，有人说：“不能再添油似的增援！敌人兵力那么多，增援

上去一两个营能解决什么问题！”也有人建议说，如果有船能开过去，不如接登岛部队回来，接回多少算多少。晚十九时半，叶飞司令员来电：“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派兵增援，同胡琏打到底！”接着，兵团从厦门方向开来一条机动船和几条木船，大约能运载四个连的兵力。

夜色中，增援的官兵上船了。

奉命带领部队增援的二四六团团长孙云秀正在患病，咳嗽得厉害。但是，这是一个真汉子。孙团长把自己的钢笔和手表摘下来，递给军侦察营长张宪章，说：“我这次革命成功啦！我没有别的东西，只有一支笔和一块表，我老家在洛阳。我如果回不来，叫我老婆愿随部队就随部队，愿回家就回家。”

然后，他头也没回上了船。

同时，二五九团三营也出动了两个连，由代理营长梅鹤年率领。

四个连，对于增援来讲兵力实在是太少了。

代理营长梅鹤年带领的两个连，由于船只在中途被风吹散，在古宁头登陆的只有四个排。孙云秀团长带领的两个连，于二十六日凌晨二时在古宁头以东海岸登陆。

看到增援部队，退守古宁头海岸的官兵短暂的兴奋之后便是沉默：不但来人太少根本无济于事，而且他们终于知道大部队已无增援可能，现在只剩下用自己的牺牲最大限度地换取敌人更多的伤亡这一条路了。

二十六日，大金门岛上血光迸溅。

早晨的时候，登陆官兵只控制着金门岛北部古宁头附近的林厝、北山和南山三个村庄，范围不足两平方公里。他们依靠村庄里的石头房屋与国民党守军逐屋抵抗，几小时之后，南山和林厝村丢失，残存官兵退守北山和海边。

十一时，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官胡琏亲自到前线指挥。

与此同时，第十兵团政治部主任刘培善由厦门到达第二十八军前线指挥所。

萧锋在报告战况时流了泪，但此时第十兵团已拿不出任何办法。刘培善命令八十五师师长朱云谦过海指挥战斗，但因为没有船只命令随即被取消。更重要的原因是：金门岛上的战斗已基本平息。

午后，萧锋和李曼村联名致电大金门岛上的登陆官兵：

敬爱的邢永生同志、孙云秀同志、刘天祥同志、田志春同志、徐博同志、陈利华同志并转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和船工：敬爱的同志们，自十月二十四日晚二十一时，为了解放祖国东南沿海岛屿，你们乘坐木船战胜八九公里的惊涛骇浪，在金门岛西北岸十公里海滩实行坚决的突破。为歼灭蒋介石的残余溃兵，付出了宝贵的鲜血，不少同志牺牲了年轻的生命。我英勇善战的人民子弟兵，在后无船只援兵的情况下，血战两昼夜，给数量大大超过我军的敌人以惨重的杀伤，摧毁了敌人很多军事设施。由于领导错误判断了敌情，我十个战斗建制营遭到失败，写下了极壮烈的史篇。目前还活着的同志们，正抱着有我无敌的决心，继续战斗。为保存最后一分力量，希望前线指挥员机动灵活，从岛上的每个角落，利用敌人或群众的竹木筏及船只，成批或单个越海撤回大陆归建。我们在沿海各地将派出船只、兵力、火器接应和抢救你们。

没有任何史料表明岛上还活着的官兵收到了这封电报。

下午十五时，二五三团发来最后一次报告：敌人三面进攻，情况严重……话说到此，一声爆炸，自此，第二十八军、第十兵团与登上大金门岛的官兵失去了联系。

事后得知，二十六日晚，岛上尚未阵亡的团级干部曾开过一次会，决定分散打游击，并且利用一切工具渡海归建，“回一个算一个”。

直到二十八日，隔海依旧可以听到岛上传来零星的枪声。

第二十八军副军长萧锋长时间地看着大海那边的金门岛——“我心痛如刀绞，我的眼被泪水遮住。通信员小苏在我身边劝，副军长别看啦，进屋休息吧。这时敌机又飞到莲河上空，轰的一声，一颗炸弹落在指挥所附近。我想，这颗炸弹如果落在我身旁，让我追随那些牺牲在金门岛上的战友，我的心就永远不会痛苦了！”

今天，我们所能知道的大金门渡海登岛作战的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军各团指挥员的情况是:

二四四团团长邢永生，二十五日中午负伤，二十六日被俘，被押送台湾嘉义陆军医院，十一月因叛徒告密，团长身份暴露，遂被害。

二四四团参谋长朱斐然，登岛前渡海时即负重伤，二十五日上午被俘，被押送台湾后牺牲。

二四四团政治处主任孙树亮，二十六日被俘，被关押于台北内湖集中营。一九五〇年被遣返回大陆。

二五一团团长刘天祥，二十八日晨负重伤被俘，绝食而死。

二五一团政治委员田志春，二十七日晨被俘，被关押于台北内湖集中营，一九五〇年初被害。

二五一团副团长马绍堂，二十七日晨被俘，被关押于台北内湖集中营。一九五〇年被遣返回大陆。

二五一团参谋长郝越三，二十七日夜阵亡。

二五一团政治处主任王学元，二十五日下午阵亡。

二五三团团长徐博，在大金门岛的山中藏匿三个月之久，于一九五〇年一月被俘，关押于台北内湖集中营，一个月后被害。

二五三团政治委员陈利华，在转移中于二十七日失踪。

二五三团参谋长王剑秋，二十六日负伤被俘，关押于台北内湖集中营，后下落不明。

二四六团副团长兼参谋长刘汉斌，二十五日登岛抢滩时阵亡。

二四六团团长孙云秀——那个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时刻率队增援的汉子——二十八日转移至大金门岛的中部，被敌发现，拼死抵抗后拔枪自尽，时年二十九岁。

金门岛一战，我军官兵阵亡六千人，被俘约三千人。

战后，第二十八军副军长萧锋、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直至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和副司令员粟裕，都主动承担了作战失利的责任。特别是叶飞司令员表现出共产党人的磊落，他不但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而且要求承担主要责任并请求处分。

二十九日，毛泽东将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代参谋长袁仲贤和副参谋长周骏鸣于二十八日发给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和副参谋长陈铁君及福建省委的电报，转发至各野战军前委和各大军区：

据第三野战军粟裕、袁仲贤、周骏鸣三同志十月二十八日致第十兵团叶陈及福建省委电称，十月“二十七日八时电悉。你们以三个团登陆金门岛，与敌三个军激战两昼夜，后援不继，致全部壮烈牺牲，甚为痛惜。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大者。其主要原因，为轻敌与急躁所致。当你们前次部署攻击厦门之同时，拟以一个师攻占金门，即为轻敌与急躁

表现。当时，我们曾电你们，应先集中力量攻占厦门，而后再转移兵力攻占金门，不可分散力量。但未引起你们深刻注意，致有此失。除希将此次经验教训深加检讨外，仍希鼓励士气，继续努力，充分准备，周密部署，须有绝对把握时，再行发起攻击。并请福建省委，用大力为该军解决船只及其他战勤问题。至失散人员，仍望设法继续收容”等语，特为转达，请即转告各兵团及各军负责同志，引起严重注意。当此整个解放战争结束之期已不在远的时候，各级领导干部中主要是军以上领导干部中容易发生轻敌思想及急躁情绪，必须以金门岛事件引为深戒。对于尚在作战的兵团进行教育，务必力戒轻敌急躁，稳步地有计划地歼灭残敌，解放全国，是为至要。

金门岛一战，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解放战争中损失最大的一仗。

胡琏向蒋介石报告，金门岛守军伤亡九千人。

蒋介石说，台湾安全了。

交战双方近一万八千名官兵血拼金门岛，战后，蒋经国上岛视察——“俯瞰全岛，触目凄凉，车至汤总部途中，尸横遍野，血肉模糊。”

金门岛之战的结局一直影响着中国当代史。

而从战争的角度讲，金门岛是一个永远的惆怅之地。

## 给解放军长官磕个头

被国民党人视为“革命根据地”的广东，是中国南方的重要门户。

一九四九年初，蒋介石任命薛岳为广东省府主席，余汉谋为广东绥靖公署主任——内战爆发以来，在国民党军内部派系争斗中，薛岳和余汉谋都是因不得志而郁郁寡欢的人物。蒋介石的这一任命也是无奈之举，因为，多年来不断与他对立的粤系只对这两个人还算买账。

余汉谋自一九二〇年便在粤军供职，是粤军中老资格的将领。一九四八年五月，在何应钦和顾祝同的举荐下，他出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但上任仅仅半年，即在蒋介石下野前被任命为广东绥靖公署主任。虽然可谓衣锦还乡，但余汉谋并没打算为蒋介石死守广东：

> 我以前没有做过京官，很少接触党国要人，总以为他们对国家大事会有一套办法。去年我在南京搞了几个月的陆总（陆军总司令），与他们接触多些，才使我认识到这帮官僚饭桶，二三十年来，他们除了树立私人势力，争权夺利，对国家大事确实毫无办法，根本谈不上为国家人民做好事。照我看，只要共军渡过长江，势必马上解体，可以肯定是无法再支持下去了。我这次回来为桑梓服务，希望团结广东军政人员，进而与广西合作，支持李宗仁收拾残局。如不可能，只好认输，决不陈兵边境做最后挣扎，使广东同胞重受战祸，加重我的罪责。

余汉谋所能指挥的部队，为十一个军三十三个师，加上地方保安部队，总兵力约为十五万。余汉谋知道这点兵力根本无法抵挡解放军的进攻，因此他和薛岳都非常欢迎白崇禧的桂军进入广东——从国民党军的历史上看，两广联合与蒋介石闹别扭已成惯例。十四年前，中央红军撤离苏区开始长征，最先进入的就是广东，广东军阀陈济棠在白崇禧的点拨下，居然命令粤军留出通道让红军大队人马通过，蒋介石怒言此举乃“贻我国民革命千秋万世莫大之污点”。此刻，白崇禧也希望自己能够早日控制广东，因为富庶的珠江三角洲能够解决桂系的兵饷问题，同时还可拥有便利的出海口以得到美国的补给支援。

蒋介石在广东问题上心绪复杂。他一向自称是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如果轻易放弃孙中山的革命大本营，政治上极为不利。但是，他又担心历史上两广军队联合谋反的事件重演，所以不得不以防范桂系威胁为第一要义。所以，蒋介石将防御重点放在了台湾和西南地区，对广东防御始终持迟疑不决的态度。由于国民党政府位居广州，代总统李宗仁对此愤愤不平：“何应钦、白崇禧曾一再电请蒋先生将精锐部队由海道调至汕头，北上布防，以阻共军入粤，而蒋氏不听。待共军攻大庾时，胡琏兵团竟由汕头乘船退至厦门，最后渡海撤至金门、马

祖等岛屿，使粤东完全空虚。行政院长阎锡山为巩固广州防务计，屡请蒋先生把刘安祺兵团从海南岛调至广东增防，蒋先生虽口头答应，刘兵团却迟迟不来，终至粤局无可收拾。”

桂系认为，无法突破蒋介石的阻挠，根本原因是没有实权。于是，白崇禧声称如果要保卫广州，桂系必须进入广东，前提是由他出任国防部长。但是，阎锡山不肯，说他兼任国防部长是蒋介石决定的。粤系将领又想出个把广州改为省辖市的主意，因为当时广州税收几乎占全省的一半以上，粤系以为这样就可以把广东的财权从蒋介石那里拿过来。蒋介石亲自飞到广州，对余汉谋、薛岳等人大发雷霆：“你们以为你们可以反对我咯？谁反对我，我就叫谁死在我面前！”——这个细节如果不是出自李宗仁的回忆，很难令人相信蒋介石会用此种口吻说话。粤军元老张发奎建议把蒋介石扣押起来，这位曾经率领叶挺独立团参加北伐的将领认为，蒋家的天下是广东人打下来的，蒋介石竟然在最后时刻置广东于不顾，那么要保卫两广就必须先除掉这个掣肘。李宗仁认为这样做“徒招恶名，无补实际”。张发奎则认为李宗仁的胆子太小。李宗仁的解释是：“我们所需要的，第一是兵，第二是钱。蒋先生把兵调走，把钱存在台湾。我们纵然把蒋扣起来，第一不能把兵调回，第二不能把钱取出，扣蒋又有何用？固然，蒋的一连串拖垮两广局面的毒计是罪无可逭，把蒋扣起来宣其罪状于天下，可以泄一时之愤，但处理国家大事，应以国计民生为出发点，不可徒为泄一时之愤。现在失败的局面已定，我们既有‘宁人负我，毋我负人’的雅量，就应任其全始全终，不必于败亡前夕做无补于大局之事，为天下笑！”

李宗仁的“雅量”，最终令桂系走向覆灭之路。

八月二十三日，李宗仁召集两广军政首脑余汉谋、薛岳、白崇禧商讨，决定改广州绥靖公署为华南军政长官公署，由余汉谋统一指挥

广东境内的军事力量，配合桂系军队“巩固粤北、确保广州”。

蒋介石随即让参谋总长顾祝同表明了他的守粤原则：“应集中现有驻粤兵力，保卫广州革命根据地，为目前剿共军事革命战略之最高指导原则。如有余力，则可扩大范围，以期保卫华南，万不可再蹈保卫长江全线，而放弃京沪重地，以至江防部队几遭全部被歼之覆辙。故对现驻粤中之第五十、第三十九、第六十三、第一〇九军之建制，切莫再分割使用，以免陷于被动，为匪各个击破，今后一切部署，均应准此原则实施，切莫举棋不定，俾确保革命基地。”

“集中现有驻粤兵力”，意味着桂系军队还是不得进入广东。

余汉谋将广东守军部署在北起韶关南至广州一线，以阻止解放军南下。同时，他在湛江和海南岛也部署了部队，以确保广州守军的退路。

这个准备好退路的防御计划，足以证明余汉谋并不准备“确保革命基地”。

第四野战军命令进军广东的部队是：第四兵团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军，第十五兵团第四十三、第四十四军以及两广纵队，总兵力达到二十二万，由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统一指挥。

为了加强两广地区的军政领导，中共中央批准成立新的华南分局，以叶剑英为第一书记，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受华中局领导，负责解放广东和经营两广。

九月二十八日，陈赓、郭天民（第四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刘志坚（第四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签发广东战役作战部署。

秦基伟的第十五军四十五师自江西西部一路南下，歼灭国民党军第六十三军一八六师一部，占领从江西进入广东北部的重镇南雄。在南雄以南，国民党始兴县长兼自卫队长饶纪绵率部起义，起义部队调转枪口袭击了国民党军第三十九军一四七师一部，为南下广东的第四兵团侧击韶关打开了通路。

此时，衡宝战役已经开始，由于白崇禧试图反击，驻守湘南的第四十八、第九十七军和驻守粤北的第四十六军奉命北调，所谓的“鄂湘粤联合防线”瞬间便不存在了——这就是蒋介石不许桂军进入广东的后果，因为此时白崇禧没有理由顾及广东是否安全。他致电余汉谋，认为广东所能做的是：“竭力掩护广州政府人员之撤离”，“以雷州半岛为后方，竭力于珠江三角洲地区，争取半年以上之迟滞时间，以待有利之时机到来”。明知陈赓的二十多万兵力正在南下广东，白崇禧为了他的衡宝防线，竟将紧邻粤北的三个军火速北调。那么，一旦广东失守，白崇禧打算让国民政府“撤离”到哪里去？让得不到任何增援的余汉谋如何等待“有利时机”？

果然，余汉谋的部队大多未战先逃。

十月六日，第四兵团第十四军占领广东北部的要道乐昌，左翼第十三军占领仁化。第二天，位于第十三军左翼的第十五军占领韶关。驻守粤北一带的国民党军第六十三军逃得无影无踪。由于韶关地理位置重要，第十三军奉命留下守备，第十四军向西直插乳源，官兵们冲进乳源县城的时候，不见一个国民党守军的身影。第十四军没有停留，沿着纵贯广东中部的北江继续南下，十三日到达距广州咫尺之遥的清远。第十五军四十五师占领南雄后，沿粤汉铁路南下，十日到达韶关至广州间的英德县城，抢占了穿城而过的滃江上的铁桥。

虽然一路没有遇到严重的作战，但第四兵团的官兵宁可遇到战斗，也不愿意承受翻越五岭山脉的苦楚。绵延数百里的大山中白茫茫

一片，无法分辨是雾气还是细雨。峭岩陡壁上的羊肠小路，人行其间不见天日，山谷里闷热异常，森林里阴气逼人。翻越大庾岭的岭子坳时，官兵们不得不用炸药开路，因为根本无路可行。五岭山的顶峰之一是胸膛山，炮兵们扛着沉重的车轮和炮身，几乎要贴在山道上爬行，当他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当地的百姓惊讶不已，说祖祖辈辈都没见胸膛山上能过人马。

邓华的第十五兵团位于第四兵团的左路。第四十三军一二七师追到翁源的时候，侦察员带着两名俘虏向师长王东保报告，再往南，前面的佛冈和花县有敌人防守，守军是第三十九军一〇三师三〇七团，全副的美械装备。国民党军第三十九军于一九四八年在烟台组建，曾在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中擦了个边，并没有与解放军打过大战，三〇七团团长王家桢年轻气盛，说他指挥的这两千多人是“钢铁团”。第四十三军一二七师经过七十公里的奔袭，于十一日下午接敌。当时，王家桢正在隐蔽部里与军官们推牌九，他认为共军三五天之内打不到这里，但是一二七师的第一发炮弹就把隐蔽部的顶盖掀翻了。黄昏，三〇七团团长以下官兵五百余人被毙伤，副团长以下官兵两千余人被俘。

至此，广州外围已无险可守。

就在陈赓已经接近广州的时候，由于衡宝战役进入白热化阶段，林彪连续致电中央军委，建议陈赓兵团放弃攻击广州的计划，从现地转向西直插广西的桂林和柳州，将白崇禧桂系部队的退路最终封堵。

林彪的建议出自对衡宝战役紧张局势的担忧。

桂系的四个师被包围在湘南祁阳山区，而白崇禧已命令各路主力迅速北援，林彪担心白崇禧部队战斗力强，衡宝战役没有绝对取胜的把握，因此希望陈赓兵团加入对白崇禧的作战：“建议陈赓兵团即由现

地［英德、韶关线］沿公路直向桂林、柳州之线前进，借以加大消灭桂敌计算。目前似应以集中兵力歼灭白兵力为主。否则，今后兵力分散各省，而敌兵力反形成集中（指粤军退入广西，与桂军合为一股），则使战局甚为拖延。”林彪分析了白崇禧部队“流窜不定”的作战特点，认为即使“我层层反复堵击，敌仍能突围一部”，对付这样战斗力强又“行动甚快”的敌人，必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实施多方面和多层次的迂回、包围、堵击、攻击才能取胜。至于广州，林彪认为：从韶关至广州沿线敌人都在撤退，广州必将被余汉谋主动放弃——

如目前我们拿下广东，由于粤汉路沿线桥梁遭受严重破坏，山地桥梁工程浩大，绝非短期内可以恢复交通，则将使广州煤、粮发生严重困难，财政上开始时期也要亏本，在军事上也要分散我军力量，而促成敌力量之集中，仅仅只有在政治上能有较大的收获。但实际的得失相当，并不合算。

中央军委回电同意林彪的意见，命令陈赓兵团“即由韶关、英德之线直插桂林、柳州，断敌后路，协同主力聚歼白匪”。中央军委认为“此计划如能实现，可以大大缩短作战的时间”。

但是，陈赓认为，他们已得到来自香港方面的情报，余汉谋并没有去广西的打算，而是准备抵挡一阵之后逃往海南岛。如果第四兵团不去占领广州而让余汉谋跑掉，不但甚为可惜，对今后的作战也是不利的。再说，第四兵团的前锋已经到达广州以北的清远地区，这时候转向广西的桂林和柳州，直线距离有一千三百多里，从路程所需的时间上计算无法赶在桂军的前头封堵其退路。如果战局需要立即直下广西，从目前战场上各部队的分布情况看，位于湖南西南部的程子华的第十三兵团也许来得更快些。第四兵团如果必须转向桂林和柳州，“则一方面路远赶不上；另一方面，广州不能获得迅速解放，有两头失塌的顾虑”。

陈赓致电中央军委报告了自己的意见，但在电报的最后他表示：“也许这是偏重局部的看法，你们从全局打算认为必要，命令一到，我

们坚决执行。”

陈赓签发电报的时间是十月十一日十三时。

十一日晚二十一时，衡宝战役接近尾声，被包围在祁阳以北的桂系四个主力师基本被歼，林彪所担忧的问题已不存在。但是，林彪依旧建议“暂时不夺取广州”，“以免促成粤桂之敌集中”。只是，他的想法也稍微发生了变化：“如敌守广州或我军有可能在广州或广州以外求得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时，则陈（陈赓）邓（邓华）两兵团仍继续向广州前进，达到歼敌目的。”

十一日午夜，中央军委复电，同意林彪的建议。

然而，当毛泽东得知白崇禧最终没有北援，衡宝战役已经胜券在握时，于十二日凌晨三时给林彪发出一封电报，要求他慎重考虑在衡宝战局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坚持让陈赓兵团不打广州而西进广西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只是，在电报的最后，毛泽东表示，陈赓兵团最终如何行动，须待林彪考虑成熟时再作决定。

林彪同志：

因为据你们十日七时电，白崇禧全力增援祁阳以北之敌，该敌已完全陷入被动状态，有在湘桂边界聚歼白匪主力之可能，故我们同意你们以陈赓兵团由现地直出桂林抄敌后路之意见。但据你们十一日十时电，敌原拟增援之兵力现已停止在东安、冷水滩、零陵之线，并未北进。似此，无论祁阳以北地区之敌被歼与否，白崇禧均有可能令其主力退至广西中部、西部和西北部，背靠云贵，面向广东东北部及东部，采取游击战术，不打硬仗，与我相持，我军虽欲速决而不可得。此时，因陈赓已进入广西，广东问题没有解决，广西问题亦不能速决。如我军向广西中部、西部及西北部迫近，则白匪退入云贵。如四野跟入云贵，则不能分兵解决广东问题。如四野不入云贵，则解决白匪的责任全部落在二野身上。因此请你考虑这样一点，即在桂林、柳州以北、祁阳、宝庆以南地区采取围歼白匪的计划是否确有把握，如有把握，则你们的计划是很好的；否则我军将陷于被动。为了使问题考虑成熟起见，目前数日内陈赓兵团以就地停止待命为宜。

毛泽东

十月十二日三时

林彪放弃了自己的想法，致电陈赓“要该兵团继续向广州前进”。

他在给毛泽东的复电中表示：“大约还有六至八天可占广州。”

十三日凌晨二时三十分，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顾祝同宣布：国民党中央政府移至重庆，中枢各部院和各地区党政长官移至海南岛，华南军政长官公署移至湛江，广东省府移至广西南部沿海的合浦。

随后，广东境内的国民党军全面向西江地区撤退。

十四日，广州海珠大桥被炸毁。

当天下午，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第四十三军一二八师三八二团和第四十四军一三二师三九六团先后进入广州市区。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四日二十一时，广州解放。

国民党方面迅速放弃广州出乎陈赓的预料。

陈赓判断，广州守军因为没有那么多船，不会从珠江口逃跑，陆路逃跑只有两条路：一是沿着海岸逃向雷州半岛，控制半岛后，策应白崇禧残余部队逃至海南岛；二是直接逃向广西境内。陈赓命令第四兵团各军一律不进广州，继续向西南方向追歼逃敌。陈赓怕不让部队进城官兵会有意见，先给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打电话，秦基伟回答得很痛快：“我们坚决执行！”他再给第十三军军长周希汉和第十四军军长李成芳打电话，两位军长的回答都是四个字：“坚决照办！”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郭天民很是感慨：“我们这个部队太好了！”

十六日，第十四军追上了国民党军第三十九军一〇三师，这个师的三〇七团已被歼灭，剩下的部队逃至广州以西的四会、高要地区，

因为深感绝望四千余人投诚。军长李成芳从一〇三师师长曾三元口中得知，余汉谋已经逃到湛江，其部队正向广东西南方向的阳江逃跑，企图经过阳江地区逃至雷州半岛。陈赓命令第十四军军长李成芳统一指挥第十四、第十三、第十五军的六个师快速追击。官兵们当日就追上了国民党军第三十九军一四七师四四一团和第七十军的警卫营，并将其全歼。与此同时，位于鹤山附近的国民党军第三十九军九十一师被迫接受和平改编。李成芳军长问九十一师师长刘体仁，为什么之前不肯向截住他们的粤中纵队缴枪？刘体仁说："他们是土共！"李成芳军长一下子火了："胡说！共产党只有一个，哪有土共洋共之分！"

十七日，陈赓重新编组部队，以第十四军四十二师一二五团和四十师的一二〇团、一一九团为右路，由四十师师长刘丰、政治委员张子明指挥；以四十一师和四十师一一八团为中路，以四十一师师长查玉升指挥；以第十五军四十三、四十四师为左路，由四十三师师长张显扬和四十四师师长向守志指挥，三路平行向广东阳江方向追击。一天之后，右路部队歼灭国民党军广东暂编第三总队，中路部队俘虏国民党军第六十三军的一千多名逃敌。陈赓通过截获的国民党军电台通话得知，被海运广东的刘安祺的第二十一兵团部正拥挤在阳江以北的恩平附近，他立即命令各路部队进行合围。

二十四日，刘安祺发现被围后，一面请求余汉谋派军舰从海上接应，一面组织部队向西面的雷州半岛突围。突围的部队刚一动身，迎头撞上了急速赶来的第十四军四十二师一二五团。团尖兵连指导员王之江当机立断，率领一个排抢占要点后对逃敌开了火。逃敌认为阻击他们的是"土共"，叫喊着拼命向前冲，但很快就发现当面的阻击火力异常猛烈，不但冲锋被击退，一个师参谋长还被捉走了。逃敌重新组织部队，先后投入一个整团加一个营的兵力，并集中所有的火炮向一二五团二营和三营的接合部猛烈轰击。一二五团政治处主任武建率领增援部队到达，与突围的敌人展开殊死搏斗。战斗中，一二五团副政

治委员李珍之，一营长张太子、教导员刘一峰，三连长王福有和一排长张小生等先后阵亡。一连司号员郭虎生在连队干部大部伤亡后，主动站出来指挥作战，团长周力率领警卫连的一个排和一个侦察班冒着弹雨增援一营。逃敌在转换攻击目标之后，二营阵地出现危机，六连副指导员卢建吉、四连副连长高绪兰相继阵亡。三营长石占标命令一个排拼死增援二营，指导员程钱垒冲在最前面，身负重伤。

二十五日凌晨，第四兵团向被围之敌发动夹击，国民党军集中兵力向白沙圩方向突围，连续冲锋八次都被阻击回来。下午，逃敌转向大海方向，企图乘船逃跑。第四兵团各部队全力向海岸压缩，并用炮火封锁海面，一部分逃敌已经上船，遭到炮火的猛烈轰击，除小部分乘军舰逃走外，被击毙和溺水死亡者达万人以上。没有乘船逃脱的敌人，被压缩在南北十公里、东西五公里的狭小区域内，至二十六日中午被全歼。

阳江围歼战共歼敌四万，其中俘敌三万。

国民党军广东守军丢盔卸甲的重要原因，是他们的最高军事指挥官余汉谋根本无心作战。陈赓兵团刚入广东，余汉谋就带领部队一路狂逃，既不抵抗也不起义。最后，他自觉面临绝境，便自掏腰包给长官公署每人发了三个月的饷，让他们各自寻找出路，然后自己带着几名随从从虎门乘海轮逃至海南岛。

广东战役，陈赓兵团以顽强的作战意志，进行了超出常人忍受极限的长时间、长距离的昼夜追击，付出伤亡一千七百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余汉谋集团共六万余人。

第四野战军下一个作战目标是白崇禧的老巢广西。

尽管共产党人一再向白崇禧发出和平信息，但白崇禧的最后表态是："失败就失败，算了，投降起义我不来。"白崇禧之所以坚不妥协，除了政治立场之外，手中拥有兵权和地盘是重要原因。桂系在国民党军中相对独立，蒋介石从来很难指挥。当年桂系第七军尾随中央红军，总是以两天的路程距离徐徐跟进，蒋介石急令第七军昼夜追击，第七军的答复"容请示白副总司令允许"，蒋介石恼怒地感叹道："这是外国的军队了！"无论时局如何变化，李宗仁和白崇禧都把桂系牢牢握在手中，这也是他们在与蒋介石的多年争斗中始终不倒的保障。同时，自内战爆发以来，桂系军队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少有大规模正面作战，直至战争即将结束时部队基本保持完整。桂系在广西盘踞二十多年，根深蒂固，坚如磐石，所以非到万不得已，白崇禧不会放弃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广西，他抱有的唯一侥幸是：林彪要在与桂系的作战中取胜，不仅需要付出代价，还需要付出时间，而在时间的拖延中，时局或许会发生变化。

白崇禧撤退到桂林之后立即备战。在政治上煽动全省"空室清野"，"反共保乡"，同时极力扩充军事力量，除重新整编现有部队之外，推行"一甲一兵一枪"制度，大量组建地方民团武装。经过整编和扩充，白崇禧在广西的防御部队拥有五个兵团十二个军三十二个师。只是，包括白崇禧在内，所有的桂系将领都明白，一旦解放军大举进入广西，最终逃亡的结局不可避免。

桂系将领预想的逃亡路线有云贵、雷州半岛和海南岛，或者干脆越境逃到越南去。进入越南，确实是白崇禧的设想之一，他甚至向第四十八军军长张文鸿交代，让他派一个师先期前往边境处的龙州，努力收罗精通越语和熟悉越南地形的人，了解将来入越的路线和补给问题。按照张文鸿军长的说法，精明过人的白崇禧已经没有了昔日的风采，"处事慌乱是二十多年从没有过的"。他虽然在大力备战，但始终没有制定出一个完整的防御作战计划。

十月二十七日，李宗仁突然电召白崇禧去重庆，原来蒋介石又向桂系发难了——蒋介石通过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向李宗仁转达了一个建议：李宗仁应该知难而退，公开呼吁让蒋介石复位。李宗仁听后不禁勃然大怒："礼卿兄（吴忠信，字礼卿），当初蒋先生引退要我出来，我誓死不愿，你一再劝我勉为其难；后来蒋先生处处幕后掣肘，把局面弄垮了，你们又要我来'劝进'。蒋先生如要复辟，就自行复辟好了，我没有这个脸来'劝进'！"李宗仁本想让白崇禧来商量对策，但白崇禧却想到这是一个只有他出面才能调停的机会，也许可以用李宗仁的下台换取他取代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于是，白崇禧草拟了一个妥协的方案交给吴忠信：第一，蒋介石复职；第二，李宗仁出国；第三，白崇禧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几天之后，蒋介石答复：第一，同意复职；第二，李宗仁不能出国；第三，白崇禧出任行政院长，但不能作为蒋李合作的条件。蒋介石之所以不允许李宗仁出国，是怕他在国外利用自己的影响进行反蒋活动；至于把拥有军权的国防部长一职交给桂系，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有人从旁警告李宗仁，如果再不主动辞职，就可能有生命危险。

李宗仁以出巡为名迅速离开了重庆。

第四野战军兵临广西，什么也没有得到的白崇禧回到桂林，立即召集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李品仙、夏威，参谋长徐祖贻、副参谋长赖广大以及第一兵团司令官黄杰、第三兵团司令官张淦、第十兵团司令官徐启明、第十一兵团司令官鲁道源、第十七兵团司令官刘嘉树开会。除了李品仙和黄杰主张按照国民党军国防部的意见向西转移，进入云贵与宋希濂、胡宗南会合之外，其余的将领都赞成白崇禧提出的向广西南部转移的意见，以便不得已时经钦州撤退到海南岛——面对兵力数倍于己的第四野战军即将发起的进攻，白崇禧和他的军事将领们所能计划的只是短暂的抵抗之后往哪里跑。

“第四野战军的司令员穿得就和他的任何一个战士一样”。苏联作家西蒙诺夫从北京来到湖南衡阳见到林彪，“一件草绿色的布制棉军服，柔软的草绿色军帽。这个个子不高，非常安详，非常严肃，轻易不微笑的人，清瘦的脸上有一双又大又非常专注的黑眼睛，动作既敏捷又镇静。”窗外细雨蒙蒙，室内“从地板到天花板”挂满、铺满了各个作战地区的地图。林彪告诉西蒙诺夫：“第四野战军现在正由左右两翼，猛插到国民党军主要兵团的后方去，力求将现在的半包围圈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全部的包围，并且将包围圈在西南、在云南与越南的边界上合拢。”西蒙诺夫表示，有消息说，国民党正在与法国人沟通，以使国民党军队能够进入越南，国民党甚至向法国方面暗示，这些军队可以用来对付越南境内的共产党。“林彪第一次微笑了一下”，他的回答是：“我们将做一切努力，以求比国民党军先赶到越南边境，虽然现在我们离越南要比他们远得多，要远几乎一倍的路程……我们在广西境内加以围歼的敌人，有近十八万正规军和十二万地方部队。指挥他们的是白崇禧。”西蒙诺夫还在北京时，就听共产党人谈起过白崇禧，他们告诉他这个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不肯投降的原因，是他在广西“保存着自己的主要资产，而对于这位将军极为不利的是他拥有的这些资产，与其他国民党军将领的资产不同，主要的是不动产，这也就促使他要特别疯狂地保卫广西”。林彪没有回答关于白崇禧的资产问题，却对白崇禧的军事才华赞誉有加：“我认为白崇禧是国民党军将领中最有才干的一个，而这句话可以说并非过奖。他不用说有多年的军事经验，他的指挥也比其他国民党军将领高明，可是因为他的军队现在是非常明显而且公开地在与人民为敌，而作为一个政党的国民党也已经四分五裂，且军事上的各方面形势也对他完全不利。因此，白崇禧的那一点或多或少的军事才干，实质上在这里也就起不了什么作用了。”

林彪的作战计划是兵分三路，首先切断白崇禧所有的逃跑路线，然后大军实施合围，将其聚歼于广西境内：一，西路第三十八、第三十九军，首先歼灭位于湘南与桂北交界处的第一〇〇、第一〇三军，

然后南下向广西西部的河池、百色方向前进，切断白崇禧逃往云贵的道路；二，南路军陈赓的第四兵团从广东西进广西南部沿海，防止白崇禧退入海南岛；三，中路军第四十、第四十一、第四十五军，待西、南两翼完成大合围之后，从中路实施猛烈的突击。而第四十九军在中路军的后面，负责接受和管理沿路被解放的所有城镇。

广西作战，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白崇禧的桂系军事集团的最后一战，但此战已无任何悬念。

十一月六日，西路第三十八、第三十九军开始奔袭湘南与粤北交界处的通道和靖县，广西战役打响。

随着第四野战军三路大军挺进广西，白崇禧开始实施他的“南路攻势”计划，即南下钦州、转运海南：第十兵团转向柳州以南，阻击正奔袭南下的第三十九军；第一兵团掩护桂林、柳州的物资向南宁转运；第十七兵团从湘南向东兰、百色地区转移。但是，计划刚一开始实施，立刻演变为各路部队的纷纷南逃。

二十二日，第四十一军占领桂林；二十四日，第三十八军占领思恩；二十五日，第三十九军占领柳州，第四十军占领梧州——第四野战军已突入广西腹地，截断了白崇禧集团西撤云南和贵州的退路，从西、北、东三面对其形成了包围之势。而南路的陈赓兵团，从广东阳江等地向广西秘密开进，二十三日控制了粤桂边界一百七十公里的地带，封闭了白崇禧集团经雷州半岛逃往海南岛的通路。

西蒙诺夫跟随着第四十一军在广西的大山中奔袭，没有车辆的解放军士兵高昂的斗志令他万分惊讶：

需要首先忘掉人世间有四轮车、两轮车以及一般的车辆的存在，车辆是没有的。在路上走的只有人，有的步行，有的骑马，还有就是驮东西的骡马。骑马的很少，有时从队伍旁边疾驰过传达命令的通信员。团长和营长们都是和战士们一道步行的，连长们就更不用说了。

驮东西的骡马也不怎么多：它们驮着山炮、大口径的迫击炮、工兵器材的最庞大部分、一些通讯器材——主要是笨重的电话线卷、炮弹箱，有时候还有烧饭用的大锅。所有其余的东西战士们都随身带着：机枪——中型的和轻型的、迫击炮、工兵器材的主要部分、背包、电话器材、烧菜用的锅、弹药箱、小炮弹。小炮弹四个四个地缚在一根棍子的两头，棍子则像步枪似的扛在肩膀上。给养是用中国农民常用的办法挑的——用一根竹扁担，两头缚上要挑的东西，放在肩上挑着走，而笨重的东西——杀好了的猪或是饭锅——则是两个人抬的，把要挑的东西缚在扁担中间，两个人一前一后地抬着走。那些无须扛机枪、迫击炮或任何特殊物资的步兵，也是背着够重的东西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支步枪或自动枪、装满在一条布的子弹袋里大量的弹药、有棉被打在里面的背包、饭包、水壶、装满了米的带子、还有棉衣——在这样热的天气里，棉衣常常或是塞在背包后面，或是就挂在步枪的枪筒上面。

沿途很少看到老百姓和国民党军——百姓们都被白崇禧赶跑了，而国民党军队则望风而逃——在被丢弃的工事和路边的残垣断壁上，两种政治立场截然相反的标语口号排列在一起："国民党将作战到底"的口号旁边，是一幅讽刺画，蒋介石被画成一只狐狸，李宗仁则是一只兔子；在"蒋介石是中国的救星"的标语边，写的是"活捉丧家狗白崇禧"；在"结束战争，解放两广"标语的下面，是"共产党要杀掉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要强迫兄弟与姊妹结婚，强迫寡妇嫁给先夫的兄弟"。西蒙诺夫说："国民党的标语是如此可笑，如果不是我亲眼目睹的话，我真难以相信天下能有白痴到如此程度。"

第四十一军进入桂林后，官兵们看见了白崇禧撤退前印刷出来的最后一期《广西中央日报》。报纸的大标题为：白崇禧司令继续坐镇桂林与共党和谈谣言不值识者一笑。报道写道："本报记者曾走访华中最高统帅部，据统帅部发言人姚修琼将军见告如下：前线情况现时极其稳定。谈判谣言不值识者一笑，且与世界著名战略家白崇禧之坚决抵抗共产主义之伟大理想相抵触。"另一篇报道说："李宗仁先生正患十二指肠溢血。护理李宗仁先生的医生已经给他做了预防注射。"其他的新闻还有："贵州某军长因贪污及作战无方以致贵阳失陷被枪决"、"为国军赶制军服的被服厂一群人在一条基督教箴言之下积极工作着：'为了给自己赚一块面包，你应该汗流浃背'"。

随着桂林、柳州失守，残余桂系被压缩在广西南部沿海一带。

十一月二十日，李宗仁从南宁飞往香港。

阴润的南宁那一天阳光炫目，白崇禧送李宗仁到机场，两个人相对无言。李宗仁登机前望着白崇禧还是无话，白崇禧问："德公，还有何吩咐？"李宗仁紧紧抱住白崇禧的双肩流出泪来，他最后告诉与他共同走过近三十年纷乱岁月的白崇禧："健生，世界上哪都可以去，就是不能去台湾。"白崇禧答应了。

两天后，白崇禧要求各部队不惜一切向南攻击，把从广东西进至广西南部的陈赓兵团压进海里，迅速打开撤往海南岛的通路。二十六日，白崇禧部主力张淦兵团第七、第四十八军与陈赓兵团先头部队交火，在飞机的火力支援下，桂军向陈赓兵团的第十四、第十五军发动猛攻，但攻击数次损失数百人却不得前进一步。同时，邓华兵团的第四十三军在右翼开始攻击桂系第五十八军，第五十八军主力放弃阵地逃跑，致使张淦兵团的侧翼完全暴露。陈赓抓住战机，立即命令对桂系第七军实施合围，李本一的第七军无心作战向西逃跑。

到了这时候，白崇禧才明白，这一次桂系必失广西。

白崇禧命黄杰的第一兵团掩护长官公署撤往钦州，命令张淦的第三兵团、鲁道源的第十一兵团和徐启明的第十兵团向钦州、北海撤退。

林彪立即命令各部队猛烈追击。

第四十三军一二九师连克容县、北流，歼灭鲁道源的第十一兵团部和第五十八军一部共五千余人，毙伤兵团副司令官胡若愚；一二七师三七九团和一二八师三八二团向南猛进，逼近张淦兵团指挥部所在地——博白县城。

三八二团自进入广西以来总在跑路，部队一直没有打过像样的仗，官兵们一路走一路念叨：“七八天一口气走了六七个县，人家兄弟部队连副司令官都解决了。”因此，当他们从逃难的百姓口中得知，第三兵团司令官张淦还在博白县城时，两个小时内急行军二十公里，先头部队三营七连首先赶到博白。七连官兵化装成国民党军骗过守城哨兵，然后用五块银元诱使一个小个子国民党兵带他们去找张淦。七连副连长卢福山和他率领的官兵胆子奇大，他们跟着那个小个子国民党军兵，顺着大街径直来到张淦的兵团司令部。突然来了这么多人，引起司令部哨兵的怀疑，哨兵大喊：“解放军进城啦！”兵团作战处长跑出来呵斥道：“胡说！肯定是自己兄弟！”话音未落就被下了枪。七连官兵一拥而上，将张淦兵团部里的大部分官兵俘虏。司令部里的喊声惊动了在后院睡觉的张淦。他起身对身边的值班参谋说：“前边有四个军守着，东北方向的共军至少还在一百八十里之外，怎么还会冒出来共军？”但是，轰然一声巨响，后院的大门被炸开了，卢福山冲进张淦的房间，喊：“张淦快投降！解放军宽大俘虏！”然后，他一步冲上去，把已经躲到床下的张淦拖了出来。

张淦的头破了，三八二团医生崔廷贵进来给他包扎。张淦突然看见解放军官兵带着他的女儿进了屋。女儿抱住他放声大哭。赶到现场的三八二团政治委员王奇说：“只要你不再与人民为敌，做有益于人民的好事，我们是会宽待的。”张淦对女儿说：“来，孩子，给解放军长官磕个头。”王奇政委连忙上前制止，流着泪的女孩已经跪地磕了个响头。王奇政委问：“你想怎样立功？”张淦说：“白崇禧把他的三个兵团比作车马炮，我就是他的车。车是骨干，车完了，棋就没法下了。”张淦起草电报，命令第七、第四十八、第一二六和第一二九军放下武器。

十二月二日，第十三军解放北海；四日，第三十八军占领南宁。

就在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向钦州撤退的时候，白崇禧本人乘飞机撤往海南岛。然后，他乘坐军舰，率领着用黄金租来的十条轮船，抵达广西北海对面的涠州岛海面，一面组织桂系的总撤退，一面等待撤向大海的官兵。

那时，桂系的第一、第十、第十一兵团残部正拼命朝钦州海岸方向奔逃，但很快就被追上来的几十万解放军官兵包围。这是桂系前所未有的大溃败，通往海岸的各条路上，到处都是奔逃的官兵。他们把枪扔了，把军官们的财物抢了，然后朝着各自的家乡跑去。那些被成群的士兵抢劫一空的军官，连身上的衣服都被扒光了，他们只能从田野上拔些稻草把自己围上，他们的样子被追上来的解放军官兵称为"广西装备"。为了不被溃兵抢劫和欺辱，与丈夫失散的桂军军官家眷忍受着疲惫和饥饿，一步不落地紧跟在解放军的队伍后面，无论爬山过河都不敢掉队，追击中的官兵偶尔回头喊一句"别跟着啦"，还是赶不走她们。解放军开饭的时候，她们走过来要，可怜的样子令官兵们不忍，于是把米饭倒在她们手里。第三十九军官兵往广西边境追击的时候，发现跟在后面的家眷行列里有两个男人，一问两个人都自称是商人，但不久就被俘虏兵认出来了，其中的一个竟然是桂军第一兵团第七十一军军长熊新民，另外的那个是他的副官——难道这两个人也怕被溃兵扒光了不成？没多久，前面有敌人要来投降，一问，是第七十一军副军长鲍志鸿。

白崇禧在涠州岛海面等了两天两夜，没有等到桂系的一兵一卒。

桂系第一兵团黄杰部大部被歼，其中第七十一军军长熊新民、副军长鲍志鸿，第九十七军副军长郭文灿被俘，残部逃到越南谅山。桂系第三兵团张淦部被歼，兵团司令官张淦、副司令官王景宋、第七军军长李本一、第四十八军军长张文鸿、第一二六军副军长王卫苍被俘。桂系第十兵团徐启明部大部溃散，残部逃往越南，其中第四十六

军军长谭何易在钦州附近被俘。桂系第十一兵团鲁道源部在容县被歼，兵团司令官鲁道源逃往越南，副司令官胡若愚在岑溪战斗中受重伤死去。桂系第十七兵团刘嘉树部被阻于贵州，后窜至中越边境被歼，兵团司令官刘嘉树被俘。

十一日，第四野战军第三十九军占领镇南关，十四日占领边境要地龙州。

至此，广西全境解放，广西战役结束。

第四野战军发动的广西战役，以伤亡和失踪两千四百七十七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白崇禧集团主力和余汉谋集团残部共十七万两千九百人，其中俘虏十六万余人。

中国历史上的桂系永远消失了。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日，白崇禧从海南岛飞往台湾。此后除了与旧部下棋，就是与何应钦打猎。一九五二年的一天，蒋经国派人对他的宅院进行搜查，大量的黄金和美元被搜走。蒋介石对此的解释是："每个人都应该这样来一次。"从此，白崇禧在蒋介石面前小心谨慎。在台湾岛上闲居十七年后，白崇禧在台北去世，享年七十四岁。

在席卷广西的征途中，解放军官兵曾在一座小庙的墙角看见一块陈旧的匾额，上面用金字写着蒋介石的几句话："中国之命运应操于中国人民自己手里。此命运有赖于人民之强大与独立。唯有强大而独立的中国人民，始能建成新的中国。"——不知是什么人出于什么动机制作了这块金匾，也不知是谁把它遗弃在破败庙宇的角落里，那个背阴的角落里落满灰尘——无论如何，话的意思还是不错的，特别是有关国家命运的格言般的铿锵之词。

# 大陆的最后一战

一九四九年夏末初秋，坚持到最后时刻的两个国民党军高级将领——胡宗南和宋希濂——在他们各自结束自己战争生涯的前夕，曾有过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地点是在胡宗南据守的陕西汉中。

谈话从晚上八点开始，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两个人试图从国民党政府二十多年的统治中，寻找三年来与共产党作战失败的原因："在政治上，没有做出一点成绩，贪污成风，腐败无能，弄得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经济上没有一点建设成就，而且弄得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党务上更是一团糟，国民党员号称几百万，毫无组织力量；军队内部矛盾重重，中上级军官大多腐化堕落，士气消沉，指挥紊乱。"接下来，私密的谈话集中在四个问题上：第一：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会于短期内爆发？两人都认为可能性很小，因为即使美国想与苏联打，因为西欧国家在二战中损失严重，没有再打一场世界大战的力量和意愿，他们决不会与美国一起干。第二：中国共产党内部是否有分裂的可能？胡宗南认为有可能，理由是：共产党并不团结，过去内部整风激烈，一些人从陕北跑出来就是实例；且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发展了许多游击根据地，这些力量壮大后势必要扩展，互相摩擦是不可避免的。第三：就目前形势看能否保有西南和台湾？两个人的估计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至少在四百万以上，地方武装也已达到一百万人，而国民党军现在只剩下百万左右，因此大陆上的任何一块地盘都难以保住，只有台湾、海南岛和舟山群岛等几个海岛有保住一个时期的可能，因为解放军要拥有渡海作战必需的海空力量，至少要三五年。第四：我们能不能在西南与共产党决战？如果不能应该怎样办？两个人用了很长时间统计川、黔、滇、康、鄂西、鄂西北和陕南地区的国民党军实力，结果是加上保安部队在内，大约还有九十万人左右，其中一半以上的兵力归他们指挥。但即使如此，决战也不可能，因为大部分部队是新编成的，装备不全，缺乏训练，战力脆弱，且西南地域广

大，地形复杂，道路破旧，既无法迅速集结兵力，也无法便捷机动兵力。最后，宋希濂提出：“在共军尚未向西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以前，应设法将主力转移到滇缅边区”，“只要能保存力量，则前途仍是大有可为的”。胡宗南立即从座位上站起来，拍着宋希濂的肩膀说：“老宋！这个计划好极了！好极了！”

几天后，两个人带着这个“好极了”的计划到重庆，面见从台湾飞来的蒋介石，却受到蒋介石的一顿训斥。蒋介石认为：在大陆必须保有西南地区，将来才可能与台湾及沿海岛屿配合进行反攻；如果再将西南完全放弃，国民党政府在国际上将完全丧失地位；西南地势险要，物产丰富，尤以四川人力物力均很充足，必须使其成为复兴基地——蒋介石要求胡宗南和宋希濂必坚守西南。

两个月后，即一九四九年十月中旬，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

令宋希濂没有想到的是，进军竟是从他的湘鄂川边区开始的。

攻击突然而至，宋希濂对全局没有判断，认为这是一场局部作战。他迅速调集优势兵力，由来凤、龙山地区（位于湘西与鄂西南交界处）向湘西永顺方向推进，目标是把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七军合围消灭。宋希濂曾对胡宗南说他不了解共产党，那么他就更不会了解自己的作战对手林彪。林彪命令第四十七军一四一、一三九师停止在龙山以南、永顺以北一线，同时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希望第二野战军抽出两三个师的兵力迅速进占酉阳（位于川东南）——“如敌确实以主力进攻永顺，则可由酉阳向黔江（位于川东与鄂西交界处）前进；如敌不攻永顺地区，由酉阳直出彭水（位于川东南）及其东北断敌退路”。为此，林彪表示将第四十七军的两个师交由第二野战军统一指挥。

林彪的作战意图不在永顺，而在将宋希濂的部队分割围歼。

根据这一作战计划，右翼第四野战军第五十军主力和湖北军区部队从湖北的宜昌至秭归间南渡长江，重创宋希濂的第一二四军后，向鄂西南急速推进，占领重镇恩施，截断了宋希濂北退四川的通路。左翼第二野战军第十二军沿川湘大道迅速西进，占领酉阳后，主力直取乌江东岸的龚滩（位于酉阳以北）；第十一军则从湘西出发，直插湘鄂川交界处，将宋希濂的主力部队截成南北两块。第四十七军为隐蔽战役意图，冒着连绵阴雨翻山越岭，取捷径从第十一、第十二军之间向黔江急进，以迂回到敌人的右侧。

宋希濂对共产党军队对他的合围始料不及。

十一月七日早晨，宋希濂和他的副参谋长罗开甲、第二十兵团司令官陈克非在大雨中来到来凤城，与第十四兵团司令官钟彬一起商议对策。所有的人都预感到了被包围的危险，危险来自湘鄂川交界处那块由黔江、咸丰、来凤城、龙山组成的三角地带，这里是从鄂西南和湘西南退四川的咽喉之地，驻守着钟彬的第十四兵团部，北面就是宋希濂的绥署司令部和陈克非的第二十兵团部。几个人正一筹莫展之际，驻守黔江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今日拂晓解放军攻占了秀山。秀山位于川东南的一角，但从这里向西可达乌江东岸的彭水，向北可经酉阳直抵黔江。宋希濂意识到，以秀山为迂回出发地，解放军将形成一个更大的包围圈，那样一来，自己必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厄运。宋希濂立即命令部队沿着川鄂公路西撤四川。

八日，得知敌人开始撤退，林彪要求第四十七军一四一、一三九师“不顾一切疲劳，立即日夜沿公路猛追，每日行程必须超过一百里”，协同第二野战军将敌人全歼于黔江与彭水之间。

第二野战军第十一、第十二军也以日行百里的速度开始了追击。刘伯承、邓小平特别电告第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和政治委员谢富治:

……我四野已令四十七军等部队兼程［每日百里以上］前进，捕捉战机。因此，你们应同时令轻装行动之先头军兼程急进，打破近来屡次行军之惯例，最低限度应距四十七军不迟至两日路程，争取配合四十七军。如迟至戌（十一月）真（十一日）才到黔江，则有使四十七军孤立作战之危险，或敌人先我占领要点，望特别注意。此次四兵团在解放广州后十天左右都可以超百里以上之行程星夜急进，故能取得歼敌四个军之胜利，望以之激励所部……

十日，右翼部队截住宋希濂的第七十九军两个师，第十五军、第一二四军各一个师，经过六天激战，全歼敌军，俘虏第七十九军副军长萧炳寅；左翼第十一军击溃宋希濂第一一八军五十四师和第二、第十五军各一部，并突破乌江；十六日，第四十七军在彭水地区强渡乌江；第十二军突破乌江后继续西进，与宋希濂的第二军九师和第十五军二四三师遭遇，第十二军在四天的时间里连续发起攻击，敌军被重创后于二十日晨撤逃。

宋希濂被裹在撤退的乱军中。他弄不明白解放军向西南地区的进攻，为什么不从胡宗南那里开始却偏偏选择了他。他从咸丰撤到黔江，县城里见不到一个百姓，搞不到任何吃的东西——“回想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那个时期，国民革命军统一两广，出师北伐，百姓对军队的热烈欢迎、积极支援的情景，与今天对比起来，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十二日上午，有报告说解放军已追至黔江，正在西北方向渡唐岩河，宋希濂立即命令司令部撤离。大队人马刚上公路，第一一八军五十四师师长董惠追上来了。五十四师因为撤退的距离远，一连几天都落在大部队的后面。董师长说部队实在跑不动了，刚到唐岩河边倒下便睡，结果全师被追击来的解放军缴了枪。宋希濂没有时间责备董惠，因为枪声已经越来越近，大队人马拔脚向彭水撤去。到达彭水，正在布防，第一二四军军长顾葆裕来了。顾军长说他的部队被截成几段，然后分别遭到围歼，只有大约两千人逃了出来。接着，宋希濂又接到第七十九军军长龚传文的消息，龚军长以超出其他部队的速度此刻已经撤到长江边了。宋希濂粗略地计算了一下，仅在几天的撤退中，他指挥的六个军中，第一二二军在湘西大庸被歼，第七十九军和

第一二四军也损失得差不多了，第一一八军五十四师在唐岩河被歼，第十五军一六九师也损失了大部，第一一八军二九八师师长傅碧人正带着残部往成都跑呢，自己能指挥的部队，只剩了第二军和第十五军的大部。

逃过乌江，宋希濂到达江口。在这个位于川东的小镇上，他见到了特意从重庆乘吉普车赶来的蒋经国，宋希濂这才得知，蒋介石已于十四日从台湾飞到重庆。蒋经国带来了蒋介石的六封亲笔信，除了一封给宋希濂外，湘鄂川边区绥署下辖的六个军长每人一封。宋希濂颇感蒋介石的苦心，他给宋希濂写了五页纸，大意是他虽然引退，但为救党救国，必须和大家一起"进行生死存亡的斗争"。否则"党国陷于万劫不复之地，吾辈亦将死无葬身之所"。蒋介石勉励宋希濂抱着"有匪无我，有我无匪"的决心，"巩固川东战线，给共军以迎头痛击"。

晚上，蒋经国与宋希濂进行了一次私密谈话，与几个月前与胡宗南的谈话一样，也是从晚上八时谈到凌晨一时，只不过宋希濂的心情已大不如前，他用"相当激愤的语气"分析了自己失利的主要原因：一、共军实力雄厚，尤以指战员战斗意志旺盛，不怕任何困难，作战时猛打猛冲，经常从一些崎岖小径抄袭我军侧背，弄得许多部队被节节截断，分别被包围消灭。二、绥署指挥的六个军，除第二军较有战斗力外，大多残破不堪，尤以自国军主力部队在东北、徐蚌、平津一带被歼后，官兵对与共军作战完全没有信心。三、鄂西山地粮食产量有限，部队补给主要依靠重庆运输，但由于路程远运力差，前线官兵常常吃不饱；鄂西川东一带崇山峻岭，现在已经相当寒冷，但各部队所领到的棉服仅有半数。吃不饱、穿不暖，当然严重影响士气。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打不赢。

蒋经国对宋希濂的一番话"有些惊愕"，沉默了一会儿后，他也总结了国民党军失败的原因："二十年来，国民党既没有领导政治，也没

有领导军队，只有彻底改造国民党，使每一个政治干部军事干部，都能真正为党的主义而奋斗的时候，才能产生伟大的力量。”——面对宋希濂说出这番话，蒋经国可谓推心置腹。但当宋希濂问及关于目前局势，总裁是什么态度时，蒋经国却没有确切的答复：“现在打算把宗南的第一军调过来，希望这方面能撑持一个时期。”宋希濂终于明白，蒋介石除了要求他抵抗外，已没有任何别的办法。临别，他对蒋经国说：“我只有一句话，尽人事以听天命而已。”

此时，第二野战军杨勇的第五兵团和第三兵团杜义德的第十军已突进贵州，国民党军贵州绥靖公署主任谷正伦和驻守贵州的第十九兵团司令官何绍周放弃贵阳向四川方向撤退，第二野战军西进昆明和四川的大门就此敞开。

蒋介石这才发现自己对于共产党军队的入川方向一直判断有误。

刘伯承和邓小平都说：“毛泽东主席就是要这种气氛，这很好。”

毛泽东对于如何解决西南问题煞费苦心。

首先，必须让蒋介石判断解放军的入川方向是陕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周士第的第十八兵团在秦岭边缘不断出击，把胡宗南和蒋介石弄得十分紧张。同时，第二野战军部分主力乘坐火车北上，以造成大军向陕南开进的声势。火车从江苏的浦口发车，沿津浦路转陇海路，车到郑州时还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其次，在第四野战军横扫中南战场之际，命令第二野战军部分主力，以大迂回的方式向湘鄂黔边界集结：杨勇的第五兵团从江西上饶秘密开进湘西，陈锡联的第三兵团则由郑州秘密南下。第二野战军参谋长李达回忆说：“在武汉，我们和四野的同志在解放电影院那样小的场所联欢，等过了长沙，就连这种场合都要避免，越秘密越好。我们正是要在四野行动的掩护下，实现出奇制胜的意图。”

毛泽东决策的基本点是：首先把四川的国民党军稳住，秘密地从川黔边界直插川南，堵住川敌向云南和西康逃窜的退路。然后第二野战军从东、北、南三面全线压上，把大陆上的国民党军最后全歼于四川境内。

蒋介石之所以判断毛泽东必从陕南、川北进入四川，是因为川黔方向山势险峻，道路崎岖，关隘林立，江河纵横，交通极其不便。而从北面沿川陕公路进入四川，便于大部队机动展开；北面又有陇海铁路，运输兵力和装备快捷；还有老解放区作后盾，可以解决补给问题。为此，蒋介石在制定死守西南的作战计划时，尽管在川东地区部署了宋希濂的部队，但是从整体态势上看，他还是把战力更强的胡宗南的部队放在了陕南、川北。

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军进军江南后，从各个战场逃亡的国民党军几乎都跑进了四川，四川盆地因此成了国民党军残余部队的大杂烩。虽然番号繁多，建制混乱，军心涣散，但聚集在西南地区的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武装的总兵力，仍然达到九十万。当时，第二野战军总兵力约为五十万，加上位于陕南地区周士第的第十八兵团，承担解放西南作战任务的人民解放军总兵力约为六十万。

西南，是国共两军在大陆上的最后战场。

第二野战军向川黔进军的作战要点是："本野战军主力［除四兵团］之任务，在于攻略贵阳及川东南，以大迂回之动作，先进击宜宾、泸县、江津地带之敌，并控制上述地带以北地区，以使宋希濂、孙震及重庆等地之敌，完全孤立于川东地区，而后即聚歼这些敌人，或运用政治方法解决之，以便协同川北我军逐次解决全川问题。"

巴山蜀水，山高路远。

第二野战军从华东向西南进军，路途近者两千余公里，远者在四千公里以上。部队路过长沙的时候，专门等候在这里的西蒙诺夫，见到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并随刘伯承一起参加了长沙警备部队的欢迎晚宴——“他有着圆圆的、头发剪得短短的灰白的头，带着沉静得惊人的表情的脸，穿着没有任何职级标志的黑色制服——与其说他像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最老练的将领之一，不如说他更像大学中的一位老教授”。“这位已经毫不间断地战斗了三十年，负过十多次伤，好多次被国民党报纸说他死了，又好多次复活了的刘伯承将军，是谦逊的人之中最为谦逊的人。他坐在为他而设的晚宴间，似乎这天晚上所发生的一切全都与他无关，似乎他是一位偶然光临的客人，比谁都更希望不受人注意”。晚宴结束后，刘伯承对西蒙诺夫说：“我明天就要走了。当南方作战结束了时，请上我们部队里来——如果您来得及的话——我们也很快要发动攻重庆了。”

蒋介石刚刚过完他的六十三岁生日，那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过去之一年，实为平生所未有最黑暗、最悲惨之一年。”在发现解放军主力并没有顺着川陕公路入川之后，蒋介石立即意识到毛泽东的目标是重庆，于是他急促地调动部队重新布防：赵子立的第一二七军开赴川东与鄂西交界处的奉节和巫山，以阻止解放军沿长江北岸西进；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移至川东万县至丰都一线；宋希濂集团余部防守重庆以东的涪陵地区；罗广文的第十五兵团在重庆以南的綦江、南川地区，郭汝瑰的第七十二军开赴川东南的叙永，以加强对贵阳、遵义方向的正面防守。同时，命令胡宗南的部队由秦岭、大巴山以南撤入川，其陈鞠旅的第一军和许良玉的第三军迅速开到重庆附近加强防御。

针对蒋介石的军事部署，十一月二十一日，刘伯承、邓小平致电第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和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从战役全局着眼，我军左翼迂回部队极为重要。判断敌人于南川、綦江掩护收容后，或退

守重庆，或向西退至泸州、宜宾、毕节、昭通迄昆明地区，而以后者可能最大。因此，我十六、十八、第十等三个军，如能先敌到达叙永、筠连、盐津地区（位于川东南与滇东北交界处），即可完成断敌退滇后路而各个歼灭之”。“因此，除五兵团及十军应确实计算行程与时间［包括战斗］，求得先敌占领土城、叙永、盐津之线争取主动外，三兵团以从正面多拉敌人几天为有利”。“十一、十二两军在进至南川有粮地区后，如敌仍集守綦江地区，你们可以停止休息一下，以便后梯队和炮兵赶上，特别是等我五兵团、十军迂回到预定位置而后前进”——第二野战军的这一行动计划，仍是对中央军委大迂回大包围战略意图的实施。

陈锡联的第三兵团和杨勇的第五兵团昼夜兼程，直插川南宜宾方向——一九三六年初，毛泽东曾率中央红军在这一地区辗转良久，试图北渡长江进入川陕根据地而不成，最终被迫返回贵州四渡赤水河以寻生路。此刻，山河依旧，共产党人已可以任意驰骋。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七军截住宋希濂的部队，一日内竟歼敌俘敌两万余人。二十五日下午，一三九师四一六团三连一排追到乌江边，排长韩喜看见从上游驶来四条船，一排的战士喊：“停下来，不然就开枪啦！”船上的国民党军军官也喊起来：“弟兄们，我们人太多，坐不下啦！”一排的战士笑了，说他们把咱们当自己人了。船近了，一排的冲锋枪响了，四条船被迫靠岸。一排官兵一看，船上坐着军官太太，还堆着两麻袋光洋、六千斤大米、大批的美国香烟以及五万双胶鞋。一问，军官里还有第七十九军的参谋长。这边的俘获还没查完，那边又来了五条船，船上的两百多名国民党军即刻成了俘虏。韩喜发现船上的一个军官趁乱悄悄跑了，而且越跑越快，大盖帽都跑掉了，他立刻命令四班追上去。四班把这个小个子军官抓回来，韩喜才知道他是第十四兵团司令官钟彬，因为他身上有一封蒋介石的亲笔信。至二十八日，第四十七军主力会同第二野战军第十一、第十二军，将宋希濂的第二军和第十

五军大部以及驻守在綦江、南川地区的罗广文兵团大部，歼灭于南川以北地区。

二十九日，重庆被三面包围。

重庆全城陷入巨大的混乱中。蒋介石从台湾调来的“特种破坏队”，忙着布置对全市重要目标，包括发电厂、钢铁厂、军火仓库以及其他重要城市设施实施爆炸破坏。从广州迁到重庆不久的国民党政府各机构再一次开始大搬家，行政院长阎锡山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群飞往成都，接着各部门的大小官员们也开始“紧急疏散”。

就在阎锡山和张群逃出重庆的那天，一群衣衫褴褛的政治犯在卡宾枪和机枪近距离的扫射中爆发出绝望的呐喊，他们集体冲向中国当代史上那座最著名的监狱的围墙，围墙开裂的地方随即被交叠在一起的躯体堵塞，这些血肉模糊的躯体在彻夜轰鸣的解放炮声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那座监狱的全称叫渣滓洞，以关押政治立场最为强硬的共产主义信仰者闻名。在接连被屠杀的共产党人中，有一个名字至今为我们所熟知：江竹筠，中共川东地委地下联络员。她的同事和战友都称她为“江姐”，今天的中国人依旧这样称呼她。有资料显示，江姐被杀害的时间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四日，那一天蒋介石从台湾飞抵重庆。无法得知这位饱受酷刑而骨硬如钢的共产党人的生命终结，与蒋介石的到来有什么必然关联，但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个日子，令当代中国人永远不能释怀。可以肯定的是，那一天的重庆“充满了恐慌、惊怖和死寂的空气”。从牢房里被押解出来的江竹筠已被折磨得步履艰难，当西南朦胧的月色映上她清瘦而沉静的脸庞时，身后的枪响了——这位共产党人没能看见她为之付出生命的新中国，她在年仅二十九岁时被枪杀于重庆解放前夕。

二十九日，在蒋经国的催促下，蒋介石动身离开他居住的林园——“林园后面已枪声大作”。由于道路被混乱的溃兵和汽车堵塞，蒋

介石不得不三次下车步行，最后改换吉普车前行，午夜时分才到达白市驿机场。他在专机上一直等到三十日六时，当获悉重庆防御已全部崩溃后，飞机离开重庆飞往成都。而这时候，从江口方向渡过长江的曾绍山的第十一军“已迫近重庆白市驿机场之前方二十华里”。

三十日，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七军官兵乘三艘商轮，从巴县的广阳坝顺着长江驶来，黄昏时分，商船猛地靠上山城门户朝天门码头。与此同时，第二野战军第十一军渡江之后占领了重庆全城的制高点浮图关；第十二军在江津渡江，攻占成渝路上的要地来凤驿。

自抗日战争以来中国西南最著名的城市重庆解放。

以重庆为轴心扩大战果的行动随即展开，第二、第四野战军入川部队日夜兼程冲入成都平原。

第四十七军向重庆东北方向发展，占领长寿后翻越华蓥山占领广安；第十二军向重庆的西北方向发展，占领大足和内江，直指成都南面的彭山；第十一军向重庆的北面发展，占领铜梁和合川；第五十军和湖北军区独立一师渡过长江，阻截从万县地区逃跑的国民党军，之后沿长江占领忠县；第四十二军一二四师沿三峡西进，占领川东重镇万县。与此同时，杨勇的第五兵团和杜义德的第十军已迂回川南：第十六军渡过赤水河，翻越营盘山，于十二月一日占领川东南要地叙永，之后继续向北渡过长江，进入泸县以西的南溪地区；第十八军从贵州毕节经云南镇雄，穿越乌蒙山小路进入川南，直逼宜宾；第十军从遵义和桐梓向北连续六天急行军，十二月二日进入四川，渡过长江后进入泸县地区，然后以昼夜一百二十里的速度兵分两路追击国民党军第四十四军，终于迫使该军军长周青廷以下三千余名官兵在泸县以北投诚。

至此，川境国民党军逃往贵州和云南的通路被彻底截断。

此刻，即使云南的通路依旧敞开，国民党军残余部队也不敢往那里退了，因为国民党云南省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已经宣布起义。

卢汉，彝族吉迪家族后裔，参加过辛亥起义的滇军元老。抗战胜利后，曾作为第一方面军司令官，率几乎全部滇军部队进入越南，在河内接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日军投降。而蒋介石趁此机会剥夺了“云南王”龙云的省府主席职权，将滇系势力从根本上加以扼制。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命令越南境内的滇军开赴东北，离开湿润的亚热带地区的云南人，跨越近万公里路途，来到寒风凛冽的东北战场——自蒋介石打算瓦解滇军的那天起，就注定了滇军对他的一次又一次反叛。滇系部队进入东北之后，先是第六十军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在辽宁海城起义；接着，第九十三军被歼灭于锦州城内，兵团司令官卢浚泉、军长盛家兴弃城逃跑被俘；最后，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在吉林长春起义。一九四八年底，龙云从南京逃入香港，派人进入昆明联络卢汉，决心共同反叛蒋介石。人民解放军攻入四川后，卢汉眼见着川东与川南重地一一失守，他拒绝了蒋介石把西南地区的军事首脑机关由重庆迁入昆明的命令，于十二月九日通电全国宣布云南起义。在卢汉行动的同时，驻守川康地区的川军将领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也开始了行动。十一月三十日，蒋介石从重庆飞到成都，曾要求他们前来面见，以期配合胡宗南进行“川西决战”，但是三人皆“避不应召”，与卢汉抱病不见“如出一辙”。蒋介石的无奈与绝望难以言表，他在这种境况下仍坚持留在成都只是为了胡宗南：“本人一旦离蓉，彼等或可联合发表宣言，共同降共。故仍继续留蓉，必使胡宗南的部队部署完妥后再定行止。”然而，没等蒋介石离开，九日，在卢汉通电起义之后，国民党西康省府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率领国民党军第二十四、第九十五军和二三五师在四川彭县通电全国起义。

蒋介石宣布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十四时，蒋介石离开成都飞往台湾。

直到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二十三时辞世，蒋介石再未踏上中国大陆一步。

此刻，在四川的北面，周士第的第十八兵团右翼第六十二军从甘南出发，向江油、绵阳攻击前进；中路第六十军沿川陕公路过广元、剑阁直指绵阳；左翼第六十一军翻越秦岭，直下川东重镇巴中，继而攻占南部，逼近潼川。第十八兵团的十万大军即将突进成都平原，与从重庆向西推进的陈锡联的第三兵团，从贵州向北推进的杨勇的第五兵团一起，对国民党军最后的残余部队形成南北夹击态势。

宋希濂被从左右两翼迫近的解放军挤压到川西南地区。

十二月八日下午，宋希濂听到了对他来讲可谓致命的消息，驻守宜宾的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官兼第七十二军军长郭汝瑰起义了。

宜宾，在宋希濂的身后。

而宋希濂的眼前是山高水急的大渡河谷。

宋希濂对各位军官说：“我们在军事上是被共军彻底打垮了，我们剩下的力量很有限了。目前的处境，坦率地对大家说，是十分艰苦，甚至是十分危险。但是我们不愿做共军的俘虏，不愿在共产党的统治下过残酷可怕的生活，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是忠党爱国的军人，有一分钟的危险，便应尽一分钟的责任。现在，我计划越过大雪山，走到遥远的地方去，找个根据地，等待时机。今后的日子越过越艰苦，走的是崎岖难行的小道，吃的有时候可能很粗糙，甚至不够吃，如果情况紧张的话，可能一天要走一百多里。你们自信有勇气有

决心愿意随我一起去干的，便同生共死，一往直前；不愿意干下去的，就由此分手，当酌发遣散费。”三千人的队伍中，几十名军官领了遣散费走了。宋希濂把携带的金子散发给各部，有的发一百两，有的发五十两，发完了金子队伍再次上路。

十四日下午十四时，走到犍为县城西南一个名叫清水溪的小镇时，部队正要停下来生火做饭，镇子上的人突然纷纷向镇外跑去，有人喊：共产党离镇子只有五里地了！宋希濂急忙率领队伍向南跑，刚跑出五六里路，清水溪已枪声一片。

四十二岁的湖南人宋希濂正值壮年。他十七岁考入黄埔军校一期，先加入国民党，再加入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入党介绍人是蒋介石和廖仲恺，加入共产党的入党介绍人是他的黄埔同学陈赓。一年后，宋希濂退出共产党，他说这只是因为军队成员不能跨党，但他保证不做有损国共合作的事。只是，作为蒋介石的门生，他还是率部参加了对共产党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六月，身为国民党军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执行蒋介石就地处决瞿秋白的命令，将这位共产党重要领导人枪杀于福建长汀中山公园内。抗日战争爆发后，宋希濂以三十六师师长之职率部参加“八一三”战役，在近三个月的浴血作战中，部队因伤亡巨大，在战场上接连四次补充兵员，每次一千五百至两千人，最终，上战场时近九千兵力的三十六师，以一万二千人的伤亡代价重创日军。一九三八年，三十一岁的宋希濂出任第七十一军军长。之后，他率部参加武汉外围会战，率领三个师鏖战日军第十三、第十四师团，歼灭其各一部。一九四一年冬，他以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之职入缅作战，当时的《纽约时报》称：“宋希濂将军及史迪威将军，在中国云南省及缅甸发动之攻势，动人心魄，而未被注意，惟彼未被歌颂之英雄，在未被歌颂之战役中，克服雨季之障碍击败日军，在此次战争之历史上，用鲜血写下英勇之一页。”一九四六年十月，宋希濂出任新疆省警备总司令。一九四八年

夏，在南京国民党军最后一次全体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告诉他，不用回新疆了，即刻上任华中“剿总”副总司令。由于与白崇禧之间的矛盾，宋希濂最终还是回到了湘鄂西，蒋介石要求他经营好湘西与鄂西借以屏障四川。

逼近宋希濂的是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八军五十二师一五五团。

由于地形的限制，这支部队始终无法超越宋希濂的部队实施迂回，官兵们们只能在后面昼夜不停地追，决心不把宋希濂追上绝不罢休。

突进清水溪镇的时候，发现宋希濂已经跑了，一五五团团长兼政治委员阴法唐在营以上干部会上说：“活捉宋希濂，向新中国的第一个元旦献礼！”

十五日早晨，一五五团追上了宋希濂的警卫团、工兵营和通讯营以及后勤辎重部队，歼敌两千一百余人。还是没有抓到宋希濂。由于不熟悉道路，二营在追击时沿着一道山梁走上了绝壁，从绝壁上往下一看，宋希濂正骑着一匹白马沿着下面的马边河跑呢，绝壁上的二营下不去，官兵们惋惜得直跺脚。

一五五团连背包都扔了，电台跟不上也不要了，官兵们只有一个念头：追！

十五日下午，二营再次追上宋希濂的后卫部队。副营长王永祥带领五连迅猛出击，国民党军瞬间就溃散了，五连在乱木丛中捉到一个大胖子军官，军官的身边有一匹大白马。王永祥以为这一定是宋希濂了，谁知大胖子像明白解放军的心思一样，不停地喊：“别开枪！千万

别开枪！我可不是宋希濂！大白马确实是宋希濂的！我是绥署中将高参！宋希濂就在山下的黄丹镇！”

山下确实有个小镇。但是，当官兵们准备冲下去的时候，身后却响起了枪声。阴法唐担心后面兵力少，既要看管两千多俘虏，还要保证电台和机要密码的安全，如果受到袭击将会损失严重，于是命令部队后撤接应。

十六日黄昏，一五五团等来后卫部队，一起突进黄丹镇，获悉宋希濂已于昨日下午离去。

阴雨连绵，山高路险，沿途到处都是宋希濂部掉队的官兵和伤员，这让追击中的二营官兵脚步总是迈不开。

十八日拂晓，三营上来接替二营成为前卫。

进入毛坪镇的时候，宋希濂突然听到身边那个名叫万朝生的卫兵嘟囔了一句：“七十二战，战无不利，忽闻楚歌，一败涂地。”他浑身打了个寒颤。毛坪镇坐落在大渡河湾处，北临激流，南靠峻岭，东面是大渡河的一条支流，名为小河，小河的东岸有一个山垭口，是进入大渡河谷的咽喉之地。宋希濂决定停下来阻击，以与解放军的追击部队拉开距离，赢得时间渡过前面的大渡河。

下午，一五五团追到山垭口，正准备渡小河，遭遇对岸火力阻击。九连冲在最前面，十几个战士倒下了。三营长朱兴镇急忙命令重机枪压住敌人火力。七连增援上来，同时，二排长吕建光带领官兵向敌人的侧翼迂回。傍晚，二排从侧后干掉了敌人的重机枪手。俘虏说，十几分钟前，宋希濂还在这里指挥重机枪射击，刚刚向西跑了。阴法唐团长命令二营迅速渡河追击。

十九日凌晨，大渡河谷浓雾弥漫，一五五团在毛坪以西渡河。过了河一路向西，他们终于追上了。宋希濂的残部正在一个叫沙坪的渡口渡河，部队被河水分隔在南北两岸。追到南岸的一五五团立即发起猛攻，将留在南岸的这股敌人全部俘虏。宋希濂已经渡到北岸，南岸的枪声一响，他带领警卫排便往西跑。但是，北岸也突然响起了枪声。当一股解放军官兵从山上冲下来时，宋希濂和他的警卫排全部被俘。那一瞬间，宋希濂掏出手枪想自杀，被他的警卫排长袁定侯阻止了。

河南岸的一五五团听到北岸枪声大作，立即用火力封锁北岸，北岸的机枪顶着南岸的火力也开始了射击。宋希濂在两岸互射的混乱中趁机逃脱，躲进半山腰的一座小庙里。经过号音的反复联络，一五五团才知道河对岸的部队是第十六军四十六师一三九团。一三九团本在沙坪以北，获悉宋希濂残部向大渡河逃来后，全团立即沿大渡河推进，终于在沙坪渡口截住了敌人。

误会解除之后，两支部队开始搜山，宋希濂再次被俘。

宋希濂穿着一身士兵棉军装，自称叫周伯瑞，是一名军需官。

一三九团政治委员王尚要求俘虏们指认谁是宋希濂。

没有人吭声。

宋希濂和俘虏们坐在岸边的一间民房里，度过了一个惊恐不安的寒夜。第二天俘虏集合的时候，宋希濂准备在转运途中再次逃跑，但是一个人的出现让他彻底绝望了。这个人叫王尚述，在宋希濂办的军政干部学校工作，实际上是一名共产党的地下人员。一九四九年八月被发现真实身份后，干部学校准备枪毙他，但是，宋希濂亲自找他谈了话，将他留在干部学校继续工作。宋希濂部一路撤退，王尚述在中

途掉队，现在追了上来。在这个弥漫着寒雾的早晨，他一眼看见了俘虏群中的宋希濂，然后向解放军干部的住房走去。

很快，一个解放军干部站在了宋希濂面前。

宋希濂说："我是宋希濂。"

"一九四九年，对于我来说，可以说是有生以来最不幸的一年。"宋希濂的父亲和妻子在这一年相继去世，而他自己"打了败仗，弄得身败名裂，家破人亡"——黄埔一期中最年轻的军官，国民党军中最年轻的战将，在四十二岁的这一年花白了头发。

被俘后的宋希濂，先被关押在重庆白公馆，一九五三年移至重庆松林坡监狱，一九五四年转到北京功德林监狱。与他同在这里的还有杜聿明、王耀武、范汉杰、廖耀湘、陈长捷、李仙洲、邱行湘……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宋希濂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释放。一九八〇年他赴美国与三十一年未见面的五个子女团聚。荣辱功过都已过去，定居美国时，宋希濂已是七十三岁的耄耋老人，他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民族是永存的。"

就在宋希濂西逃大渡河谷的时候，第二野战军已将成都包围。

二十日，代理西南军政长官的胡宗南决定放弃成都，所有的部队向南突围。但是，他已经无法控制部队了：二十一日，国民党军第十六兵团副司令官曾甦元率四万余人在什邡起义，司令官孙元良带警卫人员乘飞机逃往台湾。二十二日，国民党川陕边主任喻孟群、第二路军总指挥许绍宗、第七军军长周树德率四万余人在广汉、什邡起义；西南第一路游击总司令王瓒绪率四万余人在成都起义。二十三日，国民党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官陈克非和第十五兵团司令官罗广文分别在郫县和安德起义。二十五日，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司令官裴昌会率近三万

人在德阳起义。二十六日，国民党军第三兵团司令官朱鼎卿、第二十军军长杨汉烈在金堂起义；第一二七军军长赵子立率万人在巴中起义；第五兵团司令官李文在新津地区率残部投诚。二十七日，国民党军第十八兵团司令官李振率两万余人在简阳起义；第三十军军长鲁崇义率部在巴中起义。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成都解放。

此时，国民党军残余部队全部逃到了四川西南部的西昌地区，人数约为三万五千人。

蒋介石给胡宗南的指令是：固守西昌三个月，等待国际变化；同时收拾部队并加以整顿，绝不放弃大西南。

然而，胡宗南已经万念俱灰。

几个月前，还在秦岭南麓与周士第的第十八兵团对峙的时候，胡宗南见到了他曾经的部下张新。张新于一九四八年清涧战役中被彭德怀部俘虏，那时他是整编三十六师二十四旅旅长，而此时他已是第一野战军联络部的工作人员，奉共产党方面的指令前来劝说胡宗南起义。胡宗南立即命令宪兵将张新关起来。之后，心神不安的胡宗南又三次把张新从监狱里接出来谈话，谈话全是在后半夜进行的——

你不怕共产党整你吗?

张新说，共产党有政策，不整人。

彭德怀身体怎么样?

张新说，很好，他说和你是老朋友。

那边怎么称呼我?

张新说，不叫胡匪，就叫胡宗南。

那边对文天祥这样的人认为好不好?

张新说，共产党人尊他为英雄。但国民党做的是对不起人民的事，不可能成为文天祥。

士为知己者死。你，想到过校长没有?

张新没说话。

张新后来被从汉中押解到四川，人民解放军逼近成都时越狱。

而胡宗南，成为国民党军在大陆最后一战中的最后一个将领。

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和政治委员邓小平决定，以第十四、第十五、第六十二军各一部，配属滇桂黔边纵队一部，从南北两线向西昌发起进攻。

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三日，北线第六十二军一八四师的三个团，分别从泸定、雅安、乐山渡过大渡河，然后向南攻占冕宁、越西；南线第十五军四十四师的三个团渡过金沙江，占领会理、宁南、德昌；第十四军四十师和四十二师三个团以及滇桂黔边纵队的两个团，从西南方向迅速北上，攻占盐源。至此，散落在西昌周围的胡宗南部已处于南北夹击之中。

胡宗南收到蒋介石的电报：“如西昌不能不放弃，吾弟是否仍将领导各部队行游击作战，继续与匪斗争，否则弟离部后，何人可代为领导，速告知。”——所有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除了被俘、起义和被打死的之外，此刻都已跑到海外或台湾，凭什么独让胡宗南上山打游击?第二天，胡宗南回电：“为简化机构，减少目标，便于机动起见，遵于

此间留置简单机构，由参谋长罗列负责领导，职率非战斗人员，拟本月二十六日飞琼转台。”

二十七日晨五时，胡宗南乘飞机逃往台湾。

胡宗南走后，罗列化装潜逃，残部于西昌以北的喜德地区被歼。

至此，西南地区的川、黔、滇、康四省全部解放，国民党军近九十万部队全军覆没。

回到台湾的胡宗南因丧失西南而备受指责，最后在蒋介石的袒护下才免于“议处”。在度过了十七年郁郁寡欢的日子后，六十六岁的胡宗南因突发心脏病在台北去世。这位追随蒋介石征战二十五年、曾经统兵几十万的将领，不知他离世前是否知道，当年蒋介石为了西昌这块最后的地盘，决心无论战死或是被俘都必须舍弃他，只是有人从旁直言：送一个像胡宗南这样的将领给共产党人做俘虏，既违背国民党的利益又违反指挥道德时，蒋介石才派飞机将他从大陆的最后一个战场上接回。

就在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整个大西南之际，蒋介石在台湾对国民党军的失败进行了战略检讨：一、军队高级将领的八大问题：“本位主义；包办主义；消极被动，推诿责任；大而无当，粗制滥造；含糊笼统，不求正确；因循苟且，得过且过；迟疑犹豫，徘徊却顾；主观自大，固步自封”。二、国民党军队已成为“六无”军队：“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于是，几百万的军队，“没有同共军作过一番较量，就被解决了；无数优良的装备送给了共产党，用来消灭我们自己”。蒋介石最后的结论是——“非失败不可。”

## 士兵的山河

就在人民解放军即将进军大西南之际，一位名叫胡风的文艺理论家创作的长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诗的题目是：《时间开始了》。胡风以澎湃的激情穷尽壮美的想象，描绘了刚刚诞生的新中国：

海！

欢呼的海！

歌唱的海！

舞蹈的海！

闪耀的海！

从一切方向流来的海！

向一切方向流去的海！

劳动着、战斗着、创造着

从过去流来的海

劳动着、战斗着、创造着

向未来流去的海！

这是中国当代史上罕见的激情四溢的时刻。

身上硝烟未散的共产党领导人，日以继夜地筹划着这个新生国家的构架：政权的维系要领、政治的民主样式、民族的和睦团结、经济的复苏建设和外交的斗争策略；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干部废寝忘食地学习和实践着复杂的城市接收和管理、工商业的复工和增产、金融体系的稳定和重建、失业者和战争流民的安置、农业和畜牧业生产的统筹规划；而人民解放军必需继续作战，以巨大的兵力清剿残存在这片国土上的近四十万土匪，处理国民党正规军与非正规军的俘虏，仅在西南地区这一人数就“不下九十万”。另外，还有一些官兵开始参加经济

建设，同时给自己的部队修建永久性的新营房；再有一些官兵接到了复员回家的命令，能够在战争结束之后活着回家，回到属于自己的那块土地上春种秋收，这让他们在极度的兴奋之后抱着他们的班长哭个不停。

新中国的第一茬庄稼正在灌浆，大地上弥漫着谷物生长的清香，老人们坐在自家的地头，用慈爱的眼神望着在微风中摇曳的麦穗，一遍遍地计算着可能的收成，他们认定交了公粮之后，不但全家不会再挨饿，还可以让娃娃吃上几顿白面馍馍。农村里的年轻人不多了，跟着解放军走的青年还没有回家，没有参军的青年也大多忙着公家的事，从清剿土匪到修复被战争破坏的公路和铁路。姑娘媳妇们都参加了扫盲班，不但已经学会了几百个汉字，而且能够算清楚过去地主收地租是如何不合理。还有些年轻的后生和女子，被国家招收到新建的工厂去了，他们对反对自己离开土地的老人说，将来都要用机器种田哩！

“蒋介石是被激情，而且主要是被激情搞垮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说，“投入战争与革命中的热切的希望和刻骨的仇恨，化成巨大的激情的能量，像在中国社会中爆炸了一颗原子弹似的，几乎把中国社会炸得粉碎。”

一九五〇年初，第四野战军第四十、第四十三军准备攻打海南岛。

之前，毛泽东致电林彪，特别强调了如何接受攻击金门失利的教训：

……

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力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因为潮水需十二小时后第一次运载船只方能返

回运第二次，而敌人可用空海军切断我之运输，故非选择时机一次载运一个军渡海登陆，并能独力攻进，建立基地，取得粮食，便有后援不继，遭受重大损失之危险。三野叶飞兵团于占领厦门后，不明上述情况，以三个半团九千人进攻金门岛上之敌三万人，无援无粮，被敌围攻，全军覆灭。你们必须研究这一教训。海南岛之敌，可能较金门敌人战力差些，但仍不可轻敌。请告邓（邓华）赖（赖传珠）及四十军、四十三军注意，并望你向粟裕调查渡海作战的全部经验，以免重蹈金门覆辙......

海南岛，面积三万四千多平方公里，海岛的北面隔琼州海峡与雷州半岛相望，海峡平均宽约近三十公里，最窄处宽约二十公里。如果从雷州半岛起渡，乘木帆船一夜可达，如遇顺风顺流则只需五至七小时。海峡每日早晚两次潮起潮落，北岸与南岸涨落相反，因此当海峡南面的海水向东流时，北面的海水则向西流。每年十二月至第二年的三月，海峡刮北风或西北风；四月谷雨之后，就变成了东风或东北风。后一时节，风向最适于木帆船向南行驶。

盘踞在海南岛上的国民党残余部队海陆空种类齐全：陆军为五个军十八个师以及装甲旅第四总队四十二大队五中队，兵力约为十一万人；海军为第三舰队和陆战第二旅四团，拥有军舰和炮艇二十五艘；空军为第一、第二、第十、第二十大队，拥有战斗机、轰炸机和运输机四十五架。

国民党海南省府主席是陈济棠，防卫总司令是薛岳。

那个在战争中穿越大半个中国的美国记者西默·托平，此时到达海口机场，他见到粤军出身的老资格将领陈济棠——“他邀请我一道坐在面向共产党占领区的机场候机室的阳台上，他在等候年轻漂亮的妻子从香港飞来。”——显然，妻子再年轻漂亮，也不足以抚平陈济棠此刻复杂的心绪，他抱怨蒋介石不给他所需的经费和物资，只派来一些飞机和军舰，为了缓解资金紧张，他不得不在岛内自己制造含银量不足的银元。陈济棠认为，蒋介石不应该独吞美国的援助，美援应该在台湾与海南岛之间平分。为了引起美国人对他的兴趣，陈济棠特别说明

海南岛资源丰富，蕴藏着大量的铁、锡、铜、铅、银、煤、石墨、锑、钨和水晶，而且几乎没有被开采过，农作物产量高且种类多样，可以养活三倍以上的海南岛人口，因此“非常欢迎美国私人到海南岛投资”。

陈济棠讲述的是一个美丽的海南岛，但西默·托平却感受到这座岛屿正面临着一场不可避免的战斗，因为国民党军的飞机不断地“从头顶呼啸而过”，前去执行轰炸“岛内共产党游击队的所在地”的任务——“一名叫冯白驹的老资格共产党人领导的武装力量，在这座岛屿上坚持了二十多年，控制着岛上的很大面积的区域，岛上红色政权的干部们就在离国民党军仅几英里的村子里办公。”

接着，西默·托平见到了岛上国民党军的总指挥薛岳。薛岳估计解放军的大部队很快就会登陆，而最更令他担忧的是：蒋介石可能已经决定放弃海南岛。

出生于广东乐昌普通农家的薛岳，现年五十三岁，他的老资格在同级别的国民党军将领中绝无仅有。他十五岁加入孙中山创办的同盟会，先后毕业于武昌陆军预备学校和保定陆军学校，曾是孙中山警卫团的三个营长之一，另外两个营长分别是叶挺和张发奎。北伐时，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一九二六年蒋介石开始“清党”，薛岳被认为“具有左倾迹象”。他对蒋介石的不信任极其不满，导致日后在两广联合反蒋时深陷其中。中原大战期间，粤桂联军北上支援冯玉祥、阎锡山作战战败后，薛岳终于知道国民党军内部凶险复杂，于是辞职回家赋闲。一九三三年，蒋介石任命他为第五军军长，要求他率部参加“围剿”中央苏区的作战。薛岳尽心竭力，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他率部从江西一直追到金沙江边。据他自己说，他追击中央红军的总里程超过了两万里。抗战期间，他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国民党湖南省府主席一职，指挥四次长沙会战，虽然最终长沙失守，但中国

军队却以必死犹战之势震惊中外。战后，他获得美国总统杜鲁门颁发的“自由勋章”。内战爆发后，薛岳出任徐州公署绥靖主任，他人生中的一连串倒霉自此开始，先是整编六十九师师长戴之奇被围自杀；接着，整编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被俘。很快，薛岳被蒋介石撤了职。他闲居在上海，旁观时政军机。人民解放军即将打向江南时，他再次被蒋介石起用，出任国民党广东省省长。但是，仅仅八个月后，他就不得不逃出广州跑到海南岛上。薛岳在岛上建起三道防线，自称是坚不可摧的“伯陵防线”——薛岳，字伯陵。

“伯陵防线”的防御原则是：“把握当面外匪与内匪尚呈分离之不利态势，依各个击破要领，一面以海、空军协力巩固海防；一面以陆军有力之一部，尽速歼灭本岛土共，彻底消灭内在之威胁，安定内部，再举全力，歼灭来攻之外匪。”防线的构成是：海空军大部置于岛的北面，用以封锁琼州海峡，防止解放军渡海进攻。其余部队分四路对岛内进行“清剿”与守备。薛岳知道蒋介石要固守的是台湾而不是海南岛，无论从政治还是军事上，他都无法与蒋介石的意志抗衡。他唯一的希望是：没有空军和海军的林彪不敢轻易发动进攻。

林彪说，坚决歼灭残存在海南岛上的国民党军势在必行，“这是一个完成革命和使全国进行建设与走向繁荣的绝对必须条件”。同时，他对海南岛作战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

林彪致电第四十三军军长李作鹏：

……渡海作战我军全无经验，目前渡海的具体条件如何亦不明，因此我们此刻尚无具体意见。盼你们就近弄清各种情况，细心研究作战条件和方法，并向兵团和我们提供建议。本日我们已派尹健同志（第四野战军司令部第二处副处长）去南京向粟裕同志处调查渡海作战经验。

最大的问题还是筹备船只，因为按照第一批要渡过去一个军的要求，需要能载三十人的船一千多只，可雷州半岛的船只大部分被国民

党军销毁或带走了，第四十、第四十三军收集到的船仅有四百多只，且其中只有一半的船能一次运载三十人。第四野战军后勤部政治委员陈沂，装扮成富商从深圳进入香港和澳门买船，原本认为繁华无比的这两个地方却街头昏暗，商业萧条，显然受到了内地战争的严重影响，陈沂除了买到些防晕药品、罗盘和救生圈之外，一只船也没有买到。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下达了全力支援海南岛作战的决定：

……我军为肃清该岛敌人，必须渡过海峡，登陆作战，这是一个极端复杂而且艰巨困难的任务……因此特作如下决定：

一、以支前司令部为中心，在军区指导下，应集中全力筹划海南作战必须的各种器材、船只、燃料。

二、凡公家工厂［钢铁厂、工业厂、农具厂、八十兵工厂、汽车修理厂等］均有义务担任制造、改装船只必须机件，必要时抽调一部干部、技工、工程师到前面协助装设船只。

三、不论公私登陆艇、救生器材，全部征用或借用。

四、不论任何机关部队，有空余柴油机、汽油机全部借用。

五、海南岛作战所必须之各种经费开支，统由省（广东省）财委会预支，经分局核准报销。

总之，一切为着争取海南岛战役的胜利，希各级党委负责保障执行。

东自珠江口，西至中越边境，沿着漫长的海岸线，渔民们把他们的船贡献了出来。为了提高船只的运输效率，尽可能少受风向和海流的影响，船工们还把不少木船改装成了机帆船。第四十军军长韩先楚甚至有了一艘指挥“旗舰”，当他走在这只改装过的大帆船甲板上时，很兴奋：“如果天气好，我们就能一路顺风直放海南！”

显然，参战官兵的心境要比物质准备复杂得多——从解放战争的战史上看，海南岛作战确实是最后一场大规模战斗——参战的第四十、第四十三军都是来自东北的部队，官兵们一路从北方打到南方，

本来认为打下广州就“革命到底了”，向广西边境追击的时候，就有官兵说“底漏了”，而现在对海南岛的攻击，更不在大部分官兵的预料之内——“南下的时候我们打头阵，仗快打完了又让我们包尾，怎么吃苦总是我们？”

疑问的核心清晰而尖锐：在最后一战中生或者死。

经历了无数次作战的官兵，目睹了太多的死亡和伤残。在战争进行到最为艰难和残酷的时候，每个人都必须准备去死，因为你只要有一丝畏死的恐惧，你在阵地上的须臾犹疑和胆怯，都会成为敌人先射中你的机会，你必须以最勇猛的速度和最果敢的态势，在敌人的子弹射出之前将他击毙。况且，你的班长、连长，与你家在同一个村的战友，他们刚刚在敌人的火网中倒下，仇恨的怒火会让你情愿赴汤蹈火，乃至粉身碎骨。但是，此刻，所有的人都知道，战争就要最终结束了，新中国已经诞生了，他们的兄弟部队一部分在剿匪，一部分在大城市里警备，还有一部分甚至已经回返北方开始种庄稼了——第四十三军政治部总结了官兵中的七怕：一怕海上无风三尺浪，浪大船小过不了海；二怕晕船呕吐，失去战斗能力；三怕不会游泳，没有救生器材，翻船被淹死在海里；四怕海上航行迷失方向；五怕登陆时水深下不了船干挨打；六怕敌人飞机在海上轰炸无处藏身；七怕敌人军舰在海上挡住去路闯不过去。“把这‘七怕’概括成一句话，那就是‘跨海南征，九死一生’”。但是，这支部队里的老兵们却说，人，窝窝囊囊地活着没意思，能得到认可和信任是一大快事。上级把海南岛作战任务交给我们，是相信只有我们能打下来，我们的部队是支硬邦邦的部队，每个人都是条好汉子。人谁不死？谁能王八活千年？那么多的仗都打过来了，最后一仗当胆小鬼，对得起自己和死去的战友吗？当了逃兵活着回了家，这辈子你出门不出门？人活一场，就是活一口气，一个脸面，不然，活着和死了，有什么区别？

第四十三军一二八师三八二团四连一排在海上训练，由于船是官兵们从海边捡来的一条木船，既没有橹也没有桨，只有两张破烂的帆篷，因此训练结束的时候，别的船都摇着橹划着桨回去了，但是大海突然风平浪静，他们这只只能靠风吹帆篷行驶的船不动了。副排长鲁湘云决定睡上一觉，等风来了之后再回去。一排一直睡到第二天天亮，风来了，大家赶快拔锚起舵升帆，可谁也不知道这时刮的是东北风，他们的船被向西南吹去，一直吹到了国民党军占领的海区。很快，木船碰上一艘国民党军军舰。大家顿时紧张起来，木船打军舰结果可想而知。

木船上一共九名官兵，排长鲁湘云认为包括他自己在内，这九个人打过四平，攻过锦州，解放平津，挺进广州，个个都不是平庸之辈，于是决定死也要拼一下。军舰开火了，打了四炮，海水被掀起一丈多高，船舵被打坏，篷绳被打断，小船在炮弹炸出的海浪中摇摇晃晃，一直靠到舰炮的死角距离。国民党军认为，木船上的这几个士兵只有投降，他们不可能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但是木船上的枪响了。鲁排长喊了一声“打”，木船上的子弹就射在了军舰的甲板上。柴玉林的自动步枪只打了一梭子就卡了壳，他急忙换枪继续射击；万殿臣把自动步枪往肩上一靠，瞄准军舰的舷窗就是两梭子；孟宪芝掌控着被打坏的船舵，努力保持着木船的平衡；王金秀连发四颗枪榴弹，每一颗都准确地在军舰上爆炸了。军舰开始向后倒退，退到距离木船四百多米远，然后再次开炮，炮火在木船边激起巨大的水柱，让军舰上的国民党兵害怕的是，木船竟然摇摇晃晃地再次朝着军舰靠上来了，看起来船上的这几个解放军要和他们一起去死。

军舰转向走了。

一排的官兵喊起来：“打军舰就和打地堡一样，只要往上一靠，它就完了！”

木船已经漏了，大家拼命地往外舀水，他们一边舀海水一边往船里涌，直到听见枪炮声前来接应他们的船只到达。

一排与军舰打了一仗，九个人无一伤亡，这不但证明了木船可以与军舰一拼，而且还向所有参战官兵证明了一个道理：人只要不怕死，就可以让自己活着，让敌人去死。

林彪要求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赖传珠、副司令员洪学智速至雷州半岛前线，“亲自指挥一切准备工作”。他不断致电第十五兵团：“盼查告琼崖纵队能实际出动参战的战斗兵员数目有多少”？并特别表明“不是指番号有多少”。“由雷州半岛我上船处，到敌海防不特别严密又不太远而易登陆的地方，航程时间约多少，共有几处”？“我军在夜间渡海的中途遇敌海、空军的可能情况如何，你们预定的对付方法有哪些”？

第十五兵团在不断完善的准备中，逐渐形成了攻打海南岛的作战方案：“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决定：第四十、第四十三军在春节前争取各偷渡一个团，取得经验，以利再战；以一次运载三万人计算，改装机帆船六百只，修理和购买登陆艇三十艘，准备工作在五月前完成，六月开始大规模登岛作战。为了对付国民党的海空军，建议调高射武器和重炮于海峡沿岸地区，掩护船只和部队的作战行动。

三月，薛岳的岛上防御部署基本完成，开始对琼崖纵队发动猛烈“清剿”。为支援琼崖纵队作战，加强岛上的接应力量，同时摸索渡海作战的经验，第十五兵团决定，第四十、第四十三军各派一个加强营，分别在海南岛的西北、东北地区实施偷渡，琼崖纵队以第一总队和独立团在上述两地区接应。

率先偷渡的两个营是：第四十军一一八师三五二团加强营，官兵七百九十九人，带队指挥员是一一八师参谋长荀在松、三五二团团长罗绍福、营长陈勇康、营教导员张仲先。第四十三军一二八师三八三团加强营，官兵一千余人，带队指挥员是三八三团团长徐芳春，团政治处主任刘庆祥。

五日十九时，三五二团加强营从雷州半岛西南端的灯楼角海岸，上了十三只木船，七百九十九名决心“有进无退”的官兵扑向暗海之中。

船队驶出，顺风顺水，也没有遇到敌人的舰艇。但是，不久，船边海浪的哗哗声逐渐减弱了，干部们掏出手帕高高地举起来，心情一下子紧张起来：没有风了。没有任何机械动力的帆船没有风不能前进，这就意味着不能按时登陆。这样一来，不但可能无法得到接应，还会在天亮之后被敌舰发现。船上的船工说，如果风停了，再起风得在明天下午。指挥船发出了“强行前进”的信号。各船官兵开始奋力摇橹，用枪托和铁锹划水，甚至把补漏用的木板劈开当做船桨。天亮了，还没看见登陆的海岸，却发现船队的阵形完全乱了，清晰地散落在一片海面上。神情严峻的官兵已满手血泡，还在拼命地划船。突然，一声爆炸声，船边耸起水柱，岛上的国民党守军和海面上的军舰发现了船队。接着，国民党军的十一只船分三路迎头驶来。指挥船命令各船向敌船靠近，尽量与敌船混在一起，让敌机和岸炮不敢轰炸射击。这一迎头相撞的决死举动，让国民党军有点摸不着头脑，眼见着解放军的船队快速冲过来，敌船立即转向避开，只是在船头插上了小红旗，好让天上的飞机辨别。但是解放军的船只上也插上了小红旗；敌船接着又改插上小白旗，解放军也把小红旗换成了小白旗。天上的飞机一次次俯冲但不敢投弹，军舰和岸炮也沉默着，敌我双方竟在这样古怪的情形下混杂在一起，向海南岛的海岸靠近。

韩先楚军长在雷州半岛上的指挥部里，隔一会儿看一眼门外悬挂在竹竿上的那块布，当那块布不再飘动后，他陷入焦灼之中。上半夜接到的“风向好，船速快”的电报，参谋们计算，拂晓前肯定可以登岛。但是，“午夜风停，船行很慢”的电报接着到了。第二天上午，船队报告遇到敌机和敌船后，指挥部与船队的联络就中断了，数次讯问岛上负责接应的琼崖纵队，回答都是“情况不明”。昼夜不眠的韩先楚甚至想从敌人的广播中寻找船队的下落，但依旧是一点消息都没有。

接应三五二团加强营的琼崖纵队到达预计登陆点后，在国民党军的眼皮底下潜伏到天亮也没见海上有船来。碉堡里的国民党军发现了接应部队，双方立即交火。是撤退还是继续等？官兵们商量之后决定就是和敌人拼光了，也要等下去！

三五二团加强营已经不是偷渡了，他们必须面对强行登陆的生死之战。在接近海岸的时候，天上的敌机俯冲轰炸，岸上的守军跟着开火——不可避免的伤亡开始了。二连指导员带领的那只船中弹，船上的十几名官兵伤亡，剩余的官兵向海岸方向顽强前进。在基准船上负责掌舵的战士傅世俊，由于必须站立着而被子弹击中，这是一位山东籍的老战士，从长白山跟随部队一直打到海南岛，中弹的那一刻，他知道自己真的是“革命到底”了，他对身边的官兵说“登陆就是胜利”，说完即倒下掉进大海里。船上的官兵一齐站在摇晃的木船上，机枪手端着机枪横扫，炮手抱着炮筒发射，赵连有连续发射五十四发迫击炮弹，炮筒打红了，手掌被烫得吱吱冒烟，除了一发炮弹落在海里之外，其余的五十三发全部落在敌人的海岸阵地上。

船队开始先后靠近海岸，海水清澈见底，官兵们跳了下去。一连长毕德玉的身后是旗手王忠，司号员小赵刚把军号举到嘴边就被子弹打倒了，他躺在沙滩上仰面吹号，号声颤抖而尖厉。三连在指导员郑明德的率领下，边涉水边射击。后面还在海面上的木船，在参谋长荀

在松的指挥下，全力掩护已经登陆的官兵。当最后一只船撞上滩头的时候，教导员张仲先看了一下手表，是六日十三时四十分。

接应他们的琼崖纵队官兵冲了过来，三五二团加强营穿越海岸封锁线进入五指山区。

第四十军一一八师三五二团加强营，第一批登上海南岛的九百九十七名官兵中，伤亡五十多人。

几天后，第四十三军一二八师三八三团加强营的一千零七名官兵，在海南岛东海岸文昌附近的赤水港登陆。由于敌人的大部兵力被三五二团吸引到岛的西边去了，在琼崖纵队独立团的接应下，登岛后击溃国民党守军的防域线，最终进入海南岛东面的根据地。

至此，第四十三、第四十军第一批登岛部队已至海南岛的东西两线。

二十六日，第四十军一一八师三五二团二营、三营以及三五三团二营组成了两千九百九十一人的加强团，在一一八师政治部主任刘振华、琼崖纵队副司令员马白山的率领下，分乘八十一只木帆船和机帆船，从灯楼角起渡向海南岛西北的临高角驶去。船队仅仅开出半个小时，东北风就停止了，官兵们奋力划水，但潮水也起了变化，海面上浓雾弥漫，船队难以保持队形，各船随着潮水漂移，竟有一半的船只偏离了预定的登陆点。拂晓时分，只有一部分船在玉抱港附近登陆，大部分船只散落在玉抱港两侧的海面上。这一线是国民党军正面防御的地段，接应部队尚在一百里之外，官兵们在强行登陆时，陷入守军陆地、军舰和飞机的三面阻击中。虽然没有建制完整的攻击配合，没有统一的作战指挥，但冲向海滩的官兵迅速自动组成战斗小组，哪里有枪声就往哪里打。由于登陆时电台人员牺牲，琼崖纵队官兵无法得知偷渡部队因风向改变了登陆地点，他们依旧按计划在预定登陆点向

守军发动了攻击，因为兵力有限、武器简陋，付出巨大伤亡后也没有把登陆地段的突破口撕开。让他们更为焦急的是，天亮了，预计的登陆时间到了，海面上却没有一只船，反而在东面的临高方向传来了激烈的枪炮声。琼崖纵队立即决定：迅速通知靠近临高的澄迈县委，组织当地群众接应；部队赶往响着枪炮声的地区；这边的战斗也要打下去，而且要不惜一切牺牲硬拼硬冲，争取把国民党守军缠在这里。

在第四十军加强团的船队中，二营四连两只船上的官兵还没有登上海南岛就全部阵亡了。当时，正在登陆的他们发现两艘国民党军军舰正向登陆的主力部队冲去，于是决定掉转船头前去阻挡。无法得知这是谁的命令，很大的可能是根本没有人命令，因为当时各条船都在各自为战，这个举动只能是他们自己的决定。两只木船终于冲到了两艘军舰的前面，船上所有能使用的武器一齐向军舰开火，枪榴弹、手榴弹和掷弹筒飞上甲板。两艘军舰无论如何射击、开炮，都无法摆脱两只木船的纠缠，木船上官兵的决死气概，令从没与共产党军队作战的国民党海军水兵目瞪口呆，他们集中了所有火力向两只木船开火，两只木船上的官兵全部阵亡，遗体和碎裂的船板漂荡在海面上。

三月三十一日二十二时三十分，第四十三军一二七师三七九团和三八一团一营共同组成的三千七百三十三人的加强团，在师长王保东、政治委员宋维栻的率领下，分乘八十八只木帆船，从雷州半岛东南端的博赊港起渡，向海口以东的海岸前进。

他们预计的登陆点是岛上守军重点防御地段，虽然有出其不意的效果，但一旦遇敌必是恶战。果然，在接近海岸的时候，船队被黑压压的国民党军舰艇拦截，不同口径的火炮在海面上形成一道密集的弹幕。船队的护航船朝着国民党军军舰冲了过去。世界海战史上没有过这样的先例，后来的战争史也不会再有这般情景：一方是简陋的木帆船，船上是手持陆军装备的官兵；一方则是钢铁军舰，舰上是受过训

练的水兵——从军事角度看，双方不同军种的官兵本不会以作战的形式相遇，所发生战斗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海战”，因为从常识上讲双方根本构不成作战的当量。陆军乘坐木船在海上与海军军舰作战，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解放战争中的海南岛战役就是这样打的。所谓的护航船，只是些在改装后的木帆船上架设了几门迫击炮和几挺重机枪，解放军官兵称它们为“炮船”，作为渡海突击作战中的绝对主力，它们必须迎着军舰而上，必须忘掉自己是木制的，而且与军舰相比火力微弱。

三七九团五连的第一、第二、第三号船，在副指导员呼永生的率领下，冲向距离他们最近的一艘军舰。三只单桅小木船向军舰发动冲锋的时候，船上官兵们都沉默着，看着前面体积越来越大的军舰，计算着可以开火的距离。一发炮弹在一只船的船头爆炸了，海水从炸开的洞口汹涌而入，船身开始倾斜沉没。负责修补的官兵堵着漏洞，其余官兵依旧沉默着，船依旧在向敌舰靠近。又一发炮弹击中了这只船，一班长张树昌倒下，鲜血流满船板。船板上，整齐地排列着美式的九十毫米火箭筒、六十毫米迫击炮、轻重机枪和步枪，武器的后面是沉默的官兵。在距离军舰只有百米左右的时候，呼永生“开火”的命令下达了，三只木船上的火器突然齐射。第一发出膛的火箭弹命中敌舰的侧舷，紧跟着一发迫击炮弹在甲板上爆炸了。军舰上的国民党兵猛烈还击，但是他们发现击沉木船需要很大的耐心，木船在海浪中上下颠簸使得命中率很低，而且木船越靠越近，机枪的子弹下雨一样扫来。

只有与木船拉开距离，舰炮才能发挥作用。

敌舰开始向后退，而木船拼命跟着。

军舰以更快的速度移动着，用大炮和机关炮向木船射击，不时有木船起火燃烧和沉没，但剩下的木船还是近距离地靠着军舰，船上的

迫击炮发出吭吭的闷响，夹杂着官兵们如同在陆地进攻时发出的那种声嘶力竭的呐喊。

第四十三军加强团登陆后检查建制，发现三七九团的两个连没有了，这两个连的官兵都在护航船上。

两批部队相继登陆，加上琼崖纵队，海南岛上解放军的总兵力已达两万余人，大规模渡海作战的时机已经成熟。

四月十日，第十五兵团下达了渡海作战的命令。

十六日，潮汐平流，午后为东风，大部队开始起渡。

第四十军一一八师三五四团、三五三团两个营、一一九师和一二〇师三五八团，共一万八千七百人，分乘二百六十一只船，于灯楼角出发；第四十三军一二八师三八二团、三八三团两个营以及三八四团一个营，共六千九百六十八人，分乘九十六只船，于三塘出发。经过七个小时的航行，十七日凌晨三时，第四十三军主力在北面的玉抱港、雷公岛一线登陆，第四十军主力在西北方向的新村、临高角堤段登陆。天亮时分，两军突破海岸守军的封锁，向海南岛纵深发展。

薛岳调动部队分两路发动反击，企图将第四十、第四十三军登陆部队赶下海，但登陆部队的冲击与推进迅猛而坚决。第四十军在西部地区负责牵制守军，第四十三军一二八师主力则迅速东进，二十日在黄竹、美亭地区将国民党军二五二师包围。薛岳调集主力试图对一二八师实施反包围。邓华命令一二八师死守阵地吸引敌人，命令一二七师迅速推进准备打援，其他主力部队向黄竹、美亭地区靠拢，对薛岳的主力实施“反反包围”，打一场具有决定意义的歼灭战。这场发生在海南岛上黄竹、美亭地区的混战，是解放战争中最后一场国共两军师以上规模的作战。一二七、一二八师官兵处于国民党军的夹击之中，

渡海登陆时携带的干粮已经吃完，酷热的天气中没有干净的饮用水。在奉命死守的战斗中，阵地多次出现残酷的拉锯战，一二八师师长孙干卿认为，这是“一九四七年在东北四平攻坚战中也没有出现过的复杂的局面”。第四十三军军长李作鹏命令部队以一部兵力死死顶住敌人的反击，集中大部兵力首先歼灭美亭地区的敌人。二十一日，敌人的增援部队到达，一二八师再次受到猛烈围攻，战场上的建制都已打乱，每一个阵地都发生了肉搏战。傍晚十七时，第四十军主力赶到，并从东西两面迂回到敌人的侧后，国民党军受到夹击，开始向海口方向撤逃。

二十二日晨，薛岳逃离海南岛飞往台湾。

二十三日，第四十军一一八师和第四十三军一二七师占领海口。

海南岛上的国民党守军全线崩溃。

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命令登陆部队兵分三路全线追击。

第四十军主力及第四十三军一二八师，沿着环岛公路向榆林方向追击：一一八师三五四团乘汽车从海口一路向南，二十六日追上国民党军二五二师残部和教导师，俘虏两千余人；二十七日，一一八师主力追上国民党军第三十二军等部，歼敌三千余人；二十五日，一一九师击溃国民党军第六十二军一五一师残部；二十八日，一一九师主力占领位于海南岛东南角的凌水；三十日，一二八师经过急促行军，与一一九师、琼崖纵队第五总队一起，在临海的榆林和三亚一带全歼已无路可逃的国民党军残部。追到三亚的解放军官兵，在大海边看见两块青灰色的巨石屹立眼前，上面分别写着：天涯，海角。

一九五〇年五月一日，海南岛解放。

解放战争中最后一场大规模进攻战结束了。

五十五天后，朝鲜战争爆发，攻击台湾岛的作战计划被迫搁浅。

新中国的和平的生活开始了。

仅仅一个月后，位于南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军奉命向北进发，一直开进到国土北面那条纵贯中朝边境的鸭绿江边。除了少数高级将领之外，官兵们还不知道他们将要继续作战。

他们乘上火车，从这个国家的南方向北方行进。

南国的椰林在热风中摇曳，珠江丰沛的水系环绕着闪闪发亮的稻田。南岭的湿云绸缎一样飘浮，滴水敲打着芭蕉浸染出满坡青翠。湘江水天一色，长江白浪千叠，两岸是望不尽的一熟天下足的吴楚沃野。晨风迎面吹来，土地的芳香渐渐浓郁，成熟的麦子颗粒低垂，那条黄色的大河自天际而泻，大河边溽热的柳林里蝉鸣不止，太行山蜿蜒而至。著名的城墙垛口之外，黑土地上山高林密，河滩里的庄稼泛着深深的油绿，在挺立着的高粱的梢头上，天蓝得犹如南方的那片海水——这片国土养育的近千万儿女，从投身这场大规模战争的那天起，就怀揣着光荣回家的憧憬，他们想擦干爹娘眼角边的泪水，把自己的立功证贴在堂屋的墙上，然后去自家分得的那块田地里春种秋收，但愿风调雨顺收得好庄稼，但愿房上的草顶换新瓦，但愿娶上媳妇生了娃，但愿好日子红红火火年年岁岁地传下去……

山河锦绣，儿女情长。

英雄壮怀，天地沧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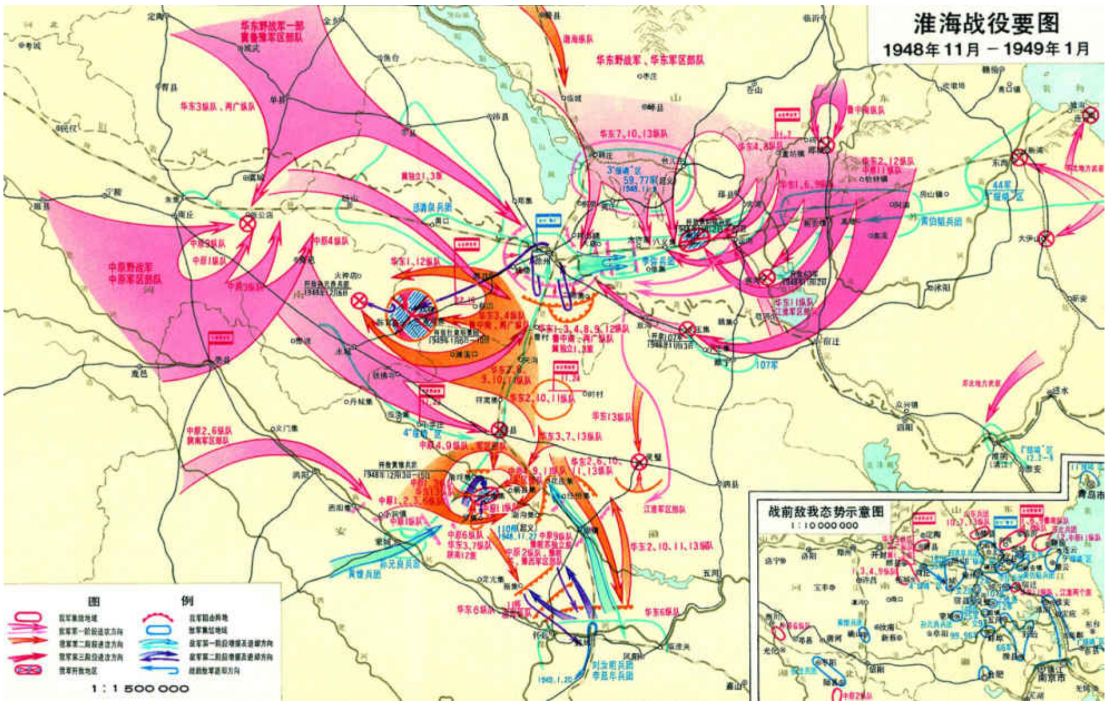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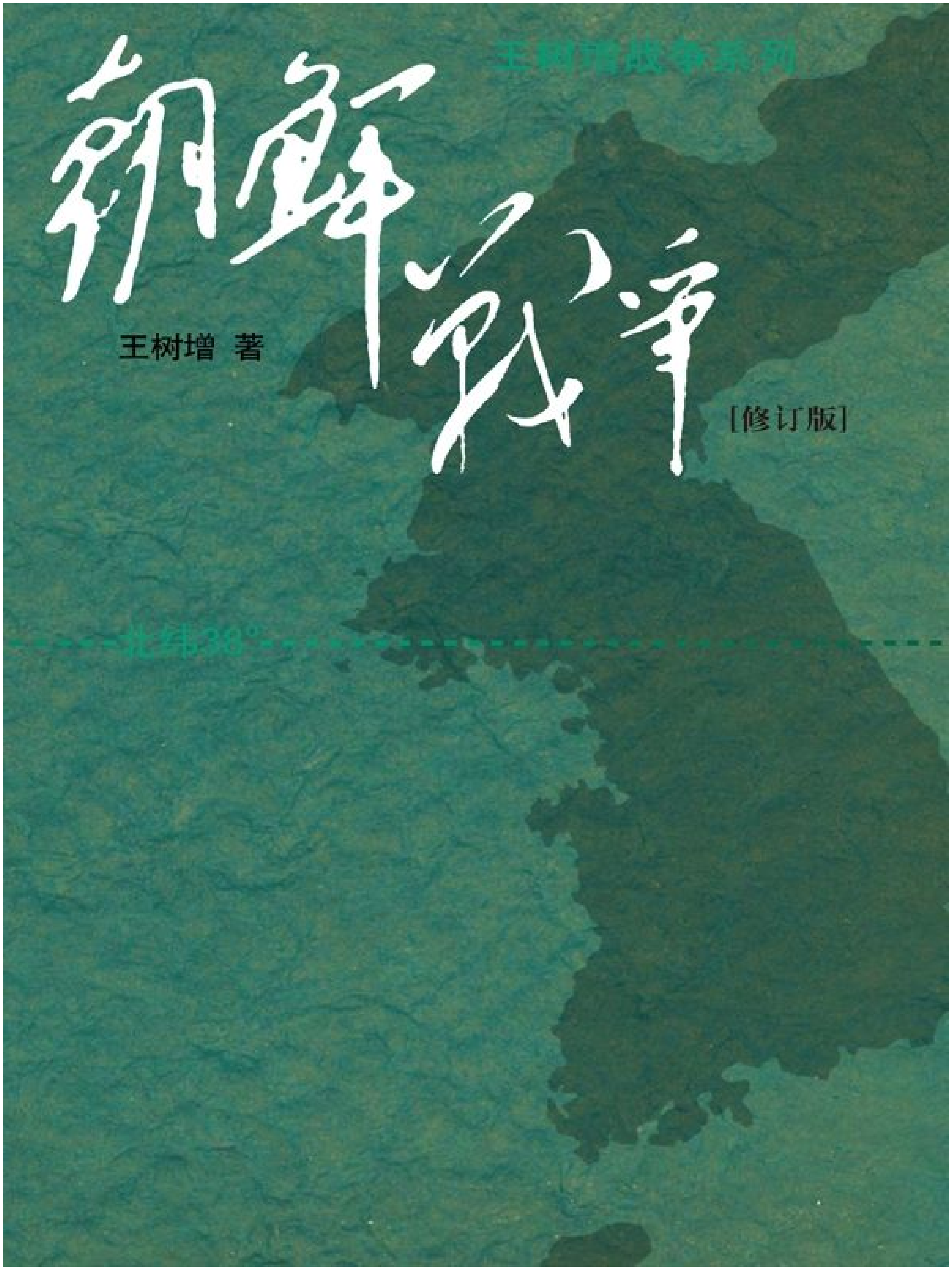
2006年10月至2009年4月

写于北京





平津战役要图
1948年11月 —1949年1月
东北野战军
华北野战军
北平市
天津市
图 例
1：2 200 000


王树增战争系列
朝鲜战争
王树增 著
[修订版]
北纬38°


王树增战争系列
朝鲜战争
王树增 著
[修订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朝鲜战争/王树增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ISBN 978-7-02-006920-0

I.朝…II.王…III.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200102号

责任编辑：脚印 装帧设计：刘静

责任校对：常虹 责任印制：董文权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564千字 开本 680×1000毫米 1/16 印张 38.5 插页 4

2009年4月北京第1版 2011年3月第8次印刷

印数 130001-150000

ISBN 978-7-02-006920-0

定价 5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前言 古老的命题

战争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

人类进步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战争的历史。

面对二十一世纪，人类的展望是和平与发展。但是，无论和平的愿望是多么的美好，发展的愿望是多么的深切，战争却每一天仍在地球上发生。

历史在某个时刻的现在时是：战争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的唯一选择，如果这个国家珍视独立、主权、领土完整以及人民的和平生活。

而选择战争意味着一个历史性的提问必须出现：是否能赢得战争？

能不能打赢？怎样才能打赢？

这是一个从来都古老而每一次又超前的问题。

距离今天最近的一场为和平而战的规模最大的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令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卷入硝烟的战争，在付出一亿人的生命伤亡之后结束了。赢得战争胜利的国家包括中国和美国。

当世界上所有的参战国都被战火破坏得千疮百孔的时候，本土没有遭受战火的美国在战争结束后拥有着领先世界的经济能力。其时，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占整个西方世界工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一九五〇年，美国的钢产量达到八千七百七十二万吨，小麦产量占西方世界总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一千五百零七亿美元。一九四九年，美国的黄金储备价值为二百四十七亿多美元，占整个西方世界黄金储备总量的百分之七十。美国还是当时科技最发达的国家，拥有世界上群体最大、水准最高的科技人才储备。于是，美国当仁不让地成为世界军事强国，它拥有大规模的杀伤武器原子弹，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性能先进的作战飞机，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军舰队。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仍有十八艘航空母舰正在建造中，其拥有航空母舰的数量和总吨位占全世界的百分之八十。美军的一个步兵师装备坦克一百四十多辆、七十毫米火炮三百三十门，陆军的火力配备居世界之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使美国从日本到菲律宾、从意大利到关岛的环欧洲、亚洲的弧形带上建立起二百多个军事基地，这些基地上部署着它三分之一的陆军、一百多艘战舰和一千一百多架作战飞机。

几乎没有人怀疑这个国家和这支军队的战争能力。

几乎没有人怀疑这个国家和这支军队将在战争中必胜。

然而，这个国家和这支军队在五年后的朝鲜战争中却失败了。

强大的美国军队称他们在朝鲜的失败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想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曾经甚嚣尘上，于是，朝鲜战争失败的结局令这个军事强国举国不解。美军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将军对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将军感叹道：“伙计……胜利一次太重要了。”

美国军队在朝鲜战争中的对手是中国。

中国，一个刚刚从战争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国家，在它宣布成立人民共和国的那一天，甚至还没有完全解放它的全部领土，人民解放军的大军还正在向西南和西北挺进。而在已经解放了的广大地区，与新生的人民政权作对的国民党军队的残余势力仍然是军事上的重大问题。连年不断的战争使中国薄弱的民族工业遭到彻底的破坏，中国本处于原始耕种状态的农业更是一片凋零。一九五○年，新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仅为五百七十四亿元人民币，换算成美元，还不及美国工农业总产值的尾数。以战争缴获为最主要武器来源的人民解放军，是从使用大刀长矛作战的红军发展来的，即便由于战争的胜利而使装备大大改善，中国军队每个军七十毫米以上火炮也仅有一百九十多门，是美军一个师装备的一半，而且大部分还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缴获的旧式火炮。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没有正规的空军部队，防空武器也很少。新中国的军队依旧是一支由“小米加步枪”装备起来的军队，而且“小米”的供应并不十分充足，“步枪”也是由不同年代、不同类型的步枪组成。新中国百废待兴。

那么，在中国军队与美国军队交战的朝鲜战场上，中国军队赢得战争胜利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决定战争胜负的诸多因素，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已演绎成战争哲学与战争艺术。中国在军事上崇尚“得道多助”是与哲学上崇尚“精神力量”相一致的。当战国时代的军中巫师占卜“天时”的时候，中国战争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已初见端倪。中国人认为，在决定战争胜负的三大要素“天时、地利、人和”中，“人和”是最主要的因素。虽然中国人将火药的发明更多地运用到了驱鬼的爆竹和喜庆的烟花上，但是中国人在战争中使用热兵器还是比西方人早了近千年。在以后漫长的历史中，战争物质的千般演进从不曾动摇中国人古老而坚实的精神基础，即使要被迫面对高质量的战争物质的重重包围。而就军事来讲，中国农民的梭镖能够夺取国家的政权，这已经是举世不争的事实。在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间，甚至连美国人都疑惑，他们援助的大批武器装备为什么就是无法支撑那个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权?为什么拥有先进美式武器的“国军”会在装备原始的共产党军队的攻击下一夜之间土崩瓦解?为什么“国军”的几百万人会不得不丢弃汽车、大炮和坦克让共产党的士兵和民众用牛车拖走？世间万事万物，人的因素第一，这是领导着一支农民军队创建了新中国的毛泽东的核心哲学思想，这也是中国战争艺术中最重要的哲学思想。

一九五○年冬天，中国的战争哲学与战争艺术在朝鲜战场上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所实践。

没有人在是否需要加强战争的科技含量这一问题上争论，没有人否认一个主权国家需要用最精良的武器来装备国家的军队，没有人无视先进的武器和尖端的装备对于改变战争进程

的重要作用。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五十五年，朝鲜战争也结束了整整四十七年。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人类的科学技术每一天都在发展与进步，而后来发生的每一场战争都显示出，人类科学技术的每一点发展与进步都已被用于战争。

那么，在战争中起着决定作用的因素究竟是什么?

只要世界上依然存在着战争，这个问题就会不断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所以，对爆发于五十年前的朝鲜战争的回顾与分析，不是没有意义的。

- 第一章 打败美帝野心狼
  - 六月二十五日
  - 台湾：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
  - 汉城大逃难
  - 美国将军的逃亡和中国的保卫国防会议
  - 仁川登陆
  - 艰难的抉择
  - 威克岛——美国式的政治游戏
  - 打败美帝野心狼
- 第二章 云山：中美士兵的首次肉搏
  - “YOYO”作战和朝鲜语《东方红》
  - 我们认为什么都知道，而实际上什么也不知道
  - 右翼的崩溃
  - 云山：中美士兵的首次肉搏
  - 天黑了，我们还在烟台峰上！
  - 早晨，中国军队消失了
  - 吃饭于前，又拉屎于后，不是白吃了吗？
- 第三章 三十八军万岁
  - “不是一支不可侮的力量”
  - 闻到中国饭的味道就撤退
  - 韩国第二军团已经不复存在
  - 悲惨的“贝克连”和“黑色的美国人”
  - “最奇怪的会议”和“闸门”的关闭
  - 三十八军万岁！
- 第四章 圣诞快乐
  - “我真为那些中国佬惋惜！”
  - “陆战队，向南进攻！”
  - 噩梦的开始
  - 水门桥
  - 圣诞快乐

- 第五章 李奇微：向中国军队总司令官致意
  - 炒面煮肉会议
  - 胜利一次太重要了
  - 大冰河
  - 不赶走美帝不回国
  - “到汉城去！汉城有姑娘！”
  - 一瓶牙膏主义
- 第六章 血洒汉江
  - 毛泽东：打到三六线去！
  - “共军士兵们，你们今天过年了！”
  - 损失最严重的一仗
  - 大雪掩埋的遗骸
  - 愤怒的彭德怀
  - “撕裂作战”：最艰难的时期
  - 不死的老兵去了
- 第七章 谁能在战争中取胜
  - 范弗里特将军：欢迎共军进攻！
  - 圣乔治日的祝祭
  - 打伪军去！
  - 是谁守不住阵地？
  - 范弗里特弹药量
  - 永远的悲怆
  - 谁能在战争中取胜？
  - “猎狗”凯南与来凤庄
- 尾声 彩蝶纷飞的幻觉

# 第一章 打败美帝野心狼

## 六月二十五日

三八线的最西端位于朝鲜半岛海州湾的最深处，这是一块盛产粮食的湿润洼地。从这里一直向北，在三八线两侧对峙的是北朝鲜的第七警备旅和南朝鲜的陆军第十七团。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星期日，凌晨四时。

夜色漆黑，大雨滂沱。

突然，一道比霓虹灯还明亮的橘红色的光线穿透雨夜升起来了。

炮火！坦克！湿淋淋的士兵！

紧接着，从三八线最西端开始，连续升起的信号弹像燃烧的导火索沿着南北朝鲜三百多公里的分界线向东飞速蔓延，一个小时后便抵达东部海岸。五时，三八线上数千门火炮开始射击。在炮火的映照下，稻田里翠绿的稻苗被裹在泥水里在夜空中腾飞，而上千辆坦克冒出的尾烟蜿蜒在朝鲜半岛的中部，犹如扑上整个半岛的惊涛骇浪。

如同这个动荡的世界中经常发生的事情一样，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在朝鲜半岛突发的是一场局部地区的局部战事。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军事上讲，至少在六月二十五日那一天，没有人会认为在亚洲东北部潮湿的梅雨季节里发生的事情，会对这个半岛以外的人们产生什么影响久远的后果。

对于朝鲜半岛以外的世界，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是一个普通的日子。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一一四师三四二团一营原营长曹玉海，这一天的上午正走在武汉市阳光灿烂的大街上。他复员后在武汉市的一所监狱任监狱长。这个农民出身的青年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参加过无数次残酷的战斗，三次荣立大功，获得“勇敢奖章”五枚。他在从军生涯中最后一次负伤，是在湖北宜昌率领士兵抢渡风大浪急的长江的时候。这次中弹令他本来就伤痕累累的身体更加虚弱。在风景秀丽的东湖疗养院休养时，他接到了复员的命令。曹玉海不想离开部队，疗养院一位女护士的爱情平复了他的伤感，爱情在刚刚来临的和平生活中显得格外温馨。当爱恋曹玉海的姑娘向他提出结婚要求的那天，他在广播里听到了一个消息：与中国接壤的朝鲜发生了战争。

六月二十五日，当曹玉海在武汉大街上奔走的时候，听说自己的老部队第三十八军正从南向北开进路过这里。他虽不知道邻国的战争与自己的国家有何种关系，但是部队向着战争的方向开进还是使他产生出一种冲动，他能够意识到的是：国家的边境此刻也许需要守一守，那么部队也许又需要他这个勇敢的老兵了。

曹玉海的口袋里此刻还揣着那个女护士写给他的信：

玉海，我亲爱的：

一想到你要离开我，我的心就像撕裂了一样！

自从见到你，我才晓得一个人应该怎样生活。但，我毕竟还有些过于注意个人幸福，你的批评是正确的。你说得对：“我不是不需要幸福，我不是天生愿意打仗，可是为了和平，为了世界劳动人民的幸福，我就要去打仗了。”

谁知道什么时候能相见，但我要等待，等待，等你胜利归来。我为你绣了一对枕头，请带着它，就像我在你身边一样……我想总会有点儿时间的，亲爱的，千万写信来，哪怕只是一个字也好……

那对枕头是白色的，上面绣着四个字：永不变心。

曹玉海真的在武汉茫茫人海中找到了自己的老部队，这支不久后即将走向战场的部队让曹玉海再次成为一营营长。

在部队继续向北走去的时候，曹玉海拿出女护士的照片给他的战友姚玉荣看。姑娘的美丽令姚玉荣羡慕不已。他问：为什么不结了婚再走？曹玉海答：万一死了多对不住人家。姚玉荣狡猾地试探：是不是不太喜欢她？曹玉海的脸一下严肃了，他说：死了我也恋着她！

距离曹玉海在武汉阳光灿烂的街头寻找老部队八个月后，经过一场漫天风雪中空前残酷的肉搏战，一营营部被美军士兵包围。曹玉海在电话中只对团长孙洪道喊了句“永别了”，便带领战士强行突围。数粒美制M1步枪子弹穿透了他的胸部和腹部。曹玉海倒下的地点是朝鲜中部汉江南岸一个地图标高为二百五十点三米的荒凉高地。他挣扎了一下便一动不动了，喷涌而出的热血很快在零下二十摄氏度的低温中与厚厚的积雪冻结在一起。

一营营长查尔斯·布雷德·史密斯感到非常疲劳。二十五日是他所在的美军第二十四步兵师的创建纪念日。师司令部在这天晚上举行了盛大的化装舞会，全师官兵都很兴奋，不少士兵把自己化装成白鹤——这是他们长期驻扎在日本的缘故——白鹤长长的红嘴到处乱戳着这个嘈杂而喧闹的不眠之夜。此时，他们没有一个人听得见隔着日本海传来的炮声，甚至连师长迪安在接到电话后的惊慌神色也没有人注意到。一营所在的二十一团，驻扎在日本九州熊本附近的伍德兵营，史密斯自从那天开始就一直头痛。几年前，这个年轻军官应该说前途是光明的，当他从西点军校毕业后，他就指挥着一个连。日本人袭击珍珠港时，他奉命在巴伯斯角紧急构筑阵地，当时他的指挥官柯林斯将军认为他是个“很不错的军官”。作为一名步兵军官，他一直作战到南太平洋战争结束。而现在，长期驻扎在日本的百无聊赖的日子让他烦透了。史密斯知道远东又一次爆发了战争，是在几天后的一个晚上。

他的团长理查德·斯蒂文森在电话里的语气十分急促：情况不妙，快穿上衣服，到指挥所报到。史密斯的任务是立即率领他的部队乘飞机进入朝鲜。当史密斯吻别妻子的时候，窗外风雨交加，漆黑一团，拿他的话讲是“上帝在为我们的爱情哭泣”。军用卡车在雨夜里向机场驶去，史密斯对他要去朝鲜参战迷惑不解。美国作家约瑟夫·格登后来写道：“史密斯并不知道——但肯定怀疑——他被派去执行一项等于自取灭亡的使命。”美军第二十四师二十一团一营的士兵是第一批到达朝鲜战场的美军士兵。

查尔斯·布雷德·史密斯以在朝鲜战争中第一支参战的美军部队指挥官的名义在战史中留下了他的名字。然而他的部队在第一仗中就在北朝鲜军队的攻击下立即溃不成军，以至于他不顾美军的军事条令，把伤员和阵亡士兵的尸体遗弃在阵地上落荒而逃。查尔斯·布雷德·史密斯还是美军在朝鲜半岛西线打仗打得最远的指挥官，他说他“几乎看见了中国的土地”。确实也就是“几乎”，当他看见一位澳洲营长的大腿在爆炸声中飞上了天空的时候，他和他的士兵立即从“几乎看见了中国的土地”的地方掉头就往回跑。朝鲜战争的史料中没有查尔斯·布雷德·史密斯阵亡的记录。如果他现在还活着，应该是八十七岁的老人了。不知道他后来是否看见过真正的“中国的土地”。

曹玉海和查尔斯·布雷德·史密斯，一个黑眼睛和一个蓝眼睛的军阶很低的年轻军官，他们在朝鲜战争中都有值得叙述的故事，尽管今天很少有人记得他们。

战争发生在一个叫朝鲜的国家，但战事必须从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和一个普通的美国人开始叙述，这就是历史。

素有“晨谧之邦”美称的朝鲜在公元前不久就有了文字记录的历史，但是战争却是这一历史始终的主题。由于居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朝鲜不断受到强国的占领和践踏。这个国家最奢侈的愿望仅仅是能够

安静地独处世界一角，以享受苍天赐予它的优美的情歌和优质的稻米。为了这个愿望，在十七世纪一段没有强国侵入的短暂时光里，朝鲜国王甚至下过一道禁止百姓开采白银和黄金的旨令，为的是减少强国对这个国家的兴趣。然而，这个“隐士般的国度”始终没能实现它和平的愿望。一八六六年七月，一艘叫做“舍门将军”号的美国船闯入朝鲜大同江，向这个国家索要财物，扬言不给就炮轰平壤。美国人没有想到这个和善的民族竟能如此激愤，在平安道观察使朴圭寿的率领下，朝鲜军民烧毁了美国人的“舍门将军”号。五年后的一天，五艘美国船再次进入朝鲜海域，与所有强盗的逻辑一样，要求赔偿“舍门将军”号的损失，并且要求“缔结条约”、“开放口岸”，否则就动武。结果，在朝鲜人民的奋起抗击下，美国人落荒而逃。如今，在朝鲜的历史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块“斥和碑”，上刻“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十二个大字，下面的一行小字是“戒我万年子孙”，另一行是“丙寅作辛未立”。

朝鲜是半岛国家，南北直线长约八百多公里，东西最宽处约三百多公里，面积约二十二万多平方公里。半岛的南部气候宜人，是丰产的农业区；半岛的北部山林茂盛，矿产丰富。朝鲜地扼东亚交通咽喉，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具有不可忽视的战略意义，它犹如一块伸向日本海的跳板，既是强国入侵远东的最便捷的必然途径，又是抵制入侵的天然桥头堡垒。

北纬三十八度线，横穿朝鲜半岛中部。

这条三十八度线，是这个国家最不幸的象征。一八九六年，俄国和日本为争夺对这个国家的统治权而交战，战争的结果是双方划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从而将朝鲜半岛分割为两半，分割线便是北纬三十八度线。后来日本人赶走了俄国人，把整个朝鲜半岛吞并为自己的殖民地。一九四二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将朝鲜变成了日本领

土的一部分，归自治省管辖。一九四三年，在德黑兰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告诉苏联元帅斯大林，朝鲜“还不具备行使和维持一个独立政府的能力，而且……他们至少应该经过四十年的监护”。于是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以及中国的蒋介石在共同签署的一份公报中，对这个国家的前途表示出强权的怜悯：“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役待遇，决定在相当的时期，使朝鲜自由独立。”到了一九四五年雅尔塔会议时，美国总统罗斯福虽身缠重病，但他依然清醒地意识到，随着日军的覆灭，长期被日本占领的朝鲜半岛将出现政治上的真空。对于美国人来讲，他们不认为凹凸不平的朝鲜半岛对美国在战略上有多大的意义，在整个远东，他们占领日本本土已经足够了。但是，美国却无时无刻不在关心苏联的势力划分到了哪里。为了促使苏联对日本宣战，罗斯福和丘吉尔向斯大林作出的让步包括同意由美国、英国、苏联、中国四大国“共同托管”朝鲜。朝鲜再一次成为强国政治的一件抵押品。美国虽然并不觊觎朝鲜，但它坚持在朝鲜插手的理由却值得注意，因为它既是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冷战开始的信号，也是未来美国涉足朝鲜战争的最根本的原因，即“美国在朝鲜没有长远的利益，他所希望的是朝鲜成为阻止苏联进攻日本的缓冲地带”。朝鲜战争爆发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道：“国务院极力主张在整个朝鲜的日本军队应由美国受降。但是，我们要是以必要的速度把军队运送到朝鲜北部，那就无法保证我们在日本抢先登陆。”美国人当时的真正想法是：全朝鲜有那么多日本兵，要是去占领“可能遭到重大伤亡”，还是让苏联人去承担吧，美国等着坐收渔利就可以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尚武，交给他一份苏联对日宣战通告。九日零时，百万苏联红军从各个方向突入中国东北，对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与此同时，苏联的几个红军师越过中国东北边境，向朝鲜半岛急速推进。到了这个时候，世界上也就没人知道这些红军战士会在朝鲜的什么地方停下来了。波茨坦会议并没有明确在朝鲜的国土上哪里是美苏双方都

认可的占领分界线。当美国人听说苏联军队已经进入朝鲜半岛时，他们开始有了最隐秘的担忧。因为在这一天，距离朝鲜半岛最近的美军还远在几百公里以外的冲绳岛上。

“应当在朝鲜整个地区就美国和苏联的空军和海军的作战范围划一条界线。”美国总统杜鲁门说，“至于地面上的作战和占领区域，没有进行任何讨论，因为当时没有人想到，不管是美国的或者是苏联的地面部队，会在短期内进入朝鲜。”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晚上，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在五角大楼召开紧急会议，磋商如何不让苏联在远东占到便宜以及如何保护美国在远东的利益。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的参谋人员中，有一位叫迪安·里斯克的年轻上校，他指出既然没有可以立即投入使用的部队，加上时间和空间上的因素，抢在苏联军队前面进入朝鲜是不可能的。国防部长助理让迪安和另一位上校参谋到隔壁的第三休息室尽快搞出一个“既能满足美国的政治意愿，又符合军事现状的折中方案”，并且“要在三十分钟之内搞出来”。两位年轻的职业军官在休息室里面对着朝鲜地图发呆，因为在这之前他们从没有关注过这个遥远的国家。此时，迪安根本不曾想到自己的一生将从此和朝鲜打交道，而且因为朝鲜的战事他将从此官运亨通。迪安的目光在朝鲜半岛狭长的版图上尽可能中间的部位搜索着——“如果我们提出的受降建议大大地超过了我们的军事实力，那么苏联就很难接受。”于是，他设想按朝鲜的行政区域划分出一条界线，提供给美苏首脑们去辩论，但此刻迪安面前的朝鲜地图上没有行政区的划分，而三十分钟的时间是有限的。迪安拿起一支红色的铅笔，干脆利索地在面前的朝鲜地图上画出了一条直线，这条线和四十九年前日俄分割这个国家的那条线完全一致：北纬三十八度线。

一个完整的主权国家，就这样被一个从来没有到过朝鲜的年轻的美国参谋在三十分钟的时间里分割成了两半。

再一次分割朝鲜的迪安·里斯克后来在朝鲜战争中任职亚洲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再后来他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中登上了美国国务卿的高位。

让美国人意外的是，斯大林没有对这条线表示反对。苏联第一远东方面军南翼部队在太平洋舰队的配合下，迅速切断了日本关东军与日本本土的联系，自十日起相继占领了朝鲜北部的雄基、罗津、清津、元山等港口，十九日攻占平壤。然后，打击占领朝鲜半岛的日军的苏联红军停止在了三八线上。

在进攻朝鲜半岛的苏联红军中有一支朝鲜部队，这支朝鲜部队的司令官名叫金日成。

苏联红军占领平壤二十天后，美军第六、第七、第四十步兵师在朝鲜南部的仁川、釜山港登陆。尽管美国人知道这次军事行动只是去接受投降，无异于坐收苏联红军的胜利成果，但他们还是为这次登陆行动取了个诡秘的代号："黑名单"。

从仁川登陆的美军不停顿地行军，最终到达了北纬三十八度线。

在时间上占据优势的苏联军队停止在三八线上，他们等来的是最高司令官名叫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美国军队。美苏两国的士兵在三八线上举行了一个联欢会，美军跳的是踢踏舞，苏军跳的是马刀舞。美国兵对粗壮的哥萨克人能用脚尖疯狂地旋转身体惊讶不已。

美国人是在事后才后悔的，早知道斯大林不反对，还不如把分界线往北移动一下，划在北纬三十九度线上，这样，中国的军港旅顺就在美国的势力范围内了。可是，北纬三十八度分界线已经存在了。

北纬三十八度线斜穿朝鲜国土的长度约为二百五十多公里。它是完全忽视了政治、军事、经济等诸多因素而臆造出来的一条分界线。它从不同角度分割了这个国家数座高高的山脉，截断了十二条河流、二百多条乡村道路、八条等级公路和六条铁路，当然，还有正巧横跨在这条线上的无数绿色的村庄。从它再次产生的那一刻起，世界上的强国都意识到，远东这个被分割为两半的国家，必定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依旧需要士兵生命的地方。尽管这个国家山脉奇多而险峻，“把那些巨大褶皱展开的面积可以覆盖整个地球”，是“世界上最不适宜大兵团作战的少有的地区之一”。

四年零十个月后，已经是助理国务卿的迪安·里斯克作为尊贵的客人被邀请参加美国新闻俱乐部举办的一个晚宴。“夜色很美，星空下，凉台上，人们谈兴很浓。”《纽约先驱论坛报》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回忆道，“一个仆人打断谈话，让里斯克去接电话。几分钟后，里斯克返回凉台，脸色煞白如纸。但是，他还是找到一个恰如其分的借口匆匆地走了。我们议论说，肯定出什么大事了，那家伙是负责远东地区事务的。远东是什么鬼地方？”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在朝鲜是星期天，而在美国是星期六。杜鲁门总统决定在这个周末离开华盛顿。他最近的心情很糟糕，原因是国会的共和党人始终与他作对，几乎到了让他忍无可忍的地步，连华盛顿潮湿的天气都令他讨厌。他决定到密苏里老家过几天身边没有国会议员吵嚷声的日子。当然，作为总统，即使休假也要寻找一点儿事情来打扮勤勤恳恳为美国公众服务的形象，他接受了巴尔的摩附近一个机场落成典礼的邀请。实际上，他确实有一点儿很“私人”的事情要做，他想去格兰特维尤农场看看他的弟弟，他自己的农场也有点儿农活需要安排。“我打算为农场的住房造一道围栅——此举绝对没有政治目的。”杜鲁门临上专机时对国务院礼宾司司长伍德沃德说，“让那些政客们见鬼去吧！”

巴尔的摩机场落成典礼用了大约一个小时。杜鲁门在讲话中虽谈到发展航空事业的重要性，但讲话的大部分内容还是不失时机地在奚落他政治上的对手——那些与他处处为难的共和党人："假如我们听信了那些老顽固的话，那么我们现在肯定还在使用公共马车；对不起，一些主张公共马车的家伙仍然待在国会里……"后来的所有回忆录都注意到，杜鲁门总统在他讲话的结尾部分使用了一连串的"和平的未来"、"和平的目的"、"和平的世界"等字眼儿。而历史的真实是，再过几个小时，一场战争将来到美国面前。

杜鲁门回到家乡，吃过晚饭，一家人在图书室里谈天说地。这时，电话铃响了。

电话是国务卿艾奇逊打来的。艾奇逊也在周末躲到了他在马里兰州哈伍德农场的家中，那个害了共产主义恐惧症的麦卡锡议员对他的指责令他焦头烂额，他想回到家乡来好好睡个觉。晚上二十二点，他桌子上的白色电话铃响了。这是个越洋电话，对方是美国驻汉城大使约翰·穆乔，电话的内容是：朝鲜战争。艾奇逊的第一个反应是，派人去和联合国秘书长赖伊联系；第二个反应是，向正在度周末的总统通报。

杜鲁门在电话里同意艾奇逊的安排，但艾奇逊不同意总统连夜赶回华盛顿。"这样会引起全国的恐慌，"国务卿说，"况且，情况还没有搞清楚呢。"

杜鲁门怀着复杂的心情度过了一个多梦的夜晚。

第二天，像狩猎般蹲守在总统农场周围的记者们发现，总统上飞机时衣冠不整，神色慌乱，两个随行人员仅仅晚到了几分钟，总统便把他们扔在跑道上不管了。

二十六日晚上七点十五分，应总统的邀请，白宫和国防部的高级官员们与总统一起在布莱尔大厦共进了一顿白宫人员匆忙准备的晚宴。撤去餐具后，餐桌直接成了会议桌。会议通过了艾奇逊提出的三点建议：第一，授权美国驻远东军队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对南朝鲜提供必要的援助；第二，命令美国空军在美国使馆人员、侨民和滞留在朝鲜的美国公民撤离时，轰炸北朝鲜人民军地面部队；第三，命令美国第七舰队立刻开往台湾海峡，阻止中国大陆的共产党军队进攻台湾。——注意这个第三，这是一个至今仍让历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建议，它针对的是战争之外的一个刚刚成立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场发生在朝鲜的战争，与中国的台湾有什么联系？包括杜鲁门在内的美国高级官员们当时并没有想到，正是这第三条建议，使世界上从来没有交战过的两个大国卷入了一场死伤惨烈的空前残酷的战争。

中国的毛泽东没有星期天的概念。北京城中松柏掩映下的古代皇家园林里一个叫丰泽园的地方是他的家，同时也是他的办公室。他在那里读书、吃饭、散步，接见需要见他的人。除了出席必要的会议和外出视察，他很少走出那个中国式的幽静的院落。前几天，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他的一个十分有名的讲话，叫做《不要四面出击》，讲的是处理好各阶级、政党、民族各方面的关系，以孤立和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树敌太多对全局不利。毛泽东讲话的时候，肯定没有想到，仅仅几个月后，他所领导的中国不但要出击了，而且要出击到国境线以外了。

那天屋子里有点热，毛泽东让卫士把他夏天用的大蒲扇找出来，卫士给他的是一把新的蒲扇。中国的蒲扇是用一种名叫蒲葵的植物叶片做成的，卫士拿来的扇子还带着植物的清香。

毛泽东说：“去年的那把不是很好嘛。”

卫士说："那把坏了，扔了。"

毛泽东不高兴地自语道："那把还是很好用的……"

毛泽东面前的桌子上放的是这个新生的国家马上就要颁布的一部重要法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三亿一千万人口的解放地区进行土地改革，是新中国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这一法令明确规定了土地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实施方法。另一份文件是八天前以政务院名义发布的《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和暂行办法》。多年的战争给中国经济带来毁灭性的破坏，人民的温饱问题亟待解决，首先需要的是粮食。政务院决定拿出二十亿斤粮食来缓解燃眉之急，不知是不是杯水车薪。桌子上还有一份关于英国人查理逊和美国人托马斯伙同西藏摄政大札秘密组成"亲善代表团"打算去美、英等国请求外国势力支持"西藏独立"的调查报告。新中国成立以后，西藏反动势力企图"独立"的活动日益加剧，"这是一个严重的斗争任务"。当毛泽东接着看到西南军区一份关于匪患严重的报告时，他的心情开始沉闷了。建国已经几个月了，而分散在这个国家偏僻地区的原国民党散兵和土匪大约仍有四十万之众。西南军区的报告说，四川地区于二月，贵州地区于三月，云南地区于四月，土匪们开始骚动。这些土匪传播谣言，说蒋委员长马上就要打回来了，新政权长不了了。他们威胁群众、破坏交通、抢劫物资，杀害的政府和军队工作人员已达两千多人。经过半年的剿匪战斗，虽然歼匪大半，但还有不少漏网分子隐藏起来，这是新中国的心腹大患。

毛泽东走出房间，在院子里散步。初夏的北京，天色湛蓝，草色新鲜。丰泽园内苍翠的松柏树龄都在百年以上。毛泽东没走几步，就听卫士在身后轻声地说："毛主席，总理的电话。"

电话的内容是：朝鲜战争。

对于邻国发生战争，毛泽东并不感到意外。但是，由此带来的一个他曾经意料过的问题此刻还是让这位伟人陷入了深思，这就是：台湾。

## 台湾：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里一个阴霾的日子，蒋介石悄然登上美制“江静”号军舰，向中国东南方向大海中的一个岛屿——台湾——逃亡而去。

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失败已经是无可挽回的事实。抗日战争的胜利给这个国民党领袖带来的声誉，加之八百万重兵和美国先进武器的援助，曾经使他在三年前雄心勃勃地宣称“三个月到半年之内消灭共产党”。这时，他的军事幕僚以及他的美国盟友都以为，无论作战兵力还是武器质量都决定了蒋介石赢得战争胜利是势在必得。可是，他们完全忽视了一个似乎是纯军事学以外的因素，那就是发生战争的这块土地上人心的向背。战争终究是人的行为。在国民党政权统治末期，政治黑暗、官吏腐败、物价飞涨使整个中国民不聊生，国民党政权在中国百姓的心目中已经是灾难的代名词，加上割据各地的军阀由来已久的帮派角斗，在手持步枪的解放军以及跟随在他们身后的上百万民众的呐喊声中，蒋介石的百万精锐之师在一个又一个的战役中纷纷解甲。蒋介石曾经对横贯中国大陆中部的一条大江抱有近乎天真的幻想——五百里坚固防线，岸炮军舰如林以待。但是，大江岸边的穷苦百姓自愿划着木船在炮火中运送解放军横渡大江，结果是“长江天堑，一苇可渡”。当穿着布鞋的解放军战士冲进南京总统府中蒋介石豪华的办公室时，桌上的电话依旧可以使用。一位解放军将领坐在蒋总统的椅子上给北平西山上苍松环绕的双清别墅打了一个电话，毛泽东接完电话后，写下了一首至今依然令人荡气回肠的诗篇，其中的一句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中国共产党人要赢得解放全中国的胜利，逃往台湾的国民党军自然在“追穷寇”的范围之内。台湾不可能成为国民党残兵败将的苟且之地，解放军大规模的渡海作战和对台湾的最终解放，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已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对此，毛泽东胸有成竹，蒋介石则心有余悸，而远在地球另一端却硬要涉足远东事务的美国自然也看到了这一必然结局。

目前的问题仅仅是人民解放军渡过台湾海峡的时间表。

惊魂未定的蒋介石在被海水包围着的台湾岛上反复强调“台湾一定能守得住”。但是，蒋介石心里非常清楚一个军事上的简单事实：一百五十海里的台湾海峡在三百年前尚且阻挡不了郑成功的木船船队和手持冷兵器的兵勇，现在又如何能抵挡得住排山倒海的人民解放军？在福建沿海，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的几十万精锐部队、各种型号的船只皆在备战之中。最令人吃惊的是，装备很差的解放军竟然有了飞机！送到蒋介石手上的情报是这样描述的：“彼等所准备的空军，到民国三十九年（一九五〇年）已有飞机四百架”；“上海的龙华机场一度为我政府炸毁者，现已借助俄人之助，修复至可以使用”；“长江以南各地约有三十个空军基地，包括对日作战时英军修筑的若干基地，亦已恢复可供使用之程度”。此刻，在蒋介石看来，唯一可以救命的稻草是美国一如既往的援助，甚至是军事干预。但是，美国人的做法对在台湾岛上惶惶不可终日的蒋介石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当毛泽东在北京的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美国国务院也紧急召开了一个远东问题圆桌会议。会议确定了一个事实：蒋介石已经被永远地赶出了中国大陆，共产党军队很快就会占领台湾，时间最迟在一九五〇年的下半年。美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要尽快从中国脱身，结束与蒋介石政权的关系。国务卿艾奇逊甚至还主张，至少暂时不向国民党政权提供军事援助，而且也不应

该试图把台湾和中国大陆分离开。美国政府的态度十分明确：在不承认新中国的同时，也不再支持已经没有希望的蒋介石。但美国国会一部分参议员却主张继续支持台湾，他们不断地向杜鲁门总统施加压力。为此，艾奇逊出面对美国军方解释：美国必须承认，共产党人控制了全中国，国民党政权已经崩溃。即使按照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继续援助台湾，其效果最多是把台湾陷落的时间延迟一年，这对美国来讲太不合算了。为了说明如何“不合算”，艾奇逊十分耐心地列举了五点理由：一、会使美国再次卷入一场有世界影响的失败中，影响美国的威信；二、会把全中国人民一致的仇恨集中在美国身上；三、会给苏联提供在安理会上攻击美国的借口；四、会使美国在亚洲人民心目中成为那个腐败并且威信扫地的国民党政府的支持者；五、没有人认为台湾一旦落入共产党之手，会打破美国的远东防线。而这第五条理由，正是美国政府改变对台湾政策的最根本的原因。美国人意识到，台湾不值得他们付出这么高的代价，在台湾问题上，作为世界强国的美国眼光应该放远一点。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美国国务院发出第二十八号密令：《关于台湾的政策宣传指示》。文件确定了美国官方关于台湾问题的统一对外宣传口径；同时，文件确定了任何支持台湾的做法都是对美国利益不利的，都会使美国卷入一场危险的战争，都会使美国成为中国人民的对立面。文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它强调了一个至今依旧十分敏感的重要观点，即：台湾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地理上，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是不能够分割的一个整体的国家。

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杜鲁门代表美国政府发表《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再次确认《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协定》中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条款，宣布美国无条件地认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美国对台湾没有掠夺的野心。杜鲁门说：“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战中的途径，美

国政府也不拟对台湾的中国军队供给军事援助和提供意见。”基于这个声明，美国宣布从台湾撤走侨民，只在台湾留有一个领事级的代表，最高武官仅仅是一名中校。

杜鲁门决心看着蒋介石自生自灭了。昔日的“盟友”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毫不含糊地一刀两断，对此，杜鲁门和蒋介石两个人心里都有各自的隐衷。一九四八年，与民主党候选人杜鲁门竞争美国总统的是纽约州共和党州长杜威。杜威对社会主义充满仇恨，强调要增加对中国国民党军队的援助，主张派美国军事顾问到中国去帮助国民党改善军队素质，不带任何附加条件地给国民党政府十亿美元以支撑其灭亡在即的政权。大洋那一端的叫嚣让蒋介石感到格外兴奋，他除了捐助现金帮助杜威竞选之外，还特地批准定居在美国的孔祥熙以他私人的名义在竞选中为杜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并且委托国民党驻美大使顾维钧向杜威颁授了一枚吉星勋章。对此，杜鲁门知道得一清二楚。杜鲁门说：“他们使许多众议员和参议员听他们的吩咐，他们有几十亿美元可花。我不是说他们收买了什么人，而是说有许多钱在流动，有许多人按照院外援华集团的旨意行事。”可是，竞选的结果还是杜鲁门当选为美国总统。

为了向全世界表明美国“弃台”的决心，国务卿艾奇逊干脆公开了美国在远东的战略防线。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的演讲中，他面对记者展开一幅远东地图，然后用讲解棒比划着说：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防线确定为北起阿留申群岛，经过日本群岛，延伸到琉球群岛，再向南延至菲律宾群岛，台湾和朝鲜均在美国的防卫圈之外。换句话说，凡是在美国防卫圈之外的事情，美国不会去管。美国远东军事防线的公开，在全世界引起轩然大波，以至于在朝鲜战争爆发的三年中，艾奇逊不断地受到美国激进派的攻击，他们用艾奇逊证明麦卡锡议员曾经说过的一句惊人的话：美国国务院一大半的人是共产主义分子。

杜鲁门的声明和艾奇逊的演讲时间都是在一九五〇年初。

对于远东来讲，这是一个微妙的时刻。

尽管后来毛泽东针对杜鲁门一月五日的声明谴责美国说话不算话，但是当时杜鲁门的声明对北京来说无疑是一个安全的信号。

横渡台湾海峡的作战计划在毛泽东的脑海中已经成熟，现在需要关注的仅仅是军事上的准备和气象资料。全中国即将彻底解放的前景令毛泽东的那段时光显得特别美好，他神采飞扬地穿行于建国初期的各种会议间，一次次地操着风趣幽默的湖南乡音向人民描绘中国的蓝图，他说："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但是，在毛泽东舒畅的心情中还是有一块小小的阴影。作为富有远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多少预感到，在远东北部与中国相邻的朝鲜半岛上，战争的态势也许不可避免。毛泽东对此倍感不安，而这种不安被美国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加强了。美国国会反对放弃台湾的议员写出了分析一九五〇年初远东政治局势的文章，文章巨大的黑色标题字让美国人都心惊肉跳：杜鲁门邀请共产党进攻！

台湾，面积三万五千七百六十平方公里，人口六百万。日本占领期间留下一些工业基础，而大部分岛民世代以耕作农田为生。一九四九年，从大陆突然拥入的国民党军队使这个封闭的岛屿骤然紧张起来。物价飞涨，物资奇缺，而解放军马上就要进攻的消息和美国坚决的"弃台"政策使本已经混乱的岛屿更加惶惶不安。从大陆掠夺了不少金条的国民党显贵们开始设法再次出逃。台湾政权在"保密防谍"口号的伪装下禁止任何人出岛，大有要完蛋大家一起完蛋的架势，但却更加剧了全岛人心崩溃的进程。国民党撤退到台湾的号称六十万人的军队，其大半已是毫无斗志的散兵，飞机没有零件，汽油的库存仅够使用两个月，破旧的军舰有一半儿根本不能参加战斗。最后，连粮食都

成了问题。一九四九年，台湾的粮食产量比十年前少了十四万吨。分散在沿海各个小岛屿上的国民党士兵衣衫破旧，饥肠辘辘，在他们拟定的作战方案中，最详细的内容就是当解放大军到来的时候如何逃命。况且，绝大部分出逃士兵的家属亲人还在大陆，对父母妻儿的思念在风雨飘摇的时刻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与解放军打过仗的老兵们都知道，到时候把手举起来是最好的出路，那样解放军会发给几块大洋当回家的路费，这是早点儿离开这个岛屿的最好的办法。

一九五〇年，解放军渡海解放台湾最适宜的时间是在六、七、八这三个月内。因为，到了九月，台湾海峡就会进入台风频发的季节。而在六、七、八这三个月中，战役最有可能打响的时间是六月。

蒋介石盼望海上的台风早点来到，越早越好，最好是整年不停地刮。

但是，六月，当他特地来到台湾海峡的海边时，他看到的是蓝得像一块大玻璃似的平静辽阔的海面。此时，蒋介石的目光死死地向他出逃的那块大陆望去，他根本没有想到，就在这块大陆的北边，有一个叫朝鲜的国家，用不了多久，这个国家将与海峡那边的大陆命运攸关。此刻，缠绕蒋介石的问题只有一个：解放军什么时候打过来？

解放军缺少空海军力量。

在建国前夕的一九四九年七月，当解放军各主力部队正向这个国家的边缘地域发展战果的时候，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代表团出发到苏联去了。这个代表团携带着中共中央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信的内容是请求苏联出动空海军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攻台湾。在苏联，刘少奇向斯大林说明了中国准备一九五〇年解放台湾的设想，要求苏联提供两百架战斗机并代训飞行员。对于刘少奇的具体要求，斯大林很痛快地答应了；但是，对于中共中央在信中的请求，斯大林却没有首肯。

苏联不愿意在解放军攻打台湾的时候派出空海军参战，是担心美国一旦无法坐视而介入将可能诱发苏美之间的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四年之后，斯大林说：“苏联人民已经遭受了巨大的战争磨难，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这样做。”

毛泽东理解斯大林的顾虑。这个农民出身的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长期的战争中树立了一个影响了他一生的信念，那就是“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办自己的事情。毛泽东并没把苏联的援助视为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但是，当他接到福建沿海前线的战斗报告时，这个从来没有出过海的伟人开始有了忧虑。解放金门岛的战斗，由于渡海工具的简陋和渡海作战的难度，解放军伤亡巨大。沿海作战尚且如此，打到台湾去的难度就更可想而知了。毛泽东决定亲自到苏联去。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莫斯科最寒冷的季节，出生于中国温暖的南方的毛泽东乘坐火车横穿西伯利亚覆盖着茫茫冰雪的荒原，来到苏联的克里姆林宫。这是毛泽东一生中第一次离开自己的祖国。

中国共产党从她成立的那天起，就决心以苏联共产党为榜样，通过浴血奋战建立起像苏联一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苏联看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国民党控制着绝大部分地区，是中国的合法政府，而共产党还很弱小，居于中国偏僻地区的一些角落。因此，在抗日战争期间，苏联把对中国的援助绝大部分给予了国民党。直到一九四八年，共产党的军队奇迹般地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消灭了国民党正规军一百四十四个师，加上非正规军二十九个师，总人数在一百五十四万以上时，苏联人才不禁大吃一惊。苏共中央派米高扬到当时中共中央的驻地西柏坡，来探究中国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米高扬回到苏联后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阶层是由一群精通马列主义的极其有能力的精英所组成，国民党的失败是一种必然。但即使在这种

情况下，苏联还是提出共产党与国民党“划江而治”。苏联的担心是：一旦解放军渡江解放全中国，美国就会参战，从而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把苏联也拖进去。结果却是，解放军一直打到了国民党的总统府，美国人没管也没救。

在刘少奇访问苏联的时候，斯大林已经知道不可轻视中国共产党人。他曾这样问刘少奇：“我们是否妨碍了你们？”刘少奇回答：“没有。”斯大林还是说：“妨碍了，妨碍了，我们不大了解中国。”

不大了解中国的斯大林，怎么可能了解毛泽东？

毛泽东率领的代表团是庞大的，名义上是来参加斯大林七十寿辰庆典。但是，毛泽东到达莫斯科后，苏联方面没有马上安排毛泽东与斯大林会面，以至后来见到斯大林的时候，毛泽东说：“我是个长期靠边站的人。”在与斯大林的会谈中，毛泽东主张搞一个中苏“友好条约”，拿他的话讲，就是搞出一个“既好吃又好看的东西”，但斯大林认为签订这样一个条约会违背《雅尔塔协议》。毛泽东坚持要签订这个条约，表示这件事不做好他就不离开苏联。毛泽东之所以能耐下心来身居异国他乡长达几个月，台湾问题是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第一次会见斯大林的时候，便把希望苏联援助解放台湾的事提了出来，但得到的却是斯大林十分含糊的回答：“这样的援助不是没有可能的，本来是应该考虑这样做的，问题是不能给美国一个干涉的借口。如果是指挥和军事人员，我们随时都可以派给你们，但其他的形式还需要考虑。”斯大林甚至还说出这样的话：“是否可以先向台湾空投伞兵，组织起暴动，然后再进攻呢？”斯大林不想也不能破坏苏、美、英三国在雅尔塔会议上对战后远东政治格局划分的共同承诺。也许就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对苏联的对立和对美国的蔑视同时产生了，而正是这两点，对未来爆发的朝鲜战争的规模、发展和结局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当毛泽东还在莫斯科的时候，杜鲁门一月五日的《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发表了。后来的史学家认为，这是一份让斯大林“解放思想”的声明。因为既然美国人主动放弃了在雅尔塔会议上划定的势力范围，公开声明美国不管那么多“闲事”，那么苏联还有什么可需要小心翼翼的？再说，当初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即将崩溃的时候，美国都没有武力干涉，那么现在他们还会在乎那个小小的台湾吗？斯大林的态度立刻有了转变。于是，原来不想签订的条约签订了，名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援助中国解放台湾的事情也有了着落：斯大林同意“在适当的时候为解放台湾做必要的准备”，“给予中国三亿美元的贷款”，其中的一半用来购买解放台湾用的海军装备。不过，直到最后，斯大林也没有同意苏军的飞机和军舰参加解放台湾的战斗。

解放台湾的军事准备在乐观的气氛中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就在毛泽东在莫斯科的时候，还有一个异国的年轻人也在莫斯科，他对斯大林提出的问题和毛泽东的问题几乎是同一个性质。斯大林没有告知毛泽东关于这个人提出的问题，仅仅是在一次会谈中，当谈到把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籍干部战士全部移交给北朝鲜时，才算是快要接触到那个年轻人的事了，然而斯大林只与毛泽东谈论着中国的问题。当毛泽东谈到中国的邻国朝鲜时，他强调朝鲜北方应该对南朝鲜随时可能发动的进攻保持高度的警惕，并采取积极防御的态势。但此刻在毛泽东的心中，新中国最迫切和最重要的问题是解放台湾。

与毛泽东同在莫斯科的人是金日成。

金日成来到苏联，是向斯大林表达他渴望朝鲜统一的焦灼心情。

曾在中国东北寒冷的丛林里、在苏联远东部队的军营里饱受战争磨难的金日成英俊而高大，他的游击队曾让朝鲜国土上的日本人胆战

心惊，他虽年轻但已位居朝鲜军队的将军，在远东多年的转战让他自信而果敢。

苏、美两国在朝鲜实施“托管”之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专门讨论朝鲜问题的会议。会后发表的公报十分清楚地阐述了朝鲜的前途：“为使朝鲜成为独立国家，苏美两国政府协商组成临时朝鲜民主政府，并协同这个政府，帮助朝鲜人民在政治、经济、社会上进步，尽快建成统一的独立国家。”至少从理论上看，朝鲜的前途是光明的。根据这份公报的精神，一九四六年三月，由驻扎在朝鲜南部的美军司令部和驻扎在朝鲜北部的苏军司令部代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成立。但是，随之而来的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立在朝鲜问题上不可掩饰地暴露出来。于是，一个“统一的独立国家”仅仅成了文件中的一句话，朝鲜实际上仍被一条戒备森严的铁丝网分成南北两个部分。

苏联军队进入北朝鲜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苏联红军宣告：“朝鲜已经成为一个自由的国家。苏军将在和朝鲜的一切反日的民主政党广泛合作的基础上，帮助朝鲜人民建立自己的民主政府。”显然，苏军的这个承诺得到了渴望独立与自主的朝鲜人民的拥护。一九四五年十月，朝鲜共产党北方组织委员会成立。第二年，北朝鲜共产党和朝鲜新民党合并，成立了朝鲜劳动党。一九四六年初，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成立，它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机关。人民委员会公布了其政治纲领：肃清一切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残余，镇压反动势力的活动，保证人民的民主和自由权利，对交通、银行、矿山等大企业实行国有化，没收日本人、卖国者、地主的土地无偿分配给农民，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为彻底完成民主革命、巩固和加强朝鲜北部民主基地而斗争。这是一个彻底的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体系的政权，它的领导者是人民委员会委员长金日成。

一九四六年三月五日，北朝鲜的土地改革开始。日本占领期间的日本企业、日朝合资企业、寺院和教堂的财产、地主占有的面积在五町步（一町步等于一公顷）以上的土地，全部被没收。有七十万以上的农民无偿得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土地。殖民地和封建制的经济基础被摧毁，农村的生产力得到空前的解放。这是贫苦者的节日，是剥削者的末日。金日成收到的农民的感谢信就有三万多封，其中有几十封信是用血写的。同时，重要的企业全部被国有化，从而保证了社会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为恢复战争创伤和民族经济起到巨大的作用。人民委员会还颁布了一系列社会改革法令，使人民感受到国家的天空阳光空前明媚。

在南朝鲜，从美军“托管”的第一天起，它的经济和政治便陷入混乱之中，其程度远远超出远东美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的预料。

美军在朝鲜登陆的第一天，即一九四五年九月八日，麦克阿瑟颁布的第一条通告是：“对朝鲜北纬三十八度以南地区及该地区居民的一切政府权力，目前暂由本人行使。”接着，他制定了一系列让南朝鲜人民愤怒的条款，其中一条是：原日本殖民政府人员继续留职履行公务。可是日本在朝鲜的残酷统治不是结束了吗？还有一条是：在军事管制期间，英语为官方通用的语言。难道解放了的朝鲜连自己的语言都不能通用吗？美军奉麦克阿瑟之命，解散了南朝鲜已经建立起来的人民委员会，恢复了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所有机构，军政各级官员一律由美国军官担任，宣布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一切法律有效，日本殖民统治者的财产全部归美军所有。据当时有关的统计数字披露，美军把南朝鲜工农业总资产的百分之八十都在“托管”时期装入了自己的腰包。

美国人把美国式的民主带给了南朝鲜，南朝鲜一下子冒出各色各样的政党，最多的时候达到一百一十三个。这些政党大多是政治上的

老冤家，谁也不愿意与谁有一丝合作，拿麦克阿瑟自己的话讲，“这简直就是一场灾难”。麦克阿瑟一生的经历表明，他既是叱咤风云的一代战将，又是国际政治中典型的低能儿。他把美军占领日本的那一套用在了南朝鲜，他甚至从来没有想到，朝鲜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二战后都与战败国日本的政治地位完全不同。在战败的结局中惊魂未定、让原子弹炸得惊恐万状的日本人可以把麦克阿瑟视为社会法制的统治象征，但朝鲜对这个美国军官没有任何可以屈从的理由，朝鲜人民渴望的是结束外国的统治建立自己的国家。于是，仅一九四六年间，大规模的示威、抗议、罢工、罢课等活动从年初到年尾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席卷了南朝鲜的七十三个郡。美军出动骑兵和坦克镇压，结果使矛盾更加激化，以致到了十月，大丘爆发武装起义并持续两个月之久，成为南朝鲜历史上著名的“十月抗争”。

麦克阿瑟的继任者李奇微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承认：“美军的军事占领政策和措施不得人心，失去了朝鲜人民的信任与合作。”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七日，苏联在第二届联合国大会上提交了两项议案：一是邀请南、北朝鲜的代表参加联合国讨论朝鲜问题的会议；二是提议苏、美两国于一九四八年初同时自北、南朝鲜撤出军队，让朝鲜人民建立朝鲜的全国政府。结果，两项议案均遭美国否决。

实际上，美国的真实想法是尽快从南朝鲜脱手。原因不仅仅是南朝鲜已经成为美军的政治泥潭，同时还因为美国国内的反战呼声日益高涨。美国国会秋季会议开始的时候，议员们收到了成百上千双鞋，大多数是美军家属送来的。“战争不是已经结束了吗？让小伙子们回家吧！”日本投降的那一天，美国尚有一千二百万青年男女仍在军队服役。到了一九四七年，美国国会两院拨款委员会规定，所有军种加在一起，美国军队的总人数不得超过一百六十万。同年，国防开支也从八百二十亿美元锐减至一百三十亿美元。理由很简单：世界大战打完

了，美国纳税人没有必要养活那么多穿军装不干活的人。基于这一点，十一月十四日，美国利用它在联合国的特殊地位，强行通过了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决议决定由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国民党政府）、萨尔瓦多、法国、印度、菲律宾、叙利亚和乌克兰九国的代表组成“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派驻朝鲜“监督进行议会选举”，“成立朝鲜全国政府和建立武装力量”。表决时，苏联、白俄罗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的代表拒绝投票，乌克兰则宣布它不参加这个“委员会”。

当其他国家决定朝鲜命运的时候，北朝鲜领袖金日成建议召开一个由“南、北朝鲜所有民主政党、社会团体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作为实现祖国统一的当前措施之一”。一九四八年，会议召开了，南、北朝鲜五十六个政党共五百四十五人参加了会议，其中的二百四十人来自南朝鲜。会议反对南朝鲜单独举行选举，致电美、苏两国撤走军队，让朝鲜人民在没有任何外部势力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命运。会议的联合声明称：“绝不承认南朝鲜单独选举的结果，也绝不承认和支持这一选举所产生的单独政府。”

美国人很清楚，如果按照金日成的建议去做，统一朝鲜的只能是强大的、组织严密的、受到绝大多数人拥护的共产党政权，而这是美国人绝对不愿意看见的局面。于是，一九四八年五月，在美国人的操纵下，南朝鲜的选举终于举行。之后，国民议会通过了《大韩民国宪法》。八月十五日，大韩民国政府在汉城成立。麦克阿瑟将军参加了大韩民国总统的就职仪式，这个总统名叫李承晚。

李承晚，一八七五年四月二十六日生于朝鲜黄海道平山郡一个富有家庭，从小受外国教会的教育。二十三岁时因参与革新政治的活动被关押八年。出狱后到了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国际法博士学位后回到朝鲜，当上了中学校长，并参加了民族独立运动。一九一九年当

上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总统。但是，由于他向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美国“托管”朝鲜的建议，加上他有贪污旅美侨胞捐献的“独立基金”的嫌疑，不久便被赶下台。日本占领朝鲜后，他流亡美国。三十年后，当麦克阿瑟进入南朝鲜时，他还不知道世界上有李承晚这么个人。麦克阿瑟的亚洲问题专家对李承晚的评价是：“一个爱挑剔的老头。”美国《芝加哥太阳报》记者马克·盖恩的说法则更为尖刻：“这是一个阴险狡猾的危险人物，他不合潮流，迷迷瞪瞪地撞进这个时代，运用陈腐观点和民主机制达到荒谬绝伦的专制目的。”李承晚离开朝鲜后自封的各种头衔，让美国人听起来都将信将疑，后来的杜鲁门总统曾明确拒绝承认李承晚的“流亡临时政府”，因为他知道承认李承晚就会“背离由朝鲜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政体和政府的原则”。

但是随着美军在朝鲜半岛登陆，麦克阿瑟急于寻找一个朝鲜人作为美国利益的代言人。他到处打听有什么合适的人选，最后打听到了蒋介石的头上。蒋介石并不认识李承晚，但是，一个名叫金久的朝鲜人是蒋介石的朋友。金久曾长时间地居住在中国，成为蒋介石的座上客，深得蒋介石的友情。金久知道李承晚是“流亡临时政府”的总统，消息经过他的传播，许多在中国的富裕的朝鲜商人特别推荐了李承晚。于是，麦克阿瑟请金久和李承晚来到汉城。当着金久的面，麦克阿瑟这位“亚洲的太上皇”表示，让李承晚担任南朝鲜的统治者。为了把戏演得更真切，麦克阿瑟专门举行了一个“欢迎李承晚回到汉城”的仪式，以便让“全朝鲜人民看看自己的领袖”。两年以后，当朝鲜战争爆发时，麦克阿瑟饱尝了他精心选来的李总统的刁钻古怪。

一九四八年，李承晚七十三岁。

大韩民国成立一个月后，北朝鲜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金日成当选为首相。

至此，在远东的朝鲜半岛上，同一个国家和民族，出现了两个意识形态截然对立的政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而导致分裂的国家有两个：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朝鲜。德国是二战中侵略国的核心，是美、苏盟军的敌人，它的分裂始发于战争胜利各方对战败国的占领。而朝鲜作为一个德、意、日法西斯统治的受害国，为什么也落得与德国一样被分裂的结局？没有人，包括苏联人和美国人，会认为这样的一个朝鲜半岛将平安无事。“战争是早晚的事。”美国驻南朝鲜大使约翰·穆乔说，“说不定就在哪天早上。”

一九四七年九月，美国陆军副参谋长魏德迈中将曾受杜鲁门总统委托到南朝鲜视察，他回国后提出的报告是：一、美军立即撤出；二、美军无限期地留下去；三、美军与苏军同时撤出。面对魏德迈的报告，参谋长联席会议从全球战略的角度出发认为：“美国所可能希望在亚洲大陆进行的任何进攻，多半会绕过朝鲜半岛。”一旦朝鲜被苏联控制从而对美国在远东的军事行动构成威胁，美国也可以依靠空中打击消除这种威胁。况且空中打击比地面作战要更容易。于是，杜鲁门总统决定，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从南朝鲜逐次撤军，但同时扩大对南朝鲜的军事援助，以维持李承晚政府的存在。

一九四八年底，为了迫使美国从南朝鲜撤军，苏联首先从北朝鲜撤军。

苏军撤出后，朝鲜半岛的局势骤然紧张起来。

美军在撤离之前向李承晚政权提供了价值一亿九千万美元的武器装备，其中美制和日制步枪十五万多支，各种火炮两千多门。美军还动用八十五万人，扩宽了仁川到汉城、汉城到釜山以及经过金浦机场和横断三八线的战备公路，扩大了以金浦机场为中心的飞行基地，并

花费巨资改造了仁川、浦项、丽水等港口，在木浦、墨湖等地修建了海军基地。在所有重要地区修筑半永久性军事设施的同时，美军还帮助南朝鲜沿着三八线构筑起几百公里的战壕和交通壕。南朝鲜的扩军计划更是随之达到高潮，李承晚声称要在两年内建立一支十五万人的国防军。他颁布的《兵役法》规定，凡是十七岁到六十岁有劳动能力的南朝鲜男人，都在服兵役的范围之内。为此他向美国既要钱又要物，胃口之大令杜鲁门总统感到了“过分”。

李承晚毫不掩饰他“北进统一”整个朝鲜半岛的企图。他一次次拒绝北朝鲜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扬言“南北分裂是必须用战争来解决的”。为了解决战争一旦爆发后的“后院”安全问题，李承晚对南朝鲜人民游击队和爱国人士进行了大规模的讨伐。一九四九年，李承晚认为他的军事准备已大致成熟。四月，他在给南朝鲜驻联合国特使赵炳玉的信中说：“我认为，就这种形势，你应该极其秘密地与联合国以及美国高级官员开怀畅谈。为了统一，除了缺乏武器和弹药外，我们在其他方面都已经准备就绪。”七月，李承晚向记者发表谈话，表示“占领北韩就可以实现统一”。十月，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又说：“要不流血，统一独立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使实现了也不会长久。”一九五〇年初，李承晚在新年祝辞中称：“我们应该记住，在新的一年中，我们用自己的力量必须统一南韩和北韩。”二月，他率领军界高级官员前往东京，当面向麦克阿瑟汇报他的军事准备计划。四月，集结在三八线附近的南朝鲜部队得到了直属炮兵和其他技术兵种的加强。同时，为配合南朝鲜的“北进统一”，美国的高级军事官员，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海军作战部长谢尔曼、空军参谋长博格等人先后到达日本，以加紧美军在远东地区的军事部署。其中，美军第七舰队增加了两艘航空母舰、两艘巡洋舰和六艘驱逐舰；美军空军的三个B-26和B-29轰炸机联队、六个歼击机联队、两个运输机联队都集中在了日本的军事基地。

在远东，战争的机器已经开始运转。

对于南朝鲜的军事准备，金日成始终处在高度的警觉中。同时他也忧心忡忡，因为这个时候，金日成手上能够作战的部队只有武器装备不足的三个师，而在李承晚的身后是拥有美式枪支的八个师。出于安全考虑，金日成两次向斯大林提出缔结《朝苏友好互助条约》的请求，并要求苏联给予北朝鲜军事援助。斯大林答应给予北朝鲜必要的军事援助，但没有明确具体的答复。

一九四九年五月，金日成的秘密特使在当时北平西山的双清别墅里见到了毛泽东。特使向毛泽东介绍了朝鲜半岛一触即发的战争局势之后，毛泽东表示他同意金日成在信中的看法：朝鲜半岛的冲突在所难免。“对你们来说，持久战是不利的，因为即使美国不干涉，也会唆使日本向南朝鲜提供战争的援助。”毛泽东这样分析，“你们没有必要担心，中国和苏联站在你们一边。一旦情况需要，中国会派军队与你们一起并肩作战。”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向金日成表示，如果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可以出兵参战。为了帮助北朝鲜加强防御，毛泽东甚至把人民解放军中的两个朝鲜师移交给了金日成。但关于目前的朝鲜局势，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希望看见战争立即爆发。原因一是国际形势不允许；二是中国共产党还不能有效地支持北朝鲜。而“一旦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任务，情况就不同了”。

毛泽东所说的“统一中国的任务”，就是指台湾岛的解放。

与不甚熟悉、甚至一开始就存在隔阂的毛泽东相比，斯大林对包括金日成在内的北朝鲜领导人更加信任，这也许和金日成在苏联远东军中作过战有一定关系。面对南朝鲜的大规模军事准备态势，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金日成更加强烈地意识到：朝鲜共产党人统一祖国，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自己当然的责任。但是，斯大林依旧对朝鲜半岛一旦爆发战争的后果感到担忧，理由是“美国在中国

失败后，可能会更加直接地干预朝鲜事务”。那么一旦北朝鲜置身于战争，不但军力上不占优势，还会在政治上让“美国有了武装干涉朝鲜的借口”。

然而，就在这时，艾奇逊国务卿把那个将朝鲜和台湾都划在之外的美国远东防线摆在了全世界的面前。金日成立即再次向苏联方面提出自己的统一计划。这一次，斯大林不能不考虑了。应该说，在朝鲜和台湾这两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中，更让斯大林忧心的是朝鲜。与和苏联的安全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台湾相比，朝鲜的地理位置一直是苏联在远东与日本抗衡的重要战略点。况且，金日成要的仅仅是武器装备，而不是苏联士兵。至于美国可能的干涉，既然艾奇逊说得那么明白，担心也许是不必要的。一九五〇年一月八日，斯大林向苏联驻北朝鲜大使发了一封电报，表示他同意向金日成提供援助，并准备随时就此事接见金日成。三月三十日，金日成再次秘密访问莫斯科。苏联对北朝鲜的援助是以有偿方式进行的：北朝鲜以九吨黄金、四十吨白银和一万五千吨其他矿石，换取苏联价值一亿三千八百万卢布的武器装备。这些装备可以武装起三个步兵师。斯大林在听取了北朝鲜完整的作战准备计划后，表示很满意。最后，斯大林告诉金日成：应该把计划通报给毛泽东。斯大林坚持让金日成征求毛泽东的意见。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三日，在距金日成和毛泽东同在莫斯科会见斯大林近半年后，在距朝鲜战争爆发只有一个月零十二天的时候，金日成到达北京。那时，北朝鲜人民军的数量已经超过南朝鲜军一倍。毛泽东没想到金日成的作战准备计划已经如此完备。当时，新中国在北朝鲜还没有派驻大使，也没有军事观察人员，毛泽东对金日成所做的一切了解甚少。此刻，毛泽东得知，苏联将给予金日成一定的军事援助。

毛泽东给斯大林发出一封电报。

第二天，斯大林回电。电文如下：

毛泽东同志：

在与朝鲜同志会谈中，菲利波夫（斯大林的化名）提出，鉴于国际形势已经变化，他们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

与此同时已商定，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同志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在中国同志不同意的情况下问题必须留待下一次讨论解决。会谈详情可由朝鲜同志向您讲述。

毛泽东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然后，他向金日成转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同意北朝鲜作战准备计划的意见。

而这时，中国军队解放台湾的许多技术问题正在解决，军事准备工作进展十分顺利。即使在朝鲜战争爆发的情况下，最迟到一九五一年，解放台湾的条件也应该基本具备了。但是，毛泽东还是有一个担心，那就是朝鲜战争一旦爆发，美国政府很可能改变对台湾的政策。如果真是这样，后果就很难设想了。

一九五〇年六月七日，朝鲜战争爆发前十八天，金日成再次以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关于促进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的呼吁书》，建议召开南、北朝鲜各政党、社会团体代表的协商会议，商谈统一的条件、大选的程序等问题，并建议八月举行全朝鲜的民主大选。

十一日，距离战争爆发还剩十四天，南朝鲜拒绝了金日成和平统一的呼吁。

十七日，距离战争爆发还剩八天，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顾问杜勒斯来到三八线上的战壕里，他举起望远镜眺望朝鲜北方，然后对南朝鲜军说："没有任何敌人能够挡得住你们，无论他多么强大。可是我希望你们做进一步的努力，因为显示你们巨大力量的时候已经不远了。"

十九日，距离战争爆发还剩六天，金日成再次建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议会和南朝鲜的国会联合起来，建立单一的全朝鲜的立法机关以便统一祖国。遭南朝鲜方面再次拒绝。

关于南、北朝鲜到底是“谁打的第一枪”这个问题，至今还在不同国家的战史学家那里争论不休。但是，最终在“谁打的第一枪”的问题上纠缠是没有本质意义的。因为，朝鲜战争爆发的性质是解决民族内部统一问题的内战，而朝鲜战争爆发的根源是美、苏两个大国在日本战败后对朝鲜的分割占领。没有那个叫迪安的上校在朝鲜版图上随意画出的三八线，就不会有后来发生在远东的这场战争。

不出毛泽东所料，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天，美国的第一个反应是：武装封锁台湾海峡。

美国为什么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对台湾问题如此敏感？杜鲁门为什么从他《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中如此迅速地转变立场？这一直是历史学家想彻底弄清楚的问题。战后解密的档案资料显示，在战争爆发前十一天，美国国防部长约翰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从远东地区视察回来，带回了一份美国驻远东部队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在朝鲜战争爆发的那天，由杜鲁门在布莱尔大厦紧急会议上作了宣读。备忘录详细阐述了台湾目前的危机，引用外交人士的说法是：台湾将在七月十五日前被共产党中国占领。麦克阿瑟以远东最高司令官的名义阐明了不让共产党中国占领台湾对美国具有重大的战略利益：如果台湾落入共产党手里并能为苏联所用，那就等于给了我们的对手相当于数十艘航空母舰组成的舰队，也就能给美国在冲绳和菲律宾的基地“将上一军”。无法确定麦克阿瑟的备忘录在布莱尔大厦的会议上对美国的决策者们产生了多大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麦克阿瑟的一句话在杜鲁门心中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分量，麦克阿瑟说：台湾是美国在远东地区的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

于是，由国务卿艾奇逊提出的一项武装干涉台湾的建议被杜鲁门接受了。当天晚上，杜鲁门要求国防部长约翰逊就美国第七舰队向台湾海峡调动一事向麦克阿瑟发出指示。杜鲁门迅速改变美国对台湾问题政策的理由是，他认为共产党在朝鲜的举动是有计划的全球扩张行动，对台湾的封锁能够让朝鲜问题局部化，并且显示美国的力量，迫使共产党退出南朝鲜。特别是，美国安全委员会警告说，由于一九四九年中国国民党政权的垮台，以及苏联爆炸了原子弹，从而导致美国对原子弹垄断地位的结束，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威信已经受到严重威胁。自此在世界任何角落的退让都是不可容忍的，“因为现在对自由制度的进攻已经遍布全世界……”

美国的行动引起北京的强烈反应。武装封锁台湾海峡不但使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攻台湾的计划受挫，而且在政治上产生了一个不是问题的新问题，这就是：“台湾地位未定”。也就是说，台湾是不是中国的领土，要等以后才能再讨论。

作为影响了世界的伟人，毛泽东此时的目光已经从一个小小的台湾岛上移开，他从一开始就没把美国干涉台湾当成单纯的干涉中国内政来考虑，他在言论中提出“帝国主义本质”这一概念，指出了美国在亚洲乃至全球的侵略野心。毛泽东说：“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美国这样地暴露了自己的帝国主义面目，这对于中国和亚洲人民很有利益。美国对朝鲜、菲律宾、越南等国内政的干涉，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全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都将站在被侵略者方面，而决不会站在美帝国主义方面。他们将既不受帝国主义的利诱，也不怕帝国主义的威胁。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

的，因为他没有人民的支持。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在台湾岛上整天担心解放军进攻的蒋介石在听到杜鲁门声称“台湾地位未定”这句话时，心里也不舒服了一下。在指示“外交部”发表了一个“保证中国主权完整”的声明后，他终究还是掩饰不住对朝鲜爆发战争的欣喜若狂。而当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时，蒋介石更感到了他将绝处逢生。因为不但台湾岛暂时安全了，而且，朝鲜战争很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真是这样，他借助美国的力量“反攻大陆”不是没有可能的。当时台湾驻汉城“大使”邵毓麟把蒋介石的这种兴奋说得十分露骨：“朝鲜对于台湾，更是只有百利而无一弊。我们面临的中共军事威胁、友邦美国抛弃以及承认匪伪的外交危机，已因韩战爆发而局势大变，露出一线转机。中韩休戚与共，今后韩战发展如果有利南韩，也必有利于我国。如果韩战演成美、苏世界大战，不仅南北韩必成统一，我们还可能会由鸭绿江而东北而重返中国大陆。韩战进展不幸而不利南韩，也势必因此而提高美国及自由国家的警觉，加紧援韩必不致任国际共党渡海进攻台湾了。”

蒋介石向麦克阿瑟发了封电报，内容是：愿意出兵三万三千人，参加朝鲜的战争！

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三天，中国总理周恩来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烈的政府声明。这个声明立即在全世界传播，想必蒋介石也可以见到，只是不知他见到后是否还能依然异常兴奋。周恩来的声明如下：

我现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声明：杜鲁门二十七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美国政府这种暴力掠夺的行为，并未出乎中国人民的意料，只更增加了中国人民的愤慨，因为中国人民许久以来即不断地揭穿美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霸占亚洲的全部阴谋计划，而杜鲁门这次声明不过将其预定计划公开暴露并付诸实施而已。事实上，美国政府指使南朝鲜李承晚傀儡军队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进攻，乃是美国的一个预定步骤，其目的是为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越南和菲律宾制造借口，也正是美帝国主义干涉亚洲事务的进一步行动。

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布：不管美国帝国主义者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且已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的中国人民，必能胜利地驱逐美国侵略者，收复台湾和一切属于中国的领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号召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正义和自由的人类，尤其是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一致奋起，制止美国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新侵略。只要我们不受恫吓，坚决地动员广大人民参加反对战争制造者的斗争，这种侵略是完全可以击败的。中国人民对于同受美国侵略并同样进行反抗斗争的朝鲜、越南、菲律宾和日本人民表示同情和敬意，并坚信全东方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必能把穷凶极恶的美国帝国主义的战争制造者，最后埋葬在伟大的民族独立斗争的怒火中。

## 汉城大逃难

在朝鲜战争留下的史料中，有一张照片声名显赫，照片上是一个头戴礼帽的美国人在一群美国军人和南朝鲜军人的簇拥下，举着望远镜向朝鲜北方窥望。地点是三八线前沿南朝鲜一方的战壕中。照片上的美国人叫杜勒斯，是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这位美国共和党著名的外交事务发言人，自从被国务卿艾奇逊邀请为幕僚后，便成为记者追逐的政界人物之一。尽管美国方面，包括杜勒斯本人，对这张照片的背景多次加以解释，声明美国总统特使的南朝鲜之行和对三八线的视察，与几天后爆发的朝鲜战争是“纯属偶然巧合，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但是，历史本身却使任何解释都无法消除世界舆论对美国大员朝鲜半岛之行的强烈质疑。更何况杜勒斯在南朝鲜议会的演说中又有这样一番含糊不清的话：“在精神上，联合国把你们当作他们的成员之一，美国欢迎你们成为这个缔造自由世界的大家庭中一个平等的成员。因此，我要对你们说，只要你们继续有效地在创造人类自由的伟大事业中发挥作用，你们永远不是孤立的。”

“美帝国主义及其南朝鲜走狗精心策划了朝鲜战争。”这是朝鲜战争中北朝鲜一方至今坚持的战争结论，并作为图片说明文字配在了杜勒斯视察三八线这张著名的照片下方，使之成为经典的历史记录。

东京第一大厦，一座位于日本天皇皇宫护城河边的高大建筑物，二战前是日本一家保险公司的总部，现在是美军驻远东部队司令部。一位在日本和东南亚几乎拥有太上皇地位的美国军人，此刻正陪着杜勒斯看电影。这是一部老式的好莱坞影片，讲的是美国西部牛仔快速从斜在腰间的枪套中拔枪杀人的故事。当然，故事中一定少不了英雄救美人的情节，美人也是美国式的，美艳并有野性，可以和一个杀了人或者被杀之前的牛仔在铺着麦草的牛车木轮下抱在一起疯狂地滚来滚去。麦克阿瑟很喜欢这类美国电影，他身边的杜勒斯却有些心神不定，因为十二个小时前，朝鲜战争爆发了。

杜勒斯对麦克阿瑟的冷静感到巨大的惊讶，尤其是他看见麦克阿瑟靠在柔软的皮椅上，叼着那个世界上至少有一半儿人都熟悉的玉米芯烟斗的神情，心里掠过一种无以名状的复杂情绪。杜勒斯知道，这个玉米芯烟斗即使在二战战况最残酷的时候，也没有离开过这位美国将军的嘴唇。二战结束后，美国的报刊舆论曾猛烈地攻击过这个烟斗，说那简直就是战争和死亡的标志，再叼着它会引起战后余生的人们的反感。于是，极力想在日本装扮成和平领袖的麦克阿瑟就很少在公开场合叼着那个烟斗了。今天，这只象征着“战争和死亡”的烟斗又开始当众冒烟了。

朝鲜战争是麦克阿瑟一生中遇到的第三次战争。

“一头让人捉摸不定的、狂妄的、难以驾驭的公牛。”杜勒斯和杜鲁门对麦克阿瑟的评价完全一致。由于解放菲律宾、接受日本投降等一系列战绩而获得最佳感觉的麦克阿瑟从没有意识到，军人在战争结束后终究会成为政客们的掌中之物。杜勒斯看出麦克阿瑟很有点儿欢迎朝鲜战争爆发的感觉。将军的人生是靠战争辉煌的。这不，战争又一次来了！

七十岁的美国远东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已经到达了一个职业军人权力和荣耀的顶峰。这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功赫赫的传奇名将，用自己杰出的军事才能和成千上万士兵的生命，换来了在远东至高无上的地位。麦克阿瑟身高一米八〇，腰杆儿永远笔直，军装永远笔挺，说话滔滔不绝，无论什么话题均能绘声绘色，诙谐而又条理分明。他非凡的记忆力和博览群书的吸纳力，令他的崇拜者对他五体投地。麦克阿瑟渴望别人对他的崇拜，渴望出人头地，于是和所有自我感觉极端良好的人物一样，他往往言过其实，不能容忍批评，有时甚至为掩饰自己的过错而大言不惭地撒谎。正是这一点，最让记者们高兴，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位将军善于制造新闻，“极具表演才能，像一名电影明星”。美国作家小布莱尔写道：“消瘦细长的手指举着烟斗，点了又点，火柴划了一根又一根，专心致志，神采飞扬，让很多来访问者为之感动，无不从内心深处油然升起对他的无限钦佩。”麦克阿瑟似乎永远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他的每时每刻都将被记入史册，于是，他的举手投足和言谈举止仿佛彩排一样具有舞台的夸张感。他说话时从不喜欢坐着，因为那样会妨碍他的表演。当他口若悬河之际，他会踱来踱去，不时地做出让摄影师满意的动作。麦克阿瑟的一个随从参谋估计，他每讲一席话，“至少需要踱步五英里”。

麦克阿瑟一八八〇年一月十六日出生在美国阿肯色州小石城的一座军营里，是一位棉花商的女儿与一位美国陆军上尉的爱情结晶。他说：“在我会走路和说话之前，我就学会了打枪和骑马。”他十三岁进入西德克萨斯州军校，显露出打仗需要的才华。他是学校的网球冠军，是优秀的棒球游击手，他率领的足球队以坚固的防守名噪一时，“任何球队都没有攻破西德克萨斯军校球队的大门”。麦克阿瑟的理想是进入著名的西点军校。在经过第一次考试失败后，一八九九年，他终于成为西点军校公认的最英俊的学员，同时也是最优秀的学员之一。麦克阿瑟在西点军校四年的成绩中，有三年名列全班第一，而他

毕业时的成绩是九十八点一四分，据说是西点军校建校以来的最高分数。一九一七年，麦克阿瑟渴望的作战机会来了，他被派往法国，任美国“霓虹第二十四师”参谋长，军衔上校。他很快在战争中出了名，“是战争中最勇敢无畏的军官之一”。他拒绝戴防毒面具，装束从来与众不同：发亮的高领毛衫，一顶俏皮的软帽，手里提着根马鞭。新闻界对他的称呼是：远征军中的花花公子。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麦克阿瑟当上西点军校校长，年仅三十岁的他以整顿军校的教程和纪律而闻名，他将西点军校带入了现代军事时代。一九三〇年，麦克阿瑟就任美国陆军参谋长，是美国历史上就任这一职务最年轻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他成为盟军太平洋战区最高指挥官。在对日作战中，他指挥的诸多战役令他的军事才能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莱特湾大海战、吕宋登陆、收复巴丹、冲绳战役，麦克阿瑟的陆军软帽、深色墨镜、玉米芯烟斗以及走路时胳膊大幅度摆动的姿势，一时成为举世仰慕的英雄形象。经过大撤退和大反攻的戏剧性战争进程，他和他的参谋们在菲律宾海滩登陆时，为了让记者拍摄，麦克阿瑟在浑浊的海水中来回走了几次，然后他说：“我说过，我一定要回来！”这句“台词”立即登在世界各大报纸的显赫位置，让饱受日军蹂躏的亚洲百姓热泪盈眶。

麦克阿瑟曾回忆最初影响了他军事生涯的父亲对他的教诲：“更为重要的是启发我的责任感，我懂得了，对于该做的正当之事，不管个人做出什么样的牺牲，都要去实现它。我们的国家高于一切。有两件事必须终生为戒：永不说谎，永不惹是生非。”

然而，麦克阿瑟终生被人攻击的正是他不断地说谎和不断地惹是生非。

六月二十七日，杜勒斯从东京返回美国，麦克阿瑟坚持要到机场送他，结果飞机出现故障不能按时起飞。于是，麦克阿瑟就和杜勒斯

聊天打发时间。参谋人员试图把最高司令官拉回到办公室去，因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立即和麦克阿瑟举行电传打字会议，并告之华盛顿将有重大决定。但是，麦克阿瑟坚持留在机场不走。“告诉他们，我正忙着为杜勒斯先生送行，让我的参谋长跟他们说好了。”至于此刻人人都担心的朝鲜战场的局面，麦克阿瑟对神情紧张的杜勒斯说：“如果华盛顿对我不碍手碍脚的话”，“我可以把一只手绑在身后，只用一只手就可以对付”。

参谋人员决定想个办法将固执的司令官骗回去。他们让机场广播室播出一条假消息，说飞机准备立刻起飞。麦克阿瑟把杜勒斯送上飞机，进行了亲切得夸张的话别，然后才离开机场。麦克阿瑟走了之后，杜勒斯立即被请下飞机，又在休息室待了好一段时间，飞机才真正起飞。

杜勒斯在日本充分领略了麦克阿瑟的神气活现。他回到美国向杜鲁门总统汇报远东局势时，其中的一条建议是：让那个狂妄的老家伙下台。

然而，朝鲜半岛的情况确实不妙了。

六月二十五日中午，美军驻南朝鲜顾问团才真正意识到战争局势的严重性。

战事已经沿着三八线全线展开，但激烈的战斗发生在两条直指南朝鲜首都汉城的公路上。

在铁原——议政府一线，北朝鲜人民军由苏制T-34坦克开道，在重炮、迫击炮和重机枪火力的支持下，两个师加一个团，共两万八千人，迅速突破南朝鲜军仅一个不满员师的战线，然后以惊人的速度向前推进。沿着西海岸的公路向南，北朝鲜人民军和南朝鲜军的兵力对

比与铁原——议政府一线一样。这两个方向一东一西，像一只张开的铁钳，将在南朝鲜的心脏汉城合口。

北朝鲜人民军在苏联武器装备的援助下，当时已编有七个步兵师、一个坦克旅、一个边界保安旅和一个摩托化团，不仅兵力多于南朝鲜军一倍，而且军官素质和士气也是南朝鲜军队不能匹敌的。其士兵的来源大部分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也有参加过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朝鲜族士兵，即使是新兵也大都是刚刚翻身解放的工人和农民，政治优势使北朝鲜军队在战争初期显示出惊人的力量。

高浪浦方向，南朝鲜第十三团在第一波次的交战中死伤就达百分之九十，人民军的坦克很快突破了南朝鲜军的阵地。

临津江方向，南朝鲜第一师在美军顾问罗德维尔中校和白善烨师长的指挥下，在临津江南岸部署阵地，等待溃败下来的第十二团，然后重新组织抵抗。结果，第十二团溃败的士兵蜂拥而至，后面紧跟着北朝鲜人民军第一师的追兵。南朝鲜工兵飞快地按下电钮，想炸掉临津江大桥，但电缆已经被切断，人民军潮水般地涌上来，占领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大桥。

议政府方向是军事上极为重要的地理走廊，坦克可以在此展开，这个方向是汉城最后的屏障。驻守在这里的南朝鲜第七师面对的是北朝鲜人民军最精锐的第三、第四师。人民军的两个师同时展开攻击，工兵在坦克和自行火炮的掩护下破坏了公路两边的碉堡，步兵登上公路边陡峭的山崖向敌后渗透，公路上正面进攻的坦克部队坚决地推进，南朝鲜军队的前沿阵地很快瓦解了。

只有春川方向的南朝鲜军队在北朝鲜人民军第二军的进攻面前进行了局部的反击，但由于议政府方向南朝鲜军队的溃败，春川已经成

为孤立的突出部，如果不逃命就来不及了，于是唯一的抵抗也被放弃了。

被美军顾问团团长威廉·罗伯特准将称为“亚洲之雄”的南朝鲜陆军在战争爆发时的表现，与其说是让顾问团失望，不如说是让美国人震惊。滂沱的大雨中，到处可见已经不成建制的南朝鲜军队向南溃逃。就在这个时候，美军顾问团又接到了令他们更为震惊的报告：人民军数架苏制雅克螺旋桨飞机飞临汉城和金浦机场上空，金浦机场的控制塔台和一架美制C-54运输机被击中，一个油罐起火；汉城附近的另一个小型机场也遭到攻击，机场上的十架教练机被击中七架。最为严重的是，这些机场上的飞机已开始沿着公路北飞，在惊恐万状的南朝鲜军的上空低空射击，使本来的溃败变成了绵延几十公里的恐怖。美军顾问团在发给麦克阿瑟的电报中说：“无论从军事形势上还是从心理上看，韩国陆军已经完全垮了。”

六月二十五日晚上，麦克阿瑟在东京看电影的时候，溃败中的南朝鲜军队真的在汉城北部的弥阿里一带建立起一条阻击阵地，史称“弥阿里防线”。南朝鲜军队企图利用这一带环抱京元公路的丘陵地形，为守住汉城做最后的抵抗。这的确是最后的抵抗，战斗一直进行到二十七日中午，北朝鲜人民军终于突破了弥阿里防线前面的仓洞防线。天一黑，人民军士兵便大规模地渗透到整个防线的后方，弥阿里防线彻底垮了。

麦克阿瑟得到的形势预测是：汉城很快就会失守。

战争最后的受害者永远是平民百姓。

六月二十五日早晨，汉城雨过天晴。星期日的街头，城市风景和昨天一样。十时，街上突然出现军队的吉普车，宪兵通过车上的喇叭喊：“国军官兵立即归队！”吉普车消失后，载着士兵的卡车和牵引火

炮从街上疾驶而过。汉城的市民开始猜测：也许边境上又发生了什么事？汉城报纸的号外开始满街散发：北朝鲜军队今日拂晓从三八线开始南侵，我军立即与敌交战，现正在将敌击退中。

汉城市民开始向往北开进的军车和征用的运兵公共汽车欢呼。他们绝对相信政府平时反复说过的话：战争一旦爆发，立即占领平壤，在短时间内就能统一北方全境。但是，当市民们听见头顶上有飞机的声音时，他们抬头看见了机身上的北朝鲜人民军标志。飞机撒下的传单上写着：南朝鲜军队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向北方进攻，北方军队将给予坚决的反击。

到了十一时，汉城广播电台的广播词是："瓮津地区，摧毁敌人坦克七辆，缴获冲锋枪七十二支、步枪一百三十二支、机枪七挺、火炮五门，全歼敌人一个营……一个共军团长同他的共产军一起投诚……"

也是十一时，平壤广播电台这样广播："无赖叛逆李承晚命令李伪军侵略北方，人民军开始自卫，并开始进攻南方。李承晚匪帮将被逮捕、被判刑……"

入夜，汉城市民彻夜未眠。

最可靠的消息来自那些从前方下来的伤兵，伤兵们说不清楚战局的全貌，但都异口同声地说：坦克！北方的坦克厉害！我们没有坦克！

六月二十六日拂晓，汉城市民听见了炮声，看见了从北边议政府方向逃来的大批难民。北朝鲜人民军的飞机再次飞临汉城，扫射了总统府。一位南朝鲜空军飞行员驾驶教练机升空，在全城市民的注视下，用没有武装的机体与北朝鲜的飞机撞在了一起。

可是，军方的公告却这样写着：国军一部已经从三八线北进二十公里！

到底是南朝鲜军队离平壤不远了？还是北朝鲜军队离汉城不远了？

汉城到处是不知所措的神情，整座城市有了一种怪异的气氛。

此时，在汉城，只有一个人对战局状况十分清楚，他就是南朝鲜总统李承晚。

当北朝鲜的飞机扫射到号称“蓝宫”的总统官邸时，惊慌失措的李承晚脑子里唯一的念头就是逃跑。

他找来了美国驻南朝鲜大使约翰·穆乔。

约翰·穆乔时年四十七岁，是个老资格的外交家，而且他外交生涯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拉美和远东度过的。美国职业军人最看不上的就是这些温文尔雅的外交官，军方称他们是一群“光屁股的甜饼贩子”。但是，穆乔和大多数甜饼贩子不同，他和军方的关系不错，这倒不在于他经常和一些下级军官们喝酒，而是他身上的确有一股一般外交官没有的“男子汉气质”。他一到南朝鲜任职，就与李承晚发生了矛盾，原因是穆乔坚决站在美国军方的立场上，企图掌握李承晚手中的一些权力，以便更有利于美军顾问团对南朝鲜军队的控制。穆乔对李承晚的评价是“吹毛求疵，喜怒无常”。

穆乔在南朝鲜代理国防部长申善模的陪同下，会见了李承晚。这次会见，令穆乔终生难忘，因为他无论如何都没想到，一个国家的总统，在国家危难的时刻竟然表现得如此贪生怕死。李承晚见到穆乔后的第一句话是：如果我落入共产党之手，对于朝鲜的事业将是一场灾难。还是撤离汉城的好。

穆乔为了让这位总统留下来，明知南朝鲜军队正在逃命的路上，有的甚至已经全军覆灭，但他还是信口开河地说，南朝鲜军队打得很好，没有哪支部队已经溃败。总统要是留在汉城，能够激励部队的斗志。如果总统逃跑，消息传开，“就不会有一个南朝鲜士兵去抵抗北朝鲜的进攻”了，“整个南朝鲜陆军就会不战而垮”。可是李承晚坚持要走。穆乔的厌恶到了极点，他说：“好吧，总统先生，要走你就走，你自己拿主意，反正我不走！”

李承晚被穆乔的强硬态度震慑住了，可怜地表示他今天晚上可以不走。

穆乔一离开，李承晚立即命令交通部长准备专列，点火待命。

总统要撤离的消息首先传到国民议会的议员们中间。议员们指责李承晚抛弃了朝鲜人民；但也有的议员认为，如果总统被俘虏，那么南朝鲜就不存在了。为此，国民议会在争论几个小时之后进行了表决，大多数议员主张总统留在汉城，“和人民在一起”。

但是，二十七日凌晨，李承晚和他的家眷以及几个贴身幕僚在战争爆发不到五十个小时后，在黑色的夜幕中乘上专列从汉城逃跑了。临走他终于没敢通知穆乔大使。“他离开以后我才知道他已经逃跑了。”穆乔后来说，“他这么做使我在以后的几个月一直处于有利的地位，因为他先于我离开汉城。”

从为杜勒斯送行的东京机场回来，麦克阿瑟看到的是一份紧急电报，内容是华盛顿批准他使用海空军力量支援撤退中的南朝鲜军队。因为美国远东空军司令乔治·斯特梅莱耶中将正在美国本土开会，于是麦克阿瑟向美国远东空军副司令厄尔·帕特里奇下达了一连串的口头命令——帕特里奇的感觉是，麦克阿瑟在下命令的时候“眉飞色舞，得意洋洋”——他命令美国远东空军在三十六小时内出动，“运用一切可供

支配的手段，狠狠揍北朝鲜人，让他们尝尝美国空军的厉害”。麦克阿瑟批准了帕特里奇要求从关岛美军基地抽调一个轰炸机大队到日本空军基地的请求。最后，麦克阿瑟提醒了帕特里奇一句，这句话表示出这场战争的微妙之处：“远东空军全面戒备，谨防苏联对日本的进攻。”

黄昏到来之前，远东空军基地处在一片忙乱之中。侦察机出发去战场照相，机场上的地勤人员在给B-26装炸弹，加油车穿梭往返，飞行员聚集在一起研究朝鲜半岛狭长的地域上每一处应该攻击的目标。

六月二十七日，夜幕降临后，当南朝鲜总统李承晚打算逃离汉城时，十架满载炸弹的美军B-26轰炸机升空了。机群穿过笼罩在日本海上空厚厚的云层，向着朝鲜半岛飞去。

美国远东空军只有六年的历史。这支部队的肩章十分特别：除有与美国其他空军部队一样的机翼外，上面还有一个据说是菲律宾的太阳，还有代表南十字星座的五颗星。南十字星座表示远东空军一九四四年诞生在地球的南半球——澳大利亚的布里斯本；而关于菲律宾的太阳，美国人的解释是——一九四一年美国空军被日本人赶出过菲律宾，远东空军将不忘耻辱。这支年轻的部队在太平洋战争中赢得了值得骄傲的荣耀。战后，远东空军司令部设在日本东京市中心的一幢大楼里，空军的参谋们可以透过窗户俯视裕仁天皇的皇家花园，那种感觉就像在俯视整个日本。

可是这一次，远东空军从一开始就遇上了麻烦。先是起飞的轰炸机因为天气的恶劣和夜色太黑，在汉城以北根本寻找不到北朝鲜人民军的坦克纵队，于是载着炸弹穿过日本海上空厚厚的云层又飞了回来。接着，当远东空军的飞机再次起飞飞抵朝鲜时，半岛上空浓云密布，轰炸机第二次无功而返。

麦克阿瑟对空军的表现怒火万丈。他在电话里对帕特里奇说，必须尽快使用空军，不然南朝鲜陆军就完了！麦克阿瑟的参谋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对帕特里奇说得更明确：要不惜一切代价，把美国的炸弹扔在朝鲜，不管准确与否。换句话说，不管炸弹是扔在北朝鲜士兵头上还是南朝鲜士兵头上，只要把炸弹扔下去！

第二天，侦察机飞行员布赖斯·波驾驶RF-80A侦察机首先起飞，他终于看见朝鲜半岛上空天晴了。于是，远东空军的大批飞机开始升空。这是B-26轰炸机最倒霉的一天。当它们向三八线附近的铁路和公路扔炸弹的时候，北朝鲜军队的地面防空火力出乎意料地猛烈，几乎每一架B-26都被打中。其中的一架迫降在汉城附近的水原机场上，另外一架受损严重的飞机虽然返回了日本基地，但已经彻底报废了。最悲惨的是，一架被打得千疮百孔的B-26在日本芦屋机场迫降时一头栽到地面上，机上所有人员全部丧命。F-80战斗机的损伤比轰炸机轻一些，但是由于从日本机场到朝鲜战场的距离几乎是这种飞机活动半径的极限，所以飞行员都在提心吊胆地作战，以免稍不留神就回不了家了。他们在汉城以北的公路上发现了长龙般的坦克和卡车队伍，他们真的“不管准确与否”就开始了攻击。“长达八十公里的公路上火光冲天”。遭到南朝鲜第一师师长白善烨咒骂的是B-29轰炸机。这种被称为“空中堡垒”的战略轰炸机本来在纯粹的战术支援行动中不该出动，但在麦克阿瑟的坚持下还是出动了四架。四架巨大的轰炸机上的机组人员采取的是一种极端的方式——只要发现地面上有目标，不管是一堆士兵还是一队坦克，也不管是敌方还是友方，拿他们的话讲：“只要看上去值得轰炸，就扔炸弹。”结果，沿着汉城北边的公路和与公路平行的铁路飞行的B-29轰炸机把携带的绝大部分炸弹扔在了向南撤退的南朝鲜士兵头上。连远东空军的参谋人员都觉得这样使用战略轰炸机“很奇怪”，但无奈“麦克阿瑟将军要求最大限度地显示美国空军的力量”。

就在李承晚逃跑的那天夜里，北朝鲜人民军的一支先锋部队第三师九团已经连同坦克一起突入汉城的东北角。南朝鲜军依据城市边缘的一个个小山包还在抵抗。北朝鲜人民军的飞机向汉城撒下传单，要求南朝鲜方面立即投降。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七日晚，对于居住在汉城的人们来说是个地狱之夜。

惊慌失措的市民在广播中听见“政府和国会临时迁往水原”的消息后，终于知道大难临头了。汉城市民扛着行李拥向火车站，所有往南开的火车都挤满了逃难的人。挤不上去火车的，动用了自行车、牛车，有的干脆步行，百姓混杂在溃败的军队中间向南逃散。据史料记载，那一天从汉城逃离的难民有四十万之众。

这一天，美国使馆里也乱成一团。穆乔大使本来抱着一线希望，认为“即使共产党占领汉城，也能宣布使馆人员有外交豁免权”，因此决心坚持到最后。但经过向国内请示，国务卿艾奇逊坚决反对，理由是“美国使馆人员很可能会成为共产党的人质”。于是，穆乔决定撤离。枪炮声越来越近，不时有南朝鲜士兵来报告说，北朝鲜军队随时可能冲进汉城市区。使馆人员慌忙把保险柜抬出来，开始在黑夜中烧掉他们认为所有不能落入共产党之手的文件。烧文件的火光看上去好像是整个使馆开始燃烧，这更增加了汉城市民们的恐惧。使馆的安全人员开始炸毁密码机。穆乔大使在与麦克阿瑟通电话，没说几句电话就断了，原来使馆人员用大铁锤把电话交换机给砸了。最后，使馆人员的家眷被送上一艘名为“伦霍尔特”号的临时征用船离开了南朝鲜海岸，而工作人员则登上飞机飞往东京。穆乔又回到大使馆，他开出吉普车，想去寻找现在已不知在何方的南朝鲜政府。当吉普车驶离大使馆时，穆乔回头看了一眼，美国的国徽还挂在使馆上。穆乔想到应该摘下美国国徽，但已经没有时间了。令他想不到的是，北朝鲜军队占

领汉城后，竟然对美国的国徽没怎么在意。几个星期后，当穆乔随着美国军队的进攻再次回到汉城时，国徽居然还在那里完好无损地悬挂着。

按照周密制定的汉城防御应急计划，汉城以北的每个重要桥梁和公路都应在危急的时刻被炸毁。但是，在南朝鲜军队一泻千里的溃败中，计划上的任何一个字都没有被执行，防御应急计划等同了一张废纸。只是，有一座大桥的炸毁计划却被执行得异常坚决，这就是汉城以南汉江上唯一的大桥，即汉江大桥。这座大桥是汉城通往南方的唯一通路，在大量的难民和溃败的军队向南撤退时，这座大桥等同于生命线。因此，当得知南朝鲜军队要炸毁这座大桥时，美军顾问团参谋长赖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向南朝鲜作战局长金白一说，在部队、补给、装备等没有撤过汉江大桥的时候，绝对不能炸毁大桥。金白一不听。赖特恼羞成怒地再次解释说，即使南朝鲜军队的撤退，也要完全指望这座大桥，何况还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正在通过这座大桥。最后，赖特找到南朝鲜陆军参谋长蔡秉德，才商定出一个原则：确认敌人的坦克接近桥畔时，再爆破。

但是，在南朝鲜国防部更高官员的命令下，南朝鲜军还是决定立即炸毁大桥。理由是，重要的不是成千上万的南朝鲜士兵和难民的生命，而是决不能让北朝鲜人民军的坦克渡过汉江。守卫汉城的南朝鲜第二师师长提出抗议，师长说他的部队还在市区，装备也还没有撤出，汉江大桥不能现在就炸毁。在参谋长蔡秉德已经过江的情况下，南朝鲜作战局副局长立即奔向大桥，企图命令暂缓引爆。但是他的军用吉普车在难民的人流中根本走不动，等他好容易到达距离大桥还有一百五十米的地方时，他看见一个巨大的橙色火球从汉江大桥上冲天而起，接着就是一声惊天动地的大爆炸。在骇人的火光中，南朝鲜作战局副局长眼见着汉江大桥上的车辆、难民、士兵，连同桥梁的碎片，一起飞向火红色的夜空……

汉江大桥被炸毁的时间是：二十八日凌晨二时十五分。

这时，南朝鲜的陆军主力第二、第三、第五、第七师和首都师还在汉城的外围阻击，拥挤在汉江北岸等待过桥的军队车辆在公路上排成八列，士兵和难民拥挤在一起"连身体都无法转动"。这一切都随着汉江大桥的炸毁被留给了北朝鲜人民军。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弗兰克·吉布尼目睹了汉城的这个地狱般的夜晚。他后来记叙道：我和我的同事坐在一辆吉普车上，用了很长的时间才从被难民和车辆塞满的汉城街道上挣脱出来。然后在公路上和头上顶着包裹的难民艰难地往南走，最后我们的吉普车终于上了大桥。在大桥上，吉普车寸步难行，前边是一队由六轮卡车组成的车队。我下了车，想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走不动，但我发现桥面上被难民挤得水泄不通，根本没有我下脚的地方。我回到车上等候。猛然间，天空被一大片病态似的橘黄色火团照得通亮，前边不远的地方传来一声巨大的爆炸声，我们的吉普车被气浪掀起有十五英尺高。当时，吉布尼的眼镜被炸飞，他满脸都是血，什么也看不见。等他能看到周围的物体时，他看见在断裂的桥面上到处都是尸体。

过早地炸毁汉江大桥，把美军顾问团也扔给了北朝鲜人民军。赖特参谋长好容易找来几条运送难民的木船，但难民根本不理会他们是什么美国人。结果，美国人开枪了，意思是要么给船，要么吃枪子儿。南朝鲜船工在美国人的枪口下把惊恐万状的美军顾问们送过了汉江。

过早地炸毁汉江大桥，给南朝鲜军队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往南溃败的南朝鲜士兵有的用木筏、有的干脆游泳向南逃命，不少士兵被江水吞没，所有的武器装备全部丢失。后来的事实证实，炸毁大桥十个小时后，北朝鲜人民军才进入汉城市区，十二个小时后才到达汉江。如果炸桥时间推迟几个小时，南朝鲜军的两个整师和大部分物资

都可以过江。据史料统计，战争爆发时，南朝鲜陆军共有九万八千多人。二十八日汉江大桥被炸毁后，逃过汉江的南朝鲜军队仅剩下两万多人。虽然后来南朝鲜军事法庭以“炸桥方式不当”为罪名，枪毙了负责炸毁汉江大桥的工兵处长，但这次事件给南朝鲜军队心理上造成的影响却长时间难以消失。正如《美国陆军史》中所言：“韩国部队从此便以惊人的速度崩溃了。”

很明显，靠南朝鲜军队来挽救朝鲜战争的局势是绝对不可能了。

当南朝鲜军队争先恐后地往南逃命的时候，在朝鲜半岛之外，却有一个人要佩戴一把手枪迎着北朝鲜军队的进攻北上，这个人就是七十岁的麦克阿瑟。

麦克阿瑟决定的事没有人能够更改。

朝鲜战争爆发以来，麦克阿瑟就对美国政府甚至是联合国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汉江大桥被炸毁的那个晚上，他给华盛顿打电报，用强硬的口气说：美国的行动太迟缓，南朝鲜已经危在旦夕。半夜，他又在给华盛顿的电传中说：除非给南朝鲜部队注入一针兴奋剂，否则用不了几个小时战争就结束了。麦克阿瑟让美国迅速行动的意思很明显，那就是直接派出地面部队参战。

从《联合国宪章》上讲，杜鲁门批准美国空军飞到朝鲜去轰炸，已经是一种违宪行为了，这一点杜鲁门很清楚。美国政府现在需要的是：联合国通过一个认可武装干涉朝鲜战争的提案。在美国的操纵下，同时也是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七日下午十五时，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会议，激烈的辩论长达几个小时，中间宣布休会几个小时，直到半夜，一个以联合国名义公然干涉一个国家内战的提案通过了：“联合国成员国向大韩民国提供此类必要的援助，

以制止武装进攻，恢复该地区的和平和安全。”现在，美国已经开始的军事行动不但合法了，而且还有了进一步升级的权力。

当麦克阿瑟把要去朝鲜的命令告诉他的座机驾驶员安东尼·斯托里中校时，中校认为这个老头儿只是在开个玩笑。麦克阿瑟把四名记者叫到他的办公室宣布他的决定，并说可以带他们一同前往，只要他们不怕死。麦克阿瑟故意把这次行动说得恐怖而刺激：“这架飞机没有武装，同时没有战斗机护航，也没有把握说出它能在哪里降落。如果明天出发前见不到你们，我会认为你们去执行别的任务去了。”记者们被这几乎像冒险电影一样的气氛迷住了，表示他们都想去。其实，这是麦克阿瑟的又一次表演。别说这是飞往战场，就是麦克阿瑟乘机出去游玩，远东空军也不可能让最高司令官的专机单独飞行。

麦克阿瑟的座机叫“巴丹”号。巴丹是菲律宾吕宋岛中部一个省的名字。二战时，麦克阿瑟的部队在这里战败，七万名美军向日军投降，战俘中后来被日军虐待而死的达一万人。“巴丹”号在日本羽田机场即将起飞的时候，天气极其恶劣。斯托里中校得知的天气预报是风暴、有雨和低云。当他向麦克阿瑟主张推迟一天起程时，麦克阿瑟正在刮脸。斯托里中校听到的是一句阴沉的回答：“立即起飞！”在四架战斗机的护航下，“巴丹”号载着麦克阿瑟、他的五名参谋，还有四名记者向朝鲜半岛飞去。在飞机到达巡航高度时，麦克阿瑟开始抽他的烟斗。美国《生活》杂志随行记者戴维·道格拉斯后来写道：“麦克阿瑟精神抖擞，两眼闪闪发光，就像我看见过的高烧病人的面孔。”

当着记者的面，麦克阿瑟口述了一份给远东空军副司令帕特里奇的电报，内容是：立即除掉北朝鲜机场。不做宣传报道。麦克阿瑟批准。这个电报意味着：美军飞机可以越过三八线进行攻击。记者们知道，美军的攻击范围被严格控制在三八线以南，这是华盛顿从来特别强调的，原因是担心苏联介入朝鲜战事。公开违背华盛顿的命令，对

麦克阿瑟来讲是个乐趣。这是朝鲜战争爆发以来，麦克阿瑟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越过总统权限自作主张。如此的狂妄是导致他日后悲剧命运的诸多因素之一。

麦克阿瑟的专机降落在水原机场，这是位于汉城以南的一个美军机场。在“巴丹”号还没有起飞的时候，水原机场就遭到北朝鲜人民军的攻击，跑道顶端的一架C-54型飞机着火了。跑道本来就很短，起火的飞机又使跑道缩短了二十米。更为严重的是，当“巴丹”号向水原机场的跑道下滑的时候，不知从哪儿钻出一架人民军的雅克式飞机，飞机直冲“巴丹”号而来。机舱内所有的人都惊叫起来，只有麦克阿瑟兴奋地说：“看，我们会把它好好收拾一顿的！”靠着斯托里灵巧的规避动作，“巴丹”号安全地降落在水原机场。这时，跑道顶端的那架C-54飞机还冒着浓烟。

麦克阿瑟穿着一件咔叽布衬衫和一件皮夹克，软帽皱着，胸前挂着架望远镜，戴着在这个阴沉的天气中显然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的墨镜，走下了他的“巴丹”号。迎接他的是美国高级官员丘奇将军、穆乔大使，南朝鲜方面是陆军参谋长蔡秉德，还有李承晚。李承晚看上去失魂落魄，要不是穆乔的坚持，丘奇将军根本不会让任何一个南朝鲜方面的人到机场来。麦克阿瑟还是拥抱了李承晚，并在穆乔的带领下，走进机场边上的一所破烂的校舍，这是美军顾问团现在的所在地。

麦克阿瑟问起战局。李承晚描绘了险恶的局面。当问到蔡秉德时，这位看上去不怎么像军人的胖子参谋长回答说，他要招募一百万青年入伍。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信口胡诌。四十八小时后，蔡秉德参谋长就被解职了。麦克阿瑟站起来说：“到前沿去看看。”

丘奇将军马上反对，因为距离这里只有二十公里的前沿的战况谁也说不清楚。麦克阿瑟不容反驳，又说了一遍：“判断战局的唯一办法

就是去看实战部队。”

参谋人员找来一辆几乎快散架的老式黑色道奇轿车让麦克阿瑟坐，记者们坐吉普车。这个小小的车队逆着溃逃士兵的洪流往北，来到汉江边。麦克阿瑟向汉城方向看去，他看到的是一座燃烧的城市。他从嘴上取下烟斗，说：“我们上那座山上去看看。”

所有的人跟着这个七十岁的美国将军往山上爬。

随行的惠特尼将军后来回忆道：

> 天空中，回荡着跳弹的尖啸声，到处散发着恶臭，呈现着劫后战场的一片凄凉。所有的道路上挤满了一群群备受折磨、满身尘土的难民。这一场面足以使麦克阿瑟相信，南朝鲜的防卫潜力已经耗尽。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挡共产党的坦克纵队从汉城沿着少数几条完好的公路直取半岛南端的釜山了。那时，整个朝鲜就是他们的了。

麦克阿瑟自己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 被击败的、溃散的军队形成一股可怕的逆流。南朝鲜军队完全是在狼狈溃逃……溃不成军……气喘吁吁的军队……被满身尘土、挤来挤去的逃难人群拥塞得不能举步。

在山上，麦克阿瑟待了一个小时。除了指着汉江上那座被炸的大桥残留的桥身说了句“炸掉它”之外，麦克阿瑟一直没有说话。

回到水原机场边那所破烂的校舍，麦克阿瑟和李承晚又谈了一个小时。之后，他飞回东京。麦克阿瑟向李承晚许诺会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同时，据他后来在回忆录中的说法，当时，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已经在他的脑海里形成，包括建立美军的立足点和策划几个月之后震惊世界的仁川登陆。麦克阿瑟说：“这将是背水一战，却也是我唯一的机会。”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必须出动地面部队。否则只能“接受在朝鲜乃至整个亚洲大陆的失败”。

麦克阿瑟回到东京，对记者明确表示：“给我两个美军师，就能守住朝鲜。”

麦克阿瑟又犯了个惹是生非的错误。美军出动地面部队，必须经过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讨论，并且只有总统才有权发布命令。为了让自己和总统较劲儿的游戏更加明确，他对记者们说：“我会向总统建议出动几个美军师，但不知道总统是否会采纳我的建议。”

紧接着，麦克阿瑟在没有华盛顿授权的情况下，于三十日访问了台湾。“巴丹”号因故比预定的时间晚到了，可蒋介石还是兴奋地等待着。麦克阿瑟于朝鲜战争爆发后的此次台湾之行，到底与蒋介石达成了什么政治交易，至今还是一个谜。但蒋介石坚决要求出动三万三千名士兵参战的事很快就见了报。麦克阿瑟擅自对台湾的访问引起杜鲁门极大的反感，而对此最敏感的莫过于中国共产党人。麦克阿瑟的台湾之行，彻底地把自己与新中国对立起来，这对日后朝鲜战争的发展和结局起到了微妙但却又是重要的作用。

六月二十七日这天，美国三军参谋长经过彻夜研究，终于得出结论：光靠美国空军的介入无法挽救南朝鲜的局势。可动用地面部队就意味着美国在朝鲜全面参战，这是一个有关国家利益的万分敏感的问题。在很长的时间里，美国的全球战略重点始终在欧洲。对于远东，美国没有大规模介入的计划。而且，美国人心理上的大患是苏联，朝鲜战争如果升级，一旦苏联介入，对美国来讲是绝对的麻烦。所以，没有人敢向总统提出这个建议。但是，到了二十八日，关于朝鲜战局的危急情况不断地报来，尤其震惊了华盛顿的是，汉城已经被北朝鲜军队占领。于是，三军参谋长坚定地认为，除了出动美国地面部队之外，绝对没有其他办法了。上午，参谋委员会提出一个谨慎的战争升级计划。

二十八日深夜，麦克阿瑟向华盛顿发出一个长达两千字的电报，详细阐述了南朝鲜军的处境，说这支军队“完全丧失了反击的能力”，现在唯一的希望是“在朝鲜作战区域投入美国地面部队”。他希望“从日本抽调两个师的兵力，供初期的反攻使用”。在电报的最后，麦克阿瑟又使用了那种“要么听我的，要么就拉倒”的狂妄口气：“除非明文规定在这一饱受战火蹂躏的地域充分使用陆海空战斗部队，否则我们的任务将是无谓地付出大量生命、金钱和荣誉的代价，最糟糕的甚至可能会在劫难逃。”

麦克阿瑟半夜发来的电报把美国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弄得焦灼不安，只有连夜召集五角大楼的高级会议。凌晨三时四十分，五角大楼与麦克阿瑟通过电传开始了辩论式的探讨。

华盛顿发出的电文如下：

陆军部一号

你的C56924电报提议的授权一事，将由总统作出决定，这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供他考虑。同时，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当晚早些时候发给你的指示，授权你向釜山基地派遣一个团的战斗队。这一点将在上午八时举行的电传打字会议上详细阐述。

麦克阿瑟的回电显得很不耐烦：

远东司令部一号

现在你们的授权确立了可以在朝鲜使用地面作战部队的基本原则，但并未对在目前形势下采取有效的行动给予足够的自由。我的电报提出的起码要求仍未得到满足。时间紧迫，要求刻不容缓地作出一项明确的决定。

柯林斯认为麦克阿瑟不应该催促总统，因为事关重大：

陆军部二号

我出席了白宫六月二十九日下午的会议，当时总统作出决定，授权按照参谋长联席会议第84681号文件所确定的权限采取行动。我认为，决定的精神表明，总统希望与他的高级顾问们经过慎重考虑后再授权美国作战部队进入战区。

柯林斯等了一会儿，不见麦克阿瑟回话，于是接着说：在你派遣一个团的行动完成时，总统会对是否派遣两个师的问题作出决定。然后是一句问话："这样是否满足了你的要求？"电传过去之后，麦克阿瑟再也没有回答。柯林斯看着沉默的电传机既尴尬又难以忍受，他知道，这是麦克阿瑟惯用的一种傲慢的沉默。因为他已经要求派遣为避免局势最后崩溃而需要的部队，如果他遭到拒绝，那么五角大楼将为一切不可预料的后果承担责任。柯林斯只好说："我们把这种沉默看成是麦克阿瑟将军要我们'刻不容缓'地作出决定的强烈要求。"他离开会议室，打电话向国防部长佩斯说了麦克阿瑟的请求。

凌晨四时五十七分，佩斯打电话向杜鲁门总统报告了麦克阿瑟的请求。

上午九时三十分，杜鲁门在白宫召开战争委员会会议。经过研究，会议否决了蒋介石参战的请求，但决定派两个美国师进入朝鲜战区。

决定的作出是艰难的。派遣美国地面部队参战，意味着美国在战争的门槛上已经把脚迈了出去，而且一步迈到了遥远的远东。对于麦克阿瑟的傲慢口气，杜鲁门现在只能忍下去了。在回答共和党反对派的质问时，杜鲁门说："我不想到处扬言是我要麦克阿瑟如何行事的，他现在不是美国将军了，他是在为联合国办事。"

杜鲁门和他的高级官员们没有想到，战争这只脚只要迈出去，就只剩下一条路了，那就是一直打下去。美国出兵参战的决定，使成千上万的美国青年陷入朝鲜战争达三年之久。三年后，躺在裹尸袋里回到美国的年轻士兵达数万人。同时，杜鲁门和他的高级官员们更没有

想到，他们在朝鲜战场上的对手不是他们一直担心的苏联，也不仅仅是北朝鲜人民军，而是一个对于美国人来讲十分神秘的国家——中国。

## 美国将军的逃亡和中国的保卫国防会议

一九五〇年六月三十日，麦克阿瑟在东京指示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将军，让他命令美军第二十四步兵师立即进入朝鲜。沃克向第二十四师师长威廉·F.迪安将军下达的命令是：

一、由两个步兵连，配属两个迫击炮排和一个七十五毫米无后坐力炮排，组成特遣阻滞分队，由一名营长指挥，立即空运到釜山，向丘奇将军报到；

二、师司令部和一个步兵营立即空运到釜山；

三、师其余人员依靠海上运输航渡；

四、尽快建立可以进行攻势的作战基地；

五、特遣队的任务是：在南朝鲜着陆后立即开始前进，与从汉城向水原南进的北朝鲜部队接触，并阻止其前进；

六、师长到达朝鲜后，出任美国驻朝鲜陆军部队指挥官。

美军第二十四师，在二战太平洋战区曾由新几内亚转战到莱特、吕宋，因在莱特登陆时的英勇作战而闻名于世。战后，该师进驻日本九州山口县。全师满编一万二千一百九十七人，现缺额约五千人。

第二十四师的行动是美国地面部队介入朝鲜战争的第一步。在这个最初的军事行动中出现了两个美国将军：一个是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另一个是第二十四师师长迪安。他们两人在以后战争中的命运是：一个死于中国军队的进攻中；而另一个被俘虏，在中朝战俘营中待了三年。同时，最初的军事行动还涉及一个下级军官，他就是第二十四师二十一团一营营长史密斯。当迪安把带领特遣队的任务交给史密斯时，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他的营缺少军官。在师长答应从三营给他

补充军官后，二十一团团长理查德·史蒂文森上校所能提供给他的关于朝鲜战场的情报仅仅是一句话：“去干吧，伙计，那里开锅了。”

一九五〇年七月一日凌晨三时，大雨。史密斯带领他的四百四十名士兵从熊本乘卡车向板付机场出发。他所指挥的兵力和武器的清单是：两个缺额的步兵连（B连和C连），半个直属连，半个通信排，一个混编炮排，四门无后坐力炮和四门迫击炮。B连和C连各拥有六个反坦克火箭组和一个小口径六十毫米迫击炮组。士兵们每人配备一支步枪和一百二十发子弹，另外还有两日份额的干粮。在史密斯的这支队伍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官兵参加过太平洋战役，大多数则是没有任何战斗经验的美国青年。

无论从沃克给第二十四师命令的措辞上，还是从派遣一支阻击部队的规模上看，美军都不像是去参加一场战争。也许包括麦克阿瑟在内的美国军官们在最初的时候就是这样理解朝鲜战争的。而这一切给史密斯营长一个错觉：这是一个用不着费劲儿的任务。但他还是在板付机场认真地问迪安师长，他此刻特别想知道，他和他的士兵在漆黑的雨夜中急忙奔赴的那个叫朝鲜的地方，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迪安师长的回答是：到达釜山后，向大田方向前进。第二十四师要尽可能在离釜山远点儿的地方阻击北朝鲜军队。所以你的营要沿京釜公路尽可能往北，同丘奇将军取得联络。如果不知道他在哪里，就上大田去。很遗憾，我无法再提供更多的情报了。祝你一路平安，上帝会保佑你和你的士兵们。

史密斯，这位来自著名的西点军校的军官心里更加茫然了，可他还是对他的士兵们说：“北朝鲜军队看见我们，会掉头就跑的。”

用来运送史密斯特遣队的六架C-54运输机飞到了朝鲜上空，却因为大雾无法降落又飞回日本。直到七月一日上午十一时，他们才降落在釜山附近的一条飞机跑道上。被颠簸的飞行弄得脸色苍白的士兵在

釜山受到夹道欢迎，南朝鲜人对于美军的到来感到欢欣鼓舞。从火车站上车的时候，甚至还有一支朝鲜乐队为他们奏乐。到达大田后，史密斯找到了丘奇将军。丘奇将军展开地图对他说：“我们要在这里展开一个小小的行动，你们上去给南朝鲜军队打打气。”

于是，史密斯到预定战场去看地形。一路上，他们看见数以千计的南朝鲜士兵和难民一起往南跑。小菲利普·戴中尉回忆道：到处“挤满了人——士兵、军官、老人、妇女、儿童，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受了伤。上帝啊，我想，这里正在进行一场真正的战争。”在乌山附近的一个阻击阵地上，史密斯命令士兵修筑工事。这时，他的头顶上飞过一群战斗机，飞机飞得很低，上面的红五星清清楚楚。但这些北朝鲜的飞机并没有向他们开火就飞走了。直到这时，史密斯都没想到，几天后，当北朝鲜军队的坦克扑上来的时候，“掉头就跑”的不是北朝鲜的士兵，而是他自己的一营。

不过，这一天，史密斯有幸看见了联合国军空军的轰炸表演：四架澳大利亚空军的“野马”式轰炸机用火箭和机枪向一列有九节车皮的列车猛烈开火，结果火车爆炸，把半个小镇都炸飞了。列车是南朝鲜军队向前线运送弹药的，正停在一个叫平泽的小站等着调度铁轨。其实，在这一天，整个联合国军空军“战果辉煌”：美国空军袭击了水原方向的南朝鲜军车队，气坏了的南朝鲜士兵居然用步枪把一架美军飞机打了下来，美军飞行员跳伞落地后，立即遭到南朝鲜军队的逮捕。下午，四架美军飞机空袭了乌山公路一带，炸毁三百辆南朝鲜军车，毙伤两百多名南朝鲜士兵。就连美军顾问团在这一天也五次遭到自己空军的袭击。一位顾问在给家人的信中自嘲地这样写道：“美国飞行员战果辉煌！他们袭击了弹药库、火车、汽车队和南朝鲜陆军司令部！”为了这混乱的一天，丘奇将军向远东空军指挥部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空中行动控制在汉江大桥以北的地区。

美军第二十四师大部队开始陆续到达朝鲜。

七月五日，史密斯的部队乘坐征用的南朝鲜卡车进入乌山阵地。一路上除了难民和败兵堵塞道路外，开车的南朝鲜人因为害怕而磨磨蹭蹭。凌晨，史密斯按照典型的阵地防御方式布置了他的兵力和火力：阵地右翼部署B连的一个排，公路东边是其他两个排，B连的三排置后，在一个小山上。在公路和铁路并行的两侧部署了反坦克炮，而迫击炮被部署在山脊的另一面。天气又像是要下雨的样子，看来无法指望空军的支援了。五时，太阳露头，步兵和炮兵开始试射。除了试射的声音外，四周似乎很安静。史密斯在反坦克障碍后面紧张地望着北边的公路，尽管天气阴沉，他还是可以看见水原城。试射后，官兵们蹲在挖好的散兵坑里开始吃定量的早餐。早上七时，史密斯的视野里出现了好像是车辆移动的黑点。半个小时后，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是向南而来的坦克纵队。没容史密斯反应，坦克就到了只有两千米的距离了。

八时十六分，美军第二十四师二十一团一营的一发榴弹炮弹出膛了，这是美国地面部队在朝鲜战争中发射的第一发炮弹。

炮弹在坦克群中爆炸，一辆坦克被击中。

但是，北朝鲜军队的坦克没有丝毫的犹豫，它既没有拐下公路，更没有迟缓下来的意思，仍在轰隆隆地向前推进。

接近四百米的时候，美军的反坦克火箭开始射击。T-34苏制坦克依旧若无其事地前进，沿着坡度很陡的公路爬上来。美军的七十五毫米反坦克火箭对T-34坦克似乎不起什么作用。在发射了二十多枚火箭弹后，一辆T-34坦克终于停止了，堵塞了公路。坦克中跳出三个北朝鲜士兵，跳出来的时候是举着手的，但是一落地，手中的枪立即开了火。由于距离很近，美军阵地上的一个机枪手中弹死亡。这个没能在

史料中留下姓名的美国青年，是美国地面部队在朝鲜战争中第一个阵亡的士兵。

T-34坦克的火力十分猛烈。戴中尉手中的七十五毫米无后坐力炮被击毁，巨大的炸裂声震坏了他的耳膜，鲜血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一个小时之内，史密斯的部队已伤亡二十多人。北朝鲜的坦克开始冲下山口，有的坦克已经开到炮兵阵地的后面去了。一些年轻的士兵开始逃跑。炮兵军官亲自装填弹药，但仍然阻止不了人民军坦克的进攻。上午十一时，北朝鲜的坦克纵队冲过了美军的炮兵阵地。接着，北朝鲜的步兵蜂拥而至。

美国兵没想到北朝鲜士兵会在瞬间成片成片地向他们冲来。坦克的炮弹开始落在美军阵地上，有人在伤痛中尖叫着从阵地上滚下去。史密斯大声地命令："向那个纵队射击！"但在胡乱的一阵射击后，他突然发现阵地左右两翼的山包上已经飘起北朝鲜的旗帜。C连和B连开始压缩，到十二时，史密斯原有的一千二百米的阵地已经被迫压缩到不足七百米了。史密斯呼喊自己的炮兵，但被报告说车载电台已被打坏。通讯的中断使炮兵无法射击了——美国式的炮兵指挥方式在朝鲜战争的第一场战斗中就受到了嘲弄。

下午十三时，北朝鲜军队开始压缩包围圈。史密斯本能地意识到，如果再固守阵地，等待他的特遣队的只能是死亡。他后来回忆说："当时已经毫无希望，伤亡惨重，联络中断，缺乏交通工具，弹药耗尽，北朝鲜人的坦克就在背后。在这种情况下，我面临的抉择是：与阵地共存亡？还是设法带领士兵突围？我们至多还能坚持一个小时，然后就会全军覆没。我选择了突围……"史密斯下达了撤退的命令，并宣布了撤退的顺序。但是，一营的撤退根本没按顺序进行，完全是一场只管自己的逃命。北朝鲜的马克沁重机枪横扫溃散的美军，美军士兵成片地倒下。史密斯最后撤出阵地，他在路过炮兵阵地时，

发现那些炮完好无损地排列在阵地上，像是在展览美军的装备，只是阵地上连炮兵的影子都没有了。

这是朝鲜战争中美国地面部队的第一场战斗。

这场战斗在后来的各种战史中一次次地被记载。二十五年后，一九七五年在日本出版的《时代》周刊曾对史密斯的乌山之役给予了这样的描述：“美军在撤退时，只带走了伤员，给战死者盖上星条旗就不管了。有不少伤残士兵，恐怖之余，扔掉钢盔和上衣，甚至脱掉了鞋子。关于史密斯支队的全军覆没，美军总部没有如实公布，仅说在近五百名士兵中有一百五十名战死、七十二名被俘，轻重伤员没有计算在内。”

麦克阿瑟原以为，只要强大的美军象征性地一出现，北朝鲜人民军就会惊慌失措地逃回北方去。然而，从美军公布的保守的数字上看，史密斯特遣队在两个小时的战斗内至少损失了一半以上。被俘的人数是准确的。北朝鲜的有关公告说：共有七十二名美国人被俘。其中有一位没有负伤并且放弃逃跑机会自愿留下来照顾伤员的美军卫生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中树立起来的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在远东一个叫乌山的角落被迅速地粉碎了。被打散的美军士兵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在陆续归队。有的士兵甚至步行到黄海或日本海岸，然后乘小船回到釜山。这些士兵的神情是真正的惊慌失措。

北朝鲜史料在记载这场战斗时写道：

美国侵略者在李伪军的掩护下，在平泽、安城北方地区把地面部队展开，企图在车岭山脉一线阻止我军的进击。

七月五日，我军尖兵在乌山以北同美第二十四师的先遣队遭遇。

第一次与美军地面部队遭遇的我人民军官兵，内心燃烧着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者愤怒和憎恶的火焰。尖兵不待主力到达，立即转入突击战。坦克部队在行进间即以纵队突入敌人阵地，一举摧毁敌人的防御阵地，压制并消灭了敌人的炮兵阵地。继坦克突进之后，转入突击的步兵在正面进攻的同时，迅速迂回到敌人的侧面打击敌人。

这样，我军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战斗中，几乎全歼美军步兵和炮兵各一个营，使其陷入了瘫痪状态。

面对与中国毗邻的朝鲜发生的战争，特别是联合国军的武装干涉，中国领导人感到深深的关切。

一九五〇年七月七日，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的主持下，保卫国防第一次会议紧急召开。

"保卫国防"，对于一个新生的国家来讲，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当时面对的不仅有国内战后恢复的巨大的压力以及解放全境的复杂的军事形势，更为重要的是，新中国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承认，还面对着强大的敌对势力的拒绝甚至是仇视。国际形势的任何一点儿风吹草动都会引起新中国领导人的密切注视，何况战争就发生在与自己存在着上千公里边境线的邻国。对刚刚迎来新生的中国人民来讲，解放了的日子与和平建设的生活是他们盼望已久的，因此，没有比"保卫国防"更能准确地体现那时中国人情感的词汇了。

朝鲜战争结束四十年后出版的《美国海军史》对当年中国调动部队的行动有这样的评论："中国是不能容忍敌对的军队靠近鸭绿江的，正如美国不会容忍在它与墨西哥边界的格兰德河上出现敌对军队一样。"

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讲，所谓"敌对的军队"就是美国军队。虽然参战的美军刚刚在朝鲜登陆，在初战中并没有显示出强大的战斗力，并

且距离中朝边界还有一千多公里。但是，终究是世界上国力最强大的国家在远东真枪实弹地参战了，对此，新中国领导人不能不产生极大的警惕。应该说，从联合国宣布介入朝鲜战争之日起，毛泽东就预感到了未来战争进程的复杂趋势，尽管当时北朝鲜人民军正风扫残云般地胜利前进着。

参加保卫国防第一次会议的有中央军委负责人和在京的解放军各兵种负责人，包括总司令朱德、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司令员林彪、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军委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摩托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炮兵副司令员苏进。而彭德怀，这个将在朝鲜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著名将领当时并没有参加会议。

两天后，七月十日，由周恩来主持的保卫国防第二次会议召开。

七月十三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同时，还作出一个日后看来极其重要、极有远见的部署：动用最精锐的战略预备队，即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四十二军，即刻集结东北地区，组成东北边防军，布防在中朝边境以防不测。

从毛泽东为东北边防军配备的领导班子名单中，就可以看出新中国领导人对朝鲜战争的极大关注。中央军委任命粟裕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治委员，李聚奎为后勤司令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比如粟裕身患重病，萧劲光正在组建新中国海军，萧华需要主持总政治部的日常工作，毛泽东最初任命的东北边防军的主要领导都没有到位。十天以后，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决定东北边防军归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指挥。

东北边防军中的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军，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兵团，是在几个月前才明确作为国家军队战略预备队的，它们部署在中国腹部可随时四方调动的河南地区。其中第三十八军驻信阳，军长梁兴初，政治委员刘西元；第三十九军驻漯河，军长吴信泉，政治委员徐斌洲；第四十军正在参加解放海南岛的渡海作战，军长温玉成，政治委员袁升平，虽然当时尚未归建，但驻地已经选定，在洛阳。第四十二军正在东北齐齐哈尔地区从事农垦生产。这样，四个军，加上配属的炮兵第一、第二、第八师等部队，共二十五万余人。之所以选中第十三兵团，重要的原因是，在这支以原第四野战军为主力的兵团中，官兵东北人居多，能够适应寒冷地区的作战，且对东北地区的地形也很熟悉。

有关第十三兵团的领导班子配备，也让毛泽东颇费心思。当时，第十三兵团的司令员是黄永胜。毛泽东，包括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在内都认为，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各方面的素质比黄永胜更强。于是，出现了一个似乎是“临阵换将”的不大符合军事常规的现象，即以第十五兵团指挥机关为基础，组成第十三兵团的统帅部。调第十三兵团原司令员黄永胜改任广东军区副司令员，调第十三兵团原参谋长曾国华改任广东军区参谋长。任命邓华为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洪学智为第一副司令员，韩先楚为副司令员，解沛然（解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

在中国军队接到向北开赴的命令时，拿政治部主任杜平的话说，“有一个转弯子的过程”。

首先，必须动员已经决定复员的士兵留下来。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的六月六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为减轻国家的经济困难，加强建设力量，决定在解放军中开展复员工作。解放军中的一些士兵，特别是一些老兵，已经习惯以部队为家，让他们复员回老家的工

作很难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老兵表示坚决不走，说是走也要等全中国解放以后。政治部门为此花费了极大的耐心和精力，才使部队的复员工作开展起来。当然，还有一部分士兵对复员是高兴的，因为终于可以回家过小日子了，“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农民出身的士兵的美好生活理想。现在，刚刚开展的工作必须立即停止，并且还要再做相反的工作，一遍遍地说明留队是多么的重要，而留队就意味着可能再次投入战争，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于是，第三十八军当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谁动员复员的，谁再负责动员不复员。

当时，驻扎在河南的第三十八、第三十九军的中心任务已不是打仗而是生产。在部队从作战转到生产的过程中，政治部门反复向部队讲述人民解放军从事生产的光荣传统，毛泽东和朱德甚至还为部队开展生产题词鼓励。毛泽东的题词是：“团结人民，发展生产。”朱德的题词是：“拥政爱民，帮助生产。”正是开春季节，本来就是农民的官兵们被渴望已久的和平的到来和对土地本能的热爱鼓动着，喊出“毛主席、朱总司令指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的口号，立即开始了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运动。这支在其发展壮大的历史上举世无双的亦兵亦农的部队，把作战武器收藏起来，在成片荒凉的土地上播下种子。到了初夏的六月，官兵们脚下的大地上已经有了一望无际的好庄稼。部队为减轻国家的负担，承担起运输粮食的任务。在中原几百公里的运输线上，上至军、师、团的军官，下至士兵、卫生员，人人推着独轮车载着粮食上路。中国军队特有的走到哪里唱到哪里的歌声让百姓们纷纷跑到路旁热闹地欢呼。第三十八军的一个师甚至还开了榨油的作坊，并且自己发电，给驻地的县城也装上了当时中国百姓很稀罕的电灯——军队的举动给予百姓的是一个强烈而温暖的信息：天下果真太平了。

更为浪漫的是，在长期的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三四十岁但还没有顾得上寻找女人的军官们，当和平到来时，他们便急切地开始解决人生中这个特别重大的问题。当时，军队驻地附近的和家乡的姑娘是一种选择，而被分配到部队的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南下工作团中漂亮的女同志成为最抢手的目标。对一些“老大难”的军官，组织上也出面搞点儿“包办”，“红娘”工作成为当时第十三兵团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内容。当兵团开始在郑州郊区大规模地建营房时，官兵们的和平思想里有了具体的内容：“该住上自己的房子，呼吸一下不带火药味的空气，让老婆孩子有个安身的地方了。”

就在这时，第十三兵团接到了北上的命令。命令中还写明：将房子、庄稼、生产工具等一切与作战无关的生活设施向地方政府完整地移交。政治部主任杜平后来回忆道：“正是西瓜丰收的季节，我们坐上了北去的列车。临行前，我围着刚打起地基的营房默默地转了一圈，又驱车去郊外农场看了我们一锹一镐开出的土地，谷子正在抽穗，玉米正在吐缨，高粱正在灌浆……”力图使官兵们在丰收的土地面前摆脱缠绵的感情，确实需要费极大的口舌；但是，战争将使他们丢掉丰收的果实这个很伤感情的事实，同时又起到了对敌仇恨的效果。问题是，部队确实已“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不少兵器生了锈，甚至一门炮的炮筒里，麻雀在里面做了窝”。也许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中国领导人意识到：对于这个世界而言，和平永远是十分遥远的事情。为此，有必要在任何时候都保有一支纯军事意义上的高素质的军队。

解放军兵团级别的大规模兵员运输开始了。

自从解放战争以来，解放军的大兵团移动都是向南、向南，而这一次是向北，再向北。

七月二十四日，第三十八军抵达凤城，后移驻开原、铁岭一带。

七月二十五日，第三十九军抵达辽阳、海城一线。

七月二十六日，第四十军抵达鸭绿江边的战略重镇安东（丹东）。

第四十二军本来就在东北地区进行农业生产，但他们的位置在中国东北的西部，必须向东移动。据军长吴瑞林的回忆，他接到结束生产的命令时间更早一些，六月二十九日，他就登上一列专列从齐齐哈尔出发了。吴军长从来没有坐过如此豪华的列车，车上为他准备的饭菜中有他从未见过的山珍海味，而且这列专列还是一路绿灯，身经百战的吴军长由此知道不寻常的事情肯定发生了。列车到达沈阳后，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简明地向他传达了第四十二军七天之内集结于通化、梅河口一线的命令。

当天晚上，第四十二军党委会作出决定：

一、我四十二军军部移往通化；一二四师为第一梯队，集结于通化；一二六师集结于通化以东临江大理寺；一二五师集结于梅河口。要求各师必须在六天之内做好一切乘车准备，待命。

二、将我军的生产任务移交给地方，抽调我军各师的解放战士组成一个留守团暂时管理，待地方派人来后，办理交接手续。

三、军所属机关、部队，立即通知各单位外出执行任务的分散人员，赶到指定地点集合归队。

四、常委会决定，一定要把生产任务向地方移交好。把所开垦之土地全部交地方，把所喂养之牲畜牛、马、羊、猪及家禽等，全部移交给地方。不准随便杀猪宰羊搞会餐，不允许损坏庄稼，破坏生产。对所借群众和地方的生产工具，一律要归还。损坏的要进行赔偿，搞好群众纪律。

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大规模地调兵遣将时，美军第八集团军主力部队投入朝鲜战场后迅速建立起阻击防线。

七月七日，北朝鲜人民军打响了著名的第三战役。

北朝鲜人民军第三战役的方针是：不许敌人有占据新防线的时间，以迅速的行动猛烈打击敌人，突破锦江和小白山脉一线，在大田地区和小白山脉一线围歼敌人的基本主力，解放全州、论山、闻庆地区和蔚珍以南地区。北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把自己的指挥部前移至汉城，直接指挥第三战役。第三战役的目标很明确：打到釜山去，把联合国军队赶下海，把南朝鲜军队彻底歼灭，实现全朝鲜的统一。

就当时战争形势的进展而言，朝鲜统一目标的实现只剩下了时间问题。

但是，就在这一天，联合国安理会召开正式会议，在苏联代表和中国合法代表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由英国和法国提出、由美国政府拟定的“关于设立联合司令部以统一指挥联合国各国参战部队”的提案：“建议所有按照前述决议提供军事部队和其他援助的国家将该项部队和其他援助交由美国指挥下的统一司令部使用”。同时“请求美国派该项部队的司令官”。第二天，杜鲁门总统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至此，自联合国成立以来，第一支打着“联合国军”旗号的部队诞生了。

面对有十几个国家声明参战的联合国军，金日成表示出的是极大的蔑视。金日成的法宝是时间。因为他知道，北朝鲜人民军不可能持续保持强大的攻势，如果不能一鼓作气战斗到全朝鲜迅速统一，很可能会出现预想不到的问题。尤其是目前联合国军队还没有在朝鲜站住脚，这是人民军击敌制胜的最好时机。在第三战役发动前，金日成坚决地撤换了一些指挥部队前进不迅速的高级将领。并决心在一个叫大田的地方，给予美军一次毁灭性的歼灭。

而此时，麦克阿瑟终于明白，他原来夸口说的“给我两个师就可以解决朝鲜问题”是多么的不切实际。麦克阿瑟是不会承认自己判断失误

的。在史密斯特遣队惨遭失败的当天，麦克阿瑟要求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增派四个师给他，以“供他在七月至八月间扭转战局使用”，因为“情况正在发展成为大规模作战”。在华盛顿的杜鲁门听到的还是那个傲慢的口吻：要么增兵，要么失败了我不负责。

再向朝鲜战场增兵对美国来讲是一个极端困难和极端矛盾的事情。

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全国陆军总兵力约为五十九万一千人，共十个作战师。其中，三十六万在美国本土，二十三万一千人分布在海外。美国战略安全的重点在欧洲，其海外驻军分布为：西德八万人，奥地利九千五百人，意大利七千八百人；而在太平洋地区分散驻扎着七千人，与苏联仅隔一道海峡的阿拉斯加七千五百人，南美的加勒比地区一万二千二百人。另外，数千名担任武官、观察员、援助人员的军人也在现役内。虽然美国在远东的兵力多达十万一千人，但承担着南亚广大地区的占领任务。小小的朝鲜战场，美国究竟要提供多少兵力才够用？朝鲜战场是不是一个无底洞呢？

麦克阿瑟的请求不是没有道理的。尽管美国在朝鲜前线使用了大批的空军，美国海军也直接游弋在朝鲜近海参战，但南朝鲜军队的节节溃败趋势却没有丝毫减缓。南朝鲜前线司令官甚至下达了“只要看见南朝鲜的散兵游勇，如果不立即上前线，就格杀勿论”的命令，但是美军和南朝鲜军建立的防线还是接二连三地垮了。为拯救败局，美军开始增兵。

七月十三日，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官沃克在大丘正式成立美军司令部。第二十四师在二十一团一营遭受失败后，师主力在迪安师长的率领下已经前进到大田。第二十五师于十日到达釜山，美军精锐的骑兵第一师也于十八日在浦项登陆。在麦克阿瑟的命令下，南朝鲜军队全部归美军指挥。

从朝鲜战场双方的态势上看，一场大战已经在所难免。

对于美军一线指挥官第二十四师师长迪安来讲，在决心以锦江为天然屏障阻击北朝鲜人民军的时候，他的心情肯定是不安的。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史密斯特遣队已经遭受重创，连续的阻击失利也使部队减员严重。更重要的是，美军士兵自从踏上朝鲜的领土起，就没有看到过一丝“胜利的希望”，伤亡和失踪人数同时增加就说明了这一可怕的现实。在把锦江上所有的桥梁都炸掉、所有可以渡江的船只都烧毁之后，迪安师长对部下的暗示是：保持与友邻部队的联系，在情况危急的时候撤退，并尽可能争取时间等待骑兵第一师的增援——尽管沃克将军的书面命令是：第二十四师在任何时候都不准从锦江一线撤退。

七月十四日拂晓，北朝鲜人民军前锋部队前进至锦江北岸。在南岸防御的美军第二十四师三十四团的L连和一个炮兵营看见只有两只驳船在渡江，就没把人民军士兵的进攻当回事。但是，当大批的人民军渡江行动出奇的迅速起来时，他们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后路顷刻间就被切断了。惊慌的L连连长没打几枪就擅自命令撤退，把炮兵营和侧翼的连队完全暴露给了人民军。结果，一个小时内，六十三野战炮兵营营长和他的一百多名士兵，连同十门火炮、八十六台车辆全部被人民军歼灭或缴获。

美国军队又一次尝到了共产党军队特殊的战术。美国兵说这是“类似西部电影中的印第安人的袭击行动”。

由于三十四团的防线被突破，它与十九团之间的联系被撕开了缝隙。迪安师长急忙命令十九团坚决阻击。十九团组建于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迪安在当上尉的时候曾在这个团任职。十九团的团长是后来成为驻韩美军上将司令的梅尔上校。十五日夜，人民军士兵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渡江手段，冒着美军空中和地面的炮火强行渡过锦江，顽强

地向十九团的阵地冲上来。战斗一直打到十六日早上，十九团的阵地多处被突破。美军发起了几次反冲击，但效果不大。到上午十时，人民军终于把十九团唯一的退路封锁了。白热化的交战持续了整整一天。黄昏的时候，在十九团大部分部队被歼灭、打散的情况下，一名参谋开着最后一辆坦克载着受了重伤的梅尔团长突围。在坦克中，梅尔得知，他负伤后任命的代理团长温斯泰德已经战死，副团长乘吉普车自行突围去了，部队现在已经没有了指挥官。透过坦克的观察窗口，梅尔团长看见公路上至少有一百多辆美军的车辆在燃烧，成群的美军士兵争相逃命。他命令作战参谋休斯塔马哈上尉把逃兵组织起来，谁知这个上尉没过一会儿就死在了乱枪中，美国兵开始大面积地四处逃散。十九团在这次战斗中的损失是：C连的一百七十一人中一百二十二人没有归队。团部、一营、迫击炮连的装备全部丢失。而团长梅尔在总结报告中说：错误是自己过早地使用了预备队。

至此，美军第二十四师的三个主力团均受到严重损失。师长迪安意识到，阻止北朝鲜军队的进攻犹如“企图防止水从渔网中漏出来”。他被迫命令他的部队全线撤退。然而，就在这时，沃克将军却对他下达了一个几乎没有办法完成的任务：在大田坚守到二十日，等待美军骑兵第一师的接防。大田，扼守在通往朝鲜半岛最南端的咽喉要道上。“当然，如果您认为已经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可以在二十日前放弃大田。”沃克最后这么说。可是，迪安是职业军人，他知道这只是客气而已，他和他的第二十四师必须坚持到二十日那一天。

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日，对迪安来讲，是一个终生不堪回首的日子。

人民军从十九日夜晚发起了新一轮的进攻。人民军采取的还是正面进攻和两翼渗透的战术，第二十四师的各个阵地一次次出现告急。下级军官们多次请求撤退，迪安没有答应。凌晨三时，人民军突破大

田防御的前沿阵地，T-34坦克甚至从美军一个营的营部帐篷上碾压过去。这时，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在大田的美第二十四师部队装备了一种专门对付北朝鲜坦克的口径为八十九毫米的反坦克火箭筒，它们是在麦克阿瑟的命令下于七月八日在美国本土的加利福尼亚装上飞机的，十日新式武器到达大田，十二日下发到第二十四师。锦江战斗开始前，美军士兵把这种火箭筒部署在公路边，然而当北朝鲜的坦克出现时，经过训练的八十九毫米火箭筒手却人影全无了。结果不但北朝鲜的坦克没被阻止，前沿美军的一个营瞬间就被打散了。

二十日天亮的时候，北朝鲜人民军突进大田市区。人民军与美军“在这座燃烧的城市里展开了一场艰难而又血腥的巷战”。师长迪安仍然相信八十九毫米火箭筒的效果，他亲自带领一个火箭筒小分队去打人民军的坦克。效果是有，但绝不像说明书上说的那么神奇，火箭弹打在T-34坦克的正面当当作响，只要射中的角度稍微偏一点就根本不起作用。不过，还是有一辆北朝鲜的坦克被迪安带领的反坦克小分队击毁了。如今在南朝鲜的大田市，这辆坦克被当作展览品陈列着，说明牌上写道：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日，在W.F.迪安将军的监督下将其击毁。然而，在一九五〇年七月的这一天，迪安的悲剧很快就来临了。人民军已经把大田严密地包围，迪安指望的外围部队始终没有来解救。他甚至说不清大田周围的阵地是否还在美军手中。到下午十七时，迪安得到的报告是：“三十四团团长不知去向。”迪安疲惫到了极点，于是离开指挥所，躺在一间充满腐土和粪便味道的破屋里倒下就睡着了。天大亮的时候，迪安醒来，看见美国兵仍在到处乱窜。迪安在发出要求增援的密码电报后开始突围。他在大田的街头拉着一门七十五毫米无后坐力炮向北朝鲜的坦克射击，但是炮弹打光了也毫无所获，极端的冲动之下他甚至拔出他的手枪向坦克射击。到第二天早晨六时，掩护撤退的三十四团代理团长在市区内走错了路，进入一个死胡同。后续部队好容易到达由二十一团坚守的一个隧道，结果那个隧道早已被人民军占领，突围的美军落入了人民军布置好的圈套中。迪

安一行人在弹雨中上了向南的公路，但他立即意识到他们把方向弄错了，因为前边出现了人民军的部队，密集的射击瞬间就把他们打散了。迪安逃离公路上了山。从这时直到朝鲜战争停战，美军始终没能得到有关这位美国将军的任何消息。

大田一战，最早到达朝鲜的美军第二十四师损失了百分之四十五的人员和百分之六十的装备。

大田阻击战结束后，美军认定迪安已经死亡，立即为第二十四师任命了新任师长。

迪安没有死。他带领一行随从进入大山中，因为不顾副官的反对自己去找水喝，迪安掉下山涧，与随从人员分开了。这位美国将军独自一人开始了长达三十六天的野人般的逃亡生活。他得了痢疾，肩部和肋骨骨折，头部也有伤。他到处躲避北朝鲜军队的巡逻，吃了他认为可以充饥的一切东西。中间，还被南朝鲜老百姓发现过一次，尽管他给了老百姓一百美元，老百姓还是向人民军巡逻队报告了，但是他却奇迹般地得以逃脱。第三十六天，他又一次被老百姓发现，这次他没能逃脱。他被抓住时原来八十八公斤的体重已经降至五十八公斤。

美军第二十四师师长迪安在战俘营中度过了三个年头，于一九五三年九月四日在板门店交换战争俘虏后回国。当他回到美国自己的家时，看见家中悬挂着一枚美国政府于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六日颁发给他的荣誉勋章，勋章颁发的理由是他为美国的利益“光荣战死”。

## 仁川登陆

美国军队在朝鲜战争初期溃不成军的情形，让人怀疑这是不是那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勇善战的部队。二战中美军高级将领组织大

规模战役的超凡能力和美军士兵在极端残酷的境遇中勇敢顽强的战斗意志，难道在朝鲜战场上丧失殆尽了吗?

一位美国记者和一名美国士兵有过如下的谈话:

士兵：他们说这是警察行动，只是警察行动！有警察？有强盗？这是什么警察行动?

记者：军官们没有对你们解释吗?

士兵：没有。咱不和鲍比谈这个。

记者：鲍比是谁?

士兵：鲍比，你不知道？我们的排长。

记者：那么，鲍比没有对你们说吗?

士兵：没有。恐怕他也说不清楚。

大田战役后，北朝鲜人民军乘胜前进，于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一日发起第四战役。

人民军第四战役的主攻方向是金泉和大丘。其战役方针将金日成的最终理想阐述得十分明白，就是要彻底地消灭敌人并且创造总攻的条件:“击溃永同、咸昌、安东地区的敌军防御部队，解放洛东江以北和以西的广大地区，并且迅速抢渡洛东江，为最后消灭敌人创造有利的条件。”

金日成的指挥部再次前移，他亲自到达位于忠州南部的前线司令部坐镇指挥。他特别强调除加强主力部队沿公路前进以外的迂回和渗透战术，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必须进一步地加快速度，不给敌人以任何喘息的机会。金日成知道，北朝鲜人民军的时间已经极为宝贵了。因为“时间每过去一天，就会有更多的美国士兵、枪支、坦克和飞机”到达朝鲜战场。

二十九日，人民军突破秋风岭，摧毁了美军和南朝鲜军队的一道道防线，相继占领金泉、晋州、安东等重镇，长驱直入到达洛东江北岸。

洛东江防线，是指南北约一百六十公里、东西约八十公里的一条外围线，它的背后就是釜山，釜山是南朝鲜军队和联合国军队在朝鲜海岸边的最后一个立脚点。所以，洛东江防线在美军的眼里是“最后一道防线”，再后退就要退到大海里了。

二十九日，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将军亲自赶到撤退中的美第二十五师师部，向全师官兵发表了“誓死坚守阵地”的讲话。他说：“我们现在是为了争取时间而战斗，不允许以战场准备和其他任何理由再后退。我们的后方再也没有可退的防线了……向釜山撤退，将意味着历史上最大的杀戮。因此，我们必须战斗到底。”

沃克所说的“为了争取时间而战斗”，是指争取联合国进一步增兵的时间。

而北朝鲜人民军在完成第四战役的预定目标后，为把敌人彻底消灭在釜山前面的狭长地域内，于八月八日强渡洛东江，美军骑兵第一师、第二十五师和新参战的第二师再次溃败后退，人民军逼近了釜山的门户马山。

北朝鲜人民军的第四战役于八月二十日结束。这时，人民军已经把敌人压缩在了一个极有限的空间内。虽然由于美军和南朝鲜军的抵抗越来越顽强，人民军第四战役的预定目标没有完全实现，但是，在第四战役中，北朝鲜人民军共歼敌三万多，占领了南朝鲜百分之九十的土地。

八月十五日，是北朝鲜“祖国解放五周年”纪念日。北朝鲜首都平壤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金日成发表长篇讲话，命令把八月变成“完全解放朝鲜的月份”。

八月三十一日，北朝鲜人民军第五战役打响，它被称为“釜山战役”。

釜山战役是最后的战役。

决战来临了。

但是，战争的进程从来会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

美军布防的“釜山环形防御圈”位于朝鲜半岛的东南角，南面和东面背靠大海，西边是纵贯南北的洛东江，北面则是连绵的山脉。战役开始后，在这块易守难攻的狭窄区域内，增援的美军源源不断地抵达，其他参战国家的部队也陆续到来。而此时，北朝鲜人民军在两个月连续不断的强度进攻中已经消耗巨大，其兵力损失已达六万多人。到八月上旬，北朝鲜人民军与联合国军的兵力比例已经变为一比二。在空中力量上，联合国军也占据了绝对优势。随着战线的不断向南推移，人民军的后勤补给线越来越长，联合国军空军开始派出大量的飞机对长达几百公里的补给线连续不断地狂轰滥炸，而当初计划的海上运输也由于美国海军舰队的严密封锁无法实施。朝鲜国土的中间很窄，美军对卡在运输线上的汉江大桥地域进行反复轰炸，北朝鲜人民军的战争补给越来越困难，直至陷入了绝境。与此同时，美军开始动用先进的反坦克武器，它的一百三十毫米火箭弹对人民军坦克的击毁率很高。更大的威胁来自凝固汽油弹，装载着一百一十加仑凝固汽油的汽油弹，燃烧时间仅为二十秒，却足以使五十平方米的区域成为一片火海。T-34坦克的引导轮是橡胶制的，加上坦克自身装载的弹药和油料，使它被凝固汽油弹烧毁的数量是被火箭弹击毁的十倍以上，北

朝鲜的坦克数量因此急剧减少。第五战役开始时，人民军的坦克数量只剩下战争爆发时的三分之一。美国空军还对北朝鲜军队的后方进行了大规模的战略轰炸。从平壤到元山、兴南等工业城市都遭到毁灭性破坏，北朝鲜的军工生产基本瘫痪。

这时，联合国军在狭窄的釜山防御圈内集中了五个师的兵力，再加上南朝鲜军的八个师，其兵力密集程度是人类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每一寸战壕里都布满了士兵。天空中，联合国军空军开始了二十四小时"不间断轰炸"。尽管人民军先头部队在第五战役中曾经打到北纬三十五度线，但是，当九月十日联合国军强大的兵力开始发起反攻时，自战争爆发以来一直处于强势进攻状态的人民军被迫转入全线防御，整个洛东江战线进入了艰苦的胶着状态。

金日成速战速决的战略开始经受严峻的考验。

金日成有限的宝贵时间在一天天的防守中消失。

同时，金日成不知道，一个令北朝鲜军队遭受毁灭性打击的行动此刻正在策划之中。

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五日，麦克阿瑟酝酿已久的一个震惊世界的军事行动开始了，这就是仁川登陆。

仁川是朝鲜中部西海岸的一个港口，距离汉城仅四十公里，位于朝鲜国土东西最狭窄的"蜂腰部位"。美军如果在这里登陆成功并且展开部队，就等于在北朝鲜人民军的后方把朝鲜国土拦腰截断，从而使在南朝鲜土地上的北朝鲜军队陷入包围之中，北朝鲜军队将会在由釜山展开的扇形战场上两面受敌。那么，连最不具备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后果将是怎样的。

但是，如果美军从仁川登陆，在理论上又恰恰违反了基本的军事常识，因为仁川港有着由巨大的海潮落差而形成的宽达二十四公里的淤泥，是“世界上最不宜进行登陆作战的港口之一”。也许正是这一点，使金日成忽视了使他的军队不久以后遭到重创的仁川港。

麦克阿瑟早就想到了仁川。当仁川登陆成功后，他说自己的这个想法产生于战争爆发后的第四天。六月二十九日，当麦克阿瑟到南朝鲜视察时，他曾登上汉城南边的一座小山，举起望远镜向北方眺望。他说：“在这座小山上，我脑子里描绘着能够对付现在绝望情况的唯一方法，就是投入美国陆军和转败为胜的唯一的战略机动——仁川登陆方案，并且分析了具体实施的可能性。”没有人知道这是否是事实。但是，仁川登陆的作战方案确实是这位美国将军晚年创造的一个能够永载世界军事史的作品。

麦克阿瑟关于仁川登陆的作战设想，来自于二战中他在太平洋地区指挥作战的经验。美军曾在太平洋战区创造过“蛙跳战法”，即向日本军队防守薄弱甚至没有防守的后方要地实施机动作战，这是太平洋战争初期被掌握了制空权和制海权的日本人逼出来的战法。麦克阿瑟曾指挥美军在太平洋诸岛屿登陆作战多次，战法几乎是一样的：迂回到敌人侧翼，从敌人背后登陆。美军就是利用这样的“蛙跳战法”艰苦却成功地开辟了通往吕宋岛的胜利之路。

尽管如此，当麦克阿瑟在东京宽敞的办公室里说出仁川登陆作战的计划时，所有在场的军事将领们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认为这位七十岁的将军“是不是脑子出了什么问题”。

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东京第一大厦会议室。

这是朝鲜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军方召集的最高级别的军事会议。到会的有从美国本土赶来的包括谢尔曼海军上将、柯林斯陆军参谋长和

爱德华兹空军副参谋长在内的三军高级将领。他们讨论的是麦克阿瑟提出的仁川登陆作战计划。

海军方面首先发言，说的全是在那个叫仁川的地方进行大规模的登陆作战是多么的不切实际。那里有世界上最大落差的潮汐，落差达几十英尺，从而使几百上千万年淤积的烂泥形成了几十公里的滩涂——“烂泥恰如巧克力软糖，但味道却大相径庭。”步兵在这样的滩涂上登陆，无异于成为敌军的活靶子。仁川港可供船只进入的水道只有一条，而且非常狭窄，潮水在狭窄的水道中水流汹涌。因此，任何一艘船，哪怕只出一点儿事故，就会将整个水道完全堵塞，这时其余的舰船就连掉头的余地都没有了。一旦行动被耽误到落潮的时候，水道上的船只就会搁浅，要想重新浮起来就得等到下次涨潮。在这样的情景下，敌军的海岸炮火怎么会闲着呢？海军的结论是：“如果在这样的地方登陆成功，海军就不得不改写教科书。”

陆军方面的忧虑是：一旦在仁川登陆的美军上岸，要想达到作战的目的，就必须指望沃克部署在釜山防御圈里的第八集团军向北实施反击，与登陆的美军形成南北夹击的态势。可是，目前沃克没有把握能够率第八集团军冲出釜山防御圈，他“为堵住他的防线上的漏洞正忙得焦头烂额，无从考虑今后突围的事”。而如果沃克不能在登陆的同时向北进攻，对于仁川登陆的美军来讲“将是灾难性的”。

是否登陆作战?

在什么地方进行登陆作战?

海军和陆军一片悲观。

麦克阿瑟最后发言。他的架势与其说是在发言，不如说是在演说。会议室中长时间的沉默使他的演说给人留下强烈的效果和深刻的

印象。麦克阿瑟欣赏所有人的悲观调子，甚至欣赏他们在争论时焦灼的神色，因为所有这些都成了他演说前的铺垫。正如柯林斯后来的回忆：“即便排除明显的戏剧性效果，这也是一次为他决心在仁川登陆而孤注一掷论点的绝妙陈述。”麦克阿瑟坚定地认为，敌人对仁川还没有防御准备。他举了一七五九年英国人在加拿大魁北克突袭的例子，正是英国士兵爬上了别人认为根本不可能爬上去的高岸，才使法国人的守卫猝不及防。仁川是一个可以出奇制胜的地方。他说他相信海军胜过海军相信自己，因为美国海军在二战的多次两栖作战中曾经克服了很多困难，海军肯定可以在仁川登陆中胜任。别的地方虽然登陆的危险性小，但价值也小。而仁川登陆可以把敌人的腰部斩断，敌人漫长的战线就会因此而瘫痪。至于第八集团军能否冲出釜山防御圈，麦克阿瑟更认为不是个问题，他认为美国士兵的顽强斗志会很快证明这一点。最后麦克阿瑟说：不登陆就只剩下一条路，就是在釜山继续进行消耗战。“你们愿意让我们的部队像牛羊一样在屠宰场似的那个环形防御圈里束手待毙吗？谁愿意为这样的悲剧负责？当然，我决不愿意！”“假如我的估计不准确，而且万一我陷入无力应付的防守局面，那我将亲自把我们的部队在惨遭挫败以前撤退下来。那时唯一的损失将只是我个人职业上的名誉而已。但仁川之战绝不会失败，并且必将取得胜利，它将挽救十万人的生命。”

在场的所有的人都被他的演说打动了。

麦克阿瑟以他的坚强固执和他作为军事将领的威望，不但说服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中难以对付的三军部长们，而且经过反复的陈述、愤怒、要挟，最终杜鲁门总统也不得不同意仁川登陆作战的计划了。杜鲁门因为麦克阿瑟早有这一重大的计划却一直不向他请示，心里很不舒服，他曾在七月间多次问到麦克阿瑟是否存在这么一个作战企图，可傲慢的麦克阿瑟一直冲总统打哈哈，仿佛美国的事务是可以由一个远东司令随意支配的。但是，朝鲜战争目前的难堪僵局该怎么打开，

杜鲁门除了同意他所任命的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意见外，似乎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但就是在此时，包括杜鲁门在内的所有的人，内心都对仁川登陆存在着巨大的忧虑。就像麦克阿瑟自己所说的那样，这与其说是一场登陆作战，不如说是一场赌博。

赌场上的规律人人皆知：靠一个筹码就能发横财的机会几乎微乎其微。

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中国在北朝鲜还没有建立大使馆，因此，中国领导人对朝鲜战争进程的了解并不是很及时。战争爆发后不久，中国驻北朝鲜大使馆匆匆建立起来。九月初，中国大使馆政务参赞柴成文从平壤回国汇报有关朝鲜战争的情况。时值釜山前线战局僵持的阶段，也正是美军秘密准备仁川登陆的时候，柴成文向聂荣臻汇报情况时，特别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美军正在积极准备反攻，很可能会在北朝鲜人民军的侧后实施登陆作战，而地点很可能在仁川。柴成文这个判断的理由是：仁川是汉城的门户，占领仁川可以直捣汉城，一举切断人民军的后勤补给线。同时，又可以和釜山防御圈里的美军相互呼应。情报显示，美军最近在仁川沿海的活动十分频繁。

这是一个事关全局成败的判断。聂荣臻当天就把柴成文的汇报提纲呈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当即批示："周阅后，刘、朱、任阅，退聂。请周约柴成文一谈，指示任务和方法。第十三兵团同柴去的军事人员是否要来京与柴一道面授机宜，请周酌定。"

周恩来在与柴成文谈话时，明确地问道："如果我们出兵，将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林彪问柴成文："他们（指金日成）有无上山打游击的准备？"

应该说，有着丰富战争经验的中国领导人对美军将要采取的行动，是有充分预料的。因为目前战局的僵持对北朝鲜越来越不利。为了应对战局的逆转，在聂荣臻的建议下，中央军委决定，调在中国华东地区准备用于解放台湾的宋时轮的第九兵团（辖第二十、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军）和在西北地区刚刚结束剿匪作战的杨得志的第十九兵团（辖第六十三、第六十四、第六十五军），分别集结于津浦、陇海两条铁路线上，作为东北边防军的第二梯队。同时，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加强对国民党军队可能发动袭击的戒备。八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再次主持召开国防会议，决定加速中国军队炮兵、空军和装甲兵的建设，加紧向苏联订购必需的武器装备。

对美军将在仁川登陆的事先预测，中国是否向北朝鲜方面打了招呼，至今没有确切的记载。

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五日。凌晨。

麦克阿瑟坐在他的“麦金莱山”号旗舰上，嘴里叼着他的玉米芯烟斗，注视着波涛汹涌的海浪和在海浪中前进的登陆舰队。麦克阿瑟此时的心情难以形容，这位身经百战的职业军人，面对黑暗中的朝鲜海岸和已经不可中止的军事行动，感到了一些心神不定。麦克阿瑟知道，登陆作战的关键是奇袭，但是，美军登陆的时间和企图可以说不是什么秘密，秘密只是登陆的地点。为此，他下令所有的电台和报刊进行迷惑性的报道，大肆宣扬联合国军要在釜山进行反攻，希望混淆人们对仁川登陆作战的戒备。同时，在朝鲜东海岸的三陟附近，麦克阿瑟命令出动以接受日本投降签字而闻名的“密苏里”号战列舰，舰上口径巨大的舰炮对三陟海岸所有目标都进行了猛烈炮击，几乎摧毁了海岸上所有的炮台和海岸阵地。“特里姆盖”号航空母舰和“海伦娜”号巡洋舰也在平壤外港和南浦一带炮击。特别是在人们最容易预想实施登陆的群山港附近，美国空军对群山港五十公里范围内的公路、铁路

等目标进行了酷似真正登陆作战前的猛烈轰炸，而且，美、英两国军队组成的联合袭击队还对群山海岸进行了战斗侦察。为隐蔽仁川登陆的一系列佯动，事后证明确实起到了作用。但是，仁川登陆点毕竟需要登陆前的侦察。于是，一个绰号“夜盗贼”的美军上尉克拉克多次潜入仁川地区，一一侦察潮汐、泥滩、海堤、防守等情况，因此产生的传奇故事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战史上留下了文字记录：“克拉克在执行任务中也担心自己的安全，因为他知道很多详细的情况，一旦被俘，对北朝鲜人来说将是无价之宝。所以，克拉克上尉行动时总是带着一枚手榴弹，他认为一枚手榴弹比用手枪自杀保险得多。”九月十四日，必要的火力准备开始了。美军的“海盗”式飞机在仁川港外的那个曾是美丽公园的月尾岛上扔下大量的凝固汽油弹，小岛立即成为一片废墟。

那么，麦克阿瑟还担心什么呢?

根据情报显示，仁川港附近的北朝鲜防御兵力不超过一千人，火力仅仅是不超过十门的火炮和一些机枪。

也许在这个时候，麦克阿瑟才真正意识到，仁川登陆作战的成败将影响他一生军事生涯的声誉。他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最后一战如果以失败告终，对于一名职业军人来讲，将是莫大的遗憾，甚至是耻辱。

麦克阿瑟在“麦金莱山”号上尽量地克制着自己。在他身边是他特意邀请来的记者们，麦克阿瑟在向他们发出的请柬上写道：请参观一次小小的战斗。记者们来到破浪前进的战舰上，不失时机地向麦克阿瑟问询“中国是否干涉”的问题，麦克阿瑟的回答是：“那样的话，我们的空军就会使鸭绿江史无前例地血流成河！”

凌晨二时，仁川登陆作战命令下达。

麦克阿瑟登上旗舰的舰桥。

这时，整个舰队已经进入仁川港狭窄的水道，所有舰船的舰炮都对准了黑暗中的仁川港。

随着一团火光和一声巨响，登陆的火力准备开始了，其空前猛烈的规模让记者们目瞪口呆。四艘巡洋舰和八艘驱逐舰在距离岸边很近的地方，在不足四十五分钟的时间内，就把两千八百四十五发炮弹倾泻在月尾岛上，舰炮火力之巨大令空中的海军飞行员根本无法看清地面的任何目标。结果，“整个岛子好像从头到尾被犁了一遍”，“月尾岛上所有的生物荡然无存”。与此同时，空军开始向整个仁川倾泻炸弹，其数量“恰恰等于诺曼底登陆前倾泻在奥马哈海滩上的炮弹数量”。

但令美国人惊讶的是，当美军登陆作战部队开始在仁川泥泞的海岸上爬行的时候，还是受到了北朝鲜军队的顽强阻击。有关战史资料记载：“李大勋上尉指挥的人民军海防炮兵连的指战员们，直到炮身烧热弯曲或被敌人的炮弹炸断为止，坚持进行火力战斗，击沉和击毁敌人四艘舰艇。炮打坏之后，炮兵指战员们和步兵一起，同开始登陆的敌人展开激烈的白刃战。九月十五日上午十时，月尾岛上响起英雄的月尾岛守卫者们最后一次冲锋的万岁声……”

美军顺利占领月尾岛后，工兵开始作业。此时海水退潮了，舰队因此退到外海。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因为登陆的行动已经公开，如果北朝鲜军队这个时候大举反击，局面如何就很难说了。为此，美军所有的舰载飞机倾巢出动，对以仁川为半径的四十公里以内的目标，尤其是公路，进行了不间断的封锁轰炸。事后得知，北朝鲜人民军确实向仁川方向增援了部队，但是在公路上遭到美军空军的猛烈阻滞，整整一个白天都无法前进。

仁川港已经成为一片火海，尤其是港内的储油罐被击中，冲天的大火仿佛整座城市都在燃烧。美国海军陆战队乘登陆艇开始向海滩冲击，“他们使用木制或铝制的梯子，从登陆舰艇上爬下来，再攀上围绕着仁川城的由混凝土构筑的海堤”。一名美国《时代》周刊记者跟随着陆战队员前进，他后来描述道：“一千英尺长的红海滩的海堤看上去像美国无线电公司的大楼一样高。”

下午十七时三十分，第一名美军陆战队员登上仁川的土地。

海军陆战队上尉B.洛佩斯登陆后突入仁川市区，在向北朝鲜人民军的一个阻击阵地发起进攻时，他的手臂中弹，“握在他手里的手榴弹掉到了地上”。为了身边同一个排的战友，洛佩斯上尉“扑倒在即将爆炸的手榴弹上”。

美军很快占领了仁川城。

紧接着，整整一夜的时间，一万八千多名美军陆战队员和大量的补给、几十辆坦克，全部在仁川上岸。在随后的四天里，又有五万多名联合国军的士兵从仁川登陆。

仁川登陆成功后，美军立即向汉城方向突进。

一九五〇年九月十六日，仁川登陆作战的第二天，麦克阿瑟登上仁川海岸。这位将军在记者们的照相机前得意洋洋。在布满烧毁的坦克和士兵尸体的阵地上，他自己又导演了一出小小的戏剧。麦克阿瑟的第一句台词是：我想寻找一个叫刘易斯·普勒的上校，他是陆战队的一名团长，我想亲自为这位团长授一枚勋章。正在进攻一个山头的刘易斯接到通知后，这位麦克阿瑟的崇拜者对前来请他去接受勋章的军官说：“我们正在战斗！如果他打算授勋，就让他来这里好了！”麦克阿瑟不但没有因为这个团长的傲慢发怒，相反对他如此配合自己的表

演十分欣赏。麦克阿瑟立即乘吉普车向枪声不断的方向前进，不管部下如何劝阻他都不听。直到在一个四周炮声呼啸的草棚子里，麦克阿瑟见到了满身硝烟的刘易斯，“他们愉快地互相敬礼”。记者们高兴得发疯了，因为世上没有比这更能激起读者兴趣的英雄故事了。

麦克阿瑟的赌博和表演都成功了。

整个仁川登陆，美军伤亡两百零三人，北朝鲜人民军伤亡或被俘一千五百九十四人。

接下来，更大的重创还在等着已经突进到朝鲜半岛南端的北朝鲜人民军。

## 艰难的抉择

美军在仁川登陆后，腹背受敌的人民军立即调整部署：一方面，在洛东江防线上顽强地阻击向北突破的美第八集团军的进攻；另一方面，调动兵力向汉城增援，试图“把敌人消灭在京仁地区”。

但是，除了在后勤补给上北朝鲜人民军已与联合国军相差悬殊外，在兵力上人民军也处于绝对的劣势。九月中旬，联合国军的兵力已经达到十五万一千人，坦克五百辆，各种火炮一千门以上，还有美国空军第五航空队的一千二百架飞机的支援。而人民军这时只有七万左右的兵力，其中约一半还是为补充战争损耗而征来的新兵，其装备也在战斗中损失严重，装备率仅仅是编制的一半。

人民军在北朝鲜前线指挥官金策大将的指挥下，在洛东江对峙线上顽强地坚持了整整六天。随着在洛东江各条防线阻击的不断受挫，人民军全线崩溃的征兆已经显露。十八日晚，人民军第一军右翼开始按秩序后退。二十二日，在釜山狭窄的防御圈内苦苦坚守两个月之久、差点被赶下大海的美军第八集团军终于突破人民军的防线，大举

渡过了洛东江。在重新构成防线已经没有任何希望的形势下，二十三日，金日成下达了全线向三八线附近撤退的命令。

金日成下达这个命令时的痛苦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因为仅仅在一个月前，全朝鲜统一的前景似乎已经很明朗。当时没有人相信丧失斗志的南朝鲜军队会死里逃生，即使有美军连续不断的支持。而那个狭窄的釜山防御圈在一个月前还犹如汪洋大海中一个仅供苟延残喘的小小的救生圈。

根据战后披露的资料，八月，麦克阿瑟确实曾经制定过一份从朝鲜半岛撤退的详尽计划，为此美国海军已经做了大规模的准备。

可是现在，北朝鲜人民军的撤退还是晚了。

二十七日，沿着京釜公路向北突进的美军与从仁川登陆的海军陆战队会师，人民军的退路被全线封锁。被包围的人民军部队顽强突围，很多部队被打散，士兵们进入山区成为游击队员。

到了二十八日，美联社以《北朝鲜军队行踪之谜，南部战线一夜之间销声匿迹》为题报道说："北朝鲜军队如何摆脱了联合国军的追击，是战局中的一个谜。"当时的日本报纸也报道说："北朝鲜军队烟消云散，一兵一卒也没抓到。"

实际上，人民军遭受的损失是巨大而致命的。根据战后资料的统计，七万多人民军撤退回三八线以北的不到三万人。在损失的兵员中，一万人伤亡，一万两千多人被俘，成为游击队员的有近两万人。而且，人民军的重装备几乎全部丢失。

北朝鲜公开资料记述的人民军的撤退如下：

西部战线的人民军部队，在咸安地区和洛东江左岸，一面展开英勇的反击和果敢的袭击战，一面逐渐撤退到洛东江右岸有利的地点。于是，敌人在九月十八日至十九日付出莫大损

失后渡过洛东江。九月十九日，敌人在我军各联合部队的接合部突破了我军的防线，攻入到我军的背后，使我军处于不利形势。

东部战线的人民军各联合部队在庆州、浦项地区不分昼夜地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九月二十一日，敌人在这个地区突破我军防线。当时敌人从北方威胁着汉城，洛东江战线地区又被敌人突破，因此整个战线的情况是紧张的。

美第九军、第一军和李伪第二军、第一军部队在大批飞机的掩护下，二十二日突破我军防御……九月二十四日到三十日拂晓，历时六天，我军联合部队在咸昌、梨花岭坚守阵地……安东、竹岭地区展开顽强防御，把敌人的进攻推迟了好几天，有效地掩护了后方部队的撤退。

但是，当时窃取在西部战线地区我军部队负责地位的以金雄（北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中将军团长）为首的反革命反党宗派主义分子们，对最高司令部的作战方针蓄意采取了消极怠工的态度，这些恶徒们没有认真执行最高司令部鉴于敌人要在仁川登陆的企图越来越露骨、为加强仁川——汉城地区的防御而下达的关于把洛东江地区的部队转移到仁川——汉城地区的命令，又没有执行鉴于其后战线已经紧张的情况下而下达的关于把西线部队迅速转移到锦江以北的有利地区的命令。这些反革命反党宗派分子阻挠了最高司令部作战方针的实现，从而帮助了敌人，给我军带来了更大的困难。

这样，我军一部分主力部队还没有从南半部地区撤完，敌人就抢占了南半部的大部分地区。因此，前线处于严重状态……我军被切成两段，主力部队的大部分陷于敌人的包围之中。

人民军统帅金日成后来是这样总结失败原因的：

一、美国动员陆、海、空的大兵力，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敌我兵力对比上敌人占优势。

二、潜入到人民军内部的金雄等反革命反党宗派分子和部分指挥人员，没有及时贯彻党和最高司令部的正确的战略和作战方针。

三、美李匪帮的屠杀政策和朴宪永（当时北朝鲜的外交部长，生于南朝鲜）、李承烨（当时北朝鲜的司法部长，生于南朝鲜）间谍集团的破坏。

除去政治上的说辞之外，金日成在他的总结中至少有两点是值得军事家们研究的：一、人民军向南前进的时候，其推进速度和兵力投入都不理想，没有达到当美军尚未在釜山形成坚固防御时一鼓作气地把敌人赶下海去的目标。而如果人民军一旦实现了这个目标，占领朝鲜全境，联合国的任何武装干涉都将失去政治和军事的依据。二、仁川登陆前的预测失误和登陆后釜山防线的被突破，以及没能对仁川方向组织有效的阻击，从而使南北美军顺利会合形成了强大的夹击攻势。

从美军的角度上看，仁川登陆的奇袭效果、空中力量和地面兵力上的绝对优势，这些都是扭转战局的关键。

仁川登陆后的第二周，即九月二十八日，联合国军占领汉城。美军战史中记载："在汉城抵抗宣告结束时，敌人向议政府方向退却了。北朝鲜军队想入侵南朝鲜是一场大赌博，并且边唱凯歌边进入汉城，至今恰恰是第九十天。"

九月二十九日上午十时，麦克阿瑟飞抵金浦机场，然后在已经成为一片废墟的汉城街道上穿过欢迎的人流，到达南朝鲜中央政府大楼国会议事堂。麦克阿瑟和李承晚夫妇一起进入会场，沃克和美国海军军官们坐在主席台上，"还都仪式"开始了。这个仪式没有仪仗队，原来指望的是美军陆战一师的乐队，可他们的乐器留在了日本没带来，况且作为步兵参加战斗的陆战一师很多乐手都受了伤。此时，还能听到汉城市区内零星战斗的枪声。麦克阿瑟的祝词是事先准备好的：

> 总统阁下，以人类最伟大希望和寄托为象征而战斗的我们联合国军，在怜悯之神的保佑下，在此解放了朝鲜的这座古都。现在，我把汉城交给你。

在麦克阿瑟说这番话的时候，大厅北边残破的玻璃在炮声的震荡中掉落下来，引起在场的所有人的一片惊慌，大家都以为是炸弹爆炸，只有麦克阿瑟一动未动，在他薄而固执的嘴唇上，玉米芯烟斗冒

出的烟草味发出淡淡的香气。他在碎裂声和惊呼声中抬头看了看他的头顶，那里飘扬着一面美国的星条旗。

尽管美国国内舆论说，那面星条旗在整个仪式中“位置太显眼”，会让人产生“美国占领了朝鲜”的联想，但麦克阿瑟在整个朝鲜战争中的个人威望在这一刻毫无疑问地到达了顶点——后来的历史说明朝鲜战争发展到现在，仅仅是序幕的序幕，但麦克阿瑟却在序幕中走到了顶点。

顶点，意味着再往后走就是下坡路了。

接着是李承晚的感谢词。全世界的人都从那一天的报纸上看到了这个老头子“泣不成声”，他说：“我本人的永远感谢和南朝鲜国民的感谢心情，不知用什么语言来表达才好……”应该说，李承晚当时确实是“百感交集”。战局的发展趋势以及他个人政治前途的转变竟然如此迅速，仿佛命运在故意折腾这个老头子一样，让他在短短的几个月中恍惚如梦。

当天，联合国军的先头部队到达三八线。

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国庆日。

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个国庆日，全国各地都举行了庆祝活动。北京的大街小巷到处红旗招展。从清晨起，穿上节日服装的工人、市民和学生就相继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上午十时，毛泽东和新中国的其他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与几十万群众一起观看了盛大的阅兵式，接着就是沸腾的群众游行。入夜，五彩的焰火腾空而起，广场上的人民载歌载舞，欢乐的场面延续到深夜。

但是，在这一天，欢乐的中国人还不知道，巨大的战争阴影正向他们笼罩而来。朝鲜战争的消息虽然已可以在报纸上看到，但大多是

北朝鲜人民军胜利的消息。即使有一些不妙的迹象，普通的中国人也不会关心，百姓们认为战争离他们很遥远。

只有中国的领导人面对欢乐的场面心中暗存忧虑。随着仁川登陆作战的成功和联合国军已经进至三八线，随之而来的令世界瞩目的问题产生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是否会越过三八线继续北进?

朝鲜战争爆发以来，如果把六月二十五日战争爆发当作一个焦点的话，那么，联合国军的介入是第二个焦点，九月十五日的仁川登陆是第三个焦点，第四个焦点就是“越线”问题。

如果说联合国军介入朝鲜战争，是外来势力介入朝鲜内战，那么，如果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向北进攻，朝鲜战争的“内战”性质就不存在了，联合国军武装进入并且明确要征服的是北朝鲜这个国家，朝鲜战争将完全国际化。关于这一点，东西方两大阵营都十分明白。

在最能体现各国政治立场的联合国安理会上，反对“越线”和赞成“越线”的国家唇枪舌剑。

南朝鲜的立场不言而喻。李承晚在九月十九日就曾说过：“万一联合国军停下来，南朝鲜军队也要前进。”南朝鲜的外交部长到处散布他们“有进攻到鸭绿江的决心”。南朝鲜国会甚至在九月三十日通过了南朝鲜军队北进的“决议”。南朝鲜军方高级将领们的情绪更加激动，在两个多月的连续溃败中一直受到舆论抨击和感到屈辱的南朝鲜军队，在“复仇”时刻到来的时候所表现出的“不杀到鸭绿江边不罢休”的情绪，甚至令美国人都感到了不安。

美国的态度是矛盾的。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联合国安理会上，美国曾解释他介入朝鲜战争的目的是“把北朝鲜军队从韩国赶出去”，现在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可是，谁都知道，美国大规模介入朝鲜战争

的真实目的并不在于一个遥远的南朝鲜，而是在于美国在整个远东的利益和与苏联冷战对峙的需要——美国不希望有北朝鲜这个政权存在。本着利益与时局这两种需要，在“越线”问题上，美国国内分成了“鹰派”和“鸽派”两种态度。“鹰派”坚决主张联合国军一举越过三八线，理由是：北朝鲜军队虽已溃败，但是具备卷土重来的条件，如果不彻底消灭北朝鲜军队，朝鲜问题将永远存在。而联合国军长期在朝鲜待下去是不可能的，不越过三八线，就意味着这条线将成为永久的国境线。既然联合国军介入朝鲜战争是“为了朝鲜的统一”，那么三八线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战争中联合国军的空军已经“越线”攻击，于是，没有地面部队不得“越线”的理由。因为有联合国六月二十七日安理会决议的限制，“鹰派”抓住菲律宾代表的一个观点，那就是在解释联合国决议中“那个地域”这个词时，将英文“THE AREA”中的“THE”解释为代表着“全韩国”的意思。在这样的解释下，如果联合国军突破三八线，继而占领整个朝鲜半岛，就成为联合国决议授权的了。美国“鸽派”在“消灭北朝鲜政权”这个根本问题上与“鹰派”没有分歧，分歧是对战争一旦进入北朝鲜领土苏联和中国是否干涉的后果存在异议。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一旦苏联和中国干涉，第三次世界大战实际上就算是爆发了。杜鲁门政府的最大顾虑也正在于此。

西欧各国本来是不赞成“越线”的，他们关心的是欧洲的安全，尤其是怕新的世界大战爆发，希望朝鲜战争赶快结束。但是，由于英国的“如果不越过三八线，就不可能在联合国的管理下在全朝鲜实行选举和统一”这个立场的影响，加上美国在二战中是欧洲的“救星”，现在欧洲的安全还指望着美国，因此西欧的立场最后形成一边倒的局面。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泛太平洋国家站在美国“鹰派”的立场上。

只有苏联的立场一直令人捉摸不定。苏联从朝鲜战争一爆发就始终处在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态中。当六月二十七日联合国就出

兵决议表决时，苏联代表出人意料地“缺席”了，这使批准联合国武装干涉朝鲜战争的决议顺利通过。当美国开始出兵进入朝鲜时，杜鲁门依旧担心苏联会反对，甚至是同样采取出兵的态度。但是，苏联外长的一个“外国势力不得干涉朝鲜”的表态式声明给了杜鲁门“苏联不打算介入朝鲜事务”的信号，杜鲁门这才放心地让麦克阿瑟指挥美国军队进入朝鲜半岛。那么，历史的真实又是什么呢？连杜鲁门都没有想到，在西方世界看来具有强大军事能力的苏联对美国竟存在着从不曾流露过的恐惧。这一点，在不久以后中国领导人艰难抉择的时刻里将显露出来。

九月十九日，联合国大会开幕。苏联外长维辛斯基提出了以三八线停战为内容的“和平宣言”，但没有获得通过。安理会提出一个“八国提案”，但这次苏联使用了否决权。为躲开苏联的否决，二十九日，“八国提案”被直接交到联合国大会。

“八国提案”，是由英国、澳大利亚、菲律宾、荷兰、挪威、巴西、古巴、巴基斯坦八国联合署名提出的，主要内容是：

一、联合国为确保全朝鲜的稳定，采取一切的适当措施。

二、为建立统一的民主政府，在联合国的管理下实施普选。

三、实现韩国的迅速复兴。

四、除完成第二项工作外，联合国军不得在韩国驻扎。

五、为了韩国的统一复兴，任命新的联合国韩国委员会。

显然，这是一个默许联合国军进入北朝鲜的文件。

整个联合国就此陷入前所未有的辩论漩涡中。中国人对联合国军一旦越过三八线将有的反应是辩论的焦点：也许中国会以公开的或“志愿者”的方式出兵朝鲜？也许中国只会最大限度地向联合国特别是亚洲国家施加压力以确保北朝鲜的“独立”或“使之成为缓冲地带”？也许中国会大规模地陈兵中朝边界但并不出兵？而英国的结论是：“中国目前内部尚未‘巩固’。正在全力进行‘恢复经济’，且‘军事实力不足以应付大战’的需要……所以出兵朝鲜的可能性很小。”尽管对中国是否武装干预的各种情报通过各种渠道不断传来，尽管与中国有着密切联系的印度不断把中国的警告明确地提到联合国大会上，历史的不幸却是：中国的警告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九月二十七日，麦克阿瑟在汉城接到来自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训令：

> ……你的军事目的是摧毁北朝鲜的武装力量。为达此目的，授权你在朝鲜的三八线以北进行军事行动，包括两栖登陆和空降或地面行动……

因为还是担心战争演变成世界大战，训令的最后提醒麦克阿瑟：

>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你的部队都不准越过满洲或苏联与朝鲜交界的地域。出于政策上的需要，在与苏联接壤的东北各道或在沿满洲边境地区，不得使用非朝鲜人的地面部队。对于你们在三八线南北作战的支持，不包括对满洲或对苏联领土的空军和海军行动。

在这种背景下，正在朝鲜半岛上作战的美军第八集团军声称，他们将要停止在三八线上以“等候追击撤退的北朝鲜军队的许可”。

一时间，共和党的议员们纷纷指责杜鲁门政府是在“姑息共产主义分子”，是在让“共产党的卫星国”得以喘息，而一旦共产党军队卷土重来，那就等于是纵容战争“再度爆发”。

九月二十九日，刚刚接任国防部长的马歇尔将军给麦克阿瑟发去一封仅供他个人阅读的密电：

日前有报道根据第八集团军的声明推测，南朝鲜师将在三八线停止前进重新集结。我们希望你向三八线以北推进时，在战术上和战略上都感到不受限制。前面提到的声明，需要联合国就越过三八线一事投票同意，这很可能会使联合国限于进退维谷的境地，还不如由你选择是否在军事上有必要这样做。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真实想法是：在完成“打败北朝鲜军队的使命之前”，尽量避免让“三八线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麦克阿瑟立即提出了北进的具体计划：

一、第八集团军以现在的编成北进，向平壤进攻。在攻占平壤时，第十军在元山登陆，同第八集团军一起实施夹击。

二、第三步兵师为总司令部的预备队，控制在日本。

三、在安州——宁远——兴南相连之线作战，只限于南朝鲜军队。

四、第八集团军发起攻势的时间，最早不超过十月十五日，最迟不晚于三十日。

美军的这个决定是在“八国提案”还没有在联合国通过的情况下作出的。尽管这样，麦克阿瑟还是非常不满意，原因是他的北进计划受到诸多限制。按照他的想法，即使苏联和中国参战，也要把战争打下去，以此“把亚洲处在萌芽状态的共产党政权通通消灭掉”。

第二天，也就是十月一日，麦克阿瑟在东京通过广播电台向北朝鲜军队的总指挥官金日成发出了要求人民军投降的敦促书。

艰难的历史抉择终于摆在了十月一日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新中国领导人面前。

早在美军实施仁川登陆的第二天，金日成就派内务相朴一禹火速赶到中国境内的安东，向已经集结在那里的中国第十三兵团的军事领导们通报了人民军面临的严重形势。对于仁川登陆后人民军到底面临着什么局面、各部队的位置、战斗力和应变措施等等，朴一禹已经无法说清楚。他只知道现在部队正在北撤，公路和铁路都已被破坏，而敌人正在急速向北推进。

朴一禹向中国转达了金日成的请求：请求中国出兵援助。

这是北朝鲜方面第一次正式提出这个请求。

金日成在接到麦克阿瑟发出投降敦促书的当天，紧急召见中国驻北朝鲜大使，坚定地表示了北朝鲜人民军决不投降的态度。这个态度在金日成发表的回答麦克阿瑟通牒的讲话中阐述得更明确，他号召北朝鲜人民用鲜血“捍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如果不得已必须后退的时候，要把一切物资和运输工具全部运走，哪怕是“一台机床、一节车皮、一粒粮食”，都不能留给敌人。

十月三日，带着金日成的急信，朴一禹到达北京：

……

在美国侵略军上陆仁川以前，我们的战况不能说不利于我们，敌人在连战连败的情况下，被我们挤入于朝鲜南端狭小的地区里，我们有可能争取最后的决战的胜利，美帝军事威信极度地降低了。于是美帝国主义为挽回其威信，为实现其将朝鲜殖民地化与军事基地化之目的，即调动了驻太平洋方面陆海空军的差不多全部兵力，遂于九月十六日以优势兵力，在仁川登陆后继续占领了京城。

目前战况是极端严重的了，我们人民军虽然对于上陆的敌人，进行了极顽强的抵抗，但对于前线的人民军已经造成了很不利的情况。

战争以来，敌人利用约千架的各种航空机，每天不分昼夜任意地轰炸我们的前方与后方。在对敌空军毫无抵抗的我们的面前，敌人则充分发挥其空军威力了。各条战线上敌人在其空军掩护下，活动大量机械化部队，我们受到的兵力与物资方面的损失是非常严重的，后方的交通运输通信与其他设施大量的被破坏，同时，我们的机动力，则更加减弱了。

敌人登陆部队与南线的部队已经连接一起，切断了我们的南北部队，结果使我们在南部战线的人民军处于被敌切断分割的不利情况里，得不到武器弹药，失掉联系，甚至于有一部分部队，则已被敌人分散包围着。如果京城完全被占领，则我们估计敌人可能继续向三八线以北地区进攻。如果不能急速改善我们的各种不利条件，则敌人的企图是很可能会实现的。要保障我们的运输、供给以及部队之机动力，则必须具备必要的空军，但是我们又没有准备好的飞机师。

敬爱的毛泽东同志！我们一定要决心克服一切的困难，不让敌人把朝鲜殖民地化与军事基地化！我们一定要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为争取朝鲜人民的独立解放民主而斗争到底！

我们正在集中全力编训新的师团，集结在南部的十余万部队于作战上有利的地区，动员全体人民，准备长期作战。

在目前敌人趁着我们的严重危急，不予我们时间。如要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则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急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

天安门夜空的焰火还没有熄灭，中南海颐年堂里的气氛严肃而紧张。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中央书记处会议，对朝鲜目前的局势和金日成的请求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讨论。

中国政府一直密切关注着朝鲜战争的局势。至于“联合国军队如果‘越线’进攻北朝鲜，中国将不能不管”这样的警告，中国政府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向国际社会作了明确的表态。美军在仁川登陆后不久，中国军队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召见印度大使潘尼迦时，印度大使曾隐晦地用麦克阿瑟在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逼近南京时的那句“给我五百架飞机就可以摧毁他们”提醒中国领导人，如果介入朝鲜战争，“中国的工业将遭受破坏”，“中国的建设将拖后十年”。而聂荣臻的回答是：“一旦战争起来了，我们除了起而抵抗之外，是别无他途可寻的。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帝国主义有他自己的弱点，因此我们今天的任务是争取和平，制止战争的发生和发展。”

九月三十日，周恩来发表重要演说，这个在后来的岁月里被反复引用的演说，被称为中国方面发表的阐述中国原则立场的重要文件。周恩来总理说：

> 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谁要是企图把中国近五万万人口排除在联合国之外，谁要是抹煞和破坏这四分之一人类的利益而妄想独断地解决与中国有直接关系的任何东方问题，那么，谁就一定要碰得头破血流。

决不能“置之不理”，这就是在明确地告诉联合国，中国不会任局势发展而没有动作。

但是，中国领导层一开始在是否出兵朝鲜的问题上也出现过分歧，虽然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初步提出了出兵的意向。鉴于当时林彪有病无法出任东北边防军总指挥，会议达成立即让彭德怀进京商议的决定。而最后是否出兵参战，会议决定于十月四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再进行讨论。

就在这天晚上，南朝鲜军队越过了三八线。

十月三日凌晨一时，周恩来再次召见印度大使潘尼迦，通过正式的外交途径对美国政府明确表示：“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管，我们要管。”

应该说，中国在未来的朝鲜战争中出兵参战，事先是没有保密的。可惜对于中国方面的一再警告，美国方面竟然当作是一种“口头上的威胁”，是一种外交上的“姿态”。拿被称为“中国通”的麦克阿瑟的情报处长查尔斯·威洛比的话说：“最近中共领袖声称，如果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他们将进入北朝鲜，这不过是外交上的一种勒索。”

中国的出兵就在美国人以为的“姿态”中开始了。

一九五〇年十月四日，一位在未来的朝鲜战争中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军队高级将领出现在北京，他是彭德怀。

彭德怀，这个八岁时就失去母亲的贫寒农民的儿子，现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他个人的历史几乎就是中国共产党从建立自己的武装直至取得全国政权的历史。红军初创时，他任红军第三军团军团长，在艰苦的反击蒋介石的“围剿”中战功卓著。红军长征时，他的军团血染湘江，突破乌江，攻下娄山关天堑，使几乎覆灭的中国红军得以转危为安。走出没有人烟的草地后，在红军的陕甘支队中，他和毛泽东一个是司令员，一个是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他指挥的百团大战震惊世界。在与蒋介石军队的最后较量中，他率领的野战军所向披靡，收复了中国西北部的广大地域。毛泽东有专门为他写下的诗句：

谁能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时任中国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彭德怀正致力于发展西北地区经济的工作。虽然他的办公室里自朝鲜战争爆发后就挂上了朝鲜地图，但是，他更为关心的还是中国西北地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他那通过血肉的拼杀建立新中国的理想已经实现，现在，他梦想的是让脚下的土地多产粮食，让人民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为此，他亲自主持制定了发展大西北的经济计划，包括石油开采、农业灌溉以及在交通不发达的地区建立起交通网。但是，他接到了立即去北京开会的通知，并且中央的专机此刻已经停在了他所在的城市西安。彭德怀上飞机的时候，还不知道中央会议要讨论的是什么，他嘱咐秘书，把他的大西北建设计划带上。他说，说不定中央要听他关于迅速恢复经济的汇报。至于朝鲜战争，还是在八月的时候，那时朝鲜人民军进攻顺利，彭德怀曾接到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为了应付局势，现须集中

十二个军以便机动（已经集中了四个军），但此事可于九月底再作决定，那时请你来京面商。”如果此次进京是为战争的事，彭德怀也没有料到会让他率领军队上前线。第十三兵团赶赴东北集结以及东北边防军的人事任命他是知道的，但即使真的因为战争需要，第十三兵团，这支由第四野战军部队组成的兵团一旦出动，统帅理所当然应该是林彪。

彭德怀把没有的事都想到了，而真正出现在他面前的事是他没有想到的。

彭德怀到达中南海时，讨论是否出兵朝鲜参战的会议正在进行，他立即感到了气氛的沉闷。中国领导层在是否出兵朝鲜的问题上分歧明显。反对出兵的理由是：新中国急切需要的是医治战争留下的创伤，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缓和严重的经济困难给这个新生政权带来的巨大压力。同时，中国的全境还没有完全解放，一些边远地区和岛屿上还残留着人数众多的国民党部队，一些地方的社会远没有安定，新政权正艰难地建立着。由于还有很多地区没有完成土地改革，建立起来的新政权还不巩固。更重要的是，如果出兵参战，对手是强大的美国，战争最终打的是国家的经济实力，特别是工业实力。目前，至少从工业力量和军队装备上讲，我们与对手相差很远。另外，中国军队中因为和平的到来对战争的厌倦思想不能不予以重视。赞成参战的意见主要认为：一旦联合国军队打到鸭绿江边，对新中国将形成巨大的威胁。这是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唇亡齿寒”这个中国妇孺皆知的古老故事，在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地成为一条维护自身安全的基本原理和处理国际事务的充满务实精神的安全准则。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证明了这一点：“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的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

彭德怀在会上没有发言。

会后，毛泽东给了这位性格耿直的将军一夜的考虑时间。

当夜，彭德怀未睡。

美国无疑是世界第一强国。国力不支怎么打仗？但是，不打结果又会怎样？

十月五日上午，毛泽东派邓小平把彭德怀接到中南海，毛泽东现在迫切需要知道彭德怀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

彭德怀毫不犹豫地说出了自己经过一夜深思的意见：立即出兵到朝鲜作战。

在下午继续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争论仍然很激烈。高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共东北局书记、东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还是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的态度极为重要。高岗认为：中国刚刚打完战争，再打仗经济上负担不起。军队的装备也落后，与美国人打仗，一旦顶不住退下来，后果不堪设想，还是在东北地区防守为好。周恩来对高岗的"防守"立即算了一笔账：鸭绿江一千多公里的边防线，如果防守，得需要多少部队？年复一年地防守将是多么被动的事？彭德怀接着陈述了自己主张出兵的理由。彭德怀后来在含冤时写的"交待材料"中记述道：第二天下午，又在颐年堂开会，在其他同志发言后，我讲了几句："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他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老虎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它的肠胃，向它让步是不行的。它既要来侵略，我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帝国主义见过高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

毛泽东对彭德怀的观点极其赞赏。毛泽东认为中国当前存在着一些困难，这是事实。但是现在美国在逼着中国打这一仗。中国只有一

条路，就是在敌人进占平壤之前，不管有多大的困难，立即出兵朝鲜。毛泽东提议由彭德怀同志率领部队入朝，协助人民军抗击敌人。

与会的人相继走到彭德怀面前与他握手。

彭德怀出兵朝鲜的使命就这样确定了。

彭德怀时年五十二岁，长期的战争生涯令他的身体已经患上不少疾病，更重要的是，他将面临的战争是一场极其艰难甚至是极其危险的战争。将军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面对非难时写道：“主席决定我去朝鲜，我也没有推诿。”

中国出兵朝鲜已成定局。

联合国对此完全不知。

十月七日，联合国大会以四十七票同意、五票反对和七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八国提案”。麦克阿瑟立即向金日成发出了敦促投降的最后通牒：“为了以最少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贯彻联合国决议，我作为联合国军总司令最后一次要求你们及你们指挥的军队，不管位于朝鲜的什么地方，都放下武器，停止敌对行动。”同时，由美军骑兵第一师和第二十四师、英军第二十七旅、南朝鲜第一师所组成的部队越过三八线，开始向北朝鲜进攻。

显然，中国希望在三八线停火并和平解决战争的设想已经不可能实现。

“八国提案”在联合国通过的第二天，也就是联合国军正式越过三八线的第二天，十月八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令：

彭高贺、邓洪解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各级领导同志们:

（一）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二）中国人民志愿军辖十三兵团及所属之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一师、二师、八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令出动。

（三）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四）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五）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六）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于我们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十月八日于北京

一九五〇年十月八日，一个在新中国历史中极其特殊的军事名词——“中国人民志愿军”诞生了，在以后的日子里它将被全世界所关注，并最终成为坚强、不屈、勇敢的代名词，永远铭刻在世界战争史中。

## 威克岛——美国式的政治游戏

就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成立的那一天，在地球的另一边，杜鲁门正派人到市场上寻找一种名叫“布隆”的糖果。为了这种小小的糖果，他

甚至征求了过去在麦克阿瑟将军身边工作过的人的意见，得知这种糖果确实是麦克阿瑟和夫人最喜欢吃的，并且这种糖果在东京街头根本买不到的时候，杜鲁门才放下心来。这包重达一磅的糖果成了包括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助理国务卿菲利普·杰塞普和迪安·里斯克、巡回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等高级官员以及三十多名记者在内的总统随行清单中的一部分。

在朝鲜战争进入最微妙阶段的时刻，杜鲁门与麦克阿瑟在太平洋中的一个小岛上见面了。

威克岛，这个在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的小岛，隶属于波利尼西亚群岛，由三个海堤相连的珊瑚小岛组成，地势平坦，海拔仅六米，岛上居民只有几百人。在碧蓝浩瀚的大洋中，威克岛和其他太平洋中的岛屿一样，除了出产椰子、香蕉和热带水果之外，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它于一八九九年被美国占领，遥远地距华盛顿四千七百英里，而距东京却只有一千九百英里。威克岛在二战中出了名，因为它作为美国在东太平洋上的军事基地，在日军袭击珍珠港的时候，它被连带着一起遭到日军的轰炸，并且在日军的强行登陆下，该岛美国守军司令德弗罗少校投降。三年后，威克岛才被美军重新夺回。岛上最重要的建筑物是机场楼，还有作为机场办事处的一幢木板房。

随着联合国军进入北朝鲜，朝鲜战争开始进入一个不可捉摸的危险阶段，这是当时美国朝野的普遍看法。杜鲁门的政敌们强烈地攻击他正把美国带入一个极大的风险中，因为他们固执地认为苏联和中国绝不会看着麦克阿瑟的军队如此顺利地向北推进而不管，这些自称把共产党“看透了”的美国政客对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即将爆发深信不疑。如果战争真的向这个方向发展，那么“任何虔诚的行为都不能让装在棺材里运回美国的小伙子们起死回生”。而政敌们所指责的，恰恰是一个让杜鲁门最没有把握的问题，即：苏联和中国对这场战争的真实

态度以及究竟是否会介入这场战争。对于这个问题，即使像艾奇逊这样的老谋深算的总统心腹都无法说清楚。中央情报局所提供的关于苏联和中国是否介入的情报更是五花八门，彼此矛盾。在与麦克阿瑟相互往来的电报中，麦克阿瑟在战争是否会扩大这一敏感问题上总是含糊其辞。这让杜鲁门强烈地感觉到，麦克阿瑟是希望战争扩大的。而杜鲁门自己对朝鲜战争的本能判断是：局势有可能恶化。所以，彻底消除疑惑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当面与麦克阿瑟会谈。

按照一般的常规，国家总统要召见其下属军官，不管这个军官的职务多高，也不管这个军官此刻驻扎在何地，这个军官都要分秒不差地来到总统办公室向总统敬礼。但是，麦克阿瑟不是一个普通的美国军官，他是不会回美国见总统的，他已经六年没有回美国了，杜鲁门知道他会以“战争正在进行当中”为借口拒绝回来。拿艾奇逊咬牙切齿的话来讲，“此时此刻麦克阿瑟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元首，他是日本的天皇和朝鲜的天皇”。当把麦克阿瑟召回华盛顿的建议被否定后，又决定麦克阿瑟和杜鲁门同时起飞，在夏威夷会见，因为这样两个人的飞行距离几乎相等。对于这个建议，麦克阿瑟没有应答。最后，让总统飞行四千七百英里、而麦克阿瑟仅仅飞行一千九百英里的威克岛被作为会见地点提出了，这回麦克阿瑟的回答十分简单：“我将十分愉快地于十五日上午在威克岛与总统会面。”这个决定让包括艾奇逊在内的很多官员们大为不满，因为总统作出的让步太大了，这将给麦克阿瑟“以心理上的更大优势”。艾奇逊极其愤怒地说：“这简直就是谋杀！就是对一条狗也不能这样！”

但是，杜鲁门这样决定了。不是因为他软弱，而是他太需要这次会见了。杜鲁门后来回忆道：“我想会见麦克阿瑟将军的主要原因很简单，我们始终没有过任何个人的接触，而我认为他应该认识他的统帅，而我也应该认识在远东战区的高级指挥官……从北平传来的中国共产党扬言要在朝鲜进行干涉的报告，是我要和麦克阿瑟将军会面的

另一个原因。我希望从他那里得到第一手的情报和判断……经过一段短时间的考虑，我放弃了在华盛顿会晤的念头。我理解到麦克阿瑟一定会认为，在这些危险的日子里他不应该远离他的部队，他一定会为远涉重洋仅仅是为几个钟头的谈话而感到踌躇。因此我提议我们在太平洋的什么地方会见，结果认为在威克岛最为合适。”杜鲁门接下来的话对麦克阿瑟后来命运的影响甚是关键：“从六月以来的多次事件可以看出，麦克阿瑟在他出国的多年中，他和国家、人民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联系。”

自朝鲜战争爆发以来，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在许多问题上的不愉快甚至是矛盾让杜鲁门十分恼火。然而，最让杜鲁门难堪的还不是麦克阿瑟与他的钩心斗角，而是绝对敏感的台湾问题。联合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作出的“台湾问题中立化”决议和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武装封锁海峡，借口是防止共产党利用朝鲜战争的时机在亚洲进行扩张行动，但却使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根连接着炸药的导火索。随着朝鲜战争的推进和局势的突变，台湾问题必定成为中美冲突的内在焦点。麦克阿瑟擅自访问台湾，和蒋介石的国民党当局进行了“会谈”，并达成“协议”：由麦克阿瑟统一指挥台湾军队，“共同防守台湾”。此后，蒋介石的讲话令杜鲁门忐忑不安：“吾人与麦帅举行历次会议中，对于各项问题，已获得一致之意见。其间，关于共同保卫台湾与中美军事合作之基础，已告奠定。”

麦克阿瑟访问台湾之后，美军第十三航空队连同一批F-20战机进入台湾。拿麦克阿瑟的话来讲，用武力控制台湾是他的“责任与坚决的义务”。身为政治家的杜鲁门懂得，在朝鲜战争开始的时候，这无异于向中国发出出兵参战的邀请信。为此，杜鲁门向麦克阿瑟提出严重警告：“只有作为统帅的总统，才有权命令或批准采取预防措施抗御大陆的军事集结行动。国家利益至关重要，要求我们不要做出任何导致全面战争爆发的行动，或是给别人发动全面战争以口实。”就在杜鲁门的

警告发出后不久，麦克阿瑟寄给"芝加哥第五十一届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大会"一封信，信中说："台湾落在这样一个敌对国家的手中，就好比成了一艘位置理想、可以实施进攻战略的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艇支援舰……"杜鲁门见报后立即命令麦克阿瑟撤回这封措辞露骨的信。他说："麦克阿瑟在热衷于一个更冒风险的政策。"

应该说，在对待共产党国家和台湾的问题上，杜鲁门与麦克阿瑟没有根本的原则冲突。问题在于，麦克阿瑟如此无视美国总统的权威，这简直是在向美国的政体进行挑战。况且，一旦中国军队参战，美国面临的肯定是一个无法自拔的泥坑——对于战争扩大后果的估计，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存在着巨大差异。

杜鲁门怀着复杂的心情开始了他越洋跨海的长途飞行。

麦克阿瑟对于威克岛会面一开始就持不感兴趣的态度。他对杜鲁门插手"他的战争"极其反感。自朝鲜战争爆发以后，麦克阿瑟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华盛顿方面千方百计地"束缚他的手脚"。用他的话说，"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的家伙们在闲极无聊的时候最大的乐趣就是发号施令"。尽管此次总统不远万里前来会见确实给了他很大的面子，但这根本不足以使这位亚洲的"太上皇"受宠若惊；相反，他对杜鲁门将要和他谈的一切方面的问题均感到"毫无意义"，他甚至认为杜鲁门此行是要在仁川登陆的胜利成果上捞取政治资本。更让这位将军不满的是，在华盛顿发来的一封电报中，特别强调有关这次会见的一切新闻报道都由白宫新闻秘书查尔斯·罗斯掌握。换句话说，关于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会见中的新闻必须经过白宫的审查。杜鲁门亲自带了一个记者团，但这些记者在麦克阿瑟看来都靠不住，他们绝对不会发布对自己有利的新闻，他要求带常年跟随采访他的几乎"是麦克阿瑟家族正式成员"的"自己的记者"，但是，白宫拒绝了。这使麦克阿瑟对杜鲁门的这次会见更增添了一种怀疑——对杜鲁门政治投机目的的怀疑。因此，在

东京飞往威克岛的八个小时的飞行中，麦克阿瑟心绪不佳地在这架杜鲁门送给他的新专机“盟军最高司令”号的过道上来回踱步。旅程刚刚开始，他就已经感到整个旅程“令人厌恶”。麦克阿瑟的参谋长惠特尼将军明白，这是六年来麦克阿瑟第一次必须面对一个是自己上司的人。

麦克阿瑟早杜鲁门一天到达威克岛，并在机场的木板房里度过了失眠的几个小时。而杜鲁门把整个行程分成了三段，安排得很有节奏：先飞到他的家乡密苏里州的独立城过夜。然后，再飞往夏威夷，在那里，“海军为总统安排了轻松的活动”。最后，再从夏威夷起飞，飞往威克岛。

总统的随行人员和记者足足装了三架飞机，随行的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罗伯特·谢罗德当时的感觉是：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好比是“两个不同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带着全副武装的随从前往一块中立地区，进行会谈和察言观色”。

十五日拂晓，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上那间潮湿的木板房中刮胡子的时候，杜鲁门的“独立”号专机飞临威克岛上空。“独立”号没有马上降落，而是在威克岛上空盘旋足有三圈。后来人们说，这是总统在证实一个问题：麦克阿瑟是否已经在这个小岛上等候他了——如果总统早于麦克阿瑟在这个机场降落，其结果不是让总统迎接一个下属吗？还好，杜鲁门透过飞机舷窗除了看见当年日本人强攻该岛时在海滩上留下的几辆破烂坦克之外，还看见了机场上已经准备好的欢迎仪式。“独立”号降落了，麦克阿瑟迎上去，杜鲁门看见这位老将军的那顶陆军软帽“脏兮兮的”。

“好久没看见你了。”这是杜鲁门握住麦克阿瑟的手时说的第一句话。

记者们敏感地注意到，麦克阿瑟将军没有向总统敬礼。

威克岛上唯一体面的汽车是一辆破烂不堪的“雪佛莱”，后门打不开，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只好从前门进去，再从前座爬到后座上。在一辆上面有四名士兵的吉普车的带领下，他们来到跑道尽头的一间活动房子里。记者们除了在杜鲁门和麦克阿瑟闲谈的时候在场，正式会议开始后均被挡在门外。天气酷热，总统和将军都脱了外套。麦克阿瑟拿出他的烟斗说：“总统先生，您不介意我吸烟吧？”杜鲁门说：“将军请便，我是世界上被烟雾喷在脸上最多的人。”会议就这样开始了。

由于参加会议的人禁止记录，因此威克岛会谈的具体内容至今没有详细的文字记载。参加过会议的人对会谈的回忆出入很大。而且，麦克阿瑟在他日后的回忆录中几乎没有提到这次会见，因为他认为这次会面“相对来说不很重要”。杜鲁门在其回忆录中对这次会见的记述也不多。所幸的是，维尔尼斯·安德逊的小姐，一位随军的临时速记员，在门外仅仅隔着一条门缝把会谈的内容速记了下来。她说她这样做完全是因为“职业上的习惯”。撇开她的记录在今后引起的麻烦不说，从她对麦克阿瑟发言的较为完整的记录中，可以令人想象到当时麦克阿瑟的固执、倔强和坚定不移。

杜鲁门和麦克阿瑟除了谈到对日缔结和约、亚洲防御联盟等问题之外，朝鲜问题是谈话的重要内容。麦克阿瑟对朝鲜战争前景的乐观估计令杜鲁门感到吃惊。麦克阿瑟用他特有的演说才能振振有词地侃侃而谈，令在场的军官们几分钟之后就认为“他确实是位军事天才”。麦克阿瑟认为，目前发生在朝鲜的战争，“所剩下的仅仅是一些必须加以钳制的游散目标而已”，战争实际上已经取得胜利。“在整个南北朝鲜，正规的抵抗都会在感恩节以前结束”。“枪声一停，军人就要离开朝鲜，要由文职人员取而代之”。此刻，麦克阿瑟想到的并不是战争怎么打的问题，而是胜利后美军部队的调度和战后朝鲜的体制问题。“希

望能够在圣诞节把第八集团军撤回日本”。然后“尽力在明年年初在全朝鲜进行选举”。

当然，面对总统，麦克阿瑟还是对自己给华盛顿惹下的麻烦作出了象征性的解释，对此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记载道：“我们泛泛地谈论了台湾。将军提起他向‘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大会’的致信……将军说对给政府造成的任何为难感到抱歉。他当时不是在搞政治，他在一九四八年上了政客们的一次当，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了。他对总统保证，他毫无政治野心。”

会议的铺垫全部完成以后，杜鲁门问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您认为苏联和中国干涉的可能性如何？”

麦克阿瑟不容置疑的态度让在场的人于事后多年里依然印象深刻：“可能性很小。如果他们在头一两个月进行干涉的话，那将是决定性的。我们已不再担心他们参战。我们已不再卑躬屈膝。中国人在满洲有三十万部队，其中部署在鸭绿江沿岸的大概不会超过十至十二万人，只有五至六万人可以越过鸭绿江。他们没有空军。现在我们的空军在朝鲜有基地，如果中国南下到平壤，那一定会遭受极为惨重的伤亡。”对于中国军队战斗力的评价，麦克阿瑟用带着一点血腥味的话说：“面对联合国军的强大攻势，他们会血流成河，如果他们干涉的话。”

关于苏联出动空军支援中国地面部队的可能性，麦克阿瑟的语气中则充满了对苏联军事力量的蔑视：“他们之间的配合会十分差劲儿。我相信苏联空军轰炸中国人的机会不会少于轰炸我们的机会。”

杜鲁门在将信将疑中脸上有了点笑容。

麦克阿瑟对中国军队参战的可能性的判断，并不完全是凭空的傲慢。作为一个具有长期作战经验的高级指挥官，他的结论是建立在对大量情报分析的基础上的。可惜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别是美国远东情报局，在中国是否会参战这件事上犯了历史性的错误。

开始，情报部门的注意力全部对准苏联，因为作为冷战的对手，苏联参战的可能性最大。情报部门吸取了二战期间日本向美国宣战前烧毁其驻美使馆文件的教训，对苏联驻西方国家的使馆给予了密切的关注，也确实发现过不少“异常动态”，比如苏联驻美大使馆里某天冒出烟雾等等，甚至连罗马尼亚宣布延长士兵的服役期、苏联在捷克军队中开始教授俄语、阿尔巴尼亚游击队正在返回希腊等，都被他们认为是“苏联的战争准备”情报。但是，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和苏联在联合国的表现，苏联直接参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于是，中国在其东北地区大规模集结兵力令美国人紧张了起来，风声鹤唳的情报对象迅速转移到中国方面。“中国部队的大规模的铁路运输开始了”、“中国正在向中立国家大量购买麻醉品和药品”、“美国空军在满洲边境发现大量战斗机”、“中国人在鸭绿江上修渡口”等等。但是，来自情报部门关于中国动向的情报常常互相矛盾，很可能在一份声称“中国的介入迫在眉睫”的情报之后，立即会有另一份“中国介入的迹象不明显”的情报送到麦克阿瑟的案头。

就在威克岛会见的前几天，麦克阿瑟看到的是一份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赞赏的结论性报告：

> 虽然应该认为中国共产党仍然有可能在朝鲜进行大规模干涉，但考虑到所有的已知因素，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除非苏联决定发动全球战争，中国大概不可能在一九五〇年进行干预。在这一时期，干预行动大概会局限于继续对北朝鲜人进行秘密支援。

虽然这份报告中使用了情报文件绝对应该禁止的“可能”、“大概”这类词汇，但类似报告无疑会对麦克阿瑟产生严重的判断误导。

而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为杜鲁门的威克岛会见准备的分析材料中有这样的结论：

> 尽管周恩来讲过那样的话，中国军队在向满洲运动，宣传上措辞激烈以及发生边境侵犯事件，但没有令人信服的迹象表明中国共产党的确打算全面干涉朝鲜……中国共产党人毫无疑问害怕与美国交战的后果。他们的国内计划规模如此之大，以致该政权的整个计划和经济将由于战争的巨大消耗而受到危害。

当然，美国情报局内部并不是人人都这么乐观。他们确实收到过有相当可信度的情报。比如，一个在中国大陆解放后潜伏下来的原国民党军官，在他向美国提供的情报中，不但把中国军队在中国东北地区的详尽部署在地图上标出，还明确地指出：中国军队即将跨过鸭绿江。这个原国民党军官有不少同事在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中服役，这使他得以知道哪支部队现在位于哪里。另外，美国中央情报局还收到过中国领导层九月在北京的会议上关于参战问题“激烈辩论”的情报。但这份情报却被中央情报局判定为C-3级。美国情报部门根据情报的来源和可靠性将情报分为A、B、C、D不同的等级，每一个等级内又有四个级别，表示情报的准确程度。那么，C-3级别的情报基本上就等于一张废纸了。

美国方面对中国参战问题判断的失误，有极其复杂的原因，但是基本的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美国人“世界无敌”的感觉。敢于和美军打仗，特别是经济落后的中国人敢于和美军打仗，在绝大多数美国人看来，是一件绝对不可思议的事情。

到了十月，就朝鲜战争的局势看，联合国军的总兵力已经超过三十三万人，如果加上美国在远东的空军和海军，兵力可达四十万人以上。这确实是一支庞大的军队，而他们的对手是已经溃散的只剩区区三万人的北朝鲜人民军。单从这一点上看，麦克阿瑟认为战争已经取得“胜利”似乎不是没有道理。

杜鲁门和麦克阿瑟的威克岛会谈在上午九时十二分结束。会谈的全部时间一共是九十六分钟。麦克阿瑟不想在这个让他厌恶的小岛上多停一秒钟，他表示不能与总统“共进午餐”了——“我需要尽快赶回去。如果方便的话，我想在午餐前离开。”杜鲁门表示遗憾，但没有表示反对。他们临分手的时候，出乎记者们预料的是，杜鲁门拿出特意从美国带来的一枚“优异服务勋章”，亲自授给了麦克阿瑟。这种勋章麦克阿瑟已经有五枚了。

在目送总统的“独立”号升空之后，麦克阿瑟迫不及待地登上他的“盟军最高司令”号，急匆匆地起飞了。

威克岛会面，杜鲁门在暂短的时间内收到了他想要的政治效果，即，他对朝鲜问题的慎重形象和由麦克阿瑟传达给他的“很快就要结束战争”的令美国人民高兴的好消息。在从威克岛回来后的外交政策演说中，杜鲁门用这样的语言称赞了麦克阿瑟：

> 麦克阿瑟将军告诉我朝鲜战斗的情况。他描述了在他指挥下的联合国部队的光辉成就。和大韩民国的部队一起，他们打退了侵略的浪潮。越来越多的战斗人员正从全世界的自由国家里赶来，我坚信这些部队不久将恢复全朝鲜的和平。
>
> 我们在美国国内的人们，自然对我们的陆海空和陆战队员的卓越成就感到自豪。他们在军事史上写下了光辉的新的一页。我们所有的人为他们感到骄傲。
>
> 联合国要求我国为联合国军提供第一位司令官，也是我们莫大的光荣。我们有这么一个适合的人选来完成这个使命真是世界的幸运。这个人就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一位非常伟大的战士。

仅仅六个月之后，当杜鲁门撤掉麦克阿瑟的职务，同时大骂麦克阿瑟是个“混蛋”的时候，美国有人曾用“非常伟大的战士”这句话来提醒杜鲁门，并问他对于撤掉麦克阿瑟的职务有什么遗憾，杜鲁门说：“我唯一感到后悔的是没有在几个月前解除他的职务！”

如今，威克岛会面已经成为朝鲜战争中一个历史性的玩笑。

就在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上展望美军士兵怎样在他们从没有见过的一条叫做鸭绿江的江边庆祝胜利的时候，几十万中国士兵连同他们的统帅在内，已经在鸭绿江的江边卷起厚厚的棉裤裤腿，准备涉过冰冷的江水向朝鲜开进了。

## 打败美帝野心狼

一九五○年十月七日，彭德怀与毛泽东研究完志愿军出国后第一步的作战部署、志愿军的后勤供应以及一旦出兵朝鲜新闻媒体的报道分寸等问题后，回到下榻的饭店。他交代秘书，把从西安带来的所有文件都上交给中央办公厅，然后去行政处领出发用的东西。

秘书按照彭德怀的指示把事办完，然后把孩子们接来。将军把为孩子们准备的糖果拿出来，然后把他们一一揽在怀里，询问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这是这位多年来南征北战的将军从没有过的温情时刻。幼小的孩子问将军："明天你到哪里去？"将军回答："你们长大了就会知道。"中国军队准备出兵朝鲜参战此时还是绝对机密。这天晚上见到彭德怀的一个孩子后来回忆说："我们看见伯伯那两天一直很忙，情绪也不怎么稳定。他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短，除询问了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外，他一再反复问我们谁要买衣服、日用品和学习书本等。他还特意让警卫员给我们每个人都买了几件衣服、鞋袜和日用品。那时我们年龄小，不懂得伯伯为什么这样慷慨地给我们买这么多东西留着用。后来才知道他是奉命去朝鲜指挥志愿军与美国军队作战。以后又听说朝鲜战场打得十分激烈，大批的美国飞机天天轰炸扫射，曾经两次把伯伯的住房炸得稀烂，伯伯两次险些遇难。回忆起当时伯伯对我们那种难以控制的感情，他在思想上是已充分做了牺牲准备的。"

彭德怀不让秘书为孩子们安排房间，说是不能给饭店增添麻烦。于是，这天晚上，将军的一家老小六七个人一起睡在将军房内的地毯上。

夜深的时候，秘书来报告，从西安带来的文件已经上交，片纸未留。

彭德怀说：“把东西准备好，明晨出发。”

秘书在他的日记里这样记述道：“十月七日，根据彭总吩咐，晚上收拾行李，准备明晨出发。去向不明。”

毛泽东为了彭德怀的安全曾主张把志愿军指挥部设在中国边境一边，但彭德怀表示他要过境和金日成一起指挥作战。

十月八日晨，北京细雨。

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亲自把彭德怀送上了飞机。飞机在气象条件不好的情况下强行起飞，向北。飞机上同行的有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彭德怀的作战参谋成普以及秘书人员。同时，这架飞机上还有个身份特殊的年轻人，他是彭德怀的俄文翻译。

彭德怀到达沈阳，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并且接见了金日成派来的特使北朝鲜内务相朴一禹，以了解当前朝鲜战局的形势。

十月九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次军以上干部会议在沈阳召开。这次重要的会议第一次明确中国军队将要出兵朝鲜作战。

彭德怀在会议上说：

根据朝鲜战场的形势和金日成首相的要求，中央已经决定出兵援朝，这不是我们好战，完全是美帝国主义逼我们走这条路的。当美军和南朝鲜军队到达三八线时，周总理曾一再对美军发出警告，倘若越过三八线北犯，中国将出兵援朝。但美、英军和南朝鲜军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无视我国政府的警告，已开始越过三八线北犯，现正逼近平壤。其目的是向中朝两国边境鸭绿江边进攻，企图完全占领北朝鲜。我们的敌人不是“宋襄公”，他不会愚蠢到等

我们摆好阵势才来。敌人是机械化部队，有空军和海军的援助，进攻速度很快，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中央派我到这里来，也是三天前才决定的。

这次出兵援朝，我们要决心打赢，但也要有不怕打烂的精神准备，万一美国人打进我国来，那我们就打烂了再建。

各军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教育干部、战士树立必胜观念，要坚信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一定能够打败美帝国主义者。各军要日夜加紧准备，在十天之内克服困难，连夜突击，努力完成出国作战的准备工作。

这次入朝与美军作战，和国内战争不一样。美国在朝鲜有一千多架各型飞机，这将严重影响我军行动。现在干部战士对美机的威胁和恐惧心理是有道理的，因我军装备太差，只有极少防空火器。因此，今天周总理已飞往莫斯科，和斯大林商谈空军掩护和武器装备问题。

在即将与美军作战的时候，中国官兵的心理是复杂的。这在彭德怀和高岗联名向中央打的一封电报中就可以看出来。电报问中央一个问题：当我军出国作战时，军委能派出多少轰炸机和战斗机掩护？何时能出动并由何人指挥？陆空联络信号如何确定？而当时，新中国军队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空军。面对即将走上的战场，中国军队官兵的思想情绪大约分为三种类型。据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的估计，第一种是义愤填膺，要求上前线与美军作战，这部分人占绝大多数，他们大多是解放军老兵，经过中国国内战争的考验，阶级基础好，政治觉悟高，作战勇敢，不怕牺牲，是部队战斗力的中坚；第二种是叫打就打，不打也行，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这部分人比第一部分的人少；第三种人则怕苦怕战，特别是害怕美军，害怕原子弹，认为到朝鲜去打仗是“多管闲事”，是“引火烧身”，这部分人大多数是新兵，或是原国民党军队的俘虏人员。于是，“该不该打”和“能不能打”成为志愿军入朝作战前必须向官兵们解释清楚的问题。

对于普通的解放军官兵来讲，最令他们关切的问题是：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经过土地改革获得土地之后，和平的日子能不能真正到来？“家”的概念是中国士兵生命中最牢固的根基。历史上帝国主义对中国肆意侵略的事实是最好的教材。美帝国主义占领朝鲜后，下一个

目标就是中国本土。对占中国军队成分绝大多数的翻身农民来讲，没有比在外国的统治下更为痛苦的生活了。准备参战的第十三兵团中，东北人居多，东北地区在日本统治时期百姓的悲惨生活曾在士兵们心头留下巨大的创伤，在创伤已经平复的时候，“再受二茬罪”成为不能够容忍的事。关于援助朝鲜的问题，官兵们接触到一个崭新的概念：国际主义义务。对于这个问题，官兵们最容易领会的方式是想想中国千百年流传的古语：唇亡齿寒。至于能不能打的问题，“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这个由毛泽东提出的论断，对中国军队不怕一切困难敢于胜利的精神起到过巨大的作用。中国文化的精髓从根本上讲是对精神力量的崇拜，精神力量永远在物质力量之上的观点在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同时，在承认美军的装备比中国军队强之外，还必须认真分析与美军相比中国军队的优势：

一、中国军队在政治上占优势。因为是为反侵略而战，师出有名，得到国内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持。美军是为侵略而打仗，是非正义的，遭到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的反对。

二、中国军队有用劣势装备打败优势装备的传统，而且善于近战、夜战、山地战和白刃战，这是美军不擅长的。

三、美军打法死板，而中国军队善于隐蔽接敌和迂回包围作战。

四、美军不能吃苦，作战主要依靠火力。而中国军队吃苦耐劳，不怕牺牲。在近战中美军的火力发挥不出作用。

五、中国军队距离后方近，而美军后勤供应路线漫长。他们的坦克飞机多，消耗的油料、弹药也多。相反，中国军队消耗少。

政治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军事上以己之长，制敌之短。中国军队的战斗热情被调动起来了，有的官兵甚至把自己的名字改成“釜

山”，意为要把联合国军打到釜山赶下海去。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作战前夕和北朝鲜人民军在战争初期的乐观情绪惊人的相似。

第四十军的一名战士写了一首“诗”，很能说明士兵们对战争实质的认识程度和广泛政治教育的成果：

美帝好比一把火

烧了朝鲜烧中国

中国邻居快救火

救朝鲜就是救中国

十月十日晚，彭德怀一行乘火车前往中朝边境重镇安东。在火车上，彭德怀成立了自己的指挥机构。

此时，朝鲜战场的局势已令人焦灼。从威克岛回到东京的麦克阿瑟命令越过三八线的联合国军队全面向北推进，并命令美第十军在朝鲜东海岸的元山实施登陆。联合国军北进的部队有：美第八集团军第一军（辖步兵第二十四师），第九军（辖步兵第二、第二十五师，骑兵第一师），第十军（辖陆战一师，步兵第三、第七师）和空降兵一八七团；另有英军第二十七、第二十九旅，加拿大旅，土耳其旅；南朝鲜军有第一军团（辖步兵第三师、首都师），第二军团（辖步兵第六、第七、第八师），第三军团（辖步兵第二、第五、第九师），而南朝鲜军第一师配属美军第一军，第十一师配属美军第九军。同时，支持作战的还有美国第五航空队，拥有各种作战飞机七百余架；第二十战略轰炸航空队，拥有各种轰炸机三百余架。联合国军的总人数已经达到四十多万人，各种飞机一千多架，各种军舰三百多艘。其中第一线的兵力就有四个军、十个师、一个旅、一个空降团，共十多万人。

面对敌方压倒一切的阵势，十一日，彭德怀到鸭绿江边察看可供部队渡江的地点，同时，向毛泽东发出一封电报。事后证明，彭德怀的这封电报是正确和及时的，从兵力运用上讲，它被军事研究者称为在中美军队首战中中国军队胜利的关键。电报内容是：向朝鲜境内出动兵力的数量。电报说："……原拟先出两个军两个炮兵师，恐鸭绿江桥被炸时不易集中优势兵力，失去战机，故决全部（四个军三个炮兵师）集结江南，改变原定计划……"

就在彭德怀准备进入朝鲜境内的十一日凌晨一时，他接到了聂荣臻的电话，电话要求他和高岗明天迅速回京。

当晚，彭德怀回到沈阳。

十二日，毛泽东急电：

（一）十月九日命令暂不实行，十三兵团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

（二）请高岗德怀二同志明日或后日来京一谈。

苏联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一系列所作所为，至今还有诸多令人迷惑不解的疑点。从联合国安理会第一次辩论朝鲜战争问题的关键时刻，苏联方面以中国有台湾问题为由缺席，从而导致联合国授权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那一刻起，这个西方国家的主要冷战对手在朝鲜问题上的态度，一直令包括中国领导人在内的整个世界有颇多的猜测。因为美国有一千个理由认为，朝鲜战争实际上是东西方冷战双方在二战后的第一次真枪实弹的较量。既然是较量，较量的另一方却始终没有明确的态度，这实在是令人费解的事。事后看来，这完全是两个军事大国互相恐惧的结果。犹如猎人面对猛兽，无论人与兽谁都无法完全不害怕。

就在彭德怀从北京飞往沈阳的十月八日那天，美军飞行员干了一件惊人的事情：美军两架喷气式飞机攻击了苏联境内苏哈亚市附近的

一个机场。事件发生后，美国方面十分紧张，因为这一事件必将成为苏联干涉朝鲜战争的最好借口，尤其是这一事件与美军越过三八线发生在同一天，这很可能让苏联人认为联合国军的“越线”是针对苏联的。

美国人怀着巨大的恐惧立即就此事件向苏联方面表示歉意，并一再说明这是领航的错误，对此负有责任的飞行大队长已经被解职，两个肇事的飞行员也已经受到惩戒，而且美国方面愿意赔偿苏联方面的一切损失。美国提心吊胆地等着苏联的反应，结果却是苏联方面根本没有反应，好像从来没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似的。美国人于是认为，这是苏联人的藏而不露，恐惧感随之更加强烈。其实他们不知道，扔在苏联境内的那几枚炸弹，已经把苏联人吓出了一身冷汗。斯大林在意识深处强烈地认为，不到万不得已，苏联绝对不能与美国交战。

在中国决定出兵朝鲜的时候，毛泽东亲自起草了给斯大林的电报，时间是十月二日：

（一）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二）我们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

（三）这两个问题中，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只要我军能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主要是歼灭其第八军（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则第二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这就是说，朝鲜问题既以战胜美军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结束了（在形式上可能还未结束，美国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承认朝鲜的胜利），那么，即使美国已和中国公开作战，这个战争也就可能规模不会很大，时间不会很长了。我们认为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

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他们很怕战争）。

……

在不长的时间内，毛泽东和斯大林来往电报多达几十封。对于中国决定出兵，斯大林是赞赏的，因为苏联在其中得到的好处十分明显：苏联既不冒与美国直接冲突的风险，又在远东地区遏制了美国的野心。对于中国方面提出的苏联出动空军给予志愿军支援的请求，斯大林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但是，十月八日，美国飞机袭击苏联机场事件发生后，斯大林在紧张之余领悟到一个现实：就美国的军事力量而言，苏联的任何地方都在美国可能攻击的范围之内。于是，毛泽东接到了斯大林“苏联空军没有准备好，不能出动”的电报。没有空军的掩护，志愿军在美国空军的直接威胁之下，仗是没法打的。这令毛泽东陷入巨大的矛盾中，并作出了志愿军暂时不要出动的决定。同时，他让周恩来立即到苏联去，拿毛泽东的话说，“还是恩来同志辛苦一趟”。

周恩来抵达莫斯科，然后转机飞往位于黑海海滨的克里米亚。当他走向正在休养的斯大林的官邸的时候，他身边还有一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人物——林彪。林彪是搭乘周恩来的飞机来苏联养病的，但当斯大林接见周恩来的时候，周恩来还是把林彪一起叫上了。和斯大林的会见极其重要，身边有证明的人是必要的。此刻的周恩来所承担的是一个艰巨的外交任务。如果将中国方面暂缓出兵的决定告诉斯大林，很难预料斯大林是什么态度；而说服苏联方面出动空军援助，恐怕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对于苏联空军之所以不能出动，斯大林干脆把“没有准备好”的借口免去了，他对周恩来直接说了他的担心：“目前苏联空军尚不能出动。飞机到了空中，很难划定出个界限。”斯大林差点儿就要举出美国飞机飞到苏联境内轰炸的例子。“如果和美国全面冲突起来，仗打大

了，也会影响中国的和平建设，特别是你们还处于战后恢复阶段……如果飞行员被对方捉了俘虏，就是穿志愿军服装又有什么用？”

周恩来说，如果苏联空军不出动，中国将暂缓出兵。

斯大林沉默了好一会才说：中国既然困难，不出兵也可以。北朝鲜丢掉，我们还是社会主义，中国还在。

斯大林的态度十分明确，苏联空军的问题是不容讨论了。但是，斯大林对中国出兵参战还是抱有希望，他指示有关部门加紧对中国空军的训练和装备援助；同时，对中国军队常规武器装备的支援也答应尽快运到。

联合国军队正极其迅速地向中朝边境方向推进。

中国军队一切准备就绪已陈兵鸭绿江边。

与出兵不出兵的抉择一样，毛泽东再次面临抉择的艰难。

经过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彭德怀、高岗等人的反复讨论，中国领导人最终作出决定：即使没有空军的掩护，也要立即出动，抢在美军的前面，至少在朝鲜境内占领一片可以部署部队的地盘。抗美援朝不是空话，战机一失就不复再来。其理由在毛泽东发给还在苏联的周恩来的电报中阐述得很明白：

（一） 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

（二） 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这封电报，不仅仅是提供给周恩来向斯大林表态的，也是对中国为什么出兵朝鲜的最实际也是最明确的阐述。

据后来的西方史料记载，当周恩来向斯大林表示，即使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中国也决定出兵时，“斯大林流出了眼泪”，连说“还是中国同志好，还是中国同志好”。不管这种传言是否可信，中国人的举动出乎苏联人的预料之外是可以肯定的。毛泽东说斯大林根本不了解中国，言外之意是：斯大林根本不了解中国共产党人。

彭德怀的一席话很能说明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安东，他对他的部下说：“我这个人命苦。从参加革命那会儿就在苦地方，长征的苦不用说了，抗日战争在太行山，解放战争在大西北，这次又要去朝鲜，到的都是苦地方，这不是命苦吗？我说的是实情。我们共产党人注定要和‘苦’字、‘穷’字打交道。没有苦和穷，还要我们共产党人干什么？”

十月十六日，回到沈阳的彭德怀再次召开志愿军高级干部会议，他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出兵参战的指示，并确定了先组织防御、再配合人民军反攻的基本作战方针。在这次会上，彭德怀还特别说明了出国作战部队的纪律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博得了全中国人民的赞扬和拥护。到朝鲜后，更要切实遵守纪律，不能侵犯群众利益。对朝鲜人民的风俗习惯必须认真注意。只有搞好群众关系，取得群众的帮助，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一般说来，在下面三种情况下，容易犯纪律：一、打了胜仗的时候；二、打了败仗的时候；三、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候。在这三个时候要特别注意。我们要胜利时不骄傲，挫折时不气馁，遇到困难不埋怨。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虚心谨慎，亲密团结，克服困难，坚持向前看，就能战胜一切敌人。”

十月十八日，彭德怀再次应毛泽东之召回京。根据目前朝鲜战局的发展，毛泽东感到原准备以防御为主的打法可能在迅速推进的敌人面前无法实施，于是，与彭德怀面谈了改变战略战术以打运动战为主的作战方案，并决定第十三兵团于十九日起开始渡过中朝边境上的鸭绿江。

在彭德怀最初离开北京的时候，毛泽东曾设家宴招待即将上前线的彭德怀。在这个家宴上，毛泽东把自己的儿子毛岸英介绍给彭德怀，且就毛岸英想跟随彭德怀去朝鲜的想法征求彭德怀的意见。彭德怀犹豫了，因为他知道，刚刚结婚的毛岸英对毛泽东的个人感情来讲是多么重要，他是毛泽东的长子，是杨开慧留下的儿子，而上前线不可避免会面临生命的危险。在毛岸英的恳求下和毛泽东的支持下，彭德怀答应了。

十月八日早晨，在那架向北飞去的飞机上，彭德怀身边的那位俄文翻译就是毛岸英。

正当中国领导人对是否出兵朝鲜进行艰难抉择的时候，麦克阿瑟下达了“联合国军第四号作战命令”，改变原定的美第八集团军和美第十军在平壤——元山腰部会合的计划，命令这两支部队继续全速前进直到鸭绿江边。

就在毛泽东举杯为彭德怀送行的那天，联合国军从三面包围了平壤，开始对北朝鲜首都实施强攻。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九日，平壤陷落。

就在这一天，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渡过中朝边境的界河——鸭绿江。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誓词是:

我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残暴侵略，援助朝鲜兄弟民族的解放斗争，保卫中国人民、朝鲜人民和全亚洲人民的利益，我们志愿开赴朝鲜战场，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为消灭共同的敌人，争取共同的胜利而奋斗。为了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战斗任务，我们誓以英勇顽强的战斗意志，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上级指到哪里打到哪里，决不畏惧，决不动摇，发扬刻苦耐劳的坚诚精神，克服一切艰苦困难，发扬革命的英雄主义，在战斗中创建奇功。我们要尊重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将军的领导，学习朝鲜人民军英勇善战的战斗作风，尊重朝鲜人民的风俗习惯，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和朝鲜人民、朝鲜军队团结一致，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队，全部、干净、彻底消灭。上述誓言，如有违反，愿受同志们的指斥和革命纪律的制裁。谨此宣誓。

中美冲突已经不可避免。

就历史而言，这场冲突的发生是一种必然。共产党中国外交政策中强烈的意识形态因素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对伟大理想目标的追求，使得这个东方民族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屈辱和失败之后，当这种追求所面临的考验被置于民族力量与尊严的至高无上的位置时，谁也不能说这种冲突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漆黑的夜色中开始渡过鸭绿江，黑压压的人流遮盖了冰冷江面上的月色。在这一天渡江的部队中，有一个名叫麻扶摇的年轻人，是志愿军炮兵第一师二十六团五连的政治指导员，他怀着誓要战胜美帝国主义的决心写下了一首“诗”：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保祖国，就是保家乡；

中华好儿郎，齐心团结紧，

打败美国野心狼！

麻扶摇的这首“诗”后来经过作曲家周巍峙的修改和配曲，成为那个时代全中国的男女老幼人人都会引吭高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

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

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

# 第二章 云山：中美士兵的首次肉搏

## “YOYO”作战和朝鲜语《东方红》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接到渡过鸭绿江的命令时，第三十八军中一个名叫高润田的排长独自来到开原城郊的一座古塔下。他在杂草丛中挖了一个坑，把他的全部“家产”——几枚解放东北、华北、滇南、中南的纪念章，一枚“勇敢顽强、艰苦奋斗”的勋章，一枚军政大学的校徽，一本中共“七大”党章，一份入党志愿书，一枚刻着他名字的印章，一个笔记本——用雨布包裹好，放在土坑里，上面扣上一个洗脸盆，然后用土严实地埋起来。这件事是秘密进行的，因为按照军队的一贯做法，个人的“家产”应该存放在留守处，以便万一牺牲了，存放的东西可以转交给他的亲人。高润田排长之所以这么做，是他坚定地认为不但自己的军队可以凯旋而归，自己也一定会活着回来，——“家产”埋藏的地点标志是明显的，因为什么都可能改变，但这座古塔已经在这里矗立几百年了，它决不会在打美国鬼子的这几天里消失了。

做完这件事，高排长就跟随部队过江了。

第十三兵团的四个军，此时是一支从服装上看没有任何标志的军队。土黄色的单衣和棉衣混杂在一起，人和驮炮的骡马混杂在一起，士兵的头上顶的是树枝树叶，胳膊上扎着白色的毛巾——这是中国军队统一配发的毛巾，上面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红字已被剪掉。夜色沉沉，战士们的脚步声和骡马的喘息声在黑暗中显得急促而杂乱。渡江在军事上是绝对机密的行动，部队全部是黄昏开进，拂晓暂时停止，第二天黄昏再次开始。

首先越过中朝边境的是第四十二军作为先头侦察部队的一二四师三七〇团，他们比大部队的行动时间提前了三天。十月十九日黄昏十八时，第四十二军五万余人的队伍从满浦铁桥和临时搭建的浮桥上渡过了鸭绿江。他们前进的目标是朝鲜北部的长津地区。那一天风寒雨冷，军长吴瑞林和政治委员周彪站在铁路桥头中国境内的一边，身边经过的是背着行李、扛着枪的长长的士兵队伍，还有驮着弹药和小炮的骡马。吴瑞林和周彪背对着鸭绿江，向着祖国的方向看了好一会儿，除了零星的村落灯火之外，他们看见的是一个空旷而宁静的夜晚。

紧随第四十二军渡江的，是第三十八军，他们集结的目标是江界——现在那里是北朝鲜的临时首都。第三十八军刚刚行军到江边，就接到立即渡江的命令，原因是前边军情紧急。过江的时候，有士兵在队伍中说话，立即被干部制止了，说是别让天上的美国飞机听见，于是士兵们从此说话的声音就极小了。

第三十九军的一一五师、一一六师从安东过江，一一七师从长甸口过江，目标是龟城、泰川。“我坐在吉普车里，伸手就可以摸到鸭绿江大桥，大桥像从两国土地上伸出的一双手臂，在江中相拥……”第三十九军军长吴信泉回忆道，“队伍非常肃静，每个人都在默默地走着，谁也没说什么话，但我听出有的战士在数这座桥有多长——从中国到朝鲜只有一千五百步的距离。车过大桥中央，也就是两国分界线，我听到车旁队伍中有战士激动地问干部：‘连长，现在是几点几分？’”

第四十军的官兵也在安东过江。他们到达安东时，正是一个秋雨中的夜晚，整个小城空寂无人。安东市民对中国军队要到朝鲜打仗的事心态已经十分平静了。安东沿街的玻璃窗都贴着防空的米字形纸条。由于事先的保密，没有市民出来看大军过江。第四十军的四列纵队走在积水的街道上，雨中的街灯留下摇摇晃晃的影子。走上鸭绿江

大桥时，官兵们的心跳声和脚步踏在桥面上的声音在夜空中显得格外清晰。大桥中间，有一条中朝两国士兵守卫的白线十分醒目，那就是中朝国境线。当官兵们走过这条白线时，异样的感觉油然而生。先头部队还没有走下大桥，一辆苏制吉普车鸣着短短的喇叭在桥上缓慢地超越长长的行军队列。士兵们习惯地为吉普车让开通行的路，吉普车越过那条白线，迅速地消失在朝鲜境内的夜色之中。没有人给予这辆吉普车特别的注意，恐怕连第四十军军长温玉成都不知道这辆吉普车里坐的是什么人。

十月十九日，彭德怀刚刚到达安东，金日成的特使朴一禹就赶来了。他急切地问:“彭总司令，你们出兵的日期定下来没有? ”

彭德怀说:“就在今天晚上。”

朴一禹听到这个回答时的心情是很难用语言形容的。此刻，北朝鲜的首都平壤已经陷落，党政机关人员正向中朝边境方向撤退，政府决定把首都临时移到江界。至于下一步的打算，朴一禹无法回答，或者说，北朝鲜领导层现在没有任何具体的打算。此时，金日成也许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在朝鲜的领土上看见彭德怀和他率领的中国军队。

彭德怀问:“金首相现在什么地方? ”

朴一禹答:“美国人的情报很灵，金首相需要不断改变位置，我也说不准他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

彭德怀说:“我们去找他，现在就走。”

于是，这位中国军队的著名将领，几十万志愿大军的统帅，就这样出发了。世界上从没有过哪个国家的哪个军事指挥员会在大敌当前的时候自己先于士兵深入变幻莫测的战场。彭德怀把他的指挥部全部

甩在身后，让他们按部就班地前进，而他仅带着一名参谋、几名警卫员和一部电台进入了朝鲜。

彭德怀没来得及按规定改换北朝鲜人民军的将军服，也没来得及去领已经给他做好的那件貂皮大衣，他身上仍然穿着他从西安穿来的那身粗呢黄军装。他面容憔悴，脸颊消瘦，两眼红肿，一头短而硬的头发已经全部花白。彭德怀是个不苟言笑的人，除了毛泽东，很少有人敢和他说句玩笑话。当第十三兵团司令员邓华得知彭德怀将是他们的统帅时，对副司令员洪学智半开玩笑地说："老哥，小心侍候！作战中稍出纰漏他就大发脾气，要是把他惹火了，你得小心脑袋！"

吉普车在鸭绿江大桥上向朝鲜开进的时候，黑暗中只有彭德怀的一双眼睛睁得很大。车轮刚接触到朝鲜的国土，他突然命令停车。彭德怀没有下车，他从车窗伸出头来向后看了看。没有人知道他在看什么。

过了江就是朝鲜的边境城市新义州。吉普车在十字路口停下来问路，这才发现由于走得匆忙，没有带上个朝鲜语翻译。这时候，有个会讲中国话并自称是新义州委员长的人走上前来。这个委员长只有一条胳膊，他解释说这是参加中国解放战争时负的伤。在他的带领下，彭德怀见到了金日成派来的副首相。副首相说金日成现在什么地方他也不清楚。不过，据可靠情报，平壤已经陷落。

彭德怀立即察看朝鲜地图。

敌人的进攻速度比他想象的要快得多。

在副首相的带领下，彭德怀又向另一个接头地点出发。

吉普车一路颠簸。参谋见彭德怀已经疲劳到极点，劝他睡一会儿。彭德怀嘟嘟囔囔地说："我带兵打仗几十年，从来没有遇到像这样

既不明敌情又不明友情的被动情况。如果敌人保持这样的进攻速度，那么我们的部队很可能要打遭遇战了。”

二十日黎明，彭德怀到达位于鸭绿江南岸的水丰发电站。

在等待金日成消息的这段时间里，彭德怀明显地心神不定。一直下着的雨不知不觉地变成了雪。彭德怀不知道自己的部队渡江的详细情况，只知道他们一定是距离联合国军的前锋部队越来越近了。等了一个上午，终于有了金日成的消息，会见地点是平安北道昌城郡北镇附近。在向这个地点前进的时候，狭窄的道路上塞满了向北撤退的北朝鲜党政机关人员、军队和难民。车辆和人畜形成巨大的洪流，彭德怀的吉普车如同逆水而上的一叶小舟。在走走停停的过程中，载着电台的卡车掉队了，这就意味着这位志愿军司令员与自己的部队彻底失去了联系。

就在彭德怀寻找金日成的时候，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代办柴成文接到中央发来的一封电报，要其速告金日成首相，彭德怀司令员入朝后，“赴金首相处会晤，望做具体安排”。柴成文立即乘车到德川去寻找金日成。因为美军飞机投下的照明弹到处闪烁，一夜行车都不敢开灯。柴成文到达德川后，发现这座城市已经空无一人。直到中午的时候，在一个郡委员长的带领下，才在一座铁路隧道里的火车上找到金日成。柴成文告诉金日成彭德怀正在寻找他，并特地强调了彭德怀现在的职务：“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要见首相。”

金日成和柴成文乘车向北，过清川江，在朝鲜北部的崇山峻岭中一直转到二十一日凌晨二时，才到达距离北镇三公里的一座名叫大榆洞的金矿。

两个小时之后，彭德怀也将到达这里。

柴成文前去迎接彭德怀。

对于柴成文来讲，在这样的时刻和这样的环境中见到彭德怀，可以说是百感交集。一九四一年，彭德怀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工作的时候，柴成文曾当过他的情报股长。令柴成文难忘的是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在日本军队的扫荡中，彭德怀身陷重围，是柴成文带着一个警卫排掩护彭德怀突围而出。在那次战斗中，中国军队牺牲了一个著名的军事将领，名叫左权。

此刻，彭德怀向柴成文询问了目前的战场情况。之后，他在一个破瓦盆中洗了脸，吃了朝鲜的米饭和酸菜，准备去见金日成。在顺着田埂向金日成等待的地点走去的时候，彭德怀突然问柴成文身上带没带剪刀之类的东西。柴成文一下子感到很惊讶，他不明白彭德怀的用意。彭德怀说：我的军装的袖口破了，露出的线头儿长短不齐，这样见一个首相不礼貌。于是，柴成文拿出一只指甲刀，两个人站在田埂上修理彭德怀的袖口。指甲刀修理的效果不好，彭德怀只好失望地说："算了吧。"

彭德怀和金日成见面了。在以后的日子里，由于种种原因，这段历史性的会见常常不被人提起，只在关于朝鲜战争的史料中稍有记载。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次会面都是一个极其珍贵的历史时刻。这不但是对朝鲜战争的战史而言，仅从彭德怀这位中国将领在异国土地上孤独地冒险行军，就足以让所有的军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们深思。此刻，战争的另一方，麦克阿瑟正在东京豪华的住宅中享受着奢华的生活，这位联合国军的总司令距离前线有一千多公里远，而他的中国对手正在充满硝烟的战场上寻找前线在哪里。彭德怀当时也许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无法予以理会，他实际上已经深入到了敌人的后面！就在他没有任何武装警卫的情况下向南走去的时候，南朝鲜军队的一个团几乎与他擦肩而过行动到了他的身后。现在，这

个团已经快要推进到鸭绿江边了。从军事的角度看，这位中国将领实际上已经陷入包围之中，然而奇迹却是他自己又从包围圈里走了出来。一位彭德怀的部下很久以后对此依然心有余悸，他说，在那两天中我们和彭总失去了联系，我们焦急万分。在战场情况如此混乱的情况下，如果发生不测，彭总面临的只能有三种选择：被俘、死亡、逃生。也许是彭德怀一行人少目标小，加上美军的情报部门完全没有想到中国军队的司令官会插到战场的前沿来。

彭德怀万分幸运。

这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和中国抗美援朝军事行动的幸事。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时，金日成、彭德怀在"充满中朝两党和两国人民亲密友好的气氛中开始了历史性的首轮会谈"。

彭德怀向金日成开门见山地介绍了中国政府的出兵决定和已经越过鸭绿江的部队组成。当金日成得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批参战部队将达到六个军共三十五万人，而且毛泽东已经另外准备了六个军的志愿军为预备队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太好了！太好了！感谢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我国的全力帮助！"彭德怀如实地说明在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出动军队参战将要承担的困难和风险；同时对中国军队参战的前途作出三种情况预测：一、大量歼灭敌人，站住脚，合理地解决了朝鲜问题；二、歼灭部分敌人，双方僵持在战场上；三、被敌人打了回去。

金日成介绍了当前的局势。实际上，这个"当前"的局势已经是过时的情报了，因为战火的迅速蔓延已使金日成无法明了战场形势。就在他们会谈的时候，头顶上有大群的美军飞机飞过，四周炮声接连不断地传来。掉队的那辆载有电台的卡车还没有消息，金日成也没有随行带着电台，身边发生的重大变化他们无从知道。

就在彭德怀和金日成会谈的时候，麦克阿瑟亲自乘专机指挥美军空降兵一八七团在平壤以北的肃川、顺川地区实施了战役空降。麦克阿瑟说:“此举的目的是包围从平壤向北撤退的北朝鲜士兵和官员。”同时，西线南朝鲜第二军团的第六、第七、第八师已前进到顺川、成川一线，距离志愿军原定的防御线仅有一百多公里。东线南朝鲜军队的首都师已经占领中国军队第四十二军原定防御的五老里、洪原等地。而志愿军已经过江的五个师，目前距离预定防御地区至少还有一两百公里，他们已经不可能先敌到达了。

金日成说:“人民军主力大部分被隔在南方，正设法向北撤退，现在能作战的不足四个师，而且多是新兵。”

彭德怀要求人民军在志愿军接敌之前尽量阻击敌人，金日成对此没有说话。

彭德怀又提出与金日成共同组成司令部的建议。金日成说:“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作战行动方案，请彭司令员亲自指挥处理。”

金日成是一国的领袖，彭德怀是一国军事将领，他们能一起指挥战争吗? 政治经验不足的彭德怀从没有想到过这一点。彭德怀还没有想到的是，会谈完毕，在这个偏僻的山沟里，金日成还能拿出一只鸡和一瓶葡萄酒来款待彭德怀。于是，他们在飞机和大炮的轰鸣声中碰了杯。

此时，彭德怀最渴望的是那辆载有电台的卡车的出现。他因自己失去对战局的了解而焦灼不安。彭德怀爬上小山，希望看见那辆卡车，甚至希望看见自己的部队突然出现，但他看见的依旧是成群结队的北撤的难民。

下午，电台车终于来了。彭德怀难得地笑了：“安全就好！快发电报！”

这是彭德怀入朝后发给毛泽东的第一封电报，时间是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一日十六时：

（一） 本日晨九时在东仓北镇之大洞与金日成同志见面。前面情况很混乱，由平壤撤退之部队已三天未联络。咸兴、顺川线以南已无友军，咸兴敌是否继续北进不明。

（二）友军位置：长津附近有一工人团和坦克团，德川、宁边大道线以北高地有四个师，肃川有四十六师，博川有十七坦克师，以上均系新兵，如敌继续北进，势难阻击。

（三）目前应迅速控制妙香山、杏川洞线及其以南，构筑工事，保证熙川枢纽，隔离东西敌人联络是异常重要的。请设法集中部分汽车速运一个师，以两个团至熙川以南之妙香山一个团至杏川、五岭线，先机构筑工事。另以一个师迅速进至长津及其以南德实里、旧津里线构筑纵深工事，并以该线以东之元丰里、广大里派出一个加强营，扼要构筑纵深工事。保障侧翼安全和江界后方交通。我能确实控制熙川、长津两要点，主力即可自由调动，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击东西或西面一路。

（四）请邓、洪、韩三同志带必要人员速来我处，商筹全局部署。解沛然同志率留余人员队后跟进。

二十二日，彭德怀分析敌情后，再次给毛泽东发去电报：

目前我无制空权，东西沿海诸城市甚至新义州在敌海、陆、空军和坦克配合轰炸下是守不住的，应勇敢加以放弃，以分散敌人兵力，减少自己无谓消耗。目前战役计划以一个军钳制敌人，集中三个军寻机歼灭伪军两三个师，以达到争取扩大巩固元山至平壤线以北山区，发展南朝鲜游击战争。

原定的先建立防御线的计划，面对敌人的迅速推进已无法实施。况且，原定要占领的龟城、温井、熙川，现已都在敌人的手里。因此，只有放弃过早接敌的计划，把敌人引进来再做打算。

方针是有了。但是部队现在哪里？遇到了什么情况？

志愿军曾明确规定，为了隐蔽作战企图，各军在没有与敌人打响之前，所有的电台一律不准开机。

彭德怀独自一人在长满杂草的山沟里徘徊。

志愿军一进入朝鲜境内，首先感受到的就是联合国军飞机的低空侦察和扫射。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士兵来讲，他们唯一有关飞机的知识是老兵对他们讲的飞机一旦“下蛋”是如何的厉害。且混乱地北撤的人民军在路上一见到志愿军，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有飞机没有？”一听说没有，这些被美军的空袭打得惊慌失措的散兵就一个劲儿地摇头。志愿军入朝初期有一条严格的命令，禁止用手中的轻武器打飞机，原因是打不下来反而暴露了目标。这样，在经过一整夜的风雪行军之后，白天大部队藏在树林的雪窝里，看着美军飞机贴着山梁、掠着树梢飞来飞去。有的部队隐蔽的汽车在士兵的眼皮底下被美军飞机炸得燃起大火，部队开始出现因为空袭而造成的人员伤亡。即使在应该全速前进的夜间，各条前进的路上都发生了堵塞现象。志愿军的大部队在狭窄的公路上急于南下，而向北逃难的北朝鲜难民把公路挤得满满的。志愿军与撤退的人民军在谁给谁让路的问题上也发生了摩擦。

到达指定地点的期限被规定得很严格，因行军速度缓慢而焦虑的志愿军指挥员们在如何提高速度的问题上伤透了脑筋。不少部队已经与派出的先遣队失去了联络，各部队指挥员仅仅靠着一张地图带领部队尽可能快地向目标接近。官兵们刚刚渡过鸭绿江时，看见人民军女战士穿着他们认为很“洋气”的苏式军装列队高唱朝鲜语《东方红》时的良好感觉，在寒冷、疲劳和紧张中消散了。那时候，新义州的朝鲜市民甚至还跑到道路两边挥动花束欢迎他们，中国士兵当时都后悔没能学会那首《金日成将军之歌》。

最影响中国士兵的是，在他们前进的路上，一路目睹了北朝鲜劳动党员、民青盟员、甚至普通的村民被南朝鲜军队杀害后横陈遍野的尸体。另外，还有美军飞机对北朝鲜村落的轰炸给普通百姓造成的不堪入目的惨状。在志愿军一支向泰川方向前进的部队中，一个叫何庆

亮的参谋在被美军飞机击中的民房里救出一个朝鲜婴儿，当时这个婴儿正在母亲的尸体上哭。何参谋把婴儿抱起来，向他的政治委员报告，得到的回答竟是："孩子就交给你负责，不许冻着饿着，一直到有人照顾他为止。"于是，何庆亮参谋只有抱着这个婴儿行进在队伍中。由于身上除了枪支弹药外，还有背包和粮食，何庆亮不久就觉得体力不支了。这支部队的士兵们开始轮流抱着这个婴儿。经过一个晚上的急促行军，天亮的时候，他们才找到一户愿意收留婴儿的老百姓。"一位慈祥的朝鲜老大爷从我怀里接过去这个无母的孤儿。"何庆亮回忆道，"围在旁边的年轻妇女们流着眼泪，亲着婴儿娇嫩的小脸。"

第四十军左翼的先头部队是一一八师。在连续五个夜晚的急行军后，这个师已经越过新仓，接近北镇地区。一一八师师长是一位年轻的军官，名叫邓岳。他不知道他的部队实际上已经成为整个志愿军的前锋，也不知道他的部队将成为最早与联合国军交火的志愿军部队之一，从而使他自己成为注定要在朝鲜战争的战史中留名的指挥员。邓岳这一年三十二岁，他十二岁参加中国红军，是个名副其实的"红小鬼"。长征途中他曾患病，他的班长给他十块光洋让他脱离队伍，他不干。当邓岳躺在路边因为高烧抽搐不已的时候，红军将领陈赓发现了他。陈赓要把自己的战马让给这个孩子，倔强的邓岳没有骑马，而是拉住了马尾巴。马蹄溅起的泥水糊住了他的眼睛，他闭着眼迷迷糊糊地走完了长征艰难的路程。后来，他历任抗大一分校区队长、干部营营长、军分区参谋长、八路军的副团长。他是一位性格坚强、能征善战的军官。到解放战争时，他已经成为一名师长，作为解放军一支主力部队的指挥员，他带领他的士兵参加了辽沈、平津等著名战役，战功赫赫。

就在彭德怀焦灼不安的时候，邓岳的部队已经接近了彭德怀。当时，他们听见前面炮声隆隆，判断那是温井方向，但是敌情不明。在一个山沟的沟口，他们发现几个人民军士兵，于是带着翻译上前询

问。谁知这几个人民军士兵对他们的问题拒绝回答。邓岳发火了，大声地说出自己的职务。双方正在僵持中，一直在沟口翘首盼望自己队伍的彭德怀的参谋跑来了。

邓岳后来回忆说：“我们快步向彭总的住房走去。这是一幢朝鲜式的大窗户茅屋，我们向半开半关的窗户望去，很远就看见彭总在屋里踱来踱去。我们在门口喊了声‘报告’，彭总马上紧紧握住我们的手，情绪非常激动地说：‘总算把你们盼来了，我这光杆儿司令真是干着急没办法，你们率部队来到这里太好了，太好了！你们吃饭了没有？’然后让我们坐下，彭总亲自给我们倒水喝，我真想不到彭总对下级这么亲热。我向彭总报告说：‘我们一一八师共有一万三千多人，先头部队已经到达大榆洞附近的沟口。现在听见温井方向炮声不断，但与军部无法联系，前面的情况一概不知，请彭总指示我们到哪个方向去作战。’彭总让我们看了准备给毛主席发出的关于各军作战部署的电报，然后非常有力地说：‘现在朝鲜人民军都自前线向北撤了，敌军在跟踪追击，情况危急。你们师赶快向温井方向开进，先在温井以北占领有利地形，隐蔽埋伏起来，将部队形成一个口袋，放心大胆地放敌人进来，然后几面开火突然猛打，趁机歼灭这股冒进的敌人，狠狠打击一下敌人的气焰，迟滞敌人的进攻，掩护军主力集结展开。这是志愿军出国的第一仗，你们师是打头阵的，看看你们行不行。’彭总明确而坚定的指示，使我们增强了胜利的信心。我们在彭总那里只待了半个小时，就根据彭总的指示，立即率领部队迎着炮声朝东南的温井方向跑步前进。”

邓岳在离开彭德怀的时候，坚持留下一点兵力做彭德怀的警卫工作。这位年轻的师长在后来的岁月里对彭德怀只身深入敌后的果敢一直满怀崇敬。

而对于彭德怀来讲，邓岳的到来足以令他充满信心。在他的眼里，此时此刻，邓岳出现的意义远远超出一个师兵力的到达。这从他竟然给这位年轻的师长看他准备发给毛泽东的电报就能看出。一一八师的到达令彭德怀实现了一个愿望，那就是：他可以住在大榆洞了，志愿军指挥部可以建在这里了。尽管这里距敌人仅有二十公里，作为指挥部离敌人太近了些。

联合国军弥漫着极其乐观的情绪，这种从突转的战势中获得的乐观已经传染给了每一个士兵。于是，当中国军队正在向他们扑来，并且几乎就要与他们迎面相撞的时候，联合国军向北进军时的心情和姿态依旧“像旅游一样”。最乐观的还是美国军方的上层。《纽约时报》社论写道：“只要在中朝边境不发生意外事件，这场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

在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的想法的驱使下，美国陆军部把精力转向了避免朝鲜战区军用物资积压的问题。麦克阿瑟从威克岛回来，发表了“充分利用一切条件全速向北推进”的命令，但远东司令部同时还发表了第202号作战计划，“对战事减少后的行动步骤作出安排，以便让某些联合国部队撤出朝鲜”。美国政府通知麦克阿瑟，停止向朝鲜运送补充人员，对此麦克阿瑟没有提出异议。在前几个星期还要求紧急补充弹药的沃克将军告诉麦克阿瑟，现在第八集团军的弹药“绰绰有余”，从美国本土运来的弹药和装备应该一律运到日本去。而美军驻日本的后勤司令官对他在旧金山的同事说：取消所有未付款的武器弹药订货。“如果那些该死的东西已在港口装了船，就卸下去”。美军中流传着马上就要回日本或美国的消息。士兵詹姆斯·卡迪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有一种传闻说，第一骑兵师很快就要返回日本了，战争就要结束了。我的确希望如此。我已经烦透了这个国家和这场战争。”美第十军甚至制定了一份在朝鲜只留一个师、其余人员统统回国的具体计划。回国热情特别高涨的是美军第二师，他们已经向仁川港派出设营队，

着手准备大部队乘船离开朝鲜的事。而历史无情的结局是：二十年后，美军第二师仍旧驻扎在南朝鲜。当美军骑兵第一师的后勤人员向在朝鲜的陆军官兵发放圣诞节礼品价格单时，很多士兵都把这份价格单扔了，他们认为圣诞节在朝鲜过是荒诞的，到时候他们肯定会在东京了。于是，这份价格单变成了日本银座的物价表。骑兵师的一些部队甚至已经把武器装箱了。士兵们议论最多的是，感恩节在东京阅兵式上，是否戴上他们师特有的标志——一条令他们自我感觉良好的黄色围巾。

在这种情况下，最能体现麦克阿瑟性格的战场部署的大疏漏出现了：美军分成了两路。

仁川登陆成功后，麦克阿瑟似乎得了“登陆病”，他命令阿尔蒙德将军率领美第十军乘船绕到朝鲜半岛的东海岸去，在元山港实施登陆后北进，最终与由沃克率领的沿着朝鲜半岛西侧北进的第八集团军会合。美军因此在朝鲜半岛北部被分成了东西两路，而中间则是连绵起伏的山脉，这就使得东西两路美军“无法在宽大的正面实施协同作战”。这种互不联系、分头并进的进攻方式，“连西点军校的初级学员都会提出质问”。特别是，当美军第十军还在仁川港上船的时候，南朝鲜军队已经从陆路抢先占领了元山。可麦克阿瑟的命令依旧不变，他“执意要让第十军经受八百五十英里海上风浪的折磨”。实际上，第十军的美军官兵除了要忍受海上航行的昏天黑地之外，到达元山港以后却不能上岸，原因是港口的海面上布满了北朝鲜军队布设的水雷。于是，在美国海军扫雷的时候，运输船只有在海面上来回游弋，以给无法靠岸的第十军补充供给，而这样的供给游弋居然持续了几天。无所事事的第十军官兵们躺在甲板上晒太阳和打扑克。很快，美国兵给元山登陆行动起了个绰号：“YOYO”行动。意思是“来回闲逛”。

对于在朝鲜半岛东边海面上扫雷的美国海军来讲，元山登陆计划实施的那些天无疑是灾难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有三百多艘扫雷舰用于诺曼底登陆作战；即使在冲绳岛战役时，海上扫雷面积几乎与元山相等，也仍有一百多艘扫雷舰；可是在元山，美军能够投入使用的扫雷舰只有三十艘，其中的二十艘连同上面的水兵还是战败国日本海军的。日本兵在朝鲜战争中出现，引起朝鲜人民的强烈反感，这个问题在战后很长时间仍被不断地提起。整个元山扫雷过程被称为"连上帝也害怕"的行动，两天内就有三艘扫雷舰触雷沉没。日本水兵听不懂英语，扫雷的方式又和美军不一样，结果用两种语言在海上对骂的场面时有发生。

事后得知，"YOYO"行动恰恰为中国第四十二军在长津地区的展开赢得了极其宝贵的时间，美军第十军的官兵很快就会尝到"来回闲逛"的后果了。

十月二十四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极其紧张的一天。因为，二十三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发来一封指示十分具体的电报：

彭并告高：

二十二日戌时电悉。你的方针是稳当的，我们应当从稳当的基点出发，不做办不到的事。朝鲜战局，就军事方面来说决定于下列几点：第一是目前正在部署的战役是否能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两个三个甚至四个伪军师（伪三师将随伪六师后跟进，伪一师亦可能增援）。此战如果是一个大胜仗，则敌人将作重新部署，新义州、宣川、定州等处至少在一个时期内不会来占，伪首伪三两师将从咸兴一带退回元山地区，而长津可保，新安州、顺川两点是否保守也可能成问题，成川至阳德一段铁路无兵保守向我敞开一个大缺口，在现有兵力的条件下，敌人将立即处于被动地位。如果这次突然性的作战胜利不大，伪六、七、八师主力未被迅速歼灭，或被逃脱，或竟固守待援，伪一、伪首及美军一部增援到达，使我不得不于阵前撤退，则形势将改到于敌有利，熙川、长津两处的保守也将发生困难。第二是敌人飞机杀伤我之人员妨碍我之活动究竟有多大。如果我能利用夜间行军作战做到很熟练的程度，敌人虽有大量飞机仍不能给我太大的杀伤和妨碍，则我军可以继续进行野战及打许多孤立据点，即是说，除平壤、元山、汉城、大丘、釜山等大城市及其附近地区我无飞机无法进攻外，其余地方的敌人都可能被我各个歼灭，即使美国再增几个师来，我也可各个歼

灭之。如此便有迫使美国和我进行外交谈判之可能，或者待我飞机大炮的条件具备之后把这些大城市逐一打开。如果敌人飞机对我杀伤和妨碍大得使我无法进行有利的作战，则在我飞机条件尚未具备的半年至一年内，我军将处于很困难的地位。第三如果美国再调五个至十个师来朝鲜，而在这以前我军又未能在运动战中及打孤立据点的作战中歼灭几个美国师及几个伪军师，则形势也将于我不利，如果相反，则于我有利。以上几点，均可于此战役及尔后几个月内获得经验和证明。我认为我们应当力争此次战役的完满胜利，力争在敌机炸扰下仍能保持旺盛的士气进行有力的作战，力争在敌人从美国或他处增调兵力到朝鲜以前多歼灭几部分敌人的兵力，使其增补赶不上损失。总之，我们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

毛泽东

十月二十三日

二十四日，西线，南朝鲜第六师已占领熙川，主力正在向温井、桧木洞、楚山方向冒进，其一个团已经到达大榆洞的后方。南朝鲜第八师已占宁远，并继续向我左后方江界方向迂回前进。南朝鲜的第七师和第一师，已占宁边和龙山洞地区，从正面向我军压来。英军第二十七旅、美军第二十四师分别向定州、泰川北进，向我军的右后方迂回。东线，南朝鲜第三师和首都师已占五老里，美军陆战一师、第三师等待元山扫雷后即可登陆，而美军第七师已经向利原方向运动。

志愿军绝大部分部队仍未到达预定的防御地，除第四十军两个先头师进至北镇和云山以北外，其余各军的先头师距离预定作战地区尚有三十至五十公里：第三十九军先头部队一一七师进至泰川地区，第三十八军先头部队一一三师进至前川地区，第四十二军先头部队一二四师进至古土里以北地区。

至此，联合国军仍没发现志愿军入朝参战的迹象，因此他们向北推进的速度极快。

中国军队与联合国军的战斗迫在眉睫。

当志愿军司令部机关全体人员和第十三兵团指挥机关赶到大榆洞与彭德怀会合后，十万火急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指挥部成立起来。按照彭德怀原来的想法，以第十三兵团司令部再加一些人组成志愿军司令部，但敌情紧急来不及了，所以索性把第十三兵团司令部直接改成了志愿军司令部。

经中央军委任命，十月二十五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构组成：彭德怀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洪学智、韩先楚任副司令员，解方任参谋长，杜平任政治部主任。另外，志愿军党委也同时组成：彭德怀任志愿军党委书记，邓华为副书记，洪学智、韩先楚、解方、杜平为常委。为协同志愿军与人民军的行动，朝鲜劳动党中央派朴一禹常驻志愿军总部，并兼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志愿军党委副书记。

在随后召开的志愿军第一次作战会议上，彭德怀嘴里嚼着茶叶说：我们原定的在防御中消灭敌人的计划不行了，在国内战争中采用的那种大踏步前进和后退的战法也不适用了。我们是战略反击，作战方针应以运动战为主，以阵地战和游击战为辅。具体部署是以部分兵力钳制东线之敌，集中主力于西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打西线战斗力较弱的南朝鲜军三个师。第一口怎么吃？我看把敌人引到对我有利的地形上来打！

根据毛泽东二十三日电报的指示，作战会议确定了以下部署：以第四十军配属炮兵第八师四十二团，集结于温井以北、北镇以东地域，待机歼灭南朝鲜第六师于温井西北地区；以第三十九军配属炮兵第一师二十六团及二十五团一个营、炮兵第二师二十九团、高射炮兵一团，迅速集结于云山西北地域，准备在第四十军围歼南朝鲜第六师而南朝鲜第一师前往支援时，将其歼灭在云山附近地区；以第三十八军配属第四十二军一二五师和炮兵第八师四十六团，迅速集结于熙川

以北明岱里、仓里地域，准备歼灭南朝鲜第八师于熙川及其以北地区；第四十二军主力配属炮兵第八师（欠四十二、四十六团），仍于长津以南黄草岭、赴战岭地区阻敌北进，钳制东线之敌，保障西线志愿军主力的侧翼安全。同时，令第六十六军自安东过江，向铁山方向前进，准备阻击英军第二十七旅。应该说，这个部署从双方的兵力对比和目前战场的态势看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对敌情了解得并不充分，志愿军指挥员们此时没能预料到将要出现的突然情况。

第四十军一一八师师长邓岳在领受彭德怀的指示后，令其前卫三五四团不过温井，而在温井以北的丰下洞、富兴洞地区修筑工事，准备阻击敌人。师主力则集结于两水洞和北镇地区，视情况投入战斗。如果敌人不北进，明晚继续前进。三五四团的前卫是四连。从当时的情况看，这个连犹如整个志愿军伸出的一只触角。他们到达了距离温井只有四公里的地方，在公路东侧的山林中就可看见温井地区南朝鲜军队露营的篝火。他们从撤下来的人民军士兵口中得知，南朝鲜军队已经占领温井，但占领军的番号和兵力以及下一步的企图无法知道。三五四团参谋长作出以下部署：二营四连配属重机枪两挺，控制公路边的二一六高地，负责正面阻击。三营在富兴洞以北的二三九点八高地以火力控制公路。一营作为预备队位于长洞隐蔽。侦察排前去摸清楚敌情，监视敌人动向。一旦战斗开始，团指挥所设在四九〇点五高地。同时宣布，全团严密伪装，管制灯火，迅速架通有线电话联系。

当中国士兵在黑暗中修筑工事的时候，三五四团政委陈耶遇到了一位北朝鲜人民军的团长，美军在仁川登陆后他突围出来一直撤退到这里。这位人民军团长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当过连长，因此他们互相格外敬重，几乎彻夜长谈。

天就要亮了。中国士兵除了警戒哨外，其他的人则蜷曲在工事中打盹。天气寒冷，不许生火，相信还是有士兵做了梦。包括三五四团

的军官们在内，没有人知道天亮后将会发生什么，只是预感到，既然修筑这个工事是彭老总亲自布置的，就说明这个地方很可能要出大事。战斗就要打响了，不管拼个你死我活的对手是南朝鲜人还是美国人，反正是外国人。中国士兵一想到这一层，心里便有一种奇异的感觉。

## 我们认为什么都知道，而实际上什么也不知道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五日清晨，南朝鲜第六师二团在晨雾中编成战斗队形。团长咸炳善上校在下达前进的战斗序列时，心里隐约感到有点不安。昨天，在二团击退北朝鲜军队的阻击进入温井的时候，三营的情报官报告说，通过对有线通讯网的窃听，发现有中共军队出现的迹象。咸炳善立即把这个情报报告给了师长金钟五，金钟五的回答是："上级的定期情报没有这个说法。"在温井宿营一夜，没有什么情况发生，现在部队就要出发了，不安的情绪还是在咸炳善的心头一掠而过。他下达了前进的指令：二营为先头营，一营随后，三营配属炮兵和坦克乘车跟进。

二团的前进方向是北镇。

九时，二团长长的队伍出了温井。

夜间派出去的侦察分队报告说：向北的公路上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早在这天的凌晨二时，位于北镇的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值班室的电话铃突然响起。参谋长解方拿起电话，是第四十军一一八师司令部打来的，里面的声音紧张而激动："我们的正面发现了敌人！"解方怀疑自己听错了，因为根据掌握的敌情，部队不可能这么早就与敌人接触。他再问了一句，得到的回答是："没错，是敌人！说的是外国话，

听不懂！”解方立即指示：严密监视，不许暴露。放下电话，解方还是对部队如此迅速接敌感到意外。觉是不敢睡了，解方把副司令员洪学智叫了起来，两个人心绪不宁地守着电话机。没过一会儿，电话又响了，这次是师长邓岳亲自打来的：“我们的侦察员已经听见他们说话了，讲的都是朝鲜话，看来不像是美军，可能是南朝鲜第六师。”洪学智说：“要是伪军的话，就把他们放进来！”

按照原定的计划，志愿军各军应在这一线展开，布置下一个“大口袋”，再寻找有利的战机，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一下子围住南朝鲜军的几个师。可是，一一八师的正面已经出现敌人，遭遇战就不可避免了。因为中国军队参战的事实一旦暴露，也就谈不上战役的突然性了，原定的计划全会被打乱。

但愿一一八师的情报是一场虚惊！

南朝鲜第六师的进攻计划是沿着球场——温井——古场的公路前进，最终目标是位于中朝边境附近的碧潼和楚山。其七团前进的速度极快，他们已经越过温井，快要到达古场了。按照第六师的进攻序列，二团跟在七团后面前进。

本是秋高气爽的天气突然变得阴暗起来，天空布满了乌云。远处，岩石裸露的狄逾岭山脉上铺着一层薄雪。眼下的公路是先头部队七团走过的，因此应该说是安全的。温井是进入朝鲜北部山区的门户。向北，一条南北方向的公路沿着从山中流出的九龙江蜿蜒北上。公路东侧是长满松树的山峦，枯草在乌云投下的暗影中摇曳；西侧是江水和延伸到江边的高山峡谷，江两边的谷地里是平展的稻田。

一一八师三五四团的士兵在公路两侧山坡上的枯草中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夜晚。现在，晨雾已经渐渐散去，江水清澈，田埂细密，茅屋

瓦舍依稀可见。山坡下的公路上空无一人，看去像一条僵死的灰白色的蛇。

从地形上讲，这是一个打伏击的好地方。

草丛中的中国士兵睁大了黑眼睛。

公路的尽头终于出现了隐约的烟尘，渐渐地，烟尘越来越浓越来越厚。最先从烟尘中走出来的是步兵。步兵端着枪分成两列沿公路两侧慢慢移动，接着，由汽车组成的队伍超越步兵浩浩荡荡而来。

紧张和兴奋的情绪在中国官兵中立即蔓延开来。日日夜夜为此产生过许多设想的情景今天就在眼前了。

三五四团政委陈耶发现，就在这个时候，团长褚传禹不见了。三个步兵营的电话全打了，还是找不到团长在哪里。陈耶让通信股开设电台向师里联系，但是师指挥所处在静默保密之中，根本呼叫不通。面临出国后的第一仗，情急中的陈耶顾不上许多，立即把参谋长，政治处主任，作战、通信、组织、宣传、保卫各股的股长召到身边。紧急会议开得十分短促，会议产生两个方案：一是把敌人迎头顶住，这样不但稳妥保险，而且可以保障后续部队和指挥机关的安全，缺点是很可能打成击溃战和消耗战；二是把敌人放进来，放进来一个营，然后打歼灭战，但是这也有一定的风险。大多数人主张第二种方案。方案确定之后，参谋长刘玉珠命令部队：没有命令不准开枪，把敌人放进来打。

这时，与陈耶政委交谈了一夜的那个人民军团长要求参加战斗，陈耶没有同意，要求他立即转移。这个人民军团长消失在中国士兵背后的密林中了。

敌人近了，头上的钢盔闪闪发亮。

三五四团官兵在有线电话里听见参谋长严厉的声音：“没有命令，谁也不准开枪！”

所有的步枪、机枪、迫击炮、掷弹筒都对准了公路。

士兵们的面前，堆着成束的手榴弹。

这时，褚传禹团长找到了，他没想到这么快就与敌人遭遇，发现敌情的时候他还在一营三连。褚传禹团长同意紧急会议决定的打法，由他带领一、三营出击，政委带领二营“扎口袋嘴”。

没有总指挥部的指示，一切是由三五四团决定的。

这是一场未预期的遭遇战。

所有参加过这场战斗的中国士兵在他们的回忆中都对那一天看到的南朝鲜士兵若无其事的样子感到十分惊讶。从温井开来的南朝鲜六师二团的尖兵根本没有进行火力侦察，并且连车都不下，他们坐在车上啃着苹果谈笑风生。当载着尖兵的卡车压上两颗中国士兵埋下的触发地雷时，由于地雷使用的不是速发雷管，卡车没有受到损失，而车上的南朝鲜士兵竟然一点惊慌都没有，卡车甚至都没有停下检查一下。

由于南朝鲜第六师二团三营是乘车的机动营，所以，虽然是最后从温井出发的，但此刻已经超越了作为先头营的步兵二营。结果，由中型卡车牵引的十二门榴弹炮成为整个二团队伍的前锋。这种在进攻中把炮兵放在最前面的阵势也是中国士兵前所未见的。在炮车的后面，是二十多辆载着辎重和步兵的汽车。

炮兵和汽车在最南边的三五四团二营四连的眼皮下过去了。

没有开火的命令。中国士兵紧扣扳机的手汗津津的。

突然，他们听见了歌声，公路上的炮车和卡车也停了下来。原来领头的炮车已开到丰下洞的村口，竟有一些老百姓挥着太极旗出来欢迎“国军”。驶过欢迎的人们，车队继续前进。这时，产生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由于汽车行进的速度快，步兵行进的速度慢，二团的队伍在公路上的长度前后足有好几公里。为了把南朝鲜的步兵营放进来，三五四团让过了前面的车队，车队超越三五四团的防区后，却直接闯入了一一八师的指挥部所在地。师指挥部虽然知道其前卫团可能会与敌人遭遇，但是由于电台的静默，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敌人会这么快闯来。当南朝鲜军的车队到达的时候，一一八师的指挥车还在路边停着，人员还在旁边的村子里休息。

车上的南朝鲜士兵立即开枪了。停在路边的一一八师指挥车的玻璃瞬间粉碎，正在里面睡觉的司机纵身扑到山沟里。师侦察连立即开枪还击，连同师长邓岳在内的指挥部人员仓促地上山占领了阵地。

这时，三五四团指挥所在南朝鲜军步兵营全部进入伏击圈后下达了开火的命令。在突然而来的密集的子弹中，南朝鲜士兵立即乱成一团。三营八连的迫击炮手何易清把一发炮弹打到一辆准备掉头往回跑的卡车上，瘫痪的汽车把公路堵塞了。如今，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里，何易清使用的这门六十毫米迫击炮仍然陈列着。

对于南朝鲜第六师二团的士兵来讲，这个日子是世界的末日。

当中国士兵端着刺刀冲上来的时候，公路上、稻田中、江岸边，到处可以看见惊慌失措的南朝鲜士兵被追杀。南朝鲜军没能组织起有效的抵抗，仅仅在二十分钟之内，那个最先走出温井的步兵营就完了。

在公路的最南边负责阻击南朝鲜军后续部队进攻的四连经受着严峻的考验。敌人的火炮把最前沿的八班阵地打成了一片火海。在击退敌人的数次进攻后，八班的阵地一度丢失，一个班的战士全部伤亡，而南朝鲜军付出了七十个士兵的生命。

奇怪的是让三五四团放过去的那个机动营，在与力量薄弱的一一八师侦察连形成僵持后，他们对身后响起的剧烈的枪声并没有给予重视，也没有即刻采取回头进攻的做法，而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三五四团将陷入两面遭受夹击的局面。此时的机动营依旧认为他们所遇到的不过是一次小小的骚扰，于是官兵统统隐蔽起来，等待后援的到来——“以赶走他们的指挥员想象的一小股北朝鲜的阻滞部队”。——美国随军记者约瑟夫·格登后来写道。结果，机动营等来的是邓岳调来的另一个步兵团——三五三团的围歼。——“在几分钟之内，该营就伤亡惨重。”二十五日下午十五时，三五三团清理战场的结果是：击毙敌人三百二十五名，俘敌一百六十一名，缴获汽车三十八辆、火炮十二门、各种枪支一百六十三支。其中一名美军顾问被打死，另一名美军顾问格伦·C.琼斯中尉负伤后被俘，他后来死于战俘营。

几乎与此同时，第四十军右翼的先遣团一二〇师三六〇团也与南朝鲜军打响了战斗。

三六〇团在徐锐团长的带领下，在云山城北的间洞南山、玉女峰一线构筑阵地，准备阻击从云山城北上的南朝鲜军队。他们的任务是：顶住南朝鲜军队，掩护第四十军展开，同时等待第三十九军的到达。徐锐是个作战勇敢的指挥员。在中国解放战争的辽沈战役中，时任副团长的徐锐率领一个营深入敌后，袭击了国民党军廖耀湘兵团的司令部，这个情节被日后描写辽沈战役的众多作品多次记述。此时，守卫三六〇团前沿阵地间洞南山的是一营三连。三连的阵地前隔着一条河就是云山城。

晨曦未露，汽车灯光却把天际照得雪亮。南朝鲜第一师的北进部队在凌晨时分进入云山城。一营三连的士兵们连城里敌人吃早饭的情景都看得清清楚楚。早晨七时，由尖兵为先导，紧跟着是坦克和自行火炮的车队，南朝鲜第一师浩荡开出了云山城。

徐锐命令把尖兵放过去，然后对准大部队突然开火了。三六〇团的团属炮兵也向南朝鲜军的坦克开始射击。坦克立即队形混乱地向后转向，而南朝鲜的尖兵大部分就地死伤。徐锐命令把俘虏到的南朝鲜士兵立即送到他这里来，他迫切地想知道敌人的番号和实力。然而美军飞机像大鸟一样飞来了，中国士兵以及他们所押送的南朝鲜军俘虏瞬间被炸得血肉横飞。

与三五四团的伏击战不同，三六〇团进行的是一场艰苦的阻击战。

南朝鲜第一师在猛烈的炮火、大量的坦克和美军飞机的支援下，开始强攻中国军队的阻击阵地，其重点是一营三连所坚守的间洞南山。

间洞南山是横在云山至熙川、云山至温井两条公路交会处的一座一百多米高的山冈，因为这个高地扼守着南朝鲜军队北进的必经之路，所以成为战场双方攻守的焦点。在长满密集马尾松的山冈上，一个连的中国士兵拼死防守，打退了南朝鲜第一师的数次进攻。中国军队的顽强程度令南朝鲜军队的指挥官十分吃惊，因为自他们开始反攻以来，虽然受到过北朝鲜人民军的阻击，但还从来没有遭遇如此有战斗力的阻击部队。在进攻失败后，南朝鲜军队集中坦克和火炮开始向间洞南山猛烈轰击。同时，二十架美军轰炸机也参加了战斗。在美军飞机的航空炸弹、火箭弹和凝固汽油弹的准确轰炸下，整个间洞南山腾起的烈焰遮天蔽日。在炽热的火焰中，中国士兵没有任何退缩的迹象。当南朝鲜士兵呐喊着冲到很近的距离时，他们一个又一个跳出已

被炸平的工事开始扫射，木柄手榴弹如大雨般落在南朝鲜士兵头上。在反复的攻守中，中国士兵伤亡过半，更严重的是弹药已经耗尽。

严峻的时刻到了。

当二十多名南朝鲜士兵终于爬上山冈的一侧时，他们看见一个衣衫破烂的士兵突然从工事中跃起，他怀里抱着一根爆破筒，几乎是面带着微笑向他们冲来。南朝鲜士兵这时还不知道他们面前的这个年轻的士兵来自中国，士兵的黑眼睛很亮，令他们想到战争中那些宁死不屈的人。等这个黑眼睛的士兵冲到他们跟前的时候，南朝鲜士兵才突然明白接下来将要发生的是什么了。但是，一切都已来不及了，黑眼睛士兵怀里的爆破筒爆炸了。——石宝山，中国第四十军的一名战士，是朝鲜战争中第一位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志愿军士兵。

三六〇团于血肉拼杀中死死地阻击，令急于北进的南朝鲜第一师三天内没有从云山城向北推进一步。三六〇团的官兵当时并不知道，就是这三天的阻击，使前面的云山成为令南朝鲜军第一师魂飞魄散的地狱。

这一天，十月二十五日，在中国军队与南朝鲜军队于西线遭遇的同时，东线的志愿军部队也打响了。

从北朝鲜的地势上看，渡过鸭绿江向长津地区的急促行军显然更为艰难，因为在这条路上横亘着朝鲜北部著名的盖马高原，由于海拔的关系，高原气温骤降，十月已经飞雪。从东海岸而来的唯一一条通往中朝边境的公路蜿蜒在深山峡谷之中。这条公路经咸兴、兴南，一直是上坡，翻过一个叫黄草岭的隘口后，就上了盖马高原。这条公路是联合国军沿东海岸向中朝边境开进的必经之路。为了阻击联合国军在东线的北进，掩护志愿军侧翼的安全，保障西线战役的顺利实施，渡过鸭绿江的第四十二军的任务很明确，就是要在这条路上坚决挡住

北进的敌人。第四十二军的指挥员已经预料到战况的复杂，于是，在大部队渡江之前就派出了由一二四师副师长萧剑飞率领的先遣队深入战区探路。先遣队冒着美军飞机的轰炸，把东线战区的重要目标都进行了侦察。

二十一日，萧剑飞见到了北朝鲜人民军长津地区守备部队司令官金永涣。这个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里当过连长、一九四九年才回国的军官会说流利的汉语，在这个艰难的时刻看见萧剑飞时他的眼里全是泪。在金永涣的带领下，萧剑飞见到了北朝鲜军队的次帅崔庸健和人民军部队里的几个苏联顾问。此刻，他们最想知道的是志愿军有多少部队正向这个方向开来，并且有多少飞机和大炮。当得知志愿军只有两个师（第四十二军的一二五师配属第三十八军在西线作战），并且没有飞机，也没有坦克，全军加上临时加强的炮兵，火炮总数不超过一百门时，面色疲惫的崔庸健和苏联顾问感到非常失望。苏联顾问提出疑问："兵器火力与美军对比悬殊太大，又没有飞机的支援，凭什么能抵御敌人的进攻？"萧剑飞回答："只要占领有利地形，封闭公路，敌人的坦克和机械化部队就施展不开。志愿军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和勇敢作战的精神，一定能战胜敌人。"与苏联顾问们不一样的是，金永涣这个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作战的军官，很早就认识第四十二军军长吴瑞林，他深知中国军队强烈的自信来源于什么。所以他对年轻的中国副师长萧剑飞的乐观表示出某种程度的相信。

关键是，对阻击战来讲最有利的地点在哪里？

研究的结果是：黄草岭。

黄草岭位于从咸兴延伸而来的公路的最高点。特别是从一个叫五老里的地方上到黄草岭的公路，必须经过约四十公里的峡谷地带，峡谷的两边都是巨大的山岭和悬崖峭壁。在这里，烟台峰、松茸洞、草

芳岭等制高点互相成为掎角之势，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俯视钳制整个峡谷。

在联合国军指挥官的心中，黄草岭对于他们同样重要：占领了这个要地，就等于打开了北朝鲜东部的门户，任何想阻止他们前进的军队都会处于无险可守的境地。而一旦失去对黄草岭的控制，要想通过这一必经之地北上，就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双方都开始向黄草岭前进，结果是要看谁能提前抢占。

第四十二军渡过鸭绿江后，因为苏联决定不出动空军参战，于是奉命在江界停留了整整两天。这两天的损失对第四十二军来讲几乎是致命的。此时，其先头部队一二四师仅仅离开江界一百八十公里，其先头团三七〇团距黄草岭至少还有两百多公里，因为是徒步开进，最快也得两天后才能到达。而南朝鲜首都师的前锋部队已经到达咸兴，美军陆战一师不久后就会从元山港登陆。从元山到咸兴距离是八十公里，再加上咸兴到黄草岭的距离，一共不到一百二十公里。联合国军是机械化行军，如没有阻挡，仅仅需要三四个小时就能到达黄草岭。

萧剑飞唯一的要求是：搞到能运送士兵的汽车。金永涣命令，用一切办法在这一地区征集军队和民间汽车供中国军队使用，并决定将从南方撤退到此的人民军的七辆坦克和十二门野炮全部归中国军队指挥。

萧剑飞终于有了十八辆汽车。他命令三七〇团副团长苑世仁带领该团二营乘车前进，务必于二十四日夜抢占黄草岭。同时，金永涣也给守备在黄草岭各高地的人民军下达了不准再后退一步的命令。

三七〇团二营的士兵一律轻装，连卡车的驾驶室顶上和车门的两边都是人。严重超载的卡车在弯曲的山间公路上疯狂地向黄草岭行

驶。到这个时候，无论是乘车的中国士兵，还是开车的北朝鲜士兵，都把性命抛在了脑后。

彭德怀接到第四十二军发来的电报，高兴地称赞他们的决定“可嘉”。

十八辆疯狂开进的卡车把两个连的中国士兵于二十四日夜送到了黄草岭。

庆幸的是联合国军对中国军队的参战毫无所知，他们仍慢吞吞地前进着，本是四个小时的机械化行军路程，他们用了整整三天的时间。

二十五日拂晓，三七〇团二营在黄草岭地区的烟台峰、松茸洞、龙水洞一线进入了阻击阵地。

寒冷的高原上白雪铺满山林。中国士兵在没有吃上一口饭、喝上一口水的极度疲劳中迅速修筑简易工事，然后等待着敌人出现。上级的命令是：据险坚守，决一死战，把黄草岭变成鬼门关，除了敌人的游魂和俘虏外，一个也不准放过。

天亮了，中国士兵最先看到的是一个奇形怪状的东西飞来了，这是一架侦察直升机。中国士兵此前谁也没有见过这种东西，不少士兵认为这是一个“大飞弹”。直升机在黄草岭的山谷间长时间地盘旋，甚至在二营的前沿阵地上降落了一会儿。等这个怪物又飞起来的时候，士兵们才确定这是架飞机而不是“大飞弹”。这时候，连队干部对他们说：敌人要上来了。

果然，直升机飞走后，美军轰炸机蜂拥而至。同时，位于五老里的南朝鲜炮兵阵地也发射了密集的炮弹。敌人的火力准备开始了。

进攻黄草岭的是南朝鲜军首都师。这个师是李承晚的近卫师，由两个步兵团和一个机甲团组成，另外配属一个美制一〇五毫米榴弹炮兵营，全师兵力一万人。南朝鲜士兵沿着公路两侧走来。与西线的第六师一样，在中国士兵的眼里，他们前进时懒散的样子根本不像是在进攻。一个小个子军官甚至走到了距离中国士兵埋伏的前哨阵地仅二十米的地方，并且招呼其他人坐下来吸烟。就在几乎能听见中国士兵沉重的呼吸声的地方，他们吸完烟后又继续前进，一步就越过了中国士兵的前沿警戒线。

三七〇团射向南朝鲜首都师的枪声响了。时间与相隔几百公里外的温井北边中国军队三五四团向南朝鲜第六师开枪的时间几乎是同时。遭到突然袭击的首都师的混乱程度可想而知。士兵们满山遍野地奔逃，尸体立即布满了陡坡。

二十五日这天，中国军队与联合国军的战斗，就这样在朝鲜北部不同的地点同时开始了，并由此演变成一场长达两年零九个月的规模巨大的战争。

十月二十五日被中国政府正式确定为抗美援朝战争纪念日。

突然打响的战斗令志愿军总部陷入紧张的忙乱之中。

对于彭德怀来讲，二十五日的这些战斗并没有发生在他所期待的时刻。预定的利用战役的突然性一举歼灭南朝鲜军队两三个师的作战企图，由于遭遇战过早地暴露出中国军队的参战，使得战役的发展一时间已难以预料。

这是一场“遭遇和反突击战役”。彭德怀是这样给突然打响的战斗定性的。

整个中午，彭德怀一言不发，连吃饭的时候都在沉思。饭后，志愿军总部的将领们跟在彭德怀的身后，希望能听到他对战局的指导性见解。美军的飞机在上空盘旋，警卫员催促彭德怀进防空洞。彭德怀发火了：“要去你们去！反正我不去！”在地图前沉默很久后，彭德怀终于说：“好事多磨，恐怕又要改变计划喽！”

此时，除了被阻击的南朝鲜军在突然被袭的情况下失去判断地到处乱窜外，联合国军的其他各路部队仍然在分兵北进。其中，英军第二十七旅已经到达南市，距离中朝边境仅三十公里；美军第二十四师已经到达大馆洞，距离中朝边境三十五公里；南朝鲜第六师七团已经占领了距离中朝边境仅五公里的楚山。

二十五日晚，彭德怀给毛泽东发去电报，从中可以看出他对战局如此开始的不安：

敌以坦克数辆和汽车十数辆组成一支队伍，到处乱窜。我企图一仗中聚歼敌两三个师甚困难，亦再难保守秘密。故决定以军和师分途歼灭敌之一个团和两个团（今晚已开始），求得第一战役中数个战斗歼灭敌一两个师，停止敌乱窜，稳定人心，是十分必要的。

毛泽东复电：

先歼灭敌人几个团，逐步扩大，歼灭更多敌人，稳定人心，使我军站稳脚跟，这个方针是正确的。

彭德怀下达了“各部队追击敌人”的命令。

二十五日早晨，在联合国军于刚刚占领的北朝鲜首都平壤举行的阅兵式上，麦克阿瑟命令第一批到达朝鲜的美军士兵“向前走一步”。他亲切地抚摸了走出队列的每一个士兵的肩头，尽管向前走出一步的士兵已经没有几个人了。第一批到达朝鲜的史密斯特遣队的士兵，有的躺在裹尸袋中回到了美国，大部分则躺在日本的美军医院里。然

后，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回答了记者关于战局的提问。沃克一边暗示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一边回答说：“一切进展顺利。”

可是，没过多一会儿，前线就传来了“遭遇强大抵抗，南朝鲜军队伤亡惨重”的报告。尤其令麦克阿瑟和沃克惊讶的是，报告异口同声地说：“可能是中国军队参战了。”

证据是，云山方向，抓获了一名“既不懂朝语也不懂日语”的敌对士兵。

这位被联合国军方面编为“战俘一号”的俘兵是中国广东省人。

接着，温井方向报告，又有一名在战斗中负伤的士兵被俘。报告说他“长得很像中国人”。

令麦克阿瑟和美军情报部门不知所措的是，其中的一名中国俘兵说自己部队的番号是中国第八军第五团。美军情报部门就此费了很大的力气查找中国军队的编制序列，最后发现这个口供是子虚乌有，因为中国军队的“第八军”属于正在中国西北地区作战的“一野”部队，而且“第八军”这个番号早在一年多前的一九四九年五月就已经撤销了。况且，所谓的“第五团”，根据中国军队“三三制”的编制方式，应该隶属“第一军”。“绝对”可靠的情报说，中国军队的第一军此刻驻扎在中国的腹地青海省，一兵一卒也没派到几千公里以外的朝鲜来。那么，“是北朝鲜士兵谎称自己是中国人，还是零散的中国志愿人员进入了朝鲜？”美军最初是这样判断的：“估计数量不会超过一千人。”因为联合国军无论如何也想不出中国军队在这个时候参战的任何可以解释的理由。于是，就在中国军队已经正式打响抗美援朝战争的时候，美军第一军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进至博川。下午四时，军长弗兰克·米尔本下达的命令是：向北追击！

但是，到了二十五日下午，各处的战报不断传来，直到天黑的时候，麦克阿瑟仍无法在混乱的战报中理出个头绪来。

无论如何，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五日发生在朝鲜半岛北部的战斗，对于联合国军来讲，是战争历史中一场悲剧的开幕。

美国国防部长马歇尔事后沉重地说："我们认为什么都知道，而实际上什么也不知道。然而，对方却一切都知道。于是，战争开始了。"

## 右翼的崩溃

十月二十六日，对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来讲，发生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灾难。

灾难是自己造成的：东线的第四十二军一二四师三七〇团的一个运输队，负责给坚守在前沿的二营运送弹药和干粮，结果在北朝鲜的大山中迷了路。在寻找二营的阵地时，他们看见一个山沟里有座茅屋，茅屋里有灯光，于是就在没有判断敌我的情况下上前问路。在茅屋中休息的是三十多名南朝鲜士兵，而志愿军运输队仅有十多个人和五支步枪。在短暂的交火之后，运输队的士兵全部被俘。

发现中国军队的消息使美军东线指挥官阿尔蒙德大吃一惊，他立即把这些中国士兵用飞机送往东京交给麦克阿瑟审问。之后，麦克阿瑟又把这些中国士兵送往了美国。

更多的关于中国军队参战的情报被汇集起来送往远东司令部，情报中包括沃克的第八集团军一个接着一个的报告，说他们不断地证实自己的部队已经与中国军队接触，其最大的兵力为师级。结论是："一个新的对手已经确凿无疑地参战了。"

但是，麦克阿瑟还是不相信。他的情报处长威洛比以其固执的性格和严重的判断失误在后来的朝鲜战争中备受抨击。威洛比于二十七日作出的补充情报中依旧持以下结论：

应该认识到，大部分中国军队都没有与一个主要的军事强国进行实际战斗的有效经验。此外，他们的训练也像原来的北朝鲜军队一样，由于缺乏统一的装备和弹药供应无保障而大受阻碍。

……

从战术的观点上看，由于节节胜利的美军师全面投入战斗，因此，进行干预的黄金机会看来早已过去；如果中国计划采取这一行动，很难设想会把它推迟到北朝鲜军队的残部气数已尽的时候。

从纯军事角度上讲，威洛比对中国军队是否参战的判断，是有其道理的，因为他所看到的关于被俘的中国士兵的描写是这样的：

所有的人都没有任何正式标记，尽管其中几人用墨水在他们的军上衣里面写了他们的姓名和部队番号。他们的常服里塞满了棉花，通常是深黄色，与朝鲜的荒山秃岭颜色相仿。军官服装的不同之处仅仅是在裤线、上衣左面、领口周围和袖口有红饰线。棉军装在干燥天气中十分暖和，但浸水后却无法使之干燥。在棉衣里面，中国人穿的是夏季军装和他们碰巧穿上的任何衣服。布鞋没有鞋带，鞋底是橡胶做的。大部分步兵装备着日式步枪，显然是二次大战结束时在满洲缴获的。然而迫击炮和轻机枪却是美国造的，是从中国国民党人那里缴获的战利品。至少百分之七十的俘虏都是来自中国军队的一个师，即一二四师，他们都说他们曾经与蒋介石打过仗。由于山地关系，中国军队没有装备大炮。

显然，这样的军队敢于和美军作战，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另外，还有一个至今仍令军事专家们反复研究的问题，即中国军队参战的时机。如果中国真的想帮助北朝鲜统一全朝鲜，那么，北朝鲜军队打到釜山或者美军刚刚在仁川登陆时，是中国军队参战的最好时机。因为那时候在朝鲜半岛上的南朝鲜军队和联合国军队都十分脆弱，会在中国军队的突然进攻下立即土崩瓦解。如果是这样，朝鲜战争的历史将重写。但是中国军队没有介入。在联合国军已经占据绝对

主动地位时投入军队，无异于往虎口中送食，没有人相信精明的中国领导人会犯这样的军事常识上的错误。

至于中国领导人为什么决定在这个时候参战，仅仅从军事上解释是不够的，这一点很久以后联合国军方面才隐约悟出了一点儿头绪，而那是两年以后战争双方已经坐在板门店的谈判桌旁时的事了。

威洛比说，由于地理、历史和政治上的缘故，战场上出现少数中国的志愿人员不足奇怪，其人数不会超过五千人。

在威洛比下这个结论的时候，已经与南朝鲜军交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依照彭德怀的命令，正向依旧分路北进的联合国军包围而来，其兵力总数已达二十五万人。

第三十八、第三十九和第四十军，分别向熙川、云山方向前进。二十七日，南朝鲜第六师主力和第一师，为增援远离主力的七团，向温井方向移动，与志愿军在温井以东、以南地区形成对峙局面。由于第三十八军距熙川尚有六十公里，彭德怀再次改变攻打熙川的原定计划，命令第四十军围歼温井地区的南朝鲜军，诱导熙川、云山、球场的南朝鲜军增援，然后用第三十九、第三十八军打援，同时抽调第四十军一一八师撤出已经占领的温井掉头向北，配合第五十军一四八师歼灭已经到达中朝边境的南朝鲜第六师七团。

第四十军一一九师首先在立石洞歼灭了南朝鲜第六师十九团的一个营。这是一次小规模的歼灭战，被兵力处于绝对优势的中国军队包围在一条山沟里的南朝鲜士兵四处突围，他们在一处只有一个营部阻击的部位几乎突围出去，但突破口即刻又被重新封堵。结果是，南朝鲜军队的这个营大部分士兵被打死，两百三十名士兵被俘虏。同时，在龟头洞方向，一二〇师包围了南朝鲜第八师十团的一营、三营和第六师十九团的一个营。在一块小小的盆地里，经过五个小时的战斗，

南朝鲜军队被打散，除伤亡外，三十名士兵被俘。当这些俘虏后来听到“你们愿意上哪儿就上哪儿”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他们的上司说过共产军是杀害俘虏的。

在另一条山沟里，中国士兵包围了大约一个连的南朝鲜士兵。一个被俘的南朝鲜军营长害怕中国士兵杀他，用自己的怀表和钞票向中国士兵行贿，遭到了拒绝。当时的北朝鲜币一元钱可以买到三只母鸡或者几脸盆煮熟的板栗。中国士兵的行为感动了这个南朝鲜军官，于是由他喊话，八十多名藏在山沟里的南朝鲜士兵出来投降了。举着枪走出来投降的南朝鲜士兵喊着一句话，中国士兵没有人能听懂。后来翻译对士兵们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共产军万岁！这支拒绝贿赂的中国连队，是第四十军一二〇师三五八团五连，也就是毛泽东在中国解放战争时期曾经嘉奖过的在盛产苹果的锦州郊区不吃群众苹果的那支部队。

温井地区的歼灭战，中国军队缴获甚丰，除七百多名俘虏外，还有大量的汽车和火炮。但是，由于志愿军中会开汽车的人不多，缴获的汽车大多停在路上，它们大都很快被美军飞机炸毁了。

在所有缴获的物资中，有一辆装满电影胶片的汽车，躺在汽车边的一具尸体的臂章上有这样的字样：

**政工 大韩民国太阳映画社 制造部部长韩昌夔 九月三十日签发**

美国随军记者当时这样报道：“次日清晨，中国人沿公路直捣温井，驱逐和击溃了韩国剩余的守备部队。当韩国的另一个团赶来救援时，也与为数众多的中国人相遇，并丢弃了该团所有的车辆和炮兵连。”

温井的战斗正在进行的时候，南朝鲜第六师七团的美军顾问弗莱明率领一个加强排自古场出发，进入了位于中朝边境的楚山镇。他看见一些零散的北朝鲜士兵正通过鸭绿江上的一座浮桥往中国东北境内撤退。弗莱明命令机枪向中国境内扫射。弗莱明的心情是激动的，因为他可能是美军中第一个看见鸭绿江的人。他甚至走到江面上，在白雪覆盖的冰面上散了一会儿步，他想要记住这个时刻。最后，他留下一个战斗小组，然后回到古场，召开七团的军官会议，计划明天全团进入楚山。

就在这时，弗莱明接到师指挥所发来的电报，电报命令七团立即撤退。电报还告诉他，二团已在温井被击溃。这个消息令弗莱明大吃一惊。七团作为南朝鲜第六师的前锋，在向鸭绿江推进的行动中可谓出尽风头，其速度之快得到一片赞扬之声。现在弗莱明手里还有一份印有东京报纸大标题的电传：国军前锋已到达鸭绿江，炮兵已向中国境内试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二团被什么部队击溃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七团的后方在哪里，是不是已经成为孤军了？弗莱明顿时一身冷汗。七团已经没有汽油和弹药了，于是，弗莱明回电：如果不补充足够的汽油、食品和弹药，七团就无法移动。

当南朝鲜第六师七团在距离中朝边境几公里远的地方等待空投的时候，中国第四十军一一八师以其三五三团为前锋正徒步向他们急促包围过来。这个刚刚打完出国第一仗的部队，现在掉头朝中朝国境线方向突进，官兵们忍受着寒冷、疲劳和饥饿，在海拔两千多米的山林中开始了昼夜兼程的急行军。就在南朝鲜军等待空投的两天中，中国士兵走了近三百公里的崎岖山路，于二十八日到达龙谷洞以南地区。

二十八日中午，七团终于看到了给他们运送补充物资的四架运输机。运输机空投下四十五桶汽油和两百发炮弹以及其他的物资。在给车辆加油之后，下午，七团开始撤退，目标龙谷洞。

三五三团团长黄德懋亲自在龙谷洞选了一片扼守公路的有利地形，然后命令部队构筑野战工事。由于这里距离中国不远，北朝鲜的老百姓对志愿军格外热情，妇女们送来的热饭让中国士兵们感动不已。甚至有一支撤退到这里的北朝鲜炮兵连用牛把仅有的几门炮拖来要求参战。

二十九日上午八时，南朝鲜第六师给七团发来电报："你团已显然处于危险状态，望尽最大努力争取突围成功。"

九时，七团的先头部队二营进入了三五三团的阵地。在突然而猛烈的射击下，二营即刻乱了队形。尽管有四架美军F-51战斗机的支援，南朝鲜第六师七团面临的崩溃局面仍是不可挽回。十二时，师长金钟五终于发来一封"令人心碎"的电报："除能携带的作战装备外，其余装备均予以破坏和烧毁，并到桧木洞集结。"这封电报的实际意思是：不管用什么方式，只要逃出来就行。

接近中午的时候，战场突然寂静了。

寂静的出现令南朝鲜士兵十分不安，但他们已经没有时间猜测和判断了，他们不得不开始急切的行军——继续向南撤退。但是，天一黑，他们的末日来临了。

下弦月清冷的微光照在残雪上。突然间，满山遍野响起了中国军队的军号声。在中国军队突然发起的夜袭下，南朝鲜军队无法组织起有效的作战行动，成百上千的士兵在夜色中惊恐地四处逃散。由于这些南朝鲜士兵如此的接近中国的边境，因此中国士兵心头的仇恨格外强烈，他们奋不顾身地在月光下追击着南朝鲜士兵，呐喊声响彻山谷。

《韩国战争史》是这样记载这场战斗的：

一到子夜，中共军吹喇叭敲锣打鼓，集中大批兵力进击第二营和第三营防守的阵地正面，企图通过强袭突破进行分割包围。两个营的全体官兵决心阻止和消灭该敌。但因敌持续以大兵力实施集中攻击，经两小时激战，我军阵地有几处被突破。两个营不得不撤往丰场方向。中共军乘胜追击，二时已逼近丰场。

在丰场，第一营为了尽力掩护前方两个营后撤，并争取时间整编，将李大榕上尉指挥的第一连配置在道路右侧洼地，将第二连和第三连配置在道路左侧的两条棱线上，然后集中所有火力阻敌前进。经约一小时短兵相接，最后因寡不敌众，第一营被击溃，丰场终于被突破……如上所述，我军在中共军采用人海战术进行作战的最险恶的情况下，为了消灭敌人，宁死不屈，英勇献身。在我军的威力面前，中共军不顾伤亡，连续蜂拥猛进。随着时间的推移，战况对我越来越不利，大部队的集结行动受到很大限制。值此，第七团团长林富泽上校，为使部队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最后战胜这一危机，断然下令："各部队竭尽全力分头突围，到球场洞集结。"

所谓"人海战术"是南朝鲜军队惊慌中的错觉。从双方的兵力上看，这场战斗基本上是一个团对一个团。而且，中国军队没有炮兵的支援，更没有空中的支援。

据联合国军方面统计，这次战斗，南朝鲜第六师七团损失了所有的重装备，全团三千五百五十二名官兵中，只有八百七十五人逃了回来，其他军官和士兵、包括美军顾问们则非战死即被俘。

弗莱明是这场战斗中唯一活下来的美军顾问。他被俘时浑身已有十五处中弹。这位一九四二年从珍珠港入伍、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九日来到朝鲜的美军少校，在朝鲜战场上当了四十天顾问后，躺在冰冷的雪地上已是奄奄一息。这时，那条中朝边境上冰封的美丽大江在他的脑海中已经模糊不清，他对中国军队的翻译说，他很想念他在美国的妻子和他那座有一百八十英亩土地的农场，并且声明他上过大学是个文明人。三年后的一九五三年秋天，作为交换的战俘，弗莱明回到了美国。

志愿军第三十八军出师不利。按照原来的部署，这个军渡江后在江界集训三个月，作为志愿军的战役预备队，等待改换装备后再投入作战。谁知道刚一入朝，彭德怀就命令他们立即向熙川方向开进。匆

忙前进的部队在狭窄的公路上与撤退下来的北朝鲜军队和政府机关的车辆挤在一起。军部与各师的联络因此中断。而更令军长梁兴初恼火的是，军司令部的一辆车翻了，包括作战科长在内的司令部人员非死即伤。还没有见到敌人就出现严重的伤亡，这也许不是一个好征兆。这时，彭德怀打来电报，命令第三十八军配属第四十二军一二五师迅速集结于熙川以北，准备歼灭南朝鲜第八师。军司令部立即起草了作战计划：一一三师担任主攻，一一二师迂回熙川以东切断敌人退路，一一四师为预备队。可是，一一三师怎么都联系不上。这时，一一二师发来的一封电报令军指挥部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熙川发现一个美军黑人团。

这个情报与志愿军司令部通报的"熙川只有南朝鲜军队一个营"相差太远。第三十八军的指挥员谨慎起来，直到二十九日才对熙川发起进攻。结果，除了在熙川外围俘虏一百多名南朝鲜士兵外，攻入熙川城的时候城内空无一人，南朝鲜第八师已经在几个小时前逃走了。而情况证明熙川根本不存在一个美军黑人团。

第三十八军的贻误使彭德怀"首歼熙川之敌"的计划落空了。

熙川之战本是第三十八军这支在中国军队中享有盛誉的部队在朝鲜战争中的第一仗，战机的贻误给这支部队的历史留下了说不尽的遗憾。

在中国军队的突然打击下，首当其冲的南朝鲜第六师在最初的三天内，二团、七团、十九团以及南朝鲜第八师的十团都遭受了致命的损失。

美第八集团军的右翼就这样崩溃了。

而此时，美第八集团军的左翼依旧在北进。

麦克阿瑟在中国军队已经参战，并在其右翼撕开战役缝隙的时候，仍然下达继续向北进攻的命令，除开对情报的误判之外，沿着西海岸北进的美军第二十四师几乎没有受到阻击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中国军队入朝参战的最初几天，沿西海岸公路向南的中国军队推进的速度十分缓慢。虽然美第八集团军的右翼由于南朝鲜第六师的惨重失利而失去了保护，可是沿着西海岸长驱直入的美军还是到达了距离中朝边境上的新义州仅八十公里的地方。由此，中国军队与美军的实际战线已经交错在一起，志愿军必须在其侧后存在着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作战了。

第二十四师是最早进入朝鲜的美军部队，曾经在北朝鲜人民军的凌厉攻势下损失巨大。在补充之后，现在他依旧可以于西海岸走在最前面。其先头部队是英军第二十七旅。三十日，英军第二十七旅占领定州。这个旅自二十一日从平壤出发，一直担任着前卫任务。到达定州的时候，旅长考德突然命令部队停止前进，他要求换班，也就是说，该让美国人走在前面了，理由是他的士兵在连续不断的行军和对付北朝鲜散兵骚扰的九天中，“精神和体力都到达极限了”。考德提出这个要求后，命令部队在定州宿营。他对他的下属军官们说，等美军一接班，第二十七旅的任务就算完成了，“没有人对到鸭绿江边闲逛感兴趣”。

就在这个时候，在帐篷里熟睡的澳洲营营长格林中校被强烈的爆炸声惊醒了。北朝鲜军队的炮兵开始扰乱射击，结果有六发炮弹落在澳洲营营部，其中的一发在格林中校的帐篷旁边爆炸了。炸成重伤的格林被送往安州的美军医院，三天后死亡。格林是朝鲜战场上除美军之外第一个死亡的联合国军参战国的军官。

第二十四师师长丘奇将军立即命令二十一团越过英军第二十七旅连夜向北推进。二十一团的美国兵在很亮的月色下听见了前面北朝鲜

军队的坦克向后撤退的轰鸣声。二十一团一营，是在史密斯营长的带领下最早踏上朝鲜国土的部队，也是在乌山一战中最先狼狈逃窜的部队。在丘奇师长的命令下，这回它又走在了向北进军的二十一团的最前面。十一月一日十二时，史密斯到达距新义州三十公里的停车洞。当他准备到鸭绿江边看一看的时候，丘奇师长的命令又一次到达：立即停止前进，就地构筑纵深防御阵地。

在有关朝鲜战争的浩瀚史料中，关于史密斯中校接到这一命令后的表情居然有着详细的描述：史密斯当时"哑然失笑"。没人能准确地理解这位美军中校的笑容，只有他自己才能仔细体味。自从仁川登陆以后，作为军人，第一个到达鸭绿江的荣誉肯定会抵消在乌山失败的耻辱，而目前好不容易"一切顺利"，眼看就要以他在鸭绿江边的照片为标志结束这场战争了，眼前的命令却是让他"停止前进"，史密斯营长对这个命令有了充满幽默的反应也就不足为奇了。

接到命令的时候，北朝鲜坦克开始炮击了。配属给史密斯的美军坦克六营的杰克连长亲自驾驶一辆坦克率领美军还击。北朝鲜的七辆T-34坦克在三百米的距离外齐射，坦克炮弹喷出的橘黄色火球一个个飞向月光下轮廓清晰的美制"潘兴"式坦克。于是，在距离中国边境很近的这个名叫停车洞的地方，朝鲜战争中最大规模的坦克战开始了。所谓最大规模，实际上仅仅是北朝鲜军队的七辆坦克对美军的十多辆坦克，结果是北朝鲜的五辆坦克被击毁。

与此同时，占领龟城的美第二十四师五团接到从通信飞机上投下的信筒，里面的命令是：停止前进，就地待命。在回应了同样"哑然失笑"的理解后，晚上，五团与史密斯的部队一起向后转了。他们不知道，此刻他们的身后已经埋伏着一个巨大的灾难，他们缓慢的行军就要变成疯狂的奔逃了。

三十日，南朝鲜第一师师长白善烨在他设在云山城内的指挥部里感到了一丝不祥。此时他实际上已经是军长了，因为任命他为南朝鲜第二军军长的命令已于二十四日下达，但随后战局的突变又恢复了他第一师师长的职务。应该说，是中国军队的参战令他在军长的位置上仅坐了一天。他曾是满洲国军队里的一名中尉情报官，在热河地区跟中国的抗日武装打过仗，是个“中国通”。他对中国共产党军队的了解，是他此刻感到不祥的根本原因。第一师连续遭受的损失和面临的强劲阻击，令他本能地感到他遇到的肯定是中国军队。他收到的战场报告中这样写道：“敌人在云山四周急促地前进，他们的队伍在山脊上移动时，看上去好像整个山都在运动。”二十九日，白善烨命令第一师向云山的西北方向进攻，结果除了伤亡之外没有任何进展。他的下属报告说：“敌人通过巧妙伪装的深堑进行极其顽强的抵抗，十五团和十二团主攻的高地一夜间变成了蜂窝一样的要塞。尽管遭到反复的炮击和轰炸，敌人仍然毫无畏惧，我们的士兵每逼近一步，都有下雨般的手榴弹劈头盖脸地抛来。”

顽强的阻击，巧妙的伪装，天才的土工作业和大量的手榴弹，不是中国军队还能是什么人?

白善烨对美第一军军长米尔本报告说：“在云山周围，全是中国的正规军。总之，有很多兵力。”

云山被包围了。

白善烨盼望的是美军增援部队快些赶来。

对于美骑兵第一师的官兵们来讲，他们的目标云山可不是什么好地方。

就在第八集团军右翼崩溃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的时候，沃克将军沉不住气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夺回温井的可能性愈加渺茫，而熙川也出现了据说是大量的中国军队，云山更是在数量巨大的敌人的三面包围之中，尽管南朝鲜第一师多次突击，企图打开局面，但成效不大。在沃克看来，再这样下去，战机就会白白地消失，他的第八集团军将无所作为。沃克下了决心，他指示米尔本军长，把在平壤执行守备任务的美骑兵第一师调往局势最扑朔迷离的云山方向，任务是超越南朝鲜第一师，打开北进的局面。

骑兵第一师官兵撤回东京的梦想被这个短短的命令粉碎了。他们在向北开进的时候，心情极其不佳——“暗云低垂下遍地岩石的山脉，像可怕的影子一样浮现在如血的夕阳之中。”

三十日，骑兵第一师到达龙山洞，并决定由八团前往云山，任务是“超越韩国第一师，向朔州附近突进”。第八集团军骑兵处处长在八团出发时提醒了他们一句：“在云山附近采取进攻行动的很可能是中国军队。”可惜的是，包括团长帕尔马在内的所有军官并没有在意，原因是他们“没有摆脱一般的潮流——中国决不会在这个无可奈何的时候介入战争”。

三十日下午，八团到达云山，云山的景象令他们顿时胆战心惊：山岭上燃烧着熊熊大火，黑色的浓烟遮天蔽日。南朝鲜士兵说，是中国军队放的火，目的是防空。

中美两军历史上的第一次战斗已经不可避免。

美国军方对中国军队是否会介入朝鲜战争，一直有一种难以描述的矛盾心情。第八集团军的一位参谋人员事后回忆说：“八团有这样一种倾向，与其说是对这个情报有怀疑，不如说是不愿意相信。”

截止到三十日，中国第三十八、第四十军的六个师已经集结在准备夺取清川江至军隅里一线地区，第三十九军已经完成对云山的包围；在西海岸集结的第五十、第六十六军正在等待着美军第二十四师。中美两军都采用的是右翼守势、左翼攻势的战法。从军事上讲，这是“勇者胜”的阵势，也就是说，谁更早更多地感到后方受到威胁，谁就注定会一败千里。

由此可知，彭德怀在入朝第一天就建议第五十、第六十六军迅速跟进入朝，用这两个军的十万兵力沿西海岸稳步推进的奥秘所在了。

沃克的第八集团军的后方此时所面临的灾难，远不是一个美军骑兵第一师能够拯救的。

命令美军骑兵第一师向北增援，事后成为沃克最后悔的决策之一。

## 云山：中美士兵的首次肉搏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一日，云山城的早晨笼罩在浓重的雾气之中。中国第三十九军一一六师师长汪洋在前哨观察所里万分焦灼，因为在校对好攻击前进的地形和炮兵支援步兵的方案之后，浓重的晨雾令他无法观察到云山城内的情况。中国军队没有侦察飞机，前沿的肉眼观察对指挥员来讲至关重要。晨雾一直到将近十时才淡下去，眼前敌人的一切动向逐渐清晰。

下午，汪洋骤然紧张起来。通过观察发现，云山东北方向敌人的坦克、汽车和步兵开始向后移动，云山城附近的敌人也开始频繁往来。同时，右翼前沿的观察所也报告，他们发现正面的敌人背起了背包，乘坐汽车开始向后开动。

汪洋的第一个反应是：云山的敌人已经察觉三面被围，要逃跑。

汪洋看看手表，十六时整，距离原定的进攻时间还有三个多小时，如果不立即进攻，战机就会失去，这位中国师长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

这是朝鲜战争战局将要发生重要转折的一天。

联合国军的右翼已被击溃，沃克虽然调整了部署，渡过清川江的兵力有所增加，但继续北进的各部队实际上仍处于分散状态。

而彭德怀敏锐地意识到，志愿军刚入朝时的混乱局面已经结束，各军目前都已到达指定位置，现在，志愿军可以集中起十至十二个师共十五万兵力作战，兵力的优势必将迎来制胜的战机。彭德怀决心给联合国军以巨大打击的战役计划是：在敌人已经破碎的右翼突进，正面进攻配合纵深迂回，割断联合国军的南北联系，将敌人歼灭在清川江以北地区。

三十日晚，毛泽东为此发来电报：

彭邓并告高：

（一） 庆祝你们歼灭伪八师四个营的胜利。（二）你们三十日九时的部署是很好的。我方对敌人数量、位置、战斗力和士气等项均已明了，我军已全部到齐展开，士气高涨，而敌人对我方情况则至今不明了（只模糊地知道我军有四万至六万人）。因此，你们以全部歼灭当面敌人伪一师、伪七师、英二十七旅、美二十四师及美骑一师一部及伪六师、伪八师残部为目标是完全正确的。只要我三十八军及四十二军一个师能确实切断敌人清川江后路，其他各军师能勇敢穿插至各部分敌人的侧后，实行分割敌人而各个歼灭之，则胜利必能取得。（三）在大作战时请注意使用六十六军，以厚兵力。

毛泽东

十月三十日二十时

三十一日上午九时，志愿军总部下达作战命令：第三十八军迅速歼灭球场之敌，而后沿清川江东岸向院里、军隅里、新安州方向突击，切断敌人退路；第四十二军一二五师向德川突击，占领该地阻敌增援；第四十军迅速突破当面之敌，于一日晚包围宁边南朝鲜第一师并相机歼灭之，得手后向灯山洞突击，切断美骑兵第一师的退路，另留一部于上九里洞地区防云山之敌逃窜；第三十九军于一日晚攻歼云山之敌，得手后向龙山洞地区突击，协同第四十军围歼美骑兵第一师；第六十六军以一部于龟城以西钳制美第二十四师，另一部阻敌运输增援，军主力从敌侧后突击美第二十四师。

从毛泽东的电报和志愿军总部的命令上看，此战役决定性的要点是：第三十八军必须穿插到位。毛泽东和彭德怀都对第三十八军寄予了厚望。现在，第三十八军的进攻已经开始，在打下苏民里后，正向球场方向前进。彭德怀特别嘱咐云山正面的第三十九军，要等第三十八军接近指定位置后，再开始对云山的攻击，而不能在敌人的后路没有被切断时让机械化很强的敌人跑掉。

可是，在没有遭到攻击的时候，云山之敌已经有了逃跑的迹象。

第三十九军军长吴信泉不得不决定把攻击的时间提前至十七时。

彭德怀同意了。

云山正面已经蓄势已久的中国大部队就要席卷小小的云山城了，而彭德怀全部歼灭敌人的战役企图，就取决于右翼横向向西穿插的第三十八军前进的速度了。

事后才知道，一一六师师长汪洋所发现的云山正面的联合国军并不是在撤退，而是南朝鲜第一师的部队正在与美军骑兵第一师八团进行换防。换防之后，在中国军队发起攻击的瞬间，骑兵第一师八团就

位于最前沿了，这一点中国第三十九军的官兵并不知道，攻击开始以后，他们依然认为对方是南朝鲜第一师的部队。

第三十九军心急如火的炮火准备，于十一月一日下午十六时四十分开始。五颜六色的信号弹在黄昏的天色中腾空而起，各种火器发出的声音震荡着云山山谷。

紧跟在炮火之后，步兵开始向云山发起冲击。

在肃清云山外围小高地的战斗中，南朝鲜军队的防线很快被突破。美第一骑兵师八团团长约翰逊上校看见了退下来的南朝鲜士兵，后来他是这样描述的："他们是泥塑的部队，完全是一种精神恍惚的状态，对于我的吉普车、对于附近时而发生的枪声全不在意，全无表情，同我在巴丹见到的投降之前的美国兵一个样。"

根据美军战史记载，中国军队的炮火十分猛烈，一检查弹道，发现是二战中曾在斯大林格勒让德军胆战心惊的八十二毫米"喀秋莎"火炮。这种武器的出现，意味着进攻的军队不是一般的军队，约翰逊团长这才意识到问题严重了。中国军队几乎看不出队形的攻击人流在各个方向上时隐时现，瞬间便冲到了美军跟前。三四七团的一个叫张生的士兵在部队受到机枪阻击停止前进时，绕到这个机枪阵地的后面，他没有用枪，而是抱住美军的机枪手一起滚下了山崖。——类似的情景在云山四周漆黑的山冈上到处发生，云山外围的一个个高地随之被突破，美军士兵们在他们听不明白的呐喊声中不断地死伤。诺曼·艾伦上尉惊恐地说："谁要敢说那不是中国人，这个人肯定是疯了！"

在肃清云山外围的战斗中，第三十九军三四八团二营的官兵创造了一项朝鲜战争中的纪录。他们沿着三滩川东岸向云山方向攻击，一班副班长李连华在炮弹爆炸的火光中发现前面不远处有四个房屋大小的物体。李连华战前曾到这里侦察过，这里原是一片开阔地。他谨慎

地向前摸过去才看清楚，这里居然有四架飞机！原来这个开阔地成了美军的临时机场！守卫机场的美国士兵立即与中国士兵短兵相接，战斗中一班伤亡严重，仅剩下李连华和另外一名战士。这两名中国士兵固执顽强地向飞机接近，两个人虽都已负伤但始终没有倒下，直到把最后一个抵抗的美国兵从一架飞机的座舱里拖出来。中国士兵占领这个临时机场后，立即用人力企图把沉重的飞机推到隐蔽的地方藏起来，但是推不动，于是就用大量的玉米秸把四架飞机遮盖起来。

后来得知，这是一架炮兵校射机和三架轻型飞机，是在日本的美军远东总部派来的，它们于这天下午从东京机场起飞，飞机上乘坐的是前来采访美军骑兵第一师的记者。记者们没有来得及采访就遇到了战斗，紧急起飞没有成功，原因是飞机被中国士兵包围了。中国士兵依靠他们手里的步枪和刺刀缴获了四架美军飞机。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唯一的一次缴获了美军的飞机。

天亮以后，被中国士兵藏在玉米秸下的四架飞机，被八架美军“野马”式轰炸机发射的火箭击中烧毁。

半夜时分，志愿军的一支分队到达云山以南十五公里的公路口，截住了一队从云山逃出的美军坦克车队。在惨烈的混战中，中国士兵赵顺山、于世雄和田有福各自与美军士兵扭打在一起。“那个美国兵很高，很胖，搞不清他是司机、军官，还是机枪兵。”赵顺山回忆道。无法知道第一次与一个外国人进行肉搏的赵顺山在殊死的战斗中是什么感觉，就在脸对脸的瞬间，在火光激烈的抖动中，赵顺山看见“他的眼珠是黄绿色的”。扭打中，美国兵掏出了手枪，可赵顺山腾不出手来制止，他大声喊：“于世雄！快帮我把这家伙的手枪抢过来！”于世雄腾出一只手打掉了那个美国兵的手枪。就在这时，与于世雄抱在一起的那个美国兵掏出手枪向他的腹部开了一枪。愤怒之极的赵顺山发现了美国人身上插着的洋镐，于是他拔出来，向被自己压在身下的美国兵

的头上砸下去。在美国兵惨厉的叫声中，于世雄身上的那个美国人崩溃了，他愣愣地站起来，双手抱头就跑，但是已经受伤的于世雄紧紧抱住了他的腿。赵顺山说:“我的动作更快，八寸长的洋镐已经举起来，敌人用两手抱住脑袋也救不了他。我的洋镐穿过他的手背，整个刨进他的脑袋里。”

恶战结束了。于世雄和田有福都躺在工事旁边，他们已经昏迷。赵顺山回忆道:“我跪在于世雄身边，他的左手还紧紧地握着敌人的手枪，牙齿咬得紧紧的。我擦着他身上的血迹，在他的肚子上找到手枪弹的伤口。我心里非常难过，他是为我受伤的。田有福躺在于世雄旁边，他的右腿断了，整个裤腿已经被鲜血染红。他是在肉搏战开始前负伤的，可是当敌人扑上来时，他仍然用仅有的一条腿跪着抱住敌人，一直拖到我刨死敌人为止。”

这时，云山城内已经陷入混乱。冲入城内的第三十九军一一六师三四六团的先头部队四连到达了公路大桥，守桥的是美骑兵第一师八团三营M连。“一个连的士兵纵队沿着通往龙山洞的干道严肃而整齐地接近南桥面。警戒该桥的美军士兵可能认为他们是南朝鲜军队，没有查问就让通过了，因为他们是堂堂正正、十分肃静地走过来的。”美军战史记述道，“纵队通过桥以后一直在干道上北进，不久接近了营部。突然间，他们吹起了军号，开始一齐向营部袭击。”四连的军事行动如同是在舞台上演出，除了胆大包天之外，中国士兵的机智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据中国第三十九军史料记载，他们在通过公路大桥的时候，甚至“还和美军握了一下手”。骑兵第一师八团三营营部立即混乱起来，中国士兵成扇面队形展开，营部周围一片白刃战的格斗声。

此战，美军战史详细描绘道:

三营的军官们意识到，通向南方的道路已被中国军队控制，遂决定从陆路撤退。他们将车辆一辆接一辆地排好，精疲力尽的士兵睡在卡车的驾驶室里、车厢上和散兵坑里，等候撤

退的命令。但一个连的中国士兵偷偷越过了警戒线——哨兵把他们当成韩国军队了——突然间，军号声响彻寂静的夜空。一个士兵后来报告说："有人唤醒我，问我是否听见一群马在奔跑……接着传来军号的滴答声，但离得很远。接着有人吹响了哨子。几分钟后，我们这里就打成了一片火海。"……一群模糊不清的人影仿佛从天而降，并立即向他们发现的任何人开枪和拼刺。

中国军队的手榴弹把罗伯特·奥蒙德营长炸成重伤，他和麦卡比上尉一起逃出营部。一颗子弹打飞了麦卡比的钢盔，几秒钟后，又一颗子弹钻进了他的肩胛骨。由于失血过多，麦卡比躺在路边不能动了。但是，接下来发生的却是令这个美军上尉奇怪和幸运的事情：几个中国士兵用刺刀指着他，但却没有刺他，甚至没有缴他的枪，只是互相说着什么。麦卡比用手指了指南边，中国士兵掉头就走了。麦卡比上尉活了下来。他至今说不清自己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他认为那几个围着他的中国士兵互相说的话是在商量什么，商量的结果是他不怎么像敌人。而奥蒙德营长在"受伤几个小时后便死去了"。

天亮以后，美军轰炸机轮番飞临云山公路大桥上空，对这个被中国军队占领的交通要道进行了猛烈轰炸。美骑兵第一师八团三营这才有机会清点人数，但死亡的人数已经无法点清，光在由三辆坦克构成的小小环形阵地里就躺着一百七十名伤员。

最先冲入云山街头的中国军队的一个先头班，只剩下四个人还没有负伤。他们两人一组，沿着街道搜索，但是被一辆美军坦克封锁住了前进的道路。坦克上的重机枪火力使后面跟进的中国官兵受到伤亡，先头班班长赵子林火了。他爬到一间小商店旁边，从与美军坦克对射的友邻部队那里弄到一根爆破筒，赵子林攥着爆破筒向那辆坦克爬去。美军坦克掩护着几辆满载美军士兵的卡车，疯狂地向接近的中国士兵射击。为了掩护赵子林，中国士兵拼死与美军纠缠。赵子林终于接近了坦克。坦克履带碾压的声音很大，震得街道的地面剧烈地颤抖。突然，赵子林在坦克的正面站了起来，一直到坦克开到他眼前的

时候，他拉开了爆破筒的导火线。巨大的爆炸声惊天动地，赵子林最后用力地睁开眼睛，他看见战友们正穿过黑色的硝烟向美军冲去。

云山城的美军开始向南撤退，但是他们的后路已被截断。

中国第三十九军一一五师三四五团的士兵抢占了一个叫诸仁桥的公路路口。这场战斗结束时，几十个美军士兵在猛烈的攻击下举着白旗投降了。他们对翻译说，他们的军官说过，投降有四个条件：一是没有子弹了，二是没有干粮了，三是联络中断了，四是突围不了。他们现在符合投降的所有条件。

十一月二日拂晓，美第八集团军命令全线撤退。位于西海岸的第二十四师接到的命令只有一句话：撤退至清川江一线。这个师的美军官兵们此刻充满着不安的情绪。是苏联军队参战了？还是中国军队把后路切断了？或者是北朝鲜彻底投降使战争结束了？美军官兵在悲喜交织的谣传中忐忑不安——“官兵们抱着失望和被狐狸迷住了一般的情绪，开始了后退。”

电报、电话、侦察机的报告，雪片一样向第八集团军司令部飞来。在大量片断的、悲观的情报中，也混杂着依然持乐观看法的报告，它们给沃克的参谋们造成了判断上的灾难。美军战史在描述当时的气氛时写道：“这是终日歇斯底里、狂热工作而效果最差的一天，也是发生了若干错误的一天……一个接一个的朝令夕改的命令，流水般地不停地发出……”

这时，美骑兵第一师五团从博川方向急促增援而来，但是当他们行至云山以南龙城洞至龙头洞之间的公路附近时，受到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阻击的部队是中国第三十九军一一五师三四三团。美军动用坦克和重炮发起猛烈的轰击，美军飞机洒下倾盆大雨一样的汽油，然后发射出燃烧弹，中国军队的阻击阵地顿时成为一片火海。阻击异常

艰苦。在三四三团三连的阵地上，天上是美军几十架战斗机在扫射，地面上是一波又一波的坦克配属步兵的冲击，原来林木茂密的阵地已经变成了一片焦土。三连全连一百六十人，打到最后只剩下几十人。在残酷的战斗中，当美军坦克的履带声在火海中再次响起来的时候，一位副营长逃跑了。但是，这个营没有牺牲的所有的士兵依然在暴烈的枪炮中坚守阵地。在美军士兵距离阻击阵地前沿仅有二十米的时候，大火中的中国士兵又一次站起来，他们端着刺刀开始了残酷的肉搏战。

美军不明白中国士兵为什么烧不死。其实中国士兵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在阻击阵地上挖防火沟。农民出身的中国士兵对挖沟的工作不陌生，他们在枪弹横飞之中不停顿地挖沟，把熊熊燃烧的烈火和藏身的工事隔离开来。甚至当战斗将要结束的时候，三四三团的团长走上阵地，看见他的士兵们依旧在疯狂地挖沟！

公路大桥桥头工事里的美军看见一个中国士兵镇静地向他们走过来，美国兵一时间懵了，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怪异的情景。中国士兵李富贵把自己身上准备买一支钢笔的一百万元东北币掏出来，交给他的班长，表示不炸掉这个疯狂扫射的工事他就不回来。他赤脚跳下已经结冰的小河，在河中央他的左肩中弹，疼痛令他流出了眼泪，但他没有停下来。他一直走到美军的工事前，把五颗捆在一起的手榴弹塞了进去。手榴弹爆炸了，一个班的美军士兵连同水泥钢筋一起飞扬起来。血人般的李富贵站在小河中笑了，他刚要抬腿跟随自己的部队追击，却一头栽倒在水里，原来他赤着的脚已经与河水冻在了一起。

夜晚来临了，作为预备队的美骑兵第一师七团派出一个营再次增援，企图解救出正在被中国军队逐渐吃掉的八团。这个营的上尉排长麦克霍恩，后来成为驻日美军陆军司令部情报与作战处长，他回忆

说："看到若无其事走过来的部队认为是韩国军队。可是样子又不像。因而连长就问营长：'有南下的韩国军队吗？'回答说：'不知道。'又问：'那么可以射击吗？'回答说：'再等等。'当察觉的时候，已经被包围了。"美军的惯例是不在夜间进攻，但是这个夜晚对这个营的美军官兵来讲，不进攻比进攻还可怕。美军战史描绘说："整整一夜，高地的四周响起的军号、喇叭、哨子声此起彼伏。中国的少数侦察兵在这个营的四周转来转去，在不合时宜的时间吹奏不合时宜的乐器。第一次与中国军队对阵的官兵，在不了解实情的状态下，整夜不得安宁，被弄得神经过敏。这是一种原始的却是极有效的神经战。因此，美军给这个高地取名为'喇叭高地'。"

在第三十九军围攻云山的时候，第四十军也开始了对宁边的攻击，其一一九师为左路，一二〇师为右路，一一八师随后跟进。部队于石仓洞附近受到猛烈的炮火拦截。一二〇师三五八团八连与一一九师的两个连迅速深入敌后，顺着敌人炮弹出膛的声音寻找了五公里，终于发现了美军的炮兵阵地。他们立即展开攻击并使之瘫痪，俘虏了三十多名美军士兵。这是第四十军的中国士兵第一次看见美国人。"个子高高的，皮肤白白的"，中国士兵惊奇地这么形容他们。

一一九师于曲波院遭遇正在向云山增援的南朝鲜第八师的两个团，中国士兵立即将其包围。南朝鲜军根本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遭遇敌情，猝不及防下被中国军队的突然攻击击溃。中国士兵俘虏了太多的南朝鲜士兵，其中仅六连一个连就抓了两百多人。没有东西给这些俘虏吃，他们就自己把老百姓的白菜拔光了，还把老百姓挂在屋檐下的玉米生吃了。在中国士兵眼里，这是"严重地违反群众纪律"的事件，于是在缴了枪支后，他们把这些俘虏放了。俘虏中有美军骑兵第一师的几个人，中国士兵看着他们奇怪地说："这些骑兵怎么没有马？"

第四十军继续向宁边前进的时候，一二〇师三五八团三营九连走在最前面。在坪洞地区的路边，他们遇到一道蛇腹形铁丝网，上面挂满了茶杯大小的铃铛。在他们想走近看明白的时候，猛烈的射击向他们袭来，连队伤亡巨大。九连遇到的是从泰川撤退下来的美军第二十四师。第四十军是最早在朝鲜战场上打响的志愿军部队，有趣的是他们的对手也是美军最先在朝鲜战场参战的部队。连续十天不间断的战斗令第四十军的士兵已经饥饿不堪，虽然他们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但始终没能冲破美军的阻击，从而失去了包围宁边和切断云山之敌退路的机会，最终使彭德怀的作战计划部分地落空了。

在反复与美军争夺阵地的战斗中，第四十军无意间为中国军队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那就是中国士兵在战斗中缴获了两件他们从没有见过的东西：一件是炮身又长又黑，炮尾呈喇叭状，炮弹上有许多洞的无后坐力炮；另一件是炮身短粗，像只大萝卜似的火箭筒。这两件东西从团交到师，从师交到军，从军交到志愿军总部，谁也没见过。后来被送到中国四川省绵阳的一个军工研究所。很快，这两种武器被仿造出来，迅速装备了中国军队。

此次多条战线上的作战，最让彭德怀不满的是第三十八军。十月三十一日，第三十八军攻占新兴里、苏民里地区，他们在第三十九军打响云山战役的那天才开始向球场方向前进。正如毛泽东在电报中所强调的，第三十八军的进攻路线是从侧面插入美第八集团军右翼的身后，只要进至军隅里、新安州、价川一线，就可以形成对清川江以北敌人的巨大的包围圈。但是，由于在穿插的路上不熟悉道路情况，同时又过于留恋小型的战斗，所以直到十一月二日，第三十八军才赶到预定地域。而这时，美第八集团军因意识到侧翼的威胁已经开始全线撤退了，并与南朝鲜军第一师在宁边东北地区，美第二师在军隅里、价川地区形成互为掩护的态势。第三十八军终于没有达成预期包围敌人的目的。

当彭德怀得知第三十八军没按时到达指定位置断敌退路时，不禁勃然大怒。

云山之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次以劣势装备严重打击了美军的成功战例。这次战斗共歼灭美军骑兵第一师八团的大部分、南朝鲜第一师十二团一部，歼敌两千零四十六人，其中美军一千八百四十人，缴获飞机四架，击毁和缴获坦克二十八辆，缴获汽车一百一十六辆、各种炮一百九十门以及大量的枪支弹药。

云山之战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作为模范战例，被日本陆军自卫队干部学校收入《作战理论入门》一书。该书说："对中国军队来说，云山战役是与美军的初次交战，尽管对美军的战术特点和作战能力并不十分了解，还是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忠实地执行了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对孤立分散的美军集中了绝对优势的兵力进行包围，并积极勇敢地实施了夜间白刃战。"

而美国人的战史记述是："中国人缺乏坦克、空中支援和重型火炮，取而代之，他们利用突然的奇袭来战胜美国人。中国军队的指挥官显示出非凡的能力，他们能够在丝毫不被敌军察觉的情况下，让数量庞大的部队利用夜间行军穿越种种艰险的地形……身穿打着补丁的棉军装的中国士兵在这件事情上胜过任何国家的士兵。他们能够在夜色的掩护下极其秘密地渗透到敌人的阵地中去，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中国士兵在云山战役被俘虏的美军士兵的背囊里，发现他们几乎人人都有几只朝鲜铜碗。后来才明白，这是因为美军士兵听说东方人使用的碗都是用黄金制造的，所以他们一边打仗一边收集着朝鲜铜碗。从这件事上就不难看出，美国人对东方民族的认识是何等幼稚。因此，北朝鲜一个名叫云山的小城，想必是在中国士兵吹响的喇叭声中幸存下来的、如果今天还在世已是白发苍苍的那些美国人永远不会忘记的地方。

## 天黑了，我们还在烟台峰上！

十月三十一日，负责朝鲜战场东线作战的美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亲临位于咸兴的南朝鲜第一军团指挥部，听取军团长金白一少将关于在部队前进的路上有大量中国军队存在的情报分析报告。报告说，可能存在的中国军队是第四十二军的一二四师，他们一周前从满浦镇附近渡过鸭绿江，从那儿开始徒步的夜间行进，迫击炮和弹药由骡马驮运。

为实施向朝鲜东北部北进的目标，阿尔蒙德的作战部署大致是这样的：南朝鲜第一军团沿东海岸公路向东北方向的边界推进；美军第七步兵师在其西南，顺着利原向北的公路到达中朝边境的惠山镇；在美军第七师的西南，是美军第一陆战师，它由咸兴向长津湖方向前进；而后到达的美军第三师负责其后方安全。——“我们这个军零散地分布在这一带相互隔绝的地形上。”连阿尔蒙德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十分糟糕。

当西线不断传来令人沮丧的消息时，阿尔蒙德接到的前方战报是：南朝鲜第一军团三师的先头部队二十六团，在向水洞发动进攻的时候伤亡惨重。

阻击南朝鲜军的就是中国第四十二军一二四师的三七〇团。

美第十军由于元山港海域的扫雷和所属部队指挥官的谨慎，造成其推进速度极其缓慢，这使彭德怀在西线战场打响之后消除了对东线的担心。

中国第四十二军一二四师和一二六师经过艰难的山地行军，于十月二十七日全部到达指定的防御地区。军指挥部的部署是：一二四师三七〇团和三七一团三营占领仓里、一一一五高地、七九六点五高地、草芳岭一线阻击阵地；三七二团和三七一团一营、二营位于下马

岱里、雷洞里为预备队，师部位于富盛里；一二六师以三七六团占领赴战岭、高大山一线阻击阵地，师主力集结于葛田里一线为军预备队。军部位于旧镇。

就在一二四师全部到达指定阵地的这一天，南朝鲜第三师受命接替已经在黄草岭受到重创的首都师，于早上八时开始向朝鲜北部的荒凉山岭推进。下午，一二四师三七〇团接到敌情报告：敌人正向水洞方向移动，目标是七九六点五高地。团指挥员立即命令四连前往阻击。

这时，因为连长带着一个排去寻找北朝鲜部队，四连实际上只剩下两个排的兵力了。夜幕降临，四连的士兵在寒冷的工事中没有睡意。午夜时分，他们听见山下传来脚踩落叶的脚步声。不一会儿，钢盔和刺刀的闪光在月色下出现了。位于前沿的五班在敌人距离阵地仅有十米的时候突然扔出手榴弹，机枪射手朱丕克跃出工事，端着机枪向敌人扫射。南朝鲜士兵在突然的打击下丢下几具尸体立即向山下跑去，眨眼之间消失在月色中。四连的士兵把他们遗弃的美制自动步枪捡了回来，对这种先进的武器感到新奇不已。当一位军官提醒勇敢的机枪手朱丕克，说他刚才打出的子弹太多应注意节省时，士兵们数了数，在南朝鲜士兵的尸体上捡回来的子弹比朱丕克打出去的还多，于是这位军官看着自己的士兵笑了。

后半夜，南朝鲜军队进行了几次偷袭，均未成功。

四连所经历的仅仅是后来黄草岭地区极其残酷的阻击战的开始。

在以后的三天里，三七〇团在南朝鲜第三师二十六团的反复攻击下，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美军飞机像苍蝇一样在中国士兵的头上轰炸扫射，中国士兵可以看得见飞机上白星的标志，甚至可以看见座舱内美军飞行员的面孔。中国军队的阻击阵地上没有任何防空设施，巨大

的爆炸声整日连续不断，灼热的弹片在令人窒息的烟尘中发出尖厉的哨声。支援南朝鲜军队进攻的还有数量巨大的炮群，它们在这个小小的高地上倾泻下密集的炮弹，高地上裸露的岩石在炮弹的爆炸中碎裂，碎片与弹片一样锋利。美军飞机还投下了凝固汽油弹，大火中，中国士兵或在地上滚动或挥舞着树枝互相扑打，以熄灭棉衣上的火焰。南朝鲜军队的进攻规模从一个连逐渐增加到两个营。四连的阵地前挤满了进攻的敌人，中国士兵可以看见身穿皮夹克的美军顾问混杂在南朝鲜士兵中间。

中国士兵的伤亡是严重的，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必需的生理需要。天黑下来以后，敌人的进攻停止了，但被照明弹照得白昼一样的漫长夜晚令中国士兵更加难熬。从团部到各个阻击高地的所有通路均被密集的炮火严密封锁，任何企图向阻击阵地运送物资的行动都没有成功。士兵们还是在进入阵地的那天吃过一顿高粱米饭，至今没有一粒粮食被运到阵地上来。阵地上没有水，有人开始喝尿。毛泽东曾经提出三个问题让志愿军的干部们讨论：能不能打？能不能守？有没有东西吃？至少在黄草岭阻击阵地上，志愿军打了，也守了，但吃的东西却没有了。不要说四连这样的前沿阵地，一二四师全师的粮食也仅剩下三天的储备了。饥饿之外，就是寒冷。这里的气温在夜间已经降至零下，中国士兵们在山野露宿，棉衣早已破烂，手脚开始出现冻伤。野外的寒风中，有士兵在哭泣，原来是他手中的镐根本挖不动坚硬的岩石，整整挖了一夜，手掌被震裂，被炸平的掩体还是没有任何修复的希望。第四十二军的指挥员们焦急万分，但漫长而脆弱的补给线上还是没有好消息。于是他们作出了一个令这场战争显得格外悲壮的决定：军指挥机关人员每人每天只供给四两粮食，二线部队每人每天六两，一线官兵每人每天八两——至于能否把粮食送上阵地是另外一回事。关于修筑工事的工具，发动军后勤人员到北朝鲜废旧的矿区中去找。关于弹药缺乏问题，规定了“三不打”：看不见不打，瞄不准不

打，距离远不打。解决防寒问题的办法除了“把被子撕下一头包住容易冻伤的手脚”之外，还有一条是：建议互相拥抱。

二十九日凌晨，四连官兵得到炊事班冒着炮火送上来的一草袋土豆和半袋萝卜。指导员李兆勤命令干部们不准留下一个土豆、一个萝卜，全部分给士兵。于是每个士兵分到两个土豆和半个萝卜——正在吃，进攻又开始了。

这是战斗最为残酷的一天。天上美军的飞机格外多，地面上进攻的南朝鲜士兵格外疯狂。阵地上没有可以燃烧的东西了，最后，是让凝固汽油浸透的泥土在燃烧。衣衫褴褛的中国士兵被炮弹炸起的泥土埋起来，又被战友再挖出来。所有的被子全部让卫生员撕成了止血的绷带。在纷飞的弹雨中，在敌我双方的尸体中，中国士兵寻找着可再供作战之需的弹药。南朝鲜第三师二十六团几乎用上了所有的兵力，沿着公路同时进攻数个高地，一支部队居然插到了四连的后面。中国士兵在前后受敌的情况下开始使用石头这个最原始的武器战斗，巨大的石块从南朝鲜士兵的头顶上飞过，被石头砸伤的士兵的大声呻吟令企图进攻的士兵毛骨悚然。在伤亡几乎到达极限的时候，四连把一个班的预备队投入了阵地，这是最后的一拼。下午十七时，四连坚持到了上级要求他们坚守阵地的最后时间。

四连以杀伤敌两百五十名、坚守阵地三昼两夜的战果，赢得志愿军总部授予的“黄草岭英雄连”的称号。写有这一称号的一面旗帜，至今悬挂在中国军队一个连队的荣誉室里。尽管后来的一批批士兵也许并不清楚黄草岭这座山在什么地方以及那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但是他们必定知道，高举过这面旗帜的前辈们肯定用生命书写过一段惊心动魄的往事。

美陆战一师师长奥利弗·史密斯是个忧郁而谨慎的军官，他的这一性格使整个陆战一师在朝鲜战场上得以逃过灭顶之灾。十月三十日，

当阿尔蒙德亲自飞到元山向陆战一师下达北进的任务时，史密斯看着眉飞色舞的阿尔蒙德，心里存在着剧烈的抵触情绪。阿尔蒙德站在地图前，一边做着进攻的手势，一边不断玩弄他的那根手杖，他在向陆战一师的军官们讲解该师向长津湖前进的路线时，“好像是筹划一次怡然自得的周末散步”。陆战一师将沿着长津湖的西岸向北推进，直捣中朝边境上的鸭绿江。阿尔蒙德最后说：“等你们把这一带扫荡完毕，韩国军队就会接替你们，然后我们就把美军撤出朝鲜。”陆战一师所有的军官都保持着沉默，这一点令阿尔蒙德军长隐约感到一丝不快。

陆战一师的军官们知道，南朝鲜军的一个师刚刚在他们将要经过的地方受到中国军队的重创，虽然中国军队已经从几个阻击阵地上撤退了，但是军事常识告诉他们，这些中国军队肯定又在其他的地方布置了陷阱。史密斯师长不愿意在无法弄清中国军队部署的情况下向前推进。尽管情报部门反复说，中国军队仅仅是为了保护长津湖水库附近几个向中国东北地区供应电力的发电厂而战，但是，没有人会相信这些鬼话——西线云山附近的中国军队又是为了保护什么而战的呢？况且，经过地形侦察，阿尔蒙德要陆战一师近万名官兵去的那个地方，简直就是个迷宫。从港口兴南到陆战一师的目的地下碣隅里，一百多公里的路途实际上是一条沙土和碎石混杂的小径，无数的急转弯和陡峭的盘山路不断地升高，直至进入连绵不绝的荒岭之中。其中最陡峭的就是黄草岭地区。这一地段一边是万丈悬崖，一边是高耸入云的峭壁，坡度陡得连吉普车都开不上去。这种地形简直就是为阻击而设计的，陆战一师一旦进入，随时可能遭遇大祸。再说，本应该是步兵的活，让精锐的陆战师来干，陆战一师的两栖作战传统将被玷污。陆战一师的作战处长看了地图后不寒而栗，他认为麦克阿瑟简直是糊涂透顶，因为东线的陆战一师和第七师距离西线的第八集团军太远了。但是，在这个作战处长看来，阿尔蒙德军长的态度“咄咄逼人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已经“把当前的形势描绘成了一个势不可挡的胜利”。

在两翼都没有保护的情况下，孤军深入险要荒僻的山区，这等于令陆战一师命悬一线。史密斯师长提出，必须在下碣隅里修建一个简易机场，以便在沿长津湖向北推进中运送补给和撤出伤员。阿尔蒙德瞪大眼睛问：“怎么会有伤亡？”

“他甚至不承认会有伤亡！这就是你面临的局面！”史密斯师长后来回忆说，“我们还是修筑了一个简易机场，从那里我们撤出了四千五百名伤亡人员。”

陆战一师七团团长霍默·利兹伯格上校清醒地知道自己的团作为先头部队将面临什么。在出发的那个晚上，他对他的军官们说：“伙计们，我可以预料，肯定会遇到中国军队。我们很快就要参加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序幕战了。”

陆战一师七团是从美国本土来的，因此比陆战一师其他的团晚一个星期到达朝鲜，但是该团很快就追上了主力部队。从仁川登陆后，通过汉城时由于进展神速，这个团被美军称为“飞毛腿利兹伯格”。

但是，在向长津湖推进的路上，“飞毛腿利兹伯格”走得缓慢而小心。其一营作为先头部队沿山路穿越山谷，二营则以利兹伯格称为“行进中的环形保护”方式沿两侧的山脊前进，三营殿后。在向水洞方向前进的过程中，他们遇到被打散的南朝鲜军队，知道了前面有中国军队，于是招来美军的支援飞机，用五百磅炸弹和二十毫米火箭弹猛烈轰击了中国军队的阻击阵地。十一月一日晚，在距离水洞不远的地方，陆战一师七团开始挖掘战壕以度过黑夜。

黑夜是中国人的。

午夜刚过，七团便遭到中国军队的攻击。

美军战史记载道：

冲天的火光和军号声是从每一条山脊发起这场进攻的信号。当中国人遇到抵抗时，他们用轻机枪和手榴弹凶猛拼杀；当他们在防线的薄弱处发现空隙时，便蜂拥冲下山谷。在夜间的混战中，中国人好像无处不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抗击过日本人夜间进攻的陆战队员发现，中国人的战术极为相似——他们用英语呼唤战地看护兵，使劲喊“你在哪里”，或是“我看见你了”。陆战队员则以紧张的心情默不作声地迎击中国人，只有在中国人暴露的时候才开枪。一辆苏制的T-34坦克冲破一个路障，隆隆震耳地开到第一营的指挥所，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迫击炮阵地、车辆、甚至单兵射击。陆战队的一枚火箭击中了这辆坦克，它的炮塔却突然转过来，只用一发炮弹——这一炮实际是在平射距离打的——便打了掉陆战队的火箭发射组。

天亮了，美军陆战队员发现他们与中国人都在山谷的谷底。中国士兵占领了第一营与第二营之间的公路，分散在山岭上的陆战队各连很多都已被切断联系。

可想而知，在这天夜晚，七团的美国兵成了真正的“飞毛腿”，他们四处逃命的速度是惊人的。利兹伯格命令他的士兵无论如何要坚持到天亮，他相信凭着陆战队凶猛而精确的火力，天一亮就会粉碎中国军队的人海战术。但是，黎明时分，当他们向高地上的中国士兵扑去的时候，同样遇到了强有力的阻击。罗伯特·贝中尉回忆说：“笔者所目睹的毫无疑问是最为密集的手榴弹火网。”美军的飞机赶来支援，中国军队的阵地上出现严重伤亡，但是美军的进攻依旧没有成功。“一个中国的狙击手发现了二营的包扎所。”美军战史记载道，“狙击手接二连三地打倒六名陆战队员，其中一人是医生克拉克中尉，他在处置一名伤员时中弹。”

让七团的美军士兵感到最艰难的攻击阵地是烟台峰。这个标高八九〇米的高地位于水洞西北，与东北面的七二七高地相呼应。烟台峰俯视着公路，是黄草岭的门户。中国第四十二军一二四师三七一团占领了该高地，并利用这个有利的地形阻击着联合国军。十月三十日，南朝鲜军第三师的二十二团和二十三团开始进攻烟台峰，至十一月一日，第三师再次加大进攻兵力，并一度占领主峰，但当晚就在中国军队的反击下丢弃。陆战一师师长史密斯认为，烟台峰如果拿不下来，

就无法夺取整个黄草岭地区，北进的目标根本无法实现。于是，命令陆战一师七团配属南朝鲜第三师，无论如何也要攻占可以袭击公路上任何目标的烟台峰。

坚守烟台峰高地的是中国第四十二军一二四师三七一团二营四连。

经过对主峰的反复争夺，坚守主峰的一个排的中国士兵只剩下了六个人，美军已经占领了主峰的半边。刚从团里开会回来的连长刘君拔出驳壳枪，对连部司号员、通信员、理发员和其他几个非战斗人员说：“跟我上去！”

他们分成两组向主峰上爬。右路由士兵刘玉龙带领，三个人在火力掩护下一米一米地接近，就在他们将要接近主峰时，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响起来，他们踏上了一枚地雷。左路的一组在爆炸的烟雾中迅速前移，他们用手榴弹把美军的重机枪消灭了。这时，前方突然站起来一排端着刺刀的美军士兵。连长刘君意识到，最后的时刻到了。就在这时，美国兵听见了一种令他们胆战心惊的声音，这声音就在他们跟前，尖厉而响亮。中国军队的军号声响起来了。美国士兵中流传着许多关于“中国喇叭”的骇人的传说，不料想在如此近的距离上不但听见了，甚至还看见了无数的“中国喇叭”在闪光。于是，美国兵转身就跑，武器丢在了阵地上。——“中国人开始进攻时，用特大号的铜军号吹出令人心烦意乱的可怕的声音，尖厉而刺耳。”

四连连长刘君冲上主峰后，发现主峰上连同他带上来的人，一共才只有十九名中国士兵，其中的四名还是伤员。他把这些士兵集中在方圆不足一百平方米的主峰峰顶上，然后，转达了团领导传达的西线的中国军队将美军骑兵第一师打得丢盔卸甲的战况。刘君连长再一次说，我们必须坚持到天黑，等待主力部队的反击。

四连的司号员叫张群生，来自中国东北，家就住在鸭绿江边。入伍前他在文艺演出队里干过，会吹小号。入伍以后，他得到部队里优秀的老号手的指点，不但能吹出传达各种指令的军用号谱，而且还能用军号吹出家乡的小曲，他因此成为士兵们特别喜欢的人。由于他作战勇敢，“点子”又特别多，士兵们干脆把他的司号员改称为“司令员”。在四连，提起“小张司令”没有不知道的。在等待敌人再次进攻的时候，“小张司令”开始吹奏中国士兵熟悉的《小二黑结婚》。

美军的进攻开始了。

张群生的身边是燃烧的树干，他手里军号上的红绸带还在飘动。美军士兵的脑袋从一个山洼里冒出来，钢盔一闪一闪的。直到美军爬到距峰顶十米的时候，连长刘君才命令射击。美军从枪声中就能判断出主峰上的中国士兵不多了，这回他们没有后退，而是趴在弹坑里往峰顶上扔手榴弹。机枪手郭忠全被美军的手榴弹炸伤，这是郭忠全的第三次负伤，之前他的一条腿已经断了。美军趁机枪停止的时候扑上来，郭忠全一条腿跪着抱起机枪，机枪的扫射声再次响起。

在另外一个方向，几个美军已经爬上主峰，连长刘君手持一支上了刺刀的步枪从战壕中站起来，迎着美军冲上去。肉搏战开始了。刘君与四个美国兵纠缠在一起，在把刺刀刺入一个美军士兵的脊背的时候，另一个美军的刺刀也正向他刺来。士兵郑友良用枪托把这个美军打倒，可是美军越来越多。这时，增援的三班到了，美军开始混乱，向山下退去。刘君高兴地喊：“三班！给你们请功！”话音未落，一颗子弹击中了他，刘君倒在司号员张群生的身上。

刘君对张群生说：“山上人太少了，要守住！”

张群生说：“咱和敌人拼了！”

刘君说："我不行了，你就当正式的司令员吧。"

张群生再一次向山下看去，远远地，他看见美军的几辆卡车把增援的士兵卸下来，然后装上美军的尸体开走了。

张群生清理了阵地上的弹药，每个人平均可以分到六发子弹和两颗手榴弹。他爬到通信员郑兆瑞身边说："子弹不够，就用石头拼！"他又爬到理发员陈凯明身边说："连长快不行了，给他报仇！"他几乎和每个士兵都说了一句话。士兵们说："小张司令，我们听你的！"

经过猛烈的炮火轰击，两百多名美军又冲了上来。烟台峰主峰上，在零散的枪声响过之后，石头雨点般地滚下来。身负重伤的郭忠全听见了张群生的喊杀声，他忙喊："小张司令！节省点！节省点！"张群生回答道："我用的是石头！"在这以后，无论谁再喊什么，张群生都听不见了，响彻烟台峰主峰的是中国士兵的一片怒吼声！

美军又退下去了，因为天黑了。

仅存的三名中国士兵和烟台峰陡峭的主峰一起，屹立在暮色中。

张群生把他的连长抱起来，呼唤着他，但是刘君连长永远不能回答他的呼唤了。

张群生把自己的白色毛巾盖在连长的脸上，哭了。

阵地前还躺着两百多具美军的尸体。

污血染红了焦土。

一个士兵提醒张群生，该向营指挥所报告了。于是，张群生在夜幕中又吹响了他的那支军号。

指挥所解读了烟台峰主峰上传来的号声，它的含义应该是：天黑了，我们还在烟台峰上！

在正面美军陆战一师的压力下，中国第四十二军一二四师的阻击线有不断恶化的趋势。侦察员报告说，陆战一师的炮兵群位于烟台峰东南的龙水洞，还配备有十几辆坦克，担任炮群警戒的只有一个营的兵力。龙水洞南约十公里处有个地方叫五老里，美军陆战一师的主力就驻扎在那里。

当晚，由四个营组成的偷袭队伍出发了。

中国军队的指挥官为这场反击美军陆战一师的战斗制定的方针很有中国古典小说的味道：打头、拦尾、击腰，深入纵深，挖穴掏心。

偷袭队伍出发后不久，一营在龙水洞北五百米处发现了美军的炮兵阵地。兴奋之余，一营营长冯贵廷发现一起行动的二营还没有跟上来。跟随一营指挥的三七一团副团长佟玉表示，如果等二营上来再打，黄瓜菜都凉啦。于是，进攻开始了。美军在突然的打击中措手不及，惊慌中有十多门炮落在中国军队手中。美军随即组织起阻击，人数多于中国士兵几倍的美军与中国士兵混战在一起，他们把丢失的火炮又夺了回来。天快亮的时候一营撤退了。

由三七〇团三营参谋长邢嘉盛带领的三营在黑暗中摸到龙水洞的西侧，发现美军就在小河的那边宿营。他亲自过河去侦察，看见一个挨一个的帐篷都亮着灯，美军士兵大多在睡觉，也有的在喝酒和打扑克。二十多门榴弹炮放在河滩上没有警戒，只有十多辆坦克呈环形围在炮兵阵地的周围，几个游动哨兵散漫地来回溜达着。邢嘉盛又涉水回来，正向各连交代任务的时候，北面突然传来枪声，是一营的方向。枪声把河对岸的美军惊动了。邢嘉盛决定把偷袭改成强攻。在中国士兵突然猛烈的攻击下，美军炮兵阵地上的十多门火炮被炸毁，一

个加强排的美军士兵大部分死在帐篷中的睡袋里。打完这一仗，三营继续向美军防线的纵深走。在一条公路上，又把美军的一个营部给袭击了，击毁两辆吉普车、七辆卡车和三门榴弹炮。这里距美军陆战一师师部所驻扎的五老里已经不远了。

二营在副营长赵继森的带领下，正准备偷袭一个高地。当尖刀班摸到前沿的时候，看见弹坑里、工事里横七竖八地散落着三十多个睡袋，只露出个脑袋的敌人正在大睡。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班长一挥手，士兵们扑上去，可是，这些中国士兵都惊呆了：睡袋中露出的脑袋个个黑糊糊的！中国士兵没有见过黑人，大多为农民出身的他们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种颜色的人。

“鬼！有鬼！”不知谁喊了一声。

中国人是信鬼神的。

尖刀班的中国士兵掉头就往回跑。

赵继森见尖刀班不但没有打响，而且跑了回来，问清楚怎么回事后，说：“就是真的有鬼，也要把高地拿下来！”

中国士兵再次攻击的时候，美军已经组成阻击阵形。经过激烈的战斗，美军的一个排被击垮。美军士兵真的成了鬼魂。

天亮的时候，中国士兵们还围在美军黑人士兵的尸体边看个不停。

美军陆战一师在遭到袭击后，立即命令暂缓正面进攻，并调预备队美第三师投入战斗，企图把深入到美军占领区内的中国军队消灭掉。

深入敌后最远的三营被美军包围在四○○点一高地上了。

在高地上，三营参谋长邢嘉盛看见了美军开来的车队，足足有一个营的兵力。车队在高地下停下，美军士兵跳下来准备攻击这个高地。邢嘉盛立即下令，趁美军还未站稳，两个连的中国士兵呐喊着冲下山头，他们猛打猛冲，一时间美军陷入混乱之中。二十分钟的战斗中有一百三十多名美军被打死，三十多名被俘虏，四十多辆卡车被烧毁，中国士兵捡了六十多支枪和两部电台跑回山上去了。

美军把三营所在的高地死死地围住，开始了疯狂的报复。殊死的攻防战激烈地进行着，十多架美军飞机轮流参加战斗。到中午的时候，美军竟然增加到一个团的兵力。由于中美士兵混战在一起，美军的飞机不敢贸然轰炸，只是在低空盘旋。这样，三营一直坚持到天黑。

天黑以后，在正面的佯攻下，三营开始突围。他们边打边撤，进了大山。在深山中历尽艰辛，三营活着的士兵终于在两天后与接应他们的部队会合。

毕业于西点军校的陆战一师师长史密斯对中国军队这次大规模、大纵深的袭击行动百思不得其解：中国人的这种几乎像是自杀的举动是基于什么战术思想呢？

在朝鲜战争进行到中期的时候，毛泽东在自己的书房里接见了第四十二军军长吴瑞林。

毛泽东说：“我从电讯上看到，吴瑞林在公路上炸石头，这是怎么回事？”

吴瑞林回答：“我在抗日战争期间，看见过日本鬼子修公路炸石头。在黄草岭我就采用了这个方法，叫工兵在山缝中塞上小包炸药，

炸开口子，再装上两百公斤炸药，用电发火，用电话机起爆，结果炸毁敌人坦克车五辆，炸伤八辆，致使敌人的地面部队五六天未敢行动。”

吴瑞林军长说的这个消灭敌人的方法，中国军队在朝鲜东线战场上多次实施。有一次，中国工兵在公路边引爆炸药，炸起的石头足有几十万吨之多，正在开进的美军的五十多辆坦克中有二十多辆被埋在石头里，由此而死伤的美军士兵更是无以计数。

毛泽东听了之后连声说：“好。好。”

这到底是什么战术呢?

在朝鲜东线战场上，美军的兵力占绝对优势。在这种似乎违反作战原则的形势下，中国第四十二军顽强地阻击着联合国军的北进，直到他们主动地从战场上消失。

## 早晨，中国军队消失了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日，一份情报送到美军远东司令部情报处长威洛比的手上，情报的内容让威洛比大吃一惊：中国本日在其电台广播中公开承认其军队在朝鲜的存在，称他们是为了保护水力发电地区的“志愿军”。

这是美军远东司令部第一次听到“志愿军”这个词，威洛比即刻陷入一种迷惑不解的状态中。他推测，中国人这样说是玩“鱼和熊掌兼得”的把戏。因为根据他的了解，中国人极端敏感和极爱面子，一口咬定在朝鲜没有正规的、有组织的军队，与联合国军对抗的只是“志愿人员”，这样既可以在万一被打败的时候不损害中共军队的声誉，又可以给退败的北朝鲜军队以实质上的支援。同时，有确切的情报表明，朝鲜战场上至少已有多个齐装满员的中国军，每个军三个师，总兵力在

十万人以上。而且，中国军队白天躲藏在山洞或林木茂密的地方，天一黑就前进，一直运动到可以俯视联合国军必经之路的山峰的一面。其中的五个军在朝鲜的中部山区与美第八集团军和韩国第二军团遭遇，另外的两个军或者是六个师留在西部山区作为预备队——全部是清一色的中国人，战地审讯人员没有发现任何北朝鲜人和中国人混编的迹象。当然，最有力的证据，莫过于遭遇战中韩国第二军团的溃败以及美军骑兵第一师的损失，这是北朝鲜军队绝对不可能做到的事，同时也是少数中国“志愿者”做不到的事。威洛比听说，驻香港的美国领事已经向华盛顿递交了一份报告，报告说中国和苏联领导人在八月份的会议上达成一项关于中国参加朝鲜战争的协议，正式决议是毛泽东在十月二十四日出席一次会议时作出的。据估计，开赴满洲地区的中共军队大约有二十个军。

威洛比想起自己在十月二十八日向麦克阿瑟提供的分析报告中说中国人的一切威胁“不过是外交上的一种勒索”。现在看来，那显然是一次严重失误的判断。为了“面子”，威洛比立即向华盛顿发去一封宁可把中国军队说得可怕一点的电报：

尽管迄今为止的迹象表明，中国人仅仅是为表面上的有限目的而进行一星半点的承诺，但也不能对这个共产党人拥有可随时动用的巨大的潜在力量的情况视而不见，这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中国共产党人高层作出全面干预的决定，他们可立即投入他们目前已经部署在鸭绿江沿岸四十四个师中的二十九个师，并且可以用多至一百五十架飞机支援一次重大的攻势行动。

紧接着，威洛比在他的第二封电报中，干脆把中国军队的数字说得更精确：

在满洲地区共有正规的中国地面部队三十一万六千人，非正规部队或者公安部队二十七万四千人。据判断，大部分正规军集结在鸭绿江沿岸的许多渡口附近。

面对威洛比的两封电报和联合国军撤退的现实，华盛顿当局敦促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打电报，让他“尽快提供关于朝鲜局势的简

要而准确的估计，并对中共军队似乎已经公开入侵的情况判断其含义”。

不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预料，傲慢的远东司令官麦克阿瑟根本不愿意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他的回电含糊其辞，仿佛就是为了让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高级官员们如入云雾。麦克阿瑟首先明确地说：目前无法对中国在北朝鲜进行干涉的确切目的作出权威性的估计。然后他列举了中国可能采取的四种方式：一、以全部力量毫无顾忌地进行公开干涉；二、出于外交上的理由，隐蔽地进行秘密干涉；三、使用“志愿军”在朝鲜保持一个立脚点；四、仅仅是为对付韩国军队，他们打败韩国军队是不会有太大困难的。对于目前的一些推测，一方面具有明显的可能性，许多外交专家也都这样推测；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合乎逻辑的理由不支持这些推测，而且目前也缺乏足够证据来使人们有理由立即接受这些看法。最后，麦克阿瑟说：“我建议，在条件可能还不够成熟的时候，不要轻率地作出结论。我相信，最后的判断还有待于今后更全面地积累军事情报。”

对于参谋长联席会议来讲，麦克阿瑟的“一方面”和“另一方面”等于什么也没有回答。唯一能在麦克阿瑟的回电中揣摩出的含义是：远东司令官认为局势没有那么严重，战场上出现一些中国人不值得大惊小怪。

烦躁不安的杜鲁门牢牢记住了麦克阿瑟电报中的“最后的判断还有待于今后更全面地积累情报”这句居高临下的话——在联合国军队不是前进而是在后退的那天，杜鲁门倒要看看这个老家伙所说的“今后”是哪一天！

西线的联合国军已开始全面撤退，彭德怀命令志愿军各军猛烈追击。

中国第四十军留下少数部队打扫战场，大部队开始了追击。为了能追上机械化行动的美军，他们破例在白天急行军。在宁边城扑空以后，第四十军加快了速度。在连续十多天的战斗后，中国士兵的饥饿与疲劳已经到达极限。跑步前进的过程中，棉衣被雨水和汗水浸透，变得越发沉重起来，有的士兵干脆把棉衣和棉裤脱下来，赤着背只穿一条内裤扛着枪奔跑。不断有耗尽生命最后一点热量和活力的士兵倒在地上再也没能起来。干部们开始穿的是从美军手里缴获来的很漂亮的皮大衣，在急促的行军中他们先是把皮里子扯掉，大衣当作雨衣穿，最后就全部扔掉了。可以想象这支衣冠不一的军队奔跑在山路上和田埂上是怎样的一种情景。奔跑中有的干部和老战士想起一年多以前的往事：那时他们在中国广西的田埂上用两个小时奔跑了五十多里，把国民党一二四军堵截住并将其消灭掉。

一二〇师三五九团在涉过九龙江后，从朝鲜农民的嘴里得知，一队美军正行进在通往九龙江的路上。团长李林立即命令：三营直插龙渊洞，在公路两侧展开，一营向九龙江方向合围。

三营刚一爬上山顶，就看见了山下公路上美军的辎重车和运兵车，士兵们紧张而兴奋，因为他们终于追上了！来不及多想，枪就响了。中国士兵手中的机枪和步枪同时射向了没有准备的美军，手榴弹在车辆之间爆炸，美军的车辆撞在一起，拥塞在公路上。美军在进行微弱的抵抗之后，投降了。战斗只用十分钟就结束了。在十一个活着的美军俘虏中，有一个军官交出的手枪精致而华丽，枪柄上一边刻着一个裸体女人，这引起中国士兵的好奇。一问，这个军官是美第二十四师的少校情报科长。

被中国军队追上的是美军第二十四师十九团。在先头营被袭之后，十九团立即展开战斗队形，向中国军队发起反击。在公路边的高地上，由于双方士兵混战在一起，前来支援的美军飞机尽管飞得很

低，但还是不敢轰炸。中国士兵们携带的弹药很快就用光了，连迫击炮弹在拔掉保险之后都当手榴弹扔了出去。由于是一个团对一个团兵力相等的战斗，中国军队使用惯用的战法，把美军截成两段，先吃其一部。被打散的美军逃得满山遍野，而一个连的美军则在中国士兵死死的包围圈中殊死抵抗。

士兵张凤山是六班的战斗组长。他在追击四个狂逃的美军士兵时感到自己的体力不行了，浑身轻飘，天旋地转，他已经整整三天没有吃过一顿饭了。四个美军士兵似乎明白了这一点，转过身向他冲过来。张凤山开枪击倒了一个，其他三个美国兵瞬间抱住了他。在搏斗中，张凤山张开嘴，咬住一只抓在他衣领上的毛茸茸的大手，被咬的美国兵叫了一声松开手，但又扑上来咬了张凤山一口。张凤山在疼痛中把枪捡起来，胡乱地扣动了扳机，咬他的美国兵倒了。剩下的两个转身想跑，结果另一个中国士兵赶来了。

指导员跑过来，当场宣布给躺在地上剧烈喘气的张凤山记大功一次。

营长找来几个迫击炮手，命令他们立即学会使用缴获的美制榴弹炮。几个中国士兵经过短暂的研究，发现除了开栓装弹有所不同外，哪国的炮都大同小异，于是拖着美军的四门榴弹炮向美军开火了。美军士兵在比中国军队的迫击炮厉害得多的爆炸声中抱头鼠窜。中国炮手们说："原来美国兵最怕美国炮！"

美军第二十四师十九团的战斗决心已经动摇，他们摆脱了中国军队，跑了。

一二〇师三五九团开始清点战果：打死、打伤和俘虏美军三百多人，缴获汽车八十一辆、榴弹炮四门、火箭十五支，另外还有不少枪支和军用物资。

遭到重创的是美第二十四师十九团的一营三连和半个炮兵连。

逃入山林的美军士兵不断被抓获。一名宣传队长带着两名干事走进一个村庄的时候，一位朝鲜老人向一间草房伸出五个指头，结果中国士兵在里面搜出四名美国兵。朝鲜老人再次伸了伸五指，原来草垛里还有一个。

美军战史对这次战斗的记载是：“大约一千名敌人渡过了距离十九团一营西北两公里的九龙江，并向南运动，穿过森林地带，显然目的是进入一营的后方。他们实施的机动取得成功。当营报务员正用电台向团指挥官报告情况的时候，中国军队缴获了这部电台。”

中国第四十军三五五团和三五八团也追击到清川江北岸，并向美军发动了进攻。美军战史记载了这次战斗的片断：

第十九步兵团桥头堡阵地和英军第二十七旅阵地之间有个五英里的缺口，一座大山位于这个无人地带，敌军越过这座山就能迂回到第十九步兵团或第二十七旅的侧翼和后方……五日晚，敌人沿着整个防线发动了进攻，遭到第十九步兵团E连和G连的顽强抵抗。至少有一部分敌人的攻击部队是从背后爬到E连阵地的，显然是顺着野战电话线摸上来的。中国人抓住了许多在睡袋里睡觉的人，并且杀死了他们。还有一些人从脑后中弹。实际上中国人已经占领了一二三高地的营阵地。

米切尔·里德·克劳德下士，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印第安人，从他所在的山顶阵地给五连发出第一个警报。一队中国人从一百英尺以外的隐蔽地突然开火。克劳德下士双腿跳起，并用他的勃朗宁自动步枪向中国人射击。敌人打倒了他，但他拖着双脚费力地前进，一只胳膊抱住眼前的一棵小树，再一次用自动步枪射击，直到中国人的子弹夺去他的生命。五连还有另一个自动枪手，上等兵约瑟夫·W.巴尔博奈，他也是同样的英勇。中国士兵出其不意地在距离他七十五英尺内接近他，并从这么近的距离向他冲过来。巴尔博奈用自动步枪突然向他们开火，他站在原地一直到被打死。两天以后，当友军巡逻队巡视到此处时，发现巴尔博奈的尸体前有十七名被打死的敌人。

中国第三十八军进入朝鲜后的作战中一直不顺利。特别是，由于诸多的原因，他们没有完成毛泽东和彭德怀赋予极大希望的穿插任务。之后，在彭德怀的严令下，第三十八军开始追击。其一一二师是

整个军的前卫师，准备向院里、军隅里方向发展。到达瓦洞的时候，一一二师被阻击在山下。师指挥部立即让三三五团团长范天恩前来接受任务。范天恩到达设在一条铁路隧洞里的师指挥部，第一个要求是让他睡上一会儿。没等师指挥官同意，范天恩就靠在潮湿的隧洞岩壁上睡着了，鼾声如雷。他带领的部队在追击的几天中一分钟也没有合过眼。师指挥官虽然不忍心，但还是把他推醒了，对他说："拿下对面的大山！"

对面的大山就是军隅里和价川北面险峻的飞虎山。

飞虎山是一个著名的战略要地，是通往军隅里和价川的必经之路。军隅里和价川都是交通枢纽，它们共同组成一个大十字路口：南可通顺川、平壤，东可通德川，西可通龟城和新义州，北可通熙川和江界。联合国军的部队要北上，必须通过这里，而且军隅里还是联合国军北进的总补给站。如果让中国军队通过飞虎山，占领这个巨大的交通枢纽，那么正在撤退的联合国军的后路将被截断——飞虎山之役势必是一场恶战！

面对强攻的任务，范天恩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粮弹不足。由于美军飞机对中国军队的后方实施了猛烈轰炸，从中国本土运送来的补给在路途中损失严重。加上中国军队在追击中行军速度快，供应就尤其显得严重不足。弹药的数量在经过数次战斗后所剩无几，最为困难的还是粮食问题。中国军队打仗的习惯是就地筹粮，但这个传统在异国战场上已不适用。志愿军所到之地基本上是十室九空，连朝鲜人的影子都见不到。士兵的干粮袋早就空了，一天里能吃上一点煮玉米粒算是很好的，可玉米粒也有几天供应不上了。

在亲自对飞虎山进行了详细侦察后，范天恩在一个废旧的铅矿洞里召开了营长会议。他居然拿出来一些美国制造的饼干招待营长们。为了这些美军的干粮他挨过严厉的批评，因为他把在熙川截获的五辆

美军卡车上的饼干、罐头、方糖和威士忌全部分给了士兵，他认为他的士兵们的干粮袋里需要补充点东西。中国军队从它还是一支游击队的时候就制定了一条铁的纪律，那就是“一切缴获要归公”，而范天恩擅自处理缴获物资违反了军纪。士兵们口袋里的那些美国饼干早已吃光，现在范天恩捧出的这些饼干如同珍藏已久的宝物——他知道到了把最珍贵的东西拿出来的时候了。在向营长们交代攻击的路线和任务的时候，营长们大嚼这些松脆的美国饼干的声音在黑漆漆的矿洞里一片响亮。

十一月四日拂晓，小雨，飞虎山笼罩在一片朦胧的雨雾之中。

四时十分，担任主攻的二营在营长陈德俊的带领下，彻底轻装之后开始向通往飞虎山主峰的那片两公里宽的开阔地冲击，那里是敌人炮火严密封锁的地段。

美军的一个炮兵营在这里支援南朝鲜军作战。这个炮兵营几乎在中国士兵冲击的同时，开始了他们早已精确准备好的猛烈射击。

二营的士兵们在接近主峰的时候，炮火中接连不断地有人伤亡。

中国军队的支援火炮也开始了压制射击。

在这一线阻击中国军队的是南朝鲜第七师，守卫飞虎山主峰的是该师的五团。南朝鲜第七师原隶属美军第一军行动，云山方向战局突变后改属南朝鲜第二军团，从后备的位置前出到熙川方向打阻击。他们在熙川第一次与中国军队交战，就被中国第三十八军给予了迎头痛击。南朝鲜战史这样记载着他们与第三十八军的作战：

第七师昨日（三日）开始防御战。是日三时，与敌一个师展开激战，大大削弱了敌人的战斗力，这是第七师北进以来首次展开激战并取得胜利的日子。师右翼的第五团同敌一个营交战，前方警戒部队第一营防守的七六〇高地处于危急状态，营长即派遣预备队击退该敌。敌人向我第五团与第三团的接合部进攻，企图控制飞虎山。敌人在炮火的掩护下发起进攻，

枪炮声响彻云霄，犹如雷鸣。这时，占领凤泉里的第二营也展开了激烈战斗，但最后被敌人包围。故我军边迟滞敌人，边向松林站、间站地域撤退。在战斗中由于敌人连续炮击，营与各连有线通讯线被炸断。敌人追击该营，势如潮水。在主抵抗线，第一营和第三营在位于价川地区的联军炮兵营的火力支援下，连续战斗三个小时。经过三次反复争夺，迫使敌人溃逃。但全团的伤亡也不小，携带的弹药几乎消耗殆尽。

就在中国士兵向南朝鲜第七师五团占据的飞虎山主峰冲击的时候，在价川的一个小学里，被中国军队打下来的南朝鲜第七师三团被换下来清点人数、点验武器。南朝鲜第二军团军团长刘载兴少将在第七师师长的陪同下，对三团进行了“表彰”：三个营长、一个通信参谋官升一级，二十名士兵被授予武功勋章。但接着这些士兵就被命令在飞虎山局势出现恶化的时候冲上去。

中国士兵已经快冲到峰顶了。

中国第三十八军一一二师三三五团二营的攻击是坚决而猛烈的。细雨变成了大雾，能见度很低，枪和炮可以说是无目标地在射击，双方官兵都无法得知对方究竟离自己还有多少距离。在接近主峰的地段，双方终于开始了预料中的白刃战，寒冷的浓雾中到处传来肉体格斗的喘息、咒骂和呻吟声。三三五团二营一位叫李玉春的指导员带领五连冲上了飞虎山的主阵地，配合二营攻击的一营和三营也占领了东西两侧的高地。

刚刚受到军长犒赏的南朝鲜第七师三团这时接到的命令并不是夺回飞虎山主峰，而是让他们立即掩护五团撤退，然后堵塞中国军队的突破口，因为范天恩的一个营已经向军隅里冲去了。

联合国军所有的炮火都在向飞虎山主峰倾泻炮弹。怒火万丈的范天恩发誓坚决打到军隅里。而正在这时，师指挥所的命令到达：停止攻击，就地防御。吃惊不小的范天恩不理解这个命令。攻击现在无法停止，因为向军隅里攻击的营已经出发。范天恩只好一边命令通信员

跑步追上那个营，让他们回来，一边思索着师指挥所命令的含义：仗打到这个份上，正是攻击的好机会，难道是整个战局出了什么问题吗?

命令是彭德怀下达的。

三三五团团长范天恩不知道，现在就是他们占领军隅里也晚了，因为联合国军已经全部撤到了清川江以南，并在南岸建起坚固的阻击防线。第三十八军切断敌人退路的任务现在已经没有意义了。

第三十八军拼尽了最后的努力，但没能最终实现彭德怀的作战计划。

此刻的范天恩并不知道，一纸“就地防御”的命令将令一场炼狱般惨烈的战斗等待着他和他的三三五团。

就在范天恩接到“就地防御”命令的时候，彭德怀已命令另一支部队向联合国军纵深前进，而且希望他们前进得越远越好。这支部队中的士兵操着中朝两种语言，在山林中唱着中国歌曲《到敌人后方去》快速前进着。

这是一支奉彭德怀之命成立的敌后游击队。

很久以来，除了少数当事人的回忆之外，中国有关朝鲜战争的史料中少有提及这支队伍的。倒是在南朝鲜的史料中，有关朝鲜战争期间在“后方清剿共产党游击队”的记载很是详尽。用于清剿“共产党游击队”的部队，除了南朝鲜警察部队、南朝鲜正规军之外，甚至连美军号称精锐部队的陆战一师也参加了行动。由此可见，在朝鲜战争中，游击队绝不是个小角色。况且这支游击队是由中国和北朝鲜的正规部队所组成，军官成熟而智慧，士兵勇敢而凶猛。

彭德怀关于成立游击队的命令是一封电报："准备一批必要干部和数营兵力，配合朝鲜人民军，组织几个支队，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第一支队，由中国第四十二军一二五师三七五团二营和北朝鲜人民军第七师七团的一个联队组成。一二五师副师长茹夫一任支队长兼政治委员，三七五团政委包楠森任副政治委员，中国三七五团副团长李文清和北朝鲜人民军第七师上校作战科长崔凤俊任副支队长。游击区域是平壤、三登里、顺川、成川、阳德一带。

第二支队，由中国三七五团一营和北朝鲜孟山郡委员会、宁远郡委员会组成。中国一二五师政治部主任王淮湘任支队长兼政治委员，中国三七五团团长赵立贤任副支队长。游击区域是德川、孟山、宁远一带。

游击队的任务是：打击小股敌人，捕捉俘虏，搜集情报，消灭伪政权和其他地方武装，破坏敌后交通，与留在敌后的人民军和劳动党取得联系。

五日，游击队在夜色中通过大同江上的浮桥，向南而去。谁知，刚过桥就遇到强大的敌人，经过战斗，伤亡很大。从敌人俘虏的口中才知道遭遇的是南朝鲜第八师的主力部队。从此，游击队尽量避开大路，避开敌人主力，挑选联合国军防线的缝隙穿插过去。

在随时可能出意外的敌后，游击队的行动十分谨慎。为了不让敌人摸清楚他们的去向和落脚之处，他们在地图上选择好行军的目的地，一般是一夜所能走到的路程之内的目标，然后找一个当地的向导，先向与目标不符的方向走几公里，然后再迅速转身向目标的方向急行，到达目标后将向导留下，至晚上再出发时把新的向导带上，再把上一个向导放走。每到一个宿营的地方，先包围，后进村，封锁消

息，村民不准出入，附近的路口和高地上布置便衣哨兵，并且派出经验丰富的侦察人员了解周围敌情。这支敌后游击队在极端危险的环境中，不断地袭击联合国军的零散部队和南朝鲜区政府，每战均告捷。他们的战斗原则是：速战速决，打了就跑，专打弱敌，扰敌后方。

游击队最大的困难是伤员问题。牺牲的士兵可以就地掩埋，但二十多名伤员必须在行军中抬着前进。按照中国军队的传统，伤员都是交给当地老乡照顾，可这里是异国他乡。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三七五团政治处组织股长高成江了解到，桧仓有不少开饭馆的华侨，他认识了其中一位名叫张兴盛的老人，老人的祖籍是中国山东荣城，抗日战争时为躲避日本人抓劳工逃到朝鲜。张大爷也开着一个小饭馆。当高成江把游击队的愿望向这位老人说了之后，豪爽的山东人张兴盛说："中国人都是我的亲兄弟！"于是，游击队的伤员全部由张大爷收留了。

游击队后来找到了转战在敌后的北朝鲜人民军的正规部队，与领导着没能撤回北方的两万多人民军的第二军团参谋长芦哲会合。芦哲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老战士，担任过辽宁军区李红光支队的参谋长，曾与茹夫一并肩战斗多年，至今还珍藏着与茹夫一在临江战役后的合影。两个生死战友竟然在这样的环境下见面了，他们相拥之际，喜极而泣。

情况报到志愿军总部，彭德怀特发来电报："你们与人民军两万余人在敌后胜利会师，意义重大，我甚为欣慰。"

五日晚上，清川江边的联合国军阵地再次遭受大规模的夜袭。

大约一个营的中国军队几乎是无声无息地冲进了配属美军骑兵第一师六十一炮兵营的阵地。中国士兵抱着炸药包接二连三地炸毁了美军的数门火炮，并与美军士兵进行刺刀搏斗。美军炮兵营除炮手外的

所有士兵组成环形防御阵地进行阻击，炮手们则以零距离为标尺胡乱地开炮，当把所有的炮弹打光后，他们不得不在美军步兵的接应下逃生。

英军第二十七旅在黑暗中受到连续四个小时的袭击，旅长考德再也无法组织起有效的阻击行动。前沿的英军士兵开始溃逃，然后就是整个阵地的丢失。考德当时认为，最后的关头到了，而英军士兵在极度的恐慌中对旅长考德说："今天这个晚上是坏人服罪的日子。"

美军第二十四师十九团的阵地受到的冲击最严重，几乎所有的连队都在告急，伤亡人数的急剧增加令美军感到世界的末日已经降临。在左翼阵地丢失后，中国士兵潮水般地涌上来，美军军官试图在阵地周围集合被打散的士兵，但是这个努力很快就被证明根本不现实。好容易坚持到天亮，十九团一营在重新装备之后，开始向丢失的阵地反击。美军士兵缓慢地向高地接近，奇怪的是没有遇到任何阻击。美军终于爬上了高地，阵地上静悄悄的，潮水般的中国军队没有了！美军士兵只是在战壕中发现了三名因为疲劳之极仍然睡得很香的中国士兵。

因为没有了密集的枪声，英军士兵更加提心吊胆了，当他们爬上布满战壕的阵地时，眼前的情景令他们惊奇不已：中国人没有了！在紧张不安中度过了一夜的观察哨兵高声喊起来："他们逃跑了！他们逃跑了！"

太阳升起来，晴朗的一天开始了。联合国军的飞机在空中盘旋，四处张望的侦察机飞行员报告说：没有敌人的影子，中国军队去向不明。

就在前一天的夜里，在战争西线清川江前线作战的中国军队事先没有任何预兆地突然消失了。

## 吃饭于前，又拉屎于后，不是白吃了吗?

随着在朝鲜北部山区与平原的接合部以及清川江北岸广大地区枪声的逐渐稀疏，大规模的战斗结束了——后来的南朝鲜战史把这一阶段的战斗称为“联军国军进击战役”，而后来中国的战史则将其称为“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

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自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五日打响至十一月五日结束，战役历时十天，以北进的联合国军遭到突然打击后撤至清川江一线建立防御阵地为战役结局。

发生在远东地区的这次规模不大的战役，因联合国第一次以联合国军的名义干涉一个地区的局部战争以及中国共产党军队以作战的方式直接参战，从而引起了历史的长久关注。同时，作为东西方冷战局面形成以来第一场东西方的军事冲突，也令交战双方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们长久地将其作为研究对象。在后来僵持日久的冷战岁月里，这场战役作战双方对对方战略战术的运用和军事思想原则的初步体会以及对这种体会的不断深入的回味，也许比战役本身的战场结局显得更为重要。

西方的军史学家把这场战役称为：“世界战争史上少有的遭遇战”。作战双方均在不预期的战斗中仓促接敌，这是这场战役的显著特点。中国军队在联合国军方面认为几乎彻底失去出兵干涉时机的时候紧急越过边境，其战略部署在情报匮乏和战局混乱中一变再变。最后，毛泽东、彭德怀抓住了联合国军分兵冒进以及其东西两线军队各自北进、互不联系的弱点，确定了东线阻击、西线进攻的总体作战方案。但是，由于西线的中国军队与南朝鲜军队在温井地区的遭遇战过早地暴露了中国军队的位置和意图，令彭德怀预定的进攻方案又一次落空。于是，中国军队在其主力没有全部到达指定位置的情况下，被迫开始攻击。突破云山之后，曾经产生过歼敌的机会，由于第三十八

军迂回路线上的严重受阻、第六十六军没能即刻抓住南逃的美第二十四师等原因而没有完全达成战役设想。但是，中国军队在战斗中所持的独特战术使不了解这支军队的联合国军损失巨大，在一些局部战斗中联合国军甚至处于崩溃状态。

美军战场指挥官对中国军队的战术有如下描述：

中国军队远比麦克阿瑟所嘲弄的"亚洲的乌合之众"要机敏老练。中国步兵除迫击炮外，没有装备任何更重的武器，但他们却能极好地控制火力，进攻美军和韩国军队的坚固阵地。尤其是在夜间，他们的巡逻队在搜索美军阵地时成效显赫。他们拟定的进攻计划是从背后发起攻击，切断退路和补给线，然后从正面发动攻势。他们的基本战术是一种V形的进攻队形，他们使敌军在这个队形中运动，然后就会包围这个V形的边沿。与此同时，另一支部队运动到V形的开口处，以阻止任何逃跑的企图和阻击增援部队。

可以说，这是对中国军队战术原则的非常精确的体会。有趣的是，在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屡次使用完全相同的战术，而联合国军屡次在其布下的V形进攻阵势中惊慌失措。

南朝鲜战史对中国军队的作战特点分析得比美军更为详尽，其原因可能是他们在这次战役中由于首当其冲而损失巨大：

机动进攻战术：抓住敌人的弱点，发起突然进攻，进攻受挫时迅速撤退，以保持主动，避免胶着和拉锯状态，灵活运用兵力，迅速机动，重点进攻。

尖刀突破战术：从狭窄的正面投入锐利的尖刀部队，形成强大的攻击尖端。第一线部队的突击力量特别强大，分成若干梯队连续攻击，利用肉搏战以减少敌炮火和空中攻击带来的损失。

穿插分割战术：攻击部队穿插到敌军阵地内，将敌军阵地分割成若干部分后，各个歼灭。特点是把大目标分割成若干小目标，在敌军阵地内形成"一点两面"的攻击态势，穿插到敌军薄弱部位实施袭击和强攻。

随机应变的防御战术：主力置于后方的适当地点后，以少量兵力占领宽大正面，遇敌时抓住敌人进攻弱点迅速机动，撤出战场，给敌人以防御的印象，而实际上却以攻击行动进攻敌人，其主力不占领阵地。作战时具有极大的伸缩性，确保阵地地位。

机动防御战术：边退边打，迟滞敌人，按阶段逐次抵抗，采用潜伏、袭击等积极手段，夺取小规模战斗的胜利，并利用宽正面、大纵深，实施多层抗击。

其他战术：将敌完全包围，但尚不能以致命打击时，派出强有力的部队插入对方核心部位，从里往外进攻，可称之为“中心开花”；利用夜间以小部队从敌两个部队的接合部插入打击，趁混乱时投入大部队发起进攻；隐蔽地开进；吹哨子和军号，以压制打击士气，振作己方士兵。

对于中国军队来讲，他们更感兴趣的也许是第一次与美军交手的体会。美第二十四师曾在战场上得到一本中国某部队编印的名为《云山战斗经验基本总结》的小册子，上面记有中国军队对美军协调迫击炮、坦克、炮兵火力以及空中支援能力和步兵火力速射方面的羡慕，但关于美国士兵战斗能力的描述却大为不恭：

美国士兵在被切断后路时，会丢弃他们所有的重武器，扔得到处都是，而且还装死……他们的步兵缺乏战斗力，胆小怕死，不具备进攻和防御的胆略。

他们依赖飞机、坦克和大炮。与此同时，他们也害怕我们的火力。他们在前进时如果听见枪声，便会退缩不前……他们只能在白天打仗。他们不习惯夜战和白刃战。如果他们战败，便会溃不成军。如果他们没有炮火支援，就会不知所措……在云山，他们被包围了好几天，但他们一事无成。他们害怕被切断后路。当补给停止时，步兵便会完全丧失斗志。

没有比看到这样的文字更让美军感到难堪的事了。在朝鲜战争之前的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即使美军遭到暂时的失败，也没有人敢这样描绘美国士兵。除了自尊心受到打击之外，更让美军军官们感到不是滋味的是，中国军队对美国士兵的评价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十一月六日早七时，麦克阿瑟怒气冲天地走进他的办公室。

让麦克阿瑟心情恶劣的是他的参谋长惠特尼将军送来的那封参谋长联席会议发自五角大楼的电报：

根据总统指示，在接到进一步命令前，推迟对满洲边界五英里以内目标的轰炸。迫切需要你对形势作出新的估计，并说明下令轰炸鸭绿江桥梁的理由。

麦克阿瑟愤怒地踱着步:“推迟轰炸?轰炸理由?究竟我是个白痴还是布莱德雷精神失常?难道他们不知道中国人已经不宣而战了吗?难道还让他们继续肆无忌惮地从鸭绿江桥上源源不断地开进战场吗?”

麦克阿瑟在给杜鲁门发去那封对中国是否参战“不要轻率地作出结论”的电报后,同时向美国远东空军下达了“把北朝鲜的城市夷为平地”的命令,并且要求“参战飞行员必要时飞到筋疲力尽为止”。美国远东空军忠实地执行了麦克阿瑟的命令,在中国军队向南追击联合国军队的时候,北朝鲜的所有城市以及那些美军飞行员认为值得轰炸的所有目标都遭到了大规模的空袭。对此,麦克阿瑟仍然觉得不满足,他又向远东空军下达了出动九十架B-29轰炸机的大规模轰炸命令,轰炸目标中有一个是麦克阿瑟恨不得从地图上挖掉的城市:新义州。这座近邻中朝边境的朝鲜城市现在是北朝鲜政府的避难所,其官员和军队此时就隐蔽在这座城市的房屋中。新义州有一座铁路与公路两用桥和一座铁路双轨桥把它与中国的城市安东连接起来。但是,令远东空军司令斯特梅莱耶中将感到不好掌握的是麦克阿瑟命令中的“摧毁满洲边界所有国际桥梁的朝鲜部分”这句话。不如干脆说把鸭绿江大桥炸毁好了,什么叫摧毁“国际桥梁的朝鲜部分”?因为如果轰炸鸭绿江大桥的“朝鲜部分”,那么从俯冲投弹的角度看,美军的飞机肯定要从空中越过中朝边界才能实施。美军的飞机飞到中国的领空去了,这可是华盛顿方面敏感之极的问题。

“将军,难道您不知道美军的飞机如果执行这个任务,就不可避免地要把炸弹投到中国境内吗?”

“你难道不知道中国军队已经和第八集团军干上了吗?”

斯特梅莱耶中将只好把麦克阿瑟的命令以“通报副本”的形式向五角大楼报告。当五角大楼得知麦克阿瑟的轰炸计划时,距离麦克阿瑟要求实施的轰炸时间只剩三个小时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高级官员们

紧急磋商后，与杜鲁门总统通了电话，华盛顿的一致意见是：几天之内联合国就要讨论中国军队的参战问题。这个时候对中国领土的任何的“误炸”都会引来类似“苏联干涉”的严重后果。“除非发现一些大规模的渡江行动威胁到我军的安全，否则这次轰炸行动是不明智的”。包括美国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安·里斯克在内的官员都认为，鸭绿江江水很浅，就是炸断了大桥，也不能有效地阻止中国军队的进军。于是，在离远东空军预定轰炸鸭绿江大桥的时间还剩一个半小时的时候，华盛顿要求麦克阿瑟陈述轰炸理由的电报到达东京。

令杜鲁门总统十分恼火的是，麦克阿瑟在回电中对局势的估价来了一个急转弯，其口气之紧迫和言词之尖刻令他大吃一惊。麦克阿瑟上一封电报还如同长辈教导孩子一样地说，对朝鲜战争局势的估价有待于“更全面地积累军事情报”，而此刻他在电报里描绘的却已是一个险象环生的朝鲜战场：

华盛顿 参谋长联席会议布莱德雷将军：

大队的人马和物资正自满洲通过鸭绿江上的所有桥梁。这种行动不仅使在我指挥下的部队陷于困境，而且有使我军全部被歼的危险。过江的行动可以在夜幕的掩护下进行，而鸭绿江与我们防线之间的距离是那么近，敌军可以不必十分顾忌空袭的威胁，就能够展开针对我军的部署。阻止敌军增援的唯一办法，就是发挥我们空军的最大威力，摧毁所有的桥梁和在北部地区所有支持中国人前进的设施。每小时的延迟，都将使美国和联合国其他国家付出大量鲜血。新义州的主要渡口要在最近几小时内加以轰炸，而且这个任务实际上已经准备就绪。我是在我所能提出的最严重的抗议之下暂缓进行这次袭击，并执行你们的指示。我所命令的行动，是完全符合战争原则和我自联合国所得到的决议和指示的，而且并不构成对中国领土任何轻微的敌对行为，虽然肆意违反国际法的行动是从那里来的。我不愿过分夸大你们所加于我的限制将在物质上和心理上造成严重损害的后果。我希望这件事立即引起总统的注意，因为我相信你们的命令很可能要导致严重的灾难，如果不是总统亲自和直接了解这种情况，我是不能担当这个责任的。时间是如此紧迫，我要求立刻重新考虑您的决定。在等待您的决定时，自然完全遵照您的命令行事。

陆军五星上将 麦克阿瑟

这是一封著名的电报，一封后来被各种史书反复实录的电报。它的有趣之处不仅仅在于一个战场司令官竟然敢以此种口吻向最高统帅部说话，如果换一个人打来这样口吻的电报就会被立即解除职务；而它的另一个有趣之处在于，电文再一次充分体现出麦克阿瑟令媒体津津乐道的性格以及他与杜鲁门总统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

布莱德雷怀着复杂的心情，在电话里把电报念给杜鲁门总统听。

杜鲁门的第一个反应是：难道仅仅过了两天，麦克阿瑟就积累了足够的军事情报了？从而使他的“别人都在中国人的参战中惊慌失措只有他一个人镇静自若的立场”有了完全相反的转变？或者仅仅在两天之内，朝鲜战局就发展到不把炸弹投到中国本土就将“使美国和联合国其他国家付出大量鲜血”的地步了？让杜鲁门更不满的是，这封电报里表露出的含义是麦克阿瑟一贯的伎俩：要么同意轰炸，要么出了意外不是他的责任。轰炸鸭绿江大桥是危险的举动，任何稍有不慎都足以成为导致苏联报复和干涉的借口。如果真是这样，后果不堪想象。但是，如果麦克阿瑟描绘的可怕情景一旦出现，他的这封电报就是一份对总统的控诉状，那个老家伙就会从失败的责任中解脱干净，而自己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杜鲁门经过反复权衡，最后告诉布莱德雷，可以授权麦克阿瑟轰炸新义州。

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的回电措辞谨慎而狡猾，简直就是钩心斗角的官方文案的典范：

你（十一月六日）的电报所描述的情况，与我们最近收到你（十一月四日）发出的电文中最后一句相比较，有相当大的变化。而你十一月六日的电报是我们收到的你的最后一个报告。我们同意摧毁鸭绿江的桥梁对于保证你指挥下的部队的安全有重大的帮助，除非中国共产党把这种行为解释为对满洲的进攻而激起更大的努力，甚至苏联也投入他们的力量。其结果不仅危及你的部队，还会扩大冲突地区，陷美国于极其危险的境地。然而，鉴于你十一月六日电文第一句所说的情况，我们授权你按照你的计划轰炸朝鲜边境，包括新义州的目标和朝鲜这一头的鸭绿江桥。如果你在收到这封电报时，你还认为这种行动对你的部队安全是必要的话。上述命令并没有授权轰炸鸭绿江上的水坝和发电厂。由于必须与联合国的政策、指

示保持适当的关系，也由于把战争局限在朝鲜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有着重大关系，所以应极端注意避免侵犯满洲的领土和领空，把从满洲方面来的敌对行动及时呈报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认为，经常把重大的局势变化在它发生的时候通知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我们三天前要求你作的估价告诉我们。

可以想象麦克阿瑟读到这封回电时的心情。

但是，至少他的目的达到了。

美国陆军部部长弗兰克·佩斯说："仁川登陆以后，我们对麦克阿瑟将军在现场估价问题的能力钦佩不已。"

几个小时之后，九十架B-29轰炸机起飞了。不久，美国海军舰载飞机也加入了这次轰炸行动。于是，在鸭绿江漫长的江岸上，美军轰炸机密集地掠过每一个渡口的上空，城市、村庄、道路随即便湮没在一片火海中。新义州市更是遭到地毯式的轰炸，整个城市瞬间成为一片废墟。

当然，中国的边境城市安东也在美军炸弹的破坏之中。

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要求，第二天，麦克阿瑟回电对局势作出"估价"。他再次将朝鲜战场局势说成"极端地严重"，又列举出数条理由说轰炸鸭绿江上的目标是阻止威胁美军的中国人的唯一有效办法："分明是防御性的，但要说这种行动会使局部性干预的程度增加，或者会挑起一次大战，那是难以想象的。"最令华盛顿最不可思议的是麦克阿瑟的最后一段话：

尽管人数的具体数字不知道，但中国军队肯定是一支有组织的军队。中国军队在阻击第八集团军的战斗中已经夺取主动。如果中国军队的进攻继续下去的话，也许有必要放弃继续前进的希望，甚至要撤退。但是我希望在十天之内在西线恢复进攻，如果我能阻止中国军队的增援的话。而只有采取这种主动行动，才能准确估价中国人的实力。

明明说大量的中国军队已经介入，明明说中国军队已经“夺取主动”，明明说他悲观地认为局势正在恶化，联合国军“甚至要撤退”，然后没有任何过渡地又说“希望十天之内在西线恢复进攻”，说只有通过进攻才能为华盛顿作出准确估价。那么，到底该怎样理解这样的电报呢？是华盛顿白日见鬼？还是麦克阿瑟精神失常？

又过了一天，麦克阿瑟的电报又到了。这回麦克阿瑟在电报中大谈他对中国人的“性格和文化”是怎样的了如指掌，说曾经是温文尔雅的中国人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变成了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者”，并说中国介入朝鲜战争的原因是“对权力扩张的贪欲”使然。麦克阿瑟的所有言论说明，他认为他的主要敌人不是北朝鲜而是中国！他所关切的远不是一场局部的朝鲜战争，而是对付亚洲共产党人的一场全面的战争。从这个角度看，就不难理解麦克阿瑟为什么会在遭到打击后，仍然固执地命令联合国军继续向北推进，即使前边有中国军队这个巨大的现实也阻挡不了他。

除了麦克阿瑟自身的因素外，导致麦克阿瑟判断失误的其他因素也不容忽视。首先是华盛顿对中国军队参战的目的、规模、决心等问题始终没有正确的结论。他们认为，中国没有足够的决心和能力同联合国军进行大规模战争。中国人在朝鲜战场的出现，一方面是作为苏联集团的一员象征性地向北朝鲜表示支持，另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在中朝边境附近供应中国东北地区的水力发电站。为此，美国政府还正式发表声明，郑重强调“美国没有破坏这些发电设备的意图，并且尊重中国的边境线”。其次，美军远东情报部门的失误也诱导了麦克阿瑟，情报处长威洛比甚至在十一月下旬还对到达前线的美军参谋总长希克将军说：“来的只是义勇军，已经证实是中国师，其战斗力相当于一个营。”希克将军对这样的判断感到“十分惊讶”，他不禁问道：“那么第八骑兵团为什么会遭到如此惨败？”威洛比回答说：“因为第八团缺乏警惕，为少数敌人的果敢所压制，在黑暗中陷入溃败。”威洛比，这个

后来被媒体嘲讽为朝鲜战争中的“出类拔萃的乐观论者”，在十一月，竟然对中国军队的参战人数作出了这样精确的判断：“现在，在朝鲜的中国军队的兵力在四万四千八百五十一至七万零五十一人之间，已经伤亡五千五百人。”情报精确到几万人的个位数字，这样的情报还会是编造的吗？于是，麦克阿瑟有理由认为，中国军队没有全面介入的可能性。十月下旬出现的中国军队，是对信仰相同的邻国礼节性的援助。同时，中国军队是兵力最多为七万人左右的义勇军，其意图是防御性的。

最能支持麦克阿瑟以上判断的证据是：中国军队不是打了一下就跑了吗？不是连最有经验的美军侦察机飞行员都没有再发现中国军队的影子了吗？

此时，入朝参战的中国军队总人数已经达到三十八万。

麦克阿瑟判断的数字也许只和跟随在中国军队身后的支前民工的人数差不多。

就在麦克阿瑟一面大举轰炸北朝鲜后方和鸭绿江上的所有目标，一面命令其部队试探性地继续向北进攻的时候，十一月十三日，在北朝鲜温井以北一座废旧金矿矿洞边的一间木板房子里，彭德怀召集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党委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党委会议。会议对第一次战役进行了总结，同时，对下一次更为巨大的战役进行了部署。

彭德怀对刚刚结束的第一次战役的战果感到不满意：由于没有把敌人的后路截断，敌人以极快的速度撤退了，使战役实际上形成一种平推，歼敌不多，没有完成毛泽东歼灭南朝鲜军队几个师和美军几个师的作战设想。

至十一月四日，中国军队共歼灭英军第二十七旅的一个榴弹炮兵营、美军第二十四师的一个加强连，重创了南朝鲜第一、第六、第八师和美军骑兵第一师的第五、第八团，歼敌一万五千余人。当敌人全部撤退到清川江一线时，中国军队歼敌的时机已经丧失。这时的中国军队连续战斗十天，伤亡不小，粮弹已尽，而联合国军在损失不大的情况下有可能组织反击（在个别地区，敌人已经这样进行了），一旦反击开始将使中国军队由主动变为被动，于是彭德怀果断地命令停止追击，向后撤退。同时，一个新的战役计划在彭德怀的心中逐渐形成，那就是在敌人继续北进时寻找可以利用的战机。

十一月四日这天，彭德怀下达的命令是：西线的各军分别以主力置于新义州、龟城、泰川、云山以及熙川以南的新兴里、苏民里、妙香山地区；各军以一个师分别位于宣川、南市、博川、宁边、院里、球场地区，采取宽大正面运动防御与游击战结合的方针，小敌则歼灭，大敌则撤退，诱敌深入，向敌侧后转移。

彭德怀把这一战役计划向毛泽东作了报告，并建议第九兵团迅速入朝参战。

几个小时之后，五日凌晨一时，毛泽东回电，批准了这一计划：

（一）十一月四日十五时电悉。同意你的部署，请你按当面情况酌情决定。（二）德川方面甚为重要，我军必须争取在元山、顺川铁路线以北区域创造一个战场，在该区域消耗敌人的兵力，把问题摆在元山、平壤线的正面，而以德川、球场、宁边以北以西区域为后方，对长期作战方为有利。目前是否能办到这一点，请依情况酌定。

同日，毛泽东再次来电，确定由宋时轮率领第九兵团（辖第二十、第二十六、第二十七三个军）立即入朝，全力担负东线的作战任务。毛泽东在电文中说：

江界、长津方面应确定由宋兵团全力担任，以诱敌深入寻机各个歼敌为方针。尔后该兵团即由你处直接指挥，我们不遥制。九兵团之一个军应直开江界并速去长津。

毛泽东的支持和信任使彭德怀加强了实施新的战役计划的决心。尤其是在东线，参战的兵力将达三个军，这样不但可以把第四十二军调到西线作战，而且当新的战役开始时，侧翼的安全问题可以大致放心了。

八日，对新的战役有了明确计划的彭德怀召开了一次作战会议。彭德怀在会上说:“麦克阿瑟不是很狂妄嘛，不是瞧不起我们嘛，不是不相信我们的大部队已经过江了嘛，我们就利用他这个判断失误，示弱于敌，诱敌深入，然后寻机歼灭。”

彭德怀这时已经找到了麦克阿瑟的致命的弱点，这就是联合国军东西两线之间的一个宽达八十至一百公里的缝隙。美军在北进中分为东西两军，而且东线由阿尔蒙德指挥的第十军不隶属于沃克将军指挥，而是由麦克阿瑟直接遥控。

诱敌深入，寻机歼灭，这是一个极其大胆的、风险也极大的计划。联合国军已经开始向北进攻，中国军队处在大战刚过十分疲劳的状态中，怎么个诱敌法?在什么地方部署V形战场?由哪支部队来诱敌深入?在军事历史上，最后的胜利才是评价战役部署的证据。彭德怀知道这个新的战役计划的冒险性。

彭德怀在温井以北的那间木板房内大声地质问第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梁兴初！我让你往熙川插，你为什么插不下去?你是怎么搞的?什么主力?主力就这么个战斗姿态?三十九军在云山打美军骑兵第一师打得很好，四十军在温井包围伪六师也打得不错，就你三十八军一再地推延攻击时间，不仅没有歼灭熙川的敌人，还延误了向军隅里、新安州穿插的时间，斩你的头都使得！”

V字形的开口处没有封闭，彭德怀无法饶恕这样的失误。

天寒地冻中，梁兴初一头热汗。

这个中国军队著名部队的指挥员也许就是在这个难堪的时候下定了向美军复仇的决心。

作战会议决定的部队调动部署是：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军运动到德川、宁边，迂回到敌人的后面，准备断敌后路，迂回包围敌人。第三十八军的一一二师在熙川一线边打边撤，引敌上钩。第四十二军把东线的防务交给第九兵团后，运动到宁边。第三十九军和第六十六军分别集结于泰川、龟城待机，形成一个口袋。第五十军严密警戒海岸。

彭德怀知道，麦克阿瑟现在的部署也是一个V形，即东西两线的联合国军队将在江界以南的武坪里最后衔接，把中国军队全部装在巨大的口袋里。但是，麦克阿瑟的口袋实在是太大了，彭德怀对这个口袋能否最后合拢很不以为然。

彭德怀现在最放心不下的是志愿军官兵的温饱问题。负责后勤的副司令员洪学智更是焦急万分，彻夜难眠。由于美军飞机对中国军队后勤供应线不分昼夜的封锁，各军不断打来前线士兵挨冻受饿的电报。彭德怀怒火万丈："我们不能让战士做无谓的牺牲。打仗打死了没有话说，但不能看着战士白白地冻死和饿死。为了争取在第二次战役中取得更大的胜利，应抓紧时间解决志愿军的粮食、弹药、装备、服装的供应问题，否则将对第二次战役歼敌计划造成极大的影响。"

经过协商，彭德怀给中央发去一封电报：

前线汽车损坏甚大，志愿军总共一千台车，据不完全统计，已遭敌机炸毁损坏者达六百台以上。现宋兵团已过江，运输甚为困难，部队经常断炊，下一战役粮食准备更成问题。因此现由满洲里向大连运送之苏方汽车一千台，无论如何，请设法借用。如何请速复。

毛泽东回电算了一笔账：

苏联汽车不久可到第一批，损车虽多，是可以补充的。以平均每天损车三十辆计一个月损车九百辆，打一年仗也不过损车一万辆左右。并且损坏之车，有些可以修好，有些可以取回若干零件，又可缴获一部，故汽车是完全有办法的。

苏联的汽车没到，苏联驻北朝鲜大使来了。金日成军队里的苏联顾问们对彭德怀居然在追击中下达撤退的命令极其不满。在彭德怀向苏联大使解释了诱敌深入的计划之后，苏联大使说："中国共产党消灭了强大的敌人，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不应该有任何的怀疑。"但是，在提出中朝军队统一指挥的问题时，金日成依旧是一种不置可否的态度。金日成不愿意把北朝鲜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一个异国的军事指挥员，尽管目前北朝鲜人民军已经没有几个师团了。

十一月八日，联合国安理会投票讨论麦克阿瑟关于中国干涉朝鲜的报告。美国人幻想着让中国人紧张的心情放松一下，表明美国无意侵犯中国的边境。于是，联合国邀请一个中国代表参加联合国讨论朝鲜问题的会议，美国表示愿意和中国人对话。

安理会讨论了两个提案。一个是美国的提案，呼吁中国军队撤出朝鲜，并且确保联合国军驻留朝鲜，直到在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的监督下，建立一个"统一的和民主的政府"。法国人对此提出了另一个提案，要求联合国军"对军事安全的必要性以应有的考虑"，采取措施防止破坏鸭绿江的水电设施。对于这个提案，美国人提出修改措辞的建议，以便给予麦克阿瑟处理军事事务的权限。法国人同意了，但要求保留这样一句话，已肯定联合国的政策是"确保中国与朝鲜的边界不受侵犯，并充分保护中国在边界地区的合法利益"。但美国人表示这句话"完全不能接受"，因为这实际上会"给进行攻击的中国飞机提供了一个庇护所"。在西方国家的争执中，这一次，苏联投了否决票，理由是"只有在有中国代表在场的情况下才能讨论这个问题"。

对于联合国提出的邀请，中国政府简单地通知联合国，中国将不参加关于麦克阿瑟的报告和美国提案的任何讨论，但中国愿意派出一

个代表团去联合国讨论“台湾问题”，并说由十四名外交官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已经出发。联合国开会的日期是十一月十四日，但那一天根本不见中国人的影子，原来中国代表团正不明原因地在路上磨蹭着呢。他们取道莫斯科、布拉格和伦敦，从中国到美国一共走了十三天，到达联合国的时候已经是二十四日了——有媒体一语双关地说：“这足以证明中美两国之间的距离是多么的遥远。”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对于朝鲜战争，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

美国人虽然没把中国参加朝鲜战争的真实原因搞明白，但从中国愿意就“台湾问题”进行磋商的态度中还是似乎感到了点什么。同时，到了二十五日天亮的时候，当朝鲜战场上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时，美国人终于明白了中国代表团为什么非要磨蹭到二十四日才到达美国。

在联合国军小心地恢复向朝鲜北部进攻的那些天里，美国人觉得整个世界都让人捉摸不透。

“甚至成吉思汗也不敢冬天在朝鲜打仗。”美军第八集团军的军官们这样说。至于没有及时地判断出彭德怀“诱敌深入”作战意图，事后美国情报专家把责任归结于在美国的图书馆里找不到毛泽东的著作。毛泽东的著作的翻译本“在全世界的共产党国家都广泛流行”，他们抱怨说，“一九五四年前，在美国几乎无处寻觅，包括国会图书馆”。美国情报专家指的是毛泽东于一九三八年写就的著名的《论持久战》。因为这部著作里的某些话“对在朝鲜的联合国军来讲是预言性的”：“我们历来主张‘诱敌深入’，就是因为这是战略防御中弱军对强军作战的最有效的军事策略。”毛泽东运用反诘和反答的方式，提出撤退也是一种战术：“英勇决战于前，又放弃土地于后，不是自相矛盾吗？吃饭于

前，又拉屎于后，不是白吃了吗？”美国人后来不得不认为毛泽东在这部书里提出的一个口号是不朽的：

敌进我退

敌驻我扰

敌疲我打

敌退我追

不管是谁进谁退，朝鲜战场的现实是：两个大国已经进入真实的战争状态。奇怪的是双方在这之前谁都没有互相宣战过——这恐怕是世界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

# 第三章 三十八军万岁

## “不是一支不可侮的力量”

日本出版的《朝鲜战争名人录》中，有那位拿下飞虎山的中国团长的名字：范天恩。其文字说明是：

> 范天恩，一九五〇年任团长。率部参加韩战。第一战役中，指挥仅有短兵火器的一个团（政委赵霄云）穿插到联军第九军后方，抢占飞虎山（六二二点一高地），威胁第九军补给总站军隅里。后受联军南韩第七师及美五团一部在大量空炮战车支援下的反扑，坚守五昼夜，主动脱离敌军，于是成名。

范天恩，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老战士，担任过连、营的军政指挥员，在纵队和军一级机关中任过参谋，以军事学识丰富和作战凶狠闻名。一九五〇年任第三十八军作战科长，部队即将入朝参战的前夕，在他的强烈要求下，调任第三十八军一一二师三三五团团长，时值他新婚蜜月。在入朝前的誓师大会上，他代表三三五团提出“创造模范团”的口号，并向兄弟部队提出挑战，挑战的条件是：“以我一个团消灭敌人的一个团。”

根据彭德怀“诱敌深入”的计划，中国军队各部此时正向指定地域集结。而麦克阿瑟也已命令西线联合国军各部队开始试探性北进。在西部的整条战线上，以南朝鲜第七师和美军一部在价川和军隅里地区的前进最为迅速。价川和军隅里都是联合国军配合东线的美第十军完成麦克阿瑟“钳形攻势”的必经之路，也是迂回到江界的必经之路。为了不让联合国军北进的速度太快，影响中国军队的调动和威胁中国军队的侧后，必须依据飞虎山之险进行阻击。

十一月五日，经过血战占领飞虎山阵地后，彭德怀命三三五团“就地防御”。

飞虎山阻击的任务落在了三三五团身上。

尽管第三十八军在第一次战役中没能完成预定任务，但这支部队在彭德怀心中依然是拥有很强战斗力的部队。阻击北进的敌人，一旦有差错，将会导致整个战役计划的落空。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在后来的回忆中特别强调了当时选择阻击部队的谨慎态度：

> 诱敌深入，一般是用非主力部队。但彭总却是用主力军中的主力师三十八军一一二师来打。一一二师原来是四野的第一师。在选择打阻击的师时，彭总征求过邓华和我的意见。我们向他建议，如用最强的部队，那么，就用这个师。用最强的部队是因为敌军战斗力很强，打阻击的部队，既要达到诱敌深入的目的，又能顶得住敌人。顶不住敌人，被敌人一下子冲进来，还谈什么调动部队、装口袋呀？后来有人说在二次战役中一一二师没使上劲儿，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一一二师在第二战役中的劲儿正是使在了这个关键的地方。

范天恩知道三三五团在飞虎山的阻击意味着什么。

应该说，在打阻击的时候，范天恩作为一个团长，也许并不知道志愿军指挥部“诱敌深入”的计划。但是，如果阵地丢失了，三三五团的每一个官兵都清楚，敌人将会通过飞虎山，向北长驱直入，而朝鲜半岛的北边就是中国。

范天恩走上飞虎山阵地，看见由进攻仓促转入防御的士兵们正在挖工事。进攻的时候，士兵们已经把妨碍冲击的小锹和小镐都扔掉了，现在，他们只有穿着被淅淅沥沥的雨淋湿的棉衣，用手、用刺刀挖着坚硬的石头，不少士兵的双手因此鲜血淋淋，血和土和雨混合在一起，像和泥一样。当没有任何战斗经验的文化教员戴笃伯冒着敌人的封锁炮火把小锹送上阵地时，三三五团的士兵们看见小锹竟然哭了。

范天恩对文化教员说：“你这个知识分子行！”

十一月六日，南朝鲜第七师在美军的配合下开始进攻了。位于飞虎山阵地最前沿的是三三五团二营五连三排。天刚亮，飞机和大炮一齐向三排阵地开始轰击，石头变成粉末，树木全部变成光杆，整整一个白天，三排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晚上，南朝鲜士兵把三排阵地旁边的树木和枯草全部点燃，三排的阵地陷入一片浓烟和烈火之中，南朝鲜士兵借着烟和火的掩护又冲上来，排长马增奎带领士兵隐蔽在阵地的侧翼，当敌人已经十分接近的时候，他们投出手榴弹，把敌人连同烧到阵地上的火焰一并炸掉。敌人退下去后，三排的士兵听见山下传来哭声，探出头去看，见南朝鲜军官正用棍子惩罚士兵。南朝鲜士兵又一次往山上爬，他们更加胆小，在距离中国士兵大约还有三十米的地方不动了。马增奎的命令是：敌人不到二十米不准开枪。可南朝鲜士兵就是不爬到二十米的距离。突然，一个等得心急的战士开了一枪，南朝鲜士兵顿时挤成一团往山下跑去。

这一天，三排以伤亡一半的代价，打退敌人的七次进攻。

四连和六连在飞虎山打得也很苦，伤员不断地被抬下阵地。六连连长刚被抬下来，指导员也紧跟着被抬下来。指导员伤得很重，他大声地叫唤。营教导员劝他不要叫，他捂着伤对教导员说："六连完啦！"

教导员说："阵地丢了？我不信！通信员！跟我上！"

教导员上了六连的阵地，漆黑的夜色中果然不见一个人。他用手在工事中摸，摸到一个活着的，是班长张德占。教导员问其他人在哪里，张德占说排长死了。教导员说："任命你为排长，赶快召集人！"

阵地上终于凑起几个人。清点后发现，连干部除了副连长外已全部伤亡。教导员当即任命副连长为连长，任命文化教员为副指导员，并立即带领所有的人抢修工事，准备阻击敌人的进攻。

天亮了，南朝鲜第七师所有的炮兵都在炮轰飞虎山，连位于价川的联合国军炮兵也在向飞虎山轰击。

中国士兵经历的是一场残酷的战斗。

当范天恩在指挥所里向上级报告战况时，团警卫连在敌人的猛烈攻击下顶不住了，副指导员和一个排长跑下阵地对范天恩喊：“团长！快撤退！敌人上来了！”

范天恩一动没动：“阵地丢了？”

副指导员和排长支支吾吾地说不清楚。

范天恩立即给山上的营长陈德俊打电话，得知冲上阵地的敌人已经被打下去了。范天恩转过头来，脸色阴沉地对团侦察参谋说：“尹曰友！把这两个人用绑腿捆起来，枪毙！”

尹曰友押着两个人走了。团政委赵霄云觉得人命关天，于是打电话给师指挥所，结果师政委不同意枪毙，说：“可以给他们锻炼的机会。”

山上的陈德俊听说团长要毙人，更不同意：“山上伤亡大，人越来越少，枪毙了不是更少了嘛。”

副团长赶快把尹曰友追回来，给两个人松了绑。

范天恩的脸色更加阴沉了：“给我到最前沿的五连当兵去！”

陈德俊在山上见到两人后破口大骂：“笨蛋！要跑怎么不往我这里跑？再说，临阵脱逃是什么行为？这事不算完，到五连看看人家是怎么打仗的！”

副指导员和排长后来都因为作战勇敢提升了。

六日至七日，联合国军加强了进攻的力度。双方在三三五团二营五连的阵地上反复争夺达十六次，其中多次进入肉搏战状态。五连士兵李兴旺头部受伤，正在给自己包扎的时候，三个美国兵抱住了他。他在夺枪的过程中把一个美国兵踢下了山崖，同时开枪打死另一个，然后用美国兵尸体上的手榴弹把第三个美国兵炸伤了。李兴旺的这个排打到最困难的时候，阵地上没有倒下的只剩了排长和三名士兵，他们的弹药全部来自战友和敌人的尸体。在中国解放战争中获得过“独胆英雄”称号的士兵李永桂，当阵地被敌人用汽油点着完全湮没在火海里时，他带头跳出战壕向敌人扑去，火海中突然出现的他把敌人吓得掉头滚向山下。弹药没有了，他跑回连部要来十几颗手榴弹和一挺机枪。第二次要弹药时，他的左腿被炸断，他拖着一条断腿把一箱机枪子弹弄上山。这个出生于贫苦人家的青年士兵在阵地上一直战斗到腿上的血流尽。

中国军队没有任何一种对空防御武器，美军飞机因此得以进行疯狂地扫射。第三十八军一一二师的指挥所在一个山洞里，本以为山洞里不会有什么危险，但是，由于这个山洞也兼收伤员，伤员的大量抬进让美军飞行员发现了目标。美军飞行员驾驶着飞机在山沟里钻，把堆在洞口的汽油桶打着了。在浓烟和烈火中，洞内的空气令人窒息，跑出洞的人在美军飞机的扫射下纷纷倒下。美军飞机确定了中国官兵的这种处境后，便有大批的飞机云集而来，这个名叫瓦洞的小山沟顿时成为大批战机的扫射场。据事后统计，在这场空中袭击中，中国官兵死亡两百三十人，其中多数是年轻的女兵和营团级军官。

在飞虎山阻击的艰难日子里，最困难的还是吃饭问题。

五连的机枪手梁仁江饥饿中把一块石头放在嘴里啃，士兵们惊讶地看着他，说：“石头能当饭，要庄稼人干什么？”

梁仁江说：“不信你们试试，口水一多，饿就差了点劲儿。”

这个发明很快在阵地上普及了，飞虎山阵地上响起一片啃石头的声音。

在这种声音中，就有士兵说：“咱们有飞机就好了，打四平那会儿，看见过国民党空投吃的东西，降落伞八床被面那么大，鸡蛋挂在上面落地都不碎！”

三三五团的民运股长冯孝先奉命筹粮。他找到了因对中国军队不了解而藏起来的朝鲜农民，讲了很多道理，又找到一座铅矿的宿舍，得到朝鲜工人们的同情。一个郡的委员长带头把自己的耕牛杀了，让群众把这头牛煮了六大锅肉汤。同时，朝鲜农民们凑了些大米，在美军飞机的扫射下点火做饭。通往三三五团阵地的路上，每一条小路都在美军飞机的严密封锁下，但是，在纷乱喧嚣的弹片中，还是出现了一支头顶瓦罐的送饭队伍。带路的是一位六十多岁的朝鲜老人，他戴着一顶中国士兵看上去有点像中国古代县官戴的那种带帽翅的纱帽。队伍里前面的人倒下去，后面的人默默地顶替上来，平静而顽强地向飞虎山前进。一位叫朴孝男的妇女顶的是一只装米饭的木盆，她被弹片击中倒下后拖着木盆爬，一直爬到了阵地上。中国士兵捧着饭眼泪汪汪地吃不下。敌人又开始进攻了，士兵们把米饭放下，说：“妈的，老子不吃了，打他个狗日的！”送饭的朝鲜农民和工人们也参加了战斗。当再一次打退敌人的进攻时，阵地上伤亡的人包括了那些送饭的朝鲜百姓。朝鲜妇女朴孝男往飞虎山上送米饭的那只木盆被中国士兵保留下来，后来，这只木盆成为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珍藏的历史文物。

十一月八日，是三三五团在飞虎山阻击的最后一天，也是最艰难的一天。美军出动飞机八十多架，数百门大炮一齐轰击，飞虎山上的各个阵地最后全部进入肉搏战状态，嘶喊声和呻吟声在长达五公里的

阵地上长久地回荡。联合国军的士兵知道中国士兵已经没有弹药了，肉搏一阵后就干脆退后二十米休息，然后再一次扑上来。飞虎山阵地在双方士兵的扭打中反复易手，混战从日出一直延续到日落。

这时，上级让范天恩到师部开会。

范天恩说他离不开这里，他一走会动摇军心。

师长命令道:“你必须亲自来！一切后果我负责！”

原来，上级命令三三五团后撤三十公里。

范天恩一听就火了:“退？拼死拼活没让敌人前进一步就落了个撤退？再退不就是鸭绿江了？士兵的工作做不通！”

师长说:“这是命令！执行！”

三三五团在飞虎山阻击了整整五昼夜，抗击着南朝鲜军一个师和美军一部极其顽强的进攻，毙伤俘敌一千八百人。

范天恩不知道，此时彭德怀发现联合国军的北进速度不快，怕是第三十八军顶得太狠了使麦克阿瑟北进的决心有变化，于是决定让他们抬一下手。

三三五团的撤退，令进攻的联合国军大喜过望。

当天，三三五团转移到九龙里一带，继续设防诱敌。范天恩知道了诱敌计划之后，便在这里与联合国军开了个玩笑：先在一个小小的无名高地上打阻击，敌人第一轮冲击被打下去后，命令部队迅速撤出阵地，跑到很远的山头上看热闹。准备第二轮进攻的联合国军先是向高地进行大规模的炮击和轰炸，然后进攻，占领了山头发现空无一

人，正在纳闷，美军配合作战的飞机飞临高地上空开始例行公事般的轰炸和扫射，联合国军士兵们的结果自然十分悲惨。

三三五团在九龙里一带边打边撤阻击了五昼夜。所不同的是，已经不再像飞虎山那样死守了。他们或者进攻一下，然后撤退；或者占领一处高地后拿出坚决死守的样子守上两天，又撤退了；或者突然前进，深夜摸下几个山头后就没了踪影。让敌人跟上来，又不让他能够真正跟着，这是靠在树干上就能睡觉、几粒玉米粒就能维生的中国士兵很乐意干的事情，也是中国军队的看家本领。世界上当时只有日本军队和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军见识过这种没办法阐述明白的战术，现在轮到南朝鲜军和联合国军品尝这种晕头转向的滋味了。

中国第四十军一一九师三五六团也是担任诱敌任务的一个团。团长符必久策划了一整套诱敌深入的方案。十一月十日在天佛山一带接触到北进的美军骑兵第一师后，他们在每一个山头都坚决地阻击一阵，再不断地放弃，一直撤退到主峰。在主峰阵地上，他们大规模地阻击了整整一天，双方伤亡都很大。但到了晚上，天一黑，三五六团又撤退了，在预定的二线阵地等着骑兵第一师的到来。结果一等就是三天，这可把符必久紧张得够呛，他怕因为顶得太厉害美军不来了。直到十六日，他们终于发现了美军的侦察队，三五六团立即主动接火，猛打了一下又跑了。他们就这样和美军骑兵第一师打一下退一下，终于师里来电说，美军已经错误地认为“共军是向北逃窜的残部”，符必久这才放下心来。

但是，彭德怀还是认为沃克这个多疑的司令官前进得太慢。联合国军北进的速度是对中国军队实力和意图判断的标尺。于是，彭德怀、邓华致电军委，建议释放一批战俘。因为这样的举动至少可以收到两个效果：一是表明中国军队的人道主义精神，二是进一步打破敌军怕杀的心理。

毛泽东对这个建议大加赞赏，立即回电：“你们释放一批战俘很对，应赶快放走，而后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

十一月十八日晚上，寒风瑟瑟。在战俘营中挑选出来的二十七名美军战俘和七十六名南朝鲜战俘在理了发、洗了澡、发了路费和吃了一顿加餐后，由志愿军组织科长司东初和司机王大海带领，乘卡车向云山地区出发。在阵地前沿，司东初对战俘们说：“你们万一过不了美军的警戒线，就回来，我们欢迎！”

同时，第四十二军也在诱敌中开始释放战俘。为了让战俘相信我军在连连败退，军部命令部队故意在撤退的路上丢下些枪支和背包。

第三十九军在释放战俘前，志愿军的军官面对战俘们讲话，内容是：我们不是什么主力部队，我们向后转移了，不打仗了，我们没有弹药和药品，准备回国了。经过在前沿与美军的交涉，中国士兵把受伤和有病的战俘用担架送到公路边上，然后后退，让美军把担架抬走。

后来担任美国远东部队司令官的李奇微将军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中国人释放俘虏的做法，与北朝鲜人对待俘虏的做法完全不同。有一次，中国人甚至将重伤员用担架抬着放在公路上，尔后撤走。在我方医护人员乘卡车到那里接伤员时，他们没有向我们射击。”

美联社记者怀特在十一月二十三日所写的报道中说：“被释放的美军俘虏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对他们很好。他们得到和志愿军一样的口粮。志愿军曾用他们有限的设备治疗这些伤兵。中国人不搜美国人的口袋，并且让他们留着他们的香烟、金表和其他私人的东西。”

中国军队释放战俘立即引起强烈的国际反应。同时，也引起美军情报部门的极大恐慌。美国人极力想知道中国军队的此举将对他们正

在进行的战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美军战史资料显示，他们当时曾分析说，中国人往往要求被释放的战俘明白：“你们是资本主义压迫的牺牲品，只有逃脱帝国主义的地狱，才能获得共产主义天堂的自由。”中国人要求战俘把中国军队的人道主义精神“告诉你们的同伴”，“敦促你们的同伴掉转枪口对准你们的军官”。这些言论的出现是因为西方人根本不了解中国人和中国军队。西方人不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还是一支农民游击队的时候，其制定的第一部军纪中就明确写有“不许虐待俘虏”的条款。

在朝鲜战争第一次战役处于收尾阶段的十一月五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曾专门给金日成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介绍中国军队优待俘虏的政策和经验。

由于自古以来战争中士兵的命运飘忽不定，战俘的命运更是岌岌可危，因此很有必要再次抄录彭德怀长信的主要内容，因为其字里行间蕴涵着一个千年古国的文明标准。

彭德怀说：

由于我们采取了上述俘虏政策，也就是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使敌人的战斗力逐渐减弱，并争取了广大俘虏补充了自己。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有一部分战士是由俘虏兵补充的。在解放战争中，我们的兵源主要是靠俘虏。这些被解放过来的俘虏，经过教育改造之后，很多都愿意参加革命队伍，有好些人已经在解放战争中成了战斗英雄和人民功臣，这证明俘虏是可以争取和能够改造的，也证明毛泽东同志的宽待俘虏的政策完全正确。

在我们革命初期，甚至以后个别地方，有些同志愤恨敌人的残暴，对俘虏官兵采取报复态度，这是很难免的。但这种报复行为，对革命非常不利，因为这种报复仇杀的结果，足以给敌人造谣的借口，只能促进敌人内部的团结，增加敌人的战斗力。如果个个敌人都需要硬拼，那么取得革命胜利的代价就更大了。因此，对有的同志这种错误的报复行为，必须进行耐心的、坚决的说服教育，使之彻底改正，才能瓦解敌人，壮大自己，取得革命的胜利。

朝鲜人民进行的战争，是争取朝鲜独立、民主和自由的革命战争，经过宽待俘虏，将这一真理传达到敌军中去，根据中国的经验其效果将是很大的。对俘虏进行宽大和教育改造工

作，这正表示了劳动人民及其军队光明磊落的伟大气魄，具有这样气魄的革命军队必然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上述经验特为介绍，供你们今后对待俘虏的参考。

在中国军队的诱惑下，联合国军终于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错觉，即他们所实施的猛烈的空中轰炸，已迫使中国志愿部队不能进入战场，而兵力有限的参战部队也在联合国军优势火力下失去作战决心，中国军队“不是一支不可侮的力量”。

而此时，在西线的中国军队第五十、第六十六、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四十二、第三十八共六个军已分别移至定州西北、龟城、泰川、云山、德川以北以及宁边以北地区，东线第九兵团的三个军也全部到达预定地点。

十一月二十一日，西线的联合国军已经进至麦克阿瑟制定的“攻击开始线”，完成了战役的全线展开。北进的美第八集团军指挥着美第一、第九军和南朝鲜第二军团共三个军、八个师、三个旅和一个空降团。在其左翼，美第一军指挥美第二十四师、南朝鲜第一师、英军第二十七旅由嘉山里、古城洞地区分别向新义州、朔州方向进攻；美第九军指挥美第二十五师、美第二师由立石里、球场地区分别向碧潼、楚山方向进攻，其第二梯队土耳其旅位于军隅里地区；美骑兵第一师位于顺川地区机动。在其右翼，南朝鲜第二军团指挥南朝鲜第七、第八师，分别由德川以北寺洞和宁边地区向熙川、江界方向进攻，这一方向的第二梯队南朝鲜第六师位于北仓里、假仓里地区机动。英军第二十九旅位于平壤，美空降一八七团位于沙里院，为西线第八集团军的总预备队。

在东线，由麦克阿瑟直接指挥的美第十军，辖美陆战第一师，美第七、第三师由长津湖向武坪里、江界方向进攻。南朝鲜第一军团指挥南朝鲜首都师、第三师沿东海岸向图们江边推进。

至此，联合国军已经全部被诱至预定战场，进入了一个西起清亭里，经泰川、云山、新兴洞到宁边以东的约一百四十公里的弧形突出地带的大口袋里，在这个大口袋的口上集结着预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共九个军。彭德怀梦寐以求的战机终于来到了。

## 闻到中国饭的味道就撤退

感恩节，起源于北美洲的英属殖民地普利茅斯。该地居民在一六二一年获得丰收后，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以“感谢上帝”，之后逐渐形成一个固定的节日，名为感恩节。节日的时间是每年十一月的第四个星期四。

一九五〇年的感恩节为十一月二十三日。

东京，麦克阿瑟的豪华官邸在十一月二十三日点起了感恩节的蜡烛，餐桌上刚出烤炉的火鸡散发出令人愉快的香味，麦克阿瑟和家人一起做了“感谢上帝”的祷告后，开始享用节日的晚餐。麦克阿瑟在餐后甜点之后又破例倒了一杯香槟酒，然后站在窗前凝望着东京的万家灯火。此时，收音机里的播音员正在描述朝鲜前线美军士兵感恩节的菜单，让人听上去不像是在报道一份战壕中的菜谱，更像是在介绍高尔夫俱乐部里银行家们的一次聚会：鸡尾酒、夹馅橄榄、烤小公火鸡加酸果酱、水果沙拉、蛋糕、馅饼和咖啡。麦克阿瑟对这份菜单的具体内容不感兴趣，天一亮他将亲自飞往朝鲜前线，他要到那些美国小伙子中间去转转。如果记者们能拍一张麦克阿瑟将军和美国士兵一起讨论火鸡味道的照片，并在报刊上发表，这个感恩节就圆满了。

二十四日，美第八集团军指挥部所在地新安州的上空天气晴朗。麦克阿瑟的专机降落在坑坑洼洼的跑道上时，以沃克将军为首的军官们恭敬地迎接了他。穿着派克大衣的麦克阿瑟走下专机，并没有先和他的军事将领们握手，因为他知道记者们对这样的照片不感兴趣，于

是他出人意料地先蹲下身来，拍了拍美第一军军长米尔本带来的一只名叫埃贝的德国种小狗的脑袋，似乎还说了一句玩笑话。记者们拍下了这张轻松愉快的照片，并在没有听清楚麦克阿瑟说的是个什么玩笑的前提下，与在场的美国将军们一起咧开嘴笑了起来。

接着，麦克阿瑟乘吉普车到前线进行视察。

麦克阿瑟半开玩笑地责怪了沃克将军行动缓慢，沃克一直对这个问题采取一种不表态的态度。他听见麦克阿瑟对美第二十四师师长丘奇少将说："我已经向第二十四师的小伙子们的妻子和母亲们打了保票，小伙子们将在圣诞节回国。可别让我当骗子。赶到鸭绿江，我就放你们走。"

麦克阿瑟的话被在场的美国《时代》周刊记者记住了。

记者们抓住这个话题，问："将军，您的意思是否是，这场战争能在圣诞节之前结束？"

麦克阿瑟说："是的。我左翼部队的强大攻势将势不可挡，任何抵抗将是软弱和没有希望的；我右翼部队有强大的海空军配合，将会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左右两翼在鸭绿江边的会合，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战争的结束。"

"将军认为中国军队有多少人在朝鲜？"

"三万正规军和三万志愿军。"

"胜利后的打算是什么？"

"第八集团军调回日本，两个师去欧洲……圣诞节前让孩子们回家！"

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五日，美国各大报纸的标题是：《麦克阿瑟将军保证圣诞节前结束战争》、《圣诞节士兵可以回家》、《胜利在望——圣诞节不远了吗？》……

“圣诞节攻势”这一战役的名称从此有了讽刺的意味。尽管日后麦克阿瑟在他的回忆录中极力否认自己说过类似的话，但是所有在新安州机场上的美军高级将领和大批的记者都是见证，彻底的不认账是不太可能的。麦克阿瑟的参谋长惠特尼将军后来回忆说，当时麦克阿瑟的话是“半开玩笑，但在意思和目的上带有某种肯定性”。麦克阿瑟自己的辩解是：“在和一些军官的谈话中，我告诉他们布莱德雷将军希望圣诞节前把两个师调回国，要是赤色中国不干预战争的话……报界将这句话曲解为我们必定胜利的预言，而且这个伪造的歪曲的解释后来被用来作为狠狠打击我的一个有力的宣传武器。”

麦克阿瑟没法否认的是当天他发表的一份公告：

联合国军在北朝鲜对在那里作战的精锐军的压缩包围现已临近关键时刻。在过去三周里，作为这只铁钳独立成分的各类空军，以模范的协同和战斗力发动了持续的攻击，成功地切断了来自北方的补给线，这样，由此而进行的增援急剧减少，基本的补给明显受到限制。这一钳形攻势的右翼在海军有效的支援下，现已抵达居高临下的包围阵地，把地理上可能有敌人的北部地区一分为二。今天上午，钳形攻势的西段发动了总攻，以完成包围并夹紧钳子。倘能成功，这实际上将结束战争，恢复朝鲜的和平与统一，使联合国军队迅速撤离，并使朝鲜人民和国家得以享有全部主权和国际的平等。我们就是为此而战。

在世界战争史上，没有哪一个军事指挥官会在进攻前光天化日地把自己的进攻计划公开宣布，而麦克阿瑟的进攻路线、规模、兵力、目的等绝对机密的军事内容都像公布旅游计划一样被他的公告“张贴”出来了。英国的《泰晤士报》说，大肆宣扬这次进攻，“显然是一种最奇特的打仗方式”。现在，我们可以认为：“七个联合国师（三个美国师和四个南朝鲜师）以及英联邦旅已准备就绪，去进行据称是最后的进攻，以扫荡从西海岸至南朝鲜部队已经到达地点的这段鸭绿江下游地区。”

麦克阿瑟的情报官威洛比的心情远比他的司令官紧张。这个有名的乐观主义者鉴于第一次战役的教训，在联合国军发起“圣诞节攻势”的前夕，他对中国军队的估计要比以前现实得多。威洛比十一月十五日提醒他的司令官：“大约有三十万有作战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已经在鸭绿江北安东至满浦一百二十八公里的地段集结。来自中国广东的情报也表明，大批火炮、轻武器、弹药和其他军事物资正在装船北运。”

威洛比对于二十四小时不间断飞行的美军侦察机飞行员“没有发现中国军队的踪迹”的报告感到怀疑。他认为中国军队有能力把大部队渗透到朝鲜，因为中国军队善于利用偏僻的道路行军，并利用夜色作为掩护。而且这支军队的后勤支援相对也容易，因为补给线非常短。

关于中国军队机动能力和隐蔽行军的特点，美军战史中描述得十分详细：

> 中共军队强行军的能力是非凡出众的。根据可靠情报，中共三个师从鸭绿江边的安东出发，用十六至十九天的时间行军二百八十六英里，到达了北朝鲜东部的一个集结地域；一个师在十八天里，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平均每天行军十八英里。中共士兵的“白天”开始于夜幕降临的时候，大概在晚上七时左右，直至翌晨三时。拂晓时，即五时三十分，他们要挖掩体，伪装所有的武器装备，然后吃饭。在昼间，只有侦察部队在行动，以寻找第二天的宿营地。主力部队都静止不动加以伪装，从航空照片和空中观察是无法看到的。如果一名中共士兵在白天去掉了伪装，飞机来时他必须在留下他踪迹的地方一动不动，军官有立即枪毙违令者的权力。

尽管美军飞机的空中侦察很严密，但中国军队大兵团的机动开进却没能被发现。朝鲜战争结束后，美、英等国的军事家们将此举称为“当代战争史上的奇迹”。

美第八集团军对为什么没有发现中国军队的大规模调动作出如下解释：

一、在得到相对准确的情报时，一种“不会是那样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左右了判断。任何情报如果指挥官不相信，是不能称为有效情报的。

二、第八集团军的情报组织贫乏。原美二十四师在南朝鲜建立的情报网后来解散了，之后没有再建立有效的情报网。

三、情报技术上没有夜间侦察的有效手段。判读军官不具备识别中国军队的伪装的能力。

四、集团军召集来的侦察军官和判读军官都是些多年没有实战经验的人，岁月已经令他们失去了职业敏感性。

对于始终没有弄清中国军队的准确人数，第八集团军的解释是他们“跌入了中国军队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骗局”。因为，“中国军队规定称呼下降两级使用”，即把军称为某某部队，让人听上去像一个团，师让人听上去像一个营，团让人听上去像一个连。

而第八集团军司令官沃克表示，这些论调统统是失败后的牵强的推托。

在麦克阿瑟眼里，沃克是个胆小而怯懦的人。在新的战役即将开始的时候，沃克不再为麦克阿瑟武断的指挥方式和把第十军独立于他的指挥之外感到愤怒。此刻，更令他忧虑的是他的第八集团军将要面临的扑朔迷离的战场。第八集团军与东线的第十军之间巨大的间隙使右翼“危险地暴露”着，这一点让沃克感到忧心忡忡。当麦克阿瑟命令他十一月十五日开始进攻时，沃克表示第八集团军还没有得到应有的供给，而他的部队每进攻一天就需要各种物资四千吨。于是，麦克阿瑟不得不将进攻时间改为十一月二十日。可随后沃克的消极准备又使进攻时间推迟到二十四日。究竟沃克的这种拖延是不是正好给了彭德

怀调动部队的时间且不说，美军的军事学家对沃克的这种谨慎给予了看似离奇但十分有哲理的分析，他们说沃克之所以这么做是出自于他对中国军队的“某种敬佩”。沃克对他的一个密友说，尽管麦克阿瑟的命令要坚决地执行，但他的准备是一旦情况有变就撤退。因为他强烈地预感到：“中国军队肯定在一个什么地方等着我们呢。”

为了与东线的美第十军联系上，以确保进攻中的相互协同，沃克派出巡逻队去寻找第八集团军侧翼的友军。结果巡逻队的报告说，第八集团军的侧翼“好像存在一支部队”。在即将开始进攻前的记者招待会上，沃克将军的话令在场的新闻人士都感到气氛十分不对头。《读者文摘》记者詹姆斯·米切纳后来回忆说，那次记者会是他“所有记忆中最为阴郁黯淡的事”。

记者问：“沃克将军，你说你的巡逻队已经与右翼建立了联系，他们是友邻部队吗？”

沃克回答：“我们是这样认为的。”

“难道您不知道吗？”

“我们认为他们肯定是友军。”

“你们与右翼没有任何联系吗？”

“没有。我们是各自独立作战。但我们确信，那些部队肯定是友军。”

几天之后，当战斗打响时，沃克知道了他的巡逻队看见的那支“友军”，其实是一支迂回运动中的中国军队。

对麦克阿瑟的“圣诞节攻势”提出强烈质疑的不止沃克将军一人。——“五角大楼惊恐不安地注视着麦克阿瑟结束战争的攻势。”美国陆军副参谋长李奇微认为，把第八集团军和第十军互相不联系地分成两路进攻，是给了善于穿插和分割的中国军队一个绝好的机会。这种部署是西点军校最低级的见习学员才会干出的事。他接着以嘲笑的口吻讥讽了麦克阿瑟的所谓“进攻”：“尽管麦克阿瑟把这次向鸭绿江的推进称为‘进攻’，但实际上不过是一次接敌运动。在未弄清楚敌人的位置之前，在敌军部队根本就未与你的部队接触之前，你是无法向敌人发起进攻的。很多野战部队的指挥官都相信，中国的强大部队一定正在什么地方待机。而且，有一两位指挥官还对不顾侧翼安全、不与两翼友邻部队取得联络而盲目向前推进的做法十分明智地表示怀疑。但是，却没有一个人知难而退，而且很多人还表现出与总司令相同的那种过于乐观的情绪。”

连杜鲁门也对麦克阿瑟“圣诞节前结束战争”的论调表示怀疑，尽管这种怀疑是在事后说出来的：“我们当时应该做的是停止在朝鲜颈部这个地方（他用手指着一个地球仪说），那是英国人所希望的。我们知道中国人在边界线有近一百万人以及诸如此类的事，但麦克阿瑟是战地指挥官。你挑选了他，你就必须支持他，这是一个军事组织得以运转的唯一方式。我得到了我所能够得到的最好的意见，而在前线的这个人却说，这件事应该这样做。所以我同意了。这是我作出的决定，不管事后怎样来看。”

连总统都拿麦克阿瑟没有办法，其他的高级军事幕僚们又能做什么？国务卿艾奇逊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政府失去了制止朝鲜走向灾难的最好机会。所有有关的总统顾问，不论是文职还是军职，都知道出了毛病，但是什么毛病，怎样找出来，怎样来处理，大家都没有主意。”

麦克阿瑟作为一名驻国外的军事将领与本国政府和本国最高军事决策机构的关系，已成为二战后世界政治史和战争史上最奇怪和最荒诞的关系。“他总认为我们是一群毛孩子。”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将军说。这个比喻极其生动，但是美国作家约瑟夫·格登说得却更妙：“五角大楼的主要罪过是胆小怕事。参谋长联席会议在麦克阿瑟面前就像学校的男孩子在城里遇到街头恶霸一样怕得发抖。”

十一月二十三日，感恩节这天早晨，彭德怀拿着放大镜在地图上晃来晃去，他把邓华、洪学智和解方叫来，指着地图上的德川和宁远说：“就在这里！就在这里！”

彭德怀等待的战机已经明朗：联合国军的右翼已经形成明显的薄弱部位，这个部位就在德川和宁远地区。在这个地区的联合国军是南朝鲜第七师和第八师，而将与之对阵的是中国的第三十八军和第四十二军。应该说，这是彭德怀预想中的最理想的状况。南朝鲜军队根本不是中国军队的对手，从这个部位插进去，可以直捣西线联合国军的大后方。彭德怀似乎已经能够看见南朝鲜的两个师全军覆灭的结局。

彭德怀立即给第三十八、第四十二军发电：

> 你们应以求得全歼德川地区伪七、八两师为目的……你们攻击时间，于二十五日晚开始，宋兵团于二十六日开始。清川江西岸各军，则视情况发展而定。以上请韩先楚同志根据实际情况做调整。总之，以先切断、包围，求得全歼七、八两师为原则。

这一天，除南朝鲜第七、第八师到达德川、宁远一线外，南朝鲜第六师正由价川地区向东转移，北仓里、假仓里由美军第二师接替。与此同时，美骑兵第一师、美第二十四师、英军第二十七旅以及南朝鲜第一师均已进至球场、龙山洞、博川一线。敌情的变化引起中共中央军委的注意，特来电报：

> 我在清川江东岸发起攻击后，应估计到美二师、骑一师向东增援的极大可能性（当然也有继续北进或原地停止及退据清川江桥头阵地的几种可能）……我三十九、四十两军在美二

师、骑一师东援和据守桥头阵地的情况下，均难达成配合四十二军、三十八军歼灭伪七、八两师之目的……因此，建议以四十军东进与三十八军靠拢，增强我军左翼突击力量……以四十军对付球场、院里方向可能东援之美二师和骑一师，以保证我三十八军、四十二军首先歼灭伪七、八两师，并对下一步对美敌作战造成战役迂回的有利条件。

彭德怀立即对战役部署作出调整：由韩先楚副司令员直接指挥第三十八军和第四十二军，首先歼灭德川、宁远、孟山之南朝鲜第六、第七、第八三个师；第四十军东移至新兴里、苏民里以北，以一个师接替第三十八军一一二师的防务，阻击敌人，其主力向戛日岭、西仓插进，阻止美军东援；在第四十军东移后，第三十九、第六十六、第五十军等部亦逐次东移，逐次接防，以保持战线的完整。当向敌发起全面进攻后，各军应全力向当面之敌进攻，求得歼敌一部。

彭德怀把调整后的计划向毛泽东汇报，并再次确定西线发起攻击的时间是十一月二十五日黄昏，而相应调整后的东线发起攻击的时间是二十六日黄昏。

毛泽东的回电是：

你们本日七时的作战部署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照此执行。

毛泽东不知道，就在他向朝鲜发出这封电报的时候，一件令他终生悲伤的事件发生了。

二十五日上午，美军飞机飞临志愿军指挥部所在地上空，一枚凝固汽油弹落在了指挥部的房子顶上，房子瞬时燃烧起来。因为前一天志愿军指挥部已被美军飞机轰炸过，在洪学智等人的坚决要求下，这天早上彭德怀一行上山隐蔽了。但是，毛岸英和另外几名参谋人员没有上山隐蔽。高温的凝固汽油弹仅用几分钟就将房子烧成了灰烬。当美军飞机离去，彭德怀从山上下来时，他看见了毛岸英被烧焦的尸体。

“为什么偏偏把他炸死？”彭德怀在极度的悲伤中反复念叨着这样一句话。

除了彭德怀和几位志愿军高级指挥员外，没有人知道毛岸英的真实身份。

毛岸英，毛泽东的长子，一九二二年出生于中国长沙，童年时跟随母亲杨开慧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度过。后被中共地下党营救。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和苏联东方语言学院的毕业生，苏德战争时成为苏军的坦克中尉。入朝前是北京机器总厂的党委副书记。入朝后任彭德怀的秘书兼俄文翻译，牺牲时年仅二十八岁，新婚不久。

这是联合国军“圣诞节攻势”开始后第二天发生的事情。

几个小时之后，士兵们用木板钉了个棺材，把毛岸英埋在了山上。

今天，在北朝鲜一个叫桧仓郡的地方，竖立着一块石碑，正面写着：毛岸英同志之墓。背面写着：毛岸英同志原籍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是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长子。一九五〇年，他坚决请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于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毛岸英同志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将永远教育和鼓舞着年轻的一代。毛岸英烈士永垂不朽！

没有联合国军特工人员的现场侦察和标示目标，美军飞机对彭德怀办公地点的轰炸绝不会如此准确。这件事表露出朝鲜战争初期中国方面对战争指挥部的保卫工作的疏忽。

如果彭德怀未听从劝告上山躲避，那么他也不会躲过这场灾难。

朝鲜战争如果没有了这位中国军队的司令官，战争又将是什么样子呢?

麦克阿瑟下达了全线进攻的命令。

坦克和战车发出的轰鸣惊天动地。

记者们在一种莫名的兴奋中向全世界发出了联合国军开始“最后的攻势”的电讯。

麦克阿瑟觉得这里已没他这个总司令什么事了，于是他登上专机，他对飞行员下达的指令让所有在场的人惊呆了:“朝西海岸飞，然后沿鸭绿江往北！”

随行的参谋们立即说不行，因为即使这架专机有自卫武器、有战斗机护航，往鸭绿江飞也是十分危险的事情。情报官威洛比不是多次警告说，苏联的米格飞机已经在鸭绿江上跟美军飞机碰过头了吗? 中国布防在江边的高射炮兵不是已经有了击落美军飞机的记录了吗?

麦克阿瑟说:“我要看看地形，看看苏联人和中国人的迹象……敢于进行这次飞行的胆略就是最好的保护！”

任何反对在麦克阿瑟的旨意面前都没有效果。

记者们害怕了，嘟嘟囔囔道:“有必要这么做吗? ”

惠特尼将军小心地提醒道:“是不是带上降落伞? ”

“你这个绅士愿意的话你就带上，反正我不带。”麦克阿瑟叼着他的烟斗，脸上浮现的是一种嘲讽。

专机起飞了。在西海岸上空转弯后，到达鸭绿江的入海口。

麦克阿瑟命令:“沿着江飞！飞低一点！”

高度五千米。

机翼下是一片白雪皑皑的山地和平原。鸭绿江已经封冻，江水特别湍急的江心偶尔露出黑色的江面。沿江巨大的荒原上，崎岖蜿蜒的道路被厚雪覆盖，没有任何人与交通工具通过的迹象，荒原在迷蒙的风雪中一直延伸到遥远的西伯利亚。

麦克阿瑟什么也没看到。

惠特尼将军后来对那天他从飞机舷窗向下看到的景象难以忘却:“极目远望的是无穷无尽的穷乡僻壤，崇山峻岭，裂谷深峡，近乎于黑色的鸭绿江水被束缚在死一般寂静的冰雪世界之中。”惠特尼感到麦克阿瑟不要降落伞是对的，因为他认为，如遇紧急情况，宁可与飞机同归于尽，也比降落到“这冷酷无情的荒郊野地上”好。

麦克阿瑟因为他的鸭绿江飞行，被美国空军授予了功勋飞行勋章和战斗飞行荣誉徽章。他在记者们崇拜的目光中结束了边境飞行。然后，他的专机向东京飞去了。当飞机消失在云层中的时候，留下来的沃克将军低声地嘟囔了一句:“胡闹。”虽然沃克的声音很小，但在场的所有的人事后都说自己清楚地听见了。沃克将军的助手林奇在不得不回答记者就此提问时说:“沃克将军无论遇到什么恼火的事都不使用亵渎的语言。”

麦克阿瑟回到东京立即发表声明:联合国军此次进攻将很快以胜利告终。

东京《朝日新闻》当日在显著位置用大号字体刊出的标题是:

**联合国军开始总攻势 战乱可望结束**

但是，回到前线的沃克却对美第二十四师师长丘奇少将说：“告诉你的先头部队二十一团的斯蒂文森上校，让他一闻到中国饭的味道就撤退！”

就在麦克阿瑟的专机刚刚掠过的一条荒凉的山沟中，潮湿的山洞里，彭德怀正用冻得麻木的手举着放大镜在看地图。他苦苦地思索着战役打响之后，最关键的第三十八军的方向还可能发生什么意外的情况。

就在美军士兵嚼着香喷喷的火鸡肉、喝着热咖啡的时候，朝鲜北部那一望无边的雪原之中，几十万中国士兵正缩在用枯枝和积雪伪装起来的战壕里，用他们的小铁锹烙一种坚硬的面饼，或者把土豆和黄豆粒烤熟，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准备自己的口粮。中午的饭是煮熟的玉米棒。玉米棒冻得很结实，他们就把玉米棒放在冬天的太阳下晒，晒软一层啃掉一层——由于已经把置敌于死地的一个巨大的陷阱挖好了，等待的时刻，他们吃得很慢很从容。

看不见阳光下战壕边沿上那一排排中国士兵而自称“深刻地了解东方民族的性格”的麦克阿瑟，由此注定了他的“圣诞节攻势”在世界战争史中演绎的必然是一场悲剧。

## 韩国第二军团已经不复存在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黄昏，在清川江以北整个西线的宽大正面上，自西至东，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于博川向英军第二十七旅、第六十六军于泰川向南朝鲜军第一师、第三十九军于宁边向美军第二十五师、第四十军于球场方向向美军第二师、第三十八军于德川向南朝鲜军第七师、第四十二军于宁远向南朝鲜军第六、第八师，开始了全面出击。两天以后，东部战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军也开始了进攻。

中国战史称这次进攻为朝鲜战争的“第二次战役”。

值得注意的是，在朝鲜与北京频繁往来的电报中，毛泽东的一个观点被反复提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这就是：首先歼灭伪第七、第八两个师。毛泽东甚至担心这个方向的兵力不够，要求在布兵上给予特殊的重视。在选择战役缺口这一问题上，毛泽东和彭德怀的观点是一致的：联合国军西线的右翼。

在后来对朝鲜战争诸多的记述著作中，有一个问题被反复涉及，即南朝鲜军战斗力的问题。美军战史中到处可见南朝鲜军队战斗力低下的例子，“一触即溃”、“乌合之众”、“惊慌失措”等字眼儿被反复使用。而在南朝鲜军的战史中，不止一次地表现出对美国人的这种描述的愤怒情绪，南朝鲜军认为美军唯一逃脱责任的办法就是大肆诬蔑南朝鲜军队的无能。

在中国军队发动的第二次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十八、第四十二军负责攻击的正面，是南朝鲜第六、第七、第八三个师的防区。这个防区位于联合国军西线的右翼，也就是毛泽东和彭德怀同时注意的地方。彭德怀的战役设想是，以两个军的兵力在战线的左翼用猛烈的突击迅速打开战役缺口，这个战役缺口一方面可以彻底切断联合国军东西两个战场的联系，另一方面从这个缺口可以横切到联合国军的大后方，从而实施整个西部战线的战役大包围。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彭德怀，都知道这次战役的成败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左翼是否能迅速突破和横向的穿插是否能按时到位。

此时，西线的美军前进速度快，而其右翼的南朝鲜军前进速度慢，于是整个战线形成一个突出部，从而使联合国军的战线被无形中拉长，兵力处于分散分布状态。尤其是右翼的南朝鲜部队已远远地孤悬于大同江两岸。而沃克的部署是把整个战线的右翼全部交给南朝鲜军队。

毛泽东和彭德怀之所以一致认定，中国军队进攻正面的左翼是联合国军整个战线最薄弱的地区，中国的两个军肯定能在这里迅速地突破当面防线，并能不可阻挡地插向联合国军的后方，他们信心的来源很简单：这个地区的对手是清一色的南朝鲜军队。而南朝鲜军队比美军好打得多。

由于左翼进攻的成败关系到整个战役的成败，彭德怀决定亲临战场第一线指挥。他的决定立即遭到志愿军党委会的否决。会议最后决定由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组织志愿军前进指挥所，统一指挥左翼的第三十八军和第四十二军。韩先楚出发前问彭德怀："还有什么交代的？"彭德怀厉声厉色地说："一要插进去，二要堵得住。要接受上次战役的教训，不能再让敌人跑了！"

所谓"上次战役的教训"，指的是在第一次战役中第三十八军在熙川方向贻误了战机。

这次，第三十八军的主攻方向是德川。

军长梁兴初自从在志愿军会议上挨了彭德怀的训斥后，心里一直不舒服。在军党委会上，他传达了彭德怀对第三十八军的批评，同时主动承担了责任："彭老总骂得对，是我没有指挥好！"话是这么说，可性格倔强的战将真实的心态是不太服气：谁不知道第三十八军是赫赫有名的部队？即使在第一次战役中打得不太理想，可歼敌数量不比别的军少，彭老总那句"什么主力"着实有点伤人。

追溯第三十八军的历史，实际上与彭德怀的军事生涯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个军的前身是中国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这支纵队是以中国工农红军为骨干发展起来的。第三十八军三三八团就是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的一部，而三三四团则是一九二八年七月彭德怀领导平江起义后组成的红五军的一部。这支部队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平型关战

役。一九四六年挺进中国东北地区，组成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后，参加了“三下江南”、“四战四平”、“辽西会战”、“攻占沈阳”等战役，战功赫赫。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第三十八军正式组建。在平津战役中，担任主攻天津的任务，最先突破天津城防，攻占金汤桥，歼灭国民党军两万多人。随后挥师南下，参加宜（昌）沙（市）、湘西南、广西等战役。在解放战争中，第三十八军从中国最北边的松花江，一直打到中国西南边境的中越边界，转战十三个省市，解放城市达一百余座，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无可争议的主力部队。

进入朝鲜的第一仗，就变成了“什么主力”。军长梁兴初对部下说：“三十八军到底是不是主力，这一仗看！这一仗要各负其责，谁要是出了问题，别怪我不客气！”

第三十八军的指挥所从球场转移到降仙洞。在一个潮湿的矿洞里，梁兴初长时间地看着地图，他几乎把他的部队要进攻的这块地方上的每一个地名都记得烂熟。

韩先楚到达了第三十八军指挥所。

韩先楚，湖北黄安县人，自参加红军后，从士兵、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师长、纵队司令员、军长，一直到第四野战军兵团副司令员，在漫长的军事生涯中，他在每一个军事职务上都干过，作战经验十分丰富。

韩先楚介绍了整个西线的形势，然后具体说到第三十八军的任务：打下德川，然后迅速迂回敌后。韩先楚说，为了能迅速打下德川，第四十二军先配合第三十八军战斗，然后再打宁远。

梁兴初一听不高兴了：“让四十二军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打德川我们包了！”

韩先楚严肃地说："军中无戏言！"

梁兴初说："二十五日开始进攻，二十六日解决战斗！"

韩先楚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第三十八军要"单干"，而且保证一天打下德川。韩先楚建议，如果第三十八军单独打德川，第四十二军就可同时打宁远，这样粉碎南朝鲜军队的防线会更加利索。彭德怀说："梁兴初好大的口气！告诉他，我要的是歼灭，不是赶羊！"

梁兴初说："我要包伪七师的饺子！"

梁兴初口气大得惊人，因为他已经有了具体计划。他要从南朝鲜第七、第八两个师的接合部插进去，包围德川的敌人。其一一三师经德川以东至德川南面的遮日峰，而后由南向北进攻；一一二师经德川以西至云松里，由西向东进攻；一一四师正面进攻德川。

"我这回要打个狠的！"梁兴初说起来咬牙切齿，"派个先遣队马上出发，由军侦察科长张魁印和一一三师的侦察科长周文礼率领，偷渡大同江，秘密潜入德川南面的武陵里，把德川通往顺川和平壤的公路桥先给我炸了，我看伪七师往哪里跑！"

韩先楚明白，对处于一触即发状态中的第三十八军，再说什么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了。

二十四日，在第二次战役开始的前一天，第三十八军先遣队在月朗星稀的深夜出发了。

第三十八军先遣队此次深入敌后的行动，后来被中国的一家电影制片厂拍成了一部黑白胶片的电影，在中国的城乡间多年放映。电影的名字叫《奇袭》。

当时，梁兴初军长把侦察科长张魁印叫到指挥所，问：“敢不敢带点儿人先给我插进去？”张魁印严肃地说：“有啥不敢的！”梁兴初说：“那就准备一下立即出发，二十六日必须给我炸掉那座桥。”张魁印的回答是：“保证完成任务。”

第三十八军副军长江拥辉指着地图对张魁印说：“武陵里西傍大同江，有一条支流横跨由南通往德川的公路。那里有一座公路桥，你们必须在二十六日早上八点之前炸掉这座桥，估计那时候受到攻击的敌人可能南逃，北上的敌人也可能增援，这个时候把桥炸掉，才能保证主力部队全歼德川之敌。”最后，江拥辉问：“今晚能过大同江吗？”

张魁印说：“没有意外是可能的。”

江拥辉说：“你带的这个先遣队人多，穿过敌人的前沿阵地困难很大，不过，有伤亡也要过去！”

张魁印说：“是！”

显然，江拥辉为这支队伍能否在南朝鲜军队的严密封锁下顺利地插入敌后感到一丝担忧：“实在过不去，也要打一下，抓几个俘虏回来。”

先遣队由三百二十三人组成，其中主要是工兵，还有英语和朝语的翻译以及前来充当向导和联络员的北朝鲜平安道内务署的署长和副署长。除了携带必要的武器之外，还携带了通讯和爆破器材。

先遣队每个人的手臂上都系上了白毛巾，他们在前沿部队佯攻的掩护下，乘夜色向南朝鲜军的阵地走去。刚出发不久，志愿军司令部来电，说不准先遣队携带译电员——怕万一出了事，让敌人知道了电报密码，损失就大了。军长梁兴初认为，先遣队没有译电员，怎么和

指挥所联系？还是相信自己的译电员吧。正好这时一发炮弹把电话线炸断了，于是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在战争中，尤其是在大战前夕双方处于蓄势待发的对峙中时，一支三百二十三人的队伍要穿过敌方的前沿阵地，而且还要不被其发现，简直是件不可能的事——不知道如果要穿越的区域是美军的阵地，梁兴初军长还敢不敢设想如此的行动——南朝鲜军队注定要让中国士兵捉弄一回。

先遣队走了一会儿，看见道路已经被铁丝网封锁，又回来了，然后向前沿的另一个方向走。就这样，他们在南朝鲜军的前沿走来走去，寻找可以插脚的地方，南朝鲜军居然没有任何反应。终于，先遣队找到一个坡度很陡的山脚，可能南朝鲜军认为这个地方人根本通不过，所以没有很严密的防范措施。山脚果然落不住脚，坡陡，土质松软，士兵们上去就往下滑，下面是一条小河，结果士兵们叠罗汉一样叠在一起滑进小河里。再往前走，接近前沿，又看见铁丝网，还看见南朝鲜士兵正在月光下挖工事。趁着一片云彩遮住了月亮，几个中国士兵在一一三师侦察科长周文礼的带领下，把铁丝网顶起来，队伍一个跟一个地弯着腰钻过去，一连钻过了三道铁丝网。先遣队在南朝鲜士兵的眼皮底下顺利地进入了一片树林，张魁印在树林里清点了一下人数，一个不少。

下一步就是过江。江桥已被敌人炸毁，但先遣队知道，北朝鲜人民军在从平壤撤退时，在江上修了一条藏在水面下的水中桥。在寻找这个桥的时候，先遣队顺着公路走，像是在自己的地盘上行军一样，对面开来满载南朝鲜士兵的汽车，居然就这样面对面地擦肩而过，中国人与朝鲜人外观上没有什么差别，黑暗中军装看上去都差不多。过去之后，连紧握着开了盖的手榴弹、紧张得出了一身汗的中国士兵都觉得奇怪，南朝鲜军队怎么这么好糊弄。

先遣队进入一个叫古城江的小镇，那座水中桥就在这个地方。小镇已经有南朝鲜军队防守，一个南朝鲜士兵正在街上睡眼惺忪地撒尿，看见迎面走来的队伍，转身就往屋里跑。中国士兵跟着他进了屋子，开枪把正在睡觉的敌人解决了。从俘虏嘴里知道，水中桥已被南朝鲜军队发现，现在已有部队防守。先遣队的一个排迅速往渡口跑，江边的一个小屋子里有几个南朝鲜士兵正在玩着什么，像是在赌博。周文礼让朝鲜联络员故意用朝鲜语大声说：“把鞋脱了，准备过江！”由于声音大而镇静，几个南朝鲜士兵竟然以为是自己人的玩笑，头也没抬继续玩着。到了江边，周文礼紧张起来，因为如果找不准水面下的桥就下水，南朝鲜士兵肯定会看出破绽来。他向江面上看了一眼，看见有一道通向对岸的细碎的浪花。周文礼伸脚走下去，果然这就是水下桥。本来认为是很艰难的渡江，就这样儿戏般地过来了。

南朝鲜军的前沿警戒和对大同江渡口的防守，形同虚设。先遣队又走了几里路，看见一个小村庄，因为不想和敌人纠缠，绕到村庄边上，可是在必须通过的小路上，发现一个南朝鲜士兵抱着枪在路中间游动，看来是个游动哨兵。先遣队好像没看见这个哨兵一样，只管呼呼啦啦地走，抱枪的南朝鲜士兵被挤到一边呆呆地看。中国士兵嫌他碍事，干脆用肩膀把他碰到沟里，他爬上沟的另一边，还是这样呆呆地看。这时，突然响起了枪声！原来先遣队的一个班进入村庄想抓一个向导，被敌人发觉，双方打了起来。先遣队想冲过去，结果被敌人的机枪压制在公路上。先遣队暴露了。张魁印知道绝不能这样打下去，他立即命令队伍摆脱敌人，离开公路上山。没等南朝鲜的士兵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先遣队已经消失在夜色浓郁的大山里了。这是座古木参天的大山，从凌晨二时一直爬到早上八时，先遣队爬到了山顶。夜里过江时棉裤和鞋都湿了，现在已经冻成了冰。士兵们边吃干粮边在太阳下晒裤子。电台已与军里联系上，并报告了这一夜的情况和水下桥的位置。

先遣队的士兵们在晒裤子的时候，被温暖的阳光照得睡意十足，个个迷迷糊糊地打着盹。

这里距离先遣队的目标武陵里还有七十公里。山下的公路上，南朝鲜军的汽车来来往往。白天走大路肯定不行。下午十四时，先遣队再次出发，走山间的小路。山间荆棘乱生，朽木倒伏，先遣队一边开路一边前进，走到天黑的时候，北面传来炮声，回头一看，炮火映红了德川上空：第二次战役打响了。先遣队的中国士兵知道，只要一打响，南朝鲜士兵就会一窝蜂似的往后跑，不快点赶路就堵不住他们啦。

十一月二十五日黄昏，第三十八军的三个师开始了攻击行动。

攻击开始时，一一二师的官兵感到最为疲劳。他们在第一次战役后担任诱敌深入的任务，师主力轮番抗击着北进的联合国军，打一仗退一步，一直把联合国军引入彭德怀设定的地域。二十五日下午，刚刚停住脚步的一一二师又接到立即进攻的命令，也就是说，沿着这些天边打边撤的路线再打回去。全师必须连夜再次翻越那座叫兄弟峰的大山，向德川的西部实施迂回包围。由于前进的命令来得仓促，连队的干部们只有一边行军一边作战斗动员。

“爬山是为了包围敌人，只要爬过去就是胜利！”一一二师提出这样的口号。

师长杨大易给部队下达的命令是：遇到敌人用少数人顶住，大部队坚决地插下去，谁恋战后果谁负责！

德川的西面是南朝鲜第七师与美第二十五师和土耳其旅的接合部，这里敌人的番号很乱，加上中国军队的正面进攻已经开始，敌人的组织便更加混乱。

一一二师从公路上急行而来，突然发现前面一串汽车灯光，副师长李忠信判断已被敌人发现，于是下命令打。短暂的战斗结束后，发现缴获的汽车上竟全是活鸡，不知道在这个时候，南朝鲜军向前沿运送这么多活鸡干什么。肚子里没有油水的中国士兵们立即想到煮鸡的味道，主张吃上一顿再说，可是杨大易师长坚决不同意，要求部队不顾一切地前进。中国士兵把俘虏到的南朝鲜士兵捆上手脚，扔在山沟里。抓到的几个美军顾问不能扔，让他们跟着部队走，几个美国人说什么也不走，于是中国士兵就抬着他们走。就这样，一一二师于二十六日凌晨五时占领了德川西面的云松里，切断了南朝鲜第七师的退路。

负责往德川南面穿插的第三十八军一一三师在一一二师开始行动的半小时后开始行动。他们穿插的路线是南朝鲜第七师与第八师的接合部，这里的防守更加薄弱。一一三师在第一次战役中没有很好地完成任务，全师上下都感到很大的压力，所以行动一开始就显得十分凶狠。每个团都用两个营打前锋，路上遇到阻碍前进的敌人，一个冲击就解决战斗。当他们夜晚到达大同江边的时候，饿虎扑食一样把在江边烤火的敌人全部消灭，然后急促过江。师长江潮和政委于敬山把棉裤和鞋袜脱下来，最先走入江水中，于是士兵们都学着他们的样子纷纷走入冰冷刺骨的江中。江中破碎的冰块在急流中互相撞击，发出很大的声音，凉透骨髓的江水使士兵们的呼吸困难起来。在过江士兵的队伍中，有一个叫郝淑芝的女战士，由于她特别能吃苦，对伤员照顾得极其周到，受到全师官兵的爱戴。这天夜晚，她也把棉裤脱了，走在黑暗的江水中，她的身上甚至比其他战士还多背了一份干粮，入朝后她一直这么做，为的是关键时刻不让负伤的士兵饿肚子。担任三三八团后卫的是一连，当走在前边的炊事班已经上岸，而走在后面的三排还没有下水的时候，黑暗中就听见有人喊：“敌人！”果然，大约一个营的南朝鲜士兵向渡口扑过来。一连的官兵们没有犹豫，立即向敌人冲上去，正渡到江心的一排在水中回过头开始射击，三排也在江北

架起机枪扫射，连长一声喊："抓俘虏呀！立功的时候到啦！"士兵们叫着应和，连炊事班的士兵也举起菜刀和扁担向敌人扑上去。等中国士兵已经冲到南朝鲜士兵跟前的时候，南朝鲜士兵看见了令他们胆战心惊的情景：在这个寒冷的黑夜中，向他们冲上来的是一群没有穿裤子的中国士兵！这些赤着两腿的士兵们浑身都是冰！瞬间而至的极大恐惧使穿着臃肿的南朝鲜士兵除了被打死的之外，被活捉的就有一百四十多人。

渡江之后，一一三师急速向预定地域前进。在通往德川的公路上，南朝鲜第七师的搜索连和警卫连把公路封锁了。三三八团三营的先头排绕到敌人背后，一阵手榴弹把这些南朝鲜士兵打散。在中国士兵的紧追不舍下，两个连的南朝鲜士兵五十多人被俘，剩下的逃得无踪无影。战斗结束后，公路边上他们煮在锅里的牛肉还冒着热气。

二十六日早上八时，一一三师占领了德川南面的遮日峰、葛洞等要地，切断了德川和宁远两地敌人的联系，切断了敌人南逃的退路。

最后行动的是在德川担任正面进攻的第三十八军一一四师，他们于二十五日晚二十时开始了正面强攻——直接攻击南朝鲜第七师的防地。攻击进行得十分顺利。三四〇团第二天凌晨五时占领向堂洞北山，上午九时占领铁马山、三峰地区。三四一团也占领了发阳洞阵地。这时，南朝鲜军的炮火变得十分猛烈。跟随一一四师前进的副军长江拥辉命令把敌人的炮兵阵地搞掉。三四一团二营在炮火中向敌人的炮兵阵地靠近，凌晨四时，二营发起了攻击：四连打指挥所，五连切断敌指挥所与阵地的联系，六连直接捣毁炮兵阵地。战斗结果是全歼敌人，还把增援的一个联队击溃了，缴获汽车五十辆，榴弹炮十一门。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时，一一四师于占领德川北面的斗明洞、马上里地区，完成了压缩德川之敌的任务。

也是在二十六日这天早上，张魁印率领的先遣队渡过大同江后，急促前进七十公里，接近了目的地武陵里。在一位朝鲜老人和一位朝鲜小姑娘的带领下，他们穿过一个村庄后，看见了梁兴初军长要求他们炸毁的那座桥。桥边村庄里的朝鲜老乡听说志愿军要解放德川，女人给先遣队做饭，男人帮他们寻找绳索和梯子。上午七时五十分，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在武陵里响起，大桥被炸毁了。

炸桥的中国士兵还没有离开，就看见北面的公路上汽车和坦克一辆接一辆地开来——德川的敌人开始南逃了。于是，先遣队立即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开始了战斗。战斗集中在桥边，敌人企图修复这座桥，张魁印的先遣队决不让敌人修复。

至此，南朝鲜第七师主力五千余人，被压缩在了德川河谷一个只有十几平方公里的地段。

第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的计划是二十六日拿下德川。

为尽快解决德川之敌，第三十八军把德川围定之后，于下午十五时发起了总攻。三个师从三面一齐猛烈攻击，随着包围圈的逐渐缩小，南朝鲜士兵像网中的鱼一样到处乱撞。中国士兵和南朝鲜士兵完全混战在一起，令天上美军的支援飞机不敢投弹和扫射，只是在天空混乱地盘旋，不知道该怎样才能挽救溃不成军的南朝鲜军队。一一二师三三六团五连指导员侯征佩带领着十七名士兵在一条公路上遇到溃败的敌人如潮水涌来，足有两千多人。十七名中国士兵无所畏惧地猛烈开火，南朝鲜士兵掉头就跑，却又遭到另一个方向的射击。于是，这些南朝鲜士兵在中国士兵的射击中来回奔跑，仅侯征佩带领的十七名士兵就打死打伤和俘虏南朝鲜士兵两百多人。

由于南朝鲜军队已经完全没有了指挥，成为一片混乱无序的溃兵，于是发生了不少意料不到的事情。一一二师的指挥所设在一个小

村庄里，师长杨大易到前沿指挥部队去了，副师长李忠信正在一个小房子里写战报，电话响了，一接，是查线员低低的声音："副师长，别说话！你听着就行了！有一股敌人正在向你的房子走去！"话音未落，负伤的政委跌跌撞撞进了门，证实了敌情。李忠信往门外一看，一伙敌人正坐在这个小房子的门口休息！指挥所没有士兵，只有一个警卫班看守着一个美军俘虏。李忠信立即命令警卫班占领房子后面的山头，然后命令司号员吹号。号声一响，副师长举着手枪冲出门，门口的敌人吓得抱头鼠窜。当李忠信正为那个美军俘虏趁机逃跑而恼火的时候，抬头一看，山头上几千南朝鲜士兵如一团浊水般地滚过去，他们的头顶有几十架美军飞机正掩护着他们逃跑。李忠信立即命令三三六团一营把这伙南朝鲜士兵堵住。一营插上去，开火了。

混战中，一一三师三三八团的八连与南朝鲜第七师的美军顾问团相遇了。中国士兵扑上去和美军顾问们摔跤，结果歼灭了顾问团大部，俘虏了美军顾问八人，其中上校一人，中校一人，少校六人。

战斗持续到晚上十九时，除少数敌人逃脱外，南朝鲜第七师的大部被歼灭于德川。德川一役，南朝鲜军死伤一千零四十一人，被俘两千零七十八人，损失火炮一百五十六门、汽车二百一十八辆。

入夜，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在第三十八军政委刘西元的陪同下进入了一片火海的德川城。城内的街道上到处是俘虏、火炮、枪支和汽车，还有堆积如山的各种物资。

天亮的时候，德川的战况被美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员作出如下描述："大韩民国军队第二军团被歼灭。在中国军队的猛烈攻击下，不到二十四小时之内第二军团已不复存在，再也找不到该部队的痕迹了。"

中国第四十二军军长吴瑞林一条腿有伤，人称"吴瘸子"。这个身经百战的著名将领在入朝后的第一次战役中，于朝鲜半岛的东部显示

出他灵活机动、顽强不屈的指挥风格。二十三日拂晓，他正在研究地图，接到韩先楚从第三十八军打来的电话。韩先楚说，第三十八军要求单独承担打德川的任务，因此，第四十二军原定的作战计划将有所变动。吴瑞林立刻想到：这个梁大牙！肯定是因为第一次战役“熙川冒出个黑人团”一事挨了彭老总的批，想在第二次战役中把面子捞回来！这样也好，我集中精力打宁远和孟山，干净利索地解决南朝鲜第八师，露脸的事情别让梁大牙一个人占了！

吴瑞林军长和军政委周彪再次确定了敌情和第四十二军新的作战计划。

位于第四十二军正面的是南朝鲜第八师。

第四十二军采取的打法是：运动歼敌，迂回分割。一二五师为正面攻击部队，由宁远实施正面突破，歼灭南朝鲜第八师十团的一、三营和二十一团的一、二营，占领丰田里、松亭里、凤德山一线，而后向宁远城攻击。一二六师占领龙德里、南中里，切断宁远敌人的退路，阻击孟山、北仓里可能北援之敌，并占领孟山。一二四师迂回到宁远东南的石幕里一线，而后北攻宁远。

侧翼的迂回在二十五日黄昏开始。

正面攻击的时间为二十五日二十三时。

韩先楚来到第四十二军指挥所，特别地嘱咐在孟山和宁远解决南朝鲜第八师之后，应立即向顺川方向插下去。

吴瑞林军长瘸着腿，不顾部下的劝阻，登上了宁远城北的山头。雪深过膝，军长于气喘中在望远镜里看见了他的部队将要攻打的宁远城。这座县城已经是一片废墟，倒塌的房屋在积雪中显得更加漆黑。西边的河面上流淌着被炮弹炸裂的冰块，冰块互相撞击发出很大的声

响。陪同军长的一二五师师长王道全指着河面说："这是'楚河汉界'。河西是伪七师，归三十八军；河东归我们。"吴瑞林说："派个尖刀营钻进宁远城，把城里伪八师的主力十团的指挥所给我端了，我要先挖他们的心！"

一二四师和一二六师向前移动的时候，由于道路拥挤，未能在指定时间到达出击位置，结果天亮时大部队还在行军，被美军的侦察机发现了，立即招致二十多架美军飞机的轰炸和扫射。部队急于前进，还需不断隐蔽，结果速度不但没有快起来，还出现了一些伤亡。

尽管如此，黄昏到来的时候，第四十二军向南朝鲜第八师的攻击行动还是按时开始了。

正面攻击的一二五师于二十三时出击。其三七五团一路连克敌人阵地，一直攻击到宁远的西侧。三七三团兵分两路，团长李林带一路打马潭里和直里，政委带一路直取马土里，保障了主攻宁远城的三七四团的侧翼。三七四团也由团长和政委各带一路，分别向宁远城的外围扑去。

吴瑞林派出"挖心"的尖刀营，是一二五师三七四团一营，尖刀营的尖刀连是由副营长孙先山率领的三连。三连素有善于夜战的名声，夜晚行动，三连的士兵如鱼得水。在扫荡外围的战斗中，他们摸到离南朝鲜士兵不到十米的距离内，用匕首将敌人的哨兵刺死。没等敌人反应过来，在炮火的支援下，三连猛扑上去，南朝鲜士兵仓促抵抗了一下，便丢下阵地向南逃窜。在攻击五六六高地的时候，南朝鲜士兵进行了顽强抵抗，整个高地上回响着肉搏战的喊声。三连二排排长名叫刘同志，在带领士兵和敌人扭打的时候，他先是跟一个矮胖的南朝鲜士兵对峙，在矮胖士兵的叫喊中，又冒出来两个南朝鲜士兵，结果刘同志被三个敌人围住。刘同志是老兵，曾在解放战争中立过大功两次，以拼刺刀闻名全师。他没有喊，不动声色地利用拼杀中对方的一

个漏洞，把刺刀戳进矮胖家伙的背。也许由于刺得太深，刘同志的刺刀一下子拔不出来了，剩下的那两个敌人向他刺过来。刘同志松开自己的刺刀，一转身，把其中一个敌人的枪夺过来，趁对方发愣的一瞬间，他又刺倒了一个敌人。最后一个敌人掉头就跑，刘同志紧追不舍，一刺刀结束了搏斗。夺下五六六高地后，三连冲破南朝鲜军一个连的阻击，如同一把尖刀直插进宁远城。这座被战争蹂躏得千疮百孔的小城黑漆漆的，在四周猛烈枪炮声的对比下，城内可谓一片寂静。三连的中国士兵摸到一座两层小楼边，发现里面有人，说的是美国话。三连立即攻击，经过短暂的战斗，窗口伸出白毛巾表示投降。中国士兵清点战果时吃了一惊，一共十七个清一色的美国兵，中间还有几个美国女兵！原来他们是从横川里来的，都是美第三师的，说是来宁远城里度礼拜日的。原来这座两层小楼是个歌舞场。中国士兵这时才知道，今天是全世界人都休息的星期日。

与此同时，副营长孙先山已经指挥士兵把南朝鲜第八师十团的指挥所包围了。南朝鲜军官没有想到中国军队会出现在这里，包括团长在内的三十多名军官全部被俘。

战斗一直持续到天亮。三七四团尖刀一营以伤亡九十七人的代价，杀敌一百九十四人，俘敌二百二十三人，缴获火炮十五门，各种枪支一百六十多支。

十团是南朝鲜第八师的主力团，负责宁远的防守。指挥所都没有了，从何而谈防守？宁远的南朝鲜军队开始四处逃散。

负责迂回的一二四师在中里南山被压制在公路上。三七六团对中里南山的攻击打了两个小时还没有打下来，吴瑞林军长急得火冒三丈。在他的严令下，由师参谋长亲自指挥，集中了九挺重机枪，以加强的兵力，向这个拦在迂回路上的障碍发起强大的攻势，最终打开了通路。插得最远的三七六团的二营，天亮的时候已经插到德化里，营

长命令士兵们抓紧时间吃东西。正吃着，突然跑来一伙南朝鲜士兵，误认为二营是自己人，跑过来就吃。当他们知道自己被俘虏了的时候，把枪扔在一边，依旧狼吞虎咽。二营就此活捉了二百多名饥饿惊恐的南朝鲜士兵。

一二四师三七〇团于午夜到达石幕里，歼灭了南朝鲜第八师二十一团的一个机枪连。由于其二营没能按时赶到指定地点，结果这个团的南朝鲜步兵连全逃了。

向宁远西南穿插的先头部队是一二四师三七二团的二营四连。在一个叫头上洞的地方，一辆吉普车迎面向四连开来。面对四连士兵的拦截，车上跳下两个南朝鲜军官，大声地喊着什么，经过翻译员的解释，四连士兵明白了他在喊："中国军队在哪里？"于是，四连的士兵大声回答："中国军队在这里！"抓了俘虏之后，一问，知道有一股从宁远逃来的南朝鲜军马上就到，于是四连立即占领了公路两侧的制高点。没多一会儿，公路上车灯闪亮，逃兵来了。四连等车辆开近之后，打头打尾，然后拦腰，车上的南朝鲜士兵跳车逃命，被四连紧紧包围。战斗结束，中国士兵意外地发现车上装满了食品，饼干、罐头，还有一些中国士兵不认识的好吃的。二营营长孔祝三发布命令："通知各连，上车拿好吃的！能拿多少拿多少！"

通信员瞬间就把"上车拿好吃的"的命令传达到了每个连。

有一样东西中国士兵拿不走，就是南朝鲜军队丢弃的汽车和大炮。中国军队中会开汽车的人很少，而大炮靠人推是推不动的。

天亮的时候，美军飞机照例飞来了。飞机在低空盘旋，确定了南朝鲜第八师已经崩溃的时候，便开始轰炸那些中国士兵拿不走的东西。公路上顿时火光冲天，中国官兵心疼地看着汽车和火炮顷刻变成了一堆废铁。

正如毛泽东和彭德怀在战役开始前所预料的，仅一天时间，联合国军战线的右翼就全部崩溃了。

## 悲惨的“贝克连”和“黑色的美国人”

美军第二师第九步兵团三营的贝克连与第八集团军的大部分美军连队一样，全连一百二十九名官兵是由白人和黑人、新兵和老兵混编而成。美军战史记载道：“其中一位来自弗吉尼亚州南波士顿的步枪手沃尔特·克劳福德下士只有十七岁。”为了适应在朝鲜战场上的作战，连队还配备了十几名南朝鲜士兵。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清晨，当贝克连的官兵得知他们今天依旧要充当先头连时，牢骚满腹，因为这些天美军中流行着一句话：“谁当先头连谁就一定会遇到中国人。”贝克连的官兵们认为，每次打仗贝克连都打头阵，显然说明贝克连在长官的眼里就是一块脏抹布，很糟糕但很有用，用完了就会毫不在乎地扔掉。

不过，事实是，贝克连自进至清川江畔以来，还没有遇到过真正意义上的战斗，除了零星小股的抵抗外，他们还没见到过中国军队的影子。

十一月二十五日，当贝克连即将出发时，侦察机飞行员的报告到达连长沃拉斯上尉手里，报告的内容和每天一样：没有发现敌人的踪迹。贝克连今天的目的地，是向北十公里的清川江边的二一九高地。

当向战场走去的时候，贝克连的官兵们都相信不会再有什么大仗打了。麦克阿瑟说圣诞节就能回家，这话听上去很诱人。况且，麦克阿瑟亲临鸭绿江上空的事，美军官兵们都知道了，他们说：“这个老头子还是很不错的。如果老头子的飞机掉了下去，中国人会把他的玉米芯烟斗送给斯大林，因为斯大林也喜欢玩烟斗。”天气虽然寒冷，但天

空很蓝。贝克连的官兵们和往常一样，扔掉了他们认为过分沉重的钢盔，戴着刚配发的暖和而又轻便的绒线帽。他们也不愿意多带弹药，每个士兵平均一颗手榴弹和十六发子弹，机枪子弹也只带了四箱，迫击炮弹带了六十一发——这是规定中最低的弹药携带量。大约有一半的士兵还带着土木作业工具，另一半的人早就把这些累赘的东西扔了。空背囊在身上轻飘飘的很舒服。至于食品，反正会有南朝鲜的民工扛上来。贝克连的电话兵嫌麻烦，连唯一的一部野战电话都没有接通，他觉得一旦真有什么事，把电话单机的线头夹在行军道路上为炮兵观察所铺设的电话线上说上几句就可以了。

贝克连两个排的士兵搭乘在四辆M-4型坦克和两辆M-16双管自行火炮车上，其余的士兵跟在后面步行。

山道弯曲不平，队伍懒懒散散，头上阳光普照，四野寂静无声。

二一九高地是座马鞍形的小山，山上覆盖着低矮的杂树，北面坡度平缓，南面是峭壁。这里是清川江边一个位置重要的高地，它控制着向北的公路，是进入朝鲜北部必须首先控制的一个制高点。

沃拉斯上尉从高地的西麓向上观察，高地上一片安静，枯叶在微风中摇摆，几只在寒夜中冻僵了的乌鸦正在晒太阳。沃拉斯上尉断定没有什么异常情况，于是命令占领这个高地。

沿着北面的缓坡，贝克连开始爬山。二排一班作为先头班爬在最前面，连主力在他们后面大约十米的地方跟进。缓慢地爬了一个小时，一班接近了山顶。在距离山顶二十米的地方，士兵们停下来擦汗，上等兵史密斯和排长基乔纳斯中尉在擦汗的间隙无意中向上看了一眼，就在这一瞬间他们吃惊地张大了嘴：在他们的头顶上，一群手榴弹正密集地飞下来！手榴弹在美军士兵中爆炸，接着射来的是步枪子弹。

贝克连的士兵顿时血肉横飞，连长沃拉斯喊了一声：“敌人！”全连一起卧倒在二一九高地上。沃拉斯在向包扎伤口的一班士兵爬去时，看见了几名中国士兵的影子在杂树丛中一闪。沃拉斯惊恐地睁大了眼睛，中国士兵却又不见了。

贝克连全连一发子弹都没有来得及射出。

时间是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时三十分。

枪声突然停止了。贝克连立即分成两路转入进攻状态。

二排正面的中国士兵好像是消失了。二排登上了一道棱线，由于遍地是岩石，机枪手一下子找不到架设机枪的位置，坦克也因为被棱线挡住而无法支援。美军士兵正在犹豫，从更高处岩石棱线上的树丛中，中国士兵的射击又开始了，铺天盖地的手榴弹和步枪子弹倾泻而下，二排伤亡的士兵一下子增加到十八名。

从另一个方向进攻的三排还没有接近山顶，就把有限的子弹打完了，于是只好逃退下来。三排排长布洛顿中尉是今天才上任的军官，他连归自己指挥的士兵们的名字都还没有弄清楚。三排退下来的时候，三营的副营长带着弹药车到了，他指挥山下的坦克和自行火炮调整位置支援三排重新进攻。布洛顿指挥三排再次向山顶冲击。就在三排又一次接近山顶的时候，布洛顿中尉看见了令他一生难忘的情景：在山顶的战壕中，突然站起来一排中国士兵，“这些中国士兵高举双手，是投降的样子”，三排在“可以看见中国士兵军服扣子的距离”成散兵队形站起来。一个会中国话的南朝鲜士兵开始喊话：“从壕里走出来投降吧！”中国士兵回答道：“来这里抓吧！”在和中国士兵开始对话的时候，又有许多中国士兵加入到举手的行列。但是，接下来，“他们突然一起投出手榴弹，然后钻进战壕里”。

布洛顿的三排在二一九高地上损失惨重。

中国士兵再次消失在杂树丛中。

这时候，贝克连完成了防御阵地的修筑。

于是，中美士兵在二一九高地上进入对射的僵持之中，一直到太阳落山。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初夜，气温零下十五摄氏度，空气清冽，月光皎洁。

寂静的夜色没有持续多久，贝克连的士兵就被偏北方向突然传来的巨大爆炸声惊呆了。半个夜空瞬间被炮火染红，滚雷般的炮声响彻苍穹。爆炸声和火光先是在清川江的对岸，没过多一会儿，贝克连的右后方就有了熊熊的大火。

贝克连的官兵们明白了，剧烈的战斗在他们的前面和侧后同时发生了。

沃拉斯连长用电报向上级问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团长查尔斯·斯隆上校的回答十分简单："这也许是真家伙。"

沃拉斯明白这个回答的大致意思，但他没能反应到贝克连白天遇到的战斗仅仅是中国军队侦察部队的阻击，而再过几个小时，他和他的贝克连将陷入一场更加惨烈的战斗中。

沃拉斯上尉无法想到是情有可原的，因为此刻连麦克阿瑟将军都想不到，彭德怀指挥下的几十万中国军队已经在朝鲜半岛的西线开始了全线进攻。这是麦克阿瑟飞临前线宣布"圣诞节前让孩子们回家"的

第二天，也是他飞到鸭绿江上空通过亲眼观察宣布“没有中国军队的踪影”的第二天。

贝克连的四周都是枪炮声，但奇怪的是他们没有受到攻击，二一九高地死一般地寂静。贝克连极度恐惧地听着自己后方的枪声，但没有人知道他们该怎么办。通过电话联络，沃拉斯了解到三营的其他连队都受到猛烈的攻击而面临溃灭，二营也已经陷入包围之中，一营因营部遭到袭击，营长和很多参谋都已下落不明。此时，美军第二师九团的各个部队都处在血战之中。而从九团右后方的三十八团传来的消息说，“他们已经卷入短兵相接的混战中”。

位于要地的贝克连居然没有受到任何方向的攻击！这比受到攻击更加令贝克连恐慌不安。贝克连的官兵们心绪复杂地望着天空，望着那轮与自己家乡差不多的月亮，缩在战壕中为自己的命运祈祷。

这时，将要置贝克连于死地的一支中国军队——第四十军一二〇师的三五九团正在一步步地向二一九高地接近。

第四十军的攻击位置在西部战线的中部，位于第三十八军和第三十九军之间。十一月二十四日晚，第四十军奉命向龙川山、西仓方向前进。二十五日早晨，由于得知美第二师已经占领新兴里、苏民里，彭德怀命令第四十军以一部继续向西仓方向穿插，其主力协同第三十九军从正面进攻，欲将美第二师歼灭。

第四十军的计划是：以一一九师继续向西仓穿插；以一一八师攻击新兴里方向的美第二师九团；一二〇师留在清川江西岸保障军主力的侧翼安全，但抽调其三五九团强渡清川江，直插鱼龙浦，切断美第二师的退路，并阻击球场方向可能增援的敌人。

当三五九团的营长们被召集起来传达任务的时候，营长们都没吭声。朝鲜北部的气温是零下二十五摄氏度，清川江江面宽两百米，江心水深流急，靠岸的部分已经结冰。而江对岸部署着美军的一个步兵营和一个炮兵营，装备着包括坦克在内的重武器，武器的目标就是封锁江面。同时，江岸这边也有敌人，还有十多公里的封锁线。没有任何渡江的器械，整个团都要涉水过江；不但要顶住对岸敌人的射击，还要受到江这边敌人侧射火力的阻拦。但是，三五九团必须渡过清川江。

一二〇师副师长黄国忠来了，他要和三五九团一起渡江。他是这个团的前任团长，熟悉每一个营的营长。黄国忠对营长们说："咱们同生死共患难，都要给我卖把子力气！"

夜幕降临，三五九团出发了。经过十公里的奔袭，官兵们到达渡江地点。

天寒地冻，北风刺骨，可以听见江水中冰块撞击的声音。现场侦察时，几个参谋带着几个士兵摸进一个窝棚避了一会儿风，出来时其中的一个士兵看着自己手中的枪直发愣：自己用的是一支半自动步枪，进了窝棚后在墙根靠了靠，怎么变成了一支美国卡宾枪？莫名其妙之中钻回窝棚并且打开手电，顿时吓了一跳，原来这个窝棚的角落里睡着七个美国兵！被惊醒的美国兵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已经被几双冰凉的手死死地按在了睡袋里。

二十时三十分，经过迫击炮连的火力准备，在重机枪的掩护下，三五九团开始强渡清川江。三营营长首先踏破冰层。在奔袭中出了一身热汗的士兵一下子进到齐胸深的冰水中，顿时浑身刀割般地剧痛。棉衣浸水后铅一样沉重，没迈出几步，两腿开始抽搐，然后就失去了知觉。接近黑暗的江心时，水流湍急得使人无法站稳，齐到颈部的水

涌令人窒息。官兵们把枪举过头顶，身体挤在一起，在江水中一步步移动。前面，月色下是白色的冰层和沙滩。

对岸的敌人开始射击了。他们没想到在没有桥梁的地方，中国士兵会在冰水中涉江，因此射击慌乱而急促。

最前面的黄国忠副师长个子矮，到江心时江水已没过他的头顶，他喝了几口冷彻肺腑的江水。警卫员把他架出水面，他的脸上和头发立即结了冰，他想说什么，但说不出话来。

黑暗的江面上回荡着三五九团杂乱的喊声:

“冲过江去就是胜利！”

“为毛主席争光！”

“冲上岸去，砸烂敌人！”

不断有士兵在对岸射来的枪弹和炮弹炸起的巨大冰块的撞击中倒下，顺水流走，但是，那些还活着的士兵，当他们的脚一踏上对岸的土地时，世界又属于他们了。

八连三排首先冲上江岸。湿透的棉衣变成了冰筒。士兵们奋力折断身上的冰碴，但在开枪的时候却发现枪已经结冰。有人开始往枪上撒尿，在极端的寒冷和紧张中把尿撒出来很不容易，但只要尿出来效果就很好。

八连打掉了一个美军的炮兵阵地。

五连占领了鱼龙浦。

六连渡江后插向公路桥，与美第二师师部的宪兵队遭遇。二十分钟的激战后，两个排的中国士兵全部牺牲。后来掩埋尸体的人看到，这两个排的中国士兵浑身冰甲，全部保持着战斗的姿势，枪口指向敌人的方向。

三五九团继续向纵深发展，对美第二师九团的三营、二营进行了攻击和包围。

这时，三五九团三营八连奉命攻击二一九高地。

已经是夜半时分。

当一排炮弹落在二一九高地上的时候，贝克连的官兵们终于意识到，灾难轮到自己了。

贝克连的迫击炮排被中国士兵包围在山腰。二一九高地战因此成为一场手榴弹战。因为双方均可利用山岩洼地掩护，枪弹几乎没有用处。美国兵发现，中国士兵的攻击在喇叭的指挥下有节奏地进行着，两声喇叭是前进，一声喇叭是投弹。中国士兵投出的手榴弹的密集程度令美国兵如同置身地狱。在狭窄的洼地里，拥挤在一起的美国兵无法躲避手榴弹，只有拼命地把手榴弹踢开。贝克连那个年仅十七岁的下士军械员克劳福德后来回忆说，手榴弹下雨般地在他身边落下，仅在手榴弹没爆炸之前他踢出去的就有“四十多颗”。

贝克连副连长乌因中尉是个身材高大的黑人军官，他在混乱的对抗中命令周围的士兵向他靠拢。但是，弹药已经没有了，乌因开始投掷石块。最后，身边的石块也没有了，他站在战壕里开始投掷罐头食品。

贝克连决定放弃阵地。在企图解救山腰处的迫击炮排时，温中尉位于所有士兵的最后，中国士兵投出的一颗手榴弹在他的头顶上爆

炸，弹片“削去了他的半边脸”。韦瑟雷德中尉后来估计，在两个小时里有六十多枚手榴弹投到他所在的那个山头上。

在距离向二一九高地开进整整二十六个小时后，贝克连彻底溃败了。全连从进攻时的一百二十九人，到撤下来时仅剩三十四人。三十四人中的半数还是“能自己走路的伤员”。

朝鲜战争结束后，在所有的战争史料中，都有对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贝克连的战事的记载。有把贝克连在二一九高地的战斗描述成一次英雄壮举的，也有残酷地记述出贝克连在二一九高地呼天喊地的惨状的。无论如何，中国第四十军一二〇师三五九团三营八连的士兵在那个月光很亮的夜晚对美军第二师第九步兵团三营贝克连的攻击，令战争的双方以及回顾这场战斗的任何人都难以忘却。

第四十军一一八师的两个团也于二十五日晚渡过清川江，向美第二师的各个阵地开始了猛烈的进攻。战场上各个部位的战斗都呈现出相同的情形：美军借助强大的火力支援进行顽强的抵抗，中国军队则是一波又一波地顽强进攻。美军战史记载道：“中国军队用步枪和机关枪猛烈射击，抛出了看来是永不告罄的手榴弹。他们冲上美军阵地，用刺刀把美军士兵刺死在散兵坑里。”

中国士兵捉住了一个名叫斯梅德利的美军二等兵，经过审问后把他释放了。释放时一位中国翻译对他说：“我们对你们了如指掌，我们知道你所在的乔治连所有军官的名字。你走吧。告诉你们的上司，不要使用燃烧弹，也就是凝固汽油弹打我们。你们的部队在那边，你走吧。”

二等兵斯梅德利向江边跑去的时候，觉得自己的身后肯定要响起枪声，但是中国人没有开枪。

斯梅德利所在的乔治连是美第二师九团的一个连队。连长弗兰克·穆森在连队垮掉之后，听见一个木板房里传出哭声，进去一看，一个士兵躲在墙角身体缩成一团。

穆森问："你在干什么？"

士兵说："不知道……我不知道。"

穆森说："跟我来！"

士兵说："上尉，我不想去……"

穆森抓住士兵的胳膊像提一只鸡一样把他提起来："我命令你把你的屁股坐到坦克上去！"

穆森拔出手枪，带领他的乔治连开始突围。结果，在不到二十分钟的时间里，七十多名士兵被打死。

至二十六日，美军第二师在中国第四十军的攻击下面临着全线崩溃。

对美军第二十五师正面发起进攻的是中国第三十九军。

第三十九军中最先与美军第二十五师接触的，是有着一个很怪姓氏的中国团长，他叫要清川。要清川率领的三四五团于二十五日拂晓赶到上九洞，接替第四十军的防务，说好了那里有第四十军的一个侦察排在等他们。可是到了上九洞，发现根本没有侦察排的影子。三四三团团长王扶之也同时赶到了，也说没有看见第四十军的人。正说着，朝鲜老乡告诉他们，村西有敌人。要清川团长到村西一看，他看见了美国兵。

这是美军第二十五师二十四团的先头部队。

和美军第二师一样，二十四团也是二十五日早上开始向北推进的。

要清川当即命令：“抢占高地，把敌人阻击在上九洞以南，为后续部队的开进争取时间！”

中国第三十九军一一五师与美军第二十五师仓促之中开战了。

由于要清川的三四五团已经与美军打了一天，二十六日的攻击便由三四四团打正面，而三四三团的任务是向上九洞穿插，切断美军的退路。师长王良太给了三四三团团长王扶之一个抓俘虏的“指标”：两百人。

美军已经知道中国军队发起全线进攻了，他们开始了撤退。

上九洞附近的公路上有个隘口，占领并守住这个隘口，就能把撤退的美军堵住。

到了二十六日的夜晚，中国士兵和美军在沿上九洞附近的公路上展开了人与人、人与坦克的殊死搏斗。在争夺公路边高地的时候，美军的强劲火力使三四三团损失不小，但美军对夜战的恐惧也令中国士兵更加胆大妄为。他们举着成捆的手榴弹，抱着炸药包，或是举着几根捆在一起的爆破筒，径直向美军庞大的坦克冲过去，一次不行再冲一次。由于是黑夜，美军坦克手看不清攻击来自什么方向，只有疯狂地转动炮塔胡乱射击，一直到履带被炸断，或者坦克的油箱被炸裂。燃烧起来的坦克堵塞了道路，后面的坦克就拼命地向瘫痪的坦克撞去，撞击的声音让中国士兵听上去比枪炮的声音更加惊心动魄。中国士兵的冲击队形在黑暗中形成一团又一团移动的影子。冲击到最近的距离时，美军士兵的心理防线垮了，于是满山遍野地奔逃。中国士兵

开始四处堵截，成群的美国兵无论朝哪个方向跑，都会遇到迎面的打击。

黑夜是中国军队的天下。

天刚一亮，美军的飞机来了。F-86一架接一架地俯冲下来，企图寻找美军部队要求支援的地面指示信号，同时也寻找中国部队的踪迹。但是飞行员看不到美国士兵的影子，他们都跑到山上去了；飞行员也没有见到中国士兵的影子，他们也都上山隐蔽起来了。就在隐藏着中国士兵和美国士兵的杂树林中，中国士兵们猫着腰搜山，以便把那些藏在山里的美国兵捉出来。

清点俘虏的时候，团长王扶之数了数，总共一百八十多个，距离师长王良太要求的“指标”还差一点。

这些脖子上挂着刻着部队番号、职务、姓名铜牌的美军俘虏，全是美军第二十五师的，而且几乎全部是波多黎各人。

美军第二十五师里有一个黑人团，这就是遭到中国第三十九军打击的二十四团。

二十四团是一支历史悠久、战功显赫的部队。

二十四团还是一支长期遭受歧视和嘲弄的部队。

美军第二十五师步兵二十四团，是根据一八七八年美国国会通过的一项法令组建的。在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对印第安人的战争中，步兵二十四团以勇敢的作风备受赞誉。但是，由于这是一支由清一色的黑人组成的部队，在种族主义盛行的年代，他们虽然作战英勇，但永远是“次等士兵”。因此，二十四团的黑人官兵根深蒂固的观点是：既然不把我们当人看待，我们干吗要替他们去死?

美军第二十五师是被派往朝鲜战场的第一批美军部队之一。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日，美军第二十五师投入战斗后，二十四团接到的第一项任务是扼守醴泉城。执行任务的第一天，二十四团的表现就令师长威廉·基恩火冒三丈：士兵们胡乱开了一阵子枪，然后就开始仓皇逃跑，理由是“遇到了占绝对优势的北朝鲜人民军”。第二天，美军派出的搜索队回来报告说，人民军根本没有到过醴泉这个地方，城内燃烧的大火是美军自己的炮火击中建筑物引燃的。在后来的尚州战斗中，二十四团的表现更成为第二十五师的耻辱。美国陆军战史对二十四团在尚州的表现记录如下：

在尚州以西几乎所有的战斗中，步兵第二十四团都处在惶惶不可终日之中。士兵们擅离阵地，溜向后方。他们把武器丢在阵地上，有一次，第三营从一座高地撤下来，扔掉了十五挺机枪、十一门迫击炮、四支火箭发射筒和一百零二支步枪。

另外一次，该团的L连进入阵地时共有四名军官和一百零五名士兵，几天后，该连从阵地撤离时，散兵坑里只剩下十七人。在这期间，只有一名军官和十七名士兵是因为伤亡和其他原因离开阵地的，其余的三名军官和八十八名士兵去向不明。在下山的路上，十七名士兵的队伍不断扩大，抵达山脚时，已经拥有一名军官和三十五名士兵了。

第二十五师其他部队给二十四团起了个外号，叫“逃窜”。无论在哪里，二十四团的臂章都会引来嘲笑。美军士兵们为二十四团编了首名为“逃窜舞蹈”的小调，小调用了黑人民谣的旋律：

中国人的迫击炮轰轰叫，

二十四团的老爷们撒腿跑。

严重的种族歧视深深地影响了二十四团黑人官兵的职责感和荣誉感。

二十四团不成文的战术是：白天坚守，晚上逃跑。在刚刚到达朝鲜后的七月二十九日的战斗中，二十四团一营全营连夜跑得没了踪影，把炮兵们全扔给了北朝鲜人民军。为了防止士兵逃跑，美军建立

了检查站，约翰·伍尔里奇少校有权扣留任何未经许可就撤退的士兵，结果他平均每天截获逃兵七十五名，最多的一天他抓住了一百五十名逃兵。扣留也没用，第二天，二十四团的一个连长吉尔伯特中尉又带着十几名士兵临阵脱逃了。检查军官命令他立即回到阵地，他拒绝执行命令。吉尔伯特后来以拒绝执行战场命令罪被判死刑。他为自己的辩护是：如果执行命令等于让我和其他十二名士兵去送死。在陆军法官的建议下他被改判为二十年监禁。

杜鲁门总统亲自批准了对吉尔伯特的军法判决。

一个总统亲自批准对一个中尉的定罪文件，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杜鲁门总统的批件时间是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恰恰是这一天，远在朝鲜战场上的二十四团又发生了一件让杜鲁门不知该说什么才好的事情。

中国第三十九军一一六师三四七团，在一个叫上草洞的村庄包围了二十四团的一个连。中国军官在望远镜中发现，被包围的美军士兵全是黑人。经过第一次战役，中国士兵已经知道美国人中有一种皮肤是黑颜色的人，中国士兵们称这种肤色很奇怪的美国兵为“黑美”——黑色美国人的意思。

会英语的中国军官开始向被包围的美军士兵喊话，让他们出来投降。

没过多久，中国士兵看见两个黑人士兵举着白旗走出来。

但是，当中国士兵站起来准备接受投降的时候，后面的美国兵突然开火，几名中国士兵当场中弹倒下。

愤怒的中国士兵开始了猛烈的射击，被包围的美国兵中响起一片悲惨的叫声。

中国军队停止了射击，再一次喊话。

终于，一个黑人军官出来了，他手里高举着的不是白旗，而是一张白纸，白纸上画着一个黑人举枪投降的姿势，画旁边是这个连队的人数。这个黑人军官是二十四团C连连长斯坦莱。C连一百四十八人，全部是黑人。斯坦莱来到中国军队面前解释说，刚才向接受投降的中国士兵开枪，是连里白人军官逼着干的。

美军第二十五师二十四团C连是整个朝鲜战争中向中国军队投降的唯一一个完整的美军连队。

没人知道杜鲁门总统和美国军方对这一事件的反应，至今美军所有的战史对这一事件都讳莫如深。

三个月之后，根据美军第二十五师师长基恩少将的建议，经美国国防部长马歇尔上将批准，美军宣布了一项改编计划：解散由黑人组成的第二十四步兵团。

从那时至今美军始终实行黑人和白人混编体制。

十一月二十六日黄昏，美军第二师三十八团团长乔治·佩普洛上校来到阵地上，这个阵地位于美军防线的最右边，再往右，便是南朝鲜军负责的地盘了。佩普洛上校登临前沿一看，眼前的情景让他大吃一惊：看上去至少有几千名南朝鲜士兵洪水般地涌入了美军阵地。一个念头立即在佩普洛的脑袋里产生了：这些南朝鲜人怎么跑到这里来了？难道由他们负责的自己的右翼出了问题？

一想到这儿，佩普洛出了一身冷汗！

与此同时，美第二师师长凯泽将军也接到电话，电话是从另一个方向的美军阵地打来的，话筒里传来的是一片嘈杂之声："韩国军队的一个整团正拥向我们的防区，我们该怎么办？"

凯泽将军顿时勃然大怒："指挥他们！使用他们！混蛋！"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天亮的时候，美第八集团军司令官沃克将军终于认识到，由于南朝鲜军队三个师在其所负责的联合国军右翼方向的土崩瓦解，联合国军的侧翼已经完全暴露在中国军队的打击面前，而此时在战线中部作战的美军已经支持不住了。由此，联合国军在圣诞节前打到鸭绿江边从而结束朝鲜战争的计划已毫无希望。美军远东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发布的"圣诞节前让孩子们回家"的宣告，就要成为一个历史笑柄了。

## "最奇怪的会议"和"闸门"的关闭

在朝鲜半岛西部战线的战斗已经进入白热化的时候，麦克阿瑟在东京举行了一次被世界军史学家称为"朝鲜战争中最奇怪的会议"。

会议时间是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晚上二十一时五十分。

美国国旗飘扬在东京第一大厦麦克阿瑟的官邸上，官邸内灯火辉煌。二战中战败的日本人似乎已经把战争遗忘得一干二净，东京繁华的街道上人流涌动，从麦克阿瑟会议室的巨大的落地窗向外看去，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参加会议的人都已到齐，他们是：麦克阿瑟、惠特尼、威洛比以及被从战场上仓促召来的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和第十军军长爱德华·阿尔蒙德、第十军参谋长埃德温·赖特。对此，美军战史描述道："麦克阿瑟现在的言行举止马上变得自相矛盾，令人困惑——这些行为表明他既迷惑不解，又惊慌失措，还不希望他所身临

其境的现实损毁他意向中的幻梦。这一系列令人奇怪的行动之第一步是，他把他的两位战地指挥官召到东京，参加一个战争讨论会。”

会议之所以“奇怪”，是因为世界军事史上还没有过这样的会议：战争的前线危在旦夕，参战的部队已面临绝境，在最需要指挥官拿出决策和办法的时候，战场指挥官却被命令丢下前线的部队，乘飞机到距前线上千公里之外的地方去研究军事问题。

在朝鲜战争第二次战役的关键时刻，一向“敢于上前线的”麦克阿瑟这次没有上前线而是在大后方开会了。

会议一直开到二十九日凌晨一时三十分。

将近四个小时的会议讨论的军事问题是：面对中国军队的强大进攻，联合国军该怎么办?

会议开着的时候，前线指挥官的告急电报一封接一封地被送进来，报文的意思基本一致：再不全面撤退，就可能全军覆没。

会上，沃克和阿尔蒙德不断地重复着一种工作，就是用尽可能形象字眼儿来描述中国军队骇然的数量和顽强的战斗力：

“这次不是局部的反攻，完全是一次预谋好的大规模的进攻！中国军队指挥有方，纪律严整，进攻时一波接着一波，没有停歇，没有节奏，即使死伤无数，他们也还是不停地冲击！冲击！”

“中国军队都是飞毛腿，往往会在你根本想象不到的地方突然出现，而且出现就是一个整师！中国士兵没完没了地吹一种特制的喇叭，好像还有哨子和铙钹之类的响器，海浪一样涌上我们的阵地。他们根本不把生命当回事！”

“他们特别喜欢在我们阵地的后面打仗，他们还特别喜欢在漆黑的夜晚发起突击。那些中国士兵的视力十分奇特，黑夜既不会影响他们奔袭也不会影响他们作战，反而给他们提供了我们无从下手的掩护。”

沃克尤其抱怨的是南朝鲜军防守的右翼的崩溃给整个联合国军战线带来的巨大危险：“没有侧翼的战线是脆弱的。中国军队擅长迂回战术，右翼的缺口如果阻击无效，我们的退路将被切断，那样的话局面不堪设想！”

麦克阿瑟此时确实陷入了一种极度的困惑中。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在联合国军发起全线进攻并计划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行动的时候，中国军队事先没有任何征兆地以巨大的兵力突然反攻了。更糟糕的是，联合国军竟然溃败得如此之快。是情报有问题？他看了一眼威洛比——这个情报大员闭着眼睛，从会议一开始他就摆出了誓死不吭声的架势。是联合国军，具体地说是美军的战斗力低下？真的是二战后的舒适生活把这帮家伙们养得胆小如鼠了？真的像有些记者说的，美军成了一支“榻榻米军队”了吗？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大批的中国军队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在长达两个多星期的大规模轰炸下，他们是怎么从中国本土集结到北韩的土地上的？如此大部队的移动为什么美军的侦察机竟然没有发现？——麦克阿瑟想起来了：这就是杜鲁门那伙人不让彻底轰炸鸭绿江大桥和直接轰炸中国本土的后果！

麦克阿瑟突然想到威洛比刚刚送到他案头的一份“绝密情报”，情报的内容据说是中国军队的将领林彪对其部下的一次谈话：

> 如果我事先不曾确切知道华盛顿方面会制止麦克阿瑟将军对我们的补给和交通线采取适当报复性措施的话，我决不会发动这次进攻，拿我的部下和军事名誉来冒险。

麦克阿瑟明白了：是华盛顿给中国人壮了胆！这些卖国贼！

其实，连麦克阿瑟的下级军官们都不会相信这份“绝密情报”，原因很简单，指挥中国军队参加朝鲜战争的不是林彪。这份文件极有可能是从战争一开始就遍布在战场上的那些蒋介石的特工们干的，他们把这种伪造的文件扔给美军是很容易的事，只有蒋介石才迫切地希望美国对中国本土实施大规模轰炸。

麦克阿瑟当然也不会轻信这样的“情报”，但这无疑是为联合国军的溃败所能寻找到的最好的理由。

四个小时的会议没有讨论出任何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说最终决定了什么的话，那就只有两个字：撤退。

会议结束后，麦克阿瑟向华盛顿发出一封电报，美军战史称这封电报内容的实质是麦克阿瑟在推脱责任：

由我们的进攻行动导致的形势发展现已展示无疑。现在，把朝鲜冲突局限于针对北朝鲜军队和象征性的外来因素组成的敌军的所有希望，都应彻底排除。中国在北朝鲜投入了大批的军事力量，而且实力仍在增强。任何在志愿名义或其他托辞掩饰下进行少量支援的借口，现在都不具有一丝一毫的有效性。我们面临着一场全新的战争。

……

目前，由于鸭绿江封冻，中国人开辟了越来越多的增援和补给通道，这使我们的空中力量无法实施封锁。显然，我们目前的军力不足以应付中国人的这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天时地利对他们更加有利。因此而产生的形势带来一个全新的局面，这种局面扩大了从全世界范围来考虑问题的可能性，超出了本战区司令的决定权限的范围。本司令部已在其职权范围内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但它目前所面临的局势却超出了本司令部的驾驭能力。

这封电报到达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将军手里的时候，已对朝鲜战局发生逆转有所了解的布莱德雷对麦克阿瑟的措辞仍是感到了吃惊，因为几乎是在昨天麦克阿瑟还说他“对很快结束战争充满信心”，怎么一夜之间战争就变成了“一场全新的战争”，“超出了本司令部的驾驭能力”？电报明显地传达着一个信息：麦克阿瑟开始为战

争失败寻找借口了——反正我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如果参谋长联席会议不作出什么决定的话，出了意外我概不负责。

二十九日早上六时，杜鲁门正准备按照惯例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进行每日的早散步，布莱德雷的电话来了：“中国人把两只脚都踏进了朝鲜！”布莱德雷说，“第八集团军在清川江北撞上了大量的中国军队，右翼已经瓦解，美军正在撤退！”布莱德雷在电话里把麦克阿瑟的电报念了一遍。

杜鲁门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那个夸口说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的老家伙正在推卸责任——如果形势到了连这个狂妄的老家伙都急于寻找台阶下的时候，那么就毫无疑问地说明朝鲜战局真的面临危机了。

接着，麦克阿瑟连续发来要求增加兵力的电报，其中竟然两次要求允许他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蒋介石的部队。麦克阿瑟的理由是：蒋介石的要求以前被拒绝，是因为担心共产党对台湾的进攻和给共产党参与朝鲜战争的口实。现在这些担忧已经不存在了，况且朝鲜战场又急需兵力。

带着极其糟糕的心情，杜鲁门立即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扩大会议。

与会者听了朝鲜战局的介绍后，个个睁大眼睛默不作声。

国防部长马歇尔坚持自己的观点：美国无论作为单独的国家，还是作为联合国的一个成员，都不应该卷入与共产党中国的全面战争中去，否则就会陷入苏联人精心布设的陷阱。所以美国不应该进入中国领土，也不应该使用蒋介石的军队。

布莱德雷补充说：“如果我们卷入一场与中国的战争，我们在欧洲的力量就不能继续扩大。”

副总统艾伯·巴克利则提出一个他认为“对本政府来说是十分危险的公共关系方面的问题”：麦克阿瑟关于“圣诞节前让孩子们回家”这句话已经被媒体广泛引用，而麦克阿瑟将军是否真的说过这样的话?

布莱德雷说：“麦克阿瑟昨天对记者说，他正式否认说过这样的话。”

巴克利怒不可遏：“作为战区指挥官，麦克阿瑟将军应该知道这样的话意味着什么，而他既然知道后果为什么还要这样说？”

布莱德雷只好替麦克阿瑟同时也是替五角大楼解释：“麦克阿瑟将军的声明也许是说给中国人听的，以向他们表示在这次进攻之后我们就会撤出朝鲜。”

国防部长马歇尔的结论是：这一说法目前的确令我们十分窘迫，所以我们“应该以某种方式避开它”。

会议开始讨论最实际的问题：如何体面地离开朝鲜?

这个令人尴尬的问题从此被提出，并且纠缠了美国政府达两年之久。

华盛顿的会议和东京的会议一样，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结果。既然第八集团军已经开始安排部队的撤退，那就没有必要再向麦克阿瑟下达什么新的指示了。况且，即使华盛顿有什么新的指示，华盛顿也知道那个老家伙是不会听的。

但是，会后，杜鲁门总统告诉马歇尔，以后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给麦克阿瑟的所有电报都必须事先“通过国防部长呈递总统”。

中国第三十八军的指挥员们于二十七日看到了毛泽东打来的电报。电报中祝贺志愿军在德川方向歼灭南朝鲜第二军团主力的胜利，而后指出，下一步的任务更为艰巨，那就是以歼灭美军第一、第二、第二十五师的主力为战斗目标。毛泽东说:“只要这三师的主力歼灭了，整个局势就很有利了。”

第二次战役全线进攻打响后，第三十八军指挥员们的认识是:能不能歼灭美军的一两个师，关系到整个朝鲜战局的前途;而歼灭美军师的关键，在于第三十八军能不能穿插到位。

彭德怀命令第三十八军向三所里方向前进，把美军的退路彻底封锁住。

刚刚结束德川战斗的第三十八军的官兵们十分疲劳。当暂时松弛下来时，饥饿和困顿立即袭来。士兵们无论是挖工事还是转移行军，都可能随时随地睡着。一一三师三三八团团长朱月清刚端起一碗稀饭，用筷子搅和的时候，头一歪就睡着了，稀饭洒了一身。

向三所里穿插的部队是一一三师，一一三师的先头团就是朱月清率领的三三八团。

师长江潮在电话里对朱月清说:“命令你团立即出发！身边有地图没有？”

朱月清根据师长的指示，在地图上标出前进的路线。在地图上测量，从出发地到三所里，直线距离是七十二点五公里。

当时，三三八团没有几个团一级的指挥员明确知道要他们急促奔向三所里到底是去干什么。朱月清随即向各营下达的命令是:饭边走边吃，任务边走边下达，不准让一个士兵掉队。

德川一役，第三十八军缴获的轻武器很多，中国士兵很多人都换上了美式的汤姆枪和机枪。

十三名会开汽车的俘虏，包括八个南朝鲜人和五个美国人被挑选出来，在中国士兵的押解下，开着十三台满载缴获弹药的汽车，跟随着一一三师前进。

朦胧的月色中，一一三师的队伍不顾一切地向预定目标奔去。长长的队伍穿越山林河流，尽量保持肃静，但还是不断有人跌倒，发出很大的声响。极度疲劳的士兵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倒在山涧里时清醒了，然后再爬上来。只要队伍一停下，哪怕是一瞬间，就有人睡着了，鼾声一下子连成一片。有的士兵怕自己睡不醒掉队，休息的时候干脆躺在道路中间，这样即使是睡着了，队伍再前进时也会把他踩醒。炮兵更加艰难，他们扛着炮件和炮弹跟着步兵一步不落，气喘之声大得吓人。一一三师副师长刘海清率领的先头部队三三八团，于安山洞消灭了南朝鲜军的一个排，又于沙屯击垮了南朝鲜军的一个连。之后在翻越一千二百五十多米高的长安山时，为了防止极度疲劳的士兵由于打瞌睡掉下深渊，这个团的所有干部走在前面开路，后面的士兵抓住前面士兵的子弹带，一个拽着一个地向前移动。

在距离三所里还有十几公里的时候，天亮了。

几十架美军飞机沿大同江飞来，在一一三师数里长的行军队伍上盘旋。士兵们想，自从入朝以来照例白天是不行军的，只要一听到隐蔽的命令就赶快藏起来，然后可以好好地睡上一会儿。结果，命令在队伍中传达下来了:“继续全速前进！”

一一四师穿插的目标是戛日岭。戛日岭是自德川向西南二十公里处的一个天然屏障，在高山密林中，有一道仅十多米宽的险峻垭口，它是穿插部队向军隅里方向前进的必经之路。但是，根据可靠情报，

为恢复破碎的右翼，沃克已经命令位于价川的土耳其旅先头部队向戛日岭奔来。从价川到戛日岭三十公里，乘坐汽车用不了两个小时，而一一四师距离戛日岭还有十八公里，疲劳的士兵靠步行先敌占领戛日岭的垭口已经来不及了。

土耳其旅的五千官兵是几天前才到达朝鲜的。沃克在右翼崩溃的时候让这支部队去堵缺口，这一调遣被美国军史学家形容为“用一个阿司匹林药瓶的软木塞去堵一个啤酒桶的桶口”。土耳其旅既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战场情报，也没有像他们想象的那样会由美军顾问来参加他们的行动。此时，西线上的美军都在向清川江以南撤退，而他们却受命向着北面的前沿开进。土耳其旅出发几个小时之后，便传来了他们“大获全胜”的消息。根据他们自己说，他们“与蜂拥而至的中国军队进行了激烈的战斗”，经过“浴血奋战”不但守住了阵地，而且还抓获了“几百名俘虏”。美第二师的军官们听了喜出望外，立即派出情报官和翻译前去审问俘虏，结果没问几句就明白了，土耳其人打垮的是一群溃败下来的南朝鲜第七师的士兵。这些南朝鲜士兵从德川逃出来，逃进了土耳其旅布防的阵地，刚上战场的土耳其人既不懂朝语又不懂英语，被他们打死在阵地上的“中国士兵”全是南朝鲜士兵。

第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和政委刘西元赶到距戛日岭只有两公里的一一四师指挥所，已在这里的副军长江拥辉向梁兴初军长报告说：土耳其旅的一个加强连先我占领了戛日岭主峰。

入夜，戛日岭主峰上闪着火堆的光亮。

江拥辉和一一四师师长翟仲禹等人经过讨论，决定采取三四二团团长孙洪道和政委王丕礼的建议：既然敌人在明处，咱们来个偷袭，悄然接近，突然开火，一举拿下戛日岭主峰。

正在商量，不远的地方传来手风琴的声音，琴声在寂静的夜色中十分响亮，令所有的人都吃了一惊。

拉手风琴的是三四二团二营营长姚玉荣。他是那个揣着情书入朝参战的一营营长曹玉海的战友。手风琴是姚玉荣的战利品，他因为喜欢而一直背着这个沉重的东西行军。他拉得虽不成调，但他的士兵们都觉得很有意思。师长翟仲禹在黑暗中朝着这个浪漫的营长赶来，骂道:“混蛋！惊动了敌人我枪毙了你！”

姚玉荣立即知道自己干了什么事，他把手风琴扔向山沟，手风琴在滚落中发出的琴声更加响亮。翟仲禹师长看着士兵们在暗夜中瞅着他的眼光，气得不知该说什么好。

三四二团二营的官兵对这里的地形很熟悉，因为第一次战役的时候，他们曾在这里防守过。在团长孙洪道和政委王丕礼的带领下，二营的七连和八连向戛日岭主峰摸上去。他们把身上可能发出声响的东西全部丢掉了，只带枪支和手榴弹。但是，在接近主峰的时候，由于脚上穿的是缴获的美军大头鞋，踩在雪上吱吱直响，于是这些中国士兵便把鞋脱了，光着脚在雪地上攀登。

戛日岭主峰上，土耳其士兵在寒冷的夜晚只顾得烤火，燃烧的木头发出爆裂的声音。火堆有十几丛，政委王丕礼把自己的士兵分成若干小组，命令一个小组解决一堆火旁的敌人。在离敌人只有二十米远的距离上，中国士兵开火了。在手榴弹的爆炸声中，土耳其士兵四处逃散。二十分钟后，戛日岭主峰落在中国士兵手中。土耳其士兵在慌乱中爬上汽车，汽车连成串地向山下开去。山道盘旋，团长孙洪道命令八连把敌人截住，士兵们抄最近的直线扑向山道的下端。山势极其陡峭，士兵们径直向陡壁下跳，摔伤的和没有摔伤的都继续前扑，终于在山道的一端堵住了逃跑的敌人。在战斗中，中国士兵发现那些钻进石头缝和汽车下的单个的土耳其士兵无论怎么喊话都坚决不投降，

直到被打死。结果，在中国士兵的围歼下，只有少数土耳其士兵被俘。中国士兵们看见被俘的土耳其士兵和他们在第一次战役中看见的那些美国兵一样，人人屁股上都挂着一只甚至几只朝鲜铜碗，这些碗在他们走起来的时候叮当乱响。中国的翻译人员跟他们解释说这碗不是金的，但土耳其士兵就是不信，无论如何也不扔。

土耳其旅开往戛日岭方向的五千人的部队，战斗结束后只剩下不到两个连的兵力。

到二十八日早上，西线战场的局势已经十分明确：美第九军所属第二师、第二十五师，土耳其旅，美骑兵第一师以及南朝鲜第一师，都已经在中国军队的三面包围之中。至此，在联合国军后撤的路上，只有自安州向肃川的退路尚未切断，而三所里是这条路上的必经咽喉之地。如果三所里堵不住，整个第二次战役势必会成为一场达不到歼敌目标的击溃战。

彭德怀的指挥部里迷漫着焦灼不安的气氛：负责向三所里穿插的第三十八军一一三师现在到了什么地方？他们能不能按时到位？一切的一切，没有半点儿消息！

向第三十八军指挥部联系，回答是：电台叫不通。

彭德怀命令自己的电台直接呼叫一一三师，报务主任亲自上阵仔细寻找这个师的电台讯号，但一一三师好像突然从整个战场上消失了一样，音讯全无！

按计划，一一三师应该已经深入敌后方八十公里。

孤军在如此纵深的敌对力量占领区域，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彭德怀双眼红肿，嘴唇裂着口子，说话的声音沙哑干涩：“娘的！这个一一三师到底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在联合国军的正面，中国第四十军、第三十九军、第五十军、第六十六军正全力向其压缩。第五十军向博川以西的天化洞、大化洞发展；第六十六军在凤舞洞地区向阻击之敌攻击；第四十军则全力向军隅里方向攻击；第三十九军向安州方向前进。

而此时，第四十二军则在全力穿插，这与第三十八军的堵截同等重要：它必须刻不容缓地向前进击，先敌占领顺川、肃川，以彻底切断敌人的退路。严格地说，第四十二军所执行的任务相比之下更为艰巨，因为他们穿插的距离远，所受到的阻击将更为剧烈。为此，毛泽东于二十八日凌晨电报指示：“……美骑兵一师（两个团）正向德川、顺川、成川之间调动，目的在巩固成川、顺川地区阻我南进。我四十二军应独立担任歼灭该敌……”

二十八日夜，第四十二军的部署为：一二五师沿假仓里、月浦里路线攻击前进，攻占月浦里后占领顺川；一二四师尾随一二五师跟进，准备投入主攻方向的战斗；一二六师经松隅里、龙门里至新兴里一带配合主力作战。

跟进的一二五师在新仓里遇到北上的美骑兵第一师的阻击。

在新仓里，出现了一个英雄的中国排长，名叫安炳勋。在向美军阵地的攻击中，他带领一个排连续攻下三个高地，创造了以一个排的兵力歼灭美军一个排，并击溃一个美军排的战绩，从而荣获“战斗英雄”的称号。战斗中，他的左腮被子弹击穿，血流满面，但仍坚持指挥攻击行动，在最艰难的时刻，他的排全排士兵与美军肉搏在一起。

在美军的多次反击中，一二五师三七三团伤亡巨大。为保存实力，三七三团撤出了战斗。面对美军的顽强阻击，第四十二军的指挥员们的信心动摇了，在反复讨论“打还是不打”之后，直到三十日才达成打的决心，决定一二四师和一二五师同时攻击美军。但在攻击前，这两个师的决心又发生了动摇，在没有得到军里命令的前提下，一二四师和一二五师没有发起攻击，反而先后撤退了十公里。撤退中，炮兵被丢在后面，结果遭到美军飞机的轰炸，损失惨重。

由于第四十二军没有果断攻击，最终没能完成彭德怀下达的穿插任务，致使美骑兵第一师七团逃出了中国军队的包围，整个肃川方向的敌人的退路没有被封死。

第四十二军的先头部队曾一度深入到丫波里地区，这是第二次战役中中国军队深入敌后最远的地方。但是，在丫波里，第四十二军依旧没有果断地对美军展开攻击。三七〇团遭到美军飞机的猛烈轰炸，指挥的不利使部队损失巨大。三七八团团长郑希和于大同江东岸在美军飞机的袭击中牺牲。

第四十二军在穿插中受挫的原因很多。当时，中国士兵的体力已经到达极限，缺乏机械化的后勤保障使弹药极度缺乏。中国军队还缺乏正面攻击美军阵地的有效手段，美军的现代化武器使中国军队一旦与之正面遭遇，必定伤亡过大。美军战史记载道，当一次攻击停止时，倒在阵地前的中国士兵的尸体“足以构成另一道防御屏障”。最后，第四十二军所承担的任务也已超出了其行动速度的极限。

就在第四十二军穿插受阻的同时，令彭德怀焦急万分的一一三师其实一直在顽强地向预定目标三所里前进。

三所里是地处西线的美第八集团军腹地的一个小山村。它南临大同江，北依起伏的山峦，村西有一条南北方向的公路使价川直通平

壤。这里是西线的联合国军北进的必经之地；当然，一旦北进失败，它也必将成为美军主力南逃的一道“闸门”。

为了按时到达三所里，一一三师的大部队破例白天在公路上明目张胆地前进。不是他们不怕美军的飞机，而是他们只能这么做了。副师长刘海清的观点是：我们是应该爱护战士，但如果不及时到达三所里，战士们的伤亡会更大，这就是辩证法，是战斗中最高的群众观念。

师长江潮同意这个观点。

奇怪的是，天上的美军飞机虽然来回盘旋，但始终没有轰炸。开始的时候，飞机到了头顶，部队还隐蔽一下，后来因为这样严重地耽误行军速度，士兵们干脆把伪装扔了，索性大摇大摆地走路。结果，美军飞行员上当了，他们认为这支部队必是从北边撤退下来的南朝鲜部队。于是美军飞行员利用无线电要求三所里的南朝鲜治安军给这支“撤退的国军”准备好饭。充满温情的美国飞行员除了要求准备好米饭、开水之外，还嘱咐要准备一些朝鲜人喜欢吃的咸鱼。

中国士兵们很快就明白美国人上当了，干脆喊起来，借此壮胆和驱赶极度的睡意：“快走！快走！前边就到啦！”

行进中的士兵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把草，在泥泞的地方为后面的炮兵垫路。

当一一三师三三八团的前卫营到达三所里的时候，一个冲击就把正在忙于做饭的南朝鲜治安军歼灭了。而后，他们迅速占领了三所里西边那条南北向的公路两侧的所有高地。

三三八团团长朱月清带着指挥所也赶到了，他刚爬上三所里的东山，就听见前卫排方向响起了枪声。朱月清举起望远镜一看，不禁浑

身一紧：北面的公路上烟尘滚滚，一眼望不到头的美军大部队撤下来了！

朱月清立即命令部队跑步前进。

后面的部队一听说堵住了美军，拼尽最后一点力气开始跑步。有的士兵倒在地上，把干粮袋和背包扔掉，爬起来再跑；有的士兵倒下，只是向前看了一眼，再也没有爬起来。

第三十八军一一三师三三八团，十四个小时强行军七十二点五公里，抢占了三所里，关死了美军南逃的“闸门”——他们仅仅先于美军五分钟到达。

在穿插的路上，这个师实施了无线电静默。

在三所里，朱月清立即让师报务主任张甫向军、师发报。

电报是事先编定的一串密码。

在彭德怀的指挥部里，一直在寻找一一三师电台信号的报务员突然大声地叫起来：“通了！”

一一三师的电台从开机，到接通师、军、志愿军总部，一共只用了五分钟，为此，报务主任张甫立了战功。

“我部已经先敌到达三所里！”

“敌人企图通过三所里撤退！”

“我部请示任务！”

疲惫不堪的彭德怀惊喜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总算出来了，总算到了！”

这时，第三十八军指挥部电告一一三师，三所里的西北方向有个龙源里，那里有一条路也可以通往顺川，也是敌人的南逃之路。军指挥部命令一一三师必须立即抢占龙源里。但是，在第三十八军指挥部给一一三师的电报中，报务员把“龙源里”的“源”字打成了“泉”字，一一三师接到电报后，在地图上怎么也找不到“龙泉里”在什么位置。时间不等人，反正大致方向明确，于是，一一三师立即命令三三七团向那个方向急促攻击。二十九日凌晨，三三七团占领了龙“泉”里。

与此同时，一一三师还派出一个营向安州方向前进，完成了破坏道路和炸毁桥梁的任务。

联合国军南逃的退路被全部封锁了。

于是，彭德怀给第三十八军下达了一道严厉的命令：“给我像钢钉一样钉在那里！”

## 三十八军万岁！

中国军队对三所里和龙源里的占领，震动了联合国军的整个战线。联合国军大后方关键部位的丢失，使徘徊于清川江北岸的美军第二师、第二十五师、第二十四师和英军第二十七旅、南朝鲜军第一师以及土耳其旅残部全部陷入了中国军队的包围之中。这时，联合国军西部战线最高指挥官、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才真正体会到使用土耳其旅去堵的右翼缺口是个多么轻率的决策。而现在，沃克手中唯一可以机动的部队仅有位于顺川的美骑兵第一师了。但由于假仓里方向已经传来“发现中国军队向顺川运动”的报告，沃克便陷入了一种极度

困难的境地：预备队的投入已经没有意义，现在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让已在包围圈中的部队赶快撤回来。

十一月二十九日早上，麦克阿瑟在东京发表了一个声明，称："由于中共军大举南进，难以指望韩国战争早日结束。"

联合国军开始向清川江南岸大规模地撤退。

联合国军撤退的目标是顺川、肃川、成川一线，这里是朝鲜国土东西间最狭窄的蜂腰部。

从地图上看，联合国军向南撤退只有四条路可以走，这也正是联合国军北进的四条路，其自西向东依次是：博川至肃川的公路，价川经新安州至肃川的公路，价川经龙源里至顺川的公路，还有一条就是价川经三所里至顺川的公路。

美军与中国军队和南朝鲜军不同，他们庞大的机械化部队一旦行动必须依赖公路。

最西边的美第一军迅速由清川江北岸撤退至新安州地区，美第九军也收缩至价川地区。

为迅速摆脱中国军队越来越猛烈的压缩，美军遗弃了大批的装备器材，一路沿着价川经新安州方向撤退而来。在三所里、龙源里，他们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向中国军队已经占领的阵地实施了猛烈的攻击，力图尽快打开向南撤退的通路。

沃克将西线被围的部队撤出的唯一希望寄托在一个设想上，即：三所里、龙源里的中国军队也许是一支仓促穿插到这里的部队，其兵力和防御纵深都应该很薄弱，兵力和火力占据优势的美军打开通路虽然是个麻烦，但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就在麦克阿瑟含糊地承认联合国军北进计划已经失败的那个早上，美第二师司令部里跑进来一个浑身是血的土耳其兵，他上气不接下气地报告说，他是土耳其旅补给连的，他们的连队在沿顺川至价川的公路往北前进的时候，在青龙站附近遇到大批的中国军队，全连遭到突然袭击，现在已没剩几个人了。

美第二师师长凯泽意识到：切断退路的中国军队可能不会是一支小股部队。

美第二师白天受到的南北夹击令凯泽师长印象深刻。中国军队在他的正面连续不断地进攻，使第二师的战斗力已经减少一半，尤其是步兵营，有的营人数减少至两百至两百五十人，而有的步兵连甚至只剩下了二十多个人。即使如此，凯泽也不敢放弃节节抵抗的战术，因为不这样，第二师就真的要全部溃散了。

听了那个惊慌的土耳其兵的报告后，凯泽决定派一个宪兵班先去南边探路，但自从这个班出发以后，凯泽师长就再也没听到他们的消息。

八时，正不知该怎么办才好的凯泽接到了美第一军军长米尔本的电话："情况如何？"

凯泽回答："不好，甚至我的指挥部也受到袭击！"

米尔本说："实在不行，就向我靠拢吧，走我们这里也许安全些。"

美第二师担负着整个战线右翼的掩护任务，怎么能够弃全线于不顾往西跑？再说，又怎么能在这时候听一个不是自己直接上司的人指挥呢？凯泽师长决定亲自到军指挥部去一趟。他是乘吉普车去的，军指挥部在军隅里以西四公里的地方。凯泽到了那里，才发现军指挥部

里根本没有人，只有一个趴在地图上紧皱眉头但什么也决定不了的作战部长。凯泽在这张军指挥地图上看了看自己师的作战区域，并决定以此为指令，于是乘车往回走。吉普车上了公路才发现，公路上挤满了撤退下来的辎重车辆，吉普车根本通行不了。于是凯泽临时改乘直升机。在直升机顺着公路向师指挥部飞去的时候，凯泽看见飞机下的公路上数千难民黑压压地向南蜂拥而去。凯泽根据自己的战场经验认为，凡是出现难民的时候，中国军队肯定还没有到来，因为战争中的常识是，难民的逃难总是在军队之前。可是，后来的事实残酷地向凯泽师长证明，他看见的那数千人的人流，根本不是什么难民，恰恰是正在南下准备切断他的退路的中国军队。

步行行军的中国士兵军装标志不明显，在艰难急促的奔跑中又根本无法顾及军容，这使美军的侦察判断一错再错。

既然认为中国军队的主力还没有到来，美第二师还是有时间沿着价川至顺川的公路撤退的——在直升机上，凯泽师长这样决断。

战后，凯泽余生每当想起这一幕时都为自己的愚蠢后悔不已。

回到师指挥部的时候，凯泽得知不但派出的宪兵班没有消息，之后派出的坦克排也是一去不复返。这时，第二师正面的压力越来越大。心情焦灼的凯泽师长又派出一个侦察连去探查向南撤退的道路，侦察连进至青龙站附近受到突然出现的中国军队的袭击，当美第二师九团的一支增援连队找到这个侦察连的时候，侦察连全连活着的官兵只剩下了二十多人。

为了给向南撤退的美军杀开一条血路，美第九军二十九日全天向中国军队展开了全面的猛攻。但是，令他们意外的是，中国军队出奇的顽强，而且根本不是想象中的一股小分队，简直就是一支精锐的大部队。

这支精锐的大部队就是快速地穿插到三所里，并且“像钢钉一样钉在那里”的中国第三十八军一一三师。

凯泽师长派出的侦察连在龙源里遇到的就是一一三师三三七团的一营三连。

三三七团以三连为前卫于二十九日凌晨四时占领龙源里的时候，正好有一队美军的车队通过这里，在连长张友喜的带领下，三连立即向美军发起攻击。战斗结果是，击毁汽车十五辆，俘虏美军十五人。经过审问，知道他们是美骑兵第一师五团的先头部队。

短促的遭遇战过后，出现了暂时的寂静，中国士兵们开始吃从美军汽车上缴获来的食品。天大亮了，哨兵说有敌情，张友喜顺着公路向北看，逐渐看清了，是一辆吉普车和几辆大卡车组成的小型车队。等车队驶近了，三连以突然的出击没费什么力气就解决了战斗。令中国士兵兴奋的是，美军车队这次运的不再是难喝的“威士忌”，而是面粉和牛油！

三连的士兵没高兴多一会儿，大批的美军到了。

二十九日整整一个白天，美第二师九团的攻击都是以坦克为前导，于是，这天的阻击实际上是中国士兵用血肉身躯与钢铁坦克的搏斗。三连三排一名叫徐汉民的士兵用手榴弹把一辆坦克的履带炸断之后，没过多久，发现被自己炸断履带的那辆坦克又“活”了。原来美军的坦克驾驶员钻到坦克下，居然把这辆坦克修好了。徐汉民一看冒了火，追过去跳上那辆坦克。其他的中国士兵一看到这个情景，大声地喊：“有种！好样的！”徐汉民在美军坦克上不知道如何下手，中国士兵打坦克的知识极其有限。坦克带着这个中国士兵开出去一百多米远，叫好的中国士兵这回又担心了，大喊：“快回来！快回来！”这

时，只看见徐汉民突然从坦克上滚下来，接着就是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原来徐汉民把一捆手榴弹塞进坦克的炮塔里去了。

就在一一三师于三所里、龙源里阻击南逃美军的时候，彭德怀命令西线的中国军队向美军发起猛烈的压缩攻击。

在以价川为中心的方圆十几公里的范围之内，中国军队分成无数支部队将美军分割开来，使价川地域成为世界战争史上规模巨大的血流之地。

第三十九军各师凶猛地压向军隅里，顽强地突入美军临时构筑的防御阵地。美军士兵惊慌地看见一个中国士兵端着机枪站立着向他们射击，士兵在身受数弹的时候依旧不倒，这个中国士兵叫杨玉鼎，隶属一一七师三四九团。一一七师三五〇团的前卫连追到一个叫三浦里的地方时，迎头遇到从军隅里逃出来的一队有坦克和飞机掩护的美军。三五〇团的士兵根本忘却了自己生命的安危，排长颜怀有跑上公路，拦住美军的退路。其他的中国士兵也都像他那样，他们把美军士兵赶进一片稻田里进行了围歼，结果这股美军没有一个人逃出厄运。

第三十八军的一一四师突破土耳其旅的防线之后，奉命不顾当面之敌迅速向三所里方向前进，向顶着巨大压力的一一三师靠拢。一一四师顽强而迅急地突进，终于靠近了龙源里。他们就是美第二师师长凯泽在直升机上看见的那数千“难民”。第三十八军一一二师于二十九日十六时到达凤鸣里。在这里的美第二十五师拼死阻击。经过残酷的战斗，两个小时之后，一一二师占领了凤鸣里。

第四十军一一八师冲破美军的拦截，占领了军隅里，一直追击到新安州地区。拂晓的时候，年轻的师长邓岳被头顶上飞来飞去的美军飞机弄得很不耐烦，因为那些飞机通过大喇叭反复向地面用英语和朝

鲜语喊着什么。邓岳问翻译："飞机上没完没了地在喊什么？"翻译听了一会儿，说："它在通知美军和南朝鲜士兵，一律到平壤集合。"

第四十军一一九师奉命直插青谷里。这是位于龙源里以北的一个公路要地。一一九师正面攻击美军的部队，他们向三所里和龙源里的逼近，证明美军已经被压缩成一团了。公路被美军丢掉的汽车、坦克和大炮堵塞，冲在最前面的六连在一个铁路隧洞附近发现三百多辆美军汽车和坦克聚集在那里。中国士兵用缴获的美军火箭筒打中了一辆油车，隧洞附近顿时大火冲天，火光把夜色照得白昼一般。在猛烈的射击之后，中国士兵冲上公路，公路上美军尸体密集，那些活着的美军士兵四处逃散。这时，公路前面突然枪声激烈，枪声来自青谷里以西，也就是被三十八军占领并且顽强阻击的阵地——松骨峰，向南撤退的美军到了这里如果被堵截就没路可逃了。

松骨峰，北朝鲜西部一个极其普通的小山头，但由于在这里发生的事情被一位中国作家写成了通讯，所以中国很多很多的成年人今天依然知道松骨峰，知道在那里发生过中国士兵与美国士兵殊死的搏斗。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三十日，是这个叫松骨峰的地方血肉横飞的日子。

虽然松骨峰在中国作家的通讯里长满了青松，但事实上松骨峰是个半土半石的小山包。松骨峰位于龙源里的东北，与三所里、龙源里形成鼎足之势。它北通军隅里，西北可达价川。其主峰标高二百八十八点七米，从山顶往东延伸约一百多米就是公路。

坚守松骨峰的中国军队是第三十八军一一二师的三三五团，团长是刚刚打完飞虎山阻击战的范天恩。

范天恩的三三五团注定要在朝鲜战场上不断地打恶仗。

当第二次战役开始的时候，三三五团还在执行诱敌深入的任务。这个团的官兵在范天恩的率领下，在飞虎山对北进的联合国军进行了顽强的阻击。之后他们边打边撤，当军主力已经开始攻击德川时，三三五团还在距德川一百多公里远的花坪站阻击北进的一股美军。当天晚上，范天恩接到新的命令，命令仅有一句话：向当面之敌发起攻击。这时，与师里联系的电台坏了，范天恩立即在地图上找前进的路线，决定就朝那个叫新兴里的地方打。这时，第四十军的一个参谋找到他，说是来接三三五团阵地的。从第四十军指挥员的口中，范天恩才知道第二次战役第三十八军打的是德川。范天恩觉得跟着第四十军，肯定没有什么真正的仗打，不如追自己的军主力去。决定之后，三三五团全团进行了轻装，除了战斗必需的东西外，其他的装备全藏在一个小山沟里，派一个班看守。范天恩计算一天走六十公里，两天就可追上主力。

三三五团没有向导，全靠一张地图和一个指北针，他们在天寒地冻中开始了翻山越岭的艰难行军。目标只有一个：追上主力，争取赶上仗打。走了两夜，到达距德川还有十几公里的一个小山村时，包括范天恩在内全团官兵实在走不动了。范天恩命令一个参谋带人去侦察主力部队的方位，同时让部队在村子里休息一下。警卫人员在寻找可以防空的地方时，意外地在一个菜窖里抓了十几名南朝鲜兵，一问，原来德川的战斗已经结束。不久，外出侦察的参谋回来了，说主力正在向戛日岭前进。范天恩立即命令部队继续追赶。在戛日岭附近，三三五团终于追上了刚刚打下戛日岭的军主力，范天恩还顺便从躺在公路上的美军汽车里弄到一部电台。这时，一一二师师长杨大易接到军指挥部的命令，让他们立即占领松骨峰。师长正苦于手上没有可以调动的部队了，看见三三五团来了，杨大易极为高兴地叫道：“真是天兵天将！”

杨大易给范天恩的命令是：直插松骨峰，在那里把南逃的美军堵住。

范天恩带着他极度疲惫的士兵，立即向松骨峰急速前进。

在漆黑的夜晚，三三五团冲破美军的炮火封锁，在书堂站一带展开了部队。

范天恩命令一营占领松骨峰。

一营先头连是三连。三连在天亮的时候爬上了松骨峰，还没有来得及修工事，大批的美军就顺着公路来了。

蜂拥南撤的部队就是美军第二师。

面对公路上一眼望不到边的美军，经过几天急行军的中国士兵立即把饥饿和疲劳忘得精光。

三连的最前沿是八班。在美军距八班阵地还有二十米的距离时，八班的机枪手杨文明首先开火，立即把第一辆汽车打着了。枪声一响，排长王建侯带领五个士兵冲上了公路，火箭筒射手抵近向坦克射击，手榴弹同时飞向汽车。这时，五班的爆破组也把第二辆坦克打着了。汽车和坦克堵塞了公路。

片刻之后，美军组织起向松骨峰的攻击。

他们要想活着就必须打开松骨峰的通路。

朝鲜战争中一场最惨烈的战斗就这样开始了。

战斗打响之后，范天恩担心阵地上的工事还没有修，士兵会伤亡很大，就打开步话机向一营喊话，结果步话机中响着的全是英语，那

边的美军指挥官正吵成一团。范天恩只好命令二营用机枪火力支援一营三连的方向，以减轻前沿的压力。

一营营长王宿启更为三连是否能在那个紧靠公路又没有任何依靠的山包上顶住敌人而焦灼不安。他命令在三连阵地左侧的一连和右侧的二连都上好刺刀。

美军的第三次冲锋开始了。

美军飞机疯了一般，擦着中国士兵的头顶把大量的炸弹和燃烧弹投下来。美军的火炮也疯了，炮兵也知道，如果不突围出去就全完了，于是，炮弹密雨似的打在中国军队的阵地上。

三连的周围弹片横飞，大火熊熊。

美军士兵冲上来了。

营长王宿启立即命令左侧的一连从侧面出击。肉搏战之后，美士兵被刺刀逼下去。于是改为从三连的右侧攻击，但右侧的二连也端着刺刀扑了上来。

就这样，三连在正面顶，一连和二连在侧面支援。

在刺刀的拼杀中，一连和二连伤亡巨大。

美军向松骨峰前沿攻击的兵力还在成倍地增加。

师长杨大易焦急地关注着三连的方向。他站在师指挥部的山头上，看见从药水洞到龙源里的公路上全是美军的汽车和坦克，多得根本看不到尽头。

美军的第四次冲锋是在阵地上的大火烧得最猛烈的时候开始的。美军士兵已经冲上四班的阵地，四班的士兵们喊：“机枪！快打！”机枪由于枪管被烧弯已不能射击了。机枪手李玉民从战友的尸体上拿起步枪向美军冲去。他的大腿被子弹穿了个洞，他用一颗子弹塞进伤口止血，然后继续与敌人拼刺刀。四班的士兵们冲过来，美国兵扔下他就跑。眼睛看不见的三排长爬过来，要把李玉民背走，李玉民说：“你快去指挥，敌人又要打炮了！”

这时候，第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的电话来了，军长在电话里向范天恩发火，原因是侦察情报报告，在三三五团的防区，有四辆美军炮车通过公路向南跑了。“给我追回来！记住，不许一个美军南逃！”

范天恩立即派三营的两个连去追。为了歼灭四辆炮车，在已经非常紧张的兵力中抽出两个步兵连，足以看出中国军队要一个不剩地将美军置于死地的决心。范天恩的两个步兵连翻山越岭抄近路，整整追了一天，最终把四辆美军炮车追上并歼灭了。

中午的时候，坚守松骨峰的三连只剩下不到一半的人了。连长戴如义和指导员杨少成烧毁了全部文件和自己的笔记本之后，与还活着的士兵们一起回忆了这个连队在其征战历史上获得的各种称号：战斗模范连、三好连队、抢渡长江英雄连……最后，戴如义和杨少成的决心是：哪里最危险，我们两个人就要出现在哪里。

就在松骨峰、龙源里、三所里阵地的阻击战斗打到白热化的时候，彭德怀的电话打到了一一三师的指挥所，他问师政委于敬山：“敌人全退下来了，一齐拥向你们的方向，你们到底卡得住卡不住？”

于敬山回答：“我们卡得住！”

在龙源里阻击的是另一个三连，隶属于第三十八军一一三师三三七团。从这个连队正面攻击的除了美第二师的部队之外，还有美第二十五师和英军二十七旅。三连的中国士兵依靠阵地上坚硬的岩石地形，吃着用缴获来的黄油和面粉烙的饼，誓死不后退一步。为了打通这条路，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美军出动了上百架飞机，整个龙源里阵地上山摇地动，坦克炮、榴弹炮、迫击炮和航空炸弹把阵地上坚硬的岩石整个“翻耕”了数遍，对自己的火力十分迷信的美军对中国人能在这样的轰炸中活下来的本领油然生出一种“宗教情绪”般的敬畏。在听说北援的敌人占领了一排的前沿阵地时，三连连长张友喜带着十名士兵立即向敌人发起进攻，用刺刀把敌人压了回去。屡次失败的美军居然想出了这样一个办法：让自己的士兵伪装投降。一伙美军坐在汽车上举起白旗，示意投降。于是中国士兵派人下去接受投降。结果当中国士兵走近了的时候，汽车上的美国兵突然开火，然后开动汽车迅速逃跑。美国兵不知道，他们这样做恰恰让中国士兵更增强了同仇敌忾的信念，中国人性格中的这种激情一旦被激发起来，他们会变得更加凶猛顽强。

三连的阵地始终处在美军的南北夹击之中，南逃的美军和北上增援的美军有时几乎已经“会师”。战后美第二师的军官回忆道：“我们甚至看见了增援而来的土耳其旅坦克上的白色的星星。”但是，在三连打到全连官兵所剩无几、弹药已经用尽的情况下，南北两边的美军始终没能会合。

龙源里的“闸门”紧紧地关闭着。

下午十三时，攻击松骨峰阵地的美军开始了第五次冲锋。

由于中国军队的合围越来越紧，美军的命运已经到了最后时刻。参加向松骨峰冲锋的美军增加到上千人，美军出动了飞机、坦克和火炮，向这个公路边的小山包进行了长达四十分钟的猛烈轰炸。三连的

士兵在根本没有任何工事可以藏身的阵地上蹲在弹坑里，然后突然冲出来向爬上来的美军射击。

随着美军的冲锋一次次被打退，美军投入冲锋的兵力越来越多，而在松骨峰阵地上的三连可以战斗的人越来越少了。排长牺牲了，班长主动代理，班长牺牲了，战士主动接替，炊事员和通信员也参加了战斗。指导员杨少成的子弹打光了，他端着刺刀冲向敌人，当数倍于他的美军士兵将他围住的时候，他拉响身上剩下的最后一颗手榴弹，喊了声："同志们，坚决守住阵地！"然后在手榴弹爆炸之际和敌人抱在一起。中国士兵看见自己的指导员就这样牺牲了，他们含着泪呐喊："冲呀！打他们呀！"士兵们向已经拥上阵地的黑压压的美军冲过去。

这是三连的最后时刻，也是那些亲眼目睹了松骨峰战斗的美国人记忆深刻的时刻。没有了子弹的中国士兵腰间插着手榴弹，端着寒光凛凛的刺刀无所畏惧地迎面冲过来。刺刀折断了，他们抱住敌人摔打，用拳头、用牙齿，直到他们认为应该结束的时候，他们就拉响了身上的手榴弹。共产党员张学荣是爬着向敌人冲上去的，他已经身负重伤，没有力气端起刺刀，他爬到美军中间拉响了在牺牲的战友身上捡来的四颗手榴弹。一个叫邢玉堂的中国士兵，被美军的凝固汽油弹击中，浑身燃起大火，他带着呼呼作响的火苗扑向美军，美军在一团大火中只能看见那把尖头带血的刺刀。美军在这个"火人"面前由于恐惧而浑身僵硬，邢玉堂连续刺倒几个敌人，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紧紧抱住一个美国兵，咬住这个美国兵的耳朵，两条胳膊像铁钳一样箍住敌人的肉体，直到两个人都烧成焦炭。

美军的第五次冲锋终于失败了。

松骨峰的三连阵地上只剩下了七个活着的中国士兵。

松骨峰阵地依然在中国士兵手中。

松骨峰战斗结束的时候，一个从中国来到朝鲜的名叫魏巍的作家和一一二师师长杨大易一起走上了三连的阵地。阵地上，在几百具美军士兵的尸体和一片打乱摔碎的枪支中间，他们看见了牺牲的中国士兵仍然保持着的死前热血贲张的姿态。他们手中的手榴弹上沾满了美国兵的脑浆，嘴上还叼着美国兵的半个耳朵。那个名叫邢玉堂的战士的尸体还冒着余烟，他的手指已经插入他身下那个美国兵的皮肉之中。作家魏巍将发生在松骨峰上的战斗写成了那篇著名的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

就在这天黄昏，范天恩的三三五团反守为攻，全团出击了。

同时，在各个方向围歼美军的中国军队也开始了最后的攻击。

在黄昏落日的映照下，在军隅里、凤鸣里、龙源里之间，被围困的美军被切成一个个小股，受到从四面压上来的中国士兵的追杀。企图解救美军士兵的飞机飞得很低，四处逃命的美国兵向天空摇晃着白毛巾，但是中国士兵也学着他们的样子摇晃起白毛巾，于是美军飞行员只能在一种不知所措的状态中向大本营不断地报告着一句话：“完了，他们完了！”

夜幕降临了。

朝鲜战场上的黑夜是为美军准备的坟墓。

第三十八军副军长江拥辉登上指挥所的最高处，他看见了令任何身经百战的指挥员仍会感到惊心动魄的场景：

我站在高处，放眼南望，冷月寒星辉映的战地，阵阵炸雷撕裂天空，“轰隆隆，轰隆隆”连绵不断。几十公里长的战线上，成串成串的曳光弹、照明弹、信号弹在空中交织飞舞，炮弹的尖啸，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发出的闷哑的爆炸声，在峡谷中回响不息。敌我双方在

公路沿线犬牙交错的激烈战斗，那是我从戎几十年，从未见到过的雄伟、壮阔的场面。敌人遗弃的大炮、坦克、装甲车和各种大小汽车，绵延逶迤，一眼望不到头，到处是散落的文件、纸张、照片、炮弹、美军军旗、伪军“八卦旗”以及其他军用物资……

这天晚上，也是志愿军司令部最紧张的一个晚上。彭德怀披着大衣，整夜不停地起草电报，根本不吸烟的他开始向参谋伸手要烟。彭德怀已经连续六个昼夜没有合眼了，当前线传来胜利的消息的时候，万般憔悴的他显得兴奋不已。彭德怀亲自起草了一个嘉奖电报：

梁、刘转三十八军全体同志：

此战役克服了上次战役中个别同志某些过多顾虑，发挥了三十八军优良的战斗作风，尤以一一三师行动迅速，先敌占领三所里、龙源里，阻敌南逃、北援。敌机坦克各百余终日轰炸，反复突围，终未得逞。至昨（三十日）战果辉煌，计缴仅坦克、汽车即近千辆，被围之敌尚多。望克服困难，鼓起勇气，继续全歼被围之敌，并注意阻敌北援。特通令嘉奖，并祝你们继续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三十八军万岁！

在汉语的词汇中，“万岁”一词是有其特殊含义的，是不能随便使用的，它是至高无上的人物和事物才能使用的专用词汇。中国战争史上以前没有、现在依然没有哪支部队能被称为“万岁”。这个嘉奖电报起草好之后，连几个副司令员都对这个“万岁”的称呼提出了异议：汉语中赞扬的词汇很多，能不能换一个。但是彭德怀坚持“万岁”。

据说，在第一次战役后受到彭德怀痛骂的第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在前线接到彭德怀的这封电报的时候，流了泪。

志愿军总部的电报发出时，第三十八军的士兵们正在公路上清理缴获的美军物资。根据副军长江拥辉的回忆，当时，一名中国士兵在摆弄一台美军收音机时，收音机里传出的一首歌曲令在场的所有中国士兵都愣住了。收音机里播音员说的是中国话：“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自出国以来便在生死中搏斗的第三十八军的士兵们，脸上烟火斑驳，身上衣衫褴褛，他们围着这台收音机站在硝烟缭绕的公路上一动

不动。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

前进进！！！

# 第四章 圣诞快乐

## “我真为那些中国佬惋惜！”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朝鲜半岛东北部的盖马高原上一片冰雪。白天的气温是零下二十至二十五摄氏度。从中国东北地区吹来的西伯利亚冷风横扫着荒凉而险峻的沟壑。一条狭窄弯曲的碎石路从半岛东海岸的咸兴一直向高原的深处爬去，蜿蜒伸进狼林山脉凌乱而巨大的褶皱之中，小路所经过的地方的名字听上去令人毛骨悚然：死鹰岭、剑山岭、荒山岭、雪寒岭……

美军陆战一师师长史密斯坐在直升机上往下看，他看见的是一个雪雾迷漫的世界。在这个一直令他心存恐惧的混沌世界中，史密斯企图发现冰雪上有一支蠕动着的队伍：这支队伍没有明显的国籍标志，士兵的棉衣近似裸露岩石的颜色，其中有的士兵因为没有棉衣而把棉被蒙在头上，棉被也不是一律军用制式的，间或有些是远东这片土地上农家的碎花棉被。这样的一支队伍如果此刻出现在盖马高原上，应该会很醒目。

作为战争一方的指挥官，史密斯的心情有点异样，进攻的军队本不该希望看见敌对队伍的出现，但史密斯却希望看见他想象中的那支队伍，这并不是因为他渴望战斗，而是他有一个原则：只要发现中国人的踪影，陆战一师立即停止推进。

史密斯在盖马高原上什么也没看见，尽管他命令直升机驾驶员飞得再低一些。

史密斯是上午从兴南港的师司令部飞往陆战一师的进攻前沿柳潭里的。陆战一师的七团比他早一个小时到达了这里。七团团长霍默·利

兹伯格上校出来迎接他。史密斯环顾了一下这个名叫柳潭里的山村，立即觉得这是个没有战略价值的地方——巨大的山峰围绕着一个小小的盆地，盆地里的村庄已经被炸弹炸毁，这当然是远东空军飞行员的杰作。除了几个没有力气逃离战事的老弱朝鲜山民在废墟中瑟瑟发抖外，这片盆地里已经没剩下什么活的东西了。

美军陆战一师到达柳潭里的唯一原因是：好几条山路会合于此，山路向北、向西有几条分支。

麦克阿瑟的命令是：陆战一师，进攻！

此时，在朝鲜半岛北部的西线战场，中国军队的进攻已经开始。

盖马高原距西部战线几百公里，这一巨大的空间距离令史密斯忐忑不安。

七团抓获了三名中国士兵，经过身份鉴别，认定他们是中国第二十军的。

第二十军！一个新的中国部队的番号！

中国士兵的口供是：有两个中国军将要进攻美军陆战一师。同时，中国军队将进攻下碣隅里，切断下碣隅里的道路。

这是一个可怕的口供。

但是口供的可靠性值得怀疑。如此精确的大兵团作战方案，不是普通士兵能够知道的事情。麦克阿瑟曾经说过：东方人是很狡猾的，他们黑色的小眼睛里总是有一种嘲弄对方的神情，他们喜欢吹嘘自己的强大以便让对手做噩梦。如果这里真的有两个中国军，按照中国军队的编制，至少应该有八万人之多。这样庞大的兵力移动，该有多少

车辆马匹？听说中国军队隐蔽的本事很大，但是，他们总不能像鼹鼠一样在土层下面行走吧？陆战一师的侦察机一直飞到鸭绿江边的渡口，回来报告说，确实没有发现大兵团接近的痕迹。

尽管史密斯师长心情矛盾，但他还是和七团团长利兹伯格温习了一下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于二十三日下达的作战命令：

军将主攻方向指向西面的武坪里，突击与第十军相对峙的中国军队的背后，与第八集团军的攻势相配合。捕捉和歼灭中国军队之后，从武坪里北进，占领鸭绿江南岸。

进攻的时间是二十七日。第一陆战师担任主攻任务。美第七步兵师作为助攻部队，从陆战师的东侧经长津湖东岸向北推进。美第三步兵师掩护陆战一师的左翼。

史密斯和利兹伯格在地图上寻找武坪里。

武坪里距离柳潭里九十公里。只要到达那里，公路的条件就好一些了，美军的机械化部队就可以直达鸭绿江边的江界。

史密斯最后下达的命令依旧是谨慎的：首先占领柳潭里西南四十三公里处的龙林洞，二十七日再从那里继续向北进攻。担任主攻任务的是五团，七团除确保柳潭里之外，同时掩护下碣隅里至柳潭里之间的供给线的安全，一团随后跟进。

下达命令后，史密斯登上直升机往回飞。

直升机起飞的声音震耳欲聋，使史密斯的心情更加烦躁不安。为了能把地面上的情况再看清楚些，史密斯打开了舱门，猛烈的寒风立即穿透他厚厚的皮夹克，刀子一般刺入他的骨髓中。

极度的寒冷！

史密斯看了一眼挂在舱门边的温度计。温度计的表面已经结了冰霜，他用皮手套擦了擦，最后勉强看清了刻度，气温已是零下四十摄

氏度！史密斯关上舱门，身体僵硬地坐着，他觉得自己的大脑里面都已结了冰。

奥利弗·P.史密斯，美国海军老牌陆战队员，一个像殉教者一样追求陆战队“应有的理想”的指挥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从担任冰岛防卫军营长开始，历任瓜达卡纳尔岛的陆战一师五团团长、图布尔作战时的陆战一师参谋长、佩累利乌岛作战时的陆战一师副师长。战争结束后，史密斯作为海军陆战队副司令在华盛顿工作。朝鲜战争爆发时，调入在陆战队中享有最高荣誉的第一师任师长。美军战史对他的评价是：不屈不挠，深谋远虑，果断坚定。

只是，史密斯师长目前的上司、美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将军对此持保留态度。

感恩节，也就是十一月二十三日那天，东线的美军和西线的美军一样，官兵们享受了一顿丰盛的节日晚餐。在美第十军的指挥部里，节日气氛被夸张渲染的程度，让包括史密斯师长在内的很多军官都感到有些不自在。餐桌上铺着餐布，摆放着的餐巾、瓷器、银器和刀叉，还有鸡尾酒和精美的姓名卡片。这些应该摆在加利福尼亚俱乐部里的东西，眼下荒诞地出现在这个严寒中的远东战场上，令军官们陷入一种无法摆脱的怪诞情绪中。更令军官们感到怪异的，是军长阿尔蒙德眉飞色舞的表情：将军在餐桌的一端不断地开着军中常听的猥琐玩笑，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去，然后反复讲述他亲自飞到鸭绿江边的惠山镇与美第七师的官兵们以中国满洲为背景合影留念的情景。阿尔蒙德将军的兴奋在于，他的部队是在朝鲜参战的美军中首先（也是唯一）推进到鸭绿江边的部队。

第七师自从元山登陆以来进展神速，十七团的一支先遣队二十一日进入位于鸭绿江边的惠山镇，在那里，美军士兵看见了已经冰封的鸭绿江及江对岸中国的村镇。阿尔蒙德将军和所有的美军官兵一样，

把到达鸭绿江边视为“战争结束”的象征，所以他决定亲自飞往惠山镇，尽管第七师师长戴夫·巴尔告诉他士兵中已有十八人冻掉了双脚。令阿尔蒙德兴奋不已的是：应该立即向麦克阿瑟报告好消息！麦克阿瑟回电：“告诉巴尔，第七师劳苦功高。”第七师二十天前在利原滩头实施两栖登陆，然后在崎岖陡峭的山地中前进了两百英里，并数次突破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阿尔蒙德说：“这件事将作为一个出类拔萃的军事业绩载入史册。”

就在阿尔蒙德在感恩节的宴会上大讲第七师的“光荣”时，巴尔师长小声地对史密斯师长说出了他对美军在东线行动的忧虑：“是他逼着我不顾一切地前进，没有侧翼的保护，天气极其恶劣，我们的补给从来没有超过一天的用量，好像占领鸭绿江边的一个前哨阵地，就他妈的赢了这场该死的战争了，这真是让人弄不明白！在这个根本没有路的鬼地方，咱们还是小心点好。”

巴尔师长的担心将在不久后被残酷地证实。他的第七师在感恩节得到短暂的满足之后，立即陷入了盖马高原的狂暴风雪中，美军士兵在严寒里一步步地走进了中国士兵铺设的死亡陷阱。

史密斯师长在焦虑中用蔑视的眼光看着他的上司阿尔蒙德。

阿尔蒙德现年五十八岁，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从一九四六年起在麦克阿瑟的麾下工作，一九四九年成为美军驻远东司令部参谋长。他和麦克阿瑟的性格有重要的相似之处：精力充沛，傲慢自大，脾气暴躁。在整个美军驻远东部队中，官兵们对他既怕又恨。五十七岁的史密斯与阿尔蒙德截然不同，他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战功赫赫，但在美军官兵的眼里他更像一名学者。三十年代在美国驻巴黎使馆工作的经历，令这个身材高大的得克萨斯人的举止中有一种法国人的温文尔雅，不了解他的人容易把这种气质当成软弱，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就是这样认为的。其实，史密斯与阿尔蒙德的矛盾，与其说是性格上的

差异，不如说是美国陆军与海军由来已久的相互敌视造成的。在史密斯眼里，阿尔蒙德是个善于阿谀奉承的老手，在指挥作战中他扮演着麦克阿瑟的传声筒的角色。尽管史密斯明白，跟阿尔蒙德对抗，就等于跟麦克阿瑟较劲儿，但是他也知道无论对抗还是较劲儿，对他的前途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影响，海军方面不会对远东陆军司令官对一个海军陆战队师长的评价感兴趣。

但是，现在终究是在战场上，史密斯不会拿战争当游戏。陆战一师加入第十军的东线行动后，史密斯师长对阿尔蒙德的命令基本上是服从的，阿尔蒙德军长对陆战一师的态度也是客气的，尽管这种客气有时让史密斯感到十分不舒服——阿尔蒙德亲临陆战一师视察的时候，当场决定给一位连长授予一枚银星勋章，以表彰这位连长在两处负伤后仍“为一个关键的高地坚持战斗”。由于手上没有奖章，阿尔蒙德写了一张字条：“授予战斗中英勇顽强者的银星勋章——阿尔蒙德。”字条被别在这位连长的军大衣上——这招来了陆战一师官兵们的嘲笑，因为他们觉得阿尔蒙德军长往那位连长大衣上别字条的动作很滑稽，至于后来一直在军大衣前晃荡的那张字条就显得更加滑稽了。

令阿尔蒙德恼火的是，史密斯的陆战一师推进的速度出奇的缓慢。

当陆战一师派出的先遣队报告说，前方几乎没有道路可走，并有中国军队活动的踪迹时，阿尔蒙德依旧命令陆战一师全速前进。史密斯坚决地拒绝了这个命令，他表示：“在据说已经出现三个中国师的情况下，在难以生存的严寒中，迅速向柳潭里方向前进是没有必要的。”阿尔蒙德对史密斯的反抗忍无可忍，再次坚决地要求陆战一师立即前进，而且要向北向西兵分两路，以配合西线美第八集团军的进攻。这一次，史密斯提出了三个条件：全面警戒补给线；储备补给品；在下

碣隅里修建简易机场。史密斯表示，如果不具备这三个条件，陆战一师根本不可能发起进攻。他的理由是：

一、西线的联合国军最右翼远在德川，陆战一师的侧翼完全暴露。

二、陆战一师补给线的起点在兴南港，部队向前推进得越远，补给线和后路被切断的危险就越大。如果不保障到下碣隅里的补给线，一旦遭遇攻击，陆战一师将会束手无策。

三、由于进攻需要大量的后勤物资，没有简易飞机场是不行的。

四、陆战一师目前全师兵力处于分散状态，分散的状态是不能够发起进攻的，这是军事常识。

就在阿尔蒙德将军命令陆战一师进攻的当天，史密斯师长给他的部队下达的指示是：放慢和停止前进，等我们的部队真正会合之后再说。

史密斯并不否认陆战一师的作战目标：到达鸭绿江。但他坚定地认为必须以确保整个陆战师安全的速度推进。

阿尔蒙德暴跳如雷。史密斯有气没处发，于是写信给远在美国本土的海军陆战队司令凯茨将军。史密斯师长的这封长信后来一直是研究朝鲜战争的军史学专家们最感兴趣的文件之一，它是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下旬发生在朝鲜半岛东北部的那场空前残酷的战斗的一种注解：

尽管中国人已退到北部，我并未催促利兹伯格迅速前进。我们接到的命令仍然是前进到满洲边境，但我们是第十军的左翼，而我们的左翼却没有任何保护，利兹伯格的左翼至少八十英里内没有任何友军的存在……我不愿意设想把陆战师在一条从咸兴至鸭绿江边境的一百二十公里的山间小路上一线展开。陆战师现在有两个团在这条路上，还有将跟随上来的第三个团……我十分担忧的是，在冬季向两个山地中的团队提供补给的能力。雪下后融化再冻结，会令这条路更加难以通行……而从长津湖水库至鸭绿江边境，除山路外别无选择。冬季

进行空投不足以提供两个团的补给，但也不能进行撤退。由于气候和部队的分散以及海拔的高度，即使乘直升机视察部队也很困难。

……我对第十军在战术上的判断力和他们制订计划的现实性没有什么把握，我在这方面的信心仍未恢复。他们是在百万分之一的地图上拟订计划。我们是在五万分之一的地图上执行任务。兵力不断地分散，不断地给小部队派遣任务，这使他们处境危险。这种作战方式看来在朝鲜很普遍。我确信，他们在这里的许多失败都是这种不顾部队的完整、不管天时地利的做法造成的。

我多次试图告诉军团的指挥官，海军陆战师是他的一支强大的力量，但如果分散其兵力，就会失去其全部战斗力，起不到任何作用。也许我坚持自己观点时比其他师的指挥官幸运得多。

某位高层人士不得不就我们的目标下定决心。我的任务仍然是向鸭绿江边境推进……我相信，在北朝鲜山地中进行冬季作战对美国士兵或者陆战师来讲是过于苛刻了。而且，我怀疑在冬季向这一地区的部队提供补给或撤退伤病员的可行性。

史密斯写这封信的时候，正好远东海军参谋长莫尔豪斯拜访了陆战一师。看见莫尔豪斯的海军军装，史密斯感到像“回到了家”。他直率地说，阿尔蒙德领导的第十军的作战计划缺乏现实性，制订计划时往往严重忽视了敌人的能力。在谈到与陆军打交道的体会时，史密斯说，陆军们不是极度乐观就是极度悲观，“这帮家伙的情绪没有什么中间状态可言”。

史密斯的谨慎态度传染给陆战一师的其他军官，于是在陆战一师中产生了一种近乎悲观的情绪。一团团长刘易斯对他的官兵讲了这样一段话：“现在你们要照我说的去做——给你们的家人写信，告诉他们这儿在打一场该死的战争。告诉他们说，那些屁股被打烂的北朝鲜人已经使很多所谓精锐的美国军队乘船来到这里；告诉他们说，我们没有什么秘密武器，只能艰苦地作战。”刘易斯团长自己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只有一场惨败才会改变我们目前的制度，这一制度正把我们引向灾难。”

陆战一师官兵们的恶劣心情还来自极度寒冷的气候。

美国士兵从没有经历过如此寒冷的气候，每当夜晚过后，所有的车辆都发动不起来，士兵们个个面色惨白。高原上一头饥饿的黑熊差点把一个冻僵的二等兵当成了食品，吓得这个二等兵制作了一面画着镰刀和锤子的苏联国旗，并且把这面苏联国旗裹在了自己身上——美国人一直把苏联比作黑熊，二等兵认为这样做是在告诉黑熊别吃自家人。尽管士兵们总是缩在睡袋中取暖，并且在柴油炉上日夜不停地煮汤，但他们还是患上了严重的冻疮，皮肤变成青色，尤其是脚趾，已经冻得发黑。“一些受伤的士兵因为医生无法给他们输血而失去生命，血浆会在瓶子和软管中被冻住”。

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的命令没有改变，每天都是一个内容：前进！迅速前进！

此刻，直升机上的史密斯师长再次透过舷窗往地面看。盖马高原上狂风怒吼，旋转的北风把雪粉扬起来，使整个高原一片迷蒙。

也许中国军队真的还没赶来？史密斯想，从中国俘虏单薄的衣服上看，他们不可能经受住如此的寒冷，他们如果一动不动地在这里趴上哪怕半个小时，他们就会被冻死——无论如何，中国士兵也是人。

史密斯错了。

此刻，就在史密斯的直升机下，数万中国士兵正潜伏在盖马高原迷蒙的冰雪之中。他们没有被冻死，他们还活着，他们等待着攻击的命令。

在朝鲜战争中，发生在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下旬东部战线上的这场战斗，至少在中国的相关史料中被叙述得十分简单。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

也许这场战斗进行得过分惨烈了。

也许是双方所付出的代价过分巨大了。

也许事后双方均宣布在这次战斗中取得"辉煌的胜利"都有点言过其实了。

也许真实地回忆代价巨大的战斗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十一月二十七日，寒冷而晴朗的早晨，在柳潭里度过第一个寒夜的美军陆战一师的士兵爬出睡袋，围着帐篷来回跺着脚和拍着手，他们把野战食品放在柴油炉上烤化。在等待食品热的时候，一些士兵同时在烤枪——结构复杂的卡宾枪和勃朗宁自动枪的零件被冻得已失去功能。一个陆战队士兵说他找到了一个防止枪失灵的办法，就是用"野根牌"发乳来取代擦枪油。

这时，陆战师士兵们中间开始传阅一本用中国文字印刷的书，据说是中国士兵们在战场上丢下的。书名叫《血腥的历程》，作者是一个叫索伊扎什维里的苏联海军上尉，写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朝鲜的事。懂汉语的翻译翻译一句，士兵们就笑一阵，这本书让这个寒冷的早晨有了些许轻松的气氛：

当美帝国主义掠夺者在朝鲜挑起血腥大屠杀时，华尔街的看门狗麦克阿瑟要求把美国所谓的海军陆战队立即置于他的指挥之下。这位职业屠夫和顽固不化的战犯打算把他们尽快投入战斗，旨在对朝鲜人民施以当时他们认为的最后的打击。麦克阿瑟提出这一要求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海军陆战队所受的训练比任何其他类型的美国部队都更适合于进行反对热爱和平的英雄的朝鲜人民的空前残暴、野蛮和掠夺性战争。江洋大盗麦克阿瑟恰恰是对海军陆战队讲了这番话："一座丰饶之城就在你们面前，那里有取之不尽的美酒佳肴，那儿的姑娘是你们的，居民的财产属于征服者，你们可以把这些财产寄回家去。"

用如此蛮横的词汇来描绘陆战队，使陆战一师的士兵们感到难堪又无奈；同时，麦克阿瑟并没有对他们讲过美酒、佳肴、姑娘和财产这些话，这又令陆战一师的士兵们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遗憾。

七团团长利兹伯格的命令终于下达了：由罗伊斯中校率领五团二营首先向西前进，三营随后，目标是西北山和西南山以及两山之间通往西南方向的道路。而七团则在柳潭里周围进行环形防御，保护陆战一师侧翼的安全，并且在五团之后跟进。

美军陆战一师的作战计划基于一个设想，就是与西线的第八集团军齐头并进，一齐向鸭绿江推进。

就在这个早晨，利兹伯格团长、甚至史密斯师长都不知道，西线的第八集团军已经全线崩溃。

没有人能解释地清楚，应该对整个战局有所了解的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为什么还在命令陆战一师全速前进。

陆战师的士兵们出发了，缓慢而谨慎。沿着土路走一会儿，然后登上路边的山坡。后面的三营速度反而快一些，到上午十时，H连没有遇到任何情况占领了第一个目标：一四○三高地。南边的J连——该连连长就是那个被阿尔蒙德授予了一张纸制勋章的人，那张纸片在嘲笑中被塞进了军用背囊——刚刚占领了西南面的主峰后，突然，子弹从距他们大约几百米远的地方射来了。由于距离远，他们没有在意，因为北朝鲜游击队类似的干扰射击几乎天天发生。五团二营的先头连是彼得斯率领的F连，这个连几乎是一出柳潭里就受到来自前方的射击。他们和五营的道格连一起被迫离开道路上了山，但是正面的射击越来越猛烈。到下午十五时，他们终于停止了前进。罗伊斯中校命令就地挖壕据守。

陆战一师白天的进攻就这样结束了。跟过去一样，还是没有完成前进计划。陆战师前进的计划是五十公里，而在罗伊斯下达停止前进的命令时，所有的部队距离柳潭里均不超过两公里。

十八时，陆战一师在山里挖掘了简单的防御工事，七团的十个连部署在高地上，其中C连和F连孤立地位于公路边，五团的两个营位于村庄附近的山谷中，大约四十门一〇五毫米的榴弹炮和十八门一五五毫米的榴弹炮被部署在柳潭里的最南端，环形配备的还有七十五毫米无后坐力炮和迫击炮。

太阳落山了。

陆战师的士兵们缩在战壕内，开始忍受不可忍受的寒冷。战后幸存下来的陆战师的一位中士这样回忆道："为了保暖多穿衣服是不可能的，你被手套、风雪大衣、长内衣、头兜和所有的东西捆得紧紧的，在爬山的时候肯定会出汗，结果是一旦停止前进，汗水就会在你该死的衣服里结冰。噢，你想和一支M-1式步枪或者卡宾枪和睦相处简直是异想天开，那钢铁的家伙是冰，你的手会被它粘住，甩掉它的唯一办法就是舍去一层皮。我的嘴张不开，我的唾液和胡子冻在一起了。耗费几百万美元研制的特制冬季缚带防水鞋，在严寒中几个小时不活动，就让你难受，汗水湿透的脚慢慢肿起来，疼得要命。我相信每个人都在想，我们为什么要来到亚洲的漫天风雪之中？"

黑夜降临了。

一个军官找到罗伊斯，给他一只盛满白兰地酒的行军酒杯。

"今天是我的生日。"军官说。

"祝你健康！"罗伊斯说。

"谢谢，如果过一会儿我还健康的话。"

军官的话音未落，整个柳潭里山谷突然枪炮声大作，特别让美军官兵胆战心惊的是混在枪炮声中却越来越清晰的刺耳的喇叭声。

中国人！

是中国军队！

中国士兵单薄的胶底鞋在夜色下的冰雪大地上发出沙沙的声响。

中国士兵冲过来时的呐喊声不知道是由于从冻僵了的喉咙里发出的缘故，还是由于寒冷的气温令声音的传播扭曲了的缘故，听上去像是抖动的海潮般一波一波地汹涌而来。

几乎是同时，有报告说抓获了几个由于严重冻伤而几乎不能行动的中国士兵，从这些中国士兵的嘴里，美军陆战一师听到了一个中国将军的名字：宋时轮。

在朝鲜战场的东线，新近入朝的中国军队于第一次战役后在这一地区集结。美军远东司令部情报处长威洛比给麦克阿瑟的报告是这样写的："在咸兴以北的长津水库地区集结的中国军队，也许现在就能夺取主动权，向南发动一场协调一致的进攻，切断咸兴西北面和东北面的联合国军部队。"威洛比报告的时间是西线联合国军开始"圣诞节攻势"的时候。

这一次，威洛比的判断是正确的。

遗憾的是，麦克阿瑟恰恰没有重视这份报告。

麦克阿瑟固执地认为，无论从哪一方面分析，中国军队也不会向这个冰天雪地的荒凉高原进行大规模的集结。

而早在第一次战役还没结束的十一月五日，毛泽东在策划第二次战役的同时，关于朝鲜战场东线作战问题曾给彭德怀发出如下电报：

江界、长津方面应确定由宋兵团全力担任，以诱敌深入寻机各个歼敌为方针。尔后该兵团即由你处直接指挥，我们不遥制。九兵团之一个军应直开江界并速去长津。

第九兵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主力部队之一，辖第二十、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军。这支由原华东野战军改编而成的部队，此时正集结于山东津浦铁路沿线，准备入朝。

宋时轮，一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老战士，十七岁即从中国著名的黄埔军校毕业，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游击队长、师长、军参谋长、军长，作战经验极其丰富。

由于军情的紧急，在毛泽东给彭德怀发出调动第九兵团电报的第三天，宋时轮率领其部队就向一个陌生的战场——朝鲜出发了。

第九兵团入朝的序列是：第二十七军为第一梯队，由北向南偏东，向朝鲜的长津地区推进，第二十军经江界由西向东为侧翼，第二十六军为预备队随后。

据说朝鲜很冷，冷到什么样子，第九兵团所有的官兵都想象不出来。在鸭绿江边，他们领到了棉衣和棉帽，但是数量不够，有的士兵有棉衣没有棉裤，有的士兵只领到一顶棉帽，有的士兵什么也没领到。

十一月七日，第九兵团先头部队越过中朝边界，进入了朝鲜。

第九兵团前进的方向偏东，所有的士兵一下子就进入了北朝鲜荒凉寒冷的大山之中。美军的飞机发现了第二十七军的一支汽车运输队，四十多辆满载物资的汽车遭到了汽油弹的轰炸。第九兵团只好轻装，数万人的队伍不顾一切地向风雪迷漫的战场开进。

狼林山脉，山高雪深。北风呼啸中，一座座险峰上的太阳像一个薄薄的白纸片。雪粉迎面打来，眼睛无法睁开。开始的时候，军官们

还不停地喊："小心路滑！互相拉着！"后来就听不见喊声了，除了长长的队伍还在缓慢地移动外，一切都被冻结了。饥饿使官兵们感到身体由于从里到外冻透了而完全麻木。

第一天行军，就有七百多名士兵被严重冻伤。

十一月二十四日，第九兵团距预定战场还有两天的路程。可是，彭德怀的命令到了：

伪三师之二十六团进至社仓里，美三师之六十五团已进上川里、龙泉里线……你们应以一个师于二十六日晚围歼社仓里、黑水里之伪二十六团。得手后，即向黄草岭以南之上下通里攻击前进。确实占领该线，阻击北援之敌。另以一个师由仓里向黄草岭、堡后庄（美一师指）攻击前进，歼灭该敌师指。得手后向古土水攻击前进，协同主力围歼古土水、柳潭里地区之美五、七两团全部。

彭德怀原计划东线的第九兵团和西线的志愿军部队于二十五日同时开始攻击。

宋时轮请求推迟攻击开始的时间，原因是作战部队还没有准备好。

由于东线战场是个相对独立的战场，彭德怀同意了宋时轮的请求。

十一月二十七日夜，盖马高原上北风呼啸。

第九兵团的第二十七、第二十军分别向柳潭里、新兴里、下碣隅里、古土里和社仓里的美军发起了攻击。

第二十军八十九师的迫击炮弹首先落在柳潭里防御阵地的七团H连头上。H连就是白天没遇到任何敌情占领了一四〇三高地的那个连。随着炮弹的爆炸声，连长库克上尉大声地喊叫起来，让他的士兵立即进入阻击位置。美军士兵几乎还没有把枪端好，中国士兵的第一

个冲击波就到了。向这个高地冲击的是八十九师的二六七团。中国士兵的手榴弹在美军士兵头上形成密集的弹幕，爆炸声在夜空里震耳欲聋地连成一片。在激烈的战斗中，美军阵地被撕开几个小口子，在库克的强力指挥下，突破口没有继续扩大。“伙计们！中国人没有预备队！”库克在黑暗中跑来跑去地喊着。这是H连的士兵们所听到的库克连长的最后的喊声了，因为他转瞬间就被一颗手榴弹炸倒了。一四〇三高地的右侧出现了崩溃的迹象，中国士兵已经冲上来，与美军士兵展开短距离的搏斗。当营部派来的新连长哈里斯中尉冒着枪林弹雨冲上H连阵地的时候，他发现这个阵地已经不大可能守下去了：除了一名叫牛顿的中尉还在指挥战斗外，这个连所有的军官都已经死亡或者负伤，士兵也伤亡过半。哈里斯中尉向阵地前方看了一眼，在炮弹爆炸的火光中，中国士兵正踏着同伴们的尸体潮水一样地冲过来。哈里斯后来一生都对中国士兵顽强血战的精神感到极度震惊。

午夜，H连的阵地丢失。

由陆战一师七团D连防御的一二四〇高地也同时受到了中国军队的冲击。中国第二十七军七十九师二三六团以密集的冲击队形不顾一切地迎着美军猛烈的射击一波接一波地拥上来，在连部也受到攻击并被占领的时候，已经两次负伤满脸是血的连长赫尔上尉的信心动摇了。主阵地上已经看见了中国士兵的影子，D连全连都在逐渐后退，一直退到了高地的下部。当五团C连派出的一个排前来增援他们的时候，赫尔和一些士兵已经被压缩在一个斜面的角落里。增援部队的到来令赫尔能够粗略地清点一下人数，他发现全连二百多人经过不到四个小时的战斗只剩下了十六人。在C连增援排的加强下，赫尔一度反击上山顶，但在中国士兵的再次冲击下，他们又一次退下来。这时，D连的官兵几乎全部伤亡，C连增援排也伤亡了一半以上。

上午十点的时候，美军陆战一师在柳潭里的最高指挥官七团团长利兹伯格在他那顶四处漏风的帐篷里召开了军官会议。他向军官们通报了有关的情报：柳潭里四周至少存在着三个中国师。中国军队的意图是把柳潭里的两个陆战团歼灭。同时，死鹰岭附近也发现了中国师，正在切断柳潭里与下碣隅里之间的联系，下碣隅里现在已被包围。而且，古土里至下碣隅里的公路也被切断了——这就是说，中国军队不但在陆战一师的正面展开了攻势，陆战一师的退路也已经面临危机。在军官们的沉默中，利兹伯格向帐篷外看了一眼，他看见了一辆"谢曼"式轻型坦克，这是柳潭里目前唯一的一辆坦克。本来史密斯师长答应给他四辆"潘兴"式中型坦克，可是坦克驾驶员说路上的冰太滑，自重很重的"潘兴"式坦克开不进柳潭里，于是只开出一辆轻型坦克探路。"谢曼"式坦克刚开到这里，驾驶员立即乘直升机回下碣隅里去了，说是去引导其他坦克往这里开。利兹伯格看见的这辆坦克，因为没有驾驶员，实际上等同了一堆废铁。四周的枪炮声一阵紧似一阵，军官们在不知所措的情绪下开始抱怨：食品和油料只有三日份，弹药只有两日份，如果师里不赶快支援，仗就没法打下去了。不过，庆幸还是有的，陆战一师运输车队白天给柳潭里拉来物资之后，返回的时候拉着伤员（大部分是冻伤）回下碣隅里去了，如果这个时候身边还有一大批伤员，那就更让人头疼了。

利兹伯格布置了防御计划，他要求无论如何要把中国军队顶在柳潭里四周的山上。同时，因为柳潭里有两个团，而他是七团的团长，所以他要求在这个时候统一指挥，协同作战。最后，利兹伯格笑了一下，他说，过不了多久，中国人就会明白，他们对柳潭里发起的攻击肯定是错了，而且是一个战术上的低级错误。如果是他指挥中国军队，不会这么早就对陆战队向北伸出的触角进行攻击，而是要让这些陆战队队员们再往北走得远一点，距离柳潭里越远越好，然后把脆弱的美军补给线一切断，那样的话，陆战一师七团和五团的狗崽子们兴许就再也走不出眼前的这些大山啦。

这时传来报告：一二八二高地快不行了。

在整个柳潭里的攻防战斗中，双方争夺最激烈的就是一二八二高地。在这一高地防守的是陆战一师七团的E连。一二八二高地是柳潭里北面的一个重要的制高点，一旦占领了这里，柳潭里就完全暴露了。美军的炮兵阵地距离这个高地不远，四十门榴弹炮彻夜进行了一百八十度的射击，炮口的火光使炮兵阵地的位置暴露无遗。由于地表冻结达四十厘米，美军配备的TD-14型推土机根本不起作用，美军火炮一律在如同混凝土一样僵硬的地面上十分暴露地配置着。但是，令柳潭里的美军炮兵奇怪的是，警戒兵力十分薄弱的炮兵阵地竟然没有受到任何攻击，中国军队只是在向步兵阵地的正面进攻。

关于中国军队在对柳潭里的美军陆战一师发起进攻的时候，为什么不把美军引到远离柳潭里的地方再攻击？为什么在攻击中不采取中国军队善用的迂回切割的办法而仅仅坚持正面袭击？为什么在攻击步兵阵地的同时不对美军的炮兵阵地进行突击？这些都是战争中的历史问题。

对一二八二高地实施正面攻击的，是中国第二十七军七十九师二三五团的一个营并一个加强连。

美军陆战一师七团E连的官兵们在向柳潭里推进的路上已经心力交瘁，冻伤累累。白天，在连长菲利普斯的催促下，士兵们勉强在高地上挖出了可以应付战斗的工事，并在山脚下布置了绊索照明弹。黑暗中，他们听见了中国士兵的胶鞋踏在冻雪上的脚步声，直到看见中国士兵的黑影时，他们才拉动了绊索照明弹的绳索。在突然亮起的惨白的光亮中，中国士兵黑压压的冲击潮令美军士兵惊呆了。E连的阵地前立即组织起机枪和手榴弹的火网，连长菲利普斯从指挥所跑向山顶的阵地，他看见凯内莫中士正在伤亡人员的身上搜集手榴弹，并且一边把搜集来的手榴弹分给其他的士兵，一边准备自己投弹。可中国

士兵投上来的手榴弹已大雨般砸下来，其中的一颗在凯内莫中士的身边爆炸了，他跪下去，正跪在另一颗冒着烟的手榴弹上，在爆炸的火光中，凯内莫的双腿像两根树枝一样地腾飞起来。菲利普斯连长尖厉地大叫起来，并把带刺刀的步枪戳在地上："从这条线起一步也不许后退！"就在这时，数发机枪子弹同时击中了菲利普斯的肩胛骨和大腿，他一头栽下了雪坡。

一二八二高地上的激战达到高潮以后，战斗突然中止了一会儿。

守在山顶阵地上的美军指挥官是E连一位名叫扬西的排长。扬西中尉在六个月前还在阿肯色州小石城经营着一间小酒店，他是以陆战队预备军官的身份入朝参战的。扬西在二战中也曾在陆战队服役，在瓜达卡纳尔岛和冲绳岛的战役中与日本人打过仗，获得过一枚海军十字勋章。他不怎么喜欢陆战队这个活儿，拒不承认自己是个职业军人。就在他参加仁川登陆的时候，他得知妻子为他生了个孩子。此时，他在一二八二高地上感到呼吸十分困难，因为弹片削去了他的鼻子，流出来的血迅速冻结在他的脸上。

短暂的中止立即结束了，扬西中尉听见了一阵由哨声和喇叭声组成的稀奇古怪的声潮，然后就是几千双胶鞋踏在雪地上的嘎吱嘎吱的声音。扬西立即命令步话机员请求照明弹和炮火的支援，但不知为什么，指挥部拒绝了他的请求。扬西火了，骂着，带领士兵开始射击。山顶上很快就布满了冲击上来的中国士兵，美军全部被压到了山腰。扬西强制性地命令几名士兵跟他反冲击时，一颗子弹撕开了他的下颚，子弹居然钻到他的嘴里并热辣辣地停留在他的舌头上。小小的反冲击立即被中国士兵击垮。在一颗手榴弹的爆炸声中，扬西的面部又一次受到重创，双目失明的扬西这一次真的倒下了。

中国士兵席卷了一二八二高地。

二十八日天亮的时候，陆战一师七团队E连伤亡一百三十人，增援而来的五团C连两个排和A连的一个排也伤亡了八十五人。

攻击一二八二高地的中国第二十七军七十九师二三五团一营伤亡一半以上，其中很多士兵是因为严重冻伤而牺牲的。

当东线的战斗打响后不久，远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德尔马军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训练中心里，一位军官冲进司令官梅尔里·特文宁准将的办公室。

“将军！”他喊道，“在朝鲜，中国人已经包围了陆战一师！”

特文宁准将漫不经心地抬起头来，他说：“年轻人，我只能说，我真为那些中国佬惋惜！”

特文宁准将没过多久就知道了他到底应该为谁而惋惜。

## “陆战队，向南进攻！”

东线攻击开始的那一天，令交战双方官兵印象最深的，与其说是一夜的流血混战，不如说是这个地区的那场漫天的大雪。雪片密集而厚重，气温已经降到零下三十摄氏度以下，交战双方的冻伤者比战伤者更加痛苦难熬。

二十八日天亮的时候，持续了一夜的猛烈攻击开始和缓。天色薄明，无论是中国军队还是美国军队，双方终于有了空隙审视自己目前的处境：

中国的第二十军六十师占领富盛里、小民泰里一线，切断了位于下碣隅里的美军陆战一师南逃的退路；第二十军五十八师已进至上坪里地区，从三面包围了下碣隅里，五十九师占领死了鹰岭和新兴里等

阵地，美军陆战一师在柳潭里与下碣隅里之间的联系已被割断；中国第二十七军八十一师占领赴战湖西侧，美第七步兵师与陆战一师因此被分别孤立，八十师于新兴里包围着美第七步兵师；在柳潭里，美军陆战一师先头部队与中国第二十七军七十九师彻夜战斗，形成战场对峙局面。

中国指挥官判明：这个地区美军的数量，比预想的数量多出一倍，而且其装备的精良远在中国军队之上。

美军指挥官判明：美军已在这个寒冷的不毛之地被大批的中国军队分割，如果不采取措施，只要天再一次黑下来，中国士兵的喇叭吹起来的时候，他们恐怕就要完蛋了。

应该说，中国军队于东线第一夜的攻击，至少在战术上是存在漏洞的，这直接导致了黎明时分中美军队在柳潭里形成对峙局面，而这一局面是中国军队的指挥员们没有预想到并且感到很头痛的。中国军队在天亮的时候，才意识到其指挥上的不妥，于是决定转变打法，即先集中兵力打击位于新兴里的美第七步兵师三十一团和相对脆弱的美陆战一师指挥所以及简易机场所在地下碣隅里。这个决定至少从战术上符合中国军队在其历史上所形成的战术原则，这些原则的基本内容是：集中优势兵力，孤立分割敌人，实施重点包围，力求各个歼灭。——昨夜中国军队开始攻击的时候，如果能围柳潭里之敌不打，集中攻击下碣隅里并将其拿下，天亮时的形势将会对中国军队有利得多。——这样的话，史密斯师长肯定会为把自己的前方指挥所设置在哪里而大伤脑筋。

凌晨时分，在兴南港美军陆战一师大本营里的史密斯师长由于彻夜未眠而神色疲倦。这个参加过二战的老兵没等到午夜就明白了一个真理：陆战一师从在这个该死的地方登陆时起，自己所做的抵触、违抗、反对阿尔蒙德的一切动作——不管这些动作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现在证明都是十分正确的。自己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其中最了不起之处在于，自己几乎冒着丧失职业军人前途的代价，赢得了在下碣隅里修建简易机场的时间。作为陆战队，目前最重要的是保住分散在上百公里路线上的中间部位——下碣隅里的安全，这是确保空中支援的中枢，是让陆战一师的士兵尽可能多地活下来的最关键的部位。

这一夜，中国军队对下碣隅里的攻击并不十分猛烈，并且没有占领它，这对陆战一师的命运来讲，真是一个万幸。

天亮了，史密斯师长乘坐直升机向下碣隅里飞去。这一次，他在飞机上凭肉眼就可以看清楚，中国军队已经把分布着陆战一师各团的那条公路分割成了一段段孤立的段落。由于美军执行轰炸的舰载飞机还没有来，沿着这条公路，中国士兵在雪地上移动的身影历历在目。

“中国人多得无法估计。”史密斯后来回忆道，“至少是陆战师的十倍。”

下碣隅里是位于长津湖南端的一个小镇，三条简易公路在这里分岔，小镇成为一个交通中枢。除了东面的一个高地外，这里是坡度平缓的盆地。南端可以供运输飞机起降的简易跑道维持着陆战一师的后勤命脉。这里设有陆战一师的前方指挥所，集中着陆战一师的勤务部队。负责这里安全的是一团三营营长里奇中校，他指挥的部队是三个连。同时，由于运输的问题，七团二营的营部和一个火器连也在这里驻留。在中国军队开始攻击之前，里奇中校指示作战参谋制订了防御方案，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会明白，防御下碣隅里的要点只能是东面的高地和南面的机场。

实际上，在阿尔蒙德给陆战一师下达“北进”命令的当天，陆战一师师指挥部的大部分人员以及第十军派来的直属队，已经陆续到达下碣隅里，这使小镇突然间人流车流拥挤不堪。在史密斯师长的坚持

下，机场的简易跑道在加紧施工，D连的士兵们奉命不分昼夜地干活。当夜幕降临，柳潭里的美军开始受到攻击的时候，简易机场的施工现场依旧灯火通明，而跑道仅仅完成了四分之一的工程量。这个史密斯师长非要不可的简易机场，在未来的若干天里，即使在中国士兵已经冲上跑道与美军士兵进行肉搏战，中国军队的迫击炮弹下雨一样地落下来时，跑道的施工工作都没有停下来，美军士兵一边开着推土机，一边举枪射击。这条用生命换来的跑道，终于在陆战一师的撤退中起到了几乎是决定性的作用，史密斯师长用它挽救了四千名美军士兵的生命。

二十七日十一时，美军陆战一师和美军第七步兵师在下碣隅里开设了指挥所。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也飞到了下碣隅里。阿尔蒙德和史密斯在指挥所的帐篷里密谈了将近一个小时。谈了些什么不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阿尔蒙德没有谈到改变计划的问题，原因很简单：麦克阿瑟没有改变进攻计划的命令。从帐篷里走出来的史密斯脸色平静。阿尔蒙德随后亲临一支已经在中国军队包围之中的小部队，并向这支小部队授了一枚勋章。在授勋仪式上，阿尔蒙德居然对士兵们这样说："现阶段是对后退之敌人的追击，要迅速地推进到鸭绿江去。"与阿尔蒙德的论调相反，史密斯师长在向部队下达的命令中，根本没有"鸭绿江"这三个字，而且史密斯已经决定这辈子不会再提到那条跟自己以及自己的士兵没有一点关系的中朝界河。

史密斯师长命令的要点是：各部队迅速打开互相联系的通路。

下午十三时，位于古土里的陆战一师一团团长普勒上校命令二营D连向下碣隅里方向攻击。该连在走出大约一公里路程的时候，在漫天大雪中突然遭遇中国军队从三面发起的猛烈袭击。普勒上校立即命令该连撤退，结果一直到将近黄昏的时候，D连才从中国军队的包抄

中突围而出，跑回古土里。D连在这次行动中损失官兵三十八人，唯一所得是知道了袭击他们的是中国第二十军六十师的一七九团。

二十八日整个白天，中国军队一直处在调动和隐蔽防空的状态中。

黄昏就要来临了。

黄昏时分美军陆战一师的态势是：在长长的山间土路上，部队仍被压缩在柳潭里、德洞岭、下碣隅里、古土里和真兴里五个相互孤立的环形阵地中。

史密斯师长决定在下碣隅里过夜。他明明知道，下碣隅里必是中国军队今夜攻击的首要目标。

史密斯守着一台吱吱乱叫的收讯机，收听着各部队的战报。西线传来的战况令他心惊肉跳：沃克的第八军团不但开始了全面的撤退，而且，美第二师在退到一个叫三所里的地方被突然出现的中国军队封堵了。

既然西线已经崩溃，陆战一师还有什么必要在东线往前推进？

既然已经证明中国军队企图在这片荒山雪岭中消灭陆战一师，那还谈什么推进到那条界河边去形成联合国军的“钳形攻势”？

史密斯不断地给阿尔蒙德报告陆战一师的危险处境。

但是，他就是没有收到阿尔蒙德任何“修改进攻计划的只言片语”。这意味着，陆战一师的任务依旧是：从柳潭里向北、向西进攻。

“真是太愚蠢了，”史密斯后来回忆道，“看来，我们只能为生存而战了。”

史密斯给柳潭里的七团团长利兹伯格的作战指示是：掘壕据守。

史密斯给下碣隅里的陆战部队下达的作战指示还是：掘壕据守。

这时的下碣隅里是脆弱的。虽然天黑的时候史密斯正式下达了“任命里奇中校为下碣隅里地区统一防御指挥官”的命令，但能够指挥目前在下碣隅里的美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里奇清点下碣隅里自己有权指挥的所有兵力之后，结果令他吃惊不小，这里的美军基本上是个大拼盘：三千九百一十三人分别来自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南朝鲜军等五十八个单位，很多是十人以下分属不同系统的先遣队或者联络队。这些士兵中很多人并不是战斗兵，而是工程技术员和通讯人员。

雪时大时小。

黄昏是寂静的，寂静得令人恐惧。

偶尔，有零星轻武器的射击声传来，更增添了整个盖马雪原的肃穆。

向下碣隅里正面进攻的是中国第二十军的五十八师。这是这支部队自渡过鸭绿江以来面临的第一场真正的战斗。其一七二团在西，一七三团在东，一七四团为预备队。当黑夜降临的时候，所有参加攻击的士兵都已经子弹上膛，刺刀出鞘。

在五十八师面前主阵地上防御的是陆战一师一团的H连和I连。为了在坚硬的冻土上挖出工事，美军士兵们把炸药装在罐头盒里引爆，他们还把上千只麻袋装上土垒成工事的胸墙。在阵地前，设有地雷、饵雷、绊索照明弹以及可由手榴弹引爆的五加仑汽油罐和蛇腹形铁丝网。机枪、无后坐力炮、坦克炮和迫击炮、榴弹炮也部署完毕。在两个连的分界线上，美军布置了两辆坦克。

在H连和I连的背后，就是灯火通明的简易机场施工现场。

二十时，天降大雪。

二十二时三十分，美军阵地前的绊索照明弹爆炸了。在照明弹的光亮中，美军看见的是分成若干小组的中国士兵在试探性地寻找美军阵地的侧翼位置和正面的缝隙。中国士兵的试探小组后退以后，中国军队的炮火准备开始了。迫击炮弹落在美军的阵地上，美军士兵们缩在工事里，握枪的手开始发热。中国军队的炮火准备持续了三十分钟，突然，三声喇叭声响起，美国兵下意识地从胸墙上探头往前看，他们看见的情景是："中国士兵的冲击阵形如同地面突然沸腾起来一般"。

抵近美军阵地前沿的中国士兵立即进入陆战一团的火网之中。

在火力配置十分强大的美军火网面前，中国士兵只有直面伤亡。中国士兵知道这一点，但是他们依然前仆后继地冲上来。中国士兵和他们的指挥员对美军火力的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只要冲过美军强大的火力，等真正短兵相接的时候，美军士兵就不行了。

一个小时后，H连阵地的中央部位被中国士兵突破。短兵搏斗中，H连放弃了他们的阵地向后退。美军士兵一直退到正在施工的机场跑道上。正在施工的D连士兵以身边的轻武器和H连的士兵一起进行反冲击，勉强把中国军队赶出了跑道。然后D连的士兵继续施工。H连的士兵在营部派来的通信兵和工兵的支援下，开始向被中国士兵占领的阵地冲击，结果是指挥增援部队的指挥官被打死。虽然阵地上布满了中国士兵，但还有美军士兵混在其中，雪夜里，双方士兵互相辨别都很困难。午夜时分，一团再次组织起由工兵、驾驶兵组成的反冲击部队，向占领H连阵地的中国军队发起攻击，美军的这次反冲击夺回了部分丢失的阵地，双方在这个局部形成拉锯式的对峙局面。

I连连长费希尔是个大个子。他从一条战壕跑到另一条战壕，中国士兵的子弹竟没有打中他这个显眼的目标。I连的阵地曾两度被中国士兵占领，由于阵地上的两幢房屋被打中起火，火光把阵地照得通亮，这是中国士兵很不喜欢的事情，加上I连的迫击炮没有受到压制，连续不断地又发射出一千多发炮弹，中国士兵最终没有占领I连的阵地。

在东面高地防御的重要性非常明显，因为站在高地上可以俯瞰整个下碣隅里。但是，美军在这一高地的防御兵力配备却令人感到奇怪。预定担任防御的陆战一师一团的G连没有到达，在中国军队开始进攻前的一个小时里，里奇中校才勉强拼凑起来一支防御部队，是由以美陆军第十工兵营D连为主的一支杂牌军。D连由七十七名美国兵和九十名南朝鲜兵组成，他们来下碣隅里的任务不是打仗，而是修理车辆和坦克。当他们得知让他们去守阵地，而指挥他们的是一名海军陆战队的上尉时，士兵们怨气冲天。晚二十时，这支满腹牢骚的队伍才到达高地，刚在残缺的战壕中蹲下来，中国军队的进攻就开始了。D连的防线顷刻间崩溃。中国士兵把与他们对抗的这支杂牌部队赶下了山顶，七十七名美国工兵在短促的战斗中损失四十四人，南朝鲜军的九十名士兵中有六十人伤亡。负责指挥这支杂牌军的海军陆战队上尉在混乱的枪声中被打死。上尉的通信兵是个名叫波多勒克的一等兵，这个一等兵背着一台无线电台藏在山上没能跑下来，于是他不断地向指挥所报告中国军队是怎么冲上阵地的。

天快亮的时候，美军才组织起一支在坦克掩护下的勤务部队，勉强在高地的一侧构成一条与中国军队对峙的防御线。

这时，下碣隅里落入中国军队之手，几乎仅仅是个时间问题了。

但是，占领东面高地的中国军队没有继续攻击。

为什么不一举扩展战果，突破美军薄弱的防御线?

史密斯的判断是：也许中国军队缺乏足以维持纵深冲击的战斗力量。接下来，史密斯又意识到了另一个值得他庆幸的现象，那就是美军环形阵地中堆积如山的弹药和油料，如果这些物资受到哪怕是一发炮弹的打击，它们所引起的爆炸和大火对于美军来讲都绝对是灾难性的。但是，虽然中国第五十八师的炮兵对美军防御前沿的射击是精确和有成效的，但他们没有向美军这些极其危险的裸露物资发射过一颗炮弹。

即便如此，东面高地的丢失对下碣隅里的美军也是致命的。因为这个高地不但扼守在通往古土里的路边，而且用步枪就可以把子弹打到下碣隅里环形阵地的任何一个位置。

从黎明开始，在里奇中校的监督下，副营长迈亚斯指挥美军向高地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冲击。

美军知道，天一亮，中国军队通常不会主动攻击，而且能把转入防御的中国士兵的帽子掀掉的美军飞机就要来了。

天亮时，一位中国连长接受了防御下碣隅里东面高地的任务，他的名字在一九五〇年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为全中国人民所熟知和敬仰，而且至今仍是中国第二十军的骄傲，他就是一七二团三连连长杨根思。

杨根思，一九二二年生于中国江苏省泰兴县五官乡一个名叫“羊货郎担”的小村庄里。在极端贫苦的岁月中长大的杨根思，二十二岁那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军后的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二十八岁的时候，他已经成为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的代表，这个荣誉足以说明他在数年的战争中表现是何等的优异。

配备给三连连长的兵力是一个排。包括杨根思在内，所有士兵身上的干粮是三个煮熟了但早已冻得坚硬的土豆。除了这三个土豆之外，士兵们身上能够装东西的口袋里，全部塞满了手榴弹。

营长对杨根思说：下碣隅里外围的所有阵地都已在中国军队的手中，天亮以后，部队准备停止攻击，进行调整和防空，等天黑后再进攻。而天亮后，美军首先进攻的就是这个高地，我们是绝对不能让美军的这个企图实现的。“不许让美军爬上高地一寸！”这是营长最后的命令。

黎明的时候，雪下得更大了。

杨根思和他的士兵们在高地上用积雪构造工事。连续在严寒中战斗，士兵们的鞋和脚已经冻结在一起，失去了知觉，手指也弯曲困难，无法一下子拉开枪栓，饥饿的袭击更是难忍。

天大亮了，美军的炮火准备开始了。同时，从兴南港外美军军舰上起飞的舰载飞机也来了。高地顿时被浓烟笼罩起来，沉重的爆炸声和尖锐的弹片声混合在一起，阵地上黑色的雪和冻土飞溅起来，浓烈的硫磺味令中国士兵窒息。美军飞机投下的汽油弹令黑色的雪燃烧起来。中国军队没有防空炮火进行还击，年轻的中国士兵只有缩在简易的工事中忍耐着，并且被不断飞溅起来的钢铁碎片和冻土掩埋着。中国士兵互相呼唤着，让自己的战友帮助包扎伤口，或者让战友把自己从塌陷的工事中挖出来。

炮火之后，美军的第一次冲击开始了，但是很快就被中国士兵密集的手榴弹打了下去。

接着，又是更加猛烈的轰炸。

这次，在爆炸声中，出现了一种令杨根思警惕的声音，他认为这是坦克的炮击声。果然，他在高地的一侧发现了八辆美军的坦克。

如果坦克加入了美军的阵地战，就说明美军要开始少有的强攻了。

美军冒着中国士兵的手榴弹冲到了阵地前沿。

两军士兵混战在一起。

美军的炮火轰击停止了，美军的飞机在高地上低空盘旋，阵地上只能听得见士兵们的搏斗声。中国士兵中没有人后退一步，美军士兵看见他们即使满脸是血，并且双目已经失明，却仍旧会向他们冲过来，只要抓住他们中间的一个便永远不会松开手。

杨根思发现了美军攻击的弱点，他派出半个班从山腰绕到高地的侧后，在冲击的美军后面突然开火。同时，他亲自带一个士兵，带上炸药，把距离阵地前沿最近的一辆美军坦克炸毁了。

美军士兵退下去了。

杨根思命令士兵们把牺牲者的尸体掩埋了，同时命令八班长带人下去运手榴弹。

八班士兵将手榴弹带上来的同时，带回来营长的一张字条，字条上字迹潦草，但意思明白：不许丢失阵地。

上午十时，美军的又一轮攻击开始了。这次的攻击比任何一次都猛烈，天上飞机密集的程度是中国士兵前所未见的。

在里奇中校的严令督战下，美军组成了“特攻队”，向高地发起了坚决的攻击。

高地前布满了美军士兵的尸体，中国士兵的人数也在不断减少。

杨根思看见重机枪排排长向他爬过来。

排长说：“机枪子弹没有了。”

杨根思问：“人还有多少？”

排长说：“除了我，有个负伤的还活着，还有连长你。”

杨根思说：“你们下去，向营长报告情况。”

排长问：“你呢，连长？”

杨根思说：“我在这里守阵地。”

杨根思独自站在东面的高地上，从这里他可以看见美军的运输机在下碣隅里简易机场的跑道上起飞和降落。机场的四周，战斗也在进行中。高地下的公路上看不见美军的车辆，这就是扼守高地的结果。现在，高地上很寂静，只能听见倒在前沿雪地上的双方伤员音调很奇怪的呻吟声。杨根思沿着高地的四周走了一圈，然后他找到一个隐蔽的地方把自己藏起来。

美军的炮火准备和飞机轰炸又开始了。

这次炮击和轰炸的时间很长。

随着炮击的减弱，美军士兵开始向高地上爬。

杨根思看见了美军中一面蓝色的旗帜，他不知道这是美军陆战队的军旗。

没有子弹打来，没有手榴弹投来，美军士兵觉得这个高地上也许没有活着的中国士兵了。

在接近山顶的时候，美军士兵们直起了腰。

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看见一个中国军人像突然从地下钻出来一样，在他们面前站了起来。他的双臂里是一个巨大的炸药包，炸药包上的导火线已经点燃，正冒出黄色的硝烟。

这个中国军人棉帽子两侧的帽耳朵摇摇晃晃的。他大步地向他们冲过来。

杨根思冲到那面陆战队的旗帜下时，怀中的炸药包爆炸了。

美军陆战队蓝色的旗帜被炸成无数碎片飞上了落雪的天空。

与旗子的残片一起腾空而起的是人体的残肢。

杨根思令美军士兵的攻击静止了。

自这个时刻起，一直到美军陆战一师全部撤出这一地区，美军士兵始终都没能踏上这个可以俯瞰下碣隅里全貌的高地一步。

不久以后，在这个普通的小山上，立起了一块石碑，石碑是用北朝鲜长津郡百姓从很远的海边运来的一种白色石头雕刻成的。几十年过去了，石碑始终矗立在绵延起伏的朝鲜半岛的北部，纪念着这位名叫杨根思的中国军人。

在美军陆战一师于下碣隅里作战的时候，在新兴里，美第七步兵师从二十八日晚开始受到了中国第二十七军八十师连续不断的攻击。到二十九日拂晓，美第七师在外围阵地上遗弃的尸体已有三百多具。中国第二十七军八十师的多数士兵冻伤严重，后勤供应又难以跟上，

但部队还是一度冲进了新兴里。交战双方在一个环形阵地上进行着残酷的拉锯战斗。据守新兴里的美军指挥官是美第七师三十二团团长麦克莱恩上校，他的部队主要由三十一团三营、三十二团一营和美第五十七炮兵营组成。当麦克莱恩团长在混战中被打死后，第七师开始陷入空前的混乱中。

眼看着第七师就要被中国军队全歼了，阿尔蒙德作出了一个令陆战一师师长史密斯极为愤怒的决定，他要求史密斯担负起指挥陆军第七步兵师的任务，并且要求陆战一师从柳潭里派出一个团把第七师解救出来。陆战一师位于柳潭里的部队此时已在中国军队的包围之中，自顾不暇，危在旦夕，正琢磨着怎么逃出厄运呢，何谈派出一个团去救该死的陆军！然而史密斯究竟是军人，他真的派出一支小部队朝着新兴里的方向试探了一下，但立即就被中国军队打了回来。美第七步兵师在中国军队一次比一次猛烈的攻击中盼不来增援，代理团长法恩中校终于下达了“自行突围”的命令，这样的命令在战场上等于宣布官兵开始各自逃命。法恩中校定下的突围目标是下碣隅里方向。但突围行动刚刚开始，这位代理团长就受伤了，失去指挥的美军官兵仓皇中溃散成散兵，跑得满山遍野都是。

根据南朝鲜战史记载，美第七师位于新兴里的部队最后逃回下碣隅里的共计六百七十人，而战前在那里的美军三个营的总人数应该是两千五百人。南朝鲜战史在注解这个统计数字的时候说：“三百人判明阵亡，其余均失踪。”无论具体的统计数字可信程度如何，美陆军第七步兵师三十一团的彻底覆灭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这是中国军队在整个朝鲜战争中歼灭美军一个整编建制团的少有战例之一。

中国军队最终没有占领下碣隅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原因不容忽视，就是有一支美军居然从中国军队布下的死亡封锁线上冲了过来，到达了急需要增援的下碣隅里。尽管这支部队人数不多，但

终究是给了处在覆灭边缘的陆战一师一个有力的支持。这支增援部队就是被称为“德赖斯代尔特遣队”的混合部队。

这支混合部队是在史密斯师长向下碣隅里派出的一个美军步兵连被打回来之后重新组织起来的。史密斯给这支特遣队下达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增援下碣隅里。”

特遣队的总指挥官德赖斯代尔，英国人，海军中校，英军第四十一支队的指挥官。这支英军支队隶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特遣队配备的部队有：美第一坦克营的五个坦克排，有“潘兴”式坦克二十九辆；美海军陆战队一团一个连，车辆二十二台；美第七步兵师三十一团一直待在古土里的一个连，车辆二十二台；美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人员，车辆六十六台，另外就是英军第四十一支队本身，车辆三十一台。

二十九日中午，增援部队出发。这是一支让中国士兵看起来十分豪华的部队：十七辆坦克在前面开路，中间是一百多辆汽车，后面是十二辆坦克压阵。在特遣队的头顶上，有两架“海盗”式战斗机掩护。同时，位于古土里和下碣隅里的美军炮兵以一〇五毫米榴弹炮和一〇七点八一毫米迫击炮全力向他们要通过的道路进行着密集的炮火支援。

德赖斯代尔特遣队一出发，就遭到中国军队的猛烈阻击，他们用了四个小时才前进了四公里。从公路两侧中国军队的阵地上射下来的迫击炮弹和机枪子弹，使汽车上的英军和美军士兵一次次地跳下车进行隐蔽还击，坦克也停下来开炮，但是他们就是无法完全压制住中国军队的射击。天黑了下来，德赖斯代尔特遣队倒霉的时候到了。先是走在前面的坦克手说，道路已被中国士兵破坏，就是坦克能冲过去，汽车也无法过去。再说，中国士兵随时可能从公路边的阵地上冲下来，拼刺刀可不是英军和美军士兵喜欢的事。接着，除了坦克里的通讯还能维持之外，所有的通讯设备都被打坏了。黑暗给英军和美军士

兵带来巨大的恐惧，严寒随着太阳的落山而加剧，令所有的士兵感到即使不被打死也会被冻死。德赖斯代尔通过坦克里的电台向史密斯师长请示怎么办，史密斯的回答依旧很简单：继续向下碣隅里前进。

等着德赖斯代尔特遣队的是中国第二十军六十师的一七九团。无法想象这些中国士兵是如何在严寒之中得不到补充而没被冻死的。黑暗里，英军和美军士兵在天寒地冻中看见的是不断向他们冲过来的中国士兵，有时是随着喇叭声来的，有时是静悄悄地来的，然后就是大雨一样落下来的手榴弹。德赖斯代尔中校和他的副官都负伤了，汽车被打坏起了火，道路很快就被堵塞，后面的汽车开到了路边的沟里。特遣队的行进序列开始混乱起来。最可怕的是，没等负伤的德赖斯代尔整顿混乱的部队，他发现跟随他前进的仅剩一小部分部队了，后面的大部队已经被中国军队切成数截。这位英国军官知道，与中国人打仗，一旦面临这种局面，就意味着最严重的时刻到了。

沿着由南向北的公路，特遣队被中国军队分段包围：集中在一条沟里的美陆军的两个排和一些海军陆战队士兵，以陆战队负责宣传的军官卡普拉罗上尉为首被压缩在一个土坎后面，以负责汽车运输的军官希利少校为首的则躲在汽车下面，还有在后面担任掩护任务的那些坦克所形成的另一个孤立的群体。这些被包围的英军和美军官兵各自进行着抵抗，中国军队的轻武器和迫击炮使他们的伤亡不断增加。中国士兵们靠近投出手榴弹，然后消失在黑暗中，不知什么时候又冲了上来。那些有装甲保护的坦克手们立即掉转方向往回开，在遭受巨大损失之后陆续逃回古土里。而失去坦克掩护、汽车也被打坏的士兵面临的只有绝望了。公路上被孤立人数较多的是一个由美军陆军军官带领的大约二百五十人左右的群体。陆军军官名叫麦克劳林，是阿尔蒙德第十军司令部作战部长助理，兼第十军与海军陆战队联络负责人。麦克劳林指挥把伤员集中起来围成圈，并且派出侦察员侦探突围路线，但人派出去就再也没回来。麦克劳林决定坚持到天亮，天一亮，

飞机来了就有活的希望了。可是到了这种时候，已经没人肯听他的指挥了。几个士兵上了一辆吉普车开始逃跑，结果车没开出去多远就全成了中国军队的俘虏。

凌晨四时左右，已经浑身麻木的麦克劳林少校看见一位中国军人带着一名被俘的美军中士来到他的面前。

麦克劳林少校嘴唇颤抖地问：“你是来投降的吗？”

中国军人说：“我是军使。我们同意你们派少数人把重伤员送回古土里，条件是剩下的人必须向中国军队投降。”

麦克劳林看看天空，说：“我考虑一下。”

麦克劳林想估计一下什么时候才能天亮，他想把谈判拖到那个时候。他跟已经负伤的其他军官们交换了意见，然后又和同样处在中国军队包围中的希利少校取得了联系，希利说他还有一点弹药，他不想投降。麦克劳林清点了自己这个抵抗体的弹药和可以战斗下去的人数，发现子弹最多的士兵也只有八发子弹了，人堆里绝大多数是仍在大声呻吟的重伤员。

麦克劳林少校说：“我们投降。”

中国士兵们蜂拥而上，不顾一切地爬上汽车卸那些战利品，因为这些战利品中有不少是中国士兵急需的食品和可以防寒的被服。

在中国士兵卸战利品的时候，一些美国士兵悄悄地溜了。

在这段公路上，特遣队投降的人数是二百四十人。

由德赖斯代尔亲自率领的特遣队先头部队此时接近了下碣隅里，他们已经能看见从简易机场上射出来的雪白的灯光了，因此只有冒死

前进。他们在距离下碣隅里只有一公里的地方，受到中国军队几乎令他们覆灭的攻击，德赖斯代尔第二次负伤，不得不让海军陆战队的一位上尉代替他指挥。最后，这位上尉终于在下碣隅里向里奇中校报到了。

德赖斯代尔特遣队向下碣隅里的增援行动，以损失一半的代价完成了。脆弱的下碣隅里的防御得到了加强，尽管德赖斯代尔特遣队到达下碣隅里的人数只有三百多人。

特遣队到达后没多久，中国军队向下碣隅里的攻击又开始了。

这是一场绝死的战斗，双方都表现出不顾一切的决心。

中国军队的迫击炮射手终于发现了美军防御阵地中的一个绝好的目标，这一次，中国炮兵的炮弹击中了美军堆积如山的汽油桶，燃烧起来的大火令整个下碣隅里亮如白昼。

中国军队在反复攻击的过程中，弹药几乎耗尽，士兵伤亡巨大。

尽管始终占领着有利地形，中国军队最终没能攻下下碣隅里。

三十日清晨，美第十军派驻陆战一师的高级参谋福尼上校从古土里飞到咸兴，向阿尔蒙德军长报告了陆战一师目前的处境。

此时，麦克阿瑟已经命令朝鲜战场上的联合国军全面撤退。

阿尔蒙德立即飞到下碣隅里。

在下碣隅里，阿尔蒙德召开了有陆战一师师长史密斯和第七步兵师师长巴尔参加的会议。阿尔蒙德终于宣布了“向南撤退”的命令，授权史密斯师长指挥长津湖地区所有美军的撤退行动，同时还授权他“可以破坏影响撤退的一切装备”。

陆战一师作战处阿尔法·鲍泽上校和约瑟夫·法恩科夫上校负责制订撤退计划，法恩科夫上校说："我的天啊，我必须去找一本参谋手册，我从未想到陆战队会参与后退或撤退行动。"

史密斯师长对这一已经太迟了的决定没有任何积极的反应。他对阿尔蒙德将军说的话是："一、撤退的速度取决于后送伤员的能力；二、陆战队愿意战斗到底并把大部分装备带回去。"

就这样，其悲惨程度在美军历史上极其少见的、对于美军士兵来讲如同炼狱一般的长津湖大撤退开始了。

而史密斯师长在给他的陆战一师下达的撤退指令中，有一句措辞让以后世界许多军史学家们长久地品味着。史密斯师长面对损失惨重的陆战一师说：

"陆战队，向南进攻！"

## 噩梦的开始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三十日夜，朝鲜半岛东北部的盖马高原上，大雪纷乱，寒风怒吼。

一支美军连队孤独地龟缩在茫茫荒原中的一个小山顶上。士兵们躺在睡袋里，露出一张张因严重冻伤而发黑的脸和一双双惊恐不安的眼睛。

北面柳潭里方向，枪炮声连续不断地传来；南面下碣隅里方向，枪炮声似乎更加激烈；而这里却是死一样的寂静。

寂静中，从山顶四周不同的方向传来美军士兵们听上去很古怪的汉语。他们认为汉语的发音是世界上所有语言中最不可思议的，是一

连串“咯咯”的声音。现在，由于从零下四十摄氏度的低温中传来，这种声音听上去更加飘忽不定。虽然亦真亦幻，但翻译还是让美军士兵明白了这些汉语的含义：

“美军士兵们！你们被包围了！你们没有希望了！放下你们的武器！志愿军优待俘虏！给你们暖和的衣服和热的食品！”

汉语的喊声在黑暗的山顶上回荡，令酷寒中的美军士兵毛骨悚然。

喊声持久地进行到午夜，美军士兵的焦躁已经达到顶峰。他们突然从睡袋中钻出来，神经质地在阵地上来回乱走，骂着叫着，有的士兵蹲在冻雪上哭起来。

F连是陆战一师开始向北进攻的时候被派到这里的。

从下碣隅里至柳潭里的公路上，有个卡在公路要冲的高地，高地名叫德洞岭。德洞岭马鞍形的山脊一直伸展到公路边，并在接近公路时形成一个数米高的悬崖。如要通过公路，就必须占领且扼守这个高地。此时，无论是从中国军队要彻底切断美军陆战一师的两个环形阵地之间的联系角度看，还是从美军要确保柳潭里部队的退路和增援下碣隅里的角度看，德洞岭都注定成为双方拼死相争的军事要点。

陆战一师师长史密斯在他的部队向北进攻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撤退的问题。他曾说：“这个高地如果丢失，两个陆战团就完了。”

陆战一师上尉威廉·E.巴伯二十天前被任命为F连连长。他是个有十年军龄的陆战队老兵，开始当过两年的空降兵，在对日作战中表现勇敢，参军第三年时被提升为少尉。在太平洋上的硫磺岛上，美军陆战队曾与日军进行过举世震惊的残酷的战斗，巴伯在该战役中获得一枚银质勋章。

史密斯师长对这个卡在陆战一师撤退路上的要地的重视，表现在他选择了巴伯这样一个陆战队老兵任连长，而且巴伯的F连得到了重机枪班和迫击炮班的加强，从而使F连比其他陆战一师的连队整整多出五十个人，兵力总数达到二百四十人。同时，在下碣隅里的一个美军一〇五毫米榴弹炮兵连还被指令专门对F连进行火力支援。

十一月二十七日，当F连到达德洞岭阵地的时候，高地下的公路上正通过一长队陆战一师的运输车队。F连的士兵们因为极度疲劳，没人愿意立刻在冻得像石头一样坚硬的冻土上挖工事，于是都打开睡袋睡觉了。三排排长麦卡锡用皮靴踢着士兵们的屁股，叫喊着让他们起来赶快挖工事。就在这时候，从柳潭里和下碣隅里方向同时传来了枪炮声，中国军队向德洞岭的进攻开始了。

没过多久，巴伯得知，与F连同时被史密斯师长派到德洞岭地区守卫公路的C连，在中国军队的攻击下伤亡巨大，阵地已经失守。而这就意味着，F连没有任何撤退的余地了。

午夜刚过，二十八日凌晨二时，中国军队向扼守德洞岭的美军F连的进攻是从军号声中开始的。美军士兵匆忙从睡袋中爬出来，大声喊道："他们真的来了！"

一个连的中国士兵从三面攻击F连的阵地，并一度从北面突破了F连的防线，在北面防御的F连的两个班顿时损失惨重，三十五个人中二十七人伤亡。在北面的防御阵地动摇之后，紧接着，西面和西北面的阵地也出现了危机。中国士兵冲进阵地，与美军士兵开始了残酷的肉搏战，双方使用了能够使用的一切搏斗工具，包括挖工事的锹和镐、枪托、刺刀和拳头。士兵们扭在一起在黑暗中滚动，互相掐喉咙、挖眼睛、打击对方的面部。山顶一度被中国士兵占领，但很快又被美军反击下去。这时，位于下碣隅里的美军炮兵的炮火支援开始了，但由于双方已经进入肉搏战，美军炮兵只能以密集的炮火封锁中

国军队可能的支援路线，而正是美军的炮兵火力令中国军队在兵力上的补充受到了限制。搏斗持续了三个多小时。接近早晨六时的时候，随着一声尖厉的哨声，中国士兵迅速撤出了战斗。

这是F连在德洞岭度过的第一个夜晚。这个夜晚，F连伤亡人数达到七十多人，其中二十多人死亡。连队的卫生兵为了防止液体冻结，把装着吗啡的注射容器含在嘴里来回奔跑，但备用血浆还是不可避免地冻结了，伤员因输血不及时而出现新的死亡。因为点燃了煤油取暖器而相对暖和些的帐篷里容纳不下这么多伤员，于是F连的伤员被要求排队轮流进帐篷取暖。天空渐渐出现了一丝黎明的光亮，美军把死亡士兵在寒冷中迅速僵硬的尸体收集在一起，由一名叫莫里西的看护兵负责登记死亡者的身份证——“把死者整整齐齐地排好是陆战队的一贯做法”。巴伯清点了一下全连的弹药，发现所剩不多。前来空投弹药和急救器材的运输机所投下的物资，基本上全落到美军士兵不敢去的环形阵地的外围了。运输机来了一次就再也不见踪影，通过无线电话联系才知道，由于位于下碣隅里的简易机场的跑道长度不够标准，运输机被禁止着陆了。

当时陆战一师没有人知道，这仅仅是F连悲惨命运的开始。

二十八日夜晚，中国第二十军五十八师再次开始了对F连的进攻。这一夜的情况和前一夜几乎一样，经过冲击和反冲击，阵地在双方手中几次易手。所不同的是，这一夜的战斗更加残酷。两枚手榴弹接连落在二等兵卡弗雷特的面前，他不得不全神贯注而又惊恐万分地将它们一一踢开，第三枚手榴弹越过他的头顶，向他身后布满伤员的掩体落去，卡弗雷特飞身扑向手榴弹然后将它挡向别处，“手榴弹在完全离开他的手指前爆炸”，他的手掌被炸裂的弹片削成碎块，“一根指头就落在他的脚边”。巴伯连长的膝盖在这天夜晚被子弹打穿。F连的

损失虽然比前一夜小了一些，但伤亡人数也达到三十多人。至此，F连的兵力已经不足半数。

天亮之后，弹尽粮绝的F连在绝望中盼来了珍贵的补给。海军陆战队另一种型号的运输机把大量的物资准确地投到F连的阵地上，其中包括弹药、正规的C类干粮、咖啡、毛毯、担架和药品，五颜六色的降落伞铺满了高地的山顶。直升机还给F连的电台送来了急需的电池。

躺在担架上的巴伯向全连士兵如实传达了目前的战况，他告诉士兵们，指望有部队来增援是不可能的，陆战师的七团和五团已经陷入中国军队的严密包围之中。F连必须在这里坚守，不然的话，整个陆战师一个人也别想活下来。巴伯说："这里是他们的唯一出路，如果我们守不住这里，他们便真的走投无路了。"

二十九日夜，中国军队没有进攻。

三十日白天，F连再次接到飞机的补给，补给物资的数量对于一个连来讲已经是太多了。

事后证明，德洞岭阵地所扼守的公路对于美军陆战一师的撤退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中国军队没能最终歼灭F连占领德洞岭阵地的原因很多，其中的一点就是严寒下的持续战斗需要有充足的物资补给，最重要的是弹药、口粮和保证士兵不被冻伤的被服，而物资补给恰恰是中国军队最薄弱的环节。

刚刚结束国内战争的中国军队在后勤供应上远没有适应现代化战争的需要。在异国他乡作战，没有了军队赖以生存的人民群众的"大后方"的依托，中国军队各军只有依靠各自独立的、运输工具贫乏的后勤勤务分队进行补给。虽然跟随在中国军队的后面有数量不等的民工，

但朝鲜半岛的补给线路如此险恶而漫长，依靠肩背手推的方式所能供应上去的物资无异于杯水车薪。从中国东北边境到东线战场的前沿，只有一条简易公路蜿蜒在崇山峻岭之中，美军对这条唯一的运输线进行了严密封锁。由于中国军队防空力量薄弱，美军飞行员白天可以对出现在公路上的任何目标进行毫无顾忌的攻击，而到了夜晚，沿着这条公路，成串的照明弹把天空照得雪亮，中国的卡车司机只有利用照明弹熄灭的短暂空隙开进，在陌生而险峻的山路上驾驶汽车而不敢开灯是极其危险的，于是由人为汽车带路才得以缓慢地开进。即使这样，东线战斗开始后不久，中国军队中数量不多的汽车也已经损失大半。中国军队动员了几乎所有的非战斗人员参加物资的运输，军一级的机关人员、勤务人员，甚至文工团的演员都加入了向前方运送物资的工作。他们背着弹药和粮食，在暴风雪中艰难地前进，送到前线的每一粒粮食和每一发子弹都是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可是，由于数量有限，前方的官兵依旧处在极度的饥饿和缺乏御寒被装的状态之中。

一支运送物资的小分队在荒山野岭中惊喜地发现一条铁路，这是一条早已废弃的运送矿石的窄轨铁路，他们立即感到前途有了光明。经过寻找，他们找到一节只有四个轮子和两根横木的破旧车厢，他们钉上了木板，装上了弹药，开始推车而行。冰雪覆盖着的窄轨铁路不但弯弯曲曲，而且不时出现巨大的陡坡，这支小分队一共才五个人，其中的三个人在车厢的前面用绳子拉，剩下的两个人在后面推。一位叫聂征夫的文化教员后来这样回忆道:

> 不知道过了多少山沟和陡坡，也不知道走了多少里路，夜更深了，山谷里的寒风卷着雪粉，直向脸上打来。我们的胡须上、眉毛上都凝结了一层冰珠，呼吸也感到困难，饥饿、寒冷和疲惫同时袭击着我们。我咬紧牙关，双手使劲地推着车厢，两脚机械地迈过枕木，一步一步往上爬。已经两天没有吃上饭了，我弯腰抓起一把雪填到嘴里，顿时清凉一阵，可慢慢地也无济于事了。身上软绵绵的没有一点力气，心里像虫咬一样难受，脑袋更是昏沉沉的。同时，两只手也感到异常疼痛，从手背一直疼到手臂。我以为是被路边爆炸的炮弹炸伤了，后来仔细一看，才发现手背肿得像馒头一样，原来是血液冻得凝固住了……

鉴于东线战场的情况，彭德怀电令志愿军第九兵团：集中兵力围歼位于新兴里的美军，对柳潭里、下碣隅里“围而不歼”。

三十日晚，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调整部署，集中了第九兵团的八十、八十一师于新兴里。

几乎是同时，美军陆战一师师长史密斯于三十日晚上十九时二十分向位于柳潭里的五团、七团正式下达了向下碣隅里撤退的命令。

五团团长默里中校和七团团长利兹伯格上校在接到撤退命令的时候碰了一下头。这两个经过二战的老兵知道，对他们来讲，生死攸关的时候到了。两人甚至还互相说了句“上帝保佑”，话语中有一个含义只有他们两人自己明白，那就是晋升的消息已经确实，再过三个月，也就是到了一九五一年一月，默里将晋升为上校，而利兹伯格将晋升为准将。

只要能活下来，一切会好的。

两个团长制订了联合撤退的计划：

第五和第七团，沿着柳潭里至下碣隅里的道路迅速向下碣隅里前进。首先以步兵逐次夺取道路两边的要点，车辆纵队在其掩护下沿道路前进。以一部利用夜暗突破敌之间隙，实施越野机动，秘密向德洞岭山口行动，救出F连的同时加强山口要点，掩护主力通过山口。前卫营为第五团第三营，担任越野机动的为第七团第一营。在向南边开始进攻之前，以第七团第三营夺取一五四二高地，另以一个连夺取一四一九高地，为主力撤退获得立脚点。

这一夜，两个团长不断地收到师部传来的战场通报：在他们撤退的漫长道路上的一个重要据点——新兴里，中国军队发动了猛烈的进攻，被围困在那里的美军已经与中国军队陷入混战状态。但是，已经顾不上想更多的事了，反正天亮之后必须突围。

十二月一日，柳潭里的清晨十分嘈杂，天刚一亮，一五五毫米榴弹炮群就开始了集团发射。没有人知道炮兵们到底要把炮弹打到哪里。因为一五五毫米榴弹炮过于笨重，为了便于和步兵一起撤退，必须在撤退前把炮弹打光。直升机把因为没有驾驶员而一直瘫痪在阵地上的那辆坦克的驾驶员运来了。驾驶员在这个时刻被投入战场，心情可想而知，他发动了坦克在环形阵地中疯狂地乱转。根据史密斯师长的命令，大部分物资必须装车带走，于是士兵们在一种紧张而恍惚的情绪中开始装车，由于没有中国军队的进攻，士兵们似乎觉得这不是在撤退而像是在搬家。环形阵地的一角突然回荡起小号吹奏的美国国歌的旋律，旋律在寒冷的风中颤抖，让美军士兵一下子想起那些没法带走的东西——无数美军士兵的尸体被就地埋在这里。这些美军士兵的尸体直到朝鲜战争结束四十年后，美国政府才在北朝鲜政府的允许下把遗骸运回了太平洋的另一边——这些美军士兵的家乡。

八时，以五团三营为前卫，美军陆战团开始了突围。

几乎是在美军突围的同时，包围柳潭里的中国第二十七军七十九师立即做出反应，在各个高地上开始了猛烈进攻。在一二四九高地、一四一九高地以及双方曾经反复争夺的一二八二高地，都发生了殊死的战斗。装备和供给都远远优于中国军队的美军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表现出孤注一掷的凶狠，因为他们知道，一旦阵地失守，正在撤退中的大部队连同他们自己定将全军覆灭。而在寒冷和饥饿中坚守包围圈的中国士兵同样表现出异常的勇敢，因为他们之所以忍饥受冻坚持到现在，就是为了给予美陆战一师以毁灭性的打击，他们决不允许美军就这样逃跑了。

在一二八二高地上，与美军展开争夺战的是七十九师二三五团的一个排。排长名叫胡金生。胡金生的营长在向他交代作战任务时，特别强调了一二八二高地的重要性：“高地下面就是通往下碣隅里的公

路，如果敌人从这里跑掉，我们的血就等于白流了！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守住它！”一二八二高地的争夺战因此空前残酷。中美双方的士兵在高地上反复拉锯达七次之多。与中国士兵争夺高地的是陆战队的G连，这个连根据他们了解的中国军队的战法，一开始就准备了大量的手榴弹，于是双方在这里打的是一场混乱的“手榴弹战”。美军的飞机成群地在高地上飞，因为阵地上的士兵混战在一起，支援飞机不敢投弹，于是他们执行“威吓中国士兵”的任务。在第七次争夺战后，排长胡金生牺牲了，高地上只剩下两个中国士兵，一个是班长陈忠贤，一个是弹药手小黄。美军最后的冲锋开始了，小黄倒下了，陈忠贤在冲天的火焰中端着一挺机枪站起来，向密集的美军士兵愤怒地横扫，美军士兵再次退了下去。这次退下，美军就再也没能组织起对这个高地的进攻，因为这时G连的美军士兵发现，柳潭里的美军已经撤光了，再不跑就来不及了。在G连扔下死伤的美军士兵的尸体向下碣隅里方向退去的时候，美军的飞机和炮火对这个高地开始了猛烈轰炸，美军工兵甚至引爆了高地上残存的炸药，整个一二八二高地立即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由于中国士兵对柳潭里周围各个高地造成的压力，作为撤退前卫营的美陆战一师五团三营直到下午近十六时才真正担负起为突围开路的职责。

在柳潭里通往下碣隅里的公路上，缓慢地行进着美军长长的车队。这是美军最薄弱的时刻。在公路两边的几乎每一个高地上，都有中国士兵射向公路的子弹和迫击炮弹。而且，没过多久天就黑了，美军的飞机不能来支援，美军士兵知道该他们倒霉了。中国士兵从公路两边的高地上冲下来，以班为单位抵近美军撤退的队伍，先是用手榴弹进行试探，然后干脆就径直冲过来。美军士兵在令他们魂飞魄散的黑暗中拼死抵抗，撤退的队伍一次次被迫停下来。美军军官们一次次地组织抵抗，尽最大的努力不使撤退的队伍溃散。美军的主要炮兵火

力一五五毫米榴弹炮因为没有了炮弹而成为废铁，将死亡的美军士兵的尸体绑在炮筒上带回去是这个钢铁家伙现在唯一的用处。一辆满是伤员的卡车仓皇中撞上一座小桥的护栏，桥被撞塌，卡车连同伤员一起掉入冰河之中。轻伤员挣扎着爬上岸，而用绷带捆在卡车车厢上的重伤员立即没了踪影。在地面美军的强烈要求下，美军飞行员在扔下大量的照明弹之后，破例开始在夜间进行火力支援。飞机扔下的炸弹不可避免地使双方的士兵都受到巨大的伤亡。飞行员们也许感到这样的低空轰炸实在是太刺激了，当地面要求他们向公路边的一个高地进行火力支援时，他们竟然在一个有中国士兵身影出没的小山脊上使用凝固汽油弹和五百磅炸弹整整轰炸了二十五分钟。远东空军后来在描述他们强大的战斗力时说，他们要使那条小山脊成为“世界上最没用的地皮之一”。

从柳潭里撤退的第一夜是美军陆战一师大批伤亡的夜晚。

天亮之后，美军飞机几乎贴着陆战队士兵的头顶掩护着他们一寸寸地撤退。

按照战斗常规，这一夜应该是美陆战一师的两个团全军覆灭的一夜。但是，善于夜战的中国军队没能抓住时机将其歼灭，原因除了极度的饥饿、寒冷和弹药不济之外，对于中国士兵来讲，最大的威胁是美军的空中火力，这是没有任何空中支援和防空武器的中国士兵无法克服与战胜的。只要天一亮，中国士兵几乎不能在战场上露面。如果说中国军队哪怕拥有少量的空中力量，美军陆战队在这天夜晚就将血流成河。拿陆战一师作战处长的话说：“如果中国军队拥有一定数量的空中力量和足够的后勤保障，陆战队肯定一个也别想活着跑出来。”

史密斯师长在布置撤退的时候，有一项决策是至关重要的，就是派出一支部队离开公路，利用野战越野的行军方式迅速突向德洞岭，

与坚守在那里的F连会合，巩固那个卡在撤退路线上的最关键的要地。

担任野战突破任务的是七团的一营，营长雷蒙德·戴维斯中校是七团团长利兹伯格亲自挑选的。戴维斯中校，毕业于佐治亚工业大学，二战中作为一名营指挥官在佩累利乌岛上有过上佳的表现。利兹伯格对戴维斯这样表述了自己的想法：我们必须营救F连，并且加强德洞岭高地的力量。中国军队认为美军士兵只会在公路上作战，而事实上也是如此，以往的战斗表明，美军士兵一旦离开公路，就是死路一条。这一次，我们就是要让中国人吃上一惊。

戴维斯中校进行了精心的准备。除了把这个营里的伤员和已经患病的士兵挑出来留下之外，特别加强了全营的火力配备，各种武器都是双倍的编制，迫击炮的弹药数量也增加了一倍。士兵除每人携带四份口粮外，还必须背上一发炮弹、一副防止冻伤的鸭绒睡袋、双倍的机枪和步枪子弹以及其他必需的野战物品。这样，戴维斯的一营每个士兵的负重达到五十多公斤。为了保证联络不中断，戴维斯把通常使用的SCR—300便携式无线电台换成了可以远距离通话的AN/GRC—9背负式无线电台，炮兵联络人员还携带了通讯距离更远的SCR—610电台。

戴维斯营的路线首先要通过一四一九高地。原来认为大白天拿下这个高地没有问题，因为根据通报，在这个高地上坚守的中国士兵已经三天没有过任何补给，美军认为高地上的中国士兵不饿死也必定冻死了，即使万一幸存下几个也不会再有什么战斗力了。但是，美军士兵很快就发现，坚守这个高地的中国士兵依然表现出超常的坚强。一个美军连整整打了一个上午，无论空军配合得多么紧密，无论一四一九高地远远地看去大火熊熊根本不可能再有什么生物存活，可是美军士兵就是爬不上去。攻打这个高地的战斗从早上一直进行到黄昏，利

兹伯格两次增加攻击兵力，最后参加攻击的包括戴维斯营的一个连在内兵力达到四个连近八百人，并且，还加强了飞机、榴弹炮和迫击炮的支援。一四一九高地最后被美军突破的时间是晚上十九时三十分。

戴维斯营还没有真正出发就损失惨重，利兹伯格不得不另外给戴维斯又补充了一个连的兵力。

晚二十一时，戴维斯命令他的一营向德洞岭进发。白天打了一天仗的士兵们浑身破烂，沉重的军服里已被汗水湿透，此时戴维斯看了一下温度计，零下二十四摄氏度。他对士兵们说：“如果在这个温度里穿着湿内衣就地过夜，等于是自己找死，我们最好的赌注是连夜出发。”

应该说，戴维斯营的行动确实出乎中国军队的预料之外。美军没有夜间在没有道路的荒山中行军的先例。在没膝深的雪中一步步地走，美国兵们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苦。不断有士兵掉队，不断有与中国士兵零星的战斗，黑暗中的冷枪和冷炮不知是从什么地方飞来的。戴维斯不敢打开电台联络，也不敢弄出任何声响，只有在士兵们走不动了时，他才连踢带拉地叫几声。实在走不动了，就命令士兵们躺在睡袋中睡上一会儿。危险始终存在着，就在戴维斯钻进睡袋的时候，一发冷枪子弹穿透了他的睡袋，他说：“几乎剥了我的头皮。”

被死亡的恐惧和残酷的寒冷折磨得有些恍惚的美军士兵常常偏离预定的路线，有几次差点走到中国军队的阵地上去。朝鲜战争后晋升为少将的戴维斯回忆道：

> 沿途有一些中国人挖的工事，为确保准确的行军方向，我常常下到这些工事里，用指北针判定方位。我两次把军用雨衣披在头上，然后趴在地上，借手电筒的光亮校正我的地图，以检查行军的方向。我把头对准一个方位物，然后关上手电，掀开雨衣，走出工事判定方向，可我常常想不起我在雨衣下干了些什么，而是站在那里茫然发呆……我不得不再次走下工事，从头做起。所有的人都三番五次地找你，好弄清楚要干什么，实际上严寒使我们完全麻木了。

十二月二日拂晓，戴维斯营到达德洞岭附近。

在接近F连时，他们又受到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经过一上午的战斗，十一时，戴维斯营与F连会合了。当戴维斯营的士兵走上F连的阵地时，他们“穿过了成片的中国攻击者的遗骸”。

戴维斯营以巨大的伤亡换取了使整个美军陆战一师能够从覆灭的厄运中逃生出来的希望。

三日，陆战一师两个团的主力撤退至德洞岭。之后，整顿队伍继续向下碣隅里撤退。车辆上的伤员已经满员，不得不把一些伤势较轻的人赶下车步行。两个团长的吉普车上也挤满了伤员，默里和利兹伯格不得不和士兵们一起步行。长长的车辆与步兵混杂着，序列混乱地向前移动，公路两侧是派出负责掩护的连队，头顶上的飞机不断地报告着中国军队目前的阻击位置和兵力。这一天，海军陆战队的飞行员们进行了一百四十五架次的出动，除了向一切可能有中国阻击部队的山脊进行轰炸外，还不断地空投地面要求的任何物资，包括车辆使用的汽油。

四日，美军陆战一师五团和七团撤退到下碣隅里。

从柳潭里到下碣隅里的距离是二十二公里，陆战一师先头部队在这二十二公里的距离内用了五十九个小时，后卫部队则用了七十七个小时，平均每小时走三百米，每前进一公里需用三个小时。在撤退的路上，共有一千五百人伤亡，其中五百人是冻伤。

《纽约先驱论坛报》随军女记者玛格丽特·希金丝在目睹了美军士兵撤退到下碣隅里阵地时的情景后写道：

我在下碣隅里看见了这些遭到攻击的官兵，不由想到他们如果再受到一次打击，究竟还有没有再次逃脱的力量。官兵们衣服破烂不堪，他们的脸被寒风吹肿，流着血，手套破了，

线开了，帽子也没了，有的耳朵被冻成紫色，还有的脚都冻坏了，穿不上鞋，光着脚走进医生的帐篷里……第五团的默里中校，像落魄的亡灵一般，与指挥第五团成功地进行仁川登陆时相比，完全判若两人……

而“像落魄的亡灵一般”的默里中校自己说道：

打开血路的五天五夜就像是一场噩梦，是海军陆战队不曾有过的最坏的时候。在柳潭里的附近，我每天晚上都会想，大概不会再见到天亮了。

海军陆战队从东线撤退的消息，立即在美国国内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反应。一种认为这是美军巨大的耻辱和失败；另一种则认为这是一次“史诗般的壮举”。

陆战一师师长史密斯说：“我们夺回了所有的主要补给线，这根本不是一次退却，因为我们在经过的每一个地方都要进攻。”

无论怎样说，美军从东线撤退是中国军队在整个朝鲜战场上所获得的巨大胜利。它证明至少截止到此时，战争的主动权已经牢牢地掌握在中国军队的手中。至于美军为什么能够从严密的包围中撤退出来，有人认为是东线的中国军队兵力过于分散的缘故，也有人认为是由于交战双方武器装备、后勤供应和通信设施的巨大悬殊造成的。

战争的胜负从来都是多种因素集合的结果。

对于美军来讲，没有任何战略目的、完全为了求生的撤退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被迫的行为，是对美国军队“战无不胜”的神话的无情嘲讽。

而且，撤退到下碣隅里，并不意味着噩梦的结束。

对于美军陆战一师的士兵来讲，他们的地狱之行才刚刚开始。

## 水门桥

按照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的计划，第二十六军主攻下碣隅里，其最迟攻击时间应为十二月五日。

然而，十二月五日这天，下碣隅里非常平静，中国军队没有任何大规模的攻击动作。

第二十六军之所以没有按照预定时间发起攻击，是因为这个军的推进速度缓慢，五日，他们距下碣隅里还有五十至七十公里的路程。

于是，当柳潭里的美军陆战一师撤退到下碣隅里以后，第二十六军攻击下碣隅里的最佳时机已经丧失。而战后的战场通报显示，在柳潭里的美军没有向下碣隅里突围之前，下碣隅里的美军兵力仅为两个步兵排。

中国第二十七军的战后总结，对当时处于朝鲜战场的中国军队具有普遍意义：对敌人估计过低；大部队过于分散，小部队过于集中；侦察手段有限，后勤补给严重不足……

到了十二月五日这天，集结于下碣隅里的美军已达到上万人，各种车辆上千台。美军的人员和车辆都集中在一个方圆仅仅几平方公里的小小地域里，如此的密集程度，加上堆积如山的军用物资，哪怕有一发炮弹落到这里，都会引起巨大的伤亡。但是，中国军队缺乏火炮迅速机动的能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美军大规模地集中在一起。

尽管如此，至少史密斯师长心里明白，中国军队吃掉他的决心已定：中国的第二十六军正向这里步步逼近，第二十七军也从柳潭里方向压来。更糟糕的是，在陆战一师下一步撤退的道路上，大约有五六个师的中国士兵已经迅速南下，在下碣隅里至古土里乃至五老里的道路两边准备节节阻击。而现在，这条道路上的所有桥梁都已被中国工

兵炸毁。可以说，陆战一师仍然深陷在包围之中，突围出去的路上一定布满死亡的陷阱。

美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下达的命令仅仅是一句话：尽快撤退到咸兴地区。

史密斯也恨不得立刻就撤退到濒临东朝鲜湾的咸兴，但是他的陆战一师根本快不了。除了要整顿经历过剧烈战斗而损失巨大的部队，并让士兵们稍微恢复一下体力之外，更重要的是，那些拥挤地躺在下碣隅里的每一座帐篷中的伤员必须撤退出去。伤员的人数大约在五千左右，带着他们突破漫长的血路撤退到东海岸的咸兴是绝对不可能的。

只有一个办法：空运。把伤员空运出下碣隅里。

下碣隅里的简易机场终于可以使用了，这是史密斯师长在这段暗淡的日子里感受到的唯一一丝光亮。当阿尔蒙德催促陆战一师迅速北上进攻的时候，陆战一师因为坚持修建这个机场严重延误了北进的时间，史密斯为此几乎丢失了自己职业军人的前途。但是，仅仅十一天后，当第一架远东空军的C-47飞机载着伤员飞离下碣隅里的时候，第十军所有的指挥官终于认识到修建这个机场的必要性了。

在撤退伤员的工作中，陆战队队员在机场的跑道上发现许多曾经仓皇逃命的美第七步兵师的假伤员。这些美国陆军士兵“走到跑道上，裹上一条毯子，倒在担架上大声地呻吟起来，于是卫生兵就把他们抬上了飞机”。在这种情况下，一名军医向史密斯师长报告了一个奇怪的数字：他管辖的帐篷里原来有四百五十名伤员，可当天他运走的伤员人数却是九百四十一人。到了天黑的时候，他从机场回来，居然发现又有二百六十人躺在他的帐篷里。军医认为，如果不加强检查，会有更多的“没有受伤的士兵上了飞机”。史密斯师长当即宣布这名军医是

能否上飞机的“最后裁定人”。军医为了更方便地执行裁定，选择了一个活的“样品”：一位名叫莱森登的军医由于脚被冻伤，走路一瘸一拐的，于是所有的伤员都必须与这位军医相比，“伤势不重于莱森登医生的人不准上飞机”。

除了伤员以外，史密斯师长坚决主张把一百三十八名美军士兵的尸体抬上飞机。为此，他又与第十军司令部吵了起来。司令部要求把死者留下，以便飞机腾出更多的地方尽快运走伤员。但是，史密斯的态度十分强硬：“我们不惜生命也要带走这些尸体，陆战队对阵亡的士兵极为崇敬，我们绝不会把他们留在孤寂荒芜的朝鲜村庄里！”然而，在柳潭里，阵亡美军士兵的尸体已经被就地掩埋了。更让史密斯恼火的是，那些已经被运到日本医院里的士兵的冻伤状况引起了舆论对陆战一师的一片指责，说使士兵冻伤是“指挥员的失职”，要求军事法庭“调查失职者”。为此，史密斯再次给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官凯茨将军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愤怒地质问道：

> 我在这里刚刚把一枚银星勋章授予一名中士，他为了扔手榴弹脱下了手套，手指被冻伤。你能因为这位士兵未能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冻伤而把他送交军事法庭吗？你能因此把他的营长、团长、师长送上军事法庭吗？

在朝鲜半岛东线的战斗中，装备低劣和补给薄弱的中国军队因冻伤而失去战斗力甚至死亡的士兵数量约为一万人，相比美军因此而失去的战斗兵员这几乎像是一个天文数字。美军陆战一师军士伯季回忆道：严寒里的中国士兵穿着单薄的胶鞋，他们的脚已被冻得肿成“像足球一样大”。那些负伤倒在阵地上已无法行动的士兵手里还握着枪，“我们不得不掰断他们的手指，才能把步枪从他们冻僵的手中拿出来”。

为了撤退，美军对下碣隅里进行了空前的物资补给。美军的四引擎飞机以红、蓝、黄、绿、橙五种颜色的降落伞，投下大量的食品、药品、汽油和弹药。数量之大使远东空军的降落伞都不够用了，以至

于要从下碣隅里的地面不断地回收，但落在下碣隅里的降落伞大部分都被美军士兵们撕开当作御寒的毯子和围巾了。由于地面冻得很硬，空投的物资一半以上落地时损坏，还有一部分落到了中国军队的火力控制范围内。尽管空投的物资总重量已达到三百多吨，史密斯师长还是认为不够。对陆战一师的另一项重要补充是人员。五百多名在仁川登陆时负伤现已伤愈的陆战队官兵也被空投到下碣隅里，作为陆战一师撤退时的主要突击力量。

美军陆战一师于下碣隅里开始的大撤退中，有一个问题成为历史性的问题，那就是，依靠美军空军的力量，使用空运的方式将下碣隅里的上万名美军运送出去，不是不可能的。当时，美军空军派出负责指挥这一地区军事行动的丹纳少将专程到下碣隅里与史密斯师长会面，明确建议使用空军的C-47飞机撤出陆战一师的全部人员。然而，陆战一师为什么放弃安全的空中撤退，而选择了九死一生的地面突围呢？史密斯师长的解释是：如果进行空运，就必须逐次收缩下碣隅里的环形阵地，以一批批地抽出兵力运走。那么，空运中，一旦中国军队进行大规模的进攻（这种可能性极大），不但空运会陷入极大的混乱，而且处在空运状态中的美军很难立即组织起有效的抵抗，部队会遭受极大的伤亡，甚至可能出现不可控制的局面，而这种局面一旦出现，陆战一师将彻底覆灭。再者，空运必须抽出兵力守卫机场，而等最后一架飞机起飞后才算完成任务的这支守卫机场的部队，必定要被中国军队全部歼灭。还有，如果下碣隅里的美军被空运出战场，那么在黄草岭等待大部队撤退路过时一起突围的那个营就没有了单独突围的任何可能性，他们只能孤零零地成为中国军队的一顿美餐。鉴于所有这些因素，地面突围尽管危机四伏，但从保存更多生命的角度看，反而比空运给予的机会多。

史密斯认为，作为师长，他必须对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每一个官兵负责。

十二月五日下午，距离预定的撤退时间还有半天，应记者们的强烈要求，史密斯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美国记者、英国记者、法国记者纷纷从咸兴飞来，他们已经把陆战队糟糕的情况向全世界进行了报道。残酷的撤退行动近在眼前，史密斯没有心思和记者们进行文字周旋，但当记者提到陆战队现在是“后退”还是“退却”的时候，曾经在陆战队从柳潭里向南撤退时发出奇怪的“向南进攻”的命令的史密斯师长顿时亢奋起来：

> 退却，是被敌人所迫使，是向友军保持的后方地域转移。但是，这次作战，后方也被敌人占领着，我们已经被完全包围，既不能后退也不能退却，陆战一师只能打出去！因此，这不是退却，是进攻！

第二天，西方各大报纸的大标题醒目而骇人：

> 说退却毫无道理，是对其他方向实施进攻！

十二月五日晚，下碣隅里美军炮兵阵地上所有的一五五毫米火炮一齐发射，巨大的轰鸣声震荡着沉寂了两天的山谷。重炮的发射目标是陆战一师即将向南撤退的公路两侧中国军队的阻击阵地以及一切美军怀疑有这种可能的地区。由于怕破坏公路，炮兵使用了一种在距离地面一定高度爆炸的炮弹引信。发射还连带着要把多余的炮弹统统打光的目的，因此，美军火力密集的轰击一直延续到六日的清晨。

五日夜，美军准备出发。士兵被告知，在这样一个夜晚，中国军队肯定会向下碣隅里进行规模空前的进攻，因此，出现在他们身边的每一个细小的声音都会引起莫名的恐慌。突然，爆炸声大作，一个巨大的火球落在下碣隅里美军士兵的帐篷上，在可怕的伤亡和骤然的混乱停止之后，才发现在夜空中向下碣隅里俯冲轰炸的是远东空军的B-26双引擎轰炸机，投下的是美国制造的航空炸弹、一三〇毫米火箭弹和十二点七毫米的机枪子弹。史密斯师长气急败坏地大叫：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在下碣隅里上空值班的海军夜航飞机到哪里去了？美军

飞行员后来的解释是：我们在无线电中受领到“攻击下碣隅里”的命令。——那么，是美军空军在无线电信号中发布了错误的命令？还是中国人用缴获的美军电台发出了“错误”的命令？

十二月六日清晨，美军自下碣隅里向南大规模撤退的行动开始了。

首先，美军自己引爆了炸药，他们要把下碣隅里彻底毁灭，特别是军事设施和可以御寒的一切房屋，同时还要彻底销毁一切携带不走的物资，包括剩余的衣服、食品和弹药。推土机把堆积如山的罐头食品压碎，泼上汽油点燃。带不走的物资中还包括随军小卖部的一些商品，商品中有裹着漂亮纸的太妃奶糖，在销毁这些奶糖的时候，军官一下想到奶糖的味道比配发给士兵的C类干粮要好，不如让士兵们吃了。于是，那一天，从下碣隅里走出来的成千上万的美军士兵人人嘴里都嚼着太妃奶糖。

当最后一批美军离开下碣隅里的时候，冲入下碣隅里的中国士兵冒着美军发射的炮弹在大火中寻找可以补充自己继续作战的物资。

离开下碣隅里的美军是一支庞大的、豪华的、诸兵种联合行动的队伍：先头部队在坦克的带领下沿着公路两侧攻击前进，后面是步兵与车辆混合而成的长长的纵队，然后是后卫部队。炮兵与先头部队之前已经出发，为的是抢先占领发射阵地。在整个队伍的上空，上百架处于同一高度的飞机严密地掩护着地面的撤退。这是朝鲜战争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空中掩护，从航空母舰“莱特”号、“巴里”号、“福基”号、“菲律宾”号、“普林斯顿”号、“斯特雷德”号、“凡尔登”号、“西西里”号起飞的舰载飞机以及美军第五航空队的侦察机、战斗机、中型和重型轰炸机，依次轮番起飞，在整个陆战一师撤退的必经空域形成了严密的掩护火力网。

六日的清晨有雾，陆战一师的先头部队居然在一个高地上发现了还在睡梦中的几个中国士兵。接下来的情况就不妙了，中国军队不顾头顶上美军飞机的扫射和轰炸，开始对美军进行殊死的阻击。中国军队把美军先头部队的坦克放了过去，然后猛烈地射击美军的步兵，密集的子弹从公路两侧的每一个山头射来。同时，在令美军士兵心惊肉跳的铜喇叭声中，中国士兵无所畏惧地冲上来与美军搏斗。陆战一师撤退的序列开始混乱，长长的车队被迫停下来进行抵抗。虽然是白天，但中国士兵勇敢的阻击令美军一天才撤出去五公里。

天黑了。

中国第二十六军的部队终于赶到了战场。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给第二十六军的命令是：全面向撤退中的美军发动坚决的攻击。抵抗中国第二十六军攻击的是陆战一师的七团，这个团的士兵已经在死亡中滚过几回了，因此面对中国士兵的冲击反而无所顾忌，他们呐喊着，在一种近乎疯狂的状态中拼死抵抗。陆战一师的后卫五团抵抗着压下来的中国第二十七军的部队。在公路两侧的各个山包上，交战双方反复争夺的状况一直延续着，将荒凉的山谷杀得血光冲天。美军士兵后来把这条山谷称为“火炼狱谷”。

陆战一师二等兵巴里·莱斯特回忆道：

陆战队与中国人混战在一起，为每个高地、每个山脊角逐争夺。中国人猛烈的反击都在晚上进行，他们的军队充分利用了后三角队形的优点，以班为单位攻击我们的中段和侧翼，在手榴弹投掷距离以内进行试探……我们五个人分布在侧翼一个高约二十五码的陡坡上，在三四个小时的时间里，与从前后左右冲上来的中国人作战。他们冲上来，极力冲到手榴弹投掷的距离，接着又退下去。我的小腿中了一枪，痛得要命，血流了一地，但最后不流了，因为血液冻住了……中国人一次比一次冲得近，我们的弹药快打光了。一位中士是我下午才碰上的，他的腹部受了伤，而且肯定伤了脊骨，因为他说他的腿动不了了……“把你们的弹夹扔给我，你们所有的弹夹……”他喊道，“我留在这里掩护你们。”我们服从了。我很难受，因为我知道他没法离开那个山包……如果中国人知道我们往下撤，一定会紧追不舍的。

莱斯特和另外三名陆战队员离开了那个阵地，在一阵剧烈的枪声响过之后，那个阵地沉寂了。

中国士兵知道，这是歼灭美军的最好的时机。

在一个卡在公路边的高地上，一个排的中国士兵自十一月二十九日就坚守在这里，他们忍饥受冻等待的就是这个时刻。美军陆战队的士兵疯狂地要夺取这个高地，他们把这个高地紧紧地围住，使用了可以使用的一切火力，并且像登山运动员一样依靠绳索往高地上爬，但是这个高地始终在中国军队的手里。

十二月七日，美国军史专家蒙特罗斯将这一天的战斗称为“最壮观的战斗”：

> 陆战队员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众多的中国人蜂拥而至。中国人一次次地顽强地进攻，夜空时而被曳光弹交织成一片火网，时而照明弹发出可怕的光亮把跑步前进的中国部队暴露无遗。尽管陆战队的炮兵、坦克和机枪全力射击，但是中国人仍然源源不断地拥上来。他们视死如归的精神是陆战队员们从未见过的。

美军的坦克先头部队冲过枪林弹雨到达了古土里，伤痕累累的美军士兵一头倒在帐篷里就睡，但是命令他们原程返回的命令到了，因为陆战一师的主力部队，尤其是辎重部队，此刻处在了与中国军队的混战之中。中国士兵已经把辎重部队紧紧地包围了，这支部队因为等待工兵修复被中国士兵炸毁的桥梁和开辟迂回道路而滞留在这里。负责掩护辎重部队的，是美国海军航空兵司令哈里斯将军的儿子哈里斯中校，中校已经把手中掌握的三个步兵连全用上了，但辎重部队依旧处在危急之中。在中国军队的顽强攻击下，辎重部队副团长死亡，指挥部的两名参谋也相继死亡。最后，哈里斯中校也死于混战之中。

这时，留在下碣隅里附近担任后卫任务的陆战一师五团与中国军队的战斗更为残酷。阻击中国军队前进的美军士兵在坦克、榴弹炮、无后坐力炮、火箭筒和机枪组成的火网中不肯后退一步，中国士兵以

令美军士兵目瞪口呆的顽强一波又一波地冲上来。美军战史记载道：“中国士兵的身影浮现在照明弹青白色的光亮下，如此视死如归的进攻从来没有见过。”

战斗持续到七日的下午。

美军陆战一师的主力部队陆续撤退到古土里。

从下碣隅里到古土里十八公里。这十八公里的道路美军走了三十八个小时，平均每小时前进五百米；美军在这十八公里的路上损失官兵六百六十一人，平均每公里伤亡三十四人。

集中在古土里的美军仍有一万多人。

这里距离陆战一师最终的撤退目标兴南港还有七十公里。

美军到达古土里的时候，一场猛烈的暴风雪来了。惊魂未定的美军官兵在极度的寒冷中听到了一个比呼啸的风雪更令他们恐惧的消息：在向咸兴撤退的路上，有一个极其险峻的隘口，隘口上唯一可供通过的桥梁已被中国士兵炸毁。

那座使美军陆战一师无路可绕的桥，名叫水门桥。

水门桥位于古土里以南六公里处。长津湖水库下面引水涵洞里的水到这里流入四条巨大的管道内，以很陡的坡度伸向山下的一座水力发电站。在管道和公路相交的地方，是架在管道上的悬空单车道桥梁。远远地看去，桥高挂于悬崖之上，桥下是万丈深渊。一旦没有了水门桥，过往车辆因无路可绕只有被堵截于此。

中国军队知道水门桥是阻止美军陆战一师南撤的好地方，于是先后两次炸桥。第一次是在十二月一日，炸毁之后，美军陆战队工兵以

一座木桥修复后通车。中国军队的第二次炸桥是在十二月四日，炸毁之后，美军工兵修复起了钢制的车辙桥。现在，中国士兵第三次将桥炸毁。这一次，炸药对水门桥的破坏大于以往任何一次。

关于这座桥梁的故事，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整个朝鲜战争中，作战双方工业能力的巨大差距导致了军事实力的巨大悬殊，从而使战争在战争力量相差巨大的前提下进行着。

陆战一师工兵参谋兼第一工兵营营长约翰·帕特里奇中校建议，最好的办法是把新车辙桥组件空投到古土里，然后再把这些组件运到架桥现场。架桥需要四套M2型车辙桥组件，但考虑到空投可能造成的损失，陆战一师要求了八套。但是，车辙桥组件重达一吨多，美军空军现有的空投降落伞能否承受如此重量还没有过先例。于是，在南朝鲜的一个空军基地进行了降落伞载重试验性空投，结果钢制的组件在落地时严重弯曲。空军要求从日本运来更大的降落伞。当夜，一支降落伞维修小组携带着更大的降落伞从日本到达位于朝鲜的美军海军连浦机场，在海军陆战队空投排和美军第一水陆两用牵引车营一百多名技术人员的配合下，连夜完成了空投试验和在古土里实施空投的一切准备。

十二月七日上午九时，陆战队员被通知离开预定空投地域，以“防止建桥部件砸到他们头上”。然后，美军空军的八架C-119大型运输机将八套钢制的M2型车辙桥组件空投到了古土里狭窄的环形阵地里，除了一套落到了环形阵地以外，其他的全部安全收回。这些组件被立即装上卡车，在重兵的掩护下，向水门桥前进。一路上大雪纷飞，中国士兵的冷枪不断，更糟糕的是，派去占领水门桥的先头部队没有完成任务，卡车被迫返回。第二天的行进很顺利。可是，当美军到达水门桥时，帕特里奇却大吃一惊：中国工兵不知道什么时候又炸掉了一截残存的桥面，M2车辙桥组件已无法达到断裂面的宽度。美军工兵们在

深谷中发现了一堆旧枕木，于是他们把枕木拖上来，架设起临时桥墩。

九日下午十六时，水门桥架设完毕。帕特里奇中校向史密斯师长“表示了歉意”，因为他曾保证在“一个半小时之内”重新架起这座桥梁。

就这样，远离本土作战的美军，用了不到三天的时间，于不断传来的枪炮声中，在朝鲜东北部偏僻山区的一座悬崖上架设起一座载重五十吨、可以通过所有型号的坦克和车辆的钢制桥梁。

事后，从中国军队对如此重要的水门桥及其隘口附近所投入的少量兵力看，说明中国军队的指挥员们必是认为美军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修复一座钢铁桥梁，而只要把桥梁炸得看上去根本不可能修复，美军的后路就可以认为是彻底断绝了。所以，中国军队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派出工兵炸毁桥梁。中国军队没有认识到美军现代化装备的优越作战能力，即使认识到了也必定不够充分。因此，直到美军士兵心惊胆战地通过水门桥的时候，他们才发现中国军队并没有在这个险要的地方部署重兵，所有的阻击从规模上判断只有营的兵力。其实，即使在美军修复了水门桥的情况下，隘口也是美军大型车队通过的瓶颈，只要在隘口附近的几个高地部署阻击兵力，对隘口进行不间断的冲击，美军就是通过也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但是，除了零星的冷枪之外，整个水门桥地区没有中国军队更大的阻击。

事后，军史专家分析说，不是中国军队的统帅不知道这个隘口的价值，而是中国军队因为后勤补给断裂这一不可克服的困难，此时已经没有力量组织大规模的攻击行动了。

从古土里到真兴里，在水洞村附近，以为已经摆脱中国士兵的一股美军突然受到攻击，在迷茫的风雪中出现的中国士兵令美军不知所

措。中国士兵中有的人脚上连鞋都没有，这令美军士兵在零下四十摄氏度的气温中看上去简直如同一种幻觉。中国士兵的手榴弹和步枪子弹立即击毙了美军的卡车司机，卡车燃起大火。在闪动的火光中，美军士兵认为到处都是中国军队，于是四处逃窜，战斗序列立即瓦解。

卡在美军陆战一师撤退路上的一〇八一高地，一直被中国军队占领着。这是一块更加远离中国军队补给线的高地。美军为了夺取这个高地，派出了一支强攻部队，美军士兵在冰雪中与中国士兵反复争夺高地。严寒使自动步枪和卡宾枪已不能发射，即使用火烤过之后依旧有百分之四十不能使用。一〇八一高地距离公路仅仅八百米，但是雪深达到二十厘米，美军从进攻前沿运送伤员下来，八百米的坡路要用去七个小时。不知道在这种极其恶劣的条件下，高地上的中国士兵在没有粮食供应和缺乏御寒衣物的情况下是怎样活下来的，但是，他们的生命在战斗中依然能够迸发出炽热的斗志。一〇八一高地最后被美军四面包围，在高地四周的每一个方位，都有美军对空引导员引来的美军飞机。真兴里方向的一五五毫米榴弹炮、团属一〇七毫米重迫击炮和一〇五毫米榴弹炮、营属八一毫米迫击炮和六〇毫米迫击炮一齐向这个高地进行射击。地面上美军动用了一个营的兵力向山顶冲击。参加过这次战斗的美军士兵战后这样评价了那天他们在一〇八一高地上看见的中国士兵："这些中国人忠实地执行了他们的任务，没有一个人投降，顽强战斗到底，全部坚守阵地直到战死，无一人生还。"

从古土里到真兴里，撤退的美陆战一师用了七十七个小时，平均每前进一公里需要两个小时。在这条路上，美军死亡八十一人，失踪十六人，负伤二百五十六人。

十二月十一日十三时，陆战一师的主力通过真兴里。

中国军队对在朝鲜半岛东线作战的美军陆战一师的阻击基本结束。

美军陆战一师自元山登陆到撤退回咸兴，共死亡七百一十八人，失踪一百九十二人，负伤三千五百零四人，合计战斗减员四千四百一十八人。同时，非战斗减员数以千计，其中大部分是冻伤。

中国军队在东线战场的损失没有公开的确切数字记载。

战后，美军曾翻译过一份中国军队第二十七军关于朝鲜东线战事的总结材料，其中有这样的叙述：

> 食物和居住设备不足，士兵忍受不住寒冷。这就发生非战斗减员达一万人以上，武器不能有效地使用也是原因。战斗中，士兵在积雪地面野营，脚、袜子和手冻得像雪团一样白，连手榴弹的拉环都拉不出来。引信也不发火，迫击炮管因寒冷而收缩，迫击炮弹有七成不爆炸。手部皮肤和炮弹和炮身粘在一起了。

即使是这样，在东线的战斗中，美国海军陆战队最精锐的陆战一师依然遭到了中国军队的重创，中国军队已迫使其在东线战场进行了大规模的撤退。至此，世界上没有人再会认为中国的这支“农民武装”式的军队是一支可以轻易侮辱的力量。

朝鲜战争结束后多年，在日本出版的一部关于朝鲜战争的著作中，日本人是这样描述那时的中国军队的：

> 中国军队在美军完全掌握了制空权的情况下，虽然苦于缺乏装备、弹药、食品和防寒用具，但仍能忍耐一切艰难困苦，忠实地执行命令，默默地行动与战斗。这就是毛泽东所提倡的“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的勇敢精神。好像对美军炽烈的火网毫不在意似的，第一波倒下，第二波就跨过尸体前进，还有第三波和第四波继续前进。他们不怕死，坚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的意志，仿佛是些殉教者。他们对面的美军官兵也在惊叹其勇敢的同时，感到非常害怕。这支军队的这种勇敢战斗精神和坚忍性，到底来源于什么？那大概不单纯是强制和命令。可能是因为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帝国主义的憎恶，坚信现在进行的这次战争是“正义战争”，这些都渗透到了这支军队官兵的心灵深处，不，已渗透到了他们的骨髓之中。

# 圣诞快乐

自朝鲜战争开始以来一直处在焦虑之中的毛泽东终于有理由高兴一下了。在得知中国军队在第二次战役中已迫使联合国军大规模撤退之后，毛泽东写道：

颜腦齐王各命前

多年矛盾廓无边

而今一扫新纪元

最喜诗人高唱至

正和前线捷音联

妙香山上战旗妍

无论从中国古典诗词精美的水平上衡量，还是与毛泽东曾经写下的那些壮阔诗篇相比，这首词都依旧是一篇上乘之作。这是毛泽东在北京的中南海里沿着秋天的湖岸当着周恩来的面即兴赋和一位"高唱而至的诗人"的结果。当时毛泽东手上拿着中国军队全面向南推进的战报，兴奋的情绪自然跃动心间。

"高唱而至的诗人"，是中国著名的民主人士柳亚子。当朝鲜战场上的联合国军不可遏制地溃退的时候，中国国内高涨的胜利情绪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柳亚子老先生也不例外，于是他给毛泽东送来一首《浣溪沙》，其下阕有这样的句子：

战贩集团仇美帝

和平堡垒拥苏联

天安门上万红妍

且不论以词著称的柳亚子先生的这首词写得如何，其反映出的微妙的国际政治关系却是真实的，那就是在朝鲜战争中中苏联盟这个巨大政治力量的影响。

如果柳亚子先生的这首词被准确地译成英文，并且传到美国政府官员的眼前，那么美国人肯定会认为，他们事前关于朝鲜战争本质的一切分析都是正确无误的。

在国际政治中与苏联结盟的新中国，不但要在军事上显示自己“不可轻视”的国际地位，而且还要在意识形态上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政治主张。

与朝鲜战场上的军事行动紧密配合，中国派出了以伍修权将军为首的九人小组前往联合国进行外交行动。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建立新中国后第一次派出自己的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当时联合国里的中国席位上坐着蒋介石的代表，而几乎所有的西方大国都无视新中国的存在。

拿毛泽东的话讲，“伍修权大闹天宫”去了。

就在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发动第二次战役，联合国军西线的右翼开始崩溃的时候，以伍修权将军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小组出发了，他们经蒙古、苏联、捷克……整整十天后，到达了与新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的美国。他们手里所持有的是成立仅仅一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

纽约机场，黎明时分，晨风很冷。一百多名记者拥挤在机场的出口，抗议和欢迎的人群也混杂在机场的出口。美国警察的表情如临大敌。九个新中国的共产党代表走下了飞机。一位美国记者在报道这一时刻的时候用了这样的标题:

这些旅行者在他们周围的历史气氛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

十一月二十八日，联合国政治委员会会议大厅的旁听席上挤满了人，会场专门为新中国的代表留出了位置，位置前是一个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的标牌，这个标牌格外地引人注目，因为此时联合国还没有承认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国家。凑巧的是，在伍修权的旁边坐着的，是那个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在三八线上举着望远镜向朝鲜北方窥探的杜勒斯。没人知道杜勒斯看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标牌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伍修权以“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为题，开始了他长达两个小时的发言。

“我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命，代表全中国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来这里控诉美国政府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非法的和犯罪的行为。”伍修权对美国散布的“台湾地位未定”、“须由美国托管”等谬论，引用《开罗宣言》、《波茨坦协定》和美国总统杜鲁门《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对中国人民的立场进行了有力的表述。在涉及朝鲜战争时，伍修权阐述的观点措辞尖锐而华丽：

朝鲜的内战是美国制造的；朝鲜的内战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成为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理由或借口。各位代表先生，能不能设想因为西班牙内战，意大利就有权占领法国的科西嘉呢？能不能设想，因为墨西哥内战，英国就有权占领美国的佛罗里达吗？这是毫无道理的，不能设想的。其实，美国政府武装侵略台湾的政策，正像其侵略朝鲜的政策一样，早在朝鲜内战被美国制造之前就已决定了。

……

美国政府武装侵略我国领土台湾和扩大侵略朝鲜战争，千百倍地加强了全中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和愤慨。六月二十七日以来，全中国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工商业家对于美国政府这一侵略暴行的千千万万的抗议，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可遏止的愤怒。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但美国侵略者如果以为这是中国人民软弱的表示，那就大错特错了。中国人民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不管美国政府采取任何军事阻挠，也不管它盗用什么样的联合国的名义，中国人民决心从美国侵略者手中收复台湾和一切属于中国的领土。

蒋介石政权的代表蒋廷黻的座位和伍修权正好面对，相信伍修权发言时的目光落在这位台湾代表脸上的频率最高。蒋廷黻在伍修权发言时一直把手遮在前额上。

美国代表极力想把话题从台湾问题上引开，引导会议讨论目前正在进行的朝鲜战争，提出“中国侵略朝鲜案”。但是，中国代表拒绝讨论这个问题。伍修权的立场是：

> 我不参加所谓“控诉对大韩民国的侵略案”的讨论，理由是很清楚的。因为朝鲜问题的真相不是别的，正是美国政府武装干涉朝鲜的内政，并严重地破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美国政府盗用联合国的名义是完全非法的。六月二十七日联合国安理会对于朝鲜问题的决议，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两常任理事国家参加，根本是非法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决不参加那根本荒谬的所谓“控诉对大韩民国的侵略案”的讨论，也完全没有必要回答奥斯汀先生以麦克阿瑟报告为基础所提出的问题。
>
> ……
>
> 只准帝国主义侵略，不准人民反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打退敢于侵略中国的一切帝国主义者。

十二月七日，联合国在美国的操纵下，还是将“中国侵略朝鲜”的提案列入了联合国大会议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九位代表愤然离开了会场。无论如何，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了。

朝鲜战争进行到这个时刻，特别是经过中国共产党人在联合国讲坛上的阐述，美国人终于明白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朝鲜参战，根本问题并非在于一个新生的政权感到了来自边境的威胁，而是在于这个新生的政权力图在国际政治上取得更大的承认。这一点从周恩来的声明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就中国军队是否在朝鲜停战，周恩来开列了三个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必须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地位；

二、美国侵略军必须撤出台湾；

三、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

周恩来拒绝了一些国家的代表提出的“先实现停火后实行停战”的建议。他特别强调，“朝鲜问题和亚洲重要问题的和平解决，离开这几点是不可能的”。更让美国人惊慌的是，周恩来指出，当美军越过三八线时，“就永远抹去了这一政治地理的界线”。

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空前强硬。中国军队在朝鲜参战的政治目的，涉及新中国国际地位的确立以及台湾问题的解决和整个亚洲局势的稳定。中国共产党人威胁的信号十分明确，三八线这条人为的界线在中国军队的眼里根本不存在，只要中国军队愿意，就可以一直战斗到把联合国军赶下日本海。

中国共产党人从开始为自己的理想奋斗时起，就已经拥有了在异常艰难的境遇中格外的顽强和特别的乐观的性格。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把国际政治的孤立当成了一种战斗的动力，这是中国军队义无反顾地出兵朝鲜参战的重要因素之一。屈服是不可能的，这不符合中国共产党人的性格。他们只有战斗，他们相信通过顽强的战斗新中国最终会赢得全世界的承认。

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性格在中国军队追击溃逃的联合国军的路上表现了出来。中国军队中优秀的士兵打着竹板，令在追击中感到疲惫和饥饿的同伴咧开嘴笑：

同志们，加把劲儿，

前边就是宿营地儿，

宿营休息喘口气儿，

不到目的不完事儿，

要问目的是哪里?

暂时还得保保密儿……

没有一个中国士兵真正知道目的地到底在哪里。他们仅仅知道这下子恐怕要把美国人一直追到海边了。而美军的撤退也许就意味着战争要结束了。都说美国军队打仗厉害，飞机大炮厉害是真的，可最后也就是那么回事。麦克阿瑟说“圣诞节前让孩子们回家”的话曾让美军士兵们高兴了好一阵子。其时，中国的传统节日元旦和春节也快要到了，中国士兵自己编出的顺口溜是：“从北到南，一推就完，消灭敌人，回家过年。”

中国士兵的乐观是有理由的。位于朝鲜战场西线的美军和南朝鲜军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六个军的打击下，美第二师、土耳其旅、南朝鲜第二军团已经完全失去战斗力，美第二十五师受到重创，美骑兵第一师、美第二十四师均伤亡巨大。在这种情况下，麦克阿瑟不得不命令他的部队全面撤退，而且是美军历史上少有的大规模撤退。其中的一部美军以在一个星期内一举撤退二百五十公里而举世闻名。美国舆论在一片悲观的气氛中对麦克阿瑟的撤退予以了极大的嘲笑：“麦克阿瑟被朝鲜山坡上枯萎的狗尾草吓得发抖”，并且“由于中国军队的强烈的冲击，麦克阿瑟实际上败于自己的想象”。而军事评论家认为，在清川江以北，美军受到的打击的确是前所未有的，但自那以后，美军都是并未经过像样的战斗而连续撤退的，不战而退二百五十公里的事例“真是罕见”。正当美军的撤退愈难愈急的时候，被送到朝鲜战场上的美国报纸上有了一则幽默，说当平壤快保不住的时候，麦克阿瑟研究了应该在哪里站稳脚的问题，并命令参谋人员制订一个撤退五十公里的计划。结果这个参谋错把一张小比例尺的地图当成大比例尺的地图了，

参谋看见有个地方防线最窄，于是决定了撤退的目的地，其实那是三八线附近的临津江口，可是麦克阿瑟却批准了。

担任第二次战役正面进攻的中国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二、第四十军在彭德怀的命令下，不顾一切困难，不畏一切风险，不惜一切代价，向南勇猛前进，力图最大限度地歼灭撤退中的敌人。

在通往朝鲜半岛南方的各条公路上，拥挤着争先恐后逃离的联合国军的车辆。而在通往朝鲜半岛南方的所有山间小路上，步行的中国士兵以惊人的速度在前进。不断有联合国军部队再次落入被歼灭境地的消息。联合国军的车轮竟不如中国士兵的脚步快，这令全世界颇感惊讶。日本军史学家认为，“中国士兵创造了战史上罕见的纪录”，这是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表现出的“七个不可思议”中的一个。

所谓“七个不可思议”是:

一、中国军队介入朝鲜战争的目的、动机和规模;

二、中国军队是如何侦察的;

三、中国军队的伪装、土木作业的能力;

四、原始的后勤系统是如何装备和供应部队的;

五、中国军队卓越的夜间战斗的本领;

六、视死如归的人海战术;

七、中国军队在没有机械运输的情况下的机动、追击的速度。

十二月四日深夜，面对联合国军向三八线总退却的战场态势，毛泽东致电彭德怀:

彭邓朴洪并告高贺:

大体上可确定平壤敌人正在撤退，其主力似已撤到平壤至三八线之间，其后卫似尚在平壤以北及东北地区。你们应于明（五）日派一个师或一个师的主力，向平壤前进，相机占领

平壤。

彭德怀当即命令以三个师的兵力威胁平壤，并且明确由第三十九军一一六师占领平壤。

联合国军的确要放弃平壤了。

中国军队在朝鲜中部的追击速度之快超出所有人的预料。平壤的两侧地区已经出现中国军队移动的踪影。位于平壤的联合国军获得的消息说，中国军队投入了新的精锐部队。情报人员甚至说，他们看见至少有两支骑蒙古马的中国骑兵部队正向平壤奔袭，并且这两个师的中国士兵是刚投入战场的部队，因为他们都“穿着新的黄色的棉衣”。联合国军开始对平壤进行大规模的破坏，在炸毁一切军事设施和工业设施的同时，开始尽可能彻底的掠夺，其中包括可以运走的一切民用物资，甚至包括金日成图书馆里的图书。在联合国军的裹挟下，大批难民混杂在撤退的联合国军士兵当中，形成大规模的难民潮。史料记载的撤退军民总人数为三百万，而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北朝鲜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南朝鲜第一师师长白善烨是平壤人，彻底毁灭平壤的爆炸声“令他受到了无可比拟的失望感的折磨”。

十二月五日一早，北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一条新闻，新闻在详细叙述了朝鲜战场的形势之后说：

> ……东西两线敌军，恐慌万状，急于逃命。平壤城内之敌，正在罪恶地屠杀人民，焚毁物资及该城的发电设备，大火弥漫平壤城。朝鲜人民军和我国人民志愿军正向平壤方向攻进中。

这篇新闻稿是毛泽东亲自撰写的。

中国军队第三十九军一一六师三四六团的一个营，在副团长李德功的率领下，不顾敌人在道路上为飞机轰炸设置的目标火堆和猛烈的炮火阻击，于十二月六日上午冲进了平壤市区。

平壤的联合国军大部分已撤到大同江南岸。为了阻止敌人炸毁大同江桥，李德功命令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向江边前进。但是，他们还没有到达，就远远地听见了大同江上的一声巨响。这时候，三四六团的主力也跟了上来。

中国军队占领大同江桥头堡的时间是：十二月六日上午十时三十分。

中国军队立即执行了志愿军总部颁发的《入城规定》。这个规定详细地制定了中国士兵在这个异国首都所必须遵守的纪律条款，其中包括重要目标的警戒、物资的清查和看管、群众工作以及社会治安。三四六团一营的一个司务长想为部队寻找粮食，他敲开朝鲜居民的家门想先借上一点，结果他敲开的是金日成的家，一位朝鲜妇女接待了他，这位妇女是金日成的婶子。

这一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这样一则消息：

> ……朝鲜人民军和我国人民志愿军本日解放平壤。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侵略军以及李承晚匪军残部，向平壤以南溃退。朝鲜人民军和我国人民志愿军的正规部队，于十二月六日下午二时进入平壤城。

这篇新闻稿还是毛泽东亲自撰写的。

对于美国总统杜鲁门来讲，从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一日开始，糟糕的事就接连不断。首先是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失败，而这意味着他政治生涯最艰难的时刻到了。共和党人抓住美国政府的一切失误来攻击杜鲁门，朝鲜战争的局势正是企图把杜鲁门赶下台的那些家伙们最喜欢说的话题。而美国驻远东部队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在这个月发表的

许多言论，证明他已坚决站在了反对派的立场上。麦克阿瑟完全不顾曾向美军士兵和他们的家属许下过“圣诞节回家”的诺言，以“神奇的速度”改变了自己过去的一切说法。令杜鲁门最为恼火的是麦克阿瑟于十二月三日给美国政府发来的战报，战报把朝鲜战场上的军事形势描绘得一片黑暗，然后麦克阿瑟开始细致入微地、不厌其烦地说明自己命令撤退的理由，并且隐晦地警告“如果美国政府再不改变对朝鲜战争的指导思想，美国人就会在朝鲜彻底完蛋”。这份报告无疑是在往杜鲁门的伤口上撒盐，并且很有点逼人就范的味道：

麦克阿瑟致参谋长联席会议：

第十军团以最快的速度撤退到咸兴地区。第八集团军的情况愈来愈危急。沃克将军报告平壤地区守不住了，敌人一旦施加压力，没有疑问，他将被迫撤退到汉城地区。我同意他的估计。企图把第八集团军和第十军的兵力合在一起，不仅是不可能，而且也不会产生任何好处。这两支部队在数量上都处于绝对劣势，他们的会合不但不能加强实力，实际上反而削弱了由于两条分开的海上补给和调度的后勤路线所带来的自由活动的便利。

正如我以前所报告的，因为考虑到设防地区的辽阔：防线的两部分必须就近从每个地区的海口取得供应，防线又被从南到北的、崎岖的山岳地带分割成两个区域，我们的兵力就显得薄弱，所以拦腰在朝鲜建立一道防线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条防线从空间计算大约是一百二十英里，从地面计算大约是一百五十英里。如果把我所指挥的七个美国师布置在这条防线上，那就是说，一个师将不得不担负起防守一条长约二十英里的前线。而其所对峙的敌人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在山地里敌人夜间渗入具有很大的威胁可能性。这样的防线，如果没有纵深的后方就不会有什么力量，而从防御的观念上看，这样的防线必然招致敌人的渗入，结果是被包围歼灭或者是被各个击破。

对付比较弱的北朝鲜部队，这样的战略思想是可行的，但是对付中国陆军的全部力量就不行了。

我不相信由于中国陆军公开地进入战斗所造成的根本变化已为人们所全部了解。估计已经有二十六个师兵力的中国部队投入了第一线的战斗。另外，在敌人后方，至少有二十万人。北朝鲜的残余部队也在后方休整。自然，在所有这些后面，还有共产党中国全部潜在的军事力量。

对于切断敌人供应系统，山岳地带减低了我们空军发挥配合的效能，而对敌人的分散战术却很有利。加上目前国际战线的限制，这就大大降低了我们空军优势可能产生的正常效果。

由于敌人集中在内陆，因而大大降低了我们海军可能发挥的威力。两栖活动不再可能，而有效地使用海军炮火配合作战也受到了限制。因此，我们各个兵种联合作战的力量大为减低，而双方的力量对比越来越决定于地面部队战斗力的对比。

所以，非常明显，如果没有最大数量的地面部队的增援，本军不是被迫节节后撤，抵抗力量不断削弱，就是被迫困守在滩头堡阵地里。这样做，固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延长抵抗的时间，但除了防御外，没有任何希望。

这支小小的部队，在目前的情况下，事实上是在不宣而战的战争中面对着整个中国。除非积极地、迅速地采取行动，胜利的希望是渺茫的。而实力不断被消耗，以致最后全军覆灭，那是可以预期的。

截至目前为止，本军还是表现了旺盛的士气和显著的效率，虽然本军已经进行了五个月的几乎不曾间断的战斗，精神疲惫，体力消耗。目前在我们指挥下的大韩民国的部队的战斗效率是微不足道的，作为警察和保安部队使用，他们还有一点儿用处。其他国家的陆军分遣队，不管其战斗效率如何，由于兵力微少，只能起很小的作用。我指挥的各个美国师，除了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外，现在大约都缺额五千人，这几个师从来没有补充到规定的名额。中国部队是新投入战斗的，组织完善，训练和装备都很优良，很明显他们处在斗志高昂的状态。此间对局势的全面估计认为，必须从这样一个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在完全新的情况下，与一个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完全新的强国进行一次完全新的战争。

我执行的指示原以北朝鲜部队为对手，由于新事件的发生，这个指示完全过时了。必须清楚地了解这样的事实：我们以较小的部队现在面对的是苏联大量供应物资所加强了的共产党中国的全面攻势。以前那些成功地用来指导与北朝鲜陆军作战的思想，现在继续用来对付这样的强国可就不行了。这就需要重新制订可行的、足以应付现实问题的政治决定和战略计划。在这一方面，时间是重要的，因为每一小时敌人的力量都在增长，而我们的力量却在削弱。

可是，在所有公开的场合，麦克阿瑟高谈的却是另外一套。他坚持说“圣诞节攻势”是成功的，因为它迫使中国军队过早地交战，破坏了中国人发动突然进攻的计划，而中国人的这个计划“会占领全朝鲜”；他极力否认由于他命令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并且逼近中国边境，从而导致了中国军队参战的说法；他坚决反对把“有计划的撤退”说成是溃败，并且说那些愚昧无知的记者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技艺高超的撤退”；最后，他没忘再次指责华盛顿束缚了他的手脚，比如禁止他越过鸭绿江打击中国军队，麦克阿瑟说这是导致目前局势的关键。

在杜鲁门看来，麦克阿瑟一再重复他的这些观点，表明了他和共和党的一些头面人物确有令人怀疑的政治来往。那么，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分歧就不仅是军事观点的不同了，麦克阿瑟在朝鲜战争中所犯的错误也不仅仅是战场上的失败，更严重的是这个老家伙也许正与自己的政敌拉帮结伙。

杜鲁门不是总能在面子上维护他的远东司令官的。在平壤被中国军队夺回的第二天，杜鲁门对所有的政府官员下达了一道命令，命令的内容让人一看就知道是针对麦克阿瑟的：未经国务院批准，任何人不得发表任何有关外交政策的讲话、新闻发布或者企图言论，以确保公开发布的消息能够“准确无误地与美国政府的政策保持一致”。

虽然严重警告了别人言论谨慎，杜鲁门自己却在三十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突然说出了一个令全世界目瞪口呆的话：美国有可能使用原子弹！

记者：总统先生，进攻满洲是否有赖于在联合国的行动?

总统：是的，完全是这样。

记者：换句话说，如果联合国授权麦克阿瑟将军向比现在更远的地方推进，他会这样做吗?

总统：我们将采取任何必要的步骤以满足军事形势的需要，正如我们经常做的那样。

记者：这是否包括使用原子弹?

总统：包括我们拥有的任何武器。

记者：您说的“我们拥有的任何武器”，是否意味着正在积极地考虑使用原子弹?

总统：一直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我不希望看到使用它。这是一种可怕的武器，不应用之于与这场军事入侵毫无关系的男人、妇女和儿童——而如果使用原子弹，就会发生那样的事。

尽管几个小时后白宫新闻办公室就发布了一份“澄清声明”，解释杜鲁门“并不是说已经决定要使用原子弹”。但是，美国记者已经把杜鲁门的这番话飞快地传遍了全世界，并且已经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大哗——人们普遍认为，杜鲁门的话意味着，性格本来就难以把握的麦克阿瑟已经领受了总统的授权，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原子弹了。

全世界都注视着两个国家的反应，一是中国，一是英国。

其实，在朝鲜战争一开始的时候，美国五角大楼就一直秘密地研究着使用原子弹的问题。当时，原子弹作为一种大规模的杀伤武器，是美国人手中一张可以解决一切难题的王牌。但是，使用这种武器的所有研究资料都处在极端的保密之中。

在中国，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时笑了。他对金日成就原子弹问题说过这样的话：“这是一种恫吓，一种赤裸裸的核讹诈。不要说苏联已经掌握了核武器，就是像对日本一样，也在朝鲜投原子弹，那杜鲁门也没有义务事先通知对方，让对方先做做准备呀。说来说去，这种做法的实质就是威胁和恐吓。”

作为具有独特性格的政治家，毛泽东始终相信一个哲学观点，他用这个观点解释一切事物，那就是：人的因素是第一的。他从来不相信某种由人发明的物质力量能够战胜人本身。具体到决定战争胜负的诸因素，他始终不认为武器的优劣是第一位的。杜鲁门关于使用原子弹的威胁对于毛泽东来讲，不过是一种言论罢了，毛泽东的笑声是真实的。

真正感到惊慌的是欧洲。杜鲁门的讲话刚一结束，许多欧洲驻联合国的大使便把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奥斯汀围住。荷兰大使“含着眼泪”问奥斯汀是否有机会避免战争的扩大。从朝鲜战争一爆发，欧洲的态度就一直处在十分的暧昧之中，很多国家甚至站在反对战争的立场

上。反对的原因并不是对共产党中国的偏袒，而是欧洲始终认为，东西方存在的巨大的意识形态分歧所带来的军事威胁的重点在苏联大量集结兵力的欧洲方向——“共产主义的威胁的火药桶”是在与苏联接壤的欧洲边境。而现在，美国人正在“一个不可思议的时间和可能出现最困难的战略条件下，把他们拖入亚洲战争的深潭”。这个观点英国政府表现得最为激烈。杜鲁门关于使用原子弹的言论，立即在英国议会引起轩然大波，大约一百多名工党议员在一封交给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的信上签名，坚决反对“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原子弹”。反对者中，包括在刚刚结束不久的二战中曾与美国人生死与共的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丘吉尔认为，战争如果在亚洲扩大，无疑会严重地削弱欧洲的防御力量，从而严重地威胁英国的安全。艾德礼首相感到了空前的压力，因为有议员要求就英国在朝鲜战争中的立场对首相本人进行信任表决，并且预言说，只要表决艾德礼肯定就要倒台。当艾德礼宣布他要亲自到美国当面与杜鲁门总统交换意见时，辩论中的议员们向首相发出欢呼之声。

英美首脑的会见是当时极为引人注目的一件大事。

为期三天的英美首脑会谈没能解决两个盟友之间关于朝鲜问题的分歧。美国人从根本上不喜欢艾德礼这个人，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引用他的老朋友丘吉尔的话对记者说，艾德礼是一条“披着羊皮的狼”。两个大国首脑关于一个问题的观点如此的针锋相对，这在英美关系史上还是极为少见的。

艾德礼认为，联合国军除了通过谈判撤出朝鲜外，没有其他出路。他甚至认为，可以把联合国中中国的席位给予北京，因为“我们不能被对方弄得难以自拔，而使西方陷入容易遭到进攻的境地”。

而杜鲁门认为，停火是可以的，但是这不意味着放弃南朝鲜和台湾，或者是让北京取得联合国的席位。如果中国不接受停火，美国人

就准备打下去，“进行各种军事、政治和经济的骚扰，包括在中国境内煽动游击战”。

总之，对于新中国，英国人认为要采取“阴柔政策”，而美国人的态度是“除了教训一下中国外什么都不欠他”。

但至少艾德礼得到了杜鲁门“不使用原子弹”的承诺。

嘴上说“教训一下中国”的杜鲁门却不时地收到从朝鲜战场传来的美军又被“教训”了一下的沮丧消息。麦克阿瑟天天有变的报告，弄得杜鲁门对他的远东司令官产生了一种极端抵触的情绪。麦克阿瑟一会儿惊呼他的部队“面临灭顶之灾”，要求给他“更多的部队和扩大轰炸的权限”；一会儿又对报界说，华盛顿的官僚们惊慌失措是没有道理的，他的部队不是失败，而是正在进行一次“巧妙的撤退”。美国报纸每天都在刊登“形势图”，表明中国军队是如何包围了美第十军和第八集团军的。好战的记者们给杜鲁门出主意，让他把战争打下去，说不然就会“打击了亚洲国家所有的反共的承诺”；绝望的记者们则在“形势图”边添油加醋：“这也许会成为美国在军事上最惨重的失败”，“除非在外交上出现奇迹，否则朝鲜战场上的美军将不得不进行一场新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以免遭受一场新的巴丹式的覆灭”。而美国人民对这场战争表现出的冷淡也令杜鲁门感到失落，无论国家的政治首脑是多么的焦虑不安，美国老百姓却有点“事不关己”的潇洒，人们照样把周末大学生橄榄球比赛的赛场挤得水泄不通。圣诞节就快到了，百货商店里采购的人流彻夜不息。有记者在街上问过路的行人关于朝鲜战争的问题，令杜鲁门吃惊的是美国人是这样回答的：“不开收音机。”

然后，最令人震惊的消息传到了华盛顿：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将军阵亡。

沃克成为朝鲜战争仅仅进行了两个月时美军阵亡的军衔最高的军官。

沃克的吉普车混杂在向南撤退的美军队伍中，而这位将军“乘车时总是急不可待地命令赶路，如果什么东西降低了他的吉普车的速度，他往往厉声命令道：‘绕过它前进。’”可是，这一天，一长串的南朝鲜军车堵塞了道路，沃克的司机本打算“绕过它前进”，但一辆南朝鲜军车突然“开出了车队，向沃克的吉普车迎面驶来”，吉普车来不及刹车被撞入沟中。沃克将军的头部“伤势严重”，送抵战地医院时“已经死亡”。美军战史记载，沃克当时正在前往美第二十师的路上，他准备去嘉奖这支部队，并把一枚银星勋章授予第二十师的一位上尉连长。上尉连长名叫萨姆·沃克，是沃克将军的儿子。

中国战史记载：沃克死于车祸。

北朝鲜战史记载：美沃克将军“被我勇敢的游击队员击毙”。

如果沃克不死，几天以后他将被授予四星上将军衔。

此时，在中国北京，毛泽东和北朝鲜领袖金日成会面了。

至少在当时，这是一次绝对机密的会面。

战争的进程无疑令两位领袖十分满意。战争前期的那种危机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他们有充分理由分享联合国军一路南逃所带来的愉快。

毛泽东对金日成说，原先我一直担心两个问题，一是志愿军过江后能不能在朝鲜站住脚，经过第一次战役，这个问题解决了；二是靠现有装备，能不能和装备现代化的美军交战，交战后能不能取得胜

利，现在这个问题也解决了。事实证明，我们不仅可以与美军交战，而且能战而胜之，看来原来的担心不必要了。

两位领袖讨论了战争如何往下发展的问题。这是一个关系到世界局势、亚洲局势的大问题，同时也是关系到成千上万在朝鲜战场上的中国士兵的生命的问题。

中国军队占领平壤之后，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全线压向三八线，并且与联合国军队形成短暂的对峙。

从战后很久才公开的资料分析，当时，杜鲁门和艾奇逊都在力求寻找一种既能保存美国人的面子，又能体面地停止战争的停火办法。有一个现实的理由是，联合国军即使撤退，也不过是撤退到战争前的三八线，而中国军队无非是把战线恢复到战争爆发前南北朝鲜分割的状态。停火对双方来讲都是可以接受的现实，虽然这个现实对于美国方面来讲是被迫的，但至少在当时，这样的现实美国不会强烈地反对。在随后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美国要员们讨论了许久，最后的结论是：除非联合国军在朝鲜由于军事原因被驱逐，否则决不自动撤军。会议同时认为，对于西方世界来讲，最大的危险在欧洲，美国最好不要卷入亚洲的一场持久战争。因此原则应该是：一、把战争限制在朝鲜；二、保持对空海力量的限制；三、不向朝鲜增派军队，保持三八线战线的稳定，达成停火协定，恢复三八线战前的状态。

可以说，如果当时中国方面同意停火，朝鲜战争也许就结束了。

但是，至今令许多西方战史专家迷惑不解的是：中国方面根本没打算在这个时候停火。

原因不仅仅是由周恩来提出的三个条件没有得到满足。

毛泽东吸着香烟对金日成说，既然美国人敢于诉诸武力，那么中国志愿军就要奉陪到底。打第一次战役，第二次战役，胜利了，但还不够，还要接着打。你敢越过三八线北进，那我为什么不能越过三八线?

金日成的回答是:“对，要乘胜前进！”

应该说，影响毛泽东对朝鲜战争进程思考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亚非一些国家的“突然的横插一棒”。

这些亚非国家大多数是毛泽东认为“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国际政治立场上以中立派居多。杜鲁门扬言要在朝鲜战场上使用原子弹后，这些亚非国家有了基于自身安全的忧虑。于是，在联合国大会上产生了一个“十三国提案”，其中心内容是“提倡和平”。这些亚非国家既希望战争结束，又不想得罪美国，于是提案特别提到“先停火再谈判”，并且对此有一个说明——就是这个说明明显地刺痛了毛泽东——“如果中国宣布不越过三八线的话，则将得到这些国家的欢迎和道义上的支持”。

无论“十三国提案”的动机多么善良，但客观上是在给美国一个得以喘息的机会，它正是美国人此刻急需的东西。提案的要害是“先停火再谈判”，它令毛泽东不由得想到当年美国人马歇尔在中国的“调停”，也是先宣布“停战”，然后背地里帮助蒋介石运送兵力，补充武器，这个亏共产党人是吃过的。

周恩来召见印度大使，提出了四个尖锐的问题:

为什么十三国不反对美国对朝鲜、对中国的侵略?

为什么十三国不宣布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

为什么十三国中还有一个菲律宾（菲律宾是在朝鲜参战的联合国军中的一员）?

为什么美军打过三八线的时候，十三国不讲话?

换句话说，当联合国军不顾一切地越过三八线，并向北朝鲜重兵大举推进的时候，十三国怎么一句话都没有说过；而当中国军队具有越过三八线的可能时，他们却提出一个“停火”的提案?

中国方面的回答是:

一、只要一切外国军队从朝鲜撤退的原则被接受并付诸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将负责劝说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回到本国。

二、停止朝鲜战争与和平调解朝鲜问题可分为两个步骤进行:

第一步，在七国会议中商定有限期的停火并付诸实施，以便继续进行谈判;

第二步，联系政治问题谈论停火全部条件，商定：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的步骤和办法；向朝鲜人民建议如何实施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的步骤和办法；美国武装力量自台湾及台湾海峡撤退以及远东有关诸问题。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必须得到保证。

这些条件显然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

于是，在一九五〇年的十二月里，朝鲜战争的前景呈现出扑朔迷离的局面。

而作为置身朝鲜前线的中国军队的总指挥，彭德怀对整个战局充满忧虑。

圣诞节前夕，北朝鲜东部的兴南港处在空前的混乱之中。从深山野岭中撤退出来的美军官兵大部分已经登舰撤退，但尾追而来的中国军队仍顽强地向这个港口发起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美军在兴南港外围的防御圈逐渐地缩小，激烈的战斗几乎遍布了港口外的每一条街巷。港口内，美军一方面全力组织登舰撤退，一方面销毁着一切带不走的物资。美军后勤指挥官知道，任何把“装满食品、肥皂、猪油、咖啡和果汁的仓库搬运一空”的企图都是“徒劳无益的”，最好的办法是敞开仓库所有的大门任所有的人“随意取食”。美国《时代》周刊记者马宁记述道：“美国士兵和南朝鲜码头工人整天都吃个不停。他们为了做一块三明治，可以漫不经心地打开一听六磅重的猪肉午餐肉罐头；为了喝一口果汁，可以打开一加仑重的罐装果汁。”与此同时，美军所有能够支援的飞机全部集中到了小小的兴南港上空，进行着比仁川登陆时规模更大的轰炸，“近三万四千发炮弹和一万二千八百枚火箭弹铺天盖地”，“四百吨的凝固甘油炸药和五百枚一千磅的炸弹”在最后的时刻被瞬间引爆，整个兴南港犹如一座喷发的火山，烈火昼夜燃烧，浓烟遮天蔽日。

十二月二十四日，圣诞节前夜，是美军撤退行动的最后的一天。航空母舰“普林斯顿”号上的飞行员麦克上尉负责执行最后一次飞行任务。他的飞机飞入了兴南港的上空，他说：“我看见了从未经历过的忧郁和悲伤的情景。在下面，最后一批士兵和物资正往坦克登陆舰上登载，其他舰艇正驶离码头。大地成为一片火海，到处都在燃烧。十二艘驱逐舰驶来，用舰炮摧毁所有的建筑物，为的是不让敌军使用。海面上的舰队像杂技团的大象，后面的咬住前面的尾巴前进。”

美军从兴南港共运走士兵十万五千余人，汽车一万七千五百余辆，物资三十五万吨。

麦克的飞机在兴南港上空盘旋了最后一圈，当他准备在航空母舰上降落的时候，突然想起了麦克阿瑟说过的那句“圣诞节前让孩子们回家”的话，于是，麦克上尉特地在无线电中向“普林斯顿”号航空母舰上的全体美军官兵喊了一句：“圣诞快乐！”

# 第五章 李奇微：向中国军队总司令官致意

## 炒面煮肉会议

彭德怀的意见是：第二次战役后，中国军队需要休整三个月以上。

彭德怀的意见是根据朝鲜战场上的中国军队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提出的。

中国军队最重要的现实问题是后勤补给。

第二次战役后期，由于联合国军队的大规模撤退和中国军队的急速追击，使得中国军队本已薄弱的后勤补给线越来越长。缺乏现代战争经验的中国军队在朝鲜战争初期，后勤补给的布局十分分散，后勤兵力的投入严重不足。在美军的后勤补给已经达到十三个后勤人员供应一个美军士兵的水平时，中国军队的后勤补给却是一个后勤人员至少要供应几百名中国士兵的作战需要。中国军队还没有系统的后勤供应机构，甚至还没有专门的后勤部，各部队的后勤科都设在司令部里。而负责整个志愿军后勤补给的是远在国内的东北军区后勤部，这个后勤部派往战区前方指挥所的不过就是十几个人，他们仓促成立的几个后勤分部，既没有健全的组织也没有充实的力量，在美军轰炸机不分昼夜的封锁下几乎没有办法有效地开展工作。在朝鲜，沿用国内解放战争时“就地筹粮”、“部队各自解决吃饭问题”的老办法根本行不通。向三八线追击的中国军队常常行进在上百里的“无人区”内，即使有异国的百姓，负责筹粮的干部们跑断腿也无法满足大兵团的作战需要。

只要打起仗来，在饥饿中冲锋的现象在志愿军各部队中极为普遍。冬天来了，官兵们很多人还没有御寒的棉衣。第四十二军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在零下二十摄氏度的气温中，士兵们还穿着草鞋。上级给一个班的士兵发下一双棉鞋，全班的人都舍不得穿，于是规定谁站岗谁就来享受这份奢侈。结果，整整一个冬天，经过无数次在严寒中的残酷战斗，这双棉鞋居然没有丢失，也没有损坏。当这个班从前线撤下休整的时候，棉鞋被完整地移交给了接防的兄弟部队。弹药和武器装备的补充不足，更是一直令彭德怀头疼的事。中国士兵手中的武器大部分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缴获来的，枪支口径不一给弹药的供应带来极大的困难。由于没有现代化的运输工具，前线士兵缺乏弹药的现象普遍存在，为此基层部队指挥员焦灼万分。最后，中国军队的官兵们已是极度疲惫。中国军队几乎全部的作战行动都是靠步行，残酷的战斗之后往往就是长途的奔袭。可是，很少有部队能够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而沿着平坦的公路前进。前进的路上山峦越险峻，中国士兵就越感到安全，于是中国士兵付出的是极限状态的体力。

第二次战役后，在彭德怀固执的坚持下，志愿军指挥部移动到了距离前线很近的君子里。

在君子里，彭德怀打电报给毛泽东，提出了部队休整的意见，并且明确提出了志愿军“不越过三八线”的考虑。

十二月十三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回电中通报了有关朝鲜战争的国际形势，并明确指出志愿军“要越过三八线”。

毛泽东的电文大意如下：

（一）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带来很大的不利。

（二）此次南进，希望在开城南北地区，即离汉城不远的一带地区，寻歼几部分敌人。然后看情形，如果敌人以很大力量固守汉城，则我军主力可退至开城一线及其以北地区休

整，准备攻击汉城的条件，而以几个师迫近汉江中流北岸活动，支援人民军越过汉江歼灭伪军。如果敌人放弃汉城，则我西线六个军在平壤、汉城间休整一时期。

这就意味着，在很短的时间内，志愿军将要投入新的战役了。

面对毛泽东的电报，彭德怀陷入极大的矛盾之中。

彭德怀认为，从军事上讲，是不应该再立即进行战斗的。志愿军入朝才一个多月，已经连续打了两次大战役，把战线推进到了三八线附近，而战争的发展之快出乎任何人的预料。西线的六个军已经非常疲劳，东线的第九兵团面临的困难更大。要求补充有作战经验的老兵还没有消息，粮食和弹药又得不到及时的补充，在这种情况下仗是很难打的。况且，第二次战役后期，敌人虽然撤得很快，但实际上有生力量的损失并不大，其主力大都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敌人大踏步的撤退，并不完全意味着最后的失败。从战争常识上看，美军的撤退是有其道理的：一是他们在三八线以北的平原无险可守；二是需要迅速脱离接触，需要重新补充，依托三八线以南的阵地进行整顿。所以，敌人之所以撤退得很快，其中有抢占既设阵地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志愿军去进攻，绝对有诸多的不利。

彭德怀想到了周恩来针对“十三国提案”所说的话：“美军既已过了三八线，因此三八线已被麦克阿瑟破坏而不复存在。”周恩来的意思也很明确，即中国军队绝不会宣布不越过三八线。

从国际政治斗争的角度看，当时，中国军队必须越过三八线，哪怕是越过一步。

军事上不允许打，政治上必须要打。

军事必须服从政治的需要。

彭德怀准备把一切军事上的困难抛在脑后。

但是，他在给毛泽东发去电报汇报越线进攻准备在即时，还是再次说明了自己的观点：

据我看，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正面狭小，自然加强了纵深，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美、伪军士气较前低落，现还有二十六万左右兵力。政治上，敌人马上放弃朝鲜，对于帝国主义阵营来讲是很不利的，英、法也不要求美国这样做。如再吃一两个败仗，再被消灭两三个师，可能退守几个桥头阵地（釜山、仁川、群山），也不会马上全部撤出朝鲜。我军目前仍应采取稳进，对现在十三兵团使用上，不要太伤元气，目前虽未到顶点，但从疲劳上（两个月不能安全休息），物资不能及时补给，气候寒冷，是值得严重注意的。现已开始战役接敌运动。此役，除运输困难、气候寒冷、相当疲劳外，特别是由山地运动战转为对阵地攻坚战（三八线原有相当永久工事），没有进行很好的普遍的教育。因为上述种种原因，我八日给你的报告中，提出暂不越三八线作战，充分准备，来年开春再战。得你十三日复电后，现已遵示越三八线作战，如无意外变故，打败仗是不会有的，攻击受阻或胜利不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为避免意外过失，拟集中四个军（五十军、六十六军在两翼牵制敌人），首先歼灭伪第一师后，相机打伪六师。如果战役发展顺利时，再打春川之伪三军团；如不顺畅即适时收兵。能否控制三八线，亦须看当时具体情况再行决定。上述各项妥否盼示。

毛泽东的回电口气平缓，但越线作战的决心依旧坚定：

九兵团即在咸兴地区休整，只将重伤病员运回东北……你对敌情的估计是正确的。必须作长期打算……美、英正在利用三八线在人们中存在的旧印象，进行其政治宣传，并企图诱我停战，故我军此时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然后进行休整是必要的……打法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即目前美、英集中于汉城地区，不利攻击，我应专找伪军打。就总的方面说，只要能歼灭伪军大部或全部，美军即陷于孤立，不可能长期留在朝鲜。如能再歼灭几个美军师，朝鲜问题更好解决……在战役发起前，只要有可能，即应休息几天，恢复疲劳，然后投入战斗……总之，主动权在我手里，可以从容不迫地作战，不使部队过于疲劳……如不顺利则适时收兵，到适当地点休整再战，这个意见也是对的……

毛泽东虽说“在战役发起前，只要有可能，即应休息几天”。但是，在朝鲜前线，这已是不可能的事了。就在彭德怀致电毛泽东的同时，中国军队的六个军正冒着漫天大雪向三八线急促行进。在没有机械化运输的情况下，中国士兵只有靠两条腿赶在战役发起的指定时间前到达战场。

第三次战役就要打响了。

彭德怀仍想着志愿军官兵们的肚子问题。

在朝鲜战场上，中国士兵中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毛泽东知道在朝鲜打仗的士兵们生活很苦，就给负责前线供应的高岗下了“让志愿军吃好面”的命令。结果，高岗把毛泽东用湖南话下达的命令听成了“让志愿军吃炒面”，于是，志愿军就整天吃炒面了。炒面维系着中国士兵生命的最低需求；但同时，因为它缺乏人体必需的多种维生素而导致士兵们患上了维生素缺乏症，最普遍的症状是嘴角溃烂。所以官兵们又说，把这东西挂在树上，“美国的飞机都不炸”。

由于中国军队后勤装备的限制，由于美军飞机的不间断轰炸，中国军队白天不敢生火做饭，而炒熟的面经过长时间运输却不会变质，士兵携带方面，食用简单，同时又能够大批量供应，因此，炒面无意中成为中国军队在规模巨大的战争中所发明的一种野战口粮。

炒面的成分百分之七十是小麦粉，混合百分之三十的玉米粉或大豆粉、高粱粉，炒熟后加入百分之零点五的食盐。

在第一次战役刚结束的时候，东北军区后勤部根据前线的要求，提出了“以炒面为主，制备熟食，酌量提高供给标准”的建议，并且将炒面的样品送到了志愿军前线指挥部。彭德怀尝了炒面的样品之后说：“送来的干粮样子，磨成面放盐好。炒时要先洗一下，要大量前送。”

如果让前线的每一个志愿军都吃上炒面，所需要的炒面量是惊人的。即使按照每人每月规定数量的三分之一供应，其数字也已经达到一千四百八十二万斤！而中国整个东北地区尽最大的努力也只能供应出一千万斤。东北人民政府为此专门下发了《关于执行炒面任务的几项规定》，把制作炒面的任务向党、政、军、民各阶层层层分配，规定各单位每天制作炒面不得低于十三万八千斤。

时值第二次战役即将开始，十一月十八日，中共东北局又召开了一个专门的会议，与会人员包括东北地区的党、政、军各方面负责人。中国总理周恩来特地从北京赶来，会议的名称定为：炒面煮肉会议。

“炒面煮肉会议”部署了在一个月之内制作六百五十万斤炒面和五十二万斤熟肉的任务。

在一九五〇年初冬的瑞雪中，中国出现了一个奇特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男女老少齐动手，家家户户做炒面，从白天到夜晚，炒面特有的香味飘散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新闻媒体特别喜欢这种热闹，特地刊出了中国总理等中央领导人和北京市的机关干部、人民群众一起炒面的消息。这个消息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为在朝鲜作战的志愿军官兵解决后勤供应的范畴。相信地球另一端的美国人看到这个消息后，应该知道这件事中没有任何幽默的成分。新中国无论如何是一个崭新的国家，新中国的领导人只要愿意，可以让任何一件事成为惊天动地的群众运动，并且在这个运动中体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的宣传色彩。

于是，在向三八线进军的路途上，中国士兵的衣服虽然单薄，肚子里也不是那么踏实，但中国官兵知道，在他们的背后有全中国的人民，因此在最朴实的政治认识中他们昂扬而乐观。

在朝鲜半岛自北向南的路上，中国军队的六个军和北朝鲜的三个军团组成了浩浩荡荡的大军，步兵、炮兵、运输队和担架队挤满了大路和小路，挤满了一个又一个的江河渡口。

夜晚，大地在月光下一片银白，中国士兵缴获的一种他们从没见过的黑糊糊的东西成了累赘。有人说这是美国兵的宝贝，没有这东西美国兵什么也吃不下去。中国士兵已经尝过了，觉得这东西恐怕是世

界上能吃的东西中最奇怪的了，味道苦得像中药不说，重要的是它根本不解决肚子里的问题。于是，第三十八军的先头部队把缴获来的美国咖啡统统撒在了雪地上作为前进的路标。中国士兵就是沿着这样一条飘着咖啡香气的道路奔向三八线的。

各军的文工团员们现在是最忙的。在中国军队这个特有的兵种中有不少正值青春年华的女孩子。她们有见到什么就歌唱什么的本领，乐器除了中国的锣和鼓外，居然还有西洋的长号和黑管。当美军飞机在夜空中几乎擦着中国军队的头顶飞过的时候，她们却站在路边的山冈上毫无惧色。“抓住敌人！不让他们跑掉呀！”她们的声音在满脸雪花的官兵听来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

你在天上团团转

我在地上一样干

你扰乱得越厉害

咱们走得越喜欢

路面上的积雪经过人流的践踏，玻璃一样地滑。拉炮车的骡马不断地滑倒，炮车翻在路边的沟里。驭手们不断地请求路过的步兵帮忙。步兵中也不断地有人掉在沟里，因为他们实在是太困了。队伍后面有汽车赶上来，士兵们惊奇地问：“这是咱们的汽车吗？”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士兵们觉得他们一下子不困了。

中国军队向三八线急速赶去的时候，正是一九五一年的新年即将到来的时候。彭德怀向北京发去这样一封电报：

毛主席、朱总司令：

在您英明领导之下，取得了两次战役的伟大胜利，现正继续努力，争取再打一个胜仗，作为新年献礼。谨祝健康！

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指战员

汪洋师长是中国第三十九军的所有师长中唯一一位在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他因为年轻英俊而又文武双全所以特别引人注目。此刻，他的一一六师是第三十九军突破临津江的先头部队。

临津江，发源于太白山脉，是汉江的主要支流，全长二百五十四公里，江面宽达百余米，两岸是起伏的高山。临津江的中游一段正好位于三八线上，因此这段江面成了第三十九军要突破的地段。

汪洋师长在临津江边的炮队镜里久久地向江对岸看去。这里距离南朝鲜首都汉城仅仅七十五公里。

一切在炮队镜里清清楚楚。对岸的敌人为了防止中国军队过江，阵地前沿架设了多道铁丝网，埋设了大量的地雷。岸边的悬崖上修筑着密密麻麻的大小碉堡。就在汪洋师长观察的时候，江面上空飞着敌人的飞机，照明弹此起彼落。

侦察参谋报告："三四七团的侦察员昨晚渡江侦察，被敌人发现，被火力压制在江水中，严重冻伤，牺牲了四个人，但是侦察结果回来了。"

"江面上什么情况？"

"新堡渡江点左面两百米的江面已经封冻，但是正面水流湍急，没有封冻，水深一点二米。"

"土井呢？"

“土井渡江点已经封冻，但是冰层很薄，恐怕炮兵不能通过。”

汪洋的心情格外沉重。

这几天，汪洋一直带着担任尖刀的三四七团团长李刚和三四六团团长吴宝光在前沿察看地形。他要亲自为这两个团选择最佳的突破口。有一天在察看地形时，十几个朝鲜老百姓模样的人向他们走来，这是对岸南朝鲜军派出的化装侦察员。中国方面的警戒分队立即与他们交上了火，这些南朝鲜侦察员掉头就往江对岸跑，但是对岸的南朝鲜士兵以为他们是中国军队的侦察人员，立即向他们开枪射击，结果这些南朝鲜军的侦察员一个也没能活下来。就是在他们的身上，汪洋发现了一份侦察计划图，这份侦察图表明了江面冰层冻结的情况。

汪洋来到三四六团。

一一六师的张峰副师长已经下到这个团，正在参加团党委会，会议讨论的是如何顺利拿下江对岸的一九二高地。

张峰说：“我们在朝鲜战场上每前进一步，距离世界和平就近了一步。无论多么艰难困苦，我都要把部队带过临津江！”

在第一次战役中大闹云山城的那个四连，有个叫张财书的扫雷组长，他在决心书中这样写道：“为突破临津江，我保证完成党交给我们的排雷任务。钩子断了用手拉，手断了用脚踩，脚断了用身子滚，一定要为突击部队开辟一条前进的道路，让他们冲上一九二高地！”四连连长朱子玉表示：“如果我没过临津江就牺牲了，把我埋在江南岸的阵地上！”

在三四七团，汪洋找到了团长李刚。李刚因发表过小说而闻名，人称“小说团长”。李刚精干而勇敢，他向汪洋汇报了这些天他奔走在前沿所掌握的情况。在三四七团的正面，李刚用铅笔在地图上画出了

许多密密麻麻的记号，这些记号代表着敌人的铁丝网、地雷区、火力点、纵深防线以及很多存在疑点的地方。接着，汪洋看到了一份六连写给担任尖刀任务的钢铁连的挑战信：

亲爱的钢铁连全体同志们！

突破临津江的任务到来了！我们万分高兴！

你们对祖国和人民已经有了很大的贡献，我们非常钦佩你们并随时在向你们学习！为了共同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特向你们来一个革命友谊竞赛，提出以下几个条件：

一、打开突破口，看谁先占领。

二、看谁先占领敌人的主阵地。

三、看谁抓的俘虏多。

致敬

六连全体同志敬上

汪洋师长的眼睛离开挑战书，向江对岸看了一眼，然后他说：“战前侦察工作要细致再细致，最大限度地减少战士的伤亡！”

士兵张国汉奉命前去探冰。他身上插着短枪，无声息地在冰面上爬，寒冷的风从冰面上卷起雪粉灌进领口，他觉得浑身都冻透了。但他很高兴，因为天越冷，冰就冻得越结实，这样部队才好突破呢。爬到江心位置的时候，他突然觉得冰面动了起来，并且还有冰面开裂的声音，这下他有点儿紧张了。他一动不动好一会儿，才明白这是冰面自然的开裂。对，家乡的那条河不是在隆冬里也吱嘎作响么？在江心，他站起来，松鼠般地乱跳，冰冻得真结实！首长不定多高兴呢！张国汉还不放心，向江心左右各三十米又爬了个来回。在要往回爬的时候，他向江对岸看了看，黑漆漆的江南岸闪着断断续续的灯光，敌人夜晚值班的机枪打出的曳光弹一串串地飞到江中。张国汉突然产生了一个怪念头：这么多天大伙一直嘀咕的那个叫三八线的东西到底是

什么样？能不能看看，甚至用手摸摸？张国汉真的爬上了南岸。他爬过江岸边的雷区，一直爬到一座山崖下。头顶上不断有敌人在打枪，他还听到了敌人使用对讲机联络的声音。他一动不动地想象着三八线的模样，最终实在想象不出名堂来，但他还是很自豪：不管怎么说，第一个突破临津江的是张国汉！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三十日，第三十九军一一六师做好了进击临津江的一切准备。

在宽两公里、纵深二点五公里的正面，在距敌一百五十至两千五百米的攻击出发阵地上，利用丘陵山包、灌木丛、小河沟渠和自然雨裂，一一六师构筑了可容纳七个步兵营的三百一十六个简易隐蔽部，以及可容纳十八个团、营指挥所三百多名指挥人员的上千米的堑壕和交通沟（壕的侧壁每一米挖一个防炮洞），还有五十多个弹药器材储备室，三十多个掘开式炮兵发射阵地，五十多个带有掩盖的炮兵发射阵地，其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容纳五百名伤员的隐蔽部。

一一六师准备了大量的渡江器材。第一梯队的士兵们准备了攀登陡壁用的梯子二十四个。徒涉部队每人用雨布缝制了防水袜子一双，打制了草鞋两双（防止在冰上打滑），还准备了大批门板和稻糠，用以填补敌人炮火破坏冰面和防滑。

一一六师的渡江准备比别的部队多了一个高招：谁也不知道他们用什么途径从国内运来了一批猪油。这些猪油被分发给士兵，让士兵们抹在腿和脚上，说这样可以防止冻伤。士兵们闻着猪油的味道很是嘴馋，自从出国作战以来几乎都不知道豆油和猪油的味道了，士兵们说：“要能吃上一顿猪油炒白菜该多美！”

师后勤部门筹集了二十万斤粮食，保证每个战士带三天的干粮和一天的粮食。同时，还为炮兵准备了一个半基数的炮弹，其中步兵炮

和迫击炮为两个基数。机枪和冲锋枪子弹均准备了两个基数以上，手榴弹每人五枚。

野战医院补充了大批急救药品。担架队准备了大量的担架。

支援三四七团的火炮由野战炮、山地炮、步兵炮和化学迫击炮组成，共二十七门。支援三四六团的火炮组成相同，共二十三门。同时，师的二线炮兵将全力支援正面攻击部队。

汪洋师长下达的命令包括这样的内容：“进入攻击阵地后，任何暴露目标的人员都将受到战场纪律的制裁！”

第三十八军突破的正面是敌人坚固防御的地区，需要强攻。将从永平首先突破的部队是一一四师。一一四师把先遣团的任务交给了三四二团。三四二团把首先突破的任务交给了一营。

选择突破地点的时候，二营营长姚玉荣腿上中了一弹被抬下去了，他对他的好朋友曹玉海说：“伙计，又轮到你打头阵啦。”

一营营长是曹玉海。

在上百万参加了朝鲜战争的中国士兵的姓名中，“曹玉海”这三个字总是能在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出现。

曹玉海说：“我倒要看看敌人的这个防线是钢铁的还是豆腐的。”

曹玉海是个极其细心的人。为了选择更好的突破点，他数次爬到江面上亲自侦察。他爬上的那条江叫汉滩川，是礼成江的一条支流，蜿蜒在三八线北面。最后，曹玉海把一座陡峭的山崖选做了突破目标，他的理论是，越是敌人想不到的地方，越是薄弱的地方，对我们来讲就越是安全。

第四十军一一九师三五五团团长李冠智是个严肃的人，他从不允许他的部下嘴里出现“大概”、“也许”这类的字眼儿。在他的要求下，一个叫石绍清的士兵前去探冰。石绍清天黑出发，不到二十点就回来了，报告说江心有大约五米的江面没有封冻。他声明自己是下了水的：“脚一沾上水，我的天！凉得我倒吸了好几口气！坐在冰上往水里一出溜，水一下子就没到了肚脐眼儿。那个冷！激得我简直喘不过气来！江底的石头很滑，水流很急，我差点没栽到水里。冰块像刀子一样割大腿，一会儿就不知道疼了！”石绍清说着挽起棉裤，他的腿已经发青，被冰块割出的口子流着血。听他诉说的士兵们全都瞪大了眼睛，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有的说必须用雨衣改制成水裤才行，有的说干脆架浮桥吧。

第二天，李冠智发现江心原来发黑的一条线没有了。也许是冻上了？

他命令再派人去侦察。

派的又是那个把士兵们吓得瞪大了眼睛的石绍清。

出发前，石绍清找来一根很结实的木棍，在木棍的一头绑上了棉花。天一黑，他披着一条看上去如一片雪似的白布出发了。接近江边的时候，石绍清匍匐着往前爬，一直爬到江心。果然是冻上了！他用裹了棉花的木棍敲击冰面，仔细听着有没有裂缝的声音，企图判断出冰层有多厚。但是，木棍敲击发出的声音总是不能令他放心，他知道如果他这次再探得不准，就会关系到很多战友的生命，关系到三五五团是否能够打胜仗。想到这儿，石绍清索性站起来，使劲儿用脚踩冰面，这样反复地踩，结果把对岸的炮火引来了。一颗炮弹在距离他十米的冰面上爆炸，激起的冰块飞起来，砸在他的身上，他疼痛得几乎叫了起来。他没有往回跑，却向被炮弹炸出的那个大窟窿爬过去。在那个大窟窿边沿，他把手伸进冰冷的江水中，真实地测得了冰面的厚

度。他很高兴，因为根据冰面的厚度，别说是步兵，就是大炮也能过去。他带着胜利的喜悦往回爬，爬着爬着，突然想到一个严肃的问题：这回用什么证明自己不是瞎白话，是进行了真实的侦察了呢？他在黑暗中想了一会儿，掉头又往江对岸爬，一直爬到敌人戒备森严的江南岸。他知道岸边首先是一片地雷区，在地雷区的那一头，他看见了敌人哨兵游动的影子。他在黑暗中摸索着花费了不少的时间，然后才又爬了回来。在向连长汇报侦察结果的时候，石绍清从怀里掏出三颗美式地雷，他说："我侦察的情况是真实的，有鬼子的地雷为证！"

第三次战役的作战计划经过了反复斟酌，彭德怀最后的决心是：集中志愿军的六个军，在北朝鲜人民军三个军团的配合下实施进攻，粉碎敌人在三八线上的防御阵地，歼灭在临津江及其北汉江地区第一线布防的南朝鲜第一、第二、第五、第六师，如果发展顺利，相机占领汉城。

第三次战役作战计划的具体部署为：

由志愿军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第五十军并加强六个炮兵团组成右翼纵队，由韩先楚副司令员指挥，于高浪浦里至永平地段突破，首先集中力量歼灭南朝鲜第六师，再歼灭南朝鲜第一师，得手后向议政府方向发展。各军的任务是：第三十九军由新堡、土井地段突破临津江，其主力向上声洞、梧岘里、法院里方向突击，准备打援与抓住汶山地区的南朝鲜第一师；另以一个师向湘水里、仙岩里实施迂回，并占领该阵地，阻击北援和南逃之敌。第四十军由峨嵋里至高滩地段突破临津江、汉滩川，而后向东豆川方向攻击，协同第三十八、第三十九军围歼南朝鲜第六师。第三十八军自楼垡至板巨里地段突破汉滩川，首先歼灭永平之敌，再向东豆川里、纸杏里方向攻击，并以一个师占领七峰山阵地阻敌北援，同时监视抱川之敌。第五十军

由茅石洞至高浪浦里地段突破，向皆木洞方向攻击，配合第三十九军歼灭出援之敌或打南朝鲜第一师。

由志愿军第四十二、第六十六军并加强炮兵四十四团组成左翼纵队，由第四十二军首长指挥，在永平至马坪里地段突破，首先集中主力于永平至龙沼洞地段歼灭南朝鲜第二师一至两个团，得手后向加平、清平川方向扩大战果，切断汉城、春川间的交通；另以一个师由华川渡北汉江，向春川以北之敌积极佯攻，抓住南朝鲜第五师。各军任务是：第四十二军由观音山至拜仙洞地区突破，主力向中板里、贵木洞方向攻击，歼灭南朝鲜第二师十七团，切断清平川至加平的公路；另以一个师向济宁里迂回，协同第六十六军歼灭南朝鲜第二师三十二团、第五师三十六团。第六十六军主力分别于龙沼洞、马坪里、圆坪里地段突破，向济宁里方向攻击，会同第四十二军歼灭南朝鲜第二师。

为了保证战役的胜利，八万多名有作战经验的老兵被补充到前线。

志愿军后勤部门加强了力量，并且增调铁道、桥梁部队参战。前线各军积极就地筹粮，共向当地老百姓借粮三万多斤。

中朝两军成立了联合指挥部，彭德怀任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

临津江两岸格外寂静，在江北岸的黑暗中，十万中国官兵蜷曲在雪地的战壕中一声不响。没有人知道在这个特殊的时刻他们是否想到了他们很小的时候在家过新年的情景。尽管元旦在中国人心目中不如春节那般的热火，但是新年毕竟要过年，家家大门上挂着烛光摇曳的红灯笼，全家人坐在一起吃一顿好饭，如果年景好就会有肉和酒。然后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在暖和的炭火前议论一些平时不大议论的事，比如关于来年的生活——老人们很早就睡下了。在中国，元旦是年轻

人的节日，因为新的一年就要来了，“将来”这个词在年轻人看来永远是朦胧而又美妙的。

一九五一年新年到来的前夜，在朝鲜半岛上的十多万年轻的中国士兵迎来的是一场残酷的战斗。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发起第三次战役的时间是：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七时。

## 胜利一次太重要了

十二月二十三日晚，美军陆军副参谋长马修·李奇微正在和他的陆军老朋友们一起共进晚餐。这些天，因为不断地开会讨论该死的朝鲜问题，所有的人都感到精神疲惫，轻松一下甚至好好地喝上几杯，在圣诞节前夕这是个说得过去的理由。但是，就在酒喝到已经快把亚洲东北角上的那个国家忘了的时候，陆军参谋长柯林斯打来电话，这个电话把喝酒的气氛完全破坏了：“马修，沃克死了！”

李奇微被通知立即到五角大楼开会。

在五角大楼，李奇微听取了一些零零碎碎的情况之后被告知：今晚飞往远东，接替沃克的第八集团军司令官的职务。

李奇微首先想到的是：该怎样跟自己的夫人说这件事呢?

李奇微，时年五十六岁，一位美国陆军炮兵上校的儿子。和父亲一样，他的大半生都是在美国陆军中度过的。他一九一七年毕业于西点军校，他的同班同学中包括现任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将军和在日后在朝鲜战争中接替他的克拉克将军。在西点军校上学的时候，他被评价为“相貌堂堂，简朴严峻”，他当过学校中最引人注目的橄榄球队队

长，同时还是学校冰球队的主力。学校年鉴里有一句话可以说明他那时的风光：“毫无疑问，马修·李奇微是此地头号大忙人。”

作为一名军人，李奇微渴望在战争中赢得荣誉。但是，当他被任命为少尉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接近尾声。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和平年代，他在中国、尼加拉瓜和菲律宾服役，除了认识了一位后来成为他夫人的姑娘之外，他没干过什么令他喜欢的事，他认为自己虽有耐心但那依然是一段“令人生厌”的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军人的机会来了，李奇微被任命为美国陆军第八十二师师长，这个师很快就被改编为空降师，成为美国陆军的精锐部队。从西西里岛作战开始，他率领他的士兵转战于欧洲战场，从西西里空降直至著名的诺曼底登陆。到了一九四五年，李奇微已经指挥一个军了。他于一九四九年出任美国陆军副参谋长，并被陆军中的所有同仁“公认为未来的参谋长”。

李奇微以治军严谨、战术机敏而享誉美国陆军。

可他还是不愿意把自己要上战场的消息告诉夫人。但是由于当晚就要出发，于是他托一位好友先把这个消息婉转地传达给夫人。

李奇微回到家，开始列出要携带物品的清单。出乎他的预料，他的夫人对丈夫将去遥远的地方接替一个充满危险的职务并没有激烈的反应。“她像一切勇敢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那样，以军人妻子特有的坚毅精神接受了这一现实”。

李奇微写了遗嘱，遗嘱中涉及了他万一死亡，家中遗产的分配方案。然后，他和他的夫人以及一个孩子照了一张合影，这张照片后来成为他在严酷的朝鲜战争中唯一能够令他感受到温情的东西。

接他到机场的汽车已经停在门口。吻别了妻子和孩子之后，他又接到柯林斯的电话，电话询问他是否需要参谋人员的陪同，李奇微说：“不，我一个人走。这是圣诞节，就连光棍汉也会有他的安排。”

飞机在黑暗中飞行。这个参加过无数次残酷战斗的老兵想起很多事，包括一些纷乱无序的回忆，这些回忆多年以后仍留存在他的记忆中：

我在军校学习的时候，常被叫到地图前回答问题。教官说一个营长阵亡了，你现在接替这个指挥位置，赶快决定怎么办。那时，我会迅速地思考敌我双方的兵力部署和作战能力，并且根据自己的知识作出决定，接着就考虑下达命令的程序和内容。

但是，我将面临的问题，和我在军校学过的、和我所经历的战争不大一样。这不是程度上的差别，而是性质的基本不同。

面前的情况是，在清川江会战中遭到失败的第八集团军撤退下来，正据守在三八线一带。第十军好容易才从长津撤出来，现在部队疲劳，士气低落。

敌人在战斗力上占优势，而且擅长朝鲜的山地作战和夜晚作战，战局是险恶的。如果，教官现在问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回答?

李奇微作为美国陆军负责作战的副参谋长，曾在华盛顿的五角大楼里每天对着朝鲜地图办公，他已像熟悉自己家的后院一样熟悉朝鲜半岛的地理环境。另外，在朝鲜作战的所有美军高级军官中，除了陆战一师的史密斯师长因归海军管辖他不大熟悉之外，其余的都是他的老朋友。

李奇微开始在笔记本上写下给夫人以及陆军部发出的电报，起草就职演说的讲话稿，同时写下了自己的行动步骤：

一、向麦克阿瑟将军报到，并了解其情况判断和作战方针；

二、行使指挥权，向第八集团军的官兵表明自己的信心，即敢于对抗神出鬼没的中国军队；

三、掌握第八集团军的参谋人员，了解他们对战场情况的判断；

四、访问各级指挥部，视察前线，掌握部队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其作战能力和弱点，了解各级指挥员都在想些什么；

五、以上各项完成之后，综合判断，定下是防御还是进攻的决心。

在阿留申群岛飞机加油并等待天气好转的时候，李奇微在那里跟基地司令官夫妇谈了一通有关考古的问题。

然后，飞机飞越太平洋，目标是东京。

李奇微和麦克阿瑟之间的个人关系很奇妙。当李奇微在西点军校读书的时候，麦克阿瑟已是西点军校的校长。从那个时候起，李奇微就对这个傲慢的大人物一直敬而远之，因为他了解麦克阿瑟"夸大其词和自吹自擂的恶习"和"把子虚乌有之事归功于己的癖好"。李奇微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这样形容麦克阿瑟：

> 这就驱使他在每次有他的地面部队参加的登陆行动和发起主要攻势时，都愿意在大庭广众之前摆出一副真正的现场指挥官的架势。他有意培养清高孤傲之情，仿佛这是天才的特征，直至它变成一种格格不入的东西……这使他失去了一名司令官从他的部属那里得到批判意见和中肯评价。他刚愎自用的性格有时使他不顾逻辑而一意孤行；他对自己的判断坚信不疑，这使他产生一种一贯正确的预感……

圣诞节的第二天，李奇微到达东京。

当晚，麦克阿瑟没有接见他，他在麦克阿瑟夫人的精心关照下度过了一个舒适的夜晚。

第二天，即十二月二十六日，他见到了他的直接上级麦克阿瑟将军。

奇怪的是，当时的麦克阿瑟给李奇微留下了难得的好印象：

> 麦克阿瑟将军造诣很深，言谈简洁，我想问询的几点，毫无遗漏地谈到了。他好像很懂得谈心术。他具有领导才能，思路敏捷，能巧妙抓住任何事物的本质并进行通顺畅晓的解释，即使头脑最迟钝的人也能得到要领。尽管他可能暴露出一些弱点，但他仍不愧是一位伟大的军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一位胸怀广阔的领袖。我对有机会同我有幸认识的少数天才之一再次共事感到高兴。

这次会见，除了谈到目前的战场局势外，两个人实际上没有谈到“怎么办”的问题。麦克阿瑟抱怨美国空军在朝鲜表现得很一般，他告诉李奇微“别指望他们这些狗东西”，并且表示他强烈地希望能让蒋介石的部队参战。至于汉城，“有可能守就守”。最后，麦克阿瑟很诚恳地告诫李奇微，不要低估中国人，“那是一个危险的力量”。

当李奇微问道，如果他要制订一个进攻计划，不知道将军是否有反对意见时，麦克阿瑟说：“如果判断后认为采取进攻最符合情况，就进攻。”说完，麦克阿瑟好像很得意地笑起来，他拍了拍李奇微的肩膀说：“你认为怎么好就怎么干吧，第八集团军是你的了。”

麦克阿瑟说这番话的时候，没有一点儿开玩笑的意思。

从麦克阿瑟官邸出来，李奇微的心情不是很好了，他知道“在这困难局面中的全部责任已经沉重地、严肃地、刻不容缓地压在自己的双肩上了”。

他必须立即飞到朝鲜去。

临上飞机时，李奇微在他的上衣上别上了第八集团军的徽章。

飞机起飞了，一路风雨交加，李奇微在剧烈的颠簸中完成了演讲稿的修改。同时，舷窗外翻滚的乌云始终令他预感着自己前程暗淡。

朝鲜大丘机场笼罩在湿漉漉的雨云下。

飞机滑行停止，机舱门打开，李奇微走下来了，欢迎的人们看见的是另一个活脱脱的麦克阿瑟：李奇微头戴一顶引人注目的毛边帽子，腰间挎着一支手枪。空降战斗服翻起的衣领上佩戴着三颗星和伞兵徽章。上衣外面套了一件马甲，脖子上吊着的两个黑糊糊的东西来回摇晃，走近了才看清楚，那是两颗美式甜瓜形手雷。

“这副打扮，是李奇微在朝鲜的注册商标！”记者们在向全世界发出的电讯中这样写道。

曾经有人对李奇微脖子上始终挂着两颗手雷提出尖锐的批评，说他这是在“哗众取宠”。

李奇微的反驳是：“他妈的，这是战场！”

在朝鲜战争以后的岁月里，这两颗手雷就一直挂在这位司令官的脖子上。

美军战史所记载的李奇微的就职演说是：

我坚信，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这种信念的基础是诸位在以往的联合作战中所发挥出来的业绩和坚忍不拔的精神。

我们正在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我们在进攻中必须有坚强的决心，在防御中必须有高度的持久精神。

我们必须足智多谋。即使一个排或者一个班的战斗，实际上也影响着全军的作战。纵然指挥官和参谋不在了，也要果敢地继续战斗。不能失去发挥伟大的美国精神的机会。

上帝将同诸位在一起。

在李奇微发表他的充满“美国味道”的演讲的时候，彭德怀正在接近前线的一个山洞里看地图。这位同样年龄已过五十的中国军队的指挥官，由于长期在阴暗潮湿的山洞里工作，面容已与洞壁一样灰暗。各军战役前的开进还算顺利，就是炮兵总是拖后腿，行进的速度太

慢！暴露目标被敌机轰炸！每个军都在抱怨炮兵没有全部到达预定位置！炮弹的运输成问题！有的部队还是缺粮！

秘书说，祖国慰问团送来了糖果之类的东西，专门给彭老总留了一些。

彭德怀说："我不要！全部送到部队去！"

秘书又说，慰问团还专门给彭总带来了毛皮缝制的护膝，说是彭总的夫人亲自做的。

彭德怀把皮护膝拿在手里，它摸上去很柔软。

参谋前来报告：李奇微今天到达朝鲜。这个美军司令官的作战原则是：一旦实力允许，立即恢复进攻。

彭德怀不由得心里一惊。

这时的联合国军刚刚结束全面撤退。从纯军事的角度上讲，联合国军撤退后最迫切的问题，是寻求一条能够防御的战线，以防御中国军队可能发动的大规模进攻。而事实是，中国军队的这个进攻马上就要开始了。新上任的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在这样的局势下居然说出了"进攻"二字。而如果此时联合国军具备了进攻的条件，中国军队必定会全线陷入被动。

朝鲜人民军指挥部第三次打来电话，邀请彭德怀去吃新年年夜饭。

彭德怀说："现在哪有心思吃饭！"

副司令员洪学智走过来说："彭总，别老看地图了，咱们杀一盘棋！"

彭德怀说：“不杀！”

目前，联合国军在三八线上的态势是：于横贯朝鲜半岛二百五十公里的正面和六十余公里的纵深地带已形成两道防线。第一道防线为西起临津江口，东经汶山，沿着三八线到东海岸的襄阳；第二道防线西起高阳，东经议政府、加平、自隐里，到东海岸的冬德里。在这两道防线的后面还有三道机动防线。此时，美军第十军已经在釜山登陆，加入到西线战场，使一线联合国军的兵力达到五个军十三个师三个旅。中国人民志愿军此时在朝鲜战场所面对的敌总兵力为三十六万五千人，其中作战兵力二十五万人。

联合国军的部署是：南朝鲜第三军团指挥三个师，即南朝鲜第二、第五、第八师，成梯队形在榻豆郁、背后岭、庆云山段依次展开。南朝鲜第二军团指挥南朝鲜第三师，在楸田里、甲屯里防守。南朝鲜第一军团指挥两个师，即南朝鲜第九师和首都师，于甲屯里至东海岸防守。南朝鲜第七师位于春川、横城地区，是南朝鲜军的预备队。美第一军指挥两个师三个旅：其第一梯队是防守盐河口至金浦的土耳其旅和防守临津江口至舟月里的南朝鲜第一师；第二梯队是美第二十五师，英军第二十七、第二十九旅，分别位于汉城西北的高阳和水原地区。美第九军指挥三个师；其第一梯队是防守舟月里至梁文里的南朝鲜第六师；第二梯队是美第二十四师、美骑兵第一师，分别防守议政府及汉城以东的金谷里、道谷里地区。美第二师主力位于堤川和洪川，美空降第一八七团位于金浦机场，是美第八集团军的预备队。美第十军的陆战一师、第七步兵师和第三师位于大丘、釜山整顿，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联合国军军事部署的特点是：南朝鲜军队普遍在一线，而美军在二线；所有的军队都重兵集中在汉城周围和汉江南北的交通要道上。这样的地理防线决定着联合国军能守就守、不能守则退的战略。

于是，对于中国军队来说，第三次战役的关键是：能不能抓住已经摆开要跑架势的敌人。

而其中最不能忽略的是：美军能以十分迅捷的速度大举撤退，一旦它掉过头来由防御转入进攻，其速度同样是惊人的。李奇微声明他要进攻，这不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威胁。美军即使在撤退中也具有转为进攻的军事能力。

李奇微不是狂妄的麦克阿瑟，也不是谨慎的沃克。

十二月二十七日，李奇微乘坐B-17轰炸机前往汉城的前线指挥所。他之所以选择这种老式飞机，是因为这种飞机射击员前面的窗户很大，便于开阔地观察地面。飞机遵照李奇微的命令沿着交战两军的对峙线飞行，高度仅为一千米。机翼下高耸的山峰给李奇微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群山像刀刃一样耸立着，峡谷像蛇一样弯弯曲曲。""这样的战场，对以徒步机动为主的共产党军队来讲，是最好的游击战活动场所和最理想的战场。而对以车辆机动的我军来讲，这将是一个悲惨的地方。"

李奇微在美国驻南朝鲜大使穆乔的带领下，在汉城见到了李承晚。这个老头儿的情绪悲观而失望。"要给中国人治罪！"李承晚激动地说，"中国是凶恶的侵略者！"李承晚已经下令在全国征召壮丁，扩大军队，在与中国军队接触的前沿，几万劳工正在修筑工事。最近，他还亲自在汉城为南朝鲜第一师全体官兵举行了出征壮行的表彰大会，鼓励他们为大韩民国而顽强战斗。可就是这个南朝鲜第一师，在中国军队即将打响的第三次战役中，以最快的速度溃败了。

李奇微说："阁下，我是为在贵国逗留而来。"

这句话很有作用，因为已有传言，联合国军要撤出朝鲜。既然司令官说他要“逗留”，就说明美国人决心把战争打下去。

李奇微来到汉城前线指挥所，一进门就火了，因为这个重要的指挥所里只有几名参谋还在工作，大部分参谋人员已撤往三百多公里外的后方。“这是什么指挥所？让那些参谋立即给我上来！”

而此刻防御线上的部队的情况更加糟糕。

在一个师指挥部，李奇微要求军官们向他汇报敌我双方的情况，但是，从师长到参谋人员都尽可能躲避着他们这位新司令官的目光，而且根本说不出一线部队指挥人员应该掌握的任何情况，包括正面的敌方的基本部署。参谋人员给李奇微看的是仅仅在中国军队集结的地域上画出一个又一个巨大红圈的军用地图。

在一个阵地前沿，李奇微问一位营长现在他的右翼是什么情况。营长说，电台坏了，没办法与右翼取得联系。李奇微命令这个营的炮兵现在就开炮，向中国军队的阵地射击。然而营长说，手上没有关于中国军队阵地的分布图，他就连自己手下连队的布防图都没有。结果，炮弹胡乱地射击，有一发炮弹竟在美军的一个阵地上爆炸了。

在一条公路上，李奇微让跟随他的宪兵把子弹上膛，截住了六辆正在撤退的南朝鲜军的卡车。“向后转！上前线去！”李奇微这样命令。南朝鲜士兵不认识这个气势汹汹的人，但认识美国的宪兵，于是卡车掉头往回开。“一会儿他们就会以更快的速度开回来的。”身边的人对李奇微说。

在一个美军团级指挥部的门口，李奇微内心的所有不满开始向吉普车的车篷发泄了：“把所有的车篷都给我拆下来！在战场上乘坐有篷的汽车，是在封闭的车厢里骗取一种自欺欺人的安全感和没有根据的

舒适感。篷布挡不住子弹，这你们知道，这是一种如同走投无路的鸵鸟把脑袋钻进沙子里一样的心态！”

李奇微终于认识到，第八集团军在中国军队的打击下“肉体上和心理上受到了多么深痛的损害”。夜晚，在接近前线的帐篷里，他开始给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写信：

> 这里确定无疑地有一种紧张不安、大难临头、动荡不定的气氛，一种惊恐不定的精神状态。我很清楚，我们的部队已失去信心。从他们的眼神、步态都可以看出这一点。从他们的长官的脸色——从军士到最上层军官，都可以看出这一点。他们反应迟钝，不愿意交谈，我必须从他们那里了解情况，可他们完全缺乏那种在士气高昂的部队身上可以发现的警觉性和进取精神。

第八集团军很快就了解到他们新任司令官的严厉作风。李奇微给所有的军官下达了一道严厉的命令：“我不希望看到接到行动的电话还坐在那里发呆，甚至还抽上支烟的军官。应该放下电话，拿起帽子，去执行需要完成的任务。所有的军官，必须和先头营在一起，文字工作可以晚上做。白天，枪炮声大作的地方才是你们必须去的地方！”

“即使你在战斗中立了大功，也不可以军装上的铜扣子没有擦亮。”李奇微知道战争容不得一丝差错，他要求当部队向某一地域前进时，指挥官必须知道那里“是否需要步兵背负武器、弹药和食品爬上两千英尺的山脊，以及他们是否能将重型武器装备运上去，一路是否需要涉水过河，是否有轮式车辆能够通过的道路”。

李奇微告诉美国陆军参谋长柯林斯，他准备“毫不留情”地撤掉那些“不称职的”指挥官。果然，在到达朝鲜前线三天内，被他撤职的中高级军官中不乏美第二步兵师师长罗伯特·麦克卢尔将军、第七步兵师师长戴维·巴尔将军、第二十四师师长约翰·丘奇将军、第一骑兵师师长霍巴特·盖伊将军。

李奇微开时向第八集团军阐述他将要采取的新的战术：

诸位和诸位部属们的祖辈如果知道某些指挥官的所作所为，一定会在坟墓里羞愧得翻身把脸转过去的。

军事入门书告诉我们，遵照的第一原则是“尽快地与敌人接触”，我和诸位都要学习这一点。下达命令！立即派出侦察部队！而且，一旦同敌人接触，就要像狗一样咬住，决不能放过。在敌人暴露其位置和兵力之前，必须捅一捅和刺激他们一下。每天都要捕捉和消灭敌人潜入的侦察员。我不允许你们告诉我“不知道这条小路通向什么地方”。

指挥官的任务是走到最危险的战斗场所。任何想象都不能代替实地观察。战斗一开始，希望师长和进行战斗的第一线营长们在一起，军长和第一线的团长们在一起。指挥官的位置必须是敌我双方互相开枪的地方！

第八集团军的问题在于过分地依赖公路，当中国人控制了山头后，他们就可以随意给我们的车队以沉重的打击。如果想赢得这场战争，美军就必须从吉普车、卡车、炮车上走下来，以徒步的方式发动进攻。任何一个不身先士卒、不敢战斗的指挥官都将被撤职并遣送回国。

美国的国威和信用，关系到朝鲜的命运。避免失败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拿出勇气来！把赤色中国洗成白色！占领几平方英里的土地无关紧要，你们的目标不是占领阵地，而应该是尽可能多地杀死敌人，阵地的得失并不意味着将会赢得或失去这场战争。最重要的是把敌人杀死！要寻找伏击他们的机会，并把强大的部队埋伏在侧翼，突然发动猛烈攻击将其歼灭！

李奇微不是一个惯用激烈言辞的指挥官，“不断进攻”的确是他脑海中根深蒂固的战术思想。

为了提高部队的士气，李奇微让他的座机飞临距离前沿很近的地方，然后随便找个什么地方就降落下来。李奇微的座机驾驶员迈克·林奇是个胆大包天的人物，他总能满足李奇微对整个战场了如指掌的渴望，经常让飞机在简易的土路上降落，甚至降落在小镇的街道上。一次，飞机飞到一个荒凉的小镇上空，李奇微想知道小镇里有没有中国士兵，于是问林奇：是否能降落？林奇说：“我能飞进去，并且降落，但这他妈的肯定很麻烦。”林奇驾驶飞机从电线底下钻进小镇，掠过一座小桥，然后降落下去。李奇微走下飞机时手里提着一支卡宾枪，然后他步行穿过小镇，并在那座小桥上检查是否有中国军队的影子和他们埋下的地雷。当一小队美国士兵闻讯快速跑来时，看见他们的司令

官被一群赶来看热闹的朝鲜孩子团团围住，而司令官正把带来的几面美国小国旗一一发给朝鲜孩子。

在以后的战争中，李奇微每每飞临战场前沿。有一次他的飞机在前线降落，几乎降落在中国军队的阵地上，中国士兵发现后击毁了他的飞机，李奇微和林奇在冲向他们的中国士兵射出的密集子弹中钻入山林逃生。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朝鲜战争结束，再也没有记者对李奇微将军脖子上的两颗手雷发表调侃的言论了。

尽管李奇微费尽心思地整顿着萎靡不振的部队，但在中国军队策划的第三次战役即将发起的时候，位于前线的所有美军官兵依旧情绪低落。

在华盛顿，对战争局势的悲观预测，使杜鲁门总统连同五角大楼的官员们都感到战争似乎应该停下来了。于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将军在参众两院的听证会上说出了那句极其著名的话："如果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大陆，同中国全面大打，那就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敌人打一场错误的战争。"

这句话很快传到朝鲜前线的美军官兵中。

但是，无论怎样，美国人最终的心态依旧是：除非把联合国军打进大海，否则绝不能这么不体面地撤出朝鲜。

杜鲁门宣布了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的法令，加强了总统在战争状态下的权力，加速了军队的扩大和军事工业的生产。

杜鲁门发表了公告：

> 现在，我，哈里·S.杜鲁门，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正式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这就要求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增强我国的陆军、海军、空军和民防力量，使我们能够粉碎对我们国家安全的任何威胁。

参议院提出加快陆军扩编的建议，落实这个建议的第一个步骤是，把第三十一、第三十七两个国民警卫师立即转为正式的联邦服役师。

国家紧急设立了国防动员局，准备把美国军队现有的二百五十万兵力迅速增加到三百五十万。

在军事工业上，一年之内要把飞机和坦克的生产能力提高四至五倍。

由于在第二次战役中美军损失了大量的军用物资，因此，美国再一次开始了向朝鲜半岛运输军用物资的行动。从美国本土、从日本，几十艘运输舰船昼夜不停地运送一切美军所需要的东西，其规模之大前所未有。美国人喜欢给任何一次行动都取一个名字，向朝鲜半岛的运输行动被命名为：石竹花。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李奇微一直心情不安。这是他上任的第五天，也是这一年的最后一天，他莫名其妙地感到一种巨大的威胁正在向他逼近。他驱车前往防御汉城的前沿阵地，看见成千上万的民工正在加固战壕。在英军第二十七旅的防御地段，他看见一位高大英俊的英国中尉正和士兵们一起整修他们的掩体，李奇微很满意地向这个年轻的英国人打招呼，英国中尉笑着迎接了他。在了解到中尉在家乡为他父亲的牧场养马之后，两个人在战壕的边上就马匹亲热地聊了几句。但是，当李奇微对中尉表示“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尽管告诉我”时，年轻的英国中尉脸色突然冷淡起来。“没什么。”中尉说。李奇微再问：“一切都很好吗？”中尉说：“是的，将军，都很好。”中尉停顿了一下，接着补充道：“但是，这是个两面透风的防线。”李奇微一下就明白这位英国中尉的意思了。对于长达三百公里的防线来讲，真正布防在防御第一线的部队太少了。就以这里为例，一个英军营正面

防御的宽度已达到十公里，而这位中尉率领的一个排的防御阵地宽达九百米。李奇微无法再和英国中尉说什么，他举起望远镜向北看去。

李奇微在望远镜里什么也没看见。

其实，就是此刻，大批的中国士兵正在他的面前悄悄地进入冲击阵地。

离开英军第二十七旅的时候，李奇微特地看了一下表，十五时整。他还不知道，距离中国军队全线发动攻击的时间，仅仅剩下两个小时了。

从前沿阵地回到汉城，李奇微询问情报消息，参谋报告说："这些天，几乎每天都有新番号的中国军队出现。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军队正在准备一场大规模的进攻行动。只是不知道中国军队的进攻什么时候开始，从什么地方下手。至于前线，我刚给前方指挥所打过电话，他们说一切都是老样子，一片寂静。"

当第八集团军的美军士兵钻进睡袋准备再做一次圣诞老人降临战壕送来圣诞礼物的美梦时，在距离他们并不遥远的一个巨大的矿洞里，中国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彭德怀把他的目光从地图上移开，并且摘下了老花眼镜，有关第三次战役的一切他已经想明白了。此刻，参谋人员手里已经抓起电话，正盯着手腕上的表，准备下达全线攻击的指令。彭德怀大口地喝着冒着热气的开水，对洪学智说："大个子！既然人家请，哪有不去之理！去吃饭！吃完饭下一盘！"

被繁重的后勤工作折磨得十分消瘦的洪学智说："如果你总是拴绳子（悔棋）就不跟你下。"

"错了，应该给人改正的机会嘛。"彭德怀说。

彭德怀乘车前去朝鲜人民军指挥部。

新年之夜，风雪迷漫。

在汉城的李奇微不知为什么突然想起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反复慨叹的一句话：“伙计，对于现在的战争局势来讲，胜利一次太重要了。”

## 大冰河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十七时整。

汉江北岸突然飞起的一串耀眼的信号弹划过除夕的雪夜，中国军队的炮兵接着开始了炮火射击，猛烈迸发的火光红透了夜空，天崩地裂的巨响瞬间撕破了战场上的寂静，临津江南岸的联合国军阵地顿时陷入一片烟火之中。

尽管中国军队的炮火准备仅为二十分钟，但这已是朝鲜战争开始以来中国军队规模最大、火力最强的一次炮击。在联合国军防线最前沿的南朝鲜军阵地上，白天还在加固的工事在爆炸中一个个地坍塌。炮弹同时引发了阵地前地雷的爆炸，连续不断的爆炸声令整个大地颤抖起来。在冲天火光中，惊慌失措的南朝鲜士兵到处乱跑。在战壕中等待冲击信号的中国士兵们站起来活动着由于长时间隐蔽而麻木的身体，他们看着自己的炮火打红了半边天，都兴奋地大叫起来。这是临战时刻已经忘却生死的人才能体会到的一种血脉贲张的兴奋。

“同志们！冲过江就是胜利！”

中国军队发动的新一轮的进攻开始了。

美军和南朝鲜军战史称这次进攻为“新年攻势”。

中国战史则称为“第三次战役”。

中国第三十九军是右翼突击纵队的第一梯队。他们突击的方向是正前方的汉城。

写了决死决心书的三四六团扫雷组长张财书，比冲击部队早二十分钟出发。他只有二十分钟的时间，这个时间是炮火准备和步兵冲击之间的短暂的一瞬，他要在这个瞬间尽可能多地扫除冲击部队将要经过的道路上的地雷。张财书和三个组员每人手持一根一丈多长的木杆，大声地向冲击线上等待冲击信号的密密麻麻的士兵群喊着："让开！快让开！"士兵们立刻闪出一条通道，他们都看着张财书的脸，想在他的眼神中发现点儿什么。

"伙计，打扫得干净点儿！"有人冲他喊。

张财书没有回答，昂着头向前跑。

由张财书、赵振海、金玉山组成的三人扫雷小组冲下了山坡，立即受到对岸射来的密集的机枪子弹的拦截。三个人不顾一切地冲过六十米长的开阔地，一头扑倒在一个沙丘上。没有伤亡。

张财书在沙丘上端探头看，江边一片平展的沙滩就是敌人的雷区。

这里是突破口，部队马上就要从这片沙滩上冲过去。正因为是突破口，所以没有事先在这里扫雷，怕的是暴露突破的位置。

对岸敌人的子弹暴雨一样射来。

张财书说："我先上去，如果我挂花了，你们接着干，你们可要隐蔽好！"

说完，张财书向沙滩爬去。

子弹打在身边的沙滩上，发出很闷的声音。

一个小洼地是白天侦察好的。张财书滚到洼地里，把长长的扫雷杆伸出去。这根扫雷杆的顶端有个钩子，钩子钩住前面连接地雷的钢丝，一扭，几颗地雷一起爆炸了，沙石飞迸，浓烈的硝烟味呛得他喘不过气来。硝烟和沙土落下之后，张财书刚要接着往前爬，发现扫雷杆被炸断了。

他急促地爬回来，看见赵振海正趴在金玉山的身上大声地喊着什么。

金玉山被机枪子弹击中，死了。

张财书抓起金玉山留下的扫雷杆再次冲上去。在第二个扫雷点，他又钩响了几颗地雷。这次引起的是连续爆炸。没等爆炸停止，他又冲向第三个扫雷点，但是，他发现手中的扫雷杆又被炸断了。

他又一次返回，拿起最后一根扫雷杆。临走还是那句话："赵振海！隐蔽好！如果我不行了，你上！"

张财书已经根本不在乎自己是否会被子弹击中，他几乎是跑向了第三个扫雷点。他连续钩响了两串地雷，被他钩响的地雷距离他太近了，几乎就在他的身边爆炸了，烟雾包裹了他，他觉得身下的大地一下子陷进去，然后他又被弹向天空。他的左腿和右手已经没有知觉，脑袋发胀，嘴里咸咸的，他知道自己负伤了。他仰天躺着，看见了被炮火和曳光弹装饰得五颜六色的夜空，他觉得自己也许就要死了。他下意识地伸出左手寻找扫雷杆，举起来的却是被炸断的半截木棍。

"赵振海！赵振海！"他声音嘶哑地喊，"上！上呀！"

没人回答。

赵振海卧在沙丘上已经牺牲。

不是赵振海不懂得隐蔽自己，他是为了吸引敌人的火力以掩护张财书扫雷，故意明显地暴露了自己。

这时，中国军队更猛烈的炮击开始了。

张财书知道，这就预示着部队要冲击了。因为连长说过，冲击前有三分钟最猛烈的炮火准备。

张财书也知道，现在，他身后的那些准备冲击的战士们正看着他呢。如果不能把地雷扫干净，将要有无数的战友倒在这片沙滩上。

他往前看，又看见了卧在冲击道路上的那一串串地雷，细细的钢丝在炮火刺眼的光亮中一闪一闪的。

张财书把手上的木棍向那些钢丝扔过去，地雷没有爆炸。

这时，一串信号弹升起来了。

战友们冲击的呐喊响起来了。

张财书突然坐了起来。他在坐起来的那个瞬间，扭头向他的战友们看了一眼，然后，他把身体横过来，向前，向着那些地雷，滚过去。

张财书血肉模糊的身体在翻滚，地雷的爆炸声连续地响着……

中国士兵潮水般地沿着张财书滚动的路冲过去。

都说，张财书肯定死了。

在临津江北岸那片曾布满地雷的沙滩上没有找到张财书的尸体。

过了很长时间，三四六团的官兵突然听说，在祖国的一家医院里，有个志愿军伤员名叫张财书，赶快打听，就是他们的那个张财书。

三四七团五连的士兵们在冲击的信号弹升起来时，就已经踏入江水中了。

这个连的突破口叫新岱，是临津江的一个转弯处，由于水流太急，江面没有封冻。他们问过朝鲜向导江水的深度，向导只是反复说一句话：我在江边生活了四十多年，还没有听说过谁敢在这样滴水成冰的时候涉水过江。

五连的士兵晚饭吃的是专门为他们准备的辣椒炖牛肉。一大锅的牛肉每块都馒头那么大，但炖得很烂。全连在吃牛肉的时候，二排副排长张殿学听见团政治处主任对营教导员说：

“把首先渡过江的前三名士兵的名字给我记下来！”

张殿学一下水，立即感到一阵彻骨的冷。他浑身一紧，差点跌倒，溅到头发上的江水瞬间结成了冰珠。他听见指导员在喊：“五连的！立功的时候到了！”士兵们把枪举过头顶，向大冰河中走去，江水顷刻没到了胸口。对岸射来的子弹在耳边尖厉地呼啸，炮弹的爆炸在身边掀起巨大的水柱。江面上游冰封的冰层被炮弹炸裂，大块的浮冰互相撞击着冲下来，有的士兵被冰块撞倒在江水中。张殿学身边有个来自中国南方的士兵，转眼间就在江面上消失了。“小范！小范！”张殿学喊，齐胸的冰水令他的声音尖厉而颤抖。小范又从江面上露出了头。“怎么回事？负伤了？”张殿学问。“副排长！我的机枪！机枪管掉在水里了！”小范哆嗦的声音中带着哭腔，说着又钻进水中。在那边，又一个声音呼唤张殿学，原来是一名战士被卡在两块冰块中间了。张殿学替他把冰块推开，解脱出来的这个机枪手一爬上冰块，就向对岸

开了火。“下来！快下来！你要被冲走的！”但是，机枪手下不来了，他被冰水浸透的身体已经和冰块冻在了一起。张殿学听见左边响起小喇叭的声音，那是说七连已经登岸了。他声嘶力竭地喊了一声：“快到啦！冲呀！”

登上临津江南岸的中国士兵被冰水浸透的棉衣裤立即冻得石头般坚硬，这令他们在敌人地堡中射出的密集的子弹面前显得笨拙而僵硬。中弹的士兵如一块石碑重重地倒在地上。士兵枪管里灌进的江水冻了冰，一时无法射击。尿！往枪上尿尿！可没有人能尿出来。张殿学指挥一挺机枪暂时压制了当面敌人的一个火力点，但是他身边的六班长踩上了地雷。张殿学掏出身上的已经冻成冰坨的急救包扔给他，然后向另一个火力点冲过去。当他终于占领了敌人的一个地堡时，突然觉得后面有人跟上来了，一回头，是拖着伤腿的六班长。张殿学呜呜地吹响了小喇叭，告诉自己的连队，他已经占领了连队冲击正面的滩头。

三四七团的另一个连队——钢铁连，率领先头排的是著名战斗英雄王凤江。他们突破地段的江面冰层很厚，士兵们在冰面上不断地滑倒，爬起来再向前冲击。但是，没过多久，全连都掉进冰水中了，因为江心的冰层已被猛烈的炮火炸开。掉进江水中的士兵们挣扎着，纷纷往浮冰上爬，一些浮冰承受不住很多人的重量再次破碎，士兵们重新掉进水中。大多数士兵抱稳一块浮冰，半截身体泡在水中前进，他们露出水面的部分很快就和冰块冻在了一起。在敌人的炮火封锁下，中国士兵一个又一个地倒在冰水中，但是没有人向后跑。最前面的王凤江一只手举着缴获来的那支美国制造的卡宾枪，一只手腾出来帮助身边的战友，他嘴里不停地喊：“同志们！争取前三名，上岸立大功！”接近岸边的时候，又是厚厚的冰层。从水中重新爬上冰层不是件容易的事，冻得全身麻木的士兵已经没了力气。江对岸封锁的炮火和机枪的射击更加猛烈，不断有负伤的士兵被江水冲走。王凤江冒着随

时中弹的危险站在齐腰深的冰水中，把士兵们一个个推上冰面。重新上了冰面的士兵迎着死亡，向江岸上跌撞而去。

王凤江是第五个冲上江岸的。

后续部队从撕开的突破口拥向临津江南岸纵深。

当第三十九军冲击正面的江南岸升起突破成功的信号弹时，军指挥所里所有的人都如释重负地长出了一口气:“行了！突过去了！”

第四十军右翼一一九师的突破口是峨嵋里至高滩地段。江南岸的南朝鲜军的防御阵地虽然坚固，但是在步兵发动冲击前，配属一一九师的炮兵发射了猛烈而准确的火力。在美军飞机破例夜间轰炸的情况下，炮手们在寒冷的气温中扒掉上衣，扛着炮弹飞似的在阵地上来回奔跑，在炮长和瞄准手连续不断的呐喊声里，火炮进行了不间断的射击。隐蔽在冲击前沿的步兵被炮兵出色的表现惊呆了。对岸敌人的阵地几乎完全被炮火覆盖，滩头被轰击成一片火海，炮弹引爆了地雷，爆炸声此起彼伏，敌人的地堡被一个个削平。当冲击信号升空的时候，步兵们高喊着口号前仆后继，仅仅用了十三分钟，作为先头突击营的一一九师三五五团三营就全部冲上了临津江南岸。营长张庆昌带领士兵冲进南朝鲜军的前沿掩蔽部时，看到正准备吃饭的南朝鲜士兵除了被击毙的之外，什么都来不及携带便跑得没了踪影，掩蔽部里的一只炭火正旺的火炉上，炖着牛肉的锅还在冒着热气，桌上的酒瓶已经开盖，酒香四溢。一个半小时之后，突击营占领了突破口上一个位置重要的高地，为后续部队打开了向纵深发展的道路。

一一九师三五六团突破临津江滩头阵地的先头部队是两个营。其中一营的突击连是三连，这个连的士兵从江北岸一个陡峭的山崖上直接滑到江面的冰层上，然后不顾一切地向对岸发动进攻。冲击在前面的士兵用斧头砍开屋脊形的铁丝网，然后不惜生命冲过了三百米宽的

雷区，很快就冲到了敌人的阻击高地下。但是，由于冲击的速度太快，班长毛凤回头一看，跟上来的士兵算上他才九个人。牺牲是大了些，但更为严重的是，冲击大部队已被敌人的火力阻击在后面了。毛凤是名老战士，在中国国内解放战争中参加过海南岛战役，立过战功。在入朝后的第一次战役中，是他率领士兵在曲波院抢占要地，掩护了主力的展开。在今天这个你死我活的紧急时刻，他决心就用这九个人攻击压制大部队前进的地堡。毛凤把九个人分成两个小组，分头往高地上摸。摸上去之后，发现在地堡的后面还有一个大暗堡。他果断地命令一个小组负责地堡，他和另几个士兵向大暗堡摸去。暗堡中传出敌人杂乱的说话声，在毛凤的口令下，孤注一掷的中国士兵把身上所有的手榴弹一齐塞入暗堡的射击口里。这边响起剧烈的爆炸声的同时，另一个小组也对那边的地堡下手了。压制冲击部队的射击立即减弱，中国军队的喇叭声顿时震耳欲聋地响起来，被压制的中国士兵一拥而上，三五六团冲击的通道也被打开了。

与一一九师相比，第四十军一一八师的突破极不顺利。年轻的师长邓岳事先把一切困难全想到了，而且对自己这支以打硬仗闻名的部队很有信心，但是在即将发起冲击前夕，他听到了一个令他极端恼火的消息：配属给他的炮兵在向前沿开进的途中不慎暴露目标，遭到美军飞机的猛烈袭击，损失巨大，真正到达前沿的炮兵仅有一个连。再申请重新配属炮兵已经来不及了，冲击的步兵失去炮兵的支援后果可想而知。邓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严肃地通知参加冲击的第一梯队的两个团：别指望炮兵了，要靠自己的努力发起进攻。

由于没有炮兵的炮火准备，一一八师正面敌人的滩头防御阵地几乎是在严阵以待的情况下等着中国士兵的到来。师右翼的三五二团和左翼的三五四团的突击都遇到极大的困难，士兵们依靠手中的轻武器，用炸药包、爆破筒与敌人在每个坚固工事的火力点前进行着艰难的拉锯战，突击行动进展得残酷而缓慢。尤其是三五二团，渡江的时

候才知道，突破地段的江面并没有完全封冻。经过艰难而损失巨大的徒涉冰河之后，他们刚刚登上南岸，又不幸进入了敌人设置的假阵地，这个假阵地却是一个真雷场——雷场没有受到中国炮兵的轰击破坏，地雷密集，难以插足，部队因伤亡巨大而进攻受挫。

从三五二团侧面辅助进攻的警卫连却意外地冲击成功。部队发动冲击前，为不使主要的战斗骨干损失得太多，邓岳特地把一个名叫金克智的“反坦克英雄”从战斗连队调到警卫连“保存”了起来，谁知这一调动在冲击中倒为金克智创造了发挥能力的机会。金克智带领警卫连的士兵们涉过大冰河，破坏了阻挡前进的铁丝网，很快就消灭了一个向中国冲击部队疯狂发射火箭弹的地堡。金克智让机枪架在这个地堡上进行掩护射击，自己带领士兵沿着敌人挖的弯弯曲曲的交通壕边打边前进，连续拿下三个堡垒，缴获了一门无后坐力炮，极大地减轻了向三五二团冲击部队侧射的阻击火力。

由于种种困难，当一一八师终于突破临津江防线的时候，其右翼的一一九师已经向防线纵深突入了十二公里，插到了南朝鲜第六师的侧后。

中国第三十八军的指挥员最担心的并不是冰河，因为他们对面的汉滩川不是一条大河。他们最担心的是横在大冰河之后部队冲击道路上的一座座险峻的山峰。

第三十八军一一四师三四〇团的突击队在炮火准备的十分钟内，在汉滩川上架起了一座浮桥，部队通过这座浮桥，仅十分钟就突破了敌人的前沿阵地。而三四二团没有那么好的运气，攻击的时间到了，浮桥还没有架好，突击连连长傅长山等不及，干脆率领士兵下了水。在攻击对岸敌人阵地的时候，部队行动极其迅速，连续占领了三个高地，每个高地解决战斗的时间都没超过十分钟。当天空的照明弹把阵地上敌人的尸体照亮的时候，中国士兵大叫起来：“大鼻子！是美国

人！”一直认为前沿全是南朝鲜军，不料这一地段的美军士兵居然这么靠近前沿。

这个在突破汉滩川时与美军相遇的三四二团先头营的营长就是曹玉海。

曹玉海命令二连不管眼前的一切，先插进去把敌人的炮阵地端了。二连没有让曹玉海失望，一直插下去，直到把敌人的炮阵地捣毁为止，但二连由于插进得太深，四面全是敌人，与曹玉海的营部失去了联系。

曹玉海正焦灼时，一连在公路上堵住了十几辆敌人的汽车。他们先打头一辆，把公路封死，然后就围起来猛打，打得南朝鲜士兵四处逃命。最后清点战场的时候，发现这是个炮兵分队。

一营三连在连长张同书的带领下占领了一个山头，却发现山头上工事虽完整但没有敌人。往山腰一看，全是帐篷。张同书端起冲锋枪冲着这些帐篷打了一梭子，帐篷中传来一阵惨叫：又是美国人！这些美军士兵认为自己是防守第二道防线的，还在帐篷里睡觉，没想到前面的南朝鲜士兵跑得那么快。

等一营的三个连队再次会合的时候，曹玉海发现三连连长张同书不在了，有人告诉他，张同书在率领连队攻打一个山包的时候牺牲了。

第三十八军由于突破顺利，前进的速度很快，很多部队与敌人交战在一起。在到处是火光的暗夜里，在弯曲的山间土路上，拥挤着混杂交战的士兵。一名疲劳之极的中国士兵肩上的九二步兵炮的炮筒冷不防被一名南朝鲜士兵夺走了，中国士兵追上去给了那个南朝鲜兵一枪托，把炮筒夺回来后继续往前走。三四二团的机关人员趁混乱抓了

不少俘虏。在一个南朝鲜军的团级指挥所里，一架留声机还在播放音乐，几个南朝鲜军官没出被窝就被打死了。在第二次战役中插入敌后的那个著名侦察科长张魁印率领一队人马向敌后插，结果在路上发现他们与敌人的队伍交织在一起了。中国军队中会英语的侦察员居然和美国士兵聊上了天。中国士兵问美国兵为什么不乘车，美国兵说汽车早就跑掉了。美国士兵还拿出一张纸在中国士兵的眼前乱晃，说这是中国人发的“优待证”，是被俘后又被释放的朋友送给他的，说有了这东西被俘后能吃热菜，还能洗热水澡。一一四师后卫部队三四一团突破后又奉命追击，官兵们疲惫不堪，在休息的时候，团政委张镇铭靠上一个草垛就躺下了，躺下才发现身边有个人已经在打盹，这个人蒙着一件美军的大衣，张镇铭知道团里只有郭参谋长有件美军大衣，就说：“老郭，你找了个好地方！”然后倒下就睡。部队继续前进的时候，张镇铭起来，又推了推身边还睡着的“老郭”：“老郭，走了！”结果还是侦察参谋多了个心眼儿，因为他发现“老郭”脚上的鞋是一双美军的皮鞋，郭参谋长虽有美军大衣却还没有美军皮鞋，于是一把将那个人按在地上，掀开大衣一问，是个由于恐惧已经神情恍惚的南朝鲜军炮兵营长！

在中国军队右翼纵队突破临津江和汉滩川前沿的同时，左翼第四十二军的突击部队以猛烈的攻击迅速地占领了当面洋蛾岩和道城岘两个险要的高地。第六十六军主力在发起攻击的一个半小时后，也突破了当面敌人的防线。

午夜时分，联合国军在三八线上的第一道防线全面崩溃。

从战役企图的隐蔽上讲，这是一次空前的成功。

中国士兵在零下二十摄氏度的气温中，冒着密集的封锁火力，徒涉冰河，一举全线突破敌人坚固的防御阵地，这无疑是战争史上的一次壮举。

为此，很多中国官兵付出了生命。

在一九五一年新年前夜的进攻中，中国士兵面对的不仅仅是一条大冰河，而且还要面对地雷、鹿砦、蛇形铁丝网以及从地堡中射出的密集的子弹。每一秒钟都有士兵牺牲。冰河的后面是连绵的深山雪谷，坡陡路滑，不少士兵滑入深深的雪沟之中，衣服上的江水和里面的汗水很快冻结，到激烈厮杀时，热血与热汗又把身上的“冰甲”融化。

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艰苦战斗。

成千上万从中国本土跟随部队而来的担架队员在这个夜晚拼死抢救负伤倒下的中国士兵。这些担架队员大多是中国东北地区的青年农民，他们对自己的士兵有一种血肉的感情联系。本应该在温暖的家中过新年的时候，他们却冒着炮火奔跑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他们在冰冷的大地上把奄奄一息的同胞抱起来，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把伤员抬到包扎所。为了让伤员能够活下来，他们把自己身上御寒的衣服脱下来盖在伤员身上。伤员很多，担架队员身上的衣服几乎脱光了，于是他们想出了一种把石头在火上烧热，塞在担架上的棉被里，以保持伤员体温的古老但很有效的办法。这个办法在以后的朝鲜战场上一直为中国军队所采用。

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黎明快要到来的时候，由志愿军总部派出指挥中国军队右翼纵队的“韩指”和第四十军军指挥部一起越过了朝鲜半岛上的三八线。所谓“韩指”，实际上只是由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杨迪和一名参谋组成。刚过了临津江，前面开路的卡车就被地雷炸毁了。第四十军军长温玉成说地雷太多，停下来，等天大亮再走吧。韩先楚坚持前进。韩先楚是第四十军的老军长，他的固执是有名的：“和部队失去联系，是什么指挥部？要指挥部队坚决把逃跑的敌人堵住！”

恢复前进没多久，后面的一辆车也被地雷炸毁了。这一回损失严重，第四十军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几乎全部负伤，一些人伤势严重。

韩先楚亲自指挥抢救伤员。这时候，前方传来报告，说第四十军的部队进展神速，已经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防线，在这道防线上防御的是美军。并且说至少在十几处地方围住了美军，每一处少说也有一个营。

这个消息缓和了车辆被炸毁的沉闷气氛。

韩先楚望着夜空，脸上没有什么笑容。

"韩指"一直前进到东豆川北面的一个叫逍遥洞的地方才宿营。和这个地名不相符的是，连同韩先楚本人在内，所有人的干粮袋全空了，指挥着四个军数万人马的中国军队右翼指挥所里一粒粮食也没有了。为了解决饥饿问题，警卫员们四处寻找可以充饥的东西。不久，有士兵兴奋异常地前来报告说，在路上捡到了一点儿敌人逃跑时丢下的小米，除去沙石，至少有好几斤。

喝完了热乎乎的小米粥，韩先楚仰望着黎明前薄明的天色说："我们也许只能高兴一会儿，天一亮，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 不赶走美帝不回国

元旦的早晨，天刚蒙蒙亮，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就乘坐一辆吉普车出了汉城，向前线方向急驶。他的双眼布满血丝，脸上的肌肉绷得很紧，随着吉普车的颠簸，脖子上挂着的那两颗手雷剧烈地来回摇摆。他腰间的手枪套已经打开，露出精致的枪柄。

昨晚从防御前沿回到汉城城内不到两个小时，中国军队突然发动的规模巨大的攻势开始了。

整整一夜，李奇微指挥部里的电话不断，电报雪片一样：从东到西的几百公里防线上，中国军队竟然很快就实现了全线突破！第一线的南朝鲜师个个都处在危急之中，尤其是第一师和第六师，已经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李承晚总统不是说在他的亲自调遣下，至少十万的民工已经把前沿修筑得钢铁一般坚固了吗？自己亲自审查过防御方案，防线上的火力配备不是相当严密了吗？仅仅阻击中国军队前进的火力网不是至少布设了数层之多吗？

寒风呼啸，凌乱的雪粉沙子一样扑打在脸上。

正前方，炮声隆隆，爆炸声连续不断。

吉普车没走出几公里，李奇微就看见公路上迎面乱哄哄地跑来一群士兵，这是他看见的从前沿跑回来的第一批败兵。吉普车再往前走，溃逃下来的士兵越来越多，拥塞了整个道路。李奇微后来一直对此记忆犹新，他说这是在他所经历的战争中看见过的最令人沮丧的溃逃部队：

> 蓬头垢面的南朝鲜士兵乘着一辆接一辆的卡车，川流不息地向南拥去。没有卡车可坐的，利用了他们认为可以利用的一切交通工具，包括牛车、驴车和骑着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各种牲畜。他们没有秩序，没有武器，没有指挥官。他们只有一个念头，就是逃离中国军队越远越好。他们扔掉了自己的步枪和手枪，丢弃了所有的火炮、迫击炮、机枪以及那些数人操作的武器。

李奇微终于暴怒了。

他掏出手枪，站在公路的中央，向天空连续射出好几发子弹，然后高声喊道：“给我停下来！”

没有人理会他。

李奇微的喊声和枪声，在溃兵的咒骂声中和越来越近的爆炸声中，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失魂落魄的士兵们根本没空儿注意这位司令官的存在，车辆纷纷绕开他的吉普车照样往南跑。最后，也许是李奇微吉普车上的三颗白星让一个南朝鲜军官认出了这个美国人是个不小的官，一支溃逃的车队停在了李奇微的面前。那个南朝鲜军官听不懂英语，或者他装作听不懂，他拼命跟李奇微打着混乱的手势，然后根本不管李奇微给他下达的是什么命令，爬上车带领车队一阵风似的跑了。

在这些溃败的士兵中间，混有不少西方的战地记者，他们在记录当时的情景时使用了很多形容词:

法新社:“盟军军队被弄得头昏眼花”，“美第八军部队成群结队地退却”，“从前沿逃来的长列士兵狼狈南行，面色憔悴发黑，精疲力竭”，“在向汉城的路上，沿途都是燃烧着的军用物资”。

美联社:“在战线后面，撤退的部队总是匆忙地诅咒，乱得一塌糊涂”，“撤退的长长的车队不断地陷入泥泞之中”。

而第八集团军新闻发布官发布的战况的措辞是:“中国军队发动有力攻势，已经在美军防线上撕开巨大的战役缺口，使以顽强著称的联合国军完全崩溃，并严重地威胁了通往美第八集团军全部战线的重要补给线。”

李奇微把手枪收起来，他明白部队已经完全失控了。

他返回汉城，命令立即在南朝鲜士兵南逃的路上出动宪兵，设置检查线，审查所有从前线逃下来的士兵，并且执行战场纪律。同时，他给南朝鲜总统府打了个电话，“邀请李总统视察前线”。

于是，年龄很大的李承晚总统在李奇微将军的陪同下，乘坐一架机身是帆布的联络飞机，向前线的方向飞去。李奇微穿着很厚的防寒服依旧在机舱中冻得要命，他看见身边的这个老头儿穿的是根本不御寒的白色的朝鲜服装，那张满是皱纹的脸在极度的寒冷中更加苍白而干瘪。

飞机在议政府附近降落，在那里他们看见了收容队收容的南朝鲜士兵正在乱哄哄地抢领食品。

李承晚向士兵们发表了演讲，要求士兵们重上战场。

演讲完，李承晚用英语对李奇微说："不要灰心！不要灰心！"

而李奇微脑海中闪现的却是一个最可怕的念头：汉城恐怕保不住了。

中国第四十二军一二四师是打穿插的部队，部队中有一个后来很出名的士兵——十九岁的冷树国。这个出生于辽宁的青年，在家乡时是个心灵手巧的小木匠，有一手不错的手艺，特别是能雕刻龙凤图案。家乡开展土地改革的那年，他参了军，加入了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在部队，他接到弟弟写来的一封信，信上说："你参军好几年了，也没见你立过什么功，村子里参军的人都有功了。老说为人民服务，可总得有点儿什么功呀。"

冷树国说这封信对他的刺激挺大。

一二四师穿插的目的地是济宁里。师长苏克之命令擅长攻击的三七二团为先头团，并主张将最硬的四连放在全团的最前面。四连连长名叫王清秀，打起仗来却没有一点儿清秀的样子，脾气十分火暴，在重机枪还没跟上来的情况下就要出发。王清秀的焦急是有道理的。天

还没亮，可是前面的枪声逐渐稀疏，可见敌人越跑越远了，而且还是乘汽车跑的，要凭两条腿追上敌人，那就得赶快再赶快！

王清秀对一排长说："你就只管往前冲！我带三排沿着公路两侧攻击掩护！"

已经极度疲惫的士兵在王清秀的带领下开始了不顾一切的追击。

联合国军在三八线上已经没有抵抗了，因此四连穿过三八线的时候，很多士兵并不知道他们的脚下就是那条朝鲜半岛上最重要的地界。

早上六时，也就是李奇微驱车在汉城外的公路上阻挡溃兵的时候，四连一排的一班到达一个叫巨林川的地方，这是他们在三八线以南遇到的第一个大村庄。侦察员报告，村庄里至少有一个营的南朝鲜军。一班长赵恒文想，要是等后面的部队上来，这些敌人也许就跑了，不如先冲进去打一家伙再说，敌人已是惊弓之鸟，一打准乱！

一个班的中国士兵向几百名南朝鲜士兵悄悄地接近着。

袭击敌人哨兵的时候，一个南朝鲜士兵逃脱，狂喊着往村子里跑。赵恒文喊了声"打"，中国士兵手中的轻武器开始射击了，手榴弹同时在村中爆炸，村庄里立即大乱。南朝鲜军官指挥士兵冲向村口，仓促组织起阻击火力，向黎明中山崖下黑暗的地方没有目标地胡乱扫射。赵恒文估计枪声一响，连长就会带领部队很快上来，于是扔下面前的敌人，喊："抄他们的后路去！"

到了村后，赵恒文吓了一跳，至少有一百多名南朝鲜士兵正沿着村后的公路逃跑，中国士兵一没留神，撞进敌人堆儿里了。只顾逃跑的南朝鲜士兵没有注意到进入他们中间的中国士兵，中国士兵被夹在逃跑的敌人的人流中。一个为了跑得更快的南朝鲜军官把皮鞋脱了，

光着脚和赵恒文并肩走着。满地都是敌人丢下的卡宾枪，赵恒文捡起几支，但很快就觉得这样不行，因为这样跑下去也许抓不到几个活的。于是，他猛地停下来，冲着天空打了一梭子子弹，大喊：“站住！”

南朝鲜士兵愣了，向公路边的沟渠轰然四散。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话一出口赵恒文知道自己说了中国话，就又喊了一句朝鲜语的“缴枪”。

被中国军队打昏了头的南朝鲜士兵一时不知该做什么好。

一个反穿着大衣的南朝鲜士兵站起来，在黑暗处小声地用中国话说：“你是中国人？”

赵恒文说：“没错！对他们说，倒背着枪走过来，志愿军不杀俘虏！”

那个南朝鲜士兵对黑压压的队伍说了一串朝鲜话，立即有二十多人过来投降。

赵恒文把他们带到公路边的一个农家院里，命令这些俘虏放下枪，然后把他们全部关在一间屋子里。完了事，赵恒文嫌抓到的人少，又让那个会说中国话的南朝鲜士兵再去公路上搜集人，又搜集了二十多个。

这时，天大亮了。院子里的南朝鲜俘虏看清了这里并没有多少中国士兵，那个咋咋呼呼的中国士兵也是个其貌不扬的人物，于是挤眉弄眼地看着赵恒文，看得赵恒文心里不免有些发毛。幸亏连长带着队伍赶来了。

赵恒文开始清点俘虏，整整五十人。赵恒文得意地想：这下子肯定当上英雄了。

冷树国对赵恒文羡慕得不得了。

连长王清秀急着要赶路，他要按时穿插到济宁里。

冷树国这回无论如何要当尖兵。二排副排长白文林带队，冷树国的五班跑在最前面。

山谷中的路是条沙石路面的小公路，弯弯曲曲地向南延伸。两侧是山崖，长满杂乱的树木。五班在这条路上往前奔跑的时候，两侧的树林中不断地有溃逃走散的南朝鲜士兵探出头来看，还不时地打上几枪。冷树国知道这一带已经被中国军队围住，就想，搜山的事让后续部队干吧，现在要紧的是按时赶到预定地点，自己一定要抓上他一大堆俘虏！于是，除了干掉了一辆往前沿运送电话线的南朝鲜军的卡车之外，五班什么也不顾地往前跑！饥饿和疲劳令冷树国的双腿有些软，他跑着跑着就觉得身体轻飘飘的像是随风在飞。一声爆炸声响之后，冷树国才停下来，他看见溃败的南朝鲜士兵用炸药炸毁了一座民房，民房边躺着一老一少两个老百姓，年少的那个大腿被炸掉，但人还活着，艰难地喘着气。

冷树国追击的速度之快，令担任三七二团先头连连长的王清秀都感到吃惊。王清秀担心跑在最前面的人人单力薄，遇到重大敌情不好办，于是带领部队拼命地跑，总想追上冷树国，但怎么也追不上。在穿插的路上，四连在追冷树国，二营在追四连，团主力又在追二营，弄得一直催促部队快速前进的一二四师师长苏克之甚至有点埋怨了，因为他看见在巨林川四连一下子解决了那么多敌人，就觉得前面的溃敌数量难以估计，他想让三七二团的主力尽快追上去，加强一下前面的力量。

冷树国的尖刀班一直跑在连队前面至少两公里。

白天，美军的飞机来了。但是，在通往南方的公路上，混乱地向同一方向奔跑着交战双方的士兵，美军飞机根本分辨不出哪些是溃逃的南朝鲜军队，哪些是追击的中国军队。两国的士兵都是一样的衣衫破烂，因此无法实施空中支援。美军飞行员不得不把飞机飞得很低，在双方士兵的头顶上不停地擦过，使得公路上的气氛更加紧张混乱。

前面的一个村庄叫道大里。冷树国停下来，这才发现自己这里一共只有五个人：副排长白文林，战士窦国斌、郭银锁、王二，加上他。

白文林让冷树国他们藏起来，自己前去侦察，结果发现道大里村里村外全是敌人，至少有四百多人。

他们追上的是南朝鲜军第二师三十二团的二营。

在巨林川，一班长赵恒文不就是这么打的么?

管他有多少敌人，就是要打！

打！

五个中国士兵分成两个组，从村子的两头摸过去。冷树国在一个土坎上抬起头，正好眼前的一辆卡车上坐着四个南朝鲜军官，司机已经发动汽车，看来他们要跑。冷树国跳起来，迎面开了枪，四个军官来不及还击就被打死了。这时，其他几名中国士兵的手榴弹也投了出去。

中国制造的木柄手榴弹爆炸时有种特别的响声，南朝鲜士兵们对此已十分熟悉。顿时，一个营的南朝鲜士兵陷入混乱。

冷树国冲进村庄里的小街。从一座小院子疾驶而出的一辆吉普车差点撞在他的身上。车上有部电台，天线很长，还有个身材高大的敌人：美国人！

穿插的这一路，冷树国还没见到美国兵，他扑了上去。

美国人一下子就把冷树国推倒了，然后向腰间去掏手枪。冷树国没等他掏出枪来，再次扑上去，死死地抱住他。美国人浑身颤抖起来，冷树国的手指抠进了他胸前很厚的肉。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力气，冷树国居然把这个美国人抱了起来，摔在车下。美国人被这个中国士兵的凶猛吓呆了，眼看着冷树国从自己的枪套中把手枪拔出来。

美国人的手举了起来。

木柄手榴弹的爆炸声令四连飞快地赶到道大里。

仅仅几分钟之内，南朝鲜军的一个整营便死伤几十人，被俘几十人，其余的全部溃散到山林中去了。王清秀还是没看见冷树国的影子。

五班在连队歼灭敌人的时候，又往前追击去了。接近中午的时候，冷树国五班的五名中国士兵到达一二四师穿插的目的地济宁里。从高处，他们看见小河边的公路上有几十辆汽车，还有牵引火炮的大型牵引车。

等后续部队上来?

不，冲上去！堵住他们！

冷树国已经冲上了那条小河。小河上的冰被他猛烈的动作踩裂，他掉进刺骨的河水中。对面的敌人发现了他，子弹蜂群般地飞过来。

冲！一定要向前冲！

敌人车队最前面的吉普车发动了，冷树国的子弹向吉普车射去。吉普车的轮胎立即被打爆，横在公路上，挡住了整个车队逃跑的路。

冷树国和白文林以及跟在他们身后的三名中国士兵，凶狠地向大群的敌人冲过去。敌人被这几名中国士兵的气势吓坏了，所有的卡车都在倒车，企图寻找逃跑的路，结果混乱地挤成一团。一辆卡车的车厢上落上了一颗中国的木柄手榴弹，立即引起巨大的爆炸。这是一辆装满弹药的卡车，冲天的气浪把几个中国士兵都掀倒了。在连锁的爆炸中，车辆的碎片漫天飞扬。冷树国在沟里抬起头，一种说不出的欢悦占据了他的整个心头。

等王清秀带领连队跟上来的时候，公路上已经布满敌人的尸体。

王清秀问："人都在？"

冷树国说："没有伤亡！就是没抓到一大堆俘虏让你看看！"

王清秀说："你这回要立大功了！一是穿插快，咱们师堵住了至少两个团的伪军；二是你不抓是不抓，要抓就抓个大个的！"

王清秀指的是与冷树国搏斗的那个美国人。经过俘虏甄别，那个美国人是南朝鲜军第二师的顾问，一个美国陆军上校。

没过多久，志愿军部队里开始流传着一个士兵的故事，说他的"11号"赛过了汽车轮子，追得美军顾问没处跑。

团长张景耀看见冷树国的时候，发现这个跋山涉水拼命追击敌人的士兵脚上竟然没有鞋，于是当场许诺一定给冷树国找双好鞋穿。

中国第四十二军一二四师三七二团四连五班班长冷树国被授予的荣誉称号是："追击英雄"。

和第四十二军同属左路纵队的第六十六军打得也很凶猛。其主力部队踏着两尺多厚的积雪，冲破敌人设置的重重火力，突破了国望峰、华岳山、高秀岭等高地，向南朝鲜军队的纵深快速穿插，协同第四十二军歼灭了南朝鲜第二师的三十一、三十二团和第五师的三十六团。第六十六军一九六师五八七团三连连长张续计，在突破国望峰阵地时，一人连续拿下敌人的五座堡垒，为部队开辟出前进的道路。五八六团四连的尖刀班，经过五个小时的殊死战斗，占领了华岳山，他们占领华岳山的时间正好是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零时，他们被授予了"首破三八线英雄连"锦旗。

到一月二日，中国军队的整个右翼纵队已经突入联合国军防御阵地纵深达二十至五十公里。

在李奇微最担心的汉城防线的正面，其一线防御部队是南朝鲜军的精锐部队第一师。这个师在除夕之夜陷入全面的混乱，天亮之后，师长白善烨发现自己的部队仍在继续崩溃，根本无法执行他下达的"有组织地撤退"的命令。中国军队强渡临津江的行动开始后不到一个小时，师右翼的十二团就打来"已经无法支撑"的电话，并随即开始撤退。江边的二线阵地刚刚开始收容失散士兵，又传来这个团的预备队已经被中国军队三面包围的消息。十二团一退再退，电台联系中断。好容易恢复了联系，团指挥所根本无法报告真实情况，只是说"四周都是中国人的锣、鼓、喇叭和军号的声音"。

第一师左翼的十一团因其右翼的崩溃，团长文亨泰说他们"必须撤退"。

作为第一师预备队的十五团，在中国军队攻击开始后不久，便看见十二团的士兵大量地拥入自己的防区。十五团团长给师长白善烨打电话，要求炮火支援，阻拦中国军队的攻势，并且说：“不管敌我，马上开炮！”结果，炮还没开，中国第三十九军的士兵就跟在十二团士兵的后面拥了过来。连同十五团在内，所有南朝鲜军第一师的阵地都没有坚持过午夜就垮了。十五团团长赵在美的解释是：“我们虽然得到一一五毫米榴弹炮的支援，但是敌人已经逼近阵地五十米，炮火支援已失去意义，阵地上很快进入了肉搏战。”

南朝鲜军战史对其第一师于一九五一年元旦那天的战斗有这样的记录：

在通宵达旦的激战中迎来了新年。辞旧迎新之际，敌人发动所谓“元旦攻势”，矛头指向汉城，而我军却不断撤退。

第十二团第一营昨夜被打散，在庚申里、碑石巨里附近重新集结，转移到莲谷里一带。第二、三营突围成功，但到东豆川西南又被敌人包围，再次被打散。

敌人同我军掉队人员混杂在一起，继续冲击过来，迫使我军继续后退。为支援后退的部队，第十五团副团长指挥的补充队，由龟岩里前出到二九五高地附近，但遭到敌人猛烈的袭击，队伍被打散。第三营的六连要求炮兵的支援，但由于敌我距离太近，又难以观测而未成，结果一八〇高地失陷，六连出现大量的伤亡。敌人又攻击五连，该连连长阵亡。最后这个连弹药耗尽，全连彻底被打散。

营长崔炳淳中校集合起约一百名人员，会同搜索连和工兵连，移至一高地，决心阻击敌人。但敌从一八〇高地出击，向补充连阵地攻击，用刺刀和手榴弹展开白刃战。敌人夺取了该高地。

第十一团的一营，从昨夜起就一直受到敌人的威胁。当敌人从积城南下，突破第三营的防御阵地攻击到马智里时，营长命令第一、第二连撤退。第三营改变防御方向，同第十五团二营衔接阵地，决心阻击敌人。就在这个时候，师里的撤退命令下达了。因此，从那时起，全团开始分阶段迟滞敌人。

是日，师司令部由新山里移至汉城市碌番洞。

突破汉城正面防御阵地的是中国第三十九军的士兵。

负责汉城正面防御的南朝鲜第一师，在中国军队打响第三次战役的第二天，就把指挥部一下子撤到了汉城市区，由此可以想象到这个南朝鲜军的精锐师溃逃的速度是何等的快。由于南朝鲜军队迅速溃败，在第二线防御的美军暴露在中国军队的攻击下了，美军第二十四、第二十五师和英军第二十九旅因此损失严重。

中国第三十九军突破临津江之后，昼夜急促追击当面的南朝鲜军第一师，其先头部队于回龙寺与美第二十四师的二十一团遭遇。在歼灭美军一部后，他们又在议政府以西的釜谷里围住了英军第二十九旅的两个连。

釜谷里，中国第三十九军的军史中一个十分显眼的朝鲜地名。

这是个距离南朝鲜首都汉城仅三十公里的小镇，是通往汉城公路上的一个重要的三岔口。中国第三十九军一一六师三四七团奉命迅速占领这个地方。全团立即分四路以强行军的速度前进，催促其前进速度的传令兵一个接一个地到达。三四七团有的士兵在极度的奔跑中昏倒，实在跑不动的伤员就躺在公路边等待收容队。短暂的“原地休息”的命令一下达，士兵们就躺在雪地上胡乱抓几把雪塞进嘴里。

在接近釜谷里的一个高地上，团长李刚召集营长们开会：“这是一场艰苦激烈的战斗，但我们必须把敌人卡在这里，等待主力的到来！”

此时，包括团长李刚在内，三四七团并不知道，守在釜谷里的军队已不是南朝鲜军了。

三日黎明，三四七团到达釜谷里。当地的一个老百姓说，这里的敌人是一个联队。因为三四七团一直认为这里只有南朝鲜部队，所以把“一个联队”听成了“一个连队”。在经过初步的研究之后，一营副营长傅学君带领三连冲了上去。激烈战斗的时候，傅学君觉得仗打得有

点不对劲儿，没过多久他就明白了：这里并非仅有“一个连队”，而是整整的一个团；与中国军队交战的不是南朝鲜军，而是英国人！

三四七团遭遇的是英军第二十九旅的皇家来复枪团。第二十九旅是英军中的精锐部队，是著名将领蒙哥马利的部队，二战中参加过诺曼底登陆战役。皇家来复枪团以擅打阵地战闻名，其官兵的军服上都佩戴着这个团的标记：一只绿色的老虎。

傅学君立即从阵地上撤下来向团指挥部跑。

天色已亮。英国人发现了他，并向他射击，他的胳膊中弹。他跑进一间空屋子里简单地包扎了一下，继续向团指挥所跑。英国人的火力继续追着他，他的腿也中弹了。等他坚持跑进团指挥所的时候，已浑身是血。他向团长李刚报告了真实的敌情。

这时，二连已经占领了一个小学校，歼灭了一个连的敌人，并且抓了三百多名英军士兵，这些俘虏被关在小学校里。现在二连正与英军对峙着。

又有消息传到团指挥所：在前边的七连副连长王凤江牺牲！

就是那个在渡大冰河的时候，站在齐胸深的冰水中，把他的士兵一个个托上冰层的王凤江。

在与英军交战的前沿，王凤江看见团副参谋长上来了，大喊一声：“五号！你下去！这里太危险！”话音还没落，一发炮弹几乎是在他的身边爆炸了，一块弹片削进了他的头部。

王凤江，中国东北地区的农民，参军后在第三十九军所历经的多次残酷的战斗中，他成为立战功最多的人。

王凤江牺牲后，他的战友在这个中国军队著名的英雄身上只找到两件东西：别在上衣兜上的一支用旧零件凑起来的自来水笔和口袋里几粒充饥的板栗。

三四七团面临的局面十分严峻。

釜谷里是个洼地，三面是山，控制着由议政府通往汉城的公路和一条铁路。英军第二十九旅的这个“绿老虎团”已经占据着这里的有利地形，准备一旦战局有变掩护其主力向南撤退。

天上的飞机来了，地上的坦克出动了，英军开始向三四七团的阵地反击。

三四七团的几个连队伤亡巨大，眼看着就要顶不住了。

一一六师全师公认的又年轻又有文化的参谋长，二十八岁的薛剑强，一直跟随着三四七团打到釜谷里。他在前沿与师长汪洋通电话的时候，声音很焦急：“抓了三百多俘虏，是英军二十九旅的！都在小学校里憋着呢！快让三四八团上来！”

就武器装备来讲，英军占绝对的优势，因此与英军对峙，战斗空前惨烈。而且，三四七团是夜晚打进釜谷里的，天亮后才发现，几个重要的制高点没有及时占领，它们对中国士兵构成了巨大威胁。战斗到中午，三四七团与师指挥部的电话和电台联系断了。下午，军电台转来一封电报，说三四七团伤亡很大。师长汪洋急了，带上参谋上了前沿，他们直接上到三四七团的阵地，汪洋师长刚上阵地，就看见担架抬着薛剑强下来了，薛剑强的警卫员仍在哭。

一一六师年轻的参谋长已经牺牲。

必须把英军阻击在这里，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

团长李刚决定把七连派上去，把卡在公路上的一个制高点拿下来并且守住它。控制了这个制高点，英军就等于被关在了釜谷里的这块洼地里。

七连连长厉凤堂和指导员张鼎先带领部队首先控制了公路边上的那个小学校。他俩爬上学校的墙头往公路上一看，黑压压的一大片汽车。厉凤堂知道，汽车是敌人的命，逃跑全靠这玩意儿，守住公路和守住汽车，敌人就绝对跑不了。于是，他带领战士迅速抢占公路边的小高地，刚刚把这个高地占领，还没喘口气，英军就攻上来了。

七连，这支由中国工农红军发展至今的连队，它生死攸关的时刻到了。

对于英军来讲，这个高地关系着他们的生死。

英军的炮火极其猛烈，高地上一尺多厚的雪立即变成了发烫的泥水。没有办法修筑工事和掩体，中国士兵们就在泥水中抗击着英军士兵的一次次进攻。弹药很快打完了，指挥所派出的送弹药的士兵全部死在了路上，英军密集的火力把高地通往团指挥所的路严密封锁了。

很快，指导员张鼎先牺牲。接着，排长们也全部牺牲。当重机枪被打坏时，连长厉凤堂负重伤倒下。阵地上没有干部了，厉凤堂在血泊中看着给他包扎的司号员郑起已经说不出话来，但郑起明白连长的眼神，连长在对他说：去指挥战斗。

郑起对奄奄一息的连长说：“放心，阵地由我负责，坚决守住！”

郑起最崇拜的人就是副连长王凤江，突破临津江的前一天，在隐蔽洞里他和他崇拜的人聊了很长时间。从他知道王凤江牺牲的时候起，他便觉得自己永远地失去了什么，心口一直在疼。

郑起集合起阵地上的人，一共还有十三人能坚持战斗，其中有六名共产党员。

郑起把十三个人分成几个战斗小组。有的人建议指挥员的位置要靠后，郑起不同意，他知道连长就是靠前指挥战斗的，他也要在最前面。并且指定了在他牺牲后接替他指挥的人。

英军在数门迫击炮的轰击之后又开始了进攻。公路上的坦克把炮口对准这个高地进行瞄准射击，英军士兵成散兵队形一排排地向高地上爬来。

郑起在阵地上奔跑着：“打！打！打胜了明天进汉城！”

在打退英军的几次进攻后，郑起发现阵地上没有子弹了。他决定去敌人的尸体中搜集子弹。

郑起在英军士兵的尸体中爬来爬去。英军的机枪几乎是跟着他的身影来回射击。他不断地跳进弹坑躲避，最后他用树枝把自己的军帽挑起来乱晃，帽子被子弹打得碎片横飞。

郑起从敌人的尸体中背回来十几条子弹袋和一堆手榴弹。

在他分这些弹药的时候，发现又有六个人牺牲了。

高地出现了令人不安的寂静。

公路上，英军的汽车还在，汽车上坐满了英军士兵。

由于这个高地还在中国军队手里，英军仍然无法逃走。

郑起把干粮袋中的最后一点儿干粮给大家分了，然后等待着最后时刻的到来。

英军发起了最后一次进攻，六辆坦克参加了向高地的冲击，而步兵人数是前面数次进攻的几倍。

等到已经能把英国人的钢盔看得很清楚的时候，郑起发出了开火的命令。

阵地上仅剩的七名中国士兵几乎是同时站起来开枪了。郑起一边扔手榴弹一边喊:“阵地是同志们用血换来的！不能让敌人夺去！”

英军士兵已经拥上阵地，所有的中国士兵都端起了刺刀。

突然，郑起跑向阵地上最高的地方，站在那里，举起了自己的小铜号。他用尽力气，把这把军号的最大音量吹了出来。

突然出现的号声令英国士兵疑惑了一下，然后他们立即转身向后跑。

正准备迎接死亡的中国士兵感到奇怪：就快占领高地的敌人听见号声，突然停止了射击，大祸临头似的向下狂奔！

在三四七团指挥所一直紧张地观察这个高地动向的人也迷惑不解：这军号声是什么意思？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郑起一遍一遍地吹着军号，一直吹到嘴唇出血，一直把敌人吹到公路上。

公路上已经起了大火，英军的汽车在三四七团主力的打击下开始燃烧。

七连，以几乎全部伤亡的代价，在这个高地上坚守一天一夜，终于等到了主力部队，把英军第二十九旅的皇家来复枪团的一个营歼灭在这里。

今天，英军皇家“绿老虎团”的团旗，陈列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里。同时陈列的，还有郑起在阵地上吹响的那支小铜号。

釜谷里的战斗结束一年以后，郑起应邀回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在北京参观了几天之后，九月三十日，郑起接到一个红色请柬，上面写着：敬请光临——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

在中南海的怀仁堂，毛泽东宴请两千多名各界来宾，共庆新中国诞生三周年。

毛泽东所坐的桌子是一百号，郑起坐的桌子是六十六号，由于排列的原因，郑起和毛泽东仅仅相隔一张桌子。

十九岁的郑起，出生于一个苦命人家，两岁时父亲去世，三岁时母亲改嫁。他要过饭，放过猪，要不是参了军，他根本不知道人吃饱饭是什么滋味。

郑起端着一杯酒，走向毛泽东。

他说：“敬毛主席一杯酒。”

毛泽东问：“是志愿军的代表？”

郑起说：“是，从前线来。”

毛泽东放下酒杯，拉起了这个年轻士兵的手。郑起回到朝鲜的战壕后，对他的战友们说，毛主席的手热热的，又厚又软。

一九五一年一月三日，中国军队全线逼近汉城。

这时，中国志愿军部队中开始流行这样一支歌：

志愿军不怕困难多，

经得起寒冷经得起饿。

两条腿撵上四个轱辘，

翻了高山过大河。

不怕美国反击凶，

隐蔽好了它炸不着。

不管飞机满天飞，

照样开会照样唱歌。

朝鲜人民军一起干，

朝鲜游击队来配合。

美军的防线ABC，

一攻就是全线突破。

志愿军不怕困难多，

经得起考验经得起磨。

不到胜利不停休，

不赶走美帝不回国。

## “到汉城去！汉城有姑娘！”

一九五一年一月三日上午，志愿军司令部情报参谋跑进彭德怀的指挥部，报告说他们在美军的无线电报中截听到了美军准备从汉城撤退的对话。

彭德怀立即电令右翼纵队的第三十九、第五十军以及北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迅速向汉城攻击。

战役开始以来一直困扰着彭德怀的悬念消失了：联合国军并不准备在汉城以北地区组织防御以死守汉城。

彭德怀知道，中国军队对汉城的占领，将是一个震惊世界的事件，因为那里是南朝鲜的首都。对于中朝军队来讲，这是取得抗美援朝战争重大胜利的一个标志。

但是，与此同时，彭德怀的心中还是有一丝说不清楚的不安。

在高阳以北大约两公里的一个叫碧蹄里的小村，中国军队第五十军遭遇了美军第二十五师三十四团一个营的阻击。第五十军的两个连对美军阵地发动了凶猛的进攻，战斗仅仅进行了二十分钟，美军便被俘二十八人，其余的全部丢下阵地向汉城方向退去。由于美军撤退的速度很快，与美军协同作战的英军很快就发现自己已经暴露在中国军队的包围和攻击中了。一个营的英军在高阳东南的仙游里高地受到中国军队的围攻，三十分钟后，英军士兵也丢下阵地跑了。由于这个高地对于迟滞中国军队对汉城的占领至关重要，且英军第二十九旅的一个重坦克营会因为这个高地的丢失而被切断退路，所以，三日整整一天，从议政府方向调来的英军达一千多人，他们配合从高地上退下来的士兵，在两百多门大炮的支援下，对中国军队占领的阵地进行反复的攻击。中国军队的阵地前布满了英军士兵的尸体，中国士兵以视死如归的血战坚持在阵地上。进攻的英军士兵看见在这个几乎被炸平的高地上，打不死杀不绝的中国士兵戴着从死亡的英军士兵头上摘下来

的钢盔，在烈火硝烟中时隐时现地呐喊拼杀，这种亦真亦幻的情景实在令他们心惊肉跳。

英军士兵在整个朝鲜战争中，神差鬼使地始终走着厄运。他们或是在美军的指挥下被派往进攻的第一线，迎接中国军队猛烈的第一波进击；或是在撤退中被美军甩在身后，与追击的中国军队进行残酷的胶着战。这次，当英军意识到美军已经溜之大吉，不会返回来接应他们，再不跑很可能来不及了时，他们便开始了快速的撤退。他们认为凭着自己机械化的运输装备，中国士兵的两条腿是绝对追不上的。况且，他们那支装备着曾在二战中让德国人吃尽苦头的"百人队长式"坦克的坦克营，一定会给仅仅只有轻武器的中国军队一点颜色看看。

但是，他们不曾想到，这恰恰决定了英军第二十九旅著名的"皇家重坦克营"悲惨的命运。

四川籍士兵李光禄是中国第五十军的一名爆破手，他白天跟着连队在荒凉的小路上急行军，小路上不见一个人影儿，他心里嘀咕：不是在追击敌人吗，是不是走错了路？这条道哪像是有人走过的？正想着，前边传下一串命令：

"准备好爆破筒！"

"准备好炸药！"

"爆破手上来！"

李光禄跑到前边，排长说："闻到汽油味了没有？现在我们正在小道上和公路上的敌人并排着比速度，要超到敌人的前边去！要准备打铁家伙！"

在不停地翻山越岭之后，连队进入一条山谷，山谷里铺满白雪，一条公路黑漆漆地卧在白雪中间。

连长说，这个地方叫佛殊地。

在公路边埋伏好，中国士兵一律反穿棉衣，棉衣的白里子使他们趴在雪地上不容易被发现。向南急行军时出的汗把棉衣湿透了，现在掉头向北趴着，西北风一吹，棉衣立即冻得铁板一样硬。李光禄觉得很冷，还很饿，肚子咕咕地响个不停。他抓起一把雪塞到嘴里，并把腰带系得更紧一些。一个念头总是缠着他：我们在这里等什么？我们是不是已经在敌人的前面了？好像是有股什么味儿，是汽油味？

正想着，北面公路拐弯处闪出一道灯光，然后是一长串的灯光。大地一下子颤抖起来，传出轰隆隆的声音。

敌人的坦克！而且很多！

突然，坦克队伍前边的一辆吉普车起火了。

埋伏在雪地里的中国士兵开火了。接着就是猛烈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

山谷被火光照得通红。

坦克向中国士兵冲了过来。

李光禄不由得万分紧张。当炸坦克和汽车的爆破手，是他自己要求的，而且还表了“把敌人的坦克炸成死乌龟”的决心。说是那么说，可真的要炸坦克，李光禄从来没干过。听说坦克刀枪不入，专门往人身上压，一压人就成了一块肉饼。没有胆量的人看见那东西稀里哗啦地开过来，吓也能吓得半死了。这时，身后二排的机枪响了，打在最

前面的那辆坦克身上，像敲小锣似的叮叮当当乱响，而坦克不在乎地呼啦啦开过去了。

李光禄手心出汗了，正骂自己这个爆破手怎么能让敌人的坦克从眼前就这么开过去的时候，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响起来，接着就是指导员的声音:

“同志们！三班长周士杰已经炸坏了一辆坦克，向三班长学习呀！”

李光禄一个鲤鱼打挺，抱着炸药包和爆破小组的人一起冲了上去。

敌人的第二辆坦克停下来，转动着炮塔四面射击。

小组中的杨厚昭首先拿着爆破筒向坦克扑上去。他想从稻田斜着接近公路，稻田离公路的路面有两米高，全是雪，他爬了几次都滑了下来，最后跟着坦克跑了几步，才上了公路，并且把爆破筒塞进了坦克的履带里。但是，还没等杨厚昭卧倒，坦克履带就把爆破筒甩到稻田里爆炸了。接着，小组的刘凤岐又上去了，这次他拿的是一个大炸药包，足有十斤，他上了公路，把炸药包放在坦克前面的路面上，点燃了导火索。但是，炸药包还没爆炸，坦克就碾了上去。

李光禄知道要看自己的了。

他抱起一个更大的炸药包爬上公路，他把身体尽可能低地贴在地面上，眼睛盯着前面的坦克。坦克走几步，停下来射击，然后再走几步，钢铁的履带压在冻得坚硬的地面上，吱吱咯咯地冒出火星。浓重的汽油味扑过来，让人喘不过气来。坦克机枪射击时迸出的弹壳下雨似的四处乱溅。李光禄第一次在这么近的距离看这钢铁的东西，他感到这东西是那么的巨大。他在地上滚动，避免这钢铁的家伙压到自己

身上，他在脑海中不停地算计着导火索燃烧的时间和坦克的速度，以盘算出炸药包放置的位置。最后，李光禄把导火索一拉，将炸药包向他算计好的位置一推，翻身滚到稻田中。就在他的滚动还没有停止的时候，只听得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李光禄觉得自己被抛起来又摔下去，顿时昏了过去。

李光禄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醒来的时候，他觉得胸口剧烈地疼痛，浑身像散了架一样，嘴里很咸很苦。吐出几口鲜血之后，他趴在地上啃了两口雪，这才清醒了一些。他倒在稻田中的碎冰上，身上还压着一大块冻土。他向公路上看去，一团巨大的火焰在熊熊燃烧，呛人的浓烟贴着地面滚动。他爬起来，看见这辆坦克冒着火斜在路边上，后面不远的地方，还有一辆坦克在燃烧，不知是被谁炸毁的。

佛殊地山谷在短时间里就变成了一片火海。爆破筒、炸药包和手榴弹爆炸发出的闪光连成一片。公路上和稻田里，几辆坦克已经着火，其他的坦克乱哄哄地到处乱开，它们互相碰撞，发出很大的撞击声。爆炸声和喊杀声在山谷里回荡，到处是奔跑的人影。

李光禄又抱起一个炸药包向一辆坦克冲过去。

突然，他听见刘凤岐在喊:“没有炸药了！”

李光禄往指挥所跑。

在指挥所里，营教导员看见李光禄浑身是血。

“你负伤了！快包扎！”

李光禄说:“我要爆破器材！”

这时传来营长的喊声:“快看，一个大家伙！”

李光禄顺着营长指的方向看去：一辆他们从没有见过的特别巨大的坦克正开过来，速度很慢，看上去像一座山包在移动。坦克停了一下，炮管中突然喷出一道光芒刺眼的火，顿时，公路边的一间茅屋燃烧起来。

这是英军第二十九旅“皇家重坦克营”的巨型喷火坦克。

李光禄抓起一个炸药包和几个手榴弹，朝那个大家伙冲过去。

他一下就跑到了巨型坦克的面前。

李光禄愣住了。现在再看，这辆坦克实在是太大了，手上五斤的炸药包肯定不管什么用。他围着这个大坦克转了一圈，然后一纵身，爬了上去。在喷火坦克的护板上，他立即感到火焰般灼热的烘烤，脸如同被剥了一层皮火辣辣地疼，坦克上每一个地方都滚烫滚烫的。他向上看，坦克炮塔的顶盖开着半边，将身体挪上去看，看见里面有两个英军士兵。坦克边开进边疯狂地转动炮塔，李光禄不顾烫手，紧紧地抓住坦克上的一个铁环，另一只手安放炸药。从坦克中射出的一串子弹从他的腋下飞出。

突然，一个巨大的声音在他耳边响了起来，而且说的是中国话，把李光禄吓了一跳。

“中国人！到汉城去！汉城有姑娘！”

这辆巨大的坦克上安装着广播喇叭！

李光禄用嘴拉着导火索，然后纵身跳下来。

“投降吧，中国人……”

闪电过后便是一声霹雳。

巨大的火球包裹了巨型坦克。

当李光禄再次苏醒后，他艰难地爬向一辆小得多的坦克，并把它炸毁。这是一辆装载着燃油的坦克，坦克爆炸的时候，汽油溅了李光禄一身，他成了一个火人，身上的棉衣被烧透。他扑打着，越扑打火燃烧得越猛烈。在窒息和疼痛中，他在雪地上滚来滚去。其他的士兵都跑来帮他，火被扑灭了。

在担架上，李光禄想着他的棉衣，心直疼。天这么冷，棉衣没有了怎么再去炸坦克?

这天晚上，英军引以为自豪的“皇家重坦克营”的三十一辆坦克被中国士兵用最原始的爆破手段击毁了。

中国军队对汉城的弧形包围在一九五一年一月三日上午基本形成。

李奇微要么坐着吉普车，要么换乘联络飞机，他在各个前线师的阻击战场间跑来跑去，和所有的军长、师长就战局交换着意见。这时，有情报说，汉江的南岸也出现了中国军队渗透的迹象。于是军长和师长们异口同声地说，一线部队的抵抗能力已经到达相当的限度，在汉城以北重新组织防御几乎是不可能了，现在唯一应该做的是继续撤退。而且从整个战略上考虑，必须放弃汉城，在汉城以南预定的防御线上再组织有效的抵抗。

麦克阿瑟下达了放弃汉城的命令，各部队撤退的目标和任务是:

一、美第二十五师，并配属英军第二十九旅撤退下来的部队，在汉城外围占领收容阵地，担任第一线部队的收容和渡江掩护任务;

二、美第一军和第九军平行撤退，占领水原至杨平一线的阵地;

三、美第十军并指挥南朝鲜军第二、第五、第八师，确保杨平至洪川一线的阵地，解散南朝鲜第二军团，其所属各师归美第十军指挥；

四、南朝鲜第一军和第三军确保洪川至注文津一线阵地；

五、美第三师转移到平泽附近，美骑兵第一师转移到安城附近。

从这个命令中可以看出，联合国军的撤退不仅仅是放弃汉城，而且是大踏步地撤退，一直撤退到三七线附近。

李奇微在日记中对朝鲜战争中的这次撤退有这样的说明：“我本来就知道，在中国军队竭力发动进攻的时候，汉城是不能长期保持住的。第八集团军的方针是尽可能给敌人以更多的损失，接着就迅速脱离，后退到新的方向上去。”

但是，李奇微知道，从汉城撤退是一次极其危险的军事行动：把汉江以北的大量部队和各种坦克、火炮和车辆撤过乱冰堵塞的汉江时，一旦受到中国军队的拦截和被迫在汉江边上进行决战，联合国军的损失将是巨大的，其后果绝对是灾难性的。

为此，李奇微把放弃汉城的决定向美国驻南朝鲜大使穆乔通告，并且请他立即通知李承晚，要求南朝鲜政府目前仍然留在汉城的机构必须在下午十五时以前撤离汉城。自下午十五时之后，汉江桥和所有的交通要道仅供军队使用，民间的一切行人和车辆一律禁止通行。

没过多久，穆乔在电话中传达了李承晚对李奇微的质问：“李奇微将军讲过，他是准备长期留在朝鲜的，可他到朝鲜上任才一个星期就要从汉城撤退，难道他的部队只会撤退吗？”

李承晚的后一句话刺痛了李奇微："告诉那个老头儿，我现在是从汉城撤退，而不是离开朝鲜！"接着李奇微又说，"让他看看他的军队是怎样在中共军队的进攻面前像羊群一样溃逃的吧！"

放下电话，李奇微任命美骑兵第一师副师长帕尔默准将为交通协调组组长，特许他以第八集团军司令的名义行使交通管制权，特别是对汉江大桥的管制。李奇微知道，如果汉城几十万的难民与他的军队同时争抢撤退的道路，那情景将是他的对手最希望看到的。

汉城，这座有一百五十万人口的城市，在五个月之内，第三次变换了它的主人。

而且，在麦克阿瑟下令放弃汉城约七十天后，联合国军又重新占领了这座城市。

短短的时间内，反反复复地在战争双方间易手，作为一个首都城市，汉城的遭遇在世界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普通的百姓再一次成为战争最深重的受害者。

在北朝鲜军队第一次攻进汉城时，汉城五十万人逃离了这座城市。虽然随着战局的变化，不久前已有十几万汉城市民逃离，但仍然有一百万市民估计联合国军绝不会放弃汉城——世界上没有人愿意抛弃自己的家而逃亡。因此，当李承晚宣布"迁都"的时候，汉城又一次陷入巨大的混乱之中。至少有一半的市民——大约五十万人决定再次逃亡，因为他们相信李承晚政府这样的宣传：共产党军队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南朝鲜政府的官员、军队的将军和普通军官的家属们更是不顾一切地把家产丢下，乘坐一切可以乘坐的交通工具向汉江南岸逃去。

一九五〇年六月汉城大逃亡的情景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又一次出现了。

十五时之前，允许难民通过美军在汉江上临时搭建的两座浮桥。

汉城几十万难民背着包袱，扶老携幼，争先恐后地向汉江边拥去。狭窄的浮桥由于挤满了车辆和人流而摇摇晃晃，其通过的速度极其缓慢，不断有人被挤下浮桥掉在布满浮冰的江水里，凄凉的叫喊声在寒冷的风雪中令人毛骨悚然。尽管一部分难民从仁川被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荷兰的船只接走，同时联合国救援机构尽全力向难民分发食品、衣服，并提供医疗和收容服务，但有幸得到帮助的仅仅是难民中的极少人，大部分难民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在越来越近的炮火声中惊恐地走向未知的前方。

李奇微亲自在汉江桥头指挥部队撤退。

十五时已过，帕尔默准将坚决地执行着李奇微的命令，难民已经不允许在桥上通过。为执行这个命令，宪兵甚至向难民开了枪。

李奇微是这样记录自己看见的情景的：

在军用桥的上游和下游，演出了一场人类的大悲剧。在刺骨的寒风中，难民们纷纷从冰上渡江。由于冰上很滑，他们连滚带爬地向南逃命。紧抱着婴儿的母亲，背着老人、病人、残疾人的男人，扛着大包袱的和推着小型两轮车的人们，从江北岸的堤坝上突然跑下来，从冰上横穿过去。其中，有的赶着高高地堆着行李和载着孩子的牛车走去，公牛几乎将四条腿悬空，沉入薄冰里。于是，人流发生了极大的混乱。没有人去扶助那些跌倒的人。在这悲惨的逃难中，谁也没有时间去帮助邻居。没有人流泪哭泣，只能听见在冰上走路的痛苦的喘息声。

作为一个美国人，李奇微本能地想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居然在那一瞬间如此清晰地浮现，为此，他对自己想到的问题不寒而栗：

如果美国有两百万市民受到严寒和原子弹攻击的威胁，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如果两百万市民被禁止从道路上通过，武装宪兵命令他们“必须下车往山冈上逃命”，他们将怎样保

全生命呢？韩国的国民比较顺从，习惯于听从命令，而且有克服困难、自求生存的坚忍性。可是，美国人体力弱、任性、主张权利、缺乏克服困难的魄力，这样的人，遇到这种悲惨情况的时候，将会以什么方式保护自己呢？

在联合国军向汉江南岸撤退时，汉城市区内则进行着规模巨大的破坏活动。

在南朝鲜最大的国际机场金浦机场上，来不及运走的大约五十万加仑航空燃料和三万加仑凝固汽油弹被点燃了，巨大的火焰和浓烟笼罩在汉城的上空。刚刚在“石竹花”行动中运到南朝鲜的各种军用物资堆积如山，本来的转运计划被中国军队迅速的推进所破坏，于是只有就地销毁。“没想到前沿阵地就维持了一支烟的工夫！”美第八集团军的后勤军官们抱怨说，“五十万加仑的燃油烧起来是个什么情景？地狱一般！”

向汉江南岸撤退的南朝鲜士兵的心中同样是一片茫然。

南朝鲜第一师师长白善烨在撤退途中遇到美军第一军军长米尔本，他问：“您认为，这场战争的未来究竟会怎么样？”

“我不清楚。”米尔本说，“我们只是按命令办事。我们不知道对方的情况，所以不知道情况会怎样变化。我认为，在最坏的情况下，联合国军很可能撤退到日本去。”

“美国人要跑回日本去！”这句话传到南朝鲜军队和百姓之中，所引起的复杂情绪难以言表。

夜晚来临了。

美国记者这样描述了那天夜晚的汉城：“警察已经撤走，汉城成了掠夺之城。巨大的黑烟在寒风中飘动，喧闹的机枪声响彻夜空。”

在汉江桥上，联合国军仓皇撤退。汉江冰面上难民涌动的时候，中国军队正在向汉城的正面攻击，汉城市郊已经出现了中国士兵的身影。在中国军队攻势的左翼，一支部队已经到达汉城以东的横城。

深入横城的中国部队是由第四十二军一二四师副师长萧剑飞率领的三七二团。这个团在横城附近一个叫静冰厅的小村遇到了停在公路上的两辆敌人警戒车，短促的战斗后，从俘虏的口中得知，这是美第二师三十八团派出的一个侦察营。

两军遭遇，三七二团没有迟疑，立即扑了上去。

正在居民家睡觉的美军士兵对突然的袭击没有防备，中国士兵逐屋扔进手榴弹，再用步枪和机枪扫射，美军士兵顿时血肉横飞。负责攻击美军炮兵的中国士兵动作迅速，美军士兵不知道到底来了多少志愿军，逃窜中大部分被打死。占领村庄四周高地的中国士兵立即与美军的警戒部队交了火，由于中国士兵冲得猛烈，两国士兵随即进入到面对面肉搏战的状态。

这场遭遇战惊动了李奇微，因为横城出现了中国军队的主力，说明美军左翼溃败的速度比他预料的要快得多。

一月四日，最先进入汉城市区的是中国第三十九军军侦察队的侦察兵，他们看见在到处冒着烟和火的街道上有一些市民正往墙上贴写有“欢迎中国志愿军”汉字的标语。这些标语覆盖在那些写有“欢迎联合国军”的英文标语之上。

他们立即向指挥部报告了情况。

指挥部命令第三十九、第五十军和北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立即占领汉城。

第三十九军的先遣部队之一，是由副团长周问樵率领的一一六师的三四八团。还在第二次战役的时候，一一六师师长汪洋提出一个问题：白天小部队能不能运动？当时周问樵就表示“个把连队还是可以的”。第三次战役开始后，由周问樵率领的先遣队一直走在主攻部队的前面，死死地跟在联合国军撤退部队的后面。他们走小路，躲敌机，在没有出现一个士兵伤亡的情况下，几乎是跟着敌人的后脚跟进入了汉城。

这支进入汉城的中国部队立即被一群说中国话的市民包围起来。汉城的中国华侨大多数是山东人，熟悉的胶东口音让中国士兵们感到亲切而激动。这些中国华侨向中国士兵诉说美军是怎样逃跑的，并且表示愿意提供中国士兵所需要的一切。

周问樵带着警卫员直接走进了李承晚的公馆。他对南朝鲜总统的家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在李公馆里，他看见了世间最富丽堂皇的房子：客厅、卧室、餐厅、书房、钢琴、落地的绸缎窗帘，还有衣柜中上百件华丽的衣服，上百双皮鞋。公馆里的落地收音机居然还开着。

他命令报务员给师长发报，说他“进来了”。

他走进李总统的盥洗室，火盆中的火还在燃烧，四处的墙壁光滑闪亮。

他脱下衣服，一抖，大个小个的虱子掉在火盆里，噼啪乱响。

这个满脸泥垢，头发粘连在一起，皮肤粗糙而僵硬，浑身散发出一种刺鼻子的汗酸味和浓重的火药味的中国军人，在越过了无数的荒山野岭和历经了无数惨烈的激战之后，终于躺在了南朝鲜总统热水荡漾的浴盆里。

收音机里传来“美国之音”播音员描述南朝鲜军队战绩的声音：“国军给予共军重大杀伤后安全转移。”

报务员走进来，说师长要和他讲话。

汪洋问：“你现在哪里？”

周问樵说：“李总统公馆！”

志愿军总部立即颁布了《入汉城纪律守则》，它以电报的形式向志愿军入汉城部队颁布。其主要内容为：

一、迅速肃清残敌，镇压反抗的反革命分子；

二、维护城市治安，恢复革命秩序，严禁乱捕乱杀；

三、保护工厂、商店、仓库等一切公共建筑；

四、保护学校、医院、文化机关、名胜古迹等一切公共场所；

五、对守法的教堂、寺院、宗教团体一律不加干涉；

六、不干涉守法的外侨，不侵入外国使馆，为防止意外，外国使馆可以派军队进行保卫；

七、向市民宣传胜利，宣传防空、防特、防火，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不得随便进入民房；

八、凡入城部队必须自带三至五天的粮食、蔬菜，严禁抢购物资，乱买东西；

九、切实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注意军容风纪和清洁卫生。

五日，在朝鲜半岛上的两个重要的城市——平壤和汉城，各有二百四十门大炮同时鸣放二十四响礼炮，以庆祝对汉城的占领。

对于中国士兵来讲，这是一个非常的时刻。

在这之前的漫长的中国战争史中，从没有任何一名中国士兵武装进入到任何一个异国的首都之中。

在这之后，一直到今天，也没有。

李奇微撤离汉城的时候，并不是很匆忙。直到担任后卫的美军撤退后，他才离开他的指挥部。他收拾起桌上的那张全家福照片，把他平时穿的那件睡衣钉在了墙上，然后在旁边写下一句话：

“第八集团军司令官谨向中国军队总司令官致意！”

## 一瓶牙膏主义

中朝军队三十多万官兵，冒着狂风暴雪，在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严寒中，流血牺牲，忍饥受冻，克服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连续八昼夜不间断地攻击，把战线向南推进达八十至一百公里，其前锋已经到达三七线。

一九五一年一月五日，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也是新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人民日报》第一版显著位置的大字标题是：《朝中军队发动新攻势，光复汉城向南疾进！》。同时，《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祝汉城光复》的社论：

> 汉城的光复，又一次证明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强大。美国绝对优势的空军、海军、坦克和大炮，在伟大的中朝人民军前面，无论在进攻和防御中，都已证明无能为力。中朝人民军今天已经向全世界表明了自己是强大的和平力量。他们完全有力量消灭与赶走美国在朝鲜的侵略军，恢复朝鲜的和平。

社论最后用前线指挥官的口气这样号召：

> 向大田前进！向大丘前进！向釜山前进！把不肯撤出朝鲜的美国侵略军赶下海去！

胜利的消息令中国百姓欢喜若狂，奔走相告。如果说在朝鲜战争开始的时候，中国的普通百姓还对自己的军队是否应该到异国去打仗、是否是强大的美国军队的对手持有一些怀疑，两个月之内三次战役的连续胜利，特别是第三次战役对南朝鲜首都汉城的占领，令在历史上饱受列强欺辱的中国人民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国家和军队是如此强大，特别是中国军队的交战方是有十五国之多的外国联军。于是，对民族实力骄傲的热情骤然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

中国的首都北京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在新年瑞雪飘飞的北京街头，工人、农民、学生和妇女们的游行队伍川流不息。庆祝游行的热浪立即蔓延到全中国的城镇和乡村。中国人民纷纷自发捐献出钱物慰问志愿军，各界团体以及青少年写的慰问信更是雪片一样飞向千里之外的朝鲜。

当国内的报纸到达朝鲜前线彭德怀手中的时候，他由于长时间的缺少睡眠和紧张不安正处在极度的疲劳和焦躁之中。他看了报纸后，紧张与焦躁更加严重："大游行，庆祝汉城解放，还喊口号，要把美国侵略者赶下海去……有些人只知道我们打了胜仗，不知道我们取胜的代价和困难。速胜论的观点是有害的。我们的报纸怎么能这么宣传？解放个汉城就这样搞，要是丢了汉城，怎么交代？"

彭德怀所说的"胜利的代价和困难"，是指自中国出兵朝鲜后三次战役打下来的损失。部队伤亡是巨大的，主力部队，尤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精锐部队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四十二军等，战斗伤亡尤其大。很多连队中的战斗骨干损失大半，基层干部的牺牲比例令人痛心。不少部队目前的兵员数量减少了三分之一。在与武器装备现代化的联合国军作战中，中国军队赢得胜利的唯一优势只有一次又一次地前仆后继，不怕牺牲。正如美军战史中所描述的："在地面密集的炮火和各种火器编织的密不透风的封锁下，在天空上铺天盖地

的飞机的航空炸弹、凝固汽油弹和机关炮所构成的死亡的大网下，中国士兵一波一波地进攻潮水般涌来。在照明弹惨白的光亮中，联合国军士兵惊恐地看着这些后面的士兵踏着前面士兵的尸体毫无畏惧地向他们冲击而来。这些中国士兵义无反顾，毫不退缩。”彭德怀和其他志愿军将领都是经历过抗日战争和国内解放战争的军人，战争中的伤亡似乎已经不能再令他们过分地伤情；但是，朝鲜战争中，中国士兵和基层指挥员伤亡的速度和数量已经超出了他们感情的承受能力。朝鲜战场上每一次战斗的胜利，都是用中国年轻士兵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作为这些士兵的指挥官，彭德怀对此刻骨铭心。

当中国军队的前锋越过汉江，继续向南突进的时候，彭德怀下达了一道顿时引起各方激烈争论和迷惑不解的命令："全军立即停止追击！"

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的长距离的撤退，再次引发了西方阵营中政治态势的混乱。包括英国在内的几乎所有的西方大国，均因朝鲜战局的再次恶化，尤其是汉城的丢失，感到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惊慌。盟国几乎异口同声地质问杜鲁门：联合国军是不是打不下去了？还不撤出那个该死的远东半岛？东京那个傲慢的美国老头儿到底是个什么人？麦克阿瑟是反共的老英雄还是通敌的老间谍?

就在中国军队发动第三次战役、联合国军的前沿迅即崩溃的时候，麦克阿瑟给华盛顿发去一封电报，要求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重新考虑他被否决了的针对中国的行动，扬言不然联合国军就要付出被迫撤退的惨痛代价。麦克阿瑟所说的"针对中国的行动"，是他在朝鲜战争一开始就提出的一系列扩大战争的主张：封锁中国的海岸，袭击中国东北的机场，蒋介石参战和骚扰中国东南大陆等等。对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来讲，麦克阿瑟电报的内容是预料之中的：面临战场上的

失利，这个老家伙肯定会打来这样的电报，继续表达一个威胁性的信号：要么将战争扩大，要么只有被迫撤退。

战后，美国军方有人重新读了战争时期麦克阿瑟打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数十封电报，得出的结论是：麦克阿瑟是一个脱离现实的指挥官；一个希望把战场上的每一个胜利都归功于自己而不承担任何失败责任的指挥官。他的每一封电报都附加着这样的条件：要么给我所需要的东西，否则后果由你们承担。

一月九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经杜鲁门总统批准，给在东京的麦克阿瑟回电，电报措辞极为含糊："不大有可能发生政策转变或其他外来不测事件以致有理由要加强我们在朝鲜的努力"，"封锁中国也要等到美国在朝鲜的地位稳定之后，同时还需要和英国等盟国商谈"，"因为要考虑英国经过香港同中国进行的贸易以及联合国的同意"。"至于对中国本土的攻击，恐怕只有待中国在朝鲜之外攻击美国部队时，才能授权进行"。电报明确拒绝了麦克阿瑟邀请蒋介石部队参战的要求。最后，关于朝鲜战局的发展，电报是这样说的：

> 在保障你部安全和保卫日本的根本使命这一首要考虑之下，逐步坚守阵地，尽可能给敌人以重大的打击。
>
> 如果根据你的明确的判断，为避免人员和物资的严重损失而必须撤退的话，那时可以将你的部队从朝鲜撤至日本。

麦克阿瑟接到电报后"愤怒之极"，他认为这是给他布下的一个"陷阱"，是要求他做出"完全矛盾的选择"。什么叫"逐步坚守阵地"，否则就"从朝鲜撤至日本"？

第二天，麦克阿瑟回电说：既要守住朝鲜又要保卫日本，我们没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如果华盛顿不能确定美国在远东的利益，以美军现有的兵力，在朝鲜的军事地位难以支撑下去。他说：

联合国军在长期艰苦的征战中已经精疲力竭，并因为那些无端指责他们在被曲解的后退行动中的勇气和战斗素质的可耻宣传而感到苦恼。士气在急剧下降，作战效率受到严重威胁，除非要求他们以生命换取时间这一政治基础，得到了明确的说明、充分的理解以及紧迫到了作战的危险可以欣然接受的程度。

他再次向华盛顿发出质问：

根据你们电报的合理解释，敌人的优势实际上倒是一个决定性的尺度。因此，我的疑问在于：目前美国的政策目标究竟是什么？是在于目前的有限时间内尽可能保持在朝鲜的军事地位，还是在能够实施撤退时就立即撤退以尽量减少损失？

最后，麦克阿瑟把前途描述得一片黑暗：

在受到非同寻常的限制和被迫面临种种困难的情况下，本军在朝鲜的军事地位是难以保证的，但是它能坚持一定的时间，直至全军覆灭，如果压倒一切的政治考虑这样要求的话。

麦克阿瑟咄咄逼人的要挟和气势汹汹的质问，是给予杜鲁门的一系列难题。公平地说，作为战场司令官，受制于本国政府的远程控制而不能随心所欲，是一件令一名担负战争胜负责任的职业军人很痛苦的事情。麦克阿瑟所提出的问题，连杜鲁门本人也无法果断地给予答复，原因很简单，整个美国政府都处在混乱的境地里。面临朝鲜战争的重大失败，美国究竟应该怎么办？没有人能对此下个结论。矛盾的本质是清楚的：和中国人在朝鲜的战争肯定是一场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战争。如果继续打下去，又怎样才能不动用美国和盟国更多的力量而胜利？有没有为避免盟国对欧洲安全的担心和对朝鲜问题的指责，而迅速在朝鲜战争中赢得胜利的可能性？如果没有这种可能，朝鲜战争最好现在就停下来。但是，怎么才能停下来？用什么方式停下来才既符合美国在远东的利益，又令美国政府和美国军队不丢面子？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中的高官们对麦克阿瑟的电报表示出极大的不满，认为这是在公开指责“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的并经总统批准的行动方针是不可行的”。华盛顿敏感地意识到：麦克阿

瑟的这封电报是“留给后人看的，目的是一旦事情到了一团糟的时候，他能就此推卸一切责任”。

国防部长马歇尔看到电报中关于士气的说明时说：“一个将军埋怨他部队的士气之日，便是应当检查他自己的士气之时。”

国务卿艾奇逊的反应更加激烈：“无需任何证明，我完全相信这位将军的桀骜不驯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而且对其总统的意图基本上不尊重！”

国务卿以官场的清醒说出了问题的实质。

麦克阿瑟这个美军海外指挥官和美国总统的矛盾已经超出了军事范畴。

不管怎么说，杜鲁门总统在召集了一系列会议之后，还是准备安抚一下麦克阿瑟，目的是再静观一下战场形势的变化。

从战后披露的史料分析，杜鲁门和他的同僚们当时已经收到美军在朝鲜战场的指挥官——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将军传来的某种信息，这种信息的核心观点是：最后的胜利且不可妄说，但是美军在朝鲜半岛坚持下去，并且在军事上给予中国军队某种打击，是完全可能的。

艾奇逊在华盛顿的政治圈内到处听取各种意见，因为他实在不知道“怎样才能一劳永逸地让麦克阿瑟明白，美国正在进行一番特殊的事业，他那没完没了的节外生枝已经让政府忍无可忍”。

杜鲁门总统决定通过三条不同的渠道使麦克阿瑟安静下来：

一、由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出电报，第三次重申华盛顿的意见，即：美国在朝鲜的长期坚守虽然不可取，但为进行外交努力而争取时间将符合美国的利益。要给中国人“尽可能重大的”惩罚，不轻易撤出朝鲜，除非确实迫于军事上的需要。

二、派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去远东，就华盛顿的决定与麦克阿瑟当面商量。“没有电报往来这一套繁文缛节”，更便于阐述华盛顿的理由。同时，柯林斯将赴朝鲜调查战场的实际情况。

三、以总统私人的名义给麦克阿瑟将军发一封电报，以便让这位将军“理解美国对外政策的原委”，从而使他跟上“自己国家的对外政策”。

关于为什么总统给一个下属发去私人电报？杜鲁门的考虑是：麦克阿瑟多次说，他的电报被参谋长联席会议截留，总统根本不知道。杜鲁门发去私人电报，为的是传达这样一个信息：总统是知道一切的，一切是总统决定的。

杜鲁门的电报十分冗长，除了对以往说过的观点进行重复之外，基本上没有新的内容。但是电报至少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彻底地、再次地说明美国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既不能扩大战争，冒引发世界大战的危险；又要在战场上有作为。同时，总统的私人电报还多少满足了麦克阿瑟将军的虚荣心。

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到达东京。麦克阿瑟又一次问起华盛顿“已经屡次答复”过他的那个问题：有无增兵的可能？柯林斯的回答依然是：没有。之后柯林斯到达朝鲜战场，亲自巡视了美第十军和第八集团军，特别听取了战场指挥官对战局前途的预测和具体的战术计划。

当柯林斯回到华盛顿后，一系列政府决策开始果断地实施了，显示出美国政府对朝鲜战争的前途有了重新估价：

签署增拨两百亿美元作为国防费用的法案，使本年度军事预算增加百分之八十，达到四百五十亿美元；

将征兵年龄从十九岁扩大到十八岁，并且延长服役期限；

将国民警备师编入现役；

加强军火生产，每年生产新型作战飞机五万架，坦克三万五千辆；

策划单独对日本签订和约问题，加速武装日本。

美国不是要撤出朝鲜，而是要全面强化战争机制。

彭德怀的焦灼是有道理的：局势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我们取得了朝鲜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事实证明，真正残酷的战争还在后面。

然而，“我们无比强大”和“我们已经胜利”的情绪已经从国内蔓延到了朝鲜前线的志愿军官兵中。

“过了三八线，凉水拌炒面。”对极度艰苦的生活的埋怨，随着胜利的情绪产生了。打过三八线的官兵们有了一种设想：快打，快胜，快回国。“速胜”的思想让官兵们对战争急躁起来：“从北到南，一推就完，消灭敌人，回家过年。”

于是，“一瓶牙膏主义”一时流行于正处在战争前线的中国军队中。

牙膏是奢侈的东西，中国士兵中很少有人使用，使用这种很文明的东西的，是干部，而且是团以上干部。

“一瓶牙膏主义”的意思很难明确地解释。一种解释是，预测或者盼望战争很快结束，最好是在一瓶牙膏没有用完的时间内；另一种解释是，朝鲜国土是狭长的，其形状像一瓶牙膏，打仗就像挤牙膏一样，一鼓作气把美国兵挤出去算了。

第四十军开了一个会，想统一官兵的思想。这是这个军的师、团主官入朝鲜后的第一次相聚，见面彼此开着战场上的玩笑：

“你还没到马克思那儿去报到？”

“彼此彼此，你也是王八活千年嘛。”

接着就交换礼物，都是缴获的一些新奇玩意儿：咖啡牌或者大象牌的美国香烟，各种式样的打火机，精致得像玩具般的小手枪，金笔尖的派克水笔，能够聚光的手电筒。

说到部队目前存在的思想问题时，大家就严肃了起来。第四十军在战场上可以说是完成了任务，仗打得还可以，但是这些师、团长们心中还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就是觉得在朝鲜打仗很“憋气”。伤亡不小，而且牺牲的都是能打仗的老战士，让人想起来就难过；歼敌不多，三次战役加起来才万把人，和国内战争中一场战斗下来的歼敌数量没法比；敌人的机械化难以对付，一个山头付出那么大的伤亡打下来，冲上去的时候，敌人坐着坦克和汽车跑了；夜间围住的敌人如果天亮前不解决，天一亮，飞机、坦克来了，就不能说解决敌人了，顶得住顶不住还是个问题；既然敌人怕死跑得快，那么就让他再快点，只要有炒面和弹药，干脆追着他的屁股打，赶羊一样一追到底，他下他的海，我回我的家。

与第四十军一样，志愿军各军都开过类似的会。

会议记录被送到彭德怀那里，更加重了他深藏内心的不祥的预感。

没有人比彭德怀更了解在朝鲜前线的中国军队所面临的巨大困难。

第四十军打给志愿军司令部的电报中说：“部队极端疲劳，困难很多。三八线以南的群众跑光，敌人把房子烧了，粮食抢光，使部队吃饭、休息都很困难，体力大大减弱。后勤供应不上，部队急需粮食、弹药、鞋子等补充……”

此时，志愿军全部拥挤在三八线以南的狭窄地区，所有的部队都缺少棉衣、药品、粮食、弹药。士兵中疾病蔓延，在渡过临津江时出现的大量冻伤还没有恢复，由于天气寒冷，部队没有御寒的棉衣，新的冻伤又大量出现。有一个师已经因冻伤使上千名士兵失去了战斗力。由于志愿军已推至三八线以南，后勤补给线一下延长了五百至七百公里，美军的飞机日夜封锁，运输工具又极端缺乏，前线的部队几乎处在令人担心的困境当中。

在朝鲜战争的后期，彭德怀已回国任职后，在一次作战会议上，他回忆了第三次战役后的情况：“我打了一辈子仗，从来没有害怕过，可当志愿军打过三八线，一直打到三七线的时候，我环顾前后左右，确实非常害怕。当时倒不是考虑我个人的安危，而是眼看着几十万中朝军队处在敌人攻势的情况下，真是害怕得很。我几天几夜睡不好，总想如何摆脱这个困境。我军打到三七线后，已向南推进了几百公里，本来后方的物资供应线就很难维持，这时敌人又派飞机对我军运输线猛烈轰炸，使志愿军的各种物资、粮食、弹药的供应十分困难。空中有敌人飞机炸，地面对着美军的坦克大炮，左右沿海是美军的舰

队，敌人不下船就可以把炮弹打过来。加之时值寒冬腊月，到处冰天雪地，战士们吃不饱穿不暖，非战斗减员日益增多。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志愿军随时有遭厄运的可能。我不能把几十万军队的生命当儿戏，所以必须坚决地停下来，不能前进，并做好抗击敌人反攻的各种准备。”

苏联驻北朝鲜大使拉佐瓦耶夫实际上是斯大林在朝鲜的军事观察员。他对彭德怀突然停止第三次战役极为不满。他把自己的意见告诉斯大林，指责彭德怀是“军事上的保守主义”，说他从没见过打了胜仗的指挥员命令部队停止追击敌人的，他的主张是“抓住战场主动权，乘胜追击，解放全朝鲜”。

彭德怀对这种指责火冒三丈：“拉佐瓦耶夫？他打过什么仗？第二次战役时我们停止追击，就是他不同意！我难道不想扩大战果追击敌人？可靠两条腿追四个车轮，能有什么结果？我难道不知道乘胜追击的道理？我们中国军队历来主张猛打猛冲，击溃敌人后应该追击，不给敌人喘息的时间。但是，朝鲜有朝鲜的特殊情况，我军战斗减员和疲劳不说，朝鲜是个狭长的半岛，东西海岸敌人到处可以登陆，我们的战略预备队上不来，仁川的教训不能重复！彭德怀不是为打败仗才来朝鲜的！”

金日成对彭德怀停止对敌人的追击更是想不通。作为北朝鲜的领袖，他渴望的就是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实现统一全朝鲜的理想，但眼看着中朝军队已经打到三七线，却停止了攻势，这令他无论如何睡不着觉。在和彭德怀的讨论中，金日成一再要求彭德怀命令部队全线“继续前进”，而彭德怀在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兵力和对峙状态之后，认为必须休整才有可能发动新的战役。两个人因为意见不同而不欢而散。夜半，彭德怀的警卫人员说，金日成屋子里的灯光一直亮着。于

是彭德怀就给金日成送去两片安眠药。但是，彭德怀知道，金日成需要的不是安眠药。

一月十一日，彭德怀和金日成就此问题举行正式会谈。

在君子里的巨大的矿洞里，中国军队一方有彭德怀、洪学智等，北朝鲜一方有金日成、朴宪永等。双方就苏联大使的“只要向南进攻，美军就会撤出朝鲜”的观点进行讨论，讨论时分歧极大，以至于各方的话里有了很浓的火药味：

朴宪永：“只要志愿军继续向南进攻，美军一定能退出朝鲜。”

彭德怀：“真的吗？如我军去追，美军一定会退吗？”

朴宪永：“是的。”

彭德怀：“美军既然要退出朝鲜也好，这符合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所提出的要求。”

朴宪永：“如我军不迅速南进，美军就不会退。”

彭德怀：“你们的依据是什么？”

朴宪永：“美国人民反对，资产阶级内部矛盾。”

彭德怀：“这是一个因素，但今天还不能起决定作用。如再消灭美军三至四个师，五至六万人时，这个因素就会变成有利条件。再过两个月后，志愿军和人民军的力量要比现在大得多，到那时再视情况向南进军。”

朴宪永：“到那时候美军就不一定会退了。”

金日成这时插话：“最好半个月内，志愿军有三个军向南进攻，其余休整一个月后再南进。”

这时，彭德怀开始克制不住自己的重重忧虑了，他越说越激动：“你们说美军一定会退出朝鲜，但你们也要考虑一下，如果美军不退出朝鲜怎么办？希望速胜，又不做具体的准备，其结果将会延长战争！你们把战争胜利寄托于侥幸，就可能把战争引向失败！志愿军需要休整两个月，休整前，一个师也不能南进！如果认为我这个中朝联军总司令不称职，可以撤职！你们如果认为只要我们一南进，美军就会退，那么，我提议由仁川至襄阳线以北的全部海岸的警备和维护后方交通线，都归中国志愿军担任，人民军五个军团十二万人已经休整两个月了，归你们自己指挥，照你们的愿望向南进攻。美军如果按你们的想象退出朝鲜，我当然庆祝朝鲜解放万岁；如果美军不退走，志愿军按预定的南进计划南进作战！”

彭德怀激动的发言令在场的人息声屏气，陪同会谈的中朝双方其他人员看此情景，都一个个地悄悄溜了出去。

毛泽东在一月十一日致电彭德怀：

> 如金日成同志认为不必补充休整就可以前进，则亦可同意，人民军前进击敌并可由朝鲜政府自己直接指挥。志愿军则担任仁川、汉城及三八线以北之守备。

这封电报，说明了毛泽东对彭德怀停止进攻决定的支持。

当时，毛泽东认真分析了朝鲜战场上中国军队的处境，并认识到敌人实力犹存，正在伺机北进。至少，毛泽东对“美军会退出朝鲜”的判断很不以为然，因为“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是毛泽东对战争对手本质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

彭德怀把这封电报给金日成看了。

现在，彭德怀明确同意北朝鲜军队单独南进，金日成和朴宪永却说："人民军没有恢复元气，不能单独南进。"

彭德怀："那么去试验试验，取得点经验教训也是宝贵的嘛。"

金日成："这不是好玩的，一试验就会付出几万人的代价。"

彭德怀："不是说我一南进，美军就会退吗？那么这种前后矛盾的说法我很难理解。"

彭德怀的意思很明白：中国士兵的生命同样宝贵！

在朝鲜战争结束很久以后，彭德怀于"文化大革命"中被诬陷关押。为了新中国身经百战的战将在其身陷囹圄的时候，回忆他在朝鲜战争中的这段日子时写道："我军将敌人驱至三七线后，敌人改变计划，从日本和国内抽调新生兵力四个师，又从欧洲抽调老兵补充部队，集结在洛东江的预备防线。从东线战场方面撤退之兵力亦集结于洛东江。总之，敌人一步一步在诱我南进攻坚，待我军疲劳消耗殆尽，再从正面反击，从侧翼登陆截击，以断我军后路。志愿军入朝后，不到三个月，连续经过三次大的战役，又值冬季，而且全无空军掩护，也未曾休息一天，疲劳之甚可以想见，战斗和非战斗减员已接近部队的半数，急需休整补充，准备再战。"

彭德怀坚持志愿军在休整之后才能南进。

在第三次战役中，中国军队前进了上百公里，战役开始时位于前沿第一线的南朝鲜军队损失也是巨大的。但是，连彭德怀都承认这个事实：美军几乎是不战而退的。志愿军的官兵都知道，三八线并不是他们打过去的，几乎可以说是走过去的。美军大踏步地撤退，实际上是按计划进行的大规模机动，从军事战略上说他们"溃败"是有些牵强

的。凡战场上出现这种大规模的撤退，精明的军事家必会十分警惕，因为这往往是有计划的大规模反击的前兆。

历史证明了李奇微正是这么设想的。

李奇微说，后退并不意味着失利。美军这次大规模后撤的好处是“占有了一条横贯朝鲜腰部的战线——由平泽往东，经原州至东海岸的三陟”，第八集团军终于有了赖以立足和作战的战线。

此时，如果几十万中朝军队继续南进的话，将正好落入李奇微的圈套。因为在三七线上，联合国军以逸待劳，已经修筑起十分坚固的工事，等待中朝军队的到来。饥饿和缺乏弹药的中朝士兵将在补充充足的联合国军的火力网中大量伤亡。而且，联合国军随时会发动猛烈的反击，以其占优势的机动手段把中朝军队切割成数段。同时，善于两栖登陆作战的麦克阿瑟决不会放过从东西两边海岸登陆夹击的好战机。那样，中朝军队就要陷入灭顶之灾了——六个月前北朝鲜军队长驱直入而惨败，正是大举盲目南进的结果；一个多月前联合国军贸然北进而遭到失败，也是刚刚发生过的事。

中国传统的节日春节即将来临，志愿军前线部队开始筹备过年的物资，国内运来的慰问品也陆续到达部队。毛泽东向在朝鲜打仗的中国士兵发出“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指示；志愿军总部号召全体志愿军官兵开展“拥护朝鲜劳动党和政府，爱护朝鲜人民”的活动。

第三十八军率先提出“十条纪律规约”：

一、尊重朝鲜人民，要当成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一样看待。严禁调戏、侮辱妇女。

二、遵守民情风俗。进门脱鞋，说话讲礼貌，经常挖厕所，不随便大小便，不在室内乱吐痰，保证室内外清洁卫生。

三、住房子要商量。要给群众留一定住处，不准强住，不得全部占光，不准强占灶头。对群众的东西，不论有无房主，均应爱护，妥加保管。

四、借用家具、木材、铺草要爱护，用后要还，损坏要按价赔偿，走时要道歉。

五、雇请向导民工，要按规定付给工资，态度要和蔼，严禁打人骂人，不得随便抓差。

六、爱护群众利益。不损坏一草一木，不拿一针一线，不随便吃群众的东西，不践踏一棵青苗。

七、借粮食、柴草要分清对象，遵守规定。按数付给柴票、草票，严禁翻箱倒柜浑水摸鱼，一扫而光。

八、买东西要公平，按价给钱，不强买、贱买，不争购、赊账，严禁杀耕牛和六十斤以下的小猪。

九、宣传教育群众。动员群众回家。召开群众会议，宣传我军胜利，揭发美、李军罪恶，提高群众觉悟。利用空闲时间，帮助群众劳作，以实际爱民行动团结群众。

十、关心群众疾苦，告诉防空办法，积极协助群众隐蔽粮食物资。加强管理，做饭、烤火，不得粗心大意，严禁烧毁房屋，不得随意玩枪误伤群众。

志愿军司令部认为既然是休整，不如抓紧时间把军官集训一下，即使是临阵磨枪也有一定效果。于是下达通知，由志愿军参谋长解方主持，邀请苏联军事专家讲课，在中国的沈阳市举办一个由师、团长参加的诸兵种联合作战的集训班，参加集训的人必须立即回国。第三十九军军长吴信泉认为，在敌人说不定哪天就会反击的时候，从前线调大批师、团长回国，显然不妥当。况且，志愿军既没空军又没海军，虽有炮兵，但数量不多、口径不大，集训“诸兵种联合作战”，现在只能是纸上谈兵。但是，绝大多数指挥官认为，敌情的掌握是上级的事，能回国看看当然是好事。于是，在那些日子里，志愿军前线的师、团指挥员都换上了干净的衣服，乘坐过路的各种车辆开始向国内赶。其中不少人心中都有另外一番激动，因为他们都是在全国解放后才结婚的，结完婚就出国作战了，中国人都说“久别胜新婚”，将与自己新娘重逢令这些指挥员一路上有了久已没有的好心情。

然而，就是在这时，一个关系到不久以后朝鲜战场局势的严重问题正悄悄地显露出来。

其时，美军在朝鲜前线的侦察活动十分频繁，美第三师已开始向战线的防御正面调动，而中国军队的主力因为正在休整，所以于前线的位置目前过于靠北，只有少量的部队突出在前沿，这种态势极容易在敌突然反攻时面临猝不及防的境地。

这一忧虑被从北京转达到了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总部，彭德怀在召集专门的会议研究后认为，“敌人没有进攻我汉江南岸桥头阵地的企图”，而志愿军部队的部署还是按准备春季攻势的态势为好，特别是位于战线后部的主力，如果太靠前将不利于休整。

于是，一个关系着战争命运的提醒被搁置了。

这是彭德怀漫长的军事生涯中少有的判断失误。

失误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

事后的评论总会显得苛刻，更何况当时的战场形势错综复杂。说彭德怀没有预料到敌人反击是不符合事实的，但是，彭德怀没想到的是，灾难会来得这么快。

# 第六章 血洒汉江

## 毛泽东：打到三六线去！

上任仅仅几天就面临着不可逆转的大规模撤退的李奇微，将美军撤退的那些天视为他军事生涯中最苦闷的时刻。

如果从战场演变的前因后果上看，也许联合国军阵地的丢失直至汉城的放弃，作为刚到任的司令官他不应该负直接的责任，但作为战场指挥官，军事和政治上的压力以及媒体添油加醋的渲染，却令他度日如年。更重要的是，他必须即刻准确地判断出自己的部队目前到底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境地里，具体地说，就是联合国军是否已经面临着准备向日本撤退的局面。正如麦克阿瑟对他指示的那样："无论如何在最后的时刻确保釜山桥头堡，以保证部队在情况最坏的时候撤回日本。"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将成为千里迢迢跑到朝鲜率领联合国军的残兵败将撤离战场的一位司令官，这个名声无论对他个人的声誉还是对他职业军人的前途都必会起到悲剧性的影响。李奇微无论如何都不想看到这样的结局。

美军战史记载道："李奇微开始像一个士兵那样履行他的职责，把麦克阿瑟同远在七千英里之外的华盛顿之间的政治和军事纷争一概抛在脑后。"

从一开始，李奇微就不认为美国人在朝鲜输定了。当柯林斯视察前线的时候，他把自己的感觉透露给他的西点军校老同学。他在地图面前详细地分析了自中国军队参战以来，三次大的战役每一点演变的原因和过程。李奇微最后的结论是：美国人完全有理由再试一试。

联合国军撤出汉城，在三七线附近加强了防御力量，准备抗击中国军队随之而来的进攻，可是，战场上却出现了令人迷惑不解的寂静。有消息说，中国军队新的攻势将于二十日开始。为此，联合国军前沿阵地上的官兵整日处在紧张和恐惧之中。但是，又有空中侦察报告说，没有发现中国军队大规模进攻的迹象，甚至在接触地段根本没有发现中国士兵的踪影。中国军队销声匿迹了，如同联合国军第一次向鸭绿江进攻受到伏击后，中国军队突然消失了一样。没人能说出中国军队的司令官脑子里正在盘算什么。因为按照一般规律，中国军队如果继续进行大规模的进攻，联合国军只能继续撤退；如果中国军队的进攻持续不断，联合国军最终被赶到大海里不是不可能的。这也许是中国军队司令官的又一次更大的阴谋？或者说，这是更大规模进攻的前兆？

联合国军整个前线弥漫在一种前途未卜的气氛里，人人都心情烦躁地预感着各种可能的不幸。第八集团军司令部的参谋们不是应麦克阿瑟的要求已经作出详细的撤出朝鲜的计划了吗？不是连撤退的细节，包括撤退的序列和运输的手段都已经制订完毕了吗？甚至连南朝鲜军的去向，当然还有南朝鲜政府官员和他们的家属的去向也考虑到了吗？听说要把这些人转移到海中的一个岛屿上去，犹如中国的蒋介石跑到海中的一个岛上一样。

在骊州第八集团军指挥部里，李奇微在光线微弱的瓦斯灯下，细心地翻看了中国军队在朝鲜参战后美军方面每一天战斗的机密记录。迄今为止，中国军队与联合国军进行了三次大的战役，前两次是联合国军处在进攻状态后遇到中国军队打响了遭遇战，后一次联合国军是防御状态，中国军队打的是阵地攻坚战。李奇微在战斗记录中发现了一组至关重要的数字：

美第八集团军第一次向鸭绿江进攻，遭到中国参战部队大规模打击的日期是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五日，真正大规模的战斗从二十六日开始，十一月二日联合国军主力撤到清川江南岸，战斗历时八天；美第八集团军第二次向鸭绿江进攻，十一月二十五日遭到中国军队的攻击，激战持续到十二月二日，中国军队停止了对溃败的联合国军的攻击，战斗历时八天；第三次，中国军队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开始大规模进攻，一月八日中国军队停止追击，战斗历时也是八天。

八天，三个相同的战时数字！

李奇微知道了，中国军队的任何攻势，无论发起时参战兵力规模多大，战斗延续的最长时间是八天。

“八天”是由中国军队的后勤补给能力决定的。

在联合国军强大的空中封锁下，中国军队的后勤补给线受到严重威胁，甚至不断中断。中国军队物资运输的手段本来就处于接近原始的状态，运输在汽车和火车受到空中封锁之后，只能依靠人力和畜力。山路崎岖，气候恶劣，支撑数十万大军的粮食和弹药供应就成了难上加难的事。在一个战役开始之前，中国军队后勤准备的最大限度，只能是为一个士兵提供大约维持一个星期的粮食和弹药，而且这些粮食和弹药还得让士兵自己携带着。一旦粮食弹药消耗完，后勤补充如果不及时，战役就只能停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军队再凌厉的攻势也只能持续一个星期。

李奇微将这种现象称为中国军队的“礼拜攻势”。

其实，这也是中国军队在占领汉城后为什么没有继续扩大战果的最根本的原因：中国军队还不具备持续攻击的能力。

李奇微终于把朝鲜战场上混乱的进进退退分析出清晰的条理：“礼拜攻势”大大限制了中国军队的作战。而且，即使在战役进行当中，中国军队也不敢在白天进行大规模的攻击行动，因为联合国军的空中打击所造成的威胁是他们不可克服的。他们每每在夜间作战，天一亮就立即隐蔽，这又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军队的攻击速度，限制了中国军队的战役发展。

军事上任何富有成效的作为在如此至关重要的限制中是不可能实施的。

李奇微总结出了对付中国军队的有效办法：当凶猛的“礼拜攻势”接近尾声的时候，以强大的反击力量立即投入前沿，向弹尽粮绝的中国军队毫不迟疑地开始攻击。

“接近他们！打击他们！”李奇微向他的部下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需要无限期地留在朝鲜，直至美军由防御转为进攻。”但是，面对危机四伏的战场，面对“被俘往往比死去更加可怕”的命运，李奇微承诺对任何一支被切割包围的部队，他都将“尽一切可能去努力营救”。他说：“要让所有的部队知道，我们不会抛弃他们，不会让他们处于绝境。我们会为他们一战，除非援救行动明显要导致同部队人数相等甚至更大的损失。”李奇微给自己要采取的第一步行动定名为：“猎犬行动”。意思是像猎狗一样跑上去寻找中国军队到底在哪里，主动创造战机，大胆地接触中国军队的前锋，把正处于物资短缺困扰中的中国军队死死缠住。“不是都在说联合国军到底应该怎么办吗？依我看，联合国军的出路只能是进攻、进攻、再进攻！”

就在彭德怀命令中国军队全线停止追击一个星期后，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五日，李奇微的“猎犬行动”开始实施了。

为了使美军官兵更加明确自己的战术思想，李奇微将联合国军今后与中国军队作战的总的战术原则定义为：“磁性战术”。他催促位于前沿的所有部队立即行动，派出小规模的侦察队，大胆地向北侦察，“一直到发现中国人的真正的防御线为止”。

李奇微特别要求：美军士兵充当侦察队的主力。

十五日，在水原至利川间的两军对峙线上，李奇微派出的侦察队开始了主动向北的试探性侦察进攻。

由汽车搭载步兵，几辆坦克为前导，采取小股多路的方式，沿着接触线上的宽大正面向北进行威力搜索，向中国军队伸向前沿的每一根触角进行小规模的攻击，并且密切观察中国军队的反应。开始是连、排级的兵力规模，后来上升到团级的兵力规模，并配合大量侦察机的空中侦察。同时，情报部门派出大量特工向北渗透。美军地面的侦察队没有寻找到中国部队的痕迹，他们看见的只有在被战火摧毁的村庄废墟中生火取暖的朝鲜农民——“只有这些零星的农民还证明着这片不毛之地尚存有生命的迹象”。偶尔，有少量中国军队的侦察兵出现，发生了数次小规模的遭遇战，战斗短暂，基本上以中国侦察兵消失在雪野中为战斗结束。

“猎犬行动”持续了八天，根据数支美军侦察队的侦察报告，李奇微虽然并没有彻底弄清中国军队的意图和防御阵地的具体位置，但至少可以证明，中国军队暂时没有发动新的战役的能力和企图。

可是，在美第八集团军的正北方，十七万中国军队的存在是明确的事实。这些军队究竟布防在哪里？他们现在正干些什么？下一步的作战意图又是什么？

二十二日，麦克阿瑟亲自飞临朝鲜。在第八集团军司令部，他审查了李奇微制订的向北进攻的计划。接着，像往常一样，麦克阿瑟向记者们发表了讲话：

> 由于补给线拉长造成的敌人战略上的弱点正在逐步发展，疾病也在敌军士兵中蔓延，中国人不知道怎么去控制广泛传播的流行病，以致他们的战斗力遭到破坏。现在有不少关于中国人要把我们赶下海去的流言飞语，正如早些时候北朝鲜人说要把我们赶下海一样是无稽之谈，没有人能把我们赶下海去。本司令部决心要在朝鲜保持一个阵地，只要华盛顿决定让我们这样做。

在联合国军决定再次北进的时候，麦克阿瑟接受了以前的教训。这一次，他对北进的目标说得含糊而保守："要在朝鲜保持一个阵地。"

李奇微的目标却不是这样，他有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向北进攻！直至碰到敌人的主抵抗线为止！"

第八集团军的参谋们把这次北进行动称为"霹雳作战"。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五日，"霹雳作战"开始。

联合国军方面集中了五个军共十六个师，外加三个旅、一个空降团及其全部的炮兵、坦克和空军力量，其地面部队兵力达到二十三万人。西线是进攻的主攻方向，东线辅助进攻。其态势为：

西线，美第一军以土耳其旅、美第二十五、第三师、英军第二十九旅为第一梯队，在野牧里、水原、金良场里一线三十公里的地段上展开，向汉城方向实施进攻，南朝鲜第一师为预备队；美第九军以美骑兵第一师、英军第二十七旅、美第二十四师为第一梯队，在金良场里以东至骊州一线三十八公里的地段上展开，向礼峰山方向实施进攻，南朝鲜第六师为预备队。

东线，美第十军以美第二师，空降一八七团，南朝鲜第八、第五师为第一梯队，在骊州至平昌以东一线七十二公里的地段上展开，向横城、阳德院里、清平里方向实施进攻，美第七师为预备队；南朝鲜第三军团以南朝鲜第七师为第一梯队，在桧洞里至旌善以东一线三十公里的地段展开，向下珍富里、县里方向实施进攻，南朝鲜第三师为预备队；南朝鲜第一军团以南朝鲜第九师、首都师为第一梯队，在北洞里至玉溪一线三十公里的地段展开，沿东海岸实施进攻。

战役的总预备队是位于大田的美军陆战一师和南朝鲜第十一师。

南朝鲜第二师担任后方的警戒和掩护交通运输的任务。

联合国军此次北进战役计划、显示出李奇微与沃克在战术思想上的迥然不同，特别表现在对美军与英军的使用上：

一、美军担任战役的主攻，集中在汉城方向的西线，南朝鲜军集中在东线辅助进攻；

二、针对中国军队惯用的分割包围的战术，采取互相靠拢，齐头并进，稳扎稳打，东西呼应的协同作战方式；

三、坚持“磁性战术”的原则，坚决近距离地与中国军队接触，不间断地持续进攻，不给中国军队以补充的时间，与中国军队拼消耗，并且在局部战斗中采取“火海方式”：即依靠优势的炮兵、空军和坦克的火力，对中国军队实施密集的高炽烈的火力突击，以杀伤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

中国军队方面没有想到美军的反攻发动得如此之快。

甚至连远在华盛顿的美国政府还在为朝鲜战局忧虑时，联合国军大规模的反击战役已经迅速地开始了。

“霹雳作战”一开始，李奇微就穿上他的伞兵战斗服，把两颗甜瓜形手雷照例挂在脖子上，然后打电话给美国第五航空队司令官帕特里奇：“帕特，有没有兴趣和我一起在共军头上兜兜风，看看他们在干些什么？”

帕特里奇回答：“很乐意奉陪，将军。我正好可以在你面前显示一下我的飞行技术。”

由空军司令官帕特里奇亲自驾驶的一架老式AT-6型教练机起飞了。飞机飞行的速度很慢，机身是帆布制作的，但飞起来十分平稳，这很利于李奇微对地面的观察。飞机沿着两军接触线深入到中国战区一边达三十二公里，很低地飞过山峦与河流，在任何怀疑有中国大部队的村庄、小镇和谷地的上空反复盘旋。飞行持续了三个多小时。

大地被白雪覆盖，山谷间的松林呈现出一片很暗很深的绿色，无数条道路蜘蛛网一般裸露在雪中的大地上，寂静得令人感到这个世界仿佛有一点不那么真实。“我们很难发现一个活动的生物。”李奇微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没有篝火的烟雾，没有轮痕，甚至没有被践踏过的雪地——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大部队的存在。”

李奇微不知道，就在他乘坐的这架低空盘旋的AT-6教练机的机翼下，在一座白雪覆盖下的大矿洞里，他的对手，中朝军队的总司令官彭德怀和北朝鲜领袖金日成以及一百多名中朝高级官员，正愉快地观看一出名叫《阿妈尼》的歌剧。大矿洞里，歌喉婉转动听，舞姿婀娜动人。

由志愿军文工团创作并演出的歌剧《阿妈尼》，是文工团员们在朝鲜战场上领受任务而仓促创作的。尽管如此，它在中朝高级干部会议的开幕式上还是受到了欢迎。金日成专门把剧本要来，说要亲自翻译成朝鲜文演出。同时在开幕式上演出的还有北朝鲜人民军协奏团的

演员们。她们身上穿着毛呢的军服，腰扎武装带，脚上是高筒皮靴，这样的装束穿在女孩子身上真是好看。而中国人民志愿军文工团的演员们没有演出礼服，上台演出穿的就是平时穿的棉布军装，因为入朝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不是在部队当兵就是深入前沿慰问，所以多数人的军装上还打着补丁，女孩子们的手也是黑糊糊的。中国军队的高级将领们为此脸上有点儿挂不住了，他们对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说："我们发起个募捐，凑点儿钱给文工团的同志也做上一套阔一点儿的衣服穿，咱也体面体面！"

这是朝鲜战争中中朝双方高级干部唯一一次"欢聚一堂"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北朝鲜首相金日成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的主要负责人、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和志愿军其他领导人、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志愿军各军的主要负责人、中国第十九兵团来朝鲜参观的领导干部，还有北朝鲜人民军总部和各军团的主要负责人，共计一百二十二人。与会的中朝人员混编成六个大组，在那个巨大的矿洞里围坐在一起。没有那么多桌椅，很多人就地坐在地上，就连吃饭也成了问题。因为美军飞机的骚扰，会议没有张贴彩旗和标语，但无论如何，这对于处于战争时期的中朝双方来讲，会议的规模已经是很豪华了。

会议通过了推举苏联的斯大林和中国的毛泽东为大会主席团名誉主席的决定，然后通过了大会主席团名单和秘书长人选。

彭德怀首先作了题为《三个战役的总结与今后的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是经由毛泽东亲自审定的，彭德怀手中的报告稿上，落满了毛泽东亲手修改的红色铅笔的印迹。毛泽东修改得最多的，是论述中朝两国和两国军队的关系问题的段落，毛泽东在报告稿上写下如下的话：

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和人民军，在朝鲜五年来的斗争中有了伟大的成绩。他们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了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政权，建立了英勇的人民军，

和苏联、中国及其他人民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现在又正在和美国侵略军及李承晚匪军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因此，一切在朝鲜的中国志愿军同志必须认真地向朝鲜同志学习，全心全意地拥护朝鲜人民，拥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护朝鲜人民军，拥护朝鲜劳动党，拥护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同志。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看法和做法一样，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最后胜利就一定会得到。

毛泽东十分清楚地知道，中国军队没有在异国作战的经验，而且，自战争开始以来，中朝双方已出现意见分歧，这对战争的进程是十分不利的。强调对北朝鲜的尊重，是为战争能够取得胜利提供一个可靠的政治基础。

彭德怀对此深有感触。在他呈给毛泽东的报告稿上，已经将这样的论述说得很多了，他认为该说到的话基本上都说到了，可是，毛泽东依旧添上了这样很长的一段话。当彭德怀在会议上念完这段话的时候，全场响起了掌声。但是，不管掌声如何热烈，在会议讨论的时候，分歧依旧存在，甚至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在第三次战役后，是否“乘胜追击”的问题，是一个中朝双方极为敏感的问题。

因此，在报告中，彭德怀就第三次战役胜利的意义、胜利的原因、战术上的几个问题、下一战役的思想准备、加强后勤工作、三八线以南地区应实施的政策、中国人民志愿军向朝鲜劳动党和人民军学习等七个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之后，彭德怀特别突出地就当前急需统一思想的几个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第三次战役后为什么不追击？对敌人的优势装备应该如何估计和应对？朝鲜战争的前景是怎样的？取得最后胜利应该具备的条件是什么？最后，在这个报告中，作为朝鲜战场上中国军队的最高指挥员，彭德怀说明了两个重要观点：在政治上，美国决不会自动退出朝鲜，除非受到更大的打击；在军事上，中国军队擅长的夜战、分割迂回、敌后渗透等战术，证明是有效的。

这两个观点对未来朝鲜战争的演变起了重要的影响。

会议的第二天，后勤工作问题引起大家的高度关注。

中国士兵普遍存在“三怕”的担忧：一怕没饭吃，二怕没有子弹打，三怕负伤后抬不下来。全面负责后勤工作的洪学智副司令员在发言中指出，志愿军后勤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物资供应不上，伤员抢救不及时，部队往往在挨冻受饿的情况下作战。由于没有制空权，三次战役打下来，损失的汽车达一千二百多辆，平均每天损失三十辆。志愿军后勤工作人员太少，没有充足的物资，没有足够的交通工具和道路条件，没有健全的组织机构，仗没法持续地打下去。

无论会议上的发言和争论如何地激烈，在会议开始后的第一天，前线传来的消息使会议蒙上了一层焦灼不安的气氛。

二十五日，前线传来敌人进攻的消息，彭德怀十分惊讶，他命令前线部队密切监视敌人的动向。

第二天，前线传来的报告更加明确：敌人已经开始了全面进攻。

彭德怀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发生了。

联合国军的进攻发生在中国军队最不适于进行战斗的时候。

中国军队目前的状况是：前线的几个军经历三个不间断的战役后，兵力严重减员，士兵疲劳，后勤供应十分短缺，而原准备在下个战役使用的第二批入朝作战部队第三兵团和第十九兵团还没有赶到，连为前线补充的四万名老兵和八万名新兵也没有到达。就兵力而言，现在敌我双方几乎相等，但与装备占绝对优势的联合国军作战，这却是一个危险的兵力对比。更为危险的是，部队没有应战的思想准备，

从目前各军的位置上看，如果应对敌人开始的全面进攻，就需立即重新部署调动。

彭德怀站在大矿洞外的山头上，可以听见远方传来的爆炸声，美军的飞机已开始昼夜不停地对平壤和其他重要目标进行轰炸。

身经百战的彭德怀能够预料到局势的发展将会多么危险。应该庆幸的是，部队在三八线上及时停了下来，如果继续南进，在部队更加困难的时候敌人进行反击，后果不堪设想。

二十七日，彭德怀向志愿军各部队发出“停止休整，准备作战”的电报。

深夜，彭德怀向毛泽东发出如下电报：

（一）美军约三个团（后续部队不详），分三路越金良场里、水原线北数里，有相机攻占汉城市、江北岸桥头阵地的模样，企图以此稳定联合国内部目前严重混乱现象。为增加帝国主义阵营矛盾，可否以中朝两军拥护限期停战，人民军与志愿军从乌山太平里、丹邱里（原州南）线，北撤十五至三十公里，消息如同意，请由北京播出。

（二）敌继续北犯，我不全力出击，消灭一个师以上，保持桥头阵地，甚为困难。出击将破坏整训计划，推迟春季攻势，且目前弹、粮全无补充，最快亦须下月初旬才能勉强出动。我暂时放弃仁川及桥头阵地，在国内外政治情况是否许可……如不可能停止敌人北进，政治上又不许可放弃汉城、仁川，即须被迫部署反击，但从各方面考虑，甚为勉强。以何者为是，盼示复。

建议“拥护停战”从彭德怀的嘴里说出来，可以想见战场局势的危险：停战是联合国根据一些国家的提案提出来的，中国方面已经予以坚决拒绝，因为这个把戏的目的是让联合国军利用停战来获得喘息的时间。连彭德怀自己在两天前的报告中也曾明确指出：联合国军是不会自动退出朝鲜的。现在，在联合国军已经开始大规模进攻的情况下提出停战，并且要主动后退三十公里，政治的天平会倒向哪一方？况且，汉城怎么办？放弃？这么快就放弃汉城怎么向中朝人民交代？对

中国军队的作战士气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彭德怀在不眠之夜把这些问题的后果一一想到了。可是，迎敌而上，出击作战，军事上又不允许。按现在中国军队的状况，如果出击，各方面都极其勉强，因此必然会凶多吉少。军事上的常识是，部队的出击应该是一切准备完毕之后的行动。战争史上没有哪一次勉强的军事出击是以胜利为结局的。战斗一旦展开，是要流血的，绝不能用士兵的生命去做一次企图侥幸取胜的赌博。如果部队遭到重大损失，军事上的被动不说，政治上会更说不过去……

战争就是政治。

电报发出后，连彭德怀自己都认为，毛泽东肯定不会同意他的意见。

果然。

二十八日晚，毛泽东回电。其内容不但没有出乎彭德怀的预料，其要求更令彭德怀大吃一惊：

德怀同志：

（一）一月二十七日二十四时给我的电报及给各军准备作战的命令均已收到。

（二）我军必须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战役，以歼灭两万至三万美李军，占领大田、安东之线以北区域为目标。

（三）在战役准备期间，必须保持仁川及汉江南岸，为确保汉城并吸引敌人主力于水原、利川地区，战役发起时，中朝两军应取突破原州直向荣州、安东发展的办法。

（四）中朝两军北撤十五至三十公里发表拥护有限期停战的新闻是不适宜的，敌人正希望我军撤退一段地区，封锁汉江，然后停战。

（五）第四次战役后，敌人可能和我们进行解决朝鲜问题的和平谈判，那时谈判将于中朝两国有利。而敌人则想于现时恢复仁川及汉江南岸桥头堡，封锁汉江，使汉城处于敌火威胁之下，即和我们停战议和，使中朝两国处于不利地位，而这是我们决不能允许的。

（六）我军没有补充兵，弹药也不足，确有很大困难，但集中主力向原州、荣州打下去歼灭几部分美军及四五个南朝鲜师的力量还是有的。请你在此高干会议上进行说明。此次会议应即作为动员进行第四次战役的会议。

（七）中朝两军在占领大田、安东以北地域以后，再进行两个月至三个月的准备工作，然后进行带最后性质的第五战役，从各方面说来都比较有利。

（八）宋时轮兵团应即移至平壤、汉城、仁川、水原区域休整，并担任巩固该区域，防止敌人在仁川及镇南浦登陆。在将来的第五次战役中，该兵团即担任西部战线之作战。

（九）执行第四次战役时，请你考虑将中朝两军主力分为两个梯队，各带五天干粮蔬菜，一梯队担任突破及一段追击，第二梯队担任又一段追击，以便能使战役持续十天至二十天，歼灭更多敌人。

（十）你的意见如何，盼告。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十九时

毛泽东不但不同意部队后撤，而且指示立即发动第四次战役，其战役目标是位于三六线上的大田和安东！

二十九日，中朝高级干部会议立即改成第四次战役的动员会议。

彭德怀心里很清楚，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打到三六线上去，是没有任何可能性的，至于在三六线上休整部队，更是一种绝对的想象。现在，在三七线上的部队想休整，人家已经不让你休整了。第四次战役在勉强发动的状况下，最好的结局根本不是打到大田、安东一线去，就连现有的三七线能否保住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中朝军队所进行的战斗是正义的，但这仅仅是战争胜利的政治保证，而军事上的保证又是什么呢？交战双方装备的极度悬殊决定了军事占领上的极大差距，弥补这个差距所付出的代价目前只能是更多士兵的生命。

撤退，在军事上是合理的，但政治上不允许。

进攻，军事上不现实，但政治上需要。

第四次战役必须打了。

彭德怀给毛泽东回电：

……

（乙）我军情况：鞋子、弹药、粮食均未补充，每人平均共补五斤，须（需）二月六日才能勉强完成。特别是赤脚在雪里行军是不可能的。将各军、师直属队、担架兵抽补步兵团，亦须（需）数日。十三兵团主力由现地出动至洪川、横城集结，约二百公里。我们拟于二月七日晚出动至十二日晚开始攻击。

（丙）攻击部署：以邓华同志率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六十六军首先消灭美二师，然后进攻堤川美七师或伪八师、二师，得手后看情况。以韩先楚同志往汉城指挥三十八军、五十军及人民军第一军团坚持汉江南岸阵地，相机配合主力出击。以金雄同志往平昌，指挥人民军第二、第五军团首先消灭伪七师，得手后向荣州前进。

（丁）九兵团目前只能出动二十六军共八个团，须（需）二月十八日才能到铁原做预备队，其余因冻伤均走不动（一个师三天只走十五里），四月才能大体恢复健康，影响了我步兵比敌步兵优势，这是严重问题。第四次战役，敌我步兵相等，情绪比敌高，我还存在许多弱点。消灭敌两三万人后，敌利用技术优势，我亦不能取得两三个月的休整。第三战役即带着若干勉强性（疲劳）。此（四）次战役是带着更大的勉强性。如主力出击受阻，朝鲜战局有暂时转入被动的可能。为了避免这种可能性，建议十九兵团迅速开安东补充整训，以便随时调赴前线。

彭德怀军事部署的意图是：以现位于西线的第三十八军和第五十军坚决阻击敌人于汉江南岸，人民军第一军团担任海岸防御和汉城守备任务；而东线则放敌人进来，然后以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四十二、第六十六军分割歼灭之，人民军第三、第五军团担任侧翼掩护。可以说，这样的一个部署并非是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向三六线进攻的部署，而是企图通过阻击和局部的运动防御，迫使敌人的进攻停下来的权宜之计。

这是彭德怀所能做到的最大限度的进攻了。

就是这个计划，虽然还没有实施，但看上去已经险象环生：西线有联合国军最精锐的、兵力强大的攻击力量，是联合国军的主攻方向，而中朝军队在这个方向上只有三个军（军团），这三个军（军团）将要出现的巨大伤亡且不说，一旦阻击不住，将会导致中朝军队防线的全面崩溃。东线虽然采取的是先放后打的原则，而且有战斗力弱的南朝鲜军可攻击之，但是，将要在东线作战的几个军（军团）目前都在距离攻击地域上百公里之外的地方休整，于是所有部队将要仓促准备，连续行军，疲于对敌……

对于几十万中朝士兵来讲，朝鲜战场上的最严峻的第四次战役，就这样开始了。

## “共军士兵们，你们今天过年了！”

当美第二十五师师长基恩透过吉普车的前窗，看见了那座岩石裸露的山峰时，心里涌起一种说不出的酸溜溜的感觉。

威廉·基恩，一九一九年毕业于西点军校，在美国陆军任职已达三十一年。二战中曾在布莱德雷手下任过参谋长，在北非和欧洲都参加过战斗。现任美国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对他的评价是：“忠诚可靠，不屈不挠，具有稳定性格。”

自基恩率领第二十五师进入朝鲜作战以来，第二十五师的表现令他一直处在沮丧的情绪中。原本属于这个师的二十四团，也就是那个由黑人士兵组成的团队，因为作战消极被上级解散了。四个月前，当北朝鲜军队全力向釜山防御圈施加压力的时候，沃克命令第二十五师沿着晋州公路和海岸公路发动一次进攻，以确保釜山防御圈南端的安全。这次进攻，由于寄托着沃克对第二十五师的极大期望，所以被正式命名为“基恩作战”。进攻中，基恩的部队虽然攻占了晋州，却受到埋伏在山里的北朝鲜人民军的突然袭击，第二十五师损失惨重，撤退

下来后，全师很不光彩地被沃克将军调到后方去整顿。“基恩作战”以一次失败的战例被写进美国陆军的战史中。

这次，第二十五师还是要沿着海岸公路攻击，这里的地形和四个月前那次倒霉的“基恩作战”时完全一样。眼前这座叫修理山的山峰看上去有种不吉利的样子。基恩知道，现在的对手可能会比北朝鲜军队更加有战斗力，而且中国军队的战术更无章法，因此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倒霉的事。基恩不希望自己的名字再一次与失利的战例联系在一起，然后进入将他送入军队的西点军校的教材中。

从“霹雳作战”一开始，基恩就给自己定下一条雷打不动的原则：齐头并进，严格按照每天前进的公里数推进，只要到达了计划中本日的调整线，无论如何也不再前进一步。

于是，位于西线的美军第二十五师的前锋部队一线平铺，由西向东并列着土耳其旅、三十五团和南朝鲜军十五团。

修理山，汉城南边的一个重要高地，俯瞰着由水原通往仁川和汉城的公路，是北进汉城的必经之路。

目前，在修理山防御的，是中国第五十军的一个师。

自从水原向北进攻以来，美军第二十五师一直和中国的这个军接触，并且一路交战打到这里来。中国军队的阻击迄今为止不算猛烈，甚至可以说算不上什么阻击，拿参谋人员写给李奇微的战报讲，“仅仅遇到中国人无关痛痒的抵抗”。二十六日，“霹雳作战”开始后第二天，第二十五师的部队除了土耳其旅在乌山附近受到猛烈的射击之外，三十五团轻易地驱赶了少数抵抗的中国士兵，进入了有城墙的水原城。水原城里的朝鲜老百姓对美国兵说：“中国人说他们很快就会回来的。”

二十七日，当第二十五师接近修理山的时候，中国军队的抵抗逐渐激烈起来。第二十五师这天没有前进到计划中的位置，并且遭到了中国军队“有组织的迫击炮的袭击”。侦察报告很快送到基恩手中：从修理山到光教山一线，中国军队修筑了相当规模的阵地，南麓棱线上有一连串的堑壕，遍布着密集的射击口。

基恩否决了参谋们提出的绕过修理山、利用公路和坦克中队向北进攻的建议。一旦激战来临，基恩反而不断地想起四个月前的那次失败，他决定夺取修理山之后，再利用装甲纵队前进。

向修理山中国阻击阵地进攻的命令下达了。

基恩确定的攻击时间是：一月三十一日。

中国第五十军，由中国国民党第六十军改编而成。一九四八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围困长春，面对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一九四九年一月二日，此军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授予第五十军番号。改编之后，补充了共产党的大批干部和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以及在东北地区招收的大批新兵。六月，第五十军奉命南下，十月参加鄂西战役，俘虏国民党第七十九军官兵七千多人。十一月，第五十军随第二野战军进入四川，随后参加成都战役，俘虏国民党军八千余人。一九五〇年二月，第五十军归入第四野战军序列，入湖北，参加修筑汉江大堤工程。

作为入朝参战的第一批部队之一，第五十军参加了第一、第二、第三次战役，一直被部署在西线的主攻方向上，全军作战英勇，战果累累。在第三次战役中，该部队在攻击汉城的主要攻击线上迅猛挺进，以在高阳附近歼灭英军“皇家重坦克营”一战闻名于战史，并且是

首先突入汉城的部队之一。第三次战役后，第五十军一直追敌至水原附近，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半岛上向南打得最远的部队之一。

第五十军现任军长曾泽生，政治委员徐文烈，参谋长舒行。

在一九五一年朝鲜战争第四次战役开始的时候，第五十军最先在美军强大的攻势面前接受了严峻的考验，为此，中国士兵用血肉之躯阻挡着美军的坦克与大炮，热血洒遍汉江南岸绵延陡峭的山峰。

一月三十一日晨，美军第二十五师师属炮兵群经过两天的准备，开始了长达一个小时的火力准备。从朝鲜半岛西海岸外海的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攻击机也飞临修理山上空进行了猛烈的轰炸。美军从中国军队阻击阵地的两翼同时发动进攻。还在火力准备的时候，参加冲击的美军就已从两翼使用营级炮火协助，仅仅担任左翼主攻的三十五团二营的营级炮火就包括了数十门七十五毫米无后坐力炮、八十一毫米迫击炮、六十毫米迫击炮以及二十一辆坦克上的滑膛炮和数辆M-16自行高射机枪。修理山一线中国军队的阵地全部被硝烟和火焰所覆盖。

美军第二十五师三十五团首先冲击。

左翼攻击的第一梯队是二营营长麦特利中校指挥的F连。在炮火准备向中国阵地的反斜面延伸的时候，F连士兵呐喊着开始向修理山中国阵地的前沿冲击。他们在阵地前沿受到中国军队迫击炮火的拦截，同时也受到侧射火力和手榴弹的杀伤，但是他们还是一步步地接近了前沿棱线的顶端。开始时，中国士兵射出的子弹十分密集，F连出现较大的伤亡后，曾经一度停止了攻击。一直到接近中午的时候，中国士兵的火力逐渐稀疏下来，F连终于爬上了前沿棱线。中国士兵的阻击突然减弱，令F连顺利地占领了阵地棱线，麦特利中校颇感意外。在占领的阵地上清点战斗结果时，麦特利中校发现F连伤亡三十人，而中国士兵留在前沿阵地上的尸体是四十三具。

右翼攻击的第一梯队是由格兰德中尉指挥的E连。在一〇五毫米榴弹炮和八十一毫米迫击炮的弹幕掩护下，E连冲过攻击路线上的一片开阔的稻田，然后接近了前沿棱线。美军士兵沿着枯枝覆盖、乱石累累的陡坡往上爬，立即受到上面射来的步枪子弹的拦截。格兰德中尉命令各排散开，从不同的方向向上跃进，在岩石的掩护下，美军士兵们喊着口令一齐向上投手榴弹，然后一步步地向山顶移动。也是在接近中午的时候，E连以伤亡二十多人的代价占领了前沿棱线。留在这个阵地上的中国士兵的尸体共有二十多具。在格兰德中尉也为今天的攻击如此顺利而感到奇怪的时候，他看见被F连赶下来的大约五十多名中国士兵沿着山沟在向后跑。

中国军队在修理山阵地的前沿修筑了很深的堑壕和很结实的隐蔽工事，但美军仅用了三个小时就打下来了，麦特利营长和格兰德连长面对胜利却相视无言，被打怕了的他们一时不知道这究竟是福还是祸。

包括基恩师长在内，美军第二十五师官兵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必须在战斗前进行猛烈的炮火准备，以把中国军队阵地上的工事全部摧毁，这样对其战斗人员的杀伤也出乎意料的多。在修理山，他们发现那些死在阵地上的中国士兵，绝大部分是因为炮击和轰炸而死的。尤其是抵近射击的榴弹炮和无后坐力炮对其工事射击口的直接瞄准射击，基本上在进攻前就能把中国阵地上的一切炸飞。

对于中国军队来讲，面对美军强大火力的攻击，把阻击阵地设置在正斜面上的传统做法已经成为用生命换来的教训。正斜面一旦承受炮火射击，人员和工事会受到惨重的杀伤和破坏。为此，美军的军事教材上写道："对拥有优势火力的敌人进行防御时，如果把阵地线选在正斜面上，结果就会白白地成为敌人的饵食。"更何况，美军的火力装备是中国军队不可比拟的。

三十一日中午，修理山中国军队一线前沿阵地丢失。

从修理山的前沿阵地，可以看见不远的一处高地上，中国士兵正在紧张地修筑阻击工事。格兰德中尉主张立即攻击。他的主张受到麦特利营长的否决："对方是中国人，没那么便宜的事，等着火力支援吧！"

麦特利在等着空军的火力支援。

没有空中支援的时候是不能攻击的。

美军士兵坐在岩石上吃着南朝鲜民工送上来的食品，其中有很热很浓的咖啡。伤员和死亡士兵的尸体已经全部抬下去了。太阳温暖地照着，除了从中国阵地上传来的修筑工事的声音外，一切都很平静。喝了热咖啡的美国兵有的开始在岩石下打盹，只有格兰德中尉越来越不耐烦，他不时地看看天空，怎么支援的飞机还没有来?

大约一个小时过去了，突然，剧烈的枪声从中国军队的阵地上响起，机枪子弹暴雨般地向美军士兵倾泻下来。美军士兵滚到岩石后面，紧张地端起枪，被射中的士兵因为疼痛尖厉地叫喊起来。

射击还在持续，美军士兵们感到中国士兵随时可能冲击过来。

太阳已经西斜，E连接到了开始攻击的命令。

麦特利营长说："飞机马上就来了！立即占领前面的高地！"

格兰德看了看仍没有飞机的天空狠狠地骂了一句。

中国军队的阵地开始受到炮火的袭击，硝烟和火焰腾空而起。E连的士兵沿着岩石的缝隙向中国军队的阵地接近的时候，居然看见距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有两个中国士兵正在有条不紊地操纵着一门迫击

炮进行射击，他们根本没把美军士兵的接近当一回事，这让美国兵十分惊讶。“这是中国士兵顽强抵抗的证据，”格兰德中尉后来说，“他们的镇静令人害怕。”

美军爬到高地腰部的时候，中国士兵的火力加强了。大量的步枪一齐射击，从声音上听，至少有两挺机枪。爬在最前面的阿卜拉哈姆排暴露在中国士兵的火力下，美军士兵像坠落一样从山腰上滚下来，混乱地分散开。负伤的士兵大声地叫着排长，排长自己滚在一块岩石的后面喘个不停，并且通过无线电向格兰德连长报告：“我们陷入困境！我们陷入困境！”格兰德又看了一眼天空说：“坚持一下！飞机马上就来！”

可是，该死的飞机还是没有踪影！

美军士兵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阿卜拉哈姆排正处在危急中，从他们的侧后，中国士兵猛烈的反冲击开始了。最先受到反击的是二营的一排，一排的美军士兵疯了一样地向后跑，但是中国士兵的刺刀就在他们的屁股后面追。在阿卜拉哈姆排的身后，出现了一队利用背负的A字形木架运送弹药的中国人，从这些中国人背上的东西上看，好像不是弹药箱，可能是装在布袋中的食品。阿卜拉哈姆排已处在三面都有中国士兵的境地中，美军士兵们息声屏气等待着自己未知的命运。

也许遭到中国军队反击的一排完蛋了？追击他们的中国士兵掉过头来开始收拾趴在半山腰上的阿卜拉哈姆排。侧射、背射和正面的射击令这个排处在完全挨打的困境中，排长立即要求撤退：“如果再这样下去，我们就会被全部消灭！”格兰德向麦特利营长报告撤退的请求时，麦特利一口拒绝了：“再忍耐一下！飞机马上就来！”

格兰德中尉忍无可忍，他们已经等了四个小时：“即使飞机现在来，也来不及了！再说，来了又能怎么样？往山上扔汽油弹？我们的一个排在上边！”

麦特利营长终于同意撤退。

格兰德把连队能够集中的炮火全部调来掩护阿卜拉哈姆排撤退。十八门各式火炮，加上八门一〇八毫米的迫击炮，一齐向中国军队的阵地上射击，短短的几分钟内竟然发射了两百多发炮弹。当幸存的美军士兵在炮火的掩护下跑下来的时候，他们破口大骂空军，然后就清理伤亡情况，结果发现其中两个死亡的士兵是刚补充来的新兵，叫什么名字谁都不知道。

美军的飞机来了，是一群A-7“海盗”式攻击机。盘旋之后俯冲下来，黑压压地向中国军队的阵地狂轰滥炸。冲天的黑烟和火柱遮住了西斜的夕阳，天空顿时暗了下来。麦特利营的美军士兵又开始大骂，因为他们看见这些飞机并没有轰炸令他们受到严重损伤的中国阵地，美军飞机轰炸的是修理山的主峰。

正骂着，美军士兵看见中国阵地的前沿上有两个人影在昏暗的天色中晃动，他们认定那必是负伤的美国兵在寻找下山的路。于是他们喊叫着，招呼那两个人快点下来，喊了半天，那两个人根本没理会，再仔细看时，发现那是两个中国士兵，正在美军士兵的尸体上搜着什么。

第二天，麦特利营继续攻击，但是，当他们缓慢地爬上高地时，发现阵地上已没有中国士兵，一些被打坏的苏制轻机枪和步枪散落在被炮火熏黑的土地上。

二月二日晚，一夜的风雪。

三日天亮的时候，美军第二十五师开始向修理山主峰攻击。

令从右翼攻击的美军没想到的是，他们居然没费什么力气就爬上了修理山的主峰。同时，左翼的土耳其旅也传来好消息，说他们也上了主峰。主峰上雾很大，美军士兵看见他们右前方的棱线上有两路纵队在向他们的背后运动，但在浓厚的雪雾中看不清楚是什么人。美军判断可能是土耳其人，因此他们没有开枪。放心不下的美军军官向土耳其旅司令部打电话，但是电话的那一端没有会说英语的军官，双方说了半天也没弄明白。不久，天黑下来，修理山山顶上的美军士兵个个心中恐慌，军官们也是个个焦虑不安——他们知道，天一黑，中国人说不定就会从什么意想不到的地方钻出来。

依旧打前锋的麦特利营长决定让G连连夜向主峰靠拢，以便在紧急时刻支援主峰上的E连。可是，G连的联络兵在黑暗中不断地叫喊，E连却没有任何回答。正在焦灼不安的时候，黑暗中有一支部队走来，队伍中一个声音传来，是英语：“我们是土耳其连！我们是土耳其连！”G连还没看清楚就走过去了。这个情况反映到美军指挥所，所有的人都感到奇怪：黑暗中那支部队走过的地方，正是中国军队的狙击手出没的地方，是明令禁止通行和特别戒备的地段。这是一支什么部队？为什么通过阻击线而没有发生任何战斗?

没过多久，土耳其旅派来的联络官到了美军指挥所，说在他们和美军的阵地之间，存在一个四百多米的空隙，要求派部队把这个危险的空隙填补上——美军军官们这才知道，原来一直以为右翼已经被土耳其旅占领，现在看来，在右翼的部队根本不是土耳其人！

上半夜发生的各种奇怪的事把美军弄糊涂了。

午夜到了。

美军第二十五师三十五团二营一排的阵地上空突然飞来了手榴弹，同时步枪和机枪的子弹也密集地飞过来，而这些射击居然是在距离他们不到十五米的地方进行的！美军士兵立即从战壕中爬出来，向可以藏身的岩石后面四处爬散。阵地立即就丢失了。

几乎是同一时刻，土耳其旅的阵地上传来更为激烈的枪声，不一会儿，一群浑身是血的土耳其人跑到了美军二排的阵地上，他们用混乱的手势说，他们完了，被击溃了。

在中国第五十军阻击部队设下的圈套中，土耳其旅开始交厄运了。白天，他们往修理山上爬的时候，没有受到什么像样的抵抗，因此他们报告说，他们占领了阵地。其实他们哪里知道，就在他们的脚下，中国士兵正息声屏气地监视着他们。在修理山阻击阵地上，中国士兵修筑了极其坚固的工事，那些伪装严密、建筑结实的火力点和隐蔽部，由掩盖着的交通壕连接在一起，里面不但有电话线，而且囤积的物资可以让中国士兵坚持一个星期。宣布占领阵地的土耳其士兵实际上正坐在中国士兵的头顶上！

在麦特利营长的指挥所里，土耳其旅旅长说什么也不相信自己的部队被打了下来。正说着，三十多名土耳其士兵跑进了指挥所，弄得正在强词夺理的旅长十分尴尬。旅长和他的士兵们用土耳其语说了一会儿之后，如释重负地对麦特利上校说："我们的士兵说，美国人也把阵地丢了！"

由于土耳其旅的溃败，修理山主峰上只剩下美军的E连了。

中国士兵开始向E连的阵地进行反复冲击。黑暗中，中国士兵的影子时隐时现，他们好像有投不完的手榴弹。顶峰上的E连不断地报告说："实在坚持不下去了！"但是，得到的回答永远是一句话："坚持下去！"

格兰德觉得绝望的时刻到了。炮兵的射击由于目标观测不准确而效果不大。一五五毫米榴弹炮发射的照明弹不但对美军没什么帮助，却正好暴露了E连的位置。在照明弹的光亮下，格兰德看见中国士兵向山顶蜂拥而来，主峰上中美士兵立即进入了肉搏战。在肉搏战中，修理山山顶被拉锯式地反复易手，战斗一直持续到天亮。

天一亮，美军的飞机来了，中国士兵不得不撤出战斗。

E连伤亡了一大半士兵，跟随连队行动的炮兵也伤亡了三十多人。

但是，土耳其旅负责攻击的阵地还在中国军队手中。恼火的基恩师长把土耳其旅的残兵换下来，派师预备队第二十七团的一个营上去。三营是由奇伊中校指挥的，这个营不但配属有迫击炮和A-16自行高机炮，同时还有一个营的野战炮兵归他们使用。

他们要攻击的是四四〇高地。

奇伊营长乘直升机察看他要接防的阵地，他看到了四四〇高地上“穿着褐色衣服的中国士兵”。同时，他还看见了在修理山主峰方向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那是中国军队再次向修理山主峰进行的包围冲击。

奇伊的三营也很快就尝到了和中国士兵打仗的滋味。

向高地接近的每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打前锋的F连刚一出击，“瞬间就出现八名士兵的死亡”。与炮兵的协同也不那么顺利，炮火的支援虽然猛烈，但总好像效果不明显，因为中国士兵的阻击没有丝毫的减弱。为了在火力上达到压制效果，奇伊在一个排的攻击中使用了五门自行高机炮和二十挺重机枪，它们一齐向迎面的中国阵地进行连续不断的射击。但令美国人吃惊的是，为什么在这么强大的火

力下，中国士兵依旧还在阻击，好像他们根本死不完似的。在付出极大的代价之后，三营攻击到四四〇高地的最后一个阻击阵地。奇伊用上了所有的炮兵，并且引导美军“海盗”式飞机加入战斗。美军炮火的密度足以摧毁高地上的所有生物，但是唯独中国士兵还在射击。“海盗”式飞机的飞行员由于看错了地面的指示，竟把炸弹投到正在射击的A-16高机炮的头上，奇伊在无线电中大声地咒骂之后说：“我们要感谢空军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

美军战史对朝鲜战争中四四〇高地的战事有如下记载：

斯基纳中尉发挥了百折不挠的勇敢精神。士兵们不愿意突击，中尉就跳着吼叫，于是，萨马中士和沃拉中士等人一齐鼓励士兵，并且踢着他们的屁股往山顶上推。大约一分钟后，全体人员都站了起来，中尉一声令下，可是全体人员都跑下了山坡。

斯基纳中尉组织起突击队。在越过山丘后，听到两米距离上子弹的呼啸声。他们边突击边射击，突然，周围陷入了平静，实际上他们陷入了错觉之中。在这一瞬间，好像泄气了，斯基纳中尉知道，实际上他们才前进了不到一半的路程。

二月六日，在给美军以极大的杀伤之后，中国军队放弃了修理山阵地，开始向后撤退。

美军士兵在战壕中开始享受南朝鲜民工运上来的香烟、点心、干燥的袜子以及邮件。战后有人仍记得，那一天，在修理山主峰弥漫的硝烟中萨马中士读信的声音：“亲爱的，你现在在干什么？告诉我……”

中国第三十八军在朝鲜战争的第二次战役中获得了“万岁军”的称号，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但是，这之后，这个军的军史上记载的却是一段无比惨烈的战斗经历，这就是从一九五一年一月底开始的汉江阻击战。

阻击战是一月二十八日于前沿阵地泰华山开始的。泰华山阵地与西边的第五十军的阻击阵地相连，山下的公路向东可通利原，西北可

通汉城，这是联合国军北进的必经之路。在第三十八军的正面，是美军骑兵第一师和美军第三步兵师的进攻部队。

最先迎击联合国军进攻的，是第三十八军一一二师三三六团的五连。五连坚守的阵地是泰华山主阵地的前沿，名叫草下里南山。

五连连长徐恒禄，山东莒县人，时年二十七岁，在国内战争中曾屡立战功。当五连发现美军进攻的时候，他正在阵地最前沿的三三一高地上，在这个高地上坚守的是六班。六班负责观察的士兵报告说："远处的公路上多了一趟树。"徐恒禄举起望远镜一看，不禁浑身一紧：是敌人，至少有一个营的兵力和十几辆坦克，正分三路向五连阵地草下里南山运动。

徐恒禄知道，最激烈的战斗来了。他立即命令隐蔽在后山的部队上来，并且严令不准暴露目标，以防止美军的炮火杀伤。然后他把兵力布置在公路边的灌木丛中，准备等美军走近了再给予其突然袭击。

徐恒禄的想法实现了。美军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遭到来自公路两侧灌木丛中的猛烈射击。在短暂的混乱之后美军展开队形，集中炮火向灌木丛轰击，一个连的美军士兵同时向灌木丛冲击而来，但是，灌木丛中却没有了中国士兵的影子。美军正不解的时候，密集的子弹又从右翼突然射来，紧接着，在手榴弹的烟雾中冲出十几名端着刺刀的中国士兵，美军丢下伤员和死亡士兵的尸体，一窝蜂似的向后逃命。

美军军官知道，自从他们开始向北攻击以来，现在才是真正遇到中国军队的阻击线了。

五连的突然袭击确实奏效了。

但是，接下来的战斗使他们开始流血牺牲。

第二天，天一亮，美军按照李奇微“火海战术”的原则进行火力准备了：数十门火炮加上三十多辆坦克一起向小小的草下里南山阵地轰击，使整个阵地如同被犁过了一样。蹲在防炮洞里的中国士兵被浓烈的硝烟呛得喘不上气来，士兵们的耳膜被震出了血。炮火整整轰击了一个小时才减弱，八架飞机紧接着来了，轮番扔下大量的凝固汽油弹，草下里南山整个山包都燃烧起来。徐恒禄担心在最前沿的三个警戒战士，于是冒着炮火向前跑，炮弹在他的前面爆炸，但是他不在乎，因为他已在连队的支委会上作了决定：把连队的主要干部分散开，要死别一块死，只要还有一个人，就坚决指挥部队打下去！

到了最前沿，徐恒禄有点转向了：工事没有了，原来的山包也没有了，树木被炸得东倒西歪，没有倒下的树燃烧着如同一支支火炬。怎么不见那三个战士的影子呢？他估算出大致的位置，用手扒开滚烫的土，结果，扒出来一个活的，一个负伤的，最后的一个已经牺牲。

突然，被徐恒禄从土中扒出来的那个战士说：“连长！敌人上来了！”

两个营的美军，在坦克的掩护下，向草下里南山阵地开始了进攻。

五连各排坚守的阵地几乎同时开始了殊死的搏斗，双方士兵一直在互相胶着的状态中对阵地进行着反复争夺。

中午的时候，美军退下去了。

草下里南山阵地上还活着的中国士兵此时反而没有了恐惧和紧张，他们只是感到又渴又饿。战斗前还可以吃阵地上的雪，现在阵地上已经没有雪了。炒面放在嘴里，嘴里一点唾液也没有，呛得剧烈地咳嗽起来。一排三班长牟林向徐恒禄要了块干净的手绢，带上三个战

士和三袋炒面，爬出去好远才找到一片雪地。他在手绢上撒上一层雪，再撒上两把炒面，然后包起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让雪融化，这样“蒸”出来的炒面团软软的，潮湿着，还有点温热。当他把自己制造出来的“食品”带回阵地上时，获得了一片惊讶和赞许之声。

十二时三十分，吃饱了的美军开始了新一轮的进攻，这次兵力增加到一个团。

草下里南山阵地曾一度丢失，但在徐恒禄指挥的反击中又夺了回来。当美军再次进攻的时候，五连一百多人的队伍只剩下了二十多人。团指挥所上来个通信员，带来了给徐恒禄和一排长记功的决定和一个命令，命令他们至少还要坚持五个小时。

美军士兵上来了，他们发现向他们头顶上砸下来的除了手榴弹之外，还有石头。

六班长王文兴负伤了，但是他坚决不下去。在反击的时候，他再次负伤，倒在地上不能动了。徐恒禄抱起他准备给他包扎，突然，腿已经断了的王文兴拿着两颗手榴弹跪了起来，脸上似乎还有一种微笑。他说：“连长，反正我活不成了，就是死也要死个够本！”

王文兴挣脱开徐恒禄，顺着山坡向正在往上爬的美军滚了下去，一直滚到美军士兵的中间，然后，他怀中的手榴弹爆炸了。

徐恒禄两眼发红，举起枪喊：“为六班长报仇！”

战士们端着刺刀向山下扑去！

五连以几乎全部伤亡的代价，在草下里南山阵地坚守到了上级规定的时间。

在第三十八军一一二师三三四团二营九连的阻击阵地上，有个叫潘天炎的中国士兵。一个团的美军向他所在的阵地进行了猛烈的炮火轰炸和反复的进攻，最后，他所在的九班只剩下他一个人了。潘天炎十八岁，个子很小，所以当美军再次向这个阵地攻击的时候，美军军官举起望远镜一看，认定这个阵地上已经没有活着的中国士兵了。这时的潘天炎正因为肚子疼在蹲着屙屎。敌人上来了，他提起裤子就干开了。潘天炎人小心眼多，他把六颗手榴弹捆在一起放在工事前边，用一根电线连接上所有的拉环，然后自己躲在一边，等敌人上来之后，他一拉电线，炸倒了一片。美军士兵又摸上来的时候，他突然喊了一声："同志们！敌人上来了！"美军士兵听见这突然的喊声，全趴在地上不动了，潘天炎跳起来就扔手榴弹。美军弄不明白这个阵地上到底还有多少中国士兵，于是开始炮击，炮击完毕之后加大兵力再进攻。最后，小个子中国士兵潘天炎准备死了，他奔跑在阵地上根本不隐蔽自己，手榴弹和卡宾枪一齐使用，就在他决心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时候，增援阵地的部队上来了。中国士兵很羡慕这个勇敢而命大的小个子兵。后来文工团的演员还专门用他的事迹编了一段单弦，单弦在志愿军各部队广泛传唱："有一位青年战士，名叫潘天炎，打退鬼子的九次冲锋，军功章佩戴在胸前。"

二月二日，三三四团三营九连阻击阵地上所有的防炮洞全部被美军的炮火和飞机炸毁。在弹药耗尽、人员严重伤亡的情况下，九连被迫放弃阵地。为掩护战士们撤退，三排副排长王青春主动一个人留在阵地上吸引敌人。当战士们刚刚撤下来的时候，美军包围了阵地。王青春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安然地拆坏了武器，然后仰面躺了下来，美军士兵向他的头部开了枪。

九连打到最后剩下不到三十人，在侧翼阵地丢失、连队所在阵地处在三面包围的危急情况下，全连没有一个人撤退。激奋的三营营长

命令把营指挥所前移，表示阵地上只要还有一个人，就不能丢失阵地。

在三三七团的阵地上，一个被称为“战士的母亲”的班长姜世福的牺牲令战士们万分悲痛。姜世福是一位面容消瘦、性格稳重的人，平时关心士兵无微不至，战士们都很喜欢他，说他像自己的母亲一样。他所在的三连在阻击战斗中因为伤亡巨大不得不从阵地上撤退。指导员白广兴最后一个离开阵地时，发现了已受重伤的姜世福。姜世福的双腿被炸断，腹部也受了枪伤，血快要流干了。指导员要背他下去，他醒来了，对指导员说：“我掩护，你快走！我求你一件事，跟同志们说我姜世福没向敌人低头！”指导员坚持要把姜世福背下去，这时美军又冲上来了。姜世福恳求指导员立即转移。无奈中指导员走了。姜世福坐在阵地上，身下是一片鲜血，直到美军士兵像发现一个奇怪的东西一样把他围住的时候，姜世福从容地拉响了藏在身上的两颗手榴弹。

第三十八军的军、师、团主要指挥员，都是从沈阳昼夜兼程赶回前线的。所有回沈阳参加集训的干部，千里迢迢地回到沈阳，仅仅进行了个开幕式，看了一场为开幕式助兴的京剧，就接到了立即回前线的命令。因为美军的全线反攻开始了。在往前线赶的时候，副军长江拥辉遇到了从前边送下来的大批伤员。伤员们看见自己的军首长，不免牢骚满腹：

“敌人搞的是火海战术，山头都炸平了，草木都烧光了，守在山上真窝火！”

江拥辉知道，第三十八军的士兵们所遭遇的远不止这些。

第三十八军在汉江南岸的阻击，不但伤亡巨大，而且险象环生。二月二日夜，美军居然模仿中国军队的战法，美第二十四师十九团以

夜行军渗透到了中国军队防线的后方。第三十八军一一三师的侧后发现美军，炮弹已经打到师指挥所了。军指挥部立即命三三八团连夜奔袭山中里解围。三三八团行动神速，插得坚决勇敢，终于把渗透到中国军队后方的美军的两个营基本上歼灭了。三三八团的官兵为此伤亡巨大，战后中国军队的战地救护队满山遍野地抢救负伤的中国士兵。在狼藉的战场上，一个牺牲的中国士兵的身边，岩石上刻着一道又一道的线条，活着的老战士说，那记录的是打死美国兵的数字。美军的伤亡同样巨大。战斗结束后，中国军队用电台和美军指挥部联系，让他们来运走美军士兵的尸体和伤员，中国军队表明可以保证其安全，结果美军真的派来了直升机，来来回回地运了整整一上午。

二月七日，中国第五十军和第三十八军同时接到彭德怀的命令：第五十军主力撤至汉江北岸组织防御；第三十八军继续留在南岸迟滞敌人。

就是在那一天，没能来得及结婚就从炎热的武汉街头走向寒冷的朝鲜战场的第三十八军一一四师三四二团一营营长曹玉海在战斗中牺牲了。

当日，三四二团二营、三营在岩月山的阵地失守，一营所在的三五〇点三高地因位置突出成为美军猛烈攻击之地。战斗前，军指挥部专门把战斗英雄一营营长曹玉海叫来，当面交代任务。美军的攻击空前强大，很快，二连的阵地失守了。为了夺回阵地，曹玉海带领部队顽强反击，一直坚守到弹药已绝的危急时刻，曹玉海饮弹倒下。教导员方新接替他的指挥，并且向团指挥所报告："营长在打退敌人第四次进攻时牺牲。"方新说完，停顿了一下，突然，他提高了嗓门喊道："我向党保证，全营血战到底！"

就在曹玉海倒下的地方，二十七岁的营教导员方新，在美军冲上阵地的时刻抱起一枚迫击炮弹跳进了敌群。

中国士兵与美军在汉江南岸以血肉相搏的时候，正是中国传统节日春节来临之际。

在中国军队阻击阵地的前沿，美军架起了巨型喇叭，向坚守阵地的中国士兵用汉语喊话。声音是个软绵绵的女声：

“共军士兵们，你们今天过年啦！可你们待在山上多苦！吃不上饭，喝不上水，脚也冻肿啦。”

“我们联合国军队，是为解放朝鲜来的，联合国已经宣布你们是侵略者！”

“投降吧！中国人！”

同时，美军飞机撒下不少传单。在一张写有“恭贺新年”四个大字的传单背面写着：“新年在望，可是你老婆在家还不起账，你很可能死在外国的战场上。”

在中国军队的阵地上，士兵们是因为炊事员破天荒地送来了肉，才知道今天是春节。第三十八军虽然战斗残酷，但是这个春节却搞得很热闹。军机关组织干部带上干粮、木炭、糖水，甚至还有肉上阵地慰问，文工团的演员们也不顾危险上前沿为士兵们演出。送上阵地的慰问品，有不少是从中国国内运来的，战士们攥着分到的几块彩色纸上写有“中国制造”的糖果都舍不得吃。后来，直到许多士兵永远倒在朝鲜半岛坚硬的冻土上的时候，那几块糖果依旧揣在他们最贴胸的口袋里。

春节过后的几天里，在阻击美军猛烈进攻的时候，中国军队的阵地上时常听见这样的呐喊：

“同志们！东线部队打了大胜仗啦！敌人的猖狂长不了啦！”

彭德怀之所以命令西线的第三十八军和第五十军不惜一切代价迟滞美军北进的速度，是因为在战场的东线，一场惊心动魄的反击作战正在策划着。

这就是著名的横城反击战。

## 损失最严重的一仗

就在西线的中国第三十八、第五十军用血肉之躯阻击联合国军向北反攻的时候，东线向横城和砥平里地区北进的联合国军以快于西线的速度一路推进，于是，他们最终从整个战线上突出了出去。

战场上出现的这种状态，使对战局十分忧虑的彭德怀突然感到，扭转被动局面的机会可能来了。

战场上的战机稍纵即逝，必须果断地抓住且利用。

二月五日，彭德怀电令第四十二军和北朝鲜人民军第二、第五军团对东线北进的联合国军进行阻击，以减轻西线中国阻击部队的压力。同时，邓华指挥的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六十六军奉命向东移动，以待寻找战机。

彭德怀已经在脑海中勾画出一个在东线打反击的初步设想，但是他还没有完全的把握。死死地顶住西线，将大兵团快速集中于东线，对战斗力相对较弱的南朝鲜军发动规模较大的反击，如果反击成功，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目前中国军队节节撤退的局面，也许还可能令联合国军的攻势停止。但是，彭德怀心里很明白，在东线组织起反击行动，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一、东线联合国军北进的位置形成前突态势；二、参加反击的部队能够及时到达战斗发起地点；三、这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在西线的第三十八军和第五十军必须能够把攻势凶猛的

美军阻击在汉江附近，如果在向东线调动大部队的时候，西线的阻击防线垮了，那么别说反击，整个战线将面临全面崩溃。

二月九日，联合国军在东线的态势为：美第二师二十三团和一个法国营被中国第四十二军阻击于砥平里以北；南朝鲜第八、第五师进至横城以北的丰水院、上苍峰里、釜洞里、梅日里一线；再往东，南朝鲜第七、第九师以及首都师则拖后于下珍富里、江陵一线。至此，展开于砥平里和横城一线的联合国军已经从整个战线上突出。而美第二师的二十八团及荷兰营、美第二师师部及其九团尚在原州，美第七师及空降一八七团在他们的后面，于是，东线上突出的联合国军相对孤立了。

在西线阻击的中国第三十八军和第五十军，虽然阻击线在一点点地后退，但还是在很大程度上迟滞了美军的向北推进。

邓华指挥的东线各军已快速到达了预战位置。

战机成熟了。

可是，彭德怀依旧还有一个难以决断的选择。联合国军在砥平里和横城一线有两个突出部，先打哪一个更为有利呢？彭德怀三思之后决定先打砥平里。他在八日打给各军的电报中指出："根据目前情况，须集中三个军主力首先歼灭砥平里附近之敌为有利。请邓华同志速与四十二军司令部靠拢，以便与各军取得联系。如何部署，请邓速决速告。"电报发出后不久，彭德怀又突然改变了决定，他立即再打电报给各军：

甲、砥平里地区据已知情况为美二师二十三团、法国营、美二十四师一至两个营，另美二师九团似已使用于石谷里方向，合计约八至九个营，如我攻击该敌一昼夜不能解决战斗，则利川地区之英二十七旅、伪六师及原州南北地区美二师二十八团与美七师均可来援，伪五、八师与空降一八七团亦会策应西犯或北犯。假如我两昼夜不能解决战斗，则水原方向之

美军之一、九两军团亦可能抽出两至三个师东援。这样如万一吃不下，打成消耗战，甚至洪川至龙头里公路被敌控制，则我将处于极为不利情况，这一着必须充分估计。

乙、横城东西地区据已知为伪八师、五师、空降兵一八七团及美七师一部，敌数量较多，但伪八师、五师较弱，我可集中三十九、四十、四十二、六十六及三、五两军团的兵力，初战把敌人打动打乱的把握较大。如果攻击得手，再向原州及以南扩张战果，可能将敌整个部署打乱，即在万一不利情况，我亦可控制洪川枢纽地区，有利对我尔后作战……前电先打砥平里，此电先打横城附近之敌。如无意见，则请邓金韩依此精神具体部署之。

彭德怀的顾虑是明显的：对于火力强大的美军和法国营，无论中国军队在兵力人数上占何等优势，还是没有打下来的把握，不如先挑战斗力较弱的南朝鲜军队来打。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一日晚，横城反击战开始了。

邓华兵团首先的反击目标是横城西北的南朝鲜第八师，他们期望由此打开缺口，向原州的美军防线进击。其具体部署为：第四十二军（配属第三十九军一一七师及炮兵二十五团一营），以一二四、一一七师为先头部队，向横城西北鹤谷里、上下加云防线进攻，切断南朝鲜第八师的退路；以一二五师前出至横城西南介田里、回岩峰地区，阻击敌原州方向可能出现的援敌，并策应第六十六军作战；以一二六师配置于砥平里以北地区，继续牵制砥平里之敌。第四十军（配属炮兵四十四团两个营、二十九团两个连）由正面向横城西北的南朝鲜第八师突击。第六十六军以一九六、一九七师向横城东南方向突击，切断横城之敌的退路。第三十九军为预备队，配置于龙头里东南地区，逼近砥平里，如果反击作战开始后砥平里之敌南逃，予以坚决追击。

士气可鼓不可泄。

但是，对这次横城反击作战是否能取得胜利并达到预期效果，彭德怀心里依旧不踏实。在他给各军发出电报之后，他给毛泽东致密电如下：

砥平里附近之敌一两天难以解决战斗，改为攻击横城周围之伪五、八两师及美七师之十七团、空降一八七团（此刻尚无捷音），于十一日黄昏开始，首先求得歼灭两三个团，得手后再歼两三个团。如能求得歼灭五、六个团，估计可能暂时稳定（半月）。如反击不得手，敌将疯狂追击（机械化与空军），三八线很难立稳脚。目前只有坚决反击，不惜一切，争取胜利，争取时间，稳定局势。否则将付出更大代价，困难亦更多。

无法知道毛泽东读到这封电报时的心情。

毛泽东要求彭德怀立即发动第四次战役，并把中国军队的战线向南推进到三六线上去，而目前的战场局势是：西线的中国军队不得不向三八线以北后退。

二月十一日黄昏，中国军队的四个军开始了向横城地区的大规模反击作战。

中国第四十军负责正面攻击的目标是南朝鲜军第八师。

第四十军军长温玉成和政委袁升平把一一八师和一二〇师放在了第一梯队的位置上，主要的突击力量是年轻的师长邓岳指挥的一一八师。温玉成不但把军主要炮兵力量配给了这个师，还将作为预备队的一一九师的主力团三五五团加强给了邓岳。而一二〇师的任务是：首先打开南朝鲜第八师坚守的圣智峰和八〇〇高地，以保证一一八师攻击路线侧翼的安全。这个部署没出各师指挥员的意外，因为以往的仗就是这么打的。第四十军的士兵中流传着这么一个顺口溜：一一八打，一一九看，一二〇围着团团转。

邓岳的一一八师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大胆迂回，分割包围的战术的有效。

邓岳在研究地图的时候发现，在一一八师主攻方向的正面，有一个两条公路会合的“丫”字形路口，这显然是一旦攻击开始，善于逃命的南朝鲜军溃逃的必经之路。要想不打击溃战，更多地消灭敌人，就

要派部队插进去，封堵这个“丫”字形路口。令一一八师其他指挥员惊讶的是，邓岳一反小部队穿插的惯例，这一次他要派一个整团插进去。从攻击开始线至那个“丫”字形路口，足有二十五公里，穿插部队必须在黎明前插到位并且占领路口，才能把正面南朝鲜第八师二十一团的后路真正封死。

多年以后，西方的军史学家仍对中国年轻的师长邓岳的战法称赞不已：两个团从正面并肩突破，一个团从中路穿插到后位。险棋！新奇！

邓岳放在正面的三个团并非一线进击，而是互相配合，互相掩护：三五三团在左，三五四团在右，并肩突破南朝鲜第八师二十一团的防御阵地；负责穿插的三五二团从两个团中间渗透进去，直插敌后。这样做，是为了加强迂回发展的迅速。邓岳不信南朝鲜军的一个团能经得住中国军队三个团的冲击！

三五二团，是邓岳手中的主力团，以敢打敢拼闻名。这个团的团长罗绍福是个老红军，曾是邓岳的老班长。

反击战一开始，一一八师就迅猛地向南朝鲜军队的阵地冲击而去。左翼的三五三团一个小时之内就突破了南朝鲜军两个连的防御阵地。右翼的三五四团二营仅用了半小时就攻占了当面的阻击阵地，歼灭了南朝鲜军的一个加强连。三五二团趁这两个团打得正激烈的时候，迅速向敌后发展。他们在前沿没有受到阻击，但是，在经过一个叫上榆洞的地方时，参谋长冷利华被敌人的阻击炮火击中牺牲。冷利华一九三九年入伍，身经百战，三次当选战斗模范，他的死令战士们悲痛不已。

三五二团七连是穿插的尖刀连，他们在冷利华牺牲的地方，与一个排的南朝鲜士兵相遇。七连的士兵凶猛地冲上去格斗，整个南朝鲜

搜索排无一人生还。三五二团逐渐脱离大部队的战线，独自深入到了敌后。进入一座大山中后，朝鲜向导迷了路。七连长张洪林依靠指北针在厚厚的积雪和迷宫一般的沟壑中带领士兵顽强前进，他们终于到达了地图上指示出的一座高地。上了高地，看见正前方的小山上有吸烟的星火。小山上的南朝鲜士兵万万没想到，在距离打得正热闹的前沿还有几十公里的地方，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三千名中国士兵正在悄悄地通过。

只要敌人没发现，三五二团就向前奔。在公路上，不时地看见从前沿逃下来的南朝鲜士兵在路边横躺竖卧，他们看着这支几千人的队伍在黑暗中急行军，由于没想到竟能是中国军队，因此根本不予以理会。有些南朝鲜士兵觉得跟着大部队逃命安全，于是就跟进了三五二团的队伍。中国士兵也不知不觉，他们这样走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在向后传口令时因为不会说汉语，才被中国士兵发现缴了枪。由于带着俘虏不方便，中国士兵把这些南朝鲜士兵推到了一边继续赶路。

六个小时后，三五二团接近了那个“丫”字形的路口。

突然，前边灯光大作，一队由一百多辆汽车组成的敌人的车队迎面开来。

三五二团没有犹豫就扑了上去。

成束的手榴弹投出去，汽车顿时燃起大火。一阵混乱之后，数辆坦克冲出来，开始进行还击。

这时，一个叫于水林的战士向坦克冲了过去。

于水林，个大身长。战前班里分到两颗反坦克手雷，他抢了过来。这种手雷很大，手榴弹袋装不下，别在腰上跑起来又不对劲儿，于是他就把手雷放在自己的米袋子里，米袋子的一头是炒面，一头就

是这两个大家伙。行军时怕把手雷丢了，就把袋子口系得很紧。现在，当他向坦克冲上去的时候，袋子口怎么也解不开了，于水林急得没了主意。班长以为他害怕了，冲他喊：“于水林！你到底有没有决心？”情急之下，他一使劲儿，硬把布袋扯开了。于水林拿着反坦克手雷，一直冲到巨大的坦克面前，把手雷往坦克的履带中一塞，巨响之后，坦克被炸毁了。于水林连续炸毁两辆坦克，又端枪追击从坦克中跳出来的美军士兵。战斗中，他的右臂连中数弹，鲜血染红了他的军装，他就用左手举着手榴弹继续追击敌人。就这样，他抓到了八个美军士兵。

三营教导员翟文清当即决定给于水林请功。

战争结束多年之后，三营教导员翟文清已成为一一八师副师长，他没有忘记在战场上倒在他身边的战友，包括举着手雷冲向美军坦克的大个子士兵于水林。于水林被转运到后方养伤，之后，就和部队再也没有联系了。部队的档案中只记载着于水林是热河人。于是，翟文清派人到承德地区去寻找，费尽周折也没有下落。翟文清不甘心，寻找的努力一直持续了很多年，直到朝鲜战争结束十年后的一天，他终于查到于水林是内蒙古昭乌达盟赤峰县美丽乡美丽河村人。

美丽乡，一个多么美丽的名字。

美丽河村极端贫困。

于水林是这个贫困村里最贫困的人。他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姐妹，孤身一人住在生产队的马棚里。他的右臂已经截肢，失去了劳动能力。

没有人知道这个衣衫褴褛的残废汉子曾经连续炸毁美军的两辆坦克，并单臂俘虏了八个美军士兵；没有人知道这位孤独的残废汉子是

在为保卫新中国而进行的战斗中荣立过一等战功的功臣。

当翟文清副师长千里迢迢地来到美丽河村，终于看见了于水林的时候，他紧紧地抱住他的这个大个子士兵，泪如泉涌。

当地政府得知于水林原来是个大英雄，于是给他盖了间房子，还为他找了个女人。结婚的时候，翟文清专门派人把于水林和他的女人接到部队，还做了一套全新的被褥枕头，并且特制了一块很大的英雄匾。后来，又派士兵把匾专程护送回那个遥远而偏僻的美丽河村。

翟文清是个多情而仗义的中国军人。

于水林从此每年都会被请回老部队做客。后来升为师长的翟文清又多次到美丽河村去看望一条胳膊的老于。于水林病逝时，翟文清师长亲自料理了这个曾出生入死的老战士的一切后事。

当于水林参加的这场战斗结束的时候，三五二团击毁美军汽车一百四十多辆，榴弹炮二十多门，高射机枪十挺。

被三五二团歼灭的美军部队是美第二师的一个装甲营。这个营奉命增援正在溃败的南朝鲜第八师，美军根本没想到在距离前线几十里的地方，会遭遇到中国军队大部队的突袭。

美军战史资料对这次战斗的描述是：

韩国一个团的溃败又一次导致了一场重大伤亡。当时，美军一个炮兵连在一支护卫队的掩护下，正沿着横城西北三英里的一条狭窄公路北上，显然没有任何侧翼保护。这支部队是去支援北面几英里处的韩国第八师的。夜间，中共部队进行反攻，韩国部队溃败逃跑。接着中国人突然向美军炮兵蜂拥扑来。五百多人中仅三人幸存。横城伏击战是整个战争中美军生命损失最惨重的一仗，大约有五百三十人丧命。这场悲剧是由韩国部队的溃败开始的，再加上美国部队战术运用不当造成的。

三名幸存者中有一位列兵，他战后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中国人打中了最前面那辆车上的司机，整个一列车队都停了下来。人人手忙脚乱，只要一个人倒下，中国人马上就来抢走他的武器。有人喊叫道："这里有一个！"我就开了火，但那只是一棵树。有人又喊道："我们从这里冲出去！"我晕头转向，好像整个世界在我的脚下爆炸了。真是血流遍野。当时我就知道我完蛋了……

在横城反击战中，另一个中国师创造了一个得意之作，即在朝鲜战争中一个师在一次战斗中歼敌最多、缴获最多。

这个师是第三十九军的一一七师，师长张竭诚。

在横城反击作战中，第三十九军担负的任务是牵制砥平里地区的联合国军。根据彭德怀的指示，为了加强横城方向的突击力量，决定把第三十九军的一一七师配属给第四十二军。一一七师受领的任务与第四十军的一一八师一样：打穿插。

一一七师出师不利。

师长张竭诚领受任务后，立即率领部队向反击发起线前进。趁着月光，全师安全地渡过汉江，经过连续两个夜晚的行军，终于接近了目的地龙头里。但是，在向龙头里靠近的时候，美军的夜航飞机在距离前沿十公里左右的地方连续轰炸，形成了一道严密的封锁线。在组织部队通过封锁线时，副师长彭金高负伤。张竭诚刚安排人把彭金高抬下去，又传来了更为不幸的消息：政治部主任吴书负重伤。张竭诚立即又组织人把吴书抬过了敌机封锁区。在一间民房里，医生们开始对吴书进行紧张的抢救。吴书的胸部和头部都被弹片击中，鲜血已经把军装浸透，他呼吸微弱，脸色苍白，突然，他颤巍巍地伸出手来握住了张竭诚的手，叫了一声"师长……"之后，便闭上了眼睛。

到了龙头里，开师党委会，少了两个常委，气氛异常沉重。张竭诚再次坚决地重申了全师的任务：十一日夜，从上吾安里敌接合部的间隙进入战斗，沿药寺田、仓村里、琴垡里一线，向横城西面的夏日、鹤谷里实施穿插迂回，务必于十二日晨七时前占领夏日、鹤谷里

公路西侧的有利地形，彻底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正面攻击部队歼灭安兴的南朝鲜第八师及美军第二师一部。其部署是：以三五一团为前卫，攻占夏日公路，三四九团负责攻占鹤谷里，三五〇团为师预备队。

十一日，中国士兵们睡了一个白天，提前吃了晚饭，携带五天的干粮，并配足弹药，每人左臂上系上了白色的毛巾，十六时四十分，一一七师进入了穿插的出发地，一个叫儿柴里的小村。大雪茫茫，连亲自带作战科长到这里侦察过的张竭诚都分辨不出哪儿是道路了。群工科找来了两位朝鲜向导，一个分给了前卫团，一个留在了师指挥部。

十七时，反击的炮声响了，正面攻击的部队已开始行动。根据第四十二军指挥部的指示，一一七师的动作与正面攻击同时开始。于是，张竭诚命令：“前卫团，出发！”

一一七师，七千人的队伍，依照三五一团、师指挥所、三四九团、三〇五团、机关、后勤分队的序列，开始了大规模的敌后穿插。

公路两边的民房在敌机的轰炸中燃烧着，凝固汽油弹的气味令人窒息。一一七师沿着公路前进，如同在火海中穿行。半个小时后，全师进入黑暗的山谷。他们悄悄地穿过南朝鲜第八师十六团的阵地左翼，除了尖刀连不断地与敌人排级规模的搜索队遭遇之外，一路上没有大的战斗，全师一直没停地向夏日前进着。

午夜，张竭诚接到报告：三五一团走错路了。核实之后，张竭诚立即调整部署。这时三五一团的电报来了，他们已经知道走错了，决定翻山去夏日。

邓华指挥部来电：正面攻击部队已突入敌人阵地，敌人开始向横城方向溃败，望穿插部队按规定时间到达阻击地点。

师侦察队奉命抓个俘虏查问情况。

师侦察队在崎岖的山路上搜索，根本见不到一个人影儿。正着急，发现在雪地中有一根美式的军用电话线，顺着电话线前进，见到一个小村落，靠近一间房舍，听见说话声，是美国人。排长吴永章一挥手，侦察队员们扑了上去。战斗很快结束，抓到三十多个美军士兵，全是黑人。一问，是美第二师九团的一个黑人排，他们担任着南朝鲜第八师的后方警戒。

跟上来的三四九团的士兵又带来一些俘虏，是南朝鲜士兵，他们身上都有一个红布口袋，这是新兵的标志。

所有的俘虏站在雪地上直发呆，他们无论如何想不明白，这些中国士兵是从哪里来的，自己怎么会在战线的后方被俘虏。

部队继续前进。翻过一座满是积雪的大山，上到山顶的时候，士兵们已精疲力竭。天开始亮了，往山下一看，一条公路延伸而来，这就是鹤谷里。公路上一片寂静，中国士兵们知道，他们已经跑在敌人汽车轮子的前边了。

本来是前卫的三五一团走错了路。意识到这个错误的时候，一群散兵乱哄哄地插进了他们的队伍，是一群溃退下来的南朝鲜士兵。短暂的交手之后，俘虏说有一条近路可以去夏日，于是就让这个俘虏带路。这可真是一条近路，可以说根本没有路，中国士兵们跟在南朝鲜俘虏的后面，在雪地上跌跌撞撞地前进，下山的时候几乎是滚下来的。南朝鲜俘虏真的把三五一团带到了夏日。刚到达那里，就看见公路上的汽车一眼望不到头地排列着。侦察队又抓回来一个俘虏，审问

后得知，这是美第二师九团的部队以及南朝鲜第八师撤退下来的部分人员，并且他们已经知道中国军队到达了这里，正在抢占公路边的高地。

最先到达的是三五一团的二营。二营没有犹豫，立即发起了攻击，虽然眼前的敌人数量至少是二营兵力的一倍。

中国士兵们把疲劳和饥饿丢在脑后，凶猛地冲了过去！美军和南朝鲜士兵几乎没有反抗，就让中国士兵俘虏和打死了两百多人，中国士兵迅速占领了公路两侧的高地。

被打散的美军士兵和南朝鲜士兵全部躲在公路附近的一个山沟里。

天已经大亮，跟随上来的三五一团政治委员彭仲韬看见几个中国士兵端着枪，冻得缩着脖子，看管着蹲在公路边的两百多名美军俘虏，顿时吓了一跳，赶快命令参谋带一个班和一挺机枪来加强俘虏的看管。

一一七师，提前半个小时到达穿插目的地，从而卡死了敌人从横城南逃的路。

三四九团团长薛复礼为部署部队占领所有的要地，正在各个山头之间奔跑，听见有人冲他喊什么，回头一看，八个南朝鲜士兵正坐在不远的地方烤火！这些南朝鲜士兵左臂上都扎着新兵的红布条。他们把戴着美军军官帽子、穿着南朝鲜军官呢大衣的薛复礼当成自己的长官了。薛复礼走过去，拔出手枪就射击，连续两枪都是不发火的子弹，第三发才响，南朝鲜士兵早跑了。

张竭诚打电话对薛复礼说："我看见敌人的坦克跑来跑去，要组织打坦克！把路给堵死！"

一名叫赵鸿吉的班长带着几个战士，钻在一座小桥下面对坦克下了手，连续炸毁的两辆坦克顿时将公路堵死。

此时，南逃的敌人开始突围。

一一七师开始了顽强的阻击战斗。

三五一团在最前沿。美军第二师九团全力向二营阵地猛烈攻击，四连在最前面，他们卡在公路上向每一辆企图突出去的汽车开火。美军向四连阵地连续进攻，二排出现了巨大的伤亡，阵地上只剩下副排长和两名战士，他们和再次冲上来的美军士兵扭打在一起，直到一一牺牲。四连把连队的文化教员、炊事员、司号员、通信员都组织起来，顽强地坚守在连队的主阵地上。五连在连长、指导员及所有连级干部全部牺牲之后，司号员马德起代替指挥，始终坚持在阵地上。三连的弹药全部打光后，士兵们就用石头、用刺刀反击美军的进攻，美军始终没有突破三五一团的阻击阵地。

从北面撤退下来的敌人越来越多，汽车和坦克把数里长的公路挤得水泄不通。

天逐渐黑下来的时候，空中升起了三颗信号弹，中国军队的总攻开始了。

公路上，在连成一片的枪炮声中，尖厉的军号声令美第二师和南朝鲜第八师的官兵们感受着世界末日般的恐惧。美军的飞机在盘旋，扔下的照明弹把战场映成白昼。到处是汽车和坦克燃起的大火，中国士兵冲上公路，与联合国军士兵混战在一起。

午夜时分，战斗结束。

一一七师歼灭敌人三千三百五十名，击毁和缴获汽车和坦克二百余辆，各种火炮一百多门。

中国军队发动的横城反击作战迫使南朝鲜第三、第五、第八师以及美第二师一部和空降一八七团开始后撤，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军队在整个战场上面临的压力。

在中国军队发动的反击作战的打击下，东线的联合国军有了全线动摇的迹象。但是，就在联合国军各部队不同程度地开始后退的时候，战线上有一个点却始终原地未动，这就是美第二师二十三团、法国营以及配属部队支撑着的联合国军的前哨阵地：砥平里。

砥平里——一个后来无论是美国军队、法国军队还是中国军队都留下了刻骨记忆地方——这些记忆是由一连串残酷的血腥场面所组成的。

## 大雪掩埋的遗骸

二月十三日早晨，面容疲惫的美第二师二十三团团长保罗·L.弗里曼上校站在砥平里环形阵地的一个土坡上，等待着美第十军军长克洛维斯·拜尔斯将军的到来。天空依旧是雾蒙蒙的，广袤的雪野十分寂静。看来司令官的直升机还要等一阵子才能飞来。

连续两天两夜的枪炮声响彻砥平里四周，令这位美军上校一直处在神经高度紧张的状态中。听说中国军队大规模地向横城方向进攻后，美第二师和南朝鲜第八师都在迅速溃退。现在，在砥平里的这个小小的环形阵地上，所有的人都在连续不断的炮声中来回跑动，指挥所里充满大祸临头的气氛。在弗里曼的“高度戒备，准备迎击中国人的进攻”的命令下，美军士兵们彻夜紧握着自动步枪，紧张地等待阵地四

周响起中国士兵的胶鞋底摩擦冻土的声音以及那直刺心脏的尖厉的小喇叭声。

两天过去了，中国人没来。

这天早上，听不见炮声了。也许中国人推进到南边去了？然而，弗里曼向四个方向派出的侦察队回来后都报告说，发现中国军队在东、西、北三个方向正在集结部队。在这一带上空例行公事的美军侦察机飞行员也报告说，发现一支庞大的中国部队正从北面和东面向砥平里接近。另外，早上从师部派出的企图北上与砥平里取得联系的一支侦察队，走到砥平里以南大约六公里的地方遭到来历不明的中国军队的袭击。一切再清楚不过了：砥平里阵地孤零零地嵌在中国人的攻击线上，二十三团已被包围。中国人肯定正在策划对砥平里的作战，只有白痴才会在这里等着中国人潮水般的攻击。

二十三团必须立即撤退。

弗里曼决心今天就带部队一走了之。整个战线都向后移动了，二十三团单独顶在这里没有任何道理。但愿那个脖子上总是挂着两颗手雷的家伙不会把二十三团的弟兄们忘了。

弗里曼忘不了自己向砥平里北进时遇到的麻烦。在一个叫双隧道的地方，二十三团由六十人组成的侦察队受到中国军队的伏击，米切尔中尉带着士兵们丢弃了所有的重装备跑到山上，这个过程中就有九个新兵因为害怕而落后，他们全部被中国士兵打死了。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地向山上攻击，弗里曼派出F连前去营救，结果F连也陷入中国军队的攻击之中，处于投降的边缘。一直熬到天亮，在飞机轰炸的掩护下，侦察队和F连的幸存者才被救出来。直升机从那个阵地拉出的尸体比活着的人多一倍。

中国人一旦开始攻击，就决不会轻易停止，他们的顽强和凶猛是著名的。最好还是不要跟中国人交手。

接近中午的时候，拜尔斯的直升机来了。

美第二师隶属美第十军管辖。在中国军队向横城的反击作战开始以后，越来越恶化的战局令拜尔斯大发脾气。他在给李奇微的电话中埋怨是软弱无能的南朝鲜军队把第十军给害了。拜尔斯说："我的第二师在中国人的攻势面前首当其冲，遭受重大损失，尤其是火炮的损失，这全是由于南朝鲜第八师仓皇撤退所造成的。该师在敌人的夜间进攻面前彻底崩溃，致使第二师的侧翼暴露无遗。南朝鲜军队对中共士兵怀有非常畏惧的心理，几乎把他们看成天兵天将，当中国军队出现在南朝鲜军队阵地上时，许多南朝鲜士兵头也不回飞快地逃命！"

拜尔斯一下飞机，立即就砥平里的问题和弗里曼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他听取了弗里曼关于立即撤退的建议及其理由，拜尔斯同意了弗里曼的要求，至少他觉得没有必要把这个团放在中国军队的虎口上，况且团长都没有能在这里坚持下去的信心。

拜尔斯表示"同意撤退"之后就飞走了。

弗里曼立即命令参谋人员制订撤退计划。

当弗里曼开始收拾自己的行装的时候，却收到了一条他万万没有想到的命令：不准撤退，坚守砥平里！

命令是李奇微亲自下达的。

李奇微对拜尔斯说："你要是撤出砥平里，我就先撤了你！"

坚守砥平里的决定出于李奇微对整个战局的独特判断，他因此成为真正令彭德怀感到棘手的战场对手。

首先，李奇微认为“霹雳作战”并没有因为中国军队在横城地区的反击而受到严重的挫折。美第二师和南朝鲜第八师的损失，仅仅是中国军队在无关要局的阻击战中的孤注一掷造成的。中国军队局部的进展，并不意味着他们全面的困境得到缓解，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勉强发动的攻势，反而令现在的中国军队更加困难。联合国军在中国军队的横城反击之后，战线的形状并没有重大的质量上的改变，因此，放弃砥平里这个位于前沿的交通要道，势必令美第九军的右翼空虚。如果中国军队再趁势攻击的话，很可能招致整个战线的龟裂，“霹雳作战”便收不到预期的效果了。李奇微相信他曾经在汉城的撤退中向其“致意”的彭德怀也会看到这一点。于是，他的结论是：“敌军为这次攻势的成功，攻占砥平里是绝对必要的。因此，我军无论如何要确保砥平里，不管付出多大的牺牲。”

李奇微给第十军下达的作战命令是：

一、砥平里的美第二师第二十三团，死守砥平里阵地；

二、第十军以位于文幕里的美第二师第二十八团即刻增援砥平里的第二十三团；

三、美第九军、英第二十七旅和南朝鲜第六师，向砥平里与文幕里之间移动，封闭美第十军前面的空隙。

砥平里，这个小小的朝鲜村庄，注定要成为一个空前惨烈的血战之地。

砥平里坐落在一个小盆地中，小盆地的直径大约五公里，四周都是小山包：南面是最高的望美山，标高二百九十七米，西南是二四八高地，西北是三四五高地，北面是二〇七高地，东北是二一二高地。

接到死守阵地命令的弗里曼开始重新制订防御部署。形成环形阵地当然是最理想的阵地，但其周长至少有十八公里，弗里曼的兵力显然不够。二十三团的兵力包括一个法国营在内有四个步兵营以及一个炮兵营和一个坦克中队，总人数约六千人，但要在这么长的环形范围上部署没有缝隙的阻击线还是不够。弗里曼在清川江边吃过由于防御阵地有缝隙而让中国军队钻到身后的苦头。最后，弗里曼划定出直径为一点六公里的环形范围，并开始修筑阵地。

美第二师二十三团在砥平里最后完成的防御体系是：一营在北面的二〇七高地的南端；二营在南面的望美山；三营在东面的二〇二高地；法国营的阵地地形最不妙，处于砥平里西侧一片平展的稻田和铁路线的周围。各营之间没有缝隙。即使这样，弗里曼还是觉得兵力太少，不得不把预备队减少到危险的程度：团只留一个连，各连只留一个排。为了使这个远离师的主力团背后达十六公里的纵深地带的安全，只能在阵地中间加强钢铁的防御了：弗里曼在环形阵地内配备了六门一五五毫米榴弹炮、十八门一〇五毫米榴弹炮、一个连的高射武器、二十辆坦克和五十一门迫击炮。环形阵地的前沿，全部环绕着坦克挖了壕沟，密集地布置了防步兵地雷和照明汽油弹。各阵地之间的接合部，全部用M-16高射机枪和坦克作为游动火力严密封锁。甚至在中国士兵有可能接近的地方，二十三团泼水制造出了陡峭的冰区。

二月十三日日落前，二十三团完成了火炮的试射，并测试了步兵、坦克和炮兵之间的通讯联络系统，准备好了充足的弹药和十日份的食品。

天黑了，四周寂静得可怕。

美军和法军士兵各自守在阵地的战壕里，等待着他们无法预知的命运。

中国军队确实要打砥平里。

对中国军队来讲，横城反击作战取得可喜的战果，特别是美第二师位于横城的部队已经开始撤退，南朝鲜第八师的战斗力也受到重创，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常规，砥平里的美军为了不至于孤立无援定会向南撤退，而如果趁其撤退之时在运动中给予打击，确实是个扩大战果的好战机。另外，当时中国军队对砥平里敌情的了解是：不到四个营的敌兵力已经逃得差不多了，敌所依托的是一般的野战工事——这绝对是一块送到中国军队嘴边的肥肉。

不准确的敌情判断和盲目的乐观情绪带来的是轻敌思想。由此，中国军队对砥平里的攻击看上去就像是临时组织起来的大杂烩：攻击战先后投入八个团，八个团分别来自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四十二三个军，而负责战场统一指挥的是第四十军的一一九师。

一一九师师长徐国夫领受任务时就想不通。别说还没有看过地形和深入了解敌情，这样打乱建制地组成攻击部队，并且让一一九师成立“前指”，而徐国夫对其他部队的情况一概不了解，由于部队严重缺乏通讯手段，一旦打起来实际上很难协同。徐国夫要求把战斗发起时间往后拖一下，以便了解敌情和战场地形，与参战的各个部队沟通协商一下，特别是，他想等一一九师的主力团三五五团回来，这样打起来心里才能有点底。但东线指挥部坚决不同意：“敌情不过是一两个营，可能已经逃跑了一部分，必须迅速抓住敌人，不能拖延！”

砥平里反击战预定的攻击时间是十三日上午。

但此时在砥平里的中国军队无法实施攻击。徐国夫师长仓促召集参加攻击部队的指挥员会议。令他恼火的是，第四十军三五九团团长没来，派来的是政委。第四十二军的三七五团只派来个副团长，但这位副团长却带来了砥平里的真实情况：那里不只有一两个营的敌人，

而且敌人根本没有要逃跑的迹象，摆出的是坚守的架势。徐国夫立即把情况向上级报告，但没有得到回应。

会刚开完，又传来让徐国夫吃惊的消息：配合攻击砥平里的炮兵四十二团，因为马匹受惊暴露了目标，现已遭到空袭，不能按时参加战斗。这意味着火力本来就弱的中国军队没有了炮火支援，只能靠手中的轻武器作战了。

这时，第四十二军一二五师三七五团在向砥平里接近的路上遭遇敌人而受阻，第四十军一一九师三五六团也因行动迟缓没按时赶到攻击地点。结果，在徐国夫指挥的方向上只有三五七团和三五九团两个团。

砥平里交战双方兵力和火力对比严重失衡的攻击在十三日傍晚开始了。

徐国夫当时不知道，其实还有几支中国部队也参加了对砥平里的攻击，只是由于通讯手段落后他们没能互相联系上。

在指挥混乱的攻击中，只有中国士兵无所畏惧的献身精神在砥平里被火光映红的夜晚迸发出耀眼的光芒。

三五七团三营七连在连长殷开文和指导员王玉岫的带领下，向着敌人炽热的火力扑上去。突击排通过冰坡的时候，在敌人的猛烈枪击中伤亡严重，但是他们无畏生死地顽强突击，终于占领了敌人的前沿阵地。但阵地立刻受到美军极其猛烈的炮火袭击，连长殷开文牺牲。阵地开始在中美士兵手中来回易手，指导员也牺牲了。七连以其巨大的伤亡，在美军的阵地前沿与之争夺，他们没能接近美军的主阵地。三五九团九连指导员关德贵是个有名的“爆破英雄”，在第一次战役中他带领士兵顽强地坚守阵地，手和脚都被凝固汽油弹严重烧伤。在这

次攻击中，他带领突击队冲在最前面。在攻击第一个山头的时候，他的胳膊负伤；在打第二个小山包的时候，他的腿又中弹，棉裤和棉鞋都被鲜血浸透。

徐国夫指挥着两个团一直打到天亮，没能占领一块敌人的主阵地，部队伤亡比预想的要大得多。

第三十九军一一五师奉命参加打砥平里的战斗时，全师上下都很高兴。因为听说砥平里敌人兵力不多，觉得这下能立大功了。所以，十三日在研究作战计划时，师长王良太主张以三四四团为一梯队、三四三团为二梯队、三四五团为预备队进行攻击。三四三团团长王扶之对这个主张有意见，王团长是个敢打硬仗的好手，他觉得把他列在二梯队心有不甘，而且他多少有点“私心”：砥平里就那么点敌人，跟在三四四团后面进去，不是什么功也没有了吗？于是，王扶之提出三四三团和三四四团并肩打进去。师长和政委交换了意见，同意了王扶之的建议。

黄昏，三四三团开始攻击。在攻下第一个山头的时候，他们向师指挥部报告：“我们打到砥平里了！”

师指挥部的回答是：攻击并且占领！

当王扶之再次打开地图核对的时候才发现，他们打下的不是砥平里，而是砥平里外围一个叫马山的山头。更让王扶之意外的是，通过对俘虏的审问才知道，砥平里根本不是“没多少敌人”，坦克大炮不说，光兵力就有六千多！

王扶之赶快向师指挥部报告，并且立即命令部队：天亮之前，无论如何要做好敌人向马山外围反击的准备。

参加对砥平里攻击的第四十二军一二六师三七六团也犯了和三四三团一样的错误。这个团被配属第三十九军，接到攻击砥平里的命令后，团长张志超立即带领部队开始行动。他们迅速拿下挡在他们攻击路线上的一座小山，并且按照地图上所指示的路线，向砥平里扑过去。按照判断的方位和计算的行进时间，应该到达砥平里的时候，他们发现山谷中有一个小村子。夜色中，有开阔地、有房舍、有公路、有铁路，一切都和地图上的砥平里标志一致，于是三七六团毫不迟疑地开始了强攻。二营打头阵，团属炮兵压制敌人的火力，三营从侧翼配合，尖刀班的士兵每人带着十几颗手榴弹冲进村庄一齐投掷，霎时间，这个村庄被打成一片火海。守在这里的美军顶不住了，向暗夜中溃退而去。张志超兴奋地向师指挥部报告："我们已经占领砥平里！"

指挥部一听很高兴，没想到砥平里这么好打，还有几个团没用上呢！于是命令同时向前运动准备攻击砥平里的三七七团停止前进，因为砥平里的战斗结束了。

一二六师师长黄经耀究竟是有经验的指挥员，越想越觉得事情恐怕没这么容易，于是又打电话给张志超，问："你给我仔细看看，公路是不是拐向西南？铁路是不是拐向东南？"

张志超说："这里的公路和铁路是平行向南的！"

黄经耀头嗡的一下大了："张志超！你给我误了大事！你打下的那个地方叫田谷，砥平里还在田谷的东南！给我立即向砥平里攻击！"

三七六团赶快集中部队，以一营为主攻，向真正的砥平里攻击。一营在七门山炮和二十三门迫击炮的支持下，连续向砥平里攻击了三次，炮弹很快就打光了，兵力损失无法补充，天亮的时候没有任何成果。

十四日，白天到了。

美军的飞机铺天盖地而来，轮番在中国军队的所有阵地上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猛烈射击和轰炸。中国军队的官兵们自从入朝作战以来还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飞机集中在这么一块巴掌大的天空中。美军飞机整整轰炸了一个上午，然后，砥平里的美军和法军开始出动坦克和步兵，向中国军队的阵地进行极其凶狠的反击。在三四三团二营的马山阵地，从砥平里出击的美军和法军多达五路，火力之强令阵地上的中国士兵抬不起头来。二营伤亡严重，班和排的建制已经被打乱，但从不同方向冲击而来的美军一次又一次发起冲锋，二营营长王少伯在给王扶之团长的电话中声音都变了调："团长！快下命令撤退！不然，二营就打光了！"

王扶之的回答是："要是把阵地丢了，我杀你的头！"

说完，王扶之就后悔了，后悔不该在这样的时刻对部下说这种话。但是，不是要坚决打砥平里吗？马山这个地形优越的冲击出发点要是丢了，还怎么打下去？

王少伯硬是指挥士兵们在马山阵地上坚持了一个白天，虽伤亡巨大，但阵地没丢。

在另一个方向，三五九团的阵地上没有可蔽身的工事。美军飞机来回地俯冲轰炸扫射，这些飞机有的来自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有的来自南朝鲜釜山的机场，重型轰炸机则来自日本板付机场。它们在很低的高度上掠过，发出的啸音震耳欲聋。与三五九团阵地相邻的高地依旧在美军的控制之下，美军在高地上使用坦克的直射火炮和M-16高射机枪，居高临下地近距离向中国军队的阵地进行射击，中国士兵的射击完全被压制了，处在束手无策被动挨打的境地。团长李林一刚在电话机中向各营传达了"坚守阵地"的命令，线路就被炸断了。想和最

前面的三营取得联系，但在连续不断的轰炸中三营根本听不见。李林一给通信连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接通电话线！结果连续冲上去七个电话员，全部倒在半路上，无一生还。

天终于黑下来了，熬过白天的中国士兵向砥平里主阵地冲击的时刻又到了。

十四日夜晚，中国军队参加砥平里攻坚战的各团都已到齐，他们从四面八方一齐向这个不到两平方公里的小小的环形阵地开始了前仆后继的攻击。

在炮弹和手榴弹连续不断爆炸的火光中，美二十三团各营的前沿阵地同时出现了激战状态。中国士兵冒着美军布下的一层又一层的拦截火力毫无畏惧地冲锋，前面的士兵倒下，后面的士兵踏着尸体前进，环形阵地内到处是跃动的中国士兵的影子，这些身影因为棉衣的缘故看上去十分臃肿，但他们滚动前进时却灵活而迅猛。美军所有的坦克和火炮用最密集的发射速度向四周喷出火焰，在中国士兵冲击的每一条路上形成一面面弹雨之墙。接近午夜的时候，激战到达最高潮，与地面上流淌的鲜血相呼应的是战场上空大约每过五分钟就升起的一群密集的照明弹，由几十条曳光弹组成的光带接连不断地平行或者交叉地穿过照明弹的白光之下。美军支援的夜航飞机投下了由降落伞悬挂着的更为刺眼的照明弹，长时间地如巨大的灯笼一般在砥平里双方士兵的头顶上摇荡。

望美山方向的美军阵地在午夜时分失守了，二营G连的一个排只剩下施密特中士还活着，三排也只剩下六名士兵。在营长爱德华的严厉命令下，连长希斯在得到了弗里曼团长从团预备队抽出的一个特种排和几辆坦克的补充后，开始对中国军队进行反冲击。但是，美军负责掩护的迫击炮受到中国军队炮火的压制，反冲击的士兵还没冲出多远就出现了六人伤亡。在继续向前冲击的时候，中国士兵的子弹从侧

面射来，原来旁边的阵地也被中国军队占领了。突击排很快全部伤亡，希斯亲自带领士兵冲击，结果在一个土坎上被子弹打倒。一个士兵拽着他往回拖，赶上来的拉姆斯巴格上尉在照明弹的光亮下看到了这样的情景：这个士兵的胳膊被打烂，一块皮肤挂在断裂的伤口上。他用一只手拉着一个人，这是胸部中弹已经昏迷了的希斯。这时，中国士兵开始了又一轮的冲击，G连活着逃回环形阵地的士兵仅仅是很少的几个人。

在砥平里环形阵地与中国士兵彻夜血战的，还有一个法国营。法国营由拉尔夫·蒙克拉中校指挥。蒙克拉是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法国军人，军服上挂满了各种军功勋章，他在他所经历的战斗中曾经十六次负伤，现在一条腿还瘸得厉害。朝鲜战争开始的时候，他是法国外籍军团的监察长，军衔是中将。他认为能带领法国军队参加朝鲜战争是一种殊荣，自愿把自己的军衔降为中校。当中国军队开始冲击的时候，这个老中校立即命令拉响手摇警报器，警报器尖锐而凄厉的声音“好似鬼哭狼嚎”般响彻夜空。法国士兵一律不带钢盔，头上扎着红色头巾，高声叫喊着“卡莫洛尼”。“卡莫洛尼”是一个墨西哥村庄的名字，九十年前在这个村庄有六十五名法国外籍军团士兵在与墨西哥士兵的战斗中全部战死，无一投降。这个法国营中的大部分士兵，都是法国原外籍军团的老兵。他们在和中国士兵拼刺刀的同时，还踢那些从前沿跑下来的美军士兵的屁股：“该死的，回到那边山头上去！反正你得死，不如死在山头上！”但是，法国人的反冲击也连续失败，弗里曼团长不得不使用预备队来堵住蜂拥而上的中国士兵。

由于G连阵地失守，环形阵地已被中国军队突开一个很大的缺口，环形变成了凹形。

就在砥平里环形阵地出现危机的时候，二十三团团长弗里曼上校的手臂中弹。

也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中国军队最不愿意看见的景象出现了：天又一次亮了。

与砥平里血战同时进行并且同样残酷的，还有在美军向砥平里增援的方向中国军队所进行的阻援战。在那里，中国士兵的血肉之躯所面对的是滚滚而来的美军坦克群。

十三日，当砥平里开始受到中国军队攻击的时候，李奇微命令美第二师二十八团立即北上增援。二十八团没有走出多远，便受到中国军队的阻击，双方发生激战并形成胶着状态。

十四日，砥平里的弗里曼上校一次又一次要求立即增援的电话弄得李奇微心烦意乱，他只有再派出增援部队去解救被围攻中的二十三团。但是，美第十军的正面已经没有可以调动的部队了，如果再增派部队，只有动用预备队。战争中防御一方如果到了动用预备队的地步，至少说明整个防线的兵力布局已到捉襟见肘之时了。

拜尔斯后来说，第十军正面的防线，由于砥平里的突出，原州与砥平里之间出现很大的空隙，如果中国军队不那么专注地攻击砥平里，而是在围攻砥平里的同时，向原州方向实施如同像横城反击规模的猛烈攻击，那么联合国军队的东线肯定会全线崩溃。

拜尔斯的话是有道理的。但是，他还没有他的上司李奇微那样更深刻地洞察到中国军队“礼拜攻势”的规律。正是横城一役，使美第二师和南朝鲜第八师受到打击并且后退，才造成了原州防线上危险的空隙，但是从中国军队发动横城反击战至今，已经有几天了，中国军队持续大规模进攻的时间只能是八天，而在大规模攻势结束后到发动新一轮的战役，至少需要一至两个月的准备时间。因此，持续的攻击对当时的中国军队来讲已经没有可能。如果中国军队具备持续进行大规

模攻击的能力，根本不会等到现在，所有的联合国军队包括拜尔斯本人早已经乘船逃离朝鲜了。

李奇微命令美骑兵第一师五团立即北上增援砥平里，他要求五团无论受到何种规模的阻击也要突进砥平里，哪怕只突进去一辆坦克。

李奇微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坚守砥平里。

美骑兵第一师五团团长是柯罗姆贝茨上校。十四日下午，五团在距离砥平里以南六公里的地方集结了部队。这是一个庞大的而混杂的部队：五团的全部兵力加上两个野战炮兵营、一个装备M-46重型坦克的坦克连、两个装备MA-76G型坦克的坦克排、一个工兵连、一个装载着支援砥平里各种物资的大型车队，还有一个准备到砥平里处置伤亡美军官兵的卫生连。

鉴于砥平里的危急，增援部队不顾美军夜间不战斗的惯例，于十四日下午十七时出发了。

坦克在前后掩护，中间是步兵、炮兵、工兵和车队，增援的队伍在狭窄的土路上足足延伸出三公里。

部队前进了大约一公里，土路上的一座桥梁被中国军队炸毁。整个行进停止，等待工兵修桥。这时，正是中国军队在五公里外的砥平里进攻最猛烈的时候，已经负伤的弗里曼上校在电话中向柯罗姆贝茨上校大喊：“迅速向我接近！”

整整修了一个晚上桥才修好。

十五日早晨，五团继续出发。刚过了桥，立即受到中国军队的阻击。阻击的火力来自两侧的高地，行进又停下来。由于是白天，五团

在美军飞机的支援下向公路两侧的高地展开，一营、二营以及两个炮兵营的三十六门火炮掩护三营和车队沿着公路向前推进。

阻击美军骑兵第一师五团的是中国第三十九军的一一六师和第四十二军的一二六师。

这恐怕是美军骑兵第一师五团入朝作战以来遇到的最顽强的阻击。中国军队占领了公路两边所有的有利地形，他们居高临下射击，虽然火力的猛烈程度比不上美军，但是中国军队迫击炮的落点十分准确，停止在公路上的车队和坦克因目标明显伤亡很大。五团的一营和二营分别向两侧的高地进行冲击，在空中火力的支援下，他们拿下一个又一个高地，但是，高地常常是刚刚占领立即又被反击下来。“伤亡巨大的中国军队好像越打越多，中国士兵的忍耐力和对死亡的承受力是惊人的。”战后柯罗姆贝茨上校这样说。

美军战史中对中国军队阻击的评价是：“非常坚决，异常顽强。”

五团与中国阻击部队的交战一直打到中午，增援的队伍原地没动。

弗里曼的二十三团在砥平里依旧承受着中国军队的攻击。这一次，中国军队在白天依然没有停止攻击。看来砥平里的局势真的不妙了。增援的五团因受到阻击而进展缓慢，这令柯罗姆贝茨上校被夹在李奇微和弗里曼两边的责骂之中。中午时分，他明白了自己要不就受军法处置，要不就创造出个奇迹，已经没有第三种选择了。

距离砥平里只有五公里，如此近的距离竟然是如此遥远。

最后，柯罗姆贝茨上校下了决心：不管那些载满物资的卡车，也不管那些与中国士兵扭打在一起的士兵，甚至不管那些炮兵了，他要亲自率领一支坦克分队，凭借着厚厚的装甲冲到砥平里去。

柯罗姆贝茨抱定了一死的念头。

下午十五时，坦克分队组成完毕：一共二十三辆坦克，四名专门负责排雷的工兵搭乘在第二辆坦克上，坦克连连长乘坐第四辆负责指挥坦克的前进，上校本人乘坐第五辆坦克指挥全局，三营营长和L连连长乘坐第六辆指挥步兵，三营L连的一百六十名士兵分别蹲在后面的坦克上跟随冲击。同时，一营和二营受命在公路两侧边前进边掩护，炮兵要不惜把炮弹打光也要把中国军队的阻击火力压制住。上校还要求空军的轰炸机向面向公路的两个斜面进行最大可能的饱和轰炸。

在坦克分队的最后，有一辆收容伤员的卡车，至于这辆卡车能不能冲进砥平里，就只有看它的运气了。

柯罗姆贝茨给弗里曼打电话：“恐怕运输连和步兵进不去了，我想用装甲分队突进去，怎么样？”

弗里曼说：“我他妈的不管别人来不来，反正你要来！”

四十五分钟后，这支孤注一掷的坦克分队开始前进了。

美军轰炸机沿着坦克分队前进道路上的所有高地开始了猛烈的轰炸，公路两侧两个营的美军则全力向中国军队的阻击阵地发动钳制火力进攻，联络飞机在头顶来回盘旋，担任引导炮兵射击和报告前方敌情的任务。坦克分队每辆坦克的间隔是五十米，整个突击分队的长度为一点五公里。

在接近砥平里的地方，有一个叫曲水里的村庄，坦克分队刚刚看见村庄里的房舍，就遭到中国军队迫击炮的猛烈拦截，长长的坦克队伍被迫停下来。无论天上的飞机和地上的坦克的火力如何压制，中国士兵的子弹依旧雨点般地倾泻而来。坦克上步兵的任务是掩护坦克前

进，但是这些步兵很快就跳下坦克，跑进公路边的雪坑里藏了起来。柯罗姆贝茨在对讲机中大喊：“我们打死了几百名中国人！”但依然阻止不了坦克上步兵的逃跑。当坦克继续前进的时候，几十名步兵包括两名军官被扔下了。

曲水里是个小村庄，公路从村庄的中央通过。中国士兵从村庄两侧的高地上向进入村庄的坦克分队进行射击，手榴弹在坦克上爆炸，虽不能把厚装甲的坦克炸毁，但是坦克上的步兵无处躲藏。有的中国士兵直接从公路两侧的房顶上跳到坦克上与美军士兵格斗，并且把炸药包安放在坦克上引爆。坦克连连长因为有的坦克已经燃烧，要求停下来还击，被柯罗姆贝茨上校拒绝了，他叫道：“往前冲！停下来就全完了！”

通过曲水里村庄后，坦克分队的数辆坦克被击毁，搭乘坦克的L连一百六十名士兵只剩下了六十人。

在距离砥平里约两公里的地方，公路穿过了一段险要的隘口：这是一段位于望美山右侧在山腰处凿开的极其狭窄的豁口，全长一百四十米，两侧的悬崖断壁高达十五米，路宽仅能勉强通过一辆坦克。

当柯罗姆贝茨的第一辆坦克进入隘口的时候，中国军队的一发反坦克火箭弹击中了坦克的炮塔。四名工兵乘坐的第二辆坦克进入隘口以后，火箭弹和爆破筒同时在坦克两侧爆炸，坦克上的工兵全被震了下来。受到打击最严重的是坦克连连长乘坐的第四辆坦克，在被一枚火箭弹命中之后，除了驾驶员还活着，其余的人包括坦克连连长希阿兹在内，全部死亡。幸存的驾驶员把这辆燃烧的坦克的油门加大到最大限度，猛力撞击已经被毁坏的坦克，终于使狭窄的隘口公路没有被堵死。

冲过隘口的坦克掉头压制中国士兵对隘口的攻击，没有通过的坦克也在后面向中国士兵开火。一直搭乘坦克到这里的美军步兵成了中国士兵射击的靶子。至于队伍最后面的那辆收容伤员的卡车，虽在中国军队的夹击下一直跟随到这里，但它只是到了这里，卡车被打坏了，车上的伤员全部下落不明。

冲过隘口，柯罗姆贝茨在坦克中看见了在砥平里外围射击的美军坦克以及与中国士兵混战在一起的美军士兵。他立即命令与砥平里的美军坦克会合，然后向中国军队围攻砥平里的阵地开炮。

砥平里的美军二十三团一听说骑兵第一师五团到达的消息，如同得到百万援军一般欢呼起来。实际上，美骑兵第一师五团的增援部队此时到达砥平里的只有十多辆坦克和二十三名步兵，二十三名步兵中还包括十三名伤员。增援的坦克一路冲杀过来基本上已经没有弹药了。因此，柯罗姆贝茨上校九死一生地到达砥平里，除了给了二十三团以心理上的支援外，没有军事上的实际意义。

所幸的是，十五日下午，中国军队停止了攻击。

对砥平里攻击的停止，是在中国军队基层指挥员的坚决要求下决定的。

在中国军队的战史中，下级指挥员在战斗中向上级指挥员提出“不打”的要求，砥平里属罕见一例。

对砥平里之战意见最大的是第三十九军军长吴信泉。

二月六日，上级的指示是：第四十二军集中力量打砥平里。但因为第四十二军距离砥平里太远，这个命令并没有执行。后来，命令第四十军和第四十二军各派一个师包围砥平里，但最后对砥平里实施的包围，仅仅是在北面和西面。在东、南两个方向没有中国部队，这叫

什么包围呢？原来的指示是：第三十九军的一一五师和一一六师沿汉江北岸东进，一一七师到龙头里集结，但实际上还没等到集结，一一七师又奉命南进。横城反击战结束，一一五师受命西进，从东面打砥平里，部队前后绕了一个大圈子，这样的调度别说打仗，来回急行军也把部队拖垮了。一一五师由于距离砥平里的路程远，直到十二日下午十五时才攻击马山，而在一一五师打马山的时候，砥平里的西、北两面都没有枪声，后来才知道第四十军和第四十二军是上半夜攻击的，后半夜攻击停止了。

十五日上午，吴信泉军长接到关于对砥平里攻击的三个师一律归第四十军指挥的命令时，他就感到仗打到这个份上已经显示出诸多不利的迹象。邓华指挥部完全可以直接指挥三个师作战，怎么打到困难重重的时候反而突然变更指挥权呢？而"邓指"又打来电话，命令"十六日务必拿下砥平里"。在砥平里坚守的美军并非原来估计的兵力数字，不但有六千人之多，而且防御工事十分坚固，我军以野战方式攻击根本攻不动，况且敌人的飞机、大炮、坦克的火力十分猛烈，我军参加攻击的三个师所有的火炮加起来才三十多门。兵力和火力的对比如此悬殊，十六日拿下砥平里的依据是什么呢？战士的伤亡实在是太大了，已经不能再这样伤亡下去了。

当邓华指挥部给第四十军打来电话，责成第四十军军长温玉成统一指挥对砥平里的攻击，并要求"十六日务必拿下砥平里"时，温玉成几天来一直积存的不满爆发了。这位富有战斗经验的军长明确地表示，这场对砥平里的战斗，是没有协同的一场乱仗，是以我军之短对敌人所长的一场打不胜的战斗，必须立即退出攻击。

温玉成军长直接给邓华打了电话，明确建议撤出战斗。

邓华让温玉成"不要放下电话"，立即向彭德怀报告了温玉成的建议。

彭德怀表示同意。

二月十五日下午十八时三十分，志愿军总部收到“邓指”的电报：

> 各路敌均已北援砥平里之敌，骑五团已到曲水里。今下午已有五辆坦克到砥平里，如我再攻砥平里之敌，将处于完全被动无法机动，乃决心停止攻击砥平里之敌。已令四十军转移至石隅、高松、月山里及其以北地区。三十九军转移至新旧仓里、金旺里、上下桂林地区。四十二军转移至蟾江北岸院堡里、将山岘以北地区。六十六军原州东北地区。一二六师转移至多文里、大兴里及以北地区，并以一部控制注邑山。各军集结后，再寻机消灭运动中之敌。因时机紧迫未等你回电即行处理毕。

砥平里战斗结束。

砥平里战斗，中国军队的伤亡人数是惊人的。参加攻击的中国军队八个团中，仅第四十军参加攻击的三个团就伤亡一千八百三十余人。三五九团三营的官兵几乎全部伤亡，三营营长牛振厚在撤退时说什么也不离开遍布着他的士兵尸体的阵地，最后硬被拖下来。三五七团团长孟灼华在向上级汇报士兵伤亡的情况时因痛苦万分而泣不成声。

中国军队对砥平里的攻击是失败的。

战后，志愿军邓华副司令员为此作了专门的检讨。

十五日夜，天降大雪。

当晚，砥平里环形阵地中的美军士兵和法军士兵紧张地等待着中国军队的再次攻击。大雪中，环形阵地的周围先是漆黑一片，然后突然出现了密集的火把，但是中国军队没有攻击。火把在砥平里环形阵地的四周晃动了整整一夜。天亮的时候，白雪茫茫，天地间一片寂静。

十五日夜，中国士兵在火把的照明下，寻找并且抬走了阵亡官兵的遗体，没有寻找到的很快便被纷飞的大雪掩埋了。

中国士兵抬着伤员和阵亡战友的遗体、押解着俘虏开始向北转移。

第三十九军指挥部撤退时，经过了一个星期前横城反击战中一一七师歼灭美第二师九团一部的鹤谷里战场。战场的公路上依旧布满了坦克和汽车的残骸，横七竖八的美军士兵的尸体僵硬地躺在雪地上，很多尸体已被美军自己投下的凝固汽油弹烧成一团焦炭。不远的地方，由第三十九军军保卫部押解着的三百多名美军俘虏正在一个小村庄里碾米，为他们自己准备行军的干粮，他们似乎已很内行地在大雪中围着牛拉的石碾子转圈。

近四十年后，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在南朝鲜收集关于朝鲜战争的资料时，特别访问了砥平里。一位南朝鲜老人说，他当年曾经在这里掩埋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士兵的尸体。根据老人提供的线索，美国历史学家在北纬三十七度线附近挖出了十九具中国士兵的遗骸，遗骸四周的冻土里还散埋着中国士兵用过的遗物，包括军装、子弹、水壶、牙刷、胶鞋等等。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二日，中国新华社电：

新近在南朝鲜境内发现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今天下午在朝鲜军事分界线边境城市开城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举行。我十九具烈士遗骨，是今天上午在板门店召开的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第四百九十五次秘书长会议上，由军事停战委员会联合国军方面移交给朝中方面的。这是自朝鲜战争停战以后，在南朝鲜境内发现志愿军烈士遗骨最多的一次。同时发现的还有数百件志愿军烈士用过的各种遗物，也已交给朝中方面。

## 愤怒的彭德怀

砥平里战斗之后，中国第三十九军一一五师三四四团二连文化教员李刚的名字被列入了烈士名单。他所在部队为他开了追悼会，战友们为他写的悼词登在部队的油印小报上。

一年以后，李刚的战友们才发现他没有死。

一一五师奉命攻打砥平里时，身为文化教员的李刚被指定为战地担架队队长。部队的攻击严重受阻，战士们伤亡很大，李刚主动参加了爆破组。他和几个士兵一起炸毁一个地堡之后，地堡里没被炸死的美军士兵突然向他开枪，子弹从他左膝关节处直贯大腿根部，大腿肌肉被撕开一条一尺多长的口子，骨头外露。李刚忍着剧痛用绑腿带连同棉裤一起把伤口捆住。就在这时候，部队开始从砥平里撤退了。

战友们轮流背着李刚撤退。他的湖南老乡看见他伤得如此严重，为他落了泪。刚撤出战场没多久，撤退的人流就被美军飞机发现，立即遭到轰炸和扫射。一颗凝固汽油弹在李刚身边爆炸，他滚到一道山沟里，失去了知觉。

不知过了多久，李刚在极度的寒冷中有了一点儿知觉。他感觉到天正下着大雪。他已经完全被冻僵，血似乎已经流尽。所有的声音，那些枪炮声和人的嘶喊声全都消失了，包围他的是一片寂静。

他一动也不能动，直到大雪把他彻底掩埋。

李刚的战友没能找到他，也许是他被大雪掩埋了的缘故。撤退的路上，连队所有的人都在惦念他。有人说他不但腿被打断了，而且肠子也被打穿了；后来有人说看见李刚被抬进包扎所；又有人说包扎所让汽油弹击中了——总之没有人看见李刚从战场上下来。

几天过去了，三四四团的判断是：李刚已经牺牲。于是，三四四团的保卫干事李家许为李刚的追悼会写了悼词。

就在李家许写悼词的时候，三四四团另外两个掉队的士兵正在大雪中寻找追赶部队的路。他们走过一条山沟的时候，觉得踩上了什么东西，扒开雪一看，是个人。这个被埋在雪里的人穿的是志愿军的干部服，胸前棉衣里有一块小红布，这是共产党员的标志。两个士兵将耳朵贴在他的胸前，他们听见这个人的心还在跳动。于是，两个士兵检查了他的伤，开始为他重新捆扎受伤的腿。捆扎的时候，这个干部醒了，喊："为什么捆我？为什么捆我？"

两个士兵说："我们也是共产党员，只要我们活着，就不能丢下你不管。"

李刚在两个不知名字的战友的拖拉下，在茫茫雪夜中开始了艰难的行进。

天亮的时候，他们进入一个小村庄，遇到了一位朝鲜老人和他年轻的女儿，还有一位朝鲜人民军女军医。所幸的是，那两个士兵中的一个人是在日伪统治下的东北地区长大的，居然能说日语，而朝鲜的成年人一般也都会日语。女军医立即为李刚处理伤口，但是，这时的李刚冻伤比腿伤更为严重。朝鲜老人和他的女儿便把李刚的裤子剪开，用雪用力揉搓着李刚被冻伤的双腿。李刚的腿上结了一层冰，他们用木棍将冰打碎，再用雪搓，他们用这种朝鲜民间治疗冻伤的办法，一直搓到李刚的双腿发红、血液开始流动后才停止，然后他们用棉絮重新把伤腿捆紧。朝鲜老人对李刚说："七天之内不能解开，如果因为疼得受不了自己解开的话，你的腿就完了。"

这个小村庄里，隐藏有十多名中国伤兵。

半夜，村庄里的朝鲜人，绝大多数是老人和女人，抬着中国伤兵开始转移。李刚在离开朝鲜老人和那位朝鲜姑娘的时候，落了泪。躺在担架上的李刚被腿伤的剧烈疼痛折磨得浑身颤抖，但他不敢出声，

因为现在还在敌占区。这些朝鲜老人和女人抬了一夜，直到把中国伤兵交给了从中国东北地区来的支前担架队。这支由中国东北农民组成的担架队，在朝鲜战争中表现得极其勇敢，常常深入到敌我交界处寻找中国军队掉队的伤兵。这其中有中国的老人。当有的伤兵对让年龄能当他们父亲的老人抬着而不忍时，老人说："孩子，咱还不老，听说在苏联不到六十岁就不算老人！"那个时候，新中国百姓生活的一切标准，都是以苏联人为准的。

天亮的时候，为了避免空袭，李刚被抬进一个村庄隐蔽，他被安置在只有母女两人的朝鲜人家中。母女两个为李刚喂水喂饭，但是，李刚突然出现的高烧令母女两个害怕起来。高烧中的李刚大小便失禁，母女两人烧水为他擦洗，如同照顾自己的亲人。当美军的飞机开始轰炸这个小村庄时，朝鲜母女冒着轰炸，背着昏迷中的李刚往山上转移。

后来，李刚终于被转交给了向祖国方向开去的一支车队。

车队向祖国方向开的时候，又遇到空袭。李刚所乘的汽车被打中，燃烧起来。车上的其他伤员都跑了，可李刚不能动。司机喊："上面那是谁？不想活了？快下来！"没有回答。司机爬上燃烧的卡车，把已经浑身着火的李刚背下来，把他拖到沟里，用铁锹往李刚身上盖土，将火扑灭了。

李刚被转送上一列火车。这是伤员专列，车厢中的人挤得满满的。李刚的昏迷不醒令火车上的军医为这个志愿军的生命担心。要想让他活下来，唯一的希望是立即动手术。火车上没有麻药，伤员们围成一圈，看着医生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在李刚身上动刀子。这是令李刚不断疼昏过去的手术，伤口挤出了一大碗脓血，在贴近骨头的地方，医生取出了一块弹片。

历经一个月的辗转之后，李刚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在长春的医院里，医生们对这位已浑身溃烂的志愿军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抢救。伤口严重感染带来的持续高烧令医生几次绝望，感染最后延伸到李刚的脑袋里，他头颈僵硬，痛苦万分。医生的诊断报告上写着：颅内压力极高，随时有生命危险。

经过多次的腰椎穿刺，脑压减下来了。但是，已八个月不能吃东西的李刚已经成为一个骨瘦如柴、浑身因大面积褥疮而一动也不能动的人。最后，他体质虚弱到连液体都输不进去了，医生和护士把他抬进急救室，日夜护理。

李刚还是活下来了。

最后的一关是腿部伤口的治疗。他的伤是炸裂型伤，肌肉翻开，骨头外露，多次手术均不能治愈，最后在切除了新生的大片肌肉之后，用不锈钢丝才勉强缝合。他的膝关节由于严重的骨髓炎，每天必须抽出大量的积液，医生认为必须截肢。幸运的是，中国著名的骨科专家陈景云先生从美国回来，知道长春的医院里有这么一位志愿军同志，就亲自赶来为李刚的膝盖做最后的努力。手术进行了八个小时，手术做完，陈景云先生昏倒在手术台边。

李刚真的活了。

这个消息让三四四团的官兵们高兴了很久。

令九死一生的李刚没想到的是，活下来，等待他的是历次政治运动中不断的政治审查。最后，他被内部审查机关定为“负伤后被俘，被美国人训练成特务，被派遣回国从事特务活动”。他被赶出部队，当了装卸工。“文革”中，这位在朝鲜战争中炸掉了敌人的地堡，被中国士

兵、朝鲜百姓以及无数的医生所救治的志愿军被关押和劳改达十年之久。

东线的中国军队已经开始撤退。西线的第三十八军和第五十军在汉城正面节节阻击联合国军后，也逐渐后退，准备撤过汉江。此时，那个被写进日本军队教科书的中国团长范天恩却受命坚决顶住，一步也不准后退。

范天恩和志愿军其他师、团主官一样，在第三次战役后受命回国集训。在回国的路上，范天恩觉得自己很神气，他坐着一辆美军吉普车，司机是南朝鲜军的俘虏，美军的北极鸭绒睡袋暖和极了，躺在车里虽然颠簸一点，但范天恩觉得，在战场上麦克阿瑟也不过是这个待遇了。谁知，乐极生悲，也许是连续的战斗令范天恩难得能有时间安心睡觉，所以一路睡得昏天黑地，还没进入中国边境，露在睡袋外面的脸就被冻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尤其是双手，已经严重冻伤。

到了沈阳，刚开始治疗冻伤，却接到立即返回前线的命令。范天恩双手溃烂钻心地疼，但他还是立刻动身了。在回前线的路上，他无论如何也不坐美军的吉普车了。他爬进一辆向前线运送物资的卡车的驾驶室里，身边带着好几箱饼干和罐头，驾驶室由于有发动机的烘烤，范天恩神气而舒适的感觉又回来了。吃饱之后，他认为这回可以好好睡上两天了。但是，卡车刚进入朝鲜境内就翻了车，范天恩从驾驶室里被甩了出来，饼干和罐头损失了不算，他的大腿被砸伤了。为了尽快赶回前线，他不得不沿路拦车，日夜兼程，神气的心情一扫而光。双手的冻伤加上腿部的剧痛，范天恩在天寒地冻的路途中吃尽苦头，等他终于赶到师指挥部，见到师长杨大易的时候，整个人已是蓬头垢面，腿肿得又粗又亮。杨大易师长看他这个样子，说什么也让他留下来治疗。范天恩说：“用担架把我抬上去！”

就是在那一天，第三十八军一一二师的三三五团奉命上去，把坚持了数天之久的三三四团从阵地上换下来。因为杨大易师长的关照，范天恩骑着一头黑骡子上了阵地。在察看地形和调整部署的时候，士兵们看见他们的团长拄着棍子走路，都心疼地搀扶着他。

范天恩向全团下达的命令是："各营做死守的准备，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范天恩所在的团指挥所决不后退一步！"

三三五团在"火海战术"的冲天火焰中连续八天顶着美军的猛烈攻击，阵地岿然不动。

美军的攻击在十五、十六日达到高潮。

范天恩知道，东线正在打一个叫砥平里的地方，听说战斗进行得很不顺利。杨大易师长把目前的形势说得很明白：部队都集中到东线去了，在这里阻击的只有三三五团以及第五十军的一个团。为保障东线的战斗，这里就得坚决顶住。如果东线还没打完，这里垮了，指挥员掉脑袋是小事，对整个战线引起的严重后果，不是一个脑袋能承担得了的。

五八〇高地是距离团指挥所最远、美军攻击最猛烈的一个阵地。坚守在那里的一营伤亡严重，而且早已断粮，几天中士兵们只能吃雪充饥。白天阵地丢了，晚上再反击回来。弹药没了，就组织人在敌人的尸体中寻找。阵地再次丢失的时候，一营一百多名伤员自动组织起突击队，坚决要把阵地夺回来。范天恩在指挥所里坐立不安，虽然在师长不断的询问中他总是回答一句话："阵地丢了我负责！"但是，右翼的三三六团撤退了，美军的榴弹炮都打到指挥所来了，炮弹直接命中指挥所的掩蔽部，把范天恩和政委赵霄云都埋在了塌陷的土石中。

在命令警卫连把右翼的缺口堵上之后，五八〇高地支撑不住了。一营所剩无几的兵力再也抵挡不住美军的轮番进攻，阵地丢了，夺回来，又丢了。范天恩不得不把三营派上去。但没过多久就听见报告：美军的炮火太凶猛，三营出现大量的伤亡。范天恩手上的兵力就这么多了，于是他破天荒地向军长梁兴初请求增援。梁兴初在提醒范天恩要掌握好“九分之一”的预备队之后，把军侦察连给了他。军侦察连上去之后，一营还是在电话中说：“光了！打光了！”

军长在电话中的口气严肃了：“你可得注意了范天恩！战争本身就是残酷的！不要总听下面叫苦！预备队不能轻易出手！”

其实，梁兴初最了解范天恩，这个人如果叫了苦，情况定是真的危急了。梁兴初要求军作战科长亲自上三三五团去看看。

作战科长不但到了三三五团指挥所，而且上了最危急的五八〇高地。

午夜的五八〇高地简直就和白天一样，美军的照明弹一个接着一个地悬挂在天空，把高地和部队隐蔽的小树林照得雪亮。只有一条小路可以上山，小路上拥挤着人流，补充的士兵往上爬，负伤的士兵往下抬，在美军的炮击中，时而有序时而混乱。作战科长跟在冒死往山上送干粮的炊事员的身后爬到山顶，山顶上所有的树都已被炸断，只剩下了烧焦的木桩。不知被炮弹翻了多少遍的冻土变成了松软的浮土，踏上去没脚脖子。作战科长找到一营营长，发现这个营长不但活着，而且精神依然饱满：“对军长说，只要给我点反坦克手雷，我就能守得住！”

根据作战科长的汇报，梁兴初军长把一一四师三四一团的一个营调来了，他亲自把营长刘保平、教导员刘德胜领到一个高地上，从这里可以看见五八〇高地：“听说你们两个打仗一贯勇敢。我让你们听从

范天恩的指挥，配合三三五团的一营，在五八〇高地上守三天。要有思想准备，准备牺牲生命。”

教导员刘德胜回答说：“我只有一个要求，别忘了在哈尔滨的烈士陵墓上，把我的名字写上去！”

范天恩得到了军长亲自派来的援兵。

美军炮火的猛烈程度是范天恩前所未见的。除了天空的飞机不间断地轮番轰炸之外，向五八〇高地射击的美军炮兵至少还有三个炮群，同时在前沿还有数十辆坦克围着射击。五八〇高地的防御面积仅仅有六百平方米，但是每天落在上面的炮弹就有两万发以上。所有通往高地的小路全部在美军炮火的封锁下，伤员转运下来和补充队伍上去以及弹药的补充，都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电话线不断地被打断是范天恩最恼火的事情，电话班的士兵连续出击抢修，抢修的士兵一个接一个地牺牲。战后撤退的时候，范天恩数了一下收回来的最后一根电话线上的接头，竟有三十个之多，几乎每一个接头都是一个年轻的生命换来的。

十五日白天，东线砥平里的中国军队在进行最后一搏，西线范天恩的五八〇高地也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营长刘保平，一九四一年就已是一一四师的战斗英雄。八连位于前沿阵地，他就在前沿指挥战斗。美军向他们这个小小的高地所动用的各种类型的飞机达七十架，四十多辆坦克沿着高地的前沿围成一圈一齐开炮，以掩护美军士兵的集团冲锋。在打退美军的几次进攻之后，阵地上只剩下十几个人了。刘保平冲上前沿，用机枪向敌人扫射，他的腹部被美军的炮弹炸开一道口子，肠子流了出来。刘保平一手托住肠子，一手坚持射击，最后鲜血流尽倒在前沿。教导员刘德胜

在主阵地上指挥战斗，各连伤亡之大使三个连最后不得不编成一个连。刘德胜以自己的勇敢做表率，阵地始终没有丢失。

十六日，是范天恩最难熬的一天。连日的战斗令他精疲力竭，没能医治的手上和脚上的伤也增加了他的焦躁。范天恩打过不少的恶仗，从来没感到这么别扭过，他甚至觉得这是在受欺负，而凭他的性格，是最容不得受欺负的。美军的火力和兵力大大地超过了自己，这样的仗他还真的没打过。“以绝对优势的兵力，打歼灭战。”这是毛主席的战术，他范天恩打起来从来得心应手，可现在全变了，他有点不知该怎么办了。他第一次在打仗时盼望撤退的命令快一些到达，他从没有如此为士兵的巨大伤亡而愧疚难当。但是，范天恩接到的命令依旧是“坚持下去”。他知道阵地一定要坚守，这一点他决不含糊；他也知道战斗会有牺牲的，他早就准备把自己随时交出去；但是，面对战士成排成连的牺牲，范天恩还是心如刀绞。

十六日，砥平里的中国军队已经开始撤退，范天恩的五八〇高地依旧在坚持。

在五八〇高地上，由于不断的增援，中国士兵有三三五团一营的、三三四团三营的、军侦察连的、三四一团三营的，幸存的士兵们集中在一起，根据范天恩的命令组成一个阻击的整体。三三五团一营营长奉命把这些来自不同营连的士兵集合起来，每个人发给两颗反坦克手雷。晚上，范天恩又派上来一些人，一问，是炮兵。原来，炮兵由于炮弹打完了没事干，范天恩给他们每人发了几颗手榴弹，让他们立即上五八〇高地。范天恩给高地上打电话，还是那句话：“即使敌人上来了，团指挥所也不后退，我范天恩和你们一起阻击敌人！”

十六日上午十时，五八〇高地不行了。范天恩把通信班的战士集中起来。这个班的战士全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都有文化，聪明机灵，每人都有一支卡宾枪。范天恩对他们说：“上高地上去！保卫那里

的营干部，不能让他们死光了！还有就是，坚守阵地，不准后退一步！不愿意上去的留下！”

这个班全上去了。上去的时候正赶上美军的一次猛烈进攻，这些年轻人没辜负范天恩平时的宠爱，很漂亮地打退了美军。

下午的时候，高地上又不行了。范天恩正在焦急的时候，外出筹粮的民运股长回来了，他带着二十多名文化教员，居然把李承晚叔叔的大庄园摸到手了，一下子弄到不少粮食。范天恩说：“把那些文化教员给我留下，粮食多了，部队留一点儿，剩下的分给朝鲜老百姓！”

那个时候的中国军队中，由于大部分士兵没有文化，因此每个连队都配备了给战士补习文化的教员。这是中国军队中非常珍贵的一份财产，最危险的时候也往往不惜代价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现在，范天恩顾不上了，高地上需要活着的人。这二十多名文化教员有的在战场上抢救过伤员，但大部分根本没有上过前沿，不知道真正的战斗是个什么样子。范天恩每人给他们五颗手榴弹，简单地向他们讲述了手榴弹怎样拉火和投掷，然后让他们上了五八〇高地。

在五八〇高地上，平生第一次投出手榴弹的文化教员们打得出乎意料的勇敢。他们都读过许多书，平时私下里议论说美国的强大是世界第一，但是，当他们投出的手榴弹在美军士兵中爆炸，他们看见美军士兵在自己的反击下滚下山坡时，他们才第一次体会到一个真理：当你勇敢的时候，你就是最强大的。

十六日晚，撤退转移的命令到达三三五团。

范天恩放下电话，一头昏倒在地上。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七日，中国军队从东线和西线全线撤退。

第三十八军立即部署部队转移。此时汉江已有解冻的迹象，这令梁兴初军长万分担心。在大部队过江的时候，掩护撤退的是三三八团和三四一团的两个营，由一一三师副师长刘海清和一一四师副师长宋文洪带领，在南岸阻击敌人。眼看汉江要解冻，这两个营撤不过江来，只有上山打游击一条路了。为此，他们烧了随身携带的机密文件，准备最坏的情况发生。但是，令他们奇怪的是，美军竟然没有像前些日子那样全面攻击，于是，他们得以在十八日安全转移到江北。

在第三十八军最后两个营撤过汉江的第二天，这条他们在一个月前曾不畏牺牲地冲过去的大冰河——汉江——解冻了。

当地的朝鲜人说，志愿军命大。南来时，多年不封冻的江封冻了；北撤时，一过江，江上的冰就哗啦一下全化了。

正是那天，美第九军军长霍奇少将给李奇微发了一封喜讯般的电报：

> 正在进攻汉江桥头堡的美二十四师右翼第一线团，今晨再次发动进攻，但没有受到敌人的任何抵抗。敌人的散兵壕中没有人，装备都遗弃了，炊事员用具也散乱在各处。我已命令恢复同敌人的接触，为查明其抵抗能力实施战斗侦察。

李奇微刚从砥平里回来。砥平里战斗平静后，他立即飞到这个他认为万分重要的地方，接见勇敢战斗的二十三团团长弗里曼。李奇微所说的"万分重要"，并不是指一个砥平里的得失，而是指这是美军参战以来第一次"坚守住了"。对李奇微来说，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信号，那就是：中国人是可以打败的。关于这支军队如何神勇的一切神话都是夸张的。只要战术得当，美国人可以在朝鲜站住脚。尽管弗里曼对他说，砥平里的战斗是他"参加过的最残酷的战斗"，李奇微还是如同看见整个朝鲜战争的胜利一样，兴奋地在布满尸体的砥平里战场上来回踱步，他说："我们很幸运没有被中国人整垮，我们熬过来

了。”而美军战史的记载是：“在朝鲜战争中，中国人的全力进攻第一次被击退了。”

但是，面对第九军军长的电报，李奇微还是表现得相当保守。他的回答是：中国军队的后退可能是引诱我军的圈套，务必谨慎行事。

正是李奇微的谨慎，使中国第三十八军得以安全转移至汉江北岸。

朝鲜战争中的第四次战役，以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六日彭德怀命令西线志愿军阻击部队全部转移至汉江以北为标志，结束了它第一阶段的战斗。

彭德怀的分析是：中国军队以高度的战斗精神进行了顽强的阻击战斗，致使美军平均每天的北进速度仅为一公里。但是，我军没有根本摆脱被动挨打的状态，战线在不断地向北推移。中央军委派出的第十九兵团于二月从安东出发，到达前线最早也要四月。后勤运输依旧困难，部队弹药缺乏和饥饿状况没有解决。为此，必须继续撤退，等待补充部队的到达和后勤供应的改善。总之，要“争取两个月的休整时间”。

十七日，彭德怀致电志愿军各军，对第四次战役作了如下总结：

> 从此次敌人进攻中可以看出，不消灭美军主力，敌人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这就决定了战争的长期性。同时，这次敌人之进攻，比第一、第二次战役时敌之进攻所不同之点是：兵力多，东西两线兵力靠拢；纵深大，齐头并进，相互呼应。经我韩集团顽强积极防御，二十三天毙伤敌万余，致敌未能进占汉城，吸引敌主力于南汉江以西，并赢得时间，使我邓、金集团歼灭横城地区伪八师、美二师一个营及伪三师、五师各一部，共毙伤俘敌约一万二千人，取得反击战的第一个胜利。但胜利极不完满，未能造成适时切断敌之退路，致被围之敌大部逃脱。十三、十四两晚，攻击砥平里之敌，虽有进展，但敌迅速纠集三个师增援。进至横城之敌被击溃和消灭，但原州敌纵深仍未打破。各个歼敌时机已慢了一步，遂将主力转移到上茶峰里、洪川线及其东西地区待机歼敌。

彭德怀对中国军队的撤退是有顾虑的。

退肯定要退；但是，退的速度不能太快，退的距离不能太远，不能影响中国军队的士气。同时，也是最重要的，要考虑政治上的影响。彭德怀对洪学智说过这样的话："人家会责问我们，你们怎么回事？上一仗打得那么好，一下子打到三七线，怎么这一仗又一下子撤得那么远？面对这样的问题，怎么向民主阵营、向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交代？"

彭德怀给各军制定了"撤退指标"，明确规定一天最多能退多少公里。而且指出：只要敌人不进，我就不退；敌人退了，我还要进一点。

明确出"撤退指标"，在战术上是不科学的。中国军队的战术传统是：撤退就要大踏步地撤退，以保存实力；在大幅度后退和前进中寻找战机歼灭敌人。但是，朝鲜战场有其特别的特点，志愿军既要力争歼灭敌人，又要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朝鲜半岛的地势地形也不允许中国军队大踏步地进与退。然而，战争的残酷在于，这一点又恰恰给了李奇微制定的"磁性战术"以可乘之机，他最担心的是与中国军队脱离接触而寻找不到战机。第四次战役中，在接触线的节节阻击给中国军队带来的巨大困难和巨大伤亡就是一个无情的例证。

军事形势是非常严峻的，下一步到底怎么打下去，彭德怀在痛苦与矛盾中萌发了回一趟北京的念头。

就在彭德怀决定撤出砥平里战斗的十六日，他曾致电毛泽东，电文的大意是：我拟乘此间隙，遵照前电利用月夜回中央一次，面报各项。如同意我拟二十一日晨到安东。为争取时间，请聂总备专机在安东等我，以便当日即可到京……

在战场前景未卜的时候，作为主帅的彭德怀提出回京，足以想见彭德怀已迫切需要中央了解朝鲜战场上最真实的情况。

前线最吃紧的问题，彭德怀认为是兵力的不足。他曾连续给毛泽东和周恩来打电报陈述困难，催促第十九兵团尽快入朝。直到十一日，中央军委来电，电报由周恩来起草：

在这次战斗中，我如反击不得手，敌人确有进出三八线可能。但如敌乘胜急进，二月底即可到达金川、铁原之线，而我十九兵团无论车运或步行均无法于同时赶到瑞兴、金川、铁原之线。敌如在到达三八线后观望并整理一个时期然后北进，则我十九兵团当可于三月十日起开始到达上述指定之线。从目前形势看来，后一种可能较大。但美帝也正如蒋介石一样，早晚市价不同，亦有可能在自以为大胜时急进。果如此，我们必须考虑在平壤、元山之线以南地区予以反击，而不可能准备在敌人进出三八线时即予以反击。

彭德怀接电后，不安和忧心加剧了。

鉴于目前中国军队的处境，彭德怀认为有关战场的实际情况用电报说明既费时又说不清楚，他必须回国把一切当面谈清楚。

毛泽东回电同意彭德怀回京。

彭德怀简单交代了一下工作，于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日匆忙上路了。他带着参谋和警卫员乘吉普车沿着弹坑累累的公路向北疾驶。二十一日晨进入中国境内，到达安东，在那里直接上飞机。飞机降落在沈阳加油的时候已是中午，前来迎接他的军政首长请他到休息室休息和吃饭，彭德怀眉头紧锁、心情恶劣：“我不吃饭也不休息！你们别管我！”他就站在飞机上等，飞机加完油后，立即飞向北京。

下午十三时，飞机降落在北京的机场，彭德怀立即让司机开往中南海。当得知毛泽东不在中南海而在西郊玉泉山的静明园时，他又立即往那里赶。到了静明园，因为毛泽东在睡午觉，秘书和警卫人员不让他进去。谁都知道毛泽东的习惯是夜间工作，天亮时才休息，而且

入睡艰难，他的午觉一旦睡了，没有人敢打扰。秘书要为彭德怀准备饭，彭德怀大吼一声：“我有急事向毛主席汇报！”然后不由分说，推门而进。

毛泽东没有恼怒，边穿衣服边说：“只有你彭老总才会在人家睡觉的时候闯进来提意见！”

听说彭德怀一路一顿饭也没吃，毛泽东表示彭老总不吃饭他就不听汇报。

彭德怀勉强吃了点东西，开始汇报朝鲜战场的情况。他围绕着“不能速胜”的观点，根据与美军作战和国内战争的区别，详细地陈述了自己的见解，并且再次说明第三次战役后他为什么命令部队停下来。

毛泽东听完之后，明确表示：“根据现在的情况看，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

毛泽东的表态令彭德怀的压力减轻不少。

彭德怀沉重地谈到了毛岸英的牺牲，毛泽东听了长时间吸着烟。

第二天，彭德怀开始找各方面的领导商谈支援前线的问题。聂荣臻是个心细的人，特地命一架专机把正在咸阳工作的浦安修接到了北京，让彭德怀夫妻见面。彭德怀回京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当他看见自己的老伴出现在他下榻的住所时，吃惊而又高兴，他感受到了老战友的关心。

二十四日，彭德怀专门找到苏联驻中国的军事总顾问沙哈诺夫，商谈希望苏联出动空军掩护后方交通线以及支援防空武器的问题。沙哈诺夫重复“苏联不宜介入朝鲜战争”的老调，令彭德怀十分扫兴和愤怒。

二十五日，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主要讨论如何支援志愿军的事，参加会议的有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领导。彭德怀介绍了朝鲜前线的情况，他充满感情地说：“志愿军在朝鲜正在抗击敌人的猛烈进攻。对志愿军的现状你们可能不大了解。国内只知道取得三次战役胜利的一面，并不知道严重困难的一面。第一批入朝作战的九个军，经过三个月的作战，已经伤亡四万五千多人，另外，生病、冻伤、冻死、逃亡约四万人。原因是：第一，敌人武器占绝对优势，有大量的飞机、坦克和大炮参战，而我军武器相当落后，没有飞机，没有坦克大炮，只有步兵轻武器。第二，由于敌机对我军后方猛烈轰炸，道路桥梁被炸毁，我军晚上抢修，敌机白天轰炸，后方运输线根本没有保障，所有粮、弹物资，服装、油盐供应受到很大的影响。在朝鲜无法就地筹粮，蔬菜基本上没有。连队断炊，战士患夜盲症已不是个别现象。第三，现在敌军仍在进攻，由于第三次战役南进过远，各种物资供应在敌机的轰炸下，根本没有保障，造成许多战士冻伤生病，衣服破烂，弹药缺乏，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因此不得不后撤。目前的困难是：后方供应线屡遭破坏，兵员不足，弹药缺乏。几十万志愿军既得不到充足的粮食和炒面供应，更吃不到新鲜蔬菜，第一线部队只能靠一把炒面一把雪坚持作战。战士营养不良，面黄肌瘦，许多战士患上夜盲症，严重影响了作战行动。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志愿军既没有空军掩护支援，又缺乏足够的高射火炮，如不迅速解决对敌空军的防御措施，将会遭受更大的损失，无法坚持这场战争。”

在会议讨论解决问题的办法的时候，有些领导开始强调自己部门的困难，彭德怀实在听不下去，禁不住拍案而起：“这也困难，那也难办，你们整天干的是什么？我看就是你们知道爱国！难道几十万志愿军战士是猪？他们不知道爱国吗？你们到朝鲜前线去看看，战士住的什么，吃的什么，穿的什么！这些可爱的战士在敌人飞机坦克大炮的轮番轰炸下，就趴在雪地里忍饥挨冻，抗击敌人的猛烈进攻，他们不

是为了保卫国家吗？整个北朝鲜由于战争的破坏，物资粮食根本无法就地解决，在第一线的连队缺粮缺菜缺衣的现象相当普遍，其艰苦程度甚至超过红军时期。经过几个月的苦战，伤亡了那么多战士，他们为谁牺牲，为谁流血？战死的、负伤的、饿死的、冻死的，这些都是青年娃娃呀！难道国内就不能采取紧急措施吗？”

彭德怀的声音震动会场。

会议没有解决任何实际问题。

回到住所，浦安修看彭德怀脸色不好，问他怎么了，彭德怀余怒未消：“前线战士那样苦，北京还到处跳舞！我这个官老爷当然饿不着冻不着，可那些年轻的战士呢？我这个司令员不能睁着眼睛不为他们说话！”

二十六日，彭德怀再见毛泽东。经过商讨，当即决定给斯大林发电报，要高射武器和车辆，购买可以装备六十个师的苏联武器，请求苏联派出两个空军师参战。同时，决定动员国内青年参军以增加朝鲜战场前线兵力。

三月一日，彭德怀离开北京回前线。

彭德怀的这次回京，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他促使中央军委作出了有利于改善前线条件的一系列决定：第十九兵团尽快赶到朝鲜前线；第三兵团的三个军立即入朝参战；给西线部队补充的五万新兵和七千名老兵立即运往朝鲜；刚成立的中国空军立即派人去朝鲜修建机场；炮兵出动一个高炮师、一个战防炮师和三个火箭炮团，四月再出动两个榴弹炮团；向苏联购买的一万七千辆汽车拟给志愿军大部分；准备十万张床位的医院，接受八万名伤员，等等。

彭德怀在沈阳等地短暂停留之后，于九日回到朝鲜前线志愿军指挥部。

彭德怀回到朝鲜前线后得到的第一个有关战事的消息是：中国军队节节后退的局面已经无法控制。其后果是：放弃汉城，退到三八线以北。

## “撕裂作战”：最艰难的时期

就在彭德怀离开北京准备回朝鲜前线的那一天，美第八集团军司令官李奇微、第九军军长霍奇、第十军军长拜尔斯以及陆战一师师长史密斯在骊州的美第九军指挥所内举行了作战会议，讨论反击作战的问题。

砥平里战斗之后，联合国军在李奇微的催促下，迅速恢复向北进攻的态势，并且没有受到中国军队的严重抵抗。李奇微再次确定了他的判断：中国军队正处于困难境地，必须立即开始新的攻势，进一步扩大北进的战果。

作战会议进行到吃早餐的时候结束了。

这时候，美国人已经知道，他们再也不能把关于朝鲜战场的一切命名为“石竹花”之类的温暖名词了，于是，新制订的作战计划被定名为“屠夫作战”。

“屠夫作战”的目的是：为了不给中朝军队以休整和重新编成的时间，再次发动进攻。在西线，摧毁南汉江桥头堡，占领汉江一线；在中线，推进到砥平里——横城——芳林里北侧一线；在东线，进至江陵北侧一线。修理战线的凹凸不平，以准备下一次正式的北进行动。

二月二十日，李奇微签署了第八集团军作战命令：

美第九军和第十军自二月二十一日十时起，以宁越、平昌为轴线，沿着原州、横城发起进攻，消灭汉江东部和“亚利桑那”线（芳林里、大美洞、玄川里、新村、丰水院、五二七高地、杨平一线）以南的敌人，韩第三军团掩护美第十军东侧翼。

在调集兵力的时候，李奇微感到了兵力不足。南朝鲜第三军团在中国军队发动的横城反击战中受到严重损伤，无论兵力还是士气上都无法让美军对其侧翼放心。而以美军现有的部队，要在这么宽大的正面上实施北进，还要不让中国军队抓住间隙，就必须增加战线上北进兵力的密度。那么就只有一个办法了：把史密斯的陆战一师拿上去。

可是陆战一师自长津湖大撤退后，部队的官兵很长时间惊魂不定，加之人员和武器装备损失较大，用船转运到釜山上岸后一直处在休整状态。在“霹雳作战”开始的时候，李奇微给这支被称为美国最精锐的部队一个让全师官兵感到很没面子的活：去山里讨伐游击队。

用美军陆战一师去对付游击队，一是因为游击队实在是太难对付；二是因为陆战一师在长津地区的损失太大。陆战一师的官兵对李奇微给他们的这个任务大为不满，且不说陆战一师是正规精锐作战部队，还因为自从陆战一师一进山就开始了疲于奔命。游击队行踪无定，他们一会儿跑到这个村庄去救被游击队包围的南朝鲜军，一会儿又跑到另一个村庄去掩护被游击队袭击的运输车队。在绵延起伏的荒山雪岭中，陆战一师不但捉不到游击队的主力，而且自己也出现了伤亡。精锐的正规军陆战一师对“一驱赶就逃走，一撤离又出现”的捉迷藏式的战斗十分厌烦，他们说：“驱赶苍蝇不是陆战师的任务。”

陆战一师终于又要上战场了。

当李奇微把“屠夫作战”的一切部署完毕之后，他接到了一个令他很不舒服的通知：麦克阿瑟要亲临前线了。

麦克阿瑟目前的处境很尴尬。当中国军队发动第三次战役，把联合国军一直赶到三七线附近的时候，惊慌失措的麦克阿瑟多次表示，正是因为美国政府捆住了他的手脚，所以战争肯定要失败了。以致西方盟国的普遍印象是：朝鲜战争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但是，自从李奇微来到朝鲜战场后，发动了一系列针对中国军队的攻势，并且取得了令人意外的成果，从而证明了中国军队并不像麦克阿瑟将军说的那么“不可战胜”。于是，麦克阿瑟必须为自己表露过的悲观情绪找出一个适当的借口，这是让麦克阿瑟十分难过的事。在麦克阿瑟身边工作的人后来回忆说：“他已经精疲力竭，失去了往日的魅力的光辉”，“就连他那顶油渍渍的军帽，也不显得怎么精神，他是一个斗败了的人”。

麦克阿瑟很快就开始了辩解行动。他再次提出“对中国进行报复的措施”：“轰炸中国本土，鼓励蒋介石军队在中国的东南沿海进行军事行动，封锁中国一切海上交通”。他描绘说：“中国军队只有十天的食品和军火的供应，如果美国不但得到增援，在蒋介石部队的配合下实施两栖登陆作战，那么中国人就会饿死，或者投降。”最令新闻界惊讶的是，这位“逐渐恢复了精神状态的将军”居然宣布了一条耸人听闻的主张：“我要在敌人的后勤供应线上，用原子能工业的副产品来设置一道放射性废料区域，把朝鲜和满洲隔开。”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官员们对麦克阿瑟的一切扩大战争的主张一直抱有高度的戒备，他们认为麦克阿瑟在“有条不紊地制造一份记录，一旦战事再次恶化，他好拿出来为自己做辩护”。

麦克阿瑟振振有词地再三声明，当初面对中国军队第三次战役的后退，是“一种巧妙的战略行动”——“我拉长了中国人的后勤线”，“现在的局势说明我的战略的有效”。一向对麦克阿瑟的虚荣极端不满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官员们听了之后质问说：“什么拉长了中国人的后勤线？照这么说我们到菲律宾去，中国人的后勤线不是更长了吗？”国务卿艾奇逊说得就更加刻薄了：“很难设想还有任何人能做出比这更可恶

和愚蠢的声明了……这是最明显和最傻气的企图，想硬说我们通过在朝鲜半岛上的一路撤退，真的就骗过了中国人，真是荒唐透顶！”

当然，对麦克阿瑟最警惕的还是李奇微。当他得知麦克阿瑟要来前线的时候，他预感到不愉快的事很快就要发生了。

果然，麦克阿瑟一下飞机就在成群的记者面前摆出一种审时度势的样子，并且给了记者们一个很强烈的印象：是他这个远东司令官来到前线，和前线的将领们商量之后，才制订出一个重大的战役决定的。麦克阿瑟在记者们面前煞有介事地宣布：“我刚下令恢复进攻！”

李奇微和前线战场上的美军军官们都清楚，“屠夫作战”计划与麦克阿瑟没有关系，而且麦克阿瑟的话等于向中国方面通报美军的进攻即将开始。为此，大为不满的第八集团军副参谋长霍迪斯少将故意问首席新闻检察官沃勒斯中校：“如果一位将军违反了新闻发布方面的保密规定该怎么办？”

李奇微对“总司令官努力保持自己的光辉形象”的做法愤怒不已：“麦克阿瑟将军向报界的谈话将危及为他而战的士兵们的生命。一成不变的是，每当一次重大攻势发动之前，麦克阿瑟将军就视察进攻部队，并象征性地打响出发的枪声。这一举动对于部队的士气不无好处，但同样对敌人的情报界也是价值连城的。”

麦克阿瑟心情不错地回到东京，但是他刚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就遭到来自美国本土的美国军人家属请愿团的围攻。

麦克阿瑟邀请女士们观赏日本樱花的客气话还没说完，就被女士们连珠炮般的质问打断了：

“我们是来向你要儿子的！去年你答应让孩子们回家过圣诞节。”

“我的丈夫正在朝鲜流血，那些黄皮肤的中国人正像围猎一样捕杀他！”

“我的可怜的约翰最怕冷，我想让他回家！”

麦克阿瑟忍着怒火说：“女士们，第八集团军的任务是统一朝鲜。如果你们想和前线的亲属团聚，请耐心地等待他们的服役期满。”

“让孩子们回家！”

麦克阿瑟厉声道：“尊贵的太太们，你们太过分了！你们放心，我会照顾你们的亲属的，我会命令他们的长官，把他们，也就是你们的儿子或丈夫，统统派到第一线上去！让他们去冲锋！去踩地雷！明白吗？！”

麦克阿瑟摔门而去。

此时，李奇微的“屠夫作战”攻势在大雨和泥泞中开始了。

中国军队进入了朝鲜战争最艰难的时期。

为了将在横城战役中被中国军队的突破所造成的凹状战线拉平，在西线美军做北渡汉江准备的同时，美陆战一师、骑兵第一师、英军第二十七旅以及南朝鲜军第三、第六师开始向横城一线的中国第四十二军、第六十六军发动猛烈的攻击。第四十二军与第六十六、第三十八军为邻，在鹰峰、中元山、没云岘一线与美军展开了艰苦的战斗。

第四十二军军长吴瑞林心里很清楚，部队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面对美军的猛烈进攻，坚守现有阵地是不可能的，他主张在这样的阵地阻击战中，兵力要按照“前轻后重”的原则，而火力配备要按照“前重后轻”的原则，“以空间换取时间”。总之，要以不多的兵力在前

沿阵地与美军反复争夺，消耗美军的时间，以落实上级“尽可能迟滞敌人北进速度”的指示。

为此，吴瑞林命令一线阵地上的团、营、连干部和战斗骨干一律抽下来一半，储备在二线阵地上，一旦一线拼光了，便可迅速重新组织战斗。

吴瑞林还在阵地后面留了一个团的预备队。

还不到下雨的季节，朝鲜半岛却大雨连绵。寒冷的雨水使阵地上一片泥泞，中国士兵白天一身泥水，到了夜晚浑身便结成了泥冰。三七一团九连在连长蒋洪信的带领下，在鹰峰阻击阵地上坚持了十六个昼夜，在与美军坦克和数次集团冲锋的搏斗中，全连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三七〇团六连连长郑家贵带领士兵在阻击阵地拼到了最后关头，美军两个连的兵力和十辆坦克把小小的阵地紧紧围住，然后强攻，阵地上的美军士兵和中国士兵扭打在一起，双方士兵的厮打和咒骂声响彻山谷。最后，郑家贵的刺刀拼断，枪托砸断，身边的石头也被他扔光了，几十个美军士兵包围了他，他带着浑身的泥泞和血迹拉响了特地留给最后时刻的炸药包。

在广滩里至龙头里的公路上，位于公路中段的宝龙里是美军北进的必经之地，三七七团二连的阵地就在宝龙里。美骑兵第一师对宝龙里的攻击规模最后竟达到一个团的兵力。阻击到第五天的时候，二连前沿阵地上只剩了二班长赵兴旺一个人。美军以两个连的兵力分两路向这个只有一个中国士兵的阵地爬上来，赵兴旺在阵地上来回奔跑，机枪和手榴弹一直没有停止，美军以为阵地上来了大量的增援兵力，始终没能爬上来。美骑兵第一师为夺取宝龙里阵地，用了六天的时间，先后组织了三十二次攻击，并付出了二百二十多名美军士兵的生命。

阻击战打到最艰苦的时候，前线传来的一个消息令各级干部紧张起来：一个中国士兵用机枪把一架美军飞机打下来了。

关崇贵是三七五团一连一排二班的副班长，机枪手。二十四日，他所在的连队在六一四高地阻击英军第二十七旅一个营的进攻。一连连夜上的阵地，挖了一夜的工事，天一亮敌人就攻上来了。一连的官兵又困又饿，仗打起来本来就窝火，打到下午的时候，英军的攻击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更加猛烈，十几架美军战斗机也飞来助战。美军飞行员自从入朝作战以来，从来没有遇到过地面射击，所以他们从来是贴着中国士兵的头顶飞，俯冲时机翼几乎能掀去中国士兵的帽子，飞机射下来的机枪子弹和扔下来的炸弹给中国士兵造成极大的伤亡。机枪手关崇贵被炸急了，端起机枪就要打飞机。弹药手马可新赶快制止："副班长，咱可别犯错误！"

志愿军有条纪律，不准对空射击打飞机。规定这条纪律是有道理的：轻武器对空射击不仅打不下飞机，反而会暴露地面目标，从而招致更准确的轰炸。这是中国军队在入朝参战初期用鲜血换来的教训，以至于这条纪律被强调得十分严格，违反后的处理也很严厉。

急了眼的关崇贵大叫："大不了枪毙我！"

关崇贵开枪了。第一次射出的七发子弹没有打着。一架飞机向他俯冲下来，他又开了枪，还是七发，结果眼前的情景连他自己都看呆了：一架P-51型战斗机翅膀一斜，屁股后面冒出黑烟，一头栽进山沟，然后就是剧烈的爆炸声和一团冲天的火焰。

"打中了！把那家伙揍下来了！"阵地上的中国士兵欢呼起来。

飞机上的美军飞行员跳了伞，但由于高度太低，没等伞张开就掉在树上被树枝戳死了。

一连一排有个兵用机枪把美军飞机打下来的消息迅速传到团里，团里立即命令查是谁开的枪。营部派人上阵地问，没人敢承认，都说不知道。关崇贵认为好汉做事好汉当，不能连累别人，于是，站出来承认是自己干的。

没等营部的人通知如何处理关崇贵，英军更疯狂的进攻又开始了，关崇贵端起机枪在阵地上来回扫射，他想自己只要还没死就先多打死几个敌人。

一个营的英军最终没能攻下中国军队坚守的阵地。

关崇贵打下飞机的事逐级上报，一直报告到彭德怀那里，以请求处理意见。正为志愿军防空火力薄弱而焦急的彭德怀一听，异常兴奋。在询问了打飞机的经过之后，他说："这个纪律犯出了条经验，就是手中轻武器是可以打下敌人飞机的，鼓舞了志愿军战士对空作战的信心，要对这个战士重奖！"

宣布立功命令的时候，关崇贵觉得是在做梦：他被授予了"一级战斗英雄"称号，记特等功。

关崇贵还是觉得自己违反了纪律，好歹要求记一个处分。

三七五团政委包楠森对他说："你别犯傻了，再犟下去，我真的处理你！"

志愿军总部决定在各部队开展向关崇贵学习的活动，推广用轻武器击落敌机的经验。

关崇贵的斗志因此受到极大的鼓舞，在接下来的战斗中，他表现出惊人的勇敢和顽强。他率领一个班坚持阻击敌人，全班战士先后全部伤亡，阵地上只剩下他一个人。大部队向后撤退了，三天之后，美

军的飞机还在向这个阵地轮番轰炸，轰炸的间隙他们依稀听见仍有抵抗的枪声。绝大部分美军说，轰炸已经好几天了，不可能再有中国士兵的抵抗，但枪声确实还在响。军长吴瑞林放心不下，下决心派两个营从阵地的两侧包抄上去。部队冲上去以后，看见在这个布满英军士兵和中国士兵尸体的阵地上，果然还有个活着的中国士兵，他就是关崇贵。

原来，在大部队撤退的时候，关崇贵没有下来。他隐蔽在阵地的石缝中向敌人射击，始终没让敌人占领这个小阵地。弹药和食品没有了，他就在尸体中寻找，孤身一人的他竟在这个阵地上坚守了两天三夜！当冲上去的中国士兵看见他的时候，由于饥饿和疲劳，他已经站不起来了。在他的身旁，堆着从英军尸体上搜集来的步枪、机枪、冲锋枪，竟有三十多支。

关崇贵的顽强精神令所有的中国官兵肃然起敬。

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得知后，命令：对这个士兵连升三级使用！

关崇贵从副班长被直接任命为副连长。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授予了关崇贵“一级战士荣誉勋章”。

关崇贵是勇敢的，也是幸运的。

在中国军队处于艰难的时期中，士兵们所面临的困苦和牺牲都是巨大的。春寒料峭，冰雪未融，冷雨霏霏。没有粮食，很多部队开始吃野菜和树皮。一套棉衣一个冬天没能脱下过，屁股的位置甚至已经露出肉来，战士们用粗针缝上一块布遮住磨烂的袖口使露出的半条胳膊冻得发紫。许多人手被冻得裂开大口子，血流得令他们不得不用线缝合以止血。每撤退到一道阵地上，饥寒交困的士兵就立即用简单的

工具修筑阻击工事，同时还要修筑防炮洞以应付坦克大炮的轰击和飞机的轰炸。如果还能再有点时间，战士们就拔掉阵地前的野草，扫清射界，打出防火带。天亮了，除了警戒哨在警戒外，只要敌人没有进攻，战士们就随便往嘴里填些什么，然后倒在冰冷的泥水中闭上眼。在战斗中，弹药的极度缺乏令中国士兵丧失了保卫阵地和他们自身的基本条件，朝鲜中部那些山岭上的石头常常是他们用来与大炮坦克搏斗的武器。无数的中国士兵腹中空空、衣衫褴褛地倒在了没有人烟的荒山野岭中。当大部队向后撤退时，他们的遗体从此默默地躺在一阵阵的冷雨里。连美军陆战一师的士兵们看见中国士兵的遗体时，都不禁浑身震颤，美军陆战一师军史记述道："这些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卧着，很多还与美国士兵的尸体抱在一起。由于尸体的冷却，已无法把他们分开。中国军队撤退的时候，有时也掩埋尸体，但是由于匆忙，无论是本国士兵还是敌国士兵的尸体，均掩埋很浅，几乎仅仅是一层被炸弹翻耕过的尘土。"

三月五日，美军陆战一师七团在天亮时发现，前方中国军队的阻击阵地上已经没有人了，联合国军占领了横城。

此时，联合国军各部队都到达了"屠夫作战"计划所指定的占领线——亚利桑那线。

"屠夫作战"实施中，二月二十二日，美国陆军部公布战报称：开战以来，中国军队损失二十万六千人，其中被杀伤十八万五千人，冻伤和生病两万一千人，不含俘虏。同时，陆军部还公布了另一份战报：开战以来，美军共损失五万二千四百四十八人，其中死亡八千五百五十三人，伤三万三千七百八十一人，失踪八千七百二十四人。

还是同时，美军高层传阅着一份机密"情报"："中共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调离朝鲜，任命彭德怀为入韩中共军司令员。"仗打到现在，号称有世界上最灵敏的情报机构的美军，居然连战场上对手的司

令官是谁都没搞清楚，又从何而来的精确到“个”位数的战场伤亡战报呢？

彭德怀回到朝鲜前线的时候，李奇微已完成“屠夫作战”计划，并着手实施新一轮的作战行动。

美国人为这个新的作战计划取名为“撕裂作战”。

如果说“屠夫作战”充满血腥气味的话，那么“撕裂作战”则带有了战术的味道。李奇微对“屠夫作战”的成果并不满意，因为在对中线的攻击中，没能彻底把中国的第四十二军和第五十军捉住歼灭，而对中国第四十军和第三十九军的攻击“因为大雨而影响了攻击效果”。李奇微认为：“中国军队不是被打败了，而是主动的撤退了。”那么，美军下一步的战斗任务首先是从中国军队的手里夺回汉城，但是，从正面夺取势必会发生规模很大的战斗，于是李奇微决定还是从中线迂回。所谓“撕裂”，就是指在战场中线撕开口子并打进去，把中国军队和北朝鲜军队隔离开，威胁防御汉城正面中国军队的防线，并对汉城形成包围。

“撕裂作战”的目标是：美军到达从汉城以东向春川转向沿三八线南侧各要点之间的连线。李奇微把这条线定名为：“爱达荷线”。

想必美国人在朝鲜半岛上每每惦记着他们不知何时才能回到的家乡，于是远东在那段岁月里有了“亚利桑那”和“爱达荷”这样的地名。

三月七日，“撕裂作战”从美第二十五师横渡汉江开始。

凌晨五时五十分，美军开始了炮火准备。在汉江的江岸上，李奇微脖子上挂着两颗手雷亲自督战。他对他的部下说，“指挥官要和正在进行激烈战斗的部队在一起”，他今天就是来做表率的。做着表率的李奇微心里还是有一点担心，原因依旧来自他的长官麦克阿瑟。发动“撕

裂作战”的计划不得不报请麦克阿瑟批准，为了防止麦克阿瑟再来前线表演，李奇微把这次作战的调子压到了最低点，可是麦克阿瑟还是表示要来。李奇微只好发去一封“措辞小心谨慎”的电报，“请求麦克阿瑟出于安全的原因放弃在战役前夕视察前线”。庆幸的是，这一次，麦克阿瑟同意了，表示等战役顺利开始之后他再来。

此刻，在李奇微的面前，美第二十五师渡江前的炮火准备可以称得上是“这次战争中最猛烈的炮兵射击之一”。一百四十八门野战炮、一百辆坦克、四十八门重型迫击炮，加上二十五辆M-16自行高射机枪、一百挺重机枪，还有天空中的十多架轰炸机，一齐向江对岸中国军队的阵地开火，情景之壮观令李奇微十分满意。火力准备二十分钟后，美第二十五师开始渡江，但是，立即遭到中国军队炮火的封锁。一发炮弹居然打到了李奇微的身边，李奇微又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打不烂的中国军队。美军使用了最先进的渡江器材，中国军队的炮火和射击逐渐减弱，美军第二十五师顺利地渡过汉江。

或许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都会这一手。李奇微离开汉江南岸后，乘直升机来到他预计战斗最激烈的原州前线，站在路边观看美第十军的进攻。依然有大批的战地记者跟随着李奇微，李奇微本能地感到现在需要做些什么了。这时，陆战一师一个瘦弱的士兵背着沉重的电台一拐一拐地走过来，原来这个士兵的鞋带松了，每走一步就踩绊一下，背上的电台使他无法蹲身系上鞋带，因此他走起路来跌跌撞撞的。那个士兵冲着站在路边的李奇微喊了句什么，李奇微没有听清，但他快步走了过去，蹲下身，为这个士兵系上了鞋带。记者们不失时机地拍下这个珍贵的镜头。照片见了报纸，结果引起的讽刺多于赞扬，人们说李奇微在出风头。李奇微解释说：“那个士兵如果自己蹲下来系鞋带，沉重的电台就可能令他站不起来了。他在叫我，我就去了，这是在帮助一个有困难的人，完全是涌上我心头的一种冲动促使

我这样做的。”因为报纸又拿他脖子上的两颗手雷顺便做了文章，于是他顺便再次解释说：“我不想不反抗就当俘虏！”

处于极端困境中的中国军队不得不再次后退，但是面对美军大规模的进攻，大多数中国军队的阵地都是在士兵全部伤亡的情况下才被美军占领的。在汉江南岸，中国军队的第三十八军和第五十军，在美军渡过汉江的时候，依旧有几个连队在进行顽强的阻击，这些连队中的中国士兵全部战死。在横城、原州方向，中国军队的阻击也十分顽强。一线的部队伤亡极大，以致在战斗中要把严重减员的连队的建制打乱，再将数个连队的幸存人员编成一个新的连队，往往一个团只能编出四至八个连。

彭德怀回到前线指挥部的时候，开始了两天的“撕裂作战”已经给整个战线造成不利的局面：联合国军如果从中线突破进来的话，势必造成对汉城的包围。如果再不采取较大距离的撤退，很可能陷入更大的被动。于是，彭德怀致电各军：从三月十日起，全线开始运动防御，有秩序地较大规模地向北撤退。

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彭德怀提出了放弃汉城的想法：

> 我于九日拂晓前安抵司令部，敌于七日又开始全线进攻，为继续疲劳敌人缩短我之护线，争取时间，决放弃汉城，采取运动防御，保持有生力量。吸引敌人主动进击三八线……运输情况未改善，部队仍经常吃不上饭，今后就地筹粮已不可能。兵力增大，供应需多，敌空军近有增加，我空军不能相应掩护交通运输，此种困难不会减少而会增加，将影响有决定性的下一战役。

一九五一年三月十四日，中国军队放弃汉城。

中国军队占领南朝鲜首都汉城的时间为：七十天。

在彭德怀决定放弃汉城的那天，南朝鲜第一师的侦察小组潜入汉城市区，他们发现城里已经没有中国军队了。这几个侦察兵在总统府

升起南朝鲜国旗，高喊了“万岁”，然后带着一个北朝鲜俘虏回到师部。南朝鲜第一师师长白善烨这才知道中国军队已经撤退，汉城已是一座空城。白善烨立即给指挥他的美第一军军长奥丹尼尔打电话，要求准许南朝鲜第一师立即进入汉城，奥丹尼尔的答复是：“开始！”

这是擅自改变李奇微作战计划的行动。李奇微原来的计划是：在中线突破后包围汉城。但是现在要在还没有实施包围时就进入汉城了。

十五日早上，南朝鲜第一师从不同方向进入汉城市区。

没有抵抗，更没有巷战，南朝鲜军队回到了一片废墟的汉城。

汉城的收复令李承晚大喜过望，他立即给麦克阿瑟致函表示感谢。

第二天，麦克阿瑟给这位南朝鲜老头儿回了一封冷冰冰的信：

暴军退却，令人欣慰。但这次与去年九月不同，敌守备部队未遭决定性失败，夺回汉城虽然在心理上具有极重要的意义，但从军事角度上看，不可认为今后汉城的安全完全有保障。本人认为，贵国政府立即返回汉城是不明智的。

麦克阿瑟虽然嘴上不说，但心中强烈地感到，中国军队的撤退，似乎有某种设置陷阱的阴谋。

由于麦克阿瑟的低调，无论是南朝鲜、美国还是中国方面，对汉城的易手都没有更为激烈的反应。

李奇微更没有迷恋汉城的收复，他仍在命令美军坚决向“撕裂作战”的预定目标北进。

彭德怀命令损失严重的中国一线阻击部队转移到后方休整，其中第五十军和第六十六军回国，第三十八、第四十二军撤退至肃川和元

山以西地区。

中国人民志愿军二线部队于十二日正式接敌。

由于彭德怀果断地命令部队大规模撤退，致使李奇微精心布置的一个陷阱没有达到目的，这就是美军空降一八七团的汶山空降作战。汶山空降作战的目的，是利用空降兵的迅速机动，把大量部队投到中国和北朝鲜军队撤退的路上，实施包围。情报说只要在汶山实施空降，至少能把两万四千中国士兵围在美军的天罗地网中。李奇微甚至准备亲自带领士兵跳伞，他的理由是他是一个老伞兵，但是被部下以他五十六岁的年龄为由拒绝了。不甘心的李奇微又跑到空降场去，他要亲眼看着美军伞兵怎样把大批的中国士兵包围，然后杀死。这次空降行动组织了C-119飞机八十架、C-46飞机五十五架，但空投开始后却事故百出：第一轮空降偏离了预定空降点，结果三十多名参谋落地之后遭到北朝鲜士兵的追杀。在后来的跳伞中，又有八十四名士兵伤于跳伞事故，部队着陆后十八名士兵因遭到地面火力射击伤亡。中国军队的地面对空火力将五架运输机击伤，还有一架运输机在返回基地的途中爆炸，机上人员全部死亡。结果，汶山大规模的空降作战没有包围住任何一支撤退中的中国部队，中国部队转移的速度之快令李奇微再一次感到十分意外。

二十日，美军占领“爱达荷线”。

“撕裂作战”完成。

是日，中国军队撤退至三八线以北——中国军队发起第三次战役的地方。

而在一九五一年的二月至三月间，日本以及西方国家的报纸充斥着如下的标题：

美军在三八线停止行动

保留通过外交解决的途径

美军谨慎地进至朝鲜战争的出发点

第八集团军距离三八线十八公里

预感到中国军队的反击

李总统出席釜山群众集会：打到北方去！

英国期待中国的态度

距离三八线一点六公里

南朝鲜军队巡逻队越过三八线

杜鲁门希望体面地结束战争

麦克阿瑟说他准备会见敌军将领

……

至此，朝鲜战争的前景扑朔迷离。

## 不死的老兵去了

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一日中午，麦克阿瑟正在他的官邸招待客人进餐，他的副官眼泪汪汪地悄悄走进来。麦克阿瑟的夫人走过去听副官说了些什么，转身回到麦克阿瑟身边，轻声地对丈夫耳语了一下。麦克阿瑟的表情一下僵住了，过了一会儿，他用一种温柔的、让在场的人都可以听见的口气对妻子说："琼，我想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麦克阿瑟被解除远东最高司令官职务的消息立即传遍了全世界。

这个赫赫有名的美国“远东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是否与正在进行的朝鲜战争有关?

正在朝鲜进行的战争怎么了?

美国人打不下去了还是中国人失败了?

在战争双方经过大规模的拼杀之后，交战的战线又回到起始时的状态，难道战争就此结束了?

“撕裂作战”完成，联合国军进入汉城，麦克阿瑟无疑被打了一针强心剂。但是，情报部门所提供的越来越多的情报都在提醒麦克阿瑟：中国人正在准备一场反击作战。侦察机上的飞行员多次发现，在通往前线的路上运动着大批步行的中国军队，主要由骡马组成的运输队有时在山间小路上蜿蜒达十几公里。在肃川至平壤的公路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中国军队的大型卡车队在移动。无线电监听中不断出现中国军队新的部队番号。

麦克阿瑟由此陷入了矛盾：是在“爱达荷线”上停下来？还是继续前进？停下来，这条线显然不是防御大规模攻击的有利地区；继续前进，又会在什么地方遇到中国军队的进攻呢?

“在这种政治因素很浓的战争中，最高统帅只说一些基本的方针，而让现场指挥官下决心的例子，世界战史上极为罕见。”麦克阿瑟指责华盛顿说，“我没有得到过华盛顿有关行动方针一类的训令。我经常背着手踱步。结果好就受到表扬，坏就受到指责。”

“如果做，就会受到责难；如果不做，也要受到责难。”但是，作为军事将领，麦克阿瑟决不会让部队停止在三八线这条不存在军事意义的界线上。不管政府怎么考虑政治问题，他必须果断地决定他的部队要前进到什么地方去，前进到那里以后准备干什么。

麦克阿瑟决定继续北进。

他的判断是，与其停止，不如前进。他的这个想法得到了李奇微的赞同，因为李奇微也是从军事角度考虑问题的。他们一起回顾了一九四四年冬天，美军在欧洲战场的莱茵河畔遇到的类似情况，那时候下决心继续前进的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当时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观点听起来有点古怪：“敌人占优势，并且拥有进攻的决心，我军缺乏足够防守的兵力，所以，除了进攻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能完成任务，并确保部队的安全——正因为兵力少，才必须进攻。”

李奇微在麦克阿瑟的同意下，制订出新的作战计划：在整个战线上发起新的攻势，全线进至“堪萨斯线”，以应对中国军队可能发动的反击。

被命名为“堪萨斯线”的目标线是：从临津江口南岸，经过板门店，斜穿三八线，至涟川北，一直到华川水库。这是一条起自三八线北侧二十公里左右、与三八线基本平行的战场线。“堪萨斯线”宽一百八十四公里，其左翼可以依托大海，而华川水库宽达十六公里，也是一个军事上防御的依托，从而可以共同构成威胁中国军队的指挥与补给的三角地带。

新的作战计划被定名为“狂暴作战”。

“狂暴”，英文为rugged，可以理解成“崎岖不平”的意思。不知美军是指越往北朝鲜半岛地势越不平，还是指美军的前途犹如崎岖山路

般的艰险。

困扰李奇微的问题是，几乎在每一条进攻的路线上，美军都会受到中国士兵异常顽强的阻击，局部战斗进行得艰苦而残酷，但是，这绝对是中国军队小股的阻击部队。那么中国的主力部队上哪里去了呢？或许他们正在什么地方张开大网等着已经精疲力竭的美军士兵呢。

中国第四十军为掩护大部队转移，在洪川附近迟滞着美军陆战一师的北进。战斗在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争夺与丢失中进行，缓慢而惨烈。在一个叫吾野坪北山的阻击阵地上，三五四团四连在伤亡一半的情况下依旧阻挡着美军陆战一师北进的路。中午的时候，二排长接到报告说，美军正向四连主阵地的侧翼迂回，而在美军迂回的方向上没有我们的部队。实在抽不出兵力了，四连指导员命令于廷起、李克先、曾南生三个士兵去守卫一个小山包，保障二排侧翼的安全。

就在三个中国士兵爬上那个小山包，准备保卫二排阵地侧翼的时候，二排主阵地上却已站满了美军——二排因为伤亡太大失去了阵地。三个士兵立即参加了对二排阵地的反击，于廷起负伤被抬下去，李克先和曾南生两个人开始面对美军一个排的攻击。山包上灌木很密，美军上了山没看见这里有中国人，于是就坐下来休息，屁股刚刚着地，手榴弹就飞来了，接着就是横扫过来的子弹。李克先和曾南生先隐蔽后偷袭，没被打死的美国士兵滚下了山包。

美军开始加大兵力，动用大炮和飞机，向这个只有两名中国士兵的小阵地进行反复冲击。战斗持续到下午，李克先腿部中弹，伤势严重，两个人决定转移。曾南生背着李克先，美军士兵在后面一步步地跟着，机枪子弹追着他们打，李克先说什么也不走了，他让曾南生留下两颗手榴弹。曾南生不肯丢下李克先，李克先说：“你背不动我，反正美国兵没发现我藏的地方，你快回主阵地上拿担架去！”

曾南生，年仅十八岁，湖南长沙人，从小生活贫困，他卖过报纸、摆过地摊、扛过大件，后来参加了解放军。他把李克先安顿好就往连队的主阵地上跑。为了节省时间，他直接从陡峭的山崖上往主阵地上爬，等他爬上了连队的阵地，发现阵地上已经没有人了。连队什么时候转移的，他不知道。他犹豫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最后决定回到李克先身边去。但是，还没等他跑回李克先隐蔽的地方，就看见三个美军士兵已经把李克先围住，接着，曾南生就听见了手榴弹的爆炸声……

内心万分痛苦的曾南生最后终于追上了撤退中的部队。

两年零四个月后，曾南生牺牲在朝鲜黄海道长丰郡项洞里的一次战斗中。

中国二线部队第二十六军一参战就赶上了艰苦的阻击战。

雷保森，二十四岁参军并入党，是个作战勇敢的士兵。他所在的部队在七峰山附近阻击美军，他带领四班在一条公路上与十二辆美军坦克搏斗，击毁了十一辆，全班竟无伤亡。部队开始向北转移，负责掩护撤退的六班阵地发出要求增援的信号。雷保森带领士兵接近六班阵地时，才发现阵地上挤满了头戴钢盔的美军士兵，六班的士兵已经全部牺牲。四班立即向美军冲上去，用身体形成一道阻挡美军前进的前沿阵地。美军发现这不是一支大部队，于是蜂拥而来。但令美军没想到的是，一声呐喊之后，中国士兵竟然进行了反冲击！雷保森的四班以惊人的胆量冲向美军，并且立即展开肉搏战！雷保森连续打倒几个和他扭在一起的美军士兵，第一个冲上六班的阵地。但是，当他回头招呼自己的士兵时才知道，在刚才的肉搏战中战士们都已牺牲，到达六班阵地上的人除了他，只有一个叫周士武的士兵了。

雷保森在阵地上看见了六班全体士兵的遗体，从这些死去的士兵手中沾满血迹的镐头上看，这里进行的是一场血肉搏斗。雷保森搜集到二十多个美式鸭嘴手雷。美军的冲锋又开始了。阵地的三面全是美军士兵，黑压压的，不知道有多少。雷保森和周士武在阵地上奔跑着，向三面拥上来的美军射击，但是美军越来越近了。周士武的双眼被打瞎，看不见了，雷保森对他说："天快黑了，你顺着北面的陡坡往下滑，我掩护你！"

周士武向北面的山坡慢慢地滑去。

雷保森砸坏机枪，手握最后一颗手榴弹，等待美军的靠近。

美军距离他很近了，他想把手榴弹扔出去，但是手榴弹掉在了地上。他负伤的右胳膊已经不听使唤。他用左手捡起手榴弹，用牙扯出拉环，把手榴弹扔出去。趁着爆炸升起的烟火，雷保森纵身跳下悬崖。

在一个黑夜里，两个朝鲜农民在悬崖下发现了多处骨折、浑身血迹的雷保森，他们用木板抬起这个中国士兵，向中国军队撤退的北方走去。

"狂暴作战"开始不久，随着中国军队的撤退，美军陆战一师接近了华川水库。但是，根据南朝鲜第六师的情报，华川水库不但有中国军队坚守，而且中国军队已把水库的闸门全部打开，北汉江江水因此猛涨，南朝鲜军不少士兵和装备已被大水冲走。陆战一师七团也许对"水库"这个词特别敏感，不久前在长津湖水库遭到的厄运令他们至今心有余悸。但是，也许就是在这样的回忆中，他们居然想学习一下中国军队的战术，对华川水库来一个突然袭击。

李奇微亲自审查和批准了陆战一师的作战计划。

袭击部队以七团为主，又特别配备了一个特种兵连。美军一改乘坐汽车白天行军的惯例，携带着个人补给品和弹药，开始利用黑夜步行前进。

打开华川水库闸门，用大水来减缓美军北进的速度，是中国第三十九军一一五师三四四团干的。他们于九日凌晨四时在师作战科副科长沈穆的带领下来到大坝，让看守水库的朝鲜工人把十个泄水闸门全部提了起来。大水下泻，不但冲走了美军的一个炮兵阵地，连公路都被冲垮了。

美军陆战一师的袭击部队想突然占领水库，然后把水闸关上。

美军袭击部队到达水库边，在乘橡皮舟渡水库的时候，被中国士兵发现了，立即遭到射击。七团留在北岸的两个连也同时遭到中国军队的猛烈反击。没有大炮的支援，山高雾大飞机也支援不了，美军士兵不知道该怎么打仗了。陆战一师一营奉命强渡水库，但是他们找了一整天都没找到他们认为合适的渡口，断崖上全是中国军队坚固的阵地。

七团袭击水库大坝的时候，为其掩护的三团开始向通往水库方向上的一个高地进行猛烈攻击。坚守在这个高地上的是三四四团的一连，连长赵志立。这场战斗打得昏天黑地，美军陆战一师三团连续以一个营的兵力一次次地进攻，每一次都被一连打了下去。为了夺取这个阵地，三团用了四天的时间，伤亡了四百多人。战斗的残酷和中国士兵的顽强令美军万分震惊，他们牢牢地记住了华川水库边上的这个小小的高地。

一年以后，朝鲜战争进入谈判阶段。在谈判中，美国方面突然提出一个要求：是否可以见见在华川水库指挥战斗的中国军队指挥官。美国人要“看看这个死硬的军人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中国第三十九军三四四团一连连长赵志立，在他指挥阻击战斗的时候，他想到过死，就是没想到他会一战出名，而且把名出到了联合国。

赵志立被打扮了起来，新军装，新鞋。为了表明中国军队的军官不是美国人说的那种“粗暴的家伙”，中国军方还特别为赵志立准备了一个公文包和一副眼镜，把他打扮成一副文绉绉的样子。在政治部门教给他许多历史知识之后，赵志立来到了板门店。

面对美国记者，问题的核心是，美方不相信在华川水库边那个小山头上阻击美军的仅仅是一个连，因为进攻的是美军最精锐部队的一个营。记者们说赵志立起码是个加强营的营长，中国人在说谎。

赵志立回答：“我今年二十二岁，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中的一名步兵连长。我率领的连队同美军陆战一师第三团作战的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接下来，赵志立详细地回忆了华川水库战斗的全部经过，甚至为证明战斗是自己指挥的，他还详细地叙述了那个小高地的地形和地貌。

记者们似乎对这位年轻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官的仪表表示出更大的兴趣。于是，赵志立，一个中国军队中普通连长的名字和照片登在了西方国家的报纸上，报纸称他为“东方直布罗陀战斗的胜利者”。

华川水库战斗进行到天黑的时候，李奇微承认中国人的战术不是那么好学的，于是宣布袭击失败。

进行袭击作战的美军陆战一师七团撤回原驻地。

在后来陆战一师的战史中，美军这样写道：“这是越过三八线进行辉煌进攻的结束。如果第七团再有一两天时间的话，就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

就在美军全力向“狂暴作战”所确定的“堪萨斯线”北进的时候，随着美军大举接近甚至越过三八线，麦克阿瑟与美国政府长期积存的矛盾终于爆发了。

三月里的一天，一份由美国国家安全局送来的绝密情报放在了杜鲁门总统的桌上。这是从东京侦获到的一份西班牙、葡萄牙驻东京大使发给本国政府的电报。电报的内容是这两个国家的大使向本国政府汇报他们与麦克阿瑟将军谈话的要点。麦克阿瑟在与西班牙、葡萄牙大使谈话时，对美国政府使用了极其尖刻的语言，并表示他能够把正在进行的朝鲜战争扩大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从而彻底消灭共产党中国。麦克阿瑟还说，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西班牙、葡萄牙政府不要感到惊慌，至于苏联，肯定会因为害怕卷入战争而置之不理。

在朝鲜战争的问题上，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分歧很简单，即：麦克阿瑟从一开始就准备把战争扩大，期望朝鲜战争能够最终演变成一场至少席卷亚洲的大规模战争，从而达到他“彻底消灭亚洲的共产党势力”的目的。而以杜鲁门为首的美国政府以及美国众多的西方盟国都认为，朝鲜战争是西方的主要敌人苏联玩弄的一个转移盟国军事力量的游戏，只有欧洲才是盟国军事防御的重点，西方应该把朝鲜战争当作一场局部战争来处理，而且这场战争应该结束得越早越好。

麦克阿瑟不断地提出扩大战争的建议，却不断地遭到华盛顿的否决，这使他与总统之间的不愉快逐渐尖锐起来。威克岛会见时，双方虽很客气，但是实际上已经貌合神离。甚至有人说，从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在威克岛见面的时候起，杜鲁门就有撤掉面前这个老家伙的念头；而杜鲁门之所以对麦克阿瑟如此尊重和热情，是总统“狡猾的政治手段”使然。

当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开始反击并取得胜利时，麦克阿瑟摆脱了李奇微的军事成功给他带来的尴尬而重新狂妄起来，可是杜鲁门政

府却陷入了极端的矛盾之中。大多数美国政府官员，包括杜鲁门总统本人，以及“最强硬的反共分子”国务卿艾奇逊，都对朝鲜战争抱有“见好就收”的念头，认为联合国军既然又打回了三八线，联合国军的体面就有了；当然，能打到鸭绿江最好，但是根据与中国军队这一段的作战情况看，这种可能实在是太小了。固然，像麦克阿瑟所建议的那样，封锁中国海岸，轰炸中国本土，台湾参战，甚至使用原子弹，不是不能够把中国置于死地，可由此带来的苏联对欧洲的威胁和盟国的分裂，会使所有这些努力最终得不偿失。总之，坚持统一朝鲜会损害美国的根本利益，既然面子已经保住还是停战为好。经分析，美国人认为中国很可能接受停战的主张，因为就现在的战线来看，交战双方实际上谁也没吃亏，中国“无论从利益还是从面子上讲，也都能说得过去”。于是，杜鲁门开始寻找谈判的机会和对话的可能，并让国务院和国防部拟定停战谈判的政策。

为停战而努力的杜鲁门读了情报部门送来的电报后，不禁怒火万丈。他“下颏绷得紧紧的，张开的手掌猛拍桌面”。他认为这是彻头彻尾的背叛——“这个老家伙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但是，侦获来的电报所提供的证据无法公开，收拾“老家伙”还要寻找别的途径和借口。

用什么方法来表明美国政府的停战意图呢?

恐怕还是要沿用老一套的政治方式：发布一份声明和一份向中国方面讨价还价的方案。经过艾奇逊、马歇尔等高级官员的反复商讨，一份可供总统发布的声明拟出来了。为了稳妥起见，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发了一封电报，就总统的声明问题向麦克阿瑟征求意见：

国务院正在草拟一个总统声明，要点如下：联合国已经肃清了南朝鲜大部分地区的侵略者，现在准备讨论解决朝鲜问题的条件。联合国认为，在大军向三八线以北挺进以前，应进一步做外交上的努力，以便取得和解。这就需要时间来判断外交上的反应，并等待新的谈判

的发展。鉴于三八线没有军事意义，国务院已问过参谋长联席会议，你具有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在以后几个星期内取得充分的行动自由，以便保障联合国部队的安全并与敌人保持接触。希望你表示意见。

三月二十一日，麦克阿瑟回电，他没有理会参谋长联席会议征求意见的电报，而是再次申说美国政府对他的指挥权的限制，“使他无法去扫清北朝鲜，或者不能做出明显的努力来达到这一目的”。

华盛顿仍在为总统声明的发布做准备，包括逐一征求所有参战国驻华盛顿代表的意见，并要求取得他们的一致赞同或支持。

最后敲定的总统声明措辞谨慎而含糊，充满似是而非的语言和模棱两可的外交辞令。但是，想要谈判的意思还是清楚的：

我作为政府的行政首长，应联合国的请求，在朝鲜行使统一的指挥权，并在与提供战斗部队支持联合国在朝鲜行动的各国政府充分协商之后，发布如下声明：

联合国在朝鲜的军队正从事击退向大韩民国和联合国发动的侵略行为。侵略者蒙受重大的损失之后，已被逐回去年六月最初发动非法进攻的地区附近去了。

有待解决的问题是按照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七日安理会的决议所提出的条件来恢复该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与原则要求尽一切努力来阻止战争的蔓延，并避免苦难的延长和生命的损失。这里有一个在该地区恢复和平与安全的基础，它应该是一切衷心希望和平的国家所能接受的。

联合国统一指挥部准备进行能终止战争并保证不再发生战争的部署。这种部署能为解决朝鲜问题开辟更广阔的道路，其中包括外国军队撤出朝鲜。

联合国已宣布这个世界组织的政策是：允许朝鲜人民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民主国家。

朝鲜人民有权享有和平。他们有权利按自己的选择，适应自己的需要，选择自己的政治以及其他制度。

朝鲜人民有权获得世界组织的援助以医治战争的创伤。联合国已准备给予这种援助，并为此设立了必要的机构。联合国会员国已提出要给予慷慨的帮助。目前需要的是和平，在和平的情况下，联合国才能把它的资源用在创造性的重建事业上去。

令人遗憾的是，那些在朝鲜反对联合国的人对原来可以而且仍然可以为朝鲜带来和平解决的机会很少加以理会。

迅速解决朝鲜问题就能大大地为减轻远东国际紧张局势而开辟道路，应按照联合国宪章中所规定的和平解决争端的程序来考虑这一地区的其他问题。

在未达成令人满意的结束战斗的部署以前，联合国的军事行动必须继续下去。

杜鲁门希望中国方面能够理解声明中明显的停战信号，并期望声明能引起巨大的国际反响。

但是，令杜鲁门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精心准备的总统声明还没有发表时，远在东京的麦克阿瑟抢先发表了自己的声明。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四日，美军在汶山实施空降的那一天，麦克阿瑟又上前线了。回到东京后，他的声明发表了：

战事仍然按照预定的日程与计划进行着。现在我们已大体上肃清了共产党在南朝鲜有组织的军队。愈来愈明显，我们昼夜不停的大规模海空袭击已使敌人补给线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这就使敌人前线部队无法获得足以维持战斗的必需品。我们的地面部队正出色地利用这一弱点。敌人的人海战术无疑是失败了，因为我们的部队已适应敌人的作战方式。敌人的渗透战术只能使其小股小股地被消灭。在恶劣的天气、地形和作战条件下，敌人的持久作战能力要低于我军。

比我们在战术上的成功具有更大意义的是，事实清楚地表明，赤色中国这个新的敌人，缺乏工业能力，无法提供进行现代战争所需要的足够多的重要物资。敌人缺乏生产基地，缺乏建立、维持以至使之投入作战的哪怕是中等规模的空、海军所需要的原材料。敌人也无法提供成功地进行地面作战行动所必需的武器，如坦克、重型大炮以及科学技术为军事战役所创造的其他精巧的武器装备。起初，敌人数量上潜在的巨大力量大大弥补了这一差距，但随着现代大规模毁灭手段的发展，单靠数量已无法抵消这些缺陷本身所固有的危险性了。控制海洋和空中，进而也意味着控制补给、交通和运输，其重要和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在现在并不亚于过去。我们现在拥有这种控制权，加上敌人在地面火力上的劣势，其作用更加倍增。

这些军事上的弱点，在赤色中国进入朝鲜战争时，就已清楚无疑地表现了出来。联合国部队目前是在联合国的监督下进行作战的，因而相应地使赤色中国得到了军事优势。即使这样，事实还是表明，赤色中国完全不能以武力征服朝鲜。因此，敌人现在已经必然痛苦地认识到，如果联合国改变它力图把战争局限在朝鲜境内的容忍决定，而把我们的军事行动扩展到赤色中国的沿海地区和内部基地，那么，赤色中国就注定有立即发生军事崩溃的危险。确

认了这些基本事实以后，如果朝鲜问题能够按照它本身的是非加以解决，而不受与朝鲜无直接关系的问题（如台湾问题或中国的联合国席位问题）的影响，则在朝鲜问题上作出决定并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

决不能牺牲已经受到极其残酷蹂躏的朝鲜国家和人民。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军事方面的结局在战斗中去解决。但除此之外，基本问题仍然是政治性的，必须在外交方面寻求答案。不用说，在我作为军事司令官的权限之内，我准备随时和敌军司令在战场上举行会谈，诚挚地努力寻求不再继续流血而实现联合国在朝鲜的政治目标的任何军事途径，联合国在朝鲜的政治目标是任何国家都没有理由反对的。

麦克阿瑟的声明让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官员们感到：“这位联合国军司令官简直再也找不到比这更有效的办法来使总统勃然大怒了。”

麦克阿瑟的声明使杜鲁门一切周密的停战准备化为枉然。

麦克阿瑟声明的内容和华盛顿已斟酌完毕的声明内容观点正相反。

麦克阿瑟违反了总统去年针对他而签发的“任何人未经允许不得公开发表有关外交政策的声明”的训令。这是对国家最高决策机构和决策者的公然违抗，是对美国宪法赋予总统权威的挑战和蔑视。同时，麦克阿瑟的声明等于以最后通牒的方式通知中国方面，盟国要用全部的力量来对付中国，这无异于宣布远东的朝鲜战争将会演变成一场世界大战。

西方盟国把麦克阿瑟的声明称为向共产党宣战的“战书”。

麦克阿瑟的行为更严重的错误在于：这是在向美国国家领导军队的政体进行挑战，而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权之本就是文官治国。

愤怒的杜鲁门立即召集会议，他说：“我现在唯一能说的是我深感震惊。我从未低估过我同麦克阿瑟之间的困难，但是自威克岛会晤之

后，我曾指望他能尊重总统的权力。现在我认识到，我本人除了解除这位国家的最高战场指挥官的职务外，没有别的选择了。”

一向与麦克阿瑟有间隙的国务卿艾奇逊更是暴跳如雷，“麦克阿瑟信口开河”，他声明里的东西“简直使人对谈判提议无论如何也没法接受”。这真是一种“难以置信”的状况，因为这会使我们的盟国“不知道是谁在管理美国”。在表示坚决同意总统的决定的同时，艾奇逊是这样评价麦克阿瑟这位美国的五星上将的：“这是个肮脏的农夫！”

至于如何下手，杜鲁门还要考虑一下。

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毕竟不是一件小事，很可能会引起政治上的轩然大波。

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发了一封电报，提醒他要遵守总统的训令，并且要求他如果向中国方面提出谈判的话，必须立即向总统报告“并等待命令”。

麦克阿瑟立即回电，表示自己的声明仅仅是“一位战区司令官的局部观点”，是“一位战区司令官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发布的那种公告”。

白宫一边提醒着麦克阿瑟说话小心一点，杜鲁门和他的官员们一边研究如何稳妥地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而麦克阿瑟此时还在继续他的言论，在与记者的谈话中，他再次说到他的军事指挥“被束缚在一张人为的罗网之中”，他“是在打一场没有明确目标的战争”，而关于三八线问题则“是政客们侵犯了军人的职权”。

导致麦克阿瑟被解职的导火索终于冒出火星了。

四月五日，美国众议员马丁在众议院的发言中当众宣读了一封麦克阿瑟的来信。这封信是麦克阿瑟发表声明的前三天写给马丁的回

信。之前，马丁在他给麦克阿瑟的信中认为，不在朝鲜战争中利用福摩萨（台湾）军队是“愚蠢透顶”的事情，于是，麦克阿瑟的回信是：

> 五日来函附来了你在二月十二日的演讲稿。我以莫大的兴趣阅读了它，我看出，多少岁月流逝了，而你的英姿未减当年。
>
> 关于赤色中国在朝鲜参战而造成的局势，我的看法和建议已极其详尽地阐述并呈交给华盛顿。总的来说，大家都知道并了解这些意见，因为这些意见只是遵循传统的方式给暴力以最大所谓还击而已。我们过去一直是这么做的。你关于利用福摩萨的中国军队的意见既符合逻辑，也符合传统。
>
> 有些人似乎不可思议地难以认识到：共产党已选择亚洲这个地方来着手征服世界，而我们对由此引起的战场问题却展开了讨论；他们难以认识到我们在这里是用武器为欧洲作战，而外交家们则仍在那里进行舌战。如果我们在亚洲输给了共产主义，那么欧洲的陷落也就不可避免了；如果我们在这里赢得胜利，则欧洲就很可能避免战争而维护了自由。正如你所指出的，我们必须赢得胜利。除了胜利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当杜鲁门在报纸上看见这封信时，终于怒不可遏。麦克阿瑟凭什么煞有介事地说共产党决定把全部力量集中在他所管辖的地区？他有什么权力说美国的政策是不符合逻辑的和违背传统的？

第二天，杜鲁门把国务卿艾奇逊、国防部长马歇尔、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召集到办公室，明确表明一定要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在场的人都表示没有异议。

杜鲁门在他当天的日记里对麦克阿瑟有这样的描述：“麦克阿瑟通过马丁又扔出一颗政治炸弹，这看来像是最后的致命一击。”

接着，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问题被提到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因为国务卿艾奇逊认为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致支持至关重要”，他不希望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看起来“像一位意气用事的总统所采取的鲁莽行为”。

虽然国防部长马歇尔希望关于这一事件得到参谋长们“严格的军事意义上的意见”，但是陆军参谋长柯林斯、海军参谋长谢尔曼和空军参谋长范登堡的意见还是集中在了“麦克阿瑟对政府政策的攻击”上。最后，参谋长们一致认为：“总统完全应该有这样一位战场司令官，他的观点和他的政府的基本政策更为一致，他更能响应作为总司令的总统的意见和意志。”当然，参谋长们私下里还一致认为，他们并不“欣赏即将发生的这件事”。陆军参谋长柯林斯说：“参与对一位杰出战士的免职，实非一件易事。”

接下来，事情转入用什么样的方式通知麦克阿瑟的问题。哪一种方式更合理而又稳妥呢？华盛顿多数人认为，通过军方渠道来发布是极不明智的，“对麦克阿瑟将是奇耻大辱，因为他的司令部里几乎每一个人都会知道将军是在事先不知道的情况下被解职的”。

四月十日，杜鲁门决定由正在远东视察的美国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把解除职务的命令当面交给麦克阿瑟。

但是，由于通讯线路的故障，陆军部长还没有领受命令，《芝加哥论坛报》就抢先把这个消息捅出去了。

于是，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一日凌晨一时，杜鲁门临时召集白宫记者团，宣布了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命令：

我深感遗憾地宣布，陆军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已不能在涉及他所担任职责的问题上全心全意地支持美国政府和联合国的政策。根据美国宪法赋予我的责任和联合国特殊委托我的责任，我决定变更远东的指挥。因此，我解除了麦克阿瑟的指挥权，并任命马修·B.李奇微中将为他的继任者。

对于有关国家政策的各种问题进行全面而热烈的讨论是我们自由民主立宪制度的不可缺少的因素。但是，军事司令官必须服从根据我国的法律和宪法所规定的方式下达给他们的政策和指示，这是一个基本的条件。在危急时期，这一因素尤其必要。

麦克阿瑟将军作为美国最伟大的司令官之一已经完全确立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对于他在重大责任岗位上对国家做出的卓越和非凡的贡献，全国人民深怀谢意。由于这一原因，我为不得不对他采取的行动深感遗憾。

之后，由白宫秘书宣读的解职命令是：

陆军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

我深感遗憾的是，我不得不尽我作为总统和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之职，撤销你盟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远东总司令和远东美国陆军总司令的职务。

你的指挥权将交给马修·B.李奇微中将，立即生效。你有权发布为完成计划前往你选择的地点而必需的命令。

关于撤换你的原因将在向你发布上述命令的同时公之于众。

当美国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正式接到麦克阿瑟被解除职务的电报时，他正在李奇微的陪同下视察朝鲜前线。晚上，在一片风雨中听到第八集团军参谋长利文·艾伦在电话中转达电报的内容时，佩斯着实吓了一跳。他立即让李奇微跟自己来到指挥所的门外。外面下起了冰雹，佩斯让李奇微把脖子上的手雷收起来，他说：“马修，把这些该死的手雷拿掉，万一冰雹把它们给砸响了，美国就没有了陆军部长和朝鲜的司令官了。”

李奇微对自己接任麦克阿瑟的职务感到万分意外。

四月十二日，李奇微到达东京上任。

在李奇微见到麦克阿瑟的时候，麦克阿瑟表情平静。他们谈论了一些关于战争局势的问题，麦克阿瑟第二次在东京给李奇微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是接下来的谈话让李奇微听起来便古怪离奇了。

麦克阿瑟说，他已经收到各种报价，请他谈他与总统之间的矛盾，有人愿意出十五万，有人愿意出三十万，最多的愿意出一百万。

麦克阿瑟还告诉李奇微，有一位“杰出的医学界人士”对他说过，杜鲁门患有恶性高血压，“大概活不过六个月了”。

麦克阿瑟回到了美国。

虽然美国人理解政府拥有宪法赋予的权力和义务去监督军方，但他们还是认为杜鲁门不该这样对待一位曾率领美军在巴丹岛和仁川港“取得巨大胜利的英雄”。七百万美国人自发地来到大街上欢迎麦克阿瑟归来。麦克阿瑟的支持率上升到百分之六十九，而杜鲁门的支持率下降为百分之二十九。麦克阿瑟感慨万千地说：“的确，在战争中没有什么可以替代胜利。”

一九六二年五月，在做了包括胆囊切除在内的几次大手术之后，面容憔悴、虚弱不堪的麦克阿瑟回到他一生戎军之路的起点——西点军校，发表了在他销声匿迹多年后的一篇极富诗意的演讲，这最后的演讲与他在太平洋上曾经创造的赫赫战功一样，令世人长久怀想。

麦克阿瑟演讲的题目是《老兵不死》：

我的生命已近黄昏，暮色已经降临，我昔日的风采和荣誉已经消失。它们随着对昔日事业的憧憬，带着那余晖消失了。昔日的记忆奇妙而美好，浸透了眼泪和昨日微笑的安慰和抚爱。我尽力但徒然地倾听，渴望听到军号吹奏起床号时那微弱而迷人的旋律以及远处战鼓急促敲击的动人节奏。

我在梦幻中依稀又听到了大炮在轰鸣，又听到了滑膛枪在鸣放，又听到了战场上那陌生、哀愁的呻吟。然而，晚年的回忆经常将我带回到西点军校。我的耳旁回响着，反复回响着：责任，荣誉，国家。

今天是我同你们进行的最后一次点名。但我愿你们知道，当我到达彼岸的时候，我最后想的是学员队，学员队，还是学员队。

老兵永远不死，他们只是慢慢离开。

我向大家告别。

一九六四年四月五日下午十四时三十分，麦克阿瑟于华盛顿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病逝，终年八十四岁。

不死的老兵去了。

# 第七章 谁能在战争中取胜

## 范弗里特将军：欢迎共军进攻！

联合国军前沿无线电监听记录：

监听时间：三月三十日。

地点：洪川北二〇五高地。

来源：中国军队汉语电话。

内容：今天的伙食有无困难?

联合国军在北进的同时一直在探察中国军队可能发动大规模反击作战的迹象。

就在第四次战役中国军队向北撤退的时候，唯独彭德怀的指挥部在一路向南推进。现在，彭德怀的指挥部几乎位于接敌的前沿，敌机不断地从头顶上飞过，可以清晰地听到前沿阻击战斗的炮声。

春天来了，尽管战场上的春天来得是那样的迟缓，但斑驳的野花和细嫩的野草已铺满遍布着弹坑的山峦，灌木枝头上挂满鹅黄色的初叶，山谷中吹来的风也变得温和起来。

一九五一年四月六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党委第五次扩大会议在朝鲜金化东北几公里处一个叫上甘岭的地方召开。

这是一个巨大的废弃金矿矿洞。数十个炮弹箱垒成的会议桌摆在矿洞的中央。参加会议的除了志愿军指挥机关的首脑之外，还有先期

入朝的志愿军九个军的军政主官，以及刚刚入朝的第三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副政委杜义德，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等领导。北朝鲜方面的人民军领导列席会议。

中国人民志愿军所有的高级军事指挥员都集中在这个矿洞里了。

这些指挥员有一些彭德怀并不熟悉，但是，高级军事指挥员们没有一个不认识彭德怀的。彭德怀看着壮大了不少的指挥员的队伍，打趣地说："美帝国主义纠集了十五国的军队组成了联合国军，我看咱们也可以说是个'联军'，来自祖国的各个地区，咱们一个兵团管辖的地区，就比他们一个国家大得多！"

彭德怀的心情随着国内补充部队的到来有了好转。在两个月以来的艰苦阻击和焦急的盼望中，第三兵团和第十九兵团的六个军终于到达前线了，加上原来参战的九个军，以及炮兵、铁道兵、后勤部队和技术兵种，此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总兵力已经达到七十多万人。

只要有了人，什么都好办。

在对人的能力的认识上，杜鲁门不如在亚洲生活了十四年的麦克阿瑟了解中国人。华盛顿的那些高级幕僚们所认为的"中国人可能也认为现在是战争停下来的时机"的判断完全是主观臆测。中国人不但不会认为战争应该停下来，而且正在准备一次自朝鲜战争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战役。即使在中国军队被动撤退的那些腥风血雨的日子里，打一个更大规模的战役、消灭更多的敌人的梦想仍萦绕在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心中。

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中国人顽强展现其特有的民族性格。没有较量到最后决不停止，而且永远也不会认输。美国人在远东的朝鲜半

岛上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才明白了这一点。

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首先总结了第四次战役的得失。

第四次战役，历时八十七天，中国军队边打阻击边撤退，一直撤退到现在的三八线以北，在运动防御中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志愿军官兵用血肉之躯顽强地迟滞了美军在空前规模的现代化杀伤武器的掩护下的进攻，令美军的北进攻击平均每天付出几百人的代价才能前进一点三公里。但是，中国军队在第四次战役中的教训也是很多的，简单地说就是：一、朝鲜战争是一个艰苦的长期的战争，“速胜”的思想是可怕而有害的；二、在美军的现代化装备面前，中国军队固守防御是困难的，必须进行积极的运动防御。

认识到这两点，足以说明中国军方在战争中头脑的清醒。

且不说中国军队在保障士兵基本生存与战斗所需物资上的困难，仅仅从部队的机动性能上看，其机动手段与美军相差甚远。进攻中，中国军队的攻击手段一成不变，在运动防御中为避免出现战线崩溃就必须保持相当纵深的阵地配置，而且不能随意撤守。由此，美军依靠机械化的速度所达成的突击便会令中国军队陷入被动。这种现实对于中国军队来讲是一个深刻的矛盾，因为即使是在认识到之后，中国军队依旧没有总结出切实可行的应对方法。于是，这导致了中国军队在思想上根本忽视了这种状况，而在未来的战争进程中依旧犯下了同样的错误。

对第五次战役的讨论开始了。

当面联合国军的前线兵力为十四个师、三个旅，再加上三个南朝鲜师，共近三十万人。至于敌人到达三八线后是否继续大规模北进，尽管中国方面收到了美国方面发出的某种和谈的信号，但是毛泽东和

彭德怀根据多年对敌斗争经验所得出的对敌人本质的判断是根深蒂固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的敌人是没有的。但是，目前的战场态势也许会出现三种情况：如果联合国军继续大规模北进，对中国军队正在准备的反击作战最为有利，因为联合国军一旦向北深入，其战线状况便于中国军队利用其间隙穿插分割。如果联合国军缓进而主力停止，那么对中国军队的目前有利，因为中国军队完全有能力阻击北进的小规模之敌，以便再争取一段战役的准备时间。如果联合国军就此不再北进了，这反而不好，因为美军一旦决心停下来并且形成坚固的防御线，中国军队要想反击，就等于打的不是运动歼敌而是对美军阵地的攻坚，这是最没有胜利把握的一种交战态势。

可是，李奇微始终没有放松对中国军队可能反击的警惕，他采用的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北进政策。部队推进的速度不快，但却十分坚决，并且战线平推，不留间隙，即使越过了三八线依旧还是如此。这反而让彭德怀举棋难定了。反击作战肯定要打，但什么时候打是最佳战机，怎么打，这些问题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军事首脑之间形成了激烈的争论。

副司令员洪学智坚决不同意立即进行大的战役，他主张把联合国军再往北放，一直放到战机形成时，也就是中国军队完全准备好以后，再打。洪学智的理由是：如果现在就打，敌人一缩，不容易达到毛主席所要求的“成建制地消灭敌人”的目的。而把联合国军放进来，中国军队可以采取拦腰截断的战术，解决问题会顺利一些。况且，现在新参战的部队刚刚入朝，没有立即投入大规模战役的思想准备。

彭德怀打断了洪学智的话：“我们不能再退了，把敌人放进铁原、金化以北，坏处很多。铁原是平原，是很大的开阔地，敌人坦克冲进来，对付起来很困难。另外，敌人进来，我们在物开里附近储藏的很

多物资和粮食怎么办？不行，不能把敌人放进来，还得在铁原、金化以南打！”

副司令员邓华也倾向于洪学智的意见：“洪副司令的意见有道理，应该把敌人放进来打。目前，三兵团和十九兵团刚入朝，九兵团也刚刚往前开进，地形都不熟悉，行动十分仓促。把敌人放进来，一是我们准备得充分一些，可以以逸待劳；二是可以把地形摸清楚。”

洪学智表示：“至于物开里的物资和粮食，我保证两天之内把它向北搬完！”

彭德怀却严肃地质问：“这个仗你们到底想不想打了？”

彭德怀按照自己的意见起草了给毛泽东的电报，电告了志愿军关于第五次战役的想法。

当天，洪学智又单独向彭德怀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彭老总，当参谋的，有三次建议权，我已经向你提过两次了，我现在再向你提一次，最后由你决定。”

洪学智最大的担心是：如果不能在战役一开始就分割包围住敌人，中国军队向前打，美军就向后退，中国士兵的两条腿是追不上美军的汽车轮子的。追远了，部队供应不上，可能还会出现第四次战役后期的状况。

彭德怀没有做声。

彭德怀主张立即作战的重要原因，他当时没有明确地说出来，那就是担心美军于朝鲜半岛东西两侧实施登陆作战。

志愿军参谋长解方提供的两个情报引起彭德怀深深的忧虑。一是李奇微到东线视察后，美海军加强了对元山、新浦、清津诸港口的炮击和封锁，并且对沿海岛屿进行了频繁的侦察；二是美军本周从其本土调了两个师到达日本，准备增援朝鲜战场，南朝鲜也至少有三万人在日本的美军基地加紧训练。另外还有消息说，蒋介石的三万名士兵已经运抵济州岛。一切迹象表明，美军很可能在策划一次大规模的登陆作战，地点很可能是在东海岸的通川、元山。在正面联合国军大举北进的时候，如果美军同时在朝鲜半岛的东西海岸进行大规模的登陆作战，那么，中国军队的供应线将被完全切断，腹背受敌的中国军队面临的局面将是灾难性的。

驻亚洲地区的美军是以两栖登陆作战能力而闻名的。

机动能力很差的中国军队承受不住类似仁川登陆一样的两栖作战的夹击，尤其是在没有准备的时候。

彭德怀自担任朝鲜战场的统帅时起，就一直对此抱有极大的警惕。要抢在美军可能发动登陆作战的前边，从战线的正面向其施加压力，以粉碎美军的企图，消除中国军队侧后的威胁。这就是彭德怀坚持立即开始新的战役的原因。

彭德怀在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我军反攻时机，以现在为最好，因敌很疲劳，伤亡还未补充，部队不甚充实，且后备部队尚未来到，但现时我军尚未集结完毕。如敌进展较快，则决于四月二十日左右发起反击战役；如敌进展较慢，则拟于五月上旬开始；若再推迟，待敌登陆和增援到来后再打，可能增加我军之困难……敌人这次兵力比较靠拢，战斗纵深大。因此，我必须实行战役分割和战斗分割相结合，必须从金化至加平线劈开一个缺口，将敌人东西割裂，然后各个包围歼灭之。"

彭德怀要求立即抓紧时间进行政治动员和战术教育，组织第一批参战部队的干部向新参战的部队介绍作战经验，并向新参战的部队派出顾问，立即开展战役侦察和战术侦察。同时，对后勤工作的要求是：加强囤积粮弹物资，保证参加这次战役的每个战士能自带五天的干粮，后勤分部同时准备可供部队五天的干粮随部队前进。要克服三八线一带一百五十公里无粮区的困难，不允许战士挨饿的情况发生，如果一两天断粮，再好的作战计划也没有用。卫生部门做好四至五万伤员的收容治疗准备。工兵部队立即开始修筑熙川经德岘里、宁远、孟山到阳德的公路，准备一旦敌人从侧后登陆，中国军队的西线交通被切断时，作为主要运输线。

十日二十四时，彭德怀将第五次战役的具体设想和部署电告毛泽东：

我作战企图，拟从金化至加平线，利用这一大山区劈开一个缺口，将敌东西割裂，然后用九兵团和十九兵团对西线敌人进行战役两翼迂回，三兵团正面进攻，以各个分割歼灭敌人，力求在三八线北歼灭敌人几个师，得手后再向纵深发展。

……

攻击时间，如敌进展快，我拟于四月二十日左右开始，各兵团于四月十五日可集结完毕，时间较仓促些；如敌进展不快时，待五月上旬出击，准备即较充分些，我空军和装甲部队亦有可能部分参战，战果亦可能大些。

周恩来提醒说，这次战役无论兵力的投放、战线的宽度，还是预想的战果，比起前四次战役都要大得多。而前四次战役的结果证明，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一个整师，甚至是一个团，都难以达成歼灭的目标。那么这次战役预定“歼灭敌人几个师”恐怕客观上难以做到……

但是，毛泽东批准了彭德怀的作战预案。

四月十三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

完全同意你的预定部署，望依情况坚决执行之。

中国军队第五次战役发起的时间最后确定为：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所有参加志愿军第五次党委扩大会的军事指挥员都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尤其是刚刚入朝并即将在开始的战役中担任主力的第三兵团、第十九兵团的军事指挥员更是格外兴奋，他们真诚地向第一批参战部队请教跟美国军队打仗的经验，兴致勃勃地听着那些激动人心的战斗故事，追根寻源地探究着每一个战例，并邀请第一批参战部队派出精干的干部到自己的部队当战斗顾问。这些指挥员都是抱着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在朝鲜战场上立大功的决心离开会场的。

没有人知道已与美军进行了四次殊死拼杀而不再参加第五次战役的第三十八、第四十二军的指挥员们离开会场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前沿的炮声越来越近，美军的前锋部队距离上甘岭仅有十几公里了。会议一结束，参谋人员就要求彭德怀立即转移。彭德怀不愿意走，但是参谋人员说，机关已经转移了，这里实际上就剩下司令和副司令几个主要领导了，连电台都搬上卡车了，如果再延迟，北撤的唯一公路要是被敌人封锁，情况就危急了。

彭德怀不得不上了吉普车。

吉普车上的彭德怀背向前线的方向而去。自他率领中国军队参加朝鲜战争以来，他的指挥部一路向南前进：大榆洞、君子里，然后南下到这个上甘岭。而现在，他的指挥部开始向北去了。

彭德怀新指挥部的地点是伊川北面的空寺洞，依旧是一个废弃的金矿矿洞。

转移是趁黑夜进行的。为了安全，志愿军总部的首长分批转移。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彭德怀难得地开了个玩笑。

即使是中国军队最高指挥机关的转移也是险象环生。洪学智在彭德怀转移的第二天乘吉普车上路，没走多远，原以为夜晚不会来的美军飞机便朝他们俯冲下来。吉普车在躲避轰炸时开进了沟里，幸亏人没有受伤，但洪学智和两个警卫员无论怎么努力也无法把吉普车从沟里弄上来，最后还是路过的卡车把吉普车拉了上来。刚把车弄上来，一辆因为防空而没敢开灯的汽车在黑暗中冲了过来，把一个警卫员撞倒了，伤势很重。在洪学智的命令下，那辆汽车负责把这个警卫员送往医院。吉普车继续走了大约一个小时，遇到空袭，紧接着又被迎面开来的一辆大卡车撞上了，吉普车被撞扁，洪学智的双腿受伤。卡车上的第四十军的财务科长，发现被撞的竟是洪副司令，吓坏了，赶快下车，洪学智让他们赶紧离开。美国制造的吉普车被撞成那个样子，居然还能开，天快亮的时候，一瘸一拐的洪学智终于到了那个叫空寺洞的地方。

空寺洞洞中滴水，实在是太潮湿，而且过于昏暗，彭德怀不愿意住。山下有几间房子没有被炸，于是彭德怀就住在房子里。一天早上五点，美军的飞机突然飞临上空，洪学智和邓华钻入了防空洞，但是看见彭德怀住的房子被火箭弹击中了。飞机飞走以后，洪学智跑过去，彭德怀住的房子已彻底烧毁，幸亏彭德怀被警卫人员迅速拉进了一个小小的防空洞没有受伤，但是堵在防空洞口的草袋足足中了七十多发机枪子弹。

从那以后，彭德怀住进了潮湿阴暗的矿洞里。为了他的工作，工兵在洞口外为他挖了一个小洞，美军飞机没有来的时候，他可以到有亮光的洞口去挂地图。但是，美军的飞机几乎天天来。

就在第五次战役准备进行到紧张阶段的时候，传来了三登仓库被美军飞机轰炸的消息。

彭德怀大怒。

三登位于平壤以东、成川以南，是铁路线上的一个隐蔽的小车站，是志愿军后勤部储藏作战物资的一个主要卸车点和转运点，它担负着供应第三十九、第十二、第十五、第六十六、第六十三军的任务。从二月初到四月上旬，这里一共卸下粮食、服装、食品等物资七百多车皮，除大部分被转运走之外，至今还存放着一百七十多车皮的物资。

美军发现了这个目标，出动飞机向三登进行了长达十个小时的轰炸，结果有九十节车皮的军用物资被炸毁，损失生、熟粮食二百六十万斤、豆油三十三万斤、服装四十三万八千套，还有其他大量的物资。

在战役即将开始的时候三登被炸，彭德怀痛心之极："暴露目标和直接责任人要军法处置！"同时，在给军委的一封电报中，彭德怀说："请立即派得力干部组织检查团，彻底追究原因和责任，严格执行纪律，教育全体人员。否则，朝鲜战争将要遭到严重损害。"

三登被炸，暴露了中国军队运输和防空力量的落后。——大量的物资因为缺乏运输手段无法及时疏散，而如此重要的物资转运站竟然没有高射炮兵的保卫。

不久，彭德怀又听到一个令他发火的消息：第六十军来电报说他们没有粮食了，士兵用衣服和毛巾与当地的朝鲜人换鸡和酸菜吃。彭德怀对负责后勤工作的洪学智说了几句很不高兴的话，然后派自己的办公室主任前去调查。结果第六十军还有三天的粮食，来电报的意思是看能不能再给一点。

彭德怀给洪学智送去一个梨，说是闹了误会，给洪副司令“赔个梨（理）”。

洪学智说：“这梨我可不敢吃！老总是怕部队饿肚子，这种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够我们学一辈子的！”

第五次战役按照彭德怀的计划，一天天接近了发动的时刻。

这时，回到中国国内作报告的志愿军英雄代表成为最受欢迎的人，官兵们所到之处都是鲜花和掌声。老人们把这些不惧死亡的年轻人视为自己的亲儿女，拉着他们的手老泪纵横。孩子们最喜欢的人就是志愿军叔叔，因为他们会讲打美国鬼子的战斗故事。学生们让他们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签名，邀请他们跳舞联欢。要求参加志愿军的年轻人愿意立即跟随他们上前线。成千上万封信飞往朝鲜前线的战壕，写信的人从三岁的儿童到古稀老者，其中最多的是中学生和大学生。年轻的女学生措辞优美动人甚至表达了热烈的爱情，令战壕中的志愿军士兵激动不已。由于一位中国作家将第三十八军的一支部队在松骨峰阻击美军的事迹写了一篇名为《谁是最可爱的人》的通讯，于是志愿军官兵有了一个全中国都使用的代名词：最可爱的人。

这就是新中国。物质的贫乏丝毫没有使这个国家的人民感到信心的挫伤，相反，他们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中国军队为什么能在武器装备与对手存在巨大差距的情况下，依旧能够英勇作战，前仆后继，至今令他们的敌人感到震撼和畏惧的原因。

李奇微接替麦克阿瑟之后，他选择的第八集团军司令官是范弗里特。

詹姆斯·A.范弗里特，接任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官之前，正在美国国内负责训练新兵。美军中有人说他是个“乱世英雄”，有人说他是个

“偏激的旧式军人”。他是从士兵成长起来的将军，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他顶多只能升到中校，是战争给了他光明的前程，幸运之神是在最残酷的战斗中降临在他头上的。诺曼底登陆时，他是美军第二十九师中的一名团长。第二十九师登上奥哈马海岸，战斗进行得很不顺利，五天以后全师还在海岸边没有进展，德军的反击令部队出现巨大伤亡。眼看这个局部的登陆就要失败的时候，视察前线的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雷决定把第二十九师师长撤了，让范弗里特团长代理师长，于是，“全师就像苏醒了一样，前进了”。不久，范弗里特正式成为师长，接着被提升为军长。二战后他在希腊待了一段时间，专门对付希腊的共产党游击队。

范弗里特不关心政治，因此被认为缺乏优秀将领关照全局的能力，有人说把第八集团军交给他指挥有点不让人放心。李奇微却不这么认为，他说他了解范弗里特：“这是个擅长战斗并且追求完美的军人，即使一个小规模的战斗，他也要获得全胜。”

四月十四日，接任第八集团军司令官的范弗里特很为自己应该干些什么或者说马上就要干的是什么而伤了一阵脑筋。中国军队反击作战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只是不知道中国军队将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开始。但是，是否就此停下来建立防御阵地等待中国军队的攻击?范弗里特认为：即使建立防御阵地，中国军队也要攻击。在这种情况下，建立防御阵地不但起不到坚固的防御作用，在士兵的心理上反而会造成不良影响。所以，只有按照李奇微的方针，北进，坚决地北进，打到哪儿算哪儿，说不定美军的持续进攻会破坏中国军队的反击计划。

范弗里特下达了一个北进计划，目标是“怀俄明线”。这是一条曲线，目的是再次把第八集团军凹凸的战线拉平。

因此，在中国军队积极准备大规模反击的时候，联合国军还在北进。

二十一日，中国军队发起攻击的前一天，战场上双方的态势是：

美第一军指挥的第三、第二十五师以及南朝鲜第一师位于汶山以东地区，其先头部队南朝鲜第一师的青年团已经到达开城和石柱院里地区。美第三师十五团是预备队，位于议政府。

美第九军指挥的美二十四师、陆战一师以及南朝鲜第六师，位于芝浦里至大利里一线。英军第二十九旅为预备队，位于加平。

美第十军指挥的美第二、第七师，荷兰营和法国营以及南朝鲜第五师，位于九万里至元通里一线。

南朝鲜第三军团指挥的南朝鲜第三师位于元通里至寒溪岭一线。预备队是南朝鲜第七师，位于县里、美山里地区。

南朝鲜第一军团指挥的首都师、第十一师在杆城一带防御。

第八集团军的总预备队是美骑兵第一师、空降一八七团和南朝鲜第二师，分别位于春川、水原、原州。

中国军队发动的第五次战役的预定计划是：以三个兵团共十二个军（含北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在西线实施主要突击，以分割汉江以西的敌人为目的。第三兵团为中央突击集团，从正面实施突击。第九兵团和第十九兵团分别为左右突击集团，从两翼进行战役迂回。首先力图歼灭南朝鲜第一师、英军第二十九旅、美第三师、土耳其旅和南朝鲜第五师共五个师（旅）。然后，再集中兵力歼灭美第二十四、第二十五师。北朝鲜人民军积极钳制敌人，相机歼敌。

中央突击集团的第三兵团指挥第十二、第十五、第六十军，配属炮兵两个团、反坦克炮兵一个团，自三串里至新光洞十五公里的正面实施突破，首先歼灭美第三师和土耳其旅，而后向哨城里、钟悬山地区实施突击，与第九兵团、第十九兵团会歼位于永平、抱川地区的美第二十四、第二十五师。

右翼突击集团的第十九兵团指挥第六十三、第六十四、第六十五军，配属炮兵一个团，在扫清临津江以西之敌后，在德岘里至无等里的三十一公里的正面突破临津江，首先歼灭英军第二十九旅，而后向东豆川、抱川方向实施突击，协同会歼美第二十四、第二十五师。第六十四军渡江后，迅速向议政府方向实施战役迂回，切断敌人退路，阻敌增援。得手后向汉城发展，相机占领汉城。

左翼突击集团的第九兵团指挥第二十、第二十六、第二十七、第三十九、第四十军，配属炮兵六个营和反坦克炮兵一个团，以第二十、第二十六、第二十七三个军在古南山至伏主山二十七公里的正面实施突破，首先歼灭美第二十四师、南朝鲜第六师一部，而后协同第九兵团、第十九兵团歼灭美第二十四、第二十五师。第四十军在上实乃里至下万山洞一线六公里的正面实施突破，向加平方向突击，切断春川至加平的公路，割裂东西线美军的联系，并以一部前出至华川、春川间，断敌退路，配合第三十九军歼敌。第三十九军以一部兵力于华川以北钳制敌人，主力向原川里、章本里方向实施突击，钳制美陆战一师、骑兵第一师，使之不得西援，保证战役主要突击方向的左翼安全。

从第五次战役的计划上看，其投入兵力之多，攻击正面之宽，预定突击距离之远，设想歼敌规模之大，都是中国军队参加朝鲜战争以来之最。这是一次空前规模的战役，决心坚定而远大，预想接近完美，歼敌目标是联合国军的五个整师！

第五次战役最后的结局最终使毛泽东和彭德怀认识到，在朝鲜的战争与国内战争因其对手不同而根本不同。在朝鲜战场上，在敌人海、陆、空现代化装备的立体作战的优势面前，中国军队过分乐观地估计了自己地面兵力的优势和敌人缺乏近战夜战的能力，致使战争在开始之时便不具备完成预想目标的条件。客观地说，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军队还不具备对美军实施大规模（五个整师）歼灭战的实力。尤其是美军已经掌握了中国军队由于种种限制而出现的某种暂时无法克服的弱点。于是，中国军队宏伟的作战计划就不仅是想象错误的事了，它还致使中国军队在战场上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可惜的是，认识到这个错误，是在付出了血的代价之后而不是之前。

四月十九日，志愿军总部向全军发出政治动员令，动员令中有这样的话语：第五战役就要开始了！大量的歼灭敌人几个师的光荣任务，已经落在同志们的肩上了！这次战役的意义十分重大，因为它是我军取得主动权与否的关键，是朝鲜战争时间缩短或拖长的关键。我们要力争战争时间缩短，因为它是符合中朝人民利益的。我们要力争这个仗打胜，因为它有胜利的条件。向敌出击了，为中朝人民立功的时机已到！我们的战斗口号是：全体动员起来，发扬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精神，争取每战必胜！保持革命光荣传统！

就在中国军队发动第五次战役的前一天，日本《朝日新闻》登出了一条醒目的大字标题：

**范弗里特将军：欢迎共军进攻!**

## 圣乔治日的祝祭

四月二十二日晚十七时。

又大又圆的月亮升起来了。

擅打夜战的中国军队，每次大规模进攻都必挑月圆之时，明月柔和的光线正好照亮中国士兵前进的道路。

在宽达两百公里的正面战线上，中国军队大规模反击作战的炮声骤然响起。

空寺洞矿洞里，彭德怀坐在巨大的地图前，他习惯在战役的整个过程中都这样坐着，看参谋在地图上插着小旗帜，那表示着各军冲击所到达的位置。

战役前的炮火准备，无论火炮的数量还是炮击的时间，都是空前的。彭德怀在那一刻也许想象到了敌人的前沿在中国军队猛烈炮火的轰击下土木横飞的景象。

冲击的时间到了。

开始！

突然，参谋报告说，有部队来电询问：他们还在向冲击起始的位置运动中，怎么就命令开始冲击了？能不能推迟冲击时间？

一个晚上能有多少时间？炮兵炮火准备后，步兵不立即冲击，那么炮火准备不就没有实际作用了？等他们到达冲击位置，下半夜了！天亮前完不成突破，大白天的还指望什么？这些部队是怎么回事？

彭德怀脸色铁青。

冲！不顾一切，直接冲击！

尽管出了一点问题，但包括彭德怀在内的所有的中国官兵都对这次大规模的战役胸有成竹：一下子投入这么多部队，打美国鬼子还能有什么问题？

军号齐鸣！

近二十万志愿军官兵在整个战线开始了排山倒海的冲击！

左翼第九兵团迅速突破敌人的防御前沿，主力向纵深发展，先后歼灭美第二十四师和南朝鲜第六师各一部，到二十三日已挺进敌纵深三十公里。

中央集团第三兵团尽管从国内到达攻击阵地才十天，但也突入了敌人纵深，分割了东西敌人的联系。

右翼第十九兵团歼灭临津江西岸之敌后，于二十三日强渡临津江，向当面敌人发起了持续攻击。

在中国军队突然发起的反击面前，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的第一个反应是：组织部队撤退。但例外的是，他从一开始就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不放弃汉城。范弗里特认为，汉城的丢失不仅是一座城市的丢失，而是关系到整个战争态势的关键。

谁说这个“旧式军人”不懂政治?

范弗里特下令将空降一八七团紧急调往永登浦待命，将预备队骑兵第一师五团配给第九军加强汉城正面的防御，同时命令美军全线向“堪萨斯线”撤退。

由于南朝鲜第六师迅速溃败，致使美第九军侧翼暴露，第九军边打边撤，各部队几乎处于失控状态。美第二十五师受到的冲击更为剧烈，中国军队的冲击部队不但炮火猛烈，而且还有坦克参加。午夜时分，二十七团顶不住了，开始向芝浦里一线撤退，二十四团也撤退到汉滩川南岸组织防御阵地。中国军队利用二十四团撤退的间隙，将土耳其旅包围，该旅进行了殊死的抵抗，炮兵一夜之间打光了所有的炮

弹，并以一个营为先头杀开一条血路，引导全旅向南逃跑，而且一夜之间便撤出去十五公里。

掩护汉城方向联合国军撤退的部队是英军第二十九旅。

范弗里特的命令是：“坚守阵地。”

在中国军队发动反击作战的时候，只有英军第二十九旅没有受到冲击。他们看着映红半边天的炮火以及从东西两边阵地上传来的剧烈枪声，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这里没有动静。

这个旅已经做好了祝祭的一切准备。因为第二天是英国人的一个重要的日子：圣乔治日。这是个宗教纪念日，英国人一般称为“守护神日”。

但是，守护神日来临的时候，降临在英国人头上的不是守护，而是中国军队的猛烈打击。

等英军第二十九旅突然觉得自己的阵地周围开始有动静的时候，中国军队已经将他们三面包围。位于最前边的比利时营最先受到打击。这个营的位置在临津江北岸，当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冲击波开始时，这个营立即陷入混乱。与旅的通讯联络中断，背后是黑暗中的大江，前面是中国士兵的一片杀声，于是全营在绝望中呼天喊地。第二十九旅派出一个营企图渡过江去解救，但是很快这个营就自顾不暇了。比利时营被洪水般冲过来的中国士兵吞没，惊慌四散的比利时人纷纷跳入临津江逃命，其幸存者在坦克的掩护下上岸，一窝蜂地消失在向南奔逃的茫茫夜色中。

最危急的是第二十九旅的左翼格罗斯特营。午夜，渡过临津江的中国第六十三军的士兵在第一次冲击后就把这个营最前边的A连包围了。连部首先被袭击，连长安格少校被乱枪打死。天亮时分，在全连

大部伤亡的情况下，中国军队占领了这个营两侧的高地，切断了英军的后路。第二十九旅投入一个营的炮兵支援，每门炮都发射了上千发炮弹，炮管都打红了，但是依旧没有令格罗斯特营的情况好转。美军的飞机开始向阵地空投大量的补给，但是敌我混战中投下的物资基本上让中国士兵利用了。格罗斯特营弹尽粮绝，四面悲歌。他们接到旅指挥部的最新命令仍是：就地坚守。

格罗斯特营是英军中唯一缀有两颗帽徽的部队，这是这支部队在一百五十年前远征埃及被包围时转败为胜所获得的殊荣。

黎明前，天下起蒙蒙小雨。中国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和他的指挥部涉水渡过临津江。迎面走来的是中国士兵押着的俘虏。江岸上遍地是尸体和零乱的物资。一队英制坦克正往北开，是从英军第二十九旅手中缴获来的，中国士兵不会开，就押着英军俘虏开。太阳升起来了，第十九兵团的将领们手拿树枝举在头顶上赶路，为的是防空。

运送第十九兵团的火车刚一进入朝鲜，因为白天不能行驶，火车就躲在山洞里。结果火车的制动闸失灵，在没有车头的情况下顺着陡坡自行滑动，越滑越快，十分钟后就风驰电掣般地冲入一个车站，眼看就要与停在车站里的车厢撞上，幸亏一个朝鲜小男孩机敏地扳开道岔，令火车滑到了安全的轨道上。车厢里包括杨得志在内的第十九兵团的全部高级指挥员，一想到一个跟枪差不多高的朝鲜男孩救了整整一个兵团，不免有些后怕。另外，在战役开始前，第六十三军军长傅崇碧带着几个参谋去找北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谁知路遇一群敌人的坦克。他们这才知道人民军第一军团已经撤退，美军现在正在反击。傅崇碧军长只能隐蔽到山上，其结果是第六十三军没能到达预定的防御地点就开始阻击敌人了。

第六十三军的阻击正打得激烈的时候，担负穿插议政府任务的第六十四军进展缓慢。议政府从正面威胁着汉城的攻守，彭德怀对此特

别重视。第六十四军渡江之后，在美军坦克和飞机的阻击下，始终无法向前推进。为此，杨得志接到彭德怀电报：“你们必须继续努力，组织火力与运动相结合作战，勇猛地向议政府及其南北线挺进。否则，正面之敌将节节抗击，退至汉江南岸，增加渡江开展战局的困难。望深体此意，坚决执行之。”

于是，杨得志给第六十四军连发两次电报，催促其迅速突破敌人的阻击防线，电报的措辞十分严厉：

（一）江南之敌为英二十九旅、伪一师全部仅两万余人，虽有工事，火力强，飞机疯狂轰炸，但散布于四五十里宽的正面。

（二）我军主力已停于江南狭小背水地区，如不坚决攻击等于死亡，势必遭到不必要的损失，会造成更大的困难。

（三）各军师本日（二十四）晚应按原定任务不顾一切牺牲，组织火力密切协同主动配合坚决攻歼该敌。六十四军各师如不猛插进到目的地完成战役任务时，会要遭到革命纪律的制裁。

由于第六十四军的受阻，第十九兵团被迫派出第二梯队第六十五军前去增援，杨得志直接与第六十四军军长曾思玉通话，命令他迅速突破，穿插纵深，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但是，激战过后，第六十四军只有一个侦察队和一个营得以突破，虽然后来的插进纵深达一百二十公里，占领了通往汉城的交通要地道峰山，给美军造成极大的威胁，但由于兵力太少而无法有效地坚持。第六十四军主力在反复的攻击中依旧不能前进，奉命增援的第二梯队第六十五军上来了，顶在前进不了的第六十四军的后面，结果，中国军队五个师共六万多人全部挤在了临津江南岸的狭窄的江边。前进冲不过去，撤退没有命令，美军飞机对没有防空能力的中国士兵群进行了猛烈的轰炸和扫射，中国士兵密集的尸体血肉模糊地倒在临津江南岸。

在中国军队冲击战线的左翼，是宋时轮指挥的第九兵团，辖第二十、第二十六、第二十七、第四十军。第九兵团在第二次战役中损失

巨大，士兵中冻伤的人数比战斗伤亡的还要多，他们在东线整整休整了五个月之久，在补充了新兵和装备之后，重新投入了第五次战役的战斗。

在第九兵团的正面，最前面的是南朝鲜第六师。

就在中国军队发动反击战役的前一天，南朝鲜第六师还在按照计划北进。黄昏十七时左右，他们在北进的途中突然遭到中国军队的大规模攻击。仅象征性地抵抗了一下之后，师长张都映便命令部队撤退到“A”线。所谓“A”线，是向后几公里处的一条预定的防御线。但是，兵败如山倒，其二团的阵地被中国军队从两侧包抄，团指挥所遭到炮轰后，全团立即向后撤退。十九团看见二团的遭遇不敢贸然前进，观望了一会儿之后，发现自己的侧后也出现了中国士兵，这才知道大事不好，十九团也开始撤退了。在撤退的时候，十九团被中国军队的冲击打乱，团长林益淳无法有效地组织部队阻击，于是形成全线溃败。作为预备队的七团本来在“A”线上做了阻击准备，任务是掩护主力撤退，但是他们很快就明白，作为师预备队的自己顷刻间便会成为前沿，前沿的命运不堪面对，因此七团还没有作战便开始了狂逃。

在这个方向上，中国第四十军的任务是打穿插。

一二〇师向南朝鲜第六师发起全面攻击之后，师属三个团并肩穿插，穷追猛打。三六〇团在攻击中发现山下的公路上足有两里地长的敌人机械化队伍正在向南撤退。团长徐锐看见了“肥肉”，不容考虑，立即命令部队攻击。原来这是南朝鲜第六师炮兵营在南撤的公路上与美军第二十四师向北增援的自行火炮营迎面顶在了一起。公路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大河，美军命令南朝鲜士兵回到前沿去战斗，而南朝鲜士兵让美军把路让开。正吵成一团的时候，中国军队来了。中国士兵把公路的两端封死，然后手持轻武器向这支钢铁的队伍冲上去。美军士兵和南朝鲜士兵在坦克的掩护下夺路而逃，但中国士兵猛烈的追击

炮弹和枪弹把这一段公路打成了一片火海。中国士兵在火焰中追逐着四处奔逃的美国兵和南朝鲜兵，在汽车下、坦克里将他们杀死或者俘虏。天亮的时候，徐锐团长上了公路，他看见了一幕令他这个老兵都心惊的景象：无数坦克、汽车和自行火炮拥挤在一起燃烧，不少汽车已经被坦克撞得四轮朝天；一门自行火炮压在一辆吉普车上，吉普车里的美军军官已被压扁；到处是南朝鲜士兵和美军士兵的尸体，尸体都已经被烧焦，在整条公路上，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气味……

一二〇师三五八团在穿插中与美军陆战一师的部队相遇了。先是一连七班的韩勤忠发现山坡下有一架直升机，几名美军军官正从机舱中出来。韩勤忠立即带领七班士兵扑了上去，直升机在手榴弹的爆炸和机枪的扫射中坏了。美军往山上跑，七班就追，谁知道追到了美军陆战一师所属部队的一个阵地面前。韩勤忠和他的士兵管不了那么多了，坚决勇猛地往山上冲击。美军步兵被这么不怕死的冲击吓蒙了，丢下阵地转身就跑。一辆坦克向中国士兵开了炮，韩勤忠负伤了。愤怒的他爬起来向坦克冲去，把一个燃烧瓶扔在坦克上。中国士兵一直把美军追进一个山洞里，大约一个排的美军这才发现打他们的只不过是区区几个中国士兵，于是开始反击。韩勤忠再次负伤，这回是胸部，鲜血涌出。这时，他听见了军号的声音，回头看，是主力部队到了，他因流血过多而一头栽在地上。

韩勤忠作战勇敢，是志愿军中第一个步兵击毁美军直升机的士兵，因此被记一等功，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战士荣誉勋章”。

三五八团在三五九团二营的配合下，围住了被压缩在板尾洞的美军。天已经亮了，在几十架飞机的掩护下，美军开始突围。中国军队不顾飞机的轰炸和炮火的阻拦，坚决冲击，但是由于缺少反坦克武器，没能封堵住美军，眼看着美军跑了。

面对美军强大的火力，中国军队即使围住了美军，甚至是以几倍于敌的兵力围住的，最终却不能将敌全部吃掉，这是朝鲜战争中前几次战役就已暴露出来的问题，在这次战役中还在重演。

一二〇师三五九团的二营，在追击中包围了美军的一个炮兵营。这是美第九十二装甲野战炮兵营，装备的全是大口径火炮，有一五五毫米的装甲自行火炮两个连和二〇〇毫米牵引式榴弹炮一个连，野战炮营的任务是对其集团军各个方向进行火力支援。炮兵们已经修筑好环形工事，又配备有坦克群和高射机枪所织成的火力网，因此不把中国军队的攻击当回事，还在公路上拦截溃逃下来的南朝鲜士兵，骂他们统统是混蛋。三五九团二营为把这个给中国军队的攻击造成巨大伤亡的炮兵阵地拿掉，两个连不顾一切地轮番攻击，整整打了三天三夜，最后两个连只剩下不足百人，但是仍没能把这个美军的炮兵阵地打下来。而美军的野战炮兵营一边阻击中国军队的攻击，一边完成集团军不断赋予他们向各个方向开炮的支援任务，他们坚持了三天三夜才撤退，全营仅伤亡十五人。

一一八师迅速突破南朝鲜第六师没有力量的抵抗，向纵深发展。那个打响入朝参战第一枪的三五四团担任着师左翼的突击任务。三五四团穿插之猛、动作之快连师指挥部都感到意外。其三营由于穿插得太猛，在打垮敌人的多次拦截之后，深入到敌后一百二十公里处。天亮时，他们到达一个叫沐洞里的地方，三营这才发现，当面的南朝鲜军队早就没影了，与他们对峙的敌人是白皮肤蓝眼睛的士兵，用的是英制“百人队长”式坦克，冲锋枪也是英制的。抓来个俘虏一问，原来是加拿大人。与后续部队脱离过远的三营很快就被加拿大第二十五旅包围了。兵力悬殊，粮弹将尽，带队的团参谋长刘玉珠和三营营长李德章紧张起来。刘玉珠认为，部队穿插的任务就是割断敌人的横向增援，既然打到这里，就要血战到底，在敌后搅他个天翻地覆，尽最大

努力打乱敌人的预定部署。决心下定，所有的干部把身上的文件和笔记本烧毁，以决死的状态投入了战斗。

加拿大旅在飞机和坦克的支援下，向这支孤军深入的中国部队展开了疯狂的攻击。钢铁的坦克冲开中国士兵的阻击阵形，把分散抵抗的中国士兵围困在公路边的数个小山包上。一些中国士兵开始与加拿大士兵肉搏，机炮连的火箭筒在击毁敌人的几辆坦克之后没有弹药了，中国士兵们便朝敌人冲上去夺枪。卫生员郁长安手中拿着仅仅是准备给伤员固定断骨的木夹板，加拿大士兵不知道这是什么武器，扔下枪就跑。文书姜臣与高大的加拿大兵扭在一起时感到自己体力不支了，便伸手去摸加拿大兵的脸，一使劲，把对手的眼球抠了出来。最后的时刻，营长李德章和团参谋长刘玉珠商量，各带一支队伍分别从东西两个方向突围。李德章先突围，吸引敌人火力，这支队伍没有越过公路就全部伤亡，李德章也中弹倒下。刘玉珠在猛烈的机枪扫射中阵亡，他带的部队也被打散。

刘玉珠，一九四〇年入伍，作战勇敢，爱护士兵，是一个受到全团官兵喜爱的军事指挥员。入朝作战以来，历经数次残酷的战斗，他一直与士兵冲杀在最前沿。

三营余下的士兵在突围中顽强抵抗，一直坚持到天黑加拿大旅撤走。

李德章苏醒之后，带领所有负了伤的士兵转战敌后，四天之后归队。

三五四团三营的官兵在战场纵深牵制了敌人的增援部队，为正面部队的攻击创造了有利条件。

李德章营长好人长命，一九九四年离世。他的老战友在送给他的挽联上写道：难得志宏胆大，身先士卒，万事蹈火不避；向来心直口快，坚守信义，一生肝胆照人。

左翼第九兵团各军于二十三日已经挺进敌纵深十五至二十公里。

第三十九军的任务特别。该军要用一部分兵力把美军陆战一师牵制在华川，使其不得西援。跟随美军陆战一师一起作战的，还有一支南朝鲜的海军陆战团。就在中国军队开始进攻的那天，这支南朝鲜军陆战团还在北进，他们利用浮桥和水陆两用车渡过北汉江，接近中午的时候占领了华川地区的一个高地。南朝鲜军战史对此写道："经过激烈战斗，中共军狼狈溃逃。并且与美陆战五团会合共享胜利喜悦。"为此，美军陆战一师师长史密斯给南朝鲜陆战团团长打来"贺电"："贵官和贵官属下官兵们对敌军强大进攻，坚决抗击，固守阵地，对这种勇敢战斗的精神我深表谢意。我们为能够同如此强大的韩国海军陆战团共同战斗感到无比骄傲。"

然而，几个小时后，"如此强大的韩国海军陆战团"就在中国第三十九军的强大压力下闻风而退了。先是美军陆战一师与南朝鲜第六师的接合部被中国第三十九军突破，南朝鲜海军陆战团立即后退，还没在新的防御阵地上站稳，其十连阵地就告危急：连长负重伤，士兵们抬着连长往后跑。紧接着就是十一连阵地的危急：十一连的连长也负伤被抬下了阵地。南朝鲜海军陆战团与美军陆战一师一起撤退时，天上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支援飞机居然把炸弹投到了南朝鲜海军陆战团一营的指挥所头上，凝固汽油弹的大火烧着了自己人。

在中国军队左右两翼突击的同时，中央突击集团的第三兵团也在华川方向突击而入。突破后，第三兵团各部队在涟川以北受到美军第三师、土耳其旅的顽强抵抗，进展不快，二十三日才到达涟川地区，继而向永平、哨城里方向攻击前进。

在汉城方向，英军第二十九旅的格罗斯特营依旧孤立地坚持着。为了解救这个营，第二十九旅命令菲律宾营在一个坦克连的掩护下前去增援。在接近格罗斯特营的时候，菲律宾营遭到中国军队的阻击而不能前进，坦克连也遭到袭击，最前面的坦克被中国士兵击毁而堵塞了公路。增援失败后，第二十九旅把比利时营和六十五团的波多黎各人的部队加入进增援的行列，结果在距离格罗斯特营仅仅两公里的地方还是打不动了。不久，英军第二十九旅被迫撤退，陷入重围的格罗斯特营终于接到了突围的命令，但是，已经没有突围出去的希望了。全营一半人阵亡，连伤员在内，活着的不足三百人。营长卡恩中校请求炮兵支援后再突围，但由于第二十九旅已经跑得太远了，所以得到的回答是“无法支援”。卡恩中校被迫下达了“分散突围”的命令。伤员集合在阵地上，与伤员在一起的是营长卡恩中校、军医希基上尉、三名卫生兵，还有随军牧师戴维斯。

突围的英军士兵立即陷入中国军队的天罗地网之中。

刘光子，中国第六十三军一八七师五六一团一营二连的战士，内蒙古杭锦后旗尖子地乡六小村人，时年三十岁。他出生于贫苦的逃荒农民家庭，为了还所欠的粮租，他入国民党军队当兵十年。一九四八年他被解放军“解放”，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他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从入朝作战的时候起，他就有立战功的想法。部队向北追击的时候，他发现了几个逃跑的英军士兵。他决心抓活的。在接近英军士兵之后，他突然端着枪站起来，呐喊了一声，结果把他吓了一跳，石头后面一下子站起来一大群英军士兵！

几十张凶狠的面孔和几十个黑洞洞的枪口向他逼过来。

刘光子鼓励自己：沉住气！沉住气！

英军士兵的枪口对准了刘光子的胸膛。

一个军官的手枪对准了他的额头。

刘光子不动声色地拉开了手雷的保险。

就在手雷即将炸响的一瞬间，刘光子往后一缩，把手雷一扔，然后滚下山坡。

手雷爆炸的声音引来了部队，中国士兵开始对英军进行围剿。苏醒过来的刘光子在黑暗的夜色中向四处逃跑的英军士兵狂追。他身上的棉衣早已被汗水湿透，气喘得如同拉风箱一样，他一心要追上去，抓几个活的立大功！

刘光子再次截住了一大群英军士兵。他站在英国人面前大喊：“谁再跑就打死谁！”

为首的一个个子很高、手提机枪的英军士兵首先放下了枪，举起了手。其他的英军士兵也把枪扔在了地上。

不远的地方还有一群英军士兵在跑，刘光子端着机枪扫了一梭子，又喊，那群英军士兵也不再跑了。

刘光子把一大群英军士兵集中在一起，掏出怀里的英文传单让他们看，俘虏们安静下来。

连里长时间不见刘光子的影子有点紧张，以为他负伤了或者牺牲了。正焦急，突然看见远处来了一队英军士兵，刚要射击的时候，才见这些英国人是举着手来的，浑身是血的刘光子端着一挺机枪跟在后面。

中国士兵们立即为刘光子抓到的俘虏点数，点了两遍才点清楚：六十三个。

这是朝鲜战争中一名中国士兵一次俘虏敌军士兵的最高纪录。

刘光子被记一等功。

刘光子抓获的英军士兵是格罗斯特营的，因为他们的帽子上都缀有两颗帽徽。

英军第二十九旅除人员损失大部外，装备也大部分丢失。

但是，从战场全局上看，也许正是由于英军第二十九旅的格罗斯特营在前沿阵地坚持了三天，在某种程度上牵制了当面中国军队的发展，这才使得汉城方向的联合国军能够较为完整地撤退了。

至二十五日，第五次战役发起的第四天，中国军队连续作战三昼夜，虽然在加平方向打开了战役缺口，对美军侧翼造成严重威胁，但战役发展基本上呈平推态势，歼敌不多。联合国军逐步撤退至锦屏山、竹叶山、县里、加平、春川的二线阵地继续阻击。

范弗里特坚决执行了李奇微的战术，以每晚撤退三十公里为最大限度，因为三十公里也是中国军队一夜进攻的最大限度。撤退三十公里之后停住，然后立即利用白天转入防御，发挥其强大的火力优势给中国军队造成尽可能多的杀伤。天黑下来的时候，视情况再一次后退，等待白天再一次攻击。此时范弗里特也知道了，中国军队攻击作战的持续时间是有限的。

二十六日，彭德怀就第五次战役的发展和下一步的打算，向毛泽东报告如下：

（一）……

（二）此役原拟于五月上旬开始，但为了推迟敌之登陆，避免同时两面作战，因此提前于四月二十二日开始，敌我准备均不充分，特别是弹药准备不足，运输条件没有改善。我十九兵团大批新兵尚未加必要训练，三兵团到达后七天即参加作战，时间仓促。三十九、四十

两军连战数月没有休息。炮兵、坦克不能及时参战，空军参战时间更远。敌军兵力齐头靠紧，没有间隙，技术条件绝优于我，战术上前进时步步为营，后退时节节抗击。我插入敌纵深必须经严重战斗，才能打开缺口，故作战三昼夜，没有达成迂回议政府，截断敌归路，估计战果是有限的，不足以打破敌之登陆企图。

（三）朝鲜地势狭窄，海岸线长，港口多，且敌有强大海、空军，这些是其登陆便利条件。大量援兵到日本，在我后方登陆将更加明显。志愿军党委常委多次考虑，下一战役须准备打敌登陆部队。因此，我主力目前不宜南进过远。我军在朝作战，如不能大量歼灭敌之登陆部队，则其登陆野心始终不会放弃。只要一意登陆，我之咽喉即被扼住。我正面即打到釜山，亦终不能不被迫撤退。只有利用敌登陆企图，待其登陆后，诱其深入，消灭其登陆部队，粉碎其登陆阴谋后，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同时，朝鲜地势狭窄，如敌不登陆，敌之兵力集中，不易分割，不如利用敌之登陆，隔离其联系，反而于各个击破有利。

（四）如敌登陆很快，我军虽有准备，但实际力量尚难应付两面作战……如能将敌登陆推迟一个月至一个半月，我即能同时应付两面作战。

（五）根据以上所述，此次我军拟在打破敌之抵抗后，即以一个兵团及人民军第一、第五军团继续相机追击至三十七度线为止。如敌扼守汉江及汉城桥头阵地，我以小部队监视之、袭击之，使敌预备兵团部分增援正面，推迟其登陆时间，减弱其登陆力量，以便歼灭之……我主力置于三八线及其以北机动地区，准备歼灭登陆部队，或各个打击正面反攻之敌，视情况而定。

彭德怀非常确定地认为美军肯定要实施登陆作战。而从战后交战各方的大量史料上看，虽然麦克阿瑟和李奇微始终存有在中国军队侧后登陆的念头，但是美军从未真正为此准备过。原因很简单，在朝鲜战争中，美军的军事行动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而从杜鲁门政府的角度上看，美国政府没有进一步扩大战争的打算，如果美国政府真的要动用一切手段与中国军队较量，那么至少麦克阿瑟不会过早地被解除职务。

毛泽东同意彭德怀的分析，并再次强调“目前应以敌人会很快登陆做准备，免陷被动”。

于是，二十六日，中国军队继续向联合国军的纵深发展，并于当日占领了联合国军的二线阵地。

至二十八日，中国右翼第十九兵团占领了国祀峰、梧琴里、白云台地区；中路的第三兵团进至自逸里、富坪里地区；左翼第九兵团进至榛伐里、祝灵山、清平里、加平、春川地区。

美军主力撤至汉城及北汉江、昭阳江以南组织防御。

汉城城内再次一片惊慌，无论李奇微甚至李承晚如何表示决不放弃汉城，汉城还是出现了朝鲜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三次难民逃离潮。

是日，美骑兵第一师奉命调至汉城，在汉城周围组织起密集的火力网。火力网由大炮和飞机所组成，炮兵每个连平均发射炮弹三千多发，而美军空军仅二十八日一天就对汉城前沿进行了三十九次猛烈轰炸。至此，美军认为，能够突破这个火力屏障的，太平洋战史上还没有先例。

中国军队没有占领汉城的打算。

中国军队位于前沿的所有部队都已弹尽粮绝。

二十九日，彭德怀命令中国军队全线停止攻击。

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作战从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二日始，到四月二十九日止，历时整整七天。

七天是一个星期，正是李奇微说的“礼拜攻势”。

但是，停止攻击以后，中国军队该怎么办?

## 打伪军去!

彭德怀不大喜欢看文艺演出，但是侯宝林的一段《语言的艺术》还是把他逗乐了。

志愿军指挥部作战室的洞子不大，但是这一天里面却集中了中国一些最著名的艺术家。高元钧的山东快书《十字坡》说的是几百年前中国一个落难的豪杰在流放途中遇到一位专门卖人肉包子的女侠客的故事。还有名角的京剧清唱和杂技表演。

中国国内赴朝鲜前线的慰问团一行五百七十五人，在廖承志团长的率领下，分为八个分团，携带着全国各地赠送的一千零九十三面锦旗、四百二十多亿元（旧币）慰问金和两千多箱慰问品，于四月中旬到达朝鲜前线。

四月二十一日，中国军队发动第五次战役的前一天，慰问团乘军用汽车到达平壤西部的一个小山村，首先向朝鲜人民、朝鲜劳动党和政府、人民军以及金日成表示慰问。廖承志代表中国人民向金日成主席致词："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说过，我们灿烂的红色国旗，是染有朝鲜革命烈士的鲜血在上面的。今天我们献给您一面鲜艳的锦旗，是表示中国人民以自己的鲜血洒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为光荣，并准备以最大的决心，实现抗美援朝战争的完全胜利。"接着，金日成在欢迎宴会上致词："当我们朝鲜人民处在祖国解放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中国人民派遣了自己的优秀儿女——中国人民志愿军来帮助我们，现在又派遣了慰问团来慰问我们。朝鲜人民永远不能忘记中国人民对我们的这种国际友谊。朝鲜人民坚信我们能够获得胜利，因为在我们背后有着四万万七千万中国人民做我们的后盾。自从中国人民志愿军来到朝鲜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以来，已取得四次战役的胜利，给予美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从而奠定了最后胜利的基础。"

在朝鲜战争进入到最艰苦的时期，虽然在战争的具体目标上中朝不见得完全一致，但双方期待战争所产生的意义是一致的，那就是：决不向联合国的势力低下头颅，用事实向全世界显示东方这两个国家

的存在——因为无论是中国还是北朝鲜，当时都是被联合国拒之门外的“非法存在”的国家。

这一最重要的一致使得中朝人民拥有了共同战斗的基础。

当时，“中朝人民的友谊”被不计其数地描绘在中朝的报纸上。

安玉姬是平壤人，丈夫参加了人民军。在联合国军占领平壤的时候，怀孕的她带着七岁的儿子金永洙向北逃亡，就在母子饥寒交迫的时候，中国士兵在路边发现了他们，并把怀孕的安玉姬抬到驻地，安置在一个隐蔽的房子里。第二天，她流产了。中国士兵们轮流去照顾她，送粮送衣，烧水做饭，使她终于活了下来。就在安玉姬刚刚康复能够下地的时候，她得知经常来照顾她的一个叫李治黄的中国士兵在执行侦察任务时没有回来。她惦念这位中国士兵，怀里揣着一枚手榴弹，带着儿子金永洙向敌占区走去。安玉姬终于打听到李治黄没有死，而是被俘了，被关押在一个村子里。黄昏的时候，她来到这个村子，她给了儿子一把镰刀，对儿子说：“到了叔叔那里，你就把镰刀从门缝中递给叔叔，然后和叔叔一起上山。你们不要等我，就向我扔一块石头让我知道就行了。”

儿子问：“我们走了，你怎么办？”

安玉姬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不要等妈妈，妈妈也许回不来了！”

在李治黄被关押的地方，七岁的金永洙躲过哨兵的监视，从门缝用镰刀把捆绑着李治黄的绳子割断，李治黄又用镰刀撬开房子的后门，与金永洙逃上山。金永洙记住了妈妈的话，临走的时候向母亲所在的方向扔了块石头。就在石头落地的时候，他们听见了一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安玉姬与和她纠缠在一起的五个敌人同归于尽了。

四月三十日，祖国慰问团在志愿军总部举行慰问大会，他们向志愿军领导机关敬献的锦旗上写着：“你们是中国人民的代表，是朝鲜人民的忠诚朋友，也是世界和平的英勇前卫。”廖承志团长在志愿军总部的致词是：“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起英勇作战，粉碎敌人的侵略阴谋，保卫了国家的安全。志愿军在抗美前线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更加提高了祖国的地位。国内的抗美援朝运动也加强了全国人民的团结。慰问团这次带来的礼物和慰问金虽然很少，但从这里也可看出祖国人民对志愿军的感谢和关心，祖国人民今后一定会源源不断地支援抗美援朝前线。”

彭德怀是这样对慰问团的代表们介绍朝鲜战争的：“敌人想诱我们前去洛东江，实现所谓的沃克计划。我们不上他的当，使之落了空。第四次战役敌人的损失和消耗更大。长此下去，敌人就受不了。美帝国主义的装备是现代化的，眼睛长在后脑勺上，只会向后看，前途是一片黑暗。”

慰问团分成若干分团，深入到前沿阵地。祖国来的人让志愿军官兵倍感亲切，他们把自己用弹壳制作的纪念品送给慰问团的代表们。当时，前线传唱着这样一首歌：

春风吹过鸭绿江，

祖国亲人来前方。

带着嘱托和希望，

来和子弟叙短长。

今天见了亲人面，

我们心里暖洋洋。

好像见了毛主席，

好像见了亲爹娘！

但是，彭德怀的心头仍有卸不去的沉重。

第六十四军党委写来的检讨报告就在他的手上。

中国军队发动的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的战斗，历时七天，联合国军方面将其称为“中国军队的第一次春季攻势”。中国军队把战线向南推进了五十至八十公里，遏制了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步步向北的进攻势头。无论各部队报来的战果统计上写着消灭了多少敌人，彭德怀知道这只是个大概的数字，决不能以这些数字作为胜利的标准。他坚定地认为：“只有成建制地消灭美军和南朝鲜军队的几个师，才能彻底扭转被动的局面。”但是，从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的战场结果上看，这个战役目标没有实现。应该说，战役的计划是周密的，中间突破、两翼迂回的战法也是对的。可打起来的情况却是：突破艰难，迂回受阻。美军节节抵抗，有秩序地后退，使得整个战线平行地往南推，而在战线的任何一个局部都很难打进去。当然，这与战役准备时间的仓促有关。特别是第三兵团，昼夜兼程地开赴前线，到达前线立即投入战斗，没有任何战前准备。在战役的进程中，中国军队确实多次把美军成建制地包围，有时包围住的甚至是一个整师，但是，美军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整团整师还是跑了。那么，中国军队的进攻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美军两栖登陆作战的企图，但是两栖登陆作战仅仅是一种猜测。不消灭敌人大量的有生力量，无论在何种战场态势下都不能算是胜利……

就在慰问团的演出刚刚结束的时候，参谋人员送来一份敌情通报：美军在中国军队刚刚停止攻击的时候，已经于全线有了反击的迹象。

要迅速进入下一步作战！决不能让李奇微从容地反击！

彭德怀知道，如果再出现第四次战役后期美军大规模反击的情况，中国军队的被动局面就可能重演。

还在中国军队开始进攻的时候，李奇微和范弗里特两个人的观点极其相似：以紧密整齐的防御线秩序撤退，躲开中国军队攻击的锋芒，待“礼拜攻势”一完，立即进入反击，在反击中大量杀伤对方。所以，每当黄昏中国军队开始攻击，美军就利用飞机和炮火的掩护，实施机械化的撤退，其速度以中国士兵的急促步行追不上为限度，要点是撤退中严密阻止中国军队的穿插，确保整个防线的不被割裂。中国军队一个晚上的攻击距离大约是三十公里，美军的撤退就到这个距离为止，然后用坦克围成坚固的防御阵地。如果中国军队白天依旧攻击，那么就在空军的配合下发挥火力强大的优势坚决阻击，严重消耗中国军队的攻击力量和作战物资。等到下一个黄昏来临，再重复以上的动作。

范弗里特在中国军队的攻击终于停下来的时候，立即对记者宣布：这是中国军队的一次失败的进攻。

彭德怀虽不承认是“失败的进攻”，但他不允许自己的记者大肆渲染“胜利”。记者们在第三次战役中国军队进入汉城后的渲染，已经让他感到过如鲠在喉。

“五一”劳动节，中国北京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游行。对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取得的胜利战果的宣扬和对“美帝国主义是只纸老虎”的论断的信奉在游行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参观了北京“五一”大游行的西方记者纷纷对中国人的激昂表示出极大的惊讶。而在朝鲜前线的山洞里，彭德怀专门召集国内的记者们谈了一次话，要求他们本着对党和人民负责的精神，对战场局势的报道，特别是对战役成果的报道，

一定要实事求是。彭德怀说：任何的夸大和不真实最终会损害党和国家的利益。

面对联合国军随时可能发动的反击，彭德怀终于发现了可以利用的战机。

由于在战役的第一阶段，中国军队南进的突击方向是以西线为主，因此，目前战线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由西南向东北倾斜的状态，造成了防御东线的南朝鲜第三、第五、第九师三个师侧翼的暴露。李奇微“决不放弃汉城”的命令使美军的主力集中于汉城周围，摆出的是死守汉城的态势，而中国军队当面的第十九兵团在停止攻击之后，并没有后退，依旧压在汉城战线的前沿，给美军造成了极大的压力。此时，如果立即移动主力向东，趁南朝鲜军侧翼暴露和美军不敢迅速从汉城当面调动兵力增援的机会，打击战斗力较弱的南朝鲜军的几个师，应该说还是有一定把握的。于是，在第一阶段的战役还没有完全停止的时候，彭德怀已急电第三兵团和第九兵团，提出自己的战役设想：

> 我下一战役拟以宋、陶（九兵团）和陈、王（三兵团）两兵团隐蔽东移，从杨口、自隐里之线向东南突击，求得消灭伪军两三个师及美七师一部。这一行动必须十分隐蔽，只有三十九军切实掩护该两兵团运动，才有可能取得，请你们详细研究部署之。

这个战役的设想基本与第四次战役后期的设想一样。

第四次战役后期，中国军队主力东移打南朝鲜军队，招致了美军的迅速增援，美军利用中国军队没有持续作战能力的弱点，进行了猛烈反击，其教训深刻。

但无论怎么说，战线呈现出的形状和战机，彭德怀是认定了的，而且他认定得早，部署得早，决心坚定。

为了不暴露中国军队主力东移的企图，如同在第四次战役中命令第三十八、第五十军坚决阻击美军一样，彭德怀致电中国第十九兵团和人民军第一军团：西线敌人美、英、土、南朝鲜军共八个师“集结于汉城周围及南岸，诱我攻坚给我杀伤”。为迷惑敌人，请人民军一军团“在汉城下游江北岸做渡江佯动，并以小部队向当面敌袭扰，抑留敌于汉城周围，（十九兵团在汉城上游亦做同样动作），以利我主力下月初旬从东线出击，消灭伪军两三个师及美七师一部。此电望严守秘密，切不要下达，并阅后焚烧”。

此时，李奇微得到情报：中国军队的主力在重新集结。

在坚持“磁性战术”积极以小部队进行反击的同时，因李奇微判断中国军队下一步的主攻方向是中线，于是美第七师被调至楸谷里、龙头里地区，南朝鲜第二师被调至禾也山、鼎排地区，以加强美第九军的防御。这样，虽然东线南朝鲜三个师的侧后力量加强了，但是其侧翼依旧暴露着。

五月六日晚，中国军队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作战命令下达。

命令的主要内容是：以志愿军第九兵团和人民军第三、第五军团首先集中力量歼灭县里地区的南朝鲜第三、第五、第九师，而后相机歼灭南朝鲜首都师和第十一师。中路之第三兵团割裂美军与南朝鲜军的联系，阻击美军第十军东援部队；西路之第十九兵团牵制当面之敌，配合东线作战。命令要求各部于五月十日前带足粮弹，于九日或十日夜间，向攻击准备位置开进，限十四日拂晓前集结完毕。

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的攻击时间为：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五日或十六日黄昏。

战役部署下达后，彭德怀还是不放心，他连续几天寝食不安，好像预感到将有什么不祥。五月八日，他再次给各兵团各军下达命令，这一命令几乎是上一个命令的重复，只不过对战役要点强调得更加突出，显示出彭德怀内心极度的焦灼。命令要点为：

一、西路第十九兵团要积极牵制敌人，实施佯动，将美军主力吸引于西线。

二、中路第三兵团、东路第九兵团要迅速组织部队开进，切实隐蔽我军企图，严防被敌发觉我军东移。

三、能否全歼县里地区三个南朝鲜师的关键，在于各军、师是否能按时插到预定的合击位置，迅速达成两翼迂回，层层包围。为此，必须选择坚强的部队和得力的干部担任钳击先锋的任务。

四、要敢于使用主力猛插，坚决反对尖兵战术，要集中力量钳击合围。各级指挥员应靠前一至两级深入指挥，并应及时报告敌情和自己的位置。

彭德怀不安的，还有中国军队的后勤供应问题。

彭德怀专门召集了一个研究志愿军后勤机构设置问题的会议。中国军队刚入朝的时候，不过是第十三兵团六个军的兵力，现在，中国军队入朝参战的部队已经达到十六个军、七个炮兵师、四个高炮师、四个坦克团、九个工兵团、三个铁道兵师以及一些直属部队，总兵力七十多万人。在这种情况下，志愿军的后勤仅仅由东北军区后勤部来管理显然已不能胜任。为此，彭德怀派洪学智专程回北京向毛泽东和周恩来请示，要求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

在北京，洪学智对周恩来的一番话，其观点之精辟令人耳目一新：

从朝鲜战争中彭总和我们都逐渐认识到现代化战争中后勤的作用。现代战争是立体战争，在空中、地面、海上、前方、后方同时进行，或交叉进行。战场范围广，情况变化快，人力物力消耗大。现在欧美国家都实行大后勤战略，五十公里以前是前方司令部的事，五十公里以后是后方司令部的事。战争不仅在前方打，而且也在后方打。现在，美国对我后方实施全面控制轰炸，就是在我们后方打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的规模，不仅决定了我们前方进行战争的规模，而且也决定了前方战争的成败。我们只有打赢这场后方的战争，才能更好地保证我们前方战争的胜利。后勤要适应这一特点，需要军委给我们增派防空部队、通信部队、铁道部队、工兵部队等诸多兵种联合作战，而且需要成立后方战争的领率机关——后方勤务司令部，以统一指挥后方战争的诸多兵种的联合作战，在战斗中进行保障，在保障中进行战争。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刚刚从国内战争中走出来的中国军队的将领，能够如此深刻地理解现代战争的某些特点，实在是件了不起的事。

但是，在讨论谁来当这个后方勤务司令部的司令时，洪学智与彭德怀弄得很不愉快。洪学智不愿意干后勤，愿意指挥打仗。话说到急处，彭德怀大吼：“你不干？那么我干！你去指挥部队好了！”

洪学智说：“老总，这话可是将我的军的话了。”

彭德怀继续吼：“是你将我的军，还是我将你的军？”

最后，洪学智服从了党委的决定。但是提出个条件，就是朝鲜战争打完，就决不干后勤了。这个条件志愿军党委接受了。

一九五二年，彭德怀离开朝鲜战场回国任职，临走时洪学智对他重提这件事，说这是党委认定的，党委要说话算数。彭德怀说：“只要我当总参谋长，你就跑不了！”

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司令员洪学智，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

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的成立，不但使志愿军的后勤供应得以改善；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中国军队向现代战争的特有规律开始了初步的探索。

五月八日，志愿军政治部发布《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的政治工作的指示》，再次强调要“实现整师、整团地取消敌人番号的任务”，“达成大量歼灭敌人的目的”。

朝鲜半岛上的山川河流大都是南北走向。从五月九日开始，在美军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志愿军东移部队横穿高山峡谷，行进于山间的小路和灌木丛中，于十五日前到达了战役发起的位置——春川至兰田间的北汉江和昭阳江两岸地区。

为了配合主力东移，在汉城方向上的第十九兵团拉开了要强攻汉城的架势。北朝鲜人民军最大的一次佯动，派出了六千多名士兵佯渡汉江，使美军很紧张了一阵子。在前沿，中国第六十四军的小部队不断与美军发生着小型战斗。

五月五日，美第八集团军的参谋们在军用帐篷中边喝着咖啡边给汉城的防御部队下达了这样一条含糊不清、令下属们无所适从的命令：

遇到下列两种情况时可随意实施撤退：

一、敌人比预料的弱小时；

二、遇到敌人的反击而处于危险时。

敌人强，退，可以理解；但是，敌人不强，也退，其含义是不是说：只有碰上了和自己的力量差不多的敌人时才只能进攻不准撤退？

范弗里特只迷恋于李奇微积极接触、谨慎反击、步步为营的“磁性战术”，在整个四月底到五月初他确实没有发现彭德怀正在干什么。

就在中国军队积极准备发动新的攻击的时候，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经过激烈的辩论，向杜鲁门总统提出了关于结束朝鲜战争的建议："在恢复战前状态的三八线上通过谈判结束敌对行动"。

杜鲁门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我从来没有忘记，美国的主要敌人是苏联，只要这个敌人还没有卷入朝鲜战争而仅仅是幕后操纵，我们就决不能浪费自己的力量。"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六日，杜鲁门批准了这个意在结束朝鲜战争的建议。

而正是在这一天，在远东的朝鲜战场上，中国军队第五次战役的第二阶段作战——联合国军称为"第二次春季攻势"的大规模战斗开始了。

## 是谁守不住阵地?

面对中国军队发动的攻击，南朝鲜第三军团的官兵什么都想到了，包括伤亡、被俘、溃败、撤退，可就是没想到这场短短三天的战斗竟然最终导致了一个令南朝鲜军队感到耻辱的后果——美军认为如此无能的军队根本没有存在的价值，南朝鲜第三军团被解散了。

一支本土军队，在本土作战中因为一败涂地，被"协助他们作战"的外国军队勒令解散，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件世界战争史中最稀奇古怪的事。

在中国军队发动的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的战斗中，南朝鲜第三、第五、第九师的表现再一次证明彭德怀"伪军是好打的"论断是正确的。在中国军队的猛烈攻击面前，南朝鲜军兵败如山倒，各自仓皇逃命，成为一群失去控制的散兵。但是，南朝鲜第三军团被解散，引起了南朝鲜军队的极大不满，他们认为南朝鲜军队之所以失败，最主要

原因是美军的溃败造成的，要解散也得先解散美军。争论之激烈，情绪之冲动，在事情过去了十多年之后，在那次战斗中到底“是谁守不住阵地”的争论依旧在进行：十三年后的一九六四年，原南朝鲜第九师师长崔锡说：“我至今不理解根据什么地图划分了美第十军和我第三军团的分界线。让美第十军负责第三军团补给路上的上南里以南地区，这是美第八集团军方面的错误，因为不能把重要的地形地物加以分割，是战术上的起码常识。”十四年后的一九六五年，原南朝鲜第三师师长金钟五说：“美军没有听从我军团长的话，没有坚守住补给线上的阵地，是导致失败的直接原因。”二十二年后的一九七三年，原南朝鲜第三军团军团长刘载兴说：“美第十军军长的固执和指挥上的失误，带来了我们与他们都被打垮的后果。”而南朝鲜军战史说：“由于美第十军和美第八集团军采取了不当措施，使我第三军团遭受意想不到的灾难。我第九师在作战上配属美第三师，应该撤美第三师师长的职，而他们却在国军脸上抹黑，根本不考虑国军的士气，自己却泰然自若！”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六日的战斗，是从南朝鲜第七师的溃败开始的。

五月十一日，当中国第十二、第二十七军向攻击出发地昭阳江北岸秘密开进的时候，依旧向北进攻的南朝鲜第七师到达了昭阳江南岸。按计划第二天他们将开始渡江。而这时，军团的侦察报告说，在昭阳江正面的麟蹄、杨口，发现“至少有十五个中国师在集结”。因此，第七师立即下令“停止前进，转入防御态势”。第二天，第七师没有渡江，开始修筑阵地，在前沿线上架设铁丝网，埋设地雷。师长金炯一认为前沿阵地与主阵地之间没有地形屏障，便命令在江岸边构成密集的弹幕地带，同时部署了十六门一〇五毫米榴弹炮负责支援第五、第八两个团的正面，一个重迫击炮连重点封锁中国军队可能的渡江点。

十六日黄昏，风雨交加。

昭阳江对岸冠岱山的后面突然升起一串信号弹，中国军队的攻击开始了。

中国军队炮火准备的猛烈程度是空前的。从昭阳江北岸射过来的炮弹，集中覆盖了南朝鲜第七师阵地后面的公路、通讯系统以及企图还击的炮兵阵地。在一个小时的炮击里，第七师的通讯联络被打断，指挥系统瘫痪。中国军队的步兵还没开始冲击，位于第七师阵地后面的炮兵就已经开始收拾炮车向南撤退了。炮兵们一下子撤出十三公里，再打出的炮弹因射程不够而打不到前沿了，于是，第七师在战斗一开始就失去了炮兵。没有受到任何压制的中国炮兵对前沿的轰击是步兵即将冲击的征兆。中国炮兵的炮弹摧毁了铁丝网，引爆了地雷，轰击扫清了江岸上的防御设置，紧接着，步兵冲上来了。

昭阳江，宽一百至二百米，水深一米，可以徒涉。中国士兵的第一冲击波就直指五团的阵地。不到一个小时，五团的前沿就被突破，五团被中国军队向南压缩了一公里，江岸各渡口向中国军队敞开了。金炯一师长见势急忙命令五团务必坚守，八团立即建立二线阻击阵地，预备队三团向前靠拢准备堵缺口。但是，连掩护步兵的迫击炮连都不知撤退到什么地方去了，五团的两侧都出现了中国士兵的影子，团指挥所遭到袭击，守卫前沿的五团已经一片混乱，各营都在向南逃跑的状态中，团指挥所也与营一起开始向南撤退，根本不可能执行任何“坚守”的命令。左翼八团的情况几乎和五团一模一样：通讯被中国军队的炮火轰击中断，后方公路被打得千疮百孔，团炮兵也是最先跑了。八团团长开始还企图坚守阵地，可是立即发现阵地的两侧已被中国军队突破，没过多久，连阵地的后面也出现了中国小股部队的骚扰，于是全团开始了混乱的大逃亡。作为预备队的三团接到“火速赶到

所峙里增援第五团”的命令后，还没有赶到预定的目标五团已经溃败了，于是三团只好临时变成收容队，收容五团逃下来的散兵。

到下半夜至黎明的时候，尽管南朝鲜第七师师长下达了一系列的命令，但是无一能够得到执行。作为预备队的三团，因卷入向南溃逃的洪流中，反而成了全师的前沿。八团奉命掩护全师撤退的公路，结果八团指挥所连自己的部队到哪里了都搞不清楚，勉强派出一个营企图抢先占领公路上的要地五马峙，但是等他们到达那里时，发现这个要地已经在中国士兵手中了。五团不断地在士兵溃逃的路上设立收容站，力图遏制住士兵失控的混乱局面，但是几乎每一处的收容站刚一设立，就立即被士兵狂逃的潮水冲垮了。

南朝鲜第七师的迅速溃败，使南朝鲜第三军团的侧翼完全暴露给了中国军队，尤其是后方公路要点五马峙的丢失，造成了第三军团的大规模的崩溃。

就在侧翼的第七师开始崩溃的时候，南朝鲜第三军团的第三、第九两个师开始心慌了。在军团指挥部里，作战参谋向军团长提出了一个似乎只有他首先说出来才合适的建议：与其阵地被突破发生混乱，不如赶快向南撤退！军团长“立即同意了这个建议”。第三军团司令部把这个决定报告给美军指挥部，得到的回答干脆而坚决：“无论发生何种情况，决不准后退！”

第九师师长崔锡向第三师师长请求增援，第三师师长告诉崔锡一个令人绝望的消息：第七师把公路要点五马峙丢失了，那里已经被中国军队占领。而这就意味着，整个第三军团的后路已被切断。既然第三师已经撤退，第九师还等什么？撤退！

于是，县里方向的南朝鲜三个师在战斗开始不到三个小时之内开始了拼命的撤退。

在县里的西南，公路上有个叫五马峙的地方。这就是南朝鲜军队和美军在战后争论不休的地方。这是个位于战线后方的补给与撤退的必经之地，高高地卡在公路边，占领了它就等于控制了公路。南朝鲜第三军团军团长刘载兴明白这个要地的重要性，一开始就在那里部署了部队以备不测。但是，由于南朝鲜第三军团与美第十军的防区分界问题，美军不允许自己的防区内部署南朝鲜军队，多次急不可待地赶他们走，生怕他们妨碍了美军的行动。而南朝鲜军队认为，这条公路是他们唯一的补给与撤退的要地，他们的后方自己不守谁又能来守？官司打到美第十军军长拜尔斯那里，拜尔斯的裁决是：韩国军队为什么要部署在我的防区里面？请他们出去！

正如后来南朝鲜第三军团所指责的那样：南朝鲜军队“出去”了，但是美军没把五马峙当回事，因为这条公路不是美军的补给线。

南朝鲜第三军团第九师的撤退大军很快到了五马峙，但是已经过不去了。中国士兵占领着高地进行着顽强的阻击，公路上等待向南逃命的车队在黑暗中排成了看不见头的长列，车灯在山谷中蜿蜒成一条灯火的长龙。凌晨三时，第九师三十团的几次攻击失败之后，南朝鲜军的绝望情绪到达了极限，有不少士兵开始丢下装备往深山中逃散。这时，南朝鲜第三军团军团长乘飞机亲自飞到县里来了。军团长刘载兴是在下珍富里的指挥部得知五马峙已被中国军队占领的，当时他除了对美军的愤恨之外，并不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他计算了一下：从昭阳江到五马峙，地图上的直线距离是十八公里，地面实际距离是二十九公里，中国人怎么能够在夜间地形不熟悉的情况下，在三个小时之内，不但突破了第七师的防线，而且快速到达并且占领了五马峙？如果这是真的，合理的解释只有两条：一条是第七师根本没有抵抗，中国人一冲击他们就让开了路，让中国人大踏步地通过了他们的阻击阵地；再一条就是，中国士兵长了翅膀具备飞翔的本领。

两个师的中国军队正从正面压下来，南朝鲜第三军团的第三、第九师等于被包围了。

刘载兴亲自督战，命令无论如何要冲破中国军队的阻击突围出去。在严厉的命令下，第九师三十团的三个营打头阵，向五马峙的中国阵地开始进攻。没有人知道五马峙高地上到底有多少中国士兵。能够面对两个师的兵力和成百辆将山谷照得雪亮的汽车坦克而敢死死地阻击，看来兵力一定不少，要不然就是一支敢死队。负责攻击中国阻击阵地的三个营的分工是：三营占领一侧阵地掩护，一、二营正面攻击。三营执行了命令，并且与反击的中国军队开始了激烈的战斗。公路上等得心惊肉跳的南朝鲜军官兵眼巴巴地看着五马峙黑漆漆的山峰，等待着一营和二营占领高地的信号。但是，过了半个小时，又过了半个小时，就是没有动静。中国军队正面压缩而来的大部队距离越来越近，迫击炮弹已经打到公路上来了，拥挤在公路上的南朝鲜步兵和车队开始出现混乱。这时传来一个令他们目瞪口呆的消息：负责攻击五马峙中国阻击阵地、为两个师打开逃生通路的一、二营根本就没向中国军队进攻，而是绕过五马峙山峰往南面的芳台山方向逃跑了。第三军团军团长刘载兴大怒，质问第九师师长这是谁下的命令，第九师师长说他根本没下过这样的命令，定是他们惊慌和害怕而自作主张了。

于是，整个南朝鲜第三军团就只有一条路了——向那两个在军团长督战下都能逃跑的营学习，绕路向芳台山方向撤退。

真正的大混乱开始了。撤退的命令还没有下达，南朝鲜士兵就已将车辆的轮胎放气然后弃车逃命。原本指望在前面开路的第十八、第三十两个团能够在芳台山方向杀开一条血路，但是很快就知道他们也处在逃跑的状态了。山谷中到处是南朝鲜士兵擅自烧毁各种装备而引起的山火。漫山遍野的南朝鲜官兵不成建制地乱哄哄地向南择路而

逃。没有一个指挥官在这个时候站出来指挥没有秩序的庞大溃兵，军官们都把自己的军衔标志摘下来扔了。奉命掩护的部队很快就分散地向各自认为可以活命的方向跑去。

就这样，两个师的南朝鲜军在溃败中形成三个大群，第一群跑向苍村里方向，第二群跑向三巨里方向，第三群跑向桂芳山方向，最后会合于下珍富里附近。

第一群南朝鲜士兵由副军团长姜英勋带头。好容易到了苍村里，却发现那里已被中国军队占领，于是部队再次混乱起来，分成若干小群四处逃散。南朝鲜士兵没有像美军一样的野战炊事装备和空军的及时补给，每个士兵身上带的干粮最多可以坚持三至五天。在逃亡的日子里，一些南朝鲜士兵饿死在深山中。更倒霉的是掩护三十团一、二营攻击五马峙的那个三营了。他们的任务是掩护对五马峙的进攻，但是过了很久，他们发现战场平静了下来，没有了上级的指示，也没有可供判断的敌情。该营用无线电向友邻部队呼叫，没有应答；派人到团指挥所去看，团指挥所已没有人影，这时他们才知道部队都跑光了，只把他们留在了后面，于是全营立即自行组织逃亡。在经过一夜的奔跑之后，营长发现他身后少了整整一个连。后来才知道，十连的官兵在逃亡中实在走不动了，连长决定找个高地，修好防御工事，布置好哨兵，全连休息一下再跑。结果，哨兵因为实在疲惫睡着了，等感到有什么动静睁开眼睛的时候，中国士兵黑洞洞的枪口已经在他们的四周围成了个圈。这个连除了个别士兵拼死挣扎跑入大山之外，全部被俘。

与南朝鲜军队相比，美军无论在火力配置上，还是阵地的坚固程度上，都显得过于奢侈了。美第二师三十八团三营为加固前沿主阵地抵抗冲击的能力，使用了六千根钢筋，二十三万七千条沙袋，三百八十五捆蛇形铁丝网。同时，前沿还布满了各种照明器材和防步兵地

雷，埋设了三十八个大型人工地雷，这些地雷是将油料和炸药混合装在五十五加仑汽油桶中制成的，一旦触发，所燃起的火焰温度可以高达三千多华氏度。

为了突破美军三营的阵地，从正面攻击的中国士兵遭到巨大伤亡。美军士兵们认为中国人肯定在死亡面前畏缩不前了，他们没想到中国士兵会绕到他们的身后，从美军阵地没有埋设地雷的一侧再次发起攻击，而这一地段竟是悬崖峭壁。中国士兵搭人梯，攀枯藤，冒着悬崖上投下来的密集的手雷和机枪的射击顽强地向上爬。当衣衫破烂、浑身鲜血的中国士兵端着刺刀爬上悬崖冲过来的时候，美军阵地的一角被撕开了。

由师长赵兰田率领的第十二军三十一师自战斗开始就发展不顺。赵师长亲自带领两个团突破当面敌人阵地之后向纵深发展，但在自隐里北侧的三巨里地区受到美军坦克集群的阻击。赵师长当机立断，绕过美军，天亮前插到杨洪公路，但是美军的炮火十分猛烈，加上白天飞机的轰炸，部队打得十分艰难。为了按时到达指定地点，部队坚持白天前进。在到达釜峰的时候，他们又与美军撞上了。中国军队没有炮火支援，凭借手中的轻武器无法突破美军的阻击，因此，三十一师没能在预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

由李德生师长率领的三十五师攻克加里山主峰后，不顾一切地在白天也坚持作战，坚决地向预定地点前进，终于完成了切断杨洪公路的任务。三十五师在攻击中伤亡很大，副师长蔡启荣、作战科副科长李超峰、一〇五团副团长赵切源等指挥员先后牺牲。

在自隐里，原来判断的由南朝鲜第五师防御的阵地，接敌之后才知道是美第二师二十三团的两个营和法国营。第十二军军长曾绍山认为敌情虽有变化，但这是歼灭敌人的好战机。只是三十五师因为连续攻击力量减弱，仅靠三十四师一个师难以全歼自隐里之敌。于是立即

打电报请示兵团，建议改变原定计划，把三十一师留下，合力歼灭美军的两个营和法国营。但是兵团回电仅同意把一〇〇团留下，三十一师需要继续完成预定的任务。而因为通讯问题，一〇〇团没有及时接到留下的命令，径直往南插下去了。曾绍山军长毅然决定就用三十四师的两个团打，三十五师负责堵截。两个团的中国士兵面对火力强大的美军毫无惧色，勇敢冲锋。法国营是在砥平里战斗中与中国军队进行过血战的部队，指挥官还是那个瘸腿的海外兵团的老兵。战斗进行了六个小时，中国士兵歼灭美二十三团和法国营各一部，俘虏二百余人，击毁汽车、坦克二百五十多辆。但是，中国军队参加围歼的兵力严重不足，火力微弱，无法形成严密的包围，致使美军的两个营和法国营的大部在飞机的掩护下逃走了。

如果三十一师留下来参加围歼，全歼美二十三团两个营和法国营的可能性就会很大。事后证明，三十一师虽然插到了南面，但因插得太远失去战机而没有大的作为，再后来又因需将部队撤回而伤透脑筋。

美第二师和法国营在受到多次打击之后开始向南撤退，十八日至二十日，他们在福宁洞和寒溪地区又遭到中国第六十军一八一师的围攻。一八一师五四二团在公路上截住法国营，向这些头缠红布的法军发起了猛烈攻击。法国营再次受到重创。后来在审问一个十八岁的法军俘虏时，中国官兵们对这个法国人嘴里不停地动着感到好奇，最后才弄明白，这个法军士兵已经两天没吃饭了，嘴里嚼的是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的花生米。

至二十一日，中朝军队在东线向南推进了五十至六十公里。第三兵团突破后插得最远，其第十二军已到达三七线，其九十一团向南插入达一百五十公里，到达三七线以南地区的下珍富里。由于朝鲜中部山脉的走向大都是纵向，而中国军队的投入很多，兵力密集，于是山

脉走向严重影响了中国军队的横向机动，中国军队所有的部队都在沿着几条有限的纵向公路南下追击，这是南下插入很远的因素之一。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军队互相交叉，对敌人形成的合围不多，所以歼敌有限。而美军和南朝鲜军利用占优势的机动性能，望风而逃，迅速撤退，这是中国军队歼敌不多的原因之二。更重要的是，中国军队连续作战，伤亡巨大，官兵疲劳，粮弹耗尽，已没有再持续作战的能力。

这时，彭德怀接到第三、第九兵团将领联名发来的电报：

据当面情况美军已东调，伪军溃散后缩，特别是我们部队粮食将尽，个别单位已开始饿饭，因此我们认为，如整个战线不继续发动大攻势，而只东边一隅作战，再歼敌一部有生力量，我们亦必须付相当代价，但如不能搅出个大结局，则不如就此收兵调整部署，进行准备，以后再斗。如全线继续大搅，则我们仍可继续作战。如何速示。

五月二十一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

……以前各役携带五天粮，可打七天。因可就地筹粮补充之。现在携带七天粮，只能打五天至六天的仗。因战斗中耗损，就地不能筹补。洪川敌顽抗不退，使我东线部队无法运输接济。美三师东调，堵塞洪川、江陵间缺口。五次战役西线出击（四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伤亡三万。东线出击（五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伤亡一万出头。为时一月，进行东西两次作战，部队有些疲劳，需恢复和总结战斗经验。战斗发起后，第一线运输极端困难。待人力运输团到后，可能得到若干改善。且雨季已接近开始，数江湖沼尽在我军之后，一旦山洪暴发，交通全断，顾虑甚大。此役未消灭美师团建制。敌夸大我之伤亡，还有北犯可能。根据上述，我军继续前进，不易消灭敌人，徒增困难。不如后撤，使主力休整，以逸待劳……

彭德怀在致电毛泽东的同时，命令部队停止进攻。第六十五军于议政府、清平里地区阻击敌人，第六十军于加平、春川地区阻击敌人，第二十七军一个师于春川、大同里地区阻击敌人，共同掩护第十九兵团、第三兵团、第九兵团主力分别转移至渭川里、涟川以北地区、金化地区、华川以北地区休整。

但是，就在彭德怀命中国军队的三个兵团向北转移的命令刚刚下达的时候，联合国军的反击作战已经部署完毕——一个巨大的阴影正向中国军队悄悄地压来。

这就是战争。

战争不依一方的计划而进行，甚至不按照双方的计划而进行。战争自有它的规律，有它的偶然与必然交织在一起的走向，有它安排下的生之喜悦和死之陷阱……

十九日，当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军队的攻势减弱的时候，李奇微飞临美第十军指挥部，与第八集团军司令詹姆斯·范弗里特、第九军军长威廉·霍奇以及第十军军长克洛维斯·拜尔斯一起商讨美军将要采取的行动。在咒骂了南朝鲜军的无能和决定把南朝鲜第三军团解散之后，会议一致认为：虽然在中国军队发动的攻势面前，美第二师至少损失了九百人以上，东部战线向南后退近百公里，但是，由于美军在中部战线的阻击，使战线形成一个很大的凸形，中国军队的宽大的侧翼已全部暴露。况且，中国军队的"礼拜攻势"到了强弩之末的时候，现在正是联合国军反击的最好时机，"是给中国人一点厉害的时候了"。会议决定立即集中四个军十三个师的兵力，以摩托化步兵、坦克、炮兵组成的快速反应和机动的"特遣队"，在空军和远程炮兵的支援下，沿着汉城至涟川、春川至华川、洪川至麟蹄的公路，实施多路快速反击。

李奇微签署作战命令：

第八集团军应于五月二十日发起进攻，各军任务如下：

第一军沿汉城——铁原轴线实施主要进攻，并负责保障第九军的左翼。

第九军向春川、华川方向进攻，并夺占春川盆地以西的高地。

第十军应制止敌人在其右翼达成突破，并协同第九军右翼部队向麟蹄、杨口方向发起进攻，第九军的右翼也由第十军负责。

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应密切注意这次进攻的发展情况。

中国军队就要面对的灾难来临了。

# 范弗里特弹药量

对于美军可能的反击，彭德怀有思想准备。

为了防止中国军队撤退时被美军尾追，防止第四次战役后期出现的被动局面重演，二十一日，彭德怀给第三兵团、第九兵团、第十九兵团、人民军前线指挥部打电报，并报军委和金日成，明确规定各兵团撤退时一定要留一个师至一个军的兵力监视和阻击美军，从撤退的位置起，要采取节节阻击的方式掩护主力转移。在详细地规定了各兵团的撤退路线后，彭德怀还是不放心，第二天又急电第十九兵团：

> 根据敌人以前习惯，在我军停止利用高度机械化进行所谓磁性战企图消耗疲劳我军。我主力北移休整时，敌尾我军北犯是肯定的。但前进速度要看敌人的兵力大小，我军机动防御打得好坏而定，距离远近以后才能逐渐判明（敌之伤亡补充具体情况不明）。我下一战役反击线，即第五次战役反攻发起阵地。

为避免各军同时撤退，战线上兵力过于密集，彭德怀命令担任此一战预备队的第三十九军提前撤退。

但是，致命的是，中国军队是在“第五次战役胜利结束”的思想大背景下开始北移的，绝大多数官兵认为北移是“得胜回师”的行动。即使意识到自己的部队已严重疲劳并缺少粮弹，但很少有人能够十分客观地正视目前是疲惫之军的大规模撤退。数个兵团十几万人的转移撤退，如果没有极其冷静、极其严密的组织和控制，一旦敌情变化，很容易造成混乱，甚至导致大规模的溃退。中国军队各级指挥员，包括兵团一级的高级指挥员，对美军反击的速度、规模和凶猛程度严重估计不足，撤退计划制定得不甚周密，对志愿军总部的撤退计划落实得不够坚决，有的兵团甚至没有执行总部的撤退计划。在军事指挥上，撤退中没有严密控制公路要点，遭敌阻击时战术单调，加上各部队之间没能达成彼此协同，于是在战场上造成很多致命的空隙。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美军突破前沿，以机械化突击速度向纵深突进，就必将使中国军队防不胜防，使灾难的发生不可避免。

这是中国军队在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战斗结束后开始向北转移时的客观而真实的状况。

美军的反击是经过长时间的筹划并在精密组织下进行的，是美军自朝鲜战争爆发以来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全线反击，范弗里特为这次反击行动制定的初步目标依旧是“堪萨斯线”。

“堪萨斯线”是“撕裂作战”没有达成的一条战线目标，即从临津江口向东到涟川，而后沿着三八线南侧连接永平、华川、杨口、大浦里所构成的一条防御线，这是朝鲜国土东西最窄、被认为最容易实施防御的一条线。

“堪萨斯线”将是一条对朝鲜半岛来说十分重要的线。是在军事上美国一方一直追求的一条线，也是在政治上中国一方一直不能容忍的一条线。然而，它却是最接近战争结束后交战双方所划定的“军事分界线”的一条线。

美第八集团军全线反击的部署是：

西线，汉城正面的美第一军向东并列配置南朝鲜第一师、美骑兵第一师、美第二十五师、英军第二十八旅（由第二十七旅改编而成）和加拿大旅，其正面是中国军队的第六十五、第六十四、第六十三军，进攻方向是涟川、铁原。

中线，美第九军从西向东配置南朝鲜第二师、美第二十四师、南朝鲜第六师和美第七师，其正面是中国军队的第六十三、第六十、第十五军，进攻方向是金化、华川。

美第十军在洪川北侧至下珍富里的七十公里的战线上，由西向东并列配置美陆战一师、空降一八七团、美第二师和第三师，与东海岸的南朝鲜第一军团策应，集中捕捉由于中国军队发动的第二次春季战

役所形成的凸部里的中国第十五、第二十、第二十七军和第十二军。在这个地段的具体分工是：陆战一师负责麟蹄、寒溪公路以西地段，进攻目标为杨口；美第二师和空降团负责该公路以东地段，进攻目标是麟蹄；美第三师配属南朝鲜第八、第九师以苍村里为进攻目标。

所谓"捕捉中国军队"的含义是：在以往直线平推战术的基础上，增加机动力量，恢复在战场上的野战式作战，强调部队突破前沿后即向对方的"根部"猛烈突击。这是范弗里特对其前任李奇微北进战术的修正，其中范弗里特居然吸收了中国军队"迅猛穿插"、"切断后路"、"迂回包围"等战术特点。

战争进行到此时，在前线作战的南朝鲜军队只剩下一个军团了，直接与中国军队在一线作战的都是美军最精锐的部队。

五月二十二日，美军在四百公里的战线上同时开始了反击行动。西线的骑兵第一师一天之内就推进到议政府一线。中线的美第九军以美第七师为右翼、第二十四师为左翼，二十四日北进至加平。东线的美第十军军长拜尔斯对反击发动以来部队每天仅仅推进四五公里感到极其不满，认为这样的速度绝不可能致中国军队于死地。于是命令美第三师立即突击到三七线附近，对位于下珍富里的中国军队进行夹击；同时把空降一八七团配属给美第二师，命令他们从中国军队暴露的宽大侧翼上，沿着洪川至麟蹄公路向昭阳江突击。

美军的前锋部队在主力稳固推进的同时，组织起若干支以坦克为主的"特遣突击队"，开始在全线进行猛烈的穿插，以把中国军队从战线上割裂开。拜尔斯军长给美第二师师长拉夫纳少将的命令是："第二师在寒溪附近，以一个步兵营、两个坦克连和部分工兵，迅速组成特遣队，自今日十二时，沿寒溪、阴阳里轴线前进，在阴阳里附近占领桥头堡，切断敌之退路。"

在美军这次发动的反击作战中，突出的特点是各部队组织“特遣突击队”，在中国军队的阵地之间“打穿插”，其中有骑兵第一师组织的以七团为主的突击队，有美第二十五师组织的“德尔温装甲支队”，而最著名的是由拜尔斯将军亲自组织的一支坦克突击支队。坦克突击支队的突击方向是中国军队最敏感的腰部。如果这里一旦被突击穿插进去，那么中国军队在先前的战斗中穿插得最远的几万官兵将会被分割在三八线以南，从而陷入美军的包围。

二十三日早，空降一八七团的两个营在大量炮兵和飞机的支援下，经过一个白天的战斗，突破了中国第十五军的阻击阵地，夺取了寒溪以北八公里处的外后洞，为坦克突击支队创造了出击的条件。

二十四日上午九时三十分，拜尔斯命令坦克突击支队两个小时之内出击。

这支美式穿插部队的组成相当于一个团的规模：它由空降一八七团一个步兵营、七十二坦克营、一个情报侦察分队、一个炮兵连、一个工兵连和四辆M-16自行高射机枪编成，队长是空降团副团长盖尔哈特上校。其前锋，是一支被称为“纽曼尖兵”的先头部队，由一个坦克排、一个情报侦察分队和一个工兵排组成，规模不足一个连，指挥官是坦克营的副营长纽曼少校。

两辆M-4坦克和两辆A-3坦克，加上两辆吉普车和两辆卡车以及不到四十名的士兵在风和日丽的春天景象中出发了。如此小规模的一支部队敢于在庞大的中国军队中间冲过去，这对美军来讲是以往绝对不可想象的事情。因此，“纽曼尖兵”的突击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军队此时的状态。

中午，“纽曼尖兵”出发的时候，纽曼少校发现他的头顶上盘旋着一架直升机。他对这架飞机没有太在意，认为那也许是师里或军里派

出的侦察飞机，至于这架飞机为什么总在他的头顶上嗡嗡，他除了感到讨厌之外就什么都没想了——他正忙着指挥他的工兵——他怕中国士兵在他前进的路上埋了地雷，于是命令坦克停下来待命，让工兵探雷班先上去摸摸情况再说。这时，头顶上的那架直升机降落了，走出来的人把纽曼吓了一跳，是军长拜尔斯。

拜尔斯问：“为什么停下来？”没等纽曼说出理由，拜尔斯就挥动指挥棒暴躁地大声喊，“我刚从自隐里飞过来，在那里，中国人正等着你们呢！立即给我前进！我不在乎什么地雷！以每小时三十二公里的速度给我前进！”

纽曼立即跳上坦克，命令出发。这支队伍沿着公路如同进入无人之境高速地前进。公路两侧不断跳出中国士兵向坦克发射火箭弹，有时甚至一下拥出十多个中国士兵把炸药包扔在坦克的装甲上。纽曼命令不准停下来，一边用火力还击，一边依旧保持高速度。在距离自隐里两公里的地方，空中的联络飞机投下来通信筒，它通知纽曼：“很多敌人正埋伏在前方公路的东侧，如果请求实施空中攻击，请以黄色信号弹为标记。”

然而，纽曼不想为等待空军的攻击而让坦克停下来，他命令继续前进。坦克发射了三十多发炮弹，不但冲过了中国军队的阻击阵地，而且还俘虏了三十名中国士兵。继续前进时，“纽曼尖兵”遇到了中国军队两百多人的阻击。纽曼命令坦克炮火掩护，他带着士兵往村庄里冲。中国军队阻击了一会儿之后，撤退了，留下二十多名伤员。

“纽曼尖兵”继续开进，在沙峙里附近，发现大约八十多名中国士兵牵着二十多匹骡马在公路上行进。好像这些中国士兵想不到美军会出现在这里，于是在距离一百多米的时候双方才交火。这是一支中国军队转移中的迫击炮兵队伍，交火十分钟，中国士兵迅速退却了。

再前进一公里，通过与主力部队的联系，纽曼才发现自己跑得太快了。这时，前方不远的地方，黑压压的一队中国士兵正在急促地行走。联络飞机的通信筒又投了下来：“在你北方一点五公里处，至少有四千名敌人迎你而来！请你等待空军的进攻之后再行动！”

纽曼还是命令继续前进。坦克排排长表示担心，认为还是应该回去与主力会合，因为前方肯定是掩护中国军队主力撤退的大部队。纽曼说：“如果你想回去的话你就回去，不过你会碰见拜尔斯那个老家伙的。”

纽曼乘坐的坦克没走多远，便看见了中国军队大规模的阻击阵形。这时美军空军的飞机来了，是一群大编队的喷气式飞机，它们对中国军队进行了“连纽曼都能感到发动机热度的超低空的凝固汽油弹攻击”。中国军队在猛烈的空中打击下不得不赶紧撤退。纽曼趁机带领他的坦克发动了冲击，在前进到青邱里的山口时，纽曼看见了昭阳江。

昭阳江，中国军队发动第五次战役“第二次春季攻势”的出发点。

江岸上狼藉一片。被打坏的美军汽车零乱地丢弃在野地中，到处是美军的补给品和装备品。中国士兵没能来得及把这些战利品运走，于是放火烧毁，此时江岸边仍是浓烟蔽日。沿着昭阳江北岸撤退的中国军队正在急促地奔跑。

一个小时后，坦克突击支队的主力到达。

纽曼立即渡过昭阳江，在江北岸占领了渡口。

美军的这支小规模坦克突击支队，三个小时之内在中国军队的腰部北进二十公里，渡过了重要的天然屏障昭阳江。这显露出中国军队在撤退掩护中的疏漏和间隙有多么大。更重要的是，“纽曼尖兵”突破的是中国军队最需要重点防范的地段，这个地段让美军轻易地沿着洪

川至麟蹄的公路斜插进来，等于是在东线撤退的中国军队的腰部斜插进了一刀。也就是说，不但远在三七线附近没有来得及撤退的中国第十二、第二十七军等部队，在彭德怀下达撤退命令的第三天就已经腹背受敌了，而且中线的第十五、第六十军的右翼也已经完全暴露。

由于紧随突击队的美第十军迅猛地向北插进，西线和中线中国军队面临的局势更加危急了。

西线，由于南朝鲜第一师的进攻，北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撤退至汶山一线，中国第六十五军的右翼完全暴露，不得不自议政府、清平里一线撤退。为了保持防线不至于崩溃，彭德怀命令第六十五军无论如何要在议政府一线阻击美军二十天。二十天，对于已经处于险境的第六十五军来讲太艰难了。在美军的猛烈攻击下，不到五天，第六十五军的阵地就被美军突破了。结果导致中国第三兵团和第十九兵团之间本来就存在的缺口完全裂开了，美骑兵第一师、第二十五师、英军第二十八旅、加拿大旅和南朝鲜第二师开始沿着这个缺口大肆向北挺进。

中线，南朝鲜第六师、美第二十四师已经突进济宁里、城隍堂地区，并控制了加平以东的北汉江南岸渡口；而美第七师、陆战一师已经接近春川，致使中国第六十军方向出现危机。第六十军一八〇师因有八百余名伤员没有转移而没有撤退，依旧还在原地阻击，而它的两翼已完全是美军。至此，一八〇师实际上已经被美军割裂孤立。第九兵团的第二十军，与在九万里附近实施空降的美军发生猛烈战斗，而第二十七军被美军阻隔在富坪里以南、洪川至麟蹄公路东西两侧的桃木洞、玉山洞、县里地区，无法执行被赋予的沿昭阳江阻击美军的任务。配属于第九兵团的第十二军也被美军割裂，而其在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的战斗中穿插得最远的三十一师九十一团则被远远地孤立于三巨里附近，与军师部都已失去联系。

中国军队预定的机动防御战线还没有来得及形成，就被美军在西线的加平和东线的麟蹄各个分割，各部队都处于分散撤退所将面临的重重险境之中。

彭德怀发出急电，要求各部队一定要克服困难，有计划地布置掩护，同时选择有利地形和时机求得歼灭美军一部。彭德怀知道，必须遏制美军的进攻，否则不但不能把伤员运回来，主力也要受到损失。

中国第十九兵团第六十三军军长傅崇碧在饥饿难忍的时候分到了一把炒黄豆，但是让他最不能忍受的还不是饥饿，而是目前战线上混乱的局势。当面的几个美军师已经包抄到第六十三军的两翼，一路美军以坦克搭乘步兵沿汉江西岸向第六十三军的背后迂回，如果再不下决心，全军的撤退后路就没有了。

撤！这个仗不能再这样打了！

下达了撤退命令之后，傅崇碧军长跟随军指挥部渡汉江北撤。一八七师跟随军指挥部撤退。就在军部和一八七师涉水过江的时候，发生了意外：几百米远的江面上，出现一支美军涉水过江的队伍，同时，还有十几艘美军渡江的船！紧急之中，美军的侦察机飞来了，就在军部和一八七师的头顶上盘旋！奇怪的是，美军没有向撤退中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双方居然相安无事地擦肩过了江——也许是美军的侦察机把这支中国军队当成南朝鲜军队了？也许美军认为要不是南朝鲜的军队怎么能敢和美军并排过江？

渡过汉江之后，傅崇碧立即命令部队迅速脱离美军，并且向兵团请示下一步的行动。兵团通报的敌情令傅崇碧心惊：中国军队第三兵团、第九兵团的部队已经被美军割断，第十九兵团目前唯一能撤退的方向只剩下铁原了。现在兵团正命令第六十五军在议政府阻击美军，以掩护兵团大部队的撤退……

傅崇碧不知道，就在他接到兵团电报的时候，第六十五军已经因再也顶不住美军的进攻往后撤了。

疲劳、饥饿、失望一齐折磨着傅崇碧。中国军队的军长和普通士兵一样都是依靠步行行动。美军的地面炮火和空中轰炸在中国军队撤退的路上形成了一道道的拦截网，每突破一次这样的弹幕拦截，部队都会出现巨大伤亡。傅崇碧已经走不动了，只得让警卫员搀扶着。当他得知一八八师五六三团在清平里渡口阻击美军的战斗中打得勇敢壮烈，并且在撤下阵地的时候坚持把烈士尸体掩埋好的报告时，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兵不由得热泪纵横。

第六十三军军部走进一条山沟，发现设在这里的兵团指挥部刚撤走不久，撤走的时候遗留下一些饼干等食品。饿急了的军部人员正在吃，就听见有人大喊："敌人来了！"一看，美军的坦克开过来了！傅崇碧拔出手枪大声命令道："军机关快走！警卫连掩护！"这是傅崇碧军长入朝作战以来第二次在这么近的距离遭遇敌人，第一次是在第五次战役开始前，在江边看地形的时候，那次也是敌人的坦克突然冲过来，钢铁履带在江边卷起漫天的烟尘……

第六十三军军部好不容易撤到涟川，兵团的急电到了，电报命令第六十三军立即接替第六十五军的防务，在涟川至铁原之间宽二十五公里、纵深二十公里的地区，不惜一切代价坚决阻击美军北进。

傅崇碧军长看着电报呆了。第六十三军在大雨泥泞中撤退到涟川，部队损失巨大，士兵疲惫不堪，要在如此宽大的正面阻击美军的集团冲锋，谈何容易！打仗没有人愿意把阵地丢了，第六十五军也是一支能打仗的好部队，不是顶不住了吗?

时年三十五岁的军长傅崇碧意识到，考验第六十三军的最后时刻到了。

中国第三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是个烈性军人，第二野战军的著名猛将，在国内战争中担任六纵队司令，打仗勇敢顽强，战功卓著，人称“王疯子”，连毛泽东都这样称呼他。战将陈赓受命组建志愿军第三兵团入朝参战，陈赓特别点了王近山的将。陈赓因病没有入朝，王近山履行着兵团司令员之职。至于他的外号，彭德怀有精辟的解释：“那是革命的英雄主义！”

王近山为人坦荡，他承认自己看不起美国人。“他们有多少兵？加上李承晚的伪军，还抵不上咱的一个军区，不够咱一个淮海战役打的！我看把美国鬼子赶下海不成问题，朝鲜多大个地方？在三八线上尿泡尿就能滋到釜山去！”

在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的战斗中，第三兵团的主力第十二军被配给了第九兵团，王近山老大地不愿意，因为这样他的第三兵团打的是助攻，而现在，真正的硬仗还没有打，他的第六十军就情况不妙了。志愿军司令部命令第六十军在加平、春川一带阻击美军，可第六十军左翼的第十二军已经后撤，右翼第十九兵团的第六十三军也撤了，后面的第三十九军撤得更早，这不是让第六十军三面受敌嘛。第六十军唯有赶快撤回才能最大地保存实力，但是没有撤退的命令；再说，第六十军还有近八千的伤员没有撤下来，就是有命令让他们撤，他们也无法立即撤下来。另外，配属第九兵团的第十二军在第二阶段的战斗中插得太远，现在已处在了更加危急的状态中了。

王近山心情极为恶劣：“为什么让十二军插得那么远？要是被阻在敌后撤不回来，我找宋时轮算账！”

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这时是整个战场上最焦急的指挥员。自从第九兵团入朝作战以来，他们打的仗是最艰苦的，在第二次战役于东线与美军陆战一师的战斗中，他们的英勇顽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战役之后，重大的损失令他们在东线整整休整了五个月之久，直到第五

次战役才重新参加战斗。第五次战役刚发起时，第九兵团担任东线的主要突击任务，他们打得很坚决，但是，正因为他们的部队向南攻击得太远，此时便成为撤退中最困难的兵团。尤其是第三兵团配属过来的第十二军，第十二军的两个师此刻已被美军切断了撤退的后路，其中，以赵兰田的三十一师最为危急。

与军部失去联系的三十一师被孤立于敌后，赵兰田师长考虑得更多的不是自己的安全，而是在战役的第二阶段插得最远的九十一团。九十一团在第二阶段的战斗中可谓进击神速，居然打到了下珍富里，那里是三八线再往南的三十七度线，实实在在地是钻进敌人的肚子里了。可是，现在部队要撤退，已钻进敌人肚子里的他们该怎么回来?他们后面的道路已被美军控制，按照进去的原路出来是不可能了，但是不走原路又有哪条路可以脱险？那是整整一个团哪，关乎一千多名官兵的生死……

左右两翼的第二十七军和人民军都来人通报，他们要撤退了。

三十一师要是再不退，就很可能孤立无援了。

经过痛苦激烈的讨论，赵兰田师长和刘瑄政委的决定是：等九十一团脱险之后，师指挥部再走。并命令九十三团坚决阻击美军，为九十一团脱险争取时间。同时，命令九十一团，能按原路撤退更好，实在不行，向东沿着东海岸的山地寻找北撤的路。

无法与九十一团取得联系，只有派人去送信了。

三十一师作战科副科长枫亭接受了这个任务，他带上两名警卫员出发了。

在中国军队全线向北撤退的整个战线上，只有这三个人迎着整个战线上的敌人在往南走。

两个警卫员先后牺牲在路上，枫亭到达了九十一团指挥部。

九十一团团长李长林看见枫亭的时候大为惊讶，他不知道这位副科长是怎样穿过敌人的一道道战线过来的。但是更为惊讶的还是枫亭副科长：对战局发展毫无了解的李长林团长正在兴致勃勃地部署进攻当面南朝鲜军队的战斗！李长林看了师指挥部的命令后明白了：大部队已经撤退了，九十一团已经孤悬于敌后。

按照原路撤退已不可能，即使杀出一条血路来，伤亡必定惨重，而且伤员没办法带走。东边是高山大海，也有敌人，只能出乎敌人的意料，向东南走，转移到敌人后方去，然后绕路向北，设法撤出敌占区。

这时，失去联络信号的报话机突然接通了，传来赵兰田师长急促的声音：“我同意你们的计划！我率领九十三团顶住敌人，掩护你们往东南走！保重！”就这样，中国军队的一个整团开始了危急万分的艰难突围。

干部们的镇静和果敢影响着士兵们。士兵们跟在他们所信赖的干部们的后面，他们没有恐惧，只有回到大部队的决心。

九十一团抬着伤员，押着俘虏，携带着所有舍不得丢弃的装备，秘密涉过了南汉江，进入茂密的山林。他们不断地遇到敌人，能够躲过的，悄悄躲过去；遭遇的，就坚决地打，战斗起来异常勇猛顽强。从敌人俘虏的口供中，他们知道，敌人正在堵截他们，堵截的兵力是三个师。

三个师在围堵一个团！

李长林接到报告说，担任后卫掩护任务的二营和一连走错方向，与团部失去了联系。这时，东南边传来枪声。李长林果断命令改变行

军方向，去营救二营和一连。黑暗的夜色中依旧能够看见山路上的嶙峋乱石。当他们登上一座山顶的时候，中国士兵们闻到了咸湿的海水的味道。

李长林也看见了大海，这是朝鲜半岛的东海岸。

二营和一连也终于回来了。他们与部队失散，边打边撤退，不但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居然还带回来六十多名俘虏。

李长林团长知道，他的士兵们精神不垮。

九十一团继续行军。他们吃野菜、吃树皮、吃草根，互相鼓励，团结一致。翻过铁甲山后，遇到北朝鲜人民军，将一百多名俘虏交给了人民军，继续顽强地走。六天后，千余名军衣破烂、面容憔悴、精疲力竭的九十一团官兵终于见到了一直在等着他们的三十一师师指挥部。

坚强的团长李长林流了泪，与他的师长赵兰田拥抱在一起。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六日，美军全线越过三八线。

胜利来得太快了，令范弗里特兴奋得不能自持。但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美国国内的一些议员们不但没有夸赞他的战绩，反而提出要调查他，让他接受国会的质询，因为他用的弹药太多了，浪费了美国纳税人的钱。

在美军疯狂的反击中，范弗里特出色地继承了李奇微的“火海战术”，而且将之“发扬光大”。战后的统计显示，他在反击作战中所使用的弹药量，是美军作战规定允许限额的五倍以上。记者们将之称为“范弗里特弹药量”。这些弹药把美军所有的必经之地统统抢先变成了一片

焦土。美军飞行员们从空中向地面看去，他们说，在那些发生过战斗的地方，“不可能再有什么生物存在了”。

范弗里特将军大为光火：“让那些议员们来看看敌人的尸体和俘虏吧，如果他们不来，就让什么‘范弗里特弹药量’见鬼去吧！”

五月二十九日晚，朝鲜中部大雨如注。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接到彭德怀声音低沉的电话，让他立即来一趟。

昨天晚上洪学智才冒着倾盆大雨从彭德怀那里回到一百多公里以外的后勤司令部，怎么现在又让再去一趟？几分钟后，洪学智的吉普车冲进茫茫大雨中。山高路险，河水暴涨，害怕空袭不能开灯的吉普车在黑暗中走走停停。深夜，洪学智终于到达空寺洞。

山洞里，只穿着一条短裤、赤裸着上身的彭德怀一个人在蜡烛光下来回踱步。看见浑身湿透的洪学智，彭德怀用最低沉的声音说：“出事了。”

第六十军一八○师已与外界失去一切联系。

彭德怀给洪学智看了一份他刚刚发出的电报：

应即以一八一师、四十五师解一八○师之围

六十军并十五军首长并王（兵团副司令王近山）王（兵团参谋长王蕴瑞）：

至现在止，无反映我一八○师被消灭。据谍息二十七日有两个营袭击美军指挥所，被其援军赶到未成。另息在纳实里、退洞里获得我一部分武器。据上判断，我救援部队如是坚决，一定可以救出该师，如再迟延不决，定遭严重损失。

彭德怀 五月三十日一时

情况一下子变得如此险恶，这是中国军队指挥员不曾想到的。

“要成建制地歼灭几个师的美军。”

“美国鬼子不也是肉眼凡胎嘛，咱集中优势兵力，收拾不了它？”

“美国兵最怕死，冲上去就能立个国际功！”

中国军队在朝鲜战争中虽然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战役，对美军的特点有了一些了解，但是这种了解依旧还很浅显，并间或带有偏颇的政治色彩。

战争是政治的一种手段。战争中的政治热情必不可缺，而且它还是赢得战争最后胜利的保证。但是，在每一场局部的、具体的战斗进行中，战争双方所较量的更多的是知己知彼、运筹帷幄的战争智力以及遵循战争特有规律的周密而准确的战术运用。

战争观念的陈旧，战争手段和战术的落伍，最终受损害的是政治利益。

一八〇师，危如累卵。

## 永远的悲怆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对于中国第六十军一八〇师来讲，这是一个关键而致命的日子。

这一天，是美军发动全线反击的第二天，第六十军一八〇师还在向南进攻。该师的五三八团、五三九团与向北攻击的美第七师反复争夺着阵地，战斗进行得正激烈中，一八〇师接到第六十军军长韦杰和政委袁子钦发来的电报，电报命令一八〇师将主力置于北汉江以南，以掩护兵团主力向北撤退。

一八〇师没有意识到自己目前的处境也已经处于危急中了。

志愿军指挥部在部署中国军队全线向北转移的时候，曾给第三兵团下达了一个指示，要求他们在其预备队第三十九军提前转移的同时，留一个军在加平至春川一线布防，利用山地阻击美军，掩护第三兵团主力向铁原方向转移。第三兵团把阻击掩护任务交给了第六十军。

第六十军军长韦杰的心情极为复杂。在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的战斗中，第三兵团三个军突击的正面仅宽十五公里，如此密集的兵力集中在如此狭小的突破正面，连打惯了“集中兵力”的韦杰都感到从未见过：兵力是否过于集中了？地方狭窄，密集的部队展不开，势必造成战场拥挤的局面。第六十军是第三兵团左翼的突击部队，第六十军的正面说是七公里的战线，但实际看看地形就知道了，“七公里”只是两条山脊。结果部队挤在一起往前冲击，谈不上任何速度，而担任穿插的部队即使翻山越岭，也追不上敌人的汽车轮子。在整个第一阶段的战斗中，第六十军基本上没有遇到大的战斗。韦杰军长那时就想，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无论如何要好好地打一下，让部队尝尝跟美国兵打仗胜利的滋味。但是，第二阶段的战役部署一到，韦杰军长更恼火了，他的第六十军居然被别的部队给“瓜分”了：一八一师配属第十二军打穿插，一七九师配属第十五军，一八〇师给第三兵团当预备队。第六十军军部成了空架子，军长能够指挥的部队仅仅剩下一个三百多人的工兵营。现在，整个兵团都要全线向北撤退，第六十军这才接到掩护撤退的任务。也就是说，到了这个时候，韦杰军长才能够真正指挥自己的部队了。但是，一八一师距离军部一百二十公里，至少两天才能归建；一七九师的归建也需要一天的路程，一八〇师还在加平方向，归建也需要两天的路程。这还不算，韦杰刚刚得知，左翼的第十五军昨天就撤退了，战线上已暴露出一个巨大的缺口，如果一八一师和一七九师无法及时赶回，这个方向上单靠一八〇师一个师，别说完成掩护兵团撤退的任务，就是现在的处境也将难保。

命令就是命令，必须坚决执行。

第六十军军长韦杰下达命令：

一七九师附炮兵四十六团，于现地即大龙山、甘井里掩护转运伤员，任务完成后预定二十五日除以一部留现地待九兵团接替后再开始向指定地区转移，师主力分两路经芝岩里、退洞里，进至加平、观音山、休德山地区布防。

一八一师于现地掩护转运伤员，任务完成后，预定二十六日经新浦里、国望峰、观音山、上海峰之间地区休整，并准备在国望峰、观音山布防。

一八〇师附炮二师两个连，以一个步兵团北移汉江以北构筑阵地，师主力置于北汉江以南掩护兵团主力北移及伤员转移。师作战地域为新延江、芝岩里、白积山、上海峰以南地区，并注意与右邻的第六十三军取得联系。

一七九师接到命令后立即行动，以最快的速度向北撤退归建。韦杰军长命令他们控制春川至华川的公路。韦杰的这一命令非常及时，一七九师刚刚部署完毕，美军的坦克部队就到了，一七九师官兵顽强阻击，以巨大的生命代价为第三兵团的撤退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一八〇师接到电报后，立即按军部的命令进行部署：五三八团、五三九团扼守北汉江南岸阵地，五四〇团在江北岸占领鸡冠山高地，以加强师的二线阵地。同时，根据军部的电报，派人去与右翼的第六十三军联系共同阻击的问题。

上午十一时，第六十三军方向突然传来枪声，一八〇师侦察员回来报告了一个令所有人都不相信的消息：第六十三军不在右翼战线，可能已经撤退了！

原来，第六十三军军长傅崇碧判断其部队已非立即撤退不可，从而果断地命令第六十三军全线撤退。这个判断无疑是正确的，确保了第六十三军的安全。但是，唯一遗憾的是，由于情况的紧急和局面的混乱，第六十三军在撤退的时候没有与相邻的一八〇师协同。而另一个更致命的疏忽是，一八〇师右翼的一七九师在撤退时也疏忽了与一八〇师的联络。这就致使美第七师和南朝鲜第六师乘虚而入，枪声就是从敌人已经占领的侧翼传来的。

一八〇师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军部。军长韦杰已顾不上再多考虑，他立即命令一八〇师天一黑便撤出阵地，向北转移。

如果韦杰的命令得到执行，一八〇师还有最后的机会能够转移出来。

但是——战争中，一个“但是”，意味的也许就是无数生命生死不可预知的意外！

正当一八〇师开始撤退，一部分部队已经北渡汉江的时候，第六十军突然又接到兵团的电报：

……由于运力缺乏，现战地伤员尚未运走，十二军五千名伤员全部未运；十五军除已运走者外，现水泗洞附近尚有二千不能行动之伤员；六十军亦有伤员千余人。为此决定，各部暂不撤收，并于前沿构筑坚固工事，阻击敌人，运走伤员之后再行撤收，望各军以此精神布置并告我们。此外各部除以自己运输力量搬运伤员外，并组织动员部队，特别是机关人员甚至干部全体参加抬运伤员，以期将伤员迅速搬运下来……

电报的意思是清楚的，要求各军组织好伤员的转运，在伤员没有转运下来的时候不要扔下伤员撤走，如果自己的伤员已转运下来就可以撤退。但是，就是这么一封电报，第六十军却理解成为：“六十军必须掩护全兵团的伤员转运”。

于是，第六十军立即再给一八〇师打电报，将那个要求一八〇师转移到北汉江北岸的命令改为："继续位于春川、加平、北汉江以南地区防御"。

于是，一八〇师不但没有撤退，反而命令已经向江北转移的部队掉头再往回走。在四周友邻部队都开始或者已经撤退的时候，只有一八〇师遵照军部的命令，全师原地未动。

一八〇师就这样失去了最后一个生还的机会。

韦杰军长其实也预感到了一八〇师的危机，因为此时已经撤退的一七九师无法再向一八〇师靠拢，一八一师距离一八〇师则更远。但是，尽管心情焦急的副军长查玉升建议把一八〇师撤回北汉江北岸以防不测，但韦杰军长认为一定要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同时，他还是因为担忧而电令一七九师立即组织兵力阻击美军的北上，以尽可能保障一八〇师侧翼的安全。韦杰军长给一八〇师下达了在北汉江南岸阻击五天的限期。——"白天失去的阵地，晚上要反击回来"。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整整一天，一八〇师就这样与撤退中的各部队脱节了。战后所有的人都明白地看到，一八〇师在二十三日这一天等于在原地等了美军一天。就是这一天的"等待"，使一八〇师等来了一次铺天盖地的厄运。

一八〇师，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代理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成德。

一八〇师官兵万余人。

郑其贵，一九二九年参加红军，历任班长、排长、连长、指导员、师司令部参谋、营教导员、团政委、太岳军区二十三旅政治部主任、晋冀鲁豫军区八纵二十三旅政治部主任、第六十军一七九师副政

委。从郑其贵的任职可以看出，他的政治工作的经历十分丰富，是一个执行命令不打折扣的军人，吃苦在前，敢挑重担，无论是个人品质还是政治素质在一八〇师堪称优秀。

虽然根据当时战场的具体情况，应该迅速把部队向北转移；虽然郑其贵坚决执行了上级的命令，在没有受命撤退之前决不擅自撤退；但是，如果在一八〇师的命运里不出现那么多的意外和疏忽呢？如果在全线战役开始的时候就能够想到战争中势必会有的撤退呢？

郑其贵命令五三八团团长庞克昌、五三九团团长王至诚扩展阵地，特别是五三九团，要确保全师右翼的安全。右翼的缺口太大了，仅二营一个营负责的正面就宽达十公里。二营的阵地在阻击战开始之后，立即受到美第七师的猛烈攻击，美军在数百门大炮和飞机的支援下，投入了一个团的兵力，二营阵地被凝固汽油弹引发的大火遮盖，弹片、石头、泥土、树枝满天乱飞。美第七师反复攻击，但是没能突破二营的阵地，这是中国军队在向北撤退中少有的成功的阻击战斗。

二十四日下午，就在五三八团和五三九团在各自的阵地上与美军激战的时候，从北汉江北岸的五四〇团传来了消息：城隍堂阵地失守！

一八〇师指挥所内顿时一片死寂：城隍堂，一八〇师身后的阵地！

城隍堂失守意味着美军已经完成对一八〇师的弧形包围！

城隍堂阵地阻击战打得空前惨烈。五四〇团一营三连打得只剩下十几个人时，在营教导员任振华的带领下与美军展开肉搏战，直到最后时刻整个三连与美军同归于尽。炮营阵地被美第二十四师突破，当成群的坦克向中国士兵们碾压过来的时候，营长虽命令弃炮撤退，但

连长华银贵视炮如命，说什么也不愿意把火炮丢弃。他大喊：“要扔炮，就先把我华银贵扔了吧！”他命令弹药手装填炮弹，在几十米甚至几米的距离上，操炮向美军坦克平射，炮弹迎面撞上美军的铁甲，阵地上山摇地动，美军为之心惊。

到了这样的时刻，郑其贵依旧执行着上级的命令，以一八〇师全师官兵的生命坚持着原地阻击。

当韦杰军长得知城隍堂阵地丢失时，终于向一八〇师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但是，一切都已经晚了……

二十四日夜，一八〇师组织部队向北汉江撤退。郑其贵命令一个团把最后的三百名伤员运走，然后后勤部门撤退，接下去是炮兵，最后是师指挥部。在江边，沉重的火炮无法过江，炮兵们只能把所有的炮弹向南打光，然后留下最后一颗炮弹自毁火炮。北汉江的所有渡口都已被美军占领，一八〇师只有在不是渡口的地方下水。连日的大雨使北汉江江水猛涨，北汉江上仅仅架设了三根铁丝让成千上万的官兵们拉着涉水渡江。美军发射的照明弹悬挂在头顶，艰难而混乱的渡江场面被暴露在美军炮火的打击之下。美军的炮兵校正飞机低空盘旋，把密集的炮弹准确无情地投向没有还击能力的中国士兵。齐胸深的江水汹涌，力气弱小的女兵和年纪大的士兵紧紧地拉住马尾，战马嘶鸣中士兵们互相呼喊着，但还是不断地有人被江水卷走，身体倾斜后迅即就消失在江面无边的黑暗中。抬着伤员的士兵为了伤员不被江水弄湿，把担架高高地举起来。在这天夜晚，一八〇师被炮火击中的官兵的鲜血染红了北汉江的江面。

一八〇师死于江水中的官兵达六百人之多。

虽然过了北汉江，但也为时过晚了。美第二十四师已经进占间村，挡在了一八〇师的退路上。美第七师突破了一七九师五三六团的防御，将该师与一八〇师的联系彻底割断。南朝鲜第六师已经到达芝岩里，一八〇师被四面包围了。

在企图拼死突围的每一个方向上，都发生了极其残酷的战斗。在向被围困中的一八〇师发动攻击的时候，一八〇师的每一个阻击阵地面前都集中了多于中国士兵几倍的美军。美军的炮兵跟进速度极快，尤其是坦克和自行火炮，可以与步兵一起参加任何位置的战斗。美军飞机的出动架次也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的战斗。阻击美军的中国官兵的弹药越来越少，他们还击的武器只剩了石头、枪托和牙齿。郑其贵在师指挥所里得到的伤亡数字令他不忍再看，一个连打不了多一会儿，干部们就全部牺牲了，士兵只剩下十几个。再上去一个连，过不了多久还是同样。

比死亡更可怕的，是难以忍受的饥饿。一八〇师全师已断粮多日，官兵们只能用野菜草根充饥，不少士兵因吃野菜中毒。伤员的情况更加悲惨，他们的伤口由于得不到及时处理而开始溃烂，他们嚼不动草根，连水也没有了。一个迫击炮班在炮弹没有了之后，有士兵主张把驮炮的骡子杀了吃，但是立即遭到反对，士兵们宁可饿死也不愿意杀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的骡马。驭手们怕这些骡马被人吃了，就解开缰绳放它们走，但是，这些骡马恋着主人，总是打到哪跟到哪儿，令炮兵驭手们放声大哭。

二十五日，不断地向军部发出求救电报的一八〇师几乎在同时接到了两封内容互相矛盾的电报。先到的一封电报要求他们转移到马坪里以北阻击美军。部队刚走出五公里地，又一封电报到了，让他们原地掩护伤员撤退，结果部队又往回走。在这两封电报之后，一个最坏的消息传来了：美军已经占领马坪里。

一八○师仅剩的一线生路被切断了。

在一八○师的周围，是五倍的美军如铁桶般密不透风的死死的包围。

在第六十军的军部里，一种大祸临头的气氛在沉默中弥漫着。几天几夜没有睡觉的韦杰军长感到神经已经快要绷断了。他只有同意一八○师向鹰峰方向突围的计划，并命令一七九、一八一师迅速向一八○师靠拢，以接应他们突出重围。

二十六日黄昏，一八○师开始突围。

一八○师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师部、五三八团、五四○团组成，向北突围；另一路由五三九团组成。两路约定第二天上午九时在鹰峰以南会合。军部发来的电报显示：只要到达鹰峰，过了公路就安全了，会有部队前来接应。

五三八团参谋长胡景义带领二、三营开始为全师撕开美军的包围。在一条公路上，两个营的中国士兵拼出性命向封锁道路的美军坦克扑上去。很快，四连所有的官兵在与坦克的搏斗中全部伤亡。五连接着冲上去继续战斗，最后只剩下了十人。三营与美军步兵混战在一起，不习惯夜战的美军显得格外顽强，双方士兵最后时刻进行了混乱的肉搏战。五三八团的两个营以伤亡殆尽的代价终于杀开了一条通路，一八○师在天亮时分撤退到鹰峰脚下。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担任前卫的五三八团的士兵跑来报告说："鹰峰上有美军！"

不是说过了鹰峰的公路就安全了吗?

接应的部队现在哪里?

一八〇师的官兵不知道，接应的部队没能到达这里。一七九师的接应部队在途中被美军插乱，经过激烈的战斗，负责接应的一个团只剩下了四个排。而一八一师接到接应任务时，该师与各团的通讯中断，只能派人去各团传达接应任务。各团的位置分散，通信员冒着大雨在山中摸索道路，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把命令传达到。而这时，美军已经占据华川、原川里、场巨里一线，一八一师失去了靠近一八〇师的可能。

当韦杰军长得知负责接应的一七九师和一八一师行动失败后，一头栽倒在军指挥部的地上。

一八〇师再次被包围在鹰峰下的时候，是这个师的最后时刻。

电台被打坏，与军部无法联系。全师已经断粮食七天，弹药将尽。重装备全部丢失，部队开始混乱。

美军的飞机在鹰峰上空一圈圈地盘旋。

美军士兵开始沿着山沟冲进来。

一八〇师开了最后一次师党委会。

会议作出的决定让这支部队在以后的岁月里永远也没检讨明白。

一八〇师党委在鹰峰下的最后决议是：分散突围。

焚烧文件，毁坏电台，销毁密码……

译电员赵国友、魏善洪和通信员正在销毁密码本的时候，美军的机枪子弹朝他们打来，郑其贵命令掩护他们把密码烧完。这时，几个美军士兵冲了上来，通信员投出手榴弹把美国兵暂时打退。炮弹很快也飞过来，在猛烈的爆炸声中，魏善洪和通信员负伤滚下悬崖。老译

电员赵国友怕密码烧不透，坚持蹲在那里用树枝拨火，一直到鲜血流尽死在火堆边。

分散突围标志着一八〇师有组织的战斗行为到此为止。

黄昏，还是大雨。

一八〇师的官兵分散成若干小股，怀着强烈的求生本能和无可名状的失措，拖着疲惫的身躯纷纷消失在黑暗的山林中。

最先突围成功的是由五三八团参谋长胡景义率领的一支小队伍。他们在突围的过程中，先后遇到五三九团高机连连长向大河、三排长李本著和他们带着的十六个人以及师炮兵室主任郭兆林、五三八团组织参谋田冠珍和他们带着的十四个人，还有师组织参谋郎东方带着的三个人以及工兵营参谋田侯娃带着的五个人。这五十多个人又一次组成了一个战斗集体，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和团支部，指定了战斗小组和组长。二十九日，在经过多次战斗之后，他们竟然带着十四个美第二十四师的俘虏接近了中国军队的阵地前沿。在最后的冲击中，趁机四处逃跑的美军俘虏被美军的子弹全部打死，一八〇师的这个五十多人的战斗集体终于回到了一八一师的阵地上。

因与一八〇师联系完全中断而万分焦急的韦杰军长立即见了胡景义，在得知一八〇师已经分散突围后，他命令有战斗经验的干部和士兵，带上粮食和弹药进入山中寻找突围的官兵。被部队如此大的损失弄得火气很盛的副军长查玉升建议调两个师立即进行反击，以接应突围的一八〇师的官兵：“上级要是追究责任，把我查玉升的脑袋交上去！”但是，韦杰军长认为，既然分散突围，就很难找到他们，反击带来的损失会得不偿失。韦杰的判断是对的，派入敌后寻找一八〇师官兵的部队最后都空手而归。

另一支突围成功的小分队，由五三九团团长王至诚、团政治处主任李全山、作训参谋张绍武所带领的四十余人组成。他们冲出包围，还完整地带出了团的地图和文件，回到一八一师的阵地。

五三九团二营在教导员关志超的带领下，六十余人两天后回到一七九师的阵地上。

五四〇团政委李懋召、五三八团团长庞克昌也带领着一部分人回来了。

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参谋长王振邦带领的是警卫分队和师指挥部的部分机关人员。这支小小的队伍黎明时分遭遇美军的追杀。美军的坦克在山谷间的开阔地上吼叫着，钢铁的履带把中国士兵的身体卷进去，然后抛起来。这支队伍不择方向地分散跑开，警卫班在混乱中依旧存在保护首长的意识，几名士兵向郑其贵奔跑的相反方向跑去，以求吸引美军的火力。在越过小河边的一片开阔地向山上奔跑时，两名警卫战士拼死阻击美军，用仅有的子弹还击，吸引了美军的大部分火力。趁这个机会，师首长们冲过山去了。

郑其贵师长在山顶回过头来。

一个战士当场被打死。另一个战士负伤仰面倒下，枪声平息后，他被两名美军黑人士兵拖着两腿拖走了。

这一幕，郑其贵永生难忘。

突围最艰难的一支队伍，是由政治部主任吴成德带领的。围绕在他身边的有数百人之多，其中还有文工团年轻的女孩子和不少伤员。吴成德为了表示他与大家同生共死，当着大家的面，掏出手枪把自己的那匹马打死了，然后他对大家说：“大家不要怕！我们互相帮助，就一定能冲出去！我可把话说明白，谁要是叛变投敌，我就枪毙了他！”

由于人多，这支队伍目标十分明显。他们抬着重伤员，扶着轻伤员和走不动的女孩子，冒着大雨向敌人的包围圈冲去。封锁线上白昼般的照明弹和密集的火力令他们屡次受挫，在多次改变突围的方向后依旧没能突出去。在一条山沟里，他们被美军的坦克堵截，美军残酷地向挤满中国官兵的山沟开炮，然后进行坦克碾压。这些中国官兵虽然没有了任何还击的能力，但是只要不被打倒，他们就反抗，他们反抗的唯一方法就是奔跑，就是不把双手举起来。最后，吴成德痛苦地明白，这支队伍肯定是突不出去了，于是他决定上山打游击。

在与敌人、饥饿、艰苦的环境拼力斗争的过程中，这支队伍由于牺牲、疾病、饥饿等种种原因逐渐分散行动。最后，吴成德和他身边的三十三个人，在敌后坚持游击战斗竟达一年之久。最后只剩下三个人的时候，吴成德在一次突围中被美军俘虏，他是朝鲜战争中被俘的中国官兵中级别最高的一个人。

一八〇师企图突围不成的官兵中还有一部分流落进崇山之中。一九五二年，南朝鲜赤根山一带有一股游击队总是不断袭扰美军，美军终于知道那是一些志愿军士兵。美军调动了三千多兵力，让曾在中国围剿过抗日游击队的日本人当顾问，进山围剿。但是费尽力气攻上山头后，不见一个人影，而赤根山的枪声依旧不断。

郑其贵、段龙章、王振邦带着为数不多的士兵，翻山越岭，最后回到中国军队的阵地上。

见到韦杰军长，他们大哭，请求处分。

志愿军司令部的一份资料中对一八〇师损失情况的记录有如下文字：

六十军一八〇师被隔断于华川以西，经几次突围接应均无效，除师长、参谋长及担任掩护大行李的一个建制营等部分人员突围外，余因饥饿与疲劳走不动，吃野菜中毒或作战死

亡、失散等约七千余人。

在一八〇师自己向上级报告的《一八〇师突围战斗减员统计表》中，总计一栏记录的一八〇师负伤、阵亡和情况不明的总数字为：七千六百四十四人。其中师级干部一人，团级干部九人，营级干部四十九人，连级干部二百零一人，排级干部三百九十四人，班以下六千九百九十人。

有资料说，一八〇师人员损失大部分为被俘，被俘人数约为五千余人。

在中国军队的历史上，一八〇师在朝鲜战场的命运是一个永远的悲怆。

## 谁能在战争中取胜?

一九五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向北进攻的联合国军中线部队已经到达涟川、华川一线，其攻击的势头没有减缓下来的趋势。中国军队的第九兵团、第三兵团还在继续向北撤退，战线距离北纬三八度线越来越远。笼罩在伤亡、饥饿和失利阴影中的中国官兵在连绵不断的淫雨中向北走，他们身上披着能够寻找到的一切防雨的东西，在无边的黑夜中拖着疲惫的身躯，无声地忍受着一种他们难以言传的情绪的折磨。我们要撤退到什么地方去？难道就这样一直向北——我们真的失败了?

兵团的高级指挥员知道志愿军司令部给他们指定的休整地在什么地方，但是此刻就连他们也都怀疑是否能够按照这个计划执行，因为没有人能预测到联合国军的攻势究竟会在什么地方停止。

机械化部队“乘胜追击”的速度是惊人的。

彭德怀站在空寺洞的洞口向铁原方向遥望。南边布满乌云的夜空不时地被爆炸的火光照亮，而身后的爆炸声听得异常清楚，那是美军飞机对中国军队后方的铁路和公路线进行的不间断的封锁。

彭德怀似乎能够猜得出李奇微在想什么。

铁原、金化一线，是朝鲜国土中部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被称为“铁三角”。这里山岭连绵，数座高山呈互相呼应的阵形，巍然耸立。占领这里便可以无遮拦地向北俯瞰，是美军继续北进的绝好的冲击地。这里公路和铁路密集地在几大要地之间交叉纵横，是朝鲜中部的交通枢纽，无论是从防御还是从进攻的角度上讲，这里都是转运物资、屯集兵力的最佳地点。进可攻退可守的地方，是任何一个军事家都会不惜一切代价占领的地方。

不能再撤退了，无论从军事上还是政治上，无论从道理上还是心理上，这里都是中国军队必须守住的最后的防线。

让谁来守住这最后的防线?

这个方向原是第十九兵团的防区。左翼是第三兵团的第十二、第十五和第六十军，但由于他们在战役进攻阶段的攻击方向是东南，攻击的距离最远，撤退时除一八〇师的失利外，其他部队能够撤回来已经很不错了，有的部队目前还在归建中，战斗减员很大。但又不能轻易把战略预备队第三十九军拿上去。也没有从其他方向横移部队补缺口的可能和时间了。

第十九兵团的防区需要他们自己负责。

当第十九兵团指挥部接到彭德怀“死守铁原十五至二十天”的电报时，兵团指挥部刚刚在转移的状态中停下来喘气。其远在战线最西面

的第六十四军正与北进的美军苦苦纠缠，第六十五军因损失严重目前的状况更不好，只有傅崇碧的第六十三军了。

第六十三军作战月余，伤亡甚大，粮弹奇缺，官兵疲惫。别说坦克，连迫击炮算在内，不过两百多门，还不说由于炮弹供应不上，不少火炮成了部队机动的累赘，炮兵当了步兵用。现在，兵团要求第六十三军死守的防线正面宽达五十五公里，当面范弗里特指挥的美军有四个整师，兵力多达五万人，平均一公里内就有三百多人。加上美军拥有各种火炮一千六百余门，坦克三百余辆，还有空军的强大的支持。

彭德怀命令的阻击时间不是几天，而是半个多月！

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和政委李志民本着负责任的态度打电报给彭德怀，陈述没有把握完成任务的理由——不能不顾现实，因为一旦防线失守，给整个战争带来的危害是不堪设想的：

敌先头坦克和汽车部队已进至涟川附近。东边之敌已到文岩里向芝浦里侦察，芝浦里是否有三兵团的部队请告。原令六十五军在涟川以南地区阻敌半月至二十天，该军未能完成任务，仅四天将敌放至涟川附近，使六十三军来不及准备。虽已令该军迅速布置，但可能难以完成志司交给的任务。

彭德怀的回电不容分说：

你们应令一八七、一八九两师各一部迅速向南挺进，坚决顶住敌人。该两师主力争取时间在预定地区抢修工事外，应令军直和一八八师一部在铁原志司指定的地区和内外石桥西北地区抢修工事以防万一，并令一八八师在朔宁及东南地区做坚决战斗的准备。

第十九兵团给第六十三军下达了行动的命令。同时，又以严厉的措辞致电第六十五军，命令他们配合第六十三军的阻击：

敌人并未增加新的力量，你们将敌人很快放进涟川地区，即如此你们应立即组织力量打击敌人侧背阻滞敌前进，便于六十三军抢修工事，否则铁原失守你们应负责任。

彭德怀干脆把电话直接打给杨得志，声音沙哑而低沉：“就是把六十三军打光，也要在铁原坚守十五至二十天！”

当杨得志从兵团直属队抽出五百名老兵，送到急需兵力的第六十三军时，年轻的军长傅崇碧十分激动，他说：“我们决心打到最后一个人，决不让范弗里特再前进半步！”

中国第六十三军军史上最悲壮的一页翻开了。

六月一日，美军集中兵力和火力开始了猛烈的攻击，涟川至铁原一线终日火光冲天，浓烟蔽日。战场的一边是中国士兵的血肉之躯，另一边是美军坦克的钢铁长龙。战场距离彭德怀的指挥部不过百里，百里仅仅是美军坦克两天的突进距离。彭德怀拒绝撤退。他昼夜不眠，常常一人于黑暗中伫立在苦雨霏霏的小山坡上向南眺望，他能够想象出美军的炮火和炸弹怎样将大雨般的弹片倾泻在中国军队的防御阵地上，而他的士兵们会怎样在鲜血流尽之前与那些美军士兵死死地扭打在一起，然后，年轻的身体一个个地倒在绝不后退半步的阵地上。彭德怀，这个中国贫苦农民的儿子，他最知道贫苦人家是如何盼望着自己的儿子长大，好让日子能够过得好一些。志愿军中有一名战士是个独生子，几天前，这个战士的父亲写信来问能不能让他的儿子回家，因为老人怕他的儿子死了他就从此没希望了。有人指责说这个老人觉悟不高，破坏抗美援朝。彭德怀听说后火了，他命令立即把这个战士从近百万的士兵中找出来，给这位老父亲送回去：“战士不是父母养的？就你是？”彭德怀不得不深深地谴责自己。尽管任何战争都是要死人的，但是，战争进行到现在，他不该过多地责备他的下属，他也有指挥上的失误，至少他对朝鲜战争的特殊性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模糊。

彭德怀不断地打电话给第六十三军，不断地严令他们必须坚守不准后退。

军令一下，将士冒死！

在山坡上伫立的日日夜夜里，彭德怀这位身经百战已年过五十的将领憔悴得如同风烛老人。

三天，仅仅三天，最前沿的一八九师坚持不住了。美军不惜伤亡地轮番攻击，阵地一日易手数次。双方士兵的尸体重叠在一起，又被无情的炮火再次炸烂。一八九师指挥部需要不停地重新组建部队，把几个营合并成一个营，几个连合并成一个连，直到机关人员也补充到连队。即使这样，阵地往往在打光最后一个人之后丢失……

军指挥部命令一八八师上去接替。

从阵地上下来的一八九师的官兵，仅仅能够再编成一个团，师长当团长，团长当营长，立即补充弹药，准备最后时刻再冲上去。

一八八师五六三团八连连长郭恩志，河北人，说话带一口任丘一带的口音。八连在阵地上阻击美军整整两天了，士兵们在战斗的间隙瘫倒了一样躺在满是泥水的地上，郭恩志实在是非常难过。连队连续打了四十天的仗，铁打的人也快顶不住啦。

“唱！唱个歌什么的！”

没有人唱。

六月六日，郭恩志灵巧地运用阵地上的地形地物，带领连队连续打退了美军骑兵第一师两个连的攻击，虽然出现伤亡，但是阵地还在。黄昏的时候，他从士兵们疲惫不堪的神色上想到了美军士兵。那些士兵不是也连续进攻了这么多天了吗？于是他派三排长带着一个小组摸到美军宿营地进行骚扰，战斗小组扔了一通手榴弹，打死几个美军士兵，还缴获了几支美国枪。

团长说：“这就对了！不管用什么办法，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坚守阵地，就是好样的！”

七日一大早，郭恩志觉得不对劲儿了，阵地下的树林中人影乱晃，前边的公路上开来一串坦克，坦克后面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黑压压的步兵。郭恩志赶快把三排的兵力加强给一、二排，刚布置好，美军就开始攻击了。一个战士说：“连长！你听，美国鬼子在说中国话！”美军中有人用汉语喊叫，意思是攻不上去就不攻了，用炮火把这个山头轰平了算了。

刚要命令大家钻防炮洞，郭恩志心里突然一动：敌人干吗大喊大叫的？不对，肯定不对！他命令各排立即进入阵地。果然，美军根本没有开炮，一个营的兵力偷偷地上来了！

几倍于八连的美军攻击的决心十分顽强。坦克开了炮，飞机接着也飞来了，八连的阵地上顿时硝烟弥漫。一排阵地上，机枪手王森茂连枪带人一起被炮弹炸起的泥土埋了起来，四十多名美军呼喊着蜂拥而上。王森茂从泥土中挣扎出来，美军几乎到了他的面前，他站起来，端起机枪猛烈扫射，美军像割倒的麦子一样倒下去。二排的阵地上已经爬上来二十多个美军士兵，四班已经负伤的冯贺一条裤腿被血浸透，他的弹药手已经牺牲在他的身边，他抓起身边的步枪就打，直到面前的美军士兵跑下去了，他还在疯狂地射击。

郭恩志站在阵地的最高处，始终大声喊叫着，鼓励着他的士兵，他同时还想以此告诉他的士兵们，连长还活着。

终于，阵地上站满了美军士兵，中国士兵被逼到了悬崖的边上。这时，郭恩志听见一排长喊：“同志们！我们还有五十发子弹，争取一枪打一个！”

这个暗语是说，全连的子弹仅剩五十发了。

阵地的后面也响起激烈的枪声，八连被前后包围了。

郭恩志知道这是他的连队最后光荣的时刻了。

士兵们几乎同时举起了石头。这些巨大的石块他们本已经举不起来，但是现在人人都能把它高举过头顶，并且扔向敌人。很快，阵地上的石头也没有了，士兵们把刺刀上好，聚集在一起，准备肉搏战。

突然，阵地的四周安静下来，美军士兵们停止不动了。从八连的阵地往四周看，下面是密密麻麻的绿色钢盔。由于中国阵地上连石头都投不下来了，美军认为这里的中国士兵已必死无疑。于是，他们兴奋地叫喊，甚至还唱起歌来。

让决死的热血涨红了脸的郭恩志对身边的士兵们说：“娘的，咱们也唱！”

我们是人民的好战士

我们在战斗中成长

只要战斗打响

我们就打个歼灭战

……

中国士兵的歌声令美军士兵愣住了。

突然，旁边九连阵地上响起了密集的枪声，美军立刻出现慌乱。就在这一刻，随着郭恩志的一声呐喊，他第一个从悬崖上纵身跳了下

去！紧接着，八连还活着的士兵们跟随着他，纷纷跳下悬崖。

悬崖下的美军被吓呆了，正不知所措，八连全连所剩的唯一一颗反坦克手雷被三班长扔向了美军。爆炸声未落，中国士兵们齐声喊杀，向炸开的缺口冲去！

天黑以后，当郭恩志带领他的士兵回到营指挥所的时候，营长兴奋之极："你们以一个连的兵力在美军的大规模进攻面前顽强阻击了两天，团长说要给你们请功！"

第十九兵团的指挥员们不得不为前沿每一个阵地的反复得失而焦虑不安。在美军不断施加的压力面前，一八八师的阻击线在不断地后退。虽然每退一步，都是经过批准的，为的是更多地消灭敌人，为的是争取更多的时间，但是，毕竟可供机动防御的纵深并不大。这里的阵地都是高山断崖，阵地在转移的时候，已经出现多次战士跳崖的情况了，这说明坚守阵地的官兵已在最大限度地迟滞着美军，他们不到最后的悬崖边上决不放弃与美军的纠缠。

兵团指挥部又接到一个消息：在五六三团的阵地上，一个排被美军孤立包围。这个排本来是被派出去打坦克的，子弹携带不多，现在，大批美军士兵和数辆坦克已经从四面把这个排围住，并开始了攻击！

好不容易与这个排接通了电话，只听副排长李秉群说了一声"我们只剩下八个人"了，电话线就被美军的炮火炸断了。

兵团指挥部开始为这八个中国士兵的命运担心！

派出部队前去接应，但阵地已深陷于美军的阵地里，接近不了。

唯一能够判断出的情况是，八个士兵中肯定还有人活着，因为在那个山头上，枪声和火光一直在持续……

后来，枪声停止了，火光熄灭了。

那个山头阵地的背后，是一道二十多米深的悬崖。

第六十三军多次派人去寻找，结果，只找到三个活着的——士兵罗俊成、侯天佑摔成重伤后，往回爬，半路上被发现抬了回来；士兵翟国灵因为挂在悬崖上的树上得以幸免，他在最后的时刻都没把他的枪扔掉，枪中还有三发子弹，他自己爬了回来。

副排长李秉群，士兵贺玉成、崔学才、张秋昌、孟庆修牺牲。

第十九兵团政委李志民在那个阵地的枪声彻底平息后，不禁潸然泪下。

残酷的铁原阻击战打了整整十天结束了，第六十三军完成了彭德怀交给他们的任务。

当第六十三军终于撤下来的时候，彭德怀亲自前去看望从前沿下来的第六十三军的官兵。他看见他的士兵们浑身的衣服已变成了一缕一缕的布条，不少士兵身上仅剩下一条沾满血迹和烟痕的裤衩。彭德怀刚说了一句“祖国感谢你们”，官兵们就都哭了，他们想起了那些牺牲的战友。

彭德怀问第六十三军军长傅崇碧有什么要求，傅崇碧说：“我要兵。”

彭德怀说：“给你补两万！”

六月十日以后，北进的联合国军在中国军队持续顽强的阻击下，其北进势头逐渐减弱，最后终于停止了进攻。

朝鲜战争交战双方的对峙战线相对稳定下来。

第五次战役结束。

中国军队对第五次战役的总结是客观冷静的。

这次战役，中国军队共投入十五个军的兵力，战役持续五十天，重创敌人八万多人，是五次大战役中歼敌最多的一次。但是，正如彭德怀所预言的：这是一场恶战。中国军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战斗减员达八万五千多人。尤其是在后期的撤退行动中，伤亡达一万六千人。战斗损失最严重的是第六十军一八〇师。

战役的结果所显现的主要问题：一是打得急了，对于美军根本不具备条件的所谓“登陆作战”的威胁判断过于武断，战役准备仓促；二是打得大了，第一阶段计划歼敌五个师（其中三个美军师），第二阶段计划歼敌六个师（南朝鲜军），事实证明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脱离实际的计划来自于对敌我双方都缺乏客观全面的认识，特别是对美军作战时战术上应该采取的变化缺乏认识；三是打得远了，战役企图过大，部队穿插得太远，但实际的补给能力很低，部队严重缺乏粮弹，伤员不能及时后运，美军反击时不能及时脱离战场。

在军事部署上，第一阶段时，第二十、第四十军突破之后，没有后续部队紧随跟进，从而使打开的战役缺口没有起到作用，如能将第三兵团以及第二十六军向东靠拢，将第二十七军作为第九兵团的二梯队，从战役缺口打进，战役发展会顺利一些。同时，第三兵团在十五公里狭窄的正面突击，造成部队过于拥挤的状态，除影响进攻的速度之外，还带来了部队的伤亡。

美军装备先进，火力强大，机动速度快，中国军队如果不能在战役发起的第一个夜晚就迂回到位，战役就很难发展下去；而即使迂回到位，被包围的美军又很难被中国军队歼灭。美军往往撤退三十公里后即停止，当其突然开始反击时，中国军队因已经发生供应困难，危机立即显现。尤其在战役后期大兵团转移时，美军利用快速的机动能力，给中国军队造成极大的被动。中国军队防御阵地纵深很浅，阻击战术手段单调，战场效果不理想。个别部队在战役撤退阶段出现混乱，暴露了指挥上的问题。

最后，后勤还是一个大问题。

针对此时出现在中国军队中的某些思想混乱、互相埋怨、甚至对战争前途悲观失望的问题，志愿军政治部发布了以《全军振奋，加速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为题的政工指示，要求各部队正确认识战争中的局部挫折，振奋精神，官兵一致，准备再战。

同时，中国军队各部队的官兵开始接受北朝鲜政府制作并颁发的各种勋章。包括彭德怀在内，朝鲜战争中先后有五十二万六千三百五十四名志愿军官兵被授予了勋章。这个数字是惊人的，几乎每两名官兵就能得到一枚。

一九五一年六月中旬，朝鲜战争交战双方对峙于汶山、高浪浦里、三串里、铁原、金化、杨口一线。

这是经过五次大规模的战役，最后依据双方的战场实力所形成的一条战线。

这几乎就是朝鲜战争爆发时南北朝鲜开始交战的那条线。

战争进行了整整一年又回到了战争爆发时的状况。

作为军事家的李奇微认为，美国军队绝对有打到鸭绿江边的实力，美国军队的空军、海军和装甲兵的力量，能保障这一目的的实现，当然付出巨大的人员伤亡是肯定的。对于这种伤亡，李奇微本人也许不愿意过于精密地计算，可有人“精确”地为他计算过：中国军队的第一至第五次战役，平均间隔是一至两个月，每次战役美军平均损失两万人。依据范弗里特发动的“快速前进”并获得“巨大胜利”的北进攻势的进攻速度，那么美军连续不间断地北进（如果中国军队允许这样，并且不发动任何反击战役的话），需要发动七次以上的这种规模的攻势，还需要六个月的时间才能到达鸭绿江边。按一次战役损失两万人计算的话，美军损失的人数将达到十四至十八万。即使美军能够在朝鲜北部实施登陆作战和空降作战，但善于在像北朝鲜这样的崇山峻岭中机动作战的中国军队给予美军的杀伤，很可能令这种努力没有什么价值。且一旦实施登陆作战，前沿的部队就得抽回来参加登陆，前沿便要出现明显的战役缺口，中国军队是不会放弃任何惩罚美军的战机的。

战争进行了一年，除了十万名美国青年的生命之外，耗费的金钱已达一百亿美元之多。这比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年的耗费多一倍以上，致使一九五一年美国军费开支增加到六百亿美元，这个数字意味着每一个美国人平均需要负担三百多美元。战争中美军每月平均消耗的物资达八十五万吨，这相当于美国援助北约一年半的物资总量。美国在朝鲜集中了全部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海军的二分之一，总兵力从战争初期的四十二万人已经增加到七十万人，尽管这样，依旧感到在与中国军队作战时兵力不足。这一切，对战略重点在欧洲的美国来说，绝对是一种战略上的本末倒置。美国的战略预备队，只剩下在日本的两个师、南朝鲜的三个师以及远在美国本土的六个师了，向朝鲜战场再派军队已不可能，而英、法等盟国均已明确表示，不再向朝鲜派一兵一卒。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明确认为，“朝鲜战争是个无底洞，看不到联合国军有胜利的希望”。

因此，杜鲁门有理由认为，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结束战争，将美国从朝鲜战争的泥潭中解脱出来，而即使联合国军打到鸭绿江边，非但战争不能因此而结束，反而意味着更大规模的战争就要开始。麦克阿瑟所主张的“把战争引向中国国内”的建议，是一种不现实的、连日本人在中国本土的失败教训都不顾的愚蠢的建议。中国军队的耐力是惊人的，毛泽东的“人民战争”和“持久作战”正是建立在东方民族这一性格基础上的绝妙的理论。况且，苏联人一旦参战，战争就不只是亚洲的事了。那么，美国人是否值得为所谓“统一”朝鲜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也就是说，战争所付出的价值是否超出了政治目的的价值？长期陷在朝鲜战场上是否真的中了苏联人的圈套？即使强行使用武力“统一”了朝鲜，美国人在亚洲的利益究竟能够得到多大的收获？美国又是否值得为此而成为亚洲国家的死敌？

从中国方面来讲，至少在第五次战役之后，中国领导人明白了一点，那就是要想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必须投入巨大的财力以加强军队的现代化装备，而恰恰这一点，是建立不到一年半的新中国目前不可能办到的事。中国也不大可能为朝鲜而耗尽本来就十分微弱的国力。中国领导人此时需要面对的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况且，中国军队成功地制止了联合国军“统一”朝鲜的企图，这在政治上讲本身就是一个胜利。至于其他的政治目的，可以在保持军事压力的基础上获得。最后，协助金日成“统一”朝鲜从来就不是中国方面参战的首要目的。

六月，毛泽东在北京连续接见了参加朝鲜战争的中国军队四个主力军的领导，并且与这些满身硝烟还未散尽的指挥员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四个军的领导分别是：第三十八军政委刘西元，第三十九军

军长吴信泉，第四十军军长温玉成，第四十二军军长吴瑞林。他们是在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的带领下回国汇报工作的。在北京，他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在各军兵种领导的陪同下，他们吃了北京的涮羊肉、烤鸭和谭家菜，但是，令他们难忘的，却是毛泽东的“家宴”，尽管是四菜一汤，而且其中只有一盘带肉的菜。毛泽东和军长们的谈话完全是在一种聊天的气氛中进行的。毛泽东的和蔼、幽默以及思路的严谨令军长们心生敬畏。毛泽东除了问到诸如“怎么看待这场战争”以及对大的战役的看法外，令军长们惊讶的是，毛泽东居然问到了一些具体战斗的极其细微的细节。

毛泽东最后的结论是：要有长期与美军对峙的思想准备。

此时，毛泽东已改变了自己对于朝鲜战争的作战指导方针，这种改变是根据朝鲜战争的现实作出的，在一封致彭德怀的电报中可以看出：

德怀同志：

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到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现在我第一线有八个军，每个军歼敌一个整营，共有八个整营，这就给敌以很大的打击了。假如每次每军能歼敌人两个整营，共有十六个整营，那对敌人打击就更大了。如果这样做办不到，则还是要求每次每军只歼敌一个整营为宜。这就是说，打美英军和打伪军不同，打伪军可以实行战略或战役的大包围，打美英军则在几个月内还不要实行这种大包围，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即每军每次只精心选择敌军一个营或略多一点为对象而全部地包围歼灭之。这样，再打三四个战役，即每个美英师，都再有三四整营被干净歼灭，则其士气非降低不可，其信心非动摇不可，那时就可以作一次歼敌一个整师，或两个三个整师的计划了。过去我们打蒋介石的新一军，新六军，五军，十八军和桂系的第七军，就是经过这种小歼灭战到大歼灭战的过程的。我军入朝以来五次战役，已完成这种小歼灭战的过程。但是还不够，还须（需）经过几次战役才能完成小歼灭战的阶段，进到大歼灭战的阶段。至于打的地点，只要敌人肯进，越在北面一些越好，只要不超过平壤、元山线就行了。以上请你考虑电告。

毛泽东

五月二十六日

以中国军队的一个军打美军、英军的一个营，这就意味着战斗将是三万人打八百余人。

集中绝对优势兵力，这是中国军队的著名军事将领刘伯承的作战原则。刘伯承的原话是：杀鸡就要用牛刀。

毛泽东以他特有的语言风格，给中国军队在朝鲜的作战重新制定了一个基本的指导方针，这就是著名的“零敲牛皮糖”战术。

牛皮糖，是中国南方一种用麦芽做成的圆饼状的糖。卖糖人用小锤一块块地敲下来零卖，顾客买多少卖糖人就敲下多少。毛泽东的意思很明白：朝鲜战争今后一般不会再有大的战役发动了，在与美军的接触线上，中国军队采取的战法将是零打碎敲。

把美军比喻成“能吃”并且“好吃”的“糖果”而不是其他什么秽物，除了毛泽东的幽默之外，其中至少包含了两层含义：

一、中国人民对于美帝国主义，还是要“吃”的，只是吃法不同而已。

二、美帝国主义是可以被吃掉的，只是吃掉它所用的时间长短而已。

世界著名军事理论家冯·克劳塞维茨针对政治与战争的关系有过这样的论述：

战争从来不是盲目的冲动，而是受政治目的支配的行为。所以，政治目的的价值必然决定着愿意付出多大的牺牲做代价和承受牺牲时间的多长。

所以，当力量的消耗过大，超过了政治目的的价值时，人们就会放弃这个政治目的而采取媾和。

一九五一年六月，联合国军北进的攻势一停止，朝鲜战争一下子就如同进入了死胡同一般。于是，一个现象随着军事与政治的进程自然出现了：双方似乎都打消了在军事上取得朝鲜战争全面胜利的念头。

战争的另外一种形式就要产生了，这就是：谈判。

## “猎狗”凯南与来凤庄

美国纽约海滨长岛伦克福庄园是一座环境幽雅的夏季别墅，是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周末常来度假的地方。在美国国土上的这个苏联外交官往来的场所里，任何一位美国人的出现都会引起极大的注意。那是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代，与苏联人接触，对于任何美国高层人士来讲，是一件“绝对危险的事”。

一九五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一辆黑色轿车驶入伦克福庄园别墅的大门，一个美国人在主人的迎接下走下了汽车。

这是个记者们都熟悉的美国人：美国国务院资深顾问、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

没有人知道他到这地方来干什么。

凯南到访伦克福庄园的目的，只限于杜鲁门总统等几个人知道。

想与自己没有外交关系的中国表达美国愿意停战并且坐下来和谈的愿望，不但令美国政府内心矛盾、窘迫、尴尬，本身也是一件周折、艰难、困苦的事情。

因为在战争一开始，作为交战一方的中国，曾经多次主张用和平的方式解决朝鲜问题。美军在仁川登陆后，中国领导人多次表示，希望美军能在三八线上停下来，通过和平的方式协商解决朝鲜问题，但是，气势正旺的美军那时一心要吞并整个朝鲜半岛。一九五〇年十月二日，美军越过三八线向北朝鲜发动进攻时，苏联等国曾向联合国大会提出和平解决朝鲜争端的提案，中国政府对该提案表示了支持的态度，可是在美国政府操纵下的联合国否决了这项提案。同年的十一月十八日，出席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向大会提出五项建议，主张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实现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但没有得到美国方面的任何反应。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一日，美方突然向中国方面提出“停战谈判”的建议，并且通过美国操纵的“联合国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提出了解决朝鲜问题的五项意见。但是，由于这明显是美军在第三次战役中受到重大损失之后的缓兵之计，且美方的建议没有回答中国方面关于一揽子解决包括中国台湾问题和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在内的原则要求，因此中国方面予以了拒绝，同时提出了真正能够和平解决朝鲜和远东问题的计划，可这时美军已经在朝鲜战场上开始了反击，军事上的顺利令美方又一次放弃了可能的谈判机会。到了一九五一年二月一日，在美国的操纵下，联合国竟然通过了“中国是侵略者”的决议案。正如周恩来所说的，这一决议案的通过露骨地证明“美国政府及其帮凶是要战争不要和平，而且堵塞了和平解决的途径”。此时的杜鲁门，不但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大门关上了，而且操纵联合国又连续通过了对中国实施禁运等议案，这使中国方面打消了一切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念头，开始做长期战争的准备。

规模空前的第五次战役结束了，双方在朝鲜战场上先后投入的兵力都已超过百万。当战线终于在三八线上稳定下来的时候，内外交困的杜鲁门想坐下来谈判了，可这时杜鲁门才发现由他自己关死的门再想打开实在是太难了，正如国务卿艾奇逊所说的那样：“于是我们就像猎狗一样到处寻找能和中国方面取得信息交流的线索。”

艾奇逊首先指示苏联问题专家查尔斯·波伦在巴黎向苏联驻德国的管制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西蒙诺夫进行试探，而对方好像就是无法领会一样地没有反应。接着，美国驻联合国使团的欧内斯特·格罗斯和托马斯·科里，在联合国大厦内努力向苏联驻联合国的代表们表示亲近，但是，试探似乎刚有点眉目的时候，《纽约时报》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搜集了一些“美国要在朝鲜战争问题上和谈”的零星迹象发表了，美国国内顿时谣传四起，令正受到麦卡锡主义困扰的美国政府赶快出面“辟谣”，原来刚刚略有所悟的苏联人也躲开了。

伤透脑筋的艾奇逊决定直接寻找中国方面的线索。他通过美国——瑞典——莫斯科的渠道极其秘密地试探了一下，还是没有效果。于是，他派人到香港去，采用的是中央情报局惯用的某些手段，千方百计地力求找到一条通往北京的“外交”之路，而美国准备在香港进行接触的人员名单正是中央情报局提供的，名单上有四个“可能的中间人”。

艾奇逊想通过“中间人”向中国方面传达的“信息”令人回味，这些“信息”后来在历史的发展中竟然部分地被印证了——美国方面力图使中国方面相信这样的道理：中、美两国应该和解，因为“苏联才是两国的共同敌人”。举的例子就是美国在中国内战期间没有“袒护”国民党一方，特别是美国在蒋介石逃到台湾后，最初是拒绝为逃亡的蒋介石政权提供保护的。美国国防部长马歇尔是个有着在中国工作经历的“中国通”，他认为，新中国在建国初期，由于政治上的需要，存在一种“寻找一个外部敌人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个角色不幸落在了美国人的头上。其实中国人不应该在反对美国的问题上“与苏联人站在一起”，朝鲜战争肯定会令中、美两国都感受到“痛苦的影响”。如果双方建立一种“一定距离的关系”，那么，“苏联肯定会成为中国的外部敌人”，那样，美国和中国公开改善关系就是“合乎逻辑的事了”。二十年

之后，当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中国北京的首都机场与周恩来总理握手的时候，中国和苏联刚刚在中苏边境一个叫珍宝岛的地方激战过。

但是，艾奇逊在香港的行动同样没有取得效果，原因是中央情报局所提供的“可能的中间人”的身份“值得怀疑”，美国政府感到让他们去传达信息“太没把握”。最后，艾奇逊派出的人仅仅把一些信息拐弯抹角地向“毛泽东的一个远亲”传达了。拿马歇尔的话说，这些努力好像是“把一封信塞进一个瓶子里，然后从旧金山的码头扔到大海里去”。指望这样做中国方面就能够得到信息，简直是太渺茫的事了。

最后，艾奇逊终于选择到一个人，他就是乔治·凯南。

艾奇逊认为凯南是个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乔治·凯南是美国国务院的苏联问题顾问，当时他正在休长假，以便在普林斯顿大学写一本关于美苏关系的著作，因此他不算是美国外交界的正式现职人员。况且，凯南和苏联人的关系一向不错，至少苏联人不认为凯南是那种满嘴谎话的外交人士。

艾奇逊让凯南立即到华盛顿来，当面给他交代任务，让他和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雅可夫·马立克取得联系。

艾奇逊对凯南说的话与他对去香港寻找线索的情报人员说的话完全相反：告诉苏联人，关于朝鲜的问题，美苏两国好像正在走向对抗，美国认为两国“都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两国不要被中国人牵着鼻子走。根据目前朝鲜战场的战线位置，“正是结束战争的良好时机”。

凯南立即给马立克写了一封信，信上询问是否能够“以私人的身份近期去拜访他”。有点出乎凯南的预料，几个小时之后，马立克就打来电话，要求凯南去长岛的别墅与他“共进午餐”。

于是，凯南和马立克，两个敌对大国的高级外交官员见面了。美国人的史料中记述说，仿佛自“一九二五年凯南成为外交官以来所受到的训练就是为了这一天”。——凯南用流利的俄语与马立克交谈，而且交谈是在一种“朋友式”的气氛下进行的。

经过寒暄之后，凯南说：“我们两国在朝鲜问题上似乎正走向一场很危险的冲突，这肯定不是美国在朝鲜行动的目的，我们也很难相信这是苏联的希望。”

老练的马立克立即明白他的这位“老朋友”干什么来了。

他反问道：“既然你们认识到这种危险，难道不能改变一下你们的政策吗？”

凯南说：“是中国人的行为导致了这种危险。”

马立克毫不含糊，立即反驳。他再次重申，是美军逼近鸭绿江才迫使中国军队出兵朝鲜的，并且历数了朝鲜战争爆发以来中国方面多次提出和平解决问题的诚意和美国方面无理拒绝的事实。他认为美国军队对台湾的干涉和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是美国人犯的最大的错误。

凯南对马立克的话一概不予反驳，他牢牢记着自己此行的目的。当他提出制止危险蔓延的唯一办法，恐怕就是战争双方指挥官坐下来谈判时，马立克眯着狡猾的眼睛说，苏联不是战争的任何一方。

凯南认为与这样一个典型的外交家不说实话怕是要永远这样绕下去了，于是他决定干脆说出来算了：“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在任何一个委员会或用其他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人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

马立克立即逼上去：“那么，必须讨论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中国台湾的地位和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

凯南表示，这些问题不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

会面就这样结束了。

令凯南又一次预料不到的是，几天以后，马立克主动邀请他，并且表示，苏联愿意看到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显然，马立克是请示了苏联政府才表这个态的。

几天以后，金日成走进北京毛泽东的书房。这是经由苏联人传达过来的信息所引起的具体的反应。毛泽东与金日成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毛泽东表示，如能再多歼灭美军的一些部队再谈，比现在可能会好一些；但是，如果能在谈判中涉及“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等问题，美国的谈判意图不宜拒绝。

六月二十三日，马立克在联合国新闻部举办的“和平的代价”广播节目中发表了著名的“马立克演说”。

联合国自开创以来，就成立了一个用于公共事务方面的广播节目，每个成员国都可以使用这个节目，但是，以前苏联人从没有使用过。当马立克要求给他安排演说时间时，联合国人员都感到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

美国人注意到马立克的演说使用的不是“苏联政府认为”，而是“苏联人民认为”这样的措辞方式：

> 全世界各国人民都认识到和平对人类具有最巨大的价值。
>
> 自从牺牲了千百万人类生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到现在还不满六年；而用这样高的代价得来的和平却又受到威胁了。

……

美国和依赖美国的其他国家对朝鲜的武装干涉就是这种政策的最生动的表现。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曾经一再提出和平解决朝鲜冲突的建议。战争之所以仍在朝鲜进行，完全是因为美国始终阻挠接受这些和平建议。

……

苏联将继续奋斗以巩固和平，制止另一次世界大战。苏联人民认为，维护和平事业是可能的，朝鲜的武装冲突——目前最尖锐的问题——也是能够解决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各方有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意愿。苏联人民认为，第一个步骤是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而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

我认为，为了确保朝鲜的和平，这个代价不算太高。

马立克的演说令美国人又喜又忧。喜的是事情终于有了眉目，忧的是不知道马立克所说的“苏联人民”是不是代表“苏联政府”。美国人这时突然发现，如果谈判时苏联人插进来，情况将不是很妙。有一点，美国人的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苏联人又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共党宣传”，“克里姆林宫的人是搞宣传的大师，宣传是他们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工具”。

马立克演说两天之后，中国《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马立克发表演说的新闻和题为《朝鲜战争的一年》的社论。社论的内容表明，这与其是中国政府对马立克的演说内容的表态，不如说是对美国的谈判信息的正式回应。社论说：

本月二十三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发表广播演说，再一次提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我们中国人民完全赞同这个建议。这是给予美国的又一次考验，看它是否接受以往的教训，是否愿意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的反侵略战争，其目的就在于求得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所以即在此后，中国人民仍然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并曾不止一次地表示支持其他国家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合理建议。

美国却依然幻想依靠它的武力来征服全部朝鲜，进而威胁我国东北，因此，使所有这些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努力归于失败。

毫无疑问，作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个步骤，马立克的提议是公平而又合理的。

同日，正在田纳西州参加一个航空研究中心落成典礼的杜鲁门在其演说中也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表明了正式的态度。他除了表示美国政府“愿意参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之外，针对美国国内的反对势力，杜鲁门对美国政府的立场进行了辩护：

抱有党派成见的人，力图把我们的外交政策说成是“姑息主义”，还给它加上“恐惧”或“胆怯”的按语。他们只指向一个目标，要使我们“单枪匹马地去干”，走上通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道路。把世界上的自由国家团结在维护和平的伟大、统一的运动中，这难道是恐惧政策吗？在朝鲜打击武装侵略，并把它击退，这难道是姑息政策吗？请看看这些批评家提出的另外的办法吧。他们是这样说的：冒一下风险吧，把冲突扩大到亚洲大陆去！冒一下风险吧，最多不过丧失我们在欧洲的盟国！冒一下风险吧，说不定苏联不愿意在远东作战！冒一下风险吧，也许他们不致挑起世界大战。

他们希望我们拿着顶上子弹的手枪，用美国的外交政策同俄国玩轮盘赌。

六月二十九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经过杜鲁门总统的批准，向美国远东最高司令官李奇微发出指示，并要求他一字不差地执行：奉总统指示，你应在三十日，星期六，东京时间上午八时，经广播电台将下述文件向朝鲜共军司令发出，同时向新闻界发布：

我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资格，奉命通知你们如下：

我得知你们可能希望举行一次会议，以讨论一个停止在朝鲜的敌对行为及一切武装行动的停战协议，并愿适当保证此停战协议的实施。

我在你们对本通知答复以后，将派出我方代表，并提出一个会议的日期，以便双方代表会晤。我提议这样的会议可在元山港一只丹麦伤兵船上举行。

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陆军中将

李奇微（签字）

七月一日，彭德怀、金日成发出复电：

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

你在本年六月三十日关于和平谈判的声明收到了。我们受权向你声明，我们同意为举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而和你的代表会晤。会晤地点，我们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地区。若你同意，我们的代表准备于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至十五日和你的代表会晤。

朝鲜人民军总司令 金日成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彭德怀

中国方面之所以不同意把谈判的地点放在丹麦的伤兵船上，是因为中国方面认为那只船是属于敌方的。至于地点定在开城，美方认为这样对他们不利，因为开城在中朝军队的控制之下，且美军距离这里最近的部队尚在十英里之外。但是为了不至于把刚有点眉目的事搞砸了，也就同意了。

双方经过多次电报来往讨论，最后达成如下协议：

一、谈判地点：选定在三八线上的开城。

二、正式谈判日期：从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开始。

三、为安排双方代表第一天会议细节，双方各派联络官三人，翻译二人，于七月八日上午九时在开城举行预备会议。

四、应联合国军方面的要求，中国军队一方负责保证对方联络官及随行人员进入其控制区后的行动安全。

五、双方代表团的车队前往开城赴会时，每辆车上均覆盖白旗一面，以便识别。

朝鲜问题的谈判渠道就这样最终打开了。

朝鲜战争交战双方在经过几番较量之后终于坐在了谈判桌边。

七月，朝鲜战场交战双方的兵力是：中朝方面，总兵力为一百一十一万，其中中国军队七十七余万、北朝鲜军队三十四余万，联合国军总兵力为六十九万，双方兵力对比为一比一点六，中朝方面占绝对优势；技术装备上，联合国军拥有各种火炮三千五百六十余门、坦克一千一百三十余辆、飞机一千六百七十余架、舰艇二百七十艘，中朝方面只有少量的坦克和飞机，火炮数量与质量均与联合国军相差甚远，联合国军在武器装备上占绝对优势。

交战双方的战线现状是，西线联合国军似乎有意放弃了临津江流域的沼泽地区，认为这块难以通行的土地没有什么军事上的价值，而在“铁三角”地区，联合国军却深深地向北插进来，一直与中国军队对峙在铁原。这条线基本上是汉城以北的一条向东北方向倾斜的斜线，对于三八线来说，双方都有“越界”的地区；但从纯军事的角度上看，中朝一方似乎有点“吃亏”。

就李奇微来说，他属于“不愿意谈判”的那一派。至今为止，他在朝鲜战场上已经度过六个多月的时间，他认为是他重新为第八集团军“树立了信心”，并且是他把战线向北推进到三八线以北，他不愿意就这样把他的战功拱手让出。即便已经得到国内关于谈判的指示之后，他依旧给参谋长联席会议打电报表示他的看法。他认为“停火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他“拒绝停火，除非是受命而为”。李奇微说他有“确凿证据”证明，对面的中国人“正在调兵遣将，准备决战”。

与此同时，毛泽东多次打电报给彭德怀，始终严肃地重复一个警告：特别警惕敌人可能发动的进攻！特别警惕美军可能发动的登陆作战！

无论怎样谈判，都改变不了毛泽东的一个著名的论点：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作为精明的军事家，毛泽东还明白，军事上的优势永远是谈判桌上的最好的筹码。

战后的许多史料表明，在彭德怀的桌子上，已经放有发动“第六次战役”的具体设想和计划了。就在谈判正式开始以后的八月，这个新战役已经准备完毕，彭德怀已经签发了发动战役的预备命令，政治动员令也同时签发了，战役开始时间是九月初。至于这次战役最终没有实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当然是与谈判有关，其次还有美军坚固的防御阵地的形成。

为保持军事优势，美军以最大的努力加强了对中国军队后方供应线的轰炸，以至于其轰炸的密集程度超过二战中的任何一个时间段。同时，持续不断的局部战斗即使在双方已经达成谈判协议时依旧在发生。战斗基本上是以争夺三八线以北铁原附近的有利地形而进行的，短暂而激烈，以致达到“寸土必争”的程度——对这个敏感地区的每一个小山头的占领，都会使谈判出现新的局面——战争与政治联系得如此紧密，在朝鲜战争开始谈判以后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这时候，朝鲜战争中还有一方，也就是南朝鲜政府，交战双方开始谈判的协定签订以后，这个几乎被遗忘的政府立即认为受到了极大的侮辱。李承晚多次表示他“誓死不与共产党谈判”，南朝鲜政府多次组织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喊出的口号是：“打到北方去！”

没有人理会这个政府。

战争在这个政府的土地上进行着，这个政府却在战争中并不具有实际意义。

就在彭德怀答复李奇微关于谈判建议声明的第二天，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日。志愿军政治部请彭德怀在纪念大会上作报告。彭德怀说：“我们党多灾多难，从什么地方说起呢？”彭德怀在他的报告中，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路线斗争的曲折和革命历史的艰难。所有参加那次纪念会的人都记住了彭德怀的两个重要的观点：一、没有

毛泽东，中国革命就不会胜利；二、朱德是我们党内最没有私心的人。从来不曾有人知道，也从来不曾有人理解到，彭德怀为什么在朝鲜战争进行到这样的时刻如此详尽地讲述出他心中的中国革命历史。

开城市区西北约两公里的高丽里广文洞，有个叫来凤庄的地方，被选定为朝鲜战争谈判的地点。这是一座富有家庭的宅院，房前有花坛，院中有古松；大门过去是三间正厅，除去屏风后可以成为一个面积不小的谈判室。宅院西面的平房，是中国代表团的住所，北朝鲜代表团住在南边的一所学校里。不远处，有一座白色的教堂，可以作为对方代表休息的地方。地点选定之后，开始打扫卫生，准备桌椅，整理道路，布置警卫，全场扫雷，粉刷墙壁，总之，彻夜忙乱。

检查准备情况的时候，突然发现，听说按照国际惯例，双方见面要交换证明代表资格的“全权证书”，中国方面根本没有准备，于是连夜派人去平壤让金日成签字，至于让彭德怀签字，已经没有时间了，好在联合国军一方后来并没在意。

一九五一年七月八日，朝鲜战争交战双方联络官第一次会晤。

联合国军方面的联络官是美国空军上校安德鲁·肯尼、美国陆军上校詹姆斯·穆来、南朝鲜中校李树荣、朝文翻译恩德伍德、中文翻译凯瑟·吴。

中朝方面的联络官是张春山、柴成文、金一波、毕季龙、都宥浩。

双方联络官向这里聚集的方式不大一样。联合国军方面的代表是乘直升机来的，开城附近为他们飞机的到来专门布置了一番，地面上书写出醒目的“WELCOME”的字样。

中朝方面的代表是乘坐汽车来的，先是分乘三辆吉普车，半路上一辆坏了，于是就挤上另外的一辆，没有走多远这辆又坏了。这次，临时拦了一辆运粮食的卡车，代表们坐在粮食口袋上，到达时已是满脸的灰尘。

经过双方联络官们的会晤安排，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朝鲜战争停战谈判正式开始。

联合国军方面的正式代表是：美国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伊中将，美国远东空军副司令劳伦斯·克雷奇少将，美国第八集团军副参谋长亨利·霍迪斯少将，美国巡洋舰分队司令阿雷·伯克少将和南朝鲜第一军团军团长白善烨少将。

中朝方面的正式代表是：北朝鲜人民军第二军团军团长南日将军，北朝鲜人民军前方司令部参谋长李相朝将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将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将军，北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参谋长张平山将军。

美国远东最高司令官李奇微在挑选谈判代表时费尽思量，他的标准首先是具有极强自制力的人，“要能忍受共产党人长达几个小时的谴责而不发脾气，又能在每天的会谈结束时给以中国人强辞回应”，甚至还要能够“一连坐上六个小时，既不眨眼，也不想抽空上厕所”。但是，被李奇微称为“尽职尽力、从不抱怨”的联合国军代表从一开始就感到了这将是一场极其艰难的谈判，原因是中国人实在是一群充满东方智慧的人。先是桌子上的小旗子，你摆上了一面，他们就立即摆上一面比你高大得多的，旗帜的大小和旗杆高低的比赛持续了好一阵子。然后就是椅子，共产党方面给联合国军代表准备的椅子至少比他们自己的矮一半，联合国军代表一坐，就好像陷入了地下找不到了。再有就是协议上规定的为了安全在“车上均覆盖白旗”，殊不知在东方人眼里出示白旗是来投降的意思，等联合国军明白了，白旗已经盖了

好几天，而且他们盖着白旗的照片早就登在所有共产党国家的报纸上了。

来凤庄，一个美丽的名字。虽然这座庭院里正在进行着关于战争的谈判，但是可以想见这座庭院原来的主人一定是懂得人间何为最美的人。因为在中国人古老的情感世界里，欢迎最尊贵的客人，被称为有凤来仪不亦乐乎。

来凤庄，这个美丽的名字注定要载入世界史册。

# 尾声 彩蝶纷飞的幻觉

朝鲜战争停战谈判进行的时候，躺在汶山附近军用帐篷中闲得发慌的西方记者们开始以赌博解闷，他们赌博的内容之一是：停战谈判需要多长时间？有人说弄不好就得一个月；立即有人愿意出重金赌另一个结果：谈判时间不会超过两周。

朝鲜战争停战谈判整整进行了两年。

在这两年中，没有发生大规模、大兵团的运动战。

在这两年中，在双方的防御线上，密集地部署着两百多万人的大军，构筑了世界战争史上最漫长的、最复杂的、最坚固的防御工事。联合国军的防线由部署严密的火炮阵地、坦克群以及步兵组成，数层阵地使其纵深达三百公里，每一层防线都构筑了永久性的工事和堑壕，每一层防线都制定了周密的空军支援预案，形成了一个火力强大的立体防御网络。这条防线被称为“一道不可逾越的死亡深渊”。而在中国军队的防线上，数十万官兵开始建设世界上最浩大的地下防御工程，其土石方总量能开凿数条苏伊士运河。沿着对峙线自西向东，数百公里的防线上，深埋在地下的永久式坑道和交通壕蛛网般四通八达，前沿的数十万中国官兵设施齐全地生活在地下，他们所布置的火力陷阱能令任何进攻的敌人立即遭到毁灭性打击。这些在地下枕戈待旦的中国官兵被称为“闭居洞中的龙”。

在这两年中，在双方的接触线上，无时无刻不发生着阵地对攻战。绝大多数战斗的起因仅仅是一个很小的山头的占有权，或者是一条弯曲的小路的通行权。这是比“摩擦战”要严酷得多的战斗，一个高不过数米的山包，往往持续战斗数周，投入兵力数团，阵地易手数十

次，伤亡官兵无数。其中一次最典型的阵地对攻战，发生在一个叫上甘岭的小村庄附近的几个山包上，双方投入兵力的密集、弹药消耗的数量之大，以及官兵伤亡的数字之巨，都是史无前例的。

在这两年中，朝鲜北部的空中，每日战机战斗飞行的频繁程度也堪称历史之最。联合国军的轰炸机和战斗机对朝鲜北方昼夜不停地进行了毁灭性的轰炸，美方称之为“空中绞杀战”。中国军队同时进行了规模空前的防空战斗，运输部队在最严酷的空中威胁中强行进行物资补充，其动员的人力规模可与世界史上任何一次伟大工程的修建相比。

在这两年中，交战双方在停战谈判的会场上，上演了世界战争史上最漫长、最艰难、最富戏剧性、最明争暗斗的心理较量。停战协定每一条款的达成、甚至每一个字的争论，都会带来整个世界瞬时的绝望或希望。繁如星河的谈判笔录和层出不穷的谈判花絮，连篇累牍地占据着世界报刊的新闻版面。

战俘的抗争，反战的游行，政治的微妙变化，战事的突然进展……

有一天传来消息：停战协定的签字就要举行。突然，战线中部规模很大的战事又起。李承晚说不要联合国军了，他要“单干”。结果中国军队发动了金城战役，专打要“单干”的南朝鲜军。南朝鲜军不但伤亡惨重，而且丢失了大片土地。新上任的联合国军司令马克·克拉克将军说：“让中国人教训一下韩国人吧！”

战争到底是什么?

真的到停战协定签字的那天了。

战后，在记录朝鲜战争的浩瀚文字中，曾有过几行文字不经意地写到了停战的那一天发生在前线的一件小事，因为在规模巨大的战争中这件事太小，所以连主人公的姓名也没能留下。前线，一名中国军队的小战士奉命往前沿阵地送一个命令。这张写着命令的字条被折好揣在他的上衣里。通往前沿的炮火不知为什么在今天变得异样的猛烈，小战士奔跑着，躲避着，不时地从这个弹坑跳到另一个弹坑。敌人射来的炮弹追着他，掀起的泥土几次把他埋起来。他不想死，尽管这条路上已经有那么多的中国士兵死去了，他只想尽快完成任务。他几次去摸他的前胸，那张命令还在。就要接近阵地的时候，小战士被炸倒了。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一只脚齐着脚腕断了，断脚就在不远的地方，还穿着胶鞋。小战士脸色苍白地躺了一会儿，开始往阵地上爬，他一只手用力，另一只手抱着自己的那只断脚，他想等爬到了自己的阵地脚就能接上了。小战士爬上阵地的时候已是黄昏，他看见天边有一轮很红很红的夕阳。昏迷前，他把那张命令从胸前掏了出来。

命令：今晚二十二时正式停战。届时不准射出一枪一炮。

指挥员拿着命令看了看表：二十时整。

离朝鲜战争正式停战仅仅还有两个小时。

指挥员把小战士抱起来，大声喊："来三个人把他背下去！不准让他死了！拿着他的这只脚！"

一位获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勋章的老文工团员，在战争结束后出版的一本名为《盛开的金达莱》的书中，回忆了这样一位小姑娘。文工团员晓燕是北京人，十六岁，脖子上总爱系一条红色的薄围巾。一九四九年北平和平解放时，刚上初中的她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参加志愿军的时候，全校师生都羡慕她，隆重地欢送了她。晓

燕是个漂亮的女孩子，眼睛大，很亮，歌唱得好，为了让她保护嗓子，上级专门发给她一条很厚的毛线围脖儿，可她一直舍不得围。她唱的那些歌唱英雄的歌都是自己写的。在坑道里一支二胡的吱呀呀的伴奏下，她一唱起来，官兵们就一脸温存地静静地听，忘了鼓掌，直到她唱完了，不知所措地看着大家时，这才掌声雷动。她唱的那首《歌唱英雄刘光子》，大家都说写得好唱得更好，就是刘光子一个人站起来说："好什么好？不好！"于是晓燕就找到刘光子同志征求修改意见，那些意见都记在她的日记本上。她的日记本像她人一样很精致，封面上有几个烫金的字：共青团手册。战斗的时候，她也很勇敢，和其他文工团员一起趴在前沿用英语向敌人喊话，劝美国兵过来投降。她的声音细细的，不知道美国兵们听到过没有。后来，她在一个朝鲜村庄里看见一位丈夫上前线自己就要临产的朝鲜大嫂，于是就去照顾她。她把自己那条舍不得围的厚围脖儿拆了，给大嫂织了一件毛衣。朝鲜乡亲很喜欢这个中国小姑娘，她就给朝鲜老乡们唱歌，唱的是朝鲜语的《春之歌》。这天，她正唱歌的时候，美军的飞机来了。朝鲜乡亲们慌乱地跑散，她一个人喊："别乱跑！进防空洞！"她一边喊，一边奔向开阔地，一边把她那条红色的薄围巾高高地举起来。美军的飞机开始向这团红色俯冲追击，机枪子弹和炸弹在她的身边爆炸，晓燕负伤了，她的身后是一条长长的血痕，最后，她被一颗炸弹炸倒，红色的薄围巾在爆炸的气浪中飞舞起来。

志愿军文工团员晓燕死的那天，是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字的前一天。

朝鲜战争停战协定正式签字的时间是：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时。

签署的文件是《朝鲜停战协定》和《关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

联合国军方面签字的是美国人威廉·哈里逊少将，中朝军队方面签字的是北朝鲜人民军南日大将。因为每份文件分别有中、朝、英三种文本，每种文本一式三份，所以签字的人要签名十八次。

根据停战协定中“签字以后十二小时正式生效”的条款，在签字后的十二个小时内，整个几百公里的战线上，空前猛烈的枪炮声撼天动地。曳光弹、照明弹、信号弹把整个朝鲜半岛的天空打得通红，宛如这里又开始了一场新的大规模的战役。——战争的双方都要在最后的十二小时内显示自己火力的强大，证明自己斗志的不屈。另外，把弹药消耗完省得往回搬运。

二十七日晚二十二时，战线突然沉寂下来，这是一种奇特的“突然”。

寂静了一下之后，前沿上双方官兵从战壕中探出头来，然后一起欢呼。

美军陆战一师士兵马丁·拉斯这时看见了夜空中悬挂的一轮明月，“它好像是一只中国灯笼”，他说。

几个中国士兵溜达到美军的阵地上，拿出几粒糖果和一块手绢要送给美军士兵做礼物，美军士兵说他们不要糖果和手绢。

美国人说，整个朝鲜战争他们损失了十四万两千零九十一人，其中三万三千六百二十九人死亡，十万三千二百八十四人负伤，五千七百一十八人被俘或失踪。

中国军队在朝鲜战争中的伤亡人数至今没有公开的记录。

彭德怀走上了还冒着硝烟的前沿阵地。几个小时前，这里还在战斗。一队担架抬着中国士兵的遗体走下来，彭德怀掀开每一个担架上

覆盖着的白布，渐渐地，他的眼睛里充满泪花。他哽咽地说：“就差几个小时，他们这么年轻……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掩埋好，立上个牌子……”走下阵地的时候，彭德怀突然命令吉普车停下来。他下车之后，在路边的泥土中，拣出一只满是弹洞的白色搪瓷水杯，水杯上红色的字是：献给最可爱的人。

彭德怀捧着这只水杯久久地不说话。

他不知道这只水杯的主人叫什么名字，但他一定是一名志愿军战士。很久以后，彭德怀喃喃地仿佛在问自己：“这个兵，牺牲了？还是负伤了？”

这时，北朝鲜所有的城市和集镇，都在反复广播着：

朝鲜人民军全体同志们：

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同志们：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了三年抵抗侵略、保卫和平的英勇战争，坚持了两年争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停战谈判，现在已经获得了朝鲜停战的光荣胜利，与联合国军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

停战协定的签订是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因而是有利于远东及世界和平的。它获得了朝中两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使全世界爱护和平的人民受到了莫大的鼓舞。

在停战协定开始生效之际，为了保证朝鲜停战的实现和不遭破坏并有利于政治会议的召开，以便进一步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起见，我们发布命令如下：

……

当晚，开城举行了庆祝晚会。

晚会上演的是两部中国古典爱情剧目：《西厢记》和《梁山伯与祝英台》。

有人说在前线演出这样的剧目不好，但是还是演了，官兵们看了还想看。当台上的祝英台因为心上人的死而也要死时，台下的官兵们齐声喊："不要死！不要死！参军去！参军去！"又有人不同意演祝英台为梁山伯"哭灵"的那一场，说总是哭，气氛太悲伤。彭德怀说："人死了，为什么不让哭？"

舞台上的祝英台最后没有参军而是选择了殉情。在现实永远无法企及的幻觉里，相爱的人化成了蝴蝶双双飞舞。

志愿军官兵看到这里既感动又惊异。

不知道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那些流着鲜血倒在朝鲜土地上的年轻士兵的身影，是否会如斑斓的彩蝶，留在不再经历战争的人们的记忆里。

有人邀请彭德怀跳舞，彭德怀说他不会，从来不会。

再来邀请彭德怀的是一位年龄很小的小姑娘，和晓燕一样有一双很大很亮的眼睛。彭德怀说："孩子，我拉着你，咱们走一圈吧！"

于是，一位憔悴的老将军拉着一位花一样的小姑娘的手，他们走了起来。他们走得很慢，从不曾如此动听的音乐缓缓地流淌在他们安然的脚步中。小姑娘抬起头去看彭德怀，彭德怀的脸上是令人敬畏的沧桑。

所有的人都哭了。

回顾朝鲜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说："在三年激战之后，资本主义世界最大工业强国的第一流军队被限制在他们原来发动侵略的地方，不仅不能越雷池一步，而且陷入日益不利的困境。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教训。它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

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1997年6月—1999年11月

广州——北京

2008年11月—2009年2月

重新修订于北京

# 修订版后记

五十多年前爆发的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参战国最多、死伤人数最多的一场战争。在那块“世界上最不适宜大兵团作战”的地区，武器装备极其悬殊的交战双方构筑了世界战争史上最复杂的工事，跨洋过海登陆朝鲜半岛的美军实施了将这块土地变成“世界上最没用的地方”的轰炸，而为保家卫国出兵朝鲜的上百万中国人民志愿军用生命进行了感天动地的殊死战斗。

三年后，战争停止在它爆发的地方。

我用了近四年时间写作《朝鲜战争》，并不仅仅是为了回顾。

如果仅从写作一部书的角度讲，《朝鲜战争》一年就可以写就，因为可参考的资料十分丰富，可采访的对象也比比皆是，而我仅用在收集核对史料和采访战争亲历者上的时间就超过了两年。那时我在广州工作，家门外是这座南方大都市中最繁华的商业街，令人眼花缭乱的生活景象穿梭往来，而我点灯熬油般地日日夜夜梳理着几十年前的这场战争，梳理着战争复杂多变的史实：交战双方每一天的作战决定、作战行动、作战路线；战场上一座山头两侧战斗人数是多少、武器是什么，坚守这座山头的志愿军排长叫什么，班长的家乡在哪里；战线上大兵团推进中，哪一支部队最先达成作战目的，令作战目的最终实现的至关重要的细节是什么；战后当事人对同一事件的回忆会有不同，各国史料对同一事件的记载也会不同，那些细微的出入究竟在哪里……整整两年后，采访和阅读笔记超过了一百二十万字，战场上的每一天都已烂熟于心。

但是，我仍未敢动笔。

我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写这部书？读者为什么要读这部书？

战争是有史以来人类除和平以外所面临的唯一另种生活形态。人类的和平景象更多地留在了音乐、诗歌和绘画中，而翻开古今中外浩如烟海的历史书籍，令人感慨万千的文字无不是在记述战争。

人类为什么要为战争留下如此浩瀚的记录？

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战争最直接的需要是生命。

一九九八年夏季里最炎热的一天，我见到了当年志愿军主力军主力师主力团团长范天恩。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三十日，在朝鲜半岛西部松骨峰战场上，在美军炸弹燃起的熊熊烈焰中，范天恩的团子弹耗尽，官兵们用带着弹孔的身体死死地拖住美军士兵，直至双方都被烧焦。战后，范天恩成为唯一被收入日文版的《朝鲜战争名人录》的中国团长。几十年过去

了，战争也许已被遗忘，年迈的范天恩靠着数不清的小药片维持着极度衰弱的生命，只有当他站起来时，那仍可称为高大的身躯才会令人遥想他当年是何等英猛。范天恩和他的士兵曾用血肉之躯经历过世界上最残酷的战斗，而今天，他已经没有力气再用语言复述所有触目惊心的战争场面了。范天恩说：一个原来讨饭的孩子，后来当了我的警卫员，在汉江南岸被美军飞机炸死了。我们用几块木板盖上埋了他。那么多士兵死了，来不及看一眼，部队就冲过去了。回国后，我给他家乡的政府写过信，想找到这孩子的家人，但没有任何回音。这么多年，我一直想，如果找到了他的家人，他们的生活我全包了。一个打过无数硬仗的指挥员，一个举世闻名的战斗英雄，暮年的时候忆及他所经历的战争，无法忘记的只有一名普通士兵。范天恩眼里含着混浊的老泪说："真正打起仗来，英雄是这些士兵。"

士兵，战争中最普通、最重要、最大数量的人，他们成为我写作《朝鲜战争》的唯一动因。

我动笔了。

那些在极其艰苦的战争条件下进行了举世无双的英勇战斗的志愿军战士，即使时光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他们依然值得我为他们动人的生命故事而歌而泣：他们曾穿着单衣埋伏在寒冷的盖马高原上，然后开始徒步追击美军的坦克；他们曾一波倒下第二波跨过尸体继续冲锋，哪怕战斗到仅剩一人；他们曾在大冰河边一个接一个用身体滚过雷区，为冲击的部队开路……每一个人都那么年轻，却牺牲得惊天动地，他们值得今天生活在和平与幸福中的所有中国人记住：记住我们这个民族曾有过如此优秀的儿女，记住我们这支军队曾有过如此不屈的精神。我们必须记住，因为他们与我们血脉相连，他们与我们走在同一个民族的历史里。

生命生生不息的创造，意味着人类千百年来的文明史，文明在战争与和平的交替中更新、断裂、再生、绵延，所以我们拥有了那么多今天读来依然令人慨叹不已、遐想不已、思索不已的历史书籍。

战争的历史值得阅读，是因为这种历史能够催生伟大与光荣。

朝鲜战争的历史，是上百万志愿军官兵用生命写就的，这样的历史令我在写每一个字的时候都心生敬重。我常常在写作中不由得搁笔长叹，想及今天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民族一旦面临危机的时候，年轻人能否像当年的志愿军官兵一样奋不顾身挺身而出？是否能像当年的志愿军官兵一样面对最惨烈的战斗英勇无畏？对于《朝鲜战争》的写作而言，生动地记述一场战争的历史很重要，深刻地记述战争中一个民族的精神历史更重要。因为前者是"昨天"的事情，而后者会在今天传承，并将影响到我们的明天。我力图让今天的读者在《朝鲜战争》中因为祖国、民族、理想、精神、信念、意志等等因素，与他们的前辈相识相知，重温一个人、一支军队、一个民族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的不屈的精神。还有那位令全世界瞩目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我曾反复阅读他后来身陷囹圄时写下的关于朝鲜战争的"交代材料"，这位为了新中国浴血奋战了一生的人，他所经历的是我们许多人根本没有勇气和力量承担的。这就是构成历史的不同寻常的内容，是历史事件中最值得书写的那部分内容。

《朝鲜战争》第一次出版的时候，名为《远东朝鲜战争》，现在重新修订后再版，采纳了众多读者的意见，更名为《朝鲜战争》。同时，在修订的过程中，采纳军史专家的意见，将书中所有的电文重新一一核对；并在海内外一部分读者的建议下，引用了此书出版后美军最新问世的战争史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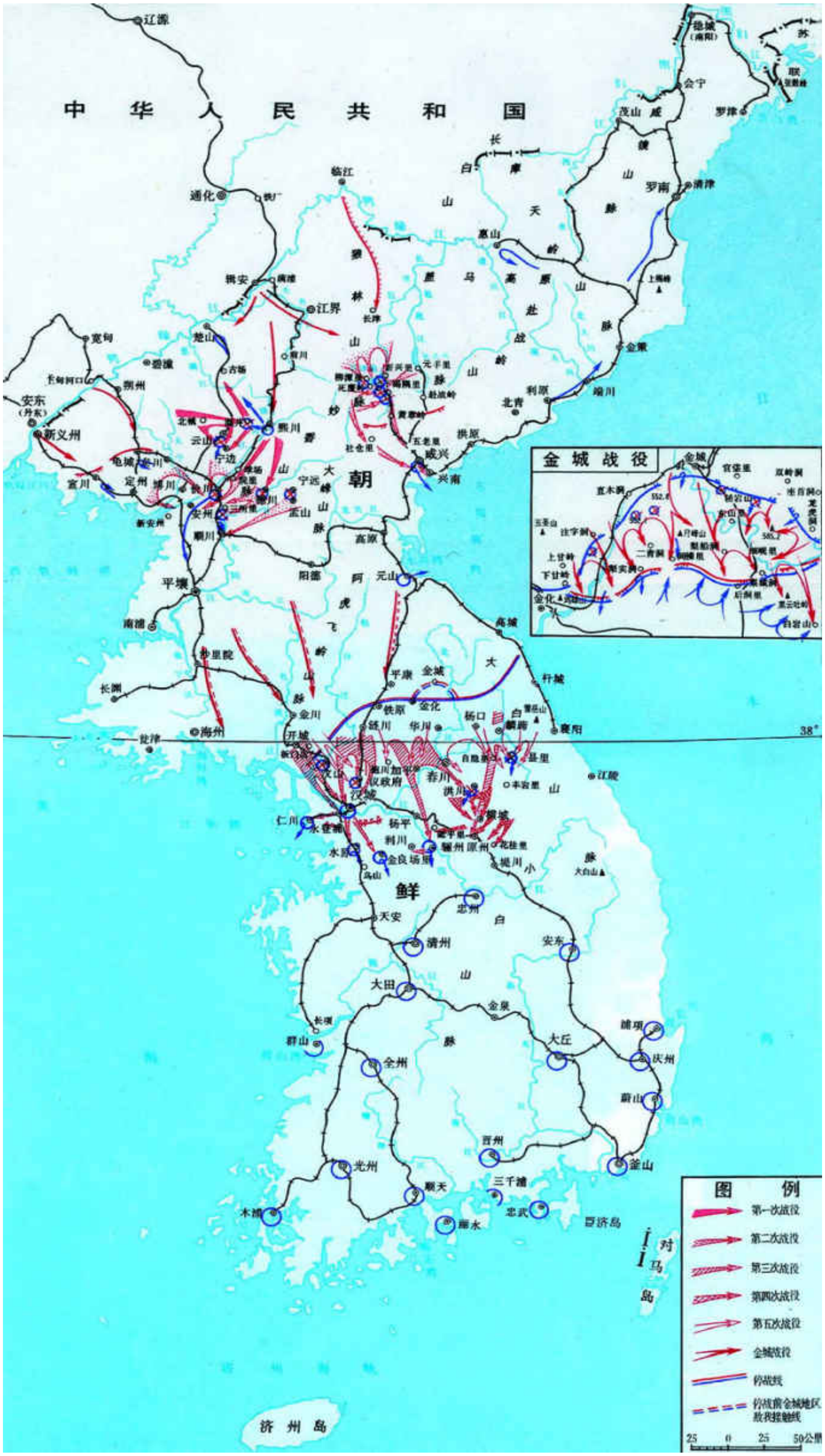
从第一次出版的一九九九年，到二〇〇九年，整整十年过去了。十年里，我在北京的公共汽车上看见过读这本书的年轻人，在飞往烟台的飞机上看见过阅读这本书的中年人，也遇到过向我要这本书的野战军政委和军兵种司令员。沈阳的一位下岗职工买不起书，把报纸上的连载剪下来贴成厚厚的一本，托人辗转带给我想换一本书留给他保存；黑龙江一位在朝鲜战争中双目失明的老兵，让他的弟弟把这本书给他读了三遍；江西的一位交警看完这本书后，写信指出了长达六十万字的书中哪个地方错了一个字。《沈阳日报》将这本书连载了整整半年，报纸的编辑打电话说，大年三十的晚上还有人站在报栏前看连载，而那一天沈阳大雪纷飞……

感谢所有的读者。

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祈望《朝鲜战争》是一本出版了许多年之后依然值得一读的书。

2009.2.20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
朝
鲜
金城战役
图 例
第一次战役
第二次战役
第三次战役
第四次战役
第五次战役
金城战役
停战线
停战前金城地区敌我接触线
25 0 25 50公里
辽源
通化
临江
江界
楚山
宽甸
安东（丹东）
新义州
熙川
云山
宁边
博川
安州
顺川
德川
宁远
孟山
长津
咸兴
兴南
北青
利原
端川
金策
惠山
会宁
清津
罗南
罗津
茂山
元山
阳德
高原
平壤
南浦
沙里院
海州
长渊
瓮津
开城
金川
平康
铁原
金化
华川
杨口
麟蹄
襄阳
高城
杆城
江陵
春川
洪川
横城
原州
堤川
汉城
仁川
水原
利川
杨平
骊州
乌山
天安
清州
忠州
安东
大田
金泉
大丘
浦项
庆州
蔚山
釜山
群山
长项
全州
晋州
光州
顺天
木浦
丽水
三千浦
忠武
巨济岛
对马岛
济州岛
长白山
狼林山
赴战岭
妙香山
大白山
38°